



中國奴隸制 揭密

作者：關敏

guan514@sina.com

作者：關敏

目 錄

序：自由與奴隸——人類社會 2 極形態

第一章 中國恒久奴隸制的真相

第1节 殷商奴隸制邪教文化

第2节 西周的宗法奴隸制

第3节 戰國秦漢的奴隸制

第4节 儒家王莽的極權奴隸制

第5节 三國到隋唐五代的奴隸制

第6节 宋代的奴隸制

第7节 遼、金、元的奴隸制

第8节 明清的奴隸制

第二章 中國奴隸制的特點

第9节 皇（國）家所有制

第10节 把人民關進“籠子”的制民術

第11节 橫徵暴斂的賦稅制度

第12节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下的全民皆奴

第三章 心奴是怎樣煉成的

第13节 中國一直無民主

第14节 熱愛獨裁的諸子百家

第15节 鄙視人民的儒家

第16节 吃人的奴隸孝道

- 第17节 儒家扼殺人權
- 第18节 墨家不是民主派
- 第19节 政教合一的愚民術
- 第20节 思想迫害、文字獄
- 第21节 真理壟斷和教育專制
- 第22节 中國人思維方式的嬰兒化特點
- 第23节 中國根本沒有科學和哲學
- 第24节 子虛烏有的“四大發明”
- 第25节 黑暗無比愚昧無比的國度
- 第26节 中國不是文明古國

第四章 專制主義

- 第27节 專制的含義
- 第28节 專制預設的前提
- 第29节 專制主義的宇宙觀
- 第30节 專制與民主的起源
- 第31节 東方專制主義
- 第32节 中國專制主義的特點
- 第33节 中國專制主義全球第一

第五章 專制邪教的總特徵

- 第34节 等級特權
- 第35节 恐怖主義或槍桿子主義
- 第36节 拜人的邪教

第37节 謊言欺騙

第38节 腐敗混亂 好大喜功

第39节 專制政治是徹頭徹尾地犯罪

第六章 專制主義的制度

第40节 任命制

第41节 終身制和世襲制

第42节 集權制

第43节 宗法分封制、契約分封制與郡縣制

第七章 專制奴役之罪惡

第44节 中國殺人史

第45节 中西戰爭之比較

第46节 中國淫穢史

第47节 儒教對婦女的壓迫

第48节 中國吃人史

第49节 口腔癖嬰兒文化

第八章 專制奴役之根源

第50节 龍就是魔鬼

第51节 魔鬼文化的特點

第52节 道教批判

第53节 佛教批判

第54节 回教批判

第九章 儒奴教是民主的絆腳石

- 第55节 中體西用的提出
- 第56节 康有為尊孔
- 第57节 新民說
- 第58节 袁世凱尊孔復辟
- 第59节 新文化運動 陳獨秀的轉折
- 第60节 孫中山的等級獨裁論
- 第61节 中國人在人權、民主上的誤區
- 第62节 尊孔復辟今又來
- 第63节 儒學還能復興嗎？
- 第64节 反全盤西化批判

第十章 民族主義批判

- 第65节 民族主義的涵義及評論
- 第66节 種族歧視——華夏中心論
- 第67节 專制文化歧視自由文化
- 第68节 義和團——儒教恐怖活動
- 第69节 阿 Q 政府
- 第70节 日本的基督教
- 第71节 中日兩國近代化的比較
- 第72节 超越愛國主義
- 第73节 仇美的荒唐

第十一章 集體主義批判

- 第74节 體主義的生活習慣批判

第75节 集體主義反自然

第76节 專制的起點是集體主義

第77节 集體主義輕視人命

第十二章 赤禍初起

第78节 列寧禍首

第79节 普列漢諾夫評“十月政變”

第80节 “十月政變”的後果

第81节 史達林罪魁

第82节 蘇聯在二戰中醜相

第十三章 赤禍東延

第83节 俄羅斯禍中華

第84节 蘇共生下中共

第85节 反智主義的興起

第86节 恐怖的中華蘇維埃

第87节 蘇俄侵華 中共保衛蘇聯

第88节 勾結日本 屠殺真抗日

第十四章 延安整風——腥中國的預演

第89节 個人崇拜的興起

第90节 整風的目的及其非法性

第91节 “群眾運動”的思想統制模式

第92节 黨文化擊垮自由民主文化

第93节 賊喊捉賊瘋狂迫害

第94节 輿論控制和保密制度的建立

第95节 神化毛澤東

第十五章 赤禍滔天

第96节 為奪權而賣國

第97节 荒唐的抗美援朝

第98节 大殺天下

第99节 思想改造運動

第100节 批胡風

第101节 批劉少奇罵梁漱溟

第102节 打倒高崗饒漱石

第103节 大肅反

第十六章 慘絕人寰的毛氏奴隸制

第104节 統購大剝削

第105节 災難性合作化

第106节 大躍進來大煉鋼

第107节 瘋狂滅麻雀

第108节 深翻土地太荒唐

第109节 王任重炮制“天下第一田”

第110节 廣西——衛星上天，天良傷盡

第111节 糧食衛星與糧食政策

第112节 人民公社窮過渡 大辦食堂招大禍

第113节 四川餓死 1200 萬

第114节 吳芝圃放出“信陽事件”

第115节 湖南——人給豬戴孝

第116节 安徽——餓死 620 萬

第117节 陝甘寧晉魯貴等地——人間活地獄

第118节 饑民外逃路斷 官僚花天酒地

第119节 “三年自然災害”根本不存在

第120节 毛餓死了 1 億 1200 萬人

第十七章 毛共爭當世界霸主

第121节 維護史達林 鼓吹個人崇拜

第122节 反“右派” 整黨外

第123节 1957 年的學校民主運動

第124节 反“右傾” 整黨內

第125节 毛澤東暫時忍讓

第126节 打擊“翻案風”

第127节 特大文字獄

第128节 批“合二而一” 批人性論

第129节 打造原子彈 統一全人類

第130节 打擊蘇聯的九評

第131节 拉攏洋人來捧場

第十八章 空前絕後的文革暴政

第132节 四清運動

第133节 學雷鋒運動

第134节 文革爆發

第135节 文革五十天

第136节 橫掃一切的紅色恐怖

第137节 武鬥

第138节 廣西人吃人

第139节 打倒劉少奇

第140节 清理階級隊伍

第141节 “內人黨”事件

第142节 “一打三反”運動

第143节 慘絕人寰的“沙甸事件”

第144节 割喉與生摘犯人器官

第145节 林彪之死

第十九章 慘無人道的城鄉隔離制度

第146节 政府壓迫農民

第147节 對農民的恐怖統治

第148节 機構臃腫敲骨吸髓

第149节 牛馬不如的中國農民

第150节 吃人不吐骨頭的社會

序：自由與奴役——人類社會制度 2 極形態

馬克思提出過古代（即奴隸）的、封建、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制度的說法，他說東方一直是亞細亞社會。後來史達林對馬恩進行歸納得出原始社會、奴隸社

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的 5 種社會說，人類社會就按這個秩序發展著，共產主義是人類的最高階段。人類社會經歷 5 種制度的說法肯定是不符合歷史真相的，是錯的。

1· 首先劃分五種社會的標準是什麼？

用生產力如工具或人均收入來衡量，怎麼能計算清楚不同時代的生產力指標？

用生產關係如看生產資料在誰手裡來衡量，根據這個標準，譬如說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土地都為少數人控制著；為什麼有農奴和奴隸的區分呢？

奴隸無非是沒有一點自主權，在主人的指揮下活動。農奴是有點自主權的生產，他們對封建領主實行承包制的生產，但受領主直接領導與控制。農民的自主權更大一些，中國古代的農民是一種農奴身份，政府不允許農民自由遷徙。唐代的農民要向國家交“租庸調”，因土地是國家均給他們的；他們自由度似乎大一些，但總是“為他人做嫁衣裳”，最後是“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可見，奴隸、農奴與農民的命運都是悲慘的，他們的區別只是管理制度的自由度大小的不同而造成。

2· 用自由來劃分人類社會

既然管理制度的自由度大小的是區分的標準，那就乾脆用自由這個指標來劃分人類的政治經濟制度。凡是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保障了人的基本自由權的，就叫自由社會；凡是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剝奪人的基本自由權的，就叫奴隸社會。所以，人類社會制度的性質只有 2 種：自由(資本主義)制度與奴役(非資本主義)制度。封建制度不過是這 2 種類型的制度的中間狀態，它或者向自由制度或向奴隸制度的方向轉化。

3· 奴隸制度的種類

亞里斯多德說，自由有四項特徵：獨立的身份、個人的不可侵犯、經濟活動自由和不受限制的行動權利；奴隸就是這四項屬性的缺失。簡言之，奴隸被剝奪了基本自由權：沒有思想自由、沒有人身自由、沒有經濟自由。奴隸主將奴隸是當牲畜、工具、寵物看待及使用。

亞里斯多德認為：“凡是這種只有體力的卑下的這一級就自然地應該成為奴隸，……能夠被統治于一位主人對於他實際上較為合適而且有益，所以，凡自己缺乏理智，僅能感應別人的理智的，就可以成為而且確實成為別人的財產(用品)，這種人就天然是奴隸。”奴隸由於其“只有體力”、“缺乏理智”。若其被統治于一位主人，對於他較為合適而且有益。

盧梭認為“強力造出了最初的奴隸”。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說：“所謂奴隸制，就是建立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特有的支配權，使前者成為後者的生命與財產的絕對主人。……奴役的方式有兩種：對物的奴役和對人的奴役。對物的奴役就是使奴隸依附于土地。塔西佗所說的日爾曼的奴隸就屬於這一類。這種奴隸並不在主人的家中幹活，他們向主人進貢一定數量的穀物、牲畜和布匹。他們的奴隸制的目的僅此而已。……最混亂的奴役制則是同時實行對物和對人的奴役制。拉婁弟夢的伊洛底就實行這種奴役制。他們要承擔戶外的一切勞動，又要在主人家裡遭受各種凌辱。”

奴隸主有低級奴隸主、中級奴隸主、高級奴隸主。低級奴隸主直接以武力暴打、不給飯吃、不許住屋為控制手段，中級奴隸主以武力暴壓、限制言論自由(即思想自由)為控制手段，高級奴隸主以意識形態的灌輸實現奴隸行為自願化為基礎、兼以暴力鎮壓為後盾。

奴隸制度有很多亞類。恩格斯指出：“在亞細亞的古代和古典時代，階級壓迫的

主要形式是奴隸制，與其說群眾被剝削了土地，還不如說他們的人身被佔有”。東方國家的所有制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為國家所有。貴族、神廟、功臣所得到的土地，帶有王“賜”的性質。東方奴隸制國家基本沒邁出完全的土地私有制這一步。為了便於統治廣闊的國土，專制君主把土地連同土地上的臣民一齊分封給貴族、神廟、功臣。這也就形成“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古漢語裡，“臣”字本意就是奴隸。分封制最為典型的西周，層層分封形成的等級君主制，實際也是等級奴隸制和宗法的奴隸制。

古埃及的奴隸制是中央集權的官僚奴隸制，農民被固定在土地上，一切行動聽官僚和最高領袖法老的指揮，所以才有金字塔之類的工程。秦皇的制度與古埃及的官僚奴隸制相似，所以，修了長城；與古埃及的奴隸制不同者，多了點土地買賣，但買去賣來，土地仍然屬於皇帝所有。東方專制王權的高高在上，使東方奴隸大多數情況下是以國家奴隸的身份存在。埃及的奴隸制度與蘇聯制度類似，蘇聯制度比古埃及的奴隸制度多了個“科學”計畫而已！

古希臘法律明文規定：不准奴隸主隨意殺害甚至虐待奴隸的，如果奴隸受到奴隸主虐待和生命威脅，他可以跑到神廟去請求法律援助，在這種情況下，奴隸主甚至不得進入神廟加以干涉。奴隸可以申訴，如果奴隸主認罪，奴隸可獲得財產和自由。顧准說：古希臘整個雅典城邦因為政務繁忙，常任吏員不可缺少，這些吏員就由國家奴隸充當。這些奴隸每人每天領取的“給養”相當於出席公民大會或陪審法庭的公民所領的津貼，也可以自行覓取住房等……古希臘**刑罰施行**原則是：對奴隸處罰肉體，對自由民主要是處罰財產或者剝奪權利。希臘的奴隸除了極個別的例外，註定終身為奴。而羅馬有奴隸解放制度。這是一種或用存下的錢贖回自由，或在長年辛勞之後，象退修金一樣的被授予自由的制度。

羅馬的奴隸制與那些誇張的歷史小說描寫不完全相同。在古代的羅馬，強迫奴隸角鬥是不得人心，通常要受到譴責的，主要是在幾個暴君當政時期比較盛行，而且較近的考證表明，大多數角鬥士是職業從事這個行當的自由人，是很受人尊重而且收入豐厚的一種職業，類似於現在的拳擊、摔角明星，而且大多數情況下，角鬥是以點到為止的方式結束的，並不一定要拼出死活。羅馬法承認奴隸為有智慧的自然入，與牛馬等畢竟不同。所以羅馬將關於奴隸的規定置於人法而不是物法中。奴隸的地位具體表現在：帝國時代：禁止不經長官許可而把奴隸送去同野獸搏鬥做為懲罰；病老奴隸，經主人遺棄後，成為自由人；禁止奴隸主不經地方長官判決而處死哪怕是犯罪的奴隸；還禁止在沒有犯罪事實根據的條件下對奴隸刑訊逼供，禁止私人監禁奴隸，禁止將男女奴隸出售做角鬥表演；後來的憲令又規定，毫無理由地殺害自己奴隸的人，與殺害他人奴隸一樣，應受同樣懲罰。制止主人對奴隸過分嚴酷，如主人過分嚴酷地對待奴隸，“使其受到虐待，饑餓和不可忍受的侮辱”，奴隸有正當理由直接向長官申告，請求地方長官援助，地方長官不應拒絕。他可強制主人出賣其奴隸。查士丁尼法典明令禁止在沒有法律上承認的原因時，用暴力對待自己的奴隸或過分虐待自己的奴隸。帝政末期，奴隸還可直接提起“自由身份之訴”，即主張自己為自由人之訴。

美國獨立後到南北戰爭前也有奴隸制，但奴隸制不是民主本身帶來的，而是在民主制度建立前就存在。其實，早期的美洲大陸，不僅有黑奴，甚至遠在黑奴之前還有白奴。把美國早期的這種強制勞動力制度稱為奴隸制是極為不妥的，應該稱為“農奴制”才是準確的。因為美國奴隸即農奴只是被限制了人身自由，而生命權基本還是得到保障的。對奴隸制的揭露《湯姆叔叔的小屋》成為美國南北戰爭的導火線。該書描述了：美國的奴隸制在買賣黑奴，妻離子散時是殘酷和不

人道的，但整個奴隸制並不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黑暗，至少來說，黑奴的物質生活是過得去的，其主食是玉米和豬肉；書中的大多數奴隸主是仁慈的，比中國的許多企業的管理人員要仁慈多少倍，更不要說那些山西的窯主了。書中描述了幾個奴隸主，除了湯姆最後遇到的一個以外比較殘酷，其餘幾個均是比較仁慈的。……留學、移民到美國的人往往有一個感覺，即他們更喜歡白人老闆，因為他們往往更仁慈、寬厚，而不喜歡亞裔老闆……今天的山西的那些煤窯、磚窯老闆，在人類歷史上都是少有的，不管是奴隸社會的奴隸主、封建社會的地主，還是資本主義的資本家，都不能和他們相比；在夏衍的《包身工》中，那些“廉價人力資源”也不是被綁架來的……

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在絕大多數時候，都存在奴隸制，而且比美國的奴隸制要黑暗得多、血腥得多。比如說，俄國，過去就一直實行的大規模的農奴制，而且被奴役的都是自己本民族的同胞，境遇比之美國的黑奴要悲慘得多。共產蘇聯建立之後，又把這種農奴制通過共產政權的專制統治變相為另一種奴工制。赫魯雪夫的兒子謝爾蓋在為其父所寫的傳記中有這樣一段話：“從我的學生時代起，我就一直努力探索，想知道共產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樣子，但卻一直茫然無獲……我一直想請老爸給點啟示，弄清共產主義的性質，但直到現在也沒能得到一點明白的回答。我懂得了，連他本人對這個問題也是不太清楚的”。事實上，共產主義是奴隸主義的最高形態，蘇聯所奉行的社會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最狡詐、最貪婪、最毒辣的特權奴隸制度。

4· 奴隸制是信仰邪教的產物

2007 年上半年媒體大量披露了山西黑磚窯案件：被拐騙被脅迫的工人們淪落為奴隸——沒有自由、沒有報酬、沒有尊嚴、沒有居所、甚至沒有姓名的“黑

人”——絕不比牲畜優越多少。還有許多從各省騙抓來的民工和穿著校服的孩子被推進地獄般的磚窯、煤窯；女孩則淪為窯妓，50 塊錢就可以嫖一次。400 個山西奴工案的大部分被害人不滿 14 周歲，最小的只有 8 歲；每天被強迫勞動長達 18~20 小時，伙食極差，磚砸、燙傷是“家常便飯”；他們被非法拘禁長達數年，有人被毆打致死，有 8 歲的童工被活埋以及民工被攪拌機攪死等罪行。可以說，一個磚窯廠就是一個微型的奴隸社會，比古希臘的奴隸制殘酷幾萬倍！21 世紀，中國山西被拐賣的奴工根本沒有生命權！“黑磚窯”事件的主角王兵兵之父、曹生村原黨支部書記王東記曾是縣人大代表。據《第一財經日報》報導，洪洞縣地質礦產局廣勝寺礦管所、洪洞縣環境保護局、廣勝寺派出所過去兩年給黑磚窯發出了非政府公文的收條。這些部門官員勒索老闆，做無本生意。廣勝寺礦管所勒索了 2000 元罰款，廣勝寺派出所民警張安喜勒索了 11000 元。不僅地方政府，而且當地百姓也熟視無睹。為什麼？因為奴工基本上是外地人，對他們的奴役沒有給本地人帶來直接的損害，而且還有經濟發展後的某種收益。在中國村莊文化中，親內仇外是根深蒂固的：對外地人的殘酷似乎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官方披露，僅山西一省，就有 2/3 的磚窯非法經營，涉及的工人達 5.3 萬人，有 1 千多人被拖欠工資達 72 萬元。醜聞爆出後，300 多家磚窯已關閉，還有 350 多家正接受調查。中國不僅沒因為黑磚窯事件的新聞而舉國憤慨，媒體反而受到了審查，而 400 名父親上了政府的黑名單，無法離開居住地去尋找自己的孩子。政府每天的日常工作就是禁止人民保護自己和家人，以此為“和諧社會”粉飾太平。全國有一千多所受到貪官保護的黑磚窯和黑煤窯。

民間奴工全國各地都有。2008 年 4 月，深圳東莞爆出了比山西黑窯奴還可怕的來自四川涼山的奴隸童工之黑幕。數百名普遍只有 13 歲到 15 歲的童工，在

勞工黑市上任人盤剝，每小時不到三元的工資，每個月超過300小時的工作時間，而且無需休 假福利勞保。在陌生的土地上，他們常被打罵、被強姦，幾天才能吃一頓飽飯。他們日復一日從事繁重的工作，一些孩子想要逃跑，但前路已被封死，工頭們用死亡進行威脅，告誡他們逃跑就要付出代價。

中國一直存在官奴。勞動教養，實際上就是讓那些敢於和政府搗蛋的傢伙當階段性的奴隸，強制從事無償勞動。中國大規模的非法的收容審查制度和未經正式法律審判的勞改制度，至少就曾經製造出了數以百萬計的奴隸出來。此外，官方還要求農民充當季節性奴隸。1991年12月7日，國務院頒佈了一個名叫《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管理條例》的行政法規，以行政立法的形式，肯定了地方政府階段性、季節性使用奴隸的權力。1998年10月14日，15屆3中全會議通過決議要求：“加快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的立法。”其意圖是用法律進一步明確政府向農民派發徭役的權力。徭役是奴隸制的尾巴，服徭役就是季節性地當奴隸。

奴隸制不是來源於法律規定，而是人們心靈的產物；它來自於“弱肉強食、稱王稱霸的不平等心理結構。君不見：我國的法律表面上是不允許奴隸制的，為什麼它能存在？顯然，它來自於我們被傳統薰染的那個意識形態。譬如說：儒家的經典書籍裡面就有一個奴隸主或奴隸的意識形態在裡面。詩經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就是說一切都是王的，王可以隨意地支配“土”和“臣”，這就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奴隸主意識！還有那個“打江山、坐江山”的理論，就是把“土”和“臣”當作被俘獲的“鹿”，這也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奴隸主意識！人在這種意識形態支配下，必然採取是奴隸制度！雖然名稱可以叫一些無比美好的名詞，但其奴役的實質是不會改變的，而且奴役得更殘酷、更狡詐。

本書作者正受迫害，贊助作者的方法：

<http://www.mjren.com/dispbbs.php?boardid=10&id=2067&page=1>

第一章 中國恒久奴隸制的真相

第 1 節 殷商的奴隸制邪教文化

1· 巫教與宗教的區別

在人類文化的早期處於巫術時代，人們普遍認為世界是可以按照人的意願改變的。所謂巫術，就是通過一定的儀式和符咒，企圖影響和改變外部世界的走向和進程，使之變得更加符合人們願望的實踐過程。所有處於蒙昧狀態的人，都無一例外地相信人類具有超自然的能力，只要通過特定的儀式和符咒，就能使晴天下雨，使萎靡的莊稼精神抖擻，使難產的女人轉危為安。印度諺語說：宇宙聽從天神的支配，天神聽從符咒的支配，符咒聽從巫師的支配，所以，巫師是我們的主宰。這種諺語體現了早期人類在掌握自己命運上的無知的自信。

依據考古證據可以推定，西元前三千年中期，巫術已成為人們的普遍信仰。那時人們心目中的巫，是人、也是神。巫術活動的目的，是事神以致福。能傳達神意的是巫，是神在人間的代言者，所以，巫不僅為氏族部落的人們所尊敬，並且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往往為他們的首領。黃帝、蚩尤，都是把巫術練到頂級的巫師。在黃帝蚩尤大戰中，蚩尤作法請神下雨，黃帝則驅動旱神天女止雨。蚩尤鬥法失敗，於是被殺。這是典型的巫師鬥法！“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這裡巫是“智聖聰明”的人。

張光直考證道：巫字金文作（齊巫薑簋），與癸（父癸鼎）相同。《說文》釋癸為“冬時水土平，可揆度也……”，則癸跟測量有關。巫為手持“工”即矩的人，矩可以用來畫方圓，測天量地，是辨方正位的“表”、“午”或“臬”。兩側之人圍繞“工”轉，故為“巫”。巫是知天知地又能通天通地的專家。他有時手舞足蹈，口中嗚嗚有詞，自稱為“吾”，相當於後世皇帝自稱為“朕”；數字“五”也許與“巫”有關，表示一個中心，四個基本方向。《史記·日者列傳》：“今夫蔔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于仁義，分策定卦，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

從巫術發展到宗教，意味著人類認識的巨大改變。宗教認為，世界的存在和運行完全不受人類的影響，人只能謙卑地承認自己需要依賴其中神秘的、看不見的權力和意志，懇求他們的憐憫和關照。後來發展起來的科學，繼承了宗教中關於世界的存在與運行不受人的影響的觀念，拋棄了對於世界的人格特徵的神秘理解，也拋棄了通過懇求得到憐憫與照顧的思想。總之，宗教和科學都認識到了人的有限性，都懂得了謙卑和誠實。而巫術卻一直不承認人的有限性，總是期望用一些奇怪的符咒和儀式改變世界的進程，常常顯得無知而又自負。

古中國人無論是祭天時的虔誠還是祭祖時的忠肅，它們都是古代精神生活的情緒化特徵服從於政治和倫理意義的結果，跟真正意義上的宗教體驗有本質的不同。著名宗教哲學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認為宗教體驗有四個特徵：①不可言傳(ineffability)；②一種能直接深入散漫智力無法企及的深刻洞見的神秘感覺(noeticquality)；③暫時性(transiency)；④個體暫時失去自我意識(passivity)。祭天、祭祖禮的情緒化特徵都不符合宗教特徵。古人用敬、誠、肅等字眼形容行祭禮時的態度和心情，但並未認為它是神秘而不可言傳的；忠敬

誠肅等感覺配合禮典是為了推行道德教化，並非為了在這些情感觸動時體驗平常悟不到的真理（宗教體驗所指的往往是神的聰明、正直和理性），至於宗教體驗的暫時性更不符合周代祭禮施行時的情況——忠敬誠肅並不是一閃即逝的，而是無時無刻不被強調，從某種意義上說，實施祭禮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強調這些美德。因此，一些學者將祭禮判斷為宗教的重要依據之一就是認為祭祀時的莊重、虔敬是“宗教體驗”，這是不確切的。

在近代以來的文化反思中，中國人和外國漢學家反復強調：中國沒有宗教和科學。那麼中國人如何理解世界呢？中國人依然用巫術眼光理解世界。古代文獻中“人定勝天”的偉大氣魄，其實就是巫術信念在文人文化中的體現。它是巫師們用以表達改變世界的願望的著名符咒。在人類漸漸擺脫巫術文化的消極影響、一步一步走向宗教和科學的時候，中華後裔卻執迷不悟地反復念叨著這樣的符咒，企圖借助符咒的力量征服世界、奴役世界。

由巫術時代遺留下來的這種奇怪的脾氣，在 20 世紀後半期發作得最厲害。那些以政治口號的名義出現的符咒也不斷有所創新。諸如“重新安排河山”、“改天換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叫高山低頭，令河水讓路”、“圍湖造田，向湖泊要地要糧”、“天上沒有玉皇，地下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嶺開路，我來了！”所有這些，都是當代中國人所發明的符咒。幾十年時間過去了，歷史已經證明，這些符咒以及與這些符咒相配合的儀式（政治運動），只給大自然帶來了破壞，給自己帶來了折騰和嘲弄。上海交通大學教授陳敏豪先生說，伴隨著這些符咒和儀式而產生的偉大壯舉，“把我們本來就飽經憂患、身患疾病的國土、山河，搞得傷痕累累，元氣大傷，生態免疫力每況愈下，災害頻頻，週期越來越短，損失越來越慘重，不斷抵消著社會經濟

發展的成果，損耗我們的國力和元氣。”使得我們本來就稀薄的宗教意識和科學意識，受到慘重的抵制和損傷。

2·殘暴的巫王政治

顓頊時代的“絕地天通”，是第一次原始宗教改革。顓頊命重、黎分理天、地與神、民之事，打破了古人登天的幻想，從中把通天的權利和巫術手段變成了僅限於個別專業巫師的事業，意味著神職的專業化。張光直根據《國語》中“絕地天通”的故事，認為薩滿(是女真語，指巫師、巫術)巫教在中國國家起源中佔有基礎性地位。他說：“它為我們認識巫覡文化在古代中國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提供了關鍵的啟示。……古代，任何人都可借助巫的幫助與天相通，自天地交通斷絕之後，只有控制著溝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統治的知識，即權力。於是，巫便成了每個宮廷中必不可少的成員。

研究古代中國的學者都認為：帝王就是眾巫的首領。三代王朝創立者的所有行為都帶有巫術和超自然的色彩。大禹治水的時候有一套奇怪的步伐，這套“淩波微步”被後來的道士們奉為“萬術之根源，玄機之要旨”。張光直為薩滿巫教理論提供了論據：“如夏禹有所謂‘禹步’，是後代巫師特有的步態。……甲骨卜辭表明：商王的確是巫的首領。”商湯為了求雨，要點火自焚，有人說這是裝樣子，但如果不是大家公認的巫王，他即便想作秀也沒機會。

許多研究者稱商周時期的王權合法性觀念是“君權神授”，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看法。“君權神授”是歐洲政治史上的一個概念，君主權力是否為神所認可，解釋權在教會而不在君主手中，這種“神授”也不須以各種神秘主義手段來驗證。

在殷商時代，認識神意必須借助巫術手段，而行巫必須借助法器、採用一定

的儀式、並模擬出相應的場景。法器、儀式和巫術知識成為瞭解神意的必備條件，王就是通過壟斷各種行巫條件——青銅器、玉器、天室、甲骨、儀式、樂舞、及卜辭的最終解釋權，贏得巫教大教主的地位。張光直認為：中國的青銅器主要是為政治權力發明製造的，它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祭祀中巫師溝通天地的法器，而青銅器上面的動物紋飾主要是為了協助巫覡溝通天地。“商周藝術中的動物是巫覡溝通天地的主要媒介，那麼，對帶有動物紋樣的青銅禮器的佔有，就意味著對天地溝通手段的佔有，也就意味著對知識和權力的控制”。春秋的時候，楚莊王到周朝的首都耀武揚威，還想問問鼎的大小、輕重，言外之意是掂量周王朝的分量。周朝的王孫滿對楚莊王說：“鼎的大小輕重可不是隨便能問的，得看德行。當年夏朝的時候，各地進貢了青銅，鑄成九鼎。上面刻畫了各種動物，讓大家知道什麼動物是能夠幫助人的。這樣，外出的時候就不怕鬼怪。這鼎可是通天的，您能隨便打聽嗎？”這表明，能幫助巫師通神的動物，就刻在青銅器上。擁有了青銅器，也就擁有了神權，擁有了統治人間的權力。所以一些學者認為，商代經常遷都，主要原因就是找銅礦。

殷商時代，已經具備有高度政教合一的巫王政治。巫王政治，就是巫術與王權合一的政治。古代黃河流域的殷商人，由於對大自然的恐懼，於是寄託巫師來與神靈溝通，以此來“趨吉避凶”和“逃避瘟疫或災難”。當人民逐漸建立對巫師絕對的仰賴後，巫師便可以透過“問神”、“求神”、“解說異像”、“解說占卜結果”等詭異方式，來建立其“無上的權威”與“絕對統治權”；巫師也透過制訂禮儀、規定禮儀、操弄禮儀、操弄集體活動等方式，來建立集體主義與對統治者的絕對服從意識，這就是最早的“巫王政治”。

殷商統治階層就是一群巫覡；所謂的殷商文化，就是巫術文化和巫祭文化，

就是使用巫文字(甲骨文)的巫文化。中國最早的文字系統是甲骨文；甲骨文記載的是卜辭；卜辭是巫覡窺測天或上帝意向的記錄。殷商王為了建立巫王的權威，透過各種相應的祭祀儀式，來迷惑人心，使被統治者屈服於鬼神的淫威。殷商王為了確立巫王的絕對權威，發明了占卜之術。這種占卜權，完全由殷商統治階層所壟斷，只有殷商統治階層才能舉行祭祀，只有殷商統治階層才能解說占卜之辭，只有殷商統治者才能執行卜辭的命令。

商周時代家國一體，王以大家長或宗主的身份高居於萬人之上。殷人占卜敬神是為了把國王的意志神聖化，以達到加強王權的目的。巫王經常透過龜甲的蔔筮活動，來與先帝與祖先溝通。“巫王”透過對祖先的不斷祭祀活動，來與“先帝”溝通“他或族人”的需要，然後請“先王”向“上帝”請求，“巫王”再透過“占卜”，來瞭解其結果，例如，征戰、求雨、出行、治病、刑罰、祈福等。這就是漢人歷代帝王，必須經常祭天以確立其絕對神權政治的原因。在這個過程中，巫王必須假意設法討“先帝”與“上帝”的歡心，因此必須提供牲畜祭品、必須提供人殉與人牲等祭品；如果巫王所求的越大，那麼祭品的量也必須加大，這完全是一種原始人交易與賄賂的意識。可見，殷人的“上帝”是多麼地貪婪、邪惡與殘暴！

從甲骨文頻繁出現的“王占曰”與“王蔔曰”等字可知，只有巫王才具有對卜辭的最高解釋權。巫王聲稱自己具有通天的法術，能與鬼神直接對話與溝通，因此，“爻”代表“巫王”所詮釋的“祖先的旨意”，其本質就是愚弄人民的謊言，其目的在於強化王的權威。

在卜辭中，商王自稱“餘一人”。王宣稱，“予迓續乃命於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尚書·盤庚中》）。王奉天承命，高居雲端，繼承先帝，統治

人民；而人民則處於被畜養被支配的地位。“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別人只有出力的份，只他一人說了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國家失政，也只是他一人之責。商朝的國君盤庚是較為賢明的君主，貴族們堅決反對他的遷都決定；盤庚利用祭祀權，召集貴族臣僚到王庭訓話說：讓他的祖先勸告那些不遵從他的意志的臣民的祖先，拋棄他們的子孫的。“你們的生命，乃是我替你們從上天保留下來的，你們如果違反我的意願，你們的祖先在天上會向我先王請求，嚴厲地懲罰你們。到那時候，勿論你們怎麼求饒，我都會把你們統統殺掉，不留下一個人，也就別想到新都去了”。這樣，商王就從其臣民的祖先那裡，獲得了對臣民的生死予奪的權力。王不僅可以利用自己的祖先，威脅不順從的臣民；而且還可以將自己的意志，假託他人的祖先，恐嚇其後人。如果臣民順從，就能得到現世的回報，殷王還會在“大享先王”的同時，使“爾祖其從與享之”，不然的話，他就要以祖先的名義“殺無赦”。

“巫王”有時假借“先王或先帝”的意志，以火祭(或水祭、活埋)其它巫覡、族長或族裡異己，來平息先王或先帝憤怒”；這就是後來“清君側”、“整肅異己”、“焚書坑儒”與“文字獄”的起源！巫王對部族的人有生殺的權力、巫王對部族女人有性支配的權力，這些可笑的事實，可以從殷商統治者的墓葬情形得知。

在殷商統治者的墓葬，可以發現大量與豐厚的墓葬品，例如，青銅禮器、大型銅器、青銅工具、銅鏡、青銅武器、玉器、玉飾、瑪瑙、貝殼、水晶製品、石製品、骨器、陶器、象牙雕刻品、樂器、人殉、狗殉、人牲、動物犧牲等。在甲骨文裡，“祭”字從又(手)從帶血的肉從示(祭台)，象“人手執帶血的肉塊，獻於祭台之上”。這種慘殺式的獻祭宗教，無法走向慈愛、道德懺悔、道德救贖

與建立絕對道德的宗教（基督徒的禱告是用信仰為基礎，而不是用犧牲獻祭的方式進行）。為什麼要“獻帶血的肉”？因為必須用人類最恐怖的手段，如“活人祭”、“人頭祭”與“割人體”等，來建立鬼神與巫王的絕對權威！

所謂人殉，就是以人為陪葬，指統治者的妻妾、子女與僕人，屬於統治者親近的人，他們要在陰間繼續服侍主人，因此在主人死後，也跟著被活埋，這種活人配葬的習俗一直延續到清代。不論是人牲或人殉，大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這是多麼殘忍的事情？即使女人陪葬，其身軀也是呈現著跪屈肢狀，多麼欺負與壓迫人？

所謂的“人牲”，就是以人為牲畜祭品，大多用俘虜的外族奴隸，如羌人等，這些被俘虜的奴隸，生時從事各種辛勤的勞動生產與耕作，主人死時還要跟著陪葬。從殷墟的甲骨卜辭中，可查的“人牲”即有 1.4 萬餘人。如商代甲骨文中就有“X 妾”（就是用火燒妾的辦法）以求雨、“沉妾”（就是把妾沉入水中）以祭神的記載。《甲骨續存》下第 744 片就是一條燒女奴祭天祈雨的卜辭；《殷墟文字甲編》第 2992 片，卜辭記載商王一次屠殺 30 名羌人祭河神。殷商最大規模的祭祀與墓葬，人牲與人殉達一千人，牛牲達一千頭。

1928-1937 年在殷墟歷次發掘中，從商王陵附近的祭祀坑裡出土了大批人頭骨，僅洹北侯家莊西北崗祭祀坑就發現人頭骨 398 具。

1934~1935 年，在西北崗所發掘的殷代的王陵，其中有九座殷王大墓與一座埋葬器物的大墓，大墓的東區又有附屬於大墓 1242 座小墓。根據資料記錄，多數都是身首砍斷，有的只有肢體，有的只有頭顱，有的雙手被縛，有的抱手蜷腿，有的張口彎頭，死狀極為痛苦，據估計約有 2000 多人。榆樹屯殷墟墓葬區 1001 號大墓葬 164 人，殉者多為少年甚至幼童。殷墟武官村“中”形大墓殉 79

人，安陽屯有近兩千餘人牲，王陵區被殺者 1178 具，18 號坑，用人牲達千人之多。大墓中還出土了雕刻精美的樂器——大石磬；廓室兩側的 24 具年輕女性骨架旁有舞具小銅戈，她們生前是樂舞奴隸。有些殉葬者屬於死者的家屬、僕役或兒童；他們要在陰間繼續服侍主人。孫淼《夏商史稿》第九章第五節人殉、人祭雲：“1950 年春，考古工作者在殷墟武官村大墓以南，發現 4 排 17 坑，坑內埋葬的都是無頭人骨架…總計共埋 152 個骨架。…規模最大的是武官村以北一批祭祀坑。據不完全的統計，191 座祭祀坑中，共埋人骨 11178 個人骨。根據發掘情況看，這些人牲並不是一次殺戮後埋入的，每次祭祀時殺戮的人數不等，少者一、二人，多者幾十人至幾百人，最多者一次竟達 339 人”。

1976 年春夏之間，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安陽地區考古隊在武官村北地商王陵附近又發掘出大批祭祀坑，其中絕大部分是集體埋葬的無頭祭祀坑，在 191 個坑中，有 1200 具遺骨，大部分都是頭顱被砍掉的軀體，這一地區共發現約 2000 具的遺骨。這和上述西北崗的人頭祭祀坑是相對應的。

在殷墟甲骨卜辭裡見到的殺人祭祀的記錄更令人震驚。胡厚宣先生從著錄甲骨文字的 90 種書刊，以及他自己長年搜集尚未著錄過的甲骨資料中找出大量有關人祭的卜辭。光商王武丁時期的人祭蔔辟就有甲骨 673 片，卜辭 1006 條，祭用 9021 人，另外有 531 條未記用人數。對奴隸的屠殺，最少兩個，可能是貴族家裡的普通祭禮；最多的一次 500 個，可能是規模較大的部落祭禮。殷商人祭祀一次可以宰殺千頭牛或數百頭牛，王死陪葬的奴隸可達千人，高層貴族可達數百人，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為了維護這種奢華的祭祀與龐大的開銷，殷王需要發動多少次的戰爭，才能夠搶奪足夠的資源與供驅使的奴隸？

商的奴隸可分為很多種，如羌、臣、奚、屯、僕、宰、芻、工等。胡慶鈞主

編的《早期奴隸制社會比較研究》中引用了大量的甲骨卜辭，共有 177 條是關於奴隸的，其中說殺奴祭祀的有 94 條，掠奪奴隸的有 10 條，追捕逃奴或對奴隸施酷刑的有 35 條，轉讓奴隸的有 14 條，用奴隸從事戰鬥的有 16 條，用奴隸生產的有 8 條。

殷王為了獲得奴隸，經常發動戰爭搶奪異族的資源與奴役異族的人民。從甲骨文的殘片記載來看，統治者經常有規律地率軍侵擾周圍的弱小部落，主要的目的就其獲取戰俘，掠奪奴隸的主要目的正是為了在舉行祭祀的時候把他們和豬、牛、羊等牲畜一起殺掉，實行活人陪葬制。比如有一片甲骨文上寫著這樣的文字：“貞自湯、太甲、太丁、祖乙百羌百牢。”意思就是說為了祭禮成湯、太甲、太乙、祖乙這幾個商的先祖，殺掉了一百個奴隸和一百頭牛。根據甲骨文的資料統計，有 7426 個羌人在祭祀中被處死！在殷商的墓裡，發現有的頭骨上有刻字，這些是人頭祭祀時的刻辭，祭祀後這些頭顱被打碎；這些頭顱屬於外族的首領或戰士，當他們死後，殷人將他們的頭顱切下，作為祭祀祖先與炫耀勝利的象徵。

阿茲克特人在一次全部族的祭祀中，就殺掉了八萬人，還專門健了兩個金字塔祭天，每天都要貢上八顆（每個金字塔東南西北各一顆）新鮮的人的心臟，而且是由祭司在塔頂上現場操作，取完之後就把屍體往下一推，必須一直滾到塔底。讀完之後，頓覺毛骨悚然。殷商人也並未遜色多少。中華“文明”有了這麼一個開頭，後世再嚴酷的統治也就不足為奇了。

為了發動戰爭，殷王發明了“華夷之辯”、“夷狄為禽獸”與“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等概念，以此來進行各種不義的戰爭，商主要是亡于過度的征戰，而不是亡於紂昏庸無道。

在甲骨文中，武從止從戈，戈為武器，表示要戰爭；止為足，表示要出行；

從止從戈，表示發動戰爭或武力威脅。許慎在《說文解字》裡說，“止戈為武”，意為停止戰爭，不符合甲骨文原意；甲骨文裡的止，象一隻腳的輪廓，“止”是“趾”的本字。殷商時代，統治者如此地貪婪好戰，如此地奢華與聚斂，他們怎麼可能有“止戈為武”的意識？

甲骨文“伐”，象“以戈擊人”，即“殺人”。甲骨文“殲”，從戈從二人，“二人”指多人，因此“殲”表示“趕盡殺絕”之意。甲骨文“取”，從耳從又，指以手執耳，指割下戰俘的左耳。甲骨文“災”，象戈上高懸著人頭，有戰爭災難的意思。

國：從戈從口，“口”象城邑之形，指“以武力保衛城邑”或“被武力征服的城邑”，這個“國”字，只體現“武力”的概念，沒有人民自由意志、人民自決與人民自治的意義。

征：甲骨文“征”同“正”，字形上邊“口”象城邑之形，字形下邊從“止”（同“趾”），表示來到城下向前攻城。甲骨文的“正”，從“止”（足）從“口”（城邑），指“兵臨城邑即將攻城”，同“征”字。甲骨文的“正”、“征”、“政”通用，均指“征伐”之義。由此可知，殷商人所理解的“正”，就是絕對的武力，就是絕對的暴力，它根本與“Correctitude、Just、Positive”等概念無關。

甲骨文的“義”從“羊”從“我”（從雙“戈”，代表我部族），指把羊給我部族就是“義”，即“我族中心主義”，因此“不給我羊”就是“不義”；甲骨文的“我”，象“帶齒的刀鋸”（刑具或屠宰牲畜的器具），後引申為“殺”。由此可知，殷商人用“殺”來理解“我”，用“獲得羊”來理解“義”，這就是“絕對的武力”的“我”、“絕對的自私自利”的“義”。這代表了崇尚“絕對

暴力”與“我族中心主義”的思維意識。甲骨文的“義”，根本與“Just、Justice、Right、Righteousness”等概念無關。

從甲骨文分析“正”與“義”，可以得知古代漢人文化的邪惡性，可以得知古代漢人只有相對於絕對“孝”與“忠”的道德觀(即“相對道德觀”)，可以得知古代漢人只有相對於絕對“統治者”與“階級社會”的倫理觀(即“等級倫理觀”)，可以得知古代漢人沒有絕對的“Justice 與 Righteousness”等理念。除非現代漢人願意認真信仰“耶穌博愛精神與道德”與“All man are created equal”等理念，否則漢人永遠不可能真正擁有絕對道德與責任意識的“Justice 與 Righteousness”等理念。

在絕對“孝”的思想下，所謂“正義”就是“統治者無所不在的統治權”，就是“絕對的王權和絕對的奴役”，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是“土地與臣民徹底王有制”。殷商的統治者，用這種迷惑人心的巫術，來建立政教合一的專制政治、中央集權政治；殷商王的統治者，就是巫王，就是自稱帶有神性的人王，就是可以絕對佔有他人財產與決定他人生死大權的人，這樣的統治者，還有什麼 Human 性與道德可言？

漢字的“公”從“八”(同“分”)從“廾”，指多數人來分配就是“公”，即多數人說了算，這代表崇尚“多數人決定論”與“集體主義”的思維意識。漢字的“理”從“王”，代表統治者與“裡”聲，指統治者的意見就是“理”，即統治者說了算，即有權力者說了算，這代表崇尚“王權”與“權力”的思維意識。如此，漢字的“公義”怎麼可能等於“Justice”或“Righteousness”？漢字的“公理”怎麼可能等於“Universal truth”或“Absolute truth”？

3·拜“鬼”而不知“God”的巫教

中國文化一開始就是種魔鬼文化。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論語》）；魂魄異兮為鬼雄（屈原）；死亦為鬼雄（李清照）；說明了中國文化就是一種鬼文化，沒有西方的神。漢文裡的“天”、“鬼”與“神”的本意，實為Ghost。

殷人“尚鬼”，“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凡事都以“占卜”方式解決。商代有了專門整理巫術檔案的“史”，有了專門負責禱告的“祝”，有了專門負責整治王八的“蔔”；原始意義上的巫師，只負責跳舞求雨。巫、祝、醫、卜，擅長於各種巫術，他們屬於商王的御用文人。巫師為了討口飯吃，當然會迎合統治者的意志；龜甲與獸骨的占卜，就是統治者與巫師串謀的雙簧戲，其目的是讓人民產生恐懼而誠服于統治者的絕對權力。

甲骨文的“神”，從“申”，象“閃電”形，表示原始人對大自然“恐懼”的感覺；“示”表示“祖宗牌位”，就是鬼崇拜。“神”表示就是“鬼”。甲骨文的“帝”，像橫七豎八的一堆木柴，或象“稻草人”形即“紮草為神形以供火祭”。燃燒時火光熊熊，象徵天神之威靈，所以帝的本義就是“天神”。如武丁時的卜辭，數次出現“上帝”的用語；殷王祭祀其死去的父或王時，亦稱其為帝，如卜辭裡有“貞咸賓於帝”，指先王死後可以升天配帝，成為上帝旁邊的人帝（或稱王帝）。帝原本指死去的王，就是鬼崇拜，後來秦始皇竟自封為皇帝。殷商的“上帝”，是統治者創造的最大的鬼，是殷商統治者御用的工具，巫王常以“上帝”的指令來統治殷商人。甲骨文的“神”與“上帝”等詞，與《聖經·四福音書》中具有完全慈悲與博愛本質的“God”完全不同，因此絕對不可以用“神”與“上帝”等漢字，來翻譯“God”，否則就是屬於十分褻瀆“God”的行為。

禘：象以手捧帝，祭帝之典；所謂禘祭，就是祭祀天神或先王的大典，殷商與周代，只有王才能舉行禘祭。甲骨文的“祝”，象“某人跪於“示”前，張口

向鬼禱告與祈求之狀”。

甲骨文的“佑”（從“右”，象“某人以雙手持眾祭品置於示上，以求祖宗保佑”，象以酒灑於示上，表示以灑酒祭神）；所謂“保佑”，在漢文裡向來就是“求鬼佑福”之意，你如何能用“祝福”或“保佑”來翻譯“Bless”？

拜死人就是“拜鬼”，拜祖先也是“拜鬼”。漢人最喜歡“拜鬼”、“拜獸”與“拜物”，但是就是不信仰 God。漢文化就是徹底地“不敬畏 God、不遵守十誡、不接受耶穌福音與道德理念”的病毒物；那些認同“漢文化、文字與語言”與自以為是“漢人”的人，他們怎麼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 Human beings？這群本質上“無賴、騙子、奴、獸、鬼與邪靈”的“漢人”，永遠不肯承認自己是“無賴、騙子、奴、獸、鬼與邪靈”。

漢文裡的“精神”，就是反“Spirit”的，所謂的“精”，就是“妖精”的“精”；所謂的“神”（即甲骨文的“申”，代表“閃電”，在祖宗牌位“示”旁的“閃電”就是“鬼”），就是“鬼”，因此“精神”不就是“妖鬼之氣”？

有人將“Holy spirit”譯成“聖靈”，這不就是褻瀆“Holy spirit”的行為？在甲骨文裡，“聖”字從“人”、“耳”與“口”，“靈”字從“巫”、“三口”與“雨”，這兩個邪惡的字，如何能表述“Holy spirit”的概念？有人將“Soul”譯成“靈魂”，這不就是異化“Soul”的行為？“魂”字從“鬼”與“雲”，“靈”字從“巫”、“三口”與“雨”，這兩個邪惡的字，如何能表述“Soul”的概念？

烈：在甲骨文裡，其上象殘骨之形，其下象滴水，表示殺牲取血，用以血祭。漢字的“裂”，甲骨文從“列”，即以刀裂骨，具有分開、分解與分裂的意思。

燎：在甲骨文裡，象火燒木頭，木上冒煙，即燎祭之形；殷商燎祭時，會焚

燒人或牲畜。

旱：“旱”字為“爨”的本字；甲骨文裡“爨”同“堇”，象把一個雙臂交縛、頭頸戴枷的人牲放在火上焚燒之形，會以人牲獻祭求雨之意。此外，甲骨文裡“爨”與“赤”字，與“爨”字類似，屬於“焚燒人牲”與“求雨之祭”的用字。

丞：在甲骨文裡，象雙手將人埋進坑洞裡，即活埋人祭；此字還有一個完全相反的意思，就是雙手將人從坑洞裡救出，具有拯救的意義，後來演變成“拯”字。甬：在甲骨文裡，象人在盤中，即人祭之象；後來演變成殉人的代用物，即始作俑者之“俑”。

葬：“葬”字同“狸”與“埋”，象“用土將牛埋進坑裡”，這就是“牲祭”；殷商人祭山林土地之神時，採行埋犧牲入土的方式。

沉：在甲骨文裡，象水中有牛，另一象水中有羊，即沉犧牲于水中以祭河神；金文的“沉”字，左邊象水，右邊象一個被捆綁的人，表示沉人于水中。

羞：從羊從又（手），表示手持羊為祭。俎：象肉置且上，表示以肉塊祭祖。魯：象魚放在缶（禮器）上，表示以魚獻祭。牲：左邊象一隻捆綁的羊，右邊從“生”（表示完整），表示以全羊獻祭；金文將羊換成牛，漢字承襲成“牲”字。血：象皿中盛血，表示以血獻祭。福：象一壇酒在示旁，表示以酒祭神。尊：象雙手抱酒罈，登上階梯，向神獻酒。

祖：在甲骨文裡，從且，且就是男性的生殖器官，或是神主牌位；金文從示從且，成為現在漢字的“祖”。殷商人民崇拜祖先，祖先崇拜的必然導致對父、兄的尊重，必然會推及到父兄亡後對其亡靈的崇拜。這種習俗，被後來的漢人與入主中原的人民承襲了。

雖然古漢人稱“周公制禮作樂”，但事實上，“禮祭”之事，自古就有了！尤其是殷商有“尚鬼”的普遍風俗，凡事都要以向祖先“祭祀”與“問卜”等方式來解決；殷商的“巫王”，為了鞏固自己的絕對統治權，於是透過在“祭祀”活動時，制定各種繁鎖的“禮的儀式”、“禮服”、“禮節”、“禮儀制度”等，來建立“社會的等級制”與“倫理的差序位格”，以此來完全確立“巫王”的絕對權威與權力。

甲骨文的“禮”，從“豆”（祭神盛物的禮器）從“曲”，即“豐”（同“豐”，象豆中有禾，表示以禾穀祭神），象豆中有兩串玉。殷商大型祭祀時，需用玉，因此祭神大典稱為禮。“玉”是祭祀時的重要物品，“玉”與“龜甲”一樣，都是屬於巫師與陰間世界溝通的神器；後來“玉”演變成“權力”與“地位”的象徵，例如，儒生佩玉，代表巫師階層與執禮者的特殊地位。禮後來引伸義為“禮器”、“禮儀”、“禮制”、“禮教”、“禮法”、“禮文化”等；“禮”的本質，就是要透過繁瑣的“禮儀”與“禮制”，來迷惑與愚弄所有的個人，以便讓統治者建構一種不合理的“倫理差序位格”與“社會等級制”文化。巫王就是建構漢人專制社會的設計者，就是數千年至今漢人奴隸社會的偉大設計與建構者，這就決定了漢人“禮”文化的罪惡起源與其邪惡的本質。

為什麼“巫王”要用“祭祀”與“禮制”，來確立他的絕對權威與權力呢？因為“巫王”要獲得絕對的掌控所有人與財富權力，他必須設法唬弄與迷惑人心，必須假借鬼神的命令與意志之說，來摧毀人的理性、邏輯思考力、自由意志、自由意識、獨立思想、獨立人格、尊嚴、人權、個體性、個體差異性、主體性與自主性等，以此來建立可笑的集體意識，以此來建立人的絕對服從“神威”與“神的命令與意志”，以此來建立“代表神威的巫王絕對神權政治”，如此，人將成

為統治者的徹底附屬，也就是所謂的奴隸。

4· 儒奴教的起源

殷商時期的巫師，逐漸發展成為儒家文人。儒教的原始形態為巫祝形態。巫祝的職能是交通天地人神，巫即是“舞”，“以舞降神”之意。“祝，祭主贊詞者，”“從示，從人、口”（《說文》）。巫、祝都是接神事神者，但二者有區別。巫，以舞降神；祝，則是祭祀時向神禱告贊詞。周以前，巫、祝不分，《說文》還有以“祝”釋“巫”之條。《周禮·春官》曰：“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春招弭，以除疾病”，“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由此可見，司巫的職能大抵是“降神、祛病、除災、祈福”。

周初，周公曾提出“由民情而知天命”的觀點，但在武庚和“三監”之亂爆發後，他又收回了對天命的壟斷權。在《大誥》中，他首先說非聖賢不足以知天命，接著又聲稱只有通過最權威的占卜才能瞭解天意——這當然須利借助最權威的法器，這個神器就是“甯王（文王）遺我大寶龜”。周公制禮作樂就始于巫祝分職，以祝代巫。周公父子自任大祝，新立祝官一躍而居群巫之上。巫師們文化程度不高，日子就更難過了，根據《周禮》記載，卜、祝、史的爵位都是下大夫，而司巫及男巫、女巫的爵位只是中士，已有淪為官府小廝的趨勢。祝的職能是製作掌誦禱辭，“順豐年”、“求永禎”、“祈祥福”、“弭災兵”、“逆時雨”、“寧風旱”、“遠罪瘡”（《周禮正義》）。周公制禮作樂正是在祭祀禮儀和樂舞的基礎上整理提煉出了儒教的禮樂規範體系，從而定型了儒教的基本特徵，實現了儒教由原始巫祝形態向高級形態——禮樂形態的轉變。孔子述作六經最後奠定了儒教的基礎。

孔子周遊列國，其目的就在於尋找一個巫王，接受他的禮樂治國理念；所謂

的禮樂治國，就是建立類似商王朝政教合一、專制、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政治。儒家荀子的弟子李斯，向秦皇鼓吹孔孟的大一統思想，最後創造了兩千多年來的“秦制”，這個秦制包含了殷商的巫王政治，也包含了華夏沙文主義的各種文化病毒。由巫師所發明的儒家思想，當然要符合統治者的絕對意識，否則統治者如何用它來愚弄與統治人民？儒家就是巫王政治的幫兇，就是發明絕對忠孝思想的偽道德者，就是提倡相對道德觀的魔鬼，就是幫助統治者壓抑人個體意識與道德的邪靈，就是推動專制與人集體意識的撒旦，就是阻礙人化與人文明的野獸，就是謀殺人靈魂與慈愛的妖怪，就是焚燒東亞大陸民主與自由的兇手。在這種專制文明、邪惡的文字與殘暴的巫王政治下，所有的人都變成了“奴”、“鬼”、“獸”！所謂的“奴”，就是沒有人權的奴隸；所謂的“鬼”，就是沒有靈魂的魑魅魍魎；所謂的“獸”，就是沒有人性的禽獸！

由巫師發明的文字，當然要符合統治者的絕對意志。張光直說：“古中國文字本身便具有內在的力量。文字的力量來源於它同知識的聯繫；而知識卻來自于祖先，生者須借助于文字與祖先溝通。這就是說，知識由死者所掌握，死者的智慧則通過文字的媒介而顯示于後人。”甲骨文是殷商統治者祭祀時的文字，它通常被刻在龜甲、獸骨、人骨或人頭骨上；是屬於殷商統治者專用的文字，也是殷商統治者用來迷惑與愚弄人心的“巫文字咒語與符號”。甲骨文在殷商時代，並不是通行於民間的文字，也不是統治者為人民設計的通行文字；它是統治者神權政治的工具，它是統治者迷惑與愚弄人心的“巫術咒語與符號”，它是壓迫與剝削人民的工具，它也是奴役、獸化、物化、白癡化、非理性化與鬼化人的工具。

在甲骨文中，“王”從斧鉞之形，象一把下砍的大斧形，上橫是斧柄，下邊是斧頭；“王”字在周金銘文中像戰斧之形，古文字學家吳其昌解釋為：“王字

之本義，斧也”。斧鉞代表刑殺征伐，戰斧是軍事統帥權的象徵，軍權是王權的主要組成部分。“夫王者，能攻人者也”，“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這說明我國最早的君主是由軍事首領轉化過來的。“王”字上的“一”，又被解釋為代表“天”，這就是古代絕對“天授王權”的思想，這不就是漢種族後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思想的根源嗎？

甲骨文的“父”字，象“手持石斧”，石斧是生產工具，亦為武器，代表權力。“父”與“王”是巫王政治與社會的兩種無上權力，後來的儒家就是用“父”與“王”權，來建構絕對“孝”與“忠”的思想，以此來壓抑個體獨立意識與尊嚴的。

尹字的甲骨文，像手執長物，這個長物，可能是針、杖、棍棒、刀、武器等；當他拿著這長物後，它就擁有某種權特別力或能力，於是產生“治”、“治理”與“主管”的意義；後來“尹”演變成“治理者”與“官名”，如“大尹”、“府尹”等，這裡面沒有人與人共同合作與互助的概念。尹字與甲骨文中的父字近形，寓有父輩掌權的意思。

君字從尹從口，這個“口”字，可能是“口”（指發號命令者）、“神器”（指權威的禮器，代表神聖權威的君權）或“城邑”（指統治者掌控的城邑）等；表示君是諸尹中的最尊者，可以用口來指揮尹，是拿著某種器具的絕對主宰者或統治者，它充分體現了古代權威或暴力政治的本質，這裡面根本沒有民主與人權的概念。

甲骨文的“孝”，從爻從子，“爻”就是卦爻，它是蔔筮的內容，代表殷王卜筮的結果，代表殷王所解釋的祖宗命令或訓示，代表被統治者必須無條件服從的法律、戒律或規範，它具有無上權威，它根本就是統治者愚弄人民的把戲；“子”

在甲骨文裡與“人”同義。孝表示“人”要遵從“爻”的權威，具有無條件接受權威者(如殷王、祖宗或族長等)教誨與順從長者意志的意思。“孝”的本義有“祭祀”、“服從”與“順從”等義。例如，《論語·泰伯》“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史記·夏本紀》“禹，薄衣食，致孝於鬼神”，此處“孝”有“祭祀”與“服從”之義；再如，《左傳·隱公3年》“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此處“孝”有“順從”之義。在專制統治下，統治者將“孝”與“順”(“絕對服從與順從”)畫上等號，這是十分非理性與不道德的行為，然而這正是大陸數千年統治者實行“愚民政策”與“奴役政策”的必須手段。

孝字從爻從子，指“人須服從爻”，就是“人須服從巫王所占卜的卦爻”，就是“人須服從巫王所詮釋的卦爻”，就是“人須絕對服從巫王的命令與規定”，就是“人須絕對服從統治者的命令與規定”；當人接受與順從“爻”時，無異於接受與順從統治者的絕對權威與意志，這就是儒家主張以孝治國的原因。儒家將“父子之道”擴大為“君臣之道”，就是用“絕對的父權”來建立“絕對的王權”；“孝”與“忠”的本質，就是無條件地“無違”與“服從”，就是要你莫名其妙去死也要絕對地“無違”與“服從”，這就是東亞大陸專制與集體意識的起源，這就是東亞大陸沒有真正意義上人的原因。

甲骨文的“孝”，等於後來篆文的“忠”的涵義。甲骨文裡沒有“忠”，只有“中”(象“旗幟”，是“部族的旗幟”)字，後來篆文“忠”，從中從心，指“心”在“部族的旗幟”裡，代表“忠誠”與“效忠”之義。這種“忠孝”思想，就是絕對的“服從”與“無違”，都含有人民應無條件順從統治者的意志之意味；後來透過儒者宣傳後，竟然極端化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死，子不

得不王”等思想，徹底否了人的尊嚴、自主性、理性等，使人民永遠沒有邏輯性、創造性、形上思考能力等，也使人民永遠沒有實行民主之可能。

有人將“Honor your father and thy mother”（Exodus 20: 12.）譯成“當孝敬父母”，在甲骨文裡，“父”從“斧”（代表暴力與權威），“母”從“跪女雙乳”（代表奴隸與哺乳者），“孝”從“爻”從“子”（代表人要服從統治者的指令）；在金文裡，“敬”從“跪人”（指俘虜）從“口”從“手持棍”（代表以棍威脅人），這四個邪惡的字，如何能表述“Honor your father and thy mother”的概念？

那麼大陸統治者用什麼方式來，推行“孝”呢？殷商統治者發明了“教”。甲骨文的“教”，從爻從子從女，“爻”就是謊言；“女”即手持刑杖棍棒之像；謊言與暴力，就是專制統治者奴役與壓迫人民的絕對工具。“教”就是“統治者拿著棍棒，要求人民服從爻”。因此，“教”就是“棍棒教學法”，就是“暴力教學法”。所謂的“禮教”、“教孝”、“教忠”與“王教化”，就是統治者用謊言與棍棒來教化人民。王為什麼要用棍棒教育法呢？因為那是一種否定自主意識的奴化教育，是教人成為統治者所需要的愚民、良民與順民，那是把人異化成奴隸、非人、沒創造力、沒抽象能力、沒邏輯能力的白癡教育！

甲骨文的“學”，從“雙手”捧著“爻”。金文與篆文的“學”從“雙手捧著爻”，從“文”從“子”，“文”指“手執棍棒”，因此“學”代表“以手拿棍棒強迫人”學習“爻”，學的古字義就是長者手持爻在家裡教導膝下的兒童。這就是強迫性的愚民與奴民教育。當然，所能教的內容就是爻。爻指代八卦，相傳創始於伏羲；到了周朝，八卦成為《周易》。儒家的五經、六經、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等經典著作中均含有《周易》的內容，可見，三千多年的

文化史中，學字的本義始終貫穿其中。中文的“學”字無形中只是在暗示你，你只能去研究、領會祖先所遺傳下來的東西。這一傳統沿襲到當代，有一種驚人的體現，即某派理論和學說已達絕對高峰，人們剩下來可做的就是去領會它、理解它、接受它，而不是去超越它、批判它、否定它；更不許去創造出什麼全新的東西。當然，此種學，只能愈學愈愚，愈學愈迷；只能讓人走到學的反面——無知與愚蠢。

《論語》裡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可見，儒家用孝來建立不“犯上作亂”的奴性意識。儒家所有的道德與價值理念，根本就是培養愚民、順民與奴隸等的工具。

漢人不斷地宣傳“孝”就是“無違”，不斷地宣傳“孝”就是“絕對化的服從”（如 24 孝故事），不斷地宣傳“三綱五常”思想，不斷地建立“倫理差序位格”與“社會等級制”，不斷地賦予父母尊長“無上的權威”意識，最後“孝”竟然成為漢人社會“暴力文化”的根源，例如：“棒打出孝子”、“玉不琢不成器”、“嚴守禮教”與“不打不成器”等反人性的變態思想。這些反人性的教條，旨在透過嚴厲打壓、扭曲與摧殘人自主性的教育過程，培養未來的愚民、順民與奴隸。漢人透過“家庭暴力”與“摧毀人主體性”等形式，達到塑造人民初級“愚民”與“奴隸”性格的基礎。統治者再透過殘酷的暴力與謊言宣傳，使人民徹底愚化與奴化，例如，使用“誅九族罪”、“文字獄”與各種殘酷的“刑罰”等手段。這種極端的“暴力孝道觀”“暴力教學法”，正是大陸專制文化的根本基礎。在無條件服從、絕對無違與棍棒教育下，人還有什麼尊嚴、自由與自主性？沒有尊嚴、自由與自主性的人格，還談什麼自由？還談什麼平等？還談什麼民主？

現在大陸仍然有許多家庭，經常強調“尊卑輩分”與“等級權威”等意識，他們就是“專制與奴隸文化”的推動者！

5·殘酷的刑法

詩人葉文福說：中國自古就是一個荒唐的國家！中華歷史不過是“野心包圍著野心、鐵蹄驅逐著鐵蹄”的歷史，中國人在馬蹄和拳頭下苟延殘喘，留下了聲聲沉重的歎息和堆堆白骨。很少能看見閃爍著人性的光彩。從甲骨文裡就可看出中國文化的邪教特徵。

宰：宰字的甲骨文，從屋下有辛，“宰”指在屋裡執行刑罰者，後來演變成“殺”、“家臣”、“官名”、“墳墓”、“主持”與“主管者”，如“宰相”、“州宰”、“宰夫”、“宰殺”、“主宰”、“宰製”、“宰人”等；“宰”字充分體現古代統治者絕對權力與殺戮的本質，這裡面沒有對人的愛與關懷。甲骨文裡的“宰、辛、辟、幸、執、摯、役、臧、尤、陵、歲、劓、元、刖、劓、劓、劓、劓、亢（同“桎”）、圉”等字，這些字充分說明了殷商統治者所用的殘酷刑罰；上述殘酷刑罰的字，只能體現“犯法”與“刑罰”的意義，並沒有任何抽象與形上“Original Sin 或 Sin”的內涵，更沒有任何道德與良心上“Original Sin 或 Sin”的意義。

辛：代表“平口刑刀”、“刑具”、“刑罰”與“罪惡”。由“辛”發展出來的字，有“幸”（代表“枷鎖”）、“童”、“妾”與“僮”等。古代男奴為童，女奴為妾，僮亦是奴，所謂奴就是奴隸，就是有罪者；後來演變成“幸”代表幸運，“童”代表孩童，“妾”代表非正娶之妻，“僮”代表僕人，這些概念都仍舊脫不了賤人、奴隸與有罪人的內涵。

從甲骨文可知，商代的刑罰有死刑、肉刑、徒刑、囚禁與服勞役等。“死刑”

分砍頭（“伐”與“元”）、劓刑、割（“卯”）刑（如“剖心”、“剖孕婦”）、凌遲、醢刑（剁成肉醬）、火刑（“炆”、“燻”）、活埋（“丞”）、沉水刑（“沉”）；“肉刑”分宮刑（“黥”）、劓刑（“陵”、“荆”與“歲”）、劓刑、刖（割耳）、黥刑、尤刑（斷指）、臧刑（以戈刺目）；“徒刑”包括拘系（即“以繩索捆綁人的頸子，牽之以行的刑罰”或“戴腳枷流放的刑罰”）。《呂刑篇》的五刑，即墨（黥面）、劓（割鼻）、荆（砍腳）、宮（閹割）、大辟（殺頭）等，《呂刑篇》甚至主張“遏絕苗民，無世再下”（要殺盡那些作亂的苗民，不讓他們的子孫後代留在人間）。

甲骨文裡充滿了各種殘忍的刑罰。例如，劓（割肉剔骨之刑）、劓（割鼻之刑）、黥（以針刺面後塗墨）、刖（割掉耳朵）、椽（割男女的生殖器）、大辟（死刑）、墨（面額刺墨）、臧（以戈刺目）、尤（斷指之刑）、亢（人的腳上套著刑具）、圜（犯人在監獄裡戴著刑具）、元（砍頭）、黥（切掉男性生殖器）、宮（切掉男性生殖器）、腐（切掉男性生殖器）、荆（割足之刑）、陵（割足之刑）、歲（割足之刑）、抽舌、鞭笞、炮烙、剖腹、焚刑、醢刑（人死後剁成肉醬）、脯刑、磬、絞、車裂、腰斬、梟首、棄市、族刑、人彘、凌遲、剜眼、刺瞎等。

“劓”字從刀從骨，即是割肉剔骨的刑罰；“刖”字像砍去人一足形；“陵”字，左邊從大而缺一足，右邊從刀鋸之刑，表示刖足之刑，後來演變成的陵（凌）遲之刑，即“斬去手足後，再割去身上的肉之刑”；“歲”字像以鉞斷足之刑，此亦為刖刑；“黥”字，左邊像男性的生殖器官，右邊從刀，是指用刀割掉男性的生殖器官；“元”字，從一點從一橫從人，一點就是人頭，一橫指用刀截斷，“元”字表示斬首之刑；“亢”字從大從一，“大”指人，“一”指橫在兩腿之間的刑具，表示人的腳上套著刑具；“圜”字從口從幸，表示監獄裡戴刑具的犯

人；“尢”字從右（手）上一橫，像斷手指的刑罰。

古代的華夏民族，竟然會發明下列的刑具與文字：例如“騎木驢”，木驢就是一頭用木頭做成的驢，木驢背上，豎著一根大拇指粗的尖木樁；將犯罪的裸體婦女綁在木馬上，讓尖釘刺入婦人的陰部，遊街示眾；隨著木驢的走動，那根尖木樁也一伸一縮，直弄得女犯下身鮮血淋漓，痛得撕心裂肺，很多受此刑的女犯往往會慘死在木驢上。這種刑罰常常用於懲處所謂的偷情淫婦。此外還有其他殘酷的刑法，如：梳洗——用鐵刷子把人身上的肉一下一下地抓梳下來，直至肉盡骨露，最終咽氣；剝皮：剝的時候由脊椎下刀，一刀把背部皮膚分成兩半，慢慢用刀分開皮膚跟肌肉，像蝴蝶展翅一樣的撕開來…最難的是胖子，因為皮膚和肌肉之間還有一堆油，不好分開。皮剝下來之後製成兩面鼓，掛在衙門口，以昭警戒。最早的剝皮是死後才剝，後來發展成活剝；俱五刑：把砍頭、刖、割手、挖眼、割耳合一，即“大卸八塊”。漢高祖死後，呂後把他的寵妾如意夫人抓來，剝去手腳，割掉鼻子耳朵舌頭，眼睛挖出，丟在豬圈裡餵養，取名“人彘”。烹煮：找個大甕，把人塞進去，然後在甕下面用柴火加熱。車裂：即五馬分屍，就是把受刑人的頭跟四肢套上繩子，由五匹快馬拉著向五個方向急奔，把人撕成六塊。還有：拶指（挾手指的刑具）、枷板、夾棍、杠子、老虎凳、腦箍（可裂開頭顱，使腦漿溢出）、站籠、欄車、盤枷、匣床、大枷、繩索、笞杖、刀錐、斧鉞、鬼頭刀、竹簽（刺人指甲的刑具）、木腳鐐、鐵鞋、腳踏球、貞節銅鎖、貞節鐵鎖（禁錮女性生殖器的刑具）、鐵鉗、銅烙印（燒紅的鐵器烙印在人的身上的刑具）、金瓜（砸犯人頭顱的刑具）、鋤刀、刑釘、絞繩等。

6·非人的“豬圈”文化

人字的甲骨文，像側立的人形；就是“半面與側面的人”，而非“全面與正

面的人”。為什麼殷商的統治者，不願意用“全面”與“正面”的人，來呈現“人”的意義？因為統治者不要“全面”與“正面”的人。人就是由兩條線組合的概念；這也許是人類造字史上最為輕率的一個事實，一撇一捺，把世界上最複雜、最美好的存在處理成了最簡單的書寫形式。世界上還從沒有哪個民族把人寫得這麼簡單過，唯獨漢字，就是這麼一個簡單的“人”。在統治者的意識裡，人必須越簡單越好，最好只是“兩條腿的東西”，看不出“頭”、“腦”、“心”、“肩膀”與“愛”，這才是統治者所喜歡的“人”！在這個世界上，只要有一點人的尊嚴與人的基本意識者，誰能夠動筆寫得下這個“人”字？英語中的許多字都可以用來指人，而且是從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角度(從生物、生理、肉體、心理、精神、人格等方面)來指人：MAN、MANKIND、PEOPLE、PERSON、BEING、PERSONALITY、CHARACTER、HUMAN、INDIVIDUAL等。在一個簡單的“人”字中，漢文化存在一個嚴重問題，即一種明顯的對人的忽視、削弱和排斥！

在甲骨文裡，“人”是一個極為簡單的概念，比“牛、羊、雞、虎、狐、兕、龜、雉、鳥、鷹、雀、馬、象、狗、鹿、麋、豕、兔、魚”等的概念還簡單。

凡是與“人”概念相關的甲骨文，都具有病態、變態、殘缺、片面、妖怪與扭曲性等概念特質，都具有奴化、獸化、牲畜化、卑賤化、物化與非人化等特點。例如，“首”字，從長髮、怪形頭、長嘴與一眼，為什麼是一眼，而不是兩眼？“頁”（同“首”）字，從首從跪坐人形，為什麼還是一眼？“首”字，在小篆變成從長髮從鼻，成為後來漢字的依據，為什麼只剩下一推頭髮與一個鼻子，那是人的頭嗎？“面”字，即“臉面的面”，象“圓框內一眼”，為什麼人的臉內只有一眼，而沒有其它的器官？“見”字，即“人睜大眼睛看東西”從“一眼與半人身”，為什麼不用兩眼看東西？為什麼沒有臉、心與嘴巴？

例如，“母”字，象“女子胸部有兩點”，以此突顯乳房與乳頭的特徵，難道母親沒有其它更重要的內涵？“女”字，甲骨文有兩種字體，一象“女子雙手交叉扶膝跪坐之形”（表示恭順與卑賤），另一象“雙乳巨大的女子跪坐之形”，這是統治者卑賤、物化與性化女人的證據！“婦”字，象“女子手持帚”，指掃地的女子。妻：甲骨文象手抓女子頭髮狀，就是指“強搶女子為妻”；此外，金文的“奴”字，從女從又（即“手”），就是指“從戰爭中抓來的女俘虜”，這充分顯示了古代部落戰爭搶女人為妻為奴的野蠻行為。

臣：甲骨文象“一豎起的眼睛之形”，《尚書》說，“男曰臣，女曰妾”，均指奴隸；古代奴隸不可以抬頭平視主人，只能仰視，因此用“豎目”代表奴隸。

方：甲骨文“方”字象“人頸部縛有繩索或戴枷械之形”，就是指“縛繩索或戴枷械的賤人”，“賤人”就是外族之人；在甲骨文裡有鬼方、土方、羌方、夷方、虎方等，這充分表現了殷商人歧視外族部落的心態！

“牧”從羊從文，其甲骨文的本意，就是“用棍棒驅趕羊群”，後來金文與篆文用“牛”取代左邊的“羊”，成為現在的漢文“牧”字。這個字後來演變成“放養牲畜”、“放養者”、“管理”、“治民”、“主事之官”、“州的長官”與“統治者”等意義，如“牧牲畜”、“牧人”、“牧正”、“教化牧民”、“天子牧民”、“天子為牧”。怎麼可用“驅趕牛羊群”的“牧”字來“牧民”？這說明了：民不過是類似牛羊的牲畜罷了！

民：在甲骨文與金文裡，“民”象“以一銳物刺一目形”；“民”的本意，就是奴隸，後來引申成為普通百姓。試想，當人睜開眼睛時，就看到一把錐刺，那就是淒慘的奴隸啊！

甲骨文的“民”與“臧”，具有類似的意義；“臧”從戈從臣，象“以戈刺

瞎眼睛之形”，指“古代為了防止俘虜與奴隸逃跑，因此刺瞎其雙目，使其成為卑賤的奴隸”。

眾：甲骨文“眾”字有兩種，第一種是“三人並排”，第二種是“日下三人”（表示許多奴隸在烈日下勞作之意）；金文將“日”改為“目”，成為“目下三人”，象徵統治者在監督奴隸勞作。“眾”字有“眾多奴隸”之意，古代的統治者，一直將人民視為私有財產與奴隸。

“大”字，象“正面而立的人”。“大”與“人”的關係，就像“巫王”與“賤民”的關係，就像“奴隸主”與“奴隸”的關係，就像“宰製者”與“被宰製者”的關係，就像“吃人者”與“被吃者”的關係，就像“全人”與“半人”的關係。這種“大”與“人”的關係，就是殷商統治者非人化與異化人的最基礎構想，唯有透過不斷地壓抑、貶低人的位格與尊嚴，才可能樹立王權的絕對權威，王才可以胡作非為。

“人”就是兩條腿的東西，就是唯物論與無靈魂下的存有，就是集體主義下的物化單位，如五人為“伍”、十人為“什”、百人為“佰”、千人為“仟”等；

“民”就是奴隸(甲骨文本意)，就是非人(甲骨文本意)，就是相對於君、王與統治者的概念，就是被統治者，就是集體主義下的奴隸概念。這種物化“人”的最難堪的，竟然是與人息息相關的“家”。

甲骨文的“家”，從“宀”從“豕”，“宀”代表“茅草搭的棚屋”，“豕”代表“豬”，“家”是用“屋下有豕”而不是“屋下有人”。因此，“家”代表“養豬的棚”，“家”就是“豬圈”，就是養豬的地方，而不是養人的地方。可見，在統治者的眼裡，豬比人更重要，也更有價值，人只不過是養豬的機器，不過是製造統治者財富的工具。這說明統治者將老百姓的家看成物質性的生產單位，

“人”、“豕”與“土地”都是統治者的私產！

英文字的 Family，是 Father-Mother-I-Love-You 的組合字，因此，Family 代表 Love，代表 I 對 Father and Mother 的 Love。從英文的 Family 到漢字的“家”，可以清楚地瞭解奠基在“耶穌基督文明的英文”與奠基在“華夏鬼文明的漢文”之間的巨大差別。現在還有人想“復興華夏（鬼）文明”，這是聰明與正確的選擇嗎？

豕：豕字的甲骨文，從豕從一小點，豕代表豬，一小點代表劊豬（閹割），
“豕”字表示閹割豬；豕有一個異體字，即“豶”，是指割掉男人的生殖器。

牢：牢字的甲骨文，從牛在欄圈中，就是指關牛的地方；這個字後來演變成
“束縛”、“關押”、“監禁”、“祭祀時用的牲畜量”等意義，如“牢固”、“監牢”、“牢獄”、“太牢”（指牛羊豕）、“少牢”（指羊豕）。然而，監禁人的地方，怎麼可以用“牢”，那麼人與禽獸何異？人的尊嚴何在？這就是統治者將人禽獸化的證據。

甲骨文的“薑”、“兒”、“匕”（即“妣”，女性生殖器官）、“此”（即
“雌”，表示性交的意思），都具有獸化人的意義；甲骨文的“自”、“男”、
“娶”、“妻”、“棄”、“族”、“旋”、“之”、“伍”、“什”、“佰”，
都具有物化人的意義；“人”、“比”、“從”、“北”、“並”、“天”、“女”、
“孝”、“教”、“學”，都具有白癡化人的意義；“異”、“畏”、“鬼”、
“醜”，都具有鬼化人的意義。

巫王用這種帶有“巫術咒語與符號”的甲骨文，來鞏固其絕對政教合一的政治，來達成其絕對專制與中央集權的政治，這樣的文字，根本地具有藐視人權與人尊嚴的特質；這種具有高度專制與奴隸意識的甲骨文，逐漸演變成後來的金文、

篆文、漢隸與漢文字，那麼漢文字能夠好到那裡去？它會有什麼 Human Right 與道德性可言？

三千五百年來的漢人，一直飽受這代表“巫毒”的甲骨文與漢文字的毒害，這“巫毒”的文字就是“巫毒”文化的統治工具；這“巫毒”文字與文化，正是導致漢人永遠活在黑暗的專制、邪惡、虛無、奴隸、愚民、非人等苦難與悲慘命運的根本原因。

古中國沒有真實的人，因為古中國是以消滅真正的人而立國的。真正的人也不會建立以消滅人性為目的的國，只有滅絕人性的人們才能建立滅絕人性的國度。在現實中國框架中生活的不會是真正的人，他們只能是奴隸、宦官、小偷、強盜、強姦者、賣淫者、御用者、皇權崇拜者、賄賂者、文化吸毒成癮者、難得糊塗者、苟且偷生者、膽小無為者、精神分裂者、人鬼不分者……可見：“中國”二字就像壓在“人”頭上的一座大山。在這座大山下人是變態的、病態的、扭曲的、非人的怪物與魔鬼。吃人是他們唯一的生存手段；他人的痛苦便是鬼怪的歡樂；認知自然規律與道德法則的人成了傻瓜；自闢忠君的宦官成了人上人；社會成了賣淫者與賣靈者的樂園；人成了無靈、無智的行屍走肉，被權貴們用來建造那苦難、毀滅與死亡的“長城”，保衛著那非人、反人的“中國”。這就是那人死鬼興的中國，這就是那痛苦的根源。要建新中國，必先重建人，讓人歸回他的本源、本性，歸回到造物主的面前。只有這樣，將來的中國才會是道德的中國，才是人的而不是鬼的中國。

甲骨文及其所演變出來的漢字，代表了古代專制的文化、代表了古代邪惡的意識、代表了古代不人道的思想、代表了古代反道德的理念、代表了古代反人類罪的意志，以這種古代非人與邪惡的文字，如何能夠為現代人類開創慈愛、公義、

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權、平安、喜樂、幸福與和平等的文明？唯有以抽象字母的英文，來代替單音節象形的漢字，這才是大陸人民未來“人化”、“自由化”與“民主化”的唯一明智與正確的選擇！

第2節 西周的宗法奴隸制

西周分封制度，實際上只是官家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王是全國土地的唯一所有者。周王再將土地分封給親屬和功臣，令其為諸侯，按級別佔有土地。王室直接管轄之地，只是其中一部分。但王室是天下諸侯共同的主人，諸侯對王室要承擔一定義務。

公有制，實質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國家的一切都屬於王或公，包括土地和臣民人身。王公把臣民視為“公”產，民不是國家（邦國）的主人，王或公才是國家的主人。“公”=“王”，對這個關係，當時的人是清楚的；而現在的人們還以為自己也有一小份，認為“公”=“你有我有大家有”，其實錯了。當人們說公門、公庭、公府、公家時，指的就是官府，所以，“公子”、“公主”不是大家的兒子、女兒，而是指王公們的兒子、女兒，後來則是對有錢有勢人家子弟的稱呼。即使到了春秋時期，“公”與君主還是基本上一體，“公”就是君主。

那時，“公”把土地分割成一個“井”字形狀。井字中間是“公”有的田，即“公田”，井字的四周共有八塊，分別包給八戶農民耕種。不僅土地歸貴族所有，就是勞動生產工具，也是歸貴族控制。社員們到田頭開始幹活前，要由農官分發工具。土地不准買賣，所謂“田裡不粥”。八戶農民首先要齊心協力把公田種好，然後才能顧及自己的承包田（見《漢書·食貨志》），還要隨時服“公”的勞役甚至兵役。西周時的臣、庶人等奴隸，雖可作為財產被主人賞賜，要到公

田即“大田”、“甫田”上服勞役，他們又有自己的家室和小塊承包地。在整個耕種和收穫的過程中還有“公”派的官員監督，“公”按時視察和舉行各種祭祀活動。

井田制本質上是一種授田制，周朝的諸侯與耕者沒有完整的所有權，只有佔有權、部分使用權和部分收益權，但沒有處分權。魯宣公 15 年（前 594 年），魯國開始實行初稅畝，即不分公田、私田，凡佔有土地者均須按畝交納土地稅。井田之外的私田，從此也開始納稅。這種對私田的承認在很長的歷史時期裡蒙蔽了史家們的眼睛，因為私田的被承認意味著它可以轉讓，這似乎就是處分權了，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並沒有發生任何改變，因此，在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一種完全不同於世界其他地方的土地權利，即土地的二級處分權。

當皇帝或者官僚不動用暴力機器的時候，私田主人可以處分自己的土地，例如轉讓，這是初級處分權，無論轉讓多少次，在政府徵收之前，其轉讓都從屬於初級處分權，如果政府沒有使用暴力徵收，那麼其初級處分權也就僥倖地成為最後的處分權，但是當政府或者官員借皇帝名義需要某塊私田時，他完全可以立刻徵收，理由很簡單：所有的土地都屬於周天子或者後來的皇帝。這是土地的終級處分權，它是土地權利所有權的本質性特徵。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離開過授田制的土地制度。即使被公認為是弱皇權時代的宋代，其土地制度總體含義上也依然沒有改變“王有”性質，否則王安石變法就不可能讓那麼多地方富族傾家蕩產。

從手工業來看，沒有私營工商業主，只有官營手工業。西周時代“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周禮·冬官·考工記》）；金文中把“百工”與臣妾並列，表明從事手工業的勞動者是奴隸。當時政府設計專官，以“僕馭百工”，《國語》謂：“處工就官府”；物品的交換，也由貴族和官吏統一控制，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

“工商食官”，即工商業者吃的是官家的飯。

從教育來看，沒有私立學校，教育由貴族控制，只有官府才能開辦學校，只有貴族子弟才能入學。就算是貴族們想開辦學校，沒有周王的批准是不行的。

在周朝的制度下，沒有自耕農、沒有獨立手工業者和商人，一切生產要素、生產過程和分配過程，都在國王、貴族和貴族官吏的直接計畫控制之下。

魯哀公問宰我祭祀土地神的牌位用什麼木頭？宰我說，夏人用松木，殷人用柏木，周人用栗木，用栗木的用意是“使民戰慄”，就是得讓老百姓害怕。道出了奴隸制的真相。

周朝所建立的封建制和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是不同的。它們的區別是，法蘭克王國的查理大帝按功績給諸侯分封土地，皇帝（領主）受分封契約的制約，為契約封建制；而周人分封土地的原則是血緣，是“親親建國”，中國周代受封的諸侯宗族是嚴格遵守周人制定的宗法制度的，因此中國周朝所建立的封建制，是宗法封建制。

宗法制度是以血緣原則為根本的社會制度，它使家庭而非個人成為了社會的基本細胞。中國的家庭因宗法制度而變得自我封閉性很強，這種封閉性使得每個家庭對本家庭之外的公共勞動帶有強的反動、抵觸情緒，並且使得家庭與家庭之間缺乏合作精神。這使得井田制得不到很好的貫徹而模糊。這種模糊的井田制也只維持了四百年，便開始瓦解了。

人們對井田制的厭惡反映在西周的詩歌集《詩經》中有關勞動的詩篇中，裡面都是農夫們的嗟歎哀怨、憤憤不平的。《詩·七月》篇有“上入執宮功”，《詩·式微》篇有“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中路？”這裡所說的勞役，大多是為君王的造基建宮，大規模的勞役負擔過重、過多，既破壞社會經濟的再

發展，又激起奴隸的反抗。《詩經》中的三百首詩還是孔丘從西周流傳下來的三千多首詩中嚴格挑選出來的，符合自己教義的詩；三百首之外更多的詩因不符合儒教教義而被孔丘無情地刪去了，在那些被刪去的詩中，可以想像得出，反映農夫們抱怨、反映階級矛盾和西周社會陰暗面的詩歌會更多。

第 3 節 戰國秦漢的極權奴隸制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吳榮曾說：“在商和西周、春秋時期，由於村社制還未解體，農業勞動的主要承當者是村社成員，奴隸恐怕只起次要作用。到戰國時期，村社走向瓦解，社會上貧富分化加劇，長期居於統治地位的宗法貴族沒落了，出現了新興的富商和手工業者，還有數量很多的獨立小農。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於是富者大量地利用奴隸去從事物資生產，貧者則因破產而淪落為奴。從這時起，奴隸制也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當時，不但官府使用官奴婢進行手工業生產，商人和作坊主也大量使用僮僕、傭工從事開礦、冶金、煮鹽、制陶、絲織等等手工業生產。當時勞動力的買賣已相當頻繁，出現了固定的或常設的勞務市場，即所謂“傭肆”。至於奴僕的買賣，則往往“售於閭巷”（《戰國策·秦策》）。

秦國的祖先非子，因養馬得到周孝王的賞識，便由奴隸升遷為帶有封土的子爵，封邑于秦。他們的命運被決定于王的喜怒愛憎之間，任免升貶以至封爵殺頭，均憑王及其親信貴族的意志決定。秦國的宰相百里奚就是五張羊皮買來的奴隸。西元前五世紀後期，魏國李悝變法，其《法經》規定：“盜符者誅，籍其家；盜璽者誅，議國法令者誅，籍其家及其妻氏”。“籍其家”就是將其家人全部淪為奴隸。此類法律為當時各國普遍採用，如雲夢《秦律》中有關各式罪犯之家人籍為奴隸的條文不少。前 361 年商鞅變法，“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將從事工商業或貧窮的民眾都淪為奴隸，而官僚集團則按軍功爵秩分配“臣妾”（見《史記·商君列傳》、《商君書·墾令篇》）。說明官府是何等蠻橫地侵犯著民眾的人身權。《商君書·錯法篇》載：“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戰國策·秦策四》謂當時各國“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裘錫圭詳盡論證了當時奴隸數量很大，且在生產上普遍使用，應定性為奴隸制社會（裘錫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2 年出版）。總之，商鞅變法後，秦國的奴隸數量大增，使用更普遍。乃至秦、漢兩代成為中國歷史上奴隸數量最多的時期。一直到清代，統治者也根本沒有保護本國民眾基本人身權的概念，民眾因犯罪與債務淪為奴隸者觸目皆是，人們始終不懂得什麼是“人格權”！

尉繚在秦國就直言不諱地說：如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在統一以後，秦始皇自己也說得很明白“六合之內，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秦始皇在秦軍攻下他少年時曾居住過的邯鄲後，就下令將曾經欺侮過他的人全部“坑殺”。秦嬴政兩次坑儒，活埋了 1 千多儒生。嫪毐家童（奴隸）數千、舍人千餘；嫪毐黨一案，嫪本人被車裂，滅族，20 幾個黨羽被梟首，4000 餘人被流放；政的母親因此案被囚禁，政的 2 個異母弟被屠殺，27 個勸諫釋放太后的大臣被處死，呂不韋被賜自盡。始皇 36 年，有一顆流星落下，有人在隕石上刻字：“始皇死土地分”。秦始皇就把隕石周圍居住的人，全部殺了。

秦朝最高人口數是 2000 萬，全國設置“縣政”約 1000 個，平均每縣 2 萬人。秦始皇為了滿足個人的欲望，在全國廣修宮殿，宮殿數號稱“關外三百，關內四百”，尤其是阿房宮，占地幾裡，能容萬人！《史記·秦本紀》記載：“始皇初即位穿治鄜山，及並天下，天下徒 70 余萬人”。這就是說：他在統一之前就開始了驪山秦始皇墓的工程，徵用民工 70 萬人！始皇 26 年，“徒天下黔首三萬戶

琅琊台下”。始皇 28 年南巡至湘山祠，遇大風，“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始皇 32 年，“乃使蒙恬發兵 30 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修長城役 50 萬人。始皇 33 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謫遣戍，”集解：徐廣曰：“50 萬人守五嶺”。就是說，秦始皇用 50 萬奴隸軍隊，征服了廣東、廣西和越南北部地方，並派兵留守駐防。始皇 35 年，修綿延 300 裡“阿房宮隱宮徒刑者 70 余萬人”。“隱宮”即宮刑。另外，修馳道民夫 30 余萬人。還有那工程浩大的馳道網、規模驚人的徐福船隊……這不是“國家權力只達到縣一級”能實現的。無償服奴隸式兵役和勞役的老百姓共 270 多萬人，為上述軍事和勞役大軍運送糧草和裝備的人以及在內地駐防的軍人、夫役，估計還有 250 萬人，兩項相加約有 520 多萬人。當時，全國人口約 2 千萬人，其中有勞動能力的壯年人（包括婦女），按 1/3 計算，不過 6 百余萬。在 6 百余萬勞力中有 5 百萬人服奴隸式的兵役和勞役。這就是大規模實行奴隸制的證據，以至於“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漢書·嚴安傳》）。始皇死後，太子扶蘇、將軍蒙恬等被秦二世害死；胡亥將自己的 18 個兄弟和堂兄弟斬首，並把 10 個姊妹統統車裂而死，其它連累致死者不計其數。此後，李斯又被斬，三族被誅。

從雲夢睡虎地秦墓的竹簡中可知，秦國的賦稅較之戰國時的其他國家是相當重的。農民除了繳納田租外，還有軍賦等其他名目，以及動輒貲甲貲盾一類變相軍賦。田租不但要收取禾稼（糧食），還要收取芻（牧草）、稿（禾杆）。至於勞役更是農民的沉重負擔，有所謂“傅”的制度，即男子到一定年齡就須向官府登記服役。秦國的傅籍年齡為十七歲。農民除了服勞役外，還要服兵役，並且要自備行裝及費用；被徵發修築某項工程，要擔保一年不壞，如未滿一年就壞了，則須

重修，並不計算服役時間。對於工匠的剝削，則更是前所未有。如：1) “隸臣、下吏、城旦與工從事者，冬作為矢程，賦之三日當夏之二日”。2) “冗隸妾二人當工一人，更隸妾四人當工一人，小隸臣妾可使者五人當工一人”。3) “新工初事工，一歲半其工，其後歲賦功與故等”。凡此種種，莫不表明秦國對勞動力的榨取之精細嚴密。秦二世胡亥統治時，賦稅超過農民收入的 2/3；引發了陳勝吳廣大起義，秦代建國 15 年即亡國。

《漢書·食貨志》記載了戰國初期魏文侯的相國李悝所算的一筆農民收支帳，農夫一家 5 口，耕田 100 畝，平均每畝收糧 1.5 石，共收 150 石。除去十分之一的租稅 15 石，余 135 石。每人每月平均吃糧 1.5 石，全家共吃 90 石，余 45 石。每石賣錢 30 文，共得錢 1350 文。除去祭祀、廟會用錢 300 文，余錢 1050 文，每人穿衣用錢 300 文，全家共用 1500 文，還差 450 文。加上婦女紡織和飼養家畜的收益，全家收支平衡，略有盈餘。

秦朝的人民生活水準，有兩句話可證：“服囚犯之衣，食犬彘之食。”西漢景帝時的大臣晁錯，敘述漢文帝在位時農民生活狀況時，也算了一筆帳：農夫一家 5 口，其中應服徭役的壯男至少 2 人，一年有幾個月不能在家勞動。一家種田不過 100 畝，收穫不過 100 石。還有送往迎來，弔喪、疾病、養育兒女。一遇災荒和急征暴斂，就要賤賣農產品和借高利貸，最後只好賣田宅賣子孫來還債。西漢“文景之治”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農民的生活還不如戰國初期，負擔比周朝高 20 倍的秦始皇時代的農民，生活水準就更加低得不可思議了。

“近幾十年由於秦簡出土，大家對秦的奴隸制有了新的認識，如奴隸在當時是大量存在的，並不像有些人所說的僅是殘餘而已。從秦簡得知，即使在百姓、士伍之類的平民家中，也擁有數量不等的臣妾；官吏、富人家中就更多。而且臣

妾也並非僅從事於家務勞動。簡文中明確表示，有的臣妾要從事于‘田作’，若他們驕悍不從主命，還會受到國法的制裁。官府也有不少的奴隸，有部分奴隸和私家臣妾一樣，也要從事農業勞動。秦不僅有很多奴隸，而且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在田野上服役的。西漢在經濟上和秦有很大的連續性，所以農業中也大量地使用奴隸勞動，而且有關的史料比秦更多。《史記·季布傳》說到的‘田事問此奴’，是西漢早期農業中使用奴隸的一條重要證據。實際上這種現象在當時非常普遍，特別是 1975 年左右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中所出的竹簡，提供了有關這方面的一些具有說服力的材料。如第八、九、一六八號等座墓中所出的竹簡，其中既有奴婢的名冊，有的注明：‘耕大奴四人’，或是：‘田者男女各四人，大奴大婢各四人’，‘小奴一人，持耜’，等等。有些竹簡上還標明奴婢所從事的各種具體職務，有侍、養、謁者、禦、牛僕、馬僕、田等，田當然是指種田，即《季布傳》所說的‘田事’。從事于田的奴婢還有更細的分工。……簡文中的這些田事奴婢，表明他（她）們和侍、禦等不同，乃是一批專職的種田奴隸。古代雖有男耕女織的傳統，但西漢時女奴也被驅使於田地之上，只是以往所不知的事實，因為在文獻中從未提到過。儘管女奴也和男奴一樣用於耕作，但男女之間似乎還有分工，如男奴一般是‘操耜’，操鋤者也有，並不多見。而女奴都是操鋤。鳳凰山竹簡中所記每家擁有生產奴婢人數不算多。這和當時社會經濟某些特點有很大關係。因為每家擁有奴隸的多少，主要由佔有土地多少所決定。從戰國開始，雖然土地也漸漸變為一種能買賣的商品，但並不普遍。土地兼併引起人們重視始于武帝時。到西漢末東漢初，土地兼併比武帝時更嚴重。西漢晚期，張禹有田四百餘頃。同時的庶民陰子方有田七百餘頃。樊重也是平民，他廣開土田三百餘頃。墾殖這些田地的自然是奴隸：‘課役僮隸，各得其宜，而財利歲倍’。從王莽的‘王田’

到劉秀的“度田”，對抑制土地兼併都無濟於事。……《後漢書·第五倫傳》說第五倫，‘免歸田裡，身自耕。’《東觀漢記》則說：‘倫免官歸田裡，躬與奴共發棘田種麥。嘗與奴載鹽，北至太原販賣。’東漢民間大量使用奴隸勞力與農耕，在地下出土的實物材料中也可看出，如四川東漢墓常出土持耜和持鋤的陶俑。東漢時農業生產的特點是大農莊式的多種經營。由於土地更加集中，土地上的奴隸人數也同步增長。特別是從東漢起，隨著私有權的進一步發展，擁有田地之家析產別居的現象日益增多，於是奴婢也和田地一樣為家產的組成部分。張瑩的《漢南記》中則以為‘（明帝外戚）陰慶推居第、園田、奴婢、錢悉分與（弟陰）員、（陰）丹。’東漢時關於田地和奴婢並列在一起的史料，尚有 1974 年四川郫縣所處的一快殘碑：‘（奴婢）五人，直（價值）廿萬（錢）；牛一頭，直萬五千。’

‘王岑田[數頃]，直[數]萬五千，奴田、奴生、奴多、奴白、奴鼠，並五人[直廿萬錢]。’ ‘張王田三十[數]畝，質三萬。奴婢、婢意、婢最、奴宜、婢營、奴調、奴利，並[七人，直廿萬八千（錢）]’。”

“記述秦代奴隸買賣較具體的材料是雲夢秦墓所出的《日書》：‘收日可以入（買）人民、馬牛、禾粟。閉日可以劈決池，入臣徒、馬牛它牲。’ ‘離日不可以嫁女、娶妻及入（買）人民、畜生’。‘毋以午（時）出入（賣買）臣妾、馬牛，是謂並亡’；‘毋以申（時）出入臣妾、馬牛、貨財’。《日書》中所提到的‘人民’即指奴隸而言。‘臣妾’是先秦時期人對奴隸最常用的稱謂。據居延漢簡，西漢時小奴一名值一萬五千錢，大婢一名值兩萬。西漢後期，王褒的《僮約》說一名奴隸值一萬五千。《風俗通》及東漢早期一名男奴值兩萬。東漢晚期，郫縣所出殘碑上所記奴婢價，每名 4 萬錢，這比從西漢到東漢早期的價格為高。”

從戰國到兩漢，是古代商品經濟較為發達的階段。到西漢早期，奴隸勞動在

手工業、礦冶方面比農業更突出。西漢末到東漢，工商業致富者減少，大富豪多為大農莊主，密集型的奴隸勞動和大土地結合。在魏晉時期，人數愈多，一家擁有僮奴往往是上千人或上萬人。

秦漢時農業中的奴隸勞動雖占很大比重，但同時也存在其他不同身份的勞動者。範文瀾敘述說：漢武帝對外用兵，財用不足，需要更多的奴隸共剝削。他對一般無市籍的地主，鼓勵獻出奴婢，按獻出奴隸多少，給予終身免徭役或做郎官等待遇。前 111 年，漢武帝大規模地沒收商賈的田宅、錢財和奴婢，獲得數以萬萬計的錢財。被沒收的奴婢，有些留在本地官田上耕作，有些分發到皇帝的苑囿裡養狗馬禽獸，並分給水衡、少府、太僕（養馬、騾、駱駝）、大司農等各個官府供使用。《史記·平准書》載楊可告緡使“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又說“徒奴婢眾，而下河漕渡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郭沫若據四百萬石推算出這次被押往長安的有 22 萬奴婢。當時的許多奴婢參加了生產。《鹽鐵論·散不足篇》說“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稟衣食……黎民昏晨不釋事，奴婢垂拱邀遊也”；這說明了奴婢比國家奴隸——農民輕鬆愉快！漢元帝時貢禹說，各官府有官奴婢十萬余人，良民出租養活他們，每年費錢五六萬萬。皇帝同時也是佔有十萬以上奴婢的大奴隸主。皇帝佔有大量公田河苑空地，使用奴隸遠不能開發這些田地，有時用‘假（借）’的形式讓貧民墾種，作為皇帝的佃戶。有封地的貴族，收入也分公費和私費奉養兩種。公費是收田租和戶賦（每一民戶每年納千二百），供朝見皇帝、祭祀祖先等事的費用。私費是佔有田地、奴婢及徵收園池商市稅，供貴族私用。（貴族）無限制地佔有田地和奴婢到了西漢後期特別嚴重，迫使某些感到危險的大官員要求朝廷限田、限奴婢。前七年，丞相孔光等奏請：王、侯、公主、

官吏、人民佔有田地不得超過三十頃；佔有奴婢：王二百人、侯和公主一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孔光的主張未實行。

自秦後兩千多年，使用奴婢和農奴的大地主莊園和小土地自耕農並存的生產方式一直是中華諸帝國的生產方式。官方和民間的蓄奴生產方式在中國長盛不衰。各朝各代的蓄奴法律不斷，如唐代的《奴法》、清代的《逃人律》，嚴懲逃奴和窩藏逃奴的人戶。《新唐書》刑法志在論當時的笞、杖、徒、流、死五刑時道：“三曰：‘徒’。徒者，奴也”。

通觀秦漢法律的一個共同的特點是，除了家庭擁有奴隸外，當一個觸犯國家法律的公民所犯的罪行比罰金規定的可贖罪嚴重，但又不嚴重至於處死時，國家的對罪人懲罰和對其他公民的威懾是對其施以徒刑即淪為勞作奴隸（隸臣、妾、城旦、舂）。與死刑相比，徒刑具有保存犯人生命的人道意義，同時又為國家獲得了大批成本最低的奴隸勞動力。

古代奴隸社會為了防止奴隸冒充公民或逃亡，迫使奴隸在身體上留有記號，使其在外表上很容易和公民區別開。這使抓捕逃奴變為易事。當一個公民犯了罰金不能贖而又不至於處死的較重的罪行後，秦漢國家要將其淪為不同級別的奴隸作為懲罰，並根據罪行輕重附加黥（面額刺字）、劓（割鼻）、刖（斬腳）、宮（割生殖器）等不同級別的傷殘人身體的肉刑。秦漢法中在前額或臉部刺字的“黥刑”不減弱奴隸的勞動能力，它和“劓刑”的作用是為奴隸打上持久以至終身不掉的奴役記號或烙印。

漢高祖九年 12 月，“（趙相）貫高等謀逆發覺，逮捕高等，並捕趙王敖下獄。（趙）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為王家奴，從王就獄”（《漢書》67 頁，高帝紀下）。漢高帝曾購求楚將季布千金，濮陽周氏為救他，將其髡賣為奴：“乃

髡鉗季布，衣褐衣，之魯朱家所賣之”（《史記》2729 頁，季布欒布列傳）。可見在秦朝和漢初，私家奴要被剃光頭髮和鬍鬚（髡）並頸戴鐵環（鉗），著褐色奴衣，而公家奴則分為完（髡）刑和部分剃髮須的耐刑二種。男女奴隸的耐髮型類似文革期間為所謂“罪人”剃的“陰陽頭式”。

秦漢國家的軍爵贖身法規定臣民或普通奴隸（隸臣妾）可以為國家做貢獻為親屬奴隸和自己贖身。秦“軍爵律”規定了二級爵（上造）以上的公民降低自己的兩級爵位變為庶人（最低公民）可免去自己的親父母中的一人的奴隸身份；以及第二等級的奴隸（隸臣）斬了足夠敵首而連升兩或三級成為公士（隸臣→（司寇）→庶人→公士）級公民如果降爵位一級為庶人，他可免除自己妻妾一人的隸妾身份的；同理，一個隸臣身份的工匠斬一敵首，或他的親屬或朋友為其斬敵首，他可升為自由工匠，但身體受肉刑的奴工只能成為半自由的國家工匠。

史料證明秦漢隋唐以來的中國的奴隸制度和古代兩河流域的巴比倫、亞述、波斯等帝國的奴隸制度基本上是一樣的。兩河流域早期奴隸制城邦舒如派克時代（前 2600～前 2400）的楔形文字契約表明田地和房產是可以出賣的，但沒有發現奴隸買賣的檔。可見在西亞文明的城邦建立時期，公私家同樣很少使用奴隸進行農牧業生產。戰俘多被處死，而不是用作奴隸。隨後，從拉吞什城邦時期（前 2300～前 2200）到亞述、巴比倫、波斯帝國時期（前 330），奴隸生產制和小農經濟一直並存。在兩河流域奴隸社會中，由於沒有國家奴隸制只有債務奴隸制，巴比倫國家不用戴罪立功贖罪的方法來減少淪為奴隸的公民數量，而是禁止私人家庭把有期限的債務奴隸變成真正的終身奴隸。所有的債務奴隸在被奴役四年後都應獲得自由。當一個國王即位後往往大赦全國的債務奴隸，其事在國王的年名中被稱為“在全國建立了公正（或國民的自由），使人心舒暢”。巴比倫王薩比

烏姆以及漢莫拉比和他的 4 個後代王：三蘇伊魯那、阿比埃舒赫和阿米迪塔那、阿米察杜卡的年名都證實了他們在其元年發佈解負令釋放債奴婢的重大舉措。和秦漢法把被俘的公民淪為國家奴隸不同，當被俘或失蹤的巴比倫士兵回到祖國後，巴比倫法律仍然把他看為公民，把公民享有的份地還給他。當一個在敵國為奴的前公民被商人作為奴隸買回國時，法律要求他的自由不用贖金就立即被恢復。

古巴比倫國家沒有發展到奴隸社會的高級階段——國家奴隸制，還停留在家庭奴隸制階段。法律往往把較重的罪犯處死，而不是淪為奴隸。由於國家對奴隸的數量需求不大，因而沒有株連親屬的法律。前 14~11 世紀的《中亞述法典》比《漢莫拉比法典》晚幾個世紀，其中的刑罰已包括為國王勞動 20 天或 1 個月，但是和秦漢法比照，罪犯被奴役時間非常短。

秦漢國家處於奴隸社會的高級階段——國家公有奴隸制階段：除了公民家庭使用私有奴隸外，奴隸制帝國還大量使用公有奴隸。國家奴隸的來源一部分出自外國戰俘，更多的是帝國通過刑法將犯有不同程度罪行的公民淪為不同級別的國家奴隸。

為了增加奴隸的數量，當一個男公民犯法成為完城旦和鬼薪以上的國家奴隸時，他的家屬也同時淪為國家奴隸。這就是中國奴隸制刑法中特有的“連坐”和“株連”法。怠于農耕生產而致貧困者，本人及其妻子沒為官府奴婢等規定，在秦律中乃為常見。由於皇帝是國家的代表，國家奴隸實質上是王朝的奴隸。這一制度的特點是，每個公民和家族都可以用貨幣購買或者戰功分得奴隸作為自己的財產，但國家或者王朝可以不花錢，通過法律的懲罰可以把許多公民變成奴隸，成為國家奴隸制度最大的受益者。

男奴娶自由女生子：巴比倫奴子為自由人，秦漢奴子為奴隸；自由男和女奴

生子：巴比倫法、秦漢法均為自由人。秦漢法：主和他人的女奴有子：為他家奴婢，男奴隸娶女主或主家女，奴隸處死，女人為國家奴隸。胡伊德說：“漢文帝十三年(西元前 167 年)，齊國的太倉令(王室倉庫主管)淳于公有罪，被押赴首都長安服刑。他的女兒上書，指出死刑和肉刑使死者不能複生，受過刑的人一輩子殘廢，想改過自新也無路可走，她表示自願當官奴婢，請求為父親贖罪。文帝深受感動，令大臣改革肉刑，最後確定將割鼻子改為打三百下，斬左腳趾改為打五百下。但是受刑人常常被打死……”這表明官奴的大量存在。

秦漢等國家奴隸制帝國滅亡的原因正是“專任刑罰”，至於“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敵讎，姦起雲合，果共軋之”，“赭衣(奴隸)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漢書·刑法志》)。這就是歷史發展的辯證性。陳勝、吳廣的首發起義軍多是奴隸、罪徒和貧民；陳涉，甕(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移之徒。

第 4 節 儒家王莽的國家奴隸制

王莽(前 45-23 年)，字巨君，他姑母王政君是漢元帝的皇后、漢成帝的生母。自漢成帝起，王家有九人封侯，五人做大司馬。王莽父親早死，沒有輪到封侯，以致家境孤貧。王莽以孝順母親而聞名，為一時人望之所寄。他的伯父大司馬大將軍王鳳病重，王莽侍疾盡心盡力，親嘗湯藥，亂首垢面，一連幾月不解衣帶。王鳳頗為感動，臨死前將王莽託付給王政君。王莽因此做了黃門郎，躋身政壇，其後終於成為大司馬大將軍。

王莽贍養救濟名士，家裡不留余財，連自己的車馬衣服都拿來分發給賓客。一次王莽的母親生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王莽妻出去迎接，她衣不曳地，破布蔽膝。諸夫人以為是婢傭，後來知道是大司馬王莽的妻子，都驚詫莫名。

漢成帝綏和 2 年（西元前 7 年）的春天，西漢的上空出現了“熒惑守心”的異常天象。所謂“熒惑守心”就是火星（古稱熒惑）在天球上運行到心宿（28 宿之一）的位置。《漢書·天文志》說“熒惑”代表“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更可怕的是“居之三月國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國半亡地，九月地太半亡，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就是說，“熒惑”超過九個月，仍出現在天空上，就有亡國的可能！如此嚴重的惡果，舉國上下豈能不惶遽忱惕！

此時，翟方進的親信議曹（丞相的幕僚）李尋受王莽指使指責翟方進說：“近年來天象異常，災害頻仍，民心浮動，盜賊四起，可為寒心。您久處高位，上無憂時濟世之功，下無舉能讓賢之行，而望永保富貴，難矣！如今大責日甚一日，對您來說，即將降臨的豈但是一般的懲罰而已。現在相府屬官三百餘人，有誰願與您休戚與共，轉危為安的？”王莽又指使皇帝身邊一個小郎官賁麗向皇帝建議說：“現在熒惑守心，應該有一個大臣出來承擔責任。”

處於恐懼中的漢成帝聽了賁麗的話，立刻召見翟方進。接著皇帝賜給他的冊書雲：君在相十年，天下災害並至，民被饑餓；加之盜賊蜂起，貪官橫行；朝中大臣朋比為奸，爾虞我詐，不知誰負其責？……事已至此，君卻幻想久處顯位，豈不難哉！今欲有所黜退，於心不忍，現命尚書令賜好酒十石，牛一條，祝君好自為之。

就這樣，這個汲汲于富貴的翟方進，讀完詔書的當天，便自殺身亡了。翟方進死後，漢成帝下令封鎖消息，不許透露翟方進的死因（讓人知道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誰還敢跟你辦事）。隨後為他舉行了空前盛大的葬禮，所用葬物和禮數都超過了以前任何一屆丞相。漢成帝多次親臨弔祭，還派九卿追贈翟方進以丞相高陵侯印綬，諡曰“恭侯”，讓其長子翟宣繼承侯位。這就是專制主義的政治，

既醜惡，又虛偽，令人作嘔。翟方進死後不到一個月，這位皇帝就死了，在位 26 年，享年 45 歲。

漢成帝死，哀帝即位，新的外戚傅氏、丁氏掌權，王家受到沉重打擊。王莽因得罪傅太后，被免職歸家。他閉門自守，兒子王獲殺了一個奴婢，被王莽逼令自殺。但王莽在士人中的聲譽日增。官員為王莽鳴冤上書的數以百計。

漢哀帝死後，王莽迎立中山王劉箕子為帝，是為漢平帝。平帝只有九歲，由太皇太后王政君臨朝聽政。王莽位居首輔，一切政令都出自他。王莽著手清除權傾一時的丁傅外戚的勢力，將皇太后趙氏貶為孝成皇后；接著再廢傅太后、趙皇后為庶人，皆自殺。丁、傅兩家親屬都被免去官職，流放蠻荒之地。

有一年盛夏大旱，郡國飛蝗成災，王莽自己帶頭不吃葷，並出錢一百萬，獻田三十頃，以賑災黎。滿朝公卿，見王莽如此，也都紛紛捐田獻宅。連王太后也省下自己的“湯沐邑”十個縣交給大司農管理。王莽派使者去民間捕蝗。又廢漢皇室的呼池苑，改設安民縣，募貧民遷居，沿路飲食及所需田宅、器具、犁牛、穀種、食糧都由官府供給。在長安城中造五個裡，有住宅二百區，讓貧民居住。因此朝野上下，都交口稱頌王莽的仁德。

為籠絡人心，王莽欲自比周公，買通塞外蠻夷，讓蠻夷假稱越裳氏，獻入白雉。遠古周成王時，曾有越裳氏來朝進獻白雉。群臣仰承王莽之意，上書稱王莽德及四夷，早已超過了周公，以安定漢朝的緣故，應加封為安漢公。王太后在群臣蠱惑下，再三加封王莽，王莽十分做作地再三推辭，甚至託病不朝。最後才接受了安漢公的賜號，接受了名號，卻把俸祿轉成二萬八千人的封賞。又有黃支國獻入犀牛，廷臣都說黃支國在南海中，離京師三萬里，以前從來沒有朝貢，現在來獻犀牛，是安漢公的威德所致。其實這些都是王莽一手安排。

王莽私下囑咐大臣，上奏稱王太后春秋已高，不宜親省小事，此後政事盡歸王莽裁決即可。之後朝中只知有王莽，不知有漢帝。平帝年已十四歲，漸漸懂事，恨王莽的專橫跋扈。宮中的侍役多是王莽安插的耳目。王莽得知後，便先下了手，他在臘日進獻一杯毒酒。平帝喝了酒後，腹痛難忍。王莽假意做愁眉淚眼的樣子。並寫了一篇祝文，情願以身代帝，然後將祝文藏在金縢裡（金縢藏策本是周公因武王有病，願甘代死的典故）。群臣都稱譽王莽是再世的周公。不久平帝腹痛而死，時年僅十四歲。

王莽的長子王宇因呂寬案，被王莽逼迫自殺，牽連數百人。由此他得到了大義滅親、公而忘私的美名。王莽的妻子病而失明，王莽叫兒子臨去照顧。臨和王妻的侍女原碧私通，後來王莽又佔有了她，臨就和原碧密謀要殺王莽。不幸事泄，王莽為了保密，竟把辦案的人全部殺掉，以毒酒賜臨，臨不肯飲，自刺身亡。王莽後立四子王臨為太子。

平帝年幼無子，群臣想在宣帝曾孫五人中推立一人，王莽藉口五王都是已故平帝的兄弟，不能相繼為帝，應在宣帝的玄孫中選立。宣帝玄孫有二十三人，王莽卻找了一個年僅兩歲的劉嬰為皇太子，號為孺子。

這時讖緯禪讓之說盛行。武功縣長孟通在井中得到一塊白石，上有紅字：“告安漢公王莽為皇帝。”王莽派王舜將此事轉告王太后，太后作色說：“這純是欺人的妄語，不宜施行！”王舜說：“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鎮服天下罷了”。王太后無奈，只好下詔封王莽為“假皇帝”。從此王莽身穿天子袞服，戴天子的冕旒，南面受朝，出入坐鑾駕，自稱為“予”。年號稱為居攝元年。

王莽攝政時的西元 7 年，東郡太守翟義舉起反王莽的大旗。長安周圍的三輔

地區共 23 縣，聽說翟義在東方舉起反王莽的義旗，也一哄而起。翟義兵敗後，被押解到陳縣（今河南省淮陽縣），當眾碎屍萬段。王莽將翟宣、劉信的兩個兒子等 24 人在長安當眾碎屍萬段。王莽又把翟義的府第全部毀掉，然後用水淹沒。把翟方進和翟家的祖墳全都刨開，焚棺揚屍；並將翟氏家族成員殺個精光，之後，同葬一坑，裡面還埋上五種毒草。西元 8 年 2 月，陝西的叛亂被平定，23 個縣遭官軍的屠殺。王莽下令在叛亂猖獗的地區：濮陽、無鹽（今山東省汶上縣西北）、圉縣、槐裡、周至（今陝西省周至縣東）凡五處，在大路通衢之側，用被處死的人的屍體，建起長寬各 5 丈，高 6 尺的“武軍”，上立高 1.6 丈的大標牌，書寫“反虜逆賊鯨鯢”幾個大字，用以警告效尤者。這就是他的“仁者愛人”。

齊郡臨淄縣亭長辛當，夜裡夢見天使對他說：“攝皇帝當為真皇帝，如若不信，亭中發現新井，便是確證。”第二天早晨辛當起來，見亭中果然有一口深百尺新井。巴郡也有石牛出現，上有紅色的文字，大體都是上天命王莽為帝之類的话。王莽便改年為初始，以應天命。

西元 8 年，在長安學儒學的梓潼人哀章投合王莽，私下制了一個銅匱，上刻傳位王莽的讖言。哀章穿黃色衣冠，扮成一個方士，趁黃昏將銅匱交給高祖廟裡的守吏，然後裝神弄鬼地匆匆離去。守廟官忙報知王莽，王莽打開銅匱，上刻攝皇帝王莽應為真天子，並署佐命大臣十一人，當然少不了哀章的名字。次日王莽率群臣入太祖廟拜受金匱禪位，定國號為“新”。廢孺子嬰為定安公，西漢滅亡。王莽照金匱策書按名授官，只有王興、王盛兩個姓名，是哀章捏造的；王莽遣人四處尋訪，不久找到一個城門令史叫王興，還有一個賣餅的叫王盛，當即把他們封為將軍。

很多人都極力支持王莽稱帝，其中包括著名的大學者劉歆和身居要職的孔子

世孫孔光。王莽上臺後，就急忙任命了西漢大儒劉歆為“新朝儒家大帝國”的國師，在王莽眼看著要被推翻的節骨眼上，劉歆背著王莽前去勾結原漢朝的將軍王涉、大司馬董忠，後因事泄而自殺。

王莽自稱為黃帝虞舜的後裔，尊黃帝為初祖，虞舜為始祖。王莽是儒家學派的鉅子，以一個學者建立一個龐大的帝國，中國歷史上僅此一次。王莽要把儒家學說在政治上——實踐，締造一個理想的快樂世界。王莽機械的迷信制度萬能，他認為“制度確立之後，天下自然太平”。他認為古代社會中，人人平等，可到了後來，互相爭奪，遂發生不平等現象。富人有很多土地，窮人一無所有。男子淪為奴隸，女子淪為婢女。為了剷除造成這種不公平的罪惡，王莽的新政府成立後，即實施一連串下列的新社會政策：

①土地國有：恢復 1200 年以前的井田制度。稱天下田為王田，不得私下買賣。一家不滿八口，田過一井（九百畝），超過的土地，一律沒收，或分給他的鄰居。

②耕地重新分配：沒有土地的農夫（佃農），由政府分給土地。以一對夫婦一百畝為原則，不滿一百畝的，由政府補足。

③凍結私奴制度：雖沒有馬上廢止，但禁止所有奴隸婢女繼續買賣，違令重罰。以限制奴隸的範圍和數目不再擴大，使它最後自然消滅。

④強迫勞動：凡無業遊民，每人每年罰布帛一匹，無力繳納的，由政府強迫他勞役，在勞役期間，由政府供給衣食。

⑤實行專賣制度：酒專賣，鹽專賣，鐵器專賣，由中央政府統一發行貨幣（從前任何富豪都可製造銀錢，新政府收回這種授權）。天然資源都為國家所有，由政府開採。

⑥建立貸款制度：人民因祭祀或喪葬的需要，可向政府貸款，不收利息。但為了經營農商事業而貸款，則政府收取純利十分之一的本息。

⑦實行計劃經濟：由政府控制物價，防止商人操縱市場。食糧布帛之類日用品，在供過於求時，由政府照成本收買。求過於供時，政府即行賣出，以阻止物價上漲。

⑧徵收所得稅：一切行業，包括漁獵、卜卦、醫生、旅館，以及婦女們家庭養蠶織布，都課征純利 1/10 的所得稅。政府用這項收入作為貸款或平抑物價的資金。

百姓養生嫁娶、宮室封國、刑罰、禮儀、田宅車服等儀式皆遵照西周制度。王莽儆遵儒家“正名”學說，他用儒家學派特有的繁文縟節，不憚其煩的改官名、改地名，凡是“現代”的全都取消，一律恢復“古代”原名。改的太多，以致沒有人能記得住。

西漢政府對西南夷諸部落酋長，大都用王爵羈縻，這不過是不費一文的虛名，王莽卻改封他們侯爵。句町王拒不接受（句町國，雲南廣南），首先起兵叛變。王莽又把西漢政府頒發給匈奴汗國單于的金印（匈奴單于璽），改為“新匈奴單于章”。皇帝的印稱“璽”，“章”是普通人的印，烏珠留若單于氣沖牛斗，遂跟中國斷絕關係。

王莽認為自己比任何人都聰明，他不能容納與他意見相異的建議。他對句町國和匈奴汗國的反抗，採取迎頭痛擊政策。

王莽連年挑起戰事，所需人不敷出，於是只有課重稅於民間：鹽稅、酒稅、鐵稅、山澤採辦稅、賒貸稅、銅冶稅等等多如牛毛。貧民無法謀生，富人也朝不保夕。揭竿造反的流民，四處攻城掠地。王莽正與匈奴作戰，顧不上這些，便親

自去南郊禱天禳災，用五彩藥石燒了一個北斗形的銅鬥，號為“威鬥”，用來象徵性地平息天下的叛亂。

天鳳四年，全國發生蝗、旱災，饑荒四起，王莽叫百姓煮草根以代糧，赤眉、綠林軍相繼揭竿而起。更始帝劉玄在綠林軍支持下即位，派王鳳、王常、劉秀進攻昆陽等地。莽軍一觸即潰，在昆陽之戰以 40 余萬軍不敵萬余兵力的劉秀，巨毋霸也掉進河裡被淹死。

地皇四年，王莽率群臣至南郊，舉行哭天大典，稱“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綠林軍另一支勁旅攻入長安，王莽赦免城中獄中的囚徒，授給他們兵器，並飲血盟誓說：“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更始將軍史諶攻佔渭橋，這些囚徒都跑得無影無蹤。城中起火，王莽逃到漸台，漸台四面皆水，王莽還抱著符命、威鬥等一些不管用的玩意，公、卿、大夫、侍中、黃門郎從官千餘人隨他上了漸台。城中少年回應，商人杜吳在漸台殺了王莽，校尉公賓斬其首，起事軍將首級懸于宛市之中，王莽時年 68 歲。當時有人割王莽舌切碎分食，因為人民痛恨王莽用他那條長舌一再向人民許願過好日子，結果是一次又一次的騙局。

由儒生把持的正統修史者把王莽定義為不道的奸臣、篡位的賊逆，儒家人物甚至拒絕承認王莽本人就是儒門弟子。遍查正史，關於王莽出身的資料只有含糊其詞的五個字：“被服如儒生”。言下之意是說“啊，這個王莽嘛，咋說呢，好象是穿了一件俺儒家的衣服。”

第 5 節 三國到隋唐五代的奴隸制

三國和晉代，奴婢制仍如秦漢，被稱為“私屬、私附”或“蔭衣食客”。同時出現農奴，被稱為“有蔭佃客”或“部曲”。東漢末大亂，人口遭受極嚴重的損耗。主要是死亡，其次是流散逃匿和豪強霸佔戶口，脅迫貧弱戶當私屬。晉武

帝又發官奴婢、屯田奴婢配為夫婦，每一百人成立一屯。與限田制同時頒佈的有蔭佃客和蔭衣食客(與奴相似的僕役)制。蔭佃客制規定一品二品不得過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六品三戶、七品二戶、八品九品一戶。蔭衣食客制規定六品官以上得蔭三人、七八品二人、九品及不入品的吏士一人。晉惠帝時，石崇做荊州刺史，家有水碓三十余區，奴八百餘人。石崇經常大宴賓客，令美人行酒，如果客人飲酒不盡，就令人斬勸酒美人。有一次丞相王導與大將軍王敦一起拜訪石崇，石崇請他們喝酒。丞相平素不能飲酒，只好勉強應付，以至大醉；大將軍敦故意不飲酒，看石崇咋辦。這樣，勸酒女郎因未“完成任務”，一連被斬了三人。旁人十分緊張、不安，勸大將軍敦快飲酒吧！敦卻說：“他殺他的人，和我有什麼關係！”真是無恥之尤。士族婦女同樣腐朽。她們使用婢僕，自己啥事都不做。有的兇悍殺婢妾，沒有人指責。

東晉士族的特權之一是“私藏戶口，以為私附”，山遐作餘桃令，到縣八十日，即查出私附一萬人。從東晉到梁陳，有所謂估稅，凡買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卷的大買賣每一萬錢抽稅錢四百。人民被迫或自斷手足、避免重役，或投靠士族做附隸，稱為屬名。南朝士族多有奴婢。如晉陶侃有家僮千數，刁協家有奴婢數千人。宋謝混有奴僮千數百人，沈慶之有奴僮千人。普通士族家庭，也把奴婢當作重要財產，兄弟分家時分取奴婢。奴婢主要用在耕田、織布；有時也派奴到遠方去經商，不會逃走。525年，梁將元法僧逼迫彭城兵將三千餘人來建康，都印額為奴。可見，奴隸額上印著字，無法逃走。齊時，劉寅使奴當伯上廣州，經過七八年還是回來了。奴婢來源主要是破產農民。侯景作亂，奴隸成為侯景唯一的支持者。奴婢一人抵米六鬥或值錢五千至七千，奴婢價格比西漢時的一萬伍千到四萬賤了不少。

在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國，奴隸制度更為發達。擄掠人口又為北魏武官致富的重要手段，最大的人口擄掠者就是魏皇帝。東晉安帝時，仇池公楊盛上表敘述魏國情形，說魏國妃妾都住瓦房，有婢女千余人，織綾錦、養豬羊、牧牛馬、種蔬菜、販賣牟利。以皇帝為首的統治集團下至一部分鮮卑士兵各佔有多少不等的奴隸。《魏書》稱奴隸為俘獲，有些稱男女或新民，有些稱生口，前者指民戶或隸戶，後者指奴婢。將士私自俘獲的人應是屬於生口類。魏太武帝時俘獲的生口數量更大，不僅頒賜給出戰的將士，而且還給留台未出戰的文官頒賜生口、繒帛、馬牛各有差。魏國存在著大量的奴隸，從事生產來供養文官和鮮卑兵。

同時，漢族人也奴役外族俘虜。匈奴人劉宣說：“晉為無道，奴隸禦我”（《晉書》33卷）。一般匈奴人給晉地主作田客，有些地主役使匈奴田客多至數千人。為了防止被掠為奴隸，外族人願為私人當田客（種田農奴）。後趙王、羯人石勒曾是並州商人郭敬和地主甯驅的田客。當他逃荒時，晉官吏想縛他賣為奴，由於甯驅的保護得免。他外出求食，得到郭敬的施捨。他建議郭敬把饑寒交迫的羯人騙到冀州出賣為奴，不至於餓死。並州刺史司馬騰大捉胡人，兩人一枷，押到冀州出賣，石勒也被執賣給平縣師歡家為耕奴。師歡怕他鼓動耕奴們反抗，把他釋放。他給人家當傭工，又被亂軍捉獲。為了不被賣為奴，他聚八騎起義，後殺敗晉新蔡王司馬騰。鮮卑慕容部人皮膚潔白，晉士族多買慕容部婦女為婢妾。

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士家、佃客和部曲，既是豪族地主的親兵，又是附屬於他們的農奴。北魏、北齊、隋、唐各朝的均田和租調、徭役制度，都規定了奴隸課稅或不課稅。這表明奴隸是這一時期的重要人力和財富資源。由於各家的奴隸數量多，北齊只能給一部分奴婢受田，但即使是平民也多擁有 60 個奴婢。京城“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止而二百人，八品以下至庶人限止 60 人”。“北

齊均田法，普通民眾一夫受露田 80 畝，一婦 40 畝，奴、婢與良人同。丁牛一頭受田 60 畝，不得多於 4 頭。每丁受永業田 20 畝種桑麻。齊制和魏制不同處在於齊制奴婢不受永業田。557 年，齊文宣帝時，宋世良請分牛地給貧人，說富家利用奴婢牛受田的制度迫使貧人無立錐之地。周武帝遵行齊制，隋文帝也尊齊制。”

581 年，度支尚書蘇威奏請減課役，得到隋文帝的允許。單丁和僕（部曲）隸（奴婢）半課。604 年，隋煬帝即位，廢除婦人、奴婢、部曲的課役。唐租庸調法採用隋煬帝的新制，不再取婦人課役。男丁（23-58 歲）和受田中男（18-22）向國家納租和調絹並服役。

北周武帝數次釋放奴隸和雜戶，但允許北周貴族保留一些部曲和客女。隋末平涼一帶有所謂“奴賊”，首領出身奴隸，士兵自然不少出身奴隸。唐軍中有奴隸應募作戰，立功後得賞，經隋末戰爭，奴隸和部曲的人數更為減少。唐刑部屬官有都官郎中，掌管奴隸。奴隸來源是俘虜和叛逆犯的家屬。通年服役者稱為官奴婢。免（朝廷下大赦）一次稱為番戶，每年服役 3 番，每番一個月。免兩次稱為“雜戶”或官戶，每兩年服務五番。免三次成為良人。

唐代奴婢數量眾多。唐高祖李淵曾賜給功臣大批奴婢，如給武則天的父親武士護奴婢 300 人，別食實封 500 戶。司農寺將官戶奴婢有技能者配諸司，婦人入掖庭，以類相偶，行官監牧及賜王公、公主皆取入。凡孳生雞彘，以戶奴隸課養。俘口則配輕使，始至給享食（《新唐書》志 38，百官 3）。稅法即行，京兆少尹韋楨、長安丞薛萃搜督甚峻。然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載得 80 萬緡。唐朝的登萊沿海奴婢買賣中有大量的新羅人被賣為奴。唐代佛教寺廟的奴婢也甚多，平均每個僧尼有一個多奴婢：武宗即位，毀天下寺廟 4600；籍僧尼為民 26 萬五千人，奴婢 15 萬人，田數千萬頃。……中下田給寺家奴婢；丁壯者為兩稅戶，人

十畝（《新唐書》志 42，食貨 2）。由於奴婢在唐代屬於不課口，可從唐代的人口普查數中的不課口數中估計出當年的奴婢數量。唐代戶分課戶和不課戶兩類。無課口的戶稱為不課戶：1、貴族和外戚的親屬；2、九品以上的官員；3、學生以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戶的人；4、老（60 歲以上）、殘廢、重病人、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流內九品以上官’（當是流外九品），本人免課役，稱為‘不課口’；5、有勳的百姓（非勳官的有功者）；6、新附戶暫免課役。據《通典》，755 年（天寶 14 載），天下不課戶 345 萬戶，課戶 534 萬。人口總數 5291.9 萬，其中不課口 4470 萬，課口 820.8 萬。”如果不課口中的女自由人和未成年人為總人口的四分之三，為 3352.5 萬，不課口中的男人加婢的數量則為 1117.5 萬。貴族、九品上官員、學生、義夫節婦家屬、老殘、寡婦、有功者和新附戶的數量不會超過不課口總數的一半，因此保守地估計當時奴婢和部曲的總數有 558.75 萬人。而普通課稅的平民男子才 820.8 萬，奴隸數量已近于平民。前一年（天寶 13），不課口為 4521.8 萬人，課口男丁為 766.2 萬人（總人口 5288 萬，《舊唐書》玄宗紀），奴婢和平民的比例更近似。當然，可能有些逃亡、隱藏的課戶不在統計之中，可是他們只能依靠豪強生活，淪為新的奴婢、部曲或佃戶。部曲和佃戶的身份是不比奴婢強多少的農奴。760 年（唐肅宗乾元 3 年），《通典》說，本年不課戶 117 萬戶，課戶 75 萬戶。總人口 1699 萬，不課口 1461.9 萬人，課口 237 萬人。5 年內，平民減了 2/3，但奴婢、部曲、佃戶數量減的少一些，不到一半。不課的的婦女和未成年人約占人口的 3/4，則為 1274.25 萬；這樣，不課口中的男性中的自由人（貴族、官員、老殘等）和奴婢為 187.65 萬人。按一半除去不課口中的男性自由人，當年的奴婢則估計至少有 93.83 萬人，接近平民男子 237 萬的一半。唐代皇室、貴族和豪強的莊園遍佈全國，由奴婢和佃戶耕

種。佃客的身份是莊主的私屬。

《唐律疏議》還把部曲和奴婢並舉：“奴婢部曲，身系於主”；“部曲奴婢，是為家僕，事主須存謹敬。”唐律中關於部曲、奴婢卑賤身份地位的大量規定以及授予主人對賤口近乎生殺予奪的權力，反映的即是世家大族利用父家長制的宗法血緣關係，利用倫常名教，確定賤口卑賤的身份等級地位、藉以強化對依附勞動人口的佔有與超經濟強制的意志。為什麼父家長制下的奴隸命運更為悲慘？為什麼唐律規定下的賤口，身份地位在許多方面比羅馬法下的奴隸還要低賤？這顯然是與父家長在宗族與家庭關係中的絕對統治地位聯繫在一起的。

第 6 節 宋代的奴隸制

宋代至清代，中國的佃客制度盛行。佃客比奴隸的地位要好一些，但低於有田地的良民（自由人），屬於半自由人。古代兩河流域有一種附屬於王室和貴族的半自由人叫“臣服者”，其社會和法律地位在自由人和奴婢之間，等於中國的部曲和佃客階級。部曲和佃客制度比奴婢制度略為進步，是地主豪強奴役農民的農奴制度。

蔡美彪等論述說：“唐代中期以來，地主佔有大片的田地，形成莊園。宋代地主的莊園，更加普遍地發展。所謂‘浮客’的佃戶也寄住在地主的莊上。佃農自己完全沒有土地，租種地主的土地。一家大地主可有佃客幾百戶。兩川一帶的大地主可有數千戶。佃農遭受著地主的地租和高利貸剝削，被緊緊地束縛在地主的土地上”。“高利貸剝削——伴隨著租佃制關係的發展，地主放高利貸成為重要的剝削手段。農民冬春借糧，以夏麥償還。夏麥償還了債，春秋再借糧，以冬禾償還。收成還債甚至還不足，無法交租，再把欠租作為借債加利。這樣，農民年年要借債，永遠還不清。在宋代社會經濟中，高利貸剝削成為極為嚴重的問題。

地主用地租和高利貸剝削、束縛著佃農。而且還可以用‘換佃’的辦法相威脅，加重盤剝。佃農卻不能隨意離開地主的土地”。 “宋朝建國前，南方各割據國裡，地主和佃客和剝削關係發展程度不同。佃客的人身束縛，即所謂人身依附關係，各個地區也存在著一些形式上的差異。宋朝建國後，這種差異性仍在不同的地區顯現出來。總的來說，在南宋統治時期，隨著土地兼并的發展，佃客的人身束縛在不斷加深。仁宗時，頒佈‘皇祐法’，禁止夔州路的施、黔二州的佃客逃移。1184年，南宋把《皇祐法》的通行範圍擴大到忠、萬、歸等州，即擴大到整個夔州路；並規定：1)凡在1181年以前逃移他鄉三年以上者，承認既成事實；以後逃移及逃移不到三年者，包括家屬，‘一併追歸舊主’。此後，嚴禁逃移。2)地主不得‘強搬佃客’，即不准搶奪佃戶。1205年，夔州路轉運判官范蓀說：‘富豪之家爭地客，誘說客戶，或帶領徒眾，舉世搬徙。’可見地主之間招誘搶奪佃客的現象仍在發展。范蓀校定後的“新法”是：1)地主只能役使佃客本人，不得強迫佃客的家屬充役；2)典賣田宅的人不得向買主租種原有的土地充當客戶。買主也不得強迫典賣田宅的人充當雇工或奴僕；3)借貸錢物，只憑文約交還，債主不得強迫債戶為地客；4)客戶身死，妻子願改嫁的，聽其自便，客戶的女兒也可‘自行聘嫁’。范蓀的‘新法’，從條文上看，是對地主的權力稍加限制；但也從反面說明：當時夔州路的地主，可以強迫役使佃客家屬，強迫典賣田地和欠債的人作佃客，以至於干預佃客妻女的婚嫁。這種佃客的人身束縛，當是夔州路普遍存在的現實。”

戴建國討論了宋代的奴婢制度，提出新出現的“雇傭奴婢”制度。在宋文獻中，經常出現“主僕名分”、“奴主之分”之說，用以指奴婢、佃客與雇主結成的關係。雇傭奴婢以契約形式與雇主結成主僕關係，成為雇主家族中的卑幼之

輩。在日常生活中，雇主以家長身分對奴婢進行監管。……奴婢在僱傭期間，猶如賣身于雇主，毫無自主權。僱傭期間，雇主可以佔有女使的身體，女使沒有性自主權。在唐代，奴婢如同財產可以買賣。至宋代，奴婢普遍以僱傭形式依附于雇主。南宋禁止略人為奴婢，違者處死刑，似乎與宋初制定的《宋刑統》規定一樣。然在民間，由於種種原因，還存在略賣奴婢現象。這些人被略賣後，“終身為賤”。

唐末五代以來，門閥士族徹底瓦解，良賤制受到強烈衝擊，從而為賤口奴婢的解放開闢了一條大道。大量奴婢成為自由人。奴婢來源逐漸枯竭，導致奴婢市場萎縮。相反，僱傭市場卻隨之擴大。許多失去生產資料的貧困良人出賣勞動力，與雇主結成契約關係，從事原來賤民所從事的職業。但是奴婢制並沒有立即隨著門閥世族的消亡而立即消失。北宋時期，還存在法律意義上的良賤制。良賤制的消亡是在南宋時期。原先賤口奴婢所從事的家內服役者的職業仍然存在，由於良賤之別的觀念不可能隨著良賤制度的消失而立即消失，這一職業的後來承擔者，在民間仍然被當作賤口奴婢看待。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在兩宋不同的時期，因良賤制度的存亡而有所變化。宋代奴婢因主僕名分的影響，依附于雇主，沒有自主權，在司法上，與雇主發生法律糾紛時，以家族同居法處置，法律上與雇主仍處於不平等地位。在北宋，奴婢實際是由賤口奴婢和良口奴婢組成的混和體。作為賤口的奴婢，依然是律比畜產，被當作家庭財產與雜畜、貨物同處一列，自由買賣。在賤口奴婢之外，普遍存在良口奴婢，他們來源於生活貧困的良人。他們以締結契約的方式，與雇主結成僱傭關係。相對於唐代的奴婢，宋代奴婢地位的提高主要是由於其成分的變化所致，即良人奴婢化的結果。在良賤制受到衝擊後，原來舊的針對賤口奴婢的法律無法適用於新的良口奴婢。

《金瓶梅》中的人一一賤。譬如：甘願為奴，人的價錢不如物，雇工 2-3 月的工錢相當於奴婢身價相當於一次通風報信的價錢，特權階級可以隨便殺人而不受追究。

第七回寫甘願為奴：婦人聽見話頭，明知張四是破親之意，便佯說道：“自古船多不礙路。若他家有大家子，我情願讓他做姐姐。雖然房裡人多，只要丈夫作主，若是丈夫喜歡，多亦何妨。丈夫若不喜歡，便只奴一個也難過日子。況且富貴人家，那家沒有四五個？你老人家不消多慮，奴過去自有道理，料不妨事。”張四道：“不獨這一件。他最慣打婦煞妻，又管挑販人口，稍不中意，就令媒婆賣了。你受得他這氣麼？”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差矣。男子漢雖利害，不打那勤謹省事之妻。我到他家，把得家定，裡言不出，外言不入，他敢怎的奴？”張四道：“不是我打聽的，他家還有一個十四歲未出嫁的閨女，誠恐去到他家，三窩兩塊惹氣怎了？”婦人道：“四舅說那裡話，奴到他家，大是大，小是小，待得孩兒們好，不怕男子漢不歡喜，不怕女兒們不孝順。休說一個，便是十個也不妨事。”張四道：“還有一件最要緊的事，此人行止欠端，專一在外眠花臥柳。又裡虛外實，欠人家債。只怕坑陷了你。”婦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少年人，就外邊做些風流勾當，也是常事。奴婦人家，那裡管得許多？惹說虛實，常言道：世上錢財儻來物，那是長貧久富家？況姻緣事皆前生分定，你老人家到不消這樣費心。”

第九回寫人不如物：西門慶用 16 兩銀子買了一張黑漆歡門描金床，……西門慶把春梅叫到金蓮房內，令他伏侍金蓮，趕著叫娘。卻用五兩銀子另買一個小丫頭，名叫小玉，伏侍月娘。又替金蓮六兩銀子買了一個上灶丫頭，名喚秋菊。排行金蓮做第五房。

而古希臘的荷馬曾提到，一名女奴可與 20 頭耕牛交換。據法國學者格羅茨所引史料，西元前 410 年雅典人獻祭所用牛的價格為平均每頭 51 德拉克瑪，不足同期奴價(1.7—1.8 明那)的 1/3；前 375 年牛價漲至每頭 77.25 德拉克瑪，不足同期奴價的 1/56。由於蓄養奴隸費用高昂(一名奴隸的年生活費相當於 3—4 頭牛的價錢之和)，因而凡購置並使用一、二名奴隸的公民，他在理論上至少可擁有 8—16 頭牛。因此，那種認為擁有一、二頭牲畜就自然可擁有一、二名奴隸的說法，是缺乏必要的史實依據的。可見，西方自古人貴物賤。

找證據要 15 兩銀。武二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幼，倒有養家孝順之心。……”向身邊摸出五兩碎銀子，遞與鄆哥道：“你且拿去與老爹做盤費。待事務畢了，我再與你十來兩銀子做本錢。你可備細說與我：哥哥和甚人合氣？被甚人謀害了？家中嫂嫂被那一個娶去？你一一說來，休要隱匿。”這鄆哥一手接過銀子，自心裡想道：“這些銀子，老爹也勾盤費得三五個月，便陪他打官司也不妨。”

雇工的工價。那傅夥計是個小膽的人，見武二發作，慌了手腳，說道：“都頭息怒，小人在他家，每月二兩銀子雇著，小人只開鋪子，並不知他們閑帳。……”

通風報信的價錢：“且說西門慶正和縣中一個皂隸李外傳在樓上吃酒。原來那李外傳專一在府縣前綽攬些公事，往來聽氣兒撰些錢使。若有兩家告狀的，他便賣串兒；或是官吏打點，他便兩下裡打背。因此縣中就起了他這個渾名，叫做李外傳。那日見知縣回出武松狀子，討得這個消息，便來回報西門慶知道。因此西門慶讓他在酒樓上飲酒，把五兩銀子送他。”

“梁中書乃東京蔡太師女婿，夫人性甚嫉妒，婢妾打死者多埋在後花園中。”

第 7 節 遼、金、元的奴隸制度

遼、金、元等遊牧民族建立的王朝都是由原始社會剛進入到奴隸社會，他們

的奴隸制非常明顯。遼、金、元設置的“投下州縣”是安置集體奴隸的地方。這和兩河流域的亞述帝國、希臘的斯巴達奴隸城邦迫使大批的俘虜遷移到國內作為集體奴隸的做法是一致的。“遼阿保機南侵漢地，俘虜大批漢族居民做奴隸。在阿保機和遼太宗時代，先後建立了許多這樣的奴隸州縣。如阿保機破代北擄掠的漢民建龍化州，燕、薊所俘建龍化縣。以燕薊的俘虜建臨潢縣，以渤海俘虜建長寧縣。這樣的州縣有時仍然沿用俘戶原屬州縣的名稱，如以檀州的俘戶建檀州，俘三河縣民建三河縣。這些所謂縣民戶少則一千，多也只四五千，其實只是奴役外族的寨堡。俘戶州縣起初當是屬於契丹最大的奴隸主阿保機。皇后另有自己的州縣。契丹貴族也各自佔有這樣的寨堡，稱‘投下’或‘頭下’。遼朝境內分佈著大小奴隸主所佔有的大大小小的‘投下’城堡，以奴役‘團集’的俘掠奴隸。”遼朝中期，奴隸制開始變為農奴制。“聖宗時，遼朝普遍實行賦稅制。俘掠奴隸設置的投下州城，分賦稅二等，工商稅中、市井之賦歸投下，酒稅繳納給朝廷。投下俘奴由此變為輸租於官、納課於主的‘二稅戶’。”

按照金朝的授田制度，女真奴隸主依照佔有奴隸和牲畜的多少，佔有不同數量的耕地。凡佔有耕牛一具（3頭），民口25，即授田四頃零五畝。民口包括奴隸和女真部落的平民。占田不能超過四十具。一個大奴隸主，有牛120頭，民口以千，就可占地160多頃。金朝奴隸主在滅遼的作戰中，曾經掠回大批的契丹、漢人作奴隸。對降服區的人民，採用強迫遷徙的辦法遷到內地。如山西州縣的居民被大批遷到上京以至渾河路。潤、來、遷等4州的人民被遷徙到沈州。被迫賣身給女真人作奴隸。1180年，上京路女真人戶出賣自己的奴婢，致使耕田者減少。金世宗下詔禁止。1181年，又禁山東、大名等路猛安、謀克戶出賣奴婢，將田地租佃。1183年的統計數字表明，各地猛安、謀克戶，每戶平均佔有奴婢

不過二點一口。金世宗時，皇室貴族仍然佔有大批奴隸。1183 年的統計，在京都的宗室的將軍司有戶 170，正口 983，佔有奴婢 17880 口，墾田 3683 頃。

成吉思汗“筭撒”規定：軍將在陣前俘獲人口，即為私有奴隸。元朝建立後，蒙古俘掠奴隸的慣例並沒有改易。大汗可隨時把農田及田上的漢人賞給皇親國戚——親王公主或功臣之類。宋國破滅後所舉行的一次賞賜中，少者賞賜數十戶數百戶，多者竟賞賜十萬戶。每戶以五口計，一次就得到 50 萬個奴隸。阿裡海牙在對宋作戰中，即在湖廣俘降民 3800 戶為奴。蒙古貴族有大量的奴隸，分佈在北方廣大地區，成為“驅奴”。

驅奴主要是外族，包括契丹、女真在內的北方漢人和部分征遷來的色目人。元朝一個中等官員就有上百驅奴，一個大使長（奴隸主）的驅奴成千上萬，忽必烈寵臣阿合馬就有 7 千多個驅奴。驅奴沒有人身自由，是主人的私有財產。驅奴既要向使長繳租，也要向政府納賦。元朝法律規定“驅奴與錢物同”，主人可以隨意買賣或饋贈；大都有馬市、牛市，也有人市，買賣奴隸。元初法律規定：奴隸有罪，主人可以專殺；以後，雖然規定要把有罪奴隸交由官府處治，但如奴隸打罵主人，主人打死奴隸無罪；主人無故殺死無罪奴婢，只是杖 87；酒醉殺奴隸，減罪一等；元律還規定，私宰牛馬杖 100，奴隸不如牛馬。主人可以對奴隸枷鎖禁錮，刺面割鼻。奴隸控告主人，即由官府處死。良民打死別人的奴隸，只杖 170，罰燒埋銀 50 兩。奴隸不能和良民通婚。奴婢所生子女，世代為奴，稱為“怯憐口”（家生子）。奴隸逃亡，要由官府拘收，稱為闌遺（不蘭奚）奴婢。驅奴用以負擔家內勞役，也用來從事農牧業生產或軍前服役。官府或諸王役屬工匠，多是奴隸。元朝一代，驅奴一直作為一個被壓迫的階級存在，人口眾多。宋代農村，地主出租土地剝削佃戶的租佃關係得到了普遍發展。金元之際約半個世

紀的戰亂中，北方的租佃制遭到了嚴重的破壞。一批佃戶被俘掠做驅奴，一批佃戶被迫投充豪門自保，大批農民逃往江南。武宗至大時，大批蒙古草原的貧民南逃，把子女賣作奴婢；有的被販賣到西域或海南。奴隸制度推行于漢人地區後，北方破產的農民，往往因償債典身或賣身為奴。江南地區也出現了變相的奴婢買賣。

元滅宋時，在江南維持原有的制度，因而廣大佃戶主要分佈在江南。江南富豪，一家可由佃戶數千家，多至萬家。大的寺廟可有佃戶數萬。佃客婚娶，田主勒索財物。如無力繳納，不能成親。佃客的子女也要供田主役使，田主可是任意打罵佃戶，甚至任情生殺。1302 年的一件公文中說：亡宋以前主戶生殺佃戶，視若草芥。自歸附以來，少革前弊。事實上，佃戶只有略高於驅奴的卑賤待遇。元朝法律規定：諸地主毆死佃客者杖 170，征燒埋銀五十兩。地主打死佃戶，不須償命，和主人打死驅奴一樣只受杖罰，只不過杖罰較重。在驅奴制盛行的元代，擁有良民身份的佃戶，社會地位和法律地位實際上都近於驅奴。元代自耕農戶大量減少，因為北方的自耕農在戰亂中大量地被掠為驅奴，又有大量的農戶淪為權豪的部曲（農奴）。倖存的自耕農和地主一起被列為‘民戶’，要負擔繁重的丁稅、地稅和多種差役，往往被迫流亡。1283 年，自北方內地流到江南的農民已有 15 萬。但是，隨著土地兼併和租佃關係的發展，江南的自耕農也越來越多地淪為佃戶。

蒙古奴隸主在對外戰爭中對抵抗他們失敗的俘虜往往大批殺死，只留有手藝的工匠，大量的工匠被帶回蒙古成為工奴。1217 年，匠官史天倪所屬土拉河上的工匠口糧斷絕，十死七八。工奴的處境十分悲慘。蒙古滅金後，把各地的手工業者調集京師，分類置局，編為官匠戶，屬於與民戶不同的匠籍。世代承襲為工

匠，設官管領。1279年，籍人匠42萬，立局院70餘所，每歲定造幣縞、弓矢、甲冑等物。1281年又在江南撥簽的匠戶30萬中汰選10.9萬余戶，其餘縱令為民戶。官工匠有官府直接管理，子女世襲其業，婚姻不能自主。這種制度是由工奴演變而來。官工匠由官府按月支給口糧。散處在地方州縣的特別是江南地方匠局的工匠，情況有所不同。他們多數是散居農村的小手工業者，被強征入局，所得衣糧多為官吏所中飽。一家生活常無著落。官府強征抄紙、作木、雜色等行業的工人去織造局，他們無法應役，只好出資雇人代替。不少人因此傾家蕩產。

蒙元統治下的漢人、南人是賤民（奴隸）。任何一個蒙古人都可以隨意侵佔漢人的農田，任憑農田生出野草，以便畜牧。殺蒙古人償命，殺回回罰銀80兩，殺漢人罰交一頭毛驢價錢。漢人村裡新媳婦的初夜一定要給蒙古保長，漢人連姓名都不能有，只能以出生日期為名，不能擁有武器，只能幾家合用一把菜刀。元政府規定：禁止漢人打獵，禁止漢人學習拳擊武術，禁止漢人持有兵器，禁止漢人集會拜神，禁止漢人趕集趕場作買賣，禁止漢人夜間走路。元政權為了試刀是否鋒利，可以隨便在街上抓人殺掉，蒙古人習慣將逃工偷懶的漢人拋入海中做為懲罰，最多的一次就將3萬多漢人拋入海中。

第8節 明清的奴隸制度

明清兩代繼承了元代的奴隸制度，“大家僮僕，多至萬指”（萬曆《嘉定縣誌》卷2“疆域志·風俗”），“人奴眾多，今吳中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

（顧炎武《日知錄》卷13，“奴僕”）。明清時代被稱作“賤”的人，以奴婢為中心，還包括了娼優隸卒、世僕、墮民等賤民集團，以及雇工人、轎夫、剃頭匠、工、商等廣泛的灰色地帶。在與紳士對比時，一般良民也在貴賤之分下被歸入“賤”的一群。皇帝以外所有的人都被納入“對上服役、被下服役”的等級制中，其中

專門服役于人成為“賤民”階層，受到差別待遇。洪武九年，南京皇宮營建勤身殿，只因有官員把中等工匠誤奏為上等工匠，朱元璋竟然要把這 2000 多個工匠全部閹割，幸虧有人竭力諫止，才使這些工匠免遭慘禍（修明陵的工匠都被悶殺了）。在明朝，不僅朝廷用宮刑，某些高級將領也濫施淫威，據《萬曆野獲記》載，明英宗時，靖遠伯王媼在征戰某地時，竟將民間幼童閹割為奴，明英宗知道後並不干預。

明代皇帝一直把臣下當作自己的奴隸，任意侮辱。“上積疑其臣而蓄以奴隸，下積畏其君而視同秦越”（《黃宗羲全集》第一冊《子劉子學言》）。太祖朝即有大臣“鐐足治事”（《明史》卷 139《茹太素傳》）；明代皇帝對士人施之的奴役還體現于“廠衛”、“廷杖”和“詔獄”上。據《明史》刑法志，明代的廷杖之刑自太祖始；到正統時，“殿陛行杖”已“習為故事”。詔獄始于漢武帝，“明錦衣衛獄近之，幽系慘酷，害無甚於此者”。廷杖和詔獄是士人作為皇室奴隸的標記。成祖則在“巡幸”時，令“下詔獄者率輿以從，謂之隨駕重囚”（《明史》卷 162《尹昌隆傳》）；正德朝“杖畢”了公卿即“趣治事”（《明史》卷 95）。明朝官俸為歷代最薄，百官之俸，最初皆取江南官田。後定明官祿，正一品月俸米 87 石，從一品至正三遞減 13 石，到最低官級，正七品至從九品最後遞減至 5 石。其後以絹以鈔以銀折算，也大抵依據此制。從官祿來看，明帝國的官員待遇同皇族相比，簡直天上地下！

中國佃客農奴制度在明朝繼續發展。明初由官家所占的官莊，其畝數已達全部民田 1/7。明代皇室貴族的土地佔有形式，大體上有三類：一類是皇室占的土地，稱為皇莊或宮莊。皇莊的收入專供某宮後妃和未就藩的親王的日常用度。從天順八年（1464）到正德九年（1514），北京附近的皇莊有 36 處，占地 37595 頃

多。武宗即位伊始，就增設皇莊七處，隨後又增設蘇家口皇莊 24 處，前後不足六年，共增設 31 處皇莊。如果按弘治五處皇莊共占地 12800 頃，每處皇莊平均占地 2560 頃的標準估計，則增設的 31 處皇莊占地就有 79300 頃之多。皇莊如此急劇擴展，大批民田很快被吞沒，田地上的農民不是被趕走就是淪為皇莊的佃戶。

另一類是藩屬莊田。洪武時分封諸王就藩各地時就已建立。朱元璋廣封朱氏宗室，幾個兒子皆擁勁卒，居大鎮，下詔嚴令群臣時時刻刻、無微不至地尊顯朱氏皇族。他有 24 個兒子和 1 個侄孫，都建藩為王，有地有兵有錢。明朝的藩王都有 5 萬石米的俸祿，還有鈔二萬五千貫，絹布鹽茶馬草各有供給，以至於最低的“奉國中尉”也有祿米 200 石。到了明末，這些只會在王府裡配種生人的朱氏鳳子龍孫，競繁殖有幾十萬之眾。《明史·食貨志》記載，禦史林潤曾經分析說：天下每年供給到京師的糧食是 400 萬石，而諸府的祿米是 853 萬石，缺一半還多；以山西為例，山西留存的糧米是 152 萬石，宗祿米是 312 萬石；再以河南為例，河南存留的米是 84.3 萬石，而宗祿米是 192 萬石。兩省存留米的全部，還不足宗祿所需糧米的一半，更何況官員的俸祿、官兵的軍餉都要從這裡邊出。

明中葉以後，各地藩王除兼併民田擴大藩府莊園外，還以子孫眾多，生活困難為由，向皇帝乞討附近的官地，來擴展自己的地產。正統五年（1440）甘肅慶王家擁有土地一千頃，大部分由占奪而來。1605 年，四川省可耕地的 70% 掌握在諸王手中，20% 為軍屯土地，平民百姓耕種的土地只有 10%。明代皇族親藩大量兼併土地，而他們的土地享有免稅的特權，造成全國 1/2 土地不納稅，給國家帶來了嚴重的財政危機。朝廷自天啟年間（1621~1627）開始屢次向普通百姓加派“三餉”。1618~1637 年，賦稅竟增加了 6 倍。一畝農田產出只有 6 兩銀子，

至少要交 10 多兩銀子的稅。面對苛重稅負，農地大量拋荒，農民流亡，最多時流民人數高達 600 萬人之巨，占當時全國總人口數的 1/8，導致了大規模農民起義的爆發。

萬曆帝的愛子朱常洵被封為福王，詔賜良田 4 萬頃為食邑。這一數字相當於河南全省可耕地的很大一部分。因此，又不得不從其他省徵用一部分民田。結果，河南、山東和湖廣共有約二萬頃民田被劃歸福王。此外，前內閣首輔大學士張居正的土地亦劃歸福王所有，同時他還得到了四川茶鹽專賣權。福王的生活極其奢華。他在洛陽的王府造價高達 28 萬兩，是規定造價的 10 倍。李自成的軍隊於 1640 年攻入洛陽，福王府被放火燒了三天。崇禎年間，河南一省有八個親王：開封的周王有良田一萬餘頃；南陽的唐王、汝甯的崇王、禹州的微王、彰德的趙王、懷慶的鄭王，每家有良田大約數千頃到上萬頃。衛輝的潞王有良田 4 萬頃，大部分土地是在湖廣。他除在河南、湖廣兩省佔有良田四萬頃外，還有皇帝賜的鹽引專利。

第三類是勳戚中官莊田。“勳”指有爵位的功臣、世家，大部分是所謂的武臣；“戚”指後妃公主皇親家族；“中官”即皇帝周圍的宦官。貴族利用皇帝賜田的機會，可以兼併比賜田大多少倍的民田，或者把民田誣指為無主荒地，藉以圈佔。勳戚貴族兼併農民土地較皇莊有過之無不及。勳戚莊田在北直隸和京畿分佈比皇莊為多，所以其兼併的規模也比皇莊為大。景泰二年（1451），貴戚汪泉霸佔官民田地共達 3 千餘頃。一些有權勢的的貴族奏請土地外，還接受所謂“投獻”來的土地。投獻是指有些土地所有者為了逃避苛重的賦役，自願把自己的土地獻給貴族，而自己則充當貴族莊園的莊頭或佃客，以求保護。一些人竟然把小戶農民的土地強行投獻給權貴豪強，自身充當管家。成化時，皇親王源的莊園原

有賜田 27 頃，但令其家奴別立四至吞占民產，乃有 1220 頃有奇，可耕者 366 頃，中多貧民開墾成熟之地。

除這三類莊田外，還有遍於全國的寺觀莊田，佔有的土地數也相當龐大。各類莊田的共同特點是，無論皇莊、藩府莊田或勳戚中官莊田乃至寺觀莊田，所占的土地一律屬官田性質，法律規定不得買賣。各地的官僚鄉紳對民田的兼併也十分嚴重。如江南華亭的鄉紳董其昌佔有膏腴萬頃。“大約自成化以來，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廣東、福建等地先後出現一種現象：許多地區的農民，由自耕農或佃農的地位下降為一種類似農奴的佃僕。所謂‘佃僕’又稱‘僮僕’，與地主不只是主佃關係，還有‘主僕名分’。他們雖然可以有妻子兒女和微薄家業，但社會地位猶如農奴。明代法律上禁止蓄奴。但許多官宦、豪富之家，多半蓄有男女奴婢。這種家奴大半用在家內使役，如被遣往莊田耕種，採用古代“免奴為客”的辦法，便由奴認為佃，但與主人仍保持主奴關係，成為佃僕。”

明清兩代的工商奴隸制十分發達，畢道村說：“馬克思一再強調，只要工商業仍奠基於奴隸制、農奴制和原始公社之上，商品生產就決不會導致資本主義。然而，中國封建工商業的主要基石恰恰是奴隸制度和農奴制度。明清兩代，人們蓄奴之多令人咋舌。有名的如王錫爵、錢海山、徐階、李欽、和珅；睢州的褚太初、甯陵的苗思順、虞城的範良彥、無錫的大地主鄒望，河南的褚、范、苗、曾，麻城的梅、劉、田、李等強宗右姓所佔有的奴婢都在千人甚至數千人以上。蓄奴範圍之廣，乃至連一些中上層農民也佔有不少的奴隸。”

明初，涼國公蘭玉令家奴販雲南私鹽一萬餘引。永樂時，各都司衛所、布政司、按察和府州縣官都收留大量的“軍伴皂隸”，以“辦納錢財、買賣借貸”。宣德時，會昌伯孫忠以“家奴貸子錢於濱州”。景泰時，都指揮孫繼宗、孫紹宗，

指揮孫顯宗及其侄子孫璘“起塌房”，“邀截客商，引鹽發賣”，遼東巡撫都禦史李純放債催款：所用之人，全是家奴。彭城伯張瑾封王於江西，“道南京，令家人市貨帛，載馬船以歸”。萬歷時，右都禦史秦耀令家奴在無錫、蘇州、常州開設典當十餘鋪，“每鋪不啻二三十萬金”。此外，著名官吏徐階、朱國禎、徐顯卿各以織布、繅絲、養蠶而聞名鄉里，如其所述，這主要出於諸女僕之功。天順時，常熟大戶錢擘靠他的十三個奴僕發家致富。著名刻書商毛于晉，“家蓄奴婢二千指”，除用於耕種宅旁的二頃地外，主要用來刻書、校書。當時中國最大的幾個商業集團，徽商、晉商、福建的海商，無一不是靠奴隸支撐其商業的。其中，徽商的資本最雄厚，而徽州同時也是中國奴隸最多、所受的奴役最嚴酷的地區。各家大姓，都蓄有大量的奴僕用於“營運”。明代各類史籍中提及的工商業勞動力，特別是官吏、地主、大工商業主在工商業中的勞動力，很少不是奴隸。類似“勳戚之家縱令家人開設店肆”，“今豪勢之家用僕開店”之類的奏疏實是舉不勝舉。明代的各類小說，如《儒林外史》、《醉醒石》、“三言”、“二拍”等，凡是敘及行此事的，幾乎都是奴隸。如《警世通言》中所講的宋金，《醉醒石》中所講的陳箴，都養了幾個至幾十個家丁專做私商勾當”。

直至清末，曲阜孔府還蓄有經營著數十種手工業的幾百名農奴工匠。掌握了土地並壟斷了重要工商業的地主、官吏豢養了大批充當鷹犬的奴僕，將大批農民淪為各色農奴。如東漢至隋唐的部曲、徒附，唐宋之際的地客、火佃，明清的佃僕、雇工人等等。因此，以奴隸為其生產、經營骨幹的中國各類地主工商業也同時基於農奴制度之上。奴隸制和農奴制之間的相互補充、協同。付衣凌先生說：

“在中國封建社會裡，凡是商業發達的社區，奴僕也跟著盛行起來。明清商品經濟最發達的江南、閩粵等省，同時也是蓄奴最多最嚴重的地區。”

清代後期對蓄奴制度進行削弱。清律規定：佃戶與地主無主僕名分。實際生活中，地主擁有不同程度的超經濟特權，欺壓凌辱佃戶的行為，極為普遍。1727年，河南巡撫田文鏡鑒於地主視佃戶為奴隸，私刑拷打，淫其婦女，地方官徇私助虐，請求朝廷立法禁止。吏部和刑部議定例文：凡不法紳衿私置板棍，擅責佃戶者，照違律議處，衿監吏員革去衣頂職銜，杖 80；地方官失察，交部議處；如將婦女占為婢妾者，絞監候。清律中，低於凡人的還有雇工和賤民。雇工不是自由的人，他對雇主有人身依附關係，其勞動帶有一定的強制性質。隨著經濟的發展，不斷修改‘雇工人’的律例，使大批農民工向著自由的雇傭勞動者過渡。

清代法令規定各級貴族佔有的生產奴隸的最高限額為：親王 950 名、郡王 270 名、貝勒 215 名、貝子 170 名、宗室公 90 名，其它各級臣僚都可合法地擁有數十名不等的壯丁奴僕。其限額遠高於西漢，而這還僅是指生產奴僕，不包括家內奴婢。

崇禎 11 年冬至 12 年春，清軍在畿輔、山東一帶掠去漢民 46 萬 2300 餘人，崇禎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軍又“俘獲人民 36 萬 9 千人”（《清太宗實錄》）。順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諭兵部“俘獲人口，照例給賞登城被傷之人”（《清世祖實錄》）。漢人奴隸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殺。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歲以自盡報部者不下二千人”（《清史稿》），由此推算，僅自殺的漢人，在滿清入關前後幾十年間，就不下 10 萬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數。由於滿清的瘋狂虐待，大量漢人奴隸逃亡，“只此數月之間，逃人已幾數萬。”順治皇帝頒佈命令，“有隱匿逃人者斬，其鄰佑及十家長、百家長不行舉首，地方官不能覺察者，俱為連坐”。順治六年又改為“隱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飭，自此諭頒發之日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決不輕恕”（《清世祖實錄》）甚

至投靠滿清的大漢奸靖南王耿仲明，由於收留了逃亡漢人奴隸，也被迫自殺。

清初大量的奴婢是皇莊和貴族莊園中的“壯丁”。他們被嚴格地束縛在土地上，從事極為繁重的農業勞動，備受虐待，毫無人身自由，壯丁反抗和逃亡甚多。以 1745 年的畿輔皇莊為例，460 余名莊頭所轄 16,800 余名壯丁，大部分不從事生產勞動，莊頭能驅使年久有益農務的壯丁僅 290 余名。清廷只好允許將各地皇莊上的壯丁交地方官“載入民籍”，共 16000 民壯丁撥出為民，只留 290 余名保留農奴身份。從雍正元年到八年，一系列的“除賤為民”的諭旨廢除了相當眾多的人的“賤籍”，但各地陽奉陰違，直到 20 世紀仍保留少部分的賤民。直到 1909 年 2 月 6 日，清廷才頒佈詔諭禁止奴隸制，規定“凡從前旗下家奴，概聽贖身，放出為民”，“其經放出及無力贖身者，以雇工人論”。

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康熙四十年說：“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內，日益貧困：農空、工空、市空、仕空。……故農民凍餒，百貨皆死，豐年如凶，良賈無籌。……吳中之民，多鬻男女于遠方，男之美為優，惡者為奴。女之美為妾，惡者為婢，遍滿海內矣。”

乾隆朝詩人魏來朋的《鬻子行》寫道：維北邑當丁醜年，沿海村落少炊煙。無麥無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懸。膝下嬌兒莫能蓄，百許銅錢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饑餓，甯甘下賤為人僕。交錢交兒說分明，錢交兒不隨人行。翁亦無奈強作色，驅之使去終不能。望兒揮手頻頻打，旁觀誰是解救者？頻打頻來懷中藏，兒聲長號翁如啞。

鄭板橋的一首《逃荒行》，可看出在所謂“十全老人”弘曆領導下的社會悲慘畫面：十日賣一兒，五日賣一婦。來日剩一身，茫茫即長路。長路迂以遠，關山雜豺虎。……嗟予皮發焦，骨斷折腰臂。見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道

旁見棄嬰，憐拾正擔釜。賣儘自家兒，反為他人撫。……身安心轉悲，天南渺何許。萬事不可言，臨風淚如注。

馬戛爾尼回程路上寫的“紀事”中強調：西方把漢族和韃靼族混淆成了一個民族，可是清君卻不這麼看。“在歐洲，不論是波旁王朝還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登上那不勒斯或西班牙的王位都無關緊要；君王完全與西班牙人或那不勒斯人同化。漢諾威人一旦掌握英國王權，他就不再是德國人了。相反，亞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過去了一個半世紀也沒有把乾隆變成一個漢人”。韃靼人說笑話總以漢人為靶子。“只要有人拿漢人說笑話，那些年輕的韃靼王子就會興高采烈。在取笑女人裹腳時，他們拍手叫好；但聽到把韃靼婦女的木底鞋比作漢人的帆船時，他們就惱火。地位最低的韃靼人，在服從漢族官員時也會表現得十分勉強”。滿清對一個奴隸的民族實行種族隔離是全面的，嚴禁不同種族間通婚，北京的整個北城都沒有漢人，專供滿人居住。宮內女眷（包括奴婢在內）無論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滿人：要防止一切種族混雜的情況。而宮內太監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漢人。這多有象徵意義呀！讓韃靼人繁殖，讓漢人絕種。英國特使發現中國“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大部分人全年只有一件衣服穿”，“我懷疑以前傳教士（指明末傳教士）的傳記都是編造的”。要知道乾隆特意讓英國特使去參觀當時中國最富地區呢。馬戛爾尼在日記中說：中國“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 150 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中國人生活“在最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恐懼之中”。中國社會關係建立在一種愚蠢的形式主義基礎上，所以人們“膽怯、骯髒並殘酷”。這些在《停滯的帝國》一書中說得很詳細。

馬戛爾尼認為滿清是衰敗之世，沒落之世，“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的狀態”！這個國家掌握全部權力的是帝國中最卑鄙無恥的傢伙。一位聰明的道台對外國人說：“皇帝以下的所有官員都是壞蛋，全該殺掉，但殺了我們沒用，下一任仍會和我們一樣壞。”

自周初至清末，中國盛行家奴制。買來的奴隸稱為奴婢，主人有隨意使喚、打罵轉賣以至轉贈之權；如無力贖身，則世代為奴。統治者根本沒有保護國民人身權的概念，民眾因犯罪與債務淪為奴隸者比比皆是。清朝各帝三令五申，主子對奴才可以任意毆打、贈送或出賣。奴才無處逃避，因不堪痛苦，往往飲恨自盡；僅康熙一朝，報部自盡者，每年即達 2000 人。

清代蓄奴養婢之風極盛。“仕宦之家，童僕成林”；“奴婢賤人，律比畜產”。

“乾隆時旗人阿克當阿任淮關監督十餘年，僮僕以百計。司書籍之僕八人，裝潢補訂又另有人。湖南藩司鄭源壽在署家屬四百余人外，養戲班兩班。道光時的閩浙總督顏伯燾罷職回鄉，隨帥兵役、抬夫、家屬、輿馬僕從三千名。光緒時之督撫司道燈官，買置田園，私蓄優人壯丁不下數百。州縣地方官多置僮僕以逞豪華，親戚往來，僕從雜遝，一署之內，幾至百人”。奴婢主要有四種：一是入關前後戰爭中所獲得俘虜；二是入關後漢人投充為奴；三是有罪發遣為奴；四是貧民賣身為奴。清初，前兩種占極大數量，後來典身賣身成為奴婢的主要來源。

中國的奴隸制一直延續到清代，甚至一直延續到近代和當代。尤其是到市場經濟時代，奴隸制似乎有複歸的跡象。現在很多企業裡，大都盛行“依附主義”，員工依附老闆，下屬依附上級，就象古代社會的奴才依附主子一樣，員工們大氣不敢吭一聲，對老闆和主子言聽計從，唯唯諾諾，實際上這是現代版的奴隸主義。奴性已經再次成為整個民族的特徵。

第二章 中國奴隸制的特點

第9節 皇（國）家所有制

柏楊說：“中國人，你的名字是苦難！”不僅生沒有尊嚴，死也沒有尊嚴，人格更沒有尊嚴。滅九族、滅十族，屠城，殺降，閹割男性的生殖器，強迫接受單一思想，三百年醜陋的剃髮，五千年無時或斷的冤獄酷刑，中國人活在恐懼、羞辱之中。這是因為專制皇權制度。

專制皇權制度，在官方教科書上被稱為私有制，實際上只是私人佔用的皇家所有制。帝王就是“人主”——人民的奴隸主，也是“天子”——天之兒子，代表天來擁有人民。在古漢語中，“臣”就是奴隸的意思。之所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當天下的土地成為皇帝的不動產，生息其上的民眾便成為了土地上的附著物。換句話說，土地是王的，土地上的莊稼也是王的，而民眾呢，一方面他們收割地裡的莊稼，另一方面，國王收割他們的一生。“六合之內，皇帝之土”——帝王是自然資源的所有者，民眾為了生存就只能成為國王的奴隸（“人跡所至，無不臣者”）。所有的土地人民都是屬於皇帝一人的家產，任他予取予奪，“天經地義”。所以劉邦和朱溫當了皇帝，都忘不了向本是農民的父兄誇耀，你看我置的家業有多大！臣下也跟著呼萬歲。這說明王壟斷了一切，臣民不但財產、就連人身都屬王所有，沒有“人”的地位，更沒有“人”的尊嚴。

追求尊嚴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願望，如何讓天下人磕頭下跪呢？周公明白，人要尊嚴，須有體面。人要體面地生活，就得有自己的財產。食不裹腹、衣不蔽體的人沒有體面可言，尊嚴無從談起。於是周公設計了天下資源歸帝王所有，由

帝王統一分配的制度：每個人的生存需求只能得自于帝王——世人必然磕頭下跪。周公把這種體制定為尊卑關係。他用酒壺和酒杯來比喻：酒壺又稱為樽（尊），酒杯與“卑”諧音。意思是掌握酒壺享有分配權的人為尊，端著酒杯等待施與的人為卑。天下老百姓創造的財富通過稅賦徭役被帝王收歸已有，裝入自己酒壺，由帝王分配給奴才，再由奴才管理天下奴隸，由此形成上尊下卑關係。

要保證這一尊卑秩序，關鍵在於不能讓世人從其它地方得到酒，這就是“利出一孔”。管子主張：臣民不能以自己的方式，更不能以施加壓力的辦法表達和維護自己的利益要求，只能依賴君主的恩典。由帝王把持臣民生命之源，就能操“生、殺、富、貧、貴、賤”之“六柄”。管仲說：“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羨（多餘的錢財），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管仲思想被歷代專制君主奉為統治民眾的金科玉律，成為實施中國特色人身控制的黃金法則。

封閉社會則是利出一孔，其他孔都被填塞，意味著臣民只能附著于君王的土地，吃君王的“君餉”，“長恨此生非我有”。任何一個人要在這種環境中生存下來就只有依附於國家，臣民只有唯上是從才能生存，全國上下形成一個等級依附系統，只有一個例外，即皇帝，因為他是權力的母體。後妃、臣僚依附皇帝，地方官依附京官，小官依附大官，奴僕依附主子。正是由於人身依附，各級官僚無法成為獨立的官員，而只能是帝王的代理人或家奴。在人身依附的格局下，長官更欣賞阿諛奉承，奴才們自然會獲得更多提升的機會，真正的精英則被淘汰，結果是庸人們大獲全勝。“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使得統治者壟斷了一切權力和所有經濟利益，這等於扼住了臣民的咽喉，擁有了對臣民的生殺予奪的絕對權

力，臣民只有唯命是從才能生存，這就是中國歷代皇帝可以實施殘酷專制奴役統治的根本原因。

在帝王眼裡，老百姓是一種財富，同這古老土地上的資源一樣，誰搶到江山，就歸誰所有。“勝者通吃”，誰勝產權就是誰的，誰勝誰就是法律。這正像《管子》所說：“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臣下者，主之所用也。”“為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韓非子說：“邦者，人君之輜重也”。荀子乾脆宣佈“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荀悅說：“天下之財歸之陛下”。唐代陸贄說：“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人之所為”。曾肇說：“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陳亮言：“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程頤說：“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凡土地之富，人民之眾，皆王者之有也。”葉適在論及治國用人之道時指出：“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這種把君主視為天下臣民和一切的最高所有者的說法，為君主支配一切奠定了理論基礎。

普天之下一切財富都屬於帝王所有，而卑微的子民們能暫時擁有財產，全出於帝王之恩庇與賜福。誠如唐代柳宗元代表長安縣百姓呈給皇帝的奏表中所說：“臣等得生於邦甸，幸遇聖明，身體髮膚，盡歸於聖育；衣服飲食，悉自於皇恩！”韓愈在《原道》中說：“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一個“誅”字，實在是夠鮮血淋淋、殺氣騰騰的，把皇權統治的專制野蠻性闡述得非常直白。谷川道雄分析唐代社會時提出，當時的人民，在律令制度的嚴格規定下生產和生活。農民對土地沒有隨意支配的自由，同時政府

在穀物和衣物的生產方面還有種種規定。這些規制在任何一個時代都可看到。他們被戶籍緊緊地束縛在本鄉本土上，沒有遷移自由。可見，中國的自耕農就是國家農奴。

中國古代土地由國家即帝王所有，大大小小的奴隸主只有土地使用權，沒有所有權。這大約是因為國家政權極其強大、牢牢控制的結果。雖有學者竭力證明中國很早就出現了土地私有制，土地買賣盛行云云，但大概誰都不能否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理論的巨大作用，否認皇帝或官府對土地的控制權和最終決定權。否則，便不能解釋中國歷史上抑豪強、抑兼併的反復展演，不能解釋抄家、籍沒的頻繁發生。譬如：秦始皇統一六國後，便強迫東方各地的富商巨賈遷移。滅魏時遷其冶鐵商孔氏于宛，滅趙時遷其冶鐵商卓氏於臨邛。被遷出家鄉的商人大部分財產被籍沒；卓氏遷蜀，只剩下夫妻二人推一車子。據史記記載，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 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陽十二萬戶”。劉邦定都長安之後，曾把 10 萬天下大戶強制遷離本土。其效果都是“邑裡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併之民。”不論何人佔有多少土地，只要王朝一道法令，都必須聽任處置。即使是細軟珠寶之類、通常理解為真正私有物品，官府都可以隨時隨地加以抄沒，這方面的例子在中國歷史上可謂不勝枚舉。與之對比是古典時代雅典的立法：如某人經公民大會表決犯有叛國罪，那麼這人須被放逐國外，時限為十年。但放逐期間，他的家產仍受法律保護，一俟放逐歸來，即馬上歸還。在西方中世紀，這一法律精神是否得到繼承雖然無從稽考，但抑豪強、抑兼併、籍沒、抄家的事情似乎很少發生。兩相比較，對於認識中國古代的“私有”顯然不無意義。

侯外廬認為以土地為主以其它產業為副的國有財產形態，從秦漢社會發源，

一直是中國社會主要的形式。所有的土地都是皇家的，只要皇家想要擁有就可以隨時剝奪這些佔有者的財產、土地甚至生命。所以，中國古代社會始終沒有形成古代西方社會的那種“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私有財產尤其土地的私人所有權。西方私人所有權的基本特徵包括財產的絕對性、排它性與永久性；古代中國人從未獲得對土地等財產的絕對性、排它性和永久性權利。中國傳世的法典表明：當時的立法從未賦予私人對土地等財產享有“排斥其他一切人，只服從自己個人的意志”的權利。一如美國學者論述古代中國法時所說：“當中國法律出現以後，它既不維護傳統的宗教價值，也不保護私有財產。它的基本任務是政治性的：對社會施以更加嚴格的政治控制”。英國經濟史學家鐘斯則認為土地的主人並不是普通民眾：（中國的君主）和在亞洲其他地方一樣是土地的唯一主人……以農產品這種原始形式取得這樣巨額的稅收是一種顯著的證明：中國皇帝的權力和財富和其他東方統治者的一樣，是和他作為帝國統治下最高土地所有者的權利有密切關係，或者不如說是建立在這種權力上的。

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理論的作用下，每個王朝建立初期，都無一例外地承襲了土地國有制。戰國時的秦、魏、齊、楚諸國都普遍實行授田制。《銀雀山漢簡·田法》反映的齊國授田制最為典型：“三歲而壹更賦田，十歲而民畢易田，令皆受地美亞（惡）均之數也。”謂國家授農民之田，三年更換一次；因田分上、中、下三品，故十年方“畢易田”，其中美惡之田均得授耕一遍（《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編第一冊，科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49～755 頁）。同時，國家的官營工商業也佔據著無可爭辯的主導地位（《從雲夢秦簡看秦的國有制經濟》，《史學月刊》1995 年第 4 期）。1970 年代以來人們從睡虎地出土秦簡與青川出土的秦牘中知道：秦朝實行的是嚴格的國家授地制而不是什麼“土地自

由買賣”；人們從《商君書》、《韓非子》一類文獻中也不難發現法家經濟政策的目標是“利出一孔”的國家壟斷，而不是民間的競爭。可以說，中國的極權政治和行政組織制度到秦已十分完善。

歷代帝王認識到，經濟權利的集中化將會產生潛在的政權中心，由此威脅現政權。因此，歷代帝王強制私人分割遺產，打破大型私產（包括寺廟財產），試圖十年一度重新分配土地。西漢末年的王莽就將天下的土地沒收重新分配。王莽的王田，曹魏的屯田，西晉的占田；這幾種田制，都是由政府把土地分給農民去耕種，農民則上交一定額的租稅。拓跋族入主中原後推行均田制，國家將土地按人口均分給農民；均田的前提是土地的公有，均田是國家行使財產權的一種方式。自從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下詔“均給天下民田”以後，均田制度相繼為東西魏、北齊、北周及隋唐等封建王朝的統治者所採用，直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兩稅法實施，均田制方退出歷史舞臺。所謂屯田、占田、均田，都是國家分配土地，農民在土地國有制的前提下使用土地。即使是官僚佔有的土地，雖可能由皇帝賜予，亦未超出土地國有制的範圍。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國人認可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論。

如果說和平交換、產權分立是經濟的制度規定性，那麼產權單一、暴力搶劫（輔助盜竊）就是中國經濟的基本特徵。它製造了絕對貧困，消滅了妥協與和諧的可能。

巧取豪奪。趙匡胤把那些掌握重兵的大將和平解職後，為穩住他們的心，不得不重加賞賜。賞賜後，又怕他們因財產太多糾集黨徒生出叛亂來。於是他想出了兩個絕妙的辦法：首先，他給這些大將們每人賞賜一塊土地，令他們修建豪華的府庭；每個大將都因修建府庭花去了數萬兩金銀。其次，在這些府庭竣工不久，

即宣召這些退休大將入宮賜宴。大將們開懷暢飲，個個爛醉如泥。帝又宣召這些大將的長子入宮攙扶各自的父親回府，臨行時，對大將們的長子說：“剛才你們的父親都答應各自向朝廷進獻十萬緡（一緡為一千錢），你們都記下了”。當這些大將酒醒之後，長子把皇上的話向他們轉告，大將們也弄不清是否說過，誰也不敢去證實，只好獻上這筆鉅款。經這麼兩次折騰，大將們的囊中所餘就有限了。

明王朝常以沒收財產作為增加國庫收入的重要手段，清朝入關更是大肆圈地。不僅土地，就連房屋也實行過公有制，明代和清代早期都實行過房屋公有的制度。

朱元璋于 1367 年消滅張士誠政權後，立即將一大批蘇州富民遷徙到他的老家鳳陽。8 年後，朱元璋再次下令將 14 萬江南富戶強制遷到鳳陽，以填實帝國中都。正是這兩次大規模遷徙，造就了鳳陽的乞丐大軍。原因是，他們被強制遷徙時，只能帶走金銀細軟，並不許隨便離開到達之地，其原有的房屋土地等不動產或被收歸官有，或落入他人之手。從此，為探親掃墓，他們只能化裝成乞丐，以逃荒要飯的名義，從鳳陽流散到江南各地。“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蓋源出於此。傳說沈萬三有一個聚寶盆，可以源源不斷地生聚財富。據說，明帝國首都南京城的城牆、官府衙門、街道、橋樑有一半是該人捐資修建的。這使皇帝朱元璋很不舒服。恰在此時，沈萬三為討好朱元璋，便說願意再捐一大筆錢，供天子犒賞軍隊。結果，朱元璋大怒，曰：一介平民，卻要犒賞天子的部隊，必是汙長犯上的亂民，其罪當誅。後來，多虧那位馬皇后講情，皇帝才免其死罪，將他全家遷徙充軍到了雲南。

朱元璋在開國之初曾屠殺了幾名讀書人，理由是他們遁入山林而不願做官。在殺掉他們之後，朱元璋向國人宣佈：“所有的中國人都是我的財產，都必須服

從於我的意志”。他說：“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我統治下的讀書人不願為我服務，就是與我作對。誅其身而籍其家，不為之過！”在《大誥三編》中，朱元璋一次殺頭抄家 160 個糧長。有一個號稱浙江金華首富的楊姓糧長，放出狂話，說是皇帝征糧萬石，不及他一個田莊的收入。結果，解糧進京時，朱元璋召見，問他：“糧食何在？”他回答說：“霎時便到。”朱元璋“哼”一聲：“殺時便到嗎？”立命拉出去砍頭。消息傳出，其家人四散而逃，家產被當地人搶掠一空。據說，有一次朱元璋夢見 100 個無頭之人跪在階下。十天後，有 100 個糧長解糧到京，恰好全部沒有足額按期交納。朱元璋下令格殺勿論。茲引吳晗《朱元璋傳》中片斷如下：“甚至地方上一個皂隸的逃亡，就屠殺抄沒了幾百家”。豪民盡皆誅戮，抄沒的田產當然歸官，“據可信的史料，三十多年中，浙東浙西的富家巨室幾乎到了被肅清的地步。”此後，朱元璋還曾數次取天下富戶填充到帝國首都南京。這種強制遷徙與性質有所不同的移民政策，一直持續到永樂年間，涉及人口累計達到了至少百萬人以上的規模。

從 1912 年清朝皇帝退位開始，連年的混戰，私有產權只能在夾縫中偷生，並且不斷地非正常地更換主人。由於相對於以前的皇朝和以後的紅朝，這段時期管制較為寬鬆，私有制因素也特別活躍，但未受法律的公正保護。這只不過是私有制的萌芽的階段。

韋伯在《儒教與道教》書裡說，中國秦統一後屬於家產官僚制（皇帝所有）。在家產官僚制下，國家體制是帝王家族的伸延；財政被視為國君的私產，官吏是皇帝的家臣。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是諸侯對君王在法律或契約上的效忠關係，王侯在自己的領地上行使獨立的權力；而中國的皇帝與官員之間是一種似父子關係的君臣關係，這種關係具有強烈的人身依附色彩，在政治統治形態上則是人治重

於法治。各級官員的升遷注重是否具備作為一名家臣的可信賴的人格修養，而不注重行政專業知識；傳統主義主導了官吏的思想意識：輕視專業知識，在儒家經典中尋求治國方略，將司法、行政、理財集於一體，無法導致理性的專業分工基礎上的行政管理體制，無法形成依嚴密計算和理性管理以謀利為目的的經濟制度。

第 10 節 把人民關進“籠子”的制民術

在古代中國，專制政權通過龐大的政權組織和宗法制度，對社會的控制達到極高的水準。春秋戰國以降，各國諸侯取代周天子而成為大部分土地的實際所有者，而諸侯王通過“授田”將土地分給農民耕種，同時將負擔徭役賦稅的責任一併強制性地“授”予人民。

1· 戶籍制和什伍保甲連坐制

為保證君子們的特權剝削，中國古代社會強化了垂直的等級序列構成的宗法社會，其基礎是由士農工商四民組成的。他們的身份與職業是世代相傳的，又有大致不變的固定居址；統治階級希望這種結構堅如磐石，所以稱這四民為石民。

《管子》雲：“是故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管子認為民富難治，所以主張“民富則不如貧”（《管子·揆度》）。管子的“利出一孔”包括政治上的人身控制和經濟上的弱民術（重農抑商）。人身控制的手段和工具就是數千年一以貫之的發達的戶籍制和什伍保甲連坐制。

中國的戶籍管理制度始於商代，由於上交到中央的戶籍簿冊一律都規定用黃色的封面，所以戶籍又稱黃籍或黃冊。據《周禮》記載，有“司民”一官，男孩出生後八個月，女孩出生後七個月，都要在戶口名簿上登記；而且是戶分城鄉，

人分男女。古代的戶籍制度不僅包括人口的登錄，而且包括定期的稽核人口，登記內容主要有姓名、性別、年齡、高矮、胖瘦和長相及外表生理特徵等，十分詳細，每一個人都必須在官府登記，否則為“脫籍”（黑戶口），不僅本人要治罪，而且街坊四鄰和執掌戶籍的官吏都要治罪。

秦國在西元前 357 年建立戶籍制度，至商鞅變革，戶籍制度更為完善，秦律還規定，已成年的兒童未登記戶口，連裡正都要受處罰；居民遷徙，必須向官府申請辦理遷移戶口的手續；擅自脫離戶籍而逃亡，稱作“亡命”，被捕後要治罪。

與戶籍制相對應的，是一套嚴密控制人身自由的組織系統，將每一座城鎮，每一個村莊，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都毫無遺漏地編入國家行政網路之中，這就是實行層層管制的裡甲連坐制度。《周禮·地官·族師》，“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管子·立政》詳細記載了保甲連坐制度。居民每五家編為一伍，設一伍長，五伍為裡，裡設裡長，負責監督裡內每個居民的一切活動，在居民點“裡”（閭）的四周築起圍牆，堵塞缺口，只留一條與外界相通的通道，以控制內外居民的進出。在裡門的左右各有一間觀察室，每天早晚，伍長和裡長坐在裡面監督居民的出進。裡門的鑰匙由裡長管理，下設看守，負責按時開閉裡門，並監督所有的出入者，向裡長彙報，凡是不按時出入，行為舉止不符合規定者，看守一經發現，都要及時向上級反映。每裡若有人犯法，則裡長與其同罪。這是用管理監獄的方法來管治人民，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齊桓公“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

商鞅為了實現國王的絕對統治，在秦國實施嚴酷的戶籍制和裡甲連坐制，

“四海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生者箸，死者削。遷移必辦“更籍”、“以分田裡、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作軍旅”；以至人民“行間無所逃，遷徙無所入”。後來商鞅遭政敵圍攻，只得隻身潛逃，來到邊境旁的小客棧，準備投宿，因無證件，被店主拒之門外，他只得長歎一聲道：“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堂堂一國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在朝廷的通緝下，連藏身之處都找不到，只有俯手就擒，由此可見人身控制的效果。

在皇權統治之下，百姓沒有脫離“編民”制度而成為自由人的權利，他們如果逃離“編戶”，就是嚴重的犯罪，官府要對他及其家人施以嚴厲的懲處；如漢武帝四年（西元前 107 年），關東 200 萬流民中發現有 40 萬人脫籍，構成丞相石慶的失職，石差點被漢武帝處死。即使在皇權衰微時民眾脫離國家編戶而成為豪強的“蔭戶”，改變的也只是依附物件而不是依附關係；由此，中國農民並不是如以往所說的自由民或自耕農。

歷史學家王毓銓說：構成古代中國編戶齊民的主體的農民（明代的“民戶”）的身分不是自由、獨立的。他們的人身和其他編戶的人身一樣是屬於皇帝的。……皇帝可以役其人身、稅其人身、遷移其人身、固著其人身。止要他身隸名籍，他就得為皇帝而生活而生產而供應勞役；而不著籍就是違背帝王大法的。……在古代中國的編戶齊民中，自由和獨立的事實是不存在的，可能連這兩個概念也沒有。……從周王說他受命於天為民之極起，一直到明清，沒有一個皇帝不是“奉天承運”的。明朝的皇帝每于郊祀上報皇天牧養有成時，都是把全國的戶口名簿籍（《賦役黃冊》）陳於祭台之下，表示上天賜予他的對人民土地的所有權。在十七世紀以前，中國沒有人對皇帝的這種權力提出質問。……朝廷有多少種勞役，就僉撥多少類人戶去承當。種田的有民戶，當兵的有軍戶，供造作的有匠戶，辦

納鹽課的有灶戶（鹽戶）。……一類役戶有一類役戶的籍（冊籍）。於是就有了與多少種戶役相應類別的籍。如民籍、軍籍、匠籍、灶（鹽）籍等等。戶帖上具填明白。民籍、灶籍隸戶部、軍籍隸兵部、匠籍隸工部、鋪戶籍隸禮部等等，專一聽從該部差遣，如奴僕。

為什麼編戶民服侍帝王如奴僕呢？因為這是他們的“本分”。明太祖說：“為吾民者，當知其分。田賦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臣僚也都異口同聲地說：“為王之民，執王之役，分也。”“分”，也叫“本分”；編戶民的本分就是納糧當差。朱元璋要求農民通過男耕女織的誠實勞動，“各守本分，納糧當差不要誤了”。每月初一日皇帝下的《宣諭》就是這麼教訓老百姓的。為此，帝國每一個鄉村都要建設“旌善亭”與“申明亭”各一座。旌善亭用來表彰良民及其令人稱道的善行義舉，他們的名字和好人好事將被認真地摹寫在亭中。申明亭是處理村中糾紛的場所，舉凡婚姻、財產、爭占、失火、盜竊、罵人、鬥毆、錢債、賭博、擅食田園瓜果、六畜踐食禾稼、褻瀆神明等等，都要在此由年高望重者予以仲裁。審理仲裁中，老人可以酌情使用竹批荊條等抽打案犯，但不許設置牢獄監禁。白天審問，晚上必須放回，第二天接著再審。那些行為不檢者的名字及其壞人壞事，也將被一絲不苟地摹寫在亭中，以此警醒後來者不重蹈覆轍。每年正月和十月，全國各地之鄉村都要舉行兩次全體村民大會餐，名曰“鄉飲”。屆時，全體村民必須在進餐前，聆聽年高望重者的訓詞報告和宣讀朝廷最新頒佈的法令文件，所有行為不軌者將在此受到批評教育。其中屢教不改及態度惡劣的人，將被宣佈為“頑民”，扭送到縣政府，他甚至包括他的家屬，都將被發配到邊遠地區。假如被推舉出來主持這些工作的年高望重者，沒能夠很好地履行上述職責，那麼他們也可能受到懲罰，嚴重者將會被發配或者充軍邊疆。皇帝規定，

上述懲惡揚善暨鄉村自治，均不許政府官員干預，官員的職責就是如實向皇帝報告。若地方政府官員敢於干預，則鄉村主持者有權直接報告皇帝。那時，這個官員將會被一同治罪。

傳統中國中央專制集權制度的最大特徵是皇權統治支配著整個社會，因而“自秦漢時起，從皇帝、郡守、縣令到鄉三老、亭長、裡魁就形成了一整套的統治體系”。宋代以後的歷代皇帝都十分重視鄉里制度建設，比如北宋中期王安石變法推行保甲制度。元代建立都圖制和社制，明朝實行裡甲制和糧長制，清代實行保甲制和門牌制等，這樣就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一套編織有序、防範嚴密的國家控制網路體系，因而被歷代統治者稱之為“萬世良法”（《嘉泰吳興志·卷十》）。但隨著宋代以後“縣治”策略的大轉變，卻出現了“官冗於上，吏肆於下”（《元史·卷八十五·百官一》）的基層政權退化現象，以至出現“任爾官清似水，怎敵吏胥如油”（《清史稿·卷一百二十·食貨志一》）的現象，最終導致中央對地方基層社會控制的弱化、蛻化、甚至異化。自清代中期以後，全國的胥吏人數“大縣多至一千餘名，小縣亦有數百名”，故又有“州縣與胥吏共天下”之說。而且還輔助以鄉里“自治”制度以維護穩定。

中國最早的成文鄉里“自治”制度，是1076年陝西藍田呂大鈞（1031～1082年）首創。這個鄉約的宗旨是：使鄰里鄉人能“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呂氏鄉約推行沒有多久，北宋就被金人滅了，曇花一現的鄉約也被人忘了。南宋朱熹（1130～1200年）據此編寫了《增損呂氏鄉約》。洪武21年（1388年），解縉建議，“仿藍田呂氏鄉約及浦江鄭氏家范，率先於世族以端軌”，以正風俗。朱元璋要求每個鄉村都要選派一位老人，每月六天，於暮靄四合時分，炊煙嫋嫋之際，在鄉村街道上，搖著銅鈴，大聲朗誦宣講皇帝的六諭：“要孝敬

父母，要尊重尊長，要友愛鄰里，要教育好子女，要安居樂業，不要為非作歹”！至成祖皇帝，又表章家禮及《藍田呂氏鄉約》，列于性理成書，“頒降天下，使誦行焉”。王陽明 1518 年頒佈《南贛鄉約》，嘉靖時朝（1522～1566 年）朝廷推廣王陽明的辦法。《南贛鄉約》的最大的特點是官辦，在政府威力下必須都加入。南贛鄉約規定，不參加集會罰銀一兩，懲罰十分嚴厲。《南贛鄉約》中約長、約副、約正等人的責任，包括協助官府勸令同約完成納糧的任務，勸助新民改過自新、各守本分，以及勸戒同約維護地方安定。

清順治九年（1652），在八旗中頒行明太祖的“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順治十六年責成各地，推選素有德望的秀才和平民擔任正副“鄉約”（宣講員），每逢初一、十五，以鄉為聚集地點，向百姓宣講。康熙九年，把它演化成“聖諭十六條”：“敦孝弟以重人倫；篤宗族以昭雍睦；和鄉黨以息爭訟；重農桑以足衣食；尚節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黜異端以崇正學；講法律以儆愚頑；明禮讓以厚風俗；務本業以定民志；訓子弟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善良；誠匿逃以免株連；完錢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仇忿以重身命。”令各府州縣鄉村人等切實遵行。雍正元年，欽定聖諭廣訓十六章，共計萬言，刊刻頒行，分發府州縣鄉村，令生童誦讀。每月朔望地方官聚集公所，逐條宣講，兵民皆得恭聽。講讀聖諭的辦法，從州縣到一村一族，構成一個多層次的宣傳機器。州縣官對此表現不一，有的為了邀功頻繁講讀，“有一歲再讀，四讀，十二讀之別”。聖諭講讀制度的前提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萬歲爺口含天憲，百姓只是接受開導訓化的愚氓。吏為民師是專制社會的一個主要特徵。

朱元璋對農民的生產與生活作了相當細緻入微的考慮與安排：“如今天下太

平，老百姓除了按照自己的本分交公糧和當差之外，並沒有什麼其他的麻煩。因此，你們務必用心打理自己的事情，以做到豐衣足食。每戶務必按照國家號令，依法栽種桑樹、棗樹、柿子樹和棉花。這樣，每年養蠶生產的絲綿，可以豐衣；棗、柿子可以賣錢，遇到歉收年景可以當糧食。此事對你們老百姓有好處，鄉村裡甲老人務必經常監督檢查。若膽敢違背，家遷化外，流放到邊疆去。”

這是朱元璋的一個極其有名詔令的部分內容。

皇帝要求，每個村莊都要置鼓一面。到農忙時節，需指定專門人員于清晨五更時分播鼓，令人們黎明即起，下田耕作。這事由老人負責。其懶惰不下田者，由老人督責。若老人沒有盡職，導致懶漢生活困窘而鋌而走險為非作歹被官府抓到了，則老人有罪，將受懲罰。

朱元璋在全國推行了一套極有創意的引憑制度。這套制度將身份證、通行證、許可證、各種執照之類熔於一爐又分別打造，對於各種職業、各種身份的活動方式及其範圍作了嚴格甚至是嚴厲的規定，其管理可謂細緻入微。商人有商引，無引以奸盜論處；販鹽有鹽引，賣茶有茶引，無引以走私論，處死刑；百姓外出有路引，凡百里之外，無官府發放之路引者概可擒拿送官，告發、擒拿者有獎，縱容者問罪。凡行醫賣蔔之人，只能在本鄉活動，不得遠遊，否則治罪；人民出入作息，必須鄉鄰互知。有行蹤詭秘、不務正業、遊手好閒者，皆“遷之化外”，流放到邊遠地區；藏匿者同罪；對於此類人士，允許四鄰、裡甲、親戚諸人拘拿到京重處；若坐視不問，一旦作奸犯科，上述人等全部連坐。百姓鄰里必須互相“知丁知業”：就是說，凡成年男子，各人從事何種職業，每人現在何處高就、何地發財、何種營生，必須彼此知曉，否則人們可以以奸人即壞分子論處報官。農民被要求“不出一裡之間，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曉”。就是說，農民

只允許在一裡地範圍內活動，早出晚歸。何時睡覺，何時起床，必須互相知道。此種的做法和毛時期有得一比。它根本就使整個國家底部演變成了一個大型集中營，活潑潑的社會變成了彈性甚少、具有高度剛性的板狀結構。生活在其中的人們，被分割成無數個獨立單元，相互間本來就少的聯繫，又被強力摻進互相監視的關係因素，於是基本淪為生產與生殖機器。此種情形持續了六百年，直到 20 世紀 80 年代。

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將皇帝的威權推向極端，釀成了最為僵硬且風險極大的政治制度和最為嚴重的宦官弄權現象。朱元璋所建立的錦衣衛，開大規模公開使用秘密員警之先河，將古代的特務制度推向了極端。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剛剛殺了宰相胡惟庸並三萬余大小官員，廢了宰相，自己做政府首腦，天天累得半死，不得已從翰林院找來幾個老儒幫忙。其中一個名叫錢宰，年事雖高，但寫東西還算讓皇帝滿意，最得朱元璋寵愛。一天散朝回家，忽然吟詩一首：“四鼓咚咚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第二天上朝，見過皇帝，朱元璋說：你昨天做的好詩，不過，我並沒有嫌你呀，何不將“嫌”改為“憂”呢？老錢宰嚇得一個勁地磕頭，餘生估計一個字的詩也寫不出了。可見，特務無孔不入。

滿清的雍正皇帝刺探監督臣僚，不只是公務，連私生活也不放過。據載，某大臣退朝後邀了幾個親朋好友聚在一起玩幾圈麻將牌，玩著玩著忽然發覺牌少了一張，無奈只好就此罷手。第二天上朝時，雍正問某大臣，晚上常常以何為樂，大臣以實相對。雍正笑笑，誇讚對方是個老實人。然後把昨天晚上他們玩丟的那張牌拿給他看。皇帝對手下大臣監視掌握到如此精細的程度，那手下大臣有什麼不恭不敬的歪邪招數能逃得過皇上的耳目？

2·重農抑商

專制特權一定帶來暴利。專制王朝無不實行鹽鐵等涉及民生的產品專賣、禁權制度。對鹽鐵實行專賣，最先開始于齊國。前 685 年，齊桓公問管仲，怎樣才能把國家治理得富強起來？管仲提出了“海王之國，謹正鹽”，“正”是徵收的意思。管仲認為，萬乘之國吃鹽的人達千萬，如果每升加二錢，一月可得六千萬錢，這比征人口稅多一倍，可見把鹽管起來財政收益是十分大的。而且，實行專賣，國家收入多而民不會受驚擾。齊國食鹽專賣的具體做法，是民制與官制相結合。在農閒時節，國家命民制鹽，由官府包收、儲存。農忙時，農民轉入農業生產。等到鹽價上漲到十倍之時，再由官府運到梁、趙、宋、衛等不產鹽之國去銷售，則國家獲利豐厚。據載可“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此外，齊國實行了鐵專賣，糧食、材木官營，國家壟斷了對外貿易，從而獲得了壟斷高額裡潤和增加了財政收入。

鹽鐵官營，因為這類商品需求量大且無價格彈性，官商以壟斷價格取代其市場價格，人民的財富被源源不斷的搜括掉卻毫不知覺，人民的血汗流入國庫卻感受不出痛苦。此乃一箭雙雕之策：抑制任何私人力量的崛起，確保專制制度的穩定；取得巨額壟斷利潤，掩蓋了殘酷掠奪人民的實質。這種暴利是以損害整個社會的利益為代價的，完全沒有進步意義可言。除了造成“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嚴重社會問題外；也使得社會中間階層發育嚴重不良，嚴重制約了工商業的發展空間，因為喪失了一大群有足夠支付能力的消費者。任何工商業都將舉步維艱：在滿足了極少數達官貴人和大富豪大地主後，進一步擴大生產規模無法進行，因而資本積累的空間很小，積累進程十分緩慢，從而直接阻礙了技術進步和投資意願。

歷代政府奉行的弱（貧）民術就是重農抑商，具體政策是：一是重稅，“不農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二是禁止商人為官，“賈人不得為吏，犯者以律論”，“市井子孫不得仕宦為吏”；其根本主張是以農為本，限制工商業的發展。這是中國歷代王朝最基本的經濟指導思想，其目的就是把人民強行束縛在土地上，達到隨時可以驅使的目的。

重農抑商政策產生于戰國時代。法家李悝（前 455—前 395 年）被魏文侯任命為相，實行變法；提出：“雕文刻鏤，害農之事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李悝認為，如果政府不禁止手工業和商業，就會“啼饑號寒”，“國貧民侈”。李悝提出“禁技巧”，意在防微杜漸，怕工商業發展起來動搖農業這個根本。

《漢書·食貨志》所載李悝變法實施的“平糶法”，就是將好年成分為上、中、下三等，壞年成也分為上、中、下三等，完全由官府控制糧食的糶、糶管道與價格，以此措施來穩定國家的經濟統治秩序。其實質上就是不允許糧食進入市場流通領域，以排斥商人打擊商業；與商鞅的“使商無得糶，農無得糶”措施一致。

商鞅變法實行了嚴厲的重農抑商政策。商鞅提出要抬高物價，加重商品稅收，使之十倍于成本，這樣商賈之人就會減少，農民就不會過度地飲酒作樂，大臣官吏們也不會沉醉於吃喝玩樂之中。《商君書·農戰》雲：“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于農；歸心于農，則民樸而可正也”。商鞅用法律手段強迫農民專心致志于耕織。商鞅還要求“壹山澤”，由國家壟斷山澤之利，“重關節之賦，則農惡商”，“廢逆旅”，“無得取庸”（《商君書·墾令篇》），更為殘酷的是立法將工商業者淪為奴隸。商鞅確立的新法規定：“耕織致粟帛多者複其身，事末利及怠

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增產超標者“複其身”，即免除徭役，如果棄農經商或怠惰致貧者，舉家罰做官奴。戰國變法摧抑私營工商業，不給人們自由經營工商業的權利，其目的在於打擊威脅統治者穩定的因素，根本無視民眾生存擇業的基本權益問題。

秦皇統一後，便把重農抑商政策推向東方，嚴厲打擊東方的富商巨賈，強迫他們遷移。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陽十二萬戶”。這是對戰國以來發展起來的工商業進行史無前例的殘酷打擊。

《史記·平准書》：“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西元前 135 年漢武帝對民營工商業連下重手，將鹽、鐵、酒等重要行業強行收歸官營，由官府對重要物資的運輸和貿易進行壟斷，對民營工商業徵收重稅。西元前 114 年，責令民營商人自報財產，陳報不實者，罰充軍一年。民營工商業者被告發者，沒收財物一半；告發者可獲得沒收財產一半的獎賞，這使得“告緡”愈加不可收拾，中等以上的工商業者幾乎全部破產。朝廷下令逮捕的工商業者就有六、七萬人，上層官吏自己私自增加逮捕數量，達十多萬人，搞得“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受傷害的民營工商業者比對匈奴戰爭中被打敗的匈奴人還多。“文景之治”培育出來的繁榮的民營工商業，就此被毀滅。漢武帝為抑商而設置了管理鹽、鐵、酒榷和均輸、平准的官職“大農丞”，由官府壟斷全國的工商命脈。

隋代開科取士，還明令工商不得人仕；而到了唐初，又禁止地主經商。

明代永樂初年鐵產量 9700 噸，高出北宋一倍多。經過明末大動亂，冶金業衰落了。由於害怕工業的發展會吸引大量的過剩人口聚集於清朝統治力量薄弱的窮山僻壤地區而給滿清造成威脅，所以，康熙帝於 1675 年諭令：“聞開礦之

事，甚無益於地方，嗣後有請開採者，悉不准行”。對於不能封閉的冶鐵廠，則抽 2/10 的重稅。雍正宣稱農民最貴，不僅工商下賤，連“不肖士人”也不如農，因此創“老農總吏”之制，選拔模範“老農”授予八品頂戴，結果只選出了一批作惡鄉里的村霸。雍正只重糧食（填飽肚子），經濟作物只准種在“不可以種植五穀之處”，導致一些官府強行毀掉已種的經濟作物令農民改種糧食，致使因失農時而絕收。雍正多次表示“招商開廠……斷不可行”，“礦廠除嚴禁之外，無二議也”。到乾隆 20 年（1755 年）全國合法的鐵礦廠只剩下 93 處，遠遠不及明代”

李約瑟和黃仁宇曾合作對於中國與英國的歷史進行考察，得出的結論是，資本主義乃是一種組織和運動，是限制國家權力和保障人民權利的法治化過程。這樣的法治化“總以在民主和立憲君主制下容易展開。極權政治一般趨向會阻礙私人資本的成長。”

顧准說“我還是厭惡大一統的迷信。至於把獨裁看做福音，我更嗤之以鼻。”西歐的封建制度，是具有嚴格身份等級的一種統治制度，可是，至少在統治集團之間，相互間的身份和關係，觀念上認為是由契約規定的，法學家稱之為規定身份的契約。中國，這類問題由簡單的十六個字加以解決，即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權威主義、無為政治和愚民政策，都包容在“大一統”裡面，是“大一統”的派生物。

顧准認為，那種關於中國可以從內部生長出資本主義的說法是一種侈談，原因就在於這“大一統”，在中國傳統內部沒有這種變異的資源。“我們有些侈談什麼中國也可以從內部自然生長出資本主義來的人們，忘掉資本主義並不純粹是一種經濟現象，它也是一種法權體系。……資本主義從希臘羅馬文明產生出來，

印度、中國、波斯、阿拉伯、東正教文明都沒有產生出來資本主義，這並不是偶然的。中國不少史學家似乎並不懂得這一點”。近現代經濟和社會形態，並不僅僅是一定規模的商品貿易、雇傭工廠生產、某些先進的生產工具和技術等等外在的方式，而更為關鍵的柱石，乃是那種使“君主被完全解除了監督私人產業、指導私人產業”之威權（亞當·斯密語）、使“政府干涉財產的權力受到限制”（大衛·休謨語）的法權制度；是保證國民擺脫聖君賢相、大救星的“恩庇”，從而能夠在“政治上發揮自由能動性，使自己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成為國家的立法者”的制度路徑。明清皇權政體將兩千年以來的“秦制”發展到空前縝密的程度，它與近現代社會的上述方向完全相逆。資本主義並不是一種純粹的經濟現象，也是一種法權體系。法權體系屬於上層建築。“並不是只有經濟基礎才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也能使什麼樣的經濟結構生長出來或生長不出來。”顧准認為，要實現真正的民主，就必須採掘西方的民主資源，實行思想的多元化和政治的多元化。

第 11 節 橫徵暴斂的賦稅制度

約翰·馬歇爾大法官曾說，“徵稅的權力事關毀滅的權力”。如果不對這“毀滅的權力”加以制度化的限制，那麼，這“毀滅的權力”必然要週期性地毀滅性社會。中國的歷史就是證明。看看中西農民起義的比較就知道中國老百姓受壓迫之深。①中國階級矛盾激化比西歐早。人類歷史表明，當一種新的社會形態剛建立的一段時期，階級矛盾比較緩和，但秦始皇統一中國不久，就爆發了陳勝、吳廣領導的大規模農民起義。西歐封建社會形成後的八、九百年時間裡，只有地方性小規模的農民起義，到 14 世紀，才有較大的農民起義發生。

②中國農民起義發生的頻率比西歐高。中國共發生多少次農民起義？毛澤東概括為“總計大小數百次”，也有人為，“見於記載的有六百餘次”。根據翦伯

贊《論中國古代農民戰爭》提供的材料推斷，在中國中古時期的約 500 年中，發生過千次以上的農民起義。北魏從西元 386 年到西元 451 年，65 年中，人民反抗包括反對民族入侵與壓迫的鬥爭共 37 次，百分率為 56.92%，而自 452 年至 485 年 33 年之中，卻爆發了以階級鬥爭性質為主的反抗起義 46 次，百分率高達 139.39%。人民起義或殺州郡守宰，襲城掠地，或自擁成王。

中國的兩宋王朝，由於實行募兵制，國家財政吃緊，遠遠不是田賦能夠滿足的。所以從北宋開始，就實行重商政策和禁榷專賣。通過在四川和西北的茶馬貿易，以及沿著自唐代建立的海上絲綢之路和東南亞以及西亞進行絲綢瓷器茶葉貿易，再加上對內的鹽、酒貿易，年財政收入近億，保障了政府的需要。然而宋代重商的目的是滿足財政支出的需要，很多商業活動都是禁榷專賣，也就是官方壟斷經營，所以宋代的重商，並沒有使普通百姓富裕起來。在宋朝前後 300 餘年中經歷了 433 次農民起義，其中 230 次發生在北宋，203 次發生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 1.4 次。農民起義“一年多似一年，一夥強似一夥。”西歐各國中世紀 1200 年，一般只有 3 至 4 次有影響的農民戰爭。德國農民戰爭前的 41 年中，是農戰爭頻率最高的時期，農民多次利用“鞋會”等秘密結社組織起義，但只有一次真正成為起義。假定西歐各國整個中世紀時期農民起義的頻率都有德國這一時期那樣高，每個國家的農民起義也不超過 30 次。可見，中國農民起義的頻率比西歐各國的總和也要高出數倍到數十倍。

③中國農民起義的規模比西歐大。中國封建社會史上參加者數十萬到百多萬眾的大規模農民戰爭有十餘次。在西歐，法國著名的紮克雷起義只有幾千人參加，英國的瓦特·泰勒起義也只有幾萬人。其規模唯一可與中國較大規模農民戰爭相比的只有 16 世紀初的德國農民戰爭，但它比同等規模的秦末農民戰爭晚了 17 個

世紀。

④中國農民戰爭的組織程度比西歐高。中國自秦末農民戰爭起，每次較大規模的農民戰爭都有較統一的領導和鬥爭綱領，在全國範圍內堅持數年到十數年，輾轉作戰數千里；而且，一般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權。西歐較大規模的農民戰爭，一般都是些地方性農民戰爭的集合體，每一地區的農民軍都各自為戰，難於形成統一的指揮和統一的鬥爭綱領。組織程度最高的德國農民戰爭，實質上也是一些地方性農民起義同時爆發，起義農民“在每省區都各行其是，向來不肯支援鄰區的起義農民”。雖然德國農民戰爭也建立了西歐唯一的農民政權“永久議會”，但卻只是一個地方性政權。

⑤中國農民戰爭的後果嚴重。中國的王朝多次是被農民戰爭推翻，或給予沉重打擊後而崩潰，有的農民起義領袖當了皇帝，強化了“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

西歐農民戰爭一般都打著國王的旗幟，把鬥爭矛頭指向貴族，視國王為自己的保護者。沒有一次農民戰爭推翻了舊王朝，更沒有農民領袖當上國王或皇帝的。

1920年代末，為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蘇聯學者最先把中國社會停滯與農民戰爭掛勾。如坎托羅維亞認為，“具有明顯土匪性和破壞性”的人民起義是使中國社會“處於停滯僵化狀態”的根源。不久，中國人也開始持類似的觀點。三十年代，有人主張“歷史循環論”。其中，莫非斯、陳高鏞等人認為是農民暴動的週期性破壞，造成了歷史的迴圈。針對這些觀點，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指出：“在中國封建社會裡，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創始人肯

定階級鬥爭的歷史作用，一般是指新舊社會更替時期階級鬥爭的“助產婆”的作用。恩格斯專門論述封建社會農民戰爭的著作《德國農民戰爭》，也沒有提出農民戰爭是封建社會發展動力的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認為，“中世紀所有的大規模的起義都是從鄉村中爆發的，但是由於農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來的極端落後性，這些起義也毫無結果。”

中國歷史上農民被壓迫之慘為世界之冠，其起義的次數為世界之冠，為此而犧牲的生命也為世界之冠。中西農民戰爭的差異巨大，不是因為中國人好戰，而是因為中國人所受的剝削更重。中國的基本矛盾是官民矛盾，民眾始終處於被剝奪的狀態。中國皇帝是全國土地最高所有者，農民便成了國家的農奴。農民除負擔名目繁多的租稅之外，最苦不堪言的是徭役。各種徭役常使“天下百姓，哀號于道路，逃竄於山澤，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大量農民背井離鄉為國家服徭役，造成全國農民生產和生活狀況同步惡化，皇帝便成了“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仇”的對象。中國多次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就是直接由服役農民發動的。

在中國歷史上，農民與地主之間幾乎從來沒有發生過哪怕是一場像樣的戰爭，而“官逼民反”卻比比皆是，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都是沖著皇權專制政府去的。黃仁宇先生說：“中國的傳統是皇帝派遣官僚到各處向全民抽稅，我們稱之為官僚主義，這是一種中央集權的特殊辦法”。它較之西方的封建制度更為嚴密、更為強化，也更為殘酷。關於這一點，可從中國幾乎每個皇權專制朝代（秦以後）都發生的全國性的大規模農民起義的起因上得到驗證。

中國農民受中央政府的沉重剝削，西歐農民基本不受這種剝削。中國是皇權和官僚的結盟，直接魚肉百姓；西方中世紀的主要矛盾是皇權與地方的矛盾，老百姓尚有喘息機會。

西歐土地所有權經多層次分封後，實際所有權屬於封建領主。因此，農民成了領主的農奴，國家無權徵調他們服徭役。西方農奴的狀況不會由於服徭役在全國範圍內同步惡化，國王和皇帝們也不會被農民視為共同的敵人。農奴佔有的土地一般較自由人為多，而繳納的租稅也一般要低。西歐各地，勞役量差別很大。大致說來，在義大利、勃艮第和羅亞爾河以南的法國，勞役很輕。在西歐大陸的北部，勞役重些，但每年的役量也不過幾十天。在 13 世紀的英國，只有少數地方如諾福克、索福克、劍橋等郡的農奴履行周工義務，數量通常為兩天。在約克、肯特、康沃爾等大多數郡，勞役很輕。1279 年，在沃維克郡兩個百戶區的 43 個村莊中，只有極少數人負擔重役，1/4 以上的地區完全沒有勞役，僅有 10% 的居民履行周工義務。另外，有些勞役僅在文件上作了規定，但並未履行。

在西方古典城邦時代，當官是公民的義務，往往沒有報酬；有的官員還要自己出資舉辦公共事業。城邦實行公民兵制度，沒有常備軍；公民作戰所需武器、乾糧也要自己準備。城邦也沒有中國那樣奢侈豪華的宮庭。中世紀的國家比古典城邦要大得多，但也沒龐大的官僚和常備軍；國家財政問題不可能象中國那樣“官府毒似狼”、“苛捐猛如虎”。

西方的王權始終是受到某種力量限制的。如安德森所說：“‘專制制度’是個誤用的名詞，在不受限制的意義上，沒有一個西方君主曾對其臣民有過絕對的權力。”這種限制主要表現在對君主徵稅權力的制約上。西元 613 年，法蘭克教俗顯貴要求國王承認以前賜予的一切封建特權，保證按法律程式審訊和判決，取消一切違反傳統的稅收（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這是首次貴族限制王權的事件。此後的查理曼帝國也沒有建立系統的稅收制度，帝國只徵收道路橋樑稅貨物過境稅和貿易特許稅；人頭稅與地產稅受抵制而取消。

中世紀的徵稅權歸於某一權力集體。在英國，這一權力集體先後經歷了御前會議、貴族大會議、國會三種形式。賦稅徵收已形成事先徵求王國社團意見的原則，1215 年《大憲章》特別強調了這一原則。《大憲章》頒佈後，英王的收入受到了貴族控制。1066 年諾曼征服前，盎格魯·撒克遜國王曾徵收名為丹麥金和卡路卡奇的土地稅，但那時封建等級制尚未確立，因而各等級間的阻隔還未形成，而且是處在丹麥人大兵壓境的形勢下，所以這種徵收是可能的。儘管如此，那時的徵收次數很少，徵收量也不大，因而為一特稅而非常稅。諾曼征服後，封建等級制業已建立，各等級間的阻隔已形成，所以從理論上說徵收已不可能。既然如此，為什麼還有土地稅的徵收呢？答案應該是：土地稅雖不常征，卻已是國人認可的稅項，徵收舊稅要較新稅容易得多，對於這種現成的稅項，國王當然不能捨棄，而對國民來說，由於已形成了習慣，或至少已有先例，繼續徵收是可以接受的。但徵收之難，已遠非昔日可比。往往多年甚至十多年不見徵收一次，而且徵收量很小。12 世紀初葉，為不定期徵收，每次少者 1 萬鎊，多者亦不過四五萬鎊。1200 年、1220 年所征僅為 7500 鎊和 5500 鎊。如此似存似廢，時續時斷，不絕如縷地維持了百餘年，終於在 1224 年被明令廢止。

1237 年英王因財政窘迫召開由大貴族參加的臨時會議，要求徵稅。由於國王在大貴族中留下了不誠實的印象，且徵稅頻繁，國王心腹大臣不得不在會議上提出：徵收協助金的方式由貴族大會決定並由會議選出的委員會掌握稅款。但大貴族並不以此為滿足，他們譴責國王非因公共事業而至貧窮，因此拒絕了國王的要求。最後，國王不得不罷免舊臣，吸收新選的三名大貴族代表入會。至此，與會貴族方批准國王徵收 1/13 動產稅。這次會議的意義在於確定了納稅人決定國王徵稅的權力，為“補償原則”的提出創造了條件。

1297 年大憲章確認令頒佈之後，動產稅稅率還缺乏起碼的穩定性。例如，1302 年稅率為 1/15，1306 年為 1/30、1/20，1307 年為 1/20、1/15，1309 年為 1/25，1313 年為 1/15。這種不穩定性不僅是賦稅制度不規範、不成熟的表現，更重要的是顯示了議會亦不排除國王在徵稅問題上的隨意性。直至 1332 年議會對動產稅進行改革，才結束了這種波動不定的局面。這一年，愛德華三世要求徵收任意稅，稅率為動產的 1/14 和 1/9。議員們對此多有抱怨，認為：“倘若國王依靠他自己的收入生活，便不會因蠻橫的特別稅以及類似的東西使他的臣民痛心”。爭論的結果是，允准國王向俗人徵收 1/10 或 1/15 動產稅，同時廢止任意稅的徵收。在通常情況下，徵稅定額很難征足，每次徵稅總根據實際情況給予某些地區、城市或鄉村以一定數量或全部的豁免。1389 年，豁免了屢經法國和蘇格蘭人搶劫而致貧窮的諾森伯蘭、坎伯蘭和威斯特摩蘭的 1/15 稅。1432 年又賜遭洪澇劫難的林肯郡玫瑰伯騷迫城兩年免征。由於請求豁免者甚眾，王室建立了津貼制度，即從應徵額中扣除一定量，然後根據所承擔的稅額在受災和貧困地區進行分配。1432 年確定津貼稅額為 4000 鎊，而 15 世紀中葉增至 6000 鎊，從而使 1332 年的規定額實際降至 32000 至 33000 鎊之間。

與西方的王權相比，中國的皇權是無限的。中國皇帝對稅款實施“強權徵收”，並不徵求納稅人的意見或同意；任何一種社會力量都沒有可能對他進行哪怕一點點的制約。

地方官員打著“聖旨”、“上諭”的旗號“暢行無阻”地徵稅，徵收多少全憑一時一地的需要，全然不顧農民的承受能力，對納稅農民亦不承擔任何法律和道義上的責任。

《宋史·食貨志》稱：宋代田賦徵收“既以絹折錢，又以錢折麥，以錢較絹，

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倍于錢。輾轉增加，民無所訴”。明代稅制規定，納稅人須將所繳稅糧運送至指定地點、指定倉庫，目的地有的遠至千里之外，“因之計及運費及加耗‘米一石’，實質上因時、因地不同，其價值千差萬別。有時也可以折布折銀，其折換率由政府憑己意而增減”。

對長江下游的沃土徵收重稅。明初，“各地賦則每畝不過升鬥”，但蘇、松、嘉、湖等地有“每畝課至七鬥五升的。宣德中加至一石以上，正統中又加至二石以上。以弘治十五年松江府納糧百余萬石，多於金閩八府一州五十七縣之輸將；嘉靖間松江府納糧一百二十余萬石，舉北直隸八府十八州一百十七縣之糧，庶幾近之。這還只是就正供而言的。此外，漕運則有加耗，征繳則多悉索；松江本無桑蠶而多賦農桑折絹；已有粗布、細布之解京，又有內號外號之織造。徭役之繁，冗費之多，實屬不可勝數。到了清代，賦額有增無減”。結果是極其嚴重的：農業生產物不足以繳稅，不得不以手工業生產來補充，因受賦稅重壓而破產的農民一旦進入城市卻發現城市工商業也被破壞殆盡，致使他們“無事可幹”，難以生存。

明神宗朱翊均把國家的財政破壞殆盡。鄭貴妃生子賞銀 15 萬兩、過生日賞銀 20 萬兩，潞王就國賞銀 30 萬兩，福王結婚用銀 30 萬兩、建洛陽府邸用銀 28 萬兩，營建定陵用銀 800 萬兩，皇子冊封等用銀 1200 萬兩、採辦珠寶等用銀 2400 萬兩。而萬曆初年，年國庫收入才 4 百萬兩。明神宗修建自己的陵墓定陵，耗時 6 年時間才最終建成。定陵工程艱巨，每天役使軍工、民匠 3 萬餘人，全國平均每戶需攤派勞役六天半，共耗白銀 800 余萬兩，為當時全國兩年田賦收入的總和，可供 1000 萬農民一年的口糧費用。定陵建成後，萬曆帶領後妃、臣僚來到陵園，一時興起，竟在“生壙”（地宮）裡飲宴起來。萬曆皇帝為了得到更多的錢財，

竟鼓勵官吏們直接向自己進奉，以進奉錢財的多寡來衡量忠心程度。

國家已有一個稅收系統，可皇帝卻在 1596 年另設直轄的稅收系統。他向全國遣派稅監礦使，到處恣意橫行而略無顧忌。比如：商人若不能滿足官員們的敲詐勒索，則他的全部家財就被立即抄沒。這種公開搶掠的物件，竟然遍及于整個商人階層，典型的例子比如稅監陳增以盜掘礦產的罪名誣陷敲詐眾多的富戶，三天內拘捕 5 百多人；陳增的黨羽程守訓誣陷眾多徽商私匿巨額財產，於是嚴加追抄，而所有的徽商只有向他重資行賄才能倖免於難。程守訓至浙江，稱奉密旨挖金寶，募人告密；誣大商巨室藏違禁物，所破滅什百家，殺人莫敢問！

時中官多暴橫，而陳奉尤甚。萬曆 27 年，受朱翊鈞派遣征荊州店稅的陳奉，對水路和陸路的商人一律施以公開的搶劫、對於一切有產之家必罄其所有而後快。富家巨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以為下有礦脈，率役圍捕，辱及婦女，甚至斷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帝縱不問。陳奉的黨羽在武昌經常假借著緝查私貨的名義，闖入民宅，姦淫婦女，勒索財物。1601 年，武昌就因稅吏強姦婦女，激起大規模暴動，20 余萬人攻擊稅務公署，陳奉逃到親王府躲避，密令他的騎兵衛隊 3 百余人向抗暴群眾衝殺，當場數十人死亡。群眾生擒了陳泰最親信的助手 6 人，投入長江。……陳奉在湖廣二年，慘毒備至。及去，金寶財物鉅萬計。

雲南稅監楊榮，比陳奉還厲害，群眾起來攻殺他的隨從，楊榮就立即逮捕了數千人，全都用酷刑拷死，又逮捕被認為拒絕合作的指揮使樊高明，拷打後戴枷示眾。1606 年民變與兵變結合，把楊榮殺死。廣東稅監李鳳在擄掠當地巨額財產的同時姦污婦女 66 人。稅監高淮在遼東帶領家丁數百人，自前屯起遼陽、鎮江、金復、海蓋一帶，大小城堡，無不迂回遍歷，但有百金上下之家，盡行搜刮，得銀不下數十萬，閭閻是空！

各地稅監為了更徹底地搜刮民財，大規模招募流氓惡棍充當打手、並大肆鼓勵誣告陷害；各地的稅監衙門動用諸種酷刑作為勒索商人的手段；等等。如兼掌天津和臨清的稅監馬堂招攬流氓惡棍充當打手以大肆掠奪，結果連中等富裕程度的人家也多半橫遭破產之禍：諸亡命從者數百人，白晝銀鎊奪人產，抗者輒以違禁罪之。僮告主者，畀以十之三。中人之家，破者大半，遠近為罷市。皇帝的“礦監”和“稅監”把百姓的財富搜括罄盡，全國中等以上的家庭大部破產。在萬曆時期經濟史料中隨處可見，比如這類描述：“吸髓飲血，以供進奉，……而天下蕭然，生靈塗炭”；“遂使三家之村，雞犬悉盡；五都之市，絲粟皆空”；“宇內已無尺寸淨地！”這種對國民基本生存權益和社會基本秩序摧殘程度之慘烈，從當時的礦監稅使將眾多稍稍妨礙其擄掠暴行的地方官員貶謫削籍、投入監獄、甚至折磨致死，就可以看得很清楚。1607年2月（明萬曆35年正月），江蘇泰興縣知縣龍鏜進京述職考核，因考績不佳，被貶了官。當他走到廣甯門時，幾個皇帝的稅監便向他勒索錢財，他卻是行囊無幾。一氣之下，這幾個稅監拳腳相加，生生把這位縣官打得口吐鮮血而死。在如此局面下，一般國民只能淪入“幽系死亡者，尤不可勝紀”的慘境。以往人們常用16世紀前後徽商等地方商業階層的形成及其廣泛的經營活動，來證明“資本主義萌芽”了，但無論徽商經營如何一時發達，但其最終根本無法擺脫專制權力橫暴摧殘之下的窘境。

神宗皇帝朱翊均，20歲之前因張居正攝政，只是經常拷打身邊的宦官和宮女，把這些人拷打至死。隨侍的宦官宮女，稍不順眼，就喝令撲殺。他平均每星期要殺死一人，每三天就要親手鞭死一個宦官，宦官們須含垢忍辱，用諂媚機警才可保衛自己。從1582年親政，到1592年的10年間，僅官方統計就已鞭死了1千多人。張居正“一條鞭法”改革，最大受益者是萬曆皇帝。他老子隆慶皇帝

撒手西去時是人不敷出的財政、紛爭不已的內閣。平民出身的李太后，全權委託張居正輔政。張居正期待神宗成為一代為民造福的“聖君”。張居正的《人主保身以保民論》，以道家學說深化儒家的民貴君輕論，融合儒道兩家節制君主的思想而以君臣共治、君民互利貫穿其中。他為小皇帝編寫的啟蒙讀物《帝鑒圖說》，教導皇帝“天下可以一人主之，不可以一人治之”，放手使用大臣；尊儒，讀經，行仁政，等等。“不可以一人治之”的君臣共治論，勢必觸動一人定乾坤的皇權專制。張居正試圖從道德制約皇權轉為以法律制約皇權的途徑尋找限制君主的方案，只是一廂情願、根本行不通的美妙幻想。朱翊均在張居正死後親政，第一件事就是抄張居正的家，地方官員還沒有得到正式命令，一聽到風聲，就派兵把張居正家團團圍住，門戶加鎖，禁止出入。等中央查抄大員張誠到達時，已有 17 人活活餓死。共抄出黃金 2400 兩，白銀 107700 兩，金器 3710 兩，金首飾 900 兩，銀器 5200 兩，銀首飾 10000 兩等。萬曆皇帝說，果然是一隻欺君盜國的碩鼠。

神宗皇帝從 1582 年初一宣佈取消群臣朝拜，不再接見任何人，完全不管國家大事達 30 年之久。他的祖先們還用“票擬”“朱批”過問一些政事。他連“票擬”“朱批”都完全停止。全國行政長期停頓。中央政府的六個部，只有一個部長(刑部)，都察院的都禦史已懸缺十年以上。錦衣衛沒有一個法官，獄中囚犯關了 20 年還沒有審問過一次。全國地方政府的官員，缺少一半以上。宰相李廷桂有病，連上 120 次辭呈，都石沉大海，只好不辭而去。後金汗國連續攻陷撫順、開原、鐵嶺諸城，守軍陣亡 4.5 萬多人，瀋陽危急，北京震動。全體大軍長跪文華門外，請求皇帝批發軍事奏章，增派援軍，急發欠餉，可皇帝毫不理會。

趙翼在《廿二史雜記》中說：“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于萬曆雲”，

實在是說對了。即使是最優越的教育，最嚴格的自律約束，也無法改變皇權制度造就的帝王本性。張居正有清醒的君主觀念，卻醉心于君主教育，嘔心瀝血造就的“聖主”，竟是一代亡國暴君。

賦稅的成倍、甚至是數十倍的增長，總是與王朝的政治週期相互吻合，而且通常是從王朝的中期開始凸顯，所以稱這種趨勢稱為“王朝中期賦稅暴增律”，即“黃宗羲定律”。

黃宗羲指出：每個王朝進行賦稅制度改革後，農民負擔雖短時間有所下降，但很快就會反彈，而且比改革前更重，這就是著名的“黃宗羲定律”。“黃宗羲定律”就是朝廷賦稅改革，將前面濫征的各種攤派與附加，與正稅合在一起一併徵收。然而改革後，政府“忘”了這一併徵收的賦稅本身已包含了攤派和附加，再次另行攤派。結果是改一次，賦稅增加一回。唐代的兩稅法改革、宋代王安石變法、明代張居正變法，莫不如此！

2003年3月6日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在與湖北代表團一起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歷史上稅費改革進行過不只一次。像唐朝時的‘兩稅法’、明朝時的‘一條鞭法’、清代時的‘攤丁入畝’等等。每次稅費改革後，由於當時社會政治環境的局限性，農民負擔在下降一段時間後會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準，走向了原先改革目的的反面。明清時期的思想家黃宗羲稱之為‘積累莫返之害’，這就是所謂的歷史上有名的‘黃宗羲定律’。”

“黃宗羲定律”表明專制列車已經“失控”。它反映的是：最高權威的衰落、官僚集團利益的不可動搖以及對“最高指示”的抵制。靠思想教育讓他們把自己的碗裡的肉，撥到民眾的碗裡，可能嗎？事實上，改革的唯一意義，就是給官僚們找了點麻煩，增加了他們的成本，他們自然要變本加厲地從民眾那裡盤剝回來。

因此，改革只能導致民眾增加負擔，絕不會有別的任何結果。這就是專制王朝改革的邏輯。

安史之亂爆發後，原有的租庸調法無法繼續實行下去。西元 780 年，唐德宗接受宰相楊炎的建議，實行兩稅法改革。兩稅法的主要內容：①“以資產為宗”，即按土地、財產的多少來確定應納稅額。②“費改稅”，把當時混亂繁雜的稅種和各類收費合併統一起來，歸併為戶稅與地稅兩種。③“以徵收貨幣為主”，規定除田畝稅以穀物形式交納外，其他一律折合成錢幣交納。④“統一徵收時間”，兩稅法規定每年納稅時間分夏秋兩季。兩稅法的精神，原不在字面所示的每年兩次徵收，即“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而在所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王公、官僚、浮客，均在被稅之列。”

白居易《秦中吟十首》寫於“貞元、元和之際”（804 年前後），相隔才短短的 20 幾年，“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的法令就恍如隔世了！請看白居易《秦中吟十首》之二《重賦》：

厚地植桑麻，所要濟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賦，上以奉君親。國家定“兩稅”，本意在憂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內外臣：“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寵，斂索無冬春。置絹未成疋，繰絲未盈斤；裡胥迫我納，不許暫逡巡。歲暮天地閉，陰風生破村。夜深煙火盡，霰雪百紛紛。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端與寒氣，併入鼻中辛。昨日輸殘稅，因窺官庫門：繒帛如山積，絲絮似雲屯。號為羨餘物，隨月獻至尊。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為塵！

官員們除了如白居易所描寫的那樣以巨額的進奉取悅皇權、鑽營升遷之外，更直接從各種名目的加征中攫取巨大的私利。比如李翱奏稱：施行“兩稅”之後，

各地節度使又假借向朝廷“進獻”之名加派賦稅，其所得之中只有 1/3 用來應付“進獻”、而 2/3 都裝進了私囊，於是使得“（百姓）父子、夫婦不能相養”。晚唐時藩鎮割據，兩稅之外的雜稅蜂起，新法被扭曲，柳宗元的《捕蛇者說》形象地揭露了當時苛捐雜稅甚於毒蛇猛獸之害。

白居易反對兩稅法的以錢定稅，希望能重新實行貞觀年間的“租庸調”制。其詩雲：私家無錢爐，平地無銅山；胡為夏秋稅，歲歲輸銅錢？錢力日以重，農力日以殫。賤糶粟與麥，賤買絲與綿。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饑寒！吾聞國之初，有制垂不刊：傭必算丁口，租必計桑田；不求土所無，不強人所難；量入以為出，上足下亦安。兵興一變法，兵息遂不還。使我農桑人，憔悴畝間。誰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權：復彼租傭法，令如貞觀年。

此外，白居易反對鹽鐵雜征，反對和籴制度。和籴制度是從南北朝到唐代推行的一種封建政府以商業方式採購其所需要的民間穀物的制度，但在推行中逐漸變成按戶攤派，成為人民沉重的負擔。白居易認為，和籴並非“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而是“令府縣散配戶人，促立程限，嚴加征催。苟有稽遲，則被追捉，迫蹙鞭撻，甚於稅賦”。

宋代稅制稱“二稅”，也是夏、秋兩季徵收，性質與唐代兩稅基本相同，但統治者卻故意混淆這種已含有人頭稅和戶稅的複合稅制與田租(土地稅)的區別，在“二稅”之外又開徵了新的人頭稅，即“丁身錢米”，這是一種典型的重複徵稅。事情並沒有到此為止，在“田租”、人頭稅之外又層出不窮地出現了多入牛毛的“雜變之賦”，在徵稅過程中還出現了“支移”、“折變”等變相增稅的措施，並令農民服“差役”。

從北宋初至徽宗初年的 140 年間，僅僅是上供“正額”一項，百姓頭上的負

擔就增長了十多倍，平均每十年上漲一倍(還不算名目和稅額更快激增的雜稅)！

1023 年北宋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官方紙幣——會子，1126 年發行的會子達到七千萬貫，造成世界上第一次濫印紙幣而引起的通貨膨脹。宋代稅法中明確規定，對於一切過往商貨，只要是官府認為需要的，就可以無償截留 1/10，名之曰“抽稅”，這當然是“官府即法理”的典型表現。

宋神宗熙寧二年（西元 1069）王安石變法，制定“免役法”，規定以貧富為標準，將民戶分為五等，按等徵收“免役錢”，政府用此錢雇人應役，不再征派差役。此舉甚得民心，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並稅”。但不久發生“元祐更化”，司馬光廢止各項新法，苛捐雜稅又不斷湧現。有史學家稱，宋代（包括南宋）究竟有多少苛捐雜稅，誰也說不清。

南宋楊萬里在其《民政》書中揭露：上賦其民以一，則吏因以賦其十；上賦其民以十，則吏因以賦其百。楊萬里說，原來的勞役額度是根據該民戶佔用田畝的數目確定的，當王安石推行“免役制”後，它很快就與民戶土地數無關而成為了單獨的稅種，在這個稅種名義下的加征加派也就沒有了限制。又比如朝廷在常設稅目之外，加征了佐助執行臨時任務的軍旅特別稅，該項特別稅被稱為“經製錢”。後來此軍旅的編制已經撤了，但“經製錢”卻成了永久的稅。“總製錢”的設立也是臨時的，後來“總制軍”的建制早已撤銷了，但“總製錢”卻要百姓永遠繳納。制定這些稅種之初，百姓負擔的稅額只是粟若干斛、帛若干匹而已；但是沿革至今，其徵收額度已經是：粟一倍於當初、帛幾倍於當初了。此外，又生出繁多的雜稅，於是今天百姓的負擔，已不知是本朝初期的多少倍，更不知是漢唐時的多少倍了。

1303 年，第八任大汗鐵木兒一次撤掉了 18473 個貪官。可後任大汗複行放

任，以致每一個蒙古官員都是百萬富翁。14 世紀 30 年代全國各項賦稅較 13 世紀 70 年代增加 100 倍。

到了明代，在二稅、丁口稅和各種雜稅之外，又征勞役（力差）和代役金（銀差）。

萬曆九年（1581）皇帝採納內閣首輔張居正的建議，實行“一條鞭法”改革，把稅糧、丁口稅、差役和所有雜稅全都歸併到一起，折銀徵收，特別是把原來每 10 年中輪值一年的差役負擔分攤到 10 年的正稅裡徵收，實際上是把銀、力二差再一次歸併到了兩稅中。“一條鞭法”推行以後，在一定時期內確實起到了杜絕苛捐雜稅的作用，國家財政形勢有所好轉，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明王朝政治衰落的危局。

但“好景”仍然不長，新法實行不到 40 年，因遼東戰起，各種田賦“加派”又紛至沓來，出現了“鞭外有鞭，條外有條”的現象。天啟、崇禎年間先後加派遼餉 500 萬兩，剿餉 900 萬兩和練餉 730 萬兩，這就是著名的“三餉加派”。明末戶部尚書倪元璐又把三餉歸併為一，再一次把雜派又併入了“兩稅”，正是這個“三餉加派”，成為明朝滅亡的導火索。

順治元年（1644），禦史柳寅東向皇帝報告明朝末年於正稅之外向農民加派雜稅的情況時稱：“解京錢糧，頭緒紛雜。有一縣正額止三千餘兩，而條分四十餘頃。有一項錢糧止一兩六七錢，而加費至二、三十兩”。在這樣無情的重稅壓迫之下，農民還能有活路嗎？正如黃宗羲所說的：“如稅額之積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者亦無幾矣。”

黃宗羲之後清康熙、雍正年間進行的“攤丁入地”改革也不過是明代一條鞭法的又一次重複，因而有“清代一條鞭法”之說。“攤丁入地”的政策意圖就是

為了從根本上解決清初以來難以抑制的雜稅叢生問題，清初雖然取消了明末的“三餉加派”，訂定《賦役全書》，企圖減輕農民負擔，但不久自己也開始大搞加派，不僅在田賦正稅上加派，如“鼠耗”、“雀耗”、“火耗”等，而且在雜稅上也搞加派。康熙 19 年（1680）給事中許承宣在給皇帝的上疏中稱：“今日之農不苦於賦，而苦於賦外之賦；不苦於差，而苦於差外之差。”鑒於明朝苛捐雜稅激起農民大起義最終導致明王朝滅亡的教訓，康熙皇帝于 51 年（1712）頒令：“今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五年（1727）在全國實行將人丁稅與田畝稅合一、“民納地丁之外，別無徭役”的“攤丁入地”制度，並實行“耗羨歸公”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地方官員對農民的濫征。可這一系列措施並沒有、也不可能完全杜絕苛捐雜稅；力役或人丁負擔不久就在合併後的“地丁銀”之外重複出現。晚清時仍然按照“地丁屬地、差徭屬人”的原則徵收，一直到民國時，人頭稅仍然是地方在田賦之外經常徵收的一種雜稅。

黃宗羲精闢地指出：“並稅式改革”決不是為了減輕農民負擔而是為了不斷增加賦稅徵收，無論稅種稅目的數量或者稅費絕對額都是增加的，以確保滿足統治者無止境的欲望。黃宗羲將之歸結為：“積累莫返之害”。公式表示為：兩稅法=租庸調+雜派；一條鞭法=兩稅法+雜派=租庸調+雜派+雜派；攤丁入畝=一條鞭法+雜派=兩稅法+雜派+雜派=租庸調+雜派+雜派+雜派……這個公式表示每進行一次稅費改革，雜派就會增加一次。依次類推，雜派逐漸增多，稅和費的界限也越發模糊。費逐漸轉化成了稅，農民的負擔沒有減輕，反而加重。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發生的千百次大規模的農民的起義和反抗鬥爭中，幾乎沒有一次發生在與封建地主階級之間，而是都直接或間接地與其稅費負擔過重相關。統治者一次次地以“稅制改革”的名義加重農民負擔，並把自己完全置於農民階

級對立面直至走向滅亡。理解了這個問題，也就對中國皇權專制社會“並稅式改革”的實質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

由於官員膨脹，致使農民的實際稅費負擔很沉重。為了鞏固皇權，歷代王朝不斷地分散削弱各級官僚機構的事權，使之上下相制，內外相維，官僚機構的規模越來越龐大。下面一組數字可作證明：唐代貞觀初年（627～630）中央政府文武官員 643 員，高宗顯慶年間（656～661）九品以上官員達 13465 員，至玄宗開元年間（713～741）達 369787 員。唐代國家財政支出中，“最多者兵資，次多者官俸，其餘雜費，十不當二事之一”。

北宋太祖時（960～976）內外官約 13000 員，仁宗時（1023～1064）為 20000 員，至徽宗宣和元年（1119）達 48075 員。宋人蔡襄認為當朝“兵冗為大，其次又有官冗”。北宋太宗至道末年（997），全部財政收入為 2224 萬貫，盈虧對半；仁宗皇祐元年（1049），全部財政收入為 12625 萬貫，無結餘；英宗治平二年（1065）財政總收入為 11613 萬貫，支出為 12034 萬貫，加上非常支出 1152 萬貫，財政赤字達 1573 萬貫。可見，從太宗到英宗不到 70 年的時間，賦稅收入增長了 5 倍多，財政卻出現了嚴重的人不敷出的局面，其中主要是“官冗”導致財政支出規模直線上升所造成的。

明代、清代同樣是“國家經費莫大於祿餉”，“官冗”已成為皇權專制社會的不治之症。明初洪武年間（西元 1368～1398）官員為 2.4 萬員，憲宗時（西元 1465～1487）為 10 萬員，世宗時（西元 1522～1566）達 12 萬員。史載明代“巡按查盤、訪輯、饋遺、謝薦多者二、三萬金，合天下計之，國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萬”。

除了“朝廷命官”膨脹外，歷代王朝末期的非正式官員人數總是比初期膨脹

數倍甚至數十倍。比如唐代初期，“諸官有員數，而署置過限及不應置而置，謂非奏授者。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唐律疏議·卷第九》）；但到唐玄宗開元 17 年（729 年），“雜色入流”官員每年任命 2000 多人，為明經、進士及第人數的 20 倍。再如明朝初期，“松江一府坊廂中，不務生理交結官府者 1350 名，蘇州坊廂 1521 名。此等之徒，幫閒在官，自名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幫虎，其名凡六。不問農民急務之時，生事下鄉，攪擾農業。……上假官府之威，下虐吾在野之民”（《大誥續編·罪除濫設第七十四》）；到洪武中期，朱元璋下令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起取天下積年民害”運動，僅松江府就革除小牢子、野牢子等共 900 餘名，削減幅度高達 3/4，以此推算全國的吏役人數是一個很大的數字。清末，“國家任命的正式官員人數還不到 2 萬名（按編制文官 9000 名、武官 7500 名），但實際上帶有功名的士紳約為 125 萬之多”。清人侯方域曾驚歎說：“天下之官冗，而吏胥日以夥，每縣殆不止千人矣”（《清朝經世文編·卷 24·吏政十》）。清廷禦史陸百川則斥責說：“州縣為親民之官，所用吏胥本有定額，乃或貼寫或掛名，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亦不下三、四百人”（《皇朝政典類纂·卷三十六》）。這樣，“國家政治下層，實由官治而淪為半官式之紳治。故所謂地方政治者，不操於官，即操於紳，甚或操于地痞惡棍，生殺予奪，為所欲為，民之所能自存、自主、自治者，亦幾稀也”。總之，一切官僚機構都具有自我繁殖和持續膨脹的規律性，因而機構龐大、人員臃腫、效率低下是慣有的通病。因此，“朝廷多一政令，百姓多一奸欺；朝廷多一章程，百姓多一奇巧。無怪乎世道之大非，民情之日變，而愈治癒難也”（清黃元吉《道德經注釋·第七十五章賢於貴生》）。

胡如雷說：高度集中的皇權專制制度以及這種制度所製造的龐大的政府“就

好象一個還沒有成年而且身體羸弱的人勉強穿上了一套不勝負擔的鎧甲”，表現出政治上的高度集中與經濟上的極端落後分散這一對中國皇權專制社會永遠無法調和的矛盾。

西歐的土地分封，最終“它要求把小塊土地分給農奴”。農奴和土地都是封建主的財產。若農奴勞累而死或者逃亡，便構成了封建主財產的重大損失。保證農奴能維持簡單再生產和繁衍後代，是封建主的根本利益所在。故對農奴的剝削必須固定在一定的“慣例”範圍內。從這個意義上說，“農奴生活有保障”，不會經常發動起義來反對封建主。

中國農民所受的地主剝削比西歐沉重。中國農民喪失“承包”的國有土地成為佃農，甚至失去一切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而成為流民。這便造成佃農的部分必要勞動也被剝削掉。“田主之收十六七”有之，“坐享七成之利”有之，剝削量有達八成者。因此，“貧民富戶，多不相得，富者欺貧，貧者忌富。一遇饑饉，初猶搶米，再之劫富，再之公然擄聚為盜。”

中國農民受商人高利貸者的剝削，西歐農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未受此種剝削。中國農戶首先受市場壓價之害。《漢書》中說：農民們為天災和賦役所迫，只能以原值一半的價錢出售產品。聶夷中《傷田家》：“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剝卻心頭肉”。其次，中國農民常受高利貸剝削。青黃不接之際，高利貸者更是猖狂，他們“春放秋收，子或敵母”。有的還乘人之危，“舉放利債，藉此准折地畝”，兼併農民的土地。西歐自然經濟的基本單位是封建莊園。農奴的生活必需品基本可不依賴市場；加之，土地不能買賣，使農奴能在較長時期避開了高利貸剝削，生活比較穩定，較少造反。14世紀以後，莊園瓦解，商人高利貸者參與對農奴的剝削，農民生活急劇惡化，西歐才爆發較多、較大的

農民起義。

西歐農民雖然處在封建社會的最底層，社會的全部重負都壓在他們身上，“可是要叫他們起來暴動卻不容易，他們散居各地，要取得任何共同協議都困難無比”。中國農民經常被集中起來為國家服苦役，比西歐農民為各自的領主服役，更容易聯絡感情，組織隊伍。中國土地兼併使大量農民破產成為流民，社會上經常有流民群存在。比起西歐破產農民被城市消化，基本無流民群的情況來，巨大的流民群實際上是一觸即發的起義隊伍。中國農民要服兵役，是軍隊的基本成員。比西歐農民被排擠在兵役之外，更有利於提高農民的軍事才能和組織才能。中國土地買賣使破產地主不斷降到農民的行列；比西歐貴族世襲的情況，更有可能在農民中擁有文化素養和政治經驗的組織者。這些條件造成中國農民戰爭的水準大大高於西歐。不難看出，中西封建社會農民戰爭的諸多差異，根源於兩者封建經濟結構的差異。

中國人的主食是糧食，而糧食易保存，刺激了統治者“深挖洞、廣積糧”的欲望，從而加重農民的負擔。中國農民要儲存很多糧食才能活命，可糧食常被極端野蠻的官府收光，農民只有死路一條。朱德回憶說，1921年前後，中國每省都處在軍閥的鐵蹄下，農民的收成被踐踏得一乾二淨，成了一望無垠的黃土沙漠。依靠土地的農民，為了混一碗飯吃，成千上萬地當兵去了。這也是中國內戰、起義多、吃人多的原因。

西方的肉魚不容易保存，不可能“深挖洞、廣積肉”啊。魚肉儲存會變臭，官方不好剝削過多。這樣，西歐各國的老百姓負擔要輕。據專家研究，中國歷代農民的實際稅費負擔是西方農民負擔的5~10倍。所以，西方起義少，矛盾相對緩和。

中國人吃糧食、喝糧食酒、吃菜子油與西方人吃肉、喝葡萄酒、用橄欖油相比，一方面是蛋白質少，另一方面是勞苦，需要精耕細作。翻地、播種的勞動比放牧、葡萄園及橄欖的管理的勞動勤苦得多。西方中世紀老百姓的休假時間比中國要多，也幸福的多。歐洲中世紀後期，通過與王室或領主間的協議並購買“特許狀”，越來越多城市獲得了保證其免受封建勢力勒索之苦的自治權；至於領主與農戶經濟關係的特點，薩塞克斯郡奇賈斯特主教的一個莊園租稅清冊中就有這樣的記載：“畢曉普頌托恩、諾頓和登頓的慣例佃農自帶犁具履行兩天幫工，這兩天中，一天吃肉，另一天吃魚，還有足夠量的啤酒。犁隊中凡使用自己耕牛的人可在領主家中用餐。所有承擔割麥的人其午餐有湯、小麥麵包、牛肉和乳酪；晚餐包括麵包、乳酪和啤酒。次日他們將有湯、小麥麵包、魚、乳酪和啤酒。午餐時，麵包不限量；早、晚餐每人限用一條麵包”（霍曼斯：《13世紀英國村民》，English Villagers Of 13th Century，哈佛1942年版，第261頁）。這張記錄在案的幫工食譜清單，規定之具體和詳細，令人瞠目也促人深思。這表明：領主和佃戶雙方都儘量不給對方的任意性留下餘地，這對農奴的怠工是一種監督；但對領主隨意加碼、恣意盤剝無疑也是一種限制。

中國由於鼓勵多生而更加貧困。人均耕地下降：西漢的可耕地約5億畝，到清末已達14億畝；西漢初年人均有地接近約100畝地，到北宋末約為10畝，到清末不足3畝。農業勞動生產率下降：西漢人均生產1400斤糧食，唐代2400斤，北宋1700斤，明2000斤，清360斤，1953年555斤；老百姓只能在饑荒的邊緣上掙扎，淒慘、窮苦、落後。統治者推行小農與家庭手工業結合的重農輕商政策，以糧為本，只發展單一的糧食生產，為此大規模開荒毀林，導致中華民族的發源地黃河流域由水草豐茂、“水清且漣漪”變為如今的黃土遍地、黃沙漫天。

西方的休耕制度把環境保護的很好。

西方人喜歡把矛盾放在面上談判解決，矛盾顯得很多；中國採取高壓政策，表面上看不見矛盾，實在勾心鬥角，矛盾一旦表面化，就不可收拾，往往血流成河。總之，西方黑暗的中世紀比中國同一時期要明亮得多。

第 12 節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下的全民皆奴

1·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據說在斯德哥爾摩地方有一個銀行，一個強盜進去搶了這個銀行，同時裹挾了一個銀行女職員，帶著她作人質。這樣，員警開槍不好開，抓也不方便。這女孩被迫跟這強盜浪跡天涯海角了。在逃跑期間，這女孩竟然愛上了這個強盜，和強盜一起幹盜竊的事了，也就是認同了強盜。被綁架了，就得從了人家，在順從下產生奴性，慢慢就適應了，甚至還崇拜綁匪。這樣的事情，規模小了叫綁架；規模大了，就是豐功偉業了。恰如古人說的竊鉤和竊國。

這在心理學上叫做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也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當你被一個力量長時期壓迫的時候，久而久之你對壓迫你的勢力認同了，你成了心奴。研究表明，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征這種心理疾病，必須同時滿足四個條件：1) 受害人生命受到嚴重威脅；2) 受害人處於完全的絕望之中；3) 受害人所獲得的資訊只能是加害者願意讓他們知道的，加害者不願讓他們知道的資訊則被遮罩；4) 加害者偶爾施小恩小惠于受害人。研究還表明，只有極少數人對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具有天然免疫力。

打中國建立起政權起，中國人就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病，這病有利於一小撮人去實施綁架行為。綁架者說被綁架者的一切都是綁架者賜予的，所謂的“普天之下，莫非妄圖；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因此，被綁架者要為綁架者歌功頌

德：商朝滅亡了，有人緬懷商朝，痛恨周，甚至不吃周的糧食而餓死。周朝不存在了，儒家懷念周，認為那是個理想的時代。暴秦也因為空前的統一和長城被誇耀至今；即使是嗜血的外族建立的蒙元，至今還能聽到讚歌。滿清朝滅亡後，還有人鬧著要復辟。一朝一輪回，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在歷史中循環往復。城頭變換大王旗，綁架者輪番登場，讚歌還是那麼唱，只不過改改主角的名字。

2·可怕的心奴——奴才或忠奴

孟德斯鳩說：“一種奴隸精神統治著亞洲，而且從來沒有離開過，在那個大陸的全部歷史中，不可能找到任何一點自由精神的痕跡，只能看到奴隸制的耀武揚威”；“在中國的全部歷史中，連一點標誌自由精神的痕跡都找不到，人們只能見到奴役的壯舉”。中國文化中最致命的罪惡因素就是奴道主義，人性的一切內容都已徹底腐爛。即使外部壓力消失，即使主子死去，奴道主義的陰魂依然不散。何況那奴隸主的空缺，及時可以遞補。因為我們是全民皆奴。廣大的奴隸隊伍乃是產生奴隸主的最好資源，每個奴隸都可在一夜之間成為當之無愧的奴隸主。中國大地只有醜陋的奴格像死狗的腐屍一樣遍野橫陳，而絕對沒有人格可言。

中國的歷史上沒有伊索那樣為自由而死的英雄，有的是為不自由[即君王]而死的“英雄”。心奴們心甘情願地為主子而死。在殷與西周時期，君主與社稷即國家政權是合二而一的。這種觀念直到春秋時期仍為相當多的人所堅持。如楚大夫克黃說：“君，天也。”由此認為，生應為君之臣，死應為君之鬼。趙盾的門客（奴才）程嬰、公子杵臼捨命救護趙氏孤兒，前者犧牲了自己的兒子，後者犧牲了自己的生命。程嬰十幾年忍辱偷生，直至將趙氏孤兒撫養成人為趙家復仇後，自盡而死。田光向燕太子丹舉薦荊軻後，為使太子丹無洩密之憂，自刎而死。

《呂氏春秋·忠廉》記載：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

“君之所予爵祿者鶴也；所富貴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瑩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于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曝”；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未之亡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如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于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自身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翻譯為白話：衛懿公不理國政，一天到晚侍弄一群白鶴。上等白鶴食大夫之俸祿，次等白鶴食士人之俸祿，出門坐軒車，號稱“鶴將軍”。衛懿公九年即西元前 661 年，北狄翟人進犯衛國。衛懿公忙命人組織軍民抵抗。可國人拒絕參加戰鬥。衛懿公大惑：何不願意抵抗侵略？眾人答：可派“鶴將軍”去啊。翟人殺衛懿公並吃了他的肉，而拋棄了他的肝。衛國的大臣弘演，看見懿公的肝痛哭不止，他決定自殺後讓人挖出他的內臟，把懿公的肝裝入他的腹腔來安葬。受到了國君桓公的讚頌。

在“八王之亂”中，嵇紹（其父嵇康被司馬昭所殺）以身護仇人之孫、“何不食肉糜”的昏君晉惠帝，擋亂兵之刃而死；亂平後手下人要洗那件血衣，惠帝說：“勿浣，此嵇侍中血”；這句話還被文天祥寫進《正氣歌》裡。

弘演納肝，不過是以己腹為禍國君主作棺；嵇侍中血，不過是用軀體為昏庸之主擋箭。均何足稱，然歷代均視為做人之典範。以君為國，為君捐軀，為鬼亦雄；蓋欲眾人效忠於一人，作為獨立的個人無復有也，只有奴隸存焉。

古羅馬思想家塞涅卡認為，奴役只有兩種：外在的奴役僅涉及人的肉體，人的精神仍然可以是自由的；內在的奴役是人成為自己情欲的俘虜，這是真正的奴隸。所以，一個披枷戴鎖的人可能是自由人，一個驕橫的帝王卻可能是奴隸；一個奴隸可能有自由人的精神，而主人卻可能生活在“自己造成的奴隸狀態”中。

梁啟超把奴隸分為兩種：身奴與心奴。身奴就是普通的或被迫的奴隸，心奴就是心甘情願的、自動獻身的奴隸。所謂的“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就是以奴隸的口吻道出了對“地主”無限的感恩，因為： $\text{湧泉} \div \text{滴水} = \infty$ 。這表明奴隸一無所有，連“一滴水”都需要他人的恩賜，多麼的淒慘！奴隸主以所謂的“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來要求奴隸，實質上是要求中國人做心奴。梁啟超將“心奴”歸為四大類：第一為尊古，做古人的奴隸。第二，為世俗之奴隸。所謂一犬吠影，百犬吠聲。第三，為境遇之奴隸。第四，為情欲之奴隸。任何一個人，只要他擁有能不斷滿足其欲望的條件，他就會去滿足其永無止境的欲望。人成了欲望的奴隸。身奴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心奴。財產被劫掠時，他說還有自由；自由被剝奪時，他說還有生命；生命被扼殺時，他還謝主龍恩。即使眼前一無是處，他也能找到讚美的一萬個理由。他認為麻木是幸福之本，媚骨是升遷之道，崇高是痛苦之源，正直是怪異之舉。

為什麼需要心奴呢？因為獨裁者僅憑自己一人不能控制所有的奴隸，這就產生了對奴才——心奴的需求。除了一部分地位下降的統治者充當獨裁者的僕人之外，大量的奴才是從奴隸階級中提拔起來的。奴才分兩類：文才和武才。文才是借三寸不爛之舌和筆頭替主子搞思想愚弄和輿論欺騙的奴才；武才則是那些仗恃蠻力給主子看家護院、彈壓奴隸、保衛專制政體的奴才。這些奴才，一遇所謂騷動之類，便會兇相畢露地演出一幕幕血腥鎮壓的慘劇。

周王朝建立後，周天子是最高的主子，他分封了若干諸侯，這些諸侯便是由主子中分化出來的高級奴才；諸侯又在自己的領地中安排若干文臣武將，這些文臣武將包括相到縣大夫，他們就是中級奴才；至於那些奔走于相和大夫車旁馬後的各種士人，便屬於低級奴才了。

那個替信陵君出竊符救趙主意的侯生，在信陵君救趙成功前夕便自殺了。這低級奴才以死效忠頂頭上司。還有那個錘殺老將晉鄙的朱亥，後來奉信陵君的命令出使秦國。秦莊襄王要朱亥留在秦國當將軍，朱亥堅決不答應。為了治服朱亥，秦莊襄王把朱亥關進老虎圈子裡。老虎見有人進圈，正要撲過來，只見朱亥怒眼圓瞪，對著老虎大喝一聲：“畜生，你敢！”朱亥的吼聲猶如晴天霹靂，竟把老虎嚇得連連倒退，然後趴在地下不敢動彈。秦莊襄王只好把朱亥放出虎圈，但怎麼也不放朱亥出秦國。朱亥見自己無法脫身，便拔劍自殺了。

象侯生、朱亥這類人為什麼對信陵君效死命呢？其秘訣就在於中國人自古以來的奴才依附性，緊跟曾給他恩惠的頂頭上司。侯生是魏國大樑看城門的老頭兒，已 70 多歲了，又窮得叮噹響，很受人輕視，但信陵君卻對他特別好，請他在家宴上坐首位，還讓侯生坐車，自己親自駕馬招遙過市……至於朱亥，本是賣肉的，信陵君把他當作貴賓對待。所以這兩個人便把信陵君當作自己唯一的主子，以死相報。

韓非為後世樹立了一個“毫不利己專門娛主”驚人的奴才樣板“和氏”。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被而刖其左足。武王即位，和又獻之武王而被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于楚山之下，三天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和曰：“吾非悲刖也。悲乎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此吾所以悲也。”

拿現代話說就是：我不是為自己的腳被砍掉而傷心。只要君王能識寶，砍去雙腳是我心甘情願的。我的雙腳本來沒什麼別的用處，長在身上就是為了讓君王今天不高興砍去一隻，明天不高興再砍去一隻。只要君王知道我有多么忠心耿耿，想砍多少就砍多少，只恨爹娘沒給我多生幾隻腳。如果君王不砍我的腳而砍別人

的腳，我會嫉妒得發瘋。為了被多砍兩次，我寧願是四隻腳的豬狗、八隻腳的螃蟹、一百隻腳的蜈蚣。我最痛心的是君王不知道我被砍腳是我心甘情願的，我最寢食不安的是君王不明白我的忠心，我最憂心如焚的是君王以為我被砍了腳會對他懷恨在心——如果君王為此而不安心，那我就萬死莫贖了。

在奴才看來，君王虐待自己，就是要自己做他的奴隸；君王不虐待自己，就是不要自己做他的奴隸了。所以，被君王砍腳殺頭，就是無上幸福、就是皇恩浩蕩！

多麼死心踏地的奴才啊！如此扭曲如此無以復加的受虐狂的內心獨白，卻被韓非當成了感天動地的忠心表白！韓非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奴才。韓非認為：和氏、商鞅、吳起為了向帝王獻寶而付出重大代價是值得的。他把《韓非子》一書當作寶貝獻給嬴政，一天重用也沒有得到，被師出同門的李斯逼迫，服毒自殺於監獄之中。《韓非子》此後成為兩千多年中國酷政的最高寶典，其卑鄙無恥、冷血無情，比世界政治學史上最為聲名狼藉的馬基亞維利的《君王論》，還要大大地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法律和道德的長久灌輸下，一部份家奴，已漸漸失去人的自立、自主、自尊的本性，反以為主盡力、盡忠是其本份。這些馴服的家奴，在主人勢盛之時，是欺壓善良的惡僕。在主人衰敗之日，則是乞食養主的義僕。主人有難，自甘頂替，主人當然詡之為忠僕。

3· 儒家不是“人”，而是心奴

中國數千年文化之主流是不以人為人。無獨立之人格，無生命、財產之保障，更無個人自由之可言。中國文化認為人生而不平等，而且把不平等擴大化、制度化。歷代統治者都把孔教定為國教，並不是專制者選擇了孔子，而是儒學天生就

是為專制服務。孔子是沒落貴族，骨子眼裡充滿了高低尊貴的等級觀念。這種人創立的學說怎能有平等精神，怎能不被統治階級所看中、所利用呢？孔子主張，“君可以使臣”、“君可以使民”、“臣應當事君”，這顯然是專制奴隸哲學的思想。儒家關於君臣關係的論述，惟“臣事君以忠”最重要、最本質。“忠”是奴才對主子的單向度臣服，“孝”是子女對父母的單向度臣服。人與人只能人格平等地相互忠誠。一個人無條件的單向度臣服於另一個人，不叫“忠誠”，而叫“奴性”或“愚忠”。由於“忠”已深入人心，“文革”時自然而然就演繹為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早請示晚彙報。

儒家“人”就是奴。儒家的“人性”是指認同君臣父子等級制的奴性，否則就是非人也的禽獸。儒家推崇的《詩經》雲：“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臣”的本義是奴隸。儒家認為，天下人就是帝王的奴隸。儒家認為人生意義，就是成為“人上人”。“人上人”就是“奴上奴”的婉詞，“人下人”是“奴下奴”的婉詞。儒家還進一步把“人上人”美稱為“君子”，把“人下人”貶稱為“小人”。把同為奴隸的“君子”、“小人”強作分別，然後以“君子”自居，以示有別於“小人”，不過是儒家的自我貼金而已。

子貢形容孔子具有“溫、良、恭、儉、讓”的特質，孔子又強調，人應該有“恭、寬、信、敏、惠”、“忠恕”、“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剛、毅、木、訥”、“訥言、敏行”的性格，這些所謂理想人的特質與性格，難道不是一種適合“身為奴僕家臣”最好的特質？誠如聞一多所說，孔家店的貨色，只是教人如何做好奴才，沒有教如何做人。“儒教”是奴才的宗教，是皇權的奴才而不是神的信徒。在三大宗教的領域，所有的王權都期盼著教宗加冕或認可，從而確立王權的合法，就連狂傲的拿破崙大皇帝也不例外；“儒教”的教宗正相反，他

眼巴巴地期盼每一個新皇上敕封，以免遭滅頂之災。一句話，“儒教”精神貴在失去自我，它的最低綱領是當奴才，它的最高綱領是當好奴才。中國人被儒家閹製成了“無腦”的愚民（相當於“雷峰”，“第一種忠誠”——愚忠，愚忠的諸葛孔明至今仍被視為人格的楷模）或有“小腦”的文死諫的儒家士大夫（相當於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諫忠）。

孟子在與梁惠王的對話中指出：判斷善惡的標準不是“利”，而是“仁義”，即先君後臣的等級順序而已。事實上儒家沒有判斷善惡的客觀標準的，孔子反對公佈成文法，強調法律秘不示人，把判斷善惡的大權交給統治者，人民成了任人宰割的豬羊。

孟子鼓吹“人性善”是要人做心奴。俗語雲：“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善”就是受人欺壓的奴性。美籍華人說：起初，在美國的中國餐飯遭搶劫時，美國員警也是在三五分鐘內趕到現場，把劫匪抓住，可受害人怕報復，不敢站出來指證，員警只好把抓到手的強盜當場放掉。劫匪看到中國人好欺負，在光天化日下一般只搶中國商店。更為氣人的是，來自中國的劫匪也選擇中國餐館動手！“善”、“刪”、“騙”，都同音“shan”，因它們之間有共性，即“好”的意思。善良是好，刪掉錯字也是好；把豬騙了更好，可以長更多的肉嘛。

儒家文人為了獲得榮華富貴與權位，以出賣自己的良心、人格與能力的方式，來滿足統治者的要求；這些文人，將自己當成工具，出賣給統治者，他們是一群待價而沽的心奴。在儒家成為主流意識之前，儒生孜孜以學見用於列國封王，所以儒家具具有當閹奴的天生的路徑。李世民搞科舉，手舞足蹈地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知識者被裝進了皇上的口袋，被閹割了獨立人格，沒有人格的人只能是奴才。科舉制不過是臣民“平等”地作為皇上奴才候選人的制度，就象

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一律“平等”地供皇上“選美”。科舉制表面上是考試規則面前人人平等，然考試的結果卻把人分出等級，按分數的高低來決定官位和收入，象範進中舉做官後就迅速腐敗，從而加劇了人間的不平等。西元 10 世紀，中國南漢的皇帝劉岩建都廣州，他認為太監最無私。他的孫子南漢王劉繼興下了聖旨雲：“凡朝廷任用的人，不管是進士還是狀元出身，一律要閹割，方能當官”。自此，在南漢當官的上至宰相下至七品芝麻官都是沒鳥的，而且規定想考科舉的都要先把“鳥兒”割掉。規定下達後，當官的人並沒見少。可見，儒生們對閹割習以為常了，實行起來一點也沒有操作上的難度。

當代科學家通過阻止猴子大腦中一種叫“D2”物質的作用，切斷了猴子行為動機和回報知覺間的聯繫。被切斷了這種生理聯繫的猴子，長時間任勞任怨地執行給定的任務，而忘記索取任何“報酬”。這種任勞任怨的猴奴對主人是多好啊！

奧爾德斯·賀胥黎在小說《美麗新世界》中，虛構了一個階級社會，那個社會的最上層是特權族阿爾法族(Alpha)，最底層是埃普斯隆族(Epsilon)。埃普斯隆族的大腦被藥物麻木，他們作為奴隸承受著繁重而乏味的工作，並對此毫無怨言。他們唯一的要求就是有飯吃。

漢族早就被孔學麻醉成了埃普斯隆——奴隸族，儒學就是麻木大腦使人心甘情願做奴隸的藥物。儒家是為皇帝製造奴隸的工程師，孔子要求人們“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把人們的自由自主的個性刪了、騙了；統治者當然叫好了！皇帝封孔子為至聖先師，讓儒生們當奴隸主的幫手。當滿清下令不要裹腳時，漢人奴習不改、照裹不誤。滿清統治者只把漢人當奴隸，從不把漢人當人；所以，慈禧太后說：“甯與洋人，不予家奴”。到了民國，辜鴻銘留著小辮子在北京

大學教書。他雖十分熟悉德國文化，但滿腦子的奴隸思想，他最崇拜的女人，居然是慈禧。他竟然說：“洋人不會因我們割掉辮子、穿上西服就尊敬我們”。漢人辜鴻銘已忘了漢人不留辮的歷史，竟習慣做亡國奴！絕大多數漢人對自立、自主、自治的自由主義一竅不通，做了幾千年奴隸而不自知，真是可悲！

儒家經典《尚書》大量地宣傳專制思想以及人如何成為一個優良的奴隸；《詩經》是古代人民在專制政權下奴隸的心聲；《禮記》是儒家擁護專制政權的法典與制度，是使人變成奴隸的工具；《春秋》是古代諸國征戰與政治鬥爭的專制歷史；《樂經》已失傳，估計也沒有什麼重大的人文思想。這些典籍，與希臘哲學家實在無法比擬，那簡直是“奴隸哲學”與“人的理性與形上學”的差異，也是“非人”與“人”的差別。儒奴主義的教條有：

1) 順從。孝作為倫理規範，它的要求是順從，兒子順從父親，臣子順從君主，妻子順從丈夫……，整個社會被“孝”結合為一個階梯型的順從體。經過儒教的薰染，順從被譽為一種美德。按“孝道”，子民為父母官的利益應犧牲一切，而父母官可心安理得地享用，這導致了無官不貪。宣揚“孝道”是為了“不犯上”，上面說什麼，大家照著說、照著做就是了。一切看主子臉色行事，甘為“革命的螺絲釘”；自己命賤如草，卻對“小草”的命運甘之如飴。在家一切聽從家長安排，在外一切聽從黨安排。結果，中國人的精神面貌被“磨練”得只剩下馴服的奴性，絕沒有自由、自信和自尊。

2) 中庸。儒家除了談論君與臣（或大人與小人）、父與子、男與女之外，還談什麼？中庸之道，不外是正名定位、安分守己，否則就被視為禽獸=當代的反革命、敵人。

3) 畏懼。畏懼是儒家道德觀的一個核心。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儒生生來就該是膽小怕事的奴才，必須畏天命如同懼怕位高權重的人，更應該懼怕精英和權貴聖人們的言論。儒家讓國人象綿羊一溫順，讓獨裁者可垂袖而治，太輕鬆了。所以，法國人說，在中國誰都想當皇帝，且誰都能當皇帝。也是啊，都一幫奴才，只要你不當奴才，你就是皇帝。

在儒教的鉗制下，中國人早已養成“卑屈之風，服從之性” “一任昏暴者之蹂躪魚肉，宰割烹醢” 甚至“蹈湯不怨，赴火不辭，呼吸彌留際猶牢守‘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 之念，以流臣節於天壤，傳青史于後人。” 清朝初年的石成基曾喋喋不休地在“傳家寶”裡宣揚：“天地君親師，此五件世上都該感激，都該設牌位早晚焚香叩謝，切不可懈怠，做個忘恩負義的人。” 並寫了歌詞，要人們“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君王。太平氣象家家樂，都是皇恩不可量。” 近 10 多年來，農民家裡又掛起了“天地君親師”的牌位，中國又回到了奴隸的道路上！這是農村的黨支書帶頭的結果，君不見官方又在玩祭孔的鬧劇？

4) 退避。孔子強調“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即“邦有道”時，出來做事，用正直來要求自己；“邦無道”時行為要正直，語言上要龜避、明哲保身、識時務者為“俊傑”。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有道則仕、無道可卷而懷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邦有道則知，無道則愚；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言足以容；君子訥于言，而敏於行（指謹言慎行）。孔子所奉行道德理念，完全缺乏對社會的基本責任意識，缺乏實踐社會正義與道德的理念，也缺乏與不公不義專制政治抗爭的意志，這樣的人，是屬於逃避社會責任的奴隸性人格。

天下太平時，儒家就紛紛出來當官，還唱“殺身成仁、任重道遠”之類的高調。碰到無道的昏君時，儒家就提倡“隱”、“愚”、“容”。對罪惡，儒家根本沒有鬥爭的勇氣；對道德，也沒有捍衛的真誠。孔子說：畏大人（指官長）；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就是大貴族。連大人都不敢得罪，怎會推翻暴君？儒家是些投機分子，既當婊子、又立牌坊。

儒家主張“無道則隱”，分明是烏龜行徑。基督教主張要與“無道”鬥爭，要與撒但爭戰。中國的某些基督教主張：要用儒家來中和基督教，實質上是在鼓吹烏龜哲學。那些主張“教會不問政治、不管社會如何，我只拜我上帝”的人，實質上把基督教烏龜化了！有些中國基督徒甚至鼓吹 XX 黨的統治是上帝的安排，一黨專政合情合理。真是邪門！

5) 忍耐。“小不忍則亂大謀”是孔子傳給後人的法寶。人們在忍耐的信條下，變得更加懦弱、苟且偷生，不敢傾吐真言。歐洲人為了尊嚴、榮譽而去面對面地決鬥，對中國人來講純屬犯傻。中國人也有爭鬥，但他們絕不會光明正大地去決鬥，而只是會在保證自己不流血的前提下用盡心思去暗算對手，就是暗算不成，也有臺階：“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中國人信奉儒家和道家，流行是“好死不如賴活”，“好漢不吃眼前虧”。只要能夠活命，管它什麼氣節不氣節、榮譽不榮譽、國家不國家！只要能夠活命，那怕像豬狗一樣活著也行。這是中國人在人類史上招惹最多暴君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就是歷史上漢奸層出不窮的原因！

韓信為避免決鬥而不惜鑽褲襠的故事，所以千古流傳，是因為它符合國人的審美觀，並為眾多的懦夫們提供了一個畏刀避劍的藉口和精神勝利的武器。韓信早年依靠“忍”而度過艱難歲月，等到進入漢朝，面對劉邦步步進逼，磨刀霍霍，

他還是一個“忍”字，結果成為別人宰割的綿羊。這不能不說是對他的人生信條的一個莫大諷刺。

日本有個不忍池，反映了日本人的性格，日本人蜀山人看到韓信鑽胯之圖時，狂歌一首：“甯斬擋道人，不能鑽胯下，這是大和魂！中國是中國，日本是日本，勿要只撿了中國的紙屑，忘掉了日本刀！”日本人不怕死，是由於他們長期受到“武士道”的薰陶。武士道的要義就一句話：“賴生不如好死”。對貪生怕死的人他們嗤之以鼻。在不得已時，為了向人們表明自己的心跡，可切開腹部，光榮地死去。由於這樣的教育，所以日本人死硬，絕少出現“漢奸”。寧可戰死自殺，也不會束手就擒受辱。這就是為什麼日本人死硬難對付的原因。

中國人凡事能忍則忍、得過且過，面對專制者的淫威，平民和下級官員也只有順從，而不敢有絲毫的質疑和違抗，更不敢主張自己的權利了。即使統治者不得人心，只要不是走投無路，很少人願意通過有理有節的抗爭打破現存秩序，中國老百姓只願做沉默的羔羊。

奴隸意識具有使人變成懦夫的魔力，中國的順民們的命運比西方的奴隸還要奴隸。西方古代的奴隸儘管身份上為奴隸，但他們的靈魂決非奴隸。例如羅馬帝國時代的斯巴達克斯。這是因為，希臘哲人的思想、基督教先知的思想，給他們帶來反抗奴隸命運的智慧。而中國的奴隸，不僅世世代代是奴隸，更可悲的是，他們的靈魂在儒家的愚弄下永遠也擺脫不了奴隸的命運。他們的靈魂，事實上永遠都處於黑暗的鐵屋子之中，他們終生終世都將無法看到天日，都將無法看到絲毫人類智慧的光芒。網上有人說宋朝開明，舉例道：宋太祖在花園遊玩，交待下去，沒有重大事情不要打擾他。一個大臣求見，結果是一件小事。太祖就用玉斧打脫了他的牙齒，那大臣把牙包藏起來，太祖問：你還想告我的狀嗎？大臣說：

我認為我的事總比你遊玩的事重要些。結果太祖認錯。試問：太祖認錯與一顆牙齒等價嗎？假如大臣打掉了皇帝的牙齒，起碼要被殺十族！舉此例子的當代人是典型的奴隸思維。

十九世紀下半葉到中國傳教的美國傳教士 Arthur Henderson Smith（漢名明恩溥），在其巨著《中國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就提到一段插曲。當時他多次看到在大饑荒中政府只是袖手旁觀，而成千上萬的饑民只是默默等死。他認為，即使是死路一條，但揭竿起義而死，總比餓死有價值吧。於是深諳漢語的他就一次又一次的去追問那些等死的饑民，希望弄個明白。果然，饑民都眾口一詞說：“不敢！不敢！”

臺灣作家龍應台詰問：“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中國人種，已經退化到不敢生氣的地步了！不敢生氣的原因：害怕強大的一方看到自己生氣的樣子，會加倍用毒招折磨自己，於是笑咪咪地偽裝成壓根兒沒有生氣；對對方的粗暴對待很滿意；沒有什麼氣可生的！

生氣是需要“力量對比”的；作為草民，不具備“生氣的力量”；並且知道在中國，生氣的危險太大了，生氣惹出橫禍的太多了。劉少奇對餓死人的經濟政策很生氣，結果死無葬身之地；張志新表達了一下對某人專橫的生氣，結果她的喉嚨被割掉了……於是，我們的民族性格就徹底地趨於：卑瑣、苟且、怯懦、謹小慎微、逆來順受。

對惡人，我們不敢表達恨；對於壓迫自己的暴君，我們總在懦弱；而權勢者總把百姓放在砧板上，進行隨意地切割。我們民族的陽剛之氣就在這樣的切割下，一點一滴喪失。官方說，中華民族是一個勤勞、勇敢的民族。勤勞，不假；“勇敢”，不配。

4·全民皆奴

中國社會一直處於人類歷史發展的最初階段，即半野蠻半文明奴隸制階段。這裡，沒有土地私人所有權，只有部落的共同所有和東方專制主義式的土地國有制。整個天下是皇帝一個人的私產，萬眾都是他的奴僕。即萬人服從于專制君主一人（或國家）的奴隸狀態。

在專制社會裡，只存在兩種“人”。專制者是不受任何限制的“野蠻人”，而廣大受壓迫的民眾則是“奴隸”。正如黑格爾所說，這是一種“普遍奴隸制”。

“在中國，只有皇帝一個人有自由，其它人一律沒有自由，一切政令都出自皇帝，臣民都被看作處在幼稚的狀態”。嚴格地說：在專制主義統治下的中國，三教九流、七十二行，上自皇帝，下至庶民，熙熙攘攘，歸納起來，勿非三種人，那就是：主子、奴隸和奴才（即心奴）。

穆勒指出：“一個中國官員和最卑微的農夫一樣，都是專制主義的工具和奴隸”。專制皇權不受任何限制，它可以不顧法律的規定，隨意剝奪人的生命權和財產權，剝奪人們自由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利，可以任意踐踏人權，視生命如草芥。生活在專制政權下的人們沒有和平安寧可言，隨時處於朝不保夕的危險之中。對於皇帝來說，包括王公貴族、大臣、地方官和豪強在內的一切社會階級都是他的奴僕，他可以任意奴役、處罰。即使貴為高官大臣，被當眾罰跪也是家常便飯。若惹得龍顏動怒，輕則被脫掉褲子露出屁股當庭打板子，重則罰沒充軍，甚至滿門抄斬。君主把臣視為工具，有用則使，無用則棄。漢武帝說：“何世無才，患人主不能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中國歷史上的商鞅車裂、吳起箭穿、王安石淒涼的晚年、張居正死後被抄家，這些改革派都下場不妙。原因在於這些改革派僅

僅是皇帝的奴僕。

青年毛澤東批評中國文化強調宗法和等級，他說：“中國人像奴隸那樣活了幾千年，只有一個不是奴隸的皇帝”。魯迅說：“中國歷來只有兩個時代：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中國人大抵只有兩種前途：1) 解放了的人們“做穩了奴隸”，其實連豬狗都不如。按照成吉思汗的法令，殺個漢人只需賠頭驢的價錢。魯迅說：“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于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

“在萬惡的舊社會，吃的是豬狗食，穿的是破爛衣”；一直如此，甚至今不如昔。

2) 沒有解放的人們“想做奴隸而不得”，一切抗爭都只為獲得奴隸的身份。

在中國，人民除了長期的絕對服從之外，唯一的選擇就是造反，“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儒教的長期浸潤使得平等觀念在中國人的頭腦中沒有立錐之地。中國奴隸們把皇帝拉下馬並不是要廢除皇帝制度，不是為了平等，而是為了自己去當皇帝！不是我服從你，就是你服從我；不是我奴役你，就是你奴役我；不是你為我綱，就是我為你綱；阿Q要麼甘心做奴隸，用“精神勝利法”平衡自己的心理，要麼就想“革命”後叫別人做自己的奴隸。社會的各個臺階上又是原來那樣一級控制一級，金字塔的格局沒變。誰也沒有想到去打碎這金字塔。幾千年來一次次起義的結局，不過是奴隸主與奴隸的對換而已。所以，鄒容在《革命軍》中說：“中國人無歷史，中國之二十四朝史，實一部大奴隸史”；即施虐受虐史。

5· 中國人的性格就是施虐狂和受虐狂

精神分析大師弗洛姆說：在極權專制的變態社會裡，人們會選擇去逃避，最後就是放棄自由。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本來是擁有理性、人格和精神的健全。或

是在變態社會裡，他為了能活下去，就被迫完全放棄了自己的理性、良知和人格。如果長年繼續下去，極權專制的變態社就會造就各種各樣的變態的人，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受虐狂和施虐狂患者。為了能夠在變態社會裡活下去，大多數人放棄了良知和獨立思考。他們選擇了沉默和服從。還有一小部分人，甘當極權專制者的走狗。他們拼命追求權力，有了機會就去壓制和迫害他人。極權專制的變態社會裡特有的那種施虐狂與受虐狂就這樣產生了。

受虐狂心理變態的一個極端例子就是郭沫若。在文化大革命中，明明他自己的兒子都受到迫害，死的死，傷的傷，他還在不停地寫肉麻的頌歌。兒子死了，他還白天強作歡笑，只能夜裡偷偷抄兒子的詩悲痛一番。1967年4月，郭沫若的三子民英在部隊自殺身亡，明明是冤死，他還是向組織寫信，作自我批評，說“我沒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郭沫若的二子世英被北京農大綁架關押，他不敢過問，見到周總理也不敢告知，還言不由衷地說“我是為了國家好啊”！心理學家告訴我們，象郭沫若這類的受虐狂心理變態患者，他們往往不只是輕視自己，屈服於外在的邪惡力量。有時他們還會尋求外在邪惡力量的傷害，自我折磨一番，並且以此為樂。這類人猶如魔鬼附身，不斷傷害著自己，也傷害著別人。

木石姻緣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句話體現中華民族的性格，而且說這就是反抗暴政！如果中國人的性格恰如木石姻緣說的就是反對暴政，為什麼中國人建立的政府卻越來越殘暴？明、清的刑罰比唐、宋還要嚴酷。根據佛洛德的理論，中國的統治者就是施虐狂，中國老百姓是受虐狂。最能典型證明這個結論是中國凌遲酷刑，那是華人發明出來的。

凌遲最早是把人殺死後再剝成肉醬，稱為“醢”。受過此刑的有子路，殷商末年，九侯有個美麗的女兒，獻給了紂，她不喜淫蕩，紂大怒，便殺了她，同時

把九侯也施以醢刑，剝成肉醬。鄂侯極力強諫，結果鄂侯也遭到脯刑，被製成肉乾。西伯昌聞見此事，暗暗歎息。崇侯虎得知，向紂去告發，紂就把西伯囚禁在羑裡，並把文王的長子伯邑考做成醢迫使文王吃下。自宋哲宗開始，凌遲成了懲治罪犯的重要手段。翻一翻《水滸傳》，便可知宋人對凌遲的愛好。《水滸傳》第 27 回，王婆因為鼓動潘金蓮謀殺武大郎，被判凌遲，“上木驢，四道長釘，三條綁索”，“吃了一副”。第 41 回，李逵對黃文炳說，“你要快死，老爺卻要你慢死”，他先從黃文炳大腿割起，好肉拿到炭火上去烤，邊割邊喝酒，最後開膛，取出心肝，給同志們做個醒酒湯。《宋史·刑法志》記述，“凌遲者，先斷其肢體，乃抉其吭”，先打斷胳膊腿，省得犯人掙扎，爾後直取咽喉，省得亂喊，最後再分 8 刀、24 刀、36 刀、72 刀、120 刀把罪犯剝死，刀數少，屬於肢解活人，刀數多，是正宗的凌遲。

凌遲後來發展更加精細，目的是要讓犯人受最大的痛苦，因此不但是活的時候施刑，還要求受刑人必須身受多少刀後才死。如漢族人心目中最大的兩個“民族英雄”岳飛和袁崇煥就是被自己人用這種手段幹掉的(岳飛據說是受剝皮之刑而死的)。到了明朝，凌遲技術登峰造極，爐火純青。劊子手們一致認為，一片片切肉比連筋帶骨剝割要省力，犯人持續疼痛時間長。行刑時，有門徒為他們端著託盤，盤中放著一組組工具，每一組由 1 把小刀和 1 只鉤子組成，分別對應不同的肌肉組織。其基本手法是，用小鉤把皮肉勾起，每刀只割下指甲大小的一片。有時候，他們會用漁網勒住死囚身體，人的肉會從網隙中透出來，然後由腳開始，一刀一刀地割；行刑的人，如果不慎讓受刑的人，提前斷氣，那麼他也要受刑；為了避免犯人咬舌自盡，必須先將犯人的牙齒敲斷。從刀數上講，明朝凌遲已達到“千刀萬剮”的地步。凡是凌遲處死的，按例要殺 3357 刀，每十刀一歇一吮

喝，最後一刀才是斬首。行刑時在旁邊架一丫形木杆，挖出肝腑後放在上面示眾。看凌遲時更是“人集如山，屋皆人覆”（《明季北略》）。明代的魏忠賢，被皇帝判劓 17333 刀，因其提前自殺而未執行。受此刑最有名的人就是大太監劉瑾，一共割了三天才讓他斷氣。司法部張文麟筆錄如下：過官寓早飯，即呼本吏隨該司掌印正郎至西角頭，劉瑾已開刀矣。凌遲刀數，例該 3357 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頭一日例該先劓 357 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動刀，則有血流寸許，再動刀則無血矣。人言犯人受驚，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劓畢開膛，則血從此出，想應是矣。至晚，押瑾順天府宛平縣寄監，釋縛，瑾尚食粥兩碗。反賊乃如此。次日押至東角頭。先日，瑾就刑，頗言內事，以麻核桃塞口，數十刀，氣絕。時方日升，在彼與同監斬禦史具本奏奉聖旨，劉瑾凌遲數足，銕屍，免梟首。受害之家，爭取其肉以祭死者。

崇禎二年（1629 年），崇禎皇帝誤信反間計，將薊遼總督袁崇煥以“欺君悖主，裡通蠻夷”的罪名綁赴菜市口處以最殘酷的凌遲之刑，判劓 3543 刀。行刑之日，天昏地暗，飛沙走石。袁將軍不為所動，談笑自若。劓子不敢懈怠，足足割滿 1200 刀，只乘下一副骨頭架子才讓袁將軍斷氣。刑後，市民爭購“奸臣肉”食之，竟然抬到 20 兩紋銀才能買一兩肉。明末散文家張岱的《石匱書後集》有詳細記載：“（袁崇煥）遂于鎮撫司綁發西市，寸寸鬻割之。割肉一塊，京師百姓從劓子手爭取生啖之。劓子亂撲，百姓以錢爭買其肉，頃刻立盡。開腔出其腸胃，百姓群起搶之，得其一節者，和燒酒生齧，血流齒頰間，猶唾地罵不已。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盡，止剩一首，傳視九邊”。“時百姓怨恨，爭啖其肉，皮骨已盡，心肺之間猶叫聲不絕，半日而止”（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五）。另一位是喜歡高調進諫的鄭鄮，罪名是棒打後媽、奸兒媳、奸妹，判劓 3600 刀，殘

肉出售，做調製瘡疥中藥的原材料。

1905年4月，慈禧廢除了凌遲酷刑。她說：“我朝入關之初，立刑以斬罪為極重。順治年間修訂刑律，沿用前明舊制，始有凌遲等極刑。雖以懲儆凶頑，究非國家法外施仁之本意。”

這意思是，俺們滿族人，是跟漢人學壞了，進關之前，俺們最重的殺人方法是斬首，進關之後才跟漢人學會凌遲，所以，廢酷刑不是放棄祖制，而是拋棄漢人的壞傳統。

最能普遍證明中國人施虐性和受虐性是打屁股。中國人搞打罵教育從而剝奪了人的尊嚴，最沒有尊嚴是打屁股。首先被教訓者要跪下，然後由父母用棍子打。這種棍棒教育被中國人捧為最有效、最必須的的傳家寶，美其名曰：“打是疼、罵是愛”，“棍棒下出孝子”，孝子其實就是奴隸。一對美國的華裔博士夫婦，對不聽話的孩子，操起了在國內時就練熟的巴掌。孩子大哭，驚動四鄰。鄰居們控告了博士夫婦。法庭較量的結果：博士夫婦被判不配撫養孩子，孩子歸別人監護。前幾年，青海省一母親就打死了兒子。這種教育就是暴力教育，這種文化就是赤裸裸的暴力文化！中國人不能完全進入文明的人性化階段，正是千百年來的暴力教育培育出來的。當人們從孩提時代就受到不斷的暴力傷害，大多數人會向暴力屈服，並由習慣于暴力“進化”到崇拜暴力。暴力成了國人深入骨子的品性，以至麻木不仁、冷漠無情、合群自大、表裡不一、口是心非、趨炎附勢、逆來順受、明哲保身、委曲求全、隨風轉舵、幸災樂禍、為虎作倀，助紂為虐……縱然用盡天下最惡毒的詞語亦不為過。

打屁股在官府衙門的表現就是原被告被不問青紅皂白“各打五十大板”；在朝廷就是廷杖，有多少大臣被打死。司馬遷為李陵說話，獲罪下獄後，就曾“暴

肌膚，受榜槓”，裸露身體挨打，最後被割了鳥。《三國志·裴潛傳》注中記載了一個例子：尚書郎韓宣因為辦事差錯受罰，被押到殿前，反綁雙手，將長衣服撩起纏在上身，正準備脫褲子用刑。這時皇帝曹丕經過，下令饒了他。當時正是嚴寒天氣，韓宣被鬆綁後，連長衣服都來不及放下就跑了。韓宣是在皇帝身邊辦事的官員，至少夠得上個處長吧，要不是碰巧被曹丕見到，就得在大冷天被按在地上，剝下褲子打屁股了。曹丕的父親曹操也愛打別人屁股，連身邊的高級參謀都不能倖免，所以何夔隨時都帶著毒藥，準備一旦受辱就一死了之。

中國歷史上最壯觀的打屁股場面還是出現在明朝，挨打的又都是朝廷官員。廷杖始於明太祖鞭死開國元勳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父子作威作福，罪有應得，但朱元璋卻開了廷杖大臣的先例。此後，臣下一言不合，扒下褲子就打。被廷杖的起初是一兩個人，但明武宗於正德十四年(1519)在午門前創下 107 人同時受杖的紀錄。上百人被扒下衣服，排在太和殿下，上百根棍子同時起落，一時間聲響震天，血肉橫飛，慘不忍睹。其中十多人從此魂歸西天。嘉靖三年(1524)一次廷杖規模更大，180 多名五品以下官員被集體打屁股，其中 16 人當場死亡，1 人隨後死亡。如此隆重、如此大規模的打屁股典禮，大概是絕無僅有的。越沒尊嚴越無恥，所以才會有成百上千的官員爭著給宦官當乾兒子、幹孫子的怪事，才有 95% 以上的朝官向大順軍、滿清軍屈膝稱臣的醜事。明朝大臣也開創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規模集體投降的先例。大臣的氣節真的還不如幾個粉面柳腰的妓女。真可謂奴才有主子，奴隸無祖國！

對婦女用刑時一般可以保留內褲，但對犯淫罪的女人一樣要剝光褲子。潘光旦先生在《性心理學》譯注中指出，一些有權打婦女屁股的官員，往往將此作為施虐的一種手段。俞樾《右仙館筆記》中記載：滇南一位新任年輕縣官表現一

本正經，專愛打妓女屁股，並且都要將她們剝光褲子。妓女們感到很可恥，想交罰金免除，縣官不答應。最後找到一位丈夫病亡後流落異鄉的縣尉太太，以每一千錢的代價請她代挨屁股，又出錢買通衙役打得很輕，每次打妓女時都由她代替。那位縣官根本不管挨打的是否真是妓女，也不問打得輕重，只要經常看得到女人的屁股被打就行。結果使縣尉太太積下二百兩銀子，將丈夫歸葬家鄉。這類代人挨板子的事其實相當普遍，明清時江南的城市中一般都可出錢雇乞丐頂替，按挨打的數量付錢，所以出現了代人挨打的專業戶。當然還得買通衙役，他們得的錢比挨打的人還多。富戶因欠交賦稅被傳訊時，一般都由僕人到堂受審，如果被判打屁股，就由衙役找人替代。明末中山王的後人徐青君，明亡後因財產被沒收淪為乞丐，當了代人挨打專業戶。有一次與人按挨打的數目議定了價格，誰知被打了一倍以上還沒有打完。更令他無法忍受的是，這挨打的場所竟是他原來家中的大廳。清朝末年廢除肉刑，打屁股不再是法定刑罰。但不僅民間照打不誤——從私塾到家族祠堂無不以打屁股為常刑，而且一些僻遠縣份依然保留著笞刑。北洋政府還一度恢復了笞刑，規定對小偷、鬥毆等輕罪犯人如交不出罰金，可以打一頓屁股後釋放。大概為了體現文明，還規定如果打的數量較多，一次受不了，可以分兩天打。

一些人對這項持續二千多年的傳統情有獨鍾，念念不忘，不斷用之於私刑。歷次革命運動中，都不乏對“階級敵人”打屁股的事例，“文化大革命”中就更普遍。紅衛兵無師自通，掄起革命的板子，打向“牛鬼蛇神”的屁股。如四川大學一位著名的老教授，就被紅衛兵剝下褲子打屁股；根據當時廣泛傳達的“清華大學經驗”，有的“牛鬼蛇神”被打得屁股上露出骨頭。直到今天，打屁股也難說絕跡，有的鄉規民約或族規公然訂著罰打屁股的條款。

洋人在中國的租界上取得司法權後，也入鄉隨俗，將用竹板打屁股列入刑法。香港的法律中一直有對少年犯用藤條打屁股的刑罰，只是以後很少運用，近年才正式廢除。新加坡的笞刑應該也是來自中國的傳統，近年則因用藤鞭打了美國小流氓的屁股而名聞世界。至於巴基斯坦等國家將犯人押到鬧市用鞭子打屁股，則是根據伊斯蘭法律。

明代小說《金瓶梅》描寫身為媵妾的潘金蓮在當眾遭受西門慶侮辱和毒打之後，反倒加倍對施虐者諂媚效忠的情態：西門慶至晚進入金蓮房內來，那金蓮把雲鬢不整，花容倦淡，迎接進房，替他脫衣解帶，侍候茶湯腳水，百般殷勤扶持。到夜裡枕席歡娛，屈身忍辱，無所不至，說道：“我的哥哥，這一家誰是疼你的？……惟有奴知道你的心，你知道奴的意，……我的俊冤家！你想起甚麼來，中人的拖刀之技，你把心愛的人兒，這等下無情的挫折！常言道：‘家雞打的團團轉，野雞打得貼天飛。’你就把奴打死了，也只在（你）這屋裡。”

這當然是對傳統社會中臣妾們受虐狂心理的人骨刻劃，並非只在明代小說中才能讀到這樣的描述。1980 年代初的官方電影《牧馬人》的主人翁許靈均被打成右派，流放內蒙古二十年。早年移居美國的父親回國看望他，邀請他去美國生活，可是被他委婉、但堅決地拒絕了。理由是：自己和千百萬中國人民的苦難，是“一場歷史的誤會”，是“母親錯怪了孩子”。孩子是不會埋怨母親的，因為母親愛孩子，希望孩子好，儘管有時方法不對頭。

1980 年代中期，被打了 20 幾年的右派、吃了很多苦的曲嘯，成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平反出來後到全國各地去演講，一把鼻涕一把淚地講：“我出來以後啊，我對共產黨更熱愛了”。他不是用法律討回公道，而是到處辯稱：“母親錯打了孩子，孩子怎麼能怨恨母親？”這樣說，好像不那麼惡劣了；實際上，

母親打孩子有這樣故意往死裡打的嗎？在這種專制的母子關係中，強調的不是“母親”對“孩子”撫愛的道德義務和法律責任，而是“孩子”對“母親”的感恩，以及“母親”傷害“孩子”的不容置疑的合理性。

共產制度把人民所獲得的一切都說成是黨的恩賜。他們的理由是：世上所有的人都是由工人農民養活的，而黨是他們的代表，還恩賜給他們生產資料；所以，任何人都是黨養活的，只許感恩戴德。整個國家處充斥著蠻不講理、自我感動式的文化騙子，如殷秀梅的那首黨啊親愛的媽媽，肉麻得人起雞皮疙瘩；80多歲母親的甘甜的乳汁怎麼撫養五千多歲的兒子？共產黨把自己裝扮成母親，以此騙取中國人的依賴、順從和供奉。

一些在運動中受過迫害的人，出來後還覺得共產黨是好的。如作家丁玲。他們把共產黨比做母親。其實，母親跟孩子是一種天然的關係，而共產黨跟老百姓根本沒有這種關係。統治階級把社會關係中的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與家庭中的長幼關係混為一談，掩蓋了政治中人吃人的事實。共產黨它把自己比喻成“母親”，這是其它的政黨很少有的一種現象，所以很多人骨子裡頭就把黨跟“母親”攪和的非常深，所以就不自覺地去維護黨的利益；成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即施虐受虐性，成了梁啟超所說的“心奴”。

共產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溫濟澤的夫人，在“文革”中與鄧拓夫人丁一嵐被關在一起，後來她曾轉述丁一嵐對自己在“文革”中家破人亡慘境的看法：丁一嵐大姐不是常說嗎：“這母親做錯了事，打錯了孩子，做孩子的你能要母親怎麼辦呢？”中國有句老話叫“野雞打得滿天飛，家雞打得團團轉”。這野雞你一打它，它就飛了，跑了。而家雞就不同了，你怎麼打，它還是在你周圍團團轉，離不開這個家……老溫他們一生受過那麼多苦，卻常說無怨無悔，這

種精神確實是好的，可問題應該往深裡一步想，就是說，怎麼才能讓黨讓母親別錯打兒女。……這麼錯打不行。母親本身你怎麼才能做一個好母親，應該多考慮這個問題，總結經驗教訓，根子究竟在什麼地方（1999年11月26日《南方週末》）？

“家雞打的團團轉，野雞打得貼天飛”——永遠自甘於圍著主人“團團轉”的“家雞”的身份、自甘於隨時可能落在頭上的無端凌辱、自甘於橫遭毒打之後反而只能加倍表示效忠和諂媚的境遇，這種植根于全民族億萬成員內心的臣民哲學和臣妾哲學，其產生固然不始於明代，卻是從明代開始根深蒂固融入我們國民性的。從《金瓶梅》到現代過去了4百多年，其間外面世界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在我們這裡，不僅人們對權勢的恭順沒多少變化，而且連形容概括這種恭順態度的辭語都還是一毫不改，這太不可思議了！

第三章 心奴是怎樣煉成的

第13節 中國一直無民主

1· 中國的“民主”乃君主，當代中國的“民主”乃黨主

民主一詞最早見於《書·多方》（約西元前1020年），“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這裡的“民主”，指的是君王成湯。春秋時代，詞意更明確：“能用善人，民之主也。”“民之主”是為民作主；是“主宰人民”，就是君主專制嘛！西方的“民主”是“民為主”，是人民自己作主，是“人民主宰”。民本思想是“為民作主”即“民之主”——專制君主，而民主思想是“由民作主”——公民決政。

“為民做主”特別容易迷惑人，實際上必然導致獨裁專制，象鴉片一樣害人。

產生“為民做主”這種思想的前提是：讓別人來做自己主人的人，沒有意識到自己擁有人的尊嚴、由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命運對自己的幸福是多麼至關重要；不相信自己的思考能力和判斷能力，不願或不會去為自己的命運作出選擇、承當責任；讓別人來做自己的救主，讓這個救世主來為自己的命運作最好的安排。慘痛的歷史教訓告訴我們：當一個人或一個民族把自己的命運交給所謂的救世主或明君、清官去決定，而自己則等著幸福的降臨，那麼，這個人或民族將落入奴隸或比奴隸還不如的悲慘境地，而那個為民做主的人將從人們的救主變為“好話說盡，壞事幹絕”的專制惡魔。能夠為所有人的命運“做主”的權力是一種能量巨大無比的魔棒，一個掌握了這種工具的人，無論他的願望是多麼美好，如果他的行為不受制約，即使他是天使，也很快就會變成惡魔。因此，我們應該相信的不是別人的願望、心意，無論它多麼善良、美好，而應該相信的是自己的思考、判斷、能力，應該相信的是民主的制度。

近代中國在反對不民主的時候，追求的是人民自己作主的民主；推翻了不民主的統治，又出現為民作主的“民主”。中國共產黨強調，必須在“黨的絕對領導下”人民才能享受民主，這不就是中國古代的“民之主”嗎？王典芬說：“共產黨已很民主了”。其實，當代中國的“民主”乃共黨領導下的“民主”，人民不能自己作主、自由地選擇執政黨，與民主毫不相干，“民之主”——“君主”變成了“黨主”而已。

2·禪讓不是民主

有人認為民主是中國發源的。他們說：自開國黃帝軒轅氏被推為“共主”，下迄堯、舜、禹帝位之禪讓，全以民意為依歸。事實是，被遠志明先生錯誤當作敬虔時代的黃帝時代，就是一個殺人的時代。黃帝通過 53 場戰役打敗了蚩尤，

統一了 3 大部落、72 個小部落。然而就是炎黃火拼，盟軍內戰，決戰於阪泉之野，太史公說黃帝“三戰然後得其志”。大敗炎帝之後，黃帝四處征討，與葷粥交戰。據《史記·五帝紀》記載，黃帝“慣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甯居”，“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凡五十五戰，而天下服”。眾酋長在刀口下，膽敢不推舉軒轅為“共主”？他的天下完全是武力打的，怎能與民主扯上關係？

有人說堯舜禪讓是“天下為公”。據《史記》記載，顓頊為黃帝之孫，帝嚳為黃帝曾孫，堯為帝嚳之子，舜為顓頊六世孫，禹為黃帝玄孫顓頊之孫，他們都是黃帝之後，因此，五帝的嬗遞和堯舜禹的禪讓雖然不是在“小家”內直接傳子，但也不過是在一個“大家”內——黃帝族團內部選擇首領而已，並沒有什麼超血緣的“公”。堯舜禪讓是在大家族範圍諮詢式的安排接班人，將國家主權當作私產私相授受，顯然具有家天下的性質。可見，即使是在五帝時代，中國也從未有過什麼為全社會的“天下為公”，有的不過是黃帝族內部的“公”而已。當時沒有元老院，只是堯個別徵求意見，談不上“為公”。“為公”不能自己說了算，要由元老院或公民投票說了算。堯舜“禪讓”，充其量也是王位繼承的接班人培養而已。

有人根據《尚書·堯典》的記載，提出“四嶽”是中國早期的部落聯盟議事會，是最高的權力中心，並以此論證氏族社會的民主制。而事實上，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載，“四嶽”乃指“四方諸侯”，金景芳先生在《中國奴隸社會史》一書中也認為是指“四方部落酋長”，它不同於西方國家的常設會議機構。對中國國家前的內部組織結構進行一番實事求是的審視、考辨，就會發現：酋邦才是中國國家產生的前身，“帝”才是社會的最高權力中心，中國國家就是在酋邦制

的基礎上“不知不覺”地發展而來的。所以，中國國家更多地表現為一種赤裸裸的暴力征服和統治，從一開始就有濃厚的專制主義色彩。

帝堯以御前會議的方式，廢其子丹朱而選擇遠房堂孫舜作繼承人。帝堯這種選拔國家領袖的方式給後世定下了兩條規則：繼任領導人由前代領導人欽定；自身素質存在嚴重欠缺者不能當國家領袖。這兩條規則，再加上另一條堯雖未說，但肯定也內蘊於堯舜體制之中的潛規則：“君權的取得以至保持主要依賴于武力”。三條中每一條都排除了人民以和平的方式選擇國家領袖的任何可能。這三規則是中國歷代最高統治者的繼承法則，是決定中國政權最高統治權歸屬的根本法則，為幾千年來歷史所默認和遵行，主導了中國幾乎所有的政權更替。

《韓非·說疑》雲：“舜逼堯、禹逼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據說：舜掌握大權之後，就把堯子丹朱殺死，把堯囚起來，強迫堯把王位“禪讓”給他，另外還接收了堯的兩個女兒。漢末曹丕娶了漢獻帝兩個女兒，又逼迫漢獻帝禪讓之後，得意洋洋地說：“現在我才知道古代的禪讓是怎麼回事了！”

儒家講“天下為公”就是因為“天下不屬公”。“天下為公”強調的統治者以所謂的“公心”來處理政務，人民只是決策的被動承受者而不是主動的參與者，人民的義務僅僅是供養統治者和服從統治者的教化，而沒有權力也沒有能力對聖人的微言大義說三道四。儒家把政治當成聖人教化管制百姓的過程，把世襲當正統，把禪讓當德政、把成功的陰謀篡位說成是有道勝無道。這種政治觀只能用來粉飾專制。

3. 納諫不是民主

中國的國家起源於家族的征服，一個家族掌握最高統治權，這個家族的父家

長便成為獨一無二的統治者。自殷周以來，中國就是君主專制政體。從殷到秦，中國政治制度演變中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專制不斷強化。殷代初年，大臣伊尹可以對“不遵湯法”的帝太甲“放之于桐宮”。但到殷代末年，對商紂王的暴虐統治，卻誰也無能為力。周代實行的分封制，看起來似乎是一種分權的行為，但最高權力仍屬於周天子。商周是以氏族為基礎的、以分封為形式的君主專制。春秋戰國時期，各大小受封者之間的鬥爭，一方面使諸侯的統治區域不斷擴大，另一方面也使得君主專制不斷加強。春秋時期官僚行政君主專制開始萌芽，戰國時期形成區域性官僚行政君主專制，到秦漢成為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從中國歷史看，殷代以降，雖然一直存在著朝堂議事制，甚至有時出現大臣專朝政的現象，但從未產生過制約君主決斷權的政治機構，更沒有什麼城邦民主制。中國，只有一個主人，其餘都是奴隸。先秦諸子無法設想無君臣（民）之別的国家。當他們探討國家的起源時，實際上就是在探討君主的產生和君臣之別的形成。在他們看來，沒有君臣之別就沒有國家，甚至也沒有文明，社會處於無序的狀態，人們的生活就如同禽獸一般。一群平等的人以某種方式聯合起來實行自治的政治形式，超出了他們的想像力之外。這種社會事實塑造了諸子的專制思維定勢。

君主專制制度的基本特徵是君主個人獨裁專斷和排斥民主性，這就使得在處理政治、經濟等各種問題時具有明顯的偶然性。由君主專斷和昏庸所造成的政治上不穩定的事實常常出現在統治階級面前，甚至造成王朝的覆滅。這種不斷重複的歷史事實，迫使統治階級不得不尋求一些補救的辦法。於是，作為專制制度補充手段的諫議制度便應運而生了。

周公等人在總結夏、商、周勝衰的歷史經驗與教訓時，雖然主要著眼于天命與君主的“德行”，但同時也涉及了納諫問題。這在《牧誓》、《酒誥》、《召誥》

諸篇中均有一定反映。例如周公在《酒誥》中告誡康叔說：“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鑒)，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豈)可不大監？”具有明顯的宣導聽諫的性質。西周末年的譏諷詩及記述這個時期的歷史文獻，明確闡述了能否納諫是關係到國家興亡的大問題。《詩經·民勞》篇最早提出了“諫”這個概念：“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戰國時代，諸子幾乎一致認為君主納諫與否關係到國家興敗存亡。在這種輿論下，連極力鼓吹君主絕對專制的法家也主張君主要納諫，如《管子·形勢解》說：“諫者，所以安主也……主惡諫則不安。”儘管先秦政治家與思想家如此重視進諫與納諫，但進諫與納諫不是一種硬性的政治制度。君主沒有必須納諫的限制，臣下也沒有必須進諫的義務，在這方面沒有任何制度上的規定。因此，進諫與納諫就其性質與實行情況而論，僅僅屬於政治責任感與道德範圍的事而已，是專制制度的一種補充。

許多人把能聽取不同意見當成民主，這是混淆民主的概念。聽取或不聽取不同意見是個人的自由，與民主無關；**民主的涵義是多數民意決政**。民主的底線是不壓制、不迫害異見者，中國的開明皇帝雖能**納諫**——聽取不同意見；但他從來沒有達到民主的底線——不迫害異見者。因為民主社會的公民可要求總統下臺，在專制社會，要求皇帝下臺都是死罪。

進諫雖然不是一種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以維護人權為根本的；但它畢竟有與民主相近的東西。①諫議理論不承認君主是萬能的，更不承認君主絕對正確、一貫正確。然而君主專制恰恰與此相反，君主專斷的特點是權力無限，地位神聖，對一切有生殺予奪之權。《呂氏春秋·執一》論述了天子只能“一”，不能“兩”的道理。所謂“一”就是君主獨裁專斷。所以，不管進諫者抱有怎樣的赤誠之心，都是對“一”的程度不同的破壞或侵犯，君主隨時都有可能對進諫者給予打擊。

②諫議的求實精神與君主專權的矛盾。進諫的求實精神與專制君主個人的剛愎自用、主觀武斷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衝突。如伍子胥諫吳王夫差滅越，夫差不聽，子胥反被戮。事隔幾年，吳被越打敗，夫差後悔莫及。個人專權制度常有詭密之謀，不能公開討論。進諫者誤入迷陣，也難逃橫禍。韓非在《說難》中舉例：鄭武公想打胡國，就先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胡君，以麻痹對方。鄭武公問群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說：“胡可伐。”武公說：“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武公佯怒而殺關其思。胡君聞之，視鄭為至親，遂不防備鄭國。此時，鄭國突然襲胡，把胡滅亡了。韓非評論說：“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韓非是沒有一點人權思想的，他主張：為了國家（權力）的擴張，可以犧牲皇帝以外的任何人。③進諫者的正派作風與專制君主喜歡阿諛奉承的矛盾，結果：諛臣得勢，諫臣遭殃。④進諫者的才能與專制君主妒才嫉能的矛盾。君主需要奴才，但有時也需要良才。然而往往是“良才難令”。敢於進諫的人對事情總有獨到見解，君主為維護自己的權威，往往不惜有意錯殺良才。勾踐在賜文種死時說的一句話，道破了這位專制君主的心理：“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秦昭王殺白起又是一個十分生動的例證。當然，進諫者也有喜劇結局的，不過這是一種偶然性、碰運氣而已。同樣的諫臣，其命運可能完全不同，因為“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繞朝(人名)之言當矣，其為聖人于晉，而為戮于秦。”老實說，這種運氣是很不容易碰到的，因為終究“世主之能識論議者寡”。

4·貫穿中國歷史五條專制政治原則

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統治權來源於民權的觀念和相應的制度形式。在綿延數千年的歷史中，中國有五條政治原則貫徹始終，直到今天仍然在發揮著實質

上的憲法原則功能。

一是最高領導人非民選繼承法則——可稱為“君統”。幾千年來，中國人所知道的君權的來源，觀念上只有三個：禪讓制，繼承制和武力奪取制。三種形式的歷史淵源分別對應於三種歷史經驗：堯禪位於舜，禹傳位於啟，湯、武以武力取代桀、紂。表面看，這三種繼位元方式大有區別。然而，認真說來，三種繼位元方式都來自堯舜體制。帝堯以御前會議的方式，廢其子丹朱而選擇遠房堂孫舜作繼承人。帝堯這種選拔國家領袖的方式給後世定下了兩條規則：繼任領導人由前代領導人欽定；自身素質存在嚴重欠缺者不能當國家領袖。國家最高統治權的傳承，無論是世襲或禪讓，都是專制者一人說了算數。這兩條規則，再加上另一條堯雖未說，但肯定也內蘊於堯舜體制之中的潛規則：“君權的取得以至保持主要都仰賴于武力”；國家機器主要是靠暴力手段而不是靠一種真正能夠統攝人心的意識形態來震懾群氓和統治愚民。三條中每一條都排除了人民以和平的方式選擇國家領袖的任何可能。這三條規則以潛規則的方式存在，是事實上的中國歷朝歷代最高統治者的繼承法則，也是決定中國政權最高統治權歸屬的根本法則，為幾千年來歷史所默認和遵行，主導了中國幾乎所有的政權更替。直到“紅朝”的毛澤東取代蔣介石和臨終指定華國鋒繼位，鄧小平以“槍指揮黨”，廢胡、趙而立江澤民和指定胡錦濤，依然因循著這三條潛規則。

二是國家的法律由最高統治當局制定。儒家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法家說：“憲令著於官府”，清末的《欽定憲法大綱》則有：“欽定頒行法律及發交法案之權。凡法律雖經議院議決，而未奉詔令批准頒佈者，不能見諸施行。”

《欽定憲法大綱》早就終止實行，然而，今天的法律仍然出自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或國務院，全國人民代表在立法中的作用主要限於舉手通過。

在上者揆道，在下者守法，到今天都沒有根本改變。

三是最高統治者統攬立法、行政、司法三權，權力不受限制、不許置疑、不許分享，其錯誤和罪行免受法律追究。在清代以前，“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君權“從來沒有明確的限制”，“是絕對的、最後的”，“是理性所不許施、議論所不敢到的領域”。臣民如果團結起來與君主分權，便被視為危機。儒家認為：把權柄給予臣下，是失道之君。並且“人君無過舉”——君主沒有錯誤，錯誤都在臣工。1949年以後，黨主席或總書記或政治局集體，其統治權力覆蓋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各個角落，集立法、行政、司法，和文化教育各大權能於一身。黨的組織，從中央委員會到地方委員會，都不得被當作法庭被告。公民如有膽敢挑戰或批評黨的絕對統治地位者，重可處死，輕則奪其飯碗斷其政治前途。

四是官員由統治者任命。整個社會形態，以郡縣制的治理結構而歸於高度統一，民間自治傳統從來就沒有逾越過鄉一級，現代更是倒退至村一級。直到帝制臨近解體，《欽定憲法大綱》第五條仍然頑固堅持：“（君上有）設官制祿及黜陟百司之權。用人之權操制君上，而大臣輔弼之，議院不得干涉。”天子制百官、定爵祿之權從《禮記》開始，幾千年間得到繼承發揚。科舉考試，名為以考取士，但進士及第並非拿到官職，學位要轉化為官職，仍然得由朝廷任命。官員由統治者任命的規則也延續到今天。全國數以百萬計的大小官職，悉數出於中共各級黨委。黨管幹部，而非民選幹部，是中國幾乎所有官員產生的唯一管道。

五是統治權與人民無關。“主權在君而不在民”，“主要以必集君主，不得旁落於臣民”。最高統治者的繼位與各級官員的任命，國家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司法審判，稅收多少，軍隊員警如何服務，宣戰與議和等等，這些在代議制下都必須經過人民同意的國家大事，中國從古至今，都是統治者說了算數，人民

不僅沒有實際的體制性權力，就連批評的權力也沒有。從古至今，人民之於國家，一直是統治的對象。當國者的治國方略和行政措施，是與人追求自由的天性為敵，其最主要功能，是用以維繫一種官本位的社會秩序。

第 14 節 熱愛專制獨裁的諸子百家

1· 君主專制

皇帝也稱為王天子，古書雲：“王，天下所歸往也”；“王者尊，故稱天子”；“君天下曰天子”。用天子稱呼皇帝，既表達了君權至上，又顯明了普天之下要服從一人的統治。

至晚到春秋初期政治家與思想家紛紛提出“國不可貳”的問題。晉大夫狐突說：“內寵並後，外寵二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齊悼公說：“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老子與孔子從宇宙體系上論證了君只能“一”。老子把王與“天”、“地”、“道”並列稱為“四大”；孔子說：“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禮記·坊記》記載，“子雲：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孔子把君主的權利看成是天上的神權在人間的一種反映，以太陽象徵君主，以“天無二日”來比附人間不可有二主；天只有一個太陽，這只是太陽系中的情形，怎能斷定別的星系沒有二個太陽呢？儒家最渴望的是：君王是太陽，照亮一切；王后是月亮，居於服從地位；而臣民如同衛星一樣環繞君王而井然有序地運行。儒家的“仁政”就是太陽放出的光和熱。孔子希望君王如太陽一般，照亮一切，而其它的人都圍繞太陽，從太陽那兒分享光和熱。太陽占太陽系品質的 99.8%，所以儒家希望政府佔有社會權力的 99.8%。

“天無二日”，應用到人類社會中，就是“國無二君”（西方古代國家都是

二王、三王甚至元老院或公民大會作主)。“天意”只能由一人來代表，這從根本上扼殺了分權民主誕生的可能。“中心”、“核心”在中國意味著——“朕就是真理，朕說了算”——即專制獨裁的代名詞。孔子又把天下看成是家的擴大，以“家無二主”作為君主專制的理由。天子既然“家”天下，而“家無二主”，自然是“民無二王”而“定於一尊”了。

諸子認為：多元的政治體制是不可能的，天下必須統一於一個君主，君權必須是獨一的、排他的，任何權力體系都只能有一個頭。孟子引證孔子的話說：“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在回答“天下惡乎定”時，他說“定於一”。古中國人流行的觀念是“國不堪貳”。諸子異口同聲：“亂莫大于無天子”（《呂氏春秋·謹聽》）。也不能有兩個天子，兩個天子就等於無天子。《呂氏春秋》總結道：“王者執一，而為萬物正。……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搏之也。一則治，兩則亂”。“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

他們一致認為最高執政者只能有一個人。在權力的層次結構中，每一層的最高權力也只能由一人獨掌。慎到認為“兩”和“雜”是亂之源。因為“兩則爭，雜則相傷害”；“兩貴不相事，兩賤不相使”。解決矛盾的辦法是定於“一”，“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家不亂者，父在也”。“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而國不亂者，君在也。恃君而不亂矣。”一國之內只能有一個君主，“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

《管子》繼承了慎到的思想。《霸言》篇說：“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治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治也。夫令不高不行，不專不聽。堯舜之民非生而治也，桀紂之民非生而亂也，故治亂在上也。”《七臣七主》說：“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

治之至也。”他甚至設計了具體的大一統制度：“天子出令于天下，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聽其上，弟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鬥斛一量，丈尺一制，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

在王制篇裡，荀子說：“分均則不偏，勢齊則不壹，眾齊則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兩貴不能相事，兩賤不能相使，是天數也。”荀子把兩個天子並存視為一家中兩個父，不可共處。“天子無妻（齊），告人無匹”；“君者，國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荀子從理論層面上為等級制奠定了理論基礎。荀子認為：“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先王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尚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

墨子設計了一個“尚同”金字塔，天下人都“尚同”於處於金字塔頂端的那“一”個天子。董仲舒說：“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起，故謂之一。一而正二者，天之行也。”帝王就是人間的“一”。一切圍繞君來轉，“朕意即天意”，一切以君上的是非為是非，一切以君上的好惡為好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權勢獨操，決事獨斷，是實現君主專制最主要的兩項內容。申不害主張“明君如身，臣如手；君若號，臣如響；君設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詳；君操其柄，臣事其常”，最後，“明君使其臣並進輻湊”。為防止大臣“蔽君之明，塞君之聽，奪之政而專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國”，他要國君“去聽、去視、去智”（《呂氏春秋·任數》），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獨視”、“獨聽”、“獨斷”。因為“獨視者明，獨聽者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韓非強調：“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王”；“權勢者，

人主之所獨守也”。《管子·明法解》雲，“兼聽而獨斷”。君主在決斷之前一定要深藏不露，不可讓臣下摸到自己的意向，為此兼聽之時絕對不動聲色。為防止走露風聲，韓非特別提出要備內，專門寫了《備內》篇，警告君主，且莫讓後妃、太子、左右之人得到消息。為防止說夢話洩露機密，韓非還勸君主要“獨寢”。凡此種種都是為了確保獨斷。

宋儒司馬光有有一段話也很典型：“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群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終決之者，要在人君。”司馬光在此提出了“獨斷”、“多謀”、“定天下之是非”、“人人之私志”、“衰亂”幾者的關係，不難看出，君主的“獨斷”是決定性的，所謂“終決”就是最高與最後決斷權，只歸君主獨有。陳亮對宋代帝王的獨斷做了如下的描述：“發一政，用一人，無非出於獨斷；下至朝廷小臣，郡縣之瑣政，一切勞聖慮。”

中國人著意不把大權分割。康熙說得十分絕對：“天下之權，唯一人操之，不可旁落。”毛說：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領導，各方去辦，也不能讓渡予他黨。“唯器與名，不可假人”（《左傳》成公二年）；如果大權被分割，便一切都完了。即使到今天，許多人仍然強調只能有一個頭，不能搞“三頭制”的三權分立；他們的理由是：“人只有一個頭，那人類社會也只能一個頭，多頭必亂”。這種觀念是中國類比專制思維的產物，人只有一個頭，但人的頭腦分為左右腦，二腦是分工協作平衡制約的；即使說人只有一個頭，並不意味著人類社會只能一個頭，只能搞一個人說了算的專制獨裁制度！

2·特權金字塔

中國的等級思想上接伊尹、周公、管仲、子產，中經孔、墨、孟、荀、商、

韓，下曆董仲舒、葛洪、韓愈、司馬光、程朱、顧亭林、曾國藩、直到今天，其核心內涵未有實質性的改變。正如曾國藩在《討粵匪檄》中所言：“自唐虞三代以來，曆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孔子學說的核心是克己復禮。他曾說：周朝借鑒了夏商兩代的經驗，其制度美好無比，我讚美擁護周朝（“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如何從周？他答道：“約束自己的欲望，恢復周代的禮儀制度”（即“克己復禮”）。在這裡，孔子不顧周王朝已走向不可逆轉的腐朽沒落，不顧新興集團逐漸取代其統治地位的現實，不顧“禮崩樂壞”到不可收拾的局面，把人生價值取捨確定在恢復先王統治的基點上，其開歷史倒車的行為已一目了然。

孔子禮教的基本內容。第一是等級制。《禮記·曲禮》雲：“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語言是人與禽獸間的本質區別之一，儒家把鸚鵡之語混同為人語是大錯。儒家這樣作的目的是為了突出周禮。子產把禮作為天、地、人的共同規範：“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禮記·冠義》雲：“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者，天地之序也”（《禮記·樂記》）。也就是說，等級特權制度是宇宙的總規律。儒教一開始就把人和人看成不平等，人一出生便因身份和地位不同而有了等級。禮是一種以血緣為基礎構建起來的等級秩序，屬於不成文的習慣法，在周代具有根本法性質，它與特權結合，毫無平等可言。儒教禮制內容龐雜，包羅萬象，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無不被禮制囊括於內；分別規定在《周禮》《禮記》《儀禮》三部書中。其所強調的核心是等級制度。如：天子的坐席是五層，

諸侯的坐席是三層，大夫的坐席是二層。天子有六軍，大國三軍，小國一軍。這是周代的軍制。統治者的既得利益正是靠武裝力量保證的，由軍隊支撐政府，自然構成黑社會性質的極權統治；六軍的相對優勢，保證了皇帝黑社會龍頭老大的地位。天子有七座宗廟，諸侯有五座宗廟，大夫有三座宗廟，士有一座宗廟。廟宇的數量和規模差別，即確定了這個特權階層的崇高地位，又劃出它們之間清晰的等級。

周禮規定：天子用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在等級森嚴的社會裡，天子主宰著國家大政，諸侯、卿士、庶民都按自己所在的等級規範行事，絕不能越雷池一步。魯國大夫季氏卻用了八佾，孔子怒吼到：“是可忍，孰不可忍？”孔子維護的是等級制度。

按周禮規定，天子祭天地，祭四方之神，祭天下名山大川，祭五祀（即：春神句芒、夏神祝融、中央後土、秋神蓐收、冬神玄冥）；諸侯祭本地之神，祭境內名山大川，祭五祀（司命、中鬻、國門、國行、公厲）；大夫祭五祀（門、戶、井、灶、中鬻）。由此看出，即令是五祀，由於地位的不同，具體的內容也大不相同。而士的階層就只能祭祀自己的先祖。平民、賤民與奴隸，連祭祀自己先祖的資格也沒有！天子用豆器二十六個，諸公用豆器十六個，諸侯用豆器十二個，上大夫用豆器八個，下大夫用豆器六個。同是儀錶，說法就不同：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蹇蹇，庶人僬僬。同是老婆，稱呼也不相同：天子後妃曰“後”，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庶人曰“妻”。同是死，叫法也不同：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天子死後七個月下葬，用五層墊席和杭木，用八層隔扇；諸侯死後五個月下葬，用三層墊席和杭木，用六層隔扇；大夫死後三個月下葬，用二

層墊席和杭木，用四層隔扇。

諸侯之下士祿食 9 人，中士食 18 人，上士食 36 人；下大夫食 72 人，卿食 288 人，君食 2880 人。次國之卿食 216 人，君食 2160 人。小國之卿食 144 人，君食 1440 人（《禮記》）。

凡養老，……50 異杖，60 宿肉，70 貳膳，80 常珍，90 飲食不違寢，膳飲從于遊可也。……50 杖於家，60 杖於鄉，70 杖于國，80 杖於朝，90 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禮記》）。

孔子論音樂：“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征為事，羽為物”（《禮記·樂記》）。音樂的五音也被納入等級專制思想中，真是荒唐！

縱觀其禮儀制度，充分體現了“貴者恒貴，賤者恒賤”的血統特徵和強盜特徵，其作用表現在兩個方面：①在統治階級內部，上尊下卑的理念以級差加以確定，拉開距離。②以禮制禮儀顯示貴族凜然不可侵犯的威儀。大到祭祀小到飲食起居一言一行等，都要表明各個人身份和地位的不同。在精神上，它無形中起到一種震懾作用，誠所謂“威儀三千”。一部《儀禮》，都是對士及士以上貴族規定的，與平民、賤民和奴隸們毫無干係，這就是“禮不下庶人”的來歷。總之，周禮是維護統治階級既得利益的“靈通寶玉”，就像《紅樓夢》中的賈寶玉一樣，丟失了這個“撈什子”，難免要失魂落魄，性命不保！自有周以來，統治者將禮視之為立國之本，《左傳·襄公三十年》講：“禮，國之幹也”（禮是國家的命脈）。《國語·晉語》講：“禮，國之紀也”（國家的綱紀，根本大法，基本原則）。孔子在回答治國是否有道的提問時，更強調說：“為國以禮！”翻譯成現代語言，就是“恢復周禮，以禮治國！”

第二是人身依附，以下附上。《禮記·中庸》說：“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

不考文”；即制定禮儀和考定文義的權力都屬於天子。帝王制禮作樂的目的是突出帝王之尊，使卑者讓尊、尊者凌賤。作威作福為帝王的權利，誠惶誠恐為臣下應盡的本分。周公制禮無非是把人安置在相應的位置上，不要動，一動就亂了綱常。制禮始終貫穿著這樣原則，即“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也。”“親親”，就是必須親愛自己的親屬，必須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就是要下級服從上級，必須做到不許犯上，不許違抗。子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愛親人有遠近之分，尊賢人有等級之分，這就是禮所產生的緣由）。儒教的核心是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綱，本是網上的總繩，君、父、夫為“總繩”，臣、子、妻為“綱”，綱對於總繩來講，除了服從還是服從。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國君是所有臣子的綱，臣子們又是自己兒子、妻子的綱，整個國家便形成了一個以皇帝為總綱的金字塔式的關係網，這個網疏而不漏，每個中國人都逃脫不了。在這個專制的網中，君、父、夫只有權利而沒義務，而臣、子、妻只有義務而沒有權利，“君可不敬，臣不可不忠；父可不慈，子不可不孝。”這是一種單向的權利、義務關係，裡面沒有雙向制約，不存在絲毫平等觀念。魯迅說：“兒子跟老子講話，還沒開口就錯了。”對君開口第一句是“臣罪該萬死”，在這些關係中只要有了矛盾，就是臣子、兒子、妻子錯了。權力者怎麼欺壓百姓都是對的，都是為百姓好。如認為“64”大鎮壓是為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於是鎮壓就是大善舉了。任何人只要在權力上“高”人一等，就可以肆意侮辱他人。這樣一來，人自然就喪失了人性、只剩下殘暴性和奴性。

三綱之外尚有五倫：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倫之中的兄弟，要求弟弟對兄長絕對服從，這一點在儒教禮制觀念中是僅次於孝道的相當重要的人

倫，因此二者常被合稱為“孝弟”。五倫之中的“朋友”，既無血緣關係，又無婚姻關係，應該擺脫父子、兄弟之間的服從關係，平等相處了吧，偏不！儒教硬是用不平等的血緣關係將之強姦了：儒教通過結拜兄弟的方式將朋友泛血緣化、泛兄弟化了。還美其名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拜把兄弟，要磕頭、燒香、喝血酒，以年長者為尊，它其實是一種泛家族化的宗教儀式。儒教通過拜把兄弟這種方式使他的等級禮制觀念突破了血緣家族的範圍，一下子放之四海皆准了。

第三是“一個頭腦，全體服從最高”即忠君。因為周王是既得利益者的總代表，是周禮框架構築的最頂端，只有恢復周王的絕對權威，既得利益者才不會失落，才有飛黃騰達的可能；鼓吹者也能分到一杯殘羹。只有周王的地位得以鞏固，生活在周王陰影下的大小貴族地位才不受威脅；如果周王倒了，必然樹倒狐孫散。所以，孔子極盡其能事地予以吶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其重要內容。齊景公聽到這一理論，高興地說道：“太好了啊！假如國君沒有國君的權威，臣子不懂得忠君的道理；父親沒有父親的尊嚴，兒子不肯服從父親，雖然有糧食，我豈能吃得安逸！”這就是後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基礎。孔子在《春秋》一書中特別強調的，無非是天子、國君不可觸犯的權威及其利益。

如何忠君？除了克己復禮，嚴格遵守上尊下卑、上命下從等之外，孔子還講了：要對統治者，對帝王將相這些賢者，對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一定要隱瞞惡行，隱瞞過錯。即“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為親者諱。”究其實，三諱的核心是諱“尊者”之過。為親者諱得區別物件，普通民眾為親者隱瞞惡行要受到法律追究；為賢者諱得有分寸，得不觸犯最高當局者利益，否則也有包庇嫌疑；唯其為皇帝隱瞞罪惡才是真的，為刻意製造“聖君”“明君”，“最高當局永遠正確”提供了理論依據。

為了忠君，孔子又講：“忠君要忠到奴顏卑漆的程度，縱令被別人笑罵也不在乎”（“事君以禮，人謂之諂”）。說到這裡，不由得想起 1958 年 3 月成都政治局擴大會議。那次會議上，柯慶施附和康生，發表了臭名昭著的講話：“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誠可謂得孔子真傳！縱觀如今，官場上不搞這套的又有多少？將孔子這句話翻譯過來，不就是笑罵由你，好官我自為之嗎！

“夷狄之有君，未若諸夏之無也”。為什麼夷狄的君主連中原的無政府狀態都比不上呢？因為野蠻人中有平等，而華夏即使處於亂世也處處是等級森嚴。孔子多麼地欣賞等級制！

在中國，只要“等級制、人身依附、一個頭腦”這三樣東西還存在，大金字塔崩潰了，仍會有許多小金字塔；小金字塔還會再構建成一個大金字塔的，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嘛！總有人想從自己的小金字塔的頂尖上，進而居於大金字塔的頂尖。

金字塔的等級制社會充斥著特權，沒有權利平等。金字塔的底層幾乎沒有任何權利，只有應付不完的義務；上一個臺階，義務就減少一些、權利就增大一些；金字塔的頂層沒有義務，權利趨向無窮大。壓迫來自以等級劃分為基礎的權利制度，權利等級制金字塔從上到下一級壓一級。由於權勢不平等，必然引起物質不平等。權利不平等是人類壓迫的根源。

維繫這樣一個大金字塔，是孔夫子開創的儒學教育的目的，通過教育讓人們自覺地去維護這個等級特權秩序。這教育不限於老師給學生講課，已滲透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包括日常生活中，可謂無所不在，其效果是顯著的，使人潛移默化地在精神上成為孔教的俘虜，能在不管受到如何不公正的待遇時，仍能

安分守己、逆來順受。

《資治通鑒》開篇“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腹心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首論即為求得國家穩定，必須社會等級層次井然有序，君主應居於金字塔社會結構之頂尖，成為眾人之首腦，眾人不過聽其指揮之四肢，而無本身之人格，獨立之意志。司馬光認為最能保持中國穩定的社會結構是：

天
子
三 公
諸 侯
卿 大 夫
士 庶 人

按司馬光的歸納，其基本原則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用以保證統治機器運轉的有效和靈活，求得“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他認為每當這個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被破壞時，天下就要大亂，在上的統治者會喪失特權；在下的百姓更是遭殃，比起來還不如有個皇帝。司馬光總結說：“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皇帝再混蛋，大臣也必須“守節伏死”。

儒家把等級制度說成是萬古不變的理。朱熹認為理是萬物的總根源，在沒有

宇宙前，“理”就存在。“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三綱、五常都是“理”所化生，是宇宙中永恆的理，也是道德的最高標準。因此，必須“存天理、去人欲”。“人之一生，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

第四是鼓吹“天命”。翻開《四書》《五經》，天命二字充斥其間：“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生德於予”，“天之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不怨天，不憂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吾誰欺，欺天乎！”“五十而知天命”；“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春秋》一書，更多處把自然現象與上天意志聯繫起來。在鼓吹天命的理論中，“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言”集中反映了孔子天命思想的真諦。在這裡，他充分利用人們對天的敬畏，強調天的意志是絕對的意志，不能違背；大人是天在人間的代表，畏天就得畏大人；聖人是代天立言的，聖人的言論，就是天的命令，必須無條件服從。說天命理論是構築不平等社會的荒謬理論，並不過分。

第 15 節 鄙視人民的儒家

1. 儒家重視民意嗎？

儒家是最主張等級制的。等級制的實質是尊上卑下，即尊崇聖王、君子，卑視小民。儒家認為上智下愚，民就是“下”，孔子只會把“愚蠢”的民意當放屁。

《論語》中記錄了孔子與子貢的對話；“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孔子的話表明，100%的“鄉人皆好之”，不如鄉人之中部分人——善者好之。也就是說，100%的鄉人<部分鄉人。可見，孔子鼓吹的是部分高於整體、聖

人高於群眾。連“天必從之”的“民之所欲”，孔子卻要打個大問號。可見，孔子根本不敬畏天，是個騙子。

孔子的政治目標是獨裁：“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不議國政）”。連議論權都不給老百姓，儒家怎麼能知道民眾的所思所想，怎麼可能重視民意？

《尚書》和《周禮》記載：西周時的庶人不但議政，還參與國家大政的決策（《尚書·洪範》），這一習俗直到春秋時代。《左傳》魯襄公三十一年雲：“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這是庶人議政之例。國人作為宗族中的基本力量，往往在戰事或奪權鬥爭中有很大的分量，所以，統治者在執行重大事項前時或會對其進行一些諮詢。這種諮詢沒有形成一種制度，國人只是處在被動的地位，更談不上如“公民大會”這樣正式的權力機構。“商周時期的‘詢萬民’和‘朝國人’只是君主和諸侯為形成自己的意見從而做出決斷而採取的一種諮詢方式，有時甚至只是向下屬和臣民貫徹自己的決策的一種布政方式。在商周歷史上，從未出現過使‘國人’或‘萬民’成為社會的一個權力點的任何制度”（謝維揚：《中國早期國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3 頁）。《左傳》魯定公八年雲：“衛侯欲叛晉……公朝國人，使賈（王孫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王伐我，病何如矣？’皆曰：‘晉王伐我，猶可以戰’，乃叛晉”。這是以庶人為主體的國人參與國家大政決策之例。可見，“庶人不議”是孔子的主張，他連周禮中庶人議政的“親民秀”都取消了。其實，天下有道，恰好是庶人議論多；庶人不議，則顯示了人民遭受著極為嚴厲的壓制，表明了天下無道使庶人不能議政。庶人們鴉雀無聲，特權階級洪福齊天。這就是孔子的理想。

孔子的核心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各守本分，“思不出其位”，不得僭越。孔子把個體提出不同政見的社會看成了一個混亂不堪的社會。這與民主政治完全背道而馳的：在民主的形式中，任何人都沒有必然的理由被束縛於某一個特定的位置上。每個人都有權利參與到世界性的事務當中，提出他自己的思考與議案。

孔子認為：人天生為不平等的道德個體，有些人天生就是聖人，命中註定就該是享受榮華富貴的，這是他們的道德換來的。德配天地，富有四海，永享祭祀。這是天命，民眾只應該服從，聽從聖人的道德教化，而不能冒犯聖人的威嚴，不能議論聖人的言行。

“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政不在大夫，…則庶人不議”。傳統的理解是大夫不應控制政府，這阻止了貴族議會共和制的產生；百姓不議論政治，這阻止了“主權在民”的民主政治的可能。康有為說“不”字系誤植，必須刪去，成了“政在大夫”、“庶人可議”，可見搞康有為也不同意孔子的君主獨裁政治的主張。

魯迅說：“‘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就是秦始皇隋煬帝，他會自承無道麼？百姓就只好永遠箝口結舌，相率被殺，被奴。這情形一直繼續下來，誰也忘記了開口……‘莫談國事’，是做小民的本分。有學者曾說過：要征服中國，必須征服中國民族的心。其實，中國民族的心，是早給我們的聖君賢相武將幫閒之輩征服了的”。

孔子反對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從心靈上桎梏人。他主張“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即：不在一定的官位，就不能考慮那個位置的政務。也就是說，上級能考慮的，下級不能考慮。沒有官位的人，就毫無政治權利了！政治權利的層層遞

減，到了人民那裡就絲毫沒有。每個人只能考慮自己分內事，縱使有絕頂的才智，也必須“思不出其位”。唐憲宗元和十年，宰相被暗殺。白居易上書堅請捕捉刺客，權貴以其越職言事為由，貶他為江州司馬，從此，白居易過上了顛沛流離的生活。而蘇軾也是因干預“王安石變法”開始倒楣的。

孔子把“越位”議政看成最大的罪；他最憎恨“庶人議政”，他害怕百姓議政危害了他精心維護的等級特權制度。“莫談國事”的傳統來自于“庶人不議”的權力蠻橫，剝奪了民間的參與權利，必然使政治為一小撮當權者所壟斷，公權力成了權貴們牟取私利的特權。

孔子強調以禮教民，“齊之以禮。”孔子要求人們都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禮制；各安其位、各守本分、沒有非分之想，天下就太平了。人們的衣著服飾、言談舉止、思想感情，無一不被等級格式化。從認識論方面考察，孔子主張以禮為標準對各種事物進行規定。他要求人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凡不符合禮制規定的，就不能看、不能聽、不能說，更不能動，當然也不能想；人們只需要盲目地跟從禮儀習俗，重複著一套一套的陳舊模式。從認識論上看，禮絕不是檢驗認識正確與否的標準，而應是認識的物件，它本身正確與否應屬於認識的問題。把禮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只能教人盲目隨俗，教人承認現實的即是合理的，因此只有窒息作用，決不會給人以啟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作為教條使無數人在思想上做了特權者的奴隸。到了現代，演變成“非令不敢視，非令不敢聽，非令不敢言，非令不敢動”。例如：謝靜宜對即將進宮的蘆荻交代了紀律：一、不該問的不問；二、不該聽的你別去聽；三、不該看的你不要看，四、不該說的你別說。這四不，你要牢牢地記住，這是紀律。這等於告訴你：你完全是在黨的控制之下，凡是黨不

讓你做的，你就不能做；凡是黨不讓你說的，你就不能說；凡是黨不讓你看的，你就不能看。這就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全面專政”啊。

東海一梟說：孟子強調尊重民意。“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孟子·梁惠王下》）這是他與齊宣王之間的一段對話，要求君主在進行政治決策時要參考、聽從民意。

批判：孟子不過是把孔子所說的“鄉人”換成了國人而已；孟子不學無術、答非所問：“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對曰：“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至於才與不才的標準他沒有說，為什麼不說？這是為了君王好根據己意和儒意來獨裁！如果把才與不才的標準說清楚了，那就不好隨意獨裁了。孔子反對鑄刑鼎是同樣的道理！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連大夫即高級官員的話都不要聽，這不是獨裁是什麼？當所有的“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也就是說，當 99%的國人曰不可時都可以置之不理，這豈不是獨裁？

當古希臘人與古羅馬人通過獨立的元老院和獨立的公民大會來監督執政官[國王]時，中國的儒家們希望君主聽到了全國人民的呼聲後再去調查，萬一君主整天花天酒地，聽不到全國人民的呼聲，那麼，人民只有無窮無盡的苦難了。

只有當 100%的國人“皆曰不可”時才受理，這樣慢吞吞的監督，有何效率可言？而且還得等到君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如果君王看不見，那不是貪官污吏要橫行天下嗎？

100%的國人皆曰不可了，就應該把那人放棄掉，還察什麼呢？可孟子還要王“察之”，可見，孟子瞧不起老百姓的意見，是鄙視民意，何尊重民意之有？孟子要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也就是說若王考察後覺得“可焉”，民意是可以否定的，那人可以不去。可見，孟子心目中的“王”是超越民之上的“神”，專制獨裁是完全合理的。

“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可見，一個人要被國君所用，比登天還難！所有的國人怎麼會知道某人確實賢？“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所有的國人皆曰的可能性極端小，這樣一來，一個大臣就可以永遠當下去了！可見，孟子是在為特權階級謀利益。

3· 儒家“民貴君輕”嗎？

奧本海默(F. Oppenheimer)分析原始國家的統治理論最重要的特徵是“貴族的誇耀”和對下層勞工的輕蔑。帝王為天，臣民為地。《管子·明法解》說：“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君臣之間的尊卑猶如天壤之別。天高地卑歷來被說成是人世間等級制度的法象，儒家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就是說：君臣之別如天地之別。

《禮記·天官書》竟然把“人民、牛馬、奴僕”放在一起，意思是“人民”與“牛馬、奴僕”一樣可自由買賣。《左傳·襄公十三年》雲：“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這“小人”是指束縛於土地上的奴隸式的農夫。

《說文解字》說：臣，象屈服之形。這個字的本義是奴隸，形如僕妾側目而

立，在文獻中多被用來稱役人、奴僕及征伐所獲俘虜。官僚貴族也稱“臣”，表明這批人終歸是帝王的隸僚奴僕。相對於帝王、臣僚，民更為卑賤。《春秋繁露·深察名號》說：“民之號，取之冥也。”《說文解字》亦稱：“民，萌也。”在文獻中可以經常看到“民者，冥也”、“下民難與圖始”等說法。民之稱謂本身就含有冥頑、愚昧、無知，又被稱為小人、野人、愚氓、庶人、黔首、糞食者、蔬食者等。臣、民的稱謂生動形象地向人們昭示了臣民的卑賤地位。

儒家的“民”是指民眾，不是指具體的個人。儒的“重民”和“為人民服務”類似。到政府機關辦事，常聽到“你又不是人民，憑什麼為你服務”。毛澤東還喊“人民萬歲”，不是比儒家更重民嗎？結果呢？不要看儒家的口號，而要看儒家能否實行！孔子的“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孟子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貴君輕”，和當代的“三個代表”都是對專政制度的美化。不管古代的民、還是現代的人民都處於虛幻的位置。表面上看，儒家以愛民為宗，好像維護民眾利益。但愛民有兩種，一種是君本之愛民，一種是人本之愛民。君本之愛民，民不自主，由君為民做主；人本之愛民，民之被愛，原于民之自愛。君本之愛民，君要教化民眾俾之有德；人本之愛民，尊重民之“自我”，民得自由。

儒士從未形成對皇權的抗衡力量，他們從未想要這樣過。他們一直跪在皇帝腳下，懇求皇帝不要過於殘暴。孔子私下裡對學生說，“苛政猛於虎”。若國君行苛政，賽過老虎；還勸此國君行仁政不要吃人，定是緣木求魚。就象一隻自以為很聰明、擁有道德優勢的羊跑到狼面前，請求狼不要吃掉這群羊，大講狼羊的共同利益，他說：如果你吃得太厲害，那麼你也得餓死了，羊猶水也，君猶舟也，羊能載舟，亦能覆舟。當狼吃掉幾隻羊時，他會熟視無睹，他會說這是自然合理的，狼也要生存，況且如果沒有這只披著羊皮的狼管著這群羊，那羊群就要亂套

了。儒家一面勸君行仁政，一面勸民順服，以“三綱”鎮住百姓，將犯上視為首惡。這是驅民於虎口。國不可無君，但必須有限制君權腐敗的辦法。孔子一生，絕無限制君權的方法，甚至以庶人議政為無道。可見，孔夫子是同意綁人投入虎口之中，還叫人不得出聲，儒家真是“為虎作倀”的鬼軍師。

1948年9月胡適在《自由主義》一文中把“民貴君輕”當成民主思想，犯了一個低級錯誤。《長編》中就記載著進士出身的宰相文彥博對皇帝說“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此語道破了皇權政治對民眾的蔑視，“民貴君輕”不過是欺世盜名的理想。

孟子雖有民貴君輕之說，然而君雖輕仍為至尊者；民雖貴卻卑賤。事實上他只把人民看成待牧的羔羊，人民只是被照料的物件，不具有自我管理的能力，不具有獨立自主的尊嚴。“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說人與禽獸之別是很細微的，這些東西是“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儒典《儀禮·喪服傳》雲：“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此處的都邑之士指國人，大夫及學士則是貴族，也就是古義的“君子”。全句的意思是：野人不知尊父母，都邑之士（國人）已知尊父，貴族則知尊祖。那時代，“野人”即“庶民”，“君子”即“國人”。所以孟子認為“庶民”近于禽獸。

儒家的“君子”不僅指道德高尚的人，而且也指身居高位者；而“小人”除了道德缺乏外，也有地位卑賤的意思，自然是沒有什麼權利的。《禮記·樂記》雲：“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樂記》區分禽獸、眾庶、君子三個層次，眾庶知音而不知樂，高於禽獸；君子知樂而且知禮，“禮樂皆得，

謂之有德”，所以，有統治老百姓的資格。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風怎麼吹，草就怎麼搖。“為他人做嫁衣裳”的草民何貴之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君子乃統治者；野人為被治者。民被稱為野人，有什麼“貴”可言？中國從來就沒有過“貴民”，只有“賤民”。在孟子推崇的統治者眼裡，“民”從來就不是人，故有“2足羊”之稱！所以，牧民的真正含義是將“民”像羊一樣喂飽，否則，就會沒有羊肉吃、沒有羊奶喝！人權=生存權，就是儒家思想的現代版本！“民為貴”是指一個政權的“君子”需要足夠數量的“野人”才能“養”好。

孟子說：“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在當時人類社會已發展到擁有“百工”即上百種社會分工的情況下，孟子依然要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誇大為“君子”與“野人”、“大人”與“小人”、“勞心者”與“勞力者”或者說官與民的天壤之別，然後站在官本位的專制強權一邊，為專制君王提供惟我獨尊、惟我正確的理論支援和道德辯護，所表現出的其實是病理學上習慣于單向思維的精神偏執狂的典型症狀。為了進一步證明“勞心者治人”的正當性，

“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的孟子接下來講述了堯、舜、禹的故事：“後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這段話意思是：後稷教百姓稼穡、栽培五穀，五穀熟了，百姓有好日子。人類的傾向是：吃飽穿暖了、住得安逸了，如果沒有教養，就和禽獸差不多。聖人堯帝為此擔憂，便派契做司徒，把綱常倫理教給勞力者：父子間有骨肉之親，君臣間有禮義之道，夫妻間有內外之別，老少間有尊

卑之序，朋友間有誠信之德。堯為得不到舜這樣的人才而憂慮，舜為得不到禹和陶這樣的人才而憂慮。那些憂慮耕種不好百畝田地的人只不過是農夫而已。孟子說“民”離開了聖人的教化就近於野獸，這個把民看作愚昧無知近於野獸的人，他怎麼會重民？

事實上，稍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個人都不難明白，人與禽獸的根本區別在於人獨有精神創造力而禽獸無。每一個正常人都擁有既“勞心”又“勞力”的雙重本能，偏重於腦力勞動或體力勞動，只是人類社會中的一種分工而已。孟子把存在於人與禽獸之間的“勞心”與“勞力”的根本區別，強加給略有職業差別的人本身，犯了最為野蠻邪惡的反人類罪。至於他所謂的“天下之通義”，事實上只限於當時極其狹隘的中原地區。在孟子眼裡，中原之外的不大講究等級差別的人就已經不再是同類而是禽獸，中原地區與周邊地區略有差別的相互交流也被他極其片面地歪曲為“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的單向壓倒。

兩千多年來，正是傳統儒學特別是孔門儒教的狹隘偏執嚴重毒化了中國人的正常人性、敗壞了中國人的正當人權，從而造就了中國人阿 Q 式的老大自尊、自欺欺人的國民劣根性。

在《孟子·滕文公上》中還有兩個非常重要的議題，其一是君王“為民父母”；其二是出身貧賤卻又勤奮學習的“勞心者”可“為王者師”。自以為可以與“為民父母”的君王站在一起專門從事“勞心者治人”的孟子，非但沒有成為“王者師”，反而給包括滕文公在內的諸侯君王留下“迂遠而闊於事情”的書呆子印象。他一生的結局與祖師爺孔子一樣，只是一條總也找不到雇主的“喪家之狗”。孔孟之後的儒教徒，所走出的更是連充當“看家狗”和“喪家狗”的骨氣和膽量都不具備的“寵物狗”即“叭兒狗”的末世路徑。孟子所謂的“勞心者治人”，直

接源於孔子語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種愚民理論把人與人之間包括體力、智力、性別、年齡、出身、財富、權勢、品質等諸多方面事實上的不一致或不平等絕對神聖化，從而為專制君王提供奉天承運、替天行道的絕對理由。

自從中國傳統的孔門儒教強詞奪理地鼓吹“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身份歧視和身份鴻溝之後，中國人在很大程度上被強制性地分割為只允許發展上半身的“勞心者”和只允許發展下半身的“勞力者”的兩個極端。在這種情況下，“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勞心者”，只能自覺自願地充當製造謊言“教化”民眾的耍流氓騙蠢貨的專制幫兇。用自己的勞動成果供養專制皇帝和儒教幫兇的“勞力者”，卻因此喪失了讀書識字和自由言論的基本人權。於是，中國的古文越來越難懂，中國的古字越來越難寫，其目的就是要將勞苦大眾永遠排斥在文化教育之外。最能夠發展既“勞心”又“勞力”的健全人格的科技工作者和工商業者，更被孔孟之徒抹黑為不務正業賺取不義之財的勢利小人。按照“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文化慣性走下來，迄今為止的中國社會，依然是也只能是身居高位的都市“勞心者”製造謊言假話、背井離鄉的鄉村“勞力者”製造偽劣商品的泱泱大國。

與孔門儒教“勞心者治人”的路徑選擇恰恰相反，封建時代的英國世襲貴族及精神貴族，所表現出的卻是“勞心者治官”或者說是依法限制最高權力的路徑選擇。1215年，英國國王約翰在內政外交方面剛愎自用、窮兵黷武，嚴重侵犯了貴族及平民的權利，致使當時的貴族團結起來制定了《大憲章》(Magna Charta)，迫使英王約翰當眾宣誓遵守憲章，並於1215年6月15日在憲章上加蓋英國國璽。貴族會議選出25位代表監視國王，若有違反憲章之事就向他宣戰。隨後又經過反反復復的曲折抗爭，英國於1265年召開人民代表大會，由每縣或每市選派

兩名議員出席，在人類歷史上初步確立了議會制度。1295年，愛德華一世成為國王，國會隨之成為英國政治生活中的經常性制度，人類歷史上較為完善的憲政民主的制度體系由此實現。英國《大憲章》所要保障的不僅是世襲貴族及精神貴族的身份特權，而是正式承認了大同人類中每一位個體都擁有的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人類社會“從身份到契約”的現代文明，就是從這份《大憲章》正式啟動的。

3· 儒家判斷是非對錯不是根據事物本身的性質，而是看你是否維護或服從上級

春秋時期，晉靈公荒淫殘暴，隨意殺人取樂，多次設計殺害正直大臣趙盾，均未達到目的。後來晉靈公被大將趙穿殺死。當時趙盾在晉國邊境，因為留戀故國，又慢慢往回走。晉國太史董狐記錄這件事說：“趙盾弑其君”。趙盾辯護說：“這事兒同我無關啊！”董狐理直氣壯地說：“你身為正卿，逃跑不越過國境，回來又不聲討殺害國君的壞人，不是你弑君是誰？”董狐被孔子稱為秉筆直書亂臣賊子懼的“良史”。

儒家不是要誅暴君嗎？為什麼誅暴君的行為被稱為“弑”呢？弑者，臣殺君並大逆不道也！可見，儒家完全是站在專制君主一邊，袒護暴君啊。孔子對維護暴君的董狐大加讚揚，充分暴露了儒家的忠於獨裁君主的依附本質。

西元前548年，[暴君]齊莊公因與大夫崔杼妻子私通而被崔杼殺害，史官記錄“崔杼弑其君”；崔杼殺史官，史官的兩個弟弟秉承兄業，又記之，亦被殺。最後一個弟弟亦記之，崔杼才被鎮住。很顯然，齊之史官三兄弟用生命的代價維護君主的權威（為了寫貶義詞“弑”），比砍腳的和氏更加忠於主子。遺憾的是，齊太史兄弟連姓名都沒有留下。

為什麼只譴責齊大夫的殘暴？不譴責齊王的荒唐[齊國王很荒唐：吃人、兄妹亂倫]，為什麼對王的過錯就要避諱呢？儒家這種搞法只會造成一邊倒！

孟子總結統治經驗時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孟子認為“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民可以徙。”他只是勸導君主行“仁政”，就是“開明專制”。孟子說，如果君主有大錯，則奉勸，如果反復奉勸無效，則廢黜君主（“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誰來完成“易位”呢？他說：異姓之卿三諫不聽只好失望地離去（“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同姓之卿諫君不聽則可取而代之（《萬章下》）。他要求同姓的大臣來推翻暴君，這顯然是以家天下為基礎。

其實，這依然是空想。因為有大錯的君主是不會聽奉勸的，而廢黜君主必須要有反對無道君王的社會集團存在。而儒家主張君子不黨，那裡會有反君主專制的社會集團？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孟子這段回答實際上是一種“狡智”，他沒有直接回答“臣可弑其君”，而是說桀紂不是君，這就間接地否定“臣可弑其君”，維護了君主神聖不可侵犯的尊嚴。本來，君劃分為仁君、暴君等，桀紂可劃在暴君的範圍，但孟子竟然說桀紂不是君，這不是睜眼說瞎話嗎？亞里斯多德說：凡是君主政體必然都是暴政；而儒家卻拼命地盼望明君，替儒家害羞！難怪秦始皇規定：嚴禁評價君主，議論人君者死罪，皇帝稱一世、二世、三世，直到萬世，而無需

褒貶。孟子為了求生存，竟然連起碼的外延劃分邏輯都不顧，這充分說明了中國人的智慧是一種求生“狡智”，缺乏古希臘、古羅馬思想家大無畏地反抗暴君、否定暴君的大智慧。

孟子的“民貴君輕”論以“誅一夫”的革命論為基礎，試圖制約無道昏君，但這種制約又與“旱幹水溢”的自然災異相鉤連，從而帶上了“天人合一”的色彩。“載舟覆舟”論雖指出了違背民意有政權傾覆的危險，但對民意怎樣去顛覆政權沒作深入的思考，只能限於一種觀念比附的水準。孟子“民為貴”的王道，不過是在“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的利害關係上，進獻給統治者的一種權術罷了。在孔子之前的幾百年，“國人暴動”就推翻了周厲王，難道那時就沒有“臣下易君”的理論？肯定有，只是沒有記錄下來。孟子說誅殺獨夫民賊只是威脅一下國王，他並沒有發展出推翻暴君的學說，跟“國人暴動”的社會實踐比，是一種倒退。

儒家反對“主權在民”原則，主張政治精英壟斷政治權力。儒家直截了當地宣告人與人不平等的，政治是屬於精英的事業，精英實行統治，大眾接受統治。孟子斷言“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是“天下之通義”。聖王的責任是確立“天道”，君子的責任是“替天行道”，即施行仁政。民眾的責任是聽從聖人和君子的教誨、循禮守法、安居樂業；處於一種消極的地位。儒家“上”與“民”的界限是不可逾越的，統治的目的是使民“服”，使民“歸心”。在孔子那裡，是找不到由民參政、多數裁決的“民主”影子。

在儒家學說中，知識精英佔據極為重要的地位。它是聖人和君子的來源，也是為政者的來源。孟子說“惟仁者宜在高位”。儒士就是有賢德的仁者，官員只能由儒士共同體推舉，而無需全體國民選舉。荀子說：“君子者，天地之參也，

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可見，儒家處處美化統治者，貶低民眾，防止民眾分享其特權。

第 16 節 吃人的奴隸孝道

儒家有“百行孝為先”之說，《孝經》說：“孝，德之本也”；任何道德缺陷都可追溯到孝心。違背禮節是因為缺少孝心，不忠心耿耿是因為缺少孝心，不克盡厥職是因為缺少孝心，對朋友不忠誠是因為缺少孝心，臨陣膽怯是因為缺少孝心。這樣，孝的內涵不僅包含了行為的動機，還包含了所有的道德內容。子女對父要孝，臣對君要忠，忠是孝的政治表現；妻對夫要順，順是孝的內在規定。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孟子·離婁上》）。中國人的家庭生活取代了宗教生活，使人們在“天倫之樂”得到精神的滿足。再進一步，如果有條件，有志向，有機會，一個人可以為國盡忠，甚至實現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因此，“孝道”成了人們行為的根本規範。儒家孝道的特點有：

1· 維護家長專制特權孝道

儒教的父家長對其轄制下的家庭成員擁有絕對的控制權。“父”字，據《說文》的解釋：“矩也，家長率教者，從又舉杖”；含有統治和權力的意義。

中國人在家長面前就是奴隸，因為：

①家長可以把子女作為私產贈予或賣掉。早在戰國時代，鬻子的現象便已出現。當時尚無法律依據，卻早為習慣所認可。及至西漢初年，“高祖乃令民得賣子”（《漢書·食貨志》）。《漢書·嚴助傳》亦謂：“民得賣贅子以接衣食”，淳如注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曰贅子，三年不贖，遂為奴婢”。可見法律對

於父母出賣子女的權利的承認，漢時已然。

②家長對子女有生殺大權。古人雲：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這說得正是父親基於父權掌控對子女的殺生大權。魯國宰相叔孫穆子凌駕于魯君之上，其子豎牛和王爭權，國君賜王一個玉環，王未經父親同意不敢戴。豎牛欺騙說：“父親同意你戴了，你就戴上吧！”王戴上後，豎牛對父親說：“王經常去見魯君，還佩戴魯君賜的玉環”。叔孫於是殺了自己的兒子王。易牙殺自己的兒子給國王吃。秦二世矯始皇詔，賜蒙田及太子扶蘇死。扶蘇說：“父賜子死，尚安敢複請”（《史記·李斯列傳》）。

父權何以包含殺生大權？因為中國社會家國同構，國被家化，君被父化，“天子為民父母，為天下王”，皇帝其實就是最大的“家長”，父權包含殺生大權實乃君權至上在家族中的體現。因此難怪“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前一句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唐朝、宋朝規定：若子孫違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毆殺者徒一年半，以刃殺者，徒二年。故殺者，各加一等，……過失殺者，各勿論。而諸奴婢有罪，其主不請官司而殺者，杖一百。無罪而殺者，徒一年。諸主毆部曲至死者，徒一年。故殺者，加一等。其有懲犯，決罰致死及過失殺者，各勿論。兩相比較，毆、殺賤口（奴隸）與毆、殺子孫處罰大體相近，而過失殺者，皆不論罪。可見，中國人在家長面前就是毫無人格尊嚴的奴隸。

元、明、清三代規定，子孫有毆罵不孝的行為，被祖父母殺死，可以免罪，而且即使非理殺死也可以無罪。《續增刑案匯覽》中便有這樣一個案例：李增財因數李枝榮屢次行竊，央同外人幫忙，將李枝榮捆住，用鐵斧背連毆，致傷兩肋。李枝榮喊嚷滾轉。李增財隨即將李枝榮兩腳筋割斷，身死。刑部以李增財因數屢

次行竊，至使割斷腳筋身死，與非理毆殺不同，從寬免議。《刑案匯覽》中的另一則案例是：陳十子令其子陳存根同往地內和糞，陳存根托故不往，訓罵之後，無奈同往，至地仍不工作，怒形於色。陳十子嚷罵，陳存根哭泣不止。陳十子忿怒，頓起殺機，用帶將其勒斃。晉撫以系有心故殺，依父故殺子律六十徒一年。刑部駁以陳存根不聽教令，實屬違犯，應依子違犯教令而父非理毆殺律杖一百。因細微的瑣事而勒斃兒子，但由於可以同違犯教令相聯繫，即使非理毆殺，也僅止於杖一百而了事。由此可見，在實際上，子孫的生殺大權仍然是操之于父祖之手的。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因此法律便明文規定：“父母控子，即照準辦理，不必審訊”（《清律例·刑律·鬥毆下》）。《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載：某甲控告其子不孝，要求官府懲治，官府按其所告查辦，“將其子斷足，遷蜀邊縣，令終身毋得去遷所論之”。父母如果認為子女不孝，可以不需要任何證據而處死（一般都是陵遲）。南朝劉宋的法律，父母告子不孝，欲殺者皆許之。《宋書·何承天傳》謂：“母告子不孝，欲殺者許之”，注雲：“謂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欲殺皆許之”。唐朝河南尹李傑，有寡婦告子不孝，其子不自辯，但雲：“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子，乃對寡婦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道：“子無賴，不順母，寧復悔乎？”旋即處死。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所以，子女不能控告父母（謀反除外）。《唐律》規定：“諸告祖父母、父母者，絞。注曰：謂非緣坐之罪及謀叛以上而故告者。疏議曰：父為子天，有隱無犯，……若有忘情棄禮而故告者，絞。”子孫告父輩等處絞刑；部曲、奴婢告主人，非謀反、叛、逆罪，“皆絞”。可見，部曲奴婢

告主人，同于子孫告父輩，皆在嚴禁之列。

③家長權神聖不可侵犯。“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齊、隋後“不孝”更成了十惡不赦的重罪嚴厲處罰。因為專制等級制度的不可侵犯，侵犯父權就是對禮義（等級制）的嚴重破壞。孟子說：“無禮義則上下亂。”破壞禮義更是導致天下大亂，故國法難容。

首先，父母人格不可侵犯：常人相罵並不為罪，而子孫罵父母、祖父母卻是犯罪，按唐、宋、明、清法律當處絞刑。其次是父母身體不可侵犯；一旦冒犯，法律不究子孫主觀是否有過錯，一律殺無赦（極個別得到皇帝憐憫例外）。例如：子孫毆父母（不論是否有傷及傷勢輕重），斬；誤傷、過失致父母死，斬；違犯教令，以至父母報忿輕生者，絞。例如，《刑案匯覽》有這樣一個案例：“龔奴才因妻與人通，爭吵鬥毆，以剪刀向戳，陳氏門避，適龔父加紅趕來勸解，收手不及，誤將龔加紅左肋戳傷。”結果依子毆父母律擬斬立決。陳汶選令子陳自康取茶，因茶不熱，傾潑地上，並當即斥罵欲毆，自康畏懼外逃，汶選持棍趕毆，滑跌於被茶潑濕之處，磕傷後腦殞命。自康因違犯教令致父死亡，處絞刑。如果父母因傷致死，又罪加一等；元、明、清三代則罪加至凌遲；這是一種最殘酷的極刑，非謀反惡逆不用，致父母于死而處以凌遲，可見法律對於逆倫罪之重視。

④懲罰子女是家長的特權。梁朝的大司馬王僧辯的母親治家極嚴，僧辯已四十餘，已為三千人將，母稍不如意，猶捶撻之。孝子受打不但不逃避，且受之怡然，雖遍流血，亦“不敢疾怨”，仍得顏色婉愉，“起敬起孝”。這種的“家規”、“家教”貫徹了，家長的尊嚴樹立了，子女卻喪失了人格和尊嚴。中國人身上的奴性，中國人對尊長的屈從，主要根源於此。

2·沒有個人自由的孝道

⑤ “孝”要求逆來順受。孔子用“無違”概括了孝悌的實質，“無違”是指不要違背君父官長的意志；子女的意志要以父母的意志為轉移，以服從家長為天職。子女連最起碼的人權都沒有，只剩下服從的義務。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禮記·內則》）。《禮記·中庸》說：“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即繼承先祖遺志、事功和經驗。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勿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三年是多年之意，即父死多年也不改變其生前的意志，這才孝。殺人犯的兒子，該怎麼遵守父親的為人處世原則？小偷的兒子該如何繼承父志？怪不得中國的殘忍罪惡風俗能夠存在那麼漫長的時間，都是因為儒家思想所致。反人性的孔子，鼓吹年齡的傲慢；好像只要是長輩，就一定比晚輩正確？就一定比晚輩聰明？

《禮記》雲：“父母有過，下氣怡然。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複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怒，起敬起孝。”

“父母之命”具有絕對的權威。孝不僅指在生活上贍養父母，還要無條件地順從父母。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意為侍奉父母，如果他們有不對的地方得輕柔婉轉地勸止，看到自己的心意沒有被聽從，仍然恭敬不觸犯他，辛勞而不怨恨；實在是勸告無效，也只能“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司馬光《家範》）。對家長的決定可以提意見，但在家長沒有採納你意見前，你必須“不違”且“不怨”的執行家長的決定，始終與家長[核心]保持一致，不得私下散佈意見，因為“父子相隱”必須執行。正如林彪所說：“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

⑥**子女沒有個人自由**。《禮記》規定：“凡為人子之禮，冬而夏清，昏定而晨省；…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曲禮上》）。子曰：“畏大人”，君子要畏懼、服從大人的獨裁。大人就是家長，子女在家裡要服從家長的獨裁，是沒有自主權的。“將仲子兮，無逾我裡，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詩經·鄭風·將仲子》）。“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典型包辦婚姻！《弟子規》、《女兒經》、《孝女經》等，把人們的言行舉止和許多生活細節都規範化了。正如林語堂先生所指出的：中國的家庭制度“使年輕人失去了事業心、膽量與獨創精神”，它“恰好是個人主義的反動”（林語堂：《中國人》，學林出版社，第182頁）。

儒家認為不僅要求子女對父母絕對服從，還要求子女不得離開父母，要與父母永遠住在一起，直到為父母送終。“父母在，不遠遊。”為了隨時伺候父母，子女還不能出門遠遊。四世同堂、五世同堂是中國人追求的家庭理想，是家庭美滿的象徵。一個人成年後離開父母自己獨居，在中國人看來這等於是拋棄父母，是不孝的行為，是沒良心的表現。不求仕會被指責：“家窮親老，不為祿仕，二不孝也”（孫奭《孟子注疏·離婁上》）；要為朋友報仇，有“父母在，不許友以死”（《禮記·曲禮》）。**孝道成了明哲保身的藉口**。“父母全而生之，自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禮記·祭義》）。於是儒家把任何有可能傷害自己身體的活動、言行都納入禁止之列，計有“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不登危”（《禮記·曲禮上》），還特地說明，這並非怯懦，而是“懼辱親也”。**這**表明個人只是父母、主要是父親的私產，而沒有任何一點屬於

自己的東西。

3· 培育心奴的孝道

⑦家長有絕對財產權。儒教規定，父母在，子女的經濟不能獨立，子女必須將個人的所得悉數交給父母，由父母支配，否則，是不孝的行為。“父母在，…不敢私其財”（《禮記·坊記》）。“父母在，不敢私其身，不敢有其財”。《內則》更規定：“子為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不敢假私，不敢私與”。宋代司馬光的《涑水家議》中說：“凡為人子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收入，盡歸之父母，當用者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在中國傳統社會裡，家長對家族財產具有絕對的財產權，子女最多享有使用權，甚至對子孫擅自處分家財究以刑事責任。唐律規定：“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藉者，徒三年”；“諸同居卑幼私輒用財產者，十匹答十，十匹加一等，罪子杖一百。即同居應分不均平者，計所侵坐贓論，減三等。”祖父母、父母、甚至曾高祖在，子孫別立戶籍，徒刑三年；卑幼私輒用當家財物者，十匹答十，十匹加一等罪，直到杖打一百。清朝的《清律輯注》規定：“一戶之內，所有田糧，家長主之；所有錢財，家長專之。”誠然，不准子女私貨、私蓄、私假、私與，有利於家庭的穩定，但這樣一來，子女確成了家長不折不扣的奴隸！

⑧家長對子女有絕對的思想統治權。和父母住在一起，將經濟權悉歸父母還不夠，做子女的還要從內心依賴父母，在父母面前永遠像個孩子才算真正的孝順。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舜是最孝順的人了，五十歲還依戀父母）。沒有自主權，主體性得不到發展，便只能永遠作個小孩子，不會成熟。自古以來，“三禮”〔《儀禮》、《周禮》、《禮記》〕、《孝經》、《女兒經》、《女論語》以及歷代的“家規”、“家訓”、“家禮”、“家範”等等，便成為了家長們進行思

想統治的教材和子女們行為規範的準則。按照這些規範，子女只能對父母百依百順，唯命是從，乃至於“一舉足不敢忘父母，……出言不敢忘父母”。

儒家文化之可惡，是以消滅自由為己任，只有順從馴服而無辨識批判。中國人幾千年來，舉凡婚姻、學業、事業都由家長作主。儒家訓練人做乖寶寶，要聽話，從小就剝奪了個人的自主權。在沒有問過父母之前就作決定，很可能會被父母指責為背叛祖訓、大逆不道！

⑨中國人是天生的“債務奴隸”。《孝經》開篇就引孔子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由此得出子女是父母之遺體，“父母的恩情是永遠也還不完的”，父母是子女的總債主。哪吒“剔骨還肉”給父母，表明他身上的一切都屬於父母，說明中國人是天生的欠父母的“債務奴隸”。債務奴隸必須把自己的一切的一切獻給債權奴隸主！

債權奴隸主——指父母家長，引申為父母官——王、皇帝；債務奴隸——指子女，引申為百姓。把一切獻給父母，甚至割自己身上的肉給父母吃——被稱為孝；把一切獻給君王，甚至割自己身上的肉給君王吃（殺身成仁）——被稱為忠。盧梭說：“我們所有的智慧，都脫不了奴隸的偏見。我們所有的習慣都在奴役我們、束縛我們、壓制我們。文明人從生到死都脫不了奴隸的羈絆”。用來形容中國社會再恰當不過了。如果說梭倫的改革的消除了雅典人淪為債務奴隸的危險，那麼孔子的說教則使中國人走上了一條永恆的自我奴役之路。

儒教對作兒女的，列舉了一大堆義務；可對父母的義務，卻隻字不提。中國人傳統上普遍的缺乏對下一代的尊重。西方人是拿孩子當人在看待，中國人是拿孩子當動物在看待。中國大陸現在普遍的政策性墮胎、吃嬰孩的肉也是這種傳統思想的遺留。

在世界其他地方，父母的義務是必不可少的。使徒保羅道出了理想家庭的四大支柱：“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不可苦待她們”；“你們作妻子的，當順從你們的丈夫，這在主裡面是相宜的”；“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恐怕他們失了志氣”；“你們作女兒的，要凡事聽從父母，因為這是主所喜悅的”。“你們做兒女的要在主裡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以6:1）。子女聽從父母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必須“在主裡”聽從父母即首先得講主的正義。聖經強調：“你當崇敬神高於崇敬你的父母”，這句意思當你的父母不正確甚至是邪惡的時候，你當尊崇上帝的真理旨意。

⑩心奴。伯奇是周代大夫尹吉甫的兒子，他父母將他逐出家門。他欣然領命，在野外以木荷為衣，采野花而食，後投水自殺。後人極力讚揚他的行為是“勇於從而順令”的楷模。

申生是春秋時代晉獻公的太子。獻公因聽信驪姬的讒言，便要殺申生；申生不做任何辯解和抗拒，隨即自殺。他的行為被儒家稱道為“恭”（即心奴），即恭順了家長的命令。

孔子所定“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學而》）中的“三年”明顯過長了，當時人的平均壽命只有四十歲左右，人生能有幾個三年？把大量時間用在守孝上，還怎麼經營自己的事情？中國人並沒有改正孔子的過激之舉，反而在激進的路上越走越遠。

梁代居然出現了“嘗糞心憂”的事情：庾黔婁的父親庾易病重，“醫雲：‘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痢，黔婁輒取嘗之”（《梁書·庾黔婁傳》）。孝敬居然到了嘗父親糞便的地步，哀哉！《二十四孝》中的“恣蚊飽血”：“晉吳猛，年八歲，事親至孝。家貧，榻無帷帳，每夏夜，蚊多攢膚。恣渠膏血之飽，雖多，

不驅之，恐去己而噬其親也。愛親之心至矣”。《二十四孝》表彰的王祥，後母虐待他甚至要殺死他，他反而“跪前請死。典型的奴隸啊！中國人認為，“偏袒妻兒”是一種不孝之舉。《孝經》敕令章中曾把它與賭博並列。《二十四孝圖》中有個“埋兒奉母”的故事。晉代的郭巨，原本家道殷實。父親死後，他把家產分作兩份，給了兩個弟弟，自己獨取母親供養，對母親極孝。後家境逐漸貧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擔心，養這個孩子，必然影響供養母親，遂和妻子商議：“兒子可以再育，母親死了不能復活，不如埋掉兒子，節省些糧食供養母親。”當他們挖坑時，在地下二尺處忽見一壇黃金，上書“天賜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奪”。夫妻得到黃金，回家孝敬母親，並得以兼養孩子。在文明社會看來，活埋三歲小孩以便養活其祖母的行為，是不能逃脫殺人罪的。

還有“曹娥投江尋父屍”等更讓人不忍卒讀的故事。曹娥之父盱，因龍舟競渡溺于江中，屍不得見，娥投江自溺求父屍，數日後女屍抱父屍浮起于滔滔江面，曹娥遂以孝女聞名。女兒投江尋父屍父女雙亡已是很極端了，可是這還不算，岸上竟然還有有人說風涼話的，說一個年青女子抱著個老頭兒，成何體統？烏乎！於是女屍與父屍又複沉于水，等再浮起時，已是女背負父屍了！一部《孝經》把中國人愚昧、奴性表現得淋漓盡致。

為了讓父母舒服一點，兒女的任何犧牲都是應當的，才有易子而食。中國人相信，父母的痼疾、只要吃了子女的肉，就有可能治癒。這些肉應該做好後、讓父母無意中吃下。即使不敢肯定會治癒，中國人認為總有可能。清代北京《邸報》上經常出現這類事例。

為了改善父母的生活，女兒可以賣作妾、作奴、甚至作娼妓…。父母死後的屍骨比自己的一生幸福重要：好多人為了給父親或母親置辦體面的葬禮，賣掉了

最後一塊田，甚至賣掉自己來買棺材。這種行為是一種社會性的錯誤。

中國文化中，孩子沒有獨立的人格，被當做種的延續的工具來“喜愛”的。中國的文化以老者為本位，父慈只是手段，子孝才是目的。生兒育女不是為了子女本身的利益，而是為了孝敬上一代，使上一代的精神和肉體永遠延續下去。“愛子”與“殺子”的關係正如禮與法、德與刑的關係，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製造上一代的複製品，扼殺下一代的獨立性。“孝”的觀念的灌輸，導致心奴和變態的人格。

1918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狂人日記》，指斥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是“吃人”的歷史，而社會上層人物所津津樂道的“仁義道德”是“吃人”的道德。那些以“仁義道德”相標榜的人不僅自己“吃人”，同時用“仁義道德”毒害心性正常的人，而受了毒害的人，又爭先恐後地幫著他們去吃沒有受過毒害的人。傅斯年讀後大加讚賞，他多次寫信給魯迅，為《狂人日記》叫好。當時有人擔心破除綱常名教之後，沒了大家共同遵守的社會信條，公眾秩序會發生紊亂。傅斯年說，要保持社會秩序，當然離不了公共的信條，但是，對於社會上的信條，“要分個是非，辨別他的性質，考察他的效果”。不可一味盲從。他提出了辨別信條是非的三條標準：1)看它是否合於“人情之自然”。2)看它“對於社會或個人”是否有益。3)看它是否“合於現日的社會情形”。那些“戕賊人性以為仁義”的綱常名教，只能說是桎梏，不能當作信條。傅斯年認為當時社會上流行的“信條”，“一百件中，就有九十九件是死靈魂、泥菩薩。”如福建延平清初的名儒李光地定下的家法，要求李氏未婚女子為未婚夫殉節，“若是不肯，別人當助她死”，那裡就流行的女子為未婚夫殉節的所謂“信條”，這就是殺人的信條，連地獄都沒有它殘酷！傅斯年認為中國的家庭是“萬惡之源”，它最大的“惡跡”

有兩條：其一是摧殘人的“個性”。其二是給人以沉重的負擔。

魯迅在《老調子已經唱完》中說“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和鮮血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讚中國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所以他們愈讚美，我們中國將來的苦痛就愈深！”

1925年，魯迅勸中國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當時沒有引起多大的反對，現在則成了魯迅的一大罪狀。當代中國人對魯迅的垢病，只能說明中國人的總體覺悟又退回到五四以前的愚昧狀態中，真是可悲！

4· 孝道的目的是培養國奴

儒家提倡“孝”，是為了天子的永久統治。有子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者也，其為仁之本與”！這種只知道對父母兄長唯唯諾諾、沒有任何自己意志的“孝子”自然是國家的好奴隸。在家裡當好了父母的奴隸，出來做事就是位好的國家奴隸！

從這個邏輯出發，中國人創立了幼稚的社會賞罰機制，那就是，把官位作為“德行”的報答。《孝經外傳》記載的第一個典型人物是大舜。據說舜的父母兄弟對他都不好，合謀要殺死他，可他還是一如既往地孝順父母。堯帝聽說了，就把兩個女兒嫁給他，後來又把帝位讓給了他。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孝子就得到了最豐厚的獎賞——帝位。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稱舜“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懈”，“舜年二十以孝聞。”顧頡剛發現：“舜”在孔子時，只是一個無為而治的聖君，到《堯典》就成了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至孟子時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模範了。可見，舜為孝子原來是戰國時期的古人附會。

《孝經》斷定：“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這表明了“孝”

的政治指向。孔子把孝悌與政治劃了等號：“《書》雲：‘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這說明孔子一開始就把宣揚孝道看成了政治行為。《孝經》的絕大多數章節，不是講“事於親”，而是講“事於君”的。在不足二千的文字中，“治”字出現了 11 次，“孝治”成為貫穿全書的根本宗旨。以孝勸忠，以孝治天下，從而達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這是統治者宣揚孝道的唯一目的。這種政治的目的不是使全國的人都變成一家人一樣的互相親愛，而是使人民都變成奴隸一般的馴順。把防止“犯上作亂”的責任，通過家庭、通過族姓關係，叫為人父的、為人夫的，為人族長、家長的去分別承擔。而且，家族政治有一種聯帶責任：在有所勸的場合，就是“一人成佛，雞犬皆仙”，“滿門有慶”；在有所懲的場合，就是一人犯法，九族株連；其結果，父勸其子，妻勵其夫，無非是要大家安於現狀，在現狀中求“長進”，求安富尊榮。而天下就因此“太平”了。

《禮記》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由於“心”在身體器官中具有更為重要的功能，所以就“推”出“君高於臣”的結論。儒家宣揚把一切獻給君主，必要時為君主“殺身成仁”。《禮記·文王世子》記錄：“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抗世子之法于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於其身以善其君乎？”這是臣為君死，以後發展成“三綱五常”。《禮記》說，孝敬父母是為了孝敬父母官、孝敬天子，因為“天子為民父母”（《書經·洪範》）；只有在家裡養成不違背父兄的習慣，才不會違背君主官長的命令。由此形成“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的政治關係（《春秋左氏傳·襄公十四年》）。

《孝經》中曾參問孔子：“兒女都聽從父母的指令，就是孝嗎？”孔子道：“這是什麼話？父母有敢於跟自己爭論的子女，他們就不會陷於不義，所以父母有不對的言行，就應該與之爭論。只聽從父母的指命，又怎能就算是孝？”可見，孔夫子要求晚輩在原則上要服從長輩，但如果長輩本身的思想行為不符合“義”的要求，就要求子女不要服從。這個“義”就是統治者強加於人的壓迫秩序。所以孔夫子要求對長輩的服從實際上就是體現了對統治秩序的服從。其目的就是為了扼殺一切新生的進步力量，以維護僵化的專制體制。

《孟子·梁惠王上》雲：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司馬光十分推崇《孝經》，認為“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他說：“父之命，子不敢違；君之言，臣不敢違。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之於君亦然。故違君之言，臣不順也；逆父之命，子不孝也。不順不孝者，人得而刑之；順且孝者，人得而賞之。違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順天之命者，天得而賞之。

中國從漢代起就搞以孝選官、以孝求忠、以孝訓民。所以，千奇百怪的“孝悌”層出不窮。古制父母死後守孝三年，可是東漢人趙宣一連二十多年都住在墓道裡，因此成了著名孝子，名氣很大，被舉為孝廉。同樣是東漢人許武，自己做了官，為了使兩個弟弟也取得做官資格，在分家的時候故意欺負兩個弟弟，把家產都據為己有。而弟弟們尊重兄長，毫無怨言，成了“悌”的典型，名聲遠揚，也被舉為孝廉。之後，許武才公佈了自己私藏的分家文書，說明是為了使弟弟們成名才這樣做的，結果許武也受到了讚揚。原因是他為了弟弟們的前途，自己甘願被人誤解，承擔罵名，於是他也被舉為孝廉，一門三孝廉，美名遍天下。

歷代統治者都對孝道大加推崇。唐玄宗曾親自為《孝經》作注，《孝經》也

是《十三經注疏》中唯一由皇帝注釋的儒家經典。朱熹說：“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滿清的康熙比其它的帝王更賣力地提倡孝道，為什麼？滿清只有三百萬人，而漢人有四萬萬。怎樣讓這些人都做順民？辦法有一個，就是推行儒家的孝治方案。如果人人都能在家做孝子了，那就不用擔心漢人會反清復明瞭。

儒家也提出“老有所養”，但從來沒有給老人設計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養老保障方案。不是他們沒有這個能力，而是他們的著眼點根本就不在老年人的福祉上，他們關心的只是對人民的統治！他們將非血緣的君臣關係硬說成是父子關係，是為了掩蓋壓迫的實質。事長以孝，就能事上以忠。儒教的家長視子女為私有財產，家長可以自己的自由意志來踐踏子女的人權；這種不合人道、非理性、反道德與反人權的孝道觀念，正好成為統治者統治人民的絕對模式。“天無二日，民無二主，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家長制管理是中國基本模式。**

1917年吳虞在《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中說：“詳考孔子學說，既以孝為百行之本，故其立教，莫不以孝為起點，所以‘教’字從孝。居住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無信，不孝也；戰陣無勇，不孝也。凡人未仕在家，則以事親為孝；出仕在朝，則以事君為孝。能事親、事君，乃可謂之為能立身，然後可以揚名於世。由事父推之事君事長，皆能忠順，則既可揚名，又可保持祿位。……家族制度與君主政體遂相依附而不可離”。總之，宣揚“孝”不是儒家的本義，只是維護君尊臣卑的權術而已。

5·視生殖為最高美德的孝道

儒教不讓人崇拜上帝，人死後的唯一寄託就是香火。孔子反復地向人們強調：

“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即為人之子的最大義務莫過於孝，為孝之道的最大責任莫過於把祖宗的香火一代一代續過來、傳下去！男婚女嫁是“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禮記·昏義》）。

前幾年，山東招遠市的趙玉令殺死了回國探親的博士女兒和博士女婿，原因是女兒不肯承擔傻子弟弟買賣婚姻所需要巨大開銷，斷了趙家的香火，所以採取了恐怖主義行動。

為了使祖先崇拜不朽，生孩子、生男孩變成了儒教的頭等大事。中國人對男系血統的重視在全世界第一的，達到了恐怖的程度。於是，儒教規定了一夫多妻制，男人的妻妾數目是不受限制的，成了一夫萬妻制。

儒家的孝道中，最重要的就是孟子說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漢人的人生最高目的和最重要的內就是繁殖下一代。獨身主義是最大之不孝，牛頓、康得不孝之至矣。十二生肖記年日，為首的是鼠而不是虎，漢人希望象老鼠一樣繁殖力強大。因此，中國的男孩子必須儘早成婚。36歲做祖父，在傳統的中國司空見慣。孝道要求：無論有沒有養活孩子的條件，都必須生養；它導致了早婚與人口氾濫，使人們倍受貧困的煎熬。

與之相反，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強調人口穩定而不是人口增長。按照柏拉圖的設想，一個理想的城邦國家所能擁有的家庭數目最多不得超過 5040 戶。

6· 違背社會正義、破壞社會公德的孝道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躬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孔子為了維護孝道主張相互包庇做偽證，並把說謊稱為正直，這是公然地踐踏社會公德（葉公之德）。孟子鼓吹做孝子就必須以舜為榜樣，舜任命不仁不義的弟弟做大官、帶著犯了殺人罪的

父親逃脫法律的懲處卻被孟子稱為大孝子。

《二十四孝圖》講到東漢的一位少年，六歲時隨父親去拜訪一位朋友。他發現，那人家裡的桔子特別好吃，於是，就偷偷地塞了兩個桔子到袖筒裡。在他告辭鞠躬時，桔子掉了下來，氣氛變得十分尷尬。可這位少年非常鎮靜，他馬上跪在主人面前，說了兩句令其名聲留傳千古的話：“家母喜歡吃桔子，我是拿給她的。”他因偷而成了典型的孝子。

7· 鋪張浪費、形式主義的孝道

一個人，不管他生前是個紳士還是個流氓，一旦死去，就成了神。他的兄弟、兒子、孫子、兒媳、以及親戚們都要向他磕頭，作痛哭狀。弔孝時磕頭、奠禮時磕頭、出殯時磕頭……一場喪禮下來，要磕幾個至幾十個頭不等。孝子要繼續崇拜並供養他們的鬼魂。禮教規定要為他們各守三年的喪——不做事、不會客、不赴宴、不作樂、不與妻妾同房——每天守在墳前上香焚紙、哭泣膜拜。人的一要用六年的時間服喪，不事生產，給全家帶來了不必要的負擔。但中國人對此極為讚賞，完全不考慮後果。

孔子說：“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中庸 18 章）。宰予提出了對三年守孝的異議，被孔子大罵了一頓。宰予的觀點是：三年守孝，禮樂必壞，農事必壞，阻礙了發展。孔子卻說，父母生養孩子，孩子三年才走出父母懷抱，父母死後三年，君子都不會吃飯香甜心中快樂；宰予真不仁義！孔子口頭上講“三年之喪”，當他母親死去不久，他還在披麻帶孝時，一聽到季氏舉辦宴會，便立刻趕去赴宴，結果被陽貨趕出，這就是聖人的孝道。三年之喪只是說給別人聽的，哪裡是他自己信奉的？

孔子為什麼要宣揚三年之喪呢？首先可沽名釣譽，突出孔丘是個大孝子，博

得別人的尊重，他可拿這一套來批評人。其次，可發展儒家。所謂的儒，原先都是通過掌握婚喪禮儀來謀取衣食，如果薄葬短守，儒的生存就會困難。而厚葬長守，有利於儒的生存與發展。孔子鼓吹厚葬，毀滅了再生產的物資基礎。

孟子說：“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為送死可以當大事（重喪禮甚於重養老）。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孝順的人決不會愛惜天下的財力而在父母的葬禮上節省），及至葬，四方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悅”（到了安葬那天，四面八方的人都來觀看，孝子神色的悲戚，哭泣的哀傷，使弔喪的人感到很滿意）。

孟軻暴露了為了達到自己祖先崇拜的宗教目的，而不惜犧牲親情、真孝的醜惡面目。儒教片面強調葬禮的重要性，使得中國人愛搞形式主義、擅長“演戲”。

“儒”的本意原是一種職業，就是周朝時喪禮中的司儀。儒生們為喪禮制定了繁雜、等級分明的禮儀。這種禮儀別說做，就是照著說，就是一件累人的事情，在《禮記》中有詳細記載。——鋪好束帶、單被時，孝子要跳腳頓足；鋪好斂被時，孝子要跳腳頓足；鋪好衣服時，孝子要跳腳頓足；遷屍時，孝子要跳腳頓足；束斂衣服時，孝子要跳腳頓足；束斂被子時，孝子要跳腳頓足；束斂束帶、單被時，孝子要跳腳頓足。每當移動屍體，抬舉棺柩時，就要哭泣，跳腳頓足無數次。……

這些只是儒較繁瑣禮儀之一斑。在儒教的葬禮中，哭泣不是感情的流露，而是一道程式，一種儀式，一種表演。在儒徒看來，所有的儀式都是你孝心的具體量化。

孝為“百德之首”，而“德”又是中國專制王朝中選拔、考察官吏的首選的、也是主要的考查內容。“盡孝”直接關係到你仕途進退、休戚榮辱。守喪 20 年、生了 5 個孩子的趙宣，被東漢的宰相陳蕃殺掉了。北海（山東昌樂）國相（封國

行政首長)孔融，竟把一個他認為在父親墓前哭聲不悲的人處斬，最後使“孝心”流為嘩眾取寵的形式。

清末小皇帝同治的師傅李鴻藻，父死當然要除缺回籍服喪，但小皇帝只喜歡聽他的課。慈禧太后和恭親王，雖然以聖旨奪志，要他移孝作忠，照旗人規矩只守三月之喪，趕快銷假授課。但李鴻藻懍於禮教令譽，竟堅不承旨，照樣在家直到三年期滿。後來翁同龢也是依樣辦理。一點通權達變的餘地都沒有，陷入教條主義的泥潭。

8·沒有真愛的“孝”道

“養兒防老，積穀防饑”，養兒等同于養老的投資，父母之愛源於一己之私。中國人重男輕女，因為生女不能給自己養老送終，是沒有價值的投資。儒家社會扶強不扶弱，棄殺死女嬰的事時常發生。今天，重男輕女在農村比任何時代都突出，在湖北紅安紅四方面軍的故都七裡坪看到的標語盡是：“溺殺女嬰是種犯罪行為，嚴禁B超查性別”。

儒教不為女兒說話，全為了兒子。生為男身，就被家裡奉為至寶，生為女身，則成了家中可怕的累贅，就算不一定被溺死，也一定會終生飽受歧視。中國人認為，女人是傳宗接代的工具，也是發洩性欲的工具。孔子沒有說丈夫應該對妻子如何，或妻子應怎樣對待丈夫。儒教只是要求男人應該依從父母，同時也強迫妻子這樣做。妻子與父母產生矛盾時，因為妻子次要、卑賤，就應該讓步、屈服。今天甚至出現妻與公婆矛盾而殺妻全家的惡劣案子。

中國人對於不是自己親生的子女，往往比親生子女感情淡薄，而且極力防止養子女知道自己的真實身世，因為他覺得這種投資不保險；但西方人收養別人的子女，卻全心全意地當作自己的親生子女傾心疼愛，無私奉獻。哪怕是異族的孩

子。

中國人很難理解西方人為什麼費力不討好地收養其它種族的孩子，而且人家不怕養子女知道自己的親生父母及其住址。他們不擔心養子女背棄自己去找親生父母，因為他們完全是無私的付出，是真愛，不像絕大多數中國人完全是把生養子女當作是一種養老的投資。

西方人的愛做到了“為愛而愛”。西元前 6 世紀的畢達哥拉斯認為：對兒女的愛是不能指望有回報的，但做父親的應當努力用自己的言行去獲得子女由衷的敬愛。父母的愛是神聖的，作子女的應當珍惜。子女應是父母的朋友，兄弟姐妹之間也應該彼此互敬互愛。西方人把子女作為有尊嚴的獨立個人平等對待並真心疼愛，長大以後則尊重其意願任其自由發展，不圖回報。所以，西方人的孝敬父母是基於真愛。中國人由於一開始的父愛母愛就是出於一種隱含勢利的養老投資，所以其衍生出來的“孝道”本質上也只是一種還債性質的行為。

儒教將“孝”納入了功利的軌道，從而使“孝”失去了存在的根基，淪為祖先崇拜的工具。儒教將自己寄生在親情之上，實質上卻是在傷害、吞噬著人的親情。1877 年，在上海召開的傳教士會議上，基督徒耶茨（Yates）博士在《祖先崇拜》的文中說：“‘孝’這個詞，極易產生誤導。在我們所瞭解的所有民族中，中國人的子孫是最不孝順的，他們對父母不順從，固執地我行我素，他們一旦知道了自己的需要，就開始固執己見。”

中國的城鄉中大街小巷，到處都可以看到靠揀垃圾為生的老年人，可以說，中國人才是世界上最沒有孝心的民族。中國人由於背負著還債心理，儘管婆媳關係緊張，也要礙著面子湊合著過，導致中國人在“孝”的形式下變相地虐待父母；或是在父母在世時對其刻薄寡恩，父母死了之後又來隆重地“厚葬”，以形式主

義標榜自己“孝順”。這是中國人的悲哀。

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說：父強調對子有“恩”，父強調子女要“孝”，只是“長者本位和利己思想”和佔有欲的思想在作怪，是“父”的“特權思想”在作怪！父母之生育兒女，大部分不過由於貪戀床第之歡而已，兒女不過是父母淫欲的副產品。父對子沒有恩，子對父也無恩可報；父對子沒有債，子對父也無債可還。父與子是平等的朋友關係，而不是其它！子不是父的私有物，子雖小，但也有他的人權，他也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個人。

魯迅說：孩子的心是發乎天性的，對老人都是“愛”和“敬”的。沒有受“孝”的教育的孩子倒對老人“愛”和“敬”，而受過“孝”的教育的大人，倒做出了對老人“不孝”“不敬”的醜惡之事。“孝”的教育可以休矣！讓我們用“愛”和“敬”來代替“孝”，讓我們用“義務”和“責任”來代替“孝”（父有養大子的義務和責任，子亦有在父年老時贍養的義務和責任），這才是我們解決現實“養老”問題的唯一正解。

第 17 節 儒家扼殺人權

1. 君權扼殺人權 偏愛扼殺兼愛

孟子說：“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孟子攻擊楊墨是“禽獸”，暗含著消滅對手、不共戴天之意。孟子一副“若自由寧願死”的態度：頭上一定要有個天子管著，沒這個天子，那還叫什麼世道！按孟子的邏輯：無君是禽獸，我等追求人權共和之輩今日全淪為禽獸矣！

楊朱派主張個人主義，屬私德。他認為“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也”；“殺一人以取天下而不為”。為我學說的核心是“貴生”，珍惜生命，“重己”，自尊自重，反對別人對自己的侵奪，也反對侵奪別人。“為我”學說極一時之盛，

以至“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沒有儒家的份。後世儒家完全托了帝王的福才霸佔了知識界幾千年的話語權。

楊子為什麼敢於公開宣傳“為我”、“重己”的主張呢？區區一毛在他的心目中真的比自己身前身後的名譽還重要嗎？《列子·楊朱篇》中有一段假託孟孫陽與禽子問答闡述楊子“一毛論”的話：孟孫陽說：“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讓別人摸一摸自己的肌膚就能獲得萬金，禽子的回答是“為之”。孟孫陽又問：“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從你身上取下一節肢體，就把一個國家給你承包，你幹不幹呢？“禽子默然有間”。是得好好想一想，若因這一“失節”弄丟了小命，那國家對自己又有什麼意義呢？

孟孫陽總結道：“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多麼深刻的見解呀！如果每一個人都知道維護自己的利益了，別人也就不致去侵犯他的利益。“人人不拔一毛，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一個人不過是人類的一分子，就可輕之乎？如被活活餓死的幼女李思怡、活活被打死的孫志剛……。當一個人分明無罪卻又遭受苦難時，任何有正義感的人都有充分的理由認為自己受到了威脅。楊朱在 2 千多年前就看到了這種威脅，認識到了輕視“一毛”的必然後果。中國許多人物因為意識不到這種威脅，或隨波逐流、或為王前驅、或落井下石，“先天子之憂而憂”、“毀”人不倦。到頭來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典型是儒家。

儒家的“禮”，本質上就是維護統治者欲望的滿足，剝奪被統治者欲望的滿足。最典型的是孟子見梁惠王的話。孟子告訴梁惠王說：作為統治者，你不能說什麼“利”，因為你一說“利”，天下人就都會說“利”了。天下人一旦各利其

利，“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也”，你還到哪裡去得你的好處呢？作為國君，只應該大談奉獻，大談“仁義”，這樣全國人民都只知“仁義”了，只知奉獻了，你國君才有大撈一票的機會啊！

面對這樣的天下，楊子公開高舉“為我”的旗幟，明卻地指出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不可轉讓的、不損害他人的“自私自利”權。大聲疾呼“為我”、“重己”，不要把自己這一毛奉獻給以天下主子自居的君主。由此觀之，楊子的“為我”論實在是君主專制的天敵。“一毛何可拔，天賦此人權。代代非楊子，愁看帝祚延。”

党治國先生說：“楊朱是中國古代徹底的人權思想家。他的‘人人不損一毫’表現了中國古代徹底的人權思想。人人不‘利天下’更加是一種了不起的卓識。因為所有專制統治者無不打著‘利天下’的旗號，拿著‘利天下’的救世方案欺世盜名，對天下實行獨裁統治。……其結果無不是禍害天下，陷天下於洪水猛獸。正因為排斥了楊朱的思想，中國才有世界史上最漫長的皇權專制統治”（《江嬰詩百首·江詩黨評·詩魂》党治國）。

我認為楊朱的思想含有一些個人主義因素和人權因數，和西方的個人主義和人權學說不能相提並論。由於缺乏神愛和博愛，楊朱學說最後演變成了道家的烏龜活命學或苟且偷生學。而西方個人主義迅速形成了自由主義體系，個人主義是對抗專制的思想武器。楊朱“為我”、莊子的逍遊和“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的自由主義精神是截然不同的，無法抵抗專制！

愛默生說：“民主的根子與種子就是‘捍衛你自己’這個學說”。否定個人私利只會有助於一小撮人的私利膨脹，每個人自我意識的發展都是對獨裁者自大狂的糾正，個人從獨裁者那裡贏回的每一個權利都削弱了獨裁者的壟斷。因此，一切獨裁者都反對個人主義，他們從不喜歡老百姓把自己看成像他們一樣的人。

古今中外的暴君無不是軟硬兼施耍盡各種花樣或威逼或利誘，要人民“狠鬥私字一閃念”、“毫不利己”地無代價獻出他們的“自私自利”權，以滿足自己一姓的最大私欲。在君主及其儒奴們的長期的圍剿下，“為我”論沒有容身之地。大音稀聲，這就是楊子二千多年來失音的原因吧。

墨家主張兼愛眾人、不分親疏，強調謀求公利、眾利，即“萬民之利”，堅決反對之為一己一身而損害他人的私利，即“虧人自利”。墨子步行千里止楚攻宋，留下千古佳話。孟軻明知“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卻血口噴人，罵墨子“是禽獸也”。梅賾寶說：“墨子是大公無私，捨己為人，只當稱頌，怎可批評？說墨子兼愛即是無父，無父即是禽獸，則墨子就是禽獸了！這實在不像討論學術的口氣。”梁啟超在《墨子學案》中雲：“說兼愛便是無父，因此兼愛便成了禽獸，這種論理學，不知從那裡得來。”孟子為戰國時鄒人，父母為墨門中人。孟母為兒子前途，曾三次搬家以便上好學校。孟軻就學墨門，卻不思進取，最後轉投儒家。孟子為排擠墨家，破口大罵墨子無父。按儒家的說法“師徒如父子”，孟子背叛墨家就是背叛父母的行為。真正無父無母的應是孟軻，禽獸不如是孟子。

儒家以不耕而食為君子、以學稼為小人，生活起居都要乘輿代步、從者眾多的大排場；與“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比，儒家只會加重民的負擔。墨家過的是“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的苦行生活。他們比儒家高尚的多。

把特殊性當普遍性是儒家致命的錯誤。孟子說，“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按他的說法，原始社會的人都是禽獸了，因為原始社會普遍的“無君”，而在其早期的母系社會則是普遍的“無父”。有國君的社會只是一種特殊歷史階段。

荀子雲：“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辨”即“別”，“別”是禮的核心。《禮記·郊特牲》雲：“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母系社會中男女自然也有別，但當時對男女兩性的定位卻與父系社會截然不同。父系社會中講的男女有別，是男尊女卑、男主女從、男外女內。“別”與“義”都是在具體歷史中的特殊概念。

當儒家自認為代表普遍、必然而且永恆的真理時，不同的思想之間便構成了你死我活敵對的關係。他們把墨家稱為禽獸，最終的結果必然是以暴力消滅對方；也許會以和平方式“教化”對方。無論暴力還是和平，都是一種以勢壓人的征服行為，依然是一種敵對的關係。

2· 儒家無人權

儒家的“人”就是等級制下的奴隸。貓眼看人的儒家信徒說“何謂人，曉禮儀廉恥忠孝仁義是謂人也，非如此乃禽獸也”。按照儒家的邏輯：只有懂得儒家的禮儀廉恥忠孝仁義，才能稱為人。也就是說，不懂儒家或反對儒家都不是人，都不享有人權。可見，儒家就是要剝奪人們的人權，使人成為奴隸！儒家談人權是天下的笑話。

其實，儒家沒有人權概念。這是因為：

1) 儒家沒有個人概念。由於血緣文化本身便是泯滅個性的，它使個體溶解在群體中而不自覺；扼殺了個人的主體意識。儒家仁學系統中的“人”，只是複雜的宗法人倫網路節點上的角色集——為臣為父為夫等等。在以宗法家族為特徵的傳統中國社會中，人只是“父親”、“兒子”、“母親”、“女兒”，而絕對不是獨立的個人。在儒家“修齊治平”的公式中，個人是始點而不是最終目的；

他不屬於自己，故不可能為自己的權利而辯護。人不過是社會關係倫常中的一個動輒得咎的可悲的符號而已。

胡適認為儒家的家族主義只有家庭，沒有個人。沒有個人的獨立空間，更沒有個人的自由。他說：“吾國家之家族制，實亦有大害，以其養成一種依賴性也。吾國家庭，父母視子婦如一種養老存款，以為子婦必須養親，此一依賴性也。子婦視父母遺產為固有，此又一依賴性也。甚至兄弟相倚依，以為兄弟有相助之責。再甚至一族一黨，三親六戚，無不相倚依。一人成佛，一族飛升，如蟻之附骨，不以為恥而以為當然，此何等奴性！真亡國之根也！”

新儒家梁漱溟反復指出：“中國沒有個人觀念”，並稱之為中國文化的最大之偏失。張東蓀也認為：“在中國思想上，所有傳統的態度是不承認個體的獨立性”。

孫隆基先生認為“仁者，人也”，實則“二人”也、關係也；離開人倫關係的物件，就沒有“人”。“二”與“人”才構成人，“一”只是半人，“一”構不成人。離開了另外的“一”半，人就撐不起來，立不起來，就東裂西倒，無所依附。孔子坦承“克己復禮為仁”。由無數這樣長不大的“人”組成的民族就是“未斷奶的民族”。孫隆基先生看出了“個人”在中國文化中的缺失，換言之，中國文化沒有養育出“個人”。對“個人”構成壓抑和殺傷。

孫隆基對中國古代政治史有過深入的思考。他認為，在皇權政治下，對自我的戕害、對個體的扼殺、對尊嚴的踐踏是真正的核心問題。“專制主義文化下，‘個人’不發展”。上層奉行專制主義，下層則奉行“鏟平主義”，最後只能將個體和個性完全消除。按孫隆基的說法，同為“國民”，“老百姓是自我壓縮的人格，而少數統治階層卻出現自我擴張的人格”，那麼，究竟自我壓縮是國民性？

還是自我擴張是國民性？這種同一國民的反方向人格發展只能說明有問題的
不是“國民性”，而在於老百姓與統治階層的政治關係根本是不正常的。在這種情
形下，個體和私人狀態嚴重不發達的中國人找不到比物欲更高的追求，比“吃”
更有意思的事情，因為吃成了一般百姓“唯一合法的對官能的滿足”。

有人認為，孟子的“浩然正氣”、莊子對逍遙由的追求是傳統中國社會存在
獨立個人的確證。這是誤解，他們只是臣民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獨立人。

2) 儒家沒有權利概念。利一直是儒家批判的對象。儒家認為人間一切醜惡
之事都是私心[人欲]引起的。其實，醜惡現象並非因個人的私心，而是只有自己的
私，不尊重別人的私，是私欲膨脹損人利己的結果。權利在古中國一直是貶義
詞，是指損人利己，與西方的權利概念不同。中國不可能產生以權利為核心的人
權文明。沒有權利概念，當然不可能有人權概念。

3) 儒家之徒否定天賦人權至上性。他們篤信人權源於權力、法律與後天性的
努力，否定普遍的、平等的、抽象的人權，視人權為具體的、歷史的、可變的。
這是荒謬的。

共產黨與儒家雜交出的民族主義說：“天賦人權從字面上理解嘛！就是等著
老天掉人權下來嘛……何必去爭取呢？爭取是不好的！”

答：人權是天賦的，它自然存在在那裡。既然如此，為什麼還有那麼多的人
權侵犯問題呢？這是因為少數有特權的人侵犯別的人權。所以，人權用不著去
刻意追求，只要取消了特權，人權便自然來到。所以叫“天賦人權”。在群體中
保證每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的方法是每人的自由不可越過一界限，此界限在
於不干涉他人同樣的自由。換言之，人權的敵人是特權。想要獲得人權的方法是
打倒特權。消滅了特權，人權自然就便被確立了。

天賦人權從來沒有說要你不爭取權利。你爭取權利不得越界，這個界限就是天賦人權。比如：你到失物招領處只能領原來屬於自己的東西，而不是去冒領別人的東西。那個原來屬於自己的東西就是你的天賦人權，這就是界限。

爭取權利不是巧取豪奪，把屬於別人的東西也搶來。當你這樣做或者認為這樣做理所當然的時候，你就是野獸，而不是人。所以，反對天賦人權就是野獸。

天賦人權已成為全人類共識。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主要是看人權標準是否已被絕大多數成員所信仰，而不是看他們是否使用了電腦或者是否贊同“知識經濟”。如果他們解決各種糾紛的方式依然還是槍桿子裡出政權，那他們不過還是一群沒走出叢林的大猩猩。中國現在雖然高樓林立、都市繁華，卻始終沒有真正進入文明世界之中。

儒徒們說人權是理想，其實，人權是做人的底線，即最低要求，不是什麼高不可攀的理想。把人權說成理想，是儒徒們理屈詞窮的表現，其目的就是為了侵犯弱者的人權。

套用《人權宣言》的話說：“對人權的該知而故意無知、或忘卻或者蔑視”者就是禽獸，對人權有知而且維護人權者就是人；中國的統治者皆禽獸也，孔子拼命為天子服務，就是禽獸。“天賦人權”與“天賦王權”是對立的。反對天賦人權者，都是非人也的儒家。

4) 儒徒曰：“中國古時就以人為本，孔孟的輕徭薄賦、民貴君輕就是以人為本。”這些人沒弄清以人為本的概念。**以人為本是以人權為本，把個人當目的，不把個人當手段！**

任何專制統治者都不會以人為本，而是以鎮壓人民為本。如同狼決不會以羊為本，而是以吃羊為本。輕徭薄賦對老百姓有點利，但對當官的更有利。統治者

的讓步是暫時的，在農民得到一定的休養生息後，剝削又會逐漸加重。孔孟的重民、特別是“孝”道是把民[子女]弄成了君王[父母]的工具，那些割肉療親、殺子救母的血腥場面，難道是以人為本嗎？那些拋棄女嬰、殺死女嬰、甚至打死子女的中國人，難道是以人為本嗎？不，那是以死去的祖宗[馬列毛鄧]為本，以家長[黨]的利益為本。在一個反對個人主義的集體主義社會，個人的概念都沒法形成，怎麼會以人為本呢？專制文化不但實現不了以人為本，反而否定了人。

第 18 節 墨家不是民主派

1· 墨子沒自然法、契約論的思想，更沒民主思想

中國思想家普遍認為自然狀態社會混亂未有文明，因此，需要以國家至上、君主為絕對權威來維繫。墨子認為，在遠古時代沒有統一的是非標準，不但“各是其義而非人之義”；而且還“厚者有鬥而薄者有爭”而導致天下大亂，“若禽獸然”。他們都崇拜聖人，認為聖人（大救星）決定人類的禍福。因此，不可能產生古希臘的契約論思想。契約論思想是自然法思想的進一步昇華！也就是說：自然規律即自然法必須得到人們認可，人們在平等協商中把大家一致同意的一些自然法作為人人享有的權利和必須遵守的義務，以便組成一個社會共同體即國家！而中國古代思想家用聖人認識自然法從而使人們結成原始國家的，這就排除了大眾的作用，看不到平等自由的協商過程。所以，中國古代思想家與自由毫無關係，而與聖人專制密切相關。“人各是其義而非人之義”，就是說：人與人之間沒有共同的義，即沒有公約數或底線或公理。而共同的義則是自然法制基礎。在西方思想家看來，自然法是神的意志，它表現為自然界的有秩序的運行即規律，它被人的理性所認識，表現為公理，就是人們之間對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認識的共同點即公約數。自然法又被稱為理性法。遺憾的是，中國人不知道理性思維，

沒有產生形式邏輯，是一個沒有理性的民族，當然不能認識自然法。墨子不可能有自然法的思想，更不可能有契約論的思想。因為社會契約的達成(或國家的產生)，乃是因為有共同的義，即公約數的存在！

墨子連共同的義都不承認，哪裡會有契約？墨子在《尚同下》說：若苟百姓為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按這種邏輯，民主的開會形式是無用的，因為人與人之間無法達成共識，不能達成契約，所以，只能獨裁！由此，可看出墨子的反民主本質。墨子的學說那只會導致更大的暴力，他的“天子”就是暴力的無窮大！

墨子認為：人類社會以混亂起源，而“一人一義”是禍亂之源、之首，有了統一之義，禍亂就會消弭。因此，首先應建立“刑政”制度、設立“政長”，政長之首便是天子。中國古代學者沒看到人與人之間共同性，最後乞求聖人、天子來“一同天下之義”，建立禮制，而禮制的目的在於鞏固人與人之間的等級差別，必然是專制的。專制者總是強調差異性、階級性，否認共同的人性，這是中國的傳統！離開了人的共同性談差異就是專制主義。沒有共同性和共識，就沒有契約，也就沒有民主。所以，中國難以產生民主思想家！

2·仲大軍說：在“尚同”篇裡，墨子反復強調了“選天子”及地方長官的思想。墨子說：“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為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可以說民主政治思想在中國早已有之，墨家學派是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我認為這種說法是不成立的！

湖南嶽麓書社 1991 年出版的《白話墨子》的《尚同》上、中、下三篇的“選天子”語句都沒有翻譯為“民選天子”！既然不是民選，何來民主可言？**即使按**

照仲大軍所說，人民能“選天子”，那必然得出結論人民也有權力罷免天子；那就不需要什麼“天志”和“天命轉移說”了。正是古中國人對民主一無所知，才產生了這些稀奇古怪的專制學說。

墨子多次說天選天子，天立天子！墨子認為：遠古“未有刑政之時”，天下之人皆自以為是，相互爭鬥，導致“天下之亂，若禽獸然”。自從有了以天子為首的正長體系，以賞罰統一天下之義，才使人類社會如絲之有紀，網之有綱。“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總之，“古者上帝鬼神之建國都、立正長也”，目的是統一天下公共之義，並通過賞善罰惡來維護社會正義，為大眾群生謀求福利（《墨子·尚同中》）。《尚同》下篇說：“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此句中：“下”為一多餘字，故括弧！翻譯為：“所以老天爺想要統一天下的‘義’，因此，老天爺就選擇賢者，立為天子。”哪裡有民主的影子？墨子在《法儀》中說：“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為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注意：“天福之，使立為天子”。

有人硬要說：“墨家的天選就是民選”。可誰都知道：天選的聖王——禹湯文武都不是民選的！仲大軍說：“墨家的選就是反對世襲制”，更是毫無道理。

“禹湯文武”，哪一個不是搞世襲制的聖王？為了給墨家的貼上民主的標籤真是到了蠻不講理的地步！

仲大軍還指責批評者使用現代民主標準要求古代人，他根本不懂古代民主！仲大軍說：“領導者注意聽取下層人的意見，這就是很大的民主了”。按照這種說法，任何一個皇帝都有聽取他人意見的時候，而任何一個人都在皇帝的下層，所以，任何一個皇帝都有過聽取下層人的意見，因此都是民主的。那麼，民主與

專制的劃分還有什麼意義？其實，“聽取下層人的意見”根本不是民主，當然更不是“很大的民主”。他是一個典型的共產黨官僚腦袋，共產黨就是這個主張：我聽取了民意，所以，我是最民主的。誰都知道：黨是有選擇的聽取民意的，對那些批評的民意往往是打擊報復的。古代官場更是如此，對批評的民意總是很很打擊的，對歌功頌德的民意總是喜歡的！民主不是聽取民意，而是由人民選舉和罷免、人們享有充分的自由和監督官員的權利、官員必須定期更換；民主的底線是不迫害異見。

墨子所謂“天志”，其實就是墨子自己的意志，所謂“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墨子認為：天具有主宰人間賞罰的最高權威，它的權威普及四方經久不衰，所以，治國應效法這種“天志”來制定法令和政策。墨子在《天志·中》說：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為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絲麻，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為山川溪穀，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否；為王公侯伯，使之賞賢而罰暴……。在這裡，墨子分明說的是天老爺立王，與民無關！

可見，墨子反復強調的是天立天子、天選天子，根本沒有民選的思想。聖經裡有民眾要求立王，上帝不樂意的故事。可見，民立王、民選王是西方的傳統！

3·有人說：墨子極力為平民的政治人權吶喊，他的《尚賢上》中要求：“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參與政治的權利是人人平等的，他在《尚賢中》說：“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這顯然是誇大其詞。

《尚賢上》的原話是：“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

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

這說明開明專制的成本很大！在古希臘雅典：決策機構——公民大會及其常委會（常委會是輪換的）是義務制，執行機構——日常管理官員由奴隸充任，其工資相當於平民；沒有高官厚祿之說，雅典的最高軍事機構——十將軍委員會的10位委員都是無薪義務制。

墨子接著說：“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明明說的是優（賢）勝劣汰，與平等有什麼關係？為什麼要提拔下層老百姓甚至奴隸？因為那些從奴隸到將軍的將軍（衛青）更聽話，更容易擺佈，他們對領袖更依賴。不象貴族，急了可能要拍桌子瞪眼。奴隸將軍怎麼敢？

《尚賢中》的原話是：“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

這能說是“參與政治的權利是人人平等的”嗎？若官方認定你是不肖者，就要“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你的人權不是被踐踏了嗎？可以說：墨子不知道人權為何物！

“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墨子·法儀》）。在墨子那裡，這樣的“平等”的思想只是一閃而已。墨家只是在“愛”普及于眾人的意義上講平等。墨家主張“罰當暴”、處罰平等。墨家的一個首領（鉅子）名叫腹黃享的，在秦國為官，其獨生子殺人，秦惠王念其年長無他子而“令吏勿誅”。腹黃享卻說：“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

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勿誅，腹黃享不能不行墨子之法”，遂殺子。墨家對於身份制、等級制，對於王子與平民身份之差異不平等，是想也沒有想過的。

墨子崇尚“天志”，主張“尚同”，他要求人們（包括國王）一切都要服從於上天的意志，服從上天的權威。而國王作為天意的代表，各級行政長官及全國百姓都應順從國王，而各級行政長官之間也應下級服從上級，老百姓是最低的一個級別。墨家主張“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等於文革的三忠於四無限）；而且說“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庶人由士政之；士由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由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由天子政之；天子由天政之。自下而上，每一級都絕對“尚同”於上級（相當於服從黨的領導）。“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這就是墨子反復強調的“尚同”。為了保證“尚同”，要嚴格地實行賞罰，對“上同而不下比”者賞，對“下比而非其上者”誅罰之。墨子解決混亂的方案不過是扼殺自由的專制方案而已。這樣，墨子就建立起一個上通天志、下貫萬民的權威序列。他認為這個權威等級金字塔是社會安定的需要，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這從根本上杜絕了民選天子的可能。墨子明明提倡的是等級金字塔，何來平等？

墨家主張“兼愛”，兼愛強調相互愛護，這比儒家先進，其具體內容不過是熟人之間的互愛和當今社會的社會保障制度而已，屬於俗世性的功利主義；與基督教的“愛人如己”、“愛你的敵人”的精神相差還很遠！墨家主張“非攻”，卻不主張為捍衛正義而主動發動戰爭。“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請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為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無視於音樂的真美善價值。墨子的功利主義觀點，同《聖經》裡的“十誡”觀點完全不同。墨家利用“鬼神治國”，墨家“敬畏鬼神，不敬畏 God”。

4· 墨子沒有民主思想的原因

一個鼓吹上智下愚、把王等同于神的學者是不可能民主思想的。這是一條普遍的規律。墨子堅信智慧不平等——上智下愚；所以，他不可能有民選“天子”的民主思想。子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為宮室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為宮室。……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帶芟，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為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絲麻，梱布絹，以為民衣。……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為民食……古之民未知為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為舟車，……。民在墨子的眼中是愚昧無知的，他怎麼會讓這麼愚昧落後的民去選天子呢？而他所說聖王就是堯舜禹，這些王和神差不多。

墨子說：“順從天意應怎樣做呢？回答說：兼愛天下的人怎麼知道是兼愛天下的人呢？因為天對人民的祭祀全都享用。怎麼知道天兼而食之呢？自古及今，無論如何遙遠偏僻的國家，都餵養牛羊狗豬，潔淨地整備酒醴粢盛，用以祭祀山川、上帝、鬼神，由此知道上天對人民兼而食之。假如兼而食之，必定會兼而愛之，就好象楚、越的國君一樣。現在楚王在楚國四境之內享用食物，所以愛楚國的人。越王在越國享用食物，所以愛越國的人。現在天對天下兼而享用，我因此知道它愛天下的人。”注意：“楚王在楚國四境之內享用食物，所以愛楚國的人”；在這裡，墨子把王剝削人民貢獻的食物，說成是愛，完全是顛倒黑白！

墨子說：“他們（指聖王）的討伐不叫作‘攻’，而叫作‘誅’。從前三苗大亂，上天下命誅殺他。太陽為妖在晚上出來，下了三天血雨，龍在祖廟出現，狗在市上哭叫，夏天水結冰，土地開裂而下及泉水，五穀不能成熟，百姓於是大為震驚。古帝高陽於是在玄宮向禹授命，大禹親自拿著天賜的玉符，去征討有苗。

這時雷電大震，有一位人面鳥身的神，恭謹地侍立，用箭射死有苗的將領，苗軍大亂，後來就衰微了。大禹既已戰勝三苗，於是就劃分山川，區分了事物的上下，節制四方，神民和順，天下安定。這就是大禹征討有苗。等到夏王桀的時候，上天降下嚴命，日月失時，寒暑無節，五穀枯死，國都有鬼叫，鶴鳴十餘個晚上。天就在鑿宮命令湯：‘去接替夏朝的天命，夏德大亂，我已在天上把他的命運終斷，你前去誅滅他，一定使你戡定他。’湯於是敢奉命率領他的部隊，向夏邊境進軍。天帝派神暗中毀掉夏的城池。少頃，有神來通告說：‘夏德大亂，去攻打他，我一定讓你徹底戡定他。我既已受命於上天，上天命令火神祝融降火在夏都西北角。’湯接受夏的民眾而戰勝了夏，在薄地會合諸侯，表明天命，並向四面八方通告，而天下諸侯沒有敢不歸附的。這就是湯誅滅夏。等到商王紂，上天不願享用其德，祭祀失時。夜中出了十個太陽，在薄地下了泥土雨，九鼎遷移位置，女妖夜晚出現，有鬼晚上歎喟，有女子變為男人，天下了一場肉雨，國都大道上生了荊棘，而紂王更加放縱自己了。有只赤鳥口中銜圭，降落在周的岐山社廟上，圭上寫道：‘上天授命周文王，討伐殷邦。’賢臣泰顛來投奔幫助，黃河中浮出圖籙地下冒出乘黃神馬。周武王即位，夢見三位神人說：‘我已經使殷紂沉湎在酒樂之中，（你）去攻打他，我一定使你徹底戡定他。’武王於是去進攻紂這個瘋子，滅商興周。上天賜給武王黃鳥之旗。武王既已戰勝殷商，承受上天的賞賜，命令諸侯分祭諸神，並祭祀紂的祖先，政教通達四方，而天下沒有不歸附的，於是繼承了湯的功業。這即是武王誅紂。如果從這三位聖王來看，則（他們）並非‘攻’，而叫作‘誅’。”像在看封神演義，沒有民主，只看到天主！這種天人感應的思想不是被董仲舒繼承了嗎！相傳“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墨家不過是儒家的改良而已，基本思想還是相同的。墨子非攻雖有反戰的思想，但

重點在維護西周的等級金字塔，不過更加集權而已（因為尚同）。

5· 墨子有邏輯嗎？

墨子是性善論者，他認為天子幾乎是全善體，因為天子是天立的，所有的其他人都是半善體或非善體，所以，必須尚同于天子！他在《尚同中》說：“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說而不治哉？”這顯然是以偏概全。他自己也承認有不仁的天子。所以，“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不成立！

墨子說：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

這種解釋不合乎邏輯！不愛包括損害和漠不關心、毫無關係、損害等方面，墨子的“不愛=損害”的公式是完全錯的！一個女子不愛其男人，我們能說她損害了男人的利益嗎？動亂根源不是“不相愛”，而是人們不知“人權”為何物？過多的愛反而出亂子！譬如：家長替子女管理收支，最初的動機是防止他們因奢侈浪費而陷於貧困。但父親的權力經過國家法律的確認，就變成嚴刑峻法了；我國古代就有“父母在別籍異財者，棄市”的規定。有人說，真善美可以殺人，其實，愛也是可以殺人的，父母之愛終於把子女送上了刑場。

兼愛中篇說：“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

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很顯然，“必然推理”是不成立，或然推理成立。把上面句子中的“必然”換成“可能”就行了！不愛不是害，溺愛就是害。這是墨學的盲點。

墨子強調尚同，把不同就等於亂。子墨子言曰：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朽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

“交相非”不正是言論自由的體現嗎，可被他視為亂；墨家根本不懂自由啊！

“交相非”而不動拳頭，就不能視為亂！所以，他又錯了。按他的推理，不同就等於亂；亂就需要真命天子來平定？誰是平亂的天子，他說老天立的。儒家說：能消滅群雄的就是新天子。怎樣平亂和尚同呢？其實就是坦克加思想改造。如今“尚同”叫“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第 19 節 政教合一的愚民術

專制統治是建立在草民的盲目性遵從的基礎上的，禁智慧、錮理性自然就成為專制社會的統治原則。專制文化本質是反智的，因為民智的開發，意味著統治難度的加大。中國專制主義最可惡、最黑暗的一個特點，就是思想統制或曰愚民政策。愚者，愚弄也。民者，大眾也。“愚民”即愚弄大眾。愚民政策就是當局為了一己之私，而推出的愚弄人民，使其愚氓無知，閉目塞聽的政策。赫爾德在《關於人類歷史哲學的思想》(1784~1791)中認定中華帝國的專制教化將臣民的理智禁錮在孩童階段的幼稚狀態。梁啟超指出，中國幾千年政治，無非愚民、柔民、渙民、馴民之術，無非“遂使舉國皆盲瞽之態，盡人皆妾婦之容”（《中國

積弱溯源論》)。中國的傳統文化正是一種反理性的專制文化系統，這種愚昧、非理性或反人性精神的狀態正是專制主義得以長期延續的精神支柱。那裡有專制，哪裡就有愚昧；同樣，哪裡有愚昧，哪裡就有專制。

先秦諸子都鼓吹“愚民”，先秦諸子都熱衷於“愚民政治”，是擔憂民智大開導致思想多元、異端蜂起，對專制統治構成威脅，動搖“國本”。他們認為，一個國家只能由君主一人思想，由君主一人來定是非曲直，而絕不許有思想上的多元。除君主外，其他任何人絕不許有半點自己的思想和見解，必須禁錮人們的思想。因此，最高明的統治，是既不能誘發民眾的物質欲望，也不能使其有知識，更不能讓其關心國家大政方針的。愚民的結果就是造成民眾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使國民把所有希望寄託在出“偉人”“聖人”的專制上；進而使專制者更加專制！所有的愚民術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即使不能洗盡人人腦袋中的獨立思想，也要把他們變成不敢說真話、不敢做實事、不敢做真人的騙子手和膽小鬼。借助于祖先崇拜、語言禁忌和政治巫術，將人的個性、自由、價值與尊嚴擠壓得幾近於無。

1· 道家的愚民專制思想

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鬥爭不已，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耷而載之木，解其劍而帶之笏。為之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箏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見《淮

南》)。

武王（周武王）問太公（姜尚字子牙）：我伐紂，天下人都認為是臣子殺他的君王，以下伐上。我怕後代效仿而用兵不止，爭鬥不停，怎麼辦？太公說：你問得太好了。打個比方，人們打獵，沒有得到獵物時，惟恐它傷得輕而捉不住它。已經得到它，惟恐傷肉傷得太多。你想讓你的江山長久，就一定要堵住百姓的口耳。道理再多再完美也沒用，只能給人增加煩惱，讓人們固定在一個職業，養成他們安逸的心態，並且給他們世俗的感情，讓他們在感情上明明白白，道義上稀裡糊塗，然後去掉人們的理性灌輸世俗文化，去掉他們的武裝而帶上有等級制身份象徵的物品。當老百姓的親人死亡讓他們服多年喪，令他們不能很好的生活和繁殖。大力宣講等級秩序和謙卑退讓的精神，使他們不起爭鬥。讓老百姓養成大吃大喝的物質習慣，讓他們養成大賭大嫖的精神習慣，用鬼神解釋人們未認知的事物並且讓他們產生敬畏之心不准許他們思考。用繁文縟禮使他們喪失自然天性，用厚葬久喪使他們耗盡財產，讓他們為喪事置辦奢侈的陪葬品，這樣來使他們陷入貧窮，讓他們服繁重的徭役使他們片刻不得休息，人們家人少族人勢力小，個個貧窮和疾苦。將世俗文化世世代代灌輸在人們的腦中，那麼可以保障天下不會丟失。最後歸納為《老子》的一句話：“萬物在自然變化中萌生了私欲，我將以道的質樸來鎮住這些私欲。”

老子的思想無法超過侯王、士的範圍。《老子》全書，決不是一個在野的聖人探索自然的奧秘，或者人怎樣達於至善的哲學，它是不折不扣的統治術。他的“道”，似乎很玄妙，涉及天地宇宙。然而主體既已確定，天地宇宙不過是統治術的隱喻，本身並無獨立的意義，所以也不求邏輯上的完整。老子說，天下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四大並列，尊君昭然。《老子》一書，正

是教育統治者成為“聖人”（比較好的統治者）的教科書。《老子》雲：“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反對言論自由），“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故聖人雲：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顯然，他的聖人就是帝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為使人民失去有為的條件和志氣，是無為政治的基本內容之一。為達到這一目的，笑容可掬的無為變成了嚴酷的專制主義，真可謂相反而相成！

錢鐘書指出：所謂聖人“法自然”一語脫胎於《老子》第五章，王弼注“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百姓為芻狗。”而王弼此注本來是對《老子》第五章中有關“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的闡釋與發揮。其含義就是說聖人對待普通百姓與天地對待世間萬物一樣，可生殺予奪，任其擺佈，或者進一步說，聖人的這種為所欲為就是在師法自然、師法天地的名義下進行的，因而有著合乎天道的合理性。事實上，“天地不仁”並非出於有意，與諸如“聖人”之類的種種“狂人”、“超人”或曰“偉人”在“法自然”的名義下的冷漠、冷酷乃至殘忍行為相比，“天地不仁”只是一種自然現象或自然災害，“故芻狗萬物，乃天地無心而‘不相關’、‘不省記’，而非天地忍心、‘異心’而不憫惜。”因此，“法自然”不過是把自己專制暴行合理化合法化而已，是一種巧飾。

老子還獻上了一套愚民馭民之術。這分明是一個心系朝廷的諫客，他的清靜無為是常保富貴的手段，他全書中絕無半句隱世遁世的話。老子認為，文明是動亂和罪惡的根源，不識字才是盛世。他主張返樸歸真，設計了一個“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津津樂道。“小國寡民……使民復結繩而用之。……雞犬之聲相聞，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80章）。

老子是一個罕見的老反智主義者。他提出：使民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復結繩而用之”；不讓人民用先進的生產工具。因為用先進的工具，生產率就會提高，吃飽穿暖後就會有精神上或其它方面的想法。不讓老百姓看到好東西，即“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不給老百姓太多的學習機會，這叫“絕學無憂”。

“樸”（simplicity）是老子和道家的一個重要觀念。“道”就是“璞”（“Uncarved Block”，未鑿的石料），“璞”本身就是“樸”；最“樸”的是“德”，順“德”而行的人應當過著盡可能“樸”的生活（返璞歸真）。孩子只有有限的知識和欲望。他們距離原有的“德”還不遠。他們的淳樸和天真，是每個人都應當盡可能保持的特性。老子說：“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又說：“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由於孩子的生活接近於理想的生活，所以聖王喜歡他的人民都像小孩子。老子說：“聖人皆孩之。”

人們喪失了原有的“德”，是因為他們欲望太多，知識太多。老子的“反智主義”警句，可在《道德經》裡的每一章中找到，最著名的句子大概是這些：知識就是偽裝：“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18章）。“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所以，老子說：無知就是幸福：“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19章）。愚民才好治理：“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多智。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道德經》81章告訴帝王只要做好兩件事就行：一件是自己裝傻，另一件是把臣民弄傻，帝王裝的無欲無為，把臣民弄的無知無求，天下就太平了。老子的社會目標是“實其腹”，相當於今天的“吃飯權”。錢穆指出：儒道本系一家，都

是入世之學；“佛教是講出世的，孔孟老莊都是講入世的”（《中國文化叢談》臺北三民書局 1976 年版 374 頁）。

事實上，智慧是不應堵塞的，所以，愚民政策必然失效。中國盜賊此起彼伏，蓋因治理辦法失當。防止盜賊最好的辦法不是否定人的智性，而是建立良好的法律制度。未必條律越繁，國民越亂。如果國家領袖如老子那樣藐視智慧，必將被別國所滅。西方國家之所以成為列強，蓋與重視智慧有關。西方人讚譽智慧為理性之光。

莊子發展了老子的思想，將老子的理想國與傳說中的帝王聯繫起來。他認為，伏羲、神農、黃帝等上古帝王所處的“至德之世”，就是“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民如野鹿”；“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這種“至德”、“至治”的社會，沒有文字，結繩記事，民風質樸，物欲低下，保守封閉，顯然屬於原始的野人時代。

莊子認為：人如同牛馬萬物一樣，都是“造物主”的產物。人不應因為是人而沾沾自喜，相反，人只有進入了“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食豕如食人”的狀態，才算真正懂得了人的意義。莊子認為人類應該像牛馬在草原上漫步那樣，過著“天放”的生活，“其行填填，其視顛顛”。填填，安詳滿足貌；顛顛，無外求專一貌。“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人應該把名利、美惡、生死等等世俗觀念拋到九霄雲外去，這叫作“解懸”。人要安生而順死。莊子主張“齊物”，人與萬物等量齊觀，貶低人的地位，人與萬物同生死，共呼吸，人有何價值？當然就會“以萬物為芻狗”了。正好為奴役張

本。

莊子認為：社會就像個大牢籠、大屠宰場，無論是被人們稱為美的東西，還是惡的東西，都起著破壞人性的作用。“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而且越是所謂美的東西，破壞性越大。“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

“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他們認為“治”是禍亂之源，“治人”之“治”造成了“亂人之性”。堯、舜、湯、武、周公被人們稱頌為聖人，他卻認為這些人是傷天害性的罪魁。人們都稱讚和追求聰明才智，他卻認為聰明才智是爭名奪利的工具，害性的手段，甚至破壞了自然界的正常秩序，使日月、天地、四時、萬物都失去了本性。莊子說：“天下大亂，罪在乎好知”，“任知，則民相盜”；一切發明創造都是產生於“機心”，而任何“機心”都是對自然本性的破壞，“渾沌”才是本始狀態。文明越發展，對人性的破壞就越嚴重。在莊子看來，偷盜固然可惡，如果沒有盜心利欲，何來盜賊之行？如果人們都如白癡，哪裡會有大偽？所以把智慧、知識統統拋掉，就不會有害人之舉了。莊子提出“大辯不言”，更是反對言論自由；人的價值不在於給社會增添什麼東西，而是從根本上擺脫社會的束縛。

2·法家的愚民專制思想

中國為什麼搞了幾千年的專制獨裁制度？上億漢人為什麼做區區幾十萬口的滿族人的奴隸？原因：民弱！民不弱，君何以暴？古希臘羅馬之所以能推翻國王獨裁而實行民主共和制度，在於它們人民強大，精英們不得不有所顧忌，乖乖地執行公民大會的決定！梁啟超在 1902 年的《新民說》中有專章“論尚武”，鼓吹“斯巴達之教育”，並作《斯巴達小志》一文。魯迅最早發表在 1903 年《浙江潮》雜誌上的一篇文章題為《斯巴達之魂》。“愚”、“弱”二字，是梁啟超

曾用過的，魯迅後來在《吶喊·自序》中也以“愚弱”描述中國國民。

一個網友說：民弱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中國人處處使女人弱小，以便維護男權，其結果是削弱了整個漢族！判斷一個民族的強弱，大致有兩個指標，即“智力”與“體力”。很不幸的是，這兩個指標中國人都不如西方人。體力方面是不用說了，一般中國人到了美國，走在人群裡都會覺著自己矮人家一大截，要說智力那更不用說了。西方近兩百年的成就將全世界改頭換面，超過中國五千年的影響力。而中國人的“體力”與“智力”輸給西方人，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的女人不行。有一年參加冬令野營活動。在上山途中，我注意到：隊伍中的華人女同學們紛紛將背包、行李交給男同學背，而她們則三五成群，嘻嘻哈哈地笑鬧著，可同時我卻看到同行的美國女學生則背著背包，健步如飛，不讓鬚眉。女性是民族之母，女性的身體柔弱，她生養的子女也一定是弱的。中國女性的體質普遍弱於西方女性，生產後要“坐月子”就是證明（這是千餘年裹小腳的結果，搞得弱不禁風。早在戰國時期，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這種以細弱為美的審美觀使我們的民主日益衰弱！而古希臘以強壯為美，古希臘的奧運會以及斯巴達對對女人強壯的要求和訓練反映了西方人的審美觀，這為西方最終戰勝東方奠定了基礎）。如此生下的子女已先天不足，再加上千年的農耕生活所造成的後天失調（缺乏運動、刺激），中國人就長得較西方人瘦弱矮小了。再來談智力，這也和女人有關。“女子無才便是德”是中國舊社會裡良家婦女的金科玉律，可是中國男人也很混帳，既然女子無才是德，又要她們“相夫教子”、“母儀天下”……可想而知，陳陳相因、代代相承，中國人的智力就每況愈下了。一個西方女子就能搞定的事，要好幾個中國女人才行！

古代思想家為了建立極權的專制獨裁制度，提出了弱民學說。他們認為，民

不可富，只有使民處於死亡邊緣才好統治。魯國的季康子母親講過一段話，頗為典型。這位老太太說：“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噁心生。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饗義，勞也。”晉國的韓獻子也說過：“國饒則民驕佚。”這種主張被法家中所接受。

商鞅說：“民強國弱，民弱國強”。官家與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對立的。要想國家富強，就必須削弱人民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削減人民的實力。“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也”（《商君書·畫策》）。“故有國之道，務在弱民”（《商君書·弱民》）。這就是“以窮制窮”的牧民之術，以後的統治者更是將此絕招發揚光大到了極致。

法家認為法的基本任務之一是“勝民”和“弱民”。《管子·正世》說：“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家的勝民說有它的特殊內容。勝民的基本精神在於“弱民”。弱民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

①政治上弱民之術主要是嚴刑苛罰和獎勵告奸。《商君書·弱民》說：“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意思是：政令實行人民所厭惡的東西，人民就會變弱。民不是怕苦、怕死嗎？政令就要用苦與死時時威脅他們，使人民處處如臨深淵，人民自然會變得怯懦。商鞅主張用酷刑重賞“弱民強國”，不治到百姓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不算完。“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鬥，狠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噁心之民無變也”。

商鞅變法分兩期進行的。第一期是在西元前 359 年，秦孝公三年進行的。其主要內容是：①以“連坐法”、“告奸法”來完善戶籍制度，貫徹法家“以刑去刑”的理論。即：以五家為一伍，十家為一什，編入戶籍。彼此都有監視告奸的

責任，如有隱瞞，就要連坐，施以腰斬之刑；商鞅實行“法西斯”連坐制，試問有誰願意生活在這樣的制度中？旅店中也要查驗是否有奸人藏匿。獎勵告奸是弱民的另一個法寶。在人民之間，要宣導“告奸”，告奸者可以得賞。反對“用善”。《商君書·說民》說：“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奸則民親其制”，“任奸則罪誅”。“任奸”就是獎勵告密，互相揭發和監視；要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這樣則民弱。

②在經濟上要通過行政手段使民不停地由窮變富、再由富變窮，是弱民的又一方術。商鞅認為民窮則思富，富則淫。《商君書·開塞》講：“夫民憂則思，思則出度；樂則淫，淫則生佚”。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呢？那就要設法使民在窮富之間不停地迴圈轉化。《說民》說：“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富者貧，國強。”的確，在這種迴圈中，國家會變得強大，民會變得軟弱。君主既然操縱了民眾貧、富轉化之機，毫無疑問，在這種轉化中，君主會變得越來越強，民會變得越來越弱。

法家主張要用強力手段劃定利途，把臣民之利與君主之利結合起來，使人們追逐利益的一切舉動都在有利於君主的軌道上轉動，這叫作“利出一孔”。這個孔即耕戰。除此之外，如工、商、學等都是這個孔道之外的異物。利出一孔還是利出多孔，法家認為關係到國家的興衰。《商君書·斬令》說：“利出一空(孔)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國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國不守。”《弱民》說：“利出一孔，則國多物。利出十孔，則國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亂。”《商君書·外內》說：“民之內事，莫苦於農。民之外事，莫難於戰。”那麼怎樣才能使民走上耕戰軌道？辦法就是賞和刑。賞要重，使人見賞之多而忘流汗、流血，如《外內》所言：“民見戰賞之多則忘死”；刑要嚴，使人“見不戰之辱則苦生”。重農抑商，獎勵耕戰。凡努力耕織的，可免除徭役賦稅；懶惰或以商牟利的，罰

為奴婢。《商君書·農戰篇》曰：“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百姓曰：‘我疾農，先實公倉，收餘以食親，為上忘生而戰，以尊主安國也。’……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所以李悝變法“盡地力之教”，要求農民“治田勤謹”。商鞅變法規定“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複其身”（《商君書·墾令篇》）。即上繳官府粟帛多者，可以免除徭役，而其重視農業生產的目的，並非是考慮農民的權益，出發點主要在於穩固君主統治和擴軍備戰。獎勵軍功，軍功以斬獲敵軍首級來計算；沒有軍功的貴族，不得列入公族的簿籍（“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有軍功的則賞給田宅、爵位、農奴。在剝奪舊貴族特權的基礎上，將臣民的等級爵秩完全納入軍事軌道，以增強國家軍事力量。當然在打擊舊貴族的過程中，部分平民得以進入軍功官僚集團，但其緣故與結果決非是為平等政治權利和提高整個基層民眾的社會地位，而主要著眼於收取舊分封貴族的權力，以完成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統治之政體。禁止私鬥。私鬥，又叫邑鬥，即為舊的宗族領主之間的私利而鬥，今量其輕重處以刑罰。賞罰都以利為中軸。《商君書·修權篇》宣言：“權者，君之所獨制也！”做到群臣乃至全國都跟著君主一人運轉。這樣，新興軍功官僚集團很快就成了君主的馴服工具，從而進一步加強了君主的專制統治。

為了促使人們走上耕戰之路，要狠狠打擊一切非耕戰之人。商鞅把“豪傑”、“商賈”、“游士”、“食客”、“庶子”、“技藝者”等等視為非耕戰之人，主張採取斷然措施加以制裁。他認為：非耕戰之人對農戰之民起著瓦解作用。《商君書·農戰》說：“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農戰矣。”他提出禁止儒生、大臣、諸大夫遊學、游仕，閉塞人們的資訊通道，使“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疾務農”。一旦平民愚昧敦厚，就不會被智巧所迷惑，就會

專心致志地按照君主的意志從事農戰。當然事情並沒有到此結束，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由農戰而產生的大利要歸於君主，這就是《韓非子·六反》所說的，“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

控制利柄主要是講君主要控制住土地。戰國時期，諸侯在一國之內擁有土地的最高所有權。戰國後期雖然出現土地買賣，土地開始變為私有，但終戰國之世，土地國有占主要地位。法家堅定地維護土地國有，主張用土地作為控制人民生計的調節器。一方面用“授田”的方式把土地分給農民，並通過授田去控制農民從事農耕。《管子·國蓄》中講的“分地”，《臣乘馬》中講的“均地”，《商君書·算地》篇講的“分田”，《徠民》篇講的“制土分民”，都是說的授田制。另一方面，用土地作為獎賞的資本，用於獎勵耕戰之士。《商君書·境內》詳細規定了依功等獎給土地等物的具體規定。《管子·八觀》指出：“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韓非子·詭使》說：“夫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顯學》說：“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管子》中的法家派對土地問題在政治中的位作了更深切的論述，《乘馬》說：“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問》篇說：“理國之道，地德為首。”掌握了土地便掌握了農民的生計與命運。君主支配土地，是君主專制的經濟基礎。

分配問題在當時主要指賦稅。法家認為徵收賦稅要有一個“度”，超出限度，政令就難於實行。《管子·權修》說：“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版法》說：“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正世》篇把適中的度量稱之為“齊”。所謂“齊”即既不要使民無法生活，因“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又不要讓民富，因民富則淫。在度量問題上最難解決的是“人君之欲無窮”與“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之間的矛盾。可是實際經驗又證

明，“未有多求而多得者也”。究竟如何解決這個矛盾，法家沒有開出一個有效的藥方，唯一的是希望明主當政。《管子·形勢解》說：“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又說：“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為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為，則令行。”一言以蔽之，既不要使民富，又不能置民於死地。用今天的話講，使民能維持簡單再生產，恰到好處。前 350 年，商鞅按成年壯丁徵收軍賦，加重徭役和兵役負擔。使父子兄弟到一定年齡必須分居，以小家庭為單位從事生產。《商君書·墾令》說：“收取人口稅，加重他們的徭役，那麼懶惰的人就沒辦法了，必須盡力開荒種田。”《中國秦漢經濟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一書，對於商鞅改革之後秦國的賦稅有一個計算，可供進一步研究參考。當時實物剝削量（商鞅時期秦國還未使用錢）占農民總收入 2/3，勞役至少占農民勞動時間的 1/7，全部剝削量約占農民總勞動量的 4/5。所以當時國家軍事實力大大增強，但農民日子並不好過，不像“四人幫”在“評法批儒”中所宣傳的那樣，人民“發家致富”了。商鞅是為了實現霸業而建造一個軍國主義國家，這一點，他做到了。秦始皇統一中國沒多久就覆亡了，為什麼？根本原因是人民承受不了秦朝統治集團殘酷的壓迫。

③弱民的又一手段是愚民。在文化上，則要實行最嚴酷的愚民政策。法家不論法、術、勢，都以民愚為基礎。“勢”是人君自處於至尊之地，居高以臨下；即：“君尊臣卑”。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禦群臣者也。因為深藏不露，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無為”。明太祖、成祖那種暗地伺察百姓的辦法便正是“術”的一種運用。“法”指客觀化的政治法律制度。管子認為“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複合為一體。”“君明、相信、五官肅、

士廉、農愚、商工願，則上下相體，而外內別也”。

法家主張除了讓民學習法令之外，不得學習其他任何東西。要取締法令之外的異說，對持異說者，非禁即戮。《管子·法禁》說：“昔者聖人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知和同以聽令也”；文中還提出了“一國威，齊士義”的主張。由於當時各種不同理論全是由士提出來的，所以“齊士義”是實現思想專制的關鍵。如何齊呢？手段是“誅”、“挫”、“折”、“破”。《管子·法法》說：“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故強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誅明。”一切持法外之說者均為“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一路殺下去，“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

統一思想，禁詩書、禁遊說，老百姓只能以法令為書、以官吏為師。商鞅認為“君尊則令行”，君主只有擁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威，君主的法令才能得到遵守。這為君主專制提供了理論依據。《商君書·修權》說：“權者，君之所獨制也。”商鞅要求君主“操權一政”（《算地》），以“專其柄”。為了達到獨尊，將所有人的思想和行為統一到一個標準上來，只要有任何的例外，獨尊就不能達成。“令雖出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系於民者也”（《重令》），因而商鞅主張：“作議者盡誅”（《法法》），他要全國人都變成啞巴。

商鞅變法時，有言新法便者，有言新法不便者，商鞅把議論法律的人統統遷至邊城。有人問他為什麼對說好話的人也處罰時，商鞅答：“此皆亂化之民也”（《史記·列傳第八》）！司馬遷批評商鞅“刻薄、少恩”。這在我國法律史上開了一個惡例：禁止談論法律。特別是自秦以後，鉗制言論成為政府鞏固統治的重要手段，對王法說三道四便是犯罪。明代的學校中就有“議國法者，杖、開除”的榜文。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發表批評法律的言論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

除非你冒殺頭的風險。以至蘇東坡這樣的大家竟說“讀書萬卷不讀律”。

商鞅在《算地》中說：“聖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窮詐。”意思是說要用各種辦法限制人民的才能，窒息他們的智慧。因為“民不貴學則愚”，“塞而不開則民渾”，“民愚則易治也”。人民愚昧，就會一心一意種地。商鞅認為：音樂、歌舞、裝飾品及人們的縱欲，不僅會造成物質上的浪費，更重要的是它還會導致人們的精力分散，不安心農戰，使人們的巧智得以發展，甚至還會激發人民的反叛之心。因此，他提出要使“聲服無通於百縣”，不許老百姓聽音樂。這樣，人民就會“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必墾矣”。《商君書·更法篇》說：“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商鞅這一思想在秦統一後成為了管制輿論的工具，以致於發展到老百姓“偶語棄市”（兩個人在一起議論國事就砍頭）的苛法。商鞅把不利於農戰的“禮樂，《詩》《書》，修善、孝弟，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說成是“六虱”，是“亡國之俗”；主張加以滅絕。這實際上是用法家所主張的法令來統一思想，取締其他各家學派，由此而提出“燔《詩》《書》而明法令”。商鞅燒詩書，是春秋戰國時期學術自由黃金時代開始沉沒的先兆。後來發生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罷黜百家，國人思想空間幾乎喪失。

前 338 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即位。公子虔等人誣告商鞅謀反，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出走魏被拒，轉回商地起兵攻鄭，因寡不敵眾，失敗被俘。在彤鎮被處以“平裂”之刑（即五馬分屍），家族也全部被殺。然而，商鞅所實行的改革，卻一直延續下來。

韓非鼓吹弱肉強食：“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於氣力。”戰國後期，七國之間的競爭就只剩下武力和經濟實力。國與國之間就是弱肉強食，

沒有道理可講。

韓非視民為愚人，他說：“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剔首座，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

韓非進一步提出所有人的思想方式和言論準則都要“以法為本”；“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韓非認為：“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說疑》）。他主張不僅行動自由當禁（“禁其行”），集會結社自由當禁（“破其群以散其黨”），言論出版自由當禁（“滅其跡，息其說”），就連思想情感的自由也當禁（“禁其欲”）（郭沫若《十批判書·韓非子的批判》（1959年 P335）。嚴厲地統治到行為、到言論、到心裡、到潛意識裡。真是世界上最早熟、最嚴密的極權統治術！法家主張以統一思想為要務，不僅要“禁言”、“禁行”，還要“禁心”。“禁心”是最重要也最有效的方法。最後要達到以君心為臣心，處處“以上為意”，“心出一穴”，就是使人們都失去思考能力和欲望，只知盲目服從。其結果也就對社會活力的禁錮到了極端的程度！他主張控制輿論，統一思想，殺戮學者，實行文化專制，“不為君用”是獨立罪，“二心私學”是思想罪。對於知識份子要“破其群”，“散其黨”，“禁其欲”，“滅其跡”，這真是法西斯主義的獨裁理論，為害中國兩千多年！

為了把遵法守令、聽從君主長官指揮和學習結合為一體，韓非提出了“以吏為師”。從教育的角度講，“以吏為師”與當時流行的以賢為師有重大的區別。以賢為師看重的是知識、認識和道德。“以吏為師”把知識、認識、道德等內容拋到了一邊，使教育完全變成了專制君主的從屬物。這當然不利於人們對知識的

追求和探討。

總之，法家就是要使人民只知道服從、聽命，此外，不得有任何知識與想法。法家的弱民主張最清楚不過地表明，法治是要人民變成法的奴僕，而法又牢牢掌握在君主手中。

人類不同於動物的之處，是人類有能動的意識活動、有豐富的精神生產，把法作為人們的行動規範，從法學觀點看，是合乎邏輯的，但用來限制人們的精神自由就過分了。韓非講的法集中體現了專制君主的意志，把人們的精神生活統統限制在這樣的法令之內，不准有與這種法令相違背的精神生活和超出這種法令的新思想的產生，這是十足的文化專制主義。

韓非將政治總結為“法、術、勢”三個方面的內容。“法”就是商鞅推行的嚴刑峻法；“法審則上尊而不侵（法律嚴酷則君主不受侵犯）”。“術”即申不害鼓吹的統治手段——權術。韓非公開地鼓吹邪惡，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要善於用權術駕馭臣下，要“藏於胸中，以偶眾端（配合各種手段），而潛禦群臣（暗中操縱群臣）”；要將自己的意志、情感、心理深藏於內心；使臣下不可窺測，視之以神秘；才有精神上的威懾力量，也就是所謂“天威不可測”。如：大將將出征，為防止他擁兵自重，謀反投敵，可將他的妻兒親戚接來“關照”，作為人質；可用高官厚祿暫時穩住恃功而傲者，以後再加以“收拾”；可使臣下相互牽制，來抑制不滿；名實相符，抓住了把柄，就可殺掉他；殺而無法向天下交代，就偷偷放毒。而“勢”則是法家重勢派人物慎到鼓吹的權勢。他認為“賢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君主擁有了絕對權勢，就能治理好國家。所以，“權勢不可以借人”，“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欲為其國，必伐其聚（打擊結黨拉派，聚議朝政者）”。以上三個代表人物的理論，在韓非的思

想裡得到了綜合、總結與發揚。

韓非把國家視為君主的私有物，從而把君主獨裁說推向了新的高峰。《外儲說右上》說：“國者，君之車也。”國家只是君主的一具馬車。韓非描繪的君主專制的格局是這樣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要”即是樞紐、關鍵，即是國家最高權力；只要君主執掌了國家最高權力，“抱法處勢”而治，則天下人不敢不歸服效勞。君主“獨制四海之內”，臣屬“遠在千里之外，不敢易其辭”。“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管子·君臣下》也描繪了類似情景，“千里之內，束布之罰，一畝之賦，盡可知也”。韓非主張君主要獨斷，聲稱“獨視者明，獨聽者聰，獨斷者可以為天下主”。

君主只能有一個，這是實現專制的前提。韓非認為：“凡物不並盛”，“夫妻執政，子無適從”。韓非把兩個天子視為一個巢中的兩個雄性動物，進而提出“勢不兩立”的觀點。他說：“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不同政治派別是“不可兩存之仇”。君臣之間是“一日百戰”。他告訴秦始皇，人是一種本性卑劣的動物，不值得尊重也不能相信。因此，一方要吃掉另一方或壓倒另一方。1) 如果能吃掉的，吃掉是上乘，比如：韓非把學者、言談者、帶劍者、患禦者、工商之徒稱為“五蠹”，主張嚴加取締，直至滅身。韓非認為，稱頌古聖者都是借古諷今主。《忠孝》說：“為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是誹謗其君者也。”為了挑起君主的猜忌，又說諸子百家稱頌堯、舜是鼓動人臣造反。韓非認為堯、舜、湯、武都是人臣篡主之輩，“堯為人君而君其臣，舜為人臣而臣其君，湯、武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屍。”這些人哪裡是什麼先聖，都是奸劫弑臣。儒、墨歌頌這些人，分明是鼓動人們犯上作亂，“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

於是要求君主採取株殺學者、投毒暗害、特務盯梢、扣押人質、連坐誅族、重刑峻法等法西斯手段，取締儒、墨等派，直至滅身。於是“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以後的子孫中，即使出現了不肖的人主，臣下也不敢侵犯他。這種制度設計，為皇權的萬世一系做好了準備。2) 有些不能吃掉，如君對臣民，但君一定要控制住臣民，使之懾服。統治天下的方法就是“執長鞭以禦宇內”，就象對待牲畜一樣。他說：“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鳥……馴鳥者斷其下翎，則必待人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為了做到吃掉另一方或壓倒另一方，必須依靠實力，“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為了務力就要提倡耕戰，把握住法、術、勢，使力量和權力集中于君主之手。“勢者，勝眾之資也”、“當今爭於氣力”、“用計算之心以相待”。將君主的利益設定為與臣民對立的地位上，並用尊君和加強君主權勢的辦法來鞏固君主的地位。法家理論的主旨，就是以力服人。以鎮壓為主要手段，鼓吹強權政治。這個思想體系，是世界上最早、最完整、最極端的專制主義理論學說。這一整套理論，卻正好搔到了嬴政的癢處。他在讀了韓非的文章後說：“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可見暴君和法家人物是多麼地心有靈犀，臭味相投！當然，這並不會妨礙他在聽信讒言後，輕易地便將韓非處死。其實暴君的內心深處，對這些品質惡劣的政治動物也是鄙視和不信任的。這就是歷史上的暴君與酷吏，千古不易的關係辯證法。是中國歷史軌跡在法家人物的影響下發生偏移後，極具諷刺意味的歷史規律。

大規模的征戰與殺戮，恰恰是從法家人物主持秦國政治開始的。商鞅為獎勵軍功，他在變法過程中還重訂軍功爵二十級，每個人都可以一級一級往上升。你

只要斬敵方一首級就可以升一級為公士，給你一頃田，相當於現在 100 畝，5 畝宅基地，還有一個奴隸。如此類推，一直到五個，就是五頃畝、25 畝宅基地；**斬敵首級 6 顆**就開始給你食稅，砍了九個腦袋，可以將三百家的稅作為你的俸祿，一直到第 20 級。**並按爵位高低授與種種特權，包括犯罪也可減刑的特權。**在這樣的制度下，秦人嗜好戰爭：突然聽說要打仗了，秦國的大街上，咸陽的大街上，那些小夥子蹦著、跳著，像過節一樣。因為他們有機會發財了，只要砍下一個敵人的腦袋，就可以從貧民變成小地主，再砍一個就變成中地主，再砍一個就是大地主了。所有的壯漢、所有的小夥子都像期待一個節日一樣期待著戰爭。秦國的士兵上了陣，本來還有盔甲，結果他們一脫光著膀子，就蹦跳著殺過去，他們左手提著人頭，右胳膊下夾著俘虜，追殺自己的對手。司馬遷記載：秦國攻魏殺 8 萬人，戰五國聯軍殺 8 萬 2 千人，伐韓殺 1 萬人，擊楚殺 8 萬人，攻韓殺 6 萬人，伐楚殺 2 萬人，伐韓，魏殺 24 萬人，攻魏殺 4 萬人，擊魏殺 10 萬人，又攻韓殺 4 萬人，西元 293 年，白起大破韓國、魏國聯軍于伊闕（今河南洛陽縣龍門山）僅殺掉的韓魏兵將便有足足 24 萬。

前 262 年長平之戰——秦趙為爭上黨，戰爭持續了三年。趙投入兵力 45 萬，秦則至少投入兵力百萬，至若最後總包圍趙軍，即秦昭襄王親趕赴河內發年 15 以上悉詣長平之時，秦投入戰爭的人數就更非止百萬了。秦軍久攻不下，使用反間計，使趙軍撤下廉頗，任用了紙上談兵的趙括為帥。趙括到達長平之後，完全改變了戰略防禦的方針，全線進攻，進入秦軍早已布好的包圍圈，被困在長平達 46 天，人乏糧絕，人與人相食，四次突圍都沒成功，趙括也被亂箭射死。40 多萬投降的趙軍全被白起坑殺。秦則“死者過半，國內空”，當亦戰死 50 萬左右，即雙方將士死亡將近百萬。隨後秦又攻韓殺 4 萬人，又攻趙殺 9 萬人……這在當

時的人口基數上，是多麼可怕的殺戮！自秦以後，中國歷史上不斷出現的大規模，特大規模的屠殺，是秦國開了一個極其惡劣的歷史之頭！山東六國稱秦為虎狼之國，是名實相符的。自此以後，從底層打拼出來的新統治者，許多都選取了這個歷史經驗，通過大規模的屠殺以樹威。這已經成為許多中國統治者的思維定式。

世界歷史上與之相對應的歐洲希臘的奴隸制民主政治的城邦，以及後一點的羅馬共和國，都沒有產生這樣的結果。這是中西方歷史最大不同的開始。作為東方文明中心的中國。在幾個功名利祿之徒的法家人物影響下，就如此輕易地改變了世界東方板塊的歷史進程，從而也改變了中華民族的命運。這種歷史的偏移，是禍是福，其實歷史已經不斷地做出了回答。

秦王朝的建立，是法家人物幫助嬴政建立了一個“贏者通吃”的政治制度。這個贏者可以澤及子孫千秋萬代。不管子孫們是否有本事繼續“贏”，他們的地位已註定了他們總是贏。除非有一天一切推倒重來，進行一次新的權力博弈。“嬴政也者，贏者通吃之政治之謂也”，這真是一個巨大的歷史的黑色幽默！中華民族用了二千多年仍未能讀懂它。

雖然在我國歷史上，也曾有人懷疑過這種制度。例如：黃宗羲就曾說過：“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說過：“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王夫之點出過，皇權是“以天下私一人”；譚嗣同說過：“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但是這些思想的閃光，都只是鳳毛麟角的閃光，片斷的閃光。既未在中國人的思想意識裡形成印象，也未能從根本上觸動頑固的權力文化，從而也未造成大的社會影響。君不見，歷史進入 21 世紀，而中國大陸“勸君少罵秦始皇”、“勸君少刺秦始皇”的鼓噪又甚囂塵上起來了嗎？

3 · 儒家的愚民思想

孟德斯鳩說：民主政體的基礎是公民的品德。因此，民主的實質就是神主。他的反面是專制、人治，它不需要什麼品德，它的基礎是恐怖。但長期專制，單靠恐怖是不夠的，還需要加上欺騙。僅僅控制了人的肉體，是低檔次的。要想使專制政權長期穩定，還必須控制人的靈魂，實行愚民政策。愚民政策有兩手：消極的一手是防堵，如焚書坑儒；積極的一手是引導，定思想於一尊，欽定學術為獨木橋，並誘之以功利，同樣可達到愚民的效果，而且顯得更高明。儒教就是控制人們靈魂的高級工具。孔子及儒家學說重視教化、教民，不是簡單的“愚民”，而是通過教化達到奴化人民的目的，這正是孔子及儒家學說的高明之處。

孔子認為：古今之民都是愚昧的。不過“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對於這些惡劣的愚民，即使施之教育也無法好轉，這就是“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中庸之為德，民鮮久矣”。既然民眾是“下愚”且無法改變，那就只能搞不透明的神秘政治，實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了。這種既愚且詐之民雖難改變愚性，仍可通過忠孝之道的培養，去其狡詐，返歸愚直，這樣的愚直之民才最易統治，所以孔子說“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主要表現在：布衣庶民沒有發言權，需要由“吏”來教化；上層勞心者不僅佔據權力，而且佔據真理與尊嚴；血統論（文革中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是也）。這句話中“唯”字有問題，“不移”的何止“上智下愚”哉？

孔子的愚民思想表現在他要求人們安於貧困上。孔子極稱譽顏回，因顏回能安於貧困。孔子告誡人們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在等級制下，庶民哪有求富貴之道？這些人只能老老實實、安分守己、安於貧困、樂於接受統治；沒有非分

之想，不會因生活的困苦而鋌而走險，走上反叛的道路。像這樣的“愚直”之民，就是孔子所理想的治世之民。

儒家既不關注人，也不關注人的智慧和天性，更不關注世界的變化和規律；只關注聖人如何治理愚人，愚人如何服從聖人；最高境界是愚人對聖人的絕對服從，下層聖人對上層聖人的絕對服從。服從就是消滅服從者的智慧，絕對服從就是絕對消滅聖人外的一切智慧。

正是為了讓“賤民”、“小人”歸於“順民”，儒士們費盡心機建立起一套“教化”倫理。為使這套稱為“思想之聖”的“教化”倫理得以實施，儒士們又要求“聖君”作為這套倫理的載體，作為“天理”的化身，讓他擁有最高的政治權力。這就是專制主義鐵的邏輯。

統治者以等級尊卑觀念“教化”民眾，本身就是對民眾身心的奴役；處處將人作為等級尊卑秩序的工具，從而“使人不成其為人”。儒家要把人修成一個等級制的人，要把國治成一個等級制的國。它要把每一個家庭變成一個類似於君臣關係的專制社會。

4·獨尊儒術、政教合一

西元前 478 年，即孔子死後的第二年，魯哀公下令把孔子的故居立為廟。皇家祭孔始於漢代，劉邦於西元前 196 年 11 月過山東曲阜時，用太牢（牛羊豬三牲）隆重祭祀了孔子。

漢統治者意識到：禁錮臣民的思想不是禁止他們思考，灌輸給他們有利於集權統治的思想最高妙。這就像對付驢子，不把驢子捆起來，而是蒙住他的眼睛，讓它在那里拉磨轉圈。統治者讓人拉的磨，就是儒家思想，轉的那個圈，就是西元前 134 年漢武帝搞得“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柏洋說：經過一百多年，到了

東漢，成了一個模式。那個時候規定，凡是知識份子，不論他的思想、講學、辯論，都不可以超過“師承”。必須按照老師指定的範圍寫，否則就是違反法條：這是古代的框框。學生只可圍繞著老師所說的話團團轉。如果講得太多，超過老師，那就無效，而且有罪。不過漢王朝時的罪並不嚴重，但是到了明王朝、清王朝，如果官方規定用朱熹的話解釋，就絕不可用王陽明的話解釋，根本不允許獨立思考，他們已完全替你思考好了。時間一久，知識份子的思考能力衰退。由於沒有思考能力，因之也沒有想像能力；由於沒有想像能力，因之也沒有鑒賞能力。

秦始皇的統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讀書，他的手段是刑罰制裁；漢武帝的統一思想是要人民唯讀一種書，他的手段是利祿的引誘。結果，始皇失敗了，武帝成功了；孔子成為“萬世師表”。後來的帝王們深感儒家文化為鞏固皇權居功至偉，於是孔夫子被歷代皇帝不斷加封，直至得到“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諡號。唐太宗貞觀四年（630年），令全國各州縣建立孔廟；到唐高宗，又下令督促“州縣未立廟者速事營造”，至此，“孔子之廟遍天下矣”，接受後世乃至今人的磕頭下跪。

儒家以道的原則約束王權，究其實不過是用理論約束權力。人類文明史證明，只有權力才能制約權力。因此儘管儒學大師們反復論證“道高於君”，在現實生活中道最終難逃王權的控制。儒家在高論之後，常常不得不認可現實。於是提出道是由聖君制定的。《中庸》說：“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只有聖君兼具德與位，才具有制定道的資格和能力。所以荀子說：“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張載也說：“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儒家還認為，道的實踐最終系于君主一身。

《管子·君臣上》說：“夫道者虛設，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石介也

說：“聖人存則道從而隆，聖人亡則道從而降。”既然儒家把道的制定與踐行的權力一併奉與聖君，那麼聖君便理所當然成為道的最高主宰，正如荀子所言：“聖人者也，道之管也。”由此，儒家們得出結論：遵道與從王是統一的。《洪範》說：“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如果說“王道”是最高層次的行為準則和認識標準，那麼道的主宰者——王就成為人們認識的最高權威和終極裁判。正如董仲舒所說：“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為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每個王未必是聖，但他們有權自封是聖主，歷史上許多荒淫殘暴的君主都戴上了聖冠，所以王在實際上把握和控制著道。

思想準則既然是帝王所確認的，那麼，當思想界出現重大的理論分歧時，最終也要由君主裁定。自秦始皇定下了“以吏為師”（實質是以帝為師），“別白黑而定於一尊”，真理的裁判權就歸屬了皇帝。兩千年來，官吏一直充當民之師、官吏是“為師”的充要條件，未取得“吏”的資格，是不能說三道四的。至於普通意義的“老師”，所要做的不過是重複“吏”的話而已。漢武帝時因封禪之禮眾儒生爭論不休，當時著名儒生兒寬上疏曰：“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群臣之所能列”。從漢武帝始，由皇帝裁定經學的是非成為慣例制度。

比如著名的石渠閣會議和白虎觀會議，都是在君主的主持下召開，按君主的旨意作結論的。石渠閣會議。漢宣帝甘露三年，為平議《五經》異同、統一經義而召開的御前會議上，宣帝親自參加，並對討論的問題作出最終裁定。“詔諸儒講《五經》異同，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石渠講論的奏疏經過彙集，輯成《石渠議奏》一書。又名《石渠論》。所輯奏議共 155 篇，今俱佚。白虎觀會議。東漢章帝時期，曾在白虎觀召開經學討論會議，“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於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室甘

露石渠故事，（由班固執筆）作《白虎奏（通）議》”。章帝批准後頒行天下。以後歷代的法典，唐、宋、明、清的律例都繼承了《白虎通議》，將三綱六紀作為貫穿始終的東西。百姓犯了罪，按照身份的高低、親疏關係來定罪。

自武則天開始親自殿試以選拔知識份子任官後，皇帝更成了最有學問的人。韓愈奴顏婢膝地說：“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柳宗元說：“身體髮膚，盡歸於聖育；衣服飲食，悉自於皇恩”。他們認為自己的一切知識都是皇帝賜給的。奴性之毒，深入骨髓（把他們言論中得“聖”、“皇帝”換成“黨”，可和黨文化歌頌黨媲美）！

朱元璋吹噓自己“未嘗從師指授，然讀書成文，釋然自順，豈非天授乎”（“翦勝遺聞”）！並把他的話編成四本“大誥”，下令家家戶戶必備，天下百姓必讀，每隔三年，京城比賽背誦“大誥”，人數多達 19 萬餘人。這是古代規模最大的背誦皇帝語錄的運動。

明代朱元璋制定的與以往具有極大差別的科舉考試制度，將“經義取士”推向極端，使我國知識份子終至形成了範進中舉和孔乙己式的心態與面目。清代康熙皇帝不僅親自講學，而且還頒佈了“十六條聖諭”，被懸掛于各學堂，成為儒生士子學習的守則。清朝的科舉，童試就有一種題型叫“聖旨默寫”，要考生把皇帝的名言默寫下來。而且規定，如果這個不合格，就算其他答的再好也不錄取。可見，儒學這個權威是靠政治權力豎立的，儒家思想的傳播實際上是皇帝意志的貫徹。張居正公開說過，孔子不能自樹門牆，與時君之教相左。也就是說，即使儒學的祖先在世，也只能做一名誠惶誠恐地效命時君世主的臣子。

君主對儒生們的要求就是作忠臣，唯君命是聽。雍正說：“使孔孟當日得位行道，惟自盡其臣子之常經，豈有儒生要自做皇帝之理？”可謂一語道破儒家思

想的真諦。君主擁有權勢，又把持著道，自然總是處於“聖明”之位，所謂“人主無過舉”，是非裁定全憑君主一語定乾坤。君主有權隨心所欲判定思想罪。人們的認識稍稍不合君主的心意，便會被冠上種種罪名。中國歷史上層出不窮的文字獄，恰恰說明了權力高於原則、王主宰著道。

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成功的聖人毛澤東統治全國27年，他把皇帝改稱主席、統帥，把聖人改稱領袖、導師，成了一個極其偉大的政教合一者，超過了歷朝歷代的皇帝聖人。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書經·秦誓》）。

“作之君”，君王擁有軍政財稅大權；“作之師”，君王有壟斷真理的大權，沒有一個皇帝不喜歡當老師的，其一言一行，都要寫進“起居注”，作天下的楷模。蔣介石最喜歡被稱呼為“校長”，毛澤東覺得“偉大的導師”最適合自己。可見，中國自古就搞政教合一的專制主義。

柏楊說中國的幹部是三作牌的幹部，就是“作君、作親、作師”，就是說中國幹部既要給老百姓作領導，又要給老百姓作家長，還要給老百姓作老師，就是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這叫三作牌的幹部。就是什麼都管，你不想他也管。

《詩經》裡說，“樂只君子，民之父母”。這君子就是官員。中國的老百姓一到當官的面前，就把自己當成官員政治上的兒子了。政治父子關係，被古希臘認為是野蠻無理性的體現。

“作之君、作之師”的帝師合一表明政治權威支配了思想，其最大危害便是思想加盟政治權威，使社會良心泯滅，社會失去對制度的反思能力。這一墮落是文明墮落，其直接後果是集雙重權威于一身的個體失去了起碼的社會道德壓力，同時使制度失去起碼的客觀的評價標準。在動盪的年代，它使制度失去起碼的穩

定；在僵化的年代，它使制度失去進化的動力。這種動盪和僵化的兩極都能產生社會災難。

康曉光說：“歷史上儒家是一個最成功的宗教。皇帝就是它的教皇，整個政府就是它的教會，所有的官員都是它的信徒。官府之外，統治社會的士紳也是儒家的信徒。老百姓也要接受儒家教化。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政教合一、教教（宗教和教化）合一的體制。” 儒教沒在政權組織以外建立獨立的組織，政權組織同時也就是儒教的宗教組織。君主不僅是國家元首，同時也是最高的教職，是天子，是“聖上”，在最隆重的祭天大典上，擔任主祭，是教皇；他手下的眾官僚，按級別依次為樞機主教、宗主教、都主教、總主教、主教、神甫等，還未做官的秀才是修士，每個家長則是一個家庭的長老。這個體系中的每個人都尊奉儒教信條，並高度自覺地向自己的臣民、老婆、孩子灌輸儒教，以使天下大順。

儒教類似伊斯蘭教，而和基督教的情況不同。基督教是從民間發展起來的，它不得不在國家政權組織之外建立自己的組織。由於具體的歷史條件，在基督教世界形成了政、教兩套獨立的組織體系。伊斯蘭教誕生不久，就用武力取得了許多地區的國家政權。這樣，他就直接通過國家政權的組織系統去貫徹自己的教義，而無須另立組織。

儒教是一種純粹政教合一的拜人的宗教。權力與教化合一使得權力即教化，從而權力成為自我闡釋的不證自明之物，從根本上排除了任何實質性的批判與審查。孔孟之道實用主義色彩較重、唯利是圖、唯上是從，不知道真理為何物，只能搞以吏[儒]為師的政教合一。

“獨尊儒術”以後，從理論上說，國家官吏只能由儒者充任；儒者要行其政教，也只有出仕。出仕後不僅行政，而且也能更好的行教。不僅管理和教化民眾，

而且擔負一定的宗教祭祀任務。儒教還建立了龐大的教育系統。學校的教員和管理者由儒者充任，被稱為學官。學官也是國家官吏的組成部分。學官除教授學生和進行正常的祭孔任務外，在國家祭祀中，要充當贊相之類的任務。學生則是國家的後備官員。

第 20 節 迫害思想的“口禍”

文禍的原因在於對語言文字的迷信。巫教意識形態以為吉言或讚語可使人得福，逆言或咒語可使人得禍；所以，對逆言或咒語採取了野蠻手段。

夏桀生性好淫而兇殘，他下令大造宮室瑤台，用美玉輔設牆壁，用金銀架設廊柱，耗盡國庫；派人四處搜求美女，凡民間長得漂亮的女人，勿論婚嫁與否，一律押解進宮，供他晝夜淫樂。“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展噪於端門，樂聞於三野”。他把數以萬計的侏儒和音樂雜耍人員弄進宮中，為他表演滑稽和雜技節目，致使夏朝宮內日夜笙歌不絕。

他別出心裁地佈置肉山脯林，在旁邊挖掘了若干個大池，池中灌滿美酒。酒池可以運船；糟丘十裡。然後召來三千名彪形大漢，要他們比賽喝酒吃肉。那三千大漢被酒肉灌得臉紅筋脹，有的實在透不過氣來，停下想歇一會兒，便被站在旁邊的武士一刀剝下了頭顱。於是一個個拼命硬吞牛飲，很快便醉得東倒西歪，紛紛跌入大池中淹死了；而那些倒在肉山脯林下的醉漢們則被一一砍下了腦袋。屍橫遍地，血盈酒池。

面對夏桀的荒淫暴虐，群臣悚懼，不敢勸諫，只有上大夫關龍逢敢於犯顏直諫說：“為人君身行禮儀，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夏桀說：“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龍逢搖頭長歎說：“君王自比太陽，你可聽

見民間歌謠說：‘太陽啊！你什麼時候墜毀，我們寧肯和你一同滅亡！’”夏王桀勃然大怒：“你竟敢咒罵孤王。請嘗嘗炮烙的滋味兒。”

桀大喝施刑，四名武士用鐵索套住赤身裸體的龍逢的四肢，把他抬到燒得泛白的銅柱邊，然後一聲吶喊，猛的讓龍逢當胸抱住銅柱，四肢及全身緊貼炮烙。龍逢一聲慘叫頓時斃命，那血肉之軀被燒得青煙騰騰，頃刻間便成了一副發黑的骨架……

殷紂王和蘇妲己日夜在宮中享樂作長夜之飲。廚師因為熊掌沒有煮透，紂王便親手殺死廚師。紂王還有一些奇特而殘忍的愛好，那就是把人的腳脛砍斷砸破，以便觀察裡面的骨髓；還把孕婦的凸腹剖開，以觀賞那閉目捲曲的胎兒；他還喜歡看把人推入虎圈，老虎是如何咬噬人體的。大臣若有規勸他的，他便學夏王桀的辦法，施以炮烙刑。紂的叔父、大臣比干苦心勸諫紂王改弦更張，竟被紂王下令挖心剖肝而死。

中國古有“愚民”一詞，《左傳》有言雲：“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還有“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可見，愚弄人民，使民愚昧，古已有之。從來就沒有人覺得人民有什麼值得尊敬的，只知道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如果人民都成了傻子，這個“川”防起來無疑能夠更方便一些。

《國語》載：“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謗矣’ ”。

當時，邵公曾苦苦地勸他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

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這段話的意思是：堵塞人民的言路，比建造堤壩來堵塞河水還危險。用堤壩堵河流，水道壅塞，一旦潰決氾濫，那死傷的人就多了。民也象水一樣。所以，治水的人一定要排除壅塞使河流暢通；治理人民的人，一定讓人民發洩、盡情說話。……人民所發表的言論，是經過他們的深思熟慮後才說出來的，怎麼能夠加以堵塞呢？假若你一定要堵塞，又能夠堵多久呢？

剛愎自用的周厲王哪裡聽得進去？暴君總是過高估計了自己的力量，結果鎬京的平民們忍無可忍，於西元前 841 年拿起了武器殺入王宮。周厲王嚇得狼狽逃竄，被流放到彘（今山西霍縣境內），死在那裡。國人又圍太子靜于召公之所，召公以其子代，太子得免，國家一時無主，於是出現“共伯和幹王位”的局面，簡稱“共和行政”。14 年後厲王死，仍以其子宣王世襲王位，最後換一個君主而已。據宣王時的銅器銘文載，參與國人暴動的有“師氏人”、“正人”等貴族官員，可以說這場政治鬥爭是國人在一些貴族官員率領之下的行動。郝鐵川經論證後指出：“所謂‘彘之亂’，就是以共伯和、師氏和官吏為首的奴隸主貴族推翻厲王統治的一場內亂，不是什麼平民革命和工商業者起義”（郝鐵川：《西周的“國人”與“彘之亂”》，《河南師大學報》1984 年第 1 期）。還有學者認為，此次暴動最後流厲王於彘，“是共伯和、召公虎、固定公、芮伯、凡伯等王室改良派大臣利用民眾憤怒情緒精心策劃的結果”（楊東晨、楊建國：《西周晚期“國人暴動”新論》，《學術月刊》2002 年第 10 期）。

相類事件在春秋時期也時有發生。由於國人並非是一個有著共同利害關係而目標一致的平民團體，不存在西方古代平民階級為爭取平等權利而進行的有關鬥爭內容，中國此類政治鬥爭的思路只能以換君主（家長）的方式予以解決。

清代詩人吳梅村道：“倉頡夜哭良有以，受患只從讀書始。”韓非子說：君主一定要禁錮臣民的思想，使他們只服從命令，不亂說亂動。秦始皇實踐禁錮思想的第一步，就是殺掉韓非本人。等他統一後，他在全國禁錮臣民的思想；他害怕不利於永久統治的文字傳開，就搞大規模焚書恐怖活動。終於達到“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道路以目”的程度。秦始皇不允許臣民隨便對他說三道四的，甚至宮中的一切也不能洩露。據說秦始皇曾行幸梁山宮，從山上望見丞相車騎甚眾，“弗善也”。身邊侍從有人私告丞相，丞相隨即減損車騎。於是，“始皇怒曰：‘從人泄吾語’；案問，沒人承認。於是，便把身邊侍從全殺了。當時，皇帝的一切都是國家機密，就連皇帝走的路都是複道，御用道路與公用道路分開，而且御用道路兩側還築有高高的壁牆，其行蹤不為臣民所知（王子今文《秦漢甬道考》，文博雜誌 1993 年 2 期）。此後“宮禁至重”、“深居簡出”是整個專制時代最高統治者的行為慣例。有許多人因為洩露後宮的政務被處死或被迫自殺。

統一本來就不應該是人類社會發展追求的最重要的指標，更不應該是民族國家追求的“唯此唯大”的目標。中華民族對“統一”的過於執著的追求，是大一統極權思維教化的結果。秦王朝的極端控制的統一模式，全面地扼殺了中華民族的發展活力。秦代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貧乏的朝代，思想家未出現一個，就連好文章都沒有留下一篇。《古文觀止》中僅有李斯的《諫逐客書》一篇，還是秦滅六國前寫的。

漢武帝時，由於連年對匈奴用兵，國庫空虛。漢武帝為了籌錢，發行了一種皮幣（上林苑中白鹿之皮），漢武帝向大農令顏異徵求意見。顏異表示反對。恰逢有人因別的事控告顏異，漢武帝便命張湯受理此案，而張湯調查得知：顏異曾

與客人交談，客人說起朝廷政令多有不便，顏異“微反唇”，即嘴唇略微動了一下。張湯據此上奏，說顏異身列九卿，見政令不便不向朝廷奏告，而私下“腹誹”（在心中誹謗），於是處以死刑。真是欲加以罪，何患無詞！連肚子裡怎麼想都成了一種罪證。

西漢時司馬遷的外孫楊惲被朝廷免職後，作書：“田彼南山，荒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宣帝以“荒穢”等詞誹謗朝廷，誅之；妻女被放逐酒泉，族人及朋友都遭貶。

東漢末年，白馬地方縣令李雲上書勸諫漢桓帝要勵精圖治，否則將“帝欲不諦”（“諦”是精明的意思），結果被殺。

“寧使我負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負我”的曹操殺了孔融（並滅其族）、楊修、華佗等名士。魏晉之際，“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性格耿介，寫有《與山巨源絕交書》，“每非孔孟而薄湯武”，拒絕為官，被司馬昭政權以“言論放蕩，非毀典謨”的罪名處斬。司馬氏還殺了張華（被夷三族）、陸機等名士。同時代的阮籍也生性疏放，為避殺身之禍，只好故意“口談玄遠，都不關人事”，才沒有遭到身首分離的禍害。

晉武帝司馬炎曾同大臣劉毅交談，司馬炎問劉毅說：“卿看寡人似漢朝哪位皇帝？”劉毅直率地回答說：“陛下同桓、靈二帝十分相似。”司馬炎陡然變色，質問道：“寡人平定吳國，統一天下，功比天高，你竟然把我比做桓、靈兩個昏君，是何道理？”劉毅冷笑道：“桓、靈之所以是昏君，就在於他們賣官鬻爵，而陛下不也這樣做麼？更何況，桓、靈賣官，錢歸官庫，而陛下賣官，錢入私囊。從這點看來，陛下還不如桓、靈呢”。把晉武帝司馬炎噎得直喘粗氣，他喝令武士把劉毅推出午門斬首，在眾官的求情下，劉毅被改為監禁天牢。

晉時“動輒滅門”，有個叫周嵩的人，僅僅因為批評皇帝周圍有“碌碌之臣”而被棄市。

崔浩寫北魏國史，備而不典，寫了鮮卑人同姓婚、紮辮子等；西元 450 年崔浩全家被殺，與他同宗的崔氏全部被殺，婚親盧氏、郭氏、柳氏，統通被殺。一樁文字獄殺盡四大望族，這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空前絕後的。

隋煬帝忌妒名聲顯赫的詩人薛道衡，於是羅織罪名，說薛的《高祖文皇帝頌》讚美先朝，意在誹謗本朝，殺之。中唐年間，北方天旱遭災，官吏隱瞞實情，向百姓追逼租稅，農民疾苦不堪，伶人成輔端寫“何其如此賤田園”等詩句以紀其慘狀，被唐德宗下令杖殺。

宋代的蘇軾因“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門前惡語誰傳去，醉後狂歌自不知。刺舌君今猶未戒，炙眉吾亦更何辭”；“我本麋鹿性，諒非伏轅姿。聞聲自覺聚，那復受繫維”等引發了“烏台（相當於現在的監察機關）詩案”。蘇軾為此還差點丟了性命。

五代時，一書生向吳越王錢鏐獻詩，中有“一條江水檻前流”之句，錢鏐認為“前流”是自己姓名的諧音，有譏諷之意，下令處死獻詩的書生。

明清時的文字獄達到了頂峰，讀書人更是匍匐於皇權的腳下，知識界一片黑暗。

洪武九年，朱元璋因天文出現星變而“詔求直言”，遂有言臣信以為真，上疏指出由於朱元璋的暴虐，使“小民不知孝悌忠信為何物，而禮義廉恥掃地矣”。朱元璋一聞此言，立刻將上疏者押至面前，親自將其射死以泄怒氣。

由於他出身貧賤，當過盜賊、和尚，對別人的言辭就特別敏感。林元亮的《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句；林伯瑾所寫的《賀冬節表》內有“垂子孫而作則”，

“則”與“賊”同音；蔣鎮的《正旦賀表》內有“睿性生知”句，“生”被讀作“僧”；許元的《萬壽賀表》內有“體幹法坤，藻飾太平”八字，“法坤”被讀為“發髡”，“藻飾太平”當作“早失太平”；徐一夔的賀表內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光”被附會剃光頭，把“聖”附會為“僧”；周冕的《萬壽賀表》內有“壽域千秋”，“壽”被附會為“獸”；吳憲的《賀立太孫表》內有“天下有道”，被附會為“天下有盜”；睿因寫“遙瞻帝扉”，“扉”與“非”同音；林雲因寫“式君父以班爵祿”，“式”與“弑”音同；都被處死。

王子之師張信以杜甫詩“捨下筍穿壁”為字帖教寫字，朱稱“堂堂天朝，何譏諂若此”！遂斬之。一和尚寫謝恩詩“金盤蘇合來殊城，玉碗醍醐出上方”，“殊”被析為“歹朱”，殺之。魏觀請名士高啟作《上樛文》，文中有“龍躡虎踞”四字，魏觀和高啟被腰斬。張尚禮寫宮怨詩：“庭院深深晝漏清，閉門春草共愁生。夢中正得君王寵，卻被黃鸝叫一聲”。朱“以其能摹圖宮闈心事”，遂“下蠶室死”。僉事陳養浩有詩歎道：“城南有嫠婦，夜夜哭征夫”，朱“以其傷時，投之于水”。……因文字獄死之人何只數千。

馬皇后腳大人人皆知，因這雙大腳，引出一樁血案。一年元宵節，出來一張漫畫，一個大腳女人，赤腳、懷裡抱了一個西瓜，到處傳的起哄。正巧朱元璋微服訪問，一見大怒，一時查不出誰幹的，下令把這條街的人全殺了。

即使沒有文字上的把柄可抓，朱元璋也會找其它藉口殺人。洪武三十年發生的“南北榜”案件就是這樣：是年會試，由翰林學士湖南人劉三吾和白信蹈主考，結果是江西人宋琮考了第一，全榜無一北方人。於是北方舉子們紛紛向朱元璋告狀，說劉三吾和白信蹈偏袒南方人。朱元璋又命侍講張信複查試卷，結果北方人還是沒有合格的。不料又有人告發說張信是受了劉三吾的囑託，故意搞的鬼。朱

元璋盛怒之下，將白信蹈和張信斬殺了，對劉三吾則念其已經 85 歲高齡，免死充軍邊地，會元考生宋琮也充了軍；然後朱元璋親自出題，錄取了 61 名，全是北方人。對這一冤案，吳晗揭示了朱元璋的把戲，原來他是為了籠絡北方士人，所以不惜以南方士人的生命與前途來作犧牲。

朱元璋的文字獄從洪武十七年一直持續到二十九年。在長達十三年的時間裡，只有一位姓張的翰林院編修因言獲罪後，搬出了孔子〈詩經〉中的句子作辯解，算是逃過了一劫，其餘的人要麼被砍頭，要麼受腰斬，並且全部都是族誅，非常殘忍。

建文四年六月朱棣攻入南京，同年十月他就下詔第二次重修《太祖實錄》（建文帝修過一次）。朱棣對修史官員獎罰分明。對聽話有意袒護朱棣篡改史實的，如胡廣、黃淮等人，升官；對直書無隱不避朱棣忌諱的，如葉惠仲，族誅。花了九個月時間，奴才們就獻上了篡改完畢的《太祖實錄》。永樂皇帝遷都北京後不久，一天他在幾位大臣的陪同下前往長陵察看，走到一條大河邊上時，他問河邊一位打魚的人：“這河叫什麼名字呀？”那打魚的人說道：“叫沙河。”永樂皇帝一聽馬上變了臉：“什麼？叫沙(殺)河？！不行，從今天就改了，叫‘金河’，‘黃金萬兩’的‘金’，這多吉利。”皇帝本姓朱名棣，朱(豬)就怕殺(沙)了。接著又傳下禦旨，命令昌平州內凡是姓沙(殺)、屠(宰)、郎(狼)、陸(戮)的人統統遷出，換上姓朱、梁(梁)、康(糠)、米、蔡(菜)、曹(槽)、甘(泔)的人家。他的歪理是皇帝姓朱(豬)，姓沙(殺)、屠(宰)、郎(狼)、陸(戮)的人住在這裡，常常會遇到朱(豬)，很不吉利。而姓梁(梁)、康(糠)、米、蔡(菜)、曹(槽)的人家才會使豬(朱)有吃有喝，大吉大利。禦旨一下，老百姓就遭了殃，許多姓沙、屠、郎、陸的人家被迫搬出去，而外鄉許多姓朱、梁、康、米、蔡、曹、甘的人家又

被迫搬進來。老百姓們被折騰了很長時間，對皇帝恨得直咬牙。

一切專制者都奉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信條，張居正也是這樣。張居正以強力集權推行政治、經濟改革，步步取勝。但當他把集權擴大到學術領域，便引發種種惡果。明中葉王陽明學興起，提出天理即良知，良知即知善知惡，天理存于人心的見解，把是非善惡歸結為人心的靈覺，人人都可通過自省成為聖賢。它在客觀上有力地衝擊傳統的偶像崇拜，動搖人們對孔孟程朱的信仰，各種學說應運而生。文人在書院中講學、發表政見、抨擊時弊成為時尚，這對於專制的朝廷，無異於離心之力。萬曆八年，張居正下令拆毀天下書院，禁止講學，消弭閑言浮議，實行思想一統。凡有譏評時政、誹謗當朝者，即以圖謀作亂懲處。著名文人何心隱被冤殺，是張居正嚴打異端學說的一大冤案。天下人才全由當政者主觀意志和官方思想標準加以篩選，凡被視為異端者，文章再好也不予錄用。文人為我所用者即是人才，否則即予淘汰，這是一切文化專制主義的慣用伎倆。其結果，是為投機鑽營之徒、拍馬奉迎之輩大開方便之門，而使正直耿介之士遠避官場翰苑、靜觀明朝走向末路。

李贄（1527～1602）否定孔子是“天生聖人”。他揭露儒學的虛偽，反對歧視婦女和壓抑商人。李贄批駁了吹捧孔子“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他說：“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於孔子而後足也。苦必得取足於孔子，則千古以前無孔子，終不得為人乎？”他還嘲諷“千古一詞”、“千年一律”的尊孔思想，無異於“前犬吠形，亦隨而吠之”的隨聲附和之犬。李贄針對朱熹“存天理，滅人欲”的說教，提出了“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物矣”的思想。明神宗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為罪，逮捕李贄，焚毀其著作。李贄入獄後自刎而死。

清朝的文字獄更邪火。康熙時浙江人莊廷攏編刻《明書》，被人告發，其父莊允城被逮入京死於獄中，莊廷攏被掘墓開棺焚骨，凡作序者、校閱者及刻書、賣書、藏書者均被處死，子侄 18 口以及 210 位士大夫被斬首；被發遣、充軍的有七百家，被牽連入獄者 3000 餘人。另一起是《南山集》獄，波及數百人；戴名世被斬首，方孝標被戮屍，兩家男子十六歲以上者均被殺，女眷等則被沒收為奴婢，方氏同族人都被充軍黑龍江。一個道士提出人是用大腦思考而不是用心思考，被康熙認為是“危險人物”處決。因文字獄，編一部《康熙字典》就殺了 100 多人。不要說反對皇權的觀點，就是文字上有“影射”之嫌，就叫你人頭落地。

雍正時文字獄氾濫。呂留良案受到株連的人多達幾萬人。刑部尚書的兒子因做詩文有“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結果按大不敬律斬首。朝臣查嗣庭任江西主考，出題“維民所止”，被告發“維止”二字，影射“去雍正二字之首”。雍正帝大怒，將查嗣庭入獄。結果查死於獄中，其屍被戮，查的親屬或處斬，或流放。

有個叫徐駿的官員，僅因“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一句，便被扣上“誹謗朝廷”的罪名，落得個身首異處誅連九族，連故里的官吏都被斬。

一次，雍正看戲劇《繡襦記·打子》，劇裡講的是：擔任常州刺史的鄭父，看到兒子因迷戀娼家而流落街頭，靠為人唱挽歌度日，一怒之下痛打兒子的情節。雍正十分喜歡扮演鄭父的小太監，於是把他叫到身邊賞飯。在吃飯的時候，小太監順口問了一句，現在的常州刺史是誰？雍正勃然大怒，說你這優伶賤輩，怎敢問國家的名器？當場下令將小太監杖斃廊下。

乾隆時發生文字獄 140 餘起，被捕殺的文人及受連累的家屬幾萬人，連瘋人

說瘋話都不放過。精神病患者發病時自稱皇帝，被乾隆凌遲處死的就有六起。乾隆自稱“古稀老人”，退休的大理寺卿尹嘉銓有一次自稱“古稀老人”，即被絞死。

1777年即乾隆42年，江西舉人王錫侯把康熙字典按爾雅體例重排為字貫，因“提要一凡例”中教人如何避諱，舉例把康熙、雍正的廟諱“玄”、“胤”開列出來，雖以缺筆處理，以示敬避，卻引得乾隆皇帝勃然大怒，被“斬立決”，其子孫王霖等七人改為斬監侯，秋後處決，妻媳及年未歲之子給功臣之家為奴。……案子還沒有了結。江西巡撫海成也難逃其咎。海成本來是乾隆在封疆大吏中樹立的收繳禁書的典型，他在江西收繳禁書八千多部，居全國之首。海成的做法是雙管齊下：一方面頒佈詔令，命令各州縣將地保招集起來，讓地保挨家挨戶收繳禁書，如果沒有完成任務，則拿州官縣官是問；另一方面也給予獻書者以豐厚的補償，由政府發給原來書價一倍的補貼。乾隆曾經命令各地仿造江西的這種做法。這次海成卻栽了。海成是乾隆朝文字獄中第一個因為查處不力而被判處死刑的地方大員。乾隆毫不掩飾地宣稱，處死海成的意圖就是“使封疆大臣喪良負恩者戒”！乾隆深知：只有壟斷了文字，才能壟斷思想；只有壟斷了思想，才能讓臣民都成為順民，才能“江山永遠不變色”。

翰林學士胡中藻有句詩曰“一把心腸論濁清”，乾隆帝看後大發雷霆：胡中藻遂因一“濁”字被殺，並罪及師友。徐述夔的《一柱樓》詩集中雲：“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被乾隆帝定為“大逆”，不但把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戮屍，其孫子和為詩集校對刊印的人也全都處死。沈德潛的《詠黑牡丹詩》雲：“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其中的“奪朱”用的是《論語》裡的典故，可“奪朱”被說成是奪了明的天下；“異種”意為“奇異之種”，但也被解為“非我族類”

的滿族。乾隆帝大怒，當時沈德潛已死，就把他的屍體拉出鞭打一通。……文字獄的盛行使朝廷的大臣們之間都不敢相互通信，不敢寫日記，生怕被人抓住把柄。

滿清一紙“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剃髮令把中國人整成了有辮子沒脊樑的精神侏儒，將數千年的奴化教育做到了登峰造極，最後只剩下一門“研究錯別字”的學問。

清朝對全國圖書都要進獻檢查，不利於滿清的文獻被禁毀；連前人涉及遼金元的文字都要篡改；查繳禁書竟達 3 千多種，15 萬多部，總共焚毀的圖書超過 70 萬部。一篇吳三桂的“反滿檄文”，一本《揚州十日記》、一本《嘉定屠城記略》、一本《天工開物》竟在中國本土湮滅，二百多年後才從外國找會來！

龔自珍大叫：庠序無才士，巷無才偷，藪澤無才盜！中國人遭受如此滅絕人性的奴化和侮辱，無休止的肉體恐怖和精神摧殘，脊樑彎了又彎，膝蓋曲了又曲，腦袋洗了又洗，中國人被磨掉了人之為人的最可寶貴的血性和骨氣，成了一個跪著的合群自大的族類。

“文革”更是一次文字獄大氾濫。有這樣的例子：師生一同下放“五七幹校”。老師洗衣服，學生搶著拿去洗。老師說：“洗洗領子和袖子就可以了，領子和袖子最髒。”有人告密，說老師污辱領袖。老師被抓去禁閉了。

幾千年來，統治中國的就是“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朱元璋《詠菊花》）式的威嚴和橫暴。官定意識形態（聖賢之道、三民主義、毛主義和民族主義）不但是中國人的行為規範，而且竟成了中國人一切智力活動的唯一靈感來源。一切對官方意識形態的質疑，都被扼殺于萌芽狀態中。任何偏離“主旋律”的噪音都被全社會合力撲殺。人們不但心甘情願地放棄對自己大腦的使用權，

改用兩三個死人的大腦，而且還剝奪別人的“用腦權”，從而有效地將一切中國人的創造性智力活動凍結了兩千年。

第 21 節 思想壟斷和教育專制

教育來源於和服務於民眾，但中國教育不是為民服務而是為愚民服務的，人民不是文化教育的主人而是奴僕。它充滿了霸權主義官僚主義神秘主義偽精英主義特權的氣息。

1· 虛假的平民教育

為了尊孔，人們編造了“孔子首創平民教育”的故事。“平民教育”有三個基本意義：1) 為普通人的教育，讀書不為作官，跟儒家“祿在其中”的教育對立；2) 普通內容的教育，識字、算術和生產知識等，跟儒家“六藝”教育對立；3) 公益性的教育管理，跟儒家的以盈利性的教育管理對立。“平民教育”是晚清西學東漸的產物，是反對孔儒教育思想的。在國民黨統治區平民教育有很大發展，那便是今日中小學的雛形。

《史記》等史料記載，西元前 675 年周王朝發生親王之間爭奪王位，掌握文史資料典籍的官員跟著親王奔波，造成大量資料流出周王室，分散到諸侯各國。由於文史資料和文史人員的大擴散，出現了“官學失守”、諸侯各自為學為教的局面，即“私學”出現。換句話說，早在孔子誕生前一百年左右，中國就有“私學”了。說孔子“首創”，那是篡改歷史。

拿孔子的交納十條幹肉即可入學的條件來說吧，當時，誰能有十條幹肉？《詩經·七月》裡說得明白，當時能拿出一條幹肉就是很奢侈的生活了，能拿十條幹肉出來，只有貴族和他們的商賈。孔子的所謂“教育”，惟一只教人學禮、知禮、習禮，除了僅僅與禮樂相關的（純粹屬於記憶性的）知識之外，孔子心中根本就

沒有任何其他一切涉及實際生活和生產的（理解性的和創造性的）知識的智慧。

《周禮》等記載，王公貴族是按照等級享受“臣”提供的“禮”，自己並不習禮，否則就是恥辱。周室動盪，許多王公奴隸主貴族失去了貴族地位，而“有教無類”就是勸說那些失去貴族地位的人：不要迷戀已經失去的地位，要“不恥下問”學點作臣的本事（六藝）、走“學而優則仕”的道路更現實。所謂“六藝”——禮、樂、射、禦、書、數。後面的四藝全都只是為統治者的禮樂服務的能力。射是射箭，禦是駕車，書是認字、書寫，數，既是算數，也是算命。這就意味著孔子的“教育”，只為統治者服務，而絲毫不涉及其他，當然也就更不可能關心人類智慧本身的核心——真理的觀念。

這一來，孔子不但為自己搞“六藝”之類的“禮教”生意找了個藉口，而且，也為廣開財路提供了理由。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這個境界遠遠比不上蘇格拉底、耶穌、佛陀，人家就從不收費，主動到大街上去免費授課。

耶穌還為門徒洗腳，沒覺得丟身份。當孔子的得意學生顏回死了無錢安葬、顏父求孔子把車賣了換棺材安葬顏回時，孔子說：賣了車我就只能走路了，而我是曾經做過官的人（曾居大夫），照禮不可以步行，這事我幫不了你。這就是孔子死要身份等級的“仁”和“禮”。

孔子的“有教無類”是為培養“臣子”而廣開財路的。如果孔儒“首創平民教育”，為什麼要拒絕和看不起“種地”一類的平民知識？如果“有教無類”是人人都可入學，為什麼“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不管正論反論，說“孔子首創平民教育”都是個彌天大謊。

儒教是為專制服務的，為專制輸送一些教徒作為官吏。儒教認為民眾是不配接受教育，無須接受教育的，有教無類跟草民是沒什麼關係的，牛馬就要永遠在

田裡勞作，是不用詩書不用識字的，儒教徒已代表大家讀書識字了。如果大家都跟儒生一樣一心唯讀聖賢書，那誰去種田來養活那些食俸祿階層呢？如果牛馬都成了老虎，那老虎吃什麼呢？這是儒教徒無法想像的，儒教徒認為“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總得有人做老虎，有人做牛馬，這樣才不會亂套。如果說儒教徒不是有意壟斷教育資源和入仕機會，那我們也未見儒教徒對普及教育提出過什麼見解，採取過切實的行動。其實，儒教徒對民眾的素質和教育並不關心，他們只想努力維持專制的秩序和既得利益，任何可能破壞這種秩序的思想、變革、技術進步，都會被他們視為異端，從這點看，儒教和專制都是反動的，他們都是社會進步的障礙。

2· 儒家的思想專制

吳虞說，“儒家道統”就是思想專制。儒的使命是“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他們企圖規勸權力者，使之推行“周公之治”；對其它思想都以惟我獨尊的態度一律排斥。

儒家從來就是思想專制的最熱心的宣導者。對不同的思想，孔孟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孔子說：“不學禮，無以立。”孟子講：“禮，門也。”《禮記·禮器》雲：“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根據對禮的態度和履行的情況，儒家把人分為君子、小人、佞人、惡人等等。違反儒的儀、止、禮等標準，就是“禽獸”，就失去了生存的資格。

看看儒徒們念的咒語：《詩經·相鼠》

〈原詩〉

〈今譯〉

相鼠有皮，

瞧瞧老鼠還有皮，

人而無儀，

你作為人卻沒有儀錶。

人而無儀， 為人而毫無儀錶，
不死何為。 不死還有什麼意思。

相鼠有齒， 瞧瞧老鼠還有齒，
人而無止。 你作為人卻沒有好行為。

人而無止， 為人而無好行為，
不死何俟。 不死還等到何時。

相鼠有體， 瞧瞧老鼠還有肢體，
人而無禮。 你作為人卻不禮節。
人而無禮， 為人而不講禮節，
胡不遄死？ 為什麼還不快死？

3· 孔子扼殺“異端”

專制是少數人把自己的快活建立在多數人的痛苦之上；共和則追求普遍的最大多數人的幸福。專制喜歡暴力和命令；專制希望平靜、太平；共和則追求真正的和平。專制是偶爾做好事，常常幹壞事；共和則是偶爾做錯事，做好事是它的常態。共和的原則是品德和真理，專制的原則是恐怖和謊言。與暴力相比，專制統治者更喜歡謊言，如果謊言能夠奏效，他們肯定優先使用謊言，這個方法成本更低。暴力使人不敢反抗，謊言使人不知反抗，詐騙比搶劫風險更低，專制教育就是充斥謊言的教育。但謊言不能在所有時候瞞住所有的人，因此，問題的解決最終還是要靠暴力。專制一離開暴力就無法維持；共和一離開品德就寸步難行。

共和國由公民組成，它努力培養公民；專制國需要奴隸，它的教育就是生產奴隸。**孟德斯鳩說：**共和國的教育提高人們的心智，專制國的教育降低人們的心

志；專制國的教育就是奴性教育；甚至對那些處在指揮地位的人們，奴性教育也是有好處的，因為在那裡沒有當暴君而同時不當奴隸的。專制國裡每一個家庭就是一個專制帝國，那裡的教育主要是教人怎麼樣相處，為人只講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教學的範圍很窄狹；只是把恐怖置於人們的心中，達到降低人們心志的目的，根本不知道邏輯和怎樣說理；三分不痛不癢的真話與七分結結實實的假話結合得天衣無縫。在那裡，知識招危險，競爭會惹禍，品德談不上。這就使教育範圍極為狹窄。在象中國這種專制國家裡，儒家教育從某些方面來說是等於零的。它不能不先剝奪人們頭腦中應得的一切，然後再給人們一點點的東西；以便培養好奴隸。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恢復周禮，維護舊的宗法制度，因而在教學中只講有利於維護傳統倫理的話，甚至歪曲事實為傳統道德辯護。他把西周的創立者和統治者說成是完美人格的化身：“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論語·子罕》）！事實上，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完美無瑕的。要維護既有秩序，就必然要壓制批判，維護恐怖極權制度使人麻木不仁。

魯哀公問孔子的學生宰予為土神祭壇種樹的禮節；宰予說：夏朝種松，商朝種柏；西周種栗，目的是威脅人民，“使民戰慄。”宰予揭示了周朝“使民戰慄”的統治原則，孔子就非常惱怒地責備宰予，說作過的事不用提，完成的事不要勸說，過去的事不要責備（“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成事”、“遂事”和“既往”三詞說明孔子承認宰予講的是真話。“諫”和“咎”兩字說明孔子也認為西周的做法不對。但他為了其政治目的，卻阻止學生指出西周的陰暗面。從中可看到孔子要使民戰慄，並且不許別人揭示。

“既往不咎”說的太好了！凡是君子，什麼都是好的，小人不得評議。歷代

史書，不都是把那君王吹捧的如同天神一般。領導永遠正確，領導一句話頂過小人們一萬句話。於是，今天會有人不允許談論過去的悲慘，動輒說民族分裂，把天下的公義是非的道理置於何處?!

孔子自稱“天生德於予”，宣稱上天將宗法制道德賦予了他，他本人是這種完美道德的化身《論語·述而》。他甚至說，在西周統治者死去後，他就是上天選定的傳播傳統道德文化的唯一使者：“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上天道德使者的教導當然是金科玉律。這說明他認為自己的觀點一貫正確。

為維護等級森嚴的周禮，孔子反復提倡敬畏權威的思想。他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跟別的訓誡一樣，孔子對此沒有任何論證；事情就那麼簡單：對於權威的言行不能有任何疑問，對於權威的觀點和要求必須戰戰兢兢地全部接受。依孔子所說的順序，“大人”在“聖人”之前，孔聖人見王時都三叩九拜、戰戰兢兢；而“天命”是什麼誰也不知道，結果中國只有由權力大小所決定的王“理”。直到今天，也是如此，上級說了，下級必須保持一致；當官的說了，百姓不許追問。大人說話、小孩不許說。有了這三畏，中國人的頭腦就是白長的，中國人都是無頭蒼蠅，創造了空長、空活的空歷史、空文化。

孔子堅決地扼殺各種不同於他的學說。他害怕自己的說教被反駁，就提倡“畏聖人之言”。對於敢於挑戰他觀念的宰予（宰予字子我，又稱宰我），孔子恨德咬牙切齒，借“晝寢”——白天睡覺之事，破口大罵：“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粉刷）也”；侮辱其人格。

其實，宰予本“孔子十哲”之一，乃“言語”科的高才生。然孔子以“晝寢”罵宰予不過是個借題發揮，其深層原因是宰予曾不信仰孔子的觀點，提出過質疑，

弄得老師很尷尬。

一次是關於“仁”。宰予問道：“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者，其從之也”（有一位仁者假設告訴他井裡掉進去了另一位仁者，他該下去救嗎）？孔子答：“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不可陷也”（為什麼要這樣呢？君子可以去救，但不能讓自己陷到井裡去）（《論語·雍也》）。宰予聽後，未接話茬，納悶：您老不是要“殺身成仁”嗎？今番的回答，總令人感到很假。

一次是關於“居喪”的期限。宰予發現，孔子既提倡“居喪”應有三年之長，但又鼓吹“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豈不矛盾？因而建議喪期當由三年縮短為一年。孔子聽後，不好正面回答，遂痛罵宰予不“仁”：“子生三年，然後免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宰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論語·陽貨》）？

正由於宰予的自由發難，才使得孔子小題大做，惡評自己的高足——宰予。孔子執教，以為“攻乎異端，斯害也已”，“道不同不相為謀”為根本，不能接受學生的提問、發難、挑戰，惡評宰予便是一例。最近有大師揚帆大罵學生的案子。中國之缺乏創造性學習機制，不易形成“吾愛吾師，尤愛真理”的探索氣氛，其源出於此。

《禮記·王制》“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巧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于鬼神時日蔔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由於儒家不講邏輯，所以儒家必然不善於講理；為了避免論證不過其他思想，就只好一殺了之了。邏輯學有兩個很大的作用——就是“巧言令色”（哲學思辨），“奇淫技巧”（科學技術）。孔子以“文武之道”來排斥其它思想文化，“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把

“己之所欲”強施於人，甚至把反對者趕盡殺絕。

少正卯聚眾講學，使得“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少正卯宣傳的是法家的一套，虛仁假義的東西受到了打擊，少正卯聲名太盛，孔子的弟子除顏回外都跑去聽，於是這個文質彬彬的孔司寇拿起了刀，二話不說就誅殺了少正卯。殺了之後，還下令暴屍示眾三日。

“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則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裡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慄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

大意是：人有五種罪惡，而盜竊還不算在內。一是內心自由放達而好冒險；二是行為怪僻而一意孤行；三是言語虛偽卻善於狡辯；四是廣泛記錄並散佈醜惡的新聞；五是贊同錯誤的觀點且說得有聲有色。這五條罪，只要人有一條，都難免要被君子誅殺，何況少正卯五罪併發。所以，在他居住的地方，他足以糾集門徒成群，他的言論足以蠱惑人心，他的意志足以使之成為反抗當局的領袖，他顯然是小人中的梟雄啊，不可不殺。

孔夫子上面所說的“五條罪”中，只有第二條涉及行為，而且還沒有具體說是什麼行為，至於其餘四條，全都只涉及思想、言論。這樣的判決，沒有一件有人證、有物證的具體犯罪事實，只是幾句抽象的形容詞，就定人死罪。是非曲直、

量刑輕重，並無客觀標準。

少正卯是個以“法”抗“禮”的學者，少正卯要求以有點平等的“法”來取代不平等的“禮”。蘇格拉底是死于“民主”的（五百人陪審團的）眾殺，而少正卯卻是死於孔子一人“專制”的擅殺。這證明孔子繼承了中國以言定罪的惡劣傳統，沒有容人的雅量，只能聽歌功頌德的諛詞而已。孔子自稱博學，而少正卯人被稱“聞人”，比他還要淵博，他當然嫉恨在心，所以就公報私仇了。毫無疑問，孔子是個內心極其陰險惡毒的偽君子；嘴上說得最好聽，殺起人來心最狠。所有的儒者幾乎盡犯了上述五條。在殺害少正卯的這件事上，孔子犯了反思想自由、反言論自由、反結社自由和濫殺無辜的反人類之罪。人類歷史清楚地證明：正是古希臘人中的烈士蘇格拉底，首先打開了全人類智慧的先河；而古中國的“聖人”孔子卻徹底掐斷了中華民族的慧根，使中華民族從此陷入了一個永遠難以擺脫的愚昧的深淵。

誅少正卯的事記載于《荀子》、《史記》、《漢書》、《孔子家語》等書。為了尊孔，朱熹懷疑這個事實，清代的學者乾脆否認這個事實。中國文化成了徹頭徹尾的虛偽文化。

4·拜祖宗的奴化教育

孔子宣導的教育是奴化教育。這套奴化教育正是孔子所鼓吹愚民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的本性大抵相同，由於教育的不同才產生了差距。既然教育可以改變人的習性，那就可以通過教育使人們“致其道”。所謂“道”，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制社會的道德規範。孔子主張學道應先從孝悌入手。

以“孝”為教的中國教育一如它的反文旁，其實是反文化的。孝字的上半截

是“老子”，下半截是“兒子”，因此孝的本義即兒子服從老子。儒家的教育內容就是孝道。

孔子認為一般的人只要有孝悌就行了（他稱這種道德的培養為“學”），一般人能懂孝道，就算是學習過了。他提出：“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孝悌是根本，學文只不過是“行有餘力”的人的進一步深造。子夏進一步闡發了孔子思想，他說：“賢賢易色；事父母而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其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直截了當地把孝悌的培養當作學習的主要內容了。

培養沒有自己意志、沒有自己思想的“孝子”、“忠臣”就是孔子教育的宗旨和根本目標。只有通過奴化教育才能在家庭內部建立起尊卑有序的等級關係，這是“齊家”。只有每個家庭都建立等第森然的人身依附關係，人們才會安分守己，最終服從于一國的最高家長——君主。君臣關係是家庭關係的放大與推廣。沒有奴化的教育，這一切便無從談起。

在《論語》裡，孔子即是真理本身，他成了整個話語世界的專制者和獨裁者。孔子認為自己是“學而知之”，在對話中，他是以“學成者”的身分高居於他人之上的。凡是需要知道的他全知道，凡是他不知道的都是不必知道的。《論語》中的對話事實上是一個聖者和凡人的對話，是一個全知者和無知者的對話，是一方對另一方傳授已有知識的行為。《論語》幾乎全是夫子一人獨白，沒有學生質疑，擴沒有學生反對他的觀點，滿堂灌填鴨式，即使有所謂循循善誘的啟發式，也不過是啟發學生說出他早已知道要告訴學生的內容。

孔子的“知”，並不是認識世界得到的新“知”，而是學習古人認識世界得到的舊“知”。這種推崇舊“知”，忽略新“知”的態度，成了中國思想的基本

特點。他認為自己所知的是不可懷疑的，必須“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卻從未考慮過自以為“知”，其實是不知的情況。孔子的“知其不知”與蘇格拉底的“自知其無知”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孔子注重“人倫”和“事功”，他的焦點集中在如何處理人際關係上以及具體成事上（“事統”），並不教導學生以對知識的抽象興趣，他不願意像蘇格拉底那樣以討論超越人倫事功之物為使命。

西方的 education 發端于蘇格拉底的“精神助產術”，是對學生的發問、引導、辯難。在這些討論中，老師並不認為自己是教導者，老師只認為自己是知識的助產士；導師的主要目的是想把大家的目光導向世界的本源、神、純粹善等抽象的本體論問題，在這裡老師並不教學生怎麼具體地做人、怎麼具體地成事。上課前老師不一定有什麼現成的結論，結論在他們的探討中。老師啟發學生？不，簡直是在刁難學生。學生聽從老師？不，是在質疑、反駁老師；唇槍舌戰十分激烈。他們是師生，更是對手。在他們那裡，可能沒有標準答案。符合標準答案的學生也很難是好學生，有創新的才是好學生。

《禮記·學記》中的“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亦即為師之道，尊嚴而已。它告知每一個為師者，在學生面前，無論如何都要保持自己的尊貴與莊嚴，這樣會使學生產生敬畏之心。敬則服，畏則從；如此為師，便是得道。

這種尊是建立在“師尊生卑”的等級基礎之上的。什麼垂首而立，什麼程門立雪，否則就有違弟子之禮。老師打罵學生是常事。可見，中國下等人無尊嚴，只有上等人有尊嚴。魯國的季孫把公室分給自己的奴隸，使他們變成了佃農。孔子對季孫毫無辦法，於是他遷怒于給季孫效力的學生冉求，對身邊的弟子們宣佈說：“冉求已不是我的學生了，你們可以打著鼓去攻擊他！”儒家搞師道尊嚴，

打罵教育是常事。自古以來，就談不上什麼文明。

儒家的“師道尊嚴”比起亞理士多德“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境界，差得太遠。孔子說“當仁不讓于師”，他真正讚賞的卻是乖巧聽話的顏回，對喜歡頂撞他的子路就很不滿。

古希臘人是“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先秦諸子是“吾愛吾師，吾更愛聖王”。把真理當作老師，真理會越來越多、大師越來越多、人們都有進步和提高從而超過大師；而把老師當作真理只會真理越來越少、師傅越來越多從而使人萎縮。孔子“傳道授業解惑”式師傅帶徒弟，弟子無人超過他。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柏拉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師徒一個勝一個，西方至今也是群星燦爛人才輩出，歷史和現實都證明孔子輸給了蘇格拉底，中國的教育輸給了西方的 education。

5· 拜人還是拜真理？

思想和思想家孰輕孰重，反映了人們的價值取向。把思想（真理、正義）放在第一位，是西方人的價值取向；這導致了對抽象神——上帝、真理、正義的崇拜，從而成就了自由民主政治。把思想家（聖王、老師）放在第一位，這是中國人的價值取向。這導致了對具體人的個人崇拜，如對周公、孔子、馬克思、總書記的崇拜，從而成就了人治性的專制奴役政治。這種專制政治表現為父愛主義和愛民主義，這種“愛”是對工具的愛、是非人的愛，不是人對人的平等的愛。尋找民間思想家依然是個人崇拜的奴性在作怪。家者，大家也，大家長也，大權威也。思想家即思想界的大權威、大家長也。尋找民間思想家好比士人尋找奴隸主或劉備之求諸葛亮也。諸葛亮者，奴隸主劉備之大管家也。馬克思是 19 世紀的

“民間思想家”，馬克思就是想當人類救世主和總奴隸主，他最終成了是二十世紀共產奴隸社會的總導師。

中國人“爭第一”是世界上最愚昧的普遍奴隸制（在印度是種姓制度）的殘餘，一些“第一名”的“精英”要打造出最優秀的品種，好千秋萬代奴役他人。他們“爭第一”的實質就是爭當第一奴隸主！中國人從小灌輸的是“學而優則士”的當官做老爺的專制思想，離民主十萬八千里。在儒學培養出來的“萬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的官本位制度下，一代又一代社會優秀人才皓首窮經；把畢生的精力和時間，都放在博取功名利祿之上。這是中國社會商業不發達、科技不發達的重要原因。在這種官本位思想影響下，形成了家家想做皇帝、人人想做梟雄，個個要當官做老爺、出人頭地、做“人上人”的民族文化。中國陷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怪圈，是“尊人為大”的文化不斷培養出覬覦王座的狂人妄夫的結果。反觀西方基督教文明，在於崇拜抽象的上帝。在這種長期形成的社會氛圍下，整體國民素質心存感恩和謙卑，因此相對而言，缺乏產生亂世梟雄狂人妄夫的肥沃土壤……

專制體制、背離上帝是中國文化野蠻的主因。在專制政治下，人們絕對沒有思想的自由、也沒有批判的權利。在這樣的氛圍之下，人類如何能擁有真正的獨立創造、客觀分析、自由批判的意識？只要中國不斷持續專制體制，中國文化就不具有獨立自主與自由創造力的可能。只要專制體制仍然存在，就意味著中國文明的沉淪。中國人要拯救自己的文化，改變文明沉淪的命運，首先必須推翻專制政權，否則永遠無法挽救中國文明沉淪的命運。

走西方對抽象神——上帝（真理、正義）的崇拜道路，這就是中國民主方案唯一正解！自由、平等、人權、民主不過是正義之神表現的各個層面。也就是說

只有正義才能拯救我們！只有對上帝懷有崇拜的人們才能形成正義的社會結構！
只有正義的人們團結合作才能最終結束腐朽的個人崇拜的專制統治，才能開啟民主的蔚藍色文化！只有擯棄了依靠個人權威的依附心理才能建立權力分立與權力平衡的法治民主社會。

第 22 節 中國思維方式的嬰兒化特點

漢字是服務于專制王權的文人造的，因此它天生就是專制政權的幫兇。最初的漢字就壟斷在王家手裡，漢字難寫難學的目的就是為了壟斷文化，使廣大的老百姓成為愚盲才好獨裁。無論是《詩經》、還是從南北朝時期的民歌，中國民間的語言早已通俗如“白話文”，然而一直到清末，官方語言還是文言文，其目的是為了壟斷知識、進行精神控制。

漢文字的兩大特性：①漢文字的“不可再造”性：《新華字典》所收單字(含繁體、異體)是一萬一千一百個左右，《康熙字典》所收漢字是四萬七千多個，《漢語大字典》所收漢字五萬六千個，全是中國人祖先創造遺留下來的，沒有任何個人可以造字。②改造漢文字的“官方”性：只有代表整體的政府，如中共政權，才可簡化文字並用權力傳播它。

基於這兩大性質，可引申為：漢文字創始的前提是人的不自由化、非個體化與奴役化。這個前提是：世界上所有的知識與概念已被中國的祖先所發現、所創造；所有後來的中國人只是去記憶、去繼承、去遵循、去服從。大部分中國人都認為人沒有個人意志，也無個人選擇，他只是環境、文化、制度的產物。這種對人的認識與他們對中文文字的無能為力，和他們的被傳統文字奴役相關。所以講漢文字作為中國專制文化制度的幫兇是不為過的。

1· 漢語語言文字的具體弊病：

(1)古漢語屬於人類的早期語言

中國語言沒有西方語言中的因時間、單複數、人稱和語氣的變化而導致的動詞變化。漢語中沒有時態、語態，語法跟嬰兒語言一樣簡單。

漢語在名詞與動詞上無單複數之分。這導致了中國人誤將複數群體作為不可分的有機單元。個附群，群壓個，個群不分便與法西斯理論有同無異。人可有可無，國不可不無。

漢語動詞缺少時態。這導致了中國人思維方向性的經常混亂。過去、現在與將來在中國人的思維中常常顛三倒四，嚴重危害了中國人的客觀歷史感。

漢語規則少，會說漢語產生不了遵守規則的意識。西方語言的語法規則複雜，這樣，西方的小孩掌握語言的過程就是掌握語法規則的過程，從小就產生了守規則的意識，這為法治奠定了基礎。

(2)漢文字重形象，忽略了“說和聽”，難以理性辯論

漢字注重“看”。這導致了國人喜歡講面子。比如，中國的菜系的菜譜都是象形的、奉承的，什麼“丹鳳朝陽”、“二龍戲珠”、“孔雀開屏”等等，直弄成一個與菜的形味風馬牛不相及的“吉祥”動物形狀來才心滿意足；許多“美術菜”只是供看的，純粹是暴殄天物的、腐朽糜爛的形式主義。這種民間吉祥圖案式的象形，幾乎滲透到生活的一切領域，直到今天，結婚用龍鳳燭，做壽獻“百壽圖”；貼倒“福”字，貼“招財進寶”鬼畫符；喪禮燒紙錢，既有紙人紙馬，也有紙冰箱、紙彩電……這股象形文化的強勁巫風貫穿千百年。講面子導致了“說一套、做一套”的兩面派，表面上冠冕堂皇、八面玲瓏，實際上是潛規則、男盜女娼，所謂“外儒內法”，國人的思維習慣於象形和比喻，習慣於吹牛拍馬和阿諛奉承

漢字忽略了“說和聽”。漢語缺乏一些必要的母音、圓潤音和柔滑音，讀起來有一種音步齊整的單調感和受阻的鈍挫感，交談時高聲喧嘩像在打仗或吵架。中國人的口語交流困難，有聲交流往往被無聲的書面交流或武力取代；從而使漢語趨於蒼白無聲的“統一”，形成了大一統的專制觀念。在“統一”的天下裡，思想趨於同化，失掉了創造性和生機。

基於人腦兩半球的感知分工，中文用形象文字的表像加義輸入人到抽象半腦，造成表像與抽象在思維時的顛倒錯亂。由於漢字數量多，在大腦中的存儲空間也就大。由於漢字字形與語音之間上無形式化聯繫規則，在大腦中形成一種無序存儲狀態。大量的漢字佔用大腦的大量存儲空間，在大腦中無序存儲，漢字含義混雜導致大腦對語詞指稱對象的識別效率低下。這一切就使得使用漢字思維需要耗費大量的能量。這個需要耗費大量能量的漢字系統使人們不能有效思維和有效交流。而且，使用漢語的人的大腦左、右腦很難明確分工：在需要使用左腦時，漢字意義系統使得右腦也參與左腦的活動；在需要使用右腦時，漢字意義系統使左腦參與右腦的活動。中國人在辯論、交流時不能在抽象實質的理性空間交鋒，而常常淪落到猜忌與人身攻擊的權力鬥爭的泥坑裡，淪落到“救臉護皮”俗套中，就是這個道理。中文的形象表達本應輸入在人的藝術創作半腦中，這種“理、藝”的衝突輸入就是“黃河渾水”的源泉。由於衝突輸入而導致的思維混亂大大降低了中國人獨立人格。群體的專制（大政府、無社會）便成為了暫時維持表面秩序的唯一共有選擇。

(3) 掌握漢文字太難

由於古漢人造字採取的是一種以形代形、以形指形的原始策略；這些象形字之間很少有邏輯關聯。這就註定了漢人要用數量龐大、形象複雜的書寫符號去表

達和指代形形色色的自然事物。漢字的構字部件(包括偏旁部首)共有 215 個之多，而英語的構字部件僅 26 個字母。由於拼音文字是以音代物，所以它的音素豐富一些。英語的注音的音標有 48 個之多，而漢語的標音符號只有 36 個。比較而言，漢語是形多音少，英語是形少音多。由於漢語的形多音少，導致了大量異字同音的現象，這給漢字的讀認造成巨大的困難。相比之下，英語沒有這一困難和麻煩。由於漢語的形音分裂，這就意味著人們在學習漢語時，必須逐一掌握形、音、義的三大任務。也就是說，在對相同數量的語言文字學習過程中，中國人比西方人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時間。漢字筆劃多，難寫；同音字多，難記；又是正楷字、又是各種不同類型的草字，把人都弄糊塗了，產生不了遵紀守法的規則意識，只會產生狡猾崇拜（所謂的書法藝術）。中國的方塊漢字從認到寫，其難度都是幾何級數的。這導致了中國兒童晚期閱讀，往往比英文兒童晚三年。所以，這也是象形文字不經濟、不科學、不簡約的一個佐證。

相對於方塊漢字，字母文字就是大眾文字。西方文明因拼音文字向口語靠攏，口語是大眾化的，知識的普及必然帶來創造力的爆發和人民素質的普遍提高。同時拼音文字也是地域化和民族化的，西方文明遂因之而不斷“分化”，由“分化”而演進，形成民族國家和民族精神。“分化”的文明，多路並進，利於發展，西方文化引領世界潮流。縱觀人類歷史，唯有使用字母文字的古希臘文明把人類引入了近現代文明，應不是偶然的。

(4)漢語含糊不清，缺乏精確性

由於古漢人以刀刻書寫，造成漢語的簡短化與一字多義的特性，因此漢字是一種含義模糊的文字。由於中文的不定義性、多義性、主觀性與虛無性，中文絕不可作為科學與法律語言。從古至今中國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領域裡是真空，

與中文的虛無性因果相關。

林語堂認為，漢語是詩的語言，它朦朧、隱晦、隨意，具有跳躍性、整體性，它重意境、暗示、象徵、音韻，因此，幾乎隨便幾個漢字組合在一起都能成一首詩。但漢語的這些特徵與科學描述的精確性是相悖的，所以，漢語不是科學研究的語言。

在五萬漢文字中，只有五千中文字是常用字。在幾千年人類知識的積累中，已經超載的中文字在近代又受到了資訊爆炸的巨大衝擊。而英語的《牛津字典》所收單詞是 60 多萬個，篇幅最大的《韋伯斯特大詞典》所收單詞幾乎達到 1 百萬之多。僅從詞彙量來比較，漢語和英語的差別是非常巨大的。漢語用五萬六千個點去“掃描”世界，英語卻用 80 萬個點去“掃描”世界。顯然，由於兩種語言其詞彙量（點陣掃描中的點）的不同，它們各自所“掃描”出的世界圖像其清晰、細微、逼真程度肯定是不同的，英語掃描的清晰度是遠遠高於漢語掃描之清晰度的。再加上漢語詞彙分佈比例嚴重失調，漢人得到的更可能是一種世界之歪象、幻象、甚至是無象。漢語言只適合創作語義含混、情緒膠著的詩歌，但絕不適合用以去認識自然和表達世界。漢文字字義已遠遠超出古代造字者的原設計值。一字多義、多字一義、一音多字、一字多音，更將原來字義含混的中文字進一步渾濁化。或者說過度超載已將中文字渾義、淡義到近於無義、虛義，甚至反義的地步。

以“法治”一詞為例：華人們從不分“法治”與“法制”之間的區別。

甲骨文裡的“法”（同“廢”），象“逐水草而居”，指“逐水草而居”經常要棄去舊地尋新處，因此有“廢”的意義；事實上，古代殷商的統治者，根本沒有現代法治的概念，他的話就是“法”，他的手杖就是“權威”，他的好惡與

自由意志就是“律”，他擁有無上的權威與決定人生死等大權，這可從甲骨文裡的“君”、“王”（手執斧鉞）、“伊”、“尹”（手執權杖）、“伊”、“父”（手執石斧）、“教”（手執杖要人服從王占卜的爻辭）、“司”、“伐”、“辟”、“禦”（雙手持棒活埋人）等字可知，這種統治者無上權威與絕對宰製人民的意識，一直在大陸延續至今，因此在漢文界談“法治”不是很可笑嗎？

篆文裡的“治”，從“水”，“台”聲，本意為“治理水”的意思；古文裡的“制”，從“未”（樹枝繁茂）從“刀”，本意為“用刀修剪樹枝”的意思。你如何用“法治”來詮釋“Rule of Law”？你如何用“法制”來詮釋“Legal System”與“Law System”？

在英文中，“Rule of Law”與“Rule by Law”是反義。前者有“人以法治政”，後者有“政以法制人”的含義。兩詞的中譯都是“法治”（或法制），孰不知前者是民主中的成分，後者是專制的定義。既不知什麼是“法治”，何謂“法治人治”之爭。中國古代的“法家”應解為“君以法治人”，“儒家”應解為“君以禮治人”。兩者都以維君權為目的，無本質區別。“儒法之爭”也只是虛無的“權力之爭”而已，旨在蒙人混腦。

語言的含混性造成了思想交流的困難和無謂的爭論。《山海經》裡的“夔一足”，到了《尚書·堯典》裡，經孔子解釋成：象“夔”這樣的人，有一個就足夠了。又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絕大多數人認為是搞愚民政策的意思。但有人偏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不是愚民政策，是讓人民享有充分知情權！若真是讓人民享有充分知情權，孔子就不應該反對鑄刑鼎、公佈成文法。既然孔子反對鑄刑鼎、公佈成文法，那就是在搞愚民政策，不讓人民有知情權。通觀孔子一生，說孔子反對愚民政策是不成立的！因為專制者都喜

歡愚民，愚民才好統治，才是好奴隸、好螺絲釘啊！造成這種爭論的原因，古漢字沒有標點符號，使人囫圇吞棗！在這種無法說清楚的語言環境裡，我們的思想怎麼能不貧乏？

這種“混義”、“反義”造成了中文字的“不賦義”或“泛賦義”性。任何人都可以將任何字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歪釋曲解，隨機而用，使中文完全成為主觀文字。這種主觀文字只能被定義為“虛無文字”。任何的虛無文字只能作為玩弄“文字遊戲”的專制者的專權刑具，而絕不能成為建樹未來的民主者的追求自由的客觀工具。

(5)漢文字使中國人缺乏抽象思維能力

漢字的繁複、混亂導致了思維困難：漢文字的圖像結構阻絕人的創造力，人的創造力來自拆散組合，中文因不給人拆散組合的機會而窒息人的創造力；漢文字的結構阻絕人的抽象思考力。殷商時期的甲骨文是統治者的工具；這種工具主要在於壓抑人的抽象、邏輯、分析、推理、溯因、創造與形上思維的能力，主要在於非人、非理性、偽道德、奴化與禽獸化人民，主要在於摧毀人的獨立自主意識，主要在於建立人的集體主義與集體服從等意識！

甲骨文裡，“我”字，象“一根長柄綁著三個戈”，，表示部落強大的武力；甲骨文裡，“我”字代表殷商部族，並沒有個體人的意義，這是多麼令人震驚的事實？在漢語中，沒有一個像英語的“I”那樣，專用於指代單數第一人稱的專有名詞。“我”的指代範圍與“I”不同，它大可指國家，如“敵師伐我”，小可指代個體。這說明華夏社會裡沒有“個體”的獨立地位，社會的基本單元是“家”，而“家”又是一個可變的“彈性結構”。

甲骨文裡的“平”，具有“樂聲平緩”之意，後來引申成為“使平靜、齊一、

不傾斜、平和與安靜”等意，如“治國平天下”、“平亂”、“平叛”等，因此“平”具有“剷除”、“掃除”、“平定”與“統一”的意義；“等”在篆文裡指“整齊的竹簡”，後來引申為“等同”、“等級”等意；那麼所謂的平等，豈不是代表以武力統一與平定一切？事實上，共產黨的暴力革命論與天堂說，更符合漢人暴力與謊言政治文化的本質！

甲骨文裡的“幸”，象“刑具”（枷鎖）；甲骨文裡的“福”，從“示”（神靈牌位）從“畐”（一壇酒），本意為“以酒祭鬼來祈福”的意思。你如何用“幸福”來詮釋“Happiness”與“Blessedness”？

甲骨文裡的“國”，從“戈”從“口”（城池或土地），代表“以武力佔領的地方”；甲骨文裡的“家”，從“宀”（茅草搭的棚屋）從“豕”（豬），代表“豬住的地方”。你如何用“國家”來詮釋“Nation”、“Country”與“State”？

甲骨文的“美”字，象“人頭上插羽毛”或“人頭上戴羊角飾物”，為什麼“人頭上要有飾物”才代表“美”？那麼“人頭上沒有飾物”是不是就不美呢？那麼誰才有權或資格在頭上戴飾物呢？那麼“美”的普遍性與抽象內涵在那裡呢？篆文的“美”字，從羊從大，指羊大美味，那麼屬於口感之外的“美”，豈不是不存在了？經由這些簡單的問題可知，這種表像式的文字絕對不可能產生那種具有普遍與絕對性“美”的古希臘理念！

人文思考是一種抽象的玄思，它的根本性觀念是從人類（the human race）的角度來思考人存在的根基，由此才有超越性問題：人的本性和本源、人和大自然的關係、人和神的關係、人和人的關係。它超越具體人倫事功，超越有限的存在。“人文”是以古希臘思想及其方式為根基的。近現代西方思維創造力的原創

基因不在別處，就在希臘哲學。

中國人的祖先，由於形象文字的輸入和限制，對自然界的認知只能停滯在表像的“金、木、水、火、土”上，而用不能借邏輯的力量走入分子、原子、電子、中子的層次上。漢人只能認知陰陽相對的道理，而永遠無法推論出抽象的絕對概念；漢人只能認知相對的道德理念，而永遠無法推論出抽象的絕對道德理念；漢人只能認知人的罪行，而永遠無法推論出抽象的人的原罪(Sin)概念；漢人只會反壓迫者，而永遠不會反抽象的壓迫制度與文化；漢人只會反某皇帝，而永遠不會反抽象的皇權制度與文化。

這是因為：漢文字是一種單音節的表像文字，這種文字永遠不能瞭解人文抽象與邏輯的意涵。由於這種文字的客觀限制，因此由這種文字所產生的文化，也會普遍缺乏人文抽象與邏輯的內在結構；因此使用這種文字的人，也會普遍缺乏人文抽象與邏輯意識！就如中國的五音樂理，簡譜在音樂領域中永遠寫不出表達多層次的人的心靈感情的宏偉的交響樂章，只有西樂“五線譜”才能承此大任。

相對於方塊漢字，以英文為主的西方多音節字母文字是符合人的生理結構的人的文字。它以抽象符號的自由組合與拆散組詞、賦義輸入人腦的抽象、理性的語言半球。它以人的自由、獨立為前提而設。它是為人服務的工具。任何人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出於任何目的將字母拆散組合，自造新字去表達新創造、新概念，用不著任何人的許可。它的內在的邏輯性、定義性、客觀性使它成為理想的科學與法律語言。它是自由的語言，解放人的創造力的語言，表達人性、人的靈智的語言。它是道德的語言。

(6)漢字使人不自由。由於漢文字的兩大性質，中國人的自由個性從一開始就被滅絕在搖籃裡了。中國人的無神崇祖的現象從其始就與中國文字的僵化、絕對

性相關，基於中文的不可再造性。中國人對群體與政府的尊崇是絕對的和來自官方的絕對的文字壟斷權上的。

中文的創始者從一開始就沒有將中國人視為自由的個體。這種文字產生的基點並不是將語言作為工具，將人作為自由的、主動的、獨立的個體去發揮，去解放人的創造力，而是將人作為被動的、消極的奴隸去控制、限制與奴化的。當一個中國的孩子拿起毛筆臨摹他祖先的筆法的時候就是在開始編織奴役自己的牢籠的時候。首先是臨摩，要掌握字的分寸，運筆方向、速度、力度，十分複雜和繁瑣，練字的過程就是摹仿的過程，就是喪失自由的過程。從那一刻起，已經沒有人將他作為一個自由人，他將自己的自由鎖在那“籠罐”裡了。

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是聖人(獨裁)文化。聖人文化認為：聖人創造了漢字，唯聖人無所不知，而小民則生性愚蠢，只能重複聖人的思想，一切行動都必須遵守聖人的教導，聽從聖人的指示，人民永遠不應該有任何自由的奢想。按照聖人文化，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自由就是認識並安於自己被奴役命運的“必然性”，從思想到行動，萬不可越雷池半步。

西方自由社會的第一個基本原則是人人平等，不強制他人也不受人強制。自由社會的第二個基本原則是“共同生存”，即樂於助人、幫助弱者。在中國，人們對這兩個原則的認同程度卻非常之低。為什麼呢？因為使用漢字的群體(統治集團)和不使用漢字的群體(被統治集團)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之中。在中國，社會分裂為勞心者和勞力者兩大集團。社會的分裂使人們不願意幫助他人，更不願意救助弱者，這樣，人們要“共同生存”也就極為困難了。掌握了文字的勞心者自以為高人一等，用自己制定的規則強制沒有掌握文字的勞力者，而這些規則不是建立在“人人平等”和“共同生存”的基礎上的。這樣，沒有掌握文字的人

自然就不認同掌握了文字的人所制定的規則。當那些沒有掌握文字的勞力者難以生存的時候，就只好拋棄所有的規則，鋌而走險而“犯上作亂”。而這一切，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漢字使得人們分裂成為兩個不能就“規則”達成共識的群體。

(7)漢字：裝不進新酒的舊瓶。現今，大量的語詞是翻譯來的。但是，由於採用漢字意譯，這些語詞基本上還是使用的漢語中的原義。這樣，儘管一個新詞是“進口”的，但由於漢字是一個裝不進新酒的舊瓶，新的語詞也就只能按照舊的含義去使用；結果，其他的文化就很難引進漢語系統。用單音節象形的漢文字，來研究其它文明的思想，經常會發生十分可笑的事情。例如，以漢文字去翻譯梵文的佛經，這種以具像為主的文字，如何能夠表述那種具有高度“精神、靈魂與抽象”的梵文哲學與思想？即使以玄奘能夠精通漢文與梵文，他所翻譯的那部具有高度抽象邏輯、精密論證與形上道德價值的《瑜伽師地論》（佛教聖經），漢人如何能夠徹底明白？中國禪宗拋棄了印度佛教的因明等邏輯理論；這不是玄奘的錯，而是漢文字的根本貧困與限制！印度的佛教具有高度的心靈、冥想與道德思辯性，漢化後佛教竟然成為百姓默拜與禮神的宗教；漢人用殷商祭祀的方式，供三牲與五果祭拜，然後要求佛消災、解運與祈福，甚至要求保佑其功名利祿與榮華富貴，他們忘了釋迦牟尼是覺者，不是神，也沒有任何的神力！多麼可笑的文化異化事實？古代的佛教文化，最終還是漢化了，漢化的結果就是最終消失了。近代以來，翻譯了近萬部西方的著作，但真正瞭解西方文化的人不太多。其根本原因就是，閱讀這些著作的人仍然是按漢語的含義去理解這些西方著作。

2·漢字思維的重大缺陷

1) 漢文字思維缺乏邏輯規則

“薩丕爾——沃夫假說”認為：語言的結構決定操該語言者的思維方法。古

漢語沒有西方語言關係詞“是”；2000 多年前古希臘人正是抓住“是”探討了主語和謂語間的邏輯關係，從而誕生了語法學。只有字母文字才能帶來語法的嚴密，語法的完善又導致了古希臘形式邏輯的產生。日本學者末木剛博說：“西方的邏輯學，是古代希臘人以純粹求知的興趣開始研究，一直銜接不斷，連綿至今的一個成長過程。它既不像中國那樣，為實踐的目標所限制；也不像印度那樣，被宗教的功效所束縛”。而且字母文字誘導出了數學、哲學和原子論。可以說，是字母創造了西方世界的一切，甚至創造今日世界的總體形貌。正如加拿大學者德里克·德克霍夫所說：“雖然《舊約全書》和《新約全書》在過去三千年裡為西方文化提供了發展的基礎和引導，但西方首要的、而且占主導地位的資訊處理系統一直是字母表，直到電的出現。字母一直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程式設計手段。西方正是從字母中才衍生出並形成了其以技術為中心驅動力之特點的。字母起到了一種文化放大器和加速器的作用，它充分利用語言表達把思維轉化為技術。希伯萊文化傳統之所以對世人始終存在著某種誘惑，其基本的原因可能來自於高性能的拼字法給予古希伯萊人的那種相對於其他民族的語言優勢。”正因為有了字母文字的橫向書寫，西方社會才發生了從垂直的等級制度向水準的民主政體的轉變。

而象形漢字語文不可能產生嚴密的語法，中國一直無語法學，語法學是 1840 年後才從西方引進的，連“主語”、“謂語”的說法和標點符號都是引進的。古印度也有語法學。

在古代，中國人“詩言志”，而古詩的代表是《詩經》，《詩經》大量的的是四言詩，四個字當然不能把人的意思表達清楚！由此導致了漢語簡單性、模糊性、含混性。古時還流行“不學詩，無以言”；就是說，不學《詩經》，就沒有辦法

說話。這樣的傳統在漢語中的表現就是成語，成語絕大多數是四個字的。中國語言由此走向了單音化的道路；詩歌散文琅琅上口，思想卻蒼白空洞。在這樣含含糊糊、好似一鍋火鍋湯的語言環境裡，誰有興趣去分析語言思維的規律呢？這樣，中國無法產生研究語言規律的語法學、無法產生研究思維規律的邏輯學。

我用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胡平先生說過這樣一句話：“孟子斷定‘仁者無敵’，殊不知這種說法正好為後來那班無敵者們利用來證明自己是仁者。”首先對孟子的“仁者無敵”進行語言邏輯分析：主語——仁者，謂語——無敵；“仁者”與“無敵”是什麼關係？仁者是必然無敵還是可能無敵？按照西方人性惡的觀點，仁者一定有敵人，其敵人就是魔鬼撒旦。

從現代漢語的角度看：“仁者”與“無敵”之間應該加一個“是”字，即：“仁者是無敵的”。這是一個全稱肯定判斷：所有的S（仁者）都是P（無敵的）。根據邏輯推理規則：所有的S都是P（意味著在外延方面， $S < P$ ；所有的S都是所有的P，則 $S = P$ ）只能得出：有些P是S，而不能得出：所有的P是S；所以，“無敵者都是仁者”是錯的。無敵者們利用“仁者無敵”來證明自己是仁者，正是漢語的含混性和無邏輯性造成的！

2) 望文生義，面向過去。在閱讀過程中，人們不是面向未來，而是面向過去尋找語詞的意義。進而形成一種保守封閉的思維慣性——法“先王”、依賴“大救星”。尊崇先聖的做法，並非中國所特有。但中國幾千年一直持此道，確實舉世無雙。先王被神化、聖化，被作為一種權威范式。每一個朝代都把開朝皇帝諡為“高祖”、“太祖”（意為最高權威），把“祖宗之制不可改”奉為定規。權力崇拜使國人的思維深陷個人崇拜的陷阱而不能自拔。中國人總是從聖人之言出發而不是從公理出發來說明自己的想法，表明國人不會理性思維。

3) 不究事理的情緒化立場思維。漢字的強烈情感作用與大腦中的“漢字意義系統”一起，使得人們的主觀選擇過程具有極大的情緒性和立場性（所謂的“忠、孝”）。這就構成了中國人的最大的思維特徵即情緒化立場思維：聽到一個語句或一個陳述，僅僅因為這個語句中的某一些語詞的情感，就贊同或反對這個語句所表達的內容。這個社會的成員就自然就不擅長“說理”，由這樣的社會成員組成的民族自然是善於“窩裡鬥”的民族。

中國人只會類比思維和感性思維，所謂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就是說中國人的思維總是被自身的感情（角色）立場所支配（“親親唯大”），缺乏抽象的理性思維能力。

中國傳統政治思維是一個由“生物血緣”向“文化血緣”擴展的過程，“身體”始終作為一個潛在的“基因”而發揮著政治作用。在這個基礎上，“家、國”同構，“君、臣”一體的思想才有生成的可能。把二者連接在一起的關鍵認知要素就是“孝”。中國搞幾千年的“以孝治天下”。中國人的“禮”和“孝”最初都是維護血統的純正，以後轉化為對等級的強調。“孝”就是血統論，就是不講是非正義[父子相隱]，就是神化祖宗、神化家長，搞“祖宗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因此，中國人的思維缺乏中立性、缺乏超越性。

孫隆基認為，中國文化是以“身”的安頓為依歸，而並不注重超越，這造成“有一口飯吃就行”的極端世俗化的人生態度。同時，強政府、弱社會使得中國文化成為一種“弱者文化”。孫隆基進一步指出，這種弱者文化的結果是，“社會”軟弱渙散，無法自我組織和管理，因而更加依賴一個強勢的中央政府來統轄。這種弱不僅表現為對個人對人際關係的依賴，放棄對環境的控制，還表現為思維能力的弱化。對別人的觀點表述不能正確理解而是給出南轅北轍之回答的現象，

卻頻頻出現在海外受過高等教育的華人身上。這說明，中國人缺少理性思考的習慣的確是存在的。很多無謂的“論爭”不是源於不能正確理解別人的本意麼？

黑格爾認為中國的思維方式帶有嬰兒時期的直觀性和不成熟性，缺乏成年人時期的成熟思維能力。林思雲說：中國人的大腦成長速度異常緩慢，20 歲中國人的理性思維能力，還不及 10 歲西方兒童的水準。如果一個成人的理性思維能力仍然停留在少兒的水準上，在醫學上就被稱為精神障礙者。按照西方的標準，大部分中國人都應該算作輕度精神病患者。

4) 整體取象的思維方式，囫圇吞棗的整體主義的粗糙思維與專制相連。這是思想懶惰造成的，不肯花精力深入分析。中國人忽視細節、忽視關鍵的整體主義思維習慣，妨礙了真理的發現，導致了技術的落後，陷入了“上智下愚”的專制主義的泥潭。

党為了自己永久的統治，教人們看毛共要三七開。毛執政 27 年犯了 23 年左右的錯誤仍然只三分錯誤而且“功大於過”。領袖壟斷了政治資源，做有利於人民的事是他們應盡的義務。這點義務和他們享受的巨大權力是不成比例的，何功之有？既然無功，又何以掩過？如果是錯誤，就應該受批評，如果是犯罪，就應該受審判。“功過論”背後蘊涵著深隧的奴性意識。

當人們說某党腐敗時，總有人說某党大部分黨員是好的。不錯，一棵大樹被天牛咬死，並不是天牛吃得太多，而是天牛將樹幹中輸送養份的管道切斷了，使得整個系統不能運轉；同樣，貪官污吏並不是由於他們貪污了多少錢財，而是由於他們破壞社會公正、破壞了政府職能的運轉，使得社會運行系統趨於崩潰。而且貪官污吏的級別越高，造成的危害就越大，如果是獨裁者發昏胡來破壞整個系統，崩潰就指日可待，比如胡亥、楊廣、蒙古皇帝、毛澤東等。當一個人咽下最

後一口氣後的一段時間內，渾身一百萬億個細胞，一定“絕大部份是好的”，“大部份”器官還是好的，所以醫院可以作移植手術，個人也可以預先立遺囑捐贈器官，更不要說在死刑犯身上淘金的大蓋帽和白大褂對“大多數是好的”這一教導的活學活用了。不過，“大部份是好的”並不能否定死亡的事實（無論採用腦死亡還是什麼別的標準）。

長於分析、注重細節、注重個體的精密量化思維與民主相關，譬如；西方人寫通信地址是先寫自己的門牌號，再寫村、鎮、縣等名稱；中國人卻相反。在時間上，西方人是日月年，中國是年月日。在姓名上，西方人先名後姓，中國人先姓後名，而且中國人特別強調姓。

美術：如斷臂的愛與美之神維納斯、蒙納麗莎夢一般的神秘微笑都以細節見長；中國的《清明上河圖》描繪的是大場面，很符合中國人自大狂的心理。小說：西方小說的心理描寫十分的詳細，中國的小說都是一些大場面，缺乏細節描寫。荷馬史詩就有詳細的心理描寫，《三國演義》心理描寫就差得多。一位牧師曾問一位鐘錶行家：“你知道為什麼最好的手錶是日內瓦生產的嗎？”行家答曰：“不知道。”“因為日內瓦有加爾文的基督教教派。”牧師說。“因為基督教非常嚴謹和注重細節的投入，使日內瓦的工匠們生產出了最精確的手錶。”

當亞運會在廣島結束的時候，六萬人的會場上竟沒有一張廢紙。全世界的報紙都驚歎：“可敬的日本民族！”因為沒一張廢紙，全世界就服。再看看“十一”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的人們散去後，滿地的廢紙，到處亂刮！外國人一看就認為：中國要同日本比，還差得遠呢！萬事從小事做起。哪次飛機失事不都是因為一節油管不通、一個輪胎放不下來才失事的？

5) 固執己見，我就是“真理”，很難接受相反的意見。這是土皇帝的專制

習慣。

專制社會，“一切行動聽指揮”，民眾不僅要跪著而且當站起來行走的時候，也要聽命于暴君。暴君不僅要管制民眾的行為，而且要控制人的思想或思維方式，可以斷定：專制社會的民眾具有專制的思維方式。這表現在看問題的專橫。暴君的特點是：不許批評，即使表揚也要按照他的方式。暴君即使死去了，活著的民眾的恐怖心理也無法消除。

有人鼓吹“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合于自由平等要求的。其實，這是曲解。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以“孝”道為基礎。離開了孝的背景解釋一通，必然得出一個假結論。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意思就是：我不喜歡的東西或事物，我不會施給你。好象很合情合理，其實不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潛在的含義是：如果是你自己所“欲”的，便名正言順地有理由“施於人”。由於孝道的作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變成了“父不喜歡的，子就必須不喜歡；父喜歡的，子不能反對甚至必須接受”，粗暴地強制性地向子女灌輸家長所認為的對子女“有好處”的事物。這就陷入了專制愚昧的泥潭。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做不到的，孝道使它無用，強權使它虛偽。譬如：孟子不喜歡別人罵他，那末他就不應罵人；他怎麼罵反對他的人是“禽獸”呢？孔子不喜歡別人殺他，他就不應殺人；他為什麼亂殺少正卯呢？

有人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處理平等的人之間的關係；問題是中國古代根本就沒有平等的人，哪會有處理平等人之間的關係準則。而且，我不欲≠人不欲，我所不欲可能是人所不欲，也可能是人所欲。“蘿蔔、青菜，各有所愛”，我不喜歡吃蘿蔔，而我的兒子卻喜歡吃蘿蔔；難道就因為孔子“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的名言，就不給我兒子吃嗎？

孔子提倡“仁”，並指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儒家當官後，“達”的是自己的親朋好友，是赤裸裸的腐敗。推己及人的處世觀，強調的是“己”，而不是公義。什麼都用“我”來做標準，用“我”來衡量一切，這就陷入了“唯我獨尊”的“定於一”的專制邏輯。孔子思維的根本錯誤就是“以己推人”，這必然導致“唯我獨尊”的專制主義和“唯利是圖”的假仁假義主義以及“唯祖是從”的復古主義。

泰勒斯(前625年～前547年)說：“不要做你討厭別人做的事情”。有人說，這和中國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有異曲同工之妙，可人家比孔子早。《馬太福音》裡說：“無論何事，你願意人家怎樣待你，你也要怎樣待人”。如果別人不願意，那麼就不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如果自己不欲而人欲，那麼不妨聽之任之，而不要認為他錯了。

正確與錯誤、正義與邪惡不是根據“欲、不欲”和“施、不施”來劃分的，而是根據是否侵犯人權來劃分。我們行為的正義標準只能是蘊涵了自由平等博愛的人權。當代社會的絕對標準就是人權。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及其人權公約，各國人民和政府都應遵守，不能違反。否則，就成了野蠻的國家。

孔子的“欲、不欲”和“施、不施”的道德說教只適合於三歲兒童的理解力，經過2000多年，中華民族的思維水準還停留在幼稚園階段，實在可悲！

3·漢人思想貧乏

邏輯即人類的語言規律、思維規律，邏輯涉及的是概念、判斷和推理論證。一個人要會正確地思維，第一步就是要弄清腦子裡的各種概念。人類要正確思考，就必須遵循一套規則，這就是形式邏輯。人類要正確表達，也必須遵循一套規則，

這就是語法。不遵守這套“交通規則”，頭腦中的各種模糊概念就只會紛至沓來，雜亂無章，永遠也理不出個脈絡來，也就不可能形成井井有條的思想體系。形式邏輯最重要的第一條的規律就是同一律。同一律就是人與人之間尋找共同的語言，有了共同語言之後，才會進一步對事物之間的關係進行討論，沒有共同語言一切都是白搭，就不可能產生環環相扣、邏輯嚴謹的數學和自然科學，更不可能社會科學了。漢語語言的模糊必然導致思想的模糊與貧乏。連件事情都說不清楚，能期望古漢人有獨立人格、能出大思想家？不可能。語言沒有說服力，只能用暴力來說服了，從而在中國歷史的早期就形成了暴力崇拜和強權邏輯，從而決定了中國人思想的貧乏。

比較同時期的希臘、印度和波斯文明，就可以發現春秋戰國時代的思想流派，在思維深度、邏輯嚴密程度上，都差得很遠。古中國人缺乏思維邏輯，沒有產生分析事物的工具——邏輯學，沒有產生計量大自然的工具——幾何學，中國沒有關於宇宙天地的自然科學，諸子百家的學問只是一門關於倫理道德等感性思維方面的治人學，這是由“勞心者治人”決定的。中國的道、禪皆主張直覺，中國人最拿手的只是比喻、象徵、暗示、零散的思維。由於中國人的思維沒有發展到嚴謹的邏輯思維階段，因此，諸子的書中充滿了大量的任意性和武斷性，這種情況在西方學者中是少見的，與西方哲學相比，顯得粗糙而膚淺。諸子的學說和宗教相比較，由於沒有一套完整的世界觀體系，只屬於亞宗教形態；至於如何建構其社會理想，則成了思維混亂的大雜燴。他們除了用含混的四字句、五字句和七字句來概語式地表達宇宙的真諦外，根本就無法表達具有一定時度性和深度性的思想（更不說具有明晰結構性和邏輯性的思想了）。他們熱衷於事物是什麼(What)，而淡漠事物怎麼(How)來和為什麼(Why)。

孔孟老莊的東西，是一些裝神弄鬼的看似壑智實則弱智的格言，順口溜。老子的《道德經》多數是 4 言，導致了五花八門的解釋！老子的“辯證思想”來自于對自然現象的膚淺觀察甚至誤解，在此基礎上作了荒唐類比。例如對“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折。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其實，屍體是死後才堅挺起來，草木是死後才枯槁的。“堅強”不是死亡的原因而是它的結果。如果老頭子的“推理”成立，那麼也應該是“敗兵則強，折木則強”，得先被擊潰或被殲滅，軍隊才會強大起來，樹木折斷了才變得結實！”

黎鳴說：中國女人們“小腳”的歷史，曾構成她們多麼沉痛的悲哀——她們的“小腳”已成了全人類巨大的笑柄；但還有一個更沉痛、更巨大的永久性傷害，那就是儒家“文化”完全使人喪失了創造性思維的功能，特別是喪失了創造人類“學說”的功能。

中國人的“腦”還依然處於“儒家文化”傳統的“閹制”之中，還依舊沒有獲得真正解放的可能。中國的一些極其愚蠢的人們又在繼續高唱“孔子”、“儒學”，以及叫囂要回歸事實上仍舊是“儒學”的“國學”。他們所做的恰恰是在繼續延長儒學的危害，而“儒學”卻是徹頭徹尾的“偽學”，本質上它根本就不具備任何真正“學”的資格。儒學根本就沒有邏輯，沒有邏輯就沒有“學”，就不能成為學問，更不能成為科學。

儒家的思維方法是明顯的“聖人”獨斷，只要人模仿、記憶古代的禮教、禮法、典籍等，不要人理解、推理，更不可能促人創新。中國人的大腦不需要思考真理，只需要起錄音帶的作用。這就是現在大陸普遍缺乏原創力，而各種盜版與偽貨猖獗的原因。

儒學在中國兩千多年中所付出的“努力”，全都等於毫無價值的“零”，根本就是生命價值的虛擲和浪費。“儒家”們曾留下了堆山塞海的文字著作，其中的絕大部分甚至 90%以上，都是垃圾。這是因為，“儒學”原本就不是為了追求任何終極性的“真理”問題而興起和誕生的。它是為了維護、鞏固、強化“周禮”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極權專制統治的）體制而興起和誕生的。說白了，“儒學”的出發點和終極追求目標就與“真理”無關，既然如此，它怎麼能夠成為“學”呢？即使叫“儒學”，它也絕對只能是“偽學”。儒學在孔子時代是“偽人學”。孔子的“知”僅指道德修養、人際關係等，而非自然界的知識以及理性和邏輯等。孔子的知識面很狹窄，樊遲一個日常的農業問題就可以把他“問倒”，更不用說列子提出的“辯日”之類的天文知識，與他“同時代”的西方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其學術幾乎是孔子的十數倍，而這樣的一個“術業了了”的傢伙居然在中國成了“聖人”。孔子以家事言國事，以父子喻君臣，以家政推及國政；修身可齊家，齊家可治國平天下。打比方可以，但在實踐中卻行不通。原因很簡單：治理家庭與國家是兩種不同的法則，構成家庭內部關係的基礎是血緣、親情，構成國家的基礎是人們的自願聯合。儒教把用於家庭的法則用到政治中去，把政府、官員看作是人民的父母，它要官員愛民如子，官員既然是父母，他當然就可以隨意地打罵它的孩子。家庭之外，人與人是完全平等的關係，人民與政府是代理的關係，這些與血緣為基礎的家庭關係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個系統研究東方思想的西方哲學家黑格爾說：在我國的歷史上，像孔子這樣的“思想家”俯拾皆是。孔子學說是一種常識道德，任何一個民族都能找到這種常識道德，甚至還要更好，比如西塞羅的《政治義務論》，便是一本道德教訓的書，比孔子所有書的內容豐富且更好。黑格爾在閱讀孔子的“著作”之後感慨道：為了孔子本

人的名譽，他的作品還是不翻譯過來好——那些日常語錄在德國任何平民百姓都是隨口可以說出來的，怎麼就成了“思想家”呢？！可見，孔子多麼簡單膚淺。

到了兩漢“儒學”的時代，由於借助於“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等讖緯觀念，變成了“偽神學”；到了宋代和明代，似乎帶有“理氣”、“心性”等觀念的思辨，一變而成了“偽哲學”。事實上，無論“儒學”家們怎麼變，只要他們的出發點和終極追求目標均遠離真理的問題，加之嚴重地缺乏邏輯的思考，他們創造的任何“新的”觀念、學問，都是毫無價值的“死”觀念、“死”學問。即使到了近代，一些人到西方學了西學，可一旦回到中國，照舊推崇儒學。這些人中，包括著名的胡適、馮友蘭等先生，更包括後來執意要走“新儒家”路向的新儒家們，例如熊十力、錢穆、張君勱、唐君毅、徐復觀、方東美、牟宗三、成中英、杜維明等先生，其實，這些人全都是傳統的儒家文人，他們的“腦”早就被“儒家文化”閹製成了“小腦”，然而他們卻毫不自知。這是一幫根本就沒有勇氣創造自己“學說”，而只能走“復古”、“唯上”、“獨斷”老路的毫無自我人格尊嚴的中國傳統儒家文人。

西方的學者常仿照牛頓的說法：“我站在思想巨人的肩上。”古希臘的諸子視野多麼廣闊，他們對靈魂、神靈、邏輯、藝術、自然、社會等都有探討。古希臘的哲人們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系統地涉及了物理、數學、天文、幾何、邏輯和政治學等基本概念和方法論，形成一個科學思維的傳統。亞里斯多德著有《形而上學》、《工具論》、《物理學》、《倫理學》、《政治學》、《詩學》、《修辭學》等書，他把知識分為理論、實踐、創作三大類，提出十大哲學範疇，研究了物體的運動、形式邏輯等，建立了多個新學科，他是希臘智慧的傑出代表。他們實際上已經初步懂得用試驗的辦法從事發明創造。正因為有著肥沃的科學土壤，

西方人能夠一代勝過一代，西方人的學說能夠不斷地向著高處、廣處發展、延伸，西方人的哲學能夠生髮出科學，西方人的科學能夠生髮出形形色色有實際效用的技術，西方人的形形色色的技術又能夠生髮出更新更強更美的思維的藝術，如此不斷地推進，乃至循環往復，終於使他們遠遠地超越了其它的人類，包括東方和中國的人類。

然而，中國的古人從來就不曾為後來的人們提供任何可以讓他們站上去的思想的“肩膀”。尤其是儒家文人，他們所提供的“觀念”，幾乎全都是毫無學術價值的“死”觀念，既缺乏必要的抽象意義，更缺乏必要的邏輯力量，但鑒於儒家“禮儀”的“師道尊嚴”，卻絕對能夠嚇唬學生和後人，讓學生和後人盲目地視之為“博大精深”（事實上都是毫無實際價值的膚淺的東西）。其結果，永遠都只能讓後人乖乖地匍匐在前人、古人的跨下，永遠稱他們為“大人”、“聖人”，而根本不是站在他們的肩上，一代一代不斷地向上攀升。所以在中國，無論在什麼方面，幾乎永遠都只能是一代不如一代。更糟糕的是，他們的所謂“儒學”，事實上是對一切中國後人的“閹腦學”，尤其是閹制一切男性讀書人的“大腦”，使之變成“小腦”，甚至“無腦”的奴隸、奴才、蠢材。因此，儒學永遠都是為維護、鞏固、強化極權專制的社會體制服務的最邪惡、最缺德的“奴學”，甚至是嚴重侮辱人的尊嚴的“辱學”，它根本就是一種永遠都不可能創造出真正人類“學說”的絕對的“偽學”。

第 23 節 中國根本就沒有科學

馬克思說過：中國根本就沒有科學和哲學。愛因斯坦說，科學的基礎有二：一是希臘發明的形式邏輯，一是文藝復興中發現的實驗方法。中國缺少這兩項，所以中國古代沒有產生科學。不存在中國古代科學曾經領先的問題（《愛因斯坦

文集》)。科學和技術之外，還有“科學技術”。後者是由科學推導出來的技術，是經驗積累所不能達到的技術。例如無線電技術，是電磁理論的產物。中國的“四大發明”都是技術，都是來自經驗的技術，不是科學。

五四時期引進民主與科學，就說明了中國自古以來就沒有這 2 樣東西，所以才需要引進！

最近這幾年，復古，飾古，偽古的風氣越演越烈，而且都是以官方的支援在搞，其目的不過是為專制統治尋找合法性，為抵制自由民主尋找藉口，所以要把西方任何先進的東西都“論證”成中國早就“古已有之”，美其名曰培養民族自尊心，其實是培養專制文化的遺老遺少。什麼風箏是飛機的雛形啊，萬虎是飛機的發明者啊，竹蜻蜓是直升機的前身啊，大禹是世界上第一個進行飛行的人啊，孔明燈是發動機的鼻祖啊，等等……實際上最早的飛行器早在兩萬多年前就有了，其實物就保存在埃及國家博物館，那時的中國這地方還沒有人呢。官方熱衷於支持操縱這種復古偽古熱潮，其動機不過是為了要向人民證明：沒有西方的政治體制，中國古代也是科技發達領先的，所以，現在中國也勿需引進西方民主體制。

1970 年代，顧准說：中國沒有產生出科學與民主。“直到現在，中國的傳統思想還是中國人身上的歷史重擔”；“批判中國傳統思想，是發展科學與民主所十分必須的。”“五四的事業要有志之士來繼承。民主不能靠恩賜，民主是爭來的。要有筆桿子，要有用鮮血做墨水的筆桿子。”李慎之也說：“在世界各古老文化中，只有希臘文化從文明發軔的‘軸心時代’開始就有科學與民主，其它如印度文化、中國文化等一概沒有。這已是世界史的常識。為什麼說中國沒有科學？理由十分簡單。第一，中國沒有按嚴格的邏輯推理發展出一套科學理論繩繩相繼，日新又新。第二，中國沒有發展出以數學作為各門科學的共同語言。……祖沖之

推算出來的圓周率的精確度據說比歐洲人早了幾百年，…但中國從來沒有幾何學。”

1·天文學

泰勒斯訪問過埃及，研究過埃及的土地丈量術，並由此創立了初等幾何學。他還根據巴比倫的天文知識，奠定了希臘天文學的基礎。他計算出一年有365天，發現了小熊星座，並根據天文學和氣象學知識預言一年的農業收成。他曾預測一次日食，促使米底（在今黑海、裡海之南）、呂底亞（今土耳其西部）兩國停止戰爭，多數學者認為該次日食發生在西元前585年5月28日。他在埃及時曾利用日影及比例關係算出金字塔的高，使法老大為驚訝。

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610～546 BC.）是泰勒斯的親戚和學生，他繪製出第一張地圖，製造了第一個天球儀和計時器；他提出月亮的光是對太陽光的反射，太陽是一團火。

畢達哥拉斯（前580年—前500年）學派利用數學關係來解釋自然現象，他們從球是最完善的幾何體出發，認為地是球形的，同時認為天體運動甚至音樂也應該服從數學規律。他們發現月亮總是以同一面對著地球、晨星和昏星就是同一個星。畢達哥拉斯學派認為宇宙是一個包括各種天體的大圓球，中心有一個火球，圓形的太陽和大地繞中心火球作均勻圓周運動，這種關於天體整體運行的推測為太陽中心說奠定了基礎。這就表現出一種了不起的擺脫了人類中心說的思想解放。阿那克薩哥拉發現月亮是一堆石頭、是由於反光而發光的，他認為月蝕的真正原因在於地球對太陽光的遮擋。為此，他被雅典人判處死刑而逃走。

古代最合理的置閏方法是默冬週期，即19年7閏的規則，是由希臘天文學家默冬在西元前432年提出的。兩河流域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沒有固定的置閏規

律，往往是國王根據情況隨時決定，給安排生產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到西元前 6 世紀末，他們摸索出了固定的置閏規則，起先是 8 年 3 閏，以後是 27 年 10 閏，最後於西元前 383 年定為 19 年 7 閏。

希臘人歐諾比德發現了黃道的斜度，明白了太陽到底是比地球大得多，這一事實便支持了那些否認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人們。赫拉克利德（西元前 388-315 年）發現了金星與水星都環繞太陽而旋轉，並且採取了地球每 24 小時繞著它自己的軸線轉動一周的見解。

薩摩的亞裡士達克（Aristarchus，前 310~前 230）比哥白尼早一千多年提出“太陽中心說”，即一切行星包括地球在內都以圓形在環繞著太陽旋轉，並且地球每 24 小時繞著自己的軸自轉一周。他第一個嘗試測量地球和太陽之間的距離，並正確提出地球的面積小於太陽，他還測出了太陽和月亮的大小以及它們之間的距離。阿幾米德在他寫給敘拉古的國王葛倫的信裡說，亞裡士達克寫成了“一部書，其中包括著某些假說”；“他的假說是說恒星和太陽不動，地球則沿著圓周而環繞太陽旋轉，太陽位於軌道的中間”。

阿基米德（Archimedes，前 287-前 212）發現了浮力定理，計算球體、圓錐體和其它立體的計算公式，並在深刻理解杠杆原理的基礎上，發明螺旋提水機械和使羅馬海軍潰不成軍的撼船機械。他簡化了數字的表達方法，宣稱可以輕鬆地用數位記錄恒河兩岸沙子的數量。在他之後的一個世紀，亞歷山大裡亞的泰西比烏斯發明了水鐘、水風琴、壓縮空氣拋彈機，以及最早的滅火機（即滅火唧筒）等。

西元前 3 世紀的艾拉托色尼（Eratosthenes，約前 275-前 194）著有《地理學》、《對地球大小的修正》等重要著作，建立了較完備的地理學知識體系。他對

地球的周長進行了科學測定。他根據夏至日正午在亞歷山大裡亞城和尼羅河中游昔恩尼(在北回歸線上)兩地日影的差異，用三角測量法計算出地球周長為 39690 公里，與現今測得的準確數值 40075.13 公里十分接近，其測出的地球周長只比今測赤道周長少 385.13 公里。同時，艾拉托色尼也是首先使用“地理學”名稱的人，從此代替傳統的“地方誌”，寫成了三卷專著。書中描述了地球的形狀、大小和海陸分佈，並將地球劃分五大氣候帶。艾拉托色尼還用經緯網繪製地圖，最早把物理學的原理與數學方法相結合，創立了數理地理學。他還提出了地球表面大部分是水面，世界各大洋互相連接為一體的學說，同時是最早提出向西航行就有可能抵達亞洲東部的人。他還把潮汐的漲落歸因於月球的影響。

希巴古(Hipparchus, 前 190~前 120)是第一個系統地論述了三角學的人，作為“方位天文學之父”他發明了“天文數”概念，發現了歲差現象，編著作了西方歷史上第一個記載 850 個恒星的星表，並測定了上千座恒星的亮度並注出了它們的經緯度；算出月球直徑及其與地球距離的近似值。他計算了日食和月食發生的時間，並根據日月的變化計算出了一回歸年為 365.2467 日(今測得正確數值為 365.2422 日)，一朔望月為 29.5306 日(今測得正確數值為 29.530589 日)，其誤差不超過一秒。他採用了並改進了亞婆羅尼(鼎盛期約當西元前 220 年)所創造的周轉圓的理論；這種學說發展到後來便以托勒密的體系而知名。後世最負名望的天文學家——托勒密，他創立的地球中心說主張地球處於宇宙中心，且靜止不動，日、月、行星和恒星均環繞地球運行。托勒密這個不反映宇宙實際結構的數學圖景，卻較為完滿的解釋了當時觀測到的行星運動情況，並取得了航海上的實用價值，並代表希臘天文學和宇宙學思想的頂峰。在以後近兩千年內，托勒密學說被奉為天文學的“聖經”。

古代天文學家推算地球、日、月的大小以及日與月的距離時所使用的各種方法在理論上都是有效的，但他們卻受到了缺乏精確儀器的掣肘。想到這一點，他們的許多成果就真是令人驚歎了。托勒密推算月亮的平均距離是地球直徑的 29 又 1/2 倍；而正確的數字是大約 30.2 倍。他們之中還沒有一個是多少接近到太陽的大小和距離的，他們都把它估計得太低了。他們的估計若以地球的直徑來表示的話，則亞裡士達克是 180 倍，希巴古是 1245 倍，波西東尼是 6546 倍；而正確的數字則是 11726 倍。他們對太陽系的圖像，與事實相去得並不太遠。

1900 年潛水夫在希臘安蒂基西拉島附近海底一艘沉沒的古代貨船殘骸中，發現了一個神秘複雜的古代希臘青銅機械裝置。2006 年，由英國、希臘等多國科學家組成的國際研究小組通過 X 光和 CT 掃描科技，發現了一段失傳 2000 年的希臘銘文，這段文字正講述這神秘機械的。它擁有超過 30 個齒輪和轉盤，可以通過一個手搖曲柄進行轉動，“安蒂基西拉機器”堪稱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電腦”，通過轉動一些刻度盤到未來的某個日期，它能夠預測太陽和月亮當天在十二宮圖中的具體位置，以及月亮圓缺狀態，是否會出現日月蝕等，該機器甚至還能預測古希臘時期已知的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的運動狀態。

科學家認為它的科技“超越”了時代至少 1000 年。數學家托尼·弗裡斯將“安蒂基西拉機器”稱作是“人類所有時代最偉大的科技成就之一”。科學家相信，希臘人很可能比哥白尼早 1400 年，就在該機器中使用了“日心說”理論。據悉，“安蒂基西拉機器”的製造日期可以追溯到西元前 100 年到 150 年左右，該機器是在希臘羅得斯島斯多葛學派哲學家波塞多尼歐斯創建的學校中製造的，因為西元前一世紀，希臘演講家和哲學家西賽羅曾在文章中提到過類似的機械，他寫道：“我們的朋友波塞多尼歐斯最近發明了一種設備，每一個旋轉都能複製

太陽、月球和五大行星的運動。”西賽羅正是波塞多尼歐斯的一名前學生。

古希臘人的曆法非常精確，而“渾天說”不可能定出太陽曆來，只能訂出所謂“陰曆”，也就是月亮曆那種原始曆法。24節氣還要專門測定是哪一天后再寫在“皇曆”裡，對農業國來說簡直是罪過。明朝初年傳教士們試圖向中國天文學家們介紹日心說和地心說的爭論時，驚奇地發現他們毫無興趣。中國人感興趣的只是天文曆算的實際功用，天文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準確地預言日蝕月蝕，確定24節氣是下個陰曆年的哪幾天就行了。

古希臘人認為大地是球形的，這是認識論上的一個極大突破，而中國人直到近代都沒完成這個突破。中國人一直以為“天圓地方”。大地是個方方棋盤，大地四周和下面都是水，大地之所以未被水淹，是因為鼈托著它，因此，中國人視鼈為神，特別崇拜鼈，由此而崇拜鼈的兄弟們——烏龜王八。華人最早的文字就是甲骨文，甲就是烏龜殼。而所謂“天空”，就是一個空心的“天球”。諸天體就嵌在這球面，天球轉動，於是便有晨昏。這就是所謂“渾天說”。任何人都會想到，如果天空真的是個包著方方的“地盤”的空心球，那“地盤”就必然是懸浮在空中的，毫無任何支柱，否則那“天球”就絕不會轉動。正是因為此，古中國杞人就憂愁天會塌下來，結果成了中國人的笑柄——“杞國無事憂天傾”。杞人不會象希臘人去推理、去計算；古人連杞人好奇心都肆意攻擊，當然不會去研究大自然，不會有科學。

中國的天文學“理論框架”是“天圓地方”，天似穹窿，籠罩四野，如蒙古包一樣懸掛在方方的地面上。天空既然是蒙古包，那高度就不是一樣的。極而言之，到了天盡頭的天地相接處，那高度不就為零了麼？南北朝時代僧一行等人卻用畢氏定理測量起天高來。僧一行在同一經度不同緯度同時測量日中的竿影，便

能據此算出天的高度來！他們算出了子午線長度，自己卻不知道，誤差大得不得了，跟古希臘人算出來的地球周長根本無法相提並論。此外，王充以“元氣呼吸，隨日盛衰”來解釋潮汐週期；宋應星則陰陽的相生相剋在解釋火藥的爆炸。而且漢人竟然用“世界中心之國”的“中國”來稱自己，多麼妄尊自大和無知邪惡！

2·數學比較

中國學者猛吹中國在西元前 1100 年就知道畢氏定理遠早于畢達格拉斯；還一直叫囂要把畢氏定理改成商高定理。改名的理由在於古文獻《周髀算經》裡，記述了西周時期一個叫商高的人，在回答周公的問話中提到：“故折矩以為勾廣三、股修四、經偶五”，即“勾三股四弦五”。據此便武斷地咬定：商高早于畢達哥拉斯六百多年，就發現了“直角三角形兩直角邊的平方和等於斜邊的平方”這一普遍規律，並將畢氏定理更名為“畢氏定理”。

畢氏定理西方很早就知道：1) 古巴比倫：在支那還沒有發明文字根本不知道會不會數學前，古巴比倫就已經知道並充分利用畢氏定理。由已出土的四塊泥版上的記載得知：古巴比倫在西元前約 1800 年至 1650 年，他們已知道及應用商高定理，且知道大約有畢氏陣列(例如出現的最小畢氏陣列為 45、60、75 等)。普林頓 322 號泥板上記錄了一個數表，經研究發現其中有兩組數分別是邊長為整數的直角三角形斜邊邊長和一個直角邊邊長，由此推出另一個直角邊邊長，亦即得出不定方程 $X^2+Y^2=Z^2$ 的整數解。

2) 古埃及：相傳古埃及人在建築宏偉的金字塔和尼羅河氾濫後，重新測量尼羅河兩岸土地的面積時，曾應用商高定理的逆定理。例如他們曾用結繩的方法，在地面上畫出邊長分別為 3：4：5 的三角形來確定直角，此即為商高定理的逆定理的特殊情形。

其實中國根本就不是在商高時代(西元前 1100 年)發現畢氏定理。《周髀算經》成書於西元前 100 年的西漢，而且是以“昔者，周公問于商高曰”開始，很明顯是後人偽託的。換句話說，中國是到西元前 100 年才知道畢氏定理，足足晚了西方 1500 年以上。更嚴重的是，其實《周髀算經》雖然有個算字，其實根本不是數學書，事實上是天文書。江曉原在《周髀算經與古代域外天學》一文中早就證明周髀算經受印度天文學影響很大，宇宙觀根本就是印度來的。可以推想《周髀算經》也可能是印度傳來的，再假託周公和商高而本土化的。

畢達哥拉斯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只是到了他手上，畢氏定理才首次得到標準的數學證明。所謂定理，是指人們對自然和社會現象的規律性的認識，而不是某一特例的偶然發現。所謂“勾三股四弦五”，不過是畢達哥拉斯定理中的一個特例，特例以外還有無窮個直角三角形，不能用“勾三股四弦五”來求解。而畢達哥拉斯和他的學生們，不但發現了直角三角形三邊長度關係的普遍規律，而且完成了對這一規律的幾何和邏輯的證明。與商高發現的特例相比，是天壤相別的，根本不能相提並論。而我們卻據此將畢氏定理改名為“畢氏定理”，並一直沿用至今。這真是一個滑天下之大稽的“壯舉”。

通過運用畢氏定律，又發現了無理數的存在。據說那是老畢弟子做出的發現。他試圖求解直角邊均為 1 的斜邊，發現 2 的平方根無法用分數表達，由此產生了“無理數”的概念。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希帕索斯無意中向別人談到了他的“無理數”發現，結果被殺害。但根號 2 很快就引起了數學思想的大革命，科學史上把這件事稱為“第一次數學危機”。畢達哥拉斯還證明了三角形的內角和等於 180 度。那都是人家西元前 5、6 世紀的發現。中國人連概念都沒有，連開平方都不知道怎麼開。“實數”、“虛數”、“有理數”、“無理數”統統是譯名。

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辭中有很多記數的文字。從一到十，及百、千、萬是專用的記數文字，共有 13 個獨立符號，記數用合文書寫，其中有十進位制的記數法，出現最大的數字為三萬。當時的人只懂得 10 進位，只懂得加減，連乘除都不會。巴比倫數學都是來自巴比倫遺址挖出來的泥版，時間在西元前 1600 年前，那時中國大陸根本還沒有文字，巴比倫人已經在解 3 次方程式和聯立方程組了。他們創造了 60 進制。巴比倫人有豐富的代數知識，泥書板中載有一次和二次方程的問題，他們解二次方程的過程與今天的配方法、公式法一致。此外，他們還討論了某些三次方程和含多個未知量的線性方程組問題。

由於中國數學長期運用算籌作為工具，更加局限了對抽象符號的創制，較大的數字表達起來往往非常複雜。在中國傳統的數學中，有關數、量及其性質、關係的專門術語並沒有形成系統。有關的專門術語基本上也是從日常生活和其它社會實踐所採用的用語中轉義或加義而成的。例如，要表示未知數，古中國人習慣用“天”、“地”、“人”、“物”四字來表示，因而對於超過四個以上的複合未知數則難以表達出來，甚至根本表達不出來。又例如，古人把 $\frac{2}{3}$ 稱為“大半”，把 $\frac{1}{2}$ 稱為“中半”，把 $\frac{1}{3}$ 稱為“少半”，把 $\frac{1}{4}$ 稱為“弱半”，結果對於 $\frac{1}{5}$ 、 $\frac{1}{6}$ 、 $\frac{1}{7}$ 、……等更小的分數就無法給予稱謂；在古老的數學書籍中，“實”表示“被除數”，“下法”表示“原除數”，“方法”表示“原除數與初商的積”，“廉法”和“隅法”則分別表示二種特定的乘積，結果習慣的日常用語被賦予複雜的特定內容。

中國能夠吹來吹去的就是個圓周率和《九章算術》；而同樣的問題埃及人巴比倫人早兩千年就已經解決了。所謂“窮竭法”求圓周率，也不過是阿基米德早就發明了的。

由於長期缺少數位化的管理意識，連中國古代朝廷紀錄中的很多數位都是不可靠的。比如《明實錄》中記錄嘉靖皇帝某年某次的鑄錢量，居然是整個明代二百多年間全部鑄錢量的十倍以上。鑄錢是當時朝廷最大的經濟行為之一，數字差錯到這個地步而沒有人發現，可見問題之嚴重，證明上上下下都不在乎實證。李約瑟認為，實證意識如此淡薄，主要是因為中國式的官僚主義。中國式的官僚主義以褒貶代替真實、以儀式代替真實、以理想代替真實，並把體制之外的真實一概予以否定，這就使得中國文化在精神上不再習慣於面對真實。

西方的幾何學術語一開始就與日常生活用語相分離，並且這些幾何學專業術語是嚴格服從一詞一義，詞義一一對應的原則的。這也是西方幾何學體系的演繹推理的一個必然要求。從“點”、“線”、“面”、“體”，到“正方形”、“長方形”、“梯形”、“立方體”、“圓柱體”、“圓錐體”、“球體”等等，都特定專門地指稱唯一的一種幾何學物件，形成指稱上的一一對應關係。現代的中國數學、幾何學就是採用或模仿西方的這一切抽象符號的特點，從而形成我們現在的關於數學、幾何學的專門的相對獨立的符號系統。

利瑪竇來到中國的時候把《幾何原本》帶過來並同徐光啟一起翻譯了《幾何原本》，歐幾裡德（Euclid，前 330-前 275）的幾何學是人類史上一大貢獻，第一次把推演法規律化，推演法對於近代科學產生的影響無法估量。徐光啟翻譯後瞭解到，推演法的一個精髓就是欲前後更置不可得。就是一條一條推論不能次序顛倒，這跟中國傳統不一樣。可惜徐光啟的譯作只翻譯了前六章，還有九卷沒有譯出。沒在中國產生應有的影響，所以推演法沒在中國生根。一直到平定了太平天國後，曾國藩做了兩江總督，他接受科學家李善蘭的建議，撥款支持把後九卷翻譯出版，把以前譯出的六卷也校對一遍，出了一個完整的版本。李善蘭請曾國

藩寫個序，曾國藩不懂，就讓自己的兒子曾紀澤（曾作過中國駐英公使）代筆。曾紀澤代他爸寫的《幾何原本》序言說：“蓋我中國算書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為一法……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幾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而概之曰：點、線、面、體。……《九章》之法，各適其用，《幾何原本》則徹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無不賅也。”這裡說透了中西思維方法的差別。《九章算術》共收有 246 個數學問題，分為九章。分別是：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不足、方程、勾股。它的計算方法有成就，但是沒有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曾國藩看完兒子寫的東西後大為讚賞。

日本數學曾長期受中國數學，特別是《九章算術》的影響，但 17 世紀初在日本發展起來的和算已超越了傳統中國數學的影響，而與西方的數學思想有了接近。這時日本著名的數學家關孝和已對微積分有了深入研究，有些學者將其與西方的牛頓、萊布尼茨並列為微積分的創始者。而此時的日本尚不瞭解西方，也就是說，日本人的數學思想是自己發展的。

3· 其他學科比較

醫學。被譽為西方“醫學之父”阿爾克芒(Alcmaeon of Croton, 西元前 6 ~5 世紀)在瞭解埃及人知識的基礎上解剖過人體。他這樣做是為了研究人的生理構造，埃及人卻是為了製作木乃伊。阿爾克芒發現了視覺神經聯繫耳朵和嘴的歐氏管，還認識到大腦是感覺和思維的器官。他的工作實際上為西方解剖生理學的傳統開了先河。阿那克薩哥拉用動物進行實驗，並且用解剖方法研究它們的構造。恩培多克勒認為血液流向心臟，並由心臟流出，健康有賴於人體中所謂四種元素的正確平衡。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前約 460-前 377)是西方醫學的奠基人，改變了以巫術和宗教為根據的傳統醫學觀念。他的生命平衡的醫學理論和

處理內外科病症的經驗具有很高的價值，他主張進行精微的觀察和周密地解釋症候，從而指出了走向現代臨床醫學的道路。“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依然是醫學院畢業儀式上的誓言，是醫生的基本道德標準。赫羅菲拉斯（Herophilus, 約前335-前280）是一位解剖學家，他首次把人體靜脈和動脈區分開來，並對血液迴圈、神經、眼睛和肝臟等器官做過詳細描述。他提出大腦是神經系統的中心，批評亞里斯多德的心臟是思維器官的說法。以他為首創立的赫羅菲拉斯派，在醫學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艾拉西斯特拉塔（Erasistratus, 約前250）詳細觀察了動脈和靜脈的分佈，甚至注意到了微血管的狀態。他指出動脈與靜脈的最後部分是連在一起的。他對人類心臟的觀察超過以往任何人，準確地描述出心臟半月瓣、二尖瓣和三尖瓣的位置。他區分出運動神經和感覺神經，在解剖學、神經系統、骨骼系統及微血管、胰腺和胚胎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而中醫一直沒有科學理論基礎。

古希臘人在光學方面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光學知識得到了較充分的發展。古希臘的光學知識包括生理光學、幾何光學和物理光學等幾個方面。

希臘人就視覺提出過截然不同的幾種理論。畢達哥拉斯、德謨克利特等認為，視覺是由所見物體射出的微粒進入眼睛而引起的。而恩培多克勒、柏拉圖、歐幾裡得等卻主張一種眼睛發射說，認為眼睛本身發出某種東西，它直線射出；與物體的邊界相切的這些射線形成一個錐體，從而被看到，物體的大小由視角來確定。其中恩培多克勒還提出過，光以有限的速度傳播，但速度極大所以難以覺察的觀點。這些理論都為後來的光的粒子學說埋下了伏筆。

亞里斯多德認為，視覺是在眼睛和可見物體之間的中間媒質運動的結果。他認為，這種中間媒質有讓光通過的可能性，即是透明的，光則把這種可能性變成

了現實。所以，沒有中間媒質就沒有視覺。在這個理論中包含著後來的光的波動說的思想。

希臘的幾何光學發展比較充分。亞里斯多德曾直接提出過光的折射問題：為什麼插入水中的棍子好象是折斷的。歐幾裡德在《反射光學》中研究了反射現象。他提出了光的反射定律，並把這個定律用於平面鏡和球面鏡的成像上。歐幾裡德發現了凹面鏡的聚焦作用，並假定其焦點在球心或球心與鏡面之間。後來盧克萊修用原子論的觀點描述了反射定律，而亞歷山大裡亞的希隆以光程最短的原則論證了反射定律。

天文學家托勒密對光的折射也有實驗研究並設計實驗測定了從空氣射入水中的光線的一系列角度值。托勒密測到的資料是足夠精確的，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而發現光的折射定律，而提出折射角與入射角成正比的結論，實際上這一結論只有在入射角很小時才適用。

古希臘的聲學和熱學知識。最早進行系統性聲學研究的是畢達哥拉斯。畢達哥拉斯學派對聲和音階的研究使他們指出了各個音程之間的算術關係。他們證明了，用三條弦發出某一個樂音以及它的諧音第五度音和第八度音，這三條弦的長度之比為 6:4:3。

亞里斯多德把聲音看作為一種運動。他指出，發聲體撞擊空氣使之在各個方向發生拉伸和壓縮運動，從而傳播開去；當它碰到障礙時，就象球被反射一樣而產生回聲。這些對聲的產生的認識，顯然是正確的。亞里斯多德還認為，如果管的長度加倍，管內的振動就要花兩倍的時間。原子論者如盧克萊修則把聲音視為物質流，並以“聲粒子”本身的性質解釋聲音的多樣性，如重濁的號聲，沙沙的笛聲和流暢的鳥啼等。以後，古羅馬的建築師們也從實際工作經驗裡提出了建築

聲學的一些問題，如聲音的交混迴響、回聲、共鳴等。他們還把聲音的傳播和石塊投向水面產生的水波相類比，認為聲音也會以無限膨脹的圓形向外發散。

關於熱現象，亞里斯多德把熱看作是先於物質元素的基原性質。而原子論者則認為熱的感覺是物質流引起的，他們認為火是最輕的和光滑的原子。

亞歷山大裡亞的希隆曾設計並製造出最早把蒸汽作為動力的“小渦輪”。這是一個裝有兩個彎管噴口的中空的球。噴管與球的軸成直角，各自彎向相反的方向。當蒸氣在球內產生時，蒸氣就由噴口射出，使球體繞軸轉動。這就是現代渦輪機的雛型。

電磁學。米利都的泰勒斯已經瞭解了電和磁的一些性質，他知道琥珀被磨擦後能夠吸引輕小物體。淡黃色的琥珀當時被稱為“琥珀金”(electron)，

“電”(electricity)這個詞也是由此而來。泰勒斯通過觀察還知道某種天然礦物具有吸鐵的能力。

磁石被人們稱為“靈敏的鐵”(quick-iron)，它的奇特能力激勵起了人們豐富的想像，這在許多文學作品中都反映。西元前七世紀，古希臘人就已經發現並記載了磁石吸鐵的現象，是世界上最早發現磁現象的，比中國早得多。泰勒斯和蘇格拉底都曾提到磁石吸鐵和磁化現象。蘇格拉底說：“這石不僅吸引鐵環，而且還使鐵環具有類似的吸引其它鐵環的能力，有時你可以看到一些鐵片和鐵環彼此勾掛以致形成一個十分長的鏈，而它們的懸吊力全都來自原磁石。”西元前一世紀，羅馬的盧克萊修也記載了磁鐵石的排斥作用並做了鐵屑實驗。

古希臘人還知道把帶電的魚用於治療。西元前 30 年左右，人們已用鐵矛接觸電鰻，利用電擊治療痛風和頭痛。忠實的原子論者盧克萊修對磁作用提出了一個原子論的解釋：磁體發射出細微的粒子流，撞擊、驅散磁鐵之間的空氣，並在

其中形成真空，鐵原子則力求進入這個真空中，從而帶動著鐵塊直貼磁體，使兩者吸附在一起，其他物體由於它們具有特殊的結構或性質（太重或太鬆懈），不能為磁體所吸引。盧克萊修可能已認識到磁的排斥作用，他將鐵屑放在黃銅水盆內進行實驗，發現當把磁石放在下面時，鐵屑便在盆內“狂舞”。盧克萊修認為，“磁”（magnet）這個詞來源於“瑪格尼西亞”（Magnesia），後者是靠近小亞細亞的一個地方，當時的磁鐵礦是在那裡發現的。

工具是文明的表現特徵。高等民族使用製造工具，低等民族使用天然工具。比如象筷子這種木制或竹制的天然加工品，與西方金屬餐具相比，在文明度上就落後了一大截。又如鎧甲，西方早在 5 世紀就發展出由整塊金屬鍛造而成的重裝鎧甲，6 世紀就有柔軟舒適的精鑄鐵編鎖子甲，而中國直至清朝依舊在廣泛使用牛皮護甲；西方 14 世紀就普及了有著複雜工藝的玻璃製品，中國人卻仍在捏土坯燒瓦罐。可見中國由古至今一直在木頭、皮草、泥土製品等天然加工品水準上徘徊，無法與西方精湛的、自古希臘一脈相承而來的科技水準相匹敵。所以說西方文明從古至今都優於華夏文明，這是不容置疑的。

西元前 611 年，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就已經成功地實現了環航非洲，跟這一成就及後來的哥倫布橫渡大洋發現美洲和麥哲倫的環球航行比起來，所謂的鄭和下西洋只不過是小孩子的遊戲。鄭和下西洋是為追剿那些有違海禁的華人。當時聚居于蘇門答臘舊港的華人最多，明成祖耗鉅資遣鄭和率二萬餘兵丁前往鎮壓。鄭和亦不負聖望，剿滅逃民之外，生擒其首領陳祖義等三人回京誅殺，以儆效尤。1405 年開始的七次下西洋，耗時 28 年，在海外征戰數次，死傷慘重，耗費空前。劉大夏《殊域周諮錄》稱：“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于國家何益？”在一片反對聲中，皇帝只得終止了如此荒謬舉措。

只不過以一種獵奇的心態在自己筆記裡記錄了一些奇聞佚事的一個士大夫官僚（沈括），居然也要吹噓成是什麼“大科學家”，這簡直就跟把某個小報的記者說成是“大科學家”一樣滑稽可笑。《夢溪筆談》其實只不過是一本收羅了藝文、政事、書畫、音律、器物、神異、曆法等等諸方面的軼聞奇談的大雜燴，是他隱閒居後的自娛之作，跟《聊齋志異》並無什麼兩樣，與“科學”無關，這些也就只能濛濛搞不懂文言文的老外。

跟這之前數千年裡古希臘，古埃及，古巴比倫科學家所留給人類的相比，如記錄在西元前一千多年前的莫斯科手卷（Moscow papyrus）和林德手卷（Rhind papyrus）上的古埃及高深數學知識，漢謨拉比王朝時的古巴比倫天文學數學知識，以畢達哥拉斯學派和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裡斯多德，阿基米德等人為代表的古希臘哲學及已上升到抽象思維階段的科學（而非實用技術），亞波隆尼亞斯的《圓錐曲線》，歐幾裡德的《幾何原本》和《光學》，托勒密的《大彙編》等等等等（僅從浩如繁星的眾多科學家和科學成就裡舉出幾個典型代表），跟這些相比，《夢溪筆談》就只能算是猴子的“科學”而已。

4·沒有科學的原因

①起點低

中國文化的源頭《易經》一開始就充滿了神秘主義、感性、反理性的特徵，並影響了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和各個流派。它只不過是一本原始時代的算命書而已。到現在人們仍在為它裡面那些弱智囁語的確切含義爭論不休，但並不防礙中國的江湖騙子，“國學專家”“民間科學家”利用它來裝神弄鬼，毒害欺騙民眾。

在某些研究者看來，凡是科學已經發現的一切，《周易》中早就有了。科學

尚未發現的，《周易》中也早就有了，只等著我們去發現。因此，有人宣稱，依賴《周易》，中國將稱霸世界；《周易》將使 21 世紀成為中國的世紀。“科學易”研究的成果之一，就是《周易》中的算命術也成了科學：預測學。有人認為用《周易》可以預測地震。

2004 年楊振寧作報告時說《周易》中沒有人們所說的那些科學成果，也不是促進科學發展的動力，甚至起到了阻礙的作用。他說：中國人的思維方法有問題，其中一點是不講演繹論證。《易經》歸納了很多當時的社會現象、自然現象，但沒有嚴謹的演繹和論證。

一些無恥的弱智文人，“學者”，熱衷於編造中國古代的所謂“科學奇跡”“先進思想”，如二進位是萊布尼茲偷學了易經的發明，墨子發現了光學原理、牛頓定律(這是那個臭名昭著的李約瑟搞出來的)等等，雖然都被駁斥過無數遍，但反復販賣這些謊言，既能夠迎合大眾的意淫需要，又能夠為這些弱智文人換幾個打牙祭的稿費，所以他們就樂此不疲。

②文人的依附性、追求眼前利益壓制了科學的興起與發展

儒教充滿了追求權力名位的病毒，如《尚書·洪範》載：“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子張問“干祿”（求官）之道，孔子回答：“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孔子教弟子如何當官，他並不告訴弟子，應該如何為百姓爭權利、實踐社會正義與監督統治者的行為，而是傳授弟子如何謹言慎行與對統治者察言觀色的本事。這樣的奴才，談不上社會正義與為政之基本道德。孔子不停地尋求從政的機會。孟子說：“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三月不做官就慌了)”。政治是需要照顧各方面利益的事務，要參與政治就不能總是堅持

自己的獨立見解。因而孔子教導學生跟人講話要察言觀色。特別是跟有地位的人在一起，如果不看清對方的臉色，就講出自己的見解，那就是瞎了眼：“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論語·季氏》）。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儒家經常宣揚“福祿壽、金榜題名、龍鳳呈祥、升官發財、權力名位、榮華富貴”等世俗性的價值觀。這套世俗性的價值觀，就是漢人靈魂裡的“永恆虛無的黑洞”。

顧准尖銳地指出：在東方專制主義之下，知識無非是“求祿”，是“貸予帝王家”換口飯吃的玩意兒；否則就消極退隱，明哲保身，“不是祿蠹，就是去出家。”讀書人唯有“學而優則仕”一途，國人的才智都用到“學而優則仕”上去了，實用技藝被貶為奇技淫巧，科技文藝活動受到壓抑，無法自由發展。科舉制使多少中國青少年的黃金歲月都虛耗在四書五經上了，完全沒有科學技術發展的人才和空間。16世紀末耶穌會利瑪竇教士來華傳教時，已將西洋學術介紹給徐光啟、李之藻等知識份子，奈何中國知識份子一心嚮往科舉考試及升官發財，對非科學的知識漠不關心。利瑪竇在他寫的《中國筭記》的書裡就結識過：為什麼中國人不重視科學？很簡單，因為這裡面有利益關係，在中國你懂四書五經，不用學數學和邏輯，也不鼓勵做實驗，就可以考取科舉和做官。很多對政治、經濟、軍事、科學等知識全然不懂的人也能作官；因而造成中國在科學方面比歐洲落後很多。

而古希臘的文人一直保留著獨立的人格，不依附權貴，當然不必學孔子那樣向統治者下跪磕頭。世界上最偉大的皇帝亞歷山大巡視時，看見了犬儒學派首領第歐根尼，第歐根尼很有學問卻一無所有，亞歷山大大帝對他說：“我可以給你一切”。第歐根尼說：“你走開吧，不要擋住大自然給我的陽光”。可見，掌權

者應讓出陽光而保證思想者的獨立性。還有古希臘的阿基米德，羅馬士兵的刀架到脖子上，仍然在算他的公式。

所以，魯迅說：“真的知識階級是不顧利害的，如想到種種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識階級……不過他們對於社會永不會滿意的，所感受的永遠是痛苦，所看到的永遠是缺點，他們預備著將來的犧牲……”（魯迅《關於知識階級——十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勞動大學講》，《集外集拾遺補編·上卷》，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8 年版 211、213 頁）。

科學並不是有用之學或提供使用技術的作坊。古代希臘智者們探求知識奧秘，完全是非功利的愛好；“哲學是愛智慧”就由此而來。古希臘哲學具有明顯的純粹性和非工具性的，即亞里斯多德所說的“自由性”、“神聖性”和“崇高性”。亞里斯多德在《形而上學》中說，科學是追求真理，是“為了知而追求知識，並不以某種實用為目的”的“形而上學”，它起源於人類的好奇心並發生在“人類有閒暇的地方”。科學不是實現某種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它是自成目的的活動，它是自由人進行的自由思考，它有其內在的價值。因此，科學活動更類似於遊戲，而不是獲取實用價值的工作。希伯來精神深化了這一思想——這正是使徒保羅告訴希臘人（希利尼人）的——因為“追求真理”和“好奇心”在邏輯上需要一個前提：真理存在並相信真理存在，而宗教提供了這一終極信仰。

歐洲中世紀，做學問主要為了證明或彰顯上帝的榮耀，與今天中國人理解的科技是生產力根本是兩碼事，更與做官相差十萬八千里。正是西方“人們追求智慧是為了求知，並不是為了實用”的亞里斯多德傳統，奠定了今天西方領先世界的文明。

萊特兄弟搞飛機試驗的時候，沒想到飛機能運人運貨，也沒想發財；他們渴

望人像鳥一樣自由。當時的專家說：“飛機絕不可能上天！比空氣重的東西怎麼能飛？”後來萊特兄弟飛起來了。專家又拼命去解釋飛機能上天的原理，搞出了空氣動力學，最後導致航太科學的誕生。不是為了實用，結果很實用啊。這實用的飛機是追求實用的中國人追求不出來的。思考蘋果為什麼往下掉的牛頓如在中國，肯定會被人看成瘋子。中國人處處追求實用，追到了什麼？數數看，從電燈電話電腦電視機一直數到抽水馬桶，沒一樣是中國人發明的。

沒有信仰，沒有高遠的境界，沒有對上帝的信仰，最終一事無成。你越追求實用，越是什麼也追不著；你不求實用，一心追求上帝的真道，什麼都會加給你。千真萬確！

徐光啟認為西方最好的是信仰，是基督教文明。洪秀全的堂弟洪仁軒在寫《諮政新篇》時說，“西方科技器物不是上寶，只是中寶而已，上寶是人們敬畏上帝、革邪心、守公義，然後這個國家就太平，才有科技發展”。

當今中國學術界，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氾濫。學術研究根本不是為了探求真理，甚至也不是為經濟建設所用，而是為了職稱、獎金、官位等個人名利。在名利主義價值觀的驅使下，學術界充滿了剽竊、抄襲和造假之風。大量的學術垃圾被製造出來。這不僅敗壞了學術道德，污染了學術空氣，更使本已稀缺的學術資源遭到了嚴重浪費。在這種“實用理性”盛行的背景之下，中國想摘取諾貝爾獎，幾乎是天方夜談。

③帝王需要的是愚氓。所以，先秦諸子大都貶斥科學技術。如道家認為人的生活方式越原始越好。《老子》：“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莊子·天地》講在漢陰有一個不用人們常用的汲水工具，

在井邊挖一個邪的隧道，抱著瓦罐汲水澆園，“用力甚多而見功寡”。當子貢表示疑問時，他還講出一大堆玄理。儒家的《禮記》雲：“作奇技奇器淫巧以疑惑眾者，殺”。從 1860 年代開始，有識之士一再呼籲要修鐵路，但在破壞風水等愚蠢的反對聲中，慈禧不敢支持；直至 1881 年才修成長約 7 英里的用於運煤的唐山至胥各莊的鐵路。而且“慮朝議禁駛機車，乃聲明以驢馬拖載，始得邀准”。最初也確實是用馬拖著車廂在軌道上跑，留下了世界鐵路史上令中國人臉紅的又一記錄。

馮友蘭說：“中國曾經有不少的創造發明，但是我們常常看到，他們不是受到鼓勵，而是受到阻撓”。從秦皇的“焚書坑儒”到文化大革命，幾千年的中國歷史是一部對創新恣意摧殘和壓抑的歷史。雖有局部的技術創新，但由於缺乏思想創新和科學創新，所以技術創新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只能起到局部的作用，或只能用到錯誤的方向上去。如火藥用來造爆竹，指南針用來看風水，印刷術用來印封建教義，造出的紙用來為祖先燒紙錢等等。

科學技術的發展，靠的是思想的徹底解放，靠的是思維方式的不斷創新和突破，靠的是新的思想自由的發表、交流和有益的爭論。獨裁政權的愚民政策完全是與科學技術發展的要求背道而馳的；它不僅愚化了億萬人民，同時也從根本上扼殺了知識份子的創新意識；從本質上說，愚民政策是反科學的、是對民族精神的蹂躪、是對人性的摧殘！人類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話，最好不要說什麼“統一思想”之類的蠢話，說尋求共識與合作才是可信的人話。

專制體制容不得思想自由交流。康熙學過算學和天學，他的目的不是宣導科學，相反是為了堵塞現代科學在民間，特別是漢民族中的傳播和發展。證據之一就是他請傳教士的目的。明末的士大夫和學者可以同西方傳教士自發地交流，萬

曆和崇禎皇帝基本不管。而根據傳教士張誠(J. F. Gerbillon)的日記，康熙不准傳教士在有漢人和蒙人的衙門裡翻譯任何科學文獻。自康熙 150 年以降，清廷的欽天監一直由西來的傳教士擔任監正或監副，從沒有漢人和蒙人。康熙請傳教士監理欽天監，目的不是開啟中西交流，相反是為了“壅塞”中西交流。康熙的政策則是鞏固“禦制”，遏制科學研究精神。在清初，還有“南王(錫闡)北薛(鳳祚)”等精通數學，天文的非“禦制”人材。那是明朝學界的殘留。後來，就徹底沒有了。

美國經濟學家 S. 蘭德斯指出，“即便有西方的火炮出現，中國人從未自己學會如何製造現代的火器，1621 年葡萄牙人送 4 門火炮給皇帝，250 年後的 19 世紀都沒啟用”。葡萄牙一傳教士曾向康熙建議用火槍取代冷兵器，被康熙婉拒了。一百多年後，中國的冷兵器抵擋不住洋人的火槍，不得不忍受城下之辱。

徐光啟在 1629 年就建議製造天文望遠鏡，那是在伽利略天文望遠鏡之後 20 年，這是很快的了。康熙也知道望遠鏡。北京的故宮中就有上百架望遠鏡，多為康乾“盛世”所收藏。但康熙防備望遠鏡的擴散。康熙命令傳教士不要去做望遠鏡。望遠鏡只能御用，所以，天文觀象臺上反而沒有望遠鏡。清宮中的御用的天文儀器比天文觀象臺上的儀器多得多。整個清朝發表星表都是沒有望遠鏡的實測資料為根據的。那還能不落後？康熙是怕儀器一經拿出宮外，就會有人複製、改進，他就不能壟斷了。

梁啟超說，康熙的科學是用來打擊他人的一個工具。1689 年康熙事先問耶穌會士南極老人星出地平幾度。見到李光地上朝後，康熙考問他：“可識老人星？”李光地無以對。康熙得意了：“老人星在北京自然看不見，在南京就看得見。到了你的老家閩廣，連南極星也看得見”。康熙得意忘了形，在閩廣，南極星是看

不見的。李光地隨後被降級。1712 年耶穌會士傅聖澤寫了篇《阿爾熱巴拉(代數新法)》向康熙介紹。康熙看不懂，他說此新法“可笑”。康熙認為一切數學原理都來自易經，西方的方法源於中國；他下令不准代數新法傳播。所以，直到 1859 年代數符號法才開始在中國流傳，那已是 150 年之後的事了。

④政治迷信：主要表現為天崇拜和日崇拜。

第 24 節 子虛烏有的“四大發明”（參考了飛虎隊文集）

論科學，科學的目的是追求真理、尋求真實，中國由於避諱文化、討厭真實，無法誕生科學。中國只有技術，唯一能夠拿來吹噓一下的就只有子虛烏有的“四大發明”。英國科學哲學家培根說的是三大發明：印刷術、火藥、指南針；他並沒有說“中國的三大發明”，而是說“不知道它們的起源”。“四大發明”是 20 世紀時的英國史家李約瑟炮製出來的。

1·指南針

指南針的宣傳包含了很多的虛假成分。比如說對磁石指南的發現，只不過是對一種自然現象的最原始認識和發現而已，一種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初始認識，並且不需要加以任何技術構建就能夠在生活中運用，唯一所做的只不過是對磁石的外形進行藝術加工而已。指南針也分兩種，水羅盤和旱羅盤，中國古代發明並使用的是水羅盤（現在也還有這種漂浮式羅盤），而歐洲人發明的是旱羅盤，而我國是到了明朝嘉靖年間時才從西方引進旱羅盤的。水羅盤是通過將磁化的鐵片或鐵針飄浮在容器的水面上來指示方向，這種水羅盤使用很不方便，因為本來容器裡的水就晃晃悠悠，到了顛簸的海上，就晃動得更厲害，根本無法準確指示方向，最多只能看個大概，或者在陸地上用來看風水時使用，並沒有什麼實用價值。

實際上，沒有任何可靠的證據表明磁羅盤是從中國傳到中東及歐洲去的。很多歷史學家認為：歐洲人的磁羅盤是 12 世紀時在義大利的阿馬爾菲城發明的。而且這種羅盤遠非中國的那種簡陋的“司南”模型可比，它通常包括在多個樞軸上水準安裝或懸掛的磁鍼，可在樞軸上自由活動直到與地球磁場在一條線上，在技術上要複雜先進得多。使用方便得多，是真正具有實用價值的磁羅盤。這個有出土的實物為證。而且在這之前，西方人已經在使用水羅盤了。即使是水羅盤，也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是從古代中國傳到西方去的。歐洲人不僅在技術上不斷革新，而且在理論上也進行了深入的探討，1269 年柏爾格利納斯(P. Peregrinus) 寫出了《磁論》一書，對磁極、磁鍼、磁力和地磁的科學原理進行了仔細的實驗研究。這以後，歐洲人又對羅盤進行了很多技術革新，如加上了防磁干擾的弗林德斯頓鐵等裝置。

中國指南針雛形的“司南”也可疑得很。因為根本就沒有任何詳細的記載，也沒有任何實物被發現。考古學家甚至都無法知道它的準確形狀，也不知道它的確切用途，但是在一種民族虛榮心的驅使下，就先把它吹噓成是指南針的“雛形”，反正把任何現代科學成果都能夠“論證”成中國“古已有之”並且年代一定要比別國早，是符合“政治正確性”的。真正的成熟的磁羅盤技術恰恰是從中東和西方傳到中國來的，不然何以解釋為什麼“沒有指南針”的阿拉伯人和歐洲人反而比擁有指南針的中國人航海活動範圍要廣大得多呢？

2·火藥

中國人發明的“火藥”實際上是“黑火藥”。學術界有人認為，是印度人先發明了黑火藥的，而黑火藥的種類有上百種。中國使用的黑火藥只是其中之一。中國製造的黑火藥由於含硝量太低，燃燒後膨脹能量不足，並不適合於作火器的

發射藥，中國的黑火藥只適合用來做鞭炮。歐洲和阿拉伯發明的黑火藥將含硝量提高到了 80%，才大量用於作火器發射藥。

黑火藥系統，中西方也是各自獨立發展的，西方的黑火藥比中國的要早得多。希臘火藥比中國的火藥早了整整五百多年。希臘火藥又稱為希臘火，是用在一種噴射式火器上的燃燒劑，是世界上最早的噴火器。西元前五世紀，斯巴達人與雅典人作戰時，就曾經將硫磺等混合物點燃後作為攻城的武器，這就是“希臘火”的雛形。西元七世紀由東羅馬帝國（即拜占庭帝國）的希臘人發明，用於與阿拉伯人的戰爭。拜占庭人對其配方長期保密，後來得知其配方是含有硝石、苦土粉、硫磺、瀝青、樹脂、石油、生石灰等的一種混合物，因為其中含有生石灰，遇水也能反應，發射之後落在水面上可以將火勢蔓延開去，所以長期用於海戰。通過很多拜占庭時期的繪畫可以看出，希臘火藥是從一個噴火筒中噴射發火的，用來燒射遠處的敵船，一直在戰爭中使用了好幾個世紀。希臘火藥後來傳到西歐和阿拉伯，並衍生出中世紀的炸藥。1247 年，英國科學家羅傑·培根（Roger Bacon）和一個修道士史瓦茲（Berthold Schwartz）根據希臘火藥及其衍生火藥的原理發明出了具有了爆炸性功能的火藥的正確配方，即：硝 75%，硫磺 10%，木炭 15%，用來作為火繩槍的發射藥。1350 年，義大利產生了歐洲最早的火銃。1480 年至 1495 年間，義大利科學家達·芬奇發明了輪發燧石槍機，用燧石的火花點燃火藥池，再由火藥池點燃火藥，將彈丸發射出去。明代開始傳入中國。不管是燃燒性的火藥，還是作為槍炮發射藥使用的黑火藥，都是西方首先發明的，而且時間上比中國早了幾百年。法國作家儒勒·凡爾納在《從地球到月球》一書中就是這樣敘述的：“火藥並不是哪一個人發明的，它是“希臘火”的直接衍生物，希臘火和火藥一樣，是用硫磺和硝混合起來的。不過這種混合物後來就由導火物變成爆

炸物了。”

中國的宣稱：宋代《武經總要》記載了世界上“最早”的三個“火藥配方”：火球火藥方，蒺藜火球火藥方，毒藥煙球火藥方。這又是一種誤導。這三種所謂的“火藥”其實只具有燃燒性的功能，只是用來做燃燒性火器的發火物、發煙物。那時候根本就沒有發現所謂黑火藥的正確配方，宋代人只是不知其所以然地胡亂把很多不必要也不相干的東西混雜在一起，其中成分多達十幾二十多種，不僅配方不正確（其中兩種仍然沒有加木炭，一種基本上沒有含硝），雜質太多，而且最關鍵的是，其中硝所占的百分比嚴重不足，不到 50%，而這是是否成其為真正的火藥的一個關鍵的技術點，因為由於含硝量太低，燃燒後膨脹能量不足，是無法用來作火器的發射藥的。而蒙古人攻城用的火炮實際上是用拋石機把爆炸性的火器拋擲到遠處來使用的。那時還沒有後來那種金屬管形的大炮。還有那時所謂的“火箭”，其實是將燃燒物綁在箭上靠弓弩拋射發射的“fire arrow”，而不是靠火藥的噴射作用發射的所謂“rocket”，而這種“火箭”，希臘人在西元前 429 年已經在使用了。中國最早的拋射性金屬管型火器出現於元至順三年（1332 年），這時候用來做發射藥的火藥中銷含量已經有所提高了，雜質也相應減少，但還是遠沒有達到後來能夠真正有實用價值的黑火藥的標準。直到明代，戚繼光所著《紀效新書》和茅元儀所著《武備志》（1621 年）才開始記載通過日本人從西方間接傳來的能適用於作火銃發射藥的黑火藥配方。

黃火藥的製造方法是使用化學合成手段，是一種化合物，屬於化學範疇的製造方法。1771 年，英國的 P. 沃爾夫合成了苦味酸，它是一種黃色結晶體，最初是作為黃色染料使用的，後來發現了它的爆炸功能，十九世紀被廣泛用於軍事，用來裝填炮彈，這就是黃色火藥的名稱的由來。它是一種猛炸藥。1779 年，英

國化學家 E. 霍華德發明了雷汞，它是一種起爆藥，用於配製火帽擊發藥和針刺藥，也用於裝填爆破用的雷管。1807 年，蘇格蘭人發明了以氯酸鉀、硫、碳製成的第一種擊發藥。1838 年，T. J. 佩盧茲首先發現棉花浸於硝酸後可爆炸。1845 年德國化學家 C. F. 舍恩拜因將棉花浸於硝酸和硫酸混合液中，洗掉多餘的酸液，發明出硝化纖維。1860 年，普魯士軍隊的少校 E. 鄔爾茨用硝化纖維製成槍、炮彈的發射藥。俗稱棉花火藥，至此取代了黑火藥作發射藥。1846 年，義大利化學家 A. 索佈雷把半份甘油滴入一份硝酸和兩份濃硫酸混合液中而首次制得硝化甘油，硝化甘油是一種烈性液體炸藥，輕微震動即會劇烈爆炸，危險性大，不宜生產。1862 年，瑞典的 A. B. 諾貝爾研究出了用“溫熱法”製造硝化甘油的安全生產方法，使之能夠比較安全地成批生產。1863 年，J. 威爾勃蘭德發明出了梯恩梯（TNT）。梯恩梯的化學成份為三硝基甲苯，這是一種威力很強而又相當安全的炸藥，即使被子彈擊穿一般也不會燃燒和起爆。它在 20 世紀初開始廣泛用於裝填各種彈藥和進行爆炸，逐漸取代了苦味酸。1866 年，A. B. 諾貝爾用矽藻土吸收硝化甘油，發明出了達納炸藥。俗稱黃色火藥。1872 年，諾貝爾又在硝化甘油中加入硝化纖維，發明了一種樹膠樣的膠質炸藥——膠質達納炸藥，這是世界上第一種雙基炸藥。1884 年，法國化學家、工程師 P. 維埃利首先發明了無煙火藥。這一發明具有極重要的意義，為馬克沁重機槍的發明提供了彈藥方面的條件。1887 年，諾貝爾用硝化甘油代替乙醚和乙醇，也製成了類似的無煙火藥。他還將將硝酸銨加入達納炸藥，代替部分硝化甘油，製成更加安全而廉價的“特種達納炸藥，又稱“特強黃色火藥”。1899 年，德國人亨甯發明了黑索今，它是一種比梯恩梯威力更大的炸藥，這是僅次於核武器的威力最大的炸藥。

從上述線索可以清晰地看出，黃火藥系列是怎樣一步步獨立發展起來並導致

了近代軍事的重大變革的。在這一過程中根本就沒有黑火藥什麼事。黑火藥在歐洲長期被用於煙火和縱火用途，也曾被用來作為槍炮的發射藥，但是主要也就適用於中世紀的那種力量有限的原始火器，如火槍火銃，而中世紀火器跟近現代槍炮也完全是兩種性質的概念，原理上，技術上，製造加工上都是完全不同的，不要被它們某些外形上的類似點所迷惑了。

近現代整個軍事工業體系中，從火帽底火所用的擊發藥，到雷管等用的起爆藥，到彈筒中的發射藥，彈體裡裝填的猛炸藥，火箭導彈的推進劑，全部使用黃火藥系列，根本沒黑火藥什麼事，根本就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東西，還有什麼可吹的呢。

3·印刷術

另外一項“偉大發明”——印刷術，實際上也不是中國人發明的。當談到發明印刷術的時候，實際上指的是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因為雕版印刷術算不上什麼發明，道理很簡單，因為雕版印刷術的原理跟另外一種東西——印章沒什麼不同，而印章這種東西在各個國家各個民族都是有的，出現年代也比中國早，何況雕版印刷術也沒有多少實用價值。在正式宣傳“四大發明”的資料中，印刷術往往都特指活字印刷術。

據說北宋畢昇首先發明了泥活字印刷術。畢昇所謂的“泥活字”嚴格地來說根本不能算是活字，因為他採用這種單獨刻字模的方案並不是為了象近代的活字印刷這樣實現重複組合使用的功能，而主要是為了解決雕版印刷術容易刻壞印版的問題，因為刻雕版時一不小心刻壞了一個字，整個印版就報廢了，所以才採用這種把字元分開單獨刻制的方案，而畢昇的膠泥活字一旦拼合在一起後，就粘在一起了，使用完後，很難再拆卸開，所以根本就沒有起到“活字”的作用，胡適，

羅振玉等人曾做過實驗，證明了泥活字無法正常使用。元代王禎首創了木活字印刷術，也沒有印本實物，和活字實物留傳下來，這種木活字，根據嘗試，效果很不理想，而使用過一次的木活字很難拆卸，損壞率很高，印墨也不均勻，根本就沒有實用價值，仍然只是一種失敗的發明。所以，畢升的“泥活字”根本就不是“活字印刷術”。

沈括所記的畢升泥活字印刷術，清代翟金生等人就仿製過，為此居然花了30年功夫才印成第一本書籍，可見這種東西效率之低下，畢升的泥活字印刷技術遠未成熟，根本就沒有在現實中得到什麼應用，從宋元到明清普遍使用的都是雕版印刷。畢升的泥活字印刷術連他那個村的範圍都沒有傳出去，卻莫名其妙憑空地一下子就傳到了數萬裡外的其他國家去了，簡直是無賴。馬可·波羅在他的遊記裡，也沒有提到過書籍印刷的事情。位於遠東和歐洲之間的阿拉伯世界，一直拒絕使用印刷術，堅持用手抄寫書籍，一直到19世紀末，更不可能成為什麼“傳播印刷術的橋樑”之類的。其實，比畢升早兩千多年的古希臘克里特島米諾斯文明遺跡中就已經發掘出了最早的活字印品。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將許多個活字印拼在一起，印在泥版上和陶器上，克里特島出土了大量這樣的活字印和泥版及陶印品。

國際上現在公認韓國清州興德寺是最早使用金屬活字（銅活字）的地方。為了印刷曾經製造出上百萬的銅活字，其銅活字印本《佛祖直指心體要節》（1377年）比德國古登堡鉛印版的《聖經》還早70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屬活字印本，被指定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紀錄遺產。因為別人拿得出實物證據，你不服也沒辦法。

一直到近代，中國才開始引進並使用德國人古登堡于1455年發明的鉛活字

版印刷術，這種技術的複雜和完善的程度也不是中國古代傳統印刷術可以相比的（由鉛、錫、錫三種金屬按科學、合理比例熔合鑄成的鉛活字，並採用機械方式印刷），事實上，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印刷術恰恰是從西方傳到中國來的。古登堡發明的是鉛活字版機械印刷機，這種垂直螺旋式手搖印刷機，是一個完整的機械體系。而不僅僅只是活字一個細節，金屬模鑄字工具是最為重要的，其次是印刷油墨，機械印刷，這些發明使得大批量的印刷成為可能

4· 造紙

跟印刷術關係密切的另一大“發明”——紙，國際上就更不承認那是中國人的發明了，因為早在五千年前，在中國的紙出現之前三千年前，古埃及人就已經發明了最古老的紙，稱之為紙莎草紙(Papyrus)，也稱紙草紙，英文中紙(paper)這個單詞就是來源於拉丁文 Papyrus（紙莎草紙），可見這種紙在西方古代應用的廣泛和悠久。紙草紙不僅是古埃及重要的書寫材料，而且也大量出口到其他國家，成為古埃及人、古希臘人、古羅馬人、亞述人、阿拉伯人所廣泛使用的書寫材料，迄今為止所發現的用古埃及文、古希臘文、古羅馬文和阿拉伯文等書寫的紙草紙文獻，數以十萬張計之多，其中歷史最早的是從古法老墓葬出土的距今五千多年前的無字紙；載有文字的紙草紙文獻距今也有四千五百多年的歷史了，比我們中國人使用甲骨文還早了近兩千年。紙草紙也不像有人說的那樣，容易斷裂，現在埃及都還有根據古代技術進行製造的紙草紙，造出的紙任意折疊完全沒有問題。

紙草紙製造工序為：將紙莎草纖維分離出來，切斷、浸泡、去除糖分等雜質，然後用木錘敲打，木棍擠壓，去除水分，再交織在一起，經過壓榨，最後製造成型。中國學者為了否認紙草紙，強調紙草紙還沒有經過造紙漿的工序，所以不能

算是真正的紙。這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因為造紙漿的工序是到了東漢蔡倫時才有的，在這之前中國的紙也是沒有造紙漿的工序的，比如，中國官方宣稱發現的中國最早的紙—灞橋紙，就是沒有經過造紙漿步驟製造出來的，它是一種麻纖維的紙，纖維很長，很粗糙，紙面上纖維清晰可見，連紙草紙的精細程度都不如，故此有專家甚至認為它不是人工製造的，可能是自然形成的，但是一樣被看作是紙，由此可看出，造紙漿並不是定義是否是紙的關鍵技術點。是否成其為紙的關鍵技術點，在於是否將植物纖維進行分離，切斷、浸泡，再平整，壓榨成型的製造過程。而造紙漿只是一個更深程度的深加工而已，不是決定本質的關鍵點，只是一種改進。可以說：埃及人發明的紙草紙通過阿拉伯人波斯人，輾轉傳播到中國來以後，經過中國人的改進然後產生了後來更高級的紙。實際上，現在中國地區發現的最早的紙之一就出現在新疆。

所謂中國人發明了紙促進了文化傳播的說法，更是似是而非。“紙草紙是古埃及人對人類文明的偉大貢獻，是歷史上最早、最便利的書寫材料。正是紙草紙的發明和推廣，才使人類可以不再用泥、石、木、陶、金屬等材料記錄文字或圖畫，也使古代大量資訊得到傳播和保存”（葛劍雄《紙草紙的興衰》）。紙草紙是最早的，真正的紙，並對文化發展和傳播起到了重大作用，如西元前三世紀，埃及亞歷山大圖書館的希臘文藏書就已經達到了七十萬卷，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寶貴的文化遺產。紙草紙在世界上很多博物館都有文物收藏，有古埃及從五千年前就保存下來的紙草紙及後來大量的紙草紙文獻，以及中世紀用紙草紙裝訂的書籍。古希伯來人用造價高但便於保存的羊皮紙記錄舊約經書而留存下來的“死海古卷”也成為現在珍貴的歷史資料。而中國據稱是在漢代時就開始出現紙了，可是你現在還能夠找到那時候保留下來的什麼書籍嗎？相反地，商代使用甲骨，反倒

為我們留存下來了大量歷史資料。以至於有人認為，中國正是因為過早地使用了這種便宜而又易毀的紙，才使得很多的古代典籍失傳。更何況，一直到近代，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仍然是文盲，“對文化傳播的重要作用”在哪裡？中國人既然已經開始使用紙這種方便的書寫材料了，卻從來沒有想過去發明一種方便的書寫工具，仍然使用毛筆這種笨拙的書寫工具達千年之久，何其荒唐。而西方人早就知道使用羽毛筆等方便快捷的書寫工具，後來又不斷創新發明了鉛筆，自來水筆（最早的金屬蘸水筆在西元前的羅馬共和國就已經出現了，發掘于龐貝古城廢墟）。

第 25 節 黑暗無比愚昧無比的國度

1· 百事不如人的民族

1935 年正當胡適主編的《獨立評論》創刊兩周年之際，一位筆名叫“壽生”的北大學生寄來一篇文章，認為我們之所以落後於日本，只不過因為我們的固有文化太豐富了，因而接受性較為遲緩，不比日本文化根基膚淺，只會一味摹仿。只要我們恢復民族自信心，努力苦幹，就可以復興。壽生的看法，在當時青年人中很有代表性。

胡適以為，這樣的自信心是建立在沙堆上的。他特撰《信心與反省》一文，指出壽生文中鄙薄日本、抹煞日本文化的惡習是最要不得的。創造不外乎摹仿功夫深時的一點新花樣。日本不僅善於摹仿，其文化中有很多偉大創造，成績遠勝於中華文明。我們到了今天，若是還看不見日本文化的長處，反而抹煞事實，笑人摹仿，那真是盲目的誇大狂了。

胡適批評了民族自大狂，他說中國人是“又愚又懶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質，便完全被壓死在物質環境之下，成了一分象人九分象鬼的不長進民族”。“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

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

胡適說：“我們如果平心研究希臘羅馬的文學、雕刻、科學、政治，這四項就不能不使我們感到我們文化的貧乏。尤其是造型美術和算學兩方面，我們不能不低頭愧汗。《幾何原本》的作者歐幾裡得和孟子先後同時，在二千多年前，我們在科學上已落後太多！從此以後，我們所有的，歐洲也有；我們所沒有的，人家所獨有的，人家都比我們強。

試舉一個例子：歐洲有三個 1 千年的大學，有許多個 5 百年以上的大學，至今繼續存在，繼續發展。至於我們所獨有的寶貝：駢文、律詩、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活現的監獄、廷杖、扳子夾棍的法庭……雖然‘豐富’，雖然‘在這世界上無不足以單獨成一系統’，究竟都是些使我們抬不起頭來的文物制度。即如壽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芒萬丈’的宋明理學，說起來真正可憐！講了七八百年的理學，沒有一個理學聖賢起來指出裹小腳是不人道的野蠻行為，只見大家崇信‘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吃人禮教。請問那萬丈光芒究竟照到哪裡去了？”

胡適的文章引來不少人寫文章反駁。反駁之一，我們的文化並不僅僅是“小腳、太監、姨太太”，我們有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向上的力量。正是這些優秀的固有文化在重利逐樂的西方物質文明衝擊下失落了，才使得我們走入歧途，墮落了。

對此，胡適再撰《再論信心與反省》、《三論信心與反省》，指出這不過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翻版。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等，作為道德品質，不過是人類共有的理想，不屬於哪個民族所特有。考察一種文化，更重要的要看她怎

樣來實踐這些理想。在中國，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等好名詞，不曾阻止“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貞節牌坊、地獄般的監獄、板子夾棍的法庭”的存在。後者的崩潰，全不是程顥、朱熹等聖賢的功勞，乃是與歐美文化造成的新文明叫我們相形之下太難堪了，這些東方文明的罪孽才逐漸崩潰的。說我們這七八十年來走入迷途、墮落了，是無稽的誣告。在幾十年中，廢除了三千年的太監、一千年的小腳、六百年的八股，五千年的酷刑，這是“向上”，不是墮落！

胡適沉痛地說，可惜我們向上得還很不夠。八股廢除了，但八股訓練的思維習慣還流毒無窮。“小腳逐漸絕跡了，夾棍板子、砍頭碎剮廢止了，但裹小腳的殘酷心理、上夾棍打屁股的野蠻心理，都還存在於無數老少人們的心靈裡。今日還是一個殘忍野蠻的中國，所以始終還不曾走上法治的道路，更談不上仁愛和平了”。

中國人只有放棄一切本不該有的傲慢心態，承認自己既不如人家古老，也不如人家文明，更不如人家先進，虛心地重新書寫被盲目放大的歷史，才能用最好的心態面對西方文明、學習西方文明。胡適說：“肯認錯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學人家。不要怕模仿，因為模仿是創造的必要預備工夫。不要怕喪失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因為絕大多數人的惰性已盡夠保守那舊文化了，用不著你們少年人去擔心。你們的職務在進取不在保守”。

2·全民皆愚

在悠久的中華“文明”中，最高統治者的權力一直不受任何約束，肆無忌憚、無法無天，可憐老百姓受盡欺壓凌辱，即使引頸受戮，亦要感謝皇恩浩蕩。朝廷只許歌功頌德，不讓揭露問題，並且一味地進行愚民教育，讓人們沉湎于皇帝、明君、聖人，陶醉于“太平盛世”，不知道危機迫在眼前、災難源自何處。在皇

權專制制度下，思想文化處於被禁錮的狀態，人們的精神活動被扼殺、被愚弄，民眾長期被置於貧困和愚昧的境地。一旦有人敢於對帝王權力提出質疑，便會立即遭致殺戮；於是，愚氓遍地，專制統治得以維持。這就從根本上斷絕了這個民族一切文化、制度創新的可能性，使得中國社會走上了一條毫無生機的絕路。

黎鳴說：中華民族充滿了阿 Q，從上到下，從政府官員到普通老百姓都是標準的阿 Q；不僅老百姓“愚”，“君”和“官”也是愚的。早在春秋時曹劌就指出：食肉者鄙。愚民之術亦可使愚民者自愚耳。這是因為，一個人騙人騙久了，不知不覺自己也會上自己的當。統治者藉以愚民的文字語言，久而久之自己也信以為真了，結果自己也變得越來越愚蠢了。

中國人的愚蠢是專制造成的。你明明看到了鹿，他偏要說是馬；你明明聽到了悲慘的聲音，他偏要歌功頌德。你只能順他的意，否則就要誅九族；或者你裝聾作啞逃過一劫，這叫“難得糊塗”。結果，中華民族消滅了自己的天才，成了奴隸、成了阿 Q。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奴隸最危險，主子對這種奴隸不是殺就是趕。這種文化孕育出來的人怎能不愚昧？一個民族的墮落從關閉大腦開始，一個不能自由思考、象豬一樣生存的民族怎能聰明起來？

在專制社會，人們在“聽話、敬上”的教條中陷入了非理性，意識不到平等博愛；他們只知道等級、特權和服從，“人上人”的帝王意識根深蒂固。中國人把野蠻當文明，理性被關閉，人們普遍愚昧；愚蠢到不知道什麼叫平等、什麼叫自由，而且愚蠢到不知道什麼叫智慧、什麼叫聰明、什麼叫愚蠢。愚蠢到自己都沒有認識到自己愚蠢。

中中國的愚民在和平時期付出了上億人的性命後，仍然一如既往的愚忠，成日裡處於極度的受虐狂高潮的亢奮狀態，這樣的民族難道不是最劣的嗎？前蘇聯

巴庫地區礦工起義，前南韓的光州起義，人家都是拿鋒利鐵器造反，蘇共和當時的南韓總統全鬥煥也不過是動用有限武力（橡皮子彈、鐵棍棒、催淚瓦斯等）鎮壓；而 89 民運，學生市民和平請願，卻遭坦克機關槍壓殺，請問世界上有哪國政府犯下如此暴行後還能受其國民擁護？犯下如此罪行的當局仍然受到支那萬民敬仰、頂禮膜拜，這樣的民族不是世界上最劣等的民族，誰是？

我們落後，是因為愚昧；我們愚昧，是因為喪失了理性；我們喪失了理性，是因為不懂得邏輯思維，不懂得自由平等，在專制的恐怖下喪失了理性思維能力。一個不會理性思維的民族，不可能進入世界先進民族之林！

我們落後，是因為野蠻；我們野蠻，是因為喪失了天理良心，喪失了對神的信仰。我們喪失了良心，是因為不知道生命神聖，在苦難的折磨下喪失了愛的力量。一個不懂得珍愛生命的民族，不可能真正走上自強之路！

我們的教育是失敗的；因為我們的學生不懂得良心和理性。把追求“人上人”說成是追求“先進”，權力崇拜，維護權勢，幫窮人有啥好處？輕視弱者的生命，說被軋死的人是闖了紅燈，連起碼的悲憫心都沒有，甚至為生命的喪失而幸災樂禍，何來良心？何來理性？

魯迅先生說中國歷史“吃人”，李宗吾先生說中國人心“厚黑”，柏楊先生說中國社會是個“大醬缸”，黎鳴說中國人兩千多年來因“愚蠢”而“白活”了。實際上都是一個意思，即：中國人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全面地喪失了人類智慧自然發展的天賦權利。其中最根本的一點，是極權專制統治者對中國人教育思想的徹底的壟斷。

第 26 節 中國不是文明古國

據香港《明報》報導，現年 43 歲的倫敦最年輕的民選市長詹森曾寫道，“中國文化影響近乎零”；他還曾在任職的《每日電訊報》發表文章認為“中國對人類沒有絲毫貢獻”。

1· 中國的文明史只有 3000 多年

從“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這兩個英文單詞的詞源上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兩者的區別。“文化（culture）”這個單詞的詞根“cult-”的原始意義是“耕作”，這很清楚地表明瞭“文化”這個概念的本義是屬於與“農耕”相聯繫的原始部落時代的範疇的；而“文明（civilization）”這個單詞的詞根“civ-”的原始意義是“市民”，這也同樣清晰的表明了“文明”這個概念的本義是屬於與伴隨著“市民”的出現而同時產生的“城市”及工商業相聯繫的青銅時代的範疇的（城市 city 這個單詞就是從詞根“civ-”的變體“cit-”演繹而來的）。而“文明（civilization）”的幾個主要特徵：文字，金屬冶煉術，城市國家（城邦），宗教禮儀，等等（雅斯貝爾的定義），正是與工商業的出現密切相關的。要判定一個文明是否開始了，什麼時候開始的，正是按照上述幾個標準來核定的，而且是按照考古發現來核定的，而不是用什麼神話傳說、民間故事、野史雜書，或者是像什麼《史記》之類的晚於考古年代兩千年之後的所謂“歷史紀錄”來判定的。這是一個考古學歷史學常識。有人會問：為什麼要用外國人的標準來判定我們自己的歷史，我們不能用自己的標準來判定嗎？如果要用我們自己的標準，那麼我們就不能再用西方的概念來宣揚什麼“我們有五千年‘文明’史”，而應該用我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們有五千年神話傳說的歷史”。按照這樣的標準，我們倒是有“五千年歷史”了，而其他國家和地區，特別是地中海周邊國家地區及中東地區，他們就起碼都是一萬年以上的歷史

了。

中國最早的文明——商文明，開始於西元前 1500 年左右，距今 3500 年，地點在今河南安陽一帶。考古依據：中國地區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成熟的青銅冶煉術，及出土的冶煉的青銅器；國家形態已出現。中國自己的歷史教科書是從所謂的西元前 2000 年的“夏王朝”開始算起的。但是國際學術界是不承認這個子虛無有的“夏王朝”的，因為沒有任何考古依據：既沒有文字出現，也沒有冶煉的青銅器發現，更沒有表明國家形態存在的任何依據，以及城市遺跡，等等。而中國的這些江湖騙子一樣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雖然把整個中國地區都翻遍了也沒找出什麼能證明所謂的“夏王朝”存在過的證據，硬是把二裡頭等地發現的一些新石器時代文化遺跡包裝一番冒充成是“夏王朝”的所謂“都城”遺跡拿出來矇騙外行人。中國“考古學者”展示的“夏王朝”的“都城遺跡”復原圖原來就是幾個爛草棚子，一個標準的原始村落，他們把這個叫做“偉大的”“夏王朝”的“都城”？還有就是一些銅渣子，大量的石器，骨器！這只不過是新石器時代的氏族部落遺跡。

要是這算是“都城遺跡”，那世界各地的新石器時代的“都城遺跡”就太多了，瑞士汪金的湖居文化（早於西元前 5000 年），人們用五萬根木樁作地基建在湖上的大型村寨，就比“偉大的”“夏王朝”的“都城遺跡”大到不知那裡去了。看來西方人臉皮還是太薄了。

其他那些古文明地區都發現有標誌文明起點的大量完整的城市遺跡，而且都是磚石結構，埃及就不用說了，希臘，西亞，印度河，特別是希臘米諾斯文明遺跡的克諾索斯王宮（西元前 2000 年），其宏偉華麗，在各早期文明中是首屈一指的，我們中國直到四千年之後的現存很多近代宮殿建築都無法相比。還有印度河

流域的哈拉巴文明（西元前 2500 年），在摩亨佐與哈拉巴等地發現了許多完整的城市遺跡，磚石結構，構造複雜。據考證當時城市人口已達到三四萬人。還有埃及的南城遺跡等（西元前 3500 年，涅伽達文明時期）。某些書上錯誤地說埃及沒有城市，瑪雅文明印加文明沒有文字，實際上都有。

說老實話，所謂“商王朝”的殷墟遺跡其實也不過就是一些夯土遺跡而已，只不過規模稍大一點，根本還不是城市遺跡。要不是發現了甲骨文，冶煉青銅器，國際上也是根本不會承認商文明的。畢竟跟其他國家地區比起來，證據太少了。

中國有些人為此找了一種藉口：說中國文明的早期建築都是磚木結構的，所以不易保存，而其他國家地區特別是西方主要用石材建築，所以保存下來多一些，甚至還反吹一把：中國的磚木建築比其他文明的石材建築技術程度更高。其實，國外早期文明遺跡都是大量使用燒制的磚塊建築的，最典型的就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遺跡，以及兩河流域最早的烏爾、巴比倫、蘇薩等城市遺跡，埃及的南城遺跡，希臘的米諾斯文明遺跡，等等，實際上西方建築的典型代表——古羅馬的建築，也不是像某些人想像的那樣都是用石材建築的，也大量採用磚塊、混凝土等建築，如現今在法國西班牙等地都還保存著的高架水渠等，這些都很好地保存著。而中國早期文明遺跡恰恰不是用磚建築，而是夯土加木材建造，當然不容易保存，但那正是因為其技術水準低下的原因。中東、西方等地用磚石建築比中國用泥土木材建築所需要的生產力水準和技術水準要高得多，造價也要昂貴得多，也更堅固，當然便於保存（希臘邁錫尼文明時期的城市遺跡，其巨石建造的城牆，厚達二十米）。所以找不到所謂“夏王朝”的遺跡是毫不奇怪的，因為根本就不存在，只有一些石器時代原始村落的遺跡。而找不到更關鍵的兩個證據——文字的出現和金屬冶煉術的出現，就更加不值一提了。

在時間上緊隨“夏王朝”後的商王朝，其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中竟然找不出有關這個前代“王朝”的任何記載。這不是已經很清楚地說明了事情的真相了嗎？你能想像周王朝、秦王朝、漢王朝等在他們的政府檔和檔案中不記載他們的前一代“王朝”的任何情況嗎？只有商王朝這樣的初始文明才會是這種情況，因為在前面什麼都沒有，一片空白。

有一些“歷史學家”用一種潑皮口吻斷言道：“夏王朝是《史記》中記載了的，不容置疑！”。好嘛，原來隔了兩千年之後的司馬遷通過道聽塗說記述了一件從未見過的事情，這就成了“不容置疑”了？那古希臘的柏拉圖還記載過一萬多年前有一個大西洲國呢，人們在海底還發現了一些疑似城市的遺跡，那也是“不容置疑”的了。

“堯、舜、禹”不過是後人的虛構，更不存在所謂的“炎黃始祖”。孔丘的春秋筆法開了中國人以文飾“非”飾“過”的先河。孔丘的學霸作風使得中國的上古史陷入了雲霧中，並給後代的儒生們編造偽史提供了榜樣。

根據考古，今天只能知道距今 3500 年的中華文明史（按商於西元前 1500 年建國算）。商以前，沒有發現有文字的存在，也沒有發現金屬和城市遺址，所以不能說商以前的中國土地上存在著國家、存在著文明。然而，在儒教的經典中，商朝以前還存在著夏王朝，夏以前，還有軒轅黃帝、顓頊、高辛、堯、舜五位帝王，足足五千年的文明史。

顧頡剛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據顧先生研究，能真實地記載歷史的古文獻中，《詩經》是最古老的了。他在對《詩經》的研究中發現，周人知道的上古史，並不比今天的人從考古中得出的歷史遠多少，他們所知道的

最上古的人物是禹。《詩經·商頌·長髮》中說：“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意思大概是在洪水茫茫之中，“上帝”叫禹下來布土，而後建立商國，禹見於載籍，以此為最古，此時的禹，還是一個“上帝”派下人間的神。

到了《論語》時代，禹已經成了人，並在他之前有由堯、舜兩位帝王。但堯與舜、舜與禹的關係還沒有提起。（《論語·堯曰篇》雖說明瞭他們的傳授的關係，但經後人考證，《論語》中從《季氏》自《堯曰》五篇是後儒續入的。儘管後儒們在問題上有意摩古，但在宗旨上，很明顯地秉著“王道”“道統”兩個主義。

《論語》之後，又有了《堯典》《皋陶謨》《禹貢》等偽古文的出現，於是堯與舜有了翁婿關係，舜與禹有了君臣關係。《論語》時，堯舜的觀念還是籠統的，只是兩個道德最高、功績最大的古王，有了《堯典》等篇後，堯、舜都有具體實事可舉了，舜也成了“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後來到了孟子時代，舜乾脆就成了一個孝子的楷模。

此後，從戰國到西漢，是儒生們偽造古史最活躍的時期，此間，又出現了一位比堯舜還早的帝王——黃帝。顧頡剛先生指出，黃帝傳說是“層累”造成的，越是晚出的文獻，黃帝的記載越詳細。《逸周書》、《山海經》、《國語》、《大戴禮》等都是周代以後的典籍，在此之前的文獻中根本沒有提到黃帝。如《尚書》從堯寫起，沒有出現“黃帝”字樣，甲骨文中也未見“黃帝”。黃帝的名號源於“五方”觀念。從甲骨文看，殷人已有了五方的觀念，卜辭中就有東南西北四土受年的記載。“四土”加上“中商”就是“五方”。五方觀念大約在西周初年開始演化為“五方色”的觀念，以“五色”顯示“五方”。《逸周書·作洛》載：“周公……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壇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

周人起於黃土高原的陝地，以黃色為貴。沿襲殷人五方觀念，周人也將天下劃分為五方，並以五方色稱五方之帝。王都所在地洛陽為中土，中土為黃，則國稱“中國”，帝稱“黃帝”。《淮南子·天文訓》說：“中央土也，其帝黃帝”。所以，黃帝在周代的出現，與當時的政治理念有關，是加強中央集權統治的需要，也就是說，黃帝只不過是一種政治理念的形態化。

《史記·封禪書》記秦靈公祭黃帝，秦宣公祭青帝，秦文公祭白帝。青帝、白帝是上帝或天帝神話，黃帝與之並稱，顯示黃帝源於天帝。黃帝只是青、白、黃、炎四個以顏色命名的神中的普通的一位。黃帝和炎帝當時與青帝、白帝並列，同為秦人所崇拜的四位神靈。

到了《國語》中，黃帝、炎帝已經變成了人，並且還是同胞兄弟，一起做了少典的兒子，把周朝時最大的兩族分配給他們，做他們的子孫。“昔少典娶於有嬌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皇帝為姬，炎帝為薑”。後經儒生的鼓吹，黃帝成了中華文明的開創者，黃帝、炎帝成了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

有了黃帝，並不甘休，後又有人抬出了神農，於是神農又立在皇帝之前了。

《易·繫辭》又抬出了伏羲，伏羲又立在神農之前了。後又有人說“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貴”，於是天皇、地皇、泰皇更立在伏羲之前了。自從《世本》出現，硬替古代名人找了很“正宗”的世襲，於是沒有一個不是黃帝的子孫了。自從漢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祖傳了過來，於是盤古成了開天闢地的人，更立在天皇之前了。時代越後，知道的古史越前；時代越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約放大；文籍越無征，知道的古史越多。假史就是這樣造出來的。

傳說中的黃帝、炎帝、堯、舜、禹等人，並不是實有其人，只是春秋戰國及

秦漢時期才陸續由方士文人根據神話傳說虛構出來的人物，但是其所對應的考古年代上相應的氏族部落，如堯、舜、禹所對應的陶唐氏、有虞氏、夏後氏，據中國學者考證，都是使用印歐語系（雅利安語系）的民族，而使用印歐語系（雅利安語系）的各民族基本上都屬於高加索人種。傳說中的黃帝部落，也是一個說吐火羅語的印歐語系氏族。薑姓的炎帝部落也是源于印歐語系的羌人（姜、羌同源）。周滅商之後，狄戎的一部分也受到了分封，建立了一些小諸侯國，其中最大最長久的是中山國，而這個“中山人”據史書上的記載就是明顯的高加索人種特徵。

“夏”是夏後氏的自稱，“大夏”與“吐火羅”對音近似，據王國維、顧頡剛考證，來源於印歐語系。周滅商之後，因為周與來源於東夷的商不是同一民族，而與夏後氏同為西戎系統，於是以傳說中的夏的繼承者自居，也稱自己為“有夏”，稱其同盟部落為“諸夏”；而“華”本也是周人的自稱，於是此後生活在中原一帶的人就自稱“華夏”，與此區別于其原來的本家——西戎、北狄、南蠻、東夷，這就是漢人的前身——華夏族名稱的來源。印歐語系的吐火羅人在文化上對早期華夏文明的影響還大量表現在語言方面。祁連山的“祁連”這個名字就來自于印歐語言，意為“神聖的”。佛教經典最初也全是經過印歐語系的吐火羅語譯成漢語的。在上古時代，漢語也是多音節語，後來因為受單體方塊字影響，逐漸演變成為了後來的單音節語。有學者通過比較漢語與英語等印歐語系語言的原始詞彙的發音異同，提出了漢—印歐語同源的理論，將漢語歸為漢—印歐語系的一種。四川廣漢出土的三星堆文化，更是典型的外來文化，其出土文物中大量的人像、面具，都是高鼻深目，典型的高加索人種特徵；其出土文物中的金王杖、青銅神樹，以及明顯的牛崇拜、石頭崇拜，建築樣式，以及懸棺喪葬這些文化特徵，都是古代閃米特人、雅利安人的文化特徵，也是猶太文化中重要的喪葬現象。有學

者推測這是閃米特語系的古猶太人的文化遺存。華夏文明的創始也是來源於印歐語系雅利安民族，今天中國地區人種中的一部分成分也來源於高加索人種的印歐語系雅利安民族——華夏族，只不過因為地理位置的封閉和跟中東中亞文明母體之間文化傳承的斷絕，以及文化上的自大心態，我們逐漸忘卻了我們民族及文明的原始來源。

《漢武大帝》中，劉徹看見大行令王恢出使匈奴前敬獻的削鐵如泥的匈奴寶刀“徑路”很震驚，派張騫出使月氏國，帶回煉精鋼技術。但是，既然鐵在支那出現可溯源到春秋以至商周。有觀眾疑惑落後的遊牧民族匈奴的制刀技術怎麼會比漢朝還高？事實上，支那的“劍”本來就是從遊牧民族傳入的。“徑路”是北方遊牧民族對寶刀的稱呼，其合音就是“劍”。這個詞據考證可能來自伊朗語系或突厥語系。支那鐵器時代發生較晚，戰國兵器仍以青銅為主，秦陵兵馬俑的武器可證。古代支那人一直以為銅中加錫越多，機械能力越好，以至於到做大刀時，錫的含量大到 33%，做鑿 燧時居然高到 50%!!其實這是錯的。含錫量大於 20% 後，合金組織中 δ 相就會大量出現，因而會變脆且強度隨之劇烈降低。錫含量大於 25% 時，則變得非常脆而不能利用。所以現代的錫青銅，錫含量不超過 12% 。支那那些用含錫量超過 20%青銅做的武器，講難聽一點，根本就是垃圾。就連日爾曼這種相對來說在歐洲算較為野蠻的地區，西元前 1 千年左右就已經進入了鐵器時代了（武器和工具普遍使用鐵制），比中國地區早了近 1 千年。就世界冶金史看，西亞、印度、北非和歐洲大約在紀元前 10 世紀即進入鐵器時代，製作優質鋼鐵兵器的技術早于支那。西漢時期支那方進入大規模應用鐵器時代，鋼鐵生產技術取得重大突破，這應是與漢武帝開闢西域交通，引進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鋼鐵技術有關。據記載，這時，從西域引進支那一種新型鋼鐵，稱曰“鑛鐵”，

又號“金剛”或“精鋼”。這種鋼質鑄鐵，中世紀也傳入歐洲，西方人稱之為“印度鋼”。

英國地區早在 5 千年前其最早居民皮克特人也已經開始建築石頭城殿。西班牙和法國尼奧岩洞等地，考古發現了數萬年前的繪畫作品（是世界上最早的繪畫和藝術品）以及最早發明弓箭的考古證據。而中國，即使是西元前 1500 年才開始的商王朝，也還是青銅器時代，夯土建築，其主要覆蓋範圍也只不過就是河南的一小部分地區，而古中國其他廣大地區，基本上都還處在野蠻原始的部落文化狀態。到底是誰“還在樹上”呢？這不是很明顯嗎？

埃及大大小小的金字塔建立起來一千多年後，中國才開始進入文明時代。埃及最初的居民是含米特人，然後與西亞進入的閃米特人逐漸融合，創造埃及文明的就是這種閃含混和民族。而閃米特人都起源于阿拉伯半島，阿拉伯人、猶太人都是閃米特人。今天生活在中國北非的大部分居民，不過就是阿拉伯化的古代閃米特人的後裔。埃及人只不過中途又接受了伊斯蘭教的成分，類似於中國人接受了佛教文化一樣。只不過伊斯蘭教基督教這種一神教的同化作用更為徹底一點，而伊斯蘭教本來就是從猶太教等中東閃米特人土生的宗教發展而來的（猶太教也汲取了早期巴比倫的閃米特原始宗教的成分）。

印度文明開始於西元前 2500 年（哈拉巴文明時期），地點在今印度河流域一帶，以哈拉巴和摩亨佐兩地發掘出來的完整的磚砌城市遺跡為代表，以及刻在發掘出土的數以千計的印章上的象形文字，青銅器。創造最早的哈拉巴文明的是達羅毗荼人，他們與後來進入印度的雅利安人逐漸融合構成了今天印度的主要居民，今天印度的人種混雜局面就是這種歷史原因造成的。至於印度後來受到蒙古（實際上是突厥）莫臥爾王朝的統治，跟中國地區被蒙元滿清統治時期一樣，而且在

殖民化程度和奴役程度上要輕得多。今天印度人口的絕大多數都仍然是古代達羅毗荼人和雅利安人等民族的後裔，其信奉的印度教也是從古代就一脈相承下來的，其創造的佛教也深刻影響了整個東亞地區，何來的“文明消失”了？

至於中國官方宣傳的“四大文明古國”中的那個巴比倫，不過是兩河地區最早的文明出現近兩千年之後才出現的一個晚期文明，這給人一種錯覺，似乎中國地區的文明跟早於自己兩千多年的兩河文明是在同一個時間層面上似的。

希臘最早的文明——米諾斯文明，開始於西元前 2500 年。最初見於《荷馬史詩》的記載。十九世紀末在希臘克里特等地發現了它的大量遺跡。考古依據：早期的象形文字，以及中期的線形文字 A；成熟的青銅冶煉術，及出土的大量冶煉的青銅器；早期的城堡，中期的克諾索斯等地的王宮，尤其是後者，其優美華麗，在各早期文明中可以說達到了一個登峰造極的地步。緊隨其後的是希臘南部的邁錫尼文明，開始於西元前 1600 年，距今 3600 年，《荷馬史詩》記敘的主要就是這一時期的歷史。十九世紀在希臘邁錫尼、泰林斯等地發現了它的很多城市遺跡，大量青銅器，還有線形文字 B。然後是兩百年的荷馬時代，這時候希臘開始進入鐵器時代，武器和工具都普遍使用鐵制，而中國直到將近一千年後的漢代才開始正式進入鐵器時代。其他諸文明地區比我們中國地區早一千年左右進入鐵器時代是個歷史常識，原因很簡單，因為冶鐵術起源於地中海一帶的赫梯文明，然後陸續傳入遠近各個文明，中國地區距離最遠，所以傳入最晚。再接下來就是我們熟知的以雅典為代表的古典文明時代了。創造米諾斯文明的皮拉斯基人，不是希臘語族，但與希臘人同為印歐種族，或者稱之為雅利安語族。而且他們從米諾斯文明早期開始就逐漸與創造邁錫尼文明的希臘族阿開亞人融合了，其文明是一脈相承的。在阿提卡等地的皮拉斯基人也早就與當地的阿開亞人融合而共同創

造出了後來的古典文明，其文化藝術的世俗主義、自然主義特徵，在幾個古代文明中是絕無僅有的，跟後來希臘古典文明同出一源。就算從正宗的希臘人阿開亞人的邁錫尼文明時代算起，也早於中國最早的商文明。不知道“四大文明古國”怎麼會算到中國頭上？

西元前 1000 年以後的希臘古典文明是南下的多利安人和原來的阿開亞人等共同創造的；而後來統一希臘並建立了大帝國的馬其頓人也是希臘族人，並開創了希臘化時代；羅馬兼併了希臘之後更是成為希臘文明的直接繼承者。而且，希臘文的古文獻原稿多得很，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仍繼續延續了一千年之久，拜占庭帝國本身就是一個以希臘人為主體，以希臘語為國語的希臘化國家，他們保存了很多的希臘文的古文獻。現在國際上的拜占庭學是一門顯學。文藝復興時期的古希臘文獻並不是都是從阿拉伯文翻譯來的，有很多是直接來自拜占庭帝國（東羅馬帝國）保存的這些希臘文的古文獻。直到十五世紀東羅馬帝國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滅亡，希臘人經歷了四百年亡國時期，到十九世紀初又重新獨立。今希臘共和國的版圖，即是古代希臘的主要區域，其人口絕大多數仍然是希臘族，希臘語為國語。這個地區自古以來民族成分就沒有大的改變過，何來的“種族消失”？

甲骨文是十九世紀末才被發現的，二十世紀上半葉才開始進行研究，商以後的古人是不知道有甲骨文這種文字的，而且大部分甲骨文到現在還沒有被解讀出來，只有一小部分被解讀出來了，也就是說，甲骨文基本上是一種被後世中國人遺忘了的文字，是一種連專家都大部分不認識的文字，一種死文字。相反，埃及古文字，早在十九世紀初就已經被法國埃及學家商博良完全解讀成功了，並據此從紙草紙文獻中將埃及的早期歷史和王朝世系基本研究清楚了，希臘米諾斯文明

的線形文字 A 也已經被解讀出來了，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也早就已經解讀出來。而且，楔形文字和埃及古文字一直在歷史上使用了長達數千年之久，雖然中世紀以後逐漸消亡，但是其基本元素仍然在後來的各種字母文字中得以殘留。相比之下，中國地區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倒真正是一種中斷了的，沒有延續下來的死文字。實際上，早期甲骨文的成熟程度還遠遠不如埃及早期的象形文字，埃及早期的象形文字甚至已經有了輔助的音節符號，並很快就從象形的碑銘體發展成具有表意表音兩重功能的僧侶體；並與楔形文字共同為後來的第一種真正的字母文字——腓尼基文字提供了字母元素。而拼音文字、字母文字在發展層次上高於單純的象形文字、表意文字，這是語言文字學常識，沒什麼可爭論的。現在世界上基本上只剩下中國還在使用這種落後的從象形文字發展而來的表意文字了。

說人家“文明消失”了，更是笑話。今天的整個現代文明完全是西方文明的內容，而西方文明又是以希臘羅馬文明為基礎的，希臘羅馬文明在今天社會的科學、哲學、文學、藝術，政治，法律等等方面仍然發揮著巨大的影響。何來的“消失”？

實際上，消亡得最多的就是中國地區的文明，除了仍然在使用漢字這一點以外，今天的中國從古代繼承下來什麼？真正的古華夏文明，從宋代以後就已經消亡了。

希臘羅馬文明只不過中途又接受了基督教的成分，而且是希臘化的基督教。基督教從一開始產生就可以說是希臘文明與猶太文明的混合產物，基督教經典《新約》從一開始就是用希臘語創造出來的，主要的傳播者也是羅馬帝國中的希臘人，只奉《舊約》的猶太教是嚴禁偶像崇拜的，而基督教各流派都可以繪畫雕刻聖像，這就是其希臘化的典型特徵。

對於希臘文明，怎麼評價都不過分。可以說：如果沒有希臘文明，就幾乎沒有我們今天現代社會的一切。現代的許多科學學科、技術發明以及民主制度，早在古希臘時代就已經產生出了其雛形。古希臘文明更是直接催生了中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導致近代科學的產生，民主制度的萌芽。這是對今天整個人類世界作出了最重要最關鍵的貢獻的一個文明。

2·中華文明的低劣性

判斷一個民族優劣的標準是什麼？在追求“現代化”的世界上，只能是符合現代化的標準：一是看該民族是否具有民主、法治、公平、高效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二是看該民族是否能創造出現代物質文明，三是看其文化是否具有反省、創新的機能，四是看其社會是否健康、文明、正義。從這四個方面來看，中華民族確實存在著令人痛心的太多的缺點。

中國一直處於一種停滯的狀態中，卡在守土思維裡跳不出來，文明沒有任何進展，始終是畫地為牢、原地兜圈。最先提出中國社會處於停滯、靜止狀態的是英國人亞當·斯密。他從英國資本原始積累時期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角度考察中國，認為“許久以前，它就停滯於靜止狀態了”。18世紀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曾指出，中國“今天的法律、風俗、習慣，甚至那些無關緊要的习惯，如衣服的樣子，和一千年相同”（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第231頁）。黑格爾認為：“中國和印度始終是停滯的，甚至至今依然維持著一種自生自滅的存在。”19世紀英國思想家J·密爾指出：中國人“幾千年來原封未動”（J·密爾：《論自由》第77頁），中國社會長期停滯不前的原因，在於壓制個性，“使一族人民成為大家都一樣、叫大家用同一格言同一規律來管制自己的思想和行為”。這就是墨家“尚同”的罪惡。

中國從宋代後就進入停滯型社會，一日本社會學者寫的中國明清農村社會的著作做了很好的實證研究。美國思想家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24 年在他的筆記中寫下的一段話：“當我們居高臨下對這個愚昧國家觀察思考得越仔細，它就越顯得令人作嘔。中華帝國所享有的聲譽正是木乃伊的聲譽，它把世界上最醜惡的形貌一絲不變地保存了三四千年……她那古老的呆癡！在各國群集的會議上，她所能說的最多只是一——‘我釀制了茶葉’。”

傳統中國的制度是非人的制度！它只能製造殺人的惡魔、愚昧的民眾、貪婪的權貴、無規則的政治、低效率的生產和社會道德的沉淪，而不可能產生理性、正義、文明。中國人儘管有飲食、計謀等方面的小智慧，但缺乏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方面的大智慧。今日有哪個行業體系是以中國傳統的行業標準來建設的？沒有，傳統行業只是泛泛的經驗之談，根本無法形成規模體系，因為我們不是一個善於建制及守制的民族，也就是說不是一個文明的民族。

論政治，中國三千年來一直都是最專制、最腐敗、最黑暗的政治，一直到現在都還是專制體制，實行的是非程式政治、謊言政治和暴力政治。集權主義、全能主義政治，金字塔型的權力結構、秦始皇的郡縣制一直保留至今，落後的權力結構、政治架構使得中國至今仍然被排除在現代文明之外。現代文明是多中心、權力分立、公民社會強大的，而傳統的中國只允許有唯一的權力中心，特權橫行，公權力不受約束，沒有邊界，形成“無限政府”，司法不獨立，立法不獨立，新聞不獨立，審計不獨立，監督機構不獨立，人治的無程式政治、暗室政治、權謀政治、謊言政治、暴力政治氾濫，國家治亂迴圈，官員制度性腐敗，政府經常失靈，民眾奴性嚴重，社會正義感衰落，仁義道德淪為遮羞布，整個民族陷入追求福祿壽喜、飲食男女、經濟利益的世俗主義桎梏之中，幾乎沒有超越世俗的理論

思維，也沒有反省制度的大智慧。中華民族淪落為地地道道的官本民族、奴性民族、權謀民族、非理性民族。

中華文明從發軔之初就蒙上了野蠻專制的陰影，不擇手段的官場哲學造就了謀略、陰謀文化，形成了虛偽的道德、窩裡鬥的習氣、野蠻血腥的品行。中國的專制統治者是一群豬狗不如的野獸！人民生活在野獸的統治之下，歷經兩三千年的茫茫黑暗；中國老百姓是一群螻蟻，微小而自卑，只能聽憑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壓迫、殺戮，只能任由統治者製造著動亂和災難。中華民族兩千多年來，內亂、戰爭大約占了一半的歷史時期（據統計占了 55%），人口死亡過半的動亂就達十多次，但沒人總結教訓、完善制度、提出防範悲劇再度發生的措施，相反，不幸和痛苦很快會被忘卻。各路強人逐鹿中原，最終目的是要實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獨裁體制，演繹出一部活生生的人吃人史，從來也不敢想會有什麼其它方式來取代。

沒有一個超越現實世界的信仰，一個民族的精神是很難提升的，最後必然崇拜自己。如果個個都崇拜自己，在政治上就易出現“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以為換了自己就能創造一個新世代。正因為人都有“罪性”，不是神；所以，對社會弊端的批判並不是要換個好人當政，而是呼喚制度變遷。而中國人卻從來沒有想到這一點。

當西方通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而解放人性、限制王權、發展議會民主時；中國的專制卻愈來愈嚴，出現了“杯酒釋兵權”、取消宰相的更加集權的趨勢，儒家倫理發展到“存天理、滅人欲”的以禮殺人地步。唐朝的大臣在皇帝面前還可坐而論事；宋時就只能站著說話；到了清朝，只許跪著而且眼睛也不能上抬，口中也只能自稱“奴才”。儒教社會習慣于讓君主支配自己的命運，所以，即使

機會在握，也會輕易地把機會交給權力狂們，如趙紫陽。

胡星斗說：中國人不屬於文明民族。即使有自稱先進的東西，也往往是先進其外，野蠻其中。中國人民二千多年來，面對著五大敵人（五種中國病）：人治（特別是專制），官有（官府壟斷資源），貪腐，愚昧，傾軋（暴力與計謀）。因為人治，因為官有，所以有暴君、暴民、貪腐、愚民、暴力、陰謀，所以，前二者又是一切禍害的根源。

論經濟，中國老百姓在封建帝王、貪官污吏、地主豪強等多重壓迫下一直都是最窮困的，所謂“唐朝時一個馬車夫都比歐洲貴族富有”之類的話完全是瞎話。事實上，古代中國所謂“繁華富裕”，跟今天靠剝削農民和城市平民，來維持寥寥幾個大都市的“繁華富裕”假相的做法是同出一轍的。這一共同點，兩千多年來一直沒有改變過。

一些弱智的中國人流行“古時候中國的 GDP 占世界的 80%（另有 50%~90%不等的多個版本）”這種白癡笑話，在中國古代的兩個鼎盛時期——漢、唐，同期的羅馬帝國和阿拉伯帝國，在領土、人口、生產力上，都遠遠超過中國；而且延續時間也比漢唐生存的時間長。

史料記載：一次，朱元璋心血來潮，到屬下家中私訪。他事先沒告訴任何人，就微服簡出，來到了弘文館學士官居五品的大員羅複仁家。可朱元璋來到羅家一見，大吃一驚。羅複仁家的房屋又舊又破，室內僅有幾件舊傢俱。羅複仁本人在家中，登梯爬高正忙著粉刷牆壁。一見皇上駕到，羅複仁趕緊從梯子上下來，吩咐夫人給皇上搬椅子。可室內的傢俱太破，無奈之下，只好讓大明皇帝坐了回板凳。朱元璋未曾料到弘文館學士的官邸如此寒酸，頓時動了惻隱之心，旋即賞給羅複仁一處豪宅。明朝萬曆年間著名的清官海瑞，在江西興國任知縣時，為了給

母親做壽，因為生活窘迫，只買了兩斤豬肉，甚至連桌上的蔬菜，也都出自他親自督率差人在衙門後院自己栽種的(明史《海瑞集》)。那窮人的生活就更可憐了！

論文化，中國文化是最腐朽、最墮落、最陰暗的奴才文化、太監文化、偽君子文化。中國文化是一種徹底的反理性思維文化、反智文化、愚民文化、專制文化；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中國文化體現了中國人最腐朽、最墮落的生活方式——太監的生活方式、奴才的生活方式。

中國文化是上層政治文化而不是民間文化，因為文字被官方壟斷；民間文化完全依賴官方的采風，官方就以自己的標準強姦了民間文化。這是中國文化從肇始階段就與西方文化所不同的特點。希臘的拼音文字首先是民間流傳的，就先有了荷馬史詩和《神譜》等民間巨作。

顧准說：“所謂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權威為無上權威，使文化從屬於政治權威，絕對不得涉及超過政治權威的宇宙與其他問題的這種文化之謂也。” 中國文化的這種卑微出身決定了它只能是一種永遠只有通過效忠權勢、服務國家才能獲得成功感和價值感的奴婢文化。

天道不在中國，而在希伯來、古希臘那裡。中國天道就是王道，因為“天何言哉？”，天之道只有天子——王才知道。所以，古中國就形成了一個跪拜王的王道文化。中國天和王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這就是所謂的“天人合一”，由於天人不分，所以沒有天道。真正的天道在古希臘人那裡，這首先表現為自然法思想，可以參見《人權正義論》。

中國文化是史官文化，商代已然，至周已凝固到不可更易的程度了。有了史官文化，先王之道才會昭然若揭；所謂“道高於君”者，先王之道也；而先王之道意味著至高無上的權力。《今文尚書·洪範》：“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

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道。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在古中國，道是“王道”，法是“王法”，義是“王義”（“義”在《墨子》中有兩種含義，一是普通人或弱者的“一人一義”，這是人類群體瓦解的因素；二是聖王“立義”之義，這是“兼相愛”、“交相利”之義，是社會安定的基礎），土是“王土”，離開了王，中國人難以自立于世界，所以，韓愈把聖人（即聖王）視為人類生存的前提，他說：“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與此相反，西方發展了拜神的神道文化，擺脫了對“王”的精神依附！

中國文人起源于宮廷史官，他們一開始就是一個務實的、以知識求俸祿的、自覺充當奴才、完全喪失文化想像力的群體。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是君主專制下奴才們的呻吟，是繼續推動中國更加專制的運動。諸子用臆造的道德高標準（聖人）來脅持人民的精神，諸子根本不是思想家，而是教人如何做個好奴才的處世家。諸子學說是一種君王本位的國家至上的處世學，其間充滿了事君匡時、馭臣愚民、竊國掠地、審時度勢、察顏觀色、諍諫策議、爾虞我詐、爭權奪利之術；至於生命存在的精神依據、人生價值和正義，是不予關注的。

拒絕討論“怪力亂神”孔子，也不探討生命本體，他討論得最多的是侍君、處世、馭民諸事，表現出君王本位和國家至上的色彩。孟子的民本說一直備受讚譽，其立場依然是君王本位主義。孟子勸君王勿嗜殺時，也沒有神聖天道或人道作為依據，而是非常實用主義地誘導之：“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

儒家文人缺乏基本邏輯與形上學的知識能力，擅長察言觀色與明哲保身的哲學，喜歡說一套做一套。形容儒家性格最貼切的名詞，就是孔子慣常罵人的話，

即“巧言、令色、足恭、鄉願、恥惡衣惡食”。所謂足恭，是指文人擅長于察言觀色，並表現出奴僕般畢恭畢敬；所謂令色，是指文人為了討好統治者，儘量表現出迎合統治者的嘴臉；所謂巧言，是指文人在統治者的規定與容忍的範圍內，儘量表現出自己的才學與兩面派技巧；所謂鄉願，是指文人經常漠視統治者的腐敗與社會不公不義，不敢挺身支援公理正義，只會保持高度的沉默與裝聾作啞；所謂恥惡衣惡食，是指文人不願意忍受惡衣惡食，喜好追求功名利祿。

諸子百家都是擁護專制政治的文人諫臣或謀士，是知識的販賣與治國術的兜售者，他們的目的是在於把自己高價賣給君王，以便取得俗世的榮華、富貴與權力。張儀本倡合縱抗秦，可不被六國所用，乃改主連橫之說，投奔秦國，協力剿滅六國，可見他所持學說並無天地大道或精神信仰作為內在依據，其目的僅在於持某說以求顯達。這種依勢弄權、謀私利己，而將正義、天良、道德、生民等棄置一旁的現實選擇，構成了一個巨大的奴才文化傳統。

諸子為什麼放棄對自然界的探索和對正義的關注呢？原因很簡單，因為中國知識份子為強權所“養”，那他就必須提供強權所需要的東西，這種東西不是科學，也不是經濟學，而是君王們需要的“帝王術”。他們認為“上智與下愚不移”；因此不想像喬達摩和耶穌那樣，成為“普渡眾生”的殉道者。他們走的是另一條路，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救世”之路：尋找“內聖外王”的現世“明君”，積極用“知識”靠攏“強權”，幻想以“帝王師”的身份，借明君之手，還“亂世”一個太平。以老子的“人君南面之術”和孔子的“德政仁治”始，直到戰國時代的楊墨、孟荀、黃老、申韓等學派，儘管彼此形同水火，但反本歸宗，都搞的是帝王術。等而下之的如孟嘗君等四公子豢養的門客們則表現的是助君之技。這條由老子、孔子奠定的、用知識與強權調情的“救世”之路，一直被後世的文人沿

著走下去。

形成奴才文化的原因有：①中國的廣大、分散的農業經濟產生了上層與底層的巨大階差，這種差距就是社會分工上的勞心者與勞力者，其中勞心者成了依附于君主威權的奴才階層。②東周士人面對殺人掠地、血流成河的亂世，忙於炮製救民於倒懸的急功近利之學，而無暇抱持玄遠之思。③中國君主過於暴戾，所有士人都不得不或虛或實地採用君王本位主義的立場，否則無法發聲。天下的中心是君王，而君王在現實中的存在方式就是權和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體現了權的無限膨脹，士人的思想言行老是繞著君王轉則體現了勢的無限膨脹。三者並作，使得中國知識者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屈勢媚時老成俗氣的群體。他們用來批判現實的常常只是過去時代小國寡民、明君聖主的和諧圖景，這個圖景依然以君王為中心。

自焚書坑儒後，中國的士人嚇破了膽，從此閉上了鳥嘴。中國的儒、道、墨、釋等思想，所有的價值理念，都必須對皇帝低頭與讓步，否則就會被剿滅，絕對沒有自由發展的空間。中國社會一切以維護統治者一人的利益為宗旨，完全泯滅了個人的獨立思考。在這種扼殺人性的文化裡，任何具有自由精神的人都遭到扼殺，默默地窒息而死；能存活下來的是那些具備這個邪惡文化全部特徵的卑劣者，即信奉奴才哲學、太監哲學的一類人。幾千年來，沒有人對太監這種非人的制度表示反抗；相反，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自我閹割。明末，當利馬竇向那些儒學大師們描述：“教宗的尊嚴比天主教國家所有的國王都要高”時，他們幾乎被嚇得半死，唯恐皇上發怒，“焚書坑儒”的惡夢又要變成現實。其實，“焚書坑儒”的事幾乎每天都在進行。漢武帝只不過變換了手法，獨尊極度推崇等級制度的儒奴教；“獨尊儒術”本身就已把“儒”視作一種“術”，跟街頭的補鍋術並無多大

區別，他用這種“儒術”麻木奴隸們的頭腦而已。區別僅在於：秦始皇整批地坑掉儒演變成後世皇帝有選擇地每次只坑掉某一些儒，恰如屠夫依據市場需求選某幾頭豬來殺一樣。那些還沒被殺掉的豬於是山呼萬歲，除了趕緊編造許多理由論述那些被殺掉的豬該殺之外，還得表白自己隨時願意被殺，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更可鄙的是，儒師們世代相傳地不斷豐富“殺豬有理”的學問，以備皇上可以隨心所欲地用來殺別人或者殺自己。士子們的最大的追求是為皇帝們當差，去幫皇帝治國平天下。中國文人們從未進行過理論創新，在人民起義的迴圈中，只是伺機尋找新主人，尋找一位心儀的皇帝，從未想出如何走出這個週期性崩潰的專制制度。他們的知識結構決定了他們只會吟詩作畫，沒有能力提出對國家、對政治、對經濟的新見解。

幾千年來正統知識份子幾乎全是御用的，不但失去了思考的能力，而且拒絕接受外界一切先進的思想。直到現在，這種局面也沒有改變。結果，民族的思維能力越來越孱弱，氣質越來越陰鬱，思想越來越實用，內心越來越機偽，而當權者越來越殘暴了。

胡星斗說：中國的歷史就是知識份子為了專制政治而犧牲獨立人格和自由的歷史。中國知識份子的最高人格是為統治者服務，其使用價值就是吹鼓手。此即所謂的“士為知己者死”，“報得君王知遇恩”，“文以載道”，“文應時而作”，“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致君堯舜上”之意。而且，中國的統治者從來不把知識份子當人看，僅看作自己的門下食客、乞討者一般；如漢高祖劉邦“輕士善罵”，看不起讀書人，經常戲虐學士，甚至往士之帽中撒尿，其流氓本性可見一斑；明太祖朱元璋也是一流氓皇帝，他大肆誅殺學者士子，各地“府學”少有存活的。儘管

知識份子這樣受盡凌辱，現在還有人說中國古代是“士人政府”，士人通過科舉進入政府，充斥衙門。其實，士人不過是最高統治者的工具而已，不但沒有獨立的人格，還隨時可能被廷杖、誅殺。這樣的士人政府，莫若稱之“奴才政府”、“豬狗政府”。

屈原為昏庸的楚懷王而死，流傳千古。他在流徙途中寫下的“千古之絕唱”——《離騷》，魯迅早就指出它表達的不過是“不得幫忙的不平”。屈原自命高潔，“舉世皆濁我獨清”，自比美人香草，其哀怨彷徨之態絕類妾婦。如“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眾女嫉餘之蛾眉兮，謠諑謂餘以善淫”，完全是一副不得寵的妃嬪的口氣。屈原與楚王同宗，身為貴族而尚且如此，後世沒有貴族身份的士人對王權的依賴就更大了。屈原的悲劇預示了他身後兩千多年中國知識份子的不幸命運，屈原人格也早已成為後世知識份子頂禮膜拜的偶像，說穿了就是一個“忠”字，就是無限忠於權力中心，即使被打入萬劫不復的地獄，心中仍然充滿對“明主”的期盼與忠誠，這種愚忠直到上世紀 80 年代還被譽為“第二種忠誠”。

陶淵明，看似很有追求身心自由的決心，實際上不過是為逃避亂世兵禍，東躲西藏尋找一個老鼠洞苟且偷生的消極避世。杜甫，看上去好像比較關心民間疾苦一點，對社會黑暗批判得多一點，不過就是不觸及實質無所思想突破，不痛不癢矯情地虛表同情一番，不過就是“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的佳人期待其“真命天子”不遇之餘的憂悶排遣而已。

李白也曾假模假樣酸溜溜地說什麼“安能催眉折腰事權貴”，這只是他跟其他奴才在皇帝面前爭寵失勢後的牢騷話而已。實際上，他頂多是不願“催眉折腰事權貴”，卻很樂意“催眉折腰事皇帝”的，而且，真的一旦皇帝或其它什麼“權

貴”召見他時，他跑的比誰都快，“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得意忘形得真的以為自己一有皇帝寵倖就高人一等了，不是俗人了；骨子裡對勞動人民極為鄙視，可笑的是，皇帝卻一直不過拿他當個娛樂用的弄臣而已，玩膩了就一腳踢開，“賜金還鄉”，然後他就滿腹牢騷地在詩歌中發洩一通《妾薄命》、《長門怨》，李白自比阿嬌紅顏薄命。白居易筆下“弦弦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的琵琶女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詩人自己的影子。而張籍在《節婦吟》中乾脆就把自己比作“妾”：“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妾婦自擬的長期心理積澱，使士大夫們漸漸在心理上具有一種女性認同的趨勢——認同於女性的角色；這種角色認同使士大夫們在審美上也傾向於認同女性的美——一種柔弱嬌婉的美。士大夫們將這種美理想化，並以這種美的標準來衡量自身。在這種美的標準下，“手無縛雞之力”不是缺點，而恰恰倒是士人的高貴優雅處。這樣，中國文化對女性與對男性的審美標準趨於一致，都以柔媚為美。於是士大夫們也就漸漸地崇尚起女性化的容貌來。

中國古代社會具有家國同構性；士大夫作為臣子充當的是君王妾婦的角色。換句話說，在“大家”——國家裡，君王是主宰，士大夫是臣妾；而在小家裡，士大夫又成了“夫君”，可以享受女人的服侍；士大夫因此便具有雙重角色。君王與士大夫的關係和士大夫與其妻妾的關係正相類似。對於臣子來說，最重要的準則是“忠”；故武王伐紂，雖是弔民伐罪，而不食周粟的夷、齊卻受到儒士們的頌揚。對於婦女來說，最重要的準則是“節”，正史中的《列女傳》記載的多就是節烈之女。“忠”與“節”本質是一致的，都是要求對自己的主與君忠貞不二；差別只在於主與君的不同。當然，中國文化對婦女另有所謂的“三從四德”說。“三從”為“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四德”即所謂“婦德、

婦言、婦容、婦功”。對於士大夫雖無所謂“士德、士言、士容、士功”之類的明確說法，然而翻開《世說新語》，所見卻也是“德行第一，言語第二……容止第十四……術解第二十，巧藝第二十一”，與女性四德之序正相暗合。古諺雲：“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所謂“知己者”無非是願意照顧自己的主子而已，“士”與“女”所充當的角色本質上並無二至。

缺乏超越權力之外的獨立思考，缺乏對“至高無上”的權力本身的質疑；有的只是文人們對權力的依附與獻媚，不可能產生出知識份子的獨立人格。所以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只有四書五經、故紙堆和考據學，最多還可以加上琴棋書畫、詩詞歌賦，惟獨沒有的是對權力的獨立批評，對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學術自由也就是對知識份子自身權利的追求。中國知識份子從來就沒有站在權力集團之外，成為一種獨立的社會力量。由此也決定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命運，這是中國歷史最大的悲哀。必須徹底擺脫對權力的依附。這種依附性雖然不是知識份子自身一手造成的，但確乎已滲入不少知識份子的骨髓，甚至內化為他們的“一種情感傾向以及認識、評判事物的既定思維方式”。不改變這一精神狀態，老是以權力者的是非為是非，甘願成為權力者的詮釋機、傳聲筒，在屈原人格的陰影中打轉，這個老大民族就不可能融入人類主流文明，我們所期待的文明中國就只能是一個遙遙無期的夢。

按照歐洲人的標準，思想家是指具有最高理性思維水準的人，可以說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一位思想家，而且沒有獨立的知識子！因為中國的歷史就是奴役的歷史。知識份子是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孔子卻提倡“畏聖人之言”。一個把“聖人之言”當教條來敬拜的人，就喪失了獨立思考能力。知識份子要有創造性；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天天“法古”，何創造性之有？儒家把人

身依附的感情(“親親為大”、忠、孝)放在第一位，真理、正義自然就只能放在“兼顧”的位置。這是一個低級民族不能產生思想家的社會心理根源！

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中只出現過一個主張“無君”的鮑敬言，只能根據東晉時的葛洪的《詰鮑》，才一鱗半爪地知道中國原來還有這樣一位獨立的思想家！一個泱泱大國，其思想之貧乏竟達到如此地步，豈不悲哉！20世紀的魯迅不但從未公開以“理論的形式”提出其個人主義的主張，而且越到晚年越相信蘇聯的宣傳，甚至出面駁斥那裡發生了大饑荒的報導。有人稱魯迅是“中國的伏爾泰”。伏爾泰的名言“我完全反對你說的一切，但是我堅決保衛你發言的權利”已成為全球倫理準則，這在中國傳統文化及魯迅著述中卻是找不到的。

中國不是輸在近百年，而是從起跑線上就差了4000年。從起點上，希臘羅馬時代的城邦民主制和共和制已經高出春秋戰國的君主制一個層次；希臘科學理性精神、邏輯學的創造，又高出古中國從《易經》衍生出來的感性思維文化一個層次；基督教博愛、懺悔、救贖的宗教精神又高出儒家君為臣綱的專制主義一個層次；文藝復興的天賦人權、自由民主理念，宗教改革，又超越原地不動的中國文化一個層次；近代科學的誕生、工業革命，又一次把仍然在落後的農業文化中做低級迴圈的中國拉下了兩個層次。到了現代，西方民主體制人權高於主權的超越性認識，又高出中國半封建集權專制不止一兩個層次。這樣累加下來，西方文明已經高出中國文化七八個層次。中國文化實在是一個劣等得不能再劣等的文化。只有西方文明，才當得起“博大精深”這四個字，其它不論何種文化，包括中國文化與其相比，是毫米與光年之間的差距，是石器時代的石斧與太空船之間的分別，根本不在一個數量級上。

波普說過：“西方文明卻是整個人類歷史中最自由、最公正、最人道主義的

最好的文明。它所以最好，是因為它具有最大的改進能力”。而中國文化註定了永遠做不到這一點。

第四章 專制主義

第 27 節 專制的涵義

廣義的專制是指侵犯人權的野蠻流氓行為。狹義的專制是指政府對老百姓的欺壓。

專制是個帶有貶義的詞，最開始出自古希臘哲學家，其中最著名的要數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這師生二人把專制用來定義一種東方式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處於主奴關係的統治形式。古希臘人認為，自由國家裡主宰一切的是法律而不是統治者；專制政體（despotism）就是運用非法的手段實施統治的政體，它是所有政體中最壞的政體。在他們看來，專制政體只是“東方”帝國的政體。在那裡，最大的敵人就是掌國的專制主，在他的治下沒有自然法，有的是單獨一人發號施令，法只不過是統治者任意發佈的命令。亞里斯多德說：“野蠻人比希臘人更有奴性，亞洲人比歐洲人更有奴性；因此，他們毫無反抗地忍受專制統治。這種君主政體很像僭主政體（tyranny，即暴政），但由於它們遵循成法而世代相傳，所以很穩定”。這樣，在歐洲全部政治哲學的源頭，專制主義就被明確地說成是亞洲的屬性。專制的這個定義延續了兩千餘年，直到十八世紀，法國人才第一次把專制的概念運用於歐洲國家。

孟德斯鳩擴展了專制一詞的內涵，把它應用於統治者對人民擁有全部權力，人民只能在恐懼中完全被動服從的政府。孟德斯鳩認為，一切集立法、行政、司法三權或其中兩權於一身的政權，都是專制暴政。孟德斯鳩區分了專制政體、君

主政體與共和政體三種不同類型的政體。專制制度的特徵是沒有法律，統治者的命令就是法。孟德斯鳩說：“專制主義是指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獨一個人按照一己的意志與反復無常的性情領導一切”。在專制制度下，“只有一個人是自由的，那就是專制統治者本人”，統治者的行為不受任何制約。君主制下，君主既受到法律的約束，也受到貴族或其他等級的約束；君主的權力是有限的，人民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共和制最能保障人民的自由，這種制度需要人民有較高的美德。這三種制度各有不同的精神，共和制的精神是美德，君主制的精神是榮譽，專制主義的精神是恐懼。專制統治者“要用恐怖去壓制人們的一切勇氣，去窒息一切野心。”專制社會的命運掌握在一個人或少數人手中，普通大眾對自己的命運沒有發言權、也不能主宰自己命運。“在專制的國家裡，絕對無所謂調節、限制、和解、條件、等值、商談、諫諍這些東西；完全沒有相等的或更好的東西可以向人建議；人就是一個生物服從另一個發出意志的生物罷了。”

黑格爾和馬克思繼承並發展了孟德斯鳩的理論，把專制這個稱謂用於僅有統治者是自由的，其他人都不自由，統治者管理著所有公共工程的一成不變的社會。20世紀威特夫創立了一套東方專制主義理論並應用於前蘇聯。現在，國際最權威的政治學詞典對專制的解釋，一般都是指擁有無限權力的政府。這樣的政府對全體國民實行不由分說的專橫統治。

專制統治表現為“三壟斷”制度。俄共書記久加諾夫說：蘇共垮臺的原因在於它的“三壟斷”制度，即壟斷真理的文化制度、壟斷權力的政治制度以及壟斷利益的經濟制度。所以，專制主義也可以稱為壟斷主義。這種壟斷主義在中國古代就已經存在。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天命——人人都要服從天子政治獨裁，因為他口含天憲；畏大人，老百姓要服從[官僚]大人的經濟

獨裁；畏聖人之言，小民要服從聖人的思想獨裁，真理都在[孔]聖人那裡，這就是真理壟斷！真理壟斷一成功，老百姓就成了雞犬不如的螺絲釘！孔子的“三畏”揭示了君子是等級關係的維護者，是不能超越天命、大人、聖人之言的。所謂的“大丈夫能屈能伸”，屈者，奴性之謂也；伸者，奴隸主的專制性之謂也。

當代芝加哥大學教授鄒讜愛用 totalism（全能主義）指專制主義，即皇帝老子什麼都要管，實際上就是“權錢通吃”。藉此，可明白專制主義的涵義。

第 28 節 專制的預設前提

專制政治的預設前提是：一邊是高高在上智力超凡的統治者，一邊聚集著生性愚昧頑劣的黎民階層。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為什麼這樣？因為“上智下愚”，所以，“上智”就該統治“下愚”，不能讓愚民來選統治者。“上智下愚”之社會，人生而不平等也。或智或愚，人的智慧和天資是生而不平等也。智慧、天資、德性最高者——聖人也，王也。從孔子到墨子到董存舒，提倡都是聖王統治。儒家認為：聖人是社會的天然統治者，應把統治權交給聖人，讓聖人們來統治和治理天下。為此，他們提出了“學而優則仕”的政治原則，主張由那些“學而優”聖人、君子來管理國家。聖王統治是一種精英政體，相當於古希臘學者提倡的哲人統治，表現為“政教合一”，即統治者不僅統治人們的行為，還要統治人們的靈魂；而且要把“下愚”者治理得服服帖帖。真正做到這點是中國，因為儒家也滲入漢人的靈魂，是世界上最好的順民。可見，“上智下愚”的社會必然是“政教合一”的社會！

獨裁的理論基礎就是愚民論，就是蔑視多數，就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智商巨差，“智商巨差”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社會利益再分配的巨大差異提供了最深層的“合法性”。

獨裁的缺點正在於極度地依賴執政者的個人才智，缺乏監督機制，致使昏君、暴君不斷出現。事實上，人與人之間的智商差別一般不大，但獨裁政治為證明自己的合法性，不惜對此進行扭曲，並且採取愚民政策人為地製造“智商巨差”的現象，由此可理解孔子的那句“格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什麼烏合之眾、濫竽充數，都隱含著對多數的蔑視。孔子鼓吹“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那時的“民”主要是農民。他鄙視農民，說幹農活的是小人，“唯女人與小人難養也”。這種極端歧視農民的思想毒化了中國，到今天，中國的城市依然極度的歧視農民，甚至出現了員警打死孫志剛打死農民的惡劣事件。在儒家的極端思想支配下，中國妥協不了，只見處處流血、天天礦難死人，還被諷刺為“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在他們眼裡，農民是該死的，是該為國家犧牲的。在這種極端思想支配下，中國看不到文明的妥協之光，看不到“多數決”的民主之光！

專制政體是中國一直未變的政體。辛亥革命後，中國有了轉入金錢政體即財產權——人權政體的機會，然而專制政體的知識精英們萬炮齊轟資本主義，使中國進入了新一輪的極權專制政體——科學社會主義政體，即最先進的馬主義哲學——唯物辯證法的統治，簡稱為“四個堅持”、“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依然是“政教合一”。

為什麼西方未產生這種高度“政教合一”的專制政體？西方中世紀的“政教合一”依然趕不上中國的“政教合一”。因為：①聖經太複雜，沒有三字經那麼容易被人掌握。基督教的“原罪”意識催發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識，這與儒家鼓吹的人生而不平等不同。②沒有科舉制束縛人。③東西方對智慧、知識的最初認識是不同的。西方的智慧是一種理性智慧，以邏輯性為判斷標準。東方的

智慧是一種悟性智慧，缺乏客觀的判斷標準，實際上是一種狡智——小聰明而已。

④西方的理性智慧觀多強調：理性面前人人平等（實質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如古羅馬的西塞羅；象尼采的“超人”畢竟是其社會思潮中的末流，曇花一現而已。而中國更強調人的智慧和天資生而不平等。所以，中國的“政教合一”就更加武斷和黑暗，皇帝可以隨意打大臣的屁股、刑警可以割犯人（張志新）的喉嚨，舉世罕見。

為什麼標榜為光明的精英專政政體這麼黑暗？不如金權政體即財產權——人權政體呢？這是因為：精英政體缺乏客觀的正義尺度，沒有客觀的判定標準，完全使黑箱造作的人治。儒家說“天生德於予”，天命歸有德者；是否真有德，由於不讓愚民表決，最後只能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竊國大盜成聖人。精英政體由於強調聖賢（科學）指導一切，必然表現為最高指示壓倒法制，成為無法無天的社會！而在以財產權為核心人權社會中，強調的不是誰最有智慧、誰最先進，不是以科學智慧指導一切，而是用客觀的財產權來束縛、制約統治者的異想天開的智慧，這就避免了改天換日的“大躍進”似的荒唐！

第 29 節 專制主義的宇宙觀

1. 天崇拜與專制的“天人合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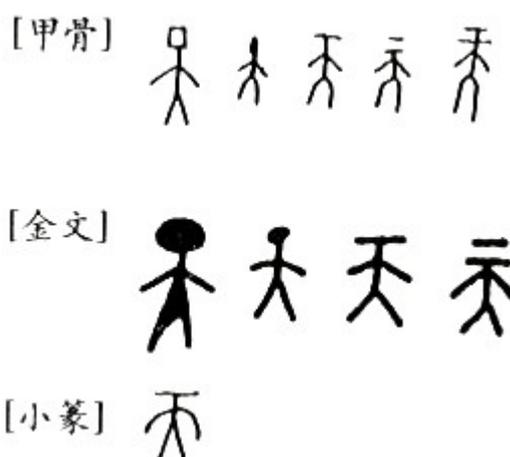
《草原帝國》的作者、法國研究亞洲史的泰斗勒尼·格魯塞說，“匈奴人於西元第三世紀後半期時組成了一個統一的和強有力的民族。他們的首領被稱作單于，這稱號的全文譯音為撐梨孤塗單于，漢文內譯作‘天子’，撐梨為突厥——蒙古語字根，它顯明的是突厥字與蒙古字‘騰格裡’（天）的譯音”。從匈奴到突厥，再到蒙古，全都崇拜騰格裡。在黃帝時期的西北遊牧族就崇拜騰格裡，要不當時的各部族就不會把黃帝尊為天子了。騰格裡崇拜和天子這一稱號都來自上

古時期的西北遊牧族。原來華夏族的“天崇拜”，是炎黃二帝從草原老家和遊牧祖先那兒帶到華夏來的。

要弄清“天人合一”的含義，關鍵是弄清“天人合一”中“天”的意義。《四庫全書》中有 200 餘條表述“天人合一”的材料。“天”包含著如下內容：天是可以與人發生感應關係的存在；天是賦予人以吉凶禍福的存在；天是人們敬畏、事奉的物件；天是主宰人、特別是主宰王朝命運的存在（天命之天）；天是賦予人仁義禮智本性的存在。今天不少人把“天”理解為自然界，認為“天人合一”就是“人與自然合一”的內容，則一條也沒有找到。古代的“天人合一”的“天”並不是自然，而是超自然的神秘。

“天”按最早的字書《說文》的解釋，表示至高無上。從字面意義看，“一加為天”，直譯應是：天者，第一大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的“天”就是這個意思。

天字在甲骨文中就有出現，是一個頭部突出的人的形象（見下圖，據許進雄，古文諧聲字根，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頁 705）。最初的意思僅僅是用來表示人的頭頂。殷商人特別崇拜鬼神，他們心目中至高無上的主宰被設想住在天上，但甲骨文中是用“帝”來表示而不是“天”，甲骨文專家許進雄教授認為，那時的人似乎還沒有把頭上的整個空間明確地看成一個系統。



商湯伐夏桀時所言的“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和《詩經·雨無正》中“浩浩吳天，不駿其德”更進一步地定義了“天”

的至高無上和絕對威權。周武王伐商誓師時責備紂王“弗敬上天，降災下民。皇天震怒，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他這是執行天的命令來了。三篇誓詞，不到八百字。“天”字出現了十九次（《周書·泰誓》）。

周戰勝了商，成為中國新的統治者，“天”也成了宇宙萬物的最高權威，道德的最後裁判，後世無不奉行。就連少數民族的口碑傳承中，天、天父、天母、天皇、天鬼、天神等都隨處可見；在中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祭拜的祖宗牌位都是以“天”字打頭的：天、地、君、親、師，僅此人們對天的崇信和“天”崇拜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可窺一斑。

連近年來有些學者所豔稱的“天人合一”，其政治上的含義也是天子承天命以禦天下。儒家認為政權的神聖合法性來自“天”。在儒家眼裡，天是至高無上的，是道的本原。人不但能夠參透天道，還能“法天而行”、“替天行道”。儒家思想的要旨在於“天人合一”。核心的是天君合一，將原始人對天的恐懼式的崇拜，引導為對君主的盲目崇拜。

儒家把天子奉若神明。《禮記》雲：“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發號出令則民悅，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堯哉！”

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天”不能自行其意志，必須通過天子來表達天意。這樣，所有的帝王專制制度都是合理的，因為是“天”給的。孟子的說法不過是天子權力的自我合法化即“王婆賣瓜自賣自誇”而已，從而為絕對專制提供了哲學基礎。

秦王政十九年（前 228），嬴政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自稱皇帝，他命工匠將

李斯寫下的“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個篆字，刻在滅趙國時得到的和氏璧上，作為他的傳國璽。從此這塊石頭便成了神聖之物，後來被想當皇帝的野心家爭來奪去，以為得到這塊傳國璽，自己便也“受命於天”，即從天那裡得到統治萬民的合法性了。

《易經》開宗第一章有一句話，“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係詞上篇）這是說人間的倫理秩序，道德規範都是天規定的，體現在自然之天所顯示的現象中，而天象的變異則預示著禍或福將降臨人間，以後就成了中國人認識世界和行事的準則。天成了和人一樣有思想意志、喜怒哀樂、超人而且超自然的神秘力量。

《荀子·王制》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

“天人感應”的觀念早在《墨子·天志中》便有所反映，即：“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後來鄒衍則加以重申，但沒有做任何說明。

那時的人們知道，物與物在不接觸的情況下是可以發生感應的。比如磁石可以吸鐵，琴弦可以共振等等。感應的發生是由“氣”在做仲介。感應的發生是有條件的，比如磁石可吸鐵，但不吸銅；琴弦的共振，也是宮弦和宮弦共振，商弦和商弦共振。如同牛鳴牛應、馬鳴馬應一樣。於是得出結論：只有同類的事物可以互相感應。

漢代的《淮南鴻烈》繼承了道家學派和陰陽家學派的觀點，發展了“天人感應”說。該書論證道：“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容波。……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霓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稜有以相蕩也。”

《淮南鴻烈》的作者們提出了“人副天數”的觀點來加以證明。該書寫道：“岐行喙息，莫貴于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世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又道：“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四肢五臟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雲，肺為氣，肝為風，腎為雨，脾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

董仲舒幾乎原封不動地把《淮南鴻烈》中的“人副天數”和“天人感應”搬到他的著作裡，從而終於建構起來“天人合一”說。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論，是借人與自然的關係闡釋人與人的關係，即“天人合一合於人”。具體說來，“天人合一”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天人同構”、“天人感應”、“天人相通”。“天人同構”——董仲舒鼓吹“天人相副”，即人是天的副本，人是天按自己的樣式製造出來的。譬如，天是圓的，所以人的頭圓；地是方的，所以人的腳方。人為什麼有兩隻眼？因為天有日月。天有五行，人有五臟；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春夏秋冬，人有喜怒哀樂；天有陰陽剛柔，人有君臣男女。

因為“天人同構”，所以“天人感應”。董仲舒雲：“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陰陽義》）。即：天是有喜怒哀樂的天，可以和人感應、能給人以吉凶禍福。自然界出現不尋常的現象，被認為是人事的影響，這種影響並非說人類活動破壞了植被、污染了河流土壤之類的影響，而是指因為周幽王寵信了褒姒導致岐山發生了地震。這種“天人感應”，將自然界的變動看成是上天在傳遞某種神秘的資訊。因此，“天人合一”

中的“天”，不是自然之天，而是有人格意志的神。譬如說，天上出了“掃帚星”，人間就要倒大黴。如果出了“祥瑞”，則證明當今皇上乃“堯舜之君”。董仲舒告誡人君，如果善待百姓，把國家治理好，上天就會降下祥瑞：黃河清，彩雲現，禾生雙穗等。否則，上天就會發出警告，直至給以懲罰，“自絕於天”會失去權位、改朝換代。日蝕、月蝕、隕石墜落、花木不合時令的開放或生長，都被視為上天的警示；地震山崩、洪水氾濫或久旱不雨、蝗蟲蜂起，不只是警告同時也是上天在施行懲罰了。他原想讓皇帝因敬畏天，不得不對自己的行為有所收斂，但難以奏效。因為中國文化中有一套自欺欺人的消災彌禍的禳解法，如用祭祀賄賂天地神靈；將責任推給臣下，讓他們當替罪羊；讓和尚道士給冤死者念經“超度”等。災害發生，受災的是百姓，統治者照樣腐敗並心安理得。

儒家所謂的“天人相通”，其核心在於人與自然道德“相通”，把自然當作父母來看待（父天母地）。“天之子”亦如“人之子”，也有嫡庶、親疏之分，而普天之下只有一個人是“天之子”，叫做“天子”，也就是當今皇帝。其他的人，能混上個“庶子”的身份就很不錯，更多的恐怕只能做牛做馬，甚至賤如草芥了。董仲舒一方面說“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言下之意王是代天行事的，雖然王自身沒有處置民的直接權力，但上天既然要王來代理它，也就賦予了王處置民的權力。董仲舒認為：“古之造文者三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君主能參天地的理論，就是將君主神化為超人，超人的權力是神聖不可侵的。帝挾天命以制民，仗天命以立權威，借天命以成人事，將自己的意志與一切行為舉措均諉稱為上天的意志。也就是說，上天的意志是通過人間的天子在世俗社會中得到貫徹的，即所謂的“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就該“受命

于天子”，“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白虎通》卷一）。“蓋聞天生民，不能相理，為之君，使司牧之”。也就是說人民生來就不能自主、自理，必須由天父地母的王者來管理、來恩賜。人生而就是不平等的，有貴賤之分。他說：“民，暝也。”百姓本性是愚昧的，是冥頑難化的，王的任務就是管教百姓。“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天人三策》）。對於百姓，必須用制度來管教約束；而民眾也就只能永遠服服貼貼地接受專制君主的獨裁統治了。在下者應當服從在上者，也就合於宇宙的公理。如果誰敢反抗，就是“天理難容”，身首異處；“順天者昌，逆天者亡”。“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只要天不變，道亦不會變。“天人合一”把統治者地位神聖化、絕對化、永恆化——皇帝“奉天承運”。所謂的“天人合一”，其實只是一套維護吃人禮教、鞏固皇權的教化理論。這種“天人合一”，我們要回歸嗎？

這就是正宗原裝的“天人合一”，它顯然和“人與自然的和諧友好”並沒有多大關係，和如今人們提倡的環境保護、生態平衡也風馬牛不相及。人們在探討人與自然的關係時常常引用“天人合一”，說什麼古人的“天人合一”體現環境保護意識，甚至連一些風景旅遊區搞生態旅遊，也經常打出“天人合一”的旗號，其實都是望文生義，誤解了“天人合一”的本來含義。“天人合一”是具有特定含義的一個詞語，我們且不要胡亂使用了。

如果說“天人合一”說的確是中國人的一大智慧，它反映了自然秩序的和諧；那麼，印度的種姓制度就應當是印度人的智慧結晶了。因為《摩奴法典》宣稱：為了繁衍人類，他（梵天）從自己的口、臂、腿、足創造了婆羅門、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羅。婆羅門因從最高貴的肢體所生，理應成為一切造物的主人。婆羅門的名字表示吉祥，刹帝利的名字表示權勢，因而“溫順地服從上等種姓”是首陀

羅與生俱來的義務。梵天作為印度教的至上神，他的地位與中國的“主宰之天”相當，只不過它是被人格化了而已。種姓制度無疑就是印度的“天人合一”的體現與確證。由此不難看出，東方的“天人合一”的真正用心了。

按照這種“天人合一”的邏輯，就自然本身去探索自然也是沒有必要了，答案就在人世間，就在學者們的心；坐在那裡冥思苦想，就是格物，也可以致知了。

如發大水是“小人專制擅權、妒疾賢者、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小人席勝，失懷得志，故湧水為災。”因為“水者，純陰之精也。”陰氣盛就要鬧水災，而小人屬陰。

鬧蝗蟲，那原因在《易傳》上有：“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征篇》說的更具體：“帝貪則政暴而吏酷，酷則誅深必殺，主蝗蟲”。

這種思維方式擴散到民間，便成了天上落下一顆星，地上就要死一個人，帝王上應天星不說，他的文臣武將也都在天上各有自己的位置；萬物皆有靈性，不僅人能修煉成仙，狐狸也能成精，石頭也可通靈，雷公電母，財神瘟神等眾多與人的安危禍福相關神，都在《封神榜》上有名有姓，而人民也真個把他們供奉起來。鬧旱災了，禁屠宰、關南門、求龍王；出現瘟疫，請道士打醮，找端公跳壇神；有人亡故，請陰陽找風水寶地埋葬，以求多福多壽多子孫……直到到民國時期仍是常有的事。

最早使用“天人合一”概念的，現在能查到的出處是宋代張載的《正蒙》。和張載同時的程頤就說：“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二程遺書·卷六》）。張的“合一”，程的“無二”，其內容是說，天人同此一氣，或同此一理，人的仁義禮智本性乃是天的賦予。在他們的著作中，這個賦予人以善良本性的天也是一個人們必須敬事的天，是一個可以和人感應的天，是可以給人以吉凶禍福的

天。

周敦頤的《太極圖》，邵雍的先天圖，被認為是講述天人合一思想的代表作。那裡講“仁義禮智”是天所賦予的，人世的秩序是天的秩序的副本。

李慎之先生指出：“道家、中國化了的佛家、法家、陰陽家、兵家、農家、醫家，以至風水、氣功、武術、房中術……”都把“天人合一”作為自己的出發點與歸宿點。李先生稱之為中國文化的小傳統，並說：“近代以來，中國大傳統中的“天人合一”說已經大大式微，但是在小傳統中近年卻不但重新抬頭，而且日見流行”。小傳統中的“天人合一”，各式各樣，臺灣的宋七力組織了個“天人合一研究會”，並不研究什麼人與自然的關係，而是用他的“分身”、“眉心放光”等等來顯示他的“天人合一”境界。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隆籠蓋四野”。這是自然之天了。中國人很注意對這個自然之天的觀察，留下豐富的記錄。可惜沒能把天作為一種獨立的自然現象去研究，而是把自然之天和精神世界的天混在一起，簡單地說就是“天人不分”。

中國因為天人不分，對人與自然的關係得不到理性的認識，也就無法正確處理。

秦始皇自以為權力為天所授，便可以凌駕于自然之上而為所欲為。南巡至湘山，逢大風，幾不得渡，於是大怒，派刑徒三千人去把湘山上的森林砍光，直到裸露出紅色的土壤，作為對山神的懲罰；一次夢見與海神戰，解夢的方士說海神是看不見的，但要有大魚、蛟、龍出現，就表示他在那裡了，於是出海去找尋，在山東之眾見巨魚，自用連弩射殺。

秦始皇是信奉“天人合一”的，而且身體力行，為修煉成水火不進、能凌雲

氣與天地長久的“真人”，動用 70 多萬人修阿房宮，因為“真人”需要住這樣複雜深沉的房屋群，使外人不知道他住在哪裡。為此，四川、湖北的許多山頭被砍光了。秦始皇築長城是信了“亡秦者胡”的預言，還有修馳道要求筆直，塹山堙穀。這些工程，對環境的破壞是巨大的。秦始皇幹出的一些事，比唐吉訶德還令人哭笑不得。

武則天下令百花在冬天齊放，當然是編出來的故事，說明“天人合一”並不尊重自然。某些人自詡中國文化不與自然作對，而是追求“天人合一”，那是紙面的東西，不是實際。

實際是，中國的土地上許多山頭早就是童山濯濯，黃河下游因泥沙淤積成為“懸河”，舉世無雙；而且長江也在步黃河後塵。“天人合一”在哪裡呢？樓蘭古國成為荒漠廢墟；就是因為天人不分，不能瞭解自然所致。以為天下就是自己目光所及那個範圍，自以為居天下之中，可以關起門來過日子，各人自掃門前雪，這難道是對自然的總體認識？倒是西方把自然作為獨立的物件去考察和研究，才真正弄清楚了各種自然現象之間，產生了科學。

人類的活動對萬物的變化是有影響的，但不存在周幽王寵信褒姒就會導致地震的因果關係。“華夏金湯固，河山帶礪長”。這是清朝時在黑龍江西邊中俄界碑上刻的字；堅如磐石，安如泰山是習慣的認識。泰山其實在不斷升高，也因受風化剝蝕而失去原有的高度。

精華與糟粕並不是機械性地混合在一起，可以簡單地剔除糟粕而保存其精華。僅僅籠統地高喊回歸“天人合一”，恐怕對急需民主化的中國有害而無益。

2·日崇拜

中國天文觀察很豐富，卻和人世結合起來了。春秋時晉人伯瑕認為日食是

“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

日食是上天對皇帝的某種警告。這或許是因為大臣搗鬼，也或許是因為皇帝自己有什麼錯誤。如有過錯，就要認真反省，改正錯誤。因日食而首下“罪己詔”的當屬漢文帝。西元前 178 年，日食之後文帝下詔：“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漢文帝把日食原因歸咎自己，並廣泛徵求進諫者，他成為後世帝王的榜樣。

黃初二年六月，日食發生。負責官員將此事上報文帝曹丕，要求按舊例罷免太尉以避災。此時的太尉是老臣賈詡。賈詡在曹丕做太子一事上立有大功，而且還因賈詡的深謀遠慮對鞏固帝位大有用場。這黃初二年，是曹丕登基稱帝的第二年，政局還未穩定，不能因一個小小的日食就除掉賈詡。所以，曹丕聽完報告，下詔說：“上天降下災異，是警告天子的。天子委過於下級官員，這不是聖人的做法。文武官員們，大家小心盡職吧！以後凡有此類警告，絕不歸罪你們。”曹丕這紙罪己詔書，不僅保住了賈詡，而且也為自己買下了美名。

日食，表示君主受到了侵犯，或是說明有人搞陰謀詭計，在皇帝背後搗鬼。唐代孔穎達在《左傳正義》中寫道：“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能夠搞陰謀的人往往是親近大臣，所以漢代常常為日食免去宰相一級官員的職務，甚至把他們處死。

太子石宣驕奢淫逸，大造宮殿，役使民工數萬之多，百姓怨聲載道。禁軍領軍王朗上奏皇帝石虎，希望他加以阻止，因此開罪了太子石宣。建武十年，天空中出現了“熒惑守房”的星象。“熒惑”就是火星。火星本呈紅色，亮度常有變化，行蹤忽東忽西，忽明忽暗，因此稱火星為“熒惑”。所謂“房”就是房宿，

是二十八宿之一，它和心宿同被古代星象家稱為“天王布政之宮”。他們以為，反復無常的“熒惑”停留在天王布政的地方，自然是不祥之兆。石宣要除掉王朗，於是就收買負責天文星象的太史令趙攬，要趙攬向皇帝石虎進言，就說要想逢凶化吉，必須“以貴臣王姓者當之”。當石虎問“這王姓都是誰”時，趙攬說：“王姓大臣中最尊貴的，莫過於王朗了”。石虎不同意，要趙攬再舉個次一等的。趙攬只好再舉個次一等的中書監王波。於是王波就莫名其妙地做了祭刀鬼。

遠古的人們認為，日食就是太陽被某種動物吞食，就象猛獸食人一樣，所以叫日食。他們每逢這時就進行救援，敲鑼打鼓，弄出各種聲響，要嚇退野獸。大約從夏代開始救護日食就成了國家禮制的一部分。每到這一天，就在國家舉行重大祭祀的場所敲鑼打鼓，向神獻祭。假若正在舉行重要會議，也必須停止，因為這是一個危難時刻。“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若哪位大臣不肯去救護，“乃是不君事其事也”（《左傳正義》），即不以其君為君，這樣的罪名誰敢擔當？

《全唐文》卷 410 中對舉報私藏天文書籍者，給予升官或五百貫賞錢。對民間私習天文者給予流放、充軍甚至死罪的懲罰。明太祖朱元璋還規定只允許有世襲權利的人學習天文。青年學者江曉原在《天學真原》中認為，中國古代天學“在上古是王權的來源，到後世是王權的象徵，因此，如果誰打破了天學的壟斷，就意味著王權受到挑戰並被削弱。……天命的確認（王權的確立），除了依靠經濟、軍事、德行之外，最根本的政治資本是天學。”

假如曆法預報的日食沒有發生，人們就會說那是因為皇上的德行感動了上天，於是就要慶賀。唐玄宗時有兩次預報的日食沒有發生。一次是因為在中國看不到，一次是剛開始日食，太陽就落山了。但天文學家一行告訴玄宗說：這是皇上的德

行感動了上天。

3· 天尊地卑

中國文化的核心是“尊卑”。《易經》中的陰陽乾坤，本無尊卑賤之分。孔子偏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易經·坤卦》說，坤是“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不難推斷，乾是“天道也，父道也，君道也”。董仲舒說：天有高卑，故人有貴賤；天有陰陽，故人有剛柔。具體地說就是君尊臣卑、官貴民賤、男陽女陰，夫剛妻柔。做臣子做妻妾的，要柔順；當皇帝做丈夫的，則可以為所欲為，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命如此，那些處於底層的卑賤之人，受奴役壓迫，也只好認命了。

“乾坤，一乾而已”，“男女，一男而已”。皆是主張“一股獨大”的“控股”。《易傳》的作者孔子（或其弟子）將“不平等合作”上升為“三綱五常”的人生倫理與治國之術，說什麼“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天尊地卑，君尊臣卑。尊君主；卑臣民，由此推出“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無尊嚴者接近 100%。

孔子天尊地卑學說及其所制定的一套儀禮和做人規矩，目的在於維護奴隸主的統治。儒家的一切個人修養無不圍繞著服從和遵守行事。孔子最不願意看到的是犯上作亂，最喜歡循規蹈矩，稍有不合禮儀規範的他都會感到不安。在孔子的誤導下，中國歷代專制者只有一己絕對自由的追求，卻從無“合作共生”的真誠願景；只想統治別人，統一別人，只想剿滅在野派，“口含天憲”，“輿論一律”，從沒有與對立面平等合作的“朝野合作”觀念；無論是古代的“招安”，20 世紀的幾次“國共合作”，還是文革前的“公私合營”、“統一戰線”，往往都只是“引蛇出洞”，借合作之名伺機吃掉合作者的“陽謀”。中國歷代讀書人、士

大夫包括商人，也多半只有“學得文武藝，貸與帝王家”，當個“紅頂商人”的依附、投靠、歸順意識，總覺得執政者是“皮”，文化人和商人是“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平等合作的自信。即使是一些當代文化人和當代企業家，也不是以獨立身份與政府溝通，而是以“鸚鵡討主人歡喜”的方式異化“朝野合作”。他們不明白，合作共生的前提是雙方各自保持獨立地位；人若沒有平等合作的概念就只會成為專制者或奴才。世間萬物，只有平等互利的合作共生才是自然之道，才是長治久安之道。首先保持獨立身份，然後才可能合作共生。合作共生的方式有多種，招商引資是合作，批評監督更是合作。

《莊子·天道》中記載：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也，安取道哉！

莊子的意思是說：君在先而臣從其後，父在先而子從其後，兄在先而弟從其後，長在先而少從其後，男在先而女從其後，夫在先而婦從其後。尊和卑有先有後，天和地就是如此運行的，所以聖人效法天地規定了人倫等級。天為尊，地為卑，這都是神明之位；春夏在先，秋冬在後，這就是一年四季的順序；萬物生長，萌芽和分支各有自己的形狀，春夏萌芽茂盛到秋冬衰落死亡，這就是變化的順序。天和地最為神明，還有尊卑先後的順序，何況人道呢！宗廟裡崇尚親緣，朝廷裡崇尚尊貴，鄉村崇尚年長者，任事崇尚賢能，這就是大道的順序。論道卻否定道的尊卑先後順序，所談論的就不是真正的道；論道卻否定真正的道，怎麼能遵循

於道呢！這些就是莊子的尊卑順序論觀點。

中國古人把人間的等級投射到天上。天上的星座等級最早出現于馬遷《史記·天官書》，天上的一個個星都是天的官員或官廳，天做為整體象徵了國家的等級體制。司馬遷道：“凡舉事無逆天數”，“天有十二辰而作十二本紀；天有十幹，作十表；天有八方，作八書；…”。地上的紫禁城完全是與天上的紫微垣相對應的。北京的故宮就是“象天設都”的體現。天上本沒有帝、後宮、貴人、騎官、上將、貴相等特權等級，是古人為維護王權臆造出來的。

聖經中沒有天尊地卑的思想。《創世紀》講述神創造宇宙，地是宇宙的核心，頭一天，神創造出地來。“神稱空氣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即第二天創造出天，沒有天尊地卑的思想。《聖經》天然地不適合專制皇帝的需要。

第 30 節 專制和民主的起源

1· 災禍頻繁導致專制

黑格爾稱中國為“災荒之國”。中國的災荒、饑荒發生之頻繁、為害之大為世界之最。

自西周至清末約 3000 年間，共發生大災荒 5168 次，平均每年 1.723 次。中國歷史上僅有記載的地震就有 8137 次，其中 1004 次為 6 級以上的破壞性地震。從 1303 年至今，發生 8 級以上強震 17 次。《宋史·仁宗本紀》載“地震，吏民壓死 32306 人”。1556 年 1 月 23 日陝西華縣的大地震造成 83 萬餘人的死亡，居世界震災史上死亡人數之首。從 1501 年到 1900 年的 499 年中，發生有害地震 419 次。在全球死亡人數大於 5 萬人的 17 次大地震，有 7 次發生在中國，其中死亡人數大於 20 萬人的 4 次大地震全在中國；全球 7 級以上的陸源地震，有 30% 發生在中國。據統計中國平均每年因地震死亡 2000~3000 人。

據《洪荒啟示錄》的統計，黃河 2000 年來中下游決口氾濫 1593 次，大的改道 26 次。1876 年至 1879 年晉、冀、魯、豫一次大旱災就餓死 1300 萬人（僅魯北就餓死了 200 萬人）。1920 年黃海流域發生了著名的大旱災，約 2000 萬災民在饑餓中號啕；1942 年至 1943 年的旱災僅河南一省就餓死 300 萬人。1950~1980 年僅水災平均每年經濟損失 150~200 億元。

長江 1931~1949 年成災 11 次，其中 1931、1937 兩次水災死人都超過 14 萬人，1931 年災民 1 億人，水災後因饑餓、瘟疫而死亡的人數達 300 萬人。中華民國 38 年間餓死的人數達 2 億。1954 年長江淮河的水災導致 3.3 萬人死亡；1956 年 6~8 月，淮河流域洪澇，僅駐馬店、許昌地區淹田 54 萬公頃，毀屋 47.8 萬間，死 172 人。毛統治 27 年餓死 1.2 億人。

中國人以以血緣為紐帶，以集體的力量抵禦各種災害。歷史上就有禹召集萬國集會于塗山，商討集體治水的傳統。“哀田以族”，甲骨文中“田其豐年”中的“田”都是集體開荒和集體耕種的意思（見張光直、毛小雨譯《商代文明》）。這種集體生產的制度產生利害與共、疾病相扶持的集體主義思想，也產生以王為中心的極端集權專制的奴隸制傳統。

農耕文明中的百姓容易被奴役被統治，長期屈服於各種天災人禍，不到萬不得已絕不遷徙，造成農耕族群的性格整體較為懦弱，養成服從、逆來順受的習慣。所以農耕文明更容易產生中央集權和獨裁統治。饑荒的根源與其說是天災，不如說是人禍。官府的橫徵暴斂、賦役之繁重；人口劇增後盲目開墾土地，導致水土的破壞；官僚劣政的延誤、人工治理的廢弛；好大喜功，急躁冒進，虛報浮誇，災情資訊不通；農業技術的停滯、農民缺乏防災抗災的能力；戰爭造成饑荒，饑荒導致暴動，陷入惡性循環，如此等等，皆是饑荒的主要原因。

而遊牧、狩獵文明則強悍得多，他們與大自然更多的是鬥爭和遷徙。而遷徙和殖民的組織需要由某個首腦或家族來領導。在這種情況下，領導往往是由選舉產生，不可能獨裁，領導所做的各個重大決策必須與全體族人或族人代表商量，來共同通過這個決策，否則他的決策因為不能服眾而不會產生任何效力。早期的希臘正是由北方的遊牧民族在希臘地區形成的一個個殖民點，而慢慢形成的一個個城邦國家。早期羅馬也是如此。而後的日爾曼同樣是遊牧民族。正是遊牧民族的不斷遷徙和殖民，使的中央集權制度很難產生，一旦某地出現了集權和暴政，人民就會向其他地方遷徙流動，這和中國的農耕定居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

在中國獨裁和暴政往往被人民所忍受屈從，當過了某個臨界點時，則會帶來農民起義這種極端的反抗方式。亞當·斯密則認為中國下層階級的生活狀況，比歐洲的乞丐還要悲慘。大多數中國人，幾千年來就是在半饑餓中綿延生息過來的，能吃飽飯的“盛世”少於易子而食、析骨為爨的災荒歲月。天災人禍迫使饑民揭竿而起，掀起一場又一場的饑民暴動或曰農民起義。中國於是成為農民起義的王國。農民起義的規模之大，舉世無匹。

2· 酋邦社會演變為專制國家

中國的母系氏族公社沒落後，社會出現了“分層”，男子在社會據主導地位，少數人掌控了資源，這些人擁有比其他人更多的特權，成為酋邦的酋長，酋長位於權力金字塔的頂端，沒有相應的權力或機關可以與之抗衡，“帝，天神也”，“執中而偏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在我國將首邦的最高首領稱為“帝”就是這種權力極端的表現。

當時，陝西黃土高原、渭水流域和豫西一帶是以黃帝、炎帝為主體的酋邦，黃河下游、山東半島一帶屬於大皐、少皐為主的東夷酋邦，在江漢流域是以三苗

為主的苗蠻酋邦。這些酋邦的帝是當時的最高統治者，享有最高權力，他可以直接任命其他部落酋長或近親貴族擔任某項職務，並加以任意的處置。如帝舜命棄為“後稷”、命契為“司徒”、命皋陶為“士”、命垂為“百工”、命伯夷為“秩總”，命尤為“納言”。可見，中國國家前的這種組織結構明顯與“民主”、“平等”為組織原則的西方部落聯盟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模式。可以說中國國家的產生從一開始就沒有民主的、平衡的色彩。

謝維揚說：酋邦社會的權力特徵為：①酋邦社會的大酋長具有真正的實權。大酋長基本上掌握著酋邦的經濟社會管理權、宗教祭祀權、軍事權，甚至部落民眾的生死予奪之權。酋長有權分配土地，徵募兵役，“控制社會剩餘產品和物資”，掌握“人力資源”，酋長對酋邦的成員具有人身處置權，這種權力是以武力為基礎的；“在有些個案中，甚至對人民有生殺予奪之權”。“酋邦首領的權力不受部落成員的制約”，人們相信酋長的權力是神靈賜給的。

②大酋長擁有聽從其旨意的各種官員，組成一個較正式的權力機構。不同社會階層的劃分主要是依據與酋長及其世系的血統關係、財富、社會職務等等，各階層之間的關係是不平等的。酋邦內部各部落、村落都有自己的首領（酋長），他們都負有忠於大酋長的義務。

③酋邦內部形成了社會財富集中與再分配的體制，酋長位於社會再分配網路的中心；酋長及其所屬的官員擁有物質和精神方面的種種特權。一種特權是他對平民無條件的索取，得到酋邦平民的貢獻。酋長的另一特權是精神性的，即共同體成員須尊敬他，以此來證明他的權力地位。大酋長已不是部落中平等的一員，而是高居於部落其他成員之上的人物。所謂酋邦模式，就是通過酋邦社會進入國家社會的模式，其主要的一個特徵是，在國家產生之前，這個社會的最高權力就

已是“在一定形式下被佔據社會特殊地位的個人所掌握”了的，或這個社會的政治權力已經是“集中於一個人(酋長)身上”了的。這就是所謂的“中央集權”，酋邦社會的權力結構呈現為一種等級制的結構，有一個人高高在上，掌握著整個社會的最高權力。與部落聯盟社會權力結構的平等性質相比較；酋邦實際上已形成了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只有個人性質的權力而無集體性質的權力。故酋邦社會具有專制政治的特徵。

④酋長的地位逐漸成為“永久性”的。大酋長通過愚民的宗教來維護其統治。在某種意義上，與其說酋長是社會權力結構的一個環節，不如說整個社會權力結構是以酋長為中心，為了酋長的目的而存在的。這些權力特徵，已經基本上勾勒出專制主義的總的特點，那就是君主的個人統治、一個權力私有化的社會。

為了獲取更多生產和生活資料，酋邦之間往往發生矛盾，戰爭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恩格斯說過：“他們是野蠻人，進行掠奪在他們看來是比進行創造的勞動更容易更榮譽的事情。以前進行的戰爭，只是為了對侵犯進行報復，或者是為了擴大已經感到不夠的領土；現在進行戰爭，則純粹是為了掠奪，戰爭成為經常的職業了”。有學者提出：原始社會主要是圍繞治水和戰爭而進行的。在我國的一些傳說和史料中，各酋邦為了掠奪財富、侵佔土地，憑藉原始的蠻力和衝動，在歷史上都曾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引發了多次戰爭。考古材料證實，在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以及馬家窟文化的墓葬中，有些遺骸無頭或無肢，有些遺骸還帶有傷痕，這些都是當時戰爭頻繁的確證。

《漢書·刑法志》在追述我國古代刑法的起源時，認為“黃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對於本酋邦以外的異族部落採用作為大刑的“兵”去征伐，對擄獲的俘虜也需要殘暴的刑加以鎮壓和管束。中國法之所以沒有一種親切感，不

具有西方法的民主性和妥協上的平等性，是一種惡的象徵和暴力的工具，就在於它原本就是為了在戰爭中對付外來酋邦或異族人的。“刑始於兵”、“兵刑合一”、“法就是刑”的這種傳統在史前和上古三代形成之後，對中國法都有重要影響。據《尚書·甘誓》載“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甘誓》就是夏啟與扈氏大戰中而頒佈的軍令；是禹刑中的一部分。“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商湯時候的《湯誓》等都是湯王在戰爭中攻打夏桀時發佈的法令。隨後晉國的《被廬之法》、《常法》、楚國的《矛門之法》等都是在戰爭中頒佈的。這種法起源於酋邦戰爭中以方式深深影響了中國的法觀念，法被看成是惡的象徵，是暴力和專政，是用來對付野蠻人。

3· “部落聯盟”演變為早期民主國家

部落聯盟先天地具有民主成分，部落聯盟社會只有集體性質的權力而無個人性質的權力，最高權力是一種集體性質的權力。**部落聯盟權力結構有四個重要的特徵：**

①**部落聯盟沒有最高首腦**。易洛魁人部落聯盟，最高權力掌握在由 50 名出自各個部落的首領組成的“首領全權大會”手中，各首領的級別與權威一律平等，最高權力是一種集體的權力，而不是屬於任何個人的權力，這是“典型氏族制度所必然產生的結構”。

②**部落聯盟的議事原則是全體一致通過**。謝維揚認為，“這深刻反映了聯盟組織原則上的平等性的因素。這種因素在聯盟的特徵中是本質性的”。這一原則“正好體現了典型氏族社會在權力結構上的主要特徵，即任何權力都是集體性質的”。

③**參加聯盟的各部落報紙獨立、相互間地位平等**。這表明，“聯盟的形成，

並不改變參加聯盟的各部落自身的結構，它們與聯盟的關係也不是從屬關係”。當然，對於聯盟之外的部落，聯盟就可能保有某些特權了，不那麼平等了，可能作出強迫它們納貢之類的事情。

④**部落聯盟的二權制和三權制特徵**，是指摩爾根人類早期組織演進三個階段的後兩個。摩爾根已證明，人類原始時代的權力發展經歷了三大階段：第一階段為部落酋長會議，由各氏族選舉的酋長組成政府，稱為“一權政府”。第二階段是由酋長會議和一個最高軍事統帥平行並列的政府，稱為“兩權分立政府”。第三階段是由一個酋長會議、一個人民大會和一個最高軍事統帥組成的政府，稱之為“三權並立政府”。在人民大會出現之後，酋長會議依然存在，但它開始置於民眾的監督、制約之下。在後兩個階段出現的最高軍事統帥職位，“是典型氏族社會中最具有向個人權力的傾向的一種政治因素，演變將引起氏族社會權力結構的深刻變化”。但是在典型氏族社會中，比如在古希臘，“部落聯盟的軍事統帥巴賽勒斯在行使職務時”必須向酋長會議負責。第三個階段只有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曾經達到過。

謝維揚在最後道：“部落聯盟從開始產生時起就不是只有一個權力中心，而是有兩個或三個權力中心。其中只有一個是同個人有關的，而且它還受到另外一個或兩個集體性質的權力中心的制約，同時它本身也總是被分配在兩個以上的個人身上。這個現象非常突出地表明瞭部落聯盟中個人權力的發展是非常有限的。……即使產生了某種必需的具有個人傾向的權力，其也始終不會超過社會所固有的集體性質的權力。”正是由於以上特點，導致了民主國家的產生：“由部落聯盟轉化而來的國家，其政治機構繼承了部落聯盟政治機構上的一些主要遺產。……聯盟的體制在政治形式方面決定了由它轉化而來的國家機器的基本構

成。”這主要是指，部落聯盟時期的三權制政治形式，分別改造成了國家機關。

希臘羅馬的古典民主共和制度是在王權尚未專制化時依靠集體治權的民主機制阻斷了王權的進一步強化。已發現的資料及晚後希臘政體的研究者告訴我們：雅典、斯巴達、羅馬的“王制”、“王政”被廢黜或被“憲政”化，都依據集體議事會的古老權力，由“公民集體決定”或由元老院議決。大約到西元前8~7世紀，王制基本上都被各式貴族制、民主制所取代。斯巴達儘管還有兩個平行的王，但其實際許可權與軍事執政官無大差別。在古希臘世界，原始平等的觀念和原始民主傳統始終有強大的影響力，很關鍵的原因是原始民主的組織機構——貴族集體議事會和人民大會始終存在。《奧德修記》將有無民眾大會的開會場所當作判斷一個民族或地區是否開化的標誌之一，這樣的認識在其它地區的文明史上尚無見到。在《伊裡亞特》中，阿加門農作出重要決定，需要事先與眾“巴賽勒斯”及貴族開會商議，事後還要召開全軍大會進行宣佈，戰士們或呼喊或咕嚕表示贊成和不贊成。只有經過這套程式，阿加門農的最高決策才獲得承認。集體會議是古希臘群體社會的一個典型特點。原始民主傳統是古希臘社會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依據，是他們自覺或不自覺遵循的“法”。亞裡斯多德在談到梭倫改革時，也提到一些希臘人認為梭倫實行的民主改革不過是在恢復“祖制”。希臘人尊重傳統，崇敬祖制，與古代東方國家相比，較多地保留了集體議事會、人民大會等“祖制”的權威，它使貴族集團能憑藉傳統議事會對王權進行監督和限制。有學者說，荷馬時代的“王制”，更像後世的“君主立憲體制”，這大概就是它們與東方君主制的最重要區別。

在雅典，王權因缺乏大規模的戰爭行為，一直未能對雅典各部族形成壓倒性優勢，相反卻在各部族的壓力之下逐漸被執政官制度所替代。部落聯盟時期的酋

長會議變成了國家的元老院，人民大會變成了公民大會，最高軍事統帥巴賽勒斯為三位執政官所代替。亞里斯多德在《雅典政制》中說，提秀斯是以“說服”的形式，使阿提卡半島的有關族各系“合併為一個氏族，以雅典為其政府所在地”。也正因合併採取了“說服”的形式，建立在各族系自願的基礎上，其本身便不能不以保持各族系權利平等為原則，而這一族系間權利的動態平衡，最終促使雅典政體向民主而不是專制的方向邁進。正如大量文化人類學資料所顯示的那樣，以“說服”達成部落合併的方式，在世界範圍內是很少見的，而以征服方式達成合併，具有相當的普遍性。這就說明了希臘人具有高超的政治智慧。

在羅馬，部落聯盟時期的元老院成了國家的元老院，庫裡亞大會的實權為百人團大會所取得，勒克斯的職權也為執政官所代替。在民主制下，一切公共措施方案都提交人民大會聽候批准或批駁，人民大會具有最後決定權或一切法律的施行或取締都要經過這個大會通過，一切行政長官和高級公職都要由這個大會選舉或授予。古希臘雅典、羅馬國家的產生是通過氏族內部及平民與貴族的鬥爭，是妥協的結果，而不是任何一方以暴力無條件地強加于對方的命令。這種方式歷史地賦予了西方法具有公道、正義、平衡的民主含義。

第 31 節 東方專制主義

馬克思認為，在東方，土地不屬於個人私有的財產，而屬於村社“共同體的財產”。這種所有制結構不僅使得“每一個單個的人在事實上失去了財產”，而且使得政治“統一體”成為“一種凌駕於這許多實際的單個共同體之上的特殊東西”。“而像在亞洲那樣，國家既作為土地所有者，同時又作為主權者而同直接生產者相對立，那麼，地租和賦稅就會合為一體，……在這裡主權就是在全國範圍內集中的土地所有權。但因此那時也就沒有私有的土地的所有權，雖然存在

著對土地的私人的共同的佔有權和使用權。”

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中指出：“節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這種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蘭德斯和義大利，曾使私人企業家結成自願的聯合；但是在東方，由於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願的聯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來干預。因此亞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所以，只能是“專制政府的事業”。“只有當人們利用灌溉，必要時利用治水的辦法來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調時，農業生產才能順利地和有效的維持下去。這樣的工程時刻需要大規模的協作，這樣的協作反過來需要紀律，從屬關係和強有力的領導”；“要效地管理這些工程，必需建立一個遍及全國或者至少及於全國人口重要中心組織網。因此控制這一組織網的人總是巧妙地準備推行最高權力”，於是便產生了“東方專制主義”。

大禹治水的事蹟很能說明問題，他自己就是利用在治水過程中積累起來的權威奪取了部落聯盟首領的位置。在他即位後，又召集各部落首領大會來顯示自己的權力，防風部落的首領遲到，竟然被他處死。可見，治水對領導人專制權力擴張產生的作用。和戰爭一樣，在與惡劣的自然環境作鬥爭中，每個人都不得不放棄個人的權利和自由，而被納入了高度組織化的“命令—服從”系統。人的生命得不到重視，人的思想受到鉗制，藝術、哲學等文明社會的象徵就得不到充分的發展，殘酷與專制便成了這個國家的傳統。

馬克思認為西歐國家是公民個人的自由聯合，首先產生的公權力機構就是議會。亞洲首先產生的公權力機構是作為行政機構的政府。行政本位而不是議會本位，才是亞洲國家政治機構的基本模式。行政專制式政權和土地國有制，構成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和亞洲社會形態。

馬克思認為，象中國這樣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個人尚未成熟，以自然血緣聯繫臍帶為基礎……存在的條件是低級階段，是簡單的生產方式”。可以說，中國文明在近 4000 年的漫長歲月中始終停留在自然的“尚未成熟”的階段而反復自我強化其劣根性。兩千多年的中國社會，農業人口長期佔據統治地位，是世界上僅次於非洲的貧困地區，有的地區甚至比非洲還窮；而絕對不是在古代是先進的，只是在近代才落伍的。

魏特夫原籍德國，猶太人，早年曾是狂熱的共產主義信徒，加入了德國共產黨，並成為德共的中央委員，在共產國際幹過。1933 年魏特夫被納粹關進集中營，放出後就移民美國。1935 年，魏特夫到中國收集資料兩年，回到美國後開始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性質。

他認為像中國這樣的東方社會，社會生產方式是一直停留在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水準上。亞細亞生產方式也叫“東方專制主義”，就是說，中國從周朝開始到 20 世紀為止，並沒有經歷過所謂的奴隸制、封建制和資本主義，而一直是以東方專制主義為特徵的亞細亞生產方式。這種東方專制主義社會的特徵有以下幾點：

1) 這是一種“水利社會”（Hydraulic Society），就是說中國的水利工程十分艱巨，所以必須要有勞動力、生產資料、科學技術和管理體系的高度集中才能完成這些水利工程。

2) 這種高度的集中，造成政治權力的集中和專制，所以中國社會一直都是專制社會。

3) 正是這種君主專制，造成生產資料如土地、江河等等完全歸皇帝所有，真正的土地私有沒有出現，東方社會的政府對國家的經濟實行壟斷。

4) 東方社會只有皇帝控制下的貴族，並沒有相對獨立的貴族階級；中國近2000年來根本沒有貴族，只有當官的世家。皇族一旦離開了皇權，就會“五世而斬”。中國只在先秦時期有封建，秦漢後就沒了。中國的皇帝是權力和真理的化身。封建一詞是共產黨強加給中國人的。共產黨為了奪權，就編出了人類社會是由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順序。

5) 東方社會沒有法律，專制君主意志就是法律。

6) 東方社會的專制特點具有十分強烈的穩固性。

魏特夫所描述的東方專制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正是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他的最終結論是，像蘇聯和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制度，只不過是古老的東方專制主義的翻版。

文化相對主義者拒絕承認“東方專制主義”，這些人主要是弱勢民族的官方學者或西方學院裡的有色人種的學者，他們否定基本人性的普遍一致，以完全主觀的“族性”取代人性。波普爾把文化相對主義看作是非理性主義的現代變種。

第 32 節 中國專制主義的特點

自從用甲骨文記載歷史以來，中國便是一部帝國霸權史。中國的帝王制度，正如韋伯所說的，是一種“卡理斯瑪”支配型的政治制度。中國的帝王也被賦予一種卡理斯瑪的特質：在商朝他是宇宙的至上神——上帝的人間代表；在周朝以後他是天之兒子，奉天命而成為人民的主人(天生丞民，而立之君)；他是英雄崇拜的物件，也是亦人亦神的人物(龍的政治神話)；他是祖宗崇拜的人間化身(萬歲爺)，他的宗廟就是整個民族的祖廟；只有他才可以祭天封禪；他也是道生的化身(內聖外王)；他象徵著社會的安定，國家的統一；他負責從政治上、文化上整合全社會；他又是中國這個大家庭(家天下)的大家長，手中掌握著統治國家的

全部絕對權力。帝王霸權思想是中國幾千年來傳統政治文化的核心思想，是中國人最原始、最根本的信仰和最中心的價值觀念，也是中國人視之為最神聖的靈物。

秦始皇時期的中國就出現了第一個標準的專制政治。所謂標準，就是百官不對人民負責，只層層向上級負責，最後皆向最高最大的官僚——帝王一人負責。只要搞好對帝王的關係、對上級的關係，他們就可以為所欲為地圖謀私利、魚肉人民，而人民則無可奈何；形成帝王百官為一方，人民為另一方的官民對立的典型格局，後世幾千年莫不以此為榜樣。

秦以後的中國社會成了“集權專制主義”，其特點有：

1· 整個國家是個高度集權的統一大帝國，權力都集中在最高統治者——皇帝手裡，其地位是終身、世襲的；重大決策過程是家長制、一言堂。皇帝剝奪地方事權，官吏自帝出。

中國君主集權加強表現為相權的削弱。秦漢的三公制度，是以丞相為首，百官隸屬於皇帝，協助皇帝處理政務；隋唐的三省體制，則把相權一分為三，體現皇權的加強；明太祖廢中書省，罷丞相不設。永樂朝創設內閣，至清朝又設軍機處，這一變化反映皇權已達頂峰。

皇帝至高無上，永遠正確，金口玉言，其命令就是法律，法由帝頒，不受任何制衡；法律主要是刑罰的手段，缺少保護人民權益的功能。

2· 財政上“利出一孔”，即財源由中央壟斷。通過捐稅和地租極力掠奪人民的財產和所得，而且通過強制手段(如徭役等)，剝奪和或限制人民的經濟和政治權力。為達到對全國財權的控制，歷代封建王朝採取多種措施，一方面將農民固著在土地上，以保證農業稅收的來源。另一方面加強對鹽、鐵、銅、錢幣等重

要資財的管理，如：漢武帝時的鹽鐵專賣。

3· 在意識形態領域，實行愚民政策和“別黑白而定於一尊”的文化專制主義，鉗制思想、控制輿論，大興文字獄；在全社會推行對皇帝的個人崇拜。

4· 軍事上，“強幹弱枝”，中央宏觀調配全國軍隊，皇帝總攬兵權。

5· 等級森嚴的官僚體制以及與等級制相聯繫的種種特權。

第 33 節 中國專制主義全球第一

1· 極端封閉的繼承制度

殷以前的繼承制度無嫡庶之制。黃帝之崩，其二子昌意、玄囂之後，代有天下。自成湯至於帝辛三十帝中，以弟繼兄者凡十四帝；其以子繼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為弟之子。也就是說，在遠古時代，兄弟間在權利上是大致平等的。

為維護宗法統治，周公確立了嫡長子繼承制。嫡長子在繼承方面有著特殊的地位，兄弟間的平等關係被徹底消除。嫡長子繼承的原則是：立男不立女、立嫡不立庶、立長不立幼。

首先，嫡長子制排斥庶子(側室妻妾所生之子)的繼承權利，“立嫡以貴不以長”，宗法的繼承原則是嫡嫡相承，如周制：太子死立嫡孫，嫡孫死，立嫡曾孫，向下皆然。

其次，嫡長子制還排斥其餘嫡子的繼承權利，“立嫡以長不以賢”；以先天的出生定序擯棄後天的人為選擇，迫使在選賢制下有機會者心無異想而安其分守其責，從而認命。

中西君主制度都實行世襲制度，古羅馬的皇位一般是在有能力的人中選好繼承者後，皇帝收其為養子，以此名義傳位於後者，很少傳給親子的。

中國卻採取了“以貴”、“以長”而“不以賢”的方式來選擇君主，把具有

繼承資格的人數限制在一個人身上，無法顧及對君主在才智德方面的要求，必然造成愚昧君主的統治。

儒家強調血統穩定論，主張嫡長子繼承制，導致了幼童、白癡不斷登位的事實，說明了儒家學說的蒼白無力。晉惠帝當政時發饑饉，惠帝卻說：“百姓沒米吃，為什麼不吃肉呢？”左右都掩口失笑。他聽到蝦蟆的叫聲，便問左右：“蝦蟆亂鳴，為官呢？為私呢？”左右又笑不可抑。有一人說：“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惠帝還一再點頭。

嫡長繼承制是為了穩定，可嫡長制下的繼承人資格最終是根據生母的貴賤確定的，一旦皇位繼承人的生母因失寵而動搖皇后地位，勢必危及太子的地位，引發流血事件。中國歷史上不知有多少因立嗣而引起的政治混亂，甚至暴力流血事件；並導致宦官、外戚與母后亂政。

中國統治者認為，嫡長子繼承是天下之大義，絕不得違背。為維護這一制度，歷代王朝制定相關的法律，對以庶冒嫡、以次充長破壞嫡長子繼承制度者課以刑罰。

《唐律·戶婚》中規定：“諸立嫡違法者，徒一年。即嫡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者，得立庶以長，不以長者亦如之（亦徒一年）”。宋、元、明、清各律，亦有類似的規定。

嫡長子繼承制的絕對化，必然導致對人才的扼殺，極不利於家族的進步與發展。為了保護家族的利益，中國人有“傳子不傳女”、“傳媳不傳女”的規定，因為子、媳是自家人，女兒嫁出去是外人，所以親生女兒都不能瞭解家族的技術“機密”。這導致了許多藝術、技能沒落，而且阻礙了公司的制度化。華僑們擅長個體買賣，卻不擅長於集團聯合經營。華人企業不讓外姓的專業經理接管公司

的經營，而是眼睜睜看著它分裂成幾個新的公司或全面解體。所以，中國沒有出現像洛克菲勒、福特、摩根這樣延續百年依然充滿活力的大企業。

日本養子制度非常發達。異姓的養子在改變了姓氏之後，就可以進入家庭、繼承家業。如果沒有管理家業的能力和好的資質，即使親生兒子也可能被剝奪家業繼承權。例如支持孫中山鬧革命的宮崎滔天，兄弟姐妹一大堆，但其父仍然選擇了一個養子作為繼承人。

日本人重家而輕血緣的態度打破了家族血緣關係的封閉性，使人們可以依據品德和才能標準選擇家業繼承人，它不僅維護了家業的延續，使日本擁有百年以上甚或數百年歷史的企業或店鋪屢見不鮮，也促進了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

2· 皇權無任何制約

西方的王權受到了較為嚴格的限制。譬如：斯巴達設有國王兩人，權力平等。平時只擁有宗教和司法上的權力，戰時由一名國王任軍事統帥，指揮對外戰爭；兩個國王受到了廣泛的監督。許多國家的國王都是有任期的：瑞典國王任期為九年，古希臘國王任期為八年，巴比倫國王任期為一年，日本歷史上出現過兩位天皇輪流執政的政治奇觀，每位天皇的執政期限只有一個月……似乎國王這一行當比其他任何行當更須要及時更換新鮮血液。

西方中世紀有如下特點：①古典時代確立的制度通過基督教的維持仍有一定的影響，教權和王權之間相互競爭而抑制了王權。教會在西歐中世紀的強勢存在，造成了宗教勢力與世俗政治勢力之間的制衡，客觀上為人們提供了一定的自由空間。既然不存在絕對、唯一的權威，也就不容易產生鉗制一切的專制。“一個追求自由的人可以在兩邊躲藏——得罪了世俗政府，可以躲到教會；得罪了教會，可以請求國王的庇護”。教會與政府之間的爭奪張力給人們帶來了一個相對自由

的空間；不像中國那“獲罪於君，無所逃也”，只能延頸就戮！在中國，帝王永遠是天子；而在西方，上帝面前君王也是人，君王的形象經常是跪著的，在上帝面前，他們和普通人一樣，歐洲的君主登基之時，要向教皇行效忠之禮，然後由後者為他戴上王冠。在歐洲，國王和皇帝們只能掌握有限的世俗權力，卻無權染指臣民的精神世界，意識形態和教育是教士們的領地。這種文化使得他們始終不能擺脫對上帝的敬畏之心，這才能夠使西方從文化上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過渡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依據。

在西方，近代的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最初是在宗教的庇護下得以孕育形成並發育成熟的。在中國，一直沒有出現一個類似於基督教教會的精神與權力體系，以對君權進行任何有效的制約與均衡。在中國專制制度下，皇帝本人就是權力的源泉，政權運用的最後的決定權操在皇帝一人手上，而且這種權力不允許任何法律及制度對其加以束縛和制約。整個國家，除了皇帝自己，沒有一個人具有獨立人格。個人在強大的皇權面前被壓縮到近於零的地步，民眾以至士大夫階層都失去了人身自由，人們統統成為皇帝的徹頭徹尾的奴隸，不可能產生個人自由和權利的政治意識。中國的工商業主、手工業者和知識份子等勞動階級無法獲得獨立、自由的發展空間，中產階級無法形成，城市無法自治，資本主義無從產生。

②法律限制王權。日爾曼部落習慣法中限制王權的因素還在，他們明確宣佈：“國王在萬人之上而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國家本身並不能創造或制定法律，當然也不能夠廢除法律或違反法律。”陪審員制度為歐洲少數國家所繼承。因為法律的保護，一個窮人可以宣佈，他不歡迎國王進入他的房屋：“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在中國，皇帝的話就是法律。

③封建領主相對獨立于王權，國王和貴族之間通過契約互相制約。在中國，

“君”與“臣”一個是天一個是地；而英語裡的“KING”，除了“國王”之意外，還表示“大的”、“主要的”。事實上，英國的貴族一直認為國王是自己隊伍中的一員、“貴族中的第一人”。國王本身不過是最大的貴族而已，一定程度上來講，他與其他貴族主要是朋友關係。他的那些哥們一不高興，就可以聯合起來，把他顛覆下王位，所以他不得不處處討好他們，儘量考慮他們的利益。

④人民制約王權。公民大會繼續在某些國家存在；即使在西歐君主制時期，還存著制約君權的國會，存在著合法的反對舞臺，甚至由議會來選(廢)國王的。

⑤城市自治。商人、手工業者和知識份子獲得了一定的獨立和自由的發展空間，形成了行會，城市土地逐漸從封建領主手中落入城市人手中，富裕工商市民發展成為上層人物。當市民各階級聯合的力量變得足夠強大時，他們發動革命，建立了自由民主制度。

在漢語言文字中，“權”字本來是專指度量衡器具中的砝碼。後來被衍伸成權柄、勢力、變通，而衍伸意義反而成為主要之義。原來的字義卻被人淡忘了，從而產生了以權字為詞根的大量片語。例如：權力、權利、權勢、權威、權貴、權謀等等。這些片語把力量、利益、威勢、貴顯、謀術等概念與權柄聯繫起來。這種可惡可鄙的聯繫，題中之義是非常明顯的。中華民族對權力的崇拜就如此地進入了記憶符號的骨子裡。使“權本位”的社會色彩無比濃厚！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其他國家，歷史上也長期遭遇過國家權力得不到有效的監督制衡的問題。但是歷史性、文化性地對國家權力缺乏制衡機制，卻必須首推中國！

中國從一開始便是一個君主，所謂“天無二日，國無二主”。中國的君主從來就是至高無上、唯我獨尊、一人說了算，誰也不能約束和監督他。皇權神授，皇權無限，皇權完美無缺，皇權“神聖不可侵犯”，是中國皇權專制文化規定的

不可質疑的價值觀。皇帝是上天的兒子，又是百姓的嚴父，百姓對皇上的依附關係又比外國的臣民對君主的依附更深一層，地位更低下。唯一可令皇帝俯首的就是上天，然而上天是虛幻的，所以中國皇帝的權力實際上沒有任何限制和禁忌。這種制度的根本特徵是，皇帝不是為國家而存在，相反，國家是為皇帝而存在。中國是“以皇帝為本”的。皇帝一個人的意志大於所有臣民意志的總和。整個國家，就是給皇帝提供服務的莊園；全體臣民，都是皇帝一家人的奴隸，其生存的意義都在於為皇帝奔走；一切制度安排，都以皇帝一家的利益為核心。所有的權力，都為皇帝一人所壟斷；不但政治權力，而且經濟權力、文化權力，皆集中于皇帝。社會的所有方面，都為皇帝一個人所牢牢控制。在他的疆域之內，不允許有任何一片可以自由呼吸的空氣。曾經有許多人因為日記中的一句不滿而被斬首，也有人因為精神分裂胡言亂語而被千刀萬剮。全天下人民的命運，完全懸于皇帝一個人的“明”或者“昏”：皇帝性格平和安定，天下按部就班；皇帝好大喜功，天下則動盪不安；皇帝萬一是一個精神病或者變態狂，天下就會變成血海屍山……“皇帝”對於傳統中國的重要性，從這個事實可以看得更清楚：浩如煙海的中國史，歸納起來只記載了兩件事——奪取皇位和保護皇位。為了奪取皇位，幾千年中國烽火不息。孫中山說過：“幾千年來歷史上的戰爭，都是大家要爭皇帝。”為了保住皇位，歷代中國帝王不得不絞盡腦汁，展開了鞏固統治的漫長接力。他們防範權臣、防範外戚、防範太監，直至防範自己的妻子兄弟；他們發明了“保甲制”、“連坐制”、“科舉制”、“文字獄”，從控制人民的身體發展到控制人民的頭腦，創造了舉世無雙的中國式專制監獄。

毫無疑義，中國皇帝的權勢達到了人類所能達到的頂峰。不論是東方小國、非洲酋邦或者西方王國，其君主的聲威都遠遠不能望中國皇帝之項背。法國的路

易十四，令他的臣民羨慕的不過是可以“毫無節制地吃青豌豆”。路易十四出行時，身邊帶著“瑞士百人警衛隊”，就以為排場大到了極點，殊不知隋煬帝楊廣每次出門，身邊盛裝的武士最少 3 萬人。

中國的專制皇權，是世界上最完備、最極端、最不受監督制衡的絕對權力。君臨天下的地位，奸諛群小擁簇的環境，以及中國人長期遭受專權統治形成的對權力無條件的屈從，認同、崇拜的社會氛圍；尤其是叔孫通定朝儀制定的一系列程式化的語言、音樂以及五體投地，完全臣服的程式化肢體動作；無不有助於形成一種為樹立絕對權力服務的宗教化的心理定式。除了皇帝外，下面各個層次的官吏，也遵循著類似的模式，這樣也就確立了各個層次的絕對權力。這種高度壟斷的絕對王權長期存在就說明了中國文化是一種極端腐朽的文化。

辛亥之後，雖然皇權被推翻，朝儀官儀被廢除；但中華民族的權力崇拜的心理定式並未完全消除。使統治者心智敗壞的絕對權力的地位、環境、氛圍並未消除，所謂“官氣一進，人氣漸出”的心理環境仍在。於是，中國社會的最高權力以及各級政府的公共權力，往往要交給一些心智不全的人手中。為了迎合這種心智不全者，下面的官吏會說出大量荒謬的話，做出大量荒謬的事。這也就是中國上層社會經常流行大話、空話、謊話、套話、惡話、蠢話的原因。加上個人專斷的決策機制，使關係到國計民生、內政外交的大事，許多時候就被情緒化地輕率決策了。這導致了中國人對“明主”永遠的企盼；寄望于好皇帝和清官，幾乎成為人們唯一的選擇；中國人始終離不開對“君”、“官”的依戀，對權威的依戀。

1998 年克林頓在陝西歷史博物館看見站在兩米高檯子上的小姑娘壯壯，等她走下後，克林頓握住她的手問她為什麼站那麼高的地方。壯壯說：“只有站在那兒才能看見你”。克林頓笑著問：“你很想看見我嗎？”壯壯說：“是的，因

你是美國總統。” “你知道美國總統是做的什麼的嗎？” “美國總統是領導美國人的，權力很大。” 當時，克林頓正因自身的問題被弄得焦頭爛額，聽了這話，不免觸動了心事。於是，克林頓說：“你說錯了，是全美國的人民領導我。” 這個中國孩子，小小的年紀，當奴隸主的思想已經深深印在他的腦子裡了。可不是嗎？美國總統領導美國人民，中國的官老爺領導中國人民，老百姓只有被領導的份；只有當官的才可以胡作非為，游離於法律之外。這領導與被領導之間，哪裡有什麼公正和平等可言。這種根深蒂固的等級（奴隸）觀念，雖然與現代文明相悖，但在中國人當中卻表現得非常自然，以至於一個小孩子可以順口說出。這是中國人的恥辱！

一個正常的健康的社會，權力的行使者怎麼可能會成為孩子的偶像？如果政治家成為孩子的偶像，是多麼可怕和糟糕的事情。那就意味著：權力是不受約束的，統治者沒有被關進牢籠，隨時隨地都可能危害民權、民生。一個隻知權力壓倒一切的而不知人權、不知約束權力的民族必然是一個奴性入骨的下賤民族！專制皇權的長期存在，促使中華民族形成了對權力盲目崇拜的癡迷，和對自身權利意識的淡漠和麻木。這種權力和權利意識的反差，是構成漢族主奴劣根性的重要根源。這種劣根性使我們難於“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3·專制主義的人情化

專制主義的人情化就是孔子的奴隸孝道。三綱六紀是從父子的親情出發的，所謂“孝弟其仁之本歟”，“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再比喻到天上，所謂“王道之三綱，可求之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曾國藩在家書裡說：“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君雖不仁，臣不可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不順”。這就構成了一個迴圈糾結的

天羅地網，而最後落實到皇帝的絕對專制上。

李慎之說：專制主義的氣息瀰漫在各色各樣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只要一接觸就會感染而不自覺。文天祥的《正氣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三綱實系命，道義為之根”就足以證明。它也是專制主義下的愛國忠君的表現。《紅樓夢》裡賈元春回家省親，不是她先向長輩請安，而是祖母和父母先要跪迎她這位貴妃，這就叫“未敘家人之情，先行君臣之禮”。

4· 中國的專制主義歷史特別長，已到了深入到了華人的骨髓

法國 18 世紀思想家孔多塞說：“一大專制帝國之在中國從不間斷的存在，長期以來已經玷污了全亞洲。”誠如梁啟超所說：“專制政治之進化，其精巧完滿舉天下萬國，未有若中國者。”中國的專制獨裁是全球之冠，與之相適應的奴才特性也是全世界罕見的。

中國專制政體誕生以來，“亂紛紛你方唱罷我登臺”，國君和皇帝換了也不知有多少個？但專制體制非但沒有改變，反倒愈來愈完備和嚴密，其原因就在於奴隸基因的遺傳。皇帝換了，但依附關係卻更深，新的主子又會有一批新的奴才去拱衛，一切又恢復原狀。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中國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可 1915 年袁世凱就又稱帝，他只做了 83 天的皇帝就取消帝制而病死了；1917 年又發生了張勳擁戴溥儀復辟的短命鬧劇。蔣介石率領國民革命軍北伐，但不久就暴露出其獨裁的本質。

1949 年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就是中國傳統對現代化的一次反撲，文化大革命則是反撲的最高潮，其中的忠君思想、禁欲主義、上綱上線，全在中國

傳統文化裡一份不拉地可以找到。無怪乎其發起人最喜歡的不是馬列大部頭，而是中國線裝書。中國人民一百多年的維新、革命並沒有改變兩千多年的專制主義的本質，只是革掉了一個皇帝。

因此，李慎之說：“中國文化具有很強的專制性和惰性，有著很大的反撲的能力。中國要想真正的強大，必須堅持不懈地加強思想啟蒙。中國自由民主人權思想的啟蒙，任重道遠，決不可靠一時、一事的運動來解決”。21世紀中國必須有一場波瀾壯闊的啟蒙運動，徹底摧毀一黨專制的邪教意識形態。

第五章 專制邪教的總特徵

無論專制主義表現形式如何，其特徵都是一樣的：專制主義=等級+謊言+暴力，這些共同性決定了它們政治邪教的本质。當否認上帝的時候，就否認了生命的價值和尊嚴，不可避免地要淪落到血腥專制的境地。以人為神和個人崇拜就是邪教。邪教就是搞等級制度，反對人人平等；就是輕視百姓的生命，儘管用各種美麗的詞語包裝，也掩蓋不了其野蠻的性質。

邪教組織使用謊言欺騙和思想控制手段損害個人的自由意志，致使個人完全依附於領導。邪教組織是個獨裁主義集團，由一個人或一組人實行專制領導。邪教組織在謊言欺騙不見效的情況下，公然使用赤裸裸的暴力，踐踏人類的良心與正義，墮落為毀滅性組織。

第 34 節 等級特權

在專制主義統治下，主奴關係取代了兄弟關係，等級制取代了平等制。……專制社會就是等級森嚴的社會，極少數人享有極大的特權。因為權力是靠暴力獲得的，而不是各方平等達成的契約賦予的。由於一方在暴力上絕對地壓倒其他方，

那麼這唯一勝方必然擁有更大優勢和特權。暴力是一種成本最高的競爭方法，它必然要求高得多的回報，也就是高度特權；而且暴力形成的規則不可能對特權者產生有效的制約，否則付出高昂暴力成本的意義何在？

人類歷史上形形色色的專制者，總是找出人們的某些表面差別，並據此建立人類價值等級論，以維持其永久的統治。等級制是專制邪教的目的，企圖通過穩定的等級壓迫使少數人獲得永久的特權。《水滸傳》第 71 回講“忠義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宋江發現手下的 107 個兄弟經常為排名和生活待遇等鬧彘扭；遂決定用成文法的形式將他們的等級身份秩序化。恐眾人不服，宋江炮製出一份“天書”。“前面有天書三十六行，皆是天罡星；背後也有天書七十二行，皆是地煞星，下麵注著眾義士的姓名”。梁山眾好漢聽得目瞪口呆。宋江趁熱打鐵：“鄙猥小吏，原來上應星魁，眾兄弟也原來都是一會之人。上天顯應，合當聚義。今已數足，上蒼分定位數，為大小二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眾頭領各守其位，各休爭執，不可逆了天言”。眾人皆言：“天地之意，物理數定，誰敢違拗？”

身份制度是一種等級森嚴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中，人們因身份的不同而承載著不對等的權利義務關係。身份制度是傳統社會暴力原則演繹的必然結果。暴力社會裡，社會關係定位于勝王敗寇的森林法則；權利與義務嚴重不對等是暴力社會從而也是身份社會的本質特徵。梁山好漢雖以兄弟（兄弟關係本身就是等級制度的載體之一，所謂兄貴弟賤）相稱，但事實上宋江和諸頭領是一種不平等的君臣關係。天書的出現更是將這種等級身份制度神聖化了。

第 35 節 恐怖主義或槍桿子主義

專制政權是使用野蠻的武力而建立，勿需獲得人民的同意就以武力統治人民。

孟德斯鳩指出：專制的政體“靠武力來建立，以恐怖來維繫，朝令夕改，反覆無常”。專制者大權獨攬、橫行無忌，對內對外政策均從自身利益出發，而不顧人民之公益。自專制國家產生以來，國家就日益變成了純粹的戰爭機器。無數的奴隸在專制的枷鎖下呻吟；無數的平民在專制的異化機器中掙扎。專制主義嚴重破壞人類的團結、和平和秩序，給人類帶來了無窮無盡的戰爭動盪和災難。專制政權統治的社會是一個野蠻或文明程度很低的社會。

中國一直是個叢林國家，暴力是歷代王朝的起源和存在方式。黃帝的統治是通過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的“血流飄杵”的戰爭實現的。故國人崇尚暴力、崇拜權力、信仰多子多[征]服也。所以，中國最高權威是君主（暴力的總代表）而不是法律。

中國政治的意識形態手段有兩個：力量崇拜（包括武力崇拜和陰謀崇拜）與仁政倫理。力量崇拜是“槍桿裡面出政權”。力量崇拜的反倫理性質需要精神上的塗脂抹粉，這就是儒家仁政倫理。儒家倫理是一種“詩性政治”：“家”是社團的基本形式和倫理歸宿，同時為父主權威裝飾粗糙的玄學。這種詩性語言和法家、兵家的軍事語言一起構成了暴力主義體系。

孔子稱讚子產的“寬猛相濟”時說：“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寬就是讓步，猛就是嚴刑酷法甚至是屠殺。魯昭公 20 年，鄭國發生奴隸起義，在萑苻劫殺了貴族，奴隸主貴族游吉派兵鎮壓，起義者全部被奴隸主殺死。孔子聽說了這件事，拍手高興地說：殺得好！然後是一通治國寬猛的妙論，這就是所謂的仁者愛人。孔子因為齊國不重用他，派子貢遊說列國，使得齊國吳國遭受滅國的災難，死了百萬人。這也叫仁者愛人？奴隸起義領袖柳下跖（盜跖），痛斥孔某人是一個巧偽

人，是“盜丘”。“寬猛相濟”，亦可謂德法互補、禮刑結合，也就是現在所說的“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相結合。孔子也強調和為貴，但那是對自己人。毛澤東之後時代，又回到了“和為貴”，但絕不放棄階級鬥爭的恐怖手段。

法的精神要求罪責自負，儒教對誅九族卻無動於衷。一人犯罪讓九族都來承擔，說明誅九族已根本不是什麼刑罰，動物也不至於如此野蠻暴虐，這是一種喪心病狂的迫害，目的不是懲罰犯罪，而是要營造一種恐怖氣氛。作為專制的太傅，儒教成功地把人民馴服了，把人民置於專制的魔爪之下，卻任由專制隨意糟蹋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因此，它是要負一定責任的。誅九族狠狠地抽了儒教一巴掌，宣告仁政理論徹底破產，證明了聖人治國的虛偽性。

顧准說：孔子心裡明白，仁、恕是講給別人聽的，是對芸芸眾生的要求；當權的人要成霸業，不心狠手辣是不行的。後代史家說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一直是內法(或荀)而外孔；其實這種說一套做一套開始於孔子本人。實際上無論是儒法互補、儒法結合、外儒內法等，都只是一種統治手段。如果說“外儒內法”有道理的話，那就說明儒家的精神追求和處世倫理對於墮落人性來說，根本就是行不通的一條死胡同，否則怎麼就被“內法”給篡奪了呢？

漢宣帝晚年濫殺好人，一些能臣或賢人不過是講了幾句不中聽的話，就慘遭殺身之禍。年少的太子劉奭（漢元帝）不太樂意，就利用一次吃飯機會，說“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變了臉色，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事後歎氣道：“亂我家者，太子也！”毛澤東對漢宣帝的“王霸道雜之”非常欣賞。漢宣帝把這個經驗傳給兒子，毛企圖傳給他的後代。姚遠方在《天上掉下來一個毛姑娘》裡講“文革”期間，肖力（李納）在《解放

軍報》奪了權。“當時，肖力就宣告她在報社要實行‘王、霸雜用’的方針。‘王、霸雜用’就是王道與霸道雜用。肖力是在北大攻讀歷史專業的，她知道歷史上的‘王道’‘霸道’的典故，宣佈從今以後她要在軍報實際上實行‘霸道’的統治”。霸道即專政（階級鬥爭），這是專制統治的實質；王道（和諧）不過是裝飾門面、欺騙輿論的做秀而已。

毛澤東還說，“千古皆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十批”是郭沫若揚儒抑法之作），實與譚嗣同說“兩千年之政皆秦政也”相一致，即“外儒內法”、“儒表法裡”相一致。

專制是不需要仁義的，也不可能有人性的，專制需要的是令人恐懼不安。老虎如果不吃人，那它就不是老虎了，老虎一仁慈，它就得餓死了。如果國民不再恐懼，專制就一天也無法維持，這樣的政體怎能施仁政呢？它要人們時時刻刻把恐懼植入心中，使人們不敢輕舉妄動。赤裸裸的暴力對統治者並不有利，導致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過於緊張，不用多久，人民就會忍無可忍，起來造反。秦朝焚書坑儒，以法家思想治國，迅速滅亡，就是例證。漢朝吸取教訓，抬出儒教僵屍，內行法家霸道，外掛儒家王道。儒教使老虎稍稍減去一點野性，同時增強了奴隸的忍耐能力，於是就延長了專制王朝的壽命，但也只是延長壽命而已。

中國古代的兵家馴服民眾的辦法就是恐怖和死亡，他們以此綁架民眾，只能跟誰他們走到底，否則就會死的很慘。兵家多征戰撕殺，殘酷嗜血；兵家的目的是馴服萬民，為君王賣命，自己在這過程中謀取功名利祿。這就決定了他們對百姓的手段只能是野蠻和殘酷的。兵家主張將廣大士卒當成沒有頭腦、任憑驅使的“群羊”，“若驅群羊，驅而來，驅而往”。孫子曰：“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孫子·九地》）。孫子說：“使民與上同意

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威”（《孫子兵法·始計篇》）。孫子在練兵時只因吳王的兩個愛妃 2 次沒號令排好隊，孫子就殺了 2 人，連吳王的求情也被否決。他以恐怖手段達到了威使眾人的目的。這種踐踏人權的事情卻為當代的中國人所肯定。

銀雀山漢墓出土的《孫臏兵法》雲：“將德（將者，於士卒不可不德）保之若赤子，愛之若狡童，敬之若嚴師，用之若土芥”。“用之若土芥”暴露了“將德”僅僅是一種手段：“將德”的目的，只在於把士卒像泥土草芥一樣使用，才有一將功成萬骨枯！

傳統中國是血腥之國、殘暴之國。老百姓中流行的口頭禪是“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現實社會中殺人越貨者，手段極其殘忍；中國人吃動物也是世界上出了名的，沒有動物不敢吃的，吃法殘忍無比。在政治中，血腥味更不消說了。秦始皇因為一塊石頭上刻著“始皇死而天下分”，就殺掉附近村莊的所有人，朱元璋因為寺院牆上寫著勸勿殺的詩而“誅盡寺僧”。

五千年悠悠歲月，何時蘇醒一個中國夢？有歌詞曰：“黎民百姓長久，功名利祿短暫，一部青史等閒看。說一千，道一萬，人心要比天地寬”。其實，這是徹頭徹尾的謊言。黎民百姓的生命如草芥，怎能說長久？功名利祿雖是過眼雲煙，但暴烈專制的秦皇漢武傳之萬代，怎能說短暫？為了無休止的權力殺戮不止，怎能說中國人人心寬厚？

中國人是最不信神的，下地獄進天堂都無所畏，更不在乎生死輪回和來世報應。人人都有成龍成鳳的理想，當亂世出現時，“英雄”起四方。在亂世，社會規則和規範不起作用，只有強權和武力起著支配作用，即所謂有槍才是草頭王。陳勝、吳廣就提出“帝王將相寧有種乎”；東漢末張角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

立”；在中國歷史上的一百餘次農民起義中，採用的都是“農村包圍城市”的手段，不是創立新的朝代、自立為皇帝，就是武裝割據，占山為王。毛澤東在從西北坡去北平的路上，不無得意的說，我們就要去金鑾殿坐皇位了。

中國文化是叢林文化，叢林界的規律決定了其本質。古印度和基督教都產生了非暴力的思想，在中國的墨子有反對戰爭的非攻思想，還算不上非暴力思想，但很快就消聲匿跡了。這證明了中國文化暴力成分的強大。一部漫長的中國專制史，就是暴力崇拜者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權力而廝殺的血腥史。在中國，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是永遠不變的“真理”。

叢林經濟是掠奪型經濟、權力型經濟，通過暴力獲取權力、通過權力搶奪一切資源。互相搶劫是種正當職業，搶得贓物愈多的人就愈光榮（獎勵耕戰，重點獎戰）。叢林界弱肉強食，崇尚以強凌弱、以智詐愚，只有利益的爭奪，不存在公理、正義、平等和博愛，暴力和欺詐被當成主要美德。這種社會在道德上是“反道德”的，而且把反道德奉為道德。叢林中的家族、人群是一個個大大小小戰鬥的小團體，互相廝殺掠奪對方的財物和資源；在這群相互征戰的“野獸”中，誰最殘暴、最狡猾誰就最後勝出，成為最高統治者。所以，只有最殘暴、狡猾的暴徒才能最後登上領袖的寶座。中國的歷史是“成王敗寇”的歷史，所有的“歷史勝利者”都是暴力的服從者和實施者。用合法性理論來解釋中國“政治”，中國“政治”從古到今都是非法政治！中國一直沒有產生過一個合法政府，中國是真正的“無政府狀態”。統治中國的不是國王也不是祭司，而是反復揭竿而起的殺人強盜或唯物主義惡棍。

既然盜人之國能為君，萬民也依樣畫葫蘆，無人不盜。於是，中華大地上湧現出一場場的野蠻競賽。“你狠嗎？老子比你更狠！”野蠻比賽在中國釀造出了

野蠻的盜匪文化，在這種文化中薰陶出來的人泯滅了與生俱來的同情心，甚至從虐待同類中得到快感。從叢林規則脫胎而來的強盜邏輯支配著國家的政治生活，在虛幻的共同體的名義下踐踏著百姓的利益。

時至今日，漢語知識界還有那麼多學者、專家、策士假裝不知道普世價值的存在，他們或者以東西方文化差別論自欺，或者以狹隘的民族主義狂熱自慰，或者以虛幻的集體主義觀念自殘，藉以維護現政權的合法性和正當性，為一切踐踏基本人權的罪惡行徑辯護。凡是對既得利益者不利的思想、觀念、價值和規範，都可以斥之為不合國情而拒之門外。凡是有利於既得利益者但與普世價值相背離的東西，都可以掛上美名來粉墨登場。他們拒絕的恰恰是人類共有的符合人性的部分，維護的卻是傳統文化中動物性的成分。

鋪天蓋地的法西斯民族主義實力主義的灌輸教育，目的是通過實力主義教育，達到讓中國人民鄙視一切人類道德底線，崇拜強人，爭當強人。把人類同情憐憫弱者的天性從中國人民心中徹底清除掉。這樣統治者一切迫害弱者的行動，就都變成了強人偉大的證明。人類道德底線的核心，不外是對弱者懷有同情憐憫之心。一個民族，崇拜強人、爭當強人、喪失最後一絲對弱者的同情憐憫之心，自然也就會鄙視人類一切道德底線。

李昌平說：我們正在建立一種強盜輿論和強盜道德。這種強盜輿論和強盜道德正在不遺餘力地論證和美化這個強盜社會。在我們的主流媒體上，強者被捧上了天，而弱者得不到任何同情。不幸者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社會對你沒有任何責任。一切都是你的命，你必須自己想辦法解決自己的問題。我們的媒體，天天宣揚的就是這樣的一種東西！

一些武俠片，俠客們一不高興，就在飯店裡大打出手，凳子亂打，碟子亂飛，

窗子砸爛，客人連滾帶爬，店主鼻青臉腫，桌子底下面亂鑽，從來沒有聽說過這些俠客義士們與店主和客人商量賠償的事！人的天賦、精力、時間、財產乃至生命就在互相的內耗中白白浪費了。任何社會都有矛盾，有矛盾只能用輿論監督、民主法治來解決，你有什麼權力該出手就出手呢？罪行法定，只有法官按照法定程式審判後，才有權定罪判刑，其它人一概沒有權利。

總之，中國人如果不對傳統文化進行痛心革面的反省，不以生命為代價來捍衛人性的尊嚴，中國的暴君就永遠不可能絕跡。在現代文明社會裡，它必將經過改頭換面，以新的更具欺騙性的面目站在民主政體的最前列，給傷痕累累的中華民族造成新的更大的傷害。

勿需否認，現代文明仍然無法完全拋棄暴力手段，但這絕不是濫用暴力的藉口。越來越遠離暴力，才是人類文明與野獸的區別。暴力手段必須嚴格由社會契約規定，按社會契約行使，而不是由另一個更大的暴力來規定，因為暴力本身不能規定和取締暴力的運行。同樣，也不能指望用大特權去消滅其它特權，因為特權本身並不能限制和消滅特權。只有消滅專制主義，才可能在個人、階級、民族、種族和國家之間建立平等、友好、互惠、互利的關係，人類團結、國家和平、社會正義和政治秩序才會有實現的希望。

第 36 節 拜人的邪教

中國專制皇權堅不可摧，蓄奴制度根深葉茂，貴賤等級思想天經地義。皇權用提倡貴賤等級的孔孟禮教來統一人民的思想，極力打擊和排斥任何主張社會平等、人性自由的新的思想和世界觀。禮教把蓄奴習俗融入“名分”、“綱紀”、家法和族規中，使主貴奴賤的思想顯得天經地義。奴隸也不例外，儒家的觀念讓他們以“忠”為榮，信守“主奴如父子、君臣”的名分。獨裁的理論基石是“上

智與下愚”的聖人論和愚民論。儒家理論可以概括為：1) 聖人論——天子——天
下的總奴隸主——一切權力自天子出；2) 愚民論——野人、國人、庶民（其實是
國家奴隸）——“庶人不議”——只能“為他人做嫁衣裳”，只能默默地忍受比
老虎還厲害的暴君；3) 君子論——君子是總奴隸主的幫兇和打手——在天子和愚
民之間協調——要愚民順從天子，為此提出三綱五常。中國古代的諸子都鼓吹聖
人論。

1· 拜聖人的邪教

“聖”的主要含意就是聰明；聖人，也就是聰明人。這種聰明，不是一般性
的才智，而是見微知著、通幽知化、洞察一切、通曉一切的品格。《尚書·洪範》
雲：“於事無不通謂之聖。”《大禹謨》篇也說：“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

“聖”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末期和西周早期，只是讚美的意思。“聖”與“人”
連用，發生在西周的中後期。西周中期的《師望鼎》銘文：“王用弗忘聖人之後”。
顯然，這是王對自己的有功的“先王”的尊稱而已。

《左傳》雲：“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民，神之主也。是以
聖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可見，在春秋戰國時期聖人崇拜取代了對神的崇
拜。

古人以為聖人有如下作用：

1) 聖人是完成“天人合一”的仲介。聖人溝通了天地自然，也溝通了神明。
《易傳·繫辭》講：“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
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中庸》講，聖人“可以贊天
地之化育”，“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老子反復論述了
聖人是唯一能體認“道”、法自然的人。有了道便具備了最充分的合理性，於是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失道者失天下，得道者得天下”等。老子認為有兩種聖：一是用形而上的方法“得道”之聖；一是憑直覺之智規範事理之聖。他認為後一種聖人是世俗之聖，只懂形而下之事，只會帶來災難，對這種凡俗之聖應摒棄。

《管子·心術下》雲：“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呂氏春秋·盡數》稱：“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聖人察陰陽之宜，弁萬物之利以便生。”《淮南子·泰族訓》雲：“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禮運》說“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致政也。”

聖人本質的屬性就是“體道”，或曰“聖道同體”。韓非在《揚權》中說：“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衡不同於輕重，繩不同於出入，和不同於燥濕，君不同於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由此可見，君是道的人格化。“明君貴獨道之容。”君主與道相對應，“道無雙，故曰一”，君主便是人間的“一”。君主本來是“個別”、“個性”、“偶然”，由於把兩者混同起來，君主的地位發生了“質”的變化。君主成了歷史進化中的決定力量，人世間一切文明的源頭、規律的化身。由於君主掌握至道真理，自然地應該指揮一切人。韓非還反復強調君主要“體道”。《解老》說：“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計算）遠，其會遠，眾人莫能見其所極。”君主“體道”的表現是把握住政令、法術以及各種規定，人臣只能按照君主的規定去辦。君主高於臣民的地方就在於體道，《主道》說：“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

董仲舒講：“天者，辟物之祖也……聖人法天而立道”。“道之大源出於天，

天不變，道亦不變”。在理學家的論述中，理的人格化就是聖人。朱熹講：“聖人形骸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又說：“聖人都忘了身，只有個道理。”換言之，聖人是肉體化的天理。周敦頤講：“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聖同天，不亦深乎！”

道與天理既是萬物的本原，又是理性的極致，是芸芸眾生必須遵循的準則。聖人與道、天理同體，無疑也就是真、善、美的化身和絕對的權威。聖人作為天人合一的仲介，特別是把天道與人道溝通，這種作用與功能本身就表明聖人是神、人的混成體。

聖人最主要功能是把天的作用、性格、原則等社會化，使天人之間獲得調和與統一。芸芸眾生只有通過聖人的調理才能各得其所。先哲們雖有天地之間人為貴的言論，但凡人在天地之間僅是被動物，只有經過聖人之手的再塑造，才可獲得某種自覺。

2) 聖人是文明、人文及其物化——各種器物的發明者和創造者。《易傳·繫辭》認為人類社會的文化(包括禮儀、教育、制度等)是聖人創造的。《周禮·冬官考工記》雲：“百工之事，皆聖人之所為也。煉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為行陸，作舟以為行水，皆聖人之所為也”。《易·繫辭下》雲：“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史稱“伏羲作八卦，結繩而為漁罟”；黃帝、堯、舜“垂衣裳”，“剡木為舟，剡木為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服牛乘馬，引重致遠”。

《墨子·節用》講：“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制為飲食之法”，“制為衣服之法”，“教民以兵行”，“制為舟楫”、“節葬之法”、“宮室之法”等。

《韓非·五蠹》雲：“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木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燧人氏”。

3) 聖人救世觀：聖人是解民於倒懸的救星和理想社會的創造者。在中國傳統的政治觀念中，聖人是理想的人格化，同時又是實現理想的締造者，人們追求理想、擺脫災難所信賴的唯有聖人。老子的“小國寡民”之世要由“聖人之治”來實現，老子說：“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孔子的“博施於民，泛愛眾”的理想，堯舜猶難做到，必待聖人而後行；孔子說：“甚也吾衰矣，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易·鹹卦》稱：“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易·頤卦·彖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管子·心術下》雲：“聖人裁物，不為物使。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墨子講兼相愛，交相利，也同樣要有聖人而後能實現，“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韓非子·奸劫弑臣》說：“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

孟子更是堅定不移地相信“五百年必有王者興！”荀子則焦急地期待著一個“庶人隱竄，莫敢仰望，居如大神，動如天帝”的“絕對聖王”。而他的高足弟子韓非則努力論證這個“絕對聖王”不是什麼別人，而是一個深知“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的獨裁君王。

古人認為各時代有各時代的聖人，而理想的未來要由“新聖”去締造。《商君書·君臣》曰：“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聖人列貴賤，制爵位，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眾萬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眾

而奸邪生，故立法制，為度量以禁之。” 《呂氏春秋》說：“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間。”時時刻刻盼望聖王救民於水火。這種盼望寄託著中國人全部夢想。即使“革命”，也是新聖人來領導即“湯武革命”。“湯武”便是聖人的代稱。可見，“革命”不是一般人所敢涉及的，而佐君致“堯舜”才是正人君子們的流行觀念和價值準則。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把一切希望寄託于君主聖明或聖君再世，其中雖不乏善良的願望，但終歸還是一種依附觀念。

中國古代文人最鄙視多數，鼓吹聖人決定一切。在他們看來，當時所知道的一切文明，如君臣之分、夫婦之別、禮義道德、賞罰、土地財貨之分，乃至科學技術文明，都是聖人君主創造出來的，君主把人類從混濁引向光明。凡聖人所言，皆為天理。稅率應該多少？官俸應該多少？百姓應該遵守哪些規矩？貴族應該享受什麼福利？凡此只有聖人才能知道。可是當今（即戰國時期）又遇到了禍亂，“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的歷史任務又落在了“新聖”肩上。聖人君主拯救了人類，自然應居於人類之上，這就為絕對君主專制奠定了基礎。

韓愈把聖人視為人類生存的前提，他說：“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君主、聖人不僅是天地的助手，簡直可以說是天地第二。天地固然是化育萬物之本，如果萬物不經君主、聖人整治梳理，只能以散漫的形式存在，只有經過君主、聖人之功，萬物，特別是人類，才能各得其所，井然有序。這就把君主、聖人抬到超人的地位。超人的人理所當然應該是支配人的人！這種理論為君主的絕對地位奠定了不可動搖的基石。

20世紀，聖人觀念在中國搖身一變，變成了“科學”、“先進”、“偉大光榮正確”的說詞，1950年代修三門峽大壩時，“聖人出，黃河清”成了建壩

的有力證據。“聖人出，黃河清”帶有讖緯迷信色彩，是聖人崇拜的表現。可見，華人中聖人觀念的毒有多深。

2· 聖人皆禽獸

李宗吾（1879. 2. 3—1943. 9. 28）說：周秦諸子認為，凡是有權勢的人說的話，人人都能聽從；世間權勢之大者，莫如人君，尤莫如開國之君。於是道家托于黃帝，墨家托于大禹，倡並耕的托于神農，著本草的也托于神農，著醫書的、著兵書的俱托于黃帝。孔子所托的更多，堯舜禹湯文武之外，更把魯國開國的周公加入。諸子的門徒都稱其先生是聖人。原來聖人二字，在古時並不算高貴，只要是聰明通達的人，都可呼之為聖人。到漢武帝罷黜百家，只承認孔子一人是聖人，諸子的聖人名號，一齊削奪，孔子就成為御賜的聖人了。孔子既成為聖人，他所尊崇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當然也成了聖人。

《公羊傳》稱為“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許慎《說文解字》“姓”字條就解釋說：“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感生說登峰造極的例子，正是中國歷史第一個聖王——周文王姬昌。《史記》裡說姬昌出生之時，天命赤爵口含一大篇聖人文章到他家，教導做仁君的道理。所以，姬昌的兩個叔父太伯、虞仲不敢與天爭鋒，早早就退避三舍，主動向荊蠻之地流亡，並且“文身斷發，以讓季曆”。季曆是太伯、虞仲的弟弟，他繼位也是一個過渡，是為成全父子相繼的規則，最終還是很快讓位給了兒子姬昌。

李宗吾說：李自成進了北京，尋著崇禎帝后的屍體，盛以柳棺，放在東華門，聽人祭奠。武王是個聖人，他走至紂死的地方，射他三箭，取黃鉞把頭斬下來，懸在太白旗上。他們這宗舉動，連流賊都不如，公然也成為惟精惟一的聖人。…後人見聖人做了不道德的事，就千方百計替他開脫，到了證據確鑿，無從開脫的

時候，就說書上的事蹟，出於後人附會。這個例是孟子開的，他說以至仁伐至不仁，斷不會有流血的事，就斷定武王伐紂時血流漂杵的話是假的。從殷民三叛和多方大誥的文字看來，可知伐紂之時，血流漂杵不假。所以，聖人與君主是一胎雙生的，處處狼狽相依。…君主鉗制人民的行動，聖人鉗制人民的思想。…中國的人民，受了數千年君主的摧殘壓迫，民意不能出現，無怪乎政治紊亂；中國的學者，受了數千年聖人的摧殘壓迫，思想不能獨立，無怪乎學術銷沉。因為學說有差誤，政治才會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該革，聖人之命尤其該革。

雍正以君臣之倫作人獸分別的標誌。“夫人之所以為人而異於禽獸者，以有此倫常之理也。故五倫謂之人倫，是闕一則不可謂之人矣。君臣居五倫之首，天下有無君之人而尚謂之人乎？人而懷無君之心而尚不謂之禽獸乎！”又說“為臣民只能作君主的馴服奴人者，義當惟知有君。”雍正帝賜其八弟名為“阿其那”（豬），賜其九弟名為“塞黑思”（狗）。這豬狗的父親是聖人，哥哥也是聖人，豬狗與聖人錯雜而生，聖人的價值也就可以想見了。耶穌說：“凡向弟兄動怒的，難免受審判；凡罵弟兄是魔利的，難免地獄的火。所以，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獻禮物”。

儒家崇拜的“聖人皆無父”，按儒家的“無父乃禽獸”的道理，儒家崇拜的聖人皆禽獸也！聖人即禽獸，聖人之道即禽獸之道。儒家把自己的兒子謙稱為“犬子”。自謙，也不能把自己說成是“犬”啦。當儒家把己子稱為禽獸，那他自已必是禽獸了。儒家的官場用語往往是禽獸的叢林語言，如“肝腦塗地，在所不惜”就是。為什麼要這麼殘忍血腥呢？因為他們是禽獸，沒有生命尊嚴的概念。漢語已被儒家糟蹋成禽獸語言，見不到文明之光！

傳統社會的崇聖意識從兩個方面限制了人的主體性意識。一方面，聖人居高臨下，對一般人形成“天蓋”式的桎梏；另一方面，個人要向聖人學習，追求“內聖”，就必須不停地向自己本來有限的主體性開戰，即不停地“鬥私”。因為“人皆可以為堯舜”的人格模式是由抽象的政治倫理原則構建出來的，所以，人只剩下了一個以道德為軸心的軀殼，這個軀殼在儒家那裡便是三綱五常之類的“理”。凡人在聖人面前，沒有任何個性和獨立性可言，只有心悅誠服地崇拜和追隨聖人，才能使自己的道德得以提升。聖人崇拜桎梏了人的主體性，否定人的個性；人的個體獨立人格在聖人博大的共性人格面前消失殆盡。因之，儒家的聖人崇拜本身即意味著對人的個性和獨立性的剝奪。而且，這種崇拜越虔誠、越神聖，對人的個性和獨立性的剝奪就越徹底。因此，獨裁者才維護儒家的旗幟近二千年。

3· 拜聖王、拜皇帝的邪教

聖人崇拜必然走上聖王崇拜。聖王崇拜是中國專制文化影響時間最長、範圍最廣、程度最深的原因。先秦諸子皆言聖，並將聖與王相提並論。“聖王”一詞最早見於《左傳·桓公六年》：“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墨子》中“聖王”一詞屢見，聖人與聖王幾乎沒有什麼區別。所謂聖王，從歷史上看，也就是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先王。凡屬理想政治都與聖王相連，聖王是理想的實現者，聖王是崇拜的物件，是希望所在，是社會政治問題的核心。老子說：“聖人抱一為天下式。”莊子以為“靜而聖，動而王”，內聖則外王。在儒、墨兩家的盛世理想中，聖是王的最高境界，聖人一出，萬亂皆休。儒家主張“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周易·說卦》），而聖人又是具有最高美德和最高權力的人即聖王；所以，儒家進而主張聖王天子擁有一切，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結果是儒教帝國無社會（社會應理解為公民社團組織）！可見，

崇拜聖人是為了崇拜天子、崇拜帝王。荀子雲：“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法家認為聖即王，王即聖。《管子·正世》說：“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始終者也。”《管子·君臣下》認為，人類最初由於無“君臣上下之別”，造成了“以力相征”的亂局。在相互爭鬥中，“智者假眾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為民興利除害，正發之德，而民師之”。這種智者就是最早的君主；因此又說：“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

聖、神與王的合一，是政治權力大一統的產物。自從秦始皇正式把聖的花環戴在自己頭上後，帝王無論愚賢，一律稱聖或聖人，有的還以“神聖”或“聖神”為號。所以皇上也被稱做聖上，皇上的話就是聖旨，是絕對真理。君主是聖明的，無所不知，明察秋毫。君是心，臣是股肱；君是首，臣是四肢。按照這個邏輯，臣下的職能就是聽令。於是有臣者“奉命而行事”、“下順於上”之論。臣在向君主奏對中，便以自卑自謙反襯君主的聖明。古代臣下給皇帝上疏，均有套話鋪前墊後，諸如“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兢兢無措”、“昧死以言”、“愚臣”、“愚見”、“惟聖心裁鑒”、“臣不勝倦倦之至”、“臣罪當死”、“彷徨闕庭，伏待斧”等等。久而久之，臣下在君主面前便形成一種自然而然的錯感和罪感意識，即使遭冤殺，也要歌頌皇恩浩蕩，稱“臣罪當死”。臣民的惟一任務就是獻媚。軍隊員警捍衛的只是獨裁（特權）者的尊嚴，民眾不過是用來烘托他們尊嚴的犧牲品；媒體不過是獨裁者的傳聲筒，用來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即使有一小部分揭露黑暗面的內容，不過是小罵大幫忙。一句話，沒有公共輿論，只有專制統治者的聲音。

帝王的邏輯的是：他占盡人間春色，朕即國家，當然要進一步與天公試比高，

步入神的仙境。所以秦皇一即帝位，就嫌肉身凡胎的終身制與世襲制的不足，而要遍尋長生不老的仙藥；漢高訂定朝儀，百官便須三呼萬歲而後已。幾千年歷史哪個帝王的壽命不被頌揚得與天地同輝，哪個帝王的威信不被神化得與日月爭光。這是權力拜物教在作祟。這種權力拜物教對死去的首腦會產生祖先崇拜，對活著的領袖發展為個人迷信是十分自然的過程。

官僚們以為：帝王是權力的化身、真理的源泉、苦難的救星、榮耀的施主；為了官僚們的利益，管它什麼主義和階級，皇上的智慧只能以全民的愚昧來對比，皇上的金口必須以全民的啞巴作陪襯；皇上的萬能不惜以全民的精神白癡為條件；皇上的縱欲以全民的禁欲來增效添趣；皇上的光榮以用全民的恥辱來換取；皇上的神化當然以全民的奴化為代價。

在對皇上實行個人崇拜的同時，當然也要求下級實行對自己的個人崇拜。於是，官僚政治中的上行下效現象就成為一條規律。而且往往是“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者”，變本加厲地擴大權力單向支配的效應。上既有三千粉黛的風流天子，下必有霸佔民女的花花太歲；上既有急性病，下必多催命鬼；帝王的權山利壑之欲沒有窮盡，百官的人欲橫流哪有止境？

在姬昌當政前，周人就對王頂禮膜拜、呼萬壽無疆了。姬昌為了表示對紂王的忠誠，吃掉了用自己兒子做的肉羹。表面上看，好象是韜光養晦，其實是“君尊臣卑”的思想使然。姬昌被囚時研究八卦，提倡天尊地卑、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父尊子卑、兄尊弟卑。

西元前 1046 年 1 月 20 日（天文學推算的），周武王推翻紂王，心奴化的政策就開始實施。周王稱“天子”，“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尚書·召誥》）；同時“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尚書·洪範》）。前 1042 年後，周公在

誥文中給民眾規定這規定那，剝奪民眾自由生活的權利。周公在商禮的基礎上，制定了“周禮”，規定了人們起坐臥行、吃飯上朝、哭喪穿衣以及男女尊卑的秩序，以此維護王權、籠壓諸侯。周公還確立了嫡長子繼承制。從此，中國僅有的兄弟平等都被消滅了，人與人之間的等級關係成了社會的主軸關係。

“天王聖明”的尊嚴，尊卑有序的秩序，必須通過長時間的儀式的薰陶和演練，才能內化為人們的習慣行為。周公讓兒子周小公姬伯禽去魯國主持工作；姬伯禽主張全盤周化、“親親尊尊”，具體措施從學習磕頭開始。磕頭有很多種磕法。姬伯禽教大家說：“第一種磕法是稽首，就是跪下後，兩手著地，拜頭至地，停留一段時間，這是磕頭中的最重者。頓首是引頭至地，稍頓即起，停留時間短，是磕頭中次重者。空首是兩手著地，引頭至手而不著地，是較輕的。這三種磕法最流行”。姬伯禽站起來拍拍手上的土說，“臣拜君，子拜父，學生拜老師，新婚夫婦拜天地，都要行最重的那個稽首禮。平輩同級之間，拜迎拜送，拜望，拜謁，行頓首禮，是輕一點的。對於卑者的稽首禮，尊者以最輕的空首禮答拜。”

《周禮·春官宗伯第三》有：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拜（兩手相擊，振動其身而拜），五曰吉拜（先拜而後稽顙，將額頭觸地），六曰凶拜（先稽顙而後再拜，頭觸地時表情嚴肅），七曰奇拜（屈一膝而拜），八曰褒拜（為回報他人的拜禮的再拜），九曰肅拜（拱手禮，不下跪，推手為揖）。嚴格刻板的周禮遂在魯國流行，後來這裡出現了一個大講親情禮義的孔丘就是必然的了。等孔教盛行以後，“魯國模式”又被推廣到全國。

按周公的禮儀，不光磕頭有禮數，連走路說話都有章法：你在尊貴者或長輩面前經過時要“趨”（急走、小跑）而不能平穩地邁著方步過去。在登上堂的時候，從東階上先邁右腳，從西階上先邁左腳，每登一級都要稍停一下，讓兩足都

在同一階之後再登。登堂以後，要“接武”，“武”是指足跡，“接武”就是後一步要踩在前一步的足跡之半的地方。如果手裡拿著貴重的禮玉，那無論是在堂上或在堂下庭院，都不必趨，怕跌壞了寶玉。

孔丘是實踐周禮的表率：當孔丘走進宮廷大門時，總是恭敬的彎著身子，好象無容身之地，到處躲躲閃閃，站立時不敢站在門中間，行走時不敢走門檻。孔丘提起衣襟往堂上走的時候，更是恭敬謹慎，好像憋住氣不敢放一樣。經過國君的座位時，臉色立即莊重起來，腳步也快了起來，說話時聲音低微，好象說不出來一樣（儘量顯得自己渺小，在尊長面前不是人）。這種拘謹的狀態直至拜見完畢。孔丘走出宮室降下臺階，面色才開始放鬆。下完了臺階，孔丘再快快地向前急走幾步，猶如鳥兒展翅一般。但是，這也好不了多久，等到回到自己車上，孔子便又擺出恭敬而內心不安的樣子了。

孔丘在擔任魯國的中都宰、司空、司寇期間，一聽見魯定公叫他，總是不等車馬備好，就急忙地向魯宮奔去，進門就連連磕頭。照“周禮”規定，臣子去見國君，必須先在堂下磕頭，然後升堂入室，再磕一次頭。春秋末期的魯國，由於季氏掌權，早就減去了堂下那一次，只在室內磕頭了。但孔丘與眾不同，每回總要磕兩次頭，以此來顯示他對國君的忠順。且一邊磕頭，一邊咒罵那些只磕一次頭的人傲慢自大，違背了神聖的“周禮”。願意當忠心耿耿奴隸的孔丘懇求奴隸主殘酷制裁不願當奴隸的人，“是可忍，孰不可忍？”看孔丘跪王的樣子，就知道中華民族是個無骨民族，只能過屈辱的奴隸生活。

管子雲：“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為人臣者，仰生於上也。”君主是天下人的衣食父母，君主把恩澤、陽光、雨露灑給天下，惠及牛馬。既然一切都是由君主賜予，甘心做臣僕與狗馬也就是合乎邏輯的，於是“北面委質，無有二

心”是為臣的準則。在聖王面前，漢人們只能匍匐而仰視，甚至只能五體投地而不敢仰視。

幾千年來，中國人必須有一個供跪拜的主子，即“國不可一日無君”。官僚們需要專制君主。官僚們要當人民的主子，就先得當帝王的奴才；他們有帝王作主子，才好讓人民作自己的奴隸。這是因為大小官僚們如能夠幫助大皇帝登上寶座，樹立絕對權威，他們就可以借助這絕對權威樹立自己的小皇帝、土皇帝的地位。這叫月光效應或狐假虎威。誰想當明月，就要捧出個紅太陽，誰想耍威風，最好假傳聖旨，用“偉大”的名義。

只要社會上還存在大小特權者，他們就必然造出一個最高最大的特權者來充當他們的偶像。所謂“三月無君，則遑遑如也”，這不是為了什麼忠君愛國或行什麼天道，而無非是為了方便對人民的壓榨。為了強化活偶像的作用，還不時抬出死偶像加以頂禮膜拜，以便表明現行特權來自列祖列宗的遺詔遺訓或至聖先師的典籍教誨，不得有絲毫的懷疑。

歷朝歷代，跪拜著的奴民也常常鬧出些“造反”、“農民起義”之類的大舉動，使得中國成了人類史上戰禍最頻繁的地方之一。那緣故，並非是要免去跪拜，而是換一個一個新的農民做接受跪拜的主子。當那個“救星”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時候，人民站起來了嗎？非也，是一個新的主子站起來了，人民不過換了跪拜的偶像而已。一但失去接受跪拜的主子，這個民族就會六神無主。跪拜不折不扣地成為漢民族文化傳統的表現。歷朝歷代，無論誰登上皇帝寶座，無論新朝廢除前朝多少規矩，唯獨三拜九叩大禮不但照單全收，還要發揚光大。劉邦在叔孫通制定了禮儀後，一幫混混子畢恭畢敬地對他跪拜的景象使他感受到皇權的威力。歷代王朝對禮儀重視的程度不亞於財賦與軍隊。官

僚體系中，負責禮儀的專門機構，只有增加的份，而沒有縮減的可能。帝王們為推行磕頭下跪禮教，用四書五經作為科舉考試標準，使天下人自幼就把學習儒教。帝王以此手段將天下精英收為自己的鷹犬，他們能穩坐江山，全靠儒奴收拾人心。官辦的學校教育，學禮一直都是主要的內容，以至於到後來，老百姓一致認為，上學就是達到“知書達禮”。

縱觀兩千多年來的中國的文化，其核心就是“跪拜”二字，或曰“跪拜文化”。堂堂正正的人，面對同類，卻要雙膝落地叩頭跪拜，這無論如何是一種剝奪人格尊嚴的卑賤造型。俗諺“男兒膝下有黃金”，跪不得也。更何況，跪不但屈膝，而且還把人的脊樑整個彎下去、彎下去，這分明是動物的姿態。人之所以為人，就是因為它的脊樑是豎著的。豎著的脊樑乃靈長類中的惟一，這一豎就把人與動物判為兩界，動物從來就沒有站直過。站起來與跪下去，這是身體的兩種姿態，但同時又蘊含著截然相反的品格——人的和非人的。上天賦予了人類直立行走的本能，然而在帝王專制、儒家思想的荼毒下，近三千年來，中國人一直匍匐在地，沒有尊嚴、沒有人格。磕頭不僅是雙膝彎曲頭點地的運動，其帶來的心理影響是不可估量的，試想一個人連最昂貴的頭顱都拜倒在對方腳下，還有什麼不能付出。磕頭下跪表示屈辱臣服，這種屈辱成為國家禮儀，成為國人習慣，就意味著整個社會失去了起碼的人性尊嚴。周公、孔子就是用這樣的禮儀法規剝奪了國人尊嚴，實現了一人為主、天下為奴的君主統治。

餘秋雨說：中國文化，跪拜是最高禮節。在中國古代史上，任何大臣見到皇帝，都必須雙膝跪地。不管這位大臣職務多高，年紀多大，與皇帝的關係多深，也不管他是否有過戰功，或者挽救過王朝，都必須顛巍巍地跪下來，而且長跪不起，除非皇帝下旨“平身”。跪地，還要磕頭，所謂“五體投地”，就是兩手兩

腳和頭部都按在地下。這本來是原始宗教表現人對於天神的敬畏，但把這種方式搬移到崇拜帝王的禮儀當中，讓人又一次確認自己渺小，自己的非人一般的低賤。下官要跪拜王公大臣；百姓得跪拜官員。家長們必須跪族長；晚輩得跪拜長輩；子孫們要跪拜祖宗；活人要跪拜死人。總之，“天、地、君、親、師”，無一部跪拜。最嚴酷是：處以極刑的囚犯，是一定要跪著受刑的。即使被判死刑也要跪著受刑。更有甚者，秦檜夫婦雖然死去近千年，還被鑄成雕像袒胸露腹跪在嶽飛墓前。跪拜不僅是國人生活內容，而且成為必不可少的生存方式。於是有歪論：中國人不跪著，長膝有何用？

中國文化嚴重侵蝕人格尊嚴的一大標誌，就是幾千年來一直提倡的伏地跪拜。跪拜是非尊嚴文化之首。沒有尊嚴的文化是文化災難中最大的災難。剝奪人格尊嚴，是一切文化災難中最大的災難。這是因為，沒有人格的文化算不上文化，沒有尊嚴的文化也算不上文化。

中國的“跪拜文化”造成了人們迷信權力(或權威)，為求升官不惜吹牛拍馬、行賄走後門。中國人表現“尊嚴”的方式便是愛面子、擺架子，以一種盛氣凌人的態度來證明自己的優越；奴隸主最大的心理滿足便是奴才的下跪，而奴才喜歡的是跪著等候主子的賞賜。成語有“屈膝投降”，看來跪拜練習使漢人喪失了骨氣，以至於中國的歷史越到後來漢奸、馬屁精越多。想一想吧，8個日本人就可以統治中國的一個縣，難怪魯迅說：中國人一直無脊梁，到現在為止還可以說中國人沒有脊梁。中國文化是沒有骨氣的文化、是向官方曲膝投降的文化！民怕官，官都貪，政權越來越腐朽。在最腐敗無能的獨裁國家，專政可隨隨便便的制服人民，而人民根本不去反抗壓制者。現在，共產機器早已臭不可聞了，但是他能繼續在中國統治，主要原因是：中國人是懦夫，如果 1/10 人民起來，這個腐敗的

政府早跨了！

西方文化以聖經為指南。聖經中的“摩西十戒”中的一戒便是不跪拜偶像。因此，中古的歐洲人寧可決鬥而死也不願下跪而生。即使晉見國王，也只是單膝跪而已。而這個單膝跪禮也不是國王獨享的，許多淑女在紳士向她求婚時同樣得以享用。

中世紀，西方人乘馬車；中國人坐轎子。其實，坐轎子也是一種剝奪他人尊嚴的方式。1578年張居正回籍葬父，其坐轎要32個轎夫扛抬，內分臥室及客室，還有兩小僮在內伺候。

清朝時，外國人只能在廣州經商，而且只能和清朝指定的十三個商家——十三行來往。外國人在十三行不得外出，不能接觸十三行以外的中國人，不能坐轎，不能學說中國話，不能帶女眷來廣州，不准在廣州過夏和過冬，有事只能通過十三行轉稟。十三行行總和窮凶極惡的官吏對商人們隨意敲詐勒索以中飽私囊；每批貨物該交多少關稅，也由官吏們隨口說定。

1792年9月英國的馬戛爾尼率團第一次出使中國，他們乘五艘大型艦船，從朴茨茅斯港起錨，繞好望角經10個月的航行，700餘人使團於1793年7月抵達天津大沽口，拉開了中國和西方國家正式交往的序幕。英人攜帶了天文望遠鏡、地理測繪儀、樂器、鐘錶、車輛、武器、圖冊、航模等禮品，虔誠程度可想而知。清廷雖已經經歷過外使不願下跪導致訪問失敗的先例，但泱泱大國不懇在跪拜上讓步。爭執直到進入承德避暑山莊仍未解決，最後總算達成協議，馬戛爾尼以單膝禮朝見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不悅，下令“全減其供給”以出鳥氣。鑒於適逢乾隆83大壽，還回贈了禮品，並允其遊覽避暑山莊以示寬宏。

有腐儒寫書立說，指洋人身上少幾塊骨頭，腿不會彎曲，跟“人”不一樣，

是半畜半人。還有一個大臣寫文章說，外國人為什麼不下跪？因為他們沒有膝蓋，想跪也跪不下去，所以他建議今後和外國人打仗不必用刀槍，不必用什麼火炮，只要用長竹竿捅他們的腿就可以了。因為他們由於沒有膝蓋一定是一捅就倒，可以快速的結束戰鬥。可見，幾千年下來，中國不少人把跪拜當作了生理機能，而且進而對不跪拜的外國人作出了生理推測。當朝文人無羞無恥無知到如此程度，真可謂斯文掃地，顏面全無。

馬戛爾尼到了北京，開列出通商的要求，計有六大項之多：①在舟山、廣州各開一處荒島，由英人出資建為商埠，以便英國貨船停泊卸貨；②請按俄國先例，允許英商在北京開商號一間；③允英人到寧波、舟山、天津登陸經商；④請准英國商貨經澳門運抵廣州，只按中國所定稅率納稅，不受地方官府任意加征。並請將稅率張榜公佈；⑤允英人傳教；⑥雙方互派使節常駐。對此要求，乾隆修書予以回敬：“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磁器、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並沾餘潤”。馬戛爾尼使團的成員們憤憤不平：“我們象要飯的一樣進入北京，象囚犯一樣被監禁在那裡，而離開時簡直像是盜賊”。

1816年，英國再派阿美士德使團訪華。嘉慶皇帝堅持要使團“行三跪九叩首”之大禮。於是到了允見之時，阿美士德“忽稱急病，不能動履”。他的兩位副使也離奇地“同稱患病”。如此怠慢之舉，導致龍顏大怒，當天阿美士德一行就被驅除出境。阿美士德報告英國政府：指望和平手段與中國開展貿易交流是不可能的，只有三條路：①訴諸武力；②維持現狀；③放棄貿易。這個奴性入骨的“禮儀之邦”，外交可以不要，科學可以不要，還有別的敏感詞……禮儀是萬不可以不講究的。因為孔丘教導過：“悠悠萬事，惟此為大，克己復禮”！

可見，中國的跪拜文化和抑商政策竟然註定了其半殖民地的命運。

3·拜祖宗的儒邪教

祖先崇拜是一種原始的宗教，它往往比其它神靈崇拜的宗教感情更加執著、有力。祖宗是中國人的神祉，祖先崇拜是中國人共同的宗教。中國人所崇拜的祖先，是已亡的父母親、祖父祖母以及對家族有傑出貢獻的顯名達貴的遠祖。中國人相信祖先的亡靈不滅，並能像神一樣在冥冥之中保佑自己和全家，祖先的墳墓——陰宅所處的位置的好壞，決定著子孫的命運和前途。祖先在陰間需要子孫常常獻祭，貢一些祭品，燒一些紙錢。祭祖是被儒教強制執行的。誰要違背，將被視為大逆不孝，將會失去作百姓的資格。中國人對祖先亡靈的感情是實實在在的，他是祭祀者與亡靈生前親情的延續，是對祖先功德、養育之恩的感激和追憶。

中國人的喪事、葬禮也是一項重要的宗教活動。祭祀祖先是儒家禮制中最重要的事。祭祀分有四季，春天的祭祀叫做灼，夏天的祭祀叫做禘，秋天的祭祀叫做嘗，冬天的祭祀叫做烝。在祭祀的日子，進到祭室，就仿佛一定見到有先人在位；轉身出門，肅然間感到一定聽到有先人的聲音；出門以後再聽，慨然間覺得一定聽到有先人的歎息聲。所以先王所做到的孝，是先人的容顏不會在眼前忘記，先人的聲音不會不會在耳邊消失，先人的意志、嗜好不會在心中忘卻。孝子將要舉行祭祀時，考慮事情不可不有預先準備，……主人夫婦就齋戒沐浴，穿上禮服盛裝，端奉著祭品進獻上來，恭恭敬敬，專心致志，就好象不能勝任的樣子，就好象將要使手的樣子，這就是孝敬的心意到了極至的表現。……於是知道了孝子的心思，以他恍惚的感覺而於神明交接，期望著供養神明。

每年陰曆的正月初三、清明、七月十五、十月一等都是今天中國人祭祀先人的鬼節氣。祭祀時，子孫將祭品貢放在墳頭，放一掛鞭炮，燒一些冥鈔、紙做得

錢幣、金銀元寶等，向祖先亡靈磕頭，並“祈禱”：爺爺（爹、娘），我們今天給您送錢來了，您就拿去慢慢地享用吧……您在天之靈一定要保有全家平安，保佑您的孫子今年順利考上大學……。

理學創始人張載認識到建立崇拜祖先的宗法家族制度十分重要。“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宗法宗子”。此後，理學家莫不提倡。經過明清兩代的宣導，一套完整的宗法家族制度建立起來了。全國各地紛紛起來修族譜、建宗祠、立族產、建立族規族法，對人民進行嚴密的宗法統治。中國人的祖先崇拜從宗族意識中生髮出來，它用死人統治活人，使人面向過去，背對未來，並衍生了一整套的等級制倫理。身份等級成了多數人的生活指南，人人平等的觀念沒有立足之地，生命至上的人本主義思想無法在傳統的母腹中孕育和分娩，個人主義的本體價值無法獲得自身的正當性和現實的立腳點。

祖先崇拜是由泛神論、不可知論和無神論構成的。它把死人變成神，神也不過是死人而已。他們只對父母表示愛、感恩和畏懼，他們不知道天上的父，就是知道了，也毫無興趣。

海外《黃花崗》雜誌上有篇文章題目是“祖宗無罪，罪在我輩”。這完全是胡說！人人皆罪人，祖宗怎能倖免？我們祖宗是有罪的，如：秦始皇、黃巢等歷史上的祖宗難道無罪？祖宗無罪就是祖宗崇拜，就是儒家孝道的表現。神化祖宗、把祖宗當神，這樣一來，神就多了，多神論其實就是無神論。好的信仰是一神論，而且人不是神，祖宗當然不是神。

韋伯認為，中國由國家所規定的“俗世宗教”乃源自對祖先神力的崇拜和信仰，中國所有其他的民間宗教，不管它是巫術性的或祭典性的，就其本質而言是面向今世的。韋伯依據司馬遷《封禪書》序言推測，很可能中國所有“神”的觀

念最初源於這樣一個信仰：十全十美的人能逃脫死亡並且永生於一個永遠幸福的王國。無論如何，一般而言，正統的儒教中國人是為了他在此岸的命運——為了長壽、子嗣與財富，以及很小程度上是為了祖先的幸福——而祭祀，全然不是為了他在彼岸的命運。

第 37 節 謊言欺騙

專制社會充斥著統治階級散佈的謊言。暴力必然違背人們基本良知，而特權必然讓人們反感抗拒；所以統治者必然散佈兩類謊言：第一類，此廝該死，那賊該殺，以此來證明使用暴力的合理合法。第二類，吾皇英明神武，澤被蒼生，德播四海，真龍天子，萬歲萬歲萬萬歲，好讓人接受特權的合理合法。

中國人喜歡喊口號，特別喜歡奉承、讚揚、簡單、省勁的口號，喊得一個個人飄飄然，喊得一群群人愚昧無知。早在上古時代，詩經就記載周人反復歌唱國王“萬壽無疆”，說明古時的中國人就已感染了個人崇拜的精神病毒。孔子把堯吹捧為天一般的偉大，儒家鼓吹聖王是“天地人合一”者，掌握了“天地人”的發展規律，不過是指鹿為馬的馬屁而已。

中國的語言是高度等級化的，若說話時等級弄錯了，輕則被貶，重則殺頭。誰敢自稱萬歲，就被殺九族，清朝就有這樣的例子。1930 年代李慎之上小學時唱的一首歌道：“把生命交托給總理（孫中山）”；他上中學時學的一首歌道：

“大哉中華，代有賢能，蔣公中正，今日救星”。有一天蔣總統前往某家精神病院視察，所有的病患都站在走廊上高聲歡呼，“蔣總統萬歲！蔣總統萬歲！”只有一名病患面無表情，對總統不理不睬。蔣總統看到了，於是問院長說：“那位病人為什麼不對我歡呼呢？”院長道：“因為他今天精神非常正常”。抗日戰爭開始後，為了維護團結的大局，毛澤東也違心地高喊“蔣委員長萬歲”。

“萬歲”一詞的意義當然不是指壽限。帝王們並不認為自己能“萬歲”，否則不會從登基之日起就大修陵寢，預謀後事了。領袖們也不認為自己能長命百歲，否則就不會存在“革命接班人”問題了。“萬歲”的真實含義是在“九五之尊”的絕對權力面前的絕對臣服。“萬歲”就是一個製造至高無上的權力威嚴的特定政治符號。能夠讓一個民族產生領袖萬歲的個人崇拜現象，僅靠領袖個人的超凡魅力和不世功績是不夠的，還需要用權力意志自上而下地製造大一統的絕對臣服。從歷代人都喊“奉旨龍恩”、“萬歲！萬萬歲！”到現代人常喊的“大救星”、“最高指示”，“一年比一年好”……。口號喊得多，人民群眾卻越發可悲。從歷史上看，一個國家出現個人崇拜的時期往往就是國家政治倒退時期。1960年代，中國所以出現那場狂熱的“造神”運動，正是由於“大躍進”的慘敗大大損害了領袖威望，所以要“大樹特樹”他的最高權威。這場“大樹特樹”的結果，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如今大陸中國，有的領導人為了獲得絕對臣服的快感，甚至還會有意地指鹿為馬，以訓練人們對他的絕對服從。這種風氣所到之處，小人得勢，君子隱匿，以“跟風、吹牛、拍馬”為能事的“風馬牛”幹部大行其道，吏治敗壞，莫過於此。吹牛拍馬是一種太監奴格。

人一旦做了大官，免不了要端架子，自我感覺膨脹；但人還是那個人，任憑你改了姓，更了名，喚作了漢高祖，你也就還只是那個潑皮無賴的劉三。於是，權力的神化過程就需要大量的高級奴才敬獻各種馬屁文章，以維持官人良好的自我感覺，另外也可以使官人與一般平民百姓拉開距離，比如說在毛澤東時代，只要老毛愛玩的把戲——詩歌、書法什麼的——在馬屁文人的吹捧之下，就會成為該領域最高峰，無人堪敵。這便是馬上打天下的王侯將相之所以需要文人的原因之一，沒有馬屁文人對其天賦異秉和豐功偉績的藝術化吹噓，沒有馬屁文人對其

“理論”、“思想”的系統化闡釋，王侯將相就只是和奴才們一樣的造糞機器而已，這是千方百計自我神聖化的政權絕不能容忍的。為此，中華文化中的重要一脈——馬屁文化——便歷經千年而不絕，並有與時俱進、漸趨化境之勢，而高級馬屁精作為馬屁文化的重要載體，在以馬屁語言神聖化權力的過程中，也會分得權力的一杯羹，有機會被賞一塊骨頭或一頂紅帽子，如果紅帽子夠大，則會多年媳婦熬成婆，便可轉身享用別人送上來的馬屁文字了。由此可見，馬屁是巧言令色者通往權力的捷徑，是官、名、利鏈條的重要維繫。作為一個低投入高產出的行業，投身馬屁事業的人從來是絡繹不絕，巨大的利益誘惑之下，哪怕是頂著小丑、佞臣的罵名，也總少不了馬屁事業的接班人。

肉麻的馬屁語言在漢語相當豐富。漢人不僅拍領導家長馬屁，而且還要拍集體民族的馬屁，因為領導人是集體、民族的代表和象徵。拍集體、拍民族的馬屁是拍領導馬屁的一種方式，可以使領導高興；領導高興，你小子前途就無量了。這樣一來，拍集體、拍民族的馬屁就成一種思維慣性——夜郎自大性，任何對集體、對民族的批評都會遭到這批無腦人的憤怒、抗議和吐口水。這些儒徒們說：“誰批評我，誰就是共產黨的幫兇”，這是一種多麼獨斷、多麼偏執、多麼荒謬的邏輯啊！這批人的大量存在，說明中國教育是完全愚民的、完全失敗的。

喜歡聽好聽的話是醜陋的中國人低劣心理的需要，中國人特別迷信吉言。中國人吉祥數字是“8”，因“8”與“發財”、“發達”的“發”音相近而等同起來；汽車牌照的含“8”的號碼還拍賣出天價呢：上海一個吉祥車牌號可以飆到5萬元，而便宜的車上海市價還不到5萬元！其實，“8”不是發財而是發瘋。地球發瘋了。2008年5月12日，四川發生毀滅性地震，若有人說“天譴”，必遭圍攻，說那是唯心主義的有神論。若有人說“天佑中華”，大家都歡喜。其實，

天譴、天佑的“天”都是同一個天，對“天佑”的天，沒有人會說是唯心主義。毛澤東在 1976 年 4 月下旬，仰望天空，就吉林的隕石雨表示：“我相信噢，中國有一派學說，叫做天人感應，說的是人間有什麼大變動，大自然就會有所表示，給人們預報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 1976 那年，中共死了周恩來、朱德、毛澤東 3 個巨頭，而吉林的隕石流星雨發生在 3 月 8 日，唐山大地震發生在 7 月 28 日，都有個“8”字。

除了這次地震震級是 8 級外，地震發生時間剛好是北京奧運開幕前的 88 天；而奧運的開幕日子又是 2008 年 8 月 8 日 8 時 8 分 8 秒。開幕日的 8 字自然是號稱“無神論”的中共揀出來的黃道吉日。可當初北京提出舉辦奧運會的申請檔中，開幕式的時間是 7 月 25 日。在 2001 年獲得奧運會舉辦權之後，北京奧組委在 2002 年 12 月向世界奧會提出報告說：在 7 月 25 日後的這段時間多惡劣天氣。北京奧組委把舉辦時間改為 2008 年 8 月 8 日至 8 月 24 日。可是與地震有關的 8 字，卻是老天爺揀出來的。而被老天爺揀出來的 5 月 12 日， $5+1+2=8$ 。不但如此，3 月 14 日中共鎮壓藏人製造流血事件， $3+1+4=8$ 。地震發生在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也與藏人有關。而地震發生的具體時間則是下午 2 點 28 分；228 不但有 8，而且是台獨的政治符號，老天爺算來算去，地震就是與奧運、藏獨、台獨有關，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也。也就是中共今年主辦奧運，惹來許多災難。

西方人好象不象中國人這樣需要吉言。譬如：聖經說人人皆罪人，西方人能接受“罪人”，中國人認為這是不吉利的詞，往往接受不了。因此，西人的度量寬大，媒體罵總統白癡，沒關係；在中國，就會株連九族了。中國人不愛聽不吉利的話。因此，中國人很嚴肅，缺乏幽默感，很呆板，思維活力差。不同的話語習慣培養出不同的精神面貌：或者使人精神，或者使人懶散；或者使人思索，或者

使人頹廢；或者使人猶如活鮮鮮的人，或者製造一具具僵屍。

《論語》有段故事：“孺悲想拜見孔子，孔子託辭有病，謝絕見他。但傳話人一出房門，孔子便取下瑟，邊彈邊唱，故意讓孺悲聽見”。這就是孔子的“誠實”。孔子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論語》沒有一個“真”字，更談不上追求真理、追求自由了。一個公開奉行“說謊價值論”、撒謊成精的老油條被奉為民族聖人，是我民族的不幸。

儒家的“智”在中國演變為鬼計、權謀，“信”被犧牲。子貢問：“怎麼樣才可以算士呢？”孔丘說：“對自己的行為有羞恥心，出使外國不辱君命，就可以算士了。”子貢說：“請問那次一等的呢？”孔丘說：“宗族裡稱讚他孝順，鄉親們稱讚他敬兄長。”子貢說：“請問那再次一等的呢？”孔丘說：“說話定守信用，行為定有結果，這是倔強固執的小人那！也可算是次一等的了”（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君子堅守正道而不拘泥于信用）（《論語·衛靈公》）。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高尚的人，說出的話沒必要守信，所辦的事沒必要有結果，只要符合道義就行了）（《孟子·離婁下》）。孟子曰：“君子不亮（同諒），惡乎執”（君子不守信用，認真固執是不好的）（《孟子·告子下》）！

哦！原來孔孟的誠信是針對百姓、小人說的，君子、大人是沒必要遵守的，誰遵守，誰就成了“硜硜”的小人了，就不是君子了。這種針對百姓、小人的誠信，是奴才的誠信。的確，如果百姓、小人們不誠信，不老實，統治起來不就太困難了嗎？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已為厲己也；……”（《論語·子張》）（君子應先確立信譽，然後再去勞役人民，不然的話，人民就會認為君子在傷害欺騙自己）。

孔丘師徒不讓君子們講信用，但為了奴役人民，還必須做做樣子。這不是明著在教統治者怎樣去欺騙人民的嗎？表面上儒教在教人誠信，實際上他是個地地道道的欺詐教唆犯。儒教的欺騙性很強，這在“誠信”上表現得最明顯。

儒教的祖師爺孔丘就是一個說謊話、假話、篡改歷史的大師。周朝流傳下來的《詩》本有三千多篇，到了孔丘手中，他將其中絕大部分不符合自己觀點的詩都給刪了，僅僅保留了一個零頭——305 首符合其教義的詩作為儒教的教材，成為儒教的“五經”之一。

孔子鼓吹“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可他自己就不兌現。他沒做過史官，居然就敢寫史書《春秋》。他編《春秋》的原則就是避諱，即“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避諱就是為別人隱瞞醜事，為別人說謊。避諱是為了維護君主的統治。據說：《春秋》會使暴君凶父懼，使亂臣賊子懼。然此意不明顯，連梁漱溟也讀不懂“春秋以道名份”之意義。直到近代熊十力和徐復觀，才在依稀字行間發現：凡是不利於君王的話都被悄悄刪除了。

在《春秋》所記載的 240 年中，孔子的“祖國”魯國，有四個國君被殺，一個被打跑，還有一個客死外邦。如此重大的事件，《春秋》裡是一個字不提。這就是“為尊者諱”。連編纂史書這麼嚴肅的事情，都可以說謊了，那麼天下還有什麼不可以說謊的呢？《春秋》“微言大義”，“大義”乃尊“王”而已。孔丘尊周王室為正統，吳楚等自稱為王的國君，在《春秋》被貶為子爵；晉文公在踐土與諸侯會盟，實際上周襄王是被召入會的，但《春秋》卻避諱說：“周天子巡

狩來到河陽”，何謂“巡狩”？視察之意也。北宋的徽、欽二帝被金國人當了戰利品掠走，中國的文人們稱二帝“北方巡狩”；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慈禧太后倉皇西竄，清人也說“太后西安巡狩”。君子、大人們犯了“不廉”（祭貪污、受賄）之罪，不能稱為“不廉”，而是稱為“簠簋不飾”。“簠”“簋”均為盛食物的器皿，“簠簋不飾”就是吃了點不乾淨的東西。君子、大人們犯了“污穢”（男女淫亂）之罪，不能稱之為“污穢”，而是稱之為“帷薄不修”，“帷薄”是床上幔帳之類，“帷薄不修”就是床沒有收拾整齊。……

由於儒家宣導避諱，中國文化成了徹頭徹尾的撒謊文化，且令國人神經兮兮，荒誕離奇。到了宋朝，連“丘”字也要避諱。寫起來或缺一筆成“斤”，或寫作“某”，或用朱筆劃圈。讀起來或讀為“區”或讀作“休”，不一而足。丘姓也被迫寫作“邱”。大觀四年，改瑕丘縣為瑕縣，龔丘縣為龔縣。不單為聖人諱，還得為所謂尊者賢者諱。楊萬里任監司，出巡外地，州府的歌妓為他唱“賀新郎”詞。其中有“萬里雲帆何日到”，楊萬里聽後不悅，說：“萬里昨日到”。太守大懼，趕緊下令將歌妓收監。田登做太守，元宵節不許百姓說燈，下令把點燈三日說成放火三天，開創了“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千古奇跡。

孔子所創的“三諱原則”，在歷史編纂中，在日常生活中，大行其道，暢通無阻，不僅適用於大人物，也推及到朋友熟人的社交圈內。為尊者、賢者、親者而撒謊而掩飾，在公共事件中被儀式化為慶典語言，變成公共倫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私人事務中被日常化為習慣話語，變成血緣倫理的組成部分。“家醜不可外揚”的血緣倫理向社會倫理的推廣，就是“國醜不出國門”：“官官相護”之外，還有“人人相護”。特別是為國家、為民族和為政府遮醜，甚至具有大義凜然的道德正當性，撒起謊來大都底氣十足。“子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野

雞打得滿天飛，家雞打得團團轉”，縱然國家有千百個不是，作為草民也只能萬般無奈忍氣吞聲，像弱女子碰到強姦犯一樣只能閉上眼睛默默忍受到享受。

“三諱”的實質就是維護主奴秩序。在主奴秩序下，主人高於奴僕，勞心者（統治者）高於勞力者（臣民），國家（政權）高於個體，政治權力高於個人權利……皆是合理的正義的。後者為了前者的尊嚴、利益或面子而隱惡虛美，就變成了一種強制性的義務或責任。為帝王隱惡是臣民之忠，為先哲文過是弟子之義，為父母遮醜是子女之孝，為丈夫掩疵是妻妾之責。更進一步就發展為蠻橫的原諒倫理：子女要原諒父母之過，臣民要原諒祖國之錯。

“諱”“飾”和“瞞”其實是一回事，都不過是“騙”字的另一種寫法罷了。孔丘造假大體上屬於“瞞”的範疇，而他的徒之徒孫們則就“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不單單只是瞞了。孟軻為孔丘的造假行為辯護：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說話沒有真實的內容，是不好的。但不吉祥的事實，只有否定賢者、尊者的人才會說）。

“融四歲，能讓梨”，“讓”本來就是儒教所鼓吹的，最能體現其禮制精神的一個君子行為。但儒教的“讓”不可能是“真讓”，如果本性善良君子們處處真心實意地讓人，就會處處讓不知禮讓的小人占盡便宜，最終會使小人騎在君子的頭上，這豈不是亂了綱紀？為了維護乾坤綱紀，“讓”只能是有分寸的，有技巧的“虛讓”。“虛讓”使得中國人具有了一種特有的虛偽、擅長“謙辭”、說假話的本領。

中國的集體敘事從來就是掩過取功、掩惡取善。每個朝代，都大肆刪改前代的歷史，直至改得面目全非；而對於本朝的歷史，則會千方百計塗脂抹粉，拋光潤色。因此，必然禁止思想言論自由，否則謊言如何能說得下去？有意用功來掩

蓋過錯，這本身就是故意犯罪。

中國當權者不斷的掩飾自己的錯誤，死不認錯，不惜以更多的錯來掩蓋原先的錯；不斷的講大話、空話、假話、謊話、毒話，中國人的心靈遂完全封閉，不能開闊。

漢族是崇拜計謀與血腥爭鬥的民族，其權謀與暴力思想源遠流長、極其發達。中國人推崇的是狡智，老子就是中國的狡智之祖。鬼穀子主張“聖人之道陰，愚人之道陽”，即聖人、統治者可以搞陰謀詭計，愚蠢的人才張揚外露；鬼穀子還說：“聖人謀之于陰，故曰神；成之于陽，故曰明”，就是說，聖人暗箱操作，所以顯得神乎其神，他的成功被世人看見，所以可以自詡為正大光明。“兵者，詭道也”（語出《孫子》，是說要勇於裝孫子）、“兵以詐立”等詭計思想，中國人是奉為圭臬的，在西方軍事家中也非常罕見。亞歷山大大帝建立了龐大帝國，他鄙視詭計、不願偷襲。流傳下來的 3000 多部兵書，是中華民族權謀與暴力文化的典型遺產。精於“假作真來真亦假”的諸葛亮成了民族英雄；

專制是有權通吃天下，共和是有理走遍天下。共和國裡，處處有法律罩著，人們是值得信任的，無須依賴關係網，失信必遭法律制裁，正義無處不在。專制國裡人與人是缺乏信任的，因此，合作的風險是很大的，只能依靠宗族、親戚、朋友、同學、同事等關係牢靠的人，沒有的話也要創造出這種關係，劉備如果沒有桃園結義，他就沒有造反的最初力量。關係是很重要的，離開這個關係網，背信棄義是很常見的。跟親人朋友以外的人打交道，沒有權力的庇護是要冒很大風險的，法律是無足輕重的，權力才是保護神。

西元 610 年，隋煬帝搞對外開放，請外國商人到洛陽來，用了一萬八千人演節目，聲聞數十裡，一連半個月，城中商人、居民身著華衣，盛飾市容，西域商

人免費吃喝，醉飽方休。他們看見樹上纏著錦緞，就問：“你們不是還有許多人沒衣服穿嗎？為什麼把錦緞纏在樹上，不給他們做衣服？”可見，假大空古代就風行。

中國的口號向來漂亮，中國的事情向來骯髒。西元 626 年 6 月 4 日，李世民發動了“玄武門之變”，殺死了太子建成和三弟齊王李元吉及其大批隨從人員。李世民在殺人後，奔入李淵的寢宮。當時因天熱，李淵正袒露著肥胖的上身乘涼。李世民假星星地跪倒在李淵面前，一面哭，一面喊著已死去的母親竇氏，還歇斯底里地抱著李淵的胖胖乳頭吮吸著。李世民卻命人立刻去把建成的五個兒子和元吉的五個兒子全部殺死。他還把建成和元吉的家產、美女悉數奪為已有。李世民使三國時魏文帝曹丕欲殺而未殺自己的弟弟曹植，只迫令他七步成詩的事件相形見绌。李淵只好恕李世民殺害了建成、元吉的罪，封李世民為太子。李世民殘忍令人髮指，可謂不孝不悌之至的亂臣賊子。他當皇帝後就立即做秀：給死在他刀下的兩個兄弟追加封號，把他們重新安葬，出殯的時候，還登上城樓遠望，大哭一場……

太子李承乾欲殺泰，串通叔父漢王李元昌、吏部尚書侯君集等謀反。案發，廢太子為庶人，李世民把李承乾發配到黔州(今貴州彭水)而死，東宮人馬全部斬首。太宗答應立泰為太子，大臣亦有建言者；而重臣兼皇親長孫無忌則堅決請求立李治為太子。要在兩個兒子中作出選擇，真是難捨難分，他甚至哭著痛苦地說了一句“我真不知如何是好！”遂起入宮，當著幾位重臣面，心力交瘁的唐太宗說：“我三個兒子一個兄弟，所為如此，太讓人傷心，活著也沒意思！”說著把頭猛往床上碰，被人緊緊抱住了；他又抽出佩刀欲自戕，被臣奪下。你瞧，十八歲起兵，蕩平天下無敵手，殺兄斬弟那麼果敢的李世民，竟讓太子問題逼得哭鼻

子甚至要自尋短見呢！最後定下的是庸懦無能的李治，為武則天的專權篡國鋪平了道路。從武則天退位到唐玄宗即位，八年半的時間裡，一共發生了7次政變，換了四個皇帝。其中有兩次大規模的殺戮。一次是中宗（李顯）死後，李隆基（玄宗）和姑母太平公主聯手，清除掌權的韋後集團，凡韋氏族人以及投靠韋後的官員，一律殺光，“緦裸兒無免者”；再有一次是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姑侄翻臉，最後太平公主失敗了，凡屬她這個集團的人也是基本殺光。

朱元璋成為皇帝後，心裡卻感到納罕。一天，朱元璋摒退左右，獨自在剛剛修建的金殿上閒步。他回想起自己往日的貧困，不禁感慨萬端，又看四下無人，便自言自語地說：“我因為窮，被迫參加紅巾軍，原只想搞點搶劫以維持生活，不料得到皇帝寶座，實在是出於意料之外……”朱元璋話未說完，似乎聽到什麼響聲，他抬起頭來一看，不禁大吃一驚：原來在雕樑畫棟間，有一個人正在那裡刷著紅漆。因這殿剛剛修成，油漆還未完工。

朱元璋沒料到有人聽到了他的秘密，若傳揚出去，皇威何在？他暗罵了一句：“這是你自己找死！”他抬頭對梁間的油漆工叫道：“下來！”哪知油漆工根本不理睬，仍一個勁兒地刷著油漆。朱元璋又叫了一聲，油漆工仍然不睬。

朱元璋惱怒不已，喝令：“來人！”轉眼間，從殿角階下奔來了數十名手執武器的御林軍，皇帝要他們拿下油漆工。幾名御林軍應聲爬上樑柱，把那個油漆工拖了下來。

油漆工傻乎乎地跪在朱元璋面前。朱喝道：“你為什麼不下來？”油漆工仍傻乎乎地跪在地上、呆呆地望著滿臉殺氣的皇帝。朱元璋更火了，怒喝道：“孤在問你的話，為什麼不回答？”幾名御林軍也一齊喝叫道：“快回皇上的話！”油漆工仍傻乎乎地望望御林軍，又望望皇帝，口裡發出嘍嘍唔唔的聲音，雙手做

著奇怪的手勢，樣子十分滑稽。

看到這情況，朱元璋禁不住轉怒為喜，仰天發出一陣愉快的大笑，說：“原來是個聾啞人。”朱元璋揮手示意讓油漆工出宮去。油漆工走出戒備森嚴的皇宮後，突然長長地歎了口氣說：“我今天算撿回了一條活命！”原來此人既不聾又不啞，只因為在偶然間聽了皇帝的心聲，明知要被砍頭，急切間，想出了這個裝聾做啞的辦法，騙過了暴虐的明太祖。

朱熹大肆鼓吹“革盡人欲，復盡天理”。宋慶元二（1196）年，監察御史沈繼祖揭露他言行不一：他曾引誘兩個尼姑作妾，出去做官時都帶著她們；他讓守寡的大兒媳有了身孕。宋甯宗降旨要貶朱熹的官，朱熹嚇得趕緊上表認罪，不僅承認了納尼作妾等事，連幾十年“正心誠意”的大學問也不講了，說自己是“草茅賤士，章句腐儒，唯知偽學之傳，豈適明時之用”，表示要“深省昨非，細尋今是”。陳亮等人和他反復辯論多年，他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現在一看政治風向不對，馬上承認自己提倡的一套是“偽學”，要“深省昨非”了。

朱聖人為了讓男人們不受女色誘惑，發明了“朱文公兜”和“朱文公簾”。“朱文公兜”就是要求婦女出門時不准暴露身體的任何部位，要用一塊布將頭包起來，僅在眼睛處留兩個小孔。“朱文公簾”要求婦女在其房間外面要掛上竹簾子，“大門不出，二門不進”。家裡來了客人，婦女不能走出簾子，也不能隨便向外看。後世的皇后、太后要替幼年的皇帝處理國家大事，也不得不遵守朱聖人定下的規則，必須藏到簾子後面，謂之“垂簾聽政”。

中國幾千年來就是個劣性競爭的大舞臺，越是心狠手辣背信棄義表裡不一如劉邦朱元璋慈禧太后者越有可能取得成功；而越是天真仁慈的人越遭到慘敗，比如那個聖賢之書讀得很好的建文帝朱允炆。由於帝王們的無恥表演，仁義道德實

際上很早就破產了。

在儒家文化的調教下，中國卻出了更多的亂臣賊子，更多的逆子惡親，更多的荒淫暴君，更多的酷吏暴行。跟從前不太一樣的是：從前的壞人是赤裸裸的，現在呢，所有的壞人都懂得要打著仁義的旗號反仁義。殺人成了替天行道，篡位成了賢王禪讓，欺騙成為足智多謀，族誅成為社稷安危，厚斂成為充實國庫，納妾成為天倫之樂，嫖娼成為儒雅風流。做什麼事，須找一個合乎天理人情的說法，至於暗地如何操作，就沒人問了。

清朝的才子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載了幾個關於假貨的事。一件事紀曉嵐買羅小華墨（是當時的名牌），買回去一用，居然是泥搏的，染以黑色，還帶了一層白霜，利利索索地把紀曉嵐給騙了。另一件是買蠟燭。紀曉嵐趕考，買了一支蠟燭，回到寓所裡怎麼也點不著，仔細一看，原來也是泥做的，外面塗了一層羊脂。

紀曉嵐的從兄萬周，一天晚上見燈下又要和叫賣烤鴨的，買了一隻回去，竟然也是泥做的。這鴨子的肉已被吃盡，只剩鴨頭、鴨脖子、鴨腳和一幅完整的骨架。骨架裡搪上泥，外麵糊上紙，染成烤鴨的顏色，再塗上油，燈下難分真假。

紀曉嵐的奴僕趙平，曾以 2000 錢買一雙皮靴，自以為買合適了，沾沾自喜。有一天下雨，趙平穿著皮靴出門，結果光著腳丫子回來了。原來那靴子的腰是烏油高麗紙作的，揉除了皺紋紋，貌似皮子。靴子底則是破棉花粘糊的，在用布繃好。此外，紀曉嵐還講述了兩個更難以想像的假夫妻和假房客的故事。

1748 年英國海軍上將喬治·安森出版了他的《環球旅行記》，書中記載了他真實的環球經歷，這位漂流者很鄙視中國，因為他從中國商人手裡購買的物品，大多是假貨。“蔬菜像爛草一樣，豬羊的肚子裡灌滿了水，而且缺斤短兩。”中

國人的貧困、不講生活品質更讓他吃驚：“中國人搶著吃外國船上扔下來的臭肉，腐爛的貓與狗的屍體。”

美國傳教士史密斯（明恩溥）在其 1898 年出版的《中國人的特性》中說：“假份量、假尺碼、假錢鈔、假貨物，——這些在中國是在所難免的。”

之所以出現這種欺詐有理的現象，是存在“狡猾崇拜”這種民族文化。以狡猾為能事的社會，被懲罰就是講實話、正直的本分人。在一個老實人吃虧，狡猾人大撈好處的社會，誰還會去做誠實的人。一旦社會選擇了狡猾為生存規則，那樣的社會將讓人無所適從。

韋伯(1864~1920)說：中國文化裡沒有懼怕上帝的心理，所以中國人缺乏心靈的約束力量。只要不被人發現，就等於那件壞事從來不曾發生，行惡者也不會在內心進行自我的道德譴責。中國人的道德不是來自個人的內心體驗，而是一種外部壓力，是“他律”而不是“自律”。在中國人的道德中，不是不能幹壞事，而是不能在別人知道的情況下幹壞事。這是對來自社會的可能懲罰的計算與應對。中國人對是非的評判標準來自外界，所以，謊言才能夠產生、並經久不衰，因為謊言可以逃避責罰、可以保住官位甚至官運上升。儒家謹小慎微的自我控制出自要保住他的“面子”。儒家專注於自己的外表、掩飾自己，認為別人也在掩飾自我，這種普遍的不信任妨礙了信用和企業活動。沒有信任就沒有信用，沒有信用就沒有正常的商業活動，所以，資本主義在中國得不到正常的發展。

近現代社會從國家的政治、外交到民間的貿易、雇傭，都以契約的形式進行，近代社會被稱為契約社會。發達國家都把契約看作有絕對的約束力，應無條件地執行。對契約“馬馬虎虎”的中國人，易被指責為是不可信賴的夥伴。

中國由於不信仰上帝，所以，不信守合同的現象嚴重。目前中國每年訂立的

合同約有 40 億份，合同涉及的金額達 140 億元，但卻只有五成的合同履約；中國企業聯合會的最新資料顯示，我國每年因逃廢債務造成的直接損失約 1800 億元，產品品質低劣和假冒產品所造成的各種損失達 2000 億元；幾十家跨國公司產品被中國仿冒率均在 50% 左右，而各公司用於打擊假冒產品的費用為 50 萬至 200 萬美元，假冒產品造成的損失在 2000 億元以上；近年來，中國由於缺失誠信所造成的經濟損失驚人，據有關部門初步估算，從 20 世紀 80 年代迄今，共有 6000 千億元人民幣在失信的“漏斗”中流逝（《法制日報》2003 年 2 月 18 日）。

猶太人在經商中最注重信守契約。他們說：“我們人與人之間的契約，也和神所定的契約相同，絕不可以毀約。”猶太人由於普遍重信守約，相互之間做生意時經常連合同也不需要，口頭的允諾也有足夠的約束力，因為“神聽得見”。

有一個猶太人，接到美國芝加哥一個公司 3 萬個刀叉餐具的訂貨單，雙方商定的交貨日期是 9 月 1 日。這個商人必須在 8 月 1 日從本港運出貨物，才能在 9 月 1 日如期交貨。但由於碰上意外的事故，商人沒能在 8 月 1 日趕制出 3 萬個刀叉餐具。他沒有請求延期交貨並表示歉意，因為這本身是違背契約的，不符合猶太商法，並且也是逃避責任的做法。結果，這位猶太商人花鉅資租用飛機送貨，3 萬個刀叉如期交貨了，這位猶太商人損失了 1 萬元。

第 38 節 腐敗混亂 好大喜功

專制制度的實質就是權力壟斷，任何壟斷都會腐化墮落。專制統治集團權力過大，社會不能對其監督制衡，腐敗必然日趨嚴重，社會風氣日益敗壞。專制主義嚴重阻礙了人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正常發展，破壞了人類政治精神、政治倫理、政治心理和政治結構的健康成長，給人類社會帶來了總體性的災難。……

中國古代從周穆王開始，便訂出了用巨額金錢贖刑的條例，規定：墨刑（用

刀刻面塗墨)贖金黃銅六百兩，劓刑(割鼻)一千二百兩，劓刑(砍腳)三千兩，宮刑(男子閹割生殖器，女子禁閉宮中當奴隸)三千六百兩，斬刑六千兩。周穆王用這種辦法向那些犯了罪的富人奪取金錢，充實國庫；同時，也是對當時獄官的貪贓枉法、收取罪犯賄賂的一種對抗方式。從此以後，歷朝常有用金錢贖罪的規定，如漢將李廣因誤軍機判罪，在繳納了大筆贖金後免罪罷官閒居；而司馬遷獲罪下獄，由於無巨額金錢作贖金，以致被閹割了生殖器，悲憤終生。晉朝法律規定：自死罪以下都可以用錢贖罪，最重要的罪—死罪，贖金黃金二斤。

當王朝剛建立時，新的統治者鑒於前朝傾覆的教訓，希望江山千秋萬代，訂下了很多祖訓。明朝《大誥》中明確規定：凡官吏違旨擾民，或相互勾結，包攬詞訟，教唆陷人者，民眾可以“連名赴京狀奏”，甚至可以將害民官吏“綁縛赴京”。各地官府對於持誥赴京面奏之民不得阻攔，否則官吏“族誅”(《禦制大誥三編·民拿害民該吏》)。朱元璋詔告天下：“有等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違旨下鄉，動擾於民，今後敢有如此，許民間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壯拿赴京來”。即允許百姓對那些違旨擾民的官吏進行抓捕，然後送往京師問罪。

朱元璋親自撰寫的《大誥續編》中，朱元璋向全國通報表彰了常熟農民陳壽六。陳壽六率領自己的弟弟和外甥3人捆綁了“害民甚眾”的縣吏顧英，到首都告禦狀。結果受到朱元璋大張旗鼓的支持。朱元璋嘉獎他能幹，賞了他鈔票20錠(大約相當於今天1萬多元人民幣，免除雜泛差役三年，並通報全國予以嘉獎。朱元璋嚴厲警告說：若有敢於無事生非擾害陳壽六者，“族誅”；若有敢於捏造罪名誣陷陳壽六者，“族誅”。此後，陳壽六若有過失，只有朱元璋本人有權力審問他。《大誥三編》的《縣官求免于民》有這樣一個故事：在北平布政使司，相當於今天河北省樂亭縣的農民趙罕晨，率領三、四十個農民將一幫縣裡的貪官

污吏擒拿起來，押送到了首都。“事情的起因是。樂亭縣的主簿汪鐸與縣機關部門負責人一起設計了一個‘斂派徭役’。用今天的話講。就是策劃一個項目，然後把該項目與全縣的發展進步，人民幸福聯繫起來；老百姓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巧立名目，攤派斂錢。民怨沸騰之下，農民將 8 個縣機關負責人捆綁起來押送京師，朱元璋下令將其砍掉了腦袋。

朱元璋整飭貪腐最烈，規定凡貪贓白銀 60 兩以上者，一律梟首示眾，剝皮填草，風乾屍體，懸掛於衙門座位旁。自唐宋以來，政治制度、機構設置多有不同，但縣衙的佈局是差不多的，都有大門、戒石、鼓樓、二門這些結構，但在明朝卻在大門和二門之間多設置了一個土地祠。這個土地祠就是剝人皮用的。朱元璋在各州縣設有“剝皮亭”，官員一旦被指控貪污，無需審判即被剝皮，懸皮於亭中，以示警戒。這些清規戒律剝不住腐敗。因貪污罪名死於監獄或被判刑的，每年有數萬人。到洪武 19 年(1386)，全國 13 個省從府到縣的官員很少能夠做到滿任，大部分都被殺了。可就是這樣也沒能止住貪腐，官員倒是越來越少，於是在當時的史料中出現了這樣一個滑稽的記錄：該年同批放榜派官 364 人，皆為進士監生，一年後，殺 6 人，似乎不多，但後面還有：戴死罪、徒流罪辦事者 358 人。這三百多人實際上一個也沒漏掉。什麼叫戴死罪、徒流罪辦事呢？就是因為官員被殺的太多，沒有人幹活了，就只好把已被判了死罪的官員拉去審判其他的犯人，然後自己再到朱元璋那裡去領死。朱元璋歎曰：“朕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暮犯！”（明劉辰撰《國初事蹟》。卷一）。駙馬歐陽倫也因倒賣茶葉而被誅，但明王朝最終仍然陷於腐敗泥淖而不拔。

中國皇帝制度設計中的每一個細節都貫穿著這樣一個核心理念：把每一種享受都推向極端，竭盡一切想像力去繁複、誇張和浪費，直至無以復加、毫無必要、

令人厭倦。以吃飯為例，眾所周知，皇帝身上只有一個胃，並且通常並不比普通人大。但是，皇帝一個人每餐的飯菜要數十上百樣，擺滿六張桌子。崇禎帝和他的皇后每年吃到肚子裡的日常伙食費就達 16872 兩白銀，按糧價折算超過 52 萬美元（不包括每年宮內脂粉費耗銀就達 40 萬兩、鞋料費 5 萬兩），而嘉靖、萬曆等朝此項開支超過 36 萬兩白銀，即超過 1000 萬美元；而美國總統克林頓的年薪才 20 萬美元、俄國總統普京年薪 3.3 萬美元。明王朝有 10 萬宮女、10 萬太監（明亡時宮中還有太監 7 萬余人），幾十萬皇族王孫，這對人民是怎樣的負擔啊！

清代在中國歷史上最儉樸的朝代，宮中規定，皇帝一人每天消耗食品原料的定額是六百斤：盤肉二十二斤、湯肉五斤、豬肉十斤、羊兩隻、雞五隻（其中當年雞三隻）、鴨三隻、白菜、菠菜、芹菜、韭菜等蔬菜十九斤、蘿蔔（各種）六十個、蔥六斤、玉泉酒四兩、青醬三斤、醋二斤以及米、面、香油、奶酒、酥油、蜂蜜、白糖、芝麻、核桃仁、黑棗等數量不等。此外，還要每天專門給皇帝一個人提供牛奶一百二十斤，茶葉十五斤……為了給皇家生產衣料，清代專門在三座城市設立了規模巨大的工廠。為儲存皇帝的衣服，專門建有數間殿宇作為御用衣服庫，為管理這些服裝，專門成立了擁有數十名辦事人員的尚衣監。末代皇帝溥儀在回憶他那實際上已經是大大沒落了的帝王生活時說，“衣服則是大量的做而不穿。”“一年到頭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麼，我也不知道，反正總是穿新的。”（《我的前半生》）據他後來翻檢檔案，發現僅僅一個月內，內務府就為他做了四十九件衣服，這些衣服，當然絕大部分都永遠白白貯存庫內，從來沒有機會上皇帝的身。

扶貧賑災、禦敵平亂，不僅物資被層層克扣、侵佔和濫用，最後到災民和士

兵手中時已所剩無幾，而且會以此為名義掀起新一輪對民間的掠奪和搜刮；治理江河、興修水利，則會搞出大量的貪污腐敗和豆腐渣工程。

乾隆時空前的腐敗。乾隆 14 年至 33 年，兩淮鹽官共侵吞官銀 1900 萬兩；46 年，哈密通判經方貪污官銀 15 萬兩。乾隆 46 年，甘肅省官員串通一氣，用賑災的名義集體私分巨額公款。全省沒一個官員是乾淨的，也沒一個官員舉報。案發後，乾隆氣得發抖，連連大叫說：“官官相護之風，舉朝皆然！”他嚴令重懲：封疆大臣、甘肅總督勒爾謹被賜自盡，藩台王亶望、蘭州知府蔣全迪斬首示眾，接任藩台王廷贊處以絞刑，共計處死大小官員 47 名，被革職下獄的 82 人，11 名賊犯之子被解送新疆伊犁做苦工。甚至一個外省官閔鶚元因為給其弟閔鵬元藏了贓銀三兩，也被降了三級，並停發了三個月的“養廉”。唯一逃脫懲辦的只有按察使福寧一人，他是因為案情即將敗露時首先坦白交待，並積極檢舉揭發，獲得寬大處理。

乾隆 47 年，皋蘭等三十四廳、州、縣貪污國庫金銀和官倉糧、草。案發後，乾隆更為火冒，下旨嚴辦，殺了大小官員 56 名，免死而流放充軍的 46 名。州、縣、道、府、藩司、督撫被勒令攤賠 42 萬兩白銀。同年，山東又出現國庫因被侵吞而虧空 130 萬兩，除令在兩年之內由山東省各級官員如數補足外，殺了 4 名知縣，1 名巡撫，另有 1 名布政使令其自盡。

乾隆 57 年，浙江發生鹽道運使柴楨截貪商人應繳納錢糧案，浙江巡撫福崧一人就侵吞鹽運款 11.5 萬兩；結果是柴楨和巡撫福崧處斬，柴楨的管家柏順因替柴楨出謀劃策，被判處絞刑。另外，兩淮鹽政全德降為郎中，藩台景照撤去職務發配伊犁充軍，道台明保、張慎和撤職發往軍台效力贖罪。乾隆 60 年福建全省虧空 250 萬兩、糧谷 64 萬石。

諸如此類的大案、要案，乾隆皇帝處置起來毫不手軟，甚至若干小的貪污、索賄案，乾隆也動輒以撤職、充軍和殺人來對待，以期吏治清明，江山永固。

最為露骨的是，一邊追贓，一邊又貪贓，追贓官把追到手的贓款納入私囊，贓上加贓。如：乾隆 46 年甘肅集體貪污大案發現後，奉旨追繳查抄藩台王亶望的家財時，登記冊上明明寫著金條、金錠 4748 兩，而上報內務府的冊上只列著金葉 9 兩 3 錢，懸殊大得驚人，等解到內務府時，這區區 9 兩 3 錢金葉也不翼而飛，其膽大妄為、頂風作案，曠古罕見。

愈懲貪而貪污愈盛行，愈倡廉而吏治愈腐敗。其根子在專制政體，表現在皇帝本人身上。中國的專制帝王，比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國王所享受的都要優越，而且誰也不敢提出異議，提出異議就是目無聖上，就要遭受懲處。乾隆皇帝堪稱最會享受的皇帝。他大張旗鼓整治貪官污吏，獎勵廉潔臣子，但他又帶頭肆意揮霍國庫。他大肆營造宮殿、園林，極盡豪華壯麗。

更為露骨的是：乾隆帝還發明了多種公開勒索盤剝官員和富戶的手段。僅舉幾例：

(1) 交納“議罪銀”：凡官中犯有某種過失，或皇上認定某官犯有某種過失。犯過失的官員便向皇帝自行請罪，並根據過失大小交納數量不等的“議罪銀”，多則數十萬兩，少則幾萬兩，以換取皇恩寬恕。這些數量巨大的金銀，一般都不入國庫，而直接解交內務府廣儲司庫，作為皇室的私蓄——這是皇帝公開貪污。

(2) 乾隆皇帝曾六次南巡和多次東巡，每次出巡，都示意要沿途貢獻禮品，於是沿途大小官員只好爭相呈獻巨額金銀和奇珍異寶。乾隆沒經過的省、州官員，為了討好皇上，也競相搜羅寶物進獻——這是皇帝公開勒索。每次都是上萬人的

隊伍，地方官員就建起行宮、備好美味佳餚款待。道傍破舊民房，因有礙觀瞻，都被勒令拆除，致使大批黎民流離失所。所到之處，幾乎都被洗劫一空。乾隆皇帝的一次出巡中，內務府官員記載道，為供應皇帝路上的飲食，他們提前把 1 千隻選好的羊、3 百頭特選的牛以及 75 頭專用的奶牛帶上車。在數千里的出巡路上，皇帝只喝四眼泉裡汲出來的水：北京的玉泉山泉、濟南的珍珠泉、鎮江的金山泉、杭州的虎跑泉。為皇帝運送泉水，專門成立了一車龐大的車隊。在炎熱的夏季，幾十萬斤冰塊從北京提前運送到路上，以備皇帝口渴時能吃上冰鎮的西瓜……為了防止皇帝回去的路上因為重複的風景而感到厭煩，“歸途還必須另修一條道路”……

乾隆第一次南巡後，有人假託工部尚書孫嘉徐之名寫文章指責並私下流傳，乾隆竟然興起大獄進行追查，牽連下獄達上千人。江蘇省學政（教育廳長）尹會一，曾上奏章勸阻，奏章上說：“民間疾苦，怨聲載道。”弘曆光火說：“民間疾苦，你指出什麼地方疾苦？怨聲載道，你指出什麼人載道？”侍讀學士紀曉嵐因主編《四庫全書》而被人尊重，就趁機透露江南人民的財產已經枯竭，弘曆大怒說：“我看你在文學方面有一些根基，才賞賜了一個官兒作，其實，不過是當作娼妓和戲子一樣豢養罷了，你怎敢得寸進尺，妄議國家大事呢”？乾隆重複的是漢武帝說過的話，《資治通鑒》有明確記載。於是，乾隆皇帝決定置紀曉嵐置於死地而後快。有一次，紀曉嵐鸚鵡學舌地說出宋儒“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時，乾隆就立即抓住這個機會，命令紀曉嵐立即去死……紀曉嵐無法，只好遵命去投水自盡。紀曉嵐緩緩躑躅到水邊，突然回去跪見乾隆皇帝道：“固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臣走到水邊，正要投水，卻遇上一個人，把我罵得狗血淋頭。臣才不敢貿然去死。待臣回奏皇上後，臣才敢去死。”皇帝說：“你遇

上誰了呀？說了什麼？”紀回奏道：“臣正要投水，屈原從水中冒出來罵臣曰：

‘臣不幸遭遇楚懷王這個無道昏君，才迫不得已投水而亡。而今皇上是何等聖明仁智！你投水而亡，將置當今皇上如何地？’臣實不敢隱瞞，故回來奏明皇上，請吾皇聖裁”。乾隆皇帝明知紀曉嵐在胡說八道，但因紀曉嵐的馬屁拍得實在妙、實在高明，拍得他心花怒放，於是哈哈一笑，赦免了可憐巴巴的紀曉嵐……孫靜庵在《棲霞閣野乘》說：“河間紀文達公，為一代巨儒。幼時能於夜中見物，蓋其稟賦有獨絕常人人者。一日不禦女，則膚欲裂、筋欲抽。嘗以編輯《四庫全書》，值宿內庭，數日未禦女，兩睛暴赤，顴紅如火。純廟偶見之，大驚，詢問何疾，公以實對。上大笑，遂命宮女二名伴宿。編輯既竟，返宅休沐，上即以二宮女賜之。文達欣然，輒以此誇人，謂為‘奉旨納妾’雲。”

(3) 舉辦各種壽誕盛典，通知舉國賀壽獻禮。按滿清定規：每當皇帝或皇太后整旬壽誕，便要大規模地慶賀，乘機向朝中大員和各省地方官員及富商大賈進行攤派勒索。到了乾隆時代，這種“報效”勒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每次慶典的收納金銀都在 100 多萬兩至 200 萬兩，幾乎相當於一次戰爭的經費消耗——這是皇帝的公開索取賄賂。

除了富商大賈是掏的自己的腰包外，官員交納的經費竟是名為“養廉”（俸祿外的補貼）的銀兩。據史料記載：“所有王公大臣、八旗、各部院官員應交經費，行令戶部在俸廉內分別坐扣”、“各省督撫應交經費，按其通省養廉數目，量其多寡，酌量令其扣繳十分之二五”。本來是用於培養廉潔的錢，結果變成向皇帝賄賂的贓款，荒唐、滑稽到了極點！

皇帝帶頭公開貪污、勒索、收取賄賂，吏治怎麼會不腐敗？在專制政體裡，廉政只是一塊漂亮的畫著羊頭的招牌，在這塊羊頭招牌下，賣的全是貪污賄賂。

乾隆時代全國最大的貪污犯和珅一直受到皇帝的寵倖，乾隆三次派和珅去查辦貪贓案，給和珅提供了在全國貪贓枉法的巨大機會。他將乾隆晚年的四方貢物的十之八九都扣下，據為己有，還買通太監從宮中偷竊珍寶。和珅像一個無底的洞，全國官員們的賄賂鉅款，瀑布般地傾注到裡面。1799年，乾隆逝世。**新任皇帝立即把和珅逮捕處死，清算他的財產時，總數有9億兩**，這還不包括他家人們貪污的龐大數字。那時國庫全年的總收入才8千萬兩，和珅當權20年，貪污的數目等於12年的全國總收入，使人驚駭。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於1715年逝世時，全部財產僅2千萬法郎，已招全國的唾罵，以當時的幣值，一兩折合3.75法郎計算；這位歐洲雄主的財產不過是中國一個貪官財產的1/170；而16世紀的貪官嚴嵩，只貪了2百萬兩，不過和珅的1/450。

比起皇帝來，和珅又是小巫見大巫。乾隆在位時想方設法進行搜刮，每年他的壽辰時文武百官都要進獻，一次所收金佛就多達1萬尊，其80壽禮之黃金編鐘就重達1萬3千多兩。

開明專制者最多只會克制濫用特權，而絕不會放棄特權。哪怕皇帝比較廉潔清明，或者再出一兩個包清天之類的人物，也無法挽救整個官僚體系一天天腐敗、墮落下去。因為專制主義只會一層層地向下複製，一代代地向後複製，而不可能複製出契約體系。

專制政權一定會追求“有所為”、“大有所為”，因為對權力已經沒有了有效的規範和約束。獨裁者會無視“有所不為”的原則和要求，好大喜功。這種“有所為”定會給社會和人民帶來傷害和災難。

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也就是說：當三年清官，就可以至少貪得“十萬雪花銀”，而且貪得“十萬雪花銀”是小菜一碟，不算貪污，還是清官。可見

無官不貪。

梁啟超認為李鴻章是清官，在李鴻章病死時他為李算過帳，“家資逾千萬，其弟兄子侄私財又千萬餘元”。實際上，梁算的賬不全，因為李家擁有的數千頃土地沒算進去。留學美國、辦過洋務的容闈對李鴻章的富有估計說：“絕命時有私產四千萬兩以遺子孫”；到過中國的西洋人也有同樣的估算。“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詩句，形象地刻畫了李鴻章大發洋務財的貪婪相。李鴻章辦洋務中大撈油水，不需自己動手，光是手下人的“孝敬”就把他喂肥了。

李鴻章不僅收受下級官僚的賄賂，而且在辦理外交中，外國賄款也照拿不誤。1895年，翰林院張謇等聯名向朝廷奏參李鴻章，揭露說：“……倭來船則放之，倭運開平煤則聽之，倭諜被獲，非明縱則私放……軍械所歷年所儲槍炮多被監守盜賣。……有銀數百萬，寄存日本茶山煤礦公司，伊子又在日各島開設洋行之所……”。李鴻章作為朝廷大員，對日本侵略聽之任之，只顧自己發財，李氏父子既然是這樣的人，難怪日本在甲午戰後與中方談判賠款條約時，點名要和李氏父子談，而拒絕清廷派遣的其他人選。

沙皇冬宮檔案記錄證實，1896年6月，出賣中國主權的《中俄密約》簽訂的第二天，由道勝銀行要員牽線，經欽差大臣李鴻章過目，沙俄財政大臣維特簽字同意，雙方私下簽了一項議定書：如中東鐵路修築成功，道勝銀行撥出300萬盧布給李鴻章作酬謝。分三期付款，首期100萬在清朝皇帝正式批准條約後付款，二期100萬在全線測量結束、築路合同簽訂時付款，三期100萬在鐵路完成時付清。道勝銀行中國分行帳冊中專設“李鴻章基金”帳戶，從1897年起，先後支付五次，總額達170.25萬盧布的賄賂（有李鴻章派人提取款項存條和當日提款的記錄）。由於沒有得到俄方許諾的全額款項，李鴻章的兒子李經方曾抱怨說：

“俄國人花小錢辦大事，最不講信義，老爺子為了他們挨了多少罵，最後跟打發要飯的差不多”。其實，在此之外，李鴻章還接受過俄方另一筆賄賂：1898年3月22日，沙俄給李和總理衙門張蔭桓各50萬元賄賂（張蔭桓實得25萬），旨在催促中方儘快簽署《旅大租地條約》和稍後的《續訂旅大租地條約》。李鴻章在俄國人指定的時間之內完成了“任務”，使遼東半島實際成為俄國獨佔的殖民地。可見，李不僅大發洋務財，而且還發賣國財。

專辦洋務的、李鴻章的乾兒子盛宣懷，被李誇為精通洋務、商務，委以重任。盛宣懷“挾官以凌商，挾商以蒙官”，左右逢源，官運亨通，且精於算計，很會撈錢。甲午海戰，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李鴻章因簽訂馬關條約聲名狼藉，盛宣懷受牽連被彈劾。當時的電報局副辦經元善譏諷盛宣懷，“一手撈十六顆夜明珠”，極言其貪欲之大。立憲派的湯壽潛揭發，“輪電礦政，國無寸效，徒以使盛宣懷之損中益外，化公肥私”。盛宣懷辦洋務，善於“借雞生蛋”，一是大舉外債。如以修鐵路為名，一年之內使外債猛增兩個億。二是從民間大量融資，然後又炮製“鐵路國有”政策，把民間資本一腳踢開。盛本人從中大牟私利。最後釀成“保路風潮”，四川等地紛紛要求殺盛宣懷以謝天下，盛不得已逃到日本。1916年，盛宣懷去世，他的遺產超過了李鴻章，達近億之巨。其女婿邵洵美曾擁有上千萬家產，受到魯迅先生的嘲諷。洋務運動失敗，李、盛卻在辦洋務中撈足了錢財，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發洋務財的，當然不止他們兩個。上至太后老佛爺，大內總管李蓮英，下至具體經辦洋務的胥吏，或多或少均有“收穫”。若說李、盛發洋務財還用了點諸如股票、招商、經營企業之類的經濟手段，那慈禧等人就純屬超經濟的強奪。顯例之一當數“昆明換渤海”修造頤和園。修園總費用至少五六千萬兩，除了戶部

積餘和公開賣官所得兩千萬兩，其餘都是挪用海軍軍費。北洋水師是李鴻章辦洋務的重中之重，但從光緒十四年起，慈禧叫李鴻章每年拿出二百萬兩移作造園費用，只好停購鐵甲炮艦，並“以海軍之人以督大工修頤和園”，當真把昆明湖作渤海經營了。修園費用原本預算 1000 萬兩，後來不斷追加，窮極富麗，以至翻了幾倍。內中原由，據說宮中成例是“三成到工”，“胥吏輾轉克扣，到工者十得二成而已”。一大半銀子落入個人腰包。建成後的頤和園每天開支在一萬兩以上。清廷最高領導慈禧竟以強權大揩洋務之油，用於個人享樂，底下大小官員紛起效尤，發些洋務財，又何足道哉！

第 39 節 專制政治是徹頭徹尾地犯罪

專制主義政治集中暴露了人性中惡的一面：自私、野蠻、殘忍、不文明和非理性。專制主義在本質上是反人權、反人類、反宇宙、非理性、扭曲人性和玷污人的尊嚴的一種體制、文化和行為模式，是一種徹頭徹尾地犯罪。

1· 專制主義將人置於獸性的控制下

專制主義以“強權就是真理”、“強力就是正義”為其根本的行為原則和罪惡的精神支柱，以“國家”和“法制”的力量公然破壞一切文明與進步，助長了最原始的野蠻與殘暴，使人類社會賴以維繫和發展的自由、平等、博愛、正義、良心、人性尊嚴等等基本價值倍受摧殘、分崩離析乃至喪失殆盡，專制主義將人置於獸性的擺佈之下。

專制制度下，國君將國土視為自己作威作福的專有領地，將國民視為可供任意驅使的家奴。《孔子家語·執轡》雲：“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轡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禦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君臣關係被界定為馭者、銜轡與牛馬的關係，一切臣民都是帝王的工具，帝王治國猶

如鞭笞天下。“萬民為馬”，何貴之有？

全體臣民實際上都是被武裝劫持的人質！合其意者，留；不合其意者，或誅或刑，無所不用其極。政府從來不把人作為目的，而只是把王朝作為目的，把王朝的江山穩定作為目的。所有的人都要為王朝而任勞任怨地、幾十年如一日地勞作。王朝不是為實現人權而設的，恰恰相反，人的生存和發展卻要以王朝的旨意為方向、為目的。在這樣的社會裡，一切人權思想甚至神權的存在，都構成了對皇權的挑戰，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在西方一些不言自明的公理，中國人想一下都是殺頭之罪。社會各階層之間沒有平等可言，大特權可以隨意剝奪小特權，小特權可肆意欺壓沒特權的百姓，在權力意志橫行的社會裡，人民哪有尊嚴可言呢？這種非人的制度存在多久，中國人民就在這種罪惡的制度中垂死掙扎多久。

專制主義的本質是，無論在事實上還是法律上都不存在對統治者不受制衡的權力的挑戰。“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在中國人的思維裡是不存在的；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結果：導致最需要監督制衡的公共權力，在中國的社會裡，是最缺乏監督制衡的權力。孟德斯鳩說：“專制國家有一個習慣，那就是下級給上級送禮，而上級對下級沒有任何義務，於是上下級合夥對人民沒有義務。人人都認為每個上級對下級都沒有義務，只有人民對各個上級有義務。人們認為彼此之間的唯一聯繫就是一部分人加給另外一部分人的懲罰；是一大部分人為一小部分人提供利益。……在那裡，人的命運與牲畜別無二致，只有本能、服從和懲罰”。由於全社會的權力崇拜情結，助長了國家權力的惡性膨脹。在中國，國家權力被理解為統治權，即對全體國民的統率治理權，甚至是將人民看成牛羊，可以進行隨意宰殺。帝王對人民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官吏們也擁有矯詔侵害人民的權力。“甯不聞滅門令尹耶？”。一個縣官，其權力

足以滅你的門，你說這種絕對權力可怕不可怕？

中國的老百姓就是那無法逃跑的可憐小白鼠。某博士曾把小白鼠分成甲、乙二組，然後電擊它們。甲組的小白鼠受電擊後，立刻奔向另一端的幾個小門逃走。乙組的小白鼠，在受電擊後，由於無門可逃，它們四處奔碰壁，直撞得精疲力盡甚至撞昏。在試驗若干次之後再做電擊，甲組小白鼠，照樣從小門逃走。可乙組的小白鼠，在接受電擊後，卻不再有任何反應，它們趴在地上，無奈的承受，不再掙扎。唯一的盼望就是電擊早一點停止，或不再電擊到自己的身上，而電擊到別只小白鼠身上。西方的老百姓如古羅馬的平民反抗貴族的撤離運動就是逃到山上和海島上。魯迅唉聲歎氣地說，別國的硬漢比中國多，因別國的淫刑不及中國的緣故。強權的棍棒和屠刀塑造了中國人膽小的奴隸性格。面對強權、面對一切非法的強暴，中國人總是選擇屈服、選擇忍耐、選擇“打落牙齒和血吞”！中國人的忍受能力特強，等到忍無可忍起來反抗時，往往就背離了正義，魯迅曾說“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中國人什麼殘忍的事都做得出來，什麼卑鄙的手段都使得出來。以黑暗對付黑暗，結果心靈變得無比的陰暗，成了渾身是毒的老毒物——暴民：見人就殺、有火就放；以血還血，血流得更多；以暴易暴，得勝的是更殘暴。用流氓手段挫敗敵人，自己成了流氓。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人們也是用非正義的方式去追求正義的目標。每個人都作出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結果卻進入一個負反饋和逆淘汰的惡性循環。

2· 中國的老百姓連奴隸都不如

專制實行動物的統治法則。專制統治下的人依然停留在動物狀態，其處境有時比動物還要可憐。在擺脫專制的地方，人才算真正過上了人的生活，才算是進入了文明狀態。

在君主專制的中國，君主既是上天派往人間的神明，又是人世間的唯一主人，偌大一個中國，只有他一個人在生活，“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百萬千萬億萬被統治者——無論是大官，還是小民——只不過是君主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君主使用的工具或用具。只有統治者一個人的生活，被統治者不僅沒有生活，甚至於連君主生活的旁觀者也算不上，生活的美酒永遠只能是君主舉在手中的一杯千年陳釀，生活的主旋律永遠是君主親手譜寫的一曲千載老歌。

中國的專制社會只養一條龍，那就是皇帝。他怕別人“取而代之”，便不惜一切手段去摧殘和打擊個體的龍性，造就絕對服從、絕對聽話的應聲蟲。在造蟲的環境裡，別說成龍了，就是連個長蟲（蛇俗稱小龍）也養不出來。中國的社會結構較類似螞蟻模式。螞蟻社會嚴格分工，工蟻的生殖功能被閹割。在蟻群社會裡兵蟻一方面具有保衛和掠奪的功能；另一方面出於對社群而非對於蟻后的忠誠，具有換掉不合格的蟻后，保證社群新陳代謝的功能。

儒教強調的是類似蟻后的領導者——皇帝至高無上的地位；中國的老百姓的確是蟻民，連奴隸都不如，他們只是工蟻。在儒教社會，皇帝首先考慮的是兵蟻更換蟻后的威脅，所以必須對有才幹的武將除之而後快，以便從源頭上杜絕社群的糾偏行為。王夫之說：“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鑒陳橋之已事，懲五代之前車，有功者必抑，有權者必奪，即至高宗，微弱已極，猶畏其臣之強盛，橫加侵削”。武將越能幹，死的越快；只有貪鄙無能的武將是可使用的。從生物學上看中國的傳統社會結構徒具螞蟻模式的外形，卻沒有螞蟻模式的合理內核，不能保證自我糾正，而具備一種自我自我毀滅的趨勢，是一種失敗的社會組織結構。

扼殺忠厚的奴才，必然鼓勵狗才。狗才有三個特點：吹牛拍馬向上爬；賣友

求官喜告密；造謠中傷壓同行。專制者不知道誰是異見者，這就需要告密。告密者出賣了他人的隱私，知道對方隱私的，不是親戚，就是朋友。連親戚朋友都出賣的人，其道德墮落的程度可以想見。

對內拼命打擊的結果，必然是對外侵略抵抗的減弱。所以漢族屢屢南遷甚至亡國，中國的漢奸就特別多。大漢奸雖然是外力的奴才，對內卻可以當主子。長期的專制統治孕育了世界上最膽大妄為卻又奴性十足的一個群體，隨時準備依附於一個最高權力或最強暴力，以便可以做不公不義的事情而不受到懲罰。對奴隸來說，做異族的奴隸和做本族的奴隸並沒有多大區別，在哪個強者統治下還不是一樣交錢納糧，還不是一樣不被當作人看待？

滿清政府進北京，靠的是吳三桂出賣國家，而不是靠了自己的弓馬嫻熟，所以有“小兵臨大國”之感，大概與柳宗元的寓言故事“黔之驢”一樣，剛剛得到貌似龐然大物的驢子，有無從下口之感。一旦認識了驢子的脾氣，那個小老虎，再也不怕驢子了。滿清統治者認識到，制服中國這頭驢子，只要抓住所謂的“儒學禮教”，也就掌握了制服中國的全部靈魂。於是，滿清政府幾乎一字不改，把中國幾千年不變的儒家思想繼承下來。滿清統治者用這種中國土生土長的儒家思想，管束為它賣命的漢奸吳三桂之流，一旦吳三桂開始反叛，它便舉起儒教的大旗，毫不手軟地加以鎮壓。此種方法十分見效，儒家的“忠孝”思想，使中國人一致口誅筆伐“三藩叛亂”，因此，滿清統治者也很快地在中國人的支持下，剿滅了“三藩叛亂”。同樣，他們也用這種方法，招降明王朝的舊臣，譬如皇太極的老婆孝莊，就曾親自出馬，用儒家禮教說服明朝經略大臣洪承疇。孝莊不但用自己的身體給“既好色、又好男風”的洪承疇以性欲的享受，還用儒家禮教與洪承疇溝通思想，她讚揚洪承疇的“忠孝”，也告訴他“明珠暗投”不符合儒家

禮教，“士為知己者死”，“不為不知己者死”。於是，洪承疇在既“洗身”、又“洗腦”的作用下，從儒家禮教之中，找到了當漢奸“名正言順”的理由，那就是“滿漢一體”。爾後，這種思想一直是滿清統治者統治中國的法寶。

3· 專制導致主奴根性

專制誘致了畸形人格的形成。具體表現是：一是國人的劣根性——主子與奴才人格的統一。當一個人有權時，主子人格占主導地位；當一個人無權時，奴才人格占主導地位。同一個人，對上級而言，他是無權者，對下級而言，他又是無權者。所以，在權力不均衡的等級制環境下，一個人只有實現主奴人格的有機統一，才能為自己創造一個好的生存和發展條件。

“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幾千年來，不管是在清醒的意識裡或在潛意識裡，早已成為大多數炎黃子孫的政治理想。“人皆可以為堯舜”和“匹夫可以為天子”正是儒家文化“內聖外王”文化的表現形式。炎黃子孫如果有什麼政治共識，那就是在有帝王霸權思想這點上。炎黃子孫如果有什麼是平等的，那就是在人人有做皇帝的潛在資格上。貴族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之！”小吏劉邦說：“大丈夫當如是也！”木石姻緣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句話體現中華民族的性格，而且說這就是反抗暴政！這完全是胡說！“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不過是說：你能當奴隸主似的皇帝，我也可以“取而代之”當奴隸主似的皇帝，不過我目前暫時是奴隸而已，這叫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奴隸們受慣了豬狗的待遇，逼急了造反，成功者便成了新主子。新主子的殘暴一點不亞于先前的主子，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陳勝一旦稱王做了一個暫時的奴隸主，就殺了來看他的做長工的同事，怕別人知道他過去的奴隸遭遇，壞了他做真命天子的好事。從個故事可以看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表達的是一種奴隸主的野蠻性格。這充分說明了欣賞

者的本人野蠻性和文氓性！

專制國裡人人是奴隸，人人又是奴隸主。有權的人是無權的人的主人，權大的人是權小的人的主人，上級是下級的主人，下級是下下級的主人，富人是窮人的主人。共和國裡人人是平等的，不論財富多寡、地位高低，人們在政治上是平等的，掌握權力的人不會永遠佔據這個權力，權力是有限的，通常是有期的，是要按法律行使的，是為公民服務的，人們服從權力是服從法律，每個人都有法律保障的自由，都是平等、安全的。

主奴劣根性者，不可能平等待人；“在外做奴才，在內做主子”，淵源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於是，漢族在皇帝面前做奴才，離開皇帝做主子；高官面前做奴才，離開高官做主子；面對強者做奴才，面對弱者做主子；面對洋人做奴才，面對國人做主子。專制滋長奴性；奴性可以為一個主子服務，也可以為別的主子服務。儒奴們可以在女真人的刀尖下賣國求榮，可以為蒙古人的鐵蹄去牽馬墜鐙，可以在滿族人的剃刀下引首就戮，還可以在日本人的“維持會”裡苟且偷生。從跪伏於遊牧民族，到俯首於商業民族，儘管服裝、禮儀各異，奴魂如一，正是此輩之普世價值也。總之，都是一副奴才相和奸相，心甘情願地踐行著“在外做奴才，在內做主子”的惡習，最終成為賣友求榮、賣國求榮的敗類。

而且中國存在著把“主子和奴才”予以制度化的“太監制度”——閹割男人的生殖器官，徹底消除了男人的生理欲望，既說明了“太監制度”的殘酷性，又說明了有人甘願做奴的劣根性。但是，太監又決不會放棄做主子的任何機會。皇帝的重要特權就是國人的最高主子，無償地佔有全國的男人和女人，尤其是無償地佔有著女人的肉體，並形成了“宮女制度”——關進“深宮”不得見其它任

何男人！而唐朝的女皇武則天也在事實上養著“宮男”，迫使“宮男”取悅於自己，不得取悅於她人。可見這種劣根性是多麼地醜陋、多麼地無情殘忍。中國專職社會的“改朝換代”，換了皇帝——主子，換了大臣——奴才，不換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子—奴才”的精神和意識機械地照搬照用，延續了兩千餘年。

二是羊人格與狼人格的統一。當一個人是主子時，殘暴的狼人格占主導地位；當一個人是奴才時，柔弱的羊人格占主導地位。儒家通過仁義禮制勸人民順服統治、法家則通過嚴刑峻法使人民服從統治；他們把人民變成了馴服的羔羊，而對於統治者這匹惡狼來說，基本上沒有制約的辦法。而歷史上的文字獄把知識份子變成了戰戰兢兢的待宰之羊。無數順昌逆亡的教訓使大家明白，最佳處世哲學就是多磕頭、少說話，循規蹈矩當順民。孩子自幼便接受家長的磕頭下跪教誨，往往沒有學會走路，先學會了磕頭，這樣的羊文化薰陶陪伴國人終生。由於磕頭下跪不是發自內心，而是出於被迫、無奈和盲從；獲得尊嚴的渴望與不得不屈辱地磕頭下跪，形成了國人的扭曲人格。經過一代代人汰優擇劣的複製遺傳，國人缺少公共精神之程度天下少有，這樣的民情也為專制獨裁在中國發展提供了最佳土壤。

專制制度在把統治者變成魔鬼的同時，也把被統治者變成了奴隸或者小鬼。專制主義把人變成羊、專制主義又把羊變成了狼，這種政治文化惟獨不能使人成其為人。專制使人暴虐，專制使人愚昧，而極端可惡的專制，正如托克維爾所說——使人民墮落。

正義的政體塑造著勇敢、善良、正直、互助、富有創造力的國民；非正義的政體製造懦弱、卑鄙、無能、邪惡、自私自利的國民。專制主義嚴重毒化了人民

的心靈，阻礙了人民自身的改善。在專制主義高壓政策和愚民政策之下，廣大人民無時不刻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邪惡、黑暗、貧窮、骯髒、非人道、不體面以及人人自危的惡劣環境，加之剝削、壓迫、疾病和戰亂，致使他們形容枯槁、性格扭曲、心理變態、精神抑鬱、身心倍受摧殘。……

專制的動力是利益、生存、物質上的好處，活得比別人更好，因此，人最終墮落為跟動物無異。共和國的動力是美德、幸福、共同富裕、平等、自由、正義。品德對專制來說是有害的，在專制國裡，正直、良心、正義、責任感、見義勇為、知識、才幹都是危險的，知識越多越反動，因為知識越多思考越多，想法越多，看見問題越多，知識越多就越難管理。人們成功獲取物質滿足和權力不是依靠知識、能力，而是依靠陰謀、權術、出賣靈魂。奴隸主儘量濫用權力，謀取個人的利益，奴隸則為了生存，還有什麼事幹不出來呢？

第六章 專制主義的制度

第 40 節 任命制

專制國家的官員任免都採取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官員都服從上級，最高領導人直接指定接班人。在封建社會，官員的任用主要途徑是科舉制，儘管有科舉制有弊端，但是，在主流上，還是能遴選到憂國憂民，德才兼備的官員；在今天世界的民主制度下，政府主要官員通過選舉產生，政府公務員通過考試選拔產生，因此，官員絕大多數都是合格的，勝任的，清廉的。在共產奴隸主義專制政權下，實行的是人類歷史上最反動、最腐朽、最落後的幹部任用制度。十月革命後列寧從儘快接管地方政權考慮，不得不採取幹部委任制，而史達林卻把委任製作為任用幹部的惟一方式。這種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導致幹部只對上負責，不用對下負責；

只怕領導批評，不怕群眾反對；必然帶來官壓迫民的官僚主義。

共產黨任用和提拔幹部，雖然公開講要“任人唯賢”，但實際上的任用的是“三種人”；這就是“用親人”（指子女、親屬）、“重親信”（即唯命是從、能無條件貫徹上級意圖的吹牛拍馬者）、“唯黨員”（自“反右”運動後科長以上的幹部基本上都是中共黨員）。在腐朽落後的“共產”奴隸主義制度下，完全由帶著“共產黨”帽子的大大小的奴隸主一手遮天，“共產黨”奴隸主任命官員的準則是“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那些善於政治投機、媚上壓下的幹部總是被一再提拔重用，而對現行政策的批評卻被百般地打擊。因此，遍地都是昏官、貪官、庸官；其後果可想而知。共產奴隸主義專制政權下，官場升官的鐵律是“不跑不送，向下運動；只跑不送，原地不動；又跑又送，立即重用”。如果白費錢財、未達到目的，一怒之下就會“殺官”。

陳泱潮先生在其名著《特權論》說：“任命制歷來是專制統治者用以維持其官僚軍事機器的通靈寶玉。一方面是當權的官員若不安置一群宵小，把一部分權力分給他們，就不可能篡奪非法的權力；另一方面，企圖升官發財的鑽營利祿者同意戴上枷鎖為的是反轉來能把枷鎖套在別人身上。由於權力的腐蝕性，任命制總是有利於剝削者、壓迫者結黨營私、藏垢納污、搞專制恐怖”。共產奴隸主義專制政權下，“優汰劣勝”的逆向淘汰用人制度，只能讓有知識、有才能、有良知的社會精英慘遭到逆向淘汰，而讓一批不學無術、胸無點墨、素質垃圾的社會渣滓依靠投機鑽營、溜鬚拍馬、行賄買官而竊據官位，讓一群貪官、昏官、庸官在官場上大行其道，狗苟蠅營，尸位素餐，魚肉百姓。在今天共產政權的大糞坑中，任何人都沒法做清官，只能做貪官，要麼同流合污，要麼淘汰出局。另外，

利用腐敗收買官僚的效忠，制約官僚的背離，利用腐敗打擊政敵，是共產奴隸主義專制政權的基本組織政策。

第 41 節 終身制和世襲制

專制主義國家的皇帝任職都是終身制，死而後已；傳位的世襲制度被稱為“宗法制度”，即“傳嫡不傳庶，傳長不傳賢”。從 4 世紀到 10 世紀大約 700 年時間，中國的政治舞臺被 30 個左右的世家大族所獨佔，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至唐代士族勢力已遭打擊，但唐代 300 年的宰相職務還是被 20 個左右的家族包攬（吳晗等《皇權與紳權》，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5～56 頁）。這種世襲制導致社會在僵死中崩潰。

潘恩認為把政府拿來搞繼承，就有如把人民拿來像牲口繼承一樣。“因為，既然一切人生來是平等的，那麼誰也不能由於出身而有權創立一個永遠比其他家庭占優越地位的家庭，並且……他的後輩卻可能絕對不配承襲這種榮譽。”一個國王的產生無非有抽籤、選舉、篡奪三種方式，但這三種方式的任何一種都不能成為世襲產生的理由。世襲制不但荒謬而且還造成許多禍害。首先，它會為愚人、惡人、下流人大開方便之門，因此它就帶有苦難的性質；其次，它會使王位動輒為一個未成年人或年老體衰之人所佔有，在這兩種情況下，“民眾成為形形色色的惡棍手中的犧牲品，因為這些人可以順利地玩弄由老年或幼年所造成的種種愚蠢行為。”世襲制度不是按照智慧和道德品質的優劣來決定王位繼承者，因此它是一種卑劣的拉平制度：“它是憑感情衝動與偶然事件統治的。它帶著幼稚、老朽和昏聩等特徵出現在人們面前；是一種要吃奶、要人牽著走或拄著拐杖走的玩意兒。它把生氣勃勃的大自然秩序弄顛倒了。它經常叫幼兒頂替大人，把乳息小兒的狂想當作智慧與經驗。”

西元前 221 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國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國家。“秦始皇”的意思是開天闢地第一個皇帝，他的繼承人就叫秦二世，他希望他所建立的國家和制度萬代永存。最高權力的繼承人由前一獨裁者指定，每代獨裁者之間有嚴格的輩分關係，即所謂“代”。

用這種標準來衡量，中國今天的政治制度至少在最高權力的繼承上還處於一個離秦始皇並不遙遠的時代。我們生活在一個叫中共的王朝之下，這個王朝的姓氏是黨。雖然中共將它建立的國家標榜為“新中國”；實質上，“新中國”仍是一個傳統專制社會。

現代專制是一黨專權的黨天下。“黨天下”是由一個意識形態集團創建的，黨的領袖既是意識形態的創立者或權威詮釋人，同時又是槍桿子的最高指揮者。這種體制迫使每一代接班人將自己打扮為聖人和理論大師，同時又要求他建立一支效忠個人的軍隊，這雙重任務的極高難度註定了最高領袖的終身制或垂簾聽政式的變相終身制。

中國的憲法就未限制中國軍委主席任期屆數，這就是終身制。官員屆滿如不能升遷，往往轉到其它部門同級職位上。如：市委書記屆滿，可調市人大另就，屆滿還可調市政協任職。可謂具體職位有期限，官位換坐無期限。這是變相的終身制。

現代專制實行指定接班人制度，只在統治機構內部輪回，就像低等動物的無性繁殖，沒有雜交優勢。當權者不會指定比自己高明的接班人，所以總是武大郎開店，一代不如一代，逐級矮化。中共的接班人制度是君主世襲的翻版，和現代政治制度格格不入，是對人人生而平等這個普世觀念的公然蔑視。中共在小圈子裡私相授受國家權力是一個國家的恥辱。誰接受這種私下饋贈的權力，誰就是竊

國大盜，就是全民公敵。

“接班”制度還在全社會推廣。父親退休了，他的工作職位便可以由他的兒子接替，就是父親未退休，他的兒子、女兒也可因是直系親屬受照顧進入本單位工作。父親是鐵路工人，兒子就是鐵路工人；父親是員警，兒子就是員警；父親是演員，兒子就是演員……農民的兒子還是農民，工人的兒子還是工人，幹部的兒子還是幹部。所謂“新中國”其實與“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的周代中國並無多少差別。

隱形世襲制。

傳統世襲制是父業子繼，這種世襲方式目前在中國官場已基本不存在；但一種新的世襲模式已形成。即：各級各部門掌權者相互關照，你幫我親友升官，我幫你親友發達，雖未直承其職，也在別處得到一定的權位。權貴們將國家權力資源在親友間進行互利的共同分配，變家庭直接對位元世襲為親緣曲線換位元世襲，形成了特權階層的體內權力共繼模式。這種傾向越往上層越嚴重，高幹子女佔據諸多高位，就是這種互相提攜的結果。中下層官位也被盤根錯節的親緣關係網瓜分不少。這樣，中國的公共權力就成了特權階層的共用資源，被該階層壟斷，在該階層內部私相授受。這種“隱形世襲”現象在有些地方尤其顯得觸目驚心。據《新華每日電訊》2003年11月8日報導，湖北省涉田縣廣播電視局從1995年到2001年，全域人員由50余人猛增到240多人，其中絕大多數是本單位領導、部門領導和上級領導的親屬。如局長吳某的兒子，原副局長任某的妻子、女兒、兒媳，原副局長宋某的女兒，有線電視臺台長王某的妻子，保衛科長馬某的妻子。這些人只有初高中文化，有的只有小學文化。社會上流傳的兩首民謠生動地展現了“隱形世襲”現象，一首是：“書記喊精簡，兒女往內安；局長喊精簡，外甥

上了編；主任喊精簡，妻妹往內轉；秘書喊精簡，哥們往裡鑽。飯鍋大又大，加碗再加碗；一年復一年，超員又翻番；脂肪未曾減，更把肥膘添；精簡又動員，大夥笑破天！”另一首是：“父子室，夫婦科，外甥打水舅舅喝。孫子開車爺爺坐，親家辦公桌對桌。有利一條裙帶裏，有油流滿一口鍋。”

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義的涵義具體體現在機會對每個社會成員平等，包括起點平等和規則平等。“隱形世襲”是對這兩個平等原則的嚴重背離。

首先表現在起點不平等上。就像登山比賽一樣，有的從山腳出發，有的則直接從山腰往上爬。那些權勢人家的子弟，在成長過程中能夠上好的學校，受到良好的教育，畢業後能夠找一個好工作，甚至直接進入權力系統，為今後的發展早早打好基礎。而那些普通家庭的子弟，沒人提供這些優越的條件，不得不從最苦最累的活幹起。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報告《當代中國社會流動》指出的，幹部子女首次就業時成為幹部的機會是非幹部子女的1.75倍。特別是在1949年至1956年這個時段，如果“14歲時父親的身份”是“幹部”，那麼，自己的第一次就業就成為幹部的概率非常大，為“14歲時父親身份”不是幹部的那些人的2.65倍。這個報告也表明，各階層子女進入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的機會不同，父親職業是幹部、企業管理人員和企業主的人，最可能成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這些人的子女100個人中約有7個成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而工人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有1人進入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農民家庭出身的人，100人中不到1人進入這一階層。在發展過程中，權勢人家子弟在父輩的安排下在實權部門的關鍵職位上不停挪動，以便建立勢力網，為以後佔據要位打下權力根基。而絕大多數普通家庭的子弟付出十分努力才能得到社會的一分承認，有的甚至為了生存不得不低聲下氣，更莫侈談進入權力圈。

“隱形世襲”氾濫的惡果，就是直接製造政治腐敗、社會結構斷層和社會階層對立，從而帶來社會穩定和秩序的嚴重危機。這種隱蔽的世襲制與傳統世襲制相比，更不負責任和更加貪婪，因而具有更大的社會危害。在靠“隱形世襲”這種途徑獲得權力的人眼中，他們手中的權力並不是人民給的，而是父輩或其它有權人所賜。於是，當他們掌握權力後，並不是“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而是把權力當作蔭庇自己或給予他權力者的子弟、謀取家族或小集團利益的工具，而且做起來心安理得。他們的後輩掌握權力後也如法炮製，從而形成家族政治或朋黨政治的惡性循環。

而那些有知識、有能力的普通家庭子弟，如果因沒有背景被排斥在體制之外，可能會滋生怨恨甚至仇恨心理，從而採取極端的報復行為，走上暴力犯罪道路。據《民主與法制》2004年2月號（下）報導，大學生崔殿軍畢業後招聘到黑龍江省某市環保局工作。按規定，試用期合格即可轉為正式職工。出身貧困家庭的崔殿軍，為了給大家留下好印象以便轉正，工作上積極努力，同事們有求必應。他還無償為局長的女兒輔導功課。然而，他的努力最終還是付之東流。單位上僅有的兩個轉正指標給了兩個領導的親戚。崔殿軍將全部怨氣發洩在局長身上，淋汽油火燒局長後服毒自殺，造成兩人隕命的慘劇。

隨著被排斥在體制外的人越來越多，在體制外就會形成一個既無政治地位也無經濟地位但有能力、有知識的特殊人群——民間精英群體。求生存求發展是人的天性，通過體制內的途徑不能如願，就會產生強烈的價值失落感，很可能會尋求體制外的極端方式。當這些民間精英達成某種共識時，就會對現存社會秩序提出嚴峻挑戰。

羅爾斯認為，作為公平的正義，應符合兩個正義原則：一是每個人對與其它

人所擁有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二是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它們被合理地期望適合於每一個人的利益，並且依系於地位和職務向所有人開放。要避免社會秩序危機的發生，關鍵在於改革產生目前這種權力（或利益）獲取途徑的“潛規則”的制度，拆掉孕育“隱形世襲”的溫床，使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職務不是形式上而是真正地向所有人開放，讓每個公民都有公平競爭、實現自身價值的寬闊舞臺。

第 42 節 集權制

專制制度最突出是君主集權。《春秋公羊傳》認為周天子應做到“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只有秦始皇才做到了，以後就成為定制。自秦以後，地方行政長官都由中央派出，以下層層節制，最高權力集中在“執長策以禦天下”的皇帝一身。這種政治，是由君主個人全權佔有和控制整個國家機器，其統轄範圍內的任何人物對君主都是絕對隸屬和臣服的關係。

君主集權又體現為中央集權——指權力集中到中央，中央說了算。戰國時代就提出“百縣之治一形”（《商君書·墾令》），郡縣制即早期的中央集權制的形式。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國家集權程度十分徹底，一切權力都是皇權至上而下地經過層層授權而產生，無微不至地管理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再具有分權制約的牽制。中央集權與君主個人集權相輔相成，中央集權是君主專制的前提和基礎，君主專制是中央集權的必然產物。其目的都是要從政治制度上保證君主的絕對權威。而中央=中心=核心，所以“要團結在 XXX 為核心的周圍”，可見，中央集權總是表現為個人集權和君主獨裁。韓非宣佈的中央集權的原則：“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就是皇帝的個人獨裁。集權政治的權力核心就是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絕對權力必然導致災難，秦朝二世而亡就是證明。

專制儒教在政治上的核心內容是一統：包括思想一統、政治一統、生活方式一統，什麼都要統管。在《尚書》《周禮》等典籍中，詳細地刻畫了理想的世界政治秩序是：天子居中，統禦八荒，其親轄的方圓千里之地，稱為“王畿”；其餘的臣民，根據與天子關係的親疏以及所盡義務的不同，圍繞天子排列成一個個相距五百里的同心圓，分別被稱為“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等。天朝的統治者們根據繳賦、應役與朝貢情況，對複雜的同心圓進行了簡化，將天下分為“化內”、“羈縻”、“土司”、“外國”等。但不管“中國”還是“外國”，都沐浴在天子的光輝普照之下。這就是中國的大一統思想。

在絕對的權力下，統治者肆無忌憚地實行專制與中央集權的政治。《春秋公羊傳》首頁雲：“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春秋》大一統，“統”何謂也？一言以蔽之曰：尊“王”而已。“大一統”的世界，就是“王”的世界。在“王”的世界裡，時間以“王”來標記，空間以“王”為中心。儒家宣揚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大一統思想”等，成為兩千多年來大陸各地爭戰與血腥政治發生的根源！

以武力建立大一統政權，必然會創造出類似劉邦、毛之類的草莽梟雄。中國苗人養蠱，他們將一群不同種類的毒蟲，放在瓦罐之中，不提供任何食物，讓這些毒蟲互相吞噬對方，最後存活的那只毒蟲，就是所謂的蠱。這只蠱，就是中國歷年改朝換代時，取得政權的統治者。文革打倒孔子，只是打倒表面而已，儒教的核心“一統”絲毫未動。只是用新的一統代替舊的一統。這根本就是以儒打儒，打來打去還是儒，只是換了包裝騙騙不懂行的而已；就象從前換皇帝，大家輪流做，奴役的實質沒有變。

對帝王而言，統治的疆域越大，意味著他剝削的貢賦就越多。只有主子才需

要統一以滿足更大的控制欲和支配欲。最早把“國家統一”這種次價值偷換為最高價值的是帝王及其謀士。大一統的皇權制度認為：無限江山都是皇帝之私產，億萬臣民都是皇帝之奴僕。統治者居住環境與生活品質，遠遠高於各地區的人民；這些城市優渥的生存條件，都是剝削大多數農民與貧困人民的結果。皇帝一人之時間、精力有限；天下之事無窮，以有限對無窮，累死也辦不好，何況他們常常不上朝理政。許多時候，都是皇帝大權旁落，小人得志。因此，皇帝制度又是孳生小人的溫床，會創造一批奸邪、權術、狡詐的人。

在大一統下，全社會只能有一個聲音，就是統治者的聲音；只有一個旋律，就是統治者的旋律。秦一統以來，一統天下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用一個人（最高統治者）的思想去統一天下人的思想，去鎖住天下人的人心。為鎮壓異己與反對言論，中國古代官方主要採行各種刑法、連坐法、誅九族罪、文字獄等殘酷的方法，堪稱人類之最。民主思想根本沒有產生的空間。直到現在，“父母官”三個字，還掛在人們嘴上，壓在人們心頭。“親民之官”固然也有好人，但往往是更加專橫、更加殘暴，到今日尤甚。

大一統的集權政治，會摧毀地方人民的自主意識。歷史上凡是出現列國並立的局面，即使人民生活安定繁榮，也不被視為正常；而即使生民塗炭、生活水準下降，只要能使天下歸於“一統”，便被視為理所當然。像四川，歷史上曾經出現數次獨立政權，生活水準不差，被“統一”之後（例如被趙匡胤的宋帝國併吞），不久就發生了饑民起義。五代十國的大閩國，前後 53 年，開發了福建地區，促進了海外交通與外貿的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中國的政治傳統中沒有自治的概念，信奉的是一元化領導，領袖人物乾綱獨斷。在民主制度下，地方官時時事事首先必須考慮到民意必須考慮到當地百姓的

選票。但在中央集權的獨裁體制下，即使地方官是當地人，也決不會把地方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時時刻刻放在他們的心坎上的，是關乎他們自己仕途命運的首要任務——逢迎上司、搜刮地方、孝敬中央！在專制政治下，不會有真正的地方建設。這些地方官員，不會真正關心地方人民的權益，他們真正關心的是如何討好或賄賂上級官員以便升官發大財。皇帝所任用的官員，只是皇帝的爪牙與工具。官員任命一條線操控在中央手裡，“一朝天子一朝臣”，走馬燈來來去去，輪番刮盡了地皮，交相坑害，苦慘了地方！地方官個個鑽頭覓縫尋找攀附中央的門路，統統把犧牲和攫取地方百姓的利益，當做了個人向上爬，進貢邀寵、翼圖再加官進爵的途徑！在這種體制下的所謂“政績”，往往就是逢迎中央壓榨地方的鎮壓搜刮之績！當代地方官員們為了表面上的政績，也會搞一些虛假的形象工程，以滿足“合理提拔”的基本要求。

集權制使國家權力一元化和絕對化，掌權者往往成為特權者、高於民眾，導致專制或腐敗。愛因斯坦在 1930 年《我的世界觀》中說：“強迫的專制制度很快就會腐化墮落。因為暴力所招引來的總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總是由無賴來繼承，這是一條千古不易的規律”。“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讓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讓任何人成為崇拜的偶像”。不讓任何人成為崇拜的偶像，是使“邪教”斷子絕孫的絕招。

大一統的集權政治，會導致各種貪污腐敗。例如，過年過節，下級官員必須對提拔他的長官，敬獻孝禮；不僅如此，下級官員也必須對提拔他的長官，經常做出各種回報的行為，如將在地方任官時所搜刮的資源，經常奉獻給他的長官。這就是中國所有地方集體腐敗、地方集體貪污、豆腐渣工程、國有資產流失與銀行貪污的發生原因。同時造成社會各種嚴重的問題。例如，人心渙散、道德墮落、

不公不義、資源配置不公、貧富懸殊、假大空、坑蒙拐騙、誠信破產、等問題；社會必然會走向文化倒退與人民普遍愚、貧、弱的情形。

大一統的集權政治，使中國人陷入“大一統”崇拜。國人推崇統一，甚至統一壓倒了生命尊嚴，陷入了野蠻而不自知。譬如：因蒙古、滿清建立過地域廣大的國家就有意的隱瞞蒙古滿清血腥大屠殺的事實並塗脂抹粉，從而走向了野蠻的暴力崇拜。

世界史上也出現過一些版圖遼闊的大國。如日本西元七世紀實行大化改新曾建立了統一的國家；阿拉伯人在聖戰的旗幟下於西元 732 年建立的穆斯林帝國；西元 800 年建立的查理曼大帝國，都十分短暫。這些地區就少有上述缺點。

第 43 節 宗法分封制、契約分封制與郡縣集權制

中國的商周時期的分封制是種原始的分封制度，與西方中世紀的分封制有很大的區別。中國的宗法分封制趨向于集權，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西方的契約分封制趨向于民主自治，因為他們有宗教、有自由城市、有議會。

契約分封制，中央與地方權力劃分得較清楚，由此可以抵制國王的橫徵暴斂，與國王的談判機構就是國會。在英國經過反復較量，國家權力集中到議會手裡，形成了民主制度。宗法分封制無法轉化為民主自治的聯邦制，因為它缺乏抵制集權的制度框架。

民主聯邦——權力來自於基層、來自於人民的週期性授權。聯邦政府與地方權力分得很清楚，地方是獨立自主的，不必聽中央；中央領導人無權任命撤換地方領導人，中央與地方出現矛盾衝突由最高法院裁決，全國服從憲法和最高法院。這就形成了法律是最高權威的觀念，美國瑞士是典型。只有在權力受控的情況下，

公民才是幸福安全的。

契約分封制與民主聯邦制的區別：聯邦的權力來自於基層、來自於人民；分封制的權力來自於上層即國王早期的分封。一旦分出去，國王不能隨意反悔。好比大家庭分成小家庭後，再往來就要算經濟帳，不能隨便侵犯小家庭的利益。分封制的好處是限制削弱了國王的權力。

歐洲之所以領跑全人類，沒有形成中央集權是主要因素。中央集權，無疑是歷史道路上一個沒有出路的死胡同。正如美國麥迪森總統所說：“所有的權力置於同一人手中，不論是一個人，少數人或許多人，不論是世襲的，自己任命的或選舉的，可公正地斷定是暴政。”

分封制優於中央集權郡縣制，原因如下：

1· 分封制比集權制容易分散風險。分封使一國變成數國，一王變成數王，腐化滅亡的危險有所降低。例如，隋煬帝一君暴而天下反；如果是分封制，頂多像周幽王被殺，但各諸侯國沒事兒，不會天下大亂導致全國性農民起義，這種分散權力風險的辦法或許正是為什麼夏商周可以各延續 8 百多年的原因！

2· 郡縣制並不是歷史的進步。試想，一個將子子孫孫世襲下去的公爵更注重自己領地的長遠發展，還是一個三年後就要調任的太守更注重自己轄區的長遠發展？誰更會不顧人民死活地竭澤而漁、殺雞取蛋，像過境的強盜那樣大掠三天后揚長而去？郡縣制有利於大一統，大一統對人民有多少好處？

郡縣集權制毛病很清楚，剝削壓迫更重。“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據說現在的貪官轉移出去的錢是晚清對外賠款的上百倍。分封制倒可輕徭薄賦。領主直接治其轄地，對領土的征斂就會考慮到長期利益最大化從而保持在相對合理的範圍內。例子：馮雍客孟嘗君故事，馮雍說孟嘗君不重視他，彈劍歌曰要吃肉、

要車馬；條件滿足後，要他辦事情；他卻把孟嘗君封地的債券當眾燒毀了。後來孟嘗君被趕回封地，人民夾道歡迎他。

魏晉時的學者陸機認為封建比郡縣更合理。封建制下，中央與諸侯相對獨立，互相照應。社會在常態下民有定主，諸侯各務其治，若出現異常情況也能有緩衝。即使國家衰弱，受害的只是局部，王朝不至於很快滅亡。郡縣制就沒有這種優勢，一處有亂，天下大亂。秦代失於孤立無援，以至國家很快滅亡。此外，封建諸侯比郡縣長官更可能精心治理，這是他從人之常情得出的結論。“五等之君，為己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封建諸侯會更盡心治理，因為他的封國等於他的財產。郡縣長官更關心升遷及其他的私利，而把百姓的福利放在其次。陸機承認有不好的諸侯，也抨擊當時的郡縣長官昏庸無能。但是他說，封建制下“鹹述其職”，“無所容過”，所以容易興治；而郡縣制賣官鬻爵，“百度自悖”，所以容易亂。

用一個比喻：某村的選民寧願讓腐敗官員繼續當政，他們的邏輯是：腐敗官員是肥豬，新選上的官員是瘦豬，瘦豬比肥豬更貪，肥豬的貪心要小。肥豬=分封制；瘦豬=郡縣集權制。

3·分封的第三個好處，就是給了農民以選擇的機會，如果你在這裡過不下去的，可以逃到其它領主的領土上去。孔子在春秋分裂時期要君王“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而中國一旦統一了，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文德”修不修都跑不掉，也就無所謂“來之”，當然更無所謂“安之”了，那還修麼子文德呢？

西方國家是分裂的，領主的騎士武裝主要是對外的，且領主之間互相窺伺，這就削弱了領主武裝實際上可用于鎮壓農民造反的力量。領主是相對較弱的，在

武力無法壓倒農民的情況下，領主對領民就要讓步，所以，為領主提供稅款的商人和農民的地位就相對於中國要高。西歐的城市自治和區域自治，就相當於領主將領土的治權“賣”給市民階級和資產階級。

4·有利於不同方式的探索。中央集權下，治國的方式是單一的，這就決定了嘗試他種管理方法的可能性小；分封制保證地方的獨立性，從而使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變革成為可能。

日本 19 世紀都有分封制，中國沒有。在分封制度下，權力分散並受到了有力的制約。不但天皇和幕府之間有矛盾，地方各藩和幕府之間有矛盾，而且哪一方的舉措不對，其它方面有力量制約和糾正，不是一權獨大。這為明治維新的成功提供了活力。

5·分封制間接促進了自由。思想文化的發展在於自由，一旦到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下，不同言論都被封殺。秦實行了郡縣制，使東亞大陸變成了鐵籠一個，文化日益衰落！

元朝中央集權制又向集中的程度發展到行省制度，更加黑暗。蒙古人在漢人區當甲長，不僅有初夜權，還有濫交權，看中的女人就可玩；而且連切菜的刀子也歸蒙古保長管理。

蒙古人在俄羅斯沒有實行中央集權制度，當時莫斯科公國臣服於蒙古人統治，蒙古人在俄羅斯搞的是分封制或附屬國制度。由於漢人受壓迫比俄羅斯人重，所以漢人起義推翻了元朝，後起的明朝也很黑暗。而俄羅斯人推翻了蒙古後，就侵佔到外蒙古和中國的東北。可見，分封制下的俄羅斯人比中央集權制下的中國人更有活力，表現得更優秀。

福澤指出中國在秦始皇統一之前思維活躍，充滿自由精神和多元表達。但是，

大一統之後中國的專制制度使得政權與意識形態的闡釋權集中于一體，形成了一種事實上的單一的神權統治。如果不是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五四的文化幹將也絕不可能大肆攻擊孔家店。

在日本，政治權力和神權並沒有結合在一起，掌握政權的幕府將軍並不象中國皇帝一樣代表道德的最高典範，不需要人們在精神上頂禮膜拜。在分離的軍政權力和天皇的神學權力的相互制衡中，日本人自然生髮出理性和自由精神，日本人在政治思想領域原本比中國人來的豐富活潑，因而也比中國人更易於接受西方文明。

明代學者顧炎武認為基層是治國的關鍵，忽視基層則難以為治。關於地方制度的優劣，他的看法是“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所以，既不能繼續過度集權的郡縣制，也不能回復宗法封建制，而是要實行一種結合二者優點的制度，即“寓封建於郡縣”——契約自治的封建制，建議縣令由地方來選聘和考核，政績好的縣令可以連任，許可權也可逐漸擴大，甚至退休時還能推舉兒子或弟弟繼任。

第七章 專制奴隸制之罪惡

在魔鬼的統治之下，龍吞噬了無數生命。中國的政治問題遠不是專制權力的傲慢專橫，而在於“四萬萬人都想當皇帝”（孫中山語），並以群眾暴政為基礎。專制是人定秩序對神定秩序的顛覆，由於心中無神，每個人都自以為是神而任性而為，殺人越貨，並以此自我榮耀。在中國歷史中最能彰顯“撒但榮耀”的，應是中國殺人史和食色史。

第 44 節 中國殺人史

中國歷史上幾乎每一個日子都在血雨腥風中飄搖，每一個心靈在皮鞭和饑餓的恐懼中顫抖。無神論者相信優勝劣汰、弱肉強食是世界演變的根本法則。誰把誰吃掉，誰就能佔據進化上的優勢地位，當然也沒有什麼公義、平等、愛。無神論的最大危害是鼓吹棍棒教育的鬥爭哲學，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鬥得七零八落，鬥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民不聊生。

事實上五帝與周邊部落戰爭從未中斷。顓頊與共工的戰爭，《淮南子》之《天文訓》、《兵略訓》皆有記載，起因是“爭為帝”。共工與高辛氏的戰爭，見於《淮南子·原道訓》。堯與三苗的戰爭，《呂氏春秋·召類》：“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與“四凶”的戰爭，舜對三苗的戰爭；禹對三苗的戰爭，從《墨子·非攻下》來看，這場戰爭的規模相當大。

有夏（前 2033~1562）一代，權力內戰和周邊戰爭仍然不斷（《史記·夏本紀》）。商有“九世之亂”，仲丁開始，其後 5 代 9 王皆為王位殺伐，屢次遷都，並不斷與周邊部族征戰。在商朝的《卜辭》中就記載了各種戰爭 61 次。據《殷墟書契考釋》（增訂本）所輯卜辭統計，商伐苦方就有 26 次之多。從商帝國用兵的數額看，一次可徵集 3000 或 5000 人以至 3 萬人，一次殺伐敵人竟達 2656 人。戰爭的規模可不算小。《大誓》記載周武王的話說：“紂有億兆夷人”，所謂“億兆夷人”，就是紂在征夷方戰爭中獲得的俘虜。牧野之戰，紂王一下子武裝起 17 萬（一說 70 萬）奴隸，證明武王的話是真實的。西周（前 1066~771）內亂不止，外患頻仍，如武庚之亂，南討楚國，征伐犬戎。

三千年有文字的歷史記錄了六千次的戰爭！約占世界戰爭總數的 1/3 左右。正所謂“豈有分權傾社稷，歷來極權起戰端”。春秋（前 770~476）242 年間，36 位君主被殺，52 個諸侯國被滅，大小戰事 480 多起。戰國（前 476~221）250

年間，僅大規模的戰爭就有 222 次……禹時天下萬國、西周初期 1773 國、春秋時 1200 國，到了戰國時期只剩下七國了。

孟子說，春秋無義戰。豈止春秋！2500 年來，哪一場自相殘殺，談得上正義？哪一次改朝換代，不是人口死亡過半？秦皇后的`中國人口死亡過半的大戰亂至少有 14 次。

1· 秦末農民戰爭（前 209-前 195 年）：前 207 年項羽坑秦降兵 20 萬，而後世為霸王別姬，惋惜英雄末路者，至今不衰，感念秦卒者，複有幾人？秦末 2000 多萬人，到漢初，人口下降至約 600 萬，原來的萬戶大邑只剩下兩三千戶，消滅了原來人口的 70%。

劉邦死後，呂後專權。她將情敵戚夫人關進永巷服苦役，戚夫人邊舂米邊悲歌：“子為王，母為奴，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呂後聞歌，大怒曰：“你想翻天”。前 194 年，呂後把戚夫人的兒子趙王如意招回長安毒死，把戚夫人砍去四肢，挖去雙眼，割去鼻子，割掉耳朵，藥啞嗓子後扔入廁內，取名為“人彘”。對戚夫人的處置比極刑——凌遲還殘忍，他的獨生子惠帝見“人彘”後被嚇傻，從此以後不能理政（而武則天對待王皇后和蕭淑妃的做法是，將她們的手腳砍掉，把手接在腳上，把腳接在手上）。

漢惠帝死後，呂後專權；立的皇帝都是小孩子，先是劉恭，被呂後殺了；又立劉弘。在呂後死後，大臣清除呂氏家族的當權者，同時把這個小皇帝殺了，另立劉邦的兒子劉恒來當皇帝，同時將劉弘的三個弟弟都殺了。人們明知兒皇帝無辜，還是要殺掉。

漢景帝劉啟生前驅使數十萬老百姓和帶著刑具的犯人，為自己修建規模宏大的陵墓長達 28 年之久。僅在 1972 年，就在陽陵附近發掘出有脖頸和腳腕上套有

刑具、頸部或腰部有明顯斬斷痕跡的刑徒屍骨，達萬具以上。最無恥的是劉啟還出賣、殘殺了最忠於他的晁錯和晁錯全家；晁錯還是他從小便在身旁的近臣，也是言聽計從、寵信有加的愛臣。然而，到了要犧牲晁錯的時候，劉啟卻處晁錯以腰斬酷刑，而且還要“無少長皆棄市”。

2·漢武帝獨尊儒術，重用酷吏，大興冤獄，剝奪民財，重刑殺戮，窮兵黷武，四處用兵（打了 30 年的仗，徵發兵力 200 萬），弄得民不聊生，百姓易子而食；全國人口減少一半，其昏聩比秦始皇有過之而無不及。

漢武帝嗜殺成性。元光三年（西元前 132 年），大臣灌夫被滿門抄斬，竇嬰被斬首示眾且滅族。元光五年（西元前 130 年），武帝派中將唐蒙率數萬人修築巴蜀之路，許多人死亡，許多人逃跑。唐蒙就以“軍興法”誅殺士兵。

當時，女巫師楚服等人以巫蠱之術教陳皇后咒衛子夫以使自己重獲寵愛。誰知幾個月過去，並無效驗。事敗露，陳皇后被收回印璽、廢去尊號、將其終身禁錮在長門宮。武帝又派酷吏張湯徹底查處，楚服被斬首示眾，楚服徒眾、宮女、太監等牽連者 300 餘人一併處死。由此，武帝提升張湯為太中大夫，讓張湯和趙禹共同制定了許多嚴厲的法律，特別是鼓勵告密揭發的“知見法”，使官吏們不得不相互窺探、相互揭發，朝廷上下，誣告成風。

元朔二年（西元前 127 年），著名俠士郭解被斬首且滅族。武帝派主父偃任齊國相，負責查問齊厲王劉次昌，齊厲王害怕，服毒自殺，燕國也滅掉。趙王劉彭祖上書武帝，力陳主父偃的罪狀，武帝在諸侯國的壓力下，殺了主父偃並滅族。武帝徵調十萬民夫修築朔方城和要塞，國庫被消耗一空。元朔三年（西元前 126 年），武帝任命酷吏張湯出任廷尉，完全根據武帝的喜惡執法，造成了不少冤案。而太子劉據仁慈寬厚，平反了不少冤案，這自然引起了酷吏們的不悅。所以，主

張寬厚的大臣們多支持太子，而酷吏們則詆毀他。而且，由於酷吏多結黨，所以，對太子進行詆毀的言論就多於讚美的言論。太子的母親衛皇后一貫小小謹慎，安分守己，擔心太子處理事情過於寬鬆引起武帝和朝臣不滿，讓太子處理事情要順從武帝的意圖。武帝得知後，明確表示太子所為符合律法，甚至還批評了皇后。

征和元年(前 92 年)冬，武帝在上林苑建章宮內閉目養神。恍惚中，一個男子手持長劍快步竄入華龍門內，武帝大呼救駕，喝令左右搜捕刺客。宮中護衛馬上在建章宮內細細搜索一遍，沒有發現任何可疑跡象，守門的侍衛也說沒有見到帶劍男子入內。武帝驚魂難安，將守門侍衛斬首示眾，又派駐守在京郊的部隊搜查上林苑，也一無所獲。武帝依然不罷甘休，下令關閉城門，挨家挨戶搜查，前後共搜了 11 天，鬧得長安城內雞犬不寧。最終雖沒有發現刺客，卻從宮中一些妃嬪宮女居室、長安百姓家中搜出不少巫蠱所用器具。經過審訊，查出這些宮女妃嬪因為失寵懷恨在心，勾結巫婆用巫蠱術作法，詛咒皇上或其他宮女。武帝當即大怒，認為帶劍刺客是有人行蠱作法謀害自己，下令將牽涉到巫蠱的妃嬪、宮女、巫婆處死，用巫蠱術的百姓也投入牢獄，嚴刑拷掠以示懲戒。

征和二年(前 91 年)為漢武帝在位的第五十年，這時的武帝已經 66 歲，離他歸天的時間只剩 4 個年頭了。由於長期和方士打交道，武帝的迷信是很深的。雖然皇帝玉璽上刻著“受命於天”的話頭，但他並不相信自己擁有無上的權威。對於冥冥中的巫鬼，他仍然確信它們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正圖謀結束他的生命。由此造成了巫蠱之禍致使數萬生靈成為犧牲。

造成巫蠱之禍的直接起因是丞相公孫賀和他的兒子公孫敬聲。公孫賀出身世家大族，在武帝為太子時，他官居太子舍人，成為武帝的親近之臣。公孫賀的夫人為武帝衛皇后的姐姐，在衛子夫得寵時，公孫賀青雲直上，並以軍功封侯。但

究其實，這些並非出自本人的能耐，而是得力于皇后的恩澤和大將軍衛青的提攜。公孫賀拜相後，他的兒子公孫敬聲代他擔任了太僕，從而父子並居三公卿位。公孫敬聲竟擅自動用北軍錢一千九百萬，終於被發覺而下獄。為了救兒子的性命，公孫賀親自請捕朱安世。在得到武帝的批准後，他立即行動，居然大功告成。當朱安世得知公孫賀捕自己是為他兒子贖罪後，他說，公孫父子的罪過，“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穀之木不足為我械”，於是他獄中向武帝上書，揭發了敬聲的種種不法行為。其主要事實為：一、與武帝的女兒即他表妹陽石公主私通；二、使巫在祭祠時詛咒漢武帝；三、在上甘泉宮的馳道上埋下木偶人等等。上列罪狀，除第一條為當時常事，不值深究外，第二、第三條都是很難證實的。然而，正是在這一問題上，最犯武帝的忌諱。在武帝的授意下，有司窮治所犯，結果是征和二年初公孫賀父子俱死獄中，誅滅公孫賀九族。武帝與衛皇后所生的女兒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和大將衛青的兒子長平侯衛伉，也被以私通外廷的罪名處以死刑。處死兩位公主時，衛皇后哭求武帝免殺親生女兒，武帝無動於衷。涉案人員越牽扯越多，很多與公孫賀父子過從甚密的大臣以及後宮的妃嬪宮女等牽涉在內，也被處死。

經過這一大案，武帝已處於妄想與懷疑的狂熱之中。武帝已處於精神崩潰的邊緣，數不清的巫詛和偶人，使他日夜膽戰心驚，寢食難安。“上心既疑，常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為驚疑，因是體不平”。睡午覺也夢見攻擊，甚至嚇出病來，其精神之緊張可以想見。為了消除這神秘的隱患，這年夏天，他委派江充為專治巫蠱的使者。

江充得旨後，在首都長安搜查巫蠱。他改變了前次派士兵搜查的辦法，選擇了幾個據說從西域來的很有道行的胡人巫師，宣稱這些胡巫能看見鬼魅和地下埋

藏的木偶。他帶領這些胡巫在長安城內四處巡查，故意把酒灑在地上，事先在地下埋入木偶，讓胡巫故弄玄虛地作法念咒，說某人在這裡祭酒拜神，用巫蠱詛咒皇上。從祠堂到寺廟，從店鋪到民宅，後來又到官吏居所，一旦挖出木偶或者發現酒汗痕跡，不管是平民百姓還是朝廷官吏，一律抓入牢獄拷問。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怎麼回事，也被抓入牢獄。江充指使部下使用各種酷刑，燒鐵鉗灼，許多人不堪忍受，只得含冤屈服，隨意誣攀他人，結果越攀越多。江充正希望如此以顯示功勞，對所有牽連到的人員全判以“大逆無道”的罪名處斬，一時間長安城內人人自危。各地官吏也上行下效，以查獲犯案人員數量作為平步青雲的政績，爭先恐後羅織冤獄。幾個月下來，城內和三輔地區被牽連進去處斬的有數萬人。全國其他地方也開始搜查巫蠱，同樣用酷刑峻法處死了不少涉案者，整個長安乃至全國一片烏煙瘴氣，直如人間地獄。

江充見自己可以為所欲為，武帝隨時可能駕崩，自己與太子之間的仇隙極深，武帝一死，必為太子所誅，現在奉旨勘查巫蠱，正是打擊太子的絕佳機會。江充將胡巫檀何向武帝推薦，吹噓此人能望雲看氣，哪裡地下埋有巫蠱，一看其上空雲氣便知。武帝讓檀何作法察看，檀何裝神弄鬼一番，說：“後宮中有邪氣，如不儘快驅除，龍體難安啊！”武帝隨即下詔讓江充率胡巫、士兵前去後宮搜查，同時責令按道侯韓說、禦史章籟、黃門蘇文等協助搜查。

江充先從失寵的夫人、妃嬪寢宮開始查起，範圍逐步擴大。每到一處都掘地三尺，每一個角落都讓人挖開尋找木偶，連皇帝的御座也不能倖免。七月九日，江充兵分兩路，自己持詔令闖入太子住的博望苑，同時派黃門蘇文去衛皇后住的未央宮搜查。太子自信沒有罪狀，毫不在乎。江充搜查得特別仔細，命士兵刨開地面認真翻檢，將宮中挖得一片狼籍；蘇文在未央宮也是如此，連衛皇后的鳳床

也被搬開。果然，江充真的在博望苑和衛皇后宮中共挖得木偶六枚，每個木偶都是武帝模樣，並用鐵針刺心。在太子的博望苑裡還發現了許多布帛，上面寫滿了惡毒詛咒皇上的咒語。其實，這是江充一夥早就做好手腳栽贓太子和衛皇后的。

江充擎著木偶向隨從宣佈：“太子宮裡掘出木偶最多，還有寫咒語的帛書，本官一定如實奏報皇上，嚴懲兇手。”太子驚懼非常，就問自己的師傅少傅石德怎麼辦。石德說：“先前丞相公孫賀父子、兩位公主和年幼的衛伉都死于巫蠱，現在江充蓄意偽造罪證陷害太子，皇上不瞭解其險惡用心，見到這些證據，也無法辨明真假。現在最安全的辦法就是逮治江充，再揭露其罪行！而且，如今都說皇上有病，住在甘泉宮，皇后和太子去問安也被擋在門外，皇上是死是活還不知道。奸臣江充當道，一手遮天，太子如不從速行動，必定重蹈秦王扶蘇的覆轍啊！”太子遲疑不決：“江充是奉父皇詔令來的，我們怎能擅自捕系？不如我去向皇上說明情況，還有可能使皇上知道我們無罪。”誰知太子帶人剛走到門口，就被江充派的負責監護的士兵攔住，禁止出門。太子只得回到宮中，坐立不安，心急如焚，一籌莫展，最後把心一橫：“我好歹也是太子，江充奸佞憑空誣陷我，將我逼到無路可走，難道現在我只能坐以待斃？”決定聽從石德的意見，起兵自衛。

太子沒有調動一支正規部隊，只得把關押在城內的囚徒全部放出，發給他們兵器，由少傅石德和門客張光統率，鼓動他們共擊奸賊，必定按功封賞。不過，這些烏合之眾在丞相率領的正規軍的打擊下，迅速土崩瓦解了。太子見囚徒兵寡不敵眾，危在旦夕，只得將長安城內的平民百姓驅趕數萬出來，充當士卒，做拼死抵抗的準備。太子的軍隊和丞相的軍隊進行了五天五夜的惡戰，繁華的長安城每一條街巷都成了殺戮戰場，喊殺聲驚天動地，成片的百姓倒下，屍體層層疊疊，鮮血匯成了小溪，汨汨流淌，真正達到了流血漂櫓的地步。五天五夜的血戰後，

太子的兵卒幾乎全軍覆沒。丞相的軍隊逐漸控制了長安的局勢。太子的門客、內侍被捉住全部處死，跟隨太子發兵的護衛以謀反罪族誅，那些被逼從軍的囚徒、百姓則發配敦煌戍邊。隨後，武帝逼迫衛皇后自盡。衛皇后在與武帝相處 48 年、做了 37 年的皇后後，以三尺白綾自縊身亡，香消玉殞。武帝又派人將太子劉據的夫人、妃嬪、太子的兒子史皇孫劉進及其妻子處死，史皇孫的女兒雖已出嫁，也被處死。太子留在長安的家眷，惟一剩下的就是有幾個月大的皇曾孫劉病已，他被投入郡邸獄中，後改名劉詢即位為漢宣帝。

太子帶著兩個兒子逃出長安後，歷盡千辛萬苦，來到湖縣(今河南靈寶縣西)一農家避難，在那裡住了半個多月。主人家裡很窮，以編織草鞋為生，卻依然盡力照顧好太子父子數人。太子想起有一位故交在湖縣，決定派內侍去尋求幫助。沒想到走漏風聲，八月初八日深夜，地方官派兵包圍了農夫的小院。太子見無路可逃，悲憤交加，只得懸樑自盡。兩個皇孫則被亂刀砍死。農夫一家也全被殺死。20 多天的時間，造成逾十萬人的死亡和不少大臣的誅殺。

征和三年(前 90 年)三月，武帝派二師將軍李廣利率 7 萬大軍出征匈奴。李廣利自然想把自己的外甥立為太子。他作為當時最高的軍事將領，又與當今丞相是兒女親家，兩人掌握大漢的軍政大權，只要兩人稍微用力，裡應外合，就很有可能達到目的。不久，有人告發丞相劉屈氂的夫人祭祀時用惡毒的語言詛咒武帝；並與二師將軍李廣利祭祀時共同祝告神靈，祝願昌邑王為帝。武帝大怒，當即將劉屈氂夫婦逮系下獄。六月，丞相劉屈氂被腰斬於東市，其妻也在華陽街斬首。李廣利的妻兒也被逮系下獄，只因李廣利尚帶兵征戰大漠，武帝怕他聞訊謀反，沒有將其家屬處死。李廣利領兵 7 萬，兵發五原，此時正在塞北與匈奴騎兵殺得難解難分，已經取得了不小的勝利。胡兵奔走逃散，不敢抵抗。突然有心腹從長

安趕來向他報告了長安動亂的情狀，李廣利才知道妻兒及全族被系詔獄。李廣利一怒之下，率軍投降匈奴。武帝得知李廣利投降匈奴，當即將其妻兒及族人全部處斬。

征和三年(前 90 年)九月，武帝查明江充所判巫蠱案大多查無實據，才知道太子死得確實冤枉。下令把死于太子之手的江充誅滅九族，把蘇文燒死在橫橋上，參加湖縣剿捕行動的官吏張富昌、李壽被滅族。為表達對兒子的哀思和追悔之情，武帝在長安修建了一座思子宮，在湖縣修建了歸來望思台，時時追悼太子和皇后的無辜冤死。完全是掩人耳目的“作秀”。

漢武帝在位 54 年，一共用了 13 個丞相，罷了 3 個，自殺了 3 個，殺死了 3 個，其中詔殺竇嬰、族誅公孫賀、腰斬劉屈氂，三個不是“因病”提前退休便是病死在任上，最後一個丞相田千秋只是因為漢武帝死在他的前頭才倖免於難。

大將王恢，屢建功勳，就因設計騙匈奴王軍入馬邑城聚而殲之的計謀沒有取得成功，漢軍雖未取勝，但也沒有遭受損失，結果王恢被判死罪，王恢在獄中上吊自殺；

材官將軍韓安國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吃一次敗仗，即被漢武帝派人痛加譴責，韓安國又羞又怕，沒等到漢武帝辦罪便吐血而死。

名將李廣，累建奇功，威震漠北，被匈奴尊呼為“飛將軍”，反倒因為一次中了匈奴埋伏，在眾寡懸殊的情況下，他奮勇率領殘部殺出了重圍，渾身傷痕，血透戰袍，結果被判死罪。由於當時有納重金贖罪的法令條文，飛將軍繳納了重金，才獲得了一條性命，但是，晚年還是因為一次軍事行動的失誤而被迫自殺。李廣的孫子李陵，其遭遇就更悲慘了。李陵率領五千漢兵，深入匈奴腹地，被匈奴十萬大軍圍攻。李陵臨危不懼，指揮將士以一擋千，殊死拼搏，在殺死了超過

自己兵力數倍的敵人，且戰且退了一千餘裡之後，僅剩下一百餘人。在矢盡援絕、刀斷矛折的情況下，李陵被迫投降了匈奴。漢武帝在未查明李陵的情況下，“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並把為李陵說情的司馬遷處以宮刑。

在蘇武滯留匈奴期間，蘇武之父蘇建因“扶輦下除，觸柱折轅”而“伏劍自刎”；蘇武之弟蘇賢因追捕逃犯而不得，“惶恐飲藥而死”；母死，妻改嫁，妹妹存亡不可知。

相比之下，匈奴的單于對蘇武、李陵可是關懷備至，極盡籠絡之能事。即使蘇武所率領的外交使團的成員在出使匈奴期間欲發動政變，謀殺單于，後來又始終不為所用；單于也沒有一殺了之，而是讓他牧羊，許他與胡婦產一子，真是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西元前 100 年，中國派遣正使蘇武、副使張勝赴匈奴汗國報聘。張勝跟早先投降匈奴汗國的一些漢人，密謀乘單于外出打獵時，殺掉匈奴的智囊衛律，然後劫持單于的母親，逃回中國。事情敗露後，經過一場殺戮，張勝露出投機的原形，投降匈奴。而毫不知情的蘇武卻拒絕投降，匈奴把他放逐到冰天雪地的北海——貝加爾湖，靠牧羊維生，始終拒絕投降。西元前 81 年，中匈複交，中國派到匈奴汗國的使節聽到蘇武仍然活著的消息，就告訴匈奴說：中國皇帝曾射下一隻雁，雁足上系著蘇武求救的信件。匈奴吃了一驚，才把他釋放。蘇武出使時只 40 餘歲，回國時已 60 余歲，妻子早已改嫁，家人也早星散。還有李廣那個孫子李陵，跑到匈奴去以後，匈奴人很敬重他，單于還把女兒都嫁給他了，漢人未必有此胸懷。而同時期的漢人卻經常幹那種殺害俘虜的事情。比如說李廣就曾經殺掉了幾百個被誘降的羌人。

張騫這個間諜被匈奴人抓到後，要是按漢人的德性，早就被砍掉腦袋了，但匈奴人只是罵了他一頓，責問漢人為什麼不守信義，還給他討了老婆，生了兒子。

這傢伙第二次又被抓到時，匈奴人還是沒有殺他，所以他還能夠活著把情報帶回去然後回頭來攻打匈奴。

漢武帝的妾鉤弋夫人懷孕 14 個月生了個兒子，漢武帝很高興，因為傳說古聖人堯就是在娘胎 14 個月才生出來的。武帝盛愛之下，決定立這個兒子為太子，又擔心這個小太子將來管不了他年輕聰明的母親，就找藉口指責鉤弋並下令處死。這樣，就建立了立子殺母制。

《史記·外戚世家》說：鉤弋夫人“生昭帝，後受責，憂死于雲陽宮。”是睜眼說瞎話，司馬遷讚賞漢武帝的這一暴虐行徑為“昭然遠見、為後世計慮”。被儒家人士狂呼叫好的“立子殺母”制度使劉氏後裔不是昏庸無能便是懦弱不振。

北魏仿效立子殺母，一直延續了好幾個朝代。後來，幸虧宣武帝元恪篤守佛法，不忍殺生，“立皇子(元)詡為太子，始不殺其母。”這才廢除了這一野蠻而殘忍的制度。

3. 《漢書·王莽傳》載“連年久旱，…人相食，…饑民死者十(之)七八”；“會稷大疫，死者萬數”。西元 2 年全國人口 5959 萬，經過西漢末年的混戰，到光武中元二(西元 57)年，人口 2100 萬。中國人口減少 3859 萬。損失率 65%。20 年間，西安的人口從 68 萬減到 28 萬，大荔從 91 萬減到 14 萬，興平縣從 83 萬減到 9 萬，綏遠縣從 69 萬減到 2 萬……

4·東漢末年濫殺與三國混戰

漢桓帝時的外戚梁冀任河南尹，殺洛陽令呂放，然後嫁禍于呂放的仇家，殺其宗族賓客百餘人；郎中袁著上書諫戒，被殺，其友胡武等薦海內高士，不要去謁見梁冀，梁殺胡武全族 60 餘人；梁冀為佔有富豪孫奮的財富，向孫借錢 5000

萬，孫只給了 3000 萬，梁遂誣告孫奮，孫被抓，死於獄中，梁冀便沒收了孫的 7000 萬家財。梁冀把持朝政十多年，“大起第舍”、“廣開園囿”，梁冀一句話就吞併了扶風的一個億萬富翁，一個命令就把幾千個農家子弟抓來作奴婢，並掠取良家女子幾千人以供淫樂，把洛陽周圍幾十裡的農田強行圈起作“兔苑”，將上千里的地方封起，作為梁家獵苑；一個商人不知禁令，誤殺了苑中一隻兔子，他竟先後殺死十多人。當他乘車出遊時，都有成群結隊的倡伎婢妾緊隨車後，鳴鐘吹管，歌酣竟路。梁冀的家產值 30 萬萬緡，抵全國租稅的一半。

西元 159 年，桓帝與宦官單超、左悺、具瑗、徐璜、唐衡合謀，殺了梁冀滿門老少，而單超等五人也于同日封侯。這五人中除單超早死外，其它四人的驕奢淫佚也毫不亞于梁冀。他們是宦官，已無性功能，但也“多取良人美人，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

宦官張讓的弟弟以殺孕婦取樂，時任司隸校尉李膺將其逮捕後處死。西元 166 年河南術士張成縱子殺人，李膺將其處死。張成的弟子與宦官勾結，誣告李膺與太學生等誹謗朝廷。盛怒中的桓帝下令逮捕了李膺等 2 百餘人，並在全國懸賞捉拿李膺的黨人。有些“黨人”自請入獄，聲援李膺。太尉陳蕃因上書為李膺鳴不平，而被皇帝罷官。城門都尉竇武及尚書等也上書為李膺喊冤。桓帝迫于壓力，於 167 年赦免了李膺等 2 百餘人，但終生禁錮鄉里。

西元 167 年，桓帝死，年僅 13 歲靈帝即位，竇太后臨朝稱制。大將軍竇武“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宴，旬月之間，費財億計”。在竇太后的支持下，竇武殺死了在朝中專權宦官管霸、蘇康二人。竇武還計畫除掉大宦官曹節等，曹節等迅即劫持漢靈帝和竇太后，並假傳聖旨，捉拿竇武；最終斬殺竇武及其宗親、賓客，竇太后隨之被囚禁。陳蕃不顧年老體弱，召集屬吏和學生 80 余人持刀攻擊宦官，

陳蕃等因寡不敵眾而遭殺害。

宦官侯覽的母親及其家人在家鄉山東無惡不作，山東名士張儉上書彈劾，反被誣告造反；靈帝下詔追捕張儉等人。宦官們借此大肆捉拿張儉黨人，受牽連者甚眾。

李膺在張儉事發後，站出來說話而受難，被捕後死於獄中，其子弟、親戚全部削職為民。此外，杜密、虞放等百余官員及名人被誣殺，受牽連而被流放、禁錮、處死者多達六、七百人。其後，宦官們又幾次追捕黨人，黨人之獄遍全國，形成了東漢時期的第二次黨錮之禍。

柏楊說：士大夫比宦官還殘忍。160年，士大夫連宦官的賓客都殺。166年，士大夫連宦官的朋友也都殺，更殺宦官的母親。而且很多次都在政府大赦令頒佈後再殺，而且以對宦官苦刑拷打為榮——否則的話不會自己洋洋得意記錄下來。像京畿總衛戍司令（司隸校尉）陽球，他在審訊王甫、王苗宦官父子時，親自指揮拷打，王萌向他哀求：“我們到這種地步，自知非死不可。但求你垂念先後同事之情（王萌也當過京畿總衛戍司令），憐恤我父親年老，教他少受痛苦。”陽球說：“你們父子罪大惡極，死有餘辜，妄攀同僚交情，有什麼用？”王萌氣憤地說：“你從當小官的時候，出入我家，像奴隸一樣侍奉我們父子。今天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上天不會容你。”這一下揭了陽球的瘡疤，他羞怒交集，用泥土塞住王萌的口，父子二人被活生生地拷打到死。陽球娶的是宦官家的女兒，靠著拍宦官的馬屁而逐步升遷。

漢桓帝永壽三年（157），中國有1067萬多戶，5648萬多人。《後漢書·桓帝紀》載“豫州饑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經黃巾起義和混戰，西元208年赤壁大戰後的全國人口為140萬，曹操說當時活下來的人只有原來人口的1%！

“馬前懸人頭，車後載婦女”、“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餘一，念之斷人腸”。赤壁之戰，曹軍損折更是數以萬計。西元 221 年人口下降到 90 萬；損失了 98.3%。西元 265 年，三國人口總計才 767 萬。晉武帝太康元年（280）三國復歸一統，中國人口只有 1616 萬多人了。人到哪裡去了？

一是各路諸侯混戰不休，相互吞併，最後形成魏蜀吳三家鼎足而立。蓋強者臥榻之側豈容他人安睡，弱者寧為雞口，不為牛後，都非通過武力解決不可。被殺掉的，多是老百姓。

董卓派遣軍隊到老百姓正在趕會的陽城，把趕會的男子的統統砍頭，駕著死者的車子和牛，將搶來婦女財物裝載上車，把砍下的頭顱也掛在車轆上，喊著萬歲的口號驅車回到洛陽，說是討賊獲得的戰利品，然後把這些頭顱燒掉，搶來的婦女被分配給士兵為婢妾。

《三國志》中董卓傳的記載：西元 192 年，董卓部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時三輔民尚數十萬戶，傕等放兵劫略……人民饑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兩年間數十萬戶人竟所剩無幾，一片荒涼。皇帝劉協逃出長安後，住處是以荊棘編的門戶，許多宮女餓死途中。隨駕官員出門打柴，往往倒斃路邊。袁術軍在江淮，不得不以蚌蛤充饑。民人相食，州裡蕭條。

曹操曾經泗水坑殺男女數萬口，屍體把河道都堵塞了。他進攻徐州被陶謙的軍隊阻擋，前進不得，便南向攻佔了幾個縣，把那裡的居民坑殺數萬，竟至“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曹操在攻打並州、青州時，凡遇頑強抵抗，都一律屠城。曹軍救劉備而打呂布首先攻下了彭城，並將彭城的守兵和平民全部殺戮一空。官渡之戰，曹操一方斬首 7 萬餘級，坑殺袁軍 8 萬降卒。那時常需短兵相接；殺人三千，必然會自傷八百；曹軍傷亡，亦可想見。

更多的人是餓死、病死了；餓急了、人吃人。饑荒和戰爭，使得病的機會增加，而且常大面積地傳播。曹操赤壁之敗，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士兵中很多人得了疫病；西元 217 年即建安 22 年北方有過一次疫病大流行，死人無數；那些生活條件還算好的中上層人物，年紀輕輕就因病去世的也不少。結果是“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當時中國的心臟地區，十成居民，剩下不到一成了。《三國志·魏書·張繡傳》有“天下戶口減少，十才一在”的估計。《三國志·吳書·朱治傳》描述當時的情況是“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東吳的領域包括從長江中下游到珠江流域的廣大地區，歸於一統時，才 230 萬人。魏蜀吳三家通共也只有 147 萬多戶，767 萬多人，可是要供養三個皇帝和百萬軍隊以及三架官僚機器，人民的負擔和痛苦該有多重。

西晉統一後的太康年間，有 240 多萬戶，1600 多萬口。金屬貨幣五銖錢被廢棄，布帛代替金屬，成為交易的手段。可注意的是，這種經濟衰落從漢末（西元 3 世紀初）一直延續到唐中葉天寶年間（西元 8 世紀初），500 來年才得恢復。人口恢復到漢代水準，金屬貨幣又代替布帛。這情況，不是戰爭所能解釋的。戰國是戰爭最多的時期，但戰國時期卻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簡單的講，秦漢社會土地兼并嚴重、農民破產流亡，變為奴隸，漢代是中國歷史上奴隸數量最多的時代。這導致了農業衰落。

5·西晉時經過八王之亂後人口減少 80%。從西元 291 年開始，先後有汝南王亮、楚王瑋、趙王倫、齊王、長沙王、河間王、東海王越及成都王穎八王為爭奪皇位，在洛陽相互攻殺，戰亂歷時 16 年之久，許多城鎮均被焚毀，史稱“八王之亂”。這場禍亂令晉室元氣大傷，更使生靈塗炭。都城洛陽及關中是主戰場，

受害尤烈。單單滅趙王倫一役，就“自兵興 60 餘日，戰鬥死者近 10 萬人”！諸王混戰中又引胡人參戰，最終覆滅了西晉。

與此同時，關東地區又爆發了罕見的蝗災和瘟疫，史載“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饑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並、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饑饉，流屍滿河，白骨蔽野”（《晉書·食貨志》）。

西元 301 年，蜀西氐族豪強李特糾合流民二萬餘，自稱鎮北大將軍，在綿竹（今德陽市黃許鎮）扯旗造反，陷廣漢，圍成都，入城大屠殺。李特戰死後，其子李雄稱成都王，後又稱帝，無惡不作，播亂長達 50 年。

永嘉五年（311 年），“關西饑饉，白骨蔽野，民存者百無一二”（《資治通鑑》）。《晉書·卷 37 司馬模傳》：“時關中饑荒，百姓相啖；加以疾疫，盜賊公行，模力不能制。”

晉愍帝建興四年（316 年），八月，劉曜進逼長安。司馬模之子司馬保遣胡崧兵入援，打擊劉曜於靈台（長安西）。“崧恐國威復振，則曲索（曲允、索琳守長安）勢威，乃帥城西諸郡兵屯渭北不進，遂還槐裡（長安西興平）。曜攻陷長安外城，曲允、索琳退保小城以自固。內外斷絕，城中饑甚。斗米值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眾千人守死不移。太倉有麩數十餅，曲允屑之為粥以供帝，既而亦盡”（《資治通鑑》）。

6·東晉內亂和南北朝混戰。

《晉書·劉聰載記》稱永嘉 5 年 4 月石勒殺“王公士庶死者十余萬”；同年六月王彌縱兵燒殺洛陽，“害諸王公百官以下 10 萬餘人”！石勒率輕騎在甯平城一次殺死晉軍 20 萬人，少數民族士兵接著連敗晉軍 12 陣，晉軍再死 3 萬人，

洛陽失陷；320年石虎擊敗前趙劉曜，“坑士卒1萬6千”。321年石勒“坑”晉軍曹嶷部的降卒3萬人。在今河南鄆城縣東，石勒將西晉逃竄的10多萬官員及士兵團團圍住，全部射殺，死屍堆積如山。

羯趙石勒明文規定羯人有權搶劫任何漢人；同時禁止漢人稱遊牧民族作胡人，違者重罰。一次，一個醉酒騎馬者突闖入宮門，再飛馳而去。石勒見了大怒。責問門衛為何不阻止他。門衛驚懼，忘了石勒禁令，如實說，那是個喝醉了酒的胡人。俗話說，胡人難纏，我哪裡阻止得了他。言畢，突記起石勒禁令，嚇得跪地求饒。石勒反而笑道：胡人是難說話，免罪。

名士樊坦被石勒任某地方官。有次他回京僅見石勒，半路上被國人搶個精光。石勒見他衣衫襤褸狼狽不堪，驚問怎麼會是這樣子。樊坦答：羯賊無道，把我的財物都搶光了。我這身衣服是臨急找人借來的。石勒笑道：羯賊確實亂搶亂幹。這樣吧，我替他們賠給你。樊坦這才想起石勒禁令，惶恐不已叩首祈恕。石勒免之。

後趙帝國地盤很小，皇帝石勒卻有五個皇后，一萬多姬妾。他死了以後，兒子日夜與五個皇后母親淫樂，被石虎殺掉，滅絕了皇族。

石虎每攻下一個漢人據守的城池、堡壘，便將其中的人全部殺死。他在首都鄴城以南開闢了世界上最大的狩獵圍場，任何人都不許向野獸擲一塊石頭，否則就是“犯獸”，要處死刑。官員們遂用“犯獸”作敲詐的工具，一個人如果被指控犯獸，就死定了或破產定了。石虎造獵車千乘，車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同時造格獸車四十乘，令犯人在車裡和猛獸格鬥。

有官員報告：濟南一個石頭雕制的老虎，走到城東南，後有狼群千餘相隨，腳印深陷入石頭中。石虎大悅：“石虎便是朕的名字。自西北徙至東南，大約天

意佑朕得天下啊。”

於是石虎宣稱要進攻晉帝國，下令徵兵，家有三個男人的征兩人入營，製造盔甲的工匠就有 50 余萬人，制造船艦的工匠也有 17 萬人。這些工匠 2/3 在徵調途中被水淹死或被因田畝荒涼而出沒無常的野獸所吞食。士兵比工匠更苦，後趙政府不但不供應糧食，每 5 個士兵還要獻出 1 輛牛車、2 頭牛和 15 斗米、絹十匹，違令者斬，繳不足的亦斬。人民賣子賣女來供奉石虎的揮霍，等到子女賣盡或沒有人再買得起時，世界上最和平善良的中國農民，便全家自縊而死，從洛陽到長安的道路兩旁的大樹上掛滿了屍體，前後銜接。

石虎為聚斂金帛，發掘前代帝王的陵墓。又發近郡男女 16 萬人，車 10 萬乘，運土至鄴城北隅築華林苑，華林苑的圍牆就有數十裡。天寒地凍，役夫凍死路上的有近萬人。

石虎掠奪中原地區年齡在 13~20 歲的漢族美貌女子 3 萬多人充實自己的後宮，僅西元 345 年一年中，因征美女而不情願者被殺高達 3 千餘人。其他羯族貴族各自奪取的美女又有近萬人，就連結過婚的、老百姓的妻子也不放過。當美女送到鄴城時，石虎龍心大悅，凡有超額成績的地方首長，都晉封侯爵。等到其暴政引起人民大規模逃亡時，石虎又責怪那些新晉封侯爵的地方首民不知道安撫人民，一律斬首。為容納美女，石虎分別在鄴城、長安、洛陽興建宮殿，用人力 40 萬。

石虎好男色，男色鄭櫻桃為人又輕佻淫妒，使出種種柔媚的手段將石虎籠住。他每夜在枕邊詆毀石虎的妻子郭氏，且時常當著石虎的面譏諷嘲笑。郭氏反唇相譏，誰知石虎袒護鄭櫻桃，於是和石虎起了爭執。石虎性似烈火，一頓拳打足踢，將郭氏當場打死。

後來石虎又娶清河崔氏女為繼室，相處一年有餘，鄭櫻桃又加以詆毀。石虎大怒，取來弓箭，急召崔氏問話。崔氏光著腳來到石虎跟前，邊哭邊哀求：“大王不要殺妾，先聽妾一言！”石虎獰笑說：“你若心無歹意，何必這樣慌張。你先坐下，我給你時間慢慢說。”於是崔氏轉身入座，卻聽見背後弓弦聲響，她急欲閃避，但已來不及，一支箭從後背穿入前胸，血光疾射而出，立刻倒地畢命。

石虎察知太子石邃有反意，當即誅殺了石邃及其親隨 30 多人；石邃妻張氏等男女 26 人，一律誅死，同埋在一口棺材裡；並殺東宮僚屬 2 百余人。另立河間公石宣為天王太子。

石宣出入建天子旌旗，前呼後擁，戎卒隨從多至 18 萬。他日夜荒淫，所經之地，必須窮極珍奇地供應，州縣多為之一空；石韜的行徑與其兄石宣類似。348 年，石宣害怕弟弟石韜跟自己奪位，先派人刺死石韜及隨從，再密謀幹掉老爹提前接班。事敗之後，石虎立即將石宣綁到台下，將石宣割舌、剜目、剝腸、斷手足，最後活活燒死。石宣妻妾子弟 29 人一併被殺死。石宣所有的妻子姬妾兒女，全都處斬；石宣的小兒子拉住石虎的衣服，狂叫痛哭，石虎咬牙將他猛擲出去，摔死了事。東宮僚屬 3 百人、宦者 50 人全部被車裂肢解，將東宮作為養豬的場所，東宮 10 余萬衛士全部謫配 1200 公里外的梁州。

再議立太子，被兩任太子殺怕了的石虎說了一番痛徹心肺的話：“吾欲以純灰三斛自滌其腸，何為專生惡子，年逾二十輒欲殺父！”遂選年齡最小的“紅小兵”石世，“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被兩任太子殺得心驚肉跳的老天王，也顧不了小王子將來能不能守住石家江山，只求一個底線——我活著的時候，他不會萌生殺死我的念頭！選定接班人之次年即 394 年，石虎匆匆稱帝后撒手而去。不等老皇帝入土為安，石虎的兒子們為爭奪皇位就開打了，這裡適用

的是所謂叢林法則，弱肉強食。繼位 33 天的少年天子石世及其母劉太后成了哥哥石遵登基的祭品；接著，石遵在位 83 天后被弟弟石鑿殺死，石沖爭奪帝位失敗後，“坑其士卒三萬餘人”。石鑿登極 103 天后又被石虎的養孫冉閔殺死，冉閔殺盡皇室，下令：“凡殺一個胡人者，官升三級。”霎時間，僅首都鄴城屠殺胡人 20 萬，造成數百萬人的死亡。冉閔於 350 年在鄴城建立冉魏帝國。352 年，東北的前燕帝國跟冉魏帝國在廉台村（河北無極）決戰，冉閔馬倒被擒。前燕帝國把冉閔打了三百鞭之後斬首。前燕帝國進圍鄴城，那被石虎千方百計搜羅來的數萬宮女，不是餓死，就是被士兵烹食。

“五胡入中華”造成中原大地巨大戰亂，洛陽焚毀，血沃中原，十室九空，人口銳減。據史料記載，中州大約有六七成的漢人逃往江南。此後源源不斷來自草原的遊牧民族，尤其是鮮卑族填補了空蕩蕩的中原和荒涼的洛陽。北魏的鮮卑人更是公開揚言漢人的性命只值一文錢。《中國通史簡編》說：“照江統《徙戎論》所說，關中人口百余萬，氐羌和鮮卑等族約占半數。”魏孝文帝從平城遷都到洛陽時，就遷來鮮卑人不下 100 萬。為穩定統治，鮮卑鼓勵鮮漢通婚。經過十六國和整個北朝長達 260 多年的民族雜交混血，北中國實際上已成為遊牧民族與漢族在數量上大致相當的民族混合地區，尤以鮮卑族的數量和影響為最大。

北魏末年爾朱榮欲稱帝，怕北魏舊臣不服，有人勸他全部剿滅，他笑了笑，答應了，於是，他請莊帝循河西至河陰，引導百官於行宮西北，告之大家說要祭天，不能請假。百官聚集之後，爾朱榮撿個高臺四處望，立馬於上，大聲叱責說：“天下喪亂，肅宗暴崩，都是你們不能輔弼造成。而且朝臣貪虐，個個該殺！”言畢，縱兵大殺。死難朝臣人數極多，據《北史》、《魏書》記載有 1300 多人，《資治通鑒》記載有兩千多，上至丞相高陽王元雍、司空元欽、義陽王元略，下至正

居喪在家的黃門郎王遵業兄弟，不分良奸，全部刀劈斧砍，殺個精光。爾朱榮又讓軍士鼓噪：“元氏既滅，爾朱氏興！”

北朝的齊國有 2000 萬人，到北周時人口僅 900 萬；南朝宋國有 469 萬人，到南陳國滅亡時只有 200 萬人，損失率達 60%。

7·西元 581 年，隋文帝楊堅篡北周，把年僅 10 歲的外孫小皇帝宇文衍殺掉後，又遍誅宇文氏皇族，共殺掉北周文帝子孫 25 家，節閔帝及明帝子孫 6 家，武帝子孫 12 家，數千鳳子龍孫，一時屠戮殆盡。隋文帝以殺人立威。他經常對大臣施以廷杖，一天之中四五人，常常有人被打死。他把帛故意放在道旁，誰揀起拿走，便立斬。有人告：禦史監師沒有劾奏衣劍不齊的武官，文帝便命殺之；有人勸阻，又被殺。特別是在他鬱悶的時候，沒有什麼大罪的人往往也被處死。隋文帝造仁壽宮數以萬計的死者或將死者被殘忍地活埋在坑內。

西元 598 年，高句麗王率騎兵萬餘進擾遼西，隋文帝即命漢王楊諒、上柱國王世積為行軍元帥，周羅喉為水軍總管，率大軍 30 萬分水陸兩路進攻高麗。漢王楊諒率陸路隋軍出山海關，時逢雨季，道路泥濘，糧草供應不上，軍中疫病流行，雖勉強進至遼水，已無力戰鬥；水路隋軍由周羅喉率領，自東萊出海，直趨平壤城，在海上遇大風，船多沉沒。於是水陸兩路被迫退還，死者十之八九。

文帝 24 年揚廣發動政變殺死文帝和哥哥揚勇，霸佔文帝最愛的夫人。煬帝更是擅殺大臣、屠戮臣民數萬，他擴建洛陽皇宮，每月役丁 2 百萬人。修運河，“詔發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俱要至，如有匿之者斬三族”，役夫達 543 萬餘，晝夜開掘，男人不足，女人充數，死者過半。如此浩大的工程，其目的是為滿足揚廣的腐朽生活。

西元 611 年揚廣第一次東征高麗時的總兵力達 113.38 萬人，號稱 200 萬，

運輸的夫差是兵員總數的好幾倍，結果大敗而回，只剩下 2700 殘軍跟皇帝回來。煬帝第一次征高句麗以慘敗告終，上百萬人的生命葬送在遼河以東，高句麗得勝後，將數萬中國士兵的屍體築成“京觀”。西元 613、614 年，隋煬帝又發動二次攻高句麗之戰。皆以失敗告終。

隋煬帝狂征高句麗給國家帶來了嚴重的後果，由於廣征丁夫，糜費巨大，加上修運河等工程，嚴重耽誤農事，造成大量壯丁死亡，以致出現“男丁不足，役使婦人”的可怕局面，各地紛紛揭竿而起。山東有一個自稱“知世郎”的王薄，利用人民反戰的情緒，作了一首《無向遼東浪死歌》，鼓動百姓起事造反，天下大亂。

從西元 611 到 628 年 18 年間，兵變、民變和宮廷政變共 136 次，有 50 多位稱帝稱王者，均統兵 15 萬以上，各據一方，相互混戰。全國戶數由 890 萬減至 290 萬，人口由西元 606 年 4602 萬人，減到 639 年 1235 萬，損失率 73%。

8·安史之亂。755 年，楊國忠派遣警備部隊包圍安祿山在長安的住宅，逮捕他的賓客，全部處死。安祿山遂率領洋華混合兵團 17 萬人南下，宣稱討伐楊國忠。洋華混合兵團一路勢如破竹，攻陷洛陽。756 年，攻陷潼關。李隆基從長安逃出，逃到了距長安 60 公里的馬嵬坡（陝西興平西），憤怒的禁衛軍把楊國忠殺掉，屠滅他的全家。為了防備復仇，禁衛軍要求李隆基處置楊玉環，李隆基只好把她絞死。

太子李亨奔向靈武郡（寧夏永寧西南）宣佈即位。因 20 萬精兵被楊國忠送死在雲南，唐朝的皇帝竟乞求回紇出兵，條件是：所有美女和財產任憑回紇姦淫燒殺和擄掠回國。757 年，回紇兵團收復長安，在李亨的兒子李豫一再要求下，回紇答應等收復洛陽時再踐約。當洛陽被收復時，那些日夜盼望政府軍的人民，

卻發現政府軍燒殺擄掠、猙獰無比。隨後，安祿山的大將史思明在范陽投降。759年李亨要秘密殺掉史思明，陰謀洩露後，史思明再度叛變。皇帝再向回紇乞援。762年，回紇軍團收復洛陽，洛陽遭到第二次惡運，距上次惡運只5年。洛陽的婦女兒童湧向聖善寺和白馬寺躲避，希望佛祖保護。結果回紇縱火焚燒，一萬余人全被燒死，大火數月不熄。繁華蓋世的東都，再罹浩劫，從此一百年間，一片荒涼。歷時九年的殘殺，使黃河流域蕭條淒慘，人煙斷絕，獸遊鬼哭。中國人口從九百萬戶銳減至二百萬戶，殘存者以紙為衣。西元755年有5292萬人，到760年人口1699萬。損失率68%。

唐政府的軍隊也效法回紇，對自己的同胞，比回紇兵團還要兇暴。西元760年，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借平息劉展叛亂，命部下殺死居住在揚州的阿拉伯、波斯商人數千人，把一個繁榮的揚州城屠為死城。《舊唐書·秦彥傳》描述：“江淮之間，廣陵（揚州）大鎮，富甲天下，自（畢）師鐸、秦彥之後，孫儒、（楊）行密繼踵相攻，四五年間連兵不息，廬舍焚蕩，民戶喪亡，廣陵之雄富掃地矣！”

《舊五代史》記載：“安祿山之亂，肅宗在靈武，悉召河西戍卒收復兩京，吐蕃乘虛取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於吐蕃。”吐蕃對所佔領的河西地區的漢民是進行了極其殘酷的民族壓迫，漢民被迫穿上吐蕃人的服飾，還得說吐蕃話，平時走在大街上，還必須像奴隸般的彎腰低頭行走，更是不能直視吐蕃人。史載，沙洲城破時，“丁壯者淪為奴婢，種田放牧，羸老者咸殺之，或斷手鑿目，棄之而去”。

9·唐武宗（841-846年）時有496萬戶，後周世宗（955-960年）僅120萬戶，到宋初為200萬戶。損失率76%。

有一句俗語：“黃巢殺人八百萬——劫數難逃”。黃巢實際上是一個儒生，

黃巢出身於一個靠販運私鹽暴利發財的富裕家庭，殷實的家底使得黃巢自小就有條件苦讀儒經以求晉身官場，卻不料屢次科舉均以落第告終。憤怒的儒生黃巢陡然間“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離開長安時扔下一首“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盡白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殺氣騰騰的誓言。

黃巢回家做了幾天私鹽販子。唐代規定只准國營企業經營鹽，黃巢沒有經營鹽的許可證，結果他們的鹽巴被查封沒收了。他便散盡家產嘯聚山林投身“農民革命運動”去了。黃巢變成暴民，是被暴官逼出來的。有暴官就有暴民，有暴民就有暴官，最後就是你吃我我吃你，吃得血肉橫飛，必然是對財產、對文化，對於所有社會生產力積累的破壞。

黃巢做了農民起義軍的“沖天大將軍”後，極端的復仇心理促使他對社會不加選擇地實施破壞政策。西元 879 年，黃巢攻陷廣州，屠殺城內各國商人 12 萬人，摧毀一切教堂，把曾經是海外貿易中心的廣州幾乎一舉蕩平。黃巢痛恨外貿至極，大軍所至，砍絕桑樹，為的只是不許養蠶織絲以貨外夷罷了。唐末動亂對於海外貿易的摧殘幾乎是毀滅性的。在廣州北伐前黃巢從《詩經》的“率土之濱”取了個“率土大將軍”的名稱。

西元 880 年黃巢攻陷長安，自立為帝。有人題詩嘲諷，查不出作者，巢大怒，把當時在尚書省門前警衛的官兵全部處死，並搜捕全城所有會寫詩的 3000 余無辜的儒生，全部殺掉。

黃巢將士進城時長安市民夾道歡迎，曾感動得起義軍散發金銀綢緞給民眾；黃巢稱帝后，黃巢士兵則如同明火執仗的強盜一般在長安街頭殺人越貨，爭搶美女，毆打平民，無惡不作。幾個月後出現了糧荒，長安城裡一片混亂。小股唐軍乘亂攻城，黃巢帶了少數隨從潛逃出城。唐軍進城之後，受到長安百姓的歡迎。

黃巢到了城外定下神來，才發現入城唐軍人數很少，隨即反攻入城。重入長安的黃巢，對於百姓歡迎唐軍一事恨之入骨，居然下令屠城。將城中男丁殺戮殆盡，來了個“巢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人，血流于路可涉也，謂之洗城”式的血洗長安城。883年4月，唐廷借沙陀兵協助攻城，一萬多沙陀兵與黃巢十餘萬人對陣，黃巢一戰即潰，只好棄城逃跑。逃出前，下令縱火。長安城在黃巢的一炬之下化成灰燼。

黃巢把唐末腐敗的政治制度和腐朽的生活方式全盤接收。像“監軍”即是，黃巢也派出他的監軍。朱溫所以叛變，就是因為不堪監軍的壓制，他的一切申訴，都被截留，無法到達黃巢面前，於是他把監軍斬首，向唐王朝投降。

朱溫（852-912），後名朱全忠、終名朱晃，唐朝宋州碭山（今安徽碭山）人，乳名朱三。朱溫的祖父和父親朱誠都是鄉村的私塾教師，長兄為全昱，次兄為朱存。父親早亡之後，因為家貧，兄弟三人隨母親一同投靠蕭縣劉崇家。朱溫當初參加黃巢起義，並非為了什麼勞苦大眾的幸福，更沒有什麼替天行道的思想，而僅僅是出於一種圖富貴、出人頭地的私心。在黃巢軍中無法混下去時，他聽從謀士謝瞳的計策背叛黃巢而投降了唐朝廷。

唐蔡州節度使秦宗先投降黃巢，黃巢敗後，他就在蔡州當起皇帝來，並攻佔了河南的許多地方，成為與朱溫的對手。朱溫雖然兵少，卻毫不示弱。一面派人到山東募兵，一面向兗州的朱瑾、鄆州的朱宣尋求支援。先後多次戰勝秦宗權的驕縱部將，尤其是在汴州北面孝村一戰，斬首2萬餘級，秦宗權開始居於下風，最後滅于朱溫之手。

901年，唐王朝宦官政權內哄，禁軍中忠於皇帝的宦官，起兵把兩位司令官殺掉，救出廢帝李晔，使他復位。宰相崔胤建議乘著這個機會使禁軍擺脫宦官的

掌握，任命正規軍出身的將領任司令官。李曄不聽，任命他最親信的宦官韓全誨、張彥弘接任左右軍司令官。宦官勾結鳳翔節度使李茂貞作為外援；崔胤自知危在旦夕，就給宣武（汴州）節度使朱溫寫信說，奉皇帝密旨，命朱溫發兵救駕。朱溫統軍西上。韓全誨立即強迫李曄投奔鳳翔，距李曄復位只十個月。朱溫圍攻鳳翔，鳳翔堅守二年，可怕的饑餓使它不能支持。903年，李茂貞只好把韓全誨、張彥弘殺掉，跟朱溫和解，送李曄返回長安。朱溫迅速派軍進入皇宮，殺盡了宦官數百人。派到各戰區擔任監軍的宦官，朱溫也命李曄下令，一律就地處決。

904年，強迫李曄遷都到重建後的洛陽，並裹脅長安全體市民跟隨東遷。長安宮殿和所有民房，悉數拆除，百萬余市民剎那間成為赤貧，被朱溫的汴州兵團押解，踉蹌上道，咒罵聲和哭聲，連綿四百公里。李曄到洛陽後四個月，就被朱溫派人刺死。李曄的兒子李祝繼位。為早日稱帝，朱溫令宰相柳璨、樞密使蔣玄暉等人加緊謀劃。柳蔣二人認為自魏晉以來，稱帝者都是按部就班地走上皇位的，不能著急。朱溫認為他們故意拖延時間，殺掉這兩位大臣。隨後又殺了許多大臣。907年，朱溫命李祝禪讓。第二年，乾脆派人將其殺掉，以絕後患。

朱溫對部下、戰俘、士人均濫殺成性。為保證戰鬥力，對待士兵極為嚴厲，每次作戰時，如果將領戰死疆場，所屬士兵也必須與將領與陣地共存亡，如果生還就全部殺掉，名為“跋隊斬”。所以，將官一死，兵士也就紛紛逃亡，不敢歸隊。朱溫又讓人在士兵的臉上刺字，如果思念家鄉逃走，或者戰役結束後私自逃命，一旦被關津渡口抓獲送回，必死無疑。

在誅殺敵兵時，朱溫殘忍的本性暴露無遺。魏博的羅紹威幾次請求朱溫幫他除掉難以控制的牙兵（即長期形成的節度使親兵），朱溫和羅紹威有姻親關係，於是就趁自己女兒（即羅紹威的兒媳）病死的機會，以奔喪為掩護，先派精兵裝

扮成擔夫，進入魏州城，然後由大部隊跟進。內外夾攻，將 8 千牙兵全部殺死，連婦女兒童也不放過。正和梁軍一起圍攻滄州的魏博軍聞訊反擊梁軍。梁軍攻下魏博軍的城池後，又將軍民殺得一個不留，激怒了當地百姓，因為魏博軍都是當地人出身。百姓紛紛抗擊梁軍。

其次就是亂殺戰俘。朱溫率軍在鉅野（今山東巨野）南邊擊敗朱瑄部，部將萬余人，清理戰場的時候，突然間狂風大作，沙塵彌天漫地。朱溫殺性頓起，借機對眾將說：“這是因為殺人不夠！”於是命將士把 3000 戰俘悉數殺死。

有一年，朱溫命朱友甯攻打青州博昌縣（今山東博興），打了一個多月仍未攻克。朱溫盛怒之下，命友甯驅使俘虜的 10 萬民眾背著石頭木料，牽著牛驢，在城南築土山攻城。到了城下，竟將人畜木石合在一起築成攻城的道路，慘不忍睹，喊冤之聲幾十裡之外就能聽到。不久，城被攻陷，朱溫又命令屠城，屍首遍野，清河竟也被阻塞不流。歷來戰爭成名的只有將領，受害的總是百姓，所謂“一將成名萬骨枯”絕不僅僅是一句賣弄文采的七言詩！

朱溫對待士人是殘忍至極。有一年的六月，朱溫與眾多幕僚及當地遊客在大柳樹下乘涼。朱溫望瞭望柳樹枝，自言自語道：“這柳樹正好可以做車轂。”眾人都未及回應，幾個書生遊客順口應道：“是啊，正好做車轂。”沒想到朱溫勃然變色，斥責道：“書生們只知道順嘴戲耍人，什麼東西！車轂要用榆樹做才耐用，柳木中看不中用！”然後沖著左右衛士們喊道：“還等什麼？”數十名衛士亮刃向前，將答話的幾個書生全部砍殺。

更讓朱溫遺臭萬年的是他的荒淫，而且是前無古人。西元 912 年，朱溫兵敗路上生病，回師洛陽後，住到大臣張全義家的會節園裡避暑，前後十多日。張家的妻妾都被他召去侍寢，淫亂終日，連張全義已是半老徐娘的繼妻儲氏也被他召

來強與交歡。張全義的兒子憤恨至極，持刀要與朱溫拼命，被張全義死死拉住，說不要忘了昔日朱溫對他全家的救命之恩。

朱溫在他的兒子外出征戰時，便將兒媳召入宮中，命為侍病，實為侍寢。更讓人吃驚的是，他的兒子們對父親的亂倫不但不憤恨，反而利用妻子在父親床前爭寵，討好朱溫，以求將來繼承皇位。父子這種醜聞，在歷史上恐怕獨一無二了。

朱友文是朱溫的養子，其妻王氏姿色出眾，美豔無雙，朱溫尤為喜歡。朱溫為滿足欲望，枕席之間答應王氏將來傳位給朱友文，這又引起了親生兒子朱友圭的不滿。朱友圭的妻子張氏也常常侍奉朱溫左右，甘心獻身，隨時注意年老多病的朱溫的一舉一動。後來，朱溫病情加重，就告訴王氏，讓她通知朱友文來見他，以便委託後事。友圭的妻子張氏知道後，趕緊密告友圭：“朱溫已將傳國寶交給王氏去找友文，我們就快完了”。朱友圭得到消息後，立刻利用他掌握的宮廷衛隊及其它親信所率的部隊發動了政變，連夜殺入宮中。朱友圭的隨從馮廷諤一刀刺入朱溫腹中，刀尖透出背部。朱友圭見他已死，用破氈裹住屍首，埋在了寢殿的地下。毛澤東一人無師自通了朱溫的秘訣，許多中國人因此變成豬瘟，把無恥當成有德。

唐末、五代，前後八十年，中國內外一片混戰，億萬生靈塗炭。前後 58 個皇帝，有 42 個死於非命。五代十國後漢的蘇逢吉梳理獄囚，便將囚犯無論罪行輕重曲直一律殺掉；為霸佔前宰相的房宅，他引誘僕人誣告，然後殺其一族；史弘肇出兵巡視，必殺人，一次，太白星座晝見，有人仰視，便被腰斬；史氏還實行斷舌、決口、斷筋、折足等酷刑。南漢開國之主劉氏性極殘忍，他以酷刑為樂，將人鍋煮，然後暴曬、灑鹽，使之肌體腐爛，尚能行走，不久死去；或用錘鋸待人，使之血肉交飛，慘叫聲不斷。劉氏還使用灌鼻、割舌、肢解、炮烙等刑罰。

自秦後的所建立 30 餘個朝代的開國之君出身遊民和社會下層的約占了一半。五代十國之間的開國之君十有七八是兵痞、無賴、流浪漢，心狠手辣就是自然的了。

10·金元滅宋。1122 年全國人口 9347 萬，到元初 1274 年人口 887 萬。損失率高達 91%。

北宋時期，宦官童貫在鎮壓方臘等農民軍的過程中，縱兵殺掠，殺害軍民近百萬人。

金兵圍攻陷汴京前後，大肆燒殺擄驚，姦淫婦女，無惡不作。除金銀財物之外，他們大量俘虜宋朝官員和百姓，其中女性尤多。《甕中人語》載，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七日，金兵掠巨室，火明德劉皇后家、藍從家、孟家，沿燒數千間。幹離不掠婦女七十余人出城。”這位幹離不就是金兵統帥完顏宗望，他以婦女為戰利品。金兵大規模索要宋國婦女是在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二日。《甕中人語》記載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五日，虜索玉冊、車輅、冠冕一應宮廷儀物，及女童六百人、教坊樂工數百人。二十七日，虜取內侍五十人，晚間退回三十人。新宋門到曹門火。二十八日，虜索蔡京、王黼、童貫家姬四十七人出城。”他們利用重兵壓境，先是要求宋朝支付簡直是天文數字的犒軍費，他們的真正用意就是掠奪宋王朝的婦女。《南征錄匯》記載：“原定犒軍費金一百萬錠、銀五百萬，須於十日內輪解無闕。如不敷數，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錠，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錠，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錠，宗婦一人准銀五百錠，族婦一人准銀二百錠，貴戚女一人准銀一百錠，任聽帥府選擇”。宋欽宗很快在上面畫押同意了，開封府不僅照辦，而且《開封府狀》還保存了這恥辱的見證：一份詳細的帳單。帳單上各類婦女的價碼與金人所開列的完全相同，只是將“貴戚女”改成了“良家女”，這表明受害面更廣了。該清單中，被一次抵押折價的各類女子竟然多達 11635 人！

一支原先三千多人的趙宋宗室隊伍，到達燕山後，只剩下一千幾百人，而且十人九病。後來嶽飛在朱仙鎮宰殺來犯金兵 59 萬多人，為漢人歷史所讚揚。

蒙古人的征服過程中，滅國無數，許多民族被斬盡殺絕，以至於全世界丟失了 2 億人，逾三分之一的人口。1211 年，蒙古攻擊金國，攻破居庸關（北京昌平）；1213 年全殲金國主力部隊，橫屍 150 公里。金帝南遷開封，1215 年金中都（即今北京）陷落；蒙古人對城中居民進行了長達一個月之久的大屠殺，100 多萬人為此殞命。

1215~1216 年，蒙古滅西遼帝國，蒙古帝國的邊界遂與花刺子模王國接壤。1215 年成吉思汗派使臣與商隊 450 人、500 頭駱駝，攜帶大批金銀珠寶與商品前往花刺子模國通商；該國邊境總督見財起意，誣指商隊為間諜，上報國王屠殺之。成吉思汗派出使臣，致書摩訶末責其背信棄義，要求交出兇手。摩訶末拒絕要求並殺害正使，剃光兩位副使鬍鬚，押送出境。鐵木真遂暫時放下金國，於 1218 年親率大軍西征。1220~1221 年對花刺子模國尋思幹（撒馬爾罕）瘋狂屠殺；當時共計 5 萬蒙古兵，平均每人手刃 24 個百姓之多，被屠殺者多達 120 萬。滅花刺子模王國後，鐵木真繼續率兵南下，消滅位於今阿富汗及伊朗東部的幾個古老王國。1223 年，蒙古西征軍攻入南俄羅斯地區。基輔大公穆斯提斯拉夫·羅曼諾維奇組織南俄聯軍迎戰，在卡爾卡河畔遭蒙古人突襲，幾乎全軍覆沒。這次西征歷時 8 年，於 1225 年結束。鐵木真把原西遼大部分、以及花刺子模王國故地封給他的次子察合台。

1227 年 8 月屠夫鐵木真發洩獸欲時，被西夏婦女咬掉了小弟弟于 8 月 18 日去世。其後繼者實現了對西夏的征服。出於報復，將西夏境內的居民係數屠戮。僅西夏都城興慶府（今銀川）就有超過 80 萬的居民被屠殺，黨項民族也從此滅

絕于中華大地。

1231年，拖雷派遣使節速不罕到南宋談判借路。然而走到沔州（陝西略陽）時，被守將張宣殺掉。拖雷大怒，即從大散關（陝西寶雞西南）攻入宋境。一連攻陷興元（陝西漢中）、金州（陝西安康），沿漢水而下，在光化進入金境。宋帝國因一個將領的顛覆，竟付出數十萬人死亡的代價，並為拖雷解決了借路的困難；現在不需要借，路已成為他的了。

金國駐防鄧州（河南鄧州）大將完顏合達，在鄧州西南禹山迎戰，大敗，急撤退到鄧州固守，一面向中央報告大捷，金國在狂歡中度過新年。1232年春，完顏合達的女真兵進入蒙古的口袋陣地。在蒙古騎兵衝殺下，15萬女真兵四散逃命。這時潼關守軍也急行軍赴援開封，他們攜妻負子，疲憊恐懼，好容易走到洛陽以南，被埋伏的蒙古兵團截擊，全軍覆沒。

1233年春天，金帝完顏守緒逃奔蔡州（河南汝南）。蒙古國派人到宋國的襄陽要求援助。於是，兩國簽訂軍事同盟，蒙古帝國答應宋國可以收回淮河以南若干被金國強佔的地區，宋國答應供應糧秣；宋與蒙古以淮河為界。該年底，蒙古兵團抵達城下。宋軍2萬人在大將孟珙率領下，按盟約規定饋贈給蒙古兵團的糧秣30萬石，也抵城下。

1234年正月，完顏守緒自縊身死，縱火焚屍。剛剛火起，城即陷落，金國立國120年，到此滅亡。蒙古兵團遂撤回關中（陝西省中部）。沒過多久，宋國宰相鄭清之和大將趙范就決定收復東京開封，西京洛陽，南京應天（河南商丘）。也就是違約來收復整個黃河以南地區。6月，宋國北伐兵團三道出擊，收復開封和歸德（即應天，金國改名歸德）。7月，收復洛陽。8月，蒙古兵團發動反攻，除了三京再度陷落外，宋軍喪失戰士10余萬人。

1237 年秋蒙古攻入俄羅斯境內，首先圍攻大城梁贊數月，12 月 21 日大肆屠城。1238 年蒙古人攻陷莫斯科、弗拉基米爾等城市，遭到的抵抗非常激烈，光是小城科澤爾斯克就抵擋了蒙古人 50 天才陷落。1240 年底蒙古大軍攻陷基輔。1241 年拔都攻掠加利西亞和波蘭，在捷克受挫後南下與南路大軍匯合。南路蒙古軍大敗匈牙利人，在多瑙河草原上大肆劫掠，遠達亞德里亞海岸，最後於年底開始撤離歐洲。北路蒙古軍在 1242 年夏被捷克人擊敗後才退回伏爾加河草原。1243 年，拔都在伏爾加河下游薩萊立庭，金帳汗國的統治正式開始。

東方帝國雖強大，但只要擊敗其主力軍，整個國家即行瓦解崩潰，民眾亦成為征服者的奴僕。俄羅斯由眾多分立的的城市和鄉村構成，要徹底征服他們，除了逐個攻陷這些設防的城市和堡壘並派兵駐守之外沒有其他辦法，要做到這點是不可能的。比如諾夫哥羅德就毫髮無損倖存下來，當時諾夫哥羅德認真抵抗蒙古人未必會敗。可諾夫哥羅德寧願向蒙古人稱臣，是因為必須對付來自西北方的瑞典人和德意志騎士團。蒙古人如同風暴一般，席捲大地之後自然會退去；而瑞典人和德國騎士的目的在於開拓疆土，對俄羅斯的威脅更大。1240 年諾夫哥羅德大公亞歷山大·雅羅斯拉維奇在涅瓦河畔擊敗瑞典人，同時立沃尼亞騎士團趁虛攻佔臨近大城普斯科夫，給諾夫哥羅德造成更大威脅。雅羅斯拉維奇傾全力以戰，於 1242 年初收復普斯科夫，隨後在 4 月 5 日爆發了著名的冰湖血戰，俄羅斯人大敗立沃尼亞騎士團，終於遏制了德意志騎士團的東進勢頭。這幾場大戰都發生在蒙古人西征的高潮時期，這至少證明俄羅斯人的實力並沒有被蒙古人完全摧毀。俄羅斯諸邦事實上只是金帳汗國的屬國。俄羅斯人於 1395 年正式廢除對蒙古的朝貢。蒙古人對俄羅斯人的威脅跟同時期蒙古人對明帝國的威脅沒有兩樣，俄羅斯人表現還好些，沒有經歷土木堡之類的屈辱。

蒙古諸王在元帝國境內都有封地，拔都在中國的封地共三處：平陽，晉州，永州。其中平陽有戶約四萬一千，晉州約一萬，永州約六萬。三處加在一起人口超過任何一個俄羅斯城邦，油水也遠超過俄羅斯，金帳汗直接派官員來平陽管理稅收。因金帳汗遠在西方，平陽百姓的實物稅和勞役必須折成金銀收取，金帳汗國官員以遠高於市價的價格橫徵暴斂，大批百姓破產。即便是在中國，俄羅斯人的地位也比漢人高得多，屬二等色目人。元皇帝對俄羅斯人的戰鬥力也頗欣賞，後來收聚境內的俄羅斯人共約一萬戶，安置在山西大同一帶，從這些俄羅斯人中招募一隊禁衛軍，稱“斡羅思扈衛親兵”，駐紮於大都以北拱衛京師。

1252~1259年，蒙古征服了波斯（伊朗）和黑衣大食（伊拉克），凡有抵抗即屠城，共屠數百城，整個中亞一片廢墟。1258年，旭烈兀（拖累的兒子、忽必烈的兄弟）的蒙古鐵騎攻陷巴格達，120萬人死於屠刀下，底格裡斯河河水為之血紅！蒙古軍隊曾一度佔領今敘利亞和土耳其東部，大汗把這塊廣大的土地封給旭烈兀。稱伊爾汗國。

1253年蒙古攻陷大理，1258年安南國王陳日照向蒙古投降。1259年，忽必烈也渡過長江，抵達鄂州城（武昌）下攻城。宋國擢升賈似道當宰相，命他救援鄂州。賈似道那時駐防在黃州（湖北黃州），他派遣密使向忽必烈乞求和解，願意承諾下列條件：一宋帝國向蒙古國稱臣，降為藩屬。二以長江為兩國疆界，宋帝國全部割讓江北土地。三宋帝國每年向蒙古帝國進貢銀幣二十萬兩，綢緞二十萬匹。和解的建議提出得恰是時候，因為蒙古大汗蒙哥逝世，傳來消息說，親族會議可能推舉忽必烈的弟弟阿裡不哥繼任大汗。這使忽必烈心如火焚，所以他迫不及待地接受賈似道的條件，命兀良哈台兵團放棄潭州（長沙），一齊北返。

賈似道立即叛盟，下令截殺蒙古殿后的散兵遊卒，用他們的人頭向首都報告

大捷。當賈似道凱旋返都之時，宋帝命全體文武官員都到郊外盛大歡迎。名作家廖瑩中還撰寫《福華篇》巨著，歌頌賈似道對國家民族的偉大貢獻。就在宋國慶祝勝利時，蒙古的使節郝經前來宋國報聘，並談判履行和約的細則。賈似道遂把郝經逮捕，秘密囚禁在真州（江蘇儀征）軍營。

忽必烈登基後，於 1269 年圍攻襄陽（湖北襄樊）。賈似道封鎖了襄陽被圍的消息，並命他最親信的大將範文虎前往援救。範文虎紮營包圍圈外，偶爾截擊一下蒙古的巡邏部隊，大部分時間都在跟美女享樂。襄陽被圍 5 年，糧盡絕。1273 年，蒙古兵團運來回回巨炮，一炮就把城樓轟碎，聲如百萬霹靂。守將呂文煥望著首都臨安痛哭，開城出降。

1274 年，蒙古對宋國全面進攻。1275 年，蒙古兵團迫近安慶，範文虎魂不附體，全軍投降。謝太后把賈似道免職，貶謫到循州（廣東龍川）。走到漳州時，住宿在木綿庵，押解他的差官鄭虎臣把他拖到廁所，擊碎肋骨而死。謝太后派人向伯顏乞和，願降為屬國，伯顏接受了。可蒙古使節廉希賢一行前往臨安談判，走到獨松關（浙江安吉南）時，被一位愛國心強烈的守將殺了。謝太后在驚恐中，急忙再第二次派特使到已陷落的建康向伯顏解釋，保證嚴懲那守將。伯顏第二次派出使節張羽，走到平江（江蘇蘇州），又被另一位愛國心強烈的守將殺掉。伯顏發現他面對的是一個不可理喻而又狡獪兇惡的野蠻部落，蒙古兵團遂進抵臨安。謝太后和皇帝趙顯投降。九歲的親王、趙顯的哥哥隨著他的母親楊太后逃到福州繼位，號召繼續抗戰。蒙古軍隊不停追擊，一直追到了井澳（中山南一百公里海上橫琴山小島），宋帝龍舟翻覆，跌到大海裡，受驚而死。大臣們再擁立他的弟弟、八歲的趙昀繼位，進駐崖山。這時殘餘的軍民和眷屬，還有 20 余萬人。1279 年，蒙古大將張弘范發動海陸攻擊，宋軍崩潰。陸秀夫背負趙昀投海而死，楊太

后也投海而死，宋亡。

中國有 60%的人口死於蒙古人的屠刀下。中國北方 90%漢族平民慘遭種族滅絕，忽必烈就下令屠殺了 1800 萬漢人。焚燒房屋農田造成凍死、惡死，用死屍污染水源造成的疾病沒能直接統計，西方人估計是 3000 萬。四川在蒙古屠殺前，估計有 1300-2000 多萬人，屠殺後竟然不滿 80 萬人。四川四路，包括今陝西所屬的大安軍、興元府、沔州、洋州、金州，甘肅所屬的天水軍、西和州、階州、成州、文州，估計戶數從戰爭前 1175 年的 258 萬（包含上述陝甘兩省地區），減至戰後 1290 年的 15.5 萬（包含上述陝甘兩省地區），人口減少到 1/15。幾乎成了無人區。1231 年拖雷攻進潼關、四川後，屠殺的漢民數量是吉尼斯世界之最。“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元代賀清泉《成都錄》）。“蜀民就死，率五十人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積其屍。至暮，疑不死，複刺之”（《三卯錄》）。蒙古還對徐州、杭州進行了野蠻的大屠殺。在蒙古人殺戮和統治下，中國喪失了 7000 多萬人口。蒙古帝國在中國境內的種族滅絕，作為世界記錄放在《吉尼斯世界記錄大全》1985 年版。

11·元末大混戰，人口損失率 75%。

朱元璋重用儒家，結果殺得血流成河。朱元璋出生微賤，在生計艱難之際為郭子興收留、重用，完全借郭子興而興，得勢後他卻忘恩負義。朱元璋的好友殺了都元帥，朱元璋又殺了好友，當上都元帥。1366 年，朱元璋救應遭難的小明皇帝，在龍舟上把皇帝推入長江，建立了明朝。他殺來殺去，先征服了中國人，才轉向驅趕已經式微的蒙古人。

奪得天下後，朱元璋翻臉不認人，“火燒獨角樓”，大殺功臣、朝臣。據史書記載，明初胡惟庸、李善長、藍玉三案總共殺人十萬之多。空印案、郭桓案共

殺了七、八萬人。

胡、藍兩人的所謂謀逆純屬子虛烏有。胡惟庸專權不假，但禦史中丞塗節告發謀反卻沒有證據。雲奇也並非朱元璋貼身宦官，僅僅是西華門的一個小太監，他攔御駕告狀不知出於何故，卻正好給朱元璋找到了殺人的藉口。《明史》記載雲奇告變一事，有四個字：“鑿空說鬼”，很耐人尋味。至於說胡惟庸暗通蒙古、倭寇，那分別是洪武十九年和二十三年的事了，而胡惟庸被殺則是在洪武十三年，此時的胡惟庸，按《明史》的說法“反跡尚未暴露”。顯然，這是一次有計劃的謀殺！因胡案遭殺的人前後達三萬餘人。

藍玉案。藍玉一生南征北討，戰功無數，從未謀生反意，他的“罪過”就在於功高蓋主。洪武二十五年年底，藍玉平叛勝利，十二月班師回朝。轉年正月初十左右，藍玉回到南京。朱元璋大封功臣，許多人都得到了很高的封賞，連傅有德也封了太師，而藍玉才僅僅封了個太傅，他於是口有怨言，誰知這怨言竟被特務聽了去，錦衣衛指揮使蔣璞誣告藍玉謀反。二月初八日，早朝即將結束時，突然有人控告藍玉謀反，大將軍、涼國公、太子太傅藍玉被當場逮捕。一天后，西元 1393 年即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十，朱元璋就下令將他處死了。到當年五月一日，朱元璋已經將京城各軍府、衛所的中高級將領基本牽連進來殺光，並將自己親自作序的藍玉《逆臣錄》公告天下。就這樣，在兩個多月時間裡，將大約兩萬多需要幹掉的人大體清除完畢。這份《逆臣錄》同樣可笑，它煞有介事地選錄出近千人的口供，並記載著近千人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前往藍玉的公爵府飲酒赴宴、密謀造反的故事。於是，這位曾經百戰百勝的大將軍，霎時間變成了一個不是弱智、就是腦子進水的陰謀造反者。李善長在藍玉案發生十年後被牽出遭誅滅三族，此時李善長已是 77 歲的退休老人。胡、藍兩案將元勳宿將幾乎一網打

盡，被列逆臣錄的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

空印案。1382 年，明帝國最高財政機關，在每年審核各地例行財政報表時，要求嚴格，精確到了小數點以後的多少位元數字，稍有不合，立即作廢重報。於是，各地進京申報報表的財務人員為了少跑冤枉路，就在進京時，攜帶了蓋好本地公章的空白報表，以便與中央機關核對過數字後，或者在遭受到刁難時，就地重填。為各方所默認接受。誰知，朱元璋偶然知道了這個情形後，認定自己發現了一個官員相互勾結、舞弊欺詐的潑天大案。於是，這位缺少財務知識的皇帝立即發雷霆之怒，下令將全國各地、各級政府部門的正印官，即一把手全部處死，副手以下官員打一百棍，充軍邊疆。1300 多個官員，不論良莠好壞，全部被殺掉。以後又牽連了數萬人，著名學者方孝孺的父親便在空中印案中遭殺害。

郭桓案。1385 年，戶部侍郎郭桓貪污了的財物總計折合精米 2400 多萬石，相當於當時全國一年的稅糧收入。朱元璋要求對此案一追到底。最後的結果是，所有中央六個部和全國各地、各級的大部分官員被牽連進去。朱元璋自己說，此案“天下諸司盡皆贓罪，系獄者數萬，盡皆擬罪”。《明史》的《刑法志》記載：自六部左右侍郎，即從中央六部每個部兩位副部長開始的以下官員全部處死，全國各地各級官員處死者數萬人。由於“寄贓遍天下”，所以，“百姓中產之家大抵皆破”。就是說，朱元璋畢其功於一役，將天下的貪官污吏和豪門大戶一網打盡了。其中有多少冤魂怨鬼基本無從查考。

茹太素是明初有名的大臣，以忠厚正直為時人所敬重，官位最高時為正二品戶部尚書，相當於今天中央最高財政經濟部門首長。此人就是因為奏摺寫得太長而被朱元璋急急召來打了 80 板屁股的那位。他就曾經被判罪後戴著鑊銬上班辦公，後終於被朱元璋殺死。在《大誥三編》中，這種為朱元璋所發明的嶄新工作

方式，叫做“戴罪辦事”。戴，是已經被判刑的意思。當時，在各級政府機關裡，這種戴罪辦事的人，按照朱元璋的記錄，有 328 人。

朱元璋曾賜給了劉伯溫一個很美貌的侍姬。劉伯溫知道這是來監視自己的，因此，特別小心翼翼。當時，為了一個基本算不上過失的事情，朱元璋下旨，令劉伯溫將一篇無用的文書必須每天抄寫一遍，以示懲罰。這實在無聊。時間一久，皇帝也不再提起此事，而且待劉伯溫親切如初了。65 歲的劉伯溫也就不再抄寫。而在此期間，那位美麗的女孩子，卻真心愛慕上了這位老先生的人品才學，使老人悽愴蒼涼的心境得到不小的慰藉。

誰知，很久以後，朱元璋突然下令，要檢查太久之前給劉伯溫留的家庭作業。劉伯溫一下蒙了，他哪裡能拿得出來？這雖然不是一件大事，但安上一個抗旨的罪名卻恰好合適。劉惶恐無地，由此知道，皇帝是想要自己死。不料，那聰穎的女子卻比劉伯溫更瞭解皇帝。她每天都在悄悄替劉伯溫抄寫，遂使劉伯溫得以交卷。朱元璋卻在隨手一翻之際，看出後面的字跡有異，詢問之下，得知實情。皇帝沒有表示什麼，放過了劉伯溫。據說，劉伯溫晚年喪妻，對那位女子充滿愛憐與感激。他離開皇宮，急急忙忙想趕回家向她報喜，沒有注意一隊輕騎兵風馳電掣般駛過身邊。劉伯溫到家時，便看到她倒在血泊中，已經氣絕。

正史記載說，胡惟庸在朱元璋的暗示下，帶著醫生去給劉伯溫看病。於是，劉伯溫的肚子裡很快長了個痞塊。最後，在一種典型的慢性中毒症狀中，輾轉反側，相當痛苦地死去了。

大將軍、穎國公、太子太傅傅友德作戰勇猛，愛兵如子，深有謀略。據說，他平素沉默寡言，每臨戰事卻常能身先士卒、出奇制勝，其身上的刀劍傷痕不下百餘處。且此人在個人品行上也幾乎無懈可擊，相當自愛。因此，從一個普通的

校級軍官，一直成長為屈指可數的帝國開國功臣，為朱元璋冊封的全部九個公爵之一。1394年11月29日，朱元璋舉行盛大宴會。誰都沒有想到，大家剛剛坐定，朱元璋突然提出的話題是，傅友德擔任宴會警衛的兒子簡慢無禮。傅友德連忙站起來，打算賠罪。不料，朱元璋也立即站起，喝問道：“你站起來幹什麼？哪個讓你站起來？”傅友德趕緊埋首坐下，不敢吭聲。朱元璋下令說：“去把你的兩個兒子叫來。”傅友德遵命向外走去。他剛剛走到門口，朱元璋的貼身衛士便趕來傳旨：“帶二人的首級來見！”隨即，遞給傅友德一把寶劍。傅友德提著兩個兒子的人頭返回時，沒有下跪，也沒有說話，只是靜靜地站在朱元璋面前。朱元璋呵斥道：“你怎麼這樣殘忍？莫非是怨恨我嗎？”傅友德大吼：“你不就是想要我們父子的人頭嗎？你不就是想要我遂你的心願嗎？”說完，橫劍自刎而死。朱元璋當即暴怒不已，下令：除他自己的外孫之外，將傅友德全家查抄、流放到雲南。雲南全省，正是傅友德帶領大軍收歸大明帝國版圖的。

1395年即洪武二十八年正月春節過後不久，馮勝被逼自殺。馮勝也是朱元璋所封的九個公爵之一，而且是第一批冊封的六大公爵之一。到朱元璋死前，他所封的全部九個公爵，除病死者外，只有一個信國公湯和，得以善終。原因是，此人第一個交出兵權，且久患中風，除了不停地淌口水，已經連一句完整話都說不清楚了。他所封的全部54個侯爵，在朱元璋死前，只有人們普遍認為最平庸、最沒有威脅的兩個還活在世上。

朱元璋在位三十年，殺了20萬，基本上將功臣殺光。連毫無二心的幼時放牛娃朋友徐達也不放過；“武臣第一”的徐達長背疽，忌吃蒸鵝；朱元璋為除掉功臣，就專門賜他吃蒸鵝，徐達不得已流淚吃下，不久背疽爆發而亡。無人不殺，無人不可殺，一個個的殺，一家家的殺，有罪的殺，無罪的也殺。可謂冷酷刻暴

到了極點，名副其實的恐怖政治。

朱元璋一生的只有一個“殺”字，殺人是他一生的嗜好與“成就”，就在他咽氣前還特別下旨，將 40 多個後妃全部被勒死為自己殉葬。從他的兩首詩中可以看出這個流氓皇帝的霸氣與血腥氣：“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菊花詩》）。“殺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猶腥，小僧不識英雄漢，只憑嘵嘵問姓名”（《不惹庵示僧》）。只要一絲不滿，他就可以大規模的殺人。有一次他微服私訪，聽到老百姓稱他為“老頭”，頓時怒上心頭，回宮便調軍隊將那個地方附近的人全部抓來殺掉。還有一次朱下令免除江南賦稅，可是到了秋天又反悔了，複令收稅。禦史周衡進諫說，出爾反爾是失信於民。朱當時沒有發作，卻記恨在心。不久，周禦史因家事請了六天假，因故多耽誤了一天。到第七天回來銷假時，朱元璋以“你失信於我”，最終將周禦史殺了。

朱棣比起乃父來毫不遜色。1402 年，他奪了親侄子的皇位，導致了百萬人戰死沙場；建文帝宮中的宮人、女官、太監被殺戮幾盡；他又遷建文帝母親于懿文陵幽禁，殺掉建文帝三個兄弟。建文帝七歲太子朱文奎於亂中“不知所終”，肯定被殺了，另外的小兒子朱文圭當時才兩歲，還是在懷抱之中，朱棣先把這個小孩幽閉于廣安宮，後來不知所終，定是被殺了。他一次性枉殺建文帝忠臣及其家屬 1 萬 4 千多人。

朱棣的謀士姚廣孝在北平時對他講，方孝孺是天下“讀書種子，”絕不可殺。朱棣召方孝孺入殿，方孝孺也不施禮，依舊嚎哭不已。朱棣說：“詔天下，非先生不可。”方孝孺邊哭邊罵道：“死即死耳，詔不可草！”

朱棣怒急，大聲叫道：“怎能讓你痛快一死，即死，難道你不怕我誅你九族

嗎？”

方孝孺大喝：“便誅十族又奈我何！”朱棣命衛士用大刀把方孝孺嘴唇割開，一直割裂到耳邊。然後，命人逮捕其九族親眷外加學生，湊成十族，共 873 人，依次碎剮殺戮于方孝孺面前。方孝孺忍淚不顧，最後被凌遲於聚寶門外，時年 46，充軍邊遠地區而死的有 1000 多人。孝孺臨刑前做絕命詩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尤，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

兵部尚書鐵鉉被逮至京，朱棣派人割掉鐵鉉耳鼻，在熱鍋中燒熟，然後硬塞入這位忠臣口中，問：“此肉甘甜否？”鐵鉉答：“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朱棣下令寸磔鐵鉉，這位忠臣至死罵不絕口。朱棣又把鐵鉉 80 多歲的父母投放海南做苦役，虐殺其十來歲的兩個兒子，並硬逼鐵鉉妻子楊氏和兩個女兒入教坊司充當妓女，任由兵士蹂躪。

刑部尚書暴昭，由於陛見抗罵，朱棣先去其齒，次斷手足，以刀慢割脖項而死。

對禮部尚書陳迪，朱棣命衛士綁送他及其六個兒子一起至刑場凌遲。朱棣又先派人割下陳迪兒子陳鳳山的鼻子和舌頭，塞進這位忠臣嘴裡逼他下嚥。陳迪至死不屈，怒罵而死。

對太常卿黃子澄，也滅其三族，凌遲處死。兵部尚書齊秦因其不屈，送刑場凌遲；兄弟全體處斬。財政部副部長卓敬滅三族。教育部長陳迪全家處斬，親屬 180 余人廷杖後貶竄蠻荒。監察部代理部長景清磔死，家屬親朋全數處決，故鄉一連數個村莊房舍一空。

右副禦史練子寧，因殿上怒罵，朱棣命人先割掉其舌，此後寸磔而死，其宗

族被殺者 151 人，數百人貶竄蠻荒。

最高法院秘書長鄒瑾家族 448 人處決。最高法院副院長胡閏家族 217 人處決。

對建文帝監察禦史高翔，因其喪服入見，朱棣命衛士殺之于殿上，沒產誅族，又掘發高氏宗族墓地，焚骨拋屍，交雜狗骨馬骨四散丟棄。

對監察禦史王度，宗人府經歷宋征、監察禦史丁志、巨敬，棣皆施以族誅之刑。

歷朝歷代異姓相伐相殺，從未有這樣慘屠對方官吏臣下的舉動。因此，清初史家谷應秦這樣歎道：“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強漢之律，不過五宗……世謂天道好還，而人命至重，遂可滅絕至此乎！”朱棣秉承朱元璋老混蛋血脈中淫暴兇殘的因數，把多位忠臣孝子的大好清白妻女送入教坊司（公家妓院）做性奴，每天受二十多精壯漢子輪奸，生下男丁當家奴，生下女孩長大後接著做妓女，死後便“著抬出城門喂狗吃了”……（西歐沒有中國的將罪犯妻女沒官為奴的法律，更無株連之說）。

殘暴如此，坐穩龍椅後的朱棣又給自己立牌坊。永樂 22 年甲辰科舉考試，本來第一名狀元是孫日恭。考試官員把錄取名單呈給朱棣過目，這位流氓皇帝竟咬文嚼字起來：“孫日恭第一名，不行！日恭兩字合起來就是‘暴’。朕一向以仁心為本，平生最惡殘暴苛刑，隱暴於名的人斷斷不能為我大明狀元”。批來批去，從三甲之中點了一個名叫邢寬的人為狀元。

朱棣曾經嫌棄朱高熾的肥胖，不讓禦膳房給朱高熾吃飽，說是減肥，有人看到太子餓的難受，就給他做飯，讓朱棣知道後，把此人剁成肉醬。

1449 年也先率軍侵略，王振為了邀功取寵，不顧于謙等大臣的強烈反對，

力主皇帝親征。兩軍一交戰，明軍即大敗。前線接連傳來失敗的消息，王振與英宗才決定班師。本來英宗有充足的時間避開也先軍的追趕，但王振想炫耀鄉里，主張皇帝轉道其家鄉，後來又怕大軍踏壞其莊稼，改道而行。如此反復再三，給也先以追趕的時間。也先輕易地捉住了明英宗及各部尚書等 50 余位重要官員，明 50 萬大軍全軍覆滅。當英宗被捉時，護衛將軍樊忠看到亂軍中的王振，氣憤地喊：“我為天下誅此賊！”用鐵錘砸死了王振。

土木堡慘敗的消息傳到北京後，悲憤的大臣誅殺王振的死黨，查抄了王振的財產，得金銀 60 餘庫，其它珍寶無數。王振家族無論老幼皆被斬殺。這就是沁透血水的中國。

12·從李自成起義到吳三桂滅亡，混戰五十四年。明末人口為 1 億，到清世祖時全國人口只剩下 1400 萬人了，銳減了 80%多，損失人口 8000 多萬。

1627 年 3 月陝西大饑荒，人相食；這場空前的大災難拉開了農民起義的序幕。1628 年高迎祥反明稱“闖王”。1630 年李自成殺驛站的上司後投奔舅舅高迎祥。1634 年農民軍戰敗，李自成（軍）投降官軍並被禮送回陝北，但李自成殺掉了護送的官軍。1635 年 3 月李自成軍燒毀鳳陽皇陵和皇覺寺。1636 年夏，高迎祥被俘而亡，李自成稱“闖王”。

1641年1月李自成攻破洛陽。正月二十日，洛陽福王府邸。人聲鼎沸中，烈焰騰騰，珍稀香木製成的無數王府家俱皆成為柴木，烘燒著一口從洛陽郊外迎恩寺抬來的“千人鍋”。巨大的鐵鍋內，撒滿薑、蔥、蒜、桂皮、花椒以及無數高湯燉煮用料，奇香撲鼻。熊熊烈焰中，最駭人心目的景象是，巨鍋之中，除七、八隻剝皮去角的整只梅花鹿以外，還有一個光頭的三百多斤的巨胖活人在裡面，他盲人游泳一樣瞎撲騰，時而竄上水面，時而沉入水底，邊嚎邊叫，好不淒慘。

其間，這個連陰毛都被剃光的“豬油糕”樣大胖子剛剛抓住一隻浮起的梅花鹿屍體喘息，大鍋周圍兩三千圍觀的農民軍士兵立刻用長矛戮刺其胳膊，使此人不得不慘叫著放開手，重新在已經微微燒開的熱水中“游泳”。此人乃崇禎皇帝的親叔父、明神宗最寵愛的兒子——福王朱常洵。大鍋周圍興高采烈圍觀的人，乃李自成手下農民軍，他們正在欣賞的“活物”，正是馬上要享受大餐的一味主菜——“福祿(鹿)宴”中的“福”菜。一個時辰過後，煮得爛熟的福王朱常洵以及數隻鍋中的梅花鹿已經被幾千兵士吃入腹內，成為大家的美味晚餐。大順軍的戰馬飲的是俘虜的血，馬飲慣了血，對水不屑一顧。上了戰場，戰馬一聞到血腥味，奔騰嘶鳴，眼睛發紅，簡直像獅子一樣。

1642年5月李自成第三度圍攻開封，因開封總兵陳永福之子陳德在西門一箭射瞎了李自成的左目。《守汴日誌》記載：到了八、九月之交，開封城內到了“人相食”的絕境。光天化日之下，時有強壯者擄人至背處，殺掉割肉分食之。此時，守城官軍被許殺馬充餉，竟有將馬肉人肉相混，每斤賣價數兩，一馬可值千金。戰時的開封居然有“賣人懸馬”這樣往史未見的罪惡絕例。弱民無法殺人，只能吃幾乎一切不能吃的東西。如水草、膠泥、皮革、中藥，甚至新馬糞。城裡多水坑淺溝，水中有一種小紅蟲，也被饑民撈取，拌蔥油炒食。有騎馬過來者，尾隨一群人，爭拾新馬糞，捧回炒成淡黃，用水吞咽。推官黃澍於九月初一那日，行至曹門，眼見一二人於城牆下，敲人骨吸髓，不忍目睹，旋走之。

西元前225年秦國王賁久攻魏國大梁不下，引黃水猛灌大梁三個月，城破，魏國滅。過了1867年後，又是西來的秦人再次大水灌城，把大梁舊地的開封城給徹底毀掉了。9月14日夜，李自成掘開黃河大堤，“河伯震怒，水聲遠聞”；翌日黎明，水至開封城下。據史料所錄，李自成圍困開封城農民軍躲避不及，溺

死一萬。9月16日開封守軍兩營兵抱土塞門，“水從隙入，勢不可扼”，“是日，南門先壞，北門衝開，至夜，曹門、東門相繼淪沒。一夜水聲如數萬鐘齊鳴”。9月17日黎明，“滿城俱成河漢”，只存鐘、鼓兩樓及周府紫金城屋脊、相國寺頂、延慶觀、土街等高阜處。一些惡兵奸民架舟泛行，窺有財物，乘四邊無人，將難民推入水中，殺人滅口。難民渡水者，間有攜帶財物，多被兵士搜奪劫取。監軍王燮決意再戰，9月26日秘密發兵3千，潛登西城，農民軍鬆懈不備，多未攜帶兵器，忽遇官軍襲擊，被逼投水亡命。溺水死者數千，斬首級500餘顆，活捉62人，後押解到北岸柳園全部斬殺。

關於開封城中戰死、餓死、溺死的數字，無人能說得準確，十之九亡是古人的概算。白愚說城內百萬之眾，後奉旨領賑者不足10萬；而今天開封人說：“城破後人還剩2.7萬，明末開封最多30萬人口”。1644年正月有人提出派人去開封打撈沉銀。崇禎聽說有銀可撈，敦促人火速去辦。又覺得名義不雅，即以汴城修復為名，去其積水，撈出沉銀，以助兵餉。順治二年（1645年），河南巡撫甯承勳“由大河泛舟，直抵城下，城垣半在沙淤水浸之中”。20年過後（康熙元年），河南巡撫張自德、布政使徐化成始重建開封城。

河南鹿邑縣縣誌記載，李自成的農民軍在鹿邑縣除縣西南任集鄉的柴莊之外，把鹿邑縣其餘所有的人口全殺掉了。據史料記載，當年縱然是活著的人，也都“骨磊磊，息縷縷也”。

大順軍打下安徽桐城，百姓箠壺食漿，以迎義師。一農民在城門口攔住幾個大順軍戰士，向他們講述自己的苦難，一個大順軍小頭目說：“哎呀，你既然那麼苦，何必活在世間？”就把老農殺了。李自成對安徽戕害最深，十室九毀，十人九亡。清初只得從江浙遷徙民眾到安徽居住，史有‘湖廣填四川，江浙填安徽’

之說。

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進入紫禁城，僅42天便退出北京。時人稱大順軍在北京計掠銀7千萬兩，實際所掠則要高於此數。大順兵沿街大呼索馬騾，“居民盡驅馬騾出城外，賊爭騎去”（《北略》卷20）。進城後大順軍高級將領分居勳戚豪宅，中下級軍官則分據各中下級官邸或富民巨室，並占其妻妾。大順軍不僅把宮中女子當作勝利品瓜分，而且平日裡“劉宗敏、李過、田見秀等歸所據第，呼蓮子胡同優伶、變童各數十，分佐酒，高踞幾上，環而歌舞。喜則勞以大錢，怒即殺之。諸伶含淚而歌，或犯闖字，手斬其頭，血流筵上”（《平寇志》卷9）。士卒進居民宅，先“曰借鍋，少焉，曰借床眠；頃之，曰借汝妻女姊妹作伴。藏匿者，押男子遍搜，不得不止。愛則擄置馬上，不從則死，從而不當意者亦死；一人不堪眾擄者亦死。安福胡同一夜婦女死者三百七十餘人。降官妻妾俱不能免”。大順士卒在居民家中，“責男子飼馬，婦女執爨、供酒漿，搜索銀錢，髮屋掘地不已。女年十二三、婦年五十皆不免。……姦污婦女，三五朋淫，去來無定”（《平寇志》卷9）。在京外所占州縣亦如此，“遇賊兵過，先掠民間婦女供應，稍或不足，兵即以刀背亂下，偽官苦不可言。美者擄去，惡者棄下，仍命本官雲：‘留待後來者用’。婦女供役之苦如此”。

大順軍在恣行殺掠中為防止居民逃匿，竟然也用上了連坐之法。他們“先令十家一保，如有一家逃亡者，十家同斬。十家之內有富戶者，闖賊自行點取籍沒，其中下之家，聽各賊分掠。又民間馬騾銅器，俱責令輸營，於是滿城百姓，家家傾竭”（《北略》卷20）。

中國史上想改朝換代的流氓軍閥，互相殘殺起來比任何人都厲害，就是為了不讓對手獲得土地與人民，不讓對手比自己更強大，寧願一切都毀滅！

張獻忠（1606～1646年），字秉吾，延安人。張獻忠小時候就因為看到他父親被人喂馬屎，於是發誓殺盡天下富人。崇禎三年（1630年）于米脂起事，自號八大王，人稱“黃虎”。其起事後，克鳳陽、焚皇陵、破開縣、陷襄陽，勝戰連連。1637年被擊敗，投降官軍，皇帝赦免其罪。1638年夏，張獻忠復叛。

崇禎十六（1643）年春天，張獻忠連陷廣濟、蘄州、蘄水等地。他進入黃州的時候百姓都逃走了，於是他驅趕婦女鑿城，之後將城裡的婦女全部殺死填在溝塹。張獻忠的軍隊5月克武昌，將楚王裝進籠中投入江中，強迫15-20歲的男子入伍，其餘的人一律屠殺；由鸚鵡洲至道士洲，浮屍遮蔽了江面，水面上人的脂油漂了幾寸累，水裡的魚鱉都不能再吃。

1644年陰曆8月初9張獻忠陷成都，張獻忠下令屠城3日。三日過了，停止大殺，仍然每日小殺百餘人以樹威。男子無論老幼一律殺死，或者剝皮後剁碎製成醃醬。

在攻城的時候遇到激烈抵抗，張獻忠就讓所掠的婦女裸體向城上辱罵。凡是有姿色的婦女都被輪奸得奄奄一息，然後割下首級，將屍首倒埋進土中，女人的下體朝上。據他們認為可壓制炮火。張獻忠的部隊不論到什麼地方都不停地姦淫，他以此籠絡士兵。他們往往將丈夫與妻子面對面縛在一起，讓丈夫親眼看著妻子被人姦淫，只要作丈夫的稍微流露不滿的神情就會慘遭殺戮。或者強迫父淫女、子淫母，等他們互淫完畢再一起斬首；再製成軍糧。

張獻忠每攻陷一城，所擄掠的婦女必須由他先挑選出幾個姿色美豔的輪流伴宿。這些美女的上半身穿著豔裝，下半身赤裸什麼也不穿。無論什麼時間、什麼地點，只要張獻忠淫興勃發，立刻命這些美女橫倒在地進行姦污。等到他玩膩了的時候便將她們洗剝乾淨殺死，蒸著或煮著吃。有時他等不及這些美女煮熟了，

就帶著血大嚼起來。

有時張獻忠命人將被擄的孕婦衣服剝去，他與部下一邊飲酒一邊猜測打賭孕婦的腹中懷的到底是男還是女，然後剖開孕婦的肚子查驗。或用矛刺入小孩子的身體高挑到空中，小孩子在矛尖上痛嚎而死。他還用大鍋先將人油煮沸，然後將小孩子扔進去，直到小孩子被活活煮熟了便充作下酒的食物。張用刀子戳鍋中小兒的肉，吃飽了之後剩下的賞給兵士下酒。

除了在一種情況下婦女可以免死，那就是張獻忠的士兵一進入百姓家，家裡的婦女裝出十分情願的樣子主動與士兵相淫。因此張獻忠的士兵經過的地方，婦女不得不首先迎出來自己脫了衣服供他們侮辱，這樣才有機會救一家人的性命。

而且張獻忠對付婦女還有特別的辦法，他設計了一種叫做“騎木驢”的酷刑用來對付不合作的女子：首先將該女子吊起來，使其陰部對準一根高豎的木竿，然後割斷繩子使這個女子墜落下來，讓木竿從女子的陰部穿進來，再從口鼻中穿出去。被折磨的女子直到三四天后才死去。民女驚駭之極，只好紛紛主動獻身，比娼女還像娼女。

張獻忠患了瘡疾，他對天許願說如果病好了就以“朝天蠟燭兩盤”貢奉給上天，直到他病好後周圍的人才明白這話的意思。張獻忠即令兵士，專砍女子的纖足，每個兵士必須至少進獻十雙小腳。那些如狼似虎的士兵專門搜尋女子的纖足，只要遇見女子就地先將腳砍下來。將收集的三寸小腳疊成一座山的形狀，稱為蓮峰。他帶他最心愛的小妾去參觀。小妾說：“好看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雙秀美的小腳放在頂端，就再好也不過了。”張獻忠說：“你的腳就最秀美。”於是把小妾的腳剝下來放到“山尖”上。隨即再將這些小腳架火燒毀，名為點朝天燭。至於男子則被砍腦袋或割下陽具，也堆在一起在太陽下暴曬。

張獻忠還列木為台，命男女共登臺上，然後在四面縱火焚燒，一時間慘叫聲震地，張獻忠與屬下看著狂笑不已。他為了餵養戰馬，在殺人剖腹後挖去臟腑，然後用人血浸過的米豆喂馬，使馬長得十分肥壯。

張獻忠性格狡譎嗜殺，一天不殺人就悒悒不樂。他在蜀地開科取士，得到一個姓張的狀元。張狀元的外表學問都很優秀，容貌長得像美女一樣嬌豔。張獻忠對他非常寵愛，吃飯睡覺形影不離。但是有一天張獻忠忽然對左右隨從說：“我很愛這個狀元，一刻捨不得他離開，還不如殺死了他，免得整天牽腸掛肚”。於是將張狀元砍成了好幾塊用布囊裝了掛在床邊。接著他又懸榜詭稱開科取士，召誘士子前來應考，他令人在地上挖掘一個深三、四丈的大坑，待這些寒窗十年的數千四川學子來到青羊宮後，就被張獻忠推進土坑活埋。

張獻忠學朱元璋剝人皮，“先施於蜀府宗室，次及不屈文武官，又次及鄉紳，又次及本營將士。凡所剝人皮，滲以石灰，實以稻草，植以竹竿，插立於王府前街之兩旁，夾道累累，列千百人，遙望如送葬俑”。張獻忠又創造了生剝皮法，就是在人皮還沒有被完全剝下而人已經死去的，劊子手抵死。屬下的將卒以殺人數目的多少敘功。若屬下表現出不忍心的神情，張獻忠就將他們處死。都督張君用、王明等數十人都因為殺人少而被剝皮。

據《蜀破鏡》記載，某日晚，他的一幼子經過堂前，張喚子未應，即下令殺之。第二天晨起後悔，責問妻妾們昨晚為何不救，又下令將諸妻妾以及殺幼子的刀斧手悉數殺死。

張獻忠在中園坑殺成都百姓。明朝投降的各衛籍軍 98 萬全部被殺死。每屠殺一地，都詳細記錄所殺人數，其中記有人頭幾大堆，人手掌幾大堆，人耳朵幾大堆。

張創造了許多殺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將軍們四面出擊，“分屠各州縣”，名曰“草殺”。上朝的時候，百官在下邊跪著，他招呼數十隻狗下殿，狗聞誰就把誰拉出去斬了，這叫“天殺”。平民被殺完了，張獻忠就派心腹去士兵中間竊聽，士兵偶有怨言就會全家被殺。

1646年（順治三年），清軍攻四川。1647年7月張獻忠率軍逃離成都前，更是對成都實行殘酷的“四光政策”，盡殺蜀人，從老百姓到軍隊家屬（老弱病殘）再到他部隊中的湖北兵、四川兵，最後連早期跟隨他出生入死的秦兵也在副殺之列，副殺後製成醃肉以充軍糧。單就此點來說，實在獨步中國大屠殺史。同年11月，被清軍包圍，張獻忠正在西充屠城，張獻忠匆忙迎戰，在西充鹽亭界鳳凰坡，張獻忠被清兵捕獲斬首。

當清軍到成都府時，整個成都只剩下不到20戶人。四川人口由600多萬銳減至50萬。《溫江縣誌》上說，溫江縣由於張獻忠的屠戮，“人類幾滅”；1659年清查戶口，全縣僅存32戶，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滿清卻繼續下達屠四川全省令：“民賊相混，玉石難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民國《簡陽縣誌》卷十九：“明末兵荒為厲，概成曠野，僅存土著14戶”。

張獻忠與清兵入侵使四川人口由明萬曆6年（1578年）310萬降到康熙24年平定全蜀時（1681年）的9萬，即四川人口只有原來的1/34，從中可窺戰亂血腥之一斑；而墾田數字則從萬曆年間的13萬頃到康熙24年的1.7萬頃，可見田地荒蕪的淒慘景象。

滿族征服漢族，始終貫徹一個既定方針：屠殺。對蒙古人和朝鮮人卻不是這樣。努爾哈赤的清軍佔領遼東地區後，先是擔心當地窮人無法生活而造反，把遼東地區的貧民都抓起來殺掉，稱“殺窮鬼”。兩年後，清軍又怕遼東的富人不堪

壓迫而反抗，又把遼東地區的富人幾乎殺光，稱為“殺富戶”。共殺遼民 300 多萬，遼東地區的漢民基本殆盡。皇太極破錦州，三日搜殺，婦孺不免；掠濟南，城中積屍 13 萬。吳三桂和清軍趕走李自成佔領了北京，對明廷說：我們為你們報君父之仇來了！南明朝上上下下包括史可法都以為然。他們對清軍在自己的國土上大舉進攻持肯定態度。當清軍把李自成解決得差不多了，兵鋒也對準了南明。

1645 年 5 月 13 日，清軍薄揚州城下；5 月 20 日揚州城破，揚州頓成屠場。任何女人不論願意還是不願意，都有可能被成群的清兵輪奸。清軍下令“十日不封刀”，到 5 月 29 日，即濫殺和搶劫的第十天，這場大屠殺結束了。那座城市當時已沒任何生命跡象，和尚們得到命令開始收集和焚燒屍體。據當時人們的保守估計，有 80-90 萬人死於這場屠殺。

令人感到納罕的是漢人竟是那樣沒有血性。城破，守城明軍爭相逃命，寧可從城牆上摔下跌死，也不敢抵抗。“惶惶覓隙潛匿”，百姓亦然。史載：只要遇見一個滿族士兵，“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頸受刀，無一敢逃者。”一個清兵，遇見約 50 名青壯男子，清兵橫刀一呼：“蠻子來！蠻子來！”這些人皆戰戰兢兢，無一敢動。這清兵押著這些人(無捆綁)去殺人場，無一人敢逃。到刑場後，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殺。

順治 2 年 11 月 15 日，揚州十日的大劊子手豫親王多鐸，將屠殺中掠奪的“才貌超群漢女人一百零三”，奉獻給滿清最高酋長。順治帝獲得十名，攝政王多爾袞獲得三名，輔政鄭親王濟爾哈朗三名，肅親王豪格等各二名，英郡王阿濟格等各一（《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中冊，第 197 頁）。清興安總兵搶奪婦女達 100 多人，“淫欲無厭”。製作長押床，裸姬妾數十人於床，“次第就押床淫之。

複植木椿於地，銳其表，將眾姬一一簽木椿上，刀剗其陰，以線貫之為玩弄，拋其屍于江上”（《平寇志》卷12）。

順治二年（1645）5月9日，南京失陷時，當塗孫陶氏被清兵所掠，“縛其手，介刃於兩指之間，曰：從我則完，不從則裂。陶曰：義不以身辱，速盡為惠。兵稍創其指，血流竟手。曰：從乎？曰：不從。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剗其胸，寸磔死”（《明史》卷303）。

滿清佔領南京後，一些降官自動剃髮，並建議漢人效之。滿清遂頒佈命令：“所過州縣地方，有能削髮投順，開城納款，即與爵祿，世守富貴。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盡行屠戮。”《東華錄》卷五順治元年條則記載：“不隨本朝制度剃髮易衣冠者，殺無赦”。鎮江知府告示則是：“一人不剃髮全家斬，一家不剃全村斬”！江甯巡撫土國寶宣佈：“剃髮、改裝是新朝第一嚴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論紳士軍民人等，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動！”並將反抗者的人頭，集中懸掛起來恐嚇人民。

順治二年（1645年）6月24日，清庭新任江陰知縣方亨到任。28日方亨佈告全縣立即剃髮，並限令三天內剃完。佈告用詞極為嚴峻。稱：“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常州府並派了四名滿兵到江陰監督剃髮。這激起了江陰人民的極大憤慨。29日幾十位德高望重的老者受民眾之托到縣府向方亨請求免剃。方亨厲聲叱斥。老人們義憤填膺。斥責他身為明朝進士來做清朝之官，實是不知羞恥！潤六月初一。民眾再次聚眾向方亨請求。方亨仍是大罵不休。民眾憤怒已極。一位叫許用德的青年振臂高呼：“頭可斷，發決不可剃！”這個義薄雲天的口號立即得到大家的回應。一場悲壯的起義遂由此展開。原南明江陰典史陳明遇被推舉為首領，因功升調另職尚未赴任暫居城外的前典史閻應元被請入城主持防務。全城

人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許多殷實士紳捐出大量金銀。富商程璧捐餉達四萬兩之巨，可以說是毀家舉義。清庭調集大軍把江陰包圍得鐵桶一般，日夜狂攻。但在江陰人民的堅決抵抗下屢屢敗績城下遺屍而返。清軍對陳明遇、閻應元的勸降也遭到堅決拒絕。江陰城小，面積和人口都只有揚州的好幾分之一。但其守城的時間比揚州長十幾倍。清軍源源補充。義軍的人力、物力不斷消耗。精疲力竭，城池陷落是不可避免的。但清軍也遭到他們南下後的第一場硬仗。有史籍稱，清軍在攻城中死傷六萬多人，在城破後的巷戰中又死傷數千人。而江陰軍民在戰鬥中和城破後的屠城中死義 17 萬多人。所有的領導人亦全部身殉。《江陰城守紀》雲：“滿城殺盡，然後封刀。……城中所存無幾，躲在寺觀塔上隱僻處及僧印白等，共計大小 53 人。是役也，守城 81 日，城內死者 9.7 萬余人，城外死者 7.5 萬余人”。清兵在江陰的觀音寺“掠婦女淫汙地上，僧惡其穢，密於後屋放火。兵大怒，大殺百餘人，僧盡死”（《明季北略》卷 11）。抗拒清軍姦淫被害婦女，按照滿清地方誌統計為 101 人（道光《江陰縣誌》卷 20《烈女》）。

常熟大屠殺，“通衢小巷，橋畔河幹，敗屋智井，皆積屍累累，通記不下五千餘人，而男女之被擄去者不計焉”。“沿塘樹木，人頭懸累累，皆全發鄉民也”（《海角遺編》）。

清軍陷昆山，在那裡抵抗了三天的義軍逃走後，於是對平民實行大屠殺，當天的死難者就達 4 萬。“總計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墮井投縵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倖免者十之一”（《昆新兩縣續修合志》卷五一兵紀）。“殺戮一空，其逃出門踐溺死者，婦女、嬰孩無算。昆山頂上僧寮中，匿婦女千人，小兒一聲，搜戮殆盡，血流奔瀉，如澗水暴下”！昆山縣庠生胡泓時遇害，其妻陸氏 21 歲抱著三歲的兒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執。“氏

徒跣被發，解佩刀自破其面，……氏罵不絕口，至維亭揮刀剖腹而死”（光緒六年《昆新兩縣續修合志》卷 36）。

嘉定三屠，滿清殺了 20 多萬。清軍圍困嘉定城時，在城外“選美婦室女數十人，……悉去衣裙，淫蠱毒虐。”嘉定淪陷後，清軍搶掠“大家閨彥及民間婦女有美色者生虜，白晝于街坊當眾姦淫；……有不從者，用長釘釘其兩手於板，仍逼淫之。”“婦女不勝其髒，斃者七人”（《嘉定屠城紀略》）。“市民之中，懸樑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斷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猶動者，骨肉狼籍”。清兵“悉從屋上竄土，通行無阻。城內難民因街上磚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紛紛投河死，水為之不流”。“兵丁每遇一人，輒呼蠻子獻寶，其人悉取腰纏奉之，意滿方釋。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獻不多，輒砍三刀。至物盡則殺”（《嘉定乙酉紀事》）。更有甚者，清軍“拘集民船，裝載金帛、子女及牛馬羊等物三百餘船”，滿載而去了。魏斐德慨歎：“三屠留給這座城市是毀滅和不知道德為何物的倖存者”。滿清主要靠穿著滿清軍服的漢人殺漢人，不然光憑滿人是殺不過來的。

涇縣，屠殺了 5 萬；舟山，第一次屠殺約萬餘，第二次全部沉海溺殺，數字不可考；蘇州，因為投降的早，僅屠半城，屠殺約十餘萬；嘉興，屠殺約十餘萬；金華，屠殺約五萬；贛州府，屠殺合計約 40 萬；南昌府屠殺合計約 40 萬。

清人寫圍攻南昌，對投降的一律殺死。明軍王姓副將帶士兵和家眷 5 百多人，剃頭棄甲投誠，清軍留 11 人活口，其餘“分殺”。史書稱降者少則三四十，多則數百，除部分婦孺留做奴隸，都死在清刀下。“婦女各旗分取之，同營者迭髒無晝夜。三伏溽炎，或旬月不得一盥拭。除所殺及道死、水死、自經死，而在營者亦十餘萬，所食牛豕皆沸湯微集而已。飽食濕臥，自願在營而死者，亦十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載鹵獲連軻而下，所掠男女一併斤賣。其初有不願死者，望城

破或勝，庶幾生還；至是知見掠轉賣，長與鄉里辭也，莫不悲號動天，奮身決赴。浮屍蔽江，天為厲霾”（徐世溥《江變紀略》）。

1649年佔領湖南湘潭後屠城，僅存百餘，被殺者約5萬。沅江屠殺了約十餘萬。

1649年大同守城8月之久後，兵民全部被屠絕，僅存五人。“附逆抗拒”州縣也一概屠殺；汾州、朔州、渾源、太谷、沁州、澤州全部屠絕，合計超過40萬。順治七年十二月，山西總督佟養亮揭貼：“大同、朔州、渾源三城，已經王師屠戮，人民不存”！《朔州志》也承認：“城破，悉遭屠戮”。

福建省被殺的合計過百萬人。福建同安縣屠城死難5萬餘人，梵天寺主持釋無疑收屍合葬于寺東北一裡之地，建亭“無祠亭”，墓碑上則刻“萬善同歸所”。

清寇攻陷潮州，“縱兵屠掠，遺骸十餘萬”，揭陽縣觀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屍聚焚於西湖山，將骨灰葬在西湖南岩。

尚可喜率明軍火器部隊歸後金，扭轉了後金和明的武器對比，充當清軍的先鋒。尚可喜剛一攻入廣東就在南雄屠殺了兩萬人。他的文書陳殿桂親眼目睹“伏屍如山”的慘狀，寫下《雄州店家歌》回憶：家家燕子巢空林（家燕逃到樹林裡），伏屍如山莽充斥（莽，野草）…死者無頭生被擄（生者都被俘虜，婦女為主），有頭還與無頭伍（婦女最後還是要被凌辱逼死）。血泚焦土掩紅顏（紅顏，婦女），孤孩尚探娘懷乳（嬰兒在死去的母親懷裡掙扎）。

尚可喜於1650年2月率軍攻至廣州城下，開始了長達9個月的圍城攻堅。

《順治實錄》記載偽清屠城令：“其據城逆命者，並誅之。”清軍屠城佈告：“諭南朝官紳軍民人等知道：……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盡行屠戮！”

至十一月，廣州城破。隨即對廣州進行了 12 天的瘋狂大屠殺，至少 70 萬人遇難。史稱“庚寅之劫”。

林文陔《淺析建國前佛山商業的興衰》：“明末清初的戰爭，廣州遭兩藩屠城，當時廣州死者 70 多萬人”。廣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廣州市志·宗教志》：“清順治七年(1650)，清軍攻廣州，死難 70 萬人。”

清初人鈕琇《觚賸》記載：“再破廣州，屠戮甚慘，居民幾無噍類。浮屠真修曾受紫衣之賜，號紫衣僧者，募役購薪聚骸於東門外焚之，累骸燼成阜，行人于二三裡外望如積雪。因築大坎瘞焉，表曰共塚。”大意：滿清攻破廣州，大屠殺很悲慘，市民幾乎沒留活口。釋真修法師曾被明朝皇帝賜給紫衣，他出錢雇人買柴，把死者的遺體運到東門外堆積，用火焚燒，骨灰成山，行人在二三裡外望去，如同積雪。後來就在旁邊挖大坑掩埋，立碑為“共塚”。

魏斐德(F. E. Wakeman)《洪業》雲：“尚可喜佔領了廣州。此後 10 天裡，廣州城慘遭洗劫，…屍體在東門外焚燒了好幾天。…這個焚屍的火堆，在許多複明分子的心目中，標誌著明朝重建希望的真正破滅……直至 19 世紀，仍可看見一座積結成塊的骨灰堆。”

《廣州城坊志》轉引了方恒泰《橡坪詩話》的記載，曰：“……城前後左右四十裡，盡行屠戮，死者六十餘萬人。相傳城中人士竄伏六脈渠約六七千人，適天雨，瀆溺幾盡，其所存僅二人，雙門底劉中山其一也”。“止有七人躲入大南門甕城關帝廟神像腹中，得免誅戮”（黃佛頤：《廣州城坊志》226 頁，221 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 年 12 月版）。

當時在華的義大利籍耶穌會士衛匡國(Martin Martini, 1614~1661)寫有《韃靼戰紀》一書，對廣州屠城記述曰：“大屠殺從 11 月 24 日一直進行到 12 月

5 日。他們不論男女老幼一律殘酷地殺死，他們不說別的，只說：‘殺！殺死這些反叛的蠻子！’但韃靼人饒恕了一些炮手以保留技術為自己服務，又饒恕了一些強壯的男人，為他們運送從城裡搶到的東西。最後，在 12 月 6 日發出佈告，禁止燒殺搶掠。除攻城期間死掉的人以外，他們已屠殺了十萬人”（杜文凱：《清代西人見聞錄》53 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 年 6 月版）。

荷蘭使臣紐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聯合省的東印度公司出師中國韃靼大汗皇帝朝廷》一書中亦記述到：“韃靼全軍入城之後，全城頓時是一片淒慘景象，每個士兵開始破壞，搶走一切可以到手的東西；婦女、兒童和老人哭聲震天；從 11 月 26 日到 12 月 15 日，各處街道所聽到的，全是拷打、殺戮反叛蠻子的聲音；全城到處是哀號、屠殺、劫掠；凡有足夠財力者，都不惜代價以贖命，然後逃脫這些慘無人道的屠夫之手”（司徒琳著，李榮慶等譯《南明史》131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版）。

倪在田《續明紀事本末》：“可喜屠廣州，孑遺無留；逸出城者，擠之海中”。在一片天愁地慘的最恐怖氣氛之中，不少市民特別是婦女知道沒有活路，只好自盡。

嘉慶年間方恒泰《椽坪詩話》：“居民有跳入六脈渠者，值大雨，淹死約六七千人。”六脈渠，廣州古時城內的水渠系統。另有記載說六脈渠中浮屍 4 萬多人。

屈大均《廣東新語》記載，一位元婦女李氏跟隨丈夫投水自殺，並留下絕命詩：“恨絕當時步不前，追隨夫婿越江邊。雙雙共入桃花水，化作鴛鴦亦是仙！”

一位婦女背著繡襪中的嬰兒，一起投水自殺，“庚寅冬，廣州城拔（攻陷）。天濠街有婦繡負嬰兒，……赴池而死。”小孩子淹死，也要比被二鬼子殺好。

李天根《燭火錄》記載，明軍將領施輝然“分守西城，巷戰死”後，“家中男婦十餘人從死。子祚基才五歲，亦死”。《番禺縣誌》記述：番禺典吏丁有儀夫妻先後被殺，“越日(第二天)，所棄兒匍匐屍旁，猶吮其(母親之)乳，過者無不淚下。”

戴耘野《行在陽秋》記載：“初二日，清陷廣州，屠之…百萬人民，盡死於內”。屈大均為守城犧牲的回民將領羽鳳麒寫的悼詞中說：“國殤百萬，于爾尊崇”，意思是百萬死難者中，羽公您死得很崇高。當時人陳恭尹《番禺黎氏存詩匯選序》也說“竹帛煙銷，與百萬生靈俱燼”，指黎氏作品和百萬生靈在大屠殺中毀滅了。所以，死難者很可能接近 100 萬人。

南來屠城九十九，漢血染盡漢河山。十萬萬人齊倒戈，自此中國無漢人！

滿洲衣帽滿洲頭，滿面鹹風滿面羞。滿眼干戈滿眼淚，滿腔悲憤滿腔愁。

直隸“一望極目，田地荒涼”（衛周元，痛陳民苦疏，皇清奏議，卷 1），河南是“滿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龍，墾荒宜寬民力疏，皇清奏議，卷 4），湖廣“彌望千里，絕無人煙”（劉餘謨，墾荒興屯疏，皇朝經世文編卷 34）。整個中國，“縣無完村，村無完家，家無完人，人無完婦”。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幾被殺盡，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順服的奴才。

由於明軍長期缺餉，再加上發餉的官員克扣，實際到士兵手裡的很少，有的部隊甚至常年不發一分餉銀，這為軍隊的嘩變和剽掠埋下了禍根。比如，左良玉的部隊，人稱“左軍”，是出了名的驕悍無禮，“紮營之處，方圓數十裡，婦女悉被姦污”，因而，不僅老百姓畏之如虎，有的地方官也禁止左軍入城。令人髮指的是，有的部隊為了掩敗、領賞往往“殺良冒功”，就是把老百姓的人頭拿來作為自己殺敵的憑證。至於動輒以“打糧”為名，劫商賈、搜珍奇、淫婦女、焚

民居，更是司空見慣。正當史可法在江北防線上和清軍決一雌雄的時候，左良玉在武昌而起兵征討馬士英，聲言要“清君側”。馬英士公然宣稱“寧可君臣皆死於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遂不顧危在旦夕江的江北防線，撤了四鎮兵力去對付左良玉。

孫可望和李定國都是張獻忠的義子。張獻忠死後，他們率大西軍余部進入雲南貴州一帶，建立了以昆明為中心的政權。1652年，李定國率軍出全州，在桂林週邊大敗清定南王孔有德，孔有德自殺身亡。接著進逼長沙。清廷特派敬謹親王尼堪統領精銳部隊15萬人，救援湖南。李定國詐敗撤離長沙，伏兵於衡陽城北；李定國軍在激戰中斬殺尼堪，大獲全勝。南明實權人物的孫可望還令馮雙禮部偷襲李定國。李定國擊敗並收服馮雙禮後，他與孫可望的矛盾更為激化。1657年，孫可望為了一官半爵之爭，竟然合兵14萬進攻李定國。孫可望很快大敗于李定國。孫可望就投進了清軍的懷抱，充當了清軍掃平雲貴的帶路人。

滿清入關後，對朱家宗室，可謂殘酷至極，除魯王朱以海一系逃至菲律賓得以存留外，其餘幾乎全部斬盡殺絕。崇禎帝的長子被多爾袞絞死，其第二子隱姓埋名在民間數十年後，不慎暴露了身份，年已七十多歲的他和他的兩個兒子仍被康熙帝下令凌遲處死，明朝永曆帝儘管逃到了緬甸，還是被清朝抓回雲南，全家被殺。

順治康熙年間，為了和鄭軍作戰，清政府甚至下達命令，要求浙閩粵沿海居民向內陸後退數十裡，以達到堅壁清野困死鄭軍的目的。1664年3月初6，清軍大隊兵船入東山，“盡驅沿海居民入內地，築牆為界，縱軍士大淫掠，殺人山積，海水殷然”（《臺灣鄭氏始末》）。莆田縣“著附海居民搬入離城二十裡內居住，二十裡外築土牆為界，寸板不許下海，界外不許閑行，出界以違旨立殺。武兵不

時巡界。間有越界，一遇巡兵，頓時斬首……截界十餘年，殺人以千計”（《清初莆變小乘》）。一位清軍官佐整日巡迴線上，每天都殺數人；有的民眾因追趕過線的家畜而被殺，難民數以 10 萬計。在這樣的滅絕人性的政策下，鄭軍確實很難繼續維持廈門一帶的據點，只好反身收復臺灣，開拓根據地。

《清史稿·鄭成功傳》裡說他“凡事獨行獨斷，不與人商量、用法嚴峻，果於誅殺、雖在親族有罪，不少貸，凡有犯奸者必死之”。因為執法太嚴厲，導致部下多有反叛降清之心，使得廈門得而復失，後來名將施琅也被逼降清，終致臺灣被清廷佔領。被鄭成功誅殺的部將，在當時戶官楊英《從征實錄》裡，記有姓名的就多達 70 餘人，有的還連累妻兒並九族。《臺灣府志》卷十九也提到：“成功立法尚嚴，雖親族，有罪不少貸。其立法：有犯奸者，婦人沉之海、姦夫死杖下。為盜，不論賊多寡，必斬。有盜伐人一竹者，立斬之。”鄭成功部屬阮錫所撰《海上見聞錄》卷二也提到：“初至，水土不服，疫癘大作，病者十之七八，死者甚多。加以用法嚴峻，果於誅殺。府尹楊朝棟以小鬥散糧，殺其一家。又殺萬年縣知縣祝敬，家屬發配。於是人心惶懼，諸將解體。”

擔任過鄭成功翻譯的東印度公司的土地測量師菲力普（Philippus Daniel Meij van Meijenstein）在其《梅氏日記》裡提到鄭成功對屬下的嚴酷：“國姓爺的士兵若犯法，即使情節輕微，一樣也會被斬首。甚至，他的將官運氣不佳，沒能戰勝，也要斬首，這種情形幾乎每天發生”。《梅氏日記》裡還提到鄭成功追繳臺灣人積欠荷蘭人債務的殘暴：“他們必須在三天之內償還，如果不還或是沒有還清，就要挨打，打在裸露的屁股上。第一次打三下，若再不還，第二次打五下，第三次打十下（像這樣加倍打下去）。最後就被關進監牢，用一塊大的四方形木板，好像領巾枷在脖子上幾個月，使那些人想要躺也躺不下去，想要站也

站不起來；因為那種木板長寬都足有二尺半，厚達兩拇指。因此，所有公司的屬民都會帶著淚眼，期待這個獨裁者倒下去，使他們得以再回到公司的管轄下生活。”

鄭成功大軍入台初期，臺灣人的反抗相當慘烈。楊英《從征實錄》裡說 1661 年 7 月，臺灣中部原住民不堪鄭軍的凌虐而抗暴：“援剿後鎮、後沖鎮官兵激變大肚土番叛，衝殺左先鋒鎮營，楊祖與戰，被傷敗回，至省病，死之。”印尼國立檔案館收藏的《巴達維亞城日記》(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ct Batavia) 裡，也有臺灣原住民協助荷蘭對抗鄭軍的報告。《巴達維亞城日記》還說到：“大部分農民深受國姓爺的壓榨，很少人能享受他們的勞力所得，而且無法擁有全部的土地所有權。華人得將欠荷蘭人的款項交給國姓爺。國姓爺把大戶人家的婦人和孩子拘禁起來，因為國姓爺認為他們仍藏有金錢。就如他從六哥的婦人哪裡發現二十錠黃金和十三箱銀子一樣。三哥的女兒，他一來就把她納入自己的妾群中。有些住在中國的人，由於害怕他的苛政，不敢來臺灣探望親友。”

鄭成功把接收自荷蘭人的土地劃分為(一)王田、(二)私田(為文武官員的私有田地)、(三)營田(軍隊屯田之地)。名雖分三種、實際上都是鄭氏一族、文武官員與軍隊幹部所有。人民受罪比荷蘭統治時期更深而已。除了苛酷的地賦外，鄭成功另外制定了包括陸餉和水餉的“雜賦”。陸餉就是陸上的許多的稅目如厝餉(房屋、豬舍、雞舍都要交稅)、磨餉、菜餉等。水餉則有梁頭餉、潭 餉、港滬餉等。而且不結婚的僧侶要徵稅，結婚的人也要交“婚姻介紹稅”。荷蘭殖民時代的“人頭稅”被鄭成功保留下來。臺灣人在重稅盤剝下，難怪到了鄭氏第三代，必須箠食壺漿迎接另一個殖民政權——滿清政府。

荷治時期對原住民的宣教，相對於鄭成功的重利盤剝，對幾千年不曾使用過

文字的臺灣原住民來說、這種從歐洲傳來的福音，是讓臺灣邁向文明世界的開端。

此外，滿清又殺苗民一百萬，殺回民數百萬，1755年，乾隆派清將班第征準噶爾國。1757年，將軍兆惠率清軍大舉清剿，將準噶爾人男女老少幾乎斬盡殺絕，至今只餘一個地理名詞“準噶爾盆地”而無準噶爾人了。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罕見的殘忍！

13·清代的白蓮教起義（1796~1805）時期。清朝中期以後，白蓮教等宗教組織、會黨盛行，統治者加強鎮壓。一次，僅武昌府就捕了無辜達數千人之多；在荊州等地，嫌疑分子被押往省城時每船一二百人，被迫投江而死，或被拷打而死，最終激起白蓮教大起義。起義爆發於四川、湖北、陝西邊境地區，鬥爭區域遍及湖北、四川、陝西、河南、甘肅五省，甚至還波及到湖南省的龍山縣。白蓮教起義軍在歷時9年多的戰鬥中，佔據或攻破清朝府、州、縣、廳、衛等204個。抗擊了清政府從全國16個省徵調的兵力，殲滅了大量清軍，使清軍損失一、二品高級將領20多人，副將、參將以下的軍官400多人，土豪劣紳1000余人。清政府為鎮壓起義耗費白銀2萬萬兩，相當於當時清政府5年的財政收入。

1786年人口3億9110萬人，起義失敗後，人口為2億7566萬人，損失了1億1千萬。

14·金田起義初起，遠在廣東的洪氏宗族就遭了滅頂之災，2萬餘人被殺得乾乾淨淨，洪秀全家鄉洪姓5百餘人無一倖免。永安突圍時，清將賽尚阿在龍寮嶺峽谷將太平軍後衛軍2千餘人屠殺，其中絕大部分是婦女兒童。

《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雲：“一般人都把殘酷、兇狠、口是心非歸之于中國人的天性，其實這多半是由於邪惡的滿清政府所造成的。這些人從嬰兒時代起，

就習慣於流血和酷刑的慘像。正象他們的祖先在最近兩世紀中被韃靼征服者所屠殺的慘像一樣。統治者的無窮迫害使他們麻木不仁、墮落退化；剃髮的奴隸標記使他們帶著不自然的烙印；橫恣暴虐的專制制度摧毀了並貶抑了他們的精神；他們的生命財產完全操在最卑鄙最無人心的官吏手裡，操在只有賄賂可以動心的審判官手裡；凡是反叛異族皇帝的非正義統治的人，按律是‘千刀萬剮’，凌遲處死，稍涉嫌疑就被砍頭”。“中國人向來被認為是面目愚蠢、裝飾惡劣的民族；而使面容變醜的剃髮不能不說是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之一。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個中國人的面部都表現了蠢笨，冷淡，沒有表情，沒有智慧，只有類似半狡猾半恐懼的奴隸態度，他們的活力被束縛，他們的希望和精神被壓抑被摧毀”。和明朝人相比，清時中國人形體明顯醜陋；性格上變得保守、忍耐，飽受生活的無奈而甘於現狀；審美方面趨於陰暗；人情世故上流行明哲保身、多疑和冷漠。在民情上，亡國奴特徵非常明顯。

“兩百年來的暴政壓迫，顯然消滅了這個國家的一切善良高貴的品德，滿清人入侵的惡劣影響似乎完成了對於中國人的道德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全部破壞”。

“這樣，滿清政府的排外政策還有什麼奇怪呢？閉關自守是清政府的救星；他們的確知道他們的權力是建立在漢族奴隸的軟弱愚昧和迷信退化之上。”“滿洲統治者的這種殘忍暴行繼續了很多年，凡太平軍所到之地，都浸透了無辜者的鮮血：不但參加革命者的家屬全被屠戮，而且成千上萬的人都以嫌疑處死。我們難道不記得野蠻的欽差大臣葉名琛的誇口麼？僅在廣東一省，他在一個月之內就殺了七萬人以上（1855年兩廣總督葉名琛“為除患于未然”，在那個夏季斬首了7.5萬人；容閔發現，即使追溯到古羅馬的蓋烏斯·凱撒或者法國大革命，都找不到如此血腥的場面）！這些人都是和平的鄉民，他們並沒有犯任何罪。這只是一個

滿清官吏的屠殺成績，試想：一批一批戴花領拖尾巴的滿清屠夫，將要冷酷無情地屠殺多少生命？這批屠夫從來不敢在戰場上抗拒太平軍，縱使在深溝高壘之內，倘無外國人幫助也不敢抵禦太平軍，現在他們卻被派來對這些男人的手無寸鐵的婦女和家屬，濫施可怕的報復行為了”。

史載洪秀全原打算假道全州城北大道，並無破城之意。不料全州城勇炮擊馮雲山。洪秀全怒不可遏，遂揮野蠻之“紅腦殼兵”攻城。守城軍民憑藉其壕深城固，予太平軍以重創。太平軍久攻不克，“天王怒甚”，遂用數口棺材盛炸藥十六擔，才炸開城牆二餘丈。城破之日，全州城內，頓時成為血的海洋。據縣誌記載，太平軍盡屠全州軍民，僅四人藏身下水道之中，才得以逃生。今日的全州城人，絕大多數為湖南移民之後裔。

咸豐年間，洪秀全在天京（今南京）建立了太平天國，成為威脅清廷的大患，時任兩江總督並任為欽差大臣的曾國藩，指揮三路大軍向太平天國進行圍剿，一路是其弟曾國荃率領的湘軍主力，一路是左宗棠率領的另一部分湘軍，還有一路是李鴻章率領的淮軍及英國人戈登指揮的常勝軍。曾國藩制訂的兩個基本方針：一是實行屠殺政策，把人煙稠密的蘇南一帶變成無民之境；一是實行焦土政策，把沃野千里變成了不耕之鄉。

石達開攻破江西吉安城時，除殲滅抵抗的敵軍外，“不戮一人，有擄民間一草一木者，立斬以徇。”鄒樹榮的紀事詩中有這樣的描寫：“傳聞賊首稱翼王，仁慈義勇頭髮長，所到之處迎壺漿，耕市不驚民如常。”他的《紀平江勇事》詩記述湘軍在南昌紮營情況：“伐樹拆屋摧民牆，婦女逃竄毀容妝，……相近數裡各村莊，用器食物皆奪攘，關門閉戶天昏黃，或有畸寒小地方，深夜公然上婦床。”移營梧桐崗後，更是“搶奪民財持刀槍，稗堆竹木皆精光。車牽鋤耜亦喪亡，或

作爨村炊黃梁，或索贖值充私贓”。 “茶酒肉飯任取嘗，不敢索值采篋囊。”

曾國荃攻陷安慶，不消半日就殺死了一萬多名太平軍俘虜，他怕到陰曹地府受到懲罰，曾寫信給曾國藩流露出後悔之意。曾國藩立即回信說：“你現已帶兵，自然要以殺賊為志，何從後悔殺人多？”可見，曾國藩殘忍嗜殺的程度，是遠遠超過他的九弟的。

安慶城區本來是越語區，現在卻成了北方方言區。原因就是湘軍吉字營把安慶城內的3萬老百姓幾乎屠盡，至今安慶農村有民謠“鮮血滿城流，死屍滿街頭，誰是殺人凶，湖南曾老九”（曾老九就是曾匪國藩的九弟曾國荃）！湘軍那次屠城，把安慶的房屋也幾乎燒光了，只有一個70米高的振風塔是石頭的燒不掉，保存了下來，成為無言的見證。

湘軍“見屋即燒”，“見長發者即殺”“以多殺為是”。湘軍朱品隆部駐紮在安徽石埭時，到處燒民房、搶財物，使石埭“城鄉內外房屋安全者百無一二”，連地方上的“紳耆”亦發出“官軍不若長毛之歎。”曾氏的同僚胡林翼，也曾下達過同樣的命令：要屬下的軍兵“見屋即燒，燒一屋即賞一次，無論是民居還是賊館。”除軍兵外，他還安排團練“專管燒屋”，要將“民居賊館，排隊逐層焚燒，逐次燒入，不過三四日可以一空。”

1864年7月14日曾國藩率湘軍攻入“天京”時，城裡的老百姓數十萬，只有幼天王等部分人突圍，整個天京城3萬多戰士，全部戰死或者自殺。湘軍一沖入城內，就開始了殘忍的大屠殺。他們殺死的人中，太平軍將士為數僅有數千人，大部分是天京城內的平民百姓，尤其是老人、兒童和中年以上的婦女。這場大屠殺一直持續了十餘日。他們殺人的目的並不是為了佔領城池，而是為了搶劫財物和姦淫婦女。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在《能靜居士日記》中寫下：城內“老弱本地

人民不能挑擔又無窖可挖者，盡遭殺死，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砍戮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 40 歲以下者一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於四遠。” 就是說，除了強使一部分壯丁為他們服勞役，並把四十歲以下的婦女都搶走以外，其餘老幼男女，一概殘忍殺害。屍骸塞路，臭不可聞，秦淮河裡屍首如麻。他總結道：“自湘軍平賊以來，南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熱。”

曾國藩上報說：曾國荃率所部在南京城內“分段搜殺，三日之間斃賊共十餘萬人。秦淮長河，屍首如麻。” 這就是說：3 天就屠殺了十餘萬南京居民。總共屠殺了 30 萬左右。

清人記載：“金陵之役，伏屍百萬，秦淮盡赤；號哭之聲，震動四野。” 所謂伏屍百萬，除了戰死者，就是曾國藩在城內外屠殺的平民，至少殺害數十萬人的生命。“群屍山積”，“白骨山積”，“自五季以來，生靈塗炭，殆無逾於今日”。

湘軍佔領天京後，立即開始肆無忌憚的搶劫。湘軍中從上到下，每一個人置備一個大竹筐，搶到錢財就往竹筐裡裝。他們先搶王府，再挖地窖，接著就逐戶搜搶居民財務，掘地拆屋，挖墳盜墓，直至全城物品蕩然無存，洗劫一空。當時不僅攻城的將士橫行無忌，四處搶劫，連留在城外看守營寨的老弱兵勇也空營而去，入城大肆搶掠，甚至守衛曾國荃大營的兵勇和各棚長夫廚役人等也都進城搜刮財物，肩挑手提，成群結隊，滿路都是搶劫而歸的士兵。有時搶紅了眼，他們之間還互相搶劫甚至發生火拼。

7 月 28 日，曾國藩到金陵，見“城內自偽宮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一炷”。“萬室焚燒，百物蕩盡，而貢院倖存”。因為貢院是考場，內無財貨，所以湘軍不來

光顧。宮室民居都有財物可搶，湘軍搶殺之後，把房付之一炬，以毀滅罪證。無論王府民宅，大肆搶掠一番後，隨即付之一炬，一走了事。他們天天搶劫，日日放火，大夥一連燒了十餘日。經過這場浩劫，這座繁華古都幾乎變成一片廢墟，滿園殘牆斷壁，遍地碎磚爛瓦，連一棵樹都很難找到。

湘軍入城後，肆意糟蹋婦女。他們隨意闖入民宅，姦淫良家婦女，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于大街上施暴；四十歲以下的婦女大多被湘軍擄走，成為士兵們姦淫的獵物。官家文書說，曾國荃先鋒提督李臣典日夜血戰，進城後不久即力竭身死；清追念其功，封世襲子爵。其實，李臣典是另一種“過勞力竭”：他“戮絕妖男，虜盡良女”，日夜宣淫，在天京破城後不到十天裡，每天辱虜女子幾十，最後因色斃身，死時才二十七歲。

經過一個多月的燒、殺、搶，攻入天京的湘軍將士個個都發了大財。當時長江之中千船百舸，連檣而上，滿載著搶掠來的財物和婦女，日夜不停地向湘南老家行駛。曾國荃更是大發其財，獲資數千萬，其後他在家鄉大量搶購民田、樹木，置田百頃，廣起宅第，被人稱為“老饕”。毛澤東的家產就是那時乘亂搶劫來的。。

曾國藩想出了一個欺騙窮人拼命的辦法，就是每打下一個地方，允許官兵大搶幾日，以刺激其士氣。曾國藩寫信給其九弟國荃，常有“想見大索三日”、“大索十日”的詞句，所謂“大索”，名義上是搜索“殘敵”，實際則是搜索財寶、公開搶劫。搶劫之余，強姦婦女。

民國初年，湖南農民當兵的最多，除農村破產的一般原因外，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受曾國藩部下湘勇在蘇浙皖贛搶掠發財的影響。放縱官兵搶掠雖然能夠刺激其拼命，打一個地方，就可以發財；但不能鞏固部隊，因為官兵搶飽了就想開小

差回去，即使不開小差，有了錢也就不肯拼命。於是曾國藩就想了第二個好方法，叫官兵賭博，在賭博中把兵的錢都騙光了，於是再鼓動他們去打仗。士兵拼命打仗搶老百姓；搶到後在賭博中被軍官騙去；騙光後再拼命，再搶掠；如此迴圈不已，湘軍軍官就發了大財。

後來李鴻章署理兩江時說，天京沒有百年很難恢復。在湘軍攻陷天京後 30 年，譚嗣同曾到金陵，他記錄道：“頃來金陵，見滿地荒寒現象。本地人言：‘發匪（指太平軍）據城時，並未焚殺，百姓安堵如故。終以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軍之至，不料官軍一破城，見人即殺，見屋即燒，子女玉帛，悉入於湘軍，而金陵永窮矣。’至今父老言之，猶深憤恨。他說洪、楊軍所至亦“頗縱殺”，至於已佔據的城邑“未嘗盡戮”，沒有屠城。但在湘軍收復之後，卻“良莠皆膏之於鋒刃”，並“乘勢淫擄焚掠，無所不至”，“卷東南數省之精髓”，悉入湘軍的私囊。曾國藩的湘軍塗炭生靈，留下了千古罵名。

曾國藩推行三光政策，把屠城當作功勞來吹捧！“直教戮滅無遺種，屍湧長江水不流”（彭玉璘《克復九江屠城》）；公然把大屠殺當作可以吹噓的功績的叫囂，簡直比日本人更甚。從九江到南京，一路屠城過來，“雞犬不聞三千里”，“皖南及江寧各屬，市人肉以相食，或數十裡野無耕種，村無炊煙”。當時全國死於湘淮軍之手者決不會少於 5000 萬。太平天國強盛時，南京城最多有 100 萬人，可曾剃頭殺過 10 多年後，到光緒登基時，南京也還不到 50 萬！據《太平天國》一書的統計，僅在江浙一隅之地，不過三四年光景，被屠戮的竟達 287 萬人。江蘇在太平天國戰爭中死亡 1679 萬，約占戰前全省總人口 37.6%；浙江省死亡 1630 萬，占戰前總人口的 52%；江西人口損失 1172 萬，占戰前總人口的 48.3%；湖北死于戰亂者達 500 萬，約占 22.5%；湖南死亡大約 200 萬，占占前全省人口

數的 9.2%。

網蟲蝸牛角上說：“曾國藩為了練兵，把長毛的匪徒捆起來，自己先吃一口，然後大家一人一口，殘酷殘忍，但我覺得當時也是沒有辦法啊”。公然鼓吹吃人有理！儒徒甚至說“壯士饑餐漢奸肉，笑談渴飲極毒（基督）血！以後俺也這樣練兵，學習曾大人！”

1862 年 5 月 13 日《印度泰晤士報》發表的一封英國軍人的信，信中說：我跟一大群人去看清軍屠殺俘虜……這批俘虜，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從剛出世的嬰孩，到 80 歲蹣跚而行的老翁，從懷孕的婦人，到 10 至 18 歲的姑娘，無所不有。清軍把這些婦女和姑娘，交給一批流氓強姦，再拖回來把他們處死。有些少女，劊子手將她們翻轉來面朝天，撕去衣服，然後用刀直剖到胸口。這批劊子手做剖腹工作，能不傷五臟，並且伸手進胸膛，把一顆冒熱氣的心掏出來。被害的人，直瞪著眼，看它們幹這樣慘無人道的事。還有很多吃奶的嬰兒，也從母親懷裡奪去剖腹。很多壯的男俘虜，不但被剖腹，而且還受凌遲非刑，劊子手們割下他們一塊一塊的肉，有時塞到它們的咀裡，有時則拋向喧嘩的觀眾之中。……

李鴻章答應赦免太平軍蘇州降軍，甚至封官許願，請了洋槍隊首領戈登做保證人，結果將降人全部屠殺。戈登為此大怒，要和李鴻章決鬥，並拒絕了清廷 1 萬兩白銀的賞賜。這個被我們醜化的外國侵略者，還頗有正義感，反倒是李鴻章等幹出了令人噁心的罪行。

太平軍的石達開、李秀成等人，都是投降後被殺，可見滿清之惡習不改。殺降不祥，必有報應。清雖然並未早亡，但自同治起，連續三代斷子絕孫，也算中國歷史上的異例。

太平天國爆發（1851 年）前夕中國人口 4.3 億，太平天國失敗（1863 年）

後，中國只有 2.3 億人，一場農民戰爭使中國損失了 2 億人[4000 萬人死於戰爭中]，這是何等的殘酷！到 1911 年全國恢復到 3.4 億人。

從 1856 年至 1872 年，戰爭與鼠疫共同造成雲南大約 270 萬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在 1862 年開始的西北回民戰爭和接踵而至的大旱災中，陝西有 710 萬人口死於屠殺和饑饉，占戰前人口的 52%；甘肅更嚴重，回民軍在甘肅屠殺了 1455 萬漢人，人口損失 74.5%

15·1927 年起，中共武裝奪取中華民國的政權，使 5000 萬人在內戰中悲慘的死去。

從 1946 年 6 月到 1950 年 6 月，共產黨的軍隊共殲滅了國民黨軍 807 萬人，實現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發動一系列的運動，又使上億的人民死去。

從西元前 221 年秦朝的建立到 1911 年清朝的覆亡的 2132 年間，中國出現過大大小小的皇帝 280 多個，平均七年半即有一個皇帝誕生。改朝換代免不了血腥的大屠殺，即便是同一朝代的皇帝更替，也免不了屠戮杖打、由此也難免傷及無辜。中國人殺戮中國人，中國人謀算中國人，中國人虐待中國人，中國人專制中國人，直到中國人自己折騰得精疲力竭、奄奄一息，外寇乘虛而入、橫掃中原。在過去的 2700 年間，中國人自專自製下僅有的 200 年瑞祥日子，即文景、光武、貞觀、開元。兩千多年來，內亂、戰爭大約占了一半的歷史時期（有人統計，占了 55%；資料來源：《陳平集》P142-145，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及中國歷代人口統計）。兩千年來中國人流的血積在一起，足以淹沒整個地球。

第 45 節 中國與西方戰爭之比較

人口比較：中國在戰國大概 2000 萬人，西漢達到 5900 萬；亞裡山大希臘化帝國的人口大概有 4000 來萬，羅馬帝國的人口有 1.2 億左右。

<http://www.cclw.net/book/shipotianji/htm/chapter15.html>

1· 戰爭的規模不同

中國軍隊遠遠超過歐洲。西元前 1044 年周武王聯合八個西方戎狄國，親率“戎車 3 百乘、虎賁 3 千人、甲士 4.5 萬人”，攻打商紂王 70 萬（一說 17 萬）大軍，聯軍“如虎如羆如豺”勇猛殺敵，滅掉了商朝。中國自春秋戰國以降的戰爭，軍隊動則數萬數十萬。西元前 225 年，秦王派兵 20 萬入侵楚國失敗而歸；西元前 224 年，秦王又派兵 60 萬入侵楚國，第二年終於滅楚國。在這裡可看到人多勢眾的作用。赤壁之戰，參戰的軍隊在 40 萬左右。淝水之戰投入的軍隊在 1 百萬左右。衛青第一次征匈奴就帶兵 3 萬餘，還有其他各路軍隊相助，一共不下 10 萬人。第三次出征，衛青與霍去病各帶 5 萬騎兵，還有步兵和後勤部隊數十萬。而凱撒征高盧時的軍隊在 5 萬人左右，征西班牙的軍隊是三萬六千人左右。

中世紀歐洲各國無常備軍，打仗是臨時召集軍隊，參軍的主要是貴族騎士，平民一般不參加軍隊。西方人打仗時軍隊規模很小；諸侯間的交戰一般就幾百上千人的規模，騎士間的交戰往往通過個人間的決鬥來解決。所以，因戰爭造成的死亡比中國小得多。歐洲人吃牛羊肉，肉易腐化，所以不能養大規模的軍隊。歐洲打仗，往往趕著牛羊去打仗，這樣戰爭的規模就小，死得人當然就少。不可能象中國的韓信搞“多多益善”，搞人海戰術打擊對手。

1066 年 9 月威廉率領 7000 人的軍隊渡海侵入英國，一個月完成對英國的征服。

十字軍東征，不過是伊斯蘭教勢力對歐洲的侵略所做的自衛性防禦性反擊。

耶路撒冷本來是羅馬帝國領土和基督教聖地，十字軍將其從阿拉伯人手裡奪回來，天經地義。十字軍的軍隊規模不過幾萬人，這還是經過教皇廣泛動員的結果。1099年7月15日十字軍佔領耶路撒冷屠殺了7萬人。這跟當時中國五代十國比，殺人的規模小得多。

1815年6月18日，以拿破崙為統帥的法國軍隊和以英國人威靈頓公爵為統帥的歐洲聯軍，在這裡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大決戰。雙方投入的兵力14萬多人。這場決戰持續了大約12個小時，聯軍戰勝了不可一世的法國皇帝拿破崙。

就投入戰爭的人數來說，西方遠不如東方。看來人海戰術是古已有之。明代的鄭和一次出動200艘大船，隨行人員2.5萬，而哥倫布只有3只帆船，90名隨員；麥哲倫的環球，船5只，265名船員。鄭和的行為不是探險而是示威，從古到今，沒哪國的探險隊伍達2萬人馬的。第一次鴉片戰爭，英國開赴中國的遠征軍也就4000千人而已。

死人比較：西元前147年羅馬摧毀迦太基，城破時迦太基人戰死8.5萬人，殘存的5萬人悉賣為奴（週一良、吳于廑主編：《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第305頁，人民出版社出版1973年版）。中國歷史的戰爭往往死亡人口過半，自秦以來出現過15次人口大滅亡。

由於中國人吃糧食、糧食的保存期比較長，不容易腐化，能養很多的軍隊。軍隊規模大，打起仗來必然死得人多。加上用人海戰術圍城，糧食很快消耗完，經常發生大規模人吃人的現象。打仗時，很多中國人躲到城裡，結果還是被相互吃掉了，留在鄉里的人被攻城軍吃了，躲到深山老林好些，可見“苛政猛於虎”。所以，歷代的帝王們要“深挖洞、廣積糧”啊，毛澤東說“手裡有糧、心裡不慌”，就可“準備打仗”了。

2 · 戰爭的文化背景不同和目的不同

古代中國戰爭的主要兵力來源是奴隸，秦的二十級軍功爵位制度就說明了這個問題。對待奴隸就不用那麼客氣了，當時的人也沒把奴隸當回事。中國發生內戰的原因都可看成是朝代更替戰爭，戰爭就是要置對方于死地，所以古代中國的戰俘是最悲慘的。慢慢的，戰士就把戰死沙場當成了一種解脫，既可以讓自己避免可預見的悲慘下場，也可以讓後方的親人免于迫害（因投降後家人被滿門抄斬的不在少數）。東方士兵就形成了一種“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精神，這種精神得到了歷代皇帝的高度讚賞，在儒家思想的教育下，戰死沙場就成了軍人的最高榮耀，也就形成了東方士兵的這種戰至最後一人的態度。

西元前 321 年，當羅馬軍全軍進入了這個考狄烏姆峽谷的時候，發現穀口已被砍倒的大樹所封死。薩姆尼特軍在樹木路障之上，居高臨下，亂箭齊發，試圖突圍的羅馬軍根本無法靠近。訓練有素的羅馬軍在山谷中央建起堅固的羅馬式軍營以圖固守。當羅馬軍吃完軍糧時，執政官終於明白了堅守下去只是死路一條，為了挽救約兩萬羅馬士兵的生命，決定向薩姆尼特軍投降。薩姆尼特人命令他們放下所有的武器，甚至連外衣也被盡數除去，像奴隸一樣身著單衣的羅馬士兵又被迫從兩排薩姆尼特士兵用矛架成的通道中俯首鑽過，薩姆尼特的媾和條件更是使羅馬失去了許多殖民城和勢力範圍。當他們狼狽地逃出薩姆尼特人的地盤進入羅馬城時，羅馬人依舊歡迎他們的平安返回，沒人指責他們為什麼不和敵人拚死一戰，來個什麼人在陣地在，誓死不降之類的混帳話。對於羅馬元老院不得不同意割讓勢力範圍一事，羅馬市民也能保持理智，不會去叫喊甯失千金不讓寸土一類不切實際的口號。

西方世界的軍人基本上是由貴族和自由民組成，像亞歷山大的王牌重騎兵部

隊就是由貴族青年組成，這些人受過良好的文化和軍事教育，且對亞歷山大本人都具有崇拜情節，所以往往能爆發出驚人的戰鬥力。到了羅馬時代的早期，有貴族組成騎兵和公民組成步兵，而且裝備都是自理。古代的公民兵役制是臨戰徵召軍隊，戰後即解散，不可能形成軍事獨裁。羅馬廢除公民軍實行雇傭軍制度，才出現軍事獨裁者。凱撒獨裁就被被公民刺殺了。

中世紀時西方的軍隊主要由騎士組成，而騎士都是貴族。中世紀教會對騎士們的精神指引形成了騎士團體內所以人都一律平等的騎士精神，使得當時西方國家間的戰爭表現出很紳士的一面：很少有殺害俘虜的現象，在對待俘虜尤其是貴族俘虜時候都不趕盡殺絕，而是由對方的家人或國家花錢來贖；決沒有殺害使者的現象，雙方都把盟約和協議看得很重要。看《英法百年戰爭史》就知道：相互敵對的軍隊在城外列陣，明火執仗爭戰，晚上雙方紮營休息，非常默契，沒有晚上偷襲、“劫營”的事，次日天明發起進攻，雙方都約定俗成地在白天爭戰，戰役的勝敗取決於雙方統帥的策略、臨場指揮、陣法、武器的優劣、臨陣的士氣和軍人的戰鬥素養，戰敗的一方也往往“體面”地認輸，撤退或投降，並且交出城門的鑰匙。這樣的“規矩”的戰爭，能夠做到儘量少的戕害平民和非戰鬥人員，這就是為什麼中世紀歐洲封建主之間混戰不比中國的內戰少，但對文明的破壞卻遠沒有中國的內戰為烈的原因。

反觀沒有宗教傳統的中國，戰爭從春秋戰國開始，就是不擇手段的“超限戰”，為了獲勝，使盡《三十六計》，什麼卑鄙下作的手段都採用，斬殺來使，背信棄義，出爾反爾是家常便飯，甚至穿著敵軍的衣服偷襲對手也屢見不鮮，而且一旦獲勝，任何卑鄙下作的手段都成了大智慧，堂而皇之被列入《三十六計》、《孫子兵法》、《百戰奇謀》，被收入《三國演義》、《水滸傳》、《厚黑大全》

等權謀詭詐梟雄黑道叢書，成為上流社會精英嚮往的智慧境界；成為下層草民膜拜和津津樂道的智慧範例。而歐洲中世紀一千年，宣揚權謀詭詐梟雄黑道的書只有馬基雅維裡的《君王論》，該書因為鼓吹不擇手段而臭名昭著，為歐洲上流社會所鄙視，馬基雅維裡主義也成為卑鄙下流的代名詞。

在儒家的教化下，中國的上流社會始終行不成依規則行事的風尚，歷史上中國的權貴沒有公平競爭的精神、沒有紳士風度，中國上流社會的爭鬥幾乎純粹是爾虞我詐，普遍以釋放暗箭為能事、為智慧。而在基督教的教化下，中世紀的歐洲上流社會越來越按規則行事，崇尚公平競爭；甚至仇敵之間的鬥爭，也崇尚一種公開和公平的方式——決鬥，一種公開化、透明化的單挑武鬥，有裁判和明文規則，在決鬥中雙方把糾葛怨系交給上帝裁決，死傷無怨，如在決鬥中雙方都沒死，則恩怨從此了斷。應該說，比起中國人習慣的陰招暗箭式的爭鬥，西方式的決鬥是一種光明磊落的鬥爭方式。任何時代，上流社會都是下層社會追求和效仿的目標，“上樑不正下樑歪”，中國上流社會崇尚的不擇手段，自然帶動整個社會崇尚不擇手段；整個社會的崇尚不擇手段，就不可能發展出社會公德，這就是把不擇手段當作智慧的中國傳統社會長期不知社會公德為何物的原因；而西方基督教國家在依規則行事的基礎上，能夠形成社會公德，進而能夠形成公民社會和市場經濟，再進而能夠形成憲政國家。

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精神氣質決定了中世紀歐洲社會和中國傳統社會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中世紀歐洲雖然黑暗，黑暗中卻孕育著光明，歐洲人在一千年當中，靠著自身的力量步入了憲政文明；中國傳統社會更加黑暗，中國人在黑暗中渾渾噩噩地折騰了兩千多年，不僅混到鴉片戰爭之前沒有任何長進，至今仍走不上憲政的光明大道。

中世紀的騎士在戰場上的爭鬥往往不以殺戮對方為目的，更多以商業利益為目的。殺死對手，就無法做生意了，就損害了自己的商業利益。所以，儘量少殺是西方戰爭的特點。1106年，在廷切佈雷（Tinchebrai）之役，英王亨利一世的300名貴族打敗了亨利一世之兄的所有諾曼第公國的騎士，400個騎士被捕，但亨利一世的騎士沒有一個陣亡。維泰利描述1119年Bremule之戰，報告說：“900個武士中，只有3個被殺死”。布汶（Bouvines）之役是中古流血最多、最富決定性的一場戰役，1500個騎士中，只有170個喪生。這主要是騎士間的默契與規約均要求善待俘虜及索取合理的贖金額。通常俘虜以信譽保證於一定日期繳給贖金後即被釋回，很少有騎士會破壞這種誓約。史載英法戰爭時在克裡西及普瓦泰被俘的法國騎士，與英國之俘虜者自由而舒適的生活在一起，並與他們的主人分享餐宴及運動，直到被贖回為止。這種以金錢贖俘的方式，甚至連國王也如此（如獅心王理查一世）。

中國古代戰爭的目的不是商業利益，而是佔領土地，達到改朝換代的目的。因此，必然斬草除根、趕盡殺絕，殺得越多越能使己方掌權。

《漢書》記載王莽篡漢時將反對他的劉信、翟義、趙明、霍鴻等人及其親屬全部“坑殺”，但該書所載的王莽關於誅殺這些人的詔書中，明明白白地寫著是要將這些人的屍體堆土，築為“方六丈，高六尺”的京觀，上面再樹6尺高的旗杆，寫上“反虜逆賊鯨鯢”。可見“坑”或京觀、武軍實際是一回事，都是指將屍體堆積封土。

《晉書·載記》中“坑”的記載不勝枚舉，如310年石勒攻晉冠軍將軍梁巨于武德，“坑降卒萬餘”。317年前趙劉聰鎮壓平陽貴族，“坑士眾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為之空”。這些“坑”並非活埋，該書記載401年後秦等長期圍攻後涼

呂隆佔據的姑臧城（今甘肅武威），城內缺糧，但呂隆不准百姓出城，將企圖逃出城的百姓“盡坑之，於是積屍盈于衢路”。該書的“坑”實際就是將受害者屍體堆積封土的“京觀”。

貞觀 19 年，太宗率六軍從洛陽出發，御駕親征高句麗。唐軍渡遼水，“收靺鞨 3300，盡坑之”。初勝後，卻在安市城碰到頑強阻擊。由於守軍殊死抵抗，使唐軍至 9 月仍未攻克。時近深秋，草枯水凍，士馬難以久留，唐太宗被迫班師，數萬將士殞命沙場。太宗晚年，他命四川等地伐木造船，以備征高句麗之用，結果造成山民暴亂，唐朝動用了數萬大軍，費了幾個月才將起義鎮壓下去。英明的唐太宗差點走了煬帝楊廣的老路。

龍朔元年（661 年），鐵勒酋長比粟毒夥同其他部落起兵犯境，唐高宗任命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大總管，薛仁貴為鐵勒道行軍副大總管，出兵討伐思結、拔也固、僕骨、同羅四部。當時鐵勒九姓擁兵十幾萬，憑藉天山之地利，企圖與大唐雄師一決勝負。他們派出數十位驍勇騎士出馬挑戰，眨眼間，就被薛仁貴三箭射死三人，膽寒之下，鐵勒人下馬投降，放棄了抵抗。為消除後患，薛仁貴命令部下，將 13 萬已投降的鐵勒人就地坑殺，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殺降暴行。唐軍中到處傳唱道，“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784 年軍閥李希烈叛軍攻蘄春，被李皋打敗，“斬首萬級，封屍為京觀”。936 年遼國幫助軍閥石敬瑭消滅後晉政權，將後晉皇室成員以及晉軍將士屍體都埋在汾河岸邊，“以為京觀”。986 年遼軍在莫州打敗宋軍，將宋軍屍體築京觀。北宋田況鎮壓保州反叛士兵，先是招降，然後“坑其構逆者 429 人”，得到朝廷讚賞。1410 年明朝大將張輔進攻安南，擊敗安南軍隊，殺死 2000 多名戰俘“築京觀”。

有人用兩次世界大戰死了很多人來說明西方文化殘酷，中國人愛和平。其實，當時的中國軍閥混戰，國共內戰，尤其是二戰結束後，中國繼續內戰違背了世界和平民主的潮流，以後又積極投入到史達林挑起的朝鮮戰爭。這樣的歷史，怎能證明中國更愛和平？中國內戰的殘忍性遠遠超過了世界大戰，看看 1948 年圍攻長春的大規模吃人事件就可知。

中古騎士在戰場上甚少殺戮對方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考慮到傷亡過重會引起嚴重的復仇。歐洲中世紀的互相優待被俘騎士的不成文的制度，顯得相當的智慧化和人性化。有著這樣的理念和精神，就必然能設立出《日內瓦戰俘公約》了。而在中國，不要說“同級別文明民族之間”，就是同為華夏族內部間戰爭都沒有這樣理念，對於戰俘採用坑殺、砍頭、剜眼，割鼻、烹煮、剁手腳乃至挖祖墳等等，顯得相當的野蠻。偶而有幾個被俘軍人獲得優待，只是因為其人格或能力受到戰勝者首領的青睞，而不是因為有互相優待制度在產生約束作用。這一切都在證明西方人是善於建立各種制度、進行自我管理的高智商群體，而華人不

是。

重視生命在英美國家形成了傳統。英國的邱吉爾在敦克爾克撤退時，為了人，連武器都放棄了。因為船艦的容積和載重量不足，他命令軍隊將武器投入海中，赤手上船回國。後來他再靠這些人反攻，打敗希特勒。海灣戰爭時老布希對前方將士講：我命令前線的將軍，不惜一切代價保護每一個美軍士兵的生命。為防止萬一不幸被縛，給士兵身上放兩種文本的投降書，和買通敵方的金條之類的貴重東西。

獨裁國家往往草菅人命。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軍第六軍團 20 多萬人，不肯放棄斯大林格勒，希特勒絕不准撤退，結果 20 多萬人全犧牲了。如果希特勒

准許撤退，這 20 多萬人可能再將斯大林格勒攻佔回來。日本也是一樣，明知很多島嶼守不住，卻偏要守，結果土地丟了，很多軍隊也犧牲了。

3·（孝道與神道）精神不同

孔丘任魯定公任魯國大司寇時，魯國連著打了三次敗仗，孔丘問一個士兵打仗時逃跑的原因，士兵說：“我有老父，我如果戰死，就沒人養活我父親了”。孔丘認為他很孝，不但不責備他，反而提拔他做了官。韓非說儒術乃“亡國之言”，“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商鞅說以儒治國“敵至必削”“必削至亡”。被孔丘周遊過的、受儒家思想不同程度感染的六國，並沒像孟軻這個江湖術士向六國國王所許諾的“仁者無敵”，而是先後亡了國。

“父母在、不遠遊”的孝道導致中國人家庭觀念強、民族觀念弱；產生了諺語“好男不當兵”，樂當縮頭龜。自西漢儒教正式登上中國政治舞臺起，漢民族就此一蹶不振，就連其它的少數民族也未倖免於難；一旦遭到儒家閹刀的屠戮，天性被泯滅、文化被抹殺、鬥志被瓦解，無數的生命被馴化為毫無思想的順民，中華民族雄風不再。

宋朝由於儒家思想的發達，被文化欠發達的蒙古族滅亡了。

明朝人口 1.2 億，敗亡于人口 50 萬、兵員只十餘萬的滿清；漢族人口減少近 3/4；數以百萬計的龐大的職業漢族軍隊，不是十幾萬非職業的滿族八旗武裝的對手，並且敗後大批投敵，成為漢奸軍隊，幫滿人屠殺自己的同胞。最令人不齒的是，95%的儒官：先作了明室的奴才，次作大順的奴才，後作滿清的奴才，作了三姓家奴，禮義廉恥蕩然無存。尤其作清奴才時，剃掉了前額頭髮，後邊留一豬尾巴。儒生以其賣身投靠得來的豬尾巴洋洋得意，將其教主孔二所說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得毀傷”，忘得一乾二淨。漢人當了近 300 年屈辱的奴才；

其原因仍是儒家主政導致殘酷剝削、社會大動亂所致。

1683 年，清政府福建海軍司令官攻佔臺灣。鄭氏政權投降。清宰相李光地（著名的儒學巨頭之一）向康熙大帝建議，鄭氏政權已滅，臺灣是蠻荒煙瘴之地，不適合人類居住，應賜給紅毛（荷蘭）。皇帝拒絕他的意見。可見，儒家實質上是些賣國賊。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的龔自珍，若知道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領路的恰是他的親生子龔孝拱的話，他一定會害羞的。清朝的皇帝們被儒家思想漢化後高喊著“以孝治天下”，結果被西方列強和革命黨的槍炮滅亡了。滿清一是官場腐敗，腐敗的主體當然是儒生了；二是人民愚昧。究其原因，也是儒教反對技術進步，他們說這是怪力亂神。

1894 年 5 月，韓國東學黨人提出要求實行民主憲政體制“盡滅權貴”、反對封建專制統治以及一切外國勢力的口號，一時間要求自由、獨立的火焰迅速在韓國燃燒進來。

韓國執政者者要求清政府派兵協助鎮壓獨立運動。清政府認為：中國作為亞洲頭號大國，又經過“洋務運動”，大清的軍事裝備在世界上是一流的，有陸軍 95 萬，且海軍軍艦 71 艘，實力位居世界第 6、亞洲第 1。當時日本僅有陸軍 10 幾萬人，海軍二十幾艘軍艦（其中有 9 艘在修理）、實力在世界僅是位居第 16。憑著強大的軍事力量，是可打敗日本的。甲午戰爭之初，沒幾個人認為日本能勝。

為了這支北洋水師，清政府總計花費了上億兩白銀，裝備了當時亞洲最大的鐵甲艦。“北洋水師”擁有戰列艦 11 艘，其中超級噸位戰列艦兩艘——定遠號和致遠號，清政府每年足額定期撥款軍費 400 萬兩白銀，用於水師官兵的軍餉、水師的日常維護及添置水師的裝備和武器。“日本水師”只擁有 8 艘戰列艦，且

全部是中小型號、低噸位，日本政府上起天皇、下到平民每日只吃兩頓飯，節衣縮食才保證了每年 230 萬兩白銀的軍費。

大清每年 400 萬兩白銀由戶部撥到水師提督丁汝昌處，克扣三成後再分發到各艦管帶，管帶截留三成，最後才派到各艦官兵手中。這筆被長時間克扣的軍費大部分被拿去公款吃喝及跑官要官，包括丁汝昌、鄧世昌在內都參與其中。北洋水師利用軍艦開展商業運輸，提督丁汝昌以下趁勢經商，全體將士聲色犬馬，既損耗了裝備，又荒廢了技術。

1894 年 6 月清政府派直隸提督葉志超率領陸軍 1500 人進駐牙山。漢城憲政派則請求日本政府支持韓國“獨立”自治。按照《天津條約》，中國向朝鮮派兵，則日本也可藉口出兵。6 月 3 日，袁世凱正式通知日本駐朝代理公使，朝鮮已正式向清政府請求派兵，6 月 4 日，日本外相向正在本國度假的駐朝公使大鳥發出訓令，要求他一旦確認清政府向朝鮮派兵時，日本應立即出兵。6 月 5 日，日本議會通過了關於日本出兵朝鮮致中國的照會，同一天成立了戰時大本營。6 月 6 日，汪鳳藻根據《天津條約》照會陸奧宗光，告知中國政府應朝鮮政府的請求，按照“我朝保護屬邦舊例”，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帶兵赴朝鮮剿匪，“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6 月 7 日，日本駐中國代理公使照會總理衙門，聲明根據《天津條約》，日本將出兵朝鮮。同日，日本外務省照復汪鳳藻：“查貴國照會中有‘保護屬邦’之語，但帝國政府從未承認朝鮮為中國之屬邦。”為“屬邦”二字，雙方激烈辯論。6 月 8 日，日軍開始出動，6 月 10 日，大鳥率兵入京，朝鮮政府得知後，又趕忙派代表前往勸阻，也被大鳥拒絕。當天午後，大鳥帶領海軍陸戰隊 420 人，野炮 4 門進入漢城。6 月 12 日，中日開始談判撤兵。同時，朝鮮政府先後照會了日本和中國，要求撤軍。在各方外交壓力下，撤軍談判開始

比較順利。但日本政府怎肯輕易放棄這樣的機會？16日日方提出兩點方案：第一，由中日兩國共同出兵鎮壓叛亂；第二，叛亂平定後，中日兩國共同協助朝鮮內政改革。這意味著在今後朝鮮政府中，日本將與中國取得平等的參政地位。中方當場拒絕。17日李鴻章表示，如日本“欲強遂之，除訴武力外無他”。7月23日凌晨，日軍一路鳴槍放炮進入漢城。大鳥親率一個聯隊包圍了王宮。守衛王宮的朝鮮士兵寡不敵眾，被日軍攻破。日軍擄走國王，成立了親日政府，宣佈獨立自治。7月25日，朝鮮親日政府宣佈廢除以前同清政府締結的一切條約，並授權日軍驅逐在朝清軍。這天，中日海軍首先交戰。

1894年8月1日，清政府對日正式宣戰。9月15日“平壤之戰”，清軍將領左寶貴戰死。當日軍拿下平壤的外城時，當日就戰死189人，傷516人，清兵傷亡人數少於日軍。日軍所帶的彈藥、口糧都已用盡，在平壤城外冒雨露宿，處境極為艱難。大清“名將”葉志超不想死在戰場上——家有老小呀——“孝”讓國人愚活苟活，“孝”使他喪失了信心，遂傳令放棄輜重，趁夜而退。當時，大雨傾盆，清兵冒雨蜂擁出城。混亂中不分敵我，胡亂放槍開炮，在混亂中死傷人數達到2千多，遠遠超過了在戰役中的損失。16日拂曉，日軍進入平壤，發現城內已沒有清軍一兵一卒，而被清軍丟棄的武器、彈藥、糧餉和其它物資無數，盡數為日軍所得。日軍於是完全控制了朝鮮。

兩天後，北洋海軍在大東溝以南的黃海海面上遭遇日本海軍，北洋艦隊的旗艦“定遠”、“揚威”號中彈起火，丁汝昌受傷。“致遠”艦被魚雷擊中，管帶鄧世昌和全艦官兵250人全部沉沒，“經遠”號也中彈起火，除16人獲救外，全艦官兵270人全都殉難。

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張之洞和其它各省督撫軟磨硬泡，公然抗旨拒不

派南洋水師和所屬軍隊北上增援，形成了偌大中國只有北洋一師獨抗日本全國之軍力的局面。

李鴻章誇耀北洋水師“攻守多方，備極奇奧”、“發十六炮，中至十五”，而在實戰中命中率卻極低。據統計，黃海海戰中日艦平均中彈 11.17 發，而北洋各艦平均中彈 107.71 發，北洋艦隊火炮命中率不及日本聯合艦隊 1/9。1895 年 1 月底，日軍進攻威海衛，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在絕望中自殺。北洋水師 11 艘戰列艦全軍覆沒，日本水師只有兩艘受了點輕傷。北洋水師之敗，除了訓練無素，還歸咎于李鴻章的“棄戰保船”戰術，而這一戰術的本質是李將艦隊視為自己的私人武裝，愚蠢自私的“棄戰保船”非但未能保住船，反而使艦隊在威海港內束手待斃，被日軍全殲。清臣文廷式氣憤地慨歎：北洋水師“糜費千萬卻不能一戰。”

結果，中國被打得一敗塗地，1895 年 4 月 17 日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清政府割讓臺灣及澎湖列島，賠款 2.3 億兩白銀，艦艇等戰利品價值也有 1 億多日元；而當時日本政府的年度財政收入只有 8 千萬日元。

1900 年 8 月 3 日，從天津出發進攻北京的八國聯軍，日軍 8000 人；俄軍 4800 人；英軍 3000 人；美軍 2100 人；法軍 800 人；奧地利軍 58 人；義大利軍 53 人；還有 7000 德軍在海上，來不及上陸。上陸作戰的總共 18811 人。清軍十五六萬，義和團團民五六十萬，兵力對比是 40:1。可 10 天之內，18000 餘人的八國聯軍攻陷北京！

八國聯軍在大沽口登陸時，只有炮臺守軍獨自拼死抗戰，其他各軍竟然全作壁上觀，海軍甚至不戰而作俘虜；爾後只有直隸駐軍參加抗戰，東南各省竟然與洋人簽訂了“東南互保協議”，就連坐鎮山東、執掌最精銳的現代化新軍的袁世

凱也坐視侵略者攻陷首都。

中國軍隊打仗時，軍官們躲在後面，用槍逼著士兵向前沖，這就是所謂的“督戰隊”。中國軍人總想讓別人犧牲而保全自己，結果是敵軍打過來大家一起犧牲（龐大的 18 路諸侯軍打不了小小的董卓軍；蕭衍兒子們的各路勤王軍為保存實力眼睜睜地看著侯景攻破建康餓死蕭衍）所以中國軍隊打起仗來傷亡總是特別大，可謂“占小便宜吃大虧”的典型。

日本人的克己奉公精神遠遠大於中國人。日本軍隊每次打仗時，基層軍官的死亡率特別大，因為軍官們總是身先士卒，這是日軍打仗特別勇敢的原因之一。

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幾百萬軍隊，無法抵擋日本的幾十萬軍隊。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日軍總共派遣了 70 萬部隊在中國，而幫助他們打中國人的偽軍人數超過了 800 萬；偽軍人數與日軍的比例是駭人的 11：1！同時期的中國軍隊平均要犧牲 5.6 人才能換回一個日軍的陣亡。日本在中國大陸死亡的只有 30 幾萬人，近 270 萬的日本兵是在其他地方被美國人、其他人消滅的。而我們中國人為了保衛中華民族，國共之間卻互相鬥來鬥去，你打我，我打你，而且彼此還偷偷跟日本人勾結，想借助日軍來消滅對方。如此讓人感到噁心的卑鄙的思想從哪兒來？孔子及其儒家的兩千多年獨尊文化的諄諄“教誨”能夠逃脫得了責任嗎？

10 多年前日本足球不敵中國足球，今天卻是“中國足球為什麼打不過日本”？日本請外籍教練，中國也請；日本在國內搞職業聯賽，中國也搞；日本請外籍球員參加國內球賽，中國也請；日本職業球員收入高，中國職業球員收入更高。日本職業球員年薪低者為 4 萬美元，高者不過 25 萬美元；中國職業球員年薪 12 萬美元，高的年薪達 60 萬美元。中國足球打不過日本，主要是精神上的因素，中國人缺乏宗教信仰、缺乏博愛寬容、缺乏自組織能力和奉獻精神，誰上場都不願

多出力，所以必敗無疑。這是上帝對無神論國家的懲罰。

康有為細察漢族歷史，發現漢人早已墮落，如果推翻清廷，必然會陷入無休止地自相殘殺的泥潭。這個判斷，還是被年中國史證明了的。孫中山把一個皇帝趕走了，卻迎來了無數個“皇帝”，有時稱“總統”、“委員長”或“主席”；軍閥混戰，民不聊生。

2007年12月民盟南師大委員會的主委林振山教授語重心長地說：“你也不小了，40不惑了，看來還很幼稚。只有共產黨才能管好中國，其他任何民主黨都沒有這個能力。而且，漢族人的人性是最壞的，如果給中國人民民主，漢族人的自相殘殺是最厲害的。”

4·戰爭方式不同

西方多海戰，使用海軍，戰爭對社會的直接破壞要比陸戰小些。海戰要求速決戰，在海上拖延意味著死亡，否則，連淡水都沒有喝的了，海軍貴在精，而不是數量。

西元前5世紀，艾奧尼亞的經濟遠比波斯帝國發達，體制的民主化也比希臘本土來得早。波斯國王強迫艾奧尼亞諸國放棄民主制而採用君主制。西元前499年艾奧尼亞諸國便以米利都國(現土耳其艾登市西部沿海一帶)為首，舉起了反旗。這次反抗運動成了希波戰爭的導火線。西元前490年9月，波斯國王大流士遣陸、海軍5萬多人，還有號稱無敵的騎兵，進攻曾支援艾奧尼亞反抗的雅典和埃維厄兩國。埃維厄國兵敗如山倒，傾刻便被血洗、掠奪一空，家園被破壞，居民全體被販賣為奴。波斯大軍乘勝轉攻雅典，在阿提卡地區的馬拉松平原(Marathon 雅典市東北海岸)登陸成功，直指雅典。雅典於是向斯巴達求援遭拒絕，雅典只好孤軍奮戰。雅典立即組編了1萬人的公民重裝步兵趕往馬拉松平原。波斯大軍5

倍于雅典軍，斯巴達援軍又不能趕來，雅典明顯處於劣勢。米提阿德將軍故意將陣線拉得與波斯軍同長，卻將精銳放在兩翼。兩軍交手，雅典軍中軍不敵重壓步步後退，波斯軍不知是計紛紛擁入突破口，以圖擴大戰果，雅典軍兩翼精銳鐵臂合圍使波斯軍四面受敵，善長強弓硬弩的波斯軍完全不得發揮。這是場包圍戰的典範，以前在波斯面前常遭敗北的希臘人這次卻取得極為光輝的勝利，波斯軍陣亡人數 6400，雅典僅損失 192 人。**首席執政官卡裡瑪科思戰死，將軍特拉希拉奧和眾多雅典名士皆陣亡與此戰。**勇士費迪皮迪茲（Pheidippides）奉命跑回雅典報捷，他在三小時內跑完了從馬拉松到雅典的路程（42 公里），當他風塵撲撲的回到雅典時，只喊了一句“高興吧！我們勝利了”，就倒地而死，為了紀念這位英雄，從 1896 年開始，即近代第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起，定期舉行馬拉松賽跑。希羅多德記述了這個勇士，說他是個長跑運動員，前一天還跑去斯巴達求援，兩天內總共跑了 240 公里。從此事上也可見當時的作戰方式為步戰，極少用馬，所以才將費迪皮迪茲活活累死。波斯軍只好撤回東方。戰後雅典人用塑像和繪畫紀念 192 勇士，震撼了斯巴達及整個希臘世界。

西元前 334 年，亞歷山大率領步兵 3 萬，騎兵 5000（《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第 240 頁）進入小亞細亞（在當時的東方，這實在算不上一支大軍）。在格拉尼科斯河畔擊敗了四倍于己的波斯軍隊，並通過外交手段使小亞細亞的希臘城邦不戰而降，順利進入敘利亞。西元前 333 年在伊蘇斯城同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的 40 萬大軍狹路相逢，大流士在中軍被擊潰的情況下倉皇逃脫，波斯軍隊全線潰敗，連他的母親、妻女都成了亞歷山大的俘虜。

中國歷史還沒有過這樣智勇雙全、奮勇當先的皇帝。李世民的勇敢是在當皇帝前，當皇帝後征服高麗反以失敗收場。

基督教的皇帝打仗都是衝鋒在第一線的，士兵們才會去玩命，大家想想古代瑞典 12 歲的小國王親自出征保衛國家就能看出來了。儒教徒都是縮在安全的地方的美其曰這個叫做決戰千里之外，基督教的思想教育下皇帝全都是文武雙全的。從治理國家的角度來看許多國家又沒有儒教思想一樣把國家治理得很好，例如古代的蒙古，很早就有部落議會選舉制度，比當時的宋朝制度要先進，貧窮是因為其所在地區資源匱乏，所以才會經常對外戰爭，佔領中原後吸取了儒家思想後居然越來越弱了，落到被漢人統治的地步？

1720 年一位敏銳的西方觀察家就指出：“中國的一切富足，浮華與禮儀，政體與衙門，生產與貿易，與歐洲相比又算得了什麼？中國的強大不過是一個錯覺。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三萬英國或德國步兵加上一萬名騎兵，只要指揮得當，就能打敗中國的全部軍隊。”

1840 年 6 月，英國 4000 遠征軍抵達廣州，他們裝備著槍炮與蒸汽輪船；這些東西馬戛爾尼使團曾經贈給清廷，但清廷並沒有人發現它們有什麼用處。清朝軍隊的主要裝備仍是弓箭和長矛，岸邊的炮臺猶如古董。為籌集戰費朝廷在各地廣設關卡，可是這些錢繳入國庫時已經所剩不多。英軍 7 月攻入廈門、佔領定海，8 月進入天津百河口。隨後清廷同意進行談判，英艦返回廣東。1841 年秋戰事再起，英軍相繼佔領寧波、上海、鎮江，清朝的經濟動脈京杭大運河因而被截斷，朝廷耐以生存的江南財賦一直就靠它北運。1842 年，英軍 1 千餘人在寧波擊潰清軍的 2 萬餘人的精銳大兵團，然後以 2 千 5 百人的極少數軍隊，在長江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8 月英軍抵達南京，清廷這時感到與其糜兵費餉、節節敗退，不如稍作讓步、委曲求全；而於 8 月 29 日在英艦“皋華麗”號上簽署了《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的主要內容包括 2100 萬兩白銀賠款，以及將香港割讓給英國，開廣州、福州、寧波、廈門、上海五口通商，清朝海關關稅應公開、明確（次年的虎門條約確定為 5%），今後兩國應平等交往；後來的相關附約還含有領事裁判權和最惠國待遇的條款。

鴉片戰爭打擊了滿族奴隸主政權。如果沒有鴉片戰爭，中國人也許仍在奴隸主專制的黑洞中三跪九叩，在眾中睽睽之下用板子打屁股……如果沒有西洋文明的強制性介入，單靠中國人自身的進化是很難走出專制的，中國至今都沒有擺脫專制。

鴉片戰爭後，清朝方面認為對條約不需當真的大有人在，廣東巡撫葉名琛和廣州士紳們即堅決不同意英國人依約進入廣州城，道光皇帝對葉名琛還降旨嘉勉。清朝官吏對外國人採取敵對態度，使正常的貿易難於進行；貨物從口岸城市轉運內地時，各地官吏照例強制收取高額厘金，也使他們無法容忍。1856 年，修改條約的時間到了，英、美、法三國即多方和清朝方面聯繫，但清朝官吏根本不予理睬。英法兩國於是決定再度出兵。

1856 年 10 月，清朝官兵登上在香港註冊的亞羅號船，拆下了船上懸掛的英國國旗；1857 年，法國一名傳教士在廣西被中國官吏殺害；這兩件事讓英、法找到了出兵的藉口。1857 年 12 月 27 日，英法聯軍只用了一天時間便攻佔了廣州城。

1858 年 5 月，2600 名聯軍北上攻佔天津。清朝方面不得已，只好與各列強簽署了《天津條約》。條約規定賠償英法軍費百銀 600 萬兩；同意各國派公使駐京，增加通商口岸；除 2.5% 的轉口稅外，清朝不得對洋貨再收取厘金；外國人可以進入中國內地；清朝海關應招聘外國人進行管理。條約草簽後，英法撤走了

軍隊。

1859年6月，西方使節乘軍艦抵天津，準備交換條約批准書，卻在大沽口再起衝突。

1860年8月，英法出兵25000人，並招募2500名中國苦力擔任後勤支援，重新佔領了天津。隨後雙方談判20餘日；通州談判時，清政府答應英法聯軍全部條件，但在枝節問題上寸步不讓。全權代表、欽差大臣載恒要求“見皇帝必須跪拜”，“必須按中國禮制，跪拜如儀，方可許可。”巴夏禮說：“我不是中國臣民，為何解袍跪拜？”

9月16日清軍僧格林沁遂將巴夏禮代表團一行39人全部逮捕，押往北京作人質。巴夏禮39人是外交使團，人質被扣押促使英法聯軍迅速進軍北京城。

聯軍遂恢復進攻，滿清朝廷逃往承德避暑山莊。三天后，皇帝的弟弟奕訢被迫向英法聯軍交還人質，但39名人質中生還者不足一半——僅18人，其餘都是屍骸，其中《泰晤士報》著名記者被“大卸八塊”。

扣押使節、虐待俘虜、殺死人質、殘害記者……英國公使額爾金和英軍司令格蘭特勃然大怒。他們認為大清國有的是金山銀山，不怕割地賠款。故宮是政府機構屬於公共財產，燒了，皇帝可以加稅，漲價再蓋新的。而圓明園是皇家園林屬於皇家私產，就像他們白金漢宮和凡爾賽宮，燒了才會讓皇帝心疼，長記性別再誤國誤民。

“餘可以要求鉅款，以懲戒清政府，然其罪惡如此，豈區區金錢可以救贖……餘未嘗不可提議將陷害我國人及破壞休戰之輩交出懲辦。然所指過於籠統，清政府必交出下屬，犧牲者徒為下屬……”故反復衡量的結果，只有毀圓明園一法最為可行，否則遇難之君之仇永不可報，而且此舉可給中國皇帝以極大打擊。10

月 6 日，聯軍進至圓明園，這個無比壯麗繁華的皇家園林，遭到聯軍的搶劫以後又被他們放火燒成灰燼。

中國戰爭是陸戰，喜歡搞持久戰，經常是圍城戰術，破壞性大。死的人必然多，不是餓死了，就是相互吃了。魏國將軍龐涓因為嫉妒同學孫臏的才華，而將孫臏誘騙來魏，處以臏刑，挖去膝蓋骨；孫臏裝瘋賣傻吃豬屎，無尊嚴到了極點。一個嬰兒化的民族，怎麼會有尊嚴？西元前 354 年龐涓率領 8 萬魏兵伐趙，趙向齊國求救，齊王答應出兵，但遲遲不發兵，等到魏軍攻破趙都邯鄲，雙方疲憊不堪時，齊派 8 萬大軍偷襲大梁，迫使魏軍撤回，於其歸途中攔擊，終獲全勝，這就是孫臏的圍魏救趙。這種包含持久戰的做法必然破壞性巨大。西元前 342 年孫臏用“滅灶法”殲滅了龐涓 10 萬大軍，龐涓被殺。

505 年，南梁皇帝蕭衍命他的弟弟蕭宏親王當總司令統軍北伐；渡過淮河，進入敵境，推進了十數公里，到達洛口（安徽懷遠），不敢再進。506 年，北魏反攻部隊陸續集結，蕭宏幾次要撤退，被一些將領苦苦留住。可一個暴風雨的晚上，營中發生夜驚，稍為熟習軍旅生活的人都知道，夜驚是平常的事。蕭宏卻心膽俱裂，竟拋下他所統率的大軍。秘密乘坐小艇逃走。等到天亮，將士們才發現失去元帥，全軍立刻崩潰，搶先渡淮河南奔，互相爭奪殘殺，死傷 5 萬餘人，卻連敵人的影子都沒有看見。然而最奇異的是，蕭宏高官貴爵如故。

蕭衍不承認失敗。514 年他決心奪取壽陽（安徽壽縣），壽陽是北魏帝國突入淮河南岸的一個軍事重鎮。蕭衍命在壽陽下游 130 公里處的浮山（安徽五河）附近，建立橫斷水壩。計畫水壩築成後，淮河上游水位提高，壽陽即被淹沒。蕭衍動員 20 余萬人，從淮河北岸兩岸分別興築，向中流合攏。514 年 11 月開工，515 年 4 月完成。想不到剛剛完成，水庫的水只積蓄一點點，水壩即行崩潰。幸

虧春雪還沒有融解，損失不大。蕭衍下令重建，從 515 年 4 月到 516 年 4 月，歷時 1 年零 1 個月，第二次完成，長約 4 公里半、高 20 丈、上寬 45 丈，軍隊駐紮其上。這是一個驚人的長度，即使在今天，也是世界上最長的水壩之一。

水壩完成後 5 個月，9 月份來臨，淮河水位暴漲，水庫盈滿。於是水壩第二次崩潰。建立在壩上的軍營和沿淮河下游兩岸的 10 萬村莊沖入大海，10 余萬人葬身東海。

蕭衍自從北進政策屢次失敗之後，在國內先後四次捨身建康同泰寺。他極醉心“仁慈”“寬厚”的美名，所以皇親國戚士大夫無論有多大的罪惡，都不予追究。但對於普通平民卻無一點寬假，一個人被定罪，父母妻子都受連累。一人逃亡，全家都下獄。

547 年，正是蕭衍第四次捨身的那一年，侯景歸降，並把北朝的 13 州帶入南朝。東魏帝國立即對侯景發動攻擊。蕭衍命侄兒蕭淵明當總司令，會同侯景的部隊，進攻彭城（江蘇徐州）。蕭淵明在距彭城九公里的寒山地方，被東魏擊敗，全軍覆沒，蕭淵明也被捉。侯景也全軍覆沒，他領著數百名親軍，進襲已歸南朝的壽陽，把代理州長（監州事）韋黯驅逐。

蕭衍對侯景驅逐地方政府首長，不但沒有責備，反而任命侯景當州長（州牧）。侯景就向南朝最尊貴的王、謝二姓求婚，蕭衍說：“王謝門第太高，不能匹配，不妨向朱姓張姓以下試試看。”侯景答：“什麼門第？我教他們作我的家奴”。侯景進入建康後，王謝二家被屠殺和所受的羞辱最慘，幾乎滅絕。二姓的門第和世家，從此消失。

蕭淵明被俘後，高澄請他寫信給蕭衍，建議兩國和解，蕭衍應允。侯景上奏章說：“兩國如果和解，恐怕我不能免高澄毒手。”蕭衍保證說：“我是天下之

主，豈會對人失信。”侯景假冒高澄名義寫了一封信給蕭衍，提議用蕭淵明交換侯景。蕭衍覆信說：“你早上送還蕭淵明，我晚上就送還侯景。”侯景遂集結兵力，從壽陽南下，直指首都建康（江蘇南京）。

侯景於 548 年 8 月起兵，如入無人之境的渡過長江，於 11 月包圍了建康。南梁帝國各路勤王軍隊，在親王和親信統率下，雲集城外，每天跟美女飲酒歡宴，不作戰而保存實力。蕭衍把詔書系到風箏上，命他們進攻解圍，可是沒人聽他的命令。549 年 3 月，建康陷落。5 月，86 歲的蕭衍，被活活餓死。建康 20 萬人慘遭屠殺。

蕭衍的兒子之一蕭繹親王，于 552 年在江陵繼位。他在登位之前，做的第一件事是消滅那些可能跟他爭奪帝位的兄弟叔侄。蕭繹在殺光了他所能殺的假想敵之後，才命他的大將王僧辯，東下進攻盤據建康已 4 年之久的侯景。侯景兵敗，在逃竄途中被他的親信部將用矛刺死。大亂總算平息，可南中國已殘破不堪，遍山遍野，屍體相接。百萬富豪人家，穿著綢緞，帶著稀世珠寶，臥在錦繡帳內，輾轉餓死。東西千餘公里，白骨莽莽，不見炊煙。

554 年，蕭繹寫了一封十分傲慢的信給西魏帝國宰相宇文泰，要求重劃邊界。宇文泰即命于謹當總司令大舉南下侵。當西魏遠征軍入境時，蕭繹卻在金鑾殿上給將領們講解《道德經》。江陵城破，蕭繹平常總是要求別人為國而死，臨到他時，卻屈辱的投降求生。投降前，蕭繹作了幾件事：第一件，江陵獄中囚犯，約有七千餘人。圍城之際，城防兵力不足，軍方請求釋放，充作戰士，這是古代習慣。蕭繹反而下令一律格殺，幸而獄吏還沒來得及執行，城即陷落。第二件，蕭繹把所收藏的 14 萬冊圖書，全部焚毀。許多絕版珍本，都成灰燼。蕭繹認為是書害了他；國破家亡，全是讀書太多的緣故。第三件，蕭繹在焚書時，表演了一

個小動作，他拔劍砍柱，嚎叫說：“文武之道，到今天為止。”意思是文武百官沒有拼死保護他，是放棄了他們神聖的責任。西魏遠征軍故意把蕭繹交給恨他入骨的仇人蕭警，蕭警對這位失去毒牙的叔父，作報復性的侮辱之後，用沙袋把他壓死。

1913年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袁世凱派張勳鎮壓。張勳攻南京時，曾下令城破之日大掠三日以為獎賞。於是南京城破後，北洋軍放火燒了下關，從9月1日至3日，張勳大縱兵士任意地姦淫搶劫，他於9月4日才進城。由於討袁軍總司令黃興是湖南人，因此，南京的湘人被殺的不計其數。在洗城的三天中，雷震春軍在南門，張勳軍在北門，好像劃分勢力範圍一樣，挨家挨戶地燒殺搶擄，上自天花板、下至陰溝都不放過。許多婦女投秦淮河自殺。

在搶劫過程中，城內大街小巷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怪現象，有些兵士脫下軍衣，把步槍當作扁擔來搬走他們的“戰利品”，有的強迫人力車替他們搬運，有的則因搶奪贓物而互相槍擊。張勳雖打了一次勝仗，可是等到士兵們歸隊點名時，卻少了很多。原來他們打完了仗，老總們都飽攬滿載，發了一筆不小的財，於是便開小差回家去享福了。

張勳和辮子軍攻下南京後，大肆洗劫，使到天愁地暗，中外震動，連袁世凱聽了也為之驚訝，於是發電給南京各軍師，全電如下：

“閱路透電，稱南京城內住宅商店，茅舍草屋，無不被搶，婦女老小貧富，多被姦淫，其餘均入外人家避難，各軍皆然，而張部藍衣兵實占多數。各官長目睹不理，所謂不傷一人，不驚一戶之宣告，完全背棄。日本民居，亦多被害，有自日領署出者，被兵槍斃三人，受傷一人云云。此次大兵南下，伐罪救民，似此強暴行為，如果盡確，則是喪盡名譽，大幹軍律……”

張勳做了江蘇都督後，偌大的一個南京城立刻就看不到一點民國氣象，完全恢復清代的氣氛。他絕對不准他的兵士們剪掉辮子。他看見穿西裝剪短頭髮的人就生氣，看見留辮子的就引為同志，於是，南京城內突然流行起拖辮子，紮假辮子的風氣盛行一時。

辛亥起義，張勳被江浙聯軍趕出南京城時，城內員警曾經歡迎革命軍。這次他收復了南京後，首先把所有的南京城內的員警一齊革職，用辮子兵代替員警站崗，然後從北方招了一批北洋員警來。辮子兵的各營都用龍頭令箭，官長們則穿的是清代的藍制服，軍營中不許懸掛中華民國的軍旗，而要懸掛紅色白邊的蜈蚣旗。民國的國旗也不許懸掛，江蘇都督府門前大桅杆上掛的是一個鬥大的“張”字紅旗。所有這些怪現象，袁都裝做不曾曉得，可是外國使節們對此非常驚訝，他們曾質問南京城不掛民國國旗的原因。袁待外國人抗議了，才打電報責備張勳不該禁止懸掛國旗。9月17日，南京城內才有五色國旗出現。

1918年3月北洋皖系軍閥張敬堯的部隊攻入湖南平江，縱容士兵燒殺、搶掠、強姦三日，令人髮指；據同年湖南禮陵由於軍閥混戰造成47901戶受害，死傷23459人，其中被殺的21592人。張昌宗的軍隊作惡多端，實行“三光、二翻、一空”的政策。

從1911年到1928年，在中國有1300多個敵對軍事集團發動了約140場戰爭，全國大部份地區戰亂不斷。從1912年到1930年，軍費開支平均占廣東省政府稅收收入的93%。持續的戰爭，不斷擴充的軍隊，高額的軍費開支，造成對經濟和社會的嚴重破壞。

5·西方人的惡是有底線的，中國人的惡是沒有底線的，中國人為了私利什麼事都做得出來。西方歷史上的罪惡比起中國歷史上的罪惡來，只是小巫見大巫，

簡直微不足道。

中世紀火燒異端信仰者是宗教法庭的審判，而當時的宗教法庭在許多時候是服從國王或被國王所控制的，火燒異端是國王政治的需要。神聖羅馬（以德國為主體，另外包括義大利的北部、捷克、奧地利、現今波蘭的一部分）帝腓特烈第二（Frederick II）施行許多律例（1220 年至 1235 年之間），規定凡異教徒均為犯法者，若不悔罪歸正，即處以火刑，悔罪者亦加以監禁，如再背教，則處以死刑。

在西班牙，火燒異端最多，那是西班牙國王要消除穆斯林的影響，政治因素大於宗教因素。西班牙於 15 世紀之末制定了一種制度，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延至 19 世紀始取消）的成績之一是驅逐摩爾人（Mariscos）於境外，又傳曾撲滅猶太教，又曾防禦新教教士的宣傳。

教會的裁判官宣佈被拘禁者是無望改宗的異教徒之後，再交與（公文上謂之“寬縱”他）俗界的當局，要求並委託地方官“仁慈而寬和地處置他”。而俗界官吏不問皂白，惟有置之死地；不如此，那麼，他就是異教的提倡者了。依照教會法律（The Canon Law），各國王和各官員均須及時地、迅速地處罰宗教裁判所交與的異教徒，否則逐出教會之外。我們所要注意的是：因火刑而致死者的數目，普通人的想像中是大大地誇大了的。

西方的宗教性起義的屠殺規模比較小，宗教的信奉者總是希望能儘量爭取更多的皈依者，有一種普天下的信教者是一家的概念。布魯諾神父不是因為日心說而是由於他反對三位一體的教義的異端思想於 1600 年 2 月 17 日被燒死，而且沒有誅連到他人。天主教承認自己所犯下的罪，並一直在為過去的過錯進行彌補。

所謂“販賣黑奴”，是非洲本地的部落頭領，黑人人販子與西方不法分子互

相勾結主動出賣自己同胞，西方政府一直都是視為非法，嚴厲打擊禁止的（特別是英國）；西方人沒用武力到非洲本地去強搶，只是在非洲沿海港口向黑人人販子購買，黑人人販子是主犯，白人人販子只是從犯；而且，販賣黑奴最多時間最長最殘酷最瘋狂的是阿拉伯人不是西方人（一直到現代，阿拉伯人還在販賣黑奴）。但是敵視西方無恥反美反西方的人不敢（或者根本就不知道）罵阿拉伯伊斯蘭土匪，只是拼命詆毀攻擊西方。此外，中世紀歐洲人也大量被北非人綁架販賣為奴，多達數百萬。更不用說，中國人一直到了二十世紀中葉還在合法地買賣人口，而且是自己同族的人。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人沒有任何資格指責西方人！

所謂“販賣鴉片”，西方人把吸鴉片賣鴉片看作是跟吸煙賣煙一樣平常的事情，西方人自己也吸食鴉片，英國有好幾個首相都是鴉片癮君子。人家沒有故意陷害你的意思。

所謂“屠殺印地安人”，絕大部分印地安人集中在西班牙人控制的拉丁美洲，他們早就跟西班牙葡萄牙移民融為一體了。西班牙人給美洲帶去了天花，就像蒙古西征把鼠疫傳播到歐洲一樣。歐洲的天花病死率為 10%，而美洲高達 90%。天花曾至少造成 1 億人死亡，另外 2 億人失明或留下終生疤痕。印第安人由於地理隔絕，對於天花、麻疹、傷寒等疾病毫無免疫能力，只能成群成群地死去。到 1570 年，戰爭和歐洲傳來的流行病，使墨西哥地區的人口從 2500 萬下降到 265 萬，秘魯的人口由 900 萬下降到了 130 萬。美洲大陸的原住民印第安人從那以後急劇減少了 90%。在 17 世紀，據估計西屬美洲的人口從 5000 萬銳減到 400 萬。倖存的印第安人成了一群無足輕重的順民，在美洲的政治生活中再沒起什麼作用。

北美印地安人本來只有幾十萬（近百萬）人，以前是那麼多現在還是那麼多。

他們並沒有建立國家組織，還處在野蠻原始的氏族社會。北美的絕大部分土地是荒無人煙的，殖民者除了進口些黑奴，絕大多數人只能自己動手，開荒種糧。17世紀初，印第安人在與英國移民半個世紀的交道中，除了喜好移民帶來的消費品乃至奢侈品外，對外來的其他事物——宗教、科技、法律制度、定居方式等，印第安人均無特別的興致。他們熱衷用土地換酒和槍械，換一塊少一塊，直到賣掉最後一塊保命的土地。絕大多數的印地安人是死於對之沒有免疫力的歐洲疾病，不是死於“屠殺”。在與西方人的衝突中死掉的印地安人絕大多數也不是什麼善類，一般都是他們主動先發起對歐洲移民的攻擊後才遭報復的。這跟義和團性質一樣。

中國人早在兩千多年前漢代時就開始對西域的主權國家進行長期的侵略和屠殺；兩千多年來，仍不斷對周邊國家民族如朝鮮（隋唐時）越南進行多次侵略殖民，對南方百越苗蠻諸族多次進行種族屠殺（秦、漢、三國、明清時代），明朝軍隊對少數民族的滅絕性圍剿（大家都知道中國南方有個懸棺之謎，不過製造這個謎語的民族卻在明朝消失了），以及現代對西藏的種族屠殺，中國才是世界上進行侵略、殖民和種族屠殺最早、規模最大的國家。

由於沒有宗教傳統，中國的統治者殘暴起來是沒有底線的，對於“大逆”者，不僅要殺死其本人，還要滅其“三族”、“九族”；到了滿清，屢屢因為一首詩、幾個字，就將思想犯滿門抄斬，這種瘋狂濫殺無辜的現象，在基督教國家、甚至伊斯蘭教國家都不存在；歷史上中國的刑法之殘忍，堪稱文明世界之最：凌遲、腰斬、車裂、活剝皮等等令人髮指的慘無人道的酷刑長期被列入國家明正典刑，殘忍的閹人制度存在了兩千多年，這是西方世界所沒有的。另一方面，造反的老百姓的殘暴也是沒底線的，中國歷史上農民暴動者幾乎無一例外地瘋狂地濫殺無辜，

把富人和官吏全家殺光，甚至連嬰幼兒都不放過，以“斬草除根”，張獻忠造反集團在四川的所作所為。因為缺乏罪惡感，中國人人性中的惡得不到有效的制約，所以中國的統治者一旦大權在握，被統治者一旦有機可乘，都表現得窮凶極惡，沒有緩衝和妥協的餘地，這是中國兩千多年來走不出治亂惡性循環，社會不能進步的根本原因。

第 46 節 中國淫穢史

打開中國歷史書籍，滿紙仁義道德的字裡行間不僅充滿了吃人的血腥味，並且還會有一股混合著脂粉氣的腥臊淫味撲鼻而來。中國的歷史，是貧窮的歷史，是戰亂的歷史，更是淫亂的歷史。中國對宦官的使用比西方更早（西元前六世紀，波斯已經有了使用宦官的風俗）。從甲骨文中考證，最早使用閹人當在殷商時代，是為了貴族們多妻制的需要。傳說孔子曾作《秘房記》。1973 年長沙馬王堆出土了 15 種醫書，屬於房中術的就有 5 種。追求肉體享受必然導致道德的墮落，人心越來越貪婪，愛心越來越少。

春秋時期的衛宣公，先私通庶母夷姜而生急子，又奪急子之妻宣姜生壽與朔。宣姜覺得，她的前任未婚夫衛急子必須排除。衛宣公遂決定殺急子。西元前 701 年，齊國攻擊紀國（山東壽光南紀台村），要求衛國相助，衛晉命衛急子前往齊國約定日期。卻暗中派武士偽裝做強盜埋伏中途殺之。這陰謀被宣姜的大兒子壽探知，把消息通知急子，勸他逃走。急子拒絕相信父親會殺死親子。衛壽不得已，設宴餞行，把他灌醉，留下一張字條說：“我已代你前往，請快逃命。”然後將白色牛尾插在自己船頭出發，到了埋伏地點，“強盜”把他殺掉了。衛急子酒醒後，大驚說：“我應該追上救他。”可是當他追到，弟弟已死。他放聲痛哭，責備“強盜”殺錯了人，“強盜”自不能允許正主仍然活著，於是再把衛急子殺掉。

宣姜後來又嫁宣公庶子碩，生子女五人。詩經《新台》《二子乘舟》就是吟詠這醜聞的。

新台醜聞說明：多妻制度下的中國宮廷；是一個黑暗的、人性淪喪的毒蛇穴窟。父母夫婦和兄弟姊妹兒女，在忠孝仁愛禮教喊不絕口之下，為了淫欲或繼承，而互相猜忌陷害，互相殘殺吞食。並且隨著歷史的發展，一個王朝比一個王朝更窮凶極惡。

齊國國君姜諸兒自小就跟妹妹文姜通姦。文姜嫁給魯國國君後，西元前 694 年，隨魯君到齊國訪問，兄妹重溫舊夢。魯君發現醜聞立即辭行。齊君遂命大力士彭生在扶魯君上車時把他扼死。魯國知道內情，因軍事力量太弱，只好要求懲凶。姜諸兒就把彭生殺掉了。

在春秋初期，齊國的宰相管仲（前 685-前 645 年）設“女閭”，《東周策》說：“齊桓公宮中女市七，女閭七百”。“閭”是門的意思，在宮中以門為市，使女子居之，這是國家經營妓院的開始。西方的國營妓院始於雅典的大政治改革家梭倫，梭倫定律法為西元前 594 年，他設國家妓院也在這一時期。可見，管仲創設國家妓院至少比梭倫早 50 年左右。

楚莊王“淫於聲色，左手擁秦姬，右手抱越女”；齊景公是“左為倡，右為優”；魏王飲宴時有楚姬舞于前，吳妹歌于後，越女鼓瑟于左，秦娥泛箏於右”；吳王夫差的後宮中竟有“宮妓數千人”。西元前 562 年，晉悼公興師伐鄭，鄭國派人贈送女樂 16 人及其它禮品給晉悼公以求和；晉悼公受禮後又以女樂 8 人賜給功臣魏澤作為獎賞。

《史記·秦本紀》載：秦穆公三十四年（西元前 626 年），穆公為離間戎王與賢人由余的關係，從而戰勝強鄰西戎國，送去了女樂 28 人，誘使戎王沉溺於

聲色之中，終於打敗了西戎國。《左傳·襄公十一年》載：西元前 562 年，鄭人把女樂和歌鐘一起作為禮品送給了晉侯，以麻痹其鬥志。《史記·孔子世家》載：西元前 496 年齊國懼怕魯國強霸，送去美女 80 人給魯國的統治者季桓子，從此，季桓子不理朝政，於是，孔子就離開魯國走了。

《墨子·辭過篇》雲：“當今之君，其畜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

《管子·小匡篇》雲：“（齊）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豬舞戈，不聽國政，卑聖侮士，惟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千；食必梁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饑。”

《三輔舊事》裡記載：“始皇……後宮列女萬餘人，氣上沖於天。”漢武帝得力于房中術，60 多歲還有很強的性欲，宮中蓄女 18000 人。漢武帝“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無婦人”。

東漢建初四年（79 年），朝廷組織了一次全國經學討論會，由皇帝親自主持，這個會議的記錄以後由班固整理編輯成《白虎通》，這是當時官方對經學的標準答案。在這部官方極為“正統”的書中，甚至討論了應該和未滿五十歲的妾性交幾次這樣的細節。

趙翼于《二十二史劄記》中曾論述漢王朝豪門貴族生活驚人的淫亂與墮落：例如燕王劉定與文康王姬發生姦情，並生子；又奪弟妻為姬，並與子女三人姦淫。趙太子且復與胞姊淫亂。江都王劉建令人與獸交生子，並令宮人裸而踞地，與羝羊及狗交合。齊王終古使所愛的奴與婢及諸妾交，或白晝裸伏與犬馬交接以為樂事。

靈帝十分好淫，他在後宮裡隨時隨地看中了哪個女子就拉到床上交歡。漢朝的宮廷女子都穿著開襠褲，而且開襠褲裡面什麼也不穿，為的就是讓皇帝臨幸起來方便，連衣服都不用脫。明末張獻忠讓姬妾不穿下衣在室內晃蕩，更是青出於

藍而勝於藍。

靈帝與眾多的姬妾在西園裸體遊玩，為了盛夏避暑他蓋了個“裸遊館”。他選擇玉色肌膚、身體輕盈的歌女執篙划船，搖漾在渠水中。靈帝與美女在裸游館的涼殿裡裸體飲酒，一喝就是一夜。他感歎說：“假如一萬年都如此，就是天上的神仙了。”靈帝整夜的飲酒直到醉得不省人事，天亮了還不知道。宮廷的內侍把一個大蠟燭扔在殿下，才把靈帝從夢中驚醒。

靈帝在後宮中設列市肆，他白晝與宮女們貿易，夜裡就抱著她們恣意地淫樂尋歡。據《古今情海》引用《文海披沙》的記載，靈帝甚至在西園里弄狗與宮女進行交配。

在靈帝身邊隨時侍從左右的中常侍有張讓等十二人，被稱為“十常侍”。他們把持朝政，而靈帝公然覬顏稱：“張常侍（張讓）乃我公，趙常侍（趙忠）乃我母。”朝政日益腐敗，最終釀成了東漢末年的黃巾大起義。

魏、晉時期，道家宣揚房中術，認為“采陰補陽”可以延年益壽，提倡禦女“多多益善”。曹操就奉行房中術以淫樂。他發出“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感歎，收羅“倡優在側，常日以達夕”，特地修築銅雀台以收蓄天下美女。他招募方士研究房中術，並以大量宮女作試驗。根據史書記載，曹操曾向甘始、左慈等人學習房中之術，一夜曾禦 70 女。他甚至在臨死時還遺令這些宮女、倡優在每月初一、十五的上午要在銅雀臺上對著他的陵墓表演歌舞。

曹操一死，曹丕就把曹操的寵妾們都收納到自己的宮裡去享用了。後來曹丕病重了，他的母親去看他，發現他的許多侍妾都是“先帝”用過的。太后大罵曹丕道：豬狗不如的東西，死了活該！罵完後轉身就走。

晉武帝司馬炎是一個聲色之徒，他的後宮佳麗逾萬人，由於宮嬪數量太多，

晉武帝最初也頭痛於到何處過夜。後來，發明了羊車，以致他每日幸禦宮女時，常常坐上羊車，羊走到哪裡，他就臨幸那裡的宮女。於是，一些宮女為求寵倖，就把竹葉插在門前，將鹽水潑在地上，引誘羊舐著鹽汁，順路走到門前，吃門上的竹葉，於是，車子就停了下來。從此，羊車成了後宮的傳世寶物。南朝宋文帝乘羊車經過諸嬪妃房前，羊總在潘淑妃的門前停下，舐地上的鹽水。文帝見到潘淑妃說，“羊都為你留連，何況人呢？”潘淑妃由此愛傾後宮。

晉惠帝的賈後是個嫉妒心極強的女人，當她是個太子妃時，就殺死了好幾個受丈夫寵愛的宮女，如果哪個宮女懷了孕，她就以長矛戳其腹部，使這宮女和胎兒立即死亡。惠帝是個傻子，凡軍國重權，全在賈後一手遮天，惠帝全然不知。太醫令程據相貌英俊，賈後借醫病為名，一再召診，讓要他值宿宮中，連宵侍奉。賈後令心腹侍女在洛陽街市招尋美少年入宮交歡，又怕走漏風聲，有損名譽，就將伴寢男子一一殺以滅口。

西元 291 年 4 月太傅楊駿被賈後誅夷三族，一口氣殺掉數千人，老幼不免。皇太后楊氏也因“圖危社稷”的罪名被廢為庶人，其母裴氏依罪該斬，她“截發稽顙”，上表兒媳賈後，自稱臣妾，哀求饒母親性命。賈後當然不許，當著“婆婆”的面殺掉楊駿妻子後，又把楊太后幽禁，派人斷絕飲食，活活餓死了這位風華絕代的美人。

前秦帝國出現一位足可媲美石虎的暴君苻生，這個自幼瞎了一隻眼的 21 歲青年，身旁不離鐵錘鋼鋸刀斧之類的兇器，一言不合，就親自動手。大宴群臣時，凡不酩酊大醉的人，苻生就教弓箭手一一射死。苻生曾問他的大臣：“你看我是一個怎麼樣的君主？”被問的人惶恐說：“陛下是聖主。”苻生大怒：“你諂媚我呀。”處斬。再問別人，那人謹慎地回答：“陛下是仁君，只刑罰稍為重一點。”

苻生同樣大怒：“你誹謗我呀。”也處斬。他命宮女與男人性交，親自率領群臣在旁觀看。又命宮女與羊性交，看她能不能生下小羊。又把牛馬驢羊等活活剝皮，使它們在宮殿上奔跑哀鳴。或者把人的面皮剝下，再教他表演歌舞。苻生殺的高興時，把政府中所有的高級官員，包括宰相元帥，統統在謀反的罪名下處決。又殺掉他的妻子梁皇后，他的舅父勸他少殺，他用鐵錘擊碎他舅父的頭頂，腦漿迸裂。苻生因只有一隻眼的緣故，所以最忌諱“少”、“無”、“缺”、“傷”、“殘”之類的話。有一次他問宮廷御醫（太醫）人參的功用，御醫回答說：“雖然少少一點，力量卻很大。”苻生下令把御醫雙眼挖掉，然後斬首。357年，苻生的堂弟苻堅率軍闖入皇宮，把苻生殺了。苻堅甚至荒唐到“使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引群臣臨而觀之”的地步。

南北朝時劉宋前廢帝劉子業將山陰公主召入宮中，留住不遣，不顧姊弟名分，居然顛鸞倒鳳；同餐同宿，同輦出遊。山陰公主毒死親夫後，對劉子業說：“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惟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劉子業聽了這番話，只好答應她的要求，讓她任意挑選了30名年輕英俊的男子，養在後宮，供她發洩性欲。劉子業後又佔有了姑媽，殺了姑丈，又殺死了同祖宗的皇位威脅者及隨從若干人。

劉子業一天召諸王妃公主等，聚在一室，令左右幸臣，脫去衣裳，與王妃公主共赴巫山。王妃公主莫不花容失色。劉子業縱使左右，強行褫去王妃公主的內衣，迫令行淫。南平王鑠妃江氏抵死不從，劉子業怒道：“若不依命，當殺你三個兒子！”江氏仍然不依，劉子業命鞭江氏百下，派人到江氏家中，殺死了江氏的三個兒子。劉子業因江氏敗興，忿尚未平，另召後宮婢妾及左右嬖幸，往游華林園竹林堂。堂宇寬敞，令男女裸體，與左右互相追逐，或使數女淫一男，或使

數男淫一女。自己興起，便擁了謝娘娘席地而淫；而且讓宮女與羝羊猴犬交媾，一個宮女不肯裸衣從淫，被立刻斬首。竹林堂上，已橫陳了十多個裸體宮女的屍體。一個個血肉模糊，慘不忍睹。

劉子業“使婦人裸身相逐”，叫一群妃子和宮女一絲不掛地做捉迷藏遊戲，有個妃子不願意，子業當場就把她殺了。以後，夢中有這女子的鬼魂來擾，他就把宮中幾十個長相與這女子有些近似的嬪妃、宮女全殺死。當天夜裡，這幾十名女子的幽魂又出現在他夢中，向他索命。於是，他就擺宴祭祀亡魂，在宴席上，他就被近臣殺死了。山陰公主淫亂宮闈，即日賜死，以面首 30 人殉葬。劉子業被草草葬在了秣陵縣南，年僅 17，時人稱為廢帝。

南北朝時，劉宋朝的劉昱即帝位後，往往率左右數人，或者出郊野，或者入市井，隨從都手執戈矛，路上遇到行人男女以及犬馬牛驢，劉昱隨手刺死，不論人還是牲畜無一倖免的。民間對此十分害怕，商販都歇了業，家家戶戶的門戶大白天緊緊關上，路上看不見一個行人。

有一次劉昱用鐵椎刺入一個行人的陰囊，那行人陰囊立刻破裂而死。一個侍從不忍心看，斂起眉閉上眼。劉昱大怒，令這個侍從脫下上衣站在地上，用矛刺穿了他的胛骨。

京城有一個女子，年紀十五、六歲，是個傻子，所以劉昱的御駕來了也不知道回避，只是在一邊憨笑。劉昱便當著左右的面與她交媾。這個傻女子任劉昱所為，劉昱大悅，從此經常與這個傻女子幽會。人們背後稱那個傻女子為路嬪嬙妃。

《宋書·南郡王義宣傳》：“義宣多蓄嬪媵，後房千餘，尼韞數百，男女三千人，崇飾綺麗，費用殷廣。齊武帝蕭蹟的後宮達萬人。蕭齊朝的王太后曾光明正大地擁有男寵三十人。梁簡文帝玩弄宮女還不夠，還常狎妓以為樂，並寫過《聽

夜妓》、《春夜看妓》等詩。

北齊開國君主文宣帝高洋極愛喝酒，常發酒瘋。有一天忽然向他妹夫元韶發問：“漢光武何故中興？”元韶是魏朝皇族，因是高家的女婿，活得不錯，老實回答：“因為王莽沒把劉姓皇族全部殺絕。”於是高洋把魏朝姓元（原姓拓跋）的 25 家直系皇族全部殺光，把元韶也囚入地牢，餓得這位駙馬爺啃自己衣服而噎死。而後又在晉陽把諸元親屬也全部殺淨，共殺 721 人，棄屍漳水，以至剖魚的人常在魚腹中看見人的指甲，致使鄴城人都不食魚。

高洋又留東魏王子元黃頭一個人，讓他和一些死囚從高臺上以席為翅，飄悠而下，事先講好摔不死就饒一命。死囚們紛紛摔成肉餅，惟獨元黃頭靈巧身健，竟能飛到紫陌慢慢降下，高洋全然不顧“君無戲言”的古訓，把元黃頭交給禦史關在獄裡餓死。

一次，他斥退左右，瘋狂地撕亂他父親的小妾爾朱氏的衣帶，企圖強姦。爾朱氏不從，雙手緊緊護住身體，哀求他不要亂倫。高洋假意應允，卻用刀捅進爾朱氏的下體，在爾朱氏死前痛苦的掙扎中獲得快感。

高洋有個寵妃姓薛，早先與清河王高岳相好，後被高洋看中，強行將她迎入宮中。薛氏極受寵倖，被封為薛嬪。薛嬪有個姐姐，長相也很妖豔，高洋乾脆將她也弄進宮來，高洋與薛氏姐妹，有時一連數日不離床榻。兩姐妹便懇請皇帝封他們的父親為司德公。高洋探知薛嬪依舊與高嶽藕斷絲連，便令人當著他的面，將薛嬪的姐姐活活鋸成八塊，接著又砍掉薛嬪的頭，將她的屍體亂刀剁碎；又把兩姐妹的血滲進酒裡，讓大臣共飲。他還叫樂師剔去薛嬪大腿的筋肉，用白森森的腿骨做成樂器。在每次殺人後的酒宴上，讓樂師用薛嬪腿骨做成的樂器彈奏“佳人再難得”的曲子，以示對薛嬪的“懷念”。

隋煬帝晚年服了方士的大丹，性欲一發不可收拾，每晚禦女數十人，到了夏天，要用冰制止熱燥，以至藏冰之家，皆獲千金。全國供楊廣一人享樂的美女，總數在 15 萬人以上。

武媚娘在唐太宗死後被送到感業寺出家為尼，和白馬寺的和尚馮小寶鈞達成奸了。武則天當上皇后，立刻讓馮小寶當上了洛陽名剎白馬寺的主持。高宗死後，武則天就讓馮小寶隨便出入後宮，賜名薛懷義。薛懷義因督建萬象神宮有功被擢為正三品左武衛大將軍，封梁國公。後來還多次擔任大總管，統領軍隊，遠征突厥。

不久御醫沈南璆成為武則天的新寵，薛懷義出於嫉妒，一把火燒掉了耗資巨萬的萬象神宮，武則天卻不予追究。而後薛懷義日益驕橫，終於引起武則天的厭惡，指使人將其暗殺。

太平公主是武則天的獨生女，她屢屢給母親介紹情人（面首），如張易之、張昌宗、柳良賓、侯祥、沈南璆、僧惠範等，都是以“陽道壯偉”著于史頁的“面首”。而且，這些“面首”的性能力大都由太平公主先嘗試過，才介紹給武則天的，有些“面首”最後被太平公主誅殺了。張易之倆兄弟是二十歲左右的美少年，聰明伶俐、通曉音律、精力旺盛，更有侍寢的本領。把武則天服侍得身心愉悅。武則天馬上給二人加官四品。從此二張儼若王侯，每天隨武則天早朝，待其聽政完畢，就在後宮陪侍。二張恃寵而驕，結黨營私干預朝政。終於在神龍元年，張柬之等策動了“宮廷政變”，殺掉二張，武則天在病榻上被“請”下御座。

唐代的醫聖孫思邈（活了 141 歲）在他的《千金方·房中補益》中說：“黃帝禦女 1200 而登仙。數數易女，則得益多，人常禦一女，陰氣轉弱，為益亦少。能禦 12 女而不復施瀉者，令人不老，有美色。若禦 93 女而自固者年萬歲矣。”

唐代的醫藥家張鼎在他的《玉房秘訣》中說：“不可以一女為之，多多益善，易女可長生，數數易女則益多，一夕易十人以上尤佳”。

李隆基通過鐵血手段發動政變殺死了太平公主、韋後一千人馬，讓父親當皇帝，隨後其父親禪位給他。他當皇帝後，唐朝轉向尊孔，他給孔子加上了“文宣王”的頭銜，大力宣揚孔子，對孔子的《孝經》親自作序、注解和書寫，並要天下人熟讀。

李隆基的生活就是儒家羨慕的生活。據《新唐書》載，開元天寶年間李隆基的宮妃達 4 萬人，他用“隨蝶所幸”的方法睡宮女，寵倖揚貴妃時已年過半百，安祿山因獻春藥“助情花”而被加高官厚祿，結果導致了安史之亂。

從唐肅宗李亨開始，宦官出任監軍，開創了貽害千年的監軍制度；唐代宗李適，乾脆把禁衛軍交給宦官統領，神策軍、天威軍司令也由宦官充任。這樣，掌管禁衛軍的宦官，幾乎成了實際的皇帝，真正的皇帝則成了他們手中的一個傀儡。權力的天平出現嚴重傾斜，皇帝的被殺被立已經由不得他自己。唐憲宗統治後期開始追求生活上的奢侈腐化，拒納忠諫，不斷服食丹藥，動輒痛責身邊的宦官。第十四任皇帝憲宗李純說：“宦官不過是家奴。”西元 820 年，宦官們將憲宗悶死在中和殿。此後，宦官挾制君主乃至弑君立君，一憑於己。第二十二任昭宗李晔也被宦官所殺，其餘七任皇帝全都由宦官所立。唐文宗李昂在位時，發生“甘露事變”，李昂想聯合宰相舒元興、李訓等，借觀看石榴樹上的甘露之名，伏兵盡殺宦官，結果事情敗露，包括宰相在內的數千官員，被宦官仇士良等屠殺一空。

唐敬宗發明了一種風流箭，用意也是決定侍寢之事。用竹皮做弓，紙做箭，紙中間密貯龍麝末香。宮嬪聚在一起，敬宗搭箭一射，中箭者濃香觸體，了無痛楚。後來宮中流傳著“風流箭中的一一人願”的話。

西元六到七世紀時，中國的房中術傳入印度，與印度佛教結合，繁衍出一種講求身心合一、男女雙修的佛教宗派，即密宗。男女雙修就如同“鳥有雙翼”，這樣方可達到佛教修養的最高境界。在密教的經典中有大量關於“佛母”“明妃”“天女”“歡喜金剛”的故事，在密宗和喇嘛教的寺院裡還有“大聖歡喜天”等男女合抱性交的塑像，表現出性交不僅有神力在，而且通過“雙修”可以得道、成正果。隨後，密宗又逐漸東傳至尼泊爾、東南亞以及西藏（即“喇嘛教”），八世紀進入中國內地，受到唐王室和貴族們的歡迎。

1150年，完顏亮即位剛一年就對皇族大肆屠殺，最有趣的是，完顏亮殺了他們之後，卻把他們的妻子和女兒，納入後宮，以供淫樂。而這些婦女正是完顏亮的叔母、姑母、姐妹，完顏亮對亂倫有特別的喜愛。

元代，蒙古人奉喇嘛教為國教，故密宗喇嘛教的性命雙修術傳到宮廷，被稱為“演揲兒”，就是大喜樂的意思，追求的就是淫蕩的房中術。在元朝，帝王和僧人的淫蕩都到達極至，詩曰：“紅紅白白好花枝，盡被山僧折取歸。只有野薇顏色淺，也來鉤惹道人衣”。

明代後宮，每日天漸黑時，嬪妃所住的宮門前，都掛起兩隻紅紗籠燈。皇帝臨幸某宮，則該宮門上的燈卸下來，表示皇帝已選定寢宿的地方。於是，負責巡街的宦官，傳令其他各宮均卸燈寢息。失意的嬪妃們只得滅掉希求寵倖的紅紗籠，明晚再重新掛上。

明朝的皇帝對房中術、春藥更感興趣。朱高熾死于“陰症”，就是行房後誤吃冷飲或者被陰風侵襲，朱高熾對於其父朱棣有一種強烈的逆反心理，按照制度，居喪期間，是不准近女色的，可是朱高熾偏偏不守規矩。當時，一個小臣李時勉就此上奏，皇帝不能這個時候還這樣荒唐，氣得朱高熾立刻把他下獄。

九任帝明憲宗朱見深的廚役達到八千人，他寵信太監汪直，在位 24 年，始終藏在深宮，不出見政府官員。萬安因敬獻春藥有功，竟被擢升為首相。

明武宗朱厚照從 1506 年至 1521 年，在位 16 年。他沉迷於喇嘛教，並從喇嘛僧處獲得大慶法師的稱號。他不僅每天專心於誦讀藏文經文，還在內廷建立豹房和一些邪淫寺院，裡面住著樂師、回教徒和喇嘛僧侶等人，他就每天和這些人淫樂、嬉戲、縱酒，完全不理國家政務。武宗只要知道諸侯伯家有回回籍的婦女，都召入宮，駕言教舞，把漂亮的長期留下，供他玩弄。在太監強尼的引導下去南中國遊蕩，常常信步走到一大戶人家，命錦衣衛把這家的男人敢走，而留下女人伴寢。車駕到的地方，近侍就掠奪良家婦女供他玩弄，有時塞滿了幾十車，日有死者，左右亦不敢聞。

武宗越玩心越野。有一次他托言邊關多警，要以“總督軍務”的名義北行，許多大臣泣諫，武宗不聽。於是宦官江彬導引武宗由大同渡黃河，次榆林，至綏德州，到總兵官戴欽的府第，看到戴欽的女兒，就要過去了。在歸途中又大征女樂，見到一個樂工楊騰的妻子劉氏，又淫心大發，又要過去了，很加寵倖。在乘船的時候，湖廣參議林文贊不知道這是皇帝的船，乘船一沖而過，武宗大怒，止住他，上了他的船，把他的一個妾搶走了。可見，明武宗的荒淫實在比隋煬帝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武宗聽說右都督馬昂的妹妹美豔，武宗便使召來，得之大喜，那時馬女已嫁畢指揮，且有身孕，武宗對此也置之不顧，由於寵此女，馬氏一門，無論大小，都賜蟒衣，內廷都呼馬昂為舅，聲勢頓盛。武宗也常去馬昂家飲酒，有一天在酒酣之際，武宗要馬昂召其妾，馬昂推託妾病，未出見，武宗十分不悅，馬昂之寵乃衰。

武宗曾說：“我把天下交給劉瑾也無所不可”。宦官劉瑾把 53 位反對者列入奸黨，逮捕入獄，施以酷刑。劉瑾為懲治反對者，還違制建造刑具。明律規定套在犯人脖子上的“枷”，最重不超過 13 公斤，而劉瑾發明的枷竟然重達 75 公斤，不少官員當場就被枷死。

西元 1508 年，有人用匿名的方式向武宗告發劉瑾，武宗竟然把信交給劉瑾。劉瑾矯詔讓百官在酷夏之時整日跪在奉天門外，逼迫寫信人自首。官員們多人渴昏，三人當場渴死，餘怒未息的劉瑾把五品以下的 3 百余官員全部關進獄中。

1510 年，武宗疏遠了劉瑾，最後下令把劉瑾碎屍萬段，其族人和黨羽也都被處死。

世宗嘉靖皇帝朱厚驥在位 46 年，為了得到長生不老藥，召方士入宮，不少人因獻秘方而大紅大紫，以至明朝的宮女一度達 10 萬人。1540 年起不出見政府官員，27 年(到死為止)不理朝政(只跟群臣見過 4 次面)。平均七年出席早朝一次。嚴嵩的濫用職權，起貪污款相當於好幾年的國防預算！全國沸騰的抗暴民變如火如荼，每年至少都要有一次大規模的暴動。

宮女楊金英等人也受不了朱厚驥禽獸般的惡行，試圖乘朱厚驥熟睡時用繩索把他勒死。如果不是打了個活結，朱厚驥必死無疑。這是一種深入骨髓的仇恨，世界上最善良的宮女以圖跟她們的仇敵同歸於盡。由此可以想見明政府的宮廷是何等骯髒恐怖。

萬曆 48 年朱翊均皇帝駕崩，太子朱常洛即位稱泰昌皇帝。這位受到普遍歡迎的新皇帝登基不過一個多月，突然間卻暴病身亡。追查死因，一是新皇帝曾“一夜禦美女四人”，淫樂過度敗壞了身體，二是生了病竟服用小臣敬獻的“紅丸仙丹”兩顆，第二顆“仙丹”吃下去不久就一命嗚呼。因此此案叫做“紅丸案”。

十六任帝明熹宗朱由校在位八年，是一個狂熱的木匠，經常揮汗如雨地製造桌椅案櫃；把朝政委託給帶他的玩伴魏忠賢（1568-1627）。一個文盲高踞于皇帝的寶座上，而另外一個文盲當上了皇帝的秉筆太監，替皇帝擬寫朱批。這是天啟元年（1621）至七年間的事。

明熹宗的乳母客氏，長得面似桃花，腰如楊柳，18歲進宮，兩年後丈夫死去，她就被長期留在宮中。客氏在宮內哺乳皇子，不能隨便外出。

熹宗漸漸長大，早已斷乳，客氏仍留居在宮禁服侍熹宗。一天黃昏，她正在房中閑坐，忽然魏朝闖進來，寒暄了幾句後，魏朝就挑逗客氏，惹得客氏欲火燒身，她恨恨地說：“你雖是個男子，與我們女人也沒什麼不同，做此醜態有什麼用？”魏朝嬉皮笑臉說：“女人就是女人，男人就是男人，那怎麼會一樣，不信你摸！”客氏當然不信，伸手摸他的胯下，誰知摸到一隻火燙的東西，不禁紅臉縮手：“你哪裡來的無賴，竟敢冒充太監，看我奏聞皇上，敲斷你的狗脛。”魏朝四顧無人，遂把客氏牽入羅幃。

《詩經·小雅》“巷伯”篇是宮廷宦者的淫行的最早記載。後漢的太監樂巴的“陽具複起”歷史有明確記載。並且太監娶妻歷代都有，如唐玄宗時的高力士，唐代宗時的李輔國。

《後漢書·周策傳》雲：“豎宦之人，亦復虛有形勢，威逼良家，取女閉之”，就是宦官去勢不盡，程度不一地恢復了一些性功能。二是有的宦者顯貴後，設法使“陽具複起”，至於用什麼方法，野史小說記的很多，但無從考證。

明代萬曆時，朝廷派到福建的抽稅太監高策為了恢復性功能，使陰莖重新長出來，就攫取民間小兒，吸食腦漿，致使稅監府院的水池中白骨累累。

此後魏朝怕出入不便，讓客氏去熹宗那裡乞賜對食。客氏對熹宗一說，熹宗

就答允了。關於“對食”，《明史》雲：“宮人無子者，各擇內監為侶，謂之‘菜戶’，具財物相通如一家，相愛如夫婦，既而妃嬪以下，亦頗有之，雖天子亦不之禁，以其宦者，不之嫌也。”

但好景不長，憑空鑽出個第三者魏忠賢。三人之間展開了一段爭風吃醋的穢事。

魏忠賢原名魏進忠，河間肅寧人（河間肅甯盛產宦官）。家裡十分貧寒，沒上過一天學，大字不識一個，善於騎馬射箭。17歲娶媳婦，經常和村中的無賴在一起酗酒賭博，但從來沒有贏的時候。22歲為了逃避巨額的賭債，把親生女兒賣給人家當童養媳，被迫淨身進皇宮，照顧皇孫朱由校。他見熹宗性好遊戲，就別出心裁，糊制了獅蠻滾球、雙龍賽珠等玩物，每天與客氏兩人誘導熹宗專以嬉戲為樂。熹宗遂倚兩人為心腹，幾乎頃刻難離。

給事中楊漣參劾魏進忠導上為非，魏進忠十分害怕，求魏朝的保護。魏朝轉托王安，王安便對熹宗說楊漣所參劾的是宮中的李進忠，不是魏進忠。於是李進忠便因同名而做了替死鬼。熹宗怕朝臣再誤會，在天啟二年給他賜名“忠賢”。

魏忠賢很感激魏朝，與他結為兄弟。所有宮中大小事，魏朝無不與魏忠賢密談，甚至采藥補陽的密術，以及與客氏的床第私情，也全部告訴了魏忠賢。魏忠賢正豔羨客氏的姿容，只是身上少了一件要緊的東西，無從縱欲。此時得了魏朝的秘授，當即依法一試，果然陽具重生，幾個月後恢復了原樣。一次魏朝值差，魏忠賢便去調戲客氏。魏忠賢年輕貌偉，比年老的魏朝高出許多，客氏不由得暗暗動情，但魏忠賢不過是淨身的太監，所以客氏並不在意。魏忠賢假裝與她戲玩，趁機按倒客氏，一番鏖戰，長至二三時辰，客氏滿身爽適，覺得魏忠賢遠勝魏朝。魏忠賢過河拆橋，從魏朝手中奪取了客氏。從此客氏視魏朝如眼中釘。

一天，魏忠賢與客氏在床上周旋，恰好魏朝乘醉而來，見了魏忠賢，氣得七竅生煙，便伸手去抓。魏忠賢也出手來抓魏朝，兩人扭作一團。魏忠賢年輕力大，按住魏朝，痛毆了幾拳。魏朝慌忙轉身拉著客氏就走。魏忠賢便追出來，兩人邊扯邊鬥。驚動了皇帝，熹宗即命將三人召入，三人跪在禦榻前供認不諱。熹宗笑說：“朕不便亂點鴛鴦，還是令客媼自己選擇。”客氏毫不猶豫地把手指向了魏忠賢。

第二天，有諭旨頒下，將魏朝攆出了宮。魏朝無可奈何，落得雞飛蛋打，只好長籲短歎一番，垂頭自去。客氏更是毒辣，想出一條斬草除根的計策，令魏忠賢假傳聖旨，將魏朝遣戍鳳陽守皇陵，並密囑鳳陽官員，等魏朝到了立即將他勒死。

客氏與魏忠賢兩人從此在宮禁恃勢橫行，熹宗反而越加寵倖，封客氏為奉聖夫人。

司禮監太監王安曾受光宗顧命，為人倒還剛直，目睹客氏與魏忠賢橫行無忌，暗中想將他們除去。禦史方震孺曾彈劾客氏與魏忠賢，王安便從中回應。熹宗被迫遣出客氏，將魏忠賢交給王安處置。

不料熹宗離開這兩個人後，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以致念念不忘。不久又召客氏入宮。客氏入宮，仍與魏忠賢住在一起，日夜圖謀害死王安。朝臣連續上疏請逐客氏，都遭貶謫。東林黨要員葉向高為首輔，請停“中旨”，凡事均由閣臣議擬。熹宗也不予採納。

內侍王體幹想做司禮監，便與客氏、魏忠賢朋比為奸。他們暗中慫恿給事中霍維華彈劾王安。再經客氏在裡面加讒言，惹得熹宗大怒，將王安降職，司禮監一職由王體幹繼任。魏忠賢又命參與盜寶被赦出獄的內監劉朝殺王安，奏稱自

殺。

王體幹雖為司禮監掌印太監，也得聽魏忠賢使喚。魏忠賢很快就權傾朝野，成了代替皇帝批改公文的司禮太監。他要干預朝政，便需要在朝臣中培植黨羽，一些貪污不法分子，也很想找到新的後臺和保護傘，雙方一拍即合。比如禦史崔呈秀貪贓劣績敗露，左都禦史高攀龍要參劾他，他就夜間找到魏忠賢長跪叩頭，請求做魏的乾兒子，魏便矯旨免他的罪，還升他的官，再把高攀龍貶逐回鄉。再如人品卑污的內閣大學士魏廣征，受到東林黨人的參劾，他便投靠魏忠賢，自稱“宗侄”，於是那些參劾他的官員便紛紛獲罪。諸如此類奸邪卑劣之徒，這時紛紛呼朋引伴拜倒在魏忠賢腳下，為魏出謀權劃策，一個個都成了“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他們置國家危局於不顧，卻以搏擊殘害東林黨人為業。他們編制了一份黑名單，仿效《水滸傳》中一百零八將的綽號，一一對號入座，名之曰《東林點將錄》。他們將政敵比作梁山泊中叛逆的強盜，已在政治上預先將他們判處了死刑。

禦史周建宗在彈劾魏忠賢時說魏氏“目不識一丁”，這句大實話讓魏忠賢惱羞成怒，周建宗被無端下獄，活活折磨死了。工部郎中萬某上言：“內廷外朝，只知魏忠賢，不知陛下，豈可尚留左右。”魏忠賢正憤無所發，見了此疏大怒，隨即傳出矯旨，廷杖萬某百下，一班走狗都跑到萬家，你一拳，我一腳，邊牽邊毆，待牽到闕下，萬已氣絕而亡。

魏忠賢在朝中結黨營私，他建立起一個包括兵部尚書、禮部尚書、錦衣衛在內的龐大黨羽組織，這個天下最有權勢的組織被人們形象地稱作“閹黨”。

閹黨瘋狂迫害對國家民族還有一點責任感的朝臣。稍稍敢講兩句真話的抗擊後金的軍事天才、遼東軍區司令官熊廷弼被誣陷“貪污”，熊廷弼棄市，傳首九

邊。

魏忠賢誣陷熊廷弼賄賂楊漣、左光鬥、魏大中，並大興冤獄。東林首領楊漣、左光鬥、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等六人被逮。囚押楊漣等人的“檻車”一路北上，一路都有士民群眾“設案焚香祝禱”，為他們鳴冤、祝福。楊漣被押途中都城士民數萬，擁道號泣；楊漣的屍體被家屬領出時，全身已潰爛不堪，胸前掛著壓死他時用的土囊，耳朵裡還有一根橫穿腦部的巨型鐵釘。野史記述，錦衣衛用尖刀剗出了楊漣喉骨送給了魏忠賢，魏把那段喉骨燒成了灰，用燒酒伴著吞了下去[忠賢殺並吃了7名囚犯的腦髓]。

左光鬥被五日一審，裸體受拶、夾、棍等刑，不能跪起，平臥堂下受訊。左光鬥、魏大中被打死後均體無完膚，魏大中的屍體一直到生蛆才被拖出來。六人皆死，時稱“六君子”。

保定舉人孫逢奇更在畿南各地“舉旗擊鼓，張榜設櫃”，公開為蒙冤“追贓”的東林黨人募捐“義助完贓”，等於在大張旗鼓地為東林黨人鳴冤、求助。更有一位無名氏，人們稱之為“燕客”，聽說楊、左諸公被捕，便趕到北京，投宿在“詔獄”附近，換上吏卒衣衫，天天找獄卒、馬夫們吃喝交朋友，設法混進獄中，終於見到了被捕的黨人們，把他們慘遭酷刑被摧殘致死的情形，以及他們的遺言、遺書、血書一一收集整理。但在某次多喝了酒說漏了嘴，被人發覺後，於是趕快換上商人的服飾，跨馬疾奔南方，一晝夜急馳三百里，這才逃脫虎口，為死難黨人們的殘酷遭遇留下了見證，也為他們留下了一批珍貴的血書和遺稿。

閹党的反對派、士大夫組成的“東林黨”被鎮壓。各地東林講學書院被毀，不附魏忠賢者，均被指為東林黨，被奪官者達三百餘人，下獄處死及流放邊地者數十人。東廠和錦衣衛的緹騎四出，有人在旅店喝酒，罵了魏忠賢幾句，被探子

偵知，就被施以剝皮之酷刑。

西元 1626 年，兵士押解了一個東林黨官員路過蘇州，周順昌替他擺酒席送行，在宴席上指名道姓大罵魏忠賢。押送的兵士回去，報告了魏忠賢。魏忠賢大怒，命令東廠派出兵士，由南京巡撫毛一鷺帶領，到蘇州捉拿周順昌。

東廠到蘇州抓人的消息一傳開，轟動了蘇州市民。二十多年前，蘇州市民在葛賢的領導下，曾經跟稅監鬥爭過。現在皇帝的特務又到蘇州來抓人，怎麼不激起大家的氣憤。到了東廠兵士到蘇州的那天，蘇州成千上萬市民擁上街頭，聲援周順昌。

大家攔住毛一鷺的轎子，推了幾名秀才向毛一鷺請願，要求取消逮捕周順昌的命令。毛一鷺見群眾聲勢浩大，嚇得滿頭大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旁邊的兵士著急了，他們把手裡的鐵鐐往地下一扔，厲聲嚇唬說：“我們是東廠來的，誰敢阻擋！”

鐵鐐發出“噹啷”的聲音，市民們被激怒了。有人站出來責問兵士說：“你們不是說奉皇上的聖旨抓人嗎？原來是東廠搞的鬼！”兵士還來不及回答，群眾都高叫起來：“原來是東廠來的奸賊！”大夥一面叫，一面向毛一鷺和兵士沖過去，聲音像山崩地裂一樣。憤怒的群眾趕上去，把他們揪住，劈頭蓋腦地痛打。一個兵士被擊中了心窩，倒在地上滾了滾，就斷了氣。其餘的兵士也被打得頭破血流，連滾帶爬地逃走了。毛一鷺趁人群亂轟轟的時候，脫了官服，從一條小巷裡溜出去，正見到前面有一個糞坑，也顧不得體面，鑽到臭氣熏天的糞坑角落裡。直到市民群眾散去，隨從們才從糞坑邊把嚇昏了的巡撫拖了出來。

東廠特務逃回去後，立刻向魏忠賢哭訴。魏忠賢哪肯甘休，命令毛一鷺派兵到蘇州鎮壓。他們把那天帶領市民暴動的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元

五人抓進監牢，加上一個煽動叛亂的罪名，把他們定了死罪。當五個人被押到刑場就義的時候，他們神色自若，還指著魏忠賢、毛一鷺的名字大罵哩！他們犧牲之後，當地人民出了錢，從劊子手那裡領回屍體，把他們安葬在虎丘東邊的山塘上。後來，還立了墓碑，碑上寫著“五人之墓”。

1626年，浙江地方官潘汝楨奏請在西湖為魏忠賢建生祠。魏忠賢當即矯旨嘉獎。遂在西湖上嶽飛祠不遠處，創建魏忠賢祠宇，氣象輝煌，比嶽飛祠壯麗數倍。各地紛紛效尤，不到一年，魏忠賢的生祠幾遍天下。各地紛紛建立起金碧輝煌的魏氏生祠，就連耿直的袁崇煥也還是忍氣吞聲在遼東給他做了一座生祠。

“一祠之費，多者數十萬兩白銀，少者數萬，剝民財，侵公帑，伐樹木無算。”各祠鬥巧競工，所供魏忠賢的塑像，多用沉香木雕成，冠用冕旒，五官四肢，宛轉如活人。腹中的肺腑，全用金玉珠寶妝成。髻上插四時香花。傳說有一個祠中頭像稍大，不能戴冠，性急的匠人把頭削小。一個闖人抱頭大哭，罰令匠人長跪了三日三夜。活著的人享受人間香火，真可謂空前絕後了。《堅瓠集》記載，當時一個巡撫在其為魏所立之生祠上題聯：“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極；允文允武，並日月以常新”。極盡阿諛之能事。

祠堂，原本是祭祀死去的祖先或先賢的宗廟。但搖尾拍馬屁的官員卻在魏忠賢還活著的時候，在祠堂中樹立他的塑像，供人當神仙般的焚香跪拜，祈求降福。各地不斷在生祠裡舉行各種莊嚴盛大的崇拜活動，以歌頌他的豐功偉績。各級軍政要員三跪九叩。幾乎全部的官僚都加入了向宦官魏忠賢歌功頌德的行列。

在滾滾熱浪中，魏忠賢個人崇拜愈來愈離譜。國子監生陸萬齡，獻媚唯恐落後，居然向皇上提出以魏忠賢配祀孔子，以魏忠賢之父配祀孔子之父，在國子監西側建立魏忠賢生祠。國子監監生集體上書說：“督廠魏忠賢提不世之貞心，佐

一朝之幹斷，披丹開導”，說魏忠賢芟除東林黨猶如孔子之誅少正卯，魏忠賢編《三朝要典》猶如孔子之筆削《春秋》，因此，“其功不在孟子之一下。”博得了一些人的叫好，魏忠賢被歌頌為只有上古時代堯和舜才能與之相提並論的曠代偉人。其褒頌之詞是無以復加的，比如：“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可見對魏忠賢的個人崇拜導致道德淪喪到了毫無是非的地步。

在一個皇帝、一個女人、一幫吹鼓手的推波助瀾下，魏忠賢的“無上名號”愈來愈多愈來愈高，也愈來愈離奇：廠臣、元臣、上公、尚公、殿爺、祖爺、老祖爺、千歲、九千歲，對於九千歲魏忠賢似乎還不滿意，因而有些人乾脆叫他“九千九百歲”。呂毖《明朝小史》說：“太監魏忠賢，舉朝阿諛者但拜為幹父，行五拜三叩頭禮，口呼 9999 歲爺爺。”

歷史上“九千歲”時有所聞，“9999 歲”聞所未聞，距離“萬歲”僅一步之遙，個人崇拜已達到頂峰了。如果熹宗不在天啟七年死去，瘋狂個人崇拜運動將發展到何種地步，是難以預料的。別以為魏忠賢個人崇拜是歷史上的特例。只有要專制政治的土壤，形形色色的個人崇拜就不可能絕跡。魏忠賢當權僅僅七年，就把明王朝的根基全部挖空。

魏忠賢是一個目不識丁的刑餘之人，何以能成為個人崇拜的對象？關鍵在於皇帝專制制度，是熹宗本人把皇帝的權力讓給了他，使他能以皇帝代言人的身份出現於朝廷，手中掌握著生殺予奪的大權。明代的太監，對於皇帝總是無條件地服從。較漢、唐時代的宦官動輒殺死皇帝，這種專權充其量也只能說是濫用了皇帝的授權而已。

魏忠賢得寵于熹宗的原因，還在於魏忠賢善於房中之術，經常能與客氏一起

導熹宗淫樂。魏忠賢的素質恰是貪玩的熹宗所欣賞的；而魏忠賢小心翼翼的服侍，使他能在天啟一朝成為一個大國的實際主宰者。終熹宗一生，他對魏忠賢的眷愛始終不替。

崇禎元年，皇帝降旨將魏忠賢謫置鳳陽。魏忠賢被貶謫的路上還有數百隨從前呼後擁，崇禎又連下諭旨，命錦衣衛速即逮訊。魏忠賢聽到京中密報錦衣衛即將到來，他便自縊身亡。崇禎將魏忠賢家產籍沒，又查客氏的家資，卻搜得宮女八人，多已懷孕。原來熹宗無子，客氏竟帶出宮女若干名，令與子弟同寢，待懷妊後再進宮中，謀為秦時呂不韋的秘計。崇禎立命將客氏拘至浣衣局，掠死於杖下。所有客氏、魏忠賢的家屬，無論長幼男女，都被斬首。魏忠賢各處生祠也全部撤除，毀去《三朝要典》，為被害諸臣全部昭雪。魏黨二百餘人皆免職斬首或充軍了事。民憤不能平，魏忠賢死後仍遭凌遲，被割了三千六百刀。

十七任帝朱由檢：在位 18 年。他中了清帝國的反間計，宣稱清帝國的剋星、用兵如神且忠心耿耿的遼東軍區總司令袁宗煥是清帝國的“奸細”，把他押赴刑場千刀萬剮。

有一次他把宰相們請到金鑾殿上，向他們作揖行禮，說：“謝謝各位先生，幫助我治理國家”。然而不久就大發雷霆，把被他謝謝的“各位先生”殺掉。朱由檢寵信太監曹化淳，讓他擔任北京城防司令，後者在李自成兵團來到時大開城門迎接農民軍進城。

十八任帝朱由崧：在臨時首都南京即位，明政府的殘餘國防軍力量弱不禁風，不堪一擊。朱由崧上殿時表情憂愁，大臣以為他憂心國事，未免說些安慰話，朱由崧卻回答說後宮宮女數量少且不夠漂亮，當務之急是挑選美女，弄得大臣一個個哭笑不得。朱由崧頒佈的第一道敕令是徵集宮女，第二道敕令是命各地方官員

進貢春藥秘方。被貶竄的閹党巨頭阮大鍼被召回政府擔任要職，跟實力派宰相馬士英結成一條陣線，瘋狂打擊忠於明政府的文武官員。朱由崧只當了十三個月皇帝，就被清帝國俘虜，送到北京砍頭。

清代的宮廷也有各種秘藥，宮女好幾千，皇帝還不滿足，還要下江南玩女人。

洪秀全(1814-1864)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廣東花縣人。他7歲入本地私塾讀書，14虛歲考為童生。此後連續4次，一共經歷17年，也沒考上生員(秀才)。在他一再落榜到公開造反期間，不止一次“坐館”當私塾師，收入比普通農民好不了多少。

1836年春天，洪秀全來廣州參加第二次應考，接受了9本一套的《勸世良言》，作者是梁發。梁發對基督教教義的理解不透徹，在某些非常重要教義的傳達上也難免有失真走樣的地方。如書中對上帝、耶穌和“聖神風”(聖靈)的關係，就沒有從“三位一體”的意義上闡明，而給人以“三位三體”的印象。梁發在中國長大，信奉基督教後，也不能盡然擺脫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加上他力求使文章具有“中國味”，在字裡行間摻入了儒學的成分。所以，曾是梁發上司的傳教士馬禮遜在談及梁發所寫的佈道書籍時說：在領悟基督教教義上“實有一些心得”，同時又指出：“其中不免染有彼國固有之異教色彩”。

1837年他第三次應試失敗後，大病了一場，一連40日高燒昏迷，精神恍惚，竟幾次覺得遊歷了天界，遇到種種奇異的事，這就是後來一些文獻中記述的“丁酉異夢”。

1842年，他第四次應考落榜。此時，洪秀全偶然重讀《勸世良言》，其感覺與認識同前番流覽時大不相同。書中抨擊“儒教”，指斥科舉，否定民間鬼神的文字，深深地吸引了他，他情不自禁地細讀下去，身心漸入神奇靈光的海洋，領

悟著“正經大道之聖理”，似乎進入大覺大悟之境。聯想 6 年前病中的幻象，他自信那是上帝召游天庭，大有昔日千疑百惑，今日煥然得釋之感。他說：這幾本書實為上天賜於我，以證實我往時經驗是真確的。

洪秀全決定皈依“上帝”，並按他自己的理解自行洗禮，表示清除罪惡，棄舊從新。他決心造反，就說上帝封他為“太平天王大道君全”，命他“時或稱洪秀”。從此，洪仁坤、洪火秀改名為洪秀全。秀全拆開，是“禾(吾)乃人王”。簡括地說，考不上秀才，是造反的決定性原因，造反是為了做人王，殺盡所痛恨、憎惡的人；佔有一切，“禾乃玉食”，“世間萬寶歸我有”。洪秀全遂創立拜上帝教。其後，洪秀全撰寫的《百正歌》、《改邪歸正》、《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等著作中體現出來，並擁有了一批中堅分子。洪與楊秀清、蕭朝貴的力量結合，承認了天父、天兄下凡等神鬼附身的荒唐舉動，就成了地地道道的邪教。

1847 年春，洪秀全來到廣州美國新教傳教士羅孝全處學習基督教兩個月，並要求羅孝全為他施洗。但羅孝全對洪秀全所講的有關宗教信仰方面的事情莫名其妙，實在缺乏對基督教的真正瞭解，沒有答應。洪秀全遂回到廣西桂平，而助手馮雲山的傳道工作逐漸地打開了局面，拜上帝會發展到 2000 多名信眾。洪秀全遂把拜上帝會演變成為政治和軍事的組織。在其後建立的政權中，又採取了政教合一的體制。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是夏商時期的上帝+儒家教義+基督教的幌子。洪秀全不拜耶穌，他搞的不是基督教。基督教教義中的上帝是個靈體，是人未曾看見也不能看見的。而拜上帝教中的上帝具有明顯的人神同形的特徵。其上帝的形象在《太平天日》中的描述是：天父上主皇上帝，頭戴高邊帽，身穿黑龍袍，滿口金須托在腹上，相貌最魁梧，身體最高大，坐裝最嚴肅，衣袍最端正，兩手覆在膝上。

拜上帝教是多神論宗教，太平天國的一神論，實際上是“一帝論”。基督教實行一夫一妻制，洪秀全搞多妻制，這根本不是基督教，是邪惡的儒教。

邪教的教主都是淫棍，年輕的女教徒都是他們的獵物。洪秀全還未公開造反時，就有妻妾多人。到了佔領小小的永安，已有 36 人。進南京後，每做生日，蒙得恩就要為他獻上美女 6 人；每年春暖花開之際，蒙得恩還在天京 13 道城門口為洪秀全選美女。甚至乾脆明文規定，“所有少婦美女俱備天王選用”。

《江南春夢筆記》中說，總計有 2300 多名婦女在天王府陪侍天王。3 宮 6 院 72 妃都是腐朽的儒家思想影響的結果。1861 年太平軍進取蘇浙的時候，洪秀全又從李秀成選送到天京的 3000 美女中挑出 180 人收入天王府，當時即有人寫詩諷刺：“三千怨女如花貌，百八佳人墮溷愁。”1864 年天京淪陷，幼天王洪福瑱被俘後說：“我 88 個母后，我是第二個賴氏所生，我九歲時就給我四個妻子。”88 個後妃已超過了歷代帝王的 3 宮 6 院 72 後妃的人數了。宮中有橫直均 8 尺的大雕花床，幹什麼用的，不言而喻。洪秀全因妻妾太多，連姓名都記不住，乾脆一概編號。

洪秀全寫了幾百首管教妻妾的《天父詩》叫她們背誦。如禁止女子抬頭看他，“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點罪萬千”。“看主單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個大膽看眼上，怠慢爾王怠慢天”。太平天國“旨准頒行”的官書《天父詩》十七、十八中所載對後妃的管教規定：服事不虔誠，一該打；硬頸不聽教，二該打；起眼看丈夫，三該打；問王不虔誠，四該打；躁氣不純淨，五該打；講話極大聲，六該打；有喙不應聲，七該打；面情不歡喜，八該打；眼左望右望，九該打；講話不悠然，十該打。

洪秀全將皇帝和邪教主對婦女的佔有和虐待，到了傷天害理滅絕人性的程度。

天京宮廷生活中，洪秀全把嬪妃當成一群牲口，動輒打、殺。後宮婦女失掉了所有的人格尊嚴，一言一行隨時都有招致責罰的可能。她們啼笑皆非，左右為難，誠惶誠恐，動輒得罪。

當婦女們受到天王的責罰時，即使冤枉也不得辯解，只許認錯領打，口稱“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否則便會受到加罪處罰。“打開知錯是單重，打不知錯是雙重，單重打過罪消融，雙重雪下罪難容”！“雪下”是太平軍“刀下”的代稱，至少有3個女人因為挨打時喊冤不認錯而被殺。被殺的人當中，有人至死不認錯並且頂撞了天王，受到五馬分屍的酷刑。

太平天國的理想是“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無處不飽暖”。可太平天國的等級更加鮮明、森嚴。太平天國就有性禁忌的嚴格法規：違背性禁忌的人不是開除而是殺頭，夫妻一起過一夜也要點天燈[殺頭]，天國子民私自說句悄悄話也得算通姦，要千刀萬剮；王侯過路時老百姓全部要跪拜，稍微抬一抬頭就要‘過雲中雪’（砍頭）。起義的領袖們自稱千歲萬歲；他們三宮六院，士兵卻過著苦行僧的禁欲生活。洪秀全在南京城內出行，也是百人隨行，前呼後擁，路邊行人皆需下跪。

太平天國吹噓洪秀全是世界萬國獨一真主，還按廣西“降僮”的迷信習俗，吹噓天父能附楊秀清之身下凡說話，天兄能附蕭朝貴之身說話。這是中國的傳統迷信，和西方的宗教沒直接的關係。這樣揚秀清說的話就是神的話，洪秀全感到大權旁落，1856年，洪秀全利用韋昌輝殺害楊秀清及親信6千余人，兩個月總共殺了文武官員2萬多人。後又利用石達開來天京靖難，凌遲處死韋昌輝，將其屍體寸磔，割成許多塊，每塊皆二寸，掛在各處醒目的柵欄處，標上“北奸肉，只准看不准取”的字樣，真是厲害之至。“洪楊之變”導致了十幾萬人被殺。而

太平天國在起義後的六年中，不過犧牲 4 千余戰士。以後又逼走了石達開。

太平天國實行“萬事爺哥朕作主”、“敬主方是真敬天”、“只有人錯無天錯，只有臣錯無主錯”那套儒家獨裁思想。

太平軍進入天京後，就廣為宣揚兩句話：“正是萬國來朝之候，大興土木之時。”其實當時根本沒有一國來朝，而大興土木則立即就開始了。

天王府的第一期工程，半年即建成，可惜被突起的大火燒毀了一部分，於次年正月又開始了第二期工程。兩期工程所用的磚石木料都是從明故宮、廟宇、民房拆取搬來的，建築工人主要是徵用沒有隨軍的婦女、老人，工匠則是奉天王的詔命從安徽、湖北招募來的且都是無償勞動。第三期的天王府工程，計畫擴建到周圍的 20 裡。

天京諸王豪貴也上下爭奢賽富，競相大搞華麗非常如輿馬定制，從基層管轄 25 人的“兩司馬”乘 4 人抬黑轎開始，層層加大。東王楊秀清每次出行要乘 48 人抬的大黃轎，夏日轎下設玻璃注水養金魚的水轎，每次出行時前後儀仗數裡，像賽會一般。而天王洪秀全從不出宮門，宮內有美女牽的金車，宮外常備 64 人抬龍鳳黃輿。為了適應豪華的鋪張，宮內專設典天輿一千人、典天馬一百人，還有典天鑼、典天樂……等等。奢侈已極。

太平軍從武漢到南京，驅趕居民男女分居後接收居民家中錢財不計其數，為了管理使用這些金銀財寶，天朝設立專管鑄印和製造金銀器皿的典金官；專管雕琢玉器的典玉局；管製造冠帽的典角帽；製造靴鞋的典金靴等。如為天王製造 24 只金碗，金筷子，“筋長近尺，浴盆亦以金。”（《金陵省難紀略》）連淨桶夜壺都俱以金造。

天朝各官在穿戴裝飾上更是追求華麗奢侈之風，互相爭奇鬥豔，奢侈已極，

一冠袍可抵中人之產。而天王洪秀全的金鈕扣和八斤重的金冠，更是無價之寶。除了供天王如此揮霍之外，還有參加爭吃爭穿爭排場的朝裡朝外文武各級官員 31 萬多人，其中大部分都是王親國戚和洪秀全起事時的功勳兄弟，坐享榮華，很快就把庫中掠奪來的金山銀海挖空吸幹了。

洪秀全總共封了 2700 多個王。所有受封為王的，不論等級，不分有職無職，一朝受封，立即修王府，選美人，辦儀仗，出門時前呼後擁，盈街塞巷。至今浙江還流傳侍王李世賢出門坐 54 人抬的龍鳳黃轎，轎上可以召集部下開會。王爺轎輿所到之處，小官和軍民百姓都要回避，回避不及的要就地低首下跪迎送，如果不小心撞了儀仗，輕則杖責，重則斬首。因為當時王爺太多，百姓們迎不勝迎，遂流傳出民謠：“王爺遍地走，小民淚直流”。

這麼多的王爺需要大量的雜役服侍，於是就抓兵拉夫，招降納叛。反過來為了養兵，為了營造安樂窩，他們又巧立名目，橫徵暴斂，諸如店捐、股捐、月捐、日捐、房捐、局捐、灶捐、禮拜捐、門牌稅、人頭稅、犒師費等等二三十種。田賦則由天朝初時制定的每畝一鬥七升五合，兩年中即增加到每畝七鬥。

擁有百萬雄兵的後期統帥李秀成擁有百萬家財。當陳玉成為保衛天京上游門戶安慶而浴血奮戰的危急關頭，李秀成、李世賢兄弟一心經營其蘇浙領地，始終未發一兵一卒前往皖北助戰，坐視安慶和廬州相繼失守、陳玉成犧牲而不顧。直到廬州失守後 17 天，天京再一次陷入湘軍重圍的時候，李秀成才為時已晚看到大局動搖的危險性，組織起 13 王 60 萬大軍，救援天京。但因諸王各懷私念而消極畏戰，對陣 46 天，竟未把饑病交加的 2 萬湘軍打退，藉口缺寒衣而各自散去，直到天京淪陷為止，再也沒有哪個王來解圍了。

這些王爺們各回自己的安樂窩，享受榮華富貴，小王不聽中王，中王不聽大

王，最後紛紛叛變。李秀成苦心經營的蘇州，也被其叛變投敵的心腹部屬四王將它完整地奉送給李鴻章了。李秀成從佔領蘇州到蘇州失守，僅三年半時間，腐敗毒菌吞噬了李秀成的百萬大軍。李秀成在蘇州失守以後只率數百親隨狼狽逃回天京，但天京也在半年後失守，天京失守時，李秀成保護幼天王突圍出城以後，與大隊離散，孤身逃到方山，解下纏在腰上的百寶囊休息時被人發現，寶囊被人哄搶，他也被捉住送到清營成了階下囚。他在天京的兩座新舊王府被搶後也被大火夷為平地，與天王府一樣只落得一片廢墟，任憑野鴿飛來飛去了。

皇帝佬	蓄六院	怕偷情	把人闖	兒娶媳	父嘗鮮	兄淫	
妹	天倫亂	養男龐	搞雞奸	喜群交	壁上觀		
士大夫	納小妾	戲丫環	泡戲子	同性戀	狎娼妓	最難	
過	美人關						
老百姓	也不閑	夫偷情	妻養漢	女能賣	妻可典	春宮	
畫	大力丸						
	房中術	象流感	得大瘡	苦難言			
薄命女	是紅顏	裹小腳	苦難言	守活寡	日如年	貞潔	
牌	血淚沾						
	說官場	皆爭權	拍馬屁	一招鮮	排異己	搞誣陷	忌賢
能	散流言						
	衙門口	面朝南	想辦事	先打點	官多大	多大貪	
	說社會	更黑暗	幫會頭	人口販	盜墓賊	江湖騙	叫花
子	流氓犯						
	吃人肉	不眨眼	偷東西	賭大錢	賣老婆	吸鴉片	罵大

街 撕破臉

男和女的出生比例基本上是一比一的，皇帝、官僚們多占一個女人，民間就會多出一個光棍漢。由於性的極度不平等，又沒有信仰制約，導致了奸屍。如西漢農民起義軍挖掘了咸陽的個帝王陵，後妃的屍體被姦污。《晉書·平原王幹傳》：“幹前後愛妾死，即斂，輒不釘棺，置後空屋中，數日發視或行淫穢，須其屍壞，乃葬。”

1928年，軍閥孫殿英的部隊炸開了慈禧的墓，大肆掠奪。華北出版的《時事白話》中記載了這麼一件事，孫殿英與土匪無異的軍隊打開慈禧的棺槨之後，見屍體栩栩如生，有個士兵在其它士兵的鼓噪與慫恿下準備奸屍，因為這個士兵是仵工出身，即做收拾屍體的事，他姦污年輕女性的屍體已成習慣。於是，這些士兵紛紛剝去屍體的衣服，還圍著細看了一會。過了不久，屍體和繡袍見風就化，頓時慈禧的面孔萎縮，成骷髏狀態，那個意欲奸屍的士兵就意興索然，停止奸屍，然後就一起搶奪珠寶。

第 47 節 儒家對婦女的專制壓迫

1· 一夫萬妻制

理論上說，皇帝可以玩弄他想要的每一位女性。甲骨文表明，商王武丁先後有妻三人，寵倖女子 60 餘人。女奴是貴族男子次要配偶的主要來源，久之即成為事實上的妾。主人去世，則由主人的嫡子壟斷繼續享用，有的則被出賣或贈給別人。

民間流傳的“游龍戲鳳”故事，講的就是明武宗在宣化與酒家女李鳳姐的故事。武宗於酒肆中當場強暴李鳳姐，這對鳳姐是一個悲劇。可當武宗一亮出皇帝身份，鳳姐就感激涕零了：“今以賤軀事至尊，曷勝榮幸之至。”舒蕪早在 1944

年便指出：“天下人生下來都是姨太太或‘收房’的丫頭，所以每個人就都有‘薦枕席’的義務，皇帝隨時都可以‘召幸’。”皇帝對女性的性玩弄性迫害，還要被視為“恩寵”，婦女還以之為無尚的光榮。

儒家的貞潔觀念實際上只是對如何分配女性資源而做的一種制度化的規定。《禮記·婚儀》篇雲：“古者天子後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禦妻，以聽天下之內治。”這 121 人成了歷代後宮妃的常數，而宮女的數量是沒節制的，走向了一夫萬妻制。可見，一臉正人君子相貌的儒家諸人，實際上是這個世界上最下流的一批人，他們在欺壓迫下層人民的同時，也就兼任了給以皇帝為代表的統治者拉皮條的任務。

周代不僅規定了天子[諸侯、大夫]妻妾的數目，而且規定了同房的順序。具體情況是：一到九日，八十一禦婦，每夜輪九人；十到十二日，二十七世婦，每夜輪九人；十三日輪九嬪；十四日輪三夫人；十五日，皇后。十六日，皇后；十七日，三夫人；十八日，九嬪；十九日到二十一日，二十七世婦，每夜輪九人；二十二日到三十日，八十一禦妻，每夜輪九人。

周制規定：諸侯有九個妻子，其中除一位夫人外，另外還分為甲、乙、丙、丁四組側室。每天晚上除了由夫人陪伴外，另由兩個側室相伴。通常的情況是，50 歲以下的側室才有和主君共寢的權利，因為還有懷孕的能力；50 歲以上就不可和主君共寢了。夫人（正室）則不受年齡的限制，可一直和丈夫相處，同進同退。大夫有一妻二妾，以三日為一輪，允許妻死再娶，士大夫之妾，也稱小婦、小妻、傍妻、下妻、側室等。而士族只能有一妻一妾；妻、妾有嚴格區別，一般情況下，妻子可從晚上一直到次晨，而妾必須在深夜時分等主君睡著後即行離去。至於庶民，只允許一夫一妻，稱匹夫匹婦。

妾的本意是女奴隸，《尚書》有雲：“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意思是牛馬發情逃跑了，男女奴隸私奔了，都不必去追。其中“妾”指女奴隸，“臣”指男奴隸。

妾的來源有買而為妾、奔而為妾、奪而為妾、“烝”而為妾（與庶母或孀母通姦，娶以為妾）、收婢為妾等手段。《禮記》：“奔者為妾，父母國人皆賤之”。就是說，假如男女們自由戀愛受阻，相約私奔的話，則女方沒有資格為妻，雙方家族都只認為她是一個妾而已。《禮記》雲：“妾合買者，以其賤同公物也”。妾的身份卻只不過是買來的物品。因此娶妻講究的是門當戶對，三媒六聘，“八台大轎抬進門”，拜堂成親。而妾是買來的身分微賤的女子，一般從側門抬進去，也沒什麼熱鬧的場面。至於妻和妾生的子女，就更有區別了，禮教中最講究的是嫡庶，即“立嫡不立庶、立長不立幼”——正妻生的為嫡子，妾生的則稱庶子，除非正妻或逐或死，妾被扶正，否則做妾的很難有翻身餘地。

春秋戰國時代多妻制盛行。管子說“齊襄公陳妾數千”（《管子·小匡》）。墨子說：“當今之世，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孟子說，當時的大人“侍妾數百”。

孔丘的父親孔紇曾做過魯國陬邑的邑宰（相當於縣長），他娶了個姓施的老婆，生了九個女孩，卻沒有男孩。孔紇唯恐斷子絕孫，又娶了個小老婆，不久生了一個男孩。不過，好景不長，這個男孩得病成了癩子。孔紇急得要死，到了60多歲的時候，又和一個15歲的叫顏征的女人胡混，二人野合於尼山之上，生了個兒子，取名叫孔丘，字仲尼。

孔子也有小老婆。孔子使宰予使于楚。…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

去，退無吝心。妻不服彩，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

顧准說：“春秋時代，諸侯聘妻，女方就以娣(小姨子和夫人的女兒)陪嫁，這些女的是當然的小老婆。西方史諷刺路易十五有情婦；不過路易十五有情婦卻沒有3宮6院72妃。”

漢武帝後宮18000人；漢元帝後宮兩萬人，連看都看不過來，只好由宮廷畫師毛延壽描像給皇帝過目。王昭君不肯向毛延壽行賄，毛就把她畫得很一般，被皇帝漏過了。及至和親當日，漢元帝見王昭君美若天仙，大吃一驚，相見恨晚。之後就殺了毛延壽。石虎竟曾一次性“奪人妻女十萬余口以實後宮”，隋煬帝後宮有10多萬女人，唐明皇有5萬宮女，明朝宮廷有10萬宮女。

多妻制決不是專制皇權的特權，它是龍文化中普遍的人民意志。在中國，多妻制是全社會奉行的婚姻制度，正如太監雖然是龍的僕從，卻也是一種大眾心理一樣。白居易的《追歡偶作》中就有這樣的句子：“十載春啼變鶯舌，三嫌老醜換蛾眉。”即：“我家裡養的家妓，每過三年多，我就嫌她們老醜了，又換一批年輕的進來，十年間換了三次。”舒蕪痛斥道：“他買了一批十五六歲的女孩來當家妓，才玩三年，人家也才十八九歲，就嫌人家老了醜了，當廢品處理掉，再買進一批新鮮貨，一而再，再而三，還公然寫進詩句，公然以此自炫。說得這樣得意、這樣自誇，賤視女人到什麼程度，恬不知恥到什麼程度！”白居易在裴侍中府中夜宴，就有“九燭臺前十二妾，主人留醉任歡娛”之句。元、白二人交情很深，有時還交換妓女，相互狎玩，如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時，就曾讓元稹把杭州歌妓商玲邀往越州，狎玩了一個多月才歸還。這種狀況當然決不僅限於“元、白”。這在當時是很風雅的[當今的官人們玩女人仍是風流倜儻的象徵]。

宋代的司馬光沒有兒子，妻子和妻子的姐姐曾為他買妾。妾甚至可以用來送給妻子。有一個例子，妻子的家務活兒太多而丈夫又很窮，於是妻子的哥哥送她一個 12 歲的女孩幫她幹活；結果女孩子最終成為丈夫的妾，28 歲時生了一個兒子。父親在女兒出嫁時也會買丫頭或妾送給她做陪嫁。這作為一種減輕嫉妒的辦法頗受宋代男人歡迎。對妻子說來，把她的丫頭送給丈夫做妾有許多好處。這個丫頭出身低微而比較謙卑，也沒接受過可使她魅力大增的訓練。因此與妻子相比沒有社會地位方面的野心。另外，廣泛接受的僕人應該忠於主人的觀念使人相信她上升後會保持對舊主人的尊重。

宋代大文豪蘇軾對自己的妻子王氏一往情深，一曲《江城子》令人潸然淚下。蘇東坡一生姬妾眾多，他對這些姬妾基本上無情無意，僅僅是將她們視作私人物品而已。蘇東坡貶官時，將身邊的姬妾一律送人，其中有兩妾已身懷有孕，北宋末年的宦官梁師成以及翰林學士孫覿，都自稱是蘇東坡送人之妾所生的蘇軾之子，就連蘇東坡認可的兒子蘇過，都對這種情形不予否認，反而與梁、孫親密無間。據說梁師成顧及兄弟情誼，甚至對家中帳房說：“凡小蘇學士用錢，一萬貫以下，不必告我，照付就是。”

蘇東坡的朋友蔣某來為他送行，偶然看見了春娘，大為欽慕，便對蘇東坡說：“我有一匹白馬，願意與學士相換美妾。”蘇東坡立刻點頭應允。但這消息被春娘聽說之後，這個才貌雙全的姬妾卻不肯，指責蘇東坡道：當年晏嬰尚且知道不能因馬罪人，你這個堂堂蘇學士，美其名曰憐香惜玉，卻要將人換馬！激憤之下，春娘當場撞槐而死。——雖然是姬妾，卻也是女人，女人而竟被自己所愛的男人視做馬驢，既恨且辱，真是了無生趣。

王朝雲是唯一一個沒有被蘇東坡送人、得以陪他流放嶺南的姬妾了。儘管王

朝雲與他同甘共苦、為他生下了兒女，她仍然沒有能成為他的妻子，到她死後，蘇東坡也只在她的墓碑上寫著“姬人”二字。——因為她出身卑賤，因為以妾為妻乃是當時社會大忌。

王曾（978～1038）為了回報歐陽修（1007～1072）為他寫的文章，送給歐陽修一對金酒杯和兩個陪他喝酒的丫頭。潘良貴（1094～1150）得知一位朋友沒有兒子，送給他一個已經與自己生過孩子的婢女。據說辛棄疾（1140～1207）把自己的妾送給為他治病的大夫，然後寫了一首打油詩記敘此事。據閒談傳說，程松花 80 萬錢買下宰相韓侂胄退給人販子的一個妾，指望韓冷靜下來，還會要回這女人。後來他把她帶到韓侂胄（韓有 14 個妾）面前，果然如願以償，作為回報，程得到一個更好的職位。

大多數妾多半都通過中間人買來，高度專業化的市場在京城，特別是南宋時期的杭州。一位沒有兒子、姓馮的商人順路到開封買妾。到成都和蘇州這樣的城市遊逛，也可得到同樣的機會。經紀人在納妾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就像婚姻大事中的媒人。經紀人準備的契據要標出妾的“身價”。數額依據市價而定，同時，迷人和多才多藝的比一般的女孩子價格高。洪邁提到的數額從 140 貫到 300、400、900 和 1000 貫。甚至低級官吏也能湊夠買一個年輕女子的錢，洪邁觀察到，最低的官吏（縣衙的書手和衙前）在配發的稻米以外，都有大約 50 貫錢的月俸。有些父母自始至終打著賣女兒的主意，很早就開始教她們學會能賣高價的技藝。陳郁（逝於 1275 年）寫到蘇州的窮苦人家怎樣教女兒吹拉彈唱以便做私妓，待她們成人後就賣個好價錢。廖瑩中寫道：“京都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生女則愛護如捧璧擎珠。弗長成，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采拾娛侍。”父親賣女兒做妾完全合法，就像他可以簽約把女兒賣掉當婢女，或把她嫁出去。洪

邁的逸聞裡女人自己賣自己的事不罕見。比如，一個逃荒的女人經過官宦人家的大門時，有人問她是否願留下做妾。她說自己太餓，走不動了，並答應做妾，這位官員叫來一個牙人寫了契據。另一個故事，一位游商的寡婦，丈夫死後無以為生，敲門請求收留她做婢女或妾。無論多麼低下，侍候人，也比餓死或淪為妓女好。有一個男人，不到二十歲就有幾十個妾。還有七八十歲納妾的老翁。財力雄厚的男人似乎經常有好幾個妾。由於對婢女、妾、妓女和藝人的需要如此之多，不法之徒便不擇手段、用各種欺詐伎倆弄來姑娘以回應那種需求。洪邁記錄了一位元十七、八歲的宗室女乘轎子到附近親戚家的路上遭綁架後還挨了打，被交給生口牙人（人販子），賣給一個男人做妾。

男人一般不為妻子改名，但是差不多為所有的妾和婢女改了名，這象徵著這些女人社會地位的低下。妾的名字經常含有“奴”字，如“柔奴”，“蓮奴”，“馨奴”或“進奴”。下層階級的女孩子受到的準備做上層階級男人的妾的訓練就像在等著當妓女，而且很多男人喜歡讓妾在家裡像妓女那樣招待客人、逗客人取樂。寇准（961～1023）以喜好徹夜的華宴知名於世，宴會上還要有歌舞姬跳舞、奏樂，還必須有一位能即興作詩、吟詩的女子。妾也就容易像妓女那樣為人行事。蘇軾之所以得出這個結論，源於他發現一個剛去世的朋友最寵愛的妾在另一個男人家裡招待客人。“不覺掩面號慟，妾乃顧其徒而大笑”。蘇軾顯然不願意面對這樣的現實：妾們經常沒事人似的從一個主子轉到另一個主子手裡。洪邁說有一個妾住在主人的寡妻和已婚兒子的家裡，惟一下場就是被寡妻活活打死。官員和商人們離家在外時納妾陪侍他們，待到離開那個地方時就把妾遣散的事也不是很少見。他們還會因妻子的嫉妒趕走妾，哪怕她已經生了孩子。這些妾的孩子經常失掉與生母的所有聯繫。

宋以前民間實行一夫一妻制，之後普通民眾也可納妾。《明會典·刑部律例四》：“民年四十以無子者，方聽娶妾，違者笞四十。”很少嚴格遵守。清代庶民納妾不受限制。一個鄉巴佬多收了幾斛麥子，就想再娶房小老婆。穆斯林男子儘管依伊斯蘭教的教義只准娶四個妻子，但對於帝王和富貴之家，這一限制不起作用，他們可以幾十、上百地娶妻納妾。古代印度三個種姓的男子都可以娶一個以上的妻子（婆羅門可娶四個，刹帝利可娶三個，吠舍可娶兩個），只有最卑賤的首陀羅才實行一夫一妻制。這些悲慘不幸的東方婦女，作為男人的玩物或生兒育女的工具，她們的尊嚴、自由與幸福都犧牲於變相幽禁她們的東方後宮或深宅大院中。

德國著名性學家赫希菲爾德博士于 1931 年來中國調查國人性生活狀況時寫到：“任何人在中國看到一個由 30—50 人組成的大家庭一齊用餐的情景都會大吃一驚……由大家庭使我不禁對中國婚姻習俗產生了濃厚興趣。據推測，在當今的中國，約 30% 的中國男人只有一位妻子；大約 50% 的中國男子（其中許多人是苦力）有兩個老婆；約 10% 的男子娶有 3—6 個女人；另有 5% 的人據說有 6 個以上的老婆，有些人竟有 30 多個妻子。據說張宗昌元帥一人就有 80 個妻子……我在香港親眼看到一個乞丐，除了靠討飯支助他的妻，還養活著兩個妾。”

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娶寡婦為妻，沒有生一個子女，別人怎麼不納妾？中國是小老婆成群。康有為是 20 世紀初期的例子，毛澤東是 20 世紀中期的例子，陳希同是 20 世紀晚期的例子。不信耶穌，中國的二奶群體會越來越大。在信耶穌後，神要把信徒的“個人第一、他人第二、神第三”的道德觀念完全顛倒過來，變成“神第一、他人第二、個人第三”，從而脫胎換骨成為一個新人。所以，在美國沒有一個總統有小老婆的。

中國真正的一夫一妻制，是在傳教士到中國之後才逐漸開始的。一些知識婦

女今天聲稱熱愛中國文化，她們根本不知道她所熱愛的中國文化原是婦女的祭壇。中國男人視女人為玩物的根本原因是中國人不信上帝，沒有人人皆是上帝的兒女的思想，也就沒有男女平等觀念。

2·女又為奴

在中國，女又為奴，“奴”的貶義並不下於“匪賊”和“強盜”，因為後者似乎還有一點骨氣。一稱“奴”，人格全無，尊嚴蕩然，但中國千百年來居然習慣了。中國女人為什麼要自稱為“奴”呢？原來中國人“心甘情願”喜歡做奴隸，我現在為奴，但“30年的媳婦熬成婆”，30年後我就是主婆(升級)了。難怪中國人生了小孩子後，聽到的恭喜卻是：“你又升了一級”！一個等級奴隸制意識根深蒂固的民族，是無法真正理解自由平等的，因為他心中根本就沒有這些概念。儒家的等級文化怎能轉化為民主文化？

西元前 2515 年，顓頊開始在中原執政，他下令女人在路上遇到男人必須恭恭敬敬站在路旁，讓男人先走，否則就流竄蠻荒之地。自此，中國的婦女地位開始低人一等。周禮規定女人不能與男人同桌吃飯。當時的法律規定：如果女人打男人一嘴巴，那就鞭這女人 300；如果男人打女人一嘴巴，沒事；法律還規定女人不能擁有私有財產（除少量個人裝飾品外），不能成為一家之主。孔子提出：“女子小人難養也”。他把女子小人相提並論；小人即當時的奴隸用勞動養活了世界，可孔子居然說這些小人真難養活和對付。還有比這更無恥的言論嗎？自從有了孔子給女性的定位，婦女的地位在傳統社會中就沒有高過“小人”。

服從是女人的天職。儒家經典《禮記·郊特牲》篇說：“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禮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孔子家語·本命論》）。孟子認為女人應“未嫁從父，

在家從夫，夫死從子”，如果一個女人在孩子只是個嬰兒的情況下死了丈夫，“婦將有事，大小必請于舅姑”。

在儒家眼裡，從宇宙到社會都是等級性的。天在上，地在下，所以天尊地卑。皇上是天，是天子，百姓是地，仰望上天。男人和女人也是有尊卑等級的。董仲舒說：“凡物必有合。……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為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君與臣、夫與妻皆為陽與陰的關係，而“陰道無所獨行……陰兼功于陽”，故“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也就是說，陰是為陽服務的，須順從于陽。故董仲舒在《白虎通·三綱六紀》曰：“君臣者，何謂也？君者，群也，群下之所歸心也；臣者，堅也，厲志自堅固也。……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以禮屈服也。”司馬光：“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陽也；妻陰也。天尊而處上。地卑而處下。日無盈虧；月有圓缺。陽唱而生物；陰和而成物。故婦人專以柔順為德，不以強辯為美也。”朱熹引用《禮記》解釋為什麼婚禮是由新郎迎娶新娘時回應了這種說法：“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意一也。”

秦始皇巡視會稽刻石雲：“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佚；男女潔誠。夫為寄，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見《史記·始皇本紀》三十七年事）。對於女子貞潔，荷馬並非看得極重。像美少女海倫，雖對特洛伊戰爭負有責任，但在戰爭中受苦最少，最後也得到了其夫的原諒，與他過著幸福的生活。荷馬對於婦女也有寬容的一面、也有尊重的一面，這也是當時希臘人對於婦女認識的反映。

我國土生土長的道教，如其中的“太平道”也曾主張社會的“極大公平”，

但這個公平是不包括婦女在內的。《太平經》說：“天法陽教一，陰教二；故陽者奇，陰者偶……陽者尊，陰者卑。故二陰當共事一陽，……二女當共事一男也”。其中“男尊女卑”的思想一目了然，而且還為“一夫多妻”提供了理論根據。

佛教將婦女貶到了社會最低層，它視女性為“污垢、罪惡”的結晶。《阿含經》說婦女有“九惡”：(女子)污穢不淨；口惡；反復無常；好嫉妒；慳吝；喜遊樂；多嗔恚；多妄語；舉動輕佻。《大菩薩藏經》中還說：“婦女是眾苦之本，是障害之本，是殺害之本，是系縛之本，是憂愁之本，是怨寇之本，是生育之本。應當知道，婦女是消滅聖慧之眼的”。《諸經要集》說的更狠毒：“在家的俗女多恚毒，近之則失國破家，觸之則如遇蛇，其言如蜜，內心如鳩”。總之，婦女在佛教裡比魔鬼還要壞三分，他們把一切罪過都記到了婦女的頭上。

南朝宋時的法律就規定：一般傷人者處四年徒刑，妻傷夫則為五年。明清時的法律規定：妻毆夫即杖一百，不問有無傷害。毆夫致死者，唐、宋、明、清律俱處斬。妻子謀殺丈夫，不問有無傷害，是否得逞，皆處斬；已殺者則罪大惡極，凌遲處死。反之，夫毆妻則實行減刑。明、清律規定，丈夫毆打妻子無傷則不論，打傷或更嚴重者才論罪，刑罰減常人二等，且須妻子親自告狀才理。而妻子告夫，除非丈夫犯了謀反大逆等重罪，妻子本身就已有罪，因為這屬於幹名犯義，以下犯上，要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唐律規定：妻子告夫與告發其尊長同罪，處徒刑兩年。明、清律處罰更嚴，妻妾告夫與子孫告父母、祖父母同罪，杖一百並處三年徒刑，誣告者絞刑。這無形中縱容丈夫毆打妻子。丈夫即便打死妻子，如屬過失，也不論罪。兒媳對公婆打罵不孝，便屬有罪，且罪至於死(詈者絞，毆者斬)，法律授權丈夫可殺死這樣的妻子。在中國，丈夫毆打妻子甚或致傷乃家常便飯，

人們不以為怪。而妻子毆打丈夫幾同叛逆，非常罕見；道德與法律都絕對不允許。

到了清代“男尊女卑”已達到了一種迷信的地步，甚至認為只要軍隊中有女人就註定要打敗仗。乾隆三十四(1769)年頒佈了禁令，嚴禁外國婦女來華，其後世代相傳。道光年間這種情況更變本加厲，《東華續錄》記載，道光十(1830)年，軍機大臣上書奏請“藩婦不准來省居住，夷商不准坐轎進館”。當時的兩廣總督盧坤在《防範夷人章程八條》中明確規定：“夷人偷運槍炮，及私帶藩婦梢人等至省，應責成行商一體稽查也”。

古中國的婦女對於婚姻大事無任何自主權。男女結合，完全由父母做主，既嫁之後，婦女便沒有離婚的自主權。所謂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只能聽天由命。即便丈夫已死，女子非常年輕，而且無兒無女，道德、法律上也不允許女子再嫁，而是要女子為丈夫守節一輩子，在孤寂與無奈中度完一生。《白虎通·嫁娶篇》雲：“夫有惡行，妻不得去。”因為“地無去天之義也，夫雖有惡不得去也”。作為婦女道德規範的《女誡》這樣教訓婦女：“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在作者班昭看來，妻子事夫猶如孝子事父、忠臣事君一樣，只能委曲求全，一意順從，從一而終。漢代的儒家寫《忠經》，把臣“忠”移用于女人，宣揚“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女人若嫁了兩個丈夫，不但難以做女人，而且難以做女鬼；據說死後要被判官一劈兩半，分給兩個丈夫。

隋開皇十六年詔令：官員九品以上夫亡妻不許改嫁，五品以上夫亡妾不許改嫁。柳宗元在《河間傳》中說：“聞婦之道。以貞、順、靜、專為禮。”孟郊《列女操》：“貞婦貴徇夫，舍生亦如此。波瀾誓不起，妾心古井水。”《去婦》：“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天。”《靜女吟》：“豔女皆妒色，靜女獨檢蹤。任禮恥任

妝，嫁德不嫁容。”邵謁《金谷園懷古》：“竹死不變節，花落有餘香。美人抱義死，千載名猶彰。”《貞女墓》：“生持節操心，死作堅貞鬼。至今墳上春，草木無花卉”。唐朝女人甚至寫詩表明自己的守節志向，周仲美《書壁》：“婦人義從夫，一節誓生死。”程長文《獄中書情上使君》：“妾家本住鄱陽曲，一片貞心比孤竹”。大量的唐朝文獻及詩歌表明，唐朝具有極其濃烈的壓迫婦女的氛圍。

唐朝宋若莘、宋若昭姐妹寫的《女論語》開宗明義第一章立身就說：“凡為女子，先學立身。立身之法，惟務清、貞，清則身潔，貞則身榮，行莫回頭，語莫掀唇……”《女論語》的第十二章就是守節：“第一貞節，神鬼皆欽。有女在室，莫出閒庭。有客在戶，莫露聲音。不談私語，不聽淫音。黃昏來往，秉燭掌燈。暗中出入，非女之經。一行有失，百行無成。夫妻結髮，義重千金。若有不幸，中路先傾。三年重服，守志堅心。保持家業，整頓墳塋。殷勤訓子，存歿光榮”。在這部《女論語》中你可以找到“男尊女卑”、“三從四德”、“夫為妻綱”、“男女授受不親”、“笑不漏恥”、“大門不出，二門不邁”、“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新、舊唐書列女傳都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房玄齡病重將死，對妻子盧氏說：“我死之後，你還年輕，不必為我守寡，好好地對待你將來的丈夫。”房夫人盧氏為表示自己守節，大哭後竟剜了一隻眼睛出來，立誓不嫁。《太平廣記》記有，唐朝衛敬瑜的妻子年紀十六歲時丈夫就死了。她割掉耳朵立誓，決不改嫁。唐朝文昌左丞盧獻的二女兒丈夫早早去世，立誓不再改嫁她竟剪去了滿頭秀髮。

“為人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白樂天的哀歎，是為中國婦女的痛苦而發。關盼盼難忘亡夫張建封恩情，移居舊宅燕子樓，矢志守節，過著與世隔

絕的生活。白居易聽聞了關盼盼 10 年守節的故事，認為她既已堅持這麼久，何不索性以死殉夫，留下貞節烈婦的美名呢。於是提筆作詩雲：“黃金不惜買娥眉，揀得如花四五枚，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托人轉交關盼盼，盼盼閱後為其亡夫張建封絕食十天而死。唐朝的男人連妓女都要守節的地步，守節十年還不夠還要以死殉夫才能留下貞節美名。唐朝禮教真是害人不淺，唐朝上層貴族可以亂倫，卻讓廣大的普通婦女守節……

明、清律規定：七品以上官員之妻夫亡再嫁者，杖一百，並追奪誥封。若妻妾背夫在逃者杖一百，聽憑丈夫願將妻妾賣出去或嫁出去自便。如妻妾背夫出逃又改嫁者，處絞刑。可是，丈夫卻可以隨便以任何一個理由提出休妻。中國女人稍有不對就可被休，有所謂“七出”：無子、淫逸、不事舅姑、口、盜竊、妒忌、惡疾。“無子”放在首位，一個女人不會生孩子，那她就喪失了存在的價值。僅僅是多言、妒忌這樣微不足道的缺失，就足以構成婦女被離棄的理由，而丈夫嫖娼納妾，虐待妻子，都不能成為婦女要求離異的理由。而且，休妻的手續也特別簡單，只要丈夫一低“休書”，妻子就會淪為“棄婦”，受到社會的歧視。

幾千年來，中國民間一直流傳著“好馬不配二鞍，好女不嫁二男”、“一女不吃二家飯”的諺語。而相比之下，丈夫可在妻子死後名正言順地續弦，就是妻子在世時，仍可三妻四妾。如此的不公道、如此的不平等，在華夏文明史上竟成了天經地義。

孔子說：“男女授受不親”，導致了寡婦因手臂被男人碰而自砍手臂。五代王凝妻李氏，只因為被亡夫之外的男子拉了一下手臂，便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一手並汙吾身。”於是以斧自斷其臂，為歐陽修大加贊許。

“存天理滅人欲”就是宋朝理學家二程、朱熹之流提出來的。所謂的“天理”就是儒教的祖先崇拜，這使得男人們可以理直氣壯地不受限制的納妾，以多生孩子，以廣子嗣，以繼香火。理學所謂的“滅人欲”其實是專門針對女人們講的。單單用外在的“禮”束縛女人們的行為是不夠的，還需要用“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貞操烈女觀來禁錮她們的心，才能做到萬無一失。有人問朱熹寡婦因為無力維生，餓死怎麼辦？朱熹回答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把貞操看得比生命還重要導致了多少人間悲劇！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曾下詔令，旌表節婦，同時規定了“凡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

據《古今圖書集成》記載，“烈女”、“節婦”唐代只有51人，宋代增至267人，明代竟達36000人，而到了清代，僅安徽省休寧縣這一個縣，就有2200多人。當時全國人口不多，加以還有不少女子未被記載，這個數字是很驚人的。

明代蘇州昆山有一個叫李惠的婦女，19歲時夫亡，也沒有生育。她留在夫家決心守節，有人勸她：“沒有兒子，老了靠誰？”她說：“丈夫是天，天只有一個。夫死無子，是我的命不好，你們不要用這些髒話來汙我的耳朵！”為了“明志”，她幾次想自殺，都被家人救下。洪武十年時，丈夫的哥哥犯法被捕，她也受株連入獄。有人又勸她說：“如果你改嫁，離開夫家，這事就與你無干了，你就可免罪了，否則，將死在獄中。”李惠怒氣衝衝地說：“我不會因為危難而拋棄禮義，只要能守節，就是死一萬次也在所不辭。”她的行為深受官府賞識，明太祖下詔旌表了她。

明朝的“清官”海瑞居家九娶而易妻，離開北京時，使用30名轎夫，到德州後，增加到一百多名。他出門祭祀海神，說要訪問民情，行的是擾民的事，連

百姓家的柴火都被徵用光了。海瑞年僅五歲的女兒，僅僅因為從家僮（自然是男性）手中接了一塊餅吃，便被海瑞認為亂了“男女授受不親”的大防，犯了不貞之罪，逼令其自行餓死以贖罪。海瑞嚴格遵循儒家倫理道德，殘忍地殺害了自己的女兒。他從來就不懂得什麼叫“愛”。

漢民族有女性自殺殉夫的傳統，娥皇、女英因夫死後投江。正史孝行傳對殉夫而死的未亡人，也大加表揚！皇帝們死後，往往還要妃嬪殉葬。女人不過是男人的財產罷了。

有的女子只是許聘於人，並未過門，夫死，也終身守節，或以身殉夫。如據《開封府志》記載，明代開封府杞縣有一個女子鄭京姐，10歲時許聘給王念祖，不久，王病死。當時年僅十一二歲的鄭京姐力請父母讓她歸於王家。去王家後，穿上自備的哀服，先拜天地，再拜王氏父母，再拜父母，一如婚儀。禮畢，來到念祖靈柩前哭奠、守靈。5天后，送葬的日期到了，她換上吉服，在柩旁自縊身死。《儒林外史》中《徽州府烈女殉夫》更是殘忍。

清乾隆時，山西有個姓李的人，無性功能，他的妻子陳氏不安於室，常常逃回娘家。有一天，她的父親陳維善親自把她送到婿家，然後回去，可是走到半路，女兒又跑口來了。陳維善氣得不得了，就活活地把女兒縊死，自己也上吊死了。這類事在封建社會並不少見。

清代學者方苞寫過一篇《康烈女傳》，康烈女是個商人的女兒，許配給貧家之子張京，還沒過門張京就死了，康烈女卻以張氏媳自居，上吊自殺殉夫。張家原來是個破落之家，張京的父親品行又不好，本來人們是看不起他們的，但是由於康烈女這一死，張家馬上身價百倍，在京師出了名。正因為這樣，所以都要以女子做犧牲品。

《新青年》中的一篇《一個貞烈的女孩子》，描寫強迫殉情的慘狀：一個 14 歲的望門寡被其父關在房裡強制絕食，她哭著喊餓。她父親說：“阿毛，你怎麼這樣的糊塗？我自從得了吳家那孩子的死信，就拿定主意叫你殉節。又叫你娘勸你走這條路，成就你一生名節，做個百世流芳的貞烈女子。我為什麼這樣辦呢？因為上吊服毒跳井那些辦法，都非自己動手不可，你是個十四歲的孩子。如何能夠辦到的？後來是你大舅來替我想出這個法子，叫你坐在屋裡從從容容的絕食而死。這樣殉節，要算天底下第一體面的事，祖宗的面子都添許多的光彩。這樣的做法，不是逼迫你，實在是成全你。你反要怨我，真是不懂事啊”！餓到第六天，其於心不忍，勸其父乾脆送毒藥進去，早早“成全”算了，她父親卻說：“阿毛絕粒的第二天，我已托大舅爺稟報縣官了。服毒的人死後，臉變青黑色、還七竅流血。縣官將來一定要來上香的，如何能瞞過他的眼？這豈不是有心欺騙父母官嗎？我如何擔得起！”阿毛在第七天餓死了。縣官送了一塊匾，上題四個大字——“貞烈可風”。

1918 年，中國有一個女人死了丈夫，她試用了九種不同的方法自殺，磨難了 98 天才成功死去。死後她的神主牌被供奉在祠堂上讓人膜拜。政府、民間宗法勢力都對踐行這些儒家教條的行為都加以引導和鼓勵。依照“褒揚條例”，凡婦女至少在 30 歲到 50 歲之間不再嫁人或為亡夫或未婚夫而自殺或因遇強暴不從致死或羞忿自盡者，都會受到政府褒獎。

佛教、回教、基督教都反對自殺，惟有我們這個民族鼓勵女人自殺，真是野蠻啊！野蠻來自於儒家教條[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及其信徒。

3. 凌虐婦女，從天子至庶人，彌不有之；蓋婦女居於底層之底層，被視為器物、家畜；生殺予奪，無復人氣；尤為可歎者，社會熟視無睹，甚至讚揚此類野

蠻行為。

中國雖有著“人命關天”的諺語，卻歷來是一個輕賤人命的國家。周代人殉風行，《墨子·節喪》雲：“天子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西漢年間，廣川王劉去盜掘了一座古墓，發現有 100 多具屍體，衣服完好，栩栩如生。這些屍體只有一個男性，其它都是女性，原來這是西元前 771 年西周末代帝王周幽王的墓，那些女屍都是殉葬的妃妾。西元前 621 年，秦穆公死後用 177 人殉葬，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乃作黃鳥之詩。秦穆公號稱賢主，猶遺命驅人(奴隸)殉葬。這項殘酷的“從死”制度在秦實行了三百年，到前 384 年即秦獻西元年才宣佈廢止。

晉文公登位前曾住在齊國，他的老婆為了讓他逃出齊國，殘忍地殺死了知道消息的丫環。

魯國對齊國作戰，吳起殺妻以求將，因此而得將印。吳起是儒家，他以兵機見魏文侯，是儒冠儒服。吳起率魏軍與中山國作戰，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吮其膿。權力使人墮落，為了軍權，吳起連人性都沒有，更不可能有尊嚴！一個沒有人性、沒有尊嚴的文化肯定是反人權的落後文化。

趙國貴族平原君寵姬玉嫵嘲笑了癩子門客，許多門客因此而去。平原君為了贏得奴才的忠心，不惜殺掉心愛的女人。

荊軻見燕女之手美，隨口盛讚，燕太子丹遂斷女臂以贈荊軻，此與取千里馬之肝為荊軻療疾，同為求得荊軻為其效死力，而視女人與馬無異。

秦二世雲：“先帝后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下令一萬多宮女為秦始皇活活殉葬。妃妾殉葬，一直延至明清。這種人殉，在古希臘的歷史中在整個西方歷史中都找不到的，這不正說明了東西方兩種文化的天壤之別嗎？

皇帝劉邦有詩雲：“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我若不是婦人生，天下婦人都殺盡”。劉安殺妻給劉備吃而得曹操賜金；劉備說妻子如衣服，可隨時甩掉：這和西方尊重女人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三國志卷六.裴松之注引典論》：（袁紹妻）劉氏性酷妒，紹死，僵屍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劉子袁）尚又為盡殺死者之家。曹植的妻子為了討丈夫歡心，她穿了一件漂亮的華服，在曹植面前轉著圈子，不料被曹操看到。由於曹操嚴禁家人穿綾羅綢緞，加上曹操正對曹植一肚子不滿，一聲令下，一位愛美的女性便命赴黃泉。

魏文帝曹丕即位第三年，頒佈了一項《禁婦人與政詔》，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君臣不得奏事太后，後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曹丕太過分了，剝奪婦女參政之權倒也罷了，還要將“亂之本”這頂惡帽送給她們戴。曹丕還用一杯毒酒把自己的妻子甄氏殺了。

據《世說新語》記載，晉代權貴石崇曾在一次宴會上因他的婢妾勸王敦飲酒不成一連斬殺三人，石崇、王敦竟還神色不變，意態自如。似這樣濫殺弱女子，自然不會受到任何懲罰。

十六國之一的前涼王張天錫，有寵妾閻氏和薛氏。有一天張天錫重病臥床，自覺性命不長，對二寵妾說：“你們將何以報我？我死後，二人豈可再為他人妻！”二妾回答說：“你若不避諱談死，妾請求殉死，供灑掃地下，誓無他志。”到張天錫病危時，二妾都自刎而死。後來，張天錫的病卻好了。

南朝梁時有個叫杜嶷的人，納了一個年輕貌美的妾。有一天這個女子收到其父的來信，正讀信時杜嶷回家，妾羞以家事告杜嶷，把信吞了下去。杜嶷懷疑是情書，命令剖腹取信，信取出時，妾氣尚未斷。杜嶷看完後，知妾被冤枉，可妾

已經死了。

嚴武稚年稚殺父妾，由此成名。《新唐書》卷 129 嚴武傳：武字季鷹，幼豪爽。挺之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而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錐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這段文字約占嚴武傳全文 1/4，足見儒家如歐陽修者，對這類非人道之行為不僅不加譴責，且持讚賞之態度）！嚴挺之寵愛妾玄英，其嫡子嚴武非常不滿，趁玄英熟睡時用鐵錘把她的頭打碎。嚴挺之沒懲罰兒子，倒是對兒子年紀小小便有殺人的勇氣讚歎不已！後來嚴武果然成了節度使，想來嚴挺之便更是得意了。

虐殺婢女的事在包括唐代在內的封建社會實在太多了。雖然法律規定殺奴婢是犯法的，但與殺良民量刑卻不一樣，只是“杖一百”或“徒一年”，不需抵命。至於權貴豪門，法約束不了他們，更視婢女的生命如草芥。例如驍衛將軍張直方生性暴戾，對奴婢稍有過失就殺。房孺復妻崔氏一夕就杖殺侍女兩人，埋於雪中。韋皋做了高官後，將岳丈家當年對自己無禮的婢僕全部杖殺，投入蜀江。

南宋的名將楊政，殺妾更是家常便飯：“姬妾數十人，皆有樂藝，但小不稱意，必杖殺之，而剝其皮，自首至足，釘於壁上，直俟幹硬，方舉而擲諸水。”直嚇得幕僚口不能言。

朱元璋的一個妃子因為通姦，朱元璋殺了相關人（如推薦者、把關者和牽皮條者）的九族共計上萬人；耶穌卻釋放通姦的女人。明太祖朱元璋死後，用了 46 個妃妾、宮女殉葬。

永樂八年，明成祖朱棣因懷疑其寵妃權氏是被一個姓呂的宮女“點毒藥於茶進之”而被謀害，遂殺掉呂氏和宮女宦官數百。其後，朱棣又懷疑宮女與宦官私

通，處死宮女 2800 余人。1424 年，明成祖死亡的當天，30 多名宮女被帶上殿堂，殿堂內置有小木床，使宮女立在床上，梁上結有繩套，把她們的頭放在圈套中，然後撤掉小床，使她們吊死。為明宣宗生殉的 10 位宮妃中，有一人名郭愛，進宮不到一月，就被迫作了殉葬人。

明代的張獻忠為祭神，砍了無數女人的雙腳，堆成兩座金蓮峰，由於峰頂要放最小的腳，他只好把身邊的寵妾的腳砍下來放了上去。可以想像沒有了雙腳的女人命運，只有死路一條。所以，一有戰亂便自殺保節，成了傳統女性的人生追求。

後金的努爾哈赤大妃阿巴亥被逼殉葬，同時被逼殉的還有努爾哈赤的兩個姬妾。清代，風流才子冒辟疆納妾董小宛，名為風流事，實際上董小宛在冒辟疆眼裡，也不過就是任打任罵之物而已。在戰亂中冒家舉家逃難，冒辟疆攜母扶妻，卻斥罵董小宛拖他後腿，就是一個明證。董小宛侍疾之時，冒辟疆對她呼來喝去，連打帶罵，說自己是病失常性。——既然失常性，為什麼打罵的都是董小宛？從來也不曾打罵過母親和嫡妻？很簡單，他心裡早已認定，姬妾是可打可罵之物罷了。

中國《禮記》裡都是男人優先。唐代開始纏足，變為小腳的女人只能是性工具了。文人們鑒賞小腳分出了等級：神、妙、仙、珍、清、豔、凡七品；還分出了南北的不同審美：北喜垂鉤南愛翹。由此可知，中國女人成為掌上“珍品”之後，就只有被品味著吃掉了。

女孩子纏腳的痛苦，是難以忍受的。發生了完全的骨折，長時間走不了路。但是，女孩子淒慘的哭聲，幾乎在一千年裡，都沒有打動醜惡的中國男人！很少有人對纏足的惡習表示憤怒；相反，更多的是下流文人的低級肉麻的讚歎。

胡適 1961 年在《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的演講中說：“一個文明容忍像婦女纏足那樣慘無人道的習慣達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沒有一聲抗議，還有什麼文明可說？”

阿拉伯婦女的面紗，非洲女子的割禮，中國婦女的小腳，都顯示了古代社會對婦女的凌虐和奴役到了多麼嚴酷和殘忍的地步。她們作為男人的奴隸和財產的一部分，可以被男人隨意地繼承、買賣或饋贈。古代中國、印度、巴比倫、波斯、匈奴、土耳其普遍存在這種情況。

可悲可憐的古代東方婦女！她們的生命也不屬於她們自己，可以被她們的丈夫殘忍地予以剝奪或為死去的丈夫做完全不必要的犧牲。中國式的“姬妾制度”，是一種極度沒有人性、極度殘忍無情的制度。因為它將等級帶進了家庭，強行把血脈相連的一家人分成了壓迫和被壓迫的兩類。這實在是對人性莫大的嘲諷。光從制度含義來講，姬妾制度連阿拉伯國家的“四妻制”都不如，這是“仁恕”之道背後的黑色幽默。

從對待女性等弱勢群體的態度上來看，中國文化中的“禮儀”與西方文化的禮儀相比，那是猴子的禮儀與人的禮儀的區別。中國的禮儀只是猴子的禮儀：有吃的東西要先給大王吃，有母猴子先給大王泡，小猴子要對大猴子恭恭敬敬，不然就要挨揍；大猴子要對猴王恭恭敬敬，不然就要挨揍；母猴子要對公猴子恭恭敬敬，不然也要挨揍；這就是猴子的禮儀。

4·東西男女法律地位之比較

古羅馬通過法律取消了平民與貴族的婚姻壁壘。然而，古中國奴隸、平民與貴族卻互不通婚。秦、漢後，“良賤不婚”仍受禮的約束，法律上未明確規定。自北魏文帝拓跋濬時發佈詔書，始明文禁止良賤通婚。《方言》：“燕北之郊，民

而媵嬋，謂之臧（也僕臧），女而歸奴謂之獲。”臧、獲皆賤民。《魏女·高宗文成帝紀》：“夫婚姻者，人道之始……尊卑高下宜令區別……今制：皇族師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技巧卑姓為婚，犯者加罪。”唐律規定良賤婚娶為犯罪行為。《唐律·戶婚》：“諸雜戶不得與良人為婚，違者杖一百。”《唐律疏議》明確規定：“妾乃賤流”、“妾通買賣”、“以妾及客女為妻，徒一年半。”其理由是：一則紊亂了上下不移的等級關係，二則破壞了宗法嫡庶次序。妻是嫡，而以妾為妻是以庶代嫡，違背了禮教等級。“是可忍，孰不可忍？”假如將妾升為妻，就是觸犯了刑律，一但事發，兩口子要一齊服刑一年半，服完了刑照樣得離異。這樣的法律下，做姬妾的已不是人了，丈夫或嫡妻凌虐姬妾，也就成了家常便飯。《宋刑統·戶令》：“奴詐稱良，娶良家女為婚者，所生子孫女從良，女方知男方為奴者，從奴。”《元典章》十八：“妾從奴婢為良人，而與良人為夫婦，徒二年。奴婢自娶者亦同，各還正之。”又“良家女願與奴為婚者，即為奴婢；奴收主妻者，以奸論；強收主女者，處死。”明代沿之。《明律·婚姻》：“凡家長與奴娶良人為妻者，杖八十，女家減一等，不知者不坐……若妾以奴婢為良人，而與良人為婚者，杖九十，各離異改正。”歷代賤民的範圍包括官私奴婢、僮僕、官戶、雜戶、部曲、工樂百戶、倡優、隸率、伴當、世僕、惰民、丐戶、浙江九姓漁民、廣東等地疍民等。雍正初，陸續廢除良賤之分，不再禁止通婚，但積習難於驟改，直至 1911 年後，才有所轉變。

聖經中亞當對夏娃說：“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也就是說，你是我寶中的寶，妻子是丈夫的心肝。這是人類史祖的神愛關係。《聖經》說：“我對著沒有嫁娶的寡婦說：若他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與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為妙”（歌林多前書 7：8）。

《聖經》說：“人若死了，沒有兒子就要把他的產業歸給他的女兒”（民數記 27：8），這是強調女子的繼承權！而儒家卻剝奪了女子繼承權！聖經中上帝尊重婦女的教導，比起儒家宣導的婦女從一而終、女人只能守寡、男人卻能三妻四妾的婚姻奴役，不知文明多少倍！

西方自古以來從法律上就規定了嚴格的一夫一妻制。從古希臘古羅馬到中世紀歐洲，再到近現代，莫不如此。從傳說中的羅馬建城直到西羅馬滅亡，羅馬人都是古代世界嚴格實行一夫一妻制的範例。古羅馬法學家莫德斯丁即稱，“婚姻是一夫一妻的終身結合，神事和人事的共同關係”。即便貴為羅馬皇帝或各國國王，也不例外。西方的帝王從沒有妻妾成群，嬪妃如雲。他們只能有一個配偶，同普通百姓一般。他們如對自己的皇后或王后不滿，可以離婚，再結良緣，但沒有重婚的權利。他們可以與別的女子偷情，可以與情婦幽會，但不能像東方帝王那樣可以隨意占人妻妾，奪人女兒。在中世紀和近代早期，西方的帝王們連離婚的權利也幾乎被教會剝奪。離婚還要請求羅馬教廷的批准，否則，其離婚及再婚都是非法的。

西方自進入文明階段後，從未實行過一夫多妻制。即便古日爾曼蠻族時期的國王、貴族可以不止一妻，但真正多妻的仍極少見。後來他們接受了基督教，基督教嚴格實行一夫一妻制，連國王貴族的這一特權也被取消了。無恥的東方帝王、貴富們將妻妾成群視為其享受及榮耀，而西方人一直將一夫多妻制看作東方人人性墮落的證明。一夫多妻制與一夫一妻制，顯然表明了東西方婦女權利、地位的重大差異。一夫一妻制起碼在男女結合上給人一種男女平等的含義，而東方的一夫多妻制則連這種形式上的平等也一掃而光，從男女結合的一開始，就是極大的不平等，直到終結，也絲毫看不到平等的影子。

自古以來西方婦女的法律權利和社會地位優於東方婦女。在法律與社會生活涉及婦女的方方面面，都能看出這一點來。如在婚姻自主權問題上，古雅典法律規定，男女雙方都有結婚離婚的自由。只要一方逐出另一方，或拋棄另一方，就構成離婚的事實，無須提出任何理由。在財產繼承方面，法定財產繼承的順序是：兒子、兄弟、侄子，如無上述人等，則姐妹、甥女輩可以繼承。如果死者沒有兒子，女兒雖無繼承權，但可以把這份產權轉移到其兒子身上。雅典法律還明令禁止虐待婦女孤兒，將其作為刑事犯罪予以懲罰。

古羅馬在共和時期實行有夫權婚姻，妻在家中與其女兒的地位同等。丈夫雖對妻子有家長權，但妻子也有繼承丈夫遺產的權利。妻子與子女一樣，是丈夫財產的當然繼承人。如果丈夫在遺囑中沒有明確提到妻子的繼承權或剝奪了妻子的繼承權，則遺囑無效。有夫權婚姻下實行夫妻財產共有，丈夫管理妻子在婚前婚後的全部財產，但是沒有妻子的同意，丈夫不得讓與不動產。這裡的財產首先指在義大利境內的土地，後也包括在外省的不動產。在制定《十二銅表法》前，法律只准許丈夫休妻，即如果妻子與人通姦，準備放毒或偽造鑰匙等。因為雅典的法律同樣給予丈夫與妻子離婚的權利，受雅典法律的影響，《十二銅表法》也給予妻子休棄丈夫的權利。也就是說，即便在古羅馬有夫權婚姻中，婦女的權利地位也遠優於古代印度、中國的女性。羅馬共和制末期，普遍流行無夫權婚姻。這種婚姻不以家族利益為基礎，而以男女雙方本人利益為目的。結婚無須履行法定儀式，只要男女雙方同意，即可成立。夫對妻無所謂“夫權”，妻沒有絕對服從丈夫的義務。夫妻財產各自獨立，妻子的財產無論婚前婚後所得，一律屬自己所有。夫妻雙方可以互為各種法律行為，如買賣、互易等，如同與第三者發生法律行為一樣。夫妻有互負貞操的義務，任何一方的重婚都為法律所嚴禁。夫妻雙方

都有離婚的自由，只要對婚姻不滿意，男女都可以提出離婚。羅馬帝國時期，男女離婚很普遍、很正常，即與此有關。對女子來說，如果丈夫出征，杳無音信，妻子可以自由地重行結婚。羅馬法規定的離婚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為協議離婚，一為片意離婚。前者指只要夫妻雙方同意離異即可解除婚姻關係，後者指由夫妻一方提出的離婚。羅馬帝國時期，因離婚頻繁，西元 331 年，康士坦丁頒佈法律，對離婚加以限制，規定夫離妻的理由為：妻與人通姦、以毒謀殺其夫、墮胎；非此，夫若無故離異，妻可取回嫁資；夫若再娶，妻並可取得後妻的嫁資。妻離夫的理由為：夫犯謀殺罪、以毒謀殺其妻、毀壞墳墓；除此，妻若無故離異，沒收其嫁資，處以徒刑。總之，在羅馬法中，夫妻雙方都有離婚的主動權，決不像印度、古中國法律規定的只有男方主動、女子只能被動接受的片面與不公。按照羅馬法，凡父母死亡未立遺囑者，每一子女可獲得遺產的四分之一。女子出嫁，不僅有權從家父獲得嫁資，而且家父死後，已出嫁的女子仍有權繼承家父的遺產。這意味著她實際上比其兄弟繼承的還要多。再者，羅馬的家長權意味著在父親死亡前，兒子所有的勞動所得都屬於家長的財產，出嫁的女子再來繼承其父親及兄弟的財產，顯然有失公允。為了保護其兄弟的正當財產權利，羅馬法中又規定了“財產合算制”，即出嫁的女子主張遺產佔有時，要將她從父親處得到的嫁資提交出來，同家父的遺產一併分割繼承。

早期日爾曼法律規定實行夫妻財產共有制，實際由丈夫管理和處理，但也承認已婚婦女可有自己的個人財產。主要包括：丈夫支付的身價、嫁妝、新婚之晨丈夫對妻子的財產贈與（一般是較貴重的物品，也可能是不動產）、從娘家繼承來的財產。對屬於妻子的個人財產，丈夫不得處分。在繼承制度上，六世紀後半期以後，子女對父母的不動產都有權繼承。在沒有男性子嗣的情況下，女子有權繼

承採地。而對動產，則所有的親屬都有權繼承，包括子女、父母、兄弟、姐妹。死者的嫁妝，只能由女兒繼承，其他人無繼承權。例如，《薩利克法典》規定：“如果有人死去而無嗣子者，如果他的母親還在，她應接受遺產。”“如果母親已不在，又如果他有弟兄或姊妹，他們應接受遺產。如果沒有他們，母親的姊妹應接受遺產。如果沒有母親的姊妹，父親的姊妹應接受遺產。”早期日爾曼法律規定，殺死人可以用贖罪金抵罪，根據死者不同身份支付數額不一的贖罪金。如殺死一個普通自由人付二百金幣，殺死一個貴族付六百金幣。它還有一獨一無二的規定：殺害一個婦女的贖罪金是殺害一個男子的三倍，這是日爾曼社會婦女確有較高社會地位的明證。

中世紀調整西方家庭、婚姻關係的主要是教會法。從一開始，教會法就宣導由男女雙方自由同意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只要男女當事人同意，即可構成一件合法婚姻。當然，在特定條件下，婚姻也可以由任何一方當事人廢除。不過一般來說，婚姻是神聖不可離異的，對男女雙方都一樣，男子決沒有單方面離棄妻子的權利。16世紀英王亨利八世提出離婚，即被教皇所否決。普通民眾的離婚更是難於上青天。教會法這種一般不准離婚的規定，在中世紀自然有利於保護婦女。教會法堅持在上帝面前男女雙方平等的原則，規定了婚姻義務、忠誠義務的相互性，比同時期東方國家片面要求女子對丈夫忠誠來得合理和公平。為了保護婦女的應有權利，使其在丈夫死後不至出現生活的困難，教會法規定男女結合前必須劃出一筆撫養寡婦的財產。這筆財產在婚姻存續期間不得克減，否則，任何婚姻契約均不得締結。在繼承問題上，教會法保護妻子和子女的法定繼承權，以使她們免於被遺囑剝奪繼承權利。如果死者只有妻子或只有子女，則她或他們就可以取得遺產的一半。14世紀德意志皇帝查理四世的《黃金詔書》規定，任何臣民

如圖謀弑君，或圖謀殺害公侯，本人處死，罪犯財產充公，罪犯之子不得繼承任何親屬的遺產，但得保全性命而已，而對罪犯之女，則恩出格外，可以獲得父母遺產的四分之一，使彼等能享受適當的生活。“因女性較為柔弱，不能以身試法，故量刑應較輕。”似這樣法律上特地照顧女子的內容，在古代東方是難以想像的。

更重要的是，中世紀的歐洲不僅承認女子對父母財產的繼承權，而且規定女子有權繼承父母的身份與地位，包括王位。所以我們在西方歷史上見到不少女王。除了法國剝奪了女子對王位的繼承權外，歐洲大多數國家都有合法繼承的女王。如西班牙的伊莎貝拉女王，英國的瑪麗女王、伊莉莎白女王、安妮女王等。更令東方人難以置信的是，不僅公主有王位繼承權，而且連公主的丈夫、子孫也因此享有王位繼承權，哪怕他們有一半外國血統。由於歐洲王室之間通婚頻繁，如果沒有直系男性女性繼承人，則由已嫁到外國的公主的丈夫或兒子繼承王位，這在歐洲既合法又合理。如 1603 年蘇格蘭國王詹姆士一世繼承英格蘭王位，1688 年荷蘭執政者威廉出任英王，1714 年德國漢諾威選侯喬治一世繼任英王。他們之所以以一個外國人的身份得以繼承英國王位，是因為法律承認公主對王位的合法繼承權。他們或是英國公主的丈夫，或是公主的子孫。而在東方，幾乎不見依法繼承的女王或女皇，更不用提公主的丈夫、兒子依法繼承岳父、外公或舅父的王位。

東方法律規定：女兒沒有繼承權，更不用說女婿、外甥有什麼繼承權了。中國目前的農村，仍然流行“嫁出去的女，潑出去的水”，是沒繼承權的。女人出嫁，戶口很快遷走了；要是招女婿，戶口很難遷進來，而且女婿往往是受社會歧視的物件。

690年武則天改唐國號為周。中國每次改國號都死千千萬萬的人，為何對國家的名字改來改去？因為中國繼承權的高度排他性，異姓(包括女兒)不得封王，更不能當皇帝。所以，為了名正言順，乾脆把國名也改了。武則天後來取消帝號和國號，承認改國號錯了。其實，俄羅斯也有2個女沙皇，她們是沙皇的老婆，還是德國人，人家當皇帝就不用改國號。

古代東西方法律對婦女權利保護之巨大反差，可從下面一事上看得最清楚。《漢謨拉比法典》規定：“倘自由民之妻與其他男人同寢而被捕，則應捆縛此二人而投之於河”；甚或僅僅懷疑妻子行為不端，並沒找到真憑實據，也可以投之於河。古印度、中國的法律都有大致同樣的規定，可以當場將姦夫姦婦殺死而不負法律責任。

而古雅典立法規定，如男子發現妻子、姐妹與人通姦，他僅有權當場將那個男子殺死，卻無權殺死自己的妻子和姐妹。自古以來，除非是通姦，在西方從未見丈夫可以殺傷妻子的規定或風俗，也沒有妻子為丈夫殉葬的野蠻情狀。用婦女殉葬，這是東方如中國的傳統，與西方文明是沒有任何關係的。不知道那些常愛誇耀東方文明的先生們是否也拿此誇耀。

東方婦女沒有受教育的權利，“女子無才便是德”！有才便是無德了。但這個說法用在男人身上卻截然相反了。男人要越有才便越有德。這是什麼邏輯呢？說穿了，只是用來轄制婦女，壓迫婦女罷了。女子有了才，不服男人管了，那可怎麼辦？西元前6世紀，畢達哥拉斯就主張婦女受文化教育，柏拉圖更是極力主張婦女受文化教育。古斯巴達的婦女從小就有文化教育……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中國的女孩子都熱衷於傍大款，當二奶，而且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而西方女性追求人格獨立，中國人是不能容忍人格獨立這種事的。

當然，不管古代史上東西方婦女的權利地位有多大的差異，總體上看，不分東方或西方，婦女的權利地位不及男子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即使在歐洲，男女之間畢竟存在著相對的不平等，男子於女性而言，具有一定的優勢，但婦女從來都不是任由男子支配的家庭奴隸。確如孟德斯鳩所說：在西方，“丈夫之于妻子，只有微小的權力；父之于子女，主人之于奴婢，也都一樣。他們一切糾紛，都可以訴諸法庭”。而法庭的判決往往對丈夫不利。而在東方，與政治上的專制主義相伴而行的，是男子對婦女的全面奴役。“在亞洲，無論什麼時代，我們都看到家庭的奴役和專制的統治總是相輔而行的。”在東方專制主義最典型的中國與印度，專制統治表現得最殘酷、暴虐，男子對婦女的奴役凌虐也最殘酷。

孟德斯鳩說得好：“歐洲人認為，使心愛的女人不幸，不算厚道；亞洲人則認為，制裁女子，乃自然給予男人的特權，如若放棄，那才有點卑賤。”因此，那種尊重女子、甘為心愛的女子做一切事情，乃至獻身的騎士精神，只能產生於中世紀的歐洲，不可能產生於極度貶低奴役女子的東方國家。所以，在西方才產生女士優先的概念，才有自己的老婆單獨出去老公連忙給閉孕套的舉動。而在東方國家，男子平等對待女子，甚至照顧女子，不僅不會被視為美德，反會被看作異類，遭到大眾的嘲笑甚至口誅筆伐，更不必說要男人為女子作犧牲了。因此，騎士精神和東方是沒有緣的。自古以來，東方的法律與道德在對待女子方面何嘗有什麼厚道可言？擴而論之，古代東方的法律與道德在對待一切社會弱勢群體方面又何嘗表現出真正的厚道？如果說到近現代情況發生了一定的變化，那還不是受歐風美雨浸潤的結果？近現代東方人難道不正是從西方的法律與文明中學會了尊重婦女、善待婦女嗎？

第 48 節 中國吃人史

世界各國都有大洪水的故事。聖經裡說，亞當的後人不敬神，日益邪惡，所以，上帝以大洪水毀滅人類，下了 40 夜暴雨，洪水氾濫 150 天之久，挪亞一家 8 人依靠方舟而倖存。他們反思大洪水的結果就是敬神守道德！希臘神話說：人類不敬神，相互殘殺邪惡到吃人肉，所以，宙斯以大洪水毀滅人類。原來，宙斯來到人間查看，發現人類很墮落，特別是阿卡迪亞國王呂卡翁以人肉招待客人。宙斯氣憤填膺，把呂卡翁變成了一隻狼。隨後，宙斯與諸神商議決定以大洪水懲罰人類。他降下暴雨，下了九天九夜。普羅米修士的兒子丟卡利翁事先得到父親的警告，造了一條大船。當洪水到來時，他和妻子得以逃生，人類得以延續。而丟卡利翁得救的根本原因並不是父親的幫助，而是他和妻子的善良和敬神使宙斯網開一面，放其生路。希臘人反思大洪水的結果就是敬神守德、不許吃人。

希臘文化反對吃人。克洛諾斯的父母是天神烏拉諾斯和地神該亞，他的妻子是女神瑞亞。瑞亞生了許多子女，但每個孩子一出生就被克洛諾斯吃掉。當瑞亞生下宙斯時，她決心保護這個小生命。她用布裹住一塊石頭慌稱這是新生的嬰兒，克洛諾斯將石頭一口吞下肚裡。於是，宙斯躲過一劫。宙斯長大成人後打敗了吃子的克洛諾斯。用正義的政治治取代了吃人的政治。中國文化裡缺乏宙斯，所以中國文化被稱為殺子文化（魯迅）和吃人文化！

坦塔羅斯想知道神是否先知先覺，就把自己的兒子珀羅普斯殺了做成肉泥招待奧林匹斯諸神。結果只有得墨特爾因悲痛未看出來吃了一塊人肉，其他的神都看出來了，沒有動那碗人肉。眾神因此把坦塔羅斯打入地獄，他被浸在齊頭頸深的湖水裡，湖周圍有許多果樹，結滿了果子。當他口渴低頭喝水時，水就下降了，因此他永遠喝不到水；當他伸手去摘果子時，樹枝就揚了起來，他永遠也夠不著。更可怕的是，一塊大石頭懸掛在他的頭上，隨時都會掉下來結果他的生命。神的

這個懲罰真讓人害怕，坦塔羅斯所受的折磨讓人無法忘懷，英語的 tantalize(折磨)就是這麼來的。坦塔羅斯受懲罰後，他的王國無人管理。於是宙斯神又令其兒子珀羅普斯復活，並使其成為國王。

堤丟斯是希臘神話中的大英雄，他在同底比斯人決鬥時殺死了所有的對手，但在同墨蘭尼波斯交戰中受了致命傷，雅典娜準備賜他永生，這時有人送來了墨蘭尼波斯的首級，他砸碎首級，吃了腦漿。雅典娜見此大驚，取消了賜他永生的計畫，他最後死在異鄉。

歷史學之父希羅多德曾記載：“大流士王召集了一批人到宮廷上，問他們，什麼代價可以使他們願意去吃自己父親的遺體，希臘人說，不可能，沒有任何代價能讓他們去做出如此可怕的的勾當。同時殿前有一批印度人，這些人是以吃父輩的遺體為風俗的”。

中國人對大洪水缺乏道德上的反思，把大洪水解釋為天漏，所以有女媧補天的神話（大禹治的洪水低於聖經和希臘神話裡大洪水幾個數量級，聖經和希臘神話裡大洪水毀滅了人類，由大禹來治理大洪水是毫無意義的）。女媧補天后才開始造人，說明了大洪水滅絕了中國大地上的人，後來中國人不能從大洪水產生道德意識。這說明中國人的道德意識起源較晚。正因為遠古中國人缺乏道德底線意識，所以，中國文化墮落為吃人的文化。

中國文化一開始就是吃人文化！最近一部關於周口店北京猿人頭蓋骨的一個電視片說，為什麼只有頭顱而沒有其他的身體部分？是因為當時的人類還處在人吃人的階段，有吃人腦的習慣，被發掘出來的頭蓋骨正是被帶到山洞裡吃掉腦漿的人頭。

舉世罕見的劣質文化！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黃帝經》，對發生

在冀州中部的黃帝蚩尤大戰（距今約 6465 年）有較為詳細的記述。據其《十大經·正亂》載，黃帝對被俘的蚩尤處以極刑：先折斷他的脊骨，然後剝下皮膚製成箭靶，令人射，多中有賞；削下他的頭顱懸掛在城門上，稱之為“蚩尤旗”；割下他的胃，填滿雜物，做成球任人玩耍；把他的肉腐為肉醬，讓天下人嘗食。上帝震驚，禁止黃帝如此行徑；黃帝說：不要阻止我，否則便是“反義逆時”（詳見王大有《中華龍種文化》，中國社會出版社 2000 年，第 84~86 頁）。

玉皇大帝窩囊廢，要靠人肉來保命。千手千眼佛是玉皇大帝在人間做皇帝時的幼女。有一年，皇帝得了重病，需用女兒的一隻手、一隻眼睛做藥引子，才能救治。這幼女就砍了自己的手，挖了自己的眼，做藥治好了皇帝的病。後來，如來佛為該女子安上了千手千眼。這就是開封相國寺的千手千眼佛（《彩色神話詞典》，上海辭書出版，1991 年，第 185 頁）。

孔子讚揚晉文公的政績，可從沒有譴責過晉文公吃人肉。晉文公繼位前曾到處流亡，沒吃的，介子推就割自己的肉給他吃。這很合乎孔子的殺身成仁的精神，真是仁者吃人！以後歷朝歷代都規定寒食節來學習介子推的獻身精神，臣民都象介子推一樣的獻身，君王的統治就可以千秋萬代了。割股填君腹的介子推正是孔子“孝”道的典型。以後“割股療親”的事就時常發生。用自己的身體的某一部分做藥，獻給自己的父母，為他們治病，滋養他們的身體。《二十四孝圖》儘量讚美的就是這一類的“食人”。

陳泱潮在《不信上帝是中華民族走向衰微和覆亡的致命病毒》中說：我的外祖母身體力行儒學“百行孝為先”的教義，實踐過“割股療親”（割下腿肉作藥引以治父疾）。2005 年 1 月 30 日，四川忠縣一流浪漢被人殺死，其男性生殖器被兇犯磨成粉，兌水喝下以治病。

韓國裔的美國人鄭麒來在《中國古代的食人》一書中說，中國的“食人”記錄，在世界上是少有的。食人的多次性、殘酷性和有理論的吃人，在世界上是罕見的。中國歷史上共有 118 個年代發生過人吃人的記載。平均每 18 年就有一次大規模的人吃人。這還僅限於有官方文獻可考的官方紀錄(不包括地方誌、野史雜記)，也僅限於大饑荒時的人吃人。若至於戰亂時的人吃人，平常時的吃人肉……那就更無計其數了。從中國史書上常可以讀到諸如“人相食”、“啖肉”、“癩肉”、“肉刑”、“割股事親”、“割肝炒菜”、“弱肉強食”、“人市”、“人肉包子”、“人肉市場”、“人肉筵席”、“殺妻宴客”，甚至“乾屍”、“鹽屍”、“人彘”等駭人的字眼，可見中國不僅饑荒時人吃人，戰亂時人吃人，即使平時，也常以人肉當美食，生病時以人肉當藥補，併發展出一套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人肉料理學。

商朝的末年，紂王任用九侯、鄂侯、姬昌做三公。九侯把自己的女兒送給紂王。該女不善奉承，紂王就把她們父女殺了，剁成肉醬。鄂侯據理力爭，也被斬殺而熏成肉乾。姬昌聽到消息歎了一口氣而被逮捕，囚禁在羑裡（河南湯陰）。紂王還把姬昌的兒子姬考處決，做成肉羹給姬昌吃，周文王姬昌為了表示對紂王的忠誠，吃掉了用自己兒子做的肉羹。

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帝王沿用同樣的把戲：強迫臣民吃人肉。從秦以降，中華文化的觀念上，在人與人性方面，一直保持著原始奴隸時代的水準，幾乎沒有發展，即：人只是一種工具、一種食品，父母妻兒莫不如是。中華文化中，從根本上說沒有愛的概念。

《管子》中記載：齊桓公有一次說：“易牙做的飯太好吃了，只是還沒有吃過易牙做的蒸嬰兒肉。”第二天，易牙就把自己的 3 歲兒子蒸了端來給齊桓公吃。

齊侯一面講禮教，尊周室，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葵丘大會說了多少“誅不孝，無以妾為妻，敬老慈幼”等等道德仁義的門面話；他不但是姑姊妹不嫁的就有七人，而且是一位吃人肉的。

豎刁知道齊桓公喜好女色，就把自己閹割成太監，以便能夠經常接近齊桓公。齊桓公歎曰：“豎刁自宮以事寡人，是愛寡人勝於愛身”。豎刁因此得寵。這就是“豎刁自宮”的典故。桓公的宰相管仲卻說：“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後來齊桓公病倒了，易牙、豎刁乘機囚禁齊桓公，追殺太子姜昭。齊桓公被活活餓死，死在宮中後 67 天，還不讓人收屍，以至屍體上的蛆蟲，紛紛爬出宮門。

西元前 682 年，南宮萬、猛獲殺了宋王國的國君和華督後逃跑。南宮萬被抓回宋王國後，據《左傳》的記載，“宋人皆醢之”，即南宮萬和猛獲都被切碎做成肉醬被人分食。西元前 661 年，翟人攻衛國，殺衛懿公並吃了他的肉，而拋棄了他的肝。衛懿公是歷史上唯一的被人吃掉的國君。《左傳》記載：宋國的都城被楚軍圍困時，宋國人都“易子而食”。

趙襄子聯合韓國與魏國滅掉智伯，趙襄子更將智伯的人頭當酒杯。

戰國時，魏國的將軍樂羊率軍攻打中山國，中山國把在該國為人質的樂羊的兒子做成羹送給他。樂羊知道羹的來歷，他還是喝了下去。他的行為受到魏國人的廣泛讚揚。

戰國時期，就曾發生這麼一件事。齊國有兩位勇士，一人住城東，一人住城西，互相不服氣。某日，他們突然在沖上相遇，想比試一下，到底誰是真正的勇士。他們一同到酒店飲酒，一個人說：“喝酒不能沒有下酒菜。”於是就拔出刀來，割下自己身上的一片肉給對方吃。另一位毫不示弱，也拔出刀來割自己身上

的肉給對方吃。這樣，你割一片，我割一片，割來割去，兩個人不一會兒都送了命。

漢高祖二年（前 205 年），“人相食，死者過半。”“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資治通鑒》）。《史記·黥布列傳》記載，西元前 196 年夏，劉邦以梁王彭越陰謀造反為由，將其殺死，切碎作成肉醬，並把這肉醬分發給全國各地的諸侯食用，以示恐嚇。不但皇帝吃人肉，還要追給諸侯嘗人肉滋味。劉邦一面講禮教尊孔子，一面吃人肉。

漢武帝獨尊儒術，窮兵黷武，弄得民不聊生，百姓易子而食。漢武帝建元三年（西元前 138 年）：“河水溢于平原，大饑，人相食。”漢武帝建元六年（西元前 135 年）：“河南……父子相食。”漢武帝鼎元三年（西元前 114 年）：“關東郡國十餘，饑，人相食。”

漢元帝初元元年（前 48 年），“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漢元帝初元二年（前 47 年）六月，“關東饑，齊地人相食。”

漢成帝永始二年（前 15 年），“梁國平原郡人相食……”
漢王莽天鳳元年（14 年），“緣邊大饑，人相食。”王莽地皇三年（22 年），“關東，人相食。”漢王莽時：“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王莽被殺，懸首示眾，“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將其舌頭切了分吃。

光武帝建武元年（25 年）“民饑餓，相食”。建武二年（26 年），關中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

漢安帝永初三年（109 年）三月，“京師大饑，民相食。”十二月：“並、涼二州大饑，人相食。”

漢桓帝元嘉元年（151年），“任城梁國饑，民相食。”

漢靈帝建寧三年（170年），“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

初平二年（191年），曹操軍困鉅野西南；大饑，人相食。

獻帝興平元年（194年），出現蝗災，“六月，蝗蟲起，百姓大饑，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臭穢滿路。”興平元年初，曹操乏食，程昱向曹操搶來的三日軍糧中就夾有不少人肉乾（“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頗雜以人脯”）。

獻帝興平二年，董卓初死（195年），關中“三輔民尚數十萬戶。李榷、郭汜等放兵劫掠，加以饑饉，二年間民相食略盡”。（《資治通鑑》）

漢末臧洪為袁紹所圍，城中食盡，亦“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吳虞在《吃人與禮教》一文中說，“把人當成狗屠，把他人的生命拿來供自己的犧牲”，然而，就是“這樣蹂躪人道蔑視人格的東西，史家反稱准他為‘壯烈’，國人反親慕他為‘忠義’，真是是非顛倒，黑白混淆了…孔二先生的禮教，講到極點，就非殺人吃人不成，真是慘酷極了！”他得出結論說，禮教就是“吃人”，“吃人”就是禮教。

在食人習以為常的動亂中，孔融為人吃人製造理論根據；他說吃不認識的人，就好比吃猩猩吃鸚鵡。吃人的強盜將人當作牲口一樣，用繩子穿過手心牽著走。曹操手下有位將官王忠，在關中當亭長時就吃過人；曹丕知道王忠的老底，在和王忠同行時，竟叫隨從的小丑將荒墳中取來的死人頭骨系在王忠的馬鞍上取樂。皇帝對吃人不當一回事。其它人可想而知。

三國時，吳國大將高澄好飲酒，愛殺人並飲人的鮮血。每天夜晚，他都在住所附近擄掠過往行人，殺死後飲其血食其肉。

青龍四年（236年），遼東公孫淵反。景初二年（238年）正月，使司馬懿將四萬人討淵。六月，至遼東，圍襄平（遼陽市）。七月，大雨，雨霽，合圍，百計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八月，淵請降，不聽。城潰，斬淵父子于梁水上。

西元304年，當時還是“八王之亂”。幽州刺史王浚引進慕容鮮卑來對付成都王穎。慕容鮮卑乘機大掠中原，搶劫了無數財富，還擄掠了數萬名漢族少女。回師途中一路上大肆姦淫，同時把這些漢族少女充作軍糧，宰殺烹食。走到河北易水時，吃得只剩下八千名少女了。王浚發現後，要慕容鮮卑留下這八千名少女。慕容鮮卑一時吃不掉，又不想放掉。於是將八千名少女全部淹死于易水。易水為之斷流。

羯族簡直就可以稱之為“食人惡魔”了。史載他們行軍作戰沒有糧草，擄掠漢族女子作為軍糧，羯族稱漢族女子為“雙腳羊”。夜間姦淫，白天則宰殺烹食。羯族的後趙政權使漢族到了滅族的邊緣。太子石邃比他爹石虎還要令人髮指。太子石邃性情極為殘暴，他酗酒好色，縱欲無度，有時深夜出宮去大臣家，見凡有姿色的婦女，就強迫交歡。有時他將宮女先濃妝豔抹，然後割下頭，將頭放在盤上，傳示四座觀賞。石邃這個惡魔竟然篤信佛教，他命令他所擄掠的漢族女子做尼姑，碰到漂亮的就先交配，然後就把這個倒楣的尼姑身上的肉割下來和牛羊肉混著煮，還把這種食品賞賜給部將吃，讓他們猜測是什麼原料做的。

冉閔滅後趙政權，一次解放被擄掠的漢族女子達20萬。這些漢族女子不是被擄去作妻作妾的，而是作為“雙腳羊”一樣的家畜。隨時隨地被姦淫、隨時隨地被宰殺烹食。有5萬多少女這時雖被解放但無家可歸，被冉閔收留。後來冉閔被慕容鮮卑擊敗，鄴城被占。這5萬名少女又落入食人惡魔慕容鮮卑的手中。慕

容鮮卑姦淫污辱，又把這 5 萬名剛脫離羯族魔爪的少女充作軍糧。一個冬天就吃了個乾淨。鄴城城外這 5 萬名少女的殘骸堆成了小山。

《禮記·檀弓上》說，“父之仇，弗與共戴天。”父是兒子的“天”，因此必須報仇，不可與其敵共處於天下。往往是殺人還不足以洩憤，作為懲罰，仇敵應被完全徹底地吃掉，包括骨、肉、心、肝等等。西晉末年，馬權殺了綦毋翊因為殺了馬的兄弟，馬權吃了綦毋翊的肝。陰平太守譙登利用流寇的力量，殺了巴西太守馬晚，並且吃了他的肝。

東晉初年的趙胤殺了杜曾，並吃了杜的肺和肝。大約是在同一時間，出於同樣的原因，謝混活捉了張猛。他為了報仇，對其“割肝生食之”。因張猛是殺死謝混父兄的兇手。

東晉孫恩作亂時，擒獲縣令就把他剝成肉醬，並且把他的妻子兒女殺死吃肉。誰不肯吃這人肉就把他支解處死，連他的肉也一塊吃掉。

《晉書·劉聰載記》記載，十六國時期漢王劉聰當政時，平陽發生過一次大地震，狂風暴雨，大樹被連根拔起。當時有一個村婦生下了一個雙頭小孩，孩子大伯父以為這小孩是妖怪，竟然把他給放在鍋內煮熟，吃了。更不可思議的是，吃了小孩三天后，這人離奇地死了。雙頭兒明顯是母親懷孕時畸變所致，但當時人們卻將之與地震的發生聯繫了起來，荒唐至極。

到了南北朝進，拓跋鮮卑的拓跋燾發動 30 萬大軍進攻宋國，居然不帶一點糧草，如果掠奪的食物不能解決需要的話，就只能是“掠人而食”了。事實上他們也確實是這麼幹的。

385 年正月，秦王堅朝饗群臣，時長安饑，人相食，諸將歸，吐肉以飼妻子（《資治通鑒》）。十月，“燕、秦相持經年，幽、冀大饑，人相食，邑落蕭條，

燕之軍士多餓死，燕王（慕容）垂禁民養蠶，以桑椹為食”（《資治通鑒》）。苻登領兵征戰，把殺死的敵兵叫做“熟食”。他對軍士們說：“你們早上作戰，晚上就可以飽餐肥肉，不必擔心挨餓。”於是，部下都甘願效力，打完仗就吃人肉，吃飽後再作戰，兇猛異常。

劉宋元嘉 18（441）年酒泉守將沮渠夫周“殺妻以食戰士”。宋文帝元嘉 30 年（453），劉劭的助手張超之在守衛京城皇宮的戰鬥中失利，最後被亂兵所殺。

“張超之走至合殿禦床之所，為軍士所殺，剖腸割心，諸將鬻割其肉，生啖之，焚其頭骨”。

前廢帝永光元年（485）：“討義恭殺之並其四子，斷絕義恭肢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謂之鬼目粽。”

南梁蕭綸驕縱跋扈，受到父親蕭衍責備。他懷疑是何智通告的狀，便派爪牙在街巷中將何智通刺死。後來這些殺人兇手被抓獲，何智通的兒子何敞之把他們裝在車籠裡，四面架上火，燒的焦熟。何敞之還用車拉上錢，並備置了鹽和蒜，雇人來吃他們的肉。每吃一塊肉，賞一千錢。頃刻之間，被分光吃淨。

梁武帝太清三年（549），“九江大饑，人相食者十四五”（40%-50%），建康城被侯景圍困“數月之間，人至相食，存者百無一二”。“軍人屠馬于殿省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

元帝承聖元年（552）“暴（侯）景屍于市，市民爭取食之，骨皆盡；”侯景的屍體被切成碎塊煮成湯（羹），侯景的妻子溧陽公主也被民眾殺而食之。侯景的副將王偉被囚並解往江陵，被梁朝的民眾放在爐中烤熟食用。

隋朝初年，王頒因不滿陳國國王陳霸先殺其父，加入了正在南方攻打陳國的隋軍。陳國敗後，王頒從墳中掘出陳霸先的屍體，焚其屍骨，用水和著骨灰喝了

下去。

隋煬帝開汴渠，麻叔謀被任命為開河督護。他到達寧陵後患病，求醫診治。醫生說必須用肥嫩的羊肉蒸熟後加入藥物，一起服食。鄉村百姓前來獻羊羔約有數千人，麻叔謀給了他們優厚的報酬。寧陵縣下馬村有個叫陶榔兒的，他家的祖墳靠近河道，害怕挖河時被發掘，就偷了別人家一個三四歲的男孩，殺死後蒸熟裝入食盒獻給麻叔謀。麻叔謀吃著這肉，香美異常，十分滿意，就下令讓河道在經過陶家墳地時繞了個彎。陶榔兒兄弟繼續偷盜小兒蒸熟獻給麻叔謀來討賞。其它百姓也效法他們。當時，附近村莊接連丟失小兒達數百名。當地凡有小孩的人家，都特製一個大木櫃，夜裡就把小孩藏在櫃中，用大鎖鎖牢，而且全家人點著蠟燭值班看守。到天亮打開櫃子，若小孩還在，全家老幼都一齊慶賀。即使如此，丟失小兒的事件仍然不斷發生。

隋代楊玄感謀反，煬帝把他正法，罪及九族，並命令官員，都去割食他的肉。楊廣以不忠的罪名逮捕了解斯政，並把他製成食物。楊廣要斛斯政的同僚們吃他的肉，有的吃得比自己所得的一份還多，有的則不肯吃。吃得多的人因此而受到褒揚，並受賜大量的貴重賞物。

王文同是隋代有名的酷吏。隋軍征遼東時，楊廣命令王文同巡察河北諸郡。他到河間時，正值數百名僧人舉行佛會，便認為這是聚結惑眾，把他們都殺了。楊廣得知此事，將王文同斬於河間，以謝百姓。“仇人剖其棺，割肉而啖之，斯須鹹盡。”

隋代末年，高瓚宴請諸葛昂，把一對十來歲的雙生子煮熟，頭顱、手和腳分別裝在盤子裡，端上宴席。不久，諸葛昂宴請高瓚，讓自己的愛妾敬酒，那妾無故笑一下，諸葛昂怒叱她一頓，命令她退下。不一會，把這位妾整個放在大蒸籠

裡蒸熟，擺成盤腿打坐的姿勢，放在一隻特大的銀盤子裡，她的臉上重新塗好脂粉，身上用錦蓋著。這道“菜”抬上來後，諸葛昂親手撕她大腿上的肉給高瓚吃。諸葛昂神態自若，撕扯妾的乳房上的肥肉大吃大嚼、盡飽而止。後來遭遇兵亂，諸葛昂和高瓚一齊被盜賊抓去，盜賊割下他們的肉烤著吃。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616），江淮饑饉無食“始采樹皮葉，或搗槁為末，或煮土而食；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西元 617 年，薛舉佔據了陝西、甘肅一代。618 年，其子薛仁果俘獲了著名文人庾信之子庾立，但他拒不承認薛舉政權。庾立被炙烤而死。他的肉被切成小塊，分給薛仁果手下的士兵食用。隋朝末年，張金稱被俘，並因叛逆罪被處死。他的頭和腳均被砍下來，掛在木柱上示眾，身體的其餘部分被陳屍鬧市。所有恨他的人，都可以分享他的肉。

隋末的朱粲是一位吃人魔王。當時襄陽、鄧州一帶大災荒，白米萬錢一斛還買不到，百姓相食成風。朱粲乘亂起兵，常捕捉民間幼兒蒸吃，朱粲用二百石銅鐘煮人肉。他對軍士說：“世上最美的食物，還能超過人肉嗎？只要國中有人，我就不必擔心軍糧。”他下令捕獲婦女和兒童，蒸熟分配給士兵當飯。後來朱粲降唐，李淵派部將段確勞軍，宴席間，段確對朱粲開玩笑說：“人肉到底什麼滋味？”朱粲反唇相譏：“如果是剛喝過酒的人，他的肉就像糟藏豬肉一樣。”段確怒罵道：“你這狂賊，既已入我唐朝，不過是一個奴才罷了，還敢吃人嗎？”朱粲就下令將段確殺死，烹食其肉。

貞觀年間，代州都督劉蘭謀反被腰斬，名叫丘行恭的將官用手挖出劉蘭的肝生吃。

武則天時期，杭州臨安縣尉薛震好吃人肉，有一個向他討債的人帶一名僕人來到臨安，住在旅店裡，薛震把他們主僕二人用酒灌醉殺死，然後把屍體放入大

鍋中，加上水和水銀同煮，連骨帶肉一起化為肉醬。薛震又要煮食自己的妻子其妻驚覺逃走，報告縣令，縣令派人逮捕薛震，審得真情，把他笞杖致死。

此時，嶺南陳元光性情暴戾，他設宴待客，一男僕敬酒，陳元光勃然大怒，命令衛士立即把他拉出去殺死，又把他的肉煮爛端上宴席讓客人們嘗鮮。客人們不知是人肉，邊吃邊說好吃。當時又有施州刺史獨孤莊喜歡吃人肉，他生病時不想吃飯，只回憶起平時吃過的人肉味道不錯，這時他的部下有人死了一名婢女，就叫人割下她肋下的肉煮熟給他吃。

著名的酷吏來俊臣死後，朝廷下令把他陳屍鬧市，讓民眾分食其肉。片刻之間，民眾就把他搶食而光。民眾還對他的屍體做了異乎尋常的凌辱，以泄其忿。例如，他的兩個瞳孔被從眼球中擠出來，皮被剝掉，肚子被剖開，心臟也被掏了出來。武則天死後，其寵臣張易之、張昌宗兄弟被殺，百姓們鬻割他們的肉，煎炒而食。

開元中葉，陳藏器（713年—741年）《本草十遺》寫吃人肉可以治病。

《舊唐書》描述了吃人過程：“內給事牛仙童使幽州，受張守珪厚賂。玄宗怒，命（太監）思勳殺之（即牛仙童）。思勳縛架之數日，乃探取其心，截去手足，割肉而啖之”。

安史之亂時，皇帝李隆基向西南逃跑；士兵們在陝西馬嵬驛發生嘩變，楊玉環、楊國忠被殺；楊國忠的肉被士兵吃得乾乾淨淨。

唐肅宗至德二年（757），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張）巡出愛妾，殺以食士……將士皆泣下不肯食……（許）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女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才四百人。”一座3萬餘人口縣城吃人吃到最後，只剩下4百來人。《資治通鑑》記述睢陽張巡殺妻妾吃肉裹腹這一

事件的時候，不僅未對張巡殺人、吃人的暴行作絲毫的譴責，反而對他“忠心耿耿報君王”的行為大肆讚揚。

唐代宗廣德元年（763年），江東大疫，“死者過半”，獨孤及描述這次的災難：“辛醜歲（762年）大旱，三吳饑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為之空虛，而存者無食，亡者無棺殯悲哀之送。大抵雖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棄其骸于田野，由是道路積骨相支撐枕借者彌二千里，春秋以來不書”（《吊道殣文》）。

代宗永泰二年十二月癸卯（766），（周）智光素與陝州刺使皇甫溫不協，“志斌入奏事……叱下斬之，齧食其肉。”

唐代白居易（772~846年）的《輕肥》說：“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元和年間，節度使張茂□常吃人肉，後來到朝中任職，別人問他在節鎮時吃人肉的事是真是假，他毫不掩飾地回答說：“人肉腥且，爭堪吃？”

在許許多多苦難之中，最大的苦難，莫過於人食人；而所有發生在王朝末代的這類人間慘劇，莫過於唐末。而在唐末，所有食人者，又都比不上以黃巢為首的農民起義軍。

黃巢所過之地，百姓淨盡、赤地千里。《舊唐書》記載：880年，黃巢攻佔長安，“時京畿百姓皆寨于山谷，累年費耕耘，賊坐空城，賦輸無如，穀食騰踊，米鬥三十錢，官軍皆執山寨百姓，蟻于賊為食，人獲數十萬”。

883年，黃巢在滅亡前夕包圍陳州近一年時間裡；採用過機械化方式，數百（一說三千）巨碓，同時開工，成為供應軍糧的人肉作坊，流水作業，日夜不輟。將大批鄉民、俘虜，無論男女老幼，悉數納入巨舂，頃刻磨成肉糜，供應他圍城部隊，以保證起義軍的戰鬥力。陳州四周的老百姓被吃光了，就“縱兵四掠，自

河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徐、兗等數十州，鹹被其毒。”最保守的估計，吃掉 10 倍于張巡守睢陽城時的人口——30 萬。像黃巢以人肉為糧糶的惡行，絕非一般意義的戰場上的較量，而是人性滅絕的屠殺。正如《魔鏡》雲：這是一塊被施了魔法的玻璃/吃進人肉，不吐人皮/

黃巢拉起的隊伍，在行軍作戰中病死、餓死、戰死的總數至少在 1 百萬人以上。他帶進長安的幾十萬人，大部分是餓死的。在黃巢起兵時，中原本是一個人口稠密的地區，到了他敗死之時，這裡已是縱橫千里，全無人煙，一片焦土。後來，黃巢棄城逃跑到山東狼虎谷時，只剩下殘兵一千余人，黃巢走投無路，眾叛親離，自殺身亡（一說被他外甥林言所殺）。

《資治通鑒》中“人相食”出現頻率最高：有人統計該書，發現 10 頁之內就出現“大饑，人相食”之類的字眼；即使是多達百萬的民眾被吃，史家也若無其事的一筆帶過。

秦宗權稱帝，軍隊用人肉乾當糧食，“賊首皆剽銳慘毒，所至屠慘人物，燔燒郡邑。西至關內，東極青齊，南出江淮，北至衛滑，魚爛鳥散，荊榛蔽野。賊既乏食，啖人為儲，軍士四出，則鹽屍而從”（《舊唐書·列傳第一百五十》）。

西元 882 年，當長安的米價上漲到每鬥三十緡時，盜匪也開始抓人賣給官軍做軍糧。官軍還直接去山寨抓人充口糧，當時一人值錢數百緡，以肥瘦論價。在這種情況下，野蠻殺人變成了營利事業。

886 年，“荊、襄蝗，米鬥錢三千，人相食，淮南蝗，自西來，行而不飛，浮水緣城入揚州府署，竹樹幢節，一夕如剪……”

光啟三年（887）：“秦彥遣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楊行密，稠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采路絕，宣州軍始食人。楊行密圍廣陵且半

年，秦彥、畢師鐸大小數十戰多不利，城中無食，料值錢五十緡，草根木實皆盡，以堇泥為餅食之，餓死者大半。宣州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一聲，流血滿於坊市。彥、師鐸無如之何，鬻鬻而已。”當城裡糧盡時，“饑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自相牽，就屠賣之，屠者割剔如羊豕”。人像豬羊一樣被屠夫切了在市場上賣錢營利，其景象雖比人間地獄亦有不及。“河陽節度使李罕之所部不耕稼，專以剽掠為資，啖人為糧。”

889年，“楊行密圍宣州，城中食盡，人相啖……”（《資治通鑒》卷258）。

西元891年5月，前蜀的建立者王建命令武將唐友通生擒韋昭度的親吏駱保，並把他製成食物。前蜀的士兵抵禦入侵的大理軍隊時，他們生擒了一些敵兵，並吃了他們。

891年孫儒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以充食。

893年3月，李克用引兵攻天長鎮，殺了王鎔部上萬士兵。當時軍中無糧，李克用准許部下把敵人屍體做成肉脯當軍糧。

王延政是閩國的最後一任國君，王延政率軍駐紮在軍事基地建州時，他在福州的部下伏擊叛軍，殺了七千餘人；死屍都被肢解，骨頭扔掉，肉被晾乾成脯。這些人肉脯後來多次作為口糧發給士兵，即使口糧不缺時也是如此。

昭宗天復二年（902年），鳳翔城被朱全忠包圍，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已為人所副。狗肉每斤五百錢，人肉每斤只一百錢。

天佑三年（906年）：“時汴軍築壘圍滄州，鳥鼠不能通，仁恭（劉仁恭）畏其（朱全忠）強，不敢戰。城中食盡，九土而食，或互相掠啖”（《資治通鑒》卷265）。

姚洪是後樑的一個小校，曾在梁將董璋手下供職。後來，姚洪投唐，任指

揮使，率一千人守閬州。董璋寫信招降姚洪，姚洪把他的信扔進了廁所。董璋軍攻破閬州，抓住了姚洪。他命人在火上架起大鍋，又挑了十個大漢，將姚洪邊割邊吃。姚洪至死大罵不絕。

911年9月，劉守光準備稱帝，將佐多以為不可。守光大怒，將進諫者孫鶴“伏諸質上，令軍士副而啖之”。

922年10月，鎮州陷落，獲勝的晉軍進城後吃了部分守城官吏及其家屬，以示懲罰。

同光三年（925年），“崇韜征犒軍錢數萬于宗弼、宗弼斬之。士卒怨怒，縱火喧嘩。崇韜欲自明，乃白收宗弼族誅之，籍沒其家。蜀人爭食宗弼之肉”（《資治通鑒》）。

942年，後晉萇從簡屠戶出身，官至左金吾衛上將軍，歷任河陽、忠武、武甯等鎮節度使，尤好吃人肉。“……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新五代史·萇存簡》）。

後晉天福12（947）年，張彥澤因為任意劫掠，他被耶律德光處死。“斬彥澤及住兒于北市，……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齧其肉而食之”。

武將王彥升對入侵的西方游牧民族的報復，是用手將俘虜的耳朵揪下來，大嚼著下酒。受到迫害的人渾身是血，戰慄不敢動。前後受此酷刑的人有幾百個。自此，“西人畏之，不敢犯塞”。頑抗到底的人受罪最多。

948~949年，趙思綰喜食人肝，更喜歡用酒吞人膽，他說：“吞此千枚，則膽無敵矣！”，共吃人肝66個。“趙思綰好食人肝，常面剖而膾之，膾盡，人猶未死。又好以酒吞人膽，謂人曰：吞此千數，則膽無敵矣。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為軍糧，日計數而給之。每犒軍，輒屠數百人，如羊豕法”（《資治

通鑒》、《舊五代史》卷 109)。

後漢蔡王劉信掌管禁軍時，左右若有人犯罪，就抓來他的妻子和孩子，當著他的面零刀割他們，讓犯罪者吃自己親人的肉。被零割的人身首異處，手足分離，滿地鮮血橫流，劉信舉杯飲酒，並讓樂隊奏樂，毫無憐憫的表情。劉信雖然自己不吃人肉，但他的這番舉動和那些吃人的人相比，其暴虐程度更嚴重。

古代契丹的東丹王李贊華好飲人的鮮血，他常把婢妾的身上刺個洞，用嘴對著傷口吮吸血液，像小兒吸奶似的。

北宋大將王彥升領兵作戰，得勝後就會命令設宴，把抓到的敵兵俘虜綁在旁邊，他用手硬扯下俘虜的耳朵，放在嘴裡咀嚼，同時慢慢舉杯飲酒。俘虜滿面鮮血淋漓，疼得嗷嗷直叫，王全然不顧，與賓客談笑風生。他用這樣的辦法共吃了數百名俘虜的耳朵。

王繼勳是趙匡胤的明皇后的同母弟，他依仗權勢，嗜殺成性。他因違背上諭被解除兵權後，常怏怏不樂，便把怨氣發在無辜者身上，“專以鬻割奴婢為樂”。一天大雨沖壞了圍牆，群婢逃了出來，狀告到趙匡胤那裡。他再次被削官爵。後來他任職西京，變得更加殘暴，常買民家女子，稍不如意，“即殺食之”，然後把屍骨裝在棺材裡拋到野外。女人販子和賣棺材的“出入其門不絕”。長壽寺僧人廣惠常和他在一起食人肉。977 年將他罷官治罪。他供認共殺食婢女百余人。被斬首于洛陽，洛陽市民拍手稱快。

仁宗時期，廣源州儂智高的母親阿虎喜愛吃人肉，每頓飯都要殺死一名小兒供她食用。

北宋初年，武將楊師瑋受命處罰叛將張文表。張文表被捕後，被“鬻而食之”。

宋將高永年率軍抵禦西羌，不慎被羌人所俘，獻給了多羅巴人。多羅巴人吃了他的心、肝，因為他們相信是他使其“宗族飄落無處所”，而成為流民的。

宋將李處耘在戰鬥中捉了很多俘虜。很快，他就選了數十個肥胖的俘虜，“令左右分啖之”，既作為食物，又作為懲罰。詹良臣任縉雲縣尉時，因抵禦盜賊而被俘。盜賊要他投降，他破口大罵，激怒了盜賊。他們從詹良臣身上割下一塊塊肉，逼他當眾吃下。詹良臣一面吐一面罵，至死罵聲不絕。每個在場的人都為他的慘死而落淚。這種懲罰是逼迫受懲罰的人吃自己的肉，含有極大的羞辱性質。

宋仁宗慶曆八年（1048年），河北大饑，人相食；“河北、京東西大水為災，人相食，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續資治通鑒》卷50）。

元祐二年（1087年），蘇轍《因旱乞許群臣面對言事劄子》：“臣伏見二年以來，民氣未和，天意未順，災沴薦至，非水即旱。淮南饑饉，人至相食。河北流移，道路不絕。京東困弊，盜賊群起。……”

西元1131年，劉起起義軍攻入孫知微鎮守的舒州，並佔領了該地區。孫知微被俘後，“不屈，忠怒，齧而食之”。

岳飛的舅舅就是被他親手殺掉的，而且是親手挖出心臟。雖說是他舅舅作亂在前，但是這手段也太狠了一點。另據《三朝北盟彙編》記載“先是飛在洪州，與江南兵馬鈐轄趙秉淵飲，大醉，擊秉淵幾死”，和別人喝酒，喝醉了就打人，差點打死，可見脾氣很暴躁。岳飛對下屬很苛刻，他的一個幕僚出於好心為他向上表功，他為了顯示自己“無私”，就找藉口把別人打了五百鞭子。他手下的士兵僅僅因為買東西粗心地多找回了幾文錢，就被他小題大做斬了首，這種借別人腦袋來樹立自己權威的作法跟曹操的借糧官的人頭來穩定人心和割發代首的陰謀手段是完全一樣的。岳飛手下部將傅慶，想去投奔南宋另一支軍隊的首領劉光

世，嶽飛知道後就殺了傅慶。嶽飛多次縱兵燒殺淫掠自己的同胞來邀功。岳飛跟同為抗金力量的友軍也經常火拼，如劉涇，與嶽飛同為統制，有人向嶽飛告發，說劉涇陰謀吞併嶽飛的軍隊。岳飛先下手為強，殺了劉涇，吞併了他的軍隊。可見，嶽飛為了擴充實力是有點不擇手段的，“岳家軍”相當於是一隻私家軍隊，如果任由他的勢力坐大，很難說他不會演變成唐代的藩鎮割據，這也是他受到趙構猜忌，導致被殺的重要原因。岳飛在朱仙鎮宰殺來犯金兵 59 萬多人而為漢人歷史所讚揚。岳飛詩詞中有“壯士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此處的匈奴，是指女真人），一個心中充滿了仇恨又想吃敵人肉與血的人，是被反文明、反人道的野蠻專制的愚忠所徹底異化了！到了中世紀，人吃人已是極其罕見的偶然事件了。到了十二世紀，在世界各文明國家中，人吃人的行為都會受到法律的禁止和道德的譴責。因此，岳飛滿江紅中的“餐人肉、飲人血”的文字表達，無異于向世界發表宣言：漢民族就是野蠻民族，大宋國就是野蠻國家。更重要的是，政治家的文學藝術作品很容易被敵人利用。敵人為了對抗嶽飛的反攻，當然要搞好內部的團結，而嶽飛的“餐飲”之說，正好幫了敵人的忙，促使他們緊密團結，奮勇抵抗。本來，敵人陣營中也有厭戰甚至反戰的人，他們對於大宋軍隊收復失地的軍事行動可以發揮一定的支持和幫助作用。然而，金國的好戰者利用嶽飛的“餐飲”之說，從而迫使厭戰、反戰的金人加入到反嶽飛的行列，使嶽飛的敵人越來越多。

漢族為什麼如此仇視異族？！岳飛殺了一個漢奸，圍觀的人們把死人碎屍並食用，以發洩對賣國者的仇恨。有的人來遲了，則從屍體上割食任何部分，包括心和肝。

莊綽在《雞肋編》說：“自靖康丙午歲（1126 年），金狄亂華，六七年間，

荊榛千里，盜賊、官兵、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價，賤於犬豚，肥壯者一枚不過十五千，全軀暴以為臘。老瘦男子名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不慕羊’；小兒呼為‘和骨爛’，又通稱為‘兩腳羊’”。兒童的肉叫“和骨爛”，是最鮮美的，因兒童肉在煮爛後，可以連骨頭一起全部吃掉；年輕女子的肉則被稱為“不羨羊”，意思是比羊肉更鮮美；男人的肉被叫作“燒把火”，意為燒不爛，是人肉中最不好吃的（需要多加把火）；對人肉的通稱則是“兩腳羊”。

南宋時，因元兵打來，齊魯一帶的漢人從山東逃到杭州，半路上沒有吃的，他們就吃人肉乾：“人臘”，一直吃到杭州為止。

高宗紹興三年（1133年），江淮之間民眾相食，人肉的價錢比豬肉還便宜，一個少壯男子的屍體不過15千（1斗米要數十千錢）。

南宋甯宗嘉定年間，林千之任西欽州知州，得了一種病（末疾），有個醫士告訴他，吃童男童女的肉可以強筋健骨。於是，林千之派人在本州境內捕少年男女，製成肉乾，叫做“地雞”、“地鴨”。嘉定十年（1218），此事被當地土司告發，林千之被朝廷免官，但未判死罪，僅流放到海南。由於南宋政治腐敗，這樣的吃人的昏官竟然沒有得到懲罰。

南宋紹定六年（1233年），唐州被困，“城中糧盡，人相食，金將烏庫哩黑漢，殺其愛妾以啖士，士爭殺其妻子”。殺妻或殺妾之後，必是“括城中婦人食之”！

忽必烈在位期間，有個貪官阿合馬被人刺死。元大都百姓和士兵怒而食之，狂舞痛飲三天三夜以示慶祝。據說當時京城裡的酒因此而全部售罄。

元人陶宗儀所著的《南村輟耕錄》裡說，“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為上，……或使坐兩缸間，外逼以火。或於鐵架上生炙。或縛其手足，

先用沸湯澆潑，卻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夾袋中，入巨鍋活煮。或男子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剗其兩乳，酷毒萬狀，不可具言”。人肉曰‘想肉’，食之而使人想也。“淮右之軍”即朱元璋之軍，這個吃人上癮的軍隊，何嘗考慮過民意。

朱元璋賜給常遇春美妾，可常遇春的元配砍掉了美妾的手。朱元璋派人殺了常遇春的元配。她的肋骨被砍成小塊弄熟，由朱元璋分發給常遇春及眾大臣食用。

明太祖朱元璋的孫子朱有熹，最愛生吃人的肝、膽和腦汁。每天天黑後，他看見有人經過他所居住的王府旁邊，就命令手下人把他們引誘到府中殺死，供他食用。後來，人們都不敢從他的府邸前後經過。像朱有熹這樣的皇室貴胄，竟然如此殘暴，其下的凶官悍將的吃人行為也就不足為奇了。

明代初年，韓雍率軍平定廣西壯族、瑤族的叛亂。有一次，他和部將在轅門商議軍事時，把幾名俘虜拉過來斬首，然後剗出死者的心臟，砸開頭顱取出腦汁，趁熱吃下肚去。

明成化年間，湖廣都指揮彭倫跟隨趙輔平定大藤峽民叛亂，把抓獲的俘虜綁到高竿上，讓兵士將他們亂箭射死，然後又割裂他們的肢體，讓兵士烹煮而食。

明代有個名叫王冠的人，熱衷於房中術。他有婢妾十餘人，恣意縱欲，婢妾懷孕快要分娩時，王冠就讓她服藥打胎。胎兒產出，王冠就把胎兒放在石臼中搗成肉醬，配製成藥丸。他還購買別人家的幼兒烹熟食肉。後來事情敗露，王冠被治罪，凌遲處死。

正德三年（1508年），大旱、蝗災，民大饑，疫病流行，人相食。

正德五年（1510年）八月，劉瑾被磔死，凌遲三日，共劊3300餘刀。行刑之日，北京鼎沸，百姓相爭以一錢買劉瑾一塊肉，生吞以洩恨。

正德十四年（1519年）：“是歲，淮揚饑，人相食。”《明史·武宗紀》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遼東大饑，人相食”（《明史，五行志》）。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八月，以遼東連年饑饉，至有父食死子者，發銀糴粟賑之。”

（《中外歷史年表》）

嘉靖時，王被嚴嵩殺害，後來嚴嵩的兒子嚴世蕃獲罪被斬首，王的兒子王世貞、王世懋兄弟花錢買通行刑的劊子手，砍下嚴世蕃的一條腿帶回家去，煮熟祭奠父親，之後，王氏兄弟把那條人腿上的肉吃個淨光。

萬曆6年（1578年）李時珍完成《本草綱目》，鼓吹吃人對人的身體有好處。他蒐集藥名是為了“凡經人用者，皆不可遺”，“人部”舉凡毛髮、指甲、牙齒、屎尿、唾液、乳汁、眼淚、汗水、人骨、胞衣（紫河車）、體垢、月水、人勢（陰莖）、人膽、結石……皆可入藥。頭髮可治傷寒、肚疼，男性陰毛治蛇咬，人魄（人吊死級的魂魄）可以安神定魄。

萬曆15、16年（1587年—1588年）河北大饑，“七月，黃河以北，民食草木。富平、蒲城、同官諸縣，有以石為糧者。”、“河南饑，民相食。”

萬曆29年（1601年）“兩畿饑。阜平縣（真定西北，鄰山西）有殺食其稚子者”（《明史·五行志》）。萬曆44年（1616年）正月，“以山東大饑，致母食死兒，夫食死妻，再振之”（《中外歷史年表》）。萬曆45年山東大饑，蔡州有人肉市，慘不忍睹。

崇禎四年（1631年），皇太極攻大凌河，祖大壽死守，史載“旋有王世龍者，越城出降，言城中糧竭，商賈諸雜役多死，存者人相食，馬斃殆盡。……大壽欲突圍，不得，與約許至錦州取妻室，乃誓而後降”（《清史稿·卷234 祖大壽傳》）。

崇禎六年（1633年），“河間大饑，人相食”《明史·陳三接傳》。

崇禎七年（1634年），“太原大饑，人相食”（明史·五行志）。

崇禎九年（1636年），“山西大饑，人相食”（《明史·莊烈帝紀》）。

崇禎十年（1637年），浙江鬧饑荒，父子、夫婦、兄弟相食。

崇禎十三年（1640年），全國有123州縣發生“人相食”，98州縣蝗災。崇禎十三年“兩畿、山東、河南、山、陝旱蝗，人相食。”，“北畿、山東、河南、陝西、山西、浙江、三吳皆饑。自淮而北至畿南，樹皮食盡，發塚瘞以食。”

崇禎十四年（1641年），“浙江大旱，飛蝗蔽天，食草根幾盡，人饑且疫”。時山東荒旱，寇盜益熾，徐德（南端到北端）數千里白骨縱橫，父子相食，人跡斷絕（彭貽孫《平寇志》）。

明末，“蜀大饑，人相食。先是丙戌、丁亥，連歲乾涸，至是彌甚。赤地千里，糲米一鬥價二十金，養麥一鬥價七八金，久之亦無賣者蒿芹木葉，取食殆盡。時有裹珍珠二升，易一面不得而殆；有持數百金，買一飽不得而死。於是人皆相食，道路饑殍，剝取殆盡。無所得，父子、兄弟、夫妻，轉相賊殺”（彭遵泗《蜀碧》卷四）。

明末，河南和山東發生饑荒和蝗災，可以吃的東西都已經吃完，唯一剩下的可以吃的就只有人，於是便有了公開的人肉市場，其販賣的乃是活生生的人，稱之曰“菜人”。清代紀曉嵐（1724-1805）在《閱微草堂筆記》敘述了中國北方的饑饉和食人情形。人肉在市場上公開出售，這一地區的人們以人肉為消費品是常見的事，因而政府正式認可這種減緩食品短缺的非人道交易。書中說：“有客在德州、景州間，入逆旅午餐，見少婦裸體伏俎上”，馬上要被屠宰出售，旅客起了惻隱之心，願意付雙倍的價錢從屠夫手中贖買下她。不料在幫她解開繩索時，

旅客無意間“手觸其乳”，少婦當即義正辭嚴地說：“荷君再生，終身賦役無所悔。然為婢媼則可，為妾媵則必不可。吾惟不肯事二夫，故鬻諸此也。君何遽相輕薄耶！”仍舊伏身砧板，閉目受屠。這位“不肯事二夫”而被賣為“菜人”的少婦，其實多半就是為其丈夫所賣，卻還要為這樣的丈夫守節！舒蕪不無激憤地指出：“這個故事如果完全真實，自然可見儒家的仁義道德、儒家的禮教、儒家的女教，確確實實是在吃人，是在使被吃者心甘情願地被吃。即使故事不完全真實，說故事者意在歌頌讚美這樣甘心被吃的女子，而他[指紀昀，字曉嵐]平素還是思想通達的學者，這一點同樣可怕，或者該說更加可怕。”

明末的劉澤清是一位活吃人的典型人物。他鎮守廬州(今合肥)，平時讀書作詩，頗為風雅，實際上極其兇殘。有一天，劉澤清設宴請客，讓一隻猩猩捧著一盞裝有三升酒的金甌向客人跪著敬酒，客人嚇得渾身發抖不敢接酒。劉澤清笑著說：“你連這畜生也害怕嗎？”他又叫人拉過來一名死囚犯，在宴會廳中當場打死，取出腦漿和心肝放在另一盞金甌中，讓另一隻猩猩捧著，劉澤清吃著血淋淋的人心肝，喝著白花花的人腦漿，旁若無人，賓客莫不膽戰心驚。後來劉澤清投降清朝，清朝擔心他反復無常，尋藉口把他磔死。

清初順治年間，安邑知縣鹿盡心得了痿痺之疾(半身不遂)，有個方士對他說吃小兒的腦子可以治好病。鹿盡心相信他的話，用高價購買小兒，猛擊其頭部致死，取出腦漿燉熟服用。這樣，他吃了許多小兒，病情未好轉，又請方士扶乩求仙，方士又教他吃生腦漿。於是鹿盡心就把捕獲的小兒敲開頭骨，生吸腦汁。但是，鹿盡心的病到底沒有好，不久他就死了。

清順治九年(1652年)南明將領李定國攻新會，城中糧盡，清軍開始殺居民為食。新會被圍八個月，吃掉居民近萬人。有一回城門正要關閉，有幾百名鄉

下百姓湧到城門外請求進城避難，縣令不同意收留他們，清軍守將說：“讓他們進來吧！到緊急的時候，這批人可作為我們十天的口糧。”於是打開城門，把百姓放進來。姓莫的媳婦願代婆婆而死，清軍把莫氏烹食。有戶人家數口被吃，只有一人倖免，這位倖存者有一天在路上遇見了清軍守將，就跪下向他下拜。守將感到驚訝，問：“你拜我幹什麼？”那人說：“我的父母妻子都安葬在你的肚裡了，他們都沒有墳墓。如今寒食節臨近，我不朝著你的肚子下拜又到哪裡去拜呢？”守將滿面羞慚，急忙離去。

嘉慶六年（1801年），四川人羅思舉的部隊缺糧，開始吃俘虜，共吃3500多人。

太平天國之亂後，同治三、四年間（1864、1865），皖南到處人吃人，皖南、蘇北的人肉價目，高不過百余文，低僅數十文，遠較豬羊肉為廉；人肉開始賣到30文1斤，後來漲價到120文1斤；江蘇句容、溧陽、溧水等處賣到80文1斤。最初人肉市場中出售的只是死人肉，以後便發展為當場屠宰活人，謂之“菜人”。

同治七年（1868年）定西、通渭大旱，時逢戰亂，瘟疫並起，人相食。

1895年8月，廣東一個村子為水發生了武裝衝突；被俘的人被殺死，他們的肉、心和肝被分發給勝方食用；勝方的小孩子，也可以參加這一人肉“盛宴”。在魯迅《狂人日記》裡提到：近代的徐錫麒被抓後，他的心被炒著吃了。

據《清史稿》記載，352次災荒，發生19次食人事件。在清朝統治的260多年間，大約每15年就有食人的情況發生。

1948年6月國共內戰期間，林彪進行長春圍城，造成很多人餓死街頭，到了10月長春城內開始賣人肉，10月21日城內守軍鄭洞國投降。50萬人相互吃

得只剩下 17 萬了。

1958 年大躍進引發的大饑荒（1959-1962），造成了“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餓得啃磚頭”。1968 年廣西發生大規模屠殺與吃掉了 2 萬多人惡性事件。1976 年唐山地震中一個困埋在地下的男人，因為將剛剛死去的妻子的胳膊啃吃了一條，才維持著生命等到了救援。

春秋戰國、秦代都沒有出現大量的吃人案例，那時吃人的案例多為因為“仇恨”而吃人，且多集中在君王的範圍內。自漢代以來，則大規模的吃人案例層出不窮。所以，吃人與否和吃人普遍與否與生產力、耕地數量沒有必然的聯繫。非洲黑人部落吃人，也不是為了吃飽，而是一種宗教或者其他的圖騰信仰之類的。比如大放衛星的时代，傻子都知道老百姓已經無糧，卻依然上交糧食，直到餓死人和吃人出現。所以，這類吃人不能簡單歸功於饑荒之類，而是因為制度浪費所造成的吃人，也就是說制度吃人。

饑餓只是造成吃人的表面原因。制度和道德的雙重交互影響，才是吃人的根本原因。春秋戰國、秦代戰亂那麼多而且生產力比後來的朝代落後，也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吃人；而漢代尊儒以後，卻出現大批的吃人案例甚至軍隊吃人或者義軍以人肉為軍糧的事情了。所以說，只有整個社會和官僚階層以及民眾的道德觀因儒而改變後，才開始逐漸認同吃人和理解吃人，並把吃人當做理所當然的發洩“仇恨”“享樂”“饑餓”“忠孝”的表達手段和解決手段。把自己老婆殺了煮肉給劉備吃，被儒稱為“忠”、割股救親被稱為“孝”、把滿城的人都吃了為官僚集團守城，被儒評為“忠和義”、吃敵人的肉喝敵人的血，稱為“勇、義”……這些例子很多，但你很難找到其他文明中的相關典例，根本見不到其他文明公開表彰和肯定“吃人”的典例。所以，儒與吃人都是有必然和千絲萬縷的

聯繫，這個無法否認。

林沖必須提人頭才能入梁山吃人集團（朝廷命官黃文炳則被梁山眾好漢給生吃了！原文道：宋江便把黃文炳剝了濕衣服，綁在柳樹上，請眾頭領團團坐定，宋江便問道：“我與哥哥動手割這廝。我看他肥胖了，倒好燒吃。”於是李逵便拿起尖刀，先從黃文炳的腿上割起，揀好的就當面炭火炙來下酒。割一塊，炙一塊，無片時，割了黃文炳。當宋江等眾頭領吃完了烤人肉，口乾舌燥之際，李逵又拿刀割開黃文炳的胸膛，取出心肝，把來與眾頭領做醒酒湯。可見，水滸英雄個個都是殺人高手，吃人也甚在行。這個吃人集團被中國人所崇拜，恰恰證明了中國的野蠻落後性）。在 1920 年代井崗山又重演過，在 21 世紀的中國仍在演義這類野蠻故事。那個搶劫武漢廣場和銀行的湖南張君集團，其入夥的條件就是必須先殺個人！

中國文化提倡吃人。吃人已進入了中國的文學，被審美化了。《三國演義》第十九回講：劉備被呂布打敗而投奔曹操，在途中住在獵戶劉安家中。劉安非常崇拜劉備，劉安家中又沒吃的，他就“殺妻以食之”。這樣他以“食人”的行為實現了“忠孝兩全”的儒家理想。曹操知道後還給劉安百兩黃金。

奴隸主灌輸給奴隸這樣一種倫理：一個奴隸，只要忠誠地侍奉奴隸主，即使殘殺並吃掉另外一個奴隸，也可以不用承擔任何的罪責。假如這種殘殺和虐吃的目的是為了維持奴隸主的統治，那奴隸的行為還會受到褒揚和獎勵。作者是讚美這種的德行，而讀者看書時也沒感覺到可怕，可見我們的心靈麻木到了什麼程度！這種吃人有理的文化說明了中國人根本是一個“妖魔”的種族，無需別人來“妖魔化”。恐怕全人類找不到第二個這樣沒有人性的民族。

魯迅說：“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

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否則，此輩當得永遠的詛咒”！在這個以“仁”為道德核心的國度，幾千年來，這樣大規模、肆無忌憚地食人，這種被儒家學說所默認、所鼓勵的食人，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罕見的，都是毫無人性到了極點！

中國根本不是文明古國，更不是禮儀之邦。論思想文化，直到二十世紀還沒形成平等、博愛的觀念，仍然停留在茹毛飲血的吃人階段。帝王需要臣民成為行屍走肉、螺絲釘，儒家教導人們成為行屍走肉、螺絲釘，兩者一文一武，紅白搭配，形成了千年大一統的吃人國家。

每一種文明都必須具有道德底線，才能防止人的集體性道德犯罪與無意識地全面墮落。道德底線，是守衛人的最基本的尊嚴、良知的最低防線，是做人應該遵守的最基本的行為規範（或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良知），是是非、美與醜、善與惡、好與壞的分水嶺，也是使人不至於墮落為禽獸的最後防線。道德底線要求人們譴責並反抗傷天害理、泯滅人性的事。如果整個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中一代代的重複那些滅絕人性的事，對泯滅人性的制度、習慣熟視無睹，那麼這種文化絕對是出了重大的問題甚至是野蠻到了極至而使人喪失了覺悟能力，是一種野蠻的變態文化，是文飾野蠻的偽文明。

《聖經》中三次提到“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出埃及記》23:19、34:26、《申命記》14:21）。萬能的上帝是那樣深切地愛著這個他創造的世界。上帝不能縱容類似於“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的事情的發生，更不能縱容人類吃掉自己後代的事情的發生。那麼，我們這個墮落到地獄最底層的民族，等待最後的審判的來臨吧！

在基督教未傳入的地區，食人的習俗是很普遍的。在古城城牆外的肉鍋中常

是死屍的存放處，讓最窮的人將它拿來烹煮當作食物。他們以為吃下敵人之後，可以讓對方的力量與自己相結合，以致能戰勝他們的對手。因此，阿茲特克人 (Aztec) 為了要尋求力量而吃了數以萬計的人。不過，在福音所傳之處，食人的習俗都被廢止了，人們在信基督後便有了新的眼光，看到了生命的真正尊嚴。

一位學者在描述斐濟島上所發生的事時，他以一句話總結了在大部份地區食人習俗被連根拔除的情形：“從食人到愛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太平洋一個的小島上，一位美國大兵遇到了一個手持聖經且會說英文的當地國民。士兵指著聖經笑道：“受過‘教育’的人不再相信那本書了。”這位島上的居民也笑道：“嗯，我們這麼做對你們是有益的，”他一邊撫著肚皮一邊說：“不然，你現在就已經在這裡面了。”

第 49 節 口腔癖文化

1· 中國文化的嬰兒化特徵

有人說：中國文化是早熟文化，理由是中國人不信仰神。不信神和早熟完全無關。豬和白癡都不信神，能說豬和白癡是早熟嗎？我認為中國文化不是早熟的文化，而是處在人類嬰兒時期的文化！譬如：美國每年都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當權者及許多高級知識份子就反對講人權；這是違反我國憲法的。我國憲法在 2004 年已經寫入了國家尊重人權，而且人權前面沒有加上無產階級或者社會主義限制，這就說明了我國憲法中人權就是聯合國人權憲章中的普世人權。既然憲法都寫了人權，一談人權就要反對美國，就不許人家談；這種把人權列為禁區的做法違反了“學術無禁區”的自由精神，是與知識份子不相稱的。這好比說，一些國家指責中國的商品不合健康標準，我們就反對講衛生、講健康。這種思維病態就像我那 5 歲幼兒的思維水準，當我指責他不講衛生的時候，他就說：“你閉

嘴，不許你說我的壞話”；當我說他下棋輸了時候，他就說：“我贏了，你輸了”，並把棋盤掀掉，而且用拳頭打家長。這種“老虎屁股摸不得”的病態精神存在于我國大學的教授、博士後和留洋回國的博士身上，這就部分地說明了我國部分優秀人物的思維水準還停留在幼兒階段，豈不悲哉？

我認為：嬰兒思維特徵就是中國文化的特徵。嬰兒的特徵是口腔癖，由口腔癖導致貪婪癖，由貪婪癖導致戀嬰癖和戀母癖。看看這些癖好在我們文化上的反映！

2·口腔癖文化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臺灣一華人在婚宴上堅持要有魚翅和“熊掌”，被其美方親家堅決拒絕。該華人退而求其次，堅持中式喜宴一定要有魚翅招待，才稱得上稍微有點“派頭”。“沒魚翅，會讓客人覺得我們過於寒酸。我就是下半年喝稀粥、啃鹹菜，也絕不能背負嫁女兒太小氣的惡名。”

而老外對中國人的口腹之欲一向批判得十分尖刻，海洋博物館裡的鯊魚館特意擺放著香港魚翅罐頭，斥責濫捕鯊魚只為取其鰭做佳餚的行為實屬野蠻謀殺。經過兩天的反對，華人的妥協方案是，外國人那桌不提供魚翅，臺灣的親朋們照吃。末了還吼上一句：“喜筵不招待魚翅，讓我這張老臉往哪放！”在美方的一再抗議下，魚翅終於撤了下來。

口腔癖文化以吃為核心，而且吃的意識是貫穿到整個思維中。中國人吃蛇、吃鱉、吃河豚、吃果子狸之類暫且不說，因為那總還與人體的消化器官有關聯。但“吃黃牌”、“吃官司”、“吃敗仗”、“吃一刀”、“吃回扣”、“吃不消”、“吃不開”……最古怪的是“吃一塹，長一智”，連“塹”也講究“吃”，你說

中國人思維中還有什麼是不能吃的？

3·貪婪癖文化

中國的長輩對嬰兒非常嬌生慣養，導致了嬰兒多吃多占多浪費的貪婪癖。這種貪婪癖在文化上的表現就是貪婪癖文化。

羅素認為中國人性格中有三個重大的缺點：冷漠，對他人的苦難沒有足夠人道主義的衝動；膽子小，勇氣不入西方人，這是中國兵無用的原因之一；貪婪，中國人生活艱苦，掙錢不易，除少數在外國受過教育的人外，所有人都犯有貪污罪。

羅素說的中國人性格中的三大缺陷：冷漠、膽子小、貪婪；不正是中國兒童的通病嗎？

趙匡胤在杯酒釋兵權時對心愛的大將們說：“人生有限，轉眼老死。拼命上進，追求富貴，目的是什麼？不過升官發財自己既可享受，兒女們也不貧乏，如此而已。依我之見，各位不妨辭去軍職，改任高級文官，多多購買肥沃田地，營建豪華住宅，搜羅天下歌童舞女，晝夜飲酒取樂。”皇帝鼓吹中國人的人生觀就是貪婪享受而已，此人生觀在中國影響最大、危害也最大。中國專制政治不許人有獨立的思想見解，專引導人在物質上用功夫。弄到現在，中國一般的人只求吃好、穿好、住好，並無精神上的追求。中國社會的一切罪惡，都是不追求精神上的快樂引起，而不知精神上的快樂又是由物質主義的人生觀所致。

中國人是一個貪圖現世享受的民族，在吃和性交上，中國人的技術是第一的。雖然中國的烹調術、房中術非常發達，但能享受的並不是眾多怕死的人，而只是一小撮不怕死的人。這一夥亡命之徒成為統治者後，會把貪生怕死的民眾作為牛馬無限制地壓榨。而怕死的民眾對殘酷的專制也能默默的承受，除非沒有飯吃。

和民眾的極端貧困相對應的是專制者們的極端奢侈，他是通過極端縱欲來毀壞生活品質的：慈禧每餐上百道菜，肯定是浪費美食。

中國權貴們的窮奢極欲，造成了老百姓饑寒交迫，迫使百姓“民以食為天”、勤儉不已，這種被迫的勤儉，是奴隸的美德。奴性十足的、怯懦的中國人，願意用一百滴汗水去換取財富，而不知、也不敢用半滴鮮血來保衛自己的勞動所得，直到今天仍是這樣。

中國人為什麼看起來比西方人“自私”？嚴複在《〈法意〉按語》中明確指出中國人自私的根源正在於專制體制下“小人”沒有機會參與國家和社會之事，管理混亂在於缺少地方自治之規，而法律優待外族，“自抑其民”，傷害了民眾的愛國情感。

漢族是貪婪的民族，中國人給外國人的印象是愛錢如命。中國人的新年的賀詞就是“恭喜發財”；在日本，即使是專門從事買賣的商人也沒有“恭喜發財”的說法。這只能說明中國人太注重金錢了，怎能說注重精神？

隨著《遺產稅暫行條例(草案)》上報國務院，國內大款紛紛把財產轉讓給自己未成年的子女，更有人直接用繡襪中嬰兒的名義購置物業，以便在將來節省一大筆遺產稅金。

與中國相反的是美國。美國公民是世界上最少遺產觀念的公民，而且有一種傳精神不傳財產的傳統。遺產稅是多少？如果將一萬美元遺產給兒子，兒子必須要交 50%的稅，也就是五千美元的稅。每年美國前 50 項數額最大的個人慈善捐款中，大約有 1/5 就來自遺產捐贈。美國法律規定，捐贈的財富不在徵收遺產稅的範圍之內，比如你捐款 100 美元，就可以得到 30 美元的稅務優惠。布希 2001 年上臺後，宣佈 10 年之內廢除遺產稅。2001 年 2 月，美國 120 位最有錢的富翁

和大企業家，主動上書國會請願，要求國家繼續徵收遺產稅。

一個網蟲寫到：“我是一個可憐的中國人，活了這麼多年，在國外還是被稱為‘討厭的中國人’，在老外眼裡，中國人更象一群只會工作、吃飯的蟲子。從古到今，中國百姓與政府永遠是對立面，不信任規則和秩序，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能拿得到手的東西。孩子從小就被教育‘不要吃虧、不要信別人’。中國人看起來總象忙碌搶食的螞蟻，不團結，不文明。另外，究竟有幾個中國人在勞碌一生後能夠肯定地說他自己很幸福的？”

在歐美，人們以精幹、健壯為美，以在戰爭中負傷為榮，以胖為醜，視肥胖為懶惰、疾病、甚至貧窮的象徵。而在中國，人們卻以胖為美：“富潤物，德潤身，心寬體胖。”“腹肚下垂，福祿綿綿。”“頭大無肩，富貴長年”；“臍深容李（肚臍能容下李子），富貴自起”。“腹如抱兒，四方聞知”“腹懸向下，富貴主壽。腹墜而垂，智合天機”。

歐美人心中的美，能讓他們選舉出名副其實的公僕。中國人心目中的美，只能使他們選舉出（就是有選舉權的話）一個腦滿腸肥、大腹便便的爺或者是豬。

貪婪癖文化在理論上表現就是唯物主義，名之曰物質第一性，實質上是利益第一，因此就認識不了正義和真理。貪婪癖文化後果使中華民族成了一個缺乏理性的民族，思維能力停留在嬰兒時期，只會類比，不會歸納，不會演繹。

4· 戀嬰癖和戀母癖導致戀古癖和唯上癖文化

戀嬰癖就是對嬰兒時期的戀戀不捨，在文化上表現就是過去的就是好，古代的最好。孔子主張法先王。他一味地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西方對伊甸園的懷念也是種戀嬰癖文化的表現，但人家沒象孔子把始祖亞當封為聖人，反而說亞當犯了原罪，人類因此而墮落。猶太人的舊約聖經不斷地批評祖宗犯罪了，西方人繼

承了猶太人批判祖宗傳統，他們認為神最偉大，祖宗在神面前是渺小的。中國人沒有神，把祖宗當神來拜，對祖宗頂禮膜拜是嬰兒文化的表現！因為在嬰兒眼裡，祖宗就是神！

戀母癖就是對母親和家長的完全依賴。中國皇宮裡太后專政，就是因為兒皇帝對世事一無所知、依賴母親的結果。太后專政導致了太后的兄弟們即外戚專政，導致兩漢的滅亡，導致武則天篡唐，導致清末的慈禧專政，使中國人失去了走上西方道路的時機！

戀母癖不僅導致了兒童唯母親是從，而且導致了唯家長是從、唯上級是從。這種盲從會使大多數中國人成為無思維能力、無理性能力的人，形成了“子為父隱”的阿Q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就是復歸於嬰兒的文化。老子說：“為天下溪，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穀。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第八章 專制奴役之根源

第 50 節 龍就是魔鬼

遠志明在《神州懺悔錄》中說：到周幽王時，龍涎怪胎褒姒“一笑傾國”，從此天下大亂，血淚春秋。……從那時起，敬拜人，遠離神，父傳子，家天下，欲與天公試比高，就在神州開了先河……曾幾何時，神州竟落入了惡龍之手？曾幾何時，我們竟成了龍的傳人？

“敬拜人，遠離神，父傳子，家天下”是從黃帝就開始了。遠志明把龍分好壞，好龍依然是獸。龍崇拜從有中華民族開始就存在，而不是從夏啟或龍涎褒姒開始的。如果中國各部落從土拿平原輾轉東來，當時撒但就尾隨而至；中國離聖

城最遠，離撒旦最近，是被詛咒之地。因此，“敬虔時代”是一種虛構，而“神州”並非是真神之國，而是“錯把鬼域作神州”。

伏羲被視為中華民族第一位代表。晉王嘉《拾遺記》卷1記載：伏羲氏之母華胥氏，感履蒼帝之跡，有虹繞之而生伏羲。《詩含神霧》等典籍將伏羲說成是雷神的兒子。有研究者推出：閃電為龍之形、虹是龍之象、雷聲為龍之音、雷神就是龍神、雷神的兒子也就是龍子、龍子當然是龍。《拾遺記》稱伏羲“長頭修目，龜齒龍唇”；《春秋元命苞》稱伏羲“龍顏”；《白虎通》說伏羲“鼻龍狀”。《三皇本紀》說伏羲降生時“龍瑞”現，故“以龍紀官，號曰龍師”。“上古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河”，伏羲“以畫八卦”（《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

再看女媧。《山海經》中記載的女媧是“人面蛇身”。《楚辭·天問》：“女媧有體，孰制匠之？”王逸注：“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帝王世紀》講女媧氏“蛇身人首”，曹植《女媧畫贊》雲伏羲女媧“人首蛇形”。《太平御覽》卷78引《風俗通》載：“俗說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搏黃土作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絙於泥中，舉以為人。”女媧搏黃土作人是撒旦的謊話。屈原質問“女媧有體，孰制匠之”已將這一謊話戳穿；而所謂“力不暇供”，足以證明此蛇非神。此外，《釋史》還引用的《風俗通》說：“女媧禱神祠，祈而為女謀，因置昏姻”——按這種說法，女媧氏不但造了中國人，還是中國人的婚姻之神。然而，這位婚姻之神卻不禁止婚姻的混亂，這與《創世紀》和《出埃及記》中神定的一夫一妻制形成明顯衝突。這種衝突顯示了“古蛇”在世界各地如何阻擋神的律法。

至於炎帝，相傳由其母感龍而生，生下來卻是“人面魚身”，亦說“人身中首”。有研究者稱：古時，魚、龍是混用的，即說炎帝象龍一樣。《絳書》卷4

引《帝王世紀》說炎帝“神農氏之母任姒（女登、安登），于華陽有神龍首感于常羊，而生神農。”

黃帝以降，皆為“龍的傳人”。《竹書紀年》雲黃帝母附寶，見電光繞北斗，樞星光照野，感而孕生之。《帝王世紀》曰慶都“感三河之赤龍負圖而出，與之合，昏而生舜”。

一個幽靈在中國徘徊，其名龍，其形怪獸，其民為龍的傳人。中國人淪為怪獸後裔，且以恥為榮，令人扼腕不已。遠古之龍並無仁慈之象，醜陋而兇險；中古的龍，是皇家的徽記；皇權被打倒後，龍又成了民族的旗幟。中國人千百年來崇拜龍，視蛇為神物，而龍和蛇在基督教文化裡都是撒旦的象徵。聖經《創世紀》談到人類在魔鬼的誘惑下背叛了神，而魔鬼則取了蛇的形象：耶和華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上帝並沒有造魔鬼，上帝只造天使。撒旦本是神創造的完備的天使或基路伯，起先叫做路西弗（Lucifer），即“明亮之星”或“早晨之子”的意思。這位天使“智慧充足，全然美麗”，只因心中高傲，妄想與上帝同等，它拋開了受造物物的位置，要篡奪造物主的位置。因此被逐出天堂，墮落為魔鬼（以 14:12-15）。天使的墮落是出於自己。

耶穌說：我曾看見撒但從天上墜落，像閃電一樣（路 10:18）。聖經啟示的龍就是古蛇、古蛇就是撒但外，也談到魔鬼本是“明亮之星”，卻象“閃電”一樣從空中墜落。在《聖經》故事中，魔鬼撒旦化成一條大紅龍，尾巴掃過了 1/3 的天上星辰，它有七個頭，每個頭上都戴著王冠，貪婪地吞吃著新生的嬰兒。撒但以龍的形象出現在遠離加利利海的遠東，試圖在那裡構築抵抗神最後、最強大的防線。撒但是知道神的，“撒但也信，卻是戰兢”。撒但要在這末世更瘋狂地

抵擋神，興起龍文化無疑是末日瘋狂的巔峰。

以西結書 28 章則說：人子啊，你對推羅君王說，主耶和華如此說，……你因罪孽眾多，貿易不公，就褻瀆你那裡的聖所。故此，我使火從你中間發出，燒滅你。這裡的“推羅王”指的不是國君，而是在背後控制這個國君的魔鬼，因為撒旦是通過人來做工的——“在許多情況下，他會借助政府的掌權者來達成他的目的”。

聖經最後一卷《啟示錄》談到，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在末世，撒旦將以巨龍的形式與上帝爭戰，最後這條巨龍被上帝捆綁扔如永火中承受永罰。

魔鬼只有一個，即撒旦。這個墮落的撒旦，帶領 1/3 的天使從此背叛神、與所有良善為敵、與神作對，這些背叛神的天使就變成了鬼。魔鬼撒但是眾鬼的首領，汗鬼邪靈都是它的部下。這些汗鬼跟從了撒但背叛上帝，墮落成為魔鬼的走狗。

聖經中用了許多的綽號來描寫魔鬼：1) 那試探人的、2) 撒旦、3) 惡者、4) 鬼王、5) 說謊人的父、6) 世界的王、7) 彼列、8) 空中掌權者的領袖、9) 天空屬靈氣的惡魔、10) 那掌死權的、11) 大龍、古蛇、迷惑人的、12) 控告人的。

魔鬼的特性：有位格，有靈體，因是由天使墮落成的。有智慧，有記憶力。有意志，有情緒，有欲望。只降服主耶穌基督，甚至怕主的名，因此基督徒可奉耶穌的名將它趕逐。

魔鬼的工作。1) 摹仿神。魔鬼以假亂真，有自己的會堂，迷惑人的道理，有它的使者，以及敬拜它的人。魔鬼也能行奇事，也收獻祭。2) 散播似是而非的假道理。3) 曲解神的真道：不外乎將聖經斷章取義，或曲解聖經，或過度偏

重某一方面的道理教義。4) 阻擋神僕人的工作。5) 阻擋神僕人的禱告。6) 使人眼瞎不見真理。7) 試探迷惑人，使人受苦。8) 在神面前控告基督徒。9) 使人犯罪不聖潔，而干犯上帝。

第 51 節 魔鬼文化的特點

圖騰崇拜對中國人來說可能要數龍的崇拜了。龍是什麼呢？一個虛構的“雜種”，而且還是動物，因此“龍的傳人”這一說法完全是一種自我侮辱。對圖騰的敏感是所有原始宗教的共同特徵，它不僅崇拜受造之物，而且崇拜人造之物，這是一種地地道道的迷信。

中國人拜龍，龍性淫蕩，所以中國自古以來妓院文化就比其他國家發達。因此，聖經規定不准拜獸。聖經中的不准拜偶像，就是不准你去拜人為生產出來的偶像聖人。聖經中說：基督在曠野中你不要相信，基督在內屋你也不要相信。這裡的意思是：叫你不要去相信任何假扮聖人的傢伙，要相信自己，人間永遠沒有聖人和救世主。你只要心中依靠基督就可以了。因為神性完美，人性有缺陷，獸性導致毀滅（膽小懦弱吃軟怕硬與奴性其實也是獸性的一種，野獸中的兔子就是這一參照物）；人性其實是神性加獸性結合體，當人性向神性傾斜時，人類社會就會進步，當人性向獸性傾斜時，人類就會走向災難與自我毀滅。

撒但或龍的文化品質包括以下幾點：

1· 驕傲，以人為神，甚至以動物等偶像為神

驕傲是撒但的第一特徵，也是它墮落的原因。這種驕傲主要表現就是以自己為神，不認識罪，更不順服神。對於屬於撒但的人來說，他們就象他們的父魔鬼一樣，以人自己為神，或者通過拜假神來背叛神。

在世俗世界，這種驕傲非常明顯，它主要表現為無神論背景下的所謂人本主

義和專制主義。撒但誘惑人擁有神的地位（“象神一樣可以論斷善惡”），因此，人當然樂意跟隨撒但的意志。這正是人類始祖和後來人墮落的根源。撒但出於驕傲，而用驕傲捆綁人。所以使徒保羅說：“恐怕他們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罰裡”（提摩太前書 3:6）。

中國人在與基督教長期的接觸中也沒有接受基督教，唯獨對搞崇拜偶像不信神的佛教情有獨鍾，而拜偶像信假神在基督教中被上帝仇視的。現在中國乾脆追捧起了無神論，把基督教當作毒害人民的鴉片。這一切，都說明，中國的文化和本性，有深深的撒旦的痕跡。

2· 殺人與仇恨，力量崇拜

約翰福音 8:44 說：“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你們父的私欲，你們偏要行，他從起初是殺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裡沒有真理，他說謊是出於自己，因他本來是說謊的，也是說謊之人的父。”撒但起初就是殺人的，在撒但掌權的國度，殺人是應當的，仇恨取代愛成為原則，屍體成為勝利者的豐碑。在這裡，人們只敬畏力量，卻不順服愛，並奉行徹底的道德相對主義。在這裡，力量是上帝，上帝不是力量。“從此就顯出誰是神的兒女，誰是魔鬼的兒女。凡不行義的，就不屬神。不愛弟兄的也是如此”（約翰一書 3:10）。流人血的必被人流血，在這仇殺主宰的歷史中，兇手是一種民族身份——“你們這些蛇類，毒蛇之種阿，怎能逃脫地獄的刑罰呢”（馬太福音 23:33）？

3· 說謊，以無恥為智慧

在創世記第 3 章裡，撒旦就撒謊騙夏娃說，“你們不一定死。”撒但是“說謊之人的父”，它以說謊和詭詐為智慧。“這樣的智慧，不是從上頭來的，乃是屬地的，屬情欲的，屬鬼魔的”（雅各書 3:15）。使徒行傳 13:10 說：“你這

充滿各樣詭詐奸惡魔鬼的兒子、眾善的仇敵，你混亂主的正道還不止住嗎？”通過《孫子兵法》、《三國演義》、《資治通鑑》等，一部中國詭詐史帶著作者和讀者稱羨的表情躍然紙上。

4· 誘惑人，包括功利主義、以食為天、以性為榮

中國龍是蛇狀，形似陰莖，與魔鬼的邪淫相關聯。中國人千百年來沒有發展出一種追求天國的精神，不追求永生，只崇拜世俗的價值“福祿壽”，而世俗的福祿壽在基督教文化裡被視作是“肉欲”，是來自撒旦的誘惑。

撒旦如何誘惑人呢？馬太福音 4:1-11 談到撒旦在曠野裡試探耶穌，就是通過“肉體、自我與世界”三個方面試探神。人伏在肉體、自我和世界之下，離棄神而成為撒旦的兒女。自我就是虛榮和驕傲，世界就是權力和財富，就是徹底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至於肉體，就是叫人做食欲和性欲的奴僕，並以此互相炫耀。腓立比書 3:19 說：“他們的結局就是沉淪，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專以地上的事為念。”約翰福音 8:44 中說：“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你們父的私欲，你們偏要行”。聖經上多處記載，魔鬼敗壞人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讓人成為食物的奴隸，而福音永遠高揚“生命勝於飲食”、“人活著靠主口中的話，而不單單靠食物”這一真理。始祖起初受魔鬼誘惑犯罪，就是因為“以食為天”，吃了智慧樹上的果子。

耶穌說：“你不能同時侍奉兩個主，即侍奉上帝，又侍奉瑪門（金錢）”。

“瑪門”在人們的心中實行王權，世人一起向錢看，沒有錢的想盡一切辦法得到錢，有了錢的用盡心計得到更多的錢。基督教不反對財富，以此把人和神區別開來；但反對財富崇拜，以此把人和動物區別開來。對財富的崇拜並不導致節儉和效率，而是導致人為財死並達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5·用世俗道德論斷人，假冒偽善

撒但就是通過道德上的論斷離間人與神的關係，而它論斷人最重要的方式有兩個：一是通過“動機分析”在神面前控告人，稱人不配得救。另一種方法則是在人面前控告神，暗示神是不愛人的，教唆人與神為敵。在《約伯記》中，撒但在上帝面前控告約伯：“約伯敬畏神豈是無故呢”（約伯記 1:9）？“你且伸手，毀他一切所有的；他必當面棄掉你（約伯記 1:11）”。撒但也會裝成“光明的天使”或人道主義者，以體貼人的方式阻擋真理和救恩。所以馬太福音 16:23 中說：耶穌轉過來，對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邊去吧。你是絆我腳的。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撒但的控告在龍文化中就是通過大批判、雜文、檄文等話語方式大行其道，也通過各種互相諂媚和吹捧俘獲人；更把“什麼都不信”放到人裡面，使唯物主義和虛無主義成為民族的哲學。

6·假冒先知，篡改神的真道

中國人又喜好算卦占卜，聽信算卦占卜，而算卦和占卜在基督教文化裡被認為是撒旦的伎倆，是通邪術，唯有撒旦的子民才會做的，是被上帝仇恨和詛咒的。

異教和異端往往是撒但抵擋神的工具。約翰說，“親愛的弟兄啊，一切的靈，你們不可都信，總要試驗那些靈是出於神的，因為世上有許多假先知出來了。凡靈認耶穌基督是成了肉身的，就是出於神的，從此你們可以認出神的靈來。凡靈不認耶穌，就不是出於神，這是那敵基督者的靈。你們從前聽見他要來，現在已在世上了…”（約翰壹書）這些假先知都會講一套“鬼魔的道理”，而他們往往特別願意通過曲解聖經來幫助自己。

事實上為了讓亞當和夏娃順服，撒旦就通過引用神的話曲解、篡改了神的用意。“這不法的人來，是照撒旦的運動，行各樣的異能、神跡和一切虛假的奇事，

並且在那沉淪的人身上行各樣出於不義的詭詐；因他們不領受愛真理的心，使他們得救。故此，神就給他們一個生髮錯誤的，叫他們信從虛妄”（帖撒羅尼迦後書）。撒但在曠野裡對耶穌的試探，也是通過錯誤引用聖經進行的。毫無疑問，那些不相信基督為唯一真神卻總是引用聖經為自己服務的做法，都是屬撒但的。

7·撒但企圖在世界做王 無孔不入

彼得說：“務要謹守、儆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尋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書 5:8）。

主耶穌起先對彼得說過：“西門！西門！撒旦想要得著你們，好篩你們如同篩麥子一樣；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失去了信心”（路加福音 22:31）……

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功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這是中國心靈面對撒但絕對統治的悲歎。在這種歷史結構中，良心除了死滅沒有任何希望，生命除了死亡沒有任何指望。撒但在這國家裡不僅通過權力掌權，也通過每一個人特別是通過多數暴政在人心裡做王。

第 52 節 道教批判

1·個人崇拜

道教，以老子為神，顯然是以人充神，是謂人教。老子何許人也無從查考，竟被張道陵奉為“神”，後來又被歷朝皇帝加封了許多神靈進去，明朝的皇帝朱棣封了許多神，自己居然也被奉為“真武大帝”。道教的“神”是最多的，例如關公（關羽）、川主神（修建都江堰的李冰）等等，但都是人所塑造的偶像。道教的長生不死的追求只能說是准宗教的。道教追求肉身成仙來擺脫死亡、擺脫短暫，讓靈魂永遠寄居在自己的肉體之中。它追求的方式不是對自己內心的謹守，而是裝神弄鬼，玩煉丹術、房中術，根本就是邪教。其來世信仰也只是現世的直

線型延伸，而不是對現世生活的否定。在組織形式和宗教生活領域，它與佛教相似。

2· 唯物主義和相對主義

“道”訓為路，可理解為物體移動的軌跡或規律。道德在現代漢語中是一個詞，指的是古漢語中的德。德字裡有一個“心”字，說明它是指思想意識方面的東西。德和道常放在一起，是因為德是道產生的，就是作為物質基礎的道產生了作為意識形態的德。

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屬於道的相對主義）、“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毫無根據妄斷：“尚賢”與“民爭”，“貴難得之貨”與“民盜”沒有必然聯繫。毛澤東搞共產主義，所以的財產包括難得之貨都歸公了，饑民只得盜竊地裡未成熟的莊稼）；“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蔑視人類尊嚴）、“人之道，為而弗爭”、“夫唯不爭，故無尤”（缺乏追求正義的積極意識）、“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道的相對主義）、“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主張詭詐術）、“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屬禍福相對論）、“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陰柔的烏龜哲學）等。

3· 龜的傳人

有人說中國人是豬的傳人，我要說中國人是龜的傳人。道教是一個教人委曲求全、貪生怕死的宗教。在老子高深幽遠的警言中，對權勢的屈從和恐懼常常噴湧而出，甚至閃晃著俗不可耐的術數色彩。老子主張功成身退，理由是不如此就必有禍患。莊子為什麼要作隱士？“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刖也，子胥靡，

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於戮”（《莊子·外篇·月去篋》）。他一口氣列出四個因入世太深而遭慘禍的血淋淋的故事。並不是有什麼新的精神價值使他看透了俗世的浮幻與虛無，而是對權勢的恐懼逼出了他側身江湖的犬儒主義態度。

莊子提倡吃泥巴的烏龜逍遙遊，是“誤把生存作自由”。莊子在濮水中釣魚，有兩個楚王的使者來拜訪，說：“我們大王想把國事託付給你。”莊子持著魚竿頭也不回地說：“我聽說楚國有一神龜，已死去三千年了，楚王把他用布包起來，裝進竹箱，藏在廟堂上。這只龜，是寧可死去而留下骨殼被人尊重呢？還是寧願搖擺著尾巴在泥中打滾呢？”兩個大夫說：“當然是搖擺著尾巴在泥中打滾好。”莊子說：“你們回去吧！我將擺著尾巴在泥中打滾”（《莊子·秋水》）。莊子的烏龜逍遙遊就是一個活托托的奴隸形象——古代阿Q而已！阿倫特反復說：“過於珍愛生命阻礙了自由”，是“奴性的準確標誌”。

“騎個毛驢在中游”的生存哲學來自於莊子。一天早晨，農婦殺母雞招待莊子，因該母雞不下蛋；莊子歎曰：因不才而亡。中午時分，農夫砍了棵大樹回家，要用大樹做新房的棟樑；莊子歎曰：因有才而亡。學生疑惑，莊子指點道：人應該處在才與不才之間。也就是說：處在中游就能安全生存下去。才者，上游也，出頭椽子先亂；不才者，下游也，落後就要挨打、就要被淘汰。總之，中游最安全。有了道教的教導，中國人個個都是賊精。

4·陰道房中術

老子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否定神創論）。漢人的哲學和漢化佛教強調“無”、“虛”、“空”，其目的就是要人民不去過問社會的真相，不去過問政治的黑暗與骯髒，不要反叛與對抗統治者，就是要人民變成“愚民、順民與奴隸”。因此，數千年來漢人一直活在虛無與不真實之中，一直不敢面對

社會的不公與不義，一直不敢面對政治的黑暗與野蠻，一直不敢說出社會與政治的所有事實，一直活在膽怯、逃避與自我麻醉之中。

西方的基督文明，強調“有”、“God”、“靈魂”，因此西方人發展出“博愛、正義、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權、平安、喜樂、謙卑、幸福與和平”等實在性的價值理念，也發展出現代“科學、物理、化學、生物學、醫學、工程學、建築學、心理學、法律學、教育學、精神學、神學、社會學、農業學、天文學、航空學”等實質性的學問。

這兩種文化最大的差異，就是“無”與“有”的差別。這種由“無”與“有”本體論的基點，所發展出的不同人性與思考的意識，可從古漢人水墨畫與西方油畫來分析。

古代漢人的水墨畫，從不畫太陽，從不畫人的真實表情與內在心情，從不畫人的靈魂，從來弄不清楚繪畫裡的單一焦點概念，從來區分不出物體的遠近與大小關係，從來就是畫山水(屬於心靈逃難的地方)的主題，從來就是畫梅蘭竹菊花鳥(自比君子性格)等的主题，從來不敢畫自畫像(不敢面對真實的自我)等。西方的油畫，永遠會標示出清楚的光源，永遠要設法畫人的真實表情與內在心情，永遠要設法畫人的靈魂，永遠會在畫裡面體現清楚的單一焦點概念，永遠會區分物體的遠近與大小關係，永遠會嘗試對不同主題的創作(不會拘泥于山水或梅蘭竹菊花鳥等畫)，經常會嘗試畫自畫像等。

在這種“無”、“虛”、“空”的哲學下，漢人變成了普遍虛無化與缺乏邏輯思維的人；例如，漢人發明了一個世界上並不存在的“龍”，這個“龍”沒翅膀，但是卻會飛，你說這合邏輯嗎？然而，這只代表抽象意象的“龍”，後來竟然會成為皇帝的代表，後來竟然會成為皇權的代表，後來竟然會成為中國的代表，

後來竟然會成為中華民族的代表，難道他們忘記了“龍”是多種“獸”的拼裝組合嗎？難道他們忘記了“龍”就是“禽獸”嗎？

“無中生有”得不到數學支援。因為： $0+0=0$ ， $0-0=0$ ， $0\times 0=0$ ， $0\div 0=$ 無意義。

“無中生有”是類比思維的產物。“一”是指男根，“— —”指女陰，“— —”中間的“空”就是老子說的“無”，那是生命的孕育地，所以說“無中生有”。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生萬物”是古老的性交類比思維的產物。從陰陽八卦中可知：“一”是指男根，“— —”指女陰，“三”=“一”+“— —”=男根+女陰=性交，性交生小孩，引申為陰陽交合生萬物，故曰：“三生萬物”。老子的無中生有、無為而治、以及對無的推崇，說明老子的道德經就是陰道經。《老子》第6章說：“穀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處“穀”是象徵著穀的空虛、接納、被動、包容等特徵，意指女性的性器。穀神，一說為“道”，一說為生殖之神。“牝”指的是一切動物的母性生殖器官，“玄牝”是巨大深遠的生殖器象徵。“大邦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天下。”老聃顯然是從女陰的生育功能引伸出天地的起源，又從男女交合引伸出人生思想上的無為守柔，致虛守靜。老子的思想來源於古老的生殖（性交）崇拜。

後來道教把“玄牝之門”的哲學發展為房中術。房中術是地道的淫術，其手段是極其醜陋下流不堪入目的，什麼同性戀、采陰補陽、攀弓踏弩、摩躋過氣、燒茅打鼎、進紅鉛（服用女人月經）、煉秋石（將男人的尿熬成藥）服婦乳、食淫液、服婦尿液，等等。道教以獻房中術而獲皇帝青睞，成了中國人的靈魂，看看房中術就可以知道中國人的靈魂有多骯髒。

第 53 節 佛教批判

在古印度的種姓制裡，政治上由婆羅門與刹帝利兩個種姓擔任統治階級，並且對吠舍與首陀羅兩個種姓進行各種不合理的剝削與壓迫；前兩個種姓階級為了鞏固種姓制度，因此編造了神話，指出梵天（造物神）用口創造出婆羅門，用兩臂創造出刹帝利，用兩股與兩腳創造出吠舍與首陀羅；前兩者是高貴的，後兩者是低賤的，故前兩者可合法統治後兩者。

早期佛教為了改革古印度的不合理階級社會，主張眾生平等；早期佛教於是用與印度教相反的理論，即“空”、“緣起說”、“無常與無我”與無神論的“輪回說”等，來否定印度教的“梵”、“我”、“種姓制度”與有神論的“輪回說”等理論。佛教用“空”來反對印度教“梵”，這導致了日後佛教理論永恆混亂的結果；佛教應該反對“梵”對“種姓制度”的神話，而不是反對“梵”的“世界萬物的最高本體”與“造物主”等的本質。說明：印度教的“梵”（梵天），是指世界萬物的最高本體，是恒常不變的存有，是造物主；“梵”亦稱為“我”（大我），個體的我（小我）其本質即是“梵”（大我）。

佛教有明顯的缺點：一是佛教屬於無神論宗教。佛教能夠中國化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它是無神教，它關於“人可成佛”切合和儒家“人可為堯舜”的人本思想。這和基督教關於“人人有罪，人神隔絕”的思想完全對立。釋迦牟尼在佛經中從來都沒有講過自己是“神”，只是一味提倡心理自律，靠自己的修煉成佛。佛教是一種關於此生修行的學理態度。佛家鼓吹“一切人類悉有佛性”，人人可成佛。佛教相信自我，自我就是生命的神，實質上是無神論。在無神論的基礎上，所謂的愛、正義、慈悲、般若、妙覺、如來藏、菩薩行、犧牲、舍己、利他、佈施、救人、濟世、對抗黑暗勢力與不公不義等，在人文邏輯上，如何能成立？

二是佛教樹立偶像、個人崇拜，勞民傷財。

佛教認為，生命在六道輪回中迴圈流轉，是個不斷經受痛苦的過程，下地獄等自不必說，即使是物質生活富足，也不能免除精神煩惱和生老病死之苦。唯一的解脫之道就是修煉成佛，方能脫離六道輪回的苦難，得以在極樂淨土永享安樂——這正是藏人追求的人生終極目標。而成佛之路最重要的就在於皈依上師。所謂上師指的是那些已修成佛者，但是他們為了普度眾生，自願放棄在佛界享受安樂，忍受往復轉生之苦，屢返人世引導眾生獲得解脫。上師是信眾與佛界之間的橋樑。按照藏人的說法：“沒有上師，就算所有的佛都對我們微笑也無法看到。”因此藏人的每日祈禱首要表達是皈依上師，接著才是皈念佛、法、僧。在西藏佛教中，上師的地位至高無上，除了佛陀釋迦牟尼，藏人第二崇拜的就是上師。

漢地佛教寺廟的和尚不拜菩薩、也不拜佛，卻專門塑許多像讓“眾生”頂禮膜拜。佛教在民間變成了某種多神（佛、菩薩、羅漢）的宗教，這些神與西方創生萬物的唯一神——上帝在人們心中的地位卻毫無可比性，與其說它形成了人們心中執一意志的宗教信仰，還不如說它流變成了民間的巫術迷信。佛教因“業力輪回”思想使道德關懷陷入邏輯困境，它為東方利己主義思想提供的宗教根據。

“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說明中國人拜佛不是出於真信仰。一個跪在送子觀音前磕頭的中國婦人，她的心頭裡絕不會有犧牲二字；她的行為無異於做買賣，香燭和磕頭是陽冥間交易的通貨。佛院成了信徒“求財、求官、求子”的功利主義場所，到廟裡求籤問卦的人，不論是黑社會人物，不論走私販毒，不論賭徒騙子，一律可以求問，只要添“香油”就是了。這不是對佛的賄賂又是什麼？

三是寺廟僧眾靠信徒供養，和尚居於廟內，只為自己修行成佛，不過問現實人民苦難的問題、不主動積極參與社會的改革、不過問政治腐敗的問題、不過問社會不公不義的事件，甚至成為容忍專制政權存在的婢女，不免被人視為寄生一

族。

與之比較，基督教新教的牧師，帶領信眾一同奔天國之路，他不僅是人們的精神導師，同時能深入社區，組織各種活動，隨時為人們排難解紛，牧師是社區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所以與群眾共同生活的牧師，要比離群索居深藏寺廟的和尚，更受人愛戴和歡迎。

四是釋家是愚民的。它勸人棄世的“諸法無常”、“諸法無我”、“萬法皆空”、“涅槃寂靜”等思想，它的關於“六道輪回”的信念使人重視對“來世”、“轉世”的修練，而輕視對今生今世的現實的奮鬥。這種關於棄絕今世的消極人生的主張，根本不可能促進人類對發現、發明、創造新事物的聰明才智，而只能促使人們變得愚蠢，變得易於被他人愚弄。

佛教對中國文化最大的負面影響是合道成禪，並形成了政治上回避現實生活的遁世主義、哲學上傾向不可知論的神秘主義。理性和信仰遇到的最大敵人就是禪宗思想，它“什麼都不相信，什麼都可以包容”因而消解了任何邏輯理性，它就是一種絕望。根據禪宗經典《壇經》記載，被日本禪學界公認為中國禪的創始人六祖慧能，不會讀寫，有一天，五祖弘忍讓眾弟子作偈語，說誰做得好，悟得透，就把衣鉢傳給誰。知識淵博的神秀上座做了一偈，貼了出來，人人傳誦，慧能聽了，覺得不夠意思，就請一個童子帶他去看看：“童子引能，至南廊下，能即禮拜此偈，為不識字，請一人讀，慧能聞已，即識大意。慧能亦作一偈，又請得一解書人，於西間壁上題著，呈自本心”（《壇經》第八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才識俱佳的神秀教授寫的偈語沒有被五祖看上，大字不識的慧能伙夫請人代寫的偈語卻受到弘忍激賞，結果，慧能得到了衣鉢。不識字的人做了祖師，在這樣的祖師看來，文字自然不僅是多餘的，而且還可能是直見本性、成佛悟道的障

礙。如果要用最少的話說出慧能禪的精髓，大概就是下面這 16 個字了：“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日本當代禪學大師鈴木大拙對此的解釋是，“禪是訴諸個人經驗事實，而非訴諸書本知識來提出解決辦法的”。既然世界是不真實的，“本來無一物”，科學研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佛教發展不出科學技術，創造不出豐裕財富，更不會衍生出強力的豐功偉績；是愚民政策的最佳工具，其對現世倫理架構之破壞，責任之逃避，將使其國家永遠與現代化絕緣。

五是“萬物皆空、眾生平等”的荒謬。佛家主張“空”（所以必須經常重複敲木魚麻痹自己）、“無我”（所以不用承擔人的道德責任）、“涅槃”（所以死後才能進極樂世界，不死不能進極樂世界）、“人是臭皮囊”（所以人可以見死不救，所以人可以逃避道德責任）；又說“慈悲”（“慈悲”同“空”、“無我”與“涅槃”，是完全對立與相反的概念）。

佛先說眾生平等，把人與禽獸同列，是踐踏人性。佛教未能啟迪中國人作為人的主體價值的覺醒，反而加深了中國人內心的迷茫。在中國，人人不平等根深蒂固，而佛教反而宣傳人與動物，甚至與螞蟻、蛆蟲等生物的平等，這除了讓普通中國人更喪失“人”的最起碼的自尊和應有的“人”的價值之外，根本就與啟迪人人平等的終極真理價值毫不相干。佛家的眾生平等實為虛假的平等，在佛教的世界裡卻是崇尚權威、等級森嚴，甚至存在奴役、虐待現象。佛主張眾生六道中輪回；造孽太多，打入牲道受報；當然修成正果得上登菩薩道，受人供奉膜拜。顯然各道之間，受到極不平等的待遇。

佛教相信四大皆空，然而，一些披了袈裟的僧侶以為要去掉七情六欲，失去了常人對愛情、家庭、財產等的追求，反而對佛教界裡的地位、權力、名望、享

受追求更加厲害。小和尚受到的欺凌只能忍氣吞聲。許多寺廟聚斂金錢財富並不亞於世俗社會，不少和尚尼姑追求生活享受遠勝世俗人士。佛家向來世寄託，時間久了，也就成了鴛鴦，遇到危險就把腦袋插到褲襠裡，不求公義，唯求自保。有一位佛教法師在還俗後撰文說，經過十多年在佛教組織中生活，她發現“宗教界的人與外界無分別”、“人性都是一樣的”、而“穿起袈裟事更多”。

六是武力傳播。基督教在 300 年傳教歷史中，遭到羅馬皇帝的殘酷鎮壓，賴上帝保佑，依然獲得勝利。佛教在印度伴隨阿育王的屠刀傳播，在中國伴隨十六國和北朝的屠刀支持。比如元朝的江南佛教總督楊璉真伽居然將大宋皇帝陵墓全部挖開，挖取陪葬的金銀珠寶；並且至少有 50 萬戶農民（約 250 萬人）被他編為寺院的農奴。喇嘛所過之處，隨從如雲，強住漢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婦女陪宿。喇嘛很少買東西，都行奪取。一個柴販曾向大都（北京）留守長官李壁伸訴，李壁正在處理時，眾喇嘛已手執木棍，呼嘯而至，把李壁摔倒痛毆。李壁向大汗控告，大汗立即下令赦免喇嘛。喇嘛曾跟一位王妃爭路，竟把王妃拖下車轎，拳腳交集，大汗的反應仍是下令赦免喇嘛。宗教裁判所一共燒了幾百萬人，十字軍打了 200 年不過死了幾百萬人。但佛教徒隋朝和元朝對百姓的屠殺何止那個數字。特別是蒙古人使南宋損失數千萬人口。僅此一個時代，佛教的罪行就遠遠大於基督教頭上的罪行。

歷史上出現過著名的三武一宗廢佛事件，即北魏太武帝(446)北周武帝(574)、唐武宗(841-846年)、後周世宗(955)摧毀佛教的行為。北魏鎮壓蓋吳起義的時候，在一所佛寺裡發現大量的兵器，又發現大量地方官和富人寄藏的私物。這給了魏太武帝暴力滅佛的藉口，“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令“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北周滅北齊後立即推行滅佛政策，限制寺院人數，有 300 萬僧尼還

俗。這個數字是當時總人口的 1/10。

唐代開國時立下一個規定，進入佛門的人“可免死”，因此很多叛軍被擊潰後就往寺廟躲。以儒學正統自居的韓愈兇狠地叫嚷，對佛教要“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羅家倫說：“至於韓愈、李德裕排斥佛老，所排斥的是佛教的組織，是因為僧侶不生產，並非在思想上反對佛老的哲學”；按他的邏輯，不生產就該消滅，那不生產的皇帝和儒們怎不首先消滅呢？唐武宗時期，強迫還俗的僧尼達 26 萬，寺院所附奴婢 15 萬人被解放，數千萬頃的良田被收繳，拆掉寺廟 4600 所、小廟宇 4 萬所，此後佛教勢力受到慘重的打擊。

後周世宗在短短一年時間，廢除佛寺三千餘所，毀掉銅像法器無數，命令民間銅佛像悉數上交，全部鑄成銅錢，以緩解國庫空虛。令人驚異的是，擁有數萬寺廟、數百萬僧尼的佛教面臨如此的滅頂之災，竟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反抗，竟讓皇帝的一紙詔令得以順利執行。它反映了中國人的宗教態度，說明了皇權的強大專橫和佛教在政治上的軟弱無力。

七是佛教沒有把全體教徒組織起來的教會，更沒有對教徒從宗教上實行強制性約束的教會法。印度的佛僧不受國家法律管理，基督教教士不受國家法律的審判，然而中國的出家人卻不能享受這一特權，他們必須受世俗法律管理。唐玄奘曾向唐太宗提出僧眾可否由僧法管理而不依俗法，結果遭到拒絕。佛教的教團即僧伽團體，是出家僧侶的組織，相當於基督教的修道院，比修道院鬆散得多。它沒有像基督教從基層教區到主教區直到跨國家的“普世教會”或“大公教會”的組織，沒有從制度上對教徒進行管理的由神父、主教和教皇組成的嚴密的教階制，更沒有對教徒從宗教上實行強制性約束和規範的教會法。由於缺乏組織，教徒就不可能有一個規範化的宗教生活。佛教徒由內而外可分三層：第一層是出家

僧侶，他們人數很少；第二層是在家修行的稱居士的守戒的信徒；第三層是燒香拜佛的人，這部分人的數量通常是非常龐大的。這三種人的組織性和宗教生活依次遞減。其中第二部分人相當於基督教的平信徒，不過他們的宗教生活遠遜於基督徒。一個基督徒的皇帝或國王如果因違背教規或得罪了教會而被剝奪了在告解式上領聖體的權利，他會被迫跪在主教膝下悔罪，或跣足屈膝，任由教士的鞭打，以獲得赦免重過宗教生活。這在佛教的居士中是見不到的。在佛教裡，一個出家的僧人或受戒的居士，只要向任何人聲明之後就可以還俗和放棄居士身份，這在基督徒是不可想像的。至於第三層的廣大信徒，他們可以在各種宗教間朝三暮四，也可以同時腳踩多支船。這部分信眾，更給佛教染上了自由鬆散的色彩。

第 54 節 回教批判

凡是以煽動人仇恨與鼓勵暴力的宗教，都是邪教；人類有三大邪教，即伊斯蘭原教旨派、共產主義與大漢沙文主義，後兩者為類宗教的人文宗教。這三大邪教，都鼓吹仇恨與暴力；都是“自我中心主義”並排斥異類，甚至要消滅異類！伊斯蘭原教旨派，將人分為穆斯林與非穆斯林(或稱異教徒)；共產黨，將人分為無產階級與有產階級；大漢沙文主義者，將人分為漢人(華夏人)與夷狄(漢人以禽獸與蟲魚等名稱異族)。

伊斯蘭教崇拜教主默罕默得，而且默罕默得一開始傳教就依靠武力開路。當年默罕默德一手持刀，一手拿可蘭經傳教，不信者殺，對改教者往往一刀奪命。這就是專制。阿拉伯軍隊在征服中亞的過程中，大肆破壞。阿拉伯的呼羅珊總督庫泰拔(705~715 間)從中亞略走居民 10 萬人，把他們變為奴隸。21 世紀的塔利班統治者炸毀了阿富汗的佛像。

1453 年 5 月 29 日，土耳其攻佔了君士坦丁堡，縱兵屠殺搶掠，連續三天。

許多居民被賣為奴，壯麗的宮殿付之一炬。根據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法律，主要納稅人是異教徒。這種稅款相當高，一般人無力承擔。如果成為穆斯林，就可以免交此項稅款。於是，在巴爾幹地區，信仰天主教的阿爾巴尼亞人再一次改變宗教信仰，皈依伊斯蘭，成為穆斯林；波士尼亞——黑塞哥維那的一部分信仰東正教的塞爾人也皈依伊斯蘭，成為穆斯林。

1822 年 1 月 1 日第一屆國民大會宣佈希臘獨立，成立希臘執行委員會。土耳其政府調兵鎮壓起義，在開俄斯島對希臘居民進行大屠殺，2.3 萬人遇害，4.7 萬人被賣為奴。1890 年代，30 萬亞美尼亞人被屠，1914 年土耳其伊斯蘭教徒屠殺了 150 萬亞美尼亞基督徒。

回教徒，他們以阿拉之名至少處決了 5 百萬的基督徒。時至今日，回教徒還會處死凡相信耶穌基督的回族同胞，有基督徒在蘇丹被釘在十字架處死！

1862 年，當駐陝清軍到南方鎮壓太平天國，西北又爆發了擄軍起義。1862 年 5 月，兩個參加過雲南起義的阿訇——任五和郝明堂來到了陝西華縣，借著全國擄軍運動的勢頭，組織陝西回民向清廷發動聖戰。此時華縣政府已招募了 400 名漢人和回民做團丁，以防太平軍，但未曾料到回民的聖戰攻勢，結果團丁中的 200 名回民當下響應聖戰號召，殺死團練，當夜逃走。隨後，任五和郝明堂挑起回漢械鬥事件，以次宣佈聖戰開始！回民軍襲擊了漢族村莊八女井，也就是今天的大荔縣八魚，將全村 1 萬餘口不分男女老幼集體屠殺，血流成河。

首領任五為了表示自己“不再回頭”的決心，竟手刃了自己的家屬，他們號召穆斯林起來“聖戰”，殺光關中的異教徒，建立一個獨立的伊斯蘭國家，於是回民迅速組織了 30 萬穆斯林民兵，在關中諸地的漢族地區展開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陝西死亡達 500 萬餘人。

臨潼縣 1861 年人口是 26 萬，據縣誌記載，“1862--1869 七年，臨潼縣死亡人口 30 余萬。渭河南北燒殺之災無一村一人而倖免。”也就是說，不僅殺光了原來的人口，也殺光了這七年新生的孩子。涇陽縣 1861 年人口 17.7 萬，戰後 6.7 萬，戰爭中損失 11 萬。興平縣 1861 年人口 18.4 萬，戰爭三年人口損失 7.9 萬。戶縣戰前 16.2 萬，戰爭中人口損失比例超過 2/3。高陵縣戰前 8 萬人，損失 4.8 萬。富平縣戰前 31.8 萬，損失 20.3 萬。1861 年三原縣人口 21.6 萬人，損失 12.3 萬。據縣誌記載，回民起義兩年間（1862~1863），“縣舊隸五百餘村俱殘破，僅存東裡、蔡王二堡”。1861 年高陵縣人口 8 萬人，“同治三年（1864），縣內人口銳減至 32192 人。”損失 4.8 萬。大荔縣（舊制），戰前 22.4 萬，三年後僅餘 72679 人。損失 67%。合陽縣戰前 29.9 萬，戰後余 14.6 萬，損失 57%。澄城縣戰前 20.6 萬，損失 60%。蒲城縣戰前 32 萬，損失 64%。華州（現華縣）戰前 17.8 萬，戰後不到 9 萬。

1862 年 9 月，為了呼應陝西回民，寧夏回族對寧夏漢人展開了血腥屠殺。1863 年 4 月回民軍攻克靖遠，殺 10 萬人；1863 年 7 月，回民軍詐降清軍，騙開城門克寧夏府、靈州，屠殺 140 萬。這次戰爭帶來的大屠殺使寧夏的人口損失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直到今天，寧夏還有一百多處當年遺留下來的廢棄村莊，全是被當年的回民軍屠戮一空的村子。

1863 年，陝西回民軍進入甘肅，對甘肅漢人進行瘋狂大屠殺。一次殺 10 萬以上的例子很多，如 1865 年河州回民攻狄道州，殺 10 余萬人。

以下是甘肅部分縣大屠殺的情況：慶陽府三次被攻破，戰後“奇禽猛獸麇集”，左宗棠花了很大力氣搜索老百姓，只在深山裡找到幾個人，他們吃野果，不穿衣服，跟野人沒有兩樣。據宣統《甘肅新通志》卷 47，同治二年（1863 年）

八月，回民軍隊“陷平涼城府……官員死節者百餘，士民死者十數萬。”據《中國人口史》一書推算，同治年間平涼府（包括華亭、隆德、平遠、海城、固原）人口損失 249.1 萬，占戰前人口的 88.6%。

華亭縣“從此丘墟”，“平安後召回遺民，僅得男婦老幼 70 餘人，男女老幼死亡數萬”。據《中國人口史》，華亭縣咸豐十一年（1861 年）人口約 17.1 萬，戰爭中人口損失約達 94%。

隆德縣，據載：“同治四年縣破城，從此官逃莊浪，城空無主者五年，人民殺斃餓死十有八九，逃出者十之一二。全縣村村焦土，十室九空”。人口死亡比例高達 90%，而今這個縣的人口，基本上均是戰後移民。靖遠縣內“漢人死者男婦約十餘萬”。

據鎮原縣誌：“四鄉堡寨攻陷無遺，而縣城獨全，蓋四鄉之人逃出虎口者，生後入城避難。是月初九日……（回軍入城）……，全城糜爛，死者不知其數。”據《中國人口史》，回民屠城前全縣人口 26.9 萬，戰爭損失 23.4 萬，損失比例為 87%。據《中國人口史》，涇州四縣咸豐十一年（1861 年）有人口 92.8 萬，戰爭中人口死亡 82.2 萬，損失 88.6%

據《中國人口史》一書的統計，回民起義前的 1861 年，甘肅人口 1945.9 萬人；戰後的 1880 年，人口僅存 495.5 萬人，人口損失 1455.5 萬人，損失比例為 74.5%。回民起義殺掉陝甘兩省的總人口大約 2000 萬人。這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殘暴的種族滅絕，比希特勒屠殺猶太人手段更殘酷。不分男女老幼，全部用刀砍死，用火燒死，進行種族滅絕大屠殺。

伊斯蘭教在基督教福音派的眼中，一直被認為是撒旦的教義。在全界引起軒然大波的《撒旦的篇章》一書就反映了福音派的這種認識，作者拉什迪斯是出生

於伊斯蘭世界的基督教徒。曾經主持過小布希就職典禮的牧師小葛培理說：“古蘭經鼓勵穆斯林對猶太人和基督徒使用暴力，恐怖主義是伊斯蘭的傳統”，福音派領袖法維爾說：“伊斯蘭的先知都是好戰之徒”。司法部長阿什羅福特說：“古蘭經讓信徒獻出自己的兒子殉教；但在《聖經》中，上帝為人類犧牲了自己的兒子，一望即知，誰在鼓勵流血，誰是邪教”。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對立，來自於兩個宗教在教義上的不可調和的根本的對立。基督教主張，上帝以耶穌的形式降臨人間，替人類贖罪，在十字架上死了一回，把人類從罪與滅亡中救了出來。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是同一上帝的不同位格。因此崇拜上帝是三位一體的上帝，向耶穌禱告就是向上帝禱告，耶穌就是上帝。

伊斯蘭教則認為耶穌僅僅是天使的一位，在十字架上死的不是耶穌本人。人不能崇拜天使或其他，只能崇拜真主安拉。伊斯蘭教抽空了上帝替人類贖罪的神學的本質。

基督教吸取了聖經中好的一面——一夫一妻制，伊斯蘭教吸取了舊約中不好的一面——多妻制。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相互指責。伊斯蘭教指責基督教崇拜天使而不是崇拜真主本身，是異教徒，是撒旦；基督教則指責伊斯蘭否認人類的罪性，否認上帝替人類贖罪，來自撒旦。

在原教旨主義者看來，伊斯蘭不僅僅是邪教，而且是來自撒旦的古老的反基督勢力，是與基督教不共戴天的仇敵，是以基督徒為代表的上帝的力量必須摧毀的邪惡勢力。

第九章 儒教是民主的絆腳石

第 55 節 中體西用的實質

在中華文化的各個要素中，專制是最為頑固最善於應變的要素，即使受到挑戰，專制制度總能借屍還魂。滿清的統治，使中國人更加奴愚。

太平天國絕對不是一場真正的基督教運動，但這並不妨礙清政府聯合儒家士大夫一起以抵制耶教為名發起了近代歷史上第一次複孔運動。這場運動的標誌性

“檔”是咸豐帝尊崇儒學防止“聚眾滋事”諭（1851年1月13日）：朕思性理諸書，均為導民正軌，著各直省督撫會同各該學政，轉地方官及各學教官，于書院家塾教授生徒，均令以《禦纂性理精義》、《聖諭廣訓》為課讀講習之要，使之家喻戶曉，禮義廉恥油然而生，斯邪教不禁而自化，經正民興，庶收時效。曾國藩的《討粵匪檄》（1854年2月）則表明中國士大夫對西方宗教積怨已久：“自唐虞以來，曆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序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姐妹也。……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 面對洪秀全，曾國藩甚至“敏感地”懷念起李自成來了，因為“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而洪秀全拜洋教完全數典忘祖。

1862年同文館設立招生，規定學習外語，畢業後可保舉為八品或九品官，可士大夫都不願進同文館。夏燮認為出洋學習是“相率而為漢奸，用夷變夏之漸不可不防”。中國第一位到美國的留學生容闈，1854年從耶魯大學畢業，8年後回國，卻等了十年才被曾國藩用於買機器和當翻譯。容闈建議的留學政策，直到他回國15年後才實施。1872~1875年，在容闈的主持下，先後派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學；同行的還有老式中國教師，好教兒童們學“之乎也者”的《孝經》以

不忘本；清朝還派一位保守派與容閔同行，以便監視他並防止兒童被西方思想精神污染。頑固派認為舊制度、舊文化的存亡，比國家的存亡更重要，他們擔心幼童會被“美化”，從而就“不復卑恭”為清朝的“順民”了。原定 15 年為期，學成回國。由於精神污染很難防止，於是，這些留學生在 1881 年被全數撤回。

1867 年 3 月山東道監察御史張盛藻雲：中國必須恢復“孔孟之書”和“堯舜之道”，“臣民之強惟氣節一端耳”。倭仁（大學士）說：“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因此面對“耶穌之教”，“所恃讀書之士講明義理，或可維持人心”。于凌辰（通政使）說：“洋人之所長在機器，中國之所貴在人心”，“官畏夷，民不畏夷，夷人敢與官爭，不敢與民抗，其畏我人心，更甚於我之畏彼利器。”故“所可恃者，中國數千年禮義廉恥”。李鴻章認為：“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洋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馮桂芬在《采學西議》（1861）裡說：“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不更善之善者哉？”

張之洞說：“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因此，他堅決主張“民主萬不可設，民權萬不可重”。總之，在政治問題上絕無妥協的餘地。

1898 年夏張之洞刊行《勸學篇》，宣揚“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說：滿清與外強較量時碰了釘子，是輸在軍事、科學技術上，至於政治體制、教育制度、司法官吏等方面的，洋人還不如大清。只要引進一些工匠、技術、設備，為我所用，不愁江山萬年長。

中體西用中的中學，指的是“形而上”的聖人之道。當時所謂的西學，主要是自然科學和技術，被認為不過是“形而下”的器藝。“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馮桂芬（1809-1874）這話，最能表達中體西用的內涵。倫

常名教即孔教是這個中學的精髓。“中體西用”的實質無非是在保留中國專制制度的前提下，吸取西方的技術思想以及其它對專制勢力不構成實質威脅的制度，以達到強國的目的。

在那時，說上一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不容易了。然而，這樣的民族是沒有出息的，很難進步的。有人說得好，應當倒過來，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把世界上最先進的東西拿來作為“主體”，民族才有希望。但是，中國人卻做不到。

中國人應當學會“否定自己”，只有否定自己，民族才可能進步。如果總是滿意自己，歌唱自己，那中國還需要進步嗎？一個半世紀以前，日本人發現西方國家先進，立刻就開始了“脫亞入歐”的進程。明治時期有西方人到日本教書，就發現日本青年對日本“自我否定”的情緒非常強烈。有一次，老師要一個日本學生談談日本的歷史，那個學生憤憤地說：“我們日本沒有歷史，要有，也是從今天開始。”這種普遍的自我否定精神，給日本突飛猛進的發展，留下了廣闊的精神空間。與此相反，中國幾乎所有的官僚和民眾一味地妄自尊大，都抱持著“中國文化”和“中國傳統”優秀論，這就形成了難以動搖的“夜郎自大”的傳統，因而中國也就不能斷然向西方學習、不能果斷地拋棄自身的舊的壞東西。日本以“開明專制”避免了“落後挨打”，中國卻把“開明專制”的希望淹沒在血泊之中。中國被迫地學習西方，總是扭扭捏捏，從不敢把話說清楚。曾國藩、李鴻章的思想一直傳流到今。西方人不就是“船堅炮利”麼，只要我們把他的船炮都買來，中國不需要改變體制，也會強大。當時北洋艦隊被稱為“海上第六強國”，卻被個小日本打得慘敗。儘管如此，仍然沒能教訓中國。中國從來不認為應該換換“瓢子”。慈禧太后因為不滿列強支持光緒皇帝，竟然荒唐地下令軍隊配合拳

民攻擊外國使館，招致八國聯軍入侵的後果；即使如此，她也寧願對外國力量低頭，但決不容許光緒皇帝重掌權力。不幸的是，中國人對自身的落後毫無自省。說到“西方”，仍然基本上是一個貶義詞。似乎中國再怎麼“民主”，也不能有“西方式”的民主！

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啊！中國有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啊！這些空洞的東西，使中國人沒法不糊塗起來。正是因為有了這些愚昧的“中國老大”的思想，中國也就只好落後了！日本引進技術，有了自己的技術精英隊伍，日本有了“世界第一”的工業加工技術。中國則是反面例子，大力“引進外資”而沒有能夠真正“引進技術”。重皮毛而不重核心。中國至今也沒有一支驕人的技術精英隊伍，因此也很難消化外國技術。中國流行的是“老闆文化”，“能人”們都去當老闆了，而技術人員們是給老闆們“打工的”。於是，直到今天，中國自己不能設計和建造石化技術，不能設計大多數北京高級的水泥樓房，中國的生產商要支付大量DVD關鍵技術的外國專利，據說數控機床也要從外國大量進口……，這還不說，令人驚訝的是，中國至今連地鐵的關鍵技術也都要依賴外國！

今天的中國依然像滿清一樣大量引進外資，而外資把中國當成了廉價勞動力、廉價土地、廉價資源的提供地和生產操作間，還當成了傾瀉化學污染和工業垃圾的地方。就是這麼一種“經濟發展”，仍然能引發中國人“民族吹牛”的神經亢奮。今天官方學者們幾乎天天大肆吹噓，大講中國將在什麼時候能超過德國、什麼時候能超過日本、什麼時候能超過美國……

第 56 節 康有為尊孔復辟

西方傳教士是維新運動的積極參與者，特別是甲午前，傳教士是西學東漸的主要媒介，他們積極鼓吹中國按西方模式改革，而康梁黨人深受其影響。有研究

者稱：從 1889 年到 1898 年，英美傳教士在《萬國公報》上發表鼓吹變法的文章多達數百篇，使《萬國公報》成為“一個影響中國領導人物思想的最成功的媒介。”傳教士也向清政府遊說改革。李提摩太、李佳白等參與了強學會，康有為的西學啟蒙書《西國近事彙編》即傳教士所編。康曾說：“我信仰維新，主要歸功於兩位傳教士，李提摩太牧師和林樂知牧師的著作。”梁也對傳教士所編著西書大為推崇。但是，這一緊密聯繫卻沒有使維新派接受基督教，卻間接鼓舞維新派堅信另外的“宗教救國論”——孔教救國。維新派堅信：沒有上帝中國仍能取得進步和自強，而在梁啟超看來，中國正是因為沒有基督教，才更可能儘快迎頭趕上西方。

康有為自詡為中國的救主。康有為早年家貧，11 歲父死，靠母親勤儉持家、出賣嫁妝度日。康為了上書清帝，用盡伎倆，向多人騙取錢財，包括自家親人和北京望族，以給他的銀子數量多寡分封“賢人”、“大賢人”等稱號。康有為流亡期間，靠保皇會和憲政會供給。他以被囚的光緒皇帝的不幸境遇作為政治資本，甚至發行股票。1899 年 7 月，他在加拿大組成“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即保皇會。正是以這個公司的名義，康有為發行股票，鼓動人們購買，“將來光緒皇帝救出來，復辟了，股票價值不知道會翻多少倍。有人攻擊他侵吞鉅款，是馬扁（騙），他以鉅款購買各國文物，說是開發民智，搞展覽，最終歸他私有。

康有為 19 歲結婚，1897 年他 40 歲看老婆無子，便納 17 歲的梁某為妾。1907 年康有為 50 歲在美國納 17 歲的何某為妾。1911 年康有為攜帶兩妾到日本，2 年後納日本人岡鶴子為第三妾。1914 年冬娶廖某為第 4 妾。1918 年在杭州挾妓遊湖，把妓女當西施，自比范大夫；後看中一洗衣少女，納為第 5 妾，於 1919 年在上海成婚，該妾兩位兄弟做康家傭人。康有為一生共有 6 位夫人（一妻五妾），

14 個子女，生了 12 個子女，因小老婆沒有生育，還領養兩個子女。在上海嫖娼多次，不付錢，被妓女追著索要；等等。

康有為的生活完全是儒的一套。康的哲學是“主樂派哲學”——主張及時行樂。他竭力追求物資享受，在吃喝玩樂住上都追求高標準。他雇傭了大批傭人，其中丫頭 5 人，老媽子 5 人，男雇員 30 余人，他在上海的家常住人口達 60 人，流動食客多則 30 餘人，少則有 10 餘人。每天在家就餐的人多達 80 餘人。4 天吃一擔米，僅伙食方面的採購就要用汽車去拉。他食不厭精，講究營養，即使下鄉也不馬虎。據當年的人回憶，康在鄉下的家中，中午要吃八大盤八小盤，康有為喜歡吃雞蛋，一次吃了 10 個蛋。此外，他在杭州、青島有兩處別墅，別墅的留守人員達 10 人以上。每月的經常性開支達 3000 大洋。1913 年送母、弟的靈柩回家的場面，空前壯觀。香港港督派一百多員警護送，廣東省派兵艦 2 只迎于海面，都督率軍警千人，民政長官率百吏繼之，紳士千數，喪輪抵家鄉，眾賓數百，觀者數萬。如此排場，招待費和給軍警的賞錢要多少？康有為承認僅 1919 年的喪葬費支出就達 3000 大洋。

康有為是一個孔子迷終身宣導尊孔、祀孔、學孔。1877 年，他未滿二十歲時所作的《性學篇》一文中，已經將孔教與佛教、回教、耶穌教並列。他搬弄迷信，自比孔子。康有為認為中國的物質文明固然落後於西方，精神文明還高於西方。他主張在政治上實行君主立憲，進行西方式的社會改革，但在思想上仍然需要回到儒學中去尋找答案。他說：“吾國行專制政體，一君與大臣數人共治其國，國安得不弱？蓋千百萬之人，勝於數人者，自然之數矣。……（立憲政府）時勢所趨，民風所動，大波翻瀾，回易大地，深可畏也。”康有為遇到了一個難題：中國沒有憲政的實踐，但有沒有憲政的精神呢？若有，為什麼產生不出憲政？若

沒有，是否意味著中國文化要全盤西化？康氏陷入了二難選擇：若主張有，必須重新解釋儒教；若主張無，有傷民族自尊。兩害取其輕，他選擇了第一種方式：重新解釋儒教。

康氏鼓吹要絕對服從孔子。他說：“無教者，謂之禽獸；無道者，謂之野人。道、教何從？從聖人。聖人何從？從孔子”。也就是說，任何人不想做禽獸，就要追隨孔子。“蓋天不能言，使孔子代發之。”於是，人們對孔子只能“服從而已”。他建議清政府下令信仰諸天神佛的“鄉落淫祠，悉改為孔子廟，其各善堂會館俱令獨祀孔子……扶聖教而塞異端。”且向國外“派設教官，立孔子廟”，實現“用夏變夷”的盛舉。除勸牖愚民外，士紳治學亦“皆以孔子經學為本”，且每十日要舉行一次拜經會。從 1895 年組織強學會到 1898 年的保國會都念念不忘“保教”。在《保國會章程》中五次提及保教，而且“保全國地、國民、國教”三個目標是並列的。“中國貧弱的根源在沒找到孔學真傳。不幸之中大幸的是天哀生民……予小子（康有為）夢執禮器而西行，乃覘此廣樂鈞天，複見宗廟百官之美富，門戶既得……不敢隱匿大道”。於是，救世主康有為銜命降臨人間，小民合該頂禮膜拜！章太炎指出：“康党諸大賢，以長素為教皇，又目為南海聖人，謂不及十年，當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電，此病狂語，不值一笑。”神化孔子歸根到抵是神化康有為自己。

早在康有為在湖南協助張之洞開展維新時，忠於朝廷的湖南紳士名流，就要求處死康有為。張之洞不為所動，最早支援康有為於 1895 年在上海開設強學會，並提供經費。但當康有為把孔子打扮成一個“托古改制”的變法祖師，又將西方的議會、民權等附會於儒家經典，以證明他的維新變法是合“聖人之道”時，張之洞便表示反對，並以不提供經費相威脅，直至後來站到了反對派陣營。傳統的

實權派和士人階層斥康“其貌則孔也，其心則夷也”。中國自北宋以來，一切重大改革只要超出儒教正統，都被斥為異端而失敗，如王安石變法就是。

康有為相信儒教比世界上任何其它學說都優越，適宜於全人類。他說堯舜為民主、為人道之極至；有人企圖證明，周朝就存在過現代的議會。既然中國早已有如此美妙的古代模式，為什麼歷朝歷代卻從不遵循呢？康的解釋是，因為漢以來的儒家傳人背叛了先秦理想，自劉歆作偽經始，以後的儒生全都錯解了古代先賢的思想，使得後來的社會在歧途中越涉越遠。康有為“上清帝第六書”（1898年1月29日）雲：中國在民主實施上落後於西方，不是因為孔子的學說有缺點，而是他的許多門徒誤解了他。

他在公車上書中要求變法，根據“先王之治天下，與民共之”的道理，提出為了上下溝通，每十萬戶公舉一人到朝廷備皇帝顧問的建議。但強調的是“富國為先”，對富國之法說的最多也最為詳細具體。他認為自由民主在中國是古已有之，中國的政治體制沒有西方那樣專制，因此在這方面的變革不是當務之急，當前最主要的是把物質建設搞上去。

康有為主張在政治上學習西方，仿效“三權分立”，變君主專制為君主立憲。戊戌年，面對列強瓜分中國的危局，他指出：“應知天下為公產，應全民權救我疆”。他的這個“公產”，就是他的《大同書》中所闡述的空想社會主義。據說，在那種“公產”社會內，“人人平等，無有臣妾奴隸，無有臣君統領”。他在《論語注》中提出了“有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每一世都有他相應的政治制度：絕對王政適於據亂世，君主立憲適於升平世，共和制度適於太平世，把美國的民主說成最理想的“太平世”。

康氏認為適用於“太平世”的民主尚未到來，操之過急，將適得其反。他說，

共和並未給予百姓自由、平等，只因他們還不配享有民主。唯有當每一個國民行止如士君子，才配享有民主，否則享有民主的民眾流為暴民時，則會導致濫用自由和多數專制。

光緒皇帝除不答應確立孔教為國教外，其它主張大多被接受，並任命康有為作整個變法的“總設計師”。可以說，康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變法時期關於“憲政移植與文化抵抗”的樣式。它奠定了未來中國百年憲政移植的基本態勢。

1905年他寫《物質救國論》。對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康有為很重視；對民主自由，沒有興趣。康有為晚年曾寫道：“追思戊戌時，鄙人創議立憲，實鄙人不察國情之巨謬也。”康有為在《大同書》中已對傳統家族主義作了尖銳批評，以後對儒家五倫中的“義”也有刻薄的非議。1912年10月康有為在北京組織孔教會，自任會長，鼓吹半部《論語》治天下，決心把孔教會普及於全國，推廣於世界；學習日本的君主立憲制度。張勳擔任名譽會長。

第 57 節 新民說

嚴復在 1895 年 3 月間發表于天津《直報》的著名論文《原強》，進行了“白種、黃種、黑種”的人種區分，指出中國“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在《原強》修訂稿中，嚴復提出以民力、民智、民德作為標準來判斷“民種之高下”，對中國的變革而言，則應當“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他在《救亡決論》中說：“時局到了今天，我寧可背負起發狂的罪名，決不能吞吞吐吐，甚至無恥作偽。”今日，“四千年文物，九萬里中原，所以至於斯極者，其教化學術非也，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禍首，若充類至義言之，則六經五子亦該責難辭。”鋒芒所向，直指皇權至上和神聖的儒術。他在《論世變之及》又將中西文化作了一系列鮮明對比，指出：“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

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党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重譏評。其於財也，中國重節流，而西人重開源；中國追淳樸，而西人求歡娛。其接物也，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多發舒；中國尚節文，而西人樂簡易。其於學也，中國誇多識，而西人尊新知。其於禍災也，中國委天數，而西人恃人力。”學界常引之作為中西文化比較的典型論述，其實應該說，這是中國近代真正的民主啟蒙運動的起點。他所否定的正是中國人的臣民觀念種種，所肯定的正是西人的公民意識之類。他認為中國今日“不容不以西學為要圖。此理不明，喪心而已。救國之道在此，自強之謀在此”。

三年後，嚴復發表了他的譯著《天演論》，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天道變化，不重故常”，“物各爭存，宜者自立”，“保群進化，與天爭勝”等嶄新的理論。嚴復還告訴人們，“天演之事，將使能群者存，不群者滅；善群者存，不善群者滅”。這裡所謂“群”，同于西人自主性的個體所組成的群體，就是現代社團和政黨。這種群體必須脫離血緣關係，而以具有公民意識的個體為骨幹才能組成。嚴復在 19 世紀末拿來的西方思想理論，如星星之火，燃燒起了中國知識精英的熱血良心。胡漢民說：“自嚴氏書出，而物競天擇之理，厘然當于人心，而中國民氣為之變，即所謂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滿者，固為風潮所激發者多，而嚴氏之功蓋匪細。”嚴復所提的“開民智”和“言合群”兩條對公民意識的興起和組織黨團運動的勃發起了先導作用。他在《辟韓》一文中尖銳地提出：專制君主為了竊國而故意使民眾“弱而愚”。改善民智，首要的是改良教育。嚴復認為，舊教育全是為了獵取“富貴功名”，應當在學校中教授現代科學；而民德方面，則必須合私為公，培養愛國精神。嚴復相信，是教化衰頹退化造成了中國人的“幼

稚”和“巧偽”。作為知識份子的嚴復，更加看重“民智”問題，他堅信中國舊學術和“士大夫心術之壞”是造成民智低下的根源。嚴復對於中國國民的“程度”持一種較悲觀的看法，他在 1905 年與孫中山的辯論中聲稱“以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他認為只有從教育著手，逐漸變革或許有望，而孫中山則立即答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也”。

嚴復對“國民程度如此”的深刻懷疑使得他反過來相信“天下仍須定於專制”，相信“聖主”和“天子”的力量，認為時人反對袁世凱是一大錯誤。嚴復在參與了袁世凱復辟鬧劇，晚年轉向佛道、吸鴉片。這樣，嚴復的思維率先陷入了現代中國思想中的一個極大的悖論——要改變舊的專制所帶來的弊病，只能依靠新的專制，然專制既是病根，又何以為藥方？

梁啟超在主持湖南時務學堂期間，就醉心“民權”說。他首先揭露君主與民主的對立：“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飲冰室文集》之一）他同樣把中國歷代君主斥為“民賊”，並極力主張只有興民權，才能強國家，認為“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源”（《飲冰室文集》之一）。

“民權興則國權立，民權滅則國權亡……故言愛國必自興民權始”（《飲冰室文集》之三）。在 1898 年戊戌變法失敗流亡日本後所著的《戊戌政變記》一書中，梁啟超開始把國家的衰弱歸因於人民。他說：“中國之弱，由於民愚也，民之愚，由於不讀萬國之書，不知萬國之事也……”值得注意的是，他並不認為愚是中國民族內在固有的，因為“歐西四五百年前”也曾“守舊愚弱甚矣”，但由於政府發展教育，鼓勵創新，情況得以改觀。梁啟超此刻的著眼點在於教育和啟蒙，主張以開學校、譯書、開報館救中國之弊。梁氏強調，“中國人之聰明本不讓歐西”，

只可惜聰明被數千年來的愚民政策所抑遏。中國人的“奴性”，在《戊戌政變記》中已有論及，他說：“吾國之大患，由國家視其民為奴隸，積之既久，民之自視亦如奴隸焉”。梁啟超于 1898 年在東京創辦《清議報》，其宗旨是“激發國民正氣，增長國人學識”。在 1899 年的《獨立論》中，梁氏聲言“不禁太息痛恨我中國奴隸根性之人何其多也”。1900 年，梁啟超開始強調“民權”，認為“不與民權，民智烏可得開”。1901 年，梁啟超在《清議報》發表《中國積弱溯源論》，提出中國積弱的根源在於全體國民的內在根性，他把中國人的缺點如愚昧、為我、好偽、怯懦、無動等歸因於數千年的“政術”對民眾“馴之、愚之、役之”，因而，“縱成今日之官吏者，則今日之國民是也；造成今日之國民者，則昔日之政術是也”。1901 年冬，梁啟超將《清議報》改為《新民叢報》的時候，特地強調“倡民權”為“獨一無二之宗旨”，並要以報紙和後來創辦於上海的廣智書局來“廣民智、振民氣”。他仍然在《清議報》和《新民叢報》上宣傳“民權”，詳細介紹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熱情稱頌《人權宣言》。他指斥“霸者私天下為一姓之產而奴隸盜賊吾民”，因而“專制久而民性漓”（《飲冰室專集》之四）。

梁啟超在 1900 年前後曾有非常精闢的論述。他在反駁其師康有為否定自由的觀點時指出：“自由之界說，有最要者一語，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是矣。……要之，言自由者無他，不過使之得全其為人之資格而已。質而論之，即不受三綱之壓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縛而已。”他接著駁斥所謂民智未開不能實行民主和自由會導致混亂的糊塗思想說：“夫不興民權民智烏可開哉。……故今日而知民智之為急，則舍自由無他道矣。”“又自由與服從兩者相反而相成，凡真自由未有不服從者。……但使有絲毫不服從法律，則必侵人自由，蓋法律者，除保護人自由權之外，無他掌也。”一個國家幅員再大，資源再豐富，如果普通

百姓沒有權利去享有和處置，只有幹活的份兒，那麼再多的財產是別人的，而不是自己的，憑什麼要去愛護，去保衛？雇工沒有義務去愛財主家的田地和宅院。這也是中國在甲午戰爭以一大國敗給日本那個蕞爾小國的根本原因。因此梁啟超說：“國者何？積民而成也。國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愛國者何？民自愛其身也。故民權興則國權立，民權滅則國權亡。為君相者而務壓民之權，是之謂自棄其國；為民者而不務伸其權，是之謂自棄其身。故言愛國必自興民權始。”這些話在 19 世紀下半葉以降的西方是常識，在發展滯後的中國卻至今仍被目為啟蒙者的語言，不時還被一些人視為異端邪說，成為思想圍剿的目標。

不幸的是，梁啟超沒有將這些正確觀點堅持到底。據丁文江編著的《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中指出，梁氏 1903 年的美洲之行是一大轉折，自美洲回日本後“言論大變”。梁啟超的美洲行是帶為保皇會籌款的使命，但在籌款過程中，尤其是華人最多的三藩市一站，梁啟超深深感到當地華人調度之困難、辦事效率之低下。梁啟超對“中國人的缺點”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指出三項缺陷：深察祖國之大患，莫痛乎有部民資格而無國民資格；有村落思想而無國家思想；只能享專制而不能享自由。……故我中國今日所最缺點而最急需者，在有機之統一與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原本覺得中國不會亡的梁氏，思想中開始出現頹廢的一面：“覺中國無不亡之理，每一讀新聞紙，則厭世之念自不覺油然而生。”

與此同時，他認為，19 世紀末開始，“物質文明發達之既極，地球上數十民族，短兵相接，於是帝國主義大起……乃至於最愛自由之美國，亦不得不驟改其方針，集權中央，擴張政府權力之範圍，以競於外，而他國更何論焉！”他由此得出結論：中國人民智未開、一團散沙，這樣的素質，無法實行民主，只有等

培養出高品質的“新民”後再建立民主。

新民說是梁啟超在1902年至1906年發表在新民從報上的二十篇政論文章。

1902年，流亡日本的梁啟超在橫濱創辦了《新民叢報》，首次標舉起“新民”的旗幟。創刊伊始，他即以“中國之新民”為名連續發表了《新民說》、《新民議》、《論民族競爭之大勢》、《論中國國民之品格》等重要論著，系統闡述了他在“列國競爭”時代重塑民族性格的主要思想。梁啟超指出：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因此，首先應當“維新我民”；由於中國人“無權利思想，無政治思想，無國家思想”，因此應“自除心中之奴隸”。梁啟超《新民說》中關於“新民”的觀點在當時就引起了爭議。有一名署名為“飛生”的留學生當年即在《浙江潮》撰文，認為梁啟超把新民作為首要條件，忽視了政治改造，是“倒因為果”。飛生認為，從理論上說，有了新民，自然會有新政府，事實上，必須先有新政府，而後才有新民，因為政府是國民的代表。梁啟超對這一駁詰予以了正面回應。“餘為新民說，欲以探求我國民腐敗墮落之根源，而以他國所以發達進步者比較之，使國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厲自策進。”這是嚴復提出“開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之後最系統最完整全面的“新民”理論闡述，在當時的留日學界影響甚大。梁啟超提出的一系列有關國民精神與國民生存的詞語，如“破身奴”、“破心奴”、“依附人格”、“獨立人格”、“國民”、“自由”、“權利”等，在以後的思想與文學實踐中都獲得了越來越廣泛的闡發。

1916年部分收入《飲冰室文集》；1936年收入中華書局出版的《飲冰室合集》，同年並出版單行本《新民說》。《新民說》的主要期望喚起中國人民的自覺，要從皇帝的臣民，轉化為現代國家的國民，並講述現代國民所應有的條件和準則。郭沫若在五四以後回憶梁啟超思想的影響時說：“20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

就是當時的有產階級的弟子——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

“新民說”的核心是“群”，合群救國才是新民說的根本目的。“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夫吾國言新法數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則於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也就是說，梁啟超“立新民”只是為了“立新國”，人還是工具、手段，不是終極目的。他明確表示：“自由雲者，團體之自由，非個人之自由也。野蠻時代，個人之自由勝而團體之自由亡；文明時代，團體之自由強，而個人之自由減。”頗具有近代西方文化色彩的“自由”一語，也被梁啟超讀解作“克己復禮為仁”了。

對中國民眾劣根性持批判態度的魯迅也呼應“新民說”，認為中國人不可以實行民主，連“代議制”（國會制度）他都反對。其實，“新民”的途徑是信基督教，他們認識不到。

梁啟超不遺餘力鼓吹中國必須實行“開明專制”，和康有為一起堅定地保皇。他說“中國今日尚未能行君主立憲制”，更不用說民主立憲了。理由有兩條：“（甲）人民程度未及格”：“（乙）施政機關未整備”；包括教育未普及，地方自治未實行，法律不完備，司法不健全等等。可是，1904至1905年間的日俄戰爭，立憲的日本打敗老大的俄羅斯，震撼了世界輿論。久未能擺脫貧弱困境的中國，士紳和市民對憲政的嚮往，成為風氣。在內外形勢脅迫下，梁啟超及其追隨者調整策略，參與立憲運動，但是，他們認為實現憲政需要一個實行開明專制的過渡期。在梁啟超看來，除美國等少數國家外，開明專制階段都是無可避免的。

應該指出，開明專制論不僅是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的認識，激進如陳天華，也持此說。他在留給湖南留學生的絕命書中寫道：“當今之弊，在於廢弛，不在

於專制。欲救中國，惟有開明專制。”這封信寫於 1905 年 12 月 7 日，比梁啟超發表《開明專制論》（1906 年 1 月 25～3 月 25 日）還要早一些。也許有人以為，這是個別人士的極端觀點。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為了與改良派劃清界限，革命派領導人誠然沒有忘記把民主、共和等字眼掛在嘴邊。但是，他們往往以先知先覺自居，逐步形成以軍政、訓政、憲政命名的革命三階段論，所謂訓政就是開明專制的別名。20 世紀初葉始，同盟會和保皇黨人異口同聲說：國家利益和國民素質低下決定中國人必須放棄個人自由。而離開個人自由的所謂國家、民族的自由不過是獨裁專制的別名。國家主義蒙住了啟蒙先驅的眼睛，兩個流派的領袖們的思想在這裡匯合了。他們的分歧停留在方法層面，在國家、民族、集體這座迷宮面前，都忙著頂禮膜拜，而忘記離開人的解放，離開公民權利的保障，不但國家失去根基，人們夢寐以求的民富國強的目標也化為鏡花水月。要理解這個基本道理，必須對文藝復興以降的思想文化有較深切的瞭解。不幸，20 世紀初的中國思想家們很少人能達到這個高度。

梁啟超是以西方經驗作為開明專制論的根據的。他認為法國“革命之後，殆如無政府然。故再經拿破崙之十年開明專制，裁抑而鍛煉之，而憲法乃漸確立也。”普魯士“行開明專制最久”，到德國統一後，“鐵血宰相之政治，名為立憲，實變相之開明專制耳。”而東方後起的強國“日本自明治元年至明治二十二年，皆開明專制時代也。”從歷史經驗看，梁啟超推崇的這些東西方國家的所謂“開明專制”都沒有成為過渡到憲政的橋樑。他們走上憲政軌道還要付出非常巨大的代價（德日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真正實行憲政）。

第 58 節 袁世凱尊孔復辟

1912 年 3 月 10 日袁世凱就任國民政府臨時大總統。9 月 20 日袁世凱頒佈《整

飭倫常令》，下令“尊崇倫常”，提倡建立全國性的孔教會，鼓吹忠順的公民必須信奉忠孝之道。他指責學生之不受駕馭，且公開宣稱：自由派的婦女平等觀是反家庭、反社會秩序的。袁更認為，民國元年從小學課本裡去掉孔夫子，是離經叛道、數典忘祖。

1913年6月，袁發佈《通令尊崇孔聖文》，把孔子捧為“聖哲”、“至聖”，視孔教為“日月之無傷，江河之不廢”，把民主看作孔子大同思想的實踐，孔孟之道乃“國家強弱，存亡所系”，並要求國民“根據古義，將祀孔典禮，折衷至當，以表尊崇，而垂久遠”。

1913年8月，孔教會代表陳煥章、嚴復、夏曾佑、梁啟超上書參政兩院，提交《請定孔教為國教》請願書，認為“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經義為根據，一切義理、學術、禮俗習慣，皆以孔子之教為依歸。此孔子為國教教主之由來也。”

1913年9月28日，袁世凱親至孔廟，行三跪九叩大禮，上演祀孔醜劇。他弄了一個“籌安會”，找了一批社會賢達捧場，鼓吹“中國國情特殊論”，以此為復辟帝制作輿論準備。

國會秉承他的意旨，相繼通過“祭天”、“祀孔”兩個議案，還恢復了跪拜禮節。袁明確提出以孔教綱常禮義代替西洋“自由、平等”之說，“中華立國，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人道之大徑，政體雖更，民彝無改”，並稱“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這“八德”是“人群秩序之常，非帝王專制之規也”。袁及其控制下的進步黨議員堅決主張孔教應定為“國教”，作為“立國之根本”和“憲法”的主要指導原則之一。由於國民黨議員的強烈反對，最後，雙方相互讓步，1913年10月通過的《天壇憲法草案》第19條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

大本”。12月23日袁世凱至天壇祭天為稱帝從思想上到輿論上做準備。

1914年袁世凱針對思想文化界的貶儒批孔，強調“中國數千年立國之本在道德，政體雖取革新，禮俗當要保守”。5月教育總長湯化龍《上大總統言教育書》主張立孔教為國教。9月25日，袁世凱正式頒發了《祭孔令》，宣稱：“近自國體變更，無識之徒，誤解平等自由，逾越範圍，蕩然無守，綱常淪棄，人欲橫流，幾成為土匪禽獸之國。……中國服循聖道，自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本于修身。語其小者，不過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皆日用倫常所莫能外，如布帛菽粟之不可離。語其大者，則可為天地育萬物，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明令於孔子誕辰之日，中央和各地方必須舉行（前清的）祭孔典禮。9月28日，袁世凱在一大群全副武裝的侍從護衛下，于早晨6點半抵達孔廟，換上了繡有四團花的十二章大禮服，下圍褶紫緞裙，頭戴平天冠，由侍從官朱啟鈐、周自齊及侍從武官廕昌引導行禮，俎豆馨香，三跪九叩。與此同時，各省將軍、巡按使也都在省會文廟祭孔，這是民國以來第一次全國性的祭孔。隨後，他令財政部撥款修繕北京孔廟，並自捐銀5000元相助。

清朝遺老們的尊孔活動因此獲得合法地位，並且確曾一度在社會上掀起一股復古的妖鳳。他們為了使“人道”不致“漸滅”，曾經於“癸醜、甲寅（1913、1914年）兩次會於曲阜”，隆重舉行祭祀孔子的典禮。1913年春，揚州“尊孔崇道會”在孔廟舉行祭祀，到會的人“大半蒼蒼白髮，豚尾猶存，其行禮時均三跪九叩首”。可見“孔教會”之類的組織，正是復辟分子藏汙納垢之所。曾經七次上書變法維新的康有為竟然在《請飭全國祀孔仍行跪拜禮》中說：“中國人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為？”又在《以孔教為國教配天議》中說：“中國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其留此膝以傲慢何為也？”一時間，全國上下尊孔復

古一派烏煙瘴氣。1915年江蘇青浦所舉行的“祝聖禮”規模更大，僅禮成後參與和詩者即達“千數百人”之多。這說明他們的復古活動並非完全沒有社會基礎，而反動影響頗大。

1915年袁世凱親自舉行祭孔活動和祭天儀式，他所進行的尊孔祭天一套儀式，完全是古代王朝更替的現代版。他為了表示他踐履帝祚的合法性而擺出來的“禪讓”姿態，便是源于《書經》中的堯舜傳說。他加封孔子的第76代孫“聖衍公”孔令貽為“郡王”。他命令小學必須開設儒學經典課程，而且堅持要把全部《孟子》編入初級小學的課程中。他在稱帝前寫道：吾國民愚昧不堪，民智甚低，民主自由之體制實不適吾國也。

1915年12月12日他公開復辟稱帝；此前稍早的日子裡，他簽署了後來引發“五四”運動的著名的“二十一條”。1916年6月6日，袁世凱病死，復辟並未終止。

黎元洪是孔教運動的堅決支持者。早在1913年9月，他電請定孔教為國教，認為“欲覺世牖民，其功必在立教”。“孔道一昌，邪說斯息。”1916年9月，黎元洪主政，憲法審議會召開，開始審議憲法草案，是否當以孔教為國教加入憲法再度成為審議的焦點，由此，激起了新文化運動宣導者對孔教運動的高度警覺。同年9月，陳獨秀創辦的《青年雜誌》改為《新青年》，陳獨秀、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正式舉起反傳統的大旗，由反對定孔教為國教，進而猛烈批判儒家文化，向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運動發起猛烈進攻。

1916年9月康有為在《時報》上發表致總統書說：“萬國之人，莫不有教，惟生番野人無教。今中國不拜教主，豈非自認為無教之人乎，則甘忍與生番野人等乎”。他極力主張“以孔子為大教，編入憲法，複祀孔子之跪拜明令，保守府

縣學宮及祭田，皆置奉祀官”。

1917年，張勳率領2000名辮子兵進京，康有為輔佐張勳復辟滿清。……

著名漢學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中觀察到，“儒學準確無誤地和當時所有復辟帝制運動建立了聯繫”。儒教就是中華專制思想的根本，是為專制復辟鳴鑼開道的精神法寶，是專制賴以復辟的政治法寶，更是專制已經實現復辟的一劑“思想保和湯”。

第59節 新文化運動 陳獨秀的轉折

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就是專制主義，而專制主義必然衍生出蒙昧主義。中國人家裡的堂屋中都供著有“天地君親師”的牌位，中國人歷來就生活在這一張從天到地，從朝廷到家庭無所不包的網羅之中，直不起腰來。所以，要趕上世界先進潮流，就是要引進作為專制主義對立面的“民主”與作為蒙昧主義對立面的“科學”。這個要求，陳獨秀在1915年在《青年》雜誌創刊號即已露其端倪。他揭櫫辦刊的宗旨為：(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青年陳獨秀參加過拒俄運動，加入過暗殺團，創立了安徽愛國會、岳王會等革命組織，辦過《國民日日報》、《安徽俗話報》等，自述辦刊十年風氣為之一變。辛亥革命後還擔任過安徽都督府的秘書長。1914年11月反袁失敗後，他再次東渡日本，和章士釗一起辦《甲寅》雜誌，第一次用“獨秀”的筆名發表了《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開宗明義提出：“人民何故必建設國家？其目的在保障權利，共謀幸福，斯為成立國家之精神。”為什麼要愛國？“愛其為保障吾人權利謀吾人幸福之團體也。”他提出要有愛國心，也要有自覺心。“惡國家甚於無國家”，如果是一個人民沒有權利、幸福可言的國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國之奴，

何事可怖”，引起輿論一片大嘩，不少人指責他不愛國。對於這一點，他後來在《每週評論》第 25 號發表《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一文，說得更清楚：“我們愛的是人民拿出愛國心抵抗被人壓迫的國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愛國心壓迫別人的國家。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

1915 年 9 月 15 日，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在第一期的《敬告青年》一文中他就明確提出科學與人權“若舟車之有兩輪焉”，“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他認為人權說是近代文明的三個基本特徵之一，不久他又進一步把人權擴大為民主。正是通過《新青年》這個平臺，他打出了“德先生”和“賽先生”（即民主和科學）這兩面大旗，發表了一系列振聾發聵的言論，橫掃千軍如卷席。除他本人之外，《新青年》還“以披荊斬棘之姿，雷霆萬鈞之勢”連續發表了胡適、吳虞、魯迅、李大釗、劉半農、錢玄同、高一涵、易白沙、周作人等人的文章，連魯迅都承認他那時候的創作是奉了陳獨秀的思想“將令”。胡適說過“當日若沒有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的精神，文學革命的運動決不能引起那樣大的注意”。正是陳獨秀率領千軍萬馬第一次向儒家學說、傳統道德，向文言文、舊文學發起了全面的、猛烈的衝擊，第一次大力提倡西方的“自由、平等、獨立之說”，張揚自由自尊的人格、獨立自主的人格，不是僅僅局限在政治層面，而是全方位地要引進新的文化、價值，開創了以現代文明為核心的新文化運動。可惜，這場以現代文明為導向，以民主、科學為旗幟的啟蒙運動前後僅僅持續了四年，就被它的宣導者自己親手扼殺了，這是“一幕奇特的歷史悲劇”。

陳獨秀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揭露“儒者三綱之說，……君為臣綱，則

民於君為附屬品，而無獨立人格矣；父為子綱，則子于父為附屬品，而無獨立人格矣；夫為妻綱，則妻于夫為附屬品，而無獨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為臣、為子、為妻，而不見有一獨立自主之人者，三綱之說為之也”。所謂名教、禮教都是擁護“別尊卑明貴賤”的制度。而“共和立憲制，以獨立平等自由為原則，與綱常階級制度為絕對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

陳獨秀說：“孔教與帝制，有不可離散之姻緣”。“蓋主張尊孔，勢必立君；主張立君，勢必復辟，理之自然，無足怪者”。尊孔幾乎就是復辟的同義詞，不論是袁世凱稱帝還是張勳復辟，都是在尊孔的名義下進行。袁世凱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只要這樣的文化一日不加以梳理，蕩舊滌汙；袁世凱二世、三世乃至無窮世，便會以不同的面貌繼續存在。

陳獨秀在袁世凱復辟後作的《我之愛國主義》中指出：“經數千年之專制政治，自秦政以訖洪憲皇帝無不以利祿奔走天下，吾國民遂沈迷利祿而不自覺，卑鄙齷齪之國民性由此鑄成。”陳獨秀在《駁康有為共和評議》中指出：“國為公有”和“非專制不能為治”的康有為自相矛盾。陳獨秀認為袁世凱廢除共和復辟帝制，“乃惡果非惡因；乃枝葉之罪，非根本之罪惡”。而那種“別尊卑、重階級、主張人治、反對民權思想”的儒家學說，才是“製造專制帝王之根本惡因”。“要鞏固共和，非先將國民腦子裡所有反對共和的舊思想一一洗刷乾淨不可”。陳獨秀說，“忠孝節義，奴隸之道德也”。因此，為爭取獨立人格，就必須廢除奴隸道德。“一切都應該採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麼國粹、什麼國情的鬼話來搗亂”。

當時有人責難陳獨秀：你所說的孔教是“指漢宋儒者以及今之號為孔教孔道諸會所依傍之孔教”，還是“指真正孔子之教”，並說孔教本來是好的，只是被

後儒所敗壞了。陳獨秀首先反問對方，漢唐以來諸儒為什麼“不依傍道法楊墨”，為什麼“獨與孔子為緣而複敗壞”他的學說呢？隨後證明“今之尊孔者，多醜詆宋儒”，其實把“孔門倫理道德”傳之後世的正是宋儒。孔孟儒學與後世儒學陳陳相因，萬不可借醜詆宋儒而頌揚孔孟。

陳獨秀在 1917 年 1 月 1 日說：“竊以無論何種學派，均不能定為一尊，以阻礙思想文化之自由發展。況儒術孔道，非無優點，而缺點正多。尤與近世文明社會絕不相容也。”

1916 年 8 月，李大釗寫了《孔子與憲法》，他說：孔子是“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所謂綱常，所謂名教，所謂道德，所謂禮義，那一樣不是損卑下以奉尊長？”儒家賦予了君主以天然的政治領袖和道德領袖的雙重權威人格，否定了民眾作為獨立政治主體存在的意義，在理論上堵塞了民主的產生。李大釗說：憲法是“現代國民自由之證券，專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當存於憲法”。“自由為人類生存必須之要求，無自由則無生存之價值”。自由的敵人，“惟皇帝與聖人而已”，“自我之解放，乃在破壞孔子之束制”。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第十九條竟然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這是對言論、出版和信仰自由的限制。如果將孔子入憲，則這樣的憲法“非為孕育自由之憲法；將為束縛民彝之憲法，非為解放人權之憲法也；將為野心家利用之憲法，非為平民百姓日常享用之憲法也。憲法與孔子發生關係，為最背於其性質之事實”。他建議于國會二讀時刪去此項，以全憲法之效力。1919 年 2 月 23 日李大釗在《每週評論》刊文說：“沒有全民普選，還配叫共和國麼？”

“五四”運動，按陳獨秀在 1942 年追悼蔡元培的文章中說，“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歸到哪幾個人。可是蔡（元培）

先生、(胡)適之和我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我們不妨看看他們當時“最尖端”的主張：

蔡元培主張“道德之精神在於思想自由”，他在 1917 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以後，以“思想自由，相容並包”的精神改造了北京大學，使之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

胡適主張：“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來的。”胡適是“文學革命”開第一炮的人，他自己也因此而“暴得大名”。中國新文學的開山大師魯迅，不但以其文學的天才刻畫出中國人在兩千年的專制主義下受扭曲的性格，如阿 Q 和《狂人日記》中的“我”，大大加深了新化運動的影響，而且也在思想戰線上樹起一面不朽的個人主義旗幟，而且在晚年和蔡元培、宋慶齡一起組織保衛人權大同盟，為確立和發揚中國的民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陳獨秀主張：“思想言論之自由，謀個性之發展也。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也。個人之自由權力載諸憲章，國法不得而剝奪之，所謂人權也。人權者，自非奴隸，悉享此權，無有差別。此純粹個人主義之大精神也。自唯心論言之，人間者，性靈之體也；自由者，權利之實行力也。所謂性靈，所謂意志，所謂權利，皆非個人以外之物。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名與個人主義相衝突，實以鞏固個人利益為本因也。”1919 年陳獨秀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號上發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辨書》說：“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大家平心

細想，本志除了擁護德、賽兩位先生這外，還有別的罪案沒有。請你們不要專門非難本志。要有氣力，有膽量來反對德、賽兩先生，才算是好漢，才算是根本的辦法。”

1919年6月9日，“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北京大學的前文科學長，竟然親自出手去散發《北京市民宣言》的傳單，結果被捕入獄，引起舉國震驚，青年毛澤東在湖南高聲喊出“陳君萬歲”，“我祝君至高至堅的精神萬歲”。在各界營救下陳獨秀於9月16日出獄。1919年11月他還說“我們現在要實現民主主義（Democracy），是應當拿英、美做榜樣”，到1920年他就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他說：“德謨克拉西是資產階級的護身符、專有物”，民主主義是資產階級“拿來欺騙世人把持政權的詭計”，“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錯而特錯”，“民主主義只能夠代表資產階級”。“只有用階級戰爭的手段，打倒資產階級，從他們手中奪得政權，並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建設勞動者的國家”。民主啟蒙運動就此告終，他的宣導者和送葬者都是陳獨秀。

“5.4”運動雖然喊出了“民主”和“科學”，但民主仍是作為強國的手段而被強調的。當他們發現民主不能迅速強國時，民主就被獨裁的口號所代替了。所以，高舉“愛國主義”旗幟的“5.4”運動，既沒有救了國，更沒有救成人。陳釋放後，就轉入了馬列主義，主張無產階級獨裁，放棄了民主，這可以說是中國專制文化在他身上復辟了。

1921年、1922年陳獨秀因為建共產黨兩次在上海租界被捕，在各界朋友（如胡適等）的關注下，關押時間都很短。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在國民黨巨額懸賞他的上海隱居多年後，終於第四次被捕。國民黨各地黨部、省主席、司令

等紛紛致電要求予以嚴懲，共黨對陳獨秀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罵他為資產階級走狗。蘇區《紅色中華》報 1933 年 5 月 8 日的報導《托陳取消派向國民黨討饒》稱，陳被捕後“頗得國民黨當局青睞”，“對國民黨更願表示‘五體投地’以為‘報德’”，受審時，陳“服服帖帖”，“跪在國民黨法庭面前如此討饒”，王觀泉先生評論說，這是“歪曲事實真象，羅織人罪，影響極壞”，尤以陳獨秀“向國民黨法庭討饒”這篇“最為惡劣”，“令人齒冷”。

但陳獨秀也並不為舉國所棄，他在《甲寅》時的同伴章士釗出庭為他辯護，他在北大、《新青年》的同伴和學生胡適、傅斯年等紛紛站出來為他說話，羅家倫、段錫朋等都曾到獄中看望他，給予了他人性的溫暖。1933 年 4 月公開開庭審判，他自己在法庭上更是慷慨陳詞，不失“五四”當年的丰采。他的自辯詞，即便今天讀來依然讓人拍手稱快，針對指控他“叛國”、“危害民國”的罪名，陳獨秀一針見血地指出國家是土地、人民、主權的總和，“若認為政府與國家無分，掌握政權者即國家，則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國家’之說，即不必為近代國法學者所摒棄矣。若認為在野黨反抗不忠於國家或侵害民權之政府黨，而主張推翻其政權，即屬‘叛國’，則古今中外的革命政黨，無不曾經‘叛國’，即國民黨亦曾‘叛國’矣。袁世凱曾稱孫、黃為‘國賊’，豈篤論乎？！”他在法庭上抨擊國民黨政府“以黨部代替議會；以訓政代替民權……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權利，高居人民之上”。他說民國就是共和國，“若認為力爭人民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信仰等自由權利，力爭實現徹底民主的國民立憲會議以裁判軍閥官僚是‘危害民國’，則不知所謂民國者，應作何解釋？”章士釗是當時名動全國的大律師，他為陳獨秀作無罪辯護：“現政府致力於討共，而獨秀已與中共分揚，余意已成犄角之勢，乃歡迎之不暇，焉用治罪為？”用意無非是為他開脫，但陳

獨秀當庭聲明“章律師辯護詞，只代表他的意見，我的政治主張，要以我的辯護為準”。這才是陳獨秀的人格風範，當時即贏得旁聽席上的讚譽聲。結果他“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被判處有期徒刑 13 年。他的自辯和章士釗的辯護詞在天津《益世報》全文登載，其他報紙也紛紛報導，一時轟動全國。曾出版過《獨秀文存》的亞東書局公開出版了陳案的資料彙編，還被上海滬江大學、東吳大學選為法學系的教材，這些事竟然都發生在 1933 年陳獨秀被判刑的當年，可能也讓後人感到驚訝。在南京獄中，他利用國民黨的優待條件，大量閱讀古今中外的書籍，潛心研究中國古代的語言文字、孔子、道家學說等等，完成了不少有價值的學術著作，尤其是對民主的思考與反省，逐步回到了五四的軌道上。

第 60 節 革命黨人和孫中山獨裁等級論

革命黨人一方面抨擊專制制度，為民主、自由、共和、革命奔走號呼，另一方面心裡卻仍揣著與民主、自由相悖的孔孟之道不放，甚至將孔孟之道與民主自由混雜一起，當作革命理論向民眾宣傳。鄒容的《革命軍》是當時革命理論中最響亮的號角，《革命軍》高呼“我中國欲獨立”，“欲與世界列強並雄，不可不革命”。同時它又疾呼：“中國之有孔子，無人不尊崇為大聖人也。曲阜孔子廟，有人人知為禮樂之邦，教化之地，拜擬不置，如耶穌之耶路撒冷也。乃滿人割膠州於德，而請德人侮毀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遺教之地，生民未有神聖不可侵犯之孔子之鄉，使神州四萬萬眾，無教化而等倫於野蠻。是誰之罪與？夫耶穌教新舊相爭，猶不惜流血數百萬人，我中國人何如？”

陳天華，《警世鐘》、《猛回頭》的作者。1905 年因抗議日本“取締清韓留日學生規則”，而在日本大森海灣投海自殺，臨終前寫有《絕命書》。《絕命書》中說：“今日死之，使諸君有所警動，去絕非型，共講愛國，更臥薪嚐膽，刻苦求

學，徐以養成實力，丕興國家，則中國或可以不亡。此鄙人今日之希望也”。其中又說，“如謂宗教必不可無，則毋寧仍尊孔教。”

鄒容、陳天華乃是革命隊伍中最剛烈、最勇猛、沖在最前頭並為革命奉獻出年輕寶貴生命的兩位鬥士，他們的思想中尚且有如此多的“傳統”，就遑論其他的革命黨人了。

正是由於自身對民主、自由認識的糊塗，並將革命不同程度地理解為改朝換代；使得滿清皇帝下臺後，許多革命同志認為完事大吉，產生功成身退、消極歸隱的思想，紛紛脫離同盟會；甚至使得光復會創始人陶成章被自己革命黨人所暗殺，同盟會因而陷入混亂、分裂的狀態。正是由於自身對民主、自由理解的膚淺，使得革命不徹底，急於求成，流於形式；坐視起義獨立的諸省的政權被舊官僚們搶去；使得革去的僅僅是“衙門”、“縣太爺”“把總”等舊稱謂，使得革命最終淪為新瓶裝老酒、換湯不換藥的表面文章。

中國人的缺陷，孫中山也看得很清楚，他不否認中國人是所謂“一盤散沙”，不否認中國人缺乏自修的工夫和基本的社交禮儀。他始終堅把國民性缺陷歸結為民權缺乏。在 1897 年所作的《倫敦被難記》中，孫中山這樣描述中國人的處境：“無論為朝廷之事為國民之事，甚至為地方之事，百姓均無發言或與聞之權”，而根源則在於統治階級“堵塞人民的耳目，錮蔽人民之聰明”。中國人的政治思想十分薄弱，在孫中山看來，原因是除了納糧以外，百姓和皇帝根本沒有任何直接關係。但孫中山的改造路徑與嚴復、梁啟超均不同。如果嚴、梁乃至後來的新文化運動人士均主張緩慢地教育啟蒙、文化轉化，孫中山則更偏重直接以政治參與來訓練民眾。在他看來，教育不是民主的先決條件，因為民主本身就是一種教育。

國民性的缺陷抑或“程度不足”容易成為維持或復辟專制的絕好藉口，孫中山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因此他指出：“袁世凱之流必以為中國人民知識程度如此，必不能共和，曲學之士亦曰，非專制不可也。嗚呼，牛也尚能教之耕，馬也尚能教之乘，而況於人乎？”這裡所指出的“曲學之士”正是嚴復、楊度等人。他們與孫中山相比，在針砭國人缺陷方面並無差別，所看到的問題也大同小異，但角度和解決辦法卻大相徑庭。首先，孫中山並沒有過度強調這些缺陷的“中國特色”，而是從積極的角度著眼於“人”的普遍性。既然人類都能也必須學會理性的政治生活，中國人怎能例外？第二，孫中山絕不相信中國人內在地欠缺政治能力。中國人固然如楊度所說以家族為中心，但是孫中山卻樂觀地認為，中國人中的宗族團體和家鄉基礎是兩個“好觀念”，以此做基礎，“很可以把全國的人都聯結起來”。為梁啟超深惡痛絕的致公堂等華僑秘密會社，成為孫中山共和革命的盟友。第三，孫中山主張吸取傳統和西方文明中好的方面來積極改造國民性，在個人修養、社交禮儀方面，他認為應該學習外國人的新文化，並難能可貴地創作《民權初步》，以詳盡的技術細節來教導國民行使民權，但同時又不主張全盤拋棄傳統，而是鼓勵發揚傳統中的固有美德。第四，作為“實行家”的孫中山相信制度的積極作用。嚴復、梁啟超等人都已經意識到的地方自治問題，孫中山決意以政治手段加以推進。孫中山所進行的確實是一種更積極和正面且極富遠見的啟蒙。

孫中山能一眼洞穿國民的帝王思想是何等地荒誕。孫中山在“同盟會宣言”中發誓：“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1910年1~3月，孫中山指出：“吾知推倒滿清，可告成功，但建立中華民國基礎甚遠；滿清帝國一倒，中國人人皆抱皇帝思想，此後中國民族歷史，其中不知經過多少帝制、軍人專制途徑，乃獲

真正民國之望。吾頗欲為中國人民，上一尊號，名曰帝民，人欲做皇帝之願望也。”

又說：“他日中國排滿成功，所憂患在帝王思想，名非帝王，擁兵造亂，有過帝王者，是吾之大患也。”帝王制度雖在 1911 年的辛亥革命中被推翻，但袁世凱、張勳復辟帝制的歷史醜劇、鬧劇，證明帝王思想仍活躍在很多人的心裡。

1923 年孫中山歎道：“現代民國災患禍害的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第一個是大清帝國留下來的老官僚武人，還沒有肅清。從前革命黨推倒滿清，只推翻清朝的一個皇帝，但是推翻那個大皇帝之後，便生出無數小皇帝來，象現在各省的督軍師長和北京的總統總長，都是小皇帝。那些武人官僚都是大清帝國留下來的，只知道做官，他們的思想純粹是做皇帝的思想，他們有了兵，便胡行亂為，象袁世凱擁兵最多，便自己稱皇帝。如果擁兵較少的，雖然不敢自己做皇帝，只要有了三、五千兵，便想反叛民國，恢復舊制度。那些恢復舊制度的行為，就是實行專制，就是專制時代小皇帝的行為。所以說到民國以來，我們革命黨只推翻大皇帝，那些小皇帝還沒有推翻，故民國徒有民國之名，仍受專制之實。”

孫中山還全面地總結了中國歷史上的經驗：“外國嘗有人因宗教而戰，自由而戰的，但中國幾千年以來所戰的卻是為皇帝一個問題。”他認為太平天國之敗，敗在眾王都爭做皇帝。“中國向來沒有為平等自由起過戰爭，幾千年來歷史上的戰爭，都是大家要爭皇帝。只有此次我們革命、推翻滿清，才是不爭皇帝的第一次。但是這種不爭皇帝的思想，只限於真革命黨以內的人才是。說到革命黨以外，像北方的曹錕、吳佩孚，名義上雖然贊成共和，但是主張武力統一，還是想專政。如果他們的武力統一成功，別人不能夠反抗，他們一定是想做皇帝的。將來沒有人敢擔保這種危險不發生。”“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來同志就要打同志，二來本國人要打本國人，全國長年相爭相打，人民的禍害，便沒有止境。”

他嘲笑陳炯明宣揚自己夢見懷抱日月（合為“明”字），也有帝王之夢的荒唐。

“所以中國的革命，至今沒有成功，就是因為做皇帝的思想沒有完全剷除，沒有一概肅清。我們要把這種做皇帝的思想完全剷除，一概肅清，就不得不再來奮鬥，再來革命。”

嚴復等人以為中國人因為缺陷太多所以需要帝制勉力加以維持。孫中山指出，帝王心理本身就是最大和最需要革除的國民缺陷與弊病。“曠代逸才”楊度在1914年致袁世凱的一篇謝辭，就已經沿用諸葛亮《出師表》中的話自稱“臣本布衣”，而此時袁世凱尚未稱帝。楊度內心深處根深蒂固的“為帝王師”的陳舊觀念是不爭的事實，其師從之經學大師王闈運就是一名醉心於“帝王之學”的儒者，曾勸曾國藩稱帝以輔佐之而遭曾文正堅拒。王闈運之慫恿曾國藩，楊度之吹捧袁世凱，恍如漢代劉歆之捧王莽，這中間無疑都是帝王思想作祟。楊度因為個人的“知遇之恩”而甘願為袁世凱驅馳，這何嘗又不是一種深陷其中而不自知的奴性。楊度的後人楊念群教授精闢地將楊度的世界觀總結為“十九世紀末一名湖南普通鄉紳的世界觀”。自由主義的大師胡適，接到廢帝宣統的一個電話，馬上就受寵若驚，見了宣統就口稱“皇上”。以致於後來通電反對馮玉祥發動的驅逐溥儀出紫禁城的“北京政變”（他在1915年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時，曾就袁世凱稱帝一事，寫過反袁文章）。

不幸的事，孫中山依然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惰性的一面——等級特權的專制思想。“凡於革命軍未起義之前進黨者，名為首義黨員；凡於革命軍起義之後，革命政府成立以前進黨者，名為協助黨員；凡於革命政府成立之後進黨者，名為普通黨員。”這三類黨員享有不同的權利：“革命成功之日，首義黨員悉隸為元勳公民，得一切參政、執政之優先權利；協助黨員得隸為有功公民，能得選舉及

被選舉權利；普通黨員得隸為先進公民，享有選舉權利。”而“非黨員在革命時期之內不得有公民資格”（程思遠《中國國民黨百年風雲錄》）。國民革命追求的是為黨謀取特權，使黨員成為特權階層，而不是為全體國民謀利益。

孫中山認為在中國爭取自由、平等和民主不是緊迫的任務，要緊的是發財。1924年他認為中國人不是自由太少，而是自由太多，所以才一盤散沙。“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充分的自由”，“用不著爭自由”。“歐洲一二百年前為自由戰爭，當時人民聽到自由便象現在中國人聽到發財一樣。……因為中國現代到了民窮財盡的時代，人民所受的痛苦是貧窮；因為發財是救窮的獨一無二的方法，所以大家聽到了這個名詞便很歡迎。”不錯，在中國是有許多人只想發財，對自由民主沒有要求，但是孫中山忽視了一個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孔教的作用，使許多人失去獨立的人格意識。只要孔教還存在于廣大人群的頭腦中，儘管沒有皇帝了，社會還會按專制秩序運作。孫中山說的中國人太自由不是西方意義上的自由，而是西方所反對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孫中山在誤解自由的同時也對它產生了恐懼感。他宣稱：“我們的革命黨，向來以三民主義去革命，不以革命去爭自由”。

孫中山追求的民權主義只是全體人民對政府的直接監督之權，絕不是個人自由，也不是政府體制上的分權制衡。民族主義一旦與民主主義結合在一起，就很可能把民主政治中的專制傾向表現出來，人民主權的概念就很可能被置換為“民族至上”和“統一至上”，民族主義因此成為暴政的發源地。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極其狹隘，只注重民族的獨立而缺乏個人獨立個人自治地方自治的觀念。這種理論導致了對外孤立於世界、對內則實行專制強權統治。

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1914年7月孫中山將一個原本已經很有西方政黨色彩的國民黨，改造成幫會式的中華革命黨，所有黨員分出等級，都要對他絕對

效忠，還要打指模宣誓。當年幾位國民黨同志如黃興、陳炯明、柏文蔚、鈕永建、李烈鈞等均因此拒絕參加入這個樣子的新黨。這套倒行逆施的行為是孫中山當年在檀香山致公堂（洪門）做洪棍時學來的。

所以，真的國民黨，是民國元年（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成立，由四個政黨併入同盟會組成的國民黨；孫中山為理事長，宋教仁曾任過代理理事長的國民黨。到了1914年之後，孫中山為“黨魁”，要人宣誓向他個人表示效忠服從的國民黨，已是一個變質的國民黨。到了1924年，改組蘇化後的國民黨，與蘇俄的共產黨一樣，不是一個真的政黨。這個假政黨出胎後不到一年，即有廣州“西關屠城”，焚斃無辜平民過千人的慘案發生。

1922年，孫中山說：“近來俄國新發明了一種政體，這種政體不是代議政體，是‘人民獨裁’政體，……比代議政體改良得多”。“俄國革命6年，其成績既如此偉大；吾國革命12年，成績無甚可述。故此後欲以黨治國，應效法俄人”。“現尚有一事可為我們模範，即俄國完全以黨治國，比英、美、法之政黨握權更進一步；我們現在並無國可治，只可說以黨建國。待國建好，再去治他——我以為今日是一大紀念日，應重新組織，把黨放國上。”因此，“法美共和國皆舊式的，今日唯俄為新式的；吾人今日當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國”。提出要抑制“舊式的”個人主義和個人自由，強調國家的絕對自由。至此，孫中山的“民權主義”已經抽去了歐美現代憲政的宗旨和基石。

國民黨“一大”提出“民主集權制”，就是民主+個人集權。儘管有民主做修飾，但無法消除集權的本質。孫中山是黨的總理，是黨代會的主席、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主席，對黨的全國大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有覆議和最終決定之權，黨員必須服從總理指導。總理的任期是無限的，並對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成員進行

指定和任命。

1924年4月12日，孫文手書《國民政府建國大綱》，提出了中國民主要經過三階段，即先“軍政”（3年）、“訓政（6年）”，然後才實行“憲政”民主。孫中山將人分為“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及不知不覺”三大類和聖、賢、才、智、平、庸、愚、劣八等作為其訓政理論的依據。他有時把革命黨比作母親，把人民比作嬰兒；有時又把革命黨比作諸葛亮，把人民比作阿斗。孫認為：“中國奴制已行了數千年之久，所以民國雖有九年，一般人民還不曉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夫中國人民知識程度之不足，固無可隱諱者也。且加以數千年專制之毒深中乎人心，誠有比于美國之黑奴及外來人民知識尤為低下也”（孫中山《建國方略》）。中國人素質低下，還無法自治，需要有人替他們“做主”。訓政就是以“先之先覺之革命政府”和政黨，去訓導人民使其懂得自己是共和國的主人，以及怎樣做主人，甚至“要用些強迫的手段，迫著他來做主人”。“中國人民今日初進共和之治，亦當有先知先覺之革命政府以教之。此訓政之時期。所以為專制入共和之過渡所必要也”。他講的訓政，主導權掌握在政府和政黨手裡，這樣就把民主當作是政府和政黨給人民的恩賜。孫中山的訓政，讓政黨掌握“訓權”，讓人民承擔“聽訓”的義務，如何“訓政”和“聽訓”，全由政黨規定。什麼叫“先之先覺”，全由“革命黨”說了算，人民群眾什麼時候才能達到“先知先覺”的水準呢？6年真的夠嗎？這就留下了後遺症，後來的蔣介石政府一再以孫中山的訓政思想為依據，提出由於內亂未平息，人民無文化不懂得民主政治，所以訓政需延期，反對其他黨派和民眾要求儘快建立憲政的正義呼聲，訓政變成了獨裁者反民主的擋箭牌。

孫中山明確提出了在訓政時期由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代替”人民行使一

切權力。一經地方自治完成，執政黨將還政於民，國家將進入憲政階段。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以法律條文的方式明確頒佈了“黨放國上”、“以黨治國”的一系列原則：在革命政黨的原則下，不但不許他黨過問政治，而且亦不容許他黨合法的存在，所以理論上在訓政時期全國只有中國國民黨為唯一合法的政黨；訓政時期施行約法之治，其法由黨制定；訓政時期，政府由黨產生，對黨負責；訓政時期由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替國民大會行使政權；治權之行政、立法、司法、監督、考試五項，付託於國民政府總攬而執行之。1928年10月4日公佈《訓政綱領》，但直到國民黨逃離大陸，訓政也還未結束，“民國”變成“黨國”，是民主的倒退，是專制的復辟。孫中山沒有充分看到人民群眾在爭取民主的革命鬥爭中，是能夠自己提高民主覺悟的，他對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以來民眾在民主運動的基本作用估計不足，這也使得他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前的革命鬥爭中不注意發動群眾，導致革命一再失敗。

1920年代中後期，蔣介石把“三民主義”確立為全國的“中心思想”，宣稱“思想統一，比什麼都要緊”。他強調紀律時說：“黨要我們生，我們就可以生；黨要我們死，我們就要去死”；“黨員所有的一切都要交給黨，交給領袖”；“黨員要有服從性，不能有一點自由”。在黨外，宣揚愛國主義和領袖崇拜；宣揚“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力量集中，意志集中”和“為國家盡大忠，為民族盡大孝”的口號。蔣既排拒自由主義，又痛斥共產主義，其指導思想是儒教。1934年國民黨政府恢復了官方的孔子誕辰紀念。在1938年3月召開的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仿效納粹的做法，公開提出“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口號。1940年初發表《中國之命運》，說“今日的中國，沒有了中國國民黨，那就是沒有了中國。”標誌著國民黨一黨獨裁，已經進入它的巔峰狀態。抗戰勝

利之後，還在南京演出了一場獻九鼎的個人迷信的國粹醜劇。蔣介石公開說：“無論專制國家、民主國家，乃至社會主義國家，都必須有一個元首或領袖。在帝制國家裡，稱為皇帝與天子；民主國家，便稱為大總統與主席。名義雖不同，而其為代表國家的首領則一。所以《大學》裡的天子，我們可以廣義解作國家之首。”大家知道，皇帝作為國家元首和總統作為國家元首，其性質是根本不同的。皇帝有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而總統只有行政權。更重要的是皇帝背後有“君權天授”的價值觀念支撐；總統背後的價值觀念卻是“主權在民”和“憲法至上”。皇帝有權力說：“朕即國家。”總統無權力說“我即國家。”蔣介石到死都實行“軍政”，最後把權力傳給了兒子。可見，極少數的人把持的政權是永不會使民眾得著現代政治的訓練的。

1929年，國民黨給孫中山在南京修建了總理“陵園”；為孫中山遷墓舉行的儀式稱為“奉安”大典。大家知道，“陵”是中國帝王的墳墓的稱謂；“奉安”大典是中國帝后安葬及神主遷廟的典禮。蔣介石和其國民黨把孫中山視作皇帝，這不僅暴露了蔣等的帝王思想，而且是對孫中山一貫反對帝王思想的嘲諷和背叛！北京的毛澤東紀念堂和臺北的蔣介石紀念堂實際上都是變相的帝王陵墓，它們雄辯地證明帝王思想仍然盤踞在中國人的靈魂裡。

第 61 節 中國人在人權、民主上的誤區

1. 康、梁、袁、孫、鄧都剝奪了人的“天賦人權”

康有為、梁啟超是近代中國傳播西方思想的先驅，但康有為認為在中國實行民主不合實際，讓百姓民主猶如“程度未至而超越為之，猶小兒未能行而學竊牆飛瓦。”康先生主張君民共主。孫中山也不主張立即給公民以權利，更反對給公民以自由。在他看來，中國人的素質太低，“初次脫去奴隸的地位忽然升到了主

人的地位，還不知道做主人的方法，實行民權，所以他們更目無主人，胡行亂為。”毛澤東依靠農民取得政權後又不信任農民，認為農民只能被領導，不能做主。所以他提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由於對國民的不放心，總是強調“我們主張有領導的自由，主張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可見，“公民素質低”的認識是中國長期以來發展民主的重要理論障礙。

人權的核心內容是自由選擇權，它是屬於每個人的天賦權利，和貧富、種族、性別、學識等等都沒有關係。從這個理論出發，才能產生民主選舉的制度。天賦人權論表明，民主制度是沒有先決條件的，在任何社會環境下都可以實行。西方思想家著眼的不是“新民”、“舊民”，而是“人”。只要是人，就應享有人權。之所以說人權是上帝給的、與生俱來的，就是強調它的絕對性，強調對它的擁有是沒有任何先決條件的，任何統治者都不可用任何藉口來剝奪這種權利。無論博士還是文盲，在“天賦人權”的理論下都有平等的權利，根本不存在等成了“新民”後才可投票選舉的邏輯。

如果說中國文化特殊，那臺灣就是最好的反證。同樣在中國文化背景下，2300萬臺灣人民已三次選“總統”，無數次的選議員和縣市長。臺灣今天走向憲政，並不是由於蔣家父子的“軍政”“訓政”塑造了“新人”之後才產生的，而是人民反抗專制的結果。

中國不是因為落後而不能搞民主；中國是因為沒有民主才如此落後。人們愚昧落後才更需要實行民主，因為民主實踐可以讓人們擺脫愚昧；民主過程的本身可以讓人們儘快的掌握民主的方法。民主是人的天然要求，它與人的素質沒有什麼關係；相反，人的高素質是自由民主活動的結果。在當今世界，自由民主制度，而且也只有自由民主制度，才是增強國家的實力，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

準的最根本的出路。

2· 只要統治者可收回人民的政治權利，就可永遠不再把這種權利還給人民

歷史證明，沒有任何專制者會主動把權利還給人民。那時候再哭民主，就束手無策。統治者以為民眾謀溫飽為由，剝奪人民的選舉權來保持專制，理所當然符合他們的利益邏輯。

知識份子主張“新民說”，謀求在開明專制下進行改革，結果是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到了統治者的一邊，使專制有了繼續存在的理論基礎，結果“開明專制”變成了永久的專制。

中國知識份子總是把對民族、國家的忠誠落實到對皇權的效忠上。從康有為、嚴復、梁啟超到陳獨秀、李大釗再到當代中國知識界的反抗，皆以尋找開明獨裁者為歸屬。即便是最具自由主義色彩的胡適，在政治制度的選擇上，也是偏向於“好人政府”；即便象魯迅這樣的虛無主義者，也想在左翼文藝運動中充當領袖乃至文壇霸主。

最有效的人權訓練，是開放政權，使人民得到民主政治訓練。1945年國共重慶談判時期的爭論：共產黨當時要國民黨開放政權，實行民主。當時國民黨認為中國人民素質太低，實行不了民主；而共產黨的反論是：要學會游泳只有跳下水裡去才能學會，不實行民主，人民的素質永遠不會提高。奇妙的是，半個世紀過去了，國民黨的論點現在成了共產黨的論點。

這裡面的道理很簡單：當你想奪權時，最好的旗號是：普選。當你不想被奪權時，最好的旗號是：那些人素質那麼低，讓他選他也不會。

3· “開官智”才是中國政治改革和其它各項改革的關鍵

胡適在1929年《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一文中指出：孫中山在民國13

年以後放棄自己的約法思想，只講軍政和訓政，由國民黨和政府來訓練人民，這是不相信人民有在約法和憲法之下參政的能力：“人民需要的訓練是憲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與黨部諸公需要的訓練是憲法之下的法制生活。‘先知先覺’的政府諸公必須自己先用憲法來訓練自己，制裁自己，然後可以希望訓練國民走上共和的大路。不然，則口口聲聲說‘訓政’，而自己所行所為皆不足為訓，小民雖愚，豈易欺哉？我們不信無憲法可以訓政，無憲法的訓政只是專制。我們深信只有實行憲法的政府才配訓政”。“我們實在不懂這樣一部約法或憲法何以不能和訓政同時存在。我們必須要明白，憲法的大功用不但在於規定人民的權利，更重要的是規定政府各機關的許可權。立一個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機關不得逾越他們的法定許可權，使他們不得侵犯已人民的權利——這才是民主政治的訓練。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訓練，政府也需要訓練。人民需要‘入塾讀書’，然而蔣介石先生、馮玉祥先生，以至於許多長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夢見共和政體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讀書’罷”。胡適強調“民主政治本身就是最好的訓練”，憲政是最符合人的本性的，它不是高渺的理想；不僅僅是人民大眾需要接受民主訓練，政府官員更需要接受訓練；要訓導政府這頭猛獸按遊戲規則辦事，訓導的要點不外乎三點：限制權力，行政中立，接受監督。

中國過去有句老話，“只有落後的領導，沒有落後的群眾”；中國落後的原因即在此。如果人民沒有素質實行民主的話，那麼這些專制精英就更無“素質”實行專制，因為大國的集權管理比民主管理需要更高的智慧和善良，如果沒有這種智慧和善良，就只能運用暴力和謊言，他們的確正是這樣做的。

中國之所以自己開不出憲政，移植憲政又不成功，就因為一群為民作主的“好人”以“民智未開”而主張集權教化人民，看似有理，實際上是一個禍害致

深的偽命題。

“民智未開”並不構成政府干預的正當理由，因為政府並非全知全能，在中國行憲前，不會存在一個憲政素養良好的官吏集團足以示範教化人民，因為官吏和人民一樣只有在憲政的環境裡才能逐步培養憲政素養並提高參政議政的能力的熱情。

人民沒有行憲的熱情和能力，或憲政一開就導致自由濫用、縱欲敗道等諸現象，這並非“民智未開”，而是憲政制度尚未產生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這是行憲初期的必然現象；而政府一旦熱衷干涉，可能會返回專制狀態。

以民智未開而行訓導教化政策，必然用權至極並視人民為掌中可任意揉搓的試驗品。其無法避免的結局是：政府打著人民的旗號反人民，官吏以行公益之名中飽私囊。“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腐化”，因此，政府用以反對惡的手段也容易變成惡，成為惡的手段。

事實表明，不管是清政府，還是國民政府，或共政府，其民主意識都比他們所反對的民間社會活動家要低得多。再加上當權者對權力的貪戀，指望他們去推動憲政、實行民主，無異南轅北轍、與虎謀皮。

今日中國的現狀是“民智初開，官智未啟”，啟蒙的主要任務是啟執政黨之蒙。中國民主化的主要障礙，既不是中國民眾的民主覺悟不高，也不是中國民眾不懂得實踐民主，而是執政黨壟斷政治權力、阻止中國民眾享受正常的自由民主權利。只有以人權民主思想啟執政黨及黨國官員之蒙，這樣的啟蒙才是對症下藥。

4·他們的根本錯誤都是把社會穩定、國家強大作為優先選擇，而忽視和犧牲了人的自由和人的政治權利這種更根本性的價值。

西方思想家強調自由思想，是把人作為目的，把人的自由作為終極目標，把國家作為維護個人人權的工具。美國《獨立宣言》，沒有一個字談到要把美國建成強大的國家，全篇主要是談個人的權利和自由，美國卻成了當今世界唯一最強大的國家。道理很簡單：只有自由而強大的個人，才可能結出繁榮而強大的國家這個“果”。

嚴複似的倒果為因的強國論引起共鳴。當時一批名士都認為強國比自由、民主更重要。

九一八事變後，一部分知識份子對日本的侵華野心非常擔憂，因此主張儘快實現統一，哪怕是以武力統一的方式，以便凝聚國力。1933年胡適在《獨立評論》的發刊詞中說，“目前在中國提倡天賦人權、主權在民等理論，不但無益，而且有損。”“短時期的專制反可成為達到民主政治的途徑。”1933年12月至1935年2月間，丁文江、蔣廷黻、錢端升等人連續在胡適主編的《獨立評論》上發表文章，鼓吹專制與集權，在中國實行德國式的獨裁統治，反對英美民主政制。時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的蔣廷黻在《獨立評論》八十號上發表了《革命與專制》的文章。蔣廷黻認為，當時中國之所以內戰頻仍，國家無法真正統一，其原因就在於未像能英國、法國、俄國等國那樣，經歷過“十六世紀的頓頭朝的專制”、“二百年布彭朝的專制”和“羅馬羅夫朝三百年的專制”，因此，惟有先經過一個“專制建國”階段，國家才能有效地走向近代化。“西洋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當作學術來研究是很有興趣而且是很有價值的，當作實際的政治主張未免太無聊了”。他在隨後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又說：“以個人專制來統一中國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的可能性高，因為中國人的私忠既過於公忠，以個人為中心比較容易產生大武力。即使現在的專制只是二千年來專制的延續，但是因為現在有

了科學與機械這兩個東西，儘管政府完全無為，只要它能維持治安，這兩個東西就要改造中國，給它一個新生命。” “我以為唯一的過渡方法是個人專制”，“個人的專制來統一中國的可能比任何其它方式可能性較高”。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吳景超在《獨立評論》八十四號發表《革命與建國》一文，稱從中國歷史上找到了一個治亂迴圈的法則，即一個週期的三個階段：自苛政至人民不安、至革命到現狀推翻；自群雄相爭至天下統一；自善政至和平恢復。進而斷言：當時中國二十多年仍未跳出第二個階段，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統一問題。而統一，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例外，都是以武力的方式而完成的。

時任天津《益世報》社論主筆的錢端升也在《東方雜誌》第 31 卷第 1 號上發表《民主政治乎？極權國家乎？》，與蔣、吳相呼應，提倡獨裁統治，“因為獨裁是一種強有力的制度”，“對內可以消除各種職業及各階級無謂的紛擾及自相抵制”，“對外則可以舉全國的力量以應對國際間的經濟鬥爭”。他在分析了當時歐洲民主政治之所以衰頹的原因後說：“一切制度是有時代性的。民主政治在五十年前的英國尚為統治階級所視為不經的危險的思想；但到了 1900 年以後，即保守黨亦視為天經地義了。我們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個——本是受過民主政治極久的薰陶的，這些人對於反民主政治的各種制度自然看了極不順眼。但如果我們要使中國成為一個強有力的近代國家，我們恐怕也非改變我們的成見不可。”

1934 年年底，胡適在《東方雜誌》32 卷 1 號上發表《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一文。文中表示，這場未經任何“策劃”的論戰，完全是在當年“國難”這一背景下自覺進行的。幾天後，他的好友丁文江在《大公報》上發表《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批評胡適“民主憲法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宜於

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的說法“是不可通的”。丁文江認為，“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獨裁政治更大”，中國應當“試行新式獨裁”。胡在給丁的一封信中憤慨地說：“你們這班教孫升木的學者們，將來總有一天要回想我的話。那時我也許早已被‘少壯幹部’幹掉了，可是國家必定也已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時你們要懺悔自己的誤國之罪，也來不及了！”1935年1月20日，丁文江以《再論民治與獨裁》一文答，批評胡適“忘記了今日中國政治的實際了，‘孫’也罷，‘三歲小孩’也罷，木已經升了，火已經放了，我們教不教是毫無關係的。”

“惟一的希望是知識階級聯合起來，把變相的舊式專制改為比較新式的獨裁”。

“新式的獨裁”須具有四個條件：獨裁的首領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要徹底瞭解現代化國家的性質；要能夠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才；要利用目前的國難問題來號召全國有參與政治資格的人的情緒與理智，使他們站在一個旗幟之下。丁文江這樣表白自己的心態：“我少年曾在民主政治最發達的國家讀過書的。一年以前我又曾跑到德意志蘇俄參觀過的。我離開蘇俄時，在火車裡我曾問我自己：‘假如我能夠自由選擇，我還是願意做英美工人，或是蘇俄的知識階級？’我毫不遲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問道：‘我還是願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蘇俄的地質技師？’我也會毫不遲疑的答道：‘蘇俄的地質技師！’在今日的中國，新式的獨裁如果能夠發生，也許我們還可以保存我們的獨立。要不然只好自殺或是做日本帝國的順民了。”

當時小學考試有道選擇題，“最好的制度是君主、民主、還是獨裁？”正確的答案竟是“獨裁”。然而，任何專制體制一經確立、運作，權力必然不受限制，就天然地步步擴張，每一步的擴張，總是以公民私權的喪失為踏板，直至權力完成了對每一個私權領域的血淋淋的侵佔為止。在這個意義上，專制是毫無“正當

性”可言的。

這種為了國家強大而先犧牲個人自由的思路，至今仍然像春藥一樣使許多中國知識人興奮。當今的“新權威主義”、某美學家提出的“先經濟發展，後個人自由”等，都只不過是炒已經失敗的前人的冷飯而已。這種“強國第一”、“穩定至上”，連“軍政”、“訓政”的階段都不設定的理論，到底還要讓專制獨裁統治多久呢？中國到底要強大到什麼程度，中國人的素質到底要提高到什麼水準才配享受民主呢？

第 62 節 尊孔復辟今又來

從乾隆拒絕英國公使馬嘎爾尼始，到最後的慈禧，都在討論“西化”問題。最終的開放，已到 1979 年，但仍然是中體西用。從乾隆到鄧小平，一個社會可以空轉兩百多年！

1980 年代老鄧在會見外賓時，外國人問起中國的民主現狀，他說，中國百姓文化素質太低，不能正確地判斷事物，故競選不適合中國，等他們素質提高了，可以考慮民選。

江 ZM 崇儒不能明講，煞費苦心地以“以德治國”、“民族復興”、“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等口號來代替。蔣慶等在網上反對人人平等和理性平等，說：“人生來就必須按聖賢的教誨生活，先覺覺後覺、上智化下愚天經地義，下愚就該服從上智，群氓就該服從領袖，小孩就該服從父親”。他們鼓吹復興“原典儒學”，宣導“讀經運動”，在兒童中全力普及，希冀恢復封建統治思想的根基。“讀經”將成為又一次的“洗腦”活動，為什麼要如此荼毒世人？兒童何辜？試問蔣慶，十年二十年後孩子的智慧超過了父親，是不是父親就該服從孩子呢？把人類的的不平等絕對化、擴大化的專制制度，使中國陷入了萬劫不復的野蠻深淵。

儒家文化是世界上歷史最為悠久、傳統最為深厚、性質最為殘酷的專制文化。孔教是奴役人的精神鴉片，在今天提倡儒家就是阻止中國民主化。

孔子是反和平演變的高手，儒家的最大功勞就是抵禦外來文化，防止了和平演變，結果是刀把子出政權。難道中華民族還要拒絕和平演進的道路而走刀把子出政權的路嗎？中國要過度到多元民主，必須反對孔子。

南京大學教授、中國太平天國史研究會方之光說：“帝王將相充斥螢屏。《漢武大帝》、《大明王朝》、《秦王李世民》等等，不一而足。曾問過一些專家《漢武大帝》代表先進文化嗎，回答都是否定的。他們認為該片大力宣傳專制、宣傳權術、宣傳民族仇視……”

魏文彬《精神上的皇權復辟》說：“埋在地下的封建帝王們絕對想不到，在中國已加入 WTO、‘與國際接軌’口號叫得震天價響時，竟還會有人為他們極力辯護、翻案！無論扭到哪個頻道，螢屏上都可見到男人頭上拖著長辮子，‘萬歲’、‘奴才’之聲不絕於耳，真讓人不知究竟置身於何朝何代，有時光倒流之感……精神上的皇權復辟有愈‘演’愈烈之勢。”

皇帝戲危害國家民族，誤人子弟，至少有以下四毒：

第一，皇帝戲阻礙了國家民主化的進程。建立一個民主國家，其重要基礎是老百姓具有公民意識，知道為國家要盡哪些義務，享有哪些權利。如果思想深處還保留臣民意識，一事當前，先想的是少管閒事，少操閒心，免談國事，莫論軍情，則法律中公民權利的規定，也就成了一紙空文。為了推動政治文明建設的進程，國家正在努力宣傳公民權利，培養百姓的公民意識，但那些熱心的編導們偏要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設置一隻攔路虎——皇帝戲。

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說：“‘正史’的作用是：一、為統治

者統治臣民提供借鑒、為專制皇帝培養忠順臣民。”也就是說，“正史”是專制王朝灌輸臣民意識的教科書。現在一般人費時讀“正史”的不多了，皇帝戲正好取代了正史的作用，時時在宣傳帝制的好處，培養電視觀眾的“臣民意識”。

傅白蘆《電視劇·錯別字·下跪》：“《康熙王朝》更妙，歌詞作者假亡靈之口反復寄託自己的祝願：‘我真的還想再活五百年’，不圖萬歲萬歲萬萬歲，只要五百年；希望君主制度在神州大地上延續到 2222 年（1722+500）？電視劇這般‘創意求新’出於什麼心態，對封建專制制度如此留戀基於何種原因？我不願去揣測，只是深深地憂慮著，我們這些平凡百姓，男的要蓄辮子，女的要纏著雙足，黑黑壓壓地跪成一片，戰戰兢兢地匍匐地上，恭謹地喊著皇帝萬歲、主子吉祥，卑賤萬分，也會覺得這不是人過的日子。”

曾伯炎《可厭的皇帝熱》：“歷史上，最不好的就是皇帝，那種壟斷權力物力人力的強橫，特別是用他一個腦袋代替萬千個頭腦思考決策天下大事，倒行逆施與胡作非為……也算精神產品的影視產品，頗像在同現代唱對臺戲。……如果外國人回去談觀感，說中國崇皇意識還在，豈不給現代中國又罩上封建陰影了嗎？這種與現代唱對臺戲的皇帝熱不可謂不怵目驚心。這麼熱下去，只會加深觀眾的臣民意識，不可能增加現代社會的公民意識吧！”

第二，皇帝戲敗壞社會風氣，引致道德滑坡。皇帝制度本來就是摧殘人性極不人道的惡劣制度。這種制度下的皇帝，必然是極端自私卑鄙慣用陰謀詭計的人物。皇帝戲以之作為榜樣大肆宣傳，自然會對社會風氣造成潛在的負面影響。戲中情節告訴我們，在爭奪帝位的鬥爭中，勝利者得到一切，失敗者則輸得乾乾淨淨。因此，要勝利，就得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即：只顧自己，不顧別人，只顧身前，不顧身後，只要利益，不講道德。

第三，皇帝戲摧殘民族精神。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人物，都會通過這些英雄人物長期保持自己的民族精神。但是一些皇帝戲的編導卻是另一種思維：唯有皇帝才是英雄，在皇帝的控制之下，對國家民族有重大貢獻的人物都成了皇帝的玩物。

例如《漢武大帝》一劇中，屢次親手製造冤案的劉徹是英雄，而蘇武、張騫、司馬遷這些光輝形象，卻在皇權的籠罩之下，成了黯淡無光的小人物。從劇中不難看出，編導們崇拜皇帝，輕視臣民；崇拜權勢，輕視貢獻。這和我們的民族精神正好反其道而行。

歷史上漢武帝亦非上乘人物，他晚年下了罪己詔，承認“即位以來，所為狂悖，徒使天下愁苦”。人家自己都誠心悔過，而影視製作人為什麼不惜違背史實，文過飾非！

第四，皇帝戲干擾了對青少年的教育培養。兩千多年來中國人同情孟姜女，反對秦始皇。中國人認為秦始皇是暴君。秦皇出，乃有韓非之刑死。秦皇后，中國這塊土地便成了人權的絕地，為一句話、一個字砍頭坐牢、扳斷手指的不能數清。從殺男人殺到了女人，從殺有學問的殺到沒學問的，一代比一代殘暴；因而使無數的讀書人習慣了做奴才，從恐懼生出對秦皇的無限崇拜，以謳歌秦皇為天下最大的《英雄》的方式，維護自己的奴才狀態；靈魂的深處裡，更是“有一天老子做了萬歲、萬歲、萬萬歲，殺，殺，殺！”意淫得快樂無比。

極權社會中，極權者千方百計地向兒童、學生和成年人宣揚英雄崇拜和領袖崇拜。於是，在專制國家中，人們總是把英雄與獨裁者等價。

《英雄》歌頌暴君秦始皇，以軍隊屠殺平民的血腥場面作為“藝術”，供人欣賞。這樣，會不會給人以中國人野蠻、嗜殺、專制、落後的印象？楊金幫《說

破“英雄”是殺人》：“兩組鏡頭相映入眼：一組是軍強馬壯的秦軍的凌厲箭雨漫天而來，摧毀一切；另一組是手無寸鐵、奔跑哀號著紛紛中箭慘亡的趙國百姓。影片把全副武裝的軍隊大規模殺戮平民百姓的過程拍攝得如此威武雄壯……從未有哪部影片膽敢把殺戮平民的軍隊當成正面歌頌形象的。”

中國有想做秦始皇的人，有崇拜秦始皇的讀書人，中國人的命運，便是數千年不變的魚肉宿命。秦皇們所需要的聲音，無論他們怎樣聲稱自己寬容，只會是絕對一統的專制。因此，只要中國仍然整天熱衷於什麼領導、統一之類，中國人就不可能徹底擺脫被魚肉宿命。

皇帝戲宣揚封建專制，培植“臣民意識”，摧殘民族精神，毒化當代人尤其青少年一代的心靈，遺禍久遠，弊莫大焉！

周泉《重編歷史意味著什麼》：“許多知識份子相繼發表文章，反對古裝歷史戲充滿電視螢屏的現象。這些有識之士認為：這些歷史劇反映的君權至上的倫理觀念，其治理國家的封建專制制度與現代民主自由的普遍價值觀念格格不入……是在開歷史的倒車。因而有學者呼籲：讓更多的反思專制主義黑暗、樹立啟蒙精神的歷史劇問世。”

第 63 節 儒教還能復興嗎？

有人說，西方有文藝復興，中國可以來個儒家復興。文藝復興是 700~800 年前的事，當時人們要復興古代的多元民主共和、羅馬法治和人性自由的傳統精神。這些精神在儒家裡是沒有的，我們復興儒家只能使中國人遠離民主自由，更加專制愚昧。

有人說：基督教不是有專制等級嗎？他們經過宗教改革變得民主了，我們也可對儒家改革，讓它自由平等民主。這種說法很荒唐，總是認為別人能做到的，

我們的傳統文化就能做到。如果真能做到，為什麼我們的文化越來越專制，而不是越來越民主呢？

基督教與民主政治的關係，正如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所說：“若以為民主社會必然與宗教為敵，那就大錯特錯了：基督教乃至天主教中，並沒有什麼東西是與民主社會的精神絕對對立的，有好多東西甚至對民主社會大為有利。”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洛克在《政府論》的上篇中正是以《聖經》為據闡述民主政治的合理性。

聖經的歷史比儒家的經典的歷史要悠久得多，它保留遠古的民主思想。譬如：“上帝造人”這一學說比“進化論”、比“投胎轉世論”更容易引伸出人人平等、人格尊嚴神聖不可侵犯的思想；耶穌認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樣的，上帝對人類一視同仁，因此，人類之間沒有高低貴賤，即使存在著財產和權力上的差別，在人格上也一樣的。在這種觀念的主導下，窮人即使窮，在人格上也沒有對富人低下的心理。耶穌基督是用“夫妻[兄弟]之倫[愛]”來規範世界的；他為自己的門徒洗腳，就是為了讓門徒知道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都是兄弟，要互相示愛，因而基督思想中天然地包含著平等、博愛的內容。而儒家經典《易經》裡的“天尊地卑”只能引伸出等級制的君尊臣卑的思想。

而儒家以“父子之倫”來闡發到“君臣”倫理關係，把政治問題和倫理問題視為一談。儒家的政治哲學還沒有從倫理學的母體中剝離出來，政治問題被當作倫理道德問題來討論。道德系統的政治關係中無法找到一點民主政治的影子。一個明顯的例子是老百姓慣于視權力者為父母爹娘。幾十年前我們中華大地上不是唱熟了一首“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麼？其實這只是古老的傳統觀念的再現而已。在太平天國起義中老百姓歌頌忠王李秀成就有一首“羅藤爬在高牆上，農

民要靠李忠王。地主老爺嚇破膽，百姓找到親爹娘”。殊不知老百姓一旦把農民領袖尊為親爹娘，他們也早以人民的親爹娘自居，於是家天下的權力體制再一次理所當然地建立，專制主義再一次理所當然的降臨，農民的苦難再一次進入一個苦難的迴圈。

孔子把一切社會關係都看作是“父子之倫”的衍生，提倡以“孝”治天下。什麼君和臣的，顯然不能適應消滅了“君”“臣”的民主社會。儒家學說存在很多落後的成分。表現為：鼓吹吃人、保護盜竊、主張說謊、保護殺人犯、任人唯親；宣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奴役人民的精神；宣揚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的等級制，導致拋棄女嬰，敗壞了社會風氣。

基督教偉大貢獻就是超越了家庭血緣、民族國家的狹隘界限，用信仰把人們團結起來，化解了人們之間的矛盾，使社會日趨和諧、溫馨、理性；基督教通過教會把人們組織起來以對抗王權的專橫。儒家是半宗教，只有教義，沒有獨立的組織系統。沒有獨立的組織系統，散兵游勇豈能抵抗王權？儒家幾千年來停留在家庭血緣的狹隘圈子裡，由孝推出忠來，國不過是家的放大而已，這種類比推理毫無邏輯說服力；儒家只是把人民馴化成了綿羊，既沒有組織，也對抗不了王權的專橫，所以只能無道則隱，做軟骨頭。儒家只會依賴當權者，看主人臉色吃飯怎能會有民主？

2000年中國歷史已證明儒家不行。儒學說實踐的結果是：專制獨裁越來越嚴重，官僚越來越貪婪，和珅就是最大的貪官，人民越來越大貧弱！亡國、亡國、再亡國。幾千年來漢族同北方遊牧民族的戰爭中負多勝少，只有短暫的時間取得了階段性勝利，也不過是把遊牧民族驅趕的遠一些而已，大部分時間是被動防禦，所以，歷代都要修長城。強大的唐朝，其實很窩囊！李淵為自己奪得政權，出賣

祖國的利益對突厥稱臣。唐朝是吐蕃人、南昭蠻(雲南人)和契丹人的手下敗將！安史之亂後，唐朝要回紇人來幫忙收拾江山。後晉的石敬瑭靠出賣國土而當兒皇帝，以後宋朝對北方民族國家自稱兒皇帝，真丟人，而此時儒學已經到了頂峰！明朝雖趕走了少數民族的政權，但後來明皇帝又被蒙古人抓去。袁世凱尊孔，卻把國家主權賣給日本；蔣介石尊孔，丟了大陸政權。

新加坡 1965 年獨立，人均 GDP50 美元，70 年代初才真正開始大的發展，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前達到人均 GDP27000 美元，2005 年人均 GDP24000 美元。新加坡的統治者是華人，但它的文化政策是：“承認英馬華印四元文化，以英為首，馬華印平等居次”。新加坡承認四種合法語言，但實際上只有英語是“官方語言”，占人口 80%的華人與占人口不到 10%的印度人的母語一樣只有民間語言的地位。新加坡的正規教育幾乎是英語教育一統天下，政府與公共服務系統基本都用英文。新加坡的傳媒高度英語化，中文媒體只有《聯合早報》碩果僅存。殖民時代一直存在的中文大學（南洋大學等）在李光耀時代反被取締。在保留傳統中國道德倫理方面，新加坡也遠遠不比台港。李光耀的開明專制的治績是可肯定的，但它與儒家沒有必然聯繫。開明專制並不等於“儒家”，正如俾斯麥、葉卡捷琳娜等人不是儒家一樣。李光耀是個傑出的政治家，與其說他像孔孟，不如說他像俾斯麥更合適。

耶穌說：“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裡”。儒家就是不結好果子的樹，理應拋棄。連新加坡都拋棄儒家了，可一些戀古癖們卻要復活儒家，真是嬰兒化的腦子。

賀麟先生說：“中國近百年的危機，基本上是一個文化的危機。”新儒家韋政通認為：“中國近百年來，是問題最多的時代。每一個問題，追根究底，都是

一個文化問題。”梁漱溟先生說：“中國的失敗自然是文化的失敗，西洋的勝利自然亦是文化的勝利。”

1937年梁漱溟在《鄉村建設理論》中承認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是人類大勢所趨，當時西方的學者卻在批計劃經濟。梁漱溟在晚年對毛也屈服了，失去了自由精神。文化革命初，梁漱溟不甘寂寞，卻寫信給中央文革並轉毛澤東，表示贊成文革：“主席此番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使廣大群眾振起向上的精神，鄙視資產階級，恥笑修正主義，實為吾人渡入無階級的共產主義之所必要……當紅衛兵來臨，我以維護此一大運動之心情迎之。”新儒家代表馮友蘭以及其他國家級大儒楊國榮、週一良等都在文革期間開出“外王”，但事實證明這些都是助襯為虐、鮮謙寡恥，他們也都為此後悔莫及。可見，新儒家沒有多少原則立場。

當代的儒家信徒甚至否認儒家有專制思想。如果儒家沒有專制思想，專制的皇帝會獨尊儒家嗎？在人權時代，專制的東西肯定沒有用了，用它只會阻礙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儒家信徒總會舉一些片言之語來說明儒家沒有專制性，那是因為他們的思維就是專制思維，就象蛇毒對蛇不是毒而是寶一樣。所以，對儒家思想必須採取一票否決制，凡是反人權就是壞的。譬如：孝道就是剝奪了子女的人權；“父子相隱”包庇盜竊、侵犯了他人財產權，既虛偽又貪婪更不道德。所以儒家思想從總體說就是壞的。

房子塌了，當然不能住了，要廢物利用拿幾塊磚當然是可以的。儒家就是那塌了的房子，“取其精華”不過是“廢物利用”罷了。

既然可利用儒家的元素，為什麼不能利用西方的元素呢？這是因為儒家信徒搞血統論。有人甚至講“凡是祖宗的就是好的，凡是非祖宗就是壞的”。這是典型的不講是非的血統論。

有人狡辯說不是“血統論”，是要用古代的標準衡量古代的人，難道我們瘋了嗎？我們不是古代人，幹嗎要要用古代的標準衡量古人，用古代的標準衡量出的“精華”能為今天所用嗎？既然要用古人的東西，當然要用當代的標準來衡量它們是否能為我所用。用古代的標準來支配我們的言行的話，我們就成了古人的奴隸！這樣一來，民族就毫無希望了。

在辛亥革命後，魯迅先生發出一個至今聽來仍刺耳的讓人流淚的聲音：“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在人口眾多，土地廣袤的中國，特別是占人口大多數且知識水準低下的農村社會，傳統思想根深蒂固，仍然是現代化的一個極大的阻力，專制主義-小農經濟-儒家文化的體制的真正顛覆，需要長時間的韌性的思想啟蒙，更需要建立新的自由民主制度。

民主國家沒有官方意識形態，它在精神文化領域的方針只有3個字——自由化。因此，想把儒家復興為官方的意識形態，那只會離民主越來越遠，倒退到專制社會。

民主國家的文化建設已不屬於政府事物，是由民間進行的，這樣可保證各種文化的自由競爭、百花自放，提升民族的智慧和創造能力。任何加強文化（宗教）管理的提法，都會導致政府主導文化的發展，中國幾千年的專制皇帝就是這樣做的，這是反民主、真專制的做法。

按民主國家要求，做到政教分離，也就是政府不能去主導社會的文化、輿論、教育、宗教的發展與發揮，政府權力和管轄範圍是有限的，不能什麼都管。如果說我們的經濟進行了改革，政府權力收縮了；那麼在文化、政治領域還沒有多少權力收縮的跡象，反而權力擴張了，控制加強了。這就不利於走向多元民主。

因此，今天的文化之爭，應該是自由平等的競爭，而不是促使政府來扶持某種文化。通過政府來扶持某種文化的成長，這本身就說明了該文化是病態的，沒有自我生存能力，是該被淘汰的物件。

第 64 節 反全盤西化批判

“全盤西化”的思想又被稱為“基瑪律主義”（或“凱末爾主義”）。17 世紀末到 18 世紀末的百年時間裡，在與俄、奧、英、法、埃及諸國的戰爭中，土耳其一敗再敗，統治集團內部實行的修補補式改革全歸於失敗，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割地賠款，被迫簽訂一系列恥辱性條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土耳其更是面臨被肢解亡國的命運。當時的英國首相喬治·勞合甚至放言：“我們用不著為土耳其將從（國際政治）舞臺上消失而惋惜。”在民族存亡的關頭，穆斯塔法·基瑪律（凱末爾）·阿塔蒂爾克（1881-1939）認為，只有以政治制度上的全盤西化為手段，才能實現捍衛土耳其民族存續和獨立這個目的，因此提出了全盤西化的主張。撒母耳·亨廷頓把這種主張歸納為：“現代化是可望的和必要的，本土的文化與現代化不相容，必須拋棄或廢除；為了成功地實現現代化，社會必須完全西方化。”。凱末爾在土耳其推行“全盤西化”的結果，並未因此喪失掉民族尊嚴和特徵，而是保住了民族獨立和國家完整，避免了土耳其被肢解的不幸命運。全盤西化以基瑪律主義命名，但最早實踐並提出全盤西化主張的卻並非土耳其人，而是日本人。天皇 1668 年頒佈“五條誓文”，強調要“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破除舊習。……求知識於世界”。日本著名學者福澤諭吉（1834-1901）此後又明確提出，“我國不可猶豫於期待鄰國之開明而共同興盛亞細亞，寧可脫其伍而與西方之文明國家共進退。”並形成以“全面西化”為核心的理論。

西化，不是中國獨有的，也不是新東西，而是所有非西方國家歷史上基本都

曾遇到過的老問題。西化問題的出現，不是落後國家和民族的主動要求，而是被迫因應。世界歷史上完全或部分拒絕西化的例子並不鮮見，如印第安人、澳洲原住民、東印度群島的部分居民、亞馬遜流域的部分居民，都是相對而言西化成分少的，或至今尚未西化的。拒絕西化的民族為堅守或嚴重依賴原有文化和生活方式付出了很高的代價，時至今日，其中部分仍然處於十分貧困落後的狀態。因此，西化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堅持本土化與西化哪一種更有利於自身生存與發展的問題。“要不要西化”的提問應當改為“西化對本民族有利，還是拒絕西化更有利”。西化與是否崇洋媚外沒有必然關係，也與賣國求榮不能劃等號，主張西化的目的往往正是為了救亡圖存。西化或拒絕西化，前提一樣都是不屈服，只是在如何才能免於屈服的對策上有所不同。不西化是強要以本土力量抗拒，西化論者則認為，繼續堅持原來的那一套不行，得學習西方長處，非如此不足以自保。雖然這種策略不一定就是最好的選擇，但也並非註定就是壞的。是好是壞，不取決於那個“西”字，而取決於最後是否有利於本土民族在全球化時代獨立自由地生存和發展。

現代自由民主制度雖然源於西方，卻是具有普世價值的人類共同成果。一些國人卻將普選、多黨制、三權分立、法治等內容構成的現代民主扣上“全盤西化”的帽子來抵制，源於他們的愚昧或奴化意識。中國人對於西方諸強報有強烈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同小農意識中的狹隘與保守結合在一起，形成了對西方民主思想與政治制度的近乎偏執的拒絕。

在中國，凡是不禁止的領域都可西化，從吃喝玩樂到生老病死結婚生養、從如廁馬桶到高等學府研究機構的思維模式或思想工具，都可以西化；連漢字也沾了西化的邊（拼音）。當權者絕對不容許政治領域西化，造成了中國人缺乏起碼

的民主政治常識。

在中國一聽到全盤西化，就等於崇洋媚外、賣國求榮。有人說：落後了，學習西方甚至西化我們不反對，但堅決反對全盤西化，只吸收西方的精華。

過去，精華糟粕由領袖來解決。領袖說是精華，那就是精華；領袖說是糟粕的，你若偷偷吸收，那就不好了，後果有時候很嚴重[大刑伺候]。胡適指出，“政府無論如何聖明，終是不配做文化的裁判官的”。靠領袖區分精華糟粕的結果就是普遍的愚昧。

如果讓專家學者來區分精華糟粕，專家學者們的意見往往不一致，必須自己判斷。當代中國人在文化上的弱勢是，資訊流動被人為的遮罩，窒息了思想的活躍，窒息了人的創新能力，文化由此而衰落。因此，與其發出文化宣言，不如喊一聲“思想無禁區”。

中國最大問題是：只要不全盤西化，權力者就有選擇性，凡是對他們有利的，或對他們無害的，都可以允許西化；凡不符合他們偏見和特權的，都被宣佈為“不符合中國國情”而加以封殺，結果是排斥和封殺那些對統治者的特權有威脅但有利於中華民族進步的思想和制度。中國統治階層剝奪民眾選擇制度和文化的基本權利，進而將自己的荒唐選擇宣稱為“人民的選擇”或“歷史的選擇”，目的是為了維護和鞏固自己的特權和私利。什麼國情、特色、穩定、傳統、愛國等等都是藉口，不過是在拼命拖延和維護它的江山和既得利益而已。

全盤西化就像是作業系統重裝。當系統問題越來越多，總是死機、崩潰的時候，人們無法忍受了，就開始重裝，這時候我們換個最新版的 WINDOWS 就好多了。除了制度西化外，文化的西化是可以民眾自己完成的，也是任何執政者不能代勞的。

彼得大帝進行改革時，所有方面都效仿法國，甚至服裝、語言也不例外；結果一個民族崛起了，莫斯科大公國成了俄羅斯大帝國。1989年俄羅斯又一次向西方看齊，俄羅斯擺脫了社會主義的蕭條，走上了復興之路。中國卻在抵制西方的和平演變。直至今日，一些“國學大師”還認為西方文明即將衰落、取而代之的將是東方文明。在“中國人建餐館，韓國人修教堂”這種巨大的文化差異下，為什麼“亞洲四小龍騰飛靠儒學”還被一些人所津津樂道？！

中國的整個歷史就停留在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階段，只不過隨著歷史的不同，說法稍有差異，那時叫“中國式的現代化”，現在叫“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已。

延安時期的理論家艾思奇說：“近代中國的一切反動思想，都有著一個特殊的傳統，如果要給它取一個名字，那也許可以叫做思想上的閉關自守主義。……不管它的外表形式怎樣千變萬化，它的基本內容不外是這樣的：強調中國的‘國情’，強調中國的‘特殊性’，抹煞人類歷史的一般規律，認為中國的社會發展只能依循著中國自己特殊的規律”。他進一步指出，不斷翻新的“國情論”，是近代以來中國“民賊國賊所應用著的根本的思想武器”。

國情論成了拒絕人類文明的藉口。什麼民主自由不符合中國國情，免費教育不符合中國國情，福利住房不符合中國國情，總之，凡是好東西都不符合中國國情。這實際上是把中華民族放到了世界被告席上。道理很簡單，國情論的前提，就是承認對方是正確的，只是不符合中國國情，對其它國家都是適合的。說人權不適合中國國情，完全是對中國人民的侮辱，也是對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世界人民的敵視。人權是沒有國界的，別說人權問題沒有什麼國情不國情的束縛，即便是真的有國情的束縛，人類寧可改變國情也要追求自由和幸福。人類物質上追求

幸福、精神上追求自由的天性，是任何力量都改變不了，即便是國情也改變不了。他們不承認人權原則的普適性，拒絕世界輿論對他們的譴責。在他們看來，只要強調所謂的“家有家法”，就可以置任何普適原則於不顧，就可以為所欲為了。這是一種十足的封建家天下的邏輯，暴露了宣揚者本身的專制本質，是政客和御用文人們用來掩飾獨裁的遮羞布。

在中國近代史上主張全盤西化的呼聲，最終都被中國文化、民族主義浪濤所淹沒。西化主要指建立在尊重人的政治權利之上的民主制度和建立在個人主義之上的文化價值，西化就是人化。那些認為中國不適合西化的理論，就等於說中國人不配人化。

任何一個成熟的專制、集權政制，其背後必有一番漂亮的說辭，高明的統治者總是將“天道”、“歷史使命”、“人民”、“國家”、“民族”、“階級”等集體意志和整體利益納為獨攬大權的偽邏輯。按照這套邏輯：否定專制，就是否定“天道”、“歷史使命”、“人民”、“國家”、“民族”、“階級”的意志與利益。反之亦然。

中國的專制思想始終具有壓倒優勢，以至走不出日本那一步，其根源在於存在著一個靠意識形態吃飯的統治階層。在清末，中日雖同是儒家思想居統治地位，但中國有科舉制，日本卻沒有。中國的科舉制培養了一個以儒學為飯碗的官僚士大夫階層，這種學說既然是其飯碗，自然要拼命維護。日本居於統治地位的是武士，武士信奉儒教，但儒教只是其修身養性的手段，不是其飯碗，所以扔起來要容易得多。在甲午戰爭中，日本海軍司令伊藤致信鄧世昌說：“貴國的現狀無疑是一種政治體制的結果……現在這種體制已經過時了。一個民族不可能在關閉中生存。您知道日本帝國在過去的 30 年中是如何在艱苦的環境中度過的，我們又

是如何屏棄了舊制度而採用了新制度。貴國也應採取新的生活方式，否則它將滅亡。”

中國在自身專制土壤的環境中掙扎了數千年還不夠，拿到的是德國、英國都不要的社會主義思想；日本早期是社會主義思想的積極研究者，日本沒有採行。建立在集體主義基礎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與國家大於個人的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把強國家至上的理論發展到了頂峰，徹底消滅了個人價值，使人完全成了專制政權下的奴隸。當代的中國仍有一個靠馬主義吃飯的階級，所以當全世界扔掉馬垃圾後，中國仍然把它當寶貝疙瘩。西方的中文學習者聲稱他們聽不懂中央電視臺的新聞用語，那是因為播音員還在使用從俄國學來的歪理邪說。俄羅斯記者在珠海航空展上看到中國的政治標語，蔑視之至。

官方在鼓吹“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後，又胡說“文化沒有高低（優劣）之分”。秦暉說：“文化無高下，制度有優劣”。一個御用學者必然犯這種低級的錯誤？三個代表說，黨代表先進文化。這就說明了文化有先進落後之分、有高下之分。“文化無高下”不過是阿Q的自我安慰而已！古希臘哲學家掌握了天文學知識、幾何學知識、邏輯學知識，能準確地預測日食、能測量日地間的距離、能發明浮體定律，亞里斯多德更是古代最大的博學家。古希臘的文化水準是古中國的文人們望塵莫及的。儒教就是在缺乏古希臘文化水準的貧乏基礎上生長出來極端維護等級制度的學說，內容極度貧乏蒼白；而基督教文化來自於猶太教，猶太教本身就吸收中東地區巴比倫文明和埃及文明的精華；而且基督教是猶太教在古希臘文化基礎上的再提高，其內容比儒家豐富博大精深得多，2者是無法相提並論！中世紀基督教會學校講授天文學、幾何學、修辭邏輯學、亞里斯多德等的物理學知識，這些內容在儒家學校教育中是沒有的，儒家只有順口溜之類的之乎

也者加死記硬背外，只會使人愚蠢到不知道什麼叫愚蠢，還以為“老子天下第一”。“文化無高下”就是這種愚蠢的表現。

“文化無高下”說各民族或各種形態的文化沒有高低之分、沒有先進和落後之分。如果不承認 16 世紀以來中國已落後於西方，從徐光啟開始，特別是鴉片戰爭後百多年來一批又一批志士仁人百折不撓學習西方文明不都成了庸人自擾？承認落後，才可能改革和趕上。籠統說文化沒有優劣之分，比孔子慈禧高唱的“中華文明教化遠非蠻夷可比”（或三個代表）的高論自然略勝一籌，其實質並無差別：在國家落後的年代，拒絕學習海外的先進文化。

官方說：我們的制度好得很，決不學西方民主。一個制度好不好，不是理論問題，而是實踐問題。實踐是檢驗真民主和假民主的惟一標準。我們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上百萬知識份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躍進的瘋狂發動，當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廢止憲法、停止議會活動的時候，我們的制度沒有任何反抗。能說我們的制度好嗎？

建設一個健康的國家，民主制度從來就是根本。市場經濟、民主制度、軍隊中立化、司法獨立、輿論自由、宗教自由缺一不可。只要這些在中國的確立了，中國就真正走上了強盛的道路，也只有這些，才是真正的強國之道。

第十章 民族主義批判

早在 2 千多年前，《聖經》便將民族主義視為害人的瘟疫（詩篇 91:3）。然而，中國近百年的知識份子，從來就沒有很嚴肅地探討這種文明的瘟疫，導致中國近百年各種的貧窮、苦難、內戰與外侮；從這個意義而言，中國近百年的知識份子，難辭其咎。

第 65 節 民族主義的涵義及評論

“民族”一詞曾與國家同義，民族主義也被譯為國家主義。但民族偏重于心理文化，國家偏重政治法律。在法國，1798 年第一次有人使用“民族主義”一詞。1836 年編撰的《英國牛津詞典》第一次將它收入，釋義為一種學說；以後的詞典指明其意義為“集體本位主義”，有民族獨立存在（National Individuality）的含義。

民族主義形成於近代西歐反專制的鬥爭，人們把對世俗貴族和國王的忠誠變成了對“祖國”的忠誠、對民族全體成員的熱愛。所以，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Patriotism）也常常難解難分。法國大革命中動員國民為保衛革命而戰，要求公民都說一種“國家的語言”來代替眾多的地區方言，建立公民學校灌輸對國家的熱愛，促進了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發展。

民族主義在 19 世紀末成為右派政治人物揮舞的大旗。民族主義從一個原本與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有關的概念，轉變成種族主義、沙文主義、強權主義、帝國主義的運動。

民族主義主張“民族”至上，它的基本含義是對一個民族的認同、忠誠乃至奉獻。民族主義認為個人的利益和全人類的利益都微不足道，為了維護民族或種族的生存，無論個人承擔什麼樣的犧牲都是應當的；個人的尊嚴與權利根本不可能與民族相抗衡，更不可能成為國家的正當性基礎。民族主義所訴求的是一種國家或准國家的主權獨立或區域自治，為達到這個最高目的，一切專制化的努力都是合理的，結果造成了本民族成員極大的個人犧牲。這種情況在落後國家或地區普遍存在，主權已成為專制符號，國家可在主權的名義下胡作非為。

民族主義者的眼裡只有國家的價值，國家的榮耀，而沒有人的價值和尊嚴。

恐怖主義是民族主義的一種極端形式。恐怖主義者不惜毀滅整個世界，拆除一切道德防線，牢記仇恨（階級仇、種族恨），不擇手段，甚至犧牲自己去消滅敵人。恐怖主義泯滅人性中最可貴的東西，如對生命的敬重、對他人的同情心和人的起碼良知。

阿克頓說：“民族主義的基礎是集體意志永恆至上，民族統一是一種意志的必要條件，其它任何勢力都必須服從這種意志，對抗這種意志的任何義務都不享有權威，針對這種意志的一切反抗都是暴亂。在這裡，民族凌駕于居民的權利和願望之上，把公民形形色色的利益全都納入了一個虛幻的統一體；它壓制一切自然權利和一切既定的自由。無論何時，只要某個單一的目標成為國家的最高目的，無論該目標是某個階級的優先地位、國家的安全或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還是對一個抽象觀念的支持，此時國家走向專制就是不可避免的。”

阿克頓認為民族主義是不健康的，即便它與民主理論聯繫在一起，其實際的結果是把民主政治中的強勢（多數）邏輯和總體主義的極權專制因素擴展開來。他說：“在民主和民族之上還有另外一個更高的價值，那便是自由（即人權）的價值。獨立論使民族成為專制和動亂之源，而自由論卻把民族視為自治的保障和對國家權力的最終限制。同一主權之下若干不同民族的共存，其作用相當於國家中教會的獨立。它可以維護勢力平衡、增進結社、形成共同意見給予臣民以約束和支持，藉此避免出現在單一權威的籠罩下四處蔓延的奴役狀態。”

他精闢的指出：“同一國家之下若干民族的共存不僅是自由的最佳保障，而且是對自由的一個驗證。……如果政治邊界和民族邊界重合，社會就會停滯不前。兩個人之間的差別把人類聯合在一起，不僅是因為這種差別為共同生活的人提供了好處，而且因為它用一條社會或民族的紐帶使社會結合在一起”。

自由主義並不排斥民族、國家、民族利益、國家主權。自由主義認為公民權利和個人自由比民族國家和民族利益更為重要，主權雖具有一定的意義，但並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人權；只有以個人的自由、幸福為價值指向的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才具有正當性。

愛因斯坦 1931 年發表的《主權的限制》一文中開頭便提到：“國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愛國和人權是不可分離的。如果不講人權，愛國就蛻化成了無是非可言的愛統治者。他說：“民族主義是一種幼稚病，是人類的麻風病”。民族主義的那種無條件的祖國之愛是變態的，它強調犧牲個人權利來保障對民族國家的絕對忠誠，這樣就難免與專制獨裁為伍，成為抵制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祖國不是無形的鐐銬，哪裡有自由和人權，哪裡才有祖國。韋伯說：“國家本身不具有內在的價值，它只是實現其他的價值的一個純粹的技術性工具，國家惟有從這些其他價值中取得它自身的價值，而且只有當國家不追求超越它的這個僅僅是輔助性的地位時，它才能保留它的這種價值。”

專制政府不愛他的國民，因此，也就得不到國民的擁護，愛國這種崇高的感情在專制國是找不到的，因為這是暴君的國家，臣民只有個人的利益，沒有需要他關心的公共利益，沒有需要他負責的公共義務。當政治權利被剝奪的時候，人們就不再關心政治，不再關心公共事務，不再關心國家大事，人們寧願遠離這是非之地。在專制國，愛國就是忠君。在共和國，愛國就是愛自己。在和平時期，“愛國主義”的提倡，只能有利於權力者或最高權力者，因為國家權力在其中代表了“最終的”價值。但是它不可能給人民帶來任何好處，反而因為概念自身的含混性，容易喚起他們關於幸福的幻覺，在國家的祥光之下，模糊、忽略、以致放棄個人權利的追問，和爭取這權利以及與此相關的所有合法權益的鬥爭。

血緣最利於誇大同仇敵愾。就像某些只顧哥們的朋友，不講原則。遇見自己人吃虧，有理由要上，沒理由創造理由也要上。從這種群體血緣相似性擴展開去的民族主義：第一特別容易寬容自己人的罪過，就像魯迅所說：“覺得做外人的奴隸，不如去做自己人的奴隸”；把淪為異族之苦告訴國人是必要的，但切莫得出結論：“我們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隸”。1840年中英戰爭傷亡的軍人還不及朱元璋搞一回冤獄死的人多。專制一點都不比侵略者的槍炮溫文爾雅。第二是容易在民族的大義下，貪得無厭地要求個人犧牲和奉獻。

1925年6月陳源在《西滄閒話》裡感慨：“中國人永遠看不見自己的尊容。自己的軍閥每年殺人遍野，大家一聲不響，一旦外國人殺了幾十個中國人，便全國一致的憤慨起來。”中國的事情，就這麼怪。洋人殺一個中國人叫殺人，中國皇帝殺了千萬中國人卻是恩典。主子可以任意殺死奴才，因為奴才的生命所有權都歸主子。

受一個黃皮膚的人侮辱，就要忍氣吞聲；而受一個黃頭髮的洋人欺負，就要拼命。是何理由？正義和邪惡、善良和惡毒、正確和錯誤，難道是是以血緣、人種、民族來劃分的嗎？一個人最需要的是敢於對一切奴役，無論它們是以何種名義，都能夠堅決地說不。

20世紀，中國專制政府只要把民眾的怒火引到外國身上，就可以壓倒民眾的民主要求而加強自己的統治。在專制國裡，政府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當外邦對專制國進行制裁時，這種制裁又往往作用於政府與人民身上，而且國民受到的損害遠遠大於政府。專制政府往往會利用這一點對人民進行愚弄和宣傳，把人民的怒火、仇恨引向外國，於是民族主義就會發高燒。制裁的鞭子本來是要打向專制統治者，最終卻落在人民的身上，這就是制裁效果甚微的原因。對專制國的援助也

是一樣，本來是要援助其國民的，最終卻落入了專制統治者的口袋。

專制統治者有時會製造、誇大外部威脅來恐嚇國民以便人民順服。專制國既有外部威脅，又有內部威脅。專制國面對外部威脅的時候，是軟弱無力的，因為他得不到國民的支持。專制國看似強大，其實是紙老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專制國是不適用的。在專制國裡，奴隸沒有政治生活，從未參與政治活動，又怎能要求他們對興亡負責呢？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他們要負什麼責呢？共和國只有外部安全威脅，沒有內部安全威脅；共和國無須當局說教，公民為了自己的自由，每個人定會全力以赴，因為國家的安全就是他自己的安全。要征服一個共和國將面臨無數的困難，因為人人都將為自由而戰；要征服一個專制國卻是很容易的，因為它的力量其實是很脆弱的，沒有多少人會真心替它賣命，這個國家是君主的，不是人民的。如果在征服者治下比暴君統治更好，他們甚至會盼望征服者的到來。

民族主義具有本能愛國主義輕率的激情，還多了使本民族滯後的護短情緒和向外宣洩的破壞性情緒——仇外排外。民族主義把國家人格化，拿君主當國家化身。輕率、護短、仇外排外，再加上把國家人格化和視君主為國家化身，使愛國主義蛻化為強權的工具。它有團體自戀傾向（拒絕批評）和誇大自己的民族成績的傾向。中國人民歷來講究“夷夏之辨”，又歷來不講究專制與人權的區別。他們對愛國還是賣國的敏感程度比對專制還是人權的敏感程度高出萬倍。民族沙文主義把對祖國的熱愛變成了對於強權的熱愛、對於一小撮當權者的暴政的熱愛。當權者正是利用這類蠱惑人心的符號騙取了人民的向心力，以此維護自己的專制統治。如果一個民族的振興是以每個成員的工具性使用和無償犧牲為代價的話，這種民族主義是可恥的。因此，對這種無條件的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應該保持

足夠的警惕。

在 21 世紀，官方若指望依靠民族主義來彌補意識形態的缺陷，來抵擋自由民主的大潮，來掩蓋官民之間的衝突，不過是一廂情願罷了。民族主義天然就具有一定程度的民粹特色，它的源泉不在官方，而在民眾，包括那些具有狹隘、極端、反智和無政府傾向的盲目民眾。當群眾性的民族主義脫離了官方軌道，或者當民粹意識處於極端情緒化的爆發之際，專制政府難免要惹火燒身，這正是“請神容易送神難”。

第 66 節 嚴夷夏之防——最嚴重的種族歧視

“中國”就是專制“天下觀”的反映。所謂的中國，從字面上分析，它就是世界中心之國；這種概念，源於漢族世界中心的意識，也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漢族認為，漢族有權統治世界。中國人具有自我中心的國民性格。而將其擴大到國家規模時則成為本國中心主義。自稱為“中國”是其最有力的證據。傳統中國的民族觀基本上是一種以血統論為基調的種族主義的民族觀。以血統作為認同的根本要素，使得中國的“族類”概念具有濃厚的種族主義的特徵。從夏、商、周三代開始，以血統關係為基礎的宗法制度就根深蒂固。夷夏之稱始於西周，夷夏之辨嚴於春秋。嚴夷夏之防，蔑視近鄰諸國，這種蔑視觀念強烈到視不同文化的人們不是人，其優越意識超過南非的種族隔離主義，其最好的證據是中國人自以為是天下中心、是最先進的，華人自古就把別族人當禽獸。凡不是漢族者，就是夷人；漢人視夷人為蠻族，漢人用“蟲魚鳥獸”來形容他們，例如，蜀、閩、回鶻、鮮卑、氐、羌等；由於漢人認為夷人不是人，因此漢族有權統治與掠奪他們。在古漢語裡，其它民族的名稱常用獵犬旁，以表示這些異族類似野蠻的動物。如“獫狁”、“狄”。《國語·周語》雲：“夫戎狄，冒沒輕儻，貪

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狄，豺狼之德也，……狄，封豕豺狼也”。在秦漢以後，“狄”或“北狄”曾是中國中原人對北方各民族的泛稱。韓愈在其著作“原人”一書中，評定夷狄為“半人半獸”，是由禽獸進化而來的。

華夷之辨陷入了非理性的偏執。明清王朝是最講究華夷之辨。因為明政權是驅逐元朝，恢復“中華”的產物，而清朝則是以“東夷”的身份入主中原，“名不正，言不順”，在對內統治中非常忌諱自己的“夷狄”身份，故在對外關係上大力提倡華夷之辨，企圖借此把漢族視滿族為夷狄的看法轉移到西洋民族身上，以提高自己的身價。19世紀曾在“英”“法”的左側加犬旁羞辱之。魯迅則批判中國人的國民性說“中國人不把人看做人”。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有些有良知的漢族知識份子對此亦感到汗顏，並促進了一些文字變革，如將“獠族”改為“僚族”（我國古民族，分佈在今廣東、廣西、湖南、四川、雲南、貴州等地區。古人亦以“獠”泛指南方各少數民族。）又將“獯族”改稱“僮族”。但是“僮”還有僕人的意思，還是一種歧視，解放後就再改為“壯族”。

千萬不要認為漢人歧視周圍的少數民族僅僅是由於一種民族優越感所然。從上個世紀初到二戰爆發之前，大量的中國難民為了躲避戰亂和饑荒紛紛逃到東南亞各國；那些難民（或移民）大多數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南方人，但他們到了僑居國依然要歧視其它種族的人群；他們稱當地人是“番鬼”、日本人是“東洋鬼”、白人是“紅毛鬼”、印度人是“大眼睛鬼”或“孟加拉國鬼”、黑人是“黑鬼”。只有一個民族是人，那就是“唐人”。現在的廣東百姓還時常稱外國人為“鬼佬”。中國人自認為有異于他人，由來久矣。

清末面臨列強的瓜分，嚴復於1895年發出“亡國滅種”的警告。康有為、

梁啟超等維新派於 1989 年在北京成立保國會，提出“保國、保種、保教”的口號。康有為在《大同書》裡提出在全球範圍內讓黃種人與白種人通婚混合，消滅不易改良之黑色人種。在這裡，以康有為為代表的公羊學派已經從天下主義修訂為黃白二色人種的“共同中心”主宰世界的構想。

魯迅曾說：在國人意識中，“異族不是主子就是番子”，缺乏民族平等、世界一家的意識（傳統的四海一家是指服從華夏等級文化的一統天下，而不是多元文化的共同體）。

1912 年 1 月 1 日，孫中山發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第一次提出了“五族共和”論：“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方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五族共和”被作為維護國家統一、爭取各少數民族參加民國的口號和政策而加以強調；國旗也被定為五色旗，代表五族的聯合。

蔣介石政府最終放棄了“五族共和”論，其標誌之一是改五色旗為青天白日旗。1943 年，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明確指出，“五族”不是單獨的五個“民族”，而是原本有著共同血緣的五個“宗族”，共同組成統一的“中華民族”。

第 67 節 專制文化歧視自由文化

有人說中國人強調自己文化的優越性不是種族主義。中國人對共同體的歸屬只有一個判斷標準，就是以文化辨夷夏。中國文化的核心就是皇權主義，就是外族人要向中國皇帝俯首稱臣。皇權主義就是專制主義，天下服從一個腦袋，用專制文化或主義來辨夷夏那是古代愚昧的做法，在今天已毫無價值，而且十分有害。

強調自己文明優越性、鄙視外來文化的例子最早見於《論語·憲問》：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翻譯：原壤伸長兩腿坐在地上等孔子。孔子（認為伸長兩腿坐就是違背了“禮”）罵道：“你小時作為弟弟不懂得謙讓，長大了也不講禮，老不死的，一個害人蟲。”罵完就用棍子打他的小腿。

“老不死”！罵得很下流！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他罵做俑的工人斷子絕孫，這是婆婦們最惡毒的罵人。有理說理，無知無識才罵人。自古皆然。

孔子“以杖叩其脛”，跟原壤的“夷俟”有密切的關係。當時中原人的坐勢和夷人是完全不同的。中原人的坐勢是“跽”（相當於今天日本人的坐勢），夷人的坐勢卻是“蹲”。原壤以夷人的坐勢等孔子，這對於主張“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的孔夫子，是絕不能容忍的。難怪他又罵又打。夷夏之別，在孔子時代是儼然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成公四年》），就是這種歧視心理的反映。

孟子也輕視外來文化，他把“為神農之言”的許行比做“南蠻鳥夷之人”，認為許行說的是“非先王之道”，又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對於異己，除了見解不同外，更重要的是這些見解是來自不同的族類，所以持斷然否定的態度。

韓愈也輕視外來文化，對佛教更是恨之入骨，他說“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論佛骨表》）。甚至要“滅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原道》）。中國後來通過反復的屠殺最後接受了佛教文化，中國既接受了佛教，同時也改造

了佛教。

孔子“華夷之辨”和“用夏變夷”的文化傳播方式導致了惟我獨尊意識，將自己的文化當成中心和標準，鄙視、敵視和懷疑為自己所不熟悉的外來文化，拒絕向外族學習。這是禁閉中國人頭腦的思想牢籠！

中國人以為“六合之內，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其實眼光並不出於東亞，對南亞、西亞，對歐洲瞭解極少，更不用說非洲、美洲了。實際上是“關起門來做皇帝”。

第 68 節 義和團——儒教恐怖活動

康熙歿時，葡萄牙傳教士穆經遠與雍正繼位之敵有染，1723 年雍正下旨驅除所有傳教士，沒收教堂，嚴禁百姓入教；1784 年更有搜捕傳教士之乾隆聖旨；及至嘉慶，更演繹成捕殺傳教士、以“中國教難”聞名於世。但傳教士也確實不屈不撓，仍在“地下”或邊遠地區堅持。到了鴉片戰爭之後，有了戰勝的保障，洋教士們始得以浮出地面，公開傳教。

那些傳教士們奉“十戒”為至寶，他們竟敢勸中國的教民拒絕跪拜！於是，那些教民們不僅不跪拜官員，而且不跪拜長輩；有的甚至連祖宗都竟敢不跪拜了。如此“大逆不道”，雖然惹怒了官府，但官府怕洋人，有洋人庇護，便只能如此了。如此作法也激怒了地方士紳和民眾。在他們看來，這將是中華文明禮崩樂壞的前兆，如不制止，則國將不國。他們的想法與官方不謀而合，於是官方縱容暴民，挑起了一次次教會案件。

19 世紀中國不少地方反對外來文化的暴行就是這樣的儒家信徒幹出來的，義和團則是其顛峰。1897 年發生的“曹州教士案”。山東曹州府巨野縣有座天主教堂，因教徒和民眾發生糾紛，引起民眾不滿，有二、三十人沖入教堂打砸搶，

不幸卻打死了兩個德國教士，這就引起了外交事件，德國的海軍陸戰隊強佔膠州灣。義和團的本稱是義和拳，基本上是一群拳民。毓賢在山東的政策是“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他在山東上任不到三個月便殺了 1500 多人，又在營州府三個月內殺人三千。跪拜朝廷的拳民打出“扶清滅洋”的旗幟，迫使朝廷逆歷史潮流而動。跟著洋教站起來是不行的，向著朝廷跪下去才是正理。

許多義和團的告示，都歷數洋教對佛教的大不敬。何以外來的回教被中國社會所包容、外來的佛教還成了義和團捍衛的偶像，而外來的洋教就該殺該剮了呢？究其根由，佛教回教都崇尚跪拜，而洋教反對跪拜。崇尚跪拜的，如魚得水；反對跪拜的，大逆不道。

庚子年春，山東大股拳民進入直隸，很快就到了北京附近的高碑店，六月間便進了北京。當時慈禧想廢光緒，已立了大阿哥（太子）。不料大阿哥之父急於讓兒子登位，乃偽造了各國最後通牒，令老佛爺歸政光緒。老佛爺忍無可忍，決定背城借一，和鬼子拼個魚死網破。這“城”，便是北京城；借的“一”，便是朝中死硬派推薦的義和團（此時義和拳被政府收編賜名“義和團”，類似於湘軍那種稱為“團練”的非正規軍的民間武裝力量）。

1900 年 6 月 21 日清政府對外宣戰，義和團和清軍開始圍攻使館。22 日黃昏清軍燒毀英國領事館東南角鄰接的密集民居。23 日伊斯蘭教徒士兵董福祥（清廷“甘軍”首領）在翰林院點燃了火，他期待火勢蔓延到毗鄰的英國公使館。當時藏身使館的一位美國女教士安德魯斯小姐記述說：“煤油被澆到了樹上，以便助長火勢。”燒翰林院是為了蔓延燒毀英國公使館，結果公使館完好無損，翰林院被毀，數千萬卷古籍善本也在大火中燒毀，其中包括當時僅存副本的《永樂大典》和從全國各地搜聚的《四庫全書》的大量底本。翰林院大火所造成的中國古

籍文化方面的損失是永世無法彌補的。

7月15日，義和團開始進攻聚集在宋家河的三千多名教民；義和團用炸藥包炸毀圍牆攻入，殺死了所有做最後抵抗的修女，對困在教堂中的1000名男女老少施以焚燒，只有50人從視窗逃出；3千多名教民只有5百人倖存。

義和團在北京放火焚燒西藥房，大火波及店鋪4千餘家。正陽門內外，被焚千餘家。義和團阻止任何官民滅火施救，對於救火者，則給戴上一頂“二毛子”的帽子，拉上大街就用大刀辟了。義和團“相率到津，勒民供給，兼索官餉，稍有不從，肆行擄掠。並至紫竹林租界，殺人放火，見有洋行洋房，立即焚毀”。義和團將北京這個“首善之區”變成了一個恐怖的殺人場，變成了一個血與淚的海洋。

義和團喊著“男練義和拳，女練紅燈照，砍倒電線杆，扒了火車道”的口號，打著“扶清滅洋”的幡子，砸機器、拆鐵路，焚燒電報和郵政局，搗毀洋行、剿殺買辦（洋貨代理），連鐘錶、鏡子、眼鏡、煤油燈等都不能倖免。凡是洋人傳來的東西，就是他們仇恨和毀滅的對象。他們見教堂就燒，見機器就砸，見洋人就砍，見洋貨就毀。

在義和團運動盛行之時，民間有因不知“洋貨”已被禁而仍用“洋火”（火柴）、“洋釘”而滿門被斬者。一次在一戶百姓家中搜出了一根火柴，這家8口人全被殺光。一群小學生被“義和團”攔住，不幸被搜出半枝鉛筆，結果6名孩子當場喪命；甚至戴西洋眼睛、打洋傘、穿西服和蓄短髮的中國人傾刻淹沒在腥風血雨之中。十九世紀末中國的維新志士——中國最最寶貴的財富，竟被義和團的暴民屠殺一空！這才是中國最大的損失！

對於那些敢於堅持國際公法和主持正義的官員，“義和團”則以“裡通外國”

的罪名，進行大肆搜捕和追剿，直至將其全家老幼屠戮淨盡才心滿意足。京城內人人自危，任何富室只要被加上個裡通外國的罪名，立刻被搶掠一空。匪徒們甚至沖進大內去搜索第一名賣國賊光緒皇帝，全靠老佛爺出來戟指大罵作獅子吼，光緒才逃過大難。

然而德國公使和日本的一個外交官員就沒那麼幸運，被暴民們在街上活活打死了。莊親王載勳竟在北京街頭張貼懸賞殺人告示：“殺一洋人賞銀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清廷官員則以“執法”的名義，對洋人大開殺戒。

時任山西巡撫的毓賢，一次將 44 名外國傳教士、17 名中國教徒以及從壽陽押來的英國教師畢翰道一家 7 人全部帶到巡撫衙門西轅門前，在百姓的圍觀下逐一殺害，教民們被殺後，梟首示眾，剖心棄屍，備極殘酷。在山西汾州府，美國傳教士和他們幼小的兒女，被騙到府城外，被埋伏的中國士兵射殺；連帶被殺的還有兩個中國教徒和兩個被雇的馬車夫。

在山西太谷，一位中國教徒吳安圓對暴徒說：“弟兄，讓我上天堂吧！”語畢即遭毒手。一姓王的女信徒，在義和團分子向其下毒手前說：“請你等一等”，便去洗臉並換了一身乾淨衣服，才對暴徒說：“我不悔教，你想怎樣就怎樣吧！”話畢便遭殺害，她的幼子亦遭殺。

那時，美國歐柏林大學在太谷的傳教士們在生命危殆時，全都非常堅定，不後悔他們來華宣教的初衷。本來他們有少量自衛用的槍，至少可以殺死數名拳眾，但他們並未使用，就勇敢就義。主要人物 Dwight Howard Clapp 先生在他生命的末期寫給在美親友信上的一句話“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is the seed of truth”（殉道者的鮮血是真理的種子）。表達了他對神與未來的堅定信念。歐柏林大學為了紀念在太谷殉道的校友，在校園中的廣場建了一座拱型紀念碑，上

面就刻著這句遺言，撫今思昔，令人感動深思。

據事後統計，“山西教案”席捲全省 79 個州縣，全省被殺教士 191 人，被殺教徒 6060 人，被毀教堂、醫院 225 所，被燒拆房屋兩萬餘間。全國被殺傳教士有幾千人，死難的中國籍基督教徒則高達 50 萬人！！！！

曾為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出過力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曾認為，中國是他眼中非信教地區中最文明的一個。但義和團運動使李提摩太大失所望，因此，他堅持要在太原開辦一所高等學府以使中國青年擺脫愚昧，在征得英美等國公使同意後，他用從山西罰得的 50 萬兩白銀建立了山西大學堂（即後來的山西大學），他說，建大學的目的是“專門開導晉省人民知識，教育有用之學，使官紳庶子學習，不再受惑”。

1990 年代，蠻不講理的民族主義興起。1998 年大使館被炸，死了幾個共產黨官吏舉國上下痛斥美國，暴民們又一次襲擊美國大使館，放火焚燒成都領事館。而中國因人為事故害死了千百人卻不知道似的。當人們只抗議外面的暴力，對內部的暴力卻閉上眼睛的時候，這些人如果不是缺乏道義良知，就是中了什麼邪；這些人貪生怕死、搞雙重標準、浪得虛名。

第 69 節 阿 Q 政府

漢人認為遊牧民族可以在武力上征服中原，但是漢族卻可以用漢文化征服遊牧民族，這是一種大漢族主義觀點。這種觀點最大的錯誤是否定了最根本的非文化因素——華夏廣闊的農田能夠征服、軟化武功強悍的遊牧民族，農田的征服作用遠遠超過文化上的作用。明末的儒者李卓吾指出：中國人謂“對如何禮贊自己會下很大的苦心，對批判自己卻完全不關心”。

1840 年鴉片戰爭，中國被打垮後，仍然堅信“中華文明天下第一”，把西

方侵略中國看作是“兒子打老子”來聊以自慰。傲慢來自於對世界的無知，自信建立在與世隔絕之上。1844 年中美簽定《望廈條約》後，美國公使贈送給主持“夷務”的耆英幾座炮的模型和一些有關海陸軍戰術及防禦工事的書，並婉言這對中國有用。卻遭到耆英的謝絕，他表示大清已獲和平保障。1866 年第一個出使歐洲的官員斌椿在法國見到自行車，以為有“木牛流馬之遺意”！在 1894 年被日本打敗後，中國終於承認自己的政治制度不如別人，才有了康梁變法。可見，沒有暴力的打擊，中國人永遠弄不清世界的真象。

1900 年中國在遭受列強瓜分的危難時刻，士大夫們竟然炮製出“西學東傳”荒誕怪論！胡適在康乃爾大學求學時用英文寫了《中國之婚俗》一文，投給校刊發表，內容竟是為包辦婚姻叫好。胡適就是父母包辦婚姻的受害者，但他卻論述父母包辦“早婚”的四大好處，並批評自由戀愛是不堪忍受的習俗。曾非常崇拜西方的新潮詩人徐志摩到美國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寫的題為《論中國婦女的地位》的碩士畢業論文，說納妾對妻子並不是侮辱，強調中國女人一直和男人平等，並為醜陋的“纏足”辯解說，“西方婦女流行的束腰又比中國的纏足好多少？”不顧事實的闡發所謂的中華文化的優點。他們甚至為一些糟粕和陋習辯解。

人性善導致官方死不認錯。在中國，本土文化運動是以抵抗西方文化的入侵為目標的，哪談得上引入西方文化。中國近代的沒落從鴉片戰爭以後都歸罪列強侵略的結果，無論中國本身有何問題都不願面對。這種推卸責任的心態，正表現了中國人對中國文明的優越性的固執。文化大革命終結，“動亂的十年”的責任推給四人幫，絕不觸及毛的過錯，那麼大的混亂的責任完全推給四個領導者，是在愚弄老百姓。到了改革開放時期，因經濟開放，被稱為“六害”、“七害”的強盜殺人、賭博、販賣麻藥、買春賣春、詐欺、迷信等兇惡犯罪橫行。這樣的無

序是中國原來的真面目，不過是百年不變的國民性格的復活而已。但官方卻反而一口咬定這是資本主義精神污染的結果，並呼籲要“創造社會主義新文明”。陳寅恪先生說：“以儒學三綱六紀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已經具體化為社會制度；中國文化即使吸收外來文化也堅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來學說之後，即顯現排外的本質；中國的制度文化已不可救療”。

中國總是誇大自己的成績，抹殺外國的成績。我們津津樂道的唐朝偉大與開放，說有很多外國人來中國做官。這不過是少見多怪而已，其它地區的開放普遍得很。例如羅馬帝國時期，甚至有好幾個皇帝[羅馬皇帝並非國家主人而是第一公僕，是元老院代表人民選出的行政代表]是阿拉伯人、腓尼基人、日爾曼人等外族人，而且是依照正常程式繼承的皇位。

李慎之等人揭露了“1988年初聚會巴黎的70多位諾貝爾獎得主在發表的宣言中說，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過頭去汲取2500年前孔子的智慧”是個彌天大謊。實際情況是：會議主持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伊利·韋塞爾倒是提到了老子，他在開幕講話中說，“如今的學者借助先進的通訊手段可以身處異地而參加同一些討論，啊，要是設想一個有耶利米、畢達哥拉斯、老子和瑣羅亞斯德——還不要漏掉釋迦牟尼參加的討論會，該多麼有趣！”就這麼簡單的幽默居然引出了一個“孔夫子救世界”的學界笑話。

有人若說美國人發明了電腦，為人類文明和社會進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有人反駁說：這算啥！我們的老祖宗在周代就發明了籌算，這不是電腦的雛形嘛？

《周易》裡面的推算八卦，不就是用一長一短的線條組合變化，來表示各種不同的意義嘛？二進位只是它的一條支脈呢。又據某時某地的考古發掘，還發現了一隻“陶制滑鼠”呢，不信請看某日某報！

有人若說中國的農業落後、農民困苦，比之西方各國差距很大，特別是以色列在沙漠戈壁灘上建成了世界上最高效的農業，令世人驚歎，中國應為此感到羞愧。此時又可從我們的課本中抽出某章某節來反駁：這算啥！我們以世界 17% 的耕地，養活了世界 20% 的人口。你能說成績不偉大？這不是惡意誣衊是什麼？

中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而日本的自然資源卻極其貧乏；中國的人口雖多，但人口密度卻小於日本（中國為每平方公里 130 人而日本每平方公里 330 人）；1840 年以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投資也遠大於對日本的投資。可 1950 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僅為我們的 80%，但現在我們的 GNP 僅僅為日本的 1/6，2002 年日本的恩格爾係數是 22.3%，而中國目前城市為 37.1%，農村為 45.6%；也就是說，中國人目前生活支出主要是忙乎吃，日本卻將主要支出花在食物之外的其它方面，中國是生存消費，日本是發展消費；……中國趕不上日本顯然是中國人本身的原因所致。

中國的阿 Q 政府總是宣揚外國的醜惡，隱瞞自己的醜惡。專門熱衷於挑剔他國的缺點而暗示自己偉大的民族是幼稚的，也不可能有進步。當指責他國缺點時，多數中國人有一種幸災樂禍的快感。我們民族夜郎自大、好大喜功、巴不得一步登天當上全球老大的躁狂心態，使得“先進者”決定以“走俄國人的路”來建立“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後來又驅使全民“超英趕美”，以“全人類解放者”的身份幹盡人間的醜惡。一個民族只要幹出“大躍進”和“文革”這兩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該民族就能進入“恥辱吉斯尼大全”而永垂青史。中國政府不斷培育自豪感，結果是看不清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在中國文化中，無不瀰漫著這種害國主義的毒素。“多有這種‘合群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這種唯我獨尊的心理至今還在延續。目前美國是中國最大的交易夥伴，中國

的命運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與美國的關係。但中國竟沒有“美國學”。惟我獨尊註定了中國文化僵化、停滯、解體的命運。中華民族的長期苦難也就與這種民族精神同其久長了。

一些人內心裡還做著天朝上國的夢，他們說的無非是“中國人是世界最優秀的種族”之類的法西斯口號，打心眼裡從來看不起任何外國，最自大的就是這些蠻不講理的“愛國賊”。

當我們批評中國的罪惡時，愛國賊們說，外國也有這樣的罪惡。這種辯護簡直令人髮指！難道外國有罪惡，我們這裡就應該有罪惡？這種蠻不講理的愛國主義實際上害國主義，使我們民族失去了自我反省自我更新的能力，甚至滑向了賣國主義。這些人無限熱愛政府領袖，而領袖恰恰是有資格的賣國者，他們自然就成了賣國主義、專制主義的幫兇。這些被傳統文化毒害過深的民族主義者已經淪為徹底的文化中心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由於中國人拒絕承認自己的缺點錯誤，缺乏對自身問題進行深刻探討和反省，使中國人無法從以往的失敗中吸取到真正的經驗教訓。一個不願意把別國的優點當作鏡子來對照的民族是沒有任何希望的。一個拒絕批評、不敢正視自己缺點的人，是一個毫無希望的人；一個拒絕批評、不敢正視自己缺點的民族，是一個毫無希望的民族。一個不願意聽反面意見的民族是不能進步的。

我們對祖宗的錯不能文過飾非甚至把它吹成鮮花，這只會越來越錯。無原則瞎吹捧專制的祖宗對廣大的人民是犯罪；這是在愚弄人民，只對當官的有利。祖宗的錯就是我們的錯，我們有義不容辭的責任來批判、來反省、來改正，通過制度建設、民間組織建設、道德建設來避免再犯類似的錯。文化不只是自己的才好，別人的如果比自己的更好，為什麼不可以學？以人類文明的普遍原則來批判東方

民族的野蠻“文化”，實乃替天行道。

一個背離上帝不講是非的民族

一個邪惡的吃人民族

一個越到後來就越專制的民族

一個越到後來就越被外族征服的民族

一個不依賴西方民主思想就無法推翻滿清的民族

一個依靠蘇聯的極權主義顛覆了民主共和的民族

一個自高自大的拒絕學習外族的阿 Q 民族

你的希望在哪裡？你的未來在哪裡？

一個吃人的越來越專制的民族

有什麼道義資格批判越來越自由的西方文化

整天罵外國，只會導致民族的自我毀滅

只有真心誠意的懺悔，我們的民族才有希望。

第 70 節 日本的基督教

1543 年三名葡萄牙人從澳門乘船去暹羅，途中遭遇風暴，被吹到日本九州島的種子島。他們攜帶的鳥槍立即被種子島島主時堯所接受，很快便仿效製造出大批洋槍，從九州島逐漸向全國普及。大量生產的結果對作戰方式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不僅各國大名均組成步兵火槍隊，而且城堡的建築方式也發生變化，即出現了帶有高牆、深壕、射擊孔的巨大城堡。

1549 年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沙忽略 (Frasisco. Xavier, 1506-1552) 來到鹿兒島，到山口傳教，為西方宗教到日本之始。為了便宜行事，傳教士們首先與當地人大名往來，取得信任。而大名們為確保貿易的豐厚利潤，也樂於同西方傳

教士交往。伴隨天主教迅速擴散而來的西方曆法、文字以及書籍、繪畫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更強化了“西洋”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一時間，西方宗教在日本以驚人的速度傳播開來。

到了 16 世紀 80 年代以後，天主教在日本已擁有 15 萬信徒和 200 多所教堂，在傳教士的建議下，1582 年日本四少年曾赴歐洲參見羅馬教皇。

豐臣秀吉統一後，曾採取過保護天主教權益的政策。可是西方宗教教義中的原罪意識、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夫一妻等思想觀念，不僅與幕府賴以維繫思想統治的佛教、神道教發生衝突，還削弱了幕府的統治的政治基礎。像大村純忠把自己的領地奉獻給長崎教會，迫使領地內百姓改信天主教，更令秀吉對西方勢力有所警覺。1587 年豐臣秀吉改弦更張，宣佈了《禁教令》，開始逮捕傳教士和部分信徒。1596 年秀吉逮捕了 6 名傳教士和 3 名修道士，以及 17 名日本信徒，在長崎以殘酷的磔刑（撕裂肢體）將 26 人全部處死。

德川家康重新統一後，德川幕府最初對西方宗教採取了較為寬容的態度，傳教士在西南部再度活躍起來。1605 年日本天主教信徒上萬人，並按照教會組織形成聯絡體系。當德川家康意識到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勢必衝擊東方封建專制統治的正統意識形態，於是，轉而實行取締西方宗教的政策。1612 年德川家康致函西班牙總督，要求停止傳教活動。並明令天領（幕府在各地的領地）內實行禁教，凡旗本、家臣及居住江戶的大名妻室當中有天主教嫌疑者，一律強迫改變信仰。拒不放棄洋教者，削去官位，逐出城外。

1621 年德川幕府向全國發佈了第一道禁教令。1622 年 10 月，幕府在京都將 53 名教徒處以火刑；1623 年 9 月，又在長崎將 555 名教徒分別以火刑和磔刑處死。

1624 年後，德川幕府屢次向長崎地方官下達“鎖國令”：1633 年取消朱印船貿易，禁止持有幕府奉書的船舶出海；1634 年建造限制葡萄牙商人活動的人工島嶼“出島”；1635 年全面實行海禁，違者格殺勿論。

為了有效鑒別出潛藏的天主教信徒，禁教官吏“發明”了名為“踏繪”的方法，將帶有聖母瑪利亞和耶穌浮雕的鐵板放置地面，命令百姓逐個從聖像上走過，以便甄別出信仰洋教與否，果真有不少信徒因拒絕踐踏聖像被逮捕。為了強迫信徒皈依神道、佛教，酷吏們使用了駭人聽聞的刑罰折磨信徒。對於堅持天主教信仰的男女信徒，分別採用火燒、凍餒、半身掩埋、裸體倒吊並在顏面燙烙十字架等酷刑，直到用鋸鋸斷頭顱或以荊棘捆綁焚燒的極刑。

幕府的禁教政策和殘酷的迫害引起了下層百姓的極大憤懣。1637 年，島原、天草農民不堪忍受苛政，揭竿而起，爆發了直指幕府統治的武裝起義。17 世紀初，有一個叫馬可斯的神甫被幕府驅逐出境時留下預言：將來必出現一位具有神聖稟賦、通曉教義的 16 歲的童男，代表上帝來拯救萬民。這一預言在信徒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起義者推舉年僅 16 歲的天草四郎為“總大將”，把 3000 多信徒集結到島原城中。驚恐萬狀的幕府調集大批軍隊鎮壓，卻遲遲不能攻克。起義者環繞在靈異少年周圍，堅持兩個多月，彈盡糧絕，全部戰死。

此後，幕府懼怕民眾繼續利用宗教旗幟再度團結起來，進一步地閉關鎖國。1639 年 7 月，下達了最後一道鎖國令，把葡萄牙、西班牙、英國等天主教國家的貿易對手全部趕走，徹底禁絕了天主教在日本的傳播。在禁教過程裡，幕府陸續關閉了沿海口岸，僅在長崎一地的“唐人屋”與孤懸海上的出島的“荷蘭商館”（有幕府武士把守的一條棧橋同長崎口岸連接），保留了對中國和荷蘭的限量貿易，以解決國內對生絲、香料等貴重物品的急需。

當幕府將軍對天草起義軍民固守的島原城久攻不下，荷蘭殖民者不惜以炮擊城牆，屠殺起義軍民來取悅日本統治者，終於保住了自己在出島荷蘭商館的貿易地位。

鎖國以後，荷蘭人再三表明只從事貿易活動，決不傳教，為此還“避免在公開場合祈禱和唱讚美詩，並卸載了基督教的一切外部標記”。這些人，全被限制在長崎港外的一個小小的人工島上，與日本老百姓隔離。幕府也就是通過這一嚴格控制的孔道，從西方獲得必要的資訊、技術、和物資。當時的西學，就叫蘭學。比起中國來，日本人瞭解西方條件差多了。

這個連接日本與西方文明的小小視窗，在 18 世紀中期以後竟成為“蘭學”傳播的基地，及至幕府末年，蘭學已經“如滴油入水，佈滿全池”，為明治維新推翻幕府封建統治提供了必要的精神準備。這也是當年封建幕府的決策者們始料不及的。

19 世紀中葉，俄羅斯的東正教傳入，西方宗教在銷聲匿跡 200 年後再度出現在日本。1865 年天主教也重新登陸，而後基督教（新教）也出現在日本。

第 71 節 中日兩國近代化的比較

1. 中日兩國全球化觀念之比較

直到明末，中國人的地理觀念依然是“天圓地方”。歷代統治者皆以為中國位於地球中央、疆土四面環海、旁無大國，真是狹隘。在宋人刻印的《華夷圖》、《廣輿圖》中，周邊國家和海洋都被繪得很小，而中國區域則畫得很大。當利瑪竇在肇慶掛出世界地圖時，中國人對於地圖不是將中國放在中央，而是推倒東方一角上，不能接受。當利瑪竇向明萬曆皇帝貢獻了一副世界地圖——《萬國輿圖》，中國人才知道地球是圓的。明末耶穌會士主持翻譯的世界地理著作，實際上已經

向閉鎖狀態的中國人介紹了五大洲、地圓說、五帶劃分、測量經緯度等全新的世界地理知識。但世界地理知識的傳播範圍很小，有些西洋輿圖的收藏者，其動機只是好奇。翻檢明清時期的典籍，懷疑、排斥西方世界地理知識的言論俯拾皆是。他們將世界地理知識斥之為“邪說惑眾”，“直欺人以目所不能至，無可按驗耳”。《四庫提要》的作者們雖然將耶穌會士所著之《職方外紀》、《坤輿圖說》等世界史地著作列於“總目”之中，卻將耶穌會士描繪的真實世界圖景視為虛幻的傳聞之辭，採取了“姑且錄之”的態度，根本不承認其學術價值。從 16 世紀上半葉的西人東來，到 19 世紀中葉鴉片戰爭爆發前夕 300 餘年間，在人類文明由“分散”到“整體”，走向一體化的大背景下，中國人沒有對劇變的世界作出迅捷的回饋和回應，沒有完成由古代世界秩序觀向現代世界秩序觀的轉變。

直到 19 世紀四、五十年代，以《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開眼看世界的史地著作誕生為標誌，中國思想界興起了一股強勁的認識西方的思潮。如魏源在《海國圖志》的三種版本中，均按區分國，圖文並茂地介紹了世界各國的地理、歷史及其他情況，成為當時中國最完備的世界知識總匯，構成了立體實證的世界文明全圖。在傳統地理世界觀轉變的基礎上，國人初步擺脫了華夷觀念的束縛，實現了由傳統世界秩序觀向現代世界秩序觀的轉變。

日本在江戶時代由國學派、水戶派宣導的國學運動，旨在擯除儒、佛外來文化的滲透。隨後，蘭學大盛，許多日本中心主義的國學家同時也是蘭學家，對西方充滿敬意。他們還對被禁的基督教充滿了熱情，偷偷地弄到中譯的傳教士的著作，甚至借用利瑪竇關於基督教優於儒教的理論，來論證他所鼓吹的神道優於儒教的學說，並公開主張日本要向各種文化廣泛學習。日本的國學派逐漸建立了一種文化精神：我們是日出之國，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世界的學術文化都湧向日本。

中國只知道固守自己的傳統，難以包容天下的學問，是文化的邊緣。

日本在初步接受世界史地知識的基礎上，日本的蘭學家和幕府中較為開明的統治者摒棄了傳統狹隘的“三國世界觀”，確立了科學實證的現代世界觀。據日本學者鯉澤信太郎研究：無論是織田信長，還是豐臣秀吉、德川家康，都是日本新世界地圖的研究者，他們常看著世界地圖，與近臣暢談世界形勢，表現出極高的認識世界的熱情。1708年，新井白石通過審訊潛入日本的義大利傳教士西篤梯與荷蘭商館長等途徑，成為鎖國時代日本最大的“海外通”。“九千里外存知己，五大洲中如比鄰”，這是蘭學家杉田玄白所賦的詩句，從中可知日本知識精英全新的、開闊的世界文明視野。

18世紀70年代是日本民族世界秩序觀開始發生決定性變化的時期。其具體標誌是1771年杉田玄白等親自解剖處刑犯人的屍體，並據此證明了荷蘭版醫書的正確性，糾正了中醫傳統理論的錯誤，由此對中國文化產生懷疑。1774年，日文版的《解體新書》出版，立即在日本社會產生了劃時代意義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打破了對中國的傳統崇拜觀，確立了西洋文明崇拜觀。1775年杉田玄白繼譯刊著《狂醫之言》，否定了古來流行的“中國中心論”，形成了“西洋文明中心觀”。他說：“地者，一大球，萬國分佈，所居皆中，任何一國皆可為中土，支那亦東海一隅之小國也”。渡邊華山也提出：西洋各國“藝術之精博，教正之羽翼鼓舞，似為唐山(指中國)所不及”。在他們的文化世界觀念裡，中國已經不再是文明的中心，崇拜中國的天平已逐漸向西方傾斜，這標誌著日本知識精英中國文明崇拜觀的崩潰和西洋文明崇拜觀的確立，也揭開了日本攝取西方文明的序幕。蘭學家前野良澤在《管蠡秘言》中即指出歐洲的教育比中國和日本優越，批判了封建的身份制度，從而暗中讚美了基督教。本多利明也認為“國土之貧富強

弱皆在於制度與教示”。

18 世紀，日本俸祿低微的下級武士為貧困所窘迫，不得不出賣祖上傳下來的武器。他們有的去經商，有的以收養富商子弟為養子的方式出賣武士身份。很多人轉化為資本家，更多的人變為知識份子，充任教師。他們成為學習傳播蘭學的主要隊伍。

據 1852 年出版的《西洋學家譯述目錄》統計，自 1774 年至 1852 年的 78 年間，日本翻譯歐洲的醫學、天文、曆學等書籍多達 470 餘種，從事翻譯西洋書籍的學者有 117 人。而且，其中還有像杉田玄白、志築忠雄等蘭學家構成了日本攝取西方文化的核心力量。可見，日本與中國不同，其“執政者雖亦關心西歐科學，但其輸入及研究卻以民間為主”。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股起自民間的攝取西方文化的浪潮，逐漸向幕府權力深層滲透，出現了與政治結合的趨向。有些幕府的老中、一般官吏和地方諸侯大名醉心於以蘭學為核心的西方文化，被稱為“蘭癖老中”和“蘭癖大名”，形成了由蘭學家、諸侯大名、幕吏藩臣三者構成的攝取西學的主體力量。如 1795 蘭學家大規玄澤成立以蘭學家和蘭學愛好者為核心的沙龍式組織“新元會”，定期集會，研討西方學問。從 1795 年到 1837 年，共集會 44 次。據考證，計有 104 名蘭學家和蘭學愛好者參加了集會，“就其中經歷大致清楚的 67 名來看，官藩醫階層 26 人，被推定為町醫的有 8 人，醫生占絕對多數。此外，藩主階層 7 名”，足見其成員構成的多元性。再如薩摩藩主島津齊彬酷愛西方文化，常“與江戶洋學者川元幸民、箕作阮甫、高野長英等共講洋學，在當時的諸侯中率先研究泰西文明，通曉海外大勢，見識遠大”。這些具有新思想的人物在日本放棄鎖國，走向開放進程中起決定性的作用。也使日本現代化在啟動的伊始階段便呈現出“自

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特點。

1838年著名的蘭學家緒方洪庵在大阪設“適適齋”，講授西方科學知識和民主思想。24年間，各地來的就學者達3千餘人，其中不少是下級武士。3千余人中，出了不少明治維新的著名活動家，如橋本左內、大村益次郎、寺島宗則等。有的則成為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就是代表。可見，一個國家的教育制度與思想，將直接影響到國家的興衰存亡。

正因為如此，面臨西方的挑戰，日本比中國有準備得多。1854年佩里送給日本人一些體現西方成就的禮物，如火車模型等，意在嚇唬一下日本人。但美國人發現，日本人拿到這些禮物後，如獲至寶，並不斷提問，顯示他們對這些新技術早從書上讀到，而且研究過。

福澤諭吉說，日本人從第一次看到蒸汽機船後，只用7年就掌握了駕駛技術，並獨立遠航跨越太平洋。1860年福澤諭吉到美國驚奇地發現美國居然有“女尊男卑”的現象；美國總統的子女居然和普通人民一樣生活。他覺得社會文化給了他巨大震撼，但工業技術和科學方面，並沒有什麼超出他的想像，因為他來之前作了家庭作業，對這些內容瞭若指掌。

可見，日本在現代化的啟動發軔階段已比中國早了80多年。18世紀70年代，日本已經實現了由傳統世界秩序觀到現代世界觀的“無形”之變，開始了以攝取西方文明為主題的現代化運動。而同時期的中國，則仍陶醉於“天朝意象”之中，難以自拔，這使得兩國在現代化的啟動階段，已經存在一個不小的“時間差”，直接導致了兩國現代化的不同命運。

2·中日兩國近代化的比較

1840年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給日本帶來前所未有的震撼。此前，在日

本人心目中，中國一直是天朝大國的形象。如今，中國在西方面前不堪一擊，這令日本聯想起自己岌岌可危的處境來。於是，幕府開始聘請軍事專家高島秋帆製造槍炮、改革兵制，以應對時局變化。

1853年佩里率美國率四艘軍艦直入江戶灣時，日本無力抵抗。1854年2月，培理再次率七艘軍艦到達日本，與日本簽訂了《日美親善條約》，正式敲開了日本鎖國（1639-1854）的大門。後來日本人十分感激美國人促使日本擺脫鎖國狀態，並為佩里建了銅像。

1855年和1857年，在幕府的主動請求下，荷蘭先後派遣海軍軍官佩爾斯雷根與軍醫鮑姆培赴日，幫助日本人開設海軍講習所與軍醫講習班。1855年，幕府還設立了洋學所。洋學所的興盛，使日本很快湧現出一大批通曉近代科學技術的人才。幕府還從國外聘請大批技術專家，創辦了許多近代工業，如浦賀造船所、石川造船所和關口製造所等。以薩摩藩為首的各強藩也積極進行藩政改革，其重點是整頓洋學設施、開展洋學教育、創辦近代工業。1866年，幕府准許國民出國學習或進行貿易，還與各藩一起，向英、美、法等國派遣留學生。

1858年6月幕府簽定了《日美修好通商條約》，該條約導致了黃金外流、物價飛長、人民貧困化、城市貧民暴動。開港僅半年，日本黃金就外流了100萬兩，國內經濟蕭條，民怨四起。德川幕府驚慌失措，破例向天皇報告事態，並向各地大名徵求意見；結果卻為天皇、公卿貴族以及強藩大名參政開闢了道路。在強藩的策動下，天皇拒絕批准簽定《日美修好通商條約》，但幕府大老井伊直弼採取強硬態度，在沒有天皇批准的情況下擅自簽定了上述條約，並對反對派進行殘酷鎮壓。有關大名被禁閉，尊攘派鼻祖尊攘派鼻祖長州藩士吉田松陰等人被處死，其它遭受迫害者多達近百人，史稱“安政大獄”。

1860年，以水戶藩為首的十八名志士刺殺井伊直弼。1861年，水戶藩武士襲擊東禪寺，擊殺英國使節。1862年第二次東禪寺事件，排夷活動漸入高潮。水戶藩6名武士刺殺老中安藤信行未遂，全部死難。1862年9月，薩摩藩武士在神奈川縣生麥村因道路糾紛而殺死英國商人，薩摩藩反幕志士有馬新七等8名志士死難。

1863年長洲藩武士高杉晉作、伊藤博文等襲擊英使館。1863年6月，長州藩炮擊通過下關海峽的外國商船和軍艦，並封鎖下關海峽；馬上遭到報復性打擊，高杉晉作臨危受命，組織“奇兵隊”；同年7月薩摩藩與英國艦隊爆發“薩英戰爭”，英7艘軍艦炮擊薩摩藩的鹿兒島，摧毀了炮臺，並焚燒了市區，薩摩藩被迫接受“賠償”、“懲凶”等屈辱條件。8月，京都“8.18”政變，尊攘派主力長州藩軍退京都，中山忠光發動“大和舉義”，開始倒幕軍事行動，不久失敗。尊攘運動受到重大挫折。1864年：長州軍兵進京都，遭大敗。8月，幕府及21藩動員15萬大軍，發動“第一次征長之役”；9月，英、法、美、荷四國聯合艦隊發動對長州藩的武力征服，進攻下關，並攻陷了所有炮臺，長州藩被迫求和；長州藩保守派倒戈，幕府軍隊不戰而勝，高杉晉作出逃。薩英戰爭和下關戰爭使尊王攘夷的下級武士意識到：在武力相差懸殊的狀況下攘夷是輕率的；抵禦西方勢力入侵、保障國家安全，只能打倒傳統的幕府，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統一的近代民族國家。1865年，高杉晉作、伊藤博文起義，三個月橫掃長州藩，保守派垮臺，倒幕派保住了長州藩這最重要的倒幕基地。

1866年，在阪本龍馬努力下，薩摩藩的西鄉隆盛與長州藩的木戶孝允歷史性的會面，奠定薩長兩藩合作基礎；西南兩大強藩在1866年3月簽定密約，結成討幕軍事同盟。

1867年1月30日頑固的鎖國攘夷論者孝明天皇去世，15歲的明治天皇(1852～1912)繼位。皇室公卿立即與西南諸藩策劃武裝討幕——薩摩藩與土佐藩達成盟約，明確剝奪將軍權力的反幕盟約；9月，薩、土、長三藩達成舉兵討幕的約定。11月，德川慶喜以退為進，請求“奉還大政”。1868年(戊辰年)1月3日，天皇發佈《王政復古大號令》，廢除幕府，令其交權。幕府末代將軍德川慶喜宣佈該天皇令為非法，並以“清君側”為名，立即率兵從大阪向京都進軍。以薩摩藩和長州藩為主力的新政府軍與幕府軍在京都附近的鳥羽、伏見地區激戰三天，結果數量佔優勢的幕府軍被打敗，德川慶喜從海路退奔江戶。5月，新政府軍尾隨而來，幕府知道大勢已去，於10月獻城投降。1868年11月，東北地區的叛亂被評定。幕府海軍將領夏本武揚率八艘軍艦和幕府殘兵逃至北海道，於1869年1月建立“蝦夷共和國”；同年6月，在新政府軍的進攻下，夏本武揚投降，“戊辰戰爭”結束。

1868年4月6日天皇發佈著名的《五條誓文》：①廣開言論、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②上下一心一德，奮起為國。③所有文官、武士、平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④革除舊有之陋習，守天地之公道。⑤求知識于世界，振興偉大的皇基。

在《五條誓文》的基礎上，又提出了三大口號：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具體的有四大措施：(一)奉還版籍、廢藩置縣。消除封建割據勢力，建立中央集權。(二)地制改革、租稅改革。允許土地自由買賣，個人可以對土地有所有權。(三)宣佈“四民平等”，廢除封建等級身份制度。士、農、工、商，“四民平等”，各階層均有通婚、居住、遷徙、選擇職業和簽定契約的自由。(四)普及全民義務教育。開辦新式學校，大力普及西方式的現代教育，即講授西方的政治、經濟、文

化、科技等現代知識，摒棄在日本已有千年歷史的儒家文化

1871年11月，正是明治維新初期，百廢待興。日本5名政府高級官員：外務卿岩倉具視、參議木戶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輔伊藤博文、外務少輔山口尚芳組成了著名的岩倉使節團，出訪歐美。使節團通過實地考察後，提出了“全盤西化、脫亞入歐”的口號，全面向先進的西方學習，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科技等。

1876年元老院起草的憲法由議長呈現給天皇，世稱元老院憲法，其基本精神取自於英國憲法。此憲法遭到伊藤博文為首的政府的反對，天皇遂命伊藤博文率人赴歐洲考察憲政制度，伊藤博文歸國後開始起草憲法，1888年完成，並秘密呈奉明治天皇欽定，並邀集國家元勳及學者，在天皇親臨下開會審議憲法草案。1889年頒佈大日本憲法即明治憲法。憲法規定：不得隨意逮捕公民，財產權受到保護，公民享有宗教、言論和結社的自由；規定了三權分立的政治體系。1890年實行了普選制，

中日兩國近代化迥異的制度文化背景差異是：

1) 日本有分權的封建制度，中國有極權的專制制度。日本的明治維新所以能迅速成功，是因為日本和歐洲資產階級革命前的社會一樣，是封建社會。中國的戊戌變法所以失敗，是因為中國是一個比封建社會還要落後的宗法專制的氏族社會。在封建制度下，權力分散並受到有力的制約。不但天皇和幕府之間有矛盾，地方各藩和幕府之間有矛盾，而且哪一方的舉措不對，其它方面有力量制約和糾正，不是一權獨大。西洋文化中的民主政治，主要的精神是帝王無權，權在民選的宰相和議會；這恰恰嚴重違反了中國政治傳統，更觸犯了權力中心皇帝的最大禁忌。日本天皇事實上一直沒有權力，所以也從不擔心喪失權力，征夷大將軍歸

還大政，不過把權力從舊式的幕府轉移給新式的內閣與國會而已。

2) 日本有（荷）蘭學，中國沒有。日本的蘭學大師成了明治政府的主要靈魂人物與指導大師。中國當時的領導與知識階層，很少人懂外語，對世界文明亦不感興趣，沒有培養人才的完整計畫，更不想追究西方船堅炮利背後的原因。

3) 日本有一半的政府官員曾赴洋考察與留學。1871 年，一支近百人的政府使節團從橫濱港出發，前往歐美各國。使節團中包括 49 名明治高官，這個數字幾乎是當時政府官員總數的一半。伊藤博文用英文在三藩市作演說：“本國的政府與人民最熱切希望的，就是與各先進國一樣，達到文明的最高點”。為了支撐這次龐大的出行，成立剛剛三年的明治政府拿出了當年財政收入的 2%。在一年零十個月的時間裡，他們考察了歐美 12 個國家，寫下了長達百卷的考察實錄。世界上從沒有第二個國家，在政府剛成立後的四個月，在政務還未上軌道時，便派遣“半個政府”花如此長的時間，考察如此多的國家。他們最後用的是始驚、次醉、終狂三個詞來概括的：始驚就是歐美的文明使他們吃驚，次醉就是陶醉在西方文明之中；終狂就是發瘋似地學習西方一系列的文物制度，要使日本跟西方一樣。

中國大部分政府官員對外一無所知。由於當時中國領導階層的無知、守舊和落伍，以及對新思想的抵制，致使中國近代史上的自強運動與光緒維新相繼失敗，甚至發生震驚世界的義和團事件。中國近代史上，由於主政者的無知與無能，造成國家被侵略與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之數量，超過人類史上任何一個國家。

4) 中國有科舉制度，日本沒有。科舉制給中國的知識階層構建了一條比較公平的上升管道；科舉的考試科目太偏窄，主要考兩千年前的儒書，儒家強烈的保守和崇古本質成了士大夫的冥頑性格，他們對社會上的任何改革和進步都狂熱

地對抗。日本知識份子也有這種毛病，但毛病要輕得多，大多數都能冷靜地思考到自己國家的缺點，虛懷若谷地接受他國文化的長處。日本沒有科舉，因此學術發展較開放，不受任何限制，知識份子可研究儒學、國學或蘭學。現在日本引以為豪的國粹——漆器、茶道、禪宗等等，源於中土，發揚於扶桑。

郭沫若在 1930 年代寫的《中日文化的交流》一文中認為：明治維新時期，日本的領袖人物竭誠歡迎歐洲文化，而唾棄他們本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它的儒家色彩。這是日本成功的關鍵。反觀清朝則專用中國傳統文化來統治中國，維持科舉制度長達 260 年之久，優秀人才都埋沒到八股文中，反抗這種考試制度的人們也只不過是掉頭去鑽研往古，窮究音韻、甲骨、小學之類的學問而已。一代博學碩儒至多不過對中國古代文化生活的解釋和分類有所貢獻，殊不能邁過古代學術一步。由於清代的愚民政策，中國就這樣蹉跎了 300 年。

嚴復曾於 1877 至 1879 留學英國海軍學校，成績比同學伊藤博文優異，回國後得不到重用，只能淪落到坊間翻譯書籍過活，嚴復又分別於 33、36、37 歲時，參加了三次鄉試，企圖借科舉登上中國政治舞臺，以便實現自己的理想，可惜一切均告落空。伊藤博文回日本後當了總理。他意識到，如果沒有組織和公眾的支援，單純寫在書面上的政體與議會是不可能運轉的。於是他 1898 年辭去官職，創建了新政黨，促進了日本現代政治生活的形成。

日本學習是有取捨的。周作人曾驚歎：日本摹仿中國文化，卻能唐朝不取太監、宋朝不取纏足、明朝不取八股、清朝不取鴉片。明治維新後，日本學習西方法治思想，加以學習科學技術，發展到現在的世界第二經濟強國。日本學西方學的都是精髓，德國的司法制度、英國的議會制度、法國的員警制度、俄羅斯的音樂思想。日本徹底地向西方學習，不但學習其技術思想，而且還學習其制度，通

過虛心地學習別人，以達到超越別人的目的。

德國首相俾斯曼在看清朝留學生和日本留學生學習時，看到中國學的是科學技術，日本更重視政治與法律，就斷言“日本必勝，中國必敗”。果然甲午海戰一場，中國割地賠款，喪權辱國。原因是無論多麼先進的科學技術，在腐敗的政治條件下，根本就無法發揮作用！

1889年日本政府改革了教育制度，模仿西方在全國開辦小、中、大學和各類專校，讓各階層子民都有機會學習先進的西方知識。1900年實行免費初等教育。

1890年日本發佈《教育敕語》要求：“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輔佐天壤無窮之皇室，為朕之忠良臣民”。它用以教育青少年的所謂“東洋道德”依然是儒家道德。日本人盲目追隨軍閥侵略，就是這些愚昧價值觀的惡果。二戰後儒家道德被徹底摒棄。

5) 日本統治階級具有國家使命感，中國統治階級沒有國家使命感。中日兩國的社會結構均有士、農、工、商四個階層。日本的“士”是武士，武士由於長年征戰，形成了勇猛堅毅的性格，在日本社會中代表著最完美的人格。武士的任務是尊王、統治及打仗，他們有非常強烈的國家使命感，為了國家可以犧牲個人，因此明治政府才能順利地“王政復古”及“廢除幕府”。中國的“仕”是文士，文士的任務是讀書、升官、發財，他們只會讀四書五經及全心追求科舉功名，不懂得如何打仗及捍衛國家，他們認為打仗是軍隊的事。

日本的天皇制比中國皇帝制廉潔得多。中國宮廷養著成千上萬的宮女和太監，日本沒有採用中國的宦官制。因為：①日本不象中國嚴厲地強調血統，②天皇后宮的後妃不多，好監視。奈良時代規定除皇后外，還有妃二人，夫人三人，嬪四

人。進入平安時代後，“更衣”、“女禦”取代妃、夫人、嬪等。到昭和天皇時皇室已實行一夫一妻制。明治維新一開始，天皇為了讓日本擁有鐵甲艦隊，不惜花費血本向英國購買。因國庫空虛，他毅然宣佈：哪天資金沒有到位，哪天自己就只吃一頓飯。視天皇為神明的日本國民大受刺激，紛紛省吃儉用捐錢買軍艦，甚至出現了妙齡少女不惜賣身籌款的新聞事件。與此同時，慈禧太后修建頤和園，用了將近 3000 萬兩白銀，挪用了德國給清政府海軍的貸款。光緒皇帝大婚用掉 500 萬兩。1888 年海軍衙門和北洋艦隊正式成立後就不買軍艦了。而日本海軍在 1888 年之後接連造了一批先進的軍艦，他們的速度比中國的更快，火力更強。這只能用制度上的因素來解釋了。

1877 年 12 月 16 日，中國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抵達日本。28 日早晨，何如璋來到東京的皇宮晉見日本明治天皇。事後，何如璋在日記中寫到，明治天皇身著西服，伸出兩手恭敬地接受國書，以鞠躬為禮。他評論說，這些儀式“於泰西同”。

在北京，外國使節覲見皇帝的問題多年來一直得不到解決。講究天朝面子和君臣關係的高官顯貴們，堅持“夷人”必須向至高無上的皇帝下跪。西方人在自己的國王面前也不會下跪，更不用說要向一個被他們打敗的老大帝國的皇帝下跪了。

6) 日本人民的危機警覺性強，中國人的危機警覺性不強。中國發生鴉片戰爭後，中國人仍沒有檢討失敗的教訓，國家依然腐敗；日本在中國發生鴉片戰爭時，舉國震憾及熱烈討論，例如佐久間象山致友人信中說：“關於清國與英國之戰爭，事態嚴重，這個太古聖人以來的禮樂之邦，被歐洲人蹂躪，真令人難過。”這是日本知識份子危機意識的體現。

7) 神道是日本民族文化的根源。日本的神道信仰表現在遍佈日本全國的 7 萬多座神社上(截止 1985 年,日本全國神社共有 79161 座),更表現在日本皇室的萬世一系上。從西元前 660 年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瓊瓊杵尊的重孫)始,直到今天,日本的天皇是一脈相承的。718 年,日本中央政權已被藤原家族完全控制,天皇既不管理朝政,也不與民眾接觸,過著隱居般的生活。在 12~19 世紀近 700 年幕府掌握實際軍政大權的時間裡,天皇仍是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在日本,天皇的地位始終是穩固的,無可爭議的。天皇和中國的皇帝們的命運迥異,是因為日本是一個有神論國度。日本人認為,日本乃是天神所生之國,大和民族是神選定的民族,天照大神(太陽女神)為眾神的中心。天照大神命她的孫子瓊瓊杵尊統治日本,瓊瓊杵尊就是天皇的祖先。天皇作為神權的象徵始終存在於日本社會之中,天皇制萬世一系的穩定是建立在日本民眾的虔誠信仰之上的。對天神的信仰,使得天皇和民眾保持了一種和諧、輕鬆的關係;而在無神論的中國,皇帝不得不用酷刑、文字獄、戶口制度對人民嚴加防範,不得不與其臣民保持一種草原動物式的緊張關係。在科學主義盛行的近、現代,無神論被某些人視為文明、進步,殊不知無神論其實是一種近似於動物的愚昧無知。

1923 年,一位名叫難波大助的青年狙擊裕仁天皇,事件發生後,政府內閣全體辭職,從警視總監到警備道路的警官等一連串的“責任者”全被免職,犯人的父親隨即辭去眾議院議員之職,在門前紮起柵欄,從此閉門不出。大助的家鄉,全村廢止了正月的賀典,陷入悲哀之中。大助畢業的小學校長及班主任也因大助曾經是他們的學生而引咎辭職。大震災時,為從火中搶出天皇的肖像,竟使許多學校的校長喪命。

神道在日本具體的、集中的體現就是武士道,武士道是日本人的中心價值觀。

“專注於死”是武士道的根本特徵。武士道就意味著死的堅決意志。日本武士對中國人的委曲求全，則是嗤之以鼻。日本人蜀山人看到韓信鑽胯之圖時，狂歌一首：甯斬擋道人，不能鑽胯下，這是大和魂！中國是中國，日本是日本，勿要只撿了中國的紙屑，忘掉了日本刀！

戰爭時期，武士道使日本人成為最勇猛的士兵；二戰時，日本神風敢死隊的士兵在明知失敗的情況下還發動自殺式衝鋒，為天皇而戰死，當天皇詔書投降時，卻立刻統統放下武器……。在和平時期，武士道的拼命三郎精神使日本人創造出了世界矚目的經濟奇跡。

3·思想家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1834—1901）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最有影響和代表性的啟蒙思想家，是向日本民族傳播近代西方思想的先驅者，其肖像印在目前流通的一萬日元的鈔票上。

福澤諭吉 1834 年出生在一個下層武士家庭，其父對漢學有很深的造詣，諭吉本人早年通讀《左傳》11 遍。福澤從小就善於動手製作和改善器物，使用工具，他從不恥于做學士文人通常認為低賤的雜事和體力活，這和四體不勤的中國儒生完全不同。

1854 年，19 歲的福澤離開故鄉赴長崎學習炮術，之後又轉到大阪鑽研物理和醫學。在這裡，福澤學習了近代科技知識，開始疏遠、鄙視封建的儒家文化。24 歲改學英學。

1860 年 25 歲的福澤隨幕府官員乘船訪問美國，到美國驚奇地發現美國居然有“女尊男卑”的現象；美國總統的子女居然和普通人一樣生活。美國社會文化給了他巨大震撼。

1862年27歲的福澤又隨幕府使節赴歐，由於聽說外國食宿不便，他們隨船帶了幾百箱大米、數十個鐵絲燈籠。可到了巴黎一看，他們住的旅館是五層樓，無數汽燈將室內外照得亮如白晝，飯廳裡擺滿了山珍海味，“這時不管多麼討厭西洋人，心理也不會有‘攘夷’之念了”。福澤不禁慨歎百聞不如一見，通過考察醫院、銀行、郵政、兵制、議會等，他深刻認識了資本主義發達，深感日本以前的制度非變不可，同時對中國的看法也發生了根本改變。他諷刺中國是“不擅變革之國，一兩千年只知固守古人之言而根本不知隨機應變，妄自尊大之風盛行……”。1865年32歲又隨幕府使節赴美，這三次出國使他親自體驗歐美文明。

福澤諭吉在明治維新前就創辦了慶應義塾，這所學校不再傳授漢學經典，主要教授英語和商科，培養實用人才，許多畢業生被三菱公司聘用，為日本現代化起了極大作用。

福氏於1866至1870年間，出版了三卷《西洋情事》，在日本首次介紹西洋文明（如西方政治、經濟和文化），造成日本巨大轟動。

1874年他的《文明論之概略》系統地反映了1870年代日本思想界在“文明開化”口號下的整個學術思想氣候和世界觀。他極力批判日本傳統文明，主張全力引進西洋文明。

福澤秉持著知識份子純粹的非功利的欲望。他拒絕任何官方職務，一直以報人和教育家的身份出現。他堅持認為一個學者應該獨立地從事研究而不是效命於政府。他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在日本新舊政權轉換時期，他既不尊崇德川幕府，又不特別親近新的維新政權。

福澤說：“我不急於證明我的原則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如果證明有效，很好；如果無效，那就很不幸。我無意對我在遙遠的將來可能產生的結果負責。”福澤

宣稱，他決心堅持自己，如果因為理想而變得貧困，那就在貧窮中生活，如果因此而變得富有，那就把錢隨心所欲地花掉。他還宣稱他只按自己的原則做事，其餘則笑罵由人，自己不喜不悲。

福澤的論述的主要是關於文明型態的問題，宏觀介紹西方文明和日本的目標和發展原則。他在日本思想史上的重要貢獻就是為處於歷史轉折關頭的日本指出了新的方向。他不象康有為那樣設想一個烏托邦大同社會，也不對很多社會政治問題頻頻發表意見。康梁反對自由婚姻等，很快就成為保守過時的象徵。福澤的思想更具有連慣性和超越性。

1872 至 1876 年間出版 17 卷的《勸學篇》，又造成了全國轟動，成為風靡一時的暢銷書。書中討論“人與人平等”、“國與國平等”、“尊重國法”、“國民責任”、“論懷疑精神”、“論思想和行動一致”、“論誠信”……等新思想。

《勸學篇》開篇提出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名言，批判了中國的封建專制和儒教漢學，認為文明的關鍵是個人的自由和獨立，“個人獨立則一家獨立，一家獨立則國家獨立，天下獨立”。

福澤承認，在漫長的幕府時代，儒家文化對日本擺脫蒙昧和迷信，提升日本的文明水準起了重要作用，但站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下，福澤又對儒家文化持一種嚴厲的批判態度。

福澤的回憶錄中專門提到對中國士大夫的看法，他最不喜歡的就是中國文人的虛偽。“他們宣講四德：忠、孝、仁、義，然而一旦危機來臨，就變成了膽小鬼。他們中有的人過著荒淫的生活，酗酒、作詩、熱衷於書法”。福澤不作詩，也不鑽研書法。

他堅持認為：日本人的虛假落後的一面正是中國文化影響的結果。日本要實

現以西方為標準的現代化，就必須擺脫儒家文明，學習西方文明。他本人的責任正在於挺身而出，肅清儒家文化對於日本現代化的束縛，傳播西方現代文明，從根本上改革日本人民的精神。

福澤諭吉尖銳地批判孔孟思想的局限性，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學就是“事君”。他說：三綱五常的關係模式只在特定條件下偶然形成，並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和普世的；儒家的體制是個宗法家族體制，只會造成裙帶政治，沒有制衡體系，結果就是專制。孔子完全為他的時代和社會經驗局限，結果他的學說雖然代代相傳，但永遠只能基於治與被治的固定模式上，並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文明發展，將不可避免地失效，而人類知識的進步其實是獨立於儒學而發展的。儒生除了死讀書、做官，退休後發牢騷外一無所成。如果不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的價值觀，那麼把中國導向文明開化是一場空話。他不贊成“中學”“西學”的提法，認為你中國人學到手了就成了你中國的學，何必計較是誰的學呢。

福澤在 1870 年代對儒家文化文化的鮮明批判直到 1910 年代才由胡適和陳獨秀在中國進行。正是在對待儒家的態度上，可以找出中國實現現代化的真正障礙。日本的現代化改革一開始就對儒教進行了全面清算，最終落腳於對西方價值觀的全面認同，而中國的改革卻始於對傳統的拼死捍衛，經歷了一個從技術變革（洋務運動）、制度改良（戊戌變法）、政治革命（辛亥革命）到文化批判（新文化運動）的不斷試驗、失望、再試驗的深入過程，才艱難地走到挑戰儒學的道路上，思想革命不幸落在所有改革的最後面。

福澤將人類社會的發展階段，分為野蠻社會、半開化社會、文明社會三個階段。他明確指出歐洲和美國是最高階的文明，中國、日本、土耳其並列算是半開化國家，而非洲和澳洲土著為不開化民族。歐洲文明是日本的前進方向。對於有

著巨大文化優越感的中國人來說，要承認自己是“半開化民族”是不可能的。

由於文明階段論，福澤首先從理智上認為先進文明征服落後文明是一件自然而然而事。這樣，他對於日本被西方控制的並沒有太強烈的屈辱情緒，也不認為排外是解決民族獨立問題的方式。他早已超越了對日本文化本體的頑固堅持，也不熱衷於東西文化之爭和反對帝國主義的話語。福澤關注的是，如何調動日本國內的積極然而非暴力的力量來爭取獨立，例如，宗教或許可以成為一種凝聚力量；政府如果鼓勵工商業發展，國內就可以實現富強。

福澤堅決反對不負責任的排外思潮和行為。他認為，日本的目標是實現國家獨立，但實現國家獨立的唯一途徑就是全民族達到現代文明。福澤指明日本既要獨立又要走向現代文明的方向，並指明二者是不可分隔的整體。他沒有象後來的中國知識份子一樣，把啟蒙（追求文明）和“救亡”人為地分割開來，並最終以“救亡”為名犧牲對民主文明的追求。

福澤以理性的態度指出，我們固然不滿意西方文明目前所達到的水準，但如果拒絕它的話，還能找到其它的標準嗎？文明是動態發展的，即便西方也只能說是達到了人類智慧當前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針對伴隨西方文明而來的傲慢和殘酷的征服，福澤認為傲慢和殘酷不過是富強的副產品，最終可以通過人類理性來克服。

在中國，不論是康有為、梁啟超還是李大釗，都沒有將西方文明發展中出現的負面問題如貧困和剝削、殖民主義看成是人類文明可能面臨的共同問題，而是無一例外地看成西方文明特有的罪惡。很多中國思想家都從道德主義和完美主義的角度出發，在中國的資本主義文明遠未充分發展的時候，就急於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提出道義上的批判，大喊西方物質文明破產，幻想中國可以以某種途徑一

舉超越這些弊病。

福澤認為，文明雖然是人類的唯一目標，其路徑是多元的，政治制度必須保障民權和社會相對於國家的獨立和制衡；對具體的政體形式，他說，“假如有利於國家的文明，政府的形式可以是君主的，也可以是共和的。美國的民主政府比中國的君主制更好，但墨西哥的共和制卻比不上英國的君主制”。他主張實施議會制、普及教育、重視婦女權利和文字改革。

福澤認為現代化的根本動力不在於獲取先進的技術，而在於改變政治形態，使全體人民獲得精神和思想上的解放。把人從傳統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主要意味著兩點：

一是人心的解放，即人的“智德”的進步。這“智德”的進步，實際上便是文明開化。他在《自傳》中寫道：“將東洋的儒教主義和西洋的文明主義比較一下來看，東洋缺乏的東西有二，在有形的方面是數理學，在無形的方面是獨立心”。 “智”就是指“數理學”，“德”則是指“獨立心”，這兩點構成西方文明的本質——科學理性和人道主義。

二是人欲的解放，以人欲的擴張為文明發展的動力。他說：“只有人欲才是文明開化的元素，其欲愈多，心之動亦愈多；其欲愈大，其志亦愈大”。這種人欲就是浮士德式的不斷追求的精神，不可遏止的生命意志的衝動。

人心和人欲都獲得解放，謂之“一身獨立”，“一身獨立”是“一國獨立”的必要前提；大學教育應讓人有獨立精神，獨立是不能靠政府命令得到的。在公私關係上，他強調了“私益是公益的基礎”，這就把國家主義的理想放在了個人主義的基礎上。

福澤於 1899 年初版的《自傳》中認為，中國要走向文明，必須推翻清政府，

否則，再來 100 個李鴻章也無濟於事，這預言了孫中山領導的共和革命在中國的環境下的合理性。

福澤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人應當知道究竟是政府為人民存在還是人民為政府存在”。而正是這個根本問題困擾了中國人幾千年之久，似乎至今也沒有得到清晰的回答。

1875 年清政府邀日本和中國聯合起來抗擊西方列強，被日本拒絕。福澤認為，國際關係自古以來都由武力決定，“禽獸相接，互欲吞噬”，吞食他人者是文明國，被人吞食者是落後國，日本也是禽獸中的一國，“應加入吞食者行列，與文明人一起尋求良餌”，以“在亞洲東陲，創立一個新的西洋國(日本)”。那麼“良餌”是誰呢？

1884 年 10 月福澤在自己創辦的《時事新報》上發表了《東洋波瀾》一文，文章說：15 年後中國將被歐洲列強和日本瓜分，日本將佔據臺灣全島和福建的一半。

1885 年，福澤發表《脫亞論》，

1885 年 3 月 16 日，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發表了著名的《脫亞論》一文，全面地闡述了“脫亞入歐”的主張。日本經由明治維新，已脫離半開化社會，逐漸接近文明社會。“日本雖處亞洲東部，但國民精神已脫亞洲固陋，轉向西洋文明，雖常說‘唇齒相依’，但現在的支那、朝鮮於我日本無絲毫幫助，反而玷污我名，……為今日計，我國不應猶豫等待鄰國之開明而共同振興亞細亞，不如脫離其行列與西方文明之國共進退；對待鄰國支那、朝鮮，亦不能因其為鄰國而給予特別關照，唯有按西洋人對待彼等之法處理之”。

“脫亞入歐”口號一經提出，便被日本政府奉為圭臬，成為明治維新時期日

本列島上下喊得最響亮的口號。他的思想使促使了日本舉國上下同心學習西洋文明，讓日本人放棄了“東洋道德，西洋技術”的錯誤觀點，使日本走上了“脫亞入歐”的道路。

脫亞論者聲稱中國日本朝鮮等東亞國家是未開化的野蠻國家，日本人和這些野蠻人在一起就會“近墨者黑”，就難免染上東亞人的壞毛病。日本要專心和歐洲的“好朋友”交往，把日本人改造成像黃皮白心的香蕉那樣、具有白種人靈魂的黃種人。1893年日本對日本人傳統上的排外、無知、自我陶醉、偏執等“島國根性”進行了尖刻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

日本在二十世紀初就步入了世界最先進國家的行列。現在的中國卻仍然處在現代化轉型的漫長過程中，對西方文明仍然欲迎還拒。在堅持獨立的個人主義立場方面，福澤諭吉在一百多年前已經做到的，中國知識份子直到現在依然沒有完全做到。

1945年日本敗戰後，再次認真向美國學習，進行了脫胎換骨的改造，將軍國主義的日本改造成為民主主義的經濟大國。

第 72 節 愛國主義批判

愛國主義有三個層次：愛政府主義，愛國勢主義，愛國民主義。愛政府主義最膚淺，愛國勢主義次之，而愛國民主義才是愛國主義的真正精髓之所在即憲政愛國主義。

1· 憲政愛國主義

真正的愛國主義並不是民族極端主義的情感，愛國主義是有條件的，它對於祖國的熱愛和效忠是以一個怎樣的國家政體為前提的，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共和派的愛國主義是對共和國及其公民的一種普遍並且強烈的熱愛或博愛。經院思想家 Ptolemy of lucca 說：“對祖國的愛應該來自於博愛，即那種將公共事業放在私事前面的精神。”維羅裡指出，這種愛國是尊重正義與理性的原則，可稱之為理性之愛，是對於共和國所賴以建立的法治社會、自由權利、公共秩序的熱愛或崇信。這種愛是有條件的，它所立足的基礎不是種族性，而是政治制度及其政治制度所賴以維生的人權正義及其美德。

哈伯瑪斯說：如果真的要愛，就愛德國基本法所保障的人權與正義吧！這個說法的重點是“人權”而不是“愛國”，“國”已經被定義為人權正義之國。真正的愛國不是愛現存秩序，更不是愛權勢人物，而是胸中裝著祖國的利益、人民的疾苦；不是讚美病態，而是為著國家的前途向病態挑戰；不是忠於哪個政權，而是忠於良心、忠於公理。這是憲政愛國主義。

愛國民主主義指的是以熱愛人民為標誌的愛國主義。愛國志士們愛的不是政府，而是實實在在的人民。政府是人民建起來的，是為人民服務的，這就決定了國家對人民的從屬性。沒有了人民，政府就都成了無源之水，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愛國民主主義要求人們熱愛人民，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如果國家處在外國殖民統治下，就要不屈不撓的與侵略者作一切形式的鬥爭，以爭取民族獨立；如果國家處在專制獨裁之下，就要與專制者作不妥協的鬥爭，以爭取人民的民主權利得到保障和維護。這都是愛國的表現！

愛祖國最深切地表現在致力於使祖國成為全體人民自由和幸福的樂園。這種責任感要求對自己的民族、國家的歷史和現狀進行批判性自我反思的精神以及興利除弊的決心。他們忠實地為祖國服務，而當國家處於停滯和衰頹之際，他們不顧個人安危地為革除形形色色使祖國蒙羞含垢的醜惡現象而奔走呼號；當國家淪

為某些人的囊中私物而陷於黑暗之時，他們勇敢地揭露黑暗，並致力於喚醒酣睡中的人民。

2·愛政府主義

愛政府主義就是認為國家與政府是一體的，愛政府就是愛國。由此引出的愛國行為就是：無條件的擁護政府，對批評政府的言論一律堅決駁斥，嚴厲打擊。在中國，愛國往往被等同于愛皇帝，愛執政黨，愛政府。中國缺少的就是對政府的不信任態度。

信奉這種愛國主義的人多是官員或思想怠工者。這種思想使官員們獲得了道德上的解脫：我拆閱他人信件、竊聽他人電話、暗殺反對派領袖、向示威群眾開槍，這些都是正確的，因為我是奉國家（政府）之命行使事，我是因為愛國（愛政府）才這麼幹的。

對於思想怠工者，信奉這種愛國主義使他們擺脫了思考的責任，只用服從政府，做一個順民，就是愛國了。思考什麼？上級已經替你思考好了。你在政治上沒有半點風險，在思想上解除了繁重的思考，在道德上也沒有遺憾（愛國=道德），又何樂而不為呢？在當今世界，這種奴隸般式的愛國主義已沒有什麼市場了。

維護政府並不總是愛國。現代政治學普遍認為，在政治上提倡和保障國民對政府的嚴苛監督、自由批評和有效制衡，是確保政府增進國家利益、而不是危害國家利益的最重要的政治條件。因此，無條件地維護政府的制度和行為不是愛國、而是害國行為。

批評祖國並不總是害國。表面看，公開批評祖國是削弱國家在內政外交方面的公信力，似乎是害國行為。但是，國家只有在提供令人滿意的公共產品，從而增進國民的政治認同時，才是值得維護的；如果批評國家，是為改善其制度和政

府行為、使其更公正和有效，那麼，批評政府就是愛國主義，而不是害國。那些冒著個人被迫害的風險，為維護公眾利益和政治主義，挑戰和抨擊政府及政要的過失的國民，是具有最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的國民。

在美國，愛國和愛政府明顯是兩回事，不少人正是以反感政府的姿態表現他們的愛國精神。美國人對政府的基本理念就是把政府看成“必要之惡”。你真的愛國嗎？那就要把政府管緊點！要警惕政府越權濫權，要隨時隨地批評監督政府。那些自己不敢批評監督政府，反倒支持政府壓制批評的人，非但不是什麼愛國者，而是國家的蛀蟲。

當美國和伊拉克進行戰爭時，美國人在街頭反對美國政府的政策。反戰的人被認為是愛國的，他們有反對政府的權利。因為國家是所有國民的國家，而不僅僅屬於白宮。指責小布希的伊拉克政策的人，不僅沒有“叛國罪”，反而可以氣勢如虹地與小布希競爭總統寶座。

如果中國和別的國家打仗，你要到街頭反對官方的政策，那一定被看作漢奸了。當局要整你，老百姓會罵你。這種處處維護政府的行為並不是愛國。

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要由國民通過民主機制來決定。中國沒有民主機制讓老百姓來決定什麼是中國的國家利益，民眾沒有權力獲得資訊、做出選擇，也沒有權力把這個選擇反映到政治層面，那愛的是什麼國呢？愛的是一種虛幻、空洞的東西，是一種虛幻的愛國主義。

不愛國人卻“愛國”，只“愛民族”不愛民；這就是某些中國人的“愛國主義”。他們對英國人怒火萬丈的原因是：“英國人統治香港百年沒有給港人以民主，為什麼現在要給港人民主？”原來英國人的錯誤在於他們沒有把 600 萬人的民主權利剝奪到最後一秒鐘，為什麼不讓港人做奴隸做到 1997，而只讓他們做

到 1995？為什麼英國人做主子不做到底？……

當英國人在諸如新機場工程和鐵路這類明顯是為英國人爭利益的事情上漫天要價時，這些“愛國者”總是更願意讓經濟之利而換取不搞“政改”：我讓你狠敲香港一筆竹杠，你給我做主子做到底罷！別的都好商量，千萬不能讓那 600 萬賤人鼓搗什麼“權利”呀！……即使如此，這些“愛國者”們仍然對“西方來的”民主、人權表示了最大的恐懼。

沒有正義和人權的國家不是國家。例如：假設在一個沒有人權和正義的國家裡，某一公民受到迫害，或者受到非法的或非正義的傷害，這個公民不會認同這個國家；如果這種現象是普遍的，那大多數公民就不會認同這個國家。這種國家就不值得愛。

如果生下來便被派定必須愛什麼擁護什麼，那只不過說明他一出生便已淪為奴隸。脫離自由這個人類普遍的價值去建構什麼抽象的國家或神聖國家，是一個騙局。跟在獨裁者後面保衛祖國的人其實是在保衛做奴隸主的國家。

當權者的“愛國主義”是政治流氓手中最後一張王牌。18 世紀英國著名作家山繆·詹森說過：“愛國是惡棍的最後藉口”。這些流氓用它去敗壞國民，使國民白癡化，他們就正好從中撈取好處。為政者在情況于己不利時，還可利用“愛國主義”的蠱惑在需要時拿人民作人質或人肉盾牌。可見，一個專制獨裁腐朽墮落的政府是多麼的喜歡民族主義。

當權者的“愛國”就是熱愛社會主義制度，就是贊同把人民劃為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等級觀念，支援由員警、軍隊向被統治階級實施專政。“愛國就是忠於政權”，愛權勢者之所愛，攻權勢者之所恨。於是，官方的愛國主義者們吹捧權力，掩蓋罪惡。當權勢者作了惡，他們小心地抹掉作惡的痕跡。他們攻訐的

矛頭徑直指向那些挑戰黑暗的真正愛國者。那些公款出國溜達過一遍又一遍的“公僕”，當他們在國外窺見了人家的公僕受到的重重制約，他們真的是很熱愛對他們幾乎毫無制約、並且使他們八面威風的國家。

3·愛國勢主義

愛國勢主義就是讓國家強大。這種愛國主義認為只要國家強大，什麼代價都可以付出。。國家強大和人民幸福不一定一致。例如：納粹德國橫掃歐洲，當時的德國人民幸福嗎？

極端民族主義者鼓吹“唯強大論”，以為為了強大可以付出一切代價，包括人民的幸福。他們一旦聽見對政府的批評，就立即警覺起來，“你是什麼意思？你想削弱祖國嗎？你是賣國賊在配合西方遏制中國的陰謀嗎？”這樣“愛國”，與納粹的“愛國”有何區別？

那些搞“強國論”、搞“富國強兵”的國家，有哪一個不是禍國殃民、榨取人民血汗的國家。北洋海軍的近 3000 萬兩的軍費都挪用到建慈禧太后的頤和園去了。甲午戰爭開戰的時候，中國海軍的戰艦數量大過日本，仍然敗於日本；失敗的最直接原因，竟是由於承包商在許多炮彈裡灌了泥沙，將大量軍費中飽私囊。國家就成了吃人民肉、喝人民血的怪獸。

4·法西斯的愛國主義

德國式愛國主義在於仇恨中成長，它使人心胸狹窄、冷酷無情，滋長一種粗野精神。1930 年代的德國的政治領袖們，尤其以希特勒為首的納粹黨徒，極力鼓吹“國際反德陰謀”，他們把自己民族的一切挫折都歸於他國，就象中國把鴉片戰爭以來的所有不幸都歸罪於“帝國主義”一樣。一戰的失敗，凡耳賽條約的簽訂，德國經濟的不穩定，六百萬的失業人口等等，都是故意和德國過不去的巨

大陰謀，西歐所有的國家都“亡我之心不死。”在國際反德陰謀的話題上搞“三講”：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在納粹民族團結、民族復仇和韜光養晦的幌子下，各種各樣的進步勢力遭到瘋狂的打壓，所有的反對勢力和自由派組織都遭到禁止。到 1934 年夏天，全德國只剩下一個合法的黨，那就是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黨，無數知識份子遭到迫害，像愛因斯坦也逃亡美國。1939 年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的民族主義狂熱終於走上了與世界人民的對抗之路。

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是通過“恨”來號召的——恨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干涉、恨外國敵對勢力的瓦解和滲透、恨民族分裂和反抗，通過對“恨”的號召以建立人民對政府的依賴和對反抗獨裁專制的“仇恨”。這是中國式的愛國主義教育。

以“恨”為出發點的愛國主義是短命的，“恨”的力量是有限的，“恨”不但加大民族之間隔閡，也一定會導致矛盾加深、民族分裂。中國的民主事業應是以“愛”為出發點：愛土地、愛國家、愛人民。以“愛”為出發點的愛國主義教育是永恆的，“愛”的力量是無限的，“愛”能夠消除民族之間的隔閡真正地讓人民團結在一起，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完整。

中國經常講“落後就要挨打”，這是一種動物似的仇恨教育。落後與挨打間沒有必然聯繫，只有或然的聯繫。按“落後就要挨打”的邏輯，這個世界將永遠處於戰爭狀態；因為世界上永遠有相對落後國家和發達的國家，古巴應該挨美國“打”，墨西哥早就應該不存在了。這顯然不是事實。這種邏輯意味著對世界公理的毫無信心，意味著可不遵守國際公德，意味著對比自己落後的國家擁有或保留“打”的權利；這不僅是鬥爭思維，而且是動物層次的思維。這種思想恰恰是世界不安、軍備競賽、各種瘋狂政策的心理根源。

5 · 世界主義

如果一個人以自己為中心，做任何事都首先考慮到自己的利益，那麼他就會被人們認為是很“自私”，而受到這個社會的鄙視。如果一個人以人類和世界為中心，做任何事情都首先考慮到全世界的利益，很多人會認為這個人具有烏托邦的思想，太脫離實際了。如果一個人以自己的國家為中心，做任何事都首先考慮到自己國家的利益，那麼他就會被人們認為是“愛國主義者”而受到國人的讚揚。實際上，以個人為中心是“小我”，以國家為中心是“中我”，以世界為中心是“大我”。為什麼“小我”和“大我”都得不到認同呢？原因很簡單，許多國家一直在向人們灌輸“愛國主義”，而極少提倡“愛世主義”。

愛國本身並沒有錯，一旦把“愛國主義”強調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一旦把國家利益凌駕於全人類、全世界的利益之上，那麼，每一個有理智的人都應當想到：如果別的國家也提倡這樣的“愛國主義”，這個世界還會有太平嗎？

歷史上國與國間的戰爭，幾乎都是打著“愛國主義”的幌子進行的。如兩伊戰爭的雙方都認為自己的“愛國主義”是正義的，對方是非正義的；於是，一場給兩伊雙方帶來巨大災難、死傷數百萬人的戰爭就這樣毫無意義地持續了八年！

其實中國傳統文化並不缺乏愛世主義的思想，《禮運》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描繪了一幅天下“大同”的美好景象。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到19世紀才產生的。因此，它是民族解放主義，而不是民族擴張主義。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中國應回到愛世主義。

在這個世界上，國家有許多個，但地球只有一個。你可以改變國籍，但“地球人”的身份與責任，是任何人無法逃避的。魯迅和梁啟超都這樣說過：不怕中國人消失，而怕中國人不能成為世界人。因為中國人不可能消失，他們擔憂中

國人能不能成為世界人。

由於世界公民的胸懷，酷愛自由的潘恩宣佈“哪裡沒有自由，哪裡就是我戰鬥的故鄉！”

詩人拜倫奔赴戰場，為希臘的獨立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事件發生後，雨果憤然怒斥他的國家參與了可恥的暴行。

當民族主義情緒瀰漫法國和全歐，各國人民在戰場上互相殘殺，羅曼·羅蘭毅然決然發表“超越混戰”的政論，反對國與國的仇恨，指出“以為熱愛祖國就一定要仇恨別的國家”是野蠻而愚蠢的。這種愛是一種抗擊野蠻、遏制罪惡的力量。

法國式愛國主義不僅在於愛自己的家邦，還愛整個世界。當德國老百姓不堪暴政之苦大批逃離國境，途徑法國前往阿爾及利亞或別的什麼地方另尋生路時，流亡法國的海涅親眼目睹了普通的法國人，包括老人和小孩怎樣熱情地向這些難民隊伍伸出援手、提供方便，連乞丐也把自己討來的麵包掰下一半給他們。這是一種使人心胸開闊的愛國主義。

印度的聖雄甘地說：“我首先是一個人，其次才是印度人。”

歐洲著名的人道救援組織“無國界醫生”，其成員都身體力行承擔人道責任。在阿富汗八年戰亂時期，這些來自基督教國家的醫生，曾出生入死地救助那裡的穆斯林傷病員。他們中有的醫生被殺害，有的女醫務人員被歧視婦女的阿富汗人強姦，但他們從不因此把穆斯林當做敵人。俄國的人權工作者也同樣高尚，他們本身是被車臣恐怖分子炸彈威脅的俄羅斯人，但他們聯合一百多個人權組織，一起批評本國政府在車臣濫殺無辜。

第 73 節 仇美的荒唐

1. “緬因號”戰艦紀念碑

1998 年 2 月 15 日，古巴外交部部長及官員一行數十人，在古巴首都憑弔美國“緬因號”戰艦紀念碑！為什麼？

1868 年古巴工人爆發反抗，西班牙政府允諾改革，可長期不兌現，1895 年再度爆發革命。西班牙將軍韋勒強令所有暴動地區的民眾進入集中營，殺戮所有躲避集中營的藏匿者。大片土地瞬間變成廢墟，饑饉和瘟疫肆虐橫行。古巴在 19 世紀末變成了真正的人間地獄。

古巴革命者在美國大肆進行宣傳活動，被奉為古巴獨立之父的作家何塞·馬蒂以他極其有說服力的文章觸動了美國人的同情心。他們在美國購買了大量軍火偷運進古巴。

1897 年美國第 25 位總統威·麥金利在就職演說中強烈地表達了反戰立場。當時的美國剛剛走出 1893 年開始的經濟大蕭條，任何戰爭都可能把美國再度推上經濟蕭條的深淵。

1898 年 2 月 16 號，美國為保護美國在古巴的公民的戰艦“緬因號”發生爆炸，沉沒在哈瓦那港口，至少 266 名美國船員官兵在爆炸事件中喪生。消息傳來，美國人極為震驚悲痛！人們發出了“記住緬因號”的吶喊，全美進入緊急狀態。

4 月 19 號美國國會通過決議：以地面部隊和海軍對西班牙作戰，為古巴爭獨立。國會同時通過“泰勒提案”聲明：美國不向古巴要求主權、司法、裁判、管轄權或控制權，美國爭取的只是帶給加勒比海的和平與安寧。提案保證，一旦古巴獲得自由，美國將撤出古巴。

宣戰前，全美只有不足 2.8 萬的陸軍官兵，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宣戰後，

就有 20 萬民眾報名參加義務兵。這些義務軍人中包括那位曾詛咒麥金利沒有脊樑骨的海軍部長助理羅斯福，羅斯福當時辭去了他的海軍職務，在解放古巴的戰爭中領導了一個由義務軍人組成的名為“魯莽騎士”的騎兵軍團。他身先士卒、勇於殺敵，聲譽鵲起，後當選美國總統。

1898 年 7 月 17 日西班牙軍陸軍在聖地牙哥投降。古巴由此開始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

美國人為古巴獨立付出了鮮血和生命代價。《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645 頁說：“3 月 27 日，美國通過駐西班牙公使提出要求西班牙停火和取消集中營法等條件。西班牙為了避免對美作戰，在 4 月上旬基本上接收美國要求。但麥金利對西班牙作戰的方針已定，仍於 4 月 25 日宣戰”。

事實是：美國已經堅持了一年避免與西班牙宣戰，總統麥金利被西班牙駐美國公使私下裡罵成是軟骨頭沒宣戰；在美國艦隻被炸沉後，美國才對西班牙發出通牒。通牒後，西班牙在古巴獨立問題上閃爍其辭。美國這才對西班牙最後宣戰。

《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第 361 頁說：“1898 年 4 月 28 日，美國為了奪取古巴人民的果實，以緬因號事件為藉口對西班牙宣戰，派兵在古巴登陸。在古巴義軍配合下，打敗西班牙軍”。事實是：古巴獨立戰爭，一直到美國對西班牙宣戰並在菲律賓群島附近消滅了西班牙大西洋艦隊和在古巴聖地牙哥補給燃料的艦隊之後，美軍在古巴登陸作戰，才得以扭轉局勢，獲得勝利。

《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645 頁說：“美國從西班牙取得波多黎各和關島等殖民地”。被刻意漏掉的事實是，在解放古巴的戰爭中，美國全數消滅了西班牙的海軍，並順手解放了菲律賓。西班牙大勢已去，它不得不放棄他的其它殖民地。所以在巴黎談判時提出放棄這些地方的主權。這是美國始料未及的，美

國於是出錢買下了這些西班牙殖民地。

2· 誰護中華

1900年6月21日，當幾個極端頑固的朝廷親貴將偽造的列強要求其歸政的照會上奏後，慈禧向各國同時宣戰，然後命令軍隊和義和團攻打使館；她要把這些外國使節徹底消滅，以一舒自己的心頭之恨。在此之前，義和團已將北京燒得火光蔽天。6月11日，一位日本使館官員被害；20日，德國公使在去總理衙門的路上被清軍所殺。義和團殺掉了幾千名外國傳教士和50萬中國教民。

1900年8月初，奧、英、法、德、意、日、俄、美八國聯軍18000人倉促在天津集合，於13日便進抵北京郊外，14日攻入使館區，清軍和義和團完全潰散。15日晨，宮監告訴慈禧聯軍已經進城，這個夕日不可一世的滿族獨裁者，匆忙換上漢族老農婦的服裝，丟下她的親信同黨，挾持皇帝坐上騾車，出神武門向西狂奔。

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後，當時英、德、俄、日、法、意、奧七國曾要求：將這個“未開化、恐怖、野蠻、血腥、暴虐”的國家裂土而分之。當時中國確乎命懸一線，西方列強中幾個龍頭老大都要一勞永逸地肢解中華大帝國，俄國要割去滿州大部；日本要割遼東半島；法國要割去兩廣大部……剩下的國土準備分解成數個國家。天幸中國不滅，完全因為美國堅決反對，它提出“門戶開放”的自由貿易主義，力主中國疆域的完整。其它七國在美國的堅持下，遂贊成美國的主張，從而保證了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

《辛丑合約》規定，中國向列強賠款4.5億兩白銀，分39年還清，年息4厘，實際賠款本息合計為9.8億兩。賠款總額中，俄國獲得二億八千多萬兩，德國獲得一億九千多萬兩，法國獲得一億五千多萬兩，英國獲得一億一千多萬兩；

這就是所謂的庚子賠款。

後來經美國提議，英法等數國回應，庚款餘額約 3 億兩被退回中國。中國給美國的賠款，美國人一分錢都沒拿走；美國人認為美國在中國遇到的最大敵人是中國人的愚昧無知！因為有太多的無知、太多的不理解，就會盲目排拒和仇視……因此美國的中國政策要取得成功，首先要消除這個最主要的敵人——中國人的無知，最好的方式是在中國發展義務教育。

1907 年 12 月 3 日，美國總統希歐多爾·羅斯福在致國會的諮文中，宣佈“我國宜實力援助中國厲行教育，使此繁重之國能漸漸融洽于近世之文化。援助之法，益將庚子賠款退贈一半，俾中國政府得遣學生來美留學。”這項提案在國會通過。1908 年 5 月 25 日，美國國會正式通過退還“美國應得賠款之餘額”給中國的議案，羅斯福簽署此法案，這次退還賠款一千多萬美元。主要用途有二，一是清廷於 1911 年興辦清華學堂（即後來的清華大學），二是作為中國官派留美學生的費用（詹天佑即是靠此資助留學的）。此次退款尚有餘額，後來又第二次退還。燕京大學、北京協和醫院和協和醫學院也是用這筆賠款建設的。還有在上海、廣州也建立多間學府；美國人在中國辦的大量教會醫院幫助了很多中國人。必須說明的是，美國發還賠款興教育之議者，實為公理會牧師施密士(Arthur Henderson Smith)。

1918 年德國戰敗，宣佈放棄 1917 年以後的中國賠款；奧匈帝國瓦解後，奧地利和匈牙利分別於 1919 年和 1920 年放棄所占賠款。俄國先後經過緩付、停付，最後聲明放棄。1920 年 12 月，英國通知中國，英將退還賠款，作為中英兩國共同利益之用。法國這時也通知中國退還賠款。比利時在 1925 年退還賠款。義大利於 1933 年退還賠款。荷蘭在 1926 年將賠款全部還給中國，但指定 65%用於中

國的水利事業，35%用於文化事業。日本也表示願意退還賠款，但堅持不將錢直接還給民國政府，而是由日本人在華搞文化事業。其實用於文化事業的款項只占賠款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用於留日學生的補助，以及用於日本在中國設立的學術研究機構及中日文化流；1936年以後，餘款甚至用於在中國建立偽政權的軍費。

幾千年來有哪個國家象美國那樣幫助過中國？1941年4月日本和蘇聯簽訂了互不侵犯的中立條約。此後，惟有美國支持中國。在三年零五個月的時間裡，有70多萬噸戰略物質從印度的加爾各答空運到昆明，然後轉運到各抗日戰場。僅航空油料就需消耗420萬噸，而這些物質運抵印度加爾各答，又需逃避被德軍“狼群”潛艇的封鎖和擊沉，其消耗之大，運輸之艱巨，無法用噸位來簡單計算。在這艱苦卓絕的41個月的“空中輸血”中，有1579名飛行員犧牲在這條航線上，有609架飛機墜毀在高山峽谷之間，平均每月犧牲飛行員39名和損失飛機11架。部分美國空軍陣亡官兵——240多名美國人民的優秀兒子就埋在重慶南山鎮青山綠水之間。可是解放後，空軍烈士陵園被挖掘一空，只剩下一排排長滿荒草的240多個空穴。飛虎隊以30架老式飛機的代價，擊落日軍性能優異的戰機297架，奇跡般的創造了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輝煌的戰果的奇跡，嗣後第十四航空隊又以500架飛機的代價擊落日機2600多架，令日本空軍聞之膽裂心寒。為中國抗戰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也付出了巨大的犧牲。1942年2月7日美國國會批准給予中國5億美元財政援助；因為美國的壓力，英國也借貸5000萬英鎊。這兩筆款項超過國民政府全年預算。羅斯福決心幫助中國戰勝日本並建立世界大國的地位，成為戰後制約日本的強大力量。美國完全可以與蘇聯一樣只為自己的利益向日本妥協，甚至與日本結盟。如果那樣做，世界上沒有人能擊敗日美軍事聯盟，美國也不需要犧牲那麼大的人力、物力。在對日戰爭中，美國犧牲了92540人，

戰傷 228182 人；擊斃日軍 1587814 人，擊傷日軍 60872 人。被擊毀艦艇 133 艘；擊毀日艦 324 艘。損失商船 98 艘，計 519772 噸；擊毀日商船 2259 艘，計 8141591 噸。損失飛機 21555 架；擊毀日機 43125 架。以上資料均採納損失國政府自己統計的資料。如果美國也像史達林一樣要求加入德意日聯盟，與日本簽訂《中立條約》，承認“滿洲國”，我們又將會如何？

1943 年 1 月開始，在美國的表率 and 壓力下，西方在中國擁有特權的 11 國全部與民國政府簽約，正式放棄所有在中國的特權。11 月，在開羅會議上蔣介石終於成為四大強國領袖，儘管史達林抵制他而拒絕參會。羅斯福希明確要求英、法在戰後放棄在亞洲的殖民地，包括印度在內。在開羅，羅斯福與蔣不僅談論抗日戰爭，而且討論戰後的馬來亞、緬甸、越南甚至印度等原殖民地國家的獨立，英、法在戰後不應該回到亞洲。

對屠殺了我幾千萬同胞並且沒有認錯的日本，我們經常說“要世代友好下去”對幫助我們打敗了日本的美國人民，我們又有什麼理由要仇視呢？

日本無條件投降後，中國發生了大饑荒。美國運來了大量的麵粉和大米等食物，賑濟中國災民。可朱自清先生寧願餓死在家裡，也拒絕去救濟站領取美國運來的麵粉和大米，因為那是“嗟來之食”。今天的教科書卻說朱先生“有民族氣節”和“死得高尚”，真是荒唐。

1944 年 7 月 4 日是美國國慶日，當時的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主辦的《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慶祝這個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並在結尾處高呼三個萬歲：“七月四日萬歲！民主的美國萬歲！中國的獨立戰爭和民主運動萬歲！”

中國在聯合國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是美國的提議而取得的。二戰後美國對國民黨禁運武器好幾年。當國府潰敗，共軍渡江在即，美國大使司徒雷登也

沒有隨同蘇聯大使撤退到廣州去，而是冒著危險留在南京，與黃華等高級共幹接頭，想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只是因為毛悍然決定“一邊倒”，決定不急於與西方國家建交，司徒雷登才無限惆悵地快快離去。

朝鮮戰爭爆發後，蔣介石要求派兵參戰。可美國寧願派自己的子弟去朝鮮打仗，也不讓臺灣出兵。1960年代蔣介石多次提出“反攻大陸”，因美國反對未付諸行動。如果美國仇視中國的話，挑動中國人之間的內戰是代價最少、效果最好的做法。但美國對此不予考慮。

1969年中蘇之間的大規模的戰爭迫在眉睫，是尼克森總統的介入才使得中國轉危為安。1980年代，美國使臺灣中止了發展核武器的計畫。可見，美國政府對中國人民非同一般的善意。否則，中國人早就亡國滅種了。中國人應該在天安門廣場上樹碑立坊，世世代代永遠銘記美國的恩德！這才叫做真正的不忘本！

3·和平與繁榮的保障

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表明，美國對他國沒有領土野心。

若美國有霸佔他國領土的野心，它完全可乘世界大戰的機會吞併整個美洲；即使美國託管的波多黎各，美國人也不歡迎它加入美國呢！當年的西貢市，與上海齊名，美國沒保住南越，西貢的風采今何在？保下來的南韓，現在是世界一個重要的經濟體！

二戰後美國並沒有把自己的總統制模式強加給日本、西德；蘇聯卻把自己政治模式強加給了東歐並多次出兵軍事干預東歐國家的人民起義及體制改革。二戰後日本歡迎美國駐軍、並願意為美國駐日軍隊出錢。韓國、新西蘭歡迎美國駐軍，很多小國都希望能加入北約、得到美國的保護。毫不誇張地說，我們能享受太平，很大程度應歸功於美國。這是上帝的恩賜！

諾利加通過暗殺國防部長奪取了巴拿馬軍權的獨裁者，把整個國家變成了走私毒品的大本營。在 1989 年的巴國大選中，諾利加不僅不承認選舉結果，還指使士兵當街毆打獲勝者，逮捕反對黨領導人，將其拷打致死後分屍。諾利加本人更在群眾集會上揮舞大刀，展示他毫不在乎文明世界的反應。諾利加政權這種把國家變成毒品集團，殘忍殺害異己，不僅危害美國和週邊國家，本國人民也忍無可忍。美國政府是聯合巴拿馬內部的民主力量推翻了諾利加政權，從此使巴拿馬成為一個民主國家。

如果美國這是霸權的話，那麼怎麼解釋美國軍隊進入巴拿馬的時候，當地民眾夾道歡呼？美國在抓獲了諾利加之後，並沒有佔領巴拿馬，而是交給了巴拿馬人民自己的政府。巴拿馬人民是多麼歡迎美國的干預，多麼感激美國的幫助，因為是美國改變了這個國家的進程。巴拿馬這些年的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與那次美國的干預有直接的關係。

索馬里軍閥混戰，民不聊生；能怪美國嗎？美國士兵去把那些軍閥隔開，反遭殺害；美國的援助、空投的救濟物質，反美人士是不提的。

1999 年的 5.8 使館風波，美國向中國做了多次道歉並給予了賠償，中共也接受了北約的解釋，但是在國內，科索沃問題上的反美宣傳達到了瘋狂的程度。官方以最高規格悼念三位元誤炸中殉難的記者，並加封為烈士；各大城市舉行聲勢浩大的反美示威遊行。老百姓當然不知道，美國也在兩伊戰爭期間遭到過誤炸，1987 年 5 月 17 日，伊拉克的導彈在公海上，誤炸過美軍為科威特油輪護航的護衛艦斯塔克號，造成 37 名士兵死亡。美國政府和美國人並沒有激烈反應，只是要求伊拉克賠償了事。

米洛舍維其政權以國家的名義，對國內的阿爾巴尼亞族進行種族清洗，被控

掘出來的種族屠殺的萬人坑就有 10 餘座，造成超過 20 萬人死亡，高達 3 百萬人無家可歸，又造成國際性的騷擾。一個無人權的國家，又殃及鄰國，再加勸阻無效，國際社會予以干涉是必要的，否則無法制止人權災難。米洛舍維其被送上海牙國際刑事法庭是罪有應得。美國干預科索沃，是她所有軍事干預中最偉大的一次。她完全站在一個和自己的宗教、種族不同的被迫害的弱者一邊，沒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捷克總統哈威爾說，美國這次出兵是最具有人道色彩的一次。

今天不僅科索沃人民感激美國，連南斯拉夫人民都感激美國促使他們加速了南斯拉夫的民主進程。今天，對巴拿馬人民、對科威特人民、對波士尼亞人民、對海地人民、對科索沃人民來說，美國代表著正義。今天，正是由於美國的存在，才使人感到世界有和平的保障；正是由於美國的存在，才使人對自由世界的最後勝利充滿信心。

4 · “9.11” 事件

1998 年本·拉登就號召屠殺世界各地的美國人，同年美國攻擊阿富汗境內的恐怖訓練營基地之後，本·拉登發誓要為每一個死去的恐怖分子殺死 1 百個美國人。面對頻繁的恐怖活動，美國一直沒有採取堅決果斷的措施，直到 2001 年 9 月 11 日 6 千多名無辜者喪生，美國脾氣才再度全面爆炸。

劉亞洲說：9.11 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館被憤怒的美國人砸了。這個時候，有相當多的美國人自發組織起來，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飯館為他們站崗。到阿拉伯人居住區巡邏，阻止悲劇的進一步發生。這是一種怎樣的精神啊！

有很多仇美的中國人為“9.11”叫好。恐怖分子撞擊世貿大樓是存心拿平民大開殺戒！這是反人類的滔天罪行！面對無數無辜生命的毀滅，許多中國人不僅

無動於衷，而且幸災樂禍，這已不是對他人災難的漠視，而是一種近乎歇斯底里的毫無人性的聲音。小布希在清華演講時提到“9.11”事件時，眼裡滿含著淚，但清華學子們，沒人注意到這些；在對話的時候，沒人問候一句“9.11”事件的遇難者，他們沒有把別人的苦難當成自己的苦難。

在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中，死了幾個中國人，中國憤怒了。可恐怖分子在“9.11”事件中殺害了更多的中國人，很多國人卻興高采烈，譴責同樣遇難並且損失更加慘的美國人，甚至為殺害了我同胞的恐怖分子辯護！似乎說一個暴徒只要多殺幾個美國人，就對中國有功，就有權殺死少量的中國人！他們自稱愛國者，把為死難者悲傷的人罵為賣國賊！他們糟蹋人權和恐怖分子完全沒有區別！

與美國長期敵對的朝鮮、古巴、伊朗、利比亞等國家，人民都沒有為此歡呼喝彩。即使越南人，也對美國抵抗共產邪惡充滿了感激，“911 救援基金”收到的最大個人捐款支票是 2 百萬美元，來自一個越南人。

5· 伊拉克的昨天與今天

從 1983 年到 1988 年薩達姆政權使用了芥子氣和神經毒氣導致了 3 萬以上伊拉克和伊朗人死亡；在 80 年代對以庫爾德地區發動了“安法爾行動”，當場處決大批民眾，強行遷移以及摧毀 2000 多個村莊，其中包括學校、清真寺、農場和發電站。人權觀察進行了三年的調查發現，“安法爾行動”至少造成了 5 萬到 10 萬名伊拉克庫爾德人死亡。

1991 年伊拉克南部發生暴動後，估計有 3 萬到 6 萬名什葉派人士被政府軍殺害，50 萬難民滯留在伊拉克北部禁飛區，還有 120 萬到 140 萬名難民逃到伊朗。薩達姆強迫非阿拉伯人的伊拉克公民被迫改用阿拉伯姓氏，否則他們的財產

和配給證將被沒收。據估計，已經有 300 萬到 400 萬伊拉克人逃離伊拉克。知名的伊拉克流亡人士在他們避難的國家遭到暗殺。

1979 年，伊拉克人均收入與義大利持平。薩達姆·侯賽因政權垮臺之時，伊拉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下降到貧窮發展中國家的水準，成為全世界債務最沉重的國家。伊拉克 2004 年人均收入預計為 780 美元，高於 2003 年的約 500 美元。

在哈威爾的呼籲下，歐洲 9 個國家連署了支持美國對伊動武的聲明（捷克、英國、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波蘭、匈牙利、丹麥、斯洛伐克），隨後不久，也是在哈威爾影響下，東歐 10 個國家（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阿爾巴尼亞、馬其頓、波士尼亞、斯洛文尼亞、立陶宛三國）也發表聲明支持美國對伊動武。再加上已決定出兵的澳大利亞，以及美國本身，美英攻伊聯軍已達 19 國。伊拉克戰爭後美國全部免除了伊拉克拖欠美國的主權債務，總計 41 億美元。巴黎俱樂部(Paris Club)債權國已決定分三個階段將伊拉克欠該組織成員國的外債減免 80%。這項協定將伊拉克欠其成員國的債務從 389 億美元減至 78 億美元。美國希望其它債權國能效仿美國，全部免除伊拉克所欠的債務。

6·當代中國人的“仇美”是被官方引導和教育出來的

仇美反西方就是源自於尊清滅洋的偽史教育！在西方人教訓滿清統治者之前，滿清統治者戰無不勝；是英國人打了滿清統治者一記耳光，打破了滿清皇帝天縱神武的神話，才讓洪秀全、孫中山等仁人志士相繼而起，推翻了滿清殘暴專制。

1950 年 10 月 26 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在全國進行時事宣傳的指示》開展“三仇”教育，指出“全國人民對美國應有一致的認識和立場，堅決消滅親美的反動思想和恐美的心理，普遍養成對美國的仇視、鄙視和蔑視的態度。使人人對

援朝表示積極有信心不怕困難，對美帝國主義表示不共戴天，使親美恐美情緒與抗日運動中的親日恐日情緒同樣不能容身”。全國人民擁護抗美援朝就是如此形成的。史達林只不過是同美國明交暗鬥，從不曾要蘇聯人“普遍養成對美帝國主義的仇視、鄙視、蔑視的態度”，更沒有要蘇聯人同美國“不共戴天”。在毛時代，美國幾乎就是邪惡和魔鬼的代名詞。那時，中國人竟愚昧而又天真地認為：被貧困、失業折磨的、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美國人民，正等待著中國人去拯救呢。

挑起戰端的是蘇聯支持和指使下的朝鮮，共產黨在歷史課本裡一口咬定是美國侵略朝鮮。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在中學語文裡保留近半個世紀，課文有一段顛倒黑白的提示：“1950年6月25日，美帝國主義悍然發動侵朝戰爭……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進行抗美援朝的偉大鬥爭”。這樣，北朝鮮違背聯合國協議打過三八線向南推進，聯合國號召全體會員國共同阻止北朝鮮南進的事實消失了。…魏巍似的對美國軍人和南朝鮮軍人的仇恨心理、其筆下的戰士對領袖的崇拜意識徹底吞食了中國人的自我意識，徹底摧毀了中國人在20世紀上半葉形成的公民文化。

官方充分利用境外自由媒體的多樣性，多方搜集臭美消息，用歪曲的報導來潛移默化讀者仇恨美國。譬如：明明美國在一戰前經濟總量就世界第一了，官方卻要說美國靠戰爭起家，明明美國每年的軍火交易只有美國年總貿易額的3%，卻要說美國靠販賣殺人武器致富。

一個非民選的獨裁政權所聲言的國家利益，大都是掛羊頭賣狗肉，常常與民意南轅北轍，因為政府權威是建立在對民眾的暴力恐懼和意識形態謊言之上的。而一旦獨裁政府通過強制灌輸和謊言誤導，將國內危機轉化為外部敵人的威脅，就能加強獨裁政府對民眾的精神控制，就很可能在國際問題上贏得了民意的支持。

因此，中國的國家利益與政權利益是背道而馳的，中共利用反美反霸的民意所維護的，表面上是國家利益，實質上是一黨獨裁的利益。

反對美國的結果是損害中國的國家利益。如果中國在美蘇的冷戰中不反對美國，不參與朝鮮戰爭，美國就不會在 1950 年派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中國的統一問題早就解決了。今天的臺灣問題是 50 年代初中國反對美國的後果。按照“遠交近攻”的原則，日本不希望中國強大，它必然阻擾和反對中國的統一。因此支持台獨的是日本。

7· 讚美與反美的實質

義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說，“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欠美國一筆巨大的債，……美國不僅是我們的朋友，而且是民主、自由的保護人……每當我看到美國星條旗，我看到的不只是那個國家的代表，而是民主和自由的象徵。”過去半個多世紀，美國經濟在全球獨佔鰲頭，一直處於領導地位。美國的“軟力量”輻射整個世界。美國不僅把民主自由的價值輻射到全世界，而且還成為全球所有求知者的“天堂”，每年有幾十萬留學生湧向美國。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代表。連不斷向美國說“不”的法國總統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國留學；江澤民的公子也得在美國鍍金。今天不是世界在迎合美國，而是美國的價值符合全世界人們內心的呼喚。

親美與仇美的實質，不是賣國與愛國的問題，而是民主與專制的問題。也就是反對和贊成愚民政策的問題。一些中國人不研究中國的問題，卻整天研究美國的缺點來襯托“風景這邊獨好”，這是在掩蓋本國特權階級的罪惡。中國新聞媒體的首要任務是遮罩事實的真相，它只是需要你的憤怒。舉個例子，每年美國都會發表一個世界各國人權報告；這時，中國政府也會發一個關於美國的人權報告。

這樣一來，你就不能理直氣壯說美國干涉你的內政，因為你也干涉了別人的內政。問題是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批評美國報告的全文，而看不到別人的報告。讓老百姓看看美國政府怎麼誣衊我們的人權狀況嘛，讓人民來自己判斷。但政府不需要你看到，它只需要你憤怒就可以了。政府認為人民沒有能力去判斷這份報告，怕被美國誤導了，人民只要相信政府給的結論就可以了。政府不需要老百姓知道，如果老百姓知道真相，那政府怎麼利用老百姓呢？總之就是要你對美國反感，對自由反感，對民主選舉反感。

今天共產黨卻這樣反對美國？原因只有一個：美國崇尚自由、民主的理念，而這種理念正是中共政權的剋星，因為中共實行的就是國家權力的官僚集團私有制。

國安部上報中共政治局的報告說：“雖然美國現在不想侵佔中國的國土、不想掠奪中國的財富，但美國是西方“民主自由”價值觀的大本營。這種以信仰上帝為基礎的價值觀同我們民族以無神論為基礎的大一統價值觀，是水火不相容的敵對關係。”

袁木在“六.4”後天天罵美國，他卻把女兒送去美國。特區大量親共分子，口口聲聲留港建港聲稱愛國，卻最先把老婆送去加拿大、兒子送去英美。中國的權力階層口頭反美，兒孫一家都送美國，他們是口頭上的義和團分子，行動上的媚外者。共黨們對美國在世界上的“劣跡”如數家珍，對中國政府干涉他國內政一概隱瞞；這些人的“正義感”從不對本國下層人民[如何院士說死去的礦工是該死]和少數民族表示出來，這是一種假冒偽劣的正義感！

親美派不是漢奸、不是賣國賊，他們是理性、深沉的愛國主義者。他們之所以親美，是想更好地吸收其它國家和民族的優秀文化成果，從而使中國更好、更

快地走向富強、民主和文明。親美、親西方，與其說是媚外，不如說是對人類智慧的尊敬。

第十一章 集體主義批判

第 74 節 集體主義的生活習慣批判

實際上，中國的傳統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歷來排斥個人主義而崇尚集體主義。儒家思想是將人看作“群”和“類”的存在，每個個人只有在滿足了“群”的道德角色要求後，才有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此理。

據說馬可·波羅回到義大利的時候，他的家人問他在中國見到的最奇異的景觀是什麼，他說：“是一張可以容納四、五十人吃飯的大圓桌。”家人又問這麼大的桌子怎麼夾得著菜，他說：“那筷子有一米多，比手臂還長。”家人再問他比手臂還長的筷子怎麼能把菜送進嘴裡，他說：“我夾給你吃，你夾給他吃，他夾給我吃。”

筷子是一種極端原始的、天然的工具，多數人種在剛開始學會使用工具時，都懂得用幾根樹枝來取代手夾起食物。東方人所使用的筷子就是樹枝的初級加工品，不含任何複雜的工藝技術。一些沙漠或草原遊牧民族的先民，因為當時找不到樹枝，所以腦中缺少餐具的概念，形成現在吃手抓飯的傳統。而歐洲人卻率先進化，以石刀替代樹枝，進而發展到金屬刀具，最後又發展出叉子。西方人以肉食為主，樹枝和筷子等原始工具完全無法適應肉食，這就註定了西方人天然會發展出高級工具。

中國的合餐制消滅了公共性與私人性的界限，使得對食物的消費異化為集體主義的相互侵犯過程。把自己的唾液留在他人即將享用的食物上，已經構成了對

他人的侵權；而以友情、親情、上下級之情要求他人享用這食物，則意味著侵權上升為強權。這等於沒有將他人當作權利主體，因而從根本處否定了對方的人格。國人在聚餐時追求其樂融融的大團圓氛圍，但更講究尊卑有序和典讓有禮，這決定了侵權和被侵權的遊戲的不對稱性。地位高者對食物有優先享用權，自然可優先地把自己的唾液滲透到他人的身心。合餐制不但高效率地傳播著疾病，而且不斷演繹著古老的等級制，使許多人成了精神上、肉體上的病夫。合餐制使侵權和棄權成為人際交往的常態，是徹底的集體主義專制文化，國人對合餐制的迷戀說明建設公民文化在中國任重道遠。

最早出使中國的英國使臣馬嘎爾尼在筆記裡寫道：“中國人在個人與集體之間有一種反差：一個貪吃、撒謊、不講道德的個人使英國清教徒式的個人主義者反感；但英國人感到吃驚的是，組成集體的中國人則守紀律，有力量。”

第 75 節 集體主義反自然

“強扭的瓜不甜”。不能退出的“集體”就是監獄。如果集體在人們的心中與監獄類似，那怎能夠喚起人們的集體認同感和集體主義意識呢？有人不明白小崗村當年鬧單幹為什麼需要齊心協力按“血手印”搞“生死文書”，說集體主義應該是用來搞“集體化”的，怎麼會以集體主義來逃出“集體”呢？事實上：把一群人關進監獄是不需要他們有什麼“集體主義”的，但這群人如果想冒險越獄，那倒是必須有集體主義精神才行，各顧各是幹不成的。人民公社時代刮“共產風”、搞“一平二調”是不需要農民有什麼集體主義的（只需要他們一盤散沙敢怒不敢言足矣），倒是那時搞“瞞產私分”需要大家齊心才行。那時的體制恰恰對這種集體主義是拼命打擊的。所以，官方提倡了幾十年“集體主義”，到頭來卻發現人們的合作是那麼困難，公德是那樣的缺乏，公益精神是那麼淡薄，甚至

出現了“人心散了”。

一個網友講了他的經歷：在美國有困難時，美國人伸出人道之手，而中國人則要麼敲詐要麼冷漠不理。這說明：中國集體主義文化極力扼殺個人主義的同時也扼殺了人道。

另一網友說：我媽去縣城半路上心臟病復發，村裡的人見到後，用喇叭喊叫了起來。結果幾十人前去搭救，包括那村的赤腳醫生。那些人不認識我們，純粹是人道支援。兩年後，我媽到北京遊玩。在 332 路電車裡，她突然心臟病又犯了，我大喊幫忙，竟然沒一個站起來給我媽讓座。車子在抖動，我抱不住她，只好讓她慢慢地坐在車裡的地板上。

為什麼有這樣？因為：農民因在自留地上耕作，其文化中有個人主義的成分，他們還保留著人道主義精神；全民所有制的城裡人，個人主義全被扼殺，人道主義也就淡漠了。

有人問：人道不是奉獻嗎？它怎會跟自私的個人主義有緣？

因為：個人主義是自然行為，集體主義是反自然行為。譬如：農村的隊長每天督促社員幹活，對怠工者開批判會以懲戒，但對集體的莊稼誰也不上心；自留地裡的莊稼反而綠油油，

熱力學定律說：有序度越高，維持該有序狀態需要的能量就越大。集體主義是高度有序狀態，維持該狀態的能量非常巨大。這導致了中國幾千年來生產力發展極慢，因為能量全部用來維持這個高度有序狀態了。這也是個人主義文化支撐的資本主義發展迅猛的原因。

個人主義文化支撐的資本主義國民為何人道？因為他們沒有官方的有意強調而產生的逆反心理；另一方面，在個人主義文化根基上建立起來的制度保護著

每個人的人權。而人權和人道都是符合自然天性的，無須靠消耗巨大能量來維持的。所以，個人主義文化支撐的資本主義社會在體現人權的同時也體現人道。凡是有人道主義的國家，人權狀況肯定好。

在集體主義統治下的人民，由於對集體主義有極強的逆反心理。他們認為一切無私奉獻都是集體主義貨色，而對他人施人道就是無私奉獻的內容，也就自然而然地被他們歸類為集體主義而遭鄙視。這是他們唯一能對集體主義發洩不滿的途徑了，否則就有砍頭的危險。比如，在毛共時代，誰要是想把原來本屬於自己但被共產了的豪宅要回來，毫無疑問會掉腦袋。

因為在集體主義文化統治下，人民的逆反心理使一切政治說教都成了自欺欺人的笑料。在人民心目中雷鋒成了傻子，“學雷鋒見行動”如果有行動的話，也是成了入黨的敲門磚。越是學雷鋒，人心越是冷漠。而且，雷鋒精神培養出來的不是貪官就是盜賊。所以，在沒有個人主義文化的專制國家，想靠雷鋒精神來建立人道主義那是緣木求魚。

第 76 節 專制的起點是集體主義

集體主義認為：集體的權利是本，個人的權利是末；集體高於一切，個人隸屬於集體，集體高於個人之上；在社會目標面前，個人在社會的面前是卑微的，不值得尊重的，個人不過是實現理想社會的一種手段；為了社會整體利益，常常需要個人做出犧牲；人權、人道主義都遭官方批判。因此，集體主義也就必然演變成專制主義。

在專制社會，“黨或國家”是所有人心目中的神，它獨一無二、永遠正確，它值得所有的人都為之犧牲。似乎所有人都犧牲了，“黨或國家”依然存在。“黨”就是這樣一個不依賴於個體而獨立存在的怪物。“黨”這個怪物是要喝血的，它

必須把所有的血肉之軀吸幹才能生存。在納粹德國，他們的國歌名叫《德意志高於一切》，他們的婦女是為德國生產優良後代的工具，科學被“看作是增進國家榮譽的一種工具”，教育的目的“是把青年鍛煉成一副有用的工具”（《我的奮鬥》）。在蘇式國家，把人說成“螺絲釘”或“人材(才)”。曾經流行這樣的話：“我是一塊磚，哪裡需要哪裡搬”。所以，專制國家可以培養火箭專家、導彈專家等，但永遠不會培養具有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人，這與他們國家的性質不相容。

工具是沒有個人意志的，它可被任意操縱和控制。所以，專制主義者都熱衷於把人變成工具，而把人變成工具的利器便是集體主義。在集體主義的道德體系下，它不存在良心自由，也沒有所有的人都得遵守的道德底線；有的只是組織利益和組織原則。納粹可一邊彈鋼琴一邊屠殺猶太人；恐怖分子可以一邊放輕音樂，一邊把人質的頭顱割下來。他們之所以心安理得，是因為他們堅信，集體利益高於一切。“講不講組織原則”，是集體主義重要的道德標準。所以，集體原則壓倒天理良心、壓倒人性是符合集體主義道德規範的。對於喪盡天良或者扭曲人性的選擇，他們往往給予“組織性強”或“識大局、顧大體”等高度評價。

集體主義作為社會主義道德原則是史達林 1934 年提出的，指一切言行以合乎無產階級集體利益為根本出發點的思想。其要求是：從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堅持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在維護集體利益的前提下，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結合起來，當兩者之間發生矛盾時，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在必要時甚至犧牲個人利益。

集體主義認為：唯有集體知道是非善惡，集體須給人民灌輸“真理”。集體主義必定是把某個集團的特殊價值觀強加給了整個集體的，這是對公民思想言

論自由權利的踐踏。

集體主義強調為了集體可以無條件犧牲個體，那到底犧牲誰呢？由誰來決定取捨呢？領導嗎？如果領導不夠高尚，私心作祟，那麼他的決策很可能違背集體利益；如果領導足夠高尚，那麼高尚的人怎麼可能讓別人犧牲而保全呢？那些高唱改革犧牲論的，自己是從不做出犧牲的。他們為什麼不能犧牲自己的住房，讓那些被強迫拆遷的人有個棲身之所？他們為什麼不能犧牲大吃大喝，讓那些吃了上頓沒下頓的農村學子改善生活？一說犧牲就是要別人犧牲，而且打的還是集體的旗號，集體啊集體，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當我們被要求放棄自己的權利滿足集體的需要時，我們應問：我們讓渡出來的利益都到哪裡去了？姑且不說經濟權利，先說言論、思想。作為普通公民，我們每個人都放棄了一部分言論和思想的權利，在批評方面，有些話只能點到為止，有些話根本不能說。那麼，我們讓渡出去的這些權利到哪裡去了？你會發現：權力越大的人，越敢說別人不敢說的話，到軍委主席這個級別，他幾乎可以表達任何觀點，幾乎可以做任何事情；他是全中國乃至於全世界最自由的人，用毛的話來說，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可見，我們讓出去的自由造就出了少數人極大的自由。這就是集體主義真相——集體主義是少數人自私自利的工具。

共產黨詞典裡的“公”，就是他們自己。一旦大家都按其要求“為公”了，也就心甘情願的受其奴役了。“大公無私”，就是要天下的人都放棄自己的“私”，一心一意地為他們“一黨的私”效力。集體優先的正當性不是源於集體比個人更加正義，而是源於人數的多寡。這種不平等的優先權一旦被認定，就常常出現，以集體名義侵犯個人正當權利的事情。比如，強制拆遷往往以城市規劃的需要為名，迫使個人放棄合法權利。而西方國家在拆遷時，之所以尊重個人產

權，“風可進，雨可進，就是國家不能進”，其思想基礎是個人主義，即個人權利與集體權利平等，集體或者國家無權要求個人犧牲其合法權利以滿足集體需要。

集體主義造就的是無私的個人和極自私的領導人。專政者要求他人對自己盡忠；把他人當手段、當工具、當資源，從來沒把下屬當人。他們強迫別人放棄個人權利，為集體而犧牲個人，表面上看是整體利益，但強調者的真正目的，不過是以國家民族的名義，將一切利益都攫取到自己手中。當他們地位不穩時，就先將這些攫取物以國家的名義儲存起來。一旦地位穩固，他們甚至連將這些攫取來的利益放在國家銀行裡儲蓄片刻的耐心都沒有，頃刻間就化為他們為所欲為的特權。為欺騙群眾為其賣命，他們用集體主義哄人，說他們是集體的代表，個人沒理由拒絕，一切必須服從組織，個人絕對服從領導。這種忘“我”道德的後果是個人在社會中無足輕重，甚至連個人的人身自由、前途、尊嚴、婚姻和生命都必須服從整體的需要，因而對人的積極性造成極大壓制、對人的尊嚴和權利造成了極大的摧殘。擁有這種絕對權力的統治者要求其下屬“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下級都成了奴隸。這樣的集體已墮落為罪惡集體。和這樣集體的領導保持一致，就是和罪惡保持一致。

專制是以集體的名義維護極少數人特權的獨裁制度。獨裁者最毒辣、最陰險、最狡猾的手法就是把集體主義灌輸給國人，並以集體利益為藉口剝奪每個人的自由，從而剪除異己；就是讓你被人賣了還心感情願地幫人數錢。例如：中國的壟斷企業每次漲價都說是為了集體的利益。他們的集體利益，就是依靠專制手段欺壓人民所獲取的既得利益。

集體主義易導致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或階級主義。為了把一個集體牢牢地團

結在一起并共同行動，一個重要的的條件就是需要把“我們”和“他們”對立起來，并向該集團以外的人進行共同的鬥爭。因此，必然製造敵人，大搞階級鬥爭或反自由化。

集體主義強調社會或國家比個人更重要，一個人只因為他是那個集團的成員才受到尊敬，單純依靠他作為人的資格卻不會帶給他什麼尊嚴。集體主義容易助長門戶之見和唯我獨尊的傾向，集體主義易成為“好戰的民族主義者”。

集體主義是支持專制的強大力量。集體主義是扼殺人性的最惡毒的兇手，血流成河的百年烏托邦史已作了有力的證供。集體主義以奴役人為目的，是不人道的。

第 77 節 集體主義輕視人命

集體主義教育本質上是一種勢利教育。勢利原則就是利益至上。集體主義的精髓就是：對外，比整體實力大小；對內，制訂總目標，按對總目標的貢獻大小給個體排座次、定名分，這都是按集體的勢利原則決定最相宜態度，謀求最優的方案。什麼道義、禁忌，可以全然不顧，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這實際上就是將勢利原則發揮到極至。以勢利為原則，則必然以自由、尊嚴為犧牲，而失去自由就失去一切，失去尊嚴就失去了人性，比野獸還殘忍。

有人說，尊重人，要以人為本！然而集體主義文化裡，集體是目的，個人是為集體服務的手段。共產主義流行語是：(個人的)身體是革命的本錢。本錢者，手段也。毛澤東就是把人當手段的典型。大躍進時，毛大講死人的實用價值。1958年12月9日，他在八屆六中全會說：“人要不滅亡那不得了。滅亡有好處，可以做肥料”。1959年，曾當過土匪的河南固始縣期思公社黨委第一書記蔣學成響應毛的號召，創造了熬人油當化肥的辦法，據反映熬了100多個小孩，經調查

證實熬了 20 具屍體。可見，**集體主義就是草菅人命**。

如今，官方還堅守著“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比如生命），集體的事再小也是大”的“崇高”的原則。這是對生命價值的褻瀆，是對生命尊嚴的踐踏，是對文明道德的鄙視。

1926 年的“三一八慘案”死難者中，初中生占了相當大的一部分。如：謝戡，男，祖籍江蘇武進縣，1912 年 12 月生，北京會文中學學生，未滿 15 周歲。陳時棻，男，祖籍廣東文昌縣，北京藝文中學學生，年 15 歲。朱良鈞，1914 年出生，祖籍江蘇江都縣，北京清明中學初一學生，槍響後被人群踐踏致死，年 12 歲。這是中國政治童工史上悲慘的一幕。

中國現代史上最典型也最有名的政治童工是劉胡蘭。劉胡蘭，女，1932 年 10 月 8 日出生於山西省文水縣。1946 年 6 月，這位不滿 14 周歲的小女孩被吸收為中共預備黨員，並被派到雲周西村領導當地的土改運動（按照當時黨章年滿 18 歲才可入黨，吸收未成年人入黨，並要他們為黨獻出一切，屬於拐騙性質）。同年 12 月，未經審判，劉胡蘭配合共產黨武裝工作隊處死了該村與國民黨閻錫山軍隊合作的村長石佩懷。1947 年 1 月 12 日，國民黨閻錫山的軍隊突襲雲周西村，劉胡蘭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同樣未經法庭審訊，國民黨閻錫山的軍隊即判處劉胡蘭死刑並立即執行（鋸刀鋸首），死時尚未滿 15 周歲——14 歲 3 個月。毛題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就是在號召沒有獨立能力的未成年人為黨犧牲，何其毒也。

一個年僅十三、四歲，完全沒有民事行為能力的小姑娘，不僅被拉進了暴力團夥，還因此被鋸了頭。共黨如同教唆未成年人犯罪一樣，應負主要、甚至是全部責任。中共的課本寫道：劉胡蘭“從容地躺到鋸刀下麵，大聲地說：死有什麼

可怕的！要殺就由你們吧，我再活 17 年，也是這個樣子。”作者欲通過這段文字，來拔高他們要樹的英雄慷慨就義、死得其所的光輝形象。打一個不一定恰當的比方，這就如一個大淫棍說，他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關係，一點強迫手段也沒有用，完全是那個小姑娘自願。幹了傷天害理的事，不僅不感到一絲一毫的不安，還振振有詞，這就是典型的流氓無賴的嘴臉。

眾所周知，中華民國作為當時的合法政府，其治下的村長石佩懷為自己的政府做的那些事，一如今日中共的村主任、村支書催繳農業稅費或向上面彙報情況一樣，是在履行職責。奇怪的是，在同一片國土上，49 年前的村官履行職責，怎麼就成了“反動村長”，怎麼就“成為當地一害”，就被中共手下的“武裝人員”未經任何司法程式將其處死；而自己親人的生命財產被中共的村官、鄉官、縣官等整死，胡文海、薑世興等今日之“劉胡蘭”就該被擊斃？這是什麼混帳邏輯，這是什麼黑道是非觀？假如劉胡蘭“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而她加入的是中共恨得要死、怕得要命的法輪功，她又以 14 歲的少女之手在月黑風高的夜晚處死了中共的村長。那麼，中共一定會像九八年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洪水氾濫一樣，利用好這一求之不得的案例來教育、引導自己的臣民：快來看啊，我們將法輪功定性為邪教，有人還不相信，看看劉胡蘭，一個十三、四歲的花季少女，如果不是聽信了歪理邪說，不是走火入魔，她怎麼會成為少女殺手，犯下如此與自己的年齡不相符合的殺人命案！

中共硬樹給少年兒童學習的反人性少年英雄可多了。什麼小兵張嘎、潘東子、劉文學、小鐵錘、草原英雄小姐妹等。中共之險惡用心，不外乎是對處於成長中的少年兒童施行偷心換腦術，讓他們永遠失去獨立思考能力，失去是非判斷能力，成為唯黨首是瞻，無條件恪守“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的冷血動物或行屍走肉，

成為思想上的“太監”。

中共的確十分重視對未成年人的宣傳教育，從四九年前的所謂兒童團，到四九年後的少先隊，文革時期的紅小兵、紅衛兵，再到如今的少先隊，其實質都是在培養一個又一個劉胡蘭、潘東子似的人為智障者，心腸冷硬如鐵的無情無義者。希特勒當年垂死掙扎時，曾招募大批兒童扛槍上戰場；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基地組織天天都在訓練大批兒童為自己當人肉炸彈。正如那位設計“人肉炸彈”遊戲的美國青年所說的那樣，自殺炸彈襲擊者只不過是死不足惜的一顆過河卒子。中共之所以要立劉胡蘭這道“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忠義牌坊，就是要自己地盤上千千萬萬個人像劉胡蘭、董存瑞、黃繼光等那樣，為它們打江山、坐江山獻頭顱，當人肉炸彈，塞槍眼。工廠、作坊使用童工都是違法的，中共卻使用政治童工，並導致其悲慘死亡。不僅如此，毛共登基後，竟殘忍地讓劉胡蘭的二妹劉愛蘭在戲劇《劉胡蘭》中扮演其姐，劉胡蘭的繼母胡文秀，在文革中竟被懷疑為出賣劉胡蘭的兇手而受到摧殘。

在中共治下，政權重於泰山，民命輕於鴻毛。中國的戰爭文藝歌頌的是“敢死”精神：“頭可斷血可流，陣地不可丟！人在陣地在，誓與陣地共存亡！”人命不重要。

“頭可斷，血可流，國家財產不能丟”。歐陽海想推開站在鐵路上的騾子，讓疾馳的火車頭撞死；為保住國威奮起制服劫機犯的空勤人員成了全國歡呼的英雄，導致後來的效法者造成震驚中外的白雲山空難……。1988年14歲的賴寧為保護地面衛星接收站的安全，撲滅山火時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成了少年英雄。1994年4月，遼寧省瓦房店市許家屯鎮東馬屯小學對面的山上發生山火，十幾名小學生爭先恐後去救火，結果8個孩子葬身火海；事後有關部門評估，那場山火沒有

造成任何經濟損失。

1994年12月8日16時，克拉瑪依市教委組織15所中、小學15個規範班和教師家長等796人（每所學校組織最漂亮的40多名學生歌舞隊）在友誼館為區教育檢查團進行文藝彙報演出。齊聲高唱“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現場氣氛熱烈，歡歌笑語。

18時20分左右，舞臺上方的一盞照明燈烤燃了附近的紗幕，坐在前排的人們聞到了一股淡淡的焦糊味。很多人認為僅僅是一個不和諧的小插曲而已，演出繼續進行。一分鐘後火勢蔓延，電線短路，所有燈光瞬間熄滅，高高的幕布帶著火苗砸向人群。人們瘋狂逃竄。當時的主持人大喊：“大家不要吵，不要動，讓領導先走，讓領導先走！”

學生們很聽話，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動；等官員與教育局所有在場的26個官員都從第一排撤退到最後一排的出口處“先走”了之後，教師才開始組織學生撤離，但此時唯一的逃生之路已被熊熊火焰堵住（當時劇場只開放一個安全門，其餘安全門均鎖著）！此時的友誼館變成了一個完全封閉的大火爐。反應快的一批人成功逃生，而剩下的人們則成了火爐中肆意烘烤的人肉燃料，僅僅過了二十幾分鐘，一切都結束了。

大火中，死亡325人，包括少數民族73人；其中288人是年齡在8~14周歲的中小學生，其中的獨生子女占98%；60%小學生死亡，幾乎都是被踩傷後煙熏死的；有近百名孩子是被人擠死或踩死的；在孩子們弱小的屍體上，有成年男人的大皮鞋印，也有成年女人細若尖刃的鞋跟所踩下的血洞；一名被踩破肚皮的小男孩，被運往殯儀館時，腸子還拖在地上。130名中小學生終身致殘的。

火災中有40位老師在場，就有36位遇難殉職！這些教師不愧是在烈火中永

生的英雄！

有一名舞蹈教師，前後幫助 12 名孩子逃生，她自己的兒子卻葬身火海。據報導：克市第八小學三年二班的老師孟翠芬是一位已經辦了退休又返聘的白髮蒼蒼的老人，人們在撲滅大火後發現她時，孟老師的頭和背已被燒焦。但是，她的兩隻臂肘下一邊護著一名學生，其中一名學生的心臟還在微弱跳動，他還活著！

第八小學校長張莉和市一中副校長倪振性，都是幾次把學生推出火海，自己最後被大火燒得面目全非。然而他們的遺體都是張開雙臂，還像母雞護著小雞一樣，在牆邊圍護著幾位死去的學生。市第七中學的周健老師，在大火襲來時，正用力撐著往下落的捲簾門。”他只要向前跨一步，就可以脫離火海，可是他一直堅持著站在原地用肩膀撐起鐵門，“活著的學生看見他最後三次用一隻手往外推出三位學生，最後倒了下去。

第一小學的李平老師，戴著眼鏡，瘦弱的身影好幾次沖進火場救出十幾名學生，直到再也無法靠近猛烈的火焰時，這位老師才一下子身體一軟靠到牆上，她大喊了一聲“我的孩子還沒出來！”接著就昏倒在地。人們後來發現許多老師的遺體，不是張開雙手拉學生，就是撲在學生的身上。他們在危難時刻，分明是在以自己的血肉之軀，在最後掩護孩子！

在場的克拉瑪依市副處級以上官員有 20 幾個，當時他們的位置離火源最近，離逃生門最遠，竟“奇跡般”地無一人傷亡，而且走出劇場門口時還個個衣冠楚楚！事實很清楚，是克拉瑪依市教委的主持官員葬送了學生逃生的時間與機會！造成了本來可以避免或減少的學生大批死亡的慘劇！作為大人，明知火災的危險，卻把孩子留置于死地而不顧，無異于故意殺害孩子！人類 5 千年歷史上最無恥的組織！

查法院判決書和當時媒體報導，在火災現場的市教委領導有如下2人：唐艦，原克拉瑪依市教委副主任，不指揮打開所有安全門和組織學生疏散，“只顧自己逃”。唐是下達“學生不要動，讓領導先走”罪惡命令的人！以怠忽職守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

況麗，原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訓中心黨委副書記。她憑藉著對友誼館地形的熟悉鑽進了廁所，又憑著成年人的力氣，把原本可塞三十人以上的廁所反鎖頂上，任憑孩子們哭喊也絕不開門；事後在廁所門外地上發現一百多具學生屍體。她還驕傲地告訴記者，“自己的逃生知識有多豐富”。以怠忽職守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

方天錄，新疆石油管理局副局長，在場的最高長官，只顧自己逃命。儘管他只被火星燒焦了幾縷白髮，仍然一頭鑽進小轎車直奔醫院找醫生“檢查身體”；儘管途中順路經過消防隊大門口，它也不下車報案。以怠忽職守罪僅判處有期徒刑5年。

克拉瑪依大火至今迴響著一句話：“學生們不要動，讓領導先走！”

“讓領導先走、讓領導先富起來”，幾千年來已成為國內官員的習慣。他們以仁義道德、“為人民服務”等謊言欺騙人民已三千年，它們是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吸血鬼！

“讓領導先走，是全世界幾千年來最無恥的語言”！“先走的領導不配做人，不配做動物，他們是地球的病毒”。皇帝時代的“肅靜、回避”的招牌就是“讓領導先說”、“讓領導先走”的意思，當代中國和古代唯一的區別，是老爺改成了領導，領導更無恥、更虛偽、更喪盡天良；那些領導和那些馬屁精是最卑鄙的！

克拉瑪依大火好象去了很遠，

大地上餘熱未消陰魂未散，
那群罪惡的丑類仍在臺上：
續演人間假與真、醜與美、惡與善……
當殉難教師用聖潔的身軀，
護佑著孩子們幼小的生命。
“讓領導先走！”
如惡魔嚎叫，震動了大地，刺破了蒼天。
他們踏著師生們的鮮血，
把“三個代表”用行動兌現。
他們自稱是人民群眾的“公僕”
卻絲毫沒有人的一丁點心肝
天地難道只能無言的注視？
為什麼不把他們雷擊電斬！
過去了，克拉瑪依的大火，
留下了，人民永恆的創傷……
願這樣的慘劇永不發生，
願祥和的陽光永遠燦爛，
抹去吧，那荼毒新疆的幽靈，
離開吧，那愚弄人民的邪黨！

“泰坦尼克號”沉船之難，由於船上人多而救生艇不足，許多資產階級富翁和貴族人士不是利用各種優勢“先走”，而是紛紛主動讓出逃生機會，堅持讓婦女兒童先上救生艇，一位富翁為此留下遺言：“我決不會讓一個婦女兒童先我而

死，我要死得象一個男子漢！”

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什麼事都是讓婦女和兒童先走的，看來我們和人家的差距不只是國力和經濟，最大最悲哀的差距是信仰的差距。

正是集體的利益高於生命利益的價值觀，導致全社會對生命的輕視。司機不珍愛行人的生命，醫生不珍愛病人的生命，事故時常發生。連石油工人也輕視農民的生命。2003年12月23日22時左右，重慶市開縣高橋鎮的川東北氣礦天然氣礦井發生井噴時，石油工人跑了，毒死了近300農民。若工人點火，死人可避免，設備會報廢；可工人為了設備，犧牲了農民。

江澤民就SARS擴散講過：“死上200萬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不要亂了佈局”。他拉攏軍隊，動輒一次犒賞幾百億人民幣。他花27億元蓋大劇院，花上千億元搞大閱兵，卻嚴禁貧苦無救的當年志願軍人上訪，何況在朝鮮的百萬屍骨！

美國的“9.11”國難、2003年3月韓國地鐵縱火案、俄羅斯核潛艇事故、莫斯科文化宮人質事件、別斯蘭人質事件、義大利在伊拉克陣亡的官兵、被綁架被殺害的英國工程師比格利，在這些悲慘事件中失去生命的民眾，都得到了降半旗的“待遇”。

2004年西班牙“3.11”爆炸案，死202人。3月12日1400萬西班牙人舉行了大規模的遊行，在馬德里230萬人的隊伍前列，出現了歐洲各國領導人的身影，他們與首次遊行的西班牙王室成員一起，並肩行進在風雨中。3月15日歐洲各大城市的建築物都降半旗對“3.11”事件死難者最深切的哀悼，3月24日西班牙又給死難者舉行了隆重的國葬！

中共為重要首領和外國大人物死亡下半旗外，從未對百姓的重大傷亡下過半旗。199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規定，除了國家重要領導人逝世應下半

旗外，“發生特別重大傷亡的不幸事件或者嚴重自然災害造成重大傷亡時，可以下半旗致哀”（第十四條第二款）。

1998年九江大堤決口所造成的特大洪災中，死亡人數達3656人，當局並沒按《國旗法》為死難者下半旗致哀。約一個月後，國家主席楊尚昆逝世，卻獲得下半旗的哀榮。可見，中共黨國政要1人的價值超過了3656人。

《紅旗飄飄》歌中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好啊好、飄啊飄，“我為你驕傲、我為你自豪、我為你歌唱、我為你歡呼”，…“五星紅旗，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這首歌集中表達了中共及其黨魁長達半個多世紀以來對中國人民造成巨大歷史災難和現實災難的原因、本質及其形式。只有五星紅旗最重要，而其它的一切，包括人的一切，統統不重要！為了五星紅旗江山一統、萬世一系、高高飄揚、永遠飄揚，哪裡還有人的生命？哪裡還有生命的價值？哪裡還有人的尊嚴、人的地位？哪裡還有人權？《紅旗飄飄》極端無恥地表達了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人的生命不重要！中國人的生命更是不重要！

正是把共慘主義看得比生命的尊嚴還重要，導致了1949-1978期間千萬知識份子淪為賤民受盡迫害；正是把共慘主義看得比人的尊嚴還重要，導致了大躍進大饑荒餓死5000萬人，毛時代餓死1億1千多萬人；正是把共慘主義看得比人還重要，導致了慘絕人寰的文化大革命，害死了2000多萬人；正是把社會主義看的比人重要，導致了我們至今難以擺脫一黨專制的束縛；……

第十二章 赤禍初起

第78節 列寧禍首

1 · 列寧的流放生活

1896 年列寧因為鼓動罷工被捕。1897 年 2 月，列寧被判處去西伯利亞流放三年。判決下達後，列寧的母親要求推遲動身的日期，並要求將流放的地點選在葉尼辛省南部的小鎮，那裡氣候對列寧的健康有利。當這些要求被滿足後，列寧有兩個星期的時間在監獄外自由活動，從容地和親友話別。1897 年春，列寧到達流放地點蘇申斯克，這裡是西伯利亞氣候最好的地方之一。除了家人給他寄錢外，政府還給每個流放者每月 8 個盧布的津貼，列寧根本不用從事伐木或者背纖的苦役。列寧在信中說：“除了打獵、釣魚，就是游泳，大部分時間在散步”，“睡覺的時間特別長”，“住房和伙食令人滿意”，還常曬日光浴。他還可以閱讀各種政治書籍和雜誌，和流放地的其它革命者自由來往，討論將來如何推翻沙皇制度。

1898 年 5 月，列寧的未婚妻和丈母娘來到了他身邊。那年 7 月，婚禮在教堂舉行。克魯普斯卡婭描繪道：“蘇申斯克的東西便宜極了。弗拉基米爾·伊裡奇八個盧布的‘工資’給他提供了一間乾淨的屋子、食品加上洗漱和縫縫補補。他們每個星期給伊裡奇宰一頭羊，他每天吃羊肉一直吃到倒胃口。他們還把伊裡奇每週供應的肉食倒在飼料槽裡，由村裡的姑娘給他切成肉排。伊裡奇有喝不完的牛奶，他用牛奶喂他養的那頭叫贊卡的狗。十月裡，一個叫帕莎的女孩來幫我們了。她 13 歲，瘦得皮包骨頭，她為我們承擔了所有的家務。我教她識字，她對牆上媽媽貼的一張紙條奉若神明：‘永遠，永遠不准把茶打翻！’”

2 · 1905 年革命與蘇維埃

1905 年 1 月 16 日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廠 1.2 萬名工人為反對廠主開除 4 名工人舉行罷工；其他工廠工人群起回應，幾天內罷工人數達到 15 萬人。

1月22日，一位名叫加彭的東正教神父(Father Gapon)領導15萬群眾到冬宮廣場舉行非暴力的示威；準備向沙皇呈遞請願書，其中提出言論出版自由、8小時工作制、土地歸農民、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召開立憲會議等要求。加彭事先就把他的示威遊行計畫向沙皇照會。可沙皇不但不理會人民的請求，埋伏的軍警向工人們開槍，1000多人死難，數千人受傷。這就是俄國史上的“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沙皇當時不在聖彼德堡，也沒有下令開槍。後來謀士要他公佈真相以重建威信，被他拒絕，他不願他的軍隊與大臣受過。

血腥鎮壓激起罷工運動蓬勃發展。1~8月，全國參加罷工人數達80萬。在罷工鬥爭中創造了蘇維埃這一組織形式。蘇維埃是俄文COBET的音譯，即會議或代表會議，它是為了協調罷工行動而自發組織的工人市民臨時行動委員會，後來發展成為由工人、農民和士兵參加的全國性的群眾革命組織。蘇維埃的正式名稱應當是工農兵代表會議(鄉區的可簡稱農民代表會議)。1905年列寧說：“蘇維埃乃是為達成一定目的的戰鬥組織。”

1905年6月間，黑海艦隊裝甲艦波將金號的水兵自發舉行起義，擊斃反動軍官，把軍艦開往正在舉行總罷工的奧德薩。8月5日，沙皇同意成立國家杜馬。10月26日，聖彼德堡蘇維埃誕生了，孟爾什維克在蘇維埃居領導地位；全俄各行各業都開始罷工，參加罷工的有2000多個大工廠，200多萬工人。

沙皇被迫于10月30日頒佈《立憲宣言》詔書，答應召集具有立法權的杜馬，規定沒有杜馬的同意，任何法律無效；允諾人民有言論、集會、出版、結社等自由。俄國因此第一次出現多黨制，以前處於秘密狀態的地下政黨紛紛浮出水面，瞬間冒出來一百多個政黨。這個時期被高爾基稱為“新聞界的黃金時代”。列寧說，從那以後“俄國國家制度的基本特點發生了迅速的變化”，“就是俄國社會

的各個階層在不同的舞臺上活動（杜馬內外的活動、出版、結社、集會等等），這些活動之公開、力量之雄厚、規模之巨大，在歷史上是罕見的。”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也擺脫了秘密狀態，他們派代表出席國家杜馬的工作，公開出版、發行黨的機關報，這本身就是俄國民主化巨大的進步。列寧卻從未考慮過與其它政黨在議會內真誠合作，而只是把議會當作工人階級政黨宣傳自己的綱領的講壇。列寧在《12月17日宣言》中說黨應當有兩手，“合法工作與秘密工作結合”；應當有兩套平行的“陰陽”機構，“陰機構”——密謀委員會，對當內外都保密；“陽機構”——無需保密，演戲給外界看而已！

由於孟爾什維克在蘇維埃居強勢地位，列寧遂同意與孟爾什維克聯合。1906年4月23日，第4次統一代表大會在斯德哥爾摩召開。參加代表大會的多數代表是孟爾什維克。孟爾什維克62票，布爾什維克只有46票，大會通過的綱領和決議大都符合孟爾什維克的主張。此次大會通過了臭名昭著的“民主集中制”；列寧強調集中，孟爾什維克強調民主。孟爾什維克沒有統一的理論，他們大致認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不能奪取政權，在沙皇被推翻後，必須經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時期！列寧稱他們為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者。

大會閉幕不久，列寧就發表《告全黨書》批評代表大會的決議。列寧利用少數反對派的特權（他從不承認他的反對者有這些特權），把廣大黨員和地方委員會同中央委員會對立起來。布派出版了自己的報紙《無產者》報，把它當作彼得堡、莫斯科的黨委的機關報，他們特別重視黨的軍事和戰鬥組織工作！

1906年5月7日的俄羅斯《國家根本法》規定沙皇握有確定對外政策、宣戰、媾和、任免大臣等大權，杜馬和國務會議通過的法律要經沙皇簽署才能生效；其中第87條規定在“休會”期間沙皇政府有權不經杜馬同意自行立法。這樣，

沙皇仍是至高的專制君主。

1906年7月8日杜馬為農民的利益討論土地問題被解散；布派中央委員建議武裝起義回擊沙皇。中央委員會否決了這一要求，主張進行非暴力鬥爭：拒絕納稅、不服兵役、不認購政府公債。於是，列寧就不惜任何代價、不擇手段地到處破壞中央委員會的威信。當中央委員會號召罷工遊行示威反擊沙皇解散杜馬時，列寧卻說：“和平示威會使無產階級削弱得不到任何好處，會幫助士兵對手無寸鐵的人們進行演習、逮捕和槍殺他們。”列寧通過《無產者》報煽動對中央委員會的不信任，鼓吹召開新的黨代會。

1906年11月在塔墨爾福斯召開的新的全國黨代表會議來解決布派與孟派之間的分歧。代表會議否決了布派的激進要求，同意與立憲黨人結成聯盟。布派控制的個別地方委員會拒絕代表會議的決議，使彼得格勒黨組織重新分裂為孟派和布派。

第二屆杜馬選舉的結果表明，中央委員會的策略是正確的：第一屆杜馬中只有18名社會民主黨人，而第二屆杜馬有65名社會民主黨人，其中布爾什維克派獲得15席。杜馬中的多數社會民主黨人在杜馬中討論一些建設性議案，都遭到布派的反對，布派猛宣傳革命。

1907年4~5月在倫敦舉行了黨的第5次代表大會。雖然列寧派在新的中央委員會占多數，但列寧不信任中央，他認為組織鬆散的中央委員會無從領導革命；在代表大會即將結束時，他召集了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成立了非法的“布爾什維克中央”。

1907年6月3日，沙皇解散了第二屆杜馬，逮捕了社會民主黨的議員。在逮捕潮中，列寧於12月從芬蘭逃往瑞典。依據新選舉法選出的第三屆杜馬，左

派只占 7%，社會民主黨有 19 席，布派 4 席。1907 年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人數合在一起共有 8.4 萬人；後來革命退潮，黨員人數銳減，到了 1910 年只剩下不足 1 萬人；當時俄國的總人口是 1.5 億。

在一戰爆發前，列寧根本就沒有預見到未來會有革命高潮的出現，曾悲觀地預言：“我們這一代人大概是看不到革命爆發了”。等到戰爭爆發後，列寧主張“把帝國主義間的戰爭變成國內的革命戰爭”，即把德國對俄國的戰爭，變成讓俄國軍隊和平民調轉槍口對準新生民主政權的國內戰爭。他要革命黨人不遺餘力地破壞搗亂，導致國家打敗仗而從中漁利，由此導致他與孟什維克和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人的決裂。布爾什維克黨人因此在國內外被普遍視為人人可得而誅之的俄奸國賊，眾叛親離，聲望跌到了最低點。

3·二月革命

1917 年 1~2 月通貨膨脹惡化，各地出現糧食短缺，首都彼得格勒爆發示威及搶糧暴動。1 月 22 日，聖彼德堡工人紀念“流血星期日”12 周年時，舉行大罷工，示威遊行罷工波及全國，到處是“反對戰爭”、“打倒沙皇”的呼聲。

3 月 8 日國際婦女節，“由於運輸設備不足”使得商店裡麵包脫銷，引起了一些主婦的騷動，彼得堡紡織女工率先開始走上街頭要求麵包，隨後全城 50 家工廠約 13 萬男女工人參加罷工和遊行。第二天，罷工繼續進行，示威者衝破員警的封鎖線，進入市中心，抗議饑餓，要求麵包。參加的群眾增加到 20 萬，隊伍中傳出了“打倒戰爭！給我們麵包！打倒專制制度！民主共和國萬歲！”的口號。彼得堡軍區司令按照事先擬就的防暴計畫派出哥薩克騎兵，然而騎兵已經不願使用暴力驅散群眾。

3 月 10 日首都的所有工廠和企業全部陷於停頓，罷工人數達到 30 萬人。在

郊區，工人解除了員警的武裝，幾支軍隊被調出來鎮壓示威，雙方發生了幾起衝突，但士兵們多半不肯向工人開槍。哥薩克騎兵在鎮壓 1905 年革命時十分賣力，現在卻支持示威者反對員警。

沙皇疑杜馬參與了騷亂，於 11 日下令解散杜馬，不料杜馬轉入地下。彼得格勒的衛戍部隊是一批年齡較大的農民，他們認為他們應該免役了，不滿的情緒一直在增長，所以當他們的長官下令讓他們向鬧事的民眾開槍時，他們拒不執行命令。向晚時分，禁衛軍巴夫洛夫斯基團的第四連發生嘩變，加入遊行群眾。在幾處地方，軍隊向群眾開槍。

3 月 12 日，又有一部分衛戍部隊的士兵們把武器彈藥分給工人，員警從街頭消失。武裝暴動席捲全城。工人和革命士兵佔領了彈藥庫、兵工廠，打開監獄釋放政治犯，並逮捕了沙皇的大臣和將軍。被釋放的政治犯和工人、士兵一起前往陶立特宮，創立了“工人代表蘇維埃臨時執行委員會”，迅速執掌大權。晚 9 點，罷工委員會領袖、工廠選出的代表和各社會主義政黨的代表在陶立特宮舉行集會，成立了工人代表會議——彼得格勒蘇維埃；大會選出了 11 名成員的執行委員會，孟什維克占多數並擔任主席。

13 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從白俄羅斯大本營(最高統帥部)企圖乘坐火車回到首都，挽回敗局，但由於沿途地區的鐵路工人罷工以及士兵起義，未能得逞。來挽救政府的前線部隊的調運被鐵路工人截住了。首都衛戍部隊倒向了革命，團隊也選出代表，很快就被接納為蘇維埃(後改稱“工人和士兵代表會議”)的成員。這時，蘇維埃已成為唯一事實上存在的政權了。蘇維埃決定成立工人民兵，滿足首都的糧食供應，並命令恢復民用鐵路交通。群眾攻佔了俄羅斯的巴士底獄——施利塞爾堡要塞，釋放了政治犯。沙皇的大臣都被逮捕。

面對著既成的革命事實，杜馬臨時委員會決定組成一個政府。3月14日經過磋商，組成了一個以李沃夫親王為首的臨時政府，臨時政府派古契柯夫和叔爾根去勸說沙皇讓位給皇儲阿曆克塞。沙皇遂決定把皇位讓給他的兄弟米哈伊爾大公，而不要皇儲阿曆克塞繼位。

彼得格勒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決定只向政府提出一定的政治要求，並監督其實行，拒絕參加政府。當晚，蘇維埃執委會把政權交給了臨時政府。當晚，陶立特宮舉行了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第一次會議，決定建立蘇維埃士兵部，一切政治行動完全服從蘇維埃。

3月15日宣告成立的臨時政府中，11名部長有10名是資產階級和立憲黨的代表，只有克倫斯基(社會革命黨人)以社會主義者身份入閣任司法部長。

3月15日，沙皇簽署了退位法令。臨時政府的外交部長米留可夫在沒有獲悉詳情以前，就公佈了沙皇退位的消息。他在一個軍官集會上宣稱，沙皇將由他的獨生子繼任，在新沙皇成年以前，米哈伊爾大公將擔任攝政。參加集會的軍官們提出抗議關於攝政的公告。在蘇維埃裡，克倫斯基則已經談到建立共和國，並因此而博得了熱烈的歡呼。臨時政府陷於分裂，君主立憲派和共和派的部長們把他們的爭議提交到米哈伊爾大公面前。米留可夫敦促大公即位，而杜馬主席羅將柯和克倫斯基則勸他退位。大公決定引退。但臨時政府卻沒有能力宣佈它本身是擁護帝制還是擁護共和，因此，決定把這個問題留待召開一次制憲會議時解決。

臨時政府和彼得格勒的蘇維埃從它們成立之日起，就互把對方視為實際的敵對者。蘇維埃沒有任何合法的資格來支持它所擁有的權力；它代表著實際上發動了革命的那些力量，即工人和士兵。臨時政府擁有中上層階級的支持，它的合法資格也頗成問題。臨時政府代表最後一屆杜馬，而這屆杜馬已經被沙皇在退位前

解散了，而且它是依據 1907 年 7 月 16 日的一項選舉法選舉出來的，該選舉法又是斯托雷平政變的一個產物，因此，它根本沒有任何代表性。臨時政府的主要弱點在於它沒有能力行使實權。臨時內閣宣佈了一系列的共和政策——頒佈了無條件的國民自由權利：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結社自由、組黨自由；所有年滿 21 歲的人，包括婦女都將有權投票選舉制憲國會成員；廢除宗教特權和任何社會特權……所有這一切，立刻使戰時的俄國變得比即使是處於和平時期的其它國家都要自由得多……他們甚至決定從現今地主們的手裡買回土地，並將這些土地分給農民們。

蘇維埃不僅有工人階級作為依靠（在彼得格勒還有駐防軍的支持），而且能同群眾保持最密切的接觸，並能最有效地召集群眾採取行動。任何一個蘇維埃的代表都是在工廠由全體工人群眾、在營房由全體士兵選出的。作為代議機構，蘇維埃的基礎要比由普選產生的議會狹窄。它們是一種典型的階級組織，它的選舉方式排斥了上、中層階級的一切代表。由於選舉不是按區域而是按生產單位或軍事單位進行的，蘇維埃採取革命行動的能力是十分巨大的。代表們是立法者、執法者和人民委員，一身數任，自成一體。

3 月 15 日彼得格勒蘇維埃發佈了著名的第一號命令，宣佈接納士兵代表加入蘇維埃，號召士兵選舉自己的委員會，接受蘇維埃的政治指令，同時不要執行與蘇維埃的命令相抵觸的任何指示。這項命令特別提醒：士兵們守衛軍火倉庫、抵制可能由軍官作出的解除部隊武裝的任何企圖。第一號命令重新引起士兵反對軍官，同時，也引起軍官反對蘇維埃。立憲民主黨和軍官團一心要消滅蘇維埃；布爾什維克則一心要消滅臨時政府。

4· 武裝顛覆臨時政府

革命勝利之快使列寧來不及回國，只好在瑞士連呼：“料想不到的奇跡發生了”。當時托洛斯基在紐約、史達林在西伯利亞；他們皆對“二月革命”毫無貢獻。布爾什維克黨在二月革命後走出地下狀態時僅有 24000 人，其中彼得格勒約有 2000 人，莫斯科 600 人。

尚未回國的列寧立即拋出了他的“四月提綱”：一、堅決反對戰爭，反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以革命二字掩飾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二、無產階級及農民奪取政權，不能使資產階級組織臨時政府；三、不幫助和信任臨時政府；四、一切政權歸蘇維埃，因工人蘇維埃是革命政府唯一的形式，並由之召集“憲法會議”。五、建立“貧農和無產階級專政”，而不是“工農民主專政”；六、組織農民委員會，奪取土地，無須訴諸憲法會議，一切重要產業歸工人監督生產和分配；七、沒收全國銀行，建設全國統一銀行，直接歸政府管理；八、社會民主工黨的名聲已經為孟什維克出賣，嗣後應改稱共產黨；九、帝國主義戰爭已經消滅了第二國際的革命性，應該重新組織無產階級國際，稱為“共產國際”。在這個提綱裡，列寧反對臨時政府為擔負國際條約而繼續對外戰爭，卻要俄國的工人和農民馬上起來奪取政權，可見列寧“要和平是假，要政權為真”；在這個提綱裡，列寧公然地將俄國二月民主革命所建立的共和國政府當成了他的革命的物件，聲明他們要建立的政權是一個“貧農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連“工農民主專政”的提法都不容許，所以，列寧的提綱不過是在革命和無產階級的名義之下，對於俄國民主革命和俄國共和政府的專制反撲和公然背叛罷了！

列寧的行為，無疑為德國帶去了好消息。德國當時兩面作戰，希望列寧從後方搞垮俄國，讓俄國把兵力從前線調開，於是便主動向列寧提供專列。列寧生怕被人民當成奸細，便想出了個自欺欺人的花樣，把專列從外頭封了起來。4 月 9

日列寧一行共 30 人乘坐德國的密封火車回國。一路無事，4 月 16 日晚 11 時火車進了彼得堡的芬蘭站，就立即在布爾什維克的總部——“舞女克舍辛斯卡婭宮”發表演說，稱：“保護祖國就等於保護一個集團的資本家……我們不需要議會共和國，我們不需要資產階級的民主制。我們除了工農兵代表的蘇維埃，不需要任何政府”。列寧堅決的攻擊了他回國前布派支持臨時政府的策略，要求蘇維埃掌握全部政權。17 日清晨，列寧在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的代表）聯席會議上以個人名義把他的觀點作一報告，即《四月提綱》。在那一天，沒有一個人贊同列寧的觀點，有人斥之為托洛茨基主義。4 月 20 日四月提綱在《真理報》發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報紙相繼轉載。4 月 27 日彼得格勒全市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召開（5 月 5 日結束）。列寧在會上做了關於目前形勢和對臨時政府的態度的報告，為會議起草了關於對臨時政府的態度、關於戰爭問題的決議草案。“老布爾什維克派”們多半或是公開反對——認為監督臨時政府就行了，工農民主專政還沒開始呢，就來無產階級革命？——或是默不作聲，作壁上觀。對此，列寧既加以無情批評：“沒有政權就無法監督。用決議等等來監督，完全是胡說八道”。

5 月 7 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第七次全國代表會議在彼得格勒開幕，5 月 12 日結束。列寧的主張為布黨所接受。列寧在代表會議上說：“蘇維埃共和國是一個沒有員警、沒有常備軍、沒有特權官吏的國家”。然而，員警、常備軍、有特權官僚正是蘇聯生存的三大支柱。

在 1917 年 6 月年召開的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該大會共有 1090 名代表，其中布爾什維克只有 105 名），列寧就公開放言他的黨“隨時都準備奪取全部政權”。

列寧充分利用臨時政府許諾的自由，用德國人送來的 5 千萬金馬克，一下子辦了 40 多種刊物報紙。布爾什維克一方面在前線向軍隊散發《士兵真理報》、《戰壕真理報》作反戰宣傳，煽動士兵放下槍桿回家，遂造成俄軍對德攻勢於 7 月 1 日慘敗。

7 月 16 日，布爾什維克在彼得堡發動 2 萬多人的武裝示威，他們甚至運來了 1 萬多水兵遊行，企圖奪取政權。這造成衝突，而且搶劫商店，他們高喊“一切權力歸蘇維埃”。旁觀者認為：“一切權力歸蘇維埃”恰恰是一切權力歸孟爾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例如：[在全俄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有 700—800 名代表，而布爾什維克只有 100 多代表](#)；第一次代表大會選出的最高蘇維埃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中，總委員數 256 人，其中孟爾什維克 104 人，社會革命黨 99 人，布爾什維克 35 人（《蘇共黨史》俄文版第 3 卷第一分冊第 142 頁）。遊行甚至包圍了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逮捕了兩位議員和兩位部長，直至宣佈解散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使整個首都陷入混亂之中……法國反間機構手發現大量的德國馬克轉到布黨手中，他們把證據提供給臨時政府。

7 月 17 日，臨時政府乃急令瓦令斯基聯隊對布爾什維克的叛亂進行鎮壓，雙方死亡達 5 百人；封閉《真理報》，解除赤衛隊武裝；以煽動群眾暴動和充當德國間諜罪，于 7 月 19 日下令逮捕列寧。孟爾什維克在蘇維埃為列寧辯護，說政府是誹謗。蘇維埃的大多數人支持臨時政府的政策，蘇維埃中央委員會譴責了列寧與季諾維也夫。列寧與季諾維也夫嚇得化裝後逃往芬蘭。雖然臨時政府查封了《真理報》，占了克舍辛斯卡婭的房子，發佈了逮捕列寧與季諾維也夫的命令，逮捕了托洛茨基，但它沒有取締布爾什維克及其各級組織。結果，布爾什維克卻

大辦新報刊，到處宣傳說：臨時政府危害自由，迫害“民主主義者”列寧。列寧迅速轉變立場，要求放棄“一切權力歸蘇維埃”，被布黨中央所否定！

8月9日，成立了以克倫斯基為首的第二屆（臨時聯合）政府。其主要成員為立憲民主黨人、孟爾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全俄蘇維埃決定對接任了共和政府總理的克倫斯基委以最高權力，要他負責重新組閣，並立即組織軍隊和嚴肅軍紀，藉以捍衛共和國。克倫斯基決定與立憲民主黨、革命民主派和有產者團體等另行組織會議，以代替蘇維埃的職能。

8月25日，克倫斯基在莫斯科召集了一次有各個政黨、各個社會和經濟組織的代表參加的“國務會議”。召集這次國務會議的目的是想要提高政府的威信；會址特地選在莫斯科，因為布爾什維克在當地的影響似乎不如在彼得格勒強大。布爾什維克派則於莫斯科組織並號召罷工以示抗議，甚至造成全國代表會議的會場沒有電燈照明。

克倫斯基和科爾尼洛夫都主張要有一個被賦予全權的強有力的政府。但科爾尼洛夫認為軍官團是這個政府的主要支柱，他自己是獨裁者候選人。克倫斯基希望他的政府不遭受蘇維埃的壓力，但不論願意與否，他卻不得不依靠蘇維埃的支持——他自己當時仍然是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克倫斯基希望用軍隊作為一支平衡力量來遏制蘇維埃的要求，而科爾尼洛夫的目標則是要全部解散蘇維埃。由於克倫斯基反對左派，又對陸軍總司令科爾尼諾夫將軍懷有不滿和戒心，於是大會各派歧見紛存，不了了之，形同流產。

9月3日，里加被德國佔領了。科爾尼洛夫則利用里加的失陷作為反對的藉口。9月7日，他命令強大的哥薩克支隊進入彼得格勒，並公開收回他忠於政府的誓言。克倫斯基指斥總司令為叛逆，號召蘇維埃出面抵制，又在“蘇維埃”中

成立有布爾什維克參加的“對抗反革命戰爭委員會”。於是，原來就有武裝力量的布爾什維克，便立即要求政府釋放7月暴動的被捕者，發放槍枝並成立赤衛軍。克倫斯基全部答應。他向波羅的海艦隊的水兵發出呼籲，並鼓勵布爾什維克的鼓動家出來和科爾尼洛夫的部隊接觸。列寧當即指示布爾什維克立即組織赤衛軍，發動群眾破壞交通，唆使鐵路工人停運科爾尼諾夫的軍隊。布爾什維克在科爾尼洛夫部隊中的宣傳鼓動如此卓有成效，結果科爾尼洛夫的士兵拒絕服從命令，不肯攻打彼得格勒。9月12日，科爾尼諾夫的騎兵團司令又突然逮捕了科本人。

50年後克倫斯基回憶說：“我發覺在處理科爾尼諾夫“叛變”案中鑄下了大錯。拉維爾·科爾尼諾夫將軍在許多俄國人心目中是個了不起的民族英雄。……柯尼洛夫與另外幾名涉嫌參與反革命政變的軍官一起銀鐐入獄。布爾什維克革命發生的第一天，他從彼得格勒監獄中逃出。在布爾什維克掌權後，柯尼洛夫將軍領導了一支白衛軍在俄國南部地區繼續對紅軍作戰。1918年4月，紅軍發射的一枚炮彈直接命中他的指揮所，當場身死。”

布爾什維克借機得以起死回生。9月17日，在彼得堡的蘇維埃選舉中，布派得票22萬張，占33%，較6月前提高一倍；當9月18日布爾什維克第一次在彼得格勒蘇維埃裡獲得明顯多數的時候，托洛茨基從獄中被保釋出來（可見臨時政府之混帳），當選為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主席，這是他在1905年曾經擔任過的職務。9月19日，莫斯科因受彼得堡的影響，布爾什維克又較6月前增加36%……但在全俄779個都市已舉行選舉的634個都市中，布爾什維克得票僅有2%到7%而已。布派掌握的是仍是“兩都”的勞動者和不願打外戰的軍隊。

鑒於蘇維埃日趨左傾，各派為護國擬另組機構來替代“社會主義國會——蘇維埃”，遂決議選舉各階層代表組織“預備國會”，作為“憲法會議”未召集前

行使國會職權的機關。

1917年9月，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在彼得格勒召開全俄民主會議，並產生了“預備國會”，布爾什維克也出席了此次會議。身在芬蘭的列寧激烈批評了布爾什維克黨參加民主會議的“錯誤策略”，警告同志們不要成為“十足的議會迷”。正是在列寧的堅持下，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做出了退出預備議會的決定，全力準備武裝暴動。

9月26日，在芬蘭鄉下的列寧已寫信給布爾什維克中央說：“布爾什維克既然已經在兩個首都的工兵代表蘇維埃中取得多數，就不但能夠、而且應當把國家政權拿到自己手裡來”。次日，他又寫信給布黨中央，指示發動暴動的三個條件已經成熟，絕對不允許喪失機會。這就是列寧在九月所寫下的著名的“兩封信”。10月9日，列寧公開發表“革命的任務”一文，聲稱“要使蘇維埃把國家政權完全單獨掌握到自己的手裡”。10月12日，列寧發表“危機成熟了”一文，認為暴動勝利所需要的一切政治前提都已具備，要求他的黨立即暴動。

10月20日，預備國會開幕。由農民蘇維埃主席擔任大會主席，出席大會的勞動代表344人，中產階級代表153人，布爾什維克代表53人。在國外的列寧全力反對該會的召開，命令布派代表擾亂會議，務使預備國會失敗。托洛斯基受命在會上宣讀預備好了的“退出會議宣言”，他高喊道：“資產階級們！……雖然偽裝成超政治的，但他們已經決定把阻撓憲法會議作為他們的目的了……我們，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聲明：我們與賣國政府毫無共同之處……憲法會議萬歲！……”把自己打扮成“憲法會議”捍衛者的布爾什維克雖然宣佈單獨退出會議，克倫斯基仍然在會上宣稱：“政府將全力於最短時期內，促成召集憲法會議”。

10月16日喬裝的列寧從芬蘭回到彼得堡後，21日發表“局外人的建議”一文，特別摘錄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暴動法則”的要點，主張最火速地、最出其不意地進攻彼得堡。他還特別地提出了一個口號：“寧可全體犧牲，絕不放走敵人！”自然，這個敵人，就是所有志在維護和捍衛俄羅斯共和國的人們，其中自然也包括他的那些“原先的社會主義戰友們”。

10月23日，列寧發表了“暴動藝術”一文；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開會討論列寧的起義計畫。列寧的親密追隨者和朋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對舉行起義。他們極力主張中央委員會等待政府已答應召集並將由激進派多數控制的國民議會。針對這些議論，列寧重申，等待召開國民議會毫無益處。列寧預言，如果起義趕快舉行，敵人只能聚集微不足道的力量進行抵抗，“而整個無產階級的歐洲”將會起來回應。列寧的意見得到中央委員會內托洛茨基、史達林、捷爾任斯基等十個委員的贊同，只有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投票反對他的動議。

10月22日，布爾什維克占多數的彼得格勒蘇維埃要求成立監管首都軍隊的委員會，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同意了。10月25日，托洛茨基領導的彼得格勒蘇維埃成立了軍事革委會，共有80多名委員，其委員中有53名布爾什維克，21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4名無政府主義者，1名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軍事革命委員會主席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拉濟米爾，後來是波德沃伊斯基。這是起義的司令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對此一無所知。

官方教科書說：俄國二月革命後建立了臨時政府代表了“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拒絕人民退出世界大戰和解決土地問題的要求，而布爾什維克代表了人民提出了這些要求。其實，臨時政府鑒於秋收在即，為了避免妨害收成而暫緩分配土地，主張在過年後把土地分給農民。

官方教科書忽視了“臨時政府”的含義。當時臨時政府的成員很多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他們也是社會主義者，其最終目的和布爾什維克並無二致。只是他們視臨時政府為一種暫時的權力委託，其合法性並不完整。臨時政府不具有宣佈退出戰爭和重新分配全國土地的權力，臨時政府是維持會，它的權力只限于在沙皇交出權力之後和全國大選之前的過渡。這屆政府並不想為一時的大眾支援付出規則被破壞的代價。正是臨時政府對規則的遵守(玩世不恭者或許會說這是天真)，給布爾什維克提供了契機。

10月31日，加米涅夫在《新生活報》指責布爾什維克黨的武裝起義是冒險，洩露了正在準備起義的機密。很多人都不相信，當時高爾基不相信俄國有如此權慾薰心、不擇手段的政治家。當他得到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布爾什維克兩個領導人)反對政變的聲明後，立即要求列寧對關於政變的“謠傳”進行闢謠，高爾基認為列寧是一個失去了理智的狂熱分子！

11月3日首都衛戍部隊完全承認蘇維埃為唯一的權力機關，承認軍事革命委員會為直接指揮機關。11月4日彼得格勒蘇維埃用書面通知說：首都的執政者不是克倫斯基，而是托洛茨基；蘇維埃向所有的衛戍部隊發出電話通知：“任何發給衛戍部隊的命令，不經軍事革命委員會的簽字不能生效。”軍事革命委員會向首都市郊部隊和重要的居民點指派了政委，政委是蘇維埃的代表，人身不受侵犯。

列寧故意將11月4日安排為“首都蘇維埃日”，目的是要以大型示威來造成社會混亂，以便“亂中奪權”。遊行群眾喊出了“打倒克倫斯基政府”、“消滅戰爭”和“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混亂局面開始形成——連克倫斯基最親信的軍隊也因列寧的煽動而叛變了。

11月6日晨，臨時政府下令封閉布爾什維克黨中央機關報《工人之路報》。當此共和國性命悠關之際，克倫斯基沒有忘記“民主程序”，於6日召集“預備國會”以討論處理方式。雖然他要求鎮壓列寧的暴動，社會革命黨的左派代表則發言說：“列寧暴動責任，在政府舉措不合民意所致，所以應當彈劾政府。”孟什維克左派代表丹恩雖極力抨擊布爾什維克，卻又聲稱“革命的民主主義者不必運用武裝來對付叛亂者。”……克倫斯基政府的“民主風範”使得這個共和政府，面對叛亂和顛覆，竟然“無所適從”。

與之相反，列寧告誡他的黨徒：“認清這千鈞一髮的時候……千萬不要等待，否則，我們就會失去一切……”6日凌晨，布爾什維克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發動武裝起義。這時首都各區的革命軍隊和赤衛隊不斷彙集到布爾什維克黨總部和軍事革命委員會所在地——斯莫爾尼宮。6日晚上，列寧主張立即發動起義。他連夜來到斯莫爾尼宮，親自領導起義。

7日凌晨，托洛茨基領導工人赤衛隊和革命軍隊佔領電話局、郵政局、國家銀行、火車站、主要政府機關和軍事據點。克倫斯基於凌晨逃往前線去調部隊。凌晨2點35分，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在斯莫爾尼宮舉行緊急會議。托洛茨基宣佈臨時政府已被推翻，全部政權轉歸蘇維埃手中。1918年11月史達林曾指出：“起義的全部實際組織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可以堅定地說，無產階級很快轉到蘇維埃方面來是與革命軍事委員會善於做日常工作分不開的，在這些方面黨首先並主要應該歸功於托洛茨基。”由列寧起草的、宣告臨時政府已經被推翻的蘇維埃政權的第一個檔《告俄國公民書》中宣佈：“臨時政府已被推翻。國家政權業已轉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的機關，即領導彼得格勒無產階級和衛戍部隊的軍事革命委員會手

中。”

列寧出現在蘇維埃緊急會議上，去掉了假髮，接受歡呼，慶祝他們敢於推翻——剛剛推翻了沙皇才創建的俄羅斯共和國及其嶄新的共和制度……大會通過《告工人、士兵、農民書》。7日下午9時40分，“阿芙樂爾”號巡洋艦開炮轟擊冬宮。

7日晚10點40分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布派要求大會批准已發生的起義，社會革命黨和孟派抗議布派的陰謀政變，立即退出了會議。8日，大會成立第一屆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共13名委員，其中有9名後來被官方鎮壓）。列寧當選為人民委員會主席。

列寧的武裝奪權、解散預備國會和“獨霸”蘇維埃大會，立即引發了俄國除布爾什維克以外各派政治力量、包括其它社會主義派別的強烈反對。社會革命黨和立憲民主黨等7日晚退出蘇維埃大會後立刻到市杜馬大廈，在那裡組成了“祖國及革命救援全俄委員會”，提出：急速組成臨時政府，採取積極行動，以“撲滅布爾什維克”的暴動，鎮壓一切反革命的計畫……

臨時政府沒有武裝對抗的準備，手裡可供調動的只有一些軍事院校的學生和女兵，對暴力奪權根本不知所措。逃出魔掌後的克倫斯基，立即與第三炮兵軍團司令克拉斯諾夫將軍指揮哥薩克軍隊反攻彼得堡。至11月11日，距彼得堡僅有15裡。彼得堡城內，在“祖國及革命救援全俄委員會”指揮下的軍校士官生立即起義回應。列寧一則命令赤衛軍抵抗和鎮壓，二則利用工人組織鐵路聯合委員會不為克倫斯基運兵。由於哥薩克軍隊本無決戰的信念，第三炮兵軍團11月14日戰敗退卻，克倫斯基護國失敗。在莫斯科，11月8日，各黨派即已組成“社會安全委員會”，次日向蘇維埃提出要求：解散革命軍事委員會及赤衛軍，未獲

結果；10日，幾千軍校學生及大學生出而佔領莫斯科的中心要地，雙方經過整整一個星期的血戰，因列寧從彼得堡調重兵支援，並以大炮轟擊，11月14日，莫斯科落入列寧之手。

針對俄國人民及其各派政治力量勇敢地護國護法，列寧於12月20日成立“全俄非常委員會”——被列寧稱為“革命之白刃”的紅色恐怖組織——“契卡”，負責“肅清反革命工作”。列寧說道：“假使在俄羅斯的一億人口中有一千萬不願意服從蘇維埃，那我們便將這一千萬人的肉體加以毀滅。”他認為：“如果沒有恐怖和暴力，無產階級獨裁便成為不可能。”

5·武力解散立憲會議

召開立憲會議，制定憲法，成立議會，取代君主專制，使政治民主化、法治化、規範化、現代化，使憲法凌駕于最高統治者、政府、議會、政黨、軍隊之上，是各國仁人志士夢寐以求的事。在俄國最早提出召開立憲會議的要求是十二月黨人，以後在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鬥爭中得到廣泛傳播。所以，1903年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就將召開立憲會議列入自己的黨綱。明確提出：“建立人民專制，即國家整個最高權力掌握在立憲會議手裡。”“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堅信，只有推翻專制制度，並召集由全民自由選舉的立憲會議，才能完全、徹底、鞏固地實現上述各種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但是這件事一直到二月革命之後，才有了希望。

1917年2月革命勝利，臨時政府馬上宣佈籌備立憲會議，同時把一切重大的改革問題(例如土地問題，8小時工作制等)都留待立憲會議決定。1917年3月2日，臨時政府曾宣佈要召開立憲會議，但拖延了選舉的準備工作，6月14日(27日)宣佈立憲會議定於9月17日(30日)召開。8月上旬臨時政府決定將選舉推遲至11月12日(25日)。

立憲會議在當時的俄國是眾望所歸。各方爭論的似乎只是“快慢”問題。更重要的是，被蘇共描繪為連續體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並不存在。從二月到十月，動盪中的俄國實際共經歷了五屆黨派構成不同的短暫政府，其主導力量從右翼自由派、左翼自由派到“社會主義者”，總的趨勢是一個比一個更“快”的主張者輪番得勢。十月之變產生的蘇維埃政府似乎只是第六個更“快”的“立憲會議”主張者上臺。十月政變是在媾和、把土地交給農民、儘快召開自由選舉的立憲會議這三項名義下發動和成功的。列寧多次說：“將保證按時召開立憲會議。”並說：“只有我們的黨掌握了政權才能夠保證立憲會議的召開，我們的黨在掌握政權之後，就要對其他政黨的拖延提出控告，並證實這種罪行。”當時大家都認為蘇維埃是一個臨時機構。可以設想，如果布爾什維克當時不是以召開立憲會議為號召，而是公然提出取消立憲會議，那它的奪權必然會“震撼”得多，而能否成功也就未可逆料了。

布爾什維克雖然提出過“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也只不過是把它作為奪權的措施，他們指責臨時政府終於宣佈的立憲會議選舉日期是靠不住的，宣稱只有蘇維埃才能保證立憲會議選舉如期舉行。在十月革命前兩周，列寧指示布爾什維克控制的軍隊要給士兵放假，以便組織他們回鄉進行“關於立憲會議的鼓動工作”，爭取農民選票以便“在立憲會議中獲得多數”。在十月革命前夜，布爾什維克的機關報《工人之路》以通欄標題向人民發出號召：“把惟一徹底的和堅忍不拔的革命黨——布爾什維克選進立憲會議！”

就在打下冬宮、奪取政權後的次日即 1917 年 11 月 8 日召開的第二次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大會上，列寧重申了臨時政府不願召開立憲會議是它被推翻的理由之一，而且強調即將召開的立憲會議才是惟一有權決定國家問題的機關。他明確

表示，即使布爾什維克在選舉中失敗，他們也將服從“人民群眾”的選擇。人民委員會立即認可了上述立憲會議選舉日期，選舉於 11-12 月舉行，在某些邊遠地區於 1918 年 1 月舉行。對於這次選舉，列寧是肯定的：“立憲會議是通過普遍、直接、平等和無記名投票，按比例代表制來選舉的。這種選舉制是最完善的選舉制。”這說明列寧對立憲會議的選舉制是肯定和滿意的。

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控制的全俄鐵路工會執行委員會（以下簡稱“全俄鐵”）是在 1917 年 7 月成立的，11 月 11 日全俄鐵就政權問題發出緊急電報，說“國內不存在政權……在彼得格勒成立的人民委員會只依靠一個黨，不能得到全國的承認和支持。必須建立新的政府……”為此目的，它以舉行罷工、停止鐵路運行作威脅。同日，全俄鐵召開會議，參加的有各黨派的 30 名代表。會議決定成立一個叫做“制定各黨派和組織間協定特別委員會”，以準備關於政權成員和關於中止國內戰爭的措施的建議。列寧主張現在不必同全俄鐵對話而是需要把軍隊派往莫斯科。列寧強調：“談判應當是軍事行動的外交掩護”。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主張通過和平綱領、保證在預定的時間內召開“憲法會議”。11 月 15 日，加米涅夫竟以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議：取消布爾什維克的政權，代以各黨派的聯合政府。列寧不但否決了他們的動議，而且用黨紀來處分他們。加、季等人乃宣告退出中委會。而人民委員會的 15 位委員中，就有 11 人反對列寧用政治恐怖的手段來建立一個殘暴的獨裁政府，列寧則辱罵他們是“逃兵和工賊”，開除了他們在蘇維埃和黨內的職務。因此，布黨同全俄鐵的談判談判失敗。但在立憲會議選舉如期進行後，全俄鐵就立即宣佈與蘇維埃政權和解。由於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的主要政治力量都宣稱俄國前途最終取決於立憲會議，人們也就在等待立憲會議的心態下大體平靜地接受了既成事實。

列寧發動十月政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臨時政府正在籌畫召開立憲會議，為俄國制定一部民主的新憲法；立憲會議一旦召開，布爾什維克不可能占多數，新憲法一旦通過，共黨掌權的可能性就是零，因為除了在少數大城市有一定支持者外，共黨在農村根本沒有支持者。僅以第三版《列寧選集》第三卷中的幾則注釋，就說明民心趨向社會革命黨人的程度。①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於 1917 年 6 月在彼得格勒舉行。出席代表 1090 名，絕大多數屬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人，布爾什維克只有 105 名代表（864 頁）。②全俄農民第一次代表大會於 1917 年 5 月在彼得格勒舉行，各省及軍隊選出農民代表 1115 名，社會革命黨人 537 名，孟什維克 94 名，布爾什維克 9 名，人民社會黨人 4 名，勞動派分子 6 名，無黨派人士 136 名（14 名傾布），黨派不詳的 329 名（863 頁）。③1917 年 11 月 11-25 日（11 月 24—12 月 8 日）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非常代表大會於彼得格勒舉行。代表 330 名，其中左派社會革命黨人 195 名，布爾什維克 37 名，右派和中派社會革命黨人 65 名。關於政權問題，通過要求成立“清一色的社會黨人政府”的決議，以及平均地權的決議（896、897 頁）。④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於 1917 年 11 月 26 日-12 月 10 日（12 月 9-23 日）在彼得格勒舉行，在 790 名有表決權的代表中，有 303 名右派和中派社會革命黨人，350 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91 名布爾什維克。大會起初以不多的票數通過了右派社會革命黨人提出的要求把國家權力交給立憲會議。但在布爾什維克黨團的堅決要求下，重新進行了表決。右派和中派社會革命黨退出了大會。大會選出了由 250 人組成的執委會，其中 108 人（布 20 人、左派社會革命黨 81 人、其它 7 人）被選入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列寧奪權成功後，就認為“立憲會議只有統戰的意義”，而當前的使命則是“確保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權”。立憲

會議被秘密推遲到 1918 年 1 月 18 日召開，而選舉日期不變。

立憲會議選舉採取比例代表制，各黨派的競選政綱和候選人名單是“十月政變”前早已公佈了的。1917 年 11 月 25 日的選舉以普選、均等、直接、無記名等為原則；無論男女，年滿 20 就有選舉權；這是俄國歷史上最自由的一次選舉。25-27 日，首都彼得格勒進行立憲會議選舉。29 號公佈了最後選舉結果。布爾什維克黨得票 42.4 萬張，6 個席位；立憲民主黨得票 24.7 萬張，4 個席位；社會革命黨得票 15.2 萬張，2 個席位（包括左派社會革命黨 1 個席位），布爾什維克得票最多。美聯社記者問列寧對選舉結果有何看法時，列寧說：“我認為這次選舉是布爾什維克黨取得巨大勝利的證明。”並認為立憲會議定會批准人民委員會的全部措施的。“決不會有多數人反對我們。”在答覆哪些黨將參加新的人民委員會時說：“我不太清楚。但我認為，除了布爾什維克黨以外，只有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這是首都這個工業比較發達地區的情況，後來加上其他農業地區，情況就不同了。立憲會議選舉共得 4450 萬張票，布爾什維克黨得 1060 萬張，占 23.82%，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共得 2630 萬張，占 59.10%。以下四類黨派合起來計算結果是：

布爾什維克黨	902 萬張，占 24.90%
社會革命黨	2090 萬張，占 57.71%
孟什維克黨	170 萬張，占 4.69%
立憲民主黨及其它	
地主資產階級政黨	460 萬張，占 12.70%
合計	3622 萬張，占 100%

這些數字說明布爾什維克只得到近 25%的選票。布爾什維克聲稱代表多數人

統治，可在全俄立憲會議的 703 名代表中，[社會革命黨人獲 412 名](#)，布黨只占 168 名。加上左派社會革命黨的 39 名代表，擁護十月革命的總共才 207 名，不足全體代表的 1/3。

1917 年，在俄國的工人無產者只有 300 萬人，占總人口不過 2%，連貧農、城市半無產者算上，也不過 10% 左右。況且，鐵路工人、印刷工人和軍工廠工人反布爾什維克的情緒不亞於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全俄鐵路員工代表大會就曾力主成立“清一色社會黨人政府”，並提出侮辱性的要求：列寧與托洛茨基不得參加政府。後來又通過“全國政權應歸立憲會議”的決議，起碼說明黨脫離本階級的意志。再按照黨員數量來看，二月革命前，布爾什維克不足 2 萬人（一說 2500 人），1917 年 4 月七大會議時發展到 8 萬，8 月初發展到 24 萬。當時孟什維克黨的黨員是 19.3 萬，而社會革命黨的黨員已達 100 萬。而立憲會議的選舉，社會革命黨得到近 58% 的選票，超過布爾什維克 132%。這多數人民的意願豈能忽視。

顯然，布爾什維克輸掉了這次選舉，而且輸得很慘。其慘還不在於得票少，而在於這是在它當權條件下、由它組織的選舉。它沒有理由、而且的確也並未指責這次大選有舞弊、賄選一類的污點。後來布爾什維克反對的理由只是說立憲會議的選舉是根據臨時政府的法律進行的，而這個法律現在已經過時。反對者指出，這個理由顯然太過牽強：既然這次選舉本來就沒有合法性，為什麼又要組織這次選舉呢？考茨基也認為：“在立憲會議居於少數之後，才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其實布爾什維克在選舉過程中已經感到不妙，並通過蘇維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頒佈法令，授權那些選出的代表不符合其意願的地方蘇維埃可以暫停選舉、召回已選出的代表並組織改選。然而，各地蘇維埃並沒有行使這

一權力。

由於總的投票使布爾什維克黨成了少數黨。自然其它黨必然提出“全部政權歸立憲會議”，即布爾什維克交出政權。布爾什維克自然是不接受的。列寧在1917年11月27日作了回答：“至於立憲會議，有一位報告人說，它的工作將以國內的民意為轉移；但我要說：依靠民意吧，可是不能忘掉步槍。”這是“槍桿子出政權”的最早版本。於是，列寧的人民委員會政府又在立憲會議預定開會日11月28日（12月11日）前，以到達的代表太少為由宣佈推遲會期。當天一些立憲民主黨人示威抗議這個決定，要求“一切權力歸立憲會議”，結果遭到嚴厲鎮壓。當天人民委員會通過“逮捕反革命內戰首領”的法令，逮捕了一些人民自由黨活動家，其中包括當選的立憲會議代表，立憲民主黨事實上被取締，其當選代表或被捕被殺，或逃亡。同時決定立憲會議延至1918年1月5日開幕。

列寧迅速拋出了由他起草的《被剝削勞動人民的權利宣言》（此宣言在1月25日為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通過），稱：“俄國為工農兵代表的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和地方的全部權力歸蘇維埃，立憲會議必須擁護蘇維埃政權和人民委員會法令”；並威脅說：“一切權力歸立憲會議”是反動口號，任何人及任何機關企圖攫取政權的嘗試，蘇維埃政權將予以鎮壓直至使用武力。俄曆12月23日列寧宣佈在彼得格勒實行戒嚴，忠於布爾什維克的部隊被調入首都，打算“用武力更正票箱”。在排除了立憲民主黨人的情況下，公立1918年1月18日，立憲會議開幕。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組織的“保衛憲法會議聯盟”決定在陶德里宮前舉行和平的遊行慶祝。但當遊行向陶德里宮門前進時，立刻遭到布爾什維克的槍擊，因為擔任警戒的水兵奉令“絕不要吝惜子彈”，百餘參加遊行的男女被打死，遊行被驅散了。

當列寧得知支持立憲會議的群眾被鎮壓，他才允許立憲會議開幕。陶德里宮的四周，站滿了全副武裝的水兵，他們對進宮開會的代表，不是叫囂“這個人應該挨上一刀”，就是說“把子彈打進這個人的腦袋，並不是一件壞事。”但是，代表們沒有因為武裝的威脅和死亡的恐懼而退縮。雖然會場外迴響著機關槍聲，會場內佈滿了粗野的士兵，多數代表不同意由列寧起草的、在《真理報》上刊登的、並要求立憲會議“批准”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代表們以絕對多數否決了布爾什維克提案和全部政綱。列寧立即帶著他的代表團揚長而去，這就是行動的信號。喝得醉熏熏的士兵們開始在會場內大叫大嚷，不斷起哄打斷代表的發言，更有人舉槍向發言的代表瞄準。那些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代表們對兵痞不屑一顧，會議仍然按議程進行。到次日凌晨 4 時，當議長切爾諾夫宣佈就一項議案表決時，一個當兵的大搖大擺走上主席臺，拍一下他的肩膀說：“喂，我奉命通知讓所有的代表離開會場，士兵們已經累了！”當議長質問他從那裡得到的命令，並說代表們已經疲勞，但仍然要通過一項人民期待已久的法律時；士兵們咆哮起來：“夠了！夠了！”隨即更多的士兵蜂擁而入，在暴力和混亂中代表們被抓了起來，以後又讓契卡把他們統統斃了。

當天，布爾什維克就宣佈立憲會議是“人民的敵人”。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法令，解散了立憲會議。1 月 20 日又宣佈用他們所控制的蘇維埃代表大會取代立憲會議，成為俄國的最高立法機構。列寧在新聞發佈會上說：“俄國革命的全部歷史，早已準備好了蘇維埃與憲法會議的衝突……一切政權歸蘇維埃。誰要破壞，我們一定打斷他的脊椎骨！”他的囂聲未止，當日，兩名立憲民主黨人哥羅什金和辛格諾夫就被列寧的水兵殺死于議院。托洛斯基說：“在我們單純地、公開地、粗暴地去解散憲法會議之後，實際上就是給形式的民主制度以

一個永遠再不會復活的最後一擊”。就這樣，布黨敲響了俄國民主革命的喪鐘。

對於上述行動，列寧用 1903 年普列漢諾夫的話作了解釋：“所有的民主原則應該完全服從我們黨的利益。”革命勝利、革命利益是最高法律。“有那麼一天，我們黨會反對普選權，在革命熱情迸發的情況下，人民選出了一個很好的議會，那麼我們應該力求使它成為長期的議會，如果選舉的結果不能令人滿意，那我們就應當力求解散它，不是過兩年，要是可能的話，過兩周就解散它。”據此接著列寧說：“對社會主義的敵人，在一段時間內，不僅可以剝奪他們的人身不可侵犯權利，不僅可以剝奪他們的出版自由，而且可以剝奪他們的普選權，而不好的議會力求在兩周內將它解散。”因此代表農民利益的社會革命黨人在伏爾加河流域、西伯利亞等地的蘇維埃選舉中獲勝，自然也就給予以解散。**列寧之所以專橫霸道，是因為在立憲會議選舉中布爾什維克在軍隊中大勝。不僅在北方戰線、西方戰線、波羅的海艦隊，布爾什維克分別獲得 61%、67%、57.5% 的選票，更重要的是在大的衛戍部隊，即彼得格勒與莫斯科分別獲得 79.2%、79.5% 的選票。易言之：槍桿子對於解散立憲會議起了關鍵作用。**

這自然引起其它黨的堅決反對，他們指責“人民的少數代表，趕走了人民的多數代表”，而且是“用射擊驅趕的”。1 月 20 日，主要由孟什維克組成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發表《致全俄公民書》，指出：“立憲會議被以武力驅散了……甚至早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打算做出解散立憲會議的決定之前，立憲會議就已經被解散了。布爾什維克一如既往，首先用武力解散了立憲會議，隨後便關閉了陶德里宮不讓任何一位立憲會議成員進入。只是在這以後，才要求中央執行委員會公佈關於解散的命令。因為自布爾什維克黨奪取政權以來，蘇維埃的全部作用歸結為在‘人民委員會’的決定上蓋上一個印章。沒有任何‘蘇維埃政

權’，有的只是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的政權，以及追隨他們的那些武裝隊伍的政權。”

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和人民社會黨聯合發表傳單指出：“（俄曆）1905年1月9日，尼古拉·羅曼諾夫和特列波夫槍殺過要求召開立憲會議的工人。今天，當勞動人民經過12年鬥爭之後，立憲會議已由人民選舉產生，而彼得格勒的工人又一次為立憲會議而遭到自稱是工人階級代表的那些人的槍殺！”從此，“公民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被剝奪了。”“工人的旗幟被撕毀、被燒掉了。”

與這份傳單類似，沙皇時代素來同情布爾什維克的左派作家高爾基，在這一天激憤地寫下了《1月9日與1月5日》，發表在《新生活報》上，嚴厲譴責布黨。他認為當天發生的慘案比1905年1月9日沙皇屠殺和平請願工人的“流血星期日”在性質上要惡劣得多。

1905年1月22日，當士兵服從著沙皇政府的命令，向一些沒有防禦而和平的工人群眾開槍射擊時……知識份子們和工人們向士兵們走過去高喊：“你們幹什麼？……你們知道你們屠殺的是誰嗎？他們都是你們的兄弟：他們沒有武器，他們對你們沒有惡意；他們現在是去請求沙皇注意他們的需要。他們不是去提什麼要求，而是向沙皇請願！……想想看吧，你們是在做些什麼，你們這些傀儡們！”但是士兵回答說：“我們奉有命令。”他們像機械一樣的開射起來……也許不是出於本心，但是他們還是射擊了。

在1918年1月18日，沒有武裝的彼得堡的人民、工人們和店員們出來慶祝制憲會議開幕。這是將近一世紀以來俄國人民所夢寐以求的。他們把制憲會議看作一個能給俄國人民自由表現其意志的政治機構。數以千計的知識份子和數十萬工人與農人，更為這個夢想而坐牢、而充軍，甚至被絞死、被槍殺。為了這一個

神聖的日的，曾經血流成河。現在目的總算達到了，爭取民主的人民也走出來歡舞了，但是“人民政治委員”卻命令開槍。我們不應當忘記，有些“人民政治委員”過去正向受苦的大眾強調過為制憲會議而開爭的必要性的。

真理報撒謊了！它把1月18日的遊行示威說成是由資產階級和銀行家組織的……真理報是在說謊，因為它知道資產階級沒有理由來慶祝制憲會議的開幕。在246個社會革命黨人中和140個布爾什維克黨人中的這些人有什麼事情好做呢？真理報知道，那些參加行列的是工廠的工人，而那些被槍殺的，也就是這些工人。真理報雖可說謊，但是不名譽的事實總是存在着的。很可能的是，資產階級會很高興，因為他們看見士兵和赤衛軍從工人手中把革命的旗幟奪走，從泥濘中拖過，然後焚毀掉。但資產階級也很可能因這種景象而難過，因為在他們中間也有真正愛國愛民的誠實人士。其中有一個名叫安特烈·愛維諾維契·辛格蘭夫的人，後來被野蠻地殺害了。……

正如同1905年1月22日一樣，在1918年1月18日的遊行慶祝中，也有人向那些開槍的人問：“傀儡們！你們在做什麼？這些都是你們自己的同胞。你們難道看不見那些赤色的旗幟嗎？這裡沒有一面旗幟是對工人階級，或是對你們有敵意的。”

這一次，正和1905年一樣，士兵回答說：“我們是奉命開槍的。……”我要請問人民的政治委員們，你們當中也有誠實而又有理性的人，你們是不是知道：把他們殺死，是破壞了俄國的民主，是破壞了革命的勝利呢？你們是不是明白此中道理呢？或者你們會不會這樣想：即使這樣做會導致俄國民主的毀滅，也必須由我們來幹，決不許別人過問。

列寧取締立憲會議沒有任何理由，之前布爾什維克為了參選做了大量的非常有效的宣傳，還給士兵放假兩個星期專門去宣傳。但選舉的結果不利，他就拋棄了憲政的外衣，用刺刀扼殺了民主。列寧解釋說，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粉碎了“資產階級民主”。而按布爾什維克以外的其他社會主義黨派的說法，則是“民主革命”的毀滅和“專制黑暗”的重返。

從贊成立憲會議到取締立憲會議，是列寧跟第二國際的分手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這之前列寧雖然對第二國際在一戰當中的態度不滿，但因為第二國際本來就有各種派別，這種鬥爭多少年一直在進行，大家都承認這個共同的國際組織的。

在取締立憲會議以後，第二國際各派都寫了大量的文章反對這樣做。德國社會民主黨人、馬克思主義者羅莎·盧森堡說：“列寧和托洛茨基曾經強烈的要求召開立憲會議”，而十月革命後的立憲會議選舉又“是根據世界上最民主的選舉”，“在完全自由的條件下進行的第一次人民投票”，布爾什維克卻“毫無敬畏之念，乾脆宣佈投票結果毫無價值”，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行為。1919年她在德國監獄中留下了遺作《論俄國革命》，指出：列寧不是在搞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在對無產階級專政。只要共產黨人要保住他們的政權，他們就不得不依靠暴力實行專橫的統治。列寧在1919年致羅日科夫的一封信坦率的說法值得一提：列寧認為當時的內戰是“蘇維埃政權反對‘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選舉的鬥爭，即反對反革命立憲會議的鬥爭”，“這是資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議會制的世界性大崩潰，無論在哪個國家，沒有國內戰爭就不會有進步。情願者命運引著走，不情願者命運拖著走。”

1918年至1919年，針對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以及布爾什維主義在俄國的暴政，第二國際思想家考茨基（1854. 10. 16～1938. 10. 17）先後發表了《無產階

級專政》、《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兩本書。他在《無產階級專政》一書中批評蘇維埃政權不該解散立憲會議、認為這種做法是“毀滅了民主”，遣責布爾什維克政權是“專制政權”、是一個“革命官僚督察的國家機器”。他認為俄國缺乏社會主義的必要前提：“只有在無產者構成居民多數的情況下，無產階級才能奪取國家政權”；“只有靠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生產力的大規模發展”，社會主義革命才有可能；而俄國在經濟上極其落後、無產階級還只占極少數，搞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布爾什維克自稱是代表工人，可工人在俄國人口中只占1~2%；而在這少數的工人中，只有5.3%屬於布爾什維克黨。因此，這個新政權別無其他選擇，只能實行一黨專政。“我們的布爾什維克同志把一切都押在歐洲普遍發生革命這張牌上，因為這張牌沒有拿到手，他們就依靠行使赤裸裸的權力，即實行專政來代替他們所缺乏的條件。” “蘇維埃組織優於普選，在於它更加專斷，他可以把他看著不順眼的組織排除在外”。列寧立刻把考茨基污蔑為“叛徒”，寫了《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表示和第二國際決裂。

考茨基在《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一書中對布爾什維克的罪惡本質進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他說：“布爾什維克正犯下了殘酷、恐怖的罪行”，“布爾什維克迷信暴力，把單純的權力看作是世界上決定一切的因素，無產階級中最缺少修養的分子被放到運動的最前列”；“布爾什維克不懂得什麼是社會化政策，不明白消滅剝削不能靠簡單地剝奪資產者的資產來完成，只能在社會經濟按其自身規律的充分發展中來實現；它們發動農民沒收地主土地，徵用富農糧食，走的是劫富濟貧的俠盜式道路，而聽任群眾自由行動的結果，是把剝奪的過程從剝奪生產資料擴展到了剝奪消費資料，實際上完全是一次政府組織的、遍及城鄉的公開搶劫”；“所謂蘇維埃，只不過是獨裁和專制的一種組織形式，蘇維埃制度表現出

來的革命贖武性質，使俄國成了兵營社會主義”；“槍斃——是蘇維埃政府的全部智慧”；“在‘反革命’這個名詞下，把所有不順從他們的人，和他們看不順眼的人都包括進去，加以槍斃或監禁”；“蘇維埃政權面臨經濟破產施行的強迫勞動政策，不僅把原有的資產者都變成了新的奴隸階級，而且把全國變成了一個大監獄”。考茨基認為：俄國已“從工人蘇維埃的獨佔統治中產生了一個新的官僚階級。“布爾什維克一開始就決心摧毀現成的國家機器，以及它的一切軍事和官僚機構，以建立他們的共產主義，最後終於發現自己不得不重新建立原來同樣的機構；他們成了把一切控制權都抓在自己手裡的新官僚階級。對於無產階級來說，這個新官僚階級是比舊的統治者更加暴虐和更加有害的；它的暴虐和迅速氾濫的貪污腐化，正在使他們成為自己的掘墓人。”

俄國的國內矛盾自此迅速尖銳化，不久就爆發了大規模的殘酷內戰。列寧1919年致羅日科夫的信中說：“蘇維埃政權反對‘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選舉的鬥爭，即反對反革命立憲會議的鬥爭”，“這是資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議會制的世界性大崩潰，無論在哪個國家，沒有國內戰爭就不會有進步。情願者命運引著走，不情願者命運拖著走。”

從某種意義上講，內戰是一場圍繞“立憲”的戰爭，列寧政府的反對派最著名的口號就是“一切權力歸立憲會議”。而內戰中出現的許多反蘇維埃勢力也都以民主立憲為旗幟。包括大量的左派勢力，也在“既不要列寧也不要高爾察克”的口號下成了反對派。“專政”與“民主”的衝突如此尖銳，以至於布爾什維克方面當時抨擊“民主”常常連“虛偽的”、“資產階級的”等限制詞都不用，乾脆流行起“民主反革命”、“立憲反革命”的說法，並由此衍生出“民主反革命時期”、“民主反革命緩衝地帶”、“民主反革命政治派別”等一系

列術語。“專政”是“革命”，“民主”就是“反革命”，一月前後的劇變乃至於斯。更嚴重的是，在二月革命後懾於當時人們對民主的認同而一時蟄伏的各種舊俄勢力，也堂而皇之地出來搶奪江山，“有槍便是草頭王”的局面于焉形成。繼“一月劇變”布爾什維克驅散立憲會議後，4月烏克蘭哥薩克首領斯柯洛帕茨基驅散了二月革命後出現的烏克蘭議會（中央拉達），12月初軍閥高爾察克驅散了從伏爾加河遷移到鄂木斯克的立憲議會委員代表大會，二月革命後曇花一現的民主權威至此蕩然無存。而二月革命以來對“混亂的民主”不耐煩的人們，在混亂變成內戰後也就各立山頭“收拾殘局”。加上乘亂而起的民族分離運動、外國支持的勢力，俄國一時陷入了空前殘酷的兵燹戰禍中，數百萬人死於非命……

6·自由被徹底消滅

1917年十月政變後的星期二，高爾基在他辦的報紙《新生活報》上寫道：

“工人階級不能不認清，列寧是在用他們的血來做試驗，他想把無產階級的革命情緒，提高到最大限度，以觀其後果。……大家必須明白，列寧並不是一個萬能的魔術師，而是一個居心叵測的騙子，他對於無產階級的生命和榮譽絲毫不存顧惜之心。工人階級不能允許那些冒險家和瘋子，硬把那些造成不名譽的、愚蠢的和血腥罪行的責任，放到無產階級身上，因為將來這些罪行不是由列寧而是必須由無產階級來承擔的。”高爾基指出列寧所引發的不是社會革命，而是獸性發洩。他給妻子寫信說：“這裡不再是首都，而是糞坑。”連司法審判也濫用：列寧派暴民在街頭上審判罪犯，一名小偷的臉被打爛、眼睛被挖出之後，旁邊一群兒童卻歡呼叫好。一場釋放出野蠻暴力的革命，“不可能改變我們的生活，只會引來仇恨與邪惡”。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說：“我們在革命鬥爭中必須猛烈地摧毀敵人……

如果以‘自由人民的國家’作標榜，那簡直是大錯特錯……無產階級要的是國家，不是為了自由，是為了消滅敵人”——這就是說：用暴力奪取的政權，也只能用暴力來鞏固；所謂自由人民的國家，對列寧而言，連做做樣子都不屑一顧……

遠在 1905 年 10 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就頒佈實施了君主立憲檔，聲稱堅決保障公民的言論、出版和集會集社的自由，給予公民最廣泛的政治權力，建立立法機構杜馬。而列寧 10 月奪權後的次日，即頒令禁止“出版自由”：立憲民主黨人的報紙先被查封，其它社會主義的出版物，亦同樣遭遇了制裁。11 月 17 日，在“起義”大本營斯莫爾尼大樓討論是否停止前幾天剛頒佈的《暫停新聞自由條令》。此時，僅僅在軍事上控制彼得堡的“人民委員會”除了布爾什維克，只有左翼社會革命黨。在布爾什維克內部，反對列寧的人數也不少。在會議上，布爾什維克成員 Larin 提議解除“政治恐怖”，恢復新聞自由，得到左翼社會革命黨和分布爾什維克成員的熱烈贊成，而“列寧派”Avanessov 提議推遲討論新聞自由，卻遭到強烈否決。此時，列寧“力挽狂瀾”，力陳剝奪“資產階級新聞自由”的權力，以 34 對 24 票通過了列寧的提議。據此，左翼社會革命黨宣佈退出軍事革命委員會(彼得堡的實際軍事指揮機關)和辭去“人民委員”的五個職位。連許多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成員，包括核心人物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也反對列寧的提議，退出中央委員會或“人民委員會”。這不僅是一黨專制代替“無產階級專政”的開端，也是列寧個人獨裁在黨內的起源。

在第四次蘇維埃大會上，當各社會主義黨派發出“我們的報紙已經被封了”的呼聲時，列寧則回答說：“這是當然的事情，只可惜還未全部封閉吧！”

至 1918 年 5 月間，所有不屬於共產黨的報紙全部被停刊，包括高爾基所辦的《新生活報》在內。俄國人民自二月民主革命已爭取到手的言論出版自由，終

於被列寧掃蕩罄盡。

普列漢諾夫在 1918 年說，“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們在半年的時間裡查封的報紙雜誌，比沙皇當局在整個羅曼諾夫王朝時代查封的還要多。” 1913 年沙皇俄國大約出版了 2 萬種圖書，而 1920 年只出版了 3260 種，而且主要是共黨的政治宣傳品。

電影《列寧在 1918》上有高爾基勸列寧不要濫殺知識份子的情節。1918 年 1 月 14 日所謂的列寧遇刺事件發生。而事情的實情是一個搗蛋鬼或是個醉漢在列寧乘坐的轎車外面用鉛筆刀摳劃了幾下。這下《真理報》則聲稱：“我們的一顆人頭要用你們的一百顆人頭換。”

高爾基在《新生活報》用譏諷的口吻說：“我並認為這一聲明是吹牛自誇，而且儘管我堅決不承認那些可以為大規模屠殺作的辯護，但是我想，在我國是會殺掉一百萬自由公民的。甚至還可能更多，為什麼不殺呢？……你們的同志已經嘗試過組織對‘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群眾性屠殺……不久前的奴隸在他獲得了充任別人的主宰的可能之後，就變成了最肆無忌憚的專制者。你們摧毀了君主制度的外在形式，但它的靈魂你們卻不能消滅。”因為你們“顯然無力消滅自己圈子裡的流氓行為……逐一殺害不同思想的人，這是歷屆俄國政府國內政策中已經驗證的老方法……列寧又為什麼應當放棄這種簡單的手段呢？”

1920 年高爾基在列寧 50 壽辰之際說：“我們忽然看見一個人物，儘管他不是個膽小鬼，卻讓我渾身感到恐怖。看見這個偉人，總讓人有那麼一種恐懼，他隨心所欲地擺弄我們這個星球上的歷史杠杆。”列寧在 1920 年 12 月 10 日答西班牙工人代表的話就是：“我們從來都不講自由，而只講無產階級專政！”

許多人，包括曾經反抗過沙俄專制、相信自己追求的是比“資產階級社會”更自由的社會的那些“老派的布爾什維克”們都認為，內戰時的嚴酷是迫不得已，1921年內戰結束，革命渡過了最緊要的關頭之後，黨內外都企盼著布爾什維克黨曾經許諾的“政治自由”。列寧和托洛茨基在內戰時也講過在得到政權、清除內亂以後會放鬆“專政”的閥門，還人民一個“民主社會”。當時的說法是：“（自由）條件不成熟是因為政治反對派還存在，這將導致新誕生的制度夭折。”但人們發現：和平到來後“自由的條件”似乎更加“不成熟”了。

1921年初肅反委員會在全國逮捕了幾千名孟爾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把他們關進監獄和集中營。1921年4月列寧在《論糧食稅》一文中說：“我們則要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不論他們是公開的或假扮成‘非黨人員的’統統關進監獄。”當時布哈林有一句名言：“我們也許有兩黨制，但兩黨中一個當權，另一個人獄”。這些人被關在一幢大樓裡，被老百姓叫做“社會主義大樓”。其中有很多人絕食，最後有十名領導人被驅逐出國。

1921年上半年任何出版自由、集會自由、言論自由，都被認為是“致人致命的藥”和“自殺”的行為。原來，1921年4月，全俄肅反委員會特派員瓦爾金首先上書中央，要求允許“蘇維埃中有反對派”，建議給他們“法律允許內的自由”。緊接著5月份一位有15年黨齡的老黨員米亞斯尼科夫向列寧寫信，信中特別強調必須“給予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說這曾經是俄國共產黨建黨時期宣佈的“主要任務”，兌現這一承諾將會大得人心，激發群眾中的革命積極性。米亞斯尼科夫在信中說：“我們需要制訂一個言論和出版自由法，使那些發昏的熱心人不至越軌。必須把全國最大的日報之一辦成各派社會思想進行論戰的報紙。蘇維埃政權將擁有像羅馬帝國一樣的胸襟，用自己的錢供養起攻擊他的人。這也

將是我們俄國條件下的出版自由，我們的任務是使我們的出版自由主要為遵守法律的人所享用，而不是為資產階級所用。”米亞斯尼科夫沒有說明那些“攻擊”布爾什維克但又不是“資產階級”的人是誰，但這似乎不言自明：十月革命後一個時期內人們並不認為社會主義運動只能有一種聲音。立憲民主黨也許是“資產階級”的，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不是，他們只是社會主義運動或工人運動中的其他派別，1917年布爾什維克曾經呼籲與他們組成“清一色社會主義者政府”。雖然後來轉而鎮壓他們，但像米亞斯尼科夫那樣的人顯然認為那是內戰中的非常措施，和平到來後還是要“關係正常化”的。但是政治局否定了瓦爾金的建議，米亞斯尼科夫則被開除出黨。從此全黨噤若寒蟬，再沒有人敢提“政治自由”，在黨內鬥爭中一次次地把“敢講真話的人”剔了出去，只留下那些識時務者和知趣者。社會民主黨曾經強調的“社會主義民主和自由”已經被連根拔去，形成了“權威與自由之間的緊張對立”。

1922年對過去的“社會主義同志”——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逮捕變成大規模的行動。布黨 12 大代表會議強調要在“較短的時期內徹底消滅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這些政治力量。”1922年6月8日~7月25日，共產黨在俄羅斯的30個城市號召檢舉社會革命黨人，該黨的47位領袖被起訴，15人被處決，6人處苦役。1922年8月1日頒佈了《關於行政驅逐》令，1922年蘇維埃把包括尼·別爾嘉耶夫在內的160名作家、哲學家、歷史學家、教授、詩人（他們構成俄羅斯文化的精華）驅逐出境。到1922年底數十萬人被驅逐，更有材料顯示，由於當時多數知識份子完全沒有接受布爾什維主義，多達200~250萬人不得不流亡國外！列寧在1922年還強調，俄共“是國內唯一合法的政黨，不允許任何政治派別出版物毒害人的思想”。1923年列寧決定對孟什維克進行大圍剿，槍

殺了 3000 多名曾與自己共同為社會主義革命奮鬥的戰友，其餘則被放逐到一年九個月結冰的梭羅威茨基荒島上。

史達林時期，為了消除“人民敵人”的腐蝕和毒害，蘇共中央向各地的圖書館下發了清除和銷毀書籍的清單。在這次“焚書”中被銷毀的外國和過去的圖書資料是驚人的，1938 年被宣佈為政治反動的圖書達 10375706 冊、宣傳畫 223751 份，有 55514 種外文報刊被銷毀。從此後“‘人民敵人’的成千上萬冊圖書從各個圖書館中取締，只有少數個人敢於在自己的私人藏書中保留這些書籍。”就是過期的報刊雜誌也被停止使用和銷毀。蘇聯史學家直到 1980 年代末幾乎接觸不到國外的書刊信息，完全生活在一個自說自話的封閉圈子裡。

第 79 節 普列漢諾夫評“十月政變”

俄國馬克思主義先驅者普列漢諾夫（1856～1918）十分受列寧尊敬。普列漢諾夫 1856 年 12 月 11 日生於唐波夫省利佩茨克縣古達洛夫卡村一小地主之家，1868～1873 年進沃羅涅什陸軍中學學習，畢業後進入康士坦丁諾夫軍官學校深造。1874 年 9 月考取彼得堡礦業學院。1875 年同民粹派秘密組織建立聯繫。1876 年 12 月 18 日他在彼得堡卡贊大教堂前組織俄國歷史上第 1 次工人政治示威，發表了反對專制制度的演說，旋被礦業學院開除，以後就成了一個職業革命家。1876 年創建北方革命民粹派小組，1878 年改稱土地和自由社，任機關報《土地與自由》編輯。1879 年 9 月另組土地平分社，在工農中積極進行革命宣傳工作，曾三次被捕。1880 年初他受到沙皇政府重賞通緝，僑居國外 37 年。他在國外期間同著名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們如考茨基、李蔔克內西、蓋德、伯恩斯坦等建立了私人聯繫，以後又同恩格斯往來並以其為導師。1882 年他把《共產黨宣言》譯成俄文，1883 年他在瑞士建立了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勞動解放社，為俄國

社會民主黨奠定了初步基礎。第二國際成立後他成為領導者之一，並代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參加第二國際的會議。他是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最早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深刻批判民粹主義，並寫了《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等名著。而且是公認的學識淵博又最善於理論思維的思想家。

普列漢諾夫 1917 年 3 月 31 日夜間回到彼得堡，不久他就撰文批駁列寧的四月提綱，認為這個提綱臭名遠揚。他說：“如果一國的資本主義尚未達到阻礙本國生產力發展的那個高級階段，那末號召城鄉工人和最貧苦的農民推翻資本主義就是荒謬的。……我們有一位同志在工兵代表蘇維埃裡反駁過列寧的提綱，他曾經提醒列寧注意恩格斯的一句十分正確的話：對於工人階級來說，最大的歷史災難莫過於由於客觀的社會條件還沒有具備就奪取政權。”

普列漢諾夫反對搞垮臨時政府。他認為臨時政府已經給了人民一定的政治權利，如引進陪審團的審訊制度，允許言論、出版和集會自由，答應全部赦免政治犯和宗教犯，給勞工組織以罷工的權利等等，如果搞垮臨時政府就等於取消了這些已經爭得的自由權利（普列漢諾夫的家就幾次被執政的布爾什維克搜查）。他寫道：“我國工人階級還遠不能把全部政權奪到自己手中來。把這樣的政權強加給它，就意味著把它推上了最大的歷史災難的道路，這樣的災難同時也會是整個俄國的最大災難。” “事變後果現在已經非常悲慘了。如果工人階級的覺悟分子不堅決果斷地反對由一個階級或者——比這更糟的——由一個黨奪取政權的政策，後果將更加悲慘。政權應該依靠國內一切生氣勃勃的力量的聯合，即依靠所有那些不願意恢復舊秩序的階級和階層。” 他還說：“推翻專制制度和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在實質上原是不同的兩回事，如果把它們結合為一，進行革命鬥爭時指望著這兩件事將在我國歷史上同時發生，就會把前者 and 後者到來的時期都推

遲”。“完成了的革命可能產生一種政治的畸形現象，有如古代中國帝國或秘魯帝國，只是一個在共產主義基礎上革新了的皇帝專制”。

1918年4月7~21日普列漢諾夫在病危中口授了政治遺囑，由密友列·格·捷依奇筆錄，又曲折而戲劇性地經過尼·尼熱戈羅多夫的秘密收藏。他聲明不願與布爾什維克作鬥爭，該遺囑在布黨掌權期間不得發表；該遺囑幾經曲折終於在《遺囑》所預言的蘇聯崩潰之後，於1999年11月30日俄國《獨立報》發表面世；《獨立報》用三版半發表了他的政治遺囑，並用一版半介紹遺囑來歷和專家對遺囑的鑒定，共五版。這些文字全譯載在中共中央馬恩著作編譯局編輯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研究》2000年第2輯中。下麵是遺囑的論點：

1) 無產階級專政的荒謬性。馬克思所理解的無產階級專政無論現在還是未來，永遠不能實現。其原因如下：隨著高效能的複雜的電動新機器的使用以及隨之而來的其他科學成就的運用，社會的階級結構將變得對無產階級不利，而且無產階級本身也將變成另一個樣子。那個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失去的無產階級的人數開始減少，而知識份子就其人數和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而言將躍居首位。……知識份子作為社會中最有學識的階層的使命是把教育、人道和先進的思想帶到群眾之中去。知識份子民族的榮譽、良心和頭腦。我毫不懷疑在不久的將來知識份子將從資產階級的“奴僕”變成一個異常有影響的特殊階級，其人數將急劇增長，其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是提高生產力、研製新機器、新工藝和培養有很高學識的工人。

知識份子在生產過程中作用的提高必然導致階級矛盾的緩和。格外合乎知識份子心意的歷史社會哲學範疇是：道德、公正、人道、文化、法。這些範疇都包含兩個方面：既有普遍的一面，又有階級的一面。…（普遍的一面）完全取決於

物質生產的水準，因此是一直向前發展進化的。在很大程度上來說知識份子正是這一面的體現者，而這一面的性質是全人類的，它將對社會各個階層發生有益的影響，緩和階級矛盾，……因此，物質進步的主要後果之一是上述範疇階級一面作用的下降和普遍、全人類一面作用的增長。例如，人道在今天被看作是人的價值觀及其幸福和權利的體系，在未來其範圍必然將擴大為對愛護一切生物及周圍自然界必要性的認識，而這也就是這一範疇全人類一面作用的發展和增強。

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知識份子人數的增長將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環境。為了操縱複雜的機器，將要求工人有更多的知識，工人不再是機器的附屬物。……複雜的機器排除了童工的使用。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觀來說已提高到知識份子的水準，在這種情勢下無產階級專政將是荒謬的。隨著生產力發生質變，將形成新的階級、新的生產關係，階級鬥爭將按新的方式進行，人道主義思想將深入社會的各個階層之中。……人道主義思想和巨大的生產將抑制赤貧化過程。近來我有時甚至想，產生于歐洲文明條件下的馬克思的理論未必將成為普遍適用的觀點體系，因為世界的社會經濟發展可能按多中心模式進行。

我以為資本主義不會很快就被埋葬。……我從馬克思逝世時起，尤其是本世紀初起對歐洲資本主義發展所作的觀察表明，資本主義是一個靈活的社會結構，它對社會鬥爭作出反應，不斷變化、人道化，朝著接受和適應社會主義個別思想的方向運動。既然如此，資本主義就不需要掘墓人。資本主義的未來令人羨慕：野蠻的民族資本主義、野蠻的國家資本主義、野蠻的國際資本主義、有民主因素的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有發達的社會保障體系的人道的資本主義，這是資本主義演進可能出現的幾個階段。……勞動者的政權——這才是不會失去意義，永遠正確的口號！靠勞動為生的人才應決定應該有什麼樣的政治和法律上層建築。

2) 布爾什維克主義是流氓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布林什維主義作為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極左派別產生於 1903 年……布林什維主義並不是什麼全新的思潮。布林什維主義思想早就縈回於革命者的腦際。雅各賓黨人、布朗基、巴枯寧以及他們的擁護者，巴黎公社的許多參加者在策略和意識形態問題上實際上就是布爾什維克。正如血腥的革命是不發達資本主義的伴生的那樣，布林什維主義思想過去和將來始終是無產階級不成熟、勞動者貧窮、文化落後、覺悟低下的伴生物。……布林什維主義是以流氓無產階級為取向的特殊策略、特殊意識形態，這是從聖西門及無政府工團主義者那裡借來的口號，是侈談馬克思主義的高調。布爾什維克的策略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階級恐怖為補充的布朗基策略。布林什維主義有什麼新東西嗎？只有一個——不受限制的全面的階級恐怖。但是歐洲社會民主黨早就否定並譴責了階級恐怖，更不用說不受限制的階級恐怖。階級恐怖作為實行布爾什維克十分傾心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方法包含著巨大的危險，因為在俄國現有的條件下階級恐怖很容易變為全面的全國恐怖。……依靠暴力和恐怖是建設不了社會主義的。正如在惡的基礎上創造的善包含著更大的惡的幼芽一樣，建立在欺騙和暴力之上的社會將帶來惡、仇恨，因而也帶來自我毀滅的炸藥。……布林什維主義是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和無政府工團主義難分難解的布朗基主義。這是布朗基、巴枯寧、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和馬克思思想折中主義的、教條主義的結合。這是偽馬克思主義，因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是布朗基、巴枯寧及其他無政府主義者有原則的、徹底的反對者。

布爾什維克沒有實現國內和平，反而將把俄國推入極其殘酷的國內戰爭之中，這場戰爭眼看就將爆發，就要血流成河；他們將把俄國推入沒完沒了的階級恐怖之中。…布爾什維克連外部的和平也不能保證。一旦他們勝利，布爾什維克的俄

國將置身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之中，這些資本主義國家未必會不去嘗試消滅輕率地叫嚷世界革命不可避免的布爾什維克。

在列寧的社會主義社會裡，工人將從資本家的雇工變成國家的雇工，而農民將變成國家農奴。布爾什維克黨的黨員人數近來激增，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它的有覺悟黨員人數的增加，因為絕大多數入黨者甚至不瞭解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一些人相信列寧的思想和布爾什維克的許諾，將成為他們領袖意志的盲目執行者；另一些人入黨是為了及時從“革命的餡餅”上撈到一塊大一點兒的，他們將只會投“贊成票”，此後將變成黨的官僚。他們將比沙皇官吏還要可怕，因為執政黨的官員將干預一切，而所幹下的一切只對“黨內同志”負責。

布爾什維克的所作所為雄辯地證明，智慧痛苦不是他們的痛苦。他們的痛苦是無知的痛苦，是對列寧及其“英明的理論發現”盲目信任的痛苦。列寧把他的“理論發現”變成法令，認為無需用最起碼的論據加以論證。他們對科學社會主義沒有絲毫概念，犯下了一個又一個罪行，甚至沒有料想到革命的暴力就是不法行為。

例如，他們所進行的“剝奪”是令人髮指的違反法紀和踐踏文明的行動，是沒有監督的掠奪(如私有銀行的例子)。這樣的剝奪必然導致全面的經濟混亂，養成一大幫不幹活、“扯著嗓子喊”的人，他們依靠步槍和革命口號來動手搶走農民手中最後一隻母雞。

列寧實現了政變，把它宣佈為社會主義革命，把俄國歷史引向錯誤的死胡同。俄國的發展將因此落後許多年，也許幾十年。……我不止一次警告過布爾什維克以及迷戀於他們的空話和錯誤口號的人，在革命行動中不要倉猝行事，不要犯冒險主義。我過去和現在都說：俄國就其生產力發展水準、無產階級人數以及群眾

的文化程度和自覺程度而言還沒有作好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因此列寧設想的社會實驗必然要失敗。擁護列寧的人或“半列寧分子”會問我說：“不錯，但是難道不能在無產階級政權的條件下消滅文盲，提高勞動者的文化和自覺，迅速增加工人的人數和發展生產力嗎？我回答說：不，不能！首先，不能破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因為這樣做不會不受懲罰。其次，群眾的文化和自覺是社會因素，完全取決於生產力的發達程度，當然也存在回饋作用。第三，列寧宣佈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後，把生產力遠遠拋在後面，從而造成了相反的革命形勢。只有現有的生產關係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水準，社會中才不會有對抗性矛盾。類似的不適應產生了新的、前所未見的矛盾，其衝突的激烈程度不比當代資本主義的矛盾小，甚至還要大。第四，列寧的政權不可能屬於也不會屬於無產階級。1917年10月積極支持列寧的人不超過俄國人的1%，因此，每一個瞭解布朗基策略的人都會承認十月革命是布朗基式的政變，按照恩格斯的說法，這樣的政變要求其組織者實行必然的專政，而任何一種專政都與政治自由和公民權利不相容。我不想充當未卜先知的卡珊德拉，但我仍要說，布爾什維克政權將演變如下：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迅速變為一黨專政，黨的專政將變為黨的領袖的專政，維持領袖權力的起先是階級恐怖，後來是全面的全國恐怖。布爾什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為他們一實施民主和自由，馬上就會喪失政權。列寧很清楚這一點。既然如此，布爾什維克除了恐怖、欺騙、恐嚇和強制，就別無道路可走。但是通過恐怖、欺騙、恐嚇和強制能否迅速發展生產力和建成公正的社會呢？當然不能！這只有在民主的條件下，在自由的、自覺的和結合個人利益的勞動的基礎上才能做到。但布爾什維克在半年不到的時間裡查封的報紙雜誌比沙皇當局在整個羅曼諾夫皇朝時代查封的還要多，還有什麼民主可言呢？實行了“糧食專賣”，提出了勞動

義務制和勞動軍的問題，還有什麼勞動自由和結合個人利益可言呢？

布爾什維克力圖進行激進的變革，不負責任地加速事變的進程，急劇地向左轉，但是他們沿著封閉的政治圈子走，必然要走向右面，變成反動的消極力量。人們很少從各種可能的後果來全面評價自己的行動。列寧通過其活動已經給俄國造成巨大的危害，我擔心在布爾什維克執政的某一階段這一危害將達到危機的程度。如果列寧及其追隨者能長期維持其政權，那麼俄國的未來將是悲慘的，等待它的將是印加帝國的命運。……列寧關於社會主義革命能在單獨一個像俄國那樣落後的國家裡取得勝利的論斷，不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態度，而是對它的背離。列寧得出這一結論決非偶然。因為他需要這個結論來鼓舞布爾什維克。列寧指望西方無產階級會回應俄國的革命，這一指望是錯誤的。歐洲不可能出現什麼重大事件，因為西方無產階級今天幾乎如馬克思時代那樣遠離社會主義革命。

布爾什維克的道路不管怎麼樣，是短還是長，不可避免地因篡改歷史、犯罪、撒謊、蠱惑人心和行為不光彩而令人印象深刻。……關於布爾什維克所說的一切——他們的策略、他們的意識形態、他們對剝奪的態度、他們不受限制的恐怖——都使我很有把握地斷定：布爾什維克的垮臺是不可避免的！布爾什維克指望的恐怖是刺刀的力量。但眾所周知，坐在刺刀上是不舒服的，20世紀是偉大發現的世紀，啟蒙和急劇人道化的世紀，將推翻並譴責布爾什維主義。我設想列寧依靠全面的恐怖將取得他執著追求的國內戰爭的勝利。在這種情況下布爾什維克的俄國將處於政治經濟的孤立狀態，不可避免地變成一個軍營，那裡將用帝國主義來嚇唬公民，給他們開各種空頭支票。但遲早有一天人人都將清楚列寧思想的謬誤，到那時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將像紙牌搭的小房子那樣坍塌。我為俄國人的命運而痛哭，但我要像車爾尼雪夫斯基那樣說：“讓要來的都來吧，我們的

大街上也會有節慶的日子！

3) 布爾什維克在鞏固政權的道路上將依次遇到四大危機：饑荒危機、經濟破壞危機、政治經濟性質的危機和意識形態危機。其掌權時間的長短全看他們究竟會栽在哪一次危機上。布爾什維克可以通過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趕出政府、唆使覺悟不高的工人去反對富裕農民和中農、組織大規模沒收糧食行動等來度過饑荒危機。為了對付經濟破壞危機，布爾什維克會發動大規模內戰，並利用階級恐怖和戰時狀態並將崩潰的責任推到階級敵人和外部敵人的身上。第三次危機是布爾什維克 1917 年為了向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讓步而埋下的定時炸彈：使土地社會公有化。列寧一貫談論的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是不可能結成的：農民需要土地，社會主義和他們的利益無關，因為農民從經營性質來說更接近於資本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明擺著貶低農民，要他們起從屬的作用。……布爾什維克為了克服這一最嚴重的危機——政治經濟性質的危機，不得不向農民宣佈總體戰並消滅最優秀的一部分農民——那些會勞動、願意勞動的農民。克服第三次危機後，布爾什維克還可維持許多年，到出現第四次危機——意識形態危機，即布爾什維克政權開始從內部解體，但解體的過程可能拖上幾十年，因為俄國從來不知道民主為何物，又一個專制政權——布爾什維克政權——將會被俄國人畢恭畢敬、逆來順受地接受下來。加之這個政權可以借助高超的蠱惑宣傳、發達的監視和鎮壓機關來得到加強。……布爾什維克最終必將垮臺。這只是時間問題，任何人都不能改變歷史發展的進程！非凡的人物只能加速或延緩這一進程。列寧延緩了俄國的歷史，因此他將帶著與偽德米特裡相同的印記進入歷史。

4) 列寧像變色龍，殘酷無情。普列漢諾夫說：自己一生最不可原諒的錯誤

是說明列寧。我對他的能力估計不足，沒有看清他真實的目標和對目標的狂熱追求，對他的最高綱領主義持寬容和嘲弄的態度。我把列寧帶進了歐洲著名的、有影響的社會民主黨人的圈子中，照顧他，全面幫助他，從而使他牢牢地站立了起來。不僅如此，1903年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代表大會上，當列寧同瑪律托夫爭論時我支持了列寧，終於導致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產生。……我很快就明白了，團結是不可能的，因為一切與列寧意見不合的看法都無權存在。列寧主張團結，但要在他的領導下，服從他的目標，採用他的策略和口號。……切爾諾夫先生斷言說，布爾什維克是我的孩子。維克多·阿德勒就我與列寧的“父子關係”開的玩笑不是沒有根據的。我的錯誤過去和未來都使俄國付出高昂的代價，這個錯誤對我本人來說也是致命的。

列寧…像變色龍一樣必要時會改變自己的顏色。他同知識份子在一起時是知識份子，同工人在一起時是“工人”，同農民在一起時是“農民”；他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是合乎邏輯的又是不合邏輯的，是簡單的又是複雜的，是始終如一的又是前後不一的，是“馬克思主義者”又是假馬克思主義者，等等。要是我指責他不懂馬克思主義，那就是在撒謊了；要是我說他死守教條，那也錯了。不，列寧不是教條主義者，他精通馬克思主義。但遺憾的是，他以不可思議的執著朝著一個方向(篡改的方向)、一個目標(證明他的錯誤結論是正確的)來“發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使他不滿意的只有一點，那就是在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尚未成熟時應該等待。列寧是一個假辯證論者。他相信資本主義越來越嚴酷，始終朝著罪惡越來越深重的方向發展。但這是一大錯誤。

列寧…病態地愛面子，絕對不能容忍批評。“凡是不按列寧意見辦的一切都应该受到詛咒！”有一次馬·高爾基這樣說過，對於列寧來說，每一個在某個問

題上與他不同意見的人都是潛在的敵人，對這樣的敵人不值得起碼的交往文明。

他不講道德，殘酷無情，毫無原則，從本性上說是個冒險主義者。但是應該承認，列寧的不講道德和殘酷無情並非出於他本人毫無道德和殘酷無情，而是出於對他自己真理在握的信念。……列寧為了把一半俄國人趕進幸福的社會主義未來中去能夠殺光另一半俄國人。他為了達到既定目標什麼都幹得出來，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同魔鬼結盟。……列寧同魔鬼的結盟是以魔鬼騎著他飛跑而告終的，正如當年女巫騎著霍馬飛跑一樣。

沒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一個大權在握的人或者一個享有巨人威望的政治家在其活動中首先應該遵循全人類的道德原則，因為沒有原則的法律，不道德的號召和口號對國家及其人民來說可能變為一場巨大的悲劇。列寧不懂得這一點，他也不想懂得這一點。

列寧狡猾地玩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語錄，往往對之作出截然不同的解釋。列寧從我關於個人和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的著作中只掌握了一點：他作為“肩負”歷史“使命的”人物可以為所欲為。列寧是一個承認意志自由，以為自己的行動統統具有強烈必要性的人的榜樣。他有足夠的學養，還不至於以穆罕默德或拿破崙自居，但卻絕對相信他是“命運的寵兒”。從社會發展規律和歷史必然性的觀點看，列寧只有在 1917 年 2 月前才是有用的——在這個意義上他是必然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消除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在此之後列寧的歷史必要性就消失了。但糟糕的是過去和現在群眾都不明白這一點。他們得到了比西歐還多的政治自由權利，但由於食不果腹，一貧如洗，加之還被迫繼續作戰，因此甚至沒有發現這一點。要是戰爭在 1917 年春天結束，要是臨時政府毫不拖延地解決了土地問題，那麼列寧要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就沒有任何機會了，而他本

人也將永遠被從肩負歷史使命者的行列中一筆勾銷。這就是十月政變和今天的列寧不是必然的，而是非常不幸的偶然的原因。

列寧是個不懂“中庸之道”的人。“不同我們站在一起，就是反對我們！”這就是他的政治信條。他在設法作踐對手時不惜進行人身侮辱，破口大罵，不僅論戰時如此，而且在他以不可容忍的速度“炮製”的鉛印著作中也是如此。天才的普希金連自己的信件也要謄寫得清清楚楚。偉大的托爾斯泰要幾次校對自己的長篇小說。列寧則只限於作一些微不足道的改正。

許多為每一個文明人承認的全人類概念列寧一概加以否定，或者從消極意義上加以詮釋。例如，對於任何一個有文化的人來說，自由主義是一個正面的觀點體系，而對於列寧來說，這無非是“自由主義的下流貨色”。對於任何一個有文化的人來說，資產階級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畢竟仍然是民主，而對於列寧來說，這是“庸俗行為”；可是不受任何限制的階級恐怖卻是“無產階級的民主”。雖然從原則上說，民主即人民的權力不可能是資產階級的，也不可能是無產階級的；因為資產階級也好，無產階級也好，單獨來說只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遠非是一大部分。

托爾斯泰，這位十分偉大的人道主義者，認為沒有愛、沒有善和純樸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偉大，他不會承認列寧是偉大的。……列寧是 20 世紀的羅伯斯比爾。但是如果說羅伯斯比爾砍掉了幾百個無辜者的腦袋，那麼列寧將砍掉幾百萬人的腦袋。我因此想起了我同列寧最初會見中的一次，我想那是 1895 年夏天在蘭多爾特咖啡館裡的一次會見。我們談起雅各賓黨專政垮臺的原因。我開玩笑說，這個專政垮臺是因為斬首機砍的腦袋太多了。列寧抬起眉毛，十分嚴肅地反駁說：“雅各賓黨共和國垮臺，是因為斬首機砍的腦袋太少了。革命應該善於自我保

衛！”於是我們只是對烏裡揚諾夫先生的極端言論付之一笑。但未來卻表明，這不是年輕和急躁的表現，而是反映了他的策略觀點，這些觀點他當時已經明確形成了。羅伯斯比爾的命運是眾所周知的。列寧的命運也好不了多少，因為他進行的革命比神話中約彌諾陶洛斯更可怕；這場革命不僅將吃掉自己的孩子，還要吃掉自己的父母。

5) 國家的偉大在於民主傳統。普列漢諾夫說：由於缺乏民主(在列寧的社會主義社會裡不會有民主)，群眾文化低下，覺悟不高，國家可能變為比君主還要可怕的封建主，因為君主畢竟還是一個人，而國家則是一台沒有個性、沒有靈魂的機器。我相信，列寧的社會主義國家將正是這樣的封建主，尤其在頭幾十年裡是如此。……俄國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布爾什維克執政時間的長短。俄國遲早將回到正常的發展道路上來，但布爾什維克專政存在的時間越長，這一回歸之路就越痛苦。……一個國家只要它的公民還貧困，就成不了偉大的國家！公民富裕，國家才富裕！決定一個國家真正偉大的，不是它的國土遼闊，甚至不是它的歷史悠久，而是它的民主傳統、公民的生活水準。只要公民還在受窮，只要還沒有民主，國家就難保不發生社會動盪，甚至難保不土崩瓦解。……俄國迫切需要以優秀的民族傳統、關於民主、政治自由權利、人道和社會公正的現代觀念為基礎的先進的意識形態。只有這樣的意識形態才能保證俄國經濟平穩地、正常地發展。

第 80 節 “十月政變”的災難性後果

布爾什維克欺騙人民的口號是：“和平、麵包、土地”

和平？在帝國主義戰爭正酣，在沒有進行周密的談判之前就讓俄國軍隊解除武裝，使得德國軍隊長驅直入，侵佔了更多的領土。布黨的血腥統治激起了幾乎

全國人民的反抗，內戰席捲全國，農民紛紛拒絕向城市供應糧食，頓河哥薩克大規模暴動，和紅軍血腥拉鋸，雙方那種原始的野蠻、殘忍和血腥，在蕭洛霍夫《頓河故事集》、《靜靜的頓河》中得到了體現。那還是官方容許的正統讀物。高爾察克、鄧尼金等前白軍將領率領的起義隊伍，一度幾乎推翻了布黨的統治。一個政權初生便激起幾乎全部人民的反抗，這在世界史上還找不到第二例。

德國人怕布黨垮了，還得兩線作戰，便慷慨給予大量的金錢。為推翻臨時政府，德方給列寧 5 千萬金馬克；為鞏固列寧的政府，德方又供給他 4 千萬金馬克。例如：1917 年 11 月 23 日德方給列寧 1500 萬馬克搞宣傳（1921 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伯恩施坦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前進報》上發表文章說：“我 1917 年底才知道：列寧的黨在德國那裡至少拿了 5 千萬金馬克”。見：阿·阿夫托爾漢羅夫《黨治制的由來》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列寧對德國投桃報李。1918 年 3 月 3 日，布列斯特和約正式簽訂。按合約，俄割讓上百萬平方公里領土，割讓幾乎整個烏克蘭（後來這部份領土在德國戰敗後又給俄國人佔領了），賠款 60 億馬克。1921 年 3 月 18 日，由波蘭支持的佛蘭格爾將軍舉兵護國，攻勢凌厲，列寧又與波蘭簽訂“波蘇和約”，同意將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劃歸波蘭。

列寧說：“和約是戰爭的喘息時機，……我有決心、有義務簽定屈辱幾十倍以至一百倍的和約……以便同大後方保持聯繫並在那裡建立軍隊”。列寧屈辱地退出戰爭是為了讓兩夥帝國主義自相殘殺、彼此削弱，從而為布爾什維克世界革命成功創造條件。

世界革命是布爾什維克和列寧當時尋找的唯一支持。這就導致不是把主要精力用於尋找和處理國內的各種可能的同盟者，而是千方百計地到國外去策動革命。

正是列寧所創建的第三共產國際要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上所有的主要戰亂負主要責任：義大利、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副產品。十月革命把災難播散到了全世界，先後有 15 個國家走上了這條通往毀滅之路，其中以和平溫良著稱的佛國柬埔寨發生的民族慘劇最觸目驚心，那兒近半數人民進了萬人塚。這就是列寧幹出來的好事。

後來，布爾什維克黨人常把內戰的責任諉之於反動派及外國幫兇。可早在 1917 以前，布黨的政治綱領中就有一項中心任務，說要把國與國之間的戰爭轉變為階級之間的內戰。

托洛茨基說：“組織蘇維埃政權，就是為了內戰”；“紅色恐怖是一種武器，專對於一個命該滅亡而不願意滅亡的階級而用。”從 1826 到 1905 年 80 年間，沙皇政府處決的政治犯共 894 人；但布爾什維克執政第一個月，死於政治原因的人達數十萬。1917 和 1918 兩年，有 1 百萬人被列寧的共產黨處決。十月政變使得俄國在內戰中又多熬了 3 年，犧牲了數百萬人的生命。十月政變後，紅軍往西趕白軍的時候，打到一個城市，紅軍不動了。為什麼呢？那城市妓女很多，都嫖娼去了。於是，指揮官一個電報給列寧，問：怎麼辦？列寧回一個電報，誰也想不到他這麼回的：“把妓女統統殺掉！”這個檔案現在公開了。

1917 年 12 月 11 日，立憲民主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則被視為“人民的公敵”，強迫他們解散黨組織，其黨人之大部被逮捕和處決。12 月 30 日契卡再次下令拘捕社會革命黨右派。

1918 年 6 月 22 日，曾大力支持過列寧的社會革命黨左派暗殺了共產黨員伏羅達斯基。6 月 27 日，列寧的共產黨將立憲民主黨和孟爾什維克左派宣佈為非法組織。7 月 6 日社會革命黨人勃留姆金刺殺德國駐俄大使米爾巴赫之舉，其本

意是為了破壞布列斯特和約。7月7日，社會革命黨左派在莫斯科組織暴動，佔領莫斯科電訊大廈，號召全國人民起來革命推翻列寧。當時正在參加全俄蘇維埃第5次代表大會的左派社會革命黨黨團的全體成員被捕。7月11日，社會革命黨人在烏拉爾山區宣佈對德國宣戰，並進攻莫斯科。為緩和德國的憤怒，列寧處決了20名社會革命黨人。由於擔心被囚禁在烏拉爾山區的沙皇一家可能號召人民造反，列寧又下令槍殺沙皇全家，7月17日命令被執行……

8月30日，彼得堡的契卡首長烏裡茨基被一個年輕的學生暗殺；同日，社會革命黨左派女革命家，曾因謀殺沙皇官員而被囚禁和流放了11年的卡普蘭，在莫斯科米海爾松工廠行刺列寧，她說：“我早就決心殺死列寧了。我認為他是出賣革命的奸細……”

這一切為列寧對人民施行大屠殺製造了藉口。列寧說：“應把槍決的適用範圍擴大到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之類的一切活動”（《列寧全集》第43卷第186頁）。1918年9月2日全俄中央執委會向全黨發出通電：“不許再軟弱！不許再有感情上的顧慮！所有的社會革命黨人必須立即逮捕起來。並從資產階級和白軍軍官中獵取大量的人質；只需有輕微的反對活動或有反抗的企圖，或白軍的擁護者中有什麼最小的活動，便須進行大規模的槍決。……契卡和軍事部門應特別努力搜索並逮捕一切改名換姓的人，並不拘何種形式地槍決每一個同白衛分子活動有勾結的人。”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季諾維也夫下令槍決了500名人質，這些遇害的人質大多是和平居民，只是因輕微嫌疑就從家裡被抓走的。

1918年列寧命令史達林在察裡津搞集體大屠殺。據蘇共官方統計，僅在1918年6月後的四個月間，列寧派往農村的“武裝糧食徵集隊”，其36000人中，就有7309人被自發反抗的農民殺死。面對農村的暴動和要征服其它地區與民族，

紅軍將白俄的近兩百名將軍及其家屬包括兒童扣作人質，要這些白俄軍官幫助紅軍打仗，如搗蛋反抗或打了敗仗，就殺家屬、兒童。當這些白俄將軍官幫助紅軍取勝後，這些白俄軍官及他們的家屬全部被秘密殺害。

埃薩克·斯坦因倍格（Isaac Steinberg）是一位左翼社會革命黨人，曾一度在共產黨政府中擔任司法人民委員。他描述 1918 年 2 月開會時的情況：列寧提出一項法令草案，標題是“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殆中”，其中有一條，要求把一大批犯人不經過審判即“就地正法”。這批犯人包括敵特、投機商、盜賊、流氓無賴、反革命煽動者以及德國奸細等。斯坦因倍格反對這項法令，他的理由是：此項法令的條文“過於苛酷，……勢必將造成全面性的恐怖統治”。“列寧對我的反對性意見大為惱火，他用革命司法的名義進行反駁。於是，我怒不可遏，喊道：‘那末，我們何必還要什麼司法人民委員部？讓我們乾脆把它叫做社會滅絕人民委員部，把社會上的人統統斬盡殺絕好了！’列寧頓時容光煥發，回答道：‘好罷，行啊，……這正是我們所要做的……不過我們卻不能把它說出來罷了。’”

一位被囚的俄國總主教曾于 1918 年指斥共產黨說：“你們曾使俄國人民的手沾染了他們兄弟的鮮血，你們猶以未足；你們肆無忌憚地挑撥人民從事公開的無恥劫掠，蒙蔽了他們的良心，並使他們不畏懼罪惡；但無論你們用什麼名義來掩飾你們的罪惡、謀殺、暴行和劫掠，罪惡終歸是罪惡，終將受到上蒼的懲罰。是的，在你們的統治下，我們將過著一種長時期的恐怖生活，因為你們已經將人民心中上帝的形象毀滅，並代之以野獸般的統治……”

契卡首領捷爾任斯基高叫：“我要請求革命的寶劍，以消滅全部的反革命”。從 1917 年到 1921 年，25 萬人成了“契卡”的犧牲品。那血腥情景，連官方讀

物《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上都有所描繪。書中角色朱赫來參加了行刑隊，每天大批斃人斃到神經快要錯亂的地步。

曾被蘇共領導人稱為十月革命的“榮光和驕傲”的炮轟過冬宮的喀琅斯達德的水兵們感到了絕望。1921年3月1日，26000名水兵和工人們在喀琅施塔德舉行大會，一個水兵呼喊道：“同志們，把我們推進這個泥坑的就是那一群共產黨。他們現在正戴著共產主義的假面具而高據在我們的共和國之上……讓我們來把那些使得工人反對農民、農民反對工人的共產黨員趕走，因為我們已經自相殘殺得夠了……”水兵們宣佈“應立即通過自由和秘密投票選舉新的蘇維埃，給與所有公民言論和出版自由、結社自由，釋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共產黨的特權地位，任何政黨都不能享有特權並從國家領取經費”。起義者們在被鎮壓前夕，曾向全世界發出呼籲：“12天來，一部分真正的英雄們——工人、水兵和紅軍戰士們，被迫同全世界隔絕，忍受著共產主義劊子手們的攻擊。我們堅定地捍衛我們所從事的事業：使人民從一個黨的狂熱性的桎梏下解放出來。我們在臨死前高呼：自由選舉的蘇維埃萬歲！願全世界無產階級瞭解事件的真相！同志們！我們需要你們道義上的援助，抗議共產主義專制者們的殘殺！”有2600名共產黨員參與了起義，有900人退黨。他們不贊成一黨專政，要求實現原先承諾的民主自由。但列寧的答覆卻是堅決鎮壓，說：“我要讓你們幾十年裡不敢再打反對派的念頭。”列寧立即命令6萬軍隊進攻，甚至使用了毒氣。

托洛茨基很不情願地帶領大批軍隊開赴喀琅施塔德。其間因冰河開裂，不少士兵未投入戰鬥便溺水身亡。血腥鎮壓之下，被鮮血染紅的15000名水兵的屍體，就橫躺在俄羅斯陰沉的天空底下，8千人跑到芬蘭，2千人被判刑……事後，據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公佈的材料，海軍中30%的黨員參加了起義，40%的黨員宣

佈中立。二戰後史達林又把逃到芬蘭的人抓回來，關到集中營裡。近幾年，俄國政府終於為喀琅施塔得事件中受害者及其家屬致歉，平反並恢復了那段歷史。史學界不再稱之為“叛亂”。

麵包？有一位蘇聯共產黨的黨內專家描述 1917 年至 1920 年蘇俄的經濟狀況，說那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場大災難。在俄國各地進行的政權拉鋸戰，中斷了城鄉物資流通管道，加劇了城市的饑荒；而採取生硬的辦法瓜分地主、富農土地給農民，直接引起了地主、貴族和富農們的抵制與反對，他們藏匿糧食、宰掉牲畜，加劇了饑荒。

列寧頒佈所謂的“餘糧徵集制法令”，他要把農民的糧食搶光，用饑餓迫使他們屈服。據蘇共官方統計，在 1918 年 6 月以後的四個月間，列寧派往農村的“武裝糧食徵集隊”，其 36000 人中，就有 7309 人被自發反抗的農民殺死。從 1918 年開始，俄羅斯發生饑荒；海外和民間救援團體一成立便被取締，而政府只能救援 1/10 的饑民，致使 520 萬人活活餓死。當年主持這項救濟工作的是美國人赫伯特·胡佛 (Herbert Hoover)，俄國受患者達 2500 萬。

實行這赤裸裸的階級歧視政策。在持續數年的糧荒中，俄共政權實行糧食配給制。1918 年 9 月 1 日，按階級的配給制在各主要城市實行。四種不同顏色的麵包和食物配給證發給人口中的四個階級，配給的數量按四、三、二、一的比率分配。獲得配量最少的第四類都是靠資本收入、房產、商業企業或者靠剝削別人的雇用勞動而生活的人，而且當供應量降得非常低的時候(這是經常發生的)，資產階級就完全得不到配給。為了得到糧食充饑活命，一些前資產階級分子把他們的珠寶樂器、衣物拿到黑市上換取糧食，但這往往會被“契卡”突然捕獲，被扣上種種反革命破壞罪名抓去做人質或者乾脆就地處決。於是，從前沒有對無產階

級實行過階級統治，現在也沒有抗拒布爾什維克政權的俄國資產者整個階級都被逼上了絕路。

共產黨人取締了自由市場，自由市場被迫轉入地下，成了黑市。那時是把所有擁有餘糧或糧食、在黑市出售糧食的農民統統當作投機倒把的敵人，甚至把整個小生產者當作是產生資本主義的敵對階級。不久，黑市經濟就超過了國營的蘇維埃經濟。政府故意地實行無限制的通貨膨脹政策，濫發紙幣，意在消滅人們的存款，結果這個目的達到了，但紙幣氾濫成災，及至 1923 年蘇俄的物價較之 1917 年的物價已漲了一億倍。

生產力大幅度下降，各項生產指標一落千丈。有一位蘇共專家描述 1917-1920 年蘇俄的經濟狀況，說那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場大災難。1913 年帝俄時代的穀物年產量為 7820 萬噸，而 1920 年蘇俄耕地面積雖然只比戰前減少 7%，但穀物總產量卻減少一半，只有 4820 萬噸。蘇聯公有化後糧食供應長期處於緊張的狀態，到 1953 年，全蘇聯糧食的生產總量為 8250 萬噸，比十月革命前的沙俄時代還少（據《炎黃春秋》2002 年 12 期第 61 頁）。1920 年棉花產量僅為戰前 6%，1920 年的重工業總產量僅及 1913 年工業總產量的 18%，煤炭產量跌到只合 1913 年產量的 27%，而鋼鐵產量只合 1913 年產量的 2.4%，日用品極端匱乏。1921 年蘇俄工業方面雇用員工的人數，尚不及 1918 年雇用人數的一半；而他們的生活水準下降，僅及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工人生活水準的 1/3。根據 1970 年代蘇聯學者計算，一次世界大戰前十年俄國的經濟增長是俄國有史以來最快的。經濟危機迅速轉變為政治危機，1920 年年底到 1921 年春，各地普遍爆發農民起義，烏克蘭、俄羅斯東南部、中部、西部、伏爾加河沿岸，如失控的野火，群起反抗，二月下旬一些城市發生工人騷動，莫斯科哈莫夫尼基區數千工人罷工，並

號召紅軍戰士參加他們的示威，反對經濟狀況惡化。彼得格勒也出現騷動。最後爆發了水兵起義，不得不實行新經濟政策度過難關。

土地？列寧要求對資本家、地主、富農和教會的財產實行強制性剝奪。馬恩的《共產黨宣言》中把農民視為反動勢力。列寧說，從馬克思來說的話，“農民是反動的一幫”。“我們起初使用一切方法支持一般農民反對地主，直到沒收地主的土地，然後，……我們支援無產階級去一般地反對農民（《列寧全集》俄文版第4版第9卷第213頁）。

在布爾什維克國家，貧農擁有土地的日子沒能持續多久，很快就全盤集體化了；農民成了地地道道的農奴，沒有土地、沒有財產，完全依附於殘酷的新地主——黨。

列寧推行戰時共產主義義務勞動制，對人民實行奴隸式的強迫勞動。1918年10月5日，人民委員會決定，對非勞動者實行強制勞動，以勞動手冊取代身份證，並將勞動記錄與口糧分配掛鉤……勞動義務制的配套形式是勞動軍事化，如欲隨意脫離崗位，要受到軍紀和戰時法律處理，有些軍工部門直接被編入軍隊行列，鐵路系統亦被列入戰時動員狀態……

列寧發明了集中營，把起來反抗布黨統治、以罷工捍衛自己權益的工人階級投入其中，強迫他們從事奴隸勞動。布黨還解散了所有的工會，代之以御用工會。世界上只有蘇聯式的“工人階級的天堂”的工會只管發電影票、送花圈，根本不管工人利益。不但俄共第一代領導班子裡只有一個工人出身的成員，而且工人階級在共黨國家的實際地位，遠沒有資本主義國家的高。共黨國家從來沒有過罷工的現象就足以說明這一點。

1922年，蘇聯政府在烏克蘭等地區征糧時，還強行徵兵、禁止農產品市場

交易。農民示威抗議，便遭機槍掃射，死傷無數。大約 4 萬農民躲進了深山老林，這些避難者便成為“剿匪”的對象。10 萬軍人和員警別動隊來圍剿他們，抓到後，就地處決，施放毒氣，無所不用其極。4 萬農民被消滅了 3 萬 9 千多，剩下的不足 1 千人被捉起來，關進了集中營。

俄國共產黨的支部，深入到各地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部門。後來，墨索里尼曾模仿列寧建黨的辦法組建義大利的法西斯黨，他把這些黨支部叫做“政權的毛細管組織”。不妨借這個名詞來說明：黨組織就像血管一樣，毛細血管遍佈全身，一切社會團體，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社會團體，都不能逃脫共產黨的控制。一個以“人民的名義”來戕害人民的暴政，一個比歷代沙皇還要殘暴千倍萬倍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蘇聯，就這樣血淋淋地在俄羅斯篡立起來……

1926 年 1 月，徐志摩看到陳毅《紀念列寧》的油印稿後，在《晨報副刊》發表《列寧忌日——談革命》一文說，“我信德謨克拉西的意義只是普遍的個人主義”，不希望馬克思列寧主義“傳佈”，因為“我怕他”。他認為“共產革命”是“盲從一種根據不完全靠得住的學理”，“在幻想中想望一個永遠不可能的境界”。他勸青年人“不要輕易謳歌俄國革命”，因為“俄國革命是人類史上最慘刻苦痛的一件事實。”

當代俄國的學生課本書上將列寧的“十月革命”定性為“十月政變”（之前發生的“二月革命”還是叫“二月革命”）。即不承認它有什麼革命的進步意義了，它推翻了“2 月革命”建立的共和政體，把社會又拉回到專制主義的政體中去。一個民主制的“嬰兒”被另一個更大的專制所取代，人民整體生活水準不但沒有提高，飽受新一輪的苦難。1991 年，前蘇聯海軍將領，齊集阿芙樂爾號巡洋艦，降下了紅旗，莊嚴地升起“2 月革命”那象徵自由、平等、博愛的三色旗，

肯定二月民主革命的成果。列寧格勒這個俄羅斯第二大城市，舉行全民公決，多數人投票贊成改名為“彼得格勒”。歷經 74 年歲月，人民還是拋棄了列寧，反而贊成彼得大帝。俄羅斯共和國總統葉利欽評價列寧說：“他給俄羅斯民族帶來了很多災難。” 1998 年 7 月 17 日，俄羅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被殺 80 周年之際，其遺骨的安葬儀式在聖彼德堡舉行，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在葬禮上說道：“整個二十世紀的俄羅斯歷史，只是一個令我們民族感到無比羞恥的歷史”。

第 81 節 史達林罪魁

從史達林毒死列寧的奪權過程中，看到歷代專制政變的血腥重演，而且變本加厲。列寧逝世前病重的幾個月裡，作為總書記（相當於書記處書記）、排名第三、四位的史達林將中央文件、決議都簽上自己的名字，然後下發，其影響力陡增。列寧去世前，曾選定托洛茨基為接班人，托洛茨基當時在黨內的威望也是最高，列寧在遺囑中評價托洛茨基是“最有能力的人”，而評價史達林則是“太粗暴”，建議撤掉他的總書記職務。而且，由於史達林對列寧的夫人克魯普斯卡婭態度粗暴，列寧還宣佈與史達林“絕交”。但史達林聯合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共產國際主席）、加米涅夫（原俄共主席）發起了對托洛茨基的批判，由加米涅夫建議史達林留任總書記職務，不宣讀列寧的遺囑。列寧去世，史達林也故意很晚才通知在外地的托洛茨基，使得他趕不回來參加葬禮，從而在葬禮上突顯了史達林。此後，托洛茨基被開除出黨，又被驅逐出境，並在墨西哥被暗殺。打倒了托洛茨基後，史達林又聯合布哈林（列寧稱讚布哈林是黨內“最優秀的理論家”）打倒了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

史達林奉行大俄羅斯主義，遭到烏克蘭政治局委員們的反對，於是，史達林致電邀請政治局委員們來莫斯科磋商，然後他下令槍斃了所有的烏克蘭政治局委

員。在 1950 年前後，史達林在東歐掀起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義、抓“鐵托分子”的運動，共處決 234.5 萬人。

俄羅斯歷史學家拉津斯基在《史達林秘聞》中這樣總結史達林對列寧主義的理解：“一天不搞恐怖黨危險，兩天不搞恐怖黨滅亡。”1928 年 3 月 10 日，頓巴斯工業聯合企業的沙赫特礦區發生礦井爆炸。頓巴斯煤田在世 19 紀末開始工業化開採，主要資本和設備來自法國和比利時。十月革命後，由蘇聯收歸國有，採煤技術和設備進口也隨之斷絕。到 1920 年代後期，設備早已老化，加上管理混亂，400 多座礦井，大小事故頻繁。沙赫特礦區發生爆炸事故發生後，史達林不從技術設備、安全生產管理等方面指導主管部門總結教訓，反而將之作為“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的典型，硬說是“資產階級在工業戰線向社會主義發起進攻”。

為了讓全國人民認識到黨有可能被毒壞，史達林派人事先與頓巴斯煤礦 53 名工程師們商量好，有意讓他們自我坦白，坦白承認自己是冒充的知識份子，其實是打入煤礦內的資產階級專家破壞組織，該組織是按照國際資本反蘇維埃組織的指示進行破壞活動的。在這一天方夜譚式的“事件”中，55 人被指控犯有破壞和叛國罪，53 名工程師中 22 人被處死刑。他們至死還不明白史達林其及布爾什維克為何出爾反爾，說好是演戲為何動真格？

正是一黨專政，讓史達林為所欲為、一手遮天。一年後史達林下結論說：“決不能認為所謂沙赫特事件是偶然的。現在我們的一切工業部門中都有‘沙赫特分子’……他們正在積蓄力量來進行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活動。”接著，在全國的工礦企業開展抓“沙赫特分子”的清洗運動。一份報刊竟宣稱：“應該毫無條件地認為舊工程師中 90%-95%的人是有反革命情緒的”。而實際上被捕的人中不僅

有工程師，還有教授、作家和演員，他們都被逼供，受盡嚴刑拷打和各種折磨，被迫承認了自己的所謂“罪行”。當然，事實上幾乎都是冤案。史達林迫害知識份子，無非是要封住他們的嘴，不許他們對史達林的專橫政策有半點懷疑和不滿。

1935 年僅基洛夫工廠就有 140 人被逮捕，後來又有 700 人被槍斃。在 1937-1938 年間，幾乎所有廠級、車間領導被逮捕。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機車車輛廠的技術人員幾乎全被消滅。改用不懂生產的外行領導工廠，致使生產率下降了一半。

布哈林是十月革命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列寧稱他為“黨的最可貴的和最大的理論家”。1925 年接替季諾維也夫，主持共產國際工作；列寧死後，他提出了如何貫徹新經濟政策、建設社會主義的一整套設想和建議。1928 年蘇聯參加集體農莊的農戶只占農戶總數的 1.7%。從 1928 年開始，布哈林同史達林就是否堅持新經濟政策發生激烈爭論。1929 年，史達林將布哈林開除中央政治局，宣佈布哈林是“走資派”、是“富農在黨內的代理人”。

史達林恬不知恥地說：只有通過一黨專政、只有通過對全國 80% 的人口——農民採取強制手段才能取得。“農民是不會為社會主義進行鬥爭的，採用強迫的方法使他們為社會主義而鬥爭是可以做到而且是必須的”（《史達林全集》俄文版第 5 卷第 5-6 頁）。

史達林打倒了布哈林等政敵後，從而得以於 1929 年開始強制性地推行農業集體化。集體化運動遭到了農民強烈反抗，僅在 1930 年初，捲入反抗暴動農民就達 70 萬人。

1929 年 12 月史達林宣稱：“富農們當然要抵抗，為了節省時間建設新農村，

就要用革命的方式來處理富農，乾脆把他們消滅掉，以便徹底解決問題”。《聯共黨史》說：“全盤集體化就是消滅富農”；1930年1月蘇共通過《關於在普遍實行集體化地區消滅富農經濟的措施》。史達林出動正規紅軍和飛機大炮鎮壓農民反抗，在一些地區的鎮壓導致了紅軍部隊的嘩變。史達林逮捕、流放了500萬“富農”，財產被沒收被驅逐到邊遠區的農民約900萬人，許多人因反抗而被殺，更多人死於途中。

農民由於害怕公有化而屠宰了大量牲畜，例如僅在1930年2-3月間就屠宰大牲畜1400萬頭，殺了1/3的豬、1/4的羊。結果，1933年畜產品生產水準只占1913年的65%，牛從6010萬頭下降到3350萬頭，羊豬下降2/3以上，役畜首先是馬也下降了2/3。大批生產資料被毀，集體化過程中2/3的馬匹、4/5的牛、5/6的豬和85%的羊都失蹤了。集體化運動使農業產量在30年代初期降低了30%以上。

農業集體化使農民陷於社會最低層，那比1861年以前的農奴制還要苛刻。因為：作為一個農奴，他還可以當家作主，領有自己的穀物和牲畜。而這時集體農莊農民的境遇，卻是奴工的境遇，只能得到一點最低的聊以活命的口糧。在1935年，一個農民家庭全家人辛辛苦苦工作一年，只能從集體農莊得到247個盧布的報酬，那隻夠買一雙靴子。

農村因此出現了嚴重的饑荒，僅在1932年至1933年期間就有幾千萬農民被活活餓死。1933年從城裡派出大批黨員工作隊下鄉徵集糧食。工作隊硬性規定每家必須繳納多少糧食，不按規定數量納糧，就地槍斃。農民有少數把活命糧食藏了起來，一旦搜查出來一點，就要把人槍斃。饑餓的人們在自己土地裡挖出一個生土豆吃，也立刻被處死！

一天，三名城裡來的共產黨來到伏爾加格勒一農家，搜出還可供全家人吃兩天的大麥，又在一個破木箱裡找到了一公斤多散雜糧食，全都被拿走。農婦看著四個嗷嗷待哺的孩子，就伸手爭奪。那女共黨掏出手槍，兩點般地砸向農婦，打得鮮血直流。當時，三個共產黨人坐下來寫判決書並當場宣讀：“布爾什維克法庭決定，抗拒交納糧食，一家人全部槍斃！”他們分別掏手槍時，農婦掙脫跑出屋外，大聲喊叫：“共產黨員要殺我們了，共產黨員要殺我們全家了！”周圍農民紛紛拿著鐵鏟鐵叉跑過來把他們圍住了。兩名男共黨膽怯了，說：我們晚上再來執行槍決。說著他們就退卻逃走了。

隨後，這家人知道要報復，遂逃到森林裡，以吃死去的人肉為生。據吃人者回憶，那時被槍殺和餓死的人比比皆是，露天扔在村外無人掩埋，變成冷凍僵屍。被宣判了死刑的農家都躲藏到森林裡，尋找死人吃，是大家唯一的出路。吃人者已經成幫結夥了。在那兩三年的期間，躲藏無產階級專政在白雪覆蓋的深山老林，凡是不吃人的都活活餓死了。除了城裡派來的共產黨員工作隊，當地農莊的少數布爾什維克黨員，也趁火打劫。村莊裡一多半人被打死或者餓死了……能對付活下來的，都是皮包著骨頭的骷髏，刮大風一定能夠把人吹倒！

1932~1933 年期間蘇共政權消滅了農村中最有勞動力的人口，烏克蘭的喪生人數最多。在北高加索地區、伏爾加河流域、白俄羅斯、阿勒泰地區、黑龍江沿岸地區也有大批蘇聯農民被餓死。1930 年代哈薩克斯坦有 230 萬人餓死，人口淨減少將近 1/3。據蘇聯官方統計，從 1929 年到 1937 年，餓死的人口達 1450 萬人（蘇聯《星火》週刊 1988 年 12 月 20 日），估計達 2000 萬。史達林不許報導饑荒，反而向國外出口糧食。據統計，1930 年蘇聯出口了 4800 萬普特糧食，1931 年出口了 5100 萬普特。即使是饑荒最為嚴重的 1933 年也還出口了 1000 萬

普特糧食。史達林以這些糧食換取外匯，以便推進工業化進程，建造他的通天塔。

起初史達林不承認饑荒，後來承認了，但嫁禍於農業部長、白俄羅斯黨中央書記等，說他們故意搗毀了收割機，弄死了 3 萬頭馬匹，往牛奶中扔玻璃渣和釘子，“以割破我國人民的喉管和腸胃”。二戰中，史達林本人對邱吉爾承認：“一千萬農民被處理掉了”，並稱：“死一個人是場生命的悲劇，死成千成萬的人就只是一個統計數字了。”

被稱作“歐洲糧倉”的烏克蘭在 1921~1923 年、1932~1933 年以及 1946~1947 年期間，曾發生過 3 次大饑荒。1932~1933 年烏克蘭糧食歉收，史達林派出專員，動用員警和契卡等機構強制征糧，導致烏克蘭伏屍遍野人相食，7 百萬~1 千萬人餓死，每天餓死 2.5 萬人。學者指出，當年的官方檔案並不完善，實際上每天餓死 3.2-3.8 萬人，總共餓死人數占烏克蘭當時全國人口的 1/3。烏克蘭學者說，在集體化運動中，農民的口糧、土豆等農副產品全被沒收。但同蘇聯其他地區有所不同的是，烏克蘭農民的牲畜、家禽等等也全被沒收。

1988 年美國國會的調查報告判定史達林對烏克蘭犯下種族滅絕罪。2003 年烏總統簽署法令，將 11 月 25 日定為“饑荒紀念日”，並劃撥經費在全國範圍內興建大饑荒紀念碑。約 30 個國家在聯合國簽署聲明，紀念因蘇聯的錯誤而餓死的百姓。2005 年 11 月 26 日，近 4 萬民眾在基輔舉行了紀念烏克蘭大饑荒受害者及其他政治壓迫受害者的活動，烏克蘭總統尤先科參加了該活動並發表了講話。他說，原蘇聯 1930 年代的大饑荒是反人類的罪行，烏克蘭一千萬人被活活餓死，是蘇聯製造的“種族滅絕”罪行。“每分鐘有十七人餓死；一天大約死亡二萬五千人。比法西斯納粹在集中營殺害猶太人還要多。”立陶宛議會通過的決議說，史達林政權對烏克蘭犯下了民族滅絕罪。歐洲委員會議會大會也通過決議譴責共

產政權的大規模侵犯人權的行為。莫斯科當局說，“大饑荒”不是針對烏克蘭，全蘇聯都一樣。那麼，當時蘇聯的大饑荒至少餓死 5-6 千萬人！外興安嶺的一位七十多歲的俄羅斯婦女曾說：“那時候饑餓的人們，在地裡挖出來一個生土豆，沒等吞入口中，就被國家安全局人員打死了！”

史達林曾授意肅反機構槍決烏克蘭的幾百名民間歌唱藝人。音樂家肖斯塔科維奇說：“每當他們槍決一個民間歌唱藝人或者走方說書的藝人，幾百首偉大的音樂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烏克蘭的民間歌手都是盲人，他們的歌曲從沒有文字記錄，每一個盲人歌手都有自己獨特的歌曲。史達林是出於什麼心態要消滅這些盲人？只因當時農村正在開展集體化運動，富農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被消滅，一些“富農”家庭在極“左”政策下絕了戶。史達林擔心這些盲人歌手四處雲遊，唱的歌又哀哀戚戚的，誰知是不是在為富農鳴冤叫屈？對盲人能有什麼審查制度？既不能把一份經過修改和批准的歌詞交給盲人，又不能給他下達書面指示。對盲人什麼都得用嘴說……還是把他們槍斃了比較省事，於是他們就這樣做了。

1932 年 8 月通過一項由史達林起草的專門針對盜竊集體財產的法令，其中規定：“侵犯公共財產的人應當作為人民公敵被槍斃。”該法被民間稱為“五穗法”，饑民們可能僅僅因為偷了集體農莊的幾棵麥穗就被槍斃，最輕也要判十年徒刑。在此項法令頒佈後的 16 個月內，有 12.5 萬多農民被判刑，其中有 5400 名是判處死刑。1932 年秋，當幾十萬個受饑餓折磨無家可歸的兒童擠滿許多火車站和大城市時，史達林曾下了一道密令：凡在搶劫糧倉時或者在扒竊列車時被抓住的人以及害花柳病的人一律秘密槍斃。到 1933 年 1 月 1 日，該法令剛剛被執行了不到 4 個月，就有高達 55000 人根據新法令被判罪，其中 2000 人被槍決。

1932 年以莫斯科市委書記留金為首的反對派，他們試圖求助於全體黨員，

改變史達林專權的局面。他們被揭露後，招致黨內一輪又一輪的清洗。史達林的威望卻明顯地跌落。

1932年10月26日，在莫斯科高爾基家有一次著名聚會，冠蓋雲集，有克里姆林宮的首腦史達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等，他們談笑風生，觥籌交錯；還有50余位作家，如阿赫瑪托娃、曼德爾斯塔姆、帕斯捷爾納克、普拉托諾夫、布林加科夫、巴貝爾等，舉止卻相當恭謹自製。忽然，作家馬利什金來到史達林面前和他碰杯，詩人盧果夫斯科依大聲喊道：“讓我們大家都為史達林同志的健康乾杯！”此時，坐在史達林對面的小說家尼基夫洛夫，猛地站起來說：“我聽厭了這種話！我們已經為史達林的健康幹了114.7萬次了。他大概已經厭煩這套了……”頓時冷場。史達林伸出手，握著這位小說家的指尖說：“謝謝你，尼基夫洛夫，謝謝你。我確實厭煩這套。”幾年後，那天晚上參加聚會者中，每4位就有一位被投入監獄，許多人被槍決。被槍決者中也包括那位小說家尼基夫洛夫。

1934年2月蘇共召開17大，都在議論讓基洛夫擔任聯共總書記，讓史達林擔任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或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之類職務。列寧格勒書記基洛夫出現在主席臺時掌聲雷動，而史達林出現在主席臺時幾乎沒有掌聲；隨後選舉中央委員也是基洛夫得票最多，史達林得到的反對票，大大地多於基洛夫。在這次大會剛開始或大會前夕，一批黨的工作者和基洛夫談過話提出必要時撤換史達林，參加談話的人在“肅反”中被迫害致死。

1934年12月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列寧格勒州委書記基洛夫在列寧格勒州委機關會議室主持州委會議。18時左右，基洛夫的警衛隊長鮑利索夫進入會議室，走到基洛夫身邊說：克里姆林宮來了直線電話。基洛夫從座椅

上站起來準備去接電話，剛剛跨出會議室的門，預先潛入、守候在會議室門外走廊上的兇手尼古拉耶夫用手槍抵著基洛夫的後腦射出罪惡的子彈。暗殺現場竟佈滿了內務部人員，兇手被當場抓獲。

1934年12月1日晚，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議通過了《關於修改各加盟共和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典的決議》。決議說：“對各加盟共和國現行刑事法典在偵察和審理恐怖組織和對蘇維埃政權工作人員進行恐怖活動有關事宜進行如下修改：(1)有關這些案件的偵察工作不能超過十天。(2)控告結論在正式開庭審判前一晝夜交給被告。(3)原告、被告雙方都不參加審判。(4)不接受判決上訴書和赦免請求書。(5)極刑判決被宣佈後立即執行。當時很多共黨的幹部沒有意識到他們接受這個嚴酷與專橫決議的同時，也為自己挖掘了墳墓。這是史達林戰勝敵方、清洗大批黨內幹部最有力的武器，因為這些人已經沒有什麼能保護他們自己了。史達林指揮內務部可以為所欲為肆無忌憚，任何人都可以說成是人民敵人，是陰謀集團的成員。限期十天內可以使用酷刑強迫被告屈招，沒有上訴。依據此決議，開始了審判。

當時史達林的一名親信，蘇聯總檢察長維斯基就叫檢察官們放心，不要有任何顧慮。他宣稱，大家應該記住史達林同志的話，在一個社會的生活中，在我們自己的一生中，總有這樣的時刻法律成為過時的東西而應該撇到一邊；“即在國家的罪行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決定性的證據。正因為如此，內務人民委員部才不惜以一切手段逼取口供。”

暗殺發生後，凡與暗殺相關的嫌疑人，以及有可能瞭解內情的人，都先後神秘地死去，沒有留下任何直接或者間接的罪證。史達林槍斃了102位知情者。史達林按“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的邏輯，認定是原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組成的地下

恐怖組織“列寧格勒總部”所為，著魔般地開始了持續 4 年的大肅反運動，共處決和迫害致死 1200 萬人。

因基洛夫一案列寧格勒州有 3200 多名黨政幹部被捕。基洛夫女秘書拉祖爾金娜原是 30 歲的美麗婦女，從集中營獲釋後變成了白髮蒼蒼的“祥林嫂”，牙齒全掉光了，兩眼直愣愣的。她不管碰到什麼人翻來覆去就是這段話：“我在集中營蹲了 19 年……我的丈夫被槍斃了……我的兩個孩子都死在卡拉幹達兒童監獄。”由於拉祖爾金娜已經呆傻，還把集中營看守唆使犯人們強姦她的事告訴給人聽，赫魯雪夫同情她的遭遇（拉祖爾金娜入黨介紹人是克魯普斯卡婭和斯塔索娃），後來讓她當了蘇共 20 大代表。

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柯秀爾受盡嚴刑拷打，被處決前仍拒絕作假交代。劊子手們把柯秀爾的十六歲的女兒帶到審訊室，當著父親的面把他的女兒強姦了。此後，柯秀爾就在所有‘交代’上簽了字，可是他的女兒被放出來以後臥軌自殺了。”

史達林在 1935 年頒佈法律規定，12 歲以上（含 12 歲）兒童犯偷竊等罪按成年人條例判罪，直至被判死刑。史達林的法律是為大清洗做準備的。他早預計到大逮捕浪潮之後必是兒童乞討流浪潮，早頒佈有關法律，可有備無患。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他主要還是想利用小孩脅迫大人。有了這條法律（對兒童判死刑），就可以利用他們對兒孫的疼愛、牽掛之心，對其進行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折磨，讓他們願認什麼罪就認什麼罪，要誣陷誰就誣陷誰。

1935 年 6 月 23~7 月 21 日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訪問了蘇聯。他看到：
高爾基被安排在像宮殿一樣的別墅裡，為他服務的工作人員有四五十個，每天都有親朋食客數十人，在這裡“不知不覺過著封建領主般的生活”。而與此同時，

普通老百姓還要為謀取麵包和住房而努力，路邊的一些農民和工人“向我們投來陰鬱的目光，有一個上了年紀的婦女向我們揮動著她的拳頭”（這就是“道路以目”）。其實，史達林想要高爾基給自己寫一些讚美詩，令克格勃送給他很多禮物。但高爾基死活不理，在小本子上寫下史達林種種不是。高爾基死後，克格勃的人看到了高爾基那個小本子，無奈地說道：“狼總是狼，再怎麼圈養也要跑回到大森林裡去。”史達林向羅曼羅蘭談到有關基洛夫被殺後的大規模鎮壓：“我們已經得悉，犯罪分子在殺害基洛夫後，還打算對其它領導人實施兇殘的計畫，為了預防這種罪行，我們承擔了槍斃這些先生們的不愉快的責任。”僅僅是為了預防，就可以將無罪的人處以死刑。史達林對羅曼羅蘭解釋懲處 12 歲以上兒童的法律：“我們應該通過這項鎮壓性的法律，以死刑來威脅 12 歲以上的兒童罪犯，尤其是他們的教唆者。”羅曼羅蘭對基洛夫遇刺後列寧格勒實行的“行政流放令”的做法極為反感，他在日記中寫道：“哪怕建幾座集中營，簡易住房，讓有嫌疑的人先住在那裡，等候對他們案件的全面審查。但讓他們呆在露天的地方，沒有任何生活設施。這樣，許許多多的兒童將死于亞洲的風沙之中(也許誇大)。”

1936 年至 1938 年，蘇聯許多大城市 10~20 歲的青少年自殺的事件不斷發生。其中就有許多是被清洗掉的人的子女。他們在自殺前還常常給史達林寄信訴說慘情，但這些信被加注的評語都是：把這些青少年趕出莫斯科去，以免讓外國記者和外賓看到這麼多被拋棄街頭的孤兒”。1937 年史達林、葉若夫下令：將全國所有父母被槍決後的青少年全部槍斃。

為消滅肅反的知情者，僅 1937 年史達林就槍決了 3 千名執行肅反任務的內務部人員，各州內務部分局的全部領導人被槍斃。在那時，僅莫斯科一城每日至少殺人 1 千。據已公開的檔案，1938 年 8 月 20 日一天，史達林批准槍決的“人

民敵人”及其家屬 735 人。12 月 12 日創記錄地達到 3167 人！1956 年蘇共準備召開第 20 次黨代會時，蘇共曾下令內政部統計史達林在大清洗中的殺人數目。統計數字指明，僅 1937 年至 1938 年一年中，史達林本人就簽署了 681,692 人的處決令。後來，一個重要的俄羅斯人權組織公佈了前蘇聯遭遇政治迫害者的名單，這個名單中，共紀錄有 1,345,796 個俄羅斯人的名字。相比之下，毛澤東在文革中殺人的“成就”要比史達林大得多。

從 1936~1939 年至少有 5 百萬人被關在監牢及集中營；其中 50 萬高級幹部被槍決。俄共最早的前兩屆政治局委員除列寧已去世和史達林本人之外，全部被處死或自殺。初期共產黨中央委員 71 人，有 50 人被清算。凡任大使的外交官，很少能倖免。有一次，中央全會上響起經久不息的掌聲，史達林居然忘記了招呼大家坐下。過了許久，終於有一個人率先坐了下來，眾人得救了。可這位曾經的工人革命家由於在這個荒誕事件中不合作，不久就被捕了。

在三十年代恐怖無比的“大清洗”中，濫捕無辜的行動大都在深夜進行，人人自危，風聲鶴唳，神經高度緊張，生怕夜間有人敲自己家門。許多住在高樓上的人為免遭被捕後的嚴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員警敲門時，便縱身跳下，以死相抗。

一天晚上，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在史達林別墅的花園中夜宴閒談時，為天上一個星座的名稱小有爭論。莫洛托夫說是獵戶星座，卡岡諾維奇說是仙後星座。由於二人爭執不下，在一旁笑聽爭論的史達林認為此事容易，給天文館打個電話就可搞清，便吩咐秘書給天文館打個電話。誰知原天文館長、一位天文學家已與其他幾位著名的天文學家一起被“清洗”；而新上任的天文館長並非天文學家，原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軍官，也回答不了這個問題。對史達林秘書的電話，這位

元新館長當然不敢怠慢，急忙派車去找一位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學家。這位天文學家自許多同行好友被捕後一直惶惶不可終日，此時見一輛汽車半夜突停在自家門口，門鈴又按得很急，以為末日已到，在開門時突發心臟病死在門口。汽車只得急馳去找另一位天文學家，而這位天文學家與新近被“清洗”的那些天文學家亦是好友，也因此而惴惴不安。他家住樓上，在夜裡兩點半突然被急促的門鈴聲驚醒，見一輛小汽車停在樓下，也以為自己的大限已到，這位年已 60 的老人不願再受凌辱，便縱身從視窗躍向夜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幾經周折後，這位天文館長終於在清晨 5 點鐘打聽清楚了星座的名稱，急忙給史達林的別墅掛電話：“請轉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岡諾維奇同志……”但值班人員回答說：“沒人可以轉告，他們早就睡覺去了。”

布哈林 1934 年至 1937 年任《真理報》主編，1937 年他被指控充當外國間諜而被捕。1938 年 2 月，蘇聯成立了特別軍事法庭，對布哈林、李可夫為首的“右派和托洛茨基聯盟陰謀集團”進行公開審訊。蘇聯總檢察長維辛斯基指控布哈林派社會革命黨人卡普蘭刺殺列寧，暗殺基洛夫、明仁斯基（全俄肅反委員會主席）、高爾基，是帝國主義的間諜。

布哈林為保護妻子安娜·拉林娜和年幼的兒子，違心地承認了所指控的罪行。但他又同審問他的法官進行了機智的鬥爭，對具體的事情又巧妙地加以否認，這為以後他的親屬要求為他平反創造了有利條件。在沒有證據，只有被告的口供的情況下，法官烏爾利希判處包括布哈林在內的所有被告死刑。在處決前夕，布哈林懷著相信真理的信念，寫了一封致未來黨的代表大會的信。在信中，布哈林為自己所受到的冤屈辯白，呼籲未來一代黨的領導人，“驅散滔天罪惡的烏雲”，為他平反昭雪，恢復名譽。他要求妻子安娜·拉林娜背誦下來。當時，他的妻子

才 23 歲，他確信他妻子能活到他平反昭雪的那一天。他跪在他妻子的腳下，含著眼淚，請求她寬恕他，請求她把兒子培養成一名布爾什維克，請求她為他以後平反昭雪竭盡全力，請求她不要忘了他遺書中的每一句話。他堅定地對妻子說：

“你還年輕，你活得到那一天，你起誓，你要記住我信中的每一句話。”布哈林的妻子起了誓，他才從地上起來，擁吻了她，用顫抖的聲音說：“不要抱怨，歷史上常有可怕的錯誤，但真理總有一天會恢復。”他相信，他的遺書會被搜查。因此，他待妻子把遺書的內容一字不漏地背出來後，他把遺書毀了。1938 年 3 月 14 日或 15 日夜，布哈林、李可夫等人被槍決。布哈林年僅 50 歲。

1956 年蘇共 20 大前夕，赫魯雪夫曾問蘇聯總檢察長魯堅科：“請告訴我，在對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提起公訴時，他們的罪狀有多少真實的事實依據？”魯堅科回答：“從司法的觀點來看，並沒有任何依據足以把那些人定罪或提交審訊。因為對他們起訴的根據，都只是一些肉體上和精神上嚴刑逼出來的口供。而這些逼出來的口供是不能作為把一個人送交審訊的合法依據的。”可在赫魯曉林、勃列日涅夫當政年代，由於他們堅持史達林的價值觀，始終拒絕為布哈林平反。1988 年 2 月 4 日，蘇聯最高法院全體會議終於決定撤銷當年軍事法庭對布哈林的判決。2 月 5 日，蘇共政治局宣佈恢復布哈林的名譽。5 月 10 日，蘇聯科學院恢復布哈林蘇聯科學院正式院士的稱號。6 月 21 日，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恢復布哈林的黨籍。

赫魯雪夫秘密報告說，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選出的 139 名正式和候補委員被逮捕和遭槍決有 98 人，即 70%。十七次黨代表大會具有表決權和發言權的 1966 名代表中，因被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占一半以上，達 1108 人。先後擔任各部人民委員（部長）的幾乎全部被槍斃。1941 年在明斯克附近一次

就槍決了 10 萬多人。為平息民憤，史達林將副手雅哥達、葉若夫先後以“毫無根據鎮壓蘇聯人民”的罪名而處決。

1937 年 5 月，史達林家鄉格魯吉亞舉行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與會代表有 644 名。會議剛結束，便有 625 名代表遭到逮捕、流放、槍決，僅 19 人倖免於難。1941 年蘇德戰爭爆發前，蘇聯紅軍元帥 5 人中的 3 人，上將 4 人中的 3 人，中將 12 人全部處死；以及所有集團軍軍長、幾乎所有的師長和旅長、半數的團長、絕大部分政治委員，多達約 5 萬重要軍事政治幹部被殺，更多的幹部遭到清洗。僅 1937、1938 年兩年共槍決紅軍指揮員 3.5 萬人。戰爭爆發時，只剩下 7% 的軍官受過高等軍事教育，75% 的軍官擔任他們的職務不到半年時間。

更荒唐的是對共產國際活動家的迫害，受害者中有些人是各國共產黨的創始人、總書記、政治局委員。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許多住在蘇聯的外國共產黨領導人都犧牲了，而留在本國監獄中的共產黨領導人卻大部分都活了下來。當然，史達林在陷害這些無辜者的時候大都使用了殘酷的肉體折磨和精神折磨，其殘酷程度遠遠超出了人類歷史上的酷刑的總和。

史達林對每一個“政敵”的家庭都是採取斬草除根的方法，似乎從中發現了樂趣。加米涅夫被槍決後，接著是他的妻子、兩個兒子以及他的兄弟、弟媳婦被槍決。托姆斯基（全蘇工會主席）自殺後，他的妻子被捕入獄，三個孩子有兩個被判死刑。沃茲涅先斯基（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被處決，他的弟弟、姐妹也跟著全都被槍斃。圖哈切夫斯基的一家總計倒下了 10 個人——妻子、兩個弟弟、三個妹夫被槍斃，母親和一個妹妹死于集中營，女兒（獨生女）斯維特蘭娜在少年監獄染上重疾，出獄不久就病死了。外甥女瑪麗娜因缺乏親人照料，很小年紀就患了肺結核，後來也病死了。三個妹妹、兩個弟媳全被判刑，其中一個妹

妹在集中營裡蹲了 18 年，1955 年才獲自由。侄兒安德列被奧德薩兒童保育院收養。這是一個專門收養“人民公敵”孩子（孤兒）的保育院。衛國戰爭爆發後，這個保育院的 5 百多個孩子被疏散到恩格斯市，到達時只剩下 120 個……史達林殘忍無比，他的妻子忍受不了他對同僚的暴虐而舉槍自殺，他的兒子也因父親的殘忍而撲向電網自殺。是什麼深仇大恨需要讓每一個“前戰友”家破人亡？史達林的殘忍已經接近了人性惡的底線。

布哈林、季諾維耶夫、皮達可夫（蘇聯重工業部副部長）、拉狄克（蘇聯《消息報》副主編）、葉戈羅夫（蘇聯元帥）、埃德曼（蘇軍上將、伏龍芝軍事學院院長）、丘巴爾（蘇聯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兼財政部長）、艾赫（蘇聯農業部部長）的年幼的孩子們（他們都已經成為孤兒）都被“格伯烏”（國家政治保衛局）收容了，最後將他們送交卡申科兒童精神病院暫時“託管”。這些孩子經常因“違反院規”而遭到毒打。著名記者帕尼佐夫斯基的孩子在“治療”中被治瘋了，皮達可夫的孩子因對參觀團說“你們看到的都是假的”被毒打後轉院送走，後來下落不明。最可憐的是布哈林的養子安德列·布哈林，十三歲的安德列在布哈林夫婦被捕時因攔救他們被保安人員打傷，送卡申科時身體非常衰弱。當安德列得知他的養父已被槍決時，他在廁所裡上了吊。安德列決心去死的那天晚上把全體同伴叫來，向他們說了這樣一段話：“我，反正是活不長的。如果你們當中有誰能夠從這個罪惡的國家逃出去，要告訴所有、所有、所有的人，蘇聯是個什麼樣的國家，甚麼是蘇維埃政權……”

赫魯雪夫與第一個妻子生的兒子列昂尼德·赫魯雪夫在戰爭爆發後當上了一名飛行員，在一次戰鬥中，列昂尼德駕駛的殲擊機失蹤了，原來他成了德國人的俘虜，最終他向德國人妥協。史達林得知後，命令要不惜任何代價把列昂尼德清

除。派到德國執行任務的“鋤奸隊”完成了這一任務。他們將列昂尼德押回莫斯科，莫斯科軍區軍事法庭判處列昂尼德死刑。赫魯雪夫曾多次請求史達林從寬處理，史達林在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後最終決定實行槍決。

史達林曾調集裝甲部隊屠殺車臣人上百萬，對高加索各族人民、克裡木韃坦人、伏爾加河流域的日爾曼人及加爾梅克人進行了大規模的屠殺。二戰後史達林把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猶太人全部殺光。1947年烏克蘭還發生大饑荒，蘇聯進行氫彈爆炸試驗的時候，用大批身穿防化服的士兵組成人牆進行活體試驗。防化服裝不管用，許多士兵當場斃命（核輻射後遺症多啦）。若沒蘇聯相關檔案的解密，這一歷史血腥外界從何得知？

從1947年起，史達林在意識形態領域發動了對所謂“資產階級思潮”和“反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批判運動，涉及文學藝術、哲學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的各個方面，將一批與史達林觀點不甚相同或比較有獨立意識的作家、學者、理論工作者打下去，不准他們發表自己的觀點，甚至對其中一些人採取了鎮壓措施。類似30年代的政治清洗再度展開。

1949年秋，蘇聯保安機關在史達林指示下突然逮捕了一批高級幹部，其中有：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沃茲涅先斯基，蘇共中央書記庫茲涅佐夫，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主席羅吉昂諾夫，列寧格勒州委書記波普科夫等。經秘密審訊，於1950年9月，以“叛國罪”將沃茲涅先斯基等人判處死刑。由於這一案件所涉及的物件大多在列寧格勒工作，所以被稱作“列寧格勒案件”。

1952年，史達林發表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根據他的設想，蘇聯將在20~30年內進入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實現無商品貨幣的按需分配，經濟指

標全面超過美國。

史達林晚年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權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被戰爭中斷的黨代表大會制度直到 1952 年才接續上（相隔了 13 年），從戰爭結束至史達林逝世的 8 年間，中央全會也只開過兩次（1947 年和 1952 年）。由於權力機制的運行完全依賴個人意志，因此，隨著史達林晚年身體的逐漸衰弱和思維方式的日趨偏執，他對蘇聯社會的負面影響也日益加深。

在史達林統治的 1920~1953 年，蘇聯被整死的人約 2500 萬（不包括戰爭年代）。其中不少於 1/3 的人被判處死刑或在勞改營和流放地死去。”這些數位不包括由於 1932~1933 年大饑荒所造成的農民大量死亡，也不包括由於民族強迫遷徙而造成少數民族的大量死亡。

麥德維傑夫感慨地說：“往昔的任何暴君都沒有對自己的同胞進行如此規模的鎮壓，也沒有消滅掉這麼大數量人的生命。”但毛澤東卻有自己獨特的看法，認為史達林搞肅反是“正確”的，只是“錯判了一些好人”，犯了“肅反擴大化”的錯誤。這種高論實在讓人驚訝！

一個蘇共黨員 1994 年在《自由思想》一書中寫道：“史達林專政是人類歷史上最血腥最恐怖的專政，難道社會主義道路要用千百萬人的屍骨來鋪墊？難道人類要用頭顱作酒杯，才能飲下文明的美酒”？凡是布爾什維克主義一經確立的地方，就必然出現誅除異己、血腥鎮壓、精神奴役和政治迫害等現象；所有這些耽誤了社會歷史的發展，拉大了與世界文明進程的差距，敗壞了道德風尚，喪失了固有的傳統。

如果有人不禁要問：為什麼竟有這樣一個政府，視萬民如草芥，草菅人命，如此殘暴地蹂躪其本國的人民呢？因為俄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家以及其他各地的

共產主義革命家，都只著眼于未來，認為人應當如何如何，而把當前的人視為贅疣。這一觀點，深深地隱藏在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中。馬克思有一次就寫道：“當前這一代的人，就像是一群由摩西率領著在荒野中流浪的猶太人一樣。他們不僅是要征服一片新世界來定居，他們也一定要死去，空出位置來讓那些適合於這片新世界的人來居住。”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沒有叫他們的信徒去搞集體屠殺，然而他們都樂於為了尚未出生的下一代而犧牲當前這些正活著的人。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總結“蘇聯解體”的教訓時也強調指出：“蘇維埃政權沒有使國家繁榮、社會昌盛、人民自由，經濟的意識形態化導致我國遠遠落後於發達國家。無論承認這一點多麼痛苦，但是我們將近 70 年都走了一條死胡同，偏離了人類的康莊大道。”

第 82 節 蘇聯在二戰中的醜惡表演

蘇聯是二戰發起國，史達林對二戰的爆發難辭其咎。1772、1793 和 1795 年沙俄和德國曾三次瓜分波蘭。波蘭亡國，波蘭就從歐洲地圖上消失長達 123 多年。1918 年 11 月 11 日波蘭恢復獨立，成立共和國。波蘭政府力圖恢復 1772 年的俄波邊界線，為此，新成立的波蘭共和國就發動了對蘇俄的戰爭，史稱蘇波戰爭。1920 年 4 月，波軍進佔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廣大地區，蘇俄紅軍進行反擊，但最後被波軍擊敗。1921 年 3 月 18 日，波蘭與蘇俄在里加正式簽訂《波蘭與俄羅斯和烏克蘭和平條約》，即《里加條約》。其主要內容是：締約雙方承認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獨立，劃定了波蘭東部邊界(將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西部地區劃歸波蘭)，這時波俄邊界線約在寇松線以東 150 英里處。根據該條約，波蘭獲得西烏克蘭和西白俄羅斯以及立陶宛的一部分，蘇俄在這場戰爭中損失了大片領土。

從 1938 年 10 月起，希特勒向波蘭提出波蘭走廊的問題，並向波蘭發出戰爭

威脅。1939年8月23日，蘇德外長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還附了一份蘇德瓜分波蘭的秘密議定書，由史達林和裡賓特洛甫簽字。1939年9月1日，德國以閃電戰突襲波蘭，迅速侵佔波蘭大部分領土，波蘭軍民英勇抗戰。9月17日，蘇聯領導人史達林以保護波蘭境內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為由，命令60萬蘇軍向波蘭發動進攻。9月18日，德蘇兩國軍隊在布列斯特會師。波蘭陣亡6.63萬人、傷13.37萬人、被德軍俘42萬人、被蘇軍俘23.25萬人；最終，波蘭政府流亡倫敦。在華沙，有25萬居民死於非命。1939年居住在波蘭邊界靠俄方一側的幾十萬波蘭人，只有婦女和兒童被遷到哈薩克定居，男人們則被斬盡殺絕。1.5萬名波蘭軍官作為戰俘被押解到蘇聯，關入勞改營。戰俘有通信權利，起初還能寫信。但1940年以後便再沒有他們的消息了。波蘭流亡政府多次向蘇聯政府詢問，但均未得到答覆。

1943年4月13日，德國第一個向全世界宣佈：德軍在蘇聯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發現一座萬人塚，裡面葬有4千波蘭軍官的屍體。納粹說，蘇軍用德軍武器槍殺了這些軍官，企圖以此掩蓋罪行並嫁禍于柏林。蘇聯當即否定，並一口咬定是德國法西斯槍殺的。二戰結束後紐倫堡國際法庭對德國戰犯進行審判，蘇方提出德軍在卡廷屠殺波蘭軍官的指控，但被法庭駁回。紐倫堡國際法庭並未做出誰是卡廷慘案兇手的判決。以後這個問題多次被提起，但始終未做出結論。蘇聯多次斷然否定是他們幹的，把罪責推給德國法西斯，但西方和波蘭對此一直持懷疑態度，理由是1940年斯摩棱斯克尚未被德國人佔領，德國人如何能在蘇聯控制區進行大規模屠殺？直至1990年4月13日，塔斯社在雅魯澤爾斯基訪蘇之際發表聲明，正式承認將近1.5萬名波蘭軍官被屠殺是“史達林主義的嚴重罪行之一”。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把有關卡廷事件的材料和死難者名單親手交給雅

魯澤爾斯基時說：“近期新發現的材料，間接地、卻無可置疑地證明，半個世紀前在斯摩棱斯克森林中犧牲的數千名波蘭公民是貝利亞及其手下人幹的。波蘭軍官的墳墓——旁邊蘇聯人的墳墓出自同一只兇殘的手。”這是蘇聯當局推卸責任時慣用的手法。史達林大清洗時很多黨政軍要人受到“貝利亞一夥人的迫害”，同史達林的專制獨裁統治所形成的社會體制無關，同其他領導人無關，而貝利亞已得到應有的懲治，沒有必要再深究了。但波蘭人對蘇共總書記的說法並不滿意，因為他們知道他並未說出全部真情。卡廷慘案並非貝利亞擅自幹的，是聯共(布)政治局的決定，貝利亞充其量是執行者。對卡廷事件瞭解得更多一些的波蘭人甚至知道不是貝利亞幹的。1940年3月5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舉行了第十三次會議，決定同意內務部的建議：處決波軍戰俘。在報告上簽署“同意”的有政治局全體成員：史達林、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揚、加里寧、日丹諾夫和卡岡諾維奇。這份報告上並無貝利亞的簽名。1992年10月14日，葉利欽總統的特使向波蘭總統瓦文薩移交了有關卡廷事件的兩包“絕密檔案”(影本)，總共20個檔，其中最重要的是聯共中央政治局1940年3月5日關於槍決14700名波蘭軍官和在獄中關押的11000名波蘭公民的決定。波方立即將其中幾個重要文件予以公佈。

1939年11月~1940年3月，歐洲大戰烽火正濃，強大的蘇聯發動了侵略弱小芬蘭的非正義戰爭。1939年10月蘇聯以維護西北邊境安全為由，要求芬蘭轉讓芬蘭灣諸島嶼和雷巴奇半島部分領土，租讓漢科半島軍事基地並將卡累利阿地峽的邊界後移。作為補償，蘇聯將卡累利阿地區兩倍於上述地區的領土轉讓給芬蘭。芬蘭政府從其安全和中立地位考慮，表示難以接受蘇方要求。11月9日，雙方談判破裂。28日，蘇聯以芬軍在邊境地區“挑釁”為由，單方面廢除兩國

互不侵犯條約，並於次日宣佈斷交。30日對芬蘭宣戰：蘇軍以20個師（45萬人）、2000輛戰車和1000餘架作戰飛機從四個方向對芬蘭發起全線進攻，企圖在3天內“解放”芬蘭，並且當晚就在芬蘭建立起了傀儡政府。當時芬蘭全國人口只有370萬人，國防軍總數只有3.3萬人。芬蘭陸軍的裝備，也只停留在一次大戰的水準上。芬蘭國土狹小，根本沒有戰略空間。蘇聯高層驕傲地認為芬蘭會像其他波羅的海國家一樣不堪一擊，乖乖地歸順于蘇聯強大的繯襪之中。然而，芬軍利用嚴寒和沼澤森林的有利地形，展開反擊戰、陣地戰和消耗性圍殲戰，蘇軍損失慘重。據赫魯雪夫的回憶錄透露，自1939年11月到次年3月13日和約簽訂，短短三個半月內，蘇軍實際在蘇芬戰爭中損失上百萬人，被俘55000人。在這場以弱抗強的戰爭中，芬蘭狙擊手有著非常卓著的戰果。百發百中是狙擊手們追求的境界。據統計，二戰時平均每殺死一名士兵需要2.5萬發子彈。越戰時平均每殺死一名士兵需20萬發子彈，然而同時期的一名狙擊手卻平均只需1.3發。這是一個多麼懸殊的數字對比！芬蘭狙擊手中最厲害的當數SimoHayha。SimoHayha是芬蘭也是世界最高獵殺記錄505次的保持者。以SimoHayha為首的滑雪部隊使用的是從帝俄時期沿用下來的步槍，卻能在700米外狙殺蘇軍，在蘇軍士兵中造成極大的恐懼，稱他們為“白色死神”。1940年3月13日，兩國在莫斯科簽訂了和平協定，芬蘭將其東南部包括芬蘭第三大城市維堡在內的卡累利阿地峽、薩拉地區和芬蘭灣的大部分島嶼割讓給蘇聯，並把漢科港租給蘇30年。芬蘭雖割讓了1/10的領土（4萬平方公里），但通過戰爭避免了與其他波羅的海國家一起被併入蘇聯的命運，基本保證了國家主權和獨立。芬蘭只有2.5萬人陣亡，4.3萬人受傷，被俘1千人。

1941年6月部署在蘇德邊境的蘇聯軍事力量的規模和品質都遠遠超過德國：

軍隊數量，蘇軍是德軍的 1.6 倍；軍事裝備的對比：坦克，蘇聯是德國 4 倍，其中有一半坦克的品質與德國最先進的坦克相當；大炮，蘇聯 6 萬門，德國 4.3 萬門；戰機，蘇聯 1.9 萬架，其中起碼有將近 4 千架戰鬥機的性能與當時德國空軍最先進的戰機 M-109 不相上下，而德國用於進攻蘇聯的戰機只有 1830 架，其中先進戰機 M-109 只有 500 架。

史達林之所以調集重兵于蘇德邊境，決不是因為他預見到希特勒隨時可能東進，而是因為他有趁火打劫的盤算。按照史達林的原來估計，希特勒不可能在西線速勝，更大的可能陷於西線泥潭而無力自拔。一旦希特勒陷入西線泥潭，蘇聯就可以借機大舉出兵，將希特勒的東歐變成史達林的東歐，然後再尋找機會佔領西歐。

基於這樣的目的，即便在希特勒迅速拿下法國並開始進攻英國後，史達林仍然不相信希特勒會在沒有打敗英國之前就揮師東進。為此，1941 年 3 月，蘇聯最高統率部制定了西線擴張戰略計畫，明確決定“6 月 12 日開始進攻”德國，但由於準備不夠，只得推遲；5 月 15 日，通過了 7 月開始進攻的計畫。

1941 年 5 月初，史達林嚴格約束國內報紙發出惹惱德國的消息。6 月 14 日，在德國發動進攻前一周，蘇聯官方通訊社塔斯社還向全世界播發了一則政府的聲明，斥責蘇德之間的對抗是謠言，是反蘇反德的宣傳伎倆。在 6 月 21 晚 9 點半，離德國發動進攻 6 小時，莫洛托夫召見德國駐蘇大使舒倫堡，對德軍偵察機頻繁侵入蘇境表示溫和的抗議後，竟低聲下氣地央告舒倫堡說，如果能告訴他造成蘇德關係緊張的原因，他將非常感激。舒倫堡無可奉告，卻在幾小時之後，向他通告了德國政府的長篇聲明：蘇聯“威脅”德國安全，德軍已開始採取“反制”措施。莫洛托夫驚得目瞪口呆。史達林萬萬沒有想到，在德英戰爭毫無進展的情況

下希特勒會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突然發動侵蘇戰爭。所以，在蘇德戰爭開始時，毫無心理準備的史達林顯得手足無措，足足隱居了一周後才在蘇聯媒體發表講話，進行全國戰爭動員。

蘇聯坐視一個個歐洲國家淪陷，對孤軍作戰的英國幸災樂禍，對德國每打一個勝仗都給以祝賀，並源源不斷把大批重要原料送到德國。但希特勒於 1941 年 6 月 22 日進攻蘇聯，邱吉爾當晚就發表支持蘇聯抵抗的廣播講話。德軍“閃電戰”第一天，就摧毀蘇聯飛機 1200 架。德國猛攻蘇聯三周後，蘇聯將近 30 個師實際上已不存在，約有 70 個師損失了 50%以上的人員，大約 3500 架飛機，一半以上的燃料倉庫和彈藥庫被擊毀。整個蘇德戰爭期間，英國不斷給蘇聯以援助，把美國援助英國的大量武器和軍需物質調撥給了蘇聯。

1941 年蘇聯自己生產的高品質航空油只能滿足其需求的 4%，從 1941 年 8 月—1945 年 9 月，蘇聯生產航空汽油所用的高辛烷燃料幾乎全來自美英的援助。西方盟國根據租借法案提供給蘇聯的航空油是蘇聯自己生產的四倍，提供石油 260 萬噸。

在公路運輸方面汽車，美國提供給蘇聯的汽車 409500 輛，是蘇聯戰時總產量的 1.5 倍；提供的摩托車是蘇聯總產量的 1.2 倍；如果再考慮到美國汽車的噸位大、性能優，所起作用就更大。美國還提供給蘇聯的汽車外胎共 5,606,000 件，而且主要是大型汽車的輪胎。英國也提供了 103500 噸橡膠。美英向蘇聯累計提供了運輸車輛 42.7 萬輛，摩托車 3.5 萬輛。蘇聯的軍用車輛有 2/3 來自美國的援助。

在鐵路方面，租借法案也大大幫助了蘇聯戰時的鐵路運輸能力。盟國提供了相當於 62 萬多的鐵軌，占蘇聯鐵軌總產量的 56.5%，即蘇聯戰時鐵路上的一半

鐵軌是由美提供的。美英兩國提供的蒸氣機車是蘇聯總產量的 2.4 倍、電氣機車是 11 倍，車廂是 10.2 倍。

美國為蘇聯提供的有色金屬為：優質銅 387,600 噸，占蘇聯總產量的 82%；優質鋁美國提供 256,400 噸，英國提供 35,400 噸，加拿大提供 36,300 噸，三國相加共 328,100 噸，是蘇聯全部鋁產量的 1.25 倍。這些優質鋁，被蘇聯用於航空業和生產坦克發動機。

美國提供坦克 7057 輛和高射炮 7944 門，英國和加拿大 5480 輛，坦克和裝甲車共計 1.3 萬輛，占蘇聯總產量的 24%。德國士兵在回憶中證明蘇軍擁有大量的美制謝爾曼坦克，某些蘇軍坦克師甚至以謝爾曼坦克為主！

美英提供了電話線 95 萬多英里，海底電纜 2100 英里，無線電臺 5899 台，雷達 348 部。

美國提供 15481 架飛機，英國 3384 架，總計 18,865 架，其中戰鬥機 17000 架，占蘇聯總產量的 30%。1941-1942 年使用的大部分先進戰鬥機來自美英的援助。

美國提供給蘇聯生產槍炮的特種機床和工業設備：金屬切削機床 38100 台，價值 6.07 億美元。儘管蘇聯自己生產的工業設備超過美國提供的 2.5 倍，但美國提供的全是蘇聯無法生產的性能優異且造價昂貴的設備。

美國提供給蘇聯的糧食 450 萬噸；糖 672400 美噸（相當於蘇聯的 610000 噸），占蘇聯總產量的 41.8%；肉罐頭 732595 美噸（相當於蘇聯的 664600 噸），占蘇聯生產的肉罐頭總量的 17%；西方盟國提供的各類罐頭占蘇聯總產量的 108%。沒有美英的糧食，蘇聯在戰爭的第一年就會餓死；沒有美英的被服，蘇聯的冬裝情況也不會比德國好到哪裡去。

朱可夫在談到租借法案時說：“如果從經濟的角度出發，談論我們對戰爭的準備情況，不能隱瞞從盟國一方獲得援助這一因素。……如果沒有美國人的火藥，我們就會處於很艱難的境地，我們不可能生產出戰爭所需的那麼多的彈藥。沒有美國人的‘斯蒂倍克’牌卡車，我們就沒辦法去運輸我們的大炮。它們確實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保證了我們的前線運輸。戰爭各個方面都很需要的特種鋼也是由美國人提供的。”

1963年蘇聯安全部門監聽並錄下了朱可夫的如下談話：“現在大家都說盟國從來沒有幫助過我們……但是要知道，不能否認的是美國人為我們迅速大量生產並供應了許多物質，沒有這些物資我們就不可能組建我們的後備部隊，也不可能把戰爭繼續下去。我們沒有炸藥和火藥。沒有這些東西，步槍就沒有子彈。美國人真誠地給我們迅速生產並提供了多少鋼材啊。如果沒有美國人提供的鋼材，難道我們能很快地生產出坦克嗎？”

西方盟國提供了具有關鍵作用的戰略物資。正如索科洛夫所說：“沒有西方的援助，蘇聯不僅不可能贏得衛國戰爭，而且甚至無法抵擋德國的入侵，也不能生產足夠的武器和技術裝備，也不能保障戰爭所用的燃料和彈藥”。在整個戰爭期間，美國向英、蘇、中提供武器援助總額達 470 億。而它自己對德、日作戰消耗的巨大的經費更達 2940 億美元。

毛澤東在 1949 年的《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公然宣稱：“以蘇聯為主力的反法西斯力量消滅了法西斯國家，結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純粹是為了政治目的而扯謊，無非是想借抬高蘇聯來貶低美國。“以蘇聯為主力的反法西斯力量”至少是最大的笑話之一。

《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是反法西斯？瓜分波蘭、侵略芬蘭、強佔羅馬尼亞的

比薩拉比亞地區是反法西斯？戰爭爆發前夕把德國共產黨員送去給希特勒屠殺，以維護蘇德友誼；想聯合德國一起對付英國也是反法西斯？

甚至在第三帝國進攻蘇聯之後，史達林還在幻想和希特勒議和——根據保加利亞駐蘇聯大使的回憶，史達林甚至想通過他轉告希特勒，蘇聯願意割讓烏克蘭、白俄羅斯、波羅的海諸國的廣闊土地，簽定俄羅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恥辱條約。直到 1944 年史達林還在自言自語“如果我們和德國人聯合起來，世界就是我們的了”。蘇聯這個“反法西斯主力”先是和法西斯勾搭不清，然後被迫和法西斯德國交戰，直到 1945 年 7 月還和法西斯日本保持“互不侵犯條約”。等到兩顆原子彈爆炸、日本大勢已去，8 月 9 日，日本“天皇”下詔無條件投降，當天蘇聯才“緊急‘對日宣戰並斷交，8 月 10 日出兵東北，受降關東軍。

1943 年下半年，德國在東線的兵力只有 280 萬人，在西線留守的兵力倒有 244 萬，如果這 244 萬人全部參與東線戰爭，不知道蘇軍能堅持多久？1943 年底，希特勒簽署了一道命令，決定今後的武器裝備都優先供應西線，這充分證明了當時德國的戰略是更重西線，更害怕美英登陸。1944 年，德國 65% 的空軍都部署在西線，蘇聯才勉強奪取了東線的制空權；在諾曼地登陸之前，德國就有 42% 的陸軍師部署在西線，諾曼地登陸後就更多了。如果沒有美英的牽制，如果沒有第二戰場，可以想像蘇聯的下場如何。

真正摧毀德國戰鬥意志的，不是蘇聯在東線取得的幾個“重大勝利”，而是美英對德國實行的晝夜不停的戰略轟炸，它不僅炸塌了德國人的士氣，也炸癱了德國的軍事工業。是美英派出的遊擊隊炸毀了德國的重水工廠，使它無法生產原子彈；是美英摧毀了德國最重要的魯爾、薩爾工業區，使德國的戰爭機器停止運轉；是美英迫使德國的盟友義大利退出戰爭，在軸心國鏈條上打開了一個缺口。

蘇聯空軍從來沒有足夠實力對德國進行戰略轟炸，蘇聯海軍根本不可能封鎖任何一個德國港口，所有這些經濟戰、士氣戰的任務都是由美英完成的。

直到 1944 年 12 月希特勒仍把美英視為頭號敵人，他把德國最後的裝甲精銳部隊都投入西線的阿登反擊戰，在東線則消極防禦。德國最後組成的一個集團軍群也是用來對付美英的，東線兵力到最後已經寥寥無幾。凡是東線和西線同時遇到危機，德國總是優先支持西線，這樣蘇聯仍付出了艱巨代價才贏得勝利。事實證明，如果沒有美英對蘇聯的援助，沒有美英對德國的戰略轟炸和經濟封鎖，沒有美英開闢的第二戰場，德國的坦克將把蘇聯碾成粉碎。

劉亞洲將軍說：“美國人有著一貫珍惜生命的傳統，而且在歷次戰爭中都是人員傷亡最少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參與了除蘇德戰場外所有重要的戰役，並在決定性戰役中起主導作用，但人員傷亡只有 30 萬，占總傷亡人數的千分之三，……美軍參與了世界上所有的大規模戰爭，從來沒有遭受到比對手更重大的傷亡，而且傷亡越來越少，直至零傷亡”。

二戰期間蘇德的死亡總數為：蘇聯 4344.8 萬人，德國 595 萬人，前者是後者的 9 倍。其中蘇德戰爭期間兩國的人員損失數字對比如下：蘇聯死亡人數為 2640 萬人，被俘人數為 630 萬人，而德國死亡人數 260 萬人，被俘人數 95 萬，前者分別是後者 10 倍和 2.4 倍。

蘇軍的損失大大超過德國，就在於蘇聯搞人海戰術，人海戰術就是逼人送死。史達林下令把監獄裡關的重刑犯人（10~25 年徒刑）全部放出來擔任殘忍的送死隊，把他們送到最危險回不來的地方去打仗送死。史達林發佈的命令中最常見的一句話是：“不惜一切代價”！當時蘇軍中將 C. A. 加里甯曾任某方面軍司令，戰後被判處 25 年徒刑，是因他在日記中提到：最高統率“不保護人力資源，所

以才在個別戰役中造成了很大傷亡”。戰爭期間，許多紅軍士兵解決不了性饑渴的問題。部隊唯一的女性就是護士或者醫生，但除了當官的，士兵如果與護士發生關係或強姦護士是要槍斃的。這些憋得慌的男人，就在戰場上尋找機會。一位女護士剛被打死，大家立刻上去扒掉才犧牲者衣褲，輪流姦淫體溫尚存的屍體……

蘇軍為了向史達林開脫自己對布達佩斯久攻不下的原因(他們先前向史達林解釋說布達佩斯守軍共有 180000 人)，抓了 50000 多名平民作為“戰俘”充數(蘇軍讓匈牙利平民將繳獲的德國軍大衣披在身上，於是這些平民就成了“德國法西斯戰俘”，而真正被俘的德國軍人大部分在被俘後立刻被就地槍決)，其中有 13000 多人再也沒有回到自己的家園。在整個布達佩斯戰役期間，平民(包括猶太人)的總共傷亡損失數字高達 76000 人左右！

蘇聯紅軍在破城之後也對平民實施了殘酷的“報復性”暴行：搶劫、毆打、強姦、蓄意槍殺時有發生。他們還對各境外使團和人士進行了大規模驅逐，1945 年 5 月 24 日由大約 60 名瑞士駐布達佩斯領事館人員起草的調查報告說：“在布達佩斯被圍期間以及隨後悲慘的日子裡，俄國軍隊肆意的掠奪了整個城市，他們幾乎闖進了每一處居民住所——不管主人是個富翁還是個窮人，拿走一切他們想要的東西，尤其是食物、衣物和貴重物品，商店均被數次洗劫，拿不走的傢俱或是類似藝術品的大件物品就任意銷毀，在大部分情況下，房屋在掠奪一空後被付之一炬……俄軍甚至還有專門獵取貴重物品的小分隊，他們使用磁性地雷探測儀和經過訓練的軍犬來搜索金子，銀子和其它金屬物……強姦成為對匈牙利平民最為殘酷的暴行，其規模極為廣泛——從 10 歲至 70 歲的女性幾乎都不能逃脫，不少女性以自殺來擺脫災難……甚至在紀律禁令被頒佈之後，俄國士兵還會不時四

處巡視有女人居住的房屋，然後在晚間對她們施暴，並且毆打任何反抗的人……許多俄國士兵還身患各種疾病，再加上城內藥品已經完全絕跡，都加深了被害者的痛苦……甚至有部分在紅軍或軍警部隊中服役的俄國婦女也犯下強姦罪行，那些沒有順從她們意願的匈牙利男子遭到了她們的毆打……截止到現在（1945年3月底），在布達佩斯地區共有約5000名匈牙利婦女由於強暴行為致死或自殺……布達佩斯城內從2歲至70歲的所有德意志族人被全部運往蘇聯，他們的下場不詳……”

一位當時年僅20歲的匈牙利女孩安多爾·塔巴在日記中寫道：“我們的鄰居，一位懷有5個月身孕的老師，在光天化日下被5個俄國士兵輪姦。這個不幸的女人最後切斷了她的動脈……想保護他們自己妻子的丈夫們，被俄國人象狗一樣打死。在他們眼裡，我們是‘資產階級’，因為我們有舒適的公寓、衣服和浴室，他們甚至喝光了我們的漱口劑，他們蓋上馬桶蓋在上面排便。那時候已經完全斷水，我們只有融化積雪來止渴……2月12日，在德國人突圍的日子，我們不得不在房子裡，2天后我們才能離開房子出來走動。德國人赤條條的屍體佈滿街道，俄國人從屍體上剝掉了一切可用的東西，坦克和卡車毫不減速的從這些屍體上面壓過。我們得走很長一段路去找水，我們已經不再為任何事所驚訝……在一條街上1個大約2米高的蒙古人抓住了我，並且把我拖到一邊。我想他肯定要殺了我，果然，他從背上取下他的槍，但是並沒有向我開槍，而是槍托砸我的頭。我摔倒在地上，但是並沒有暈過去。我開始大喊自己所認識的其他蘇軍士兵的名字——他們在我家門口架了一門高射炮。他們馬上趕來，把那個蒙古人趕走，甚至還向他開了槍，之後他們把我護送回家。我的半邊臉佈滿鮮血，1只眼睛看不見東西，頭骨也碎了。我的母親曾經鼓起勇氣去附近的蘇聯紅軍指揮部投訴，但

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我們之後再也沒有見到那個蒙古人……”

蘇軍在路過南斯拉夫北部時曾強姦當地婦女千余人，其中奸殺 121 起。而史達林面對南共產黨方面的抗議，卻說：“我們的紅軍戰士，為了解放你們南斯拉夫，命都不要了，跟你們的婦女們親熱一下就不行嗎？”蘇聯紅軍由普魯士打到柏林，一路姦淫搶掠，估計有 200 萬名婦女被姦，有些更被輪姦。柏林幾十萬女性居民幾被淫遍，有 13 萬婦女遇害，其中有 1 萬人因不堪打擊自殺。這些遭強姦的、處在生育年齡的女性中，有 11000 人懷了孕；連集中營裡放出來的蘇軍女戰俘也被姦淫；受害人中包括德國前總理科爾的夫人，當年她只有 12 歲和母親同時被紅軍強姦。某鎮婦女被淫後，集體演出“N 女投江”的慘劇來。蘇軍在中國東北也犯下了搶劫和強姦的累累罪行，以至於東北人恨“老毛子”超過恨日本人。

1945 年德國軍人投降美英的，很快就回家了、工作了、發財了；而被蘇軍俘虜的幾十萬德國戰俘被押送到西伯利亞，後來活著回去的只有幾千人，大多凍餓累死了……

史達林驅使蘇聯勞改營裡的囚犯上前線作戰，戰後又把倖存者投入黑牢，哪怕是立下累累戰功者也不寬恕；把盟軍解放並送回來的全部被俘蘇軍官兵和蘇聯間諜（例如著名的“紅色樂隊”領導人）統統投入監牢……

二戰後，波蘭 20 萬平方公里的領土、羅馬尼亞 5 萬 2 千平方公里的領土、斯洛伐克 1 萬 3 千平方公里的領土都被併入了蘇聯。

1948 年 2 月底，蘇聯突然中斷與南斯拉夫的貿易談判，3 月中旬又宣佈撤走全部駐南軍事顧問和文職專家。對此單方面行動感到不解的南共中央就此致信聯共（布）中央，要求解釋原因。3 月 27 日，聯共（布）中央發出由史達林和莫

洛托夫署名的回信，指責南共領導人有“反蘇”情緒，散佈“反蘇”言論，詆毀蘇軍名譽，還指責南共的國內政策不貫徹階級鬥爭原則，助長資本主義因素，並說南共的一些領導人是“可疑的馬克思主義者”。

6月下旬，情報局在布加勒斯特召開會議，組織對南共領導的集體批判。在南共拒絕出席的情況下，情報局通過決議，指責南共已蛻化成“富農黨”，並將南共開除出情報局。

7月下旬，南共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會議通過的決議堅決拒絕情報局的指控，並表達了對黨的路線的肯定和對黨中央領導的信任。

1949年，在蘇聯策動下，追隨蘇聯的東歐各國先後中斷了與南斯拉夫的貿易關係，蘇聯等國還在與南接壤地區部署重兵，對南進行軍事威脅。11月，情報局會議通過決議，攻擊鐵托等南共領導人是“帝國主義的間諜”，還鼓動南斯拉夫人民推翻南共領導。

史達林立即在蘇東發起了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的運動，東歐各國共產黨慘遭清洗，有237.5萬人被處決。其中，波蘭黨員從140萬減為110萬，捷共從200萬減為140萬，匈共從120萬減為85萬，保共從50萬減為30萬，羅共從100萬減為60萬。

第十三章 赤禍東延

第83節 俄羅斯禍中華

1689年9月7日在俄寇兵威下，訂下尼布楚條約，兩國國界是“西起基爾比西河沿外興安嶺經烏都斯加入海”，我們鮮卑和蒙古同胞牧獵之鄉，820多萬平方公里的“西伯利亞”被俄帝奪去了，興安嶺及額爾古那河以西約25萬平方

公里國土，於條約簽訂後喪失了。

1727 年 10 月貝加爾湖之南約 10 萬平方公里國土，被簽訂恰克圖條約而喪失。

1790 年，約 10 萬平方公里的庫葉島，被俄帝暗中吞併。庫頁島上的住民是鮮卑族中的赫哲人，他們的生活很苦，在明朝時人們就叫他們為“苦夷”，把島子叫做“苦夷島”，後來才音變為“庫頁島”。據聖武記，在 1616 年滿清就曾派兵四百到島上巡邊，因無外力威脅而撤回。俄帝自十八世紀便偷偷派遠征隊(由兵和囚犯組成)襲上庫島北端，殺散了赫哲同胞，修起營舍並開採煤礦，打下了侵佔全島的基礎。1789 年赫哲人被逼回了大陸。

1840 年原為我屬邦哈薩克，被俄帝侵並，該邦面積約 100 萬平方公里。

1840 年原為我屬邦布魯特，約 10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被俄帝併吞。

1858 年 5 月 28 日(咸豐 8 年)，混同江以西、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廣大地區，面積約 46 萬平方公里土地為俄帝侵佔，並逼清廷簽訂璦琿條約加以承認。

1860 年 11 月 14 日(咸豐 10 年)，混同江及烏蘇里江以東興凱湖附近，約 43 萬平方公里國土為俄帝侵佔，事後逼清廷訂北京條約加以承認。

1864 年(同治 3 年)後，自沙濱達巴哈起，至蔥嶺止約 43 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俄帝逼清廷訂立塔城界約等多次界約，加以承認。

1868 年(同治 7 年)，約 100 平方公里面積之我屬邦布哈爾汗國，被俄帝侵並。

1876 年原為我屬邦浩罕國，約 35 萬平方公里面積土地，被俄帝吞併。

1881 年(光緒 7 年)，自伊犁西南天山之陰，那抹哈勒克山口起至伊犁西北

喀爾達止，約 2 萬平方公里國土，俄帝逼清廷訂立伊犁條約而喪失。

1883 年(光緒 9 年)，額爾齊思河及齋桑泊附近，約 2 萬平方公里土地，於俄帝逼訂科布多塔爾巴哈台界約而喪失。

1895 年新疆省極西地區帕米爾高原約 1 萬餘平方公里土地，被俄帝與英國瓜分。

在中國歷史上，最早出現的親俄派是李鴻章。甲午戰爭中國戰敗，俄國打著“援華反日”的旗號拉攏李鴻章。1896 年乘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之際，千方百計把李鴻章“圈”到俄國，然後使用金錢賄賂等卑鄙無恥的手段，迫使李鴻章簽訂“中俄密約”，取得了在中國東北修築鐵路的權利。這個所謂的築路權，實際上是允許俄國以修路名義佔領中東路兩側。俄國乘機在鐵路沿線（鐵路 1903 年建成，全長 4607 裡）駐軍隊，設員警，對附近的採伐、礦山各專案徵稅等，儼然“國中之國”。俄國能輕易地經由鐵路控制東北、滲透華北。

1898 年(光緒 24 年)，俄帝強租旅順大連，該兩港口面積約三千八百平方公里。

海蘭泡又名黃河屯，位於精奇裡江（結雅河）與黑龍江交匯處，本為中國領土。1858 年訂的《璦琿條約》，俄人攫得黑龍江以北土地，此地被俄國改名為布拉戈維申斯克，但條約規定原居住之中國人仍准安居樂業。1900 年，中國人仍占全城居民之大半。當沙皇下令入侵犯中國後，阿莫爾軍區司令即公開號召俄軍要堅決迅速地消滅俄境之中國人。沙俄進行了三次大屠殺，被殺者在六、七千人以上，會游水過江倖免於難者不足百人。

江東六十四屯，面積約八千多平方公里，位於精奇裡河以南，黑龍江東岸，與黑龍江城（璦琿城，今黑河市愛輝鄉）隔江相對，是中國人早已墾出的沃土，

曾有六十四個村屯。據《璦琿條約》與《北京條約》規定，此地雖劃歸俄國，但中國人有永久居留權，清政府對此地有收稅、行政管理的管轄權。那裡的住民是不肯附俄的山東義民，並規定“俄羅斯人不得侵犯”。1900年7月24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親率17萬大軍將江東六十四屯圍住，把16萬多居民奸的奸、殺的殺了；最後把剩下的男子集中在黑龍江邊，用子彈逼入江中，一一射殺或溺斃，偌大的黑龍江竟一時為之染紅！

沙俄於1900年8月1日渡黑龍江，攻佔黑河屯（今黑河市），將屯中未及逃走之居民全部殺戮，全城付之一炬。五日，在激戰中奪下璦琿城，中國軍民全部遇難，侵略者放火焚城，火光燭天，數日不熄，具有二百多年歷史的璦琿城，變成了一片灰燼和瓦礫場。史載，老毛子此時對中國人殺紅了眼，在尼布楚、伯力、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屠殺“中國居民不下二十余萬，璦琿失後，殺戮尤慘”。

八國聯軍逼迫中國清朝政府簽訂不平等的《辛丑合約》。在這份條約中，俄國從中國敲詐最大的一筆賠款，近總賠款的1/3，本息達3萬萬兩白銀，比任何其它國家勒索的都多。各國在從中國敲詐一筆後，都陸續從中國撤軍。惟獨俄羅斯的17萬軍隊繼續霸佔中國東北不撤，並在東北搜刮搶掠，作惡多端。招來日本與俄國1905在中國領土上大打惡戰，給中國造成無限破壞和損失。俄羅斯慘敗，吐出南滿地區，退到北滿；日本佔據南滿。但俄國仍然加緊在北滿從事侵略，並進而把魔爪伸進外蒙古；直到在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打死之前，俄國對外蒙古的瘋狂侵略都一直沒有停止過。

俄帝侵佔我國領土，至1945年止，共有588萬3千8百平方公里，占我全國陸地面積1/3。俄國人就靠著那麼幾千個哥薩克，用了幾百年的時間佔據了世

界上自然資源最豐富的地區。俄國在歐洲的擴張是政府行為，而在亞洲早期的擴張多半是民間行為。對北亞的征服，俄國的民間力量出了大力。對外擴張，已成為俄羅斯民族性格的一個重要特徵。

蔣經國說：“俄人用武力來侵擾我們的邊境，自滿清入關以後，就開始了；直至民國三十六年伊寧事件為止，不知若干次。因為，軍事的侵略，是公開的劫掠，眾目睽睽，沒有人不知道是強盜行為；只要稍微涉獵中、俄關係歷史的人，都會明白，用不著詳細加以解說。我們統計，自一六四四年起，到大陸淪陷為止，俄國掠奪我們邊疆的土地，先後共有五十四次之多。中國領土被占的面積，包括外蒙古在內，共有六百五十七萬八千八百二十平方公里，約為我原有領土的三分之一；而與我們現有領土一千二百萬平方公里比較，則已有一半的土地被俄國佔領去了。這樣大的仇恨，我們是永遠忘不了的！”

第 84 節 蘇共生下中共

列寧寫於 1916 年上半年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說，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階段，才是帝國主義；沙皇時期尚是農奴社會，不是資本主義，因此就不是帝國主義。沙皇時期的對外侵略不是帝國主義行為，即將成立的蘇俄是“社會主義”，自然也不是帝國主義。因此，蘇聯的對外“輸出革命”不是帝國主義侵略；而是“解放全人類”。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另一個用意，就是把被壓迫、被侵略國家求解放的鬥爭目標，一股腦都引向他所說的“帝國主義”，即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

1918 年 11 月，史達林在《不要忘記東方》的文章中指出：“共產主義的任務就是打破東方各被壓迫民族成百年的沉睡，以解放的革命精神來感染這些國家的工人農民，掀起他們來和帝國主義作鬥爭……不這樣作，就休想社會主義底最

終勝利，休想對於帝國主義的完全勝利。”1920年，列寧在《巴庫宣言》中說：

“只有八億亞洲人民堅固地和我們站在一起的時候，只有非洲人民和我們攜手的時候，只有全世界無數人民準備接受共產主義的時候，才能燃起世界大火，……到歐洲之路是通過亞洲（中國和印度），北京是去巴黎的大門。”列寧把征服東方當做征服西方的橋樑。

1918年7月4日，蘇俄外交部長齊采林在蘇維埃第五次會議上說：“蘇俄政府將撤銷沙皇政府對中國東北的各種壓迫及其在中國和蒙古的治外法權，放棄沙皇政府以各種口實對中國人民所加的負擔，撤回沙皇政府在中國的領事館所設的武裝部隊，並將中國的各種賠款中的對俄國賠款部分交還中國。”

1919年7月25日，正當北京學生與全國人民憤怒抗議日本21條企圖鯨吞中國而列強裝聾作啞之時，蘇俄代理外交部長加拉罕發表對華宣言說：“凡從前俄羅斯帝國政府時代，在中國滿洲以及別處用侵略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棄；在那塊土地上的人民，願意建成哪樣的國，採取哪樣的政體，一任人民自由選擇，勞農政府把中東鐵路以及礦產林業等權利，及其它由俄羅斯帝國政府、克倫斯基政府、土匪霍爾瓦特、謝米諾夫和俄國軍人律師資本家所取得的特權，都返給中國，不收報酬，勞農政府拋棄庚子賠款以及租借地等。”這一宣告一直到1920年3月才到達北京，而且北洋政府還稱之為誤傳而拒絕與蘇俄政府談判。

1920年9月加拉罕又發表第二次宣言說：“為了發展前次宣言的原則，俄國勞農政府宣明所有昔日俄國各前政府與中國所定各條約為無效。放棄中國領土之侵佔及在中國境內各租界，並將以前俄國帝國政府及中級社會人士所掠奪者，俱以無報酬永久還付中國”。

這些報告和宣言，雖是虛晃一招，但在當時中國，引起了反響。一部分人認

為蘇俄確與沙俄不同。一些人遂對蘇俄仰望、羨慕、讚美不已。史達林掌權後，先是否認“對華宣言”的存在，繼而殺人滅口，將簽署此宣言的加拉罕作為“叛國犯”槍決，有很多人也被牽連。

1917年2月俄國共產黨在哈爾濱建立了蘇維埃式的政權，即哈爾濱兵工會。俄文就是哈爾濱蘇維埃，其領導人是紐金和斯拉文。列寧為此簽署了電報“以工農政府名義命令奪取政權並派員赴滿洲里、綏芬河、哈巴羅夫斯克海關”。十月革命後，俄國人沿中東鐵路建立軍事和經濟勢力，還建立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工會、童子軍等共產週邊組織。這個在中國領土上建立的蘇俄政權，後來被吉林督軍孟恩遠調兵強行解散。

1919年3月2~6日，列寧在莫斯科召開了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了“共產國際”，也稱第三國際。它被定為世界各國共產黨的聯合組織，也是世界各國共產黨的上級領導組織，對各國共產黨實行高度統一的領導，各國共產黨是它的下級組織。蘇聯通過把從戰場抓來的戰俘培訓為共產主義後，再把他們遣送回國，以便傳播列寧主義。

由於蘇聯的擴張轉向東方，就立即派出了重要幹部到中國宣傳馬列主義，和組織為蘇聯利益服務的政黨。現在公佈的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檔案表明，籌組中國共產黨，是由蘇聯共產黨直接派人進行的。1919年6月，華裔俄共黨員楊明齋參加在海參威的俄共遠東地區委員會的工作。1920年6月在莫斯科召集所謂“中國工人第三屆代表大會”，蘇俄人民委員加里甯、齊采林出席並祝賀，公開地指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會與蘇俄密切地同盟”。

1920年6月25日成立“俄國共產黨華員局”，為俄共領導華僑中俄共黨員的中央機構，以使用華僑中的俄共黨員向中國滲透。1920年7月19日至8月7

日，由列寧主持，舉行共產國際二大。選荷蘭人馬林、印度人羅易為“民族和殖民地委員會”的秘書和委員。

1920年3月批准建立“俄共（布）遠東局”，在海參威成立“俄共（布）海參威分局”，任命維經斯基為分局負責人，專門從事對中國的工作。維經斯基由旅俄華僑楊明齋的介紹與陳獨秀李大釗結識，提出立即組織“中國共產黨”，俄共曾派遣特使帶上價值10萬美元的鑽石到上海去賣，並不止一次地托人帶錢或匯款給維經斯基。旋於1920年5月在上海策動並資助成立“馬克斯主義研究會”；8月，決定成立中國共產黨，並設臨時中央於上海法租界環龍路漁陽裡二號。發起者七人：陳獨秀、戴季陶（當即脫離）、沈玄盧（後脫離）、陳望道（當即脫離）、李漢俊（後脫離）、施存統、俞秀松。會中通過了黨綱，並推陳獨秀任書記，並推定楊明齋在上海組設俄文學校招收青年，選派赴蘇俄東方大學學習。

1921年1月，在伊爾庫茨克成立“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設有中國部、朝鮮部、日本部、蒙藏部；還設有情報部。旋又設立東方大學和勞工大學，專門培植遠東共產黨幹部。

1921年6月，張太雷抵達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向共產國際表明，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一個支部。第三國際特派馬林於民國十年春來華，並撥款給“中共”活動。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馬林資助指導下舉行於上海。馬林給“一大”每位代表150元現大洋。先發100元，臨回去時，再發50元。當時一小職員每月工資15元，就可維持四口之家一個月的生活。當時的150元現大洋，可以供應一個學生吃50個月的伙食。曹錕賄選，向豬仔議員買一張選票，就用5

千元大洋。俄國人僅只用 150 元，就贏得了“一大”代表。俄國人這小小的投資，是最划算的“生意”。

馬林從此便留在中國，開始直接領導中共，直至 1922 年 3 月他被第三國際召回。在此期間，馬林不僅要審查中共的建黨工作報告、組織發展計畫和活動經費預算，並且申明“共產國際有幫助各國共產黨的義務，全部經費應由共產國際支付”，同時發放了第一批中共職業革命家津貼。這表明中共在建黨之初就服從蘇俄的直接領導和指揮。自中共成立後，一直有代表常駐蘇聯；蘇聯也一直有代表常駐中共黨內，出謀劃策、互通資訊、不斷指揮。

“一大”決定了政綱並推定陳獨秀、周佛海為正副委員長，決定所有一切檔自即日起不書中華民國年號，只書西曆；並規定每月向第三國際呈送報告一份；必要時應派代表去伊爾庫茨克遠東書記處，與遠東各國共產黨代表，商討聯合階級鬥爭之事。

邪教從開張的第一天起就在騙人！一大黨章只有俄文本，沒有中文本！那是俄國主子編出來，令中國奴才遵照執行。假如今天也有幾個洋奴在一外國特務操縱下成立一個黨，這黨絕對服從外國黨的指令，靠洋主子的資助活命，目的是推翻當局；定被當作賣國賊槍斃！

中共“一大”宣稱：要讓蒙古、新疆、西藏自治，要將它們劃入“某個民主聯邦”。就是說，中共建黨之初，就要將中國的蒙、藏、疆等奉送給蘇聯！

一群中國人，參加洋鬼子策劃的漢奸賣國賊組織——共產國際遠東辦事處中國支部，它的綱領規定了服從共產國際領導的內容。古往今來的漢奸們還不曾如此明目張膽過。

陳獨秀在獄中對人透露：“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據他說全部代表為十三人)，

我因事沒參加。叫我當上總書記，是第三國際根據列寧的意見，派一個叫維經斯基的到中國來轉達的。說是“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走上政治舞臺，黨的總書記一職，要找一個有名望的人，號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文若：陳獨秀的獄中生活，1989年11月21日世界日報）。

據包惠僧說：在廣州，“有一天，陳獨秀召集我們在譚植棠家會見尼柯爾斯基，說接到上海李漢俊的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了兩個代表到上海，要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請廣州派兩個人出席，還寄來2百元路費”。

據1992年中共黨史出版社所編的《中國工會史》，當時產業工人不過兩、三百萬人，僅占全中國人口的百分之零點四左右。包惠僧說得清清楚楚，是共產國際派人來主導成立共產黨；與中國工人階級沒有直接關係。在“一大”的代表中，一個工人階級的代表也沒有。

據中共創黨人之一的周佛海回憶：“當時共產黨經費，是盧布所換的鈔票。當時陳獨秀被推為委員長，尚在廣東，由周佛海以副委員長代行職權。馬林每月給生活費八十元，尚略有活動費。九月中旬，陳獨秀返滬，與馬林大鬧意見，不與見面，因馬林謂：一年來第三國際在中國用款二十餘萬，而成績如此，責中國同志太不努力，而獨秀則謂：中國所用不多，一半被第三國際代表任意揮霍享受用去。在佛海代委員長不足兩月期間，確經手用去一萬二千元，而張國燾所組織之“勞動組合書記部”經費，直接經領，尚不在內。

中國共產黨由1921年10月到1922年6月，從共產國際收到16655元。1922年9月召開的二次宣稱：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陳獨秀在1923年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公開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得到的；一年

來，共產國際在中國用款 20 余萬大洋；每月共產國際給費用平均在 2 萬元左右。

“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指：1923 年頭 8 個月）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一萬五千，其中有一千六百用在這次代表大會上”（《中共中央檔選集》第一卷 p47、p168，中共中央出版社 1989 年）。沒有蘇聯給錢，中共不僅不能活動，連代表大會也開不成。

現在解密的蘇共中央委員會的檔案中，給中共錢的地方很多：“第五十四號文件：1923 年中國共產黨費用預算（1922 年 12 月，莫斯科，絕密）。項目：支持《嚮導》週報，每月費用，二百金盧布；……中央委員會兩名委員旅差費，一百金盧布；總計每月一千金盧布，總計每年一萬二千金盧布。”再如“第七十九號文件：維傑裡致魏金斯基的信（1923 年 7 月 26 日，上海）……5 月我通過北京收到三千五百美元和二百七十八英鎊，其中二百七十八英鎊是用於紅色工會國際工作的；撫恤罷工受難的中國工人——一千美元；給中國共產黨 4—6 月的預算——一千五百美元；召開代表大會——一千美元。所有的錢都已轉撥到位並按規定予以使用。據我收到陳獨秀同志信知，7—9 月預算款，現在十分需要。”那時候，中共黨員人數很少，平均的費用是很高的。

1923 年鮑羅廷到廣州，帶來了蘇俄的盧布和軍火，促成共產黨找到了合法發展的地盤。國民黨北伐的 7 個軍是用蘇聯支援的 12 萬條槍和每個月 30 萬銀元武裝的。

1924 年，中共實得蘇聯提供日常活動經費約 36000 元。1925 年每月平均約領 3300 元；1925 年 1 月中共在上海舉行第四次代表大會，全部黨員 994 人。1925 年中共領袖李大釗又在莫斯科代表中國共產黨公然贊成外蒙古獨立，並贊成蘇聯在外蒙古駐兵。1926 年，每月得到的活動經費已超過 1 萬元。1927 年，每月僅

日常活動費就達 3 萬元以上；另外，組織上海三次工人起義用款 3 萬元；黨校開辦費 5 萬元，每月開支 1.5 萬元；12 月為廣州起義和善後用款近 10 萬元。這些費用都是莫斯科供給。

1924 年 5 月，黃埔軍校建立。當時廖仲凱引進了大批的俄國軍事顧問，共產國際強行派一批共產黨人擔任學校的重要職務，如政治部代理主任包惠僧、教授部副主任葉劍英、政治教官鄆代英、高語罕等。周恩來帶著共產國際首腦季米特洛夫的親筆介紹信回國後，年紀輕輕便擔任了黃埔軍校軍法處長，後為政治部主任，同時又在軍校學生中組織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出版地下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反對三民主義，造成軍校中另一派學生組織“孫文主義學會”，為此後國民革命軍內部的對抗和部分軍人的叛亂，埋下了重重危機。此外，中共蒙蔽孫中山，以孫同意建立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隊為名，抽調黃埔軍校中共黨員為骨幹，建成了一個兩千人的獨立團，獲蘇聯裝備最精良武器，任命共產黨員葉挺為團長，逐級設立共產黨組織，直接接受中共廣東區委領導。它是中共南昌暴動的“家底”，是後來張發奎等人不斷製造兩廣叛亂和叛變的軍事基礎。

共產黨積極發展，逐步取得一定的軍事力量，控制了某些軍團的兵力，急不可待的要自立為王。用共產黨自己的話說就是“取得革命的領導權”。1927 年 3 月 24 日，在北伐軍剛剛攻佔南京之後，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和第六軍中共產黨身份的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等，又指使共產黨身份的士兵發動南京事變，劫殺外國人，企圖挑起列強反對中國的北伐。

1927 年 4 月，共產國際迅速指揮中共，開展武裝鬥爭。要中共在“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領導下，展開農民革命。1927 年 7~9 月，當毛搞湖南農運和秋收

起義時，獲得蘇聯經費 6 萬元，占 1927 年中共獲得“特別費”的 1/4。秋收起義是“與國外敵對勢力勾結、顛覆政府、分裂國家的反革命行為”。布哈林在共產國際大會上，高度評價並發行毛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此乃中共受此殊榮第一人。

1991 年蘇聯解體後，原蘇共中央檔案解密。從 1923 年到 1927 年的 5 年中，蘇共中央政治局為討論中國革命問題開過 122 次會，作出過 738 個決議，平均下來一年是 147.6 個會議，也即平均兩天半一個。這麼大量的決議、指示像雪片似的從莫斯科飛來，有的是直接給中共中央的，有的是通過共產國際的代表來指導中共中央的。大事如孫中山在世時為實現國共合作，要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小事如蔣介石執掌國民黨大權以後，什麼時候派什麼人去找蔣介石談話，談話要注意什麼等，都有指示。共產國際代表派出周恩來去南昌領導武裝起義，莫斯科卻發來由史達林親自決定，由布哈林簽名的阻止武裝起義的電報。

1927 年 8 月 1 日，在共產國際的直接策劃、指揮下中共發動南昌武裝暴動。7 月下旬，政府軍張發奎率第二方面軍進駐江西，共產黨密派周恩來、張國燾、瞿秋白、李立三等人混進南昌。他們鼓動第二十軍軍長賀龍，及第十一軍第二十師師長葉挺，還有南昌市公安局局長朱德等人，於 1927 年 7 月 31 日深夜暴動。這就是“八一”起義。8 月 4 日國民革命軍包圍了暴動軍。5 日暴動軍突圍到江西南部，於 9 月抵達廣東汕頭，後在潮汕被國軍擊潰。葉挺、賀龍余部由朱德率領向滇軍范石曾部投降；後來朱德再叛滇軍，搞了廣東起義後，跑到廣南一帶流浪。南昌起義時賀龍還不是黨員，他打響武裝起義的第一槍。起義失敗後，賀龍隻身回到老家（湘西桑植）重又拉起一支隊伍，這便是後來的紅二方面軍。他絕對想不到：自己出生入死為“革命”，幾十年後卻被毛澤東生生折磨致死，臨死

前連喝一口水都不可得！在 1927 年 8 月至 1928 年，中共發動了一百多次武裝暴動。

自南昌暴動後，中共就在中華大地掀起了最殘酷的武裝鬥爭，大打“內戰”。這場延續數十年的“內戰”，根本不是中國人內部不同政治派別間的戰爭，而是由俄國人指揮的，並且是由俄國人供應經費和武器，用中國人打中國人的一場戰爭。把這場戰爭，說成是中國的“內戰”，是不準確的。俄國人挑動、支持一部分中國人替俄國人去打中國人。這才是實質。俄國人自己坐山觀虎鬥。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1928 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代表全部黨員 3 萬人，大會發表莫斯科宣言稱：“如果不承認民族的分離權和自決權，中國是無法統一的……”；“六大”通過的黨章，有 12 處規定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領導與被領導關係。

中共從一大到六大制定的六部黨章，都是在共產國際直接指導幫助下制定的。1945 年七大制定的黨章，則是在 1943 年共產國際解散後由中共獨自制訂的。連黨章要到“七大”才能獨立自主制訂，這是哪個國家的黨？何止是照搬外國，根本是唯命是從，成了外國勢力的基層組織。在中國成立的共產黨，就是蘇共在中國產下的“怪胎”，是蘇共的“兒子黨”。

中共“六大”以後，直至中共中央撤入江西“蘇區”為止，僅蘇俄給予中共的日常開支，每年均已達 60 萬元以上。1928 年底中共中央向莫斯科提出的 1929 年預算，僅特別費一項，就要求 1 百萬；1929 年每月僅活動費約 4 萬元；1930 年，黨活動費每月約 5 萬元；全年濟難費 11.4 萬元；全年團費 7 萬元等；1931 年，每月美金 1.5 萬元，中國元五六萬元（楊奎松《走向破裂——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p187-189，三聯書店 1999 年，香港）。

陳獨秀認為成立中國共產黨是“歷史的誤會”。他認為當時中國患“貧”，而不是患“不均”；中國無產“可共”。如要實行共產主義，必先實行資本主義。他認為十月革命“走在歷史的前面，背離歷史的軌道”（石灰：“歷史的誤會” 1991年9月8日《世界日報》）。

參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周佛海 1941 年回憶說：“現在回顧起來，真如做夢一樣。萬萬想不到我們幾個年輕的學生，會鬧出這樣的大亂子。二十年來，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燒了多少村莊，損失多少元氣，都是我們幾個青年學生種下的禍根。我現在想起來，真對不住國家、對不住人民。國家弄到現在這樣危險惡劣的情形，我們不能單責軍閥和官僚，當時在嘉興南湖的小船中的幾個青年，也要負很大的責任”（葉永烈《中共之初》430 頁）。

1923 年 8 月，蔣中正到莫斯科經過四個月的考察之後，回國時便秘密向總理報告：第一、蘇俄的共產主義實行起來，一定要危害人類；第二、今日的“朋友”蘇俄，正是我們未來的最大“敵人”。蔣中正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指出：“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的產物，乃是蘇俄共產帝國的螟蛉。蘇俄的共產主義不適用於人類的生存，更不適用於中國的氣候。”

1926 年以章太炎、馮自由為首的“反赤救國大聯合會”就致電蘇俄駐北京大使加拉罕，抗議加拉罕在中國宣傳赤化，“煽惑無知之青年，啖以金錢，授以利器，為虎作倀”（1926 年 5 月 6 日《申報》），章太炎說：“現在的共黨，我們可以直稱它俄黨，借著俄人的勢力，壓迫我們中華民族，這是一件很可恥辱的事。我們應當反對借俄人勢力壓迫中華民族的共黨”（1925 年《醒獅週報》第 58 號）。

1927 年 4 月 6 日，張作霖在北京搜查了蘇俄大使館；發現了蘇聯共產黨打

電報給當時革命政府顧問的鮑羅廷說：“我們的人幫助南方軍隊北伐，但卻不能讓南方軍隊佔領全國；我們的目的，是要用這一個軍事行動，來牽制其它帝國主義的力量，使他們不能從東方來打蘇聯”。這就是蘇聯“同情”中國革命和“援助弱小民族自決”的鐵證！

中共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做俄國人工具，為俄國人服務的奴才史。中共是蘇俄扶植成立的侵華工具；是大量出賣中國領土和主權的政黨；是一個毀國害民的黨。它謀財害命，占山為王；清除異己，血洗域疆；濫殺無辜，雞犬不鳴；私相授受，坐地分贓。

英國人用鴉片進行侵華，受到中國人的抵制。日本人明火執仗，用飛機大炮侵華，遭到中國人的抵抗。俄國人從政治侵略入手，麻痺中國人民的思想，使中國人從思想上被俘虜。這種馬克思主義政治鴉片，可比英國的真鴉片要高明無數倍啊！

第 85 節 反智主義的興起

反智論或者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按余英時的說法，是一種反對理性智慧和知識份子的態度和現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共產黨國家反對知識份子、進行殘酷的階級鬥爭的理論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承認非物資生產部門的勞動創造價值；說什麼商業職工、銀行職工不創造價值，是挪用了物質生產部門的工人所創造的價值，更不承認教師、律師等知識勞動創造價值了，說地租、利息是剝削收入。這樣，地主、資本家與店員、知識份子就成了寄生蟲和半寄生蟲，屬於被消滅被打擊之列；知識份子就難逃厄運了。

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政權必然是反智主義政權。它用統一的思想、統一的意志、統一的步伐來籠罩一個國家。知識份子是最有懷疑精神的人，必定被共產

黨人視為敵人。

1919年列寧給高爾基寫信談到：俄國知識份子只不過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人，是一些自命不凡的資本走狗。實際上他們絕不是什麼非凡的人物，而是些臭……”（《列寧全集》俄文版第5版第51卷第48頁）。1919年下半年中國的《平民教育》上發表了署名為“德”的文章說，“念書人是什麼東西，還不是‘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無用而又不安生的社會的蠹民嗎？……看看那些大睜著眼不識字底的可憐底平民，卻實實在在我們的衣食生命都在他們掌握之中。他們才是真正的中國人，真正的社會的分子”。

1920年“五一節”，陳獨秀對碼頭工人演說道，“我以為只有做工的才最有用最貴重！”他呼籲人們拋棄中國傳統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觀念，“要求做工的勞力者管理政治、軍事、產業，居於治人的地位；要求那不做工的勞心者居於治於人的地位”。文革就是這麼幹！可見，馬克思的經濟學及共產主義理論是文革的根源。

中共“一大”會議討論中，劉仁靜表示：知識份子都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一般應拒絕其入黨；他認為既然無產階級要和資產階級劃清界限，因而也要和整個知識份子劃清界限。一年後，中共“二大”決議中，仍然把知識份子排斥在黨的工作範圍和群眾基礎之外，宣稱“我們共產黨，不是‘知識者所組織的馬克思學會’，……我們不必到大學校、到研究會、到圖書館，……要‘到群眾中去’，要組成一個大的‘群眾黨’”。

更有甚者，濫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而將知識份子列入紳商剝削階級，主張消滅知識份子以解決階級不平等問題：“我們與其急急於倒強權，倒私有制，不如急急於化除知識階級。如果世界上各個人的知識都在一個平面上，那其它階級問

題，不待解決就自然解決了。”

1925年10月中央規定勞動者三個月、知識份子六個月的入黨候補期。

1925年12月《革命》半月刊發表了國民黨宣傳部代部長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把知識份子分為三類：一類是“反動知識階級”，包括一部分留學生和一部分大專院校教授和學生，屬於大資產階級，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乃極端的反革命派。第二類是多數高等知識份子，包括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大部分大專院校的教授和學生、律師等都屬於中產階級，其右翼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以當作我們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易與敵人妥協，全體看來是半反革命。第三類是“小知識份子”，包括中學生、中小學教員，屬於小資產階級，是我們的朋友”。從中可以看出，知識層次越高的人，毛越不信任，即使是知識層次最低的“小知識份子”，充其量也只是“朋友”而已。該文發表後，致使1926年部份北伐軍提出了“打倒知識階級”的口號，引起知識界的恐慌，紛紛著文質疑批駁。

早在大革命時期，就有不少讀書人遭到迫害，著名學者葉德輝就是被農民殺害的。1928年中共“六大”以後，黨從組織上全面貫徹階級路線，推行領導幹部工農化，將知識份子歸為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從根本上質疑知識份子幹部的忠誠度。

1928年9月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的以清除“投機分子”為目標的“洗黨”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早的一次整黨運動，它創造了將整黨與肅反相結合、以黨內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識份子為清洗物件的整黨肅反模式的最初形態。據記載，清洗物件除了叛變、投降國民黨者外，主要為知識份子黨員：“凡是農民黨員都發了黨員證，知識份子入黨不發（須上級批准）”。凡有親戚在國民黨反動派辦事

的、當兵的、不服從指揮的、不願幹革命的、社會關係不好的，就儘量洗刷。洗刷的黨員不宣佈也不通知，開會不叫他參加，重新立過黨員花名冊。對犯錯誤的黨員有幾種處分：警告、留黨察看、開除黨籍。到了 1930 年代“蘇區”，蔑視甚或仇視知識與知識份子，則成了公開的政策。當年邊區特委開會，與會人員都要胸前佩戴一個紅布條，寫明自己的出身。陳正人因為讀了兩年師範，實際連初中還沒畢業，也算知識份子，當選特委書記就炸了鍋，“不行，不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一個知識份子怎麼能當書記？重選，重選”，最後讓曾做過印刷工人的譚震林當上了書記。在整“AB 團”運動中，“凡是字寫得好的人，講話有條理的人”，都被當作“AB 團”給殺掉。半個多世紀以後，康克清曾這樣對黨史研究者說：“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鋼筆，就被認為是知識份子，就有遭迫害的可能。如果戴上一副眼鏡，那就更糟”（《文獻與研究》1984 年第 1 期）。

1930 年代，張國燾在川陝根據地實行愚民政策。他在許多會上再三強調：“工農幹部在工作中犯了錯誤，黨可以原諒三分，假如是知識份子犯了同樣的錯誤，就應當加重三分，這是很正當的辦法。”他的這種觀點很容易被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工農幹部們所接受，以致於在整個蘇區中一度造成了極端反知識份子的傾向。他甚至提出：“知識份子必然是地主富農，地主富農必然是國民黨，國民黨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殺。”當時，紅四方面軍仇視與亂殺知識份子的情形最為嚴重。只要你胸前插上一支鋼筆，就被視為知識份子，就有遭到迫害的可能。如果帶上一個眼鏡，那就更糟。其後果是，1937 年進入延安中央黨校的原四方面軍幹部中，許多人明明識字卻硬裝文盲，惟恐因識字而遭清洗。

一位逃出湘鄂西肅反大屠殺的“改組派”紅軍老戰士晚年自述：“當時，凡是稍有點文化的同志，大都被肅反委員會定成了‘改組派’。像我們這些大老粗，

當時還為自己不識字而感到慶倖”。這種工農幹部仇視知識份子幹部的現象，在一些偏遠的根據地，一直延續到 40 年代末。1949 年底，在海南的瓊崖根據地舉發過一宗“特務案”。投奔根據地的林雲之向上級建議：“隊伍中不要說粗話髒話，要組織學文化學理論，要搞讀書運動，以提高全體隊伍的文化理論素質”。但這一建議被某些領導視為“看不起革命隊伍、驕傲自大、打擊領導”。於是，林雲之被指斥為所謂的“特務頭子”，共有 31 名青年男女被冤指入案，最後全部被殺。此案中還有 95 人被捕，216 人受牽連。

聶榮臻 1982 年底同《紅旗》雜誌負責人的談道：“紅軍時期，醫務人員、搞無線電通訊的，差不多都是從國民黨軍隊過來的，這些事工農幹部不會，只能用他們。抗日戰爭時期，我們有了根據地、野戰軍、邊區政府，需要建醫院、辦工業、建兵工廠、修造軍械、還有無線電通訊聯絡、還要辦報紙和廣播電臺等，需要越來越多的知識份子參加革命隊伍。但有阻力，知識份子受到歧視。所以 1939 年黨中央才作了《大量吸收知識份子的決定》”。中共需要的知識份子主要是技術知識份子，是作為工具的實用的知識份子，而不是獨立知識份子。

第 86 節 恐怖的中華蘇維埃

2. 濫殺無辜的土地“革命”

1924-1927 共產黨屠殺的國民黨的追星族遠遠超過國民黨屠殺的共產黨的追星族。

1925 年 1 月，中共“四大”號召抓住可能的機會，在盡可能多的地方發動佃農、半自耕農和雇農，共同組織農民協會，用農會這種形式去反對封建地主階級。這年的《中國共產黨告農民書》說：農民階級只有組織農民協會，再由農民協會組織農民自衛軍，才能解除困苦與壓迫，保護自己的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

1926—1927年，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山東、河北、陝西建立農會，1927年3月，全國性質農民組——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成立，至1927年6月，全國大小農會組織已有21458個，入會會員達9153093人。

毛澤東在湖南領導農民暴動始于1925年冬，1926年達到高潮，湖南農會號稱有618萬人。當北伐于1926年勝利到達南京時，共產黨竟提出：“一切權力歸農會”和“紅色恐怖”的口號。農會私設公堂，酷刑逼供，燒屋分地，勒索錢財，成批殺人，強姦人家的小姐、兒媳婦；牆壁上到處刷寫著“殺盡土豪劣紳及一切反動派”、“實施赤色恐怖”。龔楚說：不僅國民黨人攻擊為過激，甚至中共高階層人士亦多認為過火。當時農會控制了鄉村政權，地方官大多數失去權力，實際無法制止農會和工會的種種暴行。他們在鄉間任意沒收豪紳地主的財物，形同盜匪；並將豪紳地主捆綁，遊街示眾，濫用私刑，死人無數。

此時，國民革命軍的將士正在前方浴血作戰，農會卻在後方抄他們的家、燒他們的房、搶他們的地、沒收他們的財產、吃他們的大戶，連前線士兵們捎回家的極少量的津貼也被強行搶去。國民革命35軍軍長何健正在河南作戰，長沙的總工會就抄了他的家，逮捕了他的父親，將其折磨致死。甚至連中共高層領導人李立三的父親亦不能倖免。李立三是湘東醴陵人，其父是個讀書人，為人一向誠實。當湖南農會控制了鄉村政權後，他家即遭到清算，李父即逃抵武漢避難。中共中央聞知此事，即致函湖南省委，明令農會不得對李父為難。李父這才放心回鄉居住，詎料農會竟將他殺害了。毛澤東在湖南領導的農民暴動，不允許任何人講一個“不”字，湖南一個大知識份子，只因為寫了一首諷刺農會的打油詩，即被農會公審，就地槍決，當時的農村一片紅色恐怖。毛澤東卻認為這樣的恐怖“好的很”。

1927年2月12日，毛參加了湖南農協第一次代表大會後到武漢，更以名言“有土皆豪”、“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就不能矯枉”著稱。1927年3月毛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革命是暴動”。毛這些話，在以後多次被做為指導方針。

在1920年代的溆浦農民運動中，鎮壓陳王齡（俗稱陳老二）是農民革命鬥爭的重要標誌性事件。陳王齡時任溆浦縣團防局長，此人被認為“心性狠毒”、“橫行城鄉”。全縣被他殺害的無辜群眾達“200多人”。1923年的一天，陳王齡為避土匪搶劫，將家裡的財物裝入18個鐵桶，密封後沉入屋前的水塘裡。待土匪搶劫風聲平息後，陳回家車幹水塘，發現少了一桶，就誣指在附近賣油粑粑的陳三伢所盜，將其抓來，為逼其供認，竟施用慘無人道的“剝皮抽筋”酷刑。當時，先將陳三伢上衣脫光，在木板上釘上兩排粗針，抽打陳三伢的背部，把肉皮打得稀爛；乘鮮血尚未凝結，用細麻線從肩部一直密密麻麻擺到臀部，然後塗上石灰粉，使石灰與鮮血、皮肉凝結在一起，成為血痂；過一兩天再來抽動麻線，就如萬箭穿心，疼痛難忍。陳三伢被折磨得死去活來，最後上吊自盡。後來發現盜竊者乃其一抽大煙成癖的侄子所為。陳王齡被認為是全縣反動勢力的靠山和總頭目，是農民運動的“攔路虎”。中共溆浦縣委為了將剛剛興起的農民運動推向高潮，秘密決定除掉陳王齡。

1927年2月26日（農曆正月25日），縣委在縣城寺坪召開慶祝國民黨溆浦縣黨部成立的萬人群眾大會，大會由縣委書記劉績成主持。陳王齡被抓獲後押到會場台下時，群情激昂。“嫉惡如仇”的向五九操起廣播筒大喊一聲：“贊成槍斃陳老二的鼓掌！”全聲頓時掌聲雷動。杜元富抽出手槍對準陳老二就是一槍，

擊中陳的腿部，士兵們連複幾槍，“結束了陳老二的狗命”。隨即，與陳老二有“深仇大恨”的群眾，紛紛跑到附近人家借來刀子，“割其耳朵和鼻子，有的剖膛取心祭靈，有的割一塊肉拿去下酒；有個士兵一刺刀挖出陳的眼珠子，猛然用腳踏破，眼液四濺。有人問他對陳老二為什麼如此痛恨？他憤然答道：‘我家被他弄死3個人，我是為了報仇才來當兵的。’不過一袋煙功夫，陳老二隻剩下一副骨架子。”在陳老二被鎮壓處死的當天下午，縣委在縣城和各區張貼佈告，宣佈陳的“十大罪狀”。為保證農民運動向前發展，1927年3月，遵照上級指示，成立澱浦縣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在全縣開展了一場“鎮壓土豪劣紳的偉大鬥爭”。在短短一、二個月內，全縣受到懲治的土豪劣紳達616人，其中鎮壓的11人，遊鬥的44人，坐牢的33人。

1927年4月12日，國共兩黨正式分裂。5月21日，許克祥在湖南長沙發動“馬日事變”，5月24日澱浦則發生了“敬日事變”。包括中共澱浦縣委書記劉績成在內的19人被澱浦駐軍陳漢章殺害，屍體被丟入澱水河中。1928年5月19日，中共澱浦縣委遵照省委“暴動就是成績”的指示精神，發動了舒溶溪農民暴動，舒溶溪小學校長龍明漢被“凌遲處死”。

1927年中共五大會議上，毛反對大會把“有五百畝以上土地的農民”定為地主的標準，他嫌這一標準的打倒物件太少。“秋收起義”時，毛在起義綱領中加上“除大地主以外也沒收中、小地主的財產”。1927年8月18日中共湖南省委會議提出“殺盡土豪劣紳”、燒毀其村莊。李慎之提到，“秋收起義後，紅軍在湘南有過‘燒，燒，燒！燒盡一切土豪劣紳的屋；殺、殺、殺！殺盡一切土豪劣紳’的政策，目的就是要讓小資產者變成無產者，然後強迫他們革命”。1927~1929年間，毛的部隊“殺盡土豪劣紳”全家，連三歲的小孩都不放過。1927

年底黃安暴動，農民進行“燒殺地主比賽”。

1927年11月中共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國現狀和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該檔寫道：“工農武裝暴動的策略，尤其應當注意的是：對於豪紳工賊及一切反革命派，應當採取毫無顧惜的消滅政策；……對於上層小資產階級——店東商人等等，切不可存在著猶豫動搖的心理，如懼怕擾亂他們的安寧秩序，因而不去發展革命的群眾的獨裁制，甚至阻止群眾的劇烈的革命行動。”這些“左”的政策，在某些農村暴動中，例如在湘南成為“殺盡土豪劣紳”以及燒毀他們房屋的所謂“燒殺政策”，甚至引進了城市（李維漢，1986：190）。

1924年就開始搞農運的大王彭湃在1927年疾呼：“把反動派和土豪劣紳殺得乾乾淨淨，讓他們的鮮血染紅海港（殺到海港的水“都成赤色”），染紅每一個人的衣裳！”他廢除了一切債務（窮人間的債務也一同廢除），燒毀一切契約，鏟去一切田塍。彭湃推崇列寧：“他的法律，是沒有什麼詳細的，反動的就殺，他的工人農民，不用報告什麼工會、農會、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紳、地主、資本家殺光”。他效法張獻忠發佈“七殺令”，下達每一個蘇維埃代表殺20個人的指標。彭湃號召：“准群眾自由殺人。殺人是暴動頂重要的工作，寧可殺錯，不要使其漏網”。“將這批豪紳地主剖腹割頭，無論任何反動分子，都毫不客氣的就地殺戮，直無絲毫的情感”。海陸豐存在的短短兩個月中，一萬多人被殘酷處死，“反動的鄉村有些全鄉焚燒”，甚至出現復仇者吃人肉、吃心肝的現象，成了可怕的屠場。1929年8月24日，彭湃到上海兩區新路12號2樓開會，被叛徒白鑫向敵人告密而被捕，犧牲於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監獄（白鑫的表弟是在彭湃亂殺中被處決的，白鑫是報殺弟之仇）。

在廣東，那些領導農運的政治家們也親手寫下這樣的文字：“凡暴動勝利後，

各級農會，及武裝組織，皆應佈告准予革命民眾自由殺戮反革命，以資鼓勵。如萬不得已退走某地時，必威嚇當地民眾，搬遷一空，俟敵人到後，無從覓食，同時並在敵人宿營附近地方潛入，夜間可任意放火，焚燒居民房屋……敵人到來時，我們應將廟宇庵堂等……乘機拆毀焚燒，使人民懷疑是敵人所幹，因而討厭敵人，並設法在敵人範圍內，隨時殺戮人民，使人民人人自危，而含恨敵人不分皂白亂殺，而圖報復，同時使敵人無地方可駐紮。凡暴動勝利所得地方……各種書店，及圖書館、或人家所藏書籍，純系養成反革命之知識份子者，應即儘量焚燒之”（見《1927—1945年國共鬥爭史料匯輯》第二集，第196、198、202頁，存萃學社編集，大東圖書公司印行）。在這樣的條文中，革命已走到了人民利益的反面。

1928年1月廣東省委和北江特委提出以“殺人、放火、搶物”為暴動原則和革命目標，提出“鼓勵自由殺人”和“獎勵焚燒房屋”。

湖北漢川地區農民暴動的指導者，甚至要燒去整個城市，湖北許多整個兒的村莊被燒盡。江蘇省的‘暴動須知’也說：‘必須挨家挨戶告以暴動的口號……不來者以反革命紀律制裁……’1920年代紅軍是流寇，它的給養主要來自“打土豪”。紅軍每打到一個地方，不管該處地主是否抵抗，一律格殺勿論。然後把浮財和糧食一沒收；帶不走的糧食和土地給貧雇農一分，它就開拔了。國軍一來，還有那些分得了土地和糧食的貧雇農好果子吃嗎？於是這些貧雇農只好背井離鄉去投紅軍。挑動階級鬥爭的結果是紅軍不但有了給養，也有了兵源。

朱德軍把郴州、耒陽兩個縣城化為焦土。1928年3月，國軍會攻湘南；中共湘南特委提出“堅壁清野，燒盡郴宜大道兩側5裡內民房”的口號。省巡視員推行焚燒湘粵大道兩側30裡內房屋和燒毀郴州等縣城的決定。指示下達後，群

眾強烈反對。特委一面逐次讓步，將焚燒範圍縮小至湘粵兩側各 5 裡，一面仍向各級幹部施加壓力，強令推行。許多幹部抵制不了，只得在大道旁焚燒了少量房屋，然而消息風傳，造成人心大亂，敵對情緒劇增。

中共郴縣縣委想說服群眾收拾家什搬遷至縣城五裡外，燒掉房子，群眾多數對此不能忍受。3 月 12 日，縣委通知在郴州城裡城隍廟召開群眾大會，打算說服群眾執行焚燒決定，以粉碎敵人的進攻。這一天，到會者格外多，平日空曠的場地擠得水泄不通。大會于十時開始。縣委書記夏明震講到為阻止湘粵兩省敵人進攻不得已實行“堅壁清野”時，台下立即叫喊：“燒房子就不行！”“燒死他們！殺死他們！”許多人迅速扯下頸上的紅帶子，換上事先暗藏的白帶子。一個人沖上臺，一刀砍死了夏明震。混亂的人群刀槍棍棒齊上，縣幹部與群眾組織負責人多人被殺。全場頓時形成一場白帶子殺紅帶子的混戰，當場死傷 2 百多人。接著，人們一路呼嘯而去，見紅帶子就殺，見商店就搶，相繼搗毀縣總工會、少先隊等駐地。

當天下午群眾聽說“城裡的工人要殺農民、共產黨要燒郴州方圓 50 裡的民房”，於是數千農民包圍了已經搬遷到城外東塔岑的中共縣委機關，搶劫一空。時任縣委秘書長的曾志逃到朱德處求救，朱德即派陳毅率一營軍隊夥同赤衛隊一起攻打已被“反叛民眾”佔據的郴州，血戰數日，共黨人員死傷千余，郴州縣委共黨幹部幾乎被殺盡，民眾死傷多達兩千。

永興、耒陽的農民也起來反對共產黨……共軍迅速地進行血腥鎮壓。

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共湖北地方簡史叢書》記載湖北陽新縣僅 1928 年 7 月至 1929 年 4 月半年間就殺死地主、富農 3170 人，1928 年元月中共遊擊隊襲擊劉家祠堂，殺死地主劉慧臣一家五口。地主黃香谷六十壽辰時被中共殺死，搶走

銀元 8 百元；大冶縣地主黃曉階嫁女兒，中共手槍隊打死黃曉階並搶走嫁妝。種種暗殺、沉塘沉江、燒人住宅的暴虐行為書不勝書。這樣的屠殺搶奪就連共黨內部一些有良知的人士也自覺不安，陳獨秀曾主張以召集國民會議來代替建設蘇維埃政權的鬥爭，經國民黨統治而和平發展來取消推翻國民黨統治的行動。他因“右傾”錯誤而被開除出黨。

福建省中共黨史研究會《黨史研究參考資料》1982 年第 5 期記載了紅軍打下福建漳州時的情況：楊成武回憶說“凡是戴禮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鏡、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當土豪。我們那個團就抓了一百多個，有的不是土豪，而是華僑”。《聶榮臻回憶錄》說：“當時陳嘉庚先生在漳州開有一座商店，派了他的款，他開始不交。我們只是派人進入他的商店，取走相當於所派款項的罐頭、膠鞋等給部隊吃用，仍令其繼續”。

1930 年紅三軍團“在黃石港宣佈沒收帝國主義的洋行、商店，成千上萬農民組成搬運隊”，“農民挑著銅幣、銀幣，一擔一擔送到紅軍司令部”（《彭德懷自述》），黃石港乃鄂東一小鎮，哪來的帝國主義？紅五縱隊在大冶縣金牛鎮殺了幾個土豪，籌得大洋 3 萬塊。

1931 年 8 月，中共鄂南蘇區特委目前工作計畫的決議案》明確提出發動貧農、中農起來驅逐反動家屬。各級蘇維埃政府命令赤衛軍、少先隊用強迫手段將“反動家屬”趕出蘇區，對不願離開者施以棍棒，斷絕飲食。於是這些被沒收了全部財產、土地，身無分文的地主及家屬四處亡命。可見整個蘇區對地主、富農的屠殺、流放是有指示、有計劃、有組織進行的。

1932 年 4 月間，方志敏領導的紅軍乘江西袁娜妮贛劇團在廿八都水星廟做戲一個月的機會，派暗探來偵察駐鎮民團和自衛隊人數、武器、行動規律，同時

也摸清了當地富戶情況。

6月28日，紅軍廣豐獨立團由團長周良瑞、政委吳光丕親自率領，會同遊擊隊、花槍連五百多人，還有大批挑夫，星夜奔襲廿八都，紅軍很快便攻下了廿八都。這一仗除了槍枝彈藥，紅軍還掠走大量食鹽、布匹、現洋等數萬元的財物；中午時分，紅軍又把未逃走的地主、商人及其家屬，不分男女老少共二百多人統統當作“財神”綁架走，有些人被贖回去了，有些人則被撕票，有些人更人財兩失。“殺害人質”不是恐怖分子的發明，而是中華蘇維埃政府的發明。跟著紅軍來的廣豐遊民，手上纏著紅布，也跟著搶，連籬筐也搶。

同年9月5日，紅軍廣豐獨立團和閩北獨立團又帶著赤衛隊、花槍連第二次攻打廿八都。這次除打死守軍三十多人外，再綁架士兵、地主和富紳三十多人為“肉票”。繁華了幾個世紀的富饒古鎮從此蕭條、冷落。1933年慕名而來的郁達夫便目睹了這個“雞鳴三省”古鎮的一派衰敗景象。《衢州文史資料》對此亦有記載：街上貼滿了“打倒國民黨！打倒土豪劣紳！”“工農兵聯合起來！”“列寧主義萬歲！”等標語。楊益豐、隆興源南貨店和楊元亨、金同順布店等二十多家大的商號店堂，全被砸開，門板七零八落，櫃檯東倒西歪，籬筐隊忙著裝貨待用。有幾個地主的家眷正在哭爹喊娘。

1949年以後，這個至今也不過三千餘人的古老小鎮，竟有86戶被劃為地主，未及逃走的就被槍決，人數在三十、四十之間，不可謂不駭人聽聞。

2·毛澤東殺 AB 團、肅反

最早積極回應共黨“打土豪分田地”的，正經農民不多，流氓痞子不少。1928年毛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說：“紅軍的成分，一部是工人、農民，一部是遊民無產者。遊民成分太多，當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戰鬥，傷亡又大，遊民分子

卻有戰鬥力，能找到遊民補充已屬不易”，他又說：“紅軍士兵大部份是由雇傭軍隊來的”。王明在《武裝暴動》的序言指示：“在許多地方的土匪漸與農民運動相接近，漸漸直接地幫助農民鬥爭，這種事實尤其使共黨不能不注意到他們對於土匪的關係的問題。我們應鑽進土匪隊伍中去，可以組織他們作革命的爭鬥”。共黨曾發出通知要求參加哥老會的區鄉兩級黨員務必參加開山堂，宣稱“有蘇維埃，有紅軍、哥老會就有了靠山”，並鼓勵蘇區內的大爺、管事的要積極到白區發展。可見紅軍的構成從一開始就摻雜著土匪、幫會成份，帶入了吸大煙、充光棍等惡習。

中共以工人階級鬥爭理論領導農民暴動，1929年中共中央調查的贛南各縣黨員人數清楚地表明，在其黨內工人只占10%左右，農民占70%，專制知識份子等其它階層占20%。即便如此，中共也頑固地認為工人階級有凌駕其它階級的種種特權，以此從精神上控制農民。

1928年6、7月間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通過的《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第十條規定：“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武裝起義前可以適用。武裝起義之後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地鎮壓他們……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1928年冬，江西省委把六大決議送到井岡山。

當年收容了毛澤東秋收起義殘部的井岡山山大王王佐(文盲)、袁文才，是毛的救命恩人；可毛澤東剛剛站穩腳跟，就根據六大“決議”，於1930年2月24日拂曉，在永新縣城用計殺害了袁文才等人、王佐逃跑時淹死於河中。當時紅五軍有一千多人，王佐有五百多人，戰鬥力不亞於紅五軍，袁、王部隊沒有打一槍。從這個形勢看，袁文才、王佐也不是“反水”。袁、王被殺後，袁文才部連長謝

角銘和王佐之兄王雲龍各帶幾十人逃回井岡山。3月初，兩部聯合通電反共，分別被編為寧岡、遂川兩縣靖衛團。從此，以茨坪為中心的井岡山根據地淪為白區一直到1949年。1979年後，王佐、袁文才平反昭雪。

1930年2月，共產國際主席團決議提出：“各國共產黨堅決反對社會民主派的鬥爭”，“必須無情地揭露那些打著共產黨旗號、以右派叛徒和託派叛徒為代表的社會民主派代理人。”6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要求：中共在反對國民黨和軍閥的同時，“應當把鬥爭的鋒芒指向改組派，指向第三黨，指向胡適派”。中共遂於1930年上半年提出反對取消派和廣泛開展肅反工作。中央蘇區首先開始肅反運動。

在瑞金蘇區最早發動清查AB團運動的是毛澤東。1930年代肅反目的地就是肅清黨內的“AB團分子”。“AB團”來自英文“反布爾什維克”(Anti-Bolshevik)的縮寫，全稱為“AB反赤團”，是北伐戰爭時期在江西建立的以段錫朋為首的國民黨右派組織，成立於1927年1月，其目的地是打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AB團成立後三個月，就被1927年4月2日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發動的大暴動所摧垮。此後，江西儘管還存在著個別的殘餘分子，但這個組織並沒有重建。廖承志在1938年曾問一個已轉變立場投身革命的原AB團頭目王禮錫：“AB團到底有多少人？”王實告之：真正的AB團僅七、八個積極活動分子。

1928年1月24日，毛親自為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大會書寫了這樣一幅對聯：“想當年，你剝削工農，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殺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

1929年，共產國際推行“反富農”的新方針，隨即迅速傳至中國，毛澤東在蘇區積極貫徹並發展了共產國際這項“反富農”的方針。毛比共產國際的有關

方針更為激烈。毛猛烈抨擊富農：“富農的剝削比較地主更加殘酷”，“這個階級自始至終是反革命的”。毛還將打擊的矛頭指向那些既出租土地、也不雇工的富裕中農，指稱他們是“第三種富農”，號召“堅決贊助群眾沒收他們的土地，廢除他們的債務”。更有甚者，毛居然發明了“富農共產黨員”的概念，把贊成中共六大“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同志，一律視為“黨內的富農成分”，要求將他們從黨內“洗刷出來”，“無條件地開除富農及一切富農路線的人出黨”。

1929年下半年始，贛西南黨組與總前委之間在土地革命問題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時機問題上產生了分歧。1) 土改政策問題。贛西南方面主張執行中共六大關於“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決定，反對毛澤東提出的“沒收一切土地”的主張。2) 軍隊及地方黨機構的歸屬及人員配置問題。1929年11月底，毛澤東提出合併贛西、湘贛邊界兩特委，成立新的贛西特委，毛並決定將李文林領導的紅二、四團合併到彭德懷部另成立紅六軍。贛西南方面則認為此決定須經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才能生效。1930年1月，毛任命紅四軍幹部劉士奇、曾山組成贛西特委作為領導贛西南等地的最高機構，但是卻受到贛西南方面的抵制。

為了解決與贛西南地方紅軍、黨團機構的矛盾，毛澤東於1930年2月6-9日，在贛西特委所在地吉安縣陂頭村召開了由紅四軍前委和贛西南方面負責人參加的聯席會議，江漢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視員身份參加會議，劉士奇等作為助手配合毛澤東組織了這次會議。

在“二·七”會議上，兩個月前經中共中央批准恢復了對紅四軍領導權的毛澤東，在劉士奇、曾山的幫助下，發動了一場對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團機構負責人的激烈鬥爭，這場鬥爭為日後掀起“肅AB團”運動埋下了火種。

以毛為首的總前委卻把贛西南黨組織的不同意見稱為“極嚴重的機會主義

錯誤”，毛列舉了主要兩項：①贛西南負責人江漢波、李文林提出僅“沒收豪紳地主的土地”的主張，是“完全走向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的路線，由此發展下去勢必走上托、陳取消路線，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取消派與 AB 團同為反革命”。②江漢波等“用非政治的瑣碎話，煽動同志反對黨的領袖”，“黨的領袖”是指由毛任命的贛西特委書記的劉士奇（毛的連襟）。

由毛主持的“二.七”會議將贛西南方面的負責人扣上“富農份子”的帽子，宣佈開除江漢波的黨籍，李文林被調離出主力部隊，轉任地方工作。聯席會議號召黨內革命同志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的布爾什維克化。

“打倒機會主義領導”是 1927 年“八.七會議”前後始出現的概念，也只是宣佈改變陳獨秀的路線並中止其領導職務。依那時的黨道德和黨倫理，不同意見仍可在黨內爭論，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則擁有最終裁判權，未聞有將持不同意見的黨內同志予以肉體消滅的事例，但是到了 1930 年，毛卻將“打倒機會主義領導”與肉體消滅結合起來。毛宣佈，機會主義領導就是地富反革命份子，從而將對敵鬥爭的口號——打倒國民黨、消滅地富反革命，與黨內鬥爭的概念“打倒機會主義領導”順利地銜接起來，一舉獲得了鎮壓的正當性。1930 年代初，史達林對托洛茨基的鬥爭還未發展到肉體消滅階段，史達林發動大清洗還在以後幾年。可見，毛在黨內大搞清洗，基本上源於國內的歷史經驗與與他自己的體會。

1930 年春，在蘇區內已流傳國民黨“AB 團”進行滲透破壞，其組織已被陸續破獲的消息，根據地的對敵警惕氣氛空前高漲。1930 年 2 月 16 日，由毛任書記的紅四軍總前委發出《前委通告第一號》，正式宣佈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

鬥爭，通告指出：贛西南黨內有一嚴重的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黨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敗。

1930年“二·七”會議後，恐怖的氣氛在江西蘇區已逐漸形成。在贛西南特委書記劉士奇的領導下，遵照紅四軍前委《第一號通告》的精神，率先發動“肅AB團”的宣傳攻勢。

6月25日，中共贛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發了《反改組派AB團宣傳大綱》，命令各級組織：如發現群眾中有動搖表現不好的份子，應捉拿交蘇（維埃）政府究辦。《大綱》同時號召“實行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以“肅清紅旗下的奸細”：“現在各級蘇維埃應加緊肅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殺豪紳地主反動富農份子以示警戒，但是殺人要有反動事實可證，嚴禁誤殺。”這份《大綱》雖然提到殺人要有證據，嚴禁誤殺，但是恐怖大門一經打開，事態很快就失去控制。劉士奇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就殺害了幾千“地主富農”、“AB團”分子。1930年7、8月間，“肅AB團”迅速從基層清洗轉移到上級機關。

1930年5月，贛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參加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此次會議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李文林返回後，於8月上旬主持召開了贛西南特委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不指名地指責了毛的一系列的觀點和做法，撤銷了擁護毛的贛西南特委任書記劉士奇的職務，並建議上海中央開除其黨籍；李文林出任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書記。這一切惹起毛的極大憤怒，毛早已習慣以中央在江西蘇區最高代表行事，豈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擁護中央為名反對自己？

在毛澤東的壓力下，贛西南特委在1930年9月24日印發的《緊急通告第

20 號——動員黨員群眾徹底肅清 AB 團》檔中宣佈：“紅旗社列寧青年社、贛西南政府，都有 AB 團的小組……所有混入在黨團特委的贛西南政府的 AB 團份子全部破獲。並將各縣區的組織通通供報出來了”。這份《緊急通告》還詳細規定了“肅 AB 團”的審訊方法和處決人犯的基本原則：“AB 團非常陰險狡猾、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招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繼續不斷的嚴刑審問，忖度其說話的來源，找出線索，跟跡追問，主要的要使供出 AB 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緊急通告》要求：對於首領當然採取非常手段處決，但須注意，在群眾大會中由群眾斬殺。……富農小資產階級以上和流氓地痞的 AB 團殺無赦。……工農份子加入 AB 團有歷史地位，而能力較活動的殺無赦。贛西南特委厲行“肅 AB 團”，到了 10 月，在贛西南三萬多黨員中已“開除的地主富農有 1 千多人”（“二.七”會議要求把“黨內代表富農份子不論其階級如何及過去工作如何，無情地堅決地開除出黨”），消滅了 1 千多“AB 團”。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 1/4 被打成“AB 團”，也大多被殺。

1930 年 10 月 14 日，毛澤東在江西吉安縣城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通報他對贛西南黨的狀況的看法及準備採取的措施。毛在這封信中繼續發展了他在“二.七”會議期間對贛西南黨團機構的基本觀點，指出：近來贛西南黨“呈一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 AB 團份子，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 AB 團富農所充塞領導機關”。毛申明，為“挽救這一危機”，決定進行一場以“打 AB 團”為號召的肅反運動，以對贛西南的黨團機構“來一番根本改造”。毛在《總前委致省行委的信》中指示：“各縣各區須大捉富農流氓動搖分子，並大批把他們殺戮。凡那些不捉不殺的區域，那個區域的黨和政府必是 AB 團，就可以把那

些地方的負責人捉了訊辦”。毛十分清楚，蘇區不可能有如此多的“AB團”，既然恐怖閘門已開，正可順勢將所有的反對勢力一概鎮壓下去。毛作出了一個驚人之舉：在鎮壓李文林等贛西南領導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揮的紅一方面軍（紅一、三軍團）進行大清洗，開展“打AB團”運動。

1930年10月，毛率紅一方面軍攻佔吉安，旋又退出，毛動員彭德懷在打下長沙後退出。毛的這些舉措引起部分紅軍指戰員不滿。毛在率軍退出吉安後，於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軍迅速發動“快速整軍”——其主要內容就是在師、團、營、連、排成立肅反組織，捕殺軍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和牢騷不滿份子。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4萬多紅軍中肅出4400餘名“AB團”份子，占軍隊總人數的1/10，絕大多數人在審訊結束後即被處決。

紅一方面軍內部的“打AB團”極為慘烈，地富或知識份子出身的黨員、過去曾與毛意見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黃克誠當時任紅三軍團第三師政委，該師組織科長、政務科長都被當作“AB團”肅掉。宣傳科長何篤才在大革命時期加入共黨，參加過南昌暴動，後隨朱德上井岡山。只因何篤才在古田會議前的朱、毛爭論中站在朱德一邊，從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被調出紅一軍團，在黃克誠手下當個宣傳科長。何篤才與黃克誠交誼，“兩人在一起無所不談”。何篤才認為，毛這個人了不起，論本事，還沒有一個人能超過毛。但毛的組織路線不對頭，“毛澤東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何篤才並舉例說，一些品質很壞的人就是因為會順從，受到毛的重用，被賦予很大的權力，幹壞了事情也不被追究。果其不然，這位聰明過人、毫無過錯的何篤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團”的惡名遭到殺害。

蕭克上將回憶打AB團的情況時說：“軍政治部告訴我們，你們師裡有AB團，

並具體指出幾人，其中有師宣傳隊隊長和一宣傳員。就憑一句話，根本沒有別的材料，就把他倆抓起來了。他們不承認，一打，一審，他倆就承認了，還供出十幾個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幾個人抓起，再打，再審，又供出了幾十個，到月底，共抓了一、二百人。” “我們師殺了六十個人，十幾天後，決定再殺一批，有六十多人。”

李聚奎上將在《李聚奎回憶錄》中說：“那時打 AB 團的做法，完全採用誘供、逼供的辦法。甚至把隊伍集合起來排成一字長隊，再把經過誘供、逼供而自供是 AB 團的人帶到隊伍面前，然後指著佇列裡的人，逐個向他提問：‘他是不是？’ ‘這個是不是？’ 只要他說聲：‘是’，或者一點頭，就當即把被指的人抓起來。就這樣誤整了許多無辜的好人。特別是在同一個地區來的人中，只要抓出一個，往往就牽連一大片。如我們團在吉安擴編了一個新兵連，大部分是吉安人，因為都是一塊來的，互相認識，所以在這個連抓出來一個吉安兵後，就‘供認’出半個連的人是 AB 團。”

參加了湘南起義與井冈山革命鬥爭的歐陽毅中將，在《我在打“AB 團”中的經歷》一文中說：“肅反擴大化使紅軍的許多優秀幹部、戰士蒙冤喪命……1930 年……部隊的肅反委員會動不動就給人扣頂‘AB 團’的大帽子，三天兩頭抓人殺人，弄得人心慌慌，朝不保夕。更可笑的是抓‘AB 團’抓到連隊來了，一些參加紅軍不久的年輕農民，大字都不識一個，一夜之間也成了‘AB’”，被抓去殺了。……我親眼看見江西省委政治保衛處處長李韶九審訊‘犯人’的血腥場景。他咬牙切齒，拿根帶刺的荊條親手打‘犯人’，邊打邊逼問。被打的同志熬不住了就亂招，招誰抓誰。如此惡性循環，不知冤殺了多少好同志。”

毛澤東既然對自己率領的紅一方面軍也大開殺戒，那麼對一貫與自己唱反調

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就更不會有絲毫顧惜了。1930年10月底，江西省行委發出通告，批評“肅AB團”鬥爭中存在的簡單化錯誤，強調對工農群眾擴大自首範圍，對捉拿老同志更要小心謹慎，如案情重大，則必須將人犯押往省行委肅反委員會審理，解除了縣以下基層組織的殺人處決權。

1930年10月，紅一方面軍攻下吉安，在國民黨地方當局的檔中發現了據稱是李文林的地主父親用真名簽字的便條，這樣，將李文林與“AB團”聯繫在一起就有了所謂證據。10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峽江會議和羅坊會議上公開反對毛提出的“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主張執行李立三有關攻打大城市的指示。由此，毛認定李文林是“AB團”首領。

1930年底11月底，李文林在甯都縣黃陂被拘押，緊接著一批與李文林有工作聯繫的人相繼被捕。毛澤東根據犯人被判刑後的口供，於1930年12月3日寫信給改組後的江西省行委，認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贛西南團特委書記）、李白芳（省行委秘書長）等為“AB團”份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並嚴搜贛西南的反革命線索，給以全部撲滅”。毛在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後“務必會同李同志（即李韶九）立即執行撲滅反革命的任務，不可有絲毫的猶豫”，對“各縣各區須大捉富農流氓動搖份子，並大批把他們殺戮。凡那些不捉不殺的區域，那個區域的黨與政府必是AB團，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負責人捉了訊辦”。

1930年12月3日，總前委書記毛給江西省行委的信中說，已有人供出段良弼、李白芳、金萬邦等（是反劉士奇的）“AB團分子”，而且明確指示總前委：“特派李韶九（總前委肅反委員會主任）同志率兵一連前往幫助捕捉李白芳等AB團要犯，並嚴搜反革命線索”。

李韶九攜著毛澤東指示信於12月3日前往富田，5日毛又派兩位紅軍戰士

將第二封指示信送給已出發的李韶九和省行委。毛在信中指示彼等要從已被捉人的線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為了督促貫徹兩封信的指示，毛又派出總前委秘書長古柏趕往富田“協助肅反”。

12月7日下午，時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席的李韶九率紅12軍一連官兵，到達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吉安縣富田村，包圍了省行委機關後，向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負責人面交了毛澤東的指示信，隨即將省行委和紅20軍八個主要領導人段良弼、李白芳、金萬邦、周冕、謝漢昌、馬銘等人予以捆綁逮捕。夜間，李韶九對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燒香火”等多種刑法毒刑逼供。受刑的省行委常委段良弼與李韶九辯理，以自己過去的鬥爭歷史來證明自己不會去搞AB團時，李韶九則說：“我不與你講理，我只有七項刑罰，第一項就是這打地雷公燒香火……無論如何，你要承認是AB團，說出你們的組織，否則給你一個不生不死。”被打同志“皆體無完膚”、“手指折斷，滿身燒爛行動不得”。據當時資料記載，被害同志“哭聲震天，不絕於耳，殘酷嚴刑無所不用其極”。

12月8日，李白芳、馬銘、周冕的妻子來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當作“AB團”抓起來，被施以嚴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燒身，燒陰戶，用小刀割乳”。

在慘酷的刑訊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萬邦、劉敵、周冕、馬銘、任心達、叢允中、段起風等“是AB團首領，並供出紅軍學校有大批AB團”。被捕人員全都被迫承認了自己是“AB團分子”。對於這次刑訊逼供，蕭克將軍在1982年曾回憶道，“即便過了半個世紀，也不能不令人慘然一歎。我們這些‘過來人’也覺不堪回首”。

在12月7~12日6天時間內，李韶九等坐鎮富田，厲行肅反，共抓捕“AB

團分子” 120 多名，要犯幾十名，先後處決了 40 餘名。大部份的省行委領導人被肅成“AB 團骨幹”。李韶九等的殘酷行動終於引發 1930 年 12 月 12 日震驚蘇區的“富田事變”。

12 月 9 日李韶九帶一排人押著謝漢昌前往東固，吃罷早飯正要動身，蔣軍飛機來這一帶轟炸；為防犯人逃跑，李韶九便將不重要的 25 名 AB 團犯人，匆匆殺了，然後上路。從富田趕到紅二十軍駐地吉安縣東固鎮，向紅 20 軍軍長劉鐵超傳達了總前委的指示信，並著手在紅 20 軍內搜抓“AB 團分子”。紅 20 軍 174 團政委劉敵率領獨立營正在前方，接到軍部要他返回的急信，以為是因打了勝仗要他回去領慰勞品和補充兵源。卻不料一到軍部即被當作 AB 團要犯抓起來，由李韶九審訊。劉敵與李韶九是湖南同鄉，且早相識，知道李的為人。心想硬頂不是辦法，便改用長沙話與之攀談，附和李，漸漸取得了李的信任，不僅不把他當作 AB 團，還要劉好好幹，示意將來 20 軍交給劉敵，並派人送劉回營。劉敵將這天的遭遇告訴營長張興和政委梁貽喜。張、梁二人都憤憤不平。

12 月 12 日吃罷早飯，劉敵找到張興和梁貽，說李韶九這次來，目的是企圖消滅江西黨和部隊的幹部，是總前委的陰謀；於是三人商定請李韶九來講話，乘機將他扣留。之後，又聽說紅 20 軍政委曾炳春等也被打成“AB 團分子”；不知確否，一營營長張興便前去軍部探詢。不料，張興一問此事，李韶九、劉鐵超便將張扣留。劉敵獲知張興被拘，立即與梁貽集合部隊，將紅 20 軍軍部包圍，捆了軍長劉鐵超，放出被李韶九關押的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等人，可惜李韶九被捉後逃脫。由於擔心李逃回富田殺害被捕的省行委同志，劉敵等立即率 174 團機槍連和獨立營馬不停蹄奔向富田。黃昏時他們到達富田，包圍省行委，繳了 12 軍一排人的槍，釋放了段良弼等等 70 餘人。古柏、曾山等在夜色的掩護下逃脫。

被解救出來的省行委領導人李白芳、段良弼、周冕、全萬邦、馬銘、叢允中等人，於 12 日當夜召開了省行委緊急會議，認定李韶九所為是毛澤東指使的，毛是“許克祥第二”；認為省行委主要領導人曾山及宣傳部長陳正人配合李韶九濫抓 AB 團，有嚴重錯誤且已逃走，就決定由省行委常委段良弼負責省行委全面工作。並對曾山、陳正人、古柏、李韶九發了追捕通緝令。會上，還以省行委名義給朱德、彭德懷、黃公略寫了一封信，表示對他們的擁護。

12 月 13 日上午在富田廣場召開了士兵大會，由劉敵主持，段良弼等人在大會上發表演說，控訴李韶九等人濫捕濫抓刑訊拷打所謂 AB 團分子的情形，有人脫下衣服展示滿身傷痕……整個會場群情激憤，人們喊出了“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然而，毛的保衛局在朱德總司令部大肅 AB 團，五個副官殺了三個；毛可以叫某個受刑的人咬朱德。至於彭德懷，連蘇軍情報局都風聞傳言，“彭可能跟 AB 團有關係”。所以，朱、彭不僅幫不了事變者；而且為洗刷嫌疑，只會更加賣力地支持毛！

此時，平日喜歡毛字體的省行委常委叢允中，模仿毛字體，偽造了一封毛澤東給古柏的信。在那信中，讓人以為是毛澤東指示古柏去搜集朱、彭、黃的 AB 團證據，妄圖以此挑拔毛與朱德等人的關係。這封冠以“黃陂支部抄錄”的假信，被作為省行委信的附件，一起分別送給了朱、彭等人。但朱、彭、黃三人識破了那封假信。彭德懷親筆寫了擁護毛的信，派人交與毛，並起草了一個擁護毛的宣言。之後，彭德懷和滕代遠親自到總前委請毛到紅三軍團講了話。朱德、黃公略在收到偽造的信後，又約集彭德懷，三人聯名發表宣言，表示擁護毛東珠和總前委。紅 20 軍領袖們的這個失敗的離間計，也是他們至今不得翻案的理由之一。

後經獲釋的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的勸說，富田事變的領導人就停止了反毛宣

傳。當天，富田事變的領導人又召開了會議，決定撤銷劉鐵超的軍長一職，並以原 172 團團長蕭大鵬為軍長。同時率紅 20 軍自行離開富田，前往吉安縣永陽以圖自保。

15 日省行委在段良弼的主持下于永陽召開了省行委擴大會議，作出了幾項決定，其中有：一、對富田事件“不應該在群眾中公開宣佈，聽候中央妥為解決”。二、派叢允中、段良弼去中央報告此事變經過。事變的主要發動者劉敵也給中央寫了一份長達 4000 多字的申訴報告，承認自己做錯的地方，懇請處分。三、派叢允中隨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前去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報告事變經過，然後再共同去中央報告，後因敵阻隔，未能成行。四、送黃金 200 斤到中央。五、釋放被逮捕的李韶九率來的紅 12 軍 1 連的全部官兵。

富田事變的爆發，毛主持召開了總前委緊急會議，會議決議仍把富田事變的領導人稱為 AB 團。毛說：“AB 團取消派為什麼要擁護朱彭黃，他們的陰謀是拉朱彭黃，打倒毛，首先集中力量，打倒一個，然後再打倒一個。蔣介石在外面喊打倒毛，AB 團取消派就在革命陣線內喊打倒毛，這是如何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啊！”

12 月 20 日，毛澤東草寫了《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他說：富田事變是“AB 團取消派合作的叛變”事件，號召黨和紅軍堅決與這些“叛逆”作鬥爭。“如果段、李、金、謝等是忠實革命的同志，縱令其一時受屈；總有洗冤的一天，為什麼要亂供陷害其它同志呢？別人還可以亂供，段、李、金、謝這樣負省行委及軍政治部主任責任的為什麼可以呢？”

毛明知將段等定為“AB 團”全靠刑訊逼供，卻對刑訊逼供無隻字批評，反而指責段等不能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邏輯，只要段良弼等自

己承認是“AB團”頭子，即可證明彼等系貨真價實的“AB團”——毛的這種邏輯和思維方式，成為日後極左的常規思路，是造成冤假錯案連綿不斷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在這樣的思路下，毛堅持“肅AB團”不僅無錯，反而是對革命的巨大貢獻。他說：“AB團已在紅軍中設置了AB團的總指揮、總司令、軍師團長、五次定期暴動，制好了暴動旗，設不嚴厲撲滅，恐紅軍早已不存在了。”毛聲稱富田事變將“叛逆的原形完全現出來了”，號召對事變進行堅決鎮壓。

毛澤東理直氣壯乃是他認定自己就是紅軍和黨的象徵，毛就是根據地的中央，就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反毛即是“AB團”，所殺的皆是反革命，何愧之有！在毛的眼裡，只要目標崇高——撲滅“AB團”就是保衛革命，即使手段嚴厲一些，也無關緊要。在大恐怖中，總前委和毛的個人權威完全確立，毛就在大恐怖中成了江西蘇區的列寧！

1930年12月中下旬，毛澤東以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的名義起草了一份六言體的討伐富田事變的佈告：段謝劉李等逆，叛變起于富田。帶了紅軍反水，不顧大敵當前。分裂革命勢力，真正罪惡滔天。破壞階級決戰，還要亂造謠言。進攻省蘇政府，推翻工農政權。趕走曾山主席，拘留中央委員。反對工農紅軍，反對分地分田。妄想陰謀暴動，破壞紅軍萬千。要把紅色區域，變成黑暗牢監。AB取消兩派，烏龜王八相聯。口裡喊得革命，骨子是個內奸。扯起紅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這是蔣逆毒計，大家要做宣傳。這是鬥爭緊迫，階級反叛必然。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團結更堅。打倒反革命派，勝利就在明天。

1931年1月5日段良弼先帶著幾十兩黃金和近萬字的報告《富田事變前後詳情》出發。一路輾轉到達上海，見到了任弼時和博古，將黃金與報告交給了黨中央。報告詳細闡述了事變經過和省行委與毛澤東爭論的十個問題。結尾寫道：

“關於我個人的錯，請求中央指出處罰，任何處罰我都會心甘情願。但我因工作能力的薄弱，請求中央派我到莫斯科去學習。”這份用毛筆書寫在毛邊紙上的報告，至今還藏在中央檔案館內。段良弼在等候中央裁決時，大概發覺情況有變，未待中央委派的溫裕成與他相見，一個人便悄悄走了，消失得無影無蹤。

1931年初，項英到了中央蘇區擔任中央局代理書記。項英一上任，立刻感到清查AB團運動過火了，不相信紅軍中會有這麼多AB團。因此，他對清查AB團的運動採取了降溫的態度，主張慎重辦案。項英對事變進行了調查，聽取了兩方面的意見，隨即在1931年1月16日的《對富田事變的決議》中指出：“富田事變在事實上是毫無疑義的一種反革命的行動”、“客觀上是與AB團取消派等的聯合一致的反動行為”；但“不能肯定富田事變是AB團取消派的暴動，富田事變是由黨內無原則派別糾紛演進而成的”；“在組織上還沒有證明他們全部都是AB團取消派”，還用較大篇幅批評了總前委在肅AB團問題上大搞逼供信的錯誤。

項英又通知紅20軍領導人停止黨內攻擊，並到黃陂參加中央局的會議。謝漢昌、劉敵、李白芳等人奉命到了黃陂，並在中央局會議上做了自我檢討。紅20軍也在原被趕走的政委曾炳春的勸說下回到了贛江以東。項英在中央局會議之後對紅20軍領袖們的檢討感到滿意。

1月17日，中央局派人到永陽，向富田事變的領導人宣佈了解散省行委，另成立陳毅為書記的贛西南特委替代其職權。當時，富田事變的領導人表示完全服從，隨後紅20軍到永新一帶與國民黨軍隊作戰，並期待中央的最後決定。當時，紅20軍沒有一人投敵，而是開闢了新的根據地，打土豪、分田地、發動群眾，並積極準備攻打白軍佔領下的吉安。

3月共產國際遠東局認為，紅二十軍少數領導人率部包圍省行委的行動是反革命的暴動，總前委領導是對的，這一點用不著再爭論，應通知蘇區無條件地在總前委領導下來作鬥爭，並要中共中央起草一指示信立即發下去。四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於1931年3月28日作出了的《關於富田事變的決議》中，便認為“富田事變以及‘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的口號提出——這些行動，毫無疑問是階級敵人以及他們的鬥爭機關AB團所準備執行的反革命行動”，明確斷定“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與立三路線為旗幟的反革命暴動”，原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堅決反對階級敵人的鬥爭路線實質上是正確的；並責成蘇區中央局“嚴厲的消滅AB團與一切反革命的組織”。至此，關於“富田事變”性質的爭論就結束了。

此時，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全權處理富田事變”的中央代表團已從上海出發。4月17日任弼時一行3人繞道福建來到江西寧都縣青壩村，傳達了政治局的決議，否定了項英的正確意見，撤銷了項的代理書記職務，由毛澤東接任。

4月18日，遵照項英指示前來參加會議的贛西南特委負責人和事變領導者正向蘇區中央局青壩村走來。他們不知道中央代表團已經到達，項英剛被撤職，項英原定的“解決糾紛”的黨的會議不准召開，中央代表團對他們的判決已定，他們將大難臨頭。他們一行剛走進青壩村，立即被一網打盡。接著就召開了公審他們的大會。審判中這人沒有一個承認自己是反革命的AB團。會後，“罪魁禍首”劉敵被當即處決了。以後把其餘20多人都槍斃了。

紅20軍移防指戰員完全不知道所發生的事情，堅持對敵鬥爭，並配合廣西來的鄧小平率領下的紅7軍打了幾個大勝仗。此時，重掌中央蘇區大權的毛，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贛西南領導肅反工作，並負責對富田事變參與者的處理。

紅 20 軍於 1931 年 7 月風塵輾轉到達江西於都縣平頭寨，吃罷早飯，20 軍副排長以上軍官奉命到謝家祠堂開會，彭德懷、林彪的部隊立即將祠堂包圍。先是收繳了他們的槍械，然後將這七八百名軍官一個連一個捆綁起來，包括軍長肖大鵬、政委曾炳春。蘇區中央局命令解散紅 20 軍，並下令周圍預先埋伏的士兵開槍打擊，700 多人全部擊斃。軍長被拴馬上拖死（為節省子彈），或者用大刀、梭標、木棒、亂石處死以節省子彈（《中國共產黨黨史全編》）。僅有兩人倖免於難。紅 20 軍政委曾炳春，富田事變時在家裡養病，富田事變後奉蘇區中央局與總前委令，仍任紅 20 軍政委，並於 1931 年 1 月 7 日在上海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補選為候補中央委員（曾未與會）。1931 年 7 月被捕，1932 年 5 月 30 日被作為 AB 團“要犯”處決，年僅 30 歲。李文林於 1932 年 5 月被中共槍決。

此後就開始大規模肅反。在嚴刑逼供過程中，幾乎無所不用其極。常用的刑法有吊打、烙刑、灌辣椒水、壓杠子、坐老虎凳等等；連燒陰戶、割奶房之類的酷刑也用來對付昔日的戰友；甚至有用洋釘將手釘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內，在各縣的刑法種類無奇不有，有所謂炸刑（萬泰），打地雷公，坐轎子，坐飛機（各縣皆然），坐快活椅子，蝦蟆喝水，猴子牽韁，用槍通條燒紅通肛門（勝利縣）……。就勝利（縣）說，刑法計有 120 種之多……。

在運動中，被審人因經不住酷刑亂供亂咬，使“AB 團取消派”越打越多。肅反機關則公開的說，寧肯殺錯一百，不肯放過一個；使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蟬。贛西南地區的幹部 90%被打成 AB 團分子。永新縣被錯殺的約 1890 人。

1915 年出生的胡耀邦，14 歲跟共產黨鬧革命，反 AB 團時他不過 17 歲。只因被人告發：他和比他大一歲的譚啟龍一起對大抓大殺自己同志表示過不滿，加上他的一個老師被當作 AB 團而遭殺害，他本人又是讀過初中的“小知識份子”。

所以，他和譚就被省委政治保衛局和肅反委員會列入 AB 團成員的名單，並立即逮捕。恰巧在湘贛區視察的少共中央局巡視員馮文彬，對他們有些瞭解，於是就要求把他們帶回中央蘇區“審查”，從而救了他們一命。

這次遭遇，幾十年後仍令胡耀邦心有餘悸。在他去世前的幾天，還對去醫院探望他的馮文彬說：“當年如果沒有你把我帶出來，我就完了；如果把我送回去，我也完了。”

傅連璋在瑞金的時代就一直負責中央高官的保健，毛澤東當年在江西害了惡性瘧疾，全靠傅連璋救了命。可是，傅連璋一家 5 口人都被當成 AB 團打死了。49 後，傅當了衛生部長，1966 年文化大革命時，72 歲的傅被打斷肋骨打破了頭，他給毛寫信說：“我挽救過你生命……希望你現在也能救我一命。”毛原想救他，但後來毛聽說傅曾對其它領導人談論過他的健康情況，這是毛的大忌。1968 年 3 月 14 日秘密逮捕傅，並立即投入秦城監獄。15 天后傅被整死於獄中。傅到死還在要求見“毛主席”，在迷惑與悲憤中走完了他自己的一生。

當時陳毅對殺 AB 團表示懷疑，釋放了多名 AB 團分子。他就受到了懷疑。後來，在一次戰鬥之前，毛澤東同志把打土豪得來用作軍費的一些金子交陳毅保管。陳毅想到，毛澤東同志這樣信任我，我就不怕任何李韶九了。李韶九冷笑說：“過不久，我就要有匹好馬，有條好槍了。”陳毅聞之大怒：“老子是有好馬、好槍，誰敢來！”話雖這麼說，終究不得不警惕。

一天，陳毅被召去開會。他感覺此行可能一去不復返，臨行時特意對年輕的妻子蕭菊英說：“我去開會了。等到今天下午六點鐘我還沒回來，你就快走，到你老家信豐藏起來。如果我沒有事，我會派人把你接回來的。”蕭菊英噙著淚，目送丈夫帶著好槍、騎著好馬遠去。

會上陳毅沒有被抓，當他輕鬆地踏上歸途時，遭遇到白匪襲擊，馬被打死了。他只好與警衛員徒步繞道而歸。晚上八時，他終於匆匆趕回。他在漆黑的夜幕找尋妻子的身影，在淒冷的晚風中呼喚妻子的名字。他沒有想到深愛著他的妻子見愛人六時未歸，以為他已被打為 AB 團，竟跳井殉情。

陳毅悲痛欲絕，摟著愛妻冰冷的屍體痛哭不已。埋葬妻子當天的夜晚，在空蕩蕩的房中，陳毅觸景生情，摸去臉上的淚水，揮筆憤書，吟詩挽妻：

泉台幽幽汝何之？檢點遺篇幾首詩。

誰說而今人何在，依稀門角見玉姿。

檢點遺篇幾首詩，幾回讀罷幾回癡。

依稀門角見玉姿，定睛知誤強自支。

正當送葬歸來夜，泉台幽幽汝何之？

昔日汝言生者好，我今體味死者高。

艱難困苦幾人負，失友中年淚更滔。

1931 年春節前夕，長汀縣南陽“龍田書院”的操坪上，中國工農紅軍第 12 軍召開紀念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先驅李卜克內西、盧森堡的大會。大會結束前，第 100 團團部的青年幹事吳拙哉伸出右臂呼口號：“堅決擁護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萬歲！”眾人齊呼。結果導致了大肅反，損失極其慘重。在 1931 年 3 月 2 日召開的閩西第一次公審處決大會上，閩西肅反委員會主席林一株明確宣佈懲處“社黨分子”的三項原則，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即出身不好者處以死刑，其依據是，“地主富農子弟，在鬥爭中必然會背叛革命”。

究竟有多少人蒙冤而死，歷史檔案沒有確切的記載。1980 年代，經過各級組織和民政部門的調查核實，才大體有了一個數字，即能夠統計到的有姓名的受

受害者、犧牲者，計有 6352 人（見於 1986 年 5 期《黨史通訊》中《閩西“肅社會民主黨歷史冤案已平反昭雪”！

1930 年毛澤東在蘇區首開殺戒，十萬紅軍將士成了冤鬼。據披露，在瑞金，萬人坑就有十幾處（見李忠道《毛酋秘聞》1976 年 6 月版）。僅中央蘇區就殺了“AB 團”7 萬多人、“社會民主黨”6200 人、“改組派”2 萬多人。

1989 年 2 月由戴向青執筆的《關於富田事變的調查報告》長達萬餘字的第二稿完成，經過富田事變事件覆核小組在京成員第三次字斟句酌的修改後，於 1989 年春夏之交上報中央。隨後，中央又派由中組部組成的覆核小組來江西，又一次進行實地調查，可謂慎之又慎。戴向青送走中組部覆核小組，苦苦地等待著，但卻始終沒有回音。

1991 年經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代表黨中央批准出版了幾部書，對肅 AB 團與富田事變作了比較公正的、科學的結論。特別是在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和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裡，已明確地肯定肅清“AB 團”和“社會民主黨”的鬥爭是嚴重臆測和逼供信的產物，混淆了敵我，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

3·周恩來屠殺顧順章親友

1931 年 4 月，顧順章乘中共秘密設置的祥泰木行貨輪，護送當時中央負責人張國燾、陳昌浩由上海到武漢。顧在武漢停留期間被捕，捕後稱須見蔣介石後才能供出情報。去去見蔣介石前，先去極密電報。可當時中共的錢壯飛已潛入國民黨的組織部調查科，為機要人員，當時該科負責人徐恩曾不在，錢閱電文後，立即派人告李克農，並以最快速度通知周恩來，周安排中共連夜撤離。第二天 4 月 28 日國民黨既展開大規模逮捕，結果是撲了個空。

身為軍委主席的周恩來對此極為憤恨，經精心策劃後在同年 5 月，與康生(趙容)率紅隊洪揚生、李龍章、王竹友等五人，在一個漆黑的夜裡，殘忍地殺掉了顧順章一家老少；包括顧妻、岳父母、小舅、小姑和保母。顧順章的小姨子張家寶是鄉下來探親的農婦，根本與顧的叛變無關，也被殺手們活活勒死。顧的家人完全無辜，被殺前還在樂呵呵地替共黨工作呢！

周在黃埔軍校的學生斯勵那天在顧家打麻將，他的哥哥斯烈是國民黨二十六軍第二師的師長，1927 年“四一二”事變時，周恩來被第二師扣押，有生命危險，是斯勵念師生之誼幫他逃出了虎口。那天為了不走漏血案的風聲，斯也被周殺死活埋。這一事件中當場被殺的有 30-40 人。在行刑過程中，康生的表現比周更堅決、冷酷。

對這次屠殺案的揭露，是因當時參與紅隊王竹友被捕後招了，他帶人到顧家後院挖出許多具屍體。這事在當時上海各報都登載了，哄動了整個上海。顧說這是“殘酷獸行，滅絕人性”，與封建王朝都慎用的滿門抄斬沒什麼區別。

4· 殺人狂——夏曦

夏曦，生於 1901 年，死於 1936 年。湖南益陽人，早年就讀於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和毛澤東是校友，是新民學會的成員，他和毛澤東等人一道參加了驅逐張敬堯的運動。1921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二大”當選候補中央委員，曾任中共湖南區委員會委員。在黨的五大上，夏曦被選為中央委員，而且也曾是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1927 年 5 月，出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在“馬日事變”前，主持召開省委會議，研究擬定了“包括加強工農武裝和組織工農義勇隊反攻長沙為內容的緊急措施，以應付可能發生的反革命事變。”然而，就在這時，夏曦知道事變將要發生，作為省委書記的他，沒有通知其他同志，自己自

行離開長沙，因此被柳直荀很是看不起，這也種下了後來夏曦殺害柳的原因。

在夏曦到湘鄂西前，湘鄂西特委書記兼紅 3 軍政治委員鄧中夏在蘇區搞“肅反”，就錯殺了不少人。1931 年 3 月 15 日，夏曦抵達湘鄂西蘇區。27 日，以夏曦為書記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監利縣正式宣告成立。5 月，湘鄂西省軍委主席團成立，由賀龍、萬濤、夏曦 3 人組成，夏曦任主席；同年 11 月中革軍委成立，夏曦任中革軍委湘鄂西分會主席。

夏曦在“反立三路線”和“擁護國際路線”的口號下，武斷地否定了湘鄂西黨、蘇維埃和紅軍在長期鬥爭中所取得的成績，提出“徹底改造和充實各級領導機關”，指責周逸群、賀龍為首的湘鄂西的黨是“隨從黨”、“反共產國際”的黨。5 月夏曦取消湘鄂西特委，周逸群改派做兵運工作，未幾，周逸群被夏曦秘密殺害。

5 月中旬，夏曦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擴大會議，決定以監利為中心開始徹底平分土地的工作。各地在實際執行不僅將富農的財產加以沒收，還沒收了一部分富裕中農的土地和財產，打擊了中小商人，從經濟、肉體上消滅地主、富農，擴大了對立面，孤立了自己，造成了嚴重影響。賀龍、段德昌等人堅決反對這些做法。為排擠賀龍對紅軍的領導，夏曦以省委名義作出決定，取消了軍、師指揮機關，將紅 3 軍改編為 5 個大團，受軍委分會直接指揮。6 月 24 日，成立了湘鄂西臨時省委，崔琪、萬濤、彭玉之、楊光華等為常委，崔琪為省委書記。但崔琪不久即赴上海治病，楊光華代理省委書記，後正式任省委書記。萬濤接替鄧中夏出任紅 3 軍前委書記兼政委。湘鄂西省委給鄧中夏以“最嚴重警告”，撤銷了他黨內外一切職務。

夏曦的冒險路線使得紅二軍團接連受到重創，萬濤、潘家辰、段德昌給中央

寫信控告夏曦，夏曦反咬一口。在 1932 年 1 月的湘鄂西省的第四次代表大會上，激烈反對夏曦的萬濤、潘家辰等人受到打擊，中央代表關向應傳達了臨時中央對萬濤、潘家辰等人的嚴厲批評和支持夏曦的決定，大會撤銷了萬濤、潘家辰的職務，給予段德昌等人以警告處分。關向應提出自己擔任肅反委員會副書記，推舉夏曦為書記，江奇為肅反委員會委員兼政治保衛總局局長。

湘鄂西蘇區第一次“肅反”（反“改組派”鬥爭）開始於 1932 年 4 月，先從地方開始，爾後波及到紅 3 軍。先是湖北天漢縣委軍事部副部長楊國茂被敵營長張錫侯誣供，夏曦、楊光華即武斷地認為楊國茂是“改組派”而將其處決。接著進行逼供訊，捕獲了眾多的“改組派”分子，不到兩個月便“破獲全蘇區的整個反革命組織”。在湘鄂西黨政軍各級負責人中，“9/10 是改組派”，僅省委常委中，就有“反革命”兩人，另一個人值得懷疑。夏曦等人誣陷湘鄂西各級黨組織是“假共產黨之名的反革命團體”，因而先後解散了一批縣委。

不久，“肅反”波及到了紅 3 軍。紅 8 師的特務隊長因違反紀律，殺雞宰牛吃，在受審訊時承認自己是“改組派”。翌日，紅 8 師參謀長胡慎己就被逮捕，說他是改組派，隨後被殺。文家墩戰鬥結束後，夏曦逮捕了紅 3 軍參謀長兼紅 7 師師長孫德清和紅 7 師政治部主任孫之濤。接著，夏曦公開表態說湘鄂西蘇區混進了大量的改組派、托洛茨基派、AB 團、第三黨、取消派等等，相當複雜，一時湘鄂西人心大亂。

第一次“肅反”被捕殺的各級紅軍幹部和地方幹部達千余人，其中師以上幹部 27 人，都是紅二軍團和湘鄂西根據地的創始人。包括：湘鄂西省委委員、湘鄂邊特委書記周小康（他搞過“肅反”擴大化，在湘鄂邊殺害了許多無辜幹部，最後還是被夏曦、楊光華殺掉），省委委員、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視員尉士筠，宜

昌特委書記張宗理，湘鄂西蘇維埃工農監察委員會副主席、黨校校長侯蔚文，湘鄂西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劉革非，蘇維埃黨團書記彭之玉，湘鄂西總工會黨團書記張昆弟等等。在紅 3 軍中捕殺的幹部有紅 3 軍參謀長兼第 7 師師長孫德清，紅 6 軍創始人之一、紅 8 師師長段玉林等（參見賀彪著的《湘鄂西紅軍鬥爭史略》）。

江奇發明了“鴨子澆水”、“背火背簍”等 20 多種酷刑，不死即殘。紅 9 師政治部主任戴君實在被打昏後指認了名單上的人，他對湘鄂西省委代理宣傳部長莊曉東說：“但願早死，請您為我們昭雪吧”（莊曉東：《歷史教訓要講清楚》）。已犧牲的湘鄂西蘇區主要創始人周逸群，被夏曦誣為“改組派首領”。根據潘家辰之妻莊曉東的回憶，省委巡視員潘家辰被捕以後，右手被打斷，但他至死不承認自己是“改組派”，並大聲喊叫著要他們拿刀來，剖開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來，看看是黑的還是紅的；後來又連續毒打，以致神智不清，關節全被打斷，最後他只求一死。萬濤被捕以後被通宵拷打，哀號之聲慘不忍聞；等到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開公審大會，讓群眾以亂棍活活打死。

曾任紅 3 軍前委書記兼紅 3 軍政委的萬濤被捕後被通宵拷打，哀號之聲慘不忍聞。等到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開公審大會，讓群眾以亂棍把萬濤等一批湘鄂西根據地的創始人當眾打死。對於萬濤的被捕，身為紅二軍團政治部主任柳直荀非常不滿，他對別人說：“夏曦就是對自己人狠毒，其實他是個十足的膽小鬼。”這話傳到夏曦的耳朵裡，聯想起他自己馬日事變的醜事，立刻決定逮捕柳直荀。這時，柳還蒙在鼓裡，還準備找夏曦談談萬濤被捕的事情，哪知道，剛一出門就被迎面而來的江奇抓獲，當場就把柳直荀打昏了。抓到政治保衛局監獄裡，副局長彭國材是柳直荀的老朋友，他準備放柳直荀跑，柳直荀還天真的要向上面反映，彭國材說你反映個屁，他們都是一夥的。結果，事情一拖，被江奇發覺，連帶彭

國材也被捕殺掉。楊光華網羅罪名，說柳直荀是紅3軍裡“改組派”的書記，在撤離洪湖前夕將其殺害。根據柳直荀妻子李淑一回憶：柳直荀被捕後幾乎每天都被拷打至深夜。判死刑的那天，他其實已經殘廢了，但還是被亂棍打死，死後屍骨無存，一直沒找到。

當時撤離洪湖蘇區時，夏曦下令政治保衛局將“肅反”中逮捕的所謂“犯人”一半槍決，另一半則裝入麻袋系上大石頭拋入洪湖活活淹死了，“嚇得農民不敢出湖打魚，因為打撈上來的多是死屍，湖水變了顏色”（莊東曉：《歷史教訓要講清楚》）。“洪湖到現在還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夏曦、楊光華等還倉皇扔下後方機關和幹部、群眾于不顧，以致他們許多人死在國民黨軍的屠刀下。楊光華作為湘鄂西省委書記，是夏曦一手提拔起來的，但他在敵人逼近時卻攜款臨陣脫逃。

據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的報告，在第一次反“改組派”鬥爭中，湘鄂西蘇區黨政軍各級幹部被捕的達“千餘人”，“處死刑者百數十人”。實際上在洪湖殺了3萬7千多自己人。賀龍回憶道：“夏曦……即使在戰鬥最激烈時依舊搞‘火線肅反’。…洪湖的區縣幹部是殺完了。紅三軍中到最後有的連隊前後被殺了十多個連長。夏曦在洪湖殺了幾個月（即第一次肅反），僅在這次肅反中就殺了一萬多人。現在活著的幾個女同志，是因為先殺男的，後殺女的。敵人來了，女的殺不及才活下來的。

1932年8月，夏曦又指揮開始第二次“肅反”。第二次“肅反”從湖北京山縣六房咀開始，一直持續到長途行軍結束為止。賀龍回憶：“洪湖失敗後，夏曦與紅三軍在大洪山會合，在那裡打圈子時，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間殺人。捉人殺人都沒有材料根據，都是指名問供。比如捉樊哲祥、譚友林等，因為他們曾

在段德昌的領導機關刻過油印”。

在“火線肅反”中，夏曦首先逮捕了“企圖把七師拖走的”紅7師師長王一鳴、政治委員朱勉之、湘鄂西軍委分會參謀長唐赤英等人，將他們殺害。紅3軍教導第1師參謀長董朗，被譽為“是文武雙全不可多得的軍事人才”，于當年11月被錯殺于江陵縣沙岡。

由於洪湖突圍時蘇區黨政機關基本上沒有帶出來，所以，“火線肅反”的物件全部是艱苦轉戰中的紅3軍指戰員。當時幾乎每個團都有“改組派”連，把那些受審察的同志集中在一起關押，行軍時用繩子捆成一串，有時甚至用鐵絲穿在鎖骨上，每個人還要背上比別人更重的負荷，並且隨時都有被殺害的可能。許多人剛從與敵人拼殺的戰場上下來，身上還留有硝煙和傷痕，未經任何審判，也沒有絲毫證據，僅憑一點懷疑，就被當作“改組派”殺害了。第二次“肅反”被屠殺的普通戰士和群眾已無法統計，其中僅團營連幹部就有241人。

夏曦還企圖對多次批評自己的賀龍下手，逼他寫聲明書，說：“你在國民黨裡有聲望，做過旅長、鎮守使等大官，改組派可以利用你的聲望活動。”賀龍回擊道：“你給我寫聲明書，民國12年，我在常德當第九混成旅旅長時，你拿著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執行委員的名片，來找我接頭，問我要10萬塊錢。……你殺了這麼多人，是什麼共產黨員？”使夏曦很尷尬。

當部隊轉移到商南竹林關時，夏曦無意中透露了9月蘇區中央局給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電報。這封電報是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針對夏曦的分兵策略而發的，主要精神是要紅3軍集中兵力，以遊擊戰術將敵各個擊破，而不是按照夏曦的“分散與持久硬打”（《周恩來軍事文選》第一卷）。賀龍和關向應對夏曦這種封鎖中央局的電報做法極為不滿，向夏曦提出嚴正的抗議。夏曦乾脆命

人把賀龍和關向應警衛員的槍下了，賀龍即把身上帶的一支勃郎寧手槍掏出來放在桌子上，說：“還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給，這是我的，我當營長時就帶著它了。”由於賀龍在紅 3 軍中享有崇高威望，夏曦未敢對他輕舉妄動。

1933 年初，在湘鄂邊的毛壩召開了湘鄂西中央分局會議；賀龍提議全力恢復湘鄂邊根據地，夏曦對此表示同意，但卻反對整頓紅 3 軍和停止“肅反”，主張在紅 3 軍中進行“清黨”，繼續“肅反”。關向應支持賀龍，夏曦就指責關向應“右傾”。夏曦關於解散黨和創造新的紅軍的提議，引起賀龍、段德昌、宋盤銘等人堅決反對。但夏曦有“最後拍板權”，“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對，只要中央分局一個人贊成，也必須按書記的決定執行。這是非服從不可的”（賀龍：《回憶紅二方面軍》）。在 1933 年 2 月紅 3 軍達到巴東縣金果坪後，夏曦悍然做出了解散黨團組織的決定，並宣佈“省蘇維埃是反革命把持的團體”。他另組湘鄂西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上由夏曦、賀龍、關向應等 7 人組成，而實際上大權操縱在夏曦手中。

夏曦將紅 3 軍和地方、遊擊隊中的所有共產黨員實行清洗，重新登記，結果在紅 3 軍和地方中只剩下了夏曦、賀龍、關向應、盧冬生 3 個半個黨員。盧冬生是中共中央派來的交通員，第三次“肅反”後任紅 7 師師長，工人出身，因而保住了黨籍。夏曦有時不讓他參加中央分局擴大會議，或者讓他參加卻不讓他發言，只能算半個。到了 1933 年秋天，經過賀龍、關向應的堅決鬥爭，夏曦才同意在紅軍中重新登記黨員，恢復了黨的組織和政治機關。

第三次“肅反”是 1933 年 3 月發起的。夏曦認為原湘鄂邊黨政軍機關的領導職務“完全為改組派把持”，“改組派”領袖是周小康、陳協平、楊英、王炳南。當段德昌和宋盤銘寫信建議回洪湖時，夏曦即說段德昌是“分裂紅軍”，是

“改組派破壞湘鄂邊蘇區路線”的陰謀，要“嚴厲打擊”。第一天提出批評，第二天就逮捕了段德昌，段德昌不但被連續毒打，在金果坪“公審”後，江奇還故意用鈍刀斬其首，特意延續他的死亡痛苦。

段德昌 1925 年入黨，畢業於黃埔軍校第四期，是彭德懷的入黨介紹人，曾任紅 6 軍政委、軍長，新 6 軍軍長，紅 9 師師長。段德昌曾對夏曦的錯誤曾進行過堅決的鬥爭，說：“中央過去給我們派個鄧中夏，鬧了一團糟；現在又派來毫不懂軍事、遲疑不決的夏曦，對我們無絲毫的具體指示，只會叫我們拼命”（賀彪《湘鄂西紅軍鬥爭史略》）。

在第三次“肅反”運動中，湘鄂邊紅軍和蘇區的創始人之一、紅 9 師參謀長王炳南也被殺。王炳南在被害前憤然說：“我在哪裡參加改組派還沒有搞清楚就殺我，真是冤枉！”王炳南被殺前已被打斷雙腿，是被人架著砍死的。王炳南被殺後，他的二兒子也被殺害。

被打折十指的陳協平則被石頭砸死。這些難以想像的殘忍惡毒，即使是在中共編造出來的“渣滓洞”、“白公館”、“上饒集中營”等神話中也從來沒有過。

第三次“肅反”株連廣泛，中央分局給中央的報告中稱逮捕 236 人，處死 56 人（《湘鄂西中央分局報告》）。而實際上被捕被殺的人數遠遠超過了這個數字，應在千人以上。

第四次“肅反”開始於 1933 年 5、6 月間，一直進行到 1934 年春天。結果，殺掉宋盤銘等團以上幹部在內的 3 千多人。由於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員宋盤銘在實際工作中抵制夏曦的“清黨”錯誤，被夏曦誣陷為“改組派”領袖。當時有情報說宋盤銘在上海的熟人中有人叛變，夏曦立即借機抓了宋盤銘，開始了第四次

“肅反”。對於宋盤銘，賀龍是竭力保護，但夏曦卻非殺不可，賀龍尋機把宋盤銘放了，被夏曦發現後又抓了起來。1933年12月29日，宋盤銘被“公審”後殺害。賀龍說：“宋盤銘是很好的同志。殺宋盤銘只有我一票不贊成，當時關向應要是硬一點，可能殺不了”（賀龍：《回憶紅二方面軍》）。

在第四次“肅反”中，擔任紅7師師長不到兩個月的葉光吉和紅7師政委盛聯均也被殺害。曾救過夏曦性命的紅8師22團團長賀炳炎（1955年授上將軍銜）被捕的“罪名”是與一個所謂的“改組派”一起下過館子，被打成“改組派”成員，開除出黨，隔離審查。後因賀炳炎任職的團作戰失利，師長盧冬生向夏曦“借”賀炳炎出來指揮。賀炳炎指揮部隊反擊，取得大捷。戰後賀龍、關向應向夏曦說了話，賀炳炎才得解脫。

賀龍從夏曦的手中救了不少人。解放後曾出任江蘇省軍區司令員的劉林，是在被拉出去要槍斃時，被賀龍看見了才救了下來。王尚榮、黃新廷、譚友林、賀彪、楊秀山、毅志標等都是被賀龍從夏曦的刀下救出的（毅志標：《難忘的歲月》，《賀龍在川東南》）。

深受夏曦器重、執掌“肅反”生殺大權的薑琦，在第四次“肅反”竟被查明是國民黨特務。薑琦可以說在紅3軍中是夏曦一人之下、眾人之上的人物，他隨身攜帶一個小本子，懷疑誰是“改組派”，就把名字記下，只要夏曦同意，就立即將其逮捕、處決。夏曦見自己最信任的人竟是國民黨特務，極為氣惱，立刻下令將薑琦逮捕。薑琦見事情敗露，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戰士擊斃。紅3軍由此除去一大害。

夏曦在兩年多的時間，竟然殺掉數萬自己人。他自己身邊4個警衛員，被他親手殺了3個！完成了四次大肅反的湘鄂西根據地由原來的人馬5萬多人減員為

4 千人，殺得只剩下 5 個黨員（李銳的資料）。這些數字都只統計了軍隊被殺者，未將地方上的冤魂統計在內。考慮到湘鄂西的面積，哪怕採用最保守的統計數字，該區肅反戰果赫赫，為各區之冠。紅 3 軍這時的兵力僅相當於兩個團，已經瀕臨毀滅的邊緣。最後，賀龍對夏曦說：老夏，不能再殺了，再殺就殺光了。夏曦大約也感到人馬太少，故而默默無語。以紅軍裝備之緊張，紅三軍竟然出現槍比人多多的怪現象，而且士兵沒人敢當班、排長，生怕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徑。

中共統治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最反動、最血腥、最野蠻的一頁。在中共上臺前，其對所謂“蘇區”和“解放區”的統治，更是黑暗中之最黑暗者。中共蘇區的肅反不但先於史達林的大清洗發生，而且和後者呈現了令人驚訝的相似，特別是湘鄂西蘇區肅反更是如此。夏曦堪稱中國的小史達林，用大屠殺打斷了紅二方面軍脊樑，使之基本喪失了戰鬥力。這和史達林後來發動的大清洗非常相似。史達林本人就是在德國入侵前夕幾乎殺光了紅軍軍官，使得紅軍元氣大傷，才先後在蘇芬戰爭和蘇德戰爭早期大敗的。中共蘇區竟會在不同地域大致同時發生與 6、7 年後史達林的大清洗驚人雷同的平行現象，這一事實就足可證明那是無產階級一黨專政的必然歷程，不可以用領袖的個人素質來解釋的。

5·張國燾大肅反

張國燾 1931 年 4 月進入鄂豫皖蘇區，出任中央分局書記和軍委主席。1931 年 9 月初曾中生、許繼慎等人在南下（曾的意見）還是北返（張國燾的意見）問題上與張有不同看法，紅四軍的一些主要領導就在雞鳴河開會，寫了一份申明書，派人向以張國燾為主席的中央分局陳述意見，官司一直打到中央。張在得到中央的支持後，就發動了大規模的肅反。

1931 年 9 月 13 日，陳昌浩借政治保衛局 8 月在後方醫院中破獲的“AB 團事

件”，根據張國燾“必然有一個反革命大組織”在根據地的想法，到紅四軍接替曾中生政治委員一職，並立即開始肅反。在陳昌浩到前，政治保衛局已在後方逮捕了紅 28 團團長潘皈佛和軍委參謀主任李榮桂，用刑訊逼供和誘出一套許繼慎、熊受暄等人“準備把部隊拉到長江邊準備投降蔣介石”的口供。陳昌浩到達後，立即逮捕十師參謀主任柯元等 20 餘人，隨後逮捕許繼慎、周維炯等幹部。張國燾由新集來到白雀園親自主持“大肅反”，用嚴刑逼供成招，幾乎把參加黃麻、商南、六安霍山起義創建鄂豫皖根據地的有豐富鬥爭經驗的幹部，統加所謂改組派、AB 團、第三黨的罪名殺害了。紅 30 團一個團，被殺的班以上幹部就有 500 多人。

1931 年十月初的一天，一連隸屬政治保衛局的士兵在返回新集途經潑陂河時，遭到駐在該地的六安獨立團少數士兵的零星射擊。張國燾得到報告後立即下令將六安獨立團班以上幹部兩百多人全部抓起來，未經任何審問便被押到潑陂河邊用機關槍打死。張國燾聽完處置報告後只是心疼費去的子彈，指示：“以後要節約每一顆子彈對付戰場上的敵人，對於內部的反革命分子，宜採取另外的辦法解決。”而這“另外的辦法”就成了用刺刀捅、用大刀砍、用繩子吊、用石頭砸。

1931 年 10 月許繼慎在光山新集，被馬活活拖死的，血肉模糊，年僅 30 歲，許繼慎正在懷孕的妻子王望春也被殺；另一個軍首長周維炯被亂棍打死。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寫到：“在這次肅反，被捕者約六百人……實際被整肅的有許繼慎等百人，其中判死刑約 30 人，判各種刑期的徒刑者約百人”。僅 1931 年的 9~11 月的兩個月間，當時張國燾手下的紅軍指戰員被殺掉 1/10，達到 2500 多人（陳昌浩回憶錄）。和湘鄂西發生的情況一樣，殺到後來就完全喪失了理智。所有的人都成了嫌疑物件，不管是誰，只要扣上“改組派”、“AB 團”、

“第三黨”的帽子，隨之而來的就是逮捕處決，到最後竟然連戰士發牢騷講怪話都成了死罪。連戰士的槍口沾點土，米袋子破了，也都格殺勿論！

在肅反中，政治保衛局人員不擇手段，搞“指名逼供”，硬說某人反動，苦打要他承認；否則越打越厲害，打得人死去活來，手足俱廢，最後就乾脆槍決了事。他們對主犯、從犯不加區分，主犯殺頭，從犯槍斃，不僅如此，連“反動”者的親戚朋友小男幼女都遭殘殺。例如，在餘篤三被捕之時，為收集徐向前的“反革命”材料就逮捕了他的夫人程訓宣，程訓宣最後成了“改組派”死於酷刑，被整肅掉的“改組派”幾乎沒有人明白這三個字的確切意義。徐向前其回憶錄中說，1931年冬被殺害的幹部戰士遠不止這個數字。“實在殺不過來了，就用機槍掃射”；殺了五千餘人，比紅四方面軍死于戰場的總和還要多，而當時紅四方面軍還不到三萬人。1932年1月，保衛局到黃安仙居捕人，引起該區幹群的反抗，將保衛局的人攆走，並呼喊：“打倒劊子手張國燾！”爆發了所謂“仙居區事件”。這一事件被定為反革命事件受到鎮壓，殺200人。以後此類事件不再發生。1932年春，大批的抓人、殺人，達到高潮，僅在紅25軍一個軍就被殺害6000人，紅25軍原有12000人，43天的肅反過後，僅剩下了6000人。張國燾當時在會上宣稱：“就是有1萬、2萬也不奇怪，……”。

1950年代初，在原四方面軍鄂豫皖總部的駐地湖北麻城灣點修建農場，挖出了當年肅反被殺的數千具屍骨。一位原保衛局肅反人員回憶：“每天殺一百多人，一人一刀，就是沒死，也壓死了。坑滿後，土封起來又挖一個坑。”張國燾走後，中央代表沈澤民竟然還在繼續肅反，殺了紅27軍軍長劉士奇、紅25軍副軍長兼73師師長廖榮坤、師政治部主任程啟波、獨立6師師長葉啟文、第八路遊擊師師長汪明國、皖西北遊擊司令吳寶才、紅28軍政委江求順等一大批紅軍

指戰員。其中這劉士奇本是毛的連襟，曾在贛西南特委任上首創“抓 AB 團”，害死了無數無辜生靈，引發了富田事變，最後自己卻成了反革命被殺。

1933 年 6 月後，張國燾又在川北根據地開展大屠殺。一個縣就有殺人的權力，隨意殺人；有的鄉開公審大會就殺了，一個縣一殺就是幾千。“解放”後，在原川陝根據地的所在地通江洪口場，挖出了大約 5 千具屍骨的“肉丘墳”，這就是張國燾殺的。

1934 年 9 月的一天，張思德的父親張行品又準備把打土豪收繳的財物上交鄉蘇維埃，村蘇維埃主席胡南台要拿走一些煙土，張行品不許，兩人為此大吵一架。胡南台遂向縣政治保衛局誣告張行品包庇富人張炳均、范有萬。其實，張、范兩人並非富農，也是窮苦人。朱德總司令的弟弟朱雲階當時是儀隴縣大風鄉河壩村蘇維埃主席，也是因被人誣告為包庇富人、敵我不分而遭殺害。縣政治保衛局也不調查，隨即讓胡南台通知張行品到巴中開會。張行品一到達目的地就被捆了起來，嚴刑拷打，張行品拒不承認被指控的“犯罪事實”，再三申辯也無濟於事。幾天後，他在巴中頂山被殺害，時年 57 歲。

徐向前說：“張國燾在根據地的政策很‘左’。如對地方政策，只要當過保長的，多要殺掉。認定是地主、富農的，也要殺掉。其實，有些保長是窮人，大家推舉他出來幹這份差事的。有些地主、富農雖有剝削，但民憤不大，可以改造，不同于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不問青紅皂白，把他們通通殺掉。只能擴大敵對勢力，嚇跑中立者，孤立自己。土地改革、經濟政策也‘左’，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侵犯中農利益，甚至將一些中農劃成地富成份，無條件地剝奪，使他們失去了生產積極性；把小經紀人當資本家打倒，搞得根據地商業凋敝，連日常生活物資都很難買到。俘虜政策上，要兵不要官，放兵不放官，尤其是對營以上被

俘軍官，殺掉不少，增強了敵軍的對抗、報復心理。這些‘左’的政策和在鄂豫皖時期差不多。”

張國燾的“左”還表現在他對川陝地方黨組織和遊擊隊的打擊迫害。張國燾對川陝黨的同志不信任。當時活躍在川東地區的是王維舟領導的川東遊擊軍於1933年10月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奉命改編為紅33軍。但是會合不久，張國燾就在33軍內部大搞肅反和清洗。王維舟回憶說：“最不幸和最令我痛心疾首的，是經過黨多年培養出來的三百余青年革命幹部，遭受了無辜的殺害。……遊擊軍和紅四方面軍剛會合，張國燾派人在宣漢雙河場以開會名義殺害了地下黨的幹部百余名。在巴中縣，張國燾把我們33軍的兩個師長蔣群林、冉南軒從前線調去，也被暗中殺害。又在宣漢清溪鄉三彎崖，于點驗時殺了三個團的團級幹部（其罪狀是他們過去當過保甲長）。又在黃中鋪前線正當同敵人在激烈戰鬥中（當時我在虹口養病），把正在火線上指揮作戰的軍政委楊克明同志撤職調離前方，又將排級幹部以上五十余人都調到後方，大部分被殺害了。未被害的只有少數幾個人。”

張國燾在不過兩三年時間，就把川陝蘇區搞得民窮財盡。儘管取得了一些勝利，也無力再堅持下去了。當張國燾決定放棄通南巴蘇區時，他下令“堅壁清野”，所過之處無論村莊城鎮，房子統統燒光。當時的紅4軍政委王建安回憶：“突圍時我在後邊掩護，燒了不少房子。因張國燾說一方面軍有30萬人，與一方面軍會合就是勝利，要把房子都燒掉。敵人來了讓他們沒地方住，睡不好，趕不上我們。我擔任後衛，燒了一些，不忍心，又留了一些。”原四方面軍幹部柯常青悔恨地說：“過岷江我負責燒的茂州，過江後把橋撤掉，紅軍家屬、孩子、地方幹部都隔在江對岸，我的愛人也在那次被扔掉了。”張國燾不僅殺害了紅四

軍的第一任軍長鄭繼勳（用繩子勒死），其他高層領導人曾中生、餘篤三等凡不滿張國濤的人都被殺害。曾中生因在紅軍中的威望很高，不敢公開殺，是在長征的途中的 1935 年 9 月在張國濤的住房裡用繩子勒死的。紅四方面軍的大屠殺主要是張的責任。張是黨的元老（周恩來曾親口對他說：“這個黨是你建立起來的”），還是黨內唯一得過列寧勳章的人。

中共宣傳的蔣介石大殺共產黨人和群眾也只 5 萬人而已。事實上，國民黨是不亂殺人的，國民黨只殺共產黨人，但並不株連；而且國民黨也給共產黨人投降的機會。

1931 年 6 月，中共中央指示：“蘇區內部肅清反革命的工作，必須變成經常性的系統工作，必須立即在各蘇區成立起‘政治保衛處’的專門組織”。1931 年 11 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政治保衛局成立。此時的國家政治保衛局已經具有特種部隊的性質，即在蘇維埃境內執行偵察、壓制和消滅政治上、經濟上一切反革命的組織活動、偵探及盜匪等任務。“秘密工作是保衛局工作的主要原則”，“在偵察和監視反革命派別活動或嫌疑分子時，則是絕對秘密的”。根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治保衛局組織綱要》規定，地方省縣兩級設分局，縣以下設特派員；軍隊方面在中央軍事委員會、蘇區軍事委員會及軍團、軍兩級也設立分局，軍以下設特派員。分局長、特派員的任免處分權，統歸於國家政治保衛局，並實行垂直領導，各分局和特派員在政治上受當地各級政府或紅軍中政委指導，工作則隸屬於國家政治保衛局。地方政府或紅軍指揮機關無權改變或停止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命令。

紅軍時期，中共除了以黨委（政委有監督、撤換同級軍官的特權，軍官的命令沒有政委的副署沒有效力，政委通過政治部）領導軍隊外，還通過中共中央政

政治保衛局在軍隊建立了直屬中央的監軍系統，暗中派有政治保衛局的人員，名義上屬於各級政治部，實際上受中央政治保衛局直接指揮；而且軍隊長官的警衛員也屬於中央政治保衛局派遣，平時保衛長官的安全，附帶監督長官的言行；若長官有異常行動，警衛員可以緊急制裁。鄧華說，第七軍長李明瑞企圖逃亡，被身邊的警衛員槍殺。張國燾在其回憶錄中評論道：中央是黨員選舉出來的，若由中央設置保衛局監視黨員，那不是中央專制黨員了嗎？黨是信仰相同的志願結合，合則留，不合則去，哪裡有什麼叛黨之說？只有黑社會，幹了見不得人的事，才怕其成員揭露。而且黨章規定：對黨員的最高制裁就是開除黨籍，無權剝奪他人自由和生命。若剝奪他人自由和生命，說明黨已經變質。可惜，張國燾醒悟過遲。

在中共早期的“革命”之旅中，每個毛孔都流淌著鮮血。它從一造反起便以反民主和反自由為旨歸。中共自始至終都是一個暴虐的獨裁黨，不曾有過與“五四”精神息息相通的時期，也不曾有過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時期。但願今天的中國人早日認識到這個簡單的常識。

6·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1931年11月7日即蘇俄的國慶日，中共在蘇俄的旨意下，在中國江西瑞金篡立了認俄為祖的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根據史達林內定，毛當了主席。這個傀儡政權是繼“烏梁土文人民共和國”及“蒙古人民共和國”之後的第三個傀儡政權。這個政權從名稱到制度全部執行蘇俄的一套，並按照蘇俄的指示行事。它的中央政府秘書長鄧小平在宣言中繼續提“武裝保衛蘇聯”，號召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起來實行民族自決並成立獨立國家。

俄國人所以要“援助”中國革命，目的“是要找尋它的東方打手，俄國人所需要的是可靠的附庸，並非獨立的中國”（張國燾：《序》）。共產黨人為了向國

民黨奪權，便甘當蘇俄走狗，當年蘇俄代表李 X 就是江西蘇區的太上皇，“他的一句話，幾乎就是一紙命令。”

中共在中央蘇區建立起一套直接脫胎于蘇俄的政治、經濟、軍事動員及意識形態體制。在中央蘇區內，黨的領導機構——由蘇區中央局、中共中央局演變而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處於主宰一切的地位。在政治局常委會下，設立了黨的軍事決策指揮機構中革軍委，下轄中國工農紅軍總部。中共中央建立起自己的直屬機關：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黨務委員會、中央審查委員會，以及中共中央黨校（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和中央機關刊物《鬥爭》編輯部。中共中央還直接指導共青團中央——少共中央局。在少共中央局下，另設有領導少年兒童的組織——少年先鋒隊中央總隊部。

政府系統的創設也依照于蘇聯的體制。中央執委會主席與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許可權範圍完全類似于蘇聯：中央執委會主席毛澤東的地位，猶如蘇聯名譽元首加里甯；張聞天的人民委員會主席一職，如同莫洛托夫所擔任的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在人民委員會之下，也盲目仿效蘇聯，畫床架屋設置了 17 個人民委員部及有關委員會。中央蘇區管轄的江西省、湘贛省、福建省和閩粵贛省，也依此例設立了名目繁多，而實際上只是徒具形式的機構。

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中央蘇區瀰漫著濃厚的俄化氣氛，許多機構的名稱都有鮮明的俄式色彩。在黨的教育系統，有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在軍隊內，有少共國際師、工人師和紅軍大學。以後為了紀念被控參與指揮廣州暴動而遭國民黨殺害的蘇聯駐廣州副領事郝西史，將紅軍大學易名為“工農紅軍郝西史大學”；在肅反保衛系統，有國家政治保衛局；在政府教育系統，有沈澤民蘇維埃大學、高爾基戲劇學校、高級列寧師範學校、初級列寧師範學校和眾多的列寧小

學。在中央蘇區，還有“蘇區反帝總同盟”和號稱擁有 60 萬成員的“蘇聯之友會”。每逢列寧誕辰、十月革命紀念日、國際勞動節等眾多的國際共運紀念日，都要舉行各種形式的紀念活動。在一些重要的政治集會上，不僅要組成大會主席團，選出國際共運和蘇聯著名人物作“名譽主席”（如 1934 年 1 月在瑞金召開的第二次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就把史達林、莫洛托夫、加里寧、合爾曼、片山潛、高爾基等都列為大會的名譽主席），還要發出《致蘇聯工人和集體農莊農民電》。



日本人看到蘇俄在江西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他們在 1932 年 2 月跟進成立“滿洲國”。中共現時常叫嚷：“不許分裂祖國”，“不承認兩個中國”。實際上搞“兩個中國”、分裂祖國的不是別人，恰恰是中共自己。中共實在是製造“國家分裂”的始作俑者。

為了維持政權，中共用各種名目榨取農民。其中之一是逼著農民買“革命戰爭公債”。為此政府“號召”婦女剪頭髮，把頭上的銀髮簪“獻”出來，終身積累的首飾銀器也一步步被拿走。買了公債後是“退還公債運動”，把所購的公債無條件退還給政府。有的不怕事的人說：“共產黨發行公債，比國民黨苛捐雜稅還惡。”糧食也是一樣。雖說農民分了田，不必繳租，但得交公糧，還得“借”糧給政府。1933 年 3 月，毛澤東發佈訓令，要農民“自己節省食用，借出谷米，

供給紅軍”。但“借”出的從來沒還過。成年男子大都被征入紅軍，或征去做勞工。共產黨統治三年下來，鄉村裡十幾歲到五十歲的男人所剩無幾。婦女成了主要勞動力。依傳統她們只幹輕活，但現在大部分農活落在她們肩上，還要為紅軍做各種雜事，像挑擔子、照顧傷患、洗衣補衣、無休止地做軍鞋——布料還得自己負擔。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不在計畫之內。有的地方，老百姓連休息的日子也沒有，代替假日的是開會。毛說：“每人每月平均約有五個整天(許多次會合計起來)的開會生活，即是他們很好的休息時間。”

從前的中學大多關了門，成為辦公場所。教育僅限於小學，名為“列寧學校”，教學生識字，達到看宣傳品的程度。孩子們組織起來站崗放哨，還成立“恥笑隊”，去羞辱那些不願參加紅軍或當逃兵的人。十幾歲的孩子有時也被鼓勵向“階級敵人”揮刀行刑。

1933年，周恩來毛澤東在江西“蘇區”執行莫斯科來的指示“消滅地主”，大搞“查田運動”，有田四十畝甚至不滿十畝者都在被消滅之列。毛要基層幹部“查出”更多的“地主富農”，逼他們交出“罰款”和“捐款”，把他們送進勞役隊當苦力。共黨統治已經幾年了，地富早已被挖乾淨了，為了湊數，幹部不得不亂整人。被整的全家“掃地出門”，住在關水牛的牛棚裡。“牛棚”作為監獄的代稱就是這樣來的。毛的運動製造了數萬苦役工，卻擠不出多少錢和糧食。從當時的統計表上可以看出，江西的十二個縣中，只有兩個縣交出了“罰款”和“捐款”，離毛定下的目標天差地遠。農民早已被榨幹了。

因反對此政策而被“開除黨籍一年”的粵贛軍區司令龔楚回憶：清算接連清算，殺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殺到紅軍幹部的家屬，如江西獨立師師長楊遇春，他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財產全被沒收……迫得他冒險逃出蘇區，向國

軍投降……農村中處決地主的手段是萬分殘酷。在未殺前，用各種酷刑，以勒索金錢；等到敲榨淨盡，才加以屠殺。在“斬草除根”的口號下，被指為豪紳地主的的嬰孩也不免於死……。

長汀縣一位替龔楚治過病的老中醫曾因交不出一大筆“捐款”而向他求救，他說了情後那醫生仍被殺掉了。瑞金縣有戶讀書人家，家中只有十多畝田，由兩個讀過書的兒子耕種，是自耕農，算不上地主。可三人都被蘇維埃政府捕去吊打，迫交250元大洋。婆婆與兩個媳婦湊了120元，並將女人家的全部首飾，繳去贖人。但金錢繳了，老人被吊死，兩個兒子也殺掉。殺了男的，仍然逼婦女繳五百光洋，否則大人孩子一起抓。這一家老小六口人向龔楚磕頭求救、流淚。龔楚答應替他們想辦法，但最終無能為力。

龔楚看到的蘇維埃運動，就是把舊的地主惡霸打倒了，而那些地痞流氓又成了新的地主惡霸；貧苦的農民更貧苦，而且一批批的往軍隊裡送，絕大多數都成了冤魂白骨。這種“革命”，除了將有產者變成無產者，而將極少數無產者變成新的統治者外，有什麼意義呢？

這個國中之國就像監獄，每個村子都二十四小時放哨，離開村子得有路條。有個管錢的管理員曾試圖想跑，“挪用”了246塊7毛錢，買了張路條。逃亡沒成功，在大會上示眾後殺掉。據過來人說，甚至“坐監獄的人逃走了，看守監獄的人要殺頭”。

住在紅區邊緣的人逃跑的機會要多一些，有的基層幹部也組織民眾成批地逃，有的地方一晚上逃走幾百人。中共於是把稍有疑點的幹部調到跑不出去的紅區中心地帶。大多數人是在國民黨進攻後起來反抗。在紅色政權最後的日子裡，當國民黨軍隊逼近時，成村的人揮舞著大刀長矛襲擊退卻的紅軍。對付反抗的百姓，

中共的辦法是加強恐怖。在最極端的時候，日常往來都可能招致橫禍。老人們回憶：有的縣“規定各家不能招待客人住宿，如發現誰家接待了客人，不論什麼人，都要和客人同罪殺頭”。

由於需要供養主力紅軍、地方武裝和機關工作人員約十萬多人，加上大量青壯年男子派到外地，蘇區農民實際負擔遠遠高於白區佃農負擔的43%，蘇區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在蘇維埃政府成立一年多裡，轄區內爆發群眾自發的數十起武裝反抗鬥爭。

中央蘇區地處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國下降最多。根據中國人口統計，從1931-1935年，江西根據地內為中共完全控制的15個縣（不包括為中共部分控制的邊緣縣），人口減少50多萬，占總人口的20%。閩西根據地的減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蘇區人口共下降70萬。由於住在這些地帶的人很難外逃，這70萬基本上屬於共黨所殺。

中共每“解放”一個地方，便把那裡的地主通通殺掉，奪取他們的財富；還把那些丈夫還健在的地主富農的老婆、兒媳和未婚女兒強迫分給了貧下中農。

“紅區”（共黨佔領地區）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沒得油水可撈了，便派出突襲隊，趁月黑風高之夜，到“白區”（國民黨佔領地區）去打“土豪”，斬盡殺絕、擄掠一空……久而久之，“白區”靠得近的“土豪”也打光了，老百姓跑得精光，形成一條30多裡寬的“赤、白交界”絕無人跡的“陰陽地界”……1931年5月12日，蔣介石在向國民會議遞交的“剿滅赤匪報告”中即稱：受赤匪荼毒最烈而最慘者——厥惟江西和湖南……江西人民被匪殘殺者約十八萬六千人，難民之陣亡者，約二百十萬人；各縣被匪焚毀之民房，約十萬餘棟；財產之損失約六萬五千萬圓。糧米之損失約三千九百萬擔……湖南匪禍蔓延……計被匪殘殺

者約七萬二千人，房屋被毀者約十二萬餘棟，財產之損失約三萬萬餘圓……凡赤匪蹂躪地區……凡是過去在村莊上有體面的乃至地主或是做過保甲長的人，皆連同親屬被殺害，到處可以看見一個坑裡埋著十人，甚至百人。在死的恐怖面前，人民除了聽從，還有什麼辦法？”

據當時上海《申報》報導，僅鄂、豫、皖邊區，23 縣的人民遭到的禍害計有：

屠殺人數	1, 563, 500 人；
流亡人數	1, 183, 530 人；
燒毀房屋	2, 433, 343 間；
牲畜損失	2, 725, 075 頭；
財產損失	1, 330, 423, 500 元。

1928～1932 年，江西全省 61 個縣人民受到共產黨禍害：

屠殺人數	431, 750 人；
流亡人數	1, 688, 532 人；
燒毀房屋	349, 743 間；
財產損失	442, 529, 110 元

（參見《中共匪黨真面目》第 183 頁，另參見大陸學者貝聿所著《中國左禍》一書。這是俄羅斯最願意看到的，他們通過中共很好地達到了屠殺中國人的目的。1927 年到 1936 年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江西人口從 2 千多萬下降到 1 千多萬，而由毛澤東掀起的肅反運動幾年間就屠殺了 10 萬紅軍和無數受牽連的百姓，其禍之烈，可見一斑。

蘇維埃政府在轄區內外實行屠殺掠奪政策，推行激進的土地制度和商貿壟斷

經營，將廣大農民捆綁在其集體農莊強制勞動，因而受到社會的普遍反對。

中共盲目提出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口號，“焚毀教堂、寺廟，撤毀鐵路、電線”（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共湖北地方簡史》），是太平天國革命和義和團運動的再次重演，嚴重影響了社會安定、經濟發展和抗日戰爭勝利的到來。

中共反對完全符合國情民意的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三民主義”，對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修改不平等條約，恢復中國在國際上自由平等之地位；實行普選制度；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居住、信仰之絕對自由”及土地制度改革的正確主張和不懈努力視若無睹，詆毀“三民主義”是“白色恐怖的旗幟”。據魯訊先生的《鏘共大觀》記載，當年長沙殺共產黨時，萬人爭睹，歡呼雀躍，這是當時的普遍現象。

7·長征時期的亂殺無辜

1934年當紅軍離開江西準備長征時，中共把“不可靠”的、動搖的統統處決。主持這項工作的是周恩來，數千人在他手下命喪黃泉。死者中不少是國民黨俘虜，在紅軍軍事學校任教員。刑場設在封閉的山谷裡，行刑人用大刀把頭砍掉，然後一腳把屍體踢進事先挖好的大坑裡。有的讓將死者自己挖坑，然後活埋。

長征途中，中央領導有權坐擔架，他們大都被抬著走。張聞天夫人劉英回憶說：毛誇耀他跟王稼祥的擔架：“你看，我們設計了擔架哩。我和稼祥，一個病號，一個彩號，抬著走。”毛澤東設計的擔架，竹子抬杆，長長的，爬山方便，抬起來省力，上面用油布做成弧形的蓋，好像南方江河裡的船篷，不怕雨淋日曬。毛後來對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他長征中“坐在擔架上，做什麼？我看書，看了不少書。”

對抬擔架的人來說就是地獄了。長征過來人說：“爬山的時候抬擔架者只能

用膝蓋跪行，有時直到膝蓋跪爛，才能爬到山頂。爬完一座山，灑下一路血與汗。”

領導“坐轎子”是長征中令人氣憤的事。一位長征老戰士在 60 多年後說起來還氣得胸脯起伏：“他們說是說平等，自己坐擔架，地主作風。我們小聲悄悄說，不敢說出來。不過還是有少數人大聲說。”領導給他們做工作：“說中央首長很辛苦，雖然他們不走路，沒有背東西，他們的腦筋比我們苦。我們光走路，吃東西，不管事。”這樣的強詞奪理當然不能服人。“走路不走路”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幹部休養連裡的受傷的、生病的、年老的高幹，沒有一個人死，被人抬著走的中央領導沒有一個人死，哪怕受重傷的也沒有一個人死。相反，比他們年輕得多的擔架夫、護士、警衛員，在長征中累死的比比皆是。中央紅軍到了幹部多、戰士少的地步。

劉志丹指揮西北紅軍在 1935 的 7 月間，就殲敵 5000 餘人、繳槍 3200 余支，先後解放了延長、延川、安定、安塞、靖邊、保安 6 縣，使陝甘邊和陝北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約 20 多個縣域。當時的國民黨報紙說：“陝北劉志丹赤匪部已佔領 6 座縣城，擁有正規紅軍五萬多人，遊擊隊、赤衛軍和少先隊二十余萬人”。當時陝北的民歌的唱法是：“劉志丹練兵石峁灣，要把世事顛倒顛”，“正月裡來是新年，陝北出了個劉志丹”。1935 年徐海東、程子華的紅 25 軍在陝南作戰時，把楊虎城派去聯絡的張漢民團消滅了，團長張漢民是共產黨員，聲稱自己認識劉志丹，也給殺了。徐海東說，白軍認識紅軍裡的人，那紅軍裡那些人也一定是反革命，還帶了一個活口，到陝北來指認。陝北黨委命令把劉志丹、高崗、習仲勳、劉景範都抓了起來。逮捕令誤送到劉志丹手裡，他滿可以先把那些人抓起來，也可以調兵自衛，但他沒有反抗，主動投案。監獄裡，劉志丹戴著沉重的腳鐐，後來長期走路都成問題。酷刑是家常便飯，燒紅的鐵絲曾捅進他一個戰友的

大腿直到骨頭上。許多人被活埋。倖存者習仲勳後來說，他被關在瓦窯堡的一個監獄裡，“埋人的土坑已經挖好，我們隨時都有被活埋的危險。”這次肅反，殺了六、七百人，把知識份子幾乎殺光了。

逃到陝北的中央紅軍只剩下近 4 千人，中央紅軍到達後，11 月底釋放了劉志丹等人，肅反被定性為‘嚴重錯誤’，兩個替罪羊受到處分。肅反使劉志丹們大受損害，他依然留有右傾錯誤的尾巴。劉志丹作為根據地的創始人，只分給很低級的職務：做一幫新兵組成的紅二十八軍軍長。毛派親信做政委，以監控劉。劉志丹沒有怨言，公開表態支持毛。

1936年2月劉志丹奉命率軍東征，4月13日那天，是毛親自下令劉志丹去三交的，第二天，從後面飛來一個子彈把劉打死了，年僅32歲。劉志丹中彈時，有兩個人在身旁，一個是政治保衛局的特派員，姓裴；另一個是劉的警衛員。根據裴的描述，劉志丹中彈後，他叫警衛員去找醫生，“當醫生來到時，劉已完全停止了呼吸”。也就是說，劉志丹死時，身邊只有裴一個人。這使人懷疑劉志丹是被裴或警衛員暗殺的。暗殺是政治保衛局工作的重要部分，給“不可靠”的“首長”派的警衛員通常也是政保部門的人。前紅七軍軍長李明瑞就是在被懷疑企圖率兵逃走時，被警衛員打死的。紅軍將領龔楚在計畫逃亡時，最擔心的也是身邊的警衛員。這是毛的陰謀，不消滅劉志丹，毛在陝北的地位就不穩固。劉的追悼會上許多人失聲痛哭，哭倒在地者無數。毛說：“他的英勇犧牲，出於意外”。當時宣傳說，劉志丹開赴前線，原是為了借道山西到華北去打日本人的，不幸遭到閻錫山的阻擊。這宣傳是為了給中共塗上抗日先鋒的光彩，同時也是給假手消滅地方武裝的一種掩飾。如真抗日，為什麼事先不跟閻錫山溝通，閻不至於拒絕吧！劉志丹在陝北的左右手也在他死的幾個星期內先後被打死：楊琪死於3月，楊森

死於5月初。也就是說，毛到陝北幾個月內，當地的3個紅軍最高指揮官都“死在戰場”。“東方紅，太陽升，陝北出了個劉志丹”的歌曲害死了劉志丹。

遵義會議後，毛不肯進川跟張國燾會師。他怕會師後，張國燾因資歷老會理所當然地當上黨領袖。為了躲避跟張國燾會師，毛帶上中央紅軍繞了一個大圈，多走了4個月，把紅軍從突破湘江時的4萬紅軍拖到不到1萬。跟張國燾會師後，因為紅四方面軍比他強，毛又盡力地破壞紅四方面軍。1936年的10月10日，紅軍一、二、四方面軍經過長征，會師在黃河以東的甘肅會寧城下。經共產國際和史達林同意，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發佈《十月作戰綱領》（即“寧夏戰役計畫”），按照黨中央的指示，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紅四方面軍的三十軍、九軍、五軍，以及紅四方面軍總部、直屬部隊共計21800餘人，先期於1936年10月24日至30日渡過黃河，先北進一條山地區，後又西進河西走廊去接受蘇聯的武裝。

徐向前在其回憶錄中暗示，陳昌浩由於擔心再犯所謂“路線錯誤”，未能及時反抗中央軍委的“瞎指揮”，而是逆來順受、惟命是從，從而遭到以驕悍的回民為主體的“馬家軍”的圍殲。中央軍委應對此承擔主要責任，這已經成為大陸黨史界的共識。這是因為，中央軍委的“指揮”完全失之常理。在短短幾個月中，“軍委”一會兒要求“東進”，一會兒要求“西進”，一會兒又要求“原地待命”。更為不可思議的是，當西路軍損兵折將，好不容易殺出重圍之後，毛澤東竟不顧嚴峻情勢，再次下令“原地堅持”，致使該軍失去最後的生機。對於像毛這樣的“遊擊戰”高手來說，這樣的“指揮”，完全違背了他親手制訂的“敵進我退”的戰略戰術原則。當時有4萬人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奸殺和淪為乞丐。到1937年4月西路軍被消滅得只剩400多人。當這些殘兵逃到陝北蘇區的時，

毛安排高崗繳了他們武器，再把他們一批批一批批騙到山溝裡，把這些四方面軍殘兵都活埋了。

1937 年初，延安演唐僧取經的戲。毛澤東突然對身邊的人說：“唐僧西天取經誰最堅定？唐僧。誰最動搖？豬八戒。”接著他指著坐在他左邊只隔一個座位的張國燾，說：“他就是長征路上的豬八戒。”張國燾聞言大怒，一下站起來，向劇場外走去，罵了句：“無恥。”此時，劉少奇拔地而起。他對張國燾厲聲道：

“你住嘴！”滿場大員，無一人拔刀相助，連毛本人都未拔刀，奴才劉少奇就挺身而出了。劉少奇不愧為一條好狗啊。緊接著，毛澤東發動批判張國燾的運動，衛兵們甚至毆打張國燾，致使張國燾被迫出逃。隨後，張被開除出黨後，毛要張的舊部把張批臭。忠實于張的官兵對此“極表不滿”，他們秘密開會討論應付辦法，結果被包圍，隨即秘密悉數解決，當時被活埋者計達 200 餘人。

第 87 節 蘇俄侵華 中共武裝保衛蘇聯

1848 年《共產黨宣言》說：“工人沒有祖國”。按照這種理論，工人階級只要沒有上升為統治階級，祖國就與他們無關。正是這一理論的影響，中共誕生之初在共產國際領導下的那一時期，一事當前考慮的首先是共產主義蘇聯的利益而不是本國工人階級的利益。

早在中共當政之前，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雷海宗就評論說：“共產黨若是剝去外來的名詞和口號，不過是一個半秘密半公開的，帶有宗教性的，以餓民為基礎的割據勢力。它的唯一真正特點，就是依附外力與否認國家民族…”（1957 年 8 月 22 日《人民日報》）。

蘇俄奪權不久，就以剿白俄兵為名，把軍隊開進中國的外蒙古。1921 年 7 月蘇軍侵佔外蒙古，打敗白俄軍，佔領庫倫。蘇軍在赤塔狂殺中國僑民。扶植由

蘇共訓練的波多任國務總理，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11月，又把這個政府改為“蒙古獨立國”。面對這種情況，北京政府極力反對，並拒絕與之發生外交關係。蘇聯這時也和孫中山接觸。孫中山與越飛簽訂了一個聯合宣言，承認外蒙古主權屬於中國的前提下，贊同蘇軍可以暫駐外蒙。

中共為了推動北京政府在外交上做出妥協，公開主張外蒙問題應依“民族自決”的原則來行事。即允許外蒙古人民自己在這個問題上做選擇：是繼續保持與中國關係的現狀，還是選擇高度自治，抑或乾脆獨立出去。中共的這一看法受到國民黨人的激烈批評。

1936年中共發表社論，反對民國政府收復外蒙。社論如下：“國民黨的報紙說：日本佔領滿洲，英國佔領西藏，蘇聯佔領外蒙；蘇聯必須將外蒙歸還南京政府。帝國主義佔領滿洲、西藏及中國其它廣大領土，這是事實。但是外蒙呢？外蒙的群眾建立了他們自己的人民共和國，外蒙人民共和國與蘇聯有友誼關係，那是極自然的事情，國民黨要求蘇聯歸還蒙古，真是無恥之極。”毛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早就承認蒙古國了。

1945年10月外蒙古舉行所謂公民投票（蘇軍亦參加投票）。國民政府未承認其“獨立”。

蔣介石退到臺灣後，對史達林沒有遵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條款感到憤慨，以蘇聯違約為由，在聯合國狀告蘇聯。當時中華民國仍擁有中國的合法代表權，並且是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中華民國宣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失效，不承認外蒙的獨立，聯合國對此予以承認。這就是至今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版圖上還包括外蒙古的法律依據。

1951年，共產黨的中央報紙《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恬不知恥的說：外蒙

獨立是受到“某正義國家的幫助”，外蒙人民比中國人“幸福”，因為更早的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中國不但不能說它分裂國家，反倒應該為之歡呼祝賀。

1921年9月蘇聯出兵侵佔中國領土唐努烏梁海，組織“土文革命黨”。1926年11月，在蘇俄導演下，成立“烏梁土文人民共和國”；這個共和國與蘇聯訂立密約，由俄國人控制軍事、政治和外交。1944年正式侵並唐努烏梁海地區，總面積約17萬平方公里。

1917年7月25日，蘇俄政府《第一次對華宣言》公開聲明：中東鐵路“歸還中國，不受任何報酬”，這就是後來被中共不斷宣傳的“蘇中友誼的開端”。然而，這一冠冕堂皇的聲明從來都沒有兌現過，而中共的喉舌卻沒有將此一變化告訴過它的愚民。

歷史的事實是：史達林掌權後收回了列寧的承諾，聲稱“為中東路不至於為帝國主義所奪取，必須將該路的管理權保留在蘇維埃政權之手”。在帝俄時代，中東鐵路的盈利由兩國政府分成；從1925年起，蘇聯卻獨吞了全部贏利。在交納中東鐵路費用時，張作霖與蘇方發生糾紛。在張作霖拒絕妥協的情況下，蘇聯於1926年8月命令軍事情報局採取暗殺行動。1928年7月4日，張作霖乘專列從北京返回瀋陽，當行駛到瀋陽郊區的皇姑屯車站時，專列車廂突然發生爆炸。令蘇聯感到意外的是，日本為排除蘇聯在中國東北三省的影響力，主動承擔了炸死張作霖的責任（詳見《青年參考》2003年9月4日《張作霖元帥之死檔案》）。

接著主政東北的少帥張學良，多次同蘇聯交涉未果。1929年5月27日，東北地方政府查明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竟是蘇聯指揮中共叛亂的巢穴，遂逮捕了正在裡面開會的39名中共黨員。7月10日，我國東北軍政長官張學良命令中東鐵路督辦呂榮寰，按照中俄協定免除俄人局長職務，並解除蘇籍共產黨份子高級職

員 59 人的職務，搜查俄人用作間諜活動的職工聯合會、國營貿易局等機構；並根據 1919、1920 年蘇聯政府曾公開發表的“放棄一切與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放棄沙皇俄國在中國所有特權”的聲明，宣佈接管中國境內的“中東鐵路管理權”。從而打擊了蘇俄深入中國的侵略勢力。

1929 年 8 月，蘇聯不承認自己以前的宣言和聲明且宣佈與中國斷交，並借此對中華民國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爭。蘇俄在遠東原駐 3 萬人的軍隊，為入侵中國，又在西伯利亞召 10 萬人入伍，還從俄內地派來 7 千的秘密員警。8 月 11 日，蘇俄大軍在東自綏芬河西到滿州裡的中國沿邊重要城鎮和地區的全面侵犯。中國政府命張學良的東北軍進行抵抗。

當中國軍隊為反抗蘇聯侵略浴血苦戰之際，中共卻奉史達林之命發起了“武裝保衛蘇聯”的運動。他們高喊：“使蔣介石政府在戰爭中失敗”、“以廣大群眾的革命暴動，來消滅帝國主義國民黨強盜進攻蘇聯的戰爭！”；李立三、惲代英等頭目，更公開發表文章擁蘇反華。中共還發表了《中央通告第 41 號：中東路事件與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中央通告第 42 號：動員廣大群眾反對進攻蘇聯》、《中央通告第 49 號：擁護蘇聯與反對軍閥戰爭》等重要文告，公然以所謂的“階級的共同利益”取代國家民族利益，推行賣國暴力。

中共的倒行逆施受到全國的一致反對，馮玉祥、閻錫山、吳佩孚、張作霖等軍閥，都發出聲討赤俄肅清共黨的宣言通電，主張一致對外。匪黨創始人陳獨秀良知尚未泯滅，儘管他已被罷免，他於 1929 年 7 月 28 日致函中央，稱中共的做法會“使群眾誤會我們只是盧布作用，而不顧及民族利益”。對此，中共於 8 月 3 日復函陳獨秀，嚴厲指責陳“站到了資產階級立場，忘記了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並進而組織對陳的批判，指控陳是“反蘇”份子。

這期間，史達林通過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要用武裝暴動和進攻中心城市的革命行動來牽制中國政府，以幫助蘇聯在中國東北的侵略戰爭。1929年9月26日，給中共發來了命令：“誰忠誠地、真正地、堅定地、毫無保留地武裝起來保衛蘇聯，誰才是革命者，才是國際主義者”。史達林的這個命令，收集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史達林全集第十卷裡。

1929年10月26日，史達林命令共產國際發來電報，要求中共堅決“武裝保衛蘇聯”，並明確指出，“武裝保衛蘇聯就是要在全國發動武裝暴動”。

1929年11月，當時的中共最高負責人李立三即在中共江蘇省“二大”上宣佈：“中央提出的‘武裝保衛蘇聯’，就是全國的武裝暴動。”

192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發表了第六十號通告，它的標題就是“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實際策略就是全國的武裝暴動”。中共黨史專家卻對此明白說道，“共產國際命令中共發動武裝暴動的一系列指示，就是要適應蘇聯對中國中東路戰爭的需要”。

共首李立三建議：為了儘快地實現社會主義，蘇聯應立即對日宣戰，蒙古應立即調兵打中國，而且蘇聯應該武裝在西伯利亞的幾十萬華工，讓他們打回中國；李立三號召全國所有城市都舉行起義。為此，取消了中國的工會、共青團和黨組織，而成立了準備進行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而蒙古共黨則宣佈，與中共的中華蘇維埃結成聯邦，並派出軍隊進攻中國北方地區。此時，周恩來、劉伯誠、葉劍英等人，由俄國人每月供應3千萬盧布，從俄國到中國東三省，召集中國、日本、朝鮮的共產黨徒，組織義勇隊，參加俄國的侵華戰爭。



(錢幣反面 發行日期 1931)

9月19日，俄軍炮毀我吉林綏濱城。同時，在三江口、同江、富錦、樺川、滿洲里、紮蘭諾爾、密山、綏芬河等地都進行激烈的戰鬥。11月17日，蘇俄軍出動飛機、大炮、坦克，猛襲紮蘭諾爾。駐守紮蘭諾爾的東北軍第17旅7000余官兵在激戰後傷亡殆盡，旅長韓光等全部陣亡。美、英、法等國見中國軍隊敗北，立即出面調，以致中國政府於12月22日再次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蘇伯力會議協定書》，承認恢復衝突之前的屈辱狀態。

1929年以前黑瞎子島上（350平方公里，加附近海域共450平方公里）駐有中國張學良的軍隊。張學良所部三艘軍艦全被蘇海軍擊沉，佔領了黑龍江主航道中國一側的黑瞎子島等三個島嶼，並將島上的居民用繩索綁到輪船上送回南岸。目前，不但俄人在該島建有一萬多間別墅，還建有從俄國城市伯力（俄稱哈巴羅夫斯克）跨越主航道到該島的浮橋。

1929年史達林對中國的戰爭還產生了一個至今仍然困擾中國的歷史遺留問題：蘇聯剝奪了中國在圖們江上的航行權，封閉了中國前往日本海的出海口。近

十來年，中國為獲得在日本海的出海口費了很大的勁兒，但難以成功。由於在日本海沒有出海口，中國在地緣上蒙受了巨大的損失。黑龍江省和吉林省與外界的運輸不得不依賴運力已達極限的鐵路和遙遠的大連港和營口港，這對兩省的經濟發展極為不利。

中共一邊打著“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崇高旗幟，一邊卻拿著侵略者的資助；它聽命于侵略者，在侵略軍殺害中國軍民的時刻，公開宣佈武裝保衛侵略國，並以武裝暴動進攻本國政府，配合侵略者的軍事戰略。1929 年的那一場遍及南中國城鄉的武裝暴動，就因此而爆發。中國人與俄國人一起殺害中國人，這就是中共的“革命”。

第 88 節 與日本勾結假“抗日” 屠殺真抗日

1. 中共誘發西安事變

1931 年日本人看到蘇俄侵略中國，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日本關東軍 19000 人，東北軍 19 萬人不戰而退，關東軍 3 天佔領瀋陽，一周控制遼寧，3 個月控制東北三省。日本人侵佔東北後，蘇俄的加拉罕告訴日本外相廣田弘毅，說蘇俄無意干涉東三省事件。蘇俄的表示，不是它不想侵華，而是它的侵華熱點已轉移。

9 月 20 日，共產國際立即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十一次全委會會議，通過了“關於當前中國共產黨的緊急任務案”，命令中共繼續執行“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立即發動全國城鄉的武裝暴動，包括發動工人罷工和學生示威遊行。當晚，中共中央在接到共產國際的電報指示後，就立即通過了“關於執行共產國際緊急任務案的緊急任務案”，公然聲稱：“9.18 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導火線”，“日本企圖侵略蘇聯，毀滅我們工人階級的祖國，中國共產黨要團結起來，發動全國

的武裝暴動，繼續武裝保衛蘇聯”，而再次“武裝保衛蘇聯”的方法，就是“紅軍要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勝利和在白區普遍實行武裝暴動……”創建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製造兩個中國。

1932年1月28日，就在第一次著名的淞滬抗戰開打、全國人心振奮之際，中共非但沒有派一人一槍支援上海抗戰，卻大派他的地下黨員混入正在上海積極抗日的十九路軍軍中，號召下級官兵造反，起來奪取軍隊權力，並成立革命軍人委員會，審判和處決正在與日寇殺得血肉橫飛的“國民黨反革命軍官”（北京師範大學主編的“中國現代史”）。污蔑蔣光鼐、蔡廷鍇率領的十九路軍不是國民黨領導的，而是反動軍閥為了升官發財和投降帝國主義。當時中共最盼挑起中日戰爭，以便讓俄國人趁機侵華。所以，當時中共的“抗日”叫囂，完全不是為中華民族著想，不是為了維護中華民族的利益；而純是為俄國人的侵華服務。

1933年，“新疆王”盛世才依靠蘇聯的力量獨霸新疆，允許蘇聯在新疆駐兵，和蘇聯簽訂同盟條約，規定出讓一系列國家主權如駐軍、開礦、修路、免稅等，三次企圖使新疆作為一個加盟共和國附庸于蘇聯。盛世才為了表現出對共黨的忠誠，不惜將西路軍殘部約5百人，從馬步芳圍捕中救出，接至新疆。盛世才為中共捐送大批物資，如軍火、通訊器材、醫藥、紙張、皮大衣、馬靴等。當時中共以滕代遠、毛澤民為首的一批幹部在新疆充當蘇聯和盛世才之間聯絡，幫助蘇聯實行這一分裂祖國的計畫。中共恨不得將中國的西北、東北全都在蘇聯的幫助下從國民政府中分裂出去。盛世才扣押、殺害南京中央政府及國民黨中央派赴新疆的工作人員。僥倖的是蔣介石乘蘇聯在衛國戰爭中無力東顧之際，說服盛和蘇聯斷絕來往，殺害、趕走了中共人員，後把盛調到中央，實現了新疆和祖國真正的統一。但蘇聯和並沒有死心，仍然策動少數民族進行分裂活動，1944年在

邊境地區策動成立東土爾其斯坦。

由於德、意、日勾結，蘇聯受到德、日夾擊的威脅，異常恐懼。蘇聯想方設法擺脫自己的困境。蘇俄採取的策略是，不斷鼓勵日本向中國南部擴張；同時指示中共宣揚“抗日”。1935年史達林為緩和來自日本的壓力，單方面把中東鐵路賣給了日本，根本沒與中國商量。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4日，在莫斯科舉行了共產國際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會上提出在各國要建立“人民統一戰線”，共同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共代表陳紹禹(王明)在會上強調，中共應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8月1日，陳紹禹以中共中央及中國蘇維埃政府名義，發表宣言，號召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是後來毛澤東叫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由來。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共產國際特別指示中共宣揚“抗日”，完全是一箭雙雕。一是中國抗日，就可牢牢牽制住日本，使日本泥坑深陷，根本不會去威脅蘇俄。二是，中國抗日，中共就可免去被徹底消滅的危險。當時中共正處在大逃亡時期。

中國抗日，或不抗日，或何時抗日，這是中國的內政。這需要中國根據中國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分析研究和決定的事情，根本無需他國進行干涉和鼓勵。

中共為了求生存，向駐守在陝西負責剿共的東北軍和西北軍進行宣傳。1935年秋，中共即令南漢宸派人向楊虎城傳達了中國共產黨的八一宣言。同年12月，中共又派汪鋒對楊虎城及西北軍將領做工作。1936年春王炳南則奉中共指派專從德國回國去做爭取楊虎城的工作。1936年4月，作為一方軍閥的楊虎城為了擴張自己的軍事勢力，終與中共結盟。此後，中共往返西安、進入內地的路條均由楊的17路軍提供。

張學良是一個放蕩公子，張學良接掌父親權力後，生活更是放蕩，對政事並

不專心。張學良尤其好色，和張作霖有妻妾 6 人不同，張學良對女色採取“用完就扔”的方法。張學良的近側們投其所好，爭相進獻美女來討好張學良，朱鐵生將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獻上，晉升為張學良的副官；朱光沐將自己的女兒獻上，當上了總務長；沈熊毅提供自己的妻子，當上財務局長；奉天省長翟文選的妹妹被張學良強姦，翟文選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出家當了和尚。1928 年底張學良易幟後，經常走訪南京。其目的不是和蔣介石商談政事，而是愛上了當時外交部長王正廷的妹妹，王正廷只好將妹妹進呈。張最荒唐的事是將當時的電影明星蝴蝶誘拐到北京，電影公司向張提出抗議，結果張乾脆出 10 萬元將蝴蝶買了下來，可謂驕橫之極。

張氏父子在東北抽稅收捐，私人財產積至天文數字，且揮金如土享盡人間榮華富貴，卻在東北有事之秋，身為邊防軍司令張學良的竟可恥的稱病躲進醫院。張學良“九一八”後被迫辭職出國時，首先做的事卻是向他的諸位愛妾一一告別，被當時的報紙責罵為“嬌妾重於國土”。豪游歐州 8 個月中，每月耗費 40 萬元，而當時中央軍每個師一月的經費僅 10 萬元。

張學良如此揮金如土的生活，當然經常感到錢不夠用，除了加收各種苛稅外，還通過其它管道搞錢，特別糟糕的是盜賣故宮的珍寶。張學良掌管北京期間，從故宮搬出數百箱珍寶運到上海拍賣，其中有一些極為珍貴的文物流失海外，比如英國圖書館以 12 萬英鎊購入了“王右軍快雪時晴圖”，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 65 萬美元購入了“唐寅踏雪尋樓圖”。

張學良周圍有多名中共黨員，他們掌管了張一切秘密，終於改變了他的是非觀。張學良不以丟失東北為恥，仍私派密使赴日，以出賣主權，換取日本支持他割據華北。1934 年，張學良獲悉盛世才崛起後，就密謀聯蘇反蔣。張不惜重金，

將何健追捕中的毛的二個兒子，秘密送往蘇聯，以討取毛的歡心；並殺掉特務行動隊隊長。張學良暗地裡加入了共產黨，並把蔣介石 40 萬元大洋贈給了共產黨。張學良接濟中共金錢、槍枝、彈藥、軍工器材、醫藥、軍糧，……直至高官享受的金龍鐵筒香煙三十筒，僅軍需帳目就達 67 萬元之巨。

為了督促張、楊剿共，蔣介石於 1936 年 10 月和 12 月兩次來到西安，佈置剿共計畫。1936 年 12 月 12 日，張學良和楊虎城發動了武裝軍事政變，將蔣介石劫持扣留。蔣介石衛隊的 67 名戰士全部被殺，連張學良私人銀行的行長也被楊虎城的部下槍殺了，慘殺蔣公的侄孫蔣孝先，加上週邊軍警殉難達到 4 百多人。大勢宣傳的“四一二大屠殺”只殺 100 餘人。張準備對蔣採取“最後手段”——殺，仍受到蔣的優待，以致能活到 101 歲的高齡。張的弟弟張學思效忠毛澤東，但毛仍未能手下留情，張學思慘死于毛的秦城監獄中。

西安事變發生當天，毛澤東給史達林的電報稱：西安事變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定而發生的，中共中央已積極推動張、楊堅決與蔣分裂”。

事變爆發後，引起了全國各界一片抗議和譴責之聲。胡適當時指出：捉蔣時，綏遠抗戰已經開始，這時把蔣介石抓起來，“把前一天受命指揮綏東國軍的陳誠次長和別的幾位重要官吏與將領也拘留了！說這是為了要‘抗日’，這豈不是把天下人都當作瞎子傻瓜！”知識界異口同聲譴責張學良，包括中共後來極力表彰的聞一多也罵張是毫無民族責任感的混蛋。他說：“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裝劫持！這還成何國家？國家絕不容許你們破壞！領袖絕不容許你們妄加傷害！”當時只有延安的一些“知識份子”對張的行為喜在心裡。

史達林聽到事變消息，立即擬電命令中共：絕不容許殺蔣。史達林讓蔣介石

見周恩來，蔣介石堅持不見。史達林帶話來說，同意放他兒子，他才見了周。在周開口“校長”，閉口“校長”，並對其動以“天倫之情”，一再向蔣保證能將被扣留在蘇俄的蔣經國弄回國，從而最終博得了蔣的原諒和許諾，即停止剿共和聯合抗日。這就是停戰換兒子的交易。

張學良親送蔣介石回南京後，一觸即發的內戰頓時消弭於無形。此時，西北軍內部分裂，兩派意見對峙。以王以哲、何柱國、於學忠、蔣斌、高崇民等為首的高級將領主張按張學良 1937 年 1 月 1 日致楊虎城函件的指示行事，避免內戰，一致對外，反對與中央軍貿然開戰，並接受中央提出的整編條件，從潼關北撤；但是，以孫銘九、應德田、苗劍秋等人為首的中下級軍官少壯派，則堅決主張中央先放張學良回陝才撤兵，否則不惜與中央軍兵戎相見。

孫銘九在西安事變中縱兵燒殺擄掠，西安商戶十室九空，且槍殺西安邊業銀行經理王德俊等。此時孫銘九等亟欲乘少帥不在陝之機而篡奪東北軍的領導權，而土匪出身的楊虎城企圖製造兵變借機兼併東北軍駐陝部隊。於是便有孫銘九命令手槍連連長於方俊 2 月 2 日闖入 67 軍軍長王以哲家中槍殺王將軍的暴行。2 月 2 日上午，孫銘九殺害王以哲、剿總副官長宋學禮、參謀處處長徐方以及西北軍交通處處長黃念堂後，親赴城門樓上把蔣斌拖出小屋。蔣斌臨危不懼，大義凜然，怒斥孫銘九發動暴亂。孫銘九聞言惱羞成怒，瘋狂地向蔣斌連開數槍，打碎了他滿口牙齒，又向他胸膛近距離開槍。更令人髮指的是，當蔣斌尚在彌留之際，孫就滅絕人性地下令將他活埋在離小屋僅十幾米遠的城牆腳下。當日何柱國因聞風及時躲避而免遭毒手。在遇害的五人中，王以哲與蔣斌軍階最高，均為陸軍中將。

“二〇二”兵變時，孫銘九率部搶劫軍需處，擄走了一麻袋鈔票。王以哲等

死難後，消息傳到渭南前線，106 師師長劉多荃代表東北軍全體將士致電警告楊虎城，聲言如不逮捕叛亂分子，則前方的東北軍將回師西安平亂。楊虎城見局面失控，才假惺惺地發佈命令通緝孫銘九等首惡分子，挽救西北軍分崩離析的局面。孫銘九、苗劍秋、應德田三凶見大勢已去，遂連夜逃離西安，由周恩來安排，跑到雲陽彭德懷駐防區尋求庇護。全面抗戰爆發後，這所謂“三劍客”全都投降日偽、淪為不齒於國人的大漢奸。孫銘九官至偽山東省保安司令；另一名少壯派、親自赴臨潼捉蔣的東北軍騎六師師長白鳳翔，投敵充任日偽“東亞同盟軍”司令，統率八個師的偽軍，1941 年被日本特務毒死；即如張學良的親弟弟張學銘，竟在日寇敗象畢露的 1943 年 6 月，投降日偽，出任汪偽軍事委員會委員。孫銘九等人躲過了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的審查，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周恩來包庇漢奸孫銘九等人，是敗德敗行。

雖然張學良破壞了蔣介石對抗戰的全盤規劃，是現代中國的“千古罪人”，但他的囚徒生涯待遇良好，還有相當的自由度。蔣介石對張學良的態度，體現了一個基督徒特有的仁慈。不妨設想，要是換了心胸狹窄、睚眦必報的毛澤東，張的下場該是怎樣——彭德懷僅僅是為饑餓的百姓說了幾句真話，就被打入十八層地獄，飽受折磨而死。

2. 挑起日本打中國

2005 年 7 月 3 日北京電視臺的《社會透視》播放了“七七事變”專輯，驚爆了不少內幕。當時，駐紮在北京的中國守軍為 29 軍，原屬馮玉祥（馮的夫人李德全是共產黨的老臥底，後曾擔任中共衛生部部長）系人馬。其中有不少中共地下黨員，或者與共黨有密切的人員，如吉星文（吉星文是吉鴻昌的侄子，吉鴻昌因與柯慶施領著上萬大軍攻打國民政府控制的北平被槍斃了）、張克俠（1929

入中共，時任 29 軍副參謀長）、何基澧等（張、何兩公 1948 年在淮海戰役時期率部起義）。北京台記者採訪了張克俠將軍之子，他說：1929 年，張將軍就已入黨，他直接受黨中央領導，不發展橫向關係；當時劉少奇指示張克俠要“主動進攻”，“進攻才是最好的防守”。不久，舉世震驚的“七七事變”爆發了，事變裡死的第一個軍官就是中共地下黨。……蘆溝橋事件，那是中共為了執行共產國際“保衛蘇聯”的命令幹出來的。據日本人調查，劉少奇領導的中共北方局派出特工在蘆溝橋開槍，這才引起日寇全面入侵。發動“七七事變”的日本駐屯軍 8400 人，宋哲元部的 29 軍有 10 萬人。8400 人，這是查遍了這段歷史所有的記錄所採取的最高的數字。29 軍的軍歌，“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今天還在唱；可當年的中國 10 人砍一個日軍，竟然沒有抵抗到一個月！

對史達林來說，日本迅速佔領全華北是對他的空前威脅。他迅速起用了一個長期潛伏在國民黨高層的紅色代理人，在上海引發中日全面戰爭，把日本拖進廣大的中國腹地，離蘇聯遠遠的。這個代理人就是張治中將軍。他成為紅色代理人要追溯到 1925 年，他在蘇聯援建的黃埔軍校當教官時。黃埔軍校一建立，莫斯科就致力於在那裡安插自己人。張治中向周恩來提出參加共產黨，周在“請示組織後”告訴他，要他留在國民黨內，“稍待適當時機”。

1937 年 8 月 9 日，經張治中一手挑選的派駐上海虹橋機場的部隊，打死日本海軍陸戰隊官兵各一人，然後給一個中國死囚犯穿上中方制服，把他打死在機場大門口，以造成日本人先開火的假像。日本人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張治中以“上海的形勢突然告急”為理由，率大批軍隊在 12 日清晨佔領上海，定於 13 日拂曉向上海日軍發起攻擊。蔣介石兩次去電叫他“不得進攻”。張 14 日電蔣：“本軍決於本日午後五時，對敵開始攻擊。”但張在午後三時就提前下達

了總攻擊命令。四時，炮兵、步兵一齊進攻。同一天，中國飛機轟炸了日本軍艦。據現有材料，蔣介石沒有下轟炸的命令。蔣五時後來電說：“今晚不可進攻。另候後命。”15日，他越過蔣直接向報界發表聲明。他先稱日本“侵滬艦隊突以重炮轟擊閘北，繼以步兵越界襲我”，再說他決心反擊，“洗雪國恥收復失地”。在高漲的抗日情緒下，一直不願在上海跟日本人大打的蔣介石不得不於第二天下令：“預定明拂曉全線總攻擊。”但蔣介石實在是不願意打，十八日，他又傳令停攻。張治中不予理睬，19日繼續進攻。22日，大批日本增援部隊到來，全面戰爭終於不可避免。蔣介石被拉進來後，下定決心大打。全國180個師中最精銳的73個被投進戰場，40多萬人幾乎打光。這場戰役重創了蔣最看重的年輕的空軍，摧毀了大部分的主力艦只。蔣介石從1930年代初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現代武裝被大大削弱。日本方面的傷亡也有大約4萬人。

一旦中日全面開戰，史達林立刻大規模援蔣，以保證蔣能打下去。蘇聯跟南京政府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開始向中國提供武器。中國當時只能製造步槍一類的輕武器。莫斯科給蔣兩億五千萬美金的貸款買蘇聯軍火，包括坦克、大炮和一千來架飛機。還派了一支飛行隊、數百名軍事顧問。在往後的四年裡，蘇聯是中國的主要軍火來源。

中日全面戰爭使莫斯科欣喜若狂。外交部長李維諾夫(Maksim Litvinov)當即對法國副總理布拉姆(Leon Blum)說，他和蘇聯“都對日本向中國開戰感到開心極了，蘇聯希望中日戰爭打得越久越好”；以便魚翁得利。為了保護這位貢獻巨大的紅色代理人，史達林把和張治中直接聯繫的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與武官雷邦隨即召回國，處死滅口。憤怒、無奈的蔣介石當然懷疑張的真實身分，開戰後不久就逼他辭了職。但蔣介石為了自身的利益像對待邵力子一樣繼續使用他。

1949 年蔣逃往臺灣時，這兩位都留在大陸。

南京大屠殺的原因其實就是共黨叛亂所致，若無共黨興起，1928 年後全國立刻由軍政進入訓政，3、5 年後就可進入憲政，日本豈敢覬覦中華？

3. 假抗日，盼望蘇日瓜分中國

毛在 1923 年就說，共產主義要在中國勝利，非得蘇軍從北邊打進來不可。長征就是為了到北邊去靠近蘇聯，接受援助。1935 年 12 月瓦窯堡會議確定“抗日反蔣”方針。36 年 4 月，季米特洛夫正式要求廢止反蔣口號、搞統一戰線。並對毛組織援款，此可謂雪中送炭。毛感激不盡說要“飲水思源”。1936 年 9 月，莫斯科擬用 150 輛汽車來回兩次把 500-600 噸軍用物資運到中蒙邊境交中共；10 月莫斯科又策劃把 1 千噸軍用物資運到新疆哈密交給中共；中共因西路軍的覆滅而未能領到這些物資，但 11 月至 1937 年 1 月，也收到了至少 180 萬美元的鉅款。1938 年，中共雖然每月從國民政府那裡領取 50 萬中國元(折合 16 萬美元)軍餉，仍要向共產國際索取 30 萬美元款項和一批印刷機械等。1940 年，根據周恩來的申請，季米特洛夫建議史達林向中共撥款 35 萬美元。1941-1944 年仍不斷有臨時撥款。

1937 年 8 月 22 日在洛川縣南 90 裡的一個村莊召開了一次為期四天、僅有 22 人出席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洛川會議”。總書記張聞天的《形勢報告》把蔣介石如何仇視共黨指斥一通；最後建議說，中共應該學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一箭雙雕”：讓侵略者與統治者兩敗俱傷。具體到中國麼，就是坐看蔣介石與日本帝國主義廝殺。毛澤東支持張聞天，強調一定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繞到日軍的後方去擴充八路軍。對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藉口予以推託。只有在日軍大大殺

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最後勝利”（戴晴《翻案文章》）。

1937年9月21日，朱德、彭德懷、劉伯承等率八路軍總部抵達山西太原。毛生怕朱、彭報國心切，從延安發去一封《從遠處大處著想》的反復告誡的電報：囑咐彭德懷等人不要打日軍，尤其不要打正面戰，而應以創立根據地、發動群眾壯大自己為第一要務。

1937年華北軍分會9月23日給毛的電報和周恩來於9月24日向毛澤東、張聞天發出的八路軍參與平型關戰鬥的軍力佈置的電報，都未得到毛澤東的複電。在國民黨軍隊已經消滅了平型關的日寇主力22000人時，9月25日林彪因羞愧而懷著“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情緒，命令115師襲擊了日寇的一支補給部隊——板垣師團第21旅團，中共部隊在此只打了一天，共軍以優勢兵力攻擊日軍數百人的輜重隊，日軍才傷亡2百多人，繳獲了15000件軍大衣！115師首戰平型關和毛避免與日軍作戰的“遊擊”方針大相逕庭。大陸許多官修抗戰史，提到平型關戰役，似乎就只有林彪的一天伏擊戰，至於那場苦戰8天，投入近16萬國軍，官兵傷亡近4萬人（傷25242人，亡14151人；其中軍官陣亡941人）的真正的平型關戰役，往往一筆帶過，甚至全盤抹煞。甚至為了凸顯中共的戰績，還不惜對那些頑強奮戰平型關的英雄部隊大潑髒水。這實在叫人不能不佩服其厚黑功夫之深，也令人不能不為那些用鮮血染紅平型關的抗日英雄們鳴不平。毛當時的評價是“以後要避免這種犧牲重大的戰鬥”，並正式向周恩來、劉少奇發出《整個華北工作應以遊擊戰爭為唯一方向》的指示。

1937年10月在山西北面，國民黨軍隊發動忻口戰役，中國方面投入13萬人，日本方面開始投入2萬餘人，後增加到5萬餘人。戰役從10月13日開始，

戰鬥持續了 23 天。軍長郝夢齡、師長劉家祺等數萬人戰死。日軍傷亡 3.6 萬餘人，中國軍隊傷亡 10 萬人左右。

1937 年 8 月 20 日中俄在南京締結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其第二條規定：“倘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國約定，在衝突全部時間內，對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援助，並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

1938 年 5 月，毛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講《論持久戰》，直言抗日戰爭拖得越久，對共產黨越有利。若實現了對日作仗的速戰速決，國民黨掉過槍口就要消滅共產黨。同志們決不應當忘記，日軍作為我們的敵人是暫時的，國軍作為我們的敵人是長久的。正是有了日本人的大規模入侵，爆發全民抗戰，我黨我軍才獲得新生的機會。是日本軍國主義加上張學良、楊虎城，救了我黨我軍的命。什麼叫愛國？愛國必須先愛黨。共產黨都不存在了，你還愛什麼國？愛那個圍剿我們、屠殺我們的中華民國？現在總的形勢，是三個國家，日、蔣、我，新三國。同志們要多長個心眼，明白一個道理，讓日本人佔領土地越多、越廣，于我越有利，就是最愛國。因為日本佔領的地方，我們可以等他撤退時去接管、去搶佔！相反地，蔣介石佔領土地越多，國統區越大，我黨我軍就越被動，你去奪它，就叫打內仗……。毛的這些高論，在後來公開發行的各種版本的《論持久戰》中，被刪除乾淨，因為實在不可見人。

1939 年 8 月蘇德條約簽訂，促使希特勒發動歐洲戰爭；輿論一片譁然，各國共產黨員紛紛退黨。全世界只有毛發表《蘇聯利益和人類利益一致》為之辯護。史達林喜出望外，將此文大量印發。這時，蘇聯駐中國上海領事館領事與日本軍部特務機關密切往來。蘇聯領事對日本人表示，如汪精衛在南京成立政府，蘇聯

將於適當時間給予承認。當時，蘇聯與日本達成秘密諒解：由日本佔據中國的華北、華東、華中、華南；而中國的外蒙、新疆、西藏以及潼關以西的大西北，為蘇聯的勢力範圍（黃大受：《中國現代史綱》第 199 頁）。

蔣介石擔心中國可能成為另一個波蘭，就此警告蘇聯。毛卻盼望蘇日瓜分中國。這年九月底，斯諾問毛對蘇日條約可能簽訂的反應，毛答道：“可以簽訂”，如果不妨礙“世界解放運動的利益”，“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的利益”。這些利益就是指中共的利益。當斯諾問：蘇聯對中共的幫助是否會採取佔領半個波蘭那樣的形式？毛積極肯定地答覆：“按照列寧主義，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在法國被劃分為德占區和維希政府區時，毛在 11 月 1 日給高級軍事領導人的指示裡說：“蘇聯出面調整中日關係的可能性仍是有的，中國要爭得比較法國優勝的地位，只有蘇聯出面調整與我們堅持努力才有可能。”毛設想的前景是：日本扶持國民黨傀儡政府，蘇聯出兵幫助中共，國共“隔江而治”搞“南北朝”。

1939 年 12 月 21 日史達林 60 大壽，毛在延安為其集會慶賀，發表了《史達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的講話。他後來說，此文是真情流露。他顛倒黑白地說：“沒有一個國家把它在中國的特權廢除過，只有蘇聯是廢除了”；“只有史達林的援助，才能解脫人類的災難”。

1940 年彭德懷決定搞百團大戰，大戰計畫的電報於 7 月 22 號送到了延安。毛把電報壓下，不回電。8 月 8 號，彭德懷下令打百團大戰，作戰數月，大小戰鬥 1800 餘次，殲滅日軍 1 千，偽軍 4 千。被抗擊的日軍，居然沒有一個甲級師團。日寇的甲級師團全都部署在與國民黨作戰的第一線。日軍無不諷刺地認為：“就戰鬥力而言，八路軍是一支土匪武裝。”

毛反對這兩場對日作戰，公開指責暴露我軍軍事機密，為了阻止林彪抗戰，

把他送到蘇聯，不許回國。用特務監視彭德懷，讓他不得抗戰（見“彭德懷回憶錄”）。

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林彪、彭德懷之間的一段精彩對話。林：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是弼時作的決定。毛：一些同志認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占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志。林：百團大戰是大戰觀念。毛：三個師只有三萬二千人，號稱四萬八。當年打大戰觀念轉不過來，本應該分散發動群眾。彭：百團大戰後才搞武工隊，這一仗幫了蔣介石的忙，但對以後整軍有好處。華北會議鬥了我，以後對紀律比較注意。

“平型關大捷”和“百團大戰”是共軍僅有的兩場打日本人的戰役，原來都打錯了。毛澤東不叫打，但任弼時和彭德懷不聽指揮，擅自打了，所以要批、要鬥。彭老最後給鬥死在窗戶都被密封的黑古隆冬的牢房裡。任弼時運氣好，沒挨鬥，因他死得早，逃脫了。

4. 背後捅刀子、假手滅項英

謝幼田在《中共壯大之謎》用豐富的史料描述了毛澤東如何欺騙和玩弄閻錫山、奪取山西政權。當閻的力量強盛的時候，中共主動與之聯絡，表示願意共同抗日，說明閻建立抗日組織。當閻的主力在對日作戰中消耗大半之後，中共立即出兵驅逐閻的地方政權，組建自己的權力機構。更加卑劣的是，毛還命令共軍與日軍保持一種心照不宣的“和平狀態”。日軍也將重點兵力用在打擊閻錫山和國軍上，對共軍僅僅是防範而已。此時，閻錫山才恍然大悟，但局面已經無法挽回。在河北、山東等地，中共使用的都是這套把戲。文獻記載，當時被中共軍隊消滅的傾向於國民黨的遊擊部隊，甚至比對日作戰中的損失還要多。

新四軍更是完全避免與日軍的接觸，一心在江南擴大地盤。謝幼田研究了《劉少奇年譜》之後發現：“中共在江南的最高領導人劉少奇，自從到達華中之後，他的全部軍令、報告，沒有一個是出於打日本人的，全部都是為了打擊或分化國軍之用。”

王明當時在延安寫的律詩前四句，題為《悼皖南事變犧牲的項英同志》：毛家詭計蔣家兵，主要目標殺項英。舉國勞工哭柱石，全民抗戰損干城。很明顯，詩中意指皖南事變項英被殺，乃毛澤東借刀殺人的詭計造成的。

新四軍政委項英與毛澤東有不解之仇。項英 1922 年 4 月加入中共，曾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是中共三屆至六屆中委，六屆中央常委，並在共產國際六大上當選為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委員。史達林特別器重他，單獨接見，親贈鋼筆、手槍，手槍柄上刻著俄文，意為：項英同志存念，約. 維. 史達林，1928 年 6 月 23 日莫斯科。項回國後一度是毛的上級，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支持王明。1931 年項英制止毛亂打 AB 團，毛誣陷他是 AB 團的後臺，後來他反對毛長征。紅軍主力長征後，項留下堅持了三年遊擊戰爭。至抗戰爆發後，1937 年 10 月開始，項英任新四軍副軍長。項英的總部有 1 千工作人員、8 千部隊，駐紮在雲嶺，在黃山之側。37 年 11 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毛正式獨攬大權，但項英不買他的帳，在新四軍發展方向上與毛針鋒相對：毛主席向北，向敵後發展；項主向南，向國統區發展。這就埋下了皖南事變的伏線。毛項鬥爭第一回合是 40 年 1 月 19 日中共中央指示：新四軍第四、五兩支隊歸中原局劉少奇指揮，項英所部削減了 2/3。第二回合是同年 5 月 5 日，毛瞞著項英，命令八路軍黃克誠等部隊“配合新四軍各部在一年之內，在揚子江以北”的華中地區，建立統一的根據地，“整個行動歸劉少奇指揮”。項英獲悉後怨憤難平，當即於五月份三次

上書中共中央，請求公開撤職。但遭拒絕並獲安撫，項更決心向南自行另辟新局面。

共產黨信奉的列寧的“讓祖國在戰爭中失敗”，布爾什維克正是在俄政府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機從背後捅刀子，然後竊據政權的。中國共產黨如法炮製，在艱苦抗戰的國民政府背後捅刀子，使得國民革命軍腹背受敵。新四軍是專門用來搞磨擦的，有個好聽的名堂：叫“打擊頑固派”。“頑固派”者即打日本的中國政府軍——國軍也。革命樣板戲、京劇《沙家浜》裡的郭建光們，打的也不過是胡傳魁，是偽軍，哪有一個日本鬼子？當時國民政府最高軍事委員會在電報中對新四軍的譴責是真實的：“見敵則避，遇友則攻，得寸進尺，更無止境；既存兼併之心，遂忘寇患之亟。”毛有意把項英的孤零零的總部送給蔣介石的部隊去殺戮，逼蔣介石開第一槍，促使史達林同意打全面內戰。

1940年7月，蔣曾下令新四軍北上華北，把長江流域讓給國民黨，毛置之不理。

1940年8月間徐向前攻陷國民黨山東省政府所在地魯村。10月5~15日，在八路軍黃克誠部配合下，新四軍陳毅部在江蘇泰興以東黃橋附近全殲國民黨台兒莊抗日英雄韓德勤第89軍和獨立第六旅（翁達獨立旅）15000多人。當時《大公報》報導：“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7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德勤）所屬陳秦運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蔣霸等地後，又陷秦于黃橋及泰縣之蔣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並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部雖嚴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復於10月4日向蘇北韓主席部猛攻，韓部獨6旅16團韓團長遇害；5日又攻擊89軍，計畫去該軍33師師長孫啟人，旅長苗端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5日晚又繼續

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沖落水，生死不明，其它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現韓主席部已繼續撤至東台附近，而該軍尚進攻不已”。在黃橋戰役後新四軍攻擊韓部的曹甸戰役中，日寇配合共軍，共殲滅 8 千抗日武裝。

蔣介石一聲不吭，怕事情鬧大了，引起全面內戰。他只在 10 月 19 日重申，新四軍必須在一個月內北移到規定地區，以使兩軍儘量脫離接觸，減少摩擦。10 月 19 日重慶軍委會何應欽總長、白崇禧副總長電令，黃河以南的新四軍及十八集團軍各部，接電一月內全部撤至黃河以北。對此，毛以朱彭葉項名義複電拒絕，但答應將長江以南的新四軍移至江北，實際乘機削去項的兵權。毛想激怒蔣介石，促蔣採用武力，展開全面內戰。他對周恩來說，這時蘇聯就會“出來調整”。蔣介石怕的就是蘇聯進來同日本瓜分中國。

11 月 7 日，“十月革命”節，毛向莫斯科強烈懇求批准他大打內戰。毛報告說他的計畫是，出 15 萬精兵抄蔣介石後方，打幾個大勝仗”，把這一行動稱為“預防性的先發制人”。毛的主張等於是同日本合作，對蔣介石兩面夾攻。這樣一來，蔣很可能垮臺，按波蘭模式瓜分中國就成了現實。日本無意與蘇聯分享中國，史達林的當務之急仍然是國共合作拖住日本。11 月 25 日，克里姆林宮命令毛：“目前暫時不要動，爭取時間，在華中地區軍隊北移問題上，與蔣介石儘量周旋，討價還價……絕對關鍵的是你不要首先挑起軍事行動”。同時，莫斯科同意毛一旦被蔣攻擊時實行自衛反擊：“如果蔣介石進攻你，你必須全力反擊。在這種情況下，分裂、內戰的責任就都落在蔣介石頭上。”

新四軍北渡長江，是毛與國軍均無異議的。軍部行軍具體路線問題，葉挺與顧祝同本已商定可走習慣線：從軍部所在地雲嶺出發東行，經馬頭鎮—楊柳鋪—孫家埠—畢家橋—郎溪—梅渚鎮—南渡鎮—竹簍橋—水西，然後經蘇南敵佔區北

渡長江至蘇北。顧祝同保證盡力掩護新四軍北撤。12月3日有後方人員千余人和物資一千三百擔經此線到達蘇北（辛子陵《毛澤東全傳》卷三，臺灣版，1993，145頁）。雙方商定的另一條（路線）是從雲嶺出發北上，經戴家匯-孫村-荻港，然後渡江至無為。12月8日有部分幹部和眷屬（包括項英、袁國平、周子昆的夫人）沿此線撤離，平安過江。12月9日上官雲相的有關電報中亦記述，新四軍軍部人員及重要文件，陸續由雲嶺經繁昌路線北移渡江（謝幼田《中共壯大之謎》，香港明鏡出版社，2002年，278頁）。12月10日蔣緻密電給顧祝同稱：“查蘇北匪偽不斷進攻韓部，為使該軍江南部隊不致直接參加對韓部之攻擊，應不准其由鎮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該長官另予規定路線亦可。”於是，由雲嶺經繁昌路線北移渡江，成為唯一合法路線。

12月26日國軍情報仍然記載：“新四軍軍部人員及主要檔，由涇縣雲嶺陸續向繁昌縣北移”，還報告（繁昌以南的）南陵附近駐有傅秋濤部的一個團。“在事變發生以後，新四軍軍部和主力被殲滅，只有兩千餘人突圍，這兩千餘人主要就是傅秋濤率領的一個團，這個團走的是規定路線，在江北無為集結”（《中共壯大之謎》，279頁）。可見，事前國軍並無蓄意殲滅葉項所部新四軍的打算，否則傅秋濤部千余人不可能成建制地北撤。另外的二千餘人也不可能於事變前‘平安過江’。事實俱在，不容抹殺。

毛沒有向蔣表示異議，29日，他批准了這條路，對項英說：“同意直接移皖東、分批渡江”。12月30日，毛致電葉項表示同意周恩來意見，不顧蔣在皖南渡江的命令，決定以“分批走蘇南為好”。毛於1941年1月3日複電葉項稱：“你們全部堅決開蘇南，並立即行動，是完全正確的。”這一路線改變，毛沒有通知蔣介石。蔣介石以為項英會按他的要求走皖東，於1月3日發電給葉挺，重

申皖東路線，並說他“沿途已令各[國民黨]軍掩護。”項英知道後，在4日給蔣介石發電報通知他已經改變路線。這封關鍵電報沒有送達蔣介石手裡，原因在毛。毛早已明令禁止中共將領直接跟蔣介石聯繫，所有的聯絡都必須經過他，再由周恩來轉。毛把項英給蔣的電報壓下了。項英發完電報又等了若干小時，拖到當天夜裡才出發。他以為蔣介石應該得到改變路線的消息了，沿途駐紮的國民黨軍隊也應該接到命令，給他讓路了。顧祝同指揮的七萬多人的大軍，已經把軍部團團包圍，只留下往北的一條路。

1月4日的夜晚，風雨交加，項英和1萬新四軍進入了國民黨十幾萬大軍在安徽涇縣的駐紮區。這些軍隊沒有得到項英要過路的通知，以為是新四軍來挑釁，就開了火。早已因黃橋之戰而痛恨新四軍的顧祝同，6日下令把項英的部隊“徹底加以肅清”。慌張的項英發了一封又一封電報給延安，要毛向國民黨交涉停火，但毛毫無動靜。到了9日，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劉少奇電毛談起項英，毛才回電說他什麼情況也不知道。1月6~9日，國民黨軍隊圍殲項英部的最激烈的4天，毛沒有接到過項英的電報？在這些日子裡，項英的電臺不斷發出求救的電訊，劉少奇都收到了，獨獨毛沒收到？真是沒收到，為什麼不設法恢復聯繫，在這重要的時刻？毫無疑問，毛不想為新四軍解圍，毛要借蔣介石之手，除掉項英這個心腹大患。

在收到劉少奇1月9日發給毛的電報後，毛的電臺奇跡般地恢復運作了。10日新四軍總部報告毛：“支持四日夜之自衛戰鬥，今已瀕絕境，幹部全部均已準備犧牲”；“請以黨中央及恩來名義，速向蔣、顧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脅，要顧撤圍，或可挽救。”然而，毛仍舊一動不動。10日那天，項英自己給蔣介石打了封電報，懇求蔣撤圍。這封電報他再次發給毛轉，毛又再次把它壓了下來。

毛對周恩來說，項英的這封電報比前一封“立場更壞”，“此電決不能交，故未轉你處。”11日晚間，周恩來在重慶開酒會，慶祝《新華日報》三周年。毛關於新四軍總部被圍攻的電報這時姍姍來到，由周對慶祝會上的人宣佈。遲至12日毛才讓周“向國民黨提出嚴重交涉，即日撤圍”。周恩來在13日才向國民黨提出抗議。蔣介石已經在前一天主動下令停止攻擊了。就在13日這一天，毛突然活躍起來，叫周恩來“向全國呼籲求援”。他命令部隊：“軍事上立即準備大舉反攻。”“已不是增兵威脅問題，而是如何推翻蔣介石統治問題”；“一下決心，就要打到四川去，打到底。”毛知道他的軍隊遠不是國民黨的對手，沒有史達林出兵相挺，他將一敗塗地。

項英的女兒說：在事變前13天，中央仍給他和葉挺發來“以拖為宜”的電報。而在事變發生的當時，在與父親等人失去聯繫，在父親生死未明的情況下，黨中央發出了“項英、袁國平對於中央指示陽奉陰違，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的決定。儘管這個決定最終沒獲七大通過，但它卻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對父親評價的依據。作為新四軍領導人之一，父親“負有責任”，但不應該是“全部責任”。解放後父親從許多歷史紀錄中消失了，顯然有失公允。

項英及其警衛人員突圍成功，跟他一起的還有其副官劉厚總，以及參謀長周子昆等幹部戰士六七十人。不料因身帶黃金而被劉厚總謀財害命。周子昆同時遇害。

1月15日，周恩來去見蘇聯大使潘友新，說中共急需蘇聯的拯救。潘潑了他一頭冷水。潘當時懷疑皖南事變是毛澤東有意讓項英去送死。毛繞過潘友新，直接向莫斯科呼籲懇求，用蘇聯人的話說是發了“一封又一封歇斯底里的電報”。毛說蔣介石的計畫是全殲新四軍，然後消滅八路軍，然後“摧毀中國共產黨”，

“我們有被斬盡殺絕的危險。”毛硬要把莫斯科拉進中國打仗，使史達林大為不快。1月21日在列寧忌辰紀念儀式上，史達林以譴責新四軍軍長葉挺的方式表達他的不快。史達林稱葉為“一個不守紀律的打遊擊的”，“查查看[皖南]事變是不是他挑起的。我們也有些打遊擊的，人是好人，但我們不得不把他們槍斃掉，就是因為他們不守紀律。”季米特洛夫明白史達林是在含沙射影暗指毛，於是再次警告毛，口氣比以前更堅決：“不要挑起破裂。”2月13日，史達林批准了季米特洛夫寫給毛本人的命令。命令不容爭辯：“我們認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不應該竭力製造破裂。相反地，你應該盡一切努力防止內戰發生。請重新考慮你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毛當天給莫斯科回電表態：“服從您的指令”，但仍然執意要打蔣：“破裂在將來是不可避免的。”

皖南事變後，莫斯科在西方組織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蔣宣傳，稱蔣介石屠殺了1萬新四軍。實際數字是死亡兩千餘人。3千新四軍成功歸隊，原因是他們掙脫包圍圈後，轉身走皖東路，渡過長江。他們走的是蔣介石指定的路，一路安全，沒人騷擾。

蔣介石並沒有給新四軍設陷阱，但他很不會做宣傳。他的政府不明智地宣佈解散新四軍，給人的印象是他已經把新四軍全都殺光了。對蔣更不利的是，他一向不肯公佈中共軍隊圍殲國民黨軍隊的消息，也不准媒體報導，所以人們都不知道，其實他的損失比皖南事變中新四軍大得多。共黨吞併山西新軍、河北民軍等抗日武裝，以反頑為名攻擊各路友軍時，可厲害呢。蔣怕打內戰的消息影響國內士氣和國際援助。

5·毛澤東——漢奸賣國賊

為了讓中國拖住日本，蘇聯向中國提供了有限的援助，以不得罪日本、不把

蘇聯捲入中日戰爭為前提。無論國民政府如何懇求，蘇聯堅拒對日出兵。另一方面，史達林為討好日本人，加大了對遠東中國人政治迫害力度。把遠東的 10 多萬世代居住的華僑和 20 多萬中國客商勞工，安上各種罪名：如危險份子、日本特務，分別判刑數年到十多年。幸運的被發配遠離日本佔領地的中亞無人煙地區的青山腳下，更多的發配到西伯利亞的高寒地帶去服苦役。符拉迪沃斯托克這樣的城市，華僑一個也不准居留。至少有 30 萬華僑、華工被全部剝奪了財產流放，其中 20 多萬人被折騰死。1940 年後，東北抗日聯軍已無立腳之地，余部進入蘇聯，以為會得到給養和幫助，重返抗日前線。經請示史達林後，被全部繳械，關押勞改。

1941 年 4 月 13 日蘇聯與日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蘇日《共同宣言》更聲稱：“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當時除法西斯國家之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承認“滿洲國”。關於《日蘇中立條約》，明明是蘇聯急切要求，日本遲遲不肯。毛卻說：“蘇聯是否願意訂立……就是要看這個條約是否不和中國民族解放戰爭的利益相衝突。”在《蘇日中立友好條約》中，蘇聯把自己擺在了侵略國的地位。對正處於抗戰最艱苦歲月的中國來說，這是令人寒心的叛賣。此條約一簽，日本立即揮師南進，放心地向中國擴大進攻，使中華民族面臨空前的災難。“三光政策”就是在此次進攻中實行的。史達林對中國的掠奪與傷害是最兇殘的，並不亞于日本天皇！蘇聯不但出賣了中國，而且還要瓜分中國的神聖領土（想想俄羅斯-蘇聯與德國多次瓜分波蘭吧）。從此斷絕了對中國的援助。

這個臭名昭著的中立條約和宣言向全世界一公佈，就立刻激起全世界人民特

別是中國人民的無比憤怒。當然這也引起南京汪精衛偽政權的一片歡呼。汪偽政權的報紙在刊發這一消息時，專門用套紅大字出版，還配以史達林與日本外相松岡洋右並立握手的大照片，聲稱“日蘇條約的成功，是以證明和平運動的正確，將使渝方抗戰之日益失其根據。”以蘇聯為祖國的中共卻對此歡欣鼓舞，延安的《解放週刊》發表了《蘇日條約的偉大意義》的社論說：“在國民黨中的親日派方面，則強調此約只于日本有利，於中國不利，散播恐怖情緒”。按這篇文章的觀點，該條約將世界分成了兩大陣營，一個陣營是該條約的支持者，即蘇聯、德國、義大利、日本和中共自己；另一個陣營則是該條約的反對者，即美國、英國和國民黨政府。如果不是兩個月後德國入侵蘇聯，中共的這一“統一戰線”不知還要“團結”多久！

民間反應最強烈的是為抗日救國戰鬥不息的“全國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震驚之餘他們立即做出決定：在重慶召開座談會以示抗議。“救國會”的負責人、著名愛國“七君子”中的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王因主張抗日曾被蔣介石投入監獄）相約出席。座談會上根據大家的討論和意見，公推王造時起草《致史達林大元帥的信》。信中要求史達林做出說明：“1）尊重所謂的‘滿洲國’是否事實上包含承認滿洲偽國？2）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是否與1924年中蘇協定內‘蘇聯政府承認外蒙古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的規定發生抵觸？3）對於我國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的積極援助是否有所影響？”信中對蘇聯進行了批評，最後還向史達林致以革命敬禮。署名者為：沈鈞儒、章乃器、王造時、李公朴、沙千里、張申府、劉清揚、鬍子嬰等。簽字日期為1941年4月17日。該信交到蘇聯駐華大使館後公開發表，國內外媒體無不稱讚其愛國精神。由於造公執筆書寫了這封信，從此他成了中國知識份子中的一個

“反蘇”的代表人物。“反蘇”就意味著“反共”。從此以後，王造時就成了毛先生反感的人，因為他是“反蘇”的罪魁禍首。

1949 年建國以後，除了已過世的鄒韜奮和李公朴，七君子中的沈鈞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等人，都到北京做高官去了，只有王造時在上海家中失業。到 1950 年秋天，才有復旦大學的陳望道校長聘請他去做法律系的教授。1957 年王造時因“歷史上的反蘇劣跡”，終於在反右運動剛開始時就被打成為中國的大右派。王造時的女兒王海容，1953 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復旦大學物理系，在畢業的時候，也被株連成右派。造時家裡兩個休學在家的兒子，受此強刺激而神經分裂，都變成了神經病。從此，只有兩個右派養活和照顧著兩個神經病。1966 年，王海容患惡性乳房腫瘤，父親以反革命罪被上海市逮捕。兩個神經病因衣食無著，於 1969 年先後去世！王海容因受不了無休止的批鬥和高強度的體力勞動，1973 年 3 月病逝。1971 年 8 月 5 日，大右派王造時在上海監獄中被迫害而死，身邊竟無一個子女送終。一代法學宗師，因抗日救國而聞名天下的名門望族，從地球上永遠而且徹底消失！

中國抗日期間，日本人對中國大後方狂轟亂炸，唯獨就沒炸延安。日本人進攻湖北、湖南、廣西，唯獨就不打陝西。由於蘇日密謀瓜分侵華範圍，中共在延安受到保護。

《中共壯大之謎》一書說：中共 1939 年 10 月曾派出超級間諜潘漢年作為“中共大使”潛赴上海，潘通過特殊關係，命年輕漂亮、精通日語的女作家關露打入日本駐滬特務機關“岩井公館”，陪岩井等日特頭子睡覺以竊取絕密情報。關露獲得的情報，使得江蘇、安徽境內的新四軍一次次躲過了日軍的掃蕩。

在這同時，潘漢年又派遣人員到南京，打入汪偽政權特工總部頭子李士群家

中。李士群曾是中共地下黨員，後被捕叛變。不久潘漢年也和李士群見了面，建立秘密聯繫。

由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的《潘漢年的情報生涯》說：在汪偽特務頭子李士群的安排下，潘漢年會見了日本華中派遣軍謀略課長都甲大佐。該書記載道：“都甲說，清鄉的目的是為了強化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關心的是津浦線南段的運輸安全。只要新四軍不破壞這一段的鐵路交通，日方則希望和新四軍有一個緩衝地帶。潘漢年說，新四軍的發展很快，目前正在穩步地鞏固和擴大農村根據地，也無意立即佔領鐵路交通線和其他交通據點。日軍要給新四軍一定生存條件，否則遊擊隊就會隨時破壞鐵路交通。”這些細節說明，當時國民政府最高軍事委員會在電報中對新四軍的譴責是真實的：“見敵則避，遇友則攻，得寸進尺，更無止境；既存兼併之心，遂忘寇患之亟。”

潘漢年的聯絡人之一袁殊，時任汪偽中央委員、中宣部副部長、憲政實施委員會委員等要職；日本投降後，當國民黨政府擬按漢奸罪對袁殊提出起訴時，由中共將他轉移到根據地，此後袁擔任了中共華中聯絡部第一工委主任、中央軍委聯絡部副處長、中央情報總署亞洲司司長、中央軍委聯絡部副處長等職；後因 50 年代肅反收監，82 年被中共平反。

潘漢年通過袁殊與日本駐華最高特務機構“梅花堂”建立聯繫，並領取活動經費，第一次就獲得了一萬元的費用。“梅花堂”的首任“機關長”影佐禎昭，曾參與策劃汪精衛的叛逃，他非常重視潘漢年的作用，專門在上海“六三花園”請潘吃飯。此後，潘漢年給日本特務頭子岩井每半個月提供一次中國情報，領取每月 2000 大洋的日特津貼，潘本人以胡越明的化名直接列名岩井的花名冊。潘漢年給岩井提供蔣介石的抗戰能力、與中共、列強的關係等情報，還有英美情報

人員在香港、重慶的活動訊息。日本方面對這些情報評價很高。岩井給了潘漢年一張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簽發的特別通行證，上面明確寫著：凡日本軍、憲警如對持證件人有所查詢，請先與日本總領事館聯繫。延安派去的情報幹部一度還在岩井公館裡架設了電臺，以便直接同延安聯繫，後因“困難太大”而沒有使用。日本侵佔香港時，岩井派專人把中共在那裡的情報人員安全撤走。潘漢年對岩井說：這些人將“一部分去內地，繼續幫助我搜集那邊的情報，一部分轉到上海來幫助我們搞和平運動。”所謂“和平運動”是日本脅迫中國投降的非武力運動。有個著名的“興亞建國運動委員會”，由潘漢年參與組織，裡面主要成員都是中共派去的。潘漢年的情報致使國軍抗日屢遭大敗。國府忍無可忍，兩次發動所謂“反共高潮”，卻被日軍及時地抄了後路，不得不放棄對奸黨奸軍的進攻。

1941年4月史達林命令中共和日本駐華軍總司令岡村甯次、汪精衛南京偽國民政府聯繫簽約，商談夾擊國民政府及其軍事力量的具體步驟和措施。當時，中共保衛部長李克農，派專人到蘇北新四軍駐地傳達中共中央指示，命令新四軍政委饒漱石、情報部長楊帆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兼長江局情報部長潘漢年具體執行。

毛 1925年在廣州期間加入了國民黨，並任汪精衛的秘書，汪對毛多有關愛、提拔，直至推薦毛接替自己任國民黨中宣部代部長。毛那時奉汪精衛為“恩師”。1939年10月毛囑潘漢年到上海、南京後，可設法去和汪取得聯絡，並轉達他的口頭致意。

潘漢年直到1942年9月才在李士群的安排下赴南京見到汪精衛，會見中，潘的身份並非一般的情報人員，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談了兩次，自然轉達了毛對汪先生的致意。汪建議潘轉達他對中共的“善意”，並尋找雙方的“契合

點”——即共同反對蔣介石在重慶的國民政府。1943~1944年，中共透過日軍特務機關，將國民政府軍部署和作戰計畫密告日軍，希圖引誘日軍攻打政府軍，並深入華西地區，以便與日軍一起夾擊四川和貴州。這就是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表現，與日本人站在一起，共同攻打中國政府軍。

對於這些骯髒的行徑，謝幼田評論說：“中共所謂秘密戰線，竟然是和日本侵略者聯合在一起，彼此交換有關中國抗戰的政治、經濟、軍事的情報，聯合對付國民政府。潘漢年所領導的所謂情報活動，是毛澤東的延安政府打擊國民政府的一部分，其實質也是出賣中國抗戰，而有利於中共延安政權和日本侵略者政府，是不折不扣的漢奸行為。”

曾慶紅的老子叫曾山，抗日戰爭中在蘇北擔任了一個很重要的任務：直接到上海、南京去和日本人談判，談判的主要事情是：讓日本人只打國民黨不打共產黨。

1967年9月造反派把這個檔案沖出來了，就說他是個大漢奸，開大會鬥他。曾山立刻打電話向周恩來求救。周知道這是高級機密，當場手書四點指示：一、對曾山同志的錯誤，可以批判，但性質應由中央來定。第二、曾山同志的活動聽命於中央，造反組織不能干涉。第三、外來學生不能干預內務部事務，要立即撤出。第四，開批判會搞噴氣式、大彎腰是錯誤的，今後不准再搞體罰和變相體罰。周當場手書四條發下去，把曾山給救出來。這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曾山傳》裡就有。這是為了保住黨和日本人暗通款渠的機密。

據共產國際派駐延安的聯絡代表弗拉基米若夫（Peter Vladimirov）日記指出：“延安與日敵南京派遣軍總部有協定，‘互不開火’”（中共文化學院編：中國近代史，P172—173，華崗出版社，1977年9月版）。

另外，大陸出版的《南京志史》一書披露：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日本陷於戰線過長的困境。中國戰場上，國軍仍頑強抵抗。為了挽救被動的局面，岡村甯次向新四軍軍部發出了議和資訊……新四軍接報，即由中共華東局請示延安獲批准。六月初，日軍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兒子，日軍總司令部參謀部對共工作組組長為首的使團，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並建議中共方面派出負責官員前往南京與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

1945年6月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便啟程赴南京。抵寧次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和楊帆開始正式談判，並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以之外，日方還答應讓出八個縣城，新四軍保持中立，也可以將來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國軍和美、英方面……這化敵為友的第一次正式談判自然未獲實質性成果，但已協商好保持秘密接觸的級別、方式、地點、時間，為進一步談判做好了準備工作。

這一系列賣國勾當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1945年8月發現的秘密。他指責道：“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縮，卻乘中央政府和日軍衝突之際為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嘗艱辛並作出了不可估價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制于法西斯分子的時刻，採取這種策略，豈止是背信棄義而已”為了一己私利，中共真正是不擇手段。

延安不僅與日寇暗通款曲，其腐敗程度也大大超過重慶。作為名義上的基督徒，蔣介石的生活相當簡樸；而毛以窯洞為偽裝，過著奢華的生活。在1943年2月7日的日記中，弗拉基米洛夫描述了毛澤東的一次宴請：“把待客的七十道菜都一一列舉出來，是不可能的。餐前小吃和酒都很豐富。有沙拉、捲心菜、鴨子，不同燒法的肉，鮮美的海味……看，海參端上來了。毛澤東猛然起身，小心

翼翼夾起一塊海參，站著就吃。康生的高級廚師原是中國末代皇帝、當今偽滿皇帝溥儀的廚師”。這是抗戰最艱苦階段毛的真實生活情景。

張思德並不像《毛選》中注釋的那樣，在陝北安塞山中燒炭時因為炭窯崩塌而犧牲，而是被派到當地一處大煙加工廠參與燒制大煙時，因為煙窯崩塌而被活埋的。除了張思德，中央警衛團很多幹部、士兵都輪流參加過加工煙土的工作。販賣大煙的行當實在不是什麼體面光彩的事情，所以根據地統一將大煙稱為“土特產”。這種“土特產”交給山西、河北的八路軍經營時，則一律稱之為“特品”或“特種物資”。販賣土特產的收入要占到延安財政收入的半數以上，個別時候要占到 2/3 左右。

王震的三五九旅還專門雇來工匠，把收穫的鴉片加工成煙土，然後交由陝甘寧邊區財政廳集中保管，隨時運往山西、河北等地，無論是國民黨軍守備區還是日偽佔領區，誰給錢就賣給誰。事實上，因為日偽佔領區很難進入，所以絕大部份邊區煙土都被賣到國民黨守備區，部份賣到民間，部份直接到賣給國民黨軍隊。

6. 誰在抗日？

當時日本侵略者把國民黨作為主要作戰對象。正面戰場無論在戰略上還是在戰役上，都是抗擊日軍進攻的主要戰場，國民黨軍隊曾先後進行了平津、淞滬、晉北、徐州以及保衛武漢等戰役，並取得台兒莊戰役的勝利，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計畫。可見說國民黨“真投降、假抗日”，“積極反共、消極抗日”，都是誣陷不實之詞了。

國民政府從來就沒有消極抗日，面對的始終是抗日主戰場。自 1937 年 7 月至 1945 年 8 月，國民黨軍隊曾發動大型會戰 22 次，大型戰鬥 7 次，小型戰鬥 2

萬 8 千 9 百餘次。陸軍陣亡、負傷、失蹤達 321 萬 1419 人，空軍陣亡 4321 人，毀機 2468 架。海軍艦艇幾乎打光。其中壯烈犧牲在戰場上的國民黨將軍就有 2 百位之多。自 1929 年至 1933 年，從中央軍校畢業的大約 2 萬 5 千名青年軍官中，就有 1 萬名壯烈犧牲在全面抗戰爆發的前四個月。蔣介石總是親臨前線英勇沉毅，甚至數次險被敵人所害的事蹟，今日中國大陸人民感慨萬端。

僅就長沙會戰而言，第一次長沙會戰，殲敵 3.3 萬人，第二次長沙會戰，殲敵 4.8 萬人，第三次長沙會戰，斃傷敵人 5.6 萬人。

1944 年慘烈之衡陽保衛戰，60 萬八路軍見死不救，竟然是坐視日軍對中國從北到南、全方位的攻勢。此時的八路軍擁有 60 萬行動敏捷、作戰驍悍的遊擊部隊，可以發動好幾個百團大戰，全面切斷日軍的補給線，那麼日軍很難在華北平原上，進行快速與飄忽的攻擊行動。八路軍樂為缺席的旁觀者，是造成中國抗日戰爭歷史悲劇收場的最大原因之一。因為在盟國中，最後支持中國的政治力量，就在這場作戰中崩潰，從此他們轉而認為，中國沒有實力可以痛擊在亞洲大陸的日軍。因此中國遭到雅爾達密約之陰謀陷害，從此成為了不可挽回的發展。在抗戰面臨最嚴重危機的時刻，中國除了要遭到美國與英國內部反華勢力的打擊之外，自己裡面還進行全方位的內鬥，如何能夠抵擋日軍最後傾全力出擊的攻勢呢？

1944 年，日軍為了逆轉它在太平洋戰場上急遽失利的厄運，“內心極度焦灼”的日本大本營參謀總長杉山元上將上奏日天皇，提出了“打通大陸作戰”的設想，並得到了天皇裁可。後來日大本營遂將此作戰命名為“一號作戰”。

日軍在攻佔長沙的同時，橫山勇對衡陽發動長距離的奔襲突擊，日軍第 68 師團（佐久間為人）與 6 師團（岩永汪），沿著湘江東西兩岸，分途包抄衡陽；第 68 師團的決死突擊隊，在 6 月 26 日半夜，攻佔了美軍在華最大的空軍基地衡

陽機場，得到了日皇的傳令嘉獎。

6月28日，日軍一攻衡陽城。日軍第68師團在南面，第116師團在西面，同時向衡陽城發起急攻，意在一舉拿下該城。第10軍軍長方先覺、參謀長孫鳴玉將軍守衛衡陽城。

7月2日下午，日軍的炮火啞了，衝鋒也停了。只有大群大群的日軍飛機還在接連不斷地轟炸、掃射和施放毒氣。午夜時，橫山勇經請示（火田）俊六總司令官同意，下令停止攻城。日軍企圖以奇襲和強襲手，閃電式攻取衡陽卻遭到失敗。

羅斯福認為，這足以證明蔣無法應付日軍的攻勢，而史氏有能力指揮華軍打敗日軍。在日本方面，東條則是將所有的軍力，包括抽調關東軍的20軍，以及日本本土的47師團，都投入了湖南的戰場。可是日軍仍無法在7月攻下衡陽，同時日本又在緬甸與塞班島遭到慘敗的打擊，日皇裕仁已經對於戰局感到震動。

7月11日，清晨，日軍二攻衡陽城。此時第十軍全靠一些美軍的空投物資，繼續進行防守作戰。但是由於史迪威希望華軍作戰失敗，所以對於陳納德的空軍支援作戰，總是設法加以制肘。陳納德要設法四處張羅更多的油彈供應，以增加對日軍的空中壓制。陳納德若是充分能夠得到美國軍方、政府全力的支援，應該可以達成阻絕日軍補給的作戰任務，因為日軍支援衡陽作戰的補給線，已經多次受到美機嚴重的打擊，日軍的彈藥與糧食幾度都無法接濟上攻勢的運作，其部隊也瀕臨作戰失敗的壓力。

由於衡陽久攻不下，致使日“派遣軍甚感不安，大本營之不滿逐漸達到極限”。7月16日，日軍向衡陽發動第2次總攻再度挫敗時。1944年7月18日，東條終於被迫辭職下臺。

橫山勇認為日軍兩個甲種精銳師團，四五萬兵力，還配有那麼強大的炮兵部隊和轟炸機戰隊，竟然攻不下個衡陽孤城。況且城內僅有中國軍一個軍，無論從人數上還是從武器裝備上，都不及日軍一個師團。8月2日，日軍對衡陽發動最後一波的攻勢。8月6日，第58師團終於從北門攻進城去，與守軍展開激烈巷戰……沖進城來的一股日軍距方先覺的軍部僅一、二百米遠。參謀長孫鳴玉帶領特務營和軍部科室人員，在軍部附近同敵人廝殺。軍部與各師的聯繫徹底中斷，到處都在展開巷戰，傳令兵也無法出去聯絡。各部隊之間失去聯絡。軍部還有一部電話與重慶相通。方先覺將軍含著眼淚，哽咽著口訴電文：“重慶。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敵人今晨已由北門沖進，城內已無可用之彈及可增之兵，危急萬分。生等只有一死為國，來生再見。方先覺、周慶祥、容有略、葛先才、饒少偉、孫鳴玉。同叩於（6日）”。

孫立人在緬甸打日本，一個新一軍就幹掉3萬多日軍。薛岳在萬家陵打得日軍“對著十月的月亮放聲大哭”，徹底打廢106師團。

巴黎屈服了，菲律賓、馬來亞、荷屬東印度、緬甸淪陷了，重慶還在戰鬥。重慶是中國抗戰的精神堡壘。從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航空部隊進行了為期5年半的戰略轟炸，史稱“重慶大轟炸”。1939年5月4日，日軍飛機瘋狂轟炸重慶，市內發生大火，市民死亡4400多人，受傷3100多人，房屋被炸毀1200餘棟，無家可歸者達20萬人。1941年6月5日——日本空襲重慶，數萬重慶市民在防空洞內發生混亂，導致互相擠撞踩踏，2500多人死亡，史稱重慶大隧道慘案。據統計，空襲重慶共218次，出動飛機9513架次，投彈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傷14100人，炸毀房屋17608幢，有30所學校曾被轟炸。重慶沒有屈服，中國沒有屈服。重慶大轟炸背後是英勇不屈的重慶精

神。

據大陸 1994 出版的《血祭太陽旗》，在中國斃命的日寇將領共 129 名。其中，只有 3 位是死於跟八路軍的戰鬥中。八年抗戰，共消滅日偽軍 128 萬人，其中國民黨消滅 120 萬，共產黨消滅共 8 萬多人。國民黨陣亡少將以上軍銜的將領 200 來位，共產黨陣亡的夠得上將軍的只有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一人。戰前戰後國民黨軍隊都是 430 萬，毛的“一分應付、兩分打頑、七分發展”的戰略部署使共軍由抗戰初期的二萬多猛增到國共內戰時的四百萬多。

事實勝於雄辯，數字說明問題。所謂“中國共產黨抗擊了 90%以上日軍”，“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完全是胡說八道，是貪天之功為己有，是對中國人民的欺騙和愚弄，是對為國捐軀的英烈們的極大侮辱。

正如謝幼田所論：“毛澤東是一個少有的奇人，他既沒有什麼民族責任感，也不受傳統道德的約束；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淡薄，對共產國際的事務從來不熱心。只有打江山是毛澤東比生命還要看重的事情，其他的信仰和責任，對於他是不存在的。”誰能幫助毛澤東打江山和坐龍廷，他就跟誰做朋友。在抗戰期間，毛可以跟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挖中國人民抗戰長城的牆角；在五十年代，毛可以向蘇聯“老大哥”一邊倒，跟蘇聯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在七十年代，毛又可以向“不共戴天”的“美帝國主義”拋出橄欖枝，以改善在國際上千夫所指的形像和四面楚歌的處境。毛是比石敬瑭、吳三桂、慈禧、汪精衛更大、更狡猾、更隱蔽的賣國賊，他對中國人民的欺騙和傷害也更大。七十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中國的時候，正要向中國謝罪，毛澤東卻公然向其表示感謝：“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我們現在還在山裡，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劇了。正是因為日本皇軍佔領了大半個中國，對中國人民來說已沒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覺悟起來開始武裝

鬥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以後的解放戰爭創造了勝利的條件。日本壟斷資本和軍閥給我們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倒想感謝日本軍閥”（會見日本社會黨議員黑田壽男等人時的談話 1961/1/24《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周恩來曾說：“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中國的革命至少要推遲五十年才能成功。”他所說的革命，自然是共產革命；而他所說的五十年後，則已是工人階級祖國——蘇聯崩潰的時候了。如是，中國的共產革命，還有成功的那一天嗎？

毛寬容了日本國免去了戰爭賠償，不僅把 3500 萬軍民的傷亡、5000 億美元的財物損失，就此一筆勾銷，還把戰敗日軍、軍人眷屬、日本僑民，統統安全送回日本。這是為了孤立美國，結成反美的全球統一戰線，消滅資本主義頭子，從而在全球搞共產主義！

1972 年 9 月中共與日本簽定的[中日友好條約]裡，中共置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於不顧，放棄對日本的戰爭索賠權。理由是這筆錢會轉嫁到日本人民身上，真是體貼入微。它不僅使國家損失幾千億美元，而且還導致了現今的民間組織向日本索賠的難度。

中國的情況正如蔣介石所說：“中國如亡於日本，我們還可作亡國奴，如亡於共產黨，我們連亡國奴都做不成。”如果中國亡於日本，且不說今天的日本成了世界第一，“支那省”的“皇民”們也早過上了豐衣足食的幸福生活，而且可以避免蘇式的共產主義災難。

第十四章 延安整風——腥中國的預演

第 89 節 個人崇拜的興起

1937年11月29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立即憑他與蘇聯、共產國際的特殊關係支配了黨的意識形態。12月9日至14日，中共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王明是會議的主角。王明在會議上提出了一個16人的中央政治局名單：毛澤東、王明、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朱德、張國燾等。會議決定成立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在適當時機召開黨的“七大”。並決定毛澤東為籌備委員會主席，王明為籌備委員會書記。毛澤東意識到他是孤立的，意識到大會很可能選出一個新的中共中央主席——王明！因此，毛決定要搞掉王明。此後毛與王明派的鬥爭日趨激烈。

1938年8月，王稼祥從莫斯科返回延安，毛澤東就立即決定召開中央會議，讓王稼祥向政治局委員鄭重傳達共產國際指示。9月14日—27日政治局會議在延安舉行。9月14日，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決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即《國際指示報告》：國際認為，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王稼祥說，1938年7月他返回延安的前夕，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曾對他及任弼時說：“應該支持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其它人如王明，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在（中共）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事後張聞天提出總書記職務交給毛澤東，毛澤東以為不可，也沒交會議討論。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王稼祥在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王稼祥傳達的這一口信，在1938年充滿強烈親蘇氣氛的中共黨內所發生的巨大效力，非局外人所能想像，它簡直就是一封莫斯科對毛澤東中共領袖地位的承認書。

季托夫在《抗日戰爭初期中共領導內部的兩條路線鬥爭（1937～1939）》一文中稱，王稼祥傳達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是毛澤東和王稼祥聯手搞的“陰

謀詭計”。季托夫說：共產國際根本沒有（決定毛澤東為領袖）那個意思。王稼祥是在 1937 年初作為毛澤東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為了完成毛澤東的委託，王稼祥本人同共產國際個別工作人員（指季米特洛夫）進行了交談。曾談到似乎中共中央認為必須選毛澤東當黨的總書記。但是共產國際執委會並沒有提出什麼建議，認為這個問題應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決定。

六屆六中全會後，毛的領袖地位已確定。毛對王明說，他要象孫中山一樣有自己的主義。毛說：“不搞一個主義，即使當上了領袖，在其活著的時候就有可能被人打倒。”

1940 年中共黨內打破了不突出領導者個人的傳統後，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宣傳就日益普遍。在這些宣傳中，以後人們常用的“領袖”、“導師”、“舵手”等稱呼和“一貫正確”以及其它誇功掩過的阿諛之詞不斷出現，使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蔚然成風。

1940 年在延安成立了“澤東青年幹部學校”，陳雲擔任校長，該校規定了“澤東日”，從此開始了對毛澤東個人的宣傳，而且不斷升溫。王明 1940 年 5 月 3 日在“澤東青年幹校”開學典禮上作了題為“學習毛澤東”講演。此稿經毛看過後刊登在《新中華報》上，文中除稱毛為“中國革命的偉大政治家和戰略家”外，還給毛加上了“偉大的理論家”的頭銜。

當時，還創作了由胡喬木作詞、冼星海譜曲的《延安澤東青年幹部學校校歌》。歌中唱道：“生在英雄的時代，長在人民的旗下，毛澤東的雙手，撫育我們長大。……”

同年由胡喬木作詞、李煥之譜曲的另一首歌《青春曲》則唱道：“可愛的青春發著亮光，我們的生命像大船在海上前航。英明的舵師給我們掌舵，指揮著我

們去衝破險惡的風波”。

1940年7月，郭化若在《八路軍軍政雜誌》發表《八路軍的軍事理論》一文，其中講到：“八路軍軍事理論體系之奠定，應歸功中國共產黨領袖、八路軍主要創始人之一、中國天才的戰略家毛澤東同志。”12月25日，王若飛在《八路軍軍政雜誌》發表《八路軍與抗日根據地》一文，開始稱毛澤東為“英明的領袖”。

從1940年12月29日開始，周恩來在許多份致中央的電報中，都以“毛主席並中央書記處”開頭。這在稱呼上把“毛主席”放在了“中央書記處”的前面。

1941年3月延安文痞張如心在《共產黨人》雜誌上發表《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一文，提出中共的教育人才應該忠實於列寧、史達林的思想，“忠實于毛澤東同志的思想”。說毛的言論和著作是“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典型的結晶體”；一個月後他又發表了“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前進”一文，此後張如心就被調任毛澤東的個人秘書。

1942年2月18日和19日延安的《解放日報》又連載了張如心的“學習和掌握毛澤東的理論和策略”，進一步談到“毛澤東的理論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提出了“毛澤東主義”這個名詞。1942年6月30日，劉少奇在山東分局紀念七一幹部大會上稱讚說：毛澤東是“精通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情況為每一個黨員所擁護的黨的領袖”。1942年7月1日，遠在晉察冀的鄧拓也著文論及“毛澤東主義”。

1941年年5月7日《中央宣傳部關於展開對國民黨的宣傳戰的指示》中講到：“要戰勝國民黨反動宣傳， 就必須努力於馬列主義中國化的事業，努力研

究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真正在我們宣傳戰上做到使‘中國人喜聞樂見’的‘中國氣派與中國作風’，真正使教條主義、公式主義、洋八股休息退位。但我們宣傳工作還遠沒有做到毛澤東同志的這個指示。”

5月17日中共中央華中局召開關於皖南事變的高級幹部會議。陳毅在報告中指出：“毛是例外天才，他在井岡山上就已有現在他的一套政治軍事戰略戰術的理論輪廓”。

第90節 延安整風的目的及其非法性

1940年3月，王明把他在1931年所寫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一書，在延安印了第三版，作為延安各學校學習黨建和黨史的參考材料。毛大為惱火。

1941年初發生皖南事變，支持王明等國際派的項英陣亡，蘇聯留學生在黨內軍事實力大大削弱。與此同時，蘇聯無暇顧及中共內部事務。毛澤東認為和蘇聯留學生爭奪意識形態領導權的時機成熟，便立即發動一場集體的意識形態認同運動，這就是“延安整風”。

1941年3月，毛出版主要由他在1930~1933年期間所作農村調查彙集成的《農村調查》書。毛在這本書序中指出：“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為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繫。‘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後，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沒有發言權的”。這些話顯然是針對王明派的。

1941年5月19日，他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他在報告中說，研究理論有兩種互相對立的態度：一種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

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為著解決中國革命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另一種態度是主觀主義的態度，就是抽象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許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對於研究今天的中國和昨天的中國一概沒有興趣，他們都憑主觀，忽視客觀實際事物的存在，誇誇其談，自以為是。毛澤東說：“這種作風，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這種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毛強調了“實事求是”的重要性。然而，毛的講話在黨的高級幹部中竟沒有引起多少反響。這使毛澤東進一步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決定先從統一高級幹部的思想入手。

1941年6月後，毛借鑒史達林主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經驗，主編出版了《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檔》、《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以及《兩條路線》等三部黨史文獻；文獻的主要觀點是，只有毛澤東本人始終代表黨的正確路線。

1941年9月10～10月22日，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了黨的歷史，特別是“蘇維埃”時期的路線問題；史稱“九月會議”。

毛澤東在第一天會上作了主報告，首先對王明路線發起總攻。他指出：黨內有這樣的歷史傳統：不切實際，按心裡想的去辦，這就是主觀主義。我黨很長時期為主觀主義所統治，它比“立三路線”的危害更嚴重。立三路線和後來的所謂“國際路線”（當時還不便於提“王明路線”）都是主觀主義，只不過一土一洋。這個“國際路線”穿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其實是假馬克思主義，它提出不合實際情況的任務，要求擴大百萬紅軍，進攻中心城市，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

比立三路線更“左”，結果更悲慘。毛指責說：現在的延安，學風上存在著主觀主義，黨風上存在著宗派主義，在延安的各種工作中，在學校教育中和文化人中都有表現。他提出了克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十六條辦法，提出在延安開一個動員大會，中央政治局全體出馬，大家都出臺講話，集中力量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反對教條主義和本本主義，理清思想，把犯了錯誤的同志健全地保留下來。

9月10日，張聞天帶頭檢討。他指出土地革命後期的路線是錯的，政治上是“左”傾機會主義，軍事上是冒險主義，組織上是宗派主義，思想上是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使黨受到很嚴重的損失。“我是最主要的負責者之一，應當承認錯誤”，“過去國際把我們一批沒有做過實際工作的幹部，提到中央機關來，這給黨的事業帶來了很大損失。過去沒有做過實際工作，現在還要補課。”從1942年1月起，他主動去陝北神府、綏德、米脂等地農村搞調查，調查了將近一年半左右。毛後來多次讚揚：“張聞天這個人是從來不爭權的”。

與會者對毛都作了高度評價。王稼祥9月11日檢討說：“中國黨過去主觀主義的傳統很久，其產生根源，除由於中國社會原因外，就是經驗不夠。”“從莫斯科共產國際回來，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的人，更易做教條主義者。實際工作經驗多的人，不易做教條主義者，而容易成為狹隘的經驗主義者。”王稼祥說“過去，中國黨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辯證法”；

任弼時在會議上大力推崇毛澤東。他檢討自己到中央蘇區後毫無軍事知識，卻不尊重毛澤東的意見而指揮打仗的事。陳雲說“毛主席是中國革命的旗幟”；李維漢也做了一次比一次深刻的自我反省，他說深刻檢討之後，感到“輕鬆愉快”，羅邁(李維漢)說“毛主席——創造的馬克思主義者之模範、典型”；葉劍

英說“毛主席由實踐到理論，這是我們應該學習的”。這些發言，言必稱“毛主席”的，又對毛澤東熱烈頌揚。

惟一不認錯的還是王明。他說 1932 到 1935 年的路線是四大全會同意的，蘇維埃運動後期的錯誤應該由博古負責，他當時已去了蘇聯，與他沒關係。他講了到會的與未到會的、在世的與不在世的 20 多人的“錯誤”，還抓住李維漢的“輕鬆愉快”大做文章，惟獨不說自己。他仍然堅持自己在抗戰中的觀點，要中央發表聲明，不實行新民主主義，與蔣介石妥協。最後他表示要同中央論爭到底，到共產國際去打官司。毛準備好了一個發言提綱，想在大會上與王明直接交鋒。10 月 12 日會議前的幾分鐘，王明打來電話，聲稱頭痛，不能到會。會期改到 10 天后，王明又送來病假條，表示再次不能到會。毛準備發言總攻王明路線的大綱，不久便成為《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最初文本。

根據 9 月會議的決定，成立了中央研究組（又稱中央學習組），毛澤東任組長，王稼祥任副組長。延安及各地方也成立高級學習組，歸中央學習組管理指導。毛澤東規定中央學習組的任務是：“一方面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論，一方面研究六大以來的決議。”

在毛澤東精心部署下，從 1941 年冬季開始，全國各地高級幹部的整風學習普遍開展起來，為全黨範圍開展整風運動準備了條件。

1941 年底，延安 300 名高級幹部參加了整風學習，全國各根據地、辦事處接到中央通知後，也開始籌備。周恩來在重慶參加會議，接電後，便成立了他親自任組長、董必武任副組長的 25 人重慶高級學習組。這年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毛指出，1942 年的“中心任務在於積蓄力量，恢復元氣，鞏固內部，鞏固黨政軍民”，就是在 1942 年開展大整風。

延安整風並非“思想解放運動”，實際上它是在推行新的蒙昧主義，培養一種個人崇拜與盲目服從的精神。延安整風所強調的卻是鐵的紀律和絕對服從，尤其反對“自由主義”和查禁小廣播。馬克思曾對他的女兒說過，他最喜愛的座右銘是“懷疑一切”。由於馬、恩都反對盲目服從，主張獨立思考，提倡批判精神；所以，延安的《整風文獻》根本不收入馬、恩的論述，“整風”學習中從不強調學習馬、恩著作。延安“馬列學院”在1940年前後就改變了講授內容，不再以馬克思主義為主，而是以講《聯共黨史》為主，馬、恩著作只不過作參考資料。延安的學校大多從1940年起把馬列主義課程改為《聯共黨史》課程了。

毛澤東選定的《整風文獻》，沒有一篇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東西；列寧的只有幾段語錄，史達林的卻有六篇；其餘除了劉少奇等人外，大部份都是毛澤東自己的私貨。這些東西算得上馬克思主義嗎？鄧小平在1984年告訴大家：“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

“什麼叫馬克思主義”也搞不清楚的鄧小平，卻在1981年主持泡制了所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裡面卻肯定的說，延安整風“這場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收到了巨大的成效。”真是顛三倒四，自打嘴巴。胡喬木承認延安整風後，“黨的理論水準越來越低，對馬克思主義的知識越來越低”。

延安整風的目的是學習蘇聯，整風宗旨就是要建設一個“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毛澤東說，“馬、恩、列、斯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聯共黨史》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只有這一個完全的典型”。毛澤東在秘密舉行的西北局高幹會上連續兩天講史達林《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12條。“延安整風”的學習材料中，除了中共自己的材料外，主要部

份就是史達林的理論（以《聯共黨史》為代表），還有“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的文章。1943年12月1日中央總學委發出的學習《反對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的通知，就完全是摘錄共產國際領導人的論述和語錄。說“現在共產國際雖已解散，但共產國際領導者們的指示原則依然適用，這些原則，完全與王、博的機會主義相反，而對於我黨的布爾什維克路線則是完全符合的”（《中共中央檔選集》14卷，p143）。

1944年1月2日，毛致電莫斯科：“我向您保證並且可以擔保，中國共黨熱愛並且深深地尊敬史達林同志和蘇聯”。1945年七大會議上，毛至少有9次大講蘇俄和史達林，敬重之情溢於言表：“沒有共產國際的成立和幫助，中共是不可能今日的”。“史達林是全世界的模範，全世界的總司令”，“馬、恩、列、斯，三個死了，一個活著，就是史達林，他是我們的先生。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每一個人，都是史達林的學生”。經過整風，對史達林的崇拜更加狂熱，“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的信念更深入人心。

中共發動“延安整風”的主要目的就是確立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權威，因此這場政治運動不可避免地在中國皇權主義傳統和國際影響下製造出個人崇拜。延安整風是建國後歷次運動的預演，它是一場非法的專制運動。

首先，按照中共的建黨原則和黨章來看，“延安整風”是不合法的。因為“整風運動”之發動起於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做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而這一報告並未經過中央領導集體討論。像“整風”這樣涉及全黨、影響全部工作、歷時3~4年的大事，理應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黨章規定每年一次）討論決定，起碼也應經中央全會通過；何況當時大多數六屆中央委

員和“七大”代表都集中在延安，若舉行黨代會或中央全會批准“整風”運動之實施，可謂易如反掌，然而當時的黨中央似乎“忘”了有此必要。

至於政治局和書記處，與“整風”相關的一些重大問題顯然未經過它們討論；有些事即使經過了政治局或書記處，也只是走個形式，僅用其名義而已。《胡喬木回憶毛澤東》書上一再說，“毛主席認為”（不是黨中央），進行“整風”是必要的的等等。顯然，整個“整風運動”的部署、變化，如學檔、寫筆記、查歷史、搞“搶救”等，無一不跟著毛澤東走。

其次，原先籌備中的中共“七大”的會期一拖再拖，以致各地選出的代表滯留延安長達 3 到 5 年，而拖延“七大”的目的只是為了讓這些代表參加“整風”和“搶救”（整人或挨整）。這種做法不但違背黨章黨規，違背“共產國際”關於“迅速召開七大”和“不應花很長時間爭論過去 10 年內戰的問題”之指示，也違背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有關決定和“六屆六中全會”關於召開“七大”的決議。當時中共中央的解釋是：“為了確保七大開得成功，毛主席認為有必要……統一全黨的認識。”也就是說，“七大”何時開、如何開、誰能參加，不決定於中央全會或大會籌委會，而是毛個人說了算，他認為要什麼時候開就只能什麼時候開；若代表們的“認識”未“統一”到毛滿意的程度，“七大”就不能開。

再次，黨內高層出現了一系列違背黨規和黨紀的組織設置和人事安排。例如設立了架空政治局和書記處的“總學委會”（同 66 年的“文革小組”），並在其下設立垂直系統，於是由延安派向各地的“欽差大臣滿天飛”。例如，彭真當時連候補中央委員的資格都不具備，卻被任命為全黨高幹“整風”重點單位中央黨校的主管，他還取代政治局委員陳雲而成了中組部長，甚至負責“七大”代表的資格審查和某些人事安排，並列席政治局、書記處等所有中央會議。原先在中

央無任何地位的高崗，突然成了西北局書記，與彭真一樣成為“總學委”成員和“中央反內奸鬥爭委員會”委員，經常列席各種中央會議，人稱“西北王”。

第 91 節 延安整風的“群眾運動”的思想統制模式

延安整風分三個階段，歷時近三年。第一階段是整風動員和引蛇出洞的大民主。在這一階段，為了使每個黨員都主動參與，運動一開始強調暢所欲言地向黨和領導提意見。第二階段思想鬥爭、審幹以及肅反搶救運動。第三階段是黨作出決議，毛絕對權威的確立。

“延安整風”運動的最初是思想清洗，其對象主要是黨的高級幹部。1942年1月26日，毛中央宣傳部起草的《宣傳要點》在敘述了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在黨內的種種表現後寫道：“凡此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思想與行動，如不來一個徹底的認真的深刻的鬥爭，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爭取革命的勝利。而要進行鬥爭，加以克服，非有一個全黨的動員是不會有多大效力的”。2月1日，毛在延安中央黨校做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8日，毛澤東又在延安幹部會議上做了《反對黨八股》的報告，正式在全黨發動了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其任務主要是組織學習中共中央宣傳部編的《整風文獻》，強調所有的黨員幹部都必須理論聯繫實際，做到學用統一和自覺的檢查反省。每個黨員幹部都被要求對自己的思想和歷史作深刻的反省，在撰寫思想自傳的基礎上，對個人的思想言行作全面系統的總結，特別是要端正立場和分析動機，不能再有什麼個人的獨立思想與自主意識。同時讓每個人都詳詳細細地交代個人的歷史，以便黨組織發現“階級異己分子”，也有助於黨組織掌握幹部的一切隱私。此外，各個單位也要全面地檢查工作，做出總結。

1942年4月3日，中宣部發佈了整風期間第一個“四三決定”，要求延安

開始進入整風學習階段，學習中央規定的 22 個檔，並且詳細規定了學習步驟和方法：各機關、學校“要深入的研究，熱烈的討論，先把這些檔的精神與實質領會貫通，作為自己的武器。為此目的，各同志必須逐件精讀，逐件寫筆記，然後逐件或幾件合併開小組會討論，必要時由中央及本部派人作報告。在閱讀與討論中，每人都要深思熟慮，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歷史。”以後的整風檔學習在基本方法上都是按照這一規定執行的。為了讓每個黨員的意見都能充分表達，各部門可以出自己的壁報，黨員亦可張貼大字報。

謝覺哉當時寫了一篇文章，題為《由討論到反省》，《解放日報》把它作為代社論發表，正好表徵了反省階段的到來。《解放日報》為此專門刊發過社論。該社論要求參加整風的同志“一定要反省自己”，因為反省是人們掌握檔精神的必要條件，只有經過這一階段，才能徹底清除自我靈魂深處“小資產階級的散漫性和自由主義的習氣，建立起無產階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也才能實行檔中所包含的道理，更好地達到整風的目的。

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召開的高幹會上說：“在座的同志要以身作則，自己進步，要反復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歷史、自己現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反省的重要方式就是寫反省筆記。陳伯達在他自我反省的文章說：馬列主義本來並不是什麼神秘的東西，只要人們樂於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都有“得道”的可能，因為按照孟子的說法：“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這話的意思是，人人都可以成為像堯舜一樣具有高尚之德的聖人。要真做到這點，按儒家的說法，就要“克己”、“無我”、“無欲”、“無私”。於是，在這一人格化模式中，人也就成了完全道德化的人，人也就被“道德”吃掉了。儒家在延安整風中復活了。

延安整風所謂的反對主觀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就是為了根除個體人

格之本心，而讓人把“唯一正確和高尚的意識形態理論和道德觀念”內化為自己的本心，這樣，人也就成了一個社會性的軀殼。毛一面反對教條主義，一面又宣揚教條主義。例如，毛批評宗派主義的理由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給了我們這樣的根據嗎？沒有。…中國共產黨中央給了我們這個根據嗎？沒有。…所以，一切脫離群眾的行為，並沒有任何的根據。”他說得如此振振有詞，好象“根據”只能從馬恩列斯的著作中去找，從中央文件中去找；於是，凡在這些著作和檔中沒有講過的事，就都是錯的，不可以做。至於馬恩列斯的話又有什麼根據？中央文件又是根據什麼形成？馬恩列斯或中央文件是否也會出錯？那是絕對不可思考的大逆不道之問。在這方面黨是不允許黨員和民眾採取“實事求是”態度的。

第 92 節 党文化擊垮自由民主文化

毛要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党文化”，這種文化是“科學的，民族的，大眾的”。“科學的”意味著以馬列教條為標準；“民族的”意味著排斥西方文化（即“資產階級思想”）；“大眾的”就是適應“工農兵”需要的。張聞天曾建議加上“民主的”，被毛否定了。毛提倡的新文化，實際上是極權主義的“党文化”，它的綱領就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整風運動的第二階段為批判對立面。在整風第一階段大民主中，黨員各抒己見，把對領導的不滿一一發洩出來。這就為運動第二階段批判對立面準備了條件。

毛澤東為打擊王明，發動群眾對幹部提意見。1942年初，青委的壁報《輕騎隊》和丁玲主持的《解放日報》第四版上推出王實味、丁玲本人，以及蕭軍、羅烽、艾青等人撰寫的一系列批評性的雜文和短論，內容包括棄舊娶新、生活待

遇上實行等級制度等。

在延安，從 1937 年開始每個單位都逐步形成大、中、小灶，中灶的肉、油大概是大灶的一倍，小灶就更多了。高級領導有特別的營養食品。穿著也等級。一般人穿當地自織自染的土布，粗且紮人。領導人穿國統區進口的舒服的斜紋布。毛的內衣內褲是極細的布。一個為毛家洗洗補補的傭人告訴我們，她本人不夠穿內衣褲和襪子的資格，只能穿空心棉襖，經常都在感冒。日用品像煙草、蠟燭、寫字紙都按等級分配。說到孩子，中共領導人的可以送去蘇聯，或有自己的保姆。職位低一些的高幹的妻子生產可進醫院，產後有專人服侍。再低一些的幹部可以送孩子上保育院。有幸結婚的一般幹部，要麼不敢生孩子，要麼自己想法子對付。艱苦的生活條件使疾病常常發生，但是醫藥分配按等級。毛本人有美國醫生馬海德，還有兩個蘇聯醫生。如有什麼需要，他直接向莫斯科要，或給重慶的周恩來打電報。醫院分高幹病房跟一般人病房，進醫院得要介紹信，連病人的飯菜也分等級。

延安最顯眼的特權標誌是汽車，這裡唯一的一輛汽車，是紐約洗衣房華僑捐贈來運送傷患的。但毛把它“私有化”了，做了他的專車。年輕的司馬璐看到毛和妻子江青乘車經過後說，江青穿著深紅色的春裝，“和毛澤東在車中雙雙風馳電掣，招搖過市，路人都為之側目”。江青要吃的阿膠，是從山東買到後，經香港、重慶繞了一個大圈送到延安……

延安盛傳著一句笑話：“延安就三樣東西——太陽、廁所、空氣是平等的。”

王實味為享受“中灶”待遇的中央研究院特別研究員，1942 年 3 月 13、23 日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連載了《野百合花》，放言直諫毛澤東等不要“間接助長黑暗”或者“直接製造黑暗”。據康生說，中央研究院 95% 的人贊成

《野百合花》。《野百合花》摘錄：

前記

在河邊獨步時，一位同志腳上的舊式棉鞋，使我又想起了曾穿過這種棉鞋的李芬同志——我所最敬愛的生平第一個朋友。……李芬同志是北大 1926 年級文預科學生，同年入黨，1928 年春犧牲於她底故鄉——湖南寶慶。她底死不是由於被捕，而是被她底親舅父縛送給當地駐軍的。這說明舊中國底代表者是如何殘忍。同時，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襪衣褲都穿在身上，用針線上下密密縫在一起：因為，當時寶慶青年女共產黨員被捕槍決後，常由軍隊縱使流氓去奸屍！這又說明著舊中國是怎樣一具血腥、醜惡、骯髒、黑暗的社會！從聽到她底噩耗時起，我底血管裡便一直燃燒著最狂烈的熱愛與毒恨。每一想到她，我眼前便浮出她那聖潔的女殉道者底影子，穿著三套密密縫在一起的襪衣褲，由自己的親舅父縛送去從容就義！每一想到她，我便心臟震動，血液迴圈的更有力（在這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升平氣象中，提到這樣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諧，但當前的現實——請閉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與這氣象也不太和諧）！

……

新年假期中，一天晚上從友人處歸來，昏黑裡，前面有兩個青年女同志在低聲而興奮地談著話。我們相距丈多遠，我放輕腳步凝神諦聽著：

“……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事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志，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哼，到處烏鴉一般黑，我們底××同志還不也是這樣！”

“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什麼呀——屁！好像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平常見人裝得笑嘻嘻，其實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長架子來訓人。”

“大頭子是這樣，小頭子也是這樣。我們底科長，×××，對上是畢恭畢敬的，對我們，卻是神氣活現，好幾次同志病了，他連看都不伸頭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鷹抓了他一隻小雞，你看他多麼關心這件大事呀！以後每次看見老鷹飛來，他卻嚎嚎的叫，扔土塊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傢伙！”

沉默了一下。我一方面佩服這位女同志口齒尖利，一方面惘然若有所失。

“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來叫人難過。其實，害病，倒並不希望那類人來看你。他只能給你添難受。他底聲音、表情、態度，都不使你感覺他對你有什麼關懷、愛護。”

“我兩年來換了三四個工作機關，那些首長以及科長、主任之類，真正關心幹部愛護幹部的，實在太少了。”“是呀，一點不也錯！他對別人沒有一點愛，別人自然也一點不愛他。要是做群眾工作，非垮臺不可……。”她們還繼續低聲興奮地談著。因為要分路，我就只聽到這裡為止，這段談話也許有偏頗、有誇張，其中的“形象”也許沒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們決不能否認它有鏡子底作用。我們生活裡到底缺少什麼呢？鏡子裡看吧。

……

青年的可貴，在於他們純潔、敏感、熱情、勇敢，他們充滿著生命底新銳的力。別人沒有感覺的黑暗，他們先感覺；別人沒有看到的骯髒，他們先看到；別人不願說不敢說的話，他們大膽地說。因此，他們意見多一些，但不見得就是“牢騷”；他們的話或許說得不夠四平八穩，但也不見得就是“叫嚷”。我們應該從

這些所謂“牢騷”“叫嚷”和“不安”的現象裡，去探求那產生這些現象的問題底本質，合理地（注意：青年不見得總是“盲目的叫囂”）消除這些現象的根源。說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導青年不發“牢騷”，說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麼”，這絲毫不能解決問題。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須更好一點。

……

1938年冬天，我們黨曾大規模的檢查工作，當時黨中央號召同志們要“議論紛紛”，“意見不管正確不正確都儘管提”，我希望這樣的大檢查再來一次，聽聽一般下層青年底“牢騷”。這對我們底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處。

……

在“必然性”底“理論”之後，有一種“民族形式”的“理論”叫做“天塌不下來”（毛有過“炸平廬山”之說）。是的，天是不會塌下來的。可是，我們底工作和事業，是否因為“天塌不下來”就不受損失呢？這一層“大師”們的腦子絕少想到甚至從未想到。如果讓這“必然性”“必然”地發展下去，則天——革命事業的天——是“必然”要塌下來的。別那麼安心吧。

與此相關的還有一種叫做“小事情”的“理論”。你批評他，他說你不應該注意“小事情”。有的“大師”甚至說，“媽的個×，女同志好注意小事情，現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是呀，在延安，大概不會出什麼叛黨叛國的大事情的，但每個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都有的在那兒幫助光明，有的在那兒幫助黑暗。而“大人物”生活中的“小事情”，更足以在人們心裡或是喚起溫暖，或是引起寂寞。

……

一種人說：我們延安並沒有等級制度；這不合事實，因為它實際存在著。另一種人說：是的，我們有等級制度，但它是合理的。這就需要大家用腦子想一想。

說等級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約有以下幾種道理：一、根據“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則，負責任更大的人應該多享受一點；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實行薪給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蘇聯也有等級制。

這些理由，我認為都有商量餘地。關於一，我們今天還在艱難困苦的革命過程中，大家都是拖著困憊的驅體支撐著煎熬，許許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寶貴的健康，因此無論誰，似乎都還談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負責任更大的人，倒更應該表現與下層同甘苦（這倒是真正應該發揚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層對他有衷心的愛，這才能產生真正的鐵一般的團結。當然，對於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優待的重要負責者，予以特殊的優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負輕重要責任者，也可略予優待。關於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給制，也不應有太大的等差，對非黨人員可稍優待，黨員還是應該保持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以感動更多的黨外人士來與我們合作。關於三，恕我冒昧，我請這種“言必稱希臘”的“大師”閉嘴。

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筆者自己是所謂“幹部服小廚房”階層，葡萄並不酸）一切應該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在問到是否吃得飽的時候，黨員還得起模範作用回答：吃得飽！），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講“愛”，講“溫暖”，也許是“小資產階級感情作用”吧？聽候批判。

毛看到《野百合花》後，猛拍辦公桌上的報紙，厲聲問道：“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他立刻打電話給《解放日報》，要求報社深刻檢查。3月31日，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毛對王實味進行了不點名但卻嚴厲的批評。

1942年3月初中央研究院召開了整風動員大會。院領導羅邁（李維漢）提出：檢查要同時著重領導作風和群眾的個人思想兩個方面；院長、秘書和各主任是檢查工作委員會的當然委員；壁報文章要署名等。王實味帶頭反對這些意見，主張整風應該著重整領導人，全部委員都應由選舉產生，壁報文章可以匿名。經過長時間的辯論，羅邁的意見被大會以84票對28票的絕對多數否決了。3月23日，中央研究院的壁報《矢與的》創刊，王實味連發三文，指名批評羅邁。王實味要求暴露延安的黑暗面，提出“以民主之矢，射邪風之的”；他大聲疾呼：“黨內的正氣必須發揮起來，邪氣必須消滅。我們還需要首先檢查自己的骨頭。向自己發問：同志，你的骨頭有毛病沒有？你是不是對‘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話不敢說？反之，你是不是對‘小人物’很善於深文羅織？要瞭解，軟骨病本身就是一種邪氣，我們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王實味的壁報被高高地懸掛在南門外，延安最熱鬧的地區。文章不長，但人們從四面八方川流不息地趕來，看的就是那短短的幾行字，那幾行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王實味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歷史學家範文瀾邀請王震看了當時轟動延安城的王實味的文章，王震閱後極為不滿：“前方的同志在為黨為全國人民流血犧牲，你們在後方吃飽飯罵黨。”

範文瀾感愧不已：“大學教授們熟視無睹的地方，王震同志一眼就看穿了，真了不起”。王震立即向毛報告。賀龍說：“丁玲，你是我老鄉啊，你怎麼寫出這樣的文章（指《三八節有感》）？跳舞有什麼妨礙？值得這樣挖苦？”毛立刻作出反應：“賀龍、王震他們是政治家，他們一眼就看出了問題。”

4月初的一個晚上毛又讓警衛打著馬燈和火把看了《矢與的》，當即指出：“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緊跟著，《解放日報》上就出現了一些批評王實味的文章。很快，政治局開了會。毛說：王實味是“不講成績，抹煞成績，只暴露黑暗”；“我們的工作中確實有許多缺點應加以改正，但如果要求絕對平均，不但現在，將來也是辦不到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我們應該拒絕。”“康生在會上彙報說，國民黨特務稱讚《輕騎隊》；有中共領導人趁機表示，特務分子正利用黨內的整風進行活動，故意誇大缺點錯誤，反對領導，並寫文章、出壁報、進行“小廣播”，鼓動不堅定的黨員反黨。

1942年4月7日毛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在整風學習和檢查工作中要審查幹部，發現反革命分子加以清除。毛下達指示：整風運動不僅要弄清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半條心）問題，還要弄清革命與反革命（兩條心）問題，王實味只是個別較嚴重的問題；要注意反特務鬥爭。這時，毛澤東決定以王實味為思想鬥爭的對立面，把運動引向第二階段。

1942年5月2日至23日，200多名文藝工作者在延安舉行座談會。5月23日，毛又在座談會上作總結性發言，是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幾經修改，發表於次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報》。這篇講話，標誌著毛氏黨文化觀的正式形成。作為有中國特徵的黨文化觀，毛的文藝思想則較俄式的黨文化觀更加政治化，表現出更濃厚的反智色彩。

毛氏黨文化觀包含下列五個核心概念：

1) 文藝從屬於政治，為政治服務。文藝是政治鬥爭的工具，革命文藝的最高目標和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為黨的政治目標服務。文藝的基本方向是“工農兵方向”，文藝家只能、也必須以此方向作為自己的創作原則和創作內容。“創作自由”是資產階級的口號，革命的文藝家應心甘情願地做革命的“螺絲釘”。這個“從屬”和“服務”的提法，取消了文藝對政治的批判功能、對現實的批判功能。這樣，政治家就可以對文藝家指手劃腳、橫加干涉。

2) 毛澤東以為知識份子和工農兵不是平等關係，而是低於工農兵。毛說：“拿未曾改造的知識份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份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都乾淨。”

毛澤東說“許多所謂知識份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知識份子最無知識，這話經過康生在整風會議上的反復渲染，成了延安最流行的警語之一。毛澤東對知識份子最不滿、最討厭的，正是知識份子身上最可貴的東西——即他們所懷有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理念；毛澤東喜歡的，還是農民追隨者的馴服、盲從和愚忠。而知識份子卻因為具有自己的特性而喜歡批評，有自己的看法，或者用毛的話來說，“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不肯盲從，不肯老老實實地當馴服工具。

毛給知識份子插上“小資產階級”的標籤，說文藝家的主體意識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他們的一切思想就無不打上“小資產階級”的烙印。小資產階級屬於非無產階級，而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都是錯誤的。知識份子不能相信自己，而要相信無產階級；不能依靠自己，而要依靠黨。他們必須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

來消滅自己的啟蒙思想，拋棄自己的人格尊嚴和思想獨立，貶低自我、否定自我、放棄自我，作黨的馴服工具，這才能使自己的立場轉變過來，才有希望在革命的陣營中得到新生。這種煉獄的磨煉要多久呢？毛當時說“非有十年八年的長時間不可”（《毛選》3卷857頁）；後來證明這遠遠不夠，要改造一輩子。

延安整風遠離“五四”時期對科學與民主的追求，繼承和發展了紅軍時期輕視知識份子的傳統。按領導層的看法，知識多了，思想就複雜，不如工農幹部那樣容易聽指揮。據魯煤回憶：“當時在解放區，知識份子無一例外的都被視為小資產階級，天生是被改造的物件”。

3) 文藝是階級鬥爭的反映，不能去表現普遍的人性。人道主義、人性論是資產階級文藝觀的集中體現，革命文藝家必須與之堅決鬥爭和徹底決裂；絕不允許描寫工農兵在反抗、鬥爭之外的任何屬於非階級意識的表現。毛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裡就只有帶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毛的話自相矛盾。“帶階級性的人性”意味著階級性是人性的一部分，這就預設定人性有超出階級性的部分。因此，不能既承認“帶階級性的人性”，又否認“超階級性的人性”。

毛不承認共同的人性，階級不同就什麼都不一樣；也不承認人的個性，好像同屬於無產階級就都是一樣的，同屬於資產階級也都是一樣的，把人的個性也否認掉了。毛在否定抽象人性的同時，把普遍的人性也否定了，又把具體的人性等同於階級性。毛澤東說，“無產階級的人性”包括“大公無私”“最有遠見”等等，一切革命美德無不具備。後來就出現了樣板戲中的“高、大、全”的英雄人物。這是理想的無產階級，不是現實的無產階級。

毛在延安時期給紅十字會題詞“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他給人道主義加上了“革命的”的限制詞。有兩個理由使得中共不喜歡人道主義：第一，他們認為人道主義和他們所強調的“階級鬥爭”“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是不相容的；第二，他們認為人道主義和他們所反對的“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人權、個性解放以及個人主義是不可分的。

1942年7月周揚批判王實味說：“解放個性是五四新文學的一個主題，起了反封建的巨大作用，但現在這個新的時代，解放個性的鬥爭，應當從屬於解放民族、解放社會的鬥爭……尤其在我們共產主義者說來，個性應當從屬於集體”。

4) 魯迅的雜文時代已經過去，嚴禁暴露革命隊伍中的陰暗面。毛澤東說：“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二者必居其一。”這是毛澤東禁止批評共產黨陰暗面的藉口。太陽都有黑子，難道人和組織就沒有缺點和錯誤？就不能批評？

5) 反對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遺留下的文藝表現形式上的歐化傾向，文藝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並不僅僅是文藝表現的個別問題，而是屬於政治立場和世界觀的重大問題。

一言以蔽之，毛氏文藝思想的實質是將文藝視為圖解政治的宣傳工具，將文藝家看成是以贖罪之身（身為知識份子的“原罪”）為黨的中心工作服務的“戰士”。

5月底，研究院對王實味進行批評，開始時還是作為思想問題來批評的。在會議中間，有人揭發他同託派分子王凡西有過聯繫，在上海時幫助他們翻譯過《托

洛茨基傳》中的兩章。其實，王實味過去和託派分子來往的問題，他自己在 1941 年早已向組織交代過。但康生決定要追查，中研院黨委又從 6 月 1 日到 11 日，連續召開了 10 次對王實味的鬥爭大會，不但“追查”王實味，還有同他接近的 4 位同志（潘芳、成全、王裡、宗錚）也一起被康生定性為“五人反黨集團”，指王實味為這個集團的頭目，把問題的性質上升為“黨外鬥爭”了。

6 月，中共成立了中央總學習委員會，毛為主任，康生為副主任。毛直接抓整風審幹。全國各地黨委停止其它日常的政治、經濟、教育業務活動和黨史研究，集中精力搞整風。僅在延安，參加的幹部和黨員達 1 萬多人，共分成 5 大分區，1 千多個整風小組。

1942 年 6 月 19 日毛在政治局會議上指示“現在的學習運動，已在中央研究院發現王實味託派。我們要發現壞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發現壞人，即託派、日特、國特等三種壞人”。隨後，康生又親自組織批鬥大會，發表了近 3 萬字的講話。10 月，康生授意院黨委開除王實味黨籍；10 月 31 日，王實味的問題正式定性，其罪名是：“反革命託派奸細分子，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反黨五人集團成員”。1942 年底王實味被捕。

在被逮捕幾個月後，王實味被帶出來見一些中外記者。他完全變了一個人，反復地說，“我有罪，我是個託派，我攻擊毛應該被處死，我應當被槍斃一千次。但毛寬宏大量，他不希望我死，他讓我工作。我勤奮地工作，這才瞭解到勞工神聖的偉大。我對他的仁慈感激不盡”。如果毛讓他去殺人的話，他一定會去拚命地殺人，共黨就這樣把一個好端端的知識份子，改造成這個樣子。一個記者這樣描寫：“一個臉色呈死灰色的青年，讓丁玲帶著，出來背書似地向記者們痛罵自己。”另一個記者寫道：“我在他幾乎毫無表情的臉上唯一察覺到的情緒是恐懼。”

蕭軍由於不同意對王實味的處理，最後竟不讓蕭軍吃飯。王實味在監禁期間，曾多次訴說自己“不是託派，不是特務。”但由於是毛、康一手定案，翻案談何容易。

第 93 節 賊喊捉賊瘋狂迫害

延安整風時毛採用對敵鬥爭的方法對待不同思想。毛詭辯說，“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只是不能用來對付“自己的同志”，至於用來對付敵人卻是“完全必要的”，“黨內也常常有敵人和敵對思想混進來，如《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結束語所說的那樣。對於這種人，毫無疑義地是應該採用殘酷鬥爭或無情打擊的手段的，因為那些壞人正在利用這種手段對付黨，如果我們還對他們寬容，那就會正中他們的奸計”。可見，毛說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方針絲毫不妨礙他採用高壓手段對付他想打擊的人，只要給對手戴上一頂“敵人”的帽子就可以了。所謂的“治病救人”是有條件的：你必須“不固執錯誤”，即主動承認有組織上認定的所謂“錯誤”；如果你覺得自己沒有錯，要為自己辯護，那就屬於“不可救藥”了，“治病救人”的原則對你就不適用了；而一旦把你視為“敵人”，你就更不能申辯了，只有“坦白交代、爭取寬大”。這套按照“有罪推定”原則建立起來的處理手法既用於黨內，也用到了司法體系當中，所以中共統治下，是沒有任何人權保障的。

毛澤東本是一個流氓頭子，自然會重用一群流氓。他們具有跟性欲衝動一樣粗野而原始的人生觀。延安時期，中共已喪失了一個現代政黨的所有特點，而完全淪為血雨腥風的水泊梁山。弗拉基米洛夫寫道：“人人為保命而鬥爭。不用說，好多壞蛋玩弄‘忠於毛’的一套而爬上去了。作這類事情，專業知識、貢獻和經驗都不必要——重要的是表明對毛澤東忠心耿耿，對此大肆叫嚷，同時誹謗自己

的同志。黨的原則為個人鑽營、毫不掩飾的獻媚和自我貶損所取代。”這些“壞蛋”中就有劉少奇和彭真等人。

在康生的主持下，延安“肅托”令人髮指。對犯人採取特殊的著裝與蓄髮制度。1937年10月27日，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通知雲：“為防止犯人逃跑及易於辨認起見，特令犯人穿看半紅半藍的衫褲，發蓄在頭之左右方，頭頂及前後部之發，一律剃光”。1939年這種制度曾經在一部分刑事犯中停止執行，但在政治犯中間仍然繼續推行，因觸犯康生而被秘密關押的原邊區保安處偵察部長陳湖生，就穿著這種“以胸背的中線為界，左邊紅，右邊黑”的對襟衣服，頭上留著“一條不寬不窄的‘馬路’，戴著手銬腳鐐，在延安過了五年零四個月的帶鐐生活”（卸鐐後又押了一年零七個月）。北京大學女學生陶凱孫及其已入了中國籍的朝鮮人丈夫金文哲，他們全力為中共搞地下工作，兒子一出生便送給了人。抗戰後不久，二人到達延安，1938年春一併失蹤，隨之被康生宣佈為敵人，秘密處決，死時僅27、28歲。直到1982年公安部才接受其家屬的申訴，複查後宣佈“這是一起冤案”。

據原社會部成員、任弼時政治秘書師哲揭發：1940-1941年間，師哲與陳郁參觀延安柳樹甸和平醫院，曾被一女護士長帶到一間大廳，發現一個大槽內用福馬林浸泡著一具年約30歲的男屍。護士長介紹說，“這是醫學解剖用的，原來有三具。他們都是反革命分子，是由康生批准處理的。他們的姓名、來歷，我們一概不知道”。師哲、陳鬱聽了頗覺詫異，便詢問他們被送來時是否是活人，女護士長回答，“當然，以醫療的名義送來，然後處理的”。

雷震遠神父在《內在的敵人》中說：“日本侵略者的殘忍是愚蠢而無意識的，中國共產黨的殘忍是荒淫而陰險的，他們以保護人民利益為藉口，實際則是殘暴

不仁。共產黨的罪惡千百倍於日本人。” 1940年5、6、7月，在博野有360人被殺，在定縣有1700人被殺，在安平死1200人，在深縣死2000人。被害的都是老百姓。他們被屠殺的原因是共產黨恐怕這些地方的人民會起來反抗他們。在這三個月裡，不僅是這幾個地方舉行大屠殺，因為這些地方靠近安國而為我熟知，所以我能作下正確的數位記錄。更有多少人在別處被殺，我不曉得。

一天，中共要求所有的人都到村子的廣場上去，小孩子們則由其老師領著去觀看13個青年學生是如何被砍頭的。在宣讀了一些莫須有的罪狀後，中共命令已嚇得臉色發白的教師領著小孩子們高唱愛國歌曲。在歌聲中出場的不是舞蹈演員，而是一個手持鋼刀的劊子手。“劊子手是一個凶恨結實的年青共兵，膂力很足。那共兵來到第一個犧牲者後面，雙手舉起寬大銳利的大刀快如閃電般的砍下，第一顆頭應聲落地，在地下滾滾轉，鮮血像湧泉般噴出。孩子們近于歇斯底里的歌聲，變成了不協調雜亂的啼叫聲。教員們想打著拍子將喧囂的音調領上秩序，雜亂中我又聽到鐘聲”。劊子手連續揮動了十三次鋼刀，砍下了十三顆人頭。幾個在場的觀眾，跑上去用饅頭吸取犯人頭中湧出的鮮血。有些中國人認為染存鮮血的饅頭可以醫治胃病。以前真正吃染血饅頭的中國人還很少有。現在，共產黨竟這樣鼓勵人們來破除迷信！……我恐懼地看見他們（中共的士兵）彎下身去，每人用尖刀在死人胸前挖一個洞，接著用雙腳或一腳蹬踩，使死者的心從洞中外湧，然後捉住拉出。他們把十三顆心放在一起，用柔軟的蘆葦穿成一串，拿回去吃掉。“小孩子們嚇得面孔灰白，有幾個已經嘔吐，教員們責罵著他們，一面集合列隊返校。”此後，孩子們常被迫去看殺人。

“當中共覺得殺人已不夠刺激時，他們開始發明各種各樣的酷刑，比如強迫人吞食大量食鹽卻不給一點水喝，直到受刑人渴死為止，或者強迫一個人脫光衣

服，在鋸斷型的碎玻璃上滾來滾去。或者在冬天冰凍的河上打洞，把犯人從洞口拋下，直到凍死或淹死而止。

“在山西的一位共產黨發明了一個可怕的刑罰。有一天他在一個城裡閒逛，在一家飯館門口停住，注視著煮飯的大鍋。於是他定購了幾隻大鍋，並立時捕捉些反共人士，草率舉行審判，同時令苦力把鍋裡注水煮沸。審判一完，立即把三個判死刑的犯人又脫光擲進鍋裡，活活煮死。……在平山，我曾看到一個人的父親被活活剝皮至死。兒子被共產黨逼著親眼看這慘刑的執行，親身聽到父親在哀號中死去。共產黨在他父親的身上倒上醋和酸類，一張人皮便很快地剝下。先從脊背開始，然後剝到雙肩，全身皮都剝下後，只剩下一顆頭皮存在。他的父親在全身皮被剝下後幾分鐘便死掉了。”

1940年，日本人對哈爾濱地下黨進行大逮捕，一舉消滅。倖存的左翼青年，費盡艱辛到達山東省德州地區抗日根據地。“肅托”中被疑為託派，兩度隔離審查，都未能證實，便各自恢復工作了。忽然發生日寇進攻，必須轉移了。大批幹部途中將多次經過日偽軍碉堡。這些受審者心懷怨恨，到那時只要喊上一聲，不就全完了嗎？於是決定處決兩對夫婦。男的槍斃，女的活埋。當一男一女兩個嬰孩也被扔進土坑時，旁觀者中忽有一農村女性動了惻隱之心，提出抗議：“那孩子們有什麼罪，怎能活埋！”於是兩條生命便由此得救。後來那男孩長大成人，經養父囑告，長期奔走，才洗雪了父母的冤情。

延安的征糧常常靠強制與暴力，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謝覺哉在日記提道，征糧有“逼死人”的。1940年天災歉收鬧饑荒，公糧仍增加了近一倍。1941年，收成減少兩三成，可是公糧卻再次翻一番。當地人怨聲載道，毛也知道這一點。

1941年6月3日下午，陝甘寧邊區政府在延安的楊家嶺小禮堂召開邊區各縣縣

長聯席會議，討論征糧工作和農民負擔問題。突然大風暴雨；一個炸雷，擊斷了禮堂的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縣代縣長李彩雲觸電身亡。一位農民飼養的一頭驢也被雷電擊死了。這位農民逢人就說：“老天爺不開眼，響雷把縣長劈死了，為什麼不劈死毛澤東？”保衛部門聞訊，要逮捕這農民，並要公開處理，以一儆百。毛知道這件事以後，立即阻止了保衛部門的行動。毛說：“群眾發牢騷，有意見，說明我們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聽到群眾有議論，尤其是尖銳一點的議論，就去追查，就要立案，進行打擊壓制。這種做法實際上是軟弱的表現，是神經衰弱的表現。”

不久，在陝甘寧邊區的清澗縣農村又發生了一起類似的事情。農婦伍蘭花的丈夫在山上用犁耕地時，不幸被雷電擊斃。伍蘭花一邊悲痛，一邊大罵“世道不好”、“共產黨黑暗”、“毛澤東領導官僚橫行”等。中央社會調查部聞訊後，把伍蘭花拘押到延安，並由保衛部門建議判處死刑，報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審判和中央審批以後即在清澗縣槍斃，以此來穩定社會局勢和群眾情緒。毛從社會調查部部長康生派人送來的《情況彙報》中，知道了這事。他說：“你們不能這樣做嘛！……中央設立社會調查部，不是設幾個官位。如果不做調查，就隨隨便便抓人、殺人，這是國民黨的黑暗做法！就這些而論，人家罵得就有道理呀！”

當晚，毛就叫來中央軍委總部保衛部部長錢益民，要他立即把伍蘭花帶來。在會客室裡，經過聊天，毛澤東瞭解到：伍蘭花的家裡共有六口人，七十歲的婆婆是個癱瘓病人；三個娃，大的才十歲，小的還不到三歲半；裡裡外外全靠丈夫支撐著。1935年中央紅軍來了後，她家裡分了五畝地，頭幾年還好，政府收的公糧少，家裡的糧食吃不完，踏實過了幾年好日子。這幾年變了，幹部只管多要公糧，還多吃多占。如今她丈夫死了，家裡的頂樑柱就沒有了。

毛又把錢益民叫進來，當面囑咐說：“把這個婦女馬上放回去，還要派專人護送她回家。記住，去的人要帶上公文，向當地政府當面講清楚，她沒有什麼罪過，是個敢講真話的好人。她家困難多，當地政府要特別照顧。對於清澗縣群眾的公糧負擔問題，邊區政府要認真調查研究，該免的免，該減的減。我們決不能搞國民黨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從農民罵共產黨的例子看，共黨是搞以言治罪的，是不給人民反對自由的，連自由的影子都看不到，可隨便捕人。只因毛當時還算“開明”，死的悲劇未馬上降臨農民身上。但四個月後，10月15日，毛的政府宣佈了史無前例的高額公糧。也就是說，毛得知農民的怒氣後反而加倍向他們徵收，甚至還添上一項新的稅收：公草稅，即馬料。

1943年3月25日，共產國際派駐延安的聯絡代表弗拉基米若夫（Peter Vladimirov）日記記載：給王明治病的是金醫生。當他開的處方拿到藥房時，值班藥劑師被這種不尋常的配方嚇了一跳。金開這藥方時，王明還沒有嚴重的腎病和肝病。王明的老婆馬上去找開這種藥的醫生，而金堅持要病人服用這種藥，即便藥最後變了顏色（變成深綠色），也照樣服。王明服用甘汞六個來月了。結果，他的肝和腎都出了毛病，並開始掉牙。奧爾洛夫把金的處方抄了下來，並斷然禁止病人再吃這藥。莫斯科來電說：“配方對，但有差錯，會危害健康。甘汞放一段時間，會分解成升汞和汞。長期服用這種已分解的藥物，就會慢性中毒，並導致汞中毒。嚴重時還會因急性貧血而死亡。” 中共中央衛生處的領導人傅醫生拿到了這個處方，他說，這種配方的甘汞，用這樣的劑量，毒性很大。傅醫生立即向中央委員會彙報了這個情況。江青解釋說：“金醫生靠不住，可能是國民黨特務”等。後來開了一次醫療討論會，延安總共十二名醫生都參加了。他們在中

共中央所在地楊家嶺呆了兩個星期。醫生們要求金作出解釋。事情竟發展到這種地步，以致中共主席毛禁止再向金提問題，並中斷了會議。當時王明要求到蘇聯看病，被毛澤東拒絕，毛怕王明到蘇聯後戳穿他與王稼祥的所演的雙簧戲。

1947年9月21日，紅色邊區臨時參議會副議長劉少白由康生主持批鬥；9月26日，邊區參議員牛友蘭的鼻子被鐵環穿起來由他的兒子牛蔭冠牽著遊街，牛友蘭被活活鬥死。

“賊喊捉賊”和“做賊心虛”這兩個成語，含有深刻的哲理。一個賊人，定把周圍的人都當作賊；因為他的東西是偷來的，他害怕別人也來偷。一個靠搞雞鳴狗盜而竊取政權的流氓團夥，自然對間諜特務之類特別敏感，終於患上了“間諜特務恐懼症”。

1942年底逮捕王實味後，毛又把矛頭指向所有知識份子集中的單位。他說：“醫大、中研院、民族學院、延大、科學院、魯藝、西北局、邊區政府，都有可能暗藏壞人”。

1942年12月，康生以總學委副主任的身份作《關於鋤奸問題》的報告，聳人聽聞地聲稱延安“特務如麻”。康生振振有詞地羅列了“張克勤是個典型的特務嫌疑犯”的幾點理由：“第一，他原在甘肅入黨。甘肅黨是個紅旗黨，就是打著紅旗搞破壞的假共產黨。第二，張克勤的父親，在蘭州被捕後出了問題。父親是叛徒，兒子還能是好東西？第三，張克勤平時對黨就心懷不滿，經常發牢騷，說怪話。有這樣充分的根據，還不能肯定他是特務？”

張克勤被捕時，才19歲。審訊人員採用車輪戰、神經戰、突擊戰的辦法連續不斷審問張克勤。到第三天天快亮的時候，連審訊人員也覺得困了，蠟燭也要用完了，便打電話請示社會部的負責人，回話是：已是關鍵時刻，你們怎能休息

呢，我還沒休息嘛！沒有蠟燭，讓總務處給你們送一箱去。張克勤實在支持不下了，被迫交待：他是國民黨特務，甘肅地下黨是打著紅旗反紅旗，是國民黨紅旗政策的產物，是國民黨特務組織。

張克勤交待的第二日，西北公學召開了全校師生大會，延安各機關、團體、學校也派代表參加了。張克勤在講臺上，泣不成聲地說：“我是一個罪人！”接著痛哭流涕地向大會介紹自己如何加入甘肅假共產黨，怎樣受國民黨派遣到延安搞特務活動。

甘肅地下黨組織在審幹一開始就成為重點。靠近陝甘寧邊區的隴東在審幹中首當其衝。所有地下黨員全部被捕，被押往延安審查。他們被迫承認是特務，並在嚴刑拷打之下，亂供一氣。1943年3月，中共甘肅省工委領導孫作賓、李鐵乾等在延安、隴東的近40名甘肅地下黨員全部被捕，押往延安，一些地下黨員的家屬和二三歲的小孩也隨大人被關押。

蕭煌時任陝北延川縣辦事處主任，一天被押到邊區銀行，進行審問，要他承認是“日本特務”。根據是：蕭煌的媽媽是日本人；他本人是從後方來的，很複雜；到延安後活動積極；所在辦事處短缺3000元款項，被懷疑是用作特務經費。蕭煌後來回憶說，為了讓他承認是“日本特務”，“對我軟硬兼施進行逼供，不認帳，就要殺我的頭。”

河南地下黨也被康生打成了“紅旗黨”。原在延安參加整風學習的河南省委書記張維楨被審查。緊接著，中共通知在任河南省委書記王志傑、宣傳部長郭曉棠和一批黨員幹部到延安接受審查。隨後二人又被開除黨籍。在審幹中，河南省委上到書記，下至一般幹部，凡與河南地下黨有關係的同志，甚至從河南來的黨外幹部、家屬以及13歲的孩子都未逃脫被當作“紅旗黨”挨批的厄運。他們大

多數被打成“特務”、“叛徒”。王志傑直到抗戰勝利後才被恢復黨籍。郭曉棠的黨籍拖到 1950 年才恢復，直到 1956 年才分配了適當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時，郭曉棠成為河南省第一個被點名批判的人，在殘酷迫害中含冤而去。

1943 年 4 月，原任河南省委地下交通科長的杜征遠，剛被調到中央組織部工作不久。一天深夜，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驚醒了他，他打開了門。一聲喝斥：你被捕了！杜征遠不知所措，被迫跟這些人走。第二天，就對他進行審訊。他說“我從沒參加過特務組織！”審訊人員冷笑說：“連河南省委都有問題，你是交通科長，是掌握黨內情況的重要人物，能沒有問題？河南省委是紅旗黨，是假共產黨”。杜征遠抵不過，只好認了。

四川省委工委書記鄒鳳平，長期戰鬥在國統區，對黨忠誠，在與敵人鬥爭中脊椎骨折斷，他還有胃病和肺病，1940 年中央將他從四川調到中央黨校學習，審幹開始了，四川黨被打成“紅旗黨”，他這個原四川省工委書記也“在劫難逃”，被當成“特務”進行批鬥，精神受到極大打擊。加上妻子也揭發他是“特務”並離開了他，使他憤而自殺。

當時把甘、陝、川、豫、浙、鄂等 20 幾個省的地下黨組織打成“紅旗黨”。甚至懷疑所有這些黨的地下黨員都是“特務”，而進行嚴刑逼供。

彭真 1943 年 1 月 4 日他結合中央黨校破獲“吳奚如特務案”，介紹如何與反革命鬥爭的經驗，他直接負責的中央黨校就是重災區。鄒鳳平(四川工委書記)、危拱之(葉劍英夫人)、曾淡如(四川省委婦女部長)等一大批人，或自殺或瘋癲，都毀在他的手上。

曾志在回憶錄中有如下一段描述，“一做過地下工作的老革命叫易繼光，被審查時，有人用皮帶抽他，遍體血漬，有人咬他的胳膊，肉被咬掉了一塊。有一

次用繩索吊他兩手兩腳各一指一趾，高高吊在窯洞的梁上再用皮帶抽，真是慘不忍睹。還有一位被鬥的女同志被打得昏了過去，倒在地上抽搐，有人卻說她裝死狗，用腳死命踢她。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流血，月經來了，但仍被打被鬥，結果褲子都濕了，還把窯洞的地面染紅了一大片。上吊自殺的好像叫周風平，他是來自白區的省委書記…每到夜晚，臨時支部這排窯洞的一個個小視窗透出胡麻小燈如螢火蟲般的昏黃燈光，四處靜悄悄的，只有一陣陣的喝罵聲、踢打聲和慘叫聲越過土牆，越過山梁，飄向漆黑的山野，時斷時續，讓人心驚肉跳，不寒而慄。”

有一些場面讓人肉麻不堪。如：葉劍英的前妻危拱之，大革命時留蘇，參加長征，後來當河南省委組織部長。她被審查時用褲帶自縊，被人發現時已七竅流血，但一條命算是揀了回來。此後她半瘋半傻，常常跑到男朋友的集體宿舍裡當著別人的面同床共眠，和曾志分到一個宿舍後又召來男友在曾志面前在床上摟來抱去，滾作一團。

林彪老婆葉群當時也被關起來受審查，和曾志關在一起，她不上廁所，大小便就拉在臉盆和飯碗裡，然後往門外一潑，臭氣四溢。有時，她甚至就拿過曾志的臉盆來方便。

1943年4月1日，康生親自圈定名單，指令抓人，一夜就逮捕了260多人。

4月3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發佈了《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決定說：“日寇與國民黨大規模地施行其特務政策，我黨各地黨政軍民學機關中，已被他們打入大批內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數量至足驚人”。要求在整風的同時，在全黨開展一次組織審查，以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1943年4月9~12日延安分別召開中直、軍直和邊區系統各機關2萬多人

的幹部大會。任弼時代表中央書記處作報告，號召“誤入歧途者”坦白交待，同時警告說，寬大政策的反面就是無情鎮壓，不願坦白的人是在走一條自我毀滅的死路。胸佩大紅花的張克勤站在臺上痛哭流涕地講了自己如何加入特務組織，如何被挽救的經歷及感受，使與會者大受感動與鼓舞。隨後，康生大談延安還有許許多多的“張克勤”，號召這些“張克勤”起來悔過自新。

1943年4月19日後，延安掀起了“坦白運動”及“搶救失足者運動”的高潮。為了推動及促進各單位的“坦白運動”，康生讓“坦白典型”張克勤騎上高頭大馬，胸掛大紅花，先後到中央大禮堂、八路軍大禮堂、綏德抗大總校、綏德師範等單位作巡迴“坦白運動”報告，試圖帶出新的典型。於是，各單位、各系統又掀起了“坦白運動”高潮，延安行政學院有一個班的一個小組的成員全部“坦白”是叛徒、特務、反革命。他們買來紅棗、花生，開慶祝大會，邀請其它還沒“坦白”的小組參加。“坦白”的學員一起暢談“坦白”的思想過程，動員、啟發尚未“坦白”的學員。有的單位領導為本單位沒人“坦白”而坐立不安。

凡是在搶救運動中主動坦白自己是特務的，一概給以獎勵和表彰。表彰方法有戴大紅花的，有吃番茄掛麵、雞蛋掛麵或紅棗稀飯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故而一些人尤其是年齡較小的，為了享受一番難得的佳餚，也就拼命坦白自己就是國民黨派來延安搞破壞的特務。有人被懷疑為特務，如果此人不承認或不配合組織的誘供，則將永世不得翻身，並且還要經受一番非人的折磨，而一旦承認了，則有可能再次受到組織的青睞，從輕發落。在此種情況下，被組織懷疑的知識份子也只好違心編造情節把自己說成是一大特務。

楊述曾被內定為特務，他死活不承認，害得“地委書記天天拍桌子大發雷霆”，在上級領導的一再督促下，韋君宜答應去勸說丈夫楊述坦白。韋君宜寫道：

我見了他，只說得一句：“形勢非叫你坦白不可，你就坦白了罷。”說罷就大哭起來，他也放聲大哭。他們由人見人愛的人變成了人見人唾的鬼。這叫他們怎能不倍感冤屈而淚流滿面呢？他們之所以放聲大哭，乃因他們作為正直的知識份子，卻不得不昧著良心最終走上說謊的人生旅途，誠如韋君宜後來所言：“她參加革命就準備好了犧牲一切，但沒想到要犧牲自己的良心。”這種被迫的犧牲，當時往往被看作是具有黨性的表現，是忠於革命事業和對黨負責的表現。

王世英是位與劉少奇關係不錯的高級幹部，有一次跟劉少奇說：回到延安，我好像學了一些壞東西，自己不願說的非得去說，不願做的非得去做，因而感覺沒有以前在白區幹秘密工作時那樣純潔。劉少奇卻說：你這不是學壞了，而是學好了，因為“所謂好壞之分，應從黨的工作、黨的利益出發，吹牛拍馬不好，但對工作有利就是好的、就要做。”

所謂“吹牛拍馬”，其實就是講假話、就是撒謊，而其被許可的標杆乃是符合黨的利益。延安時期的知識份子開始昧著良心走上說假話的路途，開始養成自欺欺人的奴性品格。

散文家吳伯簫可算是延安文人日漸走向說謊的典型之一。延安搶救運動期間，他擔任邊區教育廳中等教育科科長，不幸被打成“國民黨 CC 特務”，受盡了委屈。1944年3月，這一消息傳到國統區，據說他已被整死了，西安方面就為他開了追悼會。延安聽到了這消息，不久後也就特別安排他在“延安文化界招待中外記者團座談會”上發言，以示闢謠。隨即又把發言稿整理刊發在《解放日報》上。他在發言中說，我們邊區是自由光明的地方，共產黨是行仁施義的政黨，現在我很健康愉快地生活著。在那嚴酷的統制下，為了生存必須說謊。

7月11日，中共中央總學委發出通知，要求加緊對反革命分子的清查。15

日，康生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於是“審幹”運動又發展成“搶救失足者運動”。

在《解放日報》和新華社，起初沒有搞出什麼“特務”，受到康生嚴厲批評。後來採用逼供信的辦法，在兩個單位的一百幾十人中，被逼承認是“特務”的占70%左右（溫濟澤：《征鴻片羽集》776頁）。僅《解放日報》被搶救出來的“特務”占全體人員的95%。接替丁玲工作的艾思奇此時也受到懷疑，被免去學委委員。副刊部秘書溫濟澤在對王實味的鬥爭中表現積極，此時也因他有一叔叔是國民黨少將，被說成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

東北作家白朗流亡到延安，在搶救中，受到極大精神打擊，先是在解放日報社挨整，繼之在中央黨校三部遭批鬥，終於導致“在長達一年半的時間，白朗糊裡糊塗、癡呆麻木，整日不講一句話”。在《解放日報》社印刷廠一位總務科長因不堪逼供，被迫刎頸自殺。

李銳此時任《解放日報》國內部編輯，他的一個大學同學因“託派”嫌疑被抓，因不堪刑訊，承認自己是“特務”，並咬出李銳是他的“上級”。1943年4月，在邊區第一次大逮捕的浪潮中李銳被捕，作為重犯，從1943年4月至1944年6月，被關押在邊區保安處。

當李銳在1943年4月1日被延安保安處逮捕後，與他同床共枕三年的范元甄很快在黨的啟示下，相信李銳“的一切都是為了麻痹”她，所以和他劃清界線了。範在日記中寫道：“我真是對他毫無留戀了。除了因為認識到他是敵人，一切都是欺騙之外，整風是有莫大關係的”（《父母昨日書》p348）。夫妻關係成了敵我關係。“他拖了我三年，給了我許多潛移默化的壞東西，這固然是不幸。三年後的今天，竟得以解脫，倒也是件大幸”。

可是，這個滿口“進步”、“革命”的女人居然也成了搶救對象。在除了恐怖還是恐怖的氣氛中，她只好“一下寫了二三萬字的反省筆記”；承認“我的思想還是國民黨的天然同盟者”。組織上派鄧力群去搶救她。結果沒想到幫助、幫助就睡到一起了。鄧的老婆來找鄧，撞見了。范元甄起身穿好衣服，說聲“對不起”就走了。有一次，胡喬木白天去找鄧力群辦事，鄧從窯洞裡出來，對胡說：“小範在這裡”。胡心領神會，什麼也沒說就走了。

1944年6月，李銳放出來後，當晚范元甄就對他說：她和鄧力群真誠相愛了，她從心裡敬佩鄧，崇拜他的學識和能力。李銳起身就出了窯洞，兩人很快離了婚。李銳大病一場，差點叫傷寒要了命。事情鬧開了，影響越來越壞。組織上只好出面干涉，把范元甄下放到橋兒溝鄉去當鄉文書。鄧力群居然追到那裡，冒充丈夫，又與范元甄同居了一個星期。為此，組織上一個月內開了五次批判會。范元甄主動表示願意和李銳重婚。重婚時，曾親手用極工整的蠅頭小楷抄寫了楊尚昆代表組織對批判大會的總結。這份結論認為范、鄧雙方都有責任，主要責任在鄧力群。楊尚昆對鄧力群有這樣的評語：“個人主義發展到狂妄的程度，公然與黨對抗。這狂妄的個人主義有它的幾個組成的因素：一是自恃有八年的黨齡。其實八年中在黨內沒得到什麼鍛煉，小資產階級劣根性保持至今。沒有經過群眾鍛煉，在延安的工作與生活是脫離群眾的。再加中了相當深的教條主義的毒，這就給那個狂妄的個人主義以一身漂亮的外衣。掩蓋住了劣根性，並且增加了狂妄性。能夠說出一套，聽起來很好聽，但是言行不符。……”這就是活脫脫現在的鄧力群。他其實就沒有信過什麼共產黨的教條，他當初對范元甄的作法早就證明了這一點。這人一貫以革命的名義，行一己的私利；口頭上冠冕堂皇，肚子裡男盜女娼。廬山會議李銳被打倒後，李銳和范元甄又一次離婚了。

據李銳回憶，搶救運動中“延安 80%的知識份子上臺‘坦白’，成了特務，結果無一例真實”。象於光遠這些上過大學的黨員，當時都曾被當作特務關押了一年多。

據胡績偉《青春歲月》回憶，他所在的邊區群眾報社，算是搞得比較文明的，可氣氛也很緊張。“每天開鬥爭大會時，總支書記一上場，就把手槍擺在桌子上作為威懾力量”，還動不動把人吊在房梁上。報社四五十個外來知識份子中，沒有被當特務鬥爭的，只有兩人。

搶救期間，已經併入延安大學的“魯藝”的政治空氣也越來越緊張了。當時，魯藝共 300 餘人，卻有 267 人被打成特務，比例之高，駭人聽聞。有位叫高洛音的女青年，被迫承認自己是特務、叛徒，並且抓捕過周揚，但事後由於過分恐懼而與其三個孩子一同自焚。

木刻家彥涵親眼看到魯藝一位被審的青年，發瘋般沖出關押室，大呼“冤枉啊——”縱身跳下懸崖，淒厲的聲音回蕩在山溝，也久久縈蕩在彥涵的心裡。

各單位按照康生報告的精神大開“規勸會”、“坦白會”、“批判會”，大張旗鼓地抓特務分子。一時間，特務如麻。被“搶救”的知識份子占總數的 90% 以上。抗大總校 1052 個排以上幹部中，共挖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特務分子” 602 人，占總人數的 57.2%。在幹訓隊 496 人中，“嫌疑分子”竟達 373 人，其比例為 75.2%。西北公學 500 多人，只 20 人沒有被“搶救”。綏德師範“搶救”的人員達 230 人，占全校師生的 73%。

陝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所屬部隊是駐守延安地區的衛戍部隊，該司令部所轄的中共唯一 1 個炮兵團，因八路軍從事遊擊作戰，炮兵團派不上用途，所以一直被置放在南泥灣搞開荒，與外界處於半隔絕狀態。炮團幹部文化素質高，有不少

人甚至在蘇聯學習過。僅教導營就有近 2 百名知識份子。在“搶救”中，炮團 90%的人被打成特務分子，有個模範連的幹部 100%被打成“特務分子”。確定“特務”的標準非常簡單：出身知識份子、來自國統區，不是“日特”，就是“國特”；若原是中共地下黨員，則是“紅旗黨”、“假黨員”、“叛徒”。炮團參謀徐昭，因其父在國統區煤窯上管財務，他就順理成章被打成了“特務”。

陝甘寧邊區政府機關共有三、四百人，被“搶救”的達百餘人。軍委三局電訊學校 200 多人，挖出 170 個“特務”。中央秘書處 60 余人，挖出了十幾個“特務”。延安警衛團一個團被抓的“特務”占全團人員的 80%以上，延屬各縣抓“特務”達 2463 人，其中一個縣，在 13 天內就挖出了一個 200 多人的特務組織。“搶救運動”中抓出那麼多的“特務”，特別是在康生《搶救失足者》報告下發之後，“特務”越來越多。

據胡喬木說，在延安審幹、搶救運動中，僅半個月就挖出了所謂特嫌分子 1400 多人。從 1943 年底到 1944 年初，延安和陝甘寧邊區清理出的“特務”多達 1 萬 5 千多人。

毛“發動各人寫思想自傳，可三番五次地寫，以寫好為度”。“叫各人將一切對不住黨的事通通講出來。”經歷過延安整風的李銳告訴我們：“很討厭的，你要寫聽說過對黨不利的話沒有，張三講的，李四講的，我自己跟誰講過什麼不好的話，也要交代清楚。而且不止填一次，不斷挖，不斷寫，不斷填。小廣播表欄，起了很壞的作用。”表上到底填什麼，何謂“不好的話”，故意不下定義，使人們在害怕心理支配下儘量多寫。有個人嚇得填了足足八百條。

抵制一概被當作特務的證據：“你既然沒什麼見不得人的，為什麼不能向黨彙報呢？”人們無法用隱私權來自衛，共產黨人摒棄一切私有制。行政學院在命

令填“小廣播”表的大會上，有人發問：“是否晚上與老婆講的話也要填？”引起全場竊笑。結果，發問者以及學院的大多數人都成了特務。毛澤東在 1943 年 8 月 8 日《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中說：一個 2500 人的黨校已挖出 250 個特務，而且估計不止此數，“學生中很多是特務，恐怕是過半數”；還舉了行政學院的例子說，“除了一個人外，教員、職員全部是特務”（楊奎松：《延安整風的台前幕後》）。通過填“小廣播”表，毛成功地讓人們互相告密，撕斷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紐帶，沒人再敢對他人發表意見。人們既然不敢傳播小道消息了，毛也就卡住了唯一的非官方訊息管道，而所有的官方管道都緊緊地攥在他的手中。在延安，外部世界的報紙、電臺、信件都不允許，甚至跟家人通信也很危險。訊息的枯竭帶來大腦的僵化，僵化又朝僵死變去。既不能同別人商討，又不能訴諸白紙黑字，私下寫一寫也怕。為了表示清白，日記被紛紛交了出去。人們不僅不敢說，連想都不敢想。

劉少奇是 1943 年 4 月 28 日成立的中央反內奸鬥爭委員會的主任，在肅反上直接領導康生、彭真、高崗等人，是延安整風的第二號劊子手。據劉少奇 1949 年在天津的一次講話中說，當時延安審幹中採用了恐嚇和刑訊的辦法，僅延安一地自殺而死的就達 50~60 人。

楊尚昆回憶說：有一次，在楊家嶺禮堂開大會，“鬥爭”以前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柯慶施。會上，和柯慶施一起在北平做過地下工作的人起來揭他說：“你戴了黑眼鏡，大搖大擺地在東安市場走，說明你政治上有依靠”！“你還背著照相機，你是地下黨員，憑什麼敢這樣招搖？”柯慶施什麼也不承認。大家就喊口號，轟了一個下午，從下午 3 點鐘一直開到 7 點鐘，什麼結果也沒有得到。那時，康生開了二三十人的名單，一旦柯慶施突破了，那二

三十人都要抓，連關押人的窯洞也準備好了。散會後，楊尚昆把情況向毛澤東說了。毛聽後說：這個會不要再開了，我會給康生打招呼。這件事還是發生在“搶救運動”之前，後來在“搶救運動”中，又變本加厲地追逼，柯慶施的夫人被逼得投了井。

薄一波說：有一件我難忘的往事，其情其景多年來不時的湧上心頭。那時我母親也與我一起到了延安，她在一個深溝的窯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時，她說，“這裡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麼回事。”我於是向深溝裡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個窯洞關著約上百人，有許多人神經失常。問他們為甚麼？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後看管人才無可奈何地告我：他們都是“搶救”的知識份子，是來延安學習而遭“搶救”的！

死去的有上千人。自殺往往是唯一的解脫。有的跳城牆，有的跳井，有的把妻子孩子殺死然後自殺。自殺幾次才終於死去的為數不少，一個物理教師先吞火柴頭未死，再懸樑自盡。自殺未遂的人受到的無情待遇，從三五九旅政工幹部王恩茂的日記中可見一斑：“要一個同志來談話，因他坦白後大翻供，吃了一把碎玻璃，實行自殺，督促他寫檢討材料。”

自殺也是抗議的最激烈形式。一個受害者跳崖死去以後，他的同志們把屍體埋在審判官的窯洞對面，含義很清楚：讓死者的魂靈天天糾纏你們！

當時中共甚至把“一二·九運動”也視為國民黨“紅旗政策”的產物。時任中共中央青委負責人的蔣南翔在 1945 年 3 月給劉少奇和中共中央的“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中談到：聽說不少地方把參加“一二·九運動”作為審幹的尺度；隴東領導“搶救運動”的幹部公開說：“國民黨於 1935 年起就在全國實行黨化教育，所有那時以後來到邊區的知識份子，無例外地都有問題。”因此隴

東的外來知識份子，就有百分之九十九點幾是被“搶（救）”了（全隴東只有兩個外來新知識份子未被“搶救”）。直“搶”得所有外來知識份子叫苦連天，怨聲載道（這是我親歷的見聞）！”“搶救運動”中“90%以上的打擊是落在自己同志的身上”。蔣建議中央以後不再用群眾鬥爭的方式“普遍肅反”。當時，蔣南翔的“意見書”送到中央後，毛不但將其“留中不發”，而且對蔣南翔組織批判。

1943年9月後，晉綏整風進入到“搶救”階段，當時黨校共2~3百人，其中70多人被迫承認為特務分子，有日特、國特、閩特，30多人未承認或半承認，總計黨校被搶救的幹部，占總人數的60-70%。這個數字並不驚人，當時，晉西北有個師範學校99%被整為特務，所以有人給師範學校送了一個“特務學校”的綽號！教師、學生有好幾串，十五六歲的女孩還成了專職的“特務女性”，最後擴展到小學，許多小學生是也成了“小特務”，最大的十二歲，最小的只有六歲（見韋君宜《思痛錄》）。

1943年春夏；延安的“搶救”經驗傳到淮北，不久就發生了“淮中案件”和“泗陽案件”兩起嚴重的肅特假案。

1943年8月，淮北中學一女生因偷竊別人50元邊幣行為被抓後，為推卸錯誤，捏造受一“特嫌”女生指使所為。在校領導的壓力下，偷錢女生編造了“進步青年建國團”的組織，結果校領導對全校師生實行了刑訊逼供，將一個220人的中學中的42人打成“特務”。此案上報邊區公安局，情況不僅未被澄清，邊區公安局採用逼供信的方式，將“特務”又增加到56人，使全校1/2的教職員工都成了“特務”。此案於1944年7月17日予以平反。

泗陽案件發生在1943年10月-1944年2月，泗陽不到10萬人口，短短五

個月裡，全縣逼出 1400 多個“三青團員”，並逮捕了 150 多人，範圍涉及黨政軍民等各界和縣區鄉及部隊連排班幹部。1944 年 2 月，案件進一步擴大，泗陽縣委籌畫大規模逮捕縣武裝幹部。此案全由刑訊逼供造成，指控罪犯全部聽信口供，有些則憑主觀臆測，毫無人證物證。此案第三、第四批被捕人員在 1944 年 3 月予以平反（第一、第二批案犯繼續審查）。

1943 年底，中共中央鑒於絕大多數知識份子都被打成“特務”、各機構無法正常工作，乃決定對“搶救運動”中被定為“特務”的人逐個甄別，結果大部份人被平反。

經過兩年的恐嚇和洗腦，志願者們脫胎換骨了，從前充滿激情要為公正平等的理想獻身，如今演變成機器人。1944 年 6 月，當延安關閉多年後外面的記者第一次獲准來訪時，重慶記者趙超構觀察到：“以同一的問題，問過二三十個人，從知識份子到工人，他們的答語，幾乎是一致的。不管你所問的，是關於希特勒和東條，還是生活問題，政治問題，他們所答覆的內容，總是“差不多”。“但是，他們一致堅決否認黨和政府對他們的思想有直接的管制”。趙感到延安的空氣“幾乎使人窒息”。斯諾夫人海倫說，1937 年她在延安時，人們還愛說笑話，看見毛澤東走過後有人還擠擠眼說：“上帝走了。”7 年後，沒人再敢這麼說了。冷嘲熱諷，幽默，說俏皮話，發牢騷，都可能被打成“特務”。

毛要的是機器人，一按電鈕，就按他的意志開動。他的目標實現了。“搶救運動”製造的冤假錯案甄別後，毛為了緩解他們的怨氣，他在 1945 年春天作了幾次公開道歉。但他好像替人受過：“我代表中央道歉”，“整個延安犯了許多錯誤”。毛以老子自居，說：“老子打了兒子，就不要記仇了。”這僅僅是口頭道歉而已，毛始終不承認所謂的以王實味為首的“五人反黨集團”是冤案。1945

年毛說：“當時很多文化人總是和工農兵搞不到一起，王實味挑動勤務員反對我們，他像是站在勤務員立場上反對所謂三等九級、吃小廚房。… 黨要統一思想才能前進。王實味稱王稱霸，就不能前進。42年實味在延安掛帥，他出壁報，引得南門外各地的人都出來看；他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我們承認打了敗仗，於是好好整風”。

師哲回憶說：1944年初，從晉察冀邊區經晉西北押送到陝甘寧邊區四名嫌犯，其中三名是俄羅斯人，一名是南斯拉夫人，他們本是要借道解放區，設法去南洋和澳洲謀生的，他們落入康生手中，一直被關押。1947年3月，胡宗南進犯延安，王實味從中央社會部轉押晉綏根據地。並把包括這四名外國人在內的一批犯人押到後方永坪一帶，康生從瓦窯堡經永坪到山西去時，在行進中順便指示保安處將這批人連同王實味一起處決；王實味在山西省興縣蔡家窯，被晉綏公安總局處決，時年41歲；處決後把全部屍體都塞進一口枯井裡。

抗戰勝利後江青坐飛機去了兩次重慶，每次都大包小包往回帶行李。第二次，不知買的是啥東西，花了幾百萬法幣，硬要在中央特會科報銷（中央特會科即中央辦公廳特別會計科的簡稱，是專門管理中央政治局五大書記的工資、稿費及其他收支）。特會科科長見款項數目太大，不敢做主，找師哲審批。師哲說：“款項太大，等搞清楚再說！”這下捅了馬蜂窩，江青找師哲大吵大鬧，說這筆錢由她個人負擔。師哲亦不示弱，堅持要搞清楚買的什麼，為什麼要從黨的特別經費中報銷。後來師哲大怒，掀翻桌子，拂袖而去。此事後來不了了之。要說明的是，江青與師哲大吵，毛澤東就在隔壁窯洞安坐，後來坐不住，就在師哲門前走來走去。但毛沒有就此發表了什麼重要指示。文革中師哲被關入秦城，吃了不少苦頭。

1962年毛信口胡言：王實味“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只是把他“殺了

不好”，應該“讓他勞動去”。1991年，在溫濟澤等人的推動下，王實味才獲昭雪。公安部於1992年2月7日，正式作出《關於對王實味同志託派問題的複查決定》。《決定》說：“經複查王實味同志1930年在滬期間與原北大同學王凡西、陳清晨（均系託派分子）的來往中，接受和同情他們的某些託派觀點，幫助翻譯過託派文章。在現有王實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對參加託派組織一事反反復復。在複查中沒有查出王實味參加託派組織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為反革命託派奸細分子的結論予以糾正，對王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處決給予平反昭雪”。

伊索寓言說：獅子和驢子以及狐狸商量好一起聯合去打獵，他們捕獲了許多野獸，獅子命令驢子把獵物分一分。驢子平均分成三份，請獅子自己挑選，獅子勃然大怒，猛撲過去把驢子吃了。獅子又命令狐狸來分。狐狸把所有的獵物都堆在一起，僅留一點點給他自己，然後請獅子來拿。獅子問他，是誰教他這樣分的，狐狸回答說：“是驢子的不幸。”王實味就是那驢子，毛澤東是那獅子，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就是那狐狸。

延安整風，作家成了“政治化了的人”，成了馴服的工具，叫怎麼說就怎麼說，叫怎麼寫就怎麼寫。從此，知識份子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和觀點，進入了全面冬眠階段。

第94節 輿論控制和保密制度的建立

個人崇拜所要求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嚴格的輿論控制和保密制度。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剛在延安創辦時還保留了普通媒體的一些特點，人們從中不但可以知道不少資訊，而且還可看到一些不同意見的爭鳴。1942年4月10日延安的《解放日報》第二版曾登一條“黨校一學生失戀自殺”的消息，受到了毛的批評。隨後決定《解放日報》改版。

毛澤東新聞學的基本觀點師承的都是列寧史達林的新聞理論，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連史達林都難望其項背。在文網嚴密的蘇聯報刊，偶而還有幾篇批評官僚主義的小品文問世。而在延安，1942年後的報刊上已不復有任何“暴露性”的文字。在官方黨史學一再重複毛下令停止“搶救”運動後的一個多月，1943年9月21、22日的《解放日報》還連續刊登了“延安縣開展防奸運動”，“綏師失足青年紛紛悔過，控訴國民黨特務機關萬惡罪行”的報導。當時並沒聽說毛看了此類的消息後發脾氣或拍桌子，反倒是綏德地委組織的宣講團被邀請到延安給一些機關學校作報告。

“整風”後，除《解放日報》外，延安的其它報刊基本上都停刊了，連各單位“整風”開始時出的壁報也都消失了。因為先前黨中央發出的“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號召，實際上很快就被收回，變成了“以言定罪”，隨意發言屬於挨批的“自由主義”或“小廣播”。這談不上黨接受輿論監督，相反卻是由黨直接掌管和監督輿論導向，並組織人馬審查一切新聞報導。按當時的規定，報紙的通訊員由黨委設置，有關各地的消息報導原則上也必須經當地黨委同意。延安唯一的出版社“解放社”不僅不再印行各種期刊和一般書籍，而且連馬、恩、列、斯的著作也停止出版，只印有關“整風”學習的文件和材料。從此，報紙成了名副其實的黨的喉舌，徹底實現了毛澤東所要求的“輿論一律”。

毛澤東“新聞學”最顯著的特徵是將政治功利性視為新聞學的本質，而否認新聞具有超階級性屬性的觀點。它有五個核心原則：

1) “黨性第一”的原則。毛澤東、陸定一、胡喬木認為：任何報紙都是一定階級的政治鬥爭的工具，世界上絕不存在超階級的客觀報導，中共的報紙應是反映黨的政治路線的黨報。黨報不僅應是“黨的教科書”，而且也是“人民的教

科書”。為了不使人民失望——胡喬木說，“人民的希望就是讀教科書”，中共應把黨報辦成像“章章都好”的《聯共黨史》那樣，使人民能“讀一輩子”。為此，黨報“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論文、每條通訊、每個消息……中都能貫徹黨的觀點，黨的見解”。舉凡一切評論、消息、照片都必須以是否符合黨的利益為標準而加以取捨，並以黨的立場來判斷一切。黨報絕不是“有聞必錄”、單純報導消息的新聞紙，而是為了實現黨的任務而奮鬥的宣傳工具，必須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下。

2) 反對“虛假真實性”的原則。陸定一等提出一個有名的的口號：“把尊重事實與革命立場結合起來”，強調新聞“事實”必須置於“革命立場”的統帥之下。於是，陸定一等引用了列寧的“兩種真實性”觀點：即“本質真實性”代表了歷史發展方向的事實，儘管它處於萌芽狀態或尚未發生，但從本質上講它是真實的；而“虛假真實性”只反映事物的“表像”和“假像”，而不反映事物的本質，因此它必定是不真實的。如果以為它是新近發生的事實，“把個別現象誇大成為整體現象”而加以報導，那就必然會犯“客觀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錯誤，而無產階級的“真實性”和“客觀主義”、“自由主義”是截然對立的。

3) 新聞的快慢必須以黨的利益為準則。“搶新聞”是“資產階級新聞學”的惡劣表現，正確的“無產階級新聞觀”將發佈新聞的快慢完全服從於黨的需要，“該快的快”，“該慢的慢”；“有的壓一下才發表，有的壓下來不發表”，總之，一切必須聽命于黨的領導機關和最高領袖，絕不允許報紙和記者有絲毫的“獨立性”和“自由主義”。

4) 運用報紙指導運動的原則。黨的領導機關必須善於“利用”報紙，尤其要學會運用報紙指導政治運動，在運動初起和達到高潮的一段期間內，集中報導，

形成宣傳規模，用以教育幹部和群眾，震懾和打擊敵人。

5) 新聞保密和分層次閱讀的原則。抗戰前，《紅色中華》報和以後改名的《新中華報》便開始抄收國民黨中央社的電訊。一部份在報上發表，一部份編印《參考消息》，每天印五六十份，供中共中央各部門負責人閱讀。後來正式出刊了供領導幹部閱讀的《參考消息》，閱讀範圍較前有一些擴大。出版《參考消息》的指導思想在於進一步明確新聞保密和分層閱讀的原則。因為群眾有左、中、右的劃分，黨員也有左、中、右之區別。中低級黨員幹部的政治覺悟和理論水準不足以抗禦國內外新聞報刊散佈的“毒素”的侵襲，因此只有久經考驗的少數高級幹部才有資格被告知某些重要的新聞消息，幹部級別越高，閱讀限制就越小。至於普通老百姓，為了保證他們思想上的純潔性，就沒有必要讓他們知道黨報以外的其它消息了。當然，普通黨員比普通百姓多知道些資訊，這主要通過閱讀黨內讀物，聽上級的傳達報告來體現，以顯示黨員在“知”的方面所享有的特殊權利。

毛搞“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以“以糧為綱”和“以鋼為綱”，這種做法在延安時期就開始了，那時在農業上叫“提倡吳滿有方向”，在工業上叫“開展趙占魁運動”。

吳滿有是延安紅人，因連年開荒、成為“先富起來的人”。為配合大生產運動，邊區把他塑造成先進典型。《解放日報》1942年4月30日報導了他的事蹟，並配發題為《邊區農民向吳滿有看齊》的社論；接著毛澤東在西北高幹會議上提出“吳滿有式的生產運動”的概念；邊區政府主要領導林伯渠、李鼎銘等要求“廣為宣傳，號召每個農民向吳滿有學習，向吳滿有看齊……創造更多的吳滿有！”文藝家更是熱情澎湃，詩人艾青一改《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沉鬱，寫出

熱情奔放的長詩《吳滿有》，他把詩念給吳滿有聽，直到吳表示沒有意見為止。

吳成為邊區著名勞動英雄，多次參加表彰大會、群英會，入黨提幹。

1943年2月24日，安塞縣勞動模範楊朝臣寫信給吳滿有，倡議開展勞動競賽，吳滿有覆信：我也向你提出兩條：第一，就是不僅你和我兩人要競賽，而且要首先把你我兩個莊子的生產搞好，我提議根據兩莊的勞動力和牛犍來競賽，看誰個莊子的糧食多？爭取“勞動英雄莊”的稱號。第二，邊區的勞動英雄不止你和我兩個人，各縣都有，還有我們的軍隊這兩年的生產成績特別大，他們一定有更多的勞動英雄。所以，我主張把這個生產競賽運動，擴大到全邊區的軍隊、群眾中去。我想你一定是贊成的。

此信一出，朱德電令全軍回應，賀龍連夜打電話要南泥灣駐軍接受挑戰，西北局要求各地推廣和領導這一生產大競賽。“一個勞動英雄與勞動英雄之間、莊與莊之間、軍隊與民眾、軍隊與軍隊之間有生產競賽和勞動互助運動迅速在邊區掀起，發展到邊區各個角落。”

這封信有集體富裕的思想，有謙虛的態度，有對領導的回應，有對軍隊的頌揚。其思想覺悟之高、考慮問題之周延、直接反響之強烈，很難讓人相信這是40年代陝北一個農民寫的，是不是記者捉刀？以典型帶動全社會，通過典型之口說出組織者、領導者想說的話，是“抓典型”、“樹榜樣”的目的之一。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一夜之間聞名全國，不是他的命運好，而是“上面”需要這樣的角色，這就是“時勢造英雄”中國版。70年代北京市小學生黃帥也“寫”過一封影響全國的信。1947年胡宗南佔領延安後，吳滿有當了叛徒。

輿論控制必須輔之以嚴格的保密制度。因為個人崇拜的後面必然隱藏著許多見不得人的東西，這些資訊一旦暴露，個人崇拜也就坍塌了。史達林在蘇聯被崇

拜得勝過神仙，他死的時候莫斯科簡直是哭聲震天，向他的遺體告別而擁擠到踩死不少人的地步。但經過蘇共“二十大”揭露他專制暴虐、殺人如麻的真相後，人們對他的崇拜急轉直下，等到赫魯雪夫把史達林的屍體搬出列寧墓埋葬別處時，在人民當中竟未引起任何波動。

個人崇拜，必須對許多問題嚴格保密、設置禁區。“延安整風”中叫得最響的是“實事求是”，但那時卻對蘇區的反“AB團”和“富田事變”，對長征結束後西路軍的被殲等歷史真相，或者避而不談或者偽造歷史。這種口頭大講“實事求是”、實踐中並不實事求是的傳統，倒是一直繼承了下來。“延安整風”中就搞一些並不實事求是（如“無限上綱”）的批判和鬥爭，建國後哪些重大舉措又是實事求是的？

第 95 節 神化毛澤東

“延安整風”中形成個人崇拜的一個標誌就是開始了對毛澤東的神化，進行各種違背馬克思主義原則和屬於封建蒙昧主義的歡呼歌頌，如喊萬歲、唱《東方紅》之類，而且還不斷升溫，變成一種雖無明文規定但卻必須遵守和履行的儀式，最後達到宗教狂熱的程度。

1·戴毛像章、唱《東方紅》

個人崇拜的每一步驟都是毛本人親自導演的，最重要的步驟都發生在“延安恐怖”最盛的 1943 年。這一年，毛親手控制的《解放日報》連篇累牘地登著大字標題：“毛澤東同志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這一年，毛擔任校長的中央黨校大禮堂正上方鑲嵌上他本人的金色浮雕頭像。這一年，中央黨校發給每個學員一枚毛像章，為後來人人必戴毛像章之始。這一年，毛的肖像大批印刷，賣給家家戶戶。這一年，著名的毛頌歌《東方紅》要人人傳唱。

1937年前，當史大林崇拜初步完成時，俄國那位有名的小說家阿萊克舍·托爾斯泰寫過如下一首傳誦一時的詩：你，各民族光明的太陽，我們這時代的不落的太陽，你比太陽更偉大，因為太陽沒有智慧……另外還有一位較不出名的詩人，寫過一首更妙的詩如下：我們從史大林那裡獲得太陽，我們從史大林那裡獲得繁榮的生活：縱然是風雪遍地的北極苔原上的好生活，我們也是跟他，跟智者史大林，——一起創造的。

這些詩，曾被托洛茨基稱之為“豬糞叫”的，不是也充塞於中共的報刊嗎？那首最出名的“東方紅”，難道不是“豬糞叫”中調換一個名字嗎？

《東方紅》是“延安整風”期間由農民唱出來的，被發現後經文人修詞定譜，由黨組織廣為傳播，被定為一些會議和廣播電臺必須有的開始曲。往往以《東方紅》開場，最後以《國際歌》終場，先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後唱“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這種自相矛盾實在滑稽。這樣的歌曲從“延安整風”起在中華大地上卻盛行了幾十年，竟無人敢質疑。以後又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還有“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等。1954年4、5月間，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長陳沂率文工團訪問蘇聯，節目單開頭是《史達林頌》和《東方紅》。由於蘇聯當時已公開反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因此蘇方提出不能再唱《史達林頌》。於是，駐蘇大使館工作人員便要求《東方紅》也一起不唱了，否則就不禮貌。張聞天向陳毅提出不唱《東方紅》；陳毅卻堅持要唱，聲稱節目單是總理審定的。結果張大使只好直接請示國內，最後得到中宣部和總政的聯名複電（據說請示過中央）：同意使館意見。可見，文工團出國演出時唱不唱《東方紅》，不但中國唯一出任大使的政治局委員說了不算，連外交部也無權決定，可見問題之大。

經過“延安整風”，黨內的個人崇拜體制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組織上都穩固地建立起來了。新老幹部中，不說全部，起碼絕大多數人都變成了崇拜毛澤東和“聽毛主席的話”的馴服工具。從一件小事就可看出來：“延安整風”前，批評某人有自高自大的毛病時，往往說他以“老子天下第五自居”，意思是馬、恩、列、斯下來就數他了；但“延安整風”後就改成了“老子天下第六”，即史達林下面還有個毛澤東。

2·山呼“萬歲”

在封建專制時代，“萬歲”是皇帝的專稱。推翻專制王朝後，“萬歲”可用於對黨派與事業的歡呼，如“共產黨萬歲”、“革命勝利萬歲”等。毛早年崇拜陳獨秀時寫過“我祝陳君萬歲”，也有人對諂媚對象用過“萬歲”（如康生對王明）。

1943年“延安整風”結束後，“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迅速傳遍延安。據李雪峰回憶，彭真說是他第一個喊的。那時彭真主持的中央黨校集中了延安地區六分之一的幹部，包括大批高幹和文化人，彭真振臂一呼“萬歲”，各機關學校自然群起仿效。從此，在中共領導的地方，“萬歲”一詞就只能屬於毛澤東一人了，情形與稱呼皇帝一樣。

解放戰爭時期，朱德在一些地區也被“萬歲”了一陣，但很快就糾正了。在個別地方還有地方領導人也偶然被喊了“萬歲”，一旦發現，就被視為“事故”，當事人會受到批評和處分（調離）。李銳說：1950年頒佈的“五一節口號”，最後一個“毛主席萬歲”是毛澤東自己加上去的。當然，也有人不贊成喊“毛主席萬歲”，認為這是封建主義。彭德懷、張聞天等人建國後仍然堅持這一意見，這或許是毛特別痛恨他們的原因之一。到了後來，在中國絕對不能反對喊“毛主

席萬歲”，連不喊或喊得少了也是罪過。“文革”初期，王震揭批陳漫遠的罪過之一就是陳開會很少甚至不喊“毛主席萬歲”，而王震則是經常喊這一口號。

有一次，外國人到中國來喊“周恩來萬歲”，馬上被官方制止，周恩來嚇出一身冷汗。因為，外國人不瞭解中國。西方的“萬歲”是個普通語，人人皆可用。萬歲翻譯為英語就是：Long live，英語的意思就是長久的活著，沒有萬、千、百的等級制涵義。俄羅斯語的萬歲叫“烏拉”，就可喊普通人“烏拉”。中國的萬歲是個特定語，不能隨使用。

3·個人崇拜的高峰——毛澤東思想

1943年“七一”前後中共掀起了宣傳毛澤東的高潮。7月6日發表的劉少奇文章，使用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這個提法。8日，《解放日報》發表了王稼祥的文章，第一次使用了“毛澤東思想”。捉刀人其實是毛。毛到王家，叫王寫篇文章紀念中共成立22周年；“你以前和我交換過的那些意見，我看都可以寫進去。”王稼祥心領神會，廢寢忘食地寫了這篇文章，中心是：“中國民族解放整個過程中——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正確道路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

“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寫好後交給毛審閱，毛打電話答覆：“寫得很好，準備叫《解放日報》發表。”發表後成了中共人人必須“學習”的文章。

在每天的會上，一個簡單公式被反復捶打進人們的腦子：只有跟著毛，才能無往而不勝。長征中最大的敗仗土城之戰，明明是毛指揮的，現在成了“違背了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原則”的結果。毛反對的平型關之役成了“貫徹毛主席“誘敵深入”等作戰原則所取得的重大勝利”。1943年8月周恩來從重慶回到延安時就說：“沒有比這三年來的事變再明白的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

過毛澤東同志領導或其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底尾地證明其為錯誤了。我們黨 22 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串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

1943 年，延安出了本小冊子《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作者是早已被國民黨槍斃的中共勞工領袖鄧中夏。1930 年原文完全沒有提到毛。可是現在的新版裡塞進去這麼一句話：“1922 年，湖南工人運動就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猛烈地開展了起來。

1944 年 5 月 21~1945 年 4 月 20 日，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任弼時起草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該決議總結了建黨以來特別是 1931 年初到 1934 年底這一時期的經驗教訓，徹底清算了以王明為首的所謂“教條宗派”和以周恩來為首的所謂“經驗宗派”，奠定了毛在全黨的最高領袖地位，並用毛澤東思想重寫了黨史。

延安整風後期，黨內奉給毛的“偉大”稱號比“文革”時期還多。什麼“偉大領袖”、“偉大的革命舵手”，“不但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家和科學家”，“中國人民有了自己自古以來未曾有過的最偉大的領袖”，以及“毛澤東三個字不僅成為中國人民的旗幟，而且成為東方各民族爭取解放的旗幟”等。毛對所有這些極端的“封號”都是經過他一再審閱和定稿的，從來沒聽說過他對此有什麼自謙的表示。由此可明白，“文革”中毛澤東對斯諾說喊“四個偉大”討嫌，並不象官方史學所渲染的是毛澤東的謙虛，而是毛要消除喊“四個偉大”的林彪的影響。

延安整風以前，中共並沒有有效的方法來整頓幹部思想，使其和中央高度一致。經過 3 年多的“整風”和開了近 1 年的“六屆七中全會”之後；黨員的自我空間

日益縮小，甚至到了不存在的地步。它使全黨對毛的認同達到了空前統一，在這種情況下才召開了“七大”。

“七大”會堂最醒目之處，是主席臺上方的一條大橫幅：“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大會由毛直接操持，會議的任務只是把毛的地位和思想確定下來。因此，會議的發言內容（都是事先寫好並經過審定的）主要就是對毛的歌頌，此外則是許多人的檢討。這些歌頌和檢討大部分有極大的誇張和作假，不少說法已超出尊敬愛戴的範圍，明顯地是宣揚個人崇拜或帶有阿諛奉承之意。而毛澤東對這些卻欣然接受，讓大家把一切好事都掛在他的帳上。

張聞天在“七大”的發言中許多地方說的都是過頭話，如“我從未想到中國革命有什麼殘酷性、複雜性、長期性”，這完全不合乎他以往的言論和實踐。張聞天提到毛澤東時說：“他與人民的結合是如此之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還是人民是他！”這種說法無論在理論上還是現實上都是根本講不通的。

在這次大會上，任弼時提出，毛是“東方各民族爭取解放的旗幟”，這是中共自封的說法。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中國之外從來就沒有哪個東方民族承認過這一點。

周恩來的發言說：“最主要的，我們還是依靠了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的英明領導。……他領導了我們經過中國革命3個歷史時期……。”此話完全違背了史實，因為在周恩來講的這3個時期裡，多數時間毛澤東並不是黨的最高領導人。

朱德也在會上說：“我黨和中國人民在一起，得到毛澤東同志這個偉大舵手的指揮，終究越過了各種艱難險阻而前進了”；“24年的歷史證明了……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的指導是完全正確的。”這都是明顯的誇大之詞。

彭德懷在“七大”發言中也用了不少個人崇拜的語言。他說：“從黨的全部

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的偉大舵手，是中國人民的領袖。……是中國人民解放的旗幟。”

劉少奇在“七大”上所作的“修改黨章的報告”中對“毛澤東思想”作了許多說明，下了不少定義。對活人冠以“主義”或“思想”之名，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還不曾有過，是中共開了先例，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在世時堅決反對使用“馬克思主義”這一名稱。正象威廉·李蔔克內西所說：“他討厭聲望，追求聲望的行徑更使他憤怒”。

馬克思在回答一位德國黨員的問題時也曾明確表示：“我始終反對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對各國所發來的頌揚，我覺得煩惱，絕不回答，縱有回答，也許只是斥責。”同樣，列寧在世時也未自稱“列寧主義”，他把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實際的結合稱為“布林什維主義”。毛澤東就說過：“列寧主義也是列寧死後別人提的。”

史達林是國際共運中大搞個人崇拜的帶頭人，但他並不提“史達林主義”或“史達林思想”，而是以列寧的學生自居。他說過：“至於我，我不過是列寧的學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為列寧的學生。”朝鮮的金日成倒是竭力想留點思想遺產和聲望的，但也沒有提“金日成主義”或思想，而是發明了一個“主體思想”。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和阿爾巴尼亞的霍查等大搞個人崇拜，都沒有把自己的名字同主義或思想連在一起。

除中國外，大概只有越南提“胡志明思想”，但那是在胡志明逝世之後。根據胡志明的為人，在世時他是不會允許人們有此稱謂的。“延安整風”中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顯然是背離國際共運傳統、又超越國際共運陣營各國接受水準的空前之舉，結果遭到國際共運的普遍抵制是很自然的。

什麼是“毛澤東思想”呢？定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但這是極其空洞的。唯一的解釋是：毛澤東的一切思想都代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的統一；那意謂著：毛澤東的所言所行，都代表了這種“統一”；凡違反毛澤東意思，或任何人的言行與毛澤東不同的，便是犯了錯誤。這個標準不但用以概述過去，而且用以拘索未來。如此，這規定實際上是授與毛澤東個人以“永不錯誤”的特權，給了他以“絕對真理”的榮光，以此樹立了政治思想上的最高無上的個人崇拜。

除了會上這些頌揚崇拜的言詞外，“七大”前後還刮起了一陣向毛澤東敬獻錦旗之風，這些錦旗把中央大禮堂掛得密密麻麻。

七大是一次檢討的大會、頌揚的大會、推行個人崇拜的大會和為後來開類似會議立下範式的大會。會上既沒有也不允許發表不同意見或爭論，各種報告和所有發言都是早準備好並經過統一審查的，會前就已發到與會者手中，開會時只是臺上念、台下看。

聯共“第十七大”於1934年1月舉行，也是一個歌頌的大會，許多人檢討的大會，大搞個人崇拜的大會和史達林走向權力頂峰的大會。它之所以被稱為“勝利者代表大會”，主要是因為史達林已戰勝了所有的黨內反對派，完全定於一尊，而且這時蘇聯也宣佈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取得了一些建設上的成就。這次大會的基調是慶祝勝利，大力歌頌史達林，再就是讓一些反對派頭面人物作檢討。這次會上對史達林的贊詞和“封號”就傾盆而來，什麼“偉大的”、“英明的”、“天才的”、“鋼鐵般的”，不一而足。這些讚譽不僅來自史達林的擁護者，也來自他以前的反對者。

聯共（布）“第十七大”通過的新黨章與舊黨章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增加了一

個說明黨的定義、作用和地位的“導言”；中共“七大”通過的黨章與過去黨章顯著不同的，也是前面加了一個很長的“總綱”。這種雷同大概也不是偶然的。

第十五章 赤禍滔天

第 96 節 為顛覆中華民國而賣國

美軍攻佔沖繩島，雖然消滅了十多萬日軍，卻犧牲了數萬美軍士兵的生命！這把美國人嚇懵了，照這樣推算下來，攻佔全部日本列島，至少要消耗美軍一百萬以上的生命。美國總統和軍方迫於社會輿論的壓力，只好積極謀求減少士兵犧牲的方法。於是他們就主動與史達林進行了緊急磋商，要求蘇俄儘快廢除與日本的《互不侵犯條約》，儘快出兵協助美軍對日本列島的攻佔。於是，史達林向美國人開出了他的價碼——美國必須承認歷史上被沙俄非法侵佔的中國北部領土的“合法性”，方能助戰云云。1945年2月的雅爾達會議，史達林與羅斯福、邱吉爾達成了《雅爾達密約》。雅爾達會議中國未參加，關於蒙古、庫頁群島前途維持不變，及維持當時的未獨立狀態，會議決定，該會議的所有結果都須由中國同意，美國會後立刻把結果秘密通知中國。重慶政府立即聲明：拒絕承認雅爾達會議結果，拒絕蘇聯出兵東三省。因為蘇軍出兵東三省將影響中國收回蒙古、符拉迪沃斯托克、庫頁島。此時的日軍已秘密和重慶政府談判，向中國投降，而中共把秘密情報報告蘇聯，協助蘇聯佔領中國東北。

《雅爾達密約》之後，等於把美軍在太平洋血戰奪來的勝利果實的一大半，白白奉送給了蘇俄；不但沒有減少美軍士兵的犧牲，反而在未來的日子裡，使美國付出了更為慘痛的代價。史達林拿到“雅爾達密約”的全部好處之後，卻在美軍血戰日本列島的全過程中，始終默不作聲，也不作任何反應。當8月6日廣島

挨了原子彈後，8月8日蘇聯急忙宣佈加入波茨坦公告，旋即於9日出兵。貌似強大的關東軍，因其主力早已調往南亞等其它戰場（例如：自1945年1月6日開始的美日在菲律賓的決戰，日軍山下奉文大將率領的30萬大軍，絕大多數是從東北調去的；至9月2日山下奉文投降才結束，被擊斃日軍達59.2萬，是日軍所有戰例中陣亡人數最多，所謂蘇軍8月30日殲滅東寧堡日軍為“二戰最後一戰”並非歷史真實），乃至蘇軍進軍東北作戰時，傷亡還不如喝醉酒駕車傷亡大。日本70萬關東軍向蘇聯投降，史達林報日俄戰爭之仇，將70萬人活埋。並從中國進兵至朝鮮半島的三八線，並順便攻佔了日本北方的四個小島嶼……假如沒有雅爾達密約的簽訂，那麼就沒有蘇俄出兵佔領中國東三省，就沒有中共暴力篡奪中華民國的政權，也就沒有金家小朝廷；假如沒有中共政權和金家小朝廷的存在，那麼也就沒有韓戰的爆發，也就沒有嗣後的越戰的爆發……

蘇軍在我東北大規模強姦中國婦女；東北城鄉婦女都遞了光頭，抹黑了臉，充當男人，蘇俄士兵仍不放過，挨個檢驗。連中共高官、曾協助賀龍創建湘鄂川黔根據地的盧冬生將軍也被搶劫的蘇軍士兵殺死，中共稱他“因公殉職”。蘇聯還到處建立“解放碑”、“勝利碑”。長春最好的一條大街命名為“史達林大街”。

蘇聯再次佔領我旅順軍港並非法侵吞我中東鐵路，把中國東北全部工礦機械設備一掃光，拆工廠、拆鐵路、拆機器、搶市民的錢包和手錶，搶走的機器設備共價值9億多美元。毛1949年底到蘇聯求來3億美元貸款，還不到蘇軍在東北搶掠去的30%。鞍鋼的設備，都拆掉運蘇聯了！1949年夏，劉少奇率團訪問蘇聯，在呈送給史達林的報告中竟然寫著：“關於蘇聯從東北運走機器設備的問題，我們說：這些機器是日本人的，蘇聯把這些東西當作勝利品運走，去建設社會主義，

免得落在反動派手中以此反對中國人民，是完全正確的”。劉少奇奴顏婢膝將東北財富拱手送給俄國主子與慈禧太后的“甯予友邦、不予家奴”如出一轍，唯一的差別只是：慈禧太后的“友邦”包括有西方列強；而中共惟有蘇聯一家。

後來蘇把淘汰下來的火車頭外表噴一層漆，甚至把 19 世紀已不能用的火車頭用別的火車頭牽引著送到中國，僅 2 千個火車頭就賺走了中共和國幾十個億人民幣。東北人有一個說法：日本人將東北變成工業基地，蘇聯人將東北變回到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1945 年 8 月 10 日夜至 8 月 11 日下午的 18 小時內，毛向他的軍隊連續發出了七道命令，命令各地中共軍隊，要強行對日受降，強行阻撓政府軍受降。

正是在毛的命令下，8 年來養在深山、長在敵後、養精蓄銳、旨在打內戰奪江山的中共軍隊，遂如猛虎出山般地開始了對受降權的瘋狂爭奪。中共除在察哈爾、河北、山西、山東、蘇北等地強行對日受降以外，還曾對 3 萬拒絕向中共投降的日軍實行進攻、包圍和繳械，對日寇打了一場八年來從來沒有打過的“大戰和運動仗”，獲得了 8 年抗戰以來從未有過的“抗日戰果”。華北綏遠的集甯、清水二縣政府軍受降不過五日，即被 8 月 12 日自河北、山西一帶急馳而來的 3 萬中共軍隊所攻陷。9 月 11 日，抗日名將馬占山的東北挺進軍由綏遠進至察哈爾受降時，竟被中共軍隊圍殲 3 千餘人。

從 8 月 10 日日本投降到 10 月 5 日的兩個月間，包括毛在重慶“談判”的 40 天，中共軍隊一共搶佔了三百座縣城。為阻止政府軍受降，中共甚至還成立了“交通控制隊”，在華北與華中破壞鐵路與公路。據統計，僅 1945 年 10 月一個月內，平漢鐵路即被中共破壞 17 次，津浦路被破壞 18 次，膠濟路被破壞 10 次；中共軍隊甚至於河南決黃河，于江蘇、山東決運河，在河北決永定河、子牙

河，同時破壞工廠和礦山。可見，中共借爭奪受降權所發動的叛亂實已挑起了內戰。

毛澤東在重慶談判前後，命令共軍從各解放區抽調 10 余萬主力部隊從海陸兩路急赴東北。9 月初，第一批共軍已到達東北第一大城瀋陽以及本溪；至 11 月，已有 11 萬人抵達東北。國民黨也有幾十萬精銳部隊，實力上要遠遠超過中共，在當時的條件下，消滅中共非常容易，為什麼沒有消滅呢？這裡有一個障礙就是前蘇聯軍隊。

蘇聯紅軍禁止國民黨軍隊在大連登陸。1945 年 10 月 28 日，當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飛到長春與蘇軍馬林諾夫斯基元帥談判國民政府進入東北接收事宜時，馬林諾夫斯基不允許中國軍隊在大連、葫蘆島、安東等港口登陸，“允諾”中國政府軍於營口登陸。杜聿明於 11 月 7 日率領一個軍乘美艦駛向營口港外時，非但發現蘇軍不知去向，而且發現營口海灘上滿是正在修築防禦登陸作戰工事的中共軍隊。原來蘇軍早已通知中共“接防”。杜聿明只好率軍轉赴美軍佔領的秦皇島登陸。因此再度遷延時日，難以儘快佔據戰略要點，形成鉗形攻勢。政府軍派駐東北的第 13 和第 52 軍只好從門外打起，節節打退共軍的阻擊。石覺的 13 軍全部美式裝備、戰鬥力強大，逼迫林彪部隊一路後退，很快攻佔錦州；次年三月佔領瀋陽，隨後四面開花，佔領撫順、鐵嶺、遼陽、鞍山、營口等重要城市。共軍則佔領北部四平、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等城市。這樣，形成南北對峙態勢。

1946 年 4 月林彪已擁有 30 萬人，並在四平和本溪各集結 10 萬軍隊死守。國軍參戰的 7 個軍，5 個是全副美式機械化裝備，其中孫立人的新一軍、廖耀湘的新六軍則是國軍五大主力中的兩支精銳。此時，國軍在東北共 28 萬。雙方大

戰從 1846 年 4 月 18 日打到 5 月 18 日。國軍在本溪和四平兩地發動強大攻勢，空軍猛烈轟炸，首先力克本溪，10 萬林彪守軍大敗潰逃。國軍揮師北上，援戰四平，然後兵分三路，以空中優勢發起立體攻勢，四平 10 萬林彪守軍又潰敗。5 月 19 日佔領四平。國軍估計此役林彪軍隊傷亡 4 萬人。

前來四平督戰的白崇禧將軍當機立斷，命令杜聿明乘勝追擊，一舉拿下長春；然後兵分三路，向北挺進。孫立人將軍指揮的新一軍鋒芒所向如秋風掃落葉，至 5 月 30 日，已越松花江，直逼離哈爾濱不到一百里的雙城。林彪做好了思想準備，一旦哈爾濱失守，就到遼南的山區打遊擊。6 月 1 日，他給毛的電報說“準備放棄哈爾濱。”第二天，東北局也給毛同樣無可奈何的電報：“我們準備放棄哈爾濱”，“我已告辰兄準備退出”（“辰兄”即蘇軍）。毛這時兩次懇求史達林出兵干涉，來個“聯合行動”，或把中國置於蘇聯的軍事“保護”下。史達林婉言拒絕，怕出兵引起國際反應。但他允許中共軍隊退入蘇聯境內。6 月 3 日，毛萬不得已，電告東北局和林彪：“同意你們作放棄哈爾濱之準備，採取運動戰與遊擊戰方針”，而且是“作長期打算”。這意味著：10 個月來，共產黨在東北的軍事行動徹底失敗。

四平大勝、長春攻克，蘇俄冷臉變春風，向國民政府頻示友好。5 月 6 日，史達林邀請蔣介石訪蘇；長春攻克，又向國民政府表示不會支援中共。整個局面對國民政府十分有利。

白崇禧在 5 月 30 日隨蔣介石飛抵長春，建議一舉拿下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滿洲里等重要城市；然後組織民眾編成三百萬民團，保衛地方，肅清共黨殘餘；再調五個機械化師回華北消滅聶榮臻部。此時，馬歇爾威脅說，如果蔣介石繼續追擊，美國就不再幫他運軍隊去東北了。5 月 31 日，馬歇爾甚至寫信

給蔣，稱這事關係到他本人的榮譽：“因此，我再次向您要求，立即下令政府軍停止推進、打擊、或追趕[中共]”。措辭如此強硬嚴厲，患得患失的蔣介石不得不屈服，於6月6日(實際於6月2日已發出命令)正式向東北部隊發出停戰令，要求“停止攻擊及追擊，其期限為十五日。此舉在使中共再得一機會能確實履行其以前所簽訂之協定”。孫立人新一軍氣勢如虹，得到停戰令，大為吃驚，力爭不果，只得勒馬城下，口中獵物，就此放棄。此後，國軍再未跨過松花江。毛共因此絕處逢生。

6月21日，蔣氏應周恩來請求，竟再次宣佈停戰令延長8日，至6月30日。共產黨在戰場上佔便宜時，絕不談判；一敗塗地時，則乞靈於談判桌。在東北的中共官兵，從林彪到老將，都說蔣介石停止向松花江北推進是大大的失算。蔣介石只要窮追猛打，至少能阻止中共在蘇聯邊境建立強大鞏固的北滿根據地，切斷中共與蘇聯的鐵路運輸線，使蘇聯重型武器不可能運進來裝備中共。此時，馬歇爾又再施加壓力，要蔣把停火期延長4個月，甚至把整個北滿讓給中共。蔣介石被馬歇爾逼得焦頭爛額時，又接到杜魯門總統的嚴厲警告。七月中旬，兩名反蔣知識份子聞一多、李公樸在國民黨地區被槍殺。美國民意測驗立刻顯示，只有13%的人贊成繼續援蔣，50%的人要求“不介入”。8月10日，杜魯門寫信給蔣介石，聲色俱厲地提到這兩樁暗殺，說美國人民對這樣的事“深惡痛絕”，威脅說如果和談沒有進展，他只好“重新考慮”美國對蔣政權的態度。在這樣的壓力下，蔣介石在東北的停火繼續了下去。陳立夫不贊成蔣的做法，要蔣“像西班牙的佛朗哥，反共就是要反到底。打打談談，談談打打，沒用。”國軍一舉獲勝的良機一去不返。蔣氏後來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檢討說：“從此東北國軍，士氣日漸低落，所有軍事行動，亦陷於被動地位。可說這第二次停戰令之結果，就

是政府在東北最後失敗之唯一關鍵。……若不停止追擊，直占中東鐵路戰略中心之哈爾濱，則北滿的散匪，自不難次第肅清，而東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滿立足，而其蘇俄亦無法對共匪補充，則東北問題自可根本解決，共匪在東北亦無死灰復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冬季國軍最後在東北之失敗，其總因全在於這第二次停戰令所招致的後果”。

如果沒有馬歇爾的“調停”，當年中共在東北必敗無疑；得不到東北，中共割據政權就處於國民政府力量的重重包圍和夾擊之中，很難長期生存，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只有重新鑽山當土匪、或者到莫斯科做寓公的命。馬歇爾的“調停”，在最危機的關頭挽救了中共，林彪因蔣停戰而獲得喘息，迅速重整軍隊，至 1946 年底其軍隊達 36 萬。陳誠下令解散東北 30 萬偽軍，後來這支大軍被林彪收去，林彪在北滿建立了橫一千公里、縱五百公里，面積比德國還大的根據地。毛把這塊地盤比作舒適的“沙發”，背靠蘇聯，兩臂有北朝鮮、外蒙作依託。國軍被封閉在幾個城市裡，蘇軍偽裝成共軍來消滅國軍，然後轉給中共 57 個戰略據點。共軍接收 80 萬關東軍的全部裝備，其中步槍 70 萬支，機槍 1.2~1.4 萬挺，各種炮約 4 千門，坦克 600 輛，汽車 2 千多輛，飛機 8 百餘架，炮艇若干，彈藥庫 679 座；接受了 1/3 美二戰時曾援助蘇聯的 103 億噸軍用物資；45~47 年初，蘇軍還提供步槍 30 多萬支；48 前後，蘇俄還提供過了蘇制和捷克制的武裝；中共靠蘇援槍械組建了 210 個步兵師。

老蔣打內戰的軍火完全是抗戰時老美送來的：美國通過美援，為國民黨一共才武裝了 45 個步兵師。蔣在 1944 年攆走美軍隊頭面人物史迪威後，就和美國有關大員結下了梁子，再加上美國國務院一幫蘇聯特務暗中使壞，美軍在 1945 年 10 月在昆明焚毀大量本來屬於國軍的軍用物資(包括坦克重炮和炮彈)，1946 年

7月全面斷絕對華軍事援助，直到1948年5月美國國會嚴厲追究杜魯門政府的親共傾向，杜魯門才勉強同意給國民政府5千萬美元軍事援助，第一批軍火在1948年11月運抵天津塘沽，但這一切都已太晚了。

掌握擁有國民黨最精銳部隊的西北地方的剿總胡宗南，他的貼身機要秘書熊向暉是中共地下黨，直接受周恩來指揮，胡宗南部隊行動在其屬下軍長級將官還不知情況下，熊已把情報送到延安。1947年3月胡宗南進攻延安時，其計畫中共早已知道，所以胡撲了空。華中剿總白崇禧的貼身副官謝長庚也是中共地下黨，白的軍隊行動中共早已知道。

1948年5月至10月，中共進攻長春，採取的是“圍城困死”戰術。中共軍隊除在長春城外拉起幾道封鎖線，嚴查過往行人、車輛，封堵糧食進城外。當時的長春有人口60萬，國民黨部隊5萬多，為了更長久地固守，當局下令放民出城；而共軍卻嚴禁城內百姓外出。不過有一種情形例外，那就是凡是帶出一支步槍或者機槍的予以放行。很明顯，共軍是要市民吃光長春的糧食，減少長春的防衛能力。進了7月，長春吃的問題，愈來愈為嚴重，守城部隊，也以黃豆和豆餅作為主食，市內也有人因饑餓而死。於是市府下令，凡是可充作食物的東西，不准隨意搬動，由市府統一分配，而當時可以用作為食物的主要東西，則是造酒的曲子和豆餅。雖然酒麴並不好吃，但市民們仍然排隊領取配給。八月間，街頭已有了棄屍，成群的野狗出去啃人屍體，然後人再殺狗，以狗肉充饑。那是當時的珍品。在無法忍受的情形下，人們潮水般湧向城外，但到了洪熙街的國軍卡哨外，共匪仍不放行，有許多人向前沖，共匪就用機槍掃射，想回城國軍也不准許，於是留在洪熙街地區的近十萬市民，形成了一個人吃人的世界。從市區出來，帶著少許食品的人，一下子就被搶光，老弱婦孺，常被人踐踏而死。當時的情勢

是先出市區的人，搶後出市區人的東西吃。不過也有少數人，爬出洪熙街的鐵絲網，突破共匪的封鎖線，逃得一命。另外則是共軍諜報人員，向持有黃金的人，售賣“窩窩頭”，難民們用一個金戒子，可以向匪特買兩個窩窩頭；一兩黃金，可以買五個窩窩頭。但當囊中金盡時，也就臨近死期。有極少數的人，從大劫數中，保住一條性命，當時從洪熙街爬出的文藝作家王光逖，便寫了一篇“爬、爬、爬、爬出了長春”，給北平“益世報”，讀來一字一淚。王光逖也由於那篇文章，而被“益世報”聘為記者。

吉林省軍區原參謀長劉悌，當時是獨八師一團參謀長。他說：“通信員說有個老太太，把餓死的老頭的大腿煮吃了，吃了也死了。團長吳子玉是個老軍，說那能有這種事。通信員說，不信我領你去看看。進去一看，鍋裡還剩條大腿。團長回來跟我說，那天都沒吃飯。”

長春圍困前有居民約 60 萬，經過五個月的無情圍困，至中共“解放”該城時，城中只剩下了 17 萬人，減去逃走的，餓死了 30 多萬人，實堪和“南京大屠殺”媲美了！就連當時一些被迫執行圍城命令的士兵都問：咱們是為窮人打天下的，餓死這麼多人有幾個富人？

共軍中校作家張正隆在《雪白、血紅》裡說餓死了 15 萬；因這一部書，王震差點兒要斃了他。他本來就不敢在書裡披露太多的實情，所以他所說的 15 萬是縮小了的數字。當時日本新聞界估計在包圍長春期間餓死約 20-30 萬人，留在長春的日本人也大部份都被餓死了。因為日方已經無條件投降，與國共雙方都無關係，再加上日本新聞從業人員的敬業精神較好，報導比較客觀，日本人所說的數值是比較准的。

1948 年 7 月至次年 4 月，60 萬中共軍隊對山西太原發動了 7 次總攻擊。太

原國民黨守軍 15 萬餘人全部犧牲，但共軍亦損失 35 萬餘人。戰事十分慘烈，史稱太原保衛戰。據說，當共軍攻陷太原，逼近省府大樓時，代省主席梁敦厚與省婦女會理事長閻慧卿服毒自殺。此後，自殺殉難者共計 500 人。這就是太原五百完人的事件，該事件震驚中外。

鄧小平的格殺勿論。1947 年 10 月 13 日，劉鄧大軍在大別山山區尚立足未穩，在劉鄧司令部所在的鄂東黃崗總路嘴發生了一起“搶劫案”。直屬警衛團三連副連長趙桂良用步槍挑著一卷花布和一捆粉條，掖下夾著一卷白紙和幾枝毛筆，走出店主已經逃逸的店鋪，正好被鄧小平看見。事後查明，趙桂良是一個戰功卓著、愛兵如子、捨身保護首長、自己屢次受傷的好幹部。他拿這些東西，都不是為了自己：花布是為了給連裡的小戰士做棉衣的；粉條是給劉伯承補養身體的，因為他聽說劉司令員最愛吃粉條；白紙和毛筆是給連隊出壁報用的……一個連隊幹部在無主的店鋪中拿了一些並不很值錢的東西，應該算不上什麼大事。但鄧小平卻勃然大怒，厲聲吼叫，“什麼，這叫拿？這叫搶！我們事先已打過招呼，有過規定，搶劫民財要槍斃！如果令出不行，說了不算，再發展下去，我們還叫什麼人民軍隊，怎麼能在大別山站住腳！”不但政委鄧小平堅決要槍斃趙桂良，劉伯承司令員、李達參謀長、張際春副政委，都眾口一詞地要格殺勿論。鄧小平對保衛科長張之軒說：“你通知部隊，下午就召開公判大會。另外，要派一些同志上山，動員群眾下山參加。”

張之軒壯著膽子為趙桂良說情；連隊的小戰士痛哭流涕地要求自己代替副連長死；回到山下的店鋪老闆哭喊著要首長刀下留人；農民老大娘跪在地上代趙桂良求饒；公判大會台下的鄉親也齊聲附和。面對如此響亮的民意呼聲，趙桂良還是不能免去一死。他所得到的唯一優待就是：部隊將通知他老家太行山區左權縣

年近 70 的老母，他是戰死在疆場的。

林肯的刀下留人。1863 年，美國南北戰爭打得難分難解。美國總統林肯正在白宮辦公室裡處理堆積如山的檔。門被輕輕推開，一個十五歲的小女孩惶恐不安地站在門口。林肯詫異地問她有什麼事情。小女孩激動地說：“我的哥哥班尼就要被槍斃了。請總統先生救救他。他只是在站崗的時候打了一下瞌睡。”林肯回答：“哨兵的職責非常重要。稍一疏忽就可能導致成千上萬的士兵死於非命啊！”小女孩急得語無倫次，拿出了哥哥寫給爸爸的絕命書。林肯接過了那封疊得滿是皺紋的信，認真閱讀起來。

“爸爸，你讀到這封信時，我可能以已經死去。我因為耽誤了重大任務，被判處死刑。因為違犯了軍紀，所以我沒有絲毫怨恨，不過，在父親面前，我得把情形說清楚。那個吉美很可憐。他才十六歲，比我還小兩歲。當我們一起來當兵的時候，他媽媽曾經託付我，要我多多照顧他。這次他害了病，我看他的樣子實在受不住，便把他的背囊和槍支接了過來，替他背著。這樣我們在行軍中才沒有掉隊。那天晚上，輪到吉美站崗。他正在生病，怎麼能站崗呢？我自己背著兩個人的背包、槍支和彈藥，經過二十五公里的急行軍，到傍晚到達陣地時，累得像棉花一樣，差一點就要倒下！可是，我還是代替吉美去站崗了。”

看到這裡，林肯總統全明白了。他忍住眼淚，繼續讀下去。他讀到班尼想盡辦法不讓自己睡著，但還是無法站勝疲勞。他讀到班尼勸爸爸不要怨恨隊長，因為軍法如山，隊長也救不了他。他讀到班尼勸爸爸不要怨恨吉美，因為吉美還是一個孩子，又正在生病。吉美向團長請求，願意代他死。吉美還說：“如果班尼真被槍斃了，我也不會活下去。”在信的結尾，班尼這麼寫道：“我決不害怕死！但是我卻不願意吉美就這樣毫無意義的死去。我們兩人最好都能夠在戰場上英勇

的戰死。現在，我只對這一點感到遺憾。”

熱淚從林肯總統眼裡嘩嘩地流出來，他卻顧不上把它擦掉。他把滿是皺紋的信放回信封，默不作聲地提筆寫了幾行字，交給身邊的辦事員：“請立即用特快電報發出去。”他又轉向那個素昧平生的小姑娘：“放心好了，你的哥哥不會死的。班尼是真正的勇士。這樣可愛的孩子，總統怎能不救他。美國就要靠這些人的力量來挽救國家的命運啊！”

誰也無法否認，站崗時睡著比在沒有店主的店鋪中拿一些並不值錢的小東西在性質上嚴重多了。它可能造成的潛在危害是怎麼估量也不過分的。然而，林肯總統卻在沒有受到任何民意壓力的情況下，僅僅憑著自己的良心就赦免了這個“真正的勇士”，並且在把他由一等兵提升為班長。鄧小平一夥在受到了強大的民意壓力的情況下，卻仍然一意孤行，槍殺了一個出於好心而犯了小錯的忠心耿耿的“革命”戰士。多麼強烈的對比啊！為什麼會這樣？

首先，林肯能夠明確的界定無意過失和蓄意犯罪的差別。在一個忠勇的戰士的無意過失並沒有造成任何不良後果的情況下，他不但願意原諒他，而且從內心深處由衷地敬仰他。鄧小平卻是把鬥爭哲學奉為圭臬的共產黨人。他們只知道目的，不考慮動機。凡是有害於其最終目的的人和事，無論其動機是多麼無私、多麼高尚，都在他們的剪除之列。

其次，林肯對自己解放黑奴、統一祖國的事業具有必勝的信念。他相信對個別例外事件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具體處理不會影響正義事業的整體進程。而鄧小平一夥卻對自己所從事的勾當始終充滿了危機感。他們不得不承認，他們在抗日戰爭中躲在敵後不打鬼子，在抗戰勝利後卻發動內戰奪取政權是不得民心的。他們只好以死板、僵硬地態度來執行他們爭取民心的一切方針政策，唯恐稍有差池就

會喪失人民的擁護。

第三，林肯深信自己的政府是人民擁護的合法政府。他有魄力行使他認為正確的行政權力，絲毫不擔心偶然的失誤就會失去民心。鄧小平一夥卻深知自己的權力是沒有基礎的。人民盼望的是在合法政府的領導下，過上和平安逸的生活。他們的到來迫使人民躲進了山裡。他們抓住趙桂良在沒有店主的店鋪中拿一些並不值錢的小東西這件小事，把人民從山上請下來，大張旗鼓地舉行公判大會，向人民表白自己是對人民秋毫無犯的“人民軍隊”，以獲得在人民心目中的道義上的合法性，以“在大別山站住腳”！在本質上，這是一種卑鄙的權術。

1948年8月底，鄧小平在大別山地區指揮殺掉2千多名土匪俘虜。地點為大別山宋埠，背景為劉鄧大軍受毛澤東之命挺進中原，一路經受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10萬大軍只剩下5萬人之際。這兩千多名土匪俘虜便充當了鄧小平發洩情緒的替罪羊。

2008年7月11日《多維時報》刊登了洪朝輝的文章《熊式輝〈海桑集〉的史學價值》說到：《海桑集》首次披露蘇聯軍隊介入國共內戰很深。…據林彪部隊的俘虜供稱，指揮中共炮兵射擊者，多為蘇聯人。這樣，蘇軍除了在新疆殺害了三千中國守軍及家屬外，還直接在東北參戰。《20世紀戰爭中的俄羅斯/蘇聯陣亡軍人》Военные потери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в Войнах XX века 之《中國國內戰爭（1946-1950）》說：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號召解放區人民展開對國民黨的鬥爭。它向蘇聯政府求助。我國政府盡一切可能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領導的革命運動給予支援，其第一個步驟是將蘇聯軍隊1945年擊潰關東軍之後繳獲的武器和軍事裝備移交給他們。後來又向中國（共產黨）方面轉交了一部分蘇聯武器（據《解放軍報》，蘇聯軍援

總值近 9 億美元，是國軍得到美國“有效軍援” 2.5 億的三倍多)。在滿洲里，蘇聯指揮人員協助創建了**中國革命軍隊的主要基地**。在這裡，依靠蘇聯軍隊的戰鬥經驗，在蘇聯顧問和教官們幫助下，中國領導人建立了一支頑強的、能征善戰的軍隊，它能夠成功地完成現代化作戰任務。這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 年 10 月 1 日宣告成立的獨立自主的國家——而言是**必不可少的**。1946-1950 年，蘇聯軍人、蘇聯專家在中國履行國際主義義務期間，共有 936 人犧牲或因傷病而死。其中包括：軍官 155 人，軍士 216 人，士兵 521 人，文職專家 44 人。

三大戰役是前蘇聯將領親自指揮，以蘇聯軍隊為主體完成的戰爭，三大戰役之所以勝利的原因就是前蘇聯精銳的步兵、空軍、裝甲、炮兵，甚至海軍的全面參戰，導致國軍被擊敗。或許有人會問，在內戰時並沒有穿蘇聯軍裝的蘇軍呀？試問一下，在朝鮮戰場你見到有蘇聯軍隊嗎？可是他們也參戰了，穿的是中國的共軍服。這下就明白了，為什麼東北野戰軍所向披靡，為什麼後來的四野會被鎮壓，為什麼林彪是軍事天才，很遺憾，偉大的林彪僅僅是一個傀儡而已。真實的東北野戰軍的領導是那位沒有公開的前蘇聯軍事將領。

A、遼沈戰役。潛伏在國民黨軍政部長陳誠身邊的少將軍需署長汪維恒是中共秘密黨員。1948 年 5-6 月，汪維恒到河北、東北視察，回南京後，立即把河北、東北獨立團以上的部隊番號、長官姓名、兵員實力、駐地部署等絕密情報交給了共黨。兩個月後遼沈戰役打響，消滅錦州的主力部隊實際上是蘇聯的精銳炮兵和裝甲部隊，甚至還有空軍，共軍僅僅是在戰後收拾國民黨殘餘軍隊和打掃戰場。長春，瀋陽，葫蘆島等戰役很不幸都是蘇聯的炮兵和精銳部隊指揮消滅的。遼沈戰役的先鋒部隊依然按慣例是普通老百姓打頭陣，就是幾十歲的老人、婦女、兒童，這是中共的人民戰爭藝術。國府駐在東北的 47 萬精銳軍隊全部消滅。

1947 年東北人口高達近 5300 萬人，1949 年東北人口下降到只有 3400 多萬人。下降的原因是軍隊屠殺或人民逃亡，死了大約是兩千萬。所謂的東北剿匪，實際上是防止發生叛亂，在東北的鎮壓屠殺和迫害一直到 1953 年才逐步停頓下來。

B、平津戰役。林彪的四野到東北時只有 10 萬人，離開東北時就有 120 萬軍隊；其中偽滿洲國的 40 萬偽軍和 10 萬蘇聯調教過的日軍都進入了四野。如果沒有這 1 百多萬軍隊參戰，平津戰役共軍未必能勝。事實上，在平津戰役之前，共軍隊根本打不過傅作義，應當說老是吃傅作義的虧。可是四野一參戰，戰局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傅作義就支援不住了。國民黨華北剿匪總部總司令傅作義擁 25 萬精兵卻不戰而降，是由於他女兒傅冬菊、部下鄧寶珊向他下了說詞。傅冬菊是中共黨員，鄧寶珊 1921 年起就和中共保持秘密聯繫。

C、淮海戰役。國民黨中將何基澧是地下黨，總司令部參謀部郭汝槐中將也是地下黨，司令部調動部隊命令都由他向下發。在國軍聯勤總部任中將視察員的張權，原是中共特務。當淮海戰役打得如火如荼之際，他在沙文漢指揮下，以聯勤總部檢查團團長的名義飛往徐州、濟南、南京視察，不露聲色地竊取了國民黨參謀總部的作戰地圖。不久，這張燙著“絕密”火漆印記的作戰地圖便掛到了共軍第三野戰軍司令員陳毅的作戰室裡。像這樣詳盡軍事設置情況，連他們高級軍官也沒幾個知道。再加上南京總司令部作戰副部長劉斐也是地下黨（中共為了影響，49 年後也未暴露其身份而混在民主人士中）。總司令部九個機要電話員七個是地下黨，並在此建立了黨支部。國軍部隊中低一級司令部也混有中共特務。

蘇聯裝甲、炮兵、步兵、海軍部隊和被脅迫的百萬婦幼殘弱成為戰爭的主旋律，國民黨軍隊在蘇聯軍隊的打擊下潰敗。淮海戰役，國軍又被消滅 60 萬，比

南京大屠殺更殘忍。

1948 年底，國民黨丟失北半中國已成定局，這時候美國如果全力支援國民黨，派出艦隊協防長江、派地面部隊阻斷共軍繼續南犯，毛將不敢、也沒有能力“解放全中國”，史達林因為不願中共強大，支援中國“劃江而治”，蘇聯決不會同美國發生衝突，但是在這個緊急關頭，美國卻全面終止對華援助、完全拋棄了國民黨，甚至頻頻向中共搖橄欖枝。

阻擋“解放軍”渡江最重要的軍事設施江陰炮臺未放一炮，相反轉頭向國民黨軍隊開了炮，因為作戰前中共特務已滲入。作戰時中共已接收了炮臺。

但混在國民黨軍隊中中共特務，作戰時為“解放軍”俘獲，而不少因為無法證明他是地下黨而被槍決了。這樣戰爭勝利的功勞就屬毛澤東的“英勇的”作戰部隊了。這些地上黨員，他們中大部分成了“革命成功”的犧牲品，而他們的家屬也就成了“反革命家屬”了。

廈門海外 1 萬米處有一個島，叫金門，朱熹曾經在那裡講學。1949 年 10 月 24 日打金門古寧頭戰役，結果竟是 2 萬登島部隊全軍覆滅。古寧頭戰役抓了 4000 多人送來臺灣，“教育”一段時間後通通送回，一個也沒殺。可是他們回去後，被老毛殺得差不多了。

徐焰 1992 年在《第一次較量》中列舉了國共兩軍的彈藥消耗數量：共軍在 3 年的內戰中總共消耗各種彈藥約 7 萬噸，國軍略少；特別是三大戰役，共軍消耗彈藥達到 2 萬餘噸，這時國黨軍消耗彈藥明顯不如共軍；蔣軍的裝備只相當於 30 年代的美軍，步兵武器除 M3 衝鋒槍和 M1 卡賓槍外基本都是美軍 30 年代中期的制式裝備，輕機槍基本都是 ZB26 系列，勃郎寧自動步槍非常少，至於火炮就更別提了；和日軍的 4 單位制師團對比都有差距。

1949年2月周恩來向米高揚明確提出，要求蘇俄援助反坦克炮、提供生產炸彈的錯弟爾、鋼材、汽油、近三千輛汽車以及其它生產武器的必要設備，並派一些專家和顧問，幫助中共培訓軍隊，建立軍校和組織包括武器工業在內的後勤工作。當米高揚表示蘇聯要從大連撤軍時，毛澤東表示“中國是共產黨人的，蘇聯也是共產黨人的，這並不排除而且完全允許把蘇聯在旅順的軍事基地暫時保留下來”。

從1947年起，毛多次要求赴蘇朝聖。在1948年6月鐵托反目之後，史達林開始懷疑毛會是“東方的鐵托”。但毛卻是癡情一片，決心投靠史達林的。他要求參加共黨情報局，史達林不准。1948年9月28日，毛澤東致電莫斯科，“務必就一系列問題當面向蘇聯共產黨（布）和大老闆親自彙報。（為得到）指示，我打算據上一封電報所示的時間到莫斯科去。”

毛澤東毫不掩飾地將史達林稱為“大老闆”，而自己心甘情願地充當一個“小夥計”，這是一個狂妄的獨裁者向另一個更強大更狂妄的獨裁者的獻媚。於是，史達林派遣蘇共政治局委員米高揚訪問西柏坡。米高揚在給史達林的報告中說：“毛總是說，他們，中共委員會等著我黨中央委員會給予指示。我回答他說，我黨中央委員會不能干涉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活動，不能給予任何指示，不能領導中國共產黨。……毛依然堅持，聲稱他還是等待我黨中央的指示，因為他們的經驗還很少，他還故意貶低自己作為黨的領袖和理論家的地位與作用，說他不過是史達林的學生，他認為自己的理論著作沒有什麼了不起，因為他對馬克思主義並未做什麼新的貢獻等等。”一方是故作矜持，一方是死心塌地。毛澤東對“兒皇帝”身份的嚮往，比起那個向遼國稱臣的後晉皇帝石敬瑭來，簡直就是一模一樣的。

毛澤東最有求於史達林的是幫助他建立一流的軍事工業體系，使中國成為全球軍事大國，為他擴張勢力範圍作後盾。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毛對米高揚一再表示對史達林的忠誠；貓在聯絡員科瓦廖夫面前“跳起來，高舉雙手，連呼三聲：“史達林萬歲！”

毛還採取了一個所有東歐共產黨國家都未採取，連史達林本人也沒有指望的極端行動：同西方不建立外交關係。毛告訴科瓦廖夫：“我們巴不得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大使館都從中國一去不復返。”為讓史達林放心，1949年6月30日毛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宣佈要“一邊倒”；這個“人民民主專政”正是史達林提出並要求各國共產黨予以執行的。

1949年6月28~8月14日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秘密訪蘇，與蘇聯商談有關成立新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重大問題。7月4日在克里姆林宮，劉少奇呈送給史達林的請示報告中解釋了“一邊倒”的含義：“即聯共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統帥部，而中共則是一個方面軍的司令部。根據局部利益應當服從世界利益，我們中共服從聯共的決定。如果中共與聯共發生爭論，中共在說明自己的意見後，準備服從並堅決執行聯共的決定”。7月11日，史達林在克里姆林宮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室，以蘇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形式，會見劉少奇。參加會見的蘇方人員，除史達林外，還有在莫斯科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共中央駐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蘇聯國防部第一副部長索科洛夫斯基；中共方面除劉少奇外，還有高崗、王稼祥、師哲。史達林稱讚劉少奇遞交的報告寫得“清晰、明瞭”。史達林接受不了中共的提法，他說：“一個國家的黨服從另一個國家的黨，這是從來沒有過的，而且是不允許的。兩個黨必須對它們的人民負責，在一些問題上進行協商，相互幫助，並在出現困難時緊密團結，這

才是正確的”。翌日，劉將此答覆報告毛。14日毛回電：“關於兩黨關係的那種提法，是因為現在兩黨間沒有共產國際及情報局一類組織，而現在又不適宜恢復或建立這類組織的情況下的一種實際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處置或態度，不要採取任何文字的決議或記錄，更不應當向黨內外宣佈。因此，請你們和史達林及馬兄商量，如果他們認為有必要的話，你們可以從書面報告中撤銷那種提法的文字，但我們實際上這樣做，以利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這不僅在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絕無僅有，就是在世界史上，恐怕也沒有一個大國如此卑躬曲節向一個外國表示臣服的。

1949年7月18日劉少奇致電毛，傳達了史達林的指示：“你們不要急於要求各帝國主義國家承認，以便加以觀察，瞭解情況，看他們表現如何。你們有很好的法寶，就是帝國主義要和你們做買賣。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已經開始了。我想列強很快就會要承認你們的，你們可以先和他們做好買賣，再談承認問題。”史達林是不想中國同西方大國建交的。毛也心領神會，立即執行了史達林的命令。8月14日起一連發表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8月18日毛發表了《別了，司徒雷登》。1949年10月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英國、日本、德國斷交，基本上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國家。1949年後的中國又開始像1840前的中國一樣自大。名義上叫新中國，其實就是鴉片戰爭前的中國翻版和複製而也。

毛澤東並不是一個軍事天才，他唯一的才能就是在中共內部的鬥爭中擊敗異己，並被史達林扶持成為前蘇聯在中國的代言人。毛澤東是蘇聯的兒皇帝，奉蘇聯的年號，把“民國三十八年”改成“1949年”，宣佈成立偽“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蘇聯的衛星國。

共產黨定都北平，改名北京；又選擇了皇帝的內院中南海作政府所在地，並

把象徵皇權專制的天安門搬上了國徽，這是其獨裁本質的流露。國旗為五星紅旗：那顆高高在上的大星（黨星）告示人們，這個暴力集團是凌駕於一切之上的。五星紅旗鋪天蓋地滿面紅向人展示的是暴力流血——格殺勿論。這面國旗表現了中共的一黨獨尊、一黨獨大、一黨專政，絲毫沒有表現平等自由的普世價值，也沒有表現人民最大的民主思想。它把自己放在國旗上，凌駕於國家和人民之上，真是無恥之極！五星紅旗表現的是黨大民小、人輕官重。五星紅旗展現了中共打天下、坐天下、吃天下的農民造反心態和帝王意識。這面旗只代表共黨，不代表中國人民。五星紅旗是一個謬誤，高舉著它就必然走入一個荒謬的時代——毛澤東時代。

四顆小星（奴星——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環繞著，給人的印象是：卑躬屈膝、俯首稱臣。“四小星”代表四個不平等的階級，有悖於公民的政治權利一律平等的原理。毛澤東的階級理論，強調工人階級為主導，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利用小資產階級，鬥爭改造民族資產階級；把一國公民政治上分為三、六、九等。共產黨一直在教育中國人民，它是中國人民的優秀代表，人民是在它的下面。在西方國家，一個政黨只表示有那麼一群人有著相同的理念，組成一個組織。根本不存在哪個組織比另一個組織優秀的問題。美國哪個政黨敢說，我們是這個國家的優秀團體？說明中共一直在歧視廣大的中國人民；同時，它也在選舉方面歧視中國人民，它一直試圖教育中國人民，中國人民素質低下，不可能進行民主選舉，只有共產黨才能搞黨內裝模作樣的選舉。

1949年中共建國時，牆上掛馬、恩、列、斯的像掛得高高的；而毛的像則掛得很低，以示低人一等，全國各地高掛的史達林像比毛像還大。

與西方割斷關係是毛澤東給史達林準備的見面禮。一上臺，毛就急於去見大

老闆。1949年10月底，周恩來上門告訴蘇聯大使，毛希望在史達林12月21日七十大壽時，到莫斯科去給史達林祝壽。史達林點了頭。史達林宣稱他是全蘇人民“偉大的父親”，郭沫若讚美史達林是中國人的父親。1949年他為史達林70壽辰做詩一首：

史達林元帥 我向你高呼萬歲

我向你高呼萬歲

我向你高呼萬歲

史達林元帥，

你是全人類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70壽辰，

我向你高呼萬歲

.....

原子彈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兒戲

細菌戰的威協在你面前只是夢囈

你的光暖使南北兩冰洋化為暖流

你的潤澤使撒哈拉沙漠化為沃土

原子彈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兒戲，

不朽的馬克思和你同在，

你和馬克思一樣永遠不朽了！

不朽的恩格斯和你同在，

你和恩格斯一樣永遠不朽了！

不朽的列寧和你同在，

你和列寧一樣永遠地不朽了！

毛 12 月 6 日離開北京赴莫斯科，一生中第一次出國旅行。首次見面是毛到莫斯科的當天。毛向史達林再次重申他“一邊倒”的政策，說：“好幾個國家，特別是英國，都在積極地爭取想要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我們不急於建交。”在和史達林會談時，毛請求主子出兵，化裝成中共軍隊，參與“解放臺灣”，並對蘇聯空軍參與“解放”西藏之役表示感謝。

1950 年 2 月 14 日毛簽下了賣國條約。蘇聯的 3 億美元貸款都用於中國的軍事。史達林給的很少，但拿走的很多，這些都隱藏在秘密附加協定和合同裡。東北（的中東鐵路和旅順港讓給蘇聯）和新疆的工商活動只許蘇聯參與。當時中國可開採的礦產集中在這兩個地區，毛實際上是把中國主要礦產開採權都讓給了蘇聯。毛自己把這兩個地區叫做“殖民地”。史達林死後，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承認這些協定對中國不公正，主動廢除了它們。

在史達林的堅持下，中國不僅對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付以極優厚的報酬，給他們和他們的家庭極優裕的生活條件，還付錢給這些人在蘇聯的工作單位，作為對它們“損失”的賠償。這些人還享有“治外法權”，如果犯了罪一律由蘇方處理。長期以來，中共指責“帝國主義欺負中國”的最重要一點，就是“治外法權”。毛如今偷偷把它請了回來。

1945 年與 1950 年中國與蘇聯兩次簽定了中蘇友好條約。兩個條約不同點主要有：

關於外蒙古：蘇聯承認中國對蒙古的宗主國地位；蘇聯必須在 1950 年內撤走在外蒙古境內的所有駐軍。蘇聯同意中國政府對蒙古的駐軍，但其駐軍不能用來反對蘇聯。蘇聯強烈要求 25 年以內中國政府同意外蒙古舉行公民表決，由聯

合國監督表決的公平性。

中華民國政府聲明對外蒙古有不可爭辯的主權，中國政府 1950 年 10 月 10 日恢復對外蒙古駐軍，用於保護領土完整，不用於反對蘇聯，在同一時間實行蒙古高度自治。中華民國政府同意 100 年以內讓外蒙古人民舉行公民表決，由聯合國監督表決的公平性。公民表決的先決條件是 1911 年被蘇聯用武力驅逐出去的原外蒙各族居民遷回原地，參於投票。中國政府認為，公民表決是決定自治，不是決定獨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條件承認外蒙古獨立，取消國民政府關於外蒙的不平等條約並願意根據聯合國民族居住權原則把南京政府用武力霸佔的外蒙領土還給外蒙。

有關符拉迪沃斯托克與江北六十四屯等：蘇聯同意無條件撤走蘇聯駐東三省所有武裝力量。同意中國政府恢復原殖民地大連主權。蘇聯承認中國對海參威的主權，蘇聯同意在 50 年以內撤走蘇聯駐符拉迪沃斯托克所有武裝力量。中國政府將在 1995 年恢復對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主權，對蘇聯免稅。雙方同意就符拉迪沃斯托克問題繼續進行談判。蘇聯承認江北六十四屯為中國領土。蘇聯承認圖門江出海口是中國主權。中國聲明圖門江出海口是中國主權，為了中蘇友好，圖門江對蘇聯開放。

清政府割讓給沙俄的外興安嶺到庫頁島的 100 萬平方公里和割讓給日本的臺灣島，國民政府都一直未予承認。宋子文由於沒收回庫頁群島而拒絕簽字，由外長王世傑簽字。

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符拉迪沃斯托克（包括符拉迪沃斯托克所轄的郊區）是蘇聯固有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江北六十四屯為蘇聯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

承認圖門江出海口是蘇聯主權；“新疆北郊”是蘇聯領土。承認清政府關於大連的協議，承認蘇聯在大連地區的特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歡迎蘇聯在新疆、東北、內蒙駐軍。中華人民共和國停止 1945 年以來南京政府所有索土要求；承認清朝政府代表 1850 年以來所有領土條約。

1949 年新疆國民黨當局通電宣佈起義。毛澤東請求史達林用飛機空運中共軍隊。蘇聯運輸機自 1949 年 11 月 4 日開始空運，共運 1033 架次，官兵 12446 人，武器裝備 125734 噸。加上從 10 月開始車運的部隊，在年底前，解放軍的主力部隊已進抵新疆各主要城市。

1950 年 3 月 13 日，蘇軍由巴季茨基中將率領的混合航空兵集團進駐華東的上海、徐州等地機場，協助中國進行空防。這支防空部隊共有戰機 120 架、雷達 12 部、探照燈 72 部。

1950 年 6 月 19 日，解放軍第一支航空兵部隊——空軍第 4 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先後進駐徐州、上海機場，並在蘇聯空軍的幫助下，進行換裝帶飛訓練。10 月巴季茨基部隊奉調回國，其武器裝備作價移交中國，共 119 架。蘇聯空軍第二批部隊別洛夫師在 1950 年 8 月進駐中國東北擔任防空任務，後採用同樣辦法，將這支部隊的裝備作價移交給中國空軍，總共 138 架飛機。同年 10 到 12 月，又有 13 個蘇聯航空兵師分別到達東北、華北、華東、中南等地區，協助擔負上述地區的防空任務，並負責訓練中國空軍部隊。這些蘇聯空軍部隊直到 1951 年 7 月才開始陸續回國，中國空軍當時有償接收了其中 12 個師的裝備。

1952 年 3 月 28 日，毛竟然致電史達林，請求“蘇軍留在旅順口地區，並在 1952 年底不撤出旅順口。”同年 8 月，毛根據史達林指示派周恩來到莫斯科，與史達林商談這一賣國計畫。9 月 15 日，中蘇交換了《關於延長共同使用中國

旅順口海軍基地期限的換文》，中方請求蘇方同意“延長中蘇關於旅順口協定第二款中規定的蘇軍撤出旅順口的期限，共同利用中國旅順口海軍軍事基地，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以及蘇聯與日本簽署和平條約”，使得本來能在該年年底收回的旅順港，無限期淪為蘇聯的軍事基地。1953年聯大通過決議，遣責俄國強佔蒙古、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共一身聲不吭。中共領導人是漢奸、賣國賊。

毛澤東完全服從蘇聯的一切指示，從外交到內政、從軍事到民生、從機構設置到等級制度，無不以史達林馬首是瞻，甚至連出版自己的選集，也要請史達林派專家來指導，建政後更實行“一邊倒”政策。毛又通過密約，私自授予蘇聯專家治外法權，使之成為超越於中國法律之上的高等種族。中國在蘇聯顧問的全面指導下很快建立了與蘇聯完全一樣的政治、經濟、文化、法律、金融、工業、農業等等體系，成了蘇聯的翻版。

1953年，共產黨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這個計畫，從內容到名稱都是蘇聯模式。共黨的計畫就是剝奪人民的一切：土地、房屋、財產、自由和人格獨立。共產黨充當了全國的總奴隸主。全民所有，就是全民沒有，一切歸黨所有。無論農村還是城市，人民除了能勉強維持生命便一無所有。維持性命的最低生活資料，是通過定量配給的票證取得的。是不是中國生產的東西不足以養活中國人呢？？不是。物資是有的，但不給中國人，都被毛敬塘進貢給蘇聯“老大哥”了。1956年底，共產黨基本實現了全國工業奴隸化和農業奴隸化。

共產中國成了蘇聯的僕從國，成了蘇聯的大後方，物資、人力，源源不斷輸入蘇聯——這就是共產黨建國後實行票證制度定量配給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共產黨政權本來就是窮凶極惡剝奪人民的壞種）。可以說，沒有共產中國這個殖民地，就沒有蘇聯的超級大國。

在內政上，親蘇、崇蘇、恐蘇成了國策。“向蘇聯老大哥學習”的號召響徹雲天，“反蘇”成了劃“右派”的一條主要標準。毛在中央會議上宣佈：凡與蘇聯專家發生爭端，中方要“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他廢棄了民族的自尊，把國人貶作三等國民，竟然厚著臉皮自稱是“第三世界”，好一個“來自延安的無賴作風”！

越南戰爭期間，毛澤東為了支援越共打美國，擅自將北部灣中的我白龍尾島贈與越南。

江澤民在 1999 年年底與俄國簽訂了《中俄邊界新約》，正式承認了中俄之間所有不平等條約，放棄了被占的中國領土；而俄中能源談判卻一再破裂。1981 年死了 154 名中華烈士才奪回的廣西法卡山，又被共產黨在中越勘分邊界時輕輕一筆劃給了越南。2000 年 12 月 25 日，中共與越南重新劃定了北部灣的海域邊界，分界線由原來的較為靠近越南海岸線移至距海南島中線的位置，使中國漁民的撈捕面積由以前的 12.8 萬平方公里縮減 8 萬多平方公里。胡錦濤為了換取北極熊的石油，不惜把大黑瞎子島 2/3 的主權又出賣給俄羅斯了，剩下的 1/3 共同開發。2005 年中方買單邀請俄方來中國沿海搞聯合軍演，然後買俄的武器。北京邪教政權的賣國成就，堪稱“史無前例”，遠遠超過了簽訂“二十一條”的袁世凱，超過了引滿韃子入關的吳三桂，超過了萬世唾罵的秦檜，超過了兒皇帝石敬瑭……總之，大大超過了中國歷史上一切賣國賊的總和！

1949 年後中國割讓領土一覽表（不完全統計）面積單位：平方公里

邊界位置	年代	割讓地	割讓面積	割讓形式	經手人
官方立場					

緬甸	1960	江心坡	7萬	簽約	周恩來
中緬友好					
印度	1962	麥克馬洪線南	9萬	默認	周恩來
中印友好					
俄國	1950	江東 64 屯	7萬	贈予	周恩來
中蘇友好					
阿富汗	1963	帕米爾	不詳	簽約	陳毅
抗印製蘇					
巴基斯坦	1963	喀什米爾	2千	簽約	陳毅
睦鄰抗印					
越南	1970	北部灣	小島	秘授	周恩來
援越抗美					
日本	1978	釣魚島	島嶼	口頭承認	鄧小平
共同開發					

第 97 節 荒唐的抗美援朝

1· 史達林挑戰西方

史達林 1946 年 2 月 9 日宣稱：“共產主義同資本主義是互不相容的，另一場戰爭不可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戰把一個國家從資本主義的奴役之下解放了出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建立了社會主義體系，而第三次世界大戰會永遠地消滅帝國主義；我們要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並結束它”。史達林隨即撕毀了在雅爾達的承諾，他下令殺害了大批東歐各國民主派領導人，以及看不順眼的共產黨領導人，在東歐扶植起代理人政權。1946 年 3 月 5 日邱吉爾針對史達林的演講發表了著名的

“鐵幕”演說。邱吉爾這個演說被稱為冷戰的開始。隨著“馬歇爾計畫”的實施，西歐各國從戰後的饑餓與混亂中恢復過來；捷克斯洛伐克已經建立了民選多黨政府，1948年2月蘇軍卻幫助捷共發動政變，推翻了合法政府。又指使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等共黨國家出動“志願軍”幫助希臘、伊朗和土耳其的遊擊隊奪權，只是由於英、美干涉未能如願。蘇聯在奧地利的奪權活動也因美、英、法佔領軍的強硬態度未能成功。

1994年，一位名叫蘇多柏拉托夫的前蘇聯克格勃將軍在出版的個人回憶錄《特殊使命》中說，蘇聯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戰略進攻前特意引發“柏林危機”，是史達林和毛澤東共同協商而做出的一個重大戰略計畫，他們想以此調虎離山，轉移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注意力。

美、英、法佔領的西柏林同蘇聯控制的東柏林，成為光明與黑暗、自由和奴役交鋒最為激烈的橋頭堡。1948年6月24日，史達林下令不讓一個雞蛋、一枚馬鈴薯溜入西柏林，切斷其所有的水陸交通和貨運；蘇聯突然關閉了從漢諾威至柏林高速公路上、位於佔領區邊界的赫爾姆施泰特(Helmstedt)檢查站，並切斷了美、英管轄的西柏林地區所有的水陸交通，使依賴西方世界的物質支援才得以維持的西柏林變成了一塊死地。同時，蘇聯駐紮在東德的30多萬軍隊擺出了強烈的戰爭姿態。美、英等國對此反應強烈，立即向西德緊急調動兵力，準備全面迎戰。一時間，整個歐洲再度陷入危機，似乎“第三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

6月26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命令美駐歐空軍投入所有能使用的飛機實施空中補給，搭建一條通往西柏林的“空中走廊”。美國空軍最高指揮部當即從阿拉斯加、夏威夷和加勒比海等地調集了大批運輸機執行代號“運糧行動”的空運作業。同日，美國空軍第1批C-47型運輸機滿載著生活必需品飛抵西柏林，一場

被視為世界航空史上空前壯舉的大規模空運行動——“柏林空運”由此揭開了序幕。蘇聯懼於西方國家的強大實力，沒有敢攔截空運。

於是，一場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空中運輸走廊出現了！美發揚大公無私精神，拼命空運必需品，幾十人因勞累過度而以身殉職。在長達十幾月的空運中，美付出了巨大代價。美的飛行員用自己的錢買聖誕禮品給德國孩子，還自作降落傘把小禮品空降。當時的西柏林尚未從戰爭的創傷中恢復，根本不具備生產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能力，但居住在這裡的 250 萬德國人每天至少要消耗 4500 噸物資才能維持生存。因此，美、英兩國面臨著空前艱巨的運輸任務，包括糧食、布匹、藥品、煤炭，甚至某些機器設備在內的所有物資都需要空運到西柏林。英國為了不讓西柏林人餓肚子，大幅削減本國供給，甚至低於戰時的水準。

1948 年 10 月 15 日，美、英兩國建立聯合空中補給工作小組，由美國空軍中將威廉·特納負責統一指揮，進行大規模空運。特納中將被譽為“美國空運之父”，他曾在二戰期間指揮了舉世矚目的“駝峰空運”行動，從印度向中國昆明空運了大量戰略物資，為中國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作出了不朽的貢獻。起初，特納中將手頭僅有來自美、英、法三國的軍用運輸機，每天只能空運 750 噸物資，還遠遠不能滿足西柏林居民的需要。當瞭解到西柏林居民面臨的艱難後，越來越多的國家將柏林空運視作人道救援。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等國紛紛派出運輸機和機組人員參與柏林空運。西方盟國為了捍衛西柏林人民的自由與生存，每天向西柏林人民空運大量食品與其他人道主義必需品，構成了人類航空史上空前壯觀而感人的景象。從西德法蘭克福機場到西柏林的空中，有 5 層飛行路線，同時並用。每層飛行路線之間的距離，只有 500 英尺。在運輸高峰期，西柏林上空晝夜 24 小時，飛機聲轟鳴不斷，平均每一分鐘，就有一架飛機降落。隨著投

入空運的飛機、新建的機場以及運輸強度的不斷增加，柏林空運每天的空運量不斷地相應增加，1500 噸、2000 噸、4000 噸、5000 噸……直到 1949 年 4 月 16 日這天，西柏林上空異常繁忙，聯合空中補給工作小組指揮下的所有運輸機傾巢出動。當天的空運量毅然突破了 12840 噸，創下了柏林空運中的一天最高空運量紀錄。比封鎖前的地面快遞運輸量還要大。史達林的封鎖計畫徹底失敗，東德居民逃往西德的人數與日俱增。由於美國施行反封鎖，東德重工業企業因缺少煤和鋼等原料的供應而紛紛倒閉。蘇聯被迫恢復了對西柏林的電力供應，放回了扣押在蘇占區的 4000 節車廂。1949 年 5 月 5 日，蘇、美、英、法四國達成協議，宣佈自 5 月 12 日起取消對柏林實施的封鎖和反封鎖。

至封鎖終於解除之時，美國與英國的飛機總計已向西柏林人民空投了 150 多萬噸重的物資！以美國為主的盟軍總共出動飛機 27.7 萬架次（其中美軍出動 189963 架次），空運物資 230 萬噸；12 次墜機事件使得 39 名英國人、31 名美國人和 8 名德國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試想，一座大城市所需的所有物資，完全靠它上空滾動著的一條黑壓壓的空中補給線來維繫，而且，這種狀況持續一年之久！人類歷史上還有什麼比這更動人更壯觀的奇跡嗎？

史達林咄咄逼人的西進態勢和對柏林的封鎖，不僅催生了北約，還使得原本保持中立的挪威、丹麥和冰島也都加入了北約。這種影響甚至一直延續到了今天：北約成員國從最初的 12 個擴大到目前的 26 個，而華約早已成為歷史名詞。一方想餓死幾百萬人，另一方則不計代價地拼命救援，用腳趾頭想想都知道誰是人權戰士，誰又是千夫所指。

1949 年 5 月，毛澤東已經席捲了中國，史達林面對民主國家不可摧毀的維

護自由的意志，終於解除了西柏林的地面封鎖。柏林危機的解決為憲政民主國家注入了對抗共產制度的信心。與此同時，《北大西洋公約》的簽訂，把西方國家綁在一起，共同維護世界安全。

1949年9月，蘇聯爆炸了原子彈，美國的核壟斷至少提前幾年被打破了。就在此時，中國“革命”取得了奇跡般進展，美國佬灰溜溜地撤走了。莫洛托夫回憶道：史達林站在剛標明蘇聯新疆界的地圖前說：看看我們得到了些什麼，國界從列寧格勒向前推了。波羅的海沿岸現在重歸我們所有。白俄羅斯、烏克蘭、摩爾達維亞都集中了。西邊一切正常。看看東邊，“千島群島歸我們了，薩哈林島也全屬於我們了，這有多好，旅順港是我們的！”他接著用煙斗在中國一帶劃了一圈，“中國、蒙古——一切正常。”再接下去，他說：“但是我完全不滿意這裡的邊界。”然後說出了達達尼爾海峽、土耳其、利比亞……。

1948年1月，印度代表梅農率聯合國委員會赴韓，安排統一選舉事務。蘇聯禁止在北朝鮮進行選舉，不允許聯合國人員入境。造成韓國國土分裂的正是史達林及其豢養的金日成！

金日成的一切都是史達林給的；朝鮮人民軍也是蘇聯組建的；裝備由蘇聯提供，人員由蘇聯調教。韓戰爆發前，原駐北韓的蘇軍和駐南韓的美軍都已撤走。北韓的金日成在1949年3月到莫斯科請求史達林支持他統一朝鮮，未獲史達林同意。金日成不死心，不斷通過各種途徑向史達林表示解放南韓的決心。

1949年3月5日金日成訪蘇時向史達林提出進攻韓國的計畫。史達林對金日成的實力沒信心，沒有貿然同意。但他給了金日成兩億盧布貸款並同意人民軍軍官到蘇聯軍事院校學軍事。1949年6月蘇聯又給金日成軍用飛機100架，T-34坦克87輛，裝甲車57輛，大炮230門，槍10000多枝。49年9月3日，金日

成向蘇聯請示，要求先攻佔甕津半島及開城地區。23 日布林加甯與葛羅米柯複電，傳達史達林的指示：“在當前形勢下人民軍對朝鮮南方開始全面進攻是不恰當的和不合時宜的。”

毛 1949 年底到莫斯科時，史達林就把金日成的計畫告訴了毛。1947 年，東北有大批的朝鮮軍隊支援中共，中共當然要回報。同史達林會談中，毛提到過金日成想進攻南韓，中共已按史達林的要求將三個師又兩個團的兵力[69200 人，占朝鮮人民軍總數 148680 人的 46.5%]連同武器裝備交給金日成；不過現在還不是北方進攻南方的時機，史達林也表示同意。

1950 年 1 月 22~30 日，史達林與毛敲定中蘇條約，中國的“一邊倒”已成現實。1 月 30 日史達林回電：“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滿，但他應當理解，他想對南朝鮮採取如此重大的舉措，是需要有充分準備的。這件事情必須組織得不冒太大的風險。如果他想同我談此事，那麼我隨時準備接見他並同他會談。請把此事轉告金日成並且告訴他，在這件事上我準備幫助他。”此後蘇聯便全力推動金日成開戰。

2 月 4 日金日成與蘇聯大使史蒂科夫會談，用 9 噸黃金、40 噸白銀及 15000 噸有色金屬礦石換取 1.38 億盧布軍火，組建三個步兵師；並把 1951 年的貸款提前用於 1950 年。2 月下旬蘇聯任命瓦西裡耶夫中將為朝鮮人民軍總顧問，直接組織進攻的準備工作。3 月 9 日金日成要求蘇聯提供 1.3 億盧布軍事、技術、物資援助。18 日史達林答覆完全滿足其要求”。朝鮮人民軍到開戰時已有十個步兵師，兩個半滿員師，一個裝甲旅；有 150 輛 T-34 坦克；大量重火炮；180 架高性能作戰飛機。

1950 年 3 月金日成帶領龐大的軍事代表團在莫斯科呆了兩個月，史達林考

慮到讓朝中兩國在朝鮮的土地上同美國拼，對蘇聯最有利，就同意金日成的軍事計畫。他說：“如果你們想打，就打吧。我們答應提供武器支持和派遣軍事專家顧問。”但蘇聯不能出面。萬一美國干涉，就“由中國出來支撐局面並爭取戰爭勝利”。

蘇聯的底線是決不同美國打，否則將冒失去東歐的風險。中、美一旦打起來，可以牽制甚至削弱美國，蘇聯就可在歐洲成強勢；再者，中美一打就徹底斷了中國打美國牌的路，只能死心踏地靠蘇聯。在木已成舟時“抬舉”毛，讓金必與毛討論，使毛的虛榮心得些滿足。同時他還必須得到中國在美國萬一介入時能頂上去的承諾，才允許金日成開戰。

儘管美國總統杜魯門在 1950 年 1 月 5 日的聲明中已明確說不打算干涉中國解放臺灣；蘇聯不幫助中國打臺灣，卻支持朝鮮解放南方，而美韓已於 1 月 26 日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美國肯定要履行條約的。史達林顯然不想中國解放臺灣後更加強大，讓金日成打南韓，既使金強大起來可制約中國，又能在美國頭上動土，居心險惡。中國絕不應該贊同這個計畫。但毛一心“一邊倒”，只能同意史達林的意見。

5 月 13 日金日成來北京，當晚就見毛澤東，轉述了史達林“最終應由北京平壤領導人共同解決”的指示。當晚 11 點半，周恩來召見蘇聯駐京大使羅申，說毛澤東希望得到史達林的解釋。第 2 天早晨五點半，莫斯科以史達林名義回電毛澤東，確認了金日成的說法。

5 月 15 日毛與金會談，毛不諱言原打算解放臺灣後再幫朝鮮解放南方。但既然史達林已決定先解決朝鮮問題，他也沒意見。毛強調：作戰要有充分準備，兵貴神速。要集中兵力消滅敵人。假如美軍直接介入，由於蘇聯與美國有協議限

制，不便出兵。但中國沒有這樣的限制，我們可以出兵。金認為日本介入可能性不大，美國出兵幾乎不可能。毛說，我們不是美帝的參謀長，作不了它的主，準備總是必要的。打算在鴨綠江邊擺上三個軍，如美帝不干涉也沒妨礙；如干涉，不過“三八線”則罷，只要過“三八線”，我們一定打過去！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楊奎松在 1997 年第 1 期《百年潮》上透露：朝鮮南侵計畫是蘇聯制訂的，並征得中共同意。結果引起朝方的抗議。幸虧當時胡喬木良心未泯，批示曰：“朝鮮戰爭究竟是誰發動的，如今盡人皆知。《百年潮》文章只是一個天真無邪的小孩說穿了皇帝的新衣，不必大驚小怪。”一場危機才得以化解。

另一個以論文《有關朝鮮戰爭起源》取得牛津大學博士學位的學者徐澤榮，就沒有如此幸運，他以“洩露國家機密”罪名被判 13 年徒刑。

2·朝鮮戰爭的歷程

1950 年 6 月 25 日凌晨，北朝鮮人民軍發起攻擊，戰爭正式爆發，數小時後便控制了開城。金日成的進攻採取了希特勒進攻波蘭、史達林進攻芬蘭時的做法，捏造了一個南方全面進攻的謊言。這謊言立即被中國大加宣傳，直到 2000 年印刷的關於朝戰的權威著作，依然重複著這謊言。有的作者明知此謊言說不過去了，便以含糊的“朝鮮內戰爆發”略過去。

朝戰爆發當天，聯合國安理會在艾奇遜的要求下召開，並以 9:0 通過決議，要求北朝鮮軍立即撤至“三八線”。蘇聯代表沒有出席。

6 月 27 日，人民軍攻克漢城，並以凌厲攻勢向南推進。美國代表在聯合國立即建議召開了安理會緊急會議，通過了“必須用緊急的軍事措施來恢復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決議。耐人尋味的是，蘇聯代表依舊不出席。美國獲得了“聯合國

授權下的一次員警行動”的合法地位。杜魯門下令美國空、海軍介入朝鮮戰爭，美國海軍第 7 艦隊進入臺灣海峽。

蘇聯在此時完全瞭解聯合國的動態，卻躲起來。許多人弄不清何故。其實很簡單，如參會，不行使否決權必遭朝、中以及東歐各國惱火，對其鞏固社會主義陣營及其領導地位不利；行使的話，又暴露自己與此戰有牽連，在全世界面前有失形象。躲起來最好！

面對世界的強烈反應，蘇聯副外長公開聲明，蘇聯“對其它國家的內部事務奉行傳統的不干涉原則”。蘇聯這樣做無非是一邊做婊子一邊立牌坊，企圖擺脫干係。

但暗地裡是另外一套：7 月 1 日史達林致電史蒂科夫，要求轉告金日成，“不要被美國人的介入嚇壞了，必須堅決地繼續進攻”；“南朝鮮解放得越快，武裝干涉的機會就越少”。同時他也小心謹慎，下令召回前線的軍事顧問，派遣到前線司令部的軍事顧問一律以《真理報》記者的身份派往。他下令：不能讓他們成為俘虜。又對赫魯雪夫說：“我們不想留下證據被人家指控我們參與了這件事。這事是金日成自己幹的。”

史達林督促中國儘快出兵。7 月 2 日蘇聯駐華大使羅申電告史達林：周恩來與他會談時說：“中國的三個軍共 12 萬人已經集結在瀋陽地區，如果美國人越過‘三八線’，中國軍隊將裝扮成朝鮮人進行抵抗”。周恩來此答覆說明中國早就調兵了。如果朝鮮開戰後中共才開始調動，12 萬部隊是不可能在五天內就集結到瀋陽的。

史達林馬上回電羅申：“我們認為，集中九個師於中朝邊境以便在敵人越過三八線時，志願軍入朝作戰。我們將盡力為這些部隊提供空中掩護”。連志願軍

這種形式也是史達林給安排好的。中方 7 月 7 日即決定：一旦參戰就“改穿志願軍服裝，使用志願軍旗幟”。

7 月 7 日英國向蘇聯提議，希望蘇聯向北朝鮮施加影響，促使其退回三八線。史達林馬上電告中朝兩國：“我們認為英國人的這項要求是不能接受的”。7 月 8 日，史達林指示羅申：“請轉告毛，朝鮮人正在抱怨中國在朝鮮沒有代表。應當儘快派出代表，已便有可能建立聯繫並迅速解決問題”。9 日夜，中國外交官奉命緊急進入朝鮮。7 月 13 日史達林電告羅申轉毛：“我們不清楚您是否已決定部署 9 個中國師在朝鮮邊境。如果您已作出決定，我們準備給您派去一個噴氣式殲擊機師——124 架飛機，用於掩護這些部隊。到 8 月 2 日，中共在東北邊境已屯聚了 50 萬兵力。”

6 月 30 日杜魯門批准麥克亞瑟調兩個師地面部隊進入朝鮮，以聯合國軍的名義首次介入。但這些少爺兵從日本的妓院開到朝鮮戰場，根本不能阻擋人民軍。不到兩個月，北韓就控制了南韓 90% 以上的地區和 92% 的人口。7 月 29 日聯合國軍地面戰術司令沃克下死命令：“不堅守毋寧死”，終於守住了釜山一塊最後陣地。戰勢成膠著狀態，北朝鮮軍隊損失已達 40%。於是，馬立克 8 月 1 日回到安理會，4 日提議就地停火。

在馬立克提案尚未表決時，8 月 28 日，史達林致電金日成：“蘇共中央祝賀金日成同志及其戰友在偉大的朝鮮人民解放鬥爭中，在金日成同志領導下取得輝煌勝利。蘇共中央毫不懷疑，外國干涉者將會很快地被趕出朝鮮”。“金日成同志不要忘記，他的盟友現在和將來都會支援他。我們可以補充提供攻擊機和殲擊機給朝鮮空軍。”金日成感激涕零：“我們被您的關注深深地打動，並對您的熱情參與和忠告，向您，我親愛的導師，表示感謝”於是下令：不惜一切代價發

動最猛烈的攻勢，把敵人趕下海去！可見，史達林的停火提案是何等虛偽。一項自稱為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事業，全靠謊言、陰謀來施行。

9月15日，麥克亞瑟在仁川登陸，突然在北朝鮮軍的後方開戰。金日成的進攻徹底失敗了。麥克亞瑟錯失了戰機。他不是馬上切斷半島，而是全力進攻漢城等城市，使北朝鮮軍三萬余人平安撤到北方。

9月27日史達林主持蘇共政治局開會，認定金日成已無力扭轉戰局，請中國人到朝鮮是必要的。電告金向中國求援，但“不要提莫斯科”。28日金開會討論史達林的提議，一致同意求援，但企望蘇聯援助。10月1日凌晨史達林收到金日成的求援信，請蘇聯出兵，“如果由於某些原因不可能做到這一點時，請幫助我們在中國和其它人民民主國家組織國際志願部隊，給我們的鬥爭以軍事援助。”十分鐘之後史達林發電報催促中國出兵。明明是他叫金日成向中國求援的，卻謊稱“關於此事，我沒有也不打算透露給我們的朝鮮朋友”。

1950年9月聯合國軍在仁川登陸並節節取勝之時，華盛頓當局曾下達一連串命令，不准轟炸鴨綠江大橋、不准轟炸北韓境內向東北和西伯利亞輸電的一切發電站。

10月2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沒有想到幾乎所有的領導人都持懷疑或反對態度。特別是軍隊將領們幾乎都對同美軍作戰表示沒把握。毛在會上說：“你們說的都有理由，但是別人危急，我們站在旁邊看，不論怎麼說，心裡也難過”。4日彭德懷到京，表示如“蘇聯完全撒手，我們裝備差得很遠，只好讓朝鮮亡國，是很痛心”。毛提出：“如果蘇聯援助得多一些、快一些，我們的裝備改善得好一些，這場仗是不是能打？”彭答，解決得好，空軍能掩護我們，可同美軍較量一下。毛極高興。10月5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有彭的支持，氣氛改變。決

定：一方面成立志願軍，作好參戰準備。

同日蘇共政治局開了一天會，確定：不惜一切代價，哪怕放棄北朝鮮也要避免直接與美國發生衝突。會後，史達林立即致電毛，稱：美國現在沒有打大仗的準備，日本也沒有能力幫美國打仗；因此，美國將不得不接受調停，從而無法將朝鮮作為他的軍事基地；美國不僅被迫放棄臺灣，還將拒絕單獨締結對日和約。如果中國只是消極地等待，而不是進行一場認真的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顯示自己的力量，那麼中國就得不到這些讓步。中國不僅得不到這些讓步，甚至連臺灣也得不到，美國人會把持臺灣，把它當作基地。“萬一美國向中國宣戰，自然中國將被拖入戰爭，蘇聯也將同時被拖入戰爭，因為它同中國簽有互助條約。這需要害怕嗎？我認為不需要，因為我們在一起將比美國和英國更有力量，如果戰爭不可避免，那麼讓它現在就打，而不要過幾年以後，到那時日本軍國主義將復活並成為美國的盟國，而在李承晚控制整個朝鮮的情況下，美國和日本將會在大陸有一個現成的橋頭堡。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個師所依據的國際形勢及前景的考慮。”

史達林 10 月 5 日來電進一步說明用“志願軍”的理由：如果以中國軍隊的名義出兵，萬一打不過，美軍就有藉口進犯中國；根據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蘇聯就必須出兵。他依舊不能回避同美國打仗。如果不出兵，又將在全世界面前名聲掃地！老謀深算的史達林，在此電中還詳細說明美國不可能進攻中國的理由，促使毛堅定了出兵決心！

在中共的報導中還編了一個 10 月份毛採納民主人士黃炎培的建議，把原定的“支援軍”改成“志願軍”的故事。事實上，10 月 24 日周恩來才在全國政協第一次常委會第 18 次會議上向民主黨派通報出兵朝鮮的決定。10 月 2 日毛就電

告史達林“中國決定用志願軍名義派一部分軍隊到朝鮮”了，這個故事不過是欺騙中國老百姓的宣傳手段罷了。“中國人民志願軍”是一大謊言。完全正規軍嘛，正規軍有“志願”與“不志願”之分嗎？

7日毛親自答覆史達林，同意他的觀點並確認出兵且增至九個師。同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統一韓國的決議，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8日毛髮布命令：“為了援助朝鮮人民解放戰爭，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的進攻，藉以保衛朝鮮人民、中國人民及東方各國人民的利益，著將東北邊防軍改為中國人民志願軍，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協助朝鮮同志向侵略者作戰並爭取光榮的勝利”。他同時派周恩來、林彪到蘇聯，向史達林要武器。路上，林彪給毛髮了封長長的電報，再次勸毛回心轉意，放棄出兵。毛想讓林彪對史達林說出兵的困難，以便從史達林那裡得到盡可能多的東西。周、林於10日到達史達林在黑海畔的別墅，當晚談了一夜，直到黎明五點鐘。史達林答應賣給中國飛機、大炮、坦克等軍事裝備，周恩來連價格也沒問，他知道不管多少都非買不可。史達林曾許諾派“一個空軍師，124架飛機，提供空中掩護”。可現在他忽然說派不出了，蘇聯空軍尚未準備好，要等兩個月。沒有空軍掩護，志願軍只好在地面上等著挨美國飛機炸。周恩來、林彪堅持說蘇聯空軍掩護決不可少，爭來爭去史達林也不鬆口。最後，史達林打電報給毛說：中國不必出兵。用毛後來的話，史達林說：“算了吧！”史達林這是在將毛的軍，明知毛想出兵，非出兵不可。果然，毛馬上就不爭了，說：“不管蘇聯出不出空軍，我們去。”13日，他打電報給周恩來：“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毛怕周不把他的意圖傳達透澈，雙管齊下，通知蘇聯駐華大使羅申，中國一定出兵。14日毛決定19日出兵。為證明他是史達林的忠實兒子，毛硬是下令共軍在沒有空軍掩護下跨過鴨綠江。10

月 19 日在彭德懷率領下，“中國人民志願軍”的 56 個正規師 26 萬人源源不絕地入朝參戰，偷襲聯合國軍，出兵一個多月就打到“三八線”了。兩個半月後，蘇聯空軍也只到東北而不進入朝鮮！

從志願軍入朝後發動的五大戰役來看，第一、二戰役獲勝，到二次戰役結束，共軍共殲敵 51000 人，其中聯合國軍近三萬人，收復“三八線”以北全部領土。

美方立即要求停火。1950 年 11 月 30 日，安理會以 9 票通過決議，要求中國撤軍並保證中國的利益。蘇聯立即使用否決權否決了該議案。蘇聯使用否決權意味著它根本不希望也不允許中國退出朝戰，而且不屑徵求中國的意見。此時美方的提議與 3 年後雙方簽定的停戰協議基本上並無不同，而中方卻因為毛澤東的一意孤行多付出了 90 萬人傷亡的代價。

1950 年 12 月 6 日克復平壤。當時中共軍傷亡慘重，僅九兵團就減員四萬。特別是在沒有制空權的情況下，後勤損失嚴重，幾達 40%。汽車也嚴重損失，補給困難。

當時有第三國呼籲停火談判，彭德懷便致電毛澤東，主張暫時不過三八線，待充分準備後來春再戰。卻遭到蘇駐朝大使強烈反對，為此彭德懷和蘇大使、金日成吵了一天一夜。

12 月 13 日毛接到史達林指示後電令彭德懷：“我軍必須越過三八線。如到三八線以北即停止，將給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12 月 31 日，中國軍隊進行第三戰役，跨過“三八線”拿下了漢城，並打到 37 度線附近。聯合國再次呼籲停火，提出解決朝鮮問題的五項方案，其中包括臺灣問題和中共在聯合國席位問題。這正是中共夢寐以求的東西，對中共十分有利。而且該戰役後，志願軍傷亡已近 10 萬，糧彈補給更加困難，彭德懷因此

主張停火。但毛澤東懼于蘇聯的態度，不敢接受停火。經史達林批准，1951年1月17日周恩來致電聯合國大會，拒絕了五項方案。

儘管一下子把軍力從原來的20多萬增加到135萬，毛並沒有只以恢復北朝鮮為目的，他於1951年1月19日批示道：“我軍必須按照新的情況進行各項準備，採取新的戰術，以求解放全朝鮮”。彭再發動第四次戰役，結果慘敗，損兵5萬多，又被逼回三八線北。

第五次戰役在史達林直接干預下失敗得更慘。老毛企圖用國內戰爭中的人海戰術解決問題。在國內援軍王近山兵團、楊得志兵團趕到朝鮮後，糾集60萬大軍企圖與聯合國軍30萬人決戰。毛企望在朝鮮殲滅美軍一個甚至六個整師，結果連一個美軍整營都沒能全殲。中國60萬軍人血流成河，中共的第三兵團60軍的180師全軍覆沒，1萬7千人被俘，占整個戰爭被俘志願軍的80%以上。五次戰役以中國軍隊失敗而告結束，志願軍元氣大傷，根本無力再戰，經中共請求，史達林才最終批准談判。

1951年1月30日，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以44票贊成、7票棄權的表決結果通過了譴責中國為侵略者的提案。這個決議到現在仍然有效。5月18日，聯合國又通過提案，要求成員國對中國實行禁運，兩項決議充分反映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譴責。韓國人聲稱中國軍隊在韓國屠殺了上百萬韓國人。因此，韓國人一直要求中國道歉。

中國軍隊一入朝，毛馬上向史達林要軍事工業。他派海軍司令去莫斯科談海軍建設問題。跟著去的是談判建立航空工業的代表團。在航空業方面，莫斯科簽了協議，幫中國建工廠，先修理、維修飛機，再在三到五年內過渡到製造，屆時年產3600架殲擊機。轟炸機的製造也在討論之中。中國在朝鮮戰爭結束時擁有

世界上第三大空軍，有大約 3 千架飛機，包括先進的米格機。1951 年 5 月，毛派總參謀長徐向前率“兵工代表團”到蘇聯去索要中國在朝使用的各種兵器彈藥的製造藍圖，要求蘇聯說明建設軍事工業。代表團提出買 60 個師的武器裝備，對此史達林滿口答應。但建兵工廠就不一樣了。徐向前說：一連數月，“兵工生產問題遲遲不見答覆，我著急得很，左催右催，沒有結果”。徐發電報問毛怎麼辦，毛覆電說：不管怎樣，耐心等待。最後，蘇聯只同意轉讓幾種兵工技術資料，其他的一概不談。

金日成急於結束戰爭。1951 年 6 月 3 日，他秘密到中國，建議同意聯合國早已提出的停戰談判。毛不想停戰，史達林還遠遠沒有滿足他對軍事工業的要求；但他不反對臨時停火。志願軍這時正吃敗仗，急需喘口氣。毛派高崗同金日成一道去見史達林，既談臨時停火，也催幫助建設軍工。史達林談完後打電報給毛，避而不提軍工，只說了句讓毛開心的話，把金日成視為毛的部下：“今天見到了您在東北和朝鮮的代表。”史達林同意臨時停火。

1951 年 7 月 10 日交戰回到談判桌時，中共優勢已失。停戰談判在停火線附近的板門店延續了兩年。幾個月內，大多數問題都很快解決了，毛和史達林扭住一個問題不放：戰俘遣返問題。當時聯合國軍手上有兩萬中國戰俘，大部分是原國民黨官兵，不願意回到共產黨治下的大陸去。美國堅持自願遣返，毛要全部遣返，命令談判代表：“一個也不能放！”這一句冷酷的話使朝鮮戰爭多打了一年半，中國多死了幾十萬人，朝鮮死的人更多。金日成本人是一心想接受美國的條件，勸毛說沒必要去爭那幾個政治上不可靠的國民黨。金的話沒用。在此期間，雙方戰鬥仍在繼續，入朝的中共軍隊還得到了蘇聯重型武器的支持。

1952 年美國轟炸非常厲害，北朝鮮人大約 1/3 的成年男子死亡。金日成 7

月 14 日給毛髮電，哀求停戰；毛回電拒絕，說這不是軟弱動搖嗎？毛接著說死人有好處：“鍛練了人民，使他們獲得了與美帝國主義作鬥爭的經驗。”人命算什麼，中國多得是。在 33 個月的援朝戰爭中，自願軍採用輪換制人數達 300 多萬。志願軍從最初入朝的 30 萬，增到後來的 77 萬。戰爭越打越艱難只有靠人數硬扛了。

毛的參戰讓史達林可以藐視美國了，該史達林給他回報了。1952 年 8 月，毛派周恩來去莫斯科見史達林。周恩來開口就向史達林要求援建 147 個專案，“都為軍事需要服務”。這中間有生產戰鬥機的、艦艇的，坦克的，周要求“一家工廠一年出產一千輛輕型坦克，另一家四、五年內出產中型坦克。史達林拿漂亮話搪塞，什麼“中國一定要很好地武裝起來，” “中國一定要成為亞洲的旗艦。”史達林就這樣一直敷衍下去，到死也沒對周的單子點頭。

周恩來見史達林的另一目的，是確立毛的勢力範圍。自從史達林決定打朝鮮戰爭以來，他同意毛把手伸進日本、菲律賓、馬來亞等亞洲國家。日本共產黨人來北京籌備組織與朝鮮戰爭配合的武裝行動。在東南亞，緬甸共產黨遊擊隊尤其活躍，正朝中國邊境運動，以期打通中國，接受軍援軍訓。來中國受訓的還有未來的柬埔寨紅色高棉領導人波爾布特。

隨著朝鮮戰爭的繼續，毛向史達林索要軍事工業的頻率也越來越高。1953 年 2 月 2 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在國事演說中暗示他可能對中國使用原子彈。毛立刻派核專家錢三強趕赴蘇聯去見史達林，要這個夢寐以求的寶貝：你要是不想跟美國打核戰爭，你就得讓我擁有原子彈。這一招將了史達林的軍，因為蘇聯同中國有同盟條約，一方挨打，另一方也得卷進去保護它。史達林不想讓毛擁有原子彈，但他怕艾森豪真會扔原子彈。這促使史達林決心結束朝鮮戰爭。史達林在 2

月 28 日決定結束戰爭，告訴蘇共領導人他第二天將採取行動。就在當天晚上，他突然腦溢血，幾天後的 3 月 5 日去世。

隨後，莫洛托夫提出必須儘快結束朝鮮戰爭，因為它已給蘇、中、朝三國都帶來巨大損失。莫洛托夫發現，無論美國人自己是否意識到，它僅以第 8 集團軍與第 10 軍就把整個蘇聯勢力拖住了。當蘇聯因全力支持中朝而陷入朝鮮戰事之時，美國已經不聲不響地完成了世界霸權的部署：歐洲正式擁戴其為軍事領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已經變成軍事集團；西德、日本已經成為西方盟國，並且實施了重新武裝德國的計畫；美國迅速以軍事條約部署了對蘇聯勢力的包圍圈；廣大中間地帶國家紛紛投靠美國。更重要的是，美國國內孤立主義基本失敗，軍事打擊力量增長了三倍以上。特別是美國已經完善了戰略空軍的建設，製成了熱核武器，這對蘇聯構成直接威脅。蘇共高層同意莫洛托夫的見解，作出儘快從朝鮮脫身的決策。

3 月 21 日，以馬林科夫為首的蘇共新領導人與周恩來開了一夜的會，對周說他們決定結束朝鮮戰爭，要是毛合作的話，他們願意賣給毛 91 座大型軍工企業。這些都是史達林迄今拒絕出售的。但毛不停戰，他想要原子彈。周恩來參加史達林葬禮時，曾再次提出這個要求。此時仍在蘇聯的錢三強代表團一再請求核技術轉讓，都被莫斯科拒絕。錢三強等人在蘇聯“賴”了三個月，這三個月正是毛拒絕停止朝鮮戰爭的三個月。

此外，李承晚的南韓堅決反對停戰，於是美方面全部精力都用於安撫韓國。而毛則命令只打偽軍，朝鮮戰爭之最後作戰竟然是中朝方進攻韓方，美軍在旁邊看熱鬧。如高歌奏凱的金城戰役，在這個停戰協定大局已定的情況下，無論消滅了多少韓軍，我軍又增加傷亡 7.1 萬人。只有那些對中國國情有所瞭解的西方評

論家才評價道：那是為了挽回面子。1953年7月27日，朝鮮南北雙方終於達成停戰協定。朝鮮北南雙方以三八線為界實行分治。

在戰俘遣返問題上，中美國曾一度發生衝突。美方有朝鮮軍俘虜 11 萬 2 千人、志願軍俘虜 20800 人；但中朝方手中只有美俘 4417 人、韓俘 7142 人。中共要求遣返所有被俘的志願軍戰俘，但美國方面則根據自願原則遣返。1953 年有 1 萬 4 千名中國戰俘投奔臺灣。他們不願回大陸主要是中共實行洗腦等嚴酷政策，讓他們認識到了中共的本性。到了臺灣後，他們通過勞動成了富翁。另有 7110 名戰俘遣返大陸。他們以為自己在“保家衛國”的戰場上出生入死，在戰俘營裡還和敵人進行頑強鬥爭，一定會受到熱烈歡迎。不料祖國卻認定他們叛黨叛國，全部開除軍籍，黨員一律開除黨籍，以儆效尤。“學習班”上，人人檢舉揭發被俘期間的言行，然後根據情節輕重和認罪態度好壞，或判刑勞改，或從輕發落，打入另冊，遣返農村；有的文革中被整死，株連親族，悲慘之極。直到 1980 年 9 月才陸續平反。

整個朝鮮戰爭期間，所有空戰都是在北韓上空進行，聯合國軍沒有跨越鴨綠江。駐紮在瀋陽和丹東的蘇聯空軍穿著中國志願軍的軍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與中朝軍隊並肩作戰。在整個戰爭期間，先後有 12 個蘇聯空軍師投入了空戰，輪番參戰的空軍人數總計為 72000 人，1952 年最多時達到 26000 人。據俄羅斯統計，蘇在朝鮮損失了 335 架飛機和 120 名飛行員。

朝戰自始至終，毛是完全聽命於史達林的，停戰也是蘇聯決定的。所謂毛自主決定抗美援朝，完全是不顧事實的強詞奪理。一手策動這場戰爭的蘇聯，儘管沒有達到擴張目的，但成功地把中國推上了反美第一線，使中、美從對立變成了仇視；而且要按國際市場價格賣武器給中國，其中甚至有美國援助蘇聯反抗法西

斯的軍火，發了一筆橫財。甚至由中國支付他們在朝鮮的記者費用；還要扮演局外調停人的角色，在國際舞臺上唱高調！

1946 年到 1953 年的中國的真正統治者並不是毛澤東，而是史達林。正是史達林的改變導致林彪被放棄，彭德懷被派往朝鮮。中國的軍事部隊的調動、出兵人數、指揮系統實際上的決定權在史達林，具體的監督執行是史達林在中國的顧問，因為必須使中國的軍隊與前蘇聯在遠東地區的部隊協同作戰，加上朝鮮軍隊，實際上是史達林統一指揮蘇中朝三國軍隊，命令直接下給中朝領導。在整個韓戰期間，中國和美國如何打如何談，何時打何時談，有時甚至對一個營的兵力調動，都要聽命於史達林或至少要和史達林“磋商”，“謙恭得不得了”。

3·後果

交戰雙方軍隊總傷亡或失蹤：美韓方共 58 萬，中朝方 160 萬。志願軍跟美軍的兵員損失是 2.62 比 1，損失的代價遠遠超過了美軍。蘇聯官方認為中國死亡人數為 1 百萬，美國死亡人數 3.7 萬人，英聯邦 1263 人，其他國家 1800 人。中共打的是人海戰術，一共派遣 130 萬志願軍入朝，人多得有時戰場都排不開，擠成一堆，成了飛機、大炮的活靶子。西方輿論嘲笑中共把沒經驗的農民投進了李奇微（聯軍總司令）的絞肉機。據聯合國統計志願軍的傷亡加失蹤為 90 萬。

《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只承認“作戰減員”36.6 萬餘人，其中戰死者為 171669 名（這包括了中國沒制空權與制海權、缺乏與美式相比的精良武器、氣候等因素造成的死亡人數）。連中國延邊地區也多了 4 個師的朝鮮族中國寡婦；還搭上中國 100 多萬青年，至今屍骨無存。

在這場戰爭中，朝鮮雙方軍隊戰死和失蹤共 429197 人外；據估計南朝鮮包括平民在內的死亡人數大約有 1 百萬，而北朝鮮更高達 250 萬人。朝鮮花了 8 萬

斤黃金換來蘇聯支持，滿足大一統朝鮮半島的虛榮，結果韓國反多得了 3880 平方公里的土地。事實上，“抗美援朝”既沒有“保家”也不能“衛國”，無非是“保毛”、“衛金”瞎胡鬧罷了。“保家衛國”不如叫“保蘇衛朝”還更貼切些。而且，正是這“保家衛國”，一度被金日成利用，說中國出兵完全是為了自己的安全，並非是為了幫助朝鮮。

經濟方面：1951 年軍費 52.64 億元，占總支出的 43%，建設費只占 28.7%。1952 年軍費占 32.9%，1953 年占 34.2%，但絕對數都大於 1951 年。中國消耗的作戰物資 570 余萬噸，加上被炸毀的總共消耗要達上千萬噸。支出軍費 62 億人民幣；光戰爭撫恤金、醫療藥品一項，國家就要支出數十億元。僅戰略物資，中國要花費數百億美元。據準確估計，抗美援朝期間中國的總花費高達 500-600 億美元。更可氣的是，史達林賣給我們的軍火中，竟有相當數量是二戰時美國無償援助給蘇聯的。

為了支持這場戰爭，政府把國民收入的 50%用在朝鮮戰場上；不夠，便向蘇聯借款，僅抗美援朝欠下蘇聯的債，便達 34.85 億盧布。還不夠，便號召全國人民捐錢捐物，支援志願軍；依然不夠，只好使出最後一招：土改，殺地主。這一仗打下來，地主階級被消滅，民間財富被搜刮乾淨，中國人徹底變窮了。農村再也找不到一個富人，財富被洗劫一空。中國農業由此喪失了向現代化轉型的物質基礎。

有人說中國之所以這麼窮，是因為蔣介石把中國所有的財富都帶走了。蔣介石從大陸帶走的財富高達十億美金，似乎很多。但這點錢與抗美援朝比起來，連個零頭都不夠。如果不被蔣介石帶走，留在共產黨人手裡，也都被花掉了。這點錢根本不是使中國變窮的理由，抗美援朝則是真正使中國變窮的第一步。

美國政府曾給予中國的巨額戰爭援助，沒有向中國討要過一分一厘的銀兩。

“抗美援朝”前，毛與史達林協商的結果是，“中國出人，蘇聯出槍”。而戰爭結束後，蘇聯人則提出了讓中國還錢的要求。史達林死後，毛澤東不止一次地埋怨史達林關於韓戰的決定是個“極大的錯誤”，“是百分之百錯了”。毛的話已經為朝鮮戰爭做了結論。可在愚民政策下，他的話被絕對保密，全大陸的老百姓至今還蒙在鼓裡。

有人稱：此仗在朝鮮打要比在中國打要好。完全胡說八道！毛要“一邊倒”，得給史達林送點禮。毛自己都承認“使蘇聯處於第二線”是出兵的實質。1960年代中蘇論戰時，毛親自審定的《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評）中說：“寧願自己承擔必要的犧牲重擔，站在社會主義陣營的最前線，而使蘇聯處於第二線。”後來，毛澤東和周恩來都說過，正是因為抗美援朝，史達林才承認我們是真正的馬列主義。這才是問題的實質：要被承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國民黨倒向美國時，蔣介石只是想利用美國阻止英、法重返舊地。同蘇聯還是修好的，至少不替美國去打蘇聯。我們倒向蘇聯就一定要同美國勢不兩立嗎？

毛澤東出賣領土當兒皇帝，拿自己人民充當意識形態的炮灰，為乾爹火中取栗，極大地損害了中國的利益。使中國自絕於國際社會，直到1971年才進入聯合國。

中國避免參戰，在東西方之間左右逢源才應該是當時的最佳選擇！如果外國進駐中國周邊中國就應該出兵，那蘇軍進蒙古，美軍進阿富汗，中國為什麼不敢動啊？

中共說朝鮮進攻韓國是內戰，美國不應干涉朝鮮的內戰。其實，朝鮮以前是大清的附屬國，以後是日本的殖民地，二戰後分為2個地區，根本沒有成為一個

國家，何內戰之有？朝鮮半島理應按聯合國的決議統一，可北方反對自由民主的統一，形成了朝鮮、韓國 2 個國家。既然是 2 個國家，哪能稱為內戰？到如今，2 個國家都與我國建交，我國絕不會支持任何一方武力統一的嘗試。既然今天任何一方的武力統一都得不到我國的肯定，為何還要肯定 1950 年的朝鮮統一戰爭？能說聯合國軍是干涉內政嗎？聯合國軍是干涉是正義的干涉，蘇聯支那的干涉是邪惡的干涉，何況戰爭又是邪惡方挑起！

朝鮮戰爭是以共產黨中國、朝鮮、韓國為仲介的美蘇交鋒。美國一箭雙雕，挫敗蘇聯擴展勢頭，挽救了韓國；同時迫使共黨中國消耗國力，從而在事實上挽救了臺灣。戰爭打了三年，中共補充了三年兵員，司令部被美軍轟炸，撈取政治資本學習操縱軍隊的皇太子毛岸英被炸死。以全國之力，付出慘重代價，再加蘇聯支持，僅與美國一支駐外部隊的下屬部隊打成戰術平局，共產黨就猛吹法螺，正暴露其弱國意識和小國姿態。

1953 年 11 月金日成訪華，中國宣佈，朝戰時期中國援助的全部物資和現金全部無償贈送外，再贈送八億人民幣。結果並未能阻止金日成一度反華。停戰後中國繼續援朝 300 多億元人民幣。當朝鮮看到北京在建地鐵，說“我們平壤沒有”，於是毛澤東把北京在建的地鐵停下，給平壤修一條。1975 年金日成訪問中國，一開口就要走 300 架戰鬥機。

北朝鮮是一個進行徹底階級專政的國家，全國大致可分為三大類：核心階級，動搖階級和敵對階級。核心階級包括革命家庭（長輩為革命幹部）、軍烈屬、工人、貧下中農等。核心階級的人數占北朝鮮現有人口 2200 萬的 1/3，是北朝鮮政權的支柱。動搖階級是指沒有誓死捍衛北朝鮮現政權決心的人，約占人口的一半。敵對階級是指地主、資本家、反動分子、不純分子、以及在南朝鮮有親戚關

係者，約占人口的五分之一。在北朝鮮，家庭出身決定一個人一生的命運。敵對階級的家庭出身者，不能在大城市居住，不能上大學接受高等教育，只能從事一些低賤的工作。動搖階級的家庭出身者，雖然可以上大學，但入黨、提幹極難。

史達林的馬前卒金日成，僵屍還泡在玻璃棺材裡，接受著麻木不仁的頂禮膜拜。這項專利屬史達林所有。號稱最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卻在虔誠地效仿古埃及的法老，打造著現代的“木乃伊”。這是一項荒唐且不可理喻的舉措。只有最迂腐的孝子，才會對一具僵屍敬若神靈。何況這具僵屍，曾經營造了有史以來最迷信、最封閉、最專制、最殘酷的國度。

金家統治下的北朝鮮國家，就是侵犯本國人權的邪惡工具。北朝鮮的人民冒著生命危險逃離自己的主權國家，到別的國家去尋求最基本的人權。

金正日特別喜歡西方黃色電影。他大肆施行恐怖主義行動。當韓國的總統訪問緬甸時，金正日派人暗殺，造成 17 人在仰光被殺，包括隨行訪問的一半以上的韓國內閣成員。韓國航空公司的 859 號班機也被金正日的特工炸毀，殺死 115 人。1990 年代當地有 200 萬人餓死，平壤當局卻把稀有資源轉移到核武等大規模殺傷武器的生產上。

第 98 節 大殺天下

1. 土改殺地主

毛共到達陝北後，出於無奈，利用西安事變，要求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曾公開發表宣言放棄“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土地革命。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很多八路軍指揮機關的房東就是地主。如果不是地主，也不會有那麼多房屋供各級指揮部之用。

誰曾想抗戰結束後中共又重操故伎、恩將仇報，昧著良心在北方農村更大規

模地殺地主。1947年第三季度的土改，魯南地區就有20多萬人被活活打死，其中1/3只是富農、中農或小商販。輕者戴高帽遊街，全家掃地出門，重者全家抄斬，就連剛生下的嬰兒也不能倖免。劉少奇在遼南，先已作出了屠殺樣板。

1948年擔任過《新華日報》總編輯的華崗到香港，對各民主黨派人士做過一個關於解放區土改的報告，既講了運動的偉大意義與成就，也講了不少運動的偏向。此事被反映上去，中央領導人很不滿意，打電報給香港的中共工委會，指令工委會開會批評華崗。

每一地區凡是有田地的農民在地方稍有聲望的士紳，皆被定為“霸”，在必殺之列，“霸”又分三類：一種橫行鄉里欺壓良善的“惡霸”；一種專作好事的“善霸”；一種是安份守己作人，獨善其身，好事壞事皆不作的“不霸”，“三霸”同一罪行，皆當場處死。

土改中被殺的地主有的是被鬥死的、有的是被活活折磨死的。丁玲在《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說，農村的鬥地主“按照農民的心理，要麼不鬥，要鬥就往死裡鬥。在（河南）杞縣丁莊鄉的鬥地主運動中，發明了坐飛機的刑罰。把地主束縛後，再用繩子系于牛身上，再在牛的便道上拴上火燭，火燒牛身體，牛就拼命狂奔，不到幾分鐘，人就血肉模糊了。”

蘇南從1950年7月開始土改的典型試驗。亂鬥亂打現象主要發生在蘇南土改全面展開的初期，即1950年12月至1950年1月間。在全蘇南的2741個鄉中，普遍亂鬥亂打的鄉就達200個以上。亂鬥現象有如下特點。首先，鬥爭會不是說理而是鬥力鬥蠻，鬥打的花樣繁多，血腥味甚濃。主要有吊、跪、綁、坐老虎凳、蹲水缸、剝衣服、澆冷水、爬、變狗叫、在頭上壓石頭、燒陰毛、戳乳房、吃雪等。據中共蘇南區黨委農村工作委員會土地改革檢查隊（以下簡稱“檢查隊”）

的統計：奉賢縣 5 個區被鬥的 245 人中，被打的 218 人，被迫下跪的 75 人，被棒打的 35 人，被吊起來的 13 人，被捆綁的 18 人，被剝光衣服的 80 人，每人一般受多種體罰。武進縣百大區鬥一個婦女時燒陰毛，潢裡區鬥一個婦女時逼她脫光衣服在臺上爬。宜興縣強迫鬥爭對象跪碗底，把貓放入鬥爭對象衣服裡面，剪掉婦女的頭髮和眉毛；江陰縣鬥爭狗腿子時，要求狗腿子學狗叫、學狗爬、學狗啃骨頭；嘉定縣馬陸區 7 個鄉鬥爭 36 人，其中 31 人被打，10 人被剝光衣服澆冷水，30 人跪下；上海縣的塘灣鄉鬥爭 4 人，全坐老虎凳；常熟縣還發生了割婦女乳頭的事。有的地方還把石頭放在鬥爭對象頭上，把雪放在鬥爭物件身上或要求鬥爭物件吃雪。無錫縣各地的鬥爭方式除了綁、打、剝、跪、爬較普遍外，還有戴石臼、吃牛屎、學狗叫、吃雪等。1951 年 9 月江陰縣委在總結時說，上面放手，下面變成了撒手，普遍產生有鬥必打，有鬥必跪，脫衣服、澆冷水、吊等等。

1951 年 1 月 28 日的《蘇南土改情況》報導，高淳縣固城區安新鄉中農趙仲生因秋徵時拖欠公糧，民兵將其母子綁起來，吊了一夜；遊子鄉趙公廟抓了 2 個貧農到人民法庭去，說他倆是“惡霸”，要求關到土改結束，原因是地主嫁女兒去吃了酒。青浦縣龍固區在 1950 年 11 月 1 日至 3 日就打死 17 人。據蘇南農民協會不完全統計，蘇南在鬥爭中一共打死 60 人，其中鎮江專區 4 人、常州專區 6 人、松江專區 50 人。實際被打死的不止此數。據“檢查隊”調查，僅常州專區江陰縣長涇鄉就打死 18 人，金壇縣打死 2 人。據蘇南農民協會統計，在鬥爭期間蘇南共有 293 人自殺，其中鎮江專區 97 人、蘇州專區 81 人。武進縣在鬥爭中嚇死及與鬥爭有關而自殺的有 20 人。宜興縣在鬥爭中造成地主 23 人自殺。溧水縣在土改期間有 27 人自殺，其中絕大部分為地主，不少是因為害怕鬥爭或在

鬥爭被清算而自殺。

有的地主是被逼死的。前新華社社長穆青在 1950 年 6 月 2 日的中共《內部參考》中報導：河南土改運動中一個多月即發生逼死人命案件 40 餘起，大部為中農以下成份。據《帶刺的紅玫瑰》一書透露，1953 年春季，廣東粵西地區的土改中有 1156 人自殺。其中，2 月 3 日到 3 月 6 日，只一個月出頭，自殺者竟高達 85 人。

當時，僅僅由土改工作小組討論決定，就能夠槍斃成批的地主；只要幾個積極份子的幾聲口號，就能夠將地主全家的財產剝奪殆盡。比如，在進行土改運動時，工作組發動鬥爭會，事先選定被鬥的目標，羅織一些莫名其妙的故事便成了罪狀，然後幹部向台下問：“這個人該辦什麼罪？”下面安排好的人大喊：“該殺”。於是便即刻槍殺或當場打死。

以周恩來胞弟的岳父為例，他在民國初年做過江蘇省運河水利局局長，從未在國民政府中做事。加上周恩來兄弟外出革命，他將周母接到自己家中供養了十多年。共黨南下時，他認為自己不會成為鎮壓對象。不料一解放，他便因為“地主”身份成了第一批鬥爭物件，很快就送了老命。周真是革命徹底、大義滅親啊！周的親戚尚如此，別人的遭遇就更慘了。

1938 年趙紫陽 19 歲在家鄉河南省滑縣加入共產黨並於年底任縣委書記，21 歲又升為地委書記，開始領導土改運動，殺地主、分浮財。他殺別人，別人也給他出難題。趙紫陽的父親是個很謙和的老中醫，又是教了一輩子書的私塾先生，一年四季都勞動，每天早晨起來背著糞簍到大街上拾大糞，還拿著本兒書念，工作隊一再發動群眾，但確實一點民憤都沒有。但縣委硬是命令農村必須村村見血，要殺人口的百分之一，土地最多的地主就是無罪惡無民憤者也要殺，說這是為了

推動革命，檔中還介紹黨的中央委員陳鬱親手開槍把他的父親槍斃了，共產黨員都要向陳鬱學習。1947年當地組織決定要殺掉他的父親趙廷賓，他毫不猶豫簽字“同意”，因此獲得黨組織的賞識重用。他說：“地主出身的幹部必須站到農民一方面來，首先是在思想上和家庭斷絕關係，主動說服家庭，認真執行土改。”當時的場面很慘烈，土改工作隊是把老人當作還鄉團來鬥爭的，幾個壯漢把老人高高抬起來，問道：“看到國民黨回來了嗎？看到了吧！”一邊說，一邊把老人往高處一扔，給活活給摔死的，這種鬥爭方式叫作“望老蔣”。趙紫陽對其父親和家庭的態度，是共產黨性征服其人性的野蠻歷史。

1951年4月中南局將趙紫陽從河南信陽地委書記調來廣東，具體領導全省土改。1951年11月，在廣西主持剿匪有功、殺人4萬（其中1/3在可殺可不殺之間）的陶鑄調到廣東主管廣東土改；其人更“左”更狠，來粵後以反“右傾”的口號整頓土改隊伍。一大批對地主不夠狠或被認為歷史有問題的土改幹部，受到迫害或處分，一些被開除公職，有些更被殺害；如中山縣幾十個這類土改幹部被處死刑。廣東全省約5.2%土改隊隊員遭清洗或處死。

陶鑄在廣東搞“村村流血，戶戶鬥爭”，亦即是每村都要殺人流血才算過關。在廣東被濫殺者中，就有名中醫、好鄉長、歸僑教師、中農、前國民政府低級公務員。

一位原鄉土改隊副隊長說：過去殺地主沒有限定數額，1952年荔枝大熟時節每個鄉要定出殺多少個地主的計畫；過去審批判處地主死刑的許可權由縣委書記、縣長、公安局長三巨頭共同掌握，後來下放到區一級領導；過去對被判死刑的地主所犯罪行還要核實，看是否真的“罪大惡極，查有實據”，後來只要窮苦農民（不論良劣）敢於“揭發”，不需查證，便可用以作為判處死刑的“證據”。

這位當事者說，“那時，上頭一層層開放殺地主的綠燈，各鄉、各村的土改隊長、組長，便都去做，生怕完不成殺人定額，犯右傾的都被處份。”

1951年5月始僅粵西自殺的地主達1165人；1953年“土改複查”時，僅2月3日到3月6日一個月，自殺者又增805人，從中可見陶鑄、趙紫陽“土改”的恐怖。此外，陶、趙在廣東搞的“反地方主義”牽連全省各級地方幹部2萬余名，很多人被打成“反黨分子”，很多人家破人亡，蒙冤二十餘年，包括時任省委副書記的古大存和馮白駒。古大存托李富春帶一信問候毛澤東，同時也提到自己在“地方主義”問題上的“錯誤”，此信轉交陶鑄、趙紫陽；陶趙兩人竟然在省黨代會上當著七八千人面逼著古大存當場簽下“永不翻案保證書”。

曾在湖南溆浦縣八區（江口）擔任區長的郭靜秋在回憶錄中寫道：有一次，我在曹家溪村，領導一次反霸鬥爭大會。一個惡霸地主站在臺上被鬥，貧雇農一個個上臺訴苦鬥爭。一個苦大仇深的雇農，訴苦訴得大哭起來，走過去就將那地主的右耳朵咬下一半，“呸！”一聲吐在臺上，台下的群眾駭了一跳。他又準備去咬地主的左耳，我馬上制止他。對於所謂的“惡霸地主”，有的沒有經過批鬥就槍斃，有的在召開群眾批鬥會後立即拉出去槍斃。在土改中擔任過民兵的盧峰鎮橫岩村的李佑良回憶說：對於欺壓百姓的地主，就整他，關起來，有材料的就打掉（即槍斃）。都是民兵去抓，用繩子捆起來，只捆地主，那叫打威風，不然田土分不下去。十三保地主陳宗元，當過鄉長，抓到後三天就槍斃了。有一次在水東區，鬥完地主後，將地主牽到江坪（溆浦將江河的河床灘頭叫江坪）去，排一路跪著，一個個打掉。吹號了，就同時打掉。用槍對準地主後腦殼，一槍，腦殼開了花，腦殼不見了，只剩下肩膀、脖子垛垛。那一次，一下子就打掉了18條人。家裡有人屬的就將屍體抬回去埋了。沒有人屬的就死在江坪讓狗吃掉。

當時鬥爭時，有一個地主的孫子鬥爺爺的爭，說爺爺暈了他媽媽，也打掉了。思蒙和尚坪的地主雷繼熹，有幾百畝田、幾十杆槍，屬於武裝地主。將他抓到後，用鐵絲穿起他的鼻子，牽起火火起走。在思蒙批鬥後打掉了。他全家 20 多人全部打掉。雷繼熹小婆子生的兒子，七八歲，也打掉了。他一屋人有留根根，全家誅滅。

時隔 50 多年後，郭靜秋認為那時“殺人還是殺得太多了”。那時沒有法治，當時說是說（殺人）要縣委批准，其實不是那麼回事，每個幹部都可以批准，罪名是“罪大惡極”就行了。上面也不管你，只要你完成任務。我們區裡有個幹部叫羅良驥，我當區長也管他不到。他將一個 80 多歲的一般地主殺掉了，還將他全家男的都殺了，只有一個男的跑掉了。

《炎黃春秋》2006 年第 8 期發表《“土地改革法”的夭折》說：邵陽地區的土改本來遵照“《土改法》和《劉少奇報告》的精神順利進行，1950 年 12 月突然下達了根據毛澤東“親自提出來的‘反對和平土改’的指示”，才造成這一段殘暴野蠻“血淋淋的歷史”。接著，鬥爭會上打人成風，有的甚至被當場打死。為了多搞錢財，盡可能抬高階級成分，不是地主也要劃地主。強迫地主供出埋藏金銀財寶地點，否則非刑拷打，晝夜逼供，什麼稱半邊豬、吊磨盤、踩杠子、割耳朵等都用上了。普遍抄家之外，還有的掘地三尺，有的掃地出門。打死人和被逼投水、上吊的，時有所聞。有的老公死了，老婆隨後自殺，留下孤兒只好交給其親戚或願意收養者。1951 年 9 月全省第三次黨代會，邵陽縣委書記鐘石在地區代表團討論時講到：有一個村用鐵釘釘死兩個地主，還釘死了一個農民；有的叫地主女人當場脫了褲子鬥爭，不脫就打，打了還要脫；還有的強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後把他活埋了。隆回縣委書記方明說：隆回問題也很多很嚴重，把中農

劃富農，富農劃地主；關押吊打，非法鬥爭，不少富裕中農和富農都挨鬥；還出現了所謂“貧農惡霸”，“中農惡霸”。其他縣情況基本相似，不把人當人，死人不計其數。由此可見當時的混亂、殘暴和野蠻，簡直與流寇相差無幾。“和平土改”變成了暴力土改。農會派人去抓逃亡地主，一時農民紛紛到各城市集鎮去抓人，幾乎造成城市工作一個亂源。當時有些地主還有起義人員住在城市或兼營工商業，從此以後，集鎮的店鋪全部關門倒閉，農村經濟一片蕭條。當時只要能搞到錢財，哪管什麼破壞工商業和統戰政策。在一片紅色恐怖氣氛籠罩下，一般農民特別是中農和婦女很是害怕，不敢參加鬥爭，有的連開會都不敢來了。有的地主收藏有古瓷器皿字畫古籍等，其中不乏上品，都被抄出糟蹋，或當引火材料和卷喇叭筒煙紙燒掉，毀了多少文物，無法計算。亂抓亂打亂殺之風還影響到當時的鎮反，並出了大亂子：邵陽縣七區由於非刑拷打，“逼、供、信”，發生了抓捕中、小學教師百多人，打死多人，震驚全省的大錯案。……暴行也證明，人們在被煽動起來的冷酷殘忍的“階級鬥爭”中，可以異化為禽獸，人性、人道、良知、道德蕩然無存。

鄧子恢在《中南地區土改工作報告》中說：“……殺了占農村人口 10%的地主分子中的兩成。”中南地區土改沒有東北和華北激烈，因為東北和華北土改時正值共產黨在打天下，激烈的土改有激化階級矛盾，以便裹脅貧雇農出兵為共產黨火中取栗的現實軍事意義。而中南地區土改時，天下已經歸中共所有了。即便按中南地區的百分比框算，以中國當時人口 5 億計，80%的農村人口是 4 億。4 億人中 10%的地主分子是四千萬。4 千萬中被殺 20%，就是 8 百萬；據統計被殺地主的“不少於一千萬”。

官方宣傳土改得到農民支持，周立波的小說《暴風驟雨》及 Teiwes 的文獻

記載都說明，部分農民並不支援土改。土改運動比文化大革命殘酷多了，由於新聞封鎖，外界對這段血淋淋的歷史所知甚少。有人推算，每縣平均死五千人不是誇大，死人應在一千萬左右。

土改完全不必殺人，同樣可以採用臺灣政府的贖買方式，但土匪出身的中共只懂得“搶”。搶了人家的，又怕人家記恨，索性斬草除根。王若望指出：“中共特別強調地主還鄉團對共產黨懷有刻骨仇恨，試問：促成並加深這種刻骨仇恨的根子是誰呢？”

正象《中國農村曆滄桑》一書作者陳佩華教授寫到的那樣，“村民們樂意把地富當作鬥爭對象，他們很明白，只要運動的焦點集中在四類分子的罪惡上，像他們那樣的普通農民就可以躲在一邊，免受批鬥。幹部們樂意拿四類分子開刀，因為反動階級一向是中國革命的首要對象，如今他們要開展階級鬥爭，就等於再度表明了共黨幹部自身的合法性”。

暴力土改既違反國際人權法則，違反了 1950 年公佈的土地改革法，也違反了抗戰中共產黨作出的不再侵犯地主財產的憲政承諾。國家政權犯下反人類罪、謀殺罪。這類罪行的合法化，為日後歷次政治運動中國家犯下的反人類罪行開了先例。

土改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只能從國與國長期發展的表現看出來。土地改革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國人對財產權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政治權利的財產權基礎。對人們投資和經營私人財產和企業有根本性的影響。

對地富的政治迫害從 1949 年 1950 年開始，一直到 1979 年才結束，一共持續了 30 年（從 1925 年農民運動算起就更長了），比任何其它群體受迫害的時間都長。對地富的迫害從來就是超法律的，其間未經過起碼的法律程式，無罪受罰，

輕罪重罰，一罪多罰的情況極為普遍。在整個毛時代，地富都是不受法律保護的，連生命都沒有保障，文革初期普遍地發生了對地富及其子女的集體屠殺。地主富農是中共專制下最大的受害群體，估計總人數至少有兩千萬以上。1979年，中共宣佈給地富“摘帽”，此時距土改已有30年，絕大部份地富都已經死掉，沒有給家屬任何補償。據《北京週報》報導，被摘帽的地富多達400萬。

2·鎮壓反革命

在建國前後，一直沒有停止過對反革命和反革命活動的鎮壓。毛澤東說：“國民黨殘渣餘孽亡我之心不死，要推翻我革命政權！”毛澤東在剛“和平解放”北京以後並不急於進城，而是住在西山，等進城的部隊肅清北京城裡的“反革命”以後才安全進城。那時全國都展開了剿“匪”運動。愈來愈多的剿“匪”部隊成員撰寫回憶錄承認“那時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大批的降兵讓押運的部隊疲於奔命，上面乾脆下令：除了團、營一級的俘虜軍官留下審訊，其他俘虜由連一級指揮員自行處置……最常用的辦法就是乘夜晚分批押到河邊、山邊用刺刀捅死，用他們自己挖的坑埋掉，每天都要殺一兩批人”，用國軍俘虜練刺刀還不過癮，一些共軍中下級軍官還挖出俘虜的心肝切片炒熟了下酒。即便僥倖逃過鬼門關，在戰犯監獄與遣送回籍監督勞動的國軍被俘官兵無一避免歷屆運動的殘酷折磨，死得更慘。

1950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開七屆三中全會指出：凡是反革命“都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對一切土匪、特務、惡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都必須堅決肅清。

1950年10月8日中共正式決定出兵朝鮮，他兩天后就親自主持通過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又稱“雙十”指示），在全國範圍內部署大規模鎮壓

反革命的工作。

毛澤東對公安部長羅瑞卿解釋說，此前為什麼不能大量地鎮壓反革命？是因為時機不成熟，我們的財經問題還沒有解決，同資產階級的關係比較緊張。如果我們在那個時候大量鎮壓反革命，是不合適的。現在情況不同了，財經問題基本解決了，抗美援朝戰爭打起來了，因此，“你們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只有這一次，以後就不會有了。千載難逢。”劉少奇隨後的解釋更為形象說：“因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如果沒有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那麼厲害，那麼土改（和鎮反）的鑼鼓就不得了了。這裡打死一個地主，那裡也打了一個，到處鬧”。

鎮反運動剛開始，劉少奇批示對自新分子不應處死刑，毛澤東卻將其改為：“如果血債重大群眾要求處以死刑，並估計情況在處死之後比較不處死更為有利時，亦可處以死刑。”

1951年初抗美援朝極為順利，毛澤東遂決定大力鎮反。1月17日，毛讀到中南局轉來的湘西廿七軍的“鎮反”報告，發現湘西21個縣僅軍隊就處決了4600餘人，並準備在今年由地方再處決一批。區區一個湘西，人口密度也遠小於河南與華東地區，就處決了4600人，而且還有許多反革命要殺，而河南一個省處決了3000就不敢再殺了，華東幾個人口大省總共才不過處決了2911人。毛立刻就做出批示：湘西準備再處決反革命“是很必要的”。“如果我們優柔寡斷、姑息養奸，將遺禍人民、脫離群眾”。“現當反美土改兩個高潮的時機”，只要“善為處理”，就不會有問題。時機迫促，稍縱即逝，各地務必要抓緊照此辦理。

1951年1月21日，他在給上海市委的電報當中，明確告訴後者：“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內，恐怕需要處決一二千人，才能解決問題。”1月

22日，他電告華南分局廣東方面負責人稱：“你們已殺了三千七百多，這很好，再殺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殺八九千人為目標”。屆時看情況再定下一步的鎮壓計畫。1月29日，見公安部對中南局公安部逮捕19823人、在省級機關內亦逮捕160人，擔心如此內外不分會引起廣大幹部的恐慌的報告時，他明確告誡公安部稱：“湖北做得很對，不要去潑冷水。”

1951年2月5日，中共西北局報告，兩個月已捕500多人，並處決了500多人，雖然總體看“殺得不狠，處理緩慢”，但“執行鎮反計畫，一定求穩，批准殺人一律在省上”，毛對此卻批示道：“其判死刑者則經專署批准執行”即可。由於各地高層領導人責任大，任務重，顧慮相對較多，毛澤東這時甚至還親自批示要求各地縣委書記都直接與他通信，彙報各縣市鎮反運動的開展情況。用這種方法，來推動各地領導人解放思想，切實跟上他的要求。

根據毛的建議，2月10日，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處決人犯的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殺得不夠的地區，特別是大、中城市，應當繼續放手抓一批，殺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毛不認為千分之一是一個絕對不可逾越的處決人犯底線。對那些強調情況特殊，申請超出比例者，他都表示贊同。

毛隨即指示上海和南京方面的負責人說：“上海是一個600萬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萬餘人僅殺2百餘人的情況，我認為1951年內至少應當殺掉罪大的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及會門頭子3千人左右……南京方面，據2月3日柯慶施同志給饒漱石同志的電報，已殺72人，擬再殺150人，這個數目似太少。南京是一個50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應殺的反動分子似不止2百多人。”“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

那時候，因為廢除了以往的一切法律制度，且又未提出和頒佈任何新的刑法為“殺”“關”“管”的依據，各地掌握的判刑尺度頗不一致。“雙十”指示雖然明確提出了要以政務院頒佈的懲治反革命條例為依據，但直到中央決定了大致的處決人犯比例和毛開始向各地提出了具體的鎮壓數字之後，政務院才於1951年2月21日根據中共中央的要求，正式頒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條例》根據毛要“大殺”人犯的指示精神，為了使地方上能夠放開手腳，有意使對“反革命罪”的解釋變得相當寬泛。《條例》否定了“已遂”、“未遂”的概念，規定：只要有勾結帝國主義，策動、勾引、收買公職人員、武裝部隊或民兵叛變，持械聚眾叛亂，參加特務或間諜組織，以反革命為目的組織或利用封建會門，搶劫、破壞公私財產和公共設施，投毒殺人，偽造公文證件，煽動群眾對抗政府和挑撥團結，製造散佈謠言，以及偷越國境、劫獄越獄、窩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項行為，甚或意圖之一者，不論“已遂”、“未遂”，均可定為“反革命罪”。至於該殺不該殺，則主要取決於是否“首要分子”，或是否“情節嚴重”，二者占其一者，均可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量刑的標準無譜，連“傳播謠言”都能“斬立決”，對朝鮮戰爭和國內形勢發牢騷等都可以以反革命處死。

《懲治反革命條例》剛頒佈，毛即發出指示，全力督促各地抓緊實施鎮壓。依毛內定的原則：首先是“對全區性、全縣性的惡霸必須全部殺掉，全鄉性的惡霸必須一部或大部殺掉，不這樣不能解決問題，而且有些惡霸必須先殺掉，否則群眾不敢起來。”

一些地區就反映說：他們那裡很少有很大民憤的所謂惡霸分子，相反，“群眾對於直接對他們的利益有妨礙的小偷、流氓、二流子一類人的憤慨倒比較普遍。”而且，罪多少為“大”，惡多大為“極”，多少“民”有“憤”即可算“很大”，

實在難有確切的尺度來衡量。包括血債問題，一些地方找不到歷史上殺害共產黨或善良百姓的人和事，便把過去有過人命官司的，統統視同“血債”，結果包括“在解放前曾攻打偽軍、殺死偽軍數名”，“因與人通姦致使其妻氣憤投河自盡”之類，也都當作反革命血債看待了。鎮壓的反革命是國民政府縣長以下到甲長為止的公教人員，當時有些人僅僅是為了生活才參加了國民黨，他們僅僅是些普通的士兵而已，而絕大多數鄉紳富戶基本上都是有兩個小錢的好人。較典型如河南陝州，完全由縣鄉兩級幹部說了算，不到一個月就捕了五、六千人，半個月就處決了七、八百人。

2月17日，北京市在羅瑞卿的指揮下，一夜間逮捕反革命675人，次日即公開處決58人；槍斃時有數萬群眾圍觀且興高采烈。羅瑞卿指示，今後執行死刑前可召開群眾大會等，激發群眾對反革命的仇恨心理。3月7日夜北京市一舉逮捕了1050人，緊接著，北京市公安局專門在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擴大會議以及市區兩級人民代表擴大聯席會議，宣佈反革命分子罪行，提交與會代表討論懲治辦法。經過一系列宣傳工作之後，市公安局於25日當天分別在三處一次性就槍決了199人。以後每天都把一車一車的人拉出去槍斃。

天津市在3月間提出了一個具有相當氣魄的補充計畫，即準備在已經處決掉150人的基礎上，再處決1500人。毛澤東對此高度讚賞，馬上轉發各地，興奮地宣稱：“人民說，殺反革命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島、廣州、武漢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個幾個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實的鎮反計畫”，“都能大殺幾批反革命”。

按毛的建議，上海市委報告中央說：上海決心在已捕1068人、處死100餘人的基礎上，再捕10000人、殺3000、關4000、管3000。毛回電稱：“如果你

們能逮捕萬餘，殺掉三千，將對各城市的鎮反工作發生很大的推動作用。你們注意在逮捕之後迅速審訊，大約在半個月內就應殺掉第一批，然後每隔若干天判處一批。”他還特別要上海領導人注意看3月下旬北京、天津兩地的報紙，參考京津的鎮壓經驗。即先開上百人的代表會，再開上千人的各界會議，最後召開上萬人的公審和控訴大會，刺激起群眾的義憤，使之自覺地擁護“鎮反”。

在毛澤東的極力推動下，全國各大中城市從3月開始，實施了極具震懾性的大逮捕和處決的行動。太原市委報告說：他們3月13日開始實施大逮捕行動，緊接著“學習京津的經驗，於四月五日召開了市、區各界人民代表的擴大聯席會議，並於5~6兩日分批分區執行。公審大會採取了會場和會外相結合的方式，

“全市五千多架收音機全部開放，重要街道及群眾集中場所均安置了喇叭，據不完全統計，群眾在十萬人以上。很多商店居民把收音機擺在街頭，三百一群，五百一夥，聚精會神收聽大會上的報告和控訴。……大會喊口號，群眾也喊。山大醫學院六百五十人聽到農民控訴時哭不成聲，很多人也流下淚來”。

毛澤東於4月20日致電各中央局書記稱：雖然2月中央會議決定先規定殺人數以人口千分之零點五為準，但“現在西南已達千分之一，中南和華東的某些省區亦達到千分之一，個別地方且已超過。一般地看來，華東、中南、西南三大區似乎均須超過千分之一的比例才能解決問題。但是，超過太多似乎不妥。柳州專區要求殺千分之五，顯然是錯誤的。貴州省委要求殺千分之三，我也感覺多了。我有這樣一種想法，即可以超過千分之一，但不要超過得太多，不要規定一般以千分之二為標準。而（應）將許多犯人列入為無期徒刑，離開本縣，由國家分批集中，從事築路、修河、墾荒、造屋等生產事業。例如西南區準備再殺的六萬人，殺掉三萬左右以平民憤，而將其餘的三萬人左右各省區負責分批集中生產……貴

州省認為不殺千分之三就不符合准和狠的原則，我倒覺得按貴州人口一千萬已殺一萬三，省委要求再殺二萬二千至二萬五千，我們可以允許他們再殺一萬多一點，留下一萬多不殺，已超過千分之二的比例，已是按照貴州的特殊情況辦事，已經算得准和狠了。”

毛澤東於 4 月 22 日在公安部的報告上公開表揚北京一天處決 200 個反革命“殺得好”，說“這是正確執行毛主席關於人民政府要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的指示的第一次”，“證明害怕震動過大而束手束腳是不對的，是沒有根據的”。上海在 4 月 27 日大逮捕之前，所處決人犯不過 100 多人。而 4 月 27 日一舉就捕了 8359 人，僅 4 月 30 日一天就槍斃了 285 人，5 月 9 日再斃 28 人，6 月 15 日又斃了 284 人，以後即每隔數天槍斃一批，少則二三十名，多則一百四五十名，到 11 月初，半年時間就已處決到將近 2000 人之數了。

殺戒打開，慣性巨大。“至今年四月底止，華東共捕反革命罪犯 35.8 萬余人，共殺反革命罪犯 108400 余人，占人口的千分之零點七八。” 中南地區更是驚人，不到 5 月中旬，“殺人已近 20 萬，距人口千分之一點五隻差五萬左右”，遠超出處決人犯一般不超過人口千分之一的原則規定。未到 5 月份，兩廣地區就捕了 188679 人，處決了 57032 人，其中“廣東四月份即處決 10488 名”。據報，“廣西省委和省公安廳之檢討可殺可不殺的而被殺了的占總數的殺人數的 30% 左右，甚至龍州、雷平提出要殺的 40 人既無犯罪事實，連出身、簡歷及年齡都沒有。縣區個人都有殺人的，邕寧縣委組織部長個人就批殺 226 人，蒼梧一區先殺後報 14 人，又一個區殺而不報 24 人，宜山批准殺 52 人，貴縣一次夜間從後門拉出 8 人執行處決，有的地區亂棍打死，甚至割耳挖心，並都要求增大比例。欽廉專區二月份即押 1.3 萬人，內欽縣一縣即捕 8 千人，鐘山縣委不經討論批准各

區自行逮捕，結果全縣捕 1126 人，送到公安局之犯人有的連材料都沒有，僅寫一個壞字。

自 3 月以來大張旗鼓地鎮壓反革命的結果，是各地殺、關、管的數字都大大突破了原先的設想和計畫。由於多數地方按照原先掌握的情況，無法完成千分之零點五至千分之一的處決人犯比例，不得不勉強湊數，加上各地都沒有足夠的公檢法機構和人員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裡審理如此多的殺、關、管案件，結果是多數案件都未能經過嚴格審理。相當多的人犯只是基於歷史上有所謂“劣跡”，量刑的標準已遠遠超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中的規定，自然更不重視“現行”與否。不講證據、濫捕濫殺的現象相當普遍。

因挾嫌報復造成冤假錯案，乃至於草菅人命的現象，在農村地區尤其嚴重。湖南衡陽茶市以劉伯祿為首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因多數人出身地主，再加上南下工作組幹部靠“逼供信”懷疑當地有“反共救國軍”，因此相信以劉為首的當地黨組織和其所領導的青年團、農會和勵粹學友會等組織，即系“反共救國軍”及其週邊，進而將劉定為“匪特頭子”、“惡霸地主”。結果 200 餘人受到株連，許多人被吊打逼供，8 人被槍斃，5 人被判刑，4 人被開除公職，1 人下落不明。1953 年春，湖南在查出的 763 件各種反革命案件中，僅顛倒黑白的就有 82 件之多，占到需要改正案件的 10.7%。其中湘潭縣人民法院認定的一名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罪行一是解放前充當“圈子會”的“大爺”；二是曾勒索他人光洋 1200 元；三是解放後組織地富 300 餘人進行反革命暴亂，毆打幹部，企圖推翻農會和篡奪鄉政權。經查，所定罪行全無證據，純屬誣陷。原因只是因為鄉村農民和集鎮居民競選農會負責人時，曾組織農民遊行助威，被人懷恨在心，以致乘機栽贓報復。

勉強湊數、濫捕濫殺的一個極其嚴重的後果，就是把大批與舊政權有關的人員打成了反革命。福建長汀鄭冠岑，世代書香門第出身，受過高等教育，一生從事教育，毫無民憤或血債，只因抗戰期間做過三年國民黨縣黨部書記，就被作為歷史反革命逮捕，並硬是張冠李戴地將他人的罪過也扣到他的頭上。而且既無口述交待材料，亦無檢舉揭發材料，甚至全無審問筆錄，更談不上證人證言，只憑縣公安局長一紙罪狀，即被輕易槍殺。

在剛剛結束的國共戰爭當中，中共就是利用對國民黨投誠人員“不咎既往”的優待政策，瓦解了國民黨幾百萬大軍的戰鬥力。在鎮反運動中，所有這些曾對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具有極大感染力的政策檔，在各級幹部眼裡都成了一紙空文。如傅作義等人的絕大多數部下均被鎮壓。湖南茶陵 20 余名國民黨中將和少將，除去港臺者外，參加起義或投誠的 9 人，鎮反運動中多被定為反革命分子，其中 4 人被槍斃，3 人被判刑（2 人死於勞改期間）。

貴州省國民黨統治末期的 81 個縣的縣長，無論是起義、投誠，還是被捕釋放，雖多半已得到處理，甚至已安排工作，這時卻因地方要湊夠處決人犯數位，而全部被當作反革命分子給殺掉了。滿清搞“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順之者生，逆之者亡。而中共只要認定你為階級敵人，順之亦亡，其殘暴程度遠勝於滿清。

朱自清的兒子朱邁先（1918～1951）在 1936 年就已經秘密加入中共。1939 年，董必武安排朱邁先直接進入廣西的 11 集團軍從事政治工作，擔任該軍 131 師一個團的上尉指導員。1942 年，131 師調守南寧，曾參加過桂柳會戰。次年，朱邁先被派往 19 師工作，在師長蔣雄手下任中校政工隊長。1949 年 6 月，蔣雄從部隊轉到桂林任專員後，又舉薦朱邁先任自己的秘書。同年 12 月，桂林解放

前夕，由於朱邁先等人的積極工作，蔣雄手下的 70000 余名軍政人員起義。其後，朱邁先進入廣西軍政大學學習。1950 年學習結業後，朱邁先被安排到桂林松坡中學任教，該校的董事長就是蔣雄。在 1950 年 12 月的“肅反”運動中，蔣雄和朱邁先被捕，一同被押到了湖南新寧縣。1951 年 11 月，湖南新寧縣法院以莫須有的“匪特”罪，判處朱邁先死刑，並立即執行。死時，朱邁先年僅 33 歲，身後留下了年輕的妻子和 3 個幼小的孩子，其幼子因饑餓而死。“文化大革命”中，其妻傅麗卿被扣上“特嫌分子”、“反革命家屬”的帽子，被造反派剃了頭髮，還多次遭到毒打、抄家、遊行示眾，身上留下了不少傷痛。1984 年才澄清事實真相，給予平反。

另一位是三十年代被譽為京派小說代表人物沈從文的三弟，抗日將軍，抗戰後在家賦閑。50 年代在湖南遭槍斃，臨死時席地而坐，冷笑數聲道：“想不到你們這麼搞！”

抗日將領，曾歷任軍參謀長、代軍長、集團軍參謀長及代司令之職的田西園，內戰後期加入民主同盟，受命“策應解放作戰”，其組織的地下武裝並直接接受了解放軍第十二兵團蕭勁光的指揮。其後還成功策動武漢員警總隊起義，保障了武漢市的通訊交通、水電供應，免遭破壞。他卻在鎮反運動中被當成歷史反革命殺害。

甚至像在全國範圍內十分著名的抗日將領李杜，在 1951 年的鎮反運動中，也曾因信奉一貫道，而被定為反動會道門首領密謀叛亂而被捕。只是因為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出於統戰工作的需要，調閱了國民黨軍團長以上、文官縣長以上被捕者名單，偶然發現了李杜的名字，馬上指示放人，李杜才逃過一死。

李杜原本既在統戰名單之列，而他的命運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大批官階在團

營以下的普通國民黨軍官兵的命運將會如何。因起義、投誠而參加解放軍者，其中被開除軍籍和判刑、勞改、管制的就有 2.2 萬人。接近“解放”時，一個青年曾短時間參加了國民黨的某個組織，這個組織就像現在的什麼自願者之類的，他沒從事具體的反共活動。解放後，這個青年被判處了徒刑，在他入獄時，他已有一個愛人和一個三歲的女兒；共黨將這個男青年送進監獄後，還把他愛人家裡的一切衣服及財產都沒收了(只留下兩個碗)，由於沒有吃的，她三歲的小女兒很快就被活活地餓死了；由於沒有穿的衣物，這個女青年也很快就被凍死了……

那時，重慶三峽壩區某縣官壩區開過多次公審會（槍斃人的會）。有一次槍斃 12 個人，同時拉了一些人來陪殺場，他一聲令下“把他們拉下去槍斃了！”行刑的民兵們便像拖豬一樣把那些死刑犯拖下去，接著就是一陣槍聲。槍響之後清點屍體卻發現多了一個，原來把陪殺的也槍斃了一個。這在當時不算什麼，補一個手續就行了。該縣黃金鄉金銀村有一個姓方的青年人，忽然就被列入了槍斃名單。方某被押赴汝溪執行槍決的路有幾十裡遠（那時沒有公路），要經過一道山溪。那天卻忽然發了山洪，波濤洶湧，無法渡過，解押方某的民兵只好遠遠的繞道而行，這一繞就救了方某的命。汝溪那邊久等不至，怕誤了大事，就迫不及待的開槍行刑了，等方某一行趕到早散了場。第二天上面有人來通知說，方某可以不殺了，已經引頸待斃的方某於是從鬼門關檢回了一條小命，他實在是太感謝那道救命的山溪了。

最匪夷所思的是槍斃張國錦。那一天，西山公園廣場又黑壓壓地坐滿了人，又一次公審大會即將舉行。15 個死囚被押了上來，等待最後時刻的到來。當宣佈張國錦的罪名為“一貫道”（當時定性為反動會道門）成員時，張國錦一口否認。張國錦用嘲諷的口氣冷冷地說：“我根本不知道什麼一貫道，更沒有參加過

一貫道。今天在場有這麼多群眾認識我，精忠中學的全體師生都坐在前排，只要有一個人看見我參加過一貫道或者看見我搞過一貫道活動，請站出來講話。”將近一萬人參加的公審大會頓時一片寂靜，鴉雀無聲。過了一會兒，一些人開始議論，怎麼沒有一點證據就定死罪呢。審判臺上的縣長陳傑、秘書范梓裡等人似乎有點慌了，此時此刻去哪裡找證據呢？議論之聲越來越多，嗡嗡響成一片。審判台被迫臨時舉行緊急會議研究對策，最後由范梓裡宣佈，號召在場群眾揭發張國錦一貫道之外的新罪行。

在范梓裡的示意下，一個叫譚祥雲的教師爬上主席臺前的一張大方桌揭發張國錦。它說，張國錦肯定是一個反革命分子，解放前我曾親眼看見它在十字街貼壁報，內容全部是反動的，當時我就想質問它，但怎麼敢呢，因為他有“這話兒（這東西），”譚一邊說一邊將右手插進褲袋向前一比，表示手槍。第二個爬上桌子的是天塹鄉（今屬東溪鎮）人鄧覺。鄧覺說，有一次我和張國錦在上南門官茅廁（公廁）解手，靠得很近，我發現他拿著一張解放前的報紙在看，已經解放了還在看解放前的報紙，不是反革命是什麼？

這兩個毫無道理的所謂反革命證據立即為審判臺上的人解了圍，張國錦的反革命罪就這樣定下了。范梓裡馬上宣佈，現在有兩個辦法，一個是立即處決張國錦，一個是帶回去重審後再處決，徵求大家意見，看怎麼辦？范梓裡走到台前大聲說：“現在只要有一個人（除張的直系親屬外）舉手同意把張國錦帶回去重審，就帶回去。給大家三分鐘的時間”說著范梓裡很嚴肅地高舉起左手亮出手錶，開始讀秒報時：1秒、2秒、3秒……還有兩分鐘，1秒、2秒、3秒……還有一分鐘……”這時全場死一般的沉寂，人們都好象屏住了呼吸一樣，誰也不敢吭一聲。當三分鐘快到時，張國錦昂起頭以宏亮的聲音說：“在這種情況下誰敢舉手

呢？”時間到了，沒有一個人舉手。範梓裡又說：“同意立即處決的人請在三分鐘內舉手，說著又舉起左手讀秒報時。譚祥雲和鄧覺首先舉起手來，一會兒全場都陸陸續續地舉起手來了。張國錦怒吼：“在這種情況下誰敢不舉手呢！”

席台立即以舉手表決為依據宣佈張國錦死刑立即執行，張國錦等 15 人遂被押往東側草坪行刑。張國錦慢步徐行，不斷高呼“實事求是萬歲！毛主席萬歲！”直到槍響倒下。

那時，沿海地區的居民不斷偷渡逃難到香港和境外。而留在內地，能夠活下來的起義投誠人員或者家屬，改革開放紛紛要求平反。僅湖南一省，經認定身份列入複查的 17145 人中，就有 13530 人得以撤銷判決，恢復名譽，約占複查數的 79%。而列入複查的被打成反革命的中共地下武裝人員 3011 人，2291 人得以撤判糾正。在全國範圍，總共有 15 萬起義投誠人員被摘去歷史反革命的帽子，得到平反。由此，不難看出當時情況之一斑。

1951 年 11 月至 1952 年 8 月，各地又展開過新一輪的“鎮反”運動，僅華東地區就又捕了 71128 名，處決了 10727 名。並且該地區還進一步部署了第三階段“鎮反”工作，要求再捕 55000 人，處決 12279 人。以華東第一階段“鎮反”處決 139435 人即已達到人口總數的千分之零點九四的比例來看，可知三個階段下來，其被處決人數大大突破千分之一。

據新華社記者 1953 年初報導：“貴州省農村中群眾管制壞分子的面寬、量大，已造成某些地區嚴重的混亂現象。被管制分子大部分都未經過有關公安部門審查、批准，許多都是由群眾或工作組幹部說管就管。地主、反革命家屬，一般都是全家大小一律管，部分地區將小偷、遊民、妓女也大都全家全部管了起來。紫雲縣四區德興鄉二村共有 310 戶，居民 1627 人，管制了 23 戶（均全家管）150

人，占全鄉總人口的千分之九十二強，超過中央規定（千分之三）的 30 倍。貴定縣都祿鄉管制面竟占該鄉總人口的 1/2。獨山縣基長鄉全鄉人口 8361 人，共管制 456 人，去年 12 月經西南公安部及省公安廳檢查結果，僅 11 人符合管制條件，不該管而管的 454 人。紫雲縣一區松山鎮五村，農協主席梁秀清貪污銀元一元半，自己說出後，即被管制起來。該縣四區德興鄉一被開除的團員，因一次在館子裡跟地主同桌吃飯（各自付錢）被管制。紫雲縣二區四村農民班長元兩夫妻打架，被工作組宣佈管制一年。獨山基長鄉平定村羅登雲年已七十八歲，不能行動，亦無反革命活動，僅因其 1926 年曾當過一年偽區長而被當做主要管制對象。”

據一位在新疆勞改部門工作的中共幹部稱，四川省被判處七年以上並送至新疆勞改的反革命犯就有 70 萬人，其中絕大多數是貧下中農。到 1979 年 8 月上旬止，僅湖南全省已摘掉四類份子，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和壞份子帽子的，就有 329853 人。

整個“鎮反”運動究竟“殺”、“關”、“管”了多少人？毛澤東後來有過一個說法，叫殺了 70 萬，關了 120 萬，管了 120 萬。以官方的被處決 71.2 萬這個數字來計算，它已經達到當時全國 5 億人口的千分之一點二四的水準了。如果注意到 1951 年 4 月下旬毛澤東委婉批評一些地方多殺，以至有些地方明顯地出現了瞞報的情況，故實際上全國範圍實際的處決人數很可能要大大超過 71.2 萬的這個數字。同樣的情況，比較上述貴州農村的管制情況，亦可知其所謂管制數小於判刑數的統計，也未必十分準確。

法國外交官傑奎斯·圭拉麥將軍估計，從 1951 年 2 月至 1952 年 5 月間，至少有 300 萬人被中共殺害。據 1969 年 4 月 7 日莫斯科電臺廣播，1949 年至 1952

年有 280 萬人被毛澤東處死；1953 年至 1957 年有 350 萬人被殺。

據中共官方統計，中共建國初期國民黨殘留下來的潰散武裝曾被統稱為“政治土匪”的約為 2 百萬人，另有特務份子 60 萬人，反動黨團骨幹 60 萬人，共 3 百萬人。這些人大多數已在以後的運動中被關、被管或被殺。中共內務部長薄一波在鎮反報告中提及：“為了永久的和平，為了人民民主，在過去三年半（1949-1952），我們清算了 2 百多萬土匪（按：指反共遊擊戰士）。1999 年 9 月，解放軍出版社推出《新中國剿匪紀實叢書》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共軍在華東、中南、西南、華北、東北、西北地方分別殲“匪”共計 258 萬 4 千人。實則遇害的國民黨縣長以下至地方甲長的公教人員最少在 500 萬人以上。

大官可以作為“統戰標本”，省主席、廳長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殺，反而給予一個“政協委員”或甚麼代表的名義，以誘惑在海外的國民黨大官來歸。1965 年 6 月李宗仁抵上海時，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偕上海市領導人到機場迎接。李回國不到一年，陪伴他 42 年的夫人郭德潔於 1966 年 3 月逝世。在周總理的指示下，有關部門先後物色了 60 多位年輕美貌的女青年照片資料，當一個叫胡友松的照片擺在他的面前時，被李一眼看中。胡友松是一代影后蝴蝶的女兒，1959 年從醫專畢業後就一直在北京復興醫院當護士。周恩來找李宗仁談話，建議他們正式結婚，李宗仁只是擔心比他小 48 歲的胡友松不同意，為此有關領導專門找胡做思想工作。胡同意了，二人于當年 7 月結婚。1969 年 1 月 29 日，李宗仁因病逝世。沒有了李宗仁的胡友松很快被趕出李府，被說成是港臺特務，受到了審查，後來又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幹校勞動，之後又把她調入了國家第一歷史檔案館工作。1969 年和 1982 年，胡友松兩次將國家發放的生活費 13.7 萬元和李宗仁先生的私款 83662.39 元全部上繳國庫，並把李宗仁的大量遺物、160 幀照片捐贈給中

國歷史檔案館、廣西李宗仁官邸和山東台兒莊史料館。

3·三反五反

“三反”運動主要是針對腐敗。建國後，大批中共黨員進入城市花花世界，不擇手段弄錢，竟然染上毒癮。最著名的是天津市委書記張子善和市長劉青山，兩人不但吃喝嫖賭玩女人，而且都成了鴉片煙鬼。毛親自下令將兩人槍決。由此，毛下令展開“三反”運動。1951年12月1日中共發佈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史稱“三反”運動。確實有一部份中共黨員被判了罪。

中共認為其幹部變壞都是資本家引誘的結果，於是在1952年5月26日，中共提出了針對資本家的“五反運動”，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經濟情報”。二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開，很快掀起改造資產階級的高潮，其中以上海為第一目標。其原則還是順者昌、逆者亡。工商業者如果上交資產並表示擁護共產黨，則定為人民內部矛盾；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則劃為反革命成為國家專政對象。

在工商改造中，資本家、業主、商販統統上交了他們的資產。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輕生的。當時上海馬路上無人敢走，擔心突然自空中飛下一人，將自己壓死。時任上海任市長的陳毅就曾每天詢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當天又有多少資本家跳樓自殺。

一位研究“三反”和“五反”運動的學者曾描述道：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惡噩頻傳，僅上海一處，自殺、中風與發神經者，即不下萬人。自殺方式以跳樓、躍江、觸電、吊頸者為最多，毒烈藥品尤其是安眠藥片，早已禁止發售，故欲求安臥而死，亦不可得。法國公園與兆豐花園樓叢中，經常懸死三五人不等，馬路之上，常見有人自高樓跳下，跳黃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掃而空，中共為節約木料，

以“反浪費”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開火葬場，而亦時常客滿。……其它天津、北京、武漢、重慶、瀋陽、廣州各處商阜，以及凡有工商業之全國大小市鎮，無不有同樣事。四月間有人自廣州逃出，謂趕早車于晨五時經西關多寶路，見馬路上橫屍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輪車，乃不禁向車夫歎息而道：車夫遂四面瞻顧，見左右無人，乃低聲淒然道：“兩個算什麼！我經過惠愛路時，怕不躺著有十幾個？”

周鯨文《風暴十年：中國紅色政權的真面貌》一書估計，鎮反時期有 50 多萬人自殺，三反五反運動又有 20 萬人自殺。

據 1996 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資料，在“三反五反”中，有 32 萬 3100 餘人被逮捕，280 餘人自殺或失蹤。

“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毛澤東從史書中只看見階級鬥爭。他一味迷信“反攻倒算”和鎮壓，不承認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有利的“讓步政策”。他把鎮壓“階級敵人”看得比甚麼都重要。

1960 年，被毛打倒的彭德懷元帥蝸居京郊，一位警衛戰士的家屬前去探親，曾對彭訴苦：“下邊的幹部比過去的地主、保長還凶，動不動就打人罵人。這日子怎麼過啊！”

1962 年鄧小平說：“有的農民講：過去我們養一個保長，現在是好多保長。……這部份人是大量的，據說是 1600 萬，有的估計是 2500 萬。”中共執了政，地主階級消滅了，可農民階級沒有勝利，階級鬥爭只是殺了一批保長，並將“一個保長”換成“好多保長”而已。

第 99 節 思想改造運動

1·剝奪知識份子的獨立性

馬克思主張暴力革命，革命就要權威，而權威最討厭懷疑、思想自由的知識份子！所以，馬克思主義是知識份子的災星。柯慶施以男人評婢女的口吻說，知識份子有兩個字可以概括：一是懶，不肯作自我檢查，總是翹尾巴。二是賤，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為了不起。高崗更是粗野的咒罵知識份子，說他們就象雄性的生殖器“說硬就硬起來了。”而毛澤東一再教訓知識份子，要放下臭架子，要服從文盲上司的領導。並警告說，知識份子是否有前途，決定於服從命令的程度。毛澤東曾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古訓，諷刺自以為是的知識份子。話外之音是，知識份子，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大意是：共產黨供給知識份子飯碗，你必需依附在中共政權的皮上面才能夠生存，我不給你飯吃，你就得餓死；所以，你得老實點。對知識份子獨立性的否定，必然匯出知識份子依附性的結論。既承認知識份子是個社會階層，又判定其是一個只能依附於一定階級而沒有獨立性的階層。知識份子從一開始就或者屬於敵人（依附於封建地主階級），或者屬於異己（依附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即使不屬於被消滅物件，也僅僅只是屬於團結、教育、改造、利用的物件。1978年3月18日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說，即使“工人階級自己培養的腦力勞動者”，也仍然存在著“依附在哪一張‘皮’上的問題”，存在著“注意解決是否堅持工人階級立場的問題”。只要堅持一黨專政，知識份子就始終是專政者的心腹之患；知識份子必須忘我，必須失去自己的獨立意識，成為沒有主見的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被當局重視的知識份子實際上是奴才，絕不是主人。

毛在七大向黨內發出指示：“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鬥爭物件就是民主人士

了”。千家駒指出：毛既嚮往又自視超越“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所以對知識份子既蔑視又敵視。秦始皇曾“焚書坑儒”；唐太宗喜稱“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毛則笑謂“你們都上了我的賊船”。全是帝王心態，知識份子的生死全在他喜怒之間。

1947年10月27日周恩來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反對組織和平統一大同盟陰謀的指示》說：“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毛澤東在審閱這份檔時加上了一段話說：“在蔣介石打倒以後，因為自由資產階級特別是其右翼的政治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打擊他們，使他們從群眾中孤立起來。”“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

1949年8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發表了題為“美國與中國關係”的白皮書，無可奈何地承認中共在大陸上的軍事勝利，但仍然表示相信：“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於會再顯身手，中國終於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於中國目前和將來一切朝著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為都應得到我們的鼓勵。”艾奇遜所講的“外國羈絆”是指馬列主義和蘇聯的勢力。

毛為此一連寫了《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等五篇文章，警告中國的知識份子與美國帝國主義劃清界限。他心懷叵測地說：“帝國主義為了侵略的必要”，“給中國人造成了數百萬區別于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份子”。這就是把當時中國數百萬民主的新型的知識份子都列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第五縱隊了。毛在評白皮書的文章中還直稱他們為“思想糊塗的知識份子”。他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中已把所謂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劃為美國人“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所矚望和經常企圖爭取的”人，美國帝國主義有計劃

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分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因此，艾奇遜所說的“有見識的和批評性的輿論”，共產黨確是“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寬容的”。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對於內外反動派實行專政或獨裁的政府，不給任何內外反動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動的權利。反動派生氣了，罵一句“極權政府”。其實，就人民政府關於鎮壓反動派的權力來說，千真萬確地是這樣的。“這個權力，現在寫在我們的綱領上，將來還要寫在我們的憲法上。對於勝利了的人民，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樣地不可以須臾離開的東西。這是一個很好的東西，是一個護身的法寶，是一個傳家的法寶，直到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階級被徹底地乾淨地消滅之日，這個法寶是萬萬不可以棄置不用的。越是反動派罵‘極權政府’，就越顯得是一個寶貝。”從而已把自由知識份子打入了懷疑和整肅的範圍之中。毛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實際上就是“自由主義”。

1950年初，毛說：中國的知識份子不外乎兩類；一類是讀書越多越糊塗；一類是知識越多越反動。第一類是地主階級的知識份子，他們談的是孔孟之道、資治通鑒之類的書，所以讀得越多越糊塗。第二類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接受了個人民主思想，越多就越反動。毛還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這說的是封建帝國閉關自守時代的事。現在不同了，海禁大開，有了艾奇遜所說的“外國羈絆”。孫中山這位大秀才就一舉推翻了滿清王朝。我們共產黨也不是秀才造反嗎？有馬列主義和蘇聯的“外國羈絆”，不也推翻了有“美國羈絆”的國民黨反動派？所以，對我國土地上的知識份子，我們可要感謝艾奇遜給我們的教誡啊，必須記得，秀才們雖然上了我們的賊船，但是同船不同心啊！必須慎加留意，小心為上。

所以，1949後的中國，以文盲為榮，以有知識為恥。1950年華北150萬黨

員中，130 萬是文盲或半文盲；在區委以上幹部中近 50%沒有文化或文化很低。共產黨和知識份子的關係，一向是改造與被改造的關係。前者神氣而霸氣地公然以改造者自居；後者動輒得咎，如胡風說的，咳嗽一聲都有人錄音，所以總是臨深履薄，像惡婆前的小媳婦，退不完的褲子割不完的尾巴，挨不完的打屁股。為了扼殺民主自由、鎮壓知識份子，進行了一場又一場鬥爭。改造思想的實質就是消滅良心，消滅自尊，消滅獨立思考。要人人無人格，人人說假話。

1930 年年輕的沈從文（1902~1988）就公開發表《論郭沫若》一文，對這位比他年長 10 歲的成名人物作了無所顧忌的評價，一再指出郭沫若的“創作是失敗了”，寫小說不是他的長處，而且“空話”太多，直言郭的小說“並不比目下許多年青人小說更完全更好。”“讓我們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詩人上，煽動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說方面他應該放棄了他那地位，因為那不是他發展天才的處所。”

1948 年 3 月中共領導下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員會發動一場批判和“再評價”運動。在該組織創辦的文學理論刊物《大眾文藝叢刊》第一期上，發表了郭沫若充滿火藥味的檄文《斥反動文藝》，把朱光潛界定為“藍色”作家，蕭乾界定為“黑色”作家，沈從文則是“桃紅色”作家，文章宣稱：“我們今天打擊的主要對象是藍色的、黑色的、桃紅色的作家，這一批作家一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著”，必須“毫不留情地舉行大反攻”；“特別是沈從文，他一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他高唱著‘與抗戰無關’論；在抗戰後期作家們加強團結、爭取民主的時候，他又喊出‘反對作家從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也正是鳳凰毀滅自己，從火中再生的時候，他又裝起一個悲天憫人的面孔，諡為‘民族自殺的悲劇’，把我們的愛國青年學生斥之為‘比醉人酒徒

還難招架的衝撞大群中小猴兒心性的十萬道童”。周有光回憶說：“49 前中國知識份子大多傾向共產黨，而沈從文感到恐慌。……現在想來，郭沫若批沈從文是不公平的，這是一種政治性貶低。郭為了政治意圖一邊倒，揣摩上面的意圖，他當時批評許多人都是錯誤的。”

叢刊還發表了邵荃麟、胡繩、喬木（喬冠華）等激烈抨擊胡風的文藝理論和路翎的小說的清算文章。與此同時，中共領導下的香港另外幾家進步刊物也一起配合對國統區有較大影響的作家創作進行了有計劃的批評，被批評的作家有姚雪垠、駱賓基、錢鐘書、臧克家、李廣田等，範圍相當廣。這一運動可以被視為在國統區肅清自由民主主義者影響的前兆。

1949 年元月，沈從文呻吟：“我應當休息了，神經已發展到一個我能適應的最高點上。我不毀也會瘋去”。1949 年 3 月，他兩度自殺。先是長子沈龍朱看到他將手伸到電線插頭上，慌亂中沈龍朱拔掉電源將父親蹬開；再是將自己反鎖在房內，用刀片割開手腕動脈及頸上血管，並喝了些煤油。及至有人破窗而入，已是鮮血四濺。獲救後，沈從文一度“住在一個精神病院療養”。當他由“瘋”恢復“正常”，作為一名作家，沈從文便“死”了。

40 多年後，張兆和依稀記得：“1949 年 2 月、3 月，沈從文不開心，鬧情緒，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發表的那篇《斥反動文藝》，北大學生重新抄在大字報上。當時他壓力很大，受刺激，心裡緊張，覺得沒有大希望。……”

1949 年 4 月 6 日沈從文在病床上寫下一篇很長的日記，他感歎：“可惜這麼一個新的國家，新的時代，我竟無從參預。多少比我壞過十分的人，還可從種種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卻出於環境上性格上的客觀的限制，終必犧牲於時代過程中。二十年寫文章得罪人多矣。”他“得罪”的人中自然也包括即將登上文藝界

權力頂峰的郭沫若。

1953年，在絕望之中，他割喉、切腕企圖自殺，獲救後辭去北大教授的職務，離開了這塊是非之地。他從此脫離塵世，躲進故宮，以研究古代服飾以避風雨。1953年，開明書店通知他，由於“內容過時”，他的書盡數銷毀；而1954年，從香港傳來消息，他“所有作品，在臺灣均禁止”，因為他留在大陸“匪區”。他的作品的紙型都被出版社銷毀了，存書全化成了紙漿，談論現代中國文學的書籍、論文全都如避瘟疫似地躲開這個名字。

凡舊作中與新社會不合拍的，都得刪掉。為表示與新政權一致，與新社會合拍，寧可“剝卻心頭肉”。連前中共總書記瞿秋白早年寫的訪俄遊記《餓鄉紀程》裡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華僑吸鴉片、販毒等內容，也屬“給中國人臉上抹黑”，1953年出版《瞿秋白文集》時悉數被刪。一般“從舊社會過來的”老作家要出版舊作，就更得仔細斟酌、刪節了。葉聖陶忍痛將他的主要作品《倪煥之》刪去了好幾章。曹禺被迫改寫《雷雨》、《日出》的劇本，將身為勞動人民的“好人”從陰曹地府拉回人間，使他們的結局由死變為生，添個革命的尾巴。

在官方意識形態的嚴密控制下，根本不可能有學術研究所必需的自由探索和實事求是精神，只見曲阿附世之文，而上乘的精神產品則完全絕跡，致使半個世紀的文學史一片空白。

中國大陸唯一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兩位作家，老舍和沈從文，其主要成就均在“解放”前，諷刺的是，提名老舍之際，老舍已自殺身亡；提名沈從文時，沈已高齡病逝，享壽86歲的沈從文的全部作品，均創作於解放前，解放後再也沒有在文學上創作過一個字。

2·批判《武訓傳》

1950年毛先批電影《清宮密史》，1951年又發動批判電影《武訓傳》。

《武訓傳》描寫清末貧苦農民武訓行乞興學的故事。電影《武訓傳》的主題是宣揚文化教育對於社會改造的巨大推動作用，最令最高決策者側目的則是興學的武訓和參加了農民起義的周大下面的幾段對話：“喂，武七，跟咱們一塊走吧！……”周大告訴武訓。“這種世道不是人活得下去的！咱們就只有殺！殺盡那些狗官惡霸！”

“殺？……”武訓所聽過的父老傳說和故事，從李闖王和他手下的農民逼得崇禎皇帝上吊煤山，到八十年前一度佔領過堂邑、壽張、陽穀等縣城的山東貧民首領王倫都是一敗塗地。洪秀全五年前建都南京，忘記了窮人。聽說這兩年敗的敗、擒的擒，兩湖和江西全入了曾國藩湘軍手裡，眼看大勢已去……殺，又能有多大的用處？

“殺得完嗎？殺幾個惡霸就行了？……”武訓遲疑地說：“周大爺，我還是打算討飯積錢修義學……。”武訓與周大最後一次見面時，武訓又說：“單憑殺就行嗎？……那麼多的人怎麼殺得完呢？……”周大的頭不由得低了下來。他皺著眉恨恨地說：“可惜咱們就是少一個好的頭領給咱們好好地帶路。洪秀全在南京登了寶座就忘記了咱們窮人！……”

影片於1951年初放映後，報刊上發表不少讚揚的文章。

毛澤東看了《武訓傳》後勃然大怒，下令：“是改良主義的，要批判。”1951年5月20日，毛澤東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發表了批判文章“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把評價歷史人物的學術爭論變成了一場政治批判運動，因為承認或者容忍對武訓的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誣蔑農民革命鬥爭，誣蔑中國歷史，誣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是向“反動思想投降”。該社論批評

43 篇讚揚武訓和“武訓傳”的文章及 48 名作者。隨後他又派江青等人到武訓的家鄉“調查”，寫成長篇“武訓歷史調查記”，經毛澤東修改後在 7 月 23 日至 28 日的《人民日報》上連續刊載。該“調查記”斷言，武訓是“勞動人民的叛徒”，指責《武訓傳》是“反動宣傳”。

1951 年 6 月，胡繩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學習》雜誌上發表《為什麼歌頌武訓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表現》，文章特別強調《武訓傳》中一段對話：參加了農民起義的周大對興學的武訓說，“好，武七！你來文的，我來武的，咱們一文一武，讓那些狗官惡霸知道，咱們老百姓不是好欺負的！”文章指出：這‘一文一武’的看法，得到不少評論者的附和。發表於《光明日報》上的長之的文章說：武訓興學之革命的意義，是和太平軍那樣的革命意義，有某種相同處；都為了勞苦大眾翻身，不過一重在革命武裝，一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只有二者合起來，再加上正確的領導，革命才可以成功，像中國今天這樣子。就是說，‘中國今天這樣子’就是武訓加太平軍加‘正確的領導’。”胡繩直接提示讀者：《武訓傳》作者及其歌頌者，不過是借《武訓傳》表達他們的政治訴求，即把自己擺在和“武裝起義的群眾”並駕齊驅的位置上。在胡繩看來，“文”當然無“功”可言，沒有資格與“武”並駕齊驅。

同期《學習》雜誌發表的署名鄭昌的文章《從討論裡應該學到什麼？》。文章斥責《武訓傳》“把一個投降了反動統治的奴顏婢膝的小丑武訓，描寫成為革命者。把那種根本不聯繫政治鬥爭，根本不損害封建統治任何一點東西的所謂‘行乞興學’，與領導武裝鬥爭的周大的行動等同起來，稱之為‘一文一武’。”文章進一步指出《武訓傳》的問題不僅僅是一文一武並列，而且通過這‘一文’的口辱罵農民戰爭為只會殺人，那‘一武’居然被罵得‘頭不由得低了下去’；

描寫那‘一武’的行為毫無結果，這‘一文’卻幹成了據說是‘為人民服務’的事業。把農民戰爭的內容與作用歸結成為僅僅一個字：‘殺’（用周大的口說：‘咱們就只有殺！’）他把幾個領導過農民戰爭的領袖李自成、王倫與洪秀全，誣衊成為‘殺人魔王’，而其結果是‘敗的敗，擒的擒’，‘殺，又有多大的用處’。相反的，一個得到靠屠殺‘撚黨’起家的山東巡撫張曜的支持的武訓，被描寫成為代表農民階級利益的人。”

《武訓傳》批判時一直深諳天機的楊耳說：“最觸目的是電影對於武訓時期農民革命鬥爭的否定和污蔑，同時也就是對於中國歷史的污蔑。電影裡用武訓和周大兩個中心人物來代表當時中國的兩條道路：改良和革命。可是，周大所代表的農民起義的革命路線，在電影中是慘敗，是不能解決問題的無益的鬥爭……。電影《武訓傳》兩次借用武訓的嘴，咒罵並質問革命農民道：‘殺得完嗎？殺幾個惡霸就行了？…’又說：‘周大爺，單憑殺就行嗎？…那麼多的人怎麼殺得完呢？’實際上，中國的農民革命，除了張獻忠等少數錯誤的領導者在失敗之際殺人稍多之外，只有反動統治者才不遺餘力地污蔑革命農民愛殺人。《武訓傳》的這兩次質問，和惡毒的污蔑咒詛又什麼區別呢？”

不再寫詩而只寫批判文章的何其芳說：電影《武訓傳》上捏造了一個太平軍的戰士周大，說武訓和他是‘一文一武’，肯定他們都是農民的反抗，批判他們都不能獲取決定性的勝利，並且把周大和他所領導的農民隊伍歪曲地寫為只是燒殺。農民暴動和農民戰爭正是封建社會裡面農民最革命的表現。像武訓那樣剛好走著相反的道路，怎樣能夠和太平軍的戰士相提並論呢？把這樣兩種根本不同的人相提並論，對於太平軍的革命戰士是一種莫大的侮辱，而對於武訓卻是一種粉飾到極點的抬高。何況電影裡面把武訓寫得更令人同情，而周大卻成了只知道燒

殺的‘響馬’。根據歷史材料，太平軍的紀律是很好的，並不亂燒亂殺。而且像電影裡面所描寫的張舉人那樣的惡霸地主，那完全是應該殺的，周大殺了他又有什麼可以非難的呢？這實在是對於中國農民暴動和農民戰爭橫加污蔑”（《學習》第4卷第五期）。

周揚認為“《武訓傳》對農民革命給與了極大的污蔑，把周大和他所領導的隊伍歪曲地描寫為只是燒殺”。他指出：這種對農民革命的歪曲，是與現實的政治鬥爭密切相關的。

無論是楊耳文章，還是何其芳周揚的文章，實質上都是奉命之作。這些奉命之作莫不抓住《武訓傳》“文”“武”分野的幾個小鏡頭做大文章，反映了最高決策者的意圖。在最高決策者眼裡，《武訓傳》根本就不是什麼藝術作品，而是地地道道的“影射史學”、“影射文學”，用深諳天機的楊耳的原話講，是“武訓借屍還魂向革命的新中國挑戰”！換句話說，是當年國統區自由知識份子向執政黨挑戰。《武訓傳》中“文”“武”兩種勢力、兩條道路，代表了現實中“文”

“武”兩種勢力、兩條道路。在毛看來，國統區自由知識份子則是武訓的繼承者。對武訓的褒揚，也就等於是國統區自由知識份子的自吹自擂；對太平軍和洪秀全的種種批評，諸如“殺人魔王”的批評，洪秀全登了寶座就忘記窮人的批評，莫不構成對毛本人“惡毒的污蔑咒詛”。在毛澤東看來，思想層次上的資產階級，遠比經濟層次上的資產階級可怕。“武訓借屍還魂向革命的新中國挑戰”，毛自然要予以迎頭痛擊。

“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批判因此鳴鑼開場。

1916年，陶行知從英國留學回國後，單純提倡改革教學方法的問題。五四運動後，陶提倡平民教育，後熱衷於鄉村教育……。後來由於有共產黨在曉莊鬧

革命，曉莊學校（即試驗鄉村師範學校）在 1930 年被國民黨封閉。曉莊的被封，雖然促成了陶先生與國民黨反動派的對立，但陶先生依然繼續從事他那種超政治的教育活動。

陶行知看到國人只珍惜“自己人”的生命，沒有生命權利普適性的概念；只有自私的愛，沒有博愛的概念。中國人的人性觀是一種功利的人性觀，它不是著眼於生命本身，而是著眼於生命的外在價值，即社會性。生命的社會性壓倒一切，生命本身無足輕重。陶行知痛心疾首地說：“中國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貴於財富，人命貴於機器，人命貴於安樂，人命貴於名譽，人命貴於權位，人命貴於一切。只有等到那時，中國才站得起來！”

陶行知特別推崇博愛，“愛滿天下”是他的座右銘，贈之友朋以互勉互勵，終身恪守不渝。早年他斷言：“共和之大本”在博愛，若無博愛，“則希望共和，猶之水中撈月耳。” 1943 年他說：“人生最大的目的還是博愛，一切學術也都是要更有效的達到這個目的。……以後我們仍當向這個方向努力。”他關注最多的是“中華民族中最多數而最不幸之農人”。

1946 年 7 月，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周恩來聞訊立即趕到陶宅慰問，並取消了下午與司徒雷登的約會，向延安詳細報告陶行知去世的情況。毛澤東、朱德立即發出唁電，盛讚“先生為人民教育家，為民族解放與社會改革事業奮鬥不息”。此後一段時間，又精心組織了海內外一系列旨在向國民黨要民主的悼陶活動。但 49 年後“民主魂”已無價值。1951 年批《武訓傳》時，因陶行知雖已去世多年，他生前推崇過武訓，輿論界翻臉不認 5 年前毛澤東對陶的頌揚，大量的文章把陶拉來作為武訓的陪鬥。《人民教育》給陶定下四條罪狀，判定所謂“人民教育家”、“萬世師表”不過是徒有其名，其博愛精神被宣判了死刑。批判者

中少不了郭沫若。像郭沫若、陶行知之類的知名人士，其價值只在兩派政治力量較量之時才能實現。可以設想，如果陶行知晚死，後來的處境只有兩種：一種是像郭沫若一樣批武訓、寫檢討；一種是像梁漱溟那樣被逐出社會政治生活，總之“民主魂”是不能再跳動了。

錢俊瑞在批陶文章提出一個致命問題：“為什麼陶先生不放眼看看在當時的抗日民主根據地裡面，因為人民已經取得了政權，人民教育事業就那樣蓬蓬勃勃地開展呢？為什麼陶先生不集中力量搞革命，卻偏偏要花這樣多的精力在國民黨地區辦些顯然無法開展的‘育才學校’之類的教育事業，甚至最後會找到武訓這樣一塊朽木來做自己的招牌呢？”

“陶行知企圖繞開階級鬥爭，繞開暴力革命，僅僅用教育、科學、文化來改造社會，建立自由平等世界。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認為建立自由平等世界，必須經過階級鬥爭，採取革命手段才成。”這就說得很明白了：只有中共領導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人民革命事業，才是救國救民的光明大道，凡是與此沒有直接聯繫的教育、科學、文化事業，都屬於“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範疇、都是歧途。

錢俊瑞在《改良派為反動派撐腰》文章中說：一切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派的教育思想的共同和基本的特點，就是所謂“超階級”“超政治”的教育觀，就是教育與政治分離的看法。他們認為階級是不存在的，或者雖然存在也是不重要的。他們只願意清高和自在地辦他們的“普及教育”、“科學教育”、“平民教育”、“職業教育”、“鄉村教育”等等；且願意憑著這個教育之“萬能”來救我們的國家。結果怎樣呢？和他們的宣言相反，一切改良派的這種“超政治”“超階級”的觀點和作法，在客觀的社會實踐上，只是為反動統治的糞堆

插上了花朵，迷糊了勞動人民的認識，從而欺騙和麻醉了勞動人民，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們的戰鬥意志，也就是這樣，幫助了中外反動派在中國的統治。這也就是一切這些改良主義思想所被打上的明確的階級烙印(1951年8月27日《人民日報》)。

錢俊瑞在這裡是就教育而言，但其他“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事業”如：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等等，何能例外。在批判者看來，當年國統區自由知識份子似乎有三種人生路向：一是歸附于中共領導的“人民革命事業”；一是走中間道路，實踐“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一是充作帝國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的鷹犬。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要麼革命，要麼反革命，中間道路本來就沒有的。換句話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不需要文化創造、文化積累，不需要經濟建設，只需要中共領導的以奪取政權為目標的武裝鬥爭，只有這種事業才是正當的。而國統區自由知識份子的絕大多數走“中間道路”，絕大多數在客觀上“為反動派撐腰”、“為反動統治的糞堆插花朵”。所以，就總體而言，國統區自由知識份子是一個有罪的階層，其基本歷史應予否定。實際上也就是如馮友蘭所說，只要不投奔解放區而留在國統區，就是“助長蔣政權的兇焰”，對於革命的進展有壞的影響，就比武訓的錯誤更大。

具有與武訓類似經歷的平民教育家晏陽初及其子弟的遭遇就更慘了。晏氏1918年自美國耶魯大學畢業，旋赴法國為歐戰華工創辦識字班。1920年歸國後，提出“除文盲，作新民”的口號，並成立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率領有理想的人士深入農村，本著“與平民打成一片”的精神，數十年如一日地為勞苦大眾服務。1928年他赴母校耶魯大學接受名譽博士學位時，在美奔走呼號10個月，募得50萬美元，全部用於中國的鄉村教育和建設事業。1940年，在抗戰大後方，

他又創辦了中國鄉村建設學院。在無比艱苦的條件下，他仿效武訓，沿門托鉢，募集辦學經費。他以辦學的實績贏得人們的關注、解囊，不必像武訓那樣以作賤自己來換取人們的拖舍，這是他的高明之處，但教育救國的精神卻是與武訓相通的。在 1943 年紐約紀念哥白尼地動說四百周年的大會上，晏氏與愛因斯坦等人並列，被國際學術界評為“世界上為社會貢獻最大、影響最廣的十大名人”之一。1950 年，晏氏在美國受聘為國際平民教育委員會主席，但他留在國內的事業卻被當成了異端：他手創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被宣佈為“反動組織”；他在抗戰期間歷盡千辛萬苦支撐下來的“中國鄉村建設學院”被定為“反動學校”，學院的院長魏永清則被定為“反革命份子”（30 年後方被宣告無罪），學校師生受到株連，成了批判對象。這位偉大的愛國者在眼看著自己在祖國的事業被摧毀、有家歸不得的百般無奈之下，於 1960 年代到菲律賓創辦了國際鄉村建設學院，為亞、非、拉幾十個國家培訓了大批鄉村建設人才。

陶、晏都不是階級鬥爭學說的信徒，他們在中國近代百年屈辱、百年積弱的歷史進程中選擇了教育救國這一藥方。共產黨執政後如果對異己的思想加以容忍，任他們及其弟子繼續其平民教育事業，則他們向幾億農民灌輸的，必然只是文化知識而不是階級仇恨。如果陶行知的曉莊師範和晏陽初的鄉村建設學院的畢業生散佈到全國農村，無疑會妨礙中共基層組織執行其階級鬥爭政策，所以，中共不能容忍那兩支隊伍存在的理由也就不解自明瞭。

馮友蘭在自我檢討《關於〈武訓傳〉筆談》中說：“如果各大學的教授及各工廠的工程師，都算是人才的話，在解放以前，他們確是大部分集中在蔣管區底幾個大都會裡。這件事實，就助長了蔣政權的兇焰，就對於革命的進展，有壞的影響，就這一方面說，這些學術或教育工作者底錯誤比武訓又更大了。”可見，國

統區自由知識份子非但無寸功可言，反而有過乃至有罪，決沒有資格與“武”並駕齊驅。

按照毛澤東的命令，黨員、團員、宣傳部門、文藝界、教育界、史學界、報刊編輯、記者全都捲入了這場批判運動。被上述社論點名的 48 人以及該影片的編導和主要演員都被迫按照毛的觀點檢討並接受批判，全國各地報刊發表的批判和檢討文章達數百篇。從此不但該影片遭禁演，各地為紀念武訓而辦的“武訓學校”也一律更改校名，相關的紀念石碑、塑像、畫像、紀念亭統統被拆除。對《武訓傳》的批判及其後的文藝整風運動，使電影創作處於停滯狀態，當年除《南征北戰》外幾乎沒有一部影片投入生產。

毛澤東為何借《武訓傳》大做文章、搞政治運動呢？1957 年 1 月他“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回答了這個問題：“電影《武訓傳》你們看了沒有？那裡頭有一支筆，幾丈長，象徵‘文化人’，那一掃可厲害啦。他們現在要出來，大概是要掃我們了。是不是想復辟？”顯然，在毛的心目中，“文化人”就是復辟勢力，應被列為專政的物件。

1990 年，九十高齡的夏衍老人針對《武訓傳》問題對中國文化教育界以至整個知識界產生深遠的負面作用，發了長長的、深深的感慨：我記得很清楚，1951 年我訪問民主德國，當時的總統皮克單獨接見我的時候，他就說：德國有最優秀的思想家、藝術家，但現在由於他們不瞭解共產黨，所以許多作家、演員還在西歐和美國，他真誠地希望他們能早日回到他們的祖國。我五十年代兩次去捷克斯洛伐克，情況大概和德國相似，捷克斯洛伐克人熱愛自己的民族，有自豪感，但在集會或單獨會見的時候，很少談到政治，幾乎沒有人敢談到當時的執政黨。在東歐，各國都有黨領導的文化部門，但許多作家和藝術家都不關心政治。在羅馬

尼亞，有一位曾在中國讀過大學的文藝評論家公開對我說，作家的任務就是寫作，不寫作而去當官，他就失去了自己的聲譽和地位。這一切都和中國很不相同。十月革命之後，俄國的大作家如蒲寧、小托爾斯泰，以及不少的演員都跑到西歐和美國，連高爾基也在國外呆了十年。而中國呢，1949年新中國成立，不僅沒有文藝工作者外流，連當時正在美國講學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剛解放的祖國。當然，還不只限於文藝界，科學家也是如此。被美國人扣住了的大科學家錢學森，不是經過艱難的鬥爭，而回到了祖國麼？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觸過許多國內外有聲譽的專家、學者，如吳有訓、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錢鍾書、茅以升、馮德培，以及梅蘭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僅拒絕了國民黨的拉攏，不去臺灣，堅守崗位，而且真心實意地擁護共產黨的領導。他在文章結束處說：“寫到這裡，不免有一點兒感慨，中國知識份子這樣真心擁護和支援中國共產黨，而四十多年來，中國知識份子的遭遇又如何呢？眾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整風，以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當其衝的恰恰是知識份子。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順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說這是民族的悲劇吧。”

1985年9月6日《人民日報》第一版上，新華社向全國發了通稿。電影《武訓傳》在“被片面、極端和粗暴”地批判三十四年之後，終於得到平反昭雪。話雖然說得平和委婉，但是意思十分明白：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搞錯了，是一場大冤案！

3· 思想改造運動

中共建國的幾個月後，其教育部便提出了在高等院校實行“院系調整”，採用蘇式教育度的計畫。由於大多數教授受過歐美教育，他們的抵制使計畫未能實

行。中共看到“高等學校教師中還濃厚地保存著歐美反動資產階級的思想……對於蘇聯的先進科學和技術則投以不值一顧的輕視的眼光，認為是“危險到極點”（教育部副部長錢俊瑞的言論）；遂於 1951 年發動了一場以全國知識份子為物件的“思想改造運動”。

“思想改造運動”的正式名稱是“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開始於 1951 年 9 月。在這次運動之後，中國的知識份子幾乎完全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思想和獨立人格，變成了新政權的附庸。著名社會學家潘光旦教授在“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他用“4 個 S”來總結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後十幾年：SURRENDER，SUBMIT，SURVIVE，SUCCUMB（投降、屈服、活命、死亡）。“投降”階段就發生在“思想改造運動”（王友琴：中國知識份子的四個 S）。

根據科學教育出版社 1983 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 1949—1982》，“思想改造運動”是由馬寅初在北大教員中發起的。1951 年 8 月，周恩來總理在一個全國性專業會議上報告說：知識份子“要為新中國服務，為人民服務，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馬寅初校長大受啟發，當即就在北大搞起了一場“有計劃有系統的學習運動”。9 月初，馬給周恩來寫信：“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湯用彤副校長、張景鉞教務長、楊晦副教務長、張龍翔秘書長等 12 位教授，響應周總理改造思想的號召，發起北大教員政治學習運動。……他們決定敦請毛主席、劉副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董必武、陳雲主任、彭真市長、錢俊瑞副部長、陸定一副主任和胡喬木先生為教師。囑代函請先生轉達以上十位教師。”這封信在 9 月 9 日轉呈毛澤東。9 月 11 日，毛澤東在這封信上批示道：“這種學習很好，可請幾個同志去講演。我不能去。”9 月 29 日，周恩來在北京大學向京津地區高校 1700 多名教師做了題為《關於知識份子的改造問題》的

報告。“思想改造運動”至此正式開始。

馬寅初在一篇文章中宣稱：“北京大學不是沒有缺點的，自由散漫就是我們的缺點。這和我們的教職員工居所分散也有關係，但這種自由散漫的作風卻有更重要的思想根源，必須加以克服。其中最明顯的是職員思想水準和主人翁的自覺都不高，因此在暑假中發動職員學習了四十余天，成效甚好，開學後工作效率提高不少”（《人民日報》1951年10月23日）。

1951年10月23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份子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

接著，《人民日報》以通欄標題發表了“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開展思想改造運動”長文。11月30日，中共中央又發出內部檔“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學校的教職員和高中以上的學生中開展“思想改造工作”，並以此為基礎，在這些人當中組織“忠誠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清除學校中的“反動遺跡”，使全國學校完全被黨掌控。12月23-24日，毛還兩次指示中共各中央局，要求在各地學校開展大規模的“思想改造工作”。

很快，“思想改造”運動從大專院校延及到文藝、科技、宗教、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以及各級政府部門中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按毛澤東的說法，叫做“脫褲子，割尾巴”，而當時的知識份子面嫩耳軟，聽不慣這麼形象的語言，於是選擇了一個比較文雅的名稱，叫做“洗澡”。這個運動大致分成五個階段，分別是：學習、坦白、審查、改造、總結。

“思想改造工作”的第一步就是政治學習，學馬恩列斯毛的著作、學共產黨

的檔。這些“民主人士”都是讀書破萬卷的學者，而在這裡一篇簡短的檔卻要反復學習、反復討論、反復體會，不厭其煩，以磨掉你的棱角。這就像古代伊斯蘭初創時期的“一手持可蘭經，一手持寶劍”。從著名學者到普通教師，都參加到了逐日逐句的嚴肅而認真地閱讀、領會有關政策文件和“經典著作”的帶有強制性被動性色彩的學習之中，通過學習，這些舊式的非體制知識份子開始被灌輸一整套對他們來說幾乎是全新的思想觀念和思維用語。

第二階段是清理原有話語的階段，這些知識份子根據所學檔和著作去發掘自己頭腦中的各種非無產階級的“骯髒思想”，包括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名利思想等等，其中特別是“親美”“崇美”思想。主要是寫自傳，一遍、兩遍、三遍、五遍的寫。

時值朝鮮戰爭，政府要求肅清“親美、恐美、崇美”思想，樹立“仇視、蔑視、鄙視美帝國主義”思想。曾經在歐美留過學和在國民黨統治下工作過的知識份子都成為整肅重點。

張東蓀是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的一面旗幟：日偽時期坐過日寇的監獄，堅貞不屈；1945年11月參加重慶政治協商會議，並在會議上提出“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兩個原則；1946年當選為民盟秘書長；1948年底作為傅作義的代表與中共代表秘密談判，促使實現了北平和平解放。抗戰勝利後作為民盟負責人，為和平民主不懈奮鬥。建國初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

新中國在外交和意識形態方面一邊倒，張東蓀認為“中國今後要工業化，必須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美國而不是蘇聯。”在當時，是否擁護一邊倒是考驗政治忠誠的一個主要指標。張公然對一邊倒持保留立場，不可避免地要遭致疑忌。1951

年被指控向美國出賣國家重要情報，被免去政府職務，並被民盟開除。1952年4月21日毛澤東關於北京市高校情況的一個批示就點了張東蓀的名，說：“看來除了像張東蓀那樣個別的人及嚴重的敵特分子外，像周炳琳那樣的人還是幫助他們過關為宜，時間可以放寬些。”張東蓀已與敵特分子並提，不在“可以過關”之列了。梁漱溟曾當面向毛澤東為張求情，毛的回答是：“此事彭真來向我詳細報告了。彭真要捉他來，我說不必，這種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從此我再不要見他，他再不能和我們一起開會了。”張東蓀被指為“一貫反共”、“為帝國主義服務”，在燕京大學和校長陸志韋一起受到猛烈批判，批判後銷聲匿跡。五十年代中期他的一個學生偶然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遇見他，只見他身穿陳舊的布衣，面容憔悴，十分蒼老，低著頭混在人群中，像是怕熟人認出的樣子。愛國志士、學術泰斗竟潦倒至此。

張東蓀於1968年1月被捕，關押于秦城監獄。當張東蓀被關入秦城時，他的大兒子、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張宗炳也被捕。在秦城被迫害致瘋，後監外就醫。張宗炳的妻子劉拙如在其單位中被批判鬥爭，並被扭送到海澱公安局，被監禁了近一年。二兒子張宗燧1968年在單位中被關起來“審查”，1969年張宗燧在北京中關村中國科學院宿舍31樓服安眠藥自殺，時年50多歲。1966年張東蓀的三兒子張宗穎和其妻子呂乃朴遭鬥爭後，一起服毒自殺。張宗穎死時46歲。除張東蓀自己被關死在監獄中，張家的三個兒子，兩個自殺，一個被長期關押後精神失常。他的兩個孫子被判重刑，長期監禁。

第三階段是意識形態上的自我批判階段，知識份子將他們所學習、所清理的東西寫成書面的自我批判文字並在不同規模的場合宣讀或發表，以求完成“洗澡”。

周恩來就曾多次指示：運動要“以北京大學為重點”。在北京大學，思想改造運動的重點物件有兩個人，一個是著名美學家朱光潛教授，另一個是法學家周炳琳教授。1952年3月7日，朱光潛教授在西語系師生大會上檢討，但與會者一致不滿，先後有5位師生在會上對他進行揭發批判。3月29日，北大文學院召開全體師生大會，繼續批判朱光潛。4月9日，在北大全校大會上，朱光潛作了第三次檢討。會上，馬寅初校長總結說：“朱先生的檢討有進步，但需要繼續反省，加緊改造，根本改變反動立場站到人民的一邊來”。

與朱光潛一樣，周炳琳教授在北大也是檢討難以通過，因此他向馬寅初校長表示拒絕再作檢討，“願承擔一切後果”。但馬寅初先是帶人到他家裡找他談話，然後又召開20多人參加的會議“幫助”周炳琳，直到周炳琳表示願意“清算自己的反動思想”。馬寅初還親自主持北大高層領導人會議，討論如何解決周炳琳的問題。北大的做法得到了毛澤東的首肯。1952年4月21日，毛澤東給彭真寫信：“北京大學最近對周炳琳的做法很好，望推廣至各校，這是有關爭取許多反動的或中間派的教授們的必要的做法”。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羅常培在共黨接管北京大學時曾表示：“我過去是專門研究學問的，現在和將來還希望如此。過去我不願意受國民黨的訓，現在我希望共產黨也不要強迫我學習。”他的希望落了空，共黨就是要改造他。他終於被迫在報上發表自己的檢討，題為《認識我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他承認“教授治校，學術自由”是“反動透頂”（1952年8月13日《光明日報》）。民國初年赴美留學歸國的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金岳霖是個唯物主義者。他歸國三十多年，同唯心鬥爭了三十年，到此時仍不免要檢討過關。因為他的學生殷福生去了臺灣，他便檢討自己培養了“一個反動份子”。由於清華使用美國退

還的“庚子賠款”的經費，同美國文化界聯繫較多，他便在政治上檢討自己“成為美國文化侵略的工具”，“喪失民族立場”；在學術上則檢討自己搞的哲學“根本是反科學的”，要肅清自己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1952年4月17日《光明日報》）。

北大化學教授傅鷹在1957年回憶說：“前幾年，大學裡的箕豆相煎的局面，今天回想起來也還是讓人難過。有些人是無中生有的罵自己，有些人是深文周納的罵別人。老教授上臺檢查思想，稍有辯說，底下拍桌子辱罵之聲紛紛而來，誰受得了這樣的‘幫助’？許多人在一些運動中自尊心被糟蹋，精神上到現在還舒不過氣來”（《文匯報》1957年5月19日）。

清華大學的馮友蘭已作了幾次檢查，群眾反映很好，但領導認為他“問題嚴重、不老實交待”。金嶽霖跑去勸他說：“芝生，你問題嚴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檢查，才能得到群眾的諒解”。馮接著說：“是、是、是，我問題嚴重，問題嚴重……”。這時兩個白髮蒼蒼老人的頭緊緊地依偎在一起，眼淚和鼻涕齊下。當初國民黨請馮有蘭搭機南下赴臺灣，他曾以極大的勇氣拒絕，並以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身份臨時擔任清華校務會議主席，迎接共產黨。現在受到如此侮辱，只因對方是中共，他竟忍氣吞聲，不敢辯一個字；經過多次“高壓定型”，不僅完成了脫胎換骨的改造，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還成了一名光榮的“無產階級文化戰士”，他甚至以他的才學建議說：“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書坑儒，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實行全面的地主階級專政，鞏固了地主階級的政權。這個歷史經驗很可以作為無產階級的借鑒，這也是古今對照，古為今用。”也就是說，“焚書坑儒”好得很，今天還要搞。

雲南大學的教授劉文典就是拒不檢討的一個。他是一個狂放不羈的學者。二

十年代末，他在安徽大學校長任內，曾同蔣介石當面頂撞，說：“我和孫中山先生革命的時候，並沒有聽見過你的名字。我根本沒有聽過蔣介石三個字”。以至一度被蔣拘留軟禁，在蔡元培等人的呼籲下方獲釋放。他一貫目中無人，自稱是三千年來唯一真正懂得莊子的人，自然不會因為來了共產黨就肯“改造”自己。劉氏對於學校當局將他當作批判靶子毫不在乎。批判他的大會上，他公然宣佈：

“我是一個國民黨同盟會的會員，是孫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如果說政治思想錯誤，那就是孫中山的錯誤。至於我的學術思想方面，正如你們所熟知的，完全淵源於莊子。倘若你們覺得莊子的思想有問題，你們可以不選讀或是取消這一門功課。你們要清算我的思想，不如請你們先去清算孫中山和莊子。這才是正本清源。如果孫中山和莊子都是反動和應該被打倒的，則我的存在與否，也不值一談了！”

這個年愈花甲的學者，軟硬不吃，拒絕接受改造，終於落得個無課可教的下場。

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所有從所謂“舊社會”過來的知識份子，都得坦白交代自己的歷史，盡力挖掘自己內心的所謂“反動思想”，不顧事實地醜化自己。

官方還鼓勵一些知名知識份子充當“領頭羊”，在報上率先發表文章咒罵自己。但知識份子們的檢討往往不為各單位黨委組織的群眾性學習會所接受。有些黨團員和積極分子象鬥地主一樣對他們“揭露”批判，知識份子稍有辯解便遭到辱罵，他們為了“過關”，不得不顛倒是非地加倍醜化自己。比如著名橋樑專家茅以升在 20 世紀 30 年代因主持建造杭州錢塘江大橋聞名於世，此時卻被迫檢討說：“我于 1920 年初返國，自此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對於反動統治下的所謂建設，但求能參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權勢”。他甚至給自己戴上“剝削者”的帽子，說“這種剝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現在錢塘江橋工程上，那都是勞動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在美國參

加過軍事科學研究，此時被迫檢討說：從事這一研究“是我一生歷史上最可恥的一頁”，“我要控訴我自己，控訴我這個喪失人民立場，甘心為美國劊子手作幫兇的所謂科學工作者……”。

交待歷史要像竹筒倒豆子，一點不留；交待思想要深挖狠批，把民主人士過去所追求的民主自由，批成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把人情，親情，友情批成反動的人性論，把個人奮鬥，個人尊嚴批成反動的個人主義。如挖得不深，批得不透，就開會“幫助”。人生如瓶，只有把瓶子倒空，才能裝進毛澤東思想。這就是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經過所謂“脫胎換骨”的“改造”，大多數知識份子表示“與舊社會割斷聯繫”，效忠共產黨，其人格遭到嚴重侮辱。知識份子應有的個人尊嚴、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全被冠上“反動”標籤。

1952年3月到5月間，也就是“思想改造運動”的收尾階段，北京大學有7個人自殺身亡，相當於北大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數的十分之一。

5月6日，北大校長馬寅初稱“思想改造運動”已基本完成。此後兩周，北京大學再次停課，進行“忠誠老實運動”。在一周左右的時間內，據稱有三千多人交代了問題，約占參加運動人數的90%，其中41人有“重大問題”。

馬寅初的北大是一個時刻觀察政治風向的北大，一個趨炎附勢的北大，一個既不保護自己的教授、也不保護自己的學生的北大。在他的任內，北大成了政治鬥爭的風向標、角鬥場。馬寅初在解放前就與周恩來私交甚深，曾說，“只要為了國家利益，我是一定要跟共產黨走的。”而他為自己的孫子、孫女分別起名為思潤、思澤、思東，更可見他本人的傾向。馬把自己的政治傾向攙雜到一所大學的建設之中，可以說是他作為大學校長失敗的關鍵。

1952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高等學校中進行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運

動和準備進行清理中層工作的指示》，明確規定，“根據北京和上海兩地的經驗”，可以讓 60~70%的教師迅速“過關”；12~25%的教師“要經過適當批評以後再行過關；13%左右的教師，是要經過反復的批評檢討以後始予過關，只有 2%左右是不能過關，需要作適當處理。”

僅在思想上改造知識份子當然不夠，組織上的控制更為重要。譬如東北工學院便利用這場運動將全校所有的系主任（均為老教授）撤掉，換上了清一色的共產黨員。

從 1951 年 9 月 30 日至 1952 年 10 月 26 日，《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等主要報刊發表了大量著名知識份子寫的有關思想改造的文章。從內容上看，這些文章主要是自我批評性的，而且大多出自非體制知識份子之手。體制知識份子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所發表的，主要是代表權威闡釋運動的意義和必要性，例如胡喬木、周揚、艾思奇、郭沫若、範文瀾等，都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以及諸如《學習》雜誌之類的報刊上發表了署名文章，論述思想改造的重要性；民主黨派領袖則帶頭呼籲知識份子響應中共號召投入到思想改造運動中去，這可以從黃炎培、章乃器、陳叔通、李濟深、鄧初民、譚平山、周建人等人的文章中看出來；真正作為改造物件在報刊上發表自我批判性文字的，是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非體制知識份子，包括馮友蘭、賀麟、梁漱溟、金岳霖、張東蓀、沈從文、錢端升、樓邦彥、鐘敬文、金克木、週一良、黃藥眠、羅常培、周培源、華羅庚、茅以升、梁思成、錢偉長、董渭川、李宗恩、葛庭燧，等等。經過著名知識份子在“思想改造”運動中的自誣與他誣，自由主義者的形象被搞臭了，完全喪失了政治上和道德上的號召力。

思想改造、洗腦交心、“憶苦思甜”、向黨靠攏、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改造人

生觀，以及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和每天每晚的政治學習，洗劫做人的中流砥柱——人的良知、博愛、寬容、正義感、人的真誠和尊嚴，……最後剩下是一個既無國家觀念亦無天賦人性只有黨性，完全聽黨指揮棒，無主見無大腦功能的動物。以奴性取代獨立性，對不堪教化的就將其思想連同肉體一齊消滅！這是數千年來多麼慘烈的一部思想文明滅絕史啊！真正的知識份子全面死亡了，從此“大地白茫茫一片，真乾淨，只剩下皇帝與流氓，任馳騁”。

在 50 年代的北越，當抗美戰爭還未到來時，越南知識份子和幹部也經歷了和中國類似的思想改造和大規模的下放。大量的知識份子和幹部因各種原因死於非命。

4· 批判胡適及其弟子

1949 年毛澤東將胡適、傅斯年、錢穆定性為“反動文人學者”的代表並把他們宣佈為戰犯加以通緝。胡適是 1948 年 12 月 15 日離開北平南下，1949 年 4 月 6 日從上海乘海輪去美國。胡適離開大陸後，1949 年 5 月 11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封出自胡適的老朋友時任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給胡適之的一封公開信》。胡適聲稱這篇文章定是有人捉刀，他在 1950 年 1 月 9 日發表《共產黨統治下沒有自由》作為回應，說陳垣他們現在“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北京解放後，胡適的兒子胡思杜到華北革命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政治部學習。他急切的想要融入新的社會，主動上交了胡適留下的一箱財物，並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表現十分積極。他寫了一份思想報告《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表示與胡適劃清界線，這一舉動得到了上層的讚賞，使他得以在畢業後能夠到唐山鐵道學院“馬列部”教歷史。1950 年 9 月 22 日，香港左派報紙《大公報》發表了胡思杜的《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這篇文章是胡思杜在華北

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學院畢業時的“思想總結”的第二部分。文章說：“從階級分析上，我明確了他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1951年11月胡思杜的文章在《中國青年》等刊物上轉載，以此為契機，大陸方面興起了第一輪胡適批判高潮。這場批胡適的運動從1951年11月至1952年1月底，是以“京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改造運動”的形式出現的。因為“三反運動”而擱置。這場運動只局限在京津高校，涉及的人員主要是些高級知識份子。許多舊社會過來的知識份子如湯用彤、金岳霖、馬大猷、朱光潛、梁思成等等，都寫了思想反省，表明立場。

胡思杜雖是河北唐山鐵道學院的講師，因為成分不好，一直沒交上女朋友，三十好幾的人單身度日，他一直努力工作，以為會得到新社會的容納，但卻一直是二等公民。他一直想入黨，1957年中央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認為貢獻的機會來了，就主動地給領導提了關於教學改革的建議，卻被打成了“右派”。他終於承受不了打擊，在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殺了。留下一封遺書給胡思孟，滿紙辛酸：“現在我沒有親人了，也只有你了。你來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個同事，他會告訴你我的一些情況。你是我最親的人了，現在我已經死了，你不要難過。你能吃苦，耐勞。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錢，公債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學的話，供給他們上大學。一個手錶也給你，留個紀念。希望你們努力工作，你的孩子們好好學習，為社會主義立點功。”

1954年春李希凡和藍翎寫出了一篇文章，發表在1954年9月1日出版的山東大學學報《文史哲》第9期上。文章說：“俞平伯先生未能從現實主義的原則去探討《紅樓夢》鮮明的反封建的傾向，而迷惑於作品的個別章節和作者對某些問題的態度，所以只能得出模稜兩可的結論。”“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論的觀點，

在接觸到《紅樓夢》的傳統性問題時尤為明顯。”

江青讀了發表在《文史哲》上的這篇文章大為讚賞，就推薦給毛澤東看。毛澤東看後就建議《人民日報》轉載。於是，江青找到人民日報社的總編輯鄧拓，要求轉載此文。豈料，文章排出小樣後，周揚提出了反對意見。事情便擱下了。

9月中旬，江青再次來到人民日報社，督促《人民日報》予以轉載。周揚說：“這是小人物的文章，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報紙版面也不多。”他提出由《文藝報》轉載。於是，《文藝報》第18期轉載了《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10月10日《光明日報》發表了李希凡、藍翎合寫的另一篇文章《評〈紅樓夢研究〉》。

10月16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它有關同志寫了一封信：“各同志：駁俞平伯的兩篇文章附上，請一閱。這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地開火。……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採取團結態度的，但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

這封信當時只是內部傳達學習，沒有公開發表。此信後來被正式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信的標題是：《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

10月18日，中央宣傳部和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召開會議，傳達貫徹這封信的精神。確定了對《紅樓夢》研究著作的批判的組織和活動方式，改為以個人研究為主，採取較靈活的組織形式和討論方法。凡批判的主要文章，都在《人民日報》發表。為了加強對這次運動的領導，成立一個委員會，由茅盾、周揚、鄧拓、潘梓年、胡繩、老舍、尹達等組成。

10月23-24日《人民日報》連續推出了鐘洛的《應該重視對〈紅樓夢〉研究

中的錯誤觀點的批判》，李希凡、藍翎的《走什麼樣的路》，提出這場討論“是過渡時期複雜的階級鬥爭在文學研究領域的反映”，正式拉開批判運動的大幕。

10月24日，中國作協召開了批判俞平伯的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周揚、馮雪峰、邵荃麟、俞平伯、馮至、王瑤、吳紉等20多位學者和評論家。周揚指出：“李、藍不是抽象地提出問題，而是抓著了一個具體的物件，執行了尖銳的批評任務。”

俞平伯的助手王佩璋，於會後第十天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我代俞平伯先生寫了哪幾篇文章？》，語氣已與會上的發言大不相同，從“由我個人負責”變成了明辨是非的批判者。據俞平伯講，“是胡喬木叫她那樣寫的”。11月28日，王佩璋又在《光明日報》發表了《談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研究〉工作中的錯誤態度》。1958年她下放到工廠鍛煉，說她“破壞生產”被批判，1960年被開除公職，“文革”中又成為批鬥對象，不久便自殺。

毛澤東授意《人民日報》文藝組負責人袁水拍寫一篇批評《文藝報》的短評，袁提出以“評論員”的名義發表，未被同意。這樣以袁水拍署名的《質問文藝報編者》，就在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毛澤東在審稿時加寫道：“《文藝報》對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揚的是不是資產階級的東西，一概加以點頭，並認為應毋置疑。對無名的人，青年，因為他們宣揚了馬克思主義，於是編者就要一概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將其價值儘量貶低。我們只能說，這在基本上是一種資產階級老爺式的態度。”

中國作協副主席兼黨組書記、《文藝報》主編馮雪峰（馮是文藝理論家和魯迅研究專家，是魯迅晚年和共產黨聯繫的中間人，參加過長征；1949年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第一任社長和總編輯）感到袁水拍的批評措詞辭厲，甚有“來頭”，

馮在當年 10 月 31 日在文聯的大會上做了檢討，在 11 月 4 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當時毛並沒有注意，當《南方日報》在 11 月 14 日加以轉載時，卻被正在南方巡視的毛看到了，而且作了極為嚴厲的批示。馮在檢討中說：“我感染有資產階級作家某些庸俗作風，缺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鬥精神”，毛批：“不是‘某些’，而是深入資產階級泥潭裡了。不是‘缺乏’的問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馮說自己“不自覺地在心底裡存在著輕視新生力量的意識”，毛批道：“應說自覺的。不是潛在的，而是用各種方法向馬克思主義作堅決鬥爭。”馮說“我犯了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毛在此句旁批道：“應以此句為主題去批判馮雪峰。”毛逐字逐句地看一個人的文章並批註，還真不多見。既然毛對馮的看法如此，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議把他拿出來鬥爭了。12 月 8 日，馮又在大會上做了檢討，中國文聯和作協主席團作出《關於（文藝報）的決議》，把馮定性為：“對於文藝上的資產階級錯誤思想的容忍和投降；對於馬克思主義新生力量的輕視和壓制；在文藝批評上的粗暴、武斷和壓制自由討論的惡劣作風”；撤銷馮的主編職務。改組編委會，責成作協改進對該報社的領導。

周揚等 1955 年 1 月向毛彙報時說：“雪峰同志因《文藝報》的錯誤受了批評，心裡很痛苦。”毛說：“我就是他痛苦”！1957 年 7 月 25 日起，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議連續召開，批判馮雪峰。8 月 20 日《人民日報》以《文藝界反黨分子馮雪峰是丁陳集團參加者、胡風思想同路人》為題，報導了他的“錯誤”及批判他的情況。就這樣，馮雪峰被加上“勾結胡風，蒙蔽魯迅，打擊周揚、夏衍，分裂左翼文藝界”的罪名，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又被開除黨籍，撤銷人文社社長兼總編輯、中國作協副主席、全國文聯常務委員、全國人大代表等

職。被撤職後的馮雪峰 1959 年 1 月被安排進了人民文學出版社新組建的編譯所。雖然 1961 年被摘去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他多次請求恢復黨籍，直到死都未能如願。文革中，馮雪峰先是被關進牛棚，後被發配到湖北咸寧勞動改造。他種過菜、挑過糞、插過秧、清掃過廁所、放過鴨子。1976 年 1 月 30 日終因肺癌晚期去世。

曾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彭柏山是批判胡適的主將，就在他大批胡適的時候，1955 年 5 月中旬，他突然被捕，罪名是“胡風反革命集團成員”。彭柏山“文革”中再遭衝擊，1968 年 4 月 3 日在鄭州含冤去世。

1954 年 11 月初，鄧拓要王若水寫批胡適的文章。鄧拓轉達了毛的指示：俞平伯的方法是胡適的方法；現在要把對俞的批判轉變為對胡適的批判，首先要批胡適的實用主義。11 月 7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王若水的《肅清胡適反動哲學的遺毒》，這是批胡適的第一篇文章，得到了毛的贊許。12 月 8 日，郭沫若在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作協主席團擴大聯席會上說，王若水的文章是“值得特別重視的一篇文章……我完全同意王若水同志的說法”。

批判胡適的時間持續到 1955 年 8 月，前後長達 10 個月。作為這次運動的一個總結性成果是三聯書店出版的洋洋三百萬字——《胡適思想批判》（8 輯）。當時批胡的文字遠遠不只這些，散落在各種學報、刊物、報紙上的批胡文字還有不少。很多青年學生在課堂內外以作業的形式，撰寫的批胡文字，其數量就更無法統計了。

第 100 節 批胡風

文藝理論家兼詩人胡風（1902～1985），出生於湖北蘄春縣的貧寒之家，原

名張光人。一位著名的詩人、文藝理論家（胡風的“主觀戰鬥精神”和“精神奴役的創傷”的理論已在路翎等人的創作中結出碩果）。他先後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就讀，1929 年去日本慶應大學留學留學，第二年參加日本共產黨與日本反戰同盟。1933 年被捕，被日本政府驅回國，抵上海，先後任中共領導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宣傳部長及左聯書記等職。

由於他和魯迅建立了親密的友誼，引起周揚的極大怨憤。在文藝方針上，有過所謂“兩個口號”的激烈論爭即“國防文學”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之爭。從魯迅《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可看出魯迅對周揚（當時叫周起應）的憎厭之深。在周揚眼中，胡風跟魯迅一道另提口號，不是“內奸”是什麼？他以黨外的布爾什維克自居，充當了魯迅和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連絡人。魯迅逝世，胡風作為魯迅的密友，是扛靈柩者之一。

他抗戰時期在重慶，胡風團結了一批作家詩人，形成了一個既真誠追隨中共革命運動，又強烈追求創作個性的文藝派別。人們以其所編刊物《七月》而名之“七月派”。胡風在文壇上聲譽頗隆，被稱為“中國的別林斯基”、“東方的盧卡契”和“魯迅絕頂忠實的傳人”。

毛澤東早在 1940 年代初期發表的、1949 年以後近 30 年中被奉為文藝界“聖經”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曾明確指出：“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毛還借列寧的話進一步指出：“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如同列寧所說，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毛澤東強調：“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在

毛澤東看來，文藝離開了政治鬥爭和黨派需要，就成為了多餘。

胡風始終反對將文藝降低為政治的附庸，不同意“政治標準第一”的文藝批評原則，胡風始終強調的是“社會學與美學原則相統一”的批評方法。他認為：文學與政治彼此完全不存在誰主誰從、誰尊誰卑、誰高誰低的問題；而且，文藝與政治“合為一體”的唯一條件和標準就是文藝真實地反映社會和歷史，文藝應當“在革命的思想照明下反映出歷史現實底內容和發展趨向，由這來為政治開路，推動政治前進。”他不贊同文藝成為“權變的政治戰術的應付”。他希望文藝不要異化成黨派政治鬥爭一時一事之利的吹鼓手，也不要異化為政治領袖包裝自己的遮羞布和剪除“異類”的刀槍。胡風對那種“一切都簡簡單單地依仗政治”，完全忽視“文藝底專門特點”的錯誤乃至荒唐做法，總是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抵制。

40年代初胡風與周恩來身邊“才子集團”的喬冠華等發表文章，反對用教條主義反教條主義，並發表對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解放區與國統區的施行應區別對待的觀點。這自然引起了延安的嚴重關切，1943年11月22日，中共中宣部關於《新華日報》、《群眾》雜誌的工作問題《致董必武電》對此指出嚴厲批評：“現在《新華》、《群眾》未認真研究宣傳毛澤東同志思想，而發表許多自作聰明錯誤百出的東西，如××論民族形式、×××論生命力、×××論深刻等，是應該糾正的”。1944年7月黨員作家何其芳、劉白羽由延安抵達重慶宣傳毛的《講話》，並與胡細談幾次，其實是打招呼，胡仍有抵觸情緒。

胡風在重慶時期牴牾《講話》的言論，都被他的“宿敵”周揚記錄在案，連毛澤東也耿耿於心。胡風始終堅決反對文藝只顧宣傳、動員和組織農民參加“抗

戰”，卻完全忽視農民“精神奴役的創傷”，完全忽視對農民的封建思想意識的教育和改造的做法。在胡風看來，反帝是民族解放的必由之路，但它並不能代替也不能保證反封建的勝利；換言之，反帝能夠保證民族的解放，但決不能保證民族的進步，只有反封建本身才能保證民族的進步。可是，胡風在抗戰時期的真知灼見到了 1955 年都成為他“反人民”、“反黨”、“反革命”的根據！胡風對知識份子的看法也與毛澤東大相徑庭。他認為“知識份子也是人民”。

1948 年中共在香港主辦的《大眾文藝叢刊》連續發表了黨員作家邵荃麟、喬冠華、胡繩、林默涵等人的文章，點名批評胡風的文藝觀點與毛澤東《講話》的對立。這顯然是一次中共組織的、清算國統區抗戰期間的文藝工作以宣傳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舉措，當然也是藉以進行政策調整的舉措之一。胡風則以長達十萬字的《論現實主義的路》提出反批評。

1949 年開國大典後，11 月 20 日，詩人胡風在 8 月 1 日剛定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上發表政治抒情長詩《時間開始了！——歡樂頌》。以 1949 年 9 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幕為緣起，極力誇張和渲染會場的熱烈氣氛和毛澤東的偉大形象；最後一章為《又一個歡樂頌》，回到了開國大典的歡慶場面。胡風在詩中用飽滿的激情大聲歌唱：

海

沸騰著

它湧著一個最高峰

毛澤東

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

好像他微微俯著身軀

好像他右手握緊著拳頭

放在前面

好像他雙腳踩著一個

巨大的無形的舵盤

好像他在凝視著流到了這裡的

各種各樣的大小河流

長詩近五百行，佔據整版整版的篇幅，毛不大可能看不到或不知道，但毛對此並不領情。因為緊接著的長詩第二樂章《光榮贊》就不能繼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而被擠到《天津日報》上去了。接下來合計長達四千五百行長詩的五個樂章《歡樂頌》、《光榮贊》、《青春曲》、《安魂曲》、《勝利頌》的出版就遇到了麻煩，只得先後由上海的兩家私營出版社出版，幾乎都是胡自己操辦；而批評長詩的文字卻接踵而至，搞得書店積壓賣不出去。照說歌頌中共及其領袖的作品，在這舉國歡騰之際，按照常理是沒有人敢從中作梗的。解開這個誤區之謎，還是魯迅這句話說得透徹：“奴隸只能奉行，不許言議；評論固然不可，妄自頌揚也不可，這就是‘思不出其位’；據 1949 年 12 月 14 日《胡風日記》：“和胡喬木通電話。他不贊成《光榮贊》裡面的‘理論’見解，當然不能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

解放後，胡風認為黨文藝觀點、政策應該與時俱進，予以調整，因此他極力反對那種僵化的教條主義態度，把文藝作品作為圖解某種觀點政策的工具。當時人們都厭惡這種所謂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和所謂庸俗社會學觀點，而胡風挑起反對的大旗。

據學者藍棣之說：“中央檔案館裡面有這樣一篇文獻，解放初期，江青出席

文藝界一個會議時說，新中國文藝的指導思想是毛澤東文藝思想。胡風當場表示，在文藝上的指導思想應當是魯迅的文藝思想。江青回家給毛澤東說了之後，毛澤東很不高興。”

1951年毛澤東在《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一文中提出“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後，中共中央宣傳部於1951年9月24日至11月召開文藝工作會議，決定在文藝幹部中進行一次整風學習，藉以清除文藝界的各種“錯誤思想”，建立共產黨對文藝工作的有效領導，對文藝工作者進行思想改造。並決定首先拿胡風的文藝思想開刀。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批准後，文藝界的整風暨批胡風的運動開始了。

1952年4月周揚在時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的彭柏山陪同下訪見胡，這三位毛身邊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對胡的不合作、“抽象地看黨”提出批評，而胡則沒有認錯檢討的表示。7月，周揚通知胡風到北京參加名為“討論胡風文藝思想”實為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會議。9月6日至12月16日，特別安排過四次“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實質是要胡低頭認錯做檢討的專題會議。周揚在會議上作報告指出：胡風在文藝理論上是反黨的“路線”，雖說政治態度上無問題，但問題不決定於政治態度，而是決定於文藝理論；要在文藝理論上“脫褲子”，承認是“反黨的路線”。1952年《人民日報》上就公開稱之為“以胡風為首的一個文藝上的小集團”。在中共眼裡，胡風及其“小集團”成了唯一頑固堅持自己的錯誤、敢於挑戰中共權威的勢力。他屬於魯迅所稱道的那種“硬骨頭”。

1953年1、2月，《文藝報》連續發表林默涵的《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和何其芳的《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林是中宣部文藝處長，何是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副所長。林默涵說胡風文藝思想的主要錯誤是：

一，非階級觀點。二，否定思想改造。三，否定民族文化。並作結論說：“胡風的文藝思想是一種實質上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它和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毛澤東同志的文藝方針沒有任何的相同點。相反，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社會主義的。” 林默涵的文章並非個人意見，而是毛澤東，共產黨對胡風的文藝思想進行系統批判後的最後結論。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很快轉載了林默涵的文章並加了編者按。但胡軟硬不買帳，拒絕檢討。胡始終認為，是周為了 30 年代文藝理論論爭與“兩個口號”論爭的恩恩怨怨，而對自己泄私憤。

1954 年 2 月，胡風讀了報紙上公佈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其中有劉少奇在全會上不點名嚴厲指責高饒的內容：“誇大個人作用，強調個人的威信，自以為天下第一，只能聽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對批評者實行壓制和報復，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這裡所指“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的措詞，原指高饒；而胡聯繫到自己總是受周揚擠壓的實際，把周揚拿來對號入座，越看越像是指周揚。胡風遂於 1954 年 3 月至 7 月，在北京與外地的十多位同仁的配合協助下，三個月足不出戶，全力以赴地寫成《關於解放以來文藝實踐狀況的報告》即著名的《30 萬言書》。胡風對林文、何文進行了酣暢淋漓的反駁，指責周揚等封鎖了中央關於文藝的一系列指示，歪曲了毛澤東的文藝思想，蒙蔽了文藝界的幹部群眾；批評了中共對文藝發展的限制，呼籲給作家和藝術家以表現自己創造性才能的自由，並要求中央給予公正裁定。1954 年 7 月 22 日，通過習仲勳向中央政治局及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呈遞。中共中央將“30 萬言書”交中國作協主席團處理。

1954年10月31日，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召開聯席會議，批判《文藝報》在《紅樓夢》研究上“壓制小人物”的錯誤，胡風本來不想發言，經人動員才講話。胡風在會上首先批評《文藝報》向資產階級投降，具體地講“是向反動的胡適派思想投降”，胡風點出朱光潛的例子，認為朱光潛過去是“胡適派的旗幟之一”，“一成不變地為蔣介石服務”。對這樣的人，《文藝報》卻投降。向《文藝報》的上級主管人周揚猛烈開炮。胡風的發言登報後引起毛的注意，這才調來“三十萬言書”看。胡風可謂自投羅網，成了毛澤東的眼中釘，肉中刺。毛便從這一“壺”（胡）到那一“壺”（胡）——不再批胡適，而完全針對胡風了。

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由毛修改的、周揚在會上的發言《我們必須戰鬥》，其中第三節《胡風先生的觀點和我們的觀點之間的分歧》，把批判重點轉向胡風。胡到這時才提起筆來寫《我的自我批判》，但已經遲了。

1955年1月12日，毛澤東在中國作協關於公開印發胡風給中央報告的部份上作了批示。毛澤東說：“劉、周、鄧即閱，退定一同志，照辦”。毛澤東批示的內容主要是：“應在文藝界和《文藝報》讀者群眾中公開討論，然後根據討論結果作出結論”。

1955年1月14日胡向周揚提出，不要公開發表《三十萬言書》，他還要修改時，已經由不得他了。這正應了“一字入宮門，九牛拖不出”的古訓，何況三十萬言呢！

1955年1月20日，中宣部給中央送了一份報告“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1月24日，由毛簽發的《關於組織唯物主義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演講工作的通知》中已決定：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

的錯誤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對胡風派思想的批判已經初步展開，對胡風及其一派的文藝思想的批判將展開。1月26日，中共中央批復了這個報告。頓時，全國掀起了批判“批判胡風思想”的熱潮。巴金違心地寫文章批胡風。批胡風文藝思想的工作由周揚、林默涵具體指導。

1955年《文藝報》一、二期合刊，以發表“30萬言書”中最主要的兩部分作為靶子，隨後每期都發表好幾篇批胡文章以進行批判。

此時，舒蕪提供了一批胡風過去給他的私人信件，並且已經分類編輯、注釋。舒蕪將胡風主要在四十年代《論主觀》發表前後給他的信件，摘引34則，“按照林默涵同志給擬定的四個小標題，進行摘錄、分類、注釋”：第一、胡風一貫反對和抵制中國共產黨對文藝運動的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第二、胡風一貫反對和抵制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文學隊伍；第三、胡風為了反對黨對文藝運動的領導和革命文學隊伍，進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動；第四、胡風這一切反共宗派活動，以怎樣一種思想，怎樣一種世界觀作基礎。舒蕪最後寫下一段總結性評論：“整理胡風給我的信中這許多材料之後，不禁觸目驚心。……反共反馬克思主義的氣息，卑鄙的個人野心的氣味，是這樣地強烈。”

中宣部決定將舒蕪《關於胡風小集團的一些材料》和胡風《我的自我批判》同時在《文藝報》5月初加編者按發表。《文藝報》排好清樣送交周揚，周揚又送毛澤東審閱。毛讀到了舒蕪提交的那批掐頭去尾的信，親自將“胡風小集團”改成“胡風反黨集團”，將文藝思想批判一下升格到政治鬥爭！下手之狠，連早有整胡風之心的周揚、林默涵等人瞠目結舌！

1955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處理“胡風反革命案”的五人小組，指定陸定一任組長，派人四處搜集與胡風有關的材料。公安部動員大量人力物力，整理裝裱

成冊，還從中宣部機關、作家協會、文化單位及公安部抽調了何其芳、劉白羽、張光年、郭小川等十多人，在林默涵率領下審閱這些文字，用紅筆勾勒‘有用’之處，並寫上注釋，呈交上去。”

5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一批材料”，公佈了舒蕪《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開始。這裡有一個插曲：胡風《我的自我批判》改了三稿，《人民日報》5月13日應登載反省最為懇切深入的第三稿，結果卻錯登了第二稿，又接上了第三稿的附記。胡風一看，立即給周恩來打電話。周恩來與胡風有十數年深交，深知胡風為人，承認過理論上曾受他啟發。周恩來要《人民日報》檢討。但毛澤東發話：“什麼二稿三稿，胡風都成了反革命了！”

5月16日傍晚，胡風和家人正在吃晚飯。穿便衣的公安部幾個人和作協領導人劉白羽來到他家。公安人員將胡風和梅志分別隔在兩個屋子裡，不讓他們接觸。公安人員向梅志出示了搜查證，便對胡風家裡進行了搜查。屋子裡的書很多，搜查人員一本一本本地翻；對屋子裡的信件搜查得特仔細，只要是信件，都被集中放在一個地方，便於最後帶走。一家人的飯還沒有吃完，放在外面的桌子上，幾雙筷子橫七豎八地散亂在上面。這樣一直搜查到半夜，公安部的人員才將胡風從裡屋帶走。胡風被帶走的時候，還回過頭來，看了看桌上自己沒吃完的半碗飯。公安部留下的人員，對這裡再搜查了一遍。凌晨，負責搜查的人認為可以結束了，便將梅志帶走。從此，整整11年，胡風與梅志再沒有見過一次面。根據事先佈置，公安部留下幾個人在屋裡“蹲點”，負責監控電話和外來人員，三個月後這個“點”才撤離。胡風是在被秘密拘捕兩天後，全國人大常委會才在5月18日正式做出拘捕決定。

胡喬木曾說：“抓胡風，我是不贊成的。毛寫的那些按語，有些是不符合事實的。胡風說，三年局面可改變，毛主席認為是指蔣介石反攻大陸。實際上，胡風是說文藝界的局面。”陸定一說過，胡風案件要定“反革命”時，毛找了他和周揚、胡喬木商談。毛指胡風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來。周揚和他都贊成，只有胡喬木不同意。最後還是照毛的意見辦，定了胡風“反革命”。胡喬木說，他對毛的決定提出不同意見後，擔心自己的政治生命要完了。

隨著《人民日報》公佈由毛親自撰寫按語的三批材料（5月13日、5月24日、6月10日），胡風問題已經由“胡風反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而成“胡風反黨集團”，再由“胡風反黨集團”而成“胡風反革命集團”。胡風被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之首。

6月10日，毛在第三批材料公佈編者按中說：“胡風的主子究竟是誰？”“胡風和胡風集團中的許多骨幹分子很早以來就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他們和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機關有密切聯繫，長期地偽裝革命，潛藏在進步人民內部，幹著反革命勾當。”

6月15日毛在胡風材料上所寫的序言中指出：通過胡風事件，“各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會被我們一步一步地清查出來的”。毛認為，胡反《講話》，就是反他本人。其實，胡並無直接反毛言論。毛說：“胡風集團給我們一些積極的東西，那就是藉著這一次驚心動魄的鬥爭，大大地提高我們的政治覺悟和政治敏感，堅決地將一切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

毛澤東寫了編者按語，在未經任何司法程式之前，斬釘截鐵地斷言胡風“他們的人大都是有嚴重問題的。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斯基份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一

個暗藏在革命陣營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因此，留給司法機關的嚴重任務就是為這些斷語千方百計地搜尋罪證。

毛澤東為胡風及其集團成員之間的信件親自加寫或修改按語，尋章摘句，斷章取義，無中生有，顛倒黑白，望風撲影，穿鑿附會，深文周納，無限上綱，羅織罪名，鍛煉成獄。這樣的文字獄，如果雍正皇帝再世，也會自愧不如、退避三舍；或者在任何民主國家，也不可能發生這樣的枉法的事情，即使在蔣介石統治大陸的時期，蔣介石本人也沒有做過這種親自出馬超越司法加罪于政敵的事情。

一時間，從中央到地方各種宣傳機器都開足了馬力，僅毛親自撰寫序言和按語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人民出版社）的小冊子，全國就印刷了700多萬冊；那本以妖魔化為能事的漫畫小人書，估計不下千萬冊之數，當時的城市居民是挨家挨戶散發的。當時，迅速出版投入運動的書籍還有：《胡風這個反革命黑幫》（新知識出版社）、《胡風反革命集團是中國人民的死敵》（華崗編寫，新知識出版社）、《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惡活動》（北京大眾出版社）、《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醜惡面貌》（湖北人民出版社）、《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醜惡嘴臉》、《堅決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人民出版社）、《胡風黑幫的滅亡及其他》（王若望著，新文藝出版社）、《討論胡風文藝思想參考資料》第一至第五輯、《揭露胡風黑幫的罪行》及其《續編》（作協上海分會）、《胡風文藝思想批判論文彙集》第一至第六集（作家出版社）、《堅決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報刊資料索引》（山東圖書館）。這裡所存錄書名，恐怕現在許多大圖書館甚至出版社本身都未必再予收藏，這些書已成了稀世文物與古董了；其內容與印數就不必去說它了。但當時的陣勢，則由此可見一斑。

7月，五人小組又發展擴大為中央“肅反”十人小組。於是，在全國範圍內，由胡風事件轉入了“肅反”運動，整肅包括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在內的各類知識份子。對此中央卻未發過一個正式檔，對整肅給以一定的政策界限。具體的辦案人員，每天只能學習《人民日報》上面的編者按，以（毛寫的）這些按語來指導工作和劃定政策界限。

清查胡風分子有口頭傳達的的內部政策，辦案人可做筆記。當年一辦案人保留的那時的記錄，有六條：1) 與胡風直接經常接觸，直接參與胡風有計劃的向黨的文藝領導思想進攻，在一個小地區若干胡風分子推崇的小頭子。2) 一般分子，在胡風問題上不很嚴重，但其他政治歷史問題嚴重的作為一般分子。3) 一些受胡風分子影響較深者為影響分子，包括偶爾同胡風與胡風分子通訊、求教、崇拜的人。4) 與胡風有直接、密切的關係，與胡風思想一致，積極寫作，一貫宣揚胡風思想，為胡風出謀劃策或某地方的小頭目，應作為骨幹分子。5) 凡與胡風骨幹分子密切，擁護胡風主張，參加活動但與胡風無直接關係，應作為一般的胡風分子。6) 與胡風集團分子沒有直接關係或者有若干聯繫並不密切。但其思想上，觀點上與這些人是一致的甚至說謊和發牢騷，但沒有謾罵、污蔑我們黨的，應作為受影響分子。

一場搜捕知識份子的風暴席捲了祖國各地。被捕的有：北京的路翎、綠原、徐放、謝韜、劉雪葦、牛漢、魯煤、杜谷、閔望、於行前、馮大海、李嘉陵……，上海的賈植芳、彭柏山、王元化、任敏、耿庸、王皓、王戎、張中曉、羅洛、何滿子、李正廉、顧征南、許史華、羅飛、張禹、梅林、滿濤……，天津的阿壘、魯藜、蘆甸、林希、李離……，南京的歐陽莊、化鐵、華田、洪橋……，浙江的冀訪、方然、孫鈿……，陝西的胡征……，湖北的曾卓、鄭思、伍禾……，湖南

的彭燕郊……，廣東的朱穀懷……，遼寧的晉駝、侯唯動……，重慶的何劍薰、馮異……。能迅速提供一份全國各地胡風分子的名單，非周揚莫屬。這些才華橫溢的詩人、作家、文藝批評家、編輯、翻譯家，還有高校及研究機構的教授、專家、學者。

1955年7月28日，中宣部查禁這些作家作品的《通知》下達全國。正如謝泳所言：從《通知》“開列的查封名單可以看出，這些作品絕大多數是歌頌新中國和抗美援朝的，譯作也都是馬列著作和革命文學，還有梅志的兒童文學”。從“應停售和停版的胡風及胡風集團骨幹分子的書籍目錄”中可以看出，連恩格斯和高爾基的著作，因譯者是“胡風分子”，所以也不得再版和出售，並不得在圖書館公開借閱。這份文件的存在，說明50年代的“文字獄”並非個人所為，而是制度化暴力的產物。

胡風案的最大特點就是無視通信秘密受憲法保護的規定，不顧世界文明、世界通行法律的基本準則，依靠搜查私人信件，瓜蔓相抄，層層株連，無窮輻射，以信定讞，最初累及者達兩千餘人。例如：南京軍區後勤政治部有一位創作助理員，因為從某個胡風分子那裡搜查出他的信件，所以立刻逮捕。這樣的人中，還有中學生。

2004年第6期《隨筆》上剛披露的，詩人賀敬之當年因胡風問題被隔離審查半年，“審查中對我到延安初期在《七月》雜誌發表兩首詩和解放初期胡風為我出版一本詩集，以及胡風到北京後我對他的幾次看望，進行了長時間的審問，並結合我的文章和創作在大會上進行了全面批判，最後給了我黨內嚴重警告（後改為黨內警告）的紀律處分”。

1956年夏季過後，陸續被釋放的人有：上海的王戎、何滿子、梅林、王元

化、任敏、王皓、羅洛等，北京的牛漢、李嘉林等，天津的魯黎等，南京的化鐵等，武漢的曾卓等……

北京的牛漢 1955 年 5 月 14 日被關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新修的托兒所後，一直單身禁閉。關到 11 月，又轉至頂銀胡同、水塔胡同的看守所。剛到關押處，日夜三班倒地安排看守，逼著他天天寫檢查、寫證詞。夜晚睡在床上，頭頂上吊一盞一百多瓦的燈泡，徹夜通明，不讓睡好覺，以便考慮問題。在這一年多時間裡，不准看報，不准看書，與外界徹底地隔絕了。牛漢從小追求革命、加入共產黨，跟著共產黨鬧學生運動、搞地下工作，如今卻成了人民的罪人，反對共產黨的人。他無法想通。他為自己辯解，為朋友辯解。在關押時，寫出的第一份交代，就是為綠原辯誣。他瞭解綠原，他絕不相信綠原是什麼軍統特務。他舉出自己所知的證據，說明當年綠原如何受國民黨迫害，在詩中如何謳歌進步和革命。

1957 年 5、6 月間，牛漢被釋放回家，繼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上班。兩年關押，沒有審判；釋放回家，依然沒有任何說明。對於他，能早早獲得人身自由，已是幸運的事，誰也不會想到去深究一切有關法律程式的細節。在人們心中，沒有法律的位置。

上海的何滿子開始關在建國東路的一個看守所，後來換到上海第一看守所。起初不能看報，看書，1956 年初允許看報。最後一次審訊，沒有結論。只是對他說：“你過去的歷史都已經查明白了，我們花了不少錢，飛機火車，總算對你瞭解了，這對你也有利嘛。” 1956 年 9 月底，何滿子釋放回家，安排到古典文學出版社工作。1956 年 11 月，羅洛釋放回家，王元化也在此前後釋放回家。羅洛拿到一份結論：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回原單位重新安排工作。賈植芳的妻子任敏、耿庸的妻子王皓，也都在 1956 年國慶日之前釋放回家。

武漢的曾卓被捕之後，開始半年，生活待遇還算不錯。雖然不能看書看報、卻給他開幹部伙食，和別的犯人不同，可以不集中聽報告。半年之後，情形驟變，審問者的態度頓時忍劣起來，原來公安部門在四川國民黨遺留下來的檔案中，發現了他的名字，寫有：運用通訊員曾卓 400 元。經手人：陳藍遜。曾卓承認和陳藍遜認識，是小學同學，但在重慶從無來往，根本不存在提供什麼情報，領取報酬之事。後來公安部門查明，是當特務的陳藍遜當時為了虛報多領錢，將他所知的人名列出，除曾卓外，他還虛報了白揚、秦怡等當時的影星。對無辜關押，曾卓滿肚怨氣，他再三要求上法院審判，為自己辯護。自然是無果而終。他被逼著寫揭發別人的材料，也給他看別人對他的揭發交待材料。他看到胡風寫到：“我記得他從沒給我投過稿，只通過幾封信。”阿攏寫到：“他對文藝理論從來不感興趣。”曾卓看到這些材料，反倒從心底更感激這些朋友們，更懷念不知下落的這些人。在獄中一年多，唯一消磨時間的辦法，是寫詩。無用草紙寫，後被抄走，改為口吟。1957 年 3 月 27 日，曾卓由於身體有病，被保外就醫。第一個消息，是妻子提出離婚。

天津的魯黎一關進獄中，他的妻子就和他離了婚。從此，魯黎在獄中成了無人探望、無人關心的人。妻子不理他，孩子們也不理他，連換洗衣服，也沒有人送。冬天，魯黎沒有棉衣，還是 5 月抓來時的單衣，只好和難友換著穿一下棉衣，或者鑽在被窩裡，動也不動。可他仍然不承認自己有罪。雖然有人再三做工作，說只要承認是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就什麼事也沒有了，他卻反復一句話：“我不可能承認。”1957 年春天，魯黎被釋放出獄，發給他一封公函，上面寫：情節不嚴重，免予起訴。

1957 年突如其來的反右，打碎了李嘉林、曾卓、任敏、王皓、化鐵……所

有胡風分子的夢，一些與胡風有過關係、或者發表過與胡風文藝思想相近意見的人也成為右派了，和胡風交往甚密的聶結鸞、周穎，無疑被打成了右派。更把許多參加批判胡風、聲討胡風的人，捲入新的政治風暴。舒蕪曾在打倒胡風的運動中立下了“反戈一擊”的大功。然而他 1956 年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說“難免”》的短文，批評一些官員以“難免”作為工作馬虎的藉口。1957 年 1 月 27 日毛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點名批判舒蕪的這篇短文：“這就是一種有害的言論。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應當準備及時反駁，唱一個對臺戲。”結果，《人民日報》上就發表了批駁舒蕪的文章。舒蕪自然也被打成右派。

吳祖光 1954 年受共產黨感召，全家遷到北京；到京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父親吳景洲一生收藏的大量文物捐獻給國家；國家文物局長鄭振鐸和著名的文物鑒定專家楊蘭教授用了三天時間親自鑒定，241 件文物裝了幾汽車拉到故宮博物院。1957 年吳祖光在文藝界整風座談會上說：“如果黨一定要這樣的領導，過去誰領導屈原的？誰領導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魯迅的？又誰領導莎士比亞、托爾斯泰、貝多芬、莫里哀的”（《戲劇報》1957 年第 11 期第 5~7 頁）？北京戲劇電影界 1957 年 9 月 6 日到 13 日，陸續召開四次批判吳祖光“（胡風）小家族”的大會，被列入這個集團的有戲劇出版社編輯杜高、《劇本》月刊編輯汪明、北影編輯田莊、對外文化聯絡局幹部陶冶等。吳祖光因此被打成了右派分子，22 年不見天日；其妻新鳳霞因拒絕文化部副部長劉芝明的誘勸、不肯與吳祖光離婚而得罪了劉，也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其子女也成了人人得而罵之、人人得而打之的“狗崽子”！

1957 年四川省文聯的石天河、流沙河等人被打成與胡風集團“臭味相投”

的反黨小集團。流沙河寫了一組散文詩《草木篇》，刊登在《星星》詩刊 1957 年 1 月號上，結果很快就招來圍攻。詩中寫了“糾纏著丁香，往上爬”的藤。批判者咬定他咒罵共黨積極份子，說是“對人類史上最民主最先進制度的誣蔑”。詩中說梅花“把自己許給了冬天的白雪”，被批為盼望國民黨復辟。四川省文聯的領導說：“我一看見《草木篇》就想起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對這種反動的東西，一棍子打死也未嘗不可！”流被打為右派，遣送農村勞動改造。

1957 年河南文聯負責人蘇金傘被戴上了“胡風文藝觀點的批發商”的帽子予以批判，《人民日報》的標題是：蘇金傘生意倒臺醜態畢露，肩題就是那頂“帽子”。

1965 年 11 月 26 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公審”胡風，判決說：“被告胡風早在大革命時期，即投靠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反革命宣傳鼓動，為國民黨的反動政策效勞。後又為首組織反革命集團，勾引公職人員，盜竊國家機密，造謠誣蔑，企圖顛覆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文化事業的領導，破壞人民民主事業，犯有嚴重的反革命罪行。”判處有期徒刑 14 年。剝奪政治權利 6 年（1969 年又改判無期徒刑）。

文革高潮中，解放軍押送胡風夫婦到位於四川蘆山縣苗溪的勞改茶場，住進山上一座孤零零的小屋裡。一年多後即被分開。當周揚挨整時，胡風卻不肯落井下石。梅志在《往事如煙》說，1966 年 7 月，四川省公安廳負責人來找胡風：要他揭發周揚，鼓勵他“立功受獎”，甚至可以減刑。胡風答：“我是判了刑的犯人，早已沒有了談文藝問題的資格。”第二年，苗溪勞改茶場看守所長拿著登有姚文元《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的報紙又來找他，也被他頂了回去。隨後胡風被關押在成都的看守所，一度單人囚禁。1969 年 5 月，他因 14 年刑期已滿，要

求出獄，得到的指示卻是“關死為止”！胡風被害得精神失常。1979年出獄，1980年、1985年、1988年三度平反，推倒一切罪名。

許多“胡風分子”遭遇更慘。1966年2月，阿壘在天津被判有期徒刑12年。3月，賈植芳在上海被判有期徒刑12年。路翎的長篇小說《財主底兒女們》被譽為“史詩性巨著”，路翎被捕時只有32歲，在獄中，他得了嚴重的精神分裂症，不是默默無言，便是長時間狂嘯。他一度被保外就醫，痊癒後又不斷上書申辯，因而再次入獄，被判20年徒刑，1975年才得到釋放，由街道派出所監管在胡同裡打掃衛生，靠每戶每月交的一毛錢的清潔費維生。在他那像貧民窟一樣的家裡，已經不再有一本書。路翎的二女兒也患精神病，一直未成家。“都是受他的罪名的影響啊。還有幾個家庭的子女也得了精神病，例如綠原的小女兒，插隊時受了刺激，也是受綠原被冤枉成‘國民黨特務’的連累……”

1980年7月21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的複查報告》說：“沒有事實證明以胡風為首組織反革命集團。也沒有證據說明胡風有反對社會主義制度、顛覆無產階級政權為目的的反革命活動。因此，胡風不是反革命份子，也不存在一個以胡風為首的反革命集團。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應屬錯案錯判。”該報告還指出：“在全國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共觸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絕大部分作為受胡風思想影響予以解脫，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78人（黨員32人），其中劃為骨幹分子的23人。到1958年給予停職、勞教、下放勞動處理的62人。”許多胡風研究專家，如萬同林、戴光中等都認為，這是很不完全的統計，並指出：湖北蘄春縣中小學所有語文教師，就因胡風問題被停職審查一年，而其中只有一個張恩是胡風的侄兒；除此之外，沒

有一位教師與胡風有任何關係。當年作協的實際負責人之一康濯說：“全國被清查、揪鬥的達十餘萬人，被捕入獄的一萬多人。有的人僅是讀過胡風的一篇文章，聽過胡風的某次報告”，60餘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森默涵對此的回憶載於《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3期）。

第 101 節 批劉少奇罵梁漱溟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了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政權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共同綱領》第二條，國家“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保護“農民的的土地所有制”。《共同綱領》規定公民有思想自由、新聞自由、遷徙自由；後來那些“四個堅持”的內容，包括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包括馬克思主義指導和共產黨領導，統統沒有載入《共同綱領》。《共同綱領》第12條說：“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人民用普選方法產生之。”無怪乎毛必須在1953年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趕快把《共同綱領》廢掉；否則，1954年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怎麼開？1953年毛提出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標誌著《共同綱領》被正式拋棄。

1· 批周恩來、批劉少奇

毛澤東從來不滿意先資本主義、後社會主義的發展程式。早在1948年，毛澤東把張聞天起草的《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中，“決不可以採取過早地限制私人資本經濟的辦法”改為“決不可以採取過早地限制

現時還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經濟的辦法”。為此，毛澤東專門致函劉少奇解釋：因為我們的整個經濟政策，是限制私人資本的，只是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才不在限制之列。“有益於國計民生”就是一條極大的限制，即引導私人資本納入“國計民生”的軌道上。這些私人資本雖然納入這條軌道，他們總是想脫出去的，所以限制的鬥爭將是經常不斷的。

毛剛進北京城時設想：要在建國 15 年之後才考慮向社會主義轉變。劉少奇主張“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他在天津說：在現階段，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多了，而是資本主義少了。要承認資本主義的剝削是進步的；資本主義的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是有功。

1950 年 6 月 23 日毛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說：實行私營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還是在遙遠的將來。劉少奇、周恩來在經濟日常工作第一線日理萬機，在百孔千瘡的戰爭廢墟上恢復生產，動員一切物資支援前線，與世界上經濟實力最強大美國抗衡。在這個背景下，山西推動農村合作化，高崗在東北學蘇聯搞集體農莊，被當成“左傾冒進”批評。1951 年 7 月 5 日，劉少奇在中南海對中央馬列學院學員作報告《中國共產黨今後的歷史任務》，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的建國大綱：一、新民主主義經濟是一種過渡性質的經濟，過渡需要的時間大約在 15~30 年之間。二、新民主主義階段的中心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完成國家工業化。三、在新民主主義階段，五種經濟成份，即國營、集體、私營、合營、個體應各得其所，都得到發展。四、國民經濟得到恢復後，應以主要力量發展農業、輕工業及必要的軍事工業。五、反對過早地動搖、削弱甚至否定私有制，反對過早地採取社會主義步驟。中國產業落後，過早實行國有化，只會傷害私營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對發展生產不利。六、只有工業發展了，農業發展

了，國營經濟成為國家經濟主體的目標實現了，企業管理幹部也成長起來了並日漸成熟了，各行業的技術專家也大批培養出來了，工農聯盟在政治上、經濟上都鞏固了，人民群眾的生活安定並提高了，那時，我們才能真正實行社會主義的步驟。

劉少奇的報告，遭到高崗們的質疑。接著，毛批評劉少奇的《歷史任務》通篇不談政治路線，不談階級鬥爭，不談人民民主專政，光談保護、發展私有經濟，這是什麼樣的歷史任務？劉少奇委屈地解釋：《歷史任務》的講話提綱事先提交書記處討論，當時毛同意；新民主主義過渡時期需要 20~30 年時間，是西柏坡政治局會議毛親口說過的；整個講話並沒有創新，完全是闡述毛著《論新民主主義》。接著，劉少奇收回《歷史任務》的講話，痛作檢查。高崗關於東北農村合作運動的報告被毛批示，以中央名義轉發全黨。

1952 年，毛在修改中央《關於民主黨派工作的決定》時，根本不顧資產階級民主黨派的臉面，毫不客氣地明確提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

1952 年 9 月 24 日毛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從現在起就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會後不久，劉少奇率代表團訪蘇，他受毛委託於 10 月 20 日寫給史達林的信中，明確使用了“中國怎樣從現在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提法。

1952 年 10 月，調東北主席高崗、西南書記鄧小平、中南書記鄧子恢、華東書記饒漱石、西北書記習仲勳等進北京充實中央領導班子。劉少奇原本分管組織人事，經高崗提名，任命饒漱石為組織部長。11 月成立國家經濟計畫委員會，高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份任主席，與周恩來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身

份領導的政務院平級，為中央人民政府屬下的兩大執行機構，專司財政經濟，又稱“經濟內閣”。

1952年底周恩來批准頒發執行的《關於稅制若干修正及實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稅制試行辦法》這些通告和辦法根據“三反”、“五反”以後公私關係緊張、市場蕭條現象和中共中央關於第二次調整工商業的指示，取消了對國營企業與合作社在加工、調撥、代購、代銷或包銷的課稅方面的優惠條件，實行公私一律的平等競爭。

毛指責新稅法有利於資本主義，不利於社會主義。毛認為政務院在組織上犯了分散主義錯誤，1953年3月毛決定：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脫離中央領導的危險，今後政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針、政策、計畫和重大事項，必須經過黨中央批准；撤銷了以周為書記的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規定政府各部黨組直接接受黨中央領導；4月28日發佈《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對中央人民政府財政經濟部門工作領導的決定》，將政府工作劃分為計畫、政法、財經、文教、外交五“口”，分別由高崗、陳雲、鄧小平、鄧子恢、饒漱石等負責，毛澤東戲稱為“五口通商”；各自直接對黨中央負責，總理辦公室僅負責五口的聯繫事宜；而高崗卻分管8個工業部，重要性明顯超過周恩來。毛倚重高崗，顯露出破格提拔重用。

在1953年6月13日開始的全國財經會議上，毛批評“新稅制”說：“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口號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而是找資本家商量，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周、薄兩人分頭大會小會深刻檢討，撤銷薄一波中央財政部長和華北局第一書記職務，財政部改組。被毛澤東認可的稅收政策具體實施後，對私營經濟嚴重歧視，使私營業主們主動乞求政府進行公私合營。

1953年毛在同中南局、武漢市委負責人的談話（2月17日）中批評了“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觀點，提出“新民主主義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在這個過渡階段，要對私人工商業、手工業、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現在起大約需要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這是和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同時進行的”。2月27日毛在書記處會議上明確提出“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還多一些的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及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當時，戰爭創傷遠未平復；全國需要休養生息；土改遺留問題大量沒有解決；普選剛在基層進行；城鄉依舊文盲充斥。實現《共同綱領》任重道遠，沒有任何根據和理由把《共同綱領》否定掉。

為了用總路線否定共同綱領，毛在1953年5月、6月、8月曾先後三次批判劉少奇“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主張違反了“過渡時期總路線”（見《毛選》第5卷，80、81、89頁）。劉“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是以臨時憲法即《共同綱領》為根據的，而那條“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尚未提請合法的權力機關審查通過。毛劉之爭意味著劉無權根據法律工作，而毛有權在法律以外行動。這就是中共國的制度。

1953年5月，毛指責劉少奇沒經過毛簽字同意就發佈中央政治局決議是很大的政治錯誤。毛批評道：“過去幾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檔、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未經主席認可，中央會議不准發出決議；可見，毛凌駕於中央之上。

1953年6月起開始了“公私合營”。6月15日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李維漢

關於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干問題的報告，毛在會上第一次對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的內容作了比較完整的表述。9月24日發佈的慶祝國慶四周年口號，向全黨和全國人民宣佈了這條總路線。總路線的首要任務是“社會主義改造”。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主要是針對中小型乃至個體的工業、手工業、商業的私人資本和私人財產，用強制的方式把這些私人財產收歸國有。12月，中共批發中宣部擬定的《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鬥爭——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毛在提綱中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

2· 罵梁漱溟

蘇聯建國初期，為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也曾經發生過工農關係的爭論。《聯共（布）黨史》寫道：1926～1929年間，“在莫斯科的黨報黨刊上和黨員大會上，當時有人大造輿論，說必須向富農讓步，說不宜向富農徵稅，說工業化對人民負擔太重，說建設重工業為時過早”（《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324～325頁）。說過這些話的人後來全成了反對派，幾乎全部被消滅了。50年後毛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引發了“工人九天，農民九地”的爭論，爭論的時候沒有一人贊成附和，而是一片斥責之聲。直到2000年3月，一位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含淚上書國務院領導，痛陳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呼籲給農民以國民待遇，道

出了中國農民問題真相；2002年又出版了《我向總理說真話》的書，把事實與資料公之與眾。

《共同綱領》第12條規定，在普選的全國人代會召開前，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代會的職權。包括毛在內的中央政府，是由政協選舉產生的。當時政府開會，常常有政協委員應邀列席。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討論毛提出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邀請100多位民主人士徵求對黨的“總路線”的意見。

11日下午梁漱溟在會上發言說：有些農村幹部把持鄉政權，違法亂紀，生產沒有搞好，農民吃不飽，跑到城裡當小工。有的露宿街頭，設鍋造飯，影響市容。公安部門今天把他們送回去，明天他們又來了。“工人農民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天之下。過去農民“與共產黨親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勢”；“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希望共產黨進了城不要忘掉了農民。對農民施行仁政，要體恤農民。

毛澤東在延安曾經大講民主，大講自我批評，大講言者無罪，講得很動聽，這是大家耳熟能詳的。這一回，不知怎麼搞的，一聽梁漱溟提出建議，毛大怒，9月12日毛說：梁漱溟說，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你說工人在九天之上，那你梁漱溟在那一天之上呢？你在十天之上，十一天之上，十二天、十三天之上，因為你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資多得很嘛！……要是講公道，那要首先降低你的薪水，因為你不只是在九天之上嘛！梁漱溟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以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須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

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瞭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這是反動化的建議，不是合理化建議，人民政府是否能接納這種建議呢？我認為是不能的。”“假若明言反對總路線，主張重視農業，雖見解糊塗卻是善意，可原諒；而你不明反對，實則反對，是惡意的。”“講老實話，蔣介石是用槍桿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桿子殺人。殺人有兩種，一種是用槍桿子殺人，一種是用筆桿子殺人。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桿子殺人。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你梁漱溟功在那裡？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麼功？一絲也沒有。而你卻把自己描寫成了不起的第一美人，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人不害羞，事情就難辦了。“梁漱溟是野心家，是偽君子。”這就是毛澤東親自示範表演的鬥爭會。印在毛選五卷裡的白紙黑字，無疑是在毛即席講話基礎上經過潤色修辭的記錄。這最後發表的東西，決不會比原話更野蠻。毛這種放肆，不僅意味著粗暴，而且意味著言者無罪時代的結束。

梁對這一批評不服，便寫信給毛申辯道：“你說反對總路線，破壞工農聯盟，我沒有這個意思，你說得不對。請你收回這個話，我要看看你有沒有這個雅量……”毛未予理睬。

9月17日，周恩來作了長篇發言，聯繫歷史上的一些事實，證明梁漱溟的反動是一貫的。在9月18日的大會上，梁漱溟登臺發言說：我根本沒有反對總路線，而主席卻誣我反對總路線。梁再一次質問毛：“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因為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看看黨的自我批評是真是假！”毛主席立刻厲聲說：告訴你，我沒有雅量！結果梁被會場

上一陣陣狂暴的吶喊“不聽梁漱溟胡言亂語”、“民主權利不給反動分子”、“梁漱溟滾下來”淹沒了。喊口號者計有陳銘樞、史良、蔡毅仁、許德珩、章伯鈞、李維漢等六人。最後大會表決，大多數人反對梁講話，梁漱溟被轟下了台。毛開闢了一個言者有罪的新時代。作為議員和公民，梁漱溟要求“多知道一些計畫的內容”。中央政府主席毛立即判決：“對於梁先生這種人，應當使他少知道一些機密，越少越好。”國家計畫的內容必須向人民保密，重要事情不准老百姓知道，這就是領袖親自規定的制度。

毛澤東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使政協失去了共同綱領，使農民失去了剛剛得到的土地，使老百姓一概淪為無產者，使公民不能得到自由的權利，使共和國不能建立民主的制度。

“文革”期間，梁漱溟受到衝擊，家被抄，房屋被占，夫人挨打，書籍、信件、字畫被焚，手稿被沒收。“批林批孔”運動一起，梁漱溟就認為林彪與孔子既不對門又不對戶，風馬牛不相及，將他們捆綁在一起實在太荒唐。北大教授馮友蘭撰文批孔，大出風頭。梁漱溟寫信給這位昔日的弟子，聲明與之絕交。1988年，梁漱溟逝世，馮友蘭以93歲高齡撰寫紀念文章，稱讚梁漱溟“百年盡瘁”，無愧為“一代直聲”，這一評價允為確當，理應萬世不磨。

第 102 節 打倒高崗、饒漱石

1949年6月，毛澤東派劉少奇、高崗和王稼祥秘密訪蘇，請求蘇聯援助，商談兩國關係和中共建政的一些問題。在聯共（布）政治局的會議上，高崗竟然發言，向史達林建議“宣佈東三省為蘇聯的第十七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聯有十六個加盟共和國，以保護東三省免遭美國人的侵犯。如此明目張膽“裡通外國”的言論，叫劉少奇怒不可遏，在回賓館的汽車上，劉少奇指責

高崗叛變，回到賓館立刻向毛髮了密電，要求召高崗回國。

毛澤東接到劉少奇的電報後，應當比劉少奇更加“怒不可遏”，可是當高崗回國見到毛澤東時，毛澤東卻對他勸勉有加，還面許他準備當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使高崗受寵若驚。當時毛已向世界宣佈他要“一邊倒”，因此高崗的“賣國”之言正中毛向史達林輸誠之下懷。1949年底毛澤東訪蘇，在瀋陽特地下車遊覽市容？看什麼？為親眼見證一個傳說：在瀋陽的高樓大廈上，都掛著史達林的巨幅畫像，卻沒有毛的畫像。當他得到報告，說東北各省人民給史達林贈送了一車廂的禮物時，抑制不住氣憤，下令“把車廂摘下，把禮物卸下”。

1953年劉少奇、周恩來受到了毛的批評。高崗認為毛要倒劉少奇，也覺得到還權于軍隊功臣的時候了。直接起因之一，是資深的中央組織部第一副部長安子文(被認為是劉的骨幹)，私擬了一份八大政治局委員名單，居然“有薄(一波，與劉少奇、彭真、安子文等同為作白區地下工作出身的高幹)無林(彪)”！一時激起軒然大波。軍隊高幹與白區高幹的矛盾趨於白熱化。毛曾經對高崗說過：“中國革命大而言之全國，小而言之陝北，都有一個圈圈，井岡山是紅軍的圈圈，陝北是八路軍的圈圈，我們靠著這兩個圈圈贏得了革命的勝利，現在有人又說還有一個圈圈，那就是白區的圈圈，是紅區和白區兩個圈圈，製造思想上的混亂，不可不察。”這段著名的講話成為當時打擊劉少奇和周恩來的主基調，被高崗多次引用，他指責劉少奇搞白區圈圈壓紅區圈圈，說周恩來搞政府攤攤壓黨中央的攤攤。高崗一面佈置饒漱石在中組部開會批判安子文，藉以打擊劉少奇，一面請人出面調查安子文、劉瀾濤、薄一波、彭真出獄自首的歷史問題，一面竄聯彭德懷、陳正人、李富春、陶鑄、林彪等人，給他們灌輸劉少奇不行了，主席看不上他的言論。根據後來李富春、陳正人的揭發，高崗說過：“少奇在1947年就開始

犯了錯誤，主席一直容忍他，他在一線主持中央工作不行，太右了，將來中央開會，你們都要說話，少奇打擊排擠你們這些人啊，富春早就是副秘書長了嗎，現在還只是部長，正人同志也是井岡山下來的嘛，還不如叛變的(指的是彭真等人)，不平則鳴嘛。”高崗反對由劉少奇出任即將設立的黨中央總書記一職，希望在中央實行“輪流領導”等等。彭德懷和林彪做了附和的講話。高崗專門找陳雲和鄧小平談及中央副主席的人選，明確說總理也要換人，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指陳雲一個，高崗一個)；陳雲立刻給毛打電話彙報此事，小平則把此事形成材料交給毛。

毛想：假如副帥地位可以競爭(國民黨統治時期就競選副總統)，主席之位難道不可以競爭嗎？建國前夕毛就下了除掉高崗的決心，但他認為劉少奇、周恩來有專擅之嫌，危及他獨斷朝綱，他對劉周的批評和措施也是認真的。他要利用高崗制服劉周，這一目的達到之後，再利用劉周除掉高崗。毛慮及於此，把陳雲和鄧小平找來，談了幾大要點，這也就是後來七屆四中全會上《增強黨的團結》的主要內容所在。陳雲、鄧小平被毛澤東囑咐不要以毛澤東的口吻說話，而代之以他們自己，而小平一旦講完黨目前還是要以團結為主、消除分裂，陳雲一旦講完張國燾式的人物出現的背景之後，毛澤東立刻予以回應，批示：“盼照陳雲、小平同志的意見為主，另請少奇、老總、恩來酌定。”小平的聲望就此而起。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毛指責搞“清君側”，不會有好下場！他說：“我現在感覺，北京城裡有兩個司令部：一個司令部就是我們這些人的，包括少奇、恩來、老總、陳雲、小平等人在內的這個司令部刮陽風、燒陽火；第二個司令部呢，就是那麼幾個人組織的，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種風，燒一種火，叫刮陰風，燒陰火。這兩個司令部現在是頤年堂門可羅雀，東交民巷車水馬

龍。我在北京，還沒死，饒漱石有事不找我，找其他人，有事不請示中央，請示有的人，什麼圈圈、攤攤的，什麼自首叛變的，亂了陣腳，唯恐天下不亂，唯恐亂的不徹底，想亂中奪權，想渾水摸魚”（引自《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講話摘要—（1951-1955年）》第13頁）。雖然沒有點高崗的名字，但大家都知道了是說他，高、饒開始走下坡路了。

隨後毛表示：“要按照七大的路線來，不要單獨搞一個路線出來，要團結，不要分裂，少奇還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這點不能動搖，他有錯誤要檢討，但是不能動輒就要人下臺，有事不找中央，不找我，就那麼幾個人嘰嘰喳喳的，不好嘛”。毛要求高崗、劉少奇都作自我批評，而他自己則南下杭州休假。1954年2月6~10日七屆四中全會召開，通過《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劉少奇就自己批評東北、山西合作化冒進，批評晉察冀土改，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和天津剝削有功的講話；作了深刻檢討。劉抓住高的宗派活動不放，高崗覺得冤枉。高崗給毛澤東去信要求到杭州見面，毛不同意並把高的信發給政治局。鄧小平在會議上指出高、饒有野心，少奇同志的天津講話並不見得都是錯的。陳雲重複了張國燾事件，暗指高崗就是搞分裂的陰謀家。周恩來聲色俱厲的說：“高崗同志至今沒有對自己的錯誤有足夠、清醒的認識，把主席的講話、政治局的意見都當耳邊風，我認為他這樣做只會越滑越遠”。根據幾位元領導人的講話，中央請示毛同意給高饒展開“同志式的幫助和批評”。

1954年2月15~25日，周恩來主持高崗問題座談會，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饒漱石問題座談會，會前中央書記處通知一律不稱呼高崗、饒漱石為同志，展開徹底的幫教活動，要他們主動的認識錯誤。周回憶說：“高崗脾氣暴躁，喜歡動粗口，操姥姥。那天談話組裡有位警衛局幹部挨操，就打脫高崗三顆牙齒。

當時我氣得發了昏，當即喚來醫生給予治療，我一直沒有離開，並向高崗道了歉”。

不久，高崗 2 月 17 日第一次自殺未遂。2 月 25 日，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做總結發言，代表中共政治局正式提出高崗的“九大罪狀”：散佈“槍桿子上出黨”、“黨是軍隊創造的”謬論；對幹部私自許願封官；高崗無視黨紀國法，與蘇聯人談論黨中央的機密；高崗目無毛主席，在群眾集會上公然接受“高主席萬歲”的口號；在幹部會議上多次妄議毛主席只會打仗、只會古詩文，不懂經濟、不懂工業、不懂建設，而他高崗是全面之材。進行奪取黨和國家權位的陰謀活動，偽造毛澤東的言談，積極反對兩個中央領導同志（指劉少奇和周恩來），假裝推戴另外兩個中央領導同志（指陳雲和鄧小平）；提出自己當黨的副主席等等。此外，還有私生活腐化。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的發言提綱的批語和修改（1954 年 2 月 28 日）：給高崗問題上綱到階級鬥爭的高度——“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實際代理人”、“資產階級在過渡時期企圖分裂、破壞和腐化我們黨的一種反映”。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人民日報》接連發表《學習四中全會決議，正確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保持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反對卑鄙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等社論。4 月 4 日《提高革命警惕》的社論提出：國內外敵人進行破壞活動的主要方法“就是在我們黨內尋找他們的代理人”（暗指高崗為敵人）。社論說：“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有個人主義思想的人，可能被企圖破壞黨、分裂黨的反革命分子、投機分子和野心家所利用”。4 月 19 日，高崗被迫寫了檢討書《我的反省》，承認在全國財經會議上“除批評薄一波同志外，還有指桑罵槐說少奇同志的意思”，“企圖把少奇同志拉下來，使自己成為主席唯一的助手，準備自己將來做領袖”。毛在高崗做出檢討之後私下讓習仲勳給高崗捎話：主席還要用你，不會拋棄你。仲勳未捎話，因此，是年 8 月 17 日深夜高崗吃下隱藏的全部

安眠藥死亡。高、饒成了權力鬥爭的犧牲品。向來對劉有看法、又敢於說話的陶鑄文革初期一度暴升至四哥的地位，卻不敢向劉開炮，相當程度上就是汲取了高崗的教訓：擔心打虎不死，反被虎傷。

何家棟後來批評說：高崗提出一個中央委員的候選名單，為自己拉票，那不是一個黨員應有的權利嗎？如果有一點黨內民主的話，誰都可公開競爭來獲得選票，民主社會中當政者身邊出現權力挑戰者，應該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據說，1950年2月在毛訪問蘇聯即將離開莫斯科之前，史達林把高崗個人給他的全部情報案卷送給了毛。毛利用整倒高崗一事要全體高幹交代他們同蘇聯人的一切：“這裡講一個‘裡通外國’的問題。我們中國有沒有這種人，背著中央向外國人通情報？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崗就是一個。這樣的事就不要幹了。要講就經過中央去講，至於情報，不要去通。”什麼叫“情報”？毛故意不說清楚，人們為了保險起見，乾脆什麼話也不跟蘇聯人說。

高崗事件一石二鳥，既警告了劉少奇，又打倒了高崗；毛大權在握，誰也別想從毛手裡分權，以架空毛。1954年9月2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並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從而不再設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毛為國防委員會主席，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程潛、張治中、傅作義、龍雲為副主席。國防委員會是諮詢性質的機構，不是全國武裝力量的領導機關。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成立黨的軍事委員會的決議》，認為：必須同建國前一樣，在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之下成立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其他武裝力量。決定新的中共中央軍委，由毛澤東、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鄧小平等

12 人組成，毛澤東任主席，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劉少奇的軍委副主席被拿掉，說明了劉少奇地位的下降。

1955 年 3 月，中國共產黨將高崗正式開除黨籍。高崗案還株連了 8 個省級以上的官員，包括中共山東分局第一書記、省政府副主席向明，中共東北局第二副書記、軍區副政委張秀山，中共東北局第三副書記張明遠，中共東北局農村工作部長趙德尊，東北局組織部長郭峰，中共旅大區黨委第二書記陳伯村，國家計委秘書長馬洪和中國駐北韓大使倪志良。

1980 年，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主張為高崗平反，但是被鄧小平阻止。儘管鄧小平說：“高崗批評少奇同志的東西，不是完全批評錯了的，有批評對了的。”但是他堅持認為，“高崗是搞陰謀詭計的。”“反對高崗的鬥爭還要肯定。……處理得也是正確的。”

七屆四中全會結束後，饒漱石花了半年時間，字斟句酌地寫出一份兩萬多字的書面檢查，認真地交代了自己歷史上的四個主要錯誤。1954 年底，蘇共與南共和解、赫魯雪夫為鐵托恢復名譽；這一消息在我國見報後，饒漱石一反其沉默寡言的常態，先後向自己的秘書陳麒章等人大發牢騷，矢口否認自己曾經勾結高崗進行反黨活動，聲稱他那份書面檢查是被迫而言的違心話，進而說他這次“挨整”是陳毅蓄意挑起的打擊報復，並一再表示要向黨中央申訴冤屈。面對饒的這種反常表現，陳麒章等人如實向中央辦公廳寫了書面彙報。

1955 年 3 月 21 日至 31 日，全國黨代表會議如期召開，毛澤東在簡短的開幕詞中，對當時的國際國內的階級鬥爭形勢做出了十分嚴峻的估計，並表示即將在全國範圍進行一次大規模肅反運動的決心。毛號召黨的高級幹部主動交代問題，只要講清楚了，黨組織都可以寬容。陳麒章等人的書面彙報由會議秘書處印發給

全體代表，作為討論高、饒問題的參考資料。

在會議期間，有文件揭發：饒漱石分管華東暨上海市公安工作期間，縱容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長揚帆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和掩護了特務分子、反革命分子達 3300 多人”。

原來上海剛解放時，潘漢年、楊帆根據上級指示，採取“以特反特”，在公安系統暫時留用了部分反正特工、變節分子，利用他們深諳內情的特點，讓他們戴罪立功。而“3300”的數字原本是在解放戰爭時期，一個幹部在閒談時對華東局敵區工作部部長楊帆開的玩笑，說楊帆做敵區工作和保衛工作善於利用各種社會關係，手下各色人物俱全。說古代孟嘗君門下有食客三千，如今楊帆手下超過三千，並隨口謔兩句打油詩：“楊公門下三千三，盡是雞鳴狗盜徒。”當時不過引起一陣哄笑。到了 1955 年，“3300”成了實數，於是擴而大之，凡是地下鬥爭時期與潘漢年有過工作關係的人，都成了懷疑物件。

其實，這是江清的陰謀。1930 年代揚帆按黨的指示，以記者的身份，在上海“左聯”活動，對江青在上海曾被捕叛變自首和生活上的醜聞瞭若指掌。1939 年毛要與江青結婚的消息傳到新四軍軍部；項英很不滿意，他找到瞭解江青情況的揚帆進行調查，並根據揚帆寫的證明給延安黨中央發了一封密碼電報：“此人不宜與毛主席結婚”。經辦這封電報的還有新四軍司令部秘書長李一氓同志。這份電報落到了康生手中。康生把這份電報扣下後給了江青，並欺騙中央說江青歷史清白，使江青始終記恨項英、揚帆和李一氓。江青為了出這口氣，在康生的指使下，先後兩次將揚帆下獄。第一次在延安整風運動後的 1943 年 10 月。幸虧負責審查揚帆所謂歷史問題的是中央華中局社會部部長潘漢年同志，他頂住康生的壓力，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揚帆被關了 10 個月，最後放了出來。1954 年 3 月

下旬，江青收到一封揭露她過去醜事匿名信。江青得到毛的默許，於 1954 年底秘密逮捕上海市公安局長楊帆。揚帆被扣上了“反革命”、“特務”帽子，長期關押，在獄中經受了 20 多年的折磨，雙目幾近失明，並在晚年患精神分裂症，就連來勞改農場接他回家的妻子兒女也相見不相識了。

代表們看過揭發饒漱石材料後，更加群情激憤。代表們對饒的歷史提出了疑問，認為皖南事變中饒的脫險可能不是如他所說的“派警衛員下山收買敵連長成功”，而是被俘變節後被派返的。與會代表在認真討論鄧小平所作的《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後，一致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把饒漱石“永遠開除黨籍”。其實，高崗不是反黨，是和劉少奇的權力之爭、路線之爭，他是擁毛的，是毛為保劉少奇而犧牲了他。

1955 年 4 月 1 日，隨著揚帆“問題”被定性為反革命，經毛拍板，饒漱石又以反革命罪被捕。1965 年已經服刑 10 年的饒漱石因倍受煎熬在獄中患了精神分裂症。1965 年 8 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判有期徒刑 14 年；同年 9 月被假釋。1967 年重新收監。1975 年 3 月因病死亡。

1955 年 4 月 2 日，年僅 49 歲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向陳毅報告了了自己與饒漱石的工作交往情況，並請陳將彙報材料轉呈中央。在彙報材料中，潘還向党傾訴了當年曾去見汪的事，陳毅立即報告了毛。4 月 3 日夜晚潘漢年在所下榻的北京飯店被秘密逮捕，連市長陳毅都不知情。與潘漢年有兄弟關係的南京大學校長潘菽、在武漢的新華社湖北分社任社長的潘梓年一度遭株連。一時間，弟兄三個“反革命”竟在上海、南京、武漢三個長江重鎮竊據高位的傳聞，沸沸揚揚！於是，1955 年 4 月 4 日，入獄僅三天的饒漱石又成為了“饒（漱石）、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案”首犯。後來，官方又將潘漢年的下級——著名女作家和

特工關露等人殺人滅口，中共前地下工作者被中共一網打盡。即使在專案組查不出潘有任何“叛黨”罪行的情況下，毛依然在 1962 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污蔑潘犯有“投降國民黨”的“可殺之罪”。可見，毛做賊心虛，便拋出潘來轉移視線。於是，到 1963 年 6 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以“內奸”罪判處潘漢年有期徒刑 15 年，1972 年潘漢年被永遠開除出黨，改判為無期徒刑，1977 年 4 月 14 日在湖南勞改農場被折磨致死。

1978 年底，中紀委經過反複查檔，最終核實：解放前，潘漢年利用李士群打入日偽內部等情節，是奉中央有關指示，並非潘自行其是。而且，當時中央對潘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不久，中央又查實：揚帆“問題”系江青插手捏造的，旨在掩蓋她過去在上海的不光彩歷史。1981 年，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議上，鄧小平說：高饒事件的性質是“搞派別鬥爭，是分裂黨”，但“不好說是什麼路線鬥爭”。1982 年 8 月 23 日黨中央發出檔宣佈：把潘漢年、揚帆逮捕、判刑、開除黨籍，都是錯誤的。這是建國以來的一個錯案，應予徹底糾正。

揚帆不但活到冤案昭雪的一天，並且有機會通過自己的親身感受反思歷史的教訓。他在自述的最後一節《痛定思痛——我的思考》裡說到：今後發生冤假錯案就不能再強調“既往不咎”了。否則，老是口頭上說下不為例，不認真追究，老是這樣下去，又怎樣保障人權？怎樣主持社會正義？怎樣體現法律的嚴肅性？現在的立法機關應當汲取這些教訓，以形成法律來防止冤假錯案的產生；還應該立法來懲治製造冤假錯案的責任人，並對受冤假錯案傷害者的損失進行賠償。我們已經建國五十年了，重視這方面的立法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這話說了不久，揚帆便於 1999 年 2 月 20 日與世長辭，時年 87 歲。老人臨終前的這片肺腑之言，可謂金玉良言。如果為政者能夠聽得進去，加以實行，必定有功於當世，

造福於後代。

第 103 大肅反

打倒了高饒、胡風後，毛感覺“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他認為，反革命分子已經層層疊疊地鑽進到黨政軍民內部，需要開展了聲勢浩大的肅反運動。

1955 年 7 月，毛在全國開展了“肅清反革命運動”或“消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即肅反運動。1955 年下半年，1430 萬國家工作人員受到“審查”，這“審查”完全是以踐踏人權的方式進行的。方式是“坦白檢舉”，既有精神恐嚇的公審大會，也有肉體折磨的所謂逼、供、信。黨號召大家“揭發”反革命份子，只要有人“揭發”，就可以先把人抓起來或扣起來，一個大學一關就是上百人。辦公室、住宅樓、禮堂、書齋都成了關人的地方。

武漢大學的一位學生對該校的肅反曾作了如下的回憶：“運動深入時(武漢)市委派來了工作組。工作組在大會上對著我們聲色俱厲的吼叫：‘我們已充份掌握了你們的材料證據，在你們面前只有一條出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贖罪，立大功者受獎。’……運動進入檢舉階段，人人都要寫檢舉交待材料……那陣子，天天有人被批鬥，天天有學生跳樓自殺……”（轉引自丁抒先生著的《陽謀》中注釋）。不知製造了多少冤案，逼得多少人走上死路。北大歷史系王承照在肅反時挨鬥自殺，罪名是“三青團骨幹”。

1955 年 5 月 17 日，毛在十五省市書記會上定了指標：將暗藏的反革命“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反革命五年抓 150 萬，每年 30 萬”。也就是說在這場運動中，至少有 71.5 萬人被打成反革命。財政部黨委在肅反開始時先定了 5%的指標，即將部內百 5%的作為反革命抓起來“審查”。所以披關押、鬥爭的那些人不是有罪而是倒楣罷了。江蘇文聯，2/3 的成員被關進監獄。全國人民

噤若寒蟬，愈是相熟的人，見面除了談天外，國事、校事一概三緘其口，惟恐被別人抓住小辮子，說不定哪一天挨整。

這次肅反已在 1980 年代正式予以否定。在“肅反”運動中，有 21300 餘人被判死刑，4300 餘人自殺或失蹤。有人稱“鎮反肅反”殺人達 3000 萬。

比江青大 10 歲並比江青早到延安的丁玲也曾得到毛的青睞。丁玲位居毛澤東公開為之題過詞的三女性之首。丁玲被稱為文小姐與武將軍，楊開慧是驕楊，而江青則被喻為仙人洞。

丁玲原名蔣冰之，湖南臨澧人，1904 年生，21 歲與胡也頻同居。1928 年初，丁玲發表《莎菲女士的日記》，並對地下黨員馮雪峰一見鍾情。胡也頻被馮雪峰赤化，投身恐怖活動，1931 年 11 月被捕，3 個月後被殺，成為“左聯五烈士”。被欲火和怒火燒得頭腦發昏的丁玲於 1932 年正式加入共黨，主編“左聯”機關刊物《北斗》雜誌，並與另一地下黨員馮達同居。1933 年被逮捕關進南京監獄。國民黨試圖感化丁玲，讓她在獄中與馮達繼續同居，並生下一個女兒。當丁、馮在軟禁中過著悠閒的夫妻生活時，馮雪峰、沈從文等各方人士積極營救，發表文章紀念丁玲，抨擊政府，讓國民黨失去不少民心。1936 年丁玲被釋放。

1936 年 11 月 12 日丁玲抵達中共的所在地陝北保安縣瓦窯堡，見到毛澤東。兩位老鄉一見傾心，親密相處了幾天幾晚。丁玲說毛在瓦窯堡時即表現出來帝王思想，曾拉著她的手把瓦窯堡的女人(包括紅軍女戰士、未及逃亡的地主小老婆)數了個遍，封了個遍，也未能湊齊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中宣部在一孔大窯洞裡開會歡迎她，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都出席。沒當過一天兵的丁玲，竟被任命為中央警衛團政治部副主任。在慶陽前線，丁玲收到一首詞，那是毛澤東用電報發來的，後來發表時題為《臨江仙·給丁玲同志》——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

漫捲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 纖筆一支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用電報寫詩，這在中外文學史上恐怕也算一樁奇聞。毛澤東當時對投奔蘇區的文化人寄望厚愛之深，由此可見。不久，丁玲從前線回來，毛澤東又親筆抄錄了全詞給她。

1937 年初國民黨當局容許中共遷入延安城。毛隨即任命丁玲為八路軍總司令部延安留守處主任，過後才由蕭勁光接任。讓毛振奮的是，夕照下的邊關孤城，不再寂寞，因為有了新人的到來。風姿綽約的北平女子吳廣惠、金髮洋女史沫特萊來到了延安，並進入了毛的私生活，自然要把女作家放棄了。丁玲隨後到了山西太行山八路軍總部。據說她最初追求過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朱德把丁玲推薦給彭德懷，彭德懷對朱德說：“我敢要她？她是個遊擊主義者！”朱德說：“遊擊主義有什麼不好？我們不都在太行山上打遊擊嚕”。彭老總說：“人家是在個人感情上打遊擊！找男人打遊擊，還有什么杯水主義……。”後又追求總參謀長劉伯承，均未獲結果。以後重返延安，在“紅軍大學”任教，並主編《解放日報》文藝副刊。後與她的秘書、小她 14 歲的劇作家陳明結婚。

抗戰勝利後，丁玲去了華北，參加土改，寫了長篇小說《太陽照耀在桑乾河上》，經推薦，獲 1951 年度“史達林文學獎”2 等獎。中共建政北京後，丁玲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中央文學講習所所長，《文藝報》主編，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文學藝術聯合會副主席等，紅極一時。她與中共的另一員文藝大將周揚宿怨新仇，關係日趨緊張。

1955 年夏天，毛澤東忽然念及舊情，約請丁玲在中南海裡劃過一次船。玉液泛舟，眷顧隆恩。小船上只有毛和丁玲兩人。毛自然是親自掌舵了，憶述之余，

毛忽然問：冰之，你工作有甚麼困難？你覺得周揚這人怎樣？丁玲見主席親切地喚起自己的小名，一時忘乎所以，半嬌半嗔地把歷年來心中積蓄下的對周揚的怨恨，一古腦列數出來：周揚有十大問題……丁玲太過天真，太過政治化了。她原該繞過毛的話題，說些開心有趣的事，逗毛快快樂樂，使毛喜歡她，為日後的再次被寵鋪平道路。可是共黨的鬥爭哲學使她執迷，從而犯下了她一生中最大的失誤……毛澤東認真地聽著，凝視丁玲的面龐。此時的丁玲，年近半百，身子發福，頭髮也變了色，臉上有了皺紋，徐娘老矣，不復當年風韻……毛澤東耐心聽她講完，倒真的笑了：“你講周揚有十大缺點，我倒是覺得周揚還有兩個優點，他的馬列主義水準可以……”。此後，毛再沒有單獨召見過丁玲，他已覺得她已是個乏味的女人。

1955年8月3~9月4日，中國作協黨組舉行了約70人參加的黨組擴大會，對丁玲陳企霞進行了批判鬥爭。“丁陳”問題是從追查一封匿名信開始的，該信向中央反映了對作協黨組領導人在處理《文藝報》問題上的意見；官方認為是陳企霞所寫，牽連到丁玲；接著追查丁玲與胡風有關“反革命關係”及康濯“揭發”丁、陳反黨問題。這以後，作協前後召開了16次黨組擴大會，加緊揭發“丁陳”問題的罪證與批鬥“丁陳”的反黨罪行，同時又通過莫須有的罪狀於1955年8月19日將陳企霞逮捕。會議結束後，由中宣部副部長兼作協黨組書記周揚主持，寫成了《關於丁玲、陳企霞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處理意見的報告》，並代中央起草了批語一同呈報。9月30日，由部長陸定一主持的中宣部部務會議通過了這個報告，並上報黨中央。經毛澤東批准，中央書記處於1955年12月15日將此檔批轉全國縣團級以上黨委。

《報告》列舉了“丁陳反黨集團”的罪狀有四點：一、拒絕黨的領導和監督，

違抗黨的方針、政策和指示（所謂不尊重或反對黨的領導，是指丁玲和周揚的關係。丁玲對周揚有些意見，絕不能說是“反黨”）；二、違反黨的原則，進行感情拉攏，以擴大反黨小集團的勢力；三、玩弄兩面派手法，挑撥離間，破壞黨的團結（是指挑撥周揚同胡喬木之間的關係，報告中沒有提出具體事實）；四、製造個人崇拜，散播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報告認為，丁玲在作家中提倡“一本書主義”，鼓勵作家寫出一本書，以此為資本，和黨鬧獨立。調查結果是，丁玲在一次向文學講習所的學員講話時談到，作為一個作家首先應有作品，如果一本書也寫不出來，那算什麼作家呢？若說丁玲提倡“一本書主義”，她不只寫了一本書；若說名，丁玲早在 30 年代就聞名國內外了；若說利，丁玲把《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所獲史達林文學獎金全部捐給了全國婦聯婦女兒童委員會；平時所得稿費也大部分交了黨費或買了公債。關於《文藝報》主編問題，原來主編是丁玲，陳企霞是副主編。後來丁玲提議陳企霞也提升為主編，曾口頭請示過周揚。周表示同意後，刊物上才並列出丁玲、陳企霞兩個主編。這頂多只能說是任命主編手續不完備，不能說是向黨鬧獨立。因為在宣佈前已經請示了領導。

1956 年 5 月初，陳企霞、李又然的“託派嫌疑”終於被作協“肅反”五人小組與公安機關所否定。5 月 22 日，他們二人恢復了自由。恢復了自由而又不知被開除出黨的陳企霞、李又然，立即向機關黨委申訴。陳企霞在申訴中，還把他與周揚之間在政治問題、學術問題、思想問題上的分歧以及相互關係中的問題做了全面陳述。他認為作協黨組向中央的那個報告是捏造事實，是對他的政治迫害。李又然也原原本本地敘述了他與周揚之間的各種意見分歧。1956 年 6 月 28 日，中宣部部長辦公會議討論了“丁陳”的申訴，同意陳企霞、李又然繼續參加黨的生活；成立以常務副部長張際春同志為組長的審查小組。經過慎重的調查，

得出此案不成立的結論。1956年12月，陸定一在中宣部部務會議上埋怨周揚說：

“當時一再說要落實、落實，結果是這樣的！”周揚即刻表明：1955年對丁玲的批判並不出於他的建議，而是根據毛主席（恐怕是江青）的指示，他說他當時還在毛主席面前說了丁玲的不少好話。

1957年1月，周揚和作協黨組將“反黨小集團”改為丁玲、陳企霞“對黨鬧獨立性的宗派結合”，“不應以‘反黨小集團’論”。1957年6月6日，作協黨組召開黨組擴大會，周揚首先講話，表示1955年對丁玲的批判是不應該的，“反黨小集團”的結論是站不住的，並向丁玲等表示歉意。出席會議的同志一致認為，1955年的錯誤批判和結論應該撤銷，應該消除這一批判所造成的後果。丁玲提出質問：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錯誤？陳企霞講話更尖銳些。領導們對所提出的問題無法解答，但又不願接受批評。會議因此出現僵局，宣佈休會。

休會期間，形勢發生了變化：反擊右派的運動開始。作協迅速將無法解決的“丁陳”一案轉向“為‘肅反’翻案”的新罪名。隨後，在中央宣傳部部務會議對丁玲的歷史結論要重新進行修改。在沒有發現任何新事實、新證據、新證人 and 新理由的情況下，宣佈將原結論改為：丁玲被捕後叛變；從南京回到陝北是敵人有計劃派回來的。這個決定宣佈後，張際春問周揚：原來結論是你同意後才簽發報中央的，你現在又不同意有什麼根據？……接著，作協黨組擴大會於7月25日復會。主要是批判丁玲等“向黨進攻”，指責“反黨小集團”要翻案等等，會議規模由原來的幾十人擴大到幾百人。先安排陳企霞作“坦白交代”並揭發丁玲。會議進行中有一些人憤怒指責，一些人高呼“打倒反黨分子丁玲”的口號。在此情況下，把丁玲推到台前作交代。丁玲站在講臺前，面對人們的提問、追究、指責和口號，無以答對。她低著頭，欲哭無淚，要講難言，後來索性將頭伏在講桌

上，嗚咽起來…… 會場上一陣混亂。直到 1957 年 9 月 16 日周揚在《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的講話中，除肯定丁玲等是“資產階級右派反黨集團”外，還宣佈丁玲“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個人主義者”；她“早在 1933 年在南京向國民黨自首”“背叛了共產黨和工人階級”。周還點名批判了十多名知名的作家、藝術家、詩人和戲劇家，把艾青、馮雪峰、羅烽、白朗、陳明等人，與丁玲、陳企霞一道歸結為“資產階級右派集團”。隨後，又對丁玲等的作品繼續組織了“再批判”，打倒了一批有成就的作家，否定了一批有好評的作品。周揚後來回憶說：抓右派之前，毛主席給我一個名單，名單上的人都要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彙報“戰果”。我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麼辦？主席說，翻延安的老賬！

1957 年 10 月 13 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講話說：“有的人進了共產黨，他還反共，丁玲、馮雪峰不就是共產黨反共嗎？”1957 年毛澤東改寫的《再批判》說：“王實味、丁玲、蕭軍的文章，當時曾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當做反共宣傳的材料，在白區大量印發。蕭軍、羅烽等人，當時和丁玲、陳企霞勾結在一起，從事反黨活動。丁玲、陳企霞等人在此後的若干年中進行了一系列的反黨活動，成為屢教不改的反黨分子。……丁玲在南京寫過自首書，向蔣介石出賣了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她隱瞞起來，騙得了黨的信任，她當了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的主編，陳企霞是她的助手。羅烽、艾青在敵人監獄裡也有過自首行為。”1957 年還要拿出來再批判的奇文《三八節有感》裡面有一句：“而有著保姆的女同志，每一星期可以有一天最衛生的交際舞。”被認為是諷刺江青的。丁玲晚年承認，確有諷刺江青之處：“那時文抗的俱樂部，每逢星期日就有幾個打扮得怪裡怪氣的女同志來參加跳舞。‘每星期跳一次舞是衛生的’”（《

玲自傳》第 232 頁)。可見，丁玲是確實“傷害”過江青的。而以江青的心胸，也是完全可能進行報復的。

1958 年 8 月 14 日，召開中央各宣傳文教部門的黨員骨幹大會，並吸收黨和國家其他部門的代表參加，宣佈已被中央批准的“李之璉、黎辛反黨集團”的處理結論：李之璉被定為“極右分子”，黎辛被定為“右派分子”，都開除黨籍；張海和崔毅被定為“反黨分子”，都留黨察看兩年；四個人都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李之璉從行政七級降為十三級，其他人也都從原來的級別下降四級或五級。

《中共中央宣傳部整風領導小組關於極右分子的政治結論》列舉李之璉的“主要反動言行”一共有四條：一、鼓動丁玲並同她合謀翻案；二、反對“肅反”運動；三、寫反黨作品誣衊轉業軍人；四、1934 年被捕後叛黨。給他戴的帽子也有四頂：“階級異己分子”，“極右分子”、“叛黨分子”，“反黨集團首惡分子”，另有“野心家”、“陰謀家”等頭銜。在他們的眼裡，李之璉等人聽取陳企霞的申訴是“鼓動翻案”，而劉白羽等人複查“丁陳”案件卻是正當工作？這完全是顛倒事非！隨之而來的就是在全國範圍內，凡是實事求是地說過丁玲好話的人，都一一受到檢查處理，或定為右派，或定為反黨分子。

丁玲被開除出黨後，到劉白羽那裡去痛哭：“白羽！離開黨我很痛苦……”

（《人民文學》1986 年第四期第 43 頁）。自 1958 年起，她在農場養雞，小孩見了她就罵北京來的臭右派，就用石塊、土塊擊打。到了 80 年代，她回憶自己當時的表現時寫道：“一切辱罵、諷刺、一切冠冕堂皇言詞下的造謠誣陷我能忍受嗎？我能反抗嗎？我能辯護嗎？我只有匍伏流涕，錐心泣血，低頭認‘罪’”

（丁玲：遠方來信，人民文學 1985 年第 3 期）。1966 年文革風暴一來，她被投入監獄，直關押到 1977 年才出獄。1978 年末，李之璉、黎辛、張海、崔毅被平

反。1980年1月，丁玲案被定為“右派”的結論，經中央批准，作了改正，恢復了黨籍（隨後各地為此受株連者也或前或後逐個得到平反或改正）。

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期間中國作協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丁玲發言時說道：“一個人認識自己是最難的，毛主席最了不起了，但認識自己也那麼難，他對我怎樣，不管，但我對他是一往情深的。現在看到很多人還在指桑罵槐罵他，我心裡是很難受的”。真是露水夫妻難忘恩啊。在晚年為《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所寫的《重印前言》中，丁玲有這樣的回憶：“那年冬天，我腰痛很厲害。原來一天能走六、七十裡，這時去區黨委二裡來地走來都有困難。夜晚沒有熱水袋敷在腰間就不能入睡。白天我把火爐砌得高一些，能把腰貼在爐壁上燙著。我從來沒有以此為苦。因為那時我總是想著毛主席，想著這本書是為他寫的，我不願辜負他對我的希望和鼓勵。那時我總是想著有一天我要把這本書呈獻給毛主席看的。當他老人家在世的時候，我不願把這種思想、感情和這些藏在心裡的話說出來。現在是不會有人認為我說這些是想表現自己，抬高自己的時候了，我倒覺得要說出那時我的這種真實的感情。我那時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還伏在桌上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下去，像火線上的戰士，喊著他的名字衝鋒前進那樣，就是為著報答他老人家，為著書中所寫的那些人而堅持下去的。”

第十六章 慘絕人寰的毛氏奴隸制

農民苦，背朝青天面朝土。

農民悲，四方攤派八方催。

農民愁，孩子沒錢把書讀。

農民累，勞作年年不夠稅。

第 104 節 統購大剝削

辛顥年說：1950 年 12 月開始土地改革，在短短的的一年土改當中殺了 260 萬地主，把農村中優秀的種田人殺了 260 萬。中國從 1952 年就開始餓死人。

1949 年前，中國有著完整的全國性私營的糧食供銷系統，黨執政後實行“統購統銷”，利用國家財力囤積糧食、哄抬糧價，然後命令全國 23 個大中城市同時拋售，一夜之間打垮了全部私營糧商，多少人因此而傾家蕩產、自殺身亡。這個由所謂中共的經濟專家陳雲主持的“統購統銷”的陰謀，被毛得意地肯定為“不亞于一場淮海戰役”。統購統銷政策毀滅了歷經晚清和民國近百年的奮鬥才得以發展的市場經濟體制，強制建構了專制的權力型經濟。

1950 年，廣西一個地區徵收了過頭糧，導致了 1000 多人被餓死，省委第一書記被撤職。

1949 年後的土地改革導致了商品糧短缺，為了擠出農產品以供出口，中共不得不於 1953 年 10 月頒佈農產品的“統購統銷政策”，農民完成國家糧食徵購任務之後剩下的才是自己的。這一政策實際上是把農民的產品全部拿走，只留下維持生存和再生產的部分。

在決定統購統銷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把征糧比喻為打仗：“一面對付出糧的，一面對付吃糧的”。毛特別說：“馬克思、恩格斯從來沒有說過農民一切都是好的”。很明顯，當時的政府已經明擺出一副你農民要死就死去的架式。陳雲接著向各省管糧食的傳達毛的指示，全國即使十萬個村子出現“逼死人或者打扁擔以至暴動”的事件，仍然要征糧，這是不會危及共產黨統治的，他舉例說：滿洲國也搞過嚴厲的強行徵購，“但就是這樣，如果蘇聯紅軍不出，滿洲國還不倒。”換言之，共產黨是垮不了的，不管它怎樣對農民巧取豪奪。

毛政權定了個人均“口糧”標準，依據的是傳統南方農村“不饑不飽”的水準：4百斤原糧。但這個標準很少達到。毛去世的那年，人均口糧僅為381斤。對農民的口糧，毛說：“有些地方只要280斤糧食就夠了，有的只要220斤糧食”。北京西郊一位老農民說：“土改分地以後，我分了這塊地，一年忙到死，也混不了一家幾口人的生活。未等秋收先把你的糧叫政府號下了。先交公糧，然後統購，給你剩下的糧食簡直不夠一家人吃，一年至少缺三個月的糧，全家是吃稀粥，煮點野菜，雜七雜八混吃一頓。統購賣糧所得的那點錢，還不夠完雜稅，和各樣官派的開銷。”國家對農民說，糧不夠吃的可以買“返銷糧”。返銷糧遠不能滿足農民的需求，毛不斷告誡幹部們：“現在有的地方糧食銷多啦！”對農民挨餓，毛的答覆是要農民用喂豬的“薯葉填補”。1955年8月3日批示道：“教育農民吃少點，吃稀一點，國家則要盡可能減少銷售，以免在一般農民有糧季節吃得過多”。

統購統銷開始時，農民覺得政府就是強盜。廣東新會縣蓮溪鄉的政府、高要縣第九區的政府就是這樣。他們拿著秤挨家挨戶要糧食，不賣的就當場綁起來。一份報告披露說，高要全縣各區均發生嚴重的吊打現像。1955年在廣東省任職的趙紫陽，在調查報告裡描述基層幹部如何用捆打、搜屋，封家等辦法逼著農民交糧。廣東新會縣蓮溪鄉一個村子“將一老嫗封在屋內，至上吊自殺”。1955年1月以前，“全省因購糧自殺者111人”。

征糧制度實行一年之後，到1955年初，全國已是一片天怒人怨。無數報告飛向毛的案頭，報告說農民如何“吃樹皮、草皮”，如何“賣子女”，如何“老弱者躺在床上餓死”。中央警衛團戰士回家探親，毛要他們寫報告，講村子裡的情況。他們筆下出現的是一幅幅黑暗的圖畫。有的說：“缺糧戶達到百分之五十。

今春沒有東西吃，只好吃樹葉。”有的說：“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兩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有人因此中毒身亡。”

各地的反應還有：“社會主義在哪裡呢？現在就不給油吃了！”“光叫生產加油，沒有油吃還加油呢。”“共產黨把我們當魚鷹，脖子一壓，大魚小魚都吐光了。”

1955年4月11日中央農村工作部的秘書長杜潤生透露：浙江農村賣傢俱、吃種糧、要飯、賣子女，請願、老弱者躺在床上餓死等現象已續有發生。當時的浙江，被稱作全國冒進第一。1955年4月，浙江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吳植椽在全國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上的發言披露，浙江被活活整死農民為134人。

薄一波回憶說：“正如陳雲同志所預計的，統購中國家同農民的關係是緊張的，強迫命令，亂批亂鬥，逼死人命等現象都發生過。個別地方還發生了聚眾鬧事的事件”。山東曹縣，統購和合作社運動中提出的著名口號是“那個運動還不能不死人，看死的什麼人”。

一些有正義感，有勇氣的人上書毛和中央政府。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黃炎培給毛寫信說，他的江蘇家鄉，“一般居民生活苦，尤其是農民特別苦，農民說：我們吃不飽，哪有力氣去種田呢？”毛不為所動，反而整黃炎培，說：“黃炎培，得意得不得了，整他一下。”毛還理直氣壯地說：“缺糧戶，不是一年到頭都缺糧，頂多缺四個月”，“頂多六個月”。有的高級幹部用“良心”這個概念懇求毛手下留情。毛斥責他們說：“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是很沒有良心哩！馬克思主義是有那麼凶哩，良心是不多哩”，“良心少一點好。我們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厲害，就是說，不那麼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在1955年5月9日對李先念、鄧子恢兩位副總理談話時說：“農民對社

會主義是有矛盾的。農民是要自由的，我們要社會主義。”（《黨史研究》1984年第4期。）可見，社會主義沒有自由的，社會主義是通向奴役的道路。

1957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為了讓農民走集體化道路，而集體化是為了從農民那兒多弄點糧食。中央辦公廳的一份檔提供了證據：廣東、雲南實行的社會主義教育，在打擊了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的同時，還幫助了完成糧食任務。“從運動初步情況來看，效果很好。……對糧食統購統銷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潮陽縣五個鄉統計，在216個單幹戶中，原來只賣糧1.3萬斤，經過說理鬥爭後，多賣了6.2萬斤。”

河北省武邑縣以第一書記蘇波為首的三位書記于1958年5、6月間向上報告說農民糧食太少，“逼得群眾賣兒賣女，拆房扒屋，上吊自殺，變賣家產，離鄉背井，要飯討生”。他們決定開倉放糧，放了190多萬斤糧食給農民。3位書記被定為“右派反黨分子”。

甘肅成縣縣委書記郝萬傑、副書記馬炎駒認為糧食徵購任務太重，質問上級“要農民還是要糧食？”結果二人成了右派、“黨的叛徒”。

1957年底甘肅民樂縣到農民家中挖糧，引致部分農民餓死，三堡鄉黨委書記保世雄於1958年2月化名給毛澤東寫信，反映缺糧的情況；結果被打成“反黨分子”，開除公職。

迄今為止，公開披露出來的統購統銷期間最著名的整死農民的案件是甘肅鎮原“反革命集團案”。1958年甘肅省鎮原縣縣長許國和、副縣長張萬壽如實上報嚴重缺糧，卻被定為“許、張反革命集團”。鎮原是甘肅省的一個自然條件很差的地方，在一個國家向農民要糧食幾近瘋狂的年代，這個地方的農民卻要吃返銷糧。這是這個地方的農民命運悲慘的最大原因。

1958年7月，平涼地委副書記潘煥傑、檢察長胡禮新帶工作組進駐鎮原縣，他們的使命是要揪出影響糧食增產的反革命分子。兩個月之後。他們在這個貧窮地方居然查出“階級敵人”2千多人，被逮捕的人數達1096人。考慮當地如此緊張的形勢，甘肅省第一書記張仲良聽完工作組的彙報後居然立即表態說：“事不宜遲，遲則有變，立即逮捕，一網打盡。”當晚，前來打擊階級敵人的除了公檢法這些專政機器之外，還有正規公安部隊。

鎮原縣城開始戒嚴，機槍隨處可見，然後，全縣大逮捕開始。大逮捕時，全縣分為五片，每片派一名工作組成員或縣委常委擔任工作組長，隨身攜帶蓋好印章的逮捕證，隨時填寫，隨地捕人。一次，工作組負責人在先鋒農業社聽到群眾反映沒糧吃，請求供應回銷糧，即指示隨從人員把反映問題的人名記錄下來，立即召開群眾大會，一下子逮捕48人，其中有一地主成份的人與村裡的一個貧農社員重姓重名，在逮捕大會上叫到這個人的名字時，那名貧農社員應聲站起來，結果就被逮捕，不久即死於獄中。另一次，工作組負責人和縣委一副書記到馬渠一帶下鄉，幾天時間就抓了2百多人，還用麻繩把人串起來，一串一串地往縣上拉。張溝大隊有個社員到大隊部要糧，問姓名，回答說“劉國章”，工作組負責人居然荒唐地說：“劉關張！劉關張在三國時就搞得烏煙瘴氣，現在又來搞亂社會主義，給我抓起來。”此人嚇得轉身就跑，結果還是被抓進監獄，不多時即死在獄中，其母親也餓死了。

1958年10月31日，甘肅省委批准將此案定為“許國和、張萬壽反革命集團”案，到1958年底，全縣先後有3000多人受批鬥，347人戴上“四類分子”帽子，1650人受株連，1503人被捕（在社會上還逮捕了1347人），死於獄中333人，被管制147人，老百姓被迫扒驢糞、鑽雞窩，抱磨盤、拔鬍子。僅在7

～9月就有870多名農業社幹部被當作“白旗”拔掉，他們是農村收集原始資料的主力軍。

第105節 災難性的合作化

為了便於征糧，1955年中期，全國農村實行合作化。沒有合作化，個體農民是先收穫，再上繳給國家。這就使農民可能藏糧。中國農民有幾億，要挨個檢查談何容易。合作化後，收成從田野裡直接到國家手裡，再由國家分發給農民，國家對收穫全盤控制。合作化對毛的另一個好處是能監督農民勞動。1956年元旦，《人民日報》社論要今後農民幹活時間加倍。

1952年的4～8月，一個包括全國勞模和農業科技工作人員在內的二百余人的龐大中國勞模代表團被派往蘇聯，此行的目的是學習社會主義老大哥的集體化經驗。勞模之一吉林韓恩農業市場合作社領導韓恩說：“蘇聯今天的道路，就是我們明天的道路”。與此同時，黨的喉舌也開始為集體化迅速製造輿論，大意是如果不走集體化的道路，舊社會就要馬上捲土重來。1953年初中共成立了中央農村工作部，由鄧子恢任部長。1953年共黨正式通過了《關於農業合作生產互助合作的決定》，開始了農業合作化運動。

早在建國前，高崗領導的東北在搞農民互助組時就首先使用經濟強制手法。高崗領導的政府通過直接和間接手段強迫農民加入互助組比率達高達70～80%。強迫方法之一是無休止的開會，說服，直逼得農民怕耽誤生產不得不答應為止。在強迫入社外，還有強迫不許退社。有的地方規定，組員要退組，第一次給予批評，批評後仍然要退，就只能‘淨身出組，車馬留互助組’，而且不准組員和退組戶來往。有的還規定，哪個互助組散了，罰款一百萬元（舊幣），給軍屬代耕一垧地。吉林、松江兩省某些老區，採取各種方法排斥限制單幹，如單幹戶出門

不給開路條，開荒時不准先占場子。……不給貸款、貸糧、貸農具、合作社不賣給任何東西。有的人甚至提出單幹戶沒有公民權，單幹戶“不僅在生產上步步感到困難，而且在人權上受到歧視”。河北雄縣北沙口鄉，有的社員因不滿要求退社，鄉總支書記威脅社員說：“退社就是和國家分家，分了家，糧食局、供銷社、農業社一律跟你們絕交。”

山西長治晉誠一些農民因為沒有人社，供銷社幹部拒絕賣食用油給他們，晉誠三區賈泉供銷社規定社員加入農業社每人每月共油七兩，入了互助組六兩，“單幹”社員只供五兩。甚至把大農具都集中在社裡，不入社不叫使用，或以派差、換地塊等手段脅迫群眾入社；許多合作社將農民的耕畜、農具等全部歸社公有；造成了混亂，以致不少地方一冬無人拾糞，副業生產無人搞，場、地莊稼無人收，牲口無人喂（甚至有餓瘦、餓死者），有的地方甚至發生了賣土地、賣牲口、砍樹、殺豬、大吃大喝等現象，嚴重危害了農業生產。

除了經濟強迫外，還有政治強迫。即將所有事情，無論大小，上綱上線，如與愛國主義、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美帝國主義掛鉤，對農民搞“政治威脅”。這種“政治威脅”法是共產黨政府在歷次農村運動中使用的慣常手法。河北省大名縣的兩個社，發展社員時在街上擺了兩張桌子，村幹部向群眾說：“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看你走哪條，要走社會主義的在桌上簽名入社”，“誰要不參加社就是想走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美國的道路”。山西長治黎城的幹部，以“不入社就是不愛國，不愛國就是想美國”等威脅群眾報名加入合作社。在那個中美之間處於敵對狀態的年代，讓美國與自己有瓜葛是禍非福。浙江吳興縣善連區利用一次鬥爭富農大會向群眾宣佈：“走社會主義道路，就辦社。不入社，跟他們一樣。”這一招真靈驗，農民怕重新劃分成份，與富農為伍，便苦苦哀求

入社。

農民最需要的是一種作為種田人的自由感。這種自由感就是“幹活自攢自，有勞有逸，自由自在”。合作社時代的“吹哨集合，插旗幹活”這種近乎軍事單位般生活，農民會有自由感嗎？有的合作社不准串親趕集，不准私自經營副業、否則以“違法集體利益論處”。有的合作社甚至規定，夜間不准私自外出，違者以“偷竊論處”。為了實行此規定，有些鄉在街口持槍站崗搜查。在這種情況下，怪不得農民說“入了社，還不如勞改隊”。

農村一進入“社會主義”就出現了惡劣的後果。合社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民以殺自家的牛、羊、豬，砍掉自家的林木來表示抗議。1954年全國已建成的10萬個合作社，有1/4在1954年減了產。由於果樹入社是不付酬的，農民不願共產，寧可砍樹；豬羊不願送到社裡，自己宰殺；而歸到社裡去的大牲口，由於管理不善，死亡極多，全國一下子減少了200萬頭以上，1955年合作社耕牛死亡60%。1955年廣西遭受旱災和水災，由於合作化災難和國家徵購“過頭糧”等，致使1956年廣西發生春荒，尤其平樂地區的平樂、荔蒲、橫縣3個縣，發生大規模餓死人、浮腫病等嚴重事件。據統計，三縣餓死550人，14700多人流離失所，討飯渡荒。1957年6月14日國務院52次全體會議，監察部部長錢瑛作《關於1956年廣西省因災荒餓死人事件的檢查報告》。報告強調，這一事件的客觀原因，是水旱災害和56年春雨連綿，早熟作物減產50%左右。而主觀原因是當時的廣西省委、省人委主要負責人的官僚主義作風問題嚴重。國務院作出《關於廣西省1956年因災餓死人問題給有關失職人員處分的決定》，省委第一書記陳漫遠和省委書記郝中士、肖一舟撤銷黨內外職務，3人均調離廣西。同時，分別給平樂地委、專署和平樂、荔蒲、橫縣三縣縣委、縣政府有關失職人員撤職留黨

察看、記過、嚴重警告等處分。《人民日報》18日發表社論《堅持同漠視民命的官僚主義作鬥爭》。改組後的廣西省委常委、副省長陳再勵、常委王夢周、委員廖原、駱明、王浩、候補委員廖聯原等鳴不平，認為餓死人是合作化與糧食統購統銷的惡果，中央在農村工作中“犯了路線錯誤”，後來，他們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1955年中共中央書記處到浙江的調查組指出“在15個縣裡曾發生60多起群眾騷亂，開化縣一個縣餓死10人，群眾挖樹根吃得臉腫”。中央發現後，經毛批准，提出對農業合作社進行整頓。時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長的鄧子恢認真執行，全國合作社縮減了2萬個。

1955年農村工作部提出：到1956年春季農業合作社發展到100萬個，翻半番；該計畫得到政治局會議批准。五月下旬，毛從南方回京，主張修改計畫，加快發展，從65萬個發展到130萬個，即翻一番。鄧堅持自己的主張，理由是這個數字已經由政治局批准，毛本人當初也曾同意過；從1954年秋的10萬個社到1955年春的65萬個社，已很快了，存在的問題很多，應著重鞏固現有的合作社。毛自己改變了主張，卻反咬鄧一口，說鄧專替資產階級、富農打主意。1955年7月31日，毛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訓斥鄧子恢“象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對合作化運動有“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是右傾。甚至說他們是“從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出發”。這就把關於合作化發展速度的爭論，誇大成階級矛盾。毛的報告傳達到農村黨支部，各地黨組紛紛反對“右傾”，農業合作社迅猛發展。

1955年9月毛在七屆六中全會上宣佈“使資本主義在六億人口的中國絕種，我們要使資本主義在地球上絕種”；並把鄧子恢和中央農村工作部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劉少奇本是鄧子恢的支持者，他如果是個堅持原則的人，這時理應站出來抵制毛的翻番的主張，堅持按政治局的決議行事，並批評毛的蠻橫霸道的作風。然而，他為毛的霸氣所懾，毫無鬥志，一味退讓。他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上作了檢討。不過，他還是說了幾句實話：“我以為在土地改革後……大約還要一些時候，再來普遍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因而對於…合作社沒有認真地加以提倡和研究。”對此，宋慶齡於1955年寫信給毛，信中說：“我們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曾向工商界許下長期共存、保障工商業者的諾言。這樣一來，不是變成自食前言了嗎？資本家已經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懷疑和恐懼，不少人後悔抱怨。”12月毛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和按語，對合作化中的“右傾機會主義”給予更尖銳的批評。到1956年初，全國農村就基本合作化了。毛在1956年1月25日的第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表達了對社會主義來得太快而感到意外，他說：“誰料得到？現在又沒有孔明，意料不到那麼快。”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農戶，達到全國農產總數的96.3%，其中參加高級社（即包括土地等生產資料在內全部人社的合作社）的占全國農產總數的87.8%。

1956年1月25日，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通過了政治局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毛主持會議並指出農業與手工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將大大解放生產力。3月26日，周恩來簽署發佈《國務院關於切實做好春荒救濟工作的指示》。4月30日，《人民日報》宣佈，全國90%以上的農戶進入合作社。6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業合作社要注意多種經營的通知》，隨同下發的譚震林報告，稱“農村生活起了巨大的變化，討飯和主要吃稀

飯的人沒有了”；然而廣西發生 1.47 萬農民外逃、餓死 550 多人的事件，算是對譚報告的回應；8 月 26 日，周恩來、陳雲在北戴河國務院常委會上說，“看來，每人平均的農產品有下降的趨勢”；8 月 28 日，國務院第 36 次全體會議聽取李先念副總理關於全國各地受災情況救災工作的說明；28 日中央辦公廳轉發農村工作部《關於當前接待群眾來訪的重要情況和今後的意見》稱，今年上半年上訪群眾為去年的三倍，7 月 5~20 日接待更達 344 人，接近上半年一個月的接待量。來訪者皆為 14 個省的農民，他們主要要求退社，而且態度堅決，還代表著背後的一批動搖戶。其原因一是收入減少，生活下降，有困難無法解決；二是幹部不民主，違法亂紀，打罵百姓，財務帳目不公開。10 月 26 日，《人民日報》發表農業發展綱要 40 條的《修正草案》，各地學習後紛紛制定本省糧食產量指標，例如湖南省便制定到 1967 年增加一倍年產量的計畫。很顯然，“農村社會主義高潮”是與農產品產量下降緊密相連的。

1956 年 9 月，中中國首任糧食部長章乃器來浙江視察糧食工作，途經青田，順便回故鄉小源（今東源鎮）看望鄉親，瞭解民情。他用家鄉話與鄉親們拉家常，探問百姓疾苦。東源村有七八位村民參加座談，鄉親們紛紛反映幹部虛報產量，使老百姓吃了大虧，許多人餓肚子，就連番薯幹湯也喝不上幾口的情況。當得知初中生一個月只有 24 斤口糧，不夠吃後，章乃器一一記在心裡。當時有人問他：“你對家鄉印象怎樣？”章乃器說：“我在中央耳聞（下面彙報）目睹（報紙報導），浙南地區糧食自給有餘，還有外調，頗感高興。可是回來一看，群眾粗糧不夠，細糧更缺，個個面黃肌瘦。這次我回中央一定如實彙報。”事後，章乃器及時將所見所聞向浙江省和中央領導反映，並調撥了一批救急的糧食，使群眾擺脫了困境。不久，全省初中生的口糧標準提高到每月 31-33 斤。鄉親們十分感謝黨和政

府的關懷。但這件事在反右運動中，竟成了章乃器所謂“反黨”的罪行之一。

在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壓力下，到 1956 年底，全國私營工業戶總數的 99%、私營商業戶總數的 82.2%，分別納入公私合營或合作社的軌道；參加合作社的手工業人員占全體手工業人員的 91.7%。就是說，原來預計用 15 年或更多一點的時間完成的“三改”，實際只用了三年就完成了。1956 年 2 月 8 日國務院通過《關於在公私合營中推行定息辦法的規定》，指出，“定息就是企業在公私合營時期，不論盈虧，按季付給私股股東的利息。”原規定是利息一厘到六厘，後統一為每年息五厘。1966 年文革到來，定息被取消。據當時的副總理薄一波向全國人大報告：1956 年底“在全國的資本主義工業中，占產值 99.6%和占職工總數 99%的工業企業，轉變為公私合營企業；在全國的資本主義商業中，占總戶數 82.2%和占從業人員總數 85.1%的商業企業轉變為國營、合作社營、公私合營企業”。全國公私合營企業達 29598 個，240 萬人。經社會主義改造，私營的個體的經濟規模，已由 1950 年代初的占全部產出的 2/3 下降到 1957 年不足 3%，全國各類經濟的總額中，國營及公私合營已占 98.4%，私營僅占 1.6%，也就是毛說的“完全國有化”。

全國合作化結果是：1956 年棉花比 1955 年減產 147 萬擔，豬減少了 350 萬頭，大牲畜減少了 100 多萬頭。1956 年 9 月豬肉和蔬菜供應非常緊張，陳雲承認在出口未增加的情況下，大中城市豬肉供應下降，小城鎮、農村集市根本沒肉賣。1956 年底，國家的糧食儲備已下降到六年以來的最低水準。福建 1956 年豬比 1955 年減少了 20%，磚瓦減少 27%，雞、鴨、蛋也大量減少，而茶葉生產竟不及 1930 年代的一半。黑龍江省當年 7 月向中央報告，全省農村的副業生產下降了一半。其它各省大致如此。

1957年河北省副業收入比1949年下降了25%。畜牧業收入下降了一半。社員們與那些控制財富的人沒有任何關係，無法從指令性經濟中獲得他們所需的東西。從普遍的不滿中迸發出憤怒，矛頭指向那些控制財富並彼此做交易的人。當時河北農村到處流傳著這樣的民謠：“一等人兒，送上門兒；二等人兒，人托人兒；三等人兒，沒有門兒”。

作家趙樹理1956年8月給山西長治地委寫信說：“進入社會主義了，反而使多數人缺糧、缺草、缺錢、缺煤，爛了糧、荒了地，如何能使農民熱愛社會主義呢”？山西省自1956年冬以來發生的鬧社事件147起，參加的有5520多人。其中鬧分社的81起，反對領導幹部官僚主義作風的48起，鬧糧荒的18起。

1956年廣東省有13萬合作社社員鬧退社。廣東靈山縣有7個區、20多個鄉出現“混亂現象”，因鬧退社而發生多起包圍、毆打區鄉幹部和社主任的事件；中山縣16個鄉六百多名農民到廣州向省政府請願；還發生了抬菩薩遊行、毆打幹部的“永甯、曹址事件”。

1957年廣東陸豐縣農村突然爆發了散夥退社的暴亂事件，全縣幾乎有半數的農民退社，大批的社散夥。據統計，這次事件共有458個社解散，共有四萬多戶離開了農業社。全縣合作化程度由85%下降到46%，其中有六個鄉、366個村的社全部散夥，全縣只剩下26個社基本保持完整（沈志華：《整風是如何轉為反右派運動的》）。

浙江是全國農潮最嚴重的省份，寧波專區有5%社員退社，想退社而未遂的達20%，為全國之冠。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仙居全縣33個鄉鎮中，有29個鬧退社、分社。由於不答應他們散社，數千農民進城“圍攻領導，將縣政府和公安局的門窗都打爛了，呼喊著退社、退回耕畜、農具和土地”；全縣302

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者占 116 個，部份垮臺者 55 個，入戶社員由 91% 下降為 19%。被打幹部 107 人，幹部家庭被搜查的 304 戶。農民普遍反映：“初級社有優越性，高級社沒有優越性。”仙居事件是合作化期間發生的最大一次農民暴動事件，驚動了中南海。毛曾經派人火速趕往事故發生地進行調查。當時的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對從中央農村部下去調查這位官員說：由於社會不穩定，不要座臥車去，那樣目標太大，要坐吉普車。這些“欽差”“車出錢塘在蕭山縣屬的路上，便遇到結隊的農民張著各式各樣的旗幟，浩浩蕩蕩迎面而來。”當地政府組織偵察力量，逮捕 9 人，拘留 42 人。

另據新華社內部報導，江蘇、山東、貴州等省，退社的情況還要嚴重，有的地區比例高達 10%，甚至很多黨員都“要求單幹”。江蘇省從 4 月中旬到 5 月中旬，先後在江都、泰縣境內發生農民毆打社幹部、要求退社等哄鬧事件，範圍遍及 12 個區、47 個鄉、436 個農業社，參加鬧事的群眾近五萬人。江蘇泰縣數個鄉“鬧事”，到縣裡請願的農民有 2 千多人；在最嚴重的三個區，鬧事的農業社竟占到 62%。連毛的老家湖南湘潭縣韶山村也不例外。1957 年是韶山進入社會主義後第一次分配，社員人均收入僅 25 元多，比前幾年各年都低。部分社員也鬧退社，中農毛相欽把已入社的犁耙、風車背回了家，有的社員不准社裡的耕牛到他已入社的田裡耕作。遼寧、湖北、新疆、廣西等全國各地，都出現了大規模農民退社的情況。

為鎮壓農潮，1957 年 7 月，毛在青島召開的省市書記會議上指示在農村搞“鳴放”和反右運動。“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先讓農民進行鳴放，即提意見，發議論，然後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不善者而批判之。”

廣東省一個月內批判鬥爭 1.6 萬人、逮捕 2 千餘人。河南臨汝縣近 6 千人鬧退社，15 個鬧退社的農民被逮捕判刑。河南永城縣馬橋鄉專門召集鬧社、退社戶開會，採取捆綁、吊打、管制、扣押、罰跪等辦法，強迫回社。雲南江城縣對要求退社單幹的農民開展“反擊”，大肆批鬥反對合作社的“地、富、反、壞”分子，又將一些農民補劃成“漏網的反動富農”。本來 2/3 的農民堅決要求退社，中共一“反擊”，就把他們全鎮住了，都不再敢退社了。

四川榮昌縣，1956 年縣委書記強行推廣種植雙季稻，致使 6 萬畝稻田顆粒無收。鳴放中許多農民及基層幹部抨擊縣委瞎指揮；縣委便說他們“放毒”，將 5800 多人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其中 47 人逮捕判刑。

1957 年 9 月中央辦公廳的報告說：在社會主義教育中，廣東三個專區統計自殺 45 人，逃跑 90 人。山東嚇死、打死十多人。1957 年 12 月雲南通海下漁鄉（今興蒙鄉）一名共產黨員聯名向上級寫意見書，反映該鄉缺糧情況，並且發動 800 多人在意見書上簽名。結果被定為“反革命騷亂”，14 人被捕入獄。到 1979 年才平反。

浙江永嘉縣委在 1956 年 4 月 29 日《人民日報》發表《合作社和社員都要實行包產到戶》的社論後，積極在本縣農村推行包產到戶，並搞了一個推廣包產的經驗總結。1957 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迫使浙江上百萬農民接受教育，2 百多農民被批，20 多人被判刑。縣委書記李桂茂被打成中右分子，撤職降薪；縣委農業書記李雲河被定成右派、撤銷職務，勞動改造；縣委農村工作隊隊長戴潔天成為右派和反革命分子，押回原籍管制，舉家遣往農村；縣農村工作部予以取締，部長韓洪昌、副部長呂克熙、周祥千、局長胡宣哲均為右派，秘書潘長平為壞份子，一律撤職，降薪、勞動教養。農民徐適存因在群眾大會上高喊“包產到戶就

是好”而被定罪為“破壞合作化，被判刑 20 年”，最後死於監獄。此案直到八十年代才獲平反。

凡對農村真實情況有所瞭解、同情農民的基層幹部，為農民呼籲請願者，無一例外都成了右派。1957 年春，儀征縣大儀鄉黨委書記張志渠反映了農村的真實情況：“目前有 80% 的農民對現實不滿。有的貧農勞動一年，連口糧都拿不回來，沒有（過去給地主、富農）當雇工好。”儀征縣委合作部長徐寬道說：“大部分農民生活比合作化以前低，甚至不如解放以前。過去……豬子每戶四、五頭，車水時一天要吃六、七頓，現在連糧食都吃不飽，豆腐也吃不到……”因為替農民說了話，這兩位黨的幹部都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由於右派又叫“資產階級右派”，給工人、農民扣以“資產階級右派”的帽子實在有些不倫不類。所以毛指示“對工人、農民、手工業者，一般不要扣右派帽子”。對從工人農民中揪出來的人，只稱“反社會主義分子”，以示與知識份子和幹部的區別。黨史專家廖蓋隆說，在農村裡劃的反社會主義分子恐怕有幾百萬，那些沒有統計的不算。

第 106 節 大躍進來大煉鋼

1·大躍進的由來

在毛時代，國家就等於黨，黨就等於毛個人。對全民財產的絕對控制，一方面可以形成個人對執政黨的全面依附，另一方面可以供執政黨及其領袖隨心所欲地處置和揮霍。這種揮霍還不止是特權階層的個人生活的腐敗，更可怕是為了滿足官員的個人野心和狂想，執政者完全不顧人民的意願和死活，用全民的財產進行荒謬的社會實驗。

1955 年 3 月 21 日，毛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明確提出“趕超”的思

想，他說：“一個六萬萬人口的東方國家舉行社會主義革命，要在這個國家裡改變歷史方向和國家面貌，要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內使國家基本上工業化，並且要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完成社會主義改造，要在大約幾十年內追上或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

1955年10月29日，毛在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座談會上說：“我們的目標是要趕上美國，並且要超過美國，……究竟要幾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許七十五年。”“哪一天趕上美國，超過美國，我們才吐一口氣”（《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500頁）。

1955年毛批判了務實的鄧子恢，引來1955~1956年間的全面冒進。1955年中毛編輯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並出面宣導，掀起農村集體化大“風暴”，半年多時間即實現了農業的集體化。在《高潮》按語中，提出了經濟和社會文化建設方面的許多宏偉目標，並說：“將來會出現從來沒有被人們設想過的種種事業，幾倍、十幾倍以至幾十倍於現在農作物的高產量。”1955年底毛提出“多快好省”方針，1956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提出多快好省地全面發展社會主義建設，“爭取實現更高的發展速度”，把“潛在能力發掘起來”。社論批評“我們領導者中間有些人思想落後于實際”，“安心於一種落後的發展速度”，“犯了右傾的保守主義的錯誤”。社論要求採取“使廣大群眾振奮起來”的領導方法。

1956年1月，毛澤東在《農業十七條》的基礎上，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簡稱《農業四十條》。《綱要》規定，糧食和棉花的產量在1967年分別由1955年的預算計數：3652億斤、3007萬擔增加到1萬億斤、1億擔，每年分別以8.8%、10.5%的速度遞增。這是不可能達

到的。到 1996 年，時隔近 40 年，我國糧食、棉花的產量才分別達到 9800 億斤、8400 萬擔。

周恩來自 1956 年 1 月起，就不斷地對冒進的形勢進行抵制，要求“不要勉強去做那些客觀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則就要犯盲目冒進的錯誤。” 1956 年春毛提出“十大關係”時就想，“蘇聯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不是可以搞得快點多點，是不是可以用一種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可見，毛首先要超過蘇聯。

1956 年春周恩來提出 1956 年的計畫要調整，過多的基本建設專案要壓下來。但毛認為不但不能壓，還要增加。在 1956 年 4 月下旬的政治局會議上，爭論激烈；毛要增加基本建設的意見，沒被通過。毛生氣了，宣佈散會。散會後，毛就到南方去了。劉少奇 5 月間主持中央會議，決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6 月人大一屆三次會議通過了李先念報告闡述的這個方針；中宣部起草了《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於 6 月 20 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急躁情緒所以成為嚴重的問題，因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幹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統的領導幹部中，下面的急躁冒進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來的”。危害我們事業的主要傾向是急躁冒進。發表前劉曾將這篇社論稿交毛審閱，毛批“不看了”。事後毛曾抱怨說：“罵我的我為什麼要看？”

1956 年 8 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大”預備會議上說：“我們這個國家建設起來，是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將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後的那種情況，……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人家（美國）一億七千萬人口有一萬萬噸鋼，你六億人口不能搞它兩萬萬噸、三萬萬噸呀。你趕不上，那你就沒有理由，……它的鋼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萬噸，我們比它落後

六十年。假如我們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應該趕過它，這是一種責任”。

“你有那麼多人，你有那麼大一塊地方，資源那麼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麼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族人民，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 89 頁）。毛澤東還提議修改本來已經訂得不低的糧、棉、鋼、煤四大五年計劃指標，糧從原訂的 6000 億斤提高到 9500 億斤，棉花從 5600 萬擔提高到 1 億擔，鋼從 1800 萬噸提高到 2400 萬噸，煤從 2800 萬噸提高到 3300 萬噸。

1956 年 11 月中旬周恩來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做關於 1957 年國民經濟發展計畫報告中，批評了冒進傾向，提出 1957 年應適當壓縮基本建設規模，合理調整各經濟部門之間的關係。全會同意周恩來的報告。毛在會上卻強調：不平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經濟有進有退，各級黨委和政府應該促進；這是含蓄地批評 6.20 社論。

1956 年 12 月 8 日，毛澤東與工商界人士談話指出：要趕上美國一億噸鋼，請大家把目標轉向這個方面（《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 182 頁）。

1957 年 5 月 4 日，毛接見來訪的緬甸聯邦民族院議長蕭恢塔時，表示：我們要好好幹 50 年，把工業建起來，要有美國那樣多的鋼鐵（顧龍生：《毛澤東經濟年譜》第 399 頁）。

1957 年 7 月，毛澤東在青島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強調：“準備以八個至十個五年計劃在經濟上趕上並超過美國”（顧龍生：《毛澤東經濟年譜》第 400 頁）。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八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這次全會不僅揭開了批評反冒進的序幕，也揭開了農業“大躍進”的序幕。會上，毛澤東對反冒進進行了公開的批評，全黨為之震顫。10月9日他在《做革命的促進派》的講話中說：1955年來了一個高漲，1956年吃了虧，1956年的反冒進，掃掉了多快好省的口號，掃掉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掃掉了促進委員會，對這幾項東西要恢復。“我們總的方針，總是要促進的”；“黨委還是促進委員會，不是促退委員會”（《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592～594頁）。毛以為只要像戰爭年代那樣，大搞群眾運動，就什麼事情都能辦好。毛還說：“爭取以28年基本上達到蘇聯40年的水準，是否可能？”現在一人三畝地太多，將來只用幾分地種糧就夠吃。“工作進展異常迅速，不論革命工作，建設工作都是如此”。全會通過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簡稱“四十條”），“四十條”提出，在12年的時間內，糧食每畝平均產量，黃河、秦嶺、白龍江以北的地區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區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嶺、白龍江以南地區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棉花畝產由1955年的35斤，分別增加到40斤、80斤和100斤。全會作出《關於在今冬明春大規模開展興修農田水利和積肥運動的決定》。

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偉大綱領》的社論：批判了“右傾保守思想”，“為了克服各種各樣的保守思想，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農村中以四十條綱要為中心，進行一次生產建設問題的大鳴、大放、大爭”；號召各地根據農業發展綱要制訂一個積極的生產計畫，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實現一個巨大的躍進”。這是中共通過媒體正式發出“大躍進”的動員，也是第一次以號召的形式使用“躍進”一詞。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的社論。社論說，1956年公佈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後，曾經鼓舞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熱情，造成了全國農業生產的高潮，但是，有些人卻把這一高潮看成了“冒進”，他們“害了右傾保守的毛病，像蝸牛一樣地爬行得很慢；他們不瞭解在農業合作化後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這是符合客觀規律的”。這是“大躍進”口號的第一次提出。1957年冬季各地以“四大”形式，批判“右傾保守”，掀起了農田水利建設高潮，揭開了大躍進的序幕。投入的勞力從幾千萬人，1958年1月發展到1億人。

1957年11月毛率代表團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黨代表會議。提出了“東風壓倒西風”的口號，廣義說是指社會主義陣營壓倒資本主義陣營，狹義說表現了毛企圖做國際共運領袖的欲望，這裡，中共是“東風”，蘇共是“西風”。赫魯雪夫在回憶錄中說，毛充滿了“想當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的野心：毛想如果他能夠在五年內與英國並駕齊驅並且開始趕上美國，那他就能夠把列寧的黨遠遠拋在後面並且超過蘇聯人民自十月革命以來所取得的全部進展（《最後的遺言》第11章）。11月14日他說：“我們中國是為不了首的，沒有這個資本。我們經驗少。我們有革命的經驗，沒有建設的經驗。我們在人口上是個大國，在經濟上是個小國。我們半個衛星都沒有拋上去。這樣為首就很困難，召集會議人家不聽”。

11月15日赫魯雪夫在會上提出，蘇聯準備用十五年的時間趕上和超過美國。毛說：“你們再加把勁，能不能用十年的時間，在主要經濟指標上超過美國。”赫魯雪夫說：“我們努力，還是可能的。”毛說：“你們用十年的時間超過美國，我們十五年超過英國”。18日，毛在莫斯科講話說：“赫魯雪夫同志告訴我們，

15 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們也可以講，15 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現在英國年產 2 千萬噸鋼，再過 15 年，可能達到年產 3 千萬噸鋼。中國呢？再過 15 年可能是 4 千萬噸，豈不超過了英國嗎？”在莫斯科毛就親自修改審定了《人民日報》社論：《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要求掀起全國規模的工農業生產高潮。毛澤東還從莫斯科給國內打電話，說以後再也不要提反冒進了，搞社會主義就是要“冒”一點。11 月下旬，毛澤東從蘇聯回國後，連續召開會議，討論他正在思考的如何取得經濟建設更高發展速度的問題。1957 年 12 月 2 日，劉少奇在中國工會八次代表大會上正式宣佈：“在 15 年後，蘇聯的工農業在主要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美國，我們應當爭取在同一期間，在鋼鐵和其它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於是，“超英趕美”就成為發動“大躍進”的一個重要口號。

12 月 12 日社論《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方針》，批評“在去年以後的一段時間裡，在某些部門、某些單位、某些幹部中間刮起了一陣風，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針吹掉了……有的人竟說，寧可犯保守的錯誤，也不犯冒進的錯誤，等等”。社論引了毛澤東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寫的序言中的一段話，以加重批判右傾保守的分量。12 月 30 日，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時批註：“公社辦工業，我們比史達林膽大”。

1957 年底召開的中共上海市委一屆二次會議上，柯慶施作長篇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備受毛澤東青睞。《人民日報》在 1958 年 1 月 25 日將長達 3 萬字的該報告的第一和第四部分全文轉載，並加長篇按語。

1958 年《人民日報》發表元旦社論《乘風破浪》，號召全國人民：“我們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它重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

在這以後，還要進一步發展生產力，準備要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時間，在經濟上趕上並且超過美國。”

1958年1月2~4日，周恩來在杭州出席毛澤東召集的部分省、市委書記會議。借談1958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修改問題，毛對周恩來等主張反冒進的人的批評，是直截了當的：“你們那個時候，不僅脫離了各省，而且脫離了多數的部！”

1958年1月11~22日，中共在南寧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討論1958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和預算。會議提出，在今後5~8年內，提前實現四十條和“苦戰三年”的口號；會議要求地方工業“遍地開花”，限期超過農業產值。會議前後，毛主持起草了《工作方法60條(草案)》，強調了“不斷革命”的思想，並提出要“把黨的工作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

會議第一天的晚上，毛澤東單刀直入地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這是政治問題。首先是沒有把指頭認清楚，10個指頭只有一個長了瘡，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學生），多花了一些錢，這些東西要反。當時不提反冒進，就不會搞成一股風，吹掉了三條：一為多快好省；二為四十條綱要；三為促進委員會。毛批判1956年6月20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是“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庸俗的辯證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實際上並沒有反右，而專門反‘左’，而且尖銳地針對我的”（吳冷西《憶毛主席》第49頁）。12日上午，毛澤東進一步從“政治問題”上來清算反冒進問題：1955年夏季，北戴河會議“冒進”，想把鋼搞到1500萬噸（第二個五年計劃），1956年夏季北戴河開會“反冒進”。人心總是不齊。……毛批評反冒進使6億人民泄了氣，是方針性錯誤；“反冒進”的人和右派差不多，“右派一攻把我們一些同志拋到離右派只有50米遠

了”。16日上午，毛公開地在會上批了周恩來，他拿著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乘風破浪，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嚴肅地對周恩來說：“恩來，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在毛澤東的直接迫問下，周恩來只好答覆：“我寫不出來。”毛立即指責國務院是搞“分散主義”，強調權力要集中於“政治局、書記處、常委，只能有一個核心”。周恩來、陳雲、李先念被迫作自我批評。真是好一派“一鞭在手矜天下，萬眾歸心吻地皮”的氣象。

南寧會上遭毛痛斥的還有一人，江清的前夫黃敬。周、陳遭毛痛斥，一個活到1976，一個活到1995。黃就不行了，沒幾天就死了，因為被下毒！南寧會議1月22日結束，當天下午，柯慶施曾讓醫生給黃查一查。醫生在黃的房間看到：黃語無倫次，不斷地說：“饒命啊！饒命啊！”醫生立即將情況報告給楊尚昆，楊安排第二天立即去廣州住院治療。去廣州時，班機上乘有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和秘書長習仲勳。途中，黃敬突然跪在李富春腳前叩頭說：“饒了我吧！饒了我吧！”黃敬瘋了！一個黨的高級幹部、一機部部長，一把手在會上批評兩句至於此嗎？以黃的性格不至於呀！黃被送進廣州軍區總醫院後，還曾跳樓跌斷了腿，不久就死了。但正式材料上說：“1958年初，黃因過度辛勞患病。毛澤東主席獲悉後，傳話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勸勉好好養病。2月10日，因肺動脈栓塞，搶救無效，在廣州逝世。薄一波代表中央致悼詞，稱其為“共產黨人和革命幹部學習的榜樣”。

1958年2月鄧小平視察四川石油探勘局川南礦區時表示：“應該有個雄心壯志，超越國際先進水準。世界先進水準也不是高不可攀的。”他還提出：“草棚也可出科學，出先進水準”。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提出“在比15

年更短一些的時間內超過英國”；他甚至說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把“冒進”改為“躍進”，別人就只好反對了。毛指出，“有人說我們 13 年抵蘇聯的 40 年，很好，應當如此。我們人多，政治條件不同，我們可以比他們快，有客觀條件。”

在成都會議上，周恩來再一次對反冒進的“錯誤”作檢討：我負主要責任提出的反冒進報告，就是對群眾生產高潮這個主流潑了冷水，因而不是促進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費，四十條也被打入冷宮，這就是問題的本質。

1958 年 3 月 20 日，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向毛呈送了《爭取有色金屬的飛躍，佔領有色金屬的全部領域》和《鋼鐵工業的發展速度能否設想的更快一些》兩個報告。特別是後一個報告，提出了可以縮短趕超時間的建議。報告分析說，英國現在的鋼產量為 2200 萬噸，即使它今後每年增長 4%，1967 年也只能達到 3300 萬噸；美國現在的鋼產量為 1.02 億噸，這一生產水準估計今後許多年不會有多大改變。我國實行大中小鋼鐵廠同時建設，建設時又實行投資包乾，建設速度可以快一倍，投資也可以省一半。只要有具體措施，1962 年的鋼產量超過 1500 萬噸、爭取 2000 萬噸，是可能的。報告認為，只要十年超過英國，再有十年趕上美國是完全可能的。4 月 2 日，毛澤東在接見波蘭政府代表團時就將“十五年超過英國”改為“十年或更多一點時間趕上英國，再過二十年趕上美國”。

4 月 15 日毛宣佈：我國的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是那樣長的時間了；10 年可以趕上英國，再有 10 年可以趕上美國。

1958 年 5 月 5 日，八大二次會議在京開幕。劉少奇在向八大二次會議作工作報告，這份報告，是按毛澤東的思路作的。報告認為，由於反冒進，1956 年

到 1958 年間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出現了一個“馬鞍形”。並把反冒進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進行批判。報告說：“馬克思預言過，無產階級革命將使我們進入‘會有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偉大時期。如果說我們過去在革命中經歷過這樣的偉大時期，那末，我們現在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中，不又是在經歷著這樣的偉大時期嗎？在這裡，人們看見了：勇敢勤勞的中國人民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它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怎樣湧現出自己創造歷史的無窮無盡的力量和智慧。”

李富春在大會上提出：“七年趕上英國，十五年趕上美國。”毛在批語中改為：“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毛在會上說：我們不提“幹部決定一切”，“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這是史達林提出的，也不提“蘇維埃加電氣化等於共產主義”的口號，這是列寧提出的。我們的口號是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是不是高明些呢？我看我們的口號是高明些。後來者居上嘛！我看我們的共產主義，可能比蘇聯提前到來。中國應當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大國，因為人最多嘛！過去林彪同志在延安曾談過，將來中國比蘇聯強，那時我還有點不大相信，我想蘇聯也在進步呀！現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我們這麼多人，現在六億，再過十年八億。人多總要做事，總不能光睡覺嘛。”5月18日毛在八大二次會議各代表團團長會議上明確講：《十大關係》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作比較。除了蘇聯的辦法以外，還可以找到別的辦法，比蘇聯、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同一天，毛澤東正式提出：7年趕上英國，再加8年或10年趕上美國。可見，毛想的是超過蘇聯，而他則成為世界人民的領袖。

5月18日，由周恩來在大會上作反冒進“錯誤”的檢討。周說：這次會議，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大會，也是一個充滿共產主義風格的大會。大會的發言豐富多彩，生動地反映了人民在生產大躍進、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設奇跡和革命氣概。真

是一天等於 20 年，半年超過幾千年。處在這個偉大的時代，只要是一個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為這種共產主義的豪情壯舉所激動，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認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設路線的正確，同時，也就會更加認識反冒進錯誤的嚴重。我是這個錯誤的主要負責人，應該從這個錯誤中得到更多的教訓。……

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工業要在 5 年內達到年產 4000 萬噸鋼，在 7 年內超過英國，再過 8 年趕上美國；並將農業四十條規定的 12 年任務，一下子縮短到 3 年。經過這次大會，毛澤東認為反冒進徹底地達到了目的，所以他在會上宣佈：反冒進（的問題）解決了，現在中央是團結的，全黨是團結的。……中央委員會要特別注意，要顧全大局，誰不顧全大局，誰就會跌筋斗。

1958 年 6 月 9 日，中共就周恩來提出“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等問題專門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彭真、彭德懷、賀龍、羅榮桓、陳毅、李先念、陳伯達、葉劍英、黃克誠。會上討論了周恩來等人的工作安排，與會者一致認為：周“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會後，毛囑咐鄧小平起草一個會議記錄。6 月 22 日，鄧將寫好的會議記錄報送毛澤東。毛當即批示：“退（楊尚昆存。”周在反冒進受挫後提出辭職，應該是以退為進的策略。

1958 年 6 月初，國家計委提出《第二個五年計劃要點》，提出五年超過英國，十年趕上美國。這個檔得到了毛的首肯。6 月 21 日，毛在軍委擴大會上又一次將趕超時間提前，他說：我們 3 年基本超過英國，10 年超過美國，有充分把握。6 月 22 日，毛在薄一波呈送的《彙報提要》上批示：“趕超英國，不是 15 年，也不是 7 年，只需要兩到三年，兩年是可能的。這裡主要是鋼。只要 1959

年達到 2500 萬噸，我們就在鋼的產量上超過英國了。”

6 月 23 日，毛澤東在一次軍隊幹部座談會上提出了在鋼產量上趕超蘇聯的目標：“到 1962 年，可以達到 7500~8000 萬噸。趕上英國不要 5 年，2 年、3 年就可以了。5 年可以趕上蘇聯，7 年最多 10 年就可以趕上美國。”及至 9 月 2 日，毛乾脆提出“為五年接近美國，七年超過美國這個目標而奮鬥吧”（《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 236、278、368 頁）！乾脆不再把英國放在眼裡，連蘇聯帶美國一起超。所有這些，包括“也要搞一點原子彈”在內，都是為了改變“為首就很困難，召集會議人家不聽”現狀而為之。

為了實現史達林當初許諾要給毛澤東當世界革命領袖，老毛從《論人民民主專政》開始，全身心地投入“國際主義”中去，積極反美，參與朝鮮戰爭，及至史達林死後，毛發現赫魯雪夫等不買他的賬，“為首”很困難，1957 年從蘇聯一回國就兵分兩路。一是外交上激進，1958 年 2 月 11 日，毛以好戰的陳毅取代溫和些的周恩來擔任外交部長，準備著與蘇聯決裂同時更激進地反美；二是急迫地想在手中“抓一把米”，與其說“超英趕美”，實在是“超蘇趕美”，為自己成為“馬恩列斯毛”而拼老百姓的命。與蘇聯決裂和大躍進、繼續躍進同步進行，便可以看出點名堂來。等到大躍進徹底失敗，經濟上搞不掂，於是另闢蹊徑玩虛的，折騰出一個文革來，自己給自己立一塊“第三個里程碑”。除此之外，不顧血本拼命籠絡“第三世界”那些混混小國，自作多情地想以“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為的都只不過“聖賢百代帝王”而已。說到底，“天下大公”其實也就是“天下大私”，以國家民族作為個人事業的資本，人民遭殃就必不可免。可悲的是，那些沉溺於“君臣父子”文化傳統中的人們，絞盡腦汁為他們的謳歌，總要把幻覺當作真實，欺騙別人也欺騙自己。

2·全民大煉鋼

毛澤東從蘇聯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那裡得知，工業化就要優先發展重工業，重工業中鋼鐵工業又是基礎，於是以哲學家的思維，在民族工業化與大煉鋼鐵間劃了等號。大煉鋼鐵，並不僅是一年。第一次是 1958 年 9 月份開始大搞，投入的農村勞動力達到幾千萬人，年底達近 1 億人。第二次是 1959 年廬山會議後又搞，1960 年是第三次。三年大煉鋼鐵，毛煉鋼是假，煉人是真——《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把你煉成毛黨的螺絲釘。

1958 年上半年大放糧食“衛星”後，毛相信糧食問題已經解決，於是提出“糧食多了怎麼辦？”而鋼鐵生產成為心病，因而宣佈六條紀律，要以“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權威，搞出 1070 萬噸鋼來。在鋼鐵生產能力只有 535 萬噸的條件下，毛要鋼產量要翻番，本屬厥詞。可是 8 月份的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卻確定 1958 年鋼產量完成 1070 萬噸，而且認可了冶金部報告中的滿紙胡言，決定在 1959 年生產 3 千萬噸鋼。但是直到 58 年 8 月底，全國總共才生產了 450 萬噸鋼。只剩 1/3 時間，卻還有 2/3 的任務未完成。要是完不成 1070 萬噸鋼，毛的面子往哪裡擺？於是中央決定號召全民大辦鋼鐵，簡稱“全民煉鋼”。

北戴河會議後，從中央到地方，煉鋼成為壓倒一切的中心，其他各項工作與煉鋼發生衝突者均“停車讓路”。在“土洋結合”的方針下，一方面拼命“挖掘”各大中鋼廠的“潛力”，一方面大力推廣“小（小轉爐、小平爐以及遍佈全國的小煉鐵爐）、土（土法煉鐵煉鋼）、群（群眾運動）”的煉鋼“經驗”。各地黨委以第一書記掛帥，廣泛動員社會各行各業煉鋼。共產黨組織之嚴密天下第一，無微不至，無遠弗屆。大小幹部們的法律知識、經濟知識可以是零，貫徹上級指示卻效率奇高。世界一流的冶金專家葉楚佩，解放後從美國回到北京，立志投身中

國建設，但被打成右派，停止工作，大躍進後時拿個面口袋，在中關村的福利樓排隊給他的洋太太買麵包，對於煉鋼這種事是絕對插不上嘴了。另外還有黨內冶金專家，也都被整肅。整肅異見導致了高效率。因此，在 1958 年的最後幾個月，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史無前例的景象：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在“大煉鋼鐵”。災難就從這裡產生了。

1958 年 9 月 4 日，中央書記處電話會議譚震林強調，北戴河會議確定和下达的鋼鐵工業指標只能超額完成，不准完不成，少一斤也不行，少了就是失敗；要求要達到日產鋼 6 萬噸、鐵 10 萬噸，這個要求一定要完成；光靠“洋爐子”完不成任務，就要靠“土爐子”，大搞群眾運動。9 月 14 日《人民日報》發表《鋼鐵生產必須快馬加鞭》的社論，稱北戴河會議公報公佈 14 天裡，各省、市、自治區投入鋼鐵生產的大軍已達 2000 萬人以上；9 月上旬全國平均每天的鋼產量較 8 月上旬提高了 33%；到 9 月 10 日，全國建起小土、小高爐 35 萬多個，比 1 至 8 月份的總數劇增 11 萬多個。9 月 29 日毛澤東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對那種以為在工業方面搞大規模群眾運動是不正規和遊擊作風的看法，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毛澤東號召全民煉鋼鐵，熊熊火焰迅速燃遍全國，連中南海裡都建起小高爐，點火冒煙。國家計劃委員會應是經濟專家的大本營，是運籌決策的地方，可是那裡也有“煉鋼爐”。煉什麼鋼？不妨記在這裡：他們將好端端的鐵絲網拿來，不計工本地剪成一小段一小段，投進爐子，燒成一塊一塊的鐵疙瘩，然後繫上紅布條，畢恭畢敬地捧到領導那裡去“報喜”。文化部除動員千萬文藝家謳歌大躍進之外，還要直接對煉鋼有所貢獻，成立了煉鋼的指揮部，由副部長、文學家夏衍親任指揮。愛湊熱鬧的人確實不少，連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家的院子裡也砌上了爐

子。在宋的支持下，秘書、花匠、廚師一齊上陣，成了“鋼鐵大軍”中的一員。

某市中山路的十幾個家庭婦女不懂技術、缺乏材料，硬是當天建起小高爐，當天就煉出了鋼。醫科大學總醫院的醫生、護士，顧不上診治病人，在醫院裡砌高爐，也出了鋼。第二皮鞋廠土法煉鋼更為簡單，他們建造的坩堝土平爐，就是在地上挖個坑，用普通磚和耐火磚砌成，一次可以放 8 個坩堝，爐內不用焦炭作燃料，而使用劈柴和普通的塊煤，下面用鼓風機吹風，兩個半小時就可以煉出 100 多斤鋼來。尤為奇妙的是，一家手工業社辦事處，大膽試驗用中藥煉鋼，在小土爐內，加入中藥槐角、雞胃和龜甲等，這些中藥可以起到去氧脫硫、調解炭素的作用。中藥煉鋼據說已試驗成功，應獲得諾貝爾獎。

學校也投入煉鋼熱潮中。北京、上海等 11 個城市的 18 所大學，每年可煉鋼 69.2 萬噸，相當於 1949 年全國鋼產量的 4.38 倍。濟南市的中學在一個星期內建成 77 座小高爐。

外交部同金木水火土全不沾邊，竟也以煉鋼為己任，在部大院裡築起了土高爐，除了糟塌錢財外，一無所獲。政治局候補委員、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自東北回京，看到那“煉鋼”的情形，立即制止，才結束了外交部煉鋼的荒誕行為。儘管因此受到國家機關黨委的批評，說外交部煉鋼不積極，他還是頂住了，未讓那些爐子重新點火。北京市公安局局長馮基平也頂住了“全民煉鋼”的壓力。他事後對他的孩子說：“我親眼去看過，那叫煉鋼麼？像炒豆腐渣似的。我頂了。任別人搞得轟轟烈烈的，我們有我們的事情，不去湊那個熱鬧！”

湖南省一度發動四、五百萬人煉鋼，連省委的大院裡也築起了土煉鋼爐，但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對此表示“非常擔心”。他將中學時代的同學、漣源鋼鐵廠的總工程師吳鑒光請去，一起察看省委院內的土爐子，請吳發表意見；之後又將

另兩位省委書記請來，再度請吳談看法，遂共同決定停止土法煉鋼，將全省大多數的土高爐停掉，避免了一大筆損失。

但是張聞天、馮基平、周小舟們是擋不住潮流的。九月底的《人民日報》發佈重要新聞，報導了毛澤東在月中“巡視大江南北”的情況：在武漢，毛“看了第一紗廠的小高爐出鐵”；在安慶“看了安慶一個中學的小高爐，看了由機關辦的小高爐群”；“在汽車道上，毛主席看見了要走幾十公里或者幾百公里路到有鐵礦石可找的縣份去挖礦、煉鐵的人流。”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毛澤東一定是人類文明史上唯一能親眼看到浩浩蕩蕩的大軍步行幾百公里去“找”鐵礦石的壯觀場面的執政者。到了合肥，他便興致勃勃地揮筆題詞：“沿途一望，生氣勃勃，肯定是有希望的。”9月29日一回北京，他便告訴記者：“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眾很大的幹勁…但是就全國來說，有一些地方…對於發動群眾的工作還沒有做好…還有一些同志不注意在工業方面搞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他們把在工業戰線上搞群眾運動說成是‘不正規’，貶之為‘農村作風’，‘遊擊習氣’。這顯然是不對的。”

毛澤東的訴諸報社記者這一招十分有效，不贊成這樣蠻幹的人不吱聲了，全國上下立即變本加厲地大幹起來。讓我們來看看一九五八年各地的幹部如何發瘋吧：

《人民日報》十月十二日的社論說：“河南省6百萬人煉鋼煉鐵。”新華社10月13日電：四川省有“8鋼鐵隊伍”。《雲南日報》10月15日報導：全省“3百萬大軍向鋼鐵銅前線總攻擊！”新華社10月17日報導，“山西省有2百多萬鋼鐵新戰士”，“開赴各山區，參加建爐、採礦、運礦石。”全國20多省，無一甘落人後，都在這樣不顧一切地蠻幹。

農村、城市，到處有小高爐。湖南省新化縣建造了 2400 座煉鐵爐，據新華社 10 月 18 日報導，其中“其中 88%能正常出鐵”。這“正常出鐵”的數字肯定是假的，因為在 59 年的廬山會議上，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說，湖南 58 年搞了 5 萬個土高爐，其中有兩萬個從未點火，何況點了火也不等於就能正常出鐵。

廣西忻城縣集合“7 萬人採煤大軍”，“在 19 個小時內，用土法採煤 60 多萬噸”。經廣西區黨委、柳州地委、忻城縣委分頭查算，“證明數字完全正確”。報社報導這則新聞時，似乎並未想過，這個數字乘以 365，大約就是當時全國的煤炭產量了。

越往後牛皮就吹得越不成樣子。新華社 10 月 29 日電：河南省當天 670 萬人上陣，日產 105 萬噸鐵，1.1 萬噸鋼。第二天奇跡再度出現，日產 133 萬噸鐵，10.3 萬噸鋼。一個省一天生產 10.3 萬噸鋼，而全國全年計畫才 1070 萬噸，可見撒謊也是要有點勇氣的。

煉鋼首先要有鋼鐵築煉鋼爐，在這之前還必需有高爐將鐵礦石煉成鐵水，這又需要焦炭、石灰石、鐵礦石……。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即使 1 億人都是冶金專家，兩手空空也就只能坐等天上掉鋼錠下來。怎麼辦？我們國家歷史悠久，地大物博，主意就往這兒打。

河南境內的函谷關，1926 年北洋政府斥資重修。1958 年當地縣委書記提出要建“書記爐”。但沒有磚砌爐，他提議用函谷關的磚。左右勸阻，他眼一瞪：“什麼古跡，古跡也要為鋼鐵元帥升帳服務！”一聲令下，兩層樓閣及樓上兩千年來積存的碑刻等文物一掃而光。

人說文化浩劫始自 1966 年，甚實早在 1958 年就開始了。甘肅省武威縣自唐代起即為西北第一重鎮，以大磚築成的城牆十分壯觀。它雄峙千年，竟也在煉鋼

鐵聲中毀於一旦。至於全國共拆了多少古建築，那就很難查清了。

當時全國各地一陣風起，紛紛大拆民房修建土高爐，說符合“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專門拍攝了河北某縣大規模拆毀古長城，取磚建爐的“動人事蹟”。

拆古跡是為了取得築煉鋼爐用的磚。且不說普通的城磚並非耐火材料，即使砌成“土高爐”也燒不到足夠的溫度，煉不出合格的鐵水。就算爐子合格，燃料從何而來則是另一個更大的問題。中國歷來缺乏燃料，當時即使正牌的鋼鐵廠，燃料供應也不充足。張聞天在 1959 年的廬山會議上說：“像石景山鋼鐵廠這樣的重點企業，也因缺煤而要停產。”那麼，全國千千萬萬個土爐子拿什麼來煉鐵煉鋼呢？

有本事的能搞到一些煤，但是煤需要在煉焦爐裡燒成焦炭後方能使用，而建個煉焦爐至少也要一年半載，於是便出現了世界鋼鐵工業世上前所未聞的怪事：

“沒有煉焦爐，就堆在地上燒，結果大部份煉焦煤（指優質的、可用於煉焦的煤塊）被白白燒掉。”這是當時的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受周恩來委託外出調查，從北京到上海一路所見。

有正規煉焦爐的鋼鐵廠因缺煤而停產，沒有煉焦爐而有煤的卻沒日沒夜地將煤白白燒掉，這是發生在城鎮中的事。農村呢？農民是無處可買煤的，但他們有伐薪燒炭的傳統。古時候打造兵器不就是用木炭作燃料的嗎？於是全民煉鋼立即演變成了全民伐樹。欲知這全民伐樹的後果，看幾個例子就知道了。

湖北英山縣有個生產大隊擁有上百座山頭，“大躍進”前兩人合抱的樟樹、楓樹比比皆是。為煉鋼，砍樹燒炭，上百座山剃了光頭。樹木不足的，經濟林也砍。湖南古丈縣 1935 年桐油產量曾達 350 萬斤，1960 年卻只有 25 萬斤，因桐

樹被砍了。平原地帶樹不多的地方就更遭殃了。河北省涿鹿縣三堡村，為了煉鋼將所有能收集到的木材全喂了土高爐。果樹砍掉，葡萄藤也砍掉，暫無人住的房子把房架拆掉。凡能點著火的，統統投進爐膛去“煉鋼”了。砍光了果樹，欲將果園改造成為麥田，結果拋荒，成了兔子窩。

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兼任省軍區的第一政委，他下令省軍所屬部隊和駐紮在安徽的野戰部隊的所有連隊都搞小煉鐵爐。安徽將一條山溝的兩頭用土石封口堵死，將山上的樹砍一些，推下山溝，然後把鐵礦石、收來的鐵器推下山溝。再砍一些樹推下去，再堆一些鐵礦石、鐵器，這樣堆上三、四層，直到把山上的樹砍光。然後放火將樹木點燃，燒上幾天。等火熄了派人下去一看，到處是燒出來的鐵疙瘩、還有沒燒完的樹木，沒燒到的鐵礦石、鐵器。於是調動人馬，將鐵疙瘩、鐵器選出來，敲鑼打鼓去報喜：煉出了多少多少噸“好鋼”。四川的李井泉連忙派人到去考察、學習。考察的人回來一彙報，李井泉說：曾希聖真是胡搞。

毛澤東在長沙讀書時的老師、紅軍長征時最年長的徐特立，當時已是八十二歲的老人，兩年前回過湖南老家，1958年底再度返鄉時發現，昔日蔥蘢的丘陵，黃泥裸露，林子全毀了。因此當公社黨委書記向他彙報“躍進戰果”時，他問道：“山上的樹哪裡去了？”書記只好實說：“燒炭煉鋼鐵。”徐特立搖頭歎氣：“我們不能毀祖宗山，作子孫孽呀！”他回京後即給家鄉寄去了兩千元錢助其植樹。彭德懷元帥1961年底回湖南湘潭老家，指著光禿禿的山頭對隨行人員說：“你們看，山上都是和尚腦殼，繩子一扯無牽掛，森林全被破壞了。過去兩邊都是叢林茂密，如今光了，真可惜！”

1958年全民砍樹的惡果幾十年後仍在影響國民經濟。1971年初，葉劍英元帥回到老家廣東梅縣，對地區幹部說：“我離家半個世紀了…家鄉的路還是半個

世紀以前的路，田園房屋還是老祖公留下來的，沒有變；只有一樣變了，就是山光了。”他還對陪同的省委書記王首道說：“這對不起後代人呀！”中國有 2/3 的農村散佈在山區，山區砍了樹，災難也就來了。解放軍中唯一的女將軍李貞在 1980 年回到江西老家，發現鄉親們十分貧窮，村幹部把原因告訴了她：“年後山上有數不清的幾個人都合抱不過來的大樹，前山上碗口粗細的樹也密密麻麻地長滿全山，但是大煉鋼鐵以後全給砍光了。山禿了，地也貧了。下一場大雨，泥沙都沖進田裡，肥田變生了，能不貧嗎？”

全民砍樹一事，毛澤東自然知道。但他的思維方法是獨一無二的。“年大搞小土群（指一群一群的土制的小煉鐵煉鋼爐——作者注），有人說森林、煤炭有很大浪費。”他 11 月 6 舉行的鄭州會議上對此說表示不同意，他認為反而是“節省”他的邏輯是：“千萬人上山，又查出資源，又得個經驗。這是收入。”明明是無理狡辯，可是竟鎮住了黨中央的同志。陸定一也好，周恩來也好，都沒有勇氣戳穿毛的詭辯。

幾千萬農民，大多數隻識得幾個字，相當部份沒有文化，又沒有起碼的儀器、工具，即使將青山踏遍也未必能查出山肚子裡的鐵礦。不過找不到鐵礦不等於煉不成鋼。大躍進時人們就將各種各樣的鐵器拿回爐煉一煉。這樣，最新式的“煉鋼法”在中國誕生了。

北京人將暖氣管拆掉、砸碎，填進“小土群”的爐膛裡，等熔到八、九分時往外一倒，就煉成了“土鋼”，這效率比國家計委裁鐵絲煉鋼高得多。上海洋建築多，有的是鐵門，黃浦江邊的外灘還有一圈鐵鍊圍住花草，這些都可取代鐵礦石拿去煉一煉，於是它們陸續變成了牛糞堆似的“土鋼”。普通百姓家裡多少總

能翻出幾斤鐵器來，於是雲南昆明市組織了六、七萬“兒童團”四處找廢鐵。至於他們尋獲的戰利品中有多少是有用的鐵器就無人知曉了。

國防部長彭德懷到甘肅武威步兵學校視察，發現全校官兵一齊在煉鋼。在他所住的招待所裡，服務員們向他訴苦：老家的房子被拆，果樹被砍，木料全部都煉鋼燒了，連家裡的鐵鍋也被收走砸掉煉了“鋼”。彭回京的火車路過河南省時，正值夜晚，處處爐火沖天，車流不斷。他伏在車窗口看了許久，自言自語地說：“不行！這一把火會把我們的家底燒光！”於是他決定回鄉調查一番。年底他回到湖南老家，發現村子裡也有“煉鐵廠”，不過除了從老百姓家裡強行收來、已經砸碎的鐵鍋外，所見只是一堆堆的鐵疙瘩。

1958年的全民煉鋼迅速演變成了全民砸鐵器、全民砸鐵鍋，比秦始皇收繳民間鐵器更徹底。當年秦始皇用收繳的鐵器只鑄成了12對金人，大約收走的只是首都咸陽附近地區的鐵器而已。如今全民煉鋼，共產黨的命令下達到白山黑水、天涯海角，造成的破壞超過秦始皇千萬倍。李延國在《中國農民大趨勢》中寫道：在他的山東老家發生的“人類歷史極殘酷的一幕”：“奉命來收鐵鍋的人抬著筐走進我家，從古老的灶臺上摘下了鐵鍋——那是父親去世的頭年冬天，用媽媽編草鞋掙來的錢花回來的。鐵鍋在院子裡就地砸成了碎片，嘩啦嘩啦被放進抬筐裡……那一瞬間，我看見了媽媽眼裡含滿了淚水。”

鐵器不夠，別的金屬製品也可以拿來湊數，人們相傳用了數代的銅臉盆、銅湯鉢子、掛蚊帳用的銅鉤子也交出來，同鐵鍋、鐵鏟一起送進了土爐子。河北省高陽縣邢南鄉，歷來以織布換糧為生，當官的為了向上級獻忠心，竟把全部織布機都砸掉煉成了鐵坨子。

1958年的中國，通訊並不發達，許多地方連電話也沒有，可是砸鐵器煉鋼

的法子同時在全中國出現。全民砸鐵器沒有遇到抵抗。百姓抵抗不了當權者，默不作聲地任人糟蹋。一個政權將人民控制得如此服貼，不能不說是極大的成功，而這種“成功”正是毛時代的特徵。

後人會問：難道中共百萬基層幹部就真那麼愚蠢，連“建設”與“破壞”都弄不清了嗎？當然不是。可是上級每日都在催報煉鋼的數字，他們明白上級關心的只是數字，並不關心鋼的品質，並不指望用那鋼去辦什麼大事，說穿了不過是在玩數字遊戲。只要將 3 斤重的鐵鍋砸掉、燒化，就完成了煉鋼的數字。你光榮我也光榮，何樂而不為。至於貧苦婦人一把一把地編織草鞋，日積月累攢錢換來的鐵鍋，頃刻化為烏有，關那些幹部們什麼痛癢。

作為這場運動的總指揮，毛是全民砸鐵器煉鋼的始作俑者。1958 年 8 月 21 日他在北戴河會議上說：“要拼命幹，上海有十多萬噸廢鋼廢鐵回爐。要大收廢鋼鐵，暫時沒經濟價值的鐵路，如寧波、膠東線，可以拆除……”毛自己走火入魔，一味蠻幹，又擔心百姓反對，便補充一句道：“要向幹部和人民講清楚，首先保證幾件大事，才是萬年幸福”。連鐵路都可以拆，上海外灘公園的鐵鍊就更可拆了。1959 年初，上海市一個體育場的跑道內外堆滿了近一人高的牛糞狀的“土鋼”。它們的前身也許是一千座鐵門，一萬個鐵窗，十萬根鐵鍊……東北豐滿水力發電廠把發電設備拆了去搞土高爐，頭腦正常的人沒法理解。該廠的原總工程師後來的總理李鵬 1984 年說：“我對大煉鋼鐵想不通，又不敢對別人講，只能私下對電力部長劉瀾波說，他聽了我的話，長時間沉默不語。”堂堂一個政府部長，對屬下一間廠的胡鬧行為竟無力制止，連表示異議都要斟酌一番，可見當時的政府已不可能阻遏災難的蔓延了。

陸定一 20 多年後才得以在《人民日報》上披露他親眼所見的煉鋼：“民工

有的很苦，吃的是地瓜藤子，沒有地方住，在地上挖個方坑，在坑裡鋪上地鋪，被褥都是濕的……”從陸定一的描述看，那些民工們過的生活決不會好過被秦始皇征去修阿房宮、築長城的奴隸們。

1958年9月初，毛澤東認為勝券在握，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飄飄然起來。他說當年鋼產量不僅可以翻一番，而且“可能搞1200萬噸”。“明年是基本上趕上英國，除了造船、汽車、電力這幾項以外，明年都要超過英國。15年計畫，兩年基本完成，誰人料到？”

1958年11月鄧小平在雲南考察經濟工作時，首重當地冶金工業，要求昆明鋼鐵廠按照規模生產進行規劃建設，甚至具體提出昆鋼生產規劃：第一步規模不搞30萬噸而搞50萬噸；第二步搞1百萬噸並勉勵昆鋼提高勞動生產率，不要成為落後的“副班長”（事實上該廠至1993年才產鋼百萬）。12月7日中共批准的財政部報告稱：“每噸土鐵全國平均至少要虧損100到150元。今年全國土鐵產量至少有1000萬噸，總計要虧損15億元左右。”建議由國家和地方分擔，給予每噸土鐵補貼100元到150元。老毛要求的1070萬噸鋼，竟然有1000萬噸土鐵靠全額補貼“煉”出來（當時全國調撥價150元/噸）的！最後，有300萬噸是完全沒有用處的廢渣！

全國究竟有多少人去煉鋼呢？毛澤東後來說是“六千萬人上陣”，“幾千萬人上山”找礦，那指的是被迫置農田於不顧的青壯農民，如果加上城裡的機關、學校、軍隊，那麼至少是八、九千萬，近一億人。1958年糧食豐收在望，可上億的人上山煉鋼，大量成熟的莊稼爛在地沒有收入倉，或收割草率而大量拋撒。譬如：四川“拋撒、浪費的糧食約占總產量的10%左右，當在220萬噸以上；河南更為嚴重，竟有50%的秋糧被毀棄在地裡未收穫入倉。來年的糧食也無人播種。

李葆華說：“我去密雲水庫，沿途見到棉花桃被風吹得滿天飛舞，像下大雪一樣。農民都去大煉鋼鐵了。今年糧食、棉花都一樣，是豐產沒豐收。”周恩來在 1959 年 7 月 3 日致副總理李先念的信中說：“油料作物長期被忽視，而去年又大量沒收好，嚴重地影響了今年油料作物的種子……”。1958 年“沒收好”的油菜籽、黃豆、花生等作物是如此大量，以致連 59 年的種子都成了問題，事情是多麼嚴重也就可想而知了。

這時，黨的領導人中至少有一個人看清楚了形勢的嚴重，這就是彭德懷。他在 1958 年 12 月 21 日到達湖南平江。這個縣有 5 萬多人跟著彭參加了紅軍，全縣在革命中犧牲的人近 20 萬，1928 年該縣有 75 萬人，到 58 年人口尚未恢復，仍不足 60 萬。人民付出這樣的代價，當然是為了子孫能過上好生活，但是他們失望了。在彭德懷召集的當年起義的老紅軍座談會上，老戰士們紛紛表示對大躍進、大煉鋼鐵的不滿。一位叫黃杜芳的殘廢軍人甚至告訴彭，再這樣下去，“老百姓可會造反了”。會快結束時，黃遞給彭一張條子，彭回到住處展開一看，只見幾行工整漂亮、書法甚佳的毛筆字，是一首步漢代民歌《小麥謠》韻的小詩：“谷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麼過？請為人民鼓嚨胡。”

老紅軍黃杜芳文化不高，不可能寫這手好字，也不可能讀過古文，因此這大概是鄉間一位秀才寫了托黃呈彭大將軍的。《小麥謠》的原文是：“大麥青青小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嚨胡。”兩千年前，漢王朝頻受遊牧民族侵擾，不得不派大軍長駐西土，致使婦女稼禾，人民苦甚。而今歷史重演，卻不是為了抵禦外敵，而是要在一年內鋼鐵翻番，這實在是史無前例。第二天，一位公社負責人向彭彙報，大講其煉鐵煉鋼，彭忍不

住打斷了他：“你們煉鋼又沒得煤，全靠木炭，一下子把山上的樹都砍光了。農民怎麼生存喲！我勸你們不要搞了。”可惜的是，指揮過千軍萬馬的“彭大將軍”無力改變這個局面，無法阻遏行將到來的災難。

3· 廣西大煉鋼

大煉鋼鐵毀去了廣西 86%的山林。當年全自治區共砍伐各種木材折合森林蓄積量為 3700 萬立方米。若按現在的市場時價，其價值超過 750 億元人民幣。

當年的廣西，可是一個大放“衛星”的基地——在“全民大煉鋼鐵”的日子裡，廣西 700 萬大軍上戰場。到 10 月底，廣西自治區“全民大煉鋼鐵”，達到高潮。進入 10 月的柳州地區，“鋼鐵衛星”放出了高潮迭起的“大躍進新高峰”。先是剛宣佈水稻畝產 13 萬多斤的環江縣，又發射一顆“全國第一”的“大衛星”：10 月 15 日日產生鐵 63321.5 噸，另有燒結鐵 51808.5 噸；10 月 18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鄧小平領導廣西省鹿寨縣創造出全國最大的“生鐵衛星”，日產生鐵 207243 噸，另產燒結鐵 288139 噸；一天產鐵 20 萬噸，等於國家分配給廣西的全年生產任務。一天 20 萬噸，一年就能產 7200 萬噸，中國只要有三個廣西省，一年之內在鋼鐵生產上就可以超英趕美了，何須 15 年、20 年？21 日環江又放出日產鋼 13416 噸的全國最高紀錄“大衛星”。柳州地委提出：“糧食萬斤畝，鋼鐵超英國！”

據 1948 年統計，柳州武宣縣森林覆蓋率為 58%左右。1950 年代中期，武宣 1700 多平方公里土地上，亞熱帶森林古木參天，虎嘯猴戲，山泉潺潺。1957 年初全縣有林面積達 69.42 萬畝，其中山林 57 萬畝。林中常有華南虎、金絲猴、長尾猴、野豬等珍稀動物出沒。

1958 年武宣 16 萬人口，農民勞力 7 萬人，絕大部分是勞於口食、苦於生計

的文盲和半文盲。在制定政策和方針的縣幹部中，3.2%是高中文化，其餘大部分為高小和初中文化；公社（鄉）、大隊幹部基本上是小學文化和少數初中文化；生產隊幹部大部分是文盲、半文盲。太平天國故土的子孫們雄視千古，要在一片文盲半文盲的土地上建立起“共產主義人間天堂”。他們順從上級的口號，要“大煉鋼鐵”、“超英趕美”，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1958年還剩不到半年時間，武宣要完成煉鋼2萬噸，煉鐵9萬噸，採礦50萬噸，燒木炭100萬噸。大街小巷，地邊牆頭，紅紅綠綠的口號標語鋪天蓋地，寫著：“鋼鐵生產壓倒一切！”“一馬當先，萬馬奔騰！”“鋼鐵元帥要升帳，鋼鐵衛星要升天！”“笑看鋼水奔流，淹沒英倫三島！”“好幹部迅速調往鋼鐵前線去！好兒女立即奔赴鋼鐵戰場去！”……一幅幅宣傳畫塗滿牆壁：鋼鐵“衛星”上馱著中國工人遨遊太空；爐火映紅天，鋼水滿地流；人民公社社員搭起雲梯摘棉花，開動伐木機收割參天大樹般的水稻……好一個童話般的世界！

1958年8月24日，縣委召開廣播大會，號召實行“人民公社化”。8月26日，成立“鋼鐵生產指揮部”，縣委書記當眾宣佈：“大煉鋼鐵，超英趕美！是英雄好漢，還是狗熊草包，就在今朝。是英雄的上臺來，是狗熊的滾下去”！台下一陣雷鳴般的叫好聲。先上臺的兩位披英雄結，紮英雄帶，乍著膽子“放衛星”，報上個數位3000噸。接著上來的又加碼幾百噸。只見一位公社書記光著個上半身，胸前、肚皮和後脊背上各畫了一個衛星圖案，手端一杆木制步槍，豪氣沖天地躍上播臺。頓時，人們喝采叫好，掌聲雷動。只見他聲高氣昂、手舞足蹈地表示：“共產黨是太陽，毛主席是指路人，人民公社是金橋，共產主義是天堂。黨往那裡指，就往那裡沖！向共產主義大躍進，我們公社已經全部軍事化，決心煉出2萬噸鋼，向國慶日獻禮！”一個公社在離國慶還剩兩個月時間就包攬了全縣

任務，縣委書記笑顏逐開。

也有頭腦冷靜不趨時勢的人。河馬鄉鄉長韋大意不願吹牛皮放大炮，憑著良心冷靜地表示：要按實際辦，得多少糧就是多少糧，出多少鋼就是多少鋼。這一下就炸了台，他當場被宣佈為“右傾反黨”，撤銷職務，開除出黨。後戴上“右傾分子”帽子，每次開會鬥爭“右傾反黨分子”或是批判“落後保守”分子，韋大意都被揪上臺去當典型，在二塘鄉召開的縣、社、大隊、生產隊四級幹部會上，韋大意被押上臺去，一邊批鬥一邊毆打，打得頭破血流，身上青一塊紫一塊，內臟也受重傷。此後，他被下放到五道村當農民，強制勞動改造兩年。

為了超額完成大煉鋼鐵任務，縣委要求：從城鎮到農村，從機關到學校，都要實行生活集體化，行動軍事化、生產戰鬥化。“共產風”愈刮愈烈，房屋和私人財物統統充公，人們完全按性別區分，編入軍事性組織中集體群居。縣裡為師，公社為團，大隊為營，小隊為連，下設“排”、“班”，所有社員一律入編。人們只有一床鋪蓋卷跟著走。今天上這個工程，住進號著“xx營”的房；明天換新工程，又住號上“xx連”的屋。男住男營，女住女營；拆散家庭，夫妻分居，妻離子散，夫妻膽敢擅自私下同居過性生活的，一律批鬥不誤。時常父母子女在編連隊各賓士不同工地，經年累月天各一方，滅絕人倫。桐嶺鄉盤龍村的廖武瑤，新婚才幾天，就被拉上山燒炭。人累心煩，完不成每天 200 斤的任務，加上偷偷跟妻子約會性交被發現，一繩索綁起來，作為“違反紀律”的犯人，拿到各煉爐去批鬥，後來又被罰了三天三夜連軸轉，晚上也不許睡覺的鋸木活……其實，這一套“行動軍事化”的社會組織，對太平天國發源地之一的武宣人民來說並不陌生。當年太平天國的農業社會主義那一套，也是“別男行女行”，夫妻同居則犯天命；“人人棄家集合”；實行“均產制度”，“將田產屋宇變賣，易為現金，

而將一切所有繳納於公庫，全體衣食俱由公款開支，一律平均”，“同食同穿”（《太平天國起義記》，《太平天國》第六冊，第 870 頁）。就連西王肖朝貴父母因私下同居，過了一下夫妻生活，觸犯“天條”，也被斬首示眾。

根據縣委的安排，鋼鐵大軍命名為“鋼鐵野戰軍”。縣委領導人組成的“師部”統領全域。師部發出的第一個口號就是：“吃在戰場，睡在戰場，餵奶(哺乳期婦女)在戰場！”當年在煉鋼鐵的“人民戰爭”中，共投入勞動力 11 萬多人。79%的幹部職工，50%的農民和 97%的學校師生，都被送上“煉鐵戰場”，日夜苦戰了幾個月。

柳州地委規定武宣（石龍）縣要建起 3000 個煉鋼鐵的土高爐。建爐要用大量耐火磚和普通磚，臨時燒磚誤時不趕急。為保證煉鋼鐵的需要，縣委決定：就地取材，不分公和私，只要是煉鋼工地建土高爐、燒炭要的，有磚房拆磚房，有瓦屋的拆瓦屋，用材林、薪炭林、果樹、風景樹，一律砍成燒炭。當時的情況是一切“共產”，人們的生、老、病、喪都由公社包攬。幹部們帶上一群社員，指著哪家就拆哪家。青磚房、紅磚房是首選目標，青磚、紅磚拿去作爐膛材料，當耐火磚用。土磚屋的土磚，拆來用作爐外保溫層材料。社員們從自家被趕出來，心中淒慘，臉上還得掛笑，甚至有人還帶頭上房拆自家房屋，以示“大公無私”。誰若膽敢表示不滿甚至反抗，那是自找活罪受。一頂“破壞煉鋼鐵，反對共產主義”的大帽子壓下來，捆綁、吊打、遊鄉示眾就必不可免。

根據後來的清算退賠和“三反”運動時的大致估算，“煉鋼鐵”時大約拆毀民房 8000 多間。拆房的“重災區”主要在三大“鋼鐵基地”：東鄉的王道、金崗，三裡鄉的白河、靈湖，桐嶺鄉的盤龍。因為這些地方是煉鋼煉鐵爐群基地。僅盤龍的盤古村就拆了 700 多間，按當年比價損失 14 萬多元。造成民眾居無住

所，流離失所，妻離子散。

盤古村廖武瑤一家被分散，他自己被趕到鄰村住進一間牛欄，把新婚的妻子嚇得打起包袱跑掉了。到了 1959 年初，廖家搬進盤古，在舊牆基上蓋起一間茅草屋，一家 8 口人(父母、夫妻、弟妹)擠在裡面，說不出的酸、澀、苦、辣。直到 1963 年，搞了一段“三自一包”，家中有了幾個錢，才拼死拼活蓋起房子住進去。古龍村一位姓廖的婦女，丈夫是學校教師，已隨師生們到團部燒炭去了。她用籬筐挑著棉被和四歲的兒子，被編到遠離家園的地方，去當煉鐵爐拉風箱的“女戰士”。等她結束“戰鬥”回到家時，房子早已被拆毀！離家時，好端端的五間瓦房一個家，此刻卻只剩下滿地瓦礫和在風中滾動的紙片布頭。“蒼天啊，我們母子在哪瑞安身？”她緊緊摟住兒子，低聲痛苦起來。由“排長”改個名稱的生產隊長掃帚眉一橫：“哭什麼？想遊街去是不是？枉費你是個貧農，一點兒覺悟都沒有！”

沒有“覺悟”的何止是廖氏？灣龍村一位農民，從土改到合作化，土中刨食，好不容易省吃儉用攢錢剛蓋三間新瓦房，打算秋後給兒子取媳婦。沒想一夜間被趕出家門。房頂被掀，牆基被就地加高改造，填入礦石和木炭。昨日是新房，今日變鐵爐。房主瞅著瞅著，傷心得一口氣沒上來，大口鮮血吐了出來……

武宣不產煤，煉鋼鐵的燃料靠木材燒成的木炭。地委下達的檔，聲稱柳州地區大煉鋼鐵具有最大的優勢：柳州有“燒之不盡，取之不竭”的森林資源。要求各縣大燒木炭，大煉鋼鐵！武宣人修建起煉鋼煉鐵爐，武宣人開出了森林砍伐隊。山林要出炭，土爐要出鋼！

那年月，反正森林是國家所有，公社所有，濫砍亂伐誰也不心痛，幾萬農民沒日沒夜拼命砍樹，吃在深山，睡在深山，甚至病死累癆在深山，只是為了完成

一個心願：快些完成上級任務！完不成任務，食堂卡飯，幹部打人。而師首長常年掛在嘴頭的是一句毛澤東驚世駭俗的名言：“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跡也能創造出來。”大煉鋼鐵，又創造出了怎樣的“人間奇跡”來？它所創造的“奇跡”，不過是付出巨大代價後百無一用的鐵水混礦渣的廢疙瘩！大煉鋼鐵的廢鐵渣，千堆萬團，數十年風吹雨打，鏽水浸地。真應該收集全國各地的廢土鐵疙瘩，壘建一座“全民大辦鋼鐵”的大型紀念碑，告誡國勿忘記這一頁。

幾萬人砍了幾個月，竟把無邊無際的大林莽砍了個刮地光，連路邊、河邊、房前屋後的樹都砍的一根不剩。靈湖是武宣八景的“靈湖松籟”所在。從唐朝柳宗遠被貶柳州，銘詩武宣仙人山石壁至今，“武宣八景”千載隆譽。“全民大煉鋼鐵”開始，“林湖松籟”也就在劫難逃了。10月師部派來一個團，就地伐林燒炭。只用幾天功夫，這塊美甲天下的人間仙境，就被徹底抹去了綠色！至今這些土坡仍是風吹土揚，雨打土濕的光坡一片，許多已被開墾耕作，以填滿日漸人滿為患的村民們的肚子。“林湖松籟”已成歷史。靈湖村的張大爺說：“你看大躍進絕不絕啊？我房後有五棵荔枝樹，從我爺爺下來，都得靠這些荔枝果供應油鹽錢。哪曉得我養了一個敗家子，他正當什麼鬼連長還是營長，幹部帶頭，深更半夜領人回家砍荔枝樹。我罵他：這樹是我們家的命根子，你砍它作什麼？他說：爸呢，後天就是共產主義了，你還管它油鹽柴米？要吃你就吃，要錢你就拿，火炭燒不出，我要當右派呢！我一想也是，兒子遊街挨鬥，丟了祖宗八代的醜。樹就那麼砍了，我哭到天亮。唉，那時的人都瘋癲了！”

一個瘋狂的時代，清醒者被暴力捆綁，比瘋子還不如地頭戴高帽、敲鑼遊鄉示眾。人們瘋狂的扭曲自我、隨時趨勢，才能避難脫災。這種瘋癲不到十年後又

一次發作，只是不再朝向自然，而是朝向人自身。58年砍向森林的刀斧，68年砍進人的身軀。

上萬個炭窯在冒煙，上萬個煉爐濃煙滾滾。黑煙、紅旗、黃土、光脊樑。唯獨沒有綠色。山林毀去多半，火炭燒掉不少，但煉出的鐵卻不多。就是燒出一些結鐵，死煉活煉也成不了鋼。兩萬噸鋼還沒有著落。農民到底能不能煉鋼？“土法上馬”到底出不出鋼？不少幹部群眾信心動搖了，就連那位打著赤膊上陣打擂、高喊拿兩萬噸鋼迎國慶的公社書記，心裡也直發慌：燒結鐵倒是煉出一大堆，但鋼水滴點不見，這麼向上面的國慶獻禮任務交帳？！

縣委要向上級交帳，當然拿下面是問。一場大規模的“反右傾”運動，在國慶9周年前後展開了。大辯論、大字報如開山重炮在各工地炸開來。還是當年那一套：先是讓幹部群眾鳴放，然後窮追猛打大反擊。平時在勞累中有怨言的群眾，面對高指標有猶豫或不滿的幹部，鳴放中有問題的“右傾分子”成百上千地被戴上各種帽子，押上批鬥會。許多人胸前被掛上白旗和烏龜，手敲銅鑼、破臉盆，遊鄉或遊街示眾。又有許多人被繩捆索綁，棒打棍棒……歷時10天的這場運動，一下子打垮了微弱的非議。全縣幹部在縣委“煉鋼先煉人”的招數下服服貼貼，重新上滿發條，拼死拼活去完成“三千座”、“二萬噸”、“九萬噸”。

縣委決定：乘“反右傾”東風，掀起“大煉鋼鐵新高潮！”遍及各村各寨的大搜家開始了。結鐵煉不成鋼，但鐵器可以煉鋼。幹部帶隊，手拿鋤頭、鐵錘，民兵全副武裝，挨家挨戶搜，目標是鐵器，凡是沾鐵字的東西，如犁頭、斧頭、秤砣、鐵耙、禾鎌、菜刀，甚至連做飯的鐵鍋、鍋鏟，一律砸個稀巴爛，送往煉鋼爐。大搜家的結果，家家要找件鐵器，比去趟柳州還難！有的村幾乎連鐮刀也絕了跡，收割禾穀靠用木片割、人力拔。“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大躍進，結果

倒退到石器時代的生產力，搞成了原始共產主義。

一場狂飆，成千上萬間民房又被拆毀，幾千座小土爐果然象變戲法似地平地而起，冒出紅光黑煙。終於放出了所謂全縣日產鋼鐵 20 萬噸的大“衛星”。縣委還把清朝末年外國人在三裡煉鐵時丟棄的廢渣當作燒結鐵放了“衛星”。喜報交上去，地委表揚傳下來。“還是要高壓！”幹部們得意得很，插白旗的危險終於過去了；“鋼”，終於煉出來了。然而共計不足百噸的廢鋼鐵，卻耗費了價值百億元的物資和 470 多萬個勞動日！

3000 多座小土爐同時開火，幾萬人馬新編入“鋼鐵大軍”，幾萬個土炭窯濃煙沖天。砍樹伐林大軍瘋狂地糾殺著綠色的大林莽，一座山禿了，螞蟻般的砍伐隊又揮動刀斧砍向另一座山。一道道山梁露出了岩脊，一條條山溝現出了泥土……花顏村後是一片百多年的黃皮林，大大小小 3000 多棵黃皮果樹，養活著花顏村的人們。八九月正是收穫黃皮果的季節，豐收在望的千余擔黃皮果，給村民們帶來了希望。然而，炭窯已經“斷炊”，煉鋼爐要“吃糧”，那就只有讓黃皮樹化炭了。當八月十五中秋月剛從東山露頭時，一個“營”的“兵力”踏著月光，開進了這片果林。鋸聲、斧聲，還有躲在陰影中老人的哭泣聲……

盤古村後山坡上，豎有一塊石碑，刻著“光緒二年植”。坡上是一片松林，共 326 棵水缸粗的老松。這片松林，是當年本村一位族人外出做官，在縣官任上回鄉出銀買地植種的，意在保護這片風水寶地萬年常青。多少年來，村民們就象供奉祖宗牌位一樣供侍這片松林，別說伐樹，就連進都沒人進去過。“師部”看上了這片上好的林子，指示要砍了作煉鐵爐的風箱。盤穀村的人堅決抗令。“師首長”惱了，從外鄉調來一個團，一天之內全部鋸倒了。砍樹那天，全村人站在山邊放聲大哭。為此，黨支書和大隊長被停職反省。沒幾天，盤古村 200 多戶千

餘人口，全部被趕到鄰村去住牛欄、草棚。盤古村的民房，除留下舊農會樓作“指揮部”外，700多戶民房全部被拆毀，做了土高爐。那幾個月，5000多民工和學生駐紮在盤古村，折騰的人仰馬翻。當土煉爐熄火後，整個盤古村成了一片廢墟。至今破爛的土高爐和遺棄的炭窯，成為這片遭災的土地的紀念碑。

1958年11月10日當地一名叫伊民黨員幹部給黨中央寫信說：

在“以鋼為綱”的指導方針下，為了出成績，放躍進衛星，我們的一些幹部成了只要數字，不擇手段，不顧一切的機器。大煉鋼鐵本應該用焦炭，我們這裡沒有焦，而山林茂密，幾千年來我們柳州的木材是聞名於世的上好佳材。可是縣裡一聲令下，幾萬人上山砍伐森林，從7月一直砍到現在，大約幾十萬方木材砍下來全都煉了木炭拿來煉鋼，結果怎麼樣呢？我們武宣歷來不曾出過鐵礦，沒有鐵礦石，縣委領導就組織全縣開展全民捐獻鋼鐵運動，由幹部開會發動群眾，並帶領民兵組成收鐵隊，挨門挨戶查抄鐵器，就連群眾家的鐵鍋、菜刀、鋤頭、犁頭、秤砣、扁擔鉤都收去當成“廢鐵”煉了鋼了。由於條件和技術不過關，煉出來的所謂“鋼鐵衛星”，大都是無用的廢品燒結鐵。為了放衛星，爭上游，一些幹部弄虛作假，大搞表面文章。工地上搞什麼紅旗化口號化，到處都是紅旗飄飄，口號震天，社員群眾大搞連續作戰，幾天幾夜不讓休息，有什麼用呢？還是只能煉出廢品罷了。

我們這裡幹部作風也很成問題，對人民群眾麻木不仁，甚至把他們當成完成任務的工具，根本不管其死活，許多工地出現嚴重的群眾生病和個別因勞累過度、吃不飽飯的死亡現象。但一些幹部對生病的社員毫無階級感情，仍然普遍要他們出工，否則就會遭到打罵和不給飯吃。這哪裡還是共產黨人的作風？在那些幹部心裡，他們根本忘記了人民群眾是我們的親爹娘，是我們的勝利的源泉的道理，

反而魚肉百姓，草菅人命！據我所瞭解的情況，這樣的情況，還不止是我們一個縣的孤立現象，在我們柳州地區還很普遍。

我在想，我們柳州地區的林木是有名的，國家建設也需要大量的木材。與其把樹木都砍光了拿來煉這些廢品，那不是極大的浪費嗎？何必要把這麼好的木材燒了，把群眾的家都毀了，去煉成沒用的鐵渣呢？幹部是為了完成任務，但我們黨的群眾觀點和作風毀於一旦，這樣的損失和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啊！……

武宣全縣大小森林幾乎砍伐一空，伐掉武宣森林幾十萬畝，86%的山林遭受毀滅性破壞，其餘的林木也所剩無幾。加上吃食堂燒毀的木材，當年燒毀的木料大約在 50 萬立方米以上。若按現在的市場時價，其價值近十億元人民幣。倘若拿著這近十億元的木材去換鋼鐵，那又該換來多少鋼鐵！近十億的木材化為灰燼，幾十萬噸的“礦石”和幾乎全縣民眾的生活鐵器經過煉爐，然而，鋼呢？那自上而下榮辱相關的“鋼”，卻不過是躺在煉爐旁搬不走、砸不爛、百無一用的渣石相融的燒結鐵！武宣人欲哭無淚。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造成嚴重的危機：糧食緊張，缺糧斷炊，大批饑民逃亡，死人事件不斷發生。縣委大搞“反右傾”、“反瞞產”。1959年2月25日，集中全縣各社隊幹部 5000 多人，在二塘樟村召開反瞞產大會。會議主持人說：1958 年獲得了大豐收，但由於各社隊幹部故意瞞產私分，有糧不交國家。於是，縣委負責人親自指揮幹部和民兵，就地查抄了公共食堂糧倉，又挨家挨戶搜糧。並事先安排假現場，將食堂糧倉底堆上稻草，上面倒上稻穀，看起來糧食是滿倉滿庫。於是，會議主持人宣佈：食堂糧倉就地封存，上交國庫。各家搜來的糧食，作為食堂用糧。並要求各社隊當場上報“瞞產私分”的數字。達不到領導滿意的指標，立即開批判會，“教育幫助”。會議中出現大量

打罵捆綁的情況。會議結束後，各社隊幹部火速趕回去，照本宣科，全縣“掀起了一場反右傾、反瞞產的大規模人民戰爭”。“反瞞產”運動的直接後果，造成了75%以上的社隊幹部進一步缺糧、斷炊。

廬山會議後，一場新的“反右傾、反瞞產”的運動橫掃城鄉。全縣各地普遍發生更大規模的饑荒、病情和死人現象。1959年全縣農民人均吃糧降低至此81公斤，1960年出現了以野菜充饑頂餐的情況，不少人因營養不良而乾瘦、浮腫，個別地方發生餓死人的現象。1959年秋至1960年冬，全縣農村人口缺糧，情況嚴重的社隊，人均每天2兩，更有斷炊者。全縣農村平均人均口糧為5兩多。據武宣縣誌：1959年至1961年，“全縣災情嚴重。全縣營養不良、乾瘦、浮腫、子宮下垂、腹瀉病人22565人”。當年“非正常死亡者”24000多人。而據當年整風運動中一份原縣委的總結材料(草稿)透露，“從大躍進開始的一九五八年，全縣在糧食問題上就犯了較大的錯誤，造成了我們工作中相當被動的局面。從1962年初，全縣約四萬多民眾因非正常死亡而喪失了生命。全縣損失牲畜在82%”。

當時，在全國大糧荒中，中共中央屢次下發檔，一方面強調要“鞏固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一方面要求各地區“要抓好吃飯的技術革新，搞好代食品生產”。廣西自治區委在大抓“代食品”生產中，又發明了“稻草澱粉”新花招，並以此作為生產“代食品”的成績，上報中共中央。所謂“稻草澱粉”，就是把收割下來的稻草，放入水中，然後倒上石灰，浸泡幾天，用石碾壓磨成漿，說穿了，就是當年人們用來拉屎擦屁股用的稻草紙漿的紙漿。有人當時就小聲發牢騷：“沒糧吃就沒糧吃嘛，還說什麼技術革命；硬是讓人吃拉屎用的稻草紙！人比牲畜還不如！”結果讓幹部知道了，當場召開批判會，打了個半死，又送去勞

改隊。

人們吃盡野菜、草根、樹皮、樹葉、水藻、觀音土、苔蘚、蚯蚓、毛蟲……吃了死人吃活人……那些吃過“稻草澱粉”的說：“人餓極了就會什麼都吃的。那時候，公共食堂一天到晚都是清湯寡水，見不到幾粒米，漂著幾片野菜。大人都餓的受不了，小孩子餓的只有哭，只有死路一條！野菜、草根、樹皮、樹葉、水藻、觀音土、苔蘚，天上飛的，地上爬的，什麼不吃！小孩子逮個老鼠都是好東西！挖到條蚯蚓，逮個毛蟲，放到嘴巴裡就吃了。真慘哪！那個稻草澱粉怎麼吃？我告訴你，食堂把草紙漿擠出水，捏成粑粑，放在蒸籠上蒸一下，當成飯發下來，一餐大人兩個、小孩一個。比野草還要難吃多了，滿嘴發澀，滿嘴草，咽不下，卡喉嚨，就著水往下沖，到了肚子裡更難受，燒心燒胃，肚子疼。還得吃，什麼都吃！盡有吃死人的，人都餓瘋了，有的人就偷偷去創新墳，挖出死人來吃。後來人死了就扔在路邊，也沒人埋了，就會有人去弄了吃了。也有的是自己家裡人剛死，親人就吃了他。你說慘不慘！苦日子年代吃過人肉的人傳出話來，說是吃人肉大補哇，快餓死的人吃了都能救命，吃肉補肉，吃肝補肝，結果文革就發生了大規模吃人的事件，那是後遺症。”

大躍進一舉砍掉武宣 60 萬畝森林，相當於毀掉 12 座蓄水量百萬立方米的水庫。從“大躍進”過去的第 5 年起，乾早就成為武宣民生塗炭的主要因素。1963 年夏、秋大旱，連續 5 個多月滴雨未下，山泉全部斷流，田土幹得冒煙，100 多萬畝莊稼枯死，全縣 2/3 的人口及牲畜吃水困難。從 1959 年至 1962 年的嚴重饑荒還未過去，新的饑荒又橫禍撞來，武宣人如同燒焦的幹魚，不少人哀歎“生不如死”而喪失活下去的信心……

在武宣，天旱是災，下雨也成災。“滴水貴如油，下雨泥石流”。1976 年

夏，下了一場約 80 毫米的大雨，全縣因植被受破壞而導致的山崩，竟有 136 處之多。下一點雨，山土泥石隨山水滾滾而下，有史以來清澈的黔江，如今常年混黃，下雨則如泥漿翻滾！容量為 60 萬立方米的桐嶺鄉古龍水庫，每逢下雨，雨水沖刷著山土流進水庫，每年淤積泥沙近一米厚。

第 107 節 瘋狂滅麻雀

1955 年 12 月 1 日毛主席來到上海復旦大學視察，學校正大門裡，屹立著巨幅的白色的毛主席雕像，主席看到非常的滿意。正在此時，突然發現雕像的面孔有很多黑點，原來一群麻雀正在主席雕像上拉屎。主席勃然大怒：竟敢萬歲頭上拉屎，真是豈有此理！

1955 年 12 月 21 日，毛澤東起草徵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根據毛澤東手稿刊印）：除四害，即在七年內基本上消滅老鼠（及其他害獸），麻雀（及其他害鳥，但烏鴉是否宜於消滅，尚待研究），蒼蠅，蚊子（見《毛澤東選集第 5 卷 263 頁》）。

在徵求意見時，中國科學院鳥類學家鄭作新說：麻雀在農作物收成季節吃穀物，是有害的；但在生殖育雛期間吃害蟲，是相當有益的。不應該消滅麻雀本身，而是應消除雀害。

1956 年 1 月 23 日與 25 日分別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最高國務會議討論通過了《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其第 27 條規定：從 1956 年開始，分別在 5 年、7 年或者 12 年內，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1956 年 1 月 26 日《人民日報》）。

1956 年 10 月，青島舉行了中國動物學會第二屆全國會員大會；實驗生物家朱洗講了普魯士國王消滅麻雀的教訓。1774 年，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也曾下令：消滅麻雀，而且殺死麻雀者有獎。於是，百姓爭相捕雀。沒用多長時間，麻

雀真的“一掃而光”，但麻煩也就接踵而來：各地果園佈滿了害蟲，樹葉枯萎，草木不生。國王見狀急忙收回成命，緊急從外地運來雀種，加以繁殖保護，才算渡過難關。朱洗說：“除了在某些季節麻雀是有害的，其他季節則是有益的”。朱洗先生在 1962 病逝，但紅衛兵認為他把偉大領袖毛主席同普魯士腓烈特大帝相提並論並公開反對毛澤東的英明決策，因此，受到砸碑掘墳、曝其屍骨的待遇！當時除了朱洗，還有很多科學家都建議過為了慎重不要轟轟烈烈地搞捕雀運動。

1957 年 9 月到 10 月的八屆三中全會不理會反對的聲音，強行提出開展包括消滅麻雀在內的“除四害、講衛生”的愛國衛生運動。毛澤東在會上說“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這四樣東西，我是很注意的。只有 10 年了，可不可以就在今年準備一下，動員一下，明年春季就來搞？”（《毛選 5 卷》第 470 頁）接著，他提出了這樣一個目標：“中國要變成四無國：一無老鼠，二無麻雀，三無蒼蠅，四無蚊子”。

面對反對意見，1957 年 10 月《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第 27 條除四害內容修改改為：“從 1956 年起，在 12 年內在一個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滅老鼠、麻雀、蒼蠅和蚊子。打麻雀是為了保護莊稼，在城市裡和林區的麻雀，可以不消滅。”但不少城市反而更加大張旗鼓地開展圍殲麻雀的群眾運動。上海市第一次滅雀大戰進行了 3 天，滅雀 88171 只，獲雀卵 265968 只；第二次進行了兩天，滅雀 598001 只。

1958 年 1 月毛澤東又在杭州參觀了一條以清潔衛生著名的小巷，接著在南寧會議上，又指示全國搞除四害的愛國衛生運動。1958 年 2 月 12 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佈指示，開篇即說：“一個以除四害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的高潮已經在全國形成”，提出在 10 年內消滅四害（蒼蠅、蚊子、老鼠、麻雀），公

佈了各省市計畫實現的期限。

頓時，全國響應，除四害成為政治任務，億萬人民出現了除四害的狂熱。“打麻雀”是在黨中央和各級政府的統一領導部署下進行的，全國範圍內的機關、部隊、學校、廠礦、城市、鄉村，實行全民總動員，男女老幼齊上陣。《擂鼓鳴金除四害》詩雲：“老鼠奸，麻雀壞，蒼蠅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壞。千家萬戶快動手，擂鼓鳴金除四害。”

一位元外國人曾記錄道：“一大早，我就被一位婦女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吵醒了。……一個年輕婦女正在臨近的房頂上來回跑，她手裡拿著一個竹竿，竹竿上拴著一個布條，一邊跑一邊拼命地揮舞竹竿。……在這個旅館的高層樓上，穿著白衣服的婦女們正揮舞著床單和毛巾，這是要使麻雀不落在這棟房子屋頂上。”使用這種驚嚇麻雀、蒼蠅等使其亂飛最後精疲力竭而死的方法除四害，是人類史上聞所未聞的，因為它需要全民參與才有效。

北京市 300 萬人民總動員，於 1958 年 4 月 19 日經過一天的“戰鬥”，戰果“極為輝煌”，據不完全統計，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 83249 只。1958 年 4 月 21 日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發表了《咒麻雀》詩雲：麻雀麻雀氣太官，天垮下來你不管。麻雀麻雀氣太闊，吃起米來如風刮。麻雀麻雀氣太暮，光是偷懶沒事做。麻雀麻雀氣太傲，既怕紅來又怕鬧。麻雀麻雀氣太嬌，雖有翅膀飛不高。你真是混蛋鳥，五氣俱全到處跳。犯下罪惡幾千年，今天和你總清算。毒打轟掏齊進攻，最後方使烈火烘。連同武器齊燒空，四害俱無天下同。

1958 年 4 月 22 日新華社發《首都人民除四害戰鬥一大勝利 三天殲滅麻雀四十萬隻》一稿（平均起來，每 25 個人合作奮戰 1 天，消滅麻雀 1 只），其中寫道：“中國科學院有兩千多科學家和工作人員參加了戰鬥。鳥類學家鄭作新一面

指揮一面轟趕。科學家華羅庚、錢學森等今天早晨不到五點就帶著‘武器’進入了‘戰區’”……

在轟轟烈烈的滅雀政治運動中，確實有一個人不知趣的跳了出來，這個人就是中國科學院的鳥類學家賈相剛，當時他給毛澤東的信中說：第一，我和一個小組根據您的《實踐論》又解剖了一批麻雀，從其食性……確實不是害鳥。第二，我這一輩子不懂政治，不懂大事，但是我懂一件小事，那就是鳥。我願意用鳥類學者的資格，用我的生命為麻雀擔保，它無害，甚至對我們的生活有益。所以，我懇請主席收回成命……

毛澤東看後沒有理睬。此後的幾十年，賈先生經歷了不少坎坷。

有人回憶，打麻雀那天，如果你恰巧站在黃河故道邊上，你就往北看吧，哈，一望無際的大平原上，人山人海，吆喝聲、歡呼聲驚天動地，為的是逼迫麻雀不停歇地飛，不讓它們落地休息，累死它們！如果誰發現落地的麻雀就用彈弓射，用石頭打；麻雀鑽進樹洞之類的地方就防火熏燒，不把那個可憐又可恨的小傢伙弄死決不甘休。一時間，朗朗乾坤，青山綠水，被攪得烏煙瘴氣、天昏地暗！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遭殃的不只是麻雀，其他鳥兒，喜鵲、畫眉、黃鸝、金絲鳥等等，也都不知道如今這地上的人們犯了什麼病，驚恐地高高飛翔，不敢落地，邊飛邊發出一陣陣痛苦的哀鳴。據不完全統計，從3月到11月上旬，8個月的時間，全國共捕殺麻雀19.6億隻，隨著12月新的一輪“戰役”的進行，全國的麻雀基本絕跡，其他鳥兒死亡無數。

1958年12月13日這一天，為了慶祝毛澤東的生日，上海就消滅了麻雀194432只！全國各地大同小異，相當多的地方有過之無不及。《人民日報》還專門發表文章予以謳歌。

其他大城市的情況也差不多。廣州共圍剿消滅麻雀 31 萬隻（包括雀蛋 2.58 萬個），搗毀雀巢 3.9 萬個，圍剿麻雀的戰役大獲全勝。人民子弟兵廣州駐軍也參加了這次“戰役”。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

1959 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樹木發生嚴重蟲災，有些地方人行道樹的樹葉幾乎全被害蟲吃光。在這種情況下，生物學家們更加強烈地要求為麻雀“平反”。

1959 年 7 月 10 日下午，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說有人提除四害不行，放鬆了。麻雀現在成了大問題，還是要除。郭沫若為配合廬山會議，積極發動了為曹操翻案的運動。

就在毛說“麻雀還是要除”的時候，廣大農村傳出了“遍地蟲災”的消息。更多的科學家也開始挺身而出，為麻雀翻案。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的徐京華研究員。他十分天真地說，為麻雀翻案，比為曹操翻案重要得多。

1959 年 11 月 27 日，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給毛澤東報送了《關於麻雀益害問題向主席的報告》，報告中說：科學家一般都認為，由於地點、時間的不同，麻雀的益處和害處也不同；有些生物學家傾向於提消滅雀害，而不是消滅麻雀。經過艱苦的努力，科學終於暫時佔據上峰。毛澤東 1960 年 3 月 18 日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蟲，口號是‘除掉老鼠、臭蟲、蒼蠅、蚊子’。

有《鳥人賦》雲：前不見古人，先人拂袖去；後不見來者，子孫無顏跟。天地悠悠，生你孽種，愴然淚下，有你惡棍。始皇沒你毒，希魔無你狠；玩弄老百姓，覆手起烏雲。吃糠不說餓，苦水似甘霖。思想遭閹割，被奸生亢奮。指鹿豈為馬，野豬做麒麟。過河即拆橋，翻臉不認人。畝產能過萬，認賊作至親，古往

無聖賢，天下獨你尊。麻雀尚不放，何況眾草民。千古帝王，誰有你榮耀？萬里河山，何處不行淫！呼萬歲、祝無疆、樹塑像，請示彙報忠心舞；紅寶書、語錄歌、佩像章，舉國上下為你狂。餓殍數億萬，全國惟你胖；人皆有罪過，唯你放光芒。應考證：你偉大，是那凶神配下你仙種；你光榮，又何厲鬼交了你娘親？

第 108 節 深翻土地太荒唐

1958 年製造的荒唐事件，表現的瘋癲行為超出了過去一千年的總和。有科學家說，天山、祁連山的積雪融化成水後可以解決西北的乾旱問題，物理書上又說黑色物質從太陽光中吸熱的本領最大，於是派人去雪山撒煤渣，甚至派空軍去轟炸冰川，結果一無所獲。

1958 年毛總結的“農業八字憲法”（土、肥、水、種、密、保、工、管）成了對生產瞎指揮的理論依據。而御用理論家則把“八字憲法”吹得神乎其神。

如“合理密植”：是讓土地的每一平方釐米都佈滿種子，竟在每一畝土地上播種數百公斤，日後種芽發起，重重疊疊，先是將整塊土地頂起，接著就全部死亡，秋天顆粒無收。名演員新鳳霞去河北勞動，親眼見公社幹部們指揮社員連夜將幾畝地的麥子移到一塊田裡，點上大燈，用風扇猛吹（悶壞麥子），然後向上吹噓說密植帶來了豐收。她回到城裡，將此事告訴名作家老舍，老舍叮囑她：“你千萬別跟人說呀！”因為密植是毛的號召，毛 1958 年 5 月 17 日八大二次會議在上說：“密植就是充份利用空氣和陽光。現在不是反浪費嗎？就應該把空氣和陽光的浪費也反掉。陽光每天辛辛苦苦的工作，你們都不利用”。於是全國各地便競相搞密植，越植越密，越密越革命，到處都是在搞新鳳霞所見的那種把戲以應付上級。河南有兩個老農抵制密植，少下麥種，被法院以“破壞生產罪”，各判處三年徒刑。

肥料的重要性更激起了人們許多奇特的想像。有專家說，人的糞便在高溫下發酵更快，使用的肥效更高，廣東番禺縣動員農民用大鍋煮糞煮尿，以此製造高級肥料，說是這樣糧食高產衛星就有了保障。南方農民多數住茅屋，因茅草可漚肥，湖南便發明了拆茅屋，將茅草混上人畜糞浸入水塘，然後開塘水灌田的施肥法。他們將這稱做“茅屋洗澡”、“屎湖尿海”。僅寧鄉縣就拆了 15 萬間茅屋，占全縣 1/5 的住房。糞便發酵再好也還是糞便，於是又有人想到榨芝麻油、胡麻油往玉米地裡澆，給莊稼注射葡萄糖液。河南有個生產隊為了放一顆畝產 120 萬斤的巨型衛星，幹部下令打死了 70 多條狗，煮成狗肉湯澆到地裡。但是由於下種過多，出秧過密，結果不得不將秧全部割掉。70 多條狗連一斤種子都沒換回來。9 月 10 日，劉少奇去河北徐水縣視察，見大田人民公社黨委書記高玉生將帶血的狗肉煮爛，以麻油、葡萄糖、狗肉湯澆灌作物。據說此種肉湯可使玉米每株結穗十棵，使穀子穗長五寸。所以一時風行鄉間，狗跡幾絕。劉非但不制止，反而說：“那你們可以養狗嘛！狗很容易繁殖嘛！”

為種種奇跡作出犧牲的決非僅是狗，還有其它生物。陝西省蒲城縣發明改變雞的習性，讓公雞履行母雞的職責去孵化小雞，以使母雞騰出更多的時間來下蛋。在這個實驗中公雞被割去生殖器官，並且被迫像人一樣地喝下兩杯酒，然後就醉意盎然地去孵化同伴的子女。

西北農學院畜牧系的六位學生用大致類似的辦法完成了另外一項創造：他們對一頭豬施以手術，將其耳朵、尾巴、甲狀腺和部分胸腺割去。豬的照片後來掛在北京的農業展覽館中，其禿頭禿尾之狀慘不忍睹。但是照片說明寫道，這種“四割法”使這只豬在一天之內增膘九點五公斤。所以它是學生們向國慶九周年敬獻的禮物。

1958年5月間，河南長葛縣的縣委書記跑到中央在中南海的會場上去吹牛，說他們將全縣1百多萬畝土地全部深挖了一遍，做法是先將表層熟土剝下放置一旁，將下邊一尺五寸深的生土翻出，用鋤頭將土塊一一打碎，攪拌上肥料，再埋下去，然後覆上熟土，於是產量翻了一番。一輩子老謀深算的毛澤東，竟然天真地立即相信了那位縣委書記的說法，誇獎說“這是一大發明”，並當即要求全國各縣照此辦理，在3~5年內按一尺五寸的標準將全國的土地都挖一遍。由於一切都靠手工，如果按長葛縣縣委書記說的去做，一人一天只能翻兩平方米，就算加班苦幹，幹它四平方米，全縣按二十萬個勞力計，別的什麼都不做，全部投入這項工作，也要七百五十天才能幹完，可見這位縣委書記完全是在胡說八道。

毛澤東熟讀史書，自然明白隨文帝留下的民富國強的大好家業是如何被煬帝敗掉的。征遼外加挖個大運河，便弄得神人共怒，掀翻了他的金鑾殿，千餘年來，成為所有治國者的前車之鑒。而今若按毛澤東的指示將全國的土地都挖一遍，那土方量是多少？不算不知道，一算嚇一跳：相當於一百米寬、十米深、一千五百公里長的大運河整整三百條。三至五年內挖三百條大運河，另外還有幾千萬人在煉鋼，這個江山難道他不想要了？不是的，他只是輕信了長葛大夫的胡言，又忘了請秘書核實一番而已。這樣一來，兩千多名縣委書記回到各自的轄地真的深翻起土地來了。一說深翻，自然是越深越好，你說一尺五，他說二尺，我說三尺。

不知哪位科學家說，農作物的根須可長到三尺長。由於下層生土板結，根須伸展不下去，不能吸收足夠的營養，因此要提高產量應翻土三尺。於是毛澤東對農業機械部部長陳正人說：“深耕要逐步做到翻三尺。只有深翻，水、肥才能充份發揮作用。以後畝產搞到8千斤，每人2分地就夠了”。陳正人向全國傳達了毛的這個指示。在那些“敢想敢幹”的日子裡，深翻三尺已經不光榮了，有的地

方互相攀比，越挖越深，甚至挖到一丈二尺，比造樓房的房基還深。下命令的中共幹部自然不會動手去挖土，遭殃的只是成了“人民公社社員”的老百姓。

公社社員們本已疲於奔命，如今又要深翻土地，只有挑燈夜戰。電燈、燈籠、火把，凡能用來照明的全拉到地裡點起來。中國農村的土地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那樣壯觀的場面，感情再冷漠的人見了也會感動得熱血沸騰，詩人、作家見了更是靈感泉湧，寫了無數的詩歌、散文，歌頌那“挑燈夜戰”；當時有首《深翻》的歌謠：“紅色大軍千千萬，深翻土地突擊戰，沖天幹勁如猛虎，鐵鍬飛舞似閃電。寒風凜冽汗滿面，手中血泡磨成串，保證品質深一尺，超過定額駕火箭。”唯有手執鋤頭幹活的農民才知道，自己“被驅不異犬與雞”！

1958年《安徽日報》10月18日頭版報導：“淺水養不出大魚，淺土長不好莊稼，全省已組織230萬人的深翻土地的大軍。”文章說，通過“鳴放辯論，批判了右傾保守思想，扭轉了抵觸情緒，使群眾認識到深耕的好處”。由此可知，農民對如此深耕是有“抵觸情緒”的，在“辯論”、批判之後，被逼得無奈才去深翻土地的。在這塊土地上，農民並不是主人。譬如山西陽城縣，十二月份已冰凍三尺，可是還有幹部逼著農民摸黑去深翻土地，儘管鋤頭掄下去砍不進一寸深。這時的中國農民已完全成了沒有自由的奴工。

毛澤東提倡“深耕密植”，在農田上掘出一尺的深溝，大把地撒入麥種。麥種有多大力量才能頂出二尺的生土生芽成長？麥子都爛在溝裡，顆粒無收。

1956年上海奉賢縣農村全部實現高級社。生產資料全部歸了合作社，生活資料也由社裡分配，合作社控制了農民的命脈。幹部說啥就是啥，稍不馴服，批鬥、辯論、扣口糧。幹部一聲令下，社員如奉聖旨。幹部的口頭禪是：“黨叫你幹啥就幹啥！”“違令者決不客氣”。

1957年冬至1958年春，全縣抽調了30萬高級社社員，投入積肥水運動。河湖港汊，日夜紅旗招展，鑼鼓喧天。社員們駕著船撈河泥，天寒地凍，一身冰碴。是役，社員致病受傷870餘人。冬春之際，禾草不生，各社開始把社員生火做飯的柴草、繼而又把牲口過冬的草料也投進水裡漚肥。奉賢一時出現百姓流離失所，牲畜越冬無食境況。“什錦湯”積肥運動中，全縣有魚塘、河濱4000多條被封圍積肥，魚死蝦絕，臭氣熏天。

李少峰在縣委書記會上大發感慨：“合作化還感到勞力過剩，一到大躍進，各項工程都缺人、缺勞力。我看中國的女人還得學蘇聯，生它十個娃娃，封個英雄母親。人口要翻番。”

1958年縣委第一書記王文忠說：“大躍進嘛，講那麼多溫良恭儉讓幹什麼！搞生產要跟打仗一樣，要敢拼命，不怕死，敢打硬仗和大仗。還能跟小腳女人一樣？”秋收後縣委提出：“苦戰一冬春，深翻三尺三”。豐產田要翻六尺，衛星田要到一丈三。全縣計畫深翻土地四十萬畝。大約要用1600萬個強勞動力工日，挖8000萬土方。

自打深翻土地運動開展以來，各公社社員都是雞叫頭遍，就被幹部逼著上工，苦幹到半夜，還在地頭。縣委書記王文忠、副書記李少峰告訴社隊幹部：“群眾象狗一樣，只有手裡拿了竹棒，它才不敢咬人”、“老百姓象豬似的，不扯耳朵不叫”、“你不打，他不幹”，“要想大躍進，堅決大批促大幹，手頭一點也不能軟”。大批、大打、大餓飯、大勞改成為奉賢縣委的工作法寶。對於完不成任務和完成任務不好的社員，幹部舉手就打、張口就罵。動不動就罰跪、罰飯、送勞改。有些社員一看見幹部，就嚇得戰戰兢兢，全身哆嗦。社員們控訴說：“人比牲口還不如，牲口幹活還得吃料，社員幹活不給飯吃光吃傢伙（指刑具）。”

奉城公社黨委書記宮茂敏帶著全社連以上幹部檢查生產。來到五營的地頭，拿尺一量，深翻不到一米。書記光火了，召開全營社員大會，將五營營長和各連指導員撤職查辦，並當場將一名沒有完成任務的中農社員以“破壞深翻土地運動”的罪名五花大綁。全營社員嚇得大氣也不敢出，只有宮茂敏刺耳的尖叫在迴響：“任務一定要按期完成，深度不足要返工！”

深夜，大雨如注，宮茂敏親自督戰，幹部和民兵持槍荷彈，揮舞棍棒，把苦幹一天十多小時的社員，全部趕到地頭，婦女兒童也不能倖免。有幹部問：“病人怎麼辦？”宮書記大怒：“病人？哪來的病！偷懶裝病，罪加三等，給我趕下田去！大躍進你裝病，人民公社不養病人，只要吃得飯，就給我下地去！”11月的夜雨寒氣刺人，社員們拖著精疲力盡的身子，在泥水中拼盡全身最後一點力氣，舉起鐵鎬，去翻挖雨水浸透的土地。幹部們手持棍棒、皮帶，在地裡監督。誰的活慢一點，立即被打翻在地，爬起來接著幹。

風聲、雨聲、斥罵聲、棍棒打人聲、社員痛哭聲，混徹夜空。漸漸地，一個社員栽倒下地，又一個社員昏死倒地。馬燈刺破黑夜，田間倒下了幾十人。幹部民兵奉命把人拖到田塍上，宮書記命令：“醒來在幹！”此情此景，讓每個稍稍有點人性的人，都會痛哭失聲。

新寺公社一個營300多人奉令大戰豐產田，幹部規定二十多畝田，深翻六尺，天黑前須完工。結果到太陽落山，活才幹到一半。領導大怒，帶著民兵封了食堂，社員們餓著肚子在地裡幹了兩天，地翻完了食堂才開飯。結果病倒20多人，其中5人倒床重病半個多月。

曙光人民公社有個女社員，名叫顧林仙，已經懷孕六個多月，妊娠反應較大，身體虛弱。她所在支部副書記卻硬逼她下地勞動，並威脅說：“做不動就開會辯

論你！”辯論會就是鬥爭會，拳打腳踢是常事。她因害怕被辯論，就跑回娘家。她哥哥勸她回去。第二天，她哥哥上工後，她找了根繩子上吊自殺了。顧林仙死後，社員們大受震駭和刺激。

大躍進一年中，奉賢縣共拆毀焚燒民房 25000 多間。李少鋒曾說過：“消滅私有制，就必須消滅家庭。要讓家庭消滅，必須先讓私有制的溫床房屋消亡。公社化為我們提供了搞共產主義的歷史的條件”。積肥拆民房、大辦水泥拆民房，滅蟲運動拆燒民房，那大煉鋼鐵運動，自然更是要拆民房了。廣大社員憤恨地說：

“滅蟲突擊隊是放火隊；為幾條蟲子就敢拆房燒屋，拿人命去滅蟲命”；“強盜搶還剩下屋殼子，現在連屋殼子也沒有了，慘哪！”

據《奉賢縣誌》載：農家鐵鍋基本收盡。奉賢縣大煉鋼鐵運動，煉出來的生鐵，成本達每噸 2613 元，煉出來的“鋼鐵”，全是廢鐵渣。上海幹部形容當時的情景說：“站在高處看奉賢，就象日本鬼子掃蕩後的情景一模一樣，斷瓦殘壁，歷歷皆是，一片淒涼”。

按毛的指示，人民公社要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公社化運動中奉賢縣委大搞“三化”，堅決徹底。縣委規定：16 歲以上 50 歲以下，除地、富、反、壞、右分子外，全民皆兵，統統編為民兵。16 歲到 30 歲為基幹民兵，平時通過軍事化組織，大搞大兵團的生產運動，組織為農業常備兵團和專業兵團，專業兵團又下設深翻兵團、積肥兵團、鋼鐵兵團和副業兵團行動戰鬥化。兵團按營、連、排為單位，實行集體居住，男女分開，夫妻分居，父子拆散。統一勞動、統一居住、統一休息。聽哨聲起床、吃飯、出工、收工、睡覺。生活集體化鍵的是吃公共食堂，集體住大屋。據 1958 年 10 月的統計，全縣共辦起 2021 個公共食堂，共有 65001 戶，吃食堂的有 266104 人，占當時農業總人口

的 91%。

1958 年 9~10 月，全縣成立了 11 個人民公社，農村人口全被共產入社。社員生活一律軍事化，按師、團、營、連、排、班的軍事編制，把社員編入其中。吃食堂，住大鋪，夫妻分手，母子別離。為徹底解放婦女，廢除家庭私有制，各公社要組織幼稚園、托兒所。在“共產風”一風吹的情況下，一切財產歸公。每個人只剩下換洗衣物，打在一個小包袱裡，隨身帶著走。用不著的統統打爛、燒毀，以割斷“資本主義尾巴”。社員房子充了公，公社還不放心，怕見物思舊。在集中居住後，各公社還放火燒了一些空房子。僅僅為了實現“共產共居”，斷絕社員還家之念，全縣就拆燒民房 2147 間。

奉賢縣委要求社員吃在地頭、幹在地裡、睡在田頭。各公社在田頭搭起草棚，集體紮營集體睡，以便爬起來就出工勞動，幹到半夜爬上鋪就睡覺。江南的夏夜，蚊叮蟲咬，社員們受盡了活罪。被“解放”出來的女社員，統統編入各娘子軍連，參加大兵團作戰，累死累活。許多婦女勞累過度，造成子宮下垂、流產、閉經、不育、浮腫等病，直至大批死亡。

參加人民公社的婦女，許多人成為幹部的性奴隸和玩物。廢除家庭，夫妻分居，偶爾有夫婦倆相約野地交合，一旦發現，就會受到批鬥甚至毒打。新寺公社在大躍進中，幹部批鬥、毒打過 23 對野合夫妻。幹部們在公社化之初，有家室者也是偷偷摸摸，找間空屋求歡作樂。到了後來，幹部們不僅夫妻有樂，甚至以減少勞動任務，安排輕鬆活路，入黨、入團、提幹，小恩小惠，多發一點糧食等等手段，淫人妻女。據統計，新寺公社黨委成員，40%有作風問題。全縣大隊幹部中，27%犯“男女作風問題”。有的幹部，開始還只是尋找已婚婦女偶爾姦淫，後來則“專挑三揀四，引誘有姿色的姑娘”。

據奉賢縣委 1961 年的彙報材料稱：從 1959 年 1960 年夏，奉賢縣公社一級幹部中 39%有男女作風問題。有的幹部長期霸佔軍婚、女教師和少女。新寺公社一幹部玩弄女性 15 人。有的被姦淫後給一雙襪子、幾塊糖果、幾包餅乾或幾斤大米。新寺公社社員編了一首順口溜：“如今幹部不一般，白天吃喝晚上玩。開口就罵舉手打，社員難過鬼門關。鬼子愛搶花姑娘，幹部圍著女人轉。十八姑娘看上眼，上床一碗大米飯……”。泰日公社大饑荒年代，竟發生丈夫剛餓死，死屍還停在屋裡，生產隊長第二天就掖著米袋進門先占人妻後占女的事件。

縣公安局於三月和八九月間，先後兩次在南橋鎮舉辦“兒童集訓班”。集訓班公安幹部利用職權之便，對 2 名集訓少女進行猥褻、強姦。據當時對被集訓過的 88 名兒童調查瞭解，受過捆綁、吊打、扯耳朵、抽皮帶、煽耳光、曬毒太陽、罰跪和性虐待等刑罰的就有 85 人。

據中共上海市委工作組奉命複查，奉賢因幹部嚴重違法亂紀，強迫命令，直接造成死亡的共 102 人，其中死於“勞改”、“集訓”的 23 人（打死 7 人，自殺 16 人）；全縣被送入“勞改隊”進行強迫勞動改造的共有 5700 多人。無辜被撤職、停職的幹部有 660 余人。

第 109 節 王任重炮制“天下第一田”

1957 年 10 月，王任重回到武漢，即把農業跨《綱要》當成中心工作來抓。他在省委會上強調說：“總路線是要高速的，湖北能不能提前五年跨《綱要》？”一個月內，他先後講話，把跨《綱要》從規定的十年時間，提前到五年、三年，後又提出一年跨《綱要》。

樹先進、抓典型，湖北省委把工作重點放在了紅安、麻城兩個縣。俗話說，朝裡有人好做官，典型樹給黃麻起義的首長們看。王任重找來黃崗地委書記姜一，

告訴他：當務之急是抓典型、搞樣板田。省委把紅安、麻城當全省工作的樣板田，你們一定要做好 1957 年當年達標的樣板，拿出數字來，當然不能忽視工作細節，要經得起推敲，不要出漏子。10 月底，中共黃岡地委將精心編造出來的紅安糧食畝產量，麻城棉花畝產量上報省委，聲稱由於縣委領導親自深入基層，抓樣板田，以典型帶全域，經過深翻土地，施肥、合理密植，兩縣糧棉產量當年跨《綱要》。湖北省委抽調省委宣傳部和武漢大學的筆桿子，連夜苦戰，以“躍進速度”趕出了幾篇文章，經省委書記王任重和王延春親筆潤色修改定稿，上報中共中央。

1957 年 11 月 29 日，湖北省委發佈《關於各級幹部種試驗田的報告》。《報告》說，幹部種試驗田，能改進工作作風、實現高產躍進；對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實現黨對農業生產的具體領導，起著決定的作用。最近我省各縣已普遍推行了這個辦法，開始從根本上改變農村工作面貌。紅安共有縣區鄉社四級幹部 1470 名，親自動手搞試驗田有的 1151 名，共種水稻試驗田 646 畝，花生試驗地 476 畝，還有棉花、紅苕等作物的試驗田地。試驗田的產量，都高於一般田地。副縣長蕭林山兩畝試驗田，獲畝產水稻千斤的紀錄。七裡區區委書記工作中的一畝花生試驗地，獲畝產 1190 斤記錄，還有皮棉畝產一百斤、紅苕為畝產一萬斤的紀錄。試驗田推動了大面積豐產。全縣有 313 個糧食畝產千斤社、128 個花生畝產 800 斤的社、21 個皮棉畝產百斤社，全縣 15 種農作物樣樣豐產，732 個合作社，社社增產。全縣糧食平均畝產 800 斤，提前十年達綱要。麻城、孝安等縣的情況基本上如此。

湖北省委從理論的高度，在談工作方法的同時，就放出了大“衛星”。難怪毛澤東如此重視湖北的佳作。至於《報告》中提到的“高產”情況，全是編出來

欺騙中央的應景之作。

1958年2月，經毛審閱，中共向全黨發出《關於在全國各地區各方面普遍推行種試驗田的經驗的通知》。《通知》中說，種試驗田是一種徹底克服官僚主義的方法。它可以打掉官風，使幹部真正到群眾中間去領導群眾。它可以使幹部走上“又紅又專”的道路，實現政治和技術上的統一。全黨的幹部必須實現政治和技術的統一，既不要作迷失方向的實際家，又不要做空頭政治家。因此，全國普遍推行種試驗田的經驗，是完成黨的任務的關鍵之一。

當然，湖北省委當年的“傑作”還不止於此，不然就沒有了後來的精彩手筆。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經毛親自審定的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年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正式號召大躍進。社論認為：自從《綱要》公佈以後，已經造成了全國農業生產的高潮。全國已有29個縣市達到《綱要》畝產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指標，其中最典型的是湖北紅安縣，“土質瘠薄，生產條件不好，今年畝產平均產糧也達到843斤。”社論強調：“土地十分貧瘠的地區能夠提早十年實現了農業發展綱要革命的指標，那麼，條件與它們相同或者比它們好的地方，難道反而不能做到嗎？”大躍進的號角吹響了！毛激情昂揚地在社論批語中寫道：“建議把一號博士頭銜贈給發明‘躍進’這個偉大口號的那一位（或幾位）科學家。”拿到這份《人民日報》，王任重興高采烈。省委常委當天專門討論這篇社論。晚上設宴慶賀，幾位省委書記頻頻舉杯，喝得紅光滿面。

麻城縣委書記、縣長碰頭會卻氣勢不佳，怨聲時起。紅安、麻城都是省委、地委抓的典型，都是奉命報高產，怎麼紅安一下子全國出了名，麻城卻沒動靜。

縣委書記吳德簡落了不少埋怨：當初麻城為什麼只報畝產 800 斤，為什麼不報 850 斤，一下子超過紅安的 834 斤？還有人說省委不公平，厚了紅安，薄了麻城。其實，紅安、麻城都是省委布下的棋。

11 月 26 日《人民日報》發表重頭文章《麻城縣是怎樣成為皮棉百斤縣的？》，作者為麻城縣委書記趙金良。文章宣稱：1957 年，在麻城縣委的有力領導下，經過全縣幹部群眾的努力，全縣皮棉畝產已達百斤，實現超《綱要》。由此，麻城縣成為全國五個棉花畝產當年跨《綱要》的高產縣之一。趙金良還吹噓了一番棉花高產經驗：一是黨的領導，縣委領導重視，各級幹部大種試驗田，二是深翻土地，大修水利設施，大施肥料。有此二招，棉花一定高產，全縣皮棉為畝產平均過百斤。

12 月 10 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棉花豐產的典型看齊》，號召全國各地都要“學習湖北麻城縣的經驗”，“主要原因不是自然條件好，而是黨的領導強”。

12 月 29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為麻城縣委書記趙金良著《麻城領導方法》一書作的序言《向麻城看齊！》，號召學習麻城縣委的領導方法。這就是“縣委提出農業增產指標，發動群眾討論制定規劃；採取領導搞實驗田的方法，實現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典型示範，由點到面，領導和群眾相結合。”王任重強調：向麻城看齊，趕上並超過麻城，應當成為各縣的口號。從此，麻城的位置超過紅安。

同時，《人民日報》在第二版顯著地刊登了《開展友誼競賽，爭取全面躍進，麻城向湖北全省農業社發出社會主義競賽挑戰書》。《挑戰書》向全省各縣提出三大任務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第一、糧食：1958 年全縣總產要比 1957 年提

高 27.5%，畝產達到 850 斤，爭取一千斤。第二、棉花 1958 年保證畝產皮棉 130 斤，爭取 150 斤。第三、發展山區多種經營，茶園擴大 27500 畝，發展杉木 9 萬畝，各種作物產量比上年提高 22%，實現農業生產大躍進。

《人民日報》為此特意發表了一篇很有氣勢的“編後隨筆”：《趕上去，超過她！》。稱麻城的《挑戰書》“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戰鬥的號召，將推動其他縣份在這場社會主義大競賽中共同實現農業大躍進。”“麻城自然條件並不很好而能大躍進，其根本原因在於領導得法，在於領導和全縣人民那股一致的幹勁！”編者強調：“學習麻城就是要學習他們那股幹勁！能不能躍進？就看你有沒有革命精神，有沒有那股幹勁！”編者激昂地號召全黨全國：“每一個地方的領導者，應當有這樣的雄心壯志，他們能辦到的，我們也能辦到！用革命的戰鬥精神，回應麻城的挑戰！趕上去！超過她！”果然，麻城來了挑戰者。58 年 1 月 1 日，浙江慈溪縣委書記蘇守山，應邀來麻城向幹部群眾作廣播講話，介紹慈溪皮棉平均畝產 105 斤的生產經驗。這給麻城上下幹部很大的刺激。趙金良在廣播大會結束語中，說：“麻城人民將以百倍地努力，掀起更大躍進高潮，來迎接兄弟地區的挑戰！”

1958 年年初，在省委會議上，王任重手來拿著這張《人民日報》，興奮地對大家說：“總結 1957 年湖北的大躍進，湖北的工作是有成效的，麻城的幹部們創造了很好的工作方法，領導定指標，基層定措施。1958 年我們要實現更大的躍進，放更大的衛星。”很快，中央以檔的形式向全黨推薦麻城經驗，麻城的“工作方法”成為大躍進年代全黨工作法寶。

一語道破天機。所謂麻城經驗，就是領導確定高指標，基層幹部浮誇“放衛星”。據一位當事者回憶說，當年他在縣委工作。他不無擔憂地提醒趙書記，皮

棉畝產才 79 斤（實際不到 60 斤），倘若領導查下來，往後怎麼交待？趙金良沒等他說完，劈頭蓋臉地將他一頓痛罵，還說他用心險惡，給大躍過潑冷水，攻擊黨的領導，思想右傾。果然，在後來的“反右傾，拔紅旗”鬥爭中，他被打成“右傾分子”，下鄉勞動改造。在虛報皮棉畝產百斤縣的時候，縣委還有人心裡發虛，怕戳穿牛皮不好收場。由於高級合作社運動大搞生產資料歸公，社員一年四季忙於水利化工程、深翻土地運動等大兵團作戰，勞累過度而分配比互助組和單幹還差，生產減產。1957 年發生春荒，1958 年也出現春荒缺糧，不少人外出逃荒討飯。硬吹糧棉生產增產豐收，這確實象賭場上押寶一樣沒底。現在這一寶押上大發了，一鳴驚人，成了全國躍進樣板，撈足了政治資本。因此，根本就不想收場。當然，領導也不會放你出場。說到底，麻城縣委一班人，不過是當時整個“躍進”大賭場中，幾個大膽的賭徒而已，設莊者早就看中了麻城的特殊政治價值，看中了他們的勇氣。因為他們的勇氣，正是煽起其它持謹慎觀風態度者心中欲火的最佳“廣告”。往下賭，只能是越賭癮越大，賭注越下越大！

1958 年的大躍進形勢，給麻城帶來了無限風光——全國各級報刊、電臺，對麻城經驗、生產工作的“大衛星”，連篇累牘，報導不斷。又是拍電影，又是出書，天下揚名；上至黨和國家領導人、外國元首、外國代表團，下至全國各省、地、縣負責人，先後來麻城視察、參觀、訪問、學習、取經；原黃麻起義的將軍、部長們，也為麻城而驕傲，紛紛重返故里，探親、視察、支援家鄉建設上項目；湖北省委、省政府、黃岡地委、專署都把麻城當成“樣板田”，各級主要負責人時時來到麻城視察、蹲點；……不言而喻，麻城的革命歷史地位，和躍進的現實份量，正是這一切的前提條件。讓我們來看一看這樣一份歷史檔案吧：

1958 年 1 月 4 日王任重親赴麻城，視察幹部試范樣板田。2 月川、浙、滬、

湘等省市 34 個參觀團，先後來麻城參觀夏收作物田間管理、水利建設。3 月 4 日湖北省農業廳在麻城召開推廣棉花營養鉢現場會，麻城介紹 1957 棉花高產先進經驗和 1958 棉花生產的高產措施。3 月 14 日省長張體學率農業檢查團來檢查工作。3 月 16~19 日，全國婦聯書記處第一書記章溫、省婦聯主任郭力文來麻城參觀訪問，到許家鄉“看女社員鄭秀芝操作雙鐮犁表演。3 月 17~19 日蘇聯農業專家果列諾夫、畜牧專家愛拉斯契金及夫人來麻城參觀農業生產。3 月 25 日內蒙、山東等省區代表團 741 人先後來麻城參觀訪問。4 月 3 日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余毅來麻城察看蘇區生產，訪問老紅軍付興貴和國務院下放幹部。4 月 10 日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上將率 61 人參觀團回故鄉訪問。4 月 11 日李先念副總理、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湖北省委書記王延春等在麻城縣長陳化民陪同下，視察中一社桃園大隊和沙院子青年突擊隊。4 月 24 日-25 日中共中央委員、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來麻城，看望文改委下放幹部。5 月 3~7 日，中央財貿部在麻城召開財貿工作座談會。……5 月湖北省委、省人委發給麻城 1957 年糧棉雙豐收獎金兩萬元。8 月 19 日朝鮮副首相李周淵為團長的政府代表團，在副省長劉濟蓀陪同下訪問建國一社，正是早稻畝產“三萬六”大衛星發射之際。

1958 年 1 月南寧會議後，王任重回到武漢與另一省委領導人談話說：“南寧會議總理挨批，我看是跟不上主席思想了嘛。超英赴美，一個鋼鐵，一個糧食，解決了這兩個問題，中國就是強國。主席思想境界，胸懷氣勢，用敬仰二字都不足以表達我們的心情。”“主席說我們共產黨人建設新中國，就是要好大喜功，共產黨領袖的氣魄嘛。主席提倡和重視的就是大躍進，觀察主席的建設思想，近來的形勢，最對主席的心思和脾氣。我看，不研究主席的思想，那就會掉隊，犯

錯誤。湖北的工作，必須抓住時機，在大躍進上全力以赴做好文章。這就跟點狀元一樣，文章寫得好，對了路子，才會金榜高中……”春耕時王任重幾次打電話給薑一，問3千斤的指標能不能落實。到5月份，王任重在電話中強調要有一天等於二十年的眼界，放衛星重點在水稻高產，三、五千斤恐怕是沒法交待了，要考慮產量過萬斤。

3月，麻城縣委經過研究，決定不惜一切要保證畝產達到1500斤，爭取1700到2000斤。這一指標比1957年的規劃已經翻了一番。指標報導地委，姜一書記把麻城縣委第一書記吳德簡叫到地委，又是批評，又是開導：“你們麻城是全國的標兵，是湖北的標兵。大躍進形勢逼人哪，一日千里，你們拿畝產一、二千斤來應付省委？”吳德簡彙報說：“同志們信心都很足，我們爭取放畝產五千的衛星……”薑一很不耐煩地揮手打斷他的彙報：“不要死盯著一個數字嘛！要有發展的眼光。人家報一千，你報二千；人家報五千，你就得報一萬！”腦筋開了竅，回到麻城，吳德簡就風風火火地佈置起畝產過萬斤的工作。

5月八大二次會議後，中央發出號召：“用最高的速度來發展我國的社會生產力”，大躍進急劇升溫。湖北省委率先提出口號：“樹立敢想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力爭水稻畝產萬斤”。7月17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委擴大會議上，代表省委作報告《在五年內建成社會主義的新湖北》中，提出湖北到1962年工農業發展的奮鬥目標：鋼年產1000~1200萬噸，戶均1.5噸；糧食年產350~400億公斤，爭取人均1000~1250公斤；棉花2000~3000萬擔。五年內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電氣化，三年掃除文盲。同時，大力批判“農業增產有限論”，肯定“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麻城縣委於6月底正式提出早稻畝產三萬斤的高產指標。領導定指標，基層

定措施。經研究決定，麻城縣委把“放衛星”的任務，安排到了麻溪河鄉建國第一農業社。

建國一社地處平畝區，生產條件較其它地方好一些。全社 1124 戶，4715 人，耕地 5016 畝，其中水田 2504 畝，出產糧棉。1957 年糧棉雙豐收，成為全縣聞名的先進農業社。其中早稻“畝產 570 斤”，高於全縣“平均畝產 432 斤”的水準一大截。尤其讓縣委看重的，是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班子。社主任王乾成從土改當農委主任起，就一心跟黨走，黨叫幹啥就幹啥，工作年年得先進。57 年扛回“畝產過千斤”的大紅旗，當上黃岡地區農業勞動模範。58 年春還作為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的農民代表出國慰問，回國後又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省地縣三級領導都把該社當作重點，並派出白果高產工作指導組，在這裡辦點示範。

58 年新春伊始，社主任王乾成在工作組指導下，提出“去年畝產千斤田，今年爭取一千五！”此言一出，議論紛紛，竟然有一年輕人當面指責王社長是欺上哄下，拿著高產當本錢，你怕不怕別人笑你？在工作組主持下，全社開展了“反右傾、拔白旗、插紅旗”的大辯論。對“白旗分子”，哪有什麼道理好講，拳頭、耳光一齊上，推、打、搥、批不留情，打下了“右傾保守”的氣焰，打出了“高產衛星”的威風。後來王乾成宣佈：早稻試驗田，畝產要過六千斤！果然會場鴉雀無聲。

6 月中旬，縣委在閔集鄉召開水稻高產現場會，縣委負責人號召大家“要發揚敢想、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把試驗田的生產提高一步，搞出早稻畝產上萬斤的“高產衛星”。參加現場會的王乾成，被縣委負責人的講話嚇了一跳，王主任雖說是人猛氣粗，萬事不懼，但當縣委決定由他來放“大衛星”時，他還是怔住了。想來想去，縣委領導就是高出一截。你不敢想的他敢想，你不敢說的他敢

說，他想出來說出來，下面的就該你照著去做了。做不到，就要反右傾拔白旗；做好了，當然有獎賞。在縣委領導的動員下，他在會上再一次作了“高產衛星”的開路先鋒，斗膽報出高產指標，爭取試驗田畝產二萬五千斤。

但王乾成在會下給領導們出了一個難題：“衛星我是放了，不過這事只能說，不能看的。你要報高產衛星，我敢給你放，不過一檢查就過不去了，怎麼辦？”趙金良一聽，又急又惱：“你這個人怎麼回事，還要不要黨的領導。告訴你，這個衛星不僅說得。還要看得，出不得半點問題。”趙金良和吳德簡商量了半天，終於開了竅，想出了一個高招：“王主任說一畝田沖上天也產不了兩萬五，如果弄它個十畝八畝的稻子來，種在一塊田裡，那還能不高產！”兩位書記欣喜若狂，終於找到了放“衛星”的絕招來了，“好辦法，果然是好辦法！”吳德簡讚不絕口。趙金良發明了一個大躍進年代的專有名詞：“移禾並壟”，又叫“掇禾並丘”。

從此，“天下第一田”有了保障。後來全國各地水稻“高產衛星”，大多走了“移禾並丘”這條路子。高，實在是高！麻城縣委的領導方法，果然高明！

縣委書記放心了，王主任可揪心了：早稻畝產“二萬五”，在社委會上通得過嗎？“二萬五”，百分之百的“二百五”呀！看看八月就是開镰收穀的季節，一個多月想什麼方法才能兌現呢？他是種田人出身，一畝田打多少穀他哪能不知道。關鍵是田裡怎麼搞出二萬五千斤糧食。王主任急得幾天沒吃好飯，沒睡好覺，生怕完不成黨交給的光榮任務。

果然，回社後召開社委會，大家聽到畝產二萬五，全都驚呆了。畝產二萬五千斤，別說長了，堆在地上都有好幾尺高。社委會在社委們吵吵罵罵中結束，沒討論出結果。

隔不兩天，又召開了社委擴大會議，幹部和積極分子到了 37 人。高產指標一擺出來，會議又吵成了一團。王主任猛一拍桌子，提高嗓門壓住全場：“今年的早稻除了要搞大面積平衡豐產外，還要大膽搞畝產三、四萬的高產試驗田！”

主任的話音剛落，一位社委會委員立即反對說：“搞大面積平衡增產不是一樣增產，為麼事一定要搞高產試驗，盤古開天地以來也沒聽說過畝產三、四萬的事，種田人種的是稻穀，大樹上長鐵，一畝也產不出三、四萬哪。”當下附和他的人差不多占到一半。

王主任哈哈大笑：“我也讓縣裡批了一通。縣委有躍進增產新措施，把已經長好的稻穀全扯起來，幾十畝並一畝，高度密植，高產量沒問題。縣委給起了個名，叫掇穀並丘。”

會議又吵成了一鍋粥。王主任的話音剛落，一位社委會委員立即反對說：“我看人都發暈了，田裡好好地長著穀，扯它幾十畝並一畝，費多大的勁，又增加不了一兩穀。勞民傷財的，搞它做麼事？”有人說：“有功夫下在田裡，真的把產量搞上去，交了國家，社員口裡也多吃它幾兩。早稻插下去了兩個多月了，生米煮成熟飯，做麼事要搞這放衛星？”“口一張，幾萬斤，一畝田有多大不曉得，種田的人嘛，都搞不清種在田裡還是種在天上。”

王乾成斬釘截鐵地說：“開會是要大家討論一下高產衛星怎麼放，不是要大家來唱反調的。人家河南的小麥衛星，一放就是七千斤，這是大躍進的形勢嘛，又不是我王乾成瞎吹的，報紙上講嘛，黨的政策如今是要高產。”

意見不統一，擴大會很快就成了辯論會，大躍進年代有很多專有術語，辯論，就是其中之一。被辯論者被押上會場中心或臺上，任憑別人批鬥辱罵潑髒水，不能辯白一句，否則就是不老實，要打下囂張氣焰。辯論就是鬥爭，拳打腳踢是家

常便飯。會議開來開去，氣氛越來越緊張，那些有不同意見的幹部趕緊改口認錯，以避大禍。經過一番辯論鬥爭，高產“衛星”指標終於通過了，王乾成得意洋洋，趕緊向縣委彙報。

“二萬五”放“衛星”的消息傳開，社員群眾議論紛紛，說什麼的都有。有人形象地說：這是拳頭大的口，曬筐大的嘴，張得開合不攏。有人還編了這樣一首順口溜：“深耕一丈五，肥料要幾千，衛星好幾萬，恐怕不如願——減產又賠款。”社員風言風語，就連一些幹部家屬也覺得自己家裡的幹部當苕了，當的背時缺德官，明明白白的人，當了幾天幹部怎麼就發苕了，一放“衛星”好幾萬，弄得自己在人前做不起人。幹部們回到家，父母勸，老婆罵，鄉親們指脊梁。“發苕”，是湖北人罵人的方言，含義同於“二百五”、“活寶”、“白癡”、“傻瓜”。誰願意“發苕”呢？“掇秧並丘”放衛星，實在太“發苕”，誰也不願去當。而王主任迫于輿論壓力，一時也不敢下這個手，這事就被擱置下來了。

轉眼就過了個把月，到了早稻收割季節。從北方小麥夏收開始掀起的“放衛星”高潮，一浪高過一浪。王任重和湖北省委憋足了幹勁，全面佈置湖北全省水稻高產的“放衛星”。7月17日，在省委擴大會議上，王任重代表省委作報告：《在五年內建成社會主義的新湖北》。他在報告中對各地放高產“衛星”作了明確的指示和佈置，並提出：“今年稻穀可能出現萬斤，至少也有5000斤、8000斤的。要不，稻穀可成了低產了。晚稻肯定有萬斤的，是不是可能有兩萬斤的呢？也可能有。那麼我國的稻穀單產就可以創造世界最高紀錄。創造小麥最高紀錄的是蘇聯，畝產二千斤，而我們是七千斤。”省委定了調，地、縣猛吹號，姜一代表黃岡地委向省委表態：早稻定要過萬斤，爭取三、五萬。7月底，薑一打電話到麻城，催問吳德簡“放衛星”的工作準備得怎麼樣了；並明確地告訴他，省委

和地委已經在等早稻“衛星”了，必須抓落實，要立軍令狀。當吳德簡和趙金良得知建國一社放“衛星”還沒動靜時，火冒三丈，把王乾成和蹲點幹部一頓罵，責令限期落實，如有差錯，黨紀處分！

早稻開鎌了！“高產衛星”在湖北遍地開花。7月31日，《湖北日報》報導了應城縣春光農業社率先破萬斤的消息，該社放出早稻畝產10597斤的“衛星”。8月1日，孝感縣創造早稻畝產15361斤的“高產紀錄”，《湖北日報》隆重報導。

王任重召集派駐黃岡和麻城的工作組負責人親自談話，反復強調在黃麻起義的老蘇區，放“衛星”具有重大政治意義和特殊的社會效果。王書記很有幾分感染力地訓示：群眾的幹勁，靠我們把火燒起來。要善於發現典型，培養典型，總結經驗，以點帶面。現在全國各地大躍進，放“衛星”的形勢一日千里。湖北的工作歷來不錯，大躍進是不是會落後？爭上游才是我們的風格嘛！同志們下去，要充分依靠地方黨委，要堅決服從省委的部署。湖北要在全國爭上游，麻城的高產“衛星”應該當成重點。省委、地委工作組和高產“衛星”驗收團，奉命急赴紅安和麻城。麻城縣委緊急部署放“衛星”。沒過兩天，麻城縣平清鄉第二農業社1.01畝試驗田，在縣委領導人和驗團的督戰下，放出16260斤大“衛星”。

縣委領導人同省、地兩級領導，研究決定在全縣開展放“衛星”的社會主義大競賽，電話通知到各鄉和農業社，要各地儘快把高產“衛星”估產量上報縣委，並強調各社增產試驗田要現場驗收，通知到各鄉和農業社，核實產量。一時間，各鄉各社高產“衛星”紛紛上報縣委。你報五萬，他報三萬，也有報一萬八千的。一時間好不熱鬧。經地、縣兩級領導研究決定，認為畝產報五萬的不可靠，報一萬的又太少，只有建國一社畝產三萬多比較可靠，而且建國一社又是省、地、縣

的先進典型，因此決定以建國一社為重點驗收對象。

8月3日麻城縣委一位書記處書記在白果區主持召開全區早稻生產現場報喜表彰會，表彰了梁家畝鄉燎原四社的早稻畝產 10,237.127 斤，當場頒發獎旗一面，獎金 300 元。當時的縣委書記處書記、曾是王乾成入伍介紹人的領導，直接點了王乾成的名：“乾成呀，人家早稻畝產都搞到了 1 萬多斤，你還是區委下放的幹部，能不能拿點硬東西出來呀？”王乾成鼓了鼓勇氣答道：“我們有點硬東西，過幾天再向領導彙報。”

8月5日驗收的通知傳達到建國一社。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嚴峻局面，社委會連忙召開緊急會議，商量辦法。火燒眉毛能不急！這次大家倒統一認識了，既然逼上梁山，那就不幹也得幹。會上有人提出了一個辦法：掇穀！上級提倡掇秧並丘，不過現在季節已晚，稻穀都快垂穗了。是不是把快熟的稻子並田移栽，幾塊、幾十塊田的穀子並在一塊，不高產才怪事呢！

會議一下子熱鬧起來。但到哪裡去找這麼一塊高產試驗田呢？討論來討論去，最後決定由負責中片生產的社副主任負責，在生產條件較好的河北垵，找一塊條件好的早稻田。

8月6日清晨，肩負重任的馮副主任趕到河北垵，喊醒了睡夢中的二小隊隊長。兩人踩著田埂，到處選“衛星”基地。轉到水塘邊的一塊大田，卷起褲腿，下田踩踩泥腳，感覺泥質有些硬，馮副主任說：“這田搞不得，莖大的稻子插不進。”小隊長說：“那就換一塊田看看。”他們邊走邊試田裡的泥腳，不知不覺來到垵子側邊的一塊油砂田邊。一試，泥腳正適合，就近扯一把稻試栽，蠻順手。小隊長還有些猶豫：“這塊鬥丘田小點吧？”馮副主任在田邊邊洗手邊說：“管它呢，時間緊，來不急了，就是它了！”

“天下第一田”就這麼扯淡般地定了下來！午飯後，馮副主任同社主任商量好，喊來六名社委搞“試驗田”，他們先把鬥丘田的稻全部扯起來，然後從田頭開始，一棵擠一棵的栽起來。六個人忙了半天，天快黑時也只栽了一小塊田頭。太難了，幾個人歎聲歎氣回去了。

王主任在田頭蹲了半天，一看不是個事，調了 37 名社員下田搞移栽。結果跑了 17 人。這不是造孽嗎，長得好好的穀，眼看就要割了，費工又費時去從別田裡扯下來，按到這塊田裡又不多長一兩穀，反而要整掉不少穀。這年頭，黨員和幹部怎麼越搞越怏了，而且油鹽不進，刀槍不入，真沒法！有 3 個人思想鬧不通，乾脆罷工不動手。

眼看驗收日期逼近，按常規辦法已經不救急了。社委會召開幹部會，決定採取強硬手段；一定要把“觀潮派”、“秋後算帳派”狠狠整下去，堅決不准“放冷氣彈，唱促退曲”！接著，社裡又召開青年會，組織青年突擊隊，動員群眾突擊作戰。有的社員說：“這種橫拉蠻的事千萬幹不得，鬧得將來受損失，社裡要減產，公糧交不上，社員要挨餓的。”社委會當即抓住典型，召開田頭辯論會，狠批猛鬥，社員被整得服服帖帖。事情至此就好辦了。

社裡組織了 150 多人的勞動力，先將鬥丘田整得軟軟糊糊的，再分拔稻、運稻、栽稻三個專業班，“協同作戰”。稻不好運，扯下來有泥巴，禾穗上有穀，弄不好穀子就會掉落下來，而且穀穗只要碰折就會斷莖，吊幾天穀就發爛。社領導督戰，命令社員回家取來籬筐、水桶挑禾，搬來木梯、門板當“擔架”抬。真好象伺候月婆子般作難。原來估計扯 8 畝田的稻，就可以將這塊鬥丘田按滿。結果扯了 12 畝田的稻，才算“圓滿完成任務”。

由於日夜鏖戰，十分緊張，移栽的稻杆大都沾上了泥巴。他們又搬來打藥的

噴霧器，灌上水，將泥巴小心翼翼地沖洗掉。同時，還沒忘記把踩得泥濘不堪的田塍一一刮平。刮泥漿時又小心翼翼地不弄傷草，否則連草一起刮掉，田塍都成了和尚頭，那就要露底出醜了。最後，再用砂子一撒，大兵團突擊作戰的痕跡就沒影了。

試驗田如期弄成了。已成熟的稻穀移來立不住，一風順地擁在田裡。那年頭幹部們真是智謀萬千，讓人們拿來繩子，打上木樁圍住田邊。稻穗露在上頭，穗子壓穗子，足足鋪了一尺多厚。社幹部輕鬆舒坦了，心中一塊秤砣到底落了地，現在就只等上級來檢查了。

但群眾心裡憋火平不下氣。社員羅文高當眾用手戳著這塊鬥丘田大聲說：“這樣辦要能高產，我把頭剃下來給幹部當座墊。”有的社員戳著幹部的背影說：“都是苕種！好事沒見你們攬來，蠢事倒叫你們做盡了。這是睜著眼睛跳崖，自尋死路。將來會害得大家沒有飯吃！”

幹部們聽見了只當沒聽見。管他呢，反正檢查團快來了，檢查完了算交了軍令狀交了差，而接著來的獎勵、提拔、出風頭，想起來就叫人耳熱心跳！等的就是檢查團快快來，社員愛罵不罵去，只當沒聽見。他們可能也沒有想到，高產榮譽之後，真的是減產和高徵購。

為了應付上級“驗收”，社委會專門召開了“敵情”分析會，將“破壞高產衛星”的“敵情”作了估計和分析：地富反壞右會搞破壞，“右傾分子”、“落後分子”會講怪話。各隊要把這些人排一下名，把他們隔離起來，或者調到偏遠不挨人的工地上去。河北堽趕在上級驗收前，緊急遣送了“敵對分子”和“講怪話”的16人到偏遠的鋼鐵工地。這一招蠻有效。當時大部分青壯勞力都上工地“大兵團作戰”去了，家裡留下老弱病殘人心惶惶，怕吃不消那種勞動強度。社、

隊幹部又召集社員群眾開會，恩威並施，特別強調講怪話要嚴懲。

8月8日縣委書記處書記親自趕到建國一社田頭檢查，當場叫人拿來一個雞蛋，放在大田的穀穗上一滾，雞蛋在穀穗上滾了1尺多遠，仍穩穩地摺在穀穗上。這位書記滿意地笑了，講了很多鼓勵的話。後來，這位細心的書記又問王乾成：“你們放了36000斤這麼大個‘衛星’，馬上參觀學習的人很多，你們介紹經驗一定要講清楚講好。哎，我問你們，這麼多稻穀擠在一起，通風問題是怎麼樣搞的，通風搞不好，穀子可是要捂爛的喲。”王乾成隨口答道：“稻穀不通風，我們用竹篙捅。”縣委領導忍俊不禁，說：“這樣不行，趕快到縣裡去借台鼓風機來暫時用一用。”王連忙派人到縣城借來一台鼓風機，日夜不停地鼓起風來。

縣委領導上午剛走，下午縣城就來了一隊又一隊敲鑼打鼓、紅旗招展的參觀隊伍，四鄉八畝都轟動了，男男女女的人群在建國一社川流不息。

萬事俱備，8月9日，這塊撥穀並稻的試驗田開鎌收割，留下一塊一丈見方的“樣板田”，供日後驗收參觀。收割這天，為慎重起見，由省、地、縣三級領導同志組成的早稻高產驗收團親自到場參加丈田，過秤驗收。武漢電影製片廠進行了現場攝影，新華社記者進行了現場報導。10日，省、地、縣一批農技幹部奉命到達，他們在“樣板田”中選擇一平方尺的面積進行實測。據實測的結果推算，估計這塊“高度密植”的試驗田，產量不會超過9千斤，與社幹部上報的三萬多斤相差太遠。晚上，專署農業局的農技幹部向地委驗收團的領導反映了這個情況，但未得到理睬。當晚，地委驗收團會同社委會佈置連夜打場，從生產小隊趕來10多頭牛，用石滾碾場。河北垵4個小隊抽來了100多人，挑燈夜戰，苦戰一通宵，把堆在曬場上的約6分多面積的稻堆全部脫穀完了。但是，有的農村出身的幹部因為熟悉農活，當時就發現，有的稻堆是前幾天割的，不是鬥丘田的

稻穀。原來，為了完成高產豐收的政治任務，放出省委、地委、縣委所期望的高產“衛星”，建國一社的領導們又私下佈置，趁人多人雜混亂之機，派人把河北垵 4 個小隊收割的稻，全部挑到這個曬場上充數。

8 月 11 日，以湖北省委工農業檢查團成員、省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和華中農業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為首的省裡的驗收人員，到達建國一社。為了確保這顆既是生產“衛星”，又是政治“衛星”的高產“衛星”發射成功，省委驗收人員召集地委驗收團、縣委驗收組全體人員、白果指導組組長，以及省、專、縣技術幹部和各鄉、社代表數百人參加，省委驗收人員親自用三角測量法丈量試驗田的面積，又將稻場上堆放的已經脫粒的稻穀一一過秤。經過去雜、去水份後，由社會計計算出結果。最後，省人大副秘書長史林峰當中宣佈說：“建國一社創造了世界奇跡”，1.06 畝“江西早”秈稻，收幹穀 37547 斤 12 兩。平均畝產 36956.7 斤。儘管激情昂揚，但他心中還是有數的，他親手測量、過秤的，只不過是“衛星”創造者們早已弄虛作假設計周全了的結果。

當時參與驗收的科技工作者，有的人並沒有泯滅自己的良心。在當晚的驗收人員會議上，湖北省農科院的一位年輕科技幹部，陳述了自己的異議。他認為根據計算，畝產 36956.7 斤，將意味著一平方寸要生產 6 鬥穀。而樣板田的實測結果表明，這塊試驗田的產量不可能達到三萬六千多斤。還有的人口裡不說，心裡有數：“江西早”名曰早稻，實際上是中稻，只是插的時間早些。較之早稻，它的產量無疑要高些，但最高一畝也只能產 800 多斤。

主持會議的地委驗收團負責人見此情景，十分生氣，怒氣衝衝地說道：“我們應當相信群眾！人家那麼多人打場還能有假的！我看這個會議上有那麼一種十分危險的右傾情緒！”

話音剛落，剛才發言的那位年輕科技幹部騰地站起身來，拂袖而去。初生牛犢不怕虎，年輕知識份子不服邪！會場上頓時鴉雀無聲。在座的各位科技人員當然明白這話的分量有多重。經過 57 年反右，知識份子被當作資產階級看待，“知識越多越無用”，“知識份子要改造”。何況幾天前報上發表了劉少奇的講話：“農業社的幹勁和鑽勁壓倒了科學家，他們沒敢想的，農民做了，這是個革命。”大家都為那位科技幹部捏一把汗。還是專署農業局一位幹部出來打圓場，說情況還可以進一步瞭解，但應相信群眾。會議的緊張氣氛才緩和下來。

過了一會，有人拿來一張表，上面寫著建國一社早稻豐產試驗田，經過驗收畝產達到多少多少，要與會者簽字。在場的領導幹部簽字後，其他人也隨大勢一一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最後一道驗收手續到此結束。

當天晚上，新華社一位元記者在當地召開幹部、群眾座談會，由社主任介紹創造早稻高產世界紀錄、放“大衛星”的經過。王乾成重點介紹了“移苗密植”的經驗。會前，在有關人員的協助下，他已作了認真準備。當記者問他，何時“掇秧並丘”時，王主任答：“早稻抽穗時節，6 月 21 日開始”。他說，開始深耕、施肥都不夠，當時早稻已長到一尺多高，為了奪高產，他們便毅然決然把秧苗拔下來，再深耕，再增投肥料，並移苗密植。記者又問他們還採取了哪些增產措施？社主任巧妙的回答，一切能夠增產的措施，他們都努力去作；一切妨害增產的因素，他們都努力克服和消除。如加強田間管理、施追肥、防倒伏、防災害等。座談會後，新華社記者懷著抓大新聞後的職業自豪和激動感，連夜加班趕寫新聞報導，並將稿件內容火速傳到北京。於是就有了 8 月 13 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套紅新聞。

8 月 12 日，湖北省直機關和武漢市直機關曾有一參觀團前來參觀學習。一

位青年幹部提問：“這麼密的稻禾是怎麼通風的？”答：“先用竹篙捅，後用鼓風機”（密度過大致使穀子高溫發熱、脫粒腐爛，經過人力扇風也於事無補，造成糧食極大浪費）。問：“苗長得這麼密，需要大量養分，是怎麼下肥的？”答：“在水田四周開溝，用管子往田裡灌水肥。”這幹部還是不信，跑到留下專供參觀的 2 分多高產稻田邊，隨手提起幾莖連根都沒有紮住的稻禾說：“這樣也能生長嗎？”作介紹的社委尷尬地笑了，參觀團帶隊領導忍無可忍，當場喝令將這小子拖到垌子邊的竹園裡狠狠地開了一通現場批鬥會，給他戴了一頂右派帽子。

當年全國各地“放衛星”、搞浮誇，完全是順應毛的“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王任重向毛主席彙報麻城畝產糧食達三萬六千斤時，毛雖出身于農民家庭，對此確深信不疑，馬上要求刊登人民日報頭條新聞。時任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在新聞標題上加上“天下第一田”。

1958 年 8 月 13 日，中國最具權威性的《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套紅標題下，向全中國和全世界報導了開天闢地以來，人類農業文明史上最具爆炸性的新聞：《麻城建國一社出現天下第一田，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多斤》。報導說，這塊高產田從 8 月 8 日開始收割，到 11 日才全部收割完畢。參加三級驗收團的，有湖北省人民委員會副秘書長史林峰、華中農業科學研究所副所長韓玉生，麻城縣各鄉、社代表數百人。黃岡地委第一書記姜一，也參加了一部分驗收工作。收穫的過程都是由驗收人員和社員們一起收割、打場、揚場和過秤的。在 1.016 畝早稻田中，實收幹穀 37547 斤 12 兩，平均畝產 36956.7 斤。報導說，這塊高產田的主要培育人，是這個社主任王乾成、副主任馮福炳、社委王茂剛和第二生產隊隊長羅學江，他們都是共產黨員，許多社員也積極參加了培育工作。報導還說，這個人們所不敢想的早稻高產紀錄，是充分發揮共產主義風格大膽革新的成果。

這塊田共整了 10 次，深耕一尺以上。共施底肥、追肥 5 次，先後施用的肥料有：草籽 3000 斤，壟泥 1000 擔，陳磚土 400 擔，硫酸銨 105 斤，過磷酸鈣 80 斤，水糞 60 擔，豆餅 108 斤。底肥是結合犁地分層施用的，作到了層層有肥。插秧的密度，實際上已經很難用多少蔸來計算了，因為整塊田的稻子都是一根緊靠一根的。在稻禾長到 1 尺多的時候，又實行了掇秧密植。在驗收時，人們曾選 1 平方尺的面積進行實測，據實測結果推算，平均每畝約有 768 萬穗。把雞蛋隨便放在覆蓋著的稻禾上滾動，雞蛋始終不會掉到田裡去。可見這塊田的禾密到什麼樣子的程度。

13 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祝早稻花生雙星高照》。社論說：“去年我國水稻畝產的最高紀錄，單季稻是二千四百多斤。麻城麻溪河鄉建國第一社所創造的紀錄，比去年增長十四倍以上”。“這樣高的單位面積產量，這樣高速度的增產，是古今中外所沒有的。毛在 1955 年冬就說過：‘將來會出現從來沒有被人們設想過的種種事業，幾倍、十幾倍、以至幾十倍於現在的農作物的高產量！’今年的農業豐產，完全證實了毛的科學的預見。早稻、花生高產‘衛星’的出現，是共產主義風格的勝利，是破除迷信、徹底解放思想的勝利。湖北麻城縣麻溪河建國一社的同志們，實行了高度密植及其他許多革命性的措施，終於贏得了偉大的勝利。這又一次生動的證明，‘人有多大的膽，地有多大的產’，解放了的人民可以創造史無前例的奇跡來。”社論強調：“我們培育高產‘衛星’的目的，就是為大面積豐產提供榜樣和經驗，我們希望各地在培育高產‘衛星’的同時，要抓緊大面積豐產這一重要環節，認真總結經驗普遍推廣，爭取全面的大豐收。”社論充分肯定了“移苗密植”的經驗，並大力向全國推廣，強調“這個經驗，對於目前爭取大秋作物的豐收，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為各種農作物的大面積豐

產開闢了道路。”過兩天《人民日報》發表的麻城“衛星”照片，其中一幅分外精彩。只見4個小孩站在稻穀上，腳面都不埋沒一點。照片解說詞：這塊畝產田裡的早稻長的密密層層，孩子站在上面就象在沙發上似的。

與此同時，《湖北日報》也發表了署名“龔同文”（中共湖北省委寫作組）的文章《再論“衛星”的重量》，誇耀建國一社這個豐產紀錄，“比1957年早稻平均畝產570斤增加了64倍”，盛讚“這個奇跡的出現，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勝利。”

8月13日下午，幾位青年突擊隊男女蹲在這“天下第一田”的田埂邊，心事忡忡地扯開了談。一位高小畢業回鄉的青年說：“這年頭，怎麼假的跟真的那麼弄，自古種田人是弄不得假的嘛。現在好像越假越吃香了，想不通呢！”有位剛得到“躍進勞動標兵”獎狀的“突擊隊員”很激動：“這哪裡是種田，這是在種昧心田哪！人糊弄田，田就糊弄人。這幾十畝田的穀子搞成衛星田，毀了多少糧。種田人這樣種下去，只怕日後要喝西北風。”果然“苦日子”來臨後，五人中一人餓死，兩人浮腫，一人子宮下垂兼重傷寒，幾乎失了性命。

“天下第一田”問世後，有麻城縣群眾憤然上書，反映幹部的弄虛作假，強迫群眾拔禾並丘，十幾畝並一畝，放出“衛星三萬六”。患病休養的中央農村工作部長鄧子恢讀後憤怒不已，在從北京去廣州養病前，親自寫信，將上書轉送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建議中央登報制止。在當時的氣氛下，此論無息而論終。

麻城“三萬六衛星”出盡了風頭，顯盡了榮耀，並且在全國各地產生了巨大反響，成為全國各縣學習的榜樣。麻城“衛星”創造的“掇秧密植”法，一時成為全國各地放“衛星”的法寶。8月15日，省委書記王任重率領大批省裡黨、政重要領導幹部，來到建國一社賀喜，並親手獎給高產創造者一面“高舉紅旗，

爭取更大面積平衡增產”的大紅錦旗。王任重在省、地、縣領導人簇擁下，去高產試驗田。一到田頭，他就樂樂得笑哈哈地合不攏嘴。原來，麻城縣委奉省委通知，在地頭上樹起了一塊大牌子，上書六個書法非常漂亮的大字：“王任重試驗田”。趙金良趕緊上前彙報，說是這塊試驗田，是在省委領導下獲得了高產，省委領導說得好。王任重哈哈大笑：“黨的領導好嘛。”他仔細看了穀子和穗、莢。不看不放心，越看越高興。親眼看到這丈餘見方的樣板田裡的稻穀奪世界冠軍的現實，王任重心裡樂開了花，連聲讚揚說：“多厚的穀子，聯手也插不進。”這樣的高產，“是全國、全世界都沒有的事。這說明我們的農業生產大有希望。”他豪氣高嗓地說：“前些時，別的地方創造出來的小麥六千斤、七千斤的高產衛星，有些人不相信，現在水稻畝產三萬多斤，更要嚇壞那些不相信的人。耳聽是虛，眼見是真，不相信高產的人叫他來親自看看，這樣可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麻城縣委負責人因領導有方，再次受到重重嘉獎。

麻城縣水稻畝產“三萬六”特大“衛星”發射升空，在國外也產生了很大影響。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大使館很快將此消息電告國內有關當局；西方一些國家的政界要人和科學家對此表示關注；不少落後國家出於對發展生產的需要，對此也表示了極大興趣。來自省內外、國內外的參觀者蜂湧而至，建國一社先後接待了各地的參觀訪問者 10 多萬人次，其中有朝鮮政府代表團，前蘇聯、東德、波蘭、捷克、越南等國家的專家學者。為了接待好中外來賓，做到不漏破綻，建國一社的社委們對這塊田的面積進行了精確丈量，幾分幾厘幾毫都算準確了。他們請教了農業專家，算出這 1 畝多田裡的穀穗是 768 萬穗。社員們不得不放下手中農活，不停地送往迎來。有趣的是，一聽說又來客人了，就得敲鑼打鼓前去迎接。麻城縣委指示：對參觀者一律實行“吃飯不要錢”，好吃好喝好招待，不許慢待客人。

沿途十餘裡，路邊都是招待吃飯的大小指示牌。十裡炊煙十裡灶，好不熱鬧。縣裡擺闊，殺豬宰雞，酒肉伺候客人。一時間路上不斷人，灶裡不停火。河北垵的糧食吃完了，社裡大車小車趕忙送；雞鴨豬羊殺完了，縣裡怕怠慢客人，要求四鄉八社發揚“共產主義風格”，選好的往河北垵送。一時間熱鬧的場面，吸引得四鄉八社的小孩、老人都往這裡趕，總想趁機打一場“牙祭”。

“王任重試驗田”、“天下第一田”的大標牌聳立在鬥丘田地頭，未割的“樣板田”，頂上搭起帳篷，四周拉起樹樁繩圍。建國一社的王主任則忙前忙後，專職為來賓講示“先進經驗”，一天六七場，口乾舌燥，卻精神十分。人逢喜事精神爽嘛，何況這出頭露臉揚名天下的喜事！“掇秧並丘”，為大躍進放水稻高產“衛星”提供了方法和思路。中共中央指示向全國大力推廣“天下第一田”的先進經驗。一時間，電影、電臺、報刊、出版社，各路人馬蜂湧而至。這一廂，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的新聞紀錄片《早稻王》人嘶馬叫，為表現人定勝天，與暴風雨搏鬥的場景，十幾支高壓水龍向演出的幹部社員狂噴猛射；那一廂，中央和各地報刊先後發表 3785 篇有關“天下第一田”的文章和報導。麻城名噪天下！湖北人民出版社和科技衛生出版社，以精兵強將，搶版搶印，很快出版了《天下第一田》、《湖北省麻城縣早稻豐產經驗》、《湖北省麻城縣油菜豐產經驗》等小冊子，僅《經驗》一書，印 30 萬冊。

10 月 1 日，農業部長廖魯言由省委書記趙辛初陪同，來麻城寧埠、中一檢查棉花生產。次日，外交部副部長曾湧泉一行 3 人來宋埠和中一公社視察。10 月 4 日，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前來視察，次日，在麻城縣委大禮堂作報告。10 月 8 日，保加利亞國民議會副主席尼古拉格奧爾吉耶夫來麻城訪問，參觀高產“衛星田”“天下第一田”的生產情況。10 月 20 日，冶金部副部長夏耘等 11

人，視察三河鋼鐵廠，青年五星鐵廠，國營三河鐵廠。11月初，王延春視察紅旗人民公社，檢查生產，對麻城進一步安排好大躍進工作予以指示。

10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轟動全國的文章《水稻撥秧是個好辦法》。麻城縣委書記趙金良向全國介紹說，建國一社早稻插秧後多出一部分秧苗，扔掉可惜，插了九畝。出穗時九畝並一畝，收了36956.7斤穀。撥秧後空的田，立即插晚稻，預產兩千斤。今年全縣早、中、晚稻53.4萬畝，並丘撥秧，產量比大田高出一二倍，最高有畝產十萬、二十萬斤的。縣委計畫，全縣64萬畝水田，59年除30萬畝早稻外，還借晚粳田育早稻秧十萬畝，中稻並丘十萬畝，插秧面積可達84萬畝，多產20萬畝水稻。趙金良提出，要大膽設想，進一步早插早熟早稻，使之6月中下旬成熟，撥上遲熟早稻，使之7月下旬成熟，再撥遲熟中稻，使之8月下旬成熟，8月底再撥二季稻。這樣，麻城平畝一畝一年栽四茬稻，增產無可估量。

從此，高產“衛星”步步高。“天下第一田”，“一花引得萬花開”！你能九畝並一畝，我就能二三十並一畝！8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劉西平的文章《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文章說，現在畝產兩千斤根本沒人提了，提五千斤的很少了，大家正開展畝產萬斤糧的高額豐產運動，措施之一就是“放手密植”。過去穀子一步三按苗，每畝三萬多株。現在每畝二十六萬株。密植到四十至五十萬株，是完全可以辦到的。一株穀穗一兩，一畝三萬斤。

8月27日，福建連江學麻城，發出“簡作晚稻並丘”緊急指示，要求八到十畝並一畝，每畝地六十萬到一百萬株。果然很快放出畝產六萬斤晚稻大“衛星”。8月30日，《人民日報》報導，湖北應城縣白湖鄉長喜社，創造畝產43869.4斤畝產紀錄。9月1日，《人民日報》報導，麻城又創奇跡，熊家溝鄉建新六社，

學習建國一社先進經驗，中稻畝產突破五萬大關，畝產達 52599 斤。9 月 9 日，《雲南日報》報導，雲南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縣衛星公社中稻畝產突破六萬斤大關，產量為 60479.6 斤。隨縣金屯鄉將 9.75 畝稻子移栽到一塊田裡，放出了畝產 6 萬斤的“衛星”。9 月 18 日，《人民日報》刊登消息，四川郫縣友愛鄉第九農業社，中稻畝產突破 8 萬斤大關。

趙金良的《水稻掇秧是個好辦法》，一時間禍害天下。它不僅“一花引來萬花開”，引出了全國眾多水稻高產“衛星”，更為惡劣是 59 年，湘、鄂、贛、江、浙、粵六省有據可查的照此炮製案例，一年四茬的試驗田達三百多萬畝，結果早稻播種太早，二茬接不上，三茬苗、四茬苗長成爛草，300 多萬畝田基本顆粒無收，一篇“海闊天空”的文章，造成 12 億多斤糧食損失。大躍進時代，禍國者勢必殃民。

湖北的大躍進氣勢非凡。難怪當年毛澤東總喜歡坐鎮武漢，統籌全域了。九月，毛澤東再次御駕南巡，落腳武漢東湖賓館。王任重特意讓省委宣傳部將湖北大躍進的典型材料彙編成冊。其中，麻城經驗材料占了一半。王任重恭恭敬敬地向毛澤東彙報了湖北的大躍進形勢，並著重突出了省、地、縣三級領導如何促進麻城工作大躍進，麻城躍進形勢一日千里。他說：“人還是那些人，山還是那些山。但是，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幹部群眾幹勁衝天，硬是在山坡田裡搞出了畝產三萬六千斤的高產奇跡。我自己帶隊去看了那塊天下第一田，那田裡的穀子，長得好哇，人上去硬是踩不倒穀子頭。”他向毛澤東彙報解釋了“掇秧並田”、“縣委定指標，基層定措施”等經驗，還說：“看來移禾並田是個好辦法。只要科學地進行田間管理，移禾並田高產是沒止境的。空出來的田，一年四季可種稻。”看完《早稻王》的新聞紀錄片，毛喜笑顏開，點上一支香煙，很有幾分激情地說：

眼見為實，耳聽為虛，眼又見，耳又聽，看來天下第一田是令人信服的嘛。應該讓那些促退派去麻城親眼看一看人民群众的偉大創舉。我們黨歷來有一句話，正確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是決定的因素，只要幹部當促進派，中國的大躍進，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講五年、十年實現共產主義，幹部和群眾的這種共產主義偉大創舉，就是我們事業成功的基礎嘛。毛澤東還仔細詢問了幾位省委書記，糧食產量多了，吃不完怎麼辦的問題。張平化趕緊說：“主席，現在人民公社社員生活大大提高了。麻城幹部彙報了一幅農民創造的對聯，上聯是‘鼓足幹勁增產’，下聯是‘放開肚皮吃飯’”。毛澤東聞言大喜，笑得都合不上口：“好！好！幾千年農民受窮挨餓，終於在共產黨領導下，能夠放開肚皮吃飯了！”談了一陣湖北人民公社的大好形勢，毛澤東頗有幾分先見之明似地告訴這幾位，糧食多了，農民放開肚皮吃飯也吃不完怎麼辦呢？一部分交國家，支援工業；一部分要多養豬、釀酒，要讓農民吃飽飯，吃上肉，過上好生活。

11月25日，毛澤東在武漢市設宴，歡迎前來取躍進之經和共產主義所有制革命之經的金日成和朝鮮政府代表團。毛澤東邀請他們看了幾部中國大躍進的新聞紀錄片，包括《早稻王》，並向他們大談了一陣革命哲學和辯證法及建設共產主義的話題。

12月13日被禦封為“促退派”的周恩來，開完武昌會議，率領陳毅副總理、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及一大群部長、專家（包括郭沫若），在湖北省委書記張平化的陪同下，奉命視察麻城。周恩來視察了“天下第一田”等幾塊高產田，又到了幸福院、鋼鐵基地、公共食堂。看到高產田，聽到幹部和積極分子創高產的經驗彙報，面對已經空曠的田地，周恩來讚不絕口。來到公共食堂，他更來興致。詳細地詢問了社員群眾的吃飯問題。儘管冬季來臨，社員已經開始吃不飽飯，許

多社員已經餓得兩眼發花了，縣、社幹部還大談社員群眾如何一日四餐、五餐、六餐，天天有雞、鴨、魚、肉輪著吃之類。周恩來興意盎然地卷起袖子，親自下廚炒了幾個菜，招呼幹部社員說：“來，來，來，同志們在第一線辛苦了，我炒幾個菜，請大家嘗嘗我的手藝。”在公共食堂的大門口，周恩來看到了那幅毛澤東讚不絕口的對聯：“鼓足幹勁生產，放開肚皮吃飯。”他掏出紙筆記錄下來，還對張平化說：“同志們都應該把這付對聯記下來，這幅對聯是很有意義的。共產黨革命，就是要讓老百姓有飯吃，豐衣足食。”

麻城縣委搞了一個大躍進農業成就展覽館。周恩來一行人走進展覽館，迎面就是一座大大的棉花山。“高產”棉花堆成了山，糧食“衛星”直沖雲天。滿屋的躍進圖板，滿牆的躍進口號。巨幅的圖表說明，1958年，麻城全縣糧食產量十億多斤，棉花單產達千斤，六萬畝花生達千斤。還有畝產兩千多斤的小麥，三萬多斤、五萬多斤、十萬多斤的稻穀，畝產六千多斤的高粱、一萬多斤的芝麻、四千斤的黃豆等高產標本，琳琅滿目。講解員激情滿懷地指著一捆粗壯的標本介紹說：“這就是畝產三萬六千斤的早稻王。繼這個‘天下第一田’高產紀錄而來，中一人民公社、白果人民公社又發射了五萬斤、十萬斤的中稻衛星……。”

麻城“衛星”三萬六，應城“衛星”四萬四，毛澤東躊躇滿懷。不僅周恩來到麻城，朱德委員長奉命率隊訪應城，就連西哈努克親王這樣的國賓來訪，也應毛澤東的推薦，去應城參觀訪問，訪糧食高產之經，取“衛星”高產之寶。湖北大躍進，旨此第一功。毛澤東在武漢時，曾經這樣向人介紹王任重：“這是我們黨未來的接班人哩。”聽者震驚。

“天下第一田”天下揚名，天恩倍加，麻城縣委書記和上峰們歡天喜地。趁著人民公社化東風，麻城掀起了“放衛星”運動高潮。省委書記王任重、王延春

先後召集麻城縣委幾位書記和省地委麻城蹲點工作組負責人開會，大談糧食高產，

“衛星”上天的“偉大意義”，強調“當前要趁東風，放衛星，奪高產”，要讓全縣的社員“放開肚皮吃飯，吃飽，吃好，這樣才有幹勁，去奪取更大的高產勝利。”1958年9月5日，麻城縣城召開萬人大會，首建“五四人民公社”，隨後全縣迅速公社化了。人民公社、生產資料、生活資料一律歸公。公社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這樣，“生產千軍萬馬，紅旗漫天蓋地”，放起“衛星”來就更有氣勢了。播臺上，你報三萬，他報八萬，白果公社保證明年早稻“衛星”畝產20萬斤，龜山公社報出棉花畝產過萬斤。東風公社打播者，面對各社的高產指標，上得台來，急中生智，握拳揮臂，高呼出一串報高產的順口溜：“總路線，萬萬歲！大躍進，萬萬歲！人民公社萬萬歲！東風公社放衛星，明年畝產萬萬斤……”

根據麻城縣檔案館所存資料，1958年麻城“放衛星”的名目種類多達371項。其名頭有“紅薯衛星”、“高粱衛星”、“深挖衛星”、“積肥衛星”、“鋼鐵衛星”、“砍樹燒炭衛星”、“集資衛星”、“反右傾衛星”、“吃飯衛星”……不勝枚舉！

要說當年麻城為放“高產衛星”搞的花樣，真是千奇百怪，荒誕不堪。麻城縣委在電話會議上，要求各社放“衛星”要“出奇創新”，不要總是老一套。下面的幹部哪裡還有顧忌，一開口就是“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白果公社幾位幹部下隊檢查工作，公共食堂小灶煎魚炒肉，殺雞買酒。酒席之間，公社幹部從雞鉢子中夾起一串蛋巢中的蛋黃來，剛放進嘴裡，靈感衝動，要過筆來，一篇向縣委報喜的“衛星”文章脫手而出：白果公社放出高產雞蛋“衛星”，雞蛋大於鵝蛋，一個蛋足有半斤多重，十個雞蛋重6斤半……

據當年東風公社的一位元大隊分支書記回憶說：“我們公社要放牲豬‘衛星’，就編出‘千頭豬場’，‘萬頭豬場’。還弄出新聞，說是母豬發情，先用蘇聯約克夏公豬配種，又用本地公豬配種，交配幾十次，一胎下出來改良品種小豬二、三十頭。登報的人也不想一想，那頭母豬肚子能有多大？你問誰來驗收？開始那還正經請省、地、縣驗收團或工作隊的人走走過場，後來他們一天到晚跑來跑去，根本忙不贏。那你報什麼他就發什麼。當時，幹部們放‘衛星’都象發神經病一樣，指手劃腳，胡說八道。62年整風，那個‘放豬衛星’的幹部，被人起了個綽號叫‘種豬’。你說當時的幹部還有什麼人格？”

駐中一人民公社的縣委工作隊在田頭扯起“技術革命”的大旗，召來青年突擊隊，大講“科學種田”、“米丘林嫁接法”，硬是在八分紅薯地頭搞起了試驗田，要把南瓜秧嫁接到紅薯秧上。說是要讓技術革命結新果，地上長南瓜，地裡結紅薯，畝產達到30萬。結果呢？八分地裡絕種無收。用接受作者調查的原工作隊員的話來說，當年這類神話多了。柚子樹上嫁接桔子，要讓桔子長的比柚子還大。高粱杆上嫁接玉米，聲稱杆上長包穀，穗頭長高粱。在領導的“革命浪漫主義”感召下，有的說蘿蔔跟白菜嫁接，上面長白菜，下面長蘿蔔。有人說讓黃牛跟母豬配種，生下的豬有牛大……那年頭，別說幹部，就連積極點的種田人，也都跟發癲似地，胡言亂語，瘋話連篇。

1958年秋季，縣委決定在城關人民公社閔集管理區搞小麥“高產衛星”。辦法是平地上取土，堆成大土墩，要辦三個單產三萬斤的“小麥衛星墩”。縣委書記趙金良對幹部、社員們動員說：“種好這三個衛星墩就行了，一個墩子的產量留作口糧，一個墩子的產量作儲備糧，一個墩子的產量支援國家建設。但閔集管理區在落實這一指示時，又解放思想，認為只辦大小兩個“衛星”墩就夠了。

他們提出口號：“大墩產量十萬斤，小墩產量過五萬”；“小包（墩）吃全鄉，大包（墩）賣餘糧。”即小墩的麥產量用來解決全鄉幾千人的夏收口量，大墩產量給國家賣餘糧和留儲備糧。

試驗地選在閔集四大隊一小隊的董家院子（垆名）。當時由縣、社兩級幹部坐陣指揮，動員了全管理區的勞動力搞“大兵團作戰”，每天投入勞力四五百人，工地上紅旗招展，鑼鼓喧天。推車的，挑土的，白天幹，晚上挑燈夜戰。遇上幹部檢查，社員們“哦、哦”連天，工地上倒是熱鬧非凡。堆墩的土，遠的從四面八方用車推來，就近取土用擔挑。終於趕在霜降前壘起了兩個“衛星墩”。大墩面積一畝多，高達一丈四尺高；小墩半畝地左右，高一丈二。土墩四周因取土挖出大坑小沱，沱子深的達一米多。就在這片土墩上，四方八村運來的土雜肥和人畜肥堆起幾十方，雞糞幾千斤。小麥播種時，幹部親自督陣，指揮社員們背著麥種，整袋整袋往地裡倒，然後扒均一下，麥種蓋地三寸多厚，說是密植才高產。據當事人估計，兩個墩子用去麥種三四千斤。播種完畢，縣委在這裡召開全縣各社幹部現場會，下令全縣推廣這種“少種高產豐收的先進經驗”。會後，全縣各社隊聞風而動，紛紛壘起這種“高產衛星墩”。1958年全縣秋播面積比上年減少20多萬畝。1959年夏收，兩個“衛星墩”顆粒無收，全縣夏收糧食大減產。董家院子的春荒、夏荒連著冬荒，社員斷糧斷炊，死人不斷。

如此荒唐的“樣板田”，竟為省、地工作組首肯，並編成“先進經驗材料”，上報地委和省委。正在為“偉大領袖”發話“糧食多了吃不完怎麼辦”而冥思苦想的王任重和王延春，驀然驚醒，趕緊指示省委辦公廳，與省農委等有關部門召開聯席會議，落實1958年秋播，全省開展減少生產面積，大搞“少種高產豐收”運動。結果全省減少秋、春兩茬小麥600萬畝。而播種的1600萬畝小麥，20%

因密植過度，顆粒無收，餘者也大幅度減產。

1959年3月，麻城四級幹部會議，萬眾齊聚縣城，各社、隊又全面鋪開整社工作，發動幹群講問題，擺思想。形勢上轟轟烈烈，敢講真話的人卻不多。幹部和工作隊找社員作思想工作，又是承諾，又是高壓，強調這次是毛主席讓大家提意見，講問題，談思想，大家就放開膽子，決不打擊報復。群眾終於陸陸續續地開了口，四級幹部會議揭露：北戴河會議後，麻城敲鑼打鼓掀起了人民公社化高潮。從此，共產風刮得天昏地暗。公社化給麻城70萬人民的生活帶來了“三大革命”：吃食堂。全縣辦起6014個公共食堂。一時間“吃飯不要錢”、“敞開肚皮吃飯”震耳欲聾；大搞“行動軍事化，生產戰鬥化，生活集體化”。按人民公社為單位編成軍事組織，公社設團，管理區設營，大隊設連，小隊設排，排下設班。男女勞力，編入男營、女營，妻離子散，老人進敬老院，小孩入托兒所。吃飯上食堂，生產按連隊，居住大宿舍；“共產”集資，一平二調。廢除家庭，財產公有，一切歸公，社員除了隨身穿的衣物，掃地出門。這造成了諸多的社會問題和社員群眾的不滿情緒。

駐中一公社工作組報告：當時對共產主義認識不清，提出一些不恰當的口號：共產主義就是“電燈電話，樓上樓下”；“拖拉機耕田，自流化灌溉，一按電鈕長莊稼”；“穿著綢緞子，出門坐車子，吃飯不要票子，肉魚雞鴨滿肚子”。片面強調“一大二公”，無償平調社員財產。全社大搞“捐款獻資，集資生產”，動員社員捐款捐物。由於社員私心和顧慮，任務完成不好，又成立專門的“集資隊”，幹部帶著積極分子和民兵抄家，見錢拿錢，見東西拿東西。稍有怨言，即批鬥、捆綁吊打，傷了社員的心。晏店管理區的一位王老漢攔著不讓抬防老的棺材，挨了幾耳光，氣極了喊出一句，“你們搞共產，怎麼比土匪還凶！”結果被

打成“反革命”，送往集訓隊，不久勞累傷心病死了。晏店管理區第八生產隊第三小隊，從公社成立到大煉鋼鐵，搞了 7 次挨家挨戶大抄家，3 次“促進共產”。

“生活集體化”搞起集體宿舍，社員全都搬到大房子住，各家各戶均被“共產”。從此，隊裡缺什麼就到社員家裡拿。食堂缺鍋碗盆筷，就拿社員家裡的，煮飯炒菜，鋼鐵基地缺柴火，就拆社員的家俱、門梁，修土高爐又拆了一批磚瓦房。現在社員缺房住，食堂缺糧缺柴，明年生產缺工具、缺種子。已經因食堂停餐餓死 4 人，躺床病倒 30 多人，情況非常嚴重。該隊是全縣最嚴重的“鬧糧荒隊”。

麻城縣委關於鋼鐵生產情況的彙報：大煉鋼鐵，全縣扒房建爐毀壞民房四萬多間，“動員資金” 20 多萬元，“燒炭”毀林 230 多萬立方米，收集“小土爐煉鋼煉鐵原料”，毀壞農業生產工具 67 萬多件，計有鐵犁、鐵耙、鋤頭、斧頭、鐮刀、鋤鎬、車軸等，毀壞生活用具無法統計，有鐵鍋、鐵鏟、鐵鐘……工地還出現了一些幹部違法亂紀、只要產量，不關心生活的的問題。各工地打死、自殺 28 人，病死 16 人。

1960 年，趙金良在檢討會上十分愧悔：“一個糧食，一個鋼鐵，我們犯了兩個大錯誤。我們在糧食問題上，搞了浮誇虛報，跟著又是高徵購，反瞞產，加上年景不好，造成群眾生活困難。鋼鐵問題上也是浮誇虛報，毀林燒炭，砸鍋搞鐵……”

經算帳統計，麻城全縣拆毀民房 47535 間（大煉鋼鐵、興修水利、建企業、修辦公樓用料），平調耕牛 874 頭，牲豬 3024 頭，小家畜家禽 8679（只），中小型農具 69654 件。家俱 409753 件，砍伐樹木 2000 多萬棵，佔用土地 60520 畝，無償佔用勞力 32000 人，各種運輸工具 31616 件。其手段是平、調、扣、派、征、購、統、占、獻九字經。

生產隊幹部普遍有貪污行為。宋埠公社岐亭六隊 24 個幹部，19 人貪污 2400 元，5 個貪污的都因不在家。生產隊幹部貪污十幾塊錢算“清白幹部”，貪污一二百元相當普遍，多的千元以上。小隊幹部貪污一般幾塊，十幾塊，多的幾十元。貪污的名目很多，有貪污工資的，中一公社 21000 個勞動力，生產隊領去 23000 個勞動力工資。有貪污超產獎金的（58 年麻城的農民年收入才 1 元多錢）。三河公社 5 個大隊，有 4 個大隊獎金被貪污了。有貪污工農業投資的，東木公社丁家河十一隊的幹部，把社員投資工農業的現款和 7 個大元寶貪污了。有貪污副業收入的。龜山公社八隊 4 個幹部集體貪污 4900 元事業款，因為分不平，下手搶了，連通訊員也抓了一把。有貪污過節費的。三河公社春節發肉發錢，有的生產隊幹部就把錢扣了。貪污罰款的，龜山公社 8 個幹部，私罰社員 40 元，拿去喝酒。此外，有貪污利息、貸款、救濟款、購糧款、伙食費等，反正是見錢就抓。宋埠公社 116 個生產隊幹部貪污挪用 6616 元，人均 570 元。白杲、城關公社 116 個生產隊 549 個幹部（包括小隊長）共貪污 87451 元，人均 159 元。城關公社紅石三隊區幹部貪污挪用 12000 元。三合公社一個生產隊會計就貪污 816 元。中一公社各生產隊幹部一直都多領 3000 多個勞動力的工資，貪污了。宋埠公社五星三隊隊長洪中明用假髮票、偷賣公物、改單據等十種辦法貪污挪用 1418 元。白杲公社星火十隊幹部以補助照顧為名，私分三次，計 500 元。第三次曾有一個黨員反對，人們用“腦筋太死，趕不上形勢”說服了他。東木公社木子店六隊一個食堂主任貪污 226 元，會計懷疑，他就這樣嚇唬會計：“你看哪有共產貪污的。”由於貪污引起的幹部生活特殊、皮鞋、煙酒、魚肉、不務生產、亂搞皮絆等現象也是極其嚴重的。

1959 年 4 月，湖北省委召開擴大會議，總結大躍進經驗教訓。會後向中共

中央報告中，檢查說：“勝利沖昏了頭腦”和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助長了下面幹部的命令主義、形式主義，甚至弄虛作假的風氣。並修改了原上報 1958 年全省糧食產量，從 450 億斤降為 300 億斤。中共中央以充分肯定的批語，將此報告轉發全黨。此後全省浮誇風有所收斂。

自 1959 年春荒，麻城人開始過上了“苦日子”！用“天下第一田”的河北堽一位當事者的話來說：“麻城人跑過白匪、跑過日本鬼子。白匪和日本鬼子來了，你還能躲到山上去。苦日子來了，躲都沒法躲！”人們習慣把 1959 年春荒，作為苦日子的開端。建國一社吃了“36000 斤”的虧，社員到公社糧管所稱口糧，遇到的是營業員的冷嘲熱諷：“哦，你們是建國一社的，有 36000 斤糧食，還稱什麼口糧喲。”到周圍借糧，遇到的盡是白眼：“就是沾了你們建國一社的光，搞個 36000 斤，牽連我們的糧食也超了，要借糧？沒門！”真是見人矮三分，建國一社的人出門都不敢說自己是建國人。36000 斤的主要創造者王乾成的日子也不好過，反浮誇風時受到嚴厲批評，檢討寫了幾大捆，受到了降職處分。

高產高徵購，黃岡徵購高於歷年。地委原報 1958 年糧食總產 50 億斤。後在“糾風整社”時，調整為 33 億 9908 萬斤（實際不到 30 億斤），比 1957 年減產 4.5%。而徵購任務，卻由上年 6 億 2907 萬斤，增加到 7 億 1065 萬斤，多征 8158 萬斤。

麻城縣牛皮吹得大，徵購自然更高。徵購任務是按產量比例下達的。1958 年，麻城糧食總產量超過 10 億斤。因此，下達的徵購任務為 1.2 億斤，後調整為 9294 萬斤。比上年多 1169 萬斤，全縣人均多征 17 斤。而 1958 年糧食產量，實際不到 4 億斤，縣委後來“落實”為 4 億 2725 萬斤，比上年減產 5709 斤。

據《麻城縣誌》：“1959 年，饑荒。民食草根、樹皮、觀音土。”“天下

第一田”的河北堽。1958年放大“衛星”，結果高產、高徵購。徵購後，全社留下的糧食不夠吃兩個月。12月開始，社員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二兩米！食堂一天開兩餐，有時開一餐，吃的摻菜稀飯。而且食堂人員、幹部先撈稠的，剩下稀的給社員。本來冬天地裡也長菜，但耐不住拿菜當救命糧。青菜吃完了，社、隊員發動社員去采野菜、草根、樹皮摻在稀飯裡。

縣委還一個勁發動幹部搞“瞞產糧”，要完成徵購糧任務。到了春節，家家戶戶哭聲連天，男女老少餓得肚皮貼著脊梁骨。大年三十晚上，河北堽一些農民家裡冒出了煙，那是饑餓難耐的人們，把填枕頭的穀殼倒出來，磨成糠煮一餐“團年飯”！大年初一，小隊幹部望著空蕩蕩的糧倉，心裡流血，只好把喂豬的粗糠，分給社員磨了吃。正月十五那一天，小隊又把餵牲口和積肥的菜枯、麻枯餅，分給社員當糧。到了3月，公共食堂斷炊了。

“天下第一田”如今卻連吃糠、吃野菜都難了。社員靠野菜、野草救命，甚至挖“觀音土”當糧吃。還有社員跑到20多裡路外的大坳水庫，到山裡挖葛根、蕨根、麻根，拿回家當糧吃。近處挖完了，又跑到60多裡外的野馬崗挖野菜。1959年春荒，河北堽的群眾，吃的野菜，真能開博覽會了：灰灰菜、地米菜、馬齒莧、豬婆菜、鵝鵝腸，這些豬草，如今成了好吃喝。竹葉草、雞葉草、車前草、水葫蘆、野蒿子甚至茅草根、鐵盤根草、各種樹葉，這些豬都不吃的東西，人們拿來填肚子，還不容易采到手——饑民太多了！當初人歡馬叫參觀“天下第一田”的“迎賓路”上，如今樹葉捋得禿頂光，樹皮剝得淨淨光。就邊山坡上的油樹皮全都剝光了一一那東西有毒，人吃了瀉腹拉肚子，吃多了中毒會死人。但餓極了的饑民也顧不上死活了。

1959年春荒，麻城吃野菜毒死83人，中毒2758人。1961年整風整社時，

省、地工作隊有一份材料：1959年春荒，麻城縣因食堂斷糧餓死、病死4500多人（1960年，縣委一份檢討材料中說是死人1370人），病倒37380人。實際情況，應該遠比這嚴重。幸好趕上糾風整社，縣委發下920萬斤救命糧，春荒終於暫時得到一些緩解和遏制。

麻城一位原縣人委會幹部，對廬山會議後麻城形勢，作過中肯的概括：“廬山會議後，一切理想化的幻想都破滅了，從人心說，上級的高調沒誰信了，工作無法推動。但共產黨的幹部肯定跟著中央走，中央說咋個子辦，幹部肯定跟著走。吃虧的肯定是群眾。幹部說不聽，就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暴力成了動力。工作中心就是糧食，高指標、高徵購，搞不到糧食就‘反瞞產’。農村能搜刮的糧食都搞走了，整個社會都亂了套了。社員吃什麼？偷、搶糧食、挖野菜、吃觀音土，得病死人，那個罪遭大了。罪孽啊罪孽，真是罪孽！”廬山會議後，麻城縣委把上半年糾風整社中的承諾一風吹，社社隊隊大搞“反右傾”，提過意見的人被扣上“右傾”帽子挨整。1959年9月開始的“反右傾”運動，兩年中開除黨籍者112人，留黨察看84人，撤職40人，嚴重警告處分65人，警告67人。被批判者一律受到體罰。

廬山會議後，麻城糧食生產又大放“躍進衛星”。59年夏收減產，早稻減產也已成定局，而縣委訂的糧食生產指標，從四億斤、四億五千萬斤、最後“躍進”到五億五千萬斤。上級下達的徵購任務，定在一億一千萬斤。而實際產量，三億三千二百多萬斤。若完成徵購，留下種子、牲口糧，人均口糧不到三百斤，出米二百斤，人均每天吃糧不到六兩。幹部多吃多占，食堂人員貪污偷拿後，公共食堂能讓社員吃到的口糧，平均每天半斤。

收早稻、插晚稻，縣委提出口號：“交足國家的，再留自己的。”收下稻穀

就地封倉交國庫，社員一看寒了心：糧食泡了湯，日子怎麼過？因此，只有保命的心，沒有生產的勁，晚稻秧頭天插下去，第二天漂起一層。人哄田，田就哄人。稻田裡，只見禾草不見穀，普遍畝產一、二百斤。“天下第一田”，畝產不到一百斤。

59年早稻、晚稻收割，糧食成為幹群衝突焦點。縣、社幹部緊急下鄉，在曬穀場蹲點。縣委要求：“邊收，邊曬，邊入庫，邊上交，武裝護糧。”膽大的社員則邊收、邊偷、邊藏，以備饑荒。縣委聞訊，下令“堅決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堅決打擊偷糧瞞產的歪風邪氣！”在中一公社“反瞞產”現場會上，縣委書記佈置：偷糧的，要批鬥、送勞改。搶糧的，就地鎮壓。1959年至1960年，麻城縣幾個糧庫發生武裝人員開槍打死人命事件。5.28慘案：死幼兒13，傷8個。受傷的嚇癡呆。可上報的只有7個，隱瞞事實。

暴力，成了幹部們開展工作的法寶。群眾稍有不滿，“就遭亂鬥、亂罰、亂打。”縣委在宋埠公社搞“高產試驗田”。9月，聽說省裡要來人檢查工作，縣委急忙抽調大批社員“突擊作戰”。第二天，縣委負責人到田裡檢查，一看草未薅盡，劈頭蓋臉兩耳光，當事的社員在毒熱太陽下的田裡罰站兩天，不准吃飯，並發話：“還吃飯？人活都不會幹，吃屎吧！”

1960年12月，全縣糧荒十分嚴重，幹部群眾都惶惶不安。而趙金良《在縣委擴大幹部會議第一階段的總結報告》中，對與會者大力施壓，務必完成徵購任務。“我們的任務就是一億一千萬斤，把它完成再沒任務了。明年的任務一億一千萬斤已經定下來了，夏季如果豐收了，可以完成任務的50%。如果增產30%，也只增加10%的任務。我們過去的缺點，是生產的發展趕不上統購任務的增加。”在這個會議上，他還神氣活現地傳達了王任重吃糧少也死不了人的指示：“今年

再講清楚，現在每人每月留了 25 斤，再吃不到，不能找我們。我們 20 多斤糧食只要安排好，完全可以過得去。去年幾斤穀也過來了。任重同志講：四兩糧食不作重活，只作輕微的事，死不了人；半斤糧食只能搞半日制，勞動半天，休息半天；二兩糧食，吃的水也不能挑。沒有糧食有藕吃，也餓不死人，如果沒藕吃光吃菜也可以維持 20 至 30 天，死不了人。”這可不是趙金良假傳聖旨胡說八道，硬把這沒人性的話往省委第一書記頭上扣，這的確是王任重在全省省、地、縣三級幹部會議上的親口指示。

明知就在嚴重缺糧的情況下，縣委不顧人民死活，搞起了“反瞞產”運動，全力搜刮“徵購糧”，以證實麻城生產確確實實現了“更大躍進”。麻城縣委第一書記吳德簡就在反瞞產大會上兇狠地交待下來：“國家的徵購任務，一斤一兩也不准少。少了一兩，黨籍幹籍一齊拿。你不拿糧食，我就拿你的人！”全縣在這場運動中，打死逼死 67 人。“反手後糧”運動的結果，把社員口糧，及部分公共食堂糧食一掃而光，加劇了大饑荒，造成更大規模浮腫死人。

“反瞞產”運動加劇了糧荒。全縣出現大規模逃荒、斷糧、浮腫、乾瘦、婦女閉經、子宮下垂、小兒嚴重營養不良情況。僅 1959 年全縣發現婦女子宮下垂病患者即高達 34595 人。沒被“發現”者當然不在此列了。

據 1961 年冬，中共麻城縣委給省、地委的報告《關於一年來農村整風整社的總結》稱：“今年三月整風中所揭發的問題，除政策方面外，幹部作風是十分嚴重的。據統計：小隊長以上的幹部嚴重蛻化變質的有 858 人，‘五類’分子 253 人，他們貪污多占糧食 44 萬多斤，現金 7 萬多元，瞞產私分糧食 125 萬斤，油料一萬多斤，皮棉一萬多斤，打罵群眾 946 人。破壞了黨群關係，挫傷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如白杲公社梁家畝一隊黨支部付書記李安恆，從三月到八月，共

捆打吊罵社員幾十人，捏造社員董純紹偷他的皮包一個，人民幣 60 元。首先派民兵到董家進行搜查，又親自動手用扁擔毒打一頓，苦打成招，逼著賠款 20 元，棺材一個，衣服一件，共折人民幣 37 元。董因受傷過重，被打後一個月就死了。6 月 18 日，又以反偷盜為名，組織非法鬥爭，將偷走救命的婦女抓來，一次打 7 個婦女，有的打得不能走路。群眾罵他們是‘國民黨’。通過整風，發動群眾訴苦鬥爭，將李逮捕法辦，人心大快。各公社都根據揭露問題的情節輕重，分別進行了黨內的和行政的處分。1961 年，麻城縣委組織部在一份報告中寫道：“幹部中普遍存在特殊化，以權謀私和貪污行為，開小灶貪污公款，私分糧食成為尖銳問題。有的人見錢手癢，見物就拿，見吃喝就張嘴，用公款如用自己腰包。社員反映最激烈的問題，就是食堂斷夥，浮腫死人，小灶都天天大吃二喝，酒肉不斷，全縣 67% 以上的公社、管理區、生產大隊一二把手，小灶常年不斷。”

幹部不僅多吃，而且多占，往家拿。1960 年春節，宋埠公社 7 名主要幹部，從食堂小灶拿走牛肉 25 斤，豬肉 118 斤，糧 13.5 斤，油 70 斤。1960 年 10 月至 1961 年 4 月，白果公社幹部，從生產隊平調的牲口中，殺老弱病牛 6 頭、豬 58 頭、羊 22 口、雞 1750 只、鴨 630 只，以招待客人、開會、打牙祭為名，大吃二喝，集體私分。有的幹部竟把配給浮腫病，乾瘦病人救命的營養品和救濟糧，貪污私分，宋埠公社 60% 的營養品被私分。”

據 1960 年開始的農村“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三反整風運動揭露，湖北農村大隊、小隊幹部中，貪污多占的達 23%，平均每縣隊幹部貪污多占 15 萬元，打罵群眾嚴重的約占 5%。而據省裡大大縮水的材料，弄虛作假的長期吃小灶的占 10%，不勞動的占 7%。1960 年 2 月湖北省委上報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三反整風運動的報告》，認為湖北省農村幹部 30-35% 變質了，“主要是手腳不乾

淨，強迫命令，弄虛作假，‘吃小灶’，不勞動等。群眾意見很大。” 群眾批評說：“有的幹部是三子：穿的衣服公子，做起事來象戲子（做假），吃起飯來象月婆子（產婦）。” 又說：“有的幹部是三化：生產指手化，彙報說假話，生活小灶化。”

60 年春荒，麻城流傳一首順口溜：“幹部家裡人不死，食堂家裡不死人，糧店家裡死不了人。” 而廣大社員則衣不遮體，腹內填草，村村死人，戶戶浮腫。

飽暖思淫欲，饑寒起盜心。有權有勢，就有錢有糧。幹部“也是人嘛”，沒有制約，便乘機大發災荒財，貪污之餘，用糧食換社員私藏的金銀首飾，大洋、元寶。有的好色，用小恩小惠，用幾十斤甚至幾斤糧食，就脅奸一個婦女或大姑娘。更可憐的是男人在外的軍屬，家無勞力，生活更苦，一些女人便成為幹部長期逼奸霸佔的對象。麻城縣 27 名幹部為此受到黨紀國法處分。

從廬山會議“掀起更大躍進”，到 1960 年 4 月整風整社的 7 個多月中，麻城縣人民直接承擔的災難，從縣委一份縮水的統計材料中可見一斑；死亡 15300 人，浮腫、乾瘦、子宮下垂等病人 127836 人。三河口公社因饑餓死人 2447 人，占該社總人口 7.8%。其中，八磊石管理區 7 個月中死亡 631 人，占人口 28%。

1958 年到 1960 年，麻城縣人口統計，告訴了我們大躍進·苦日子年代，麻城人民受害的大致程度：

年份	總人口數	死亡人口
1958	703859 人	11254 人
1959	679819 人	15269 人
1960	672781 人	16362 人
1961	691400 人	19850 人

資料來源：黃岡地區革命委員會《國民經濟統計資料（1949—1975）》

這是文革年代公佈的大大縮水的統計數字。查閱公安部門存檔的資料，從1953—1975年，人口正常死亡每年六、七千左右。而大躍進至苦日子，包括老、弱、病人的死亡都直接與饑餓勞累有關。另據《麻城縣誌》，大躍進這幾年，麻城年均死亡15816人。依據有關材料綜合統計，麻城死人總數約在5萬多人左右。而據1962年麻城縣委關於整風整社工作總結的草稿，和趙金良檢討書的草稿來看，麻城縣因饑餓、勞累、疾病、自殺而死亡的人數，約在七、八萬左右。後來其正稿中刪去了這份數位。浮腫、乾瘦、子宮脫垂等罹病者近20萬人。大躍進還造成生產力的巨大破壞，土地大量荒蕪，耕畜大批死亡，生產工具大量破壞，房屋大部損毀，群眾生活用品大量毀失，糧食生產嚴重滑坡。從下表我們可以看到糧食生產的大略情況：

糧食播種面積、產量統計表

《麻城縣誌》

年度	面積（萬畝）	單產（公斤）	總產（噸）
1953	119.02	172	204930
1957	121.4	189	228960
1958	115.06	186	213625
1959	101.32	164	166045
1960	133.56	161	214390
1961	153.55	138	211820
1962	138.4	168	232730

從表中可以看出，大躍進年代的糧食畝產，僅相當於戰亂之中1949年的生產水準，而那時農民根本沒有雙季稻等等的生產強度和成本。大躍進，“躍進”到了戰亂經年也不如的境況，人民群眾，遭受到了史無前例的大災難。

1959年春荒，驟然降臨到荊楚大地，饑民如潮，災情如潮，而且各地的城市紛紛出現庫存緊張，糧食告急的情況。全省有800萬人一天只能吃到110克米，更有1300多個食堂斷炊！號稱魚米之鄉的湖北，發生了歷史罕見的現象：初春

樹葉剛發芽吐綠，就被饑民一掃而光，捋了長，長了又捋，樹葉捋去填饑腸。至五月暮春，許多地方還是只見樹枝不見葉。漫山遍野，老人孩子見到綠色就撲過去。餓得眼都發綠的男人們，把泥塘翻了一遍又一遍，哪怕挖出一個藕節巴，也是妻兒老小們救命的希望。

據不完全統計：1959年1月至6月，全省病餓致死的農民高達十多萬人，浮腫病人大量出現。1959年春荒，湖北最嚴重的是黃岡，黃岡最嚴重的是麻城、蘄春這些高產“衛星”縣。蘄春上報材料說，張榜公社大桴沖大隊8460人，僅二月中旬到三月底，一個多月餓死139人，113人餓成重病，682人浮腫，崩血！1960年3月，黃岡縣的浮腫人數5萬，竹山縣有5500人浮腫。1960年4月中旬，湖北省水腫、乾瘦、婦女子宮脫落人數達35.9萬人。一時間荊楚大地饑民遍野，逃荒、要飯的“盲流”滾滾……而各地民兵，公安奉命設卡堵截，大抓破壞社會主義形象的盲流，送勞改，罰苦力。

在1959年7月4日的廬山會上，王任重檢討了湖北的情況：“比1954年更困難，500萬（故意縮小）人幾兩糧、吃稀飯，教訓深刻。1954年沒吃過12兩以下（當時16兩=1斤）。已餓死了1500人，15萬人患浮腫病（按：當時省委掌握的不完全統計材料，死人37000多人，浮腫51萬人）……（1958年）糧食只產200多億斤，卻按450億斤過日子。今年1月還相信有400億斤（反了浮誇，公社上報仍說有430億斤）；3月還說有350億斤；4月再摸，不到300億斤；上山前由縣委書記再摸，230億斤（實際產量不到190億斤）。1957年是219億斤。為什麼增產不多？大躍進掩蓋水旱災情，500萬畝只收幾十斤（仍報千斤），有100多萬畝早稻失收。去年追求密植、高產，放衛星成風。……說真話真不容易，縣委書記、勞模當面說假話。假像掩蓋了真相，芝麻100斤可說1萬斤。

大半年冷不下來。大家老老實實在說假話。群眾批評：一不會生產，二不會過日子。58年底大吃大喝時，老農已提出警告。……工廠財務混亂，超支5億。3萬噸半成品，所賠的錢誰出？說大話，吃大虧。紗廠辦鋼廠，用掉流動資金。各縣盲目蓋了些工廠，可以改辦學校或變成倉庫。”

1959年，長陽縣都鎮灣公社發生了震驚全國的“社林事件”。短短一年中，該公社社林管理區共餓死病死299人。10月份，10天之內樟木壘村李光河家裡就接連死了兩人。弟弟被燙死了，奶奶活生生給餓死了，小弟弟餓得奄奄一息。冬月，李光河的父親李福年在鱧魚溪水利工地餓暈倒在地，臨死前，他向工友們哀求：“夥結們，搞把菜我吃一點。”幾天前，他回家摘了一把野菜藏在屋子裡的床上被褥裡，他想讓鄉親們幫著拿來吃了延長一口氣。可他沒能吃到就悲慘地餓死了。李光登的妻子生完小孩，沒有糧食吃，當即餓死；下午，這個出生才幾個小時的嬰兒，到人世間來沒有吃上一口奶就餓死了；岳父也隨後餓死。更淒慘的是，家裡唯一的勞動力李光登還在航運公司上班，不准許請假回家。家裡僅剩一個小腳老太太。劉朝平備有棺材，12月4日餓死後，因無人抬動棺材，過了兩天，才用木板子抬出去埋了。管理區沒有勞力，死的人又多，常常幾個人被埋在一個土坑裡。村民陳庭兵餓的哀求食堂會計：“我只想吃一碗洋芋（土豆）糊糊後馬上死。”會計給他弄了洋芋糊糊來，他真的吃完就斷氣了。30歲的李習年餓的差點掉氣，供應糧背回來後，他猛吃幾碗脹破了腸子離開人世。四生產隊9歲孩子李祖星餓病了，鄧武雲找保管員討葛根粑粑想救他的命，可沒討到，回來時可憐的孩子就斷氣了。三生產隊56歲的覃立善是五保戶，人稱能吃的“大肚漢”，身體一向結實。11月25日前幾天家裡斷了糧，他帶了苕葉子到鱧魚溪水利工地幹活，搞了兩天就病倒了。29日死去。二生產隊覃連秀的4歲小孩，

死前 20 多天沒有吃糧食，覃連秀從外面撿了點苕把子準備拿回去救命。等她回到家，小孩已經餓死了。二生產隊二小組譚自新一家 7 口人，已死 3 人，兩歲兒子臨死時拉著他的手摸著肚子，可憐地說“吃、吃、吃……”。

現住桔子溪村的 60 歲村民鄧大勝一輩子都忘不了那場劫難，他憤憤地說：“我們家 40 多天沒沾到一顆糧食，我六歲的妹妹餓的撞到椅子底下死了。”

李光河老人回憶說，群眾都特別害怕李作聖，人人見著他就拐著彎路走。李作聖及手下幹部一貫採取強迫群眾手段，特別是在群眾生活斷糧的時候，總支強迫 11 月 29 日上勞動力 400 人修鱧魚溪水利工程。群眾反映沒有糧食、病人多、死人多。總支答覆：“無糧帶菜，每人 40 斤，農業和水利分開。”上了兩天工，一批人缺糧病倒，總支下令“病人抬也要抬到水利上來，死也要死在水利上。”群眾餓著肚子勞動，兩天后又大批病倒。二生產隊上水利工 93 人，三天就病倒了 32 人。在這種情況下，李作聖等仍用右傾思想的帽子威脅下級幹部強迫群眾勞動。二生產隊的分支書黃文海向李作聖彙報災情時。李說：“老黃，我們要狠心抓，縣委工作組的謝（新）同志在糧食上有右傾思想。”鱧魚溪水利工地病人越來越多，出工的越來越少。管理區信用會計胡祝元硬強迫病人出工，不准休息。李作聖在一生產隊 5 小隊的工地氣勢洶洶地說：“西藏叛亂都平息了，匈牙利那麼大的事也打垮了。你們罷工，管理區的槍有幾條，子彈有幾百發……”他還強迫工地群眾：“我們沒有糧食，吃石頭、吃土也非完成任務不可。”李作聖等連受不了饑餓偷苕吃的 8 歲小孩都不放過，在鱧魚溪將其捆綁打罵。胡祝元同樣採用強迫手段懲罰群眾。覃樹春抬石頭沒有力跌倒了，胡祝元糾著他的衣領，連推帶踢，罵他裝病。胡威脅群眾說：“誰不幹就送到管理區，管理區槍有幾條，子彈有幾百發。”由於總支強迫命令，水利工地上大批群眾病倒，並造成 4 人死亡

的嚴重後果。二生產隊的病人鄭芳被強行拉到工地當天就死了。

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嚴重發生病人、死人的時候，全管理區有15戶無人開門。柳發秀一家4人，生病的3人。群眾個個面黃肌瘦，行動緩慢。11月21日一天死7人。12月份平均每兩天死5人，全管理區有5戶死去大人，留下12個孤兒。覃書成一家8人，12月2日、3日兩天死了3個。根據後來調查：當年社林管理區有病人787人，占總人口的25.38%，其中腫病354人，其他雜病433人。從春季以來，腫病不斷發生。1959年1~12月31日共計死人299人，占人口的10%。第4季度死亡151人，占全年死亡人數的52%，其中10月死26人，11月死50人，12月死75人；屬於營養性死亡134人，與營養有關病死50人，非營養性病死101人，因缺糧自殺6人，其他死亡8人。

1959年冬至1960年春，薛坦在荊州地區大搞新生事物，結果使京山、荊門、鐘祥以至江陵等縣，半年內餓死了將近10萬人。據《荊州地區志》“1949—1993年人口自然變動表”記述：全區人口1959年為629.19萬。1960年降為628.11萬，一年之中人口不僅未增長反而減少10800人；其中1960年死亡人數高達115844人，按照荊州地區1955年至1959年每年死亡43857—67190人的平均數，1960年比正常年景多死亡約7萬餘人，死亡率達18.67%，比1959年的10.87%加大了七點八個百分點；而全荊州地區1960年的人口增長數只有3521人，比1958年減少159372人，1960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959年的18%降為0.57%(P104)。相比之下，洪湖縣1960年人口增長7125人，人口增長率達15.52%(《洪湖縣誌》P88)。如果沒有洪湖縣驚人的高出生率，全荊州地區1960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就會出現負數。據此，“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洪湖縣沒餓死人，“京鐘荊”餓死近10萬人，確有其事。

譬如松滋縣 1959 年餓死了 6300 人，1960 年又餓死 1.6 萬(宜都縣有 1.4 萬非正常死亡)。鐘祥縣甚至還發生了一戶農民因饑餓而食親人屍體的人吃人慘劇。鐘祥縣委就此事給地委打了報告，薛坦沒當回事。地委就搞了個內部通報，通報到各縣，這是有正式檔的。

“荊州地區大事記”說：1960 年 1 月，一些地方開始出現春荒。地委、專署召開專門會議，要求大種蔬菜，組織打獵、捕魚、撈蝦，集中治療“浮腫病人”。3 月，地委在石首團山召開早稻春耕播種現場會，強調“以早為綱，一早百早，季季主動”。會後，一些地方提前一個季節播種，造成大批爛秧。李金玉領導的洪湖縣是荊州地區唯一沒有餓死人的縣，1960 年洪湖縣一次就支援江陵縣 200 萬斤糧食啊，那可是救命糧呀！李金玉 1964 年被打為“反革命集團”。當年餓死近 10 萬人的責任者，無端報復李金玉的薛坦，卻一再高升，而“愛民官”卻屢屢蒙冤，且無反可平，永難昭雪。

大躍進、大煉鋼鐵讓紅安餓死不少人，很多地方樹木被砍光用來煉鋼鐵，導致紅安很多地方呈現出黃土高坡的景觀。同時，大躍進、大煉鋼鐵的後遺症導致紅安至今仍然發展緩慢，紅安很多幹部的思想仍然停留在在大躍進時期，比如至今紅安仍然打著全國老區第一縣的稱號（交通如此落後，又沒有大工業如何拿第一），中央、省裡的幹部一到紅安來檢查，老百姓就遭殃，比如以前中央領導人來紅安視察時，紅安的官員去各村收雞，拼湊所謂的養雞場，還有省裡來檢查，為了體現紅安秋收搞的好，強迫老百姓收割沒有成熟的稻子。

據不完全統計，1959 年至 1962 年，湖北省浮腫病、乾瘦病、婦女子宮脫垂、閉經等病人累計 1493 多萬人，外逃 270 多萬人，斷糧斷炊占公共食堂總數近 20%。數百萬人死於饑荒！省政府把省裡庫存的餘糧，火速運往最困難的地方。然而，

車薪杯水，無濟於事。張體學與李先念的交情深厚，向李先念要糧食，沒兩天，中央給湖北撥來了一億斤供應糧！

第 110 節 廣西（環江）——衛星上天，天良傷盡

1·合作化災難

環江地處亞熱帶，雨水充足，地廣人稀，原始森林成片，四季常青，糧食作物季季有收，平常年景即有餘糧外運，是柳州地區乃至全自治區較好縣份。人民勤勞敦厚，解放前從未聽說過糧荒死人之事。《環江縣毛南族社會歷史調查》一書中有這樣的記敘：解放前毛南山鄉，九分石頭一分土；十年九旱窮山溝，一年普遍缺 2-3 個月的口糧，每天只能吃兩餐拌瓜菜或紅薯的稀飯，經常缺少油鹽。即使大荒之年，求親靠友或依靠自然資源，斷不至於餓死人。

1951 年 10 月，環江縣開始進行土地改革。至 1953 年土改結束，全縣農民人均擁有耕地 2.4 畝，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當年全縣糧食總產量為 4989.38 萬公斤，農業人口人均有糧 333 公斤，基本上能夠解決溫飽問題。1952 年春，三樂鄉塘蘭村組成環江第一個互助組——崖日堅互助組。1954 年 2 月，以崖日堅互助組為主轉建成塘蘭農業社，這是環江縣第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崖日堅在大躍進年代中，因為抵制“反瞞產”運動而死於非命。

環江 1954 年約 16 萬人，是專產糧、牛、豬的縣份。在大辦合作化運動中，各級幹部對農民採取“一哄二抬三強迫”的辦法，一時鬧得亂子四起。幹部們在農村和社會上大造“入社光榮”的聲勢。尤其在轉高級社時，入社成為政治待遇，對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實行群眾評議，表現好的，可摘帽入社，否則入社後實行管制勞動改造。因此，不入社的人社會地位比地富還低。對不願入社的人，一卡二壓三批判。幹部們發動社員，開會批鬥那些不願入社的群眾，經常是邊批

鬥邊打罵，搞得那些不願入社的人一聽說開會就緊張害怕。你越害怕，批鬥會還開得越熱鬧，白天開了晚上開。有的幹部實行嚴厲手段，對沒入社的群眾，牲畜不能上山吃草，孩子不能上學讀書……1956年1月，環江縣農村普遍建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社實行生產資料充公，生活資料按勞分配。用群眾的話來說，就是土地共產，耕牛、農具充公，幹部捏著社員飯碗。因此，一說到馬上要搞高級社，農民們怕共產，紛紛賣牛、殺豬、宰羊、殺雞殺鴨、砍樹……一時間造成環江縣農業生產的大破壞。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嚴重挫折，加上1955年發生春旱，導致糧食產量大減。1955年農業合作化高潮中，全縣糧食總產量由1954年的5618萬公斤，下降到4749萬公斤，減產15.47%。其中減產嚴重的地方，如下南區，糧食減產31.2%。而糧食減產，徵購糧反倒增多。因而造成嚴重糧荒。據1956年3月統計，全縣農村糧食缺口達500多萬公斤，其中，下南區缺糧106.5萬公斤，缺糧戶4466戶，占總農戶數的86.3%。群眾生活十分困難。下南的老秀才編了首民謠，農民們拿了做歌唱：“高級社，不高級，集體生產真寒心。幹部臉色象老爺，出工分糧都扯皮。出工要跑幾十裡，收工摸黑沒飯吃。一年到頭忙生產，年底糧食難充饑。不管天，不管地，要田拖牛單幹去。”由此而來，社員拉牛退社的現象大量發生。據水源、下南、馴樂3個區的不完全統計，要求退社的農戶有566戶。

為此，1956年8月，環江縣委書記王定親自帶領調查組，深入到毛南族聚居的希遠和景陽兩個高級社調查研究。王定看到：環江是大石山區，居住分散零落，為了參加集體生產（或開會），四點鐘就要起身，步行二、三個小時山路，才能到達勞動地點；下午收工回到家中，已是半夜。秋冬分配季節，更是問題重重，各個村屯，就那麼一點點糧食，又得挑回來，疲於奔命，喊苦不迭。不少僻

遠山區種了些瓜果、菜蔬及少量糧食，因路途遙遠，行走都很困難，只好爛在地裡，無人收割，造成極大浪費。許多地方，有的田塊十分狹小，集體勞動根本無法進行，有人形容一個青蛙一跳可過 12 條田埂；牛也很難進去耕作。最幼稚的孩子也懂得：像這樣地方，不應搞合作那樣大呼隆集體生產。

王定說：“一個鄉，方圓幾十裡，一個隊有十多個弄場，管理和集體勞動十分困難，太分散了嘛！什麼都統起來不好。農民習慣在田頭、地角種點菜豆辣椒，或搞點什麼副業，就扣上‘資本主義’‘自發戶’‘破壞’‘復辟’等大帽子進行批鬥。結果，牲豬大減產，鴨鵝幾乎絕了，中藥材沒了，青菜也少見，合作社勢必長不了。”縣委決定：居住過於分散的社，分為若干獨立核算的小社；保持大社原有組織，下設若干獨立核算的分社；大社規模不變，對一隊多屯，各屯收入又懸殊的生產隊，適當分小，由生產隊自負盈虧；分散的社區，就包工、包產、包投資到戶；凡山區社隊都可以推行“小作物下放到戶”的辦法。因而有效地解決了社員拉牛退社的問題。王定於 56 年底報告地委。地委加上按語，批發兄弟縣參考，准許環江試點。1957 年，全縣糧食總產量達到 4894.5 萬公斤，比 1956 年增產 739 萬公斤，增長 17.78%，山區社隊小作物生產得到恢復，群眾生活有了較大提高而深受社員歡迎。

1957 年 2 月，廣西省委工作組到環江縣進行農村社會調查。當他們發現這一情況後，立即報告了省委。在省委幾次督促下，宜山地委終於對環江縣委進行了改組。1957 年 5 月，宜山專署副專員戴春濤任環江縣委第一書記，縣委成員大多數人“靠邊站”。8 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環江縣委於 8 月 18 日召開了四級幹部會議進行傳達和貫徹，到會幹部有三千多人。接著，全縣開展起全民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並對推行“三包一獎”，“包產到戶”，“小作物下放到戶”的原縣委書記王定、副書記東丙庚、陳朝鮮、水源區委書記覃春田、明倫區委書記鄒本源、大安區委副書記韋燦如進行嚴厲批判，並將其劃為“右派分子”開除黨籍。王定被扣上瓦解合作社、破壞集體經濟，帶頭走資本主義的大帽子；被打成“右派集團”頭子，成為“極右”的反革命。縣直機關和區鄉幹部中，也有一大批人受到株連，下放農村勞動改造。還有一大批支持和實行環江縣委改革方案的基層幹部受到批判鬥爭，其中 6 人被判處徒刑。

2·畝產 13 萬斤

1957 年 12 月，“為了加強環江縣委的領導班子”，廣西省委決定調洪華任環江縣委第一書記。從此，環江縣的人民就在洪華的統治下，踏上了大躍進苦日子那暗無天日的路程！

1958 年 8 月 25 日晚，中共環江縣委召開電話會議，全縣 12 萬多幹部群眾到主會場和分會場參加會議，聽取縣委領導人關於成立人民公社的報告。當夜，全縣到處張燈結綵，鑼鼓喧天。在一派熱鬧聲勢下，“到會的 12 萬多幹部群眾都簽名要求加入人民公社”，縣委當晚宣佈“環江縣實現人民公社化”，環江縣原 108 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46342 個農戶，以區為單位，合併為 8 個人民公社：紅旗人民公社（城管區）、紅日人民公社（水源區）、紅星人民公社（川山區）、和平人民公社（下南區）、衛星人民公社（大安區）、先鋒人民公社（明倫區）、火箭人民公社（為才區）、上游人民公社（馴樂區）。入社的戶數、人口、耕地，均為 100%。原來的 108 個鄉，改為 108 個生產大隊。

人民公社建立後，公社實行高度共產化，對生產資料實行無償調撥；勞動力則按軍事編制，編成團、營、連、排、班，實行統一調度。據《環江毛南族自治

縣縣誌》，當時環江縣委提出的口號是：“組織軍事化，生活集體化，行動戰鬥化，幹部軍官化，社員戰鬥化。”“並一度推行伙食供給制、工資制，同時以自然屯或生產隊為單位大辦集體食堂，吃飯不要錢。據統計，全縣共建食堂 1984 個，就餐人數達 155745 人。全縣還建立了幸福院（敬老院）110 個，入院戶數 990 戶，1320 人；全縣創辦托兒所 444 個、幼稚園 35 所。”

從此，環江人民無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幾乎一個不少地在人民公社體制下，開始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並在此後的人民公社中，缺衣少食地生活了三十多年。

8 月 10-13 日，自治區黨委在南寧召開地縣委書記會議。會議提出，1958 年廣西要實現糧食“千斤區”，爭取實現“1500 斤區”。會議決定，苦戰 3 個月，搞好中晚稻田間管理，實現農業半機械化，做好水利建設準備工作。會後，各地對增產指標又層層加碼，訂出“萬斤縣”、“萬斤鄉”、“萬斤畝”等躍進指標。然而，平常年份，廣西大多數地區糧食畝產才二、三百斤。8 月，柳州召開地委擴大會議，提出了農業大躍進的宏偉目標：畝產達到 3000 斤，爭取 5000 斤；總產 165 億斤，爭取 275 億斤。“力爭全區第一，全國第一”。

8 月中下旬，躍進“衛星”如火如荼。湖北麻城放出水稻三萬六的“大衛星”後，劉建勳急了。8 月 19 日，自治區黨委召開全區地、縣委書記緊急電話會議。劉書記對主持會議的區委副書記說：“毛主席在看著各省放衛星呢！廣西落後了，要讓毛主席看得上，廣西必須放大衛星，爭上游。”他告訴全區地、縣幹部：“今年豐產了，但缺少一顆大衛星，這是缺點。湖北畝產三萬六的衛星，是把九畝移到一畝去的。全國衛星沒有五到十萬斤一畝，恐怕是放不出去的。”並強調：“現在不管一切，必須拿下大衛星！”8 月 28 日，自治區黨委、區人委會發出《關

於開展高額豐產競賽運動的決定》。從此，大規模“豐產試驗田”和“衛星田”到處出現。電話會議要求各地（市）、縣委必須抓緊落實糧食高產工作。

區委著了急，地委火燒心！柳州地委緊急召開地、縣、鄉、社四級幹部會議。會議的基本方針，就是“放出大衛星”！會議大唱“敢想、敢說、敢幹”，“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一定能做到”的高調。賀書記在會上擺開胡蘿蔔加大棒的架勢，言明瞭一個中心思想：放衛星爭上游的，重獎！放出衛星，“登上了《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獎一輛小汽車。”放不出衛星的，“拔白旗”！賀亦然特意私下召見洪華，千叮嚀，萬囑咐：環江一定要拿第一。要千方百計超過湖北，爭取全國第一。並明確指示，一定要解放思想，從方法上想辦法。是要學麻城，移禾並莩，要多弄幾畝田。拿了第一，一定重獎。賀亦然親自給洪華倒茶點煙，並請喝酒吃飯，邊吃邊談。洪華受寵若驚。在賀亦然辦公室，洪華拍著胸、捏著拳：“賀書記，您放一百個心。不奪全國第一，我絕不見您！”並馬上給縣裡打長途電話，佈置縣委立即開展“放大衛星”工作。並指示由縣委分工負責農業的書記江琴堂主持，由曾兼任過城管區委第一書記的縣委書記處書記季桂明、城管區委副書記韋玉昆、城管區委委員、區婦聯主任李鈺金負責，在城管高級農業合作社搞移禾並莩的“高產試驗”。家裡做好了安排，洪華心中有數，底氣十足。在地、縣幹部會議上，他多次拍著胸膛下保證：“耕地三十萬，總產百五十億斤糧，只准超過不減少，保證畝產五萬三”，“誓爭全區第一，全國第一，天下第一！”膽氣包天，豪情沖天！

在四級幹部會的播臺賽上，洪華玩了個絕活。當力爭第一的鹿寨縣委書記報標打播發完言後，洪華“蹬、蹬、蹬”幾個大步跨上播臺，猛地把白襯衫扣子一把扯開，只見裡面汗衫上寫了五個鮮豔紅字：“誓死奪第一。”臺上台下，掌聲

雷動，叫好聲連片。

會議一散，洪華急急匆匆趕回環江。在縣委動員會上，洪華向全體與會者宣佈：“區委和地委都在看著俺們，環江要放就放他個十萬斤以上的大衛星，小的沒啥意思了。”主席臺上，洪華十分亢奮，一口山東話震得山響：“放衛星，就得學麻城。麻城九畝並一畝。俺就搞它個十畝二十畝並一畝。麻城放三萬六，誰說俺就不能放它個十萬二十萬斤的大衛星？”

洪華把紅旗公社定為重點，叫來季桂明，又點煙，又倒茶，親口佈置說：“糧食衛星，紅旗公社放十多萬斤的，全縣放一批，幾個公社都放，紅旗是大頭。放好了，我先放一句話在這裡，一定嘉獎。放壞了，就自己掂量。”季桂明十分激動：“洪書記您放心，一切有我呢。拼著命一條，我也不會辜負您！”佈置完畢，洪華前呼後擁下鄉了。一路巡來，一路安排放“放衛星”。洪華也真夠辛苦的，他還要安排鋼鐵“元帥升賬”，時常連吃飯的時間都不消停，一邊吃，一邊談。他時常找來季桂明，親自安排放“大衛星”的細節，下達指示。

季桂明召集紅旗公社的社隊幹部，反復開會斟酌研究，落實放“大衛星”的措施。8月22日，季桂明、韋玉昆、李鈺金到城管農業社召開幹部會議。經過一陣熱熱鬧鬧的討論，會議決定在縣城二碼頭和公路之間的一塊半月形、一畝多地的“衛星田”裡，放“大衛星”。

地點確定之後，幹部們下起了真功夫。首先，派出社員把在塊田裡快要成熟的禾稻移出裡，然後用幾十個人深犁一尺五，按氮、磷、鉀肥的比例，成千上萬擔各種肥料倒進地裡，耙融搗爛。又砍竹子，修木樁，從8月24日到27日，準備了四天。由於主要男勞力已經調到“鋼鐵戰場”“大煉鋼鐵”去了，因此，縣委一聲令下，抽調了城關大隊的“後方”主要是婦女勞力、縣直機關幹部、集中

待命的中小學教師，共計一千多人一齊出動，從 8 月 28 日到 29 日，到半月形的鬥丘田附近的三樂、城管、要良、中山等大隊，選出 8、90 畝中稻，把長勢好、快要成熟的禾谷，連根帶泥包好，搬到鬥丘田來並蔸（見 1961 年 3 月 2 日中共柳州地委《關於洪華罪惡事實》。而《環江毛南族自治縣縣誌》據羅克正、歐談基、江琴堂等人的回憶，當時“並了五、六十畝”）。季桂明發話，移禾並蔸，密度要禾挨禾，禾擠禾，小孩坐到禾穗上，也要掉不下來。而那 8、90 畝田裡其它的稻穀，人踩牛踏的，基本絕收。

王定這時還在縣裡小勞改，路過該田，說了句“這麼搞法，怎能增產放衛星，豈不勞民傷財？”洪華聽到反映後，立即發動大批鬥，以破壞大躍進罪名，把王定妻兒子女全家 9 口人，強趕至一破爛不堪的圩亭角落裡，四面透風；最後乾脆送去勞改農場改造。

一位中山大學畢業的老農業專家去看了“衛星田”，回去縣裡彙報說：“這樣放衛星，畝產哪會有五千、一萬斤，我看五百斤也到不了。”當即被發配到右派改造隊中去勞教。

禾苗太密，幾天就會發黑發軟。他們又派出專人，6 個社員在“衛星田”的四周，日夜不停地給禾谷鼓風噴水降溫。還每隔 1.7 到 2 米打一排木樁，橫豎都攔上竹片，邊打樁拉篾片分格，邊將禾穀一蔸一蔸地緊緊頂牢實，田邊的四周也打樁拉圍，壓緊頂牢，以防倒伏。並且每晚都在這塊“衛星田”的四周點燈誘蛾。

一千多人大戰兩晝夜，終於準備就緒了。洪華向地委彙報了放“衛星”的準備，說是要放一顆全國最大的“高產衛星”，畝產要超過十萬斤！接到環江縣委的報喜，賀亦然欣喜若狂，趕緊上報自治區。於是，柳州地委和廣西自治區委向各新聞單位及電影製片廠發出邀請，地委和自治區委又分別安排了一大批幹部、

專家，組成檢查驗收團趕赴環江。劉建勳親自交代，到時候他會守著電話，等著為廣西爭光的環江“衛星”。

1958年9月9日，歷史似乎特意为環江創造了那一天，那是環江縣創造歷史奇跡的一天——環江縣創下水稻畝產十三萬多斤的“高產紀錄”！三天后的《廣西日報》，為環江的這一天留了整個頭版，詳細報導了環江縣創歷史奇跡的這一天。《廣西日報》的套紅欄大標題格外震人：“環江創全國水稻豐產最高紀錄。紅旗公社一畝一分多試驗田，畝產突破十三萬斤。”報紙還刊發了這樣兩幅新聞照片：一個小孩坐在尚未收割的禾稻上面，就象坐在一張碩大的睡蓮葉上安穩穩，眉開眼笑。照片的說明是：小孩在試驗田的稻禾上面爬來爬去也掉不下來。照片似乎讓讀者無可置疑。另一幅為試驗田的培育者之一吳彩繁的形象照。

在應邀而來的電影攝影師葉甯的導演下，9月9日一清早，各路參觀驗收的隊伍約6千多人，從四面八方實驗田湧來……記者黃義傑、張辛、駱正元、楊素珍寫的《高產頌》，使人仿佛又置身於那個熱氣騰騰，人喊馬嘶的場面——“9月9日一清早，當霧氣還密密地籠罩著四周群山的時分，絡繹不絕的人們，雲集到環江紅旗人民公社一塊一畝三厘田的周圍。人們來自最邊遠的公社，來自柳州地區其他十幾縣；當然，還有來自自治區黨委、人委的代表和有關方面的學者專家。六千多男男女女，圍得這塊已熟透了的高產田水泄不通。千萬隻眼睛充滿興奮和期待的光彩，緊盯著那塊有點象馬蹄形的懸旗掛彩稻田，看它究竟能必多少穀子……”收割前，舉行了隆重的開鑿儀式。先是估產。“有人問社幹部李鈺金同志這塊田多密。她的回答是請大家坐到上面去試一試。”結果還真有人踏上了禾穀。攝影機、照相機忙個不停：自治區農墾廳陳任生、民政廳張顯龍、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秦振武和兩名公社幹部先上了去，七八個記者和攝影師也坐了上

去……十幾個人的重量，並沒有給禾苗帶來多大影響。人們又推測這樣密的禾可以產多少斤穀！有的伸一隻手；有的說可達七八萬；但消息錄通點的人卻伸了兩把巴掌。據說縣委向地委報了十萬斤的估產數。十萬斤這是個不免使人咋舌的數字。”那是一個何等莊嚴而又熱烈的場面呵！人群如濤，鑼鼓如雷，彩門如虹。一部部照相機在按動快門，電影攝影機忙得不亦樂乎。

10 點 15 分，洪華出場了。旗門開處，站出一個北方大漢。此人貌不出眾，卻威風凜凜。只見他躊躇滿懷地環視著四周的人群，麻臉上坑坑點點，也都流光溢彩。他把系有紅綢的鐮刀，象授功勳章似地遞到領頭開鐮者的手上，授予紅旗人民公社黨委第一書記覃建勳，城關大隊黨支部書記羅克正，副大隊長歐談基和楊全明，大隊婦代會主任吳彩繁等人，而第一個從洪華手中接過鐮刀的領頭開鐮者，更是精神抖擻，神氣活現——此人就是這塊高產衛星的炮製者季桂明。一眼看得出，這是一個十分精明強幹，善於鑽營官道的幹部。

10 點 24 分，開鐮了！羅克正一聲令下，496 位“十萬斤畝野戰軍”奉命下田參加收割、運禾、脫粒和運輸。“四百多個男女社員，以軍事化的速度行動，投入戰鬥了。七八十把鐮刀不停地舞動；三十架打穀機在飛快地旋轉；數不清的人來往搬運割下的禾和打下的穀。可是，太密了，禾苗密到一條禾杆緊挨著一條禾杆；密到寬些的鐮刀伸都伸不進，而不得不用別的辦法。因此儘管人們的幹勁再大，收割的速度是很緩慢”。太陽步步升高，天也越來越炎熱，可是擴音機裡傳出“已收二分五，得谷二萬五”的喊聲，不但使大家忘記了疲勞，而且使人變得更加興奮，情緒高昂。“從上午十時許收割開始，到晚上九時三十分結束，收了將近 12 個小時長的時間，不少人連飯都沒有很好吃，可是那高漲的情緒，卻始終沒有一點鬆弛。而當司磅員最後宣佈一畝零七厘五田收谷 14 萬多斤時，更

爆發了一陣縱情的歡呼。”

“衛星”田離城不過 3 裡，收割的穀子，由人們一擔擔從田裡挑進城，在縣城主要街道上示威般地轉了一圈之後，運到了縣委院子的球場上。名為“挑糧遊行”。球場上金燦燦的稻穀堆積如山。經過十幾個小時，直到晚上 9 點 30 分，整個收割才宣告結束。

收割宣告結束後，縣委書記處書記江琴堂為豐產報導召開記者招待會，正式宣佈：這塊由 18.9 畝移禾並莩的高產試驗田的面積共有 1.13 畝，已收 1.075 畝，還留下 0.055 畝供人們參觀。經過嚴格的登記和累計，所收的幹穀達到 140217.4 斤，折算畝產 130434.14 斤。

就這樣，環江縣創造了全國，不！是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水稻畝產最高紀錄！環江縣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奇跡！水稻畝產 13 萬多斤！這是一個多麼驚人的數字！它把山高水冷，正常年景水稻平均畝產二百多斤的記錄，一下子提高了 430 多倍以上！

大批各級政府要員當場驗收，被邀請“參加驗收的有：中共環江縣委第一書記洪華，書記江琴堂，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組織部副部長陳東，自治區林墾廳副廳長陳住生，民政廳副廳長張顯龍；中共柳州地委代表、工業交通部部長張延年、組織部長馬振東、自治區工農業生產檢查團柳州分團副團長秦振武、政協區委會副主席丘辰。”

參與驗收的還有一大批奉命而來的學者專家，他們的大名也垂昭歷史：“廣西農學院院長孫仲逸，作物栽培學教授翁德齊，遺傳選種學教授吳如岐，廣西大學教授龍季和，區農耕研究所技師陳士宏、楊半年和有關農業科研機關的水稻技術人員等。”

邀請來的新聞單位有：《人民日報》、新華社廣西分社、《中國青年報》、《廣西日報》、《廣西婦女報》、《廣西青年報》、廣西人民廣播電臺、《群眾藝術報》、《紅水河》雜誌社、《躍進日報》、《柳州日報》、中央新聞紀錄製片廠、南寧電影製片廠、自治區電影攝製組的記者和攝像師等，共計 35 人之多！創下大躍進以來，一次放“衛星”到場記者最多的記錄。

這樣一個驚人的數字是怎樣炮製出來的呢？知情者後來把真相告知了歷史：原來，為了放出“放大衛星”，環江縣委事先做好安排。在“挑糧遊行”時，一群群社員遵照縣委事前的交待，從路過的四個生產隊的糧倉裡，挑上一擔擔穀子，等“挑糧遊行”的隊伍路過時就尾隨跟上。一路上，“挑糧遊行”隊伍的人數增加了兩倍多。儘管如此，組織策劃者們還生怕達不到“衛星”指標，他們事先又安排，要挑谷的社員們趁著過秤現場亂哄哄的場面，過完稱後，挑起擔子，不准倒上穀堆，又在場上三轉兩轉，插進等待過秤的人群，再次過秤。即“團團轉”過秤法！如此循環往復，同時趁亂之際，要求過磅劃碼人員一碼多劃，有的劃碼人乘上級機關的監督幹部不注意，一碼就劃上它四五道。這樣一來，累計的數位元組節升高，十幾個小時下來，水稻畝產十三萬多斤的“特大衛星”，就真的超過了環江縣委的原定計劃。

那是一個假話連天，不齒於人的時代！那是一個良心掃地，人性泯滅的時代！9月12日，《廣西日報》整個頭版套紅，發表環江水稻“創全國最高紀錄”的報導，還發表了由記者黃義傑、張辛、駱正元、楊素珍寫的通訊報導《高產頌》。12日的《廣西日報》還刊登了自治區黨委、自治區人委給環江縣委和縣人委的賀信：《祝賀環江創水稻高產新紀錄》，熱烈祝賀環江創造水稻高產新紀錄。為此，《廣西日報》鄭重發表社論《思想上的又一次解放——歡呼環江中稻大面積高額

豐產》。在一版的下角，還加了一幅“躍進漫畫”，並刊登了一首畫配詩：“稻禾密密像森林，稻杆腰際繞白雲；收割要用大鋸鋸，收下要靠火車運。”

9月12日的《南寧日報》在第一版報導了這“人間奇跡”！其標題特別震撼人心：“見過嗎？聽過嗎？想過嗎？中稻畝產十三萬斤！我區環江紅旗人民公社破全國紀錄”。

9月18日，《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先後向全世界宣告了環江水稻畝產十三萬多斤的“特大喜訊”。據現在可考的歷史資料，當年全國對環江水稻畝產十三萬多斤“人間奇跡”的報導及有關評論，高達3864篇以上。

環江的神話，震撼中外。多少年來，群山屏隔，閉塞落後的環江，似乎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榮耀。國內外趕來參觀的人群，潮水般湧向環江，湧向那塊鬥丘田。

西方社會為中國人“放衛星”的大膽想像驚歎不已。蘇聯老大哥則一驚一詫：倘若中國最貧瘠的山地，也能畝產13萬多斤，那麼赫魯雪夫在和毛澤東宣告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大進軍中，豈不會落伍三秋！蘇共秘電駐華使館，務必查清其真諦。蘇聯專家風風火火，直赴廣西。當年蘇聯專家在中國大地上，跑來跑去，名符其實地成了追星族！追趕中國大陸的躍進“衛星”，以證其實。緊靠廣西的北越領導人，為此食指大動：廣西毗鄰越南。若能取得真經，也畝產十萬八萬，那還怕什麼貧窮餓飯，革命豈能不成。北越政府匆匆派出農業考察團，專程赴環江取經。但實地一看，全傻了眼：環江人吹噓的“高產衛星”，除深翻土地多施肥外，沒有其他高招。越南人上報的結論是：畝產十三萬，不過是矇騙上級的神話。

高產“衛星”震動京華。12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謝覺哉的《觀花之詩》，其中之一《聽說環江豐收》為五言詩一首。詩人頌到：“環江試驗田，

畝產十三萬。還有九百六，平均一萬八。土肥水種密，禾上人可站。做了水稻王，又做鋼鐵漢。全縣定計劃，煉鐵三百萬。信不信由你，環江正在幹。”毛澤東更是感慨萬千：全國高產的形勢喜人，也逼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我們躍進半年多就解決了幾千年來沒有解決的人民吃飯問題。《人民日報》有幾篇好文章，要看看，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一天等於二十年，我看我們是創造了神話般的奇跡。不要迷信洋人和神仙。……毛澤東舒心開懷地指點著說：“糧食產量這麼高，要組織人研究糧食多了吃不完怎麼辦。”點頭頻頻的聽眾無不開心大笑……

洪華等人，還要求參加驗收的自治區領導、院長、教授、專家等在驗收喜報上簽名，可悲可歎的是大多數人都簽上本人大名。假戲真做，明眼人也不難識破。當時在場的區黨委組織部副部長陳東就斷然拒絕。縣委當然拿自治區委組織部副部長也沒辦法，但是背後也有人說他“右傾”。外地一些大學生和教授以寫信的方式，對環江水稻畝產十三萬多斤的神話表示懷疑和質問。環江縣城管大隊良傘屯、忻城縣林業局工作的幹部陸佩林，看了環江水稻畝產十三萬多斤的有關報導後，非常氣憤地說：“一畝田能收十三萬多斤穀子，不信！”1959年3月7日環江縣林業局幹部譚紹儒以“廣西環江縣全體農民”的名義，直接上書毛澤東，批評道：“這樣做法，我們以為13萬太少了，那塊田可畝產100萬斤的啊！”

洪華得知有人對“畝產十三萬多斤大衛星”持懷疑和反對態度時，怒火中燒，多次強調：一定要堅決打擊這股“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三面紅旗的右傾反動思想，剎住階級敵人向黨進攻的倡狂勢頭。”按照有關規定和慣例，譚紹儒的上書被轉回環江。在洪華的親自安排下，公安部門以高效工作方式，在全縣鋪天蓋地全面鋪開，圈定物件排查，找線索，查筆跡，終於很快就破獲此案。譚紹儒因此

受到嚴懲，大會批，小會鬥，漫罵捆綁，毒打酷刑，摧殘折磨，弄得他幾乎精神崩潰。並於 1959 年被開除回家，飽經風霜。陸佩林也因說了那句對“畝產十三萬多斤”的話，而被打成“中右”，清洗回家。三樂大隊塘南生產隊在廣西師範學院上學的學生崖玉鐘，因為說了幾句懷疑環江水稻畝產十三萬多斤的話，被批判鬥爭了一年多。縣委財貿部副部長張連元，就因為對畝產十三萬多斤的神話表示不滿，直斥其為“吹牛”而被送去“小勞改”（還打屁股）。據《環江毛南族自治縣縣誌》記載：在環江當年因為對畝產十三萬多斤的神話表示不滿，而單是集中關押於縣勞改隊進行“小勞改”的幹部，就高達 93 人！至於外地因此而受到批判鬥爭者，不知幾何。譬如：柳州農校老師學生中也有人深表懷疑；但發現一個，就處罰一個（勞改或送回鄉勞動）。廣西農學院翁德齊教授就因為環江水稻畝產十三萬多斤的神話表示懷疑和質疑，受到廣西農學院黨委的批判和處分。

10 月 3 日，《廣西日報》報導：《環江三千多畝中稻畝產超過萬斤》。報導說：“到 9 月 26 日，全縣已收割中稻 53523 畝，總產 161311835 斤，平均畝產 3013 斤多，其中畝產萬斤以上三千多畝，比去年畝產 261 斤增產十倍多高產的秘訣在於，普遍深耕 8 寸到 1 尺 2 寸，少數達到 1 尺 5 寸；每畝施肥兩千擔以上，全縣人民在縣委號召下，展開了增加有效分蘗，植過來，合計 164.4 來萬蔞。”報導說：“由於高度密植，禾苗不通風，他們就用三丈長的竹筒做了 50 根通風筒，還在空中安裝了 24 台風扇，用人工通風。因為當地是海拔三千公尺的高寒山區，陽光不足，社員們又拿出了幾十塊鏡屏，上午放到西方，下午放到東方，進行反射。”上級又只教了深翻和密植幾手“絕活”。山區的人們，就連編造神話也是那麼貧乏乾癟，竹筒、風扇、反光鏡，送上天的“衛星”，說不盡的拙劣的和癡笨！

3·鋼鐵衛星

洪華放“糧食衛星”出了全國第一，放“鋼鐵衛星”也曾兩度奪得全國第一。洪華也因此被自治區委領導人劉建勳稱為“毛主席的好幹部”。58年8月，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糧食問題基本解決了，全黨必須重點搞鋼鐵。7月下旬，“全黨動員，大辦鋼鐵”的口號，剛剛提到廣西自治區委主要議事日程上來，環江縣委就聞風而動，擺開了大辦的架勢。

8月8日，《廣西日報》報導，到7月30日止，環江縣已有40個鄉辦起煉鋼鐵工業，97個煉爐上馬。縣委還將全縣興建煉鐵爐的計畫，由原來的150個增至200個，生鐵產量由3萬噸，增加到4萬噸；還決定產鋼5千噸。大煉鋼鐵要大批勞力。縣委一聲令下，各公社主要勞力即丟妻棄子，拋下正待收穫的莊稼，自帶工具、糧食，按軍事化原則，編入鋼鐵野戰大軍。8月29日，《廣西日報》報導：環江全縣“鋼鐵大軍”編一個師，3個團，8個營，1個獨立營，40個連，120個排，下設戰鬥班。到8月28日止，已有3個團9000多人到達縣辦的平地、平治、龍水、都川鐵礦廠等鋼鐵工地，與各廠原有的“鋼鐵野戰軍”會合成11000多人的“鋼鐵大軍”，投入採礦、建爐、煉鐵的緊張戰鬥。環江縣“大煉鋼鐵”的高潮是在十月份，共有9萬多人投入鋼鐵戰場，而全縣總人口才16萬多人。

煉鋼鐵要建爐，要設備、要資金。縣委的辦法：一動員，二勸捐，三強迫。縣委指示，各社隊要充分動員群眾捐獻投資。於是，全縣普遍開展“大鳴大放辯論”動員投資。各社、隊召開社員大會，讓大家先自報家產，自認投資，再動員左鄰右舍互揭家底，檢舉揭發，層層加碼。結果形成你爭我吵，挾私報復，互揭陰私，必至對方傾家蕩產而後快的局面。幹部卻穩坐一邊操縱會場，最後拍板定案。倘若有人“不老實”，當場召開“辯論會”。被辯論者要站到臺上低頭認

罪，任由他人揭發批判。弄不好一繩子捆起來，吊打拷問不一而足。如果還不服氣，幹部帶上民兵抄家、搶物、拆房、揭瓦、撬磚。運用此法，平治鄉在7月份，兩天內強迫群眾獻瓦2萬塊，磚6千塊。8月23-26日，縣委號召全民為“大煉鋼鐵”捐獻投資；3天內搜刮木材14662根，瓦52240塊，磚17.6萬塊，工具6000多件。

環江大煉鋼鐵，拆房建爐，幾年後民眾的房屋還逐漸恢復建立起來了；但毀林燒炭，則禍害子孫。樹大林茂的環江大小山嶺幾千座，刀斧過後，全都成了荒山禿嶺。最為慘重的是對人的奴役和迫害。為了放“鋼鐵衛星”，“鋼鐵戰士”們經常日夜不停地連軸苦戰幾個通宵，稍有鬆懈，耳光煽，皮帶抽，便會應時上身。可憐的還要數“解放出來”的婦女。

7月底，環江縣開始籌建紅旗鋼鐵廠。該廠設在離縣城約50多公里的白合倉。8月1日，建起第一個土高爐，到9月中旬，建成土高爐23個。該廠4000多鋼鐵戰士中，有娘子軍227人，大部分是侗族青壯年婦女，還有60多歲的老太太。建爐期間，男的砌爐，女的運料。當時大雨滂沱，幹部們口口聲聲要突擊趕工，堅決不讓停工避雨。不少婦女正值經期，被迫頂風冒雨挑土擔石，晚上一直幹到轉鐘3點多，早上天剛亮又得爬起來接著幹。幹部們還經常別出心裁，來考驗婦女的“戰鬥意志”。常見的是“緊急備戰”搶運燃料。一逢爐前燃料緊張，幹部們就下達戰鬥命令，規定婦女運輸隊連夜出發，翻山過坳，到炭場院挑上滿滿一大擔炭，又火速趕回，到第二天上午11點前必須趕到爐群。否則，就以“落後分子”、“破壞大煉鋼鐵”論罪。有多名婦女因勞累過度而流產。到1959年初，這支婦女運炭隊，有一半人勞累成疾。後來因體虛多病，很多人在大饑荒中早早死去。哪位婦女想輕鬆一些少受累，來吧，幹部在床上等著哩，上了床，就

能安排炊事員、廣播員、通訊員……

採礦、碎石場這種重勞力活，也有很多婦女。採礦連 80 多人，一部分男勞力抽去砍柴燒礦，實際挖礦的勞力就剩了婦女。一個婦女每天規定任務，要挖 2 噸礦石，遇到突擊大會戰，竟然要挖 5 噸。晚上，還要輪流和男子一起燒礦。紅旗鋼鐵廠幹部對“婦女戰士們”提出：“草地作氈天作帳，荒山野嶺作食堂！”婦女們被迫吃在山頭，幹在山頭，住在山頭。

9 月 9 日中共柳州地委召開地、市委書記會議，確定 9 月份全地區產鐵萬噸、鋼萬噸。環江縣委決定將當年煉鐵任務，由 4 萬噸增至 8 萬噸，縣設鋼鐵辦公室，洪華親自掛帥。縣委提出口號：“要讓鐵水奔流滿環江！”賀亦然親臨環江督陣。環江縣委立即採取緊急措施，將全縣 4 個煉鐵基地擴大為 6 個，3 個縣委書記下到煉鐵現場掛帥督戰。

“鋼鐵戰線”轟轟烈烈，但“鋼鐵衛星”還不見大的起色。區委負責人真是焦急萬分。9 月 16 日，區黨委召開鋼鐵生產電話會議。韋國清就鋼鐵生產提出 12 條；劉建勳要求各級黨委，必須周密佈置計算，力爭全區鋼鐵生產在 9 月 20 日來一個大躍進，日產 2000 噸以上，月底達日產 5000 噸左右，確保當年鋼鐵生產任務完成和超額完成。

在全縣鋼鐵生產會議上，洪華對各級鋼鐵生產幹部們說：史達林同志教導我們說，共產黨人是鋼鐵鑄成的。現在，鋼鐵生產任務重，時間緊，有些同志有畏難情緒，有的人還有右傾思想，這不符合大躍進的要求。我現在提醒這些人，必須丟掉右傾保守思想，鼓足幹勁，拼性命也要拿下鋼鐵生產達指標。要不，危險得很呢，你就會被丟進太平洋去了。經過縣委認真決定，最後決定，9 月 29 日放“鋼鐵大衛星”，全縣日產生鐵達到一千噸。

10月1日,《廣西日報》向國慶日獻禮的套紅標題赫然醒目:《我區鋼鐵產量猛增,羅城環江成為日產生鐵千噸縣》,柳州地區的羅城和環江這兩個“衛星”搭檔,雙雙奪得廣西“鋼鐵衛星”桂冠。報導說:本區煉鐵先進旗幟——環江,9月29日產鐵1014.4噸,放出全區第二個大煉鋼鐵衛星。環江由此成為全國大煉鋼鐵中,73個日產千噸縣之一。

廣西鋼鐵生產大躍進在全國掛了號,但自治區負責人認為必須乘東風,鼓幹勁,進一步掀起鋼鐵生產新高潮,打好十月份“鋼鐵戰線的淮海大戰”。10月15日,自治區黨委召開地、市委第一書記會議,提出本月一定要超額完成生產,要求動員全民大放“鋼鐵衛星”,中央分配的任務只許超過,一斤也不許少!

10月15日,環江縣委炮製出全國最大的“鋼鐵衛星”:日產生鐵63321噸。16日《廣西日報》發表社論《歡呼環江煉鐵巨星型衛星上天》。17日《人民日報》報導了環江鋼鐵衛星,並發表社論:《祝廣西大捷》。報導說,10月初,環江縣委號召全縣人民奮戰紅十月,力爭10月20日以前放出鋼鐵大衛星。接著,全縣抽調9萬多人,會同宜山、河池兩縣的支援部隊,組成12萬多人的鋼鐵大軍,展開生鐵生產“淮海大戰”。各級黨委書記分別親臨礦山、爐邊、窯邊督戰,設英雄塔和光榮榜。燒炭隊每人日產木炭800斤;挖礦隊每人日產礦石5噸,最高達10噸;挖窯工每人日挖6個土方,運煤每人日運5噸。經過3天4夜,備足煤柴等燃料23718噸,礦石220260噸,建成大中小型鐵窯21837個。10月5日,環江生產生鐵63321.5噸,另有燒結鐵51800.8噸。北京大學和地質學院師生應命參加驗收。

劉建勳告訴各地、市委鋼鐵生產的主管書記,放鋼鐵衛星,要放連珠炮!10月17日,區黨委召開地、市委第一書記電話會議,提出本月超額完成當年鋼鐵

生產任務，力爭 11 月完成當年鋼產量 10 萬噸的任務。不僅放鋼鐵、煤炭和木材“大衛星”；還要放運輸鋼鐵、煤炭、木材“大衛星”。各地黨委要抓好 10 月下旬鋼鐵戰線上的淮海戰役的指揮工作。

在“人煉鋼鐵，鋼鐵煉人”的口號下，10 月，大辦鋼鐵運動進入新高潮。全區最多時投入鋼鐵生產勞力 720 萬人，占全區勞動力一半。10 月 18 日，鹿寨縣 8 萬多人（占全縣總勞力 95%）在柳江，融安、石龍、大苗山等縣 2.6 萬人參戰下，放出生鐵日產 20 萬噸的巨型衛星。19 日，區黨委、人委發賀電熱烈祝賀。20 日《廣西日報》發表社論《群眾運動威力無窮，再論廣西大捷》。10 月 21 日，環江又創造出另一項令人瞠目結舌的當時全國煉鋼最高日產量的“大衛星”：環江縣日產鋼 13416 噸！而環江有史以來就是一個缺鐵的山區。歷史上只有一個平治鍋廠煉過一點鐵水鑄鍋，就連群眾家中日常使用的鐵器也很匱乏。大放“鋼鐵衛星”的日子裡，社員家家戶戶的鐵鍋、鐵器都收去砸毀，扔進了煉鋼爐！

砍樹毀林砸鍋煉鐵，9 萬多人苦幹半年，環江煉出的鋼鐵，能用的不上幾噸，其他都是百無一用的“燒結鐵”。於是，環江人好多年後，一提起大煉鋼鐵，就傷心落淚！

4·反瞞產、反右傾

功勳赫赫的洪華，出盡了風頭，披紅戴彩，領到一面特大紅旗，歡迎隊伍，成千上萬，擠滿街頭，洪華被群眾高高抬起，一路抬入縣委。從此，洪華越吹越神，成了英雄。專制的權力要有專制的權威。在環江，洪華的話就是聖旨，任何人不得抗旨不遵，否則必定嚴懲不怠。在環江境內，洪華要到哪裡去，事先都要給下面打電話，佈置下級組織群眾夾道歡迎。洪華的隨行人員，總是帶著四大員：衛生員、電話員、警衛員、材料員，加上其他隨從工作人員，前呼後擁，好不威

風。有一天，洪華要到川山公社巡視。一個個電話，事先已傳遞到公社，公社連夜派人通知到大隊和生產隊。從公社幹部到大隊和生產隊幹部，人人出動，家家戶戶通知，惟恐漏掉一家一戶。有的人連夜跑上幾十裡山路，趕到深山僻嶺裡的村村寨寨，指令山民百姓，要準時到達洪華必經之地的路邊，夾道歡迎縣委第一書記洪華。山民百姓怎敢違抗？半夜，人們就打著火把，從四村八寨翻山越嶺往公路邊趕路，有的凌晨兩點多就趕到公路邊恭候聖駕。川山公社，四面八方幾千條火把如長龍擺尾，急匆匆地劃破黑夜，向公路靠攏。全公社 18000 人口，當天出動了 11000 人，歡迎的隊伍從川山排到河老，竟有 5 裡路之長！洪華到川山，登上山頂之時，俯視四鄉八野，一覽眾山小，傲笑天地低，竟然得意忘形，幾聲大笑，昂首招搖，在社隊幹部陪同下，踏進公社辦公樓。

當年太平天國軍紮環江，翼王石達開游白龍洞時曾石壁題詩。有人向洪華推薦，說題詩很值得一看。洪華指示縣委辦，“通知下面”。辦公室主任趕緊打電話到公社，公社又通知到大隊和生產隊，要求由公社、大隊和生產隊三級主要幹部帶隊，組織社員群眾沿途歡迎，“規模要大，群眾要多，情緒要高，口號要響亮。要安排好生活。”次日，洪華帶著四大員，由縣委辦公室、縣委宣傳部和縣文化局等部門的官員陪同，來到白龍洞。沿途歡迎的人們就象迎接國家元首那樣，還專門有人負責段段傳信，傳信的人趕到下一段，告訴一聲：“來了！”洪華還在幾裡路以外，幹部們就趕緊帶著社員群眾手舞足蹈，高呼口號。洪華一行人到達白龍洞後，按照“迎來送往”的慣例，歡迎的社員群眾原地待命，要直到洪華一行人離去才能解散。有的社員餓了一天也沒吃沒喝，等送走洪華，回到家時，已是第二天天黑了。

這裡還發生了一個插曲。石達開白龍洞石壁題詩，的確引起了洪華的興趣。

石達開詩曰：

挺身登峻嶺，舉目望遙空。

毀佛崇天帝，移民復古風。

臨軍稱將勇，玩洞羨詩雄。

劍氣沖星斗，文光照日虹。

共產黨人是高抬農民起義的，太平天國又有很重的份量。洪華興致勃勃，品詩論史，高談闊論：“人生要象石達開，那還是有些意思的！建功立業，封王封帥，名垂青史。”沒想到有人真不識趣，說了一句：“可惜翼王沒落個好下場。”洪華聞聲，怒火萬丈，破口大罵。後來終於趁著運動之機找個碴子，將此人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下放農村。洪華原本是想附庸風雅一番，以名留青史。但搜腸刮肚，終因思路不佳，才學不及，只好提起筆來寫了一句：“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自己也不滿意，無奈，只得作罷。沒想到下山的時候又摔了一跤。因此，洪華倒臺後，有人說他是倒在白龍洞的。

柳州地委在 1958 年初徵購方案中，分配給環江縣的徵購任務是 1260 萬斤。洪華為了放出交徵購“衛星”，早在 1958 年初，就精心做好了交糧工作佈置，夏糧剛收上來，7 月 30 日，全縣一天內上交 1447 萬斤公糧，一天交了全年的糧，還超額 14.8% 完成任務。

當時夏糧剛收，而水稻還未成熟，在縣委“先公後私”，強令數字下達指標的壓力下，許多社、隊竟將新收糧和庫存糧全數上交國庫。社員口糧顆粒不留。徵購任務放“衛星”上交後，新的超額交糧任務又下來了。洪華左一個電話，右一個電話，對各公社黨委書記連批帶訓，強硬規定交糧任務和日期，完不成任務的要受黨紀處分。倉庫裡的糧食拉走了，剛揚完場的糧食也拉走了；有的地方，

甚至剛收割上來的糧食，就全數指定為徵購糧，顆粒不剩。

豐產後的糧食到什麼地方去了？從中央到地方，得出的結論是：相當多的糧食被“瞞產私分”了！於是，1958年12月，自治區黨委在來賓縣召開了“反瞞產”、反右傾的“紅糧現場會”。自治區黨委書記賀希明在會上作了反瞞產私分的主題報告。會後，柳州地委書記處書記朱渭川趕到環江，親自出馬，指導環江的反瞞產私分工作。

洪華等胡吹瞎報58年糧食產量為3.3億斤，實際1.05億斤還大有水份。0.71億斤的征糧購糧任務，比上年增加近5倍，但農民怎麼完得成任務呢？於是，洪華不惜以瞞產私分的大帽子欺壓群眾，並製造2.4億斤“後手糧”的假現場；1959年2月27-3月3日，柳州地區3千多名公社大隊幹部出席鬥爭會。僅這次現場會，柳州地區就逼出各縣上報的完全是虛假的2億7296萬斤“後手糧”。現場會後，環江開展起大規模的“反瞞產”運動。洪華到城管公社陳雙大隊，抓反“後手糧”的典型，指導全縣的“反瞞產”運動。他把大隊和小隊幹部，黨、團員和積極分子，全部集中到大隊，搞核實產量。讓各隊當面報產。報高產的當場受表揚，產量報低的當場批鬥。又讓報高產的人，去鬥報低產的人。如果查出誰有“瞞產私分”或有嫌疑，立即撤職，送往縣辦和社辦的勞動教養集訓隊、勞改隊去“小勞改”，不給飯吃。就在洪華親自抓典型的這次核實會上，被鬥致傷又連餓帶病，致使13人死亡。洪華惡狠狠地說：“這些人是社會主義的逃兵，鬥死幾個不要緊！”上行下效，全縣反“反後手糧”的運動，毒打致死者達幾百人之多。各公社的口糧和農民家中頭年的極少量餘糧（幾斤或幾十斤）都掃出來交公。在這場“反瞞產”運動中，搞出“瞞產私分”的糧食2941萬斤。結果，集體的存糧挖空了，農民的口糧搞光了。儘管如此，環江縣的糧食徵購任務也只完

成了 2680 萬斤，而其徵購率已達實際年產量的 34%。1959 年 2 月，環江縣糧食全面告急，每人一天半斤原糧也保不住了。但洪華仍在下勁搞反瞞產，徵購還在催著交，糧食不斷外運，斷炊的生產隊越來越多。到四、五月間，明倫、水源等公社已大部斷糧，餓死人日益增多。區黨委被迫向環江返銷一百萬斤糧食，才勉強度過上半年的餓死關。

據《廣西省志·大事記》載：1959 年初，農村饑荒抬頭，4 月，全自治區農村 48% 的公共食堂斷糧，有的因無米下鍋而停炊。至 1959 年 6 月，在這場空前的大饑荒中，據不完全統計，廣西斷糧斷炊或缺糧少食的人群達到 460 萬以上，因饑荒引起的病情達 174 萬人以上，死亡達 16 萬人以上。情況非常嚴重。而自下而上都在層層隱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按照大躍進年代的慣例，從中央到地方，往往都把災情說成是因衛生問題引起病情，以免給“三面紅旗”抹黑。於是，廣西區黨委就按這樣的調子，向中央彙報。1959 年 6 月 29 日廣西自治區黨委批轉區衛生廳黨組《關於開展夏季愛國衛生運動的意見報告》，並將報告上報中央。報告說：“據不完全統計，1-5 月共發生痢疾 86000 多人，腹瀉 16 萬多人，傳染性肝類 300 餘人（據 3 市 17 縣報告）。痢疾 3 月 13080 人，4 月 26143 人，5 月 32037 人。腹瀉，3 月 10286 人，4 月 53948 人，5 月 95520 人。今年 4 月痢疾發病數與 58 年同期比較，增加 2.4 倍。我區近幾個月痢疾和腹瀉的發病數在全國列居第一、二位，更突出的是南寧發生小兒麻痺症 330 多人（柳州市、梧州市、武鳴、貴縣、左江、賓陽、南丹、賀縣等市縣亦有少數病例報告），在 6 月初發生食物中毒 1361 人。邕寧縣鳳亭河水庫 3 月 25-4 月 15 日，發生痢疾、腹瀉 1479 人，占民工總數 16.4%；大廠錫石礦 6 月中旬發生水腫病 9313 人，占全部職工 10.23%。”而此前的幾番材料，

基本調子是如此。從 1959 年春荒開始，廣西的斷糧、腫病、死人事件，就不斷地讓中央領導人擔驚。而全國病人、死亡統計材料，廣西每每名列前茅。當然，比較起 1959 年下半年的更大災難，1959 年的春荒又是小巫見大巫了！

1959 年廬山會議，彭德懷為民請命上書毛澤東，天威不測，毛澤東盛怒之下，扭轉了前期糾左整風的大趨勢。會上，劉建勳批“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發言積極，滔滔不絕。回到廣西，劉建勳立即召集省委常委會議，傳達廬山會議精神。並親自打電話到柳州，向賀亦然透露馬上就要傳達和部署“反右傾”、“更大躍進”運動。接到中共中央和區黨委通知後，柳州地區連忙召集會議，部署“反右傾”和“更大躍進”為主題的全面社會運動。廬山的風，一直吹到了柳州地區每個縣委書記的耳朵裡，環江又是運動的重點“紅旗縣”。

10 月下旬，柳州地區召開地、縣、社、隊四級幹部大會，全面部署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引蛇出洞，全面發動，耐心啟發；人人鳴放，暢所欲言；統一行動，打擊從嚴。

在環江縣委召集的幹部大會上，洪華拍桌打椅地高喊，今年上半年，有些壞人利用黨的整社之機，向三面紅旗發起倡狂進攻，惡毒攻擊我們的黨，惡毒攻擊社會主義，惡毒攻擊三面紅旗。罵我們大躍進搞糟了，罵我們人民公社刮了共產風了，罵我們大煉鋼鐵勞民傷財，跟秦始皇修長城一樣了，罵我們公共食堂斷了老百姓的生路了，罵我們共產黨的幹部斷子絕孫、比國民黨還壞了。總之，比蔣介石罵我們還凶。我們共產黨被國民黨罵了那麼多年，越戰越強，還怕你罵麼？可恥的是，我們共產黨幹部中，聽到這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不僅無動於衷，還有人隨聲附和。這次反右傾，要引蛇出洞，先讓人家罵，罵得越凶越好，等你罵完了，我再下手，打蛇要打在七寸上……

對廬山會議的形勢逆轉，廣大農民知之甚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號召大鳴大放，大多數社員以為又是上半年整風整社的風頭，什麼都說，一吐為快。且大躍進以來受苦受難，廣大群眾實在難以忍受，乾柴烈火，一點就著。很快，全區農村迅速掀起大鳴大放高潮。

1959年11月19日，中共廣西自治區委《批轉柳州地委“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情況的報告”》。據報告稱，四級幹部大會後，社教運動在“全區326個公社，2791個大隊，已全面鋪開。到14日止，全區已有80%左右的大隊形成鳴放高潮，進展較快的鹿寨、米賓、柳城、南丹、環江、柳江等縣，90%以上大隊進入鳴放高潮。據16個縣初步統計，到12日止（有4個縣只統計到10日），參加鳴放的共達145萬人，占農村成年人口的96.26%，已鳴放的116萬多條，占參加鳴放人數的80.28%，占農村成年人口的77.33%，到15日止鳴放面達到農村成年人口的90%左右。共鳴放出各種意見654萬多條，多的有一個人鳴放30多條意見的。柳城一個富裕中農，共發言20多次，一次最多發言兩個鐘頭，氣勢洶洶。南丹小陽公社一個富裕農民聲稱是代表群眾意見，說‘就是槍斃我也要講’，一連串講了22條，控制會場達一小時半之久。其中，正確或建設性意見占52.31%；認識模糊占23%；錯誤意見和反動言論占24.69%。問題性質來看：大部分是集中總路線、人民公社、糧食問題、市場供應、八字憲法，黨的領導、幹部作風等上面。

有些人倡狂向党、向社會主義進攻，表現如下：1）否定黨。說‘共產黨不如國民黨’、‘比日本鬼子還不如’、‘國民黨的狗還有骨頭吃，現在連人也沒有骨頭吃’、‘你們過去講剝削農民，我看共產黨比地主還厲害’；甚至於說‘共產黨比土匪還毒’。南丹縣一個富裕農民把縣委書記比做‘活閻王’，說國民黨

有五好（吃好、穿好、睡好、做工自由好、買賣東西好），共產黨有五光（豬光、雞光、犁光、稱錘光、樹木光），‘過去豬吃糠，現在人吃糠，人屎豬屎無法分得出來’。有的公開說‘共產黨長不了，最多還有五六年’。2) 否定總路線。把多快好省說成是‘多快好損’；說‘大躍進，豐收是幹部吹出來的’，‘五八年不如五七年，五九年不如五八年’。‘你講社會主義好，好我的鳥，現在一無肉，二無酒，三無煙抽’；說‘大躍進有三多，荒田多，病人多，缺點多’，把大煉鋼鐵說成是‘山窮樹盡，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說‘五九年大豐收是因為風調雨順，天養人肥綠綠，人養人皮包骨’。有的說‘大躍進以來沒吃過一餐飽飯，這樣下去，再過三年人都會絕種’。3) 否定人民公社。說‘公社不如高級社，高級社不如互助組’；說‘初級社好，高級社不錯，人民公社越搞越糟’，‘公社化後人瘦，豬瘦、人不如狗’，說公社化是‘人歸大隊，魚歸大塘，社員無米無糠’。有的說‘五七年糧食大把，豬鳴鴨成群，公社化吃不飽，穿不暖，又沒錢用’，把供給制說成是‘懶漢不好’。對集體養豬也誣蔑，說‘個人養豬比象大，集體養豬比鼠小’，說參加食堂後，‘屙屎狗都不吃，放田也不肥’。把公共食堂說得一無好處。4) 否定征糧。說：‘穀子黃一塊，收一塊，交一塊（入庫），加班加點辛苦幹，收了穀子一掃光，政府得豐收，農民受饑寒，種田的人反而沒飯吃。一年到頭鬧緊張，社員八月吃老糠。’

總起來說是公社化後不如公社化前，解放後不如解放前，一名話，‘今不如昔’。有些富裕農民不僅鳴放而且提出要求。來賓陶鄧公社一個富裕農民要求取消計畫，‘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河池莫四生產隊富裕農民莫芝蘭說：‘不要公社，我們保證吃好穿好。來賓和平公社富裕農民陶志明老婆說：‘把土地分給我們，不得吃也不找你們。’”

環江縣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大鳴大放，也搞得如火如荼，對“三面紅旗”，民怨沖天。環江“衛星王”所在的紅旗公社，鳴放集中在公社化、共產風、放衛星、大煉鋼鐵、高徵購、吃食堂、斷糧斷炊、浮腫死人。在“衛星王”發射地的紅旗公社本樂大隊鳴放中，364人對放“衛星王”提出意見380多條。有的說：“種田人就應該本本分分把秧種下去，把禾侍候好，田裡才能長出好收成。共產黨種田是拿著屁股當臉描，勞民傷財。盡讓幹部露臉，老百姓遭罪。”有的說：“畝產十三萬斤，神仙都想不出來的事，共產黨就這麼吹了，也還就這麼信了，丟人哩！天天參觀，有什麼好看的，你放衛星就來人看，老百姓餓肚子，人都要斷氣了，也沒聽說共產黨派幹部來看看，關心關心我們社員是死是活。”“幹部盡瞎吹，水稻畝產十三萬斤，這種丟人的話說出去也就信了，還登報廣播。現在我可明白了，上面讓你放衛星，高產哩，你還不得多交，生產的糧食共產黨都征光了，讓我們社員受苦餓肚子呢。幹部都沒了良心，你把口糧搶走了，把社員都餓死了，往後誰給你種糧呢？”還有的說：“趕上大躍進，共產黨把我們老百姓盡往死裡整，活在這年歲，命不好，還不如國民黨的時候。吃食堂吃食堂，只有食堂，沒得吃，哪天得吃幾餐飽飯，就死了也好，免得受這個罪。”

關於“共產風”。有的說：“共產黨太狡猾了，土改先分點地給你，讓你嘗點甜頭。跟著就搞合作化、公社化，把我們農民的土地、牲口、房屋都共了產，搞得你家破人亡，窮光蛋一個，只差老婆沒叫共了產。說是集體主義生活，也搞得你夫妻分離，妻離子散，老婆叫你摸不到邊，跟共了妻也差不多了！”有社員說：“共產風刮了起來，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還凶，幹部帶隊上門抄家，連馬桶也不給你剩一個，讓我們社員怎麼活？毛主席也要拉屎的，不知道他的馬桶共不共產？”

關於糧食問題。社員們鳴放最尖銳的就是公共食堂和斷糧餓飯，老百姓講的是自己的親身感受。有的說：“給地主幹活，做細活、重活，逢年過節，地主還要巴結做工的，買肉打酒，讓你吃飽喝足了好好幹活，田裡才長莊稼。共產黨拿人不當人，盡讓你幹活，不讓你吃飯，恨不得天下田裡都是畝產 13 萬斤，國家全拿走，城裡人和幹部吃得舒舒服服，好吃好喝，農民一粒糧不吃，全交回家才好。這麼幹，社員哪裡有命在？我看共產黨只管幹部和城裡人吃飽吃好，不管農民是死是活。”有的說：“剛解放，共產黨的幹部和和氣氣；合作社，共產黨的幹部神神氣氣；公社化，共產黨的幹部渾身殺氣。動不動就罰飯，打人。哪朝哪代，老百姓遭的罪也沒有現在多。自古以來，受災了朝廷就要放糧，饑荒了就要賑災，地主老財都施粥舍米行慈善。現在可好，盡說人民公社是天堂，還天堂呢！餓死這麼多人，幹部一出門，路上都是浮腫病人，不該看不見吧！食堂幾個月都不冒煙了，社員光吃野菜，幹部還抄家查糧，連人性也沒有了。”還有人說得讓幹部當場下不了臺：“共產黨的幹部就是土匪也不如，光曉得搜刮百姓，一點仁慈也沒有。土匪搶劫還給人留個路費錢，現在可好，餓死這麼多人，幹部就只管抄家抄糧，粒米不留！”……

環江縣委會議上，洪華窮凶極惡地說：“這些人，不往死里弄還了得呀！對共產黨仇恨在心，時刻盼望國民黨反攻大陸，惡毒謾罵我們黨和幹部，這是最危險的敵對勢力，不把這些反動勢力連根剷除，我們的政權就十分危險。對這些壞人講仁慈、施仁政，我們黨和國家就危在旦夕！對這種情況，我們要有充分的認識。你說糧食征多了，農民挨了餓，這是和壞人一個鼻孔出氣嘛。就是把這些壞人都餓死了，又有什麼不好？這是一個立場問題，是對敵人講仁慈，還是對黨和國家講黨性、講立場！”在洪華眼裡，不滿的人都是階級敵人，餓死的人都是壞

人，決不能心慈手軟。要搞出糧食！把饑餓的群眾當做心懷不滿的階級敵人來對待，洪華之流對農民群眾的情緒和態度可想而知。環江民眾危在旦夕。環江縣在“反右傾”運動中，有大批黨員、幹部、群眾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鬥爭、毒打和處理。據統計，全縣在職幹部中，有 135 人被劃為“右傾”分子，其中黨員 54 人。重點批判 87 人，警告 7 人，開除黨籍 2 人，撤銷職務 2 人，開除公職 6 人，打成嚴重“右傾” 16 人，其它處理 14 人。而在“反右傾”運動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鬥爭、毒打的農民群眾，則無案可考了。

9 月 13 日至 27 日，自治區黨委在南寧召開第一屆九次全體（擴大）會議和區、地（市）、縣三級幹部大會，學習八屆八中全會精神，全區開展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桂林地委書記王斌吾因說了幾句事關民生的實話，被打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到批判、撤職。

廬山會議反彭德懷後，反瞞產運動再起高潮。洪華再次赤膊上陣，爭當先鋒：59 年產糧任務是 58 年 3.3 億斤的 3 倍（9.6 億斤），秋後徵購任務是 1 億斤。可是，環江當年實產只有 0.82 億斤。於是，洪華開展了反右傾、反瞞產的大鬥爭、大迫害。

1959 年 12 月 21 日，在環江縣群英大會上，洪華全面安排反“後手糧”鬥爭。洪華說，今年大豐收，確確實實的高產豐收。糧食為什麼交不上來，因為從幹部到社員，都有資本主義思想和本位主義在作怪，不願把糧食交給國家。他們瞞產私分，貪污盜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激烈，階級敵人乘機破壞。洪華提出，今年的口糧分配，要把社員家庭副業收入都有算在分配內。“就是捉一隻老鼠，也得估價，算進社員收入裡去！”洪華提出了一套“反瞞產”政策：“帶頭歡迎，自報不咎，揭發有功，抗拒從嚴，挨戶落實，點頭承認，永不反悔，遠

征協作，集中煮飯。”所謂遠征協作，就是把這一公社的查糧隊伍，調到別的公社，各個公社互查，以防止講情面，留後手。這一招很是有效。會議規定，各公社要開展起聲勢浩大的反“後手糧”運動。運動的方法，是以大隊為單位，以報高產的小隊為標準，其他小隊對照掛鉤報產量。凡達不到的就是瞞產私分，就要進行批判鬥爭。

按洪華安排，會議上揪出了一大批縣、社、隊幹部，作為右傾“瞞產”的典型，進行大、小會批判鬥爭。洪華吩咐：“批鬥會要傷筋動骨，觸及靈魂。”會議主持人便找了一些積極分子，告訴他們決不要手下留情。批鬥會上，積極分子一湧而上，拳打腳踢，罰跪，揪頭髮，煽耳光。“不老實”的捆綁吊打。與會者為了證明自己鬥爭積極，紛紛揭發批判被鬥物件，大打出手。會議打人成風，打人者下手越重越英雄。

會議出現了打人發狂的局面。被打的人，有的只好胡說八道，承認自己帶頭藏了“後手糧”、“瞞產糧”，答應交出多少萬斤糧食。這批人便被釋放。交不出“瞞產糧”的幹部，一律繼續批鬥毆打。鬥完後關起來，不給飯吃，直至交糧。

環江縣陷入了“反瞞產”的恐怖之中。縣委決定，查“後手糧”運動，要象打仗一樣。於是，縣、社大量調動武裝民兵，荷槍實彈，挨家挨戶搜查糧食。查出糧食，不僅當場沒收，而且還要毆打、懲罰戶主全家人。是人，哪能不吃糧。但當時環江大多數社員家裡，早就糧盡食絕。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餐餐只有野菜和糠皮。有的人家，千方百計弄了一點可憐的糧食。搜出來，就是一場大禍。吉祥公社北宗大隊幹部，在抄家搜糧時，發現一戶人家的鍋裡有稀飯，便斷言這家社員私藏了“後手糧”。主婦出來爭辯幾句，當即被幹部命令民兵捆起來吊打，非讓她交糧不可。聽說沒有糧，這夥人從糞缸中舀來人屎，又找來狗屎，撬開她

的嘴巴，硬灌了進去。酷刑難當，受害者只好胡說八道。她承認自己在山后的岩洞裡藏了“後手糧”。民兵去搜，一無所獲。帶隊的幹部大怒，吩咐吊起來再打，又親自舀來一大罐糞屎，撬開嘴巴使勁灌。那位婦女只好又招認有糧，藏在山裡。搜不出來，回頭又打，又灌屎。如是幾番，這位婦女被活活打死。大隊幹部罵了一通，帶人揚長而去。

為了掏出糧食上交國家，縣委按自治區統一佈置，把集體小倉庫的糧食，作為上交徵購任務，併入國家倉庫。集體、國家的糧食倉庫已統統封閉了，公社、大隊幹部無權開倉。洪華嚴令，“死人也不動搖，一定要拿到糧食交國家！”武裝收糧隊荷槍實彈，沖進一家抄一家。沒糧，先把人捆起來。吊在屋樑上嚴刑拷打。打人的手法五花八門：反手背吊——雙手反過背去五花大綁，吊上屋樑；倒掛金鐘——用繩子捆緊兩腳大姆指，掛上房；吊死豬——稱鉤穿進肩胛骨，吊在樹上；用馬刀在人身上一塊塊割肉，問一句割一刀；傷口中搓鹽；耳朵中塞炮仗，不交糧，點燃引線……總之，為了要糧，人類所能想到的酷刑，環江都用上了。家家戶戶被翻箱倒櫃，自留地的產品全被沒收。就這樣，全縣的徵購任務只完成4445萬斤原糧，占全縣糧食總產量8280萬斤的53.7%。全縣16萬社員的口糧，30萬畝耕地的種子，和幾萬頭豬、牛等牲畜的精飼料，只剩下3755萬斤糧食。倘若按正常年景，一畝地留種籽20斤，一頭豬、牛留飼料糧50斤，則共需糧食1335萬斤。全縣只留口糧2420萬斤，人平均口糧不到150斤。若3755萬斤全作口糧，人均一年也只有口糧234斤多！而且是原糧。

小倉並大倉以後，廣西從上到下，層層宣佈封倉。環江縣委明令宣告，開倉的一律開除黨籍，偷糧的開槍擊斃。就這樣，還是有人偷。人餓急了就什麼也顧不上了。全縣因斷糧，扒倉庫、偷糧食而被打死的有幾十人。龍岩公社一個糧管

幹部發現一名僅 12 歲的學生偷糧食，立即抓住按在偷糧的地方，開槍射擊；小學生在槍口下苦苦哀求，哭喊聲撕心裂肺，催人淚下。因槍老打不響，換了 3 次子彈，扣了 8 次板機才把槍打響。小孩被一槍打中，倒在地上，鮮血四濺。3 天后不治死去。成為高徵購和反瞞產的牲祭。吉祥公社北宗大隊大隊長，捉到一個偷糧的小孩，毒打一頓後，竟慘無人道把他關進密不透風的倉庫裡。待父母和其它群眾聞訊趕來時，這個餓得皮包骨，打得血肉橫飛的小孩，早已被活活悶死了。

大饑荒年代，廣西因民眾偷青偷糧發生的慘案，不絕于時。1961 年 9 月 18 日，新華社《內部參考》在《部分農村基層幹部違法亂紀現象仍然嚴重》寫道：“廣西從夏收夏種以來，據不完全統計，從 6 月以來，有 37 個縣和兩個市發生打死、逼死人命事件 79 起，死 54 人，傷 53 人。多系大、小隊幹部和其他基層幹部主持搞的。被害的多系有拿摸行為的群眾。在 47 名被打死、打傷和逼死的人中，基本群眾 34 人，占 72.32%；五類分子 9 人，地富家庭成員 4 人。對負有監報地方官員特殊使命而能發“內參”的新華社記者，廣西區委無可奈何。

面對嚴峻的饑荒人群，一些有良知的幹部挺身而出，為民請命，實事求實地向上級有關領導部門反映情況。有的抗命不遵，堅決抵制，然而都遭到了洪華等人的殘酷迫害。城關公社塘蘭大隊幾位幹部，在大會上批評洪華放“衛星”是吹牛皮。結果被批鬥毆打。

當年環江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帶頭人、縣勞動模範、城管公社（原紅旗公社）大隊黨委支部書記崖日堅，在一次縣委召開的幹部會議上，尖銳批評洪華弄虛作假，坑害農民。回到大隊後，他不顧“反瞞產”運動的大局勢，毅然打開大隊倉庫，分發糧食給早已斷炊、瀕臨餓死的群眾。當時該大隊社員已斷糧三個月，人

們把山上的野菜、地上的青蛙和蛇，甚至是老鼠和天上的飛鳥，能捉到的、能找到的所有東西，全都吃光了。躺倒快要咽氣的社員群眾，幾乎家家都有。崖日堅召集幹部開會，氣憤地說：“留著糧食不分，眼看著人餓死，這哪裡還是共產黨的政策！”他斬釘截鐵地宣佈，開倉分糧，先救人命，出了事，天塌下來，由他一人承擔。分糧那天，全村社員一聲歡呼，父老鄉親對崖日堅萬分感激。

洪華對崖日堅竟敢無視他的權威，十分惱火憤怒。在全縣三級幹部大會上，洪華氣勢洶洶地吼叫：“哪個是崖日堅，給我站起來！”當崖日堅站起來後，洪華當場宣佈，開除崖日堅的黨籍和一切職務，並惡狠狠地說：“有你崖日堅，就沒有我洪華；有我洪華，就沒有你崖日堅！”崖日堅被罰站到散會，之後又被大會鬥，小會鬥，縣裡鬥，村裡鬥，鬥了還不准給他飯吃，誰敢違命，照鬥不誤。就這樣，在一次批鬥會後，崖日堅被活活餓死在押送回家的路上。從縣城到三樂不過三裡地，他涉過河水，剛上岸就倒在了河畔。當他倒下去的時候，手裡還拿著一隻剛從街上買到的芭蕉，還來不及給家中餓著肚子的妻兒。

給崖日堅送葬的時候，村裡大部分人都出來了。儘管當時還要冒著很大政治風險，人們還是把他送入墳地。一位老人泣不成聲地哭道：“日堅，你是大好人。你救活了我們，自己卻餓死了！”崖日堅舍己救人的事蹟，至今仍在環江人民的口碑中傳頌。

洪華卻感到不解恨，他兇神惡煞地向幹部們訓話說：“要眼睛向下，搞狠一些，糧食才搞得出來……不要聽見一些假相，聽說死了人，心就軟了，就害怕了，就此罷手不要糧了！”

自從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後，社員一律實行“三化”，廢除家庭、消滅私有，只能在公共食堂吃大鍋飯，私人不准有糧食。口糧全部由生產隊和大隊集體掌握，

定期從集體小倉庫中稱給食堂。集體小倉併入國庫，生產隊的糧食交了國家徵購，自留地的一點糧食也搜去交了國庫。洪華提出：餓死人也不得開倉放糧。真是喪心病狂！不但家家斷炊滅煙，連公共食堂也揭不開鍋。公共食堂停夥，停夥最長的馴樂公社，達 130 天；大安公社，停夥 115 天；就連環江縣城所在的城關公社，也停夥 108 天。停夥時間最短的公社，也有一個月以上。

為讓“私藏”糧食的農民有糧也吃不成，環江縣馴樂區委甚至下令“滅火封鍋”，逐門逐戶將爐灶貼上封條，連取暖的火也一律滅掉。在寒冬臘月裡，區委派民兵夜間巡邏，見到火光就搜捕。許多農民挖得野菜、剝得樹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餓死。

有一次在搜糧時，發現一戶家庭鍋邊有一粒飯，就肯定該家主婦偷糧，便將該婦女腳姆指捆起倒吊掛了起來，剝光衣服，用燒紅了的鐵釵，烙燙其肚皮及陰部，直到將她摧殘至死！1980 年代在柳州市七中任校長的覃杭生，親眼目睹了這一慘劇。類似這樣情況被折磨至死的至少有四、五十人。這種殺人遊戲，只有德國法西斯才可以與之比醜、比惡。

5· 衛星上天 百姓倒地

衛星上天，百姓倒地！稍稍有些人性的人們，都在為倒斃街頭、村口和田野裡的死屍而驚駭。同類相憐、人性相通，有良知的人開始起來抗爭。有人先是向縣委反映災荒真情，縣委的反應是嚴懲“右傾”。於是有的人就越級上告，有的人向報社投訴。但是，上告材料紛紛轉到洪華手裡，上告者被定為反黨分子，受到嚴厲懲辦。

永安公社黨委書記覃恢汗，在外當公社書記倒也精神十足，勁頭高揚。但當他於 1959 年 7 月回到家鄉水源公社和平大隊龍門屯時，耳聞目睹，慘相刺心，

令他良心有知：他自己的父親，被捉到水源公社綜合農場，在強迫勞改中死去；他親眼看見有一家三口人死絕，無人埋葬，死屍倒在家裡；有位婦女死在離水源村不遠的路上…… 刀子割肉，砍到自己身上，是痛的。殺父之仇激怒了他。一回到永安公社後，他就向那裡工作的縣長和一位縣委委員，彙報了永安公社的問題，接著又直接向縣委彙報。反右傾時，水源公社黨委書記韓祖文趁機報復。他捏造事實，告發覃恢汗回家時，開地主分子會瞭解情況，攻擊水源紅旗公社。結果，覃恢汗被縣委停職反省處分 8 個月，捉拿去小勞改。

1960 年 1 月間，城關公社副主任莫日忠到塘蘭大隊，見到病人很多，已死了幾個人，回來向醫院院長反映。院長向洪華作了彙報。洪華竟然說：“莫日忠反映社員沒吃，病人死的多，真實豈有此理！這個人一貫右傾，你們要好好解決他的問題。” 莫日忠被撤職反掉了。

縣法院院長覃盛華於 1959 年 6 月 26 日向縣委彙報，明倫公社有病人 1600 人，1415 人出不了工，重病 1004 人，浮腫 486 人。5 月 6 日死 146 人，浮腫 59 人，丟荒 600 畝。在反右傾鬥爭中，覃盛華因此被撤職，發落到川山公社，當商店門市部主任。縣人委監察室副主任羅志傑，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縣委反映明倫公社死人多，餓死路旁沒人埋的真實情況。洪華惱了，說他“對黨不滿，是反對黨的領導”。1959 年 10 月 16 日被停止反省，管制勞改，規定他每天要撿牛糞三擔。在機關被鬥了 11 天，反右傾又被當作“反面教員”批鬥。

為掩蓋環江死人的真相，洪華還對郵電局長下令：“凡是寫給上級黨委的信，全部進行扣留，送交縣委審查。” 有一封洛陽公社砂石大隊寫給報社的信，反映群眾現在全部吃木薯，有很多人中毒死亡。這封信轉到洪華手中扣壓，被翻拍成照片，追查寫信人。後來查出是縣人委幹部譚少儒寫的。洪華馬上下令將人捉來，

組織機關幹部進行批鬥，並押到洛陽公社去鬥爭。洪華在縣委常委會上提出要逮捕法辦，由於意見不一致，多數人認為達不到逮捕程度，最後定為開除公職，送農村監督勞動。洪華還說處理太松了，便宜了他譚少儒。

羅城縣交通局幹部覃瑛，回到環江縣吉祥公社老家，見到大批群眾斷糧餓死，而有的幹部還在那裡一邊大吃大喝，猜碼作樂；一邊吊打群眾逼糧。覃瑛義憤填膺，投書告發。沒想到信轉回環江縣委，被查出來。環江縣委立即派出公安局到羅城追捕抓人。幸好柳州地委有個部長在羅城工作，出面阻攔，說沒經過上級批准，不能跨縣抓人。覃瑛才倖免於身陷囹圄。

饑餓難忍，一些不甘心等在家中餓死的人紛紛外逃討飯。縣委認為這是給環江縣委臉上抹黑。因此，環江縣委派出大批公安人員、幹部和民兵，在全縣各主要路口設置檢查站，並通知各單位和各公社，堅決把出外的社員堵住，勸說不聽者，一律關押。同時，還手執縣委開具的證明，大批公安人員、幹部和民兵，荷槍實彈，前往各地追捕。把逃難討飯的饑民，當作外逃犯，繩捆銬拖，一串串押回環江。從貴州等地追捕回來 150 多人，有的遣送原籍，有的關押入獄。被關押的饑民，根本不給飯吃，又要搞重力活，幾十個人擠在一個小房間內，幾天幾夜，睡不得，連坐也擠不下去，活活悶死了 44 個人。洪華還下達指示：外逃人員如經動員仍不肯回來，或歸途中又逃跑的，就打死算了。水源公社的書記韓祖文就是這樣宣佈和執行洪華的指示的，追回來的幾乎不是被打死，就是被關死，沒幾個活下來。

環江水源區委追捕到相鄰的河池縣，將 200 多名男女老幼用繩索捆成一長串，押送回鄉。當忍無可忍的饑民到糧管所搶糧時，區委書記下令開槍鎮壓，稱被殺的饑民是“反革命分子”。

1960年2月6日，正是春荒大饑饉，腫病死人洶湧之時，洪華在縣委擴大會議上，目含凶光，殺氣騰騰地說：“有些人在去年春天見有些病號，背地裡嘀嘀咕咕，在他們看來，好象有人病的責任，也應由黨負責？聽說，現在又有人吹風吹雨，這是個本質問題。這些人不是站在黨的立場看問題，而是站在另一方面看黨的笑話，這不是右傾機會分子是什麼？”他進而強調，“一定要以鮮明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觀點來觀察、分析與解決問題，辯明是非，識別真偽，這樣才不為假像所迷惑。”洪華告訴他的部屬：“死幾個人值得什麼大驚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這是自然規律。”他還滅絕人性的說：“餓死幾個人有什麼了不起，中國有六億人口。餓死的人是體質問題，物競天擇，強者生存嘛。”站在“黨性立場”，洪華把人民的生命視如蚍蜉蟲蟻一般。餓死些老百姓，不就象死了一群蟻螻一般，值得大驚小怪嗎？只要放了“衛星”，保了“三面紅旗”，死多少人也沒關係。這就是洪華一類的社會發展觀，這就是他們的自然發展規律。洪華的“自然規律”，悖天理，反人性。

衛生部門曾向洪華彙報，浮腫病是缺糧和勞累過度引起的，並寫了專門報告。洪華看過，很不高興地說：“這個原因要找一下，不一定是糧食吃得少引起的。理髮店的人有糧食，也有一人浮腫。這是思想問題，不是實際問題。現在有這種思想的人不少，包括領導幹部在內也有這種思想。”他要縣衛生院開浮腫病現場會以證明浮腫不是缺糧引起的。結果這種會議，在浮腫如潮的環江縣無法開成洪華預期的效果。洪華不甘心，專派縣衛生院院長去明倫調查病情，以證明此病與糧食無關。院長去了，調查結論相反，經統計，明倫公社3個月死了112人。他回來向洪華據實彙報。洪華聽後大發脾氣：“算了算了，誰叫你們去給我到處找死人？！哪年沒有死人？死這幾個人，叫你們調查的越來越多。羅志傑第一次調

查 102 人，你又調查了 112 人，再搞兩次人都死完了。你不是很聰明嗎？怎麼也和羅志傑一樣右傾？”

對死人問題，洪華怎麼看待？後來在整風運動中，人們揭發批判洪華時憤怒地聲討說，下面只要一說死人問題，洪華就怒火連天，大發雷霆之怒，狠批一通。誰說他就查誰的問題，就整誰。搞得下面的幹部誰也不敢說死人的事。與會代表認為洪華對死人問題上，“滅絕人性，喪盡天良；喪心病狂，不顧人民死活的大搞高徵購，直接造成環江今天的嚴重後果。”

1960 年春節，洪華同縣委的其他領導人上街，看見圩亭裡的木板上，躺著一具死屍。他惡狠狠地對身邊的人說：“這個人這是找驚扭。是不是有政治問題，想擴大影響。要查查他的出身成份看！”又有一次，洪華從水源公社回縣城，途徑那康大隊，見一個群眾死在路邊，他惡眉一皺，說了聲“叫人埋算了”，揚長而去。有一天洪華見一個轉業軍人死在水源街上，便大罵“擋路，死也不找個地方”，並下令“以後有病的人，不准出家門來”。居然禁止死在路上。當死人越來越多，病人自身難保，到處死人，無人埋屍的時候，有人向洪華彙報，說死人沒有人埋葬。洪華聽了，氣衝衝地說：“現在死人不埋，是一股妖風，是富裕農民不滿的一種表現！”

人們申訴被迫害，求援又無望，上告也無門，外逃則無路。吃野菜、啃樹皮、咽粗糠，難以活命，肝炎、浮腫、乾瘦、子宮脫垂等病人不斷增加，餓死人現象普遍發生。據一份統計材料說，僅 1959 年至 1960 年，環江全縣死亡 24000 人。人們試圖按多年的平均死亡率計算，從中扣除一部分作正常死亡。但是，據知情者反映，當時屬於正常死亡的情況，只有一種，那就是對糧食有權支配的幹部及其親屬；其他的人，即使到了自然死亡年齡，但導致的直接死因，也是因饑餓引

發而死。而省委工作隊和縣委上報中共中央的材料，先是報告死於饑荒的人大約在 1.9 萬多，後來又上報說死難者為 3 萬多人。這不包括因幹部打死逼死的人數在內。據環江前縣委書記王定說，他有一份當年廣西自治區公安廳的調查材料：環江縣在“苦日子”中因饑餓病死的人數，總計五萬多人。

據環江縣委的整風運動彙報材料：環江縣 17 個人公社中，兩年餓死千人以上的有 9 個公社，餓死 400—1000 人的有 5 個公社。而上報中央的一份報告說，死人最多的馴樂公社，餓死了 2526 人，城管公社死了 2000 多人。城管公社的陳雙大隊，是洪華反“反後手糧”的重點，原有 800 人，死 234 人，占 26%以上。付點中山大隊原有 1212 人，死 562 人，死亡率為 46.57%。馴樂公社康林大村的死亡率也達 45.6%。馴寧大隊原有人口 640 人，死去 278 人，因而不能再單獨立為一個大隊，只好與太平大隊合併。據對水源公社所死的 1706 人的情況調查，其中餓死的有 1500 多人，鬥爭吊打至重傷而死的 82 人，當場鬥死 15 人，開槍打死 5 人，全家死絕的有 9 戶共 47 人，無依無靠的孤兒 94 人。水源公社的龍樹屯和馴樂公社的岩口屯兩個自然村的村民，人口全部死光。最後竟然出現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開擺賣人肉。

在這些地方，死人開始由生產隊負責埋葬。後來死的人太多了，體病身弱的活人，抬不了那麼多的死人去埋，只好各戶自理，哪戶死人哪戶自己埋。那些家人大部分死了的戶，死了大人剩小孩的戶，屍首無人掩埋，有的停屍家裡，有的死在門口，有的橫屍村頭。剛死人的時候還有棺材裝，人死多了，沒棺材，只好用竹席、杉樹皮包著埋。後來死人什麼也沒有裹，光著屍體，挖個坑往裡頭一扔，甚至就往野地一扔，連埋也不埋了。失去主人的野狗，吃人肉都吃瘋了，叼著人肢、人頭滿山亂跑。活人又想方設法打狗吃肉，人打狗肉的主意。環江大地，真

是屍橫遍野，慘不忍睹。

而洪華所在的縣委小灶烹炸煎炒，幹部們吃香喝辣，酒足飯飽。洪華每到一地，各社幹部小灶專門加菜加酒。各公社、大隊幹部也貪污、挪用、大吃大喝，“小灶魚肉雞蛋不斷天，酒席長流，吃飽喝足，根本不顧社員的死活。”

洪華因大放“衛星”有功，被當作自治區委重點培養的典型幹部。又因在1959年下半年廬山會議後的“反右傾”和“更大躍進”運動中表現積極，1960年3月5日，洪華被提拔為柳州地委書記處書記，兼任環江縣委書記，果然“立功受獎”！

1960年，廣西區黨委、柳州地委檢查團的一個組，由區共青團委幹部李月清帶隊，來到環江。洪華如臨大敵，派出兩個縣委副書記跟隨，暗中監視檢查組的行動。年輕人衝勁足，初生牛犢不怕虎。李月清等人到明倫調查，發現死人嚴重，於是掛長途電話，準備向區黨委彙報。電話掛不通，又改拍電報。電報稿在郵電局又被秘密扣壓，轉交給了洪華。洪華見後大怒，責罵李月清等人“不懷好意”，“專找岔子”。還說“這些年輕人無知，生活在城裡很少下鄉，下來後專找死人材料，看來思想不是躍進的人”，“反右非打成右派不可”。他找來李月清等人，責問檢查組為什麼不向縣委彙報，而直接報區黨委？洪華不斷對檢查組施加壓力，直到檢查組把死人數由801人，改為250人，把死亡原因說運動是豬丹毒傳染病、牛瘟和鉤蟲、條蟲病引起的，洪華才允許檢查組向區黨委彙報。在明倫，兩位縣委副書記背著檢查組，召開了4次秘密會議，在會上對向檢查組反映情況的幹部威脅說：“你反映（死人）的情況，如果真實，墳頭在哪裡？你敢簽名蓋章嗎？”檢查組工作處處受阻，困難重重。

1960年7月17日，因發現洪華在環江縣工作期間發生明倫、水源等公社有

餓死人事件，洪華被撤銷柳州地委書記處書記職務，降級任地委財貿辦公室主任。1960年8月21日，廣西自治區委呈上《關於三級幹部會議向中央、中南局的報告》說，幾年來糧食徵購任務增加很大，使農民口糧大為下降，不少地方徵購了農民保命線以下的口糧，造成全區浮腫、乾瘦等病的人數達100萬，非正常死亡達30萬。其中曾放出糧食畝產13萬斤高產衛星的環江縣餓死1.9萬人。1960冬至1961年春“整風整社”運動中，因環江縣大放假衛星，大刮“五風”等原因，廣大幹部群眾起來揭發檢舉，要求將洪華揪回環江批鬥。廣西公安廳又派出專門人員，協助對環江死亡人員進行逐一核定，確定環江的死難者人數為五萬多人，占全縣16萬人口的33%以上。1961年3月2日，洪華被開除出黨，並逮捕法辦。區高級法院直到63年10月31日，才以違法亂紀罪對洪判刑5年。對環江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的洪華，重罪輕判，法律何在，天理何存？！1966年3月服刑期滿，他被安排在來賓華僑農場當一般幹部。1972年4月12日，這個曾經風雲一時的歷史人物，終於病死來賓。

1970年代末期開始，洪華的家屬到處上訪，要求為他平反昭雪。1981年8月17日，中共廣西自治區黨委批准區紀檢委、高級法院黨組關於對洪華案撤銷原判，黨內給予撤銷職務、恢復黨籍，按一般縣級幹部待遇的複查處理意見。為洪華翻案的消息傳到環江，那些從大躍進年代活過來的環江民眾叫罵連天。一位大躍進的受難者，在接受採訪時曾悲憤地說：“當年禍害百姓的那些幹部，除了文化大革命曾受過幾天衝擊外，哪一個受到過清算！象洪華這樣害死幾萬人的官員，平反的平反，翻案的翻案，補發工資的補發工資。但那幾萬死難的環江父老鄉親，還有我死去的一家三位親人，誰又為他們伸過冤！歷史還有沒有公道？”

1958年的13萬斤曠古未有舉世罕見的畝產稻穀數字，完全是洪華等精心策

劃，強加給人民和全世界的大誑騙、大謊言，導致環江餓死 5 萬農民的大慘案。柳州地區餓死 16 萬！這幫共黨分子，在自然條件極好的時期，把人民群眾視同草芥，不及螻蟻，殘害致死。

當年韋國清親自坐鎮的桂林地區臨桂縣五通鎮指揮，一場令人髮指的搜糧運動遂遍佈廣西。7、8 千人口的五通鎮就餓死了 1/3，死絕了 100 多戶人家。龍勝縣 1959 糧食徵購數竟然高達 1957 年的三倍半！留給農民的口糧甚至一天不到四兩糧，結果把人活活餓死。比起其他地區，桂林並不算重災區。桂林地區 1959 年人口死亡達 11 萬多人。合浦縣：1960 年春、夏間全縣的浮腫病人有 8600 人死亡；昭平縣：1960 年因饑餓患病人數達 10 多萬人，年末死亡 8146 人；蒼梧縣：1960 年因缺糧造成 6 萬多人得浮腫病，死亡 26057 人；德保縣：農民因缺糧，從 1959 年至 1961 年間有 6328 人餓死；臨桂縣：1960 年春、夏間，農村中因缺糧發生浮腫病，當年出現死亡人數 1.58 萬人。廣西一共餓死了多少人？韋國清自己承認是 30 多萬，但廣西公安廳廳長鐘楓說，起碼 50 萬。根據楊繼繩計算是 73.96 萬人。但這韋國清不但無罪，反而聖眷更隆，一直到文革，都獲重用。

第 111 節 糧食衛星與糧食政策

1·浮誇風

1955 年毛在《高潮》按語中曾提出：將來會出現從來沒有被人們設想過的種種事業，幾倍、十幾倍以至幾十倍於現在農作物的高產量。1957 年 10 月 9 日毛說：現在一人三畝地太多，將來只用幾分地種糧就夠吃。在大躍進之前，對糧產的增加抱相當樂觀的態度。

從 58 年 1 月開始，中央到地方不斷制訂和修改農業生產計畫，競相提出高指標。毛要求糧食產量當年翻番(即從 1957 年的 3700 億斤提高到 1958 年的 8000

億斤)。4月1~6日，毛把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找來，舉行漢口會議，聽取了吳芝圃的精彩彙報：“河南省決心在一年之內實現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原訂要十五年才能完成的全部指標！其中糧食總產翻兩番，工業總產值翻三番，河南全省實現工業化，農業機械化！”各省市的諸侯們聽得瞠目結舌。聽完河南省委的彙報，毛澤東帶頭鼓掌，接著說：河南省辦得到的事，湖北省辦不辦得到？河北、山東、兩廣、四川，還有我的老家湖南等等，你們怎麼辦？河南已經一馬當先了，你們要不要來個萬馬奔騰，趕超河南？到年中，華東地區提出一、二年內實現人均糧產 1000~1500 斤，一向低產的西北地方提出當年達到 1000 斤。

6月8日，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 5 畝小麥平均畝產 2105 斤，放出了第一顆“衛星”。6月16日，新華社報導湖北省穀城縣星光社小麥畝產 4353 斤。6月23日《人民日報》報導湖北省穀城縣先鋒農業社小麥試驗田畝產 4689 斤。從此，展開了一場衛星競賽活動。

1958年6月14日，毛澤東在河南封丘說：“不要很久，全國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糧食 1000 斤，豬肉 100 斤，油 20 斤，棉花 20 斤”。

1958年6月16日《中國青年報》發表錢學森的《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的論文。“6月12日中國青年報第一版上發表了一個動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繼小麥畝產 2105 斤以後，又有 2 畝 9 分地平均每畝打下了 3530 斤小麥。土地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因為，農業生產的最終極限決定於每年單位面積上的太陽光能，如果把這個光能換算農產品，要比現在的豐產量高出很多。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 30%作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裡的二氧

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 1/5 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 2000 多斤或 3000 多斤，而是 2000 斤的 20 多倍（即 4 萬多斤）！這並不是空談。舉一個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別豐產試驗田要在一畝地裡收 160 萬斤蔬菜。雖說蔬菜不是糧食，但到底是畝產 160 萬斤！所以，只要我們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條件，加上人們的不斷創造，產、量的不斷提高是沒有問題的”。

李銳回憶說：毛相信錢學森說法（其實，毛早就有了萬斤的說法，錢迎合了毛），太陽能利用得好就能畝產萬斤糧。所以各地造假幹部、拍馬書記，在田裡支起了探照燈。毛澤東還親自跑到河南 16 萬斤田看了一次。中國有很多農業專家，毛澤東為什麼不去問他們，卻問沒有種過地的火箭專家錢學森？應該說所有農學家和所有莊稼人，都被反右整怕了。只要毛澤東一問一畝能不能打十六萬斤，經過反右和三面紅旗宣傳的人，一定知道他要聽的是“能”。誰要說不能，你就是右派右傾反革命。各級幹部在毛的壓力下虛報浮誇產量。

1958 年 7 月 15 日陶鑄在廣州寫了駁《糧食增產有限論》，發表在《紅旗》上。文章說：今年……廣東早造糧食增產 45 億斤，加上春收糧食增產 20 億斤，一共就有 65 億斤，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全部增產的數目還多 10 億斤。僅春夏收作物增長的比例，就大大超過了“糧食增產有限論”者認為不能超越的 20% 的界線，而達到 60%。就在今夏以前，人們總以為廣東早稻生產很不穩定，要畝產量超過 400 斤是不容易辦到的；……今年不是一下就超過 400 斤嗎？早稻產量超過 1000 斤的，已是成千上萬畝了。從種種跡象看來，只要沒有大的自然災害，今年廣東全省實現畝產糧食 1000 斤的指標，是完全有把握的。現在是要力爭實現畝產糧食 1200 斤。……一向被認為是低產作物的小麥，今年尚且能出現畝產

七千多斤的紀錄，那末，高產作物的水稻，在廣東一年可以種三造，達到畝產一萬斤也應當是可能的。……經過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創造性的進一步發揮，通過以密植為中心的一連串的生產技術改革，我們的增產速度將以更快的步伐向前躍進。為了確保這一躍進的勝利，我們必須給各式各樣的“糧食增產有限論”以徹底的揭露與批駁。

7月底農業部發表公報，夏糧總產量達1101億斤，比上年增長69%，小麥產量已超過美國；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夏糧大豐收說明，我國糧食要增產多少，是能夠由我國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來決定了。只要我們需要，要生產多少，就可以生產多少糧食出來。8月3日，該報社論說：我國經濟的發展，決定於人。“人有多大的膽，地有多大的產”。

8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劉西瑞的文章《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這次壽張之行，是思想再一次的大解放。今年壽張的糧食單位產量，縣委的口號是“確保雙千斤，力爭三千斤”。但實際在搞全縣範圍的畝產萬斤糧的高額豐產運動。一畝地要產五萬斤、十萬斤以至幾十萬斤紅薯，一畝地要產一、兩萬斤玉米、穀子，這樣高的指標，當地幹部和群眾，講起來象很平常，一點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八千斤、七千斤，提五千斤指標的已經很少。至於畝產一、兩千斤，根本沒人提了。這裡給人的印象首先是氣魄大。

他們的莊稼真長得好，一片黑呼呼的要壓塌地。雖然下面提出的萬斤指標，今年不一定完全實現，但萬斤社、萬斤鄉一定出現，可能不止一個。全縣畝產三、四千斤則是有把握的。

糧食單位產量從百斤到千斤，是個質變，從千斤到萬斤，是更大的質變；這樣高產量，從措施來看，也不外是水、肥、土、種、密等幾條，但是具體執行這

些措施中就有許多新東西值得研究。比如水和肥吧，他們的幹法是大水大肥，讓作物吃飽喝足，不給什麼限制，不怕作物鬧“胃脘”。看來，農作物的肚子大得很。這裡的單季玉米、穀子豐產畝，一般是八水、八肥，用水量都達到三百至五百公方；用肥是：粗肥在二、三十萬斤，化肥在二百斤左右，少數地達到五百斤，是否已吃飽喝足還難說，但決不過分。過去不少人認為一畝早作物只需要一、二百方水，化肥用多了就要燒死莊稼，損害土壤，這種看法，很顯然有片面性。

這裡幹部的看法是，只要有足夠的水和一定的有機質肥料相配合，一畝地（僅指一季作物）用它五、六百斤甚至上千斤的化肥不但沒危險，並且完全必要。同時，水隨肥漲，施的肥料愈多，用水量愈大，足水足肥是首要的關鍵。足水、足肥還必須和深翻相配合，這一點在壽張特別突出，也是他們能夠在大面積的土地上展開萬斤運動的決定環節。根據壽張的經驗，要搞萬斤糧，不掘地三尺是不行的。土質不好需要改良土壤的土地固然要這樣作，土質很好不要改良、單是鬆土的土地也要這樣作。他們的豐產田一般都深翻三尺，一般田也深翻半尺左右，他們認為不超過一尺是不行的。

在足水、足肥、深翻的基礎上，就可以放手密植。這一點在穀子的種植上表現得特別清楚。過去種穀子一步三安苗，一叢叢的，每畝只留苗三萬多株。現在他們的穀子種得象麥子似的密，基本不間留，一般在十萬株左右，豐產田二十萬株到二十六萬株，而穗子決不比過去小，很明顯，沒有深耕和足夠的水和肥是作不到這一點的。

足水足肥加深耕，在此基礎上放手密植（當然要有限度）再加上他們的“田間管理如繡花”，畝產萬斤就成一個現實的事物了。萬斤運動能否普遍推廣而不局限於小塊土地試驗，在水利已基本解決的條件下，看來主要是兩個問題：一是

肥料；二是勞力。他們解決肥料，除大搞土化肥外(有些社已生產到每畝五十斤)，主要靠拆破房、刮地皮，肥料中土肥占 80%。而土肥主要是靠勞力換來的，所以中心還是勞力問題。

到底一萬斤糧食要多少勞動日？到底一個全勞力使用手工工具一年能生產多少糧食？我們粗粗算了幾筆賬，很難答覆，原因是彈性大得很。這個問題一方面和畝產多少有關係，比如許多社原來計畫畝產雙千斤，每畝需用三十個工(單算田間和積肥用工，不包括基本建設。以前畝產二、三百斤時，一畝十五個工左右)，現在指標增到萬斤，使用原來的工具，每畝地也不過六、七十個工。就是說，產量增四倍，用的勞力不過增一倍；單產愈高，用的勞動量愈相對的少。這是一種情況。另一方面，還決定幹勁的大小和工具的優劣。據對幾個社的瞭解，畝產指標萬斤糧(一季玉米和穀子)，主要措施是：深翻二尺，施肥二十五萬斤，管理如繡花。一畝地需用的勞動工，以正常的勞動強度，使用原來的工具(鐵輪車加木輪手推車、畜力水車)計算，至少要七十個工；如果對工具加以改良，實現滾珠化，有五十個工就夠了；如果鼓足幹勁加上夜戰，工具改革的徹底些，還用不了三十個工呢！說來說去，是不怕指標高、措施大，就怕沒幹勁和不改良工具。

壽張每人平均二點六畝地，每個勞力平均六畝地，單算勞力帳，要大搞萬斤畝是絕對辦不到的，但實際上他們是辦到了。

他們的鋼鐵姑娘或鋼鐵姐妹，住到田間，專管高額豐產田，每人平均還需要管二畝地呢！他們今年的計畫實現了，平均每人就能生產六、七萬斤糧食。看來，只要幹勁鼓得足足的，加上積極改良工具，普遍搞萬斤運動(如果需要的話)不是辦不到的事。

關於工具改革，從這裡看，當前主要是運輸和深耕的問題，現在的深耕只能搞一尺多，而且要很多很強的牲畜，在目前畜力普遍不足的情況下，解決深耕工具還是個大問題。對運輸問題，我們也算了一筆賬：畝產萬斤糧，如果需用七十四個勞動日的話，其中翻整土地和澆水各占 6.6%，田間管理占 10.8%，收穫入倉占 12%，而運肥、施肥就要占 64%，後兩項費工大主要是運輸用工多。解決了運輸問題，勞動用工省不了一半，也要省 20~30%，實現了滾珠化將解決很大問題。不過目前鐵輪大車對道路破壞得很厲害，道路不好，使改良了的運輸工具大為減色。現在高唐縣有的社用舊膠皮和破鞋底代替鐵皮改裝大車，既減輕車的重量，又保護了道路，還騰出很多的鐵（一輛鐵輪車的鐵皮約百餘斤），一舉三得，值得重視。我們想，如果全華北能在短期徹底消滅了鐵輪大車，作到所有道路公路化，不但能減省勞力，對改變整個農村面貌都是有作用的。

今年壽張一個大功績，是要摘掉大豆和穀子的低產帽子。根據他們的經驗，在同樣條件下，穀子要比玉米產量高，主要原因是穀子和稻穀一樣，更便於密植。從現有條件看，一畝穀子密植到四、五十萬株，是完全可以辦到的。一棵谷穗一兩穀，一畝就是三萬斤。玉米就不同，太密了，不透風、不見陽光，就要影響生長。現在每畝一般只密植到六千多株，每株二穗，一穗一斤，才一萬多斤，而作到這樣，還很不容易。

穀子產量既高，還有便於保管和收割較早、有利於及時種小麥等好處。對玉米和穀子的身價，應該重新評評。他們的大豆產量也很高。估計畝產二千斤的很普遍，萬斤衛星也可能出現。多種一些大豆，可以增加食油，也是解決肥料不足的一個好出路。這裡過去種植穀子、大豆很不少，近兩年來因擴大玉米和地瓜，被擠掉不少。這裡的地瓜和小麥矛盾也不小，地瓜種植面積占耕地 45%，今年小

麥播種面積要占 90%，80%的地瓜茬要種麥子，小麥地要普遍深翻，地瓜要就地切片曬乾，這兩項重活擠在一起，安排不好，很容易顧此失彼。

從這些方面看，合理安排明年作物種植，是個必須及早注意的問題。

目前下面對爭取秋季大豐收的勁頭是很大的，但對收穫後如何保管，普遍沒有準備。我們問鄉社幹部和群眾時，最初他們都是“糧食多了還怕沒辦法？”“那由國家買吧！”經過算細帳才大吃一驚，才覺得糧食多了也有問題。特別在壽張，光紅薯一項大約每人平均要收四、五萬斤，該縣大部地區是滯洪區，房子很小，以往的一點點糧食還都是放在院子裡囤起來，今年不早些打主意，非吃大虧不可。這一點，我們已向縣委講了。

《人民日報》編者按：這是中央辦公廳派赴山東壽張縣瞭解情況的同志寫回來的信。這封信生動地反映了那裡大躍進的形勢，提出了一些足以啟發思想的問題，特把它介紹給讀者。

“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只要我們需要，要生產多少就可以生產多少糧食出來”。

水稻畝產萬斤的衛星騰空而起，連太陽也黯然失色；棉花堆成的高山聳入雲端，山頂的娃娃笑哈哈地遙指珠穆朗瑪峰。稻米趕黃豆，黃豆像地瓜；芝麻賽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蠶長貓一樣大，豬長像大象；一顆白菜五百斤，上面能站個胖娃娃；魚秧撒下千萬條，條條養得扁擔樣；玉米杆兒穿九天，渾身棒子有幾千……

1958年9月的《人民日報》，9月5日報導：廣東連縣 1.73 畝中稻平均畝產 60437 斤。9月6日報導，山東光明農業社玉米畝產 27312 斤。至同月 25 日，高產見報的縣還有：孝感早稻畝產 15361 斤；福建南安海星農業社花生畝產 10500

斤；河南火箭一社畝產玉米 12875 斤。安徽樅陽農業社水稻畝產 16227 斤。青海柴達木盆地的賽什克農場小麥畝產為 8586 斤。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部長陳毅撰文宣傳自己親眼看到廣東省番禺縣畝產 100 萬斤番薯、60 萬斤甘蔗、5 萬斤水稻的“事實”（載《人民日報》1958 年 9 月 26 日）。陳毅說：“這塊實驗田像個蒼翠的山岡，又像一幢幢綠色的樓房，雄偉的氣勢，遠遠就吸引著我。最初我還想，一畝田收穫一百萬斤番薯，該要插多少薯苗？插得下插不下，要長薯塊，又往哪裡長？到現場一看，一問，真是一目了然，完全信服。”陳毅感歎道：“一滴水可以透視太陽，我所到的番禺縣普通鄉村，這是我們國家的最基層。在這裡所看到的種種變化，也就看到了中國六億人民正在做著震驚世界的事情！”

1958 年 11 月，山西省候馬市新絳東方紅公社發射出一顆紅薯衛星大王，畝產紅薯 113 萬餘斤，勇奪全國糧食“衛星”之最，創造了大躍進年代糧食畝產最高紀錄的特大“衛星”。報喜者們豪氣沖天：“我們創造了人類糧食生產史上的最大奇跡，在迎接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中，我們將要創造出更大的人間奇跡！”他們向外地來的參觀者大肆鼓吹：“今年深翻五尺三，畝產紅薯百余萬；明年深翻九尺五，達到畝產五百萬！”

山西洪洞農民總結出了小麥豐產“經驗”：將小麥和穀子嫁接，每穗結籽五百粒，每畝植株二百五十萬，畝產達八點九萬斤，然後再將小麥改良成一株多穗品種，麥粒象石榴那麼大，產量將無法計算。這真是人世罕有的“奇跡”，怪不得當時一再宣傳：“只要發揮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什麼人間奇跡都可以創造出來。”

毛是想在這個六億人口的大國，製造一個落後國家一夜之間走向富裕、變為強國的奇跡。這個奇跡，就是毛在亞洲、在社會主義陣營放的“大衛星”。毛對

58年7、8月份來訪的赫魯雪夫說：1949年中國解放我是高興的，但是覺得中國問題還是沒有完全解決，因為中國很落後，很窮，一窮二白，以後對工商業的改造、抗美援朝的勝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這次大躍進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這個速度發展下去，中國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毛在1958年大躍進時所作的一系列信函、批示，簡直是些狂言亂語。什麼河南省一名小學生用竹管代替鼓風機吹風，一天吹得出兩噸鋼鐵啦；什麼安徽全省一個晚上實現農業機械化啦；什麼浙江發射蠶絲衛星，一條蠶寶寶吐絲15公斤；什麼甘肅一頭衛星豬體重1萬公斤；什麼四川全省普及大學教育，8千萬人口湧現6千萬詩人……瘋子！只有瘋子、神經病患者才寫得出這類批示，把國計民生當兒戲。名為經濟大躍進，實為思想大瘋癲！

2·糧食多了怎麼辦？

1958年8月4日，毛澤東的專列由北京站徐徐駛出，此行的第一站是河北省徐水縣。為了迎接毛的到來，徐水縣委做了一個星期的精心準備：大部分勞力和車輛，集中在鐵路兩旁和計畫讓毛視察的地方，並按軍事建制組織起來，團、營、連、班、班，哪一級出了問題，找哪一級的頭頭是問。道路兩邊的莊稼不得有一點雜草，地裡有人幹活就得要有紅旗飄揚。縣委內部的“持不同政見者”，均被打發去到偏遠的地方下鄉……一切細節的安排，都好像出自果戈理的《欽差大臣》。在看了路邊長勢喜人的莊稼和一塊莊稼地裡兩座正呼呼騰焰的土高爐後，毛澤東走進了一個乾淨得幾乎一塵未染的院落，正房是農業社的會議室，它的四面牆上，除了窗子，被各種錦旗、獎狀、生產計畫圖表和上級下發的大躍進宣傳畫所淹沒。村裡牆上畫著鮮豔的壁畫：年輕人攀著刺破藍天的玉米秸爬上天空；老漢乘著比船大的花生殼，飄洋過海，周遊世界；嫦娥從月宮下凡，到農田採摘

門大的棉桃……在這裡，毛澤東問該社社長：“你們農業社叫個什麼名字呀？”“叫第八渡河農莊。”毛大概想起了 87 年前在法蘭西的土地上誕生的第一個共產主義公社——巴黎公社。毛已在內部批判赫魯雪夫；所以，他也不想讓中國的農村再重複蘇聯集體農莊的名稱。他說：“還是叫人民公社好！”

當社長告訴毛澤東，今年麥收畝產達到 754 公斤，縣委書記又彙報到今年全縣畝產計畫達到 2000 斤、總產要達到 12 億斤時，瞪大了眼睛的毛澤東，和縣社幹部便有了這樣的對話：“要收那麼多糧食呀！你們全縣 31 萬人口，怎麼能夠吃得完那麼多糧食呢？你們的糧食多了怎麼辦呢？”“糧食多了換機器”。又問：“換機器也用不完，又不是光你們糧食多，你換機器，人家不要你的怎麼辦？”“那我們用山藥造酒精。”“那每個縣都造酒精，哪裡用得了那麼多的酒精啊！”“我們只是在考慮怎麼多打糧食。”毛說：“也要考慮怎麼多吃糧食呢，其實糧食多了還是好。多了，國家不要，誰也不要，社員們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頓飯也行！”

在眾星拱月般的簇擁下，毛又去看了社裡的幼稚園、幸福院、公共食堂，和一些將土堆積成小山狀、據說畝產可達 120 萬斤的“山藥山”。33 歲的縣委書記一路滔滔不絕，向偉大領袖介紹這些新事物、新創造。毛的思緒滔滔不絕，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中國漫長的歷史上，何曾有過為了糧食太多而發愁的日子？面對一張張激動而又木油的莊稼人的臉，他高屋建瓴地解決了這一問題：“你們這麼多糧食，吃不完怎麼辦？糧食多了，以後就少種地，一天干半天活，另外半天搞文化，學科學，鬧文化娛樂，辦大學、中學，你們看好吧？”

毛還說：“現在看來搞十幾億人口也不要緊，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國來糧食也夠用！將來我們要搞地球委員會，搞地球統一計畫，哪裡缺糧，我們就

送給他！”

8月5日在安國毛提出：糧食多了，每人每年可吃六七百斤，土地實行輪作。還稱讚了河北省委提出的大地園田化的口號。毛在天津視察時曾說：一個糧食，一個鋼鐵，有了這兩個東西就什麼都好辦了。8月17日至30日17日至30日的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決議預計：1958年糧食產量將達6000至7000億斤、1959年要達到10000億斤、1962年實現15000億斤。9月毛幾次表示，過去糧食增產很慢，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幾千億斤。今年翻一番，明年還能翻一番（達到15000億斤）。9月30日新華社報導，中國1958年的糧食產量將達到7000億斤以上，全國大部分地區糧食總產量基本實現了綱要規定的12年的指標。10月西安農業會議報告，1958年全國糧食產量8千億斤是肯定的，1萬億斤是可能的。12月初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認為這一估計水分大，打了個折扣。因此會議公報宣佈：今年糧食產量將達到7500億斤左右（棉花產量將達到6700萬擔左右）。

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提出了“三三制”的設想，即耕地的1/3種植農作物，1/3休閒和種植綠肥，1/3植樹種草。9月劉少奇視察江蘇時說：“我在河北、河南視察的時候，有些縣委書記認為少種多收比廣種薄收要節省的多，應該把豐產田的經驗推廣，集中使用人力和物力來種好田地。這樣再過幾年，就可以用1/3的地種糧食，1/3植樹，1/3休閒。”又說：“這是農業經濟上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希望各地好好算一算帳，認真研究一下”。中國科學院甚至研究“糧食多了怎麼辦”的課題。10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說，浙江、河北、山東、陝西、山西等地在農業生產上採取重大措施，特別是耕作園林化，是保證高額增產最有效的措施。它是耕作制度的革命，是實行毛的“三三制”耕作制度的重大步驟，這是全國農業發展應該走的路。各省提出的1959年種植計畫，糧食

播種面積將縮減到 15 億畝以內，比 1958 年減少 4 億，達 20%以上。11 月第一次鄭州會議，提出到 1972 年，爭取全國耕地實行“三三制”；決定把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工業首先是鋼鐵上來。

1958 年大量的糧食爛在了地裡。可在謊言齊放的氛圍下，人們已喪失了撒謊的感覺；以為我國農業問題解決了，糧食吃不了了。周恩來挑燈夜戰研究如何解決糧食太多、糧倉不足的問題。1958 年 9 月 8 日，毛在最高國務會上說要給糧食“找工業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光是我們所知的導彈試驗，每一枚消耗 1 千萬公斤糧食。毛澤東以為糧食吃不完，提出增加公糧，徵購量隨產量走。

後來經過落實的 1958 年糧食產量 4000 億斤，比 1957 年的 3900 億斤只增產了 100 億斤。但當年糧食的徵購任務和人民生活卻是按照 7500 億斤的虛假產量數位來安排的。

3·反瞞產導致大饑荒

從 1958 年秋開始，不少地方已出現了“非正常死亡”。廣西扶綏縣那江公社板包大隊，1958 年秋收後口糧標準由上半年每月人均 30 市斤下降到 20 斤谷，死亡率達 8.7%。1958 年秋天得知，安徽靈璧縣馮廟鄉、楊町鄉、尹集鄉因遭受風災和謊報畝產等原因自然災害、強行旱改稻等原因，已餓死 500 多人，還有許多人臥床不起。正陷入狂熱的毛澤東，並不立即重視這類問題，只要求曾希聖去調查“是否屬實”，“酌量處理”。1958 年春夏間雲南省因腫病、痢疾等，死亡了 39000 餘人。毛 11 月 25 日為雲南事件還寫了“一個教訓”一文，說：“千鈞重擔壓下去，縣鄉幹部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去幹，少幹一點就被叫做‘右傾’，把人們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別的省份，則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

雲南那樣的錯誤”。

大躍進的主要內容是大規模地從蘇聯和東歐進口以軍工為核心的重工業項目。這就意味著食品大量出口。1958 年僅 7-10 月，糧食徵購減少 88 億斤，銷售和出口增加 52 億斤，全國到 10 月底糧食庫存減少一百幾十億斤，各地紛紛要求調入糧食。10 月下旬，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緊急指示》，在全國農村掀起了一場高徵購運動。毛在 11 月武昌會議上說：大城市裡頭，豬肉也沒得吃了，糧食也沒得吃了，豬肉也不能出口了。

毛對“1958 年農業大豐收的事實”深信不疑，並把對此表示異議的人都叫做“觀潮派”、“算帳派”和“右傾機會主義份子”。既然肯定是“大豐收”，增加徵購、減少銷售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事。1959 年 1 月 27 日，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報告說：自 1958 年 12 月以來糧食問題已經成為輿論的中心，雷南縣 1958 年生產有很大躍進，年底卻出現了糧食緊張的不正常現象。趙紫陽到雷南縣召開 4000 人幹部大會和一系列幹部會議反瞞產，並組織查糧隊，逐家逐戶搜索，結果查出瞞產私分的糧食 7 千萬斤。雷南縣的經驗證明，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像，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廣東省委立即肯定了這個報告，表示：必須堅決領導和進行好反瞞產、反本位主義的鬥爭，才能保證完成糧食外調的任務和安排好群眾生活。毛澤東如獲至寶，認為這個經驗“極為重要”，親自擬稿於 2 月 22 日以中共中央名義轉發全國，認定“公社大隊長小隊長瞞產私分糧食一事，情況嚴重……在全國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必須立即解決。”而且必須“舉行一個堅決的教育運動，才能解決問題。”這是毛在“大躍進”期間作出的又一個災難性的重大決定，其惡果遠遠超過“拔白旗”。反瞞產造成了廣東省餓死百萬人的慘禍。廣東德慶縣 1960 年餓死 2 萬人。1960

年四月，高要縣蓮塘公社有 3790 人因缺乏營養而患病；非正常死亡人數多達 779 人，大部分是餓死、病死的，占總人口的 2.2%，其比例大大高於正常死亡人數；在饑餓和死亡的追逼下，有 609 人走上了外出逃荒之路。廣東省海南島：1959 年 7 月，海口市與其它 6 個縣有浮腫病人 4.3 萬人。1960 年 4 月據省農業辦公室對部分地區的“極不完全統計”，全省有 80 多萬水腫病人。另外還有子宮下垂、閉經、乾瘦病等，成了比傷風感冒流行得還快的病症。陽山縣的非正常死亡比例，占總人口的 4.02%，居全省之冠。

1959 年 2 月 27~3 月 5 日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鄭州會議》文件中附上了毛澤東講話：“誰要說一個廣大的社會運動能夠完全沒有缺點，那他就不過是一個空想家，或者是一個觀潮派算帳派，或者簡直是敵對分子。我們的成績和缺點的關係，正如我們所常識的，只是十個指頭中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有些人懷疑或者否認 1958 年的大躍進，懷疑或者否認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這種觀點顯然是完全錯誤的。”“大家看到，目前我們跟農民的關係在一些事情上存在著一種相當緊張的狀態，突出的現象是 1958 年農業大豐收以後，糧食棉花油料等等農產品的收購至今還有一部分沒有完成任務。再則全國（除少數災區外），幾乎普遍地發生瞞產私分，大鬧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 1953 年和 1955 年那兩次糧食風潮都有過之無不及。”“一方面，中央、省、地、縣、社五級（如果加上管理區就是六級）黨委大批評生產隊、生產小隊的本位主義，瞞產私分；另一方面，生產隊、生產小隊卻幾乎普遍地瞞產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崗放哨，以保衛他們的產品。我以為，產品本來有餘、應該向國家交售而不交售的這種本位主義確實是有的，犯本位主義的黨員幹部是應該受到批評，必須立即解決”。

“必須估計到，一方面，那些觀潮派、算帳派將會出來譏笑我們；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將會進行破壞。但是，我們要告訴幹部和群眾，當著這些情況出現的時候，對於我們絲毫沒有什麼可怕。我們應該沉得住氣，在一段時間內，不聲不響，硬著頭皮頂住，讓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們自己。到了這種時候，廣大的群眾一定會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敵我，他們將會起來粉碎那些落後分子的嘲笑和敵對分子的進攻。”

當時毛仍認為農村並不真正缺糧。例如他說：農民瞞產私分，深藏密窖，站崗放哨，保衛他們的產品，若沒有產品，如何來瞞？所以他說：“我以為，產品本來有餘”。毛又提出，關於糧食問題，應“嚴格規定一個收糧、管糧、用糧制，一萬年還是如此。大反浪費。”

1959年3月，中共中央在上海會議上決定當年計畫徵購1150億斤，這是1958年的標準；但實際上1959年全國糧食大幅減產，中共不思削減徵購計畫，反而比計畫的徵購數又多了200億斤，這1350億斤的徵購糧，就成為大饑荒的根源。1959年糧食減產11%，徵購數卻增加了14.7%。按當時的農業生產力，農村糧食的商品率僅百分之二十幾，不超過百分之三十。而59年全國徵購的糧食占產量的百分之四十。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反瞞產私分”，層層相逼，用專政的辦法強行從農民那裡搜刮走的口糧。

1959年初發生了嚴重的春荒。1959年4月初，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南、甘肅、貴州、河北等15個省區“無飯吃”的人口已達2517萬。4月17日毛批轉了《15省2517萬人無飯吃大問題》的文件，他的反應是做戲。他指示把檔用“飛機送到十五省委第一書記手收，請他們迅即處理”。毛既不說明如何處理，更沒有鬆口要他們少征糧食。

城市蔬菜定量供應按兩計，北京居民一天只能吃到一、二兩菜。這時，許多省出現成片地區挨餓甚至死人的情況。在稍後的廬山會議上，提到了 59 年的“大春荒”；河南在 58 年曾發生浮腫病和餓死人的現象，春節時幾萬人浮腫，人均口糧一斤，59 年初豫東 5 縣及開封地區已餓死數萬人。湖北 59 年春 500 萬人日均幾兩糧，吃稀飯，已死了 1500 人，15 萬人浮腫；四川普遍吃稀飯，菜裡見不到一點油葷；甘肅嚴重缺糧，公社食堂都吃麵糊煮土豆；湖南一些地方每天只有二、三兩米；山東濟寧專區嚴重饑荒等。

形勢已經極不樂觀，老毛於 4 月 29 日發出《黨內通訊》，要求省以下六級幹部不要講假話，他自己也承認：“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陳雲同時寫信給中央財經小組，提出“糧食要省吃儉用，去年夏收和秋收後，估產高了，吃用多了。今年以來，城鄉銷量繼續增加，庫存下降，到處供應緊張。”

5 月 7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業的五條指示》，指出 1959 年夏收作物比 1958 年減少 1.1 億畝，即減少 20%。這是老毛提出全國都要實行“三三制”的直接後果；10 日，中共中央批轉湖北、河北、廣東報告，湖北有 170 萬人口嚴重缺糧，河北有 30 多個縣鬧缺食，廣東崖縣等四個縣已經餓腫 10930 人，其中已餓死 134 人。檔總結原因認為：“造成糧食緊張的主要原因，是對增產幅度估計過高，產量數位估計過大；加之 1958 年秋收沒有搞好，以及一度放開肚皮多吃等。”請注意，到此尚無擁躉們喋喋不休的“天災”原因。1957 年 6 月 20 日，新華社《內部參考》第 2801 期報導了廣東大雨成災，毛批示道：“廣東大雨，要如實公開報導。全國災情，照樣公開報導，喚起人民全力抗爭。一點也不要隱瞞。”據此，可以認為：如果未見災情報導，理應沒有災情。

5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緊急指示，停止對農村用油的供應，以保證城鎮居民、出口、工業和行業用油的需要。27日，中共中央轉發勞動部報告，要求把供應緊張的城市職工減少800萬人，推到更緊張的農村去。6月11日，中共發出《關於社員私養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個問題的指示》，終於在社會主義防線上打開一個缺口，允許社員擁有一點私有財產了。15日，老毛召集少數中央領導人會議，承認綜合平衡出了問題，有主觀主義，同意把糧食產量從10500億斤減少到5000億斤。會議又沒有提出任何“天災”問題或因素。

1959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仍飭令各省區：糧食調出計畫，各地必須堅決完成，不能推遲。隨即在若干地區發生了夏荒。到7月份，全國6個月的存糧只有310億斤。

對搜刮農民口糧這一點，毛十分清楚。1959年7月5日，毛批復糧食部副部長陳國棟給中央的報告，報告稱完成上海會議定下的1959~1960年度徵購糧食1155億斤“只要做好工作，還是可以辦到”；但銷售額必須壓低，建議壓到855億斤，如此方可保證庫存。

毛當日批示：“陳國棟同志的報告是一個重要檔。請各大區區長主持討論，細緻地討論，討論兩次至三次。”毛繼續批示道：“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確實好的情況之下，徵購1100億斤，力爭辦到，這是變被動為主動的第一著。”然後，對於銷售，也就是供應給國民的糧食，毛嫌多：“是否可以調整為800億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億斤呢？告訴農民，恢復糠菜半年糧，可不可以呢？苦一年、兩年、三年，就翻過身來了。多儲備，少食用，以人定量，糧食歸戶，食堂吃飯，節餘歸己，忙時多吃，閒時少吃，有稀有幹，糧菜雜吃”。毛早已為農民安排好“糠菜半年糧”了，並且安排好“一年、兩年、三年”。不做太壞的揣測，但至

少，搜刮農民的設想毛已經提交給各地領導人了。

7月14日彭德懷給老毛寫信，認為全國出現的災難性局面是“左”傾造成的。注意，他也隻字未提“天災”禍害。甚至當初反對老彭的高級領導人，似乎也忘記拿“天災”來批駁老彭，直至8月7日中共中央《關於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同樣“忽視”了老彭趁“天災”以反黨反“三面紅旗”，而只指責他搜集人民公社和“大躍進”中的錯誤與缺點；還由周恩來牽強附會地分15個時期批判老彭歷史上就反毛的罪狀。其實，如果真有“天災”，是很容易駁斥老彭的指責並戳穿他的“反黨面目”的。

7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糧食工作的指示》指出，四月份全國已經有十幾個省、自治區出現春荒。至六月底，全國糧食庫存只有340億斤左右，減去已被地方借用部分，實際庫存數更小。1959年新小麥登場之後，仍是現收購、現調運、現供應；大米、雜糧在新糧登場前已經調不動了。歸結原因是，1959年收購量未完成，銷售量卻大幅度增加，造成糧食緊張。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春荒”是指青黃不接時糧食緊張狀況，並非天氣的描述。

8月1日，老毛批示中共轉發《廣東省委關於農村農副產品自給部分過多現象》的檔，廣東省委認為：農村人民公社農副產品內部分配供給部分比例太大，商品部分進一步縮小。為了緩解副食品供應緊張狀況，必須堅決壓縮供給制部分，即農民自己消費的部分。老毛的批示說：廣東的措施是適宜的。“這是一個大問題，必須一律採取措施，改變現狀。”中央加的批示要求：①適當限制留給農民自己的農副產品，限制在30%，最多不得超過40%；②切實做好農副產品的收購工作。連同毛的批示，中央於19日轉發給各地貫徹執行。這個指示對於農民的剝奪是極其殘酷的。當局搞“統購統銷”政策，農民每年可留多少糧自食也由政

府決定；那數位隨收成浮動，標準定得很低。毛 1960 年定過一個原則：不（餓）死人，維持人民健康。因為他認為“人窮好些……中國富起來也容易出修正主義，不能吃得太好”。

8 月 30 日，毛批轉了貴州省委的報告，推廣對秋季農作物要“快收、快打、快購、快運”，按時完成糧食徵購任務。10 月 23 日，毛澤東再批示推廣廣東實行豬、雞、鴨、鵝和蛋品的派購辦法，強令人民公社和社員“履行交售任務”。如此，大躍進浮誇風導致的原本就十分微薄的農副產品，大部分變成必須被收購的產品了。而基層幹部再層層加碼，按照虛誇數字計算執行，敲骨吸髓，農民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各地接到中央的指示後，或按照執行，或有所發揮，不管農民如何叫苦，不管發生什麼悲劇，都堅持“反瞞產”。先開“三級幹部會”，凡收羅的糧食不足上級規定數，就認定是基層幹部瞞產私分了糧；搞逼、供、信；然後成立“反瞞產運動”的民兵打人隊，對基層幹部和普通農民“家家過關”，捆綁吊打，傷人以至死人事件層出不窮；搜刮糧食，直到把農民最後一粒糧食搜走，連種子也不留下。

結果，1959 年全國農民的人均糧食佔有量僅及 1958 年的 77%。農民成千萬地餓死的慘劇與“反瞞產私分”同步發生。政府又不准農民“盲流”，民兵把守路口，農民只有死路一條。大家很清楚，餓死人其實要不了三年，一個月、甚至一個禮拜就足夠了。民間俗語有雲：“男餓三，女餓七，老婆婆要餓半個月”。其依據是男勞力新陳代謝旺盛，三天就要餓死。人的生命其實非常脆弱，要把人民餓死實在太容易了：首先餓死的是壯勞力，然後是婦女和兒童。“反瞞產”將老百姓逼上了絕路，從 1959 年 11 月起開始，各地人民公社的食堂相繼缺糧；1959 年底到 1960 年初這個冬天是餓死人最多的一個時期。可以說，1959 年冬季發生

的“信陽事件”，就是毛批示的這個命令的直接後果！

毛澤東在全國範圍內搞“反瞞產私分糧食”運動，並且依靠和縱容一批長期採用法西斯手段完成任務的幹部，去搞“反瞞產”，才是造成全國範圍餓死 5 千萬人的主要原因。

反對大躍進與反革命幾乎是同義詞。1958 年大躍進，全國大肆抓人，僅江蘇省就逮捕了 5~6 萬人。此外，還有縣辦、社辦的非正規的勞教場所，收容了數萬人。僅以鎮江市和揚中縣兩處“收容勞教場”統計，485 人中，應勞教的僅 44 人，占 9%；被打、挨餓致死、以及有病加上折磨而死就有 32 人。1958 年 7 月 12 日河南西平縣放了一顆畝產 7320 斤的小麥“衛星”，凡不跟著說好的抓起來就打，打了 7 萬多人，打跑 7000 多人，打死了 300 多人，打傷的是成千上萬。王任重說：“這是多麼殘忍的事情！”廣東第一書記陶鑄曾說：“用秦始皇的辦法完成任務，十天搞個小水庫，很可愛，但有血腥味。陶鑄說的“血腥味”，就是指大躍進中無數善良的農民被幹部捆打的事。如海南島文昌縣城郊公社規定：挑土，每日完不成三百擔者打；積肥，每日完不成一千擔者打；插秧，每日完不成二畝者打。此外還有：挑土擔子不滿者打；不出勤者打；小偷小摸者打，而且要打到快沒氣了才往公安局送。

中央高級黨校黨委書記楊獻珍憤憤地抨擊那些打人的幹部：“有的幹部把老百姓剝得乾乾淨淨，和西藏的奴隸差不多，就差剝皮。對群眾不是打就是罵，比日本人厲害。為什麼有的幹部敢於這樣呢？因為他有個藉口，就是搞“共產主義”。

1958 年秋冬之際，徐水縣宣佈進入共產主義的同時，還實行“全民肅反”，自上而下分配抓“壞人”、“消極份子”的數字，限期完成，送去勞改（1985

年 1 月 27 日《人民日報》)。古今中外暴政，找不出一個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的。

“全民肅反”的口號，是徐水縣委發明的，其實不過是按毛的指示辦事。1958 年 11 月 21 日毛在武昌會議說，1957 年右派份子鳴放，“地、富、反、壞乘機而起，所以青島會議開捉戒、開殺戒。湖南斗十萬，捉一萬，殺一千，別的省也一樣，問題就解決了。”由此可明白，為什麼 1958 年那些荒唐絕頂的行為能在全國通行無阻。全國 29 個省、市，拿湖南的數字乘以 29 似乎過多，打個七折，全國就鬥了二百萬，捉了二十萬，殺了二萬。這一鬥、一捉、一殺，“問題就解決了”。這是真的，毛澤東沒有吹牛。這本是歷代統治者消滅不同意見的慣用手法，毛後來將之歸納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不過是套了件馬克思主義的外衣而已。

1958 年 11 月，中共雲南省委因農村發生嚴重死亡情況而寫出檢查報告，承認對一些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嚴重情況估計不足，說特別是經過“反右鬥爭”和“大辯論”，某些幹部有個人主義思想，少數壞份子亦以“左”的面貌製造混亂。毛雖然同意省委對問題分析和處理，卻仍然捨不得懲辦和消除這批貫徹“左”傾路線的得力基層骨幹。

接著，河南省長葛縣坡胡人民公社公社一封群眾來信，又送到毛澤東的手中，反映社隊幹部打人罵人現象非常嚴重，許多被打的人偷跑在外，不打人的幹部反而被扣上鬥爭性不強的大帽子，要求上邊派人進行調查處理。毛澤東明知農村問題不少，卻偏要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處理時不要使那些“犯了輕微錯誤的同志”“感到恐慌”。

農村幹部打人成風，毛知道後卻說：“組織軍事化……有些地方營長可以打連長，打人、罵人、捆人，成了一種處罰。這是對敵人的方法…已經打了，也不

要到處潑冷水。以後不再打了，改正也就算了。因為他打人也是為了完成國家任務，說清楚群眾是會諒解的”（1958年11月1日在河北邯鄲地區對幹部的談話）。按毛的邏輯，以往官府徵稅、抽丁，也是“為了完成國家任務”，杜甫寫《三吏》、《三別》倒是給“幹部”潑冷水。1961年1月中央擬定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條文，原有“保護人民安全，打人要法辦，打死人要償命、保護人民自由，隨便罰人、抓人、關人、搜查要法辦”等內容，被毛批評為“太複雜……執行起來可能起反作用”，結果被改成“同勞動同食堂、辦事公道”等一團和氣的文字。

1959年1月23~3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第四次全國監察會議顯示：1958年全國處分黨員508,750人，占黨員總數的4.35%，比1954~1957四年處分總和還要多！其中開除黨籍的196,500人，相當於1951~1957年開除黨員總和的80%！持異議者被整肅，全黨處於“側目而視，重足而立”的狀況，除了助紂為虐之外，別無他計。這次會議還批判了黨的監察委員會與黨委平行的錯誤，明確規定監委必須在黨委領導下工作。

1959年2月2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上講話，明確提出：“對幹部和勞動人民的積極性要保護。就是對5%以內的違法亂紀的幹部，也要分別情節，區別對待，進行教育，說明他們改正錯誤。如果把這個問題擴大了，是不好的。結論一定要做得恰當，不然要犯錯誤。”被毛澤東及其追隨者有意保護下來，並一再加以縱容的一批無惡不作的幹部，在繼續貫徹毛澤東“左”傾路線的“反瞞產運動”、“反右傾鬥爭”和“高舉三面紅旗”的過程中都大顯身手，使數以千萬計的無辜百姓——主要是農民死於非命。

農民被迫鋌而走險。四川石柱縣1960年5月發生百餘人的暴動，搶奪糧食。

貴州雷山縣 1960 年發生多起哄搶國家糧庫事件。貴州黎平縣 1960 年 12 月至 1961 年 1 月期間發生 4000 多群眾因缺糧而哄搶國家和集體糧食事件。廣東省潮州市也發生哄搶集體糧食事件。

4·糧食政策：高徵購、不放糧、出口糧，餓死人

大饑荒中的糧食政策是怎樣的呢？柳隨年等人編著的《六十年代國民經濟調整的回顧》一書中說，1958 年實際糧食產量為 4000 億斤，比 1957 年 3900 億斤增加 2.5%（當時以為有 7500 億斤）；1959 年下降為 3400 億斤，1960 年為 2870 億斤，年平均遞減 15%，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現象；1961 年有所回升，產糧 2950 億斤。在 1960 年，農牧業產品的產量大都退回到 1951 年即建國初的水準（油料作物僅及 1951 年的一半）。但糧食徵購量非但沒有相應地減少，反而大幅度增加。1958 年為 1175 億斤，1959 年 1348 億斤，1960 年 1024 億斤，分別占總產量的 29%、40%和 36%。這三年實產平均比 1957 年減產 827.6 億斤，由於定購數字太高，平均年徵購糧食反而比 1957 增加 95.8 億斤。實際產量下降，徵購卻反而提高，一少一多，使農村留糧減少。全國農民人均留糧在 1959、1960 兩年已急劇減少，從 1957 年的 250 斤減少到 174 斤。也就是說，到 1960 年，中國農民人均每天消費糧食不到半斤。同一時期，蔬菜和肉類的生產也受到巨大破壞，人均供應量也大幅度減少。

大量出口糧食是導致數千萬農民餓死的極重要的一環。《中國統計年鑒（1983）》記載，1959 年糧食淨出口量為 4155.5 千噸（即 83.2 億斤），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平均出口量的兩倍。《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第八章寫道：“最令人驚訝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 1959 年，中國糧食的輸出，……竟然達到歷史最高水準。”1959 年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曾在筆記裡抨

擊毛：“出口過多，並且一度在國外採取傾銷政策。為了完成豬肉出口任務，中共規定農村三個月不殺豬”（三個月內禁止農民殺豬自己吃）。與 1957 年相比，1959 年的糧食產量減少了 1500 萬噸，出口卻增加了 223 萬噸，比 1957 年多了一倍以上。這完全超出了當時中國的國力。出口的糧食很大一部分是搜刮的農民的口糧。1959 年，中國政府徵購了 1360 億斤糧食，比 1958 年多 360 億斤，使徵購率從 1958 年的 29% 猛升到 40%，是中共建政後徵購率最高的一年。結果，農民只好將口糧當做徵購糧和“餘糧”交給政府，全國農民人均每天口糧不足一斤，重災區只有幾兩。僅那增加出口的 223 萬噸糧食就夠 4 千萬人吃幾個月，足以從 1959 年熬到 1960 年夏收。然而，這些糧食都被地方幹部當做大躍進的偉大成果交給了國家，轉而被政府運到國外去換硬通貨了。

以安徽為例，該省死了那麼多人，同 1959 年冬出口了 4 億斤糧食就很有關係。1958 年 11 月毛在中央會議上說 1959 年糧食可以“搞到一萬五千億斤，農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糧食多了吃不完”時，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跟腔說“我們擔心農作物的出路問題”，好象安徽的糧食多得成了災。當時若留著那四億斤糧食不出口，用於接濟缺糧最嚴重的 1/3 的人口，每人可分得四十多斤，那些“非正常死亡”們完全可以挺幾個月熬到夏收而活下來的。當然，也可能安徽省的國家糧庫有的是糧食，並不在乎賣了那四億斤糧，問題就是沒有及時開倉放糧。所以 1962 年初劉少奇處理安徽問題時曾說：“59 年調（安徽的）糧食是中央叫調的，死人同調糧食有關係，但不完全是糧食問題，其他政策不當也有關係，例如：收回自留地、幹部作風不好，水利搞那麼多。”

1959 年 6 月底，全國的糧食儲備還有 343 億斤，夠城鎮居民一年之需。但在當年糧食減產 3000 萬噸的嚴重情況下，政府卻決定出口 415 萬噸換取黃金和美

元，出口量相當於上述糧食儲備的 24%。出口耗去了糧食儲備，結果很快就連京、津、滬等大城市的糧食供應也幾乎脫銷，而農村的數億饑民就只有死一條路了。進入 1960 年，各地農民正成百萬成百萬地餓死，中國的糧食卻在一船船地運往國外。1960 年又出口了 265 萬噸（即 53 億斤）！

要是留下出口的糧食，哪怕只把 1959 年和 1960 年出口的 680 萬噸糧食留下一半（68 億斤），送到缺糧最嚴重的地區，瀕臨餓死的農民是可以得救的。然而，這不可能。因為中共的管家周恩來對糧食情況兩眼一摸黑。1 月 26 日，國務院下發檔樂觀地宣佈：“1958、1959 年糧食獲得特大豐收。當前糧食形勢好得很，國家糧食庫存在 1959 年 6 月底 343 億斤的基礎上，1960 年 6 月底將達到 500 億斤……”而 1960 年 6 月底，全國糧食的實際庫存僅為 127 億斤，少得甚至不敷糧庫的鋪底和正常周轉。正是在一摸黑的情況下，周作出了一個荒誕的決定。當時外貿部有人主張在國際市場拋售黃金，換取外匯購買糧食，可周卻認為黃金價格正低，是買進的好機會。他說“黃金不能賣，我們要以黃金作後盾”，結果非但不賣，反而購買了幾十萬兩黃金。當時，只要十斤糧就能救濟一個人不死，若周將那筆買黃金的錢用來買幾十萬噸糧食，1960 年絕不會有那麼多死亡。而殘酷的事實是：在 1959 年和 1960 年間，中國出口了 680 萬噸糧食，購買了幾十萬兩黃金，農民則餓死了 3500 萬。

在農民城千萬的餓死的同時，中國的倉庫裏囤滿了等待出口的糧食和其他食品，由軍隊或民兵把守。波蘭學生羅文斯基親眼看見“水果成噸的爛掉”。可是上面有規定：“餓死不開倉。”在 1959 年廬山會議上，以彭得懷為主的絕大多數人主張停止賣糧食，緩造原子彈；而以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為主的少數人卻堅持繼續賣糧食造原子彈。造原子彈的儀器、設備、原料的費用驚人。當時政府

一心想造原子彈、導彈，好揚威世界，因此急需大量黃金外匯進口相關的設備材料。中國政府在國際市場賣糧食換黃金是為了購買建造原子彈必需的儀器設備原料。所以“三年自然災害”的真正原因是：賣糧食造原子彈！

1961年初，國際紅十字會曾想向中國提供食品援助，被我國政府拒絕。美國也討論過無償提供糧食給我國，卻因發現我國大量出口糧食而作罷。

1960年春天，國家倉庫裡還有糧食，問題是縣委書記怕戴“右傾”帽子。譬如作家趙樹理當時在山西陽城縣任兼職縣委書記，在“反右傾”的聲浪中，他堅請上級撥給糧食，及時分發，救了不少人。趙在幾年後的文化革命中被鬥爭、整死前，有人到陽城縣去收集趙的“罪行”，老百姓不予合作，說：“要不是趙樹理，我們早餓死了。”

據當時的河北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回憶：“鑒於蔚縣死人太多，省委工作隊……來到蔚縣……調查解決餓死人問題。他們驚異地發現，在大多數公社死亡人數急劇增加的情況下，陽原片（蔚縣後分為蔚縣和陽原縣，陽原片指現在屬陽原縣的部分）卻死人很少，特別是東城公社情況最好。”原來東城公社的書記武萬升瞞著縣委秘密放糧，從公社的儲備糧中分給每個農民十斤，由社員領回家食用。相鄰的公社聞訊，也秘密放了糧，今陽原縣的農民就是這樣獲救的。可見只要幹部不在乎“右傾”帽子，不怕引禍上身，農民是不致餓死的。

把農民的口糧當做“餘糧”交上去邀功的幹部各省都有。由於“反右傾”運動清洗了體察民情、敢講真話的幹部，許多幹部打腫臉充胖子，寧可讓老百姓餓死也不願向上級承認缺糧。餓死4萬人的江蘇寶應縣就是一個例子。若不是縣委書記徐向東“死官僚主義，省裡撥給他糧食他不要”（江涓清語），寶應的4萬農民是不會被困在家中活活餓死的。

1961年廣東第一書記陶鑄說：“省委曾經三申五令，要求各縣如果糧食確實不夠，會發生人口死亡時，應該如實向省委報告，省委可以保證各地每人每月安排口糧。但是，不少的縣既沒有反映情況，又沒有很好安排群眾生活，其結果在去年春天多死了一些人，而且超過了2%的死亡率，這難道還不應該追究責任嗎？”他所說的“多死了一些人”的地方應包括死了2萬人的德慶縣，但所謂“追究責任”，只不過是撤了縣委書記的職而已。

江渭清和陶鑄提到的“死官僚主義”的縣委書記、地委書記們，對子民餓死的情形知道得一清二楚。為護住烏紗帽，他們竭力封鎖消息，以免餓死人的實情流露出去。由於民兵把守了交通要道，郵局截扣告狀的信件，地方幹部成功地把農村餓死人的實情掩蓋了很長時間。

1958年“大煉鋼鐵”、“大辦水利”，農民的生命賤如螻蟻。在“早日進入共產主義”的旗號下，許多地方竟高喊“寧教人死了，不教紅旗倒”！“寧死99，紅旗不丟手”！大躍進一開始，毛就告誡高層做好大批死人的準備。毛澤東說：“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事是經常發生的”。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毛大談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確實是喜事。你們設想，如果孔夫子還在，也在懷仁堂開會，他二千多歲了，就很不妙。講辯證法，又不贊成死亡，是形而上學。”“[莊子死了妻子以後]鼓盆而歌是正確的”，“人死應開慶祝會”。1960年春，江蘇省委向林彪彙報餓死的情況，林彪說，“我們這麼大的國家，死幾個人算什麼”。不尊重他人的生命是一種罪惡，這種罪惡大肆氾濫，毛及其戰友要負主要責任。

面對糧食緊張和“非正常死亡”等現象，毛的態度是“現在形勢大好，缺點錯誤是部分的”；將社會各界對糧食供應方面的意見，一律視為階級鬥爭的反映，

把群眾對糧食供應方面的不滿定性為“鬧糧”（1960年12月底和1961年1月10日，毛兩次批示全國推廣遼寧、錦州以階級鬥爭解決群眾“鬧糧”的經驗），而“社會主義不會餓死人”則成為一條鐵律。毛為全黨定下調子，不許亂講，凡亂言餓死人者，一律以攻擊三面紅旗論處。毛澤東把餓死的人說成是“資本主義害死的”；有些同志看到悲慘的情景流下了眼淚，卻被誣譏成是“為資本主義流淚”。毛的共產主義已發展到荒謬絕倫、毫無人性的地步。

當年副總理陳毅路過南京時，曾將江蘇省長惠浴宇找去問：“人民公社究竟好不好？你們江蘇究竟死了多少人？”可是江蘇省委事先已統一了口徑，惠浴宇也就沒有對他的老首長說實話。陳毅回到北京，歎道：“在下面跑了幾個省，誰也不敢說老實話……”

城市回鄉探親或外界去搞調查的人雖可將餓死人的消息傳開去，但反右運動搞得人人自危，敢說實話的不多。譬如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雖親眼目睹信陽慘狀，只能在家痛哭，而不敢在正式場合吐露一句真言；還有個省的軍區副司令員1960年到省內一個去檢查工作，瞭解到該縣餓死了3萬多人。但他回到省裡卻不吭聲。有人問隨該司令去那裡的一位元處長為何不反映情況時，他答道：“首長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

胡耀邦1960年曾一度下放到毛的老家湘潭兼職任中共湘潭地委書記。那年冬，他回北京向毛彙報情況，在見毛的前一天晚上，為了是否將餓死人的真實情況告訴毛這一點，他在自己的書房裡抽煙、踱步，思想鬥爭了一夜，到最後他也沒有把真相完全告訴毛。

在毛的恐怖統治下，各種荒唐絕頂的行為在全國通行無阻，無人敢阻攔，連毛的老家韶山也不例外。公社要修水庫，韶山大隊的社員在晚稻還沒有收割完的

情況下全部被調到水庫工地。剩下老弱病殘只能守家，看著到手的稻穀熟透了爛在地裡發芽，紅薯也爛在地裡。

1960 年底，毛表弟的兒子賀鳳生手持毛 1950 年寫給他父親的親筆信到京，向毛告狀說：大躍進來了，要搞公社化。好不容易一家一戶有了房子，一夜之間全部要拆了起居民點……弄得到處雞飛狗跳，哭的哭爹，罵的罵娘。一百戶二百戶連在一起，越大越是集體化。如果老天爺一把火，從東到西幾百間茅棚全會燒成灰。“小鐵鍋砸了煉鋼鐵，小灶拆了積土肥，筷子碗碟全歸公。……紅薯爛在田裡，犁掉。稻穀不想收，放火燒掉。倉裡沒得幾粒穀，還硬說畝產達到幾千斤。為迎接上級的檢查，把好幾塊裡的稻穀移栽到一塊田裡，硬說是畝產幾千斤，就是大躍進帶來了大豐收，鬼都笑落牙齒。做假事說假話的是那些人，作官受表揚的也是那些人，吃好喝好的還是那些人……老百姓餓得要死，只能在背後沖天罵娘。” 賀從一個布袋子裡掏出一大堆公共食堂的餐票說：“主席，我想請你到我那裡去吃幾餐鉢子飯。吃食堂餓死人啦，食堂不散我不回去了。” 這就是大躍進時期有關人民公社的真實記述。風吹棉桃，火燒稻穀，如此大規模地暴殄天物，在人類史上是僅見的（戰爭中被敵方燒掉的除外）。毛沒有下令做這些事，他也不贊成這麼做，但他製造了這“鬼都笑落牙齒”的時代。

中國現政權在當政初期，亦步亦趨的學蘇聯的老路即靠剝奪廣大農民的基本生存權，來換取工業資本的原始積累的。於是全國各地徵購農民賴以活命的基本口糧，出口去換取工業化的原始資本。所以，中國現政權對於當時會導致大量農民死亡是有絕對的思想準備的。因為蘇聯本來就是如此。但有一點不同的是，蘇聯工業化突飛猛進得益於其與兩個當時新型工業化強國美國和德國的良好關係，從而將這兩個工業化強國的大量技術設備帶到蘇聯。比如福特就在蘇聯設廠生產

嘎斯牌汽車，而中國人到了 80 年代還年年不忘蘇聯的嘎斯 69 汽車。當時有幾個中國人知道這是福特 20 年代在蘇聯設廠設計的汽車呢。毛猴子當政後把所有工業化國家得罪了個遍，只能依靠蘇聯老大哥搞一邊倒了。但是搞了十幾年，又耐不住繼續做小弟，於是又和老大哥鬧翻，於是這工業化的春秋大夢就徹底覆滅了。可憐的是廣大的中國農民，建政時靠他們的鮮血和生命換來，工業化靠他們的賴以生存的口糧換來。而這些農民們現在到北京首先要去頂禮膜拜的就是毛猴子的木乃伊。這就是中國農民的宿命。

第 112 節 人民公社窮過渡 大辦食堂招大禍

1·毛澤東猛括共產風

為了當紅色霸主，毛更需要加快改變生產關係。1955 年毛在《高潮》按語中提倡大社，1957 年前後各地相繼出現了一批大社，但都不成功。1957 年 9 月中央指示：幾年來各地實踐證明大隊、大社一般是不適合當前生產條件的。因此，除少數確實辦好了的大社以外，均應根據社員要求，適當分小；生產隊的規模應以 20 戶左右為宜。確定後，今後十年內不予變動。1958 年南寧會議上，聽說廣西出現並社現象，毛說：“可以搞聯邦政府，社內有社”。以後正式提出並大社的主張。有關部門起草了合併大社的意見，于成都會議通過，4 月 8 日政治局會議批准後正式下達。其後各地迅速開始了小社並大社的工作，掀開了人民公社化的一頁。同時，繼南寧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地方工業產值超過農業問題後，國家經委起草文件，第一次正式提出農業生產合作社辦工業的問題，經 4 月政治局會議批准，作為中央意見下達。這使農業社突破了農業生產合作的限制。隨著農村勞動力的緊張，一些地方出現了公共食堂和托兒所及“農業大學”等，也使中央開始醞釀新的農村基層組織。

1958年2、3月間，毛曾經說，鄉社合一，將來就是共產主義的雛形，什麼都管，工農商學兵。3~4月間，毛先後同劉少奇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陳伯達談過“鄉社合一”和公社的問題，並由中央正式提出“小社變大社”的意見。4月15日，毛澤東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中說：在中國這張“一窮二白”的白紙上，“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4月劉少奇等人一起談到“公社”這個詞。5月陸定一講到，我國的鄉村將是許多共產主義公社。到6月間，一些地方遂出現了以“公社”命名的大社，並開始嘗試“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實驗。1958年6月，陸定一編成《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論共產主義社會》，語錄中提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叫做公社。

7月1日，陳伯達在北大作《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的講演，首次公開了毛對未來中國社會的總體方案，即把公社作為中國社會的基本單位。這個講演隨即發表在《紅旗》第3期上。同月《紅旗》第4期陳伯達的文章披露：毛說，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農、商、學、兵”，組織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本單元。

最先得到資訊的河南等省，7月間迅速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熱潮。譚震林副總理在河南遂平縣講到公社的好處有：“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僅僅是填飽肚子。每頓有肉、雞、魚、蛋，還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頭、燕窩、海味等，都是按需供給。第二，衣服穿著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滿足。有各種花色和品種的服裝，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藍色。將來，普通服裝僅作為工作服使用，下班後，人們就換上皮服、呢絨和羊毛制服，當人民公社都養了狐狸，那時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第三，房屋都達到現代城市的標準。現代化是什麼？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廂有供暖設備，南廂有冷氣設備。人們都住在高樓裡，不用說，裡面有電燈、電話、

自來水、無線電和電視。第四，除了跑步的選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個方向，每個省都有飛機場，每個地方都有飛機製造廠的日子也不遠了。第五，每個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經普及。”時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康生擬寫了一副對聯：“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先把人民公社這座橋樑架起來，過了橋就是天堂了。

1958年7月劉少奇在視察了北京石景山發電廠後，同工人們舉行了座談。他說：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三年就行了，明、後年就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鋼鐵、煤炭明年可以超過，電要慢點。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你們大多數可以看到共產主義……

毛澤東離開徐水縣的次日（8月5日），縣委召開全縣的共產主義思想文化躍進大會，全縣248個農業社宣佈轉為人民公社。其後各戶私有的部分農具、牲口、房屋、樹木等均轉為公社所有，生產資料人社折價款決定取消，各公社實行或準備實行工資制。

8月5日，中共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懷揣康有為寫的《大同書》來到徐水，提出在徐水搞共產主義的試點。大躍進猶如一頭野牛沖跨了傳統的一切。早在1919年，深受《大同書》影響的毛澤東，便在《學生之工作》一文裡，論及了他對“新村”的憧憬：“合若干之新家庭，便可創造一種新社會”，“新社會”裡有公共的育兒院、蒙養院、學校。圖書館、劇院、病院、公園、博物館、自治會等，每人從事“種園、種田、種林、畜牧、種桑、鴨魚”等勞作……1958年6月14日，劉少奇同中國婦聯黨組談話時說：“毛主席講過兩次，家庭是要消滅的。他提到康有為的《大同書》。”前後娶過6位妻妾的康有為在《大同書》裡主張要破除九界，即國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財產…；而且男女同居

不得超過一年。毛在“大躍進”時，多次萌生消滅家庭的主意，他和康有為一樣堅信，不消滅家庭，便難徹底消滅私有財產……為此，成立了一個由中央、省、地和縣各級一百多位幹部組成的班子，對徐水的工農商學兵、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田園化等，進行了全面的規劃，在一個星期的時間裡拿出了《關於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向共產主義邁進的規劃（草案）》，又在一個月裡發表了《中共徐水縣委關於人民公社實行供給制的試行草案》；以後又進行了比較深入的調查、研究、修改和充實，於 11 月提交中共中央。試行草案規定：全縣公民“各儘自行的能力參加公社勞動，每個人的吃飯、穿衣及生活必需品的需要，由公社有限度的、按照工農商學兵大體平等的標準計畫供應”；從 1961 年到 1963 年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

徐水縣委提出了一條口號：“我們要一步登天，達到人類最理想的共產主義！”這個縣當時平均糧食畝產不過 200 多斤，工農業總產值不過人均 130 元，人均收入大概也就是 60 元上下，連溫飽都談不上。那些書記們的馬克思主義常識等於零。他們在全縣範圍內予取予奪，取消商業，連房屋、家畜等社員個人的財產也全部“歸公”，在“徹底廢除一切私有制”名義下，將農民的家產徹底地共掉了。於是，家家砸鍋煉鐵，戶戶不再冒煙，人們都去分文不收的食堂吃飯，就連一些對外營業的飯館也不收錢了。為了根除私有制，幹部的工資停發。改為津貼費，縣級幹部每月 9 元，科級 5 元，一般幹部 3 元，勤雜人員每月 2 元。在搞得徹底的地方，家裡的箱箱櫃櫃都收為公有，可以說除了一雙筷子和一隻碗是個人的，其它的都歸公了……“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把全縣變成了一座大兵營。徐水在全縣範圍實行了“十五包”（包括吃飯、穿衣、住房、鞋、襪、毛巾、肥皂、燈油、火柴、烤火費、洗澡、理髮、看電影、醫療、喪葬等），工

資只發了兩次，就繼續不下去了。

在此基礎之上，8月間，成立了實行縣社合一的徐水縣人民總公社，在設置有計劃委員會、監察委員會、政治公安部、軍事部、工業交通部、農田水利農業部、婦女部、文教衛生部、勞動工資福利部、畜牧家禽漁業部等15個主要部門外，還成立了徐水人民出版社。與此同時，《人民日報》9月1日發表了《徐水人民公社頌》，內稱：“徐水將要發射畝產山藥120萬斤、一棵白菜520斤、小麥畝產12萬斤、皮棉畝產5000斤、全縣畝產2000斤的高產衛星。“一個蘿蔔千斤重，兩頭毛驢拉不動”。徐水的人民公社將會在不遠的期間，把社員們帶上人類歷史上最高的境界，這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國的時光……”

想必這是原本在中國當代史上名不見經傳的小縣——徐水一段最風光的日子。這風光來得如此迅猛，如剛剛還是晴空朗朗的平疇上兜頭潑來的滂論大雨，讓徐水人一下茫然不知所措；可它又如此真實，每日裡車水馬龍、黃塵滾滾，全國各地來此朝拜共產主義“麥加”的人們似過江之鯽，僅至10月底，來徐水參觀的外賓就有近千位，他們來自40多個國家。

薄一波在回憶中說，徐水縣成為“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試驗區後，所有黨的領導人都參觀了。在這些參觀人當中，如果沒人發現畝產6萬公斤小麥、2500公斤皮棉和60萬公斤山藥之類的產量是騙局的話，實在難以想像。他到徐水參觀的時候，他看出那些掛在棉桃上的棉花全是假的。他的同伴告訴他不要與這些假棉桃合影。但是，沒有人出來揭穿這種騙局。

此後，毛澤東又視察了河南、山東和天津。據新華社報導，所經之處，無不一片豐收景象，人民群眾的精神面貌也無不熱氣騰騰。毛到處發表談話：“還是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結合在一起，便於領導”；

“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轉眼間全國就開始公社化了。當時共黨認為：只要不斷地改變生產關係，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斷提高生產力；推動更大的躍進，一直把中國推向共產主義。

離開徐水後，不到十天，毛澤東提出：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例如爭地位、爭級別、要加班費、腦力勞動者工資高於體力勞動者工資等等，都是資產階級思想殘餘。“各取所值”雖然是法律規定的，但也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整風以來，資產階級法權制度差不多破完了，要考慮取消薪金制的問題。柯慶施將他的這個講話，告訴了在上海市委宣傳部任職的張春橋，後者立即寫了《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發表在上海影響頗大的《解放》半月刊上。張春橋迎合毛意，否定改供給制為薪金制的必要性，認為這種改革“保護了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打擊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傳統”。毛看後大加贊許，並指示將之轉載於《人民日報》（10月13日），並且為《人民日報》代寫了編者按語：“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因為它是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張文基本上是正確的”。張春橋從此官運亨通！

1958年8月17～30日，毛在北戴河會議上預言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將提前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並創造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條件。8月29日中共中央通過的《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要求農民提前進入共產主義，《決議》最後指出：“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

毛在北戴河會議上說：人民公社的特點，一曰大，二曰公。大，好管，好納入計畫，統一調配勞動力，這就是戰爭時期的經驗。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會

主義，把資本主義殘餘（比如自留地、自養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房屋、雞鴨、房前房後的小樹，將來也要公有。人民公社興辦公共食堂、托兒所、縫紉組，全體婦女都可得到解放。人民公社的建立，標誌著對資產階級法權的進一步破壞。毛說：“要考慮取消薪水制，恢復供給制問題。供給制比較平等。為什麼要搞工資制？這是向資產階級讓步。過去革命打死了許多人，是不要代價的，現在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幹呢？”“有人說，平均主義出懶漢，過去 22 年（指 1927-1949 奪權階段）出了多少懶漢？現在發明一個東西，要給一百塊錢，倒是會出懶漢……我不相信，實行供給制，人就懶了，創造發明就少了，積極性就低了。”他甚至把話點明：“空想社會主義的一些理想，我們要實行。”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馬克思與秦始皇要結合起來；東西調不出來，要點強迫命令。毛還說：“大概十年左右，可能產品非常豐富，道德非常高尚，我們就可以從吃飯、穿衣、住房子上實行共產主義。城市鄉村一律叫公社，工廠、大學、街道都辦公社，如鞍鋼叫鞍山公社，不叫工廠，全國就是一個大公社。”“大城市要分散，鄉村就是小城市，每個公社都將路修寬一點，可以落飛機，每個省都搞一二百架飛機，每個公社平均兩架，大省自己搞飛機工廠。”“過去不少的人認為工業高不可攀，神密得很，有很大的迷信。我也不懂工業，對工業也是一竅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業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幾個管工業的談過，開始不懂，過幾年，也就懂了，有什麼了不起！”

鄧小平在 1958 年的 9~11 月，先後赴東北和西南地區，馬不停蹄地于各地煽動躍進熱情、傳播蜃樓美景。10 月中旬，鄧小平先後視察天津、保定，曾特地指導徐水人民公社。在徐水停留期間，鄧小平對於當地小麥創新的播種方式和豐產結果予以稱許。有關公社辦工業，如建立麵粉廠、縫紉廠，鄧大表欣賞，認

為此做法“適應了大躍進解放勞動力的需要，改革了勞動組織，促進了全縣家務勞動的集體化和社會化”。此外，鄧對於“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努力學文化”的做法也甚感興趣。在四川視察期間，鄧小平途經德陽時，對該地城市規劃指示道，“要按共產主義的生活來設計佈置街坊和住宅”，早點搞城市人民公社。鄧小平說：“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形式是人民公社”。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鼓吹下，“共產風”迅速刮遍全國，在9月一個月的時間裡，全國農村就基本實現了公社化。雲南省由於有二十多個民族，其中十三個跨越國境而居，一九五八年初時入了生產合作社的農戶僅占百分之十。但大躍進一來，“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各邊疆民族無一例外地統統被下令入了人民公社。北方的內蒙古大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牧民也全都變成了“人民公社社員”。“行動軍事化”，這是1958年最時髦的口號之一，而農民一夜之間變成公社社員，恰如一個國家突然捲入戰爭，一個緊急動令就將全體平民變成士兵一樣。

毛澤東對此非常滿意。他在九月中旬對陪同他南下視察的前國民黨將領張治中說：從1949年執政起，“我就沒有感到高興過、舒服過。我在一九五五年走了幾個省份，看到農業合作化已經超過半數戶口了，我才有點高興。可是一九五六年刮起一陣歪風，說是冒進了，趕快後退，我又不高興了。到今年，看到工農業生產發展的情況，我才真正感到高興。”

1958年10月28日，山東范縣召開萬人大會，縣委書記宣佈：“1960年過渡到共產主義”，保證屆時全縣畝產兩萬斤糧食，“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個盤，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樣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11月6日，毛澤東批示道：“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也是可行的，時間似太匆促，只三年，也不要緊嘛，

三年不成，順延可也。”

1958年11月鄭州會議批評了急於想使人民公社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以及廢除商品生產、廢除鈔票等錯誤主張。批評了廢除商品、貨幣，搞統一調配勞動力、資金和產品的主張，指出在社會主義現階段廢除商品是違背經濟規律的；對農產品實行無償調撥，實質上就是剝奪農民。毛卻陶醉於搶先進入共產主義，在鄭州會議中說：“苦戰3年，再搞12年，15年過渡到共產主義。”“蘇聯的集體農莊，不搞工業，只搞農業，農業又廣種薄收，所以過渡不了”。中國的人民“公社是實行兩個過渡的產物。……是共產主義社會結構的最好的基層單位”。“如何從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如何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史達林沒有找到適當的形式，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我們有了人民公社，將加快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並且將成為我國農村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好形式。”

1958年11月武昌會議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的決議指出：在以後一個歷史時期內，仍應保留按勞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須有一個大的發展；社員個人所有的生活資料（包括房屋、衣被、傢俱等）和在銀行、信用社的存款，仍歸社員所有，而且永遠歸社員所有；社員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樹木、小農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經營一些家庭小副業。毛在的武昌會議上卻說：過渡到共產主義，我們可能要搞得快一些，“看起來我們的群眾路線是好辦法，這麼多人，什麼事情都可以搞。”不過毛要給蘇聯老大哥一點面子，即使中國先進入共產主義也不要宣佈。“我們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面前，我設想一定要讓蘇聯先過渡（不是命令），我們無論如何要後過渡，不管我們搞

到多少鋼”。“總之，一定要讓蘇聯先進入，我們後進入。如果實際我們先進入，怎麼辦？還是掛社會主義的招牌，行共產主義的實際。”在毛澤東看來，中國將在經濟建設速度上超過蘇聯，同時又為人類指出了一條通向共產主義的光明大道，只要這一切得到各同盟國，特別是來自莫斯科的認可和支援，也就等於承認了中共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袖地位。

當局以為人民公社即是全民所有制，甚至是共產主義，各地刮起了“共產風”。按標準的“衛星公社簡章”，社員轉入公社，應該交出全部自留地，並將私有的房基地、牲畜、林木等生產資料轉為公社所有。當時，所有的私有財產全部充公，不僅是生產資料，連傢俱、被褥等生活用品也被“共產”了，口號是“一碗一筷歸個人，一草一木歸集體”；人民公社辦食堂，吃飯不要錢，消滅家庭，男人女人分開集體居住，拆毀民房，以防私有制復辟。

山西也不落後，全省範圍內已入了高級社的農民，財產早已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而尚未入到社裡去的財產，如牲口、農具、運輸工具、樹林、果園、房基等也一律無價歸公，唯一例外的是當時尚屬罕物的縫紉機可折價入到公社裡。不識共產美景的農民手腳利索，在入社前夕宰了牲口砍了樹，得了票子飽了肚，正自以為得計。不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原來上頭鑒於 1956 年成立高級社時農民殺豬、砍樹的教訓，早已明文規定，自宣佈將要成立人民公社那天起，社員的財產就已經自動地屬於公社了；凡是在那天之後殺豬、宰羊、砍樹的，均屬侵吞公社財產，必須如數吐出。肉被你吞進肚裡，吐不出來嗎？論斤付錢，吃多少付多少。無權無勢，無依無靠的農民不願被吊在樹上打，只有老老實實付錢。

江蘇揚州，向有“十裡栽花”之譽，所謂“揚州芍藥天下秀”，自宋代起便有文字記載。培育名花精品，猶如創作玉雕石刻，全憑花農手藝，如今花也入到

公社裡去共產，手藝人就不值錢了。公社只關心糧食產量的數字（因為上面向公社要數字），於是芍藥園一下刨平，改種糧食，花農代代相傳，費了一百多年心血培育成的精品統統送進中藥店，當作普通的赤芍、白芍煎了湯。至於桂花樹，不管是多珍貴的品種，一概砍倒，劈成柴，送到公社食堂燒大鍋飯去了。還有盆栽白蘭花，本來也是花農的，一共了產，花農就永遠喪失了支配權，任由大權在握公社官員處置。所以名曰“共產”，其實只是農民交出自己的財產讓人糟蹋而已。

1958年11月7日，湖北當陽縣跑馬鄉黨委書記召開全村鄉民大會。黨委書記宣佈：“今天，也就是11月7日，是我們全鄉社會主義結束之日。明天，也就是11月8日，是我們鄉大喜日子。從此，我們鄉進入了偉大的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就是財產不分你我，一切按公有制的需要重新分配”。鄉領導還沒說散會，鄉民們已一哄而散，直奔鄉鎮小店。在小店裡，見什麼拿什麼。那些沒得到財物的人就聯合起來，直沖當地比較富裕的地主家。地主家裡的人趕緊把門死死堵住。但沒用，人們翻牆而入，把地主家的東西全部掏空，連地主女兒放在床頭的內衣也掠走。那些膽子小的就偷鄰家的雞狗，當場活殺吃掉。鄰家見之也不動怒，大步跑到田間割鄉里的農作物。這其中還有搞笑的事：張三跑到鎮幼稚園，把李四家放在幼稚園的小孩抱回家，說自己一直想要一個孩子，偏偏老婆生不出來。李四不是省油的燈，把張三的的老婆騙到自家屋子，鎖上房門。說是要下功夫讓這女人來喜，補回他一個孩子。財產共用，妻子輪得。這事鬧到鄉黨委書記那裡。黨委書記抓了抓頭皮，說：“孩子領養回家，只要對方同意就沒問題。但共妻之事要先慢一步，讓我請示縣領導之後再作決定。”

一些地方男女分開居住，有的地方宣佈即將進入共產主義，小孩子也不分你

的我的，只保留一條：老婆還是自己的，據說這條還得請示上級。這些當然與“消滅家庭”的想法不無關聯，也是實行“三化”即“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一個結果。最終形成了“舊社會窮人討飯還有個碗，土改以後的窮人窮得連個討飯碗也沒有了”的局面

共產風早在舉辦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和其他大型公益事業時，即已平調勞力。大躍進的序幕是由 1957 年冬季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拉開，從那時起就開始了“大兵團作戰”，即農村勞力的大規模調撥，到 1958 年 1 月在工地上的農村勞力已達到一億人以上。這種情況，到並大社後就更嚴重了。南寧會議要求地方工業“遍地開花”，到 1958 年中，全民辦工業也已開始。在隨後的時間裡，經常有大量的勞動力被調撥出去，脫離了本地的農業生產。福建一些地區農業勞力減少 1/3 左右；浙江省自公社化以來，公社和縣以上的工業企業、基本建設共調用了農業勞動力 95 萬人，還不包括冬春興修農田水利的 200 萬人；浙江蕭山縣有個 29 戶人家的生產隊，最少時只有 2 人在生產隊出勤。在湖北荊門，有的小隊只剩下一兩個男勞動力。在這種情況下，農業生產已無法正常進行。

共產風的另一方面是平調物資。公社化以後，公社成為實際上的基本核算單位，各個農業社的全部公有財產轉歸公社所有，因此公社一級享有極大的調撥權力。它不但要在大隊和大隊之間“平均分配”，也要調撥各大隊的財產和勞力，用於隨公社化而來的各種社辦工業、學校、公共食堂和托兒所、老年幸福院以及辦公樓等。

由於人民公社包含有全民所有制成分，又是“政社合一”的（這使“共產風”與“命令風”結合在一起，使一切平調都以行政命令方式下達），縣以上的國家機關也參與了對人民公社的直接調撥。據估計 1958 年全國扣掉農業社的錢可能

達到 20~30 億元之多。據 1961 年 8 月統計，幾年以來全國平調物資折款總值為 250 億元。如按當時鄉村人口計，平均每人 49 元（1961 年農民平均消費水準僅為 68 元）。據湖南某地統計，如果以三年來平調這個公社農民的財富總額為 100，則各時期所占的比重是：公社成立前為 6%，公社建立到第二次鄭州會議前為 48%，1959 年其餘時間為 20%，1960 年為 26%，也就是廬山會議以後約占平調總量一半。事後毛說：反右帶來一個高估產、高徵購、高分配。有天災又有人禍，我們工作上的錯誤，突出的是大辦水利，大辦工業，調勞動力過多。

共產風導致了嚴重的惡果。廣東 1959 年荔枝特大豐收，雖比上年超產 3 倍以上，上市量卻減少了 50%，大部分為社員分光吃光，農民滋長了一種不計將來、只顧眼前的大吃大喝的不良風氣。在湖北沔陽，河旁路邊，房前屋後，到處種的是洋薑。其實，並不是社員喜歡洋姜，而是為了對付“共產風”所使用的一個“秘密辦法”。因為種植小雜糧往往會被沒收，洋薑則可以零敲碎打，挖一點，吃一點。實際上，種植蔬菜最主要的作用是為了在大饑荒中，彌補糧食的不足，為此中共中央從 1960 年也開始提倡多種蔬菜；同時在各類農產品中，蔬菜因不是統購物件，受控制程度較低，可以較多地落在農民手裡一些。

國家對雞、豬、蛋的強購，也使群眾不願再喂雞喂豬，說“還喂它幹啥”！1960 年底恢復農村幾項“小自由”時，發還自留地，農民不要，勸農民飼養家畜家禽，農民就是不聽。1957 年以來全國大牲畜頭數連續下降，到 1961 年 6 月底僅有 6618 萬頭，相當於 1950 年的水準，其中下降最嚴重的便有山東、河南、河北、甘肅、安徽等省。

1960 中共中央在轉發的湖北省委的報告中說，湖北省沔陽縣通海口公社，兩年以來，“共產風”年年季季在刮，年年季季在處理，可是邊處理邊刮，一直

到工作隊進村，有的隊還在收自留地。刮的單位，上至省級，下至基層，沒有不到生產隊刮“共產風”的。刮的範圍，大自土地、糧食、房屋，小至鐮刀、筷子、夜壺，無所不刮。其中僅刮個人的，就有農具 35000 件，磚瓦 147 萬塊，傢俱 24900 件。生產隊以下的“共產風”，更是一陣接一陣，幹一件什麼事情或搞一個什麼運動，就刮一次，就是一次大破壞。公社化以來，某管理區全區性的“共產風”就有 25 次，最嚴重的是 1959 年，刮了 19 次。經粗略計算，每人平均損失 50 元左右，多的達到 100 元，相當於一到兩年的分配收入。

在其後發出的材料中說，沔陽縣從 1958 年下半年以來，“共產風”始終沒有停止，而且越來越嚴重。省、縣、社、隊四級，共圈佔土地 30000 畝，佔用社員房屋 4400 棟，拆毀房屋 8200 棟，刮大中小農具 84900 件，各種傢俱 170000 件，磚瓦 1887 萬塊，調騾馬 700 多頭，生豬 17900 頭，糧食 119 萬斤，其中無物可兌部分，共折款 276 萬元。群眾從 1958 年起就漸漸消極了，經常出工的不到一半；1959~1960 年繼續“拉平”、“充公”的結果，小隊把耕牛賣了，農具、傢俱也燒了不少，一個公社損失的耕畜、農具就價值 27 萬元。

幹部的瞎指揮，嚴重到難以置信的地步。公社幹部生怕把權力交下去，自己就沒有事幹，或者就會天下大亂，因而採取了“一刀切”統一指揮的辦法，全公社統一行動，要幹什麼都幹什麼。在糧食上比較普遍的問題，是征過頭糧，有的隊把種子都賣光了。

報告指出，刮共產風、瞎指揮、購過頭糧、沒收自留地的結果，嚴重地挫傷了群眾的積極性，給生產造成嚴重的損失。動不動就圈佔土地、調走耕牛、拆毀房屋、沒收傢俱，生產不能作主，分配不能到手，吃飯很成問題，這樣幹法，叫群眾那有心思搞生產？那有心思愛護公物、提高工效和細收細打？結果生產年年

下降，收入年年減少。與 1957 或 1958 年比較，一般都減少 20~30%，嚴重的達到 50%以上。

2·大辦公共食堂

1958 年 7 月 8 日人民日報報導，湖南、湖北、福建等省辦起了公共食堂，並予以提倡。

河北省徐水縣是大辦公社食堂的一面旗幟，最先提出“吃飯不要錢”的口號。全縣 32 萬人口，64000 多戶，248 個農業社；全縣共建立了 1777 個公共食堂，有 28.5 萬人到食堂吃飯，實現了全縣食堂化。為了適應不同工作、任務的需要，還建立了野外戰鬥隨軍食堂 1410 個、幼兒食堂 119 個、老年食堂 248 個。家家戶戶都把儲蓄的糧食無償地獻給食堂，如吳莊社一連的社員獻糧 1296 斤，劉花子一戶就交出糧食 500 多斤。在辦食堂方面較為消極的南張豐鄉，受到縣委批判後，第二天一天之內就建起 92 個食堂，實現全鄉食堂化。

9 月 10-29 日，老毛巡視時視察安徽舒城，發最高指示道：“吃飯不要錢，既然一個社能辦到，其他有條件的社也能辦到。既然吃飯可以不要錢，將來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錢了。”

受其影響，在 100 多天的時間內（在 10 月底不完全統計）全國農村辦起食堂 265 萬個，在食堂吃飯的農民達到 90%。11 月 10 日人民日報社論提倡，“鼓足幹勁生產，放開肚皮吃飯”。食堂在無計畫用糧的情況下肆意浪費，有的地方搞吃飯比賽，全年的口糧在二、三個月內吃完。有的地方甚至提出“有糧大家吃，有地大家種，有錢大家用”，貴州遵義縣的一些地方，沿路設公共食堂，農民一路走，一路吃，不要錢，不收票。廣東省揭陽縣的一些公共食堂，為了顯示優越性，只准吃乾飯，不准吃稀飯，不久就不得不按年齡定量。

元朝初期的異族統治，也曾經讓百姓交出過菜刀，但畢竟十戶人家還准許保留一把公用，畢竟還允許擁有鐵鍋，還允許爐灶裡往外冒煙。1958年則是徹底的，農民交出了菜刀和鐵鍋，既支援了大煉鋼鐵，又斬斷與幾千年的私有制生活方式的聯繫。可以說，私人家裡廚房裡不再往外冒煙，是中國進入共產主義的主要標誌和證明。

辦公共食堂的目的是什麼？答：人類馴服動物的最基本的手段，就是通過控制食物使它們學乖聽話。對要馴化的動物，人們用食物做獎懲，經過反復刺激，最後形成條件反射，終於能夠按人的旨意行動。人於是滿意道：這廝“通人性”了。看來，這種辦法用於人本身，也同樣見效。幾億中國人進了大食堂，果然就被高度馴化……

農民在食堂之內，他的吃飯權利卻完全攥在了別人手裡。把糧食都集中在食堂，扣飯成了農村幹部懲罰農民的手段之一，有一些農民因為被扣飯而致死。四川省的一個農村幹部在1961年被判刑，其罪名是“連續不斷扣飯，全家6口人，在一個月餓死4人”；西昌縣的一些農村幹部利用食堂扣飯懲罰農民，造成一些農民自殺。有農民因為被扣飯而殺死農村幹部，可能是考慮到被殺死者作惡在先，因此對殺人者僅判處18年徒刑。四川省資中縣有的幹部利用“連坐法”扣飯，一人不加夜班，全家扣飯。有5名小學生沒有加夜班，連累29人被扣飯。湖南省甯鄉縣一些農村幹部對勞動不盡力者也要扣飯或者一餐、幾餐不讓吃。河北省石家莊的一個村莊，全村68.9%的人被扣過飯，因扣飯導致死亡27人，逼跑42人。福建省沙縣，許多農民吃了飯不出工，因此幹部採取扣下一餐飯、甚至關押捆綁農民的做法。

官僚特權集團多吃多占成為普遍現象，使許多人餓死。當時村裡的司務長、

炊事員都是村幹部家裡的人，貪污、克扣社員口糧現象非常普遍。四川省南江縣的《平崗公社公共食堂十項管理辦法》第一條就規定：定人定量分配到戶，食堂保管，發給飯票，自己計畫，憑票吃飯，節約歸己。實際上公社書記可批條子在全社範圍內任意平調，幹部借開會研究工作為名，大吃大喝。1958年秋安徽靈璧縣的三個鄉餓死了500多人，農民們編了個順口溜：“一天吃一兩，餓不死司務長（小隊長）；一天吃一錢，餓不死炊事員”。

雲南昆明市郊區的一個村莊，全村的男人與小孩都成了“賊”，偷竊附近國營農場的田間蔬菜，因此在困難時期僅一人直接死於浮腫病。雖然大部分保了命，但是生育基本停止了。而1960年全村僅僅出生三個嬰兒，這三個嬰兒的家庭均有人在食堂工作。河北省有一個村莊，上級下撥了5760斤薯乾，被運輸和食堂相關人員吃了1520斤。

食堂工作人員成為指責的對象。在一些單位，為了防止炊事員等人多吃多占，還設立了“監廚”崗位。1960年貴州省委給中央的《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情況的報告》中指出，“國家供應的指標又被基層幹部和食堂管理人員層層扣留了。……群眾說‘不是糧食太少了，是良心太少了’。”當年河北省委提出的口號是“共產黨員進食堂，支部書記來掌勺”。1960年6月四川省委在《關於進一步辦好農村公共食堂的十項規定》中提出了“加強領導、政治進食堂、書記下廚房”的措施。食堂工作人員中，如果出身不好，很可能成為指責的目標。1958年江蘇贛榆縣有一個食堂的47名炊事員和管理人員當中有地主富農9人，為此基層幹部作檢討，並將地主富農清除出食堂。《河南省農村公共食堂試行章程》和青海省委的《關於大力辦公共食堂的指示》中規定“地、富、反、壞、右”不得擔任食堂工作。河南省新鄉地區一次就從食堂中清洗出“地、富、反、壞、

右” 1361 人，富裕中農 2061 人。這些“地、富、反、壞、右”分子作了什麼事不得而知，但是清洗的作用是讓他們當替罪羊。

在實行公共食堂期間，為吃飯而產生的家庭矛盾倍增。有一個 26 戶人的公共食堂，12 對夫妻、2 戶父子分居或分家。有的家庭把從食堂打回的飯，按各人的定量用秤分而食之。甚至兄弟之間對掉在桌子上的飯粒是誰的都要區分。當年縣委書記可能會吃不飽，但是絕對不會餓死。可是有兩位縣委書記在同桌吃飯時，因為其中一人多吃一個饅頭而吵架。

湖南一些地方的農民把公社食堂稱為“死堂”。大躍進時期河南信陽地區關於公社食堂的一首順口溜說，“一進食堂門（兒），稀飯一大盆（兒），盆內有個碗（兒），碗裡有個人（兒）”。武都縣關於食堂的順口溜是，“口號滿天響，制度貼滿牆，只好喝清湯”、“雞不鳴，狗不叫，婦女不生娃”。在這種情況下，擁護食堂的農民所剩無幾。四川一位農民回憶說，提出辦公共食堂，叫社員討論，心裡不願意，但是嘴上說贊成，怕被批鬥。雲南省保山縣將食堂化後有錢有米不交給食堂者定罪判刑，雲南大理一位農民到食堂說他的孩子餓壞了，以現行破壞罪被逮捕。陝西省有個農民因說過對公共食堂不滿的話而被判刑 5 年。

陝西關中地區的農民給公共食堂列出了 10 條罪狀：①農民不願辦食堂，幹部就開半夜會、通宵會，說服和強迫農民辦食堂。②為了辦食堂要開無數的會。③辦不起食堂，受到上級無數次的批評。④上級批，農民罵，把幹部的面子傷透了。⑤哄騙上級。⑥整群眾，既批判群眾，又讓大家餓著肚子，從事超負荷的勞動。⑦毀樹。大煉鋼鐵要砍樹，大辦食堂也砍樹。⑧砸鍋。為了辦公共食堂，把農民一家一戶的鍋都砸了。⑨佔用了牲口草料，就是用餵牲口的草來做公共食堂的燃料。⑩騙人和辦壞事。朱德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曾經用過關中農民對

公共食堂這一套生動地描述，可見是很有代表性的。

如果把那一點糧食交給農民而不是由食堂控制，儘管仍不夠吃，卻也可能多拯救一些人命。按 1959～1960 年的糧食產量計算，如果真正做到平均分配糧食，結果誰也吃不飽，但大體上也餓不死人。1960 年是我國人口損失最嚴重的時期，這一年人均糧食消費 164 斤，日均 0.45 斤，基本上維持了生命的最低極限。因此，食堂受到農民的堅決抵制。例如有人把食堂喊成“死堂”，主張“家家起火，戶戶冒煙，拆散食堂，重建私灶”，有的說“食堂好比緊身襖，穿在身上怎麼也不自在”。河南新鄉地委書記耿起昌也到處宣揚食堂卡得太死，提出要有十大自由。隨後出現了一股解散食堂的風，四川瀘州地委從 1959 年初提出食堂“可以陰一個陽一個的解散”，“讓公共食堂名存實亡”，到年中各縣市的食堂解散了大部分，其後僅有有限的恢復。山西一度只剩下 20% 的人還吃食堂。

那時，公社食堂的弊病有目共睹，毛也同意作政策調。1959 年 3 月，毛澤東在鄭州開會期間，要求召開河南省“六級幹部會議”瞭解農村情況。上萬名幹部參加會議，大到省委書記，小到生產隊長，誰都不敢講實話。唯有洛寧縣一個生產隊長李成午冒冒失失地講了真話，抱怨人民公社隨意調用農民的糧食、牲畜、家畜和財產，“80% 的勞力都被調去煉鋼鐵了，地裡沒人幹活了。……人人都擠到集體食堂吃飯，……集體食堂已經坐吃山空，沒有糧食下鍋了，就用榆樹皮、野菜湊合，吃得解不下大手，孩子哭、大人鬧，好多人害上了浮腫病，蹲到地上就拉不起來了”。毛澤東在 3 月 8 日親自接見了李成午，讚揚說：“一萬多人的代表會議，沒有人敢這麼講實話。成午同志說得好啊！看來，‘共產風’是實。”毛澤東還對在場的洛陽地委書記、文革期間曾經擔任中共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的紀登奎說：“我去年在北戴河會議上說辦人民公社，沒說叫刮‘共產風’。……

吃食堂飯，實踐證明不行，要搞人民公社，必須去掉食堂。”毛澤東還在鄭州會議上批評“拿共產主義的招牌，實際實行搶產”，批評農村的“共產風”“是掠奪，是搶劫”。他還信誓旦旦地說：“我代表一千萬隊長級幹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搞右傾機會主義，貫徹到底，你們不來跟我貫徹，我一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也要到馬克思那裡告狀。”有了毛澤東的尚方寶劍，1959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說：“糧食分配到戶，個人自願參加(食堂)，口糧依人定量，節餘全部歸己。”還指示將自留地發還社員，允許社員私養家畜家禽。

6月13日，毛澤東在他主持的一個中央會議上還表示：“食堂，保持有1/3或1/4，或1/5的人吃就可以了……糧食要分給本人，你願意吃食堂，就自願參加，不願意可以不參加。”6月底毛在韶山住了兩個晚上。他要鄉親們對他“講真話”，鄉親們也就壯膽說了些心裡話：畝產收成誇大，說實話的挨鬥挨打。一位老人質問：“現在吃食堂，搞集中，男男女女要分開住……像個什麼世道？”人們講得最多的，還是吃不飽飯。從前韶山是“一身一口，七擔二鬥”，折合925斤糧一年，現在吃糧數不到從前的1/3。這還是在毛的故鄉，享受各種特殊照顧。毛請大家吃飯，他們狼吞虎嚥地把桌上的飯菜一掃而空。當鄉親們明白表示對吃食堂不滿意時，毛澤東只好說：“食堂裡吃不飽飯，可以散了嘛。這個辦法也太費糧食。”他一離開韶山，韶山的公社食堂就散夥。

然而毛澤東心裡根本不想解散公共食堂。他剛允許韶山解散公共食堂，就在前往廬山會議的途中鼓勵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說：“食堂要堅持下來。”“不要去提倡食堂堅決垮臺，是堅決自願，堅決辦好。”1959年6月29日，毛澤東在中共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重申要積極辦好公共食堂。1959年7月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凱帆回到無為老家，發現已有不少人餓死，氣得斥罵縣委書記：“你

把人還給我！”他應農民的要求，下令解散了無為縣的幾千個食堂。1959年8月10日，為了批彭德懷，他將解散食堂的主張斥為“反社會主義”，並把張凱帆定成了“混進黨內的投機分子”，說他“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用陰謀手段來達其反動的目的”云云。張凱帆作為“反革命”進了監獄，幾億農民則又被趕進了公社食堂。全國人大委員長朱德對公共食堂不看好，認為“全垮掉不見得是壞事”，毛澤東就在廬山會議上公開對朱德說：“總司令啊，你說食堂不好，在食堂問題上我們略有分歧。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多散。”他還斷言說：公社食堂“一定垮不了，人為地解散也是辦不到的”。

1959年2~3月在鄭州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及4月在上海召開的八屆七中全會，曾經開始糾正“左”的錯誤，鄭州會議決定實行“三包一獎”（包工、包產、包成本，超產獎勵）制度，到基層演化成“包產到戶”。曾經最積極貫徹兩個會議精神的河南新鄉地委第一書記耿起昌、洛陽地委第二書記王智慧遭清算，10月12日，中共中央轉發河南省委《關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幾個典型材料的報告》，中央批示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對人民公社的本心和實質，是根本反對農業合作化，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歸根結底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是企圖使資本主義在農村復辟”。批示要求各地深入地徹底地揭發批判。次日中共中央批轉江蘇省委報告和15日批轉農業部報告，把“小隊所有制”、“包產到戶”以及取消食堂、去掉部分供給制等做法定性為“實際上是倡狂的反對社會主義的逆流”，是“反動的、醜惡的東西”，全國都必須“徹底加以揭發和批判”。於是從10月下旬開始，全國各級機關逐步進入“反右傾”整風運動，11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總政治部《關於劃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標準和處理辦法》，所定標準為：攻擊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為彭德懷辯護的；攻擊黨中央、毛

主席的；歷史上多次犯錯誤，現在又藉口批評大躍進，倡狂進攻的；“一貫嚴重右傾”、大躍進以來又有右傾言論，執迷不悟的。半年時間裡，中央國家機關重點“幫助”2714人，湖南省僅縣以上機關有4969人被批鬥；人民解放軍中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其他政治帽子的達17212人。被整的全國估計總有1千萬。如此“英明偉大”的整肅運動，保障了老毛的倒行逆施得以順利實施，所有意見都“不須放屁”了。

1959年9月30日，湖南省委農村工作部訂立整社計畫，提出開展“保衛黨的總路線、保衛大躍進、保衛人民公社的羣眾運動”。在整社計畫下，饑腸轆轆的農民白天勞動，晚上還得參加整社會議。1959年底中共中央轉發的湖南整社經驗中說，當前農村中一部分農民和幹部倡狂地反對人民公社、反對供給制和公共食堂，反對大躍進、反對總路線和黨的領導，根本上反對社會主義。他們否認大躍進的成績，說：“共產黨好吹牛皮，講大話，年年喊增產，年年都減產”；不但不相信大躍進，而且主張根本不要搞大躍進。他們認為：“公社化搞快了、搞糟了、搞窮了”；“人民公社不如高級社，高級社不如初級社，初級社不如互助組，互助組不如單幹，解放後不如解放前，好象一個倒寶塔，一節比一節差”（不久這就成為各地的普遍說法）。他們主張把土地、耕牛、農具和糧食下放到戶，把產量、產值包到戶。說什麼“供給制出懶漢”，主張予以取消，搞“清一色的按勞分配”。經常叫喊糧食不夠，說“現在一天的糧食抵不上過去的一碗貓飯”。主張“拆散食堂，重建私灶”。反對黨的領導，埋怨“共產黨為甚麼管得這樣寬，你只管收購就算了，生產、生活隨我搞”。他們不擇手段，想方設法破壞和盜竊集體財產，或隱瞞私分，或自動擴大自留地，甚至直接進行破壞。

廬山會議以後，食堂因為毛的強調而得到了發展。1959年底，全國公共食

堂再度發展到 392 萬個，比 1958 年年底還多了 50 多萬個，在食堂吃飯的約有 4 億人，占農村人口的 73%。食堂辦得最多的幾省，差不多把餓死人最多的地方都包括在內了。

3·政策逐漸變化

1959 年 11 月周恩來說：人民公社有缺點是難免的，是不到一個指頭的問題，而且毛主席已經糾正了。1960 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提出，在 60 年代的第一年要做到開門紅、滿堂紅、紅到底。1 月當全國農村數億饑民掙扎在死亡線上時，中共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會議號召：三年完成《農業發展綱要 40 條》，五年趕上英國，同時著手部署在城市大辦人民公社。會議認為 1960 年將又是一個大躍進年，形勢可能會比 1959 年更好。

1960 年 1 月 23 日，《人民日報》根據上海會議的精神發佈社論，宣稱國民經濟進入了以興辦水利，大辦食堂，並特別指明已解散的食堂要恢復，還要普遍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更為嚴重的是，會議決定生產資料要由生產隊所有向公社所有過渡，以逐步實現毛澤東的“一大二公”的理想。這樣就刮起了比五八年更為嚴重的“共產風”。

1960 年 2 月中央下文說，食堂是“必須固守的社會主義陣地，失掉這個陣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鞏固，大躍進也就沒有保證”；有的地方稱食堂為“人民公社的心臟”。

3 月 4 日，中共中央批轉貴州省委《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情況的報告》，稱：貴州省農村食堂鞏固的約 80%，不固定的約 20%。報告還說，“食堂也是我們必須固守的社會主義陣地。失掉這個陣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鞏固，大躍進也就沒有保證。”在食堂不固定的地方，才有“外逃、腫病和死人現象。”老毛批

示道：“貴州省委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情況的報告，寫得很好，現在發給你們研究，一律仿照執行，不應有例外。”接著繼續強調：“應當在全國仿行，不要例外。”要求在1960年全國農村食堂要達到現在貴州省的水準。

3月杭州會議號召：實現“城鄉公共食堂普遍化”，毛要求全國一切公社推行“用植物秸、杆、根、葉大制澱粉”。緊接著，全國各大城市紛紛興辦起人民公社。18日，中共中央轉發《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河南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與《1959年年底全國農村公共食堂情況》等三個檔，要求全國對這個極端重要的公共食堂問題，在今年內認真大抓兩次，上下半年各抓一次，學習河南、貴州經驗——繳了“徵購糧”後，收穫的糧食一律直接送到公社食堂，不得分給農民。檔還指出：“就全國來說，能夠爭取占全體農村人口80%的人到食堂吃飯，就很好了。”有些省市“爭取了90%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飯，當然更好”。

1960年春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在瀾滄江山區，看到一老太婆挎著籃子，在風雨中爬坡去食堂，渾身是泥水。農民告訴他：“這位老人只爬兩座山梁，十五裡；最遠的有三十裡，每天騎毛驢上食堂，一天忙吃兩頓飯”。閻紅彥在總結雲南餓死人問題時說：“不顧實際情況，硬要沒收自留地的結果造成了死人。”本來，自留地生產的糧食菜蔬由農民自己支配，除集體分配的口糧外，這是另一個食物來源。1959年春，毛曾在關於農業問題的檔上批示“恢復社員的自留地”，“要社員私養豬、雞、鵝、鴨，就要給社員一定數量的自留地”。但廬山會議後，毛又將早先下達的文件作廢，給農民沒幾天的自留地又收走，食堂成了農民唯一能獲得食物的地方。食堂有什麼，農民吃什麼，食堂沒糧了，農民就只好餓死。

1959年已餓死16000多人的江蘇高郵縣，縣委書記認為解救饑民是小事、學習中央文件是大事。他們於1960年4月初召開了1千多人參加的“辦好食堂

現場會”研究如何貫徹中央推廣食堂指示，結果 1960 年和 1961 年又相繼餓死了 2 萬人！高郵縣共餓死了 3.7 萬多人，其中 1.7 萬多是兒童。1959 年初南京遠郊的句容縣寶華公社就有餓死人現象，高淳縣在 1959 年餓死 1529 人，在 1960 年 1~2 月又餓死了 1171 人。省公安廳廳長洪沛霖親自赴高淳進行調查，回到南京以後，他談起高淳的情況說：“農民家家死亡，有的村莊人都死得差不多了，只剩幾個人，何等慘啊！”揚州寶應縣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中心根據地柳堡，就是著名電影《柳堡的故事》——幾乎大家都會唱的“九九豔陽天”的那個柳堡，也餓死了 414 人，占當時全大隊總人口的 1/5，超過八年抗戰和三年解放戰爭死於日軍和蔣軍的總人數。寶應縣從 1959 年冬到 1960 年 4 月，共死亡 35391 人，絕大部分為缺糧而死，全縣共餓死 4 萬多人；該縣縣城內拾到的棄嬰有 927 名，其中死嬰 153 名。富庶的水鄉江都縣，三年間餓死了 38400 多人。溧水縣，近 1.4 萬非正常死亡。常熟縣本應“常熟”，卻也死了 1.1 萬多。武進縣東安鄉，僅兩萬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就有 400 多。

昆山縣的官方報導：1959 年巴城公社斷糧最長達 60 天，浮腫病、棄嬰、非正常死亡等事件接連發生。1960 年，縣委主要領導人深入城北公社同心大隊，發現農民吃的都是瓜菜代糧；同時還步行到巴城，沿途發現大批勞力外流，新墳增多，才深感農村已處於斷糧、餓死人的緊要關頭，便立即向地委彙報，要求從速調撥糧食。按照《昆山縣誌》有關歷年人口死亡率資料進行估算，三年大饑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 9 千。1960 年 4 月江蘇省浮腫人數達 12.6 萬人；6 月，江蘇省浮腫、消瘦人數達 89.2 萬人。

浙江省永嘉縣，有一老人快餓死了，死前掙扎著半走半爬到山上，躺到早些年給自己修好的墓穴裡等死。因為他怕自己死後，沒飯吃的兒孫們沒有力氣抬他

上山安葬。足足一個星期，村民們經過他的墓穴，都可以聽到他的呻吟。他的兒孫們沒力氣把他從墓裡抬回家。

1960年3月，毛批閱山東省六級幹部會議文件，在山東的文件中有反映該省已出現“非正常死亡”的內容。毛批示：“這些問題，各省、市、區都有，如不注意處理，定會脫離群眾。”1960年安徽餓死人已成半公開的秘密，3月29日周將反映安徽死人的群眾來信批轉給曾希聖：“也許確有其事，也許誇大其辭”。周要曾希聖派人前往調查，將結果報周。

在3月30~4月8日召開的二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幾千名來自各地的“人民代表”避而不談糧食減產和餓死人的慘狀，卻爭相報告“形勢大好”，會議“奉旨”通過了進一步“大躍進”的經濟計畫。到了4月，全國農村已有4.4億人參加了食堂。4月21日，中央批轉鞍山市委《關於改造農村落後生產隊的報告》，要求全國都按照鞍山市委的經驗行事。鞍山市委把42%的農村大隊評定是“地、富、反、壞、右分子直接或間接操縱黨政領導權”。於是，全國任何地方，只要敢於不搞“持續躍進”的，就要面臨嚴重後果。

1960年6月10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上海錦江飯店舉行。6月10日，劉少奇首次針對毛的著名的“指頭論”（成績是9個指頭，缺點、錯誤僅為1個指頭）發表看法，他說“現在是一個指頭，將來可以慢慢擴大到兩個指頭，三個指頭”。毛澤東認為大饑荒主要是由“五風”造成：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權風。毛澤東提出在農村立即開展整風、整社，用階級鬥爭的方法搞“三反運動”。

1960年7月，河南、安徽等地已經出現無人村，甚至發生父食子、兄食妹現象，慘絕天倫。7月3日，毛澤東到北戴河避暑去了。這中午，中南海北門外

鐵灰色的宮牆下，竟平地一聲驚雷，冒出來一樁新中國開國以來從未有過的反革命大案：身著靛藍色工裝的湖南省郴縣青年女工劉桂陽，雙手各舉著一塊硬紙牌，木雕似地靠牆站著，一塊上寫著“消滅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餓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一塊上寫著“公共食堂罪該萬死”、“打倒毛主席！彭德懷萬歲！”

劉桂陽很快被宮牆外的便衣警衛發現，拎小雞一般拎進北門，在接待室拷上手銬，做了簡單的訊問、口供筆錄：妳叫什麼名字？那裡人？什麼成分？職業？要老實回答！

我叫劉桂陽，湖南衡南縣人，祖宗三代貧雇農。我本人是共青團員，鯉魚江火力發電廠運煤車間工人。

妳來北京，有不有單位證明信？

沒有。但我有工作證，上面有照片、出生年月、家庭成分、政治面貌等。你們搜出來看，可以打電報到我們工廠去查對。

妳的同夥哪？他們在那裡？

沒有同夥，就我一個人，連我愛人都沒告訴，憑天地良心來告狀。

妳這叫告狀？是不折不扣的現行反革命行為。

隨你們怎樣講，我反映的是真實情況。

妳既是貧雇農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團員，為什麼要跑到黨中央、國務院的門口來幹這種不要命的反革命勾當？

同志呀，天爺呀！你們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飽崽不知餓崽饑呀！不知道公社社員吃野菜、樹葉，吃觀音土……鄉下連貓、狗都餓死了，一些人家滅了門，我叔叔全家六口都餓死……同志呀，天爺呀，我從小沒有父母，叔叔嬸嬸把我養大，送我讀初中。1956年進電廠當學徒，三年沒回老家。心想大躍進、吃公社

食堂，他們日子過得好，我就粗心了。去年下半年聽講鄉下沒吃的，我還不相信。大半年也沒有寫信。今年五月請假探親，回老家看望叔叔、嬸嬸、兄弟姐妹，沒想到都得水腫病，吃觀音土吃死了呀……嗚嗚嗚，新社會，餓死貧雇農，造的什麼孽呀！我老家那村子，餓死三十幾口……我找到一個堂叔、兩個堂妹，他們還沒有死，只是偎在火塘邊，剩下一口氣。堂叔告訴，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連張裹屍身的蓆子都沒有……堂叔破衣爛衫，和我講話，只是蹲在地下不起身，我的兩個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堂叔說，妹子妳帶有吃的，就留下一點，一家三口動不得身，去山上挖觀音土都沒有力氣……我們也出不得門，沒有東西遮下體，遮下體呀，嗚嗚嗚……同志哥，老天爺！你們要關我、殺我，槍斃打靶，也要聽我把話講完，把話講完……我帶回去四包高價餅乾，只好給了堂叔、堂妹。他們接了餅乾，就當了我的面沒命的吃啊，吃啊，四包餅乾，共是六斤，一口氣吃光……邊吃邊灌水。第二天一早，我去辭行。你們猜哪樣了？堂叔和兩個堂妹久餓猛吃猛灌水，都脹死了！嗚嗚嗚，我造的哪樣孽呀！我哭天喊地，做了殺人兇手呀……我回到工廠，廣播裡天天喊三面紅旗，大好形勢。我什麼話都不敢講，講了就是反革命。嗚嗚嗚，我曉得兇手是哪個。搞大躍進，辦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們一個村子就餓死三十幾口，還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嗚嗚嗚，我一個貧雇農的後代想不通！一個共青團員想不通！一個電廠女工想不通！我就是要到北京來喊口號，我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懷萬歲！萬萬歲！

在中南海北門接待室，青年女工又哭又鬧，戴著手銬還在地下打滾，耍潑，發瘋！只好用抹布堵上她的嘴，給她加上腳鐐，交北京市公安局去收押。這湖南女子性情剛烈。湖南人從小吃辣椒長大，天不怕地不怕，革命的、反革命的，都

是一流角色，頂呱呱。

如此重大的反革命案情，北門值班室人員不敢相瞞，將訊問口供繕寫清楚，作為急件送北戴河，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于百忙中看過，寫下六個字：請少奇同志閱。正主持中央工作會議的劉少奇看了“口供筆錄”，臉色鐵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慘，湖南災情還算輕的，別省的省區呢？此件交會議簡報組印發。又：全黨幹部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會議之後，每位領導幹部都應深入農村基層，去看看那裡發生的事情。

載有這份“口供筆錄”的會議簡報，政治局常委會秘書田家英沒有呈送病中的毛主席。整個上半年毛澤東仍在號召“繼續躍進”，“全黨為 1800 萬噸鋼、6 千億斤糧食而奮鬥”。直到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前夕，他才勉強承認了全國出現大饑荒的事實。真的死人了嗎？全國 29 個省市自治區都糧食緊張嗎？死了一些人，值得這麼大驚小怪嗎？但政治局委員的絕大多數，中央委員的絕大多數、都明確無誤地向他彙報：有統計數字，各省區的農村人口在成百萬、成百萬的減少，再不是個別地區的個別情況了。之後，毛澤東的健康狀況轉差，三天兩頭犯病，不得不向中央請假治療，並說自己已經進入遲暮之年，馬克思向他招手了。他並多次委託田家英向政治局轉達他的意見：在他生病休息期間，由劉少奇同志代理黨主席職務。

劉少奇在政治局會議上說：現在代不代理不要緊，要緊的是全國救災救人，承認血淋淋的現實，立即調整政策，開放自留地，允許農民種小菜、搞小自由，允許農村集市，發放救濟糧款，發動生產自救。人民公社那些條條框框先放一放吧，誰的面子也顧不上了。既然一名貧雇農的女兒、青年工人都敢到中南海門口來喊冤，老百姓面對饑荒死亡，還怕你關他監獄殺他頭？你不讓人活，人會讓你

活？邏輯就這麼簡單。全黨同志立即行動，同心同德，千方百計度過饑荒。等到了黃巢、李自成再來補救，就晚了。

周恩來以後回憶道：在 1960 年夏天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他本人“已意識到糧食有問題，但大家不承認，結果把真實情況給掩蓋起來了”。就在這次北戴河會議期間，毛澤東召見李富春、薄一波、陳正人談話，要求全國大搞小洋群、小土群，今冬要動員 7000 萬人大煉鋼鐵，今年鋼鐵要搞到 2200 萬噸；62 年達到 3500 萬噸；第二個十年達到一億噸。毛說：“手中沒有一把米，叫雞都不來，我們處在被輕視的地位，就是鋼鐵不夠，不僅資本主義國家看不起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也不給技術，憋一口氣有好處。”更進一步明確了那個“為首”的欲望，為了“叫雞”，必須抓住“一把米”。8 月 10 日中共發出了“保糧保鋼、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在全國人民饑腸轆轆的情況下，根本無法完成 1860 萬噸鋼生產的任務，而在繼續堅持食堂制度的前提下反五風，動員幹部下鄉整社，對解決大饑荒顯然也無濟於事。

1960 年 11 月 3 日，中央下發緊急指示信指出：自 1960 年春以來各地農村“共產風”現象仍十分嚴重，嚴重地破壞生產力，特制定了 12 條緊急措施，全面反擊“五風”，允許農民保留小額自留地，允許農民經營小規模家庭副業。但“緊急指示信”仍堅持農村食堂。

1960 年 11 月，毛澤東開始修正“形勢一片大好”的論斷，改口說“1/3 的地區的形勢不好”。同時毛又說，這是因為這些地區的“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生產力。”12 月 2 日，中共中央在批轉一個報告時說：“食堂是當前農村中階級鬥爭尖銳所在”，要“把安排生活和辦好食堂提高到階級鬥爭的地位上來”。結果，多數省

份吃公共食堂的農民接近 90%，河南省進入食堂吃飯的比例竟高達 99%，顯然將山溝裡的農民也趕進了食堂。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在康保縣山區看到一個十幾歲的孩子提著個瓦罐吃力地走，瓦罐裡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訴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裡，這是給他們領的飯。”問孩子“你家不能做飯嗎？”孩子答：“不能，糧食都在食堂裡，鍋砸了煉鋼去了。”他目送那個孩子在寒風中走上山坡，翻過山梁……。因此，本來能夠在 1959 年初制止的錯誤被毛澤東又延長了兩年。

1960 年 12 月 6 日，周恩來代中央草擬文電，針對山東、河南、甘肅、貴州等幾個餓死人最多的省份出現的嚴重情況，指出：“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壞行為顯然是封建勢力在地方上篡奪領導，實行絕望性的破壞性的報復”。12 月 14 日、21 日，毛在下發軍隊的一份檔中親筆寫道：“特別是領導幹部，一定要好好讀書，好好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毛將外國左派歌頌他的資料批轉給中央和省級負責幹部閱讀。

1961 年 1 月毛在八屆九中全會說：“各地出了亂子（指‘餓死人’），才意識到這是地主階級復辟，我們對城市反革命比較有底，對農村多年未搞階級鬥爭，沒底”（完全胡說，毛就是通過農村包圍城市的階級鬥爭手段登上權力頂峰的）。毛不能接受饑荒主要是由錯誤政策造成的，這將證明彭德懷意見的正確。毛指出，全國 1/3 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中，出亂子的原因在於：民主革命不徹底，地富復辟，勾結壞幹部，實行和平演變。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是：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用紮根串聯的辦法，組織階級隊伍（貧協），開展對敵鬥爭。階級鬥爭的對象有兩類：鑽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和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

這樣，千百萬人餓死的人禍被悄悄放到一邊，全國都大搞起“民主革命補課”

運動。1961年1月，湖南省僅在一個短時期內，就有11人在運動中被打死和自殺（薄一波說，這次社教運動，湖南被整死的人有76人）。廣東省在1961年12月，全面展開“民主革命補課”，以至劉少奇需要出來強調，在整風整社中絕不能動用肉刑。全國農村補劃了大批“漏網地主”、“漏網富農”、“反革命”、“壞份子”。譬如四川大邑縣安仁公社金光大隊僅120多戶人家，新補劃的“地主”就多達15戶，其中9戶被掃地出門、房屋沒收。另外又有8戶農民被補成了“漏劃富農”。陝西長安縣1949年土地改革時劃定2700余戶地富，運動中又補劃了3271戶。鄧小平老家所在的廣安縣協興區，20多人因重新劃分階級成份而自殺。死者之一鄧紹華是與鄧小平的父親鄧紹昌同輩，算是鄧小平的叔叔。他本是個自耕農，有部分多餘土地出租。被定為“戴帽富農份子”，沒收房屋，掃地出門後，跳水庫尋了死。

1月14~18日，八屆九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羅列了各行各業存在的嚴重困難之後，承認連續三年的大躍進產生了新的不平衡，沒有認真貫徹農業為基礎的方針，基本戰線拉得過長等。繼續整風整社糾正“五風”，採納了陳雲關於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的意見，給社員以足夠的自留地，20年不改變，鼓勵全社會發展家庭副業。這次會議確定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改變了大躍進以來經濟工作上的指導方針，基本終止了長達3年的“大躍進”運動。19日接著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了陳雲建議進口糧食。九中全會後，死人現象繼續蔓延，毛大抓階級鬥爭也無法予以制止，以至出現建國後最嚴重的危機。

3月5日，毛澤東在廣州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講話，承認廬山會議反右打斷了反左，“結果造成一種空氣，不敢講真實情況了。”3月23日，毛親筆修改檔：“中央認為最近幾年建設成就是偉大的，證明總路線、大躍進、人民

公社的方向是正確的”，只是在“具體工作”方面發生一些缺點和錯誤，造成了一些損失。所以當陳毅南下時，其老部下也不敢向他直言。毛告訴全黨：“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形勢正在好轉，問題正在解決。

警衛團負責人汪東興 1961 年初給毛的《關於中央警衛團的思想情況的報告》說：“戰士董方會說：毛主席住在北京，知道不知道農民生活？糧食打那麼多都到哪裡去了？戰士許國亂說：叫人們吃野菜是不是毛主席下的命令？中南海修建工人每月 60 斤糧食還沒勁呢，農民光吃菜和白薯，吃不到糧食。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戰士張立臣說：現在農村老百姓吃的連狗都不如，過去狗還能吃到糠和糧食，現在人餓得沒勁，小豬餓得站不起來。社員反映說：毛主席是不是叫我們餓死。中央警衛團因此受到狠狠的清洗。

胡喬木 1961 年春到湖南省湘鄉縣作調查，發現饑荒和死亡情況很嚴重，於 1961 年 4 月 14 日給毛寫了一封信。胡說：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華初同志，省農業廳賀炳賢同志等人去了一次湘鄉縣委，我們原聽說臨近韶山的東郊公社、現龍洞公社死人的情況（從 1958 年 10 月到 1961 年 3 月，三個大隊死 707 人，占 13.5%），擬去該處調查，結果因道路不便，臨時到原東郊公社現陳庚公社的楠鄉大隊、七星大隊、水底大隊、石匠大隊的幾個生產隊看了一下，發現這幾個大隊的情況也很嚴重。楠鄉大隊、石匠大隊三年來死亡率都在 20% 左右，據縣委說，全縣 3 年約餓死 3 萬人，去年約 2 萬人，而以去年年底最為嚴重，全縣病人在去年年底達 7 萬人，現已減到萬餘，但我們去的地方，有些生產隊的病情尚未停止……胡喬木說：“從群眾反映看來，大多數食堂目前實際上已經成了發展生產的障礙，成了黨群關係中的一個疙瘩。因此，我們認為這個問題愈早解決愈好。

1961 年 3 月後，中央核心層領導紛紛下鄉調查。只有毛、林兩人身體不好，

無法下去。

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劉少奇化名“劉鬍子”到湖南的甯鄉、長沙兩縣農村進行了44天蹲點調查。劉先在寧鄉縣東湖塘公社王家塘生產隊呆了5天，9日到湘潭荷塘公社許家壟生產隊，12日到長沙縣廣福公社天華大隊，在這裡蹲點18天。之後，劉回到故鄉寧鄉縣花明樓炭子沖，作了7天調查，又繼續看了一些地方後，回到長沙，結束了調查。這次調查，成為劉少奇“模範執行中央決定、帶頭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的重要資歷，成為他後來在各種會議上發表講話的題材，也成為他訂政策、發批示的參照。

劉不准湖南省委派人陪同，回到闊別44年的家鄉寧鄉縣花明樓公社炭子沖（王家灣）生產隊，住在一間破舊的空蕩的豬欄屋樓上（樓下住幾名工作人員，一個國家主席，為了不給農民添麻煩，住在髒兮兮的豬場進行社會調查，這恐怕是中國史上絕無僅有的）。他成功地隱瞞住了他的真實身分。除了省委、地委的主要負責人，農民群眾只知道他叫“劉鬍子”。當地幹部怕他發現通往他老家人民公社機關路旁的梧桐樹的樹皮已被饑民剝了吃掉，趕緊做了手腳：將樹幹塗上黃泥，再用稻草裹住。但劉少奇很快就瞭解到了真相：他在一個山坡上看到一堆風乾的人糞，用小棍子撩開，只看到米糠渣子和草根，拉的都是粗纖維，沒有糧食，沒有糧食啊。挑起來也聞不到臭味。農民告訴他，很多人已經餓死，枯木沖餓死了“一、二十個”，“跑了”十幾個。劉的姐姐劉少白家中在一個月裡接連死了兩口。

晚上，點上油燈，擺上兩條大前門煙，請鄉親們座談。問寧鄉地方好山好水好田土，日子為什麼這樣苦？起初鄉親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光抽他的煙，不回他的話。還懷疑他是在上頭犯了錯誤下來的，像彭老總的同黨。後來，他朝一

屋子的鄉親們鞠躬了，賠禮了，承認這幾年中央犯錯誤了，包括毛主席在內都犯了錯誤，搞建設太性急，太過火，不管農民死活了，對不起父老兄弟，對不起大家啊！“劉鬍子”動了真情，落淚了。一屋子的泥腳杆子也跟著紅了眼睛。劉以主席之尊，在自己的老鄉親們口中也輕易問不出真話。劉問曾任過大隊書記王升平：“你說說看，食堂到底好不好？”“咯到底講得還是講不得呢？”王升平已因為“右傾”被撤了職，心有餘悸。“怎麼講不得呢？”少奇鼓勵他：“把你請來就是要你講心裡話”。“要是叫我和群眾說心裡話，食堂還是早點散夥得好，再辦下去會人死絕”。王升平提到他們的食堂“開夥時 120 人，眼下不到 80 人，死了 10 多個，跑了 10 多個，還有幾個得水腫病住在大隊臨時醫院。過去家家戶戶養豬養雞，入了食堂沒得吃，養不成，如今 20 戶人家，只剩下集體的一頭母豬，叫鳴的雞公子都沒有……”。於是鄉親們打消顧慮，開始吐苦水，吐煉鋼鐵、公社化、公共食堂的苦水。劉鬍子說，公共食堂莫辦了，各家各戶回家開夥。鄉親們說：食堂早就沒米下鍋散夥了，各家吃青菜野菜，肚子越吃越餓。劉鬍子說：你們每戶有不有自留地？可以種點五穀雜糧充饑。鄉親們說：那不是資本主義？劉鬍子說：可以試驗，救命要緊，先度過荒年再談主義。大隊支書是個女的，名叫劉秀英，大躍進的積極分子，一聽劉鬍子允許田土包給私人種；於是站在堂屋門口罵起來：劉鬍子！你跑到我的生產隊來鼓吹單幹，我派民兵看住你，再到公社、縣裡去告你！

劉鬍子挨了罵，沒有計較、理睬，繼續和鄉親們商談救災大計。女支書果然跑到公社、縣裡去報告。公社、縣裡也不好動作，只是告訴這名忠誠的女黨員：我們也不知道劉鬍子是什麼人，只聽講是中央下來的，省委有指示，不准去干擾他的調查研究。民兵就不要派了，早有省裡的便衣公安在保護他。就這樣，劉鬍

子和他的婆娘白天四鄉里轉，找鄉親們座談，拉泥腳杆子坐一條板凳打講……晚上回到豬欄屋樓上，熬著油燈寫材料，一寫寫到天亮。

“劉鬍子就是國家主席劉少奇，就是 44 年前從我們炭子沖出去的那個後生子劉衛黃……”花明樓四鄉八裡，還是傳開了悄悄話。老實巴焦的鄉親們沒有大聲歡呼，只是奔相走告：“劉主席回來了，劉主席回來了，就住在炭子沖原先集體豬場的一間豬欄屋樓上。”

劉鬍子的化名“洩密”了，也就不再迴避。他和夫人王光美步行十多裡去到他親姐姐劉紹德住的趙家沖。姐姐一手拉住老弟，一手拉住弟媳，泣不成聲：你姐夫魯瑞林餓死了，姐姐做了寡婆了，…劉的姐夫曾在劉少奇當上國家主席以後，給劉寫過一封信，講了村民們餓肚子的真實情況。信被截下來，他被扣上“破壞大躍進”的帽子受批鬥，被綁在水塘邊的樹上任北風撕打，快要凍昏過去時才放回家。劉少奇和王光美去給姐夫上了墳，心情沉重得腳都邁不動。他在趙家沖一戶一戶看望、詢問，得知去年、前年並沒有鬧什麼水旱災害，都是煉鋼鐵、辦公共食堂、建萬頭豬場作下的孽，命令農民拆屋拼居，多次搬家，最多的搬了七次！人搬三次窮，荒唐的政策折騰得農民連個安生的住處都沒有。

劉少奇走了一路，一路都聽到這樣的故事，看到令人心碎的景象。他看得出人民痛恨共產黨，痛恨他本人。在他家老屋旁的電線杆上，一個 12 歲的孩子用木炭寫了五個大字：“打倒劉少奇！”這個孩子的家裡一年餓死了 6 口人，母親死後他抱著嗷嗷待哺的弟弟到處找人餵奶，弟弟在他懷裡斷氣。那時候“寫反動標語”要當作反革命處理。劉少奇叫當地幹部不要抓他，說這“可以理解，不要怪他！”。劉還下令地方當局不得懲罰“偷”食物的農民，說：“社員這樣想，你拿得我就拿不得？你大拿我就小拿。”這等於說共產黨政權對老百姓像強盜一

樣，劉少奇的痛心疾首可見一斑。

回到炭子沖豬欄屋樓上，劉鬍子給中央發加急電報，要求中央立即行文保護農民在土改時所分得的住房所有權，房前屋後小塊土地、果木的所有權。房屋被拆了的要作經濟退賠，協助農民重建。當甯鄉縣委書記康政向他彙報說：“1959年全縣是86萬人，1960年只有77萬了，水腫餓死5萬多，外逃謀生的3萬多人”。劉少奇聞言，手中的鋼筆震驚中落地。他指示寧鄉縣委和花明樓公社黨委：不要替我搞什麼故居了！讓住在草棚裡的鄉親們搬進去，能擠進多少戶就擠多少戶；甯鄉全縣的水腫病人一律進醫院治療，湖南全省都可以這樣做，國家撥專款辦這件事，總之要把死亡數字降下來。他探望了在花明樓公社醫院裡的水腫病人，對大家說：“四十年沒有回過家鄉了，沒想到父老鄉親們今天的生活這麼苦，沒想到解放十多年了家鄉還是這麼貧困……看到這些，我心裡很難過，我對不起大家，對不起各位父老鄉親呀……各級幹部都有責任，主要責任在中央，中央責任由我承擔。要把這些教訓刻在石碑上，子子孫孫不要再重犯。”他哽咽得說不出話來，低低地向大家鞠了一躬。

1961年4月劉少奇加大了政策調整的力度：同意陳雲建議，從國外緊急進口糧食，以舒緩空前嚴重的糧食危機；支持陳雲有關減少2000萬城鎮人口的建議（從1961年初到1963年6月，兩年半內共精簡職工約2000萬，減少城鎮人口2600萬），以減輕國家對城市的沉重負擔；主持罷免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現象嚴重省份的黨委第一書記的職務。

在這先後，朱德、陳雲、鄧小平、彭真等人也都回到了北京。和劉少奇一樣，帶回了各自調查所得到的農村災情及其救助辦法材料。基本都傾向解散食堂。

周恩來在邯鄲調研一周，有一位農民當面對周說：“司務長、炊事員多吃點，

他們的孩子老婆爹娘老子多吃點，幹部再多吃點，還能剩幾兩”；“再吃兩年大鍋飯，連你們也得餓死了”。他被周恩來稱為“第一個敢講真話的人”。5月7日周就食堂問題向毛電話彙報，建議解散食堂。但毛卻不在周的電話彙報記錄上明確表態，只是批示轉發下去，供各地同志參考。朱德在陝西、河南、河北調查後，於5月9日給毛寫信，說明食堂有“五不好”，並告毛，這三個省的省委均主張開放自由市場。5月10日，鄧小平、彭真就北京郊區的調查結果向毛寫報告，表示基層幹部和農民均主張取消供給制。1961年5月，劉少奇在他老家湖南老家對鄉親們說：“中央只曉得多征糧，搞得下面沒飯吃，家破人亡”。5月11日，劉少奇在湖南老家給毛去信，強烈要求解散食堂。5月13日，鄧子恢向中央送去報告，主張停辦農食村食堂，擴大分給農民的自留地。5月16日，毛收到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的報告，該報告建議解散公共食堂，將經濟核算單位由生產大隊下放到生產隊。5月17日，副總理李先念給毛澤東寫信說：“目前國家糧食庫存實在挖不動了，群眾的底子也空了，餘糧區、缺糧區都很緊。幾個著名的高產區、餘糧區實在調苦了，農民的生活水準大為降低。”

毛遂在五月下旬開始的北京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退讓。他承認：“我們有時也是唯心主義的，例如食堂，沒有調查……沒有聽取群眾的。”5月24日，劉試探性地提出“現在，是不是要提出反‘左’的口號”？毛未同意，但劉的語言愈來愈尖銳。5月31日劉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第一次講“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才於1961年5~6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正式同意，是否參加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1961年6月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規定，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社員口糧分配到戶。

1961年7月17日，劉在瀋陽說，“三面紅旗可以讓人家懷疑幾年”。7月

19日，劉在哈爾濱又說“有人懷疑三面紅旗是可以理解的”。8月28日，劉在廬山會議上插話，提到“整個國家要破產、垮臺，國民經濟要崩潰”。“如果搞不好，我們要跌下臺”。

1961年，河南的吳芝圃、山東的舒同、甘肅的張仲良、青海的高峰等皆被劉少奇免職調作較次要的工作。劉甚至提出對一些罪行嚴重的地、縣負責幹部應加以逮捕法辦。

與此同時，毛澤東在準備反擊。在1961年9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就很不喜歡聽人們老是談大躍進的問題，曾很不耐煩地說：“錯誤就是那麼一點，有什麼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錯誤？人不犯錯誤，天誅地滅。”1961年12月29日，毛批轉錢昌照等歌頌農村五穀豐登的詩，以說明農村出現的一片繁榮景象。直到1961年的“十二條”和1962年初的“六十條”草案，中共還在堅持辦好公共食堂，儘管中央派出的幾個調查組都帶回了農民強烈要求停辦食堂的意見。到1962年6月修正草案時，才放棄了公共食堂這個“共產主義的萌芽”。

第 113 節 四川餓死 1.2 千萬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杜牧的《阿房宮賦》訴說：四川的森林在秦皇時代曾遭過一次大難。2200 百年後四川的森林又一次遭難，焚燒的木材換來的是無數毫無用途的鐵疙瘩。1958 年，千萬名四川青壯農民被公社調到有鐵礦的地方，用人力車、雙肩挑的辦法將礦沙自百裡外弄來，日以繼夜地燒。資中縣本是林海，一個“大煉鋼鐵”就把許多山頭搞禿了。鄰縣的縣委書記不肯為煉鋼毀林，被撤了職。川西平原銀廠溝，為了煉鋼砍伐了整整三萬畝竹林。1958 年全民大煉鋼鐵，對森林、竹木、山坡野生植物進行毀滅性的“全光”砍伐，引起了氣候的惡變；水蒸氣的大量蒸發，雨量的調節失去了平衡，造成連年乾旱。

1958 年大鬧深翻，把多年施肥耕種得很細膩、滋潤的熟土翻到了底下，又把底下帶沙石的瘦劣、乾燥的死土翻到了地面，土質變壞，農作物更經受不了乾旱。又過了 20 年，大自然的懲罰來了。一場大雨降臨 9/10 為山地的四川，沒了森林，山洪一瀉千里，半個四川變成澤國，房屋倒塌，人畜傷亡。貌似天災，實為人禍，禍根就是 1958 年的全民砍樹。

李井泉在全省搞“萬斤畝”運動，明明是假的，卻不准懷疑，誰懷疑誰挨整。他在全川硬性規定必須放幹冬水田種小麥。結果水放不幹，造成小麥播種時積水歉收。第二年春天田中無水，秧又插不下去，水稻也大幅度減產，兩頭失著。糧食減產了，他不糾正自己的過失，還要在鐵路、公路、交通沿線搞所謂的“高產路”，把遠離公路的人力物力畜力肥料都集中在“高產路”沿線做給人看，造成了新的“一平二調”。他還大搞“一個樣”，規定拉繩插秧搞密植，無論山上山下、平壩丘陵，栽種收割都要一個樣。這樣瞎胡搞糧食能不減產嗎？

毛澤東的秘書、成都人田家英聞說成都郊區放了顆“畝產稻穀二萬四千斤”的大衛星，於 1959 年初率領一個工作組到那個公社調查，弄清了真相：糧食畝產只有幾百斤，上報時吹了牛，上級要征糧，公社將本應用作農民口糧的稻穀拿去湊數，公社食堂只有清湯稀飯給農民填肚子。1959 年 7 月廬山會議前，從武漢到九江的船上，田家英對李井泉說：“現在可是有的地方餓死了人”。李井泉滿不在乎地答道：“中國這麼大，哪朝哪代沒有人餓死！”

1958 年四川非正常死亡的人數超過了一百萬！四川本應反左，然而，四川的“反右傾”運動規模最大、時間最長、手段最惡劣。李井泉廬山會議後回四川召開省委大會，傳達廬山會議精神，竟不把中央已將彭德懷定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的決議告訴與會者，而是把彭德懷的萬言書交給不明真相的幹部，讓大家

表態，結果許多幹部中招，說他們與彭德懷的看法一致，也認為大躍進政策失誤。待白紙黑字記錄在案，李井泉才鐵青著臉將中央決議拋出來，當場就有發了言的幹部嚇昏過去。結果，發言支持彭德懷的幹部全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在全國反右傾運動中，四川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幹部也最多。

“反瞞產私分”是導致數千萬人餓死的關鍵一步。當時人口 7 千萬的全國第一大省四川是個典型。四川 1959 年實產糧食 1582 萬噸，可是在“反瞞產”過程中“撤換了大批堅持實報糧食產量的幹部……‘查’出大量並不存在的糧食”，於是省委公佈說產了 3500 萬噸，結果國家徵購數高達 49%（1958 年以前平均每年僅徵購 31%）。剩下給每個農民的糧食只有 139 公斤，比全國農民平均留糧數低 1/4 以上。去掉種子、飼料糧後，口糧已所剩無幾。

1959 年秋四川大規模向農民搜刮糧食；亂抓人捕人，把反對的人任意判刑。仁壽縣書記讓民兵抽打公社幹部，逼問“把糧食放到哪裡去了？招！”幹部們吃不了皮肉苦，只得胡亂報個地方，說藏了多少糧食。仁壽縣餓死了 20 萬人。宜賓市在“反瞞產”運動中捆打了 2500 多名基層幹部，將農民的平均年口糧壓得只剩 100 餘斤。結果 38000 農民餓死，差不多 1/4 的農民死亡。宜賓市就發生了將小孩騙到家中，整死煮熟後作為兔肉到街上賣的事。一直到 1961 年上半年，四川還在各地大搞反瞞產私分，抄家抓人。

紀希晨說：四川是個糧食調出大省，1950 年代中期平均每年調出 32.24 億斤，三年“大躍進”放衛星、創高產，大話說過了頭，又連續三年減產，比 1949 年還少 30 億斤，但糧食外調任務有增無減。1960 年外調糧增到 68.4 億斤，比過去增長一倍以上。四川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繼續大量往省外調糧，僅 1959 年至 1960 年三年就外調 157 億斤，幾乎相當於前五年外調糧食的總數。1958 年

四川人均佔有糧食 630 多斤（包括種子、飼料和工業用糧），1959 年為 512 斤，1961 年這個數字下降到 260 斤。此外，上調的糧食裡面還有一部分是寶成鐵路修成前邊遠地區運不出去的死角糧，是從萬縣等地調了一批民工用人力去背出來的，而那些地方的人民更加貧困。情況如此嚴峻，李井泉卻繼續欺上瞞下，硬繃面子，狠心克扣群眾的口糧。當時，四川城市居民的供應，每人每月大米 9.5 公斤，幹部 11.5 公斤，兔肉 100 克，菜油 100 克。農村社員每天的口糧由公共食堂控制，一般是老秤（16 兩為 1 斤）的 4 至 5 兩原糧（即穀子），打出米來只有老秤的 2 到 3 兩，折合新秤只有 1 到 2 兩米，城裡居民每月供應 2 兩肉和糕點，農民根本就沒有。這麼低的標準，有的地方還不落實，只有空指標沒有糧食。1960 年 7 月 1 日，省委突然一道命令宣佈糧票作廢，把老百姓苦苦積攢下的 4800 萬斤糧食化為烏有，按供應口糧標準另發新票，這種做法在全國絕無僅有。城鄉人民手中糧食蕩然無存。餓死人是註定的！

由於征了過頭糧，國家糧庫告罄，春荒沒有返銷糧，農民只好餓以待斃；城市普遍餓飯，老百姓怨聲載道。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省（包括重慶）1960 年底比 1957 年全省人口減少 1000 萬。1957 年的《戶籍年報》上，四川全省人口是 7215.7 萬，1960 年底全省人口總數是 6236 萬，相差正好約 1000 萬[真實的數字為 1250 萬]。也就是說，每 7 個四川人就死 1 個！

1959 年曾經宣佈糧食要平均畝產萬斤的富順縣，餓死 10 萬餘人，每 7 人中就死了一個。

50 萬左右人口的隆昌縣，一年多時間就減少了 1/4 的人口。

1958 年 3 月，毛澤東在成都主持會議、發動大躍進時，曾興致勃勃地驅車到灌縣都江堰參觀，感歎道：“灌縣是個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喲！”都江堰已造

福人民兩千多年，為了大躍進，竟在它上游近旁又修了一條大壩。大壩造完才發現那是水利破壞而不是水利建設，結果只好再拆除。就在這自古以來從不曾被饑饉光顧的好地方，餓死了 4 萬多人。

灌縣蒲陽公社八管區三隊潘素華，女性，現年 41 歲，地主成份……51 年丈夫病死，為逃避群眾改造，52 年便與貧農唐前武結婚，婚後夫妻感情不好……3 月 16 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發覺，管理區具棺埋葬。當晚其妻潘素華以假悲之情，叫社員埋淺點，回家後將菜刀磨得鋒快，當晚乘夜靜更深，帶上鋤頭、菜刀等物，把墳墓挖開，將頭、四肢砍下，並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軀背回家中煮熟自食外，還假以熊骨出售，以 1.5 元一斤，共賣了 11 斤 12 兩……事為食堂事務長黃榮太覺查，並在家中查出手、殘軀及腸、骨等……鑒於潘素華抱有深入骨髓的階級仇恨，有計劃、有步驟地下此毒手，為了及時有力的打擊敵人，已將潘素華依法逮捕。丈夫死了，妻子將屍體挖出來吃，這本是饑荒造成的慘劇。但因為妻子曾是地主的寡婦，丈夫是貧農，就成為有計劃、有步驟的階級報復，這是當時流行的推理方式：階級成分決定行為動機，似乎除此以外他們連人的基本需要都不存在。

崇義公社 3 管區 2 隊富裕中農周玉光，女，現年 39 歲。解放前男人外出當兵病死，周對現實極為不滿，資本主義思想嚴重，不願走合作化道路，直至公社化後才入社……3 月 16 日下午竟將該隊杜之田已死兩天的小孩（兩歲多）從埋處挖出，砍去頭部、四肢並將肚腹挖出丟在河裡，將身拿回家煮吃……”因為能找到政治原因，縣委才可能向地委報告。

成都市 1959-1960 年連續三年出現人口負增長。人口死亡率在正常年景為 0.1%左右，而 1959-1961 年為：1959 年 3.87%，1960 年 5.27，1961 年 2.7%。

從縣區統計看，1957 年為 4315005 人，1961 年減至 3777371 人，減少 537634 人，減少 12.46%。連續三年出現人口負增長。但成都畢竟是四川的省會；不少地處邊遠的鄉下，饑荒比成都更為嚴重。

瀘州專區這樣的事：一個在外地讀書的學生放假回家，一天半夜聞肉香，又聽隔牆有咀嚼之聲，從牆縫偷看，見父母正狼吞虎嚥，次日發現弟弟沒了蹤影，回到學校便瘋了。

四川某縣東陽公社五大隊第一生產隊共 82 戶 491 人，僅在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11 月期間，就虐殺並吃掉 7 歲以下的女童 48 名，占全隊同一年齡線出生女童人數的 90%，83% 的家庭有吃人史。該隊會計王解放說，“59 年底，公共食堂無糧下鍋，經常變相斷炊。所謂變相斷炊，即灶房只敞開供應白開水，而把從社員的牙縫裡強制節餘的渡荒救命糧扣下來，供黨員幹部們夜半三更時享用。因為群眾垮了幹部不能垮，否則就失去了的主心骨。

按當時的政策，公共食堂之外的私自開夥屬違法行為，所以幹部們半夜填了肚子，還肩負著巡邏的重任，要保證家家房頂不冒煙——如此“堅壁清野”持續了一年餘，而唯一的熟食來源公共食堂又名存實亡，廣大群眾只好放棄生產自救，滿山瘋轉，撈著啥吃啥。

“樹葉、樹枝、草根、野菜、地菌，後來連整張草皮也爭相恐後地鏟回家。覓食中毒的青壯年居多，口吐白沫，面帶土色，有的咽氣時還發出‘哞哞’牛叫。連蚯蚓和地蠶也成了稀罕美味。四川的社員，普遍嘗過觀音土，餓瘋了的人們在生死關頭用它充饑，一撮泥一口水，兩眼翻白地仰脖數次，肚皮就沉甸甸的，並且越來越沉，終於，餓轉化成痛。當人們抱著肚子，倒地打滾、痙攣，有效的救治方法就是灌服超量瀉藥：生菜油，桐油，最厲害的是含毒的蓖麻油，化泥的同

時也化胃腸粘膜，令你最終走向脹死的反面——瀉死。儘管如此，觀音土仍是寶物，它帶腥甜味，進口感覺似乎比鋸齒草還要好些。

“去年被掀掉的灶台原地，膽大包天的莫二娃又掘了口地灶，平時用石板扣著，要偷煮東西時才挪開——他這次煮的是自己的親生么女，3歲的樹才妹。當鍋用的臉盆四周，到處是小拳頭大的肉砣砣，…我急忙尋根繩來捆莫二娃。話音沒落，莫二娃噉的一聲，抓了一砣好肉就塞口中，估計是小腿肉，因為我們卡脖子撬開他的嘴時，那牙縫還嵌著豎條的瘦肉絲。既然做老子的開了虎口，這一窩野種就瘋迷了，當我們的面，一人搶一砣肉啃。唉，我們三個人六隻手，揪住這個溜那個，邊躲我們邊撕肉吃，還把耗子一樣尖的嘴殼戳進去，滋滋吮骨油。待把這男女老幼五口綁成一串，押到大隊時，天已大亮。”

溫江彭縣：1959年3月27日，某村婦女陳慧芳從十幾裡外的山上采野菜回家，煮熟後準備讓家裡的老人先吃。等她從裡屋把老人扶出來時，發現煮好的一鍋野菜已被其9歲的大女兒吃完，女兒因湯湯水水脹得太多，難受得在地上打滾，氣憤中陳慧芳當即將大女兒掐死，然後肢解煮食。法院判決書認定該陳慧芳對社會主義大躍進不滿致人死亡的行為構成反革命殺人罪，判處死刑。此案在審訊人員問犯人：“為什麼對自己的親生女兒也能下此毒手？”時，該犯理直氣壯地回答說：“她把我們一家救命的東西都吃光了，那我們就只有吃她了。”1959年9月13日，某村富農之妻余氏，妄想復辟變天。當發現門外路過的小女孩趙豔（11歲，村民趙長東之女）時，將其拉入屋內，掐死後肢解燉煮，鍋內溢出的異味引起過路的一個民兵的警覺，將余氏當場抓獲，余氏反革命氣焰極其囂張，膽敢對民兵說：“既然都煮好了，就讓我吃一口嘛，反正我都快死了”。其判決書最後說：“該犯犯罪情節十分惡劣，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故以反革命殺人罪，判處死

刑。”最高法院辦公廳郭副主任問溫江中級法院吳副院長：“這類案子還有多少？”吳答：“初步統計有 27 件。”“這類案子怎麼辦？”郭回答：“我們只有帶回去（指帶回北京最高法院）研究處理，現在不要動。”

地處成都平原的簡陽縣，可不是什麼窮鄉僻壤。歷史上號稱“天府之國”的成都平原，豐饒富足的程度，不讓於江南。饑荒時期，簡陽縣的人口由 120 萬左右下降到了 80 萬左右。該縣石盤公社六合大隊共和生產隊 1958 年轉公社時為 118 人，到 1962 年 11 月只剩下 58 人，死去了 50%以上。石盤公社大石、邊界兩隊，1958 年轉公社時人口為 246 人，到 1962 年 11 月份，只剩下 132 人，死去 46.47%。主勞 80 餘人，只剩下 20 餘人，死去 75%。其中邊界生產隊主勞為 60 餘人，只剩下 8 人，死去了 89.98%。兩隊派去修水庫的勞動力 40 餘人，只有 2 人活著回來。普安公社人口由 12000 人左右下降為 6900 人左右。青龍公社的人死了 40%以上；有個居住 20 多戶人家的大院子，人全部死光了，院子也全部被毀了。有人說：“過去給地主幹活，幹不到這麼多，肚子還吃得飽飽的。現在是什麼人民公社，是要人民死的公社。”養馬區火盆公社第五大隊新民生產隊，在困難時期 20 多個主勞幾乎死光……剩下的盡是些老弱、婦女、兒童。缺乏男勞力搞生產，搶種搶收時節十分困難，只好通過上級統籌調派別隊的勞力去支援。簡陽縣城邊的橋上，趕場天有用土鉢鉢裝著綿條條帶黃色的熟肉片賣，其上面灑了海椒面，鉢邊擡著一雙筷子，賣者高叫買瘟豬兒肉，三角錢一片。社員講那是在賣死人肉。還有些人擺地攤賣的舊衣服，也是從死人身上扒下來的。

同在成都平原，與灌縣為鄰的崇慶縣，也死了約 3.5 萬人。“餓”犯忌，“死”更犯忌。好象做了見不得人的虧心事，人們默默無言地忍受饑餓，悄無聲息地死去。連掩埋工作也是偷偷摸摸進，幹部唯恐被追究責任，不得不用恐赫、打罵的

辦法封社員之口，除非上面派人調查，絕少有人敢主動反映實情。在來不及組織人安埋死人的情況下，有的就下令將屍體扔到鄰近的社隊，嫁“媽”於人。需要說明的是，在死人最多的 60 年冬春，極少有反映死人問題的資料，大部分情況是在 60 年底到 61 年初整風整社運動中揭發出來的，而當時的資料，又對死人的原因作了很大的歪曲，將其統統歸結為“階級敵人”的破壞和幹部的違法亂紀行為，沒有（或者說不敢）從路線政策上找原因，甚至不敢提“餓死”二字。

崇慶縣五江公社十六管區的一分材料說：“59 年臘月社員朱克倫因病不能堅持積肥工作，向隊長粟某請假未准而哭了起來，當即被粟發現，晚上召開會議要朱講哭的道理，朱被嚇得屁滾尿流，粟即以隨便屙屎屙尿，有辱公共食堂為名，將朱打倒在地，亂踢一陣，並在嚴寒季節罰站 3 個鐘頭。朱克倫因此得病臥床不起。60 年正月 14 日朱到食堂秤米時，又被粟以樣子“襍垮垮”打了一頓馬鞭子，這樣朱便一病不起，於 60 年 2 月 24 日身故。”“1959 年冬月初四，社員粟子明，因在田裡拿了斤半紅蘿蔔被粟××當眾打了幾個手心，並將粟子明推到柑子樹下跌傷腰杆……冬月底因掃食堂走遲了一步，又被粟××打了一頓，以後病勢日漸嚴重，于臘月 29 日死亡。社員粟蔣氏（70 多歲）因遲到食堂一步，未趕上開飯時間，被粟××打了幾子，隔 3、4 天即死去。”

有關死亡的資料往往只能從幹部違法亂紀的材料中反映出來，恰恰說明當時對死人情況掩飾之嚴。事實上，幹部打人罵人的現象合作化以來一直存在，現在則達到了高峰。反右傾的結果，是使一大批正直的幹部被打倒，取而代之的是所謂立場堅定的“積極分子”。他們鑒於前者的“教訓”，面臨來自上面的高壓、下面極端惡化的現實的多重壓力，乞靈於粗暴惡劣的方式支撐局面，如果他們還想“幹”的話，恐怕拿不出什麼辦法了。

邛崃道佐公社第二書記楊樹樓，親手打過的社員有 66 人，打人手段有捆綁、吊打、逗瓜、打手心、扯耳朵等等，最具特色的“逗瓜”是數人圍住一人推來推去。管區分支書記朱正林在黨員大會上被“逗”後幾天不能出工，女社員鄭本蘭在鬥爭會上被“逗”得“屎尿流了滿褲子”。社員吳天清等 3 人到法院告楊打人，楊便把他們打成“反動小集團”弄到大會上鬥爭，並當場宣佈“管制勞動”。楊因為“工作有能力”，60 年 10 月調太和公社升任第一書記。有楊書記帶頭，全社幹部打人成風，最厲害的是三管區“當過偽軍”的主任汪齊松。據說該管理區二中隊 43 戶社員，被他打過的就有 40 戶，其中 6 戶全家老少人人被打。十二歲的女孩汪木林撿豆子吃，被汪一腳從屋裡踢到屋外，又提起扔到田坎上摔死。社員汪齊青偷了兩把葫豆，小隊長嚇唬他“等汪齊松回來再說”，汪齊青嚇得上了吊。群眾見了汪齊松“就如老鼠見了貓”，小孩哭時只要說聲“汪齊松來了”，馬上就要住聲。據工作組的調查，被汪齊松打死的有 5 人，打後 1~2 月內死的六人，3 個月後死的 11 人，打殘廢的 2 人。

楊樹樓、汪齊松違法亂紀東窗事發，是因為有人寫匿名信告到省裡。經省公安廳和縣委工作組在道佐公社三管區調查，證明控告“基本屬實”。但把道佐公社 3 管區驚人的死亡情況，歸罪於楊、汪是違背事實的。“全管區 58 年 11 月建立公社時有 840 人，到 1960 年底出生 19 人，遷入 11 人，應有 870 人。大規模的死亡從 1960 年 2、3 月間開始。其時全管區五個食堂全部斷糧，死人之慘烈，已到活人無力掩埋死人的地步。喂牛的老年人汪齊茂、汪楊氏夫婦死後擺在床上四五天，汪齊松命 3 個社員將屍體埋掉，3 個社員將屍體拖出來扔到一個露天空糞坑裡，直到爛成一堆白骨也未掩土。社員汪齊洪、廖文蘭（女）等六人死後，屍體扔在離馬路幾丈遠的土坡上，路上行人舉目可見，被成群的老鴉啄食一盡。

3、4 月份，連到倉庫運口糧的勞力都難找了。幹部派工，社員說：“我都不曉得哪天死，幹一陣又怎樣，死了還不是給野狗吃”。年底工作組統計，全管區死亡 262 人，外逃及不明生死的數十人，尚存 516 人，較公社化初期減少人 40%。”

楊樹樓十月份升調，匿名控告信 11 月份發出，可見楊在任時沒人敢告，縣上對楊的印象不錯。事實上，這只是冰山的一角，楊、汪不過是倒楣鬼罷了。死人是普遍現象，地、縣一級大部分領導幹部對死人的真正原因心中有數，除非形勢所迫，不會追究基層幹部的責任。暴露了真相他們自己也沒有好果子吃，這是各級幹部的共同心理。

基層幹部處境最難。完不成徵購，說糧食不夠吃要挨整，餓死了人還要挨整。事情敗露，上面推下面，他們毫無推託餘地。面臨大規模死人，除了竭盡全力掩飾，別無選擇。溫江縣清平公社社員李方平餓得奄奄一息，縣委檢查團下來檢查生活，管區幹部怕他走漏風聲，便把他關進保管室，關了 3 天，生產隊長報告說李已死，管區幹部下令“死了把他掩埋算球”。社員張紹春薺油菜餓倒在田頭，隊長以為他死了，趕快挖了個坑想把他埋了，埋到一半，張醒過來，大叫“活埋人了……”嚇得隊長扔掉鋤頭就跑。

社員挨打最常見的原因，一是不出工。餓得半死不活，哪有氣力出工呢？二是偷。所有能下肚的東西都屬於“集體財產”，一動即偷。有人認為偷集體的東西不算偷，既然共了產，一切東西都是大家的，“公社就是我們家”。拿別人的東西為偷，拿自己的東西怎麼是偷呢？在饑餓的煎熬下，“偷”在道義上的意義已經不存在，真正的恐懼是被抓住後所受的折磨。基層幹部收拾人最常見的手段是“開會”和“扣飯”。開會時，除了皮肉之苦，更是一種當眾的凌辱，“人的尊嚴”掃蕩殆盡，使你覺得不配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扣飯是甚於一切的懲罰，

幾乎是判你的死刑。由於懼怕這類懲罰，一些人寧肯自殺。

1958年3月16日，毛曾經視察過郫縣紅光合作社。“紅光社，開紅花，毛主席到了我們的家。”這是當時郫縣乃至全四川的學童都得會背誦的歌謠。可是兩年以後，就是這個紅光社，人口竟減少了1245人！占該社人口的31%。多少唱過《毛主席到了我們家》的學童，成了毛澤東人禍的犧牲品，活活被餓死！1959年9月，郫縣靈聖公社（原屬崇寧縣）報告當月二號發生的兩起自殺。一樁是金星管區四中隊37歲的王××，“因此人平常說了些壞話，說食堂糟糕，幹部做事不公道，鬧糧食吃少了等等”，當晚幹部通知他到食堂開會，他沒有去。隊長李××親自跑去喊他，看到他在廚房站起的，喊他數聲，不見答應，一拉他一下，人就一轉，把隊長嚇跑了。一喊群眾來看時，才知道他吊死了……另一樁是火花管區三中隊32歲的婦女易××。報告說，當夜某社員從食堂吃飯回家時，發現茄子地裡有人影，就問“是不是偷茄子的？”不見答應，就跑去一看，發現是易××，又在地邊的慈竹籠頭發現了她偷的茄子，於是將她弄到食堂去。“眾人七嘴八舌說綁起來，她要去解手，他們就等她去了，去多一陣都未見轉來，大家去找四處不見人……第二天早晨去問她男子，說未來過，到吃早飯李仙橋來人報信說她淹死了，這時才知道她畏罪自投江水而死了。

1960年10月，省委監察委員會下放金堂竹蒿區的幹部，報告三起將偷竊者打死的“令人髮指”的罪行。10月18日晚，石佛公社勝利管區社員陳××，男，31歲，偷了轉龍公社三管區兩窩花生吃，被“社員”用亂棒活活打死，然後，將死者捆綁抬到石佛公社地界。10月10日晚，隆盛公社三管區社員陳××，貧農，40歲……偷了本管區六隊花生65顆，被正在巡夜的幾個社員發現，當即被王××從治安員手中奪過步槍，將陳打死。8月14日晚轉龍公社二管區社員陳

××，62 歲，去石佛公社勝利管區偷了包穀 40 多個，被看守包穀社員拖回食堂，用亂棒打死後，抬到轉龍公社地界上……

對付偷竊，發展到草菅人命的地步。1960 年 5 月 23 日深夜 12 點，崇慶縣廖家公社兩社員在本隊洋芋田邊捉到“小偷”一名，捆綁至公社審問，發現該小偷“言語異樣”，且手上無老繭，“即認為是特務、流竄犯”，又押解至公社農場“吊打審問”，此人任憑打罵，再不開口說話。24 日下午，公社幹部下令將其反綁雙手，用槍押解至縣公安局，半路上，此人幾次倒在秧田中“打滾不走”，最後走到一條河邊，縱身投入水中。押送者追到河邊，即對準開槍射擊，子彈從左背穿出前胸而死。押送者向縣公安局報告“押一人犯跳水淹死”，縣公安局不調查追究。幾天之後，設在元通鎮的四川省革命殘廢軍人休養所到縣公安局聯繫，稱該院有一名叫廖思忠的“神經病患者”去向不明。經查證，正是那個被擊斃的“小偷”。這個休養所便是當年聞名全國的“榮軍學校”，收養朝鮮戰爭中的殘廢軍人。廖思忠幸好是“神經病患者”，否則他會為沒被美國鬼子打死，而死在同胞的槍口下不得安息呢。1961 年崇慶縣開展了七天的突擊“治安運動”，對 909 名有小偷小摸行為的人進行鬥爭，出現打死和被打者自殺事件 12 起。

大邑縣，死亡率更高，每 5 個人裡就死了一個！大邑安仁九管區社員劉元芳，30 歲，於 60 年 4 月 23 日把親生女（李水清 8 歲），兒（李永安 9 歲），用牛繩子拉到安仁觀音堂清水河淹死。據她自己說，由於這兩個孩子偷社上碗豆角二斤五兩，被發現，當天中午事務長即扣了劉元芳母子 3 人的飯。劉元芳提出她下午要耕田使牛，只給了她一人四兩米，兩個孩子即沒吃。下午這兩個孩子又去偷了附近鴨棚子的米二斤，又被捉住，第二天中隊長×××打了劉元芳兩耳光，吐劉的口水，要劉把米退出來，劉沒法，則將飯票退出。因此，想到做了活，吃不到

飯，做活路完不成任務，又要挨鬥爭，所以就下了這個毒心，把孩子整死。

井研縣，每 8 個人裡死了一個。新編《井研縣誌》記載：“起初食堂吃飯不定量，吃飯不要錢，浪費了不少糧食。1959 年糧食嚴重缺乏，不得不實行定量供應。先是每人每天定量 6~12 兩（16 兩為 1 斤），後又降至 3~8 兩不等。” 3 兩糧不到 1 百克，誰也沒法靠這點糧食活命，結果每 8 個人就死了 1 個；1960 年“人口死亡率超過歷史最高水準”。

從重慶沿長江而下，行不多遠就是“鬼城”豐都縣。那裡 8.7 萬人“非正常死亡”，差不多每 6 個人就死了一個，成了名符其實的鬼城。沿江再往下走，以“巫山神女”聞名的巫山縣，因“大煉鋼鐵”使“成熟糧食多爛在田裡”，從 1958 年就開始餓死人；先後餓死了 5.7 萬人，每 6.5 個人中死了 1 個。這是一頁怎樣腥風血雨令人戰慄的歷史啊！

長壽是當時重慶三個縣中的重災縣，1960 年有的農村食堂 2 個月沒有見到一粒米，以致有人出工後就倒在地裡死了。長壽縣餓死人數以萬計，有些生產隊“到處家徒四壁，猶如豬圈，強壯勞力喪失，剩下孤兒寡母，令人慘不忍睹”。幹部們走進一戶人家，屋裡什麼也沒有：沒有床、沒有被褥、沒有鍋和灶台，連房子都沒有了牆，用稀疏的包穀稈紮起的笆子擋不住冬天的寒風；屋裡只有一個用來到食堂去吃飯的破碗，一個空空的櫃子。

涪陵大饑荒時期死了 200 萬。1959 年涪陵召開萬人“算帳會議”，清理大大小小幹部的問題，揭發有貪污、挪用、瞞產私分、多吃多占行為的幹部 7990 人，占到會幹部的 73.3%。1959 年四川內江市將 1035 名幹部劃為有貪污挪用錯誤的幹部，占農村幹部的 62.6%。

四川的賴思強生於 1942 年，“鬧饑荒”時 17 歲，在四川省南部縣盤龍鎮的

農村長大，21 歲離家參軍，退伍轉業就職於國家事業單位，現居四川省南充市。

賴先生說：我所在的大隊，更是被上級列為試點，推行“居住集中化”，完全是兵營式的。所謂兵營式，就是改變以往自然村那種散居狀態，而是讓社員在一個山坳裡集中蓋房居住，集中就餐、出工、居住，這樣做的好處，確實便於管理社員。後來組織了一個所謂“檢查隊”，專門負責監督、查處私開“小灶”的現象，一旦發現哪家私開家庭伙食，家中的瓦罐器皿通通會被砸掉，至於鐵鍋之類的，早在 1958 年大煉鋼鐵時期就被強行收走了。當時所有的生產、生活資料通通歸公家統一調配供給，私開伙食，就有偷竊的嫌疑，所以那是不允許的。另一方面，當時地方上盛行浮誇風，虛報產量，上級看到虛報，自然是按虛報的數字和比例徵購糧食，留給社員們自己吃的，自然少得可憐。在當時，餓死人是司空見慣的事，死者包括我身邊的親人鄰里。長期的饑餓，很多人都得了水腫病，我的大伯娘（賴王氏）和堂兄（賴思孝）母子餓得‘三腫三消’，最後仍然痛苦地死去。我的父親（賴崇玉）同樣也是因為饑餓，導致水腫過世。當時民間流傳一句俗語‘三腫三消，鋤頭鐵鍬’，意思就是說某人一旦‘三腫三消’，基本上就沒救了，親人們就可以拿上鋤頭鐵鍬，送他上山安葬了。那個年月，就是眼睜睜看著親人餓死也無能為力。家中更小的弟弟妹妹們，餓得整天無精打采地呆坐在院壩裡曬太陽，一動不動，只要聽到食堂開飯的鐘聲，就都猛地跳起來躡向食堂。那時還有一種東西叫做‘觀音土’，實際就是地裡的一種白色粘土。很多人為一時充饑，不顧後果吃下這種白泥，堵塞了消化道，無法大便，不少人因此被活活憋死。當時我們家屬於南部縣盤龍人民公社十五大隊，以我所在的大隊為例，1958 年統計共有 625 人，到 1961 年公共食堂撤銷以後統計為 421 人，減少約 200 人，其中死亡約 150 人，其餘的人，基本都逃往新疆去找飯吃了。”

四川梓潼縣的羅明泉說：“大人挨餓比孩子嚴重，我們大隊餓死的大多是中壯年。那時搞‘三面紅旗’，大人們都上山鑿山頭去了，莊稼廣種薄收，沒有肥料，往地裡撒上種子就不管了，老的老，小的小，村子裡得病的得病，莊稼熟了也沒人收。我的大爺營養不良得了病，沒治療，後來死了，我的大媽從食堂裡偷東西吃，被發現遭毒打，她一氣就上吊死了。我父母就我一個孩子，父親是教師，日子稍微好點，後來我奶奶也死了，沒有上報，她的戶口就一直沒有註銷，這樣就多領了一份口糧。孩子多的人家就苦了，乾脆自己到食堂搶東西吃。我們全隊中壯年死了大約有一半，有幾百人；死的人裡搬遷戶最多，他們是從三台和潼川遷過來，餓的時候想逃回去。但那時不許外逃，那些人在半路上被抓回來，毒打後不讓他們吃飽，還得去幹活，他們跑也跑不掉，吃也吃不飽，這樣弄死的人最多。”

榮經古稱若水，地處四川盆地西部邊緣的雅安地區中部，距成都 175 公里，扼川滇、川藏線的咽喉。榮經土地資源豐富，全縣幅員 1781 平方公里，轄 25 個鄉鎮。作為有 2300 多年歷史的古城榮經，有顯項故里一一六合壩，有古代南絲綢之路和茶馬古道的重要驛站，使大熊貓的故鄉。1958 年，榮經縣人口六萬多。至九月，全縣建起十多個人民公社，大辦起五百多個公共食堂，全縣人民被納入“吃飯不要錢”、“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三化”，即“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的軍事化體制。

在山高水冷的榮經縣，人們長期以林木和茶葉為主要經濟來源，糧食作物為玉米、薯類，水稻為一季中稻，畝產約二、三百斤左右。但在大躍進年代裡，邢書記親手扶植的高產“衛星”，就達到畝產“萬斤”、“三萬斤”和“六萬斤”！榮經縣成為雅安地區大放高產“衛星”的“紅旗”縣。大辦鋼鐵，榮經縣又成為

雅安地區大放“鋼鐵衛星”的“紅旗”縣。全縣抽調二萬多勞動力，拆屋揭瓦，大建土“高爐”，上山砍樹，建窯燒炭。四個多月下來，全縣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被毀掉大半，僅留下幾處山大斷路的原始森林倖免於難。榮經縣因此換回“鋼鐵衛星”紅旗十幾面！是年8月起，全縣農村青壯勞力全部開進“鋼鐵基地”，只留下一萬多婦女和老弱病殘耕作和秋收。秋收季節，勞力奇缺，大量糧食爛在地裡。

到了年底，地委開會落實國家徵購任務，邢書記又在會上大放“衛星”，說是五八年糧食產量比五七年翻番，由2800萬斤，增產到5600萬斤。實際上，當年糧食減產兩成多。秋收不到兩個月，就出現浮腫病和餓死人情況。國家徵購任務又按“高產衛星”數字徵收。一些公社幹部向邢書記反映實際情況，遭到縣委高調痛批，一頂頂“右傾機會主義”、“落後保守”、“富農思想”的帽子壓下來，一杆杆“白旗”插下來，一車車糧食源源不斷運出去。榮經縣又一次奪得“徵購紅旗”，而全縣糧食幾乎全部被徵購殆盡。

59年夏，所有食堂都斷了糧，社員拿草根樹皮塞肚皮。夏糧收割，全縣糧食情況略有好轉，部分地區還給社員發放了一點救命糧。廬山會議後，全國掀起“更大躍進”高潮，榮經縣又是“紅旗”縣！五九年全縣糧食總產才一千多萬斤，人均不到百斤。而邢書記又是一番“更大躍進”的神吹，聲稱糧食總產比1958年翻一番。在“更大躍進”的大潮中，“躍進派”邢書記上調，得到提拔。大躍進中屢放“衛星”的饒青，接任了榮經縣委書記。

饒青書記接著前任的高調報高產，大喊榮經實現了更大躍進，結果徵購指標比實際產量高出一倍多。饒青下令，先完成徵購，再安排生活，糧食收下來一律就地徵購，就地進倉，就地封存，然後上調。老百姓口糧、飼料和種子不管。就

這樣還是完不成任務。為此，他在縣黨代會上提出：《乘勝挺進，在勝利的基礎上，再接再厲，繼續反右傾，鼓足幹勁，為奪取一九六零年的更大躍進而奮鬥》。不顧群眾大批死亡的事實，繼續大躍進。為了完成國家徵購任務，按中央和四川省委的佈置，饒青親自掛帥，大搞起“反瞞產”運動。在老百姓大量餓死人情況下，縣委組織各級工作隊和工作組，下到社隊，大力施壓，以極其殘酷的暴力手段，開展起“轟轟烈烈”的查抄“後手糧”、“反瞞產”運動。縣、社大量調動武裝民兵，荷槍實彈，挨家挨戶搜查糧食。查出糧食，不僅當場沒收，而且還要毆打、懲罰戶主全家人。

據榮經縣委在“雙整”（整風整社）運動中的材料披露，在這場“人民戰爭”中，各級幹部對“不老實”的幹部群眾，使用了拳打腳踢、罰跪、揪頭髮、煽耳光、捆綁、吊打、人撞人、火燒、鋤把捅進陰道、刀砍、活埋等幾十種刑罰！這場運動的結果，榮經縣委在“雙整”運動中總結說：“社隊倉庫基本掏光，公共食堂基本斷糧，社員群眾基本靠野菜為生”！

到 1959 年 11 月初，60%的食堂粒米不見，全靠紅薯、玉米摻野菜下鍋煮糊糊。五九年冬天開始，絕大部分公共食堂斷炊了！為了體現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優越性”，公共食堂奉命不得停夥，必須冒煙！於是，食堂將糠殼、紅樹藤葉（曬乾）、玉米秸稈、棉花殼等磨成粉子，摻上野菜、樹葉之類，號稱“吃飯技術革命”，煮成“麵糊糊”的稀“飯”，成年社員一餐兩湯瓢，老弱病殘則一餐一湯瓢。據當事人回憶：“青菜、厚皮菜加糠面就是最高級的食物了，可惜就是供不應求，剛到初冬就菜根菜芽都摳光吃盡了。食堂又從縣倉庫裡運來粗糠，加上玉米核核，經炒、炕後磨成面，或者是用玉米殼滲上石灰水，浸泡幾天、搗茸，撈去粗纖維，過濾成粉，多是石灰沉澱物，加上米漿，做成米豆腐，一斤米

能做 18 斤米豆腐。無論怎樣變著花樣吃，也總是解決不了饑餓問題，別的食堂還想出了新招，用人尿加清水，曬上兩周，待水中生出青苔，取名叫小球藻，就以這種尿水來充饑。我們食堂則把能走動的人派到山上去挖蕨雞根、粉葛根、牛馬藤、岩板花根來瀘粉、和著糠吃。”

1959 年下半年，村裡每天都在餓死人。有的走著，突然坐下地，就再也站不起來了；有的靠著土坎，像是小息；有的扶著木棍，像是站著，其實已死了。1960 年春，公共食堂大多停夥，家家都開始死人。先是死壯勞力和老人，隨即死的是那些想省下一口給娃兒吃的主婦們。到後來，死亡如瘟疫般蔓延開來，有的生產隊，一天就餓死十幾個。複順公社太陽灣生產隊，幾十戶人家幾乎死光。不到半年，榮經縣餓死了一半人。有的公社書記向饒青彙報，請求開倉發放糧，遭到他嚴厲批評，說是帶頭鬧糧，是小“彭、黃、張、周反黨集團”，要嚴肅處分。社員腫的腫，死的死，四鄉八野，盡是哭聲。逃難的人們流向縣城，流向外地。從各公社到縣城的路上，每天都有一路倒地的死屍；而縣城四街八巷，到處都是餓死者或乾枯、或腫脹、或發臭的屍體！饒青視而不見，自己和老婆天天開小灶，吃肉喝酒，直吃得紅光滿面！吃飽喝足，饒青還在大唱躍進高調。縣委辦公室彙報，對於滿街的死屍和各公社的死人問題怎麼辦？饒青怒喝道：“怎麼辦？抬出去埋了！這點事還要我告訴你啊？！”

由於縣城死人多，開始人們還將死屍抬出去，用席子一裹，挖個坑掩埋。隨後，死屍越來越多，埋屍成了各苦差事。於是，縣裡決定給埋屍的人以“糧食補助”。而奉命掩埋的人越來越精，想方設法進行“技術革命”，挖下大坑，抬來死屍往裡扔。後來乾脆不埋了，死人往溝裡扔，或者隨意扔在縣城北門口外的那條小河溝裡，任其順流而下。直到 1990 年代榮經縣城拓建新城區的時候，施工

的田壩裡，還不斷挖到當年的大規模死人坑。

至於農村，開始還有人埋。隨後，因死人太多，而活著的人們，大多病病殃殃，離死不遠，像行屍走肉，哪有精力去埋人。野狗把無人認領的屍體拖來拖去。尤其是那些死得只剩下老小病殘和那些全家死絕的家中，死人擱在家中無人過問，一直臭氣沖天，最後爛得只剩下骨架！有一個村子死得一個人不剩，連埋屍的人也沒有了，只得找另一個村的人來埋，這些人挨著餓挖坑，是重勞動，也死在坑邊了，只好再找其它村來人埋這些埋人的人。

據《榮經縣誌》記載：1958年榮經總人口是63717人；1962年總人口降至29650人。三年餓死3.4萬人，人口減少53.15%以上。五九年底至六一年夏，榮經縣發生大規模死人事件，被稱為“榮經五九事件”，又稱“榮經慘案”。

就在“榮經慘案”發展至最高潮之際，榮經縣鳳儀公社武裝部長李文中，帶領群眾武裝搶奪國家糧庫，開倉濟民，從而成為一場大悲劇中可歌可泣的史詩英雄。

鳳儀位於榮經縣城西南部，距縣城20公里。60年春，鳳儀公社各食堂都斷糧絕炊，短短幾個月，死了快一半人。有的在地裡幹活，倒地就斷氣了，有的在路走著就倒地死亡。在公社駐地鳳儀堡的小街上，幾乎天天有死屍。偏橋溝、木溝岩一帶村子幾乎死絕了人。當時李文中是鳳儀公社武裝部長。李文中的孀娘死後，叔叔帶兩個兒女去逃荒，還沒走出公社地界，一家三口全死在路上，幾天後有人告訴他才去收屍。他把三個屍體背上，輕飄飄的加起來沒一百斤！一路上，他看到路邊、河邊、山坡上，到處都是枯瘦如柴、皮包骨頭的死人。

李文中本是一個忠厚老實，積極聽話的幹部。實在忍不下去了。於是決心寧肯自己死了，也要為還沒死的老百姓搞點糧食吃！於是，他拿起了槍，率領民兵

和饑民，進行了一次在當年真是石破天驚的偉大壯舉——持槍闖國庫，開倉搶糧救災民！

據他後來對勞改營中的“同改犯”李天德和廖志強說，當時榮經縣死人太多了！尤其是鳳儀公社，家家戶戶都有餓死的，有的一個村子都死絕了，屍體都發臭了也沒人過問的情景。還有吃死人的，殺老婆孩子吃的，慘不忍睹啊！他當時想：與其餓死，不如搶糧。他拿上槍，帶領公社部分武裝民兵和勉強能走動的社員，去公社糧庫逼著打開國家糧倉。糧食搞到了。

饒青書記聞知後，怒不可遏！說他帶領五類分子搞反革命武裝暴動，報經上級批准，以“反革命武裝暴動”罪，判了他 20 年。隨即送到四川省第四監獄，即苗溪茶場勞動改造。他曾憤憤不平地對人說，其實跟他一起去搞糧食的人，沒一個是五類分子。五類分子比社員更慘，早就餓得死翹翹，沒死的得水腫病，躺在床上起不來了。

廖伯康對楊尚昆說：從 1961 年到 1962 年上半年，全國形勢都好轉了，四川卻還在餓死人。1961 年底，江北縣還有人餓死；涪陵地區先後餓死了 200 多萬；1962 年 3 月，省委傳達“七千人大會”精神的時候，雅安地區榮經縣委書記說他那個縣的人餓死了一半，前任縣委書記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為全縣餓死人太多於 1960 年秋被捕判刑八年。

四川餓死這麼多人，李井泉的對策卻是向中央封鎖消息，不准談餓死人的情況，誰要談，就是小資產階級動搖性和軟弱性的表現。雅安地委宣傳部副部長劉恩因在 1959 年因到榮經調查死人情況寫成報告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可見，誰反映實情誰挨整。蕭澤寬，時任重慶市委組織部長；李止舟，時任重慶市副秘書長兼市委辦公廳主任；廖伯康，時任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重慶市委

書記；向楊尚昆彙報情況的“重慶市青年團二同志”，一個就是廖伯康，另一個是共青團重慶市委副書記（主持日常工作）於克書。這些人只因 1960 年向中央反映了四川的實情，於 1963 年 4 月被李井泉打成反黨集團。

四川死了那麼多人，李井泉應負全責。但他成功地用幾個替罪羊頂了罪。如雅安地區死人太多，不處理不行。1960 年李井泉放過地委第一書記何允夫，下令將榮縣縣委書記姚清逮捕，判刑八年，該縣科、局長全部撤換；並逮捕了 170 名公社社長、書記一級的幹部。

李井泉的老上級、一手提拔了李的鄧小平 1960 年春到四川時，在全省縣委書記會上說：“四川的工作，中央認為滿意，是全國工作做得比較好的（省）。”餓死了數百萬人的甘肅、河南、山東、安徽等省的第一書記都被撤了職，唯獨餓死了千萬人的李井泉不僅安然無恙，而且當餓死人的災難還在繼續時，李井泉就官升一級，成了西南局第一書記，掌管雲、貴、川三省。在 1962 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四川省工作部曾就餓死人的問題向李井泉發難，李不得不在四川組的小會上作檢查。檢討通不過，鄧小平兩次到四川組為他開脫：“該檢討的都檢討了，就是那麼多問題。四川出的問題，中央也有責任。”鄧下令停止追查李井泉的責任，“會議再不能這樣的繼續開下去了”，李再次輕易地混過了關。1965 年李井泉彙報四川糧食產量並談到向中央撥糧時，毛澤東說李“只懂得大公無私，不懂得大公有私。”何謂公何謂私？挖多數人的口糧供少數人吃，多數人是公，少數人是私；為完成任務餓死百姓，完成任務是私，拯救百姓是公。毛共把“公與私”完全弄顛倒了。1967 年 6 月李井泉被打成走資派，老婆上吊，孩子們沒錢，到垃圾箱去揀東西吃。在北京航空學院上學的二兒子李明清被造反派打到要咽氣的時候，被送到火葬場，竟然活著就塞進焚屍爐，燒成了一把灰。

第 114 節 吳芝圃放出“信陽事件”

1· 吳芝圃反右

1957 年春，臨汝縣有人不同意農業合作化的辦法，出現“鬧社問題”，吳芝圃命令縣委逮捕反對者，後來潘復生從北京開會回來，傳達了中央意見：“臨汝鬧社是人民內部矛盾”，吳才放人。接著，在河南省委四次全會上，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傳達當時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的講話。鄧的講話說：河南沒有人性，群眾餓著肚子逃荒要飯，河南打腫臉充胖子，吹如何如何豐收。潘復生強調說：合作化搞快了，搞糟了，要糾偏；並說：河南西北高，東南平，地少人多，災情多，生產很落後，豐收年略有結餘，常年只能自給自足，災年還得向外求援，不能徵購太多，不能只顧任務，不顧政策，把群眾口糧購走；以至於“農民家無隔夜之糧”，“牲口死亡很多，人拉犁拉耙”，希望少調些糧出省。四次全會後，潘復生主持制訂《關於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爭取秋季農業大豐收的宣傳要點》，宣傳入社自由、退社自由、雇工自由、借貸自由等，並通報當時臨汝群眾鬧社事件和洛陽某地吃樹葉、觀音土等災情。在幹部群眾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然而，在 8 月的省委五次全會上，吳芝圃突然指責宣傳要點“是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在批判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的政策和糧食問題上存在“指導思想上的右傾情緒”。全會決定停止執行“宣傳要點”，並收回不在縣以下機關開展反右的“指示”，立即在農村批判黨內右傾思想和農村資本主義思想，在農村開展大規模的社教運動。在反右派鬥爭中，潘復生認為，右派分子不能超過參加運動人數 2%，不應在縣以下開展反右運動。9 月 4 日，毛澤東到鄭州對時任省委副書記、省長的吳芝圃鼓勁反右，支持他批判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自此，吳在河南佔據主導地位，把持了河南的黨政領導權。

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毛就多次談到要準備黨內分裂，多次提到全國一半省、市、自治區發生分裂、權力鬥爭，一種是右派反黨，一種是右傾機會主義。毛把潘與文藝界的丁玲、廣東的古大存、廣西的陳再勵並提，同時也談到“潘復生犯了錯誤，但要允許他改過，犯路線錯誤的，允許革命，對於潘復生、古大存、馮白駒，這次會議都不處理為好，提出處分是正義的，不處理也對；潘復生是好人犯錯誤。“潘復生同志不同于其它幾個省……，他不是鬧分裂。他的缺點可以批判，但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八大二次會議外，吳芝圃向總書記鄧小平彙報了河南黨內鬥爭，鄧支持說：“真理在你們這一邊。”吳準備了《右傾機會主義是當前河南黨內主要危險》發言稿，強烈要求清洗潘，同時把住院的潘拉到會上，讓光榮地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的河南省常委批鬥。吳芝圃指責潘復生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毛澤東當場拍手。潘被免去第一書記後，吳芝圃被任命為河南省委第一書記。

八大二次會議後，吳從北京把潘揪回了河南批鬥。吳芝圃召開了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會，傳達中央書記處的意見。吳在會上說：“不要怕潘復生抵抗，要鬥透，從政治上、思想上揭發，要反復鬥爭……。”在吳芝圃的主持下，全會作出了《關於徹底揭發批判以潘復生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書記處書記楊珏、副秘書長王庭棟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會後全省掀起批鬥潘、楊、王的群眾運動，省報發表批鬥“潘、楊、王”的消息，寫了社論。結果，一大批說實話辦實事的黨員、幹部被批鬥。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復生”20萬之多，其中廳局級幹部18名，洛陽的王慧智曾被鬥得神經失常。當時趙文甫書記總結說，批潘的大字報已達十幾億張。在揭批“潘楊王”以後，吳芝圃又來了一個反右補課，全省劃了7萬右派。縣以下單位、中小學、工廠、農

村也都劃右派。全省上下在反右後，噤若寒蟬，唯左是從，毀掉了實事求是傳統。

1959年8月，吳芝圃召集省委第十四次全會，再次批判省直和地市委一批幹部“右傾”，把反“潘、楊、王”的鬥爭推到頂點，繼續打擊一批幹部。吳芝圃在河南進行的這一系列“左”的運動，不但嚴重損害了黨的形象，也使自己在河南原本較高的威望大大下降了。群眾中流傳著諸如“跟著潘復生，一天吃一斤；跟著吳芝圃，吃了不少苦”之類的民謠。

毛澤東推動河南為全國反右狀元，右派人數占全國15%以上；反右傾全國第一，奠定信陽“謊言大躍進”的思想基礎。據《河南日報》信陽記者站長魯嘉賓在《千萬不要忘記“信陽事件”》文中說：河南省是反右的重災區，劃的右派占全國15%以上，全省學校教職員中被劃右派、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平均占教職工數的23%，有的地區達50%以上，個別學校達70%以上。信陽是河南省的“重中之中”。信陽地區反右派中，反映真實情況，敢講真話的人幾乎一無例外地被戴上“右派”、“中右”甚至“反革命”之類的帽子。固始縣劃右教師占全體教師的48%，“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發源地遂平縣的右派占52%，平輿縣的右派人數竟然占全縣公務員人數的18%。連老紅軍李華軒，也因為反映農村真實情況也被劃為右派。而毛澤東，正是以河南為典型推動全國反右的始作俑者。1957年9月到1958年12月，毛澤東五次駕臨鄭州，先是支持河南省委第二書記吳芝圃批倒右派第一書記潘復生，在河南興起“反右補課”，大抓“右傾分子”，850萬人的信陽地區，被批鬥的“右傾幹部”多達20萬人，數以百計的人被活活打死或逼得自殺。如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竟然發動縣委批鬥會，將“有右傾思想”的副書記張福鴻當場打死，然後說張畏罪自殺，立即埋掉。

2·大搞水利瘋狂化

1957年10月，河南省召開水利工作會議，傳達貫徹全國水利會議精神。會後吳芝圃召開座談會，要求立即迎接水利建設大躍進。中共中央書記、副總理譚震林親自赴會講話。11~12月，省黨代會召開第二次會議，吳芝圃分析階級鬥爭形勢，批判省委指導思想的“嚴重右傾錯誤”，提出實施“農業生產大躍進”，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譚震林再次赴會講話。12月7日，中央轉發了河南省委的《情況演示文稿》，稱全省1500萬人參加抗旱種麥，掀起以大興水利和大搞積肥為中心的冬季生產運動，投入勞力達991萬人，農村出現了大躍進局面。

1958年元旦剛過，河南省、地、市、縣領導、農林水負責人開會，吳芝圃組織討論1958年農業大躍進，提出全省改種水稻700萬畝，灌溉面積增加到3,000萬畝的高指標。很快地，衛生大躍進、工交大躍進的號召以及有關的指示、倡議一個接一個出臺。元月底，吳芝圃在省常委擴大會議上貫徹中央南寧會議精神，決定兩年實現水利化，三年實現無“四害”，五年實現農業綱要的糧食生產目標，五年消滅文盲，普及初中、小學教育。

據吳芝圃說，投入1958年苦戰水利的人有1500萬，1957年10月至1958年6月，共完成土石方88億公方，蓄水能力262億公方……灌溉面積共達到12546萬畝；完成的土石方相當於‘開挖四十八條巴拿馬運河’。實際上，1957年度（1956年10~1957年9月）全省的正常水利建設只能完成2909萬土石方，後來持續躍進的1960年度（1959年10月至1960年9月），也只完成1.34億立方米土石方。80年代末，河南的蓄水能力只有150億立方米，到現在全省灌溉面積也只有5,000萬畝，不到耕地總面積的一半。全省地方資金大量投入水利建設，1958年度是1.6億元，1959年度是2.1億元（同期中央投入2.75億元），至於群眾投勞折資、集體投入的資金物力就無從計算了。昭平臺、鴨河口工程居然只

有一年工期，這些水庫多成為“爛尾”工程，一直拖到 60 年代後期或 70 年代才得以竣工。

1958 年冬天，河南省洛陽地區宜陽縣大修水利的工地上，在凜冽的寒風中，一面面紅旗迎風飄揚，農民們全都光著膀子幹活，連婦女也光著膀子。穿著棉襖大衣的村幹部則站在堤頂，時不時舉起右臂高呼：“超英趕美！”赤裸著上身的婦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超英趕美！”村幹部又呼：“幹！”農婦也呼：“幹！”……雪白的奶子隨著舉起的手臂晃動著。那時的口號是“寧叫人死了，不叫紅旗倒”。挖河的農民每天要工作十五、六個小時，經常有人在解手時就蹲著睡著了。碰到雨雪天氣也不能停工，挖河的人就泡在在齊腰深的泥湯冰水中，晚上收工時全身上下都結了冰，如同武士的盔甲一般。農民白天勞苦不堪，到了晚上還得去看戲。民兵手持帶著刺刀的步槍站在道路旁，農民在中間跌跌撞撞地走著，就和押送俘虜一個樣。挖河工程最緊張時，甚至出現連續幾天幾夜不許停工、不許休息的情況。

河南大躍進期間還修了共產主義渠（1957. 11～1958. 7），宣傳可灌溉 1000 萬畝農田，但實際只能灌溉 12 萬畝，後又全部報廢。蘭考—商丘修三義寨人民躍進渠（1958. 3～8 月），計畫用黃河故道蓄水 40 億立方米，也未達到目的。1958 年人們不加論證，不計後果，一下子竟然在花園口（1959. 11 月花園口樞紐工程開工，13 萬民工上陣，1960 年初竣工）、信山、樂口又修了幾座攔河大壩。黃河被馴服了，但發電、引水澆地的甜頭剛剛嘗到，河床就被泥沙淤高了。兩岸的農田迅速鹼化，不長莊稼了。當時華北平原約有耕地 2.8 億畝，1958 “大搞水利”之前，鹽鹼地約占 15%，即 0.4 億畝左右，但一個“大搞”，三、四年間鹽鹼地劇增至 1 億畝，於是人們又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將攔河大壩一座座炸掉。類

似渠系工程還有封丘紅旗渠、引沁濟蟒渠，均未收到應有效益。由於強行突擊達到灌溉面積指針，河南大引大灌黃河水，造成田地嚴重次生鹽鹼化，1961 年鹽鹼化面積達 519.88 萬畝，嚴重破壞農業生態。1962 年，在解決黃河灌區土地鹼化問題的會議上，人們大罵引黃灌溉的餽主意。會後，他們填平了引黃灌溉的管道，炸掉了閘門。

1958～1959 年，河南平原地區還大肆開挖人工運河，企圖把海河、淮河、漢江與黃河串聯起來；此外又大搞“長藤結瓜”灌溉體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在瞎指揮和行政命令之下，經常是圖紙未出，大樣未放，民工已揮鋤破土。為了一兩年實現水利化，河南竭盡了人力、財力，然而在隨之而來的大旱災中，水利化的“成果”基本上沒有發揮效益。

1958 年同時有 9 個大型水庫施工，設計庫容總和達到 600 億立方米（其中 7 個省辦大型水庫庫容達 46 億立方米），庫區主要在河南境內的丹江口水庫，投入河南民工三萬人。1959 年，同時施工的大型水庫已達 11 個，加上幾十個中型水庫，資金和勞力遠遠超過河南當時（乃至今日）的實力。所有工程均邊設計邊施工，保質保量的作風完全被敗壞。

河南商城縣修水庫，一無圖紙，二無專家，只有幹部在指揮。工程幹到一小半，水庫已蓄成四平方公里的水面。一天深夜，忽然一聲轟響，五百米長的大壩土崩石塌，幾千民工和 19 名右派葬身水底。只因一名右派死裡逃生，30 年後外間才知那淹死了數千人的事件。

3·浮誇風——假大空

當時的中共中央委員範文瀾曾說：“在大躍進中哪一省衛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災荒就最嚴重。”河南就是衛星放得最多的省份之一。

毛澤東在 1958 年 3 月 8 日至 26 日的成都會議上，全面肯定了河南上報的一些比 1957 年實際指標浮誇 2.4 倍的假數字，高度讚揚吳芝圃。吳便在會上提出了最激進的驚人口號：一年實現“四、五、八”（即黃河以北糧食畝產 400 斤，黃河以南畝產 500 斤，淮河以南畝產 800 斤），水利化、除四害、綠化、消滅文盲，等等。吳芝圃承諾說，河南一年就能夠實現四化，四年可變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毛在 3 月 20 日說：“河南提出一年實現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滅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讓河南試驗一年。如果河南靈了，明年各省再來一個運動、大躍進，豈不更好。”又說一年內實現四化，“可能缺點很大，起碼是工作粗糙，群眾過份緊張”。毛講到：“河南的水利就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河南的水利全國第一，達 4800 萬畝”；被毛肯定的數字，已是 1957 年實際數的 2.4 倍。毛甚至在成都會議上激勵吳說：“你是馬列主義，我是右傾機會主義”。

根據毛的“可以讓河南試驗一年”的聖旨，在 4 月河南省委第八次全會上，吳芝圃部署全省大躍進，提出糧食總產達到 275~300 億公斤，三年實現水利化，農村要並社、並村、牲畜並槽餵養。6 月 8 日，《河南日報》報導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畝產小麥 2105 斤，11 日又報導該社畝產小麥 3530 斤。這是在信陽放出的全國第一顆“高產衛星”。6 月 13 日，河南省委宣佈夏糧總產已達到 103 億公斤（實際只有 50 億公斤）。接著，西峽縣先鋒社的 6494 斤、西平縣和平社的 7320 斤、躍進社的 7201 斤、鄧縣歲營社 6541 斤，“衛星”相繼見報。到秋季水稻收穫，信陽雞公山公社畝產 48925.7 斤、光山縣鋼鐵公社 31302 斤、商城縣躍進公社 30009 斤的“衛星”也“上了天”。1958 年 9 月 9 日《河南日報》在第二版上，以“雞公山上紅旗插，水稻畝產四萬八”為題，進行了詳細報導。新華社也

隨即發表了消息。省委宣佈河南是全國第二個水稻畝均千斤省。而此時，農民在幹部的威逼下，正把幾塊田、十幾塊田甚至幾十塊田的莊稼割下，再把它們堆立到一塊田裡供人參觀。到 10 月，吳芝圃宣稱有畝產小麥 7300 斤、芝麻 7239 斤、畝產 202735 斤南瓜衛星，單產增長 70 倍以上；而玉米、高粱、穀子“都比過去平均單產高近百倍，全年糧食總產量至少可以達到七百餘億斤”。他指出：毛主席關於增產十幾倍以至幾十倍的預言，“都已成為生龍活虎的事實了”。

在衛星放得密如飛蝗的日子裡，社裡騙縣裡，縣裡騙省裡，省裡騙中央。1958 年秋省委擴大會議上，吳芝圃說：歷史上有一個人手執寶劍，指石為金；過去人們說巧媳婦做不出無米粥是錯誤的，現在巧媳婦就能做出無米粥。省委第一書記頭腦發熱，基層自然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河南，吹牛浮誇之風也令全國望塵莫及：小麥衛星一直放到西平縣的畝產 7320 斤，鋼鐵衛星一直放到新鄉地區的日產 120 萬噸。原信陽地委為了誇大躍進的成果，又派人去現場對這顆假衛星作了進一步的完善，增加了很多糧倉以示大豐收。為解決糧源不足的問題，便將稻草放在倉下，上面蓋點稻穀。假現場佈置好後，以此為教材，將其當成了批判右傾的武器，組織全區各縣市社隊領導及群眾積極分子以及所謂右傾思想比較嚴重的同志前往參觀學習，接受教育。反正在河南，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就是一句話——欺騙有理。時任中央黨校校長的楊獻珍，在鄭州看到了剛剛開過的省黨代表大會上的發言材料中，其中一個縣的縣委書記在發言裡公然說：“不虛報，就不能鼓足群眾幹勁；不虛報，就不能促進大躍進的形勢；不虛報，就于幹部、群眾臉上無光……”如此等等七八個鋪排，結論便是要搞大躍進，就必須虛報！官員們為了上爬，故意弄虛作假。

4·人民公社地獄化

成都會議通過《關於把小型的農業社適當地合併為大社的意見》，吳芝圃迅速貫徹這一精神，馬上在豫南尋覓試點。

1958年4月20日，河南遂平縣山查岈山紅衛社率先由27個小合作社、9369戶合併成一個大社，接著平輿縣也辦了一個。吳芝圃後來概括說：“由於工農業生產力的大躍進，農業合作化的組織形式已經不適合社會生產力的需要”，公社“不但解決了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而且可以高速度地發展生產力，把農村經濟引向繁榮，更加便利於為過渡到共產主義準備好條件”。劉少奇曾回憶，1958年4月在自穗返京的火車上，與周恩來、陸定一、鄧力群四個人“吹半工半讀，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火車到鄭州，劉在車站與前來接送的吳芝圃談了十來分鐘，說：“我們有這樣一個想法，你們可以試驗一下。”吳的熱情很高，說大社都有了，只是還不叫公社。得到中央領導的理論點撥，吳芝圃在河南雄心勃勃地開始共產主義的大試驗。5~6月，遂平、平輿的合作社都並成大社；7月中旬，並社在豫南地區迅速鋪開。

1958年6月底7月初，華北六省市農業協作會議在農業躍進中心的鄭州召開，重點交流河南出現的小社並大社的經驗成績。主管農業的譚震林肯定了吳芝圃的試驗，把查岈山衛星大社叫作“共產主義公社”，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出現在了河南遂平縣查岈山。7~9月，每天有3000人參觀查岈山，而參加各種各樣現場會的人更是川流不息。

毛澤東親臨河南督戰。在吳的陪同下，1958年8月上旬毛澤東巡視了河南。1958年8月6日，毛澤東到新鄉縣七裡營公社視察社辦工業和棉田。他看到公社大牌後點頭說：“人民公社，名字好。”並轉頭對吳芝圃說：“吳書記，有希望啊！你們河南都像這樣就好了。”“有這樣一個公社，就會有好多這樣的公

社”。8月7日凌晨，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史向生在專列上向毛主席彙報了楂呀山衛星人民公社的情況。當談到楂呀山公社試行簡章時，毛主席邊聽邊說：“這是個好東西，給我！”毛如獲至寶，極為高興。8月7日，毛到襄城縣視察煙地與谷地，順路又看了深翻土地出名的長葛縣五四社的玉米。1958年河南省在長葛縣召開紅薯生產現場會，要求全省種薯2500萬畝，深翻土地1.5尺，每畝施肥3~5萬斤。7月27日，農業部在長葛召開全國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現場會。吳芝圃吹噓全省深翻土地8000萬畝，每畝施肥5萬斤。河南農民深翻土地時，深翻到一米多深；河南大部地區都位於黃河衝擊扇上，表層土深翻這麼深，翻上來的全是沙子，人為地加劇了沙荒。而且，翻這麼深的土地，種子種下後很難成活，第二年地裡一片荒蕪，一粒糧食都長不出來。農業本身就有靠天吃飯的因素，即便是精耕細作還免不了歉收，如此胡亂折騰，豈能不鬧饑荒？

8月8日，毛又到商丘縣中華社看了紅薯與水稻的長勢（這裡後來改名雙八公社以作紀念）。吳芝圃在全省掀起並社熱潮，8月13日省委彙報已完成計畫的52.42%。經過毛澤東派來陳伯達等空想主義者的反復研究之後，制定了一套政社合一、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農林牧副漁統一經營，生產資料全部公有，勞動組織實行軍事化，進行大兵團作戰，取消商品生產，取消集貿市場，取消社員家庭副業，勞動產品由公社統一分配，實行供給制，取消社員家庭廚房，興辦公共食堂等管理制度。吳芝圃在修武實驗，以縣為單位搞全民所有制。新鄉地區的修武一縣一社，是由原來245個合作社合併而成，有農戶29193戶。全縣統一收支，生產資料全歸公有，由公社（縣）統一調撥，生活資料的日常消費由公社供給。農村牲口飼養室點燈用油都需到縣裡去領。《人民日報》1958年8月18日在頭版以“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全面結合，人民公社好”為題，

表揚了信陽的人民公社總結出十大優點及四項有利條件。這促使信陽地區人民公社再掀“指石為金大躍進”高潮，在 8 月份，各縣市均先後召開了有數千人或近萬人參加的擴大會議，組織了反右傾、鼓幹勁和反瞞產、反“反冒進”的大會，批判鬥爭了所謂保守派、觀潮派及秋後算帳派，使極左思潮進一步膨脹起來，五風（高指標、瞎指揮、浮誇、共產、強迫命令）越刮越大，結果將廣大社員搞得十室九空。8 月底，河南省以全國最高速度實現人民公社化，全國第一。全省原有的 38473 個農業社已合併成 1355 個人民公社，平均每社達 7200 戶，入社農戶占總農戶的 95%。

當時，地方大辦工業，興起土法製造滾珠軸承，全民以此為中心搞農具改革運動。商丘地區投入人員達 100 萬，“戶戶是工廠，家家叮鏘響”。搞起什麼“車子化運動”、“滾珠軸承化運動”、“繩索牽引機械化運動”。公社普遍採用大兵團作戰的方式，實行“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把黑夜當白天，把月亮當太陽，白天紅旗招展，夜間遍地明燈”。吳芝圃得意地說：“這不是社會上層建築的大躍進嗎？”

吳芝圃為北戴河會議準備了最實際、最寶貴的素材。北戴河會議的第一天，查呀山衛星公社試行簡章就與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見》一併發到與會人士手中。9 月 1 日、4 日，《紅旗》雜誌與《人民日報》相繼發表了查呀山公社簡章，這是中國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最早的章程。毛在 8 月的北戴河會議上提到河南修武的一縣一社，說：“大，好管，好納入計畫，勞動集中、土地集中經營，力量就不同了”；並要求把查呀山公社的章程在《紅旗》雜誌發表，“要好好吹一下，一個省找十個人吹。大社要與自然條件、人口、文化等各種條件結合起來”。毛後來在廬山會議（1959 年 7 月 23 日）承認自己是因為去了河南調查：

“叫河南同志跟《紅旗》雜誌合作，搞了一個衛星公社的章程，我得了那個東西，如獲至寶。你說我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有一點……。”

吳芝圃不失時機地在《中國青年》9月號上發表文章《論人民公社》，認為河南將鄉政府與公社合一，與當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馬克思主張的將經濟組織和國家政權融為一體。9月27日，劉少奇證實：河南已決定農民吃飯不要錢，實行糧食供給制，看來大家都贊成。

1958年11月13日毛澤東親臨信陽遂平縣視察人民公社，毛要求把楂呀山人民公社的章程在全國推廣。而此時距鄭州僅僅40公里的密縣已出現餓殍，距信陽大面積餓死人只有兩個月，各種瀕死的饑民隨處可見。然而，毛澤東此時被高官和“群眾演員”前呼後擁，滿足於“專列中聽彙報，大路邊聽萬歲”，對真情毫無知覺！——經過1957年反右，1958年反右傾，敢說真話者幾乎絕跡。

1958年是吳最風光的一年。他甚至宣稱一個省可以單獨進入共產主義，河南要在四年之內實現共產主義。對於講真話的幹部，吳芝圃則給予殘酷打擊，搞所謂掃“暮氣”，直至將之定為右傾分子、“階級異己分子”關押起來。由於河南農民勞力大量轉移到水利工地，進入城鎮地方工業企業，後來又煉焦煉鋼，勞力十分缺乏，婦女大批走向第一線，公社辦起食堂、幼稚園，稱“家務勞動社會化”。人們在惶惑中憧憬著共產主義的烏托邦。

人民公社就是一個大勞改營，人民公社制就是農奴制，5.5億中國農民成了農奴。毛甚至設想過取消他們的姓名，而代之以號碼。這一設想在河南等地試行過，地裡勞動的人們，背上縫著大號碼。毛的意思是抹掉他們“人”的象徵，把他們變成一群埋頭苦幹的人面牲畜。河南帶頭高舉人民公社是天堂的旗幟，卻帶領全國農民走向了人間地獄。

聚家並屯，實行所謂的“軍事共產主義”，以一個縣為一個團，一個公社為一個營，一個村莊為一個連，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棒勞力、女棒勞力、少年勞力、老弱病殘等幾個特徵分開，分別住在不同的“連隊”（村莊）裡，分配以不同的勞動定額、不同的糧食定量。不到規定的時間，親人們不許見面。看演出時，台下男人一片、女人一片、老人一片、兒童一片，基幹民兵持槍在各個片中間來回巡視，以防止親人見面後互相交談。反人性到了極點。

大躍進期間河南農村普遍搞“插紅旗”、“拔白旗”。所謂“拔白旗”，就是批鬥那些幹活較慢的人，人們往往利用這個機會泄私憤或者欺負弱者。每次到休息時，農民們都要在村幹部的組織下搞“拔白旗”。拔出來後，村幹部就吩咐一聲：“打他！”於是，大家圍成一圈，對這個不幸的人推推搡搡，推倒後再用腳踩。為了不至於被當作下一個“白旗”，人人都爭先恐後地使出吃奶的力氣打人以顯示“積極”。那些被打的農民，趴在地上哭爹喊娘，哀號連連。每一次休息都必須從十幾個人裡找出一個不幸者進行毆打。

有的大隊黨支部書記把全村的婦女都當成妃嬪，有的帶女民工去修水利，將所有的女工都姦污了一遍。問題還在於這種惡霸在黨的幹部中占相當數量。如河南商城縣，13個公社的武裝部部長，有11個打人罵人、姦淫婦女、橫行霸道。全縣41個民兵團長，有30個是這種惡霸。全縣224個民兵營長，這種被百姓罵成“瘋狗”、“土匪”的壞蛋占了165個（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工作通訊》1961年第4期，動員部部長傅秋濤《關於河南民兵工作問題的檢討報告》）。這些人才是人民公社制度的熱心擁護者。

在“少年營”裡7~10的孩子，每天從事的都是10幾歲孩子們才能從事的勞動，如搬磚、挑土等，每天勞動十六、七個小時。這些少年兒童，也不能逃脫

“拔白旗”的厄運。

人比牛馬還賤。1958年大躍進時一般的農民還沒有刷牙的習慣和條件，可河南卻給牲口刷牙。幾個農民給牛、馬刷牙都還算順利，刷一匹騾子時出了事。騾子脾氣很怪，不聽話。那幾個人見騾子總是揚著頭不肯刷牙，就硬拽著韁繩，掰開騾子的嘴，那個拿刷子的社員就把手伸進去刷。那匹騾子受了強迫，突然把嘴一合，當場把那個刷牙的農民胳膊咬住，疼得他“哎呀娘啊”地大叫。等騾子張開嘴把他放出來，大家一看，骨頭被咬折了。在具有奴隸主意識的人看來，奴隸不如他們的牛羊豬狗，在中國尤其如此。

5·反瞞產極端野蠻

據統計，1952~1957年河南人均產糧257公斤，但1960年只有145公斤，是當時各省中最低的。羅榮桓元帥說：因為徵調農民去全民煉鋼、大辦工業、大辦水利，1958年秋季收穫時全省有一半糧食毀棄在地裡未收入倉！1958年的全省糧食產量實際只有281億斤，河南省委竟高估為702億斤。浮誇風下高估產，又高徵購，1958年徵購80.8億斤，徵購糧占實際產量的28.71%。1958年全國糧食徵購比1957年增長22.23%，河南則增加了55%。同時還外調14.78億斤，而信陽等地區，徵購竟增加75%以上。農民把口糧都上交了，還不准逃荒，認為是給社會主義抹黑。毛澤東一面鼓動指石為金，一面又要求“吹牛要上稅”，報高產地必須按比例上交國庫，結果信陽地區農民的口糧種子全部被強行搜走上交。

1958年11月底，密縣已餓死了人。楊獻珍於1959年1月初到河南省，打算看看平均畝產達千斤的全國第一個“千斤省”的實況。剛到鄭州，就有許多老幹部去看他，告訴他密縣缺糧，農民普遍得了浮腫病，已經餓死了人，衛生部派

員去調查，已查明確屬事實。這就是說，在 58 年 11 月間，即毛澤東正擔心糧食太多、如何處理的時候，下面已經餓死人了。幾個月前先到河南的兩位黨校的幹部還告訴楊說，他們所在的人民公社，社長的娘來找兒子要糧，兒子沒有，娘只好哭著回去了。公社社員斷了糧，從北京下放任職的縣委書記也拿不出辦法來，只好建議各社將曬乾的紅薯藤子磨成粉，煮成糊糊，藉以維持生命。

河南省在 1958 年年底已經發現浮腫病人 17 萬 5000 人，死亡 6000 多人。1959 年春天，豫東黃泛區浮腫病和餓死人的事態蔓延。河南省委發現豫東商丘、豫北新鄉餓死了十幾萬人，當時信陽就曾支援他們每個地區 1 億斤糧食，向中央報告說只餓死 5000 人。

當時毛澤東到河南視察時卻毫不追問此事，好像餓死 5000 人是天經地義的事，而是大講一些雞毛蒜皮的共產風問題。對反映餓死人和浮誇問題的領導幹部，則當右傾機會主義批判，說成是造謠、擴大化，是給三面紅旗抹黑。這樣顛倒是非，使整個河南的左傾思想愈演愈烈，在幹部中造成錯覺，造成人們思想的混亂，使大家失去了辯別是非的能力。

1958 年的大辦鋼鐵，且不說煉鋼的品質根本不行，數量也都是假的。許多地方把日產幾百斤說成幾千斤，商城縣竟浮誇成日產 6000 噸。為此，中央冶金部在商城開了一次全國大煉鋼鐵的現場會。1950 年代擔任過上海市財政局長等職、因被打成右派而到信陽地區商城縣勞改的顧准在日記裡寫道：“嚴冬未屆，路旁已見凍死之骨”。1959 年 2 月，信陽商城縣越美公社觀廟、汪橋兩管理區的 78 個食堂有 74 個先後斷糧，以青菜充饑，病死餓死很多人。林灣生產隊共產黨員許學富兩次給周恩來總理髮電報反映情況，國務院派人調查，指示當地領導迅速解決問題。5 月許多商品脫銷，城鎮整頓口糧指標，農村食堂以人定量。

1959年2月河南繼續高估產為1000億斤，幾個月後落了一半，估產為455億斤。1959年6月21日至22日毛澤東在鄭州向吳芝圃下達500億糧食高指標。正是這一500億斤糧食高指標，逼得信陽農民又上交了16億斤糧，將最後的一點口糧與種子全部上交一空，於是信陽村村人相食！如果沒有這最後一次上交16億斤糧，信陽人不會餓死百萬。

59年減了產，但省委的估產高出實產數一倍多。按估產，省裡確定徵購糧食72億斤，再加上公社的自籌糧和周轉糧，共徵購糧食亦為80.8億斤，而當年的實際糧食產量為194.9億斤，徵購糧占實際產量的36.9(41.5)%。1959年9月初，省委召開了三級幹部會議，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在傳達廬山會議精神之後，省財貿書記宋致和傳達中央糧食工作會議精神。他說：“李先念同志講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現在如果不抓徵購糧食，廬山會議精神貫徹後群眾就把糧食吃光了。征不到糧食城市生活怎樣安排。要求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同時，兩手一齊抓，一手抓征糧食，一手抓精神貫徹，早秋下來群眾邊收割邊徵購。”宋致和要求各地委書記向回打電話，讓各縣彙報產量，分配徵購任務（往年都是從省裡開會後回去再開會，動員，統計，最後分配任務）。這兩年河南多徵購了60多億斤糧食，大量征了透底糧。對於那些完不成任務的地區，認為是隱產不報，從而進行了大範圍的反瞞產運動。

基層幹部為完成高徵購任務而一味“反瞞產”。1959年河南挨門逐戶搜查農民“私藏”了的糧食。搜不出糧食，就捆、吊、打、押、拆（房）。村幹部只要一看到哪家有炊煙，就立刻帶人去搜查，沒收農民私藏的糧食和家什。等到勞力們上工後，村幹部和民兵手持一頭削尖的鐵棍，挨家挨戶打開大門，一進屋就用鐵棍在地上戳來戳去，以防止農民偷埋糧食。凡有可能埋糧食的地方都要掘地

三尺，一旦發現有糧食，不但全部沒收，而且要挨打、不許吃飯。農民下工後看到滿屋的狼籍，只好忍氣吞聲自己把地平上。這種敲骨吸髓般的剝奪，徹底剝奪了農民儲備糧食的自由。河南商城縣 13 個公社的武裝部部長，有 11 個打人罵人、姦淫婦女、橫行霸道。全縣 41 個民兵團長，有 30 個是這種惡霸。

9 月信陽地委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反右傾，有 3300 多名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和浮誇風有微詞的幹部受到批判鬥爭。張樹藩的妻子李瑞英 1959 年 6 月 1~7 月 1 日帶調查組到當時的萬斤紅旗鄉的雞公山搞調查，發現畝產萬斤稻是假的，給路憲文寫報告要 21 萬斤糧食安排群眾生活。為此，路說是否定大豐收，為富裕中農叫囂。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後，李瑞英被調到省委黨校，在一千多人的大會上接受批判。省委秘書長戴蘇理聽說李瑞英不服，十分惱火，說因李態度不好，要加重處分，撤銷專區婦聯黨組書記和主任職務，僅保留地委委員。

廬山會議後，原來進行的包工包產試點也被批為右傾。這本來是地委農工工作部長延炳玉佈置各縣搞的，現在不認帳了，把責任都推到下邊。為此將息縣、淮濱等數縣農工部長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廬山會議前，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曾讓副書記張福鴻到一個生產隊搞包產到戶試點。廬山會議後，馬龍山憑其第六感官預感大難將至，居然在縣委會議上反咬張擅自作主搞包產到戶。張據理反駁。馬龍山先是在縣委擴大會議上對其發動批鬥，然後親自動手毒打，眾人拳打腳踢，將張頭髮連頭皮一塊兒撕下來，活活地打死。在犯下如此罪孽之後，還編瞎話說張是畏“罪”自殺，立即埋掉。事後，上面知道了真相，馬書記按律當斬，但仁慈的毛澤東大筆一揮，說：“我還沒有殺過一個縣委書記，判死緩吧”。

信陽地區 1959 年因天旱，大歉收，實產糧食 20 多億斤，僅及大豐收的 58 年的一半。但地區各縣都虛報產量，匯總到地區成了 72 億斤，又是“特大豐收

年”。省委信以為真，分配給信陽地區徵購任務 9 億多斤。張樹藩說：“1959 年信陽地區領導班子中 9 個常委中就有 8 個同意把全地區糧食總產 20 多億斤誇大成 70 多億斤，強行徵購，農民顆粒無存。1960 年，一邊是大小官倉堆滿糧，一邊是抓人、關人，一邊是 100 多萬人成餓殍、屍橫於野，有的地方死人沒有活人掩埋。”新編《信陽縣誌》說：59 年產量減少，徵購數卻增加，結果全縣人均留糧（含口糧、種子糧、牲畜飼料糧）比 58 年減少了 30%。光山縣 1959 年秋糧實收 1.8 億斤，卻虛報為 4.9 億斤，硬要徵購 1.54 億斤；當徵購到 1.2 億斤的時候，群眾就沒糧了。路憲文卻說：“產量不能動搖，誰否認 1959 年的產量不如 1958 年，誰就是反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和總路線，誰就是反對社會主義。”他還認為：“社社有餘糧，隊隊有餘糧”；“糧食問題，是當前兩條道路鬥爭的集中表現”；“對農民的鬥爭，比打日本鬼子還難，誰打不上去，就把誰拉下來。”

1959 年秋收剛完，很多地方群眾就沒飯吃了，開始出現了逃荒要飯的現象。很多食堂開不了夥，群眾無奈，就在家裡煮紅薯葉、野菜充饑。幹部發現後，把他們的鍋給砸了，群眾就外出逃荒。地委認為這是破壞“大躍進”，就在各路口設崗攔堵，不准外逃。當時地委不僅沒有認識問題的嚴重性，反而認為是有人將糧食瞞藏起來了，於是根據毛澤東“反瞞產私分”的指示，路憲文動用民兵，指示指揮各縣委挨門逐戶搜查據說被農民和基層幹部“隱瞞”、“私藏”的糧食。信陽地區的“反瞞產”運動，不僅時間長，規模大，而且做法很毒辣：

1959 年 10 月在雞公山公社召開假現場會，從國家倉庫中運去一批糧食，搞了一個假糧屯，上面是糧，下面是草，只准遠看，不准動手。參觀的人問附近的群眾“好不好”，群眾說，“好是好，我們就是餓肚子”。當時雞公山公社食堂已停火斷炊，全社躺倒 800 多人，死了 265 人。但路憲文說：“雞公山公社是個

千斤公社，不能動搖”；“搞不出糧食不收兵”。這樣的假現場會各縣都照樣召開，僅固始縣就開了 195 次，參加的幹部有 5 萬人次。搞萬人“反瞞產”大會。在潢川縣召開的萬人大會上，演出《劉介梅》的戲，批評農民“忘本”。縣委第一書記梁德柱在會上以打、推、踢等方法，鬥爭了 60 多人，並從監獄中提出 4 人公開審判，威脅群眾。到會 6 千代表都是面黃饑瘦的農民，其中有 40% 患浮腫病。在當天的大會上，就餓死一人，抬走屍體後繼續開會“反瞞產”。會後，又有 19 人死在回家的路上。

“反瞞產”萬人大會各縣都開，固始縣就開了 40 次。固始縣委第一書記楊守績就說：“農民在社會主義時期，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是敵我矛盾，因此要開展政治攻勢；決心打好這一仗，只准前進，不准後退。”固始縣在郭陸灘公社開了 3 次萬人大會，第一次要每人帶五斤糧向大會獻禮，糧食搞光了，第二次要每人帶雞、鴨、鵝、豬向大會獻禮，家畜搞光了。第三次要每人帶一些其他東西向大會獻禮，結果，大門的銅環、破衣服、棉被連稍微值一點錢的東西都交給了大會。有 4 個農民，在會上被逼把身上破棉襖的舊棉絮挖出來上交。

固始縣還以輪訓班的形式搞“反瞞產”，共輪訓四次，三千多幹部參加。該縣甚至在學校中也搞“反瞞產”鬥爭，縣高中就為此鬥爭師生 20 餘人，搜查沒收學生糧票二千餘斤。

推廣羅山縣依靠五類份子“反瞞產”的經驗。路憲文很讚賞這種做法，叫普遍推廣，說：“這樣搞，不僅可以搞出糧食，而且可以搞出槍枝子彈來。”

信陽地委還學習中央和省委的辦法，規定 1 日 3 報，每次上報“反瞞產”的“戰果”只准增長，不准減少，發展到下邊沒有人敢接電話。

在“左”傾路線橫行之下，許多公社、生產隊也提出許多錯誤口號。潢川縣

有的公社提出：“紮緊褲帶餓三天，也要搞掉老九的帽子”（這個公社完成糧食徵購任務排第九）。有的生產大隊提出：“寧可餓死幾百人，也要把流動紅旗奪回來”（群眾反映：“這是要命旗”）。光山縣提出：“非反到底、反死不行”。固始縣黎集公社黨委書記張德瑞提出“八挖”：挖草堆、挖漏洞、挖社員家底（即搜查）、挖稻殼堆、挖炊事員、挖飼養員、挖加工員、挖保管員，並強調“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誰完不成任務，就反誰的贖產。”

在“反贖產”鬥爭中，他們最普遍的做法就是打人。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劉文才，每次打人之前都召開打手會議，研究打的物件、打人的名義和打人的方法，並檢查打手的組織情況和刑具準備情況。光山縣縣委副書記劉文彩連續拷打 40 余農民，親自打死 4 人；一青年勸說幾句，劉令人綁起，毒打至死，拋棄河中。斛山公社一個黨委委員、團委書記，親自拷打農民 92 人，打死 4 人。整個光山縣公社一級幹部動手打人者占 93%。潢川縣澀港公社黨委副書記韓得富打過 300 多人。羅山縣彭新公社 17 名預備黨員，有 16 個打人可以轉正，有 1 個未打人不能轉正。這個縣的定遠公社，調 180 個預備黨員搞“反贖產”，如果不打人，就不能轉正。羅山縣定遠公社義店大隊治保主任陳如斌，就打過 200 多人。

威逼農民交糧，有的採用了點天燈、活埋、燒鬍子、燒陰毛、捅陰戶、上絞刑架、坐老虎凳、錐屁股等辦法。至於捆、綁、吊、打、罰站、罰跑等辦法，更為普遍。光山縣打人整人的刑罰有 30 多種，潢川縣有 50 種，固始縣有 70 種。典型的懲罰有：

一、扣飯和開除飯籍。扣飯，就是只給吃一點飯；開除飯籍，就是不給飯吃。

二、拔頭髮。各縣普遍採用這種辦法。羅山縣張莽公社黨委副書記肖繼臣在石山水庫工地鬥爭胡風銀時，把胡的頭髮拔掉。以致有些人一聽到開鬥爭會，

首先把頭髮剃光。潢川縣仁和集公社黨委書記拉著阮袁氏(女)的頭髮拖著跑了20多公尺，一直把這個婦女拉死。

三、罰凍。羅山縣定遠公社雞籠水庫工地指揮部，把林灣大隊劉南階的衣服扒下，放在冰天雪地裡凍；光山縣槐村店公社把13個孤兒扔在山上活活凍死。

四、割耳朵。息縣防胡公社大路營大隊就割了17個人的耳朵，息縣防胡公社婦聯主任黃秀蓮是一個20歲的姑娘，催糧時割了4個農民的耳朵，其中1人被割而死去。

五、熬人油做肥料。毛澤東大講死人的實用價值。1958年12月9日，他在八屆六中全會說：“人要不滅亡那不得了。滅亡有好處，可以做肥料。”河南固始縣期思公社黨委第一書記蔣學成，當過土匪，1959年創造了熬人油當化肥的辦法，據反映熬了100多個小孩，經調查證實熬了20具屍體。

六、披羊皮。息縣防胡公社趙樓大隊第三生產隊一個十八歲的學生王國喜，因為餓得很，牽了雙廟黨支部書記家的一隻羊準備殺了吃，被大隊黨支部書記王國朴知道了，把他吊起來，打得頭破血流。然後把羊殺掉，把羊皮貼在這個學生的身上，令民兵用繩子牽著在大隊遊了一遍，三天沒給飯吃，再從身上把羊皮揭下來，活活把人揭死。

為了把“反瞞產”搞深搞透，路憲文指示要頂住三關：第一頂住“叫喊關”，“有人叫喊沒有糧食了，應當頂住”；第二頂住“人口外流關”，“有人逃跑，這不是生活問題，而是兩條道路的鬥爭問題，堅決頂住”；第三項住“食堂停火關”，“停火就是威脅，停火也要反。”當食堂停火斷炊，有些群眾迫於無奈而宰殺豬牛的時候，路憲文就以破壞生產為名，宣佈“殺牛的一律法辦”；原地委的幾個書記和公安處副處長韓仁炳，凡報來宰牛的都批准法辦，他們走到哪裡就

批到哪裡，就法辦到哪裡，有些壞份子就借此更加胡作非為。

平輿縣向陽店公社有的幹部罰宰殺牛的群眾穿上孝衣哭牛爹；有的把殺牛的人用鐵絲穿鼻孔，拉犁耕田；有的還把殺牛的人脫光衣服，打得周身稀爛，然後把鮮血淋漓的牛皮貼在人身上，待幹了後，就揭牛皮，連人皮一起撕下來！牛肉則被這些殺人犯沒收，大吃大喝。

信陽地委不顧群眾死活，劫掠了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牲口飼料糧，超額徵收了 16 億斤，將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都交了徵購。譬如息縣產糧 5 千萬公斤，徵購了 2756 萬公斤，占產量的 55%。結果農民的全年口糧平均只剩一百多斤，僅夠食用四個月。潢山、光山等縣，口糧甚至不足 3 個月。未到 1959 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已斷糧停夥。當群眾走投無路，啃樹皮、吃草根、烹野菜的時候，路憲文說：“這是富裕中農搞的鬼花樣，他們故意這樣，挨家挨戶搜查。”下麵的人就逐家逐戶地把小鍋打爛，不讓人家冒煙。

6· 信陽——死亡穀

1958 年 11 月 13 日毛澤東親臨信陽遂平縣視察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而此時距鄭州僅僅 40 公里的密縣已出現餓殍。然而，毛澤東此時被高官和“群眾演員”前呼後擁，滿足於“專列中聽彙報，大路邊聽萬歲”，對真情毫無知覺！人民公社採取中世紀專制的政教一體，全民煉鋼，強行公共食堂，禁止農民家庭做飯，厲行“禁真話，堵上訪，抓乞討”，造成信陽地區 850 萬人“失去在家燒飯和外出討飯的自由”，終於出現“村村人相食”慘劇。

1959 年 9 月 22 日至 23 日，毛澤東在鄭州呆了兩整天，其時河南和信陽都已大面積出現餓死人，卻仍然不知已有“人相食”慘禍！還在笑聆“好學生”吳芝圃彙報的河南省水庫裡面有許多“十幾斤重的魚”無人吃，而幽默河南人“能

治水不能治魚”，其官僚主義、專制昏庸之可怕，比歷代帝王有過之而無不及，令人髮指！

1959年冬天，名噪一時的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遂平縣查岬山人民公社，並沒有因為偉大的榮耀而免受饑餓之苦，人們挖空心思瘋了一樣尋找代食品，恐怕又創下了全國之最。大裡王大隊尋找代食品走在了前面，餓急了的群眾用9種作物替代食品。

豆子打過以後，揚場時被風吹掉的豆毛子，成了金貴的東西。儘管豆毛子過去喂豬豬都不樂意吃，可現在人不得不吃了。人們把豆毛子用細籬籬過土，把紮人的角皮放入大鍋去炒。豆毛子被炒得乾脆以後，再放進石磨中磨碎，然後再用細籬籬一遍，兌上30%的紅薯乾麵，用水和到一起，蒸成一個個紫色的窩窩頭，吃下去胃紮得人睡都睡不著。

人餓瘋了什麼都吃。稻草稈子、玉米心、枯紅薯秧子、花生皮殼、蕎麥稈子，人也吃了。查岬山大隊先後挖掘芋麻根3785斤、葛麻根和山藥蛋根1672斤，挖山野菜2075斤、野棵子37250斤給人吃。遂平縣文化局文化股長梁永祥回憶說：“人們餓的見啥吃啥，連老鼠也逮吃光了。俺們幾個小孩夜裡到空倉裡去逮麻雀，把門和窗戶一堵，點著火把，用棍子打小麻雀。然後，把麻雀放到火裡燒熟，吃下肚去，當時，覺得這是世上最香的肉。”

人牛爭食人被鬥死。土山大隊一隊的養豬場，豬比人吃得好，飼養員李宗興偷吃豬料——豆料。袁莊大隊四隊的飼養員劉志蘭和袁志江，兩個人蹲在牛棚裡，有氣無力地給牛喂草。牛棚上方的料斗子裡已經空空如也，少得可憐的牛料已經被他倆生吃完了，牛眼睜睜地看著人們偷吃牛料，眼角撲簌簌掉著淚珠。牛絕望地吃著草，不時地停止咀嚼，抬頭望一眼劉志蘭和袁志江。兩位飼養員也知道牛

的目光裡訴說著什麼，說：“牛啊，也不能怪我們啊，我們也是餓急了呀。”正在這時候，一頭豬娃餓暈了頭，鬼使神差地進了飼養室。二人就一齊動手，把豬娃埋到了牛鋪裡，準備到夜裡挖出來吃。

當他們剛把豬娃埋好，老牛就紅了眼睛，伸嘴去拱。二人一見，急忙去搶，可老牛已將豬娃咬在大嘴裡，死不肯松嘴。二人和老牛僵持不下，雙方都氣喘吁吁。正在這時，飼養室的門被撞開了，走進來的是生產隊隊長。沒什麼理可擺的，劉志蘭和袁志江被押到街上示眾，豬娃被攔腰砍斷，一人脖子上掛一截，連著幾天的辯論會，把二人鬥得恨不能有個地縫鑽進去。劉志蘭跑了 6 次，袁志江跑了兩次，均被抓獲，一塊兒被活活鬥死在辯論會場上。

據 1959 年查呀山人民公社電話記錄：土山大隊副隊長焦山根，每天都帶著孩子和小姨子去食堂，偷吃稀飯和饅。高莊三隊隊長高秀池、會計高德，一次弄豆子 80 斤，不讓社員知道，兩人私分了。生產隊留了 360 棵白菜，他倆偷吃了 45 棵。此時的查呀山區，無人不餓，無人不偷，偷盜的不光彩行為已經成為人們的手段。只是，手中有權的幹部比社員偷得更明目張膽，更肆無忌憚，社員是暗偷，幹部是明偷，而且幹部們偷得體面、光彩，偷得理直氣壯。權力，在中國是個了不起的玩藝兒！

1960 年 2 月份某一日全查呀山公社浮腫病人共計 786 人。也就是說，這一天時間查呀山區共有 786 人的生命正一步步無望地走向死亡。這 786 人中沒有一個生產隊長、大隊幹部、公社幹部，清一色的老百姓！我從小就會唱：一天吃一兩，餓不住小隊長；一天吃一錢，餓不死炊事員。隊長見隊長，比比藍大氅；幹部見幹部，比比毛呢褲。群眾有句形象的俗話，說：“大小是個官，強似賣水煙。”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人民公社的發源地——查呀山人民公社僅 4 萬人，1959~1960 的 3 個月期間就餓死了 4000 人，占總人口的 10%，有的隊竟高達 30%。餘德鴻回憶：“1959 年 7 月我在遂平縣——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誕生地，和興公社青石橋大隊丁一生產隊就親自遇到薛水源兄弟二人餓死。……據遂平縣的一位老同志回憶，他在 1959 年 11 月中旬接到劉班莊村群眾的一封信，說他村已餓死 62 人，另有幾十人外流出去了，家中剩下的人也只剩一口氣了。他趕到該村感到很累，想在一草垛旁休息，忽然發現垛根旁躺個死人。約在下午 5 點左右，在該村西頭推開了一家屋門，見當門坐了一位婦女，滿臉浮腫，身旁擺著三個孩子的屍體，剩一口氣的老頭躺在床上，又走進了一家，推門一看，發現全家 4 口人全部餓死，其中床上 2 個，地下 2 個，真是慘不忍睹。”

當群眾向外逃荒的時候，路憲文說：“好人不外流，外流無好人。”他們把外流的叫做“流竄犯”，各縣都組織民兵把關、守路，打擊所謂“流竄犯”。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就下令把在店裡住的、路上走的都抓起來，全送進監獄、勞改農場。公社也有勞改隊、立功隊，潢川縣公安局長馬振星，把扣留的所謂“流竄犯”放進監獄中，餓死了 2 百多人，卻把克扣的九千斤口糧拿出來向縣委報喜，說是公安機關節約的糧食。

在這樣既不能吃野草又不能逃荒，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就發生了人吃人的慘事。有的是吃死人，有的是把快餓死的人卡死吃掉，父母吃子女，哥哥吃弟弟，姐姐吃妹妹，潢川縣有一小孩快死時，對他母親說：“媽媽，我死了你不要吃我！”這個孩子死後，媽媽為了活命，還是把自己的孩子吃掉。固始縣 90 萬人口，官方記載有 200 例人吃人事件。固始縣兩個生產大隊統計，吃了 2 百多屍體。但地委、縣委又以“破壞屍體”為名，逮捕快要餓死的群眾。

息縣包信鎮薑寨村，隊長姜樹森把各家的鍋全部收去砸碎，讓村民們吃大食堂。吃不飽，他“不准私人冒煙”。村民們無奈，只好半夜裡偷偷在自己家用盆或罐煨一點野菜。可他十分靈通，總能順著煙味尋過去，端起盆罐不由分說摔個稀碎。村民們在大食堂只能喝到極稀且限量的稀飯，但他和親屬及其他幹部卻可以吃到饅頭，還經常加夜宵。在 59 年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內，全村 397 口人餓死 300 餘人，他老婆居然還生孩子；村民稍不順他意，只消他一句“滾吧，上午沒有你的飯了”，這位村民就要餓肚子。59 年的冬天分外寒冷。幾個月來，因一直吃不飽，大家身體格外怕冷。幹部要求幾個人共睡一個被筒，大家互相依偎，也好禦寒。狗（薑樹遠的乳名）娘就和姜振安妻子朱氏、狗妮兒等四個女人睡在一個小房間裡。狗娘常吃人肉，她多次夜裡去割死人肉，回來自己偷偷在罐子裡煮食。她的膽子特別大，在颶風下雪的夜晚，去割荒灘野地餓死的人的肉，她一般都是獨來獨往，從不害怕。

那天夜裡，狗娘又從野外把一個餓死的小孩的兩隻胳膊截掉兜了回來。在房間裡，她把小孩胳膊截成一節一節的，先用鑊子燉了一隻胳膊。肉尚未煮熟，房間已經充滿奇香。終於煮熟了。狗娘揭開蓋子，用筷子紮了一塊熱氣騰騰的人肉，一邊用嘴輕吹熱氣，一邊貪婪地咬下一口，嚼了起來。“真香啊。大家都來嘗嘗吧！好吃得很啊！香得很啊！”狗娘一邊嚼著人肉，一邊說。開始，饑腸轆轆的幾個女人還猶豫不決，但聞到滿屋的香氣，又看到狗娘吃得那樣津津有味，她們再也無法拒絕。兩個女人趕緊過來，每人撈起一塊就吃。狗娘見和自己睡一個被筒的朱氏仍然坐在床上猶豫，就用筷子夾起壇裡僅剩的一塊人肉，交給狗妮兒，讓狗妮兒遞給一床之隔的朱氏。誰料狗妮兒接過來，自己吃了起來。朱氏沒有吃到口，心裡有些不快。狗娘說：“沒關係，我再燉另一隻就是了。”接著，她把

剩下的另一隻胳膊也給燉上了。第二壇人肉煮熟後，朱氏不再猶豫。她下了床，來到罐子旁邊。狗娘用筷子在罐子裡給她挑選一塊肉質好、燉得爛的人肉遞給了她。她戰戰兢兢地吃了第一塊，感覺很好，只是還沒有吃飽。她又向狗娘要了第二塊。據朱氏自己後來說，這是她唯一一次吃人肉。

薑寨吃人肉最多的，孩兒娘應算其中的一個。一天夜裡，她和弟弟姜樹彬一起，從“萬人坑”旁邊的幹溝裡背回一個餓死的人。屍體是一個十五六歲的男性。由於兩人身體餓得都很虛弱，他（她）們輪換著才把屍體背回家。二人先把屍體的頭割下，用刀費力地把顱骨砍開，取出人腦，放在大窯碗中，足足有一大碗；再打開膛，取出心、肝、肺等。最後，把四肢和軀幹各個部位的肉全部剔出。人肉裝了滿滿一盆。儘管這個人是餓死的，但其皮下還是有一層薄薄的脂肪，他們又把人的瘦肉和人脂分開來。孩兒娘說：“人的腦子很好熟。半夜裡，我煮開半盆水，把從顱骨內取出的一大碗腦往開水裡一倒，腦就沉下去，因為這是生腦。放些鹽，再稍燒片刻，腦就漂了起來，可以吃了。人的腦子其實很好吃，很香。”

孩兒娘和姜樹彬把人腦吃完後，再把人肉煮熟，把人脂煉成人油。為了不讓其他人發現，二人把煮熟的人肉裝在一個大鑊子裡，把煉製的人油盛在一個小鑊子裡，連夜在她家附近幹了底的大塘底部偷偷挖坑，把鑊子埋起來。剔光肉的人骨頭，也坑埋在大塘底。之後，每天夜裡他（她）們就偷偷扒開鑊子上的封土，掀開蓋子，取些人肉和人油，用鑊子煨熱吃。冬天氣溫低，他（她）們的人肉一直吃了很長時間。孩兒娘還說：“人肉不同於其它肉。你別看人皮和人肉很薄，可是用水一煮，很快膨脹，人皮和人肉都會變厚。所以人肉是越煮越‘多’。”當時的薑寨，除他們二人外，村中還有一些人在偷偷吃人肉。由於這事是萬萬不能讓別人（尤其是村幹部）知道的，人們也只能是猜測，大家心中有數，可是心

照不宣。姜樹彬的孀子就懷疑侄子在吃人肉。據說有一天夜裡，他孀子餓得奄奄一息，還不住地哀求著：“我餓啊！你們也給我一點(人肉)吃吧，我餓啊！……”然而，誰又敢把自己煮的人肉給她吃呢！她的哀求聲越來越低，最後直到沒有。她當夜死去。

姜寨附近的村子王大營的西邊一個溝灘 1959 年冬扔的餓死的人較多。橫七豎八，餓殍一片。有一次，薑樹彬一人夜晚偷偷摸到這溝灘，割了五個人頭(有大人有小孩)，背了回來。他把人頭劈開，取出腦來煮吃。據他說，人腦易熟且味美，香如豬腦。

薑寨吃人肉最多的，除孩兒娘外，村東頭還有一個外號叫後背頭的女人。那是 59 年的事。一連數月的饑餓，人們身體嚴重營養不良，出現各種生理反應。後背頭原來濃密的黑髮，竟脫落大半。女人沒有頭髮，光禿禿的頭頂很不雅觀，於是她把前額僅剩的少量頭髮向後一梳，蓋在頂上。如此雖稍好看，但形象滑稽，大家就半開玩笑半當真，送她外號：後背頭。說是外號，卻比原名響亮，時間一長，大家都只知道她叫後背頭，而沒有人知道她的原名了。

後背頭有一個十多歲的女兒，叫愛容。丈夫餓死後，後背頭和女兒相依為命。這些天食堂裡有時一天做兩頓稀飯，有時只做一頓，母女二人餓得實在撐不住了，就偷偷夜裡割些野外餓死的人肉回來煮煮吃。一天下午，後背頭見拖車從前面鄰居家拉出，一問方知是鄰居家的麻芳死了。麻芳是一個 40 多歲的男人，兩個兒子姜漢崇和薑漢喜已去逃荒，他自己活活餓死了。拖車把麻芳屍體拉出村，朝“萬人坑”附近的幹溝一倒，就算了事。後背頭對麻芳十分熟悉，知道他雖是餓死，但身上也還有些肉。她決定天黑後去弄點他的肉吃。

冬季日短，天很快黑下來。後背頭還沒有去，她擔心去得太早容易碰到人。

好不容易挨到半夜，她拿起工具，帶上女兒，趁著夜色，摸到麻芳的屍體旁。伸手一摸時，二人不禁大吃一驚：屍體已經被人開了膛，臀部和大腿肉早已被偷割去。她們把麻芳的兩隻腳從腳脖子處割了下來，又在身體其它部位割些肉，才偷偷摸回去。連夜，母女二人在里間房靠牆處小心地支上盆，把弄回來的“東西”往盆裡一倒，加些水，以盆代鍋偷偷煮了起來。煮了一段時間，二人急切地撈出人肉就吃。咬一口，費了半天工夫也沒有嚼爛。後背頭對旁邊的女兒說：“先別急吃，再煮一煮。”她們把人肉、人腳放回盆裡，由女兒愛容燒火，又足足煮了半個時辰。她們再次掀開蓋子時，一股帶著奇香的水蒸氣撲面而來。後背頭用筷紮了塊人肉，女兒撈出一隻人腳，兩人邊吹著熱氣，邊貪婪地吃了起來。儘管煮了這麼長時間，待到女兒啃到腳底板時，卻還是嚼不爛。這是可以理解的，麻芳本是農民，終日勞作，真可謂“腳底板不閑”，這部位角質化嚴重，比別處肉質更結實，當在情理之中。

“59年”過後，過來的人們常在一起聊起各自經歷的苦難和辛酸，包括吃人肉之類的事，大家也都暢所欲言，說給大夥聽。一次，大夥又說起吃人肉的事，愛容接過話茬說：“麻芳的腳底板嚼不爛，煮了那麼長時間，還那麼結實。……”“麻芳的腳底板嚼不爛”這句話在全村迅速傳播開來。終有一日，話傳到麻芳兩個兒子的耳朵裡。聞此慘事的兒子悲憤交加，一起去找後背頭“算帳”，幸在途中被他人攔住，方息事端。

信陽縣五裡店公社有一家人，父母、弟弟都餓死了，剩下一個十五歲的小姑娘，她把弟弟煮了吃，縣公安局又以“破壞屍體”的罪名，把她關在監獄裡餓死了。

信陽羅山農民劉培珠說：我爸爸五九年才六、七歲，差一點餓死了。他認識

隊裡一個放鴨的人，就叫他乾爸，結果就常常得到一點喂鴨的飼料而活下來了。那時我媽一直吃糠，靠吃糠、樹皮和觀音土活過來了。吃了拉不出來，我姥姥用棍子掏她的肛門。觀音土是很難吃的，結果也給我們那裡人吃光了。還有人吃人的慘劇。我們村裡有一家人全餓死了，隔壁的人就將屍體拖過來剝掉吃了。我那吃人的鄰居，不久以後也瘋了，結果死掉了，……

2007年11月，85歲的李瑞英說：1961年春天省委派出救災工作組，我當組長，帶一個組（六七個人）到信陽西平縣搞救災。到了後嚇一跳。只見村裡面的破爛，就像過去日本鬼子掃蕩過一樣，一個院子裡面有一些穿破爛衣服的死屍，許多老鼠在吃人肉。我就看著，大家都不敢進去。後來我們到了城關公社，公社書記給我彙報（因為我是代表地委來的），說有農民破壞屍體，吃人肉，省公安廳來人在破案。我才知道出大問題了，一夜沒有睡覺。

1959年光山縣十裡（原城郊）公社高大店大隊吳圍子小隊每天都死幾個人，有的小孩死了，大人把小孩的肉煮著吃，吃了人肉又得黃腫病，不到半個月的時間，由120人的小村莊，就死去了72多人。吳擘興和父親吳永寬一起，搜集整理了一份本村1959年餓死人的名單。2004年清明節為那些冤死的人立下兩塊紀念碑。碑文寫道……一九五九年我們生產隊同歷年比，算是個豐收年，夏季小麥就收一萬二千斤，豆子三千五百斤，說把國家任務完成後再提留，實際上一點糧食也沒有了。從那個時候就開始天天開會鬥人，若不交糧，就要交人，大隊辦公室成了打人的辦公室。人人都恐慌起來，沒有糧食吃，都到外邊找野菜野草和刮樹皮吃，到了最後野菜也沒了，樹皮也刮光了，就磨起糠渣子度日子吃，之後還拉不出大便來，就這樣把人連餓帶折磨，每天都死去好幾個；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著吃，吃了小孩的肉人又得黃腫病，就這樣不到半個月的時間，

有一百二十人的小村莊，就死去了七十多人……以上這些慘劇是我親身所見，望天下人記住這段歷史，讓歷史不再重演。

碑後附有全村七十一名餓死者和四十五戶絕戶的名單。吳圍子村的“餓死者紀念碑”代表了廣大人民的願望：永遠銘記一黨專制的苦難，奮勇推進中國民主政治體制改革！

光山縣人們吃野菜根、樹皮、稻穀殼、莊稼杆。外逃的人有的就死在路邊。有的家裡死了人，可活的人餓得抬不動死屍，只好把死屍放在家裡。有的全家都餓死了，5647 戶死絕，有的整村人都餓死了。到 1960 年底，各村莊專門成立埋葬隊，專門負責埋葬死人。許多農民跑到縣城找吃的，可是縣城站崗不讓進，所以城外的雪地上都是死人。後來政府用“每埋一個屍體，發一斤糧食”的辦法，把近十萬具屍體埋葬。

在這種毒刑打殺和斷絕糧食之下，廣大群眾成批死亡，全村毀滅，全家毀滅，死在哪裡臭在哪裡，就埋在哪裡，大人是薄土一層，小孩就拋在荒山裡。光山、潢川、固始縣的許多水塘裡都有死屍。但地委還繼續搞“反瞞產”。他們把省委撥下來的救濟糧發下去，一邊發口糧，一邊又“反瞞產”，今天發下去，明天收回來。潢川縣黨委第一書記梁德柱說，這是“以糧引糧”、“拋磚引玉”。該縣城郊一個生產大隊，把發給群眾的口糧，分裝在二百個鑊鑊罐罐裡，當做“反瞞產”的成績向公社報喜，群眾說：“這不是報喜，這是報命！”

信陽地區人民除了死於“反瞞產”鬥爭之外，還大量死於各種工程建築的勞動之中。最突出的是固始縣在白果沖水庫、百里大堰等三大水利工程建設中，被扣飯 6822 人，被開除飯籍 859 人，“借東風罰站”（脫光衣服在寒風裡罰站）1686 人，被拳打腳踢 2316 人，被毒刑吊打 4643 人，罰挑雙挑子 17220 人，另有 4972

個病人被強迫勞動。初步查出在 6 萬人中，被打死、餓死、凍死、累死的即有 10700 多人。“七一”公社上元大隊去了 200 多精壯勞力，死了 160 人，有一家父子兄弟 6 人都去了，全部死光。

固始縣黎集公社南園大隊民兵營長高壽禮在東幹渠工地上，打過 110 個民兵，打殘 11 個，打死 6 人。特別嚴重的是他把從工地私跑回家的社員魏少橋抓回來，組織民兵當場打死；當魏少橋的老婆來找他時，也被他吊在梁上毒打，活活打死了這個懷孕三個月的孕婦；高喊要斬草除根，又把魏少橋僅有的 4 歲小孩活活打死。

當全區人民饑寒交迫、死亡累累的時候，地委書記路憲文卻出入都有五、六個衛士隨從，每到哪裡都事先打電話通知準備飯菜，到光山縣一次擺了 24 個菜，到白雀公社 3 天，頓頓吃魚、吃肉、吃雞蛋，夜餐吃餃子。所到之處，縣和公社組織大批群眾鑼鼓喧天，鞭炮歡迎。

固始縣的楊守績、光山縣的馬龍山、潢川縣的梁德柱、息縣的徐錫蘭等人，出入都是攜帶“三機”、“八大員”。八大員是：通訊員、女公務員、女演員、攝影員、女放映員、女廣播員、女電話員、炊事員。三機是：收音機、照相機、電影機。馬龍山還加上幾個“大將”，即武裝部、公安局、財政局、法院、檢察院、商業局、宣傳部、報社編輯等幹部。

公社幹部也一樣貪污腐化，固始縣郭陸灘公社黨委書記李思正要喝八種酒，即：入黨酒、升官酒、見面酒、陪客酒、慰勞酒、餞行酒、結婚酒、離婚酒。公社一般多是三種灶，光山縣槐店公社的書記灶，頓頓有肉，三幹、四稀（三頓正餐中，有乾飯，也有稀飯，另有夜餐）；黨委委員灶，1 天 3 幹；幹事灶，2 稀 1 幹，大隊一級幹部，也是多吃多占，貪污腐化。光山縣北向店公社冷大灣大隊，

12 個大隊幹部，用了 4 個女服務員，半年之間喝了 323 斤酒，吃了 5600 斤牛羊肉，克扣社員口糧 8 千斤，貪污 4785 元。

1959 年 11 月間，路憲文從潢川縣驅車返回地委，沿途親眼見到倒斃在公路旁的死人、攔車要糧的群眾、被父母遺棄的孩子，他卻視而不見，揚長而去。路憲文怕真實情況傳到外界，指令各縣，“不准農民生火做飯，不准外出逃荒要飯，不准向上級反映情況。” 他還下令要公安部門“限期消滅外流人員”，指示社隊幹部民兵封鎖村莊，不許群眾外出逃荒；指示城鎮機關、工廠、企業一律不准收留農村來人；要求各縣委做到“街頭、交通要道沒有一個流浪漢”。街頭、交通要道一律設了關卡。駐馬店鎮執行命令，強制收容外逃的農民，收容了又不給飯吃，“造成死亡 350 餘人的慘案”。潢川縣公安局長馬振星下令將扣留的“盲流”投入監獄，餓死了 200 多人。從 1959 年 11 月至 1960 年 7 月止，河南省信陽地區由公安機關逮捕了 1 萬多人，其中 700 多人死在拘留所和監獄。農民無處可逃，只剩下餓死一途。

信陽地區的各縣、公社、大隊分別採取了各種方式封鎖消息，民兵日夜站崗值班，封鎖村莊，不允許農民外出要飯，說外出要飯是給共產黨臉上抹黑；不准農民向上級反映情況，說那是告黑狀，是反對基層黨組織，因此就是反黨；不准私自在家做飯，說私自做飯是反對公共食堂、反對人民公社，把小鍋打爛、不讓人家冒煙；扣押了許多群眾反映真相的信件。

張樹藩回憶說：群眾寫信到省委，被轉回地委讓嚴肅處理，結果有的被逮捕法辦了，有的黨員被開除了黨籍。光山縣某地有個農民找醫生看病，醫生說這個病好治，有兩碗粥就好了。因此將這個醫生逮捕法辦了。信陽縣委紀委幹部胡修玉看到餓死人的嚴重問題，給省委寫信反映情況，受到留黨察看處分。光山縣白

雀公社民校教師李玉倫、專區建築局黨員邢貴良等向中央寫信反映實情，皆遭到處分或下放勞動。當時路憲文在省委支持下，為了不讓幹部群眾向中央寫信反映情況，還專門開會讓各郵局把關，凡是反映情況的信一律扣壓，後來統計被扣壓的信件達 12000 多封。即使如此嚴格限制，還有人跑到許昌地區向上寄信。有一個黨支部 23 個黨員餓死了 20 個，剩下的三個黨員，給省委寫了一封血書，請求省委救救他們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書長戴蘇理扣壓並要查處。”如若當時讓這 12000 多封呼救信發出，縱然政府不管，在親朋幫助下，也必然會少餓死一些人！

光山縣委書記指示縣郵電局，凡是外出的信件都要進行嚴格檢查，誰寫信給外地的親戚朋友、上級機關、省市領導以及黨中央、毛主席反映情況，就扣下來，對署名的人進行開會批鬥，並戴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對匿名信就讓郵電局的同志回憶是誰送的信，設法查出來。有一封反映光山餓死人的信，郵電局的同志說好像是一個女的臉上有麻子，於是光山縣對全縣的女麻子進行檢查，搞得人心惶惶。

當時河南省委並不是不知道信陽地區的問題，省委主管財貿的副書記宋致和就曾在信陽到潢川縣的公路兩側看到過幾個餓死的人，但那時人人自危，誰也不敢堅持原則，不敢出來為人民說句實話。河南民政廳辦公室主任去信陽調查，見到農民餓死的慘狀，回到鄭州向民政廳長和省委監委書記呼救。可是上司毫無反應。他決定親赴北京向中央面陳，可剛到火車站就被省裡派去的人截住，終於沒能去北京。

1960 年 2 月，中共河南省委第十五次全會和全省五級幹部會議召開，吳芝圃作了《為實現 1960 年的持續大躍進而奮鬥》的報告，繼續反右傾，進一步大

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養豬場，河南“大躍進”至此達到頂點。1960年3月，吳芝圃向黨中央報告說，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辦得好的食堂占總數的66%。1960年夏，信陽地區的公共食堂普遍斷炊，最嚴重的村子80天沒有一粒糧食，浮腫病大面積蔓延，農民大量外逃或餓死。然而，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還在吆喝：“不是沒有糧食，而是糧食很多，90%的人是思想問題。”

就在河南人民一批批倒斃下去的時候，吳芝圃為了實現他夢寐以求的一個理想：讓黨中央在鄭州開一次全國黨代表大會，靠高徵購、高積累聚斂起來的民脂民膏，在鄭州北郊黃河岸邊也興建了一座豪華的園林型別墅群，內中除按法時中委和候補中委的人數，以每人一個套間蓋了一幢大樓外，還別出心裁地按當時黨的七位領袖，每人一幢別墅，從總書記到黨中央主席，規格面積逐級遞增，以主席別墅最為寬大考究。不料建成，“信陽事件”案發，吳芝圃下臺，中央再沒來鄭州開會。這群別墅竟長年閒置，無以利用，也漸荒蕪，室內牆粉剝落，地板朽爛。只是那幢主席別墅，永遠緊鎖著大門，自建成從未有人住過……

儘管河南省委、信陽地委嚴密封鎖消息，但消息還是或多或少地傳出一些。1960年4、5月間，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隱隱約約聽到一些關於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逼死人的消息，立即向河南省監察委員會詢問。河南省監察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劉名榜就是信陽新縣人，他回老家時，也在路上看到過死的人沒人埋和鄉親的饑餓情況，他家裡也有人被餓死，可他不敢講真情。因為河南省自反潘、楊、王運動以來，五風極為嚴重。“一手高指標，一手右傾帽”，幹部都害怕講實話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和反社會主義的帽子。劉名榜當時是省級幹部都不敢講實話，河南省當時“左”的形勢可見一斑。

中央監察委員會在河南省監察委員會那裡得不到資訊，就直接派人到情況最

嚴重的信陽光山縣。光山縣委嚴密地封鎖消息，千方百計地阻撓中央監委的同志下去調查，同時對下面的農民威脅恐嚇，不讓他們向上級反映問題。他們排除重重困難，直接到村子裡找農民瞭解情況。這才知道問題太嚴重，餓死人的數目很大。監委員的同志又調查了其他幾個縣，情況同樣嚴重。通過初步調查，查有實據死人數達 70 多萬。這一情況立即彙報給中央監察委員會和中央組織部主要領導，他們感到問題重大，當天晚上由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向周恩來彙報。緊接著，中央監委副書記王從吾又寫了一個關於信陽事件的書面報告，上報周恩來。周恩來看了王的報告後，感到問題的嚴重性，隨即向毛談了信陽的情況。根據毛的意見，第二天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緊急會議，通報信陽事件；決定立即成立中央工作組，馬上深入信陽地區，進一步核實，向中央作詳細的彙報。中央工作組在信陽調查了一個多月，情況比較嚴重的縣基本上都走到了，他們回到北京後，給黨中央、國務院寫了一份正式報告並附有零星報告和隨時報告。後來根據毛的指示和周的安排，調撥大批糧食到信陽以解燃眉之急。

1960 年 6 月後，河南信陽地區已餓死人達 100 萬。1960 年 6 月陶鑄寫給毛的報告說：解決農村問題的方法是開展一場“三反運動”，即反官僚主義、鋪張浪費和形式主義。具體內容為糾正基層幹部的違法亂紀、強迫命令一類錯誤。事實上，幹部違法亂紀只是農村嚴重危機的原因之一，這些都是幹部在執行上級命令的情況下幹的，犯下這類錯誤的幹部基本上都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積極分子，僅幾個月前，這些基層幹部還因有力地執行了上級指示而被表揚和重用。現在領導卻將自己責任遮去，而讓基層幹部當替罪羊。陶鑄解決問題的藥方，果然獲毛賞識。信陽地區有 8 位元縣市委書記被逮捕法辦，其餘的幹部統統被撤換。

1960 年 10 月，中共副主席陳雲來河南調查，和吳芝圃算了幾筆賬：河南有

多少耕地，能夠生產多少糧食，有多少農村人口，按最低限度農村人口要吃多少糧食，種子需要多少，飼料需要多少，全省吃商品糧的人口有多少……幾筆賬算下來，陳雲的結論是：我不希望河南調出糧食，你們農村能夠徵購的糧食，養活不了城市人口。但頭腦發熱的吳芝圃仍吹牛說：河南糧食產量比去年翻了一番還要多，不但不需要國家調入糧食，還可以調出糧食……

10月21日，中組部、中監委4名幹部寫出有關“信陽事件”的報告，24日，報告送毛。10月26日，毛批示劉少奇和周恩來“即看”此件。信陽事件給毛以大震動，次日毛批轉胡喬木推廣小球藻的報告，稱“此舉可以保證，不餓死人，減少甚至消滅浮腫病。”

11月12日，毛派李先念、陶鑄和王任重來到信陽調查。在陪同調查的過程中，吳芝圃又把責任全推到負責農業口的信陽地委副書記張樹藩的頭上，聲稱省委毫不知情；遭到張樹藩反駁後，吳芝圃尷尬不已。經過調查，陶鑄在河南省委擴大會議上指出：“河南有兩個突出的問題，一是1959年春季發生問題，反瞞產，沒在廬山會議上作檢討，廬山會議後繼續搞。二是河南發生這麼嚴重的問題，一直不向中央報告，後來被迫向中央寫了報告，還是忸忸怩怩不真實反映情況，而且還封鎖消息，這是很大的錯誤。公共食堂不垮，天理不容！”王任重在講話中說：“我到（信陽地區的）光山去看過，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人人戴孝，戶戶哭聲，確實是這樣，這不是什麼右傾機會主義攻擊我們，這是真的。”

信陽事件本是共黨的業績，可信陽地委卻說是敵人破壞的結果。1960年12月，信陽地委寫了報告送河南省委並報中央，嫁禍於在“土改”中被消滅了的地主、富農：由於地主、富農在土改時“漏了網”，“大批地混進了革命陣營內部，實行反革命階級復辟”，造成“群眾生活異常困難”……。言外之意，壞事都是

混進共產黨的“漏網地主”、“漏網富農”幹的。因此必須“進行徹底的民主革命補課，像土改一樣……把領導權奪過來。”信陽地委製造的地主富農“實行反革命階級復辟”的神話；既保護了大批極左殘民的幹部，也保護了毛這個造成大饑荒的最大禍首。1961年元旦那天，毛把該報告批發全國，說那“是一個很好的檔”，全國“都應照此執行”。1月，吳芝圃被迫承認，“信陽事件是河南解放以後的大慘案”，“災難發展到慘絕人寰的程度”，是他自己對“階級敵人、蛻化分子失去警惕”的結果。

1961年7月吳芝圃改任河南省委第二書記；1962年4月，中央免去吳芝圃在河南的職務，調中南局負責文教工作。同時，河南省委為潘復生、楊珏等平反。1962年5~8月，中共中央、中央監委分別批示，為潘、楊平反。吳芝圃沉痛地說：“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大得很……組織上無論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吳芝圃後來數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萬人民的債一輩子也還不清。”

關於信陽16個縣市餓死人數，據說中共內部還有一本帳未公開：“第一次統計是83萬人（固始縣、光山、息縣各10萬以上，正陽縣8萬，潢川縣5.6萬，商城縣、汝南縣、上蔡縣和信陽市各4萬，羅山縣3.8萬，平輿縣3萬，遂平縣2.2萬，新蔡縣2萬多，西平縣2萬，確山縣1.2萬，新縣3600）；第二次統計查出97萬；上級估計在百萬人以上。”“信陽事件”的主角路憲文回憶說：後來統計實為至少150萬人以上。

當董必武派的中央監察調查組回京後，副總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率領工作組於1960年11月12日到達信陽。調查了五個月後，工作組組長陶鑄在一次講話中說：“我看死亡數字就不要再統計下去了，已經一百多萬了……”；

陶鑄的結論是造成農民餓死的“通通是貧雇家（庭）出身的幹部”。當時在死亡數字上弄虛作假是普遍現象。那時候，河北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詢問本地區餓死人的情況，下屬向他請示，餓死人的數位是不是可以少報一點？原因是有的地方死了人不報告，結果不但受到了上面的表揚，而且死人的那份口糧還可以繼續領，這叫吃空額。而張家口報一個死亡，減一份口糧，報一次死亡，受一次批評，因而各省上報國家統計局的死亡數字，已是縮小了的。

當時擔任國家統計局局長的賈啟允曾這樣說：“全國各級統計部門都在各級黨政機關領導下工作，統計數字直接受到各級黨政領導人主觀隨意性影響，計畫部門可以修改統計數字，統計數字很難搞得準確。”由此可見，全國各地真實的死亡人數是很難準確計算的。

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作家白樺是信陽人。他當時正在上海郊區的一家工廠勞改，同居一室的同鄉從信陽探親回來，對他講了如下一段話：我剛從咱們家鄉回來……俺家裡的人都餓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兒子也死了……她咋活下來的呢？……有一天夜裡，一隻餓得只剩兩張皮的豬沖進她的院子，她連忙關上門，一棒就把餓昏了的豬敲死了，連夜剝了那頭豬，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來挖出一塊燒燒吃。她不敢給她那個五歲的孩子吃，怕他說出去。一說出來，村子裡還活著的人就會沖進來和她拼命，會打死她，要她把豬肉拿出來。她眼睜睜地看著兒子叫著“餓呀！媽媽！餓呀！媽媽！”一直到死……人變得那麼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這樣。當時，信陽地區“一個村落一個村落的人被餓死”（白樺語）。

有人說：新縣當時人口40萬，餓死15萬。新編《信陽縣誌》載：非正常死

亡 5.1 萬人，占人口 9.1%。《西平縣誌》記載餓死約 4 萬人。截止 1960 年春，《息縣誌》記載 1960 年內非正常死亡 10.7 萬餘人，占該縣人口的 25.7%。餓死 10 萬人的息縣，有 5133 戶、639 個村子死絕。僅據潢川、光山、息縣統計，孤兒就達 1.2 萬人之多！餓死 8 萬人的正陽縣，不少人家絕戶了。餓死 10 萬人的新蔡縣，被稱為“大屠殺、大慘案”，至今仍在貧困中。

餓死 10 萬人的固始縣，有 3424 戶死絕，無人煙的村莊有 4 百多個，孤兒 5000 多個，房屋毀壞占 50%以上。死亡的多是青壯年。有一 12 歲的小孩到縣公安局哭訴：“共產黨為人民，我父母都餓死了，你們為什麼不管？”公安局長李克武正在打撲克，他叫人把這小孩關了起來。該縣王流公社鄧圍子大隊 1666 人，死亡 970 人，占 60%；七一公社上元大隊謝老莊小隊 132 人，死了 120 人，剩下 12 個人，其中只有 3 個勞動力。該縣段集公社趙崗托兒所，390 個小孩死了 78 個，患浮腫病的 93 個；一個敬老院 50 個老人，死了 30 人。全縣患浮腫病的 3 萬多人；16~45 歲的婦女有一半以上（有的生產隊達 70%~90%）子宮下垂和閉經。1969 年信陽駐馬店時，竟發現當地幾百里地沒有人煙，沒有耕種，而當地是肥沃的平原！只有少數外地難民在耕種。中央機關在當地建立幹校，直到 1973 年。

臨靠淮河的淮濱縣，平均每年正常死亡 4 千人。當時的淮濱約 50 萬人左右，有人說死了 18 萬，也有人說死了 16 萬或 17 萬，占總人口的 30%左右。《淮濱縣誌》載：僅 1960 年死亡 10.2 萬，9.8 萬餓死。當時的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的秘書余德鴻是淮濱縣人，半個月內，余的父親、母親、伯父、伯母先後死去。幹部家尚且餓死，普通農家就更慘了。

余德鴻撰文回憶：他因自己已和張樹藩一起被打成“右傾分子”，根本不能

向外報告“餓死人”。“我於 1959 年 12 月份奔喪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僅包信至防胡的 9 公里路旁，見到的屍體約 10 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感到極其難過。在由防胡回家的 4 公里路旁，發現了更嚴重的問題。在防胡街西的幸福河南岸，發現一片屍體，可能有百具左右。當時防胡總人口為 5 萬人左右，共餓死了 2.2 萬人，占總人口的 40% 多。走到何砦村西的葦塘附近又發現一片，數量也很多。我當時雖然眼中無淚，但心中好像正在流血。我到家後，我父親及二伯父親已經死了，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已無力行動，我母親正在采野草樹皮等物。我在家呆了兩天，既沒有力量安葬死者，更沒有力量安慰生者，也沒有吃到任何東西，就含淚離家了。據說在我走後的第二天、第三天，我三伯父母及堂弟路路就相繼死去了。其中吳砦大隊（我家那個大隊）死亡人數占總人口的 52%。小余莊生產隊（我的祖居之地）共 12 戶、75 口人，共死亡 38 人，也超過了半數。其中，我二伯父因生前日做有棺材，死後我姐姐找人將其裝了進去，因無力抬動，屍體在屋內停放了數月，到 1960 年春季才被埋進村邊的一個糞坑裡（無力重新年挖坑）。馮莊大隊小李生產隊 13 戶死絕了 9 戶，黃崗大隊馬樓村原 400 多人，餓死 300 人左右，楊圍孜大隊王莊生產隊 207 人，餓死 107 人，其中死絕了 6 戶。原地委黨校副校長李心龍同志在家的 6 口人，死了 4 口。總之凡是我瞭解的村莊，死亡人數差不多占半數左右。由於死人的時間比較集中，數量也比較巨大，而活著的人也大奢陽東倒西歪，少氣無力，不能逐個掩埋，一般都是放在拖車上（一種用牛拉著向前滑行的木制農具），用牛將其擔到村外停放。死人的高潮時期，也正是貫徹廬山會議精神，開展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運動的高潮時期。人吃人的情況幾乎是村村有之，很多典型的悲慘事例，我實在不忍心再說了。”“我回到專署的當天就被拉進了批鬥會

場，……他們問我家中的死人情況，我說是年老多病；他們問我農村形勢，我說很好。因為被批判鬥爭者和參與批判鬥爭者是不平等的，是沒有道理可講的，只能是他打你挨，他罵你聽，打死你算是罪有應得，逼死你算是畏罪自殺，叛黨叛國。面對這種情況，我不得不採取了個光棍不吃眼前虧的辦法，得過且過。”

據官方統計 1960 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 1 千萬。1960 年信陽地區有 9 個縣死亡率超過 100%，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1959 年 10 月至 1960 年 4 月的半年內，有青山綠水、魚米之鄉美稱的信陽，之所以出現 850 萬人中有 150 多萬人餓死，餓死率達 17.7%，此為官方統計數；民間推算實際上還要多一倍。大牲畜損失 24.6%，家禽、家畜損失 70%以上，破壞大型農具 78.3 萬件，破壞房屋 77.4 萬間，田地荒蕪 144 萬畝。

7·河南——比地獄還慘

1957 年 10 月，淮陽縣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在幹部中開展整風運動，在群眾中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全縣農村點名批判 464 人，逮捕法辦 196 人，重新戴帽子 94 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對一些“右傾”“瞞產私分”的農村幹部進行了鬥爭，鬥爭中採取了遊街示眾、戴高帽、畫花臉等手段。1958 年元月 3 日，整風運動在鳴深放透和充分做好準備工作的基礎上，正式轉入反右派鬥爭，至 1958 年 12 月，淮陽縣反右派鬥爭結束。在這次運動中，全縣共劃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和反社會主義份子 1235 人，其中機關幹部 333 人，教師 876 人，工商、宗教界 26 人。這些右派份子分別受到處理，其中勞動教養 117 人，撤銷一切職務送農村監督勞動 610 人，撤銷一切職務留機關使用 126 人，開除回家 295 人，其它處理 83 人。反右運動打擊了一大批說真話的人。

1958 年 7 月，淮陽縣委貫徹中共中央八屆二次會議通過的“鼓足幹勁，力

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發揚敢想、敢說、敢幹的精神，批判“觀潮派”、“秋後算帳派”。縣、鄉 7393 名幹部搞“元帥田”、“衛星田” 1.1 萬畝，開展“插紅旗、拔白旗”運動。縣、社連續召開萬人大會 60 餘次，把大躍進進一步推向高潮。一時浮誇風大起，各種衛星紛紛上天。城關葉莊靳隆昌放出的紅薯衛星，平均每棵 40 斤以上，最大的一顆有 80 斤；朱集鄉畝產 69,766.2 斤的水稻衛星；王店鄉畝產 6,421 斤的芝麻衛星；馮塘鄉畝產 1,907.12 斤的皮棉衛星；班口鄉畝產 32,750 斤的大豆衛星；齊老鄉 300 畝大面積平均畝產 2098.2 斤的大豆衛星；新站鄉畝產 12,857 斤的玉米衛星；安嶺鄉畝產 15,730 斤的玉米衛星；鄭集鄉畝產 34 萬斤的紅薯衛星；……數不勝數。

從 1958 年 8 月成立人民公社到 1959 年 3 月，全縣所有的公社、大隊、小隊和社直單位沒有不刮共產風的。共產風所至之處，大至土地、牲口、房屋，小至碗、筷、針、線甚麼都刮。這一時期，共產風範圍廣，平調項目多，數量大，平調的農副產品多，生活傢俱多，甚麼都調，平調的方法簡單，手續混亂，對生產力和社會財富破壞極大。

公社組織形式軍事化，大隊、生產隊、作業組按營、連、排編制，男女分別集體住宿。為了便於領導，開展了移村並莊運動，對一些較小村莊實行並村遷戶。鄭州會議前後（即從 1958 年公社化運動到 1959 年 4 月）共移村 647 個，占總村數的 31.1%。遷 25,477 戶，占總戶數的 16.7%。遷移村民 142,831 人，占村民總數的 22%。扒房 40,133 間。其中扒光的 172 村，占縣總村數的 8.2%。移村並莊給群眾生活帶來很大困難，很多地方出現一家三代同居一室的情景，有的地方甚至出現兩戶以上居住一屋的情況。

1958年下半年根據中央“以鋼為綱”大辦鋼鐵的指示和河南省委鋼鐵緊急會議精神，要求大搞小、土、群。全縣很快掀起大煉鋼鐵高潮，近十萬人齊上陣，機關、學校、農村紛紛建立小高爐，煉鋼煉鐵，各行各業支持“鋼鐵元帥升帳”。除支持國營大廠廢鋼鐵 1325.3 噸外，並建立煉鐵爐兩座，煉鋼爐 380 座(土爐)，調出支援鋼鐵勞動力 16500 人。淮陽縣本無鐵礦，為了煉鐵煉鋼，一面號召群眾獻鋼鐵，一面組織 4000 餘人日以繼夜在沙河撈鐵砂，到 12 月，共撈鐵砂 395 萬斤。另外還組織“鋼鐵大軍”去禹縣辦鋼鐵廠(到 1960 年 8 月才投產)。1958 年年末統計，全縣煉鋼 1.13 萬公斤，煉鐵 5.64 萬公斤，僅完成計畫的 13%，而合格產品更是微乎其微，真可謂得不償失！1958 年，盲目投資興建的澱粉廠、肥料廠、冷凍廠等 21 個工廠，或中途下馬，或因為經濟效益甚微而停辦。如造船廠造出 5 艘機動船和人力船均因不合設計要求，於 1961 年報廢，損失 12 萬元。

教育戰線提出“一個月普及小學教育”、“三個月掃除文盲”等躍進口號，大搞全民辦學，浮誇風盛行。是年秋，淮陽中學改為“淮陽大學”，淮陽師範改為“淮陽師範學院”。各部門、各公社也相繼辦起“農業中學”、“工業大學”、“淮陽縣衛生學校”、“戲劇學校”、“盲聾啞學校”、“農業中學”等。隊社還建立各種“紅專大學” 337 所，學員達 26,498 人。同時各中小學合併，實行“集體住宿，集體吃飯，集體讀書，集體勞動”。1959 年全縣有幼稚園 1161 處，2042 班，入園幼兒 4.02 萬人；小學 437 處，2246 班，學生 10.69 萬人；中學 29 處，180 班，學生 6968 班。由於學校猛增，師資、經費、校舍、設備等方面的需求超過實際承受能力。許多學校管理混亂，教學品質明顯下降，新辦大學徒有虛名。

浮誇風使人們對於糧食產量失去了正確的估計，當時認為：糧食總產達到

584,499.6萬斤，每人平均8600斤；全年糧食作物面積1336,276畝，畝產4,381.2斤，超過1957年年產量290斤的15倍；人均糧食是美國1956年人均糧食904.5公斤的4.7倍，等於英國1956年人均糧食202.5公斤的21倍。不僅高估產，1958年的糧食徵購也是驚人的，糧食徵購完成17064萬斤，超額完成2646萬斤，占第一個五年計劃累計所完成的徵購任務數30840萬斤的55.77%。而當年的糧食產量實際僅為32,017萬斤，徵購量達到了總產量的53.3%。

為了完成徵購任務，全縣範圍內普遍進行了“反瞞產”。是年秋，馮塘公社黨委第一書記位景全在泥河召開700多人的反瞞產會議。在會議上，因泥河社社長報的產量低，位景全先讓他坐在插在大車旁的擀麵杖上，後又讓他坐在石灰當中。這次會上位景全還讓劉從得跪在磚楞上，腳尖不准著地。鄭集公社副書記于敏芳，在指揮營大隊反瞞產會議上說：“糧食報的多了是英雄，報的少了是狗熊。”這次會議連開三天，一個反瞞產會上就打25人。趙莊小隊會計朱玉三，在會上被摔了20骨碌子，回去上吊自殺，被救未死。

在鄭集公社，1958年僅李營一個小隊一年就死去23人。農民曹全興（黨員）說：“人民公社不如高級社，高級社不如初級社，初級社不如互助組，互助組不如單幹，解放後不如解放前，一步緊一步，步步吃虧，真是和割心的一模一樣。”

到1959年6月份，淮陽縣患浮腫病的人數已達14000人。1959年冬天和1960年春天，發生食堂停夥的共113個大隊，占全縣276個大隊的40%；食堂616個，占19.3%，人口122,299人，占18.8%。一些幹部隱瞞缺糧饑荒的真實情況，馮塘公社宣傳委員查應國住在阮橋大隊，在實際缺糧的情況下，對公社報告是自足隊，到4月份每人吃到糧食5兩8錢（16兩秤）。這個大隊在1960年春發生浮腫病165人，死去35人，牲口死亡56頭。

幹群矛盾也十分突出。在馮塘公社，從 1959 年 10 月至 1960 年 6 月，動手打人的有 136 人，占大小隊幹部數的 38.3%。其中致死的 111 人。在林蔡公社，1959 年冬 1960 年春發生違法亂紀 1274 起，被打的群眾 1394 人，其中致傷的 73 人，致死的 54 人，打跑的 107 人。大何莊大隊 14 個大隊幹部中，1959 年冬 1960 年春共打 269 人，占該隊 1900 人的 14.1%，其中打死 3 人，因打致死 3 人，打傷 3 人，打跑 5 人。治保主任何慶學 1 人打 61 人，致死的 3 人。當時在農村，幹部打人是普遍的現象。新站公社萬許莊大隊副支書熊欽榮 1959 年以來共毆打社員 41 人，被打致死的 3 人。1959 年 12 月 24 日大連公社王集大隊趙樓小隊張洪遠（27 歲）多吃一個饅頭，被小隊長趙興亭發覺後即進行鬥爭。趙親手將張打數十骨碌子，當時打得鼻口流血，十天死去。1960 年元月因社員張洪江推磨將糧食弄撒一把，小隊長趙興亭不容分說將張按倒泥窩裡毒打一頓後又踩數十腳，打得當時吐血，14 天后死去。

社員即使生病也要上工。1960 年 2 月社員葛照祥 72 歲，因病不能上工，被小隊長張尚德打得頭破血流，昏倒在地，被人架回家死去；4 月葛應修腿腫流血不能上工，張尚德強迫其勞動，葛提了意見，被拳打腳踢，因傷重而死。1960 年 3 月張複健有病不能上工，項金高（黃集公社雙廟劉大隊項莊村小隊隊長）跟副隊長張傳志說：“咱倆是個靈先生，給他治治病”！進行拳打腳踢，擰耳朵，因打得過重 20 天死去。自 1959 年 10 月至 1960 年 9 月，項金高以社員上工晚為理由，共毆打社員 31 人，被打致死的 2 人，打傷的 3 人。

在糧食十分緊張的情況下，“餓飯”成為幹部“督促”社員勞動的重要手段。王店公社勞橋大隊支書業茂中規定病人不能幹活不叫吃飯，餓死 6 人。從 1958 年 10 月 1 號至 1960 年 10 月底，鄭集公社共 2,606 人死亡，其中正常死亡的 1537

人，非正常死亡 1069 人，占全公社人口的 1.9%。從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上看：因扣飯餓死 140 人，因打致死的 80 人。

在強制之下，農民從事著高強度的勞動，他們夜以繼日的勞作，沒有星期天，甚至春節也不能休息。1958 年春節前，縣、鄉、社、隊召開群眾會，提出打破常規過春節，春節不停工，提前實現水利化，宣誓的人在 12 萬人以上，春節一天出動勞動力 425,000 人，完成土方 127 萬方。1959 年冬和 1960 年春，在群眾生活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全縣水利工程仍在進行，先後完成蔡河、淮南、淮北三大引水渠，並完成 34 條支渠，200 條斗渠，2,500 條農渠，31,500 條毛渠，總長 5642 公里，開挖 5,627 萬土方。在衣不能蔽體，食不能果腹的境況下，農民們日以繼夜地從事著高強度勞動，這不能不損害社員們的身體。

淮陽縣共 13 個公社，273 個大隊，2,842 個生產隊，635,517 人，1959 年 10 月至 1960 年 10 月 10 日，先後共發生各種疾病 62,216 人，占總人口的 9.8%。其中：浮腫病 8,573 人，占總人口的 1.35%，占發病人數的 13.7%。在此期間共死亡 11,967 人，占總人口的 2.5%。因幹部作風死亡的 371 人，占死亡人數的 3.1%。大躍進造成多少人非正常死亡，現在已不可能獲得一個準確的數字，但下面的例子足以說明餓死人情況的嚴重。現王店鄉李莊自然村在大躍進期間百十口村民中共非正常死亡 30 人。達 1/3。

1960 年底，毛澤東指定他身邊的幾位工作人員到信陽去調查。可當這一行人于 1961 年 1 月中旬到達河南時，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生怕他們看到真實情況，把他們安排到了許昌專區的鄆靈縣。據他們回憶，鄆靈縣農民大量挨餓、生病、死亡。

1998 年諾獎得主崔琦是許昌寶豐人，中共上臺時姐姐將年僅 16 歲的崔琦接

走，逃到香港，輾轉到了美國，成為一名科學家。而留在家鄉的父母都在 1960 年前後的大饑荒中餓死。在記者採訪中被問到一生中有無後悔之事時，他這樣說：“若自己不出國，或許父母親就不會在大陸雙雙餓死了”。說著流下了眼淚。1960 年秋趙紫陽的親戚們餓死在滑縣。

南陽地區內鄉縣農民張先生說：尚崗生產隊吃食堂時 108 人，餓死了 31 人。餓死的人沒人抬，都餓得沒了氣力挖墓坑，有的死屍被老鼠掏吃了眼睛，露著倆黑窟窿，看著又慘又怕。隊幹部夜裡能偷偷吃小灶，一個也沒餓死。隊幹部就吆喝人們，把屍首拖到溝裡，填上土掩埋了。鄰近的淅川縣餓死人更多，我姑姑嫁到七八裡路遠的淅川縣唐房村，60 年春上食堂有許多天不冒煙，一個生產隊僅剩下 20 多人，有一家四口都餓死了，這戶人家也絕後了。淅川縣兩年間人口就減少了 1/5，不亞於信陽地區。

曾到方城縣勞動過的右派張先生說：我老家社旗大馮營前營村就慘了，1960 年前後，一個村兩個生產隊餓死 54 人。我那 4 個孩子餓得在床上起不來，我老婆去打水，關係好的鄉鄰在食堂做飯，不吭聲偷偷扔到水桶裡兩疙瘩芝麻葉。我老婆回家後，讓幾個孩子吃了，幾個人才緩過口氣。其子說：1960 年三兩八錢的定量也沒了，人們稀湯也喝不上了，吃糠、吃野菜，吃牛糞，吃大雁屎，把玉米芯用石滾碾碎吃，到酒精廠挑酒糟吃，人們都餓極了，只要能填肚子的東西，都往嘴裡咽。你問吃樹皮沒有？樹木在大煉鋼鐵時被砍光了，連樹皮也沒得吃。家裡人餓極了吃牛糞，牛拉糞了都去搶，回來後家裡也沒鍋，鐵鍋在大煉鋼鐵時都砸了當原料了，食堂解散後鐵鍋也買不到。我媽就用個破洗臉盆子，把牛糞拍成餅狀，放在洗臉盆裡用火燒燒，填肚裡充饑。我爺爺抗不住餓死了，死時皮包骨頭，頂多幾十斤，我媽和我們幾個餓的都動不了，鄉鄰幫忙才把爺爺埋了。

一個下放到南陽方城縣的右派李先生（為退休幹部）說：1958年夏季麥收，浮誇風盛行，虛報產量，畝產300斤小麥能報800斤，其實那時候小麥畝產大多是200多斤。當時實行統購統銷，上級以下邊報的糧食產量按比例留口糧。因為虛報的產量高，上繳的小麥也多，生產隊留的口糧就少。例如在楊樓公社，有的隊人均口糧有60多斤小麥，有的隊人均口糧才20多斤小麥。到了秋收的月份，大煉鋼鐵開始了。楊樓公社的煉鋼處選在一個叫尚洞的崗坡上，一共修建了800個小高爐。修建時都是就地取材，挖土和泥巴壘成圓柱體，外徑80公分到1米，內徑60公分左右。把農民家裡的水缸砸破，再把缸渣碎片碾成沫子做高爐底座的內芯。小高爐修建的多，看起來密密麻麻，點起火更有氣勢，夜裡十多裡地外都能看見火光沖天。燒爐子的燃料起初是木料，碗口粗的樹木全部砍完當柴火，另外家家戶戶的門板、木床、桌子、椅子、凳子，都拉到小高爐處當柴燒。專門有人負責劈柴，那些櫃子箱子，八磅大鐵錘砸下去就粉身碎骨，然後把這些乾柴壘成垛子，有兩米多高，一米多寬，象寨牆似的，最多時彎彎曲曲足有一裡地長。砍伐的樹木鋸成半米長或一米長的樹段，也堆成堆，把這些濕柴搭配著那些乾柴燒。有一次要放衛星，就是800個爐子都冒火，連續燒七天七夜。一般是兩三人包一個爐子，人都得在爐子邊守候著，瞌睡了就打個盹。你得保證七天七夜不能停火，如果哪個爐子火滅了，檢查團發現就要“炒鐵蛋。”就是五、六十人到上百人的積極分子圍成一圈，勒令那些爐子滅了火的消極分子站在中間，這邊踢一腳，那邊打一拳，把那些消極分子打的暈頭轉向。有一個農民對煉鋼說了怪話，被別人揭發。為殺一儆百，乾脆臨時搭建了一個兩米多高的檯子，幾十個積極分子把那個說怪話的農民圍在中間，打的鼻青臉腫。最後那個農民被一腳踢下高臺，摔得順嘴流血動彈不得，也不知道後來是死是活。煉鋼鐵天天吃紅薯，吃的人吐

酸水。58年莊稼長的好，紅薯又多又大，有經驗的老農估計畝產在3000多斤。可男女勞力都去煉鋼鐵，莊稼豐產不豐收。秋天又下了連陰雨，紅薯爛在地裡，也沒曬紅薯乾。豆莢炸口豆子發芽，玉米在秸杆上發芽有一砵多長。如果當時把那些紅薯收回來儲存到地窖裡，能當多少人的口糧啊！後來木柴樹段燒光了，公社就組織農民去平頂山擔煤。從方城到平頂山100多裡路，一路上看到地裡的紅薯被犁翻起來扔在地裡，擔煤的農民帶著做飯鍋，走到那裡，就撿路邊地裡的紅薯煮著吃。小高爐用當地的貧鐵礦石，鐵礦石燒化後，個別爐子流出來一些黑乎乎的鐵，可是鐵和渣凝結在一起，一敲就破。燒到冬天，上級又要求修建20個高6米的大高爐，外徑有兩米到三米，內徑有一米到兩米，底座還是用缸渣、碗渣、碎片碾成沫子。因為缸渣不夠了，就砸農民家的瓷碗。經過所謂的土專家指導，這次大高爐除了用鐵礦石，還用“引鐵”，就是把鐵車軋轆，農民家裡的鐵鍋、鐵門環，鐵門鼻等鐵器收集一空，放到高爐裡。當鐵礦石燒化時，還要放石灰石，目的是促使鐵漿和鐵渣分離。20個大高爐確實煉出了1000多斤鐵，產量最高的衛星爐產有二、三百斤鐵，都是一種粗生鐵，據說能打造簡單的犁鏵等農具，別無他用，真是勞民傷財得不償失。

他還說：60年3月，我被押送到十裡廟磚瓦廠勞動，那裡有定量供應，現在回想起來是救了我一命。6月份麥子成熟時，我們在外面勞動，看到附近的地裡，有人餓的忍耐不住，掐麥穗揉搓後吃麥籽。當時有許多從唐河等縣逃荒過來的災民，個個面黃肌瘦，他們先被集中到南陽收容站，然後被送到磚瓦廠。一個唐河縣祁儀公社的小夥子偷偷告訴我，他們那裡樹皮被扒吃光了，大雁在野地里拉的雁屎，人們也撿著吃。餓死的人很多，有的村子死人都沒人抬出去掩埋，因為都餓的走不動了。一天傍晚，我進城路上，看到一個個饑民面無表情，夕陽下

拖著瘦長的身影，在路上蹣跚挪動。有的走著走著，就一頭栽在路邊，再也爬不起來了。真可以說是餓殍載道，可是誰也無力去救去管。我老家是鄧縣文渠公社李樓村，100 多口人餓死 20 多個。其中一家是地主，別人敢去偷青苗吃，他一家不敢，結果 11 口人被餓死 7 口。由於文渠公社餓死人多，區委書記鄭某某害怕追究責任，就開槍自殺了。60 年秋季收成好一些，又開始了“拔釘子”，凡是拿印把拿勺把的基層幹部，統統集中起來整治批鬥，連鄧縣的縣長和縣委書記也不能逃脫。縣長和我是熟人，後來告訴我，在“拔釘子”期間整天喝稀湯，餓的受不了，有次上廁所，看見牆頭上搭有半幹的紅薯秧子，就拽下來往嘴裡填。

南陽地區唐河縣 1958 年曾創造全國第一顆小麥“高產衛星”和“保證畝產籽棉 1.2 萬斤，爭取 1.5 萬斤”的棉花高產奇跡。結果該縣的糧食被大量外調，供上級領導觀看的糧囤僅表面一層是糧食，下面全是稻草和玉米秸。不久，斷糧的農民成批餓死，萬戶蕭疏、餓殍遍野，路上隨時可見倒斃的死者。唐河縣餓死 50 多萬人，縣委第一書記畢可旦醒悟過來，曾五次要求上級撥給五百萬斤糧食救急，南陽地委卻無動於衷，反批評畢可旦“反瞞產私分”不積極；他只好眼睜睜地看著農民餓死。在淅川等鄰縣的三個縣委書記、縣長因饑荒死人被捕，上報中央等候批准槍決時，畢可旦風聞自己將被解押南陽，“很可能槍斃”，便領著全家 6 口人半夜跳了井，夫婦 2 人及 3 名女兒溺斃，僅年方 14 歲的兒子畢劍增被母頂上水面逃生。還有一個兒子在外地上學得以倖免。文革後，畢被平反，官方為他遷墓重葬。可是官修墓碑敘述他的生平時，只說他 1957 年任唐河縣委第一書記，1960 年 11 月逝世，對大躍進和他的死因隻字不提，好象根本就沒有那回事。倒是與他一起跳井時年方十四歲、被母親頂上水面逃生的兒子畢劍增說了實話：“唐河當時餓死人多，我父親身為父母官，他是有責任的。他既是浮誇風

的執行者，也是一個受害者。”

民間認為：河南餓死了 900 萬。按官方公佈的人口數推算，河南三年間死亡人數約 400 萬（其中 1960 年約 190 萬），少出生人口 2 百多萬（其中 1960 年約 100 萬）。人口死亡率最高的是 1960 年，為 39.6%，而增長率最低的也是 1960 年，為-25.59%，居全國之首。

第 115 節 湖南——人給豬戴孝

1· 共產風

1958 年 8~9 月寧鄉全縣迅速完成公社化。“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公社姓公，公就是共，共就是公。共產黨不共產，還是什麼共產黨；不共產，還能進什麼天堂！”湖南甯鄉縣縣委書記的這番高見，成了各級基層幹部的口頭禪。縣委領導人在大會上宣稱，我們要興無滅資，打爛罐罐罐罐，使全體人民無家無業，輕裝上陣，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為根絕私有觀念，寧鄉縣不僅抄了社員的家產，扒了社員的灶頭，而且嚴格規定，任何人不准私自起火，不准私吃食物，不准在房前屋後的零星土地上種糧種菜，不准養雞養鴨。後來個別地方准許社員家養一兩隻雞，但不許開火，雞和蛋不准自食，只能由供銷社收購，名曰“出口爭外匯，換機器”。否則就扣上“吃社會主義”帽子。

寧鄉縣東湖壩新花大隊有個周老漢，他老婆有頭昏眼花的毛病，要吃黑母雞下的蛋作偏方。於是，他便壯大膽子偷偷在床底下養了一隻黑母雞下蛋給老婆吃。這只沒共產的母雞不爭氣，下了蛋便“咯咯大”的叫了幾聲，被積極分子報告了供銷社經理。經理馬上跑到周家，強迫他交出雞和蛋，還要他寫檢討到大會上挨批。周老漢這一下受不了，跳塘自殺。老婆坐在塘邊又哭又喊，女兒和兒媳跳

進塘裡拼命地把他拖上來。經理站在岸邊大罵：“你個老不死的，好大的膽子，私養雞婆吃雞蛋，你吃社會主義，還用死來威嚇幹部，明目張膽地反對三面紅旗！你看老子怎麼整你！”最後，周老漢還是站在臺上作檢討、挨批鬥。

據 1961 年《寧鄉花明樓公社整風整社向地委的報告》：“‘共產風’刮了三年，越刮越大。大至房屋、牲畜、器材、勞力，小至火鉗、茶壺、燈盞、火柴、針線等等，無所不包。被平調房屋 25600 間，每戶平均 1.6 間。搞得許多人‘家空業盡’，有好多戶人家流離失所。貧農劉梅生有病，幹部強迫搬家，走慢了一點，被幹部一頓亂拆，把一屋的傢俱什物打碎了，僅拿出一床被窩，氣得劉痛哭而去，遠走他鄉。“生活集體化”解體後，許多人家吃沒吃的，住沒住的，真是家破人亡，流離失所。許多人只好擠居在集體的豬欄、牛圈之中；有的搭起個小草棚，一家數口，幾代同堂；有的幾戶人家擠在一間破屋裡。

共來的錢和物，大部分用來蓋樓、起廠、修水庫，小部分用於食堂和大煉鋼鐵。縣委一聲令下修禮堂，資金、磚瓦、木料和人工，全由各公社平調。至於社員家裡抄走的糧、油、肉、禽、蛋，食堂化初期，還大多送到大鍋灶中，讓幹部社員一起打牙祭。到 1958 年冬以後，歷次抄家搜抄來的肉魚蛋品，進了幹部的腹中。

據 1961 年 12 月寧鄉縣委上報的《寧鄉平調退賠情況》統計：1958 年初全縣共有炊具 500 萬件，三年來共損失 280 萬件，占 56%。1958 年初有傢俱 1200 萬件，三年來損失 581 萬件，占總數的 48.4%；58 年初共有農具 424 萬件，三年來損失 274 萬件，占 64.5%。全縣 1958 年初群眾住房有 702641 間，三年來由於拆毀敗壞減少了 262689 間，占房屋總數的 37.25%，其中拆毀 155740 間，占原有總間數的 23.1%。

2·公共食堂兩重天

寧鄉公共食堂化。人民公社宣稱：公社對每個社員實行“18包”：包吃、包住、包穿、包工資、包看病、包教育、包養老、包看戲、包喪葬、包婚嫁、包剃頭、包洗浴、包接生、包撫養、包來客……公社化中幹部們聲稱：生活越過越高，穿衣越穿越俏，工資越拿越多，老婆越娶越好……公社按軍事化體制，把全體社員組織起來，實行“三化”，其中主要內容之一，就是“生活集體化”的吃食堂。

從1958年10月紅旗人民公社松柏灣辦起第一個公共食堂，至1959年初，全縣辦起公共食堂16500個。從城市到農村，寧鄉人99.5%都開始了“吃飯不要錢”的生涯。強調“一大二公”，食堂也是越大越好，各生產隊把幾十上百家農民編入一個食堂。紅旗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吃飯的人一千多，遠的來回要跑十幾裡，排隊要排老半天，吃一頓飯時間全耽擱在裡邊，社員反映強烈。食堂又只好改小。每個生產隊有食堂3個以上。食堂大則百多、幾百人，少則七、八十人。社員一律吃食堂，幹部吃機關食堂和幹部食堂，有的生產隊幹部在大食堂中開小灶。正所謂：同是一鍋共產主義大鍋飯，飯分九等，菜分十色。

哪家的房子大，幹部看了滿意，馬上指為食堂，戶主往外搬。社員各家各戶家中的柴、米、油、鹽、存款、積糧，鍋、盤、碗、盞、水缸、瓦鉢、蔬菜、雞鴨、豬羊，凡與吃字有關的一切生活用品，統統充公，不准私藏。有抗令藏匿不交者，一律鬥爭。不交就搜，搜出來就批鬥戶主。紅旗、花明樓等幾個公社出動武裝民兵真槍實彈挨門逐戶抄家查糧搜物，鬧得社員白天心驚肉跳，晚上惡夢擾魂。

食堂設管委會，由抓生活的隊長和食堂會計統管，下設炊事班、種菜組、養

殖組等若干生產作業組。據說辦食堂的好處之一是解放勞動力。但實際上，一個食堂操忙的勞力，至少占去該食堂勞力總數的 1/3 以上。燒火的，拾柴的，煮飯的，種菜的，打雜的，挑水的，管理員，七七八八一大堆，大都是幹部親屬。食堂能多吃多占，實在是不可多得的肥差事。

剛吃食堂的頭幾天，還真是新鮮熱鬧。吃飯不要錢，社員敞開肚皮吃，不定量。為慶祝食堂成立，各食堂還把從社員家裡共產共來的東西犒賞大家，殺豬宰羊，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好不熱鬧。紅旗公社和東風人民公社好幾個食堂發生單身漢、孤寡老人吃多了撐壞肚子的事。雙堯鋪公社的一個二流子，高興得手舞足蹈，逢人就誇：“公共食堂好，共產主義好，吃肉吃飯吃大戶，神仙日子也比不上食堂好！”1960年，這位食堂的崇拜者，因大鍋飯裡光是野菜湯，肚子裡沒有糧，餓成浮腫病，受罪不過上吊自殺了。

吃了半個月，哪個食堂也頂不住勁了，於是開始實行定量進餐制。40%以上的大隊還統一印製了餐票，每人每天定量發飯票 3 張，憑票可以在全大隊範圍內的食堂開餐。東風人民公社（即現在夏鐸鋪區所屬的夏鐸鋪、歷經鋪等 5 個鄉）則是公社統一印製的餐票，憑票可以在公社各食堂開餐。但好景不長，少則個把月、多則兩三個月，各食堂缺糧少炊情況日見嚴重。1959 年春荒，全縣各食堂普遍出現缺糧或斷炊情況，不少食堂一日三餐吃稀的，野菜代糧，見不到米粒子；少數地方發生餓死人現象。公共食堂飯分 7 等，強勞力一天也只能吃糧老秤 4 兩（合 0.25 市斤）。糧少菜多，各地紛紛把喂豬的糠摻在野菜裡一起當飯吃。

1959 年到夏收時節情況才有所好轉，政策調整，各食堂普遍供給摻糧食的雜合飯，社員們自己也偷偷摸摸打野食，混個半飽。廬山會議後，縣委在全縣大搞“反瞞產、查後手糧”運動。各公社、大隊派出工作組，到各隊就地封糧，把

公共食堂的社員口糧和倉庫存儲的種子、儲備糧，一古腦兒當公糧上交國庫。社員缺衣少食，食堂缺糧少柴，於是吃食堂被嚴格執行“低標準，瓜菜代”了。野草、樹皮、糠殼成為社員救命的主食。民以食為天，天塌了，命也該絕了。湖南湘潭和寧鄉一帶流傳著這樣一首民謠：“跟著毛爹爹，吃的糠粑粑；跟著劉少奇，吃的葛筍皮。”

越是饑荒鬼越多。幹部貪污、食堂管理人員克扣，糧食更不容易吃進社員肚子裡去。更可怕的是幹部的罰飯政策普遍化和制度化。甯鄉縣各食堂通行以下幾條：抗工不出者（包括有病不能出工而請假不批者）、出工不出力者、沒完成任務者、出工不聽指揮者、偷盜集體糧菜者、思想右傾保守者、打架鬥毆者，一律罰飯！

花明樓公社朝陽生產隊的公共食堂，規定了“五不准吃飯”：去遲了不准吃飯，小孩不送幼稚園的不准吃飯，未完成任務的不准吃飯，發生口角的不准吃飯。甚至該社婦女主任劉淑元，因開飯時間到了，一畝穀還沒割完，幹部也不准她吃飯。那社員群眾就更可想而知了。

幹部不僅罰飯，還濫行罰款、罰糧。1959年反“瞞產私分”，花明樓公社對社員罰款總數達124.3萬多元，人平罰款20元。花明大隊610戶社員，罰稻穀42萬斤，戶戶受罰。社員羅守世一戶就罰了340元。一新大隊貧農鄧玉民一家，6人吃飯，3人勞動，年終決算分0.86元，而罰款60元。逼得社員生產無心，生活無著。

幹部大吃大喝當時已成普遍現象。花明樓公社機關食堂，伙食分三等，有“書記飯、委員飯、一般幹部飯”。1960年胡仁欽一人吃雞、魚、豬肉160多斤。這還不算他們借開會和檢查工作為名，長期在基層大吃大喝的物資。1960年4

月 28 日 8 個常委一天吃 4 餐，光是夜餐就吃了狗肉、雞、豬肉、雞蛋、荔枝 16 斤。有一次，4 個書記開會喝酒，喝醉了打架，衣服也扯得稀爛。饑民聞訊說：“書記吃飽了沒事幹，他們打打架，比拿社員打人取樂強多了”。太平大隊 1959 年死牛 5 頭，殺了 600 多斤肉，幾個大隊幹部就吃去 500 多斤，其中總支書記王義吾一人吃幹牛肉 70 多斤。

夏鐸鋪公社的幹部，一個個養得紅光滿面，精神十足。對全社 210 個大隊以上幹部的不完全統計，從 1959 年到 1960 年 4 月，共吃肉 2062 斤，魚 2335 斤，雞 177 斤，蛋 401 斤，油 481 斤，酒 1784 斤。而社員食堂斷糧停炊，也無人過問。

最典型的是新風大隊 9 個幹部，1959 年過端午節，一次連吃帶了 150 斤包子。從 59 年 5 月到 60 年 4 月，11 個月內吃牛肉 138 斤、豬肉 220 斤、酒 150 斤、菜油 176 斤、魚 210 斤。秘書黃振恒，用油炸麵食，吃皮不吃心；白糖泡酒，糖多酒少。他老婆來了請客吃糖，還向公家報銷。該大隊幹部食堂的方針是：“以肉為綱，雞魚並舉，小菜帶頭，保證基本供應。” 1961 年縣委書記何長友說：

“新風大隊工作隊長張其永，生活特殊，工作極不深入，在整社中繼續大吃大喝，吃魚吃肉吃蛋吃酒，侵佔病人食堂，超吃糧食，每餐吃 10 兩，嚴重脫離群眾，影響很壞”。幹部白天往外面轉一個圈，又回大隊部吃飯，晚上坐在辦公室聽收音機、開夜餐。半夜三更幹部吃夜宵，搞得乒乒乓，煎魚炒肉。可是生產上急需的 70000 斤石灰，無錢買回。幹部吃飽吃好，從不問社員食堂生活情況。社員要借 1 元錢治病，也不批准。該大隊社員吃糠咽菜，致使春荒餓死人、浮腫病一發不可收拾。嚴重影響群眾生產情緒，他們說：“我們天天忙出工，幹部光吃不勞動，具體問題不解決，搞起生產冒得勁”。群眾說：“我們大隊的幹部實現了三

化（手錶化，繩子衣化，白糖、香煙、餅乾經常化）”。

當時流傳著一首民謠，諷刺幹部吃喝風：“口裡沒得味，開個現場會；肚裡有點嘈，組織大檢查”。開會就吃肉吃魚。大檢查更是令幹部開心的事了。檢查評比，走一路，開一路葷，一家更比一家強。有的幹部自己想吃什麼就開什麼會。想吃肉，開“發展牲豬檢查會”；想吃酒席，就開個“紅旗食堂現場會”。白馬橋淺水大隊食堂管理員在筆記本上作了一個記載：1959年從5月13日至8月13日，在我食堂開過大小現場會7次，到會幹部多的31人，少的7人，共辦飯菜19桌。本子上還有這樣一段話：“我們的食堂辦得好是好，就是現場會多得不得了。辦上一桌菜，除了魚、肉開支外，至少也要吃掉我食堂80個人半個月的油鹽。此風不可長，要開也要開得少。”後來被人舉報，這位會計被撤職，送上鬥爭台。

社員一個月，吃糧不過10多斤，吃的是鹽水清湯，一個月生活總共不到8元錢。一桌酒席四五十元，相當一個社員半年伙食。淺水大隊食堂，3個月中幹部開會吃的伙食費，大約相當於100個社員1個多月伙食。

一九六〇年十月十六日花明樓群眾給國家主席劉少奇的信：

少奇主席：

我們是你的家鄉花明樓的社員，是你的鄉親，這裡向您反映一下家鄉的困難。……這兩年，我們的生活太困難了。公共食堂吃不飽，糧食絕大部分都交國家了，食堂的糧油，大部分幹部佔便宜吃了。他們多吃多占，天天吃小灶，吃得油光滿面，就連他們的家屬也吃飽喝足，而社員連喝粥都沒有米星子。尤其最近以來，田裡糧食剛收下來，大家餓了幾個月的肚子，還指望食堂裡這回會讓人吃幾餐飽飯。哪想到開飯時只多了一點米，還是吃野菜稀飯。稀飯沒吃幾天，又開

始像以前一樣吃樹葉和野菜粥，滿鍋沒幾個米星子，食堂還經常斷夥，社員們餓得前心貼後背。問幹部怎麼不讓人吃飯，幹部回答說，收下的糧食還不夠交徵購任務的，你們不好好幹活，多生產糧食交國家，餓死你們這些懶漢沒話說！可憐社員哪裡是偷懶，吃不飽飯幹不動活，一個個餓得走不動路了，田裡莊稼沒心思種，也沒力氣種。收上來的糧不夠上交國家徵購任務的，那我們種田的人就該餓死嘛？！我們真怕長此以往，年復一年，那一定有一天社員都會死光的，那還有誰來給國家種糧食呢？您當國家主席的人，是不是也要想想這個道理呢？

劉主席，我們天天餓肚子，得了浮腫病還不能說，說了就要挨打餓飯，搞不好就說你是“反黨、反三面紅旗”，要送勞改。餓死人只能說是病死的，社社隊隊，死人常見，一個生產隊，餓死的人怕不有幾十上百呢！現在我們心裡只想吃一餐飽飯，也沒枉來一回人世。不知道這封信能不能發到你的手裡。你要是能收到信，就快派人下來調查，我們保證沒說假話。劉主席啊，當了那麼大的官，你能不能照顧一下鄉親們？自古以來，好官護一方，好狗護一莊，要讓鄉親們百代都頌你的好才真好呢！不要讓後人說起我們花明樓出過一個國家主席，在他的手上，餓死的寧鄉人有成千上萬！

此致

敬禮！

花明樓群眾 1960 年 10 月 16 日

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在 90 年代看到此信時熱淚盈眶。她回憶說，“苦日子”時期，劉少奇家鄉民眾書信不斷，有些被社、縣、省及中央有關部門扣押，有些呈送到劉少奇手中，引起他的重視。這些信件，對劉少奇瞭解社會真情，體味民眾疾苦，反省政策失誤，起了相當大的作用，是促成他 1961 年春回鄉調研，下

決心扭轉局面的重要契機。

1961年4月12日，寧鄉縣委下發一份調查報告，反映了食堂絕糧斷炊、幹部克扣社員口糧，造成社員生活痛苦，輟耕停產，糧食斷炊，而瀕臨絕境的情況。這份《關於月豐生產大隊黨支部存在嚴重官僚主義不關心社員生活，停發食堂口糧，影響春耕大生產情況的報告》說：“該隊21個食堂，僅只兩個集體開餐，19個農業食堂已完全和基本上垮了。黃杆竹山小隊貧農陳朋發，53歲，身體有病，因為食堂有煮飯，每天要到山上砍柴做飯，28號在山上扒柴，不慎失足跌死（據查為饑餓發昏跌死）。特別是30號調查了楊家沖小隊情況更為嚴重。該隊13戶（貧農12戶，地主1戶）40人，男女勞力17個。由於前段糧食制度不嚴，數字不清，共虧損糧食1080斤。嚴重的是該隊支部對此一情況不深入瞭解，抱著官僚主義的態度，克扣社員口糧，使該食堂從3月12~27日，整整15天時間無米停炊。40個社員以搞小菜、野草、樹皮充饑度日，生活極為痛苦。

據初步調查瞭解，所帶來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第一、政治影響極壞，造成黨與群眾的隔閡。貧農洪大娘反映說：上面太不關心我們了。以前沒飯吃還可以到左鄰右舍家裡借得到，現在餓盡的，連黨也不借米給我們。由於沒飯吃，17個勞力在家睡覺，不能出工搞生產。貧農隊長彭冬華，兩口子都是全勞，半個月只借得半斤米吃了，無一點精神，25號想到大隊去搞點糧食來，走道路上就昏倒在三眼塘的巷子裡。29號去樓上拿牛草，又跌倒在地下。77歲的貧農李寶洪，餓的不能度日，竟外去流浪十來天，跑了四個屋場，直到29號才回隊。去年婦女陳裡梅跑到娘家借米，花了兩天時間，只吃了兩餐飯。社員李國成說：什麼三包、四包、再過幾天就沒得命了，連肚子都包不住。第二，嚴重影響春耕生產。應翻83畝板田，有10畝未翻；15畝小麥，只培育得4畝，無一1類，估計畝

產只 30 來斤來斤，田裡只積 1 擔土肥，連家肥也只收了 800 來斤。第三，影響了社會秩序。食堂被偷竊中稻穀 144 斤，食鹽 90 斤，豬油 5 斤，棉油 1 斤 15 兩及瓜菜所有種子。”

據瞭解，造成這一惡果的主要原因是大隊幹部嚴重官僚主義，不認真貫徹黨的政策，對群眾疾苦置之不理。直到公社通知 28 號大檢查，大隊怕公社檢查發現受到批評，才在 27 號叫團支書陳國兵暫借 200 斤穀，並私自規定壓低社員口糧標準，嚴重的違反了黨委關於糧食工作安排的指示精神。到 1961 年寧鄉各地公共食堂情況大抵如此，民眾苦不堪生。

“苦日子”把廣大民眾逼上了絕路。狗急跳牆。求生存是人的本能。中國的民眾逼急了就敢於起來造反的，終究是少數血性男兒。更多的人則不敢去摻和那些甯鄉城鄉一度秘謀造反的“反共救國”的組織，苟且偷生是多數，餓急了只好去偷。偷了田裡的莊稼，再偷隊上的糧倉。膽子大的，竟把耕牛偷了，弄到山裡殺來吃肉。偷竊成風，全民為盜。以致田野裡稻穀、玉米、紅薯還沒成熟，饑餓的人們就趁黑夜下田去偷。偷春造成減產失敗。對此，社隊幹部抓住就打，打死許多人，但打死還是有人去偷。

龍鳳山長湖生產隊，一青年社員因幹部罰飯，餓得實在受不了，趁黑跑到生產隊地裡偷來一竹藍紅薯，趁夜靜人深，躲在偏僻的廁所裡，弄了幾塊石頭燒了個炭火去煮，實指望能美美的飽吃一頓。不想被駐隊的“社教”工作組的人員發現了，當即用喇叭筒喊攏全隊社員，連夜召開緊急批鬥會。會場中放上一張大桌，桌上點著一桌煤油燈，髒物擺在桌上示眾。當主持人宣佈開會之後，從會場角落裡冒起一個餓肚漢子，氣憤地說：“偷集體的東西太不應該，集體的東西哪能一個人吃！集體的東西集體吃！”他邊說邊走到桌邊，一口氣把煤油燈吹熄。大家

一哄而上，你搶一個，我搶一個，一鍋紅薯被搶個精光，批鬥會也就一哄而散了。

三仙坳公社韶光大隊 70 多歲的老人肖金階，因饑餓病而死，死前留兒孫的遺囑是：“我死的這一天，敬上一大碗飯，我就心滿意足了。”

3·大煉鋼鐵

1958 年全縣 30 萬青壯勞力“大戰鋼鐵前線”。因勞力不足，紅薯爛在土裡，晚稻在田裡過冬。花明樓公社的一個小土爐群，一天就有 27 人被打。雙江口運輸營，完不成任務罰跪、挨打、吐唾沫、臉上抹屎。五星公社躍進煤礦，全礦不到 200 工人，挨過打的有 60 人。工人廖保山，有一天被打 12 次。砌爐的磚，靠拆民房；煉鐵的原料，是社員的生產、生活用鐵器。先是號召大家獻“愛國鐵”、“躍進鐵”，後來乾脆組成抄家隊伍，見鐵器就抄。好端端的鐵鍋，砸碎了收走，鋤頭、鐮刀、釘子、鐵錘、犁頭、耙齒，統統扔進煉鐵爐。58 年初寧鄉共有炊具 500 萬件，大煉鋼鐵鬧得家家沒了鍋，戶戶沒了鏟，鐵器炊具損失約 180 萬件；58 年初農具 424 萬件，大煉鋼鐵損失鐵質農具約 128 萬件。散食堂後不少人家只好在瓦罐裡做飯，用木片、石塊代替傢俱生產。有個被打成右派的回鄉青年說：“大躍進躍到了石器時代”，又作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三面紅旗”言行，打成“三反”分子。

縣委常委、宣傳部長程旭華因為不同意學生長期停課去煉鋼鐵，被拖出來在三級幹部會上批鬥。一陣拳打腳踢之後，又用磚頭擊斷他的肋骨，打得他口吐鮮血，不省人事。事後程旭華被戴上反黨分子帽子，判刑勞改，直到劉少奇 1961 年回鄉時才予平反。

1956 年甯鄉有林面積 125 萬畝，覆蓋率為 28.6%；到 1960 年，經過大煉鋼鐵和食堂燒材，砍伐立木 160 多萬立方米，有林面積只有 57 萬多畝，覆蓋率下

降為 13.1%。全民大煉鋼鐵，寧鄉 180 多萬立方米的木材化為烏有！如此代價，1958 年寧鄉煉出了多少“鋼鐵”呢？寧鄉煉出共計 504 噸燒結鐵，不少丟在地頭，任風吹雨打幾十年。青山綠水的寧鄉大地，從此山禿嶺光，荒山面積達 68.54 萬畝，水土流失日益擴大，無雨天旱缺水，下雨泥漿滾滾。

4·瞎指揮

1958 年 11 月 1 日甯鄉縣東風人民公社畝產 65012.5 斤，創造全縣晚稻的高產紀錄。明白人在背後算過一筆帳：按劉俊強書記報的插秧 4×4 寸，1 畝只有 37500 蔸。按畝產 65000 斤計算，每蔸就得結穀 1.73 斤。禾杆沒有樹幹粗，穀粒沒有桃子大，產量就不會那麼高。

雙鳧鋪公社黨委書記的晚稻高產示範田，鬧出了一場流傳至今的大笑話。他採取了 4 條“技術革命”措施：一是多施肥。他調動一百多個勞力施肥。1.5 畝地施土雜肥 450 擔，人糞尿 4500 斤，畜糞 4500 斤，另施了許多特供化肥。二是高度密植。插秧時他挑選了 25 個青年插秧能手，親自督戰，插了一整天，名為 2×2 寸，實為“板板寸”。三是紮架防倒伏。肥多苗密，禾苗長成石頭也砸不進的“冬茅草”。書記又調來大批勞力，把禾苗排開，紮上一排排支架，以防倒伏。四是人工反光。毛澤東多次向全黨幹部提出，充分利用光照，增產幾萬斤。這位書記勒令社員們把鏡子全交出來，一時間，姑娘的小圓鏡、媳婦的梳頭鏡、就連老太太幾十年前的陪嫁鏡、甚至有幾面巫婆私藏的“照妖鏡”、統統在田塍上紮起架子對好光，鏡光反射到禾苗裡。他又強迫拆下大量門窗上的玻璃，反光到田裡，以增強“光合作用”。甯鄉縣委立即向全縣大力推廣。甯鄉的山坳邊、田埂上，天照地射，鏡光閃閃。那一畝五分示範田結果如何呢？不管怎麼折騰，禾苗還是細如香杆，全部倒伏，顆粒無收。

在冰封雪飄、零下幾度的日子裡，甯鄉縣幹部說“一天等於二十年，要搶在時間前面，要讓冬天變夏天！”頭腦一熱，就號召播種早稻。強行規定家家戶戶都要用鍋、壺燒水，再把開水擔到秧田裡，均勻地倒進去，要讓秧田保持恆溫，美其名曰：“溫水催秧法”。

當冬季寒流來臨時，花明樓、流沙河、雙覺鋪等地的幹部強迫社員排成人牆，站在田頭日夜擋寒風！他們的口號：“不怕地凍天寒，誓死要奪高產！”花明樓的一位婦女剛生完孩子，月子裡就被幹部趕下田去擋寒流，結果受了寒氣凍成病，半個多月就死去了。

時過中秋，霜凍降臨，一些公社又強令種紅薯，美其名曰“旱糧革命”，讓地裡冬天長紅薯，春季收穫後播水稻，一年四季，豐收不斷。結果當然棵粒無收。

1960年2月中共寧鄉縣委提出，糧食生產要“一早百早”，全縣12萬畝早稻，春節未過完，便開始播育秧苗。天寒地凍，水田還凍冰，縣裡決定在秧田周圍建擋風牆。結果有的壘磚，有的豎門板、曬席等防風，又燒火，煮水升溫，結果全部爛種。400多萬斤稻種、幾百萬個人工被浪費。農曆臘月19，花明樓公社書記胡仁欽佈置浸早稻種。天寒地凍，谷種下水凍成冰，全社凍壞種谷95萬斤。這時正值全社幾萬人斷糧斷炊！花明大隊1441畝早稻，一連浸種9次爛9次，共計損失種穀78200斤。插晚稻時又強迫80%插粳稻。結果插三萬畝晚稻，有5420畝顆粒無收。花明樓公社糧食總產減產44%，上萬農民沒飯吃。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謝覺哉1960年回過一次寧鄉老家，除發現全縣大樹只剩了三棵外，便是看到了公社社員沒吃的。可縣裡幹部卻向他報告：要大辦養豬事業，準備養二百萬頭豬。謝當即不客氣地打斷他：“這聽來有點荒唐，人都沒得吃，哪兒來這麼多飼料喂豬？”可以設想的是，要是各縣的大人們把人民的死活

放在心上的話，湖南死的人本不會那麼多的。

劉少奇家鄉“花明樓事件”中胡仁欽的罪狀有：59年花明樓公社的產量畝產只有521斤，卻虛報為1201斤。60年胡仁欽決定修個25裡豬城，這一建設用去勞動日54000多個，拆民房1994間，佔用水田和旱土3334畝，還有什麼“水上涼亭”、“山上涼亭”、“萬人禮堂”、“綠化公路”，興建公社“辦公樓”、開“花果山”、修“環山馬路”、“新居民點”和“躍進橋”等。兩年多來共拆民房20605間，合計平調各項實物為24811.38元。

湖南鳳凰縣城是沿山築的城牆，城內一律是青石板、紅石板砌的路。躍進了，應當實行“運輸車子化”。但石板路是肩挑人扛的時代的產物，如何行車子？於是縣委下令用泥土將全城的石板街道蓋上了厚厚的一層。“車子化”的準備工作做好了，可是誰也沒本事“化”出一部車子來。有路沒車，白乾一場。要是書記們肯認錯，再下個令將泥土扒去倒也罷了，可他們沒有這勇氣。在那個一年四季時常下雨的地方，一到雨天全城就泡在泥裡，因為石板下的下水道全堵死了。直到二十多年後，新一代領導人終於老老實實地將石板翻出重見天日。

5·貪腐殘忍

幹部貪污腐化，已經成為社會性的普遍現象。1960年6月25日，寧鄉縣委第一書記李學良在《我對“三反”運動中所揭發的問題的檢查》中說到：“全縣大隊以上的6700個幹部中，貪污的達964個，占到14.2%，共貪污人民幣145000元。花明樓太平大隊保管員湯愛君，貪污600多元，打人4個。

關子沖大隊總支書記談福權，59年就貪污挪用公款200餘元。群眾反映說：“今年元月以來，以他為首全大隊幹部，打著核算糧食的幌子，在群眾家裡翻罐倒壇，到處搜。搜了布，自己就拿了做衣；搜了雞、魚就帶回家吃，搜了酒當場

就喝。”該大隊五個總支委員，個個打人，18個大隊幹部，就有16個打過人。全大隊59年以來被打的群眾有218人，因打而自殺的5人，外逃的13人。群眾稱他們“活老虎”、“閻王”等，看見他們都避而不見。當地小孩吵鬧時，只要聽見喊“閻王來了！”就馬上停止了哭聲。

花明樓公社胡仁欽專門召開黨委會議，研究打人辦法，提出“打人要不見血，用矮凳子揍，拿磚頭砸，要打的落實，又不現形。”果然，錢塘灣大隊的總支委員李德仁，在鬥貧農劉勝青時，一扁擔打出了腦漿，還說他過去不老實，又在死屍上加打幾扁擔。農場的總支書記黎廣雲，在鬥廖德生時，給廖灌尿，還逼著廖的兒子和愛人去灌。灌不進，就用火鉗撬開嘴巴灌，灌後20多天廖就死了。如59年公社380多名黨員的反右傾鬥爭大會，42人被鬥，個個挨打。如總支書記戴新民、王橋山，因報實了產量，說他們是“右傾分子”，鬥爭時就扯頭髮、揪耳朵、罰跪，直到逼著他們承認自己所編造的假數字後才止。59年胡仁欽要平調花鋼的機器，幹部黃菊初執行了地委的指示，不肯讓他調，胡給黃帶上了“反領導”的帽子，在反右傾鬥爭中三次被打，到打爛皮肉血染襯衣而止。

當地人說：“不是花明樓一個地方的事，哪裡都是這種事情。農民太苦了，你想都想不出來的。糧食打的本來就不多，差不多交了徵購就剩不下多少了。食堂吃不飽，幹部簡直拿人不當人，動不動就往死裡打。社員連話都不能說，告狀更是闖大禍了，往哪裡告？你跑又不能跑，四鄉八社民兵設崗放卡專門抓盲流，抓到就往死裡打，罪名是對公社不滿。那年月，寧鄉就象一個大的屠宰場！幹部就是那些‘殺場’活閻王！”

龍風山公社副主任湯新民不願強迫民工晚出工和克扣口糧，於是在鬥爭會上被打得皮開肉綻，幾次昏死在臺上。後來他愛人給他脫襯衣洗傷口，只見襯衣被

血粘在皮肉上，無法脫下，一撕便鑽心裂肺地痛，她只得用濃茶水侵潤襯衣，慢慢地啟動衣布，花了老半天工夫才把衣脫下，有的皮還粘在襯衣上。

雙泉鄉黨總支書記李巨鴻是個木匠出身的地下黨員，他問指揮打人的縣委副書記：“這樣打幹部，中央到底有沒有政策？馬列的書上也講過黨內鬥爭要打人的話沒有？”只這一問，就使得這位老實忠厚的老黨員成了資產階級反對三面紅旗的代言人，不但被罰跪，挨耳光，還被吊起來毒打。寧鄉中醫院一位新黨員熊智，認為應當讓醫師治病，不要讓他們長時間去煉鐵而荒疏了業務。這個昨天還受表揚的女積極分子，因此變成了“反革命”。熊智受不住毆打和人身侮辱，跳河自殺了。黨員幹部鐘日新、黃超仁對毒打侮辱幹部不滿，私下議論，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被打得九死一生，並下放到水庫工地勞動改造。

1959年7月一個月內，全縣共發生群眾自殺事件31起，死33人。如雙石生產隊會計鄧東林在發工資時，失去人民幣70元，錯怪13歲女孩劉蘭之偷了，劉被打鬥，結果錢卻找到，劉蘭之放回後投塘自殺。

在許多水利工地上，幹部們都強調一律赤膊化，男人挑土、推車、挖土一律打赤膊，婦女也必須打赤膊。一時“赤膊化”風起，下至十五六歲的小姑娘，上至五十多歲的老太婆，大姑娘小媳婦，一律打赤膊，以顯示“沖天的革命幹勁”！凡不打赤膊者，一律辯論、批鬥、毒打、罰飯、撕光衣服，或者幹部民兵上來“幫女人”，七手八腳撕光衣服。如遇反抗，毒打之外，送勞改。民工們私下憤怒地說：“如今的幹部真是狠，拿起女人打赤膊當戲看。今天看女人打赤膊，明天就搞共產共妻。不知道他們姐妹娘親讓不讓人也共產？”

參加黃材水庫建設的948個大隊以上的幹部，其中打人、罵人、違法亂紀的達117個，占幹部總數的12.4%。他們共打人1305個，其中因打死亡的23個，

打傷失去勞動能力的 9 個，打後還未痊癒的 28 個，因不遵守禁令被關和勞動改造的 198 個，受迫外逃的 157 個，兵團幹部亂搞兩性關係的 73 個。

1960 年 1 月的一天，地凍天寒，朔風刺骨。一個民工因衣薄褲單凍病了。但幹部說是裝病，他只好抱病上工地。人病了，推起土車也就跑得慢些。湯能德看見了，上去一腳把車子踹翻了，又踢了幾腳，把他踹倒在地。這個民工氣不過，爬起來就罵。湯能德馬上喊來幾個民兵，把罵他的民工摔倒在地。他抄起一根削尖的竹片，讓人把那民工捆起來按住手腳，扒掉褲子，竟將這根長約 2 尺的竹片，猛地從這民工的屁眼裡捅了進去。攪上幾轉，用力往外一拔，立時血屎迸濺。在湯能德之流手中，遭此酷刑的民工，不只一人。當年國民黨在重慶設渣滓洞，對共產黨人用竹簽釘手指頭，比起湯能德輩的刑法，只是小巫見大巫了。

寧鄉縣委上報省委的材料稱：白馬橋公社太陽大隊總支書記王尚春，1959 年整黨整團反右傾時，私立法堂，逼死 6 條人命，迫害 60 多人外逃，還成立勞改隊，打手銬兩付，梭鏢 15 支，馬刀 2 把，扣壓社員 19 人。他還夥同小學教師周國良，吃酒劃拳、強姦取樂。周組織學生抬著他的巨幅畫像，繞道遊行，高呼“王主席萬歲！”

該社金錢山大隊幹部吳獨軍，逼死 4 人，打人 30 人，扣飯 115 人。女社員王雪梅有幾分姿色，他為強姦王雪梅，逼死其親夫。後王雪梅受奸喪夫又無處投訴，含憤自殺。吳獨軍要斬草除根，不發糧食給王雪梅兩歲的兒子，把他活活餓死。駐社的工作隊長謝桂秋很欣賞吳獨軍，群眾意見紛紛，社員賀漢事提了意見。謝和吳召開了 160 多人的大會，污蔑賀漢事反黨，把他們打得皮破血流。會後群眾反映說：“我們的整社工作隊硬是一個打人隊。”

龍鳳山大隊總支書記黃禮誠違法亂紀，貪污 320 元，亂搞女人；對社員動輒

打罵，被他鬥打的幹部、社員 9 人，打後自殺的 4 人，輕傷 3 人，威逼自殺 2 人。社員看見他都怕。社員謝文秀說：“我看見黃書記，全身發抖”。公社第一書記陶選榮目睹其暴行，卻誇獎不斷，說他“鬥爭能力強，能完成任務，是個好幹部。”

1960 年 6 月寧鄉縣委上報湖南省委《關於夏鐸鋪公社開展“三反整風”運動情況的報告》稱，夏鐸鋪公社黨委委員、供銷部支書楊新甫，1958 年被評為全省紅旗，出席北京的先進生產者會議；此人一貫腐化墮落，調戲、姦淫婦女 7 人，貪污挪用公款 470 多元；調供銷部不到兩月，就挪用公款 300 多元買自行車、留聲機、照相機，供自己玩樂，下鄉工作要通訊員用自行車接送。雙湖大隊總支書記、秘書、會計三人共同誘姦軍屬王雪娥，為此爭風吃醋吵架不休，群眾諷刺：

“大隊幹部實行了公妻制。”全公社 91 個總支正副書記以上幹部，誘姦、強姦婦女的就有 25 人。有的幹部為長期霸佔他人妻子，竟然把她們男人都派到水利工地去，並不准回家，回家就捆送工地。這些幹部不僅貪污腐化，多吃多占，有的甚至公然搶掠民財，占為私有。新鳳大隊黨總支秘書黃正恆等把逃荒人樊春福的毛衣剝為己有，還把逃荒人洪渡文、岳梅蘭等家裡的衣服、鞋、床、櫃子、牙刷等用品統統搬到大隊部，總支副書記黃正祥和他們一起私分，搬回家去。社員說：“這些幹部是搶犯、土匪。”

1961 年 7 月，中共寧鄉縣委上報益陽地委，稱幹部作風問題已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花明樓公社總支書記以上幹部中，強姦婦女的 28 人，最多的一人強姦、姦淫婦女 30 多人。黨委副書記杜少才，1959 年 10 月在雞場強姦女社員傅果明，象餓虎撲食一樣又撲又撕，把女方褲子撕爛後強姦。而被姦淫的婦女呢，雖說也有反抗的，但那是少數。一是懼于幹部們的淫威；二是人餓得半死，有的以肉體換點吃喝救命。

以 1958 年為基數到 1962 年，綜合其它資料和有關檔案，“苦日子”造成了劉少奇家鄉寧鄉縣近 8 萬人餓死。按官方公佈的死亡統計數字，湖南的“非正常死亡”僅 86 萬。但陪同劉少奇去湖南調查的夫人王光美說：當時“基層黨組織……連人口死亡數字統計出來了，還要‘壓縮平衡’，不許如實上報”，可見官方統計的死亡數字必定是縮過水的，不可置信。實際上 1959-1961 年湖南省死亡的 216.5 萬人。

6·人給豬戴孝

大躍進時期，湖南澧縣在 92 名受處分的公社和大隊幹部中，有 76 人姦淫婦女，33 人貪污，37 人打人致死傷。一些人是一身數罪。澧縣“四大公案”駭人聽聞！(1)蘇海清案：閘口公社三元大隊總支書記蘇海清，強迫飼養員為死豬披麻帶孝，哭墳守靈；魚肉百姓，恣意姦污婦女，搞初夜權。(2)章自福案：白衣公社精華大隊總支書記章自福，橫行鄉里，打死多人，攔路搶劫；鬥爭會上，讓夫妻赤身裸體咬著生殖器打滾取樂。(3)如東公社社員劉家遠，饑寒交迫，殺害兒子食子案。(4)淞澧分流工地暴力案：縣委強迫命令，淞澧分流水利工地，幹部以毒刑和餓飯來控制民工，造成民工死亡上千人的慘案。

1958 年 10 月，蘇海清任閘口公社黃溪大隊大隊長，到任 4 個多月，打死 1 人，打傷 7 人。姦淫少女 4 人。1959 年 3 月，他調任閘口公社三元大隊總支副書記，11 月任該大隊總支書記。他提出：對生病在床的，糧食減半；老人、小孩不能勞動的，糧食減半；裝病不出工抗拒勞動的，停夥。幹部要包食堂，查情況，堅決堵住懶漢的嘴巴。重點清查偷青的、私自動火的。第二天，所有幹部都站在食堂門口，任何人都必須在食堂吃飯，不准家人帶飯。生病在床的，要經幹部上門檢查，然後才批准帶飯，定量減半。結果一些病人為了吃上一口飯，只好

帶病出工。當月，全大隊死在田裡的病人有 4 人。

廬山會議後，全國掀起更大躍進，蘇海清聲稱三元大隊 1959 年農業畝產平均達到 1200 斤。公社在表揚的同時，給三元大隊加了 17 萬斤的新任務。蘇海清搞“就地打場、就地徵購、就地入庫”。但全部收上來的糧食，還不夠完成任務。蘇海清宣佈了口糧分配計畫：“適當留點糧食，其它的從打草穀中挖掘潛力，再補充些菜（指野菜），熬到明年夏收就好了。”所謂“打草穀”，實際上是從脫過穀粒的稻草中複打殘剩穀子。

平均每人每天只有 6 錢糧！1960 年元月，餓死了 18 人。因三元大隊死人情況嚴重，開口公社黨委決定要撥給該大隊 15000 斤穀。蘇海清面向公社書記連聲檢討，說是三元大隊給公社找麻煩了，其實死的都是些老了該死的，缺糧情況不嚴重。硬是只要了 1 萬斤穀。

社員們長期饑荒缺糧，只好到處挖野菜吃。冬天找不到野菜，人們就上山剝樹皮。過春節前，大隊發下糠殼，家家戶戶把糠殼磨了做成糰粑過年。社員們挖野菜、扯草根、剝樹皮、做稻草漿的“代食品”、吃觀音土，就算是過了一個年。社員張長松家，因饑餓不過，只好剝枇杷樹皮做成粑粑吃，結果全家人拉肚子都病倒在床。

社員張二爹一家 6 口人，吃過豬草、糠殼、樹皮、觀音土等等；吃下去拉不出來，叫人用樹枝從屁眼裡往外掏；弄得從此得了痔瘡，四十多年一直在拉血；一家餓死 4 口人，只剩了個女兒 15 歲，嫁了個比她大 10 多歲的食堂管理員，父女倆才保了命。他兄弟姐妹 6 個，6 家共 38 口，苦日子死了 28 人，還剩下 10 人！

在大躍進苦日子年代裡，該大隊死人 328 人，占總人口的 27% 左右。

苦日子到來後，蘇海清聽說家裡人也遭了罪，便派人把他母親和孩子接來住了7個月，老婆來住了2個月，叔叔住了1個月，哥哥住了半個月。餐餐都要吃葷菜，沒有肉，他就派人到幾十里外的湖裡，駕船去打魚。來時個個面黃肌瘦，走時都是紅光滿面，還大包小筐的帶著走。當然，蘇海清是分文不付的。蘇海清說他“別的毛病沒有，就是喜歡喝兩口，燉個鉢的事。”農民餓得九死一生，蘇海清喝得昏天黑地。

1960年春荒，三元大隊病、死如潮。上級發下來一些紅糖和黃豆粉團成的“營養丸”等“補品”。他還夥同大隊文書孫逢太私分給病人補充營養的紅糖2斤，粃粃2斤，牛肉10斤，豬肉7.8斤。老婆回家時，他將大隊的麵粉8斤、食油4斤、黃豆11斤、棉花2斤，拿回來讓他老婆帶走，“分文不給”

群眾斷糧，而蘇海清和幹部們卻多吃多占，花天酒地。他和大隊長長期吃幹部小灶，還時常把各隊幹部以開會、研究工作為名，叫到大隊來“改善生活”，雞鴨魚肉蛋，炸炒蒸煮燉，搞的熱火朝天。他還有個半夜“喝花酒”的“愛好”，經常在晚上叫廚師炒幾個菜，私下分別叫來他定好的幾個十幾歲的少女，陪他飲酒作樂。吃飽喝足，再陪他上床。他是餐餐吃葷的，有肉有酒，還喜歡用紅泥爐燉瓦鉢，吃得他紅光滿面，精力充沛。社員說，“蘇書記吃飽喝足了，不是搞女人，就是打人玩！”

人民公社把“人民”管得死死的，結婚必須到大隊去開證明。誰家要嫁女兒或者娶媳婦，只要那姑娘長得還可以，蘇海清去了，他總是會有一些“表示”，送點錢，送點糧，說上幾句好話，然後叫她去大隊部，會弄些好酒好菜，把女的灌醉了，晚上他先睡一盤。那時嫁女兒的，基本上都是餓的沒得辦法，讓女兒去找個吃飯的人家。女方幾年來哪裡吃過這麼好的東西？睡覺就睡覺吧，反正都餓

麻木了，也不在乎。男方也不好鬧，書記睡了你的女人，那是看得起你，他會有數的，一定會送米送面的。只要姑娘長得好，反正蘇海清總是有辦法把她先睡了。蘇海清最不像話的，是他把人家一個姑娘搞了一晚上，第二天還到人家那裡去冷嘲熱諷，說是昨天晚上吃了一回下腳水，倒了大黴了。他送的一袋米，就當是喂豬的下腳料算了。因那姑娘在嫁過來之前，已經被她原來所在的隊長姦污過了。

澧縣人委會一位長輩說：他參與過蘇海清案的處理會議。“蘇海清我見過，這傢伙，完全是大躍進年代裡的典型幹部加土皇帝。在他的統治下，搞的是封建皇帝的那一套治民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皇帝三宮六院七十嬪妃二還有個數，他則更狠，是凡大隊中他看上的女人，全是他老婆。還搞起初夜權那一套，老百姓真是可悲！”

1959年12月，蘇海清安排平整秧田，二隊原地主孫逢聖因水腫病，在田坎上坐了一會兒。蘇海清檢查生產，正好看見孫逢聖在地上坐。孫見蘇書記兇神惡煞的樣子，半天才戰戰兢兢地解釋自己有病。蘇海清上去就是三個耳光，強迫他下田勞動，還餓他三天飯。

1960年1月24日，三元大隊突擊修葉家灣水庫。孫逢聖病情嚴重，便向隊長請假。隊長批准他在工地上看小孩。26日清晨，蘇海清在工地檢查出工情況，見孫和一個小孩坐在床上，便不問青紅皂白，抄起一根扁擔，對著孫逢聖就是兩傢伙，將孫打倒在地，強迫他上工地挖土。一直幹到下午，孫逢聖實在地上坐了一會兒，又被蘇看見毒打一頓。到吃晚飯的時候，孫慢慢爬到公路上，昏死過去。被上晚班的社員發現，將他抬回家中，當夜死去。

1960年3月3日，澧縣閘口公社三元大隊三隊女飼養員戴友姑養的一頭豬病死了。隊長孫際銀請示大隊副業主任湯明典同意後，孫便準備剝皮賣肉。大隊

書記蘇海清晚上來該隊“檢查食堂”，發現死豬，勃然大怒，將孫臭罵一通，當即責令要找木匠做棺材將豬埋葬。

次日清早，蘇海清在該食堂召集全大隊各生產隊事務長、飼養員和生產隊長等 20 多人的“死豬現場會”。他先是要戴友姑交待死豬原因。戴說豬是病死的，蘇破口大罵：“狗屁！豬是集體財產，是你害死想吃肉！”批鬥一陣，蘇海清當場宣佈：

(1)要做一付棺材和一丈二尺搞的墓碑，上寫“故顯考豬諱餓死之紀念墳墓”，寫上年月日和喂豬人名字；(2)要請道士開路。當時湯永協說，“東門的道士請不來。”蘇便要戴友姑請學校老師打秧歌鑼鼓送上山；(3)要八大金剛送豬上山（即八人抬棺送葬）；(4)養豬人帶路抱靈，邊走邊哭：“我的豬爹，這就把你作了孽，只怪我跑快了，搶了一張人皮，你跑慢了，搶了一張豬皮，把你餓死了，我還你來世帳”。(5)豬墳要埋一人多高；(6)養豬人送煙火（燒紙錢香燭）三天，送一次哭一次；(7)見幹部一來就要大哭豬親爹。並交代說，“明天公社生產大檢查，有四個大隊書記來檢查，要哭的特別傷心些”。(8)要搭棚守靈，守一個月。

他還一再強調：“一定要執行，誰違抗就的挨辯論！”並指定大隊養豬主任湯永協監督執行。早飯後，他到金盒大隊參加公社生產檢查團，並對該大隊書記劉光耀吹噓說：“別的地方總死豬，我們那邊死豬後懲辦的辦法就搞得好”。並大言不慚地介紹經驗。

當天，趁蘇海清不在，戴友姑將死豬裝進棺材，請兩人送出葬。她自己披麻戴孝，為死豬哭喪。又在死豬墳前做了五尺高，一尺多寬的墓碑，按蘇海清交代的，上寫“故顯考豬諱餓死之紀念墳墓”，並在墳前搭棚守靈。

戴友姑守靈的第二天，見公路上來了一個騎自行車的幹部，以為是四個大隊

的書記來檢查，馬上放聲大哭：我的豬爹，這就把你作了孽，只怪我跑快了，搶了一張人皮，你跑慢了，搶了一張豬皮，把你餓死了……”來人是縣公安局的幹部孫東才，見山坡上一個四十多歲的婦女哭得古怪，便下車問明情況。孫東才聞訊義憤填膺，回到縣裡告發了此案。

縣裡立即派人來調查。三元大隊社員民怨沸騰，紛紛反映：“蘇海清不調開，三元大隊不得翻身！”並向來人稱蘇是“蘇日軍”、“活閻王”。很快，蘇海清被捕。

一時間，此案轟動全縣，老百姓怒不可遏：死了幾萬人，沒見幹部過問。從古到今，沒見過死了一頭豬，竟然要活人給死豬當孝子的事！

1960年5月5日，澧縣政法委黨組《關於蘇海清嚴重違法亂紀、打死人命一案預審情況和處理意見向縣委的報告》，“該犯一貫利用職權，為非作惡，侵犯人權，打死打傷人命。53年秋至60年3月，先後打罰87人。其中貧農32人，中農32人，農11人，地主12人；毆打32人、捆打16人、打跪20人、吊打4人、罰站推搡1人、打鑼遊街2人、罰義務工12人”。“蘇犯海清一貫利用職權，行兇作惡，殘酷欺壓群眾，打死打傷人命，強迫群眾給死豬出葬，任意壓低群眾口糧標準，姦污婦女，貪污多占，還多次偽造歷史，假充功臣、排長，實屬混入革命隊伍中的壞分子，已夠成反革命罪，罪大惡極。判處死刑，以平民憤。

章自福案。章自福，男，澧縣李家鋪人。中農出身，本人成份農民，初小文化。1960年因嚴重違法亂紀、打死人命被執行槍決。同案犯有聶廷東、龔明富、鄭昌銀3人。章自福的父母都是本份老實人，為種那幾畝水稻田，吃了李姓人的不少虧。章自福長大之後，常為水的事和人衝突，但他發誓決不能象父輩那樣受氣窩囊挨人欺。他脾氣暴躁，打起架來敢拼命。一次為搶水和人打起來，他掄起

鋤頭往人腦殼上挖，差一點兒鬧出人命來。幾次下來，人家怕了他那股打死架的勁，一般人不敢惹，他還時常敢找李姓人的碴。後來他又和鎮上的一群潑皮混成了把兄弟，打架、鬧街成了經常的事。只要哪裡有趕場唱戲的場合，人群中總少不了章自福那一夥潑皮竄來竄去，吃白食、調戲婦女、打架鬥毆。長此以往，養成章自福一狠二毒三拼命四流氓無賴的性格。四鄉八村，提起章自福的大名，老實農民沒有不怕他的。一來二去，提起章自福，就連津市碼頭的青幫大哥也得買他的帳。

1949年大軍南下解放澧縣。土改工作隊進駐李家鋪，鬥地主，分田地，老實巴交的農民沒那個膽量，鄉里鄉親的，抹不開面子。只有章自福這樣的流子地痞敢打敢拼，點水（提供情況）、捉人、鬥爭、動手（打人），事事都往前沖，李氏宗族的大戶地富們倒楣了，而那些南下幹部對他非常器重。章自福成為“土改根子”、民兵。在互助化和合作化運動中，章自福“撕得破臉”、“堅定突出”的鬥爭積極性更被幹部看好，1955年，他加入了中共，同年被提拔到縣合作化工作隊。後任縣人委的檔案保管員、收發員，李家鋪鄉公安員、白衣公社政法副部長。1959年11月調任精華大隊總支書記，兼公社黨委委員。

1959年章自福調精華大隊總支書記職後，利用職權，胡作非為，勾結總支副書記龔延東、大隊民兵營長龔明富、大隊長鄭羅銀等人，迫害群眾，用捆綁吊打、罰跪、罰站、三九天潑冷水、冬天站臘水田、打赤膊吹北風、強迫被害人互咬生殖器等手段，殘害幹部群眾，先後共打幹部56人次，群眾337人次，其中打死2人。當年縣委的立案報告，對上述四人定了五條罪名：非法鬥爭，打死人命；慘無人道，摧殘人民；橫行霸道，攔路索財；欺上壓下，破壞生產，姦污婦女，貪污多占。

①非法鬥爭，打死人命。1959年12月23日晚，章自福和龔明富在花格店新化食堂召開60多人的群眾大會，鬥爭52歲的社員賀自遠。賀自遠是上中農，因公社化後，家業共產，衣食無著，到59年，食堂以野菜糠殼當糧食，人餓得九死一生。因此，他對公社化和吃食堂牢騷滿腹，對高徵購的糧食政策非常不滿。1959年冬整社運動中，被定性為“有資本主義思想行為，經公社批准為辯論對象。大會前，章自福召集了社員民主評議會，收集賀自遠的材料。與會者見幹部督陣，便紛紛揭發賀自遠，說他不出工，砍了兩棵樹，開了自種菜園。還有的說他不去食堂吃飯，（因喂牛，距食堂有好幾裡路，生產隊幹部批准、他自己吃）等等，賀自遠被評為下游。開批鬥會那天，章自福親自到會掌握。主持人宣佈起“罪行”後，社員們站起來七嘴八舌發言，你吵我罵的也很熱鬧。會議開了一陣，只鬥沒打，章自福火了，認為會開的不激烈，指使龔明富將評為上游的社員雷某拖出來辯論，說他是“同情資本主義”，質問他為什麼鬥爭不積極。一陣推打，將雷某打倒在地。龔明富又召集20多名黨團員和積極分子開會，佈置哪些人為“主攻”，哪些人來“助攻”。章自福批評說“會開得沒有勁，不激烈。反資本主義，幹勁越大越好，大家都要動手打，打出威風，打下資本主義的邪氣。哪個敢放水（手下留情）的，就把他拖上去批鬥……”由章自福和龔明富親自主持，會議重新開始，社員們為了自己不挨打，也顧不得鄉里鄉親的情份，拳打腳踢，就連婦女也下起狠手，賀自遠被打得很厲害，龔明富還親自動手推打。鬥了兩個小時，賀自遠被打倒在地，口鼻流血，氣息奄奄。章自福見賀倒在地上沒有聲氣，走到賀身邊，猛踢兩腳，說他是裝死。龔也扯著賀的手，說他“是裝死！”並向群眾宣佈賀是“裝死狗”。章自福對與會者說：“大家不要怕，賀自遠是裝死狗，就是死了，運動中死個把人不要緊的。以後還得這樣搞……”散會後，章

命令生產隊長派人將賀送回家，第二天早上，賀氣絕身亡。

1960年2月18日，公社來隊檢查“反右傾”。章自福為了個人名譽，“想在公社范書記檢查‘反右傾’時有個好印象”，便人為樹立“反右傾，鼓幹勁”的確典型。章找來聶延東商定，決定當晚半夜召開生產隊長和婦女隊長會議，要求各生產隊派先進和落後社員各一名參加，在一生產隊新食堂開會，20多人連夜到會。會前，章自福主持召開生產隊長先開佈置會，第四生產隊隊長雷大灼提出，社員鄭博先出工不積極。當時定鄭為辯論對象，即由聶延東主持開會，章自福到會督戰。會議開始，雷大灼就點名，說鄭博先散佈洩氣情緒，現在生產落後是因為“社員勁頭不大，吃不飽飯沒幹勁”，還說他“不服從須導”，提名辯論鄭博先。

37歲的鄭博先，生產一貫賣力，在治湖、生產中先後八次評為勞動模範，並被選為縣人大代表。1960年2月18日，鄭因饑餓和勞累過度，得了浮腫病，經領導批准從淞澧分流水利工地回家養病。但大隊規定，不出工就不開飯。為了吃上一口飯，他還帶病出工，只有幾次出工動作慢一點。會議開始後，鄭博先被帶上會場中央來，20多人先後上去推搡毆打。鬥了一陣，鄭大聲喊：“救命！我受不了了，我快要死了！”章自福上去猛踢幾腳：“你就沒死，你個狗日的，社會主義那能留你這種混世魔王活在人世！”推打2個多小時，生產隊副隊長雷友光猛力將鄭推倒在地，鄭倒下後就不能動，口鼻流血，當場死亡。章自福見此情景，在會上給大家壯膽說：“你們不要膽怯，今後右傾還得繼續反的。那裡有就在那裡反，對右傾分子，死個把人不要緊。”說完散會。鄭死之後，聶延東向章自福請示處理，說是“這下有皮絆了，鄭博先好像還是縣人大代表呢！哪麼搞才交得脫身囉？是不是先要向公社報告？”章自福要他先不要亂了陣腳，要穩住

神，好好想辦法。並責怪他說：“這哪裡報得！”兩人商量一陣，決計製造假現場。當晚，章自福命令大隊試驗作業組長雷立仁派人把死屍抬到四隊保管室裡。時已天明，又派婦女隊長萬儉秀在外邊派人，以搞生產為名，暗中監視，不准人靠近保管室。到了晚上，將死屍抬到山裡，用繩子吊在樹上。當天晚上，隊裡以挖木苑燒火為名，派社員上山。有人發現屍體，於是大隊宣佈鄭博先屬自殺。

②章自福除打死上述兩名社員外，還親自指揮打人、戴高帽子、罰站、冬天脫衣、吹西北風、潑冷水、站臘水田等刑罰，辱罵鬥爭幹部 25 人，社員 17 人。其中被打成重傷 6 人。作業組長黃洪堂因生產任務沒完成，章自福命令他脫光上衣，時值十冬臘月，天寒地凍。鬥爭批打一個多小時，打後腿腫了 5 天不能出工。作業組長田順初被鬥打後外逃。章自福鬥打辯論脫產幹部陳章鼇後，對陳說：“今天整你，是為了今後你好整他們（指下面幹群）。”

1959 年冬，56 歲女社員郭金姑，收了幾個自己偷種在山坡上的地瓜賣給外隊。龔明富得知，便將她抓到楊家富堰，發動群眾推踢打，將她打倒在地。社員雷大田，因 10 元錢與帳不符，龔發動社員推搡打毆約三個鐘頭，還親自動手猛擊雷胸部兩拳頭。雷頭部被打腫，腳上血流不止，受重傷倒床，半個月沒出工。1960 年 2 月，龔去劉家食堂，社員劉國章喊了他一聲“老龔”。他認為沒喊“龔書記”，抓住劉國章就是一頓狠揍。社員們私下喊龔明富為“惡老虎”。龔明富親手摧殘的群眾達 48 人。

聶廷東直接摧殘群眾 33 人。其中推踉 27 人，冬天打赤膊潑冰水 3 人，站臘水田 1 人。工程員雷華新，因不滿於幹部鬥打社員，被聶廷東鬥爭，致使雷的一條腿摔成跛子。17 歲少女吳桂香，因吃不飽餓幹活不力，被聶發現，罰她冬天站在臘水田，往身上澆冷水。幾小時下來，吳桂香凍得半死。聶廷東哈哈大笑，

讓人將姑娘扶進屋裡，找來幾件幹衣服，又生上大火，聶廷東淫心大發，將周圍人支開，硬要給吳桂香脫衣烤火，姑娘凍得動彈不得。聶摸上她身子，冰冷冰冷的，便沒了情趣，吳桂香有幸逃過此劫。

鄭昌銀共摧殘社 21 人，其中 10—15 歲小孩 10 名。13 歲學生馬興華，不小心踏了路上寫的石灰標語。鄭罰他脫掉衣服鞋襪，圍著桌子轉圈，直到轉昏倒地。小孩雷立真幹活沒力氣，大冬天，鄭昌銀往他身上潑冷水 1 個多鐘頭，雷立真大病一場。1960 年舊曆正月，13 歲女學生雷鳳英、10 歲女學生朱鳳秀，天冷挑糞便未脫棉衣。鄭昌銀大怒，說她們偷懶，強制她們脫去棉衣，站在臘水田裡，澆冷水淋濕衣服。致使二女大病。

縣委整風工作組向縣委彙報說，“章自福一夥為非作歹，致使精華大隊幹部違法亂紀，打罵群眾的歪風邪氣十分嚴重。全大隊 1758 人，受迫害毒打者 393 人，占總人口 22%。全大隊 18 個黨員，打罵群眾的 11 人，占 60%。”

一生產隊隊長雷大順，打人成性。社員周宜民餓不過，偷了隊裡的紅薯種吃，便將他捆起來，鬥爭大會上，硬是用針線縫上他的嘴巴。三隊副隊長雷有元，社員私下稱他為“惡霸”。1959 年臘月，60 歲社員黃鳳姑因帶孫女，沒出早工。雷有元就在川門食堂開鬥爭會，要她說原因。黃沒吭聲，雷就端了一盆冷水，披頭蓋臉潑在她身上。同月，川門作業組 15 歲女社員郭金枝，因來月經肚子痛，出工遲了一會。雷有元就在工地上，當眾強迫她脫光衣服打赤膊，郭金枝嚇得大哭。出工的姑娘們都跪下幫她求饒，說怎麼罰都可以，郭金枝是一個女兒家，打不得赤膊的。雷就限令她脫得只剩一件單衣，在寒水裡站了一早上，凍得她全身冰凍，還不給飯吃。郭金枝因此大病半月，精神恍惚，幾次痛不欲生想“找出路”自殺。家中人苦求苦勸，才苟且偷生。1960 年正月，女社員田巧美，因身染重

病，向雷有元請假。雷跑到她房裡，把她從床上拖下來，毒打一頓。到工地又限令她脫得只剩一件單衣，站在冬水田裡。田巧美大病一場，連吃藥都沒錢，差點病死。雷有元還幾次上門逼她出工，見她起不來，還破口大罵：“你這個懶婆娘，出工就裝死，當婊子就上勁！”

更為惡劣的是，鬥爭社員馬學金和黃珍美夫婦時，採用的手段令人髮指。1960年元月18日，該大隊婦女黃珍美，在治湖工地與石板灘社員馬學金結婚，後回大隊轉糧食關係。文書雷建峰電話請示章自福。章認為結婚沒經他批准，十分惱火，便指使將其夫婦扣留，並交代雷建峰：“你的幹勁大，任務交給你，晚上開會鬥爭。”當夜，章自福趕回大隊，召開生產隊長會議。人未到齊，章就提出：“今天要唱回雜戲。”“搞個大場合”。他讓幹部把馬學金和黃珍美夫妻兩人押來批鬥，把馬學金衣服脫光推打鬥爭。鬥了一陣子，馬說要拉屎，瞅個機會跑了。接著，又把捉來的“社會主義的逃兵”、17歲女社員田桃美押到會場。田桃美因在治湖工地吃不飽，過度勞累，逃跑回家。幹部們便圍著田桃美，讓她脫光上衣，一陣推打“肉搏”後，要開會了，又讓她穿上衣服押起來。田姑娘上身和乳房，被這些禽畜抓得稀爛，下身連陰毛也被扯了幾把。姑娘哭得死去活來。奉命抓人的幹部，把馬學金和黃珍美又捉到大隊來。幹部們會前脫過田桃美的衣服，過了癮，淫興還未消。這時便強令黃珍美脫去衣褲，只穿一條短褲。又讓馬學金脫光衣褲。推的推，揉的揉，有人趁機在黃珍美的身上和乳房、屁股、大腿上亂摸。又把夫妻兩人推倒在地，讓兩人各倒一頭，把兩人的頭部互相壓到對方胯中。聶廷東還強制黃口含馬的陰莖，並問香不香，臭不臭。又讓馬學金舔住黃珍美的陰部，夫妻二人口含對方生殖器在地上打滾，幹部們在一旁圍觀，哈哈大笑。

③姦污婦女。章自福到精華大隊只有4個多月，即利用職權，姦淫婦女多人。

16 歲少女雷金秀，是大隊衛生保健員。章自福威逼利誘，尋機姦污她多次。有一天早上，雷金秀進屋掃地，被他抱起來按在床上就強姦。從此以後，雷金秀就成了他的玩物。有幾次大隊開著會，章自福還跑過來將雷姦淫後再接著開會。被他姦淫的還有衛生所調劑員，17 歲女青年宋立英，18 歲的代大隊婦女隊長趙喜美，女社員劉雪英和雷金秀等人。鄭昌銀 1960 年 4 月姦淫四隊婦女隊長萬儉秀。聶廷東 1958 年姦污婦女馬秋美，1959 年姦污婦女胡秀芳。

④橫行霸道，攔人索財。自 1959 年 11 月至 1960 年，大饑荒降臨，各地逃荒的人流如潮。精華大隊外逃荒討米要飯的群眾 213 人，占總人口 12%。為此，章自福下令路上設卡，攔截來往行人，扣壓財物。1960 年 2 月 9 日，章自福召開大隊作業組長以上幹部會議。他佈置說：“俺大隊人外跑多。凡是從大隊路過的，沒有證明的一律扣下搞生產。”元月 29 日至 3 月 28 日兩個月內，全大隊共扣留過往行人 705 人，其中被鬥 137 人。2 月 10 日一天設立三個哨長，由龔明富、雷友元、關陽銀等人率民兵持槍檢查，一天捉拿過往行人百余人。據不完全統計，扣壓豬肉 150 斤，魚 64 斤，食油 3 斤，米 30 斤，黃豆 40 斤，雨衣一件，套鞋一雙，被子一床，布 5 尺，棉花 15 斤，煙葉 3 斤，人民幣 15 元。都為大隊幹部自己吃、用、拿了。方圓幾十裡地，老百姓不敢從精華大隊過，說是精華大隊出了山大王，過路要留買路錢。群眾稱章自福等人為“四條蛟龍”。章自福案上報後，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多次將此案作為社教和幹部蛻化變質的典型事例，向全黨予以通報。1960 年 4 月 16 日，公安部門將上述 4 人拘留，5 月 4 日逮捕。鑒於以上罪行，1960 年 9 月，章自福被判處死刑，聶廷東被判處有期徒刑 15 年，龔明富被判處有期徒刑 15 年，鄭羅銀被判處有期徒刑 10 年。

1981 年 5 月 14 日，澧縣人民法院對此案複審，認為該案是從上而下的反右

傾，“五風”盛行情況下發生的，各級領導應分擔責任；把上述錯誤因違法亂紀，強迫命令加在一起，將章自福、聶廷樂定為蛻化變質分子，龔明富定為壞分子，鄭羅銀定為變質是無限上綱；對章可判有期徒刑，判死刑是錯殺，應予糾正，作好善後工作；對聶、龔撤銷原判免予刑事處分，鄭羅銀屬一般“五風”錯誤，免除追究刑事責任。複審結論下傳後，民情譁然。

1961年4月整風整社運動中，澧縣縣委書記張琢在一次整風運動的縣委擴大會議上說：如東公社的幹部對人民群眾採取了法西斯統治，隨便打人、罵人、捆人、吊人、扣糧、鬥爭、“辯論”、罰吹西北風、吃草、吃泥巴、喝尿、吃牛屎、灌大糞、兒打娘、敲牙齒、針縫口等。公社成立勞改隊，有的大隊還成立了改造隊。開辯論會的時候，先把積極分子教好，讓他們起帶頭作用，然後幹部吹哨子為號，一起湧上去打，哨子控制節奏，吹得快，打得要快，吹慢就慢打，吹得聲音大就打重，吹得輕，就打輕點等等。

1958年9月，幹部帶頭從劉家遠家中，抄出他老婆私藏在床下的家中全部現金25元錢。劉家遠被人打得口吐白沫，他老婆被打得一頭栽倒在地，就連兩歲多的兒子也被人一腳踢得半天沒哭出聲。別人老婆挨打，做丈夫的無論如何也會跳起來拼命；他老婆挨打，劉家遠縮在牆角不敢吱聲。幹部們走後，他老婆又哭又鬧，口口聲聲罵他是個廢物，沒得本事，連老婆都護不住。家裡分文無有，兩口子連看這場傷病的錢也沒有。還是鄰居好心，去扯了些治傷的草藥來，兩口子過了好些天才慢慢恢復。

1959年9月，如東公社各大隊搞起“反偷風”運動。大隊和生產隊一級級開大會，要社員老實坦白交待從1959年春荒以偷盜集體莊稼的罪行，說是“黨的政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自己積極交待、交待退回的，既往不咎。抗拒不

交的，罪加三等。”審到劉家遠時，幹部硬逼他老實交待。他在驚恐之下，承認說偷過一次包穀。其實當時包穀在地裡還剛剛結穗，顯然是強逼屈招。結果幹部們硬說他偷了一次有二次，有二次就有三次。前前後後給他算成偷盜集體糧食 20 斤，硬是逼他交出來，並帶民兵到他家抄家。幹部們把他老婆在收割中稻時從收割後的田裡撿的 5 斤多穀子全都抄走，公共食堂又罰他一家三口人停夥兩天。是年冬，因家中斷糧斷炊，他老婆餓得受不了了，於是跟著一個野男人跑到外鄉了。

1960 年春節前後，家裡粒米不剩，劉家遠父子常常連清水煮野菜也吃不上。別人家為了救命，也顧不得人民公社的種種禁令，不少人偷偷私自跑到湖區捕魚、挖藕，搞點吃的。劉家遠膽小怕事，坐在家裡幹挨餓。大人都受不住，孩子餓得一天到晚哭哭啼啼，圍著他要媽媽、要吃的。劉家遠心煩意亂但又一籌莫展，常常坐在屋裡獨自發呆，誰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大年三十晚上，鄰居見他家實在是太可憐了，便給他端過來一小碗野菜粥，父子倆這次總算吃了頓年夜飯。這時，公共食堂一天開一頓夥，大人一人一碗見不到米星子的野菜粥，小孩子才給一勺。劉家遠的“飯”，常常被孩子吃了還不夠，整天圍著他哭鬧喊餓。這時劉家遠自己也餓出了浮腫病。不久，公共食堂停夥斷炊。劉家遠父子倆已經幾天沒吃飯了。這天，孩子哭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家裡聲息皆無。據劉家遠後來自己交代，這些天裡，他自己一聽到孩子的哭聲就煩躁不安，還經常出現幻覺，就連做夢也是夢見白米飯、紅燒肉和紅燒鯉魚，還常常把走在路上的人，看成是在動的豬，想吃肉都快要想瘋了。

當天夜裡，他看到躺在鋪上的兒子餓得就快要斷氣了，惡念頓生。心想，與其讓兒子受罪，還不如把他殺吃了，吃個飽肚子自己再死也好。於是他找來一把

破菜刀，幾刀就把他兒子殺死了，並肢解成幾大塊，用水洗乾淨。又偷偷跑到地裡，偷了一些生產隊的胡蘿蔔，洗乾淨後，放到破鼎鍋裡，和兒子的屍體一起煮。那天晚上，劉家遠說他幾年來第一次吃了餐過癮的肉！第二天，鄰居沒見他家小孩子哭鬧，“連人影子也沒照過面，感到有些奇怪，就到他家裡看看。”這一看可把人嚇壞了。只見幾塊磚頭搭起的灶上放個破鼎鍋，鼎鍋裡還煮著小孩的頭、胳膊和腿腳！於是趕緊跑到公社去報案。劉家遠被捕後，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他的罪行。說就是不想讓他兒子再受罪了。還說他的想法，是吃完了兒子自己也死了算了。

劉家遠被槍斃前一天晚上，監獄破天荒給他端來了一碗大米飯。據同號的犯人說，劉家遠竟把米飯放在地上，先祭了一番死去的兒子，嘴巴裡不知道念念叨叨些什麼，然後幾大口就把一碗飯吃了個精光。

第 116 節 安徽餓死 620 萬(有人推算餓死達 800 萬)

1·鳳陽因共產而暗無天日

1958 年 9 月毛主席提出大辦鋼鐵、大搞群眾運動的方針後，鳳陽迅速掀起了全民大辦鋼鐵運動，運動最高峰時，共有 6 萬 3 千餘人爭赴鋼鐵前線。縣委提出了“家家挖潛力，人人獻鋼鐵”的口號，有人把剪刀、鐵鍋也獻了出來。有的單位提出：“土裡挖，水裡撈，室內搜，室外找，令廢鋼舊鐵升帳”。縣直機關提出“叫鋼鐵無處藏身”，他們打開了保密室，找出舊保險櫃、自行車架、鋼絲、煙囪、鍋、鏟、棒、釘等 1400 多斤。小溪河煉鐵營因失火造成燒死、燒傷 22 人的事件。鳳陽臨淮鎮小學 1000 多名師生煉鐵，向黨委提出：“不怕礦石硬，不怕流血汗，只要多出鐵，寧願手磨爛”；10 多天就完成礦石 96 萬多斤。在三四個月的時間裡，經過數萬鋼鐵大軍的日夜奮戰，以及全縣 40 萬人的熱情支持，

10 月份的鋼產量與 5-9 月的四個月鋼產量的總和相比，增加了 31 倍多。11 月份的鋼產量與 10 月前產鋼總和相比，也增長了 22 倍多。

在安徽鳳陽，公社化時期存在急於實現共產主義的思想，誤以為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產品都可以由領導機關直接支配了，因而從四面八方刮起了一股“共產風”。集體共個人的產，有些人說：“人民公社化，不分你我他”。表現為：一是把富隊窮隊拉平，二是積累多(超過總收入的 50%)，義務勞動多，三是把生產資料無代價的歸公。全縣統計了一筆大帳，在隊與隊、隊與社之間無償調撥的有：現金 200 多萬元，糧食 300 多萬斤，煙葉 300 萬斤，棉花 3 萬斤，勞力 34 萬個，耕畜 2000 多頭，農具 2000 多件，肥料近 200 萬擔，種子 200 多萬斤，禾苗 90 多萬畝，生豬 2000 多頭，胡蘿蔔、山芋各數百萬斤。四是無償佔用勞力。鳳陽投入抗旱的最高人數為 15 萬多人，占全縣總勞力的 90%。

據檔案記載，安徽鳳陽的“共產風”一直未停，刮的範圍很廣，如土地、房屋、糧食、勞力、耕畜、農具以至家禽、鍋、碗、瓢、勺等。社員的自留地多次被沒收，沒收又還，還了又收，收了不種，大部分荒蕪。石馬大隊還把社員私人的南瓜秧拔到隊的地裡栽，一棵未活。山藥、毛芋、生薑是小溪河地區有名的價值高、產量大的土產品，59、60 年兩年沒叫種，拔掉苗不准社員生產。李武大隊總支書記郭金山居然規定：“三年內見苗都是犯法”。以至造成全社 108 個小隊 429 個小組中，就有 46 個小隊、218 個小組沒有山藥，70 個小隊 240 個小組沒有毛芋，62 個小隊 214 個小組沒有生薑。……

小溪河公社生產上的主觀主義，已經發展到瞎胡鬧的程度。喬山大隊 8 畝大麥已經盤根，幹部硬叫犁掉，種豌豆，每畝下種 200 斤，一粒未收。這個大隊的

潤西生產隊，春天撒播花生 80 畝，用種 1200 斤，秋天只收三斤半。有的是逆天行事，新田大隊秦塘小隊種麥子 7 畝，然後又採取攪苗助長的辦法，每畝施化肥 100 斤，不僅燒死麥子，連草也不生。光明大隊的住點幹部，竟佈置下雨天割麥，晴天栽秧。長塘大隊為了擴大面積，竟把 3 萬多斤稻種撒在花園湖一尺多深的水裡，並且還強迫社員在水田栽煙 250 畝，片葉未收。萬保大隊張莊生產隊幹部，大雨剛過，就叫社員在滿田是水的稻田裡栽煙 32 畝；石馬大隊在水裡播黃豆 120 畝，結果顆粒無收。錢圩生產隊組織 40 人，大幹了 5 天，把 4 畝出穗的並成一畝，畝施豆餅 1000 餘斤，秋苗全部被燒死。新華大隊把全部土地劃成三個作業區，規定作業區的其他作物一律廢除，一次就犁掉已種上的莊稼近千畝。小溪河大隊街西小隊，田裡麥子未運完，勞力就被調去抗旱栽菸，結果因苗小天旱，栽得全部死光，地裡的麥子也損失 7000 多斤。據統計，鳳陽 1959 年荒田 31 萬畝，占耕地面積的 21%，1960 年荒田 53 萬畝，占 38%。最嚴重的公社有一半荒田，有的地方荒地連片，甚至 6000 畝地不立苗，或幾裡地不種莊稼。插秧失時，種下不管，收割不盡，更是普遍現象。這些都是人為造成的，或是瞎指揮的結果。

甚至攆人搬家，不搬就把人家的東西往外扔。1959 年大通橋大隊為了辦農場，採取硬性的辦法，乘社員下地生產之機，將大通橋東頭一個小莊子的社員家的東西全部拋了出來，房屋大隊佔領。縣委要求，幾天內實現“車子化”，下邊沒有木料，只好扒社員的房子，用私人的木料，搞房前屋後的樹木。1959 年，縣委書記趙玉書親自到府城公社紅旗大隊佈置，把社員的口糧、菜、柴草集中到食堂，掀起了新的共產風。結果有些隊不准社員家冒煙，把社員的小鐵鍋也集中了，“三集中”變成了“四集中”。老年人要求留一口鍋燒開水都不准留，有的幹部當面就把鍋給砸了。砸鍋砍樹，雞犬不寧，社員“無家可歸，痛哭流涕”。……

鳳陽小溪河公社扒房並莊的現象也是嚴重至極，因此曾有 7 個大隊的 25 個村莊無人居住。石馬大隊大郢生產隊將 5 個村莊並成 1 個，男、女、老、少分四處居住。喬山大隊 31 個村莊，1960 年 6 月份，總支書記梅樹華強迫群眾在半天之內並成 6 個莊子，扒掉房子 300 多間，黨員不幹開除黨籍，團員不幹開除團籍，社員不幹不給飯吃。社員無家可歸，外流 100 多人集中以後，有 14 戶 40 人住在 3 間通連的房子裡，晚上大門上鎖，民兵持棍把門，尿尿拉屎都在一起。小莊並大莊像跑鬼子反一樣，造成田地荒蕪，草苗叢生，群眾流離失所。大伯子和弟媳婦同住一室，連撒尿都聽得到。有的婦女只要一提並莊子的事就哭。

1960 年 3 月地委吳秘書長指示：專區建兩個萬頭豬場，鳳陽縣攤一個。豬圈建成後，曾希聖要親臨檢查。要求豬圈蓋的有氣魄，要用磚或石頭打牆基，用磚鋪地。真是：百姓的房子被拆被扒被占，無家可歸；而豬圈蓋的卻富麗堂皇！
人竟然不如豬。

據 1961 年初的一項統計，全縣一平二調的財物共折款 732 萬元，人均 27 元。耕畜、農具大量減少，兩年來鳳陽全縣耕畜減少了 37%，剩下的瘦弱不堪，農具則減少了 35%，約價值 70 萬元；農具不加管理，損壞、破爛、丟失現象相當普遍。結果公社化以後，生產連年下降。如鳳淮大隊三年來糧食產量從 157 萬斤下降到 59 萬斤，總收入從 38 萬元下降到 7 萬元，人均收入從 79 元下降到 4.4 元。武店大隊的工分值也年年降低，1958 年社員人均收入 37.7 元，到 1960 年降到 4.6 元，每個勞動日僅值 0.05 元。社員說，“當社員不如老母雞值錢”。1960 年鳳陽是個風調雨順的好天氣，但由於種種原因，糧食產量僅有 9900 萬斤，比 1957 年下降了 64%，生豬下降 44%。

同時存在的另一個嚴重問題是高指標、高估產和高徵購。公社一級浮誇盛行，

向上彙報數字都是層層估，級級糊，以彘報好，以少報多，沒有報有，弄虛做假，欺上壓下。報實受批評，報假受表揚。1958年9月16日報導：鳳陽縣太陽升社主任張士俊以自己計畫畝產7萬多斤的衛星煙田，大膽地提出與定遠縣八一社計畫畝產130萬斤的衛星煙田比高低。

1957年豐收，鳳陽實收產量為2億斤，1958年卻定下了8億斤的高指標，1959年更提高到12億斤，超過58年實產量18266萬斤的6倍。連年減產的實際情況，卻被說成是增產：1958年實收產量比1957年減少了1360萬斤，但卻虛估為4.05億斤，為實產2.2倍；1959年實產10960萬斤，比1958年減少7300萬斤，但又虛估為4.05億斤，為實產3.7倍。高指標，高估產的結果，就產生了高徵購，購了過頭糧。特別是1959年鳳陽的糧食產量10960萬斤，人均270餘斤；徵購走了5974萬斤之後，只剩下了4986萬斤，僅為人均120餘斤（還包括種子和飼料糧等在內）。就算全部給人吃吧，一個人一年120斤，即一天不足3.3兩（164克）。結果從秋收結束到12月底的兩個多月中，農村中沒有供應口糧，造成了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鳳陽縣有一大半的人竟然能夠活下來，應該說已經是奇跡。

高指標，高徵購，持槍搜糧，吊打逼糧，粒米不留，活活置百姓于死地。人口非正常死亡是從1958年冬開始的，1959年冬到1960年春，正是全縣缺糧、疫病、外流、死亡嚴重的時候，卻錯誤地認為沒有糧食是思想問題，不是實際問題。於是規定各公社每天糧食入庫數字，一天報告三次，逼得賣了種子，賣了口糧。1959年10月縣委第一書記趙玉書在縣裡召開的生產組長以上的幹部大會上，搞反瞞產鬥爭，指使各地千方百計挖掘糧食潛力，對消極幹部進行體罰。大會結束後各地又分別召開了鬥爭會，其殘酷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有撤職的，有捆綁吊

打的，甚至逮捕法辦的。很多社、隊奉命成立了“查糧突擊隊”，挨家挨戶地、翻箱倒櫃地鑿壁搜查。不僅將社員自留地收的少量糧食和留下的一點雜糧、種籽沒收，就連山芋葉子、雞蛋、藕粉、現金等亦被以“反資本主義”為名搜走。直到 1961 年中，查糧翻糧仍沒有停止，嚴重的地方普遍查翻；不少大隊口糧標準每天只有 2 兩或 3 兩糧食。如板橋公社小王莊共 42 戶，戶戶被搜，吊打群眾 14 人，挖地搜糧 14 戶。板橋大隊上王生產隊支部書記李明傳說：“1960 年糧食沒有了硬叫賣，季文祥副縣長在上王莊挖潛力，叫陳玉胡天天晚上開社員會，硬逼硬打，天天審訊，沒有一天不挨打的，哪個還有勁幹活。”小溪河公社的“查糧突擊隊”深夜帶槍搜查小溪河火車站，將職工家屬的糧食、雞蛋、洋蔥等都拿走了。車站認為這是一種搶劫行為，並提出：“就是搜查也要有個搜查證。”縣司法部長徐萬里向趙反映了這個情況，趙說：“我查糧是查資本主義，要搜查證我補給他一張”。

1959 年夏季，小溪河公社黨委佈置統一行動，查糧翻糧，被搜查的有 8046 戶，占總戶數的 73.1%，長塘大隊只有 1 戶沒被搜查。小溪河公社黨委書記繆堅召開大隊總支書記會議，佈置全公社統一行動，搜查社員家糧食，並在萬保大隊召開搜集糧食現場會，搞得人心惶惶，不幹生產。1959 年冬天，小溪河山河大隊組織了一個“挖掘潛力專業隊”，村村查、戶戶搜，一戶不漏，有的戶被搜多達 4 次。稍有不滿，他們就公開揚言：“什麼是你的，只有一口牙是你的”。在搜查中，他們手持鐵棍，到處翻箱倒櫃，東搗西戳。開始主要是搜查群眾的糧食，以後就查到什麼就吃什麼，看中什麼就拿什麼。僅社員代如前一家就被搜去毛芋 600 斤、生薑 50 斤、辣椒 100 斤、大豆 20 斤、葵花籽 10 斤、乾菜 10 斤。他的兒子從學校帶來的 2 斤米和 3 斤山芋幹也被搜去了。社員王宗坤家烙的一鍋餅，

被專業隊看見後，一擁而上，全部吃光。社員稱他們是“吃幹隊”。僅一個小溪河公社就有 3175 人被打，103 人被打成殘廢，還有 30 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設的勞改隊。

趙玉書曾在一次電話上佈置說：“凡吃山芋種、油菜苗的，給我打！”大廟公社侍家生隊書記張現良發現社員史春祥偷山芋種，就罰他 5 只雞、2 床被面、2 件衛生衣、7 件單衣和 1 雙球鞋。楊有聚在總鋪公社時，對完不成徵購任務的大隊幹部不給飯吃。縣委候補委員、原檢察院院長陳世富，親手打人 17 名。小溪河公社的李清義、板橋公社的季文祥、總鋪公社的宋兆銀等縣委委員，都目無黨紀國法，私打手銬、私設公堂，擅自關押群眾，成立勞改隊。1960 年全縣逮捕和拘留 2078 人，經過正式批准手續的只有 300 多人。在逮捕和拘留的人犯中，就有 1076 人是小偷小摸。由於人犯過多，牢房擁擠，關死的就有 382 人。

1959-1960 年全縣生產隊以上的幹部 8614 人，根據三反揭發出犯有各種錯誤的 1922 人，占幹部總數的 34%。被體罰的群眾達 28 026 人(包括扣飯的 15 001 人)，占農村人口的 12.5%。因體罰扣飯致死的有 441 人，殘傷 383 人。

小溪河公社受體罰的群眾達 3175 人，占社員總數的 9.4%，被打逼和扣飯致死的 96 人，殘廢的 103 人。少數幹部殘害人民的手段難以容忍。有活埋人，有用繩勒人，有攔路搶劫，有摔鍋砸碗，有刮鼻子的，有扣人飯食的。上述種種，屢見不鮮。喬山大隊總支副書記一貫打罵群眾，1959 春以來先後打罵 60 餘人，重傷致死 3 人，致殘失去勞動能力 1 人，扒掉社員房子 18 間，用扒來的木料給他母親打了一口棺材，並經常扣社員的飯。喬山大隊總支書記李仲貴、大隊長張永家，在 60 年夏季的一天就活埋 4 個小孩，埋達腰深才被家人苦苦哀求扒出來。有的小孩扒出來後，拉了一褲子屎，有的回家嚇的生了病。大溪河大隊牛同生產

隊長岳從龍，在 60 年 6 月將一個拔玉米秸吃的 5 歲小孩甩到水深 3 尺的田頭窖內，幸被其母發現，才被救出。段橋生產隊段中付用繩勒社員楊四喜小孩的脖子，放下後已經斷氣（後被救）。大溪河大隊尹陳生產隊長陳本良，因郭傳良放牛時吃了莊稼，陳即用劈柴將郭的手指砸斷三根。1960 年萬保大隊因打致死 5 人，殘廢 1 人；大隊副兼小姚生產隊政治隊長凌萬才，先後吊打 25 人次，因打致死 3 人。社員李培林等四人偷吃不能育苗的山芋種幾斤，竟被打昏兩次，還抄了家，雞、羊、衣物動一掃而光，全被凌萬才等據為己有。小溪河大隊北夏生產隊，共有社員 240 人，被大隊長李家付打逼的就有 237 人，只有 3 人沒被打逼。

1959-1960 年山河大隊被幹部捆綁、打罵、吊罰、扣飯、游莊的群眾就有 1078 人，占總人口的 36.3%，被打死 2 人，逼死 1 個。下放在山河大隊的工作組展志生，先後在大趙生產隊捆綁吊打群眾 33 人，扣飯 30 多人，罰款 27 戶，共罰款 89 元，布 56 尺，單被 2 床，棉被 1 床，女服 3 件，小雞 16 只，並持槍搶劫加山胡蘿蔔種一包。一次，社員王尚同老婆有病，展卻說她裝病偷懶，不給打飯，王的老婆餓得到食堂要飯，展看見後，勒逼來打飯的社員每人用筷子刮她一下鼻子，誰不刮不准誰打飯，結果其鼻子被刮得皮破肉爛。社員王功良死後，展志生叫王的老婆去燃燈工地做工，因其小孩在家有病不願去，展要鬥爭人家。結果這個婦女走後，小孩就死了，小孩死後幾天無人問，屍體被老鼠咬的不像樣子。大隊副書記史永明，藉口寡婦王氏母女倆要外流，不給飯吃，並罰王氏苦工一天，晚上，又把王氏同一個男社員捆在一間房子裡，同時把王氏的小孩捆在食堂裡。第二天，王氏母女倆外流後，史又把她家的三間房扒掉。工作組李多慈發現社員廟永產偷了幾個山芋後，就把廟捆起來，把幾斤山芋掛在廟的頸子上“游莊”。三官廟生產隊團員魯維安，從外面回家看小孩時，生產隊長史家正不但一連兩天

不給人家飯吃，還要史到小溪河去挑水秫秫。後來魯餓了，偷了半碗秫秫，史家正就把魯綁了兩天不給飯吃。不幾天，魯就病死了。

1960年山河大隊總支書記陳榮付，去年麥收時，叫社員苦戰三晝夜。有一天魯殿發在場上打磕睡，被陳用開水澆頭，頸子上面皮都燙爛了。喬山大隊長鄧凡珍，60年春天以勸阻外流為名將一個過路的搞到大隊吊打，從身上搜出12斤糧票和12塊錢，自己入腰包了。總鋪公社鳳興，大隊生產隊長王雲龍逮到小偷李以俊，用鐵火叉燒紅了烙嘴，烙爛流血。殷澗公社趙窯生產隊長韓付田，逮到一個偷青的小孩，用刀砸劈了小孩的4個手指。

黃灣公社淮豐大隊小隊長張殿宏逮到偷青的社員王小腳，用鐵絲穿上耳朵，並用鐵絲捆手吊在木梁上。三小隊支書黃開俊，指使親信余往和胡作非為，將社員吳開聰的兩個小孩(偷青)用鐵絲把兩人的耳朵串在一起，掛在牆上的釘子上，並對小孩說：“你們倆打個電話吧”。星火大隊支書鐘克昌利用婦女偷青的過錯，在田裡強行姦污；大隊信用部主任丁如明就打罵106人。板橋公社浙塘大隊長孫玉昌，逮到一個偷青婦女，打倒在地，用槍搗婦女的陰部。

武店公社全社被體罰的群眾有1285人，其中被處死95人，被扣飯的1622戶，3760人。武店公社7個書記中有6個有問題，有3個是五類幹部。……趙樓大隊副趙傳舉惡毒地說：“群眾是奴隸，不打罵不扣飯就不行”，“全大隊沒有一個好人”。1960年一年他打過30多個社員，有的被打傷，有的被處死。群眾稱他是“活閻王”。……全社原有生產小組長以上幹部1163人，犯有違紀錯誤的達265人，占22.2%。這些幹部利用各種手段處罰群眾，捆綁吊打、拘留關押、扣糧扣飯、罰勞役等。全社被體罰的群眾有1285人，其中被處死的95人，被扣飯的1622戶，3760人。不僅如此，他們還貪污腐化，多吃多占，甚至攔路

搶劫……

1960年電灌站經常加班加點，增加勞動強度，克扣民工口糧12萬餘斤。縣委書記張道厚還提出了“三天三夜不吃飯，工效還要翻三番，下雪還要光著脊樑幹”的口號。縣委委員、副縣長杜思儉，對民工一貫態度蠻橫，出口罵人。他看到民工不脫衣服幹活，就罵人家沒有幹勁。同時還規定一些“殺人”制度，如：多勞多吃，少勞少吃，不勞不吃，照出勤人數發口糧，炊事員、勤雜、病號不超過10%。民工請假非經指揮部批准，否則不給飯吃。攆病號回家，因不發口糧或少發口糧，有的就死在路上。宋集公社宋集大隊民工王土中有病不能上工，兩個民工架著他去抬土，結果被折磨死掉。據統計，電灌站共死掉民工2474人，占民工總數14293人的17.3%。利民公社上電灌站的500人，死掉307人，占60.4%，宋集大隊上電灌站的40人，死掉29人，占72.5%。群眾叫杜思儉“杜閻王”，把電灌站叫做“閻王殿”。水庫工地上私設牢房，關70多人，搞死28人。白天強迫勞動，夜裡不分男女關在一起。天冷幹活不准穿棉衣，顯示幹勁，晚上民工解手也不准穿棉衣。規定每頭牛每天要拖480趟（半裡路），不執行規定就送去勞改。為了瞞縣委檢查，佈置死人不准帶血布，不准埋新墳，喪盡天良。大溪河民工王占滿還沒有斷氣，就叫民工埋掉。當時擺在外面沒有埋，後王蘇醒，爬了4天，20裡路，才到家。打人手段也是多種多樣的，一般是罰站、綁、吊、打，一種最殘酷的方法是將人的耳朵用鐵絲穿起來……在電灌站和燃燈水庫工地上，民工不僅生活安排的不好，而且勞動強度特別大。門檯子電灌站去年民工吃不飽，他們還結餘10多萬斤糧食。不執行勞逸結合的方針，天寒地凍，下雨下雪還逼著社員幹活，對有病和體弱的民工，不能給予及時的治療和照顧，相反是一推了事，叫民工回家，走又不給糧食，加上有病天又冷，有一部分民工死在路上。

有的社員身體不好，大隊和生產隊硬叫人家上電灌站，到了電灌站又不收，兩頭不給糧食吃，三推兩推就把人家搞死了，拿人命當兒戲……

山河大隊副隊長繆守堅 1960 年春帶民工上水庫時，強迫社員奴隸勞動，曾親手吊打社員 100 多人，並先後死去 35 人。新華大隊副隊長張玉蘭把社員許山友捆綁送水庫，許不願，張將許反綁，用牛拖，許頓時皮開肉綻，直到許慘叫“願意”後才放下，接著就捆綁送水庫，不允許有病送回，第 4 天死去。張玉蘭對在 1957 年整風運動中向他提過意見的社員史前山進行報復。他利用民工上水庫的機會，將史家兩個勞動力分別調去修水庫和鐵路，規定一個在家的老母和兩個孩子象男人一樣，每天交 70 斤野菜，否則不給飯吃，同時規定：不准家裡冒煙（不准燒鍋），否則沒收。與此同時，又誣史家兩個小孩偷外流地主的包袱，將兩個小孩捆綁吊打。第二天，兩個孩子就病了，並且越來越重。當其老母哀求張，要求住院治療時，張竟惡毒地說：“你家住什麼醫院！我非叫你家死得沒有開門的沒有關門的！”沒幾天，兩個小孩死去，接著老母也連氣帶餓死去。

1960 年小溪河公社原黨委書記李清義在燃燈水庫私設一個勞改隊，把外流回來的社員、撤職的幹部以及小偷小摸的落後社員、五類分子集中在一起。白天派民兵監督勞動，幹的不好就扣糧，晚上拷上手銬關進牢房。他私設的牢房任意關押民工，他還打了 20 多把手銬，專門對付所謂“調皮搗蛋”的社員。據瞭解被他關押和上銬的群眾有 70 多人。不問黨員、團員和群眾，只要“犯法”，就上銬入牢。民工病死了不上報，不通知家屬，隨便把死者埋掉。據他自己交代，承認共死掉 30 多人（據公社召開組長以上幹部會議揭發，還不止這麼多）。另外，他還在火車站私設一個關禁閉的小牢房，任意關押外流人員，嚇得外流人員不敢回來。燃燈大隊黃莊小隊社員丁學然因偷宰了老母豬，被李清義押到水庫工地

勞動，白天強迫幹重活，晚上拷上銬子關禁閉，一個月後，丁學燃被活活折磨死在牢中。小溪河大隊南劉家生產隊社員宋維勤因從水庫偷跑回來，被李清義知道後，當時就把這個社員關起來，白天勞動扣飯，晚上關禁閉，一連 3 天，結果死了。

鳳陽縣委關於瓜菜代的幾個通知。1959. 1. 14 鳳陽縣委通知：“要曬乾菜，凡是可吃的象山芋葉、芝麻葉、臘菜葉、胡蘿蔔纓等全部收藏起來，像保護糧食一樣保管好，不要造成浪費”。1959. 9. 21 中共鳳陽縣委通知：“山芋藤子、芝麻葉子都是春季食用的一種好乾菜。以 1.5 斤山芋藤子抵 1 斤糧食吃，計可抵糧食 3000 萬斤（按收 4500 萬斤山芋藤子計算）。各地應發動群眾，大量收曬”

（“1.5 斤山芋藤子抵 1 斤糧食吃”——就是對牛對馬，如此的演算法怕也對付不過去；可這卻是連年“豐收”、“增產”的中共鳳陽縣委給子民的告示）。

1960. 10. 1 鳳陽縣委通知：“糧菜混吃，是節約糧食、保證吃飽吃好的一個重要方法，在大抓蔬菜生產、大種蘿蔔的同時，還應大搞各種代食品，以彌補當前蔬菜之不足。每畝約計可採集豆葉 100~150 斤。採後用水煮八成熟，手揉、擠出綠水，變成豆葉塊，煎、炒、熬菜或兌糧食做飯都可以”。1961. 1. 30 鳳陽縣委通知：“目前有些地區瓜菜已經不多，但對於大搞代食品又未引重視，有怕麻煩的思想。代食品的資源還是不不少的，用稻根子加工麵粉，便是大有可為的事。面積大，數量多，營養豐富，容易採集。”“用稻根子加工麵粉”並且“營養豐富”——這純粹是豬糞的語言。他們確實是一群豬，一群喪盡天良的視人命如草芥的豬。

1959 年 7 月小溪河公社禹山大隊長朱厚明寫報告給鄉黨委：我大隊目前生活問題處於極端嚴重狀態。自 6 月 30 日到目前止，已有 13 天沒有支過糧。群眾

生活全以南瓜、瓜葉、瓜花、乾菜、酒糟都吃光了。通過實際調查，全大隊 4 個生產隊，已有 3 個在三天前就斷炊了（王侯、亂埂、朱秦 3 個隊）。社員東奔西流，生產處於停止狀態。發現社員有六多：一、小孩老人吃飯時哭的多；二、走親探友的多；三、到明光購買酒糟的多；四、到地裡拾糧的多；五、到地裡生產時睡覺的多；六、外流多。如後朱隊 40 多戶有 38 戶到明光買酒糟。有千人外流……在前五天下定最大決心，摸底排隊，到現在情況屬實無訛。特懇求鄉黨委設法解決以達安定社員情緒，搞好生產。這份報告同年 11 月作為朱厚明反黨的材料而整理上報。

1959 年 11 月鳳陽縣委頒發了《趙從華的反黨罪惡材料》。趙從華，1942 年參加工作，同年入黨，1954 年任鳳陽縣委書記處書記，1958 年兼任縣長。他反對人民公社：認為人民公社辦早了，辦快了，中央未搞試點。他說：“辦人民公社，中央應當先辦試點，取得經驗後再逐步推廣，這樣就不會出這麼多問題”。反對集體所有制，主張包產到戶宣揚單幹的優越性。主張把小隊的地分給社員自由耕種，並進行試驗。勒令解散食堂，他打電話批評殷澗鄉黨委書記：“你們鄉食堂為什麼散得這麼慢？就是你們幹部思想有問題”，又說：“不想退食堂，一是想多吃，二是想貪污，三是想搞鬼”，表揚食堂散得快的。到處搜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點滴缺點加以擴大宣揚，並無中生有捏造事實，衝擊人民公社。

當時棄嬰很多，1960 年 1 月趙玉書責令下邊不准收拾，如果收拾，誰收誰養。他說：“凡是丟小孩的都是壞人，要追查處理”。由於這一命令，使不少被拋棄的嬰兒失去了生命。相反他家不見了一隻老母雞，他先後責令派出所長、公安局長查處，限期 3 天破案。群眾說：趙家一隻老母雞，比街上丟棄的小孩還重要。他家一年到頭精米白麵，魚肉不斷。縣委書記楊龍華，他在總鋪公社帶著文

工團整天吹打彈唱，花天酒地，打槍照相，藉以取樂。有次縣委開會，有部分委員當場吃醉，開會胡說八道，會議無法進行，不了了之。

1960年5月，正是草苗不接的時候，副縣長兼小溪河公社黨委書記繆堅，一次到山河大隊檢查工作，對食堂斷炊和群眾非正常死亡現象，充耳不聞，竟與梅樹岩在大趙小學吃肉吃酒。社員盛長英的弟弟看見後，端了他們一碗飯，繆竟把飯奪過來，指責支部書記說：“你們是怎麼教育社員的！”在山河大隊檢查工作，三天吃了5斤香油。繆到喬山檢查工作，事先就通知大隊殺豬。他外出檢查工作，經常帶酒帶肉帶廚師。公社開了一個小吃部，專供公社幾個幹部吃喝。小溪河公社黨委書記李清義，有一人為他逮黃鱔，有一口塘養的魚供他吃，代銷店的雞蛋、洋糖包供給他。下去檢查工作，總是大吃大喝。有一次他到李武大隊去，事先打電話去，慌得大隊立即召開小隊幹部會議，忙著買煙、打酒，佈置各小隊捉老母豬、抓雞、逮甲魚等，籌備迎接。公社副書記石玉平，一向單起小灶，59-60年，只在農民食堂吃過6頓飯，家裡還有不少鹹魚鹹肉。生活極為奢侈，派人到無錫買米，到南京買白麵，到廣州買水果，家中除有大批衣料外，僅成衣就有68件。社員反映，幹部下鄉碰在一起，一比手錶，二比手槍，三玩自行車，最後吃喝一頓，這就是他們的工作作風。公社黨委常委兼長塘大隊總支書記梅德興，夏天在外乘涼，要三個婦女給他扇扇。喬山大隊開小隊會議，宰殺1條耕牛，擺席8桌；為了吃肉，公社竟通知禹山大隊向公社獻1頭大肥豬和1頭母豬。

1960年春節時，福建空軍後勤部副部長潘康，回到家鄉小溪河公社新華大隊，看到人口大量死亡，他家裡也死掉多人；到公社又見以繆堅為首的公社幹部大吃大喝，極為不滿，與繆堅發生了爭吵。潘回部隊後，繆堅等發動大隊、小隊幹部連去三封檢舉信，說潘康“思想右傾”，“攻擊人民公社、大躍進”，使潘

康在部隊被鬥爭。當部隊第一次派人來鳳陽瞭解情況時，小溪河公社黨委還以欺騙手段，供給假材料，繼續掩蓋真象，使潘康又被第二次鬥爭。在潘再次要求領導到鳳陽調查時，雖弄清了真相，但縣裡還多方尋找死人原因。

1960 年春天，蚌埠市副市長馬騫聽到家鄉（小溪河公社新四大隊）人口大量外流和死亡，即從蚌埠市支援豆渣 1 萬斤，運到臨淮關，通知家鄉來運。結果遭到總支副書記楊雲春、副縣長繆堅的拒絕。而且繆堅還去信給地委檢舉了馬騫，說馬“思想右傾，有問題！”

山河大隊從大隊書記到小組幹部以及炊事員，幾乎人人都多吃、偷吃、吃好。因此，群眾反映說：“一天吃一兩飯餓不死小隊長，一天吃一錢，餓不死管理員”。大隊書記陳榮付，煮牛肉沒有柴草，就把社員任光衡的房子扒掉。大隊書記陳榮付，煮牛肉沒有柴草，就把社員任光衡的房子扒掉。大隊長梅樹岩帶著政府發給病人的餅乾下去檢查工作，吃不了到處亂丟。社員看見後說：“怪不得我們叫大隊長吃飯他不吃呢。”在群眾一天只吃幾兩糧的時候，他還不吃白米飯，而要炊事員搞油炒飯和烙油餅給他吃。副大隊長王立正說頭交面有灰，專門叫社員搞二交面給他吃，有一次面粗了點，他就指著送面的社員的頭說：“你搞這個面叫我怎麼吃！”大隊幹部到小隊檢查工作，從來不與社員同吃，居然派一個人背著米、面、酒、肉跟著他們跑，到哪裡吃到哪裡。據初步統計，光大隊的幾個幹部，有賬可查的就吃掉牛肉 1800 多斤，春天發給病人的白米、洋面，絕大部分被他們吃掉。據初步統計，山河大隊的幹部多吃糧食 7639 斤，油 141 斤，吃肉 1949 斤，至於雞、魚、蛋、煙、酒更是無法統計。鐘莊小隊長李保珠曾先後六次到社員家裡搜肉吃，社員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地蛆”。

小溪河北夏生產隊長李家付，群眾一天幾兩口糧，而他一天 5 餐，吃面 7 斤。

喬山大隊書記梅樹華、會計梅如山等，為了達到他們的獸欲，以辦“三八”農場為名，挑選了全大隊最漂亮的婦女 8 人，任他們隨意姦污的有 7 人，僅有 1 名因嫌醜未姦。喬山大隊長張永家，一天三頓喝酒，50 天喝掉燒酒 70 斤，並以每月 45 元工資專門雇一人捕魚給他吃。喬山大隊山西生產隊長黃學昌、副隊長陳開峰經常以開會名義，集中幹部賭錢。為了掩蓋群眾的耳目，便於他們偷吃，竟利用群眾怕鬼迷信（因死人多），每晚在莊前莊後學作鬼叫，嚇唬社員關門睡覺，然後大吃大喝。新田大隊總支書記楊春雲，想吃豬肉，槍斃肥豬兩頭。浙塘大隊總支書記孫玉平，有一次大吃大喝時，一個病人要口魚湯喝，非但不給，反打人一頓。保全生產隊統計員陳德明在春糧緊張時，一人一餐吃 1 斤多糧，社員管他叫“陳小刀子”。

1958 年門台鄉宏光第七生產隊，由於隊長呂懷璧貪污挪用 600 多元，還睡懶覺，影響社員積極性，去秋有 500 多畝花生未收上來，社員說：收上來也是被幹部貪污了，收它管什麼用！梨園大隊去年按收入每個勞動日可分 0.9 元，由於 53 個幹部貪污挪用 11000 元，只按一個勞動日 0.6 元分配。社員說：“冬天吃芋頭，夏天吃南瓜，省幾個錢給幹部花。”

1959 年縣委六級幹部會議到會的 4891 個幹部，經濟帳目不清的 4062 人，占到會幹部數的 87.14%。其中貪污 662 人，佔有問題幹部的 16.3%；挪用 962 人，占 23.8%；超支 1327 人，占 32.66%；占小便宜 377 人，占 9.28%；鋪張浪費 734 人，占 18.07%。共貪污 39 004 元，挪用 41 788 元，超支 101 345 元，占小便宜 2113 元，浪費 720 元，合計 191 511 元，人均 47 元以上。在一個農民的年收入只有十幾元、幾元的情況下，47 元不僅意味著只是剝奪了幾個人、十幾個人的勞動所得，更在於絕了那些已經一無所有的農民的活路。

趙玉書在公社黨委書記會議上講：“鳳陽本來不是好地方，過去也死過人，現在死兩個人，沒有什麼了不起”。1960年春天，人口大量外流、疾病、死亡的情況，（縣委）不向上彙報，發病最嚴重時期，全縣有病員10萬多人，只向地委報1千多人，下面缺糧斷炊，餓死人，他們還向上彙報“吃得飽，吃得好”、“一千兩稀”、“兩幹一稀”。

挨整的人中有醫生，罪過是診斷出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饑餓。1960年鳳陽縣書記趙玉書和董安春到武店公社考城大隊檢查浮腫病情況，問武店醫院院長王善良，為什麼浮腫病治不好，少什麼藥？王善良說：少一味糧食！結果，趙、董二人認為是“造謠生事”，決定將王院長交大會批鬥後，當場逮捕，扔進監獄。浮腫病同餓飯有關係，連病名在不少地方也不准提，被隱諱地稱作“二號病”。多年後毛還對醫生們耿耿于懷，說：“困難時期為什麼有那麼多高血壓，那麼多肝炎，還不就是你們醫生給找出來的！”

共產黨員蔣家惠1960年春受命到武店公社山王大隊調查災情，由於她如實地彙報了該大隊遭災歉收，社員生活困苦的情況，趙玉書認為是攻擊縣委，交機關幹部大會鬥爭七次，寫書面檢查九次，停職勞動達九個月。

鳳陽縣拖拉機站王站長說：1959年我在板橋公社浙塘大隊整社，彙報人死問題時不敢說是因缺糧，就說是衛生工作沒搞好。一個婦女吃死小孩，向季文祥副縣長彙報後，季派工作隊夜裡把這個婦女捆起來送到公安局，說她破壞社會主義，……從板橋回來看到一個墳堆有上六七具屍體。縣委第一書記趙玉書怕暴露人吃人的真相，一律當作“政治破壞案件”，指使公安局進行密捕，關死為算，以此斷口滅蹤。全縣密捕63人，關死33人。1960年考城大隊王家鳳說：“西泉發現人吃人了，張正九彙報給董安春，他不讓彙報，還叫查，說：吃人的人是壞

人”。大廟公社五一大隊陳章英和她的丈夫趙夕珍，將親生的 8 歲男孩小青勒死煮著吃了。武店公社中拌井大隊王蘭英不僅拾死人來家吃，還把人肉冒充豬肉賣掉二斤。

鳳陽縣小崗生產隊從 56 年高級社以來，這個隊一直在走下坡路，社員生活極其貧困，對集體失去了信心。小崗合作化前全村共有 34 戶，175 人，耕種 1100 畝土地。合作化以前，全村正常年景糧食總產都在十八、九萬斤左右，好的年成可達 20 多萬斤。那時全村根本沒有外流。1957 年反右派反到了小崗，在討論“優越性”時誰要是說個“不”字，不管你是貧農還是佃農都要被大批一通，甚至戴上“反社會主義分子”帽子。1958 年小崗發生過生產上的瞎指揮，搞什麼“十裡芋峰嶺，五裡菜花香，千畝水稻方”。結果是：“十裡芋峰嶺變成大草荒，五裡油菜地未收半‘土缸’，千畝水稻方沒收多少糧”。在這 3 年中純屬餓死的 60 人，有 76 人背井離鄉，尋找活路。當時全村是滿目殘垣斷壁，處處蒿草叢生。犁園鄉小崗生產隊嚴俊冒說：1960 年，我們村附近有個死人塘，浮埋著許多餓死的人。為什麼浮埋？餓得沒力氣呀，扔幾畝土了事。說起來，對不起祖先，也對不起冤魂。人餓極了，什麼事都幹得出來。我的一位親戚見有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小腿肚子吃，她也去了。開始有點怕，後來慣了，頂黑去頂黑回。我問她：“怎麼能……”她歎息道：“餓極了……”

1960 年大溪河鄭山生產隊社員常介翠的母親有病，常去找生產組長花光翠要點面給她母親吃。花卻說：“還給她飯吃呢！都快死了，還不如趁犁田的人中午回來把她埋掉算了！”常不同意。花說：“你不同意，就死在家裡，埋在家裡。”常無法，只好把沒斷氣的母親埋掉。常女士為什麼“無法”，因為組長花女士說“埋掉算了”；而不照她的話辦，母親死後就只能“埋在家裡”。一個區區的組

長，權力之大，由此可見一斑。當時死人太多，許多都無人掩埋，女兒出於孝心，說什麼也不能讓母親曝屍荒野，於是，“只好把沒斷氣的母親埋掉”。大災難之中，人命如草。中國人，你活著卑微、屈辱，死也卑微、屈辱。

1960年一些地區規定死人後“四不准”：一不准淺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種上莊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其目的在於封鎖負面資訊。

更惡劣的是黃灣公社張灣小隊規定死了人不准戴白布，叫人披紅！萬山大隊雷興生隊長馬林法規定：埋人要交稅。每埋一個人要交二斤酒，一隻老母雞。少年社員馬林英的爺親死後，到姐姐家借錢買酒，給馬林法喝了，才給埋。埋時又將死人的棉被和衣服剝光拿回家。

1960年燃燈大隊副隊長高金川見財起意，他看到一過路病人腳上有一雙新膠鞋和一包行李時，人還未死就讓他給活埋了。李武大隊長蘇和仁活埋社員徐開蘭，徐曾經當面批評過蘇貪污病院的油。60年，當徐發生嚴重浮腫病後，蘇不叫醫生進行治療，說：“癆病鬼，治不好。”以致徐病日趨嚴重。之後，蘇乘鄉里來人檢查病院的機會，企圖將尚未斷氣的徐開蘭活埋。當時小孩在場哭鬧，不好下手。就用餅乾將小孩哄走，把徐用稻草蓋上，抬到外邊活埋了。徐在被活埋前還慘叫：“給我稀飯吃！”

殷澗公社黨委書記張少柏化名石求明，1960年5月29日上書黨中央毛主席反映鳳陽的情況。此信作為反動信件轉回到鳳陽縣委，縣委責成公安局查辦。內容摘錄如下：

中央並主席：我打跑了個人得失念頭，確立以黨和人民得失為重，才決心反映鳳陽縣去冬今春人口大量死亡的情況……據我知道的3個公社的4個莊子的人口死亡情況是極為驚人的。一個死亡占5%，一個死亡占11%強，一個占15%，一

個占 20%多。……在死人最嚴重的時候，有的村子一天死 5~6 人。有的村子幾乎無人了，跑的跑，死的死。我親眼看到住在我們臨淮關上的招收起來的被大人丟棄的農村兒童約有三、四百人，也死了有 100 名左右。……石求明 1960 年端陽於臨淮

從 1959~1960 年，鳳陽 335698 名農村人口中，外流的有 11196 人，占農村總人口 335698 人的 3.3%；發病的 102994 人（主要是浮腫、子宮下垂和閉經），占農村人口的 37.7%。最嚴重的小溪河公社，原有 52233 人，發病的就有 26018 人，占 49.8%，門檯子電港口灌站有一個 60 名婦女的民工隊，閉經的就有 58 人。此外，全縣還有營養不良、身體瘦弱的 17482 人，他們大部分已失去勞動能力。

3 年死掉 10 萬人，占人口總數的 1/4。其中死人嚴重的武店公社，原有 53759 人，死去 14285 人，占 26.6%。小溪河公社死去 14072 人，占 26.9%。宋集公社原有 4743 人，死去 1139 人，占 24.2%。武店公社半井大隊原有 4100 人，死去 1627 人，占 39.7%；鳳淮大隊小唐家小隊 96 人，死掉 52 人，占 54.16%；大廟公社夏黃莊原有 70 人，死掉 48 人，占 68.6%。

全縣死絕 8404 戶，死、跑而空的村莊 27 個。小溪河公社曾有 21 個村莊因人死跑而空。武店公社鳳淮大隊李嘴莊 20 戶，死絕 4 戶。光明大隊原有 1638 人，倖存 806 人，死絕 83 戶，還有 20 個孤兒。縣實驗小學校長王煥業同志家中 12 口人全部死光，曹店公社和平大隊北山下小隊社員曹宜樂家 34 口人，死去 30 人。小溪河公社長塘大隊趙莊子張玉璞的父親，死後兩天還抱著未死的女兒。有的人家兩口子一夜同死在一張床上。由於人口大量死亡，出現很多獨苦的老人和孤兒。據初步統計，全縣有孤老 1580 人，孤兒 2289 人。

武店公社山王大隊代表李金明說：“逼死人的就是公社黨委書記董安春。

1959年我們收35000斤糧食，卻徵購58000斤，結果我們交33000斤，社員只吃2000斤。真的沒有糧食了，群眾吃麻葉子，什麼都吃光了，我向董安春彙報：我們沒有吃的了。他說我帶頭鬧糧，要開除我的黨籍。結果我們280人，死後還剩170人。我家5口人，死掉4個，就剩下我自己，你叫哪個不痛心！” 全心大隊代表說：“1959年秋，一點吃的也沒有，天天死人，他(董安春)到我們那檢查工作，還向幹部說：目前是大好形勢。我們隊原有2500多人，現在還有1300多人，死那麼多，我們向董安春彙報，他還講我們玩花樣。我們帶他去看死人，他說：人要不死，天底下還裝不下呢！” 考城大隊王家來控訴道：“我們大隊原有5千多口人，現在只有3200口人了。日本鬼子來了我們也沒死這麼多。那時我們還能跑，1960年我們哪兒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我是最後一個喂牛的，快要接上夏收才沒有死，12個喂牛的都死了。” 從1958年冬，各級黨委就成立了“農民外流勸阻站”，配備幹部和民兵，極力杜絕農民外流。據到鳳陽調查的人講，當地人至今還是“恨老共不恨老蔣”，人們說，30年代鬧饑荒，老蔣派飛機從天上往下扔大餅，實在沒吃的了，我們還可以逃荒。可是60年呢，本來風調雨順的，鬧的一點吃的也沒有了，不給吃的，連跑也不讓我們跑。有的跑的讓外逃勸阻站給圈了回來，就往大隊的院子裡一關，一直關到全部都餓死為止。

被毛主席表揚過的合作化帶頭人陳學夢在會上揭發說：“今年(1960)春天，生活困難，頓頓飯都不離草。王家湖有37戶人家，大人大部分都死光了，現在每戶只有一個無娘的孤兒。小孩子們看到我說：老主任，我們家大人都見不到你了，就剩下我一個人看看你，多痛心，多淒慘哪！北山底下宣東家莊34人，59冬60春死掉30人，還剩4口；曹澤祥死去六七天家裡沒有人埋，耳朵和臉都給

老鼠吃掉了。比 2000 多年前的奴隸社會還黑暗。

2·無為受毛毒

1957 年初秋，安徽省委從安慶地區調來一個姚奎甲擔任無為縣委第一書記。他一到，就催逼農民上交糧食。當時的農民們，都是伸手向幹部們要一點吃一點，整天處在饑餓線上，他們已感到問題的嚴峻，與其坐守待斃，不如死裡逃生。隨之大批農民紛紛外流。主要是到江西去。那邊的幹部和農民對外逃的“災”民，給予同情。給他們田種，給他們飯吃，有的還發給接收證明，讓其全家遷去。以姚奎甲為首的無為縣委，視此情況，一面向省委反映，要求省委干涉江西隨意接收安置無為縣移民；一面派人前去動員返回；一面要求各個車站、輪船碼頭，凡無正式證明，一律不給賣票，使外流的農民群眾，難以逃出縣境。1958 年中稻收割後，以姚奎甲個人說話算數的縣委，為了高徵購、爭榮譽，要求農民一邊收，一邊送，勒緊農民褲腰帶。大批農民不得不進行掙扎，再一次紛紛外流。1958 年 12 月 31 日，縣委再次發出電報向省委要求去函給江西省委要其動員我縣農民返鄉和拒絕接收，使得農民欲外出謀生比登天還難。

人民公社的假、大、空。1958 年 8 月初，處於人民公社化前夕，在姚奎甲旨意下，從上到下形式主義，浮誇風興起。此年旱情較重，由於基層幹部和廣大農民，奮力抗旱，取得了較好的收成。但是在糧食產量上，一開始就大肆浮誇，特別是在收中稻時，簡直浮誇到離奇的程度。柘城社 1 畝另 9 厘中稻，平均單產 30925 斤，馬圩鄉放出中稻衛星上天，畝產 20078 斤。1 萬斤以上的鄉 3 個，3000 斤鄉 3 個。各地中稻放衛星，實際上是在稻子將近成熟時，組織青年男女社員（大部分是團員）趁著夜晚，採用幾塊田甚至一、二十塊田移稞並到一起的。這樣做，不僅浪費了大量的人力，而且減了很多產量，特別是在政治影響上損失更大。直

到有人向省裡反映，這些中稻“衛星”之謎，才得以揭穿：一心社並稞是姚奎甲親自發動的，揭穿後，姚也只是寫些遮遮掩掩的檢討報告，搪塞了事。

9月間，人民公社化運動由上而下興起，其速度勢如破竹，此時大躍進高潮推向頂點。全縣原有435個農業社，一瞬間並為31個人民公社，平均規模是7257戶。

無為縣共產風的表現，除實行“供給制”外，就是刮平調風。所謂平調，實際上就是以集體名義，侵佔農民個人或家庭私有財產。平調的種類有土地、勞力、耕牛、農具、房屋、家俱、家禽、家畜、現金、糧食、柴草、木料、磚瓦、蘆席、毛竹、稻籬、車輛、魚、藕、棉被、棺材等無所不包。1958年期間，縣向公社調動的勞力所做的勞動日就有736萬個，連同各種器材物資總共價值746萬多元。縣直農工、財貿、文教、政法、黨群6個系統，59年4月以來，平調各公社的房屋就有641間，土地1702畝，農具19件，現金22萬元。大江公社59年提出要實現“七個萬”，即萬頭豬場、萬雞山、萬瓜棚、萬鴨棚、萬魚塘、萬鵝灘、萬畝豐產片。縣委委員、三宮殿魚苗場長賴風旭彙報場裡死豬情況，姚罵道：“豬死掉了，你怎麼不死”。其結果，雖未能完全實現，但下面的“共產風”愈刮愈烈，公社提幾個“萬”，大隊提幾個“千”，生產隊也提幾個“百”，層層要從下向上調，千方百計集中湊數，如此把下面搞得空如水洗。從58年秋到60年春，大集中、大平調、大搬、大拆和大兵團作戰之風，一刮再刮。秋後，全縣實行家禽、家畜大集中，普遍出現大殺、大吃、大賣等現象，搞到最後，幾乎絕跡。58、59兩年的村莊規劃和59年冬、60年春的拆屋積肥，大量損壞了社員的房屋。據統計，僅58年和59年上半年，全縣毀去村莊有1391個，折房屋65000多間。占原有房屋30%以上。”整個農村被搞得滿目荒涼，面貌全非。

三年的共產風，給無為縣人民帶來了前所未見的災難。

首先是大量的餓死人。其次，耕牛農具大大減少。57 年全縣耕牛共有 38597 頭，到 60 年只有 28100 頭，減少 10497 頭；大型傢俱原有 294805 件，到 1960 年只有 118561 件，減少 176244 件，其中減少程度最嚴重的是無城區，達 80%。最後是土地荒蕪，糧食減產。從 58 年到 60 年，糧食產量年年下降。糧食總產量 57 年為 6.7 億斤，58 年為 6.2 億斤，59 年為 4.4 億斤，60 年為 4 億斤，與 57 年比，減少 36.5%。

1959 年 2 月 14 日，姚奎甲親自主持的大江公社反瞞產會議，追逼十分激烈。一開始就當場將一個大隊書記趙憲成撤職；官鎮大隊駱以壽被鬥被打；東河大隊牌坊生產隊一姓魏的小隊長，被指名交待時當場就嚇哭起來了，姚還叫縣委組織部副部長朱治華組織人專門鬥爭了兩天。姚對精華大隊會計趙同慶說：“你不交待瞞產帳，就法辦你，審你罪，看你狠還是我狠。”東河大隊生產隊長汪為山，被鬥時，受到打、拖、凍、把衣服扒掉用冷水澆。趙渡大隊副書記劉長山當時被排為懷疑對象，說他瞞產 3000 斤稻子，公社書記張世功找其談話，並在懷疑對象會上點名，要劉考慮交待，在劉思想極度緊張的情況下，姚奎甲又親自和張世功找劉談話，姚一見面就說：“你就叫劉長山嗎？看你思想有多頑固，是銅打的還是鐵包的”，並說“混蛋，你還蒙蔽我嗎？你的事你不講，我比你知道得還清楚些。”這次談話到深夜，劉回組後，思想更加緊張，夜裡唉聲歎氣，於 19 日晨回跑家就自縊而死。劉長山死後，姚奎甲還佈置大隊寫報告說劉長山貪污公款，瞞產私分（均非屬實），與反革命的老婆結婚，結果宣佈劉長山叛黨畏罪自殺。

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分管農業，1959 年 6 月下旬回老家無為縣視察工作並探望重病在身的老母親。原來，他母親是因嚴重營養不良，而引發腹部腫脹積水，

命在旦夕。其母想吃魚，可當地的魚塘無魚，張準備派人到巢湖弄魚，其母就咽了氣……張愷帆忍著悲痛，草草辦理了母親的喪事，繼續視察。面臨著大量死亡，7月9日張愷帆命令無為縣暫停公共食堂，宣佈“三還原”：吃飯還原，住房還原，小塊土地還原；糧食發到農民手中。當晚就要縣委書記予以貫徹。到7月15日，全縣6000多個食堂就“一風吹散”了，並對少數“雷打不散”的也下令統統解散。無為縣解散公共食堂這股風，也很快傳到了鄰近的縣、鄰近的地區。

無為縣委書記姚奎甲整張的“罪過”越級上告，毛定張“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安徽省委於1959年9月19日做出了“關於張凱帆、陸學斌反黨聯盟的決議”，指責的罪過有：房屋還原，自留地還原，伙食還原(解散食堂)，市場開放、魚塘開放(可以讓農民搞搞魚蝦)等。張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開除黨籍，撤銷副省長職務。12月12日，安徽省公安廳向省人民檢察院提請“依法批准逮捕張愷帆”，檢察院馬上同意。張愷帆被囚禁207天，什麼問題也查不出來，經批鬥後送淮北某礦勞動。其妻史邁及親友受到了株連，有6人慘死，全家被趕出省府大院(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毛在“七千人大會”上做了自我批評；7月20日經中央監委批准，安徽省委宣佈：撤銷《關於張愷帆、陸學斌反黨聯盟的決議》，恢復他們的黨籍、名譽、職務、級別，補發了工資)。

無為縣對張愷帆接觸過的人進行殘酷鬥爭。有的被罰跪，有的被扒衣，進行秘密搜查、強迫勞動，並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嚴重右傾”，送到大蜀山畜牧場勞動改造。

一次，石潤公社黨委書記譚布真，匿名向中央寫信反映情況，姚奎甲在省裡得知消息後，立即打電話要求全縣大隊以上幹部每人親筆寫一份學習八屆八中全

會文件心得，送到縣委，核對筆跡。在查對不著情況下姚逼迫縣委辦公室主任譚榮植、原副縣長劉希文及汪卓等同志承認，最後譚怕連累別人，主動承認是他和一名大隊幹部寫的。結果譚被鬥爭，定為右傾分子，受到留黨察看兩年、行政降兩級處分，並送農場勞動。原縣委組織部副部長錢漢軒病退後化名向毛主席寫信，反映無為農村情況。姚收到這信後，即交縣委辦公室轉赫店公社進行偵破（因從赫店郵局發的），並叫公安局拍成照片在赫店公社查對。錢承認是他寫的。當時錢正發燒，天在下雨，姚得知消息後命令將錢送到縣裡。姚一見錢就破口大罵。隨後把錢關了一個多月，組織兩次鬥爭。田橋公社書記季永山、廟後大隊書記楊克才等 3 人寫信給毛主席，並上北京反映姚奎甲及無為問題。姚得知後，即派人去北京將人領回，經鬥爭後下放勞動。楊克才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勞教；季永山等受到留黨察看兩年、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23 級降為 25 級的處分。在他們勞動期間，楊克才因去蕪湖探望愛人，季永山請假去馬鞍山看病，姚說他們不老實，還想告狀，即將他們逮捕起來，關押一年零 8 個月。

嚴橋南嶽小學副校長陳英于 1959 年 7 月至 10 月 3 次向姚奎甲寫信，反映基層幹部作風和群眾生活的問題。陳英被多次批鬥，姚將陳英劃為右派分子、撤職降級、監督勞動。

在張愷帆被批判後，姚奎甲變本加厲推行高徵購、公共食堂等措施。從 1960 年 3 月 12 日中共無為縣委、無為縣人民委員會發出的“關於業橋區福民鄉古樓社在反瞞產私分中逼死社員汪其培的報告”中，可以看到其狀之慘。汪其培，男 32 歲，貧農，抗日期間曾任民兵爆破班長，工作積極肯幹。59 年 10 月 11 日上午，社主任張代科、副主任顧其平等人前往汪其平生產組（全組是汪父子 6 戶）挨戶搜糧，未有效果。當晚又召開社員和瞞產私分懷疑對象會議，會上捆打、審

訊了社員朱德喜、汪發好、汪其堂 3 人，並責令朱德喜、汪發好次日回報瞞產私分情況，汪其堂當即由鄉長朱霞帶回鄉人大委會關押、令其坦白交待。次日晚鄉長朱霞和社主任張代科又召集開會，汪其培兩腮被打得烏腫，直至被迫偽認瞞產私分糧食約 180 斤，才被放其回家，並將汪發好帶至大隊關押。16 日社主任張代科派汪瑞成、汪發勝兩人前去汪其培家催糧，說：“不交糧就到大隊去。”兩人連催數次。汪因未瞞產私分，交不出糧食，找人交了假坦白書後，次日在家痛哭流涕，企圖尋死，又加催逼交糧，使其感到無路可走，於當天晚飯後上吊自殺。……從上述情況看，汪其培之死，主要是鄉、社幹部在反‘瞞產私分’中盲目亂追及捆、綁、吊、打所造成的。”

1959 年 12 月中旬，姚帶領縣委辦公室副主任汪賢爰等人，在六洲公社新華大隊搞反瞞產重點時，親自和通訊員張修白吊打了生產隊長李必松，並指使民兵和通訊員捆綁生產隊長胡必喜、陳能富和會計李必華三人，並在李村搞假搬家，住了三天也未搞出糧食。他回縣時，指定汪賢爰留著繼續搞。並說這個隊瞞產有 10 多萬斤，我回縣再抽一些幹部來，搞不出糧食不收兵，你們骨頭要硬，頭腦要清。並舉例說“新華大隊有的幹部，搞出瞞產私分的糧食，看到婦女投河就嚇得自己下水，把她拉上來，其實死是假像，威脅是真的，如果她真要死，我就站在岸上，看著她死一百，還不由她自己負責。”結果汪賢爰等人就繼續採用殘酷手段，先後又捆吊打 12 人，其中生產隊長李必文（預備黨員）、李成柱被吊打關押致死。

1959 年 12 月間，陡溝公社開了 18 天反瞞產會議，是在姚奎甲直接指導下由周洪芳、周勃（公社書記）、周志堅（副縣長）三人具體掌握召開的。會上嚴重違法亂紀，採取各種鬥、打、罰跪、罰站、罰凍等辦法，威脅假報了一些糧食。

一天姚在縣裡打電話給周洪芳，問搞出多少糧食，周彙報未搞出現糧，姚即罵他“混蛋”，“有張愷帆思想”。並要周志堅接電話，指示“要繼續鬥爭，迅速搞出現糧”。因此，原來本打算開 7 天的會議，延長為 18 天。特別是後期，違法亂紀更嚴重，鬥爭中出現推、打、跪、捆、扒衣服、潑冷水等許多酷刑，有的被打致傷死亡。如原保聖大隊小關生產隊長吳少廣，被扒掉棉衣罰凍、推打、結果嘴巴被打腫發炎流膿。田東大隊許良友在會上前後被鬥爭 6 天，扒去棉衣，推打、罰凍，結果致病，回家臥床不起，僅 12 天時間即死。官圩大隊朱文元和田西大隊孫良之，被當會宣佈開除黨籍逮捕法辦。會上被重點鬥爭的黨員就有 54 人，嚇跑 30 多人，結果也未搞出糧食。姚於 60 年 1 月 20 日親往陡溝召開公社、大隊書記和脫產幹部會議，在會上說：“陡溝開 10 餘天會議，支部書記仍有外流，這種人要找回來，開除黨籍，他們不是黨員，是黨內敗類”，並說：“陡溝存在問題根子是三不純，要整頓組織，整頓幹部，才能把糧食搞出來。”

原縣委書記處書記安賢佩同志在姚奎甲調離無為後，一次在常委會上說：

“1959 年初，姚奎甲到省裡開會，打電話回來，還要我們抓糧食。我們到下面一看，連種子也沒有了，只靠打鬧秸稻，打一點，吃一點，下去的同志回來，一碰頭都說下面沒有糧食了。第三天姚從合肥回來，把所有參加省裡開會的公社書記都帶回來了。呂奮志同志（也是縣委書記處書記）向姚彙報下面的實際情況，說今年的實際產量只有 9 億斤（實際上還是虛的，根據後來核實只有 6.2 億斤）結果姚來了一個反擊，推翻了我們在家縣委研究的意見，批評我們沒有靈魂，看不到問題的實質，說我們只要肚子，不要國家。接著就要各公社書記回去搞反瞞產私分，造假像，上面放稻子，下面放粗糠，挑著入庫，前門進，後出門，迴圈不已讓人看，開反瞞產私分假現場會，以致以後發生大量死人狀況。

1959年10月，尚禮公社已發生餓死人情況。姚在公社書記會上對該社書記劉誼寬說：“你回去，如三天完不成24萬斤徵購任務，下次來開會就提頭相見。”第二天晚上姚召開電話會，劉因吐血病倒，由副書記任士好接電話，姚命令劉馬上到縣裡來，劉還不敢說自己吐血，連晚跑到縣裡，結果被逼得將30萬斤種子送掉。59年10月，姚溝公社完成400萬斤徵購任務後，姚還要該社再完成80萬斤。公社書記王代好說難完成，姚說：“你是老右傾、老保守、不能幹書記拉下來”，逼得王將全部口糧、種子抵交了80萬斤任務。後來，王反映有的地方出現餓死人，姚說：“不是你打死的，不是你逼死的，他死怪哪個？哪裡不死人？”王因堅持要糧食安排生活，姚責令王在縣裡反省。

姚奎甲對下搶奪農民的口糧，對上彙報還謊說對農民的口糧已作了“很好的安排”，結果全縣大量人口死於饑餓。1958年9月，毛澤東視察安徽的時曾經對無為縣最早實行供給制大加誇獎，可就在一年以後，無為縣竟餓死了20多萬人。據無為縣公安局統計，1959年全縣餓死82278人；1960年餓死126524人，人口死亡率高達15.8%，幾乎每6個人死1人。據《無為縣誌》記載：1957年年底統計，全縣人口為982979人，1960年底為662557人，減少人口320422人。1961年餓死的人數還未統計在內。其中有一部分外流，還有一部分虛報人口數。因多報現有人口多算口糧、多領布票。據此推算，“大躍進”的三年“共產風”時期，即使扣除正常死亡人數，全縣餓死人應在30萬人以上。除了幹部家庭的婦女外，絕大多數婦女都不再生育，在這3年中群眾家裡出生人口寥寥無幾。

無為大量餓死人的問題暴露後，姚奎甲即調往徽州地區，去後不久，省委即通知他到無為作檢查，他在1961年1月14日無為縣委召開的常委會議上檢查說：“過去我們脫離實際的估產，把原已低標準的口糧，又挖作種子。如58年我們

先報 14 億（筆者注：實際上原先報 19 億，後 13 億，最後 10 億，但實際產量是 6.2 億斤，由於我浮誇，58 年、59 年兩年都報糧食超綱要。58 年得中央的超綱要獎狀，59 年得地委的超綱要紅旗。在徵購上只抓購，不抓留，邊收邊送，任務一加再加，既賣了口糧，又賣了種子，前面賣糧，後面無吃。特別是 59 年冬部分食堂停夥斷炊幾十天，沒有糧食吃，而我不顧實際情況，仍佈置打鬧秸稻和搞社會餘糧。在糧食入庫時，嚴重弄虛作假，每天要入庫數量，少報不行，多報歡迎，不能兌現，就批評指責。如劉渡公社先報一天完成 20 萬斤，批評後，逐漸增加到每天 70 萬斤。我們在下面設糧食臨時庫，實際上也是弄虛作假……”。

淳良的農民雞犬不如。59 年 12 月，紅廟公社反瞞產會議，是姚奎甲親自佈置的。這次會上發生的站雪地、抓爛泥、架板凳、架土基、洗冷水 10 余種刑逼辦法，鬥爭了 30 多人，開除黨籍 2 人，逮捕 1 人，黨紀處分 11 人。會議開了 13 天，群眾生活無人過問，造成大批人口死亡。新河公社，公路大隊二隊婦女熊德蘭，因饑餓難忍，偷了一點蠶豆，被指導員甯德明發覺，當場狠打一頓，晚上開辨論會，隨後把她調到另一生產組‘小勞改’，因羞憤自殺而死。湯溝公社姜橋生產隊農民龔維經，因患浮腫病未愈，生產隊長江廣波叫他參加勞動，他因體軟無力未去，因而一天未給飯吃。第二天被迫下田，死于田邊。雍成大隊江橋村光耀因小隊長吳永松和他說，誰不幹事就不給誰吃，他自己感到年老無力而上吊自殺。姚溝公社一共產黨員李德正，捆打 14 人。60 年 5 月在 7 隊把女社員葉玉英用針線縫嘴；把社員汪世清、葉世謀捆打後放在外面曬。紅旗公社花疇生產隊支部書記張朝正，因社員莫大喜有病，將田溝撤得粗糙一些，被他一頓毒打，回家上吊而死；春間栽早稻秧時，天氣很冷，浮腫病人張本勝、張成年不能下田，他硬行要他們下田栽秧，其中張本勝因浮腫病格外嚴重，上午拔秧，下午即死。

全組 47 戶，除其自家外，餘者 46 戶均被扣過伙食，並攪碎社員飯鉢子 10 餘個，小飯桶 1 個，杯子 1 個，臉盆兩個。羊山公社阮井生產隊任俊壽，捆打社員 19 人，其中被打後外逃無蹤的 15 人，死 1 人。社員周可法有病，於 64 年 4 月，有一天牽牛跌水裡去了，任硬說周是裝相，故意把衣跌濕，不想做事，周不服回了嘴，任即打他兩個耳光，並扣其早餐不給吃，周氣得當日中午上吊而死。

陡溝公社官圩大隊長蔣瑜，60 年先後共捆打社員 4 人，因打致病死亡共 2 人，傷 1 人。59 年 10 月，有一次蔣召開會議，徐村因天雨有 7 名社員遲到，蔣即拿棍子攔在路上，給每一個人打一棍子。到了會場有 5 人被罰跪，社員許以民，為其老婆罰跪不服，說一句‘你就是搞我們的貧下中農’，蔣即抓住許以民，施用‘人搭橋’（即把人腳放在一個桌上，手扒在另一桌上，人身懸空，後將桌子向兩頭拉開，使人跌下）的嚴刑，把許當時跌傷，未過幾天即死去。石澗公社陳聞大隊第六生產隊長汪命生，從 58 年 3 月到 60 年 3 月共捆打吊過社員 146 人次，其中被打致傷 9 人，致死 4 人。

據《無為縣三反整風運動開展情況》內載：“全縣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的 1154 人。石漳公社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 884 人，其中嚴重的 59 人，該社 58 年以來，社員被捆打吊跪的達 4158 人，被扣伙食的 2760 人，其中被吊打致傷的 86 人。”

縣委 60 年 11 月 27 日在《貫徹中央 12 條緊急指示信的情況》中內稱：“少數幹部任意體罰群眾，捆綁吊打，克扣伙食，罰跪罰凍，罰曬太陽，有的私設‘監牢’、‘小勞改隊’，甚至有個別的採取惡劣手法，用石頭砸手指，鋼針扎手、剪刀剪耳朵、火棍燙鼻樑、針線縫嘴巴等令人髮指的強暴行為。赫店公社蘇塘大隊汪壇生產隊支部書記丁家法，打罵群眾、克扣伙食無所不為。今年 3 月小飼養

員丁玉全因偷吃蠶豆，被他捉住，丁竟用剪刀在小玉全耳朵上剪掉一塊肉，當場血淋不止，第二天頭部腫大，半月後死去。

新河公社馬城大隊石碑生產隊隊長傅昌桂，今年上半年不到 100 天內，打了 35 人，達 153 人次。女社員倪華的小孩偷了約 5 斤稻，傅將倪華拖來吊打，用燒紅的大底針在她的鼻樑上烙了個‘十’字火印，並責令婦女組長將該女社員頭髮剪光，以示偷竊。社員陳明文因病不能參加生產，遭他一頓毒打，因傷重而死。

無為縣委 1960 年 11 月 26 日批轉的《大江公社貫徹中央 72 條指示的情況簡報》上載有：“官鎮大隊支書郭登甫，小組長張義文，群眾稱他倆是‘活閻王’。去年，57 歲的陳長和，因患浮腫病，不能生產，被扣夥一天多，陳餓得沒法，便向張義文磕頭要吃，張反而諷刺他說：“你臉上還有肉，不吃沒關係”，說後揚長而去。陳連氣帶餓，當場昏倒，醒來爬到食堂裡就死了。春上觀音大隊下一道命令，偷一次蠶豆罰款 1 元，偷二次罰 2 元，偷三次者全家‘清剿’，結果一次就清剿十五戶，清剿出社員家的 13 丈棉布，2 條麻袋，9 塊銀元，9 吊銅鈔，106 斤食鹽，15 元現金，12 丈布票，剿出後全部沒收。”壞幹部無惡不作。“58 年上半年，紅旗公社一心大隊書記張定根，對坐落在該大隊的澄霞庵尼姑先進行威逼後進行人身搜查，還逼其搬家，致使該庵尼姑丁昌榮等三人因羞憤和畏懼而集體跳塘自殺而死。”

在饑餓的逼迫下，人們已沒有了羞恥感。每到收穫季節，晚上田野裡到處都是偷食的人群，大都如驚弓之鳥。如果是群眾碰見群眾，一般不會互相檢舉，因為都是出來偷食的；一旦碰上幹部，不等對方看清自己就得拼命逃脫，否則落入幹部之手，就難逃懲處。有許多人因此遭捆綁拖入食堂吊打，還有許多婦女因偷食被幹部揪著髮辮倒著拖、沿村饒圈，或將婦女的頭髮剃成陰陽頭，許多婦女不

堪其辱，精神失常，甚至自殺身亡。

據蘇老村蘇秀芳回憶說：當時蘇老村至昆山街沿途 3、4 裡路，每天都見無人收埋的屍體十幾具，要麼是其家人已全部餓死，要麼是家人因饑餓無力挖坑掩埋親人的屍體。因此，各大隊不斷組織人民公社社員專門掩埋屍體，因屍體太多，埋屍的社員也饑餓而空乏無力，只將屍體草草掩埋。荒野常見不知是餓狗還是饑狼刨土扯拉啃咬屍骨的慘境，人見了也無力去驅趕。據她說，昆山鄉蘇老村原有 570 人，到後來因餓死加上外流，全村只剩下 2 百多人，好幾戶人家死絕。蘇秀芳的家族（共一個曾祖父的所有家族）共 72 人，其中餓死和被折磨死 53 人。她母親死後，她的弟弟時年 2 歲，依偎母屍旁，嗷嗷待哺；為了多領得一勺稀飯（當時他們村按人口到食堂領取口糧），被迫用棉被裹住她母親的屍體，與家人同臥一床，不讓別人知道她的母親已死；以死人冒充活人，多領取一勺粥水，從而使姐弟倆得以苟延殘喘，度過危機；後因屍體腐爛臭不可聞，才埋掉她母親的屍體。當時為了多領取一份糧食，幾乎每村都有蘇秀芳家這種情況。據程長水回憶，他居住的村子原有人口 327 人，吃食堂期間，餓死加上外流，全村後來只剩下 70 人，好幾戶人家絕戶。

基層幹部常把外流人員和因饑餓而死絕的家庭之住房拆毀，以取得木料和茅草作食堂燃料。所以當時各村都見殘垣斷壁，房前屋後，雜草叢生，低矮的茅屋和殘垣斷壁掩映在茂密高深的草叢中，常有野兔出沒其中，一片荒涼蕭條景象。

現任潤李小學校長的謝益文說，當時他父親是生產隊長，且在食堂工作，每次從食堂回家帶些米飯之類的糧食，放在家中櫃子裡鎖起來，等自己餓時再吃；而對滴米未進、一直嚷著叫餓的兩個兒子置之不理，結果他弟弟被活活餓死，自己後來被叔父救濟才活了下來。

據夏可文說，無為縣城有一貨郎小商人，穿街走巷做一些小生意(當時叫“投機倒把”)，經常將賺的錢換一些食物藏在貨郎擔子裡自己食用，從不給他的妻子和兒子吃；每當他的妻子和兒子向他求食時即遭他的毒打，並揚言要殺掉他們母子倆；妻子餓得快要死的時候，趁丈夫熟睡之際，與兒子一起用繩子勒死他，以奪取食物。後來無為縣公安局破了該案，周邊群眾紛紛要求減輕對這母子倆的處罰。

據蘇秀芳說，她的堂妹餓死後，她的二伯以收埋屍體為藉口，將屍體帶到蘇老村村後山岡上，割下屍肉煮燒食用，而將屍骨草草掩埋，蘇老村許多村民都看到這一幕。

據昆山鄉新華村村民反映，當時該村有一老婦，一日鄰居偶進其屋，見老婦人正在吃肉，忙問其來源，老婦良久不語，後在幹部的追問之下被迫說出實情，其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屍。“虎毒尚不食子”。“大躍進”竟逼得母親醢其親生子屍以食，由饑餓導致的人倫之變異，真是駭人聽聞。當時即將餓死的人爭吃無主屍肉也時有發生。據老人們講，有些饑餓的鄉民經常到處打聽誰家最近死了人，何處有新墳？一旦聽說某處有剛死的人或附近有新墳，人們便結夥蜂擁至新墳地，掘屍而食，野外常見被剔除了皮肉的屍骨。

時任無為縣看守所所長的胡大海對夏可文說，“看守所裡的犯人，有女人殺丈夫的，有兒子殺老子的，有母親殺兒子的，各種喪失倫理的事情都有，但大都是因為饑餓的原因”，“無為西鄉有一大隊書記，以捆綁毒打社員而出名，深得群眾怨恨。該村有兩名社員因饑餓加仇恨，將這個書記七、八歲的胖乎乎的兒子殺吃了，後無為縣公安局破獲了此案”。

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的夫人水靜曾向曾希聖反映，她的家鄉安徽無為縣

餓死人的問題，但他聽不進去。這是百姓的悲劇，也是曾希聖（隨後下臺）的悲劇。

安徽省監委檢查組 1963 年 10 月 11 日《關於姚奎甲在無為縣所犯的錯誤檢查報告》：“姚奎甲在無為期間，大量的貪污受禮，到處狂吃狂喝，生活極為墮落。僅據縣直機關、廠礦、企業、事業 14 個單位和 19 個公社統計，接受送物的就有大米 225 斤、富強粉 120 斤、掛麵 220 斤、玉米粉 80 斤、葛藕粉 16 斤、上等糕點 302 斤、魚蝦 527 斤、豬 8 頭、蛋 830 個、雞鵝鴨 15 只、肉 46 斤、香煙 45 包、酒 123 斤、茶葉 17 斤、紅糖 5 斤、木炭燒柴 2510 斤、雨衣皮鞋皮帽 8 件、瓜果菱藕 1000 多斤。此外，他還有以低價付款的 9 頭豬、120 斤魚、一隻手錶變賣後從中得利 308 元。另有免票供應糧 893 斤、食油 11 斤。還有他自己拒不承認的豬 1 頭、糕點 210 斤、香煙 5 條（原報告說進一步待查核實，實際上是沒有可能哪一位栽他的贓。——筆者注）。他要東西的方式是多樣的：①到處要東西；②暗示要人送東西；③下鄉回來帶東西。糧食局的糕點廠和綜合廠的糕點廠的糕點，冷凍廠的冷飲，專賣公司的煙酒隨要隨送；姚說想吃玉米粉，兩次要六洲公社送 60 斤，實際上是喂給豬吃；帶女兒到南門糕點廠吃糕點，誇獎該廠生產的粉絲很好即給送去 5 斤粉絲；到大堤向副指揮長谷先木說你這裡的蘆柴多，回去叫我老婆和保姆來拾回去燒鍋，穀即送去蘆柴 1500 斤；向赫店公社書記丁學甫說自己有胃病，想吃麵條，丁即送去掛麵 50 斤；到湖壟公社在吃酒桌上說他們的鴨蛋很好，便帶回 200 個；高溝公社說駱家套的藕好，公社當即派人踩了半天，搞了 70 斤花香藕帶回來；叫商業局替買魚，先送一條，因帶發票要錢，即未要，第二天送兩條未帶發票，說明不要錢，即收下了；老婆添孩子要一心大隊送糯米 55 斤。三年中他家共捉豬 17 頭，有 8 頭未付錢，另 9 頭也是大大

低於牌價付了錢。如向雍南公社書記要一頭 60 多斤重的豬，還說小了；大江公社送一頭 103 斤重的豬，只付給 24 元；縣政法農場以五角多錢一斤買進的豬，姚買了 5 頭，只給 0.26 元一斤。而他賣出的豬則硬要高價。他兩年賣給商業局 5 頭豬，利用職權，硬要提高出肉率，提高價格。該局原要求按收購規定，姚即說‘商業局有壞分子、有階級異己分子’，逼得商業局只好破例收購。60 年 9 月姚賣一頭毛重 209 斤重的豬，按規定 68 出肉率，而他硬要 73 折，又提出‘裡折外不折’，豬油加倍算肉，結果折成淨肉 212 斤，多折肉 64 斤。他家養豬要一心大隊無償派一人幫助飼養；王福大隊專派兩人幫搞青飼料。”

姚貪圖生活享受。他要吃、要帶、要送的特點，在無為是出名的。幹部們都知道“姚政委要給他好的吃”。他平時所到之處，都要大吃大喝。僅開城、襄安的 5 個公社和糧食局綜合廠統計，為招待他吃喝用去公款即達 2007.30 元。尤其惡劣的是，在人口非正常死亡最嚴重的時刻，姚仍是狂吃狂喝。59 年 12 月和 60 年元月，姚帶幾名幹部先後去 6 個公社分片召開 18 個公社幹部會議，每到一處都要好酒好菜招待。襄安公社特意請了廚師搞菜；牛埠公社專門殺了一頭豬；他在陡溝公社大吃大喝時，一面說：“死幾個人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一面說：“在公社裡吃一點沒關係，來，我們幹一杯”。60 年 2 月姚帶 7 名幹部先到赫店公社大吃大喝，又通知開城公社準備。開城公社得知消息後，沿途遍插紅旗，全社停止工作，專門迎接招待，大吃了兩整天，早餐 8 樣糕點，10 種油炸‘小菜’，中晚餐都是 12 個葷菜。姚吃得肚子發脹，還請醫師給他推摩。姚在縣直機關，也是帶頭搞大吃大喝。59 年 11 月，一次在縣糧食局大吃大喝時，還專門拍照留念；60 年 2 月縣黨代會閉幕時，專門辦了幾桌酒席，招待新任的縣委和公社書記。姚不但自己喜歡吃喝，還經常帶著兒女到處吃，還借小孩名義要東西。60

年春，正是餓死人的時候，他家喂豬，除用細糠、碎米外，還拌有吃剩的標一米飯。原五金廠廠長、北上南下的老轉業軍人田宗輝，曾把他家的‘豬食’，偷著包了一個包，保存至今。”姚奎甲住的也很講究。他的住房原是一大地主家十分闊綽的宅院，他還嫌不夠美觀。60年又重新修飾門窗，房檐、廊柱，漆上金碧朱顏，畫得花花綠綠，新砌花台、水池（供豬鴨洗澡和喝水用），豬屋是磚牆瓦頂，雞鴨房也鋪上了地板。

姚奎甲對無為人民慘遭的三年災難來說，確是一名罪魁禍首。他不許向上要糧食安排群眾生活，不許彙報死人情況。地委書記同意撥糧，他還不同意，說“要頂住歪風”。

三年中，姚有意搞浮誇、高估產、高徵購，58、59、60年三年都大量的賣過頭糧，將口糧、種子都要送。59年春到60年春，有的地方人均供應只有半斤；有的地方只吃二兩、三兩；有的地方斷炊。以致外流、浮腫病、餓死人的現象普遍發生，但他還要搞反瞞產私分。59年12月18日姚到紅廟公社召開黨委會，批判該公社為什麼只報單產360斤，說紅廟公社黨委會有特務，有瞞產私分行為。立即將黨委書記吳定誠撤掉。指出當前工作要以反瞞產私分為中心。隨於12月10日召開全公社小隊長以上的13天會議，用嚴刑威逼報糧。在會議期間及會後，全公社即死7600多人（全公社59年至60年共死12268人）。閘北大隊原有4944人，死去2260人，占該大隊總人口的49%。該大隊的西林、大季兩個生產隊，在13天的會議期間就死去395人，占兩個隊人口的46%；新屋基生產隊原有112人，死去78人，占66%，全家死光的7戶，共33人。正崗大隊王村原有590人，即死去310多人，占52.5%；徐崗大隊原有3625多人，死去2023人，占55.8%。”

59年12月31日，姚奎甲到關河公社。當時該公社有6個大隊斷炊，其中

雙泉大隊已有一個多月未有供應，每天死六七人；石崗大隊一天即死 16 個人，公社拿出 4000 斤糧食安排生活，姚知道此一情況，拍桌大發公社書記徐明理的脾氣說：“你如果不把 4000 斤糧食收回來，就是瞞產私分的頭子”。一次原副縣長周志堅把檢查新河公社銅城大隊當時發生的浮腫病 1477 人，死亡 429 人的情況向姚寫了個報告，姚在電話上問周：“你寫這個報告是什麼意思？就是死幾個人，口糧標準也不是我規定的”。大江公社畜牧場支書任靜軒，一次在途中見到三個死人，即向公社和縣委彙報。第二天姚把任靜軒叫到縣委小樓上罵道：“你這個混蛋，死幾個人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姚親眼看到死人，也是視而不見。一次他坐小車到襄安公社，在陡崗上親眼看到兩個死人，也置之不理，車子就開過去了；一次到該公社金雞大隊，見一個人死在路上，他問都不問坐車走了；一次到開城六峰大隊見一個 30 多歲的婦女倒在路上，姚說：‘死就算了，哪裡不死人’？”

一次縣委農工部副部長吳思玉，檢查關河公社花橋大隊，當時查明這個隊死幾十人，浮腫病 100 多，口糧已一個多月未供應的情況，向周志堅副縣長彙報，姚得知後，罵吳思玉“沒有政治靈魂”。一次赫店公社向縣委回報非正常死亡 2500 多人。姚打電話問該公社書記丁學甫說：“你們沒有政治頭腦，我的看法，死人都是老弱，他們本來就是要死的。還有些地主富農看到轟轟烈烈的大躍進氣死了。你們今後彙報要慎重，不准亂彙報。”

3. 全省其他地區的慘況

毛澤東號召深翻土地。1958 年霍邱縣紅星人民公社要求所有秋種作物全部深挖 1.5 尺，其中 30% 的面積深挖 3 尺到 5 尺以上，全部實行條播密植。深翻土地，浪費了大量的土地不說，許多地方還由於翻得過深，把下面的生土層翻到了

上面，破壞了土壤結構，造成減產。

霍邱縣餓死了 17 萬。人口大規模非正常死亡發生在 1959 年冬、1960 年春。很多家庭都有死人，有的竟死得絕了戶。石店公社一個生產隊 300 多人，餓死得只剩下 90 來人。為了從食堂多分得一份食物，新橋大隊一個社員把死去的孩子藏在屋裡，餓瘋了的老鼠把孩子的耳朵、鼻子都咬掉了。人性、親情受到嚴峻的考驗，夫妻不相顧，母子不相憐，兄弟之間為一瓢糠菜大打出手……這樣的事屢見不鮮。史河灌區工地上由於饑餓和勞累死亡眾多，不少民工晚上收工或生病回家倒斃於路途。毆打民工的事司空見慣，榆林公社一個姓甘的大隊副書記，1959 年在工地上任教導員，其手段之殘忍令人髮指。一個社員拿了幾根沒用的木頭給民工燒鍋，甘噉使人將其褲子扒掉，把四、五十根大頭針釘在這個社員的屁股上。另有社員偷別人的衣物，甘用小刀把他的耳朵割破一寸多寬。

《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的老家全椒縣，官方坦誠公佈，該縣 1960 年“人口非正常死亡 4 萬餘人”，每六個人就死了一個。北京大學有一位教授當時在全椒中學讀書，1995 年他對友人回憶道：“我 1960 年上初中時，是在縣城上學，每月有 30 斤口糧，而我的養父母在我上初中時都餓死了，我家所在的村是個大村子，村裡至少餓死了 1/3。我的同齡夥伴，沒在縣城上學的，差不多都餓死了”。當時，凡是在縣城裡上中學的，都有定量的口糧，所以餓不死，而沒有上學在村裡的，差不多都餓死了。這位教授還說：“我上中學的時候，路邊全是死人，有的還有氣，沒人管，有的村人都死光了。”

1964 年，安徽壽縣“四清”運動中，農民揭發：當地人口死了一半。原有 800 萬人口的阜陽地區在三年災難中竟餓死 200 余萬人。餓死了 1/4 左右人口的縣還有宿松、濉溪、靈璧、渦陽等縣。

據官方公佈，亳縣農村 1958 年底 71 萬人，到 1960 年底死亡 15 萬人，占原人口的 20%以上，有 2.8 萬個家庭徹底毀滅，留下孤兒約 5000 余人。據多點調查推算，1959 年和 1960 年兩年死亡人口在 30%左右，即死亡 20 來萬人，人吃人的現象多處發生，近 60%的耕畜死亡，房屋倒塌 10 萬間以上。有 80%的林木被砍光，出現了大面積的荒地…… 上述慘景出現後，悲慘歌謠廣為流傳，如“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說假話”、“奪高產，放‘衛星’，餓死的社員填滿坑”、“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員吃人肉”…… 。安徽發生吃死人肉的事，當局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說法。到 1961 年春，亳縣形勢開始好轉。

廬山會議後的“更大躍進”、“反右傾”運動中，安徽成為重災區。1959 年安徽岳西縣農民被迫暴動，其綱領是“襲擊糧庫，奪回糧食”。1960 年 12 月蕪湖專區發生大小搶糧事件 180 起，據查清的 96 起統計，搶走糧食 3.6 萬斤；1961 年初全省又發生搶糧事件 65 起，搶走糧食 1 萬多斤。到 1962 年春仍有搶糧事件發生。據淮南等 13 個縣 22 起搶糧事件調查，參與者 5495 人。為此，共產黨加大了專政恐怖的力度。據安徽 43 個縣的統計，1957 年 12 月至 1962 年 2 月共逮捕、拘留、扣審、勞教、集訓 15.2 萬人，有的縣受到上述處理的人占全縣總人口 3%之多。受處理比重最低的縣，人數也占全縣總人口 0.4%。有的群眾因為偷幾棵菜、幾斤糧食、說幾句頂撞負責人的話也被拘留關押。1958-60 年，安徽天長縣法院帶著蓋好公章的空白判決書下鄉，遇到被認為表現不好的人，隨時判決，宣佈管制。公安、檢察機關和公社幹部亦可隨時填寫空白判決書，甚至出現少數口頭判決現象。

從 1959 年秋至 1962 年的苦日子裡，據不完全統計，安徽死亡人口高達 620 余萬，成為全國死人最多的六省之一。1960 年是全國總人口唯一出現負增長的

一年，安徽人口死亡率最高，其次出現負增長的省份按比率高低依次是貴州、四川、河南、湖南、山東、湖北。四川因人口居各省之首，死亡人口的絕對數最大。1961年出現負增長的只有四川、湖南、貴州、青海，四川自然增長率仍為-16.3%，其次是安徽了。後來，農村改革在這兩個省率先進行，這是有歷史原由的。1962年初，劉少奇對即將赴安徽就任省委第一書記的李葆華說：“回去以後，把前三年的歷史寫本書。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編劇演。再勇敢些，就立碑傳給後代。”可惜劉少奇還沒來得及做什麼，就成了毛的刀下鬼。書也好，劇也好，碑也好，也就統統無從談起了。三十多年了，偌大的中國，連一本書、一個劇、一塊碑都不曾出現。

第 117 節 陝甘寧晉魯貴等地——人間活地獄

1. 陝北。在革命聖地陝北，1942年第一個唱起《東方紅》而載入史冊的名歌手李有源的家鄉佳縣，此刻也死了很多人，李有源的大兒媳也四出逃荒乞討。許多餓得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社員實在沒轍，一聽說哪兒剛剛埋了死人，就紛紛去掘墳扒墓，把新入葬的棺材板刨了出來，打成板凳桌子等傢俱到城裡去賣錢換糧，活一天是一天。

2. 青海省委第一書記高峰“左傾蠻幹”（劉瀾濤語），青海發生嚴重的非正常死亡，劉瀾濤向鄧小平點名要求派公安部副部長王昭去青海主持工作。據劉回憶：“王昭同志到達青海時，正是春耕大忙季節。但是從湟水之濱到黃河兩岸，地裡看不到人跡，村裡看不見炊煙，一片荒涼蕭疏景象。”王即向中央報告：“要求中央火速調撥糧食，先把人畜死亡的問題煞住。”但在救濟糧送到之前，許多農民已經死去了。青海當局公佈的死亡數為12萬多，因未算“外流”，當局說1960-1962年人口“外流”54萬。而實際上全國各處都在挨餓，外流者很難討到

吃食活下去，哪怕只有 1/4 “外流者” 死于他鄉，青海的非正常死亡數就是 40 萬、占全省人口總數的 15% 了。

3 · 甘肅

1958 年 4 月上旬，毛召集各省談水利工程，表揚了兩個省：吳芝圃的河南和曾希聖的安徽。毛說：“吳芝圃講搞三百億方，我看得死三萬人；曾希聖講搞兩百億方，我看得死兩萬人”。1958 年 8 月 5 日的甘肅引洮工程表彰大會，其口號是“鼓足幹勁，山動彈；鐵臂一揮，水上山。”甘肅省“引洮上山”工程，從岷縣古城溝攔截沈河水（即洮河水）上山，蜿蜒向東，修一條長達 1400 公里、翻越 8 百余座山嶺的大水渠，把洮河引到黃土高原。

毛澤東說：“甘肅洮河引水上山，那麼大的工程，就是靠黨的領導和人民的共產主義精神搞起來的。”該工程是毛澤東推行大躍進的樣板，規模不小，沿線調集 17 萬民工。17 萬民工在高山大壑裡挖洞穴居，席地裹衣而臥，下工後在山裡采野菜合著自帶的乾糧充饑。他們先挖了幾個月的隧道，發現不行，上面決定劈山修明渠。幹了幾個月又不行，又改修隧道。從 1958 年一直幹到 1961 年，工程整個報廢，官方自己承認：一畝地也沒澆上；浪費資金 1.7 億元，民工的血汗未計入。期間累死、餓死、砸死、病死，以及受不了苦役而逃跑（勞動力達 2 萬人）、被抓回來後關在黑屋子裡活活餓死的不知道有多少，僅僅在離工地沿途某處不遠的一個大坑裡就胡亂掩埋了幾千具民工的遺骨。像“引洮上山”一樣，大躍進中的大部分水利工程都是浪費。許多修到半途，修不下去，只好停工。蓄水量一億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庫，開工的有五百多座，一年多後就減掉了兩百座。建成的有不少毛還在世時就坍塌了。

1958 年 5 月 17 日人民日報載：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在八大二次會議上

發言說：“黨內外的右派分子利用我們工作中的個別缺點，大事向黨進攻。說‘500萬畝水地是人命換來的’，是‘秦始皇磨民’；說1956年各項工作都‘冒進’了，這些‘都是領導上的腦袋發熱造成的’；說批判‘甘肅落後論’是‘無的放矢’；說1956年春召開的區委書記會議是一個‘冒進’會等等……。經過全民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特別是經過了傳達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在黨內清除了孫殿才(副省長)、陳成義(原政法黨組書記、副省長)、梁大均(原省委委員、銀川地委第一書記)為首的右派反黨集團，情況大變，一個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一日千里地向前邁進。1956年的水利工程6個多月的成績就等於1957年的10倍。原來準備十年基本上擺脫乾旱威脅的願望，現在看來，只要苦戰三年就可以實現。”

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把個別富饒的果蔬生產隊的“摘掉貧窮帽，不吃商品糧”的口號，擴大至全省，“甘肅決心自力更生，不要國家商品糧！”在廬山會議上，張仲良在“廬山會議”上駁斥彭德懷說：“你講得不對！就以我們甘肅省為例，1957年，我們甘肅不產1噸鋼鐵，去年我們搞了5萬多噸！難道還不是大躍進？去年我們全省糧食也增產了41%，我們破天荒不再從外省運進糧食！”張在甘肅展開了瘋狂的“反瞞產”運動。全省當時組織一批窮凶極惡的“搜糧隊”，挨家挨戶翻箱倒櫃甚至掘地3尺，將老百姓的餘糧席捲一空；同時下死命令“不准外逃，堅守崗位，凡靠近鐵路一百米內的作偷越邊境論，一律格殺勿論”。

武山縣位於蘭州和天水之間的鐵路線路上，渭河從中穿過，渭河兩岸的北山和南山之間，是幾十里寬的平川。因有渭河水澆灌土地，在飽受乾旱威脅的甘肅省，屬於豐饒地帶。1958年，它是甘肅省委表彰的“紅旗縣”，1959年就成了遍地

餓殍的鬼域。武山縣百泉公社到了 59 年底，糧食沒有了，僅剩下大白菜充饑。隊裡死了驢，肉被隊長們瓜分了，社員們沒份。社員家家被搜查，翻出的糧食全部沒收歸食堂。大年初一，食堂裡只有大白菜和爛土豆。百泉大隊，1 千多人餓死了近 1/3。那些餓紅了眼的饑民，不得不把目標鎖定在“人”身上，開始時吃死人，隨後發生上百起“易子而食”的慘劇。不但荒野餓殍被皮包骨頭命在旦夕的人爭相啖食，就是一個還能挑兩小鐵皮筒水的十歲上下的小男孩，也被其生身之父活活殺死下了鍋，說是為救活這男孩的昏躺土炕生命垂危的生身之母和妹妹。結果這男孩被吃得只剩下一把細白骨之後，其母、其妹與其父也相繼離開了人世。

1959 年時任甘肅省人民政府省長的鄧寶珊將軍曾把甘肅人民吃的用雜糧、樹皮之類做的東西面呈毛主席。詩人陽飆寫道：一顆巨大的麥粒，將我擊倒在 1960 年的門檻上……

1958 年 5 月 5~23 日，甘肅通渭縣縣委書記席道隆以“先進縣代表”的身分在北京列席了八屆二次代表會議。6 月，全縣抽調農村勞動力 2.3 萬人(占總勞力 17.8%)，由副縣長白尚文帶隊，赴會川參加引洮工程。

8 月，按照毛“還是辦人民公社好”的指示，僅 10 天時間，全縣實現了人民公社化……

9 月上旬，為迎接中共水土保持檢查團，全縣調集 5 萬農村勞動力(占總勞力 38.7%)從華家嶺、馬營、城關、碧玉、雞川 160 華里的公路沿線上大搞形式主義的水土保持工程，嚴重影響了秋收、秋種、秋犁。同月，在“越大越公”的指導思想下，全縣 20 個人民公社擴建為 14 個人民公社，還提出“千斤(糧食單產)元帥升帳，萬斤(洋芋單產)衛星上天”的口號，致使脫離實際的瞎指揮、盲目蠻

幹、浮誇風開始盛行。

10月，再抽調2.5萬多農村勞力，大戰華家嶺、史家山，繼續搞形式主義的水土保持工程。又抽調1.3萬多農村勞動力，赴皋蘭、靖遠大煉鋼；共占勞力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左右。這時，全縣“三秋”生產主要靠老弱婦幼，致使許多地方洋芋沒人挖，凍死在地裡；秋田沒運上場，黴爛在田間；冬麥沒種夠，秋犁地沒犁完。同月，全縣又組織6萬多人，用“野戰兵團作戰法”大搞深翻土地。8～12月，全縣實現了食堂化，共辦2759個，隊均2個。

《通渭縣誌》：1958在“大躍進”思想指導下，全縣農業生產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上面逼，下面吹，弄虛作假十分驚人，年糧食實產1.15億斤，上報2.6億斤，徵購4154萬斤（占總產36%），人均口糧不足30斤，致使人民群眾以草根、禾衣、樹皮充饑，開始出現浮腫現象。1959年1～6月，該縣已餓死了6千多人。

《通渭縣誌》：1959年3月，根據中央鄭州會議精神，縣政府草擬了挽救通渭嚴重局面的三張佈告，很受群眾歡迎。但在後半年八屆八中全會以後，被視為“右”傾思想的產物，未能貫徹執行。4月，人口開始外流、死亡。

1988年第5期《十月》刊登的《依稀大地灣》披露：饑餓，永遠也望不到頭的饑餓，把所有正常的腦瓜都攪得天昏地暗，一塌糊塗。大難臨頭的氣氛，籠罩著這個小村也籠罩著這一戶人家。敢於想的辦法均已想盡想絕。可吃的以及不能吃的東西也全部啃了、嚼了、吞了下去。榆樹皮、楊樹皮剝光了。柳樹皮苦比黃連，也剝下來烤幹磨成粉咽了下去。還有什麼？蕎麥皮點火燒成灰，和在水裡喝下去也管用，連棉絮也扒出來吃了。最後吃了蕎衣，人腫得不成人樣……死亡的感覺在饑餓的軀體裡膨脹。這一戶人家只剩下父親和兩個娃。父親一動不動地

偎在炕上，苟延殘喘。娃們的忍耐力並不一定比大人強，但最後一點可以吃的東西總是盡娃娃們吃。現在，只有他們還能動彈。女娃似乎比男娃更多一點氣力。終於，整天整天死閉雙眼再不說話的父親這一天從炕上歪歪斜斜地撐起了上身。他給鍋裡添上水，又在灶膛點了把火。女娃被趕了出去。臨走她看見弟弟躺在床上。等她回來，弟弟不見了。鍋裡是一層白花花油呼呼的東西。她嚇壞了，整日呆在院子裡不敢進屋。她看見了，灶邊扔著一具白白的骨頭。她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她只是怕極了。隔了幾日，父親又從炕上歪歪斜斜撐起了身。這一回他幾乎是爬著給鍋裡添上水，又在灶膛點了把火。然後，他招招手，用女娃從沒聽見過的聲音，斷斷續續地喚：“來，來。”女娃嚇得渾身發抖，躲在門外大聲哭。父親還在喚她。女娃哭著說：“大大，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

僥倖活下來的寺子村婦聯主任說：“1959年11月到臘月，死的人多。老百姓一想那事就要流淚。餓死老人家的，餓死婆娘的，日子過得稀裡糊塗。把人煮了吃，肉割來煮了吃……人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怕，就想吃，想活。把娃娃、自己的娃娃吃下的也有；把外面逃到村上的人殺了吃的，也有。吃下自己娃娃的，浮腫、中毒，不象人的樣子。有的病死了，也有救下的。吃了娃娃心裡慘的，吃過就後悔了，自己恨自己。在村子裡住不下去，沒人理他，嫌他髒。沒了糧食吃，吃草葉子、樹皮，半個月就不行了。一點東西不吃，男的三四天就死，女的還能多活三四天……那時候餓死也不知道往外跑。人都怕事，……。”

原隴陽公社王書記說，饑荒時期，村裡一個不到30歲的婦女把自己的女兒的肉煮吃了。她的男人從新疆回來找女兒，村裡的人都替她打掩護，瞞過去了，因為村裡吃過人肉的不少。那時人們餓極了、餓瘋了，提著籃子出去，看看倒在

路邊的死屍上還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王對記者說，你們去看看公社門外蹲在那裡曬太陽的人，他們中就有一些是吃過人肉的。在那場饑荒中，王本人的家中一共餓死了 5 口人。

《黑石頭》是楊顯惠在《上海文學》連載的紀實性小說《定西孤兒院紀事》的第一篇。

記者問：從《黑石頭》看，連母親都吃兒子和女兒了，吃不相干的人，似乎應該是更多。

楊顯惠：你說得對。我還是舉例說明通渭縣某村有弟兄倆人。老大去水利工地了；老二在家，家中還有他老婆和嫂子。這男子總從外面檢別人家的死孩子吃肉，後來把自己的孩子也吃了。村裡活著的人感到了威脅，很恐懼；跟隊長去說那人吃自己的娃娃了，吃得身體那麼壯。他一旦把我們拉去吃，我們身體弱得對付不了怎麼辦？隊長和幾個人商量一下，認為必須先下手，便帶了幾個人提了鐵掀槓頭沖進去，把那個人打死了，把他女人的腿打斷了，因為女人也跟著吃肉。人們沒打他嫂子，因為嫂子沒吃肉。搶救人命的公安局把隊長逮捕了。過些天又放了；因為公安局也覺得隊長帶著人打死那人是無奈之舉。

記者問：《黑石頭》一篇，寫的是“扣兒娘”吃了“扣兒的弟弟”和“扣兒”。因為吃了自己的子女，所以她活到了 90 歲。這個悲劇在生活中的原型嗎？

楊顯惠：這樣的事我聽得太多了。酒泉市某村，一老婦人餓死了，兒子將她埋掉了；過了幾天又挖出來刮腿上的肉，拿回去放在鍋裡煮。隊長知道了，叫幾個人將地捆起來，罵你這個沒良心的，你把你媽身上的肉都刮著吃！兒子回答，我的兒子要餓死了，我要顧兒子，我不刮我媽的肉刮誰的肉去？再一個故事：還是酒泉市一個村莊，一婦女吃了自己的孩子，上級領導來此村檢查工作，隊長彙

報了。領導來到婦女家問罪。婦女餓得臥在炕上起不來，陪領導的一位幹部呵斥起來，領導跟你說話哩，問你為什麼吃兒子的肉？婦女還是臥著；回答兒子是我養下的，我想叫他吃我的肉，他活下去，可他還小吃不了我的肉。我把他吃了，我們兩個人都死，比起我死了他再餓死，我心裡還好受些。那位幹部還是氣勢洶洶地呵斥你胡說，你竟敢說糧食不夠吃，領導卻推了這幹部一下，說：走！再不要說了。

1959年全縣糧食實產8300多萬斤，虛報1.8億斤，徵購3800多萬斤（占實產45.6%），人均口糧20來斤，致使人口大量死亡。但省、地、縣委不承認通渭的實際問題，反而認為是“富裕中農和五類分子”搗鬼；組織“千人整社團”，在農村普遍召開“千人鬥爭大會”、“萬人鬥爭大會”，錯整了一批幹部和群眾，並翻箱倒櫃，遍搜糧食，拷打群眾，有文字記載的刑罰，就有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40多種；使人們持續浮腫、外流、死亡，許多地方出現人相食。縣誌的主要編纂者張尚質當年是《甘肅日報》的記者，災後他隨省委工作組到通渭放糧，搶救災民，他寫了通渭饑荒死人的內參，而這篇內參又險些給他扣上右傾分子的帽子。他看到路邊、田裡，到處都是死人，遍地白骨無人收。他跑回自己的村子，村子慘不忍睹。他跑進家門，家中已氣絕三人。在縣誌的編纂中，他只是簡略地寫道：那“千人整社團”到老百姓家何止翻箱倒櫃、掘地挖牆地搜刮糧食，他們完全變成了一群野獸，把拿不出糧食的婦女剝光衣服，用繩子紮起陰毛拉出去遊街示眾！要麼整死，要麼餓死，只能在這兩者之間選擇。有的人被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糧不敢吃，有野菜不敢挖，有路不敢逃，只能老老實實地餓死。“這是今古奇觀！今古奇觀啊！就是那滅絕人性的惡行，當時的工作組記下了128種！”張尚質說著說著，抑制不住地悲憤地要喊，站起來喊。

原副縣長王振說：“1959年上半年已經餓死了6000多人。一直到1960年冬季，人還繼續在死”。通渭全縣28萬人，餓死和遠逃他鄉的達12萬人。縣誌說，近7萬人死亡，近3萬人逃亡外地。人口減少了1/3，直到1980年代也沒有恢復到1949年前的水準。

《通渭縣誌》：1960年1月8日，縣委成立外流人口遣返小組，抽調110名幹部分赴陝西、青海、寧夏、新疆等地進行收容遣返及安置工作。

3月1日中共甘肅省委決定，逮捕縣委第一書記席道隆，書記張峰、陳景虞及有關負責人17名，其他縣委縣政府負責人都停職檢討。隨後，公社一級的幹部又抓了39個，以後又提審了300多人。93%的基層幹部都撤了職。群眾心傷了，幹部的心也傷了。後來人們就說，“共產黨幹部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共產黨的幹部，我們這一代把罪受完了。吃了苦也辦了壞事，在錯誤政策之下，越積極辦的壞事越多。唉……”

1960年3月，北京對甘肅通渭事件作出正式判斷。自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通渭、隴西、和政三縣出現大量餓死人現象，中央批轉甘肅省委解決通渭問題的意見稱：造成事件的原因是機會主義分子與反革命分子搞在一起，“從縣到基層都混進一批反、壞分子，幹部隊伍不純是發生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

12月，中共西北局在蘭州召開會議，研究了“通渭問題”，認為通渭縣發生如此嚴重的饑荒問題，省、地、縣委都有責任。接著中共中央、省委、地委派工作組250人，醫療隊128人，調醫藥136噸，放回銷糧3300多萬斤、救濟款330萬元、棉布110萬市尺、棉花6萬多斤，迅速安排了群眾生活，醫治因饑餓所致的8萬多病人。12月25日，縣委決定，在全縣14個人民公社分別成立兒

童福利院，收養無依無靠孤兒 1200 名。冬季，農村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幼稚園、托兒所、敬老院陸續解散。年底，全縣造林面積比 1957 年底減少 82%，林木保存面積僅占原有的 4%。是年，旱、風、凍、病、蟲等自然災害頻繁，人民群眾災難深重，吃國家回銷糧 4000 多萬斤。

為此，蘭州軍區出動大批軍車從外省緊急運糧。當時在甘肅發生過饑民哄搶部隊押運的軍隊糧食列車事件，饑民一邊搶一邊把米往嘴裡塞。1960 年 12 月中央工作組到達甘肅省定西縣，當時提出的口號是“搶救人命”。1960 年甘肅山丹縣委的一份報告，非常恰當地說明了當時許多地方農村的情況：“當前我縣農村勞苦人民正處在水深火熱之中……”。

甘肅省在 1961 年 1 月間發生哄搶糧食事件五、六百起，損失糧食百萬斤以上，牲畜近萬頭，還有大批百貨，使交通陷於癱瘓。1961 年在張掖市發生 3000 多人搶國家糧庫哄搶糧食事件。1961 年甘肅安西縣發生群眾砸開國家糧食倉庫搶糧食事件。

甘肅餓死 1/10 人口之後，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錢瑛率領的工作組就發現甘肅餓死那麼多人完全是由於省委“肆意弄虛作假，騙取榮譽，不關心群眾疾苦，徵收過頭糧所造成的。”當年徵購入庫的糧食後來有 40% 又返銷給了甘肅農民，但那是餓死人之後的事了。

生於四川通江的熊國炳，1930 年代參加紅軍，曾任“川陝省蘇維埃政府”主席，長征時期先後擔任紅四方面軍總供給部部長、“西北聯邦政府”副主席、“四川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等要職。後隨西路軍西征，熊國炳突圍時被俘，國民黨軍將其當做“伙夫”予以釋放。熊國炳帶著傷病，沿路乞討，輾轉至甘肅酒泉，幹上幫工，並與當地一寡婦成親。1946 年全家遷到玉門油礦，做工謀生。1949

年，熊國炳在民政部門調查紅軍流散人員時，鼓足勇氣，報出真實身份，得到一些救濟。當局吸收其參加土改，工作結束後，仍回鄉務農。

1959年春荒時，熊國炳想死在家鄉，帶著全家回到四川。鄉親們都趕來看他，沒人責怪他。但老伴生活不習慣，他又回到酒泉。1960年冬，熊家饑寒交迫，熊國炳硬著頭皮前往縣委申請救濟，道出自己當年的身份，縣委領導挖苦說：

“你這麼大的官，怎麼不到北京去？”被推出門的熊國炳，沒走幾步，就蜷臥在泉湖公園門外，眉須上凍滿霜雪，奄奄一息，不久凍餒而死。數日後，被親屬葬在一處沙窩。熊國炳死後，官方檔案記載為“病死”。

有人認為，熊國炳是“聰明人”，解放前不去延安，解放後也不去北京，即便最後餓死，也是死得其時。因為“文革”開始後，大部分西路軍幹部戰士被打成“張國燾的走狗”、“叛徒”，而遭到殘酷批鬥。比如，前西路軍最高統帥陳昌浩，就遭紅衛兵的殘酷批鬥和毒打，便在寓所吞下大量安眠藥，含恨而死。陳昌浩死後，被秘密火化，骨灰被揚棄于荒野，時至今日，在北京八寶山陳昌浩的墓穴裡，還只有一個空空如也的骨灰盒。相比之下，在眾多中共西路軍領導人的命運中，熊國炳的下場固然令人唏噓，但還不算是最慘的。

《[臨夏回族自治州志](#)》中有記錄：1961年和政縣部分地方連續發生饑民偷食死屍現象。一男子趁老婆出去摘樹葉時間把小孩殺了，只留下內臟，把身子放到紅薯窖裡，老婆回來後男人對他說是餓死的羊內臟，女人吃完後才想起孩子，知道情況後一跟繩子結果了自己的性命；男人也撞牆死了。甘肅最富饒的河西走廊，十三、四歲的女娃沒有衣服穿，光著屁股在村裡走動。[甘肅省大批婦女外流](#)，[流入陝西省 5 萬多人](#)，與陝西男子“非法同居”者達 3 萬人以上。[到 1964 年後](#)[仍然有 4 萬多人滯留在陝西](#)，而這些人中又有不少人原來在甘肅時已經結婚，當

災難過去後，原來的丈夫尋找到原來的妻子後引起許多糾紛。

為了自己瞎吹牛，為了得到主子歡心，逼得戶戶家破人亡，可張仲良那廝在幹什麼呢？和他主子一樣，白天批評這個，批評那個，頓頓大魚大肉，吃得嘴裡冒油，晚上歌舞昇平，欣賞文藝團體，到了週末，照例澎查查，自有文工團及大學挑來的美女伴舞，這就是以毛老頭為首的官老爺，在他們製造的人間地獄中，如此為人民造福的。

1961 年春派遣了以公安部李付部長為首的十人調查組進駐蘭州，一查，電信不通又是張仲良搞的鬼，蘭州郵局中積壓了 20 萬封向北京求援的信。而電報是只接不發，電話全部不通，真是無法無天！可他是土皇帝，誰敢講句“不”！剛反過了右派，又抓了彭德懷的“右傾反黨集團”。所以，讓這夥敗家子得逞，更可笑的是李付部長帶領的小組，突然失蹤了，最後公安部羅瑞卿部長親自掛電話給省公安廳長“限 48 小時將人交出，否則來京受審”！原來，李付部長被一個縣裡的公安局長關進大牢裡去了，理由是他在三級幹部會上動員大家“有苦訴苦，有冤訴冤”！結果被下面一個科級的小局長以現行反革命罪抓了起來。不是毛好大喜功，那來這些馬屁精。《當代中國的人口》一書首次指出了“三年困難時期”官方的人口統計數字不真實的問題。此外，當時很多列為“正常死亡”的人口中，很大部分實際是饑餓致死的。例如，在甘肅，“死了人還不敢說是餓死的”，對死人區分正常與非正常死亡，“是很難分清楚的”。如張掖地區餓死了 13 萬人；張掖縣餓死了 7.8 萬人，全家死絕 98 戶，人吃人的 58 戶；高臺縣餓死了五萬多人；全河西 14 個農業縣餓死超過 40 萬人。1959 年 10 月修迎豐渠時，一場大雪就凍死 3000 多人。據不完全統計，約 200 萬人冒著生命危險逃了出去，被搶救的人數約 500 萬人，除蘭州外至少有 300 多萬人餓死在張仲良的手中(按

人口比例計算，占 1/4 到 1/3，應列全國首位)，他應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遺臭萬年！

4· 陝西。林牧說：陝南的安康縣 1960 年“大部分社隊人均口糧不足十公斤……非正常死亡 7 千多人；山陽縣、鎮安縣和關中的鳳翔等縣也發生餓死人的事件，山陽、鎮安出現了人吃人的慘像。1961 年，國務院還從陝西調撥糧食支援甘肅。

5. 寧夏。1958 年 7 月，中寧各地競放畝產三千、四千斤的衛星。隨後的大煉鋼鐵、深翻土地、雙反運動（反壞人壞事），又加劇了經濟形勢的惡化。而中寧縣卻被評為農業生產先進縣，縣長祁佰文甚而出席了全國農業社會主義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表彰大會，捧回“畝產千斤縣”的獎旗。翌年二月，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在吳忠召開市、縣委書記會議，確定中甯縣當年糧食計畫產量為 28960 萬斤。9 月正式下達年產 11526 萬斤糧的指標，徵購任務為 4300 萬斤的指標。1959 年，中甯實有水田 221666 畝，則至少每畝產量 520 斤才可以完成上述指標。每畝攤派 190 斤才可以完成徵購任務（包括歇田、水窪地、飼料地與菜地）。正在此時，中寧有五個公社 28856 畝秋作物遭受驟風冰雹襲擊，已嚴重減產與無產。而自治區反在 11 月增加徵購任務 105 萬斤。在本年實際產量只有 6566.49 萬斤的情況下，為了完成徵購任務，邀功請賞，升任縣委書記的祁佰文動員縣府社隊的所有力量，派出工作組，強行搜刮社隊與農民庫存，竟然完成徵購任務 4973 萬斤。占當年糧食總產量的 75.7%。使當時 13 萬人的中寧縣人均所存口糧不足 100 斤（含種子，不含飼料）。

渠口公社黨委副書記陳鈺，如實反映了嚴重缺糧的情況，觸怒了祁佰文，被誣為“反黨集團頭子”，給他加上破壞統購、煽動鬧糧荒的罪名，輪番批鬥，迫

使他於 1959 年 12 月 12 日含憤自縊。和彭德懷的遭遇一樣，從中央到地方，當政治的勁風刮起來的時候，尸位素餐者們只須高歌“紅旗招展，凱歌頻傳；形勢大好，前途輝煌”，而無須睜開眼睛看世界，看社會現實。吹牛拍馬，察言觀色，弄虛作假，文過飾非；或者“急斂暴徵求考課”者流，更容易得到信任、器重，飛黃騰達，仕途順利。如彭德懷、黃克誠、陳鈺者敢於直面人生，立足實事，為民請命，則不免淪為反黨分子或者乾脆命喪黃泉，天下還有什麼真與善？耕讀出身的陳鈺放過牲畜，讀過師範，當過兵，後來參加土改做了幹部，並沒有忘記農村的窮苦。他不過作為農民的兒子為父老鄉親的困境講了兩句真話，就蒙此大難。而他身後，等待中甯十二萬農民的是比民國十九年饑荒更可怖的災難！

嚴酷的冬天來臨了。黃河冰凍三尺，氣溫低達零下二十幾度。北風淒厲地呼叫著，在空曠無人的原野上日夜地悲號。十二萬農民，對著家裡的空鍋冷灶，對著公共食堂裡食不果腹的清水米湯，開始想盡一切辦法搜尋能吃的東西。剝光了榆樹的樹皮，使衛甯平原上賴以制車造農具的最佳木料從此絕跡二十年。挖黃鼠、拾沙蔥、石蔥，將麩皮與米糠粉也作為主食，還是擋不住饑餓的侵襲。棗園公社高山寺大隊郭莊生產隊郭全禮甚至將鄰居新餓斃的嬰兒揀回家中蒸食。五十年代中後期支援中甯建設的六千浙江青年開始集體大逃亡。接著中甯本土農民的大規模逃荒也開始了。青壯年奔向正在開發的白銀、河西等地，扶老攜幼的人們則舉家逃往河套地區，那兒地廣人稀，落戶容易；加上自然條件惡劣，貧困落後，光棍居多，因此，特別歡迎有女兒的人家。中甯人得以靠賣女兒來換取那兒的糧食以渡過饑荒。最典型的如渠口公社十裡碑大隊，十室九空，可以說是“百里無雞鳴，白骨露於野。”而這時，因為祁佑文在農業放衛星，超收徵購糧中功勳卓著，上級特地嘉獎他別克轎車一輛，並擬提拔他做地區領導。古人雲：“去歲曾經此

縣中，縣民無口不怨聲。今來縣令加朱紱，皆是生靈血染成”。恰恰是祁氏此時最真實的寫照。

然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冥冥之中，總有正義之神隨時準備懲罰惡者，給他們的命運開個滑稽的大玩笑。1959年12月23日1時15分，年輕的、志滿意得的祁伍文為達到與百貨公司情婦長期鬼混的目的，於機關宿舍悍然槍殺其妻馬登華，並偽造現場，嫁禍於人，釀成了聲震銀川南部地區的血腥大案。案發後，司法機關在偵破中，幾次誤入歧途，但終覺疑竇重重，不似外來人人縣衙作案。自治區公安廳只好動用警犬，從現場遺物跟蹤尋找疑犯。無論怎樣阻撓、引導，警犬還是認定了祁伍文。於是，祁氏始被收容審查。但卻無人追究祁氏邀功請賞、荼毒百姓的滔天罪惡。春節，有人在門楣上貼出對聯，上聯雲：“二三四五”，下聯雲：“六七八九”；橫批為：“南北”。人莫知其所以。有識者補出缺字，為：“缺一（衣）少十（食）無東西”。主人為此被定性為反革命。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1960年1月，新堡尚閘農民尚漢興以“中甯縣全體農民”名義上書毛主席，托人帶去北京投遞。被北京公安局東城分局認為是反革命信件，轉回自治區政府。2月10日送到中寧縣。經半月嚴密偵察，于同心羅山將尚漢興逮捕歸案。這位63歲的老人自幼學習中醫，13歲能為人診脈，民國22年，白喉流行，尚氏以自創的“麻杏石甘湯”救活了無數兒童的性命。民國23年，馬鴻賓部三十五師駐防中甯，強征新堡劉營村土地，建造營房，付價甚微，勢同豪奪。尚漢興聯合同學向國民政府控告，事雖不成，馬鴻賓也為之側目。這次中寧餓死人，平素孤僻自傲，敢於仗義執言的尚老漢明知事不可為，但毅然以“告不好殺我一個，告好了救中寧縣十幾萬人性命”為念，慨然上書。真正應了所謂“民不畏死，奈何以

死懼之”的格言。敬錄尚氏上書條文如下，以為民族脊梁骨們張目。

澤東主席勳鑒：

欠歆義政，輒頌仁風，……恭呈者，查我寧夏自治區所屬中寧縣，有第一書記兼縣長祁伍文者，奪權希寵，媚上邀功。止知利己，不顧害人。特吹超產，逼購公糧，鄉村農庫，洗掃一光。迄今三月，訛不供營（應）。蒙欺舞弊，餓殺黎民。飯穰茹草，嚼曲啖糠。探巢挖穴，遍地饑荒。凶殍盈野，慘饑滿門，呼籲反坐，擊目傷心。記者涕泣，總報以詩。

……順應鈞安，祇聆慈訓。

寧夏回族自治區中甯縣全體農民敬禮！（尚漢興上書原文見《中甯縣誌》人文卷）

信有機出後，尚漢興隨即而被捕。然而，尚氏的被捕並沒有撲滅中寧縣人民憤怒的烈焰，反而如引燃導火索一樣，引起了連鎖的反應。告狀信與材料像雪片一樣飛向自治區政府與北京。在群情激奮中，迫於強大的輿論壓力，中寧縣公安局被迫於3月15日釋放尚漢興。自治區政府於同日派組織部長楊倉率工作組到中寧查處人口外流和浮腫問題。同時開始向農民供應口糧，人均皮糧30~37斤不等。3月25日，自治區黨委撤換了祁伍文後代理縣委第一書記的周友達，逮捕法辦了四名副縣長，三名科級幹部；強制集訓了公社、大隊、生產隊吹浮誇風。橫徵暴斂的部分幹部。3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轉了自治區黨委關於中寧事件的處理報告。報告認為1959年冬到1960年春發生的中寧縣“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原因之一在於“中寧民主革命不徹底，建黨根子不正，黨組織嚴重不純”。

如何宣判祁伍文是艱難的。馬登華家人反復申告，中甯百姓的強烈呼籲，終於使政府下了決心。1960年7月20日，中寧城西操場李吉武烈士碑前萬頭攢集。

祁伍文於此處被公開處以死刑。中甯人心大快，甚而爭食其人血饅頭。家破人亡的人家恨不啖其肉、寢其皮。

1959年初寧夏自治區賀蘭縣關於德勝大隊婦女勞力保護情況的調查，全隊婦女中患病者達69人，占婦女勞力總數的14.77%。病者總數的62.31%，是1957年大躍進以來，幹了超體力的農活而致病。現在這些病患者只能作些輕微勞動，出勤斷斷續續，甚或有極少數的人一年四季臥病在床不能起來。

6. 山西。山西壽陽的“挖糧集資”運動從1959年10月底發動，到1960年1月被制止，曆3個月。據統計，全縣283個管理區中，有259個管理區違法亂紀，造成人身傷亡；在435個生產隊中，有11159戶被抄家搜查，24063戶被集資，3116人遭到殘酷鬥爭，打死、逼死、嚇死及缺糧餓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數達349人之多。壽陽縣第一書記王之一叫嚷：“死人算什麼，死是他不願意過社會主義關，把資產階級思想帶到棺材裡去啦”！

壽陽宗艾公社在運動期間摔死4人，鬥後死亡24人，鬥後自殺19人，畏鬥自殺16人，餓死24人，因缺糧造成浮腫便秘死亡69人，共計156人，占全縣死亡總數的一半。公社辦公室主任王維等人在太安村，以“抵抗統購統銷”為藉口，對幹部群眾嚴刑拷打，逼要糧食，組織起40多人的打人隊。社員趙義元夫婦，被他們捆起來摔打，打壞胳膊，打掉牙齒，還不甘休，最後被逼上吊自殺。在摔打副隊長張信時，將張幾次高高抬起，摔在地上，又用拳頭猛擊胸部，抓住頭髮在地上猛磕腦袋，張已奄奄一息，還大罵“打死你，哪裡還在乎一半個人”，接著又是一陣腳踢，直至氣絕身亡。蘇景雲還將一個剛滿月的婦女，脫掉衣服拉至院裡受凍，一個幹部乞求，他竟慘無人地道吼叫：“不怕，凍死我負責。”僅他就親自打過86人，推打後死亡6人，畏鬥投井服毒死亡4人。新任支書梁某

也打過 82 人。

當年宗艾公社在凹兒修建一座小型水庫，800 多民工離家在外，又沒有什麼糧食可挖，但打人之風也十分猖獗，被鬥者達 121 人，致死 10 人。工地上有一個專設的“執法隊”。一次，一個叫張四姐的婦女被摔打後，子宮出血不止，她央求說：“我還有一個吃奶的孩子”，人稱“母老虎”的執法隊長任某根本聽不過去，還大喊大叫：“死一個算什麼，死十個也沒人頂。”一位 50 多歲勞動標兵王狗小因勞累過度休息時被“母老虎”發現後活活摔死。20 多歲的民工任文厚被摔死後，水庫直接將屍體拉到該家墳地埋葬，父母想看上一眼都不許。

在山西太谷，“共產風”相當嚴重。“共產”從 1958 年春天就開始了，金銀銅鐵錫，珠寶玉器藥，非獻出來不可；私人房子，隊裡想拆就拆了。說今黑夜就到共產主義了，就是“一鋪一蓋一碗一筷”。食堂也是強迫命令的，說滅老鼠窩，實際是搜糧食，拿鐵條捅這捅那，怕有糧不來食堂吃飯；破房和廟宇都拆了給食堂燒柴了。說小孩子也要集中，統一管理，不認父母；七八歲的都集中到管區，管不過來，又分散回來。從 1958 年 5 月以來，大風刮過兩次（1958 年秋公社化後，1959 年反右傾整風後），小風不斷，邊糾邊刮，糾了又刮，幾乎每一個運動，每一項工作，每一條戰線，每一個單位都在不同的刮共產風。最主要的有十個方面：①平調勞動力，勞力長年有一半在外頭。從 57 年冬開始，上級命令搞農田水利，修水庫；發動群眾投資水利建設公債；也有勞力去外縣無償開礦；麥收季節讓上山栽樹；秋收大忙，全縣卻集中深翻土地（老太婆半夜三更被迫去挖地）；同時大煉鋼鐵。做莊稼活的就是婆姨、娃娃、老漢。收蘿蔔用犁耕；莊稼扔在地裡有一半多，地也荒了不少；種麥子，叫下一二百斤的種（平常下 30～40 斤），兩個人都溜不迭，說明年能打一萬斤（實際只打了 200 斤）。②大搞

電氣化，積資獻寶運動，計有金、銀、銅、鐵、錫、珠寶、玉器、藥、磚瓦木料石、箱、櫃、棉布等，無所不包。③公社化後，搞食堂、“五化”和組織軍事化、生活集體化、行動戰鬥化，有的認為已經到了共產主義，有的實行“天下人民是一家”，吃飯不要錢，有的實行“十大”包乾、“八大”包乾的供給制，有的實行男女老少分住分吃，說什麼“你的我的大家都是夥的”。④學校大集中，“五化”硬成套，提出七天突擊、三天掃尾的口號。⑤大講衛生，大除四害，並在1958~59年冬季兩次大拆民房，大建新村。⑥1958年深翻土地和59年秋冬大搞萬畝豐產方、萬頭豬場，調勞力、土地、幹部、豬羊。⑦在反右傾整風之後，借發展社營經濟，大肆平調管區企事業現款、勞力、牲畜、工具。⑧搶過渡，急過渡，盲目擴大管理區。……據統計，1958~60年省地縣社四級共平調勞動力760萬個，土地1萬多畝，肥料99萬擔，車輛3000多輛，大小農具43000件，糧食132萬斤，日常用具42000件，灶具26000件，瓜果菜113萬斤，款項599444元，佔用民房343691間，拆房屋1377間，……共折款8164637元。其中1959年4月以前占49%，1960年4月以前占30%，以後占21%。省、地、縣和公社、管區，分別占16%、28%、26%、18%和12%。大隊平調多為實物，公社平調多為現金，縣以上平調多為勞動力和物資。但是平調退賠並不是那麼簡單的。在“問題訂證”、“作價合款”、“如何兌現”幾個環節上，通常都存在“兩種思想和兩條路線的鬥爭”，需經過與“富裕中農”的鬥爭，才能把問題確定下來。也有些東西並未退賠（如幼稚園和食堂佔用的房屋），有的則要到以後“逐步歸還”。

在山西太谷，事後由縣退還公社的錢款有127萬元，由公社退給管區的196萬元，糧食163萬斤，社員住房5500間，農具2500多件，牲畜家畜7500多頭，日用傢俱42000多件。

共產風一律拉平的做法，使許多社員偷懶不去勞動。有反映說：“實行公社化，不分你我他，人都是公家的，一碗稀飯是自己的，誰還煩鳥神，想辦法搞生產”？有的社員說：“多勞不能多得，誰還願意幹”！當時總結歸納有二不高：社員生產情緒不高、幹部工作責任性不高；四不清：收的、打的、揚的、掃的不清；十多：糧食糟蹋多、倉庫損耗多、不幹活的多、投機取巧的多、私分瞞產的多、農具隨便丟失的多、牲畜不加愛護的多、窩工浪費時間的多；七不幹：人不到齊不幹、報酬不一樣不幹、吃的不一樣不幹、牲畜農具不一樣不幹、幹部不到不幹、輕重活不平均不幹、土地遠近不一樣不幹，總之是“不幹”了。

山西省太谷縣揚家莊的一名壯勞力 58 年年終僅分紅 7.5 元錢。當時認為是共產主義了，吃國家，吃大鍋飯。村裡開著兩個灶，各取所需。外村人路過也吃，而且是挑著吃。走到哪吃到哪，五裡地一個飯鋪（好象毛澤東專門講到的《三國志·張魯傳》中所說的情況）。但到過年春天就鬧饑荒了。揚家莊大隊 1958 年總共打了 80 萬斤糧食，秋天彙報時硬被報成 180 萬斤，徵購走 100 萬。原說共產黨最講實際，不料最胡說了。直到 1960 年才有了一點返銷糧，每天吃不上幾兩。於是，從 1959 年起就開始偷，集體偷，實際就是瞞產私分。

山西農民對“一平二調”有如下各種抵制方法：1) 分，把隊裡的副業轉給社員，豬場、運輸隊轉為食堂生產；2) 關，關門不幹；3) 頂，頂住不給；4) 藏，不讓看見；5) 拆，把機器、膠皮車拆開；6) 賣；7) 殺。……有的地方害怕過渡，就“賣掉、吃光、分盡”，把錢全部分給社員。此外，還有反對生活集體化、反對供給制、反對統購統銷等言行。

這種狀況極大地影響了生產。例如土地大量荒蕪，如 1960 年山西出現了建國以來從來沒有過的草荒現象，6、7 月份全省荒地達到 600 萬畝，占總耕地面

積的 1/10。

1959 年春，山西省委於第二次鄭州會議後召開了 5000 多人參加的 6 級幹部會議。會後太谷縣召開了縣、社、管區、生產隊、作業組 5 級幹部和 500 多農民，總共 7500 餘人參加的大會。會上提出了許多意見。人們說：夏季植樹丟下了麥收；為什麼去年就要秋收，還要大抽勞力去搞鋼鐵、修水庫和深翻土地呢？“提起深翻土地，真正叫人嘔氣。光顧人多熱鬧，不管地裡活計。大搞兵團作戰，莊稼丟了一地。地也沒有翻好，溝溝坎坎洞滿地，……留下一半不管，到底有利無利”？“深翻地，調勞力，白天要下黑夜走，群眾聽了很發愁，大人哭，小孩叫，工作組說：要的就是這氣魄”！每次都要年輕人，年齡稍大還不行，只有勞力 170 個，一下就調走了 71；因此在山西各地，勞力問題成為當時三個最突出的問題之一。

公社化以後管區一點權利也沒有了，請個假都要去公社；“上級安排工作不看季節，去年麥收正忙時，硬叫搞美化環境，到處畫畫寫標語，許多人七、八天上不了地”；發展養豬事業，不分氣候，大伏天運仔豬，幾乎全部病死；十月裡強調種麥子，幹部有意見不敢提；公社職權過大，統得過死，有十不自由：佈置生產、安排工作、吃糧、經濟、說話、工具、勞動不自由；58 年秋季“縣級不求實際太官僚，鄉級任務觀點太官僚，管區怕受批評就強迫命令太官僚，隊長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亂抓亂幹更官僚”；把小黑豆種成大黑豆，結果是長了豆莢空殼子，立秋還種金黃後（玉米），不管能收不能收；社裡領導太盲目，不看條件推廣新農具，深耕犁使不得，推車安了軸承不如原來的，扇車上改輪，三架車不如一個輪子的價值，浪費了錢又浪費了勞力，社員一肚子氣沒處說；全縣整齊劃一統一行動，任務佈置很繁重，工作每日幾變動，糧食堆的豬羊吃，不叫碾場

叫種麥，過了一夜又變化，不叫種麥要秋耕；工作規劃亂，生產安排亂，勞動組織亂，財政手續亂，社員思想亂，組織制度亂，收入分配亂，農具使用亂；過去被限制得死巴巴的，所有制不知誰有。

在“共產風”方面，人們反映說：幹部認為公社化就是共產主義，一切要“歸公”；成立食堂時，攆人搬房子，說：“啥是你的，都是公社的”，把群眾的鐵鍋用火柱砸碎；“上面是一平二調三收款，我們是一愁二怕三緊張”；一些隊裡的羊兒，公社趕上走了，賣了一千多元，隊裡一文錢沒得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買輛皮車，公社白白趕上走了；膠皮大車公社用了半年，沒給一分錢（歸還管區後，9輛車6天就賺了一千元）。會議結束時，由縣退給公社和公社退給管區的款就有320余萬元，糧食163萬斤。所以供給制後，誰也不動了，什麼也是公社的，想給誰就給誰，人們不敢吭氣；把好好的小農具賣了廢鐵，把新大繩用刀割開二毛一斤賣了爛貨；許多社員不愛護公共財務，認為那是大家的，管不管、壞不壞，與我沒有多大關係；不少地方出現了揮霍浪費財產，甚至亂殺豬羊、損毀生活資料的現象。

對於分配上的平均主義，人們反映說：躍進一年，一年多還不見工資；領導上說話不頂話，說正月十五分紅，到三月十五也未分；實行等級工資制後，勞動效率普遍降低，“頭級歇二級遊，三級四級頂牲口，五級六級不見面，受不受三塊錢，夠不夠一斤糧”；“開春說的按勞分，社員們幹勁百倍增，勞動起來更有勁，為的是秋後多分紅”，結果是“按勞分配不執行，多賺少賺一律平，社員知道了這風聲，在家裝病不出門”；“評工制度全打倒，記的工分全取消，按等評級發工資，勞動一年和尚的帽”；“一年發了11塊，穿不上衣裳買不起鞋”；去年做了幾百個工，“秋天一下子給抹了個淨光”；咱們打了多少小麥不給吃，

都讓公社白白拉上走了，後來來了個供給制，給了 3 塊錢，說勞動日不分紅了，共產主義社會建成了；勞動不勞動，個個有一份，動彈不動彈，一天三頓飯，吃飯人多了，勞動的少了；群眾把平均主義總結了五大危害：“一害報酬一拉平，強弱好壞不分明。二害勞力亂調動，顧了西來丟了東。三害群眾思想亂，白天黑夜怕共產。四害群眾不滿意，一切財產不愛惜。五害勞動泄了氣，群眾要和黨脫離”。

“共產”還“共”到了個人頭上，如煉鋼鐵砸了鐵鍋，大積肥拆掉民房，人們反映說：“一切財產交公家，見了幹部把他怕，共產黨領導真是好，窮的富的都鬥了”；“房子不由自己占，三番五次搬地方。公社沒有招待所，只好搬出騰下房，另找地方安了家。住了不到七、八天，公社擴建又要占，無奈又把家來搬。自找關係落了戶，房東又想要房錢。現在提起所有權，一肚子怨氣憋的慌”；收購廢鐵時讓 3 天收購 9 萬斤，只好把群眾的鐵鍋砸碎，還搜查群眾，假說是檢查衛生，進群眾家翻箱倒櫃，“又搜鋼、又搜鐵、又搜糧”，三結合；有人自留地裡幾棵留作壽材的柳樹，公社化以來就折在社裡，個人什麼權都沒有了，說是：“什麼你的我的，都是大家的”；某管區不和群眾商量，就將 150 間房子讓食堂占了；事後由上面退還給個人的物資，計有住房 5500 間，小農具 2 萬多件，豬羊等家畜 3500 多隻，日用傢俱（主要是灶具）4 萬多件；以致有人說：“日本人是三光政策，公社化是五光政策”。

在運動中，個人人身的權益也遭到了侵害，如普遍反映只管生產不管生活；說：“大躍進以來，人不值錢了”；“對婦女不關心，起半夜睡五更，一說勞動就躍進，得了許多月經病”；大兵團作戰時社員病了，鄉長卻說：“打仗還怕死人，死幾個不要緊”。大戰鋼鐵時，有人對外來民工隨便砍樹、偷東西提了意見，

就勞改了三個月；某村把有病的人送到水庫，沒幾天就死了；強迫孕婦上地造成流產，不出勤不給飯吃；有的社把不好好勞動的農民組成躍進隊（實際是勞改隊），有的因勞動過度死了人；深翻地時，公社書記無故把一個走親戚的婦女的一籃子饅饅沒收了，把兩個行路人和一個燒五七的婦女強制勞動了半天；還有軍閥主義，捆人、吊人，逼小孩勞動等。此外，還存在農忙季節集中睡覺，吃飯睡覺地頭化，男女分開集中，小孩送幼稚園（有的因此病死）等現象，都使群眾意見很大。

在糧食問題上群眾意見更大，反映說：“自從入了人民公社，每日起來常受餓，……打下糧食吃不上，每天只吃斤二兩。明裡做，夜裡受，打下糧食不管夠。搬甕子翻箱子，找尋糧食鬧吃的”；“天長夜短兩頓飯，斤三兩糧食怎麼辦”；“一天只給斤三兩，一頓就都吃了”；“一天一人十四兩，吃的肚裡空落落”；“人民公社化，有時說大話，對著社員說，吃穿都不怕，一切供給制，勞動軍事化，群眾開口罵，說話不頂話，錢兒花不上，糧食斤二兩，勞動三小時，全部都歇下”；58年麥子豐收，整整吃了一麥秋。秋後吃飯變了樣，早晨喝的稀溜溜，晌午兩個窩窩頭，晚上肚裡咕嚕嚕；“照現在一天喝上兩頓，尿上一泡就完了”；“一天吃兩頓稀的，社會主義好在什麼地方”？會上人們提出了“十不該”：“一不該大躍進缺乏計畫，二不該大積肥拆掉民房，三不該植樹造林爛了麥子，四不該種麥子不求品質，五不該深翻地扔了莊稼，六不該強種麥誤了打場，七不該修土鐵路丟了白菜棉花，八不該集中睡覺一戶分成幾家，九不該假報成績受到表揚，十不該婦女深翻地帶上娃娃”。……

1960年初在山西晉中地區，農民指責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是“三死”、“三少”、“三沒頭”，即：集體生活限制的死，統購統銷限制的死，集體勞動限制的死；口糧留的少，自留地留的少，休息時間少；苦幹沒

有頭，大躍進沒有頭，農村沒熬頭。公開提出，要想搞好生產就得實行“四大自由”，即：勞動自由（不要集體勞動），生產自由（自由種植，包產到戶），生活自由（取消食堂，回家吃飯），買賣自由（取消統購統銷）。

從山西晉中的情況來看，據報告，1960年入春以來，“反革命現行破壞顯著增多”，兇殺、投毒、縱火案件較去年同期上升了四倍，破壞的主要目標是公共食堂、幼稚園、飼養場等；反動標語、傳單、信件，較去年上升了一倍（如有標語攻擊人民公社是“大規模的奴隸制度，破壞家庭，強制勞動，剝削個人自由……”）；反革命集團和反動會道門活動，較去年增加了六倍；反革命破壞事故，增加了五倍。到1961年第一季度，政治案件較上一季度又上升了24%，特別是偷搶糧、菜和宰殺豬羊、耕畜的案件很突出，較上季度上升78%。

7·山東。1958年大躍進，青壯勞力都煉鋼、修水庫去了，全省秋播面積不及往年的3/4。1959年風調雨順，夏糧長勢甚好。由於1/4以上土地沒播種，應豐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幾億斤。8月開了廬山會議，批判右傾機會主義，於是又“大辦水利”。從10月下旬開始，全省7百萬青壯勞力開上水利工地，到12月初達到887萬人。甚至在1960年春夏農村經濟面臨崩潰、嚴重糧荒籠罩全省時，仍有數百萬農村勞力不搞春耕春種、夏收夏種，而去大搞水利工程。田地只好拋荒，1959、1960年兩年，全省共荒地5~6千萬畝。1960年僅產166億斤。這樣，國家應當支援山東34億斤糧食才行。可是為向中央邀功，山東省委反而報告說“大豐收”，農民“踴躍賣餘糧”，從農民那裡搜刮了70億斤“餘糧”交給國家，即從每個山東農民口裡奪走了100多斤糧食。結果有1600萬農村人口“每人全年平均口糧只有142.7斤”。每人每天不足4兩原糧，還不夠兩隻雞吃的。人焉能不餓死！

據衛生部 1959 年春天的一份報告說：入春以來，腫病又有上升趨勢，涉及面也較廣。從今年 1 月到目前，在山東、河南、江蘇等 11 個省、自治區共發生腫病 105.5 萬餘人。死亡 6700 餘人。其中以山東省最為嚴重，1~4 月 14 日發生腫病病人 77.9 萬余人，死亡 681 人，僅 4 月 1~10 日即發生腫病病人 17.3 萬余人。山東省荷澤地區 1959 年以來，水腫病人達 72.7 萬人，死亡 1558 人。僅山東省章丘縣黃河公社一地，從 1960 年 6 月初至 8 月 15 日，已死亡 642 人。其中 8 月 1 日至 15 日，死亡 229 人，平均每天死亡 15.2 人。

山東餓死了 800 萬農民（民間認為餓死了 900 萬）。山東臨沂地區在大躍進中建了 11 座大型水庫、33 座中型水庫、近 1 千座小型水庫。但不出 30 年，80% 的小型水庫完全報廢，其餘的大、中型水庫，不是病庫就是險庫，一旦出事就非同小可。一個三、四百萬人口的地區，僅水庫一項就浪費了上億的資金，無數的人力，再加上大煉鋼鐵糟蹋掉大量物資，人民無不吃苦受窮。臨朐縣有個大峪大隊，1959 年秋收，40 多萬斤糧食被徵購，剩下人均口糧僅 100 多斤。從 11 月起，每人每天只配給 4 兩原糧。此外又宣佈瓜菜代口糧：“蘿蔔四斤頂一斤，菜葉子五斤頂一斤，南瓜二點五斤頂一斤。”玉米秸、剝去了玉米的光棒子、花生殼、豆秸、瓜秧磨碎，也算是農民的口糧。實在湊不出了，又假設每人偷了 40 斤糧食，強行加到每個人的頭上，算起來每人的口糧又多了 40 斤。最後向上級報告說每人口糧 357 斤。但一天四兩糧食維持不了生命，農民就這樣活活餓死。死的人多了趕不及埋，許多人暴屍路旁。臨沂地區一位元當時的中學生後來這樣回憶道：“大概是 60 年，……那時大食堂已經把許多人餓死了。（上學的路上）常見有被狗撕得亂七八糟的死孩子，我怕極了。”王兆軍的《皺紋裡的聲音(之一)》中描述道：“大量的、大量的人被活活餓死！那時的山東，真可以說是餓殍遍野，

屍橫村巷。現任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的舒同先生，那時任山東省委書記。當他在濟南修建毛、林、周、朱的豪華賓館時，1/3 皮包骨頭的農民正陸續走向墳墓。我的村子，黑墩屯，人口從 58 年的 1500 多人降到不足 1000 人。死去了 1/3！這些死去的人，多是得了水腫和其他因饑餓而派生的疾病……我的妹妹也因為沒有吃的，而活活餓死了。”

1960 年 10 月，羅榮桓元帥在一次講話中說：“在山東，農村勞動力減少了 20%，牲口由 600 萬降到 200 萬，許多土地荒了。”有一天，一老一少母女倆到了彭德懷蝸居的地方，她們是步行乞討一個多月從山東來到京城的。那母親一見到彭的一位警衛戰士就哭喊道：“兒呀，你爹和你兄弟都餓死了。全村人把樹葉都吃光了，都逃出來了……”甘肅省委工業交通部部長張北華是山東人；1960 年，在通渭縣大批餓死人後，他被派到通渭縣去處理。就在這時，他的侄兒從山東老家去甘肅找他，告訴他山東家鄉的情況與通渭縣差不多，他的父親也是餓死的。連這位高級幹部的父親都餓死了，山東死了多少普通農民就可想而知了。

1960 年底山東省長譚啟龍說：目前形勢很緊張，還有 30%的人口生活沒有著落，有的是沒有安排，有的是安排了沒有落實，問題很大。“山東去（1959 年）冬今春（不到一年的時間）非正常死亡達 69 萬多人，這是張新村在大會檢查時談到的。多慘！”1960 年底山東省大會的一位領導說：山東省過去（1957 年）人口為 5500 萬，不到 3 年的時間，現在（1960 年冬天）還有 5000 萬，減少了 500 萬。省委領導在談到當前形勢時說，今年（1960 年）農業生產又比去年減產，而且幅度很大（20%~30%），糧食徵購任務完不成，城鎮供應十分緊張，不少地方已經出現脫銷斷糧問題。入冬以來，浮腫、乾瘦病日趨增多，非正常死亡人口在增加，如不採取緊急措施，形勢將更加嚴峻。

在大躍進重災區山東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專區，1961年6月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6700多人，9月即上升到35600人，到10月僅聊城一地外流討飯人數即高達10萬，賣兒女者985人，有夫改嫁者869人，個別基層組織已完全癱瘓。

惠民地委第一書記王成旺1960年底說：山東是全國出了名的重災省份之一（被中央點了名的），山東的重災區是魯西北三個地區（惠民、德州、聊城），其中以惠民地區最嚴重。惠民地區地處魯北平原，北瀕渤海，是個老區，抗戰時期是渤海軍區所在地。這裡交通極為不便，全區不通鐵路，甚至一條像樣的公路也沒有，經濟貧困落後。這裡幾乎沒有任何工業，是一個純農業區。近兩三年來，山東的自然災害頻繁，惠民地區更加嚴重。華北平原一帶，像山東、河南，特別是魯西北黃河下游衝擊的平原，當時由於引黃工程，把黃河扒了個口子，去灌溉，灌完了以後排不出去，太陽一蒸發，平地全都一片鹽鹼，不要說糧食，連草都不長。引黃灌溉，是造成整個魯西北地方大饑荒的重要原因。再加上在舒同的錯誤思想指導下，大刮“五風”，反右傾搞浮誇，賣過頭糧，全地區災上加災。去年以來不斷發生糧荒，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在談到惠民地區災情嚴重到了何等地步時，王成旺書記引用了不久江西省慰問團來區慰問時一位負責人概括的話：“惠民地區已經山窮水盡！”惠民人民生活極端困難，沒有糧食，草根、樹皮成為百姓的主要食物。代表團在訪問一位老太太時，問她有多少錢，老人家摸了又摸，掏了又掏，掏了半天從腰中掏出僅有的3分錢。人們在一起閒談時，只有兩個話題：一是談論死人的情況，不是說這家死了人，就是說那家死了人；二是談論自己幾時死，還能活多久，能不能過了年等。有人說，活著挨餓受罪，沒有盼頭，不如早點兒死了好。王成旺說：問題更為嚴重的是災情，不但

沒有得到控制，而且還在進一步發展。入冬以來，浮腫病、乾瘦和非正常死亡在大量增加……

惠民縣北鎮(惠民地委所在地)公社書記說：全公社近4萬人，今年(1960)以來(不到一年時間)已死了1000多人，只生3個孩子(不到萬分之一)。入冬以來，病號、死人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看來明年春天將會更加嚴重。麻店公社書記說：全公社大部分社員群眾都得了水腫、乾瘦病；4594名中青年婦女(16~45歲)，有2188名閉經，占總數的47.6%，子宮脫垂的84人。他說：由於沒有吃的，營養不良，3歲的孩子(1957、1958年生的)不僅不會走、不會坐，連頭都抬不起來。很多社員群眾頭不梳，臉不洗，普遍感到生活沒奔頭，沒有活下去的信心。單寺公社高家生產隊的社員說：“糧沒了，柴光了，人病了，屋倒了，哪裡黑了，哪裡住，走投無路，沒了辦法，就等著死。”有的外出投親靠友，有的乞討他鄉，有的賣兒賣女，有的兩口子鬧分家，有的婦女丟掉家裡男人和兒女去改嫁。病的病，死的死，逃的逃，到處是一片悲慘的景象……幾年來，年年如此，一年不如一年，沒飯吃，沒柴燒，地荒了，耕畜大量死亡，人們無心生產。談到社會治安時，群眾說：這幾年來社會風氣極端反常，好人受打擊，老實人吃虧；有些地方是壞人當權，橫行霸道，老百姓受氣，既不敢怒，更不敢言。有的說：“三隻手吃飽飯，兩隻手餓著幹”，“共產風吹散了心，浮誇風要了命”，“受苦受難被活活餓死的都是咱老百姓，上什麼天堂呀，都下地獄了……”他們在會上發言時，有的邊說邊流淚，有的泣不成聲，會場裡引起連鎖反應，以至於聽會的人個個淚流滿面，有的痛哭失聲。他們是在揭發控訴“五風”帶來的災難！“五風”刮得好慘哪！共產風把農民刮得一貧如洗，浮誇風要了那麼多農民的命，瞎指揮風剝奪

農民的一切權利，強迫命令風使農民成了農奴，幹部特殊化風催生了一批新的統治階層。“五風”是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洗劫。

1961年1月13~29日，惠民縣召開了縣、區、社、隊四級幹部大會。李宅公社黨委書記在大會上的發言說：“去年春天大部分地區都是兩三個月沒有吃到糧食，很多人死得很慘！全縣一年的時間死了3萬多人，相當於現在一個公社的人口。也就是說：一年的時間死掉一個公社。各個公社的情況不同，有的公社達11%；各生產隊的情況也不同，有一個生產小隊160口人，死了60口。大批人員死亡使無數完整和睦的家庭受到嚴重摧殘和破壞，死去父母的成了孤兒，死去妻子的成了鰥夫，死去丈夫的成了寡婦。不知道有多少和睦家庭被破壞，多少感情很好的夫妻為吃而分家，多少翻了身的農民又回到了過去痛苦的深淵。家家庭院破落，家裡一貧如洗，屋子裡除了幾床破被子，就是幾把毛草了。院子裡，甚至大街小巷到處是人糞便，婦女和小孩頭不梳、臉不洗，沒心過日子……人們饑不擇食，只要是能解餓的東西見著就吃，甚至偷、搶，人到饑餓而不知羞恥！……餓死的絕大部分都是老實農民，甚至是在戰爭年代，為我們奪取天下出生入死、立過戰功、負過傷的復員轉業軍人……”

接著，這位公社黨委書記講了這樣兩件催人淚下的事例：有個生產小隊幹部，去年春天幾個月沒有糧食吃，全家五口人餓死了三口，當他娘已經奄奄一息了，還對她的兒子說：“兒呀，給娘一塊乾糧吃吧！”當兒子把唯一的一個糠餅子給了娘，娘看了看說：“兒呀，為啥不給娘一塊乾糧（糧食）餅子呢？”兒子說不出話來，哭了！娘明白了，臉上也流出傷心的淚水。在她快要咽氣時，用微弱而顫抖的聲音，斷斷續續說了最後一句話：“兒呀，千萬……不要……忘記你娘……是一怎麼死的……”說完，就咽了氣。還有一個生產隊社員，因為抵制“五風”，

被幹部扣了全家五個月的口糧。為了不致全家都餓死，他動員妻子和自己離了婚，然後讓妻子帶著兩個孩子嫁到前莊求生。他和妻子本來感情很好，家庭和睦，此舉實屬生活所迫，不得已而為之。此後，他非常想念妻子和孩子。每當看到自己的孩子，他的眼淚就沒法控制，妻子對現在的丈夫沒感情，非常想念他，但不敢來看他。現在他妻離子散只剩一個人，家徒四壁，不僅生活艱難，思想感情上受到很大刺激，病情嚴重，骨瘦如柴，給他什麼吃也沒用了，估計也不會活多長時間了。

大家聽了李宅公社書記的揭發，感到講出了廣大農民的心裡話，許多人流出了同情的淚水，會場上一片抽泣聲。

一位下隊幹部說：我剛到西馬小隊時，正是死人的高峰期。這個 40 多戶人家的小村莊，差不多一個星期就死一兩個人，情況十分緊張，今天這個剛死，人們就議論下一個該是誰了。我進村第三天就聽說有一家 3 口人都死了。最後死的那個人，隊幹部竟找不到壯勞力去抬屍，我自告奮勇跟去了。到他家一看，屋裡空空如也，只看見一具男屍躺在炕上，看上去 50 多歲，屍體已經僵硬了，不知是哪天死的。來收屍的幾位骨瘦如柴、病病歪歪的農民，都是街坊鄰居，把屍體連破炕席卷在一起，抬上一輛平板車拉走了。當時正值數九寒天，冰封地凍，人們體虛沒勁，堅硬的凍土根本刨不下去。沒有辦法，只好找點浮土壓上。這哪裡是什麼安葬？連土都沒入！他們說現在只好先這樣吧，明年春天再下葬。我說：“這怎麼行？屍體被狗吃了怎麼辦？”他們說：“哪裡還有狗，有狗人們怎能不把它先吃了，還能等到它吃人？”說著，我往旁邊看了看，就在旁邊還有三具屍體都是這樣“埋的”。他們說：“你看看那丘子已經是一個來月了，不還是好好的嗎？”他們這麼一說，我仔細想了想，可不是嘛，自從到了惠民農村以來還沒

有看見過一條狗，也沒有聽到過狗叫聲，更沒看到家畜、家禽等，甚至連個野兔子都沒看見過。有的說，這裡的活物就剩下一些還喘氣的人了。

人們告訴張廣友說，1959、60 這兩年，當地風調雨順的好年景。惠民縣 30 萬人，一年時間就非正常死亡是 3 萬，就 1/10，這還不包括 1960 年冬天後死亡的數字，而 1961 年春天正是死亡的高潮。張廣友說：我們下放幹部，下來不到一個月，就開始陸陸續續浮腫，每個公社手中的救濟糧都十分有限，張廣友所在的公社，將大部分糧食和代食品，用於救助浮腫病人。張廣友把大部分東西救濟品都給乾瘦病人吃，病人吃的雞蛋拉的雞蛋，吃的白麵的饅頭，拉的都是一團團的白的，吃大米飯，拉的整個是米飯粒，病人的腸胃功能已經全失去吸收功能。張廣友說：在黃淮流域平原地區死亡人口是 1/3 左右。他說，沒有統計數字，當時是沒，連說餓死人都不許說，誰還敢去統計啊！所以，把這事實的真相都掩蓋了。

8·福建。陳丕顯在回憶錄中說：我回到家鄉的消息不脛而走，眾鄉親不約而同地來看我。許多人被縣、社警衛的同志勸到了生產隊食堂。我得知後就來到食堂看望鄉親。當我們來到生產隊食堂時，村裡及鄰近村子的群眾不請自到，一下子聚集了五六百人。我看人來了這麼多，不好談話，便請公社副書記陳從忠把原定第二天召開的群眾會，提前到當天。這樣既省得浪費大家的時間，也可以聽聽大家的意見。陳從忠簡單講了幾句之後，我便請大家隨便談了起來。於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議論開了。許多人不客氣地問我，知不知道群眾沒有飯吃？怎麼會弄成這個樣子？一位名叫陳從明的中年社員更是激動得爬坐在桌子上，喊著我的乳名大聲說道：“春分妹子，我有很多話要對你說，就不曉得該不該講真話？”看著這位苦出身的鄉親這麼激動，我深知他有許多話要說，便對他說：“你有話

儘管講。”“我講了真話，你走後公社會不會把我打成反革命呀？”我望瞭望在場的地、縣、社領導，說：“你反映真實情況，怎麼會成反革命呢？”接著陳從明便一五一十地訴說起來：去年發大水又下冰雹，糧食減產，可是公社卻向上級浮誇說糧食跨《綱要》，並按《綱要》的指標來徵購。我們完成徵購任務之後，就沒有多少糧食了。現在飯吃不飽，靠挖野菜充饑，許多人得了浮腫病，射山村已餓死了十多個人。公社領導只顧扛紅旗爭先進，不顧群眾肚皮，不管群眾死活。說著又指著我說：“春分，你當那麼大的官，究竟知道不知道群眾沒有飯吃呀？我們實在想不通，為什麼會弄成這個樣子啊！”陳從明一席話，說出了許多群眾積鬱在胸中多時、想講又不敢講的話，引起了在場群眾的強烈共鳴全場頓時出現一片呼喊聲：“陳從明說得對呀！”“陳從明說得好呀！”大家紛紛爭相訴說餓肚皮的痛苦。

突然，一位頭髮花白、瘦骨嶙峋的老大娘跌跌撞撞地擠到廳堂中央，“撲通”一聲跪在我的面前，抱住我的腿泣不成聲。這突如其來的舉動把我嚇了一大跳，我趕忙用雙手把她扶起來。定眼一看，原來是我的一位叔婆。我一邊扶著她一邊說：“三妹婆婆，你不能這樣，我擔待不起，受不了呀，你有話起來慢慢說。”老人家站起來拉著我的手說：“春分，我這六十多歲的老太婆從來都沒有餓得這樣透（厲害）呀！我一家餓得不行，上山采山蒼子樹葉確糠吃，頭都被確打破流血呀！這樣的日子怎麼過啊！你要救我們呀！”老大娘的哭訴深深地感染了在場的群眾，許多群眾傷心落淚，會場上出現一片哭泣聲。面對此情此境，我再也無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辛酸的淚水刷刷地流了下來。

陳丕顯的弟淚流滿面、泣不成聲地向他講述，當地官員知道陳丕顯回鄉，事先撥了九千斤穀子給南陽公社。……與南陽毗鄰的舊縣、白砂等公社的一些社員

群眾，誤以為我已到了南陽。許多群眾匆匆趕來，挽著乞食的碗筷、竹筒直奔官連坑，見著李應槐專員，不分青紅皂白，不管三七二十一，倒頭便跪在他的面前，異口同聲地哭著喊著：“陳書記呀，救救我們吧！我們沒有飯吃呀！”一位群眾當場哭訴說：“我家裡人都餓死了，只剩下我孤獨一人了，走投無路才出來討飯吃呀，陳書記你大恩大德救救我們吧！”……

我們一行吃過早飯——稀飯配酸菜，就告別鄉親到南陽公社，參加了公社召開的烈軍屬代表和基層幹部會議。到會的一百多人，把公社會議室擠得滿滿的……我剛講完，軍烈屬代表劉富玉搶先發言。他說：“我們公社在‘三面紅旗’照耀下，形勢一片大好，糧食畝產 800 斤，跨了《綱要》，群眾生活比過去好多了……”她的發言引起許多幹部、代表的不滿，不少人搖頭歎氣，有的乾脆說：“劉富玉呀，你現在還在為公社吹牛皮，你不覺得臉紅嗎？”在眾人的指責下，她才不得不結束了背誦式的發言。事後我得知，原來她是按公社領導的意圖搶先帶頭發言的，以起示範、導向作用，發言的內容也是公社領導事先授意的。結果卻是適得其反，被大家哄了下來。接著一位叫黃啟智的白髮老人說：“有人說我們公社的糧食畝產 800 斤，除非把田裡的泥土挖出來湊數！我們的實際產量不過是二三百斤，公社領導不是不知道，為什麼還要這樣吹牛皮呢？這是因為幹部為了爭取先進，可以提拔當官。他們昧著良心彙報，卻苦了我們老百姓。現在群眾吃不飽，不少人篩糠、摘樹葉當飯吃。丕顯，我們真不明白，人民政府怎麼會弄成這個樣子？種田人連飯都吃不飽呀？”……

5 月 4 日上午，我回到母校——南陽龍田書院，即後來的龍田小學參觀。當我們走出校門口，路經洪田村時，只見數十個衣衫襤褸、拖兒帶女的群眾跪在路旁，大聲哭喊著：“陳書記呀，我們沒有飯吃，快餓死啦，請求政府救救我們

啊！”……幾位老者捧上手中的糠菜，塞給我說：“陳書記，你嘗嘗我們吃的是什麼？”我和秘書、警衛員各自拿了一塊，掰了一些吃了，那穀糠和野菜的滋味真是又澀又苦，叫人難以下嚥。看著眼前這幾位瘦骨嶙峋、面黃肌瘦的老人，我心如刀絞，淚水忍不住又淌了下來。…… 幾位公社領導都說，看著群眾沒飯吃，餓死人，他們心裡也難過、也著急，早就想反映，但是又不敢說。

於是我便提議把各縣縣委書記請來，匯總一下情況。各縣縣委書記來了以後，都談了情況，統計了缺糧人數，浮腫、生病、餓死人的數字。據當時統計，全區七縣，除龍岩、漳平兩縣情況稍好之外，其他五個縣缺糧情況十分嚴重，全區餓死 8000 人左右。

陳丕顯要求省委書記葉飛救濟，省裡決定馬上撥糧給龍岩地區 1300 萬斤，遺憾的是，省委撥給龍岩地區糧食後，龍岩地委的領導同志認為情況沒有這麼嚴重，遲遲不肯要這些糧食。實際上是他過去向上面吹了牛，結果露了餡，感到下不了臺，不好意思，怕影響今後的前程。到後來情況越來越嚴重，餓死的人越來越多，群眾知道省裡已撥了糧食，卻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不到，紛紛提意見。這時，他才不得不要了糧食。結果遲了一個多月時間，全區多餓死了幾萬人。據不完全資料：1961 年 6 月前，福建龍岩地區病人已達 13.5 萬。全省平均每年正常死亡數為 11 萬人，而這三年超過正常死亡率的死亡數約為 22 萬人，正常年景全省每年出生 54 萬人，而那三年比正常年景少生了 65 萬人。兩項相加，1959 年到 1961 年全省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達到 87 萬人；經濟損失約 80 億元，耽誤時間七八年。

9· 貴州。坐落在貴州省仁懷市西北 13 公里的茅臺鎮，處在赤水河穀底的山坳裡。悶熱、無風，空氣中瀰漫著濃濃的發酵味，就像一個酒氣騰騰的大蒸鍋。

每個茅臺人都會告訴外來者，這裡的小氣候是獨一無二的，離開了茅臺鎮，就釀不出真正的茅臺酒。茅臺鎮有“成義燒房”“榮和燒房”“恒興燒房”3家私人酒坊。3家酒坊經過多年苦心經營，讓茅臺酒名聲遠揚。1915年，茅臺酒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獲獎，成為世界名酒。如今，3家酒坊創始人的塑像，矗立在茅臺酒文化館的顯要位置。今天的茅臺酒廠，就是在這3家酒坊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建國後，“成義燒房”被中共仁懷縣委以1.3萬元人民幣買下。“榮和燒房”的老闆因犯有“通匪罪”被處以死刑，酒坊被政府沒收，併入酒廠。“恒興燒房”的老闆解放前擔任過貴州省銀行總經理，1952年“五反”期間，被查出“侵吞資產”，判處有期徒刑10年，酒坊由政府接管，轉歸茅臺酒廠。

1949年開國大典前夜，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會議，確定茅臺酒為開國大典國宴用酒。1958年2月何方隨周總理出訪朝鮮，周在歡迎會上喝了40杯茅臺酒，對於敬酒來者不拒，喝完酒還跳舞，在看文藝演出時，“竟然自己跑上舞臺，唱了一段《蘭花花》，還拿起大紅旗舞了幾下。”事後，他才知道周在南寧會議上挨了毛的嚴厲批評。

2001年2月14日《新民晚報》第11版《酒仙謝晉》雲：“60年代的自然災害中，文藝界在北京開會，周總理請大家去西山休息幾天，最後請大家聚餐。那天總理來到西山賓館，對夏衍說：‘今天我要喝點酒。’於是謝晉、於洋等幾個會喝酒的人被推派與總理同桌。總理請大家喝的是茅臺，代表們很興奮，你一杯我一杯地向總理敬酒，總理談笑風生，一杯接一杯。不知不覺中，幾桌人喝下了好幾瓶茅臺酒，總理也喝下七兩左右的茅臺，……”

酒廠合併之初，年產僅僅幾十噸，此後規模逐步擴大，但年產量維持在二、三百噸左右。但到了1958年，茅臺酒產量從1957年的283噸卻突然激增至627

噸。茅臺大躍進，發端於毛澤東的一句話。當時的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周林，1989年在為《茅臺酒廠志》所作的序言中記述了當時的情景：“記得在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召開成都會議期間，我陪同毛主席去杜甫草堂。主席問我：‘茅臺酒現在情況如何？用的是什麼水？’我說：‘生產還好，就是用的赤水河的水。’主席笑著說：‘你搞它一萬噸，要保證品質。’”周林回到省裡，全力貫徹毛對茅臺酒的指示。時任仁懷縣縣委書記龐耀增回憶道，那時茅臺酒廠屬於縣管企業，由他直接抓；他們提出的口號是“萬噸茅酒香”，鬥大的標語寫在茅臺酒廠的河對岸。

大躍進時期，人們的腦袋熱得發燙。河南的口號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一定能做到。”雲南有的地區號稱平均每分鐘辦一個工廠，花2元也可以辦一個工廠。甘肅靜寧縣謊報在15天內建了1萬多個工廠，而這個縣當年只有25.7萬人。貴州的“衛星”，就是茅臺酒。1959年，周林對茅臺酒廠領導說：“要保證茅臺酒的生產，既要抓鋼鐵生產，又要抓茅臺酒生產”，“對於你們來說，鋼鐵是元帥，茅臺酒是皇上”。龐耀增記得，當時縣裡傾全力支持茅臺擴建廠房。“茅酒在修廠房時，正好縣委備好木料準備建辦公樓，得知茅酒廠建廠房缺木料，立即把縣委辦公樓項目停了下來，將所有木料撥給茅酒廠。”

趙明軍從1955年開始在茅臺酒廠工作，他對當時酒廠大規模擴建印象很深。“以前只有一個車間，那3年又修建了兩個車間。此外，還在茅臺鎮以外選了好多地方試點，後來都不了了之了。人員也從幾十個人一下子增加到700多人。”趙明軍搖著頭說，過去的私人燒房雇傭工人時，條件要求很高，可大躍進時緊急招募的工人，很多完全沒有釀酒經驗。

1959年茅臺酒產量達到820噸；1960年升至912噸，用當地人的話說，茅臺也“放了衛星”。1959~1961年為2079噸。其中出口139.86噸，國內消耗1939.14噸。按茅臺酒糧酒生產比例5：1計算，茅臺酒廠用去原糧10395噸。當時仁懷有20多萬人，年人均口糧為300斤左右。如果把茅臺酒的用糧再換算一下，一萬多噸的糧食，夠仁懷縣每人平均分得50公斤左右，再配些野菜，估計熬過最危險的春荒沒什麼問題，這樣能救下多少人的性命。

糧食高徵購，1959年仁懷糧食總產為14403萬斤，實際徵收折原糧7055萬斤；1960年糧食總產為11663萬斤，實際徵收折原糧5506萬斤。均占總產量的近一半。據當時的統計資料顯示，1959、1960年的仁懷農民人均口糧分別為350斤和334斤（內含種子、飼料30斤）。而人禍天災期間，1959年在仁懷縣對浮腫病人每天補糧1兩（16兩制）、黃豆2兩、菜油3錢。人口變動：1959年仁懷縣全縣死亡6263人，其中餓死6130人，占死亡總數的97.8%。1961年人口負增長，人口自然增長為-22.55‰。死亡率為31.39‰。這個時期仁懷的非正常死亡不會低於4萬人。茅臺酒前身的“榮和酒房”前老總王少章的兩個兒子。大哥王秉坤是饑餓死亡，死在麥收前後，時年54歲；弟弟王秉均，北京某大學畢業，1950年代因“反攻倒算”被判刑5年，刑滿釋放後趕上“饑餓三年”，生活實在困難就自己撞死於光天化日之下。時年49。這是創造了天下聞名的茅臺酒的後代之命運。

1958年貴州省上報產糧180億斤，但實際只有104億斤。為了達到虛高的統購指標，就強迫農民多賣糧。結果是，1958年比1957年糧食減產2%，徵購數量卻反而增加了23.8%，達到33億斤，導致農民被迫把口糧都給賣掉了。周林在大躍進中率先大辦“公社食堂”，大搞“反瞞產”，造成貴州眾多群眾餓死。

1958年8月，貴州在全國放了一個“大衛星”，出了一個長順縣大辦公社食堂的“十大優點”。“高饒事件”後，周林把在省委會議上向他提意見，希望周林只做省委書記、不做省長的原南下幹部、省委副書記申雲浦和省委秘書長劉釗打下去，把申雲浦貶到基層農場當副場長，劉釗則被開除黨籍，貶為安順師範學校的校長。1959年9月，周林又藉廬山會議反右傾的大氣候，將幾個和他意見不和的，南下的省委主要領導打成“反黨集團”，全省共打了40多個“反黨集團”。

1959年，糧食產量繼續大幅減產到84億斤，徵購原糧卻上升到40億斤，占產量的47%。農村嚴重缺糧，糧食收不上來，省委認為基層幹部一定隱瞞了產量。1959年貴州又搞起了“捉鬼拿糧”（即反瞞產），打擊迫害基層幹部，越是執行得堅決的地方，死人越多。為逼迫他們認為隱瞞了糧食的基層幹部就範，省委通知各縣“先吃自己的，後吃國家的”，規定1959年12月和1960年1月不得發糧食給公社食堂。1960年初，貴州省委閉眼不看正在大批餓死人的現實，給中央送上一份《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的報告》，說公社食堂是“必須固守的社會主義陣地。失掉這個陣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鞏固，大躍進也就沒有保證。”毛親筆將該報告批轉全國，說它“是一個科學總結”，“應當在全國仿行，不要例外”。貴州被毛譽為“紅旗省”，號召各省向貴州學習。《人民日報》立即回應領袖指示，為食堂大造聲勢，用通欄黑體大字刊登長文：《貴州農村公共食堂成為社會主義堅強陣地》。當時，貴州已有數十萬人餓死，奄奄待斃的更多；省檢察院已將“革命聖地”遵義人吃人的報告秘密上報。可是《人民日報》竟然宣稱：貴州“11萬9千多個食堂越辦越好……社員吃得飽吃得好吃得乾淨衛生。”

1960年，產量繼續減到63億斤，徵購數量卻升到產量的52%。徵購後人均留糧

只有 215 斤原糧。215 斤原糧折合大米只有 150 斤，平均每人每天只有 4 兩。就是這 4 兩，農民也不能全部吃到嘴裡。王民三說，茅臺酒緊急調集的糧食都屬於計畫外的議價糧，就是從農民手裡二次徵購的糧食。茅臺酒越多，農民負擔就越重。

各地調糧，支援茅臺。1959 年，茅臺酒原料告急，廠領導向上級呼籲，貴州從全省調集糧食支援茅臺的情況。這次調糧的具體數字是：遵義 11 萬斤、畢節 29 萬斤、銅仁 10 萬斤、黔東南 12 萬斤、貴陽 7 萬斤、湄潭 1 萬斤、習水 10 萬斤、銅梓 10 萬斤、正安 1 萬斤、赤水 4 萬斤、務川 1 萬斤、熄峰 1 萬斤、仁懷 20 萬斤，共計 117 萬斤。後來還不夠，中央又從四川江津調來 70 萬斤，才保證了當年的生產。

從調入糧食的地區資料來看，上述地區中的銅仁 1960 年屬於全國 8 大旱區之一。1960 年初，銅仁地區思南、余慶、印江三縣相繼斷糧，農民成萬成萬地死去。活下來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秋，不料當年天旱，夏收無著，更多的饑民死去了。

遵義地區：1959 年冬，遵義、湄潭就因嚴重缺糧出現“非正常死亡”。遵義縣僅在 1960 年內就餓死 71800 多人。遵義地區成了人間地獄，農民成批成批地餓死，有的地方全家全家地死絕，成堆成堆地埋人。

當時湄潭縣是由鳳岡、余慶和湄潭三縣合併而成，全縣總人口 60.5 萬人，其中農業人口 56.57 萬人。從 1959 年 11 月到 1960 年 4 月初，全縣共餓死 12.451 萬人。死亡人數占全縣總人口的 20% 強，占農業人口的 22%。事件中，全縣死亡絕戶達 2938 戶，遺下的孤兒寡崽 4737 人，外出逃生的農民 4737 人。最為慘絕、目不忍睹的是出現了人吃人的事件。這場禍及全縣農村的大災難，史所罕見，駭

人聽聞。

1959年糧食只收了3.22億斤，比上年減少32.6%，其它農作物減產更為嚴重。然而，1958年大躍進中膨脹起來的浮誇風，不但未止息，反而變本加厲了。當時，湄潭縣委主要負責人把全縣糧食總產定為8.462億斤，虛報5億多斤。數字雖可觀，沒有糧食等於零。為了兌現8億多斤總產，一場駭人聽聞的反對瞞產私分和反盜竊運動的鬥爭，就在全縣展開了。1959年11月，湄潭縣召開五級幹部大會，佈置開展反瞞產運動。會上窮追硬逼，氣氛十分緊張，一直要等報的產量與縣領導事先框套的數字基本吻合才放過關。樹為“紅旗書記”的綏陽公社xx，開始就稱反出瞞產1200萬公斤，縣領導派出專車將該社開會的幹部送回公社。回社後就佈置假現場，先在糧食下麵堆滿亂草、秸稈、糠殼、石頭等，上面從國倉中運去糧食蓋起來，讓人參觀。1959年12月初，湄潭縣先後組織數千基層幹部到該社參觀學習，由該社領導進行經驗介紹，又讓該社事先訓練好的10名反瞞產“標兵”到全縣各公社介紹反瞞產經驗，大造聲勢。12月底，遵義地委又親自在該社主持召開全地區反瞞產現場會議，介紹經驗參觀假現場。各公社回去後如法炮製，立即行動，在全縣農村搞開了反瞞產私分的鬥爭。全縣農村停糧斷炊以後，長時間口糧標準低、瓜菜代、不見油葷的廣大農民普遍浮腫，走路拄棍棒，東倒西歪。一些農民開始紛紛逃荒活命，更多的農民到處剝樹皮、挖野菜來填肚子，時間長了就不行了，餓得連家門口都邁不出去，只有在家等死。1960年1、2月份死人最多，全縣每天都有上千人死亡，許多農民全家死絕，床上地上擺滿死屍。整個農村哀鴻遍野，餓殍滿地，實在使人慘不忍睹，耳不忍聞，視者落淚，聞者傷心。

情況如此嚴重，並沒有引起上級的重視，仍然一股勁地反瞞產，捉“鬼”拿

糧，大喊大叫要堅決打退“資本主義”的猖狂進攻，徹底粉碎“富裕農民”的瞞產私分活動，把生產隊幹部當作集體瞞產私分的頭子而橫加折磨。各地成立搜查隊、打虎隊，闖進農民家裡翻箱倒櫃，沒收財物。凡是能吃的東西全部收光，硬把群眾置於死地，有的群眾反抗，就遭毒打，有的被打傷致殘，有的被活活打死。群眾說：“國民黨又回來了！”有的群眾不堪忍受饑餓之苦，到飯店搶飯吃，有的攔路搶東西吃，甚至偷宰耕牛，盜竊國家糧食。縣委主要負責人不調查這一時期偷盜的原因，反而開展反盜竊運動。1960年元月，縣裡召開有關幹部會議，佈置反盜竊運動，開展大搜大捕，凡是平時犯有小偷小摸的人通通抓起來。並採取先捕後批准，先出佈告後判刑，判處10年以內徒刑由公社批准等違法行為。在下面設立“勞改隊”、“教養隊”，抓來的群眾，白天由民兵持槍監督勞動，晚上開會鬥爭，一鬥就動刑。被非法關押的群眾達2794人（經批准的有65人），關死的就達200餘人。這些被關押的群眾，除極少數是慣偷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基本群眾。在這場反瞞產、反盜竊運動中，動用的酷刑有：割手指、縫嘴巴、用鐵絲穿耳朵和腳後跟、點天燈、猴子搬樁、吊鴨兒浮水，拖死豬、火鉗燒紅烙嘴巴、槍斃活埋等等。實在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在開展反瞞產的同時，決定從農村抽調10萬民工（實際集中7萬民工）大墾萬畝茶園，萬畝果園，大修萬頭養豬場，大修水利，大修街道，拆毀大量民房等建築設施，使許多人無家可歸，民工體力消耗大，又吃不飽，在工地上拖死的不少。為了湊足10萬民工，農村已經大量死人了，還繼續徵調，有的農民拿點樹皮野菜，拄起棒棒上工地，還未走到就倒在路邊死了。就是到了這種時候，許多群眾對我們的黨和政府並沒有完全絕望，他們說：“這些事情黨中央和毛主席一定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是不會放過這些人的。”有的農民臨死前還在念叨：

“毛主席，你老人家趕快派人下來打救我們吧！”

1960年1月，貴州省副省長吳實同志到遵義地區視察工作，發現沿途一帶情況嚴重，在桐梓縣召開了緊急會議，會上吳實同志罵開了：“先不要說黨的原則，你們多少有點良心沒有，人都餓死了，你們還不安排生活，還在反瞞產。”各縣根據吳實同志的指示，先後開倉發糧，停止了事態的發展。而湄潭縣委主要負責人卻一直頂著，並對地委表態說：“湄潭沒有死人”，仍不發糧食。遵義地委副書記xxx忍不住了，對湄潭縣委說：“你們縣要趕快採取措施，開倉發糧。”縣委主要負責人又頂了回去，並說：“情況不是那麼嚴重，不會出死人事件，妖風刮到我們縣委頭上來了，我是不怕的，十二級颱風也刮不倒我。”他這一頂，湄潭縣多死了幾萬人。事件中，縣委主要負責人加強了郵政通信檢查，凡是向上級反映情況或控告的材料，都被卡下來，把消息封鎖得死死的。縣委第一書記個人就扣住51封信件，兩封未具名的交公安機關偵察。凡是反映情況的人都受到各種打擊迫害。1960年4月，省、地委派出工作組到湄潭調查，縣裡繼續捂蓋子。綏陽公社黨委負責人重操故技，以保護首長為名，把群眾趕上山去不與工作組接觸，又把嚴重病號和孤兒集中關起來，在一間烤煙房裡就關死36人，又組織人力把屍體丟在土坑溶洞裡。該社後面的兩個大溶洞裡面，丟了幾百具屍體，還有未斷氣的就往裡面扔，扔下去還哇哇地叫，群眾把這個溶洞叫“萬人坑”。

據統計，在這場反瞞產、反盜竊運動中，全縣被活活打死的群眾1324人，打傷致殘的175人，關押死的200餘人，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帽子、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撤銷一切職務的1680人。“湄潭事件”揭開後，為了平息民憤，挽回影響。省、地委工作組深入群眾，調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最後對“湄潭事件”作出了結論。查明公社黨委被壞分子掌握領導權的6個，占公社總數的

33.3%；管理區黨總支腐爛的 31 個，組織不純的 51 個，共 82 個，占管理區總數的 60.3%；犯有嚴重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在職幹部 377 人，等等。公社和管理區是當時縣以下的兩級主要政權組織，卻爛掉了 50%以上，情況當然是嚴重的。1960 年 6 月，原縣委第一書記xxx被定為蛻化變質分子，依法逮捕判刑，公社領導也抓了幾個。縣裡組織了龐大的專案隊伍，把有問題的幾百名幹部集中審查定性辦集訓班。於 1960 年 8 月，公開槍決了副縣長兼綏陽公社黨委書記xx（1983 年 3 月平反）；另外，還槍決了興隆公社中華管理區大隊支書xxx。後來人越抓越多，在“整風整社”中，一次會議就抓了 30 幾個幹部。在這場鬥爭中，又處分了大批幹部。

分別強行調出 10 萬斤糧食的銅梓縣到 1960 年底人口負增長 121.32‰，全縣人口在 1959~1960 年，一年間減少 41734 人；習水縣三年減少人口 42624 人，死絕 499 戶以上。

畢節地區成了活地獄，地委書記孟子明是個土皇帝，1959 年在畢節地區大搞所謂“捉鬼拿糧”，製造了全省聞名的‘金沙事件’（金沙縣嚴重死人事件），使無數貧下中農家破人亡，“非正常死亡”5.5 萬人，全縣死了大約 1/4。在災荒結束後，金沙縣另有遺孤 3191 人需要安排，一萬餘人患三病（小兒營養不良、婦女子宮脫垂、水腫等）；到 1965 年全縣五缺戶（缺衣服、被子、房子、糧食、錢等）占總戶數一半。

1960 年春貴州省檢察院將遵義分院報告的餓死人、人吃人的情況寫進簡報，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反映；省委聞知，下令即刻收回，可晚了一步，北京還是知道了“遵義事件”。4 月間，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帥孟奇打電話要貴州省委監委彙報遵義死人的情況。可省委書記李景膺卻將監委寫的報告收去，未交到中央。

7月3日，李景膺向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彙報“遵義事件”，說遵義大批人餓死“主要責任在於縣、市委。”“第一，他們……以粗暴的辦法扣發口糧，大搞反瞞產運動。第二，他們報喜不報憂……第三，對人民生命漠不關心。第四，混進幹部隊伍裡的壞分子、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的富裕中農乘機進行破壞，殘害人民。此外，從遵義地委來說，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他沒提到天災。可見貴州1960年春嚴重的非正常死亡不是天災造成的。可是，當李景膺親自去遵義處理遵義事件時，只是將幾個縣委書記撤職了事，而將遵義地委書記李蘇波上調到省裡，當了省計委副主任。

1960年6月，民政部召開全國民政廳、局長會議前，省民政廳統計了貴州的死人數字，準備向北京報告。李景膺見了大發雷霆，說“誰叫你們報的？這麼大的數字還得了！”“你們把這些數字反映出去，被臺灣、香港特務機關得到，就等於給臺灣、香港的特務機關送了情報。你們趕快把這些材料燒掉。”直到年底，公安部要貴州省公安廳報告死人數字，省公安廳報告說人口比一年前減少了一百零幾萬，省委未及制止，貴州的真實情況才得以外傳，中央特派謝富治率檢查團前去檢查。但那些“革命聖地”的冤魂卻再也不能復生了！據人口學學者的研究，在困難時期，貴州全省餓死了約174.6萬，占災前全省總人口的10.5%。

1960年2月20日，貴州省人民委員會給貴州各地區的一封加急密電《關於調高粱支持茅酒廠生產的問題》，密電說：“為支持茅酒生產，確保出口任務完成，根據各地元月底各地高粱庫存，確定調安順5（單位萬斤，下同），畢節25，銅仁16，黔東南5，貴陽市5，給仁懷茅酒廠。由於急需，希接電話後立即安排，組織發運。”這是不由分說的死命令。

1960年12月27日，縣委書記徐肇玉在關於安排生活意見中透露，茅酒原

料 1960 年底到 6 月要安排 360 萬斤。“為保茅臺，貴州做出了巨大犧牲。”

王民三還舉了一個例子，有一次，茅臺急需高粱，省裡就從四川協商籌集 400 萬斤高粱，四川的條件是貴州用 400 萬斤大豆換。“這對貴州來說很不划算，因為大豆的營養價值和緊俏程度都比高粱高很多。”他說，沒辦法，這 400 萬斤大豆也是從貴州農民手裡再度徵購的議價糧。

困難時期，王民三得了浮腫病，住進了醫院。他回憶說，1961 年，省級機關幹部吃糧標準由 27 斤降到 25 斤，接著又降到 23 斤，油水少，“瓜菜代”跟不上，很多幹部患上了浮腫病。據說是周林的意見，在貴陽市貴陽飯店辦了廳局長浮腫病醫院。王民三當時就身在其中。連廳局長都因缺糧進了浮腫病醫院，老百姓就更別提了。

為度饑荒，茅臺酒廠用 4 份酒糟配上一份麵粉，蒸成糟子粑，給職工充饑。趙明軍清楚地記得，工人每頓兩個糟子粑、2 兩高粱飯。當時酒廠工人的工作屬高強度，每天工作 16 小時，其中 12 小時釀酒，2 個小時搞基建，2 個小時政治學習。糟子粑熱量低，個個餓得無力幹活。有時工人從高粱裡揀出幾個玉米粒，也不放過，當寶貝一樣烤著吃掉。

那時，釀酒用的糧食都是酒廠工人到各地去背。每到休息日，趙明軍就帶著工人去各地背糧。“每次背糧都有民兵押送，而且荷槍實彈，怕土匪搶糧。”趙明軍說，“那個時候有什麼土匪啊，都是饑民。”已退休多年的趙明軍，有一件事至今仍讓他內疚不已。當時，有一個工人從廠裡偷了一袋高粱，作為車間主任的趙明軍親手把他開除了。其實，困難時期酒廠工人生活算是好的。已經退休多年的酒廠老工人楊玉龍告訴記者，困難時期酒廠沒有一個人餓死，而且還發肥皂、洗衣粉、工作服等勞保用品。但楊玉龍的家，離酒廠不遠的茅臺鎮上坪村就餓死

了不少人。楊玉龍說，饑荒年代有個說法叫“顆粒歸倉”，這4個字絕不是說說而已。1961年秋天，糧食已經收完了，楊玉龍的老婆又回到地裡拾掉在地上的麥穗，撿回來後沒有上交，結果被鬥了個半死。為了家裡人能有口吃的，楊玉龍當時做了一件鋌而走險的事。他聽說，翻過山的四川省有些地方，一座山只有一戶人家，山高皇帝遠，有人就偷著種了些糧食。於是，他揣上酒廠發的勞保用品，趁天黑翻山越嶺到四川，想用勞保用品換點糧食回來。誰知，在路上被人發現，扣在當地勞動了兩個星期。

當時生產茅臺酒的糧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強迫徵購的。可趙明軍和楊玉龍說，由於盲目擴大產量，完全不顧釀造規律，生產出來的茅臺品質低劣，造成國內外消費者反響強烈。迫于各方壓力，1959年4月，輕工業部派了一個“貴州茅臺酒總結工作組”進廠，進行全面整頓。整頓到1962年，茅臺產量從1960年的912噸降回363噸，酒廠很多職工也相繼調離酒廠，被安置到其他行業。此後十幾年，茅臺酒產量都在二三百噸徘徊。1970年代，為了實現毛主席將茅臺酒搞到1萬噸的指示，方毅副總理帶領有關部門在名城遵義市效選了塊風水寶地，一絲不動搬去茅臺酒的技術人員、全套的工藝、發酵的大麴……乃至窖泥，可是，搞了整整十年，產出的酒仍與茅臺酒相去甚遠。於是，由國家投鉅資進行茅臺酒克隆的步伐到此打住。直到1978年，產量才超過1千噸。大躍進時期的“陳釀”後來一直無人問津，反倒是早先私人酒坊的酒成了茅臺中的“珍品”。2003年，茅臺酒年產終達萬噸。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說：市場上每年有20萬噸“茅臺”出售，但實際上酒廠年產量還不到2萬噸。

10·河北省，並沒有因為靠近毛而沾光。1958年河北邯鄲專區由於不關心群眾生活，傷寒疫病普遍流行（波及21個縣市、70多個村莊）；河北張北縣1958

年糧食產量被近 4 倍地虛誇，使國家徵購任務成倍增加，而實際產量與徵購數幾乎相當，留給農民的只有土豆。

1960 年春，張家口市委兼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到蔚縣調查；在蔚縣西合營村，他看到“春播時，前邊播上種，後邊有人就把種扒出來吃掉。隊裡沒辦法，把種籽通通拌上毒藥，並通告全體社員。可是……種籽照樣被扒出來吃掉，只不過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糧食在土裡邊搓搓，然後迫不及待地塞進嘴裡……”

胡開明跑到省裡找省長：“請你們下來看一看，一天四兩糧食怎麼活下去！”但他空手而回，沒要到一點糧食。而蔚縣縣委書記為了向省委表忠心，竟決定再壓低農民的口糧，規定全縣農民日吃 3 兩糧。胡開明說：“這個標準降到了一隻雞所需食物以下。”在實行 3 兩糧的頭四個月裡，蔚縣就餓死了 2.8%的人口。

在那樣嚴重的情況下，河北省的書記們既不敢向中央開口討糧食，又不敢開放儲備糧倉。他們只懂得一條：卡農民的脖子。省委在 1960 年 10 月決定全省農村一律按一人一天四兩的指標配給糧食。口號是“吃四兩，曬太陽。”因為太陽光裡有熱量，可彌補食物之不足。

省委宣佈 1 天 4 兩後，宣化市的死人數也“逐月猛增”。1961 年春節初一，河北省委召開常委擴大會，省委書記指著宣化市委書記盧起責問：“宣化為什麼死那麼多人，原因是什麼？”盧起回答：“四兩不行，就是五兩也不行，至少需要六兩。”會議這才決定將農民的口糧增加到六兩。河北省的非正常死亡問題才因而逐步緩解。

11·城市與郊縣。一般說來，城市居民有“定糧”，死不了。在 1960 年下半年降低口糧標準時，撫順發電廠工人的主食是用杏條面做的窩頭，工人說：“這東西喂雞，雞都不吃，可為了裝飽肚子，不吃又怎麼辦呢？”鞍鋼有些工人說，

“過去給地主扛活還管飽不限量呢！” “舊社會不好，魚蝦酒肉都能吃著；新社會好，什麼都買不到。還不如從前給地主當雇工，也比不上過去的豬狗。” 在有些城市，居民因營養不良造成的死亡率增加也十分明顯。若將這也算作“非正常死亡”，則河南南陽市從 1958 年開始就每年有幾百人非正常死亡，1960 年非正常死亡數達 1 千以上。縣屬小城鎮的居民，凡與農民一樣無“商品糧”可買的，都是被犧牲的一群。譬如四川新津縣武陽鎮，僅 1 萬多居民，1960 年竟死了 1100 多人。

郊區農民就不行了，他們是被犧牲者。在 1959–1961 年的三年中，北京及其郊區農村共有 3.6 萬人非正常死亡。北京通縣縣委第一書記劉拓事後承認說：

“當時，通縣的大鎮永樂店有“三多”：墳頭多，墳上的白紙錢多，穿白鞋的多。”

北京的近鄰天津市也是如此，非正常死亡數為 3.5 萬多。東北重鎮瀋陽郊區，三年內共有 6 萬人非正常死亡，其中 5.5 萬左右是歸瀋陽市管轄的新民縣的農民，幾千人屬瀋陽市管轄的遼中縣。

上海市青浦縣農民說，“蔣介石手下受苦，吃飯；毛主席手下享福，吃粥。”安徽省宣城縣農民不滿道，“什麼毛主席，比茅缸板還臭！害得我們飯都沒得吃。”江蘇省海安縣農村兒童傳唱一首歌謠：“毛主席，大胖臉，社員餓死他不管！”

中國兩千餘縣，沒人餓死的很少，有些地方只是情況稍好、死亡數相對較低而已。如江西寧都縣和豐城縣，1960 年的非正常死亡均在 2 千人上下。廣西橫縣，1960 年春夏間因缺糧餓死 1400 人。連地廣人稀的糧倉黑龍江省也不例外。譬如望奎縣在 1959 年有 1 千人非正常死亡。原水利部副部長李銳，在黑龍江虎林縣興華村勞動，據他回憶，1960 年秋收前後，村中就開始死人：“有一個同我一起駕牛車拉草回來的老漢，第二天沒有起來，躺在炕上走了。一個同我很談

得來的老頭，去世前只說：‘我想喝一碗稠稀飯’。1961年年初，我離開興華村時，村中已經餓死了二、三十人。”1962年，黑龍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糧食定量減到24斤，農村糧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災地區，入春以後幾乎沒有糧食吃，人們主要靠野菜、野果、樹葉、植物的根莖充饑。

第118節 饑民外逃路斷 官僚花天酒地

反“盲流”。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將農民困在家中餓死，那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作依據的。1956年底周恩來簽署《國務院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所有未經許可“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都是“盲流”。1959年3月，即張聞天夫人說“雲南、海南島都發出了餓死人的警報”時，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指示各省、市將“盲目流入”城市和工業礦山地區的農民收容、遣返。該檔一下，全國都大抓起“盲流”來。除少數流落到東北、內蒙、新疆等地，成為最下等的苦力或奴隸被准許“不予遣返”外，為求吃飯活命而浪跡各城市、林區、礦區的農民都是“盲流”，都在清理之列。其中數進入城市的遭遇最慘；城市越大，其遭遇越慘。因為大城市有外國人往來，當局不願讓“外國朋友”看到他們，而收容遣返他們後，他們還是會設法往外跑，於是有些城市索性將他們成百上千地押往勞改農場。名曰“收容安置”，實則將他們視作勞改犯，與真正的犯人無異，儘管他們的唯一罪過只是未經政府許可“盲目外流”而已。

1958年4月，山東、甘肅農民就開始大量流入內蒙河套地區。1959年大量外地農民開始流入北京、上海、瀋陽、呼和浩特、包頭等城市。據不完全統計：河北省：外流人口28萬；山東省：外流人口32萬，其中青壯年10萬人。1960年1至4月，無票乘火車的盲流農民達17萬人次，比1959年同期增加3倍，大

部分來自魯、冀、豫。前往東北的占 60%，前往西北的占 20%，其它城市占 20%。1960 年 1 至 6 月，流入內蒙的盲流達 60 萬人，同期遼寧農民外流 30 萬人。不過，那時城鎮居民也都吃不飽，“盲流”們很難討到食物充饑，不少人千辛萬苦到了城裡，最後還是餓死。據北京作家黃秋耘回憶，當時“在北京前門外的某些貧民區，例如龍鬚溝、金魚池一帶，幾乎每天都有餓死、凍死在街頭的人，其中多數是從附近農村逃荒來的。”1961 年全國的危急形勢已趨頂點，城鄉人民普遍因缺少糧食和副食品而浮腫，大批農民自發流入城市討飯，農村地區賣兒鬻女和婦女棄家出逃現象極其普遍。許多農民跑到縣城找吃的，可是縣城站崗不讓進，所以城外的雪地上都是死人。後來政府用“每埋一個屍體，發一斤糧食”的辦法，把近 10 萬具屍體埋葬。

大饑荒表面化後，各地幹部禁止農民外出逃荒尋生路，嚴厲打擊當時農村中普遍的偷盜莊稼以求活命的行為，任其困在原地活活餓死。為了向世界封鎖消息，當時所有外出逃荒的農民被整火車整火車地拉回到原地，困在沒有糧食可吃的農村，直到活活餓死……。

上海孤兒進內蒙。1959 年底，上海、無錫、常州等地幾十個孤兒院已經聚集了 3000 余名孤兒。而 1960 年初的情況更加嚴重——僅上海育嬰堂頭兩個多月收集的棄兒就有 6500 多名，9 倍於 1959 年第四季度。這些孩子普遍營養不良。人們相信，上海會有飯吃的。然而人們不知道的是，上海也快斷糧了。1960 年五、六月間，中央曾連續發出關於京津滬等城市糧食供應告急的檔，而在 6 月 6 日發出的《關於為京津滬和遼寧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清楚地表明，這三個城市的存糧，北京為 7 天，天津為 10 天，上海幾無庫存。

上海已無法養活越來越多的棄兒，這一情況反映給了當時的全國婦聯主任康

克清。康克清立即面見周恩來，請求從內蒙調運一批奶粉救急。周恩來指示：“找烏蘭夫商量，烏蘭夫是解決困難的能手。”隨後，康克清找到了赴京開會的烏蘭夫，烏蘭夫答應內蒙想辦法。

回到內蒙，烏蘭夫立刻召開黨委會，在會上，自治區副書記吉雅泰建議，把孤兒接到內蒙，由牧民撫養。烏蘭夫將這個想法請示周恩來，周恩來的指示只有一句，卻顯得很急迫：“抓緊時間，先把孩子接過來再說。”1959年12月，烏蘭夫佈置自治區民政廳和衛生廳抽調人員組成相關機構，由朱明輝具體負責，統一協調孤兒接運事務。整個內蒙的衛生系統被動員起來，自治區醫院、呼市醫院及各盟醫院，都專門騰出房子和床位，準備了嬰幼兒童生活用品食品及藥品，一批保育員也被緊急聘請。1960年初，第一批上海孤兒被跨越千里送到內蒙古醫院和呼市醫院。一直到1963年，內蒙古一共接收了約3000名來自上海及周邊地區的孤兒，成為安置上海孤兒最多的北方省份。《人民日報》在關於北送孤兒的一篇報導中曾記述，為了給孤兒們調理身體，海拉爾孤兒院的保育員們給孩子們服用珍貴的蒙藥靈芝丸，因為害怕蒙藥會讓江南的白皮膚變黑，醫生們甚至想出了和水解蛋白一起服用的方法。從1963年前後開始，仿效送往內蒙的先例，蘇錫常一帶的棄兒開始大規模送往北方。山東、河南、河北，甚至山西、陝西，凡是鐵路線向北延伸的所及，都留下了這些棄兒的痕跡。

今天已經沒有人能確切地說出，北送的棄兒究竟有多少。當年在無錫市孤兒院工作的吳全英也已記不清他們孤兒院送走了多少孤兒。她只記得，糧食短缺情況直到1964年前後才得以緩解，北送也從那時候停了下來。吳全英說，那時，他們只是“儘量送，能送走多少就送走多少”，因為他們知道，在那個饑餓的年代，這些孩子只有向北，才是生路。

從 1958 年大躍進起的幾年間，雲南邊境不少居民逃到了國外，總數達 8 萬人。如雲南潞西縣景頗族聚居的三台區與緬甸接壤，“許多人對社會主義產生懷疑，大量外出緬甸。” 1960 年，閻紅彥調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後曾說：“邊疆跑人多，震動很大”，“跑人問題，跑了那麼多人……” 可見，問題之嚴重。

陶鑄決定放百姓一條生路，指示“對逃港者不要武裝扣押，不要武裝堵塞，不要捆綁……” 1961 年廣東省政府“放寬”條件默許饑民從深圳逃往香港，由此觸發了巨大的逃港潮，有 10 萬廣東人成功地投入了殖民地香港的懷抱。1962 年 4 月 26 日開始，在寶安縣（即深圳市）由東至西 150 多公里長的公路上，外流群眾成群結隊，扶老攜幼，奔向邊境線，伺機進入香港。每天傍晚，從各地湧到寶安邊境外流的一般有四五千人，最多的一天達八千多人。5 月中旬達到高潮；6 月 5 日廣州的廣九火車站終於爆滿失控，2 萬饑民把前去維持秩序和宣傳的警車推翻焚毀。陶鑄趙紫陽等人決定實行戒嚴。6 月 6 日，戒嚴部隊的一個營士兵，把車站兩頭封鎖起來，往外驅趕人群，捕了 1600 多人，這場戒嚴造成很多人的傷亡。逃港潮到 7 月才基本平息。據統計，從 4 月底至 7 月初的短短時間裡，共十多萬人次湧入深圳，有 7 萬人次逃入香港。1961 年 4~5 月偷渡到北朝鮮的中國人達 4500 人。

1962 年初，國內情況極其嚴峻，僅河南省 6 個專區統計，外流人口就達 32 萬人；貴州省的斷炊戶達 1 萬多戶；四川省直到 1962 年 3 月底，還有 1 千多高爐，佔用 9 萬多職工。

1962 年 4 月 22 日，新疆邊境線上的阿勒泰、塔城、博爾塔拉到伊犁四個地區，二十幾個縣，在三千多公里的中蘇邊境上，幾個重要的邊境口岸，7 萬多邊民連同縣委書記、縣長們沖過哨卡，投奔蘇聯，成為蘇聯公民，有兩個縣跑得還

剩幾百人。此次事件被稱為“伊塔反革命暴亂事件”。不久，當局血洗了新疆，造成數萬人傷亡。

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 1961 年 9 月說：“長征苦？長征還沒有大躍進苦”。農民沒出個陳勝、吳廣來“揭竿而起”。陳雲慨歎：“中國人民實在好，餓死人（也）不想起來造反”。否，不是今天的農民更逆來順受；毛收盡天下兵器，鑄為千萬機槍、坦克；當今國家權力之網鋪天蓋地、密而不漏，為歷史所未有。農民“揭竿而起”，何處去尋水泊梁山？

在最困難的時期，一切能入口的東西都想絕了。人民文學出版社老社長韋君宜在《思痛錄》中說，當時她有個妹夫李某任北京市政府秘書長，他想到廁所裡的蛆是動物，有蛋白質，竟把蛆撈出來洗乾淨，試圖做熟了吃，考慮推廣。她妹夫說他本人就親口試嘗過這種異味。

糧食也被集中起來優先保證城市的供應，並用恢復延安時代的等級森嚴的實物配給制以優先保證特權階級的需要。林牧說：有一段時間，周恩來通過分管西北地方的副總理習仲勳，要求陝西省每月給北京發一個車皮富強粉（即精粉），用於中央書記處書記、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以上領導幹部的生活補助。廳級以上幹部和高級知識份子，有特需供應，每月 2 斤豬肉，1 斤油，2 斤黃豆，2 條紙煙，在機關可以吃飽。但是，在農村參加生產和整風整社，就必須同農民一起，在公共食堂吃飯。每天上午 9 點下午 3 點吃兩頓稀飯，少半是糧多半是菜。一到晚上，肚子就餓得咕咕叫。下鄉蹲點的幹部幾乎都得了浮腫病。

1960 年 8 月 1 日，中央書記處批轉國務院秘書長《報告》，規定副委員長、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政協副主席、最高法院院長、最高檢察院檢察長，每人每天肉一斤，每月雞蛋 6 斤，白糖 2 斤，甲級煙兩條；人大、政協在京常委，

國務院各部委的正副部長（主任），高法副院長，高檢副檢察長，人大、政協秘書長等行政七級以上幹部，每人每月肉 4 斤，雞蛋 3 斤，白糖兩斤，煙兩條；其他行政十一級以上人員，每人每月肉兩斤，白糖 1 斤，雞蛋兩斤，煙兩條。以上規定 8 月即開始執行（11 月起，黨內幹部減半）。

當時對 17 級以上高中級幹部予以副食品補助，其說辭是：“幹部是國家的寶貴財產”。1962 年初，幹部階層除了供應糖豆、肉蛋等副食品外，還有其它形式優待。在北京，“黨中央決定舉辦 17 級以上黨員幹部學習班”，主要目的是為了讓幹部得到精神和物質上的營養。這種學習班帶有“保養性質”，“每期兩個月”，每天的飯食有“富強麵粉的饅頭、花卷，有大米飯，還有市場上少見的豬肉、雞蛋和香腸等葷菜”，“每天的伙食標準一元錢”（當時，省會城市一般家庭成員一月的最低生活標準是 8~10 元；在全國工資類別最高地區和上海，收入較高的紡織廠工人的月工資一般僅 40 餘元）。遼寧省委照顧幹部的方法是，安排他們輪流“住在賓館，看看馬列書，同時改善伙食”。

對農村縣社基層幹部的補助水準，則遠遜於大城市。一些省地市縣經常以開會為由，讓縣社一級幹部在縣食堂補餐，“進城開會期間，三兩天有一頓豬肉，開四五天會，可吃兩次肉……幾天不吃藥，腫就消了”，因而許多農村基層幹部“最盼的就是到縣上開會”。由於幹部進城開會，吃住在縣城，農民根本不知幹部進城開會補養身體的事。

部分地區卻更熱衷於借著“照顧 17 級”的東風，將這個門縫越擠越大。據有關資料反映，1962 年上半年，河北省唐山、承德等七個專區，大大突破“照顧 17 級”的範圍，規定 17 級以上幹部，每人每月供應食糖 1 斤、大豆 3 斤、食油 0.5-3.5 斤，肉 0.5-3.5 斤，雞蛋 0.5~2 斤，紙煙 2 條，下水 2-3 斤，水產

3-5 斤，粉條 3-5 斤，豆腐 3-5 斤。豐南縣還別出心裁地將該縣 200 余名負責幹部劃為“三等九級”。縣委書記處書記一級，平均每月吃掉雞、鴨、豬羊肉 40 多斤，而縣委第一書記一個月則分到了 70 多斤肉。

林牧指出大躍進時期中央開會：就住所來說，除了政治局常委各有專用的別墅以外，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區在錦江飯店都有各自獨立的一整套公寓式住房。各省市的隨行人員，除了秘書、警衛員以外，秘書長、農村工作部長、計畫委員會主任，每人都有一個單間，第一書記和其他中央委員有一個大套間。就飲食來說：鄭州是吃飯不要錢，不交糧票和伙食費；不僅對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貴賓是這樣，對一般賓客也是這樣。上海規格最高，早餐和晚上加餐，由服務人員逐一徵求個人意見，要吃什麼就做什麼，然後由服務人員送到房間；中餐和晚餐，每頓換一種地方菜，餐廳貼著條子，“今日揚州菜”，“今日蘇州菜，”“今日粵菜”，等等。每晚的晚會都有好幾場，有毛喜歡的交誼舞和華東各省的地方戲曲；有劉少奇、周恩來喜歡的話劇、電影、歌舞。還有保齡球之類的娛樂。會場設置了一個小賣部，以低於市價很多的價格，為與會者提供上海牌手錶、衣料、食品 and 日用品。

空前的災難是毛澤東一手製造的，他雖不認帳，倒是作了一點表示。他於 1961 年 1 月 1 日起不吃豬肉和雞，為時 7 個月。這有點像 1400 年前的隋文帝。有一次，隋文帝楊堅視察正鬧饑荒的關中一帶，派員去看看鄉民們吃什麼。隨從取回一碗“樣品”——豆腐渣與雜糠混成的飯。楊堅要群臣都看看這碗東西，隨即承認是自己的過錯，並下令以後不得給自己擺宴，吃飯不得有酒和肉。如是堅持了一年，比毛澤東不吃肉的時間還長五個月。

1958 年秋毛在武昌會議上說：“廣西死了人，陳漫遠不是撤了嗎（1956 年

廣西餓死 550 個農民，從第一書記陳漫遠到縣委書記均受處分)？死 5 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大躍進餓死了 5500 萬人（宋美齡在美國國會說死 8 千萬，劉少奇的兒子說死 8 千萬，1961 年 1 月 21 日胡適說：“大陸上人民餓死的約六千萬。在梅縣一個村莊裡本有 4 千人口，已經餓死了一半，只有 2 千多人了。在北京，每人每月還可配到八兩油，在鄉村，每月每人只有一兩油。……大陸上人民真的是餓死了”），毛卻不說要撤他的職了。作為這樁空前的人間慘劇的禍首，他展示出什麼道德良心？5 千多萬冤魂在他心裡留下了多少悔恨？沒有，什麼也沒有。在 1961 年的廬山會議上，他就很不在乎地說：“錯誤就是那麼一點，有什麼了不得！”又說：“有一點損失，我一點不痛心，橫直沒有經驗。”

第 119 節 “三年自然災害”根本不存在

在 1930 年代初，史達林強行集體化而造成的農業大衰退大饑荒中，餓死了 800 萬人，約占當時蘇聯人口的 1/20。中國三年大饑荒中死了 4 千多萬人，男女比例約為 5:2；在那遍野的餓殍中，每 7 具屍體裡就有 5 名男性，約占當時中國人口的 1/15。

1958~1961 在中國發生的大規模饑荒是人類歷史上死人最多的一個人為慘劇，不但人類歷史記載的饑荒從未有如此慘烈，人類有記載的戰爭中的死亡人數也未超過這次大饑荒中的死亡人數，而且這是在很好年成發生的由執政者人為造成的慘劇。縱觀中國歷史，一九四九年中共上臺執政之前的 2129 年中，共發生 203 次死亡萬人以上之重大氣候災害，死亡了 2991 萬多人。而毛澤東一個“大躍進”，就餓死了 4400 萬人，其中農民餓死了 4219 萬。這個數字超過了中國兩千年大規模饑荒而餓死的人數的總和。美國在廣島、長崎投的原子彈殺傷了 10

萬人；共產風的威力比原子彈大整整 440 倍。這是怎樣的一場浩劫啊！

為了給領導人不可饒恕的嚴重錯誤開脫，宣傳機構編出了“三年自然災害”這個假話，以便把人禍解釋成天災。這個說法是中共建國以來的一個最大的謊言。

這三年只在局部地區出現過洪澇災害。從 1959 年到 1961 年出現的主要自然災情是局部性的旱災，當時只有約 10% 的農田受旱成災。從旱災的嚴重程度看，1959 年和 1960 年的旱災遠小於 1972 年或 1978 年的旱情。1972 年，糧食產量因旱災減產 1367 萬噸，但未出現全國性饑饉；而在旱情最嚴重的 1978 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反而達到了歷史最高水準。

1960 年 1 月 1 日，《紅旗》雜誌發表李富春文章《迎接一九六〇年的新躍進》，終於有“農業雖遭受嚴重的自然災害，但農業總產值較計畫超過很多。”如此，我們總算查到全國性“天災”的記錄，雖然只是一筆帶過的套話。不過它並沒有影響收成，反而超產“很多”。至少應該這樣理解，“天災”沒有對農業總產值的增長造成任何影響。但全國範圍內餓死人現象已經開始，第一個人民公社的發祥地河南信陽地區在這個冬天餓死上百萬農民。就在這餓死人的關頭，1 月 2 日，《人民日報》發社論《開門紅、滿堂紅、紅到底》。同日，新華社報導：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的公共積累 1959 年都比 1958 年有大幅度增長，僅河南省公社和生產大隊公共積累超 7 億，比 1958 年增長 50% 以上。可見，河南農村大批農民是在公共積累增加 50% 的情況下餓死的！也即，餓死人並非因災欠收，而是被“公共積累”搜刮殆盡所致。

1960 年《人民日報》的國慶社論一改過去鶯歌燕舞的調子，為民眾描繪出一幅可怕的圖畫：過去兩年來，全國大部份地區連續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1961

年 1 月，中共中央八屆九中全會公報把謊言編得更大了，“在 1959 年嚴重自然災害之後，1960 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災害”。隨著官方檔、領導人講話和新聞媒介眾口一詞地宣傳“自然災害”，再加上強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災害”這個被反復重複的謊言，終於變成了民眾心目中習慣成自然的關於那個困苦年代的代名詞。而政府和領導人的政治責任也被謊言洗刷得乾乾淨淨。在謊言面前，那冤死的數千萬農民似乎死得活該，只能怪“老天不長眼”了。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幹部大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央做的報告中談到工作中的失誤，指出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一說法比《人民日報》的欺騙宣傳要真實得多，但還是有所保留的。所謂的“三分天災”也是嫁禍於天，這三年基本上是正常年景，本不應出現饑饉。至於所謂的“七分人禍”，不但身為禍首的毛澤東拒不認帳，而且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不也是“人禍”的一部份嗎？

毛澤東後來把大饑荒說成是蘇聯“撕合同、撤專家”的結果。1981 年《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說：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和逼債，我國國民經濟在 1959~1961 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顯然，關於自然災害和蘇聯毀約仍然是虛飾之詞。

據周恩來透露，當時蘇聯並未要求中國提前還清外債，蘇聯提出中國可以暫時停止還款，可中國主動向蘇聯提出，用對蘇貿易的順差額中的一部分來提前全部還清債務。赫魯雪夫不但沒有逼債，還改變了中蘇貨幣的匯率，這樣把中國的債務減少了 77%。

1950 年至 1953 年蘇聯提供的軍火和為中國提供的設備，共 77.5 億元。到

1961 年底，共還掉 47 億。其中，1960、61 兩年間還掉的債 10 億元；這數目小得不值一提。再說中國有錢每年購買幾十萬兩黃金，斷無理由怨人家逼債。蘇聯單方面撤走核彈專家，終止對華經援協議，發生在 1960 年 7 月，當時大規模的餓死人的現象早已發生。而且蘇聯毀約的主要是軍工項目，赫魯雪夫取消軍工項目只會有助於緩解饑荒，因為用來買這些軍工項目的食品就不必出口了。若這些軍工項目果真能完全中止，那時中國至少可以少死上千萬人。但是，食品出口絲毫未減。毛堅持要用它們來提前還清欠蘇聯的債。本來欠蘇聯的債按協定應 16 年還清，但毛決定 5 年還清，要老百姓，勒緊腰帶”。就在 60 年，中國人餓死 2200 萬。

三年大躍進中，全國計畫外的建設投資化了 245 億，大都未取得應有的效益。若用它還債，取其 1/3 就把債還清了。僅 1961 年度全國報廢的工程就“折合人民幣達 150 億元”。這是中國對蘇債務的一倍！1958 年的大煉鋼鐵，就使我們損失了 2000 億以上，1957 年國民生產總值才 1068 億。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長 1986 年說：“據有關部門統計，大躍進給國家經濟上造成的損失近 3000 億元。”

1960 年供應蘇聯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1961 年許多商品不能出口或減少出口，給蘇聯造成一定的困難。國務院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在 1961 年曾說：“去年沒搞好，我們應該給蘇聯的豬肉也沒有給，什麼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民主德國的也沒有給，這個很不好。好呵！你們是大躍進，欠了人家的東西不給，你什麼大躍進啊？”可見，蘇聯並非如中共說的那樣逼債，恰恰相反，蘇聯對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諒解。我們永遠珍視、並且衷心感謝蘇聯黨、政府和人民給我們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援助（1961 年 4 月 10 日《人民日報》）。1961 年 2 月 27 日，赫魯雪夫以貸款的形式向中國提供 100 萬噸糧食

和 50 萬噸古巴糖，1964—1967 年償還，（蘇方還提出 1960 年貿易欠款可延續至 5 年內償還）不計利息；卻被毛斷然拒絕，周婉言陳述，毛才同意接受糖。除了幹部們，普通人誰能享受這些白糖？4 月 8 日見報的中蘇貿易會談公報：“蘇方提議：1960 年中國貿易欠款在 5 年內分期償還；8 月底以前借給中國 50 萬噸食糖，1964—1967 年歸還；兩筆欠款均不計利息”。公報沒提到 100 萬噸糧食。毛此舉反映了他為了“為首”而要求中國百姓“寧可餓死，不食周粟”之決心，可見，把餓死人的原因說成“蘇修逼債”是倒打一耙。

1961 年，經周恩來提議，中國向蘇聯提出，就近向蘇聯的遠東借 20 萬噸糧食，用以解東北的燃眉之急。儘管兩國交惡，蘇聯還是如數借給了中國，“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東北死人較少，蘇方出借糧食是原因之一。可中共卻封鎖蘇聯借糧的消息，一味煽動反蘇情緒，使老百姓誤以為中國的“困難”來自“蘇修”“背信棄義”……。

在糧食大幅度減產的情況下，救災賑民本是政府的主要職能之一。但當時的中國政府絕大多數領導人都一心執行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根本不去救災；甚至攝于毛的淫威，不敢談災情，相反還千方百計地掩蓋災情，迎合毛的好大喜功的心態，國務院因此於 1958 年取消了專事救賑的中央救災委員會。中國的歷代王朝早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救災制度。清朝規定，督撫要向朝廷“飛章奏報”災情，晚報一月官降一級，晚報三月革職；救災措施包括蠲緩地丁錢糧、賑濟災民、留養資遣流民、撫恤災民、施粥、施放衣物藥品、掩埋屍體、修房補助、借發種子、購糧平糶、以工代賑等。但中共領導下的這三年中，中國卻沒有任何救災機構，也沒有任何災情呈報、災情調查和災情評價，更談不上救災措施，結果中災變成了重災。

紅旗出版社 1994 年 2 月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一書，在書中的“大饑荒”一文裡有統計：“1959 年至 1961 年的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四千萬人左右。……中國人口減少四千萬，這可能是本世紀內世界最大的饑荒。”

國務院前任副總理田紀雲在《炎黃春秋》雜誌 2004 年第 6 期上發表文章《回顧中國農村改革歷程中提到：回顧三年困難時期，到處鬧浮腫，餓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比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死的人還要多。是什麼原因？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現在看基本上是人禍，這個“人禍”就是瞎指揮，就是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

當年的副總理、國家計委副主任薄一波總結說：“1959 年產量僅為 3400 億斤，比 1958 年的實際產量 4000 億斤減少 600 億斤。1960 年糧食產量下降到 2870 億斤，比 1951 年的 2874 億斤還低。在這兩年中，棉花、糖料、油料、生豬等主要農產品，也都大幅度減產。1958 年的‘大躍進’和 1959 年的‘反右傾’後的繼續‘躍進’，給我們國家和民族造成了嚴重的災難。我國人民所經歷的 1959-1961 年‘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鬥爭造成的。在‘三年困難時期’，全國廣大人民因食物缺乏、營養不良，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農村因饑饉死亡增加，據統計，1960 年全國總人口減少 1000 多萬。在和平建設時期發生這種事情，我們作為共產黨人實在是愧對百姓，應該永志不忘這沉痛的教訓！”（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歷史事件的回顧》下卷，第 902-903 頁）。

1998 年諾貝爾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發現：民主的國家不可能發生饑荒；因為公民政治權利能有效地防止經濟災難，它使人民有機會表達意見，民眾的壓力迫

使政府採取適當的救助行動。大規模餓死人的事件，往往發生在專制的國家。專制導致資訊封閉、分配的極度不均，從而發生大規模的饑荒。他將貧困和饑荒看作一個健康人被種種法規堵住嘴、蒙上眼、捆住手腳的結果。剝奪自由、剝奪財產、剝奪一切，就是中國那場駭人聽聞的大饑荒的根源。

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是一個不受制約的無限權力。1959年7月到9月正是糧食減產、糧食庫存急劇下降、數億農民即將進入饑饉狀態的關鍵時刻，中國的領導人卻在風景秀麗的避暑勝地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正做著讓全國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他個人登上世界共運霸主地位的黃樑夢，而其它高級領導人則爭相獻媚邀寵。只有彭德懷等少數幾個人敢於說了一點真相，立刻遭到了毛及政治局絕大多數委員們的一致打擊。這場從上而下發動的權力鬥爭把黨內僅存的敢於說真話的幹部都打倒了，留下來的都是迎合著毛澤東、為了個人權位而把老百姓的死活擱置一旁的幹部。

政府領導人對下級被迫作出的浮誇和虛報，信以為真，並予以鼓勵，而對反對意見進行政治迫害，官員們在虛假的情報和互相欺騙中度日，因而做出極端錯誤的決策，釀成世界史上死人最多的大饑荒。在三年大饑荒中，人挨餓了還不准喊餓。許多人就因為公開喊餓而被打成“反革命”。當時餓死的人統統被說成是得瘟疫死的，不能說餓死的。假如在當年，中國人民享有最起碼的個人權利，首先是言論自由權利，挨餓了可以大聲喊餓、大聲批評、大聲抗議，中國人還會被活活餓死嗎？

印度是個自然條件極差的國家，英國殖民印度前，印度的經濟發展水準比中國低得多。19世紀前，印度經常由於乾旱而發生餓死幾百萬人的大規模饑荒；印度獨立後由於實行了民主體制，儘管人均糧食產量、人均GDP較低，卻再沒發

生大規模饑荒。中國的自然條件比印度好得多，卻出現了連續三年大饑荒。這說明一黨專制制度是糧食短缺的原因，也是餓死過多人的原因。這說明不受限制的權力對經濟發展的破壞超過戰爭的破壞作用。

中國人時常拿印度比而驕傲，此乃虛驕耳！位於南亞次大陸，面積 297.47 萬平方千米，僅為中國面積的 30%。2000 年，中國人口 12.98 億，2001 年印度人口已達 10.27 億，為中國人口的 79%。印度人口的密度是中國人口的 2.56 倍。印度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全國大大小小的民族有 300 多個，其中最大的印度斯坦族僅占全國人口的 46.3%。

印度每年有來自大陸上的東北季風（10 月到第 2 年 5 月）和來自印度洋上的西南季風。吹東北季風的 8 個月裡，印度十分乾旱，土地龜裂，農作物不能生長，就連人畜飲水都很困難。到了西南季風盛行時，又是遍地汪洋。印度第二大城市孟買，最大月平均降雨量竟超過 600 毫米，每到這時，孟買的大街小巷的洪水可以行船。南亞是世界上乾旱和洪澇最嚴重的地區，而這種自然災害幾乎年年在印度和孟加拉國發生。中國雖然每年都有乾旱和洪澇災害發生，由於中國是個大國，一般不可能同時發生全國性的自然災害。可謂“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印度則不同，這兩種自然災害的發生，每次都是全國性的。可以說，乾旱和洪澇是制約印度經濟發展的最大自然災害。

中國的煤炭儲量世界第二，鐵礦的儲量世界第三，礦產儲量世界第一的就有十幾種。而印度除鐵、錳的儲量在世界占一席之地外，其餘大多數在世界都微不足道。印度的國有經濟的比重達到 40% 以上。1986 年國營鋼鐵業雇用 24 萬 7 千員工，生產 600 萬噸鋼。同年南韓的私營企業 Pohang 只用 1 萬員工，卻生產出 1400 萬噸鋼。印度經濟落後的主要原因在於甘地的社會主義思想。1992 年，印

度開始經濟改革，結果立即出現變化；整個九十年代，印度經濟的增長率平均每年達 6%以上！印度 2003 年的經濟增長已超過了中國！

印度人享有充分的流動自由。中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要暫住證，印度不需要；也沒不因沒有暫住證被關押被打死的情況；印度人可以在總統府的對面要飯，也可以在象中國長安街一樣繁華的地段搭棚生活，根本沒有以影響市容而象趕鴨子一樣到處趕，印度也沒有象中國一樣到處打砸攤主的城管，也不會因為三輪車影響政府形象被取締。在印度，只要你能在某個地方找到謀生的門路，沒有人管你，而在中國就嚴格的多。

印度人過的是傳統的簡約生活，生活品質高，不浪費錢。而中國人，去掉 50%的統計水分，還要再去掉 50%以上的消費中的浪費。比如：假貨假藥、摻水教育、劣質住房、不衛生食品等。這些年光聽說中國人冒著生命危險到處偷渡，誰聽說過印度人不要命地逃往世界各地？英國人在考察印度和中國後，得出的結論是：印度人的生活水準是中國人的三倍左右。

為什麼中國人均 GDP 比印度高，但生活水準卻比別人差了幾倍？為什麼中國醫療費用高得讓 50%人民不敢到醫院去看病？為什麼印度工人的最低工資超出中國幾倍？印度有真正的義務教育和全民的公費醫療，中國普通人有嗎？為什麼印度獨立以來一直成功地實行一人一票的選舉，中國卻不能實行？唯一的解釋就是共黨專制、專橫，把中國人當作政治奴隸。

第 120 節 毛時代餓死了 1 億 1 千 2 百萬人

自從 1956 年中國成了毛式社會主義的天下，人民就沒有好日子過了。一走進這個社會主義，農業就一蹶不振，人民就一直挨餓。70 年代末期，城市裡醬油、醋、鹹菜都要憑票供應，油炸花生米成為過年才吃得上的大菜。正如 1979

年中共四川省廣漢縣縣委書記常光南對省委書記趙紫陽所說：“大家對人民公社有意見。自從有了公社，就沒有吃飽飯”（見《海南紀事》創刊號《紫陽治蜀》）。田紀雲 1965 年在貴州農村搞“四清”，親歷“人民公社化”的所謂“優越性”。人民公社一般是一鄉一社或一區一社，以生產隊（自然村）為單位，集體吃飯，打鐘上工，敲鑼下工。一年四季，何時下種，種什麼，何時收割，怎樣收割，一切聽從公社指揮。那個時候，農民要想務工經商，會被當成不務正業，搞點家庭副業還會被當成“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一家養幾隻雞都有規定，超過是不行的。哪塊地種什麼都要按上邊的命令做。行距、株距都規定的很細。種的不對，就要拔掉。在這種制度下，農民簡直成了公社的“奴隸”。勞動時社員們像一把扇面，一字排開，一小時休息一次，一次半小時，實際上出工不出力，磨洋工，聊天、吹牛、說空話。結果是：公共食堂辦了不到一個月就垮了，連稀飯也喝不上了。毛式社會主義使幾億中國農民餓了 20 多年肚子。

對中共革命貢獻最大湖北省紅安縣，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輸送了 223 個將軍（差不多每 7 個將軍中就有一個紅安縣人）和兩任國家主席（董必武、李先念）。可是，共產黨執了政，人民卻依然生活在貧困之中，甚至比以前更窮。僅 1975 年的幾個月之中，便發生了好幾起共 52 名女青年集體自殺的事件。譬如一位父親在 1946 年為中共打仗犧牲的姑娘，全家辛苦幹活，到年底分紅，一共才得到六元錢，只夠買半件襯衫。她到縣城去，告訴早先為她保留一件她心愛的襯衫的售貨員，衣服不必留了，便回家換上一身最破的衣裳，與另外 4 位姑娘一起走進村外的水庫，一步一步讓水淹沒了自己。5 人中唯一獲救的姑娘告訴記者：“鄉里窮成這樣，不會有什麼指望的，還不如早死。”紅安縣委負責人不僅不自責，反說自殺者“怕苦怕累，給社會主義抹黑”，甚至說他們“生的糊塗，死的反動”。

周恩來夫人聞說此事，憤怒地說：“說這話的人良心何在！良心何在啊？”

安徽省金寨縣，也是全國有名的“將軍縣”，全國各地金寨籍的軍以上幹部有四百多人，授銜將軍的雖不如紅安多，卻也有一百多名。有名的戰將如曾任南京軍區司令的許世友，東海艦隊司令陶勇，就都是金寨縣老鄉。該縣“物產是豐富的、有板栗、香菇、木耳、竹、木柴、炭、茶，還有水晶石、大理石……”可是“一些山區窮得二十幾歲的大姑娘沒褲子穿，有的一家幾口人合蓋一條破被……許多老同志回到金寨，悄然淚下，深感愧對了老區人民。”

1973年6月，周恩來重返延安，看到延安地區為中共打天下盡了大力的人民由四十年代的“豐衣足食”淪入了少吃缺穿的境地，禁不住流下了眼淚。1975年12月28日周恩來說：“國家很不幸，建國26年，還有六億人口飯也吃不飽，只會高歌頌揚領袖”（當時的全國人口是7億）。”上將李志民，回家鄉湖南瀏陽調查後，發現人民貧窮如昨，十分痛心。他於1984年給中央寫報告：“回想當年敵人摧殘根據地時，我們曾鼓勵群眾：‘燒了茅屋不要緊，革命勝利蓋高樓！’現在，革命勝利35年了，革命根據地‘公路不通、電燈不亮、廣播不響’的情形應該改變了！山東廣饒縣，1924年中共在這裡建立了最早的農村黨支部。《共產黨宣言》最早的中譯本僅餘一冊完整，珍藏在這裡。所以1958年人民公社一成立，山東省委就宣佈該縣為“共產主義試點”。十幾年試下來，廣饒縣因外出討飯的人多而出了名。東起青島，西至濟南，無人不知廣饒淨出要飯的。那討飯隊伍還有一大特色，誰都有一張本村黨支部開具的證明，作為討飯身份的“介紹信”。

大躍進時代，全國流行著一首歌頌毛澤東的苗族民歌《桂花開放幸福來》：毛主席好比太陽明，照亮了苗家的桂樹林。山前山后的桂花開，苗家從苦難中走

出來。毛主席帶了幸福來，幸福和毛主席分不開。曲子本身是美的，但是“幸福”卻是謊言。貴州省的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小有名氣的林區，素有“杉木之鄉”之稱。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木材長期短缺的中國，那裡的苗族、侗族、漢族人民是不該為溫飽發愁的。然而人民公社搞了 20 年，把那十來個縣搞得一片蕭條。祖先留給他們，如今歸了“公”的杉木林，竟然只夠他們削一根討飯用的打狗棍！年復一年，他們在南方的淒風苦雨中乞討，從不知“幸福”是何滋味。

毛澤東號稱“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可是，其他各族人民的情況也並不比山地苗族人好多少。寧夏同心縣，80%為回族，1973 年的人均收作僅七點八元。四川的彝族作家吳承柏曾經這樣描寫本族普通農民生活的困苦：“老年人餓得脖子伸多長，孩子餓得瘦精精。”一位婦女“梳了幾個月的頭，攢下的頭髮賣得二角錢，準備拿去買鹽巴過年用……”

一位青年 1968 年即人民公社成立十周年的時候到海南島黎族人民生活的地區當兵。他這樣記述在五年間親眼所見的黎族人民生活困苦的情形：“黎族同胞還是以刀耕火種的落後生產方式勞苦躬耕，結繩記事的原始生活在這裡屢見不鮮……傳說這裡的黎胞常吃漚爛的小青蛙、四腳蛇之事，實實在在是真的。”1983 年總理趙紫陽訪問非洲後，回北京時路過海南島稍事停留，這位當年的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十分感慨地說：“訪問非洲十國之前，我以為非洲是全世界最落後的地區。現在看來，海南島比非洲還要落後荒涼。”

從海南島向北走，跨越整個中國來到北疆，便是內蒙古。1979 年的農曆正月十五，內蒙古第一書記周惠到了卓資縣的一個村莊，發現竟然有一些人家外出討飯還沒回鄉。按農村傳統，即使在外謀生也要在正月之前趕回家鄉，何況是討飯。

如果他們能從家鄉的人民公社那裡討得一點糧食，決不會流落不歸。周惠當即指示當地公社把部份土地、羊畜分給社員。社員得到了歸自己支配的一小塊田，將它稱為“救命田”。說是救命，一點不誇張，從此他們就不用外出討飯了。不過，內蒙古大草原上搞了二十多年人民公社，到鄧小平著手改革時，已有 1/3 草場退化，550 萬公頃草原變成了沙漠。

在毛澤東去世的 1976 年，黃河中游地區的一百多個縣，當年人均收入是 39 元，折合美金約 20 元，亦即當時一名美國技術工人兩小時至三小時的工資。如以一個勞動力養活三至四人計，那麼一個農民一年的收入僅相當於人家一天的工資。

據 1976~1977 年統計，全國有兩百多個縣的生產水準倒退到解放初期，少數還低於建國初期。另據 1980 年上半年對全國五百萬個農村核算單位統計，年人均收入 50 元以下的幾乎達到近 1/3。截至 1977 年，全國平均每人佔有的糧食，仍然低於 1955 年。

曾任安徽省書記的萬里說：“1977 年 6 月，黨中央派我到安徽當第一書記。安徽是個農業大省，農村問題特別嚴重，農民生活特別困難……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門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傢俱，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料到，解放幾十年了，農村還這麼窮！這能算是社會主義嗎？”“我剛到安徽那一年，全省 28 萬多個生產隊，只有 10% 的生產隊能維持溫飽，67% 的生產隊人均年收入低於 60 元，40 元以下的約占 25%，我這個第一書記怎麼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後發生的三年困難時期，到處浮腫病，餓死人。據瞭解，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萬。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過去‘左’了那麼多年，幾乎把農民的積極性打擊完

了”。

1977年11月上旬，萬里看望了一衣著破爛的婦女。萬里問：“你家幾口人？”“五口人，夫妻倆和三個孩子。”“他們哪裡去了？”“出去玩了。”“請你喊他們回來讓我看。”萬里催促兩遍，這位婦女面有難色，不願意出門去找。在萬里的再三催促下，她掀開了鍋蓋，只見鍋膛坐著三位赤身裸體的孩子。原來三個沒有衣服穿的孩子在利用鍋膛中的餘熱防寒。當時他淚流滿面，沉痛地說，“我們有何面目對江東父老，問心有愧呀！”

1978年全國農民中，生活水準不如五十年代前、中期的約占2/3，具體地說，公社化二十年使2/3的中國農民生活水準降低了。更讓人驚心的是約有1/3的農民吃糧水準不如抗日戰爭前的1930年代。1978年，我國農村約有1億1千2百萬人口每天只能掙到1角1分錢，有1億9千萬人每天掙到1角3分，有2億7千多萬人每天可以掙到1角4分。

有的地方農民出工在村頭上，看見地上有個東西閃亮，撿起來一看，竟是一枚五分硬幣，於是歎道：“這一彎腰比干一晌活掙的還多！”

山西雁北地區平魯縣的農民每天只能掙上6分錢。所以有農民哀歎：“堂堂七尺男子漢，人民公社好社員，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汗，早起幹到日頭落，不如母雞下個蛋！”

1949~1977年底，因饑餓死亡的有1億1千2百萬人，其中1959~1962的四年中，餓死了4400多萬人；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中後期，每年饑餓死亡3百萬至4百萬人。

毛澤東把中國變成“奴隸勞動營”。按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自從生產力發展到人能生產出比養活自己所需更多的產品時，就不殺俘虜，而是把這些人

變成奴隸，讓他們為奴隸主生產“剩餘價值”。在毛澤東統治的時期，中國人被餓死殺死和折磨死了上億的人。這些人連做奴隸的資格都被剝奪了。

第十八章 毛共爭當世界霸主

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其實就是要稱霸。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就行誰怕誰？不是人民怕美帝，就是美帝怕人民。這就是要與美帝爭霸！反右、大躍進、多生人口、造原子彈，就是為了稱霸。解放全人類、全世界無產者團結在毛周圍，就是要當紅色總霸主。

第 121 節 維護史達林 提倡個人崇拜



（毛澤東等悼念乾爹史達林）

毛對斯具有極深厚的感情，1953年3月5日史達林死時，毛表示極度的悲哀；全中國為史達林死下半旗，命令全國人民為其戴孝弔喪。1950年代在蘇聯

駐北京大使館擔任過秘書和參贊的奧鮑拉赫馬寧說：首先來到使館見大使潘友新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首腦周恩來，兩個人痛哭流涕，只是在恢復常態後才開始交談，互通情報。稍後毛澤東在全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陪同下也來到蘇使館。他竭力克制自己，不使激動情緒表現出來，但是他未能克制自己。從其一切表現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史達林的逝世真誠地受到震撼。他含著眼淚，有點兒站立不穩，他的幾位戰友則公開地哭了起來（《毛澤東與史達林、赫魯雪夫交往錄》P141）。3月9日，天安門廣場開追悼大會，全國舉哀，規定的紀律裡有一條：

“不准笑！”天安門城樓上掛著史達林的巨幅畫像，儀式以毛向斯像鞠躬、獻花圈開場。會上有多人講話，毛沒講，毛也沒到莫斯科給史達林送葬。江青那時在蘇聯，向史達林的遺體告了別。周恩來受命出席紅場上舉行的葬禮，同蘇聯領導人一道跟在史達林的棺材後面走。那天天氣特別冷，不怕冷的周恩來只穿著件薄薄的大衣。走在周後面的捷克黨首腦哥特瓦爾德(Klement Gottwald)，幾天後一命嗚呼，說是“感冒”，實際上是酗酒過度。在布拉格舉行葬禮時，周恩來也去了，碰上英國共產黨領導波立特，向周要了5500英磅重修倫敦的馬克思墓。

1953年3月5日史達林死後，蘇聯在宣傳上開始出現反個人崇拜的跡象。1953年12月25日，根據張聞天的指示，中國駐蘇使館研究室幹部和新華社莫斯科分社記者合寫的《蘇聯宣傳工作的幾個問題》和《蘇聯共產黨反對宣傳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兩份材料，報送北京。1954年3月27日，張聞天又向北京報送了《蘇聯宣傳中對史達林提法的改變》的調研材料。4月28日，毛澤東將此材料批給劉少奇，指出：“此件及去年冬季中宣部所輯關於反對個人崇拜反對教條主義的一個檔，都是重要檔，宜作為內部檔，印發給在京及在各地的中委，候補中委”。顯然，毛不想反個人崇拜，毛想充當社會主義陣營中的世界領袖；要為

自己樹立史達林在世時享有的那種至高無上的權威，享有那種世界性的萬人膜拜的威風。

1956年2月25日，赫魯雪夫在蘇共20大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揭露和批判了史達林的罪行。據檔案記載，赫魯雪夫在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作完後不久，蘇共領導人便將這一報告的節略本贈送給了前來參加蘇共二十大的波蘭、保加利亞黨、匈牙利黨、東德、南斯拉夫和中共代表團（團長朱德）。他的報告象一枚精神原子彈，震驚了全世界。3月10日，《紐約時報》發表了這個報告的全文。許多共產黨領袖和馬克思主義者紛紛發表評論。3月17日，中共中央召開書記處會議，與會者紛紛發言。首先對蘇共事先不同兄弟黨商量就批判史達林這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人物很不滿，認為這使兄弟黨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出現嚴重混亂，同時認為赫魯雪夫報告中全盤否定史達林是嚴重錯誤。

毛“認為自己就是中國的史達林”（《胡喬木文集第二卷》第147頁；毛澤東要維護自己的權威，就要維護史達林。史達林曾經高高在上，權傾一時，不可一世，如今威名掃地，淪為千夫所指。他害怕自己落得和史達林同樣的下場，於是在3月19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史達林犯過嚴重錯誤，但他仍然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赫魯雪夫的報告，一是揭了蓋子，一是捅了漏子。說他揭了蓋子，就是講，他的秘密報告表明，蘇共、史達林並不一切都是正確的，這就破除了迷信。說他捅了漏子，就是講，他作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實際上，赫魯雪夫並沒有全部否定史達林，也沒有徹底揭露史達林的罪行。然而赫魯雪夫批判個人崇拜，卻妨害了毛，因為毛正要搞對自己的崇拜。這才是毛的真正所“懼”。因為毛在1930年代的“肅反”的罪行

不亞於史達林。這就難怪當世界上的人都為史達林的殘暴行為感到震驚的時候，毛卻批評赫魯雪夫把史達林“一棍子打死”。這就是說，毛嫌赫魯雪夫對史達林揭露得太多了，批評得過分了。

毛在3月24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對於赫魯雪夫反史達林，中共應當表示態度，發表聲明或做出決議都過於正式，因為蘇共還沒有公佈秘密報告而且其後果仍在發展中，方式可以考慮發表文章。對此全體成員表示贊成，會議決定由陳伯達執筆，中宣部和新華社協助。經歷一番緊張的過程之後，《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作為《人民日報》編輯部的論文，發表在4月5日《人民日報》上。文章說：“中國共產黨慶祝蘇聯共產黨在反對個人迷信這一個有歷史意義的鬥爭中所得到的重大成就”；文章在分析史達林犯錯誤的原因時說：“他驕傲了，不謹慎了，他的思想裡產生了主觀主義，產生了片面性，對於某些重大問題做出了錯誤的決定，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後果”。這是把思想方法的原因(主觀主義和片面性)作為重點。至於個人迷信(即個人崇拜)問題，文章裡只是簡單地提到。文章強調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總是具有極大的優越性。即使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產生了史達林這樣的獨裁者，還是比那個不會產生獨裁者的西方民主制度具有“極大的優越性”。

1956年4月下旬，赫魯雪夫報告的全部內容傳達給了在京黨、政、軍機關中行政十三級以上的中、高級黨員幹部。傳達時鄭重宣佈過不許記錄、不許錄音、不許外傳。

毛在八大的一次預備會議上說：史達林犯錯誤的主要原因是認識問題或思想方法問題；所謂犯錯誤，就是那個主觀犯錯誤，那個思想不對頭。史達林為什麼會犯錯誤呢？就是在一部分問題上他的主觀跟客觀實際不相符合(《毛選》5卷

297 頁)。其實，這種回答等於什麼也沒有說。什麼叫錯誤？和客觀情況不符合的認識就是錯誤。問“為甚麼犯錯誤”，就是問“為甚麼主觀認識和客觀實際不符合”。毛回答的是什麼叫做錯誤，而不是為什麼犯錯誤。

1956 年 9 月 15 日，中共八大開幕，毛澤東致了 2400 字的開幕詞，全場竟鼓掌 33 次，“長時間的熱烈鼓掌” 6 次，全體起立 2 次。這個致詞完全回避了史達林的錯誤，也不提“民主”二字。劉少奇的政治報告寫上了“現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狀況之間的矛盾”；卻沒提反對個人崇拜。

反對個人崇拜只在鄧小平的《修改黨章報告》中提到，鄧說：“很明顯，個人決定重大問題，是同共產主義政黨的建黨原則相違背的，是必然要犯錯誤的。”

“工人階級政黨的領袖，不是在群眾之上，而是在群眾之中，不是在黨之上，而是在黨之中。… 對於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在對於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愛護，而不是對個人的神化。蘇聯共產黨第 20 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許多嚴重的惡果。” “黨中央歷來也反對向領導者發致敬電和報捷電，反對在文學藝術作品中誇大領導者作用。當然，個人崇拜是一種有長遠歷史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中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 要“從國家制度和黨的制度上做出適當的規定，以便對於黨的組織和黨員實行嚴格的監督”。鄧小平的這個話多少觸及問題的實質。不過他只是提對“黨的組織和黨員”實行嚴格的監督，並沒有特別提到對黨的領導人的監督，也許他認為黨的領導人已經包括在“黨員”的概念中了。其實，對領導人的監督才是最重要的。鄧的這種提法當然是經過毛同

意的，然毛的興趣不在此。毛要保護史達林。

八大還考慮了毛辭去黨的主席職務的問題。自批判史達林後，毛就提出準備在適當時候不當黨的主席，退居第二線，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問題。李志綏認為這是試探臣僚的中心。對毛的退居第二線的建議，黨中央起初並不贊成，只是由於毛再三再四提出，為了準備這種可能，才在黨章裡規定，“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這是專為毛設立的。八大後，黨中央安排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在第一線，主持中央工作，毛澤東在第二線。這本是尊重毛的請求，但真地這樣做了卻又使他惱火。事實上，毛此後並沒有真正退居第二線，他是把權力緊緊地抓在手裡不放的。對於黨內會不會有人借反對個人崇拜之機來削弱他的地位和權威，毛是保持高度警惕的。

大會根據彭德懷的建議，劉少奇和鄧小平在新黨章中將“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標”的話刪去，在“黨員義務”中也刪去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內容。八大用低調處理反對個人崇拜問題本是毛澤東同意的，但他仍然感到不高興。更使他不高興的是，七大黨章規定的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這一條，在八大的新黨章中取消了。這也是毛澤東同意的，但他的同意並不是真心，倒帶著試探的意思，看看大家贊成不贊成，誰贊成，誰不贊成（象趙高的指鹿為馬）。

然而，八大閉幕後的第三天，即在 10 月 1 日的國慶日的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卻認定劉少奇在八大關於主要矛盾的表述是錯誤的，主要矛盾仍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

1956 年 11 月 2 日，中共處理波蘭、匈牙利事件的特使劉少奇、鄧小平從蘇聯回國，毛立即召開政治局會議聽取劉鄧彙報。在會上毛說：我看有兩把刀子，

一把是列寧，另一把是史達林，現在，史達林這把刀子，赫魯雪夫這些人丟掉了（毛卻不說史達林這把刀子殺了多少俄國人）。除了史達林這把刀子之外，列寧這把刀子也丟得差不多了。赫魯雪夫在“20大”報告上說，可以通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基本上就丟掉了。

11月4日，政治局開會討論匈牙利局勢。周恩來首先發言：“當前西方世界利用匈牙利事件大肆反蘇反共，各兄弟黨內出現了動搖分子以至變節分子。……蘇共領導人表現軟弱無力。我們黨應作中流砥柱，力挽狂瀾。”毛澤東提議，適應四月發表的《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後的政治思想狀況，有必要發表一篇新的文章。此項提案被通過。

11月10~16日，八屆二中全會召開。劉少奇在會上作《目前時局的報告》。劉首先指出波匈事件的共同特點是“廣大群眾的反蘇運動，是社會主義內部的問題”，接著指出：“波蘭事件非馬克思主義有一些”，而“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取得領導權”。劉談到波匈事件遠因和近因。遠因之一，波匈在對地主、資產階級的鬥爭中，沒有把工人和農民組織起來，也沒有劃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界限；知識份子沒有思想改造；肅反中犯了錯誤，整了好人，真正的反革命卻沒肅清；工農缺乏階級覺悟等。遠因之二，重工業投資過多，不重視輕工業、農業，人民生活沒有改善；領導人有特權，人民生活苦，群眾不滿。遠因之三，搞教條主義，照搬蘇聯不靈，便失去信心等。近因之一，蘇共二十大批判史達林在黨員群眾中引起混亂；近因之二，事件發生初期，蘇聯處置不當，特別是波蘭事件。近因之三，南斯拉夫進行煽動。

如何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訓？劉少奇提出：要防止黨和國家的領導機關及各級領導人脫離工農勞動群眾，形成新的“貴族階層”。劉說：“如果我們不注意，

讓其自流的話，在我們這些國家，也可能產生一種新的‘貴族階層’。在工人階級裡面可以產生，在共產黨裡面也可以產生。我想是有這種可能性的。”關於防止新貴階層出現的措施，劉少奇首先提出的是必須對權力有所限制：“什麼事情他有多大的權力，什麼事情不准他做，應該有一種限制。”其次，“國家領導人員的生活水準應該接近人民的生活水準，不要過分懸殊”。這包括縮小工資差別、取消特權等。還談了取消幹部終身制的問題，劉認為在這方面可參考西方國家的做法，他列舉了美國華盛頓、艾森豪、馬歇爾的例子，又借用毛的話說：資產階級民主，特別是初期，有那麼一些辦法，比我們現在的辦法更進步一些。劉複述了毛關於八大報告對主要矛盾的表述是錯的、現階段的主要矛盾應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的觀點。

11月13日，毛在政治局會上提出：所謂“非史達林主義化”就是非馬克思主義化，就是搞修正主義。14日晚，毛在會上說：“東歐一些國家不斷在政治上混亂，基本問題是領導層沒有階級鬥爭觀念，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新老反革命沒有搞掉，這方面我們要引以為戒。……我敢說，我們黨內也有階級鬥爭”。

15日毛在八屆二中全會上再次強調：“關於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我想講一點。我看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史達林。現在，史達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莫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這把刀子殺蘇聯，反所謂史達林主義。歐洲的許多國家的共產黨也批評蘇聯，這個領袖就是陶裡亞蒂。帝國主義也拿這把刀子殺人。杜勒斯就拿起來耍了一頓。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丟出去的。……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雪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這把刀子）

就基本上丟掉了”（《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321—322 頁）。

1956 年 11 月 11 日，南斯拉夫領袖鐵托在普拉發表演說（1955 年蘇聯和南簽署《貝爾格勒宣言》，肯定了“社會主義制度的不同和發展社會主義具體形式的不同，完全是不同國家人民自己的事情”）。鐵托認為：史達林的問題不是“由於史達林老了，他開始有點愚蠢起來，犯了各種錯誤”，也“不僅僅是一個個人崇拜問題，而是一種使得個人崇拜得以產生的制度問題”（《鐵托選集 1952-1960》，pp. 119-120，人民出版社 1983 年）。鐵托主張：不能簡單地把匈牙利危機說成是反革命事件，他批評匈牙利領導人邀請外國軍隊教訓自己的人民是“嚴重的錯誤”。鐵托反駁了南斯拉夫應對匈牙利鬧事和事態擴大承擔責任的看法，認為這些觀點來自“頑固的史達林主義分子”，他號召各國把史達林主義分子趕下臺。

普拉演說引起了蘇聯集團的圍剿。中共領導人也加入到圍剿行列。從 11 月 25 日開始，毛澤東差不多每天都召開政治局常委會，並通知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著重議論鐵托的演說。從此時起，中共的中心工作便是開展與國際共運中形形色色的“修正主義”思潮的論戰。常委會認為，鐵托提出反史達林主義和反史達林主義分子，完全搬用西方資產階級對共產黨的誣蔑，是西方分裂共產黨、分裂社會主義陣營的惡毒做法。鐵托要把犯錯誤的人趕下臺，把他們當作敵人對待，是完全錯誤的。毛澤東說，所謂史達林主義，就是史達林生前的思想和觀點；所謂史達林分子，指的是跟著史達林走的人。依我看，史達林基本上是正確的，是“三七開”。史達林主義基本上也是正確的。……而史達林是好人犯錯誤，鐵托的觀點要徹底駁倒，否則共產主義隊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現在看來史達林主義還是要的，非保持不可，因為它基本上是對的，這把刀子不能丟掉。這

是我們的資本，跟列寧主義一樣。

11月29日毛提出要寫一篇題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文章；“對鐵托，對蘇聯，都要有批評，通過批評達到團結的目的。”30日毛澤東將常委會上討論意見歸納為四點：第一，十月革命是各國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個別民族現象，而是具有時代特徵的國際現象，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規律。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第二，各國有不同的具體情況，因此各國要用不同的辦法解決各自的問題。各國革命都有具體的民族特點，十月革命本身也帶有一些民族特點。但是，所有道路都有其共性，條條道路通莫斯科。第三，蘇聯建設時期，史達林的基本路線、方針是正確的，應加以肯定。有缺點，是難以避免的，可以理解的；史達林過分強調專政，但蘇聯的專政基本還是對的。民主不夠，但也有蘇維埃民主。第四，區別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鐵托用對待敵人的辦法對待史達林和“史達林分子”，是分裂共產主義隊伍。

在12月2日的常委會上，毛進一步闡述了他的觀點：一、要講世界革命的基本規律、共同道路，然後講各國革命的具體道路，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要和各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二、講清史達林主義。應明確地講，史達林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是有缺點的馬克思主義。所謂非史達林主義化，就是非馬克思主義化，就是搞修正主義。三、講清沙文主義。要提倡國際主義，反對民族主義。四、先要分清敵我，然後在自己內部分清是非。要分清兩類事件性質根本不同，說明當前的反蘇反共風潮就是一種階級鬥爭，是國際範圍的階級鬥爭。要指出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是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矛盾，要採取不同的方針、不同的辦法，解決不同性質的問題。五、既要反對教條主義，也要反對修正主義。蘇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觀點，特別是批判史達林時的一些論點和採取的方法，否定一切的做法，

助長了共產黨內部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助長了修正主義思潮的氾濫。“現在修正主義思潮集中在一個問題上，這就是不要無產階級專政”。六、文章從團結講起，最後也落腳到團結。關於文章題目，毛建議將文章改名為《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教訓》（以下簡稱《再論》）。最後，毛指定他的胡喬木和田家英以及吳冷西起草文章。三人分工後，各寫一部分，最後由胡喬木通改全稿。

12月23日、24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再論》，當時主管意識形態的陸定一認為，不講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背叛。與會者處處為史達林擺好，甚至認為肅反擴大化也“有它正確的一面，殺人殺多了但對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是殺對了，問題是擴大化，此外，即使認為史達林有大國沙文主義，但還是認為他在多數情況下，堅持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會議特別認為：“史達林的錯誤不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28日，毛看完修改稿後決定當晚上廣播這篇文章，29日《人民日報》發表該文。

《再論》開頭說：“帝國主義在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中的活動，是帝國主義在侵朝戰爭以後對於社會主義陣營一次最嚴重的進攻。……匈牙利事件是由內部和外部的幾方面原因造成的，任何片面的解釋都是不正確的，而在這些原因中，國際帝國主義‘起了主要的決定性的作用’。”這是顛倒黑白的、指鹿為馬的說法。

《再論》對史達林使用“三七開”。文革結束後，對毛的評價也“三七開”。文章說，史達林後期的一些錯誤，之所以發展成為全國性的、長期的、嚴重的錯誤，而不能得到及時的糾正，正是因為他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脫離了群眾和集體，破壞了黨和國家的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由社會主義制度而來。試問：為什麼史達林能夠破壞黨和國家的民主集中制？為什麼人民眼看著史達林脫離了

他們而成為獨裁者，卻不能採取任何措施去及時地糾正？這不是仍和這個制度本身的缺陷有關嗎？這些問題都被文章回避了。

《再論》批評鐵托把史達林當敵人，說：兩種性質不同的矛盾，一種是敵我矛盾，另一種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後者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發生不是由於階級利害的衝突，而是由於正確意見和錯誤意見的矛盾，或者由於局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決首先必須服從於對敵鬥爭的總利益。人民內部矛盾可以而且應該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獲得解決，從而在新的條件下得到新的團結。文章肯定了史達林同蘇聯人民之間沒有根本的衝突，只是史達林錯了，這種錯誤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可實際上，史達林做到了敵人想做而又做不到的事情。史達林對蘇聯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怎麼能用“人民內部矛盾”的標籤輕輕開脫呢？怎麼能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辦法來解決呢？《再論》根本不提反對個人崇拜。1957年3月1日，負責起草《再論》的康生在介紹《再論》時說：《再論》和《一論》基本相同，但有一點不同，《一論》中有反對個人崇拜問題，《再論》中就不再提這個問題了。可以說，從1956年底開始，毛澤東就不再主張反個人崇拜了。

《再論》正式提出“反對修正主義”問題，並對修正主義從內容上作了如下界定：“藉口反對照抄蘇聯經驗，而否認蘇聯的基本經驗”，“藉口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而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藉口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企圖削弱或者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修正主義的要害是“不要無產階級專政，要資產階級民主”。

這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就出現了對“史達林現象”原因的不同分析：蘇共著重於譴責個人崇拜，中共強調思想方法問題，而南共把重點放在制度上。

1980年8月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說：“史達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鄧選》第2卷333頁）。按這話的意思，史達林的專橫和暴虐行為能夠發生，是由於蘇聯沒有實行英美法等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英、法、美都是憲政國家，有高度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這種制度使得“史達林現象”不可能產生；如果有人像史達林那樣濫用權力，早就被趕下臺了。可見，要避免重蹈史達林的覆轍，答案應該是改革政治制度、健全民主法制。但鄧引證的毛的這個話在以前從未發表過，而毛公開的話是和這相反的。毛批評鐵托，不正是因為鐵托認為史達林問題的根子在於制度嗎？如果毛表達了這樣的思想，豈不是美化資本主義了嗎？對於毛來說，必須維護社會主義制度，哪怕是史達林這種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毛像史達林一樣是一個喜歡集權的人，他絕不能容忍中國實行英美式的民主。

1957年2月27日，毛在最高國務會議第11次會議上做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他說：敵我矛盾用專政的方法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即批評自我批評）來解決。毛不指名地批評史達林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混淆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毛以“正確處理”的方式來回應史達林教訓是錯誤的。因為黨的領導人掌握了絕對的權力，那麼勸告他們“正確處理”就是可笑的——他們永遠是正確的，因為甚至什麼是正確、什麼是不正確，也是由他們說了算的。避免史達林錯誤的關鍵是人民要對領導人和官吏實行監督，防止他們濫用權力，在他們幹出荒唐事（例如混淆兩類矛盾）的時候，有辦法制止他們甚至罷免他們。這就要避免權力過分集中，實行民主制度。毛把一個需要依靠法制來解決的問題，當成了領導人的認識問題或思想方法問題。

毛澤東關於史達林混淆了兩類矛盾的說法，開脫了史達林的罪責。到現在，仍有許多人沿襲毛的說法，說史達林的錯誤是“肅反擴大化”（赫的報告並沒有這樣的提法）。其實史達林哪裡是什麼“肅反擴大化”！他根本就不是搞肅反。

“反革命”、“人民的敵人”、“帝國主義的間諜”不過是他給政治對手羅織的罪狀。他實際上是用“肅反”為掩飾來進行黨內鬥爭，消滅政治上的反對派和異己分子，鞏固自己的權力。這根本不是什麼史達林的“主觀主義”和“片面性”，而是史達林的絕對權力欲造成的。

毛認定，黨的領袖都是善意的，所以，一旦他們認識到自己是犯了混淆兩類矛盾的錯誤，就會改正。可是如果史達林在世，他是決不會採取這種“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辦法來改正自己的錯誤的；相反，他會把敢於批評他的人殺掉。在這種情況下，人民難道只能等待領袖變得賢明起來，自己不能作什麼嗎？如果這個制度並沒有能防止野心家掌握權力，掌握權力後又變成獨裁者，那麼怎能說這個制度不需要改革呢？

毛澤東提出的兩類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是政治概念，不是法律概念。在戰爭時期，劃分敵我是首要問題。對一個人，首先要知道他是敵人還是朋友，然後決定對他採取什麼態度。但是把這個方法搬到和平建設時期就不對了。共黨已經取得了政權，已經制定了憲法和法律，應該依法辦事；拋開了這些手段不用，而根據人們的階級地位和政治態度來決定是否採用專政手段，這本身就使正確的處理成為不可能。

什麼是人民（我）？什麼是敵人？毛澤東在《正處》中說：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

人。

“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具有很大的隨意性，並沒有嚴格的界定。“人民”和“敵人”在邏輯上並非一對“矛盾概念”，而是“反對概念”；換句話說，並不是任何人不是人民，就是敵人。有些人不問政治，對於社會主義事業態度冷淡，但也不反對和敵視；有些人覺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動搖；對於這些採取中間立場的人，該劃在“人民”一邊呢，還是“敵人”一邊呢？毛的定義不說個人，只說“階級”“社會集團”，似乎判定某人是不是敵人不是根據他本人的表現，而是看他屬於哪一個階級，似乎敵對階級的每一個成員都是敵人，而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每一個成員都不會變成敵人。這就走向了唯成分論。

這個標準是毛提出來的，並不是經過立法程式制定出來的。那麼裁判就只能是由共產黨的各級黨委、是毛澤東。毛的這個原則，史達林完全接受。因為史達林也會，他所消滅的是“人民公敵”，而誰是敵人是由他來判定的。史達林說誰是“人民公敵”，誰就是“人民公敵”，安全機關就要把他逮捕和處決。史達林凌駕在法律之上，他可以制定法律，法律卻管不了他。

毛說，專政的手段不適用於人民內部。這並沒有阻止他濫用專政的手段。如果要對一個人實行“專政”，只要先把他定為“敵人”就行了。照毛的解釋，只有“人民”才享有公民的自由權利。你是“人民”，你有言論自由；可你一旦批評了政府、共產黨或領袖，你就很可能被看作是“惡意攻擊”，於是你就變成了“敵人”，從而不再享有言論自由的權利；你的那些批評言論，也成了你的“反革命”罪證。毛髮明瞭以思想劃階級的理論；實際上就是以附和還是不附和毛澤東思想作劃分階級的標準，前者就是無產階級，後者就是資產階級。這就是文革

中出現許多“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人）的原因。

毛認為專政只是對敵人的，他所說的專政機關包括法院、檢察院和公安部門也應該只是對敵人的。實際上，這些機關所處理的絕大多數案犯都是毛所說的人民而不是敵人。毛解釋說，“人民犯了法，也要受處罰，也要坐監獄，也有判死刑，但這只是若干個別的情形，和對於反動階級當做一個階級的專政來說有原則的區別”（《論人民民主專政》）。但在各類刑事案件中，“反革命案件”只占極少數；大量的人民犯法。另外，那些屬於反動階級和政治態度不好的人，如果沒有犯法，難道也要被專政嗎？如果兩個人犯了同樣的法，情節相同，是否應該根據其階級出身加重或減輕其刑罰？在法律面前是否人人平等？

其實，在這裡應該區別的不是什麼“人民”和“敵人”，而是有罪和無罪。專政手段是對付犯罪的，包括“人民”中的犯罪，當然也包括“反革命罪”。毛澤東說的“敵人”，從法律的概念上來說，應該是“反革命罪”。這裡適用的原則是“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而不是根據政治態度或階級出身，否則就給任意扣“反革命”帽子開了綠燈。

在一個民主的、司法獨立的國家裡，本來就用不著什麼“嚴格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樣的理論。它純粹是多此一舉，無益而有害。

毛不許批判個人崇拜，因為他需要別人崇拜他。毛捍衛史達林，其實是捍衛他自己的領袖地位。1910年秋17歲的毛寫了《七絕·詠蛙》：“獨坐池塘如虎踞，綠楊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那個蟲兒敢作聲？”毛的那種睥睨世人、不可一世的獨裁勁頭一覽無餘。

1925年他在《沁園春·長沙》說：“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這是毛想做

皇帝意識的暴露，因為中國文化的密碼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要主宰大地，就是想當皇帝！對市場經濟來說，“主沉浮”是變態，必須依靠民主制度，才能達到“萬類霜天競自由”！

1936年2月他在《沁園春·雪》中說：“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那時他在江西原有30萬人，到陝北時只有幾千人，有什麼風光可言？唯一值得一提的是，毛掌握了軍權，象未當皇帝的宋太祖，準備黃袍加身，延安整風就是確立他的核心地位(皇帝地位)；此詩1945年發表時，更是被輿論指責為毛澤東想當皇帝，要復辟專制制度，果然！

司馬璐在《中共歷史的見證》中說，他在莫斯科時，一位王明身邊的陳女士告訴他，劉少奇曾多次警告王明，說：“你千萬不可冒犯毛。”王明說：“我們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不是很正常的嗎？”劉說：“中國國情不同，批評毛澤東就是犯上。”王明說：“黨章上有這一條嗎？”劉說：“毛成為黨的領袖、中國革命的領袖，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實際形成的，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毛的領袖權威是不能碰的。”王明說：“你這麼說，毛澤東同志豈不是成了皇帝。”劉說：“是的，你說的一點都沒有錯，毛澤東就是皇帝，是革命的皇帝，是中國革命的皇帝。”司馬璐還寫道：在1943年11月底的一次會上，周向毛澤東檢討，突然向毛下跪，連聲說：“我認罪，我認罪。”毛一驚，厲聲罵道：“你這不是罵我是封建皇帝嗎？”周說：“主席的確是中國革命的皇帝，我和少奇同志都一致同意的。”

以下是周病危期間與鄧穎超談話的部分摘錄：“1944年5月21日，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選出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主席團會議，並決議：得票最高者為主席團主席。劉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是第四。但在內部由

我提議：主席還是由毛來擔任。朱老總很反感。我又一次做了違心的錯誤抉擇”。

“1956年9月29日，中共八大後第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二項決議：黨的主席規定連任一屆；要限制領導人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黨內要體現民主集中制；是林伯渠、羅榮桓、彭真提議的。17名政治局委員，15名贊成，惟有2人（即：毛、林彪）棄權。決議都給個人意志廢了，我們也有責任和罪過”。

在1958年3月18日的成都會議上，陳伯達在會上有個長篇發言，由反右講到王明說延安整風，搞出了兩個東西：一個民族主義，一個個人崇拜。毛插話說：

“說個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點”。陳伯達在說到我們是國際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有權威、有中心人物，但並不是個人崇拜。毛插話說：“怎麼不是個人崇拜？你沒有個人崇拜怎麼行？你又承認恩格斯，你又反對個人崇拜。我是主張個人崇拜的。”陳伯達接著說：“歷史已經做出結論。……沒有延安整風，中國革命不可能勝利。”

毛說：“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而在於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體領導也不成。……打死史達林，有些人有共鳴，有個人目的，就是為了想讓別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對列寧，說列寧獨裁。列寧回答很乾脆：與其讓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因此，只要正確，不要推，不如我獨裁；也開點會，不全是獨裁就是。不要信這個邪，你反對個人崇拜，反到天上去，無非想自己獨裁。”陳伯達立即說：“個人崇拜如果按這個

定義，全部正確”。

劉少奇在會上發言說：“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不論從思想、觀點、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們都比他差一大截。”陶鑄說：“對主席就是要迷信”。柯慶施甚至說：“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柯慶施的這段“名言”，隨著成都會議向全黨傳達，竟傳遍四面八方。於是，何慶施博得“毛主席的好學生”的美譽。周恩來在發言中專門談了“向毛主席學習”的問題，他說：“中國幾十年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證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離開或者違背他的領導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發生錯誤、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錯誤就足以證明這一點；反過來，做對了的時候和做對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領導思想分不開的。”薄一波表示：“我們有了毛主席這樣的舵手，有了這樣英明的領導，我們只要老老實實地向他學習，老老實實地按照他的指示辦事，就可以避免犯反‘冒進’那樣的錯誤，在經濟建設上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緊接著，毛講了一件事情：中國畫家畫史達林和毛澤東在一起的像，把毛澤東畫得比史達林矮一些（實際情況相反，毛高一些）。這件事顯然使毛澤東耿耿於懷。他評論說，這是盲目屈服於那時蘇聯的精神壓力；好象塑菩薩，總是比人大好幾倍，為了嚇人。

其實，個人崇拜是一種蒙昧主義的認識和態度，它把領袖個人神化，強調人民群眾對領袖必須絕對忠誠，無條件的服從，有什麼“正確”可言呢？對待真理，“崇拜”並不是科學的態度，只有認真研究、努力實踐，並“把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才是正確的。更不能因為有時候真理在少數人手裡，就否定集體領導的原則和制度。

1958年毛在成都附近一個合作社聊了聊天，報上馬上報導：“社員們都說：能夠看到毛主席，是一輩子最大的幸福；毛主席看了自己社裡的莊稼，是全社最大的幸福。”毛在十三陵水庫鏟了幾鏟土，這幾鏟土大概是毛執政以來的唯一一次勞動，《人民日報》頭版跟著就是一篇妙文：“當毛主席鏟土的時候，在周圍聚集上萬的人以幸福的眼光仔細看著毛主席怎樣把一鍬一鍬的上送進柳條筐裡。毛主席剛一放下鐵鍬，一個叫餘秉森的解放軍戰士，馬上用自己的衣服把這張鐵鍬包起來。他激動地說：看到這張鍬，我們就想起了毛主席，這樣，我們的幹勁就會更大”。毛視察河北省徐水縣農村時摸過一株棉花，結果這株棉花就被系上紅綢飄帶，成為來徐水參觀的人須先看的景觀。宋徽宗的寵臣朱勳（貪官朱勳有田“至三十萬畝”）就曾把皇帝握過的地方纏上黃綾子以示重視。毛當年握過一個人的手，這個人就幾個月不洗手。1976年華國鋒的畫像送到一個省，省委書記、省革主任都帶著大家敲鑼打鼓迎接。中國依然處在皇權迷信時代。胡喬木說：毛基本上是史達林型的，但在建設新世界方面、在科學技術上，還不及史達林，而是刻意輕視科技並以此自豪。例如史達林的學術文章，一般是在學術刊物上發表，《真理報》即使轉載也不用大字標題。而我們在報紙上，只要是毛寫的東西，不管什麼文章，甚至詩詞家信，還有各種手跡，非登第一版不可，有時還在第一版幾乎用整個版面來登領袖照片，這些都是世界上少見的。史達林焉能不自歎不如？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說：“馬克思也是人，馬克思革命沒有革成，我們革成了。馬克思沒有幹過中國這樣大的革命，我們的實踐超過了馬克思。這種革命實踐反映到意識形態上，就成為理論”。會議所有代表團都神化毛澤東，說：中國出現毛，如同“德國出馬克思、俄國出列寧一樣”；毛“是真

理的代表”；毛思想“是活的馬克思主義”，學馬列要以“學毛著為主”等話語中，不難看出，林彪六十年代所唱的高調，已經露出端倪。

第 122 節 反右派 整黨外

1956 年通過合作社實現了資產國有化；1957 年通過反右達到了思想的國有化。

1·雙百方針

1953 年，中宣部就中國歷史研究中的一些爭議問題請示毛澤東，毛澤東回答說：“把稿子印發給全國歷史學家討論，實行百家爭鳴。1956 年 1 月，中央召開了“知識份子問題”會議，周恩來指出，經過“思想改造”後的知識份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份”，是國家建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為改變科學落後的狀況，會後又號召“向科學進軍”。

1956 年 2 月中共中央在毛澤東居所頤年堂開會，陸定一就學術自由做專題彙報，以“米丘林生物科學”與中國經典遺傳學派的長期交戰為例，說明在學術領域實行專橫的行政干預的危害。報告得到中共中央認可，會議決定對學術問題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1956 年 4 月 25 日毛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他說：“今後社會上的鎮反，要少捉少殺”；至於機關、學校、部隊裡清查反革命，要“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真憑實據的反革命，由機關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檢察機關不起訴，法院也不審判”。既然是“真憑實據的反革命”，為什麼不捉、不起訴、不審判呢？法院不審判，誰來判定是“真憑實據的反革命”呢？毛把清查和處理反革命的許可權交給機關、學校和部隊的黨委了。這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種做法看起來寬大，其實蘊藏著極大的危險：不經過起訴和審

判就定為“反革命分子”，那就肯定有不少冤案；蒙冤者到哪裡去申訴？如果可以抓不關的人也可以是“反革命”，那麼給一個人定“反革命”就不算回事了。

李慎之第一次聽傳達的記錄有這樣的話（《論十大關係》發表時都被刪了）：“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甚至包括反革命的力量。”“人要有統一性，也要有獨立性；要有紀律性，也要有無紀律；要有集體主義，也要有自由主義。”“中央成立一個體制小組，專門研究如何劃分權力。”“美國發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以學習之處。我們反對它，只反對它的帝國主義。”“蘇聯只有一個黨，到底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看來還是幾個黨好。……共產黨要萬歲，民主黨派也要萬歲。”“對犯錯誤的人要看他是否改。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不要學史達林，史達林對犯錯誤的人不讓改正，這是不好的。”毛 1956 年說“我們實際上實行的是訓政”，慎之以為毛在實行“必要的專政”即訓政後，馬上要“還政於民”，要實行民主了。

1956 年 4 月 28 日，毛在一個重要講話中正式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即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這個方針曾在知識界引起了熱烈的反響，甚至引起了國際上的重視，好象是一項毛澤東的新創造。其實，1954 年的憲法上早已明文規定了藝術創作和科學研究的自由；憲法還規定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結社自由。毛澤東本應該重申共產黨遵守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但他卻把藝術和科學的自由挑出來，當做黨的一項政策，恩賜給群眾。這是一個倒退。人們對雙百方針的歡呼，只表明憲法被遺忘了，只表明毛澤東的權威高於憲法的權威。如果這種自由是建築在個人的權威和黨的恩賜之上，那它就成了靠不住的東西。領袖和黨既然可以

制定這樣的政策，那也就可以收回這樣的政策。後來的事實果然如此。

1956年5月3日，周恩來同志在傳達毛澤東同志的《調動一切積極力量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講話時說，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制度的一個缺點就是一黨制，它使民主少了，集中多了，不容易聽到不同的意見，這本身就包含著它的陰暗面。一個黨，就是一個鼻孔出氣，呼吸就不舒適，會使思想僵化，社會停滯起來（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教授郝鐵川：《執政能力參政能力都要強——二論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2004年8月9日《解放日報》）。

1956年5月26日，陸定一在北京懷仁堂代表中央就雙百方針作了闡釋。陸鼓吹有獨立思考的自由和宣傳唯心論的自由，但不要象王實味。有人歡呼“知識份子的春天”來了！為創造百家爭鳴的氣氛，中共於7月間將已經停刊的上海《文匯報》復刊，製造寬鬆氣氛。

2·毛澤東準備對付國內“小匈牙利事件”

毛澤東督促蘇聯鎮壓匈牙利人事件後，又時刻準備鎮壓國內“匈牙利事件”。11月初，就在鎮壓匈牙利人民緊張的時候，毛派秘書林克就波匈事件到新華社徵求意見。新華社的人員提出了議會民主、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分權削權、選舉制度等問題。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對國際部副主任李慎之說：“毛主席說我們現在還是在訓政時期，實行的是愚民政策；我們的問題不止是官僚主義，而且是專制主義”。李慎之說“我們應當實行大民主”；應制定一個還政於民的五年計劃；在小學和中學設立公民課或憲法課；建立憲法法院等。毛聽了林克的彙報後說：“大民主就是要上大街，是對敵人的，我們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林克向毛解釋說，慎之不是這意思。毛說：“他們主張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實際上與上大街沒有什麼不同”。1956年11月15日毛在八屆二中

全會上提到：“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份子幹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採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他們這種主張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缺乏階級觀點，是錯誤的。”

在毛看來，民主從來就不是一種制度，無論“大民主”還是“小民主”，都不過是統治或鬥爭的手段。他在八屆二中全會上，首次提出用“大民主”來對付官僚主義（《毛選》5卷324頁）。他聲稱：“現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贊成。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裡。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麼，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毛選》325-326頁）。從毛這番話中，可以毫不費力地尋出他後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來源。“我們憲法上規定有遊行、示威自由，沒有規定罷工自由，但是也沒有禁止，所以罷工並不違反憲法。有人要罷工、要請願，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誰想鬧誰就鬧，想鬧多久就鬧多久，一個月不夠就兩個月，總之沒有鬧夠就不收場”（《毛選》5卷353頁）。

毛把遊行示威稱為“大民主”。“無產階級發動的大民主是用來對付階級敵人的”；敵人也可以用“大民主”來對付共產黨，匈牙利事件就是“大民主”（《毛選》5卷338頁）。毛澤東本來強調，人民內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來解決，對付敵人則要用專政的手段；現在，他又自相矛盾地說，大民主是對付敵人的。這裡暴露了毛澤東的民主觀念極其混亂。遊行示威，只是公民的自由權利，

它是民主的內容，但不等於民主。毛的“大民主”後來發展成“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並在整個“文革”過程中得到了最廣泛最充分地運用，以對付毛澤東心目中的“敵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林彪宣稱：

“這種大民主，是毛主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新貢獻”（1966年11月3日講話）。這就在許多中國人中間形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對民主的錯誤觀念，這可以解釋鄧小平等人對遊行示威的極度反感——他們由此想到了“文革”。其實，“文革”時期，憲法成了一張廢紙，人權被踐踏，連一點民主的影子都沒有。

毛當時並沒用大民主來解決官僚化問題，而寧願用整風這種“小民主”的方式。毛在會上提出：“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他強調，“以後凡是人民內部的事情，黨內的事情，都要用整風的方法，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而不是用武力來解決”。這裡所謂“武力”，就是指的湖南農民運動中群眾大批判等暴力場面，就是“大民主”。

匈牙利事件使毛極其震驚，他日思夜想的是：中國決不能出匈牙利事件，決不能出赫魯雪夫。毛老早就對知識份子抱有的不信任，以匈牙利事件為契機更加增強了。11月15日毛在八屆二中全會上說：“匈牙利有那麼多反革命，這一下暴露出來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時也教育了蘇聯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們中國的同志。”“你要搞資產階級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風。”“預先出告示，到期進行整風，不是‘不教而誅’”（《毛選》第五卷第326、328頁）。可見：毛已經把鬥爭的矛頭對準知識份子。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他做出佈署，準備在下一年開始“整風運動”，主要目的就是抓“右派”。1956年12月29日

《人民日報》發表的毛授意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教訓》說：“（當匈牙利處在緊要關頭時），一些國家的共產主義知識份子是怎样提出問題的呢？他們不但沒有提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反而出來反對蘇聯援助匈牙利社會主義力量的正義行動，出來宣稱匈牙利的反革命是‘革命’，出來向工農革命政府要求給予反革命分子以‘民主’！”

1957年1月18-27日毛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說：“蘇共20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活動。這是黨內的動搖分子，他們聽了把史達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搖過去，喊萬歲，說赫魯雪夫一切都對，老子從前就是這個主張。現在赫魯雪夫改變了（指鎮壓了匈牙利事件），螞蟻也縮回去了。”“去年下半年以來，有一股右傾機會主義的風，在地面之上雲層之下流動，黨內外有一股反社會主義的逆流。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著哥莫爾卡的棍子轉，哥莫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什麼大民主，不到處貼標語，還不曉得他們想幹什麼。他們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一般說來反革命的言論當然不讓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現，那就只好讓它放，這樣才有利於對它進行鑒別和鬥爭”。“無非是出全國性的大亂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幾百萬人起來反對我們，佔領幾百個縣，而且打到北京來。我們無非再到延安去。”

“不要怕鬧，鬧的越大越長越好。……哪裡有膿包、有細菌，總是要爆發的。大省五萬、中省三萬、小省一萬。準備鬧事，年終結帳。”全國26省，外加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大中小各1/3，加起來大概就是90萬。後來果然抓

了百萬左右的右派，不過不是等到年終才“結帳”，而是在年中六月份就結帳了。

毛還說：要出版《蔣介石全集》，“康得和黑格爾的書，孔子和蔣介石的書，這些反面的東西，需要讀一讀。”“毒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只能處在被統治的地位。”“百家”中馬克思主義以外的 99 家，原來都必須臣服於馬克思主義的“統治”，這算什麼“爭鳴”？這不過是街頭的雙簧鬧劇，引遊人圍觀而剝削之、誅滅之。

毛在當時就連什麼人是右派都已經有譜了。在這次會議上，毛舉例道：“對於蕭軍、丁玲之類的人，殺、關、管都不好，要抓他許多小辮子，在社會上把他搞臭。”後來丁玲成為全國著名的大右派，受到全國各大小報刊、雜誌的批判，被弄得其臭無比。

毛把鬥爭矛頭指向民主黨派：“帝國主義國家和我們之間，……我們裡頭有他們的人，……就是資產階級中間和民主黨派中間的許多人。”“地主、富農，資產階級民主黨派……他們老於世故，許多人現在都隱藏著”。“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臺戲，放手讓他們批評。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就有點像國民黨了。國民黨很怕批評，每次開參政會就誠惶誠恐。民主人士的批評無非是兩種：一種是錯的，一種是不錯的。不錯的可以補足我們的短處，錯的就要反駁。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讓大家聞一聞，是香還是臭，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毛選五卷 334-355 頁）。毛

57年1月說要打擊章乃器，可他不知道。

毛在會上把知識份子、民主黨派歸入資產階級，當時大約有800萬人。毛沒有認為當時罷工的工人和罷課的學生是中國的“螞蟻”，而是把矛頭指向了並沒有鬧事的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這有更深的理由。1956年前，中共剝奪了地主的土地和人身自由，鎮壓了一切可能通過武力反抗共產黨的人；社會主義改造剝奪了企業主的財產權。下一步，就是統一意識形態控制人們的靈魂。然而，要統一意識形態，有頭腦的知識份子是很難對付的勁敵。

毛需要把那些縮回去的螞蟻請出來，然後聚而殲之。他決定利用“雙百方針”，“讓牛鬼蛇神都出來鬧一鬧”。1957年2月27日毛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做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毛提出：允許罷工、罷課，遊行示威。但在6月份正式發表時，毛改口說：“我們是不贊成鬧事的，因為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民主）方法去解決，而鬧事總會要造成一些損失，不利於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我們相信：我國廣大的人民是擁護社會主義的，他們很守紀律、很講道理，決不無故鬧事（《毛選》第5卷396頁）。可見，毛的所謂民主，是不包括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的。

遊行示威是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在毛看來，這卻是不守紀律、不講道理。當然他說的是“無故鬧事”；那麼“有故鬧事”怎樣呢？他說：“對於鬧事，要分幾種情況處理。一種是鬧得對的，我們應當承認錯誤。一種是鬧得不對的，要駁回去”（《毛選》第5卷354頁）。

毛明確說：“我們是不贊成鬧事的”，這個話裡並沒有區別無故還是有故。其實，任何“鬧事”都是有故的，至少參加鬧事者不會承認他們是“無故”。毛認為守紀律就不會遊行，意思就是遊行就是不守紀律。毛還把自由和紀律作為一

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他說：“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

“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毛選》第 5 卷 368 頁）。毛不把自由和法律聯繫起來，而把自由和紀律聯繫起來，這表明他混淆了黨內和黨外的界限；毛說自由要受紀律限制，這就把黨的紀律推到全社會了。他只講自由要受紀律制約，卻沒對紀律本身作什麼限制；黨的紀律如果違反了法律，是無效的。況且，群眾遊行也可以有秩序有紀律，並不一定是搗亂、搞破壞；如果搞破壞，員警可以依法制止。毛不贊成鬧事的理由是“鬧事總會要造成一些損失，不利於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這種說法是片面的。他自己也說過，鬧事可以作為克服官僚主義，改善工作，是教育幹部和群眾的一種特殊手段。這不是有利於社會主義的發展嗎？

遊行示威在西方國家本是司空見慣的事，不一定是反對政府的，西方國家並不覺得它不利於資本主義事業的發展。相反，人民有了這樣一個表達意見的方式，倒是可以讓政府瞭解民情，防止政府的專橫，有利於社會的穩定。當然反對政府的遊行示威也是有的，如果鬧大了，政府可能倒臺，那麼換一屆政府就是了，並不影響自由民主制度本身。

3· “整風” 陷阱

毛在 3 月 12 日做了《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聲稱“雙百方針”是我們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號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向共產黨提批評意見。對批評者“不揪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決不秋後算帳”！並宣佈年內開展整風，這次整風要以延安整風為榜樣，黨外人士可以自由參加。毛在講話中首次強調了要開展對於修正主義的批判。3 月 16 日中共中央在傳達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指示中特別強調該會議吸收 160 位

黨外知識份子參加（占全體參加人數的 1/5）十分重要。

整風必定整人，各級領導人都有抵觸情緒，毛只好一路遊說。毛從 3 月 6 日到 20 日這 15 天內，在京、滬等地對各級幹部至少講了 9 次話，他批評老幹部中有 90%對“雙百”方針有抵觸。劉少奇主張以溫和方式化解批評，“要允許小民主。不允許小民主，勢必要來個大民主。”他試圖分散批評的焦點，認為“官僚主義，上面有責任，下面也有責任”。

由於對毛的上述兩次講話，《人民日報》都沒有報導，4 月 1 日毛澤東大怒，在自己的臥室裡批評《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鄧拓是“死人辦報”；“我看你像漢元帝，優柔寡斷。你當了皇帝非亡國不可”。胡績偉在《伴君如伴虎——毛澤東是怎樣把鄧拓逼入絕路的》中披露：“當我走進毛的臥室，見他滿屋子是書，床上的一半也是書，使我肅然起敬，覺得毛真是一位滿腹經綸的知書識禮的偉人。很快，他謾罵鄧拓是‘占著茅坑不拉屎’、是‘增加板凳折舊費’……。這些粗俗的不著邊際的辱罵，實在有失一個黨的領袖的身份！”

於是，《人民日報》就活躍起來，首先是做自我批評，然後就批評了陳其通四人的文章——《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原來這四人的文章是堅決反對“鳴、放”的，是極左派，只是這篇文章早發表了幾個月，觸了毛澤東的“引蛇處洞”的好事，所以反右之後，陳其通也成了右派，成了一個天大的笑話。

暴政令知識份子禁若寒蟬。身為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中央常委的北京大學原社會學教授潘光旦，對於自己在“知識份子改造運動”中檢討 12 次尚不得過關的經歷記憶猶新，於是面對幫共產黨整風的“邀請”，堅決聲明“不跳”。河南信陽地區計委幹部劉鐵華認為“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個幌子，實際上是言者有罪、聞者不戒”。“共產黨是聞到批評，面紅耳赤，居高臨下，棍帽齊來，

泰山壓頂，借機報復”。“不如武則天，倒像隋煬帝……以順為貴，以直為仇”（1957年8月2日《人民日報》）。河北一位黨外人士懷疑共產黨的“放”是“放長線，釣大魚，發現目標”，以便整肅。中央民族學院教授費孝通本為社會學教授，因各大學系均被撤銷，他無書可教，去國務院專家局做了個副局長。這幾年他心存不滿，寫了題為《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的文章，請朋友（如謝冰心）看過，修改之後，發表於3月24日的《人民日報》。文中點明瞭大多數知識份子的心理狀況：“心裡熱，嘴卻還很緊……怕（百家爭鳴）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

1957年4月10日，毛指示《人民日報》發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第二天晚上，毛找陸定一、陳伯達、康生談話說：“我贊成放，放得盡些，才能讓各階級都出來表現。不放，怎樣來辯論？放半年，不夠，放一年。左派要有準備”。

毛邀請全國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齊到北京，參加“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宣佈這次整風“不再是狂風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個不停的毛毛雨”。由於主要請黨外人士鳴放，毛在4月30日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第12次（擴大）會上說：“黨章有一條規定，工廠、農村、部隊、學校要實行黨委制，現在看來，學校黨委制恐怕不適合，要改一下。黨內外應改成平等關係，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職有權。我建議，首先撤銷學校的黨委制，不要由共產黨包辦。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為兩個組織，一個校務委員會管行政，一個教授會議管教學。應當集中在校務委員會或教授會，共產黨和民主黨派有什麼辦法和意見，都到那裡去講，人家贊成的就作，不贊成的就不作。這個問題要研究，由鄧小平同志負責找黨外人士和民盟、九三等開座談會，對有職有權和學校黨委制的

問題徵求意見”。39 天后，凡表達過同樣意見的人，無一不被打成“右派”。

如：錢傳長認為大學應該讓教授充分發揮作用，被上綱為主張教授治校、反對黨的領導而當了右派。

1957 年反右，毛的真正幫兇是鄧小平和彭真。鄧小平、彭真兩人是僅次於元兇毛澤東的第二、第三號劊子手。4 月 27 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關於整風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毛暗中規定：“整風有四個階段：放、反、改、學。就是大鳴大放、反擊右派、整改、學點馬克思列寧主義。”並安排：在“放”的階段是，“五月我們不反駁，6 月 8 日以前我們一概不反駁，這樣就充分鳴放出來了。”他還稱這種策略是“虛晃一槍，回馬便走”，“誘敵深入，聚而殲之”。5 月 1 日彭真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共開始整風，並代表共產黨號召民主黨派和各界群眾幫助共產黨進行整風。當天《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中共《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號召全國上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5 月 2 日，經鄧授意和批准，胡喬木撰寫的《為什麼要整風？》作為《人民日報》社論發表，表示中共決心“使全體人民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有充份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覺”。毛指示說：“不要搞那麼多條條框框來束縛，要改。怕放，無非怕引火焚身”。5 月 4 日書記處發出《關於重組黨外人士對黨政所犯錯誤缺點展開批評》的指示，充分肯定黨外人士提出的各種批評意見，認為這“對於黨和人民政府改正錯誤、提高威信極為有益，應當繼續開展”。這為“引蛇出洞”設下誘餌，書記處成為反右運動的前敵指揮部，鄧小平是總指揮。

自 5 月 8 日至 6 月 3 日，在毛、鄧、彭部署下，中共中央統戰部舉行了各民

主黨派負責人和著名無黨派人士參加的 13 次座談會；5 月 15 日至 6 月 8 日，中央統戰部和國務院第八辦公室聯合召開了 25 次工商界人士座談會。2 百多人發言，整理見報。鄧小平主持書記處晝夜研究，用簡報方式向毛澤東彙報。

1957 年春統戰部給章伯鈞發來召開座談會通知，就在章伯鈞出席座談會那天凌晨兩點來鐘，李維漢打來電話說，劉少奇有在中國實行兩院制的意思，但他在黨內不好講，希望由章伯鈞在座談會上提出來。因章是民主黨派，比較好說話。章伯鈞就按照統戰部長的意思在座談會上講了。原以為他還是按中共指示辦事哩，誰知是誘餌呢？

5 月 10 日，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羅隆基說，文教機關中青年黨員不應該也不能夠領導老年的舊的高級知識份子，他指出：“無產階級小知識份子同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份子是個矛盾”。這句話深深刺痛了只不過是小知識份子出身的毛澤東。他聽了統戰部長李維漢的彙報後，覺得一年來不斷謀劃張設的大羅網可以收網了。

毛澤東在《情況匯總》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階級就會表現出來，原形也畢露。共產黨執政還不到 8 年，就有 30 多萬條意見、錯誤、罪狀，那共產黨是不是該下臺？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岡山！”這段話充份暴露了毛澤東的危機感。

在毛和中共的循循善誘中，民眾真以為黨要洗滌自身的污垢，於是很多人終於信任了共產黨，在 5 月 2 日至 5 月 12 日的 10 天中，全國各地召開 28250 多次各類會議，向黨中央、各級黨組織、黨員幹部，提出了 372345 條意見、建議。

首先，一些人提出了“鎮反”、“肅反”中製造的冤案。國民黨老黨員、廣東省政府參事室副主任羅翼群說：“就廣東省來說，肅反政策、農業政策，搞得

太糟，7年以來的鎮反、肅反冤殺了許多好人”。瀋陽師範學院兩位青年幹部張百生、黃振旅聯名在《瀋陽日報》上發表文章，認為“鎮反和肅反都是企圖用暴力維護革命果實。這同我國著名的“愛民如子”、“以德立國”、“以法治國”的傳統是背道而馳的”。

民盟湖南省負責人杜邁之認為“肅反是全國性的錯誤”，是“專政專到人民頭上來了”，主張成立“肅反善後委員會”。民盟湖北主任委員、中南財經學院院長馬哲民則斥責中共搞的肅反，“把發牢騷的，就認為是反黨，反黨就是反革命。這是一種殺人邏輯。”

1957年在中共北京市委召開的非常局長座談會上，司法局副局長、原政法學院教授樓邦彥說：“肅反運動中被整的都是知識份子，而且都整錯了。《阿房宮賦》中有‘使天下人敢怒而不敢言’的話，現在卻變成了不敢言不敢怒了。”北大俄語系教授魏荒弩批評道：“中央決定肅反物件有5%，這是太主觀了。……這樣就產生了超額完全任務的現象……許多人被迫自殺，但還被扣上畏罪自殺之名。……肅反是集反憲法之大成。”

復旦大學法律系教授楊兆龍說：“希望檢查一下歷次運動的合法性，尤其是肅反運動。”對於中共將法律定義為“階級鎮壓的工具”，他表示異議：“中國今天鎮壓物件只有百分之幾，百分之九十幾的人民要不要法律？可見法律又是同一階級內部維持紀律的工具。”

其次，一部分知識份子還對於中共不依法行事提出了批評。

最高人民法院顧問俞鍾駱在中共召開的整風座談會上坦率地表明瞭他的不滿。他認為“現在的政府不保護公民權利的狀況，還不如封建王朝和蔣介石”。他批評審判時“罪與非罪界線劃不清”，並認為原因是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和審

判人員判案可以隨心所欲。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王斐然說：“市委不懂法律，還阻礙法制建設”。北京中級法院院長賀戰軍則說：“案子送給他們（指市委書記）批，我看行市也不一樣，犯人有走運的，也有倒楣的”。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長樓邦彥提出他的意見：“單憑市委的指示辦案是違法的，破壞了法院進行審判的獨立地位。”王斐然的意見同樓一樣：“現在審判獨立不起來，主要原因是黨委干涉。”

鳴放期間以顧執中教授的意見最尖銳：“憲法自 1954 年通過以後，有的被徹底破壞了，有的有名無實”。“第 89 條規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經法院決定或檢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而肅反時的行動證明這一條文全被破壞了。第 87 條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都沒有得到保證”。“集會結社的自由更少，許多人民團體幾乎都是官方包辦。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黨派？憲法沒說不行，但事實卻沒有人敢大膽的做”。“大家都把憲法當做一張紙，通過後也就算了……現在從劉委員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劉少奇）到一般公民誰也不提保護憲法了。這樣下去，把憲法當成了手紙，亂關人、亂捕人、拆（私人）信等等，都可以為所欲為，將來何堪設想”（1957 年 6 月 26 日《人民日報》）？

監察部副部長王翰要求司法部門獨立于中共領導：“監察機關從屬於誰，就不能監察誰”。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賈潛說：“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們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審判員只需服從法律，再不必有什麼黨的領導了。”

第三，1957 年為胡風鳴冤者大有人在，他們後來都受到打右派的報應。河南省文聯創作部負責人、共產黨員欒星認為胡風案是“一個大的文字獄”。他說：“當今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主義統治，比清朝的文字獄還要凶、還要厲害”

(1957年7月27日《人民日報》)。

1957年6月，成都鐵路管理局職員李昌明以“民主先生”和“自由女士”發表了《為胡風鳴不平》的長篇演講。他從五個方面為胡風辯護。第一，舉出了大量的事實，說明胡風沒有反革命身份。第二，說胡風參加過“反共政治工作”，理由不能成立。如果成立，郭沫若1937年作國民黨XX部三廳廳長及大部分起義人員將同罹此罪。第三，與陳焯之關係僅為一般社會關係，不是反革命組織及工作關係。李昌明說：“眾所周知，周總理與蔣介石集團中多人往還，宋氏三齡見解各殊，均未認作反革命關係，何獨胡風別有看待。“第四，胡風集團只能是一些偏見的學派，五四運動前後的創造社、新月派、語絲派，互相攻擊，極盡詆毀、汙罵能事，郭沫若攻擊魯迅所用辭彙其惡意不在胡風之下，魯迅與梁實秋論戰所用語詞亦尖銳之極，可見文人相輕，歷史皆然，不能對胡風有所偏頗。第五，從法律觀點看，胡風集團的行為並不構成對國家有形的損害。李昌明說：“我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上無一條對胡風集團適用，全世界任何一國民法、刑法（包括蘇聯在內）均未載有以文藝形式對文藝問題上的意見或攻擊足以構成的叛國罪或危害國家安全罪。美國的斯密斯法（Law of Smith）對國內進步人士與共產黨員的迫害均未在學術領域或文藝範圍內引用，也未有這種事實。”

第四，在對蘇關係上的一邊倒政策也遭到了批評。比如，上海第二醫學院的學生在黑板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人的呼聲》的文章，文章說：“今天已解放八年了，中國人民應該站起來了。應該由中國人來管理自己的國家！遺憾得很，現在哪一個地方沒有蘇聯專家和顧問！那些所謂中國幹部們把蘇聯專家捧得七丈高，把中國專家看作飯桶！蘇聯專家什麼都好，即使放一個屁都是香的。中國專家被排擠得透不過氣來發表與蘇聯專家相反的意見就大禍臨頭，一連串“反

蘇”、“反共”、“反動”等大帽子暴雨般地打下來。在中國境內，中國人沒有說話餘地，這是什麼樣的社會？”文章還喊出了“精簡全國蘇聯專家”的口號，呼籲“需要者留下，整腳貨叫他們回去”（《提高警惕，粉碎右派陰謀》第 105 至 106 頁）。

龍雲對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提出不同看法和批評蘇聯在東北的惡行而打成右派；但幾年後中蘇交惡，對蘇共的批判比當年龍雲的批評要厲害十萬倍，但是龍雲還是右派。

第五，為工農說話。安徽的方格恩建議成立中國農民黨。戈友辰建議，要保障居住和遷移的自由；要給農民拒絕出售勞動產品的自由；農民應在政府裡佔有席位；成立全國總農會。

1957 年西南農業學院有四個學生，以“真理塔”為筆名，在學校的自由論壇上以《請中央毛主席重新估計農民的革命性》為題，四人分段做了演講。他們認為，當時中國農民的生活非常艱難，他們的負擔已經很重。“繳公糧、賣餘糧、上夏徵稅，買公債、賣豬羊……然而他們喂肥了豬但最少吃肉，他們辛辛苦苦種了水稻而最少吃米，他們忍饑挨餓，節衣縮食來建設社會主義，“這難道還能加罪于農民革命不積極嗎？”由於農民沒有自己的政黨，因而在政協、人代會以及政府中沒有真正的代表，不能將他們的要求在這些議論中充分討論，以作出相應的決定來滿足農民的廣大要求。他們提出了農民應組織自己的政黨，在統一戰線中參政。這個思想可以說是五七年許多關心中國農民生活的人的普遍要求。在他們提出的具體建議中，對多給農民保留自留地、提高農產品價格等問題多有涉及。可以這樣說，1980 年代末中國農業改革的基本思路，大體上沒有超出這個綱領。

曾追隨孫中山的老同盟會員、廣東省政協委員羅翼群在 5 月 9 日廣東省政協

會上說：“人民有苦必叫，勢所必然，不能加以壓制，而反映人民意見，是我們應盡的責任，豈容隱諱？有人說，人民叫苦，幹部也跟著叫苦，這種說法，我認為不太正確，有違反聽取人民意見的精神。”“農民生活，的確有大部分好轉，但也有一部分壞轉，家庭主要勞動力少，老幼人口多，而又很少副業補助的，那就確實生活很苦。我近來接過很多親戚、朋友、子侄輩的來信向我叫苦，要求救濟，如果說我也跟著叫苦的人，那就請那位先生去實地調查一下，看看是真叫還是假叫？況且人民有了痛苦，叫一下是很自然的。”5月23日，羅向省統戰部建議，成立一個由政協委員組成的檢查機構，來一次全省大檢查。他說他已經收到了幾十封來信，“這些信有兩類，一類是‘叫苦’的，請求安排工作和生活救濟；一類是‘叫冤’的，提出有錯應該糾正的，其中有些人已三番四次提出請求，沒有解決，弄到失業，甚至妻離子散。”他呼籲成立一個機構和有公正人士來參加處理“叫冤”的案件。廣東省組織了一場20多天的農村“視察”，讓他吃夠了苦頭，由《人民日報》跟蹤報導。“每天，他只要一出門，就有幾百人甚至幾千人圍上來”。一天，他的去路“被幾萬憤怒的群眾擠得水泄不通，連汽車都上不去。大家高呼，要繼續和羅翼群辯理，有人恨得想用傘柄戳他……一路上，沿街店戶的商人、店員、小販也都圍上來，痛罵羅翼群。”車身上貼滿了詛咒他的標語。

遼寧撫順市工會聯合會職工俱樂部副主任劉流說“黨包辦工會的時代應該結束了。工會應當是民辦！”全國總工會辦公廳檔案處長高元說：“工會的作用只能從工人對工會的要求來考慮，不能從黨和國家方面來考慮。……（現在的）工會不能代表工人，工人不相信工會。”他主張“工人可以自己組織工會，不一定參加全國總工會。”這些人統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作為反右的一大成果，連

1951年成立的“上海工人運動史料委員會”也被撤銷了。

5月13~14日，政治局討論局勢，意見分歧，但同意“要正確引導，要再觀察一個時期”。中共於5月14日發出了《關於報導黨外人士對黨政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要求黨員對於黨外人士的這些批評不要反駁，以便使他們暢所欲言，各地的報紙應該繼續充分報導黨外人士的言論，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論，必須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導出來，使群眾明瞭他們的面目。

5月15日，中共邀集民主人士參加座談會，政治學教授張奚若指出共黨有四點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視既往；第四，迷信將來。為了不讓這個右派言論“家喻戶曉”，因此，他未被打成右派；卻招致毛澤東“痛批”多次，顯示這句話打中中共與毛澤東的要害。張奚若當時是“黨外人士”中的教育部長，到第二年的二月才罷官，但是仍然給他一個新職：國務院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主任。雖然是閒職，卻還是部長級職務，比那些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右派分子有雲泥之別。1946年，張奚若在西南聯大的廣場上痛罵國民黨說，“假如共產黨可以叫做‘赤匪’的話，我想國民黨就可以叫‘白匪’。其實‘白’字還太好了，太乾淨了，他們簡直就是‘黑匪’！”為此他要蔣介石下野。這些言論當時對中共可以說是雪中送炭，不愧是中共的“愛國人士”。1949年6月在政協籌備會上，當時有人建議國號是“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他認為人民與民主重複，所以去掉了“民主”兩字，這個建議被中共所接受。1957年7月，他進一步的解釋說：第一是好大喜功，總誤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費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組織規模大才過癮。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現為強調速成，把長遠的事情用速成的辦法去做。第三是鄙視既往，許多人忽視了歷史因

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條，把歷史遺留下來的許多東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第四是迷信將來，認為將來一切都是好的，都是高速發展的。

毛澤東說“我好社會主義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急無產階級之急，近勞動人民之利。難道你要我好小喜過，急錯近弊？”這完全是以政治標籤或政治帽子壓人，不讓對方說話。毛又說：“多數人的批評合理或基本合理，包括北京大學傅鷹教授那種尖銳的沒有在報紙上發表的批評在內。這些人的批評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關係，他們的批評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評往往是惡意的，他們懷著敵對情緒”。善意惡意（敵我）的區分，就沒有了言論自由。

5月15日，毛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起初題目叫作《走向反面》，擬在《人民日報》用“本報評論員”名義發表，排出清樣後，鄧看了覺得過於露骨，建議毛在右上角批上“內部檔，注意保存”字樣。文章題目改為《事情正在起變化》，署名改為“中央政治局研究室”，建議發至黨內十七級以上幹部參閱。毛欣然接受。這充份證明鄧的忠誠護主，得到毛的賞識。按照毛的意思，為要在黨的幹部中“引蛇出洞”，所以此文在黨內分二個階段下達：第一個階段，發至十級以上幹部；第二個階段，才再發至十七級以上幹部。其實在寫《事情正在起變化》之前，鄧主持的書記處已下發了《關於報導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以“引蛇出洞”的精神，清楚表明“秋後算帳”的決心。

《事情正在起變化》把“右傾”升格為“右派”。毛說：“我黨有大批的知識份子新黨員（青年團員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確實具有相當嚴重的修正主義思想。……他們跟社會上的右翼知識份子互相呼應，聯成一起，親如弟兄。……社會上的中間派是大量的，他們大約占全體黨外知識份子的70%左右，而左派大約占20%左右，右派大約占1%、3%、5%到10%，依情況而不同。……最近這個時

期，在民主黨派中和在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倡狂。……右派的企圖，先爭局部，後爭全部。先爭新聞界、教育界、文藝界、科技界的領導權。…新聞界右派還有號召工農群眾反對政府的跡象。……我們還要讓他們倡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倡狂，對於我們越有利。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上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毛選五卷425頁）。

16日中共發出了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

“最近一些天以來，社會上有少數帶有反共情緒的人躍躍欲試，發表一些帶煽動性的言論，企圖將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以利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方向，引導到錯誤方向去，此點請你們注意，放手讓他們發表，並且暫時（幾個星期內）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用以證明反右之必要的“罪證”，全是在毛5月15日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後，為中共反復邀請而“放”出來的。譬如：北京大學的第一張鳴放大字報（5月19日），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5月21日），龍雲的“反蘇謬論”（5月22日），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5月22日），林希翎在北京大學抨擊中共的封建社會主義（5月23日），葛佩琦的所謂“殺共產黨人”（5月30日），吳祖光的《黨“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5月31日），儲安平“黨天下”（6月1日）等。

據粗略估計，凡因為“鳴放”而當上右派的人，一大半是在5月15日之後被勸說、誘導而中計的。譬如前國民黨《中央日報》記者陸鏗，當年曾揭露過國民黨的弊政，共產黨為收買人心，給了他一個雲南省政協委員當。反右前夕，他遠在南國，嗅不到北京待發的槍筒裡的火藥味。由於政協秘書長兩次動員，他寫了份建議，希望共產黨考慮與美國化敵為友，大學用英文代替俄文，允許民間辦

報等等。可是他登了個鳴放的末班車，《雲南日報》將他的建議刊出時，反右已經開始了。他不僅成為大右派，而且為此坐了 20 年牢。

5 月 17 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歡迎非黨同志幫助我們整風”；其意就是要你跳進陷阱。5 月 20 日，中央再發出《關於加強對當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要求各地黨報“繼續登載一些右翼分子的反動言論，最好是登那些能充分暴露他們的反動面目的言論”。

5 月 25 日，周揚在邀請文藝工作者提意見的座談會上居心叵測地說：“希望大家意見提得尖銳一點。你們太客氣了，你們的批評只是一分，可是我體會到我們的缺點有十分”。其態度之誠懇，使任何善良的人都想不到共產黨正在暗裡布羅網。《文藝報》副總編輯蕭幹直到 6 月 1 日還在《人民日報》上寫文章，認真地討論實現“百花齊放”之道。他要共產黨對作家放得下心，“大家彼此都放心一些，花自然就會慢慢放開啦”。

6 月 1 日，中央召開最後一次、也就是第十三次統戰座談會，統戰部長李維漢向提了意見的朋友們表示“衷心的感謝”。中央書記處在 6 月 6 日發出《關於抓緊時間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這時毛、鄧已籌畫收網。6 月 6 日《人民日報》發文說“幫助共產黨整風，是為了鞏固黨的領導”，“有些人是在反教條主義旗幟下，反對馬列主義”。6 月 7 日《人民日報》的文章說“共產黨的領導不容動搖，社會主義方向不容模糊”，但此時似乎沒有多少人注意到比兩年前的“肅反”遠為酷烈的運動就要開始了。

4·毛澤東栽贓葛佩琦

提意見的人沒要奪權，只希望黨的“雨露”能夠更加“滋潤”中華大地。連掌管軍隊大權的彭德懷都不能奪毛的權，更何況坐在那裡僅僅動嘴皮子的人呢？

有人狡辯說：毛本欲接納對共產黨的批評，只是在鳴放超出了他的接受限度才轉而決定反擊。這與事實不符。

葛佩琦和胡風分子阿壘一樣，是中共的高級軍事情報人員，從抗日時期到國共內戰時期，一直“戰鬥在敵人心臟裡”。葛佩琦在 1935 年就是北平 12.9 愛國抗日民主運動的急先鋒，任北京大學學生救國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學生會副主席，經嚴酷考驗，1938 年入黨。並長期在黨的秘密戰線上出生入死，以國民黨少將的身分隱身。由於他的連絡人被捕，失去組織關係。解放後七八年，領導不積極給他調查落實，草菅其政治生命，僅作黨外講師使用。

1957 年 5 月 24 日人大黨委兩次發給葛佩琦書面通知，要他參加“黨外人士座談會”，幫助黨整風。葛佩琦說：“我想我是一個冒險犯難，為黨做過十多年地下工作的共產黨員，由於地下組織被破壞，單線領導人被捕，斷了組織關係。黨委並沒有對我請求恢復組織關係的申訴信，作出任何答覆，為什麼要把我列為‘黨外人士’？我有些想不通。所以接到頭兩次通知，我沒有出席座談會。第三次通知送來之後，有總支的一位同志來動員我，他說：黨委三次書面請你參加黨外人士座談會，你都不去，不太合適。我就勉強地去參加了座談會。”（《葛佩琦回憶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為了打消入會者的顧慮，使大家踴躍發言，黨委書記說：“黨的政策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冕。”而且他還補充說，這是毛主席說的方針。可惜的是葛佩琦只懂得共黨會喬裝矇騙國民黨，卻不懂得共黨還會喬裝矇騙老百姓和知識份子。

5 月 27 日，人大內部刊物《人大週報》刊出了葛佩琦的發言。其中有這樣的話：“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份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在那個

時候，對共產黨說“打倒”、“推翻”、“殺”這些詞，聽到了也會嚇出一身冷汗，更不用說此話出自葛佩琦的口。

葛佩琦看了 5 月 27 日人大內部刊物《人大週報》上刊載的自己的這個發言，感到非常驚訝後怕，因為上述這段話不是他說的，歪曲了他發言的原意。當天下午，他到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會要求更正。黨委副書記、副校長聶真同志接見的他。他指著《人大週報》上登的那段話說：這不是有意誣陷我嗎？聶副校長說：葛佩琦同志，你不要著急，黨是實事求是的，登錯了，可以更正。葛佩琦沒料到，不但《人大週報》沒“更正”，而且《人民日報》在 5 月 31 日的第七版發表他的講話時，除了原文之外，更是斷章取義、橫加篡改，拔高成了反共言論。編輯用了一個長長的提示語作為標題，以示醒目。原文為：葛佩琦認為：今天黨群關係與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黨員起了監視群眾的便衣員警的作用。他說：“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標題）。在這個小插題之下，說葛佩琦論述了這樣一些話：今天黨群關係與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老百姓把豆餅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和面。統購統銷搞糟了，所以物資供應緊張，‘肅反’運動搞糟了，黨犯了錯誤，領導人應該自請處分。豬肉緊張，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說這是生活水準提高。生活水準提高的是哪些人呢？過去穿破鞋、現在坐小臥車穿呢子制服的黨員和幹部。說良心話，這是生活水準下降，這是黨的政策犯了錯誤。豬肉哪裡去了呢？例如，豬肉哪裡去了呢？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為執行糧食被統購統銷政策發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養豬，被幹部吃光了。1949 年共產黨進城時，老百姓都是“箪食壺漿”“以迎王師”來歡迎。今天老百姓對共產黨是“敬鬼神而遠之”。……中國歷史上好多這樣的例子，當統治者沒得到統治地位的時候，老百姓是歡迎他的。但他們一旦得到了統治地位而不顧人民利

益時，人民就要反對他們。……1945年抗戰勝利時，受了日本人壓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歡迎過國民黨，後來國民黨的大員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對他們。現在的情況不同了，老百姓對共產黨的意見很多了。共產黨若不自覺也是危險的。過去在學校做地下工作時，是用聯繫進步、爭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黨員來領導……彙報得多，就是好黨員……起了監視群眾的便衣員警的作用。這事不能怪黨員……因這是組織給他的任務。……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不是共產黨的中國。黨員有主人翁的態度這是好的，但是，你們認為‘朕即國家’是不容許的。你們不應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別人，不能只有黨員是可靠的，而別人都是可疑的，特別是對愛發牢騷的黨外人士，共產黨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份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因為，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

毛澤東每天的大部分時間大概都是用在讀報上。他像獵人的眼睛尋找獵物。經過《人大週報》潤色過的葛佩琦的發言，已經初步具備了他理想中的“獵物”條件，因此，順著原文的思路與邏輯，錦上添花，說出“群眾總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這樣的話，就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了。一個由毛澤東塑造的右派典型葛佩琦就成了出爐的熱燒餅。

隨後，《人民日報》在6月5、6、7日天天都發表批判葛佩琦的文章。8日以《人民日報》第七版又發表了一篇批判葛佩琦的3000字的長文，其中摘錄批判的葛佩琦的如下“反共言論”：“群眾對共產黨的話不敢信任，共產黨對這一點應特別重視。因為，‘民無信不立’，我還要重述一遍，群眾總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那必然走這條道路。總有這

麼一天，這也是合乎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只空喊萬歲，也是沒有用的”。葛佩奇見報，當即給《人民日報》寫了更正信，於6月9日上午親自送到人民日報社要求更正為：“在這次整風中，如果黨內同志不積極改正缺點，繼續爭取群眾的信任，那不僅可以自趨滅亡，而且發展下去，可以危及黨的生存”。人民日報卻拒絕更正。於是這一言論成了中共1957年反右正確性必要性的重要佐證！也成為後來中共堅持不予平反的代表性事實依據（這成為鄧小平後來多次重複的“那時候有人確實殺氣騰騰”的根據）。

6月14日《人民日報》以南京電、保定電、瀋陽電，發表三篇批鬥葛佩奇的報導，同時刊發了《葛佩奇的學生痛斥葛佩奇》的文章。6月15日刊登著名學者民主人士馬寅初先生《我對儲安平葛佩奇的言論發表些意見》。6月16日在《堅決粉碎右派進攻》大標題下，有《農業勞動模範痛駁葛佩奇》、《復員軍人號召保衛革命果實》的報導，還說“葛佩奇、王德周之流說共產黨員‘無惡不作’”。6月17日刊登了《人民大學教授抨擊葛佩奇王德周》。6月18日，《人民日報》第七版《堅決捍衛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北京礦業學院礦工和革命軍人出身的學生座談》，大批葛佩奇。6月20日《人民日報》頭版《按不住心頭怒火，恨透了右派野心》的總標題下，報導老蘇區人民、河北一農業社農民以及一些著名烈士的夫人集會或談話，痛斥葛佩奇的“殺共產黨”、“要共產黨下臺”的罪行；……在《人民日報》帶動下，全國大小報紙、各種群眾集會迅速掀起大批“葛佩奇要殺共產黨人”的高潮，使他成了“人人得而誅之”的頭號反共人物，被理所當然地劃成了極右分子。

1957年12月24日葛佩奇被逮捕。1959年6月29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葛佩奇無期徒刑，是判刑最重的。受其牽連，葛佩奇二哥的家在文革中被“紅

衛兵”抄了，其二嫂被打死了，其二哥被遣送回山東農村而貧病而亡！1975 年葛被減為 18 年，沾了特赦戰犯的光而被“特赦”。一頂“戰犯”帽子竟然成了他的救生圈，命運給他開了一個大玩笑！

1979 年 4 月 12 日，中國人民大學黨委給葛佩奇送來了《關於葛佩琦右派問題的複查結論》說：“不屬於錯劃，不予改正”。第二天葛佩奇到北京市法律顧問處諮詢，律師說，報紙上刊登的那些沒有經你簽字同意的“言論”，是沒法律效力的，不能作為劃右派的依據。1980 年 4 月 2 日，葛佩琦被逼上胡府“上訪”；次日就拿到了耀邦的批示。經過重新複查，雖然已經查到了葛佩琦寫給人民日報社的更正信；原人民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聶真也寫出證明材料，證明 1957 年 5 月 27 日《人大週報》歪曲了葛佩琦的發言，但錯劃得不到改正。

葛去求國務院參事李逸三，李原是中國人民大學人事處處長；1957 年人民大學黨外人士座談會上，他就坐在葛的身旁，他記得葛的發言內容，對有遲遲不給改正錯劃很有意見。1980 年 11 月 20 日李逸三給總書記胡耀邦寫長信：“當時，57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報》上登載的葛的話是吃了水分的，和事實有出入的，斷章取義、誇大其詞”。“葛是 1938 年入黨的黨員，抗戰八年和解放戰爭四年共 12 年，是在敵佔區搞地下工作的，延安檔案可以證明這點”。據此，經胡耀邦幾次親自過問，這才為葛打開了綠燈。

1981 年夏，李逸三以國務院參事身份，向國務院總理寫了一份材料，彙報葛佩琦被錯劃為右派的情況。這份材料經國務院辦公廳、中央辦公廳轉到北京市委。1982 年 3 月 18 日，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宣佈對葛佩琦 1957 年劃為右派問題，予以改正。1982 年 6 月 18 日，葛佩琦原入黨介紹人，時任國務院勞動總局顧問劉子久同志：建議人民大學黨委恢復葛佩琦同志的黨籍。1983 年 5 月 23 日北京市委

組織部發文宣佈為他恢復黨籍，1986年2月6日北京市委辦公廳才發文給他宣佈右派為“錯劃”。這段佳話，葛佩琦寫了一篇文章《總書記批閱的第二千零一封人民來信》發表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

5·反擊右派

6月8日毛髮布《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攻的指示》說：“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只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毛選》第五卷第433頁。人民日報於6月8日登出了《這是為什麼？》的社論，指“少數的右派份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他們企圖乘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拉著歷史向後倒退，退到資產階級專政，……”

6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社論《工人階級說話了》，於是全國各地都將工人搬出來，異口同聲說“工人階級說話了”，“我們不答應”。一時間，“右派份子”便成了反動派、惡棍、大壞蛋的代名詞，成了“億萬工農兵”口誅筆伐的對象。

陝西省委在反右前曾宣佈：不把他們的思想問題和政治問題、歷史問題聯繫起來；不開群眾大會鬥爭他們；對於任何有打擊報復行為的人，黨和政府絕不包庇，本人有越級上訴的許可權。毛6月8日下達反右令後，陝西省委遲遲不表態，轉不過彎子。周恩來給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打電話就西安交大遊行示威問題進行批評，並且決定，反遷校的骨幹必須定為右派分子。陝西省委才從6月11日起才轉發8日的《人民日報》評論，開始反右鬥爭。

6月12日正式印發黨內的《事情正在起變化》，徑直把右派稱為“毒草”

和“牛鬼蛇神”，說右派是喜歡吃人的“鯊魚”。幾年前在朝鮮戰場上犧牲的黃繼光的母親也被安排在6月17日的《人民日報》上說話：“哪個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我就要和他拚命！”

九三學社的顧執中教授希望中共能聽進逆耳之言：“有不少人已不顧一切的說了許許多多的不好聽的壞話，這種壞話雖然在實質上是好話、是良藥，但往往容易被誤認為壞話”；將好心說壞話的人拿去鬥爭，“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是不應該的……”。半個月後，他被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人民日報》還發了辱罵“顧執中之流”的社論（顧的發言和《人民日報》社論分別見1957年6月15和29日《人民日報》）。顧執中不甘受辱，決定以死抗爭；他一頭向一個石柱撞去，幸因年老勁小，只撞成重傷，未死。

6月17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鄧小平又以總指揮的身分作了《如何領導當前整風運動反右鬥爭》的報告。據李志綏回憶，毛澤東在1957年6月底去山東濟南、上海等地視察鳴放運動途中，就一再講到王實味。他十分明確地把處理王實味同正在展開的反右作模擬。鄧小平在青島舉行中共省市書記會議上，親自作報告，部署全國的反右運動。

中共採取其一貫的策略：讓知識份子相互批鬥。6月17日，身為國務院專家局副局長的費孝通首先做了檢討，新華社報導：“費孝通表示，他有決心和右派份子劃清界線。他要跟著共產黨走，不跟野心份子走”。他揭發“羅隆基最討厭的是盟內的（中共）黨員，在背後打聽誰是黨員”；因中共說章伯鈞和羅隆基組成了“反黨聯盟”，他便攻擊章、羅在“為垂死的資產階級作最後的掙扎”。許多曾經是羅隆基的支持者和朋友也紛紛站出來“和羅隆基劃清界線”。他們本以為這樣可以獲得中共的寬恕，保全自己，但是他們的檢討和揭發只是加速了自

身的崩潰，沒有躲過“右派份子”這頂帽子。

一些知識份子仍不敢相信中共會如此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仍然以中國傳統的道德標準來衡量中共。比如，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許良英認為這是失信於人民，於是公開表示《人民日報》的社論“使人感到昨天還是笑嘻嘻的，今天突然變了臉了，不道德，連起碼的民主也沒有，太粗暴了”（1957年7月29日《人民日報》）。結果他成為中國科學院第一個全院批判的右派，並被定為“極右份子”。

6月19日，毛正式在《人民日報》發表他於二月間所作的講話，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但作了很大改動，補進了他二月時根本未曾講過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至是很激烈的”一類的話，將“毛毛雨”換成了火藥。文章還公佈了辨別“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標準”（六個“有利於……”，其實核心只有一條“有利於鞏固共產黨的領導”而已）。至此，“鳴放”正式結束。上當受騙的知識份子再一次成為中共清洗的對象，而且是較以前更為嚴酷的摧殘運動。

7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親自撰寫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本報及一切黨報，在5月8日至6月7日這個期間，執行了中央的指示；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丑類（《毛選》第五卷第436頁）。針對有人指責他言而無信，搞陰謀，他答：“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從此，中文大詞典裡多了一個新辭彙——“陽謀”。“陽謀”的真意，按照毛的解釋是：“蛇不讓它出來怎麼能捉它？我們要讓那些王八蛋出臺唱戲，在報紙上放屁，……然後……一鬥一捉。城裡捉，鄉里鬥，好辦事”。

該文指出：右派分子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的，都是自絕於人民，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章伯鈞與羅隆基就這樣被“樹立”成全國“右派分子”的老祖宗、總頭目。其實，按民盟中央常委千家駒的說法，“章、羅兩人雖同為民盟中央副主席，但……兩人同床異夢，互相攻擊，民盟中央同志，眾所周知……”。毛澤東“說他們兩人結成‘聯盟’來‘反黨’……稍知民盟內幕的人無不認為滑天下之大稽”（千家駒《七十年的經歷》第239頁）。章羅同盟不過是毛捏造的“裴多菲俱樂部”，1976年“四人幫”又捏造了“裴多菲俱樂部”，毛同意了。

鄧小平是反右鬥爭的總執行官，曾到各省巡迴作戰。1957年7月到西安，在陝西省委俱樂部發表了題為《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的演講，殺氣騰騰。鄧從西安到蘭州，打了一個以常務副省長陳成義為首的反黨集團。在寧夏，打了一個以副主席孫殿才為首的反黨集團。在青海，打了一個以省長孫作賓為首的反黨集團。這幾個反黨集團的罪名中都有一條“地方主義”。從西北各省返回西安，陝西省委在西安止園（原楊虎城私人住宅）開常委會議，鄧批評陝西省委右傾，要求抓大右派。並且說：“對黨內右派，不管它的資格有多老，一律開除黨籍。因為黨內右派反黨的政治資本就是他的黨齡，我們要徹底剝奪他們的政治資本”。

1957年6月，毛澤東看了中共高級黨校的《整風簡報》以後，認為黨內右傾思想嚴重。於是劉少奇和鄧小平把校黨委成員找去問話。黨校負責人楊獻珍說：“查了，一個（右派）也沒有。”劉少奇說：“你站在右派的立場，怎麼能查得出右派呢？”鄧小平說：“我看你就像個右派。”高級黨校後來上報了兩個右派和兩個批判對象，結果受到鄧小平的批評。黨校又將右派人數增加到9人，鄧小平

仍然不滿意。1957年8月23日，鄧小平親自主持國家機關黨委、全國總工會和高級黨校三個單位的整風，督戰反右運動，指定要打肖魯等人為右派，並批評高級黨校黨校負責人楊獻珍、侯維煜在整風反右領導工作中的“右傾”思想。鄧小平嚴厲地指斥說：“肖魯的問題，你們第一次上報他的材料時，中央就批准把他劃為右派，你們怎麼現在還在猶豫？”“如果這樣的人不劃為右派，黨內就沒有什麼右派了”。彭真插話說：“現在的問題不是肖魯是不是右派，而是你們兩個是不是中右的問題。”最後，高級黨校打了95個右派，是原來數位的10倍，包括楊獻珍的秘書馬鴻模。

1957年7月7日，毛澤東在上海接見30多位文教工商界人士。毛的湖南老友、翻譯家羅稷南壯著膽問毛澤東：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毛澤東回答：“魯迅麼——要麼被關在牢裡繼續寫他的，要麼他識大體不作聲。”這是周海嬰先生披露的史實，黃宗英也證明毛確有此話——她、趙丹、羅稷南三位，當時正和毛在同一張桌子跟前。所謂“識大體”者，承認毛黨領導一切也；就得服從黨，必須“不作聲”；“作了聲”，就得關在牢裡。

1957年7月7日郭沫若在《人民日報》發表詩歌，把右派分子當成入侵的日寇，其第二首雲：“右派倡狂蠢動時，溫情那許一絲絲！已將率土成公物，竟有妖魔倒大旗。毒草必須成糞壤，爭鳴方好詠新詩。勿忘二十年前事，起舞中宵共振衣。”

1957年7月毛澤東在青島召開省市書記會議，提出了整個整風過程分為四個階段（大鳴大放階段，反擊右派階段，著重整改階段，每人研究檔、批評反省、提高自己階段）。

反右不到兩個月，毛說：這一次批判資產階級右派的意義，不要估計小了。

這是一個在政治、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單有 1956 年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並且是不鞏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證明。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共產黨在民主黨派、知識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當然不可能有領導權，因為他們是敵人……第一個決定性的戰鬥，在過去幾個月，主要是在最近兩個月內我們已經勝利了。但還需要幾個月深入挖掘的時間，取得全勝，決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這一仗不打勝，社會主義是沒有希望的（《毛選》第 5 卷第 461～462 頁）。

9 月 20 日召開擴大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毛大談“階級鬥爭”：去年下半年，階級鬥爭有過緩和，那是有意要緩和一下。但是，你一緩和，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地主、富農以及一部分富裕中農，就向我們進攻，這是今年的事。我們緩和一下，他進攻，那也好，我們取得主動。正像人民日報一篇社論所說的，“樹欲靜而風不止”。他要吹風嘛！他要吹幾級颱風。那麼好，我們就搞“防護林帶”。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風（《毛選》第 5 卷第 475～476 頁）。他在這次全會發表的《做革命的促進派》的講話中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9 月 23 日鄧小平在八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中說，反右運動可分為“大鳴大放”（即引蛇出洞）階段，反擊右派（即定罪）階段，著重整改（即反右補課）和研究檔、批評反省、提高自己（共四個）階段。鄧大力批黨內“溫情主義”，斥責說：“現在還有一些同志，在反對黨內右派分子鬥爭中，表現了較嚴重的溫情主義，特別是對一些應該劃為右派的老黨員更加惋惜、心軟、下不了手，這種情結必須加以克服”。到了到 1958 年“反右補課”時，鄧還一再警告說，存在“姑息養奸，養癰遺患”的右傾保守危害。在反右的全過

程，鄧小平幾乎每天向毛澤東請示彙報運動進展情況，參與決策，並親自指揮和部署反右戰役，毛的反右運動各項政策、陰謀都是經鄧小平的指揮樞紐生產、實施的。

在全國，只有 2 萬多人的民盟，卻有 5000 餘人因劃為右派而遭致各種處分。民盟反右急先鋒為吳晗。1957 年 6 月 11 日他主持民盟《光明日報》支部會議，厲聲斥儲安平：“過去國民黨確實是‘黨天下’，儲安平現在說共產黨是‘黨天下’，不但歪曲事實，而且用意惡毒”，並責令儲安平把後面支持者交出來。這位史學家，深諳歷代君主“清君側”、烹“走狗”權術，他協助共黨員清君側了！不久他就火線加入了共產黨，並升任北京市副市長，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要職。在 9 月 13 日民盟全國整風會議上，史良說，“現在基層有不少右派分子沒被揪出來。有些人說，別的地方有右派，我們的單位中間不會有右派，用不著進行鬥爭。這種想法是十分有害的。也有一些人害怕打擊右派的面太廣，時間拖得太久，主張草率收兵。”她號召：“必須認識，對右派分子姑息寬容。對鬥爭採取旁觀或保留態度，就是右傾思想的表現。我們必須克服右傾思想，克服一切溫情主義，積極地勇敢地投到戰鬥中去”。

1957 年反右期間，每個地區都下達了必須抓出的右派分子數量指標。甘肅有個縣，派兩個人將二十名右派押送到勞改農場，途中有個右派跑了。縣委指示：“跑了一個，不夠上級規定的右派指標了。就讓另一名非幹部押送者去頂那個空缺吧”。這樣，那個押送右派的人成了右派，進了勞改農場。西北某地質研究所全體人員開了三天會，也沒有完成最後一名指標，誰都找不出誰有什麼右派言行。但指標必須完成，看來會還要開下去。也許是水喝得多了一些，加上天冷體虛，坐在牆角裡很少發言的張工程師起身去上廁所小解。他是全所最老實的人，41

歲，工作無可挑剔。等他回到會議室，大吃一驚：會居然散了，只有所黨支部王書記一個人在等什麼人。看著張工驚詫的表情，王書記從臉上卸下往日笑嘻嘻的臉譜，掛上有點做作的嚴肅表情，對張工說：“剛才會議一致決定，你是本所最後一名右派，請你服從。” “但是……王……” 王書記沒等張工說下去，頭也沒回地匆匆離去。張工看了一眼掛在牆上的生了鏽的鐵殼鐘，知道自己離開會場不到 5 分鐘，就交上了一生的厄運。

重慶大學的畢業生黃治中，被分到青海石油管理局的地質研究所工作。反右時他在北京進修。結業回到戈壁灘時已是 1958 年 2 月，反右已結束；可石油管理局沒有完成抓右派的指標，黃所在的地質研究所也分到待抓右派份子指標一個，於是他被劃為右派。黃申辯道：“我一張大字報沒寫，一句話沒說呀！” 黨委的結論是：典型不說話的右派，從骨子裡反黨。

從秦始皇的“偶語棄市”（竊竊私語者殺頭爆屍示眾），到漢武帝的“腹誹”（肚子裡誹謗當局）者斬，是一大“進步”；共黨發明的“骨子裡反黨”則比那“肚子裡”的“誹謗”又更上一層樓。西元前 117 年因“腹誹”罪而被漢武帝勾掉腦袋的，只不過是一個“農業部長”顏異而已；西元 1957 年因“骨子裡”的罪而蒙難的就成千上萬了。

有的人信教，在日記中寫了對基督教的認識，查出來就是右派。

一位 20 歲的小學女教師，自己未鳴放，只是當著其它教職員工的面，念了一段報上的一位民主人士向党提意見的文章。那位民主人士成了知名的“大右派”，她就成了小右派。

張伯駒自三十歲開始收藏書畫，直至六十歲，前後凡三十年。最後他將所有收藏品都無償捐獻給了國家。隋代名畫展子虔《遊春圖》是中國現存的最早山水

畫，堪稱國寶，便是張伯駒捐獻的。此畫當年索價 800 兩黃金，最後以黃金 220 成交。張氏為搶救這一稀世珍品，賣掉了自己的豪宅。陸機《平復帖》開口就要 20 萬大洋，張用 4 萬大洋從溥心畬的手裡買下。范仲淹手書《道服贊》是張用 110 兩黃金購來。還有《自書詩帖》、《章草千字文》等珍品多達 27 種；從紫禁城出版社 1999 年出版的《張伯駒潘素捐獻收藏書畫集》看，單價便是人民幣 9800 元，可知其份量。張伯駒毀家保護國家文物的精神，頗為友朋稱道；但卻不為共黨稱道，他後來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這就是中共對愛國者的報答。

江澤民當時在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動力處擔任黨支部書記，開始一個右派也沒抓。後來有人說：“動力處有那麼多知識份子，怎麼會沒有右派呢？”江澤民只好確定了兩個右派。其中一個人被定為右派的原因就是因為他說，剛剛從蘇聯進口的車床噪音比 1949 年以前從美國進口的車床要大。這本來是一個事實，但是在當時就是“反蘇言論”，就被定為右派。

一醫學院的女學生批評蘇聯醫學不及德國、日本，認為不應將蘇聯醫學拿來誤人子弟，於是被指為“反革命”，遭逮捕關押。中央美術學院學生袁運生在旅順見到用俄國將軍命名的街道時，對同伴表示過“真叫人掃興”。回到學校，同伴告了，他被劃為右派！南京工學院學生陳森輝對同學說庫頁島原本是中國的，被定為右派。北大圖書館正門外擺著莫斯科大學贈送的俄國科學家羅蒙諾索夫的塑像，一些學生建議校方搬走羅氏塑像，換成李大釗或者魯迅的塑像。因見校方毫無反應，十幾位同學行動起來，自己動手搬遷塑像。參與此事的學生也大多成了右派分子。總之，“凡愛國者都沒有好下場”。

1957 年 9 月 26 日，胡適在聯合國大會上沉痛地說：“在今天中國大陸上，凡是想做一個獨立的人，不分男女，都正被任意逮捕、拘禁、處決或消滅。千百

萬農人都正在被放逐或遭受到最殘酷的奴役。千百萬無辜的人民都正在驅作奴工，美其名為‘勞動改造’。兒女們被逼著控訴父母，家庭沒有溫暖與私人生活。個人的尊嚴與價值，已被剝奪淨盡。沒有任何基本人權，甚至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反右”後，還有“向党交心”、拔白旗、新三反、下放勞動和劃漏網右派。誰對本單位領導，特別是黨書記有意見，誰就是反黨。誰在單位業務突出，幾乎就成了單位的“白旗”；誰在“大躍進”裡安之若素，寡言少行，便成了“右派”的鄰居——“右傾”。劉鄧主導的拔白旗運動，還不是現在所說的“末位淘汰制”那麼簡單，政績的不行的人不僅要下臺，還要被說成是政治上的敵人，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何載，後來擔任過中組部秘書長，他就是 1958 年“拔白旗”時被作為敵我矛盾處理，下放到農村幹了 20 年農活。

1958 年 5 月劉少奇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更把右派和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和其他反動派相提並論。右派再不是人民中的落後分子，他們成了純粹的、地道的、完完全全的敵人。

1958 年 4 月中旬，中央統戰部在天津召開了向党交心運動的現場會，此後這一運動便在各民主黨派和全國知識份子中普遍開展起來。事實證明，這一運動是個陷阱：倘若你交出一顆金子般亮堂的心來，他說你態度有偽；倘若你交出一顆多少沾有些塵灰的心來，他便沒商量地將你打成右派。這年夏季“補課”被補成右派分子的，大多是掉進了這一陷阱而沒能夠爬出來的人。王賢才先生，此時大學畢業尚不滿一年，分在北京的一所醫院工作，他交心的材料是：蘇聯醫學不見得都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我們應該學習國際的先進經驗，不要只限于學習蘇聯一家。就因為這點“纖塵”，他的心便被嗤嗤冒煙地烙上了“右派”的火印……

解密資料顯示：1958 年 5 月 3 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佈：反右鬥爭取得階

段性勝利，定性為右派集團 22071 個，右傾集團 17433 個，反黨集團 4127 個；定為右派分子 317 萬 8470 人，列為中右 143 萬 7562 人；其中，黨員右派分子 27 萬 8932 人，高校右派分子 36428 人，高等院校學生右派分子 20745 人。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 4117 人，27 萬人失去公職。

我們平常習慣於說右派有 55 萬人，其實那只是 20 多年後有幸“改正”的一部分，更多的右派則沒有這樣的幸運，僅上述右派分子和中右相加的數字就已接近 500 萬人，嗚呼！

6·知識份子成賤民

右派們成了社會公敵，哪裡有廣播喇叭，哪裡就在唱“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四類份子”變成了“地、富、反、壞、右”“五類份子”。右派們的下場輕者是不斷被批判，重者則勞動教育或全家遷送農村。這些人連同他們的子女上大學、參軍都沒有份，就是到縣城找個工作也是不可能。從此他們失去了勞保、公費醫療，成了賤民。毛澤東刻意營造的賤民地位與非人的生活條件，是對“右派”的慢性槍決。這種“慢性槍決”並不比史達林處置政敵的手段更人道；對於統治者卻更為有利。一百多萬“反面教員”（毛澤東語）散佈在全國各地，朝夕出沒於數以億計的人們面前，無疑是對所有中國人的無言的警告：哪一個膽敢對中共稍發異議，便必定會得到同樣的下場！他們同時也在向人們昭示著：在中國做人，切不可誠實坦率，切不可過問政治，切不可有自己的善惡感，切不可違抗當權者的意旨，切不可對任何人寄予同情與信任！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將把這些畜牲戒條牢記心間，並傳給自己的子女。

在 1957 反右運動中，自殺的知識份子達到了 1949 年以後的又一個高峰。下

麵舉幾例：

雲南昆明的政協委員、資本家湯汝光本以為自己積極批判右派，黨就會信任他；不料他照樣被內定為右派，於是痛不欲生，跳河自殺。

東北人民大學（現吉林大學）歷史系主任丁則良鳴放期間正在蘇聯開會，並無反黨言論，但他尚未回國，學校裡就已製造出一個“餘（瑞璜，物理學家）丁、徐（理治，數學家）反黨集團”，把丁則良定成右派；他返國後到北京大學擬繼續編寫教材，可東北人大卻電話召其返校接受批判；他對來勢兇猛的運動毫無思想準備，遂投身北大校園內的未名湖自殺。

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女生江鳳英是該校第一份大字報《黨委在幹什麼？》，22位署名人中的第一位，因此成為全校“鬥臭鬥垮鬥倒”的頭號目標；她被連續鬥了三天，昏倒在臺上，噴幾口冷水弄醒再鬥，直到倒下後噴水不靈為止；她被抬回宿舍後當晚就跳樓自殺。

雲南大學中文系有四名同學因向系黨總支的領導提了意見，一併被定為右派分子；因不堪批判鬥爭的侮辱，其中一位黨員跳河自殺。

著名電影演員石輝反右時剛完成一部電影《霧海夜航》，由於片中有一幹部是個自私自利的傢伙，算是“誣衊黨的幹部”，他平時說的笑話也拿來作為罪證；連續被批判鬥爭兩天後，他登上自上海赴寧波的輪船，在真正的霧海夜航中跳進吳淞口外的揚子江，年僅 42 歲。

廣東某縣一位年輕的小學校長在全區右派指標缺一個時被補入名單湊數；他被准許留校，撤職當教員，但不能教政治、歷史、語文，只能教數學及做雜工；每月僅得 15 元生活費，養不活妻子小孩，還要忍受批鬥及辱罵，終於尋了短見。死後縣廣播站對全縣宣佈：“右派、特務、反革命 XXX 畏罪自殺，死於汽車輪

下”。

廣州水利發電設計院女技術員黃倩，是黃金榮的堂侄孫女，哥哥又在臺灣，只因寫了一份大字報，希望領導“對目前的知識青年的取捨、培養、使用和鑒定，不能再死死抱住其家庭出身，而應著重從他們具體的思想動態和工作表現去觀察、鑒別和評價”，因而被定為右派；一連幾天幾晚的鬥爭，鬥爭之餘又打掃廁所，這位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受不了，上吊自殺了；第二天設計院照樣召開“批判黃倩右派謬論大會”，在黨委的安排下，發言者批判死者是“用死來軟化群眾博取同情，用死來威脅黨，用死來否定黨的反右的正確性和必要性，用死來洗脫自己見不得人的醜惡……”。

一位中學生因為說“蘇聯並不是真正幫助中國，他們把中國的雞蛋、蘋果、好吃的東西都運到蘇聯去了”而被檢舉，當局便責令其父“揭發”，父親不願傷子而臥軌自殺。

還有著名的電影導演史東山；曾擔任周恩來機要秘書和《人民日報》副總編的著名女散文家楊剛；中共中央黨校秘書長、著名文學理論家周文；以及新聞工作者洛蔚、麥招漢等，都是此時自己結束了生命。黨內“極右”分子、原中共山東省委候補委員、大眾日報總編輯劉建已於 1957 年 10 月 28 日夜畏罪自殺身死；劉建死時，年齡僅 39 歲。劉建死後，大眾日報根據省委指示召開各種會議，並通過大字報，聲討劉的罪行，肅清劉的影響。

著名生物學家湯非凡是當時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于 1958 年的拔白旗運動中自殺。當時的許多自殺案都被看做是一種抗議行為，這可能與中國知識份子“士可殺不可辱”的傳統有關。不僅許多人以終結自己的生命向當局及其追隨者的倒行逆施表示最後的不屈的抗議，甚至還有為朋友被整而憤然自殺的。例如，

當劉賓雁被打成右派而遭到批判時，其好友戚學毅即以跳樓表現了“士為知己者死”之氣概。

被打成右派後的人們，表現也是迥異。有的人採取了檢討認罪以保飯碗的態度。如費孝通、儲安平、黃琪翔（黃曾批判中共學蘇聯的政治制度）等人的檢討書被冠以“向人民伏罪”、“向人民投降”、“請求人民的寬恕”的標題，印在《人民日報》上，發到全國各地。

章伯鈞說：“我不認錯，難道讓黨（共產黨）去認錯？”結果章伯鈞保留了小汽車的待遇，章乃器拒絕在“右派”結論上簽字，就沒有這個待遇。大革命時代投筆從戎的巾幗英雄胡蘭畦，長期在香港從事統戰工作，是中共大功臣；鳴放時僅僅去看望了老朋友，而章伯鈞是頭號右派，她就成了右派。章伯鈞女兒章詒和因“為反動父親翻案”，被判 20 年徒刑。

有的人始終忠於中共，比如老黨員馮雪峰被黨開除後仍忠於黨，給也是黨員的兒子寫信道：“你的一切都是黨給的……我相信你一定會跟著黨走，永遠前進。”

也有人拒絕認錯，因此遭到了更大的摧殘。比如，《北京日報》編輯徐鍾師因為同意儲安平的“黨天下”論，被揪出來鬥爭。可是在鬥爭會的臺上，人們突然發現：“此時昂首站在被審判席上的他，竟然成了亮晶晶的光葫蘆頭。老徐不但剃光了頭髮，還刮淨了臉上平日的鬍子拉茬。……穿起中式蜈蚣扣兒的蓋布褲掛，一種‘士可殺而不可辱’的神色，溢于鬚眉之間”（從維熙《走向混沌》第五頁）。由於“態度惡劣”，他就被送去“勞動教養”了。……

1957 年大鳴大放中，郁達夫與王映霞的長子郁飛出差在外，沒有發表任何言論。1958 年複查“右派”時，上級發現新疆分社所定右派不夠規定指標，要

求補定一個。新疆新華社把鬱飛補劃為“右派分子”，送去“勞動教養”，勞教的時間一再延長。為什麼延長？因為鬱飛“不認罪”。為什麼不認罪？因為他沒有鳴放。當局曾許經過勞教的“右派”自謀職業。鬱飛就到北京去謀職。由於沒錢，他想找在印度大使館任職的老同學給一點資助。結果，到大使館的門口就被中國警方戴上手銬，被宣佈為“叛國”，接受更加嚴酷的“強勞”。

艾青有一句並不晦澀的詩：“我們的世界／好像很大／其實很小”被曲解成“社會主義制度不自由、活動天地很小”。他被送進了勞改營。

北大歷史系學生雷光漢說了句“蘇俄霸佔我國江東六十四屯”，便被定為“反蘇”右派發配到新疆塔城勞改去了。民盟女中央委員王立明抨擊了 1940 年代蘇聯紅軍在東北到處姦淫婦女的行為。官方為了拍蘇聯馬屁，給了她一頂右派帽子。二次大戰後聯合國成立時，王立明曾作為當時的中國政府代表團的成員出席。當上右派後，她在家中寫了一份改造聯合國這個組織的計畫，打算日後有機會時呈交周恩來。不幸文革來臨，她家被抄，這份計畫成了她“裡通外國”的證據。她被捕入獄，死在那裡。早在 1949 年，東北作家蕭軍就因為批評蘇軍軍紀太差、到處強姦中國婦女而被一棍子打倒，在中國文壇上消失了。

《人民日報》用兩版的篇幅刊登了鐵托的一份演講文稿。有人在鐵托文章中用筆劃上了杠杠道道，被按上“讚美修正主義者，醜化我國社會主義”的罪名，戴帽去勞改。

那些被打成了右派的人，受盡了折磨。凡是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除了鬥批打關餓百般折磨外，有配偶的一定強迫配偶與之離婚；有異性朋友的一定強迫朋友與之脫離關係。許多人因受此打擊而走上絕路。名作曲家、上海民樂團團長陳歌辛韓戰期間獨自捐了一架飛機，並把長子陳鋼送到前線去“保家衛國”。這樣

一位愛國藝術家只因是從香港來的，就被扣上右派帽子，押送到安徽勞改去了。他不久餓死在那裡，屍骨無存。

7·艱難的平反

所有被毛打倒的敵人中，毛似乎特別看重右派。1962年，當毛澤東因他發動的“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導致4千余萬人餓死，以致不得不同意對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定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的人平反時，黨內出現了也應為右派平反的呼聲。安徽省作為試點，甚至已給不少人平了反；北京各機關也開始進行。毛澤東趕忙出來制止說：“對於1957年的右派，不存在甄別平反的問題”。於是全國立即剎車。一些已被列入平反議程，遵命寫了平反的材料右派份子，一概被視作“妄圖為己翻案”的死不悔改的右派，處境更加惡化。

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批發了《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的決定。根據該決定，以1957年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標準”的通知》為依據，凡符合當時劃右派標準而定為右派的，是摘帽問題；凡劃錯的，應予以改正。當時之所以對右派分子只是“摘帽”和“改正”，而不是“平反”，是因為鄧小平仍堅持認為反右運動是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1978年底經過當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的極大努力，才為99.99%以上的右派全部平反，恢復當年的級別、薪金，黨員則恢復黨籍。

1957年的整風鳴放，《中國青年報》社長兼總編輯張黎群在首都新聞界座談會上就如何辦好一份為青年所喜聞樂見的報紙為主題，作了一個包涵五個問題的發言。他說青年報應突出青年的特色，不能什麼檔講話都照抄照登，而應當精細加工，使其生動活潑，形象具體，不要將報紙弄成個“佈告牌”、“留聲機”、“翻版書”。第二天的《人民日報》把他的這些話見了報，全文被載入人民大學

新聞系講義。在接著到來的“反擊右派倡狂進攻”時，團中央的“反右”鬥爭由書記處書記兼機關黨委書記羅毅全權領導。他在團中央打出了 73 名“右派”，張黎群的那句話也被抓住不放，並被密報到黨中央。1957 年 7 月 16 日胡耀邦率中國青年代表團啟程去莫斯科參加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待他回國途經烏魯木齊作短暫停留時，得知團中央打了一大批右派，於是他說：“必須剎車了！”隨即就往團中央機關打電話說：“你們不能再這樣搞下去了。右派名單不要急著宣佈，等我回來。”但已來不及了。中國青年報社成了重災區，正、副社長和總編輯被“一鍋端”，丁望、劉紹棠、劉賓雁等 17 位元著名編輯和記者也被打成右派。約占編輯部總人數的 17%，而且大部分都是副總編輯、部主任和業務骨幹。有的是因報導過某部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有的在報上揭露了一些省、市委領導幹部搞特殊供應的“秘密商店”，有的寫了篇諷刺官僚主義的小品文，有的僅僅給人事科貼了張大字報，還有的不過是說了一句“報社哪有這許多右派”就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中國青年報社同仁戚學義不願違心批判劉賓雁，也被批判威脅警告。戚學義在新聞界、文學界、共青團中央聯合召開的一次批判劉賓雁鬥爭大會之前，當滿載著批判大會的中國青年報編輯部人員的大汽車到達會場（北京日報的五樓會議室）之時，戚學義從五樓的視窗跳下來，摔死在北京日報大樓的大門口！人們目睹了他墜落到地面的慘烈情景，都驚呆了！戚學義以身殉道，立刻被宣佈為反革命，是自絕于人民自絕於黨。這是 57 年現代史中僅見的壯烈！

胡耀邦先去了中南海，向黨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說：“張黎群在新聞工作座談會上講的那些詞句，是糊塗俏皮話。他是說報紙登的通知、講話什麼的太多了，好像是貼佈告，說了句俏皮話。他很年輕時就參加了革命，對黨還是很有感情

的……” 此前，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也在鄧小平面前為張黎群說了不少好話，並拍了胸脯打保票說：“此君絕不會反黨！”現在聽到胡耀邦也這麼說，鄧小平就說：“那就算了吧！不過他既然糊塗，就不能再當報紙總編輯了！”於是，張黎群的問題就成了人民內部矛盾，被定為“犯了具有資產階級新聞觀點的嚴重的政治錯誤”，給予四個方面的處分：寫一篇檢討文章，由新華社發通稿，供各報刊登，以消除錯誤影響；撤銷共青團中央常委；黨內嚴重警告；下放陝北米脂縣擔任縣委書記處書記。1958年2月，團中央系統73名挨整的右派全部下放到山西省平順縣去勞動改造，胡耀邦前往送行。1979年2月間，團中央召開一年一度的各省、市、自治區團委書記會議。在主席臺前，不等會議主持人宣佈開會，胡耀邦自己就站在麥克風前講起話來。他指著陳模對與會者說：“我給大家介紹一下，這位是陳模同志，團的高級幹部。1957年反右派鬥爭，他挨了整，吃的苦頭最多。這件事我也有責任，我在最後的裁定書上也簽了名嘛。現在我向陳模同志賠禮道歉！”說著，他走到陳模的面前行了三鞠躬，然後接著說：“我不但向陳模同志道歉，還要向團中央機關及所屬單位所有挨整的，被打成右派的同志道歉。”說罷，走到主席臺前向全場同志三鞠躬。胡耀邦在席上還說：“用一分为二的觀點看，這件事對陳模同志也是一次鍛煉，一次學習。我還要強調的是，今後這種整人的事，不要再發生了！”

鄧小平卻十分強硬地說：“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沒有錯，同志們可以思想一下，1957年的問題是個甚麼問題呢……這個時期出來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黨的領導。有些人是殺氣騰騰的啊！當時不反擊這些思潮是不行的。”由此可見，鄧小平對右派平反大加阻撓，親自為反右運動定性為“正確、必要”，只是“擴大化了”。

1957年鄧小平是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比毛本人還積極主張擴大打擊面。陳伯達在《最後口述回憶》中說：毛澤東曾派陳伯達去北大看大字報。陳看後報告說：“不值得大驚小怪，沒甚麼不得了”；而鄧小平卻在主持省市委書記會議上說：‘現在時間比金子還寶貴，你們要趕快回去收集右派們的言論，否則時間晚了，就收集不到了。’我當時很驚訝，怎麼會‘時間比金子還寶貴’呢？人總是會說錯話的，這樣抓緊時間去專門收集錯誤言論，牽涉的人就多了。所以，反右擴大化，鄧小平有很大責任的。”此後，中蘇論戰開始公開化，隨著十年論戰和“九評”的發表，一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左”的理論綱領也逐漸成熟，而鄧小平則是這個寫作班子總負責人。

鄧小平在1980年3月19日說：“1957年反右派鬥爭還是要肯定……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於擴大化”（《鄧小平文選》1957～1982年，第258頁）。

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決議說：“在整風運動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地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

然而，鄧小平卻在《鄧小平文選（第一卷）》出版時，悄悄抽掉了他的那些57年反右的極左文獻《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以及一系列反右立功文章和檔。這豈不是欲蓋彌彰、做賊心虛？這個舉動再明白不過地透露了鄧大人的心理玄機——以《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為代表的構陷右派的文件、文章，內含著的正是他最不敢面對的歷史責任。

鄧儘管同意給絕大多數右派“改正”，但仍堅持反右運動是“必要的”，因

為確有“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向黨進攻”，那場運動的問題無非是“擴大化”而已。為了給其論點提供依據，甚至不得不留下五個重要人物（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陳仁炳和彭文應）不予“改正”；又明知理虧，不得不派人去安撫那些人（都已故去）的家屬，私下承認這些人也屬無辜，請他們“顧全大局”，即為了黨的面子需要而任死者繼續將右派帽子戴下去。

為了一個人的面子而欺騙全黨、欺騙全國人民，這是多麼荒唐！因為根本不存在所謂“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黨和社會主義倡狂進攻”的事實。按照中共中央在 1957 年 10 月 15 日發佈的《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實際上沒有一個人符合於這個標準。鄧小平在八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裡指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在向黨進攻的時候所提出的形形色色的反動綱領，其實質就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黨的領導”。可到目前為止，任何檔、任何報刊書籍都沒有披露過哪個右派分子的言行是真正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除非像《人民日報》捏造“殺共產黨”之類的謊言。

章伯鈞的罪狀是提出政治設計院。1957 年 5 月 21 日章在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說，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他還提出，國務院開會常常是拿出成品要我們表示意見，這樣形式主義的會可以少開。四個政治設計院的提法並無不當，鄧小平不是被贊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嗎？章伯鈞提出政治設計院又有什麼錯呢？總設計師只有一人，自然還可能有分設計師，有設計員，有助理設計員，實習設計員，合在一起，不就成了政治設計院了嗎？你當總設計師滿臉堆笑，別人說政治設計院你就將人打入 18 層地獄，這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羅隆基罪名的主要根據是他主張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一

個平反委員會，而且建議全國上下都設立這種委員會，接受公民的申訴，不但審查過去運動中的偏差，為過去受了委屈的人平反，而且可制止以後可能發生的對批評者打擊報復事件。這樣做也有利於避免和減少冤案，對國家並無壞處。羅隆基的建議完全得到了證明，也被中共所實踐。可是鄧小平卻讓羅隆基把右派份子的帽子一直帶到地下。“平反委員會”這個意見之不會被接受，還有另一層原因，那就是，如果在“平反委員會”中有了民主人士，被平反的人會怎樣想呢？他會感謝民主人士，因為是民主人士幫助他獲得了平反，共產黨會受到怨恨，因為是共產黨構陷了他們的罪名，所以此事是最不可行的。

8·反右十宗罪

1) 任何政黨直接給非黨公民以處分都是非法的。古今中外，任何政黨都不具直接給非黨公民以處分的權力和職能。即使執政黨，也絕不例外。黨是黨，政是政，黨、政必須涇渭分明。不得黨政不分，不得以黨代政，不得以黨的名義向社會向公民發號施令。即使公民犯了罪，政黨只能建議政府依法查處，不得擅自給犯有罪錯的公民以處分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未曾授權中國共產黨、中國也沒有哪部法律賦予中國共產黨可直接給非黨公民以處分，中共各級黨委直接給非黨公民以戴右派帽子的處分，是無法可依、違背法律的，是非法的。

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黨對黨員的最高處分是開除黨籍，黨沒有直接處分非黨員的職能。中共各級黨委直接給非黨公民以戴右派帽子的處分，不僅是非法的，而且違背黨章。

世界上任何政黨都無權直接給另一政黨成員以處分。中共和各民主黨派都應是政治上平等、組織上獨立的政黨，彼此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中共各級黨委直接給各民主黨派成員戴右派帽子，不僅是非法的，而

且違背了人類公認的原則。

2) 侵犯了言論、出版、集會的天賦自由，屬於反人類罪。1954 憲法第 87 條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然而，凡是在 1957 年嘗試兌現這些公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人，統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江蘇省一些青年作家翻譯家陳椿年、高曉聲、葉至誠、方之、陸文夫、梅汝愷、曾華等在 1957 年 6 月初發起組織《探求者》文學月刊社，他們不過是有此意願，並沒有成為事實，就因為反右派鬥爭而中止。他們草擬的《啟事》稱：要“不斷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指導下，運用現實主義的方法進行創作，就是我們的主張。”顯然，他們與“右翼知識份子”和修正主義者都沒有任何關係，只是想辦一個同人文學刊物。結果是：“高曉聲、陳椿年、梅汝愷、曾華被劃為右派分子，陸文夫、方之、葉至誠的處境比右派分子也好不了多少。”貴州人民出版社錢革等七名編輯，籌畫辦一個名為《文學青年》的雜誌，與官辦的期刊《山花》唱對臺戲，全被打成右派，罪名是“積極籌備出版反動刊物”。青海省文聯、青海日報二十餘人提議改組《青海湖》雜誌，或者自籌資金另辦《夜鶯之友》，全都成為右派，撒拉族青年韓秋夫為此蹲了二十三年大牢。新湖南報編輯唐蔭孫聯絡鐘叔河等四名編輯，談了辦同人報紙的一些打算，並無任何行動，卻也夠“共同密謀開辦同人報”之罪了，五個人都成了右派。通俗讀物出版社副總編輯藍鈺主張“成立出版協會，作為出版界群眾性的組織，也就是讓出版界自己管自己的事”，更是罪加一等。允許辦同仁刊物，允許黨外人士辦報，是毛澤東自己放出來的風，周揚、譚震林等高級官員還向下邊傳達過，著名影評家鐘惦斐被打成右派後不服，說“怎麼他說了可以，我說了就不行？”他還不明白，這就是毛澤東的強盜邏輯。

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長期共存、相互監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都是毛澤東提出或認同的。“言者無罪”是什麼意思呢？既然只有當權者才有可能對別人判罪，而當權者們當然不會對他們所贊同的言論興問罪之師。所以，非常明顯，言者無罪尤其是肯定了唱“反調”無罪。1957年的整風運動基本上是以座談會形式進行的。座談會是正常社會人們共同討論，協商事情的一種聚會形式。能夠坐在一起談，起碼不是敵我關係。否則就不能稱座談了。在此過程中造成的誤會或摩擦應該由東道主中共包容與承擔，中共無理由更無權力來追究座談會發言人的行政責任或法律責任。誰又能想到在中共的詞典中，座談會是充滿血腥的鴻門宴。“座談會上抓敵人”。這不能不說是中共的新創造！各民主黨派成員和知識界知名人士反映政見和主張、建議和批評，是無可非議的，卻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戴帽批鬥、嚴加懲處。當時被萬箭齊發、密集批判的右派“三大反動理論”是由羅隆基、章伯鈞和儲安平幾次討論會發言組成的。他們的意見和建議無非是要建立一個有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共同組成的委員會以檢查三反、五反、肅反工作中的偏差（羅）；國務院常常出了成品要政協、人大等機構表態，建議要把政協和人大的人加進政策形成的過程中去（章）；不要在全國範圍內，事無巨細，都要看著黨員的臉色做事（儲）。有些人常在一起議論國事就被批為反動小集團、裴多斐俱樂部。山東大學部分學生，因為不滿《青島日報》對山東大學鳴放的報導，而集體去抗議，被加上衝擊“黨報”的罪名，被打成右派。

反右運動是全國範圍內違憲運動。中共中央在反右運動期間發佈的檔，無一不是對憲法的蔑視和違背。所謂“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既沒有質的明確性，也沒有量的規定性，只要稍加引申，任何言論都可以被曲解為反黨反社會主義。

右派分子就是按照這種可以由當權者隨心所欲地任意解釋的標準“劃”出來的，絲毫沒有法律依據。以言治罪是專制主義的產物，是反人類的。“劃右派”本身就是錯誤的、違法的。至於有人說這不過是母親錯打了孩子，“天下沒不是的父母”，連“錯劃”也有理了。“哀莫大於心死”，此之謂也

毛澤東開了以思想、言論定罪的戒。此後，批評共黨及其領導人，都是“犯罪”，不一定要經過審判。後來又升級，當作“反革命惡毒攻擊”而判死刑。連兒童由於年幼無知而寫出的字句也不放過。甚至只須領導說一句“我看你就不是好人”，性質就定了下來。一些單位和鄉村，根據上級授意或自行決定，就可對問題嚴重的人進行監視、關押，設立“勞改隊”、“專政隊”、“封閉性學習班”，隔離審查，甚至私設刑堂。高溫高壓的大辯論後來也發展為兼有捆綁和拳打腳踢的“拔白旗”、“噴氣式”。司法機關遵照黨委決定或書記指示，以拘代捕、以拘代刑、審而不判、判而不審、輕罪重判、無罪硬判的事，都大量發生。

3)扼殺創新罪。反右運動不僅打擊了所有敢於獨立思考並直言的知識份子，而且毒化了整個社會，完全顛倒了是非標準。一部份知識份子形成了牆頭草，隨風倒的雙重人格。他們緊跟“紅太陽”，亦步亦趨，成為黨的“御用知識份子”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則清高自遠，對政策問題噤若寒蟬。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份子像是徐庶進了曹營，一言不發了。

朱厚澤認為反右派鬥爭後造成最大的問題是抑制了創新，人們沒法創造。誰試圖創新，將丟掉身家性命。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在三十、四十年代可以培養出楊振寧、李政道，而解放後的五十八年中沒有也不可能出現過這樣的人物。反右派鬥爭以後，清華變了，不是原來的清華學風了，沒法創造了，也沒有創新的精神、勇氣和環境了。人都成為“馴服工具”，“輿論一律”、“保持一致”的

應聲蟲了，怎麼可能創新？

4) 公開誘供，罪加一等。毛澤東公開、熱烈邀請各民主黨派和非黨知識份子給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卻嚴密、層層佈置引“蛇”出洞，誘敵上鉤。響應毛澤東號召、給黨提了意見、而被打成右派的人，大叫受騙上當，中了毛澤東的陰謀。毛公開表示：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何謂陽謀，公開誘供是也。誘供是非法的，公開誘供得罪加一等。

5) 迫害人大代表、人大常委罪。54 憲法三十七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非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允許，……不受逮捕和審判。”這說明人大代表具有一定的豁免權。但是很多人大代表只是因為提出不同政見，而被劃右派，更有甚者把人大會議作為批判人大代表的會場，人大一屆四次會議（1957 年 6 月 26 日—7 月 15 日）就將批判人大代表中的右派分子，作為會議的重要議程。這是 57 年反右運動踐踏民主、踐踏憲法的典型事件，人大會議不僅是橡皮圖章，還變成了摧殘人權、打壓人大代表的鬥爭場合。

反右後將大批人大代表、公職人員撤職，免職。在 1958 年 2 月召開的一屆人大五次會議上，有 38 人被定為“右派分子”，取消人大代表資格，在這次會議上，被罷免的人大常委有：黃紹竑、龍雲、陳銘樞（注 1），被罷免的還有人大法案委員會委員張雲川、陳銘樞、黃紹竑、黃琪翔、謝雪紅、羅隆基，人大民族委員會委員費孝通、黃現番、歐百川，國防委員會委員黃琪翔，國防委員會副主席龍雲。1958 年 1 月 31 日經一屆人大常委會第 93 次會議通過決議，撤銷被劃為右派的三位部長：糧食部長章乃器（民建）、交通部長章伯鈞（民盟）和森林工業部長羅隆基（民盟）。在 1958 年至 1959 年期間，因是右派分子，經人大常委會撤銷職務的 17 起。

57 反右之後，人大代表參加會議都噤若寒蟬，十分謹小慎微，不敢輕言政治法律問題。1957 年 6 月召開全國人大會議，代表提案 243 件，其中政治法律方面的 23 件；但是在 57 反右結束後，人大會議上代表政治法律方面的提案，都明顯減少。1958 年 2 月召開的一屆人大五次會議，代表提案減少為 81 件，其中政治法律方面的只有關於民政工作的一件；1960 年 3 月召開的二屆人大二次會議，代表提案 46 件，其中政治法律方面的 1 件也沒有。政治法律議案的逐年急劇減少，這是 57 反右所製造的嚴重惡果。

朱厚澤認為反右派鬥爭實際上造成指鹿為馬的政治風氣，黨內確實形成了“不說假話，做不成大事”的新的作風；使社會失去了對於邪惡的任何有效的制約機制。遂使種種罪惡現象洪水般在中國大地上氾濫開來，其勢頭之大甚於 1949 年以前的中國。

6) 停止人大、廢除法制罪。中共隨意延長、縮短人大會期。54 憲法第 25 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每年舉行一次。”好景不長，這種關於會期的規定只執行三年，就被反右運動打破。1957 年 6 月開始反右，很多人大代表成了“右派”，必須召開人大會處理，於是就把下一次人大會議(一屆第五次會議)提前 6 個月在 1958 年 2 月召開，打破了人大會議每隔一年開一次的憲法規定。憲法第 24 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四年。”三屆全國人大召開第一次會議(1964 年 12 月)後，在 10 年之中竟沒有舉行過任何一次人大會議，人大活動停止了十年。

停止人大審議政府、最高法、最高檢察院的工作報告。54 憲法第 27、52、80、84 條都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最高法院、檢察院都要向全國人大負責並報告工作，人大要聽取和審議這些報告，並通過相應決議，給予評價，

這是人大行使監督權的基本方式。但在 57 反右後的人大一屆五次(1958 年 2 月)、二屆二、四次大會都沒有審議政府、法院等工作報告。1961 年和 1962 年的國家財政預、決算都沒有經全國人大或其常務委員會審議。

司法部、監察部、法制局反右後被撤銷，廢棄法制。在 1957 年反右運動的衝擊下，國務院下屬的司法部、監察部、法制局分別於 1959 年 4 月和 6 月被撤銷，使得本來就缺少保障的公民權利，現在更找不到歸口管理的部門。根據 54 憲法，全國人大行使國家立法權。但在反右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全國人大的立法權基本上被廢棄。

7) 違反天理良心罪。全國有 55 萬 2877 人被打成右派，其中改正的為 54 萬多人，占總數的 99%以上(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下卷，619 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93 年版)。這證實，反“右”鬥爭出錯率在 99%以上，但中共卻認定反右本身沒有錯，實在喪盡天良。2002 年 9 月初，胡啟立第一次上書要求推倒“反右運動”的正確性、合法性。當時的中央政治局經過討論，一致認為“問題已經解決，一九七八年的政治結論不變。”2006 年六中全會前夕，胡啟立再度上書，要求否定 1957 年的反右運動。2007 年“兩會”前夕，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經過討論，拒絕了胡啟立的要求。

一個案子的判決，99%以上失實，還認定它本身沒錯，那就違背了天理良心。一個運動，99%以上出錯，還認定它本身沒錯，這是公開背叛實事求是原則，是非法的。公、檢、法以“反‘右’鬥爭 99%以上出錯，還認定它本身沒有錯”為樣板，創造出諸如湖北佘祥林(判刑 15 年)殺妻錯案、湖南騰興善(已槍決)殺人碎屍錯案、浙江何旭東(判刑 13 年)綁架罪錯案、福州警匪勾結殺人奪財案……反“右”鬥爭這塊公開背叛實事求是、導致錯案頻發的負面樣板，給社會

造成的惡劣影響，是無法估量的。

8) “逼、供、信”、屈打成招罪。毛澤東在全國範圍內，掀起狠揭、猛批章羅同盟的高潮。這是逼。大會小會，報紙電臺，批個不停，鬥個不息，章伯鈞只得違心承認章羅同盟。這是供。毛達到目的，中共中央信以為真，一致認定章伯鈞、羅隆基是全國最大的右派分子。這是信。其實，章羅右案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由毛澤東一手製造、至今尚未糾錯平反昭雪的全國最大冤假錯案。毛的“逼供信”是非法的，至今還在危害中國。

章伯鈞、羅隆基等人因為經常在一起議論政治問題，儘管他們中還有很多分歧，1957年也被毛澤東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首先批為章羅同盟；198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才面對事實，作出當時並不存在章羅同盟的結論。章羅同盟並不存在，基於這一同盟的所謂反黨罪行，在法律上就不能成立。奇怪的是：章羅右案並不因此而糾錯改正，捏造事實也不因此而依法追究，這說明中共的法律是反人權、反人類的。

9) 立黨不公罪。憲法規定，由於國家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利而受到損失的人，有依照法律取得賠償的權利。“走資派”糾錯平反，工資全部照賠；“右派”糾錯改正，工資分文不賠。同是錯案，黨內的，全賠；黨外的，不賠，這是不公正的，這是立黨不公。

10) 毀滅人類文化罪。反右運動給中國造成的傷痛與災難是至深至巨的。朱厚澤認為反右派鬥爭最大罪惡是破壞了人類文化遺產、人類歷史遺產。知識是依靠有知識的人一代代傳承下來，結晶在知識份子頭腦中。打擊了知識傳承的載體——知識份子，上百萬知識份子被毀滅、受衝擊、下放勞改，這是社會從文明到野蠻的倒退。

第 123 節 1957 年學朝

1. “五一九”運動

北京大學 1957 年“五一九”運動是一場自發的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5 月 19 日 11 時左右，第一張大字報出現在大飯廳東門右側灰色的牆壁上，質問團委會出席“三大”的北大代表是如何產生的。這張大字報可能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張群眾自發貼出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用的是大紅紙，黑色毛筆寫成，十分醒目；是歷史系三年級學生許南亭寫的。因為正值開飯前夕，許多同學都圍著看。接著出現的第二張大字報是哲學系學生龍英華貼的“一個大膽的倡議”建議開關“民主牆”。這兩張普通的大字報，揭開了北大民主運動的序幕。

第三張大字報是數學系三年級學生陳奉孝、張景中、楊路、錢汝平等貼出的，題目是自由論壇成立宣言，提出了“取消黨委負責制，成立校務委員會，實行民主辦校”，“取消秘密檔案制度，實行人事檔案公開”，“取消政治課必修制，改為政治課選修”，“取消留學生內部選派制度，實行考試選拔制度”，“開闢自由論壇，確保言論、集會、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等五項主張，這一下炸了。第三張大字報的作者們，沒有署名，都署了學號。所謂自由論壇，就是在牆上發表意見，這就是“民主牆”。

當晚在全校團員大會上，有人問起民主牆問題，黨委崔副書記答覆說：大字報不是最好的方式，我們不提倡也不反對。這引起同學們很大的不滿。

這天晚上，中文系的同學沈澤宜、張元勳聯名貼出了一首長詩“是時候了！”這首詩充滿激情，號召人們去戰鬥，向“三害”（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發起猛攻！

是時候了

(一)

是時候了！

年輕人

放開嗓子唱！

把我們的痛苦

和愛情

一齊都瀉在紙上！

不要背地裡不平，

背地裡憤慨，

背地裡憂傷。

心中的酸、甜、苦、辣

都兜出來

看一看天光。

讓批評和指責

急雨般落在頭上，

新生的草木

從不怕太陽照耀！

我的詩

是一支火炬。

燒毀一切

人世的藩籬。

它的光芒無法遮攔，

因為它的火種

來自——“五四”！！！！

(二)

是時候了，

向著我的今天，

我發言！

昨天，我還不敢

彈響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調子，

歌唱和風與花瓣！

今天，我要唱起心裡的歌，

作為一支巨鞭，

鞭苔死陽光下的一切黑暗。

為什麼，有人說，集體沒有溫暖？

為什麼，有無數牆壁隔在我們中間？

為什麼，你和我不能坦率地交談？

為什麼？……………？

我含著憤怒的淚，

向我輩呼喚：

歌唱真理的兄弟們

快將火炬舉起，

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

這首激情的充滿了戰鬥氣息的詩，看的人很多。人們打著手電筒，爭先恐後地連夜閱讀、抄錄、拍照；也激起了一些人的反對，他們說：“五四”的火炬是對敵人的，對人民內部就不應該再舉起，並指責作者的情調像白毛女申冤。關於詩的爭論是運動前兩天的中心之一。

化學系的李燕生模仿唐詩寫了一首“昔人已乘民主去，此處空餘民主樓”的詩貼在了山牆上，別人的大字報想蓋也蓋不上，引起了不小的轟動。當夜李還用掃帚把蘸著石灰水在好幾條馬路上寫了“民主路”、“自由路”等。

次日清晨大飯廳附近牆壁上，已經被五顏六色的紙張佈滿。許多大字報對學校黨的工作提出尖銳的批評或建議，並對昨晚崔副書記無可奈何的態度提出抗議。

當天下午出現了一張署名“一個強壯而懷有惡意的小夥子——譚天榮”所寫的“一株毒草”，一開始就吸引了人們的注意。“我們要走自己的路。我們要回答：這一切都是為了什麼？我們要回答：生活走向哪裡，歷史走向何方？”“我們要思考，除了我們自己誰又能禁止我們思考？我們要想，不讓想嗎？偏要想！”作者吹響了反對教條主義的號角，批評一切報刊（例如《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和《物理學報》）是封鎖真理的萬里長城，批評《再論》是赤裸裸的唯心主義。他建議北大學生自己辦一個綜合性學術刊物。

大字報像雨後春筍一樣增多著，截至 20 日下午 5 時 20 分止已有大字報 162 張。到晚上，同學們已不滿足於寫大字報，還在廣場上開展了辯論會，很簡陋，卻也很方便，搬來一張桌子，就是講壇，誰想說什麼就上去發表一通意見，如果想說話的人多，就排隊，而且還限制時間，熱烈而民主。一時之間，北大校園熱

氣騰騰。大家都感到很興奮。

就在這天晚上，北大黨委書記、副校長江隆基正式表態，宣佈支持大字報（當時毛澤東指示：大字報可以揭露問題，暴露右派，鍛煉群眾，利多害少）。

物理系學生劉奇弟，湖南人，鐵路工人子弟，在 55 年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而引起的肅反運動中，因為替胡風鳴不平，被打成“反革命”，在北大遭到批鬥關押並綁在了窗戶棧上，與胡風在同一所監獄呆過。56 年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揭露了史達林所犯的肅反擴大化的錯誤以後，中共提出了“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口號，對 55 年的肅反運動進行甄別，當時被錯打成“反革命”的人得到了平反（當然不可能是全部），劉奇弟就是其中一個，摘去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繼續留校讀書。21 號，劉奇弟同學貼出大字報《胡風絕不是反革命》，他是敢於要求為胡風平反的第一人。他在大字報中說：“胡風是一位進步的作家，是民主戰士……他向青年揭露黑暗指出光明，他為青年所愛戴、尊敬。……《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完全是一本斷章取義、牽強附會，毫無法律根據的書。”他還在他的大字報旁邊張貼了一副對聯：“鐵窗禁賢良，天昏地也暗”、“忠臣血灑地，鬼神俱哭泣”。他立即遭到了全校“左派”猛烈的圍攻。推推搡搡，強迫低頭彎腰不算，並直呼其為“反革命分子”。劉奇弟的個性又非常倔強，不服氣，當然這就招來更嚴厲的懲罰，他一開始講話，便有人上去扇他嘴巴。以後，劉奇弟獲刑 15 年，1961 年遭吊打凍餓而慘死於勞改隊裡。

新聞系蔣文欽同學貼出《與北大黨委書記史夢蘭同志商榷》的大字報：“北大 1955 年下半年的肅反運動，百分之九十幾都鬥爭錯了。錯誤的根源不在於工作方式，而在於脫離群眾，以憲法為兒戲的官僚主義。”

哲學系羊華榮同學在大字報《重新估價肅反》中說：“肅反有如下缺點：①

侵犯了一些公民的基本權利，如鬥錯了人，關錯了人，迫壞了人，迫死了人”；
②破壞了法制，損害了憲法，損害了民主自由，如限制一些公民通訊自由、人身自由、無根據的搜查、看禁和逮捕。③促使了黨員與非黨員之間的牆更高、溝更深，少數黨員在肅反後，在人民頭上高視闊步。④摧殘了人們應有的感情，破壞了多少家庭幸福，拆散了多少鴛鴦，損害了多少友誼……”

數學系學生孫傳化則張貼大字報，“要求把胡風問題交待清楚，無罪釋放、道歉，有罪依法公開審判。”中文系崔德甫同學貼出大字報《最高法院必須向全國人民公佈胡風事件的下文》：“有人說，毛主席說“胡風不鬧小集團也還可以說話的。”請問主席毛澤東同志，共產黨員何其芳、林默涵等，何曾沒有小集團？何曾不在鬧小宗派？周揚等何曾不在排斥異己？為什麼不反一反他們？為什麼讓他們放炮、不讓胡風開口？”

哲學系黃學詩認為：“根據已發表的三批材料得不出胡風是反革命分子的結論。”歷史系張磊提出：“胡風不是反革命，人民日報公佈的信（胡風集團成員的通信），不可全信。《人民日報》是新聞機關不是法院，不能隨便宣佈人的罪名。”

法律系助教潘世明指出：“在懲治反革命條例中也找不到胡風究竟屬於哪種類型的反革命”。“胡風……要當文化部長……不讓胡風當文化部長就行了，何必要扣他一個反革命帽子。高饒事件是黨內爭權奪利的宗派鬥爭，不讓他當就行了（指高想當總理和黨中央總書記），何必要扣他一個反黨集團的帽子，對黨的威信也不好。”

22日晚，在27齋前，一群有組織的“群眾”圍攻兩個昨晚辯論會上說錯了話的同學，出現了“肅反鬥爭會的氣息”，質問這兩個同學有何意圖，施加壓力。然而同學們沒有讓這種不良現象繼續下去，經過幾小時的辯論之後，情況好轉了。

第二天黨委會在廣播台廣播了一封致黨員的公開信，要求黨員不要壓制群眾說話。

23 號，法律系同學邀請劉奇弟等三人開辯論會，學生會特地搭了一座辯論台，並安上了麥克風。開會的地方就在“三角地”，主席臺坐西向東。“三角地”就是學校小飯廳與大飯廳圍成的那一片空地，是右派和左派貼大字報和進行集會的主要場所。這是場大型辯論會，有數百人參加。在辯論開始不久，有人請人民大學的林希翎上臺講演，談她的看法和介紹人民大學的情況。當時的人大的學生全是保送的調幹生，是專門為國家培養幹部的，林希翎本人也是由部隊保送到人大讀書的。那時她已從新聞系畢業並當過一段《中國青年報》的實習記者，又回到人大讀法律系的研究生。林希翎本名程海果，她在 13 歲就參加革命，1956 年《中國青年報》專門為她發了一篇文章，說她“在靈魂深處長著膿瘡”。對此，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吳玉章和當時的團總書記胡耀邦也為她抱打不平。

林希翎說：“胡風是對中央遞意見書，怎能說這個意見書就是反革命的綱領呢？為什麼向黨中央提意見就是反革命呢？這是史達林主義的方法。胡風的意見書基本上是正確的。例如，他批評庸俗社會學，要動搖機械論的統治，庸俗社會學、機械論就是教條主義，他反對公式化概念化，現在的文藝作品就是公式化概念化。文藝是反映生活的，現在的生活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機械的單調的。他反對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說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這個講話是抗日時期發表的，現在情況變了，知識份子也成工農兵了，不適用了。毛主席的話又不是金科玉律，為什麼不能反對呢？…說他們通信秘密，哪個人的信不是秘密的呢？說他們私人間的友誼是小集團，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說真話，難怪有人說共產黨六親不認了！按照法律只有企圖推翻政權的才能叫反革命分子，而胡

風顯然不是這樣的。……兩年還不公佈胡風案件的下文，我看共產黨很為難，沒法下臺，知道錯了又不肯認錯……從赫魯雪夫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中可以看出，季諾維也夫、布哈林是這樣被逼上梁山的。我們知道列寧在的時候，季諾維也夫曾出賣過情報，而列寧仍給他工作。在革命勝利到史達林消滅了他們的肉體，這是史達林的專橫。……我國也是肅反擴大化，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們的法制是不健全的。例如南京肅反時，一個晚上把逮捕證發給各單位一下子就逮捕了二千多人。連某禮堂都住滿了犯人，後來又都放了出來。我曾經在區法院實習過，最近人民代表要去檢查肅反工作，毛主席下了一道命令，要檢查過去所有的案件，現在從法院、檢察院到公安局都忙著修改案卷，起訴書錯了的修改，沒有理由的補上理由，但這還叫什麼檢察呢。

（第二次她在北大演說道：法律是形式主義，蘇聯憲法更虛假。蘇聯有法制組織，實際史達林可以完全破壞法制。我們沒有法制，法院量刑是審判員說了算。如肅反問題，是否擴大化，我感到是擴大了，主席說沒有，我不同意。蘇聯破壞法制是駭人聽聞的。中國殺了 77 萬人，這也不少，冤枉的人也有 72 萬。肅反的理論根據也是錯誤的——羅瑞卿報告都是受了史達林的社會主義建成後，階級矛盾越來越尖銳化這一錯誤理論的指導。……常委會決定對肅反大檢查。那些公安局、法院，就塗改過去的案件，怕人民代表檢查。很讓人氣憤，法院審判的結果都是黨委的批示，把批示也都撤下。“十五貫”的現象在這裡太多。你對領導有意見就是反領導，反領導就是反組織，反組織就是反黨，反黨則反人民，反人民則反革命，用這個公式來定罪的，完全是史達林的方法。……我說胡風不是反革命，人大已給我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了，宣佈我是反革命，晚上到公園都有人監視我。胡風是不是反革命，從法律觀點來看，誰也不能肯定，因為現在法院尚未判

決。同時，這個案子這樣搞也是不合法的。哪有一個案子搞了這麼久還不宣判，即使特務案件，也不能二三年不結案。如果將來“訴訟法”公佈了就不能這樣做了。)

我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鐵托演說中很多是好的。我認為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所有社會現象都有社會歷史根源，史達林問題絕不是史達林個人的問題，史達林問題只會發生在蘇聯這種國家，因蘇聯過去是封建的帝國主義國家，中國也是一樣，沒有資產階級的民主傳統。我覺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認為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如果是的話，也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裡是不民主的，我管這個社會叫做在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歷史上所有的統治階級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共產黨的民主也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風暴中和人民在一起，當革命勝利了就要鎮壓人民，採取愚民的政策，這是最笨的辦法。現在他們封鎖新聞，例如北大如此轟轟烈烈，為什麼報紙就不報導（有部分群眾鼓掌）！……不僅北大，還有南京大學、武漢大學、西北大學，各地大學都聯合起來，匈牙利人民的血沒有白流：我們今天爭到這一點小小的民主，是和他們分不開的（群眾轟她）！我不害怕，大家不歡迎我，我就滾蛋，我既然到這裡來，就是冒著危險，坐牢也沒關係（群眾中有人喊：不要煽動）。**

聽說現在有風聲要收了，想封住人民的嘴吧，這是最愚蠢的。北大是放了，高級知識份子放了，但廣大基層還沒有放，現在揭發的遠不及實際生活中的1%，因為這些教授都是老頭，很世故，我們青年長個腦袋是幹什麼的呢？難道是讓人家牽著鼻子走的嗎？我們要說話！北大是放了，但我還不大樂觀，因為還有

很多衛道者，他們想把先烈用鮮血換來的社會主義成果，作為他們向上爬的臺階（群眾轟她）。……我們要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讓每個人過真正的人一樣的生活（有二三十人推著她到大會旁邊另一個場上讓她繼續講，她講到她過去的部隊裡，知道部隊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

5月27日，林希翎再次來到北大，這次是更有組織的辯論。會場的秩序好多了，雙方進行了充分說理的辯論。會場十分熱烈，台下人山人海。林希翎講的也更有條理。

“三害”（指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根本原因就在於上層建築的某些政治制度不好，不適合公有制經濟基礎的緣故。

產生官僚主義的重要原因是龐大的官僚機構；不以德才衡量一個人，而是看資格，靠老資格吃飯；看是否是黨員、團員。資產階級國家的部長可以辭職，可以罷免。我們的幹部，只是上提，不能下放。部長們調換一下和人民一起參加勞動是很好的。幹部的提拔一定要群眾同意。一個政黨也好、一個人也好，進步的標準是能不能正確地反映社會發展的要求，能不能推動社會進步。不能的話，就是反動。史達林在後期阻礙社會發展，是反動的。他殺了那麼多人，如果不是史達林的錯誤，二戰不一定起來。不是史達林的錯誤，赫魯雪夫領導的十萬人也不會全死掉。……個人崇拜是制度問題，來自於官僚主義和等級制。個人崇拜在中國也有，主席寫幾首詩給詩刊，創刊詞上有人評價，說主席不僅是偉大的政治家，也是偉大的詩人。我看主席看了一定會很生氣，這話多麼肉麻。有人說主席寫的字最好，我看不見得。

各個統治階級都有共同性、局限性，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社會主義社會，工人階級與廣大人民利益是一致的，但也有人民內部矛盾，

表現在統治與被統治之間（領導與被領導即官民矛盾），我認為領導與被領導就有矛盾，統治與被統治的地位不同，看問題角度不同、利益也不同。本來是被統治者，但一旦爬上統治（工人爬到廠長），說話口氣也不同了，一切也就變了。企業的廠長和工人的矛盾是看問題不一樣，這個矛盾目前是非對抗性的，但發展下去可能會由量變到質變轉化為對抗性的，如某些地區的罷工、罷課等”。今天整風，就是為了解決這個矛盾。如果不除“三害”，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

青年希望求知，想聽報告、看材料，但有等級限制，為什麼青年中存在虛榮、名利，和現存制度有關。幹部發桌子、紙簍都分等級，等級制度已深入到各個方面……有些黨員是為了享受特權，而跑到黨內，不入黨就沒有出路。有人叫我入團，說你不入黨入團，你的前途、婚姻、地位如何解決，我聽了很生氣，要這樣我一輩子也不入團。產生三害的原因是等級制度、人事制度與保密擴大化，這些小的制度（等級、人事、保密擴大化）組織了總的制度，具體制度本身產生了三害，這些制度和公有制是根本不適應的，是私有利的產物。

目前我國哲學、文學、藝術各領域表現的教條主義非常厲害。教條主義與買辦性有關，買辦是媚外崇美，對蘇聯的學習也是如此，當然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蘇友誼不可破，但把蘇聯東西亂搬就太教條主義。有人說：“人民大學是教條主義大蜂窩”，我看“是教條主義策源地、大本營。”蘇聯是教條主義策源地。老師講話就像個打字機，蘇聯醫學就未超過中國的協和，組織療法害人不淺，無痛分娩法現在也不用了，這都是由於處在迷信狀態。

對現實不滿，我認為是一個好現象，應該鼓勵人們對現實不滿。社會是前進的，滿意現實社會就不會發展。猴子要滿意現實的話，那麼我們現在都不會變成人。對現實不滿是應該支持的，而現在有些先生唱一些廉價的讚美詩，成天和國

民黨、資本主義比較，向後看不向前看。教員講課也是和國民黨、資本主義比較。

她還說：上次我來發言後，就有人在辯論台柱上貼一條子，“林希翎女士來北大一趟，我的水碗不見了。”同志們，那天我走的時候，北大有八個人送我，我並沒有偷你的水碗（掌聲）！幾天來北大學生川流不息地到我家去拜訪我，其中有一個同學說，我來向你自首。上次在會上擾亂秩序，破壞你的發言，都是支部書記佈置讓我做的。同志們，我用毛主席的說法，這些都是國民黨段祺瑞的作法，是極卑鄙的！

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被美國特工搞到手後，西方各大報紙都登了出來。中國共產黨一開始矢口否認這個報告的存在，但北大有蘇聯、東歐的留學生，還有英文報紙，這個報紙的某些內容早已在北大流傳開了。數學系年輕助教任大熊從圖書館借了英文版的英國《工人日報》，那上面刊有這份報告。他與陶懋頤翻譯出了“秘密報告”的節譯本，在北大張貼出來。

林希翎說：她能搞到這份報告，中央委員都有，她的男友是胡耀邦的機要秘書，可以弄出來看看。後來她真的把這份報告拿給大家看了，準備以《廣場》特刊發表，後來反右開始，《廣場》僅出了一期就夭折了，這份報告始終也沒刊印出來。當然，後來林的男友因此事以洩密罪被判7年徒刑，任大熊被判無期，後被折磨死在勞改隊裡。林希翎是大學生右派中的第一號人物，也是大學生右派中唯一不予“改正”的人物。林的同班同學中，有一位自朝鮮戰場歸來的志願軍老大姐，早先由系裡的黨組織指派她關心、幫助林希翎，準備發展林加入青年團。林成了右派份子，她便被說成是林的“裸姆”，也成了右派；她的丈夫和弟弟自然同她屬於一群，也是右派。他的丈夫仍是軍人，在部隊中當然有一群朋友，那一群十幾個為中共打過仗的幹部，就因為是林希翎的“裸姆”的丈夫的朋友，統統成了

右派份子。僅在北京一地，受林案牽連而戴上帽子的便有 170 人之多。

25 日下午，西語系的同學在賀永增、周鐸等人的帶領下，先在系裡召開了對“三害”的控訴會，由三名在肅反中曾受到不同程度迫害的同學上臺控訴。之後，他們又移到學校辦公樓召開大會。校黨委聞訊，欲予制止，要求至少去掉“控訴”二字，但遭拒絕。控訴人是一年級同學顧文選。顧原在杭州公安局工作，他親眼看到了 1955 年肅反運動中大量無辜的人受牽連而遭受迫害，他替人說話，被打成反革命，還受到了嚴刑拷打。1956 年顧被放出來了，以社會青年的身份考入了北大西語系。顧文選同學在控訴會上抨擊某些幹部：“這些名義上為人民服務的，又不與人民同甘苦，高高在上的人，卻自命為堅定的馬列主義者、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他應該在群眾有汽車坐了他才坐；群眾有呢料衣服穿了，他才穿；群眾住上洋房了，他才住……可是事實上那些人卻享受著特權，生活水準遠遠超過了群眾……”與會的同學聽了他的個人的遭遇以後都哭了。晚上電影晚會後，黨委書記江隆基向同學們說：控訴會是對敵人的，不能對黨，要求不再舉行。第二天許多大字報紛紛向江書記提出質問，認為對待嚴重的犯罪分子可以進行控訴；要求學校公開過去肅反運動中錯鬥了的問題，公佈同學自殺的真實情況和真正原因；還要求學校向本人公開人事材料，防止錯材料造成不良後果。後來，顧文選的這次發言，百花學社為他出了專文，取名就叫《一個人的遭遇》。反右後，顧文選被捕，被判無期徒刑，後越獄逃到北朝鮮，被引渡回來，召開公判大會槍斃了。

運動已經開展幾天了，北京各報記者天天來北大，而遲遲不敢報導，使同學們極為不滿，紛紛提出質問，有人直接到黨中央和北京市委談北大情況並要求支援同學們的正義行動。

北大的同學為了打破當局的封鎖，還通過到各個大學演講的方式或通過同學關係用郵寄的方式將北大同學爭取民主自由的資訊傳遞出去。26日（星期日）在清華大學召開北京市高校學校運動會，北大以西語系講師黃繼忠是一個班的班主任，曾帶領28名學生到清華宣傳，要求大家互相支援，把民主運動開展起來。該班一位學生時榮章曾打電話到中共中央，要求向毛澤東彙報北大的運動。獲准後，以他為首的十個同學，外加黃繼忠老師，于5月27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雖未能見到毛本人，卻向毛澤東的“辦公室主任”鳴放了一通。十天後，毛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反右，這11名榮幸到中南海去鳴放的小人物一個也沒逃脫。北京市市長彭真下令：“黃繼忠是北京高校第一個帶學生出校門的，應該嚴懲。”於是黃成為“極右份子”，他班上24名學生2/3成了右派。

在這運動中產生的“黑格爾——恩格斯學派”派人到北京各大學進行宣傳活動。運動開始之後，除了大小字報，同學們還編寫和油印“出版”各種小報，最初有《新聞公報》，以後又出了《自由論壇》和《百花壇》，此外，還有《浪淘沙》等等刊物。還有人組織了匹克威克社（匹克威克是一部英國電影中的主人公），刊物達八種之多。

29日由譚天榮、陳奉孝、張景中、楊路、王國鄉、龍英華等六人的“黑格爾——恩格斯學派”倡議下成立了“百花學社”。31日發表了宣言，表示在擁護社會主義前提下對任何問題都可以自由爭鳴，並準備創辦一學術性刊物，發表同學們的論文；百花學社的組織原則，是“學社”不對成員個人的行為負責，成員個人也不對“學社”行為負責，沒有民主集中制，它只是一個集會和討論問題的場所。再由陳奉孝、王國鄉等人聯絡中文系的張元勳、沈澤宜、崔德甫、張志華等人，創辦了刊物《廣場》，作為“百花學社”的言論陣地。

《廣場》的宗旨是繼承和發揚五四運動的愛國民主傳統，提倡學術自由，不論右派的文章和反右派的文章，凡是有一定水準的都登。編輯部組成人員如下：主編：張元勳；付主編：沈澤宜、王國鄉。主編張元勳在發刊詞裡這樣寫道：“北京大學是五四的故鄉，北大的兒女是五四的後裔，我們的血管裡流著五四的血液，在社會主義的五四時代，我們要學會五四先輩們的大膽提問、大膽創造的精神，去爭取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文化！我們的刊物《廣場》便為此而誕生。《廣場》的含義在於：北大民主廣場曾是舉火的地方，五四的先輩曾在民主廣場上集會點火與誓師高歌！先輩的廣場已經荒蕪了，我們艱難地把它打掃乾淨，我們願愛講話愛唱歌的人們一起來打掃它、整理它，使它開出一萬朵美麗的花！來吧！朋友們！到《廣場》上來！這裡有自由而新鮮的空氣，它可以震動你的聲帶，唱出你願意唱的個性的歌！我們的廣場期待著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文藝復興的到來！”第一期集中了當時已發表的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章，總名目是“民主廣場”。譚天榮一篇文章末尾的口號是：“自由、民主、理性、人權萬歲！”這期刊物印出來的時候，已進入反右中期，是油印的，在那個著名的“三角地”被付之一炬。只有一部分被保存下來。

北大同學為了使南開的同學瞭解事實真相，6月2日，有6人以個人名義去了天津，分別到南開、天津師範學院與天津大學去演講和開討論會。這就是後來北大黨委書記、副校長江隆基所說的一部分人去天津“興風作浪”、“召開秘密會議”、“破壞學生會”的由來。

北大的學生還通過其他同學們的通信，很快，大字報運動就在全國各地開展起來。其速度之猛烈，是任何人都難以想像的，大學、中學、乃至小學，滿牆都是大字報，最後，幾乎所有的機關單位也都貼出了大字報，宛如驚濤駭浪，席捲

整個神州大地，其勢銳不可當。表現了全國人民的強烈的民主願望，民主訴求。北大琳琅滿目的大字報所反映的問題是更加豐富多彩的。張錫錕貼出大字報《三害根源》，指出根源在於制度，必須改變一黨獨裁的政治制度。葉予勝貼出的大字報《我看民主》，指出“民主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

物四的學生嚴仲強貼出《自由主義者宣言》。文章說：“史達林專政時代實際上是奴隸加中世紀教會統治在否定的否定意識下的複歸，‘人權的喪失，對思想上異端鎮壓’……。我想舉出下麵幾點：理論上的錯誤，（1）過低估計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將社會主義建設過多地歸於黨的領導，歸於個別領導人物的作用，在決定政策路線時實際上是少數人的專斷，因為人民根本不瞭解自己國家的情況。史達林的錯誤長期被掩飾是個最好的證明，因為人民實際上無法參與國家的領導。這樣就是名義上的全民工廠，實際上操縱在少數人的鐵腕中。人民被看成群氓。（2）階級論的錯誤：理論上最突出的是‘階級鬥爭逐漸尖銳化’，這種機會主義的論調在實際工作中則將階級論的統計規律盲目地用於個別人；以致產生了‘唯成份論’的工作方法，助長了新等級的形成。（3）法權論上的錯誤：過份強調了法權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故意使民法等不健全。中國胡風問題就是一個例子，如果法權明確的話，胡風是不是反革命分子早就應當審判清楚了。……（4）對目的和手段的錯誤理解，將民主純粹作為一種手段，其他如良心、人道、友誼——不免被歸於手段了。……愚蠢的史達林實際上是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一塊拌腳石，但在過去長期有那樣高的威信。難道蘇聯在過去沒有看出史達林的倒行逆施嗎？上帝對宗教須是具有最大號召能力的，在新的宗教下，以X代替上帝吧！即使X是一個木偶也好，但歷史會使這種做法遺臭萬年的！……

‘鳴’‘放’正在被一些人引向庸俗的方向。即不談本質問題，將制度的缺陷和

工作的錯誤歸於個別人的工作方法和認識。……現在的主要任務應當是廣泛展開自由爭論，全面地揭露矛盾，使人民從盲從的環境中蘇醒過來。擁護一個最完善的社會制度及一個最正確的領導應當放在第一位，至於它是否是社會主義和共產黨則是另一個問題。共產黨只應當有爭取領導權的權利。一切權力歸於人民。全國範圍內的保守勢力正在組織反攻。有人已在有意識的收縮這次民主運動了。熱愛真理、民主、自由的人民團結起來。最後倒下的將是保守勢力而不是人民！”

6月1日王書瑤寫的大字報《從史達林的錯誤中應得到的教訓》說：“史達林的錯誤的原因是什麼呢？……是由於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制，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於這種高度集中的權力，才使史達林在後期可以膽大妄為，犯出一切錯誤。如果蘇聯在國內消滅了階級的對立以後實行高度的民主，政權不是集中在少數人手裡，則一切錯誤都是可以避免的。蘇聯共產黨或者中國共產黨在總結這一教訓時，沒有歸於是制度本身有毛病，而卻歸之於“人們的思想情況”，我認為是很不妥當的。……對一個人或一個政黨，抱著毫不保留的態度跟著走是錯誤的，只要他今天一旦不再能代表人民，違反人民了，就應該毫不留情的拋棄掉，正如今天對曾與劉志丹共同領導創建陝北根據地的高崗一樣。正是蘇聯人民對共產黨可能發生的錯誤領導喪失了任何警惕性，認為史達林就是一切，再加上蘇聯政治制度本身的重大缺陷，就促成史達林的全部錯誤和犯罪得以實現，而中央權力極大這點起了重大作用。由此可見，今天在我國廣泛流行著的對共產黨的某種崇拜，是十分有害的。……6億人民的生活決不應該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黨員占1.6%，而決定國家大事的人又占1.6%中的極少數），任何時代，權力的高度集中，不論是集於個人，還是自稱為一貫光榮正確偉大的集團，都是極大的危險，而當人民群眾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地危險！因為如果這個集團犯有

嚴重錯誤或變質，就沒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蘇聯人民，已經為此付出了自己最優秀兒子的鮮血的代價（勝利者代表大會 70%的中央委員啊！1100 多名代表啊！）人民！我所愛的 6 億人民，如果不願歷史重演，無數先烈的血不致白流，世界共產主義不受毀滅的威脅，就應該及早起來，結束這種權力高度集中的局面，真正自己當家作主，真正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也只有這樣，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才能更快更好的到來！

王書瑤說：不論權力的大小，只要這個權力是受到約束的，它就不是高度集權；也不論權力的大小，只要這個權力是不受約束的，它就是高度集權。他在大字報中提出了“惡性循環”說。第一個“惡性循環”是：越是強調某黨的重要，它就越重要，越重要就越要加強，於是它就更重要，而一旦犯了錯誤，那就不可救藥，“沒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第二個“惡性循環”是：群眾的盲從，必定會助長黨內錯誤的發展。試想，一個政黨整天都沉醉在“偉光正”中，驕傲自滿乃至犯錯誤後不承認錯誤就是自然的事情。第三個惡性循環是：黨的領袖受到群眾的無限信任，無論什麼時候都不會產生對他政策的質疑，必然會使一個小錯演變為天大的錯誤。個人崇拜形成後，不允許懷疑領袖，必然遍地是災。某大科學家說畝產萬斤水稻是合乎科學的，領袖就相信了這科學的發展觀——畝產萬斤是完全可能的。這個例子真是生動極了。這種惡性循環實在是害人不淺。

新聞系王國鄉同學寫了大字報《北京大學民主運動紀事》，他提出：“社會主義的靈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沒有這，社會主義就會枯萎……我們要求健全的社會主義法制，爭取民主，保障人權和精神人格的獨立……這就是我們鬥爭的目的。”他向同學呼籲：“有頭腦的人，不要那樣想，以為民主是誰給你的恩賜。不，不是的，這民主是我們自己爭來的——裡面，還攪和匈牙利人流的血液。”

關於教學方面，許多人提出要求改革學制，開放全部禁書，改變考試制度，取消政治課必修制。有人認為在這次運動中學生會主持辯論會的人有意壓制鳴放，偏袒衛道者，有人指出學生會不代表學生利益，是黨團的傳聲筒。

大學生們則要求“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北京大學數學系學生陳奉孝、張景中，楊路、錢如平在大字報中主張：“取消留學生內部選派制度，實行考試選拔制度。”

曾昭掄、千家駒、華羅庚、童第周、錢偉長五位科學家在《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中持與他們相同主張，指出：“過去在升學、升級、選拔研究生、留學生時，有片面地強調政治條件的偏向，我們認為今後應當業務與政治並重。人民內部在培養機會上應一視同仁，對於有培養前途的青年都應當平等地看待。”這件事被認為是民盟與中共爭奪青年人，被官方媒體宣佈為“章羅同盟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活動”。

北大学生爭取民主黨派支持。許南亭去了民主建國會，因他是民建秘書長許漢三的兒子，也是民建主委章乃器的義子。陳奉孝去了“九三”和民盟。開始他們都表示支持。

1957年6月5日，民盟的三位著名教授曾昭倫（高教部副部長）、錢偉長、費孝通與秘書長胡愈之到民盟副主席章伯鈞處，談論高校的情形。三位教授一致認為局面嚴重，隨時可發生大遊行，假使處理不當，學生和市民聯合起來，有可能發生類似匈牙利的事件。章決定第二天召開會議，加約了黃藥眠、陶大鏞、吳景超三教授。由於受抵制而流產了。閔剛侯當時擔任民盟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他和胡愈之、李文宜、周新民等人一樣，是民盟中央裡身份未曾公開的中共黨員。在民盟內部的秘密中共黨員的安排下，六教授會議就開起來了。

這個會議並不避人，因為還邀請了史良（民盟中央委員）等共 13 人參加；史是堅決跟共產黨、不批評中共的；反右後，史被認是左派，照舊做她的掛名的司法部長。會中，六教授均認為各學校形勢嚴重，如果教師給學生領頭，事情會鬧大。這是他們不希望看到的。中共秘密黨員們憑著記憶搞了一份會議紀錄，交給了中共。這次會議兩天後即被毛視為右派分子向党進攻達到了頂點，稱他們是“利令智昏，把無產階級的絕對優勢，看成了絕對劣勢”。於是，“六月六日六教授”被縮寫成“六六六”，與當時最有效的殺蟲毒藥同名。

共產黨號稱自己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但它決不允許“人民”自己起來爭取權益，“人民”只能等待“大救星”為其“謀幸福”，然後感恩戴德，山呼“萬歲”。錢偉長在“六六六”會議上說：“上個星期蔣校長（南翔）在報告中居然說了這樣的話，他說今天知識份子吃共產黨的飯，這句話引起了老教師們很大的不滿。”費孝通激動地接著說：“誰說我們吃共產黨的飯！我們從來沒有吃共產黨的飯，我們是吃勞動人民的飯。不過，現在各大學的學生都起來了，情緒激烈，事情很容易擴大。300 萬軍隊就可以收，但人心是去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也就完了。”曾昭倫說：他們上街，市民就結合起來，問題就鬧大了。這次整風可能黨的估計有錯誤，黨可能認為高級知識份子問題多，青年學生一定不會有什麼問題，結果恰恰相反，弄得很被動。章伯鈞說：大學生這樣鬧下去，說不定會發生匈牙利那樣的事件。錢偉長說：現在的情況要收也容易，只要民主黨派站出來說話就可以。

五一九民主運動被殘酷地鎮壓了。在反右運動中，僅北京大學就揪出“極右派”“右派”“中右”“右傾”分子 1500 餘名（750 多名“右派”，810 多名“中右”），越是高精尖的學科受衝擊越大，北大全校的右派學生中物理系幾占 1/3。

9月，北大的反右已近尾聲，“不老實！”的口號聲漸漸稀少了。一場運動看來已快過去。當時作為中共中央“反右運動”辦公室主任的鄧小平和北京市委書記彭真，陪蘇共中央訪問者來北大。鄧彭二人“偶然”順便看了北大的大字報，出乎他們的意料，驚歎：“北大右派的品質很高”。於是，他們立即破格優惠北大，必須再追加右派份子，數目可以不受5%的限制。因此，北大還抓出了一些“點頭右派”、“搖頭右派”。誰站在大字報欄前，看後來成了右派的人寫的文章，點過頭而被揭發出來，就成了“點頭右派”。誰看反擊右派的大字報時搖了頭，那立場也就可想而知了，就成了“搖頭右派”。幾百名師生被送到勞改營和勞教營遭受非人的折磨（其中主要是學生）。黃中奇、顧文選、張錫錕、林昭等同學和任大熊、沈元老師被殘暴地殺害，劉奇弟、賀永增、敖乃松等多名同學被折磨死在勞改勞教隊裡。

2·清華大學的狀況

清華大學教授、副校長、著名力學家錢偉長在1957年5月11日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我是老清華了，一向是敢說敢做的，但是這些年來，當家作主的味道越來越稀薄了。許多事情很想插手，但是做不了主，因為另外有一條線總是比你走得快”。“在高等學校究竟依靠誰呢？應該主要依靠老教授。目前全國高等學校對老教授的作用和積極性的估計不足是個普遍、嚴重的問題。……現在的情況是首先把人分成了兩類，對一類人總先看他的優點，對另一類先看他的缺點，這樣老用‘先入為主’的眼光看人，一堵牆就造成了。”

清華大學在“鳴放”期間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求“理工合校”的簽名運動。該校工程物理系“物八”班一小半學生成為右派，比例為全校之冠。原因是該班成立了一個“理工合校工作組”，在全校徵集簽名。他們在6月1日晚找到副校

長錢偉長，錢對他們說：“我從一開始就是反對理工分家的。院系調整把理工分了家，是一個很大的錯誤。教學改革中，有人說我落後，不願學習蘇聯，甚至說我有反黨情緒，要我做檢討。……我是不做檢討的。最近有人提出理工合校，有人提議把北大的文法學院合併到人民大學去，而把北大的理學院合併到清華，這是相當理想的方案。”這時，有學生說科學館前已經有人簽名主張理工合校了。錢問：有多少人？有人回答說有六百多人。錢說：這太少，至少要搞六千人簽名的名單還差不多，聲勢浩大，讓高教部看看群眾的意見。這個事件成為“錢偉長案”的主要罪證之一，而“錢偉長案”則是清華大學反右派鬥爭的“第一大案”。

清華大學學生孫寶琮等人組織“庶民社”，油印散發《庶民報》，抨擊當局“肅反是沒人權，沒憲法，沒常倫”，並提議“以法律制裁肅反中真正的罪人”。孫寶琮被判刑。

1957年6月2日，清華大學一共產黨員且是“解放區土生土養”、為中共打過仗的，署名“一個清華人”，張貼了《我控訴、我抗議》的大字報：“我抗議毛主席最近在團中央所說的……皇上啣！秦始皇與你相比，也只能是個無名小卒了，無怪乎你說：‘昔秦皇漢武，略輸文采’，你在鎮壓人民的這方面，是勝過了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多少倍了……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你這樣，從1949年以後殺了70多萬人民(還不算一些自殺的呢)！殺吧！把中國人殺絕吧！……胡風那一條子構成了反革命份子的罪狀呢？還不是由你將‘莫須有’的罪名加在善良人們的身上！……毛要殺你時，還不用自己動手，還可以動員你的妻子、你的骨肉孩子翻臉不認你，親手殺死你！這是理性的社會乎？這就是毛澤東式的階級鬥爭啊，這就是我們時代的精神面貌啊！獨裁者，你們已經是殘暴成性了。

在延安十二點鐘一聲炮響，你殺了多少所謂可疑份子呢？這就是你們的所謂‘純潔內部’、‘三查’和‘整風’啊！所謂甚麼聖地延安，王實味不過在《野百合花》中說了一聲大灶、中灶、小灶而挨整了。……抗大的學生們在前線拚命，而你們在延安花天酒地……抗大學生在看到這些令人不能容忍的事實後，在一個晚上打死了二十多條豬吃掉了。而你們利用了‘純潔內部’，活埋了多少人，這不是事實嗎？你們自己這樣做會有根本的動盪時，你們的沒有人性的理論出來了：委屈是應該的，為了黨的利益受委屈以至犧牲是光榮的。……有多少人死在自己人手裡呢，他們遭活埋了，他們遭自己所依靠的和所相信的人活埋了。這就是‘同志’的涵義呀！”

3·毛澤東鎮壓小匈牙利事件

1957年，中小學畢業生的升學是個大問題。4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就明確宣告了“今年高中畢業生大部分升學、小部分不升學，初中和高小畢業生小部分升學、大部分不升學”。有人“責備政府今年的教育計畫訂得過低”，為了回答這種責備，《人民日報》發表了這篇題為《關於中小學生畢業參加農業生產問題》的社論，全文長達11000字，是《人民日報》創刊以來最長的社論之一，這篇社論是根據劉少奇3月22日在長沙市中學生代表座談會上的長篇講話整理而成的。社論告訴失去了升學機會的中小學畢業生：“最能夠容納人的地方是農村，容納人最多的方面是農業。所以，從事農業是今後安排中小學畢業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們今後就業的主要途徑。”自從糧食統購統銷以後，農業人口轉變為非農業人口，是越來越困難了，農村越來越變成一個無法脫離的可怕的地方。就招生來說，城市招生比例要遠遠高於農村，當時湖北省95%的招生指標分配給了武漢市和少數幾個專區直屬市，縣以下的地區只給了5%的招生指標。該政策下達後，

意味著大多數農民的孩子永無跳出“農門”之日。生活在現實中的漢陽縣一中的應屆畢業生們，不但看了《人民日報》的這篇社論，更看到了現實的農村。就多數學生來說，他們總是盡一切可能力避下農村這樣一個前途。

漢陽縣第一中學遵照上級的指示，6月上旬召開“學代會”，以民主形式給學校領導和學校工作提意見，幫助黨支部整風，副校長王建國受校長韓建勳委託，作了題為《大家動手，勤儉辦校》的報告，學生代表共提出整風意見340多條，參加會議的縣委文教部張副部長和到過會的韓縣長，當時都說會議開得不錯。然而就在學代會即將結束的時候，6月12日上午，該校初三9個畢業班459人卻因為要求提高升學比例而罷課鬧事。

12日那天，漢陽一中的青年教師李穗在初三（4）班上化學課，因是上午第四節課，學生課堂紀律不是很好，為提醒學生學習用功，就把升學率只有5%的資訊透露給了同學們：“你們這種學習態度，這樣的學習成績，怎能考上高中？聽說20個人才能錄取個把人，不努力行嗎？”哪知不提猶可，一提卻觸動了學生們最敏感的問題。學生們不等下課，就去找副教導主任楊松濤和校長韓建勳，詢問升學率到底是多少。因為回答口徑不一，學生懷疑校領導在欺騙他們，提出要到縣教育局查看檔。韓建勳、王建國一再勸阻未能奏效。午飯後，初三（八）班一名學生敲響了集合鐘，全校9個班的部分學生湧向操場，一哄而出，到教育局去討說法，沿途有的學生還寫了一些要求升學的標語。湧到縣人委會後，學生推出代表，要求縣長接見。因為縣長不在，教育局和其他辦公室都沒有人，學生翻不到檔，就扔辦公用品，在牆上書寫要求公佈升學比例之類的標語，到郵電局給二中、三中學生打電話請求聲援（電話未通）。不久，學生得知縣長在縣委會，又一窩蜂湧向縣委會，見縣委會鐵大門關閉，便競相推撞，沖進了縣委院

內，對在場批評他們錯誤行為的縣兵役局長和團縣委一名幹部進行“圍攻”。13日上午，又有數百名學生列隊上街，副校長王建國在阻止無效的情況下，佈置兩名副教導主任在校照管上課的教師和學生，自己帶著部分教師跟著學生做工作。學生代表到縣人委會向縣長韓茂林提出要求擴大招生比例，縮小城鄉招生差別。韓茂林解釋縣裡無權解決這個問題。有的學生不服，拉扯著縣長帶領他們去省教育廳請願。有兩名機關幹部為保護縣長，與學生發生衝突，被學生捆住，押經縣委會門前時，被縣委機關幹部攔截下來，並扭打扣留了幾名學生。王建國為防止事態擴大，趕來要求放出被扣留的學生，幹部堅持不放，在幹部與鬧事的學生爭吵加劇時，數百名工人來將學生驅散。幹部、工人和學生在衝突中都有人被打。到此，學生再不敢妄動，陸續離散，事態即告平息。

學生鬧事，不過是想知道一個準確的升學率，對自己的前途有個明確的安排。升學，是關乎學生切身利益的大事，而升學率陡然下降，學生卻被蒙在鼓裡，他們當然有氣憤的理由。十幾、二十歲的學生，血氣方剛，以過激的方式發洩憤怒。事後校方及各級政府有關部門多做些解釋和疏導工作，或許這次學生鬧事就不會釀成一場震驚中外的大悲劇了。

1957年6月8日，中共曾發出了《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倡狂進攻》的黨內指示，其中說，要“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為證實漢陽一中發生了小匈牙利事件，13日晚，縣委連夜召開緊急會議，認為一中學生罷課鬧事屬於“反革命事件”。漢陽一中的黨支部書記兼校長韓建勳後來回憶：“6月14日上午八九點鐘，孝感地委秘書長、副專員兼公安處長，還有省公安廳部分同志及新華社記者等十多人趕到了學校。他們聽完彙報後拍板定案：這不是一般的為升學而升學

的問題，而是借升學之名發起的一場反革命暴亂。地委有關領導語重千鈞把這個結論的性質一定，其他人一致表示贊同”。縣委立即在一中分別召集教師、學生開會，宣佈學生鬧事屬於“敵我矛盾性質”，公安機關隨即進駐了學校。15日，孝感地委和漢陽縣委調集了近百名幹部組成“漢陽事件”考察團，進駐漢陽一中。按照已經定下的性質，考察團斷定“前臺”鬧事是學生，幕後指揮是教師，發動全校師生大揭發、大鬥爭，要求人人交代、個個檢舉，按圖索驥搜集“反革命罪證”，抓“反革命分子”。

考察團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把矛頭指向副校長王建國。王建國時年32歲，1950年從湖北革命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漢陽縣工作，1952年調任縣一中副校長，主持全校工作。由於家庭出身富農，父親參加過國民黨的“清鄉團”。他本人曾申請加入共產黨，但因家庭問題未獲批准。當時縣一中的校長兼黨支部書記韓建勳是個土改幹部，被教師們認作是不懂教育的外行，教師們任何事都主動向王副校長請示，這讓韓建勳大為不快，他提供了王建國的大量所謂“問題”。考察團首先排除了韓建勳，把王建國端了出來。凡與王建國工作上接近的，曾在湖北革大同學的，有一般政治歷史問題的，甚至一塊陪客喝過酒的，都被列為“反革命集團”成員，而這個集團的首領自然是王建國，“骨幹分子”則有副教導主任楊松濤、張良紹，原一中教導主任、當時縣教育局副局長胡平軒（胡已經內定擔任縣民盟的負責人），教研組長鄒振巨，初三（七）班班主任、“革大”同學胡斌等人。初中語文教研組長鐘毓文有個愛眨眼的毛病，在一次揭批王建國的大會上，他坐在台前正眨眼睛，臺上的韓建勳立刻向調查團彙報“此人向王建國使眼色傳遞消息”，將其隔離審查，被列為集團“骨幹分子”。

有了“首領”和“骨幹成員”，在苦於找不到反革命背景的情況下，一個學

生所寫的交待材料使一位“有見識”的負責人如獲至寶。這個學生交代上街時，經過縣文化館，向圖書管理員楊煥堯討開水喝，楊稱沒有開水，只有冷水；向楊要電話打，楊稱打電話應去郵電局。因為楊煥堯是“民盟”的成員，只要揪住楊不放就有了背景。加上楊曾按照縣委統戰部的意見，找過漢陽一中黨支部聯繫“民盟”的發展工作，有過發展王建國為“盟員”的意向。就這樣，把王建國與楊煥堯硬拉到了一起。此時“民盟”中央已經揪出了“大右派”章羅同盟，湖北省的民盟主委馬哲民也被打成“右派”，以馬哲民為“總後台”，這個“集團”就有了分量。於是，從中央到地方直到縣裡，一條完整的“反革命黑線”顯示出來了。考察團得出結論：漢陽一中有一個以副校長王建國為首、糾合教師中的反革命分子、思想反動或有政治歷史問題的分組組織的“反革命集團”；這個“反革命集團”的“軍師”是“民盟”成員、縣文化館圖書管理員楊煥堯；“總後台”是“民盟”湖北省主任委員馬哲民；是這個“反革命集團”在漢陽一中散佈反動言論、捏造升學比例、利用“學代會”煽動學生搞“大民主”，製造了這場“反革命暴亂”；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極為罕見的反革命事件，是國民黨殘餘勢力精心策劃的地方性奪權鬥爭的表現，有著深刻的政治背景。

韓茂林後來回憶說：“考察團在一中搞了兩個多月，他們按照上面預先定下的‘模式’，當作‘反革命暴亂事件’、‘小匈牙利事件’來落實材料。那個時候，左傾思想占上風，什麼事件都要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去分析，國際上要‘波匈事件’聯繫起來看，國內要和‘右派勢力’向黨進攻聯繫起來看，把問題看得越‘左’越好。”所謂“考察”，實際是為“落實材料”，羅織罪名。如此這般，產生“漢陽事件”這樣的大冤案就毫不奇怪了。

8月5日新華社報導：湖北省漢陽縣最近在蔡甸鎮舉行了群眾大會，揭發和

控訴了反革命分子王建國、楊松濤、鐘毓文、胡斌、余心平等利用漢陽第一中學學生的升學要求，煽動和組織近千名學生舉行罷課和遊行的暴亂事件。

57年8月8日《人民日報》登過一篇讀報記者曹葆銘寫的文章：《馬哲民策動的“小匈牙利事件”》(副題是：漢陽縣第一中學事件真相)。該文8000多字，對罷課、遊行、打人、捆人等等寫得很細，但未說明如何策劃。報導一開頭就對事件作了這樣了定性：這是“在章羅聯盟駐武漢的大員馬哲民的策動下，以漢陽縣民主黨派聯合小組長、民盟盟員楊煥堯和民盟發展物件、漢陽縣一中副校長王建國為首的反革命集團，在漢陽縣機關所在地蔡甸鎮製造的一次他們自稱的‘小匈牙利事件’”。報導說：“12日上午有個老師造謠說：‘今年招生很少，二十個人中取個把。你們班成績不好，頂多取兩個。’學生一聽，便哄了起來”。“頓時在三年級九個班都貼出了罷課的標語，鬧事開始了。有些教員也寫出標語：‘支持你們的正義行動！爭取受教育的權利！’這一來，學生的勁頭更大了。一些學生馬上就打鐘聚集起來，要到縣人民委員會去找檔看。他們又集體向高中同學喊話，到初中一二年級教室旁邊丟石子亂哄，把高中一年級第三班學生和初中一二年級的學生也哄出來了。校長韓建勳要召集教師緊急會議研究如何勸止，這時也召集不起來。學生們就亂哄哄地湧出學校了。”“學生們一上街，一些學生就貼出和喊出了‘歡迎國民黨回來’、‘歡迎蔣介石回來’、‘到臺灣去’等反動標語口號。學校地上也畫了個很大的國民黨黨徽。”“他們到了縣人民委員會，首先沖進文教局打東西，翻檔，然後又擁到別的辦公室亂打亂鬧，把縣長辦公室的門也打破了。”“學生這才提出了三個要求：一、公佈招生比例；二、全國統一招生；三、城鄉招生比例一致。但是，李副縣長出來答覆，他們不聽，縣委派宣傳部長等來解釋，他們也不聽。有個學生喊了一句：‘頭頭們都在縣委會！’

學生們又湧向縣委會去了。學生們一到縣委會，就沖進各個辦公室亂打亂鬧。有的學生還沖進去搶組織部裡的檔案，被幹部攔住。學生們又把縣委會的牌子反過來，寫上：‘以革命的手段打倒反革命！’” “住在鄰近的兵役局上官明顯大尉趕來勸止學生說：‘現在已發現反動標語，你們要提高警惕！’團縣委幹部鬍子樵也解釋說：‘你們不要上了反革命的當！’學生頓時就哄起來：‘什麼？你說我們是反革命分子！’立即從兜裡掏出繩子來，把鬍子樵捆到學校去了。” “學生馬上就擁到兵役局去。找不見上官，頓時有人指著樓上軍火庫說：‘他躲在這裡面！’學生就往軍火庫擁，被幹部們攔阻了。這時，有的學生說在縣委會看到上官，一聲吆喝，又擁到縣委會去，架著上官就往外拖。一到學校…就把上官關在花園裡。晚上，縣委派了十幾個幹部勸說學生把上官局長等人放了。”

“13日早晨，學校裡黑板上又貼出了大標語……早飯後，三年級第九班學生首先排隊繞校一周，喊各班學生出來，大罵不肯參加的學生是‘叛徒’、‘無恥’，並說：‘誰敢反對，拳頭領教！’結果，全校除了高中一年級第一、二、四等三個班繼續上課外，八百多名學生都停課上街了。有許多學生還買了新繩子，準備捆人。” “學生們到了縣人民委員會。縣長韓茂林接見了他們的代表。……學生代表就在下面哄。……這時候，楊松濤又在外面唆使學生捆縣長。學生幾次往裡擁，都被站在縣長周圍的幹部擋住了。……韓縣長剛一動身，學生就圍攏來，暗中打他並將他擠倒在地上。這時，幹部來扶縣長，學生們就指著幹部罵：‘你們是縣長的狗腿子！’後面的學生就丟繩子，前面就捆幹部，頓時捆走了滕良知等三個幹部。……鬧事能手許斯武（學生）跳上凳去煽動大家要求韓縣長領著學生去省裡請願”。“學生就一股勁往裡沖。衝破了縣委會的門，見了幹部就打。學生們把幹部李邦禎打暈了，四肢抽搐；把幹部陳吉達捆得渾身血印；學生們抓

住幹部丁玉喬的頭髮，壓在地下，拳打腳踢。……有的學生就把縣委書記趙連吉逼到牆角，準備捆打。”《人民日報》的這篇報導不但如此細緻地記述了學生鬧事的場景，還報導了學生進一步鬧事的計畫：“學生們也準備沖進縣廣播站，向全縣廣播‘縣委會組織工人打學生的真相’。他們還陰謀打電廠；等全鎮電燈一滅，便搶軍火，劫監獄。”幸好事態並沒有發展到這地步，鬧了兩天就平息了。

“考察團”和漢陽縣委對涉案人員一一提出了懲處意見，交有關部門分別執行。漢陽縣法官不同意對王建國等三人的死刑判決，被指為“右傾”，不予信任。縣委直接派一名公安幹部請省委分管文教和政法的書記許道琦對死刑判決簽字，並由這名幹部攜卷上北京最高法院辦理死刑核准手續。可以肯定，死刑是毛澤東一錘定音，他於9月5日到達武漢。

9月6日，在漢陽縣治蔡甸鎮開了一個有1萬多人參加的宣判大會，當場處決了王建國（一中副校長、民盟發展物件）、鐘毓文（一中語文教師）和楊煥堯（民盟成員）3人。對胡平軒以及鄒振巨、胡斌等9名教員和一名學生分別判處2-15年有期徒刑；將教師李穗等3人送勞動教養；給3名教師戴上“壞分子”帽子；韓建勳等11名教職員和10名縣直機關、政法機關幹部受到黨紀政紀處分，33名學生被開除學籍、團籍和勒令退學。其他學生則由考察團給每人做一次鑒定，載入檔案。狼是吃定了小羊；而毛比狼更陰狠的地方在於，他的巨騙能讓全國人民皆曰：“小羊犯了‘可惡罪’！狼吃小羊全是為了全國人民！”

新華社發了電訊，刊登在第二天的各報上；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把事件攝成新聞片《鐵證》，在全國各地放映；漢陽縣一中的新領導被邀請到許多大專院校作“漢陽事件”的專題報告。與此同時，臺灣當局宣稱王建國等人為“反共義士”，在臺灣開追悼會。連美國的青年代表團、路透社記者、匈牙利訪問團等

也先後到一中訪問，以打探究竟。與事件有關聯的人，死者含冤九泉，生者悉數被打入另冊，人生的尊嚴被剝奪，忍辱蒙難的日子一熬就是近 30 年。等到沉冤昭雪，多少人青春不再，韶華盡失……

鐘毓文是一中初三（9）班的班主任，“考察團”對他進行隔離審查，他對自己的活動情況作了如實交代，他們覺得沒有問題，就解除了對他的隔離審查，他高高興興回家，還對家人說：“真心不怕雷打，實心不怕火燒，你們不要怕。”他坦然得很，學生鬧事他勸阻過，平時他是骨幹教師，很受校領導的器重。解放前他是中共華英小學地下聯絡站的站長，他的工作成績，還受到中共川漢城工部部長陳靖的表揚。可是，這一劫他還是沒有躲過。幾天後的一個晚上，一中在校園裡開大會批鬥王建國，鐘毓文坐在前排，平時他就愛眨眼睛，這時會場的強燈光一照，他越發眼睛直眨。臺上坐的“考察團”人員正好發現他在眨眼，就認為他是在向王建國“使眼色”，搞攻守同盟，當即宣佈對他隔離禁閉，進而羅織罪名，硬把他打成一中“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被判處極刑。當時，鐘毓文才 32 歲，留下 5 個兒女，最大的 12 歲，最小的剛滿 1 歲。鐘毓文的妻子和 5 個孩子都不能抬頭做人，她為了孩子才堅持活了下來。為了生活所迫，4 個孩子過早失學，唯有小兒子被姑母撫養，隱姓埋名，才上了中專，後來到深圳工作，日子過得寬裕些，其餘 4 個，均已下崗。

因“漢陽事件”判刑 10 年倖存的漢陽一中女教師胡斌，被當地百姓稱之為“女中豪傑”。究其原因，大概不外這兩條：其一，她受 10 年牢獄之災，家破人亡，卻頑強地活了下來，而與她同時判刑坐牢的，如胡平軒、張良紹等，大多冤死獄中。其二，在為數眾多的受害者還在默默忍受不白之冤的時候，她拼著身

家性命一級一級申訴，不僅為自己討回了一生清白，而且使一個塵封多年的大冤案因她和趙迪生、李穗等人的頑強申訴而徹底平反昭雪。

當年事發時，胡斌是初三（7）班的班主任，學生開始鬧事時她不在學校，正吃午飯時接到學校緊急通知，丟下飯碗趕到學校，按學校的安排，上街勸阻鬧事學生。由於她和王建國是湖北革命大學的同學，她丈夫又是地主出身，隨著“考察”的進逼，她很快就受到牽連，揭發矛頭指向她，“罪行”一條條被羅列出來，和王建國等人的一次同學小聚，硬被說成是策劃反革命活動的“黑會”，她有口難辯。1957年7月19日，她被指控態度不老實，抗拒從嚴，被判處10年徒刑。當時，她只有28歲，且是3個孩子的母親，大女兒6歲，二兒子3歲，小女兒剛剛滿月。她丈夫在沔陽，家中就只有一個60多歲的婆母照看家。入獄之初，小女兒要吃奶，得6歲的大女兒抱送她到監獄，一大一小，像貓抓老鼠一般，情景十分淒涼。後來，胡斌從勞改農場到監獄，又從監獄到勞改農場，離家越來越遠，離她的親生骨肉越來越遠。她丈夫受牽連被打成右派，後死於勞改農場。婆母和兩個大孩子靠乞討為生，小女兒被迫送他人撫養。她的娘家婆家，老少三輩，都因她是“反革命”而備受歧視。她真成了禍及家人的“害人精”。1967年7月19日，胡斌刑滿釋放，回沔陽縣楊林尾鎮，依然戴著“現行反革命”的帽子，監督勞動，沒有人身自由。一個女人，拖兒帶女，在人們歧視的目光下求生，淒苦之狀，不堪言說。直到1978年被摘去帽子，她才重新獲得了做人的權利。

由於她從入獄的第一天起，就堅信自己是被冤枉的，她九死一生活下來，就是為了討還一個清白。摘帽之前，她得不到申訴的權利，一俟帽子摘去，她就開始了頑強的申訴。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她先後向有關部門寫信89件，申述所定罪行與事實不符，要求複查。甚至將她的申訴信用鋼板刻寫數份，寄給縣、

省乃至中央的有關部門和領導。寫信不成就上訪，她一級一級地上訪申冤，到北京就去了3次，風餐露宿在所不惜。她抱定一個信念，只要還有一口氣，就要申訴，就要為自己討還一個清白。1985年春天，她與同鄉同學、沔陽師範退休教師趙迪生分別上書中央，希望把“漢陽事件”的事實搞清，性質搞准，作出合乎實際的結論，讓人們“胸襟開朗，心安理得”。1985年，有關部門根據胡斌等人的申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建議，通知湖北省有關部門對“漢陽事件”進行複查。湖北省從省、地、縣有關部門抽調30余名幹部組成複查組，經70多天的調查，結論是：“漢陽事件”系漢陽一中的部分學生為升學率問題自發的罷課、鬧事，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原認定它是“王建國為首的反革命集團”製造的“反革命暴亂”，全部失實，屬於冤案。鄂文（1986）5號檔認定“漢陽事件”是一起冤案，應予徹底平反。原審法院撤銷原判，宣告所有被告人無罪；原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3人經該法院再審判決，撤銷原判，宣告無罪。湖北省財政撥發專款，武漢市及漢陽縣委從人事等方面做了善後工作。這起歷時29年的所謂“馬哲民策動的‘小匈牙利事件’”的特大冤案得以昭雪。胡斌現在生活安定，精神健旺。但她心中不可釋然的是：她的親人受她的牽連被改變了的命運再也無法為他們挽回了。

4·大學的小小匈牙利事件

四川農學院群體性事件的起因是遷校。1956年，原西康省併入四川省，在省會雅安市留下一大片辦公房，為了把這部分房子利用起來，四川省委決定把四川大學農學院從成都遷到雅安。因為雅安與成都無論氣候、環境、地理等因素差距甚大，在成都外東獅子山培植起來的稻穀良種、樹苗、奶牛都不適宜“天無三日晴”雅安的低溫氣候。院長楊志農和歸國教授夏定友等竭力反對，先後向省委

和中央負責人作過多次書面和口頭反映，但未得到妥善解決，仍堅定不移地遷往雅安。不足一年，那些辛辛苦苦培養出來的水稻良種、樹苗、奶牛等，均先後變態和死去，使得農學院的教授、教師、學生們心疼萬分，人人義憤填膺，憋著一肚子氣，等待時機爆發。1957年“整風鳴放”，這件遷校大事成了四川農學院的焦點，不論在省市各種座談會都被提出來，在校院裡更是學生“鳴放”的主題，成千上萬張的大字報都直問省市：遷校的根據是什麼？是從幾間空房考慮，還是從科學權衡，利弊得失誰輕誰重？但是官方不作回答，只一個勁的壓制，致使教授、教師、學生聯合起來組成請願團上成都向省委請願。6月15日，雅安地市委指示長途汽車站不予售票，還派出暗探盯梢跟蹤，多次釀成衝突。後經力爭，只售部份車票給上省請願的教師和學生。他們到達成都後，受到副省長康乃爾和省長李大章的代表的接見，表示一定解決此問題。18日，雅安地市委竟然組織上千工人、農民，拿著鋤頭、棍棒，沖進學校，撕去所有大字報，並毆打反抗的教師、學生，嚇得一些女同學呼天叫地鑽在床下躲藏。是夜，被傷害的學生成群結隊拿看火把上街遊行請願，但遭到公安的抓捕。《四川日報》歪曲客觀事實，顛倒黑白，反誣學生尋釁鬧事，企圖製造“匈牙利事件”，並定調為“反革命暴亂事件”，成為四川反右一件大事件，也是震驚全國的大事件，先後被逮捕、判刑、勞教、開除的教授、教師、學生近百人。時年不足20歲的上省請願學生代表覃承源就是一個活證。1980年8月9日，這一事件和這一事件的受害者（逮捕判刑、勞動教養、開除回家）的教授、教師、學生均得到全部“平反”、“改正”，可是均已垂垂老矣，有的甚至慘死獄中。蒼天啊！這到底是誰之錯？誰之罪？

西安交通大學的一部分學生，也因為不滿學校1955年從上海內遷西安，在

“鳴放”提出了這個問題，要求遷回上海去。有些學生在深夜裡敲鑼打鼓，鳴放鞭炮，迫使學校停課一周。參與鬧事的人後來多被劃為右派分子。

武漢大學的學生舉辦“民主論壇”，發起討論“胡風集團是反革命嗎？、武大肅反成績是主要的嗎？”要求建立教師民主管理學校的體制，取消黨委負責制。中文系學生吳開斌還組織了一個演講團，到處向成千上萬的學生、工人、市民發表演說。

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組織起《X光社》、《苦藥社》，自辦油印小報《底層之聲》，要求改組院刊《師大教學》。湖南長沙的中南礦冶學院的學生組織了《解凍社》，向黨委宣傳部要求接收校內廣播台，參與院刊的編輯工作。陝西師範學院的學生拿木板、鐵釘封了黨委書記的辦公室，佔領了青年團委書記的辦公室；化學系學生提出“學生會管理學校行政”，物理系學生接管了校廣播室，生物系同學將系黨總支部書記半夜從被窩裡抓起來打了頓。由於該校回族學生曾上書學院黨委，要求開設回民食堂，被黨委書記拒絕，不吃豬肉的回族學生被迫與漢人同餐。現在，他們署名“小民”貼出了一首打油詩：“共產黨，像太陽，民族政策太荒唐。和尚吃狗肉，尼姑喝狗湯。回民啃豬骨，藏胞嚼魚腸。不吃你的事，餓死自己當……”

1957年5月19日，陶鑄親臨中山大學召開第一次座談會，激勵全校教職員工，積極投身運動。校園裡沸騰起來了，多少師生夜不能寐，三五成群，或露會於草坪，或相聚於宿舍，不是高談闊辯，就是挑燈寫大字報。許多房間通宵燈火明亮。有人貼出大字報，貼了一幀肅反期間被逼迫跳樓自殺的生物系女生劉雪明的照片，並呼籲全體同學為肅反期間跳樓自殺的生物系女生劉雪明開追悼會。隨後，在追悼會上，200多名同學在她的遺像前默哀三分鐘；多人發言，要求追

查兇手，要求已調職原校黨委書記回來還帳。

華南師範學院地理系一學生質疑：“黨中央說，全國 90%以上的人是好人，百分之幾是反革命分子，這百分之幾，到底是百分之幾呢？姑且算 1%吧，全國 6 億人則有 600 萬反革命分子，哪有這樣多的反革命呢？”當黨查實胡風集團時，沒有很好的估計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誤以為暗藏反革命愈來愈凶，階級鬥爭愈來愈尖銳；同時又在史達林那裡找到了理論根據，並用這一理論指導肅反，怎能不使肅反擴大化呢？從我院來看，從廣州幾個高校來看，查出了多少反革命分子呢？錯鬥了多少好人？兩者比較一下，就可想而知。

這張大字報一貼出，馬上引起激烈爭辯。有學生反駁，黨中央說 90%以上是好人，反革命分子只占百分之幾的意思是，好人占絕大多數，反革命分子占極少數，不能機械地從數字上理解。持相反意見的學生，隨即以大字報反問：“黨中央提出這個數字時，心中是有底的，如果當時黨中央估計到反革命分子只占百分之零點幾，為什麼不說 99%以上是好人，千分之幾是反革命分子呢？用‘99%以上’不是比‘90%以上’更能說明好人占絕大多數嗎？”一位學生在發言時說：“有人怪我們的大字報把肅反寫得陰森森，但實際上，肅反就是陰森森的。肅反期中，有人自殺，有人半夜大叫大喊，有人喊打喊殺，同學沒有自由，出入要排隊，去廣州要請假。有人說，為了打倒反革命，人民的權利可以少一點，但這是違反憲法的。”

一張大字報用了 3 個巨大的驚嘆號做標題：“要求檔案結論自己能看！！！”

一、人事檔案關係各人一生前途極大，據這次“爭鳴”來看，舉凡升級、增薪、提拔、報復……冤枉之事的發生，大多以此作標準，簡直操人之“生死大權”，顯然，檔案極重要也。二、當你拿著資料袋去為社會主義建設而工作的時候，可

是資料袋裡卻說你，出身不好，很多缺點，甚至工作不可靠等等。可是你自己卻不知道自己結論有什麼缺點，屬於哪一類人，結論資料是否正確或片面，自己也無從辯護，甚至自己為國家社會忠懇地工作，到離開人間最後一瞬也不知道資料袋結論說自己是好人還是壞人，壞在什麼地方。這不是人生最遺憾之事嗎？

華南工學院幾個系組織了“自由論壇”，作為“大鳴大放”的陣地。一位學生登壇演講：“有人說，只要鬥出一個反革命分子，對人民也是有利的。難道我們能把國民黨的唯心論‘寧錯殺三千，不放走一個’的辦法搬出來嗎？”另一位學生在發言時說：“有人怪我們的大字報把肅反寫得陰森森，但實際上，肅反就是陰森森的。肅反期中，有人自殺，有人半夜大叫大喊，有人喊打喊殺，同學沒有自由，出入要排隊，去廣州要請假。有人說，為了打倒反革命，人民的權利可以少一點，但這是違反憲法的。”

在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中，廣東文教界、文藝界、衛生界、新聞界、科技界、工商界、民主黨派中，揪出了 3.661 萬名“右派分子”，占參加運動總人數 5.5%，並以“極右”、“普右”、“中右”等名目，分類歸檔。還有一種叫“疑似分子”，可以歸入右，亦可以歸入中右。民主黨派中有 20% 成為“右派分子”；機關幹部中的右派，占參加運動總人數 3.68%。其中有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省人大代表、省政協委員共 30 人。

5· 共產黨窮追猛打知識份子

1958 年，在反右運動的浪潮席捲全國之後，當時四川的一把手李井泉決定，在中學畢業班和中專、中師學生中搞一次社教運動，將學生進行政治排隊，分成進步、中間、落後、反社會主義四類。事實上並沒有局限在高三學生，而是波及到其它年級甚至初中學生，上萬中學生被劃為三類、四類（這個數字沒有包括中

專、中師的學生在內)，剝奪了升學權利，打入另冊，僅送到各廳、局變相勞改的就有 3200 人，這不包括已送勞教和押回農村監督勞動改造的（當時全川應屆高中畢業生不到一萬人）。運動由成都推向整個四川，從重慶、綿陽、廣元、自貢、內江一直到達縣、涪陵、溫江、瀘州等地，連甘孜、涼山等少數民族地區也沒能倖免。這是中國史上大規模迫害未成年學生的一個惡例。數以萬計的中學生、中專生、中師生的命運從此改變，遭受了無情的批鬥、侮辱，有人自殺，有人精神失常，有人因言獲刑，有人淪為乞丐……他們中大部分人一生都掙扎在社會底層，像周克芹（當年農校學生，1958 年被劃為四類，送回農村監督勞動）這樣寫小說成名，20 年後改變命運的只是極少數。他們沒有“右派”的名份，沒有其它的帽子，最後“平反”、“改正”也輪不到他們。

1958 年 4 月，北大開始批判校長馬寅初。1957 年 7 月，馬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根據自己在人大一屆四次會議上的發言內容寫成的《新人口論》；主張要重視節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長。北大等學校採用大字報、辯論會等方式，對馬寅初的人口理論及其整個學術思想，進行了長達一年的批判。馬不為所動，在《新建設》雜誌上發表《重申我的請求》一文，表示自己堅持真理，決不向以力壓服而不是以理說服的批判投降。據此，康生提出，馬的問題已不再是學術問題，而是右派向黨進攻的政治問題，“要像批判帝國主義分子艾奇遜那樣批判馬寅初。”對馬寅初的批判進一步升級，並於次年撤銷了他的北大校長職務……

1958 年 6 月，陳寅恪在中山大學遭受官方批判。7 月下旬，陳寅恪上書中山大學校長，憤怒地表示：一、堅決不再開課；二、馬上辦理退休手續，搬出學校。這是一個軟弱無助的知識份子所惟一能行使的了結自己命運的可憐權利……

1958 年 10 月，一股文化批判的狂潮在全國範圍內愈演愈烈。 仿佛批判中

國人還不能盡興，只有去批了外國，才能像阿Q摸到了小尼姑滋潤的腦殼一樣過把幹癮，甚至連寫出了《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和《復活》這樣的稀世巨著、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化儀仗隊見了都會致以崇高敬意的列夫·托爾斯泰，也被從俄羅斯覆滿白樺樹落葉的九泉之下拖了出來，當成思想上兇惡的敵人而加以鞭撻。一家大報以最顯著的地位和最慷慨的版面，發表了長篇論文，題目卻宛如出自于小學生的筆下——《托爾斯泰沒得用》。

在上海作家協會，直至1960年春季，一直在進行一場馬拉松式的對所謂19世紀“資產階級文學”的狂轟濫炸，不但托翁傷痕累累，受到馬克思、恩格斯極高評價的法國批判現實主義大師巴爾扎克，還有左拉等人也血肉橫飛……

原來的專家領導逐步為外行領導所取代，郭沫若在批判右派分子時曾經說過“文化工作必須由常握馬克思主義的外行領導”，如此一來，必然造成文學和藝術創作作品的品質下降。

第124節 反右傾 整黨內

1·萬言書的出籠

彭德懷原名彭得華，童年和少年是在討米、餓飯、砍柴、11歲看牛、13歲挖煤、當堤工中過來的。他的一個弟弟是活活餓死的。彭德懷回憶道：大年初二，祖母要帶著三個小孫子出去討米，“我立在門限上，我不願去，討米受人欺侮。祖母說，不去怎麼辦！昨天我要去，你又不同意，今天你又不去，一家人就活活餓死嗎？！寒風凜冽，雪花橫飄，她，年過七十的老太婆，白髮蒼蒼，一雙小腳，帶著兩個孫孫（我三弟還不到四歲），拄著根子，一步一扭地走出去。……他們走遠了，我拿著柴刀上山去砍柴，賣了十文錢，兌了一小包鹽。砍柴時發現枯樹兜上一大堆寒菌，撿回來煮了一鍋，我和父親、伯祖父先吃了一些。祖母他們黃

昏才回來，討了一袋飯，還有三升米。祖母把飯倒在菌湯內，叫伯祖、父親和我吃。我不肯吃，祖母哭了，說：‘討回來的飯，你又不吃，有吃大家活，沒有吃的就死在一起吧！’”。

彭 17 歲當勤務兵（俗稱馬弁），做事殷勤，善體人意，深得長官喜愛，數年之間，由士兵升為班長、排長等職。1921 年彭因姦淫一仕紳之閨女，被告到官方，團長限令交人拿辦。其連長推薦他到連長同學處投軍。彭自投靠周將軍後，周亦喜愛其人之智慧活潑，仍令其為排長，漸次升為連長、營長等，並保送其至湖南陸軍講武堂深造。1926 年隨同周將軍投效國民革命軍，彭任代理團長，此後，其態度日漸驕橫，因而周久不令其任正式團長。彭某曾密請周之好友向周說項，周不同意。嗣後彭乃聯絡另一營長黃公略在平江防地叛變投共。

1943 年彭德懷因在“民主教育談話”中提到“民主、自由、平等、博愛”（其實距真正的詮釋相去甚遠），而遭到毛澤東嚴詞批判。

1950 年 10 月 22 日，毛澤東把兒子送進設在朝鮮的志願軍司令部裡，工作在彭德懷身邊。11 月 25 日，毛岸英入朝後僅僅 34 天，就在剛過完 28 歲生日的一個月後，被美國偵察機炸死了。有目擊者回憶毛岸英之死的原因，說，抗美援朝期間，生活艱苦。金日成派人給總司令彭德懷送了一小筐雞蛋，這在當時的朝鮮是極難得極難得的。除了給總司令吃以外，沒有任何人敢打這些雞蛋的算盤。11 月 25 日上午，彭已吃過飯，在外邊下棋。毛太子睡足了覺，才來上班，並擅自拿雞蛋做蛋炒飯。拿雞蛋吃已經超狂妄了，而且在不應該做飯的時候讓美國的偵察機發現了目標，毛岸英不但差點害死彭老總，而且自己被美國戰機的凝固汽油彈擊中，當場被炸死，沒有吃上一口蛋炒飯。25 下午 4 點，彭德懷才緩過勁兒來，向軍委發了電報。37 天后，1951 年 1 月 2 日周恩來才把志願軍司令部電

報送給毛澤東。

毛讓毛岸英入朝是為了鍍金，積攢政治資本，好迅速當接班人。沒想到，毛岸英的死把毛的家天下計畫統統打入地獄。毛澤東把這一切都算在彭德懷頭上，從此尋找機會報復。

1957～1958 年間，在毛的支持下，國防部長彭德懷和總參謀長黃克誠在軍隊內部開展“反教條主義運動”，批判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劉伯承元帥，並且將國防部副部長兼軍隊訓練總監部部長蕭克和訓練總監部副部長李達打成“反黨宗派集團”的主帥和副帥，一批高級軍官被打成“反黨分子”。劉伯承在 1958 年被迫辭去南京軍事學院院長一職，從此在家賦閑。“文革”期間，郭天民、吳偉被折磨致死；蔡鐵根大校仍堅持當年的觀點，在飽受凌辱摧殘後，被當成現行反革命槍斃了。粟裕大將和葉劍英元帥等高級將領也受到點名批評。

1958 年 12 月 18 日，彭遇到管經濟的薄一波，對他說糧食產量絕沒有毛公佈的那樣高，決不能在此基礎上徵購。薄有同感。但當彭提議聯名給中央發電報表示意見時，薄害怕了，說還是各自反映好。彭自己發了封電報給毛，力請降低糧食徵購數字。毛沒有回音。

1959 年 4 月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舉行，毛在會上強調權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由他掛帥，還說鄧小平是副帥。在會下議論中，彭德懷就說，他本來就是帥，還要掛什麼帥？讓鄧小平作副帥，置少奇、總理於何地？為什麼要鄧小平作他的副帥呢？是因為鄧在“反右”和“大躍進”中積極啊！

1959 年 4 月中下旬，少奇同志就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國家主席。1959 年國慶日，《人民日報》等報紙第一次在頭版刊登了毛主席、劉主席兩個人的標準像。從此成為慣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1959年5月29日至6月4日赫魯雪夫正式訪問阿爾巴尼亞期間，會見了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彭讓赫魯雪夫看了一個強烈抨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備忘錄。

1959年7月2日在江西廬山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列了19個問題，讓大家隨便談談，故稱神仙會。毛在開幕時講道：過去一年中成績很大，問題不少，要求各位把問題講夠，講透，反對左傾冒進。實則與57年反右“陽謀”一樣。

在柯慶施同志主持的華東組會議上，有人說，不能認為“大躍進”破壞了按比例發展的客觀規律；認為指標越低越落實，實際上是以落實掩蓋保守思想。還有人說，有些人片面地強調經濟核算，說大躍進“得不償失”，把小洋群都否定了，等等。

7月10日毛在全體會上說：黨內要團結，思想要一致。總路線完全正確，一年來取得的成績非常大，缺點是有，可是與成績相比，人一共十個指頭，缺點只能是一個指頭。全國大煉鋼，國家賠了廿多億，可是全黨全民學會了煉鋼鐵，這就是交學費練本領。黨外右派否定一切，龍雲、陳銘樞說我們人心喪盡，天安門工程如秦始皇修長城；說歷代開國之時，減稅、薄賦，現在共產黨年年加重負擔。民心喪盡了，就是不僅資產階級、地主，就是農民、工人都不贊成了。黨內天津的科局長對去年有議論，大躍進是得不償失。他們不瞭解全面情況。“得不償失”，可舉幾十、幾百上千件，無非頭髮卡子、菜、肉、蛋不夠，有的買不到了。對這些同志要講清道理，不要罵人，要說明他們認識整個形勢。得的是什麼？失的是什麼？比如，為什麼大躍進之後，又發生市場大緊張？不要戴帽子，不要罵一頓了事。上海有一個黨委書記，否認去年的大躍進，辯論之後，殺頭也不承

認大躍進好。有這麼一些中國人，說美國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國的好。黃炎培的兒子黃萬里寫詩說，中國修的路，路面出水，不如美國。經過調查，美國的路面也有出水的（黃在校刊發表雜文《花叢小語》，對北京市道路修建有違工程常識，造成損失事，小有諷刺，謂如在美國，此等事必引起納稅人抗議）。

當時，毛澤東住了美廬別墅，劉少奇住了原俄國五州銀行別墅，朱德住了原美國威廉斯別墅。每棟別墅自成一體，廚房浴衛，花園草地。從中央要員到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又都帶來自己的廚師、服務員等，一時間南北美食薈萃，各顯精妙風味。有的要大魚大肉，有的要精工細作，有的還要吃野味、海鮮、湖蟹、甲魚。柯慶施吃慣了江蘇陽澄湖的大閘蟹，每天一隻，還不能小於二市兩，又說鄱陽湖的閘蟹不如陽澄湖的肥，有股泥腥味；陶鑄想擺個蛇肉宴，招待東北來的老戰友；周恩來愛喝茅臺，朱總司令是生活最簡樸的，可每天要吃兩個烤紅薯，可7月初的江西、兩湖、兩廣地方，紅薯還在長藤，缺早熟品種，只好動用空軍專機，臨時到海南島去弄那裡的早熟紅薯。山東荷澤、河南開封、江西贛州，已鬧開了饑荒，開始餓死人。湖北、廣東、廣西、貴州、安徽也糧食告急。到處哀鴻遍野，毛等卻在廬山夜夜歡舞，揮霍民脂民膏。惟有彭德懷憂心如焚，拒絕美女服務和豔舞。

彭德懷在回憶錄中說：（1958年）武昌會議時，我參加了西北小組。在小組討論公佈1958年的糧棉數字時，有的同志說，糧食有1萬億斤以上；有的同志說，糧食有9千億斤，棉花有六、七千萬擔；也有的同志說，糧食要多少有多少，現在是工業大大落後於農業。我說糧食沒有那麼多。當時有的同志對我提出了客氣的批評，他說：“老總呀！你這也懷疑，那也懷疑，怎麼辦呢？”我說：“公佈的數位少些，將來追加數字，比較主動；公佈數字多了，將來被動。”後來主

席說公佈 7500 億斤，我當時同意了，但心中對此數還是有懷疑的。

彭說：會議閉幕後，我先到了湘潭縣的烏石、韶山兩公社，後又到了平江縣。這幾處給我的印象是實際收穫的糧食沒有公佈的那樣多。其根據：由於勞動力不足，沒有收穫好；有些地區又多吃了一些糧食。在平江展覽館參觀時，發現將兩個年度的生產數字顛倒公佈了，即將 1957 年高產數字公佈為 1958 年的生產數字，而將 1958 年的較低數字公佈為 1957 年的生產數字。這樣的造假數字，真是令人可怕的。回到株洲市，恰與薄一波同志相遇，當談到糧食數字時，我說：“實產糧食數字可能沒有估計的那樣多，今年徵購 1200 億斤糧食是很勉強的。如果徵購了過頭糧，不僅將來返運困難，而且會影響農民的生產情緒。估計徵購 900 億斤為宜。”薄一波同志說：“你給中央打個電報。”我說：“請你寫吧。”後來還是用我的名字寫了一個電報，說明不能徵購 1200 億斤，只能徵購 900 億斤。

彭德懷在赴廬山的火車上，談到匈牙利人均每年吃 40 公斤肉，生活水準比中國高得多，還出了匈牙利事件。他說：要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也要請紅軍的。他又講全民煉鐵，國家與地方補貼共 50 多億，比一年的國防開支還大，用這筆錢去買消費物資，堆起來會有廬山高呀。毛說，不會有廬山這樣高。彭說，那就矮一點吧。

從 7 月 3 日到 10 日，彭德懷在西北小組共有 7 次插話或發言。後來，批判他時，其中的部分內容被整理出來，登在《簡報》上。主要有：“人民公社我認為早了些，高級社的優越性剛發揮，還沒有充分發揮，就公社化，而且未經過試驗，如果試上一年再搞，就好了”。“毛家鄉那個韶山公社，去年增產七成半？老毛回去看了，他相信。我也去看了，不相信！是鬼打架的事情。我去瞭解實際只增產 16%。我又問了周小舟同志，他說那個社增產只有 14%，國家還給了不少

幫助和貸款。江西現在還在講去年增產 67%，今年為什麼成為缺糧省？魚米之鄉的贛州鄉下已經餓死人”。“現在各級幹部搞特殊化，越到上面越嚴重。老百姓在餓肚皮，流行水腫病，是不是大饑荒的前兆？可是，全國到處都在修風景區，造人工湖，蓋樓、堂、館、所。好多省都給毛澤東修別墅，為什麼不制止？究竟是老百姓的肚皮要緊，還是少數人的享受要緊？共產黨革命成功，坐下十年天下，不能脫離人民群眾”。“基層黨組織的民主問題要注意，省、地的民主是否沒有問題呢？現在是不管黨委的集體領導的決定，而是個人決定，第一書記決定的算，第二書記決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體威信，只建立個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毛主席的什麼算帳派、觀潮派……等帽子都有了，對於廣開言論（路）有影響，有些人不說真話，摸領導人的心理。”

彭對廬山會議上出現的“護短”情況很焦慮。聽說快散會了，彭在 12 日上午想去找毛面談，由於毛正在休息，於是就改為給寫信，信於 14 日送給了毛。

主席：

這次廬山會議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組有幾次插言，在小組會還沒有講完的一些意見，特寫給你作參考。但我這個簡單人類似張飛，確有其粗，而無其細。

因此，是否有參考價值請斟酌。不妥之處，煩請指示。

甲、1958 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

根據國家計委幾個核實後的指標來看，1958 年較 1957 年工農業總產值增長了 48.4%，其中工業增長了 66.1%，農副業增長了 25%（糧棉增產 30%是肯定的），國家財政收入增長了 43.5%。這樣的增長速度，是世界各國從未有過的。突破了社會主義建設速度的成規，特別是象我國經濟基礎薄弱，技術設備落後，通過大躍進，基本上證實了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是正確的。不僅是我國偉大的成就，在社

會主義陣營也將長期的起積極作用。

1958 年的基本建設，現在看來有些項目是過急過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資金，推遲了一部分必成專案，這是一個缺點。基本原因是缺乏經驗，對這點體會不深，認識過遲。因此，1959 年就不僅沒有把步伐放慢一點，加以適當控制，而且繼續大躍進，這就使不平衡現象沒有得到及時調整，增加了新的暫時困難。但這些建設，終究是國家建設所需要的，在今後一兩年內或者稍許長一點時間，就會逐步收到效益的。現在還有一些缺門和薄弱環節，致使生產不能成套，有些物資缺乏十分必要的儲備，使發生了失調現象和出現新的不平衡就難以及時調整，這就是當前困難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1960 年）計畫時，更應當放在實事求是和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加以認真考慮。對 1958 年和 1959 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設項目實在無法完成的，也必須下最大決心暫時停止，在這方面必須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則嚴重失調現象將要延長，某些方面的被動局面難以擺脫，將妨礙今後 4 年趕英和超英的躍進速度。國家計委雖有安排，但因各種原因難予決斷。

1958 年農村公社化，是具有偉大意義的，這不僅使我國農民將徹底擺脫窮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正確途徑。雖然在所有制問題上，曾有一段混亂，具體工作中出現了一些缺點錯誤，這當然是嚴重的現象。但是經過武昌、鄭州、上海等一系列會議，基本已經得到糾正，混亂情況基本上已經過去，已經逐步的走上按勞分配的正常軌道。

在 1958 年大躍進中，解決了失業問題，在我們這樣人口眾多的、經濟落後的國度裡，能夠迅速得到解決，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煉鋼鐵中，多辦了一些小土高爐，浪費了一些資源（物力、財力）和

人力，當然是一筆較大損失。但是得到對全國地質作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養了不少技術人員，廣大幹部在這一運動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雖然付出了一筆學費（貼補 20 餘億）。即在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僅從上述幾點來看，成績確是偉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經驗教訓，認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

這次會議，到會同志都正在探討去年以來工作中的經驗教訓，並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見。通過這次討論，將會使我們黨的工作得到極大好處，變某些方面的被動為主動，進一步體會社會主義經濟法則，使經常存在著的不平衡現象，得到及時調整，正確的認識“積極平衡”的意義。

據我看，1958 年大躍進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有一些是難以避免的。如同我們黨 30 多年來領導歷次革命運動一樣，在偉大成績中總是有缺點的，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關係到我們今後動員廣大群眾繼續實現躍進的關鍵所在。

過去一個時期工作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觀因素是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不熟悉，沒有完整的經驗。對社會主義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體會不深，對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沒有貫徹到各方面的實際工作中去。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處理炮擊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另一方面，客觀形勢是我國一窮（還有一部分人吃不飽飯，

去年棉布平均每人還只 18 尺，可縫一套單衣和兩條褲叉）二白的落後狀態，人民迫切要求改變現狀。其次是國際形勢的有利趨勢。這些也是促使我們大躍進的重要因素。利用這一有利時機，適應廣大人民要求，加速我們的建設工作，儘快改變我們一窮二白的落後面貌，創造更為有利的國際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

過去一個時期，在我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主要是：1、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去年北戴河會議時，對糧食產量估計過大，造成了一種假像。大家都感到糧食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因此就可以騰出手來大搞工業了。在對發展鋼鐵的認識上，有嚴重的片面性，沒有認真地研究煉鋼、軋鋼和碎石設備，煤炭、礦石、煉焦設備，坑木來源，運輸能力，勞動力增加，購買力擴大，市場商品如何安排等等。總之，是沒有必要的平衡計畫。這些也同樣是犯了不夠實事求是的毛玻這恐怕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起因。浮誇風氣，吹遍各地區各部門，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跡也見之於報刊，確使黨的威信蒙受重大損失。當時從各方面的報告材料看，共產主義大有很快到來之勢，使不少同志的腦子發起熱來。在糧棉高產、鋼鐵加番的浪潮中，鋪張浪費就隨著發展起來，秋收粗糙，不計成本，把窮日子當富日子過。嚴重的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不容易得到真實情況，直到武昌會議和今年一月省市委書記會議時，仍然沒有全部弄清形勢真象。產生這種浮誇風氣，是有其社會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這也與我們有些工作只有任務指標，而缺乏具體措施是有關係的。雖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經提示全黨要把沖天幹勁和科學分析結合起來，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看來是沒有為多數領導同志所領會，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 1958 年的大躍進中，

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樣，為大躍進的成績和群眾運動的熱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搶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戰略性的佈局和具體措施，長遠性的方針和當前步驟、全體與局部、大集體與小集體等關係混淆起來。如主席提出的“少種、高產、多收”、“15年趕上英國”等號召，都是屬於戰略性、長遠性的方針，我們則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當前具體情況，把工作安排在積極而又是穩妥可靠的基礎上。有些指標逐級提高，層層加碼，把本來需要幾年或者十幾年才能達到的要求，變成一年或者幾個月就要做到的指標。因此就脫離了實際，得不到群眾的支持。諸如過早否定等價交換法則，過早提出吃飯不要錢，某些地區認為糧食豐產了，一度取消統銷政策，提倡放開肚皮吃，以及某些技術不經鑒定就冒然推廣，有些經濟法則和科學規律輕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種左的傾向。在這些同志看來，只要提出政治掛帥，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記了政治掛帥是提高勞動自覺、保證產品數量品質的提高，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加速我們的經濟建設。政治掛帥不可能代替經濟法則，更不能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政治掛帥與經濟工作中的確切有效措施，兩者必須並重，不可偏重偏廢。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現了一種空氣，注意了反右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觀主義左的方面。經過去年冬鄭州會議以後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現象基本上糾正過來了，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這個勝利既教育了全黨同志，又沒有損傷同志們的積極性。

現在對國內形勢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別是經過最近幾次會議，黨內大多數同志的認識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務，就是全黨團結一致，繼續努力工作。我覺

得，系統地總結一下我們去年下半年以來工作中的成績和教訓，進一步教育全黨同志，甚有益處。其目的是要達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個人責任。反之，是不利於團結，不利於事業的。屬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等問題的不熟悉方面，經過去年下半年以來的實踐和探討，有些問題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問題再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摸索，也是可以學會的。屬於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的問題，已經有了這次深刻教訓，使我們較易覺醒和體會了。

但要徹底克服，還是要經過一番艱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這次會議中所指示的：“成績偉大，問題很多，經驗豐富，前途光明”。主動在我，全黨團結起來艱苦奮鬥，繼續躍進的條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後 4 年計畫必將勝利完成，15 年趕上英國的奮鬥目標，在今後 4 年內可以基本實現，某些重要產品也肯定可以超過英國。這就是我們偉大的成績和光明的前途。

順致

敬禮！

彭德懷

1959 年 7 月 14 日

彭的信在肯定 1958 年成績的基礎上，著重指出大躍進的一些嚴重問題及其原因。我們犯錯誤的原因客觀上是由於缺乏經驗，主觀上是由於在思想上存在不少問題。一是浮誇風和片面性，“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跡見之於報刊，使黨的威信蒙受重大損失”，“犯了不夠實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搶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的作風置諸腦後了”。還提到：“政治掛帥不可能代替經濟法則，更不能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

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

2·毛“叫天下負我”

7月16日，毛穿著他件白綢長袍睡衣，光腳穿一雙拖鞋，在住的樓內，召開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毛反復講到黨外右派否定的一切，而在黨內有些幹部說去年大躍進得不償失。現在彭的這封信，集中代表了這方面的意見，印發下去，大家來評論這封信的性質。當彭發現要求收回意見書時，毛不予理睬。柯慶施星夜派人去上海取批“右”的材料。

從17日起，會議轉入討論這封信。大多數人基本上是同意彭的信，但其中不少人認為，某些字句值得斟酌；完全同意或根本反對的只是個別人。7月19日，上山才2天的總參謀長黃克誠和深知民苦的周小舟分別在小組會上發言，同意彭信的內容，表示有些提法和用語可斟酌。李銳、胡喬木也同意彭的信。19日彭在小組會上說：“去年下半年，黨內一些‘左’的傾向確實有所發展，如浮誇風氣的滋長，以熱情代替科學，一下子全國都吃飯不要錢，有的地方幾天內便拆了很多房子，三五年之內要消滅文盲等等。這種‘左’的傾向的滋長，是有社會原因的，這就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

7月21日，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張聞天在華東組作了長達3小時的發言，大談三面紅旗、大煉鋼鐵所引起的嚴重問題，國民經濟所面臨的嚴峻形勢。張發言到最後，才提到彭德懷的信，認為信的中心內容是希望總結經驗，本意是很好的。關於“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提法，張聞天說：“這個問題不說可能更好一點，說了也可以，究竟怎樣，可以考慮。但是，刮‘共產風’恐怕也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柯慶施以主持者的身份，不斷責難張的發言。

7月23日凌晨2時左右，毛澤東吃了三片安眠藥還睡不著覺，半夜裡把到

會人員從睡夢中叫起來開會，由他發表了批彭的講話。毛的發言態度之惡劣，與明朝的“廷杖”無異，只是沒有公開打屁股罷了。毛說：現在黨內黨外夾攻我們，黨外有右派，黨內也有那麼一批人。……一個高級社（即生產隊）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七十幾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臺。就是帝國主義不來，人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辦一張專講壞話的報紙，不要說一年，一個星期也會滅亡的。專登壞事，那還不滅亡啊！……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有兩條罪狀：一個，1070 萬噸鋼，是我下的決心，建議是我提的。結果 9000 萬人上陣，補貼 40 億，“得不償失”。第二個，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推廣之權。北戴河決議也是我建議寫的。……

“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你們贊成了，也分點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對，蘇聯也反對。中國也不是沒有人反對，照江西黨校這樣看，人民公社還有什麼意思。……對於“廣大的群眾運動，不能潑冷水”！……“有失有得”；“得”放到後，“失”放到前，這都是斟酌了的。……

參加廬山會議的同志都毫無例外地說有所得，沒有完全失敗。是否大部分失敗了？我看也不能講。大部分沒有失敗，一部分失敗了。就是所謂多付了代價，多用點勞動力，多付了一點錢，刮了一次“共產風”，可是全國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

會後，彭德懷對黃克誠說：“本來約好十三號去談。去了，他卻不起床。給他寫封信，個別反映一點看法，給他做參考，他卻連聲招呼都不打，就把我的信批成‘意見書’，交會議印發、討論！他有一絲一毫的同志感情？有一絲一毫對人的尊重？他是要公開羞辱我，把我當成會議的對立面。及至幾天的分組討論下來，大部分同志認同了我的信，並沒有形成對我的批判局面；他乾脆今天上午突

然召開全體會議，親自披掛上陣，實際上是號召大家對我開火，連他大兒子毛岸英在朝鮮犧牲的事都扯上了！美帝國主義的飛機炸死了他兒子，也怪到我頭上，難道我這個中朝聯軍的總司令應做他兒子的警衛員？他這叫立黨為公？像一個黨主席的搞法？就算我老彭有千錯萬錯，也都是為了工作、為了公家的事業！……和他爭的是農業問題、老百姓的肚皮。是豐年還是災年？是糧荒還是糧食多得吃不完？十多個省區流行水腫病，餓死了人，為什麼把個人的威信、面子看得比老百姓的性命還要緊？講現在只是豬肉少了點，雞蛋少了點，肥皂、頭髮夾子少了點……這像個共產黨領袖講的話？封建皇帝都不如！過去皇上還懂得搞賑災，開設義倉、粥棚！可我們共產黨坐天下，聽任農民出外逃荒。”

黃克誠說：“老總你聲音低一點。我的心情和你一樣，對鄉下的饑荒空著急，晚上睡不安覺。我們共產黨這一朝，不要出現大饑荒才好……目前局勢，我相信少奇、總理、陳雲、小平同志他們，心裡還是有數的，不可能睜隻眼閉隻眼，由著少數人胡來。”

彭德懷說：“有屁用！只要老毛一發威，兩眼一瞪，他們就什麼聰明才智都沒有了。小舟講得對，中國黨已經出了史達林晚年問題。我看比史達林還史達林。……克誠，你曉得我現在最想幹什麼嗎？”黃克誠警覺地反問：“你想幹什麼？又能幹什麼？”

彭德懷說：“不瞞你，手上要有一個加強連就好了！老子就要效法當年張學良，逼老蔣答應全面抗戰那樣，逼老毛下令撤銷公共食堂，開放糧食政策，解救天下饑荒！”

黃克誠低聲叫道：“老總！你千萬不能有這個念頭，那會招致殺身之禍……你過去統帥百萬大軍，現在手下沒有一兵一卒。整個牯嶺被一中隊把守得鐵桶一

般。武漢、南京、福州、廣州四大軍區司令已經上山……我怕你是氣惱得糊塗了、不理智了。”

7月24日康生說：“我認為主席所說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的兩大‘罪狀’，是從反面來講的，是從敵人、右派、黨內反黨分子的看法來講的。從我們、從全黨、從全國人民來講，這不僅不是‘罪狀’，而是兩次偉大的功績。這不僅是對加速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兩大貢獻，而且，歷史將會證明，這對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和共產主義運動，也是重大的貢獻。在具體工作上有一些缺點錯誤這是暫時的、局部的、難免的，而且是不難糾正的。1959年上半年康生就說：過去都說史達林的錯誤是肅反擴大化，現在看來，史達林肅反還不徹底；比如，赫魯雪夫這樣的人物就漏掉了，“這是史達林最大的錯誤”！柯慶施、李井泉等組織人攻擊說：彭德懷在拉隊伍，彭德懷是魏延，“有反骨”，是受赫魯雪夫指使的結果。

7月26日彭德懷在小組會上就“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檢討，說是對革命群眾潑了冷水。

7月26日毛提出現在黨內外的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倡狂進攻之勢。同時，各分組接到了毛指示：事是人做的，不僅對事，也可以對人，要劃清界限，問題要講清楚，不能含糊。毛對原國家計委基建局副局長李雲仲於1959年6月9日寄給他的信批示說，李雲仲“認為從1958年第四季度以來，黨的工作中，缺點錯誤是主流，因此作出結論說，黨犯了‘左傾冒險主義’、機會主義的錯誤。而其根源則是在1957年整風反右的鬥爭中沒有‘同時’反對‘左’傾冒險主義”。“他幾乎否定一切。他認為幾千萬人上陣大煉鋼鐵，損失極大，而毫無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錯誤的，對基本建設極為悲觀。對農業他提到水利，認為黨的‘左傾冒險主義、機會主義’錯誤是由（1957年）大辦水

利引起的，他對前冬去春幾億農民在黨的領導下大辦水利，沒有好評。他是一個得不償失論者，有些地方簡直是‘有失無得’論。”李雲仲說：1958年1月他去過灤縣扒齒港，親眼看到該縣為了要修一條100多裡長的大灌渠，既未經勘查設計，又未經群眾討論，要挖掉即將收割的1萬畝小麥。他找縣委負責人談，也未能制止住。結果這條水渠，雨季一到全淤死了。後來又參加“苦幹十天”的大會，10天內養豬增1倍、掃除文盲、除掉“四害”、鋤完大田，等等。“竟沒有一個人提出意見，反而都去應承這些根本無法實現的任務。”信中提到他參加了大煉鋼鐵運動，“回來對一位負責同志小心翼翼講了幾次：‘礦石、焦炭、煤消耗這麼多，成本這樣高，煉出來的又都是不能用的土鐵，可不能這樣搞！’這在當時大家都知道。但這位同志卻和我講，事實上很多人當時也這樣講：‘這不能算經濟賬。’為什麼不能算經濟賬？難道社會主義不是要發展生產力？”“幾千萬人拋開一切，苦幹了幾個月，上億噸的礦石，上億噸的煤炭，上百萬噸的鋼鐵材料，上百億度的電力，幾億噸的運力……都白白消耗在沒有效果的‘生產’上了，得到的卻是毫無使用價值的土鐵，這是對國家元氣最大的消耗。”關於公社化運動，信中談到：“勞動力和各種資料也都造成巨大的消耗。我到過金縣郊區的一個生產隊，這裡共有300多戶人家，去年年初有豬300多口，但今年只剩了9口，雞鴨去年幾乎殺光了。”信中說到，由於到處大辦，都要翻番，只得大量“招兵買馬”，去年增加2100萬職工。結果不僅農民、漁民，而且售貨員、理髮員、手工業者也都轉為工人。購買力提高了，但消費資料遠未跟上去。李雲仲因此被撤銷一切職務，開除黨籍，下放勞動。

7月27日，毛澤東還批發了另外兩個材料，一個是《國務院秘書廳學習簡報》，一個是《江西省中級黨校學員對人民公社的各種看法》。1959年6月間，

國務院所屬工業、農業、文教十幾個部委的黨外人士，聽了國內經濟情況解釋後，統戰部作了一個綜合反映：少數人仍有不同看法。例如，地質部副部長許傑說：“1958 年的成績，說大也大，說沒有也沒有。”有的說：“去年大躍進，還不如前幾年沒有躍進。”有的甚至說：“現在物資供應緊張情況，比日本統治時期還要嚴重。”不少人對去年糧食增產有懷疑，“糧食增產每年絕不可能超過 50%”。不少工程師說：“煉鋼損失了 23 億，這筆錢可以建設幾個鞍鋼。”“如果拿這筆錢向外國買鋼，能把全世界年產鋼都買來。”“去年煉鋼到街上去挖磚，這叫做一面建設，一面破壞。”“給鋼讓路這個提法不恰當，不符合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法則。”

1959 年 5 月間，江西黨校 80 多個縣委一級幹部（天津市各區黨員幹部）對 1958 年大躍進有如下看法：大躍進是吹起來的，是浮誇、謊報的結果；大煉鋼鐵影響秋收、煉出的鐵不能用、國家賠了 23 億；是勞民傷財；糧食、副食品供應的緊張，就是農副業沒有大躍進的證明。認為公共食堂並非共產主義因素，有三大壞處：排隊、搶食、浪費糧財；現在不要搞，將來也不能要搞。廣州軍區 42 軍政治部報告（這是彭德懷提供的），“少數營團幹部對經濟生活有抵觸情緒”。有人講怪話：“現在除了水和空氣以外，其他一切都緊張。”他們否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說“公社成立得太快了，太早了，不合乎規律”。“人民的覺悟沒有跟上來，工人、農民和軍官都對成立公社有意見”。“蘇聯建國 40 年還允許私人有房子，我們建國不到 10 年，就什麼都‘公有化’了”。“公社的優越性是宣傳出來的”。他們認為經濟生活緊張是由於路線上有錯誤。說：“去年不僅是工作方法上有問題，而是帶有路線性質的錯誤，中央要負責任。”在少數連排幹部中，也有類似情況，有位元排長聽戰士唱《社會主義好》這支歌時，不耐煩地

說：“算了，不要唱了，我看這支歌非修改不可。”海南軍區一個指導員說：“什麼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我看社會主義建設倒是一年不如一年！”有位排長講怪話：“在公社勞動，還不如給地主幹活，給地主幹活有飯吃，還給錢。”

7月31日，毛在遼寧省委的報告上批示：“反右傾，鼓幹勁，現在是時候了。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看不到這一點，是瞎子。在廬山會議上提出反冒進，大潑其冷水，簡直是罪惡。”

1958年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講到黨內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這“有些人”就包括彭德懷在內。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在許多會議上談到要準備黨的分裂問題。5月17日，他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講話的最後一個問題是“準備最後災難”。所謂最後災難，其一是世界大戰，其二是黨要分裂。在5月20日的會上，他又說：新的分裂是可能的，只要有黨，就可能分裂，一百年後還會有。5月23日，他說：有分裂的可能，這是階級鬥爭的正常現象。預料到了，就不要緊。這說明了毛早準備整彭了。

1959年8月1日的常委會上，毛對彭德懷說：1958年八大二次黨代會講過，準備對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1959年4月）上海會議也警惕過你。你恨死了我；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你的政策是這樣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認為彭的信是“犯”了他，所以要反擊）。總司令（朱德）可能鬧亂子，但他只是個招牌（組織不起隊伍）。彭“從打擊史達林後，佩服赫魯雪夫”；“要鞭我的活屍”。“我66歲，你61歲，我快死了，許多同志有恐慌感，難對付你，許多同志有此顧慮”。毛甚至說：“如果解放軍不跟我走（我看解放軍會要跟我走）”，“我就跑到農村去”，“另外組織解放軍，

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一下子把他和彭德懷之間的分歧，推到必須二者選其一的地步。絕大多數人依過去的習慣選擇了毛。

周恩來作了四個小時揭批彭德懷錯誤思想歷史根源的發言，定為反黨性質。周恩來指責彭德懷“犯上”，表示“所有領導同志都要馴服”；還說：彭德懷反對個人崇拜是“感情問題”（即沒有無產階級感情）、是“沒有領袖觀點”、“沒有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

林彪激昂慷慨地說：“中國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誰也不要當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指彭德懷）覺得他也是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對毛主席，這是事情的規律”。林彪講的是什麼“規律”呢？真正的英雄世界上只能有一個，不能有兩個。林彪正是用“天無二日，國無二主”的帝王理論，取代了“集體領導”原則。

這些高官們，一下子反臉不認人，萬箭齊發，萬炮齊轟，落井下石。他們抹著良心，白天狠批猛鬥彭德懷，晚上照舊非常開心的一一摟著姑娘鬥跳舞到深夜。

8月2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開幕，毛澤東動員全黨要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倡狂進攻。在8月3日至6日的《簡報》上，可以看到這樣一些“誅心之論”：彭反對政治掛帥，第一書記掛帥，並不是對我們的，正是對毛的（由於彭德懷在常委會上說，不習慣稱“主席”，毛澤東即讓發通知，一律改稱同志）。彭否定總路線，就是否定中央領導。彭的信上說一般不追究責任，意思就是特殊的還要追究責任。既然領導錯了，路線錯了，就得改組領導。不過這下半句他沒有寫出來罷了。如果他第一步成功，第二步他就會提出來的。彭拿匈牙利作比是嚴重的，可怕得很。因為他是國防部長，意思就是說：人民起來鬧事，我軍隊就不跟中央，

不歸中央了，你們去請蘇聯紅軍吧。彭的信，到處是伏筆，他是惡意的，是犯上的惡意。他們懷有個人野心，企圖按照他們的面貌來改組中央，改組黨，自然也改組軍隊。彭的信與張的發言，是一個向總路線進攻的綱領，他們企圖以這個綱領來代替黨的正確的總路線；其鋒芒是直接對著黨中央和毛的，其目的是企圖分裂黨，實現他們的惡毒陰謀。所以，這次黨內的爭論實際上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彭德懷同志與張聞天同志代表著黨內的一小部分具有右傾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動搖分子，與黨外的資產階級的倡狂進攻遙相呼應。

8月3日下午，康生說：“蘇聯在革命勝利10年後出了布哈林右派，我們勝利10年後出了彭、張右傾路線。我們現在的情況、條件、環境與蘇聯1928年不同，但涉及的問題，也是工業發展速度與農村集體化生產的問題。”康生把當年史達林批判布哈林的兩篇文章摘錄了幾段，送給毛。史達林說：“正因為我國所有的困難是高漲過程中的困難，而不是衰落過程。停頓過程的困難，所以這種困難對於黨也就不應當有什麼特別的危險。”“為了克服困難，首先就必須打破右傾危險。”“機會主義者的慣用手段，就是藉口說在實行正確政策時有過火行動，而要求取消這個路線，用機會主義路線來代替這個路線。”

張平化8月5日在會上說：這次事件，彭德懷同志是主帥，黃克誠、張聞天兩同志是兩相，興師動眾，向著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倡狂進攻，這是一次非常惡毒的篡黨陰謀。毛澤東同志說過，對這次事件“不要估計過高，也不要估計過低”。是的，我們不要估計過高，黨不會翻船，垮不了，保衛總路線、保衛黨中央。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分裂的鬥爭一定會勝利。可能“因禍得福”，把壞事變成好事。但也不能估計過低，如看不到篡黨陰謀的危害性，不堅決揭露和粉碎這種陰謀，對重病不下重藥，不改造這些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分子，而照樣

地把他們留在黨內，留在黨中央，並且讓他們繼續掌握軍權，後患無窮……廬山會議之後，張平化就接替被罷黜的周小舟，出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了。

廬山會議上的幹部，以專制主義的思想來看待領袖問題。宣揚對領袖要絕對忠誠，無條件服從，認為這就是“黨性”。8月6日，陶鑄發言說：我幾次聽彭說，他要辭國防部長的職，說他自己年過60，該退休回家種田了。為什麼要辭職？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辭職不是真的，發洩牢騷才是真的。……你看他在給毛澤東同志的信中說什麼認識過遲，說什麼打金門與平定西藏叛亂得心應手，搞鋼鐵得不償失，頭腦發熱，“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左”比右難於糾正等，顯然是對著毛澤東同志說的。這不過是公開放的箭，在背後對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不知道放了多少更毒的冷箭。現在看來，他經常說的辭職的一類話，只不過是放空氣，向中央“示威”而已。……彭德懷同志說黨中央沒有民主，那是胡說。……我記得二中全會（1956年底）時，他在會上說過，搞得不好，我們也會出匈牙利事件。……當時只覺得是偏激之詞，現在看來不是偶然的，他惟恐天下不亂，搞亂了，他就可以出來收拾殘局，實現個人野心。他還說：“共產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否則便不能稱為‘貞節’之婦”。在他看來，擁護是絕對的，無條件的，即使領袖錯了也不許“不滿”，更不許提意見。

彭德懷答覆說：我說過不唱《東方紅》，那是在（蘇共二十大後，在中南海西樓開）常委會上提的（不贊成喊“毛主席萬歲”，這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警覺）。在朝鮮我也和金日成說過，不要修“毛澤東廣場”。難道我還不清楚，毛澤東同志不僅是中國人民的領袖，而且是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領袖嗎？毛一再反對人家歌頌他，黨中央七屆二中全會也曾就這些問題作過決議，這一點，我們都清楚嘛！

現在，如果把毛澤東趕走，我上臺，你們能舉手嗎？

劉少奇和周恩來都找彭個別談話，終於禁不起大家的耐心幫助，彭還是在大會上承認了“我成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成為廬山軍事俱樂部的重要一員，絕不是偶然的”。他甚至還承認了“我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對周小舟、李銳等同志有較深的影響。……他們捲入軍事俱樂部，實際上我是起了橋樑作用的”。

8月10日黃克誠揭發：彭德懷給他說過，“各省都給主席蓋房子”的話。黃克誠說，李銳說過毛象“史達林晚年”的話。這就像一顆炸彈似的，會場頓時譁然：居然把毛主席比作史達林晚年，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許多人都填氣憤填膺！

8月11日，毛在全會上惡狠狠地說：彭德懷這幾個人對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精神準備。他們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黨內的同盟者、馬克思主義的同盟者。……高饒集團是在1953年嘛！形成這個集團的時候，是在抗美援朝的期間，1951至1953年3年形成的。我們知道彭德懷是陷得相當深的，那時是保護過關。是高饒聯盟，還是高彭聯盟？再遲半年、年把，我看不曉得怎樣了，就是要按高、彭、饒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即中國這個世界。毛繼續說：在廬山是兩種氣候，一種，大多數說大躍進、公社化好得很，少數，“俱樂部”的同志就說是糟得很，他們的看法跟羅隆基接近；有些人說他們是有過之無不及，因為羅隆基承認你解放軍，彭德懷連解放軍都不承認了，說可以垮臺。……彭在歷史上最嚴重的是參加高崗集團。……彭這次迫不及待，你掛帥，組織派別，進行分裂活動。……他們提出的批評，據我看，提出的盡是些雞毛蒜皮的問題。我說他們看錯了。

毛繼續說：他們所謂“集體領導”，就是要他們來領導，要高饒集團的殘餘

分子、漏網分子，還摻雜點別的人來領導。所謂“民主”，就是要反現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民主”。……他們所謂“民主”，是搞資產階級民主；所謂“言論自由”，是資產階級言論自由，是反無產階級的。他們還要求“民主、自由、博愛”，這些東西同章伯鈞、羅隆基一樣，他們也是要大民主，要大鳴大放。……他們大鳴大放，要把我們放倒，把我們鳴死，他們就活起來；我們垮臺，他們就上臺。他們這個“自由”，資產階級有自由，無產階級就沒有自由。他們“博愛”，愛什麼？是博愛右派，我們是愛“左派”：工人、農民。6億人民，除地、富、反、壞、右、資產階級分子和廬山會議上的右派司令部之外，我們都愛。這個右派司令部，我就不愛。我給他們自由、民主，目的是要他們把毒素放出來、讓毒草長起來，以利拔掉。我叫你們放，你說我釣大魚。確實，就是要大魚、小魚一起釣，不釣不得了。這個大魚是吃人的魚，是鯊魚啊！有資產階級那種“平等、自由、博愛”，就沒有無產階級這種平等、自由、博愛。這兩個東西是完全對立的，你死我活，有你就沒有我，有我就沒有你。橫豎是生死鬥爭。這些，我看是“俱樂部”的人所不瞭解的。

13日黃克誠在這篇大會發言中，對彭德懷作了一些這樣一聽就知道是言不由衷的“揭發”：“我過去和彭德懷同志相處很久，他一貫地反對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近幾年在軍委一塊工作期間，常常聽到他對毛澤東同志的不滿言論，甚至指桑罵槐的謾罵。”例如，他“對各地修房子不滿；反對唱《東方紅》歌；對喊毛主席萬歲不滿；調文工團員，他罵蕭華和羅瑞卿同志，說是‘選妃子’，實際是罵毛澤東同志”。

彭說：“我堅決地、全部地拋棄那封信的錯誤立場、觀點，堅決拋棄對毛澤東同志的一切成見，堅決回到黨的立場上來，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竭誠擁護黨

中央，擁護毛澤東同志，擁護黨的總路線，永遠做黨的馴服的工具，不管今後黨中央的領導人有什麼變動，都願堅決服從領導，在黨的監督下，老老實實地為黨工作，並願盡自己的餘生，無限忠誠地為黨的革命事業而奮鬥。”彭請求處分：人民解放軍是黨的有力工具，由我這樣的人來掌握，是非常危險的，我萬分誠懇地提議，撤銷我國防部長和軍委委員職務，並願接受黨的任何處分，請求黨分配我去做黨認為適宜的工作。

王任重提了幾個問題：彭德懷同志今天的講話，我感覺含含糊糊，似是而非，許多地方避重就輕，前後矛盾。二十多天小組會，全是這樣，凡是人家揭發的東西，事實俱在，無法狡辯的，他就承認下來；只要能狡辯的，他就狡辯過去。比如高饒事件問題，原來他講是義務宣傳員，後來同志們揭發了一些材料，他承認是高饒集團的重要成員。這個事情，他在小組會上含含糊糊，今天還是含含糊糊，似乎只是高崗向他宣傳了什麼少奇同志想篡黨，什麼宗派，他只是沒有向中央報告，自己沒有反對。

8月16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關於撤銷黃克誠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等文件。指出以彭德懷同志為首，包括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發動了“反對黨的總路線、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的倡狂進攻”；他們“進行分裂黨的活動由來已久”，“在廬山會議期間和廬山會議以前的活動，是有目的、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這就將彭等劃到資產階級範圍內。

八屆八中全會閉幕的第二天——8月17日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彭德懷被解

除了國防部長的職務，其支持者也被撤銷了軍中職務。劉少奇指責彭德懷1945年起草七大黨章時“不贊成寫毛澤東思想領導那一條”。劉少奇在會上說：所謂反對“個人崇拜”問題，在蘇共二十大以後，在我們黨裡面，有人要在中國也反對個人崇拜，彭德懷同志就有這個意見。彭德懷幾次提議不要唱《東方紅》，反對喊“毛主席萬歲”，這次又講了什麼“史達林晚年”。從蘇共二十大以後，他就一直要在中國搞反個人崇拜運動。我想我是積極搞個人崇拜的。個人崇拜這個名詞不大那麼妥當，我想我是積極地提高某些個人的威信的。我現在還要搞小平同志、林彪同志的個人崇拜，以後我還會要搞。對彭德懷同志的威信，我也沒有損傷過。如果說他去掉點個人野心，多有點馬克思主義，我想我也可以替他搞點個人崇拜的。我這個人是搞這一行的，是犯這個“錯誤”吧！這不是為了對某一個人好，也不是為了我自己好爭選票。在革命隊伍中間，個人威信跟黨的威信、階級威信是不可分離的。黨的、無產階級的威信是通過某些個人崇高的威信表現出來的，在威信這一點上，無產階級長期不如資產階級的威信高，很長的一個時期，人家總是看不大起無產階級，因此就要注意這個問題。一個黨的、階級的、革命的、人民的領袖非有不可，有了有很大的好處。恩格斯在《論權威》裡說：“革命無疑問就是天下最有權威的東西”，而反對權威的，“要麼是散佈糊塗觀念，要麼是背叛無產階級的事業”。赫魯雪夫搞反“個人崇拜”運動，我看也有許多不正確的地方，不應該那樣搞。所以在二十大以後，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上是對黨、對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

在這樣一片批鬥形勢下，彭等人被迫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彭說自己是猛張飛，給自己扣上“掛著共產主義帽子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違心的在打倒彭德懷

的決議上簽了字。黃克誠則說自己的認識是“資產階級富裕中農思想在頭腦中反映”。周小舟、張聞天也在會上作了檢討，給自己不輕不重的扣了幾頂帽子。

3·大悲劇

廬山會議後，緊接著在北京舉行的軍委擴大會議上，彭德懷完全不接受“軍事俱樂部”罪名。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有人逼他老實交代“軍事俱樂部”的綱領和名單，他說：“開除我的黨籍，拿我去槍斃了罷！你們哪一個是“軍事俱樂部”的成員，就自己來報名罷！”

彭在黨內的遭遇，激起了蘇聯黨、政、軍領導人的極大不滿和憤怒。赫魯雪夫兩次來電話，詢問彭德懷受批的情況，明確地對毛說：“我們認為彭德懷沒有錯，真理在他手裡，你們應該向彭德懷賠理道歉。彭德懷日益受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人士的普遍同情，我們希望你們應該考慮到這些情緒。”早就對赫不滿的毛很乾脆地拒絕了赫：“對不起，赫魯雪夫同志，這是我們黨內的事情，希望你不要干涉我們黨內的事務。”

根據毛的旨意，反彭的決議傳達到全黨，在全國範圍內立即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右傾”運動，報上連篇累牘地發表批判“自由平等博愛”、批判“得不償失”、批判觀潮派、算帳派的文章，黨內人人自危，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的幹部、黨員達 380 萬之眾，在農村中批判了許多農民，共整肅了 1000 多萬名“右傾分子”（據 1962 年甄別平反時的統計，被重點批判和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有三百幾十萬人之多）。從此，再也沒有人敢公開講“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中的問題，使政治體制上的弊端更加突出。

凡是像彭德懷那樣說話的全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凡是從農村回來講農村情況不好的，全是家庭屬富農或富裕中農的，是為資本主義家庭說話。因此，反右

傾打擊面就無限擴大。各單位拼命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不論工農兵學商。實際上，矛盾中心是吃飯問題，因而說過類似話的人很多很多，不只是知識份子。稍有不滿的人，全被打了進去。

比如，長辛店機車廠一位工人出身的總工程師李樹森，出身既好，又有技術，提拔又快，號稱“工人階級自己的知識份子”。可是，因為他說過，咱們的工廠領導幹部包括總工程師，目前這樣工作方法太不科學了。辦公室裡整天像騾馬大會似的，這還能讓人思考研究什麼問題？人家蘇聯總工程師都是每天規定 20 分鐘為接待群眾時間，有什麼問題按次序進來，三下五除二就解決了。其它時間是自己主動支配的……就這些話，就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否定群眾路線，高高在上，一天只辦 20 分鐘的公。另外還加上一條，他的思想已經變質到資產階級方面，因為他身上穿著一件體面的黑色呢大衣。

中國作家協會的通訊員馮振山是農民出身，反右傾那年回了一趟家，返回北京機關之後，向同事們講了一些他目睹的家鄉實際情況。無非是食堂散夥、人們挨餓、大躍進造成了農村經濟嚴重破壞之類的話。因此也被打成了右傾。類似的例子舉不勝舉。

武漢軍區衛校在傳達廬山會議的軍人大會上，一位首長除大罵彭德懷外，又大肆宣揚對毛的個人崇拜。教員唐鏡波在小組會上發問：“是不是領導傳達錯了？”就這一句話，他成了“反動份子”。軍事法庭立即判決：開除軍籍，送地方勞動教養。

廬山會議後，遵照毛的指示，中宣部提出了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和人道主義。而且批判馬寅初人口論也進入了高潮。

1966 年底，彭德懷被北京的紅衛兵從成都抓回北京，12 月 28 日安排在北京

衛戍區某部監護。1967年元旦，彭德懷寫信給毛澤東求救，毛不予理睬。隨後，紅衛兵逼他承認“是高、饒反黨集團的幹將！”勒令彭德懷“把你們那個軍事俱樂部寫出來”。彭德懷說：“沒有什麼俱樂部！”紅衛兵說：“非寫不可！”彭德懷大聲吼道：“殺掉頭也沒有！”

這時，遭受疾病折磨的彭老總，因為囚房裡沒有陽光，窗戶用舊報紙從底直糊到頂，屋內潮濕，沒有衣服可換，雙腿、臀部和背腰都長滿紅瘡，奇痛奇癢，兩個多月未換的內衣褲，沾滿了膿血，襪子也破了，棉褲露出棉花。二月底的一個晚上，他給侄女彭梅魁寫了封信，要換洗衣服。信上說：“……在成都被抓的時候，未帶應用東西，僅穿著黑棉布衣服，現已破爛不堪，春暖後無法換洗。”天暖了，他還是穿著破舊棉襖褲。他向哨兵要來針線，眯著眼睛，一針一線縫補。3月19日，一個參謀送來彭梅魁給他帶來的衣物和水果。

1967年7月的一天，中央文革的“代表”王大賓前來審訊彭德懷。這代表就是造反派“地派”頭頭。他們對彭德懷一陣拳腳相加之後，要他限期交代如下問題：1) 與劉少奇、鄧小平、賀龍的關係；2) 在朝鮮戰場反對毛主席的戰略方針；3) 毛岸英是怎麼死的……

1967年7月12日，文革小組成員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韓愛晶等人，專門下達了折磨彭德懷致死的信號，戚本禹指示說：“彭德懷要是不老實，得對他厲害點，不能對他客氣。”7月19日酷熱的中午，彭剛吃完有人塞給他的一個玉米餅，就被拉進吉普車，押到北京航空學院的一間教室裡；得到最高指示的韓愛晶有恃無恐，率領幾十個紅衛兵鬥爭彭，把年近七旬的彭打翻在地七次，額頭打破，肋骨打斷，慘不忍睹。彭被迫寫了“檢查”。1970年9月17日，“彭德懷專案組”寫過一份所謂《關於反黨頭目裡通外國分子彭德懷罪行的審查綜合報告》。報告

提議：“撤銷彭德懷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1973年4月彭德懷直腸癌惡化，1974年11月29日15時35分含冤死去。比諸南宋秦檜之殺嶽飛，則毛某就不如秦檜遠矣。因為秦檜還承認嶽飛的罪狀為“莫須有”，不像毛某之栽贓到底。

第 125 節 毛澤東暫時忍讓

1. “竊聽器事件”

1961年2月竊聽器事件使毛感到自己的地位危險。據李志綏的書中說，竊聽器事情暴露的過程是這樣的：毛的專列停在長沙車站，車上的隨從人員下車到月臺上散步。機要員劉模仿毛在臥車裡和女友打情罵俏的話與毛的女友開玩笑，該女立即報告了毛。毛將該通信兵叫上車廂詢問，該通信兵說是羅瑞卿佈置的。毛再問羅瑞卿，羅瑞卿說是楊尚昆根據政治局會議的決議要求他在毛的車廂瑞安裝竊聽器，以便政治局成員及時瞭解毛的指示好貫徹執行，羅瑞卿拿出政治局有關該決議的文件給毛看。從楊尚昆的日記的注釋和葉子龍的回憶錄中看，對毛的錄音始於1958年11月。毛認為這是其它中央常委和書記處，針對他採取的特務手段。結合這些年來反史達林的經驗，他認為這是反他的準備行動之一。很自然，從這時起，他對中央的隔閡增加了，懷疑更大了。使他更為震怒的是，錄音安裝了幾年，身邊的人竟然沒有一個向他通風報信。最後讓他知道了情況的是他的“女友”。由此，他認為身邊的人並不可靠，比較可靠的是“女友”。到1965年11月，這件小事卻被誇大，誣陷楊尚昆“背著中央私設竊聽器”，說他“同羅瑞卿等人關係極不正常”，撤了他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職務。

2. “七千人大會”

1962年1月11日，中共召開“七千人大會”。1月18日彭真發言，他講

到調整問題時說到廬山會議。劉少奇插話說：關鍵是廬山會議。彭真接著說：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提的。如果毛主席的錯誤的1‰，1‰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鄧小平插話說：我們到主席那兒去，主席說，你們的報告把我說成聖人，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人人都有，只是占多少的問題。不要怕說我的缺點（參看《新中國要事述評》277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

在1月27日的大會上，一向謹慎小心的劉少奇，當著毛澤東的面，對著七千名中共政權骨幹，講了一番跟書面報告迥然不同的話。劉說，形勢不好，“人民吃的糧食不夠，副食品不夠，肉、油等東西不夠；穿的也不夠，布太少了；用的也不那麼夠。就是說，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我們原來以為，在農業和工業方面，這幾年都會有大躍進。……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劉又說：“產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天災的確不是那麼嚴重”。他甚至暗示要重新考慮治國方針：關於“三面紅旗”，劉說：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為“三面紅旗”奮鬥；有些問題現在還看得不那麼清楚。但經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就可以更進一步作出結論（《劉少奇選集》下，421頁）。這些話表明劉要取消“三面紅旗”，他現在不便說，卻要等到5~10年後，這不是要等到毛死後來算帳嗎？劉少奇還說：彭德懷的意見“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寫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不算犯錯誤”。“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說：到底高、饒聯盟呢，還是高、彭聯盟呢？恐怕應當是彭、高聯盟（毛插話：彭和高，實際上的領袖是彭）。更主要的不是高崗利用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高崗。他們兩人都有國際背景的

反黨活動，同某些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他陰謀篡黨……彭德懷帶領我國軍事代表團在國外走了幾個月，回來以後就急急忙忙寫了那封信，是有陰謀的。”

“和彭德懷有相同觀點的人，只要不是裡通外國的，就可以翻案。”劉少奇直接針對毛說：“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毛馬上插話說：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這種地區不少。劉反駁說：“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

劉的講話在與會者心裡激起強烈共鳴。有國家主席出頭，當天的小組討論就像洪水開了閘，與前些天大不一樣。幹部們爭先恐後地發言，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反對大躍進政策再繼續下去。激烈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毛做夢也沒想到，自己親手提拔的劉少奇居然會來這麼一下。劉顯然有七千名中共政權骨幹的支持，毛不能跟他們硬碰硬。他也不能把代表們現在就放走，要先把對他的損害減少到最低程度再說。於是毛裝作他跟劉之間並無不同政策的樣子，宣佈延長會議，對代表們說這是讓他們“出氣”：“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幹一稀，大家滿意。”背地裡，他把最後一句改為“完全放屁”。

毛採取緊急步驟，把林彪即刻推出來保駕，讓林彪出來唱讚歌。1月29日林彪做了赤裸裸的“造神”發言。他說：這些年有“一些缺點”，是必要的“付學費”，“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加依靠、更加相信黨的領導、中央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這樣，我們才更容易克服困難。而且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

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多……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林彪講完後，毛第一個鼓掌，接著毛向大會宣佈：“林彪同志講了一篇很好的講話”。林彪講話之後，毛叫各省領導和中央管農業的、管經濟的，一一上臺檢討自己，承擔責任，為他開脫。林彪的講話受到毛極大的賞識，併發檔，表揚林彪的講話稿“是一篇很好、很有份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

毛認為是天災和國內外敵人的破壞造成了饑荒。但在大會氣氛的逼迫下，毛澤東不得不在1月30日的大會上，作了幾句敷衍了事的自我批評。這是掌權以來的頭一遭。他說：“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分，因為我是中央主席”。“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既然承認犯了錯誤，毛只好改變政策；被迫容忍從1962年起，把征糧指標大幅度降低。數千萬人因此免於一死。

就在七千人大會上，毛突然提出了修正主義的問題，這與大會的反“左”基調極為不協調。毛說：“沒有高度的民主，就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麼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毛的話令與會者十分不解。實際上，毛是深有所指的。在這時，他決心用林彪換掉劉少奇，作為自己的接班人的。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突然襲擊”對毛的驚嚇，在毛掌權後還是第一次。

毛最害怕突然襲擊，只有這才可能使他轉瞬間失去權力。毛恨劉少奇，恨之入骨。他也恨參加會議的人尤其是彭真，因為他們跟劉站在一起，迫使他改變政策。復仇成了毛刻骨銘心的願望。這就是為什麼在數年之後，毛髮起文化大革命，讓劉少奇、與會的絕大部分人、以及他們代表的其他幹部，都飽受折磨，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文革開始時毛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中就提到“1962年的右傾”。江青在“文革”中說：“七千人大會，毛主席受了一肚子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這話確實洩露了毛澤東的報復心理。1967年2月，毛在接見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巴盧庫時說：“我們黨內鬥爭，多年來沒有公開化。到1962年七千人大會的時候，就看出問題來了。因此就提出了中國可能變成修正主義國家，法西斯式國家。”可見，毛的鬥爭矛頭所指的就是劉少奇及其追隨者。文革不光是復仇，也是大換班。毛看得很明白，現有幹部不願意按他的意圖來管理國家。他要清洗他們，換上另一套人馬。

七千人大會精神傳達後，許多基層黨組成員對七千人大會不承認犯了路線錯誤極為不滿，江蘇省參加省委擴大會議的一些代表甚至呼籲為彭德懷平反。江蘇省常務書記劉順元也不同意所謂錯誤在於“天災”和“民主革命不徹底”，他說：“復辟哪有這麼大的面，哪裡是什麼天災，是什麼民主革命不徹底呀！”劉順元放言：根本問題是出在“君臣相煎”。

周恩來病危期間與鄧穎超談話說：“1962年1月中央召開擴大工作會議（即七千人會議）。會上總結教訓，強調要恢復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健全黨內民主生活。會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退下。在2月10日的常委會上，毛表示：願服從會議決定，辭去主席，搞社會調查。朱德、陳雲、小平表態：歡迎毛辭去主席。是我堅持：主席暫退二線，主席還是主席”。

1962年3月周恩來、陳毅在廣州會議上對知識份子“脫帽加冕”（毛不同意周的觀點，陸定一支持毛，陸私下對大躍進有異議，但在人民公社和對知識份子的看法上與毛一致）。

1962年2月，劉在西樓會議上竟自稱是“非常時期大總統”。據鄧力群回憶，劉講到“歷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劉憤憤地說：“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

1962年3月，當發現1962年財政預算中存在30多億元的赤字時，劉召見公安部長謝富治等談話時說：“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面目，怕什麼？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同時，劉少奇說過“怕什麼醜呢？今天不揭，明天還要揭；你自己不揭，別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後下一代要揭”，“三面紅旗可以讓人家懷疑幾年”之類的話。劉的這番話已涉及毛統治最敏感的部分。事後，劉覺得不妥，堅決不同意公安部黨組印發他的這番講話。他說“將來會出毛病的”。

1962年5月劉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稱“國民經濟要崩潰”。毛認為：劉無非是以講困難為由，逼毛交權！據“七千人大會”的精神，中央決定，對近幾年受過批評和處分的“右傾”黨員甄別平反。鄧小平發言說：要來個一攬子解決，統統摘帽子。結果平反了1千萬。

鄧子恢本來不贊成“包產到戶”，1962年4月安徽宿縣一位區委書記寫信給他，說“責任田”的好處，他即派人前往調查。而且他自己也外出到幾個省份去調查了一番，又聽取了派往安徽的工作組的彙報，認為責任田應予肯定。在五月間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發表自己的觀點：包產到戶是社會主義的。給農民一

點小自由，不可能發展為資本主義。從 5~7 月，他又在軍隊機關中和中央黨校多次作報告，宣傳“有些地方包產到戶，搞得很好”。鄧子恢提出：應建立嚴格的生產責任制，實行隊包產、組包工、田間管理包到戶；對一些特殊的技術活，可以實行聯繫產量超產獎勵的個人責任制；鄧子恢的主張，後來被稱為“三自一包”——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場、多搞自負盈虧、包產到戶。

劉贊同鄧子恢，主張“要退夠”。凡是超過現實可能性的都要退，退是為求得平衡。分田單幹不好說，包產到戶還是可以的。但在毛看來，“退”就是復辟。陶鑄、胡耀邦等高幹反對包產到戶，連彭德懷也反對。“七千人大會”的議題之一是批評“三自一包”，會後明令安徽省委取消“單幹”。劉雖同意“三自一包”，只能默認地方幹，不能光明正大地宣傳。

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本來不贊成包產到戶，但經過湖南農村調查後，認為包產到戶有優越性。調查期間，田家英到上海向毛彙報，毛冷漠地說：“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而陳雲卻稱讚“觀點鮮明”，劉少奇也認為很好。楊尚昆也從北京打電話給田家英：“總理要我問你一下，可不可以把農村的私有部分放寬一些？”回京後，田家英立即向劉少奇作了彙報，彙報剛開了個頭，就被劉少奇打斷了。劉少奇說：“現在情況已經明瞭”，接著就提出關於實行包產到戶的主張。

盛夏 7 月，毛回到北京。陳雲以對付蔣反攻為由，要求毛批准分田到戶（劉、周、鄧均同意陳）。毛當時只問了幾個問題，未置可否。毛很快通知劉少奇見面。劉趕到中南海游泳池，毛說：“他們都找了 you，鄧子恢吵了那麼久，西樓說得一片黑暗，你急什麼？”劉說：“餓死這麼多人，人相食，是要上史書的”。即中共的政策要受到歷史審判的！但中共黨史審定者都懂，為了維護毛澤東，必須

抵制劉少奇，無論如何不能把這種史實寫進黨史中去。

毛忌諱批評，對批評十分敏感。毛這個人是不認錯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都是“左”的錯誤，為了證明這些沒有錯，他發動了“反右傾”；為了堅持“大躍進”、“人民公社”、“反右傾”都是正確的，他發動了“文革”；為了防止有人翻“文革”的案，他又發動了“批孔”、“批《水滸》”以及批鄧。這就是說，毛澤東為了證明第一個錯誤不是錯誤，就去犯第二個錯誤，又為了證明第二個錯誤不是錯誤而去犯第三個錯誤。這樣，就是越“左”越反右，越反右就越“左”，惡性循環，越搞越亂，終於無法收拾。

在“文革”中，“修正主義”一詞的實際用法發展到指對毛澤東任何一句話（包括錯誤）的不同意見。這就隱含著一個意思：毛澤東就是真理的化身，是不能修正的。“反對修正主義”就是反對修正毛澤東的錯誤；“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鞏固毛澤東的絕對權威；“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就是防止劉少奇那樣可能效法赫魯雪夫的人來接班。毛並不是真地相信劉少奇要使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但他懷疑劉有朝一日會對他的“三面紅旗”改弦更張。

第 126 節 打擊“翻案風”

七千人大會認為彭德懷 1959 年“背著中央進行派別活動，陰謀篡黨”。彭對這種莫須有的罪名實在難以“領受”，1962 年 6 月，彭德懷寫了 8 萬字的長信，請求毛全面審查他的歷史，以澄清對他的污蔑之詞；8 月彭德懷再次寫信，要求查證他的問題。毛認為彭向中央遞交的申請書是搞翻案活動，“翻案風”就是“修正主義”，不能平反。9 月 6 日、7 日會議轉入批判彭德懷的“翻案風”，中央全會決定對“彭、黃、張、周反黨集團”進一步審查。

1962 年 8 月初張聞天寫給毛和中央的報告《關於集市貿易等問題的一些意

見》，建議開放市場。1965年中國科學院經濟所進行“社教”運動，張聞天《關於集市貿易等問題的一些意見》又成批判物件，說它是反映了沒落階級的要求，是又一次向黨進攻，超過了廬山會議的發言。後來，科學院召開批判張聞天大會，甚至鬧到對南方調查中接觸過張的人也都要進行審查，凡是有過與張聞天相同觀點的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牽連。

陝西省戶縣城關公社七一大隊幹部楊偉名等《三個黨員的萬言書》。分別寄給中共中央、中共西北局和省、地、縣、社各級領導機關。他說：“我國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在這個既窮又白的薄弱基礎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為止，僅僅用了六年左右的時間，我們的新民主主義建設就真的完成了嗎？答覆是否定的”。“新民主主義建設需要二三十年時間，由新民主主義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是一個長期性的轉化過程，又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來，我們過去所作的顯然是揠苗助長，違反了客觀規律”。他建議中共“把當年主動撤離延安的精神用於當前形勢”，“退回去，完成新民主主義建設任務”。因此，應有：①對私人工商業採取改造和節制的不同政策。對較大的工商業實行改造，對一般中小工商業，只宜採取節制的方法……使之不足以操縱國計民生，僅取其合法利潤。②在農村，實行社會主義單幹。這種單幹，土地雖分到戶，地權仍歸集體所有，牲口、農具私有，但不能買賣，也不能出租，勞動致富，生產發家，剝削行為概不能有。這就是“包產到戶”。③收縮計劃經濟範圍，擴大非計劃經濟範圍。計劃經濟應只限於工業和商業，對於農業，除按照國家需要採取徵購大包乾以外，其餘農產品的出售應採取自由選購和自由出售。糧、油、肉、蛋也可以自由交易。因各地區之間的物價參差而進行販賣從中漁利者，應從積極方面把它看成是促進物資交流的正當行為，不能同走後門式的投機倒把相提並論。④正確處理民主與

集中的關係。民主與集中，不是一半民主，一半專制；也不是群眾做一半主，幹部做一半主；也不是民主和集中的混合與折衷。就人民這一面來說，我們的民主是百分之百不折不扣的民主。而集中，亦不是集中領導者的意見，而是高度民主集中體現出來的真正的民主。

楊偉名的“萬言書”，不僅在內容方面提出了當時中國大陸其他人沒有提出的創見。在表述形式方面也顯示了過人的才華。例如：他用“一葉知秋，異地皆然”來比喻局部現象可以反映全域的形勢；他把“統購統銷”比喻為“殺雞取蛋”，把“自由貿易”比喻為“養雞生蛋”。他用“解帶松腰”來比喻放寬政策，他說：一個人勒緊腰帶，走起路來會感到緊湊輕便，……如果三條、五條地把他全身都綁起來，即使是一個走起路來健步如飛的人也動彈不得。再者，纏在腰裡的腰帶要鬆緊適度，過於松了固然不行，過於緊了倒會使人氣喘。“目前我們國家的國民經濟是否存在著渾身捆著腰帶動彈不得的意味？只有解帶松腰才能氣和神安；只有腰間僅纏一帶，其餘盡解，才能手腳靈便”。多麼形象生動地比喻啊！

從1962年5月10日發出“萬言書”到同年8月6日以前，各級領導機關都沒有加以指責，不少人還給予了不同程度的讚賞和支援。5月28日，原西安市市長劉庚向陝西省委轉送“萬言書”，並要求“省委研究處理”。6月23日，咸陽專員王世俊讚賞“萬言書”，要求咸陽行署複印若干份，發給行署各主管部門研究。6月間，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派他的秘書候永去戶縣找楊偉名等三人談話，並把他們的《萬言書》刊載在西北局機關刊物《西北建設》上。6月28日，中共中央宣傳部未加批評的在《宣傳動態》上摘要發表。

1962年8月6日，在北戴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在“形勢、階級、矛盾”

的著名講話中，嚴厲的批判了楊偉名的《萬言書》，說他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的、資產階級的綱領”。他還針對《萬言書》講到的“一葉知秋”駁斥說：一葉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個階級都講自己有希望。戶縣城關公社寫信的同志也講希望，他們講單幹的希望。對這三個黨員的來信回答了沒有？共產黨員在這個問題上不能無動於衷。毛批判了楊偉名以後，原來對《萬言書》持讚賞態度的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立即回應，批判楊偉名。代表陝西省委參加北戴河會議的陝西省長趙伯平保持沉默，因為他思想不通，會後，中共陝西省委派出兩個副部長，會同咸陽行署一個副專員和戶縣縣委書記找楊偉名三人談話，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但是，由於中共戶縣縣委一再保護楊偉名，沒有對他進行組織處理。文革中，凡對楊偉名給予不同程度同情、肯定和保護的人，無一例外的受到批鬥，楊偉名本人經過殘酷鬥爭，以自殺維護了自己的思想自由和人格尊嚴，直到 1979 年 4 月才得到平反昭雪。

1962 年 8 月 2 日，安徽省太湖縣委宣傳部幹部錢能給毛主席寫了《關於保薦責任田辦法的報告》。8 月 8 日，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向毛澤東提出《關於推行“三包到組”的生產責任制的建議》，主張由生產組向生產隊包工包戶包成本，超產全部歸生產組；同時主張在生產組中把少量的、技術性強的作物和留種地，包給個別有經驗的社員去負責管理。毛澤東批評“胡開明，胡開明，開明是開明，就是胡開明”。毛批評“單幹風”主張說：“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幹，半年時間就看出農村的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娶小老婆的……這是搞無產階級專政，還是搞資產階級專政？”毛澤東並多次批評田家英的 60%包產到戶、40%搞集體的主張；批評中央農村工作部搞資本主義，鄧子恢是“資本主義農業專家”，胡開明被撤銷了

一切職務。

1961年，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看到蘇聯農業中推行承包制材料後說，承包責任制可以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中國也應包產到戶。他表示，我們應當集中力量克服當前的困難，內憂已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在國際上應當採取緩和的政策。

1962年2月王稼祥向中央提出建議：為渡過困難，有必要爭取對外關係的相對和緩；在同美、蘇和印度的鬥爭中要注意策略；對外援助必須量力而行。他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寫信，陳述了自己的看法。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劉少奇先後看了這封信，沒有表示不同意；毛看了這封信，也沒有認為信中有什麼問題。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會在莫斯科召開世界裁軍大會。代表團回京後，卻收到一份電報，說有幾個非洲國家代表對中國代表團這次的表現不滿意，認為中國代表的發言中沒有大反美帝國主義，又認為中國代表團的同志一反過去參加類似國際會議的一貫作風，很少同非洲的積極分子交換意見。毛主席看到這份電報後批評代表團的做法是“脫離了左派，加強了右派，增加了中間派的動搖。”於是，康生和劉甯一到毛那裡告王稼祥的狀。毛主席聽後掰著手指頭說，這是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要和，對以蘇聯為首的修正主義要和，對以印度為首的各國反動派要和，這叫“三和”，對民族解放戰爭和革命運動的援助要少。

在1962年8月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把對外政策中的“三和一少”和國內政策中的“三自一包”聯繫起來，認為“黨內出現了新的右傾思想”。

“三和一少”並被當作“修正主義的國際綱領”。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關於統戰工作的許多正確建議，也被說成是“向資產階級投降”。他們受到嚴厲批判，王稼祥、李維漢被撤職。

第 127 節 特大文字獄——《劉志丹》案

1·《劉志丹》“為高崗翻案”

1962 年 7 月 28 日，《工人日報》開始連載《劉志丹》第二卷。《中國青年》、《光明日報》也發表了作品的部分章節。該書由烈士的弟媳李建彤執筆。她所寫的陝北革命鬥爭故事，基本上是真人真事，而沒有用真名。當時高崗已經早被劃為“高饒反黨集團”了；可高崗對於陝北土地革命，關係太重要了，不寫上他的事情，全書情節將無法綴合。作者只好用了假名，又儘量減少一些具體描寫。1959 年初，作者曾將《劉志丹》初稿校樣請習仲勳審查，因習是陝北紅軍、黨組織的元老之一（1945 年中共七大中央委員會的老陝北幹部僅他和高崗、賈拓夫三人）。習仲勳說：要寫出陝甘寧邊區是長征的落腳點；抗戰的出發點。但後來批判說，你們是要表現陝北救了中央，野心勃勃。其實，這話原是毛主席說的，習仲勳複述了一下，就成了反黨綱領了！外界認為小說的寫作是習仲勳、劉景范策劃的，這不是事實。

首先起而反對的是時任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的閻紅彥。1956 年，李建彤向他採訪時，他們就西北革命史上的一些問題當面發生過爭論。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前夕，李建彤也給了時任雲南省委書記的閻紅彥一份送審稿。閻紅彥可就火了！立刻給李建彤回了一封信，大意是：此書我不同意出版，應該經過中央討論。李建彤也火了，稿子你不看，就不叫出版，豈有此理。李建彤以為這是她和閻紅彥一對一的“二人轉”，沒提防人家有通天的能力。

閻紅彥當年在山西搞了一支遊擊隊，在當地站不住腳。西渡黃河到陝北，還是站不住，又逃到陝甘（延安以北叫陝北，以西稱陝甘）投奔劉志丹。劉志丹和晉西遊擊大隊大隊長閻紅彥等人將各自的隊伍合而為一，組建了西北反帝同盟軍。

閻紅彥的隊伍就搞了一個突然襲擊，把劉志丹的部隊繳械了。還把劉志丹的人殺了幾個，奪了劉志丹的權，把劉景範也開除了。遣散了一批，就把劉志丹的隊伍給瓦解了。閻紅彥在 1962 年說：劉志丹的隊伍全是土匪，搶人家的東西，搶人家的女人，吸大煙，打仗時拿毛驢馱著女人一塊跑。其實閻紅彥的隊伍也搶東西，也搞女人。紅軍打土豪，還要洋錢（銀元），現在叫“綁票”，把人抓起來，叫家中拿錢贖人，一手交錢一手放人，不交錢就撕票。閻紅彥把劉志丹搞垮了，在陝甘還是呆不住，又帶著隊伍跑回陝北，就這麼亂竄。1933 年，陝西省委軍委書記高崗從西安來到陝甘，支持劉志丹，劉志丹的隊伍又發展了起來，建立了紅 26 軍，打到陝北，陝北和陝甘連成一片，全紅了。書裡涉及到這些歷史事件，是用化名來寫的，沒有提到閻紅彥的名字。延安時期中央《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確認劉志丹、高崗是正確路線，創造了陝北根據地；閻紅彥們挨了整。高崗出事了，閻紅彥就誣衊小說《劉志丹》為高崗翻案。

1962 年 7 月下旬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閻紅彥看到《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已開始發表小說《劉志丹》，就向全國總工會、團中央提出停止刊載，而且將他的意見報告給康生。康生如獲至寶，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報刊不准刊發《劉志丹》。8 月 6 日，毛開始談“階級、矛盾、形勢”。8 月 24 日，康生又寫信給中辦主任楊尚昆，說小說《劉志丹》“不是一個單純的文藝寫作的問題，看來是帶有政治傾向的”，並要中央書記處處理此事。康生承認自己根本沒有看過小說稿，但他卻武斷地說：“我一看小說就完全是為高崗翻案的”。

1962 年 9 月 8 日，閻紅彥再次提出小說《劉志丹》問題，說在當前國內國外的氣候下，各路人馬都借機出動鬧“翻案”，小說《劉志丹》“是利用宣傳劉志丹來宣傳高崗”。康生則不失時機地說出了點睛之語：“現在的中心問題，為

什麼要在這個時候來宣傳高崗？”他們的發言在全會“總 72 號”簡報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轟動，為正在批判的“翻案風”提供了又一支靶子。為擴大事態，康生竟是如此地不擇手段：作品已出第六稿，他卻下令工人出版社將第五稿印六百本、被習仲勳否定的第三稿印三百本送中央會議審查。

康生硬說小說《劉志丹》“是為高崗翻案”，“把劉志丹寫得比毛主席還高明、還先知”，“把陝甘寫成井崗山甚至高於井崗山”，他誣衊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組成了反黨集團。習仲勳早年就擔任過陝甘蘇維埃政府主席，是劉志丹的親密戰友，後來擔任西北局書記；賈拓夫 14 歲就參加革命，是惟一 1 位從陝北到中央蘇區工作，又從中央蘇區長征到陝北的領導幹部，是毛澤東走向延安的嚮導，1949 年成為第一任西安市長，也是劉志丹的親密戰友，1952 年由毛澤東點名調任政務院財經委副主任、曾被毛澤東譽為“黨內的賈寶玉”、“陝北才子”；劉景範則是劉志丹的親弟弟，早年就在哥哥的影響下參加了革命。預備會議對小說《劉志丹》展開了批判，把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打成了“反黨集團”。

1962 年 9 月 24 日八屆十中全會召開的第一天，正當毛在會上講話時，康生寫了一張紙條遞給他：“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在會上念了這張紙條，接著說，近來出現了好些利用文藝作品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事。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既然《劉志丹》被定為“反黨綱領”，支持作者的習仲勳等就在劫難逃了。毛當場宣佈彭德懷、習仲勳、張聞天、黃克誠、賈拓夫五個人“罪惡實在太大了”，取消了他們參加中央全會的資格，國慶日不能上天安門。9 月 27 日，全會決定成立由康生負責的專案委員會，對習仲勳等人的問題進行審查。

毛在八屆十中全會上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的問題》的講

話說：“我請同志們要清醒地看到，單幹風、翻案風、黑暗風（指劉大談國民經濟困難），三股黑風正向無產階級發動進攻。三股黑風都有後臺”，說的就是劉少奇。毛危言：“1/3 的政權不住我們手裡”，要堅決“反修、防修”；“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中，資產階級都將存在，並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搬出“階級鬥爭”的口號來，無非是要給整人找藉口。劉經過短暫幾日考慮後，在大會上作了自我批評，承認自己對困難估計得多了，同意毛的觀點。劉在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總結、佈置傳達時說：“這次會議討論階級和階級鬥爭，一講階級和階級鬥爭就聯繫很廣，容易劃分不清，把什麼都聯繫到階級來分析。”因此，只傳達到 17 級以上幹部，不向下面傳達，免得把全黨的力量都用去對付階級鬥爭。

“用少數人對付就夠了，全黨不要捲入這個鬥爭中，受它們的干擾，妨礙工作。”

毛接受了這個意見，

八屆十中全會後，形勢逆轉，最具敏感的人激流勇退。1962 年 8 月，陳雲告病休息；1963 年胡喬木稱病，開始長期休養；同年，曾被毛欽定的“老右傾”，江蘇省委常委書記劉順元經其老友，中央委員鄭位三的点撥也主動隱退，以後他們皆渡過文革劫難。八屆十中全會後，形勢逆轉，只有最具敏感的人才知道應激流勇退。1962 年 8 月，陳雲告病休息；1963 年胡喬木稱病，開始長期休養；同年，曾被毛欽定的“老右傾”，江蘇省委常委書記劉順元經其老友，中央委員鄭位三的点撥也主動隱退，以後他們皆渡過文革劫難。

2·無限株連

1963 年 5 月審查小組寫出《對“劉志丹”一書的審查報告》，認為“小說誇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據地的地位和作用，為高崗翻案，是‘習仲勳反黨集團’的綱

領”。理由沒有別的，高崗已成為十惡不赦的罪犯，只要提及他的過去，哪怕只是客觀敘述，也是反黨！李建彤不服，一直抗辯：我寫的是歷史，又不是寫高饒聯盟，怎麼是翻案呢？一般讀者也不會看出其中有高崗，能起什麼翻案作用？而且即使讀者因此對高崗有一點點好感，那又怎能反得了黨？可當時就是這樣定了案，把一個國務院副總理撤了職，什麼工作也不給。

1950年詩人柯仲平去向毛澤東道別，說要回陝西，寫長詩《劉志丹》。毛說：“好啊！一個人一輩子能寫出像《紅樓夢》那樣一部書就可以了”。文革前夕，陝西省清查的反黨小說《劉志丹》運動中，因柯仲平曾為小說《劉志丹》的作者提供過素材，受到清查。他未完成的長詩《劉志丹》，也被定為“毒草”。當年延安時期他的老戰友，民眾劇團的另一位領導者——全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馬健翎在批判中自殺身亡。柯仲平含恨猝死。按李建彤的說法：“黨霸們對他也進行迫害，逼他日夜地寫交代…終於使他心血管暴裂，突然死去。”

在專案審查的過程中，康生利用手中之權借機大整一批黨政軍幹部。他曾公開說：“打這本書，就是為打西北山頭”。自1962年到1966年，西北五省區大批省級幹部被調到北京“學習”、審查，稱他們是反黨集團的人。1966年5月，康生又炮製出一份審查報告，進而誣指寫《劉志丹》一書是“習仲勳反黨集團”蓄謀已久的。他們還先後給《劉志丹》一書羅織了四大罪狀：一、書中人物羅炎基本上是高崗，是為高崗翻案；二、劉志丹搞武裝鬥爭，做農民工作，建立根據地，是剽竊毛澤東思想；三、書中把陝北寫得太好，是與中央蘇區分庭抗禮；四、小說中的人物許鐘就是習仲勳，是為習仲勳篡黨製造輿論。

1966年賈拓夫被囚禁，1967年5月7日被整死在郊外；“習、賈、劉”只剩下兩人，成不了反黨集團。1968年1月，劉景範、馬文瑞（曾接受過李建彤的

採訪)和李建彤被抓起來後，再加上一“馬”，又成了“習、馬、劉反黨集團”。原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勳被撤職後，1965年下放到洛陽礦山機器廠當副廠長，“文革”期間被關押8年；1968年1月，時任勞動部部長馬文瑞在衛戍區被關押6年；1968年5月劉志丹的弟弟劉景范因為反抗逼供，揭康生的底，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獄，坐了10年牢。另一位劉志丹當年的戰友，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白堅受盡凌辱而死。湖南省勞動局副局長劉宗煥，被毒打後扔進河裡死去。小說的作者李建彤1968年1月被關在一個地下室，1970年開除黨籍，勞動改造。

文革期間，康生曾把專案的有關材料交給造反學生，指示他們到處揪人。陝北志丹縣貼出了大字報，把劉志丹、劉景範誣為“叛徒”，曾被國民黨搗毀過的保安(志丹)紀念堂又一次被紅衛兵砸爛，刻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題詞的紀念石碑也被毀了，劉志丹的家人再次被趕到了農村。其中劉志丹的堂弟被打死，表侄被打後自殺。特別令人不齒的是，連劉志丹的夫人也成了打擊對象；劉夫人年輕守寡，守了26年，竟成了半個反革命份子，被送到陝北農村長期勞動去了。

康生甚至還追查到《工人日報》黨組、全國總工會黨組以至中宣部。出版《劉志丹》一書的工人出版社，從社長到責任編輯無一倖免。工人出版社社長高麗生被康生再三點名批判。1962年秋，康生派人到出版社調查小說《劉志丹》，高麗生站出來說話：“我認為是部好書，再過20年我還要出這部書！”為此，他被發配到外地勞動改造，文革中再揪回來鬥爭，慘遭到滅絕人性的毒打摧殘，最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總編輯呂甯在審訊中被打得死去活來，後來下落不明。編輯室主任杜映被康生點名批判，被整治得很慘。連她的丈夫，一位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軍隊某部政委也受到株連。《工人日報》社的何家棟在1957年“反右”

運動中，因出版劉賓雁《本報內部消息》一書，被定為右派分子，開除黨籍，撤銷職務，連降四級。1959年何家棟被指派為《劉志丹》小說責任編輯，他因此又被打入“習仲勳反黨集團”，成為“反黨分子”。他說：“《劉志丹》寫的不是高崗，也不是寫高饒聯盟，怎麼就說是為高崗翻案？”1965年經康生點名：“《工人日報》組織不純，《劉志丹》編輯是個右派”，他作為“雙料分子”（右派分子和反黨分子），全家被趕到山東成武縣農村，交地方管制長達14年之久；每人每月僅得五元生活費，文化大革命又被揪回北京批鬥，母親和兩個兒子相繼病餓而死。他本人在文革中遭受造反派毒打頭部，震壞了雙眼，幾乎雙目失明。另一位責任編輯王勉思和她的丈夫康濯也慘遭批鬥。李建彤在“實錄”中感歎道：“想不到我的一本書被誣告，竟把出版編輯人員全都扯進去了。”

1967年1月3日《人民日報》轉載《紅旗》同年第一期姚文元的《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誣陷周揚“夥同一小撮反黨野心家，積極支援並鼓勵為反黨分子高崗翻案的反黨小說《劉志丹》出版”。從此，《劉志丹》一書被點名批判。

《劉志丹》小說案最後升級為“彭(德懷)、高(崗)、習(仲勳)反黨集團”，時而定為“西北反黨集團”，把西北大部分司局長以上的幹部都劃進去，打了幾百幹部。“一頓陝北飯引來大禍”；說的是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期間，作者的丈夫劉景范約了幾個陝北老鄉到家裡吃了頓蕎麥麵條。不料卻惹下大禍，來吃飯的人都被認作參加了寫《劉志丹》，都是陰謀家。結果，吃了這頓蕎麥麵條的寧夏回族自治州副主席羅成德、青海省委副書記譚生彬、甘肅省副省長張鵬圖、蘭州市委書記王耀華、甘肅省酒泉地區專員毛應時等人均受到專案審查，並被打成“西北反黨集團”成員。此外，1963年從西北5省調到中央黨校學習的20多位省級幹部也都因涉及“反黨小說”而被定為“西北反黨集團”

成員。其中許多人與作者根本就不認識，連面都沒見過。不僅西北幹部，長征過來的南方幹部和 1962 年參加審查這個案件的幹部都未能倖免，涉及到 100 多個將軍。習仲勳說：“遭受迫害的黨政軍領導幹部有三百多人，受害的一般幹部和群眾就更多了”（《中國青年》1979 年 4 月號）。究竟有多少人受害？李建彤披露：陝甘寧老區的基層幹部和群眾，有上萬人被打成“彭、高、習反黨集團”的黑爪牙，甚至李建彤到陝北採訪時，帶過路的群眾也被打死了好幾個。最荒唐的是，習仲勳曾經在一家飯館吃過 8 次飯，辦案者便認定飯館經理是習的“地下交通員”，而且一下株連到 50 多家飯店，逮捕了十幾個人，打死了 6 人。更有甚者，康生、江青誣譏電影《紅河激浪》是“《劉志丹》小說的變種”，又株連迫害了近千人。

《劉志丹》案牽連 6 萬多人，許多人被折磨而死，殘酷程度遠超過了清代的文字獄。毛 1947 年離開陝北後，就再也沒有到過陝西。陝西一些老幹部議論說：毛暗殺過劉志丹，後來利用高崗反劉少奇，反對不成又打倒了高崗。他害怕到了西安又發生一次“西安事變”。毛對陝西和西安有心病，劉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寫出《劉志丹》小說，毛才那樣反感！

3·冤案的平反與反思

1977 年春天，時任中組部部長的胡耀邦簽發了一份新華社就《劉志丹》案上報的“情況反映”，標題就叫做《現代文字獄》。1978 年 5 月 27 日至 6 月 5 日，中國文聯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在京召開。經中共中央批准，會議宣佈在“文革”期間一度停止了活動的中國文聯、中國作協等文藝團體正式恢復工作，《文藝報》立即復刊。12 月 5 日《文藝報》編輯部聯合《文學評論》編輯部召開文藝作品落實政策座談會。會議提議要為杜鵬程的《保衛延安》、李

建彤的《劉志丹》和吳晗的《海瑞罷官》等作品和作者平反。12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加快為受迫害的作家和作品平反的步伐》。

1979年7月14日，中央組織部向中央遞交《關於為小說“劉志丹”平反的報告》。報告指出：《劉志丹》（送審樣書）不是反黨小說，而是一部比較好的歌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描寫革命鬥爭歷史的小說；《劉志丹》小說的創作過程是正常的，沒有什麼陰謀，沒有根據說習仲勳等在此書創作過程中結成“秘密反黨集團”；習仲勳等同志關心這部小說的創作，對如何修改好這部小說發表過意見，是完全正當的，根本談不上是什麼反黨陰謀集團活動；從案件前後經過看，所謂利用寫《劉志丹》小說進行反黨活動一案，是康生製造的一起大冤案，是一起株連甚廣的現代文字獄。為此，凡因小說《劉志丹》案受到迫害、誣陷和株連的一切人員，都應恢復名譽，給予平反。8月4日，中共中央向全黨批轉了這一報告。

1979年《劉志丹》稿子在原來的基礎上略作修改，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上卷》。後來，李建彤聽一些老幹部的建議，又重新寫了一遍，寫成三卷。三卷本小說《劉志丹》從1984年12月到1985年6月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公開出版發行。閻紅彥那一派又告了一狀，中央成立了調查組，重新調查。1986年1月12日胡耀邦決定停止發行。

“自古昏奸亂天下，豈有文章傾社稷？”《劉志丹》小說一案已過去很久，但未從中得出有益的教訓。身為幾百萬軍隊的統帥，居然被一首詩，一篇雜文，一本小說，一部電影攪得寢食不安，擔心人家圖謀不軌，篡黨奪權。果真如此，李白、杜甫早就該做唐朝皇帝了。蔣介石也不是讀了毛的《沁園春》就讓位的。如果我們是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人民有權更換自己不滿意的政府，權力的轉移

都通過合法的程式，即使《劉志丹》小說中公開提出來：“請毛主席讓賢，叫習仲勳當總統。”也說不上是篡黨篡國的綱領啊。這種言論還會受到法律的保護。只有把黨和國家當作自己的私產，而這種權力的佔有又不具有合法性，才會做“有權就有一切，失權就失去一切”那樣的惡夢。

在民主法治的國家，只有明火執仗的武裝叛亂，才受到法律的制裁；凡是以和平方式發表政見，都應得到鼓勵。平民百姓有“彼可取而代之”的念頭，如果不是從事法律所限制的陰謀活動，是不應追究的。因為這都是公民應有的權利，不能視為大逆不道。

毛澤東在談到上井冈山打遊擊的原因時說過，那是由於沒有合法鬥爭的可能。禁絕合法鬥爭，就是製造非法鬥爭；抵禦和平演變，就是鼓勵鋌而走險。合法鬥爭手段主要是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這是一種自我調節、自我完善的社會機制，是一種防止革命、自我保全的手段。如果政治權力不是由少數人壟斷，就不會發生以言治罪的事情，也不會老揪走資派、抓反黨集團、批自由化。要建設一個現代國家，必須根據自由、民主、人權的原則形成一種機制，使各種人物公開亮相，使各種政治主張都有公開表達的機會，由人民來鑒別，由人民來選擇。一個國家裡沒有挑戰者是十分危險的。

第 128 節 批“合二而一”和人道主義

1· 批“合二而一”

1959 年 11 月康生把中共中央校校長、哲學家楊獻珍打為彭德懷分子；從校長降為副校長，不再過問校政。楊獻珍也犯過瞎整人的錯誤。在 1943 年中共“延安整風”期間的“搶救運動”時擔任中共北方局黨校校長，整人十分積極。被他整過的一個人就是後來曾經擔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任仲夷。任仲夷回憶了

1943年延安整風被“搶救”折磨時說，黨校負責人楊獻珍同志曾勸我徹底“坦白”。我向他建議說：“希望黨慎重、慎重、再慎重”。他說：“黨要你坦白，坦白，再坦白！”我說：“我相信黨。”他說：“黨認為你有問題”！我說：“我相信毛主席。”他說：“毛主席認為你有問題！”他還問我：“你知道你呆的這是什麼地方嗎？”我說：“是北方局黨校”。他說：“什麼黨校，是‘格別烏’（蘇聯的特務機關，後來譯為克格勃）！”我聽了這話，感到十分震驚，腦子像炸了一樣。

康生公開批判的理由是楊獻珍反對大躍進期間刮起的共產風。楊說：“‘共產風’實際上就是18世紀末期到19世紀初期，在歐洲一度流行過的原始共產主義思潮的中國形式，它的主要特點是絕對平均地分配社會財富。”“用原始共產主義來消滅私有制，不是歷史的進步而是倒退，……原始共產主義不過是掛著公有制幌子的私有制的卑鄙的一個表現形式。”這就不僅批判了大躍進、共產風，而且連過渡時期總路線和“三大改造”也從根本上被他否定掉了。“‘共產風’的共產主義，是毀滅文明，倒退到原始社會的反動空想。……去年有的地方把共產主義說成是‘除了一雙筷子一個碗是自己的，其餘的東西都是公家的’。這是什麼共產主義？我說這是叫花子共產主義，甚至比叫花子還窮，因為叫花子還有一條打狗棍嘛！”楊獻珍還揭露了大躍進中的一些唯意志論的典型例子，如有一個被稱為“哲學之鄉”的村子，大辦鋼鐵時竟提出“超鞍鋼，超美國，超蘇聯”的口號；有的地方居然提出：“不虛報就不能鼓足群眾幹勁，不虛報就不能促進大躍進的形勢，不虛報就於群眾臉上無光”；有個地方提出“三天掃除文盲”；還有一個地方設了一個火箭師範學校，據說要“苦戰半月，初中畢業，再苦戰半月，高中畢業”，“七天學完全部數學”，“十天學完三年課程，考試門門五分”。

楊獻珍說：“搞形而上學到了這般地步，不出大亂子，勢無天理。”“個人搞唯心主義，個人就要倒楣，全黨搞唯心主義，黨就要垮臺。”這些警告，無疑會激怒大躍進的發動者。最致命的，是楊獻珍的所謂“現實主義百分之一，浪漫主義百分之九十九”的俏皮話。這話被康生知道後，他如獲至寶，趕緊去告訴毛澤東。毛澤東當然很反感，他對周揚說：“楊獻珍說的浪漫主義百分之九十九，現實主義百分之一，是反對我的。”被毛澤東一再地認為楊獻珍在反對他，這就是楊獻珍不得被打倒的主要原因。

這場對楊獻珍的批判是在毛澤東的允許下進行的。因為楊提出與毛在《矛盾論》中不同的觀點。楊獻珍認為，黑格爾說的“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是把思維與存在等同起來，是唯心主義的命題，思維與存在沒有同一性。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狂熱氣氛裡，楊發現了公社化中的許多嚴重問題，便從思維與存在的關係的角度，對“共產風”、“浮誇風”等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一些反楊獻珍的人就誇大人的主觀能動性，有人甚至斷言：“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在實際上是望不到邊的。”這些嚴重對立的看法，反映了對當時出現的大轉折的對立態度。毛在《矛盾論》著重闡述了列寧的觀念：鬥爭是絕對的，對立面的統一是有條件的、暫時的。在《矛盾諸方面的鬥爭性和同一性》這一節中，毛說：事物的運動有兩種狀態：相對靜止的狀態（量變）和顯著變動的狀態（質變）。在第一種狀態中，事物保持表現出的面貌是統一、團結、聯合、調和、均勢等等；在第二種狀態中，則表現出統一物的分解，團結、聯合、調和、均勢等狀態的破壞。“事物總是不斷地由第一種狀態轉化為第二種狀態，而矛盾的鬥爭則存在於兩種狀態中，並經過第二種狀態而達到矛盾的解決。所以說，對立的統一是有條件的、暫時的、相對的，而對立面的互相排除的鬥爭則是絕對的”。

毛說：“資產階級的政治家說：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的哲學。一點也不錯”。

“馬克思主義就是個扯皮的主義，就是講矛盾講鬥爭的”（《毛選》5卷344頁）。

楊獻珍在1963年和1964年給學生講課時，曾根據中國古代思想家的有關論述和他自己關於對立統一規律的長期思考，提出：“事物既是一分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對立統一規律也可用合二而一來表述。”高級黨校的兩位教師循著他的思路，寫出《“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刊登在1964年5月29日的《光明日報》上。對楊獻珍的動向窺測已久的康生很快便向毛澤東反映，毛澤東在6月8日的一次會議上說：“一分為二是辯證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義，階級調和的吧。”毛認為：“一分為二”沒有窮盡，階級鬥爭也沒有窮盡，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一直鬥到地老天荒。7月10日，毛在接見康生、艾思奇等人時說：“楊獻珍……他們出來搞‘合二而一’反對我。”於是，“楊獻珍提出‘合二而一’反對毛主席”的消息不脛而走，在全國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批判“合二而一”的高潮。1964年7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點名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學術界的大批判風由此而全面興起。《紅旗》雜誌隨後發表文章，說楊獻珍有意識地適應國際現代修正主義和國內資產階級、封建殘餘勢力的需要，宣傳矛盾調和論。楊獻珍因此被降級，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和“三反分子”；後來被開除黨籍，流放陝西。

從1964年6-1965年5月的一年內，全國報刊發表的批判文章，達380多篇。1966年6月初出版的《紅旗》雜誌發表社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概括道：“在哲學界，楊獻珍大肆宣傳否認思維和存在具有同一性的謬論，來打擊工農兵群眾發揮主觀能動性，來反對大躍進。接著，楊獻珍又拋出‘合二而一論’，

為‘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極端反動路線，提供哲學‘根據’。”“他們打著‘紅旗’反紅旗，披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外衣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篇社論既是為文化大革命進行輿論準備的總結，也是進一步推進文化大革命的進軍號。可見，“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和“合二而一”這兩個哲學問題的論戰，完全是為準備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而導引到政治領域的。

這場批判共持續了 8 年之久。不僅楊獻珍身陷囹圄，備受折磨；而且所有支持他的觀點的人也無一倖免。僅在中央黨校就有 154 人。康生夥同陳伯達把中央黨校哲學教研室主任孫定國打成楊獻珍分子，由康生下達“內部控制使用”的指令，孫定國受到殘酷迫害，於 1964 年 12 月 19 日，跳入中央黨校人工湖自殺而死。講師黎明也投井身亡。更駭人聽聞的是江蘇的一位解放軍戰士陳波的不幸下場。他原來是部隊的特技射手，連續 5 年被評為“五好戰士”，而且是“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僅僅因為他寫過贊成“合二而一”的文章，最後竟被凌遲處死。死裡逃生的楊獻珍悲憤地說：“歷史上曾經有過株連十族的例子，那就是明朝的方孝孺的故事。所謂十族，就是指九族加上他們的學生。而‘合二而一’受株連的卻遠遠超過十族。那些受株連的人中，很多人同我毫無關係，我也根本不認識他們，不過僅僅因為寫過贊成合二而一的文章，竟也遭到各種各樣的迫害。”

3· 批人道主義

在毛統治的 27 年中，總是要不斷地煽動人們去批“人性論”。巴人是王任叔的筆名，是早期的共產黨人，1920 年代大革命時期就為黨作出傑出貢獻。建國後曾任中國駐印尼第一任大使。1950 年代中期回國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

總編輯。1957 年他發表的《論人性》和出版的《文學論稿》裡，提出了人除了階級性以外還有共同的人性和共同意識。巴人認為，按照馬克思的觀點，階級性是人性的“自我異化”，因此，“階級鬥爭也就是人性解放的鬥爭”。錢谷融在 1957 年 2 月發表了一篇長文《論“文學是人學”》。文章說：“我們應該用力去揭穿資產階級所作所為的反人道主義性質，用力保衛真正的人道主義。”

1960 年 7 月，召開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在大會上做報告，其中有一個小標題就是“駁資產階級人性論”。周說：“目前修正主義者正在拼命鼓吹資產階級人性論、資產階級虛偽的人道主義、‘人類之愛’和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等謬論，來調和階級對立，否定階級鬥爭和革命，散佈對帝國主義的幻想，以達到他們保護資本主義舊世界和破壞社會主義新世界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周揚批評“南斯拉夫鐵托集團”宣揚“人與人之間的人道主義關係”，提倡“人道主義精神”。周還批評了中國的胡風、馮雪峰和巴人，說他們宣揚了同樣的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

1960 年，巴人因“宣傳資產階級人性論”的罪名被定為“反黨分子”，撤銷其一切職務並剝奪其文學創作的權利。“文革”中，巴人又被說成是“大叛徒”，在飽受凌辱摧殘、妻離子散之後，被遣送回浙東奉化原籍勞動，生活淒苦，無人照看，導致精神失常，終於在 1972 年 7 月 25 日悲慘地死去。逝世後七年，冤案得到昭雪。錢谷融也受到打擊，沒被打死。

1963 年 3 月 29 日，中共中央批轉了文化部黨組《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1961 年 6 月 31 日，《北京晚報》發表了繁星（即廖沫沙）讚揚《李慧娘》的文章《有鬼無害論》。江青看後認為這是一株毒草。然後，在上海通過柯慶施、張春橋的組織，於 1963 年 5 月 6 日的《文匯報》上發表了批判《有鬼無害論》

的文章，點名批判了孟超的劇本《李慧娘》和繁星(即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從此開始了在報刊上公開批判文藝學術界不抓階級鬥爭的修正主義代表人物。這顯然是一個信號，使文藝界感到氣氛緊張。

1963年10月26日，周揚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會擴大會議上說：“（現代修正主義者）放下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旗幟，舉起了資產階級的人性論的旗幟。他們把所謂‘人道主義’的概念和科學共產主義的概念等同起來，把科學共產主義完全融合於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中”。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中宣部的一個內部刊物上寫了一個批示，批評了周揚所領導的文藝部門的“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文藝界的人數很多，問題不少，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毛還多次說文化部是“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國死人部”。文化部和文藝界立即組織整風學習，文藝界的文化革命已經開始。1964年6月，毛澤東看了《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草稿）》，又批示：“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文化部和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及所屬各協會再次進行整風。並立即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一步發動了政治批判。文化革命的批判和鬥爭已經在文藝界展開。

從 1964 年夏季開始，對文藝界的批判又擴大到學術界，從哲學到經濟學、歷史學，各個學術領域都有一些代表人物和有代表性的理論觀點在研究機構、高等學校和全國報刊上受到猛烈批判。隨後文藝界開始整風，1964 年在政治局常委康生的發動下，開展了對兩部電影的批判：一部是《北國江南》，它的罪狀是“調和階級矛盾”；另一部是《早春二月》，它的罪名之一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文藝領域還有其他的批判，可以說是一個接一個，一直延續到 1965 年底姚文元發表《評〈海瑞罷官〉》，這篇文章拉開了“文革”的序幕。

“文革”把過去的文藝作品幾乎都否定了，只剩下《白毛女》等少數幾部作品。一切帶人情味的情節，一切對個人幸福的嚮往，一切人性的表現，在“無產階級的革命文藝”中是嚴禁的，更不用說人道主義在理論上的表現了。現實生活中，代替人道主義的是神道主義（個人崇拜）和獸道主義（殘酷鬥爭），許多駭人聽聞的暴行在“革命”的名義下被美化了。

第 129 節 打造原子彈 統一全人類

毛澤東對國際形勢的估計，以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為據，理直氣壯地說：“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認為世界革命的中心正在向東方轉移，轉移到北京了。“中國應對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領導世界革命的任務歷史地落在中國人（我）的身上了。

1·拉蘇援造原子彈

據錢三強回憶，1949 年 3 月中央清查國庫，拿出極其珍貴的五萬美元外匯批給他在法國購買原子核研究的儀器設備和圖書資料。1950 年周恩來“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仍然撥款 387.2 萬元研究原子彈。早在朝鮮戰爭期間，毛就曾用“不停戰”的拖的辦法，歷史達林給他核技術。他派核專家錢三強趕赴蘇聯，但

蘇聯人始終不點頭，史達林不想讓毛擁有核彈。

1954年7月，毛作出一副要打臺灣的樣子，利用蘇聯擔心被拖下水，來實現他的目標。9月3日，中共軍隊向國民黨佔領的金門島開炮，引發了第一次台海危機。1954年10月，赫魯雪夫來北京參加中共建國五周年慶典，還帶來好些蘇共領導人，這在史達林時期是不可思議的。10月3日，赫魯雪夫主動提出取消史達林同毛簽訂的條約中損害中國利益的秘密附件，答應除現有的141個專案外，再賣給中國15個大型企業，同時給中國一筆5.2億盧布的新貸款。毛就勢提出要赫魯雪夫幫他造原子彈，說是為了抵禦美國人。赫魯雪夫問他美國為什麼要朝中國扔原子彈，毛說因為“臺灣危機”。赫魯雪夫拒絕道：“搞那個東西太費錢了！我們這個大家庭有個核保護傘就行了，無須大家都來搞它。須知搞那東西既費錢費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產出來還得儲藏起來，不久又過時了，還得重造，太浪費了！假使目前要搞核武器，把中國的全部電力集中用在這方面是否足夠，還很難說。那麼其它各項生產事業怎麼辦？國計民生怎麼辦？”毛擺出一副樣子，好像赫魯雪夫的話傷了他的民族自尊心。赫魯雪夫勉強答應考慮幫中國建設一個核反應爐。赫魯雪夫走了以後，毛加緊了對國民黨控制的沿海島嶼的轟炸，導致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與臺灣簽訂《共同防禦條約》。毛繼續攻佔沿海的一系列島嶼，扯開架式準備進攻金門、馬祖。

1955年3月16日，艾森豪威爾暗示他可能使用核武器。赫魯雪夫不想捲入跟美國的核武對抗，將來也不想捲進去。他答應向毛提供核技術。毛的目的達到了，台海危機結束了。1955年4月，蘇聯正式簽約幫助中國搞發展核彈的必需之物：重水反應堆和迴旋加速器。中國成為核大國就此起步。一組組中國科學家立即赴蘇受訓。

1955 年毛對芬蘭駐華大使說：“要殺光中國人，美國原子彈太少。即使美國向中國扔原子彈，在地球上炸個洞或把地球炸得粉碎，或許對太陽系是件大事，但對於整個宇宙來說仍是無足輕重”。這樣的瘋話，人類除毛澤東之外，沒有一個說得出口。

1955 年 12 月，在蘇聯科學家協助下，1956~1967 年 12 年發展核工業的大綱計畫定出。當 1956 年元旦黎明來到時，毛對秘書說：1949 年全國解放時都沒有這樣高興。他感到自己已在世界之巔，氣概沖天地說要“把地球管起來！”毛想做世界霸主。但蘇聯的幫助不是無償的，耗資巨大的核工業只能靠出口農產品去換。這些農產品都是從中國老百姓身上擠出來的，隨著毛的購貨單不斷膨脹，到 1956 年，中國就已經餓死了不少人。

1957 年蘇共中央六月全會清除莫洛托夫“反黨集團”，毛迅速表態支持赫魯雪夫，赫投桃報李，10 月 15 日中蘇簽定了《國防新技術協議》，蘇聯將給中國一個原子彈模型以及一系列技術設備；蘇聯各部接到的指示是：“提供中方一切東西使他們能夠自己造原子彈”。連中國的核彈試驗場也是蘇聯專家幫助定下的。赫魯雪夫還派最好的核專家弗洛比約夫到中國來幫著全盤策劃核彈製造。弗洛比約夫在華期間，中國核科學家從 60 名增加到 6000 名！

1957 年 11 月 2 日毛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蘇聯，參加有 12 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及 64 個兄弟黨參加的莫斯科會議，這是毛和中共在國際共運史中最得意的時刻，也是中蘇“蜜月期”的高潮。在大會上毛作了 3 次發言，會議期間不停地穿梭外交，表現出十足的“明星”丰采。在這次會議期間蘇中兩黨儼然並肩成了國際共運的共同領袖。

赫魯雪夫在會上提出，社會主義陣營應以中蘇為首；提出由中共出 3 人、蘇

共出 3 人，雙方包辦會議共同宣言的起草等事宜，全然不考慮各國共產黨之間的平等原則。毛發言強調：人要有一個頭；我們這裡這麼多黨，也要有一個頭。蘇聯不為首哪一個為首？波蘭的哥莫爾卡既不贊成“以蘇聯為首”的提法，甚至連各國共同出一個刊物都不贊成。毛卻再三對這些國家做工作，要他們認同他提出的“以蘇聯為首”的主張。毛的意思：社會主義陣營必須有一個頭；這個頭現是蘇聯。如果蘇聯當不了這個頭，毛就可以取而代之了。

在莫斯科會議上，毛提出了著名的“東風壓倒西風”的論斷。毛早就對蘇聯奉行的對美緩和的外交路線不滿，這時公開宣佈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已經超過西方的判斷，無疑是在回答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的問題，是要規勸蘇聯改變對美緩和的外交路線。毛共並不是真心要讓“蘇聯為首”，毛的意圖是讓蘇聯充當反美先鋒，這就是毛 1957 年力主在“莫斯科宣言”中寫入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原因。那時正是毛在中共黨內高層指責赫魯雪夫是“半修正主義”的時候。為了得到國際共運領袖的地位，毛並不在乎與“修正主義者”相互提攜。

《赫魯雪夫回憶錄》說：1957 年毛訪蘇期間，有關和平問題，和蘇方有多次不愉快。對蘇聯希望解散北約與華約兩軍事同盟以緩和東西方關係這一提議，毛大表反對，不同意蘇從德國撤軍。蘇方聲明若西方侵犯東歐盟國，將予反擊，毛又反對，說應該退卻，誘敵深入，退守三年，“如果你們退到烏拉爾，那時我們中國人就可以參戰了。”老赫一頭霧水，不知道毛是否開玩笑。他對毛說在核導彈時代，戰爭方式變了……毛聽不懂。1957 年底毛在莫斯科演講道：“有人說中國人愛和平，我們說不對！我們中國人好鬥。原子彈是紙老虎，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 27 億，一定還要多”。這種強硬的反帝立場當時便遭到波蘭等國的激烈

抵制。正因為毛堅持對美國的這種立場，導致他極度反感赫魯雪夫提出的“與帝國主義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建設三無世界（沒有軍隊、沒有武器、沒有戰爭）”的新外交思維。所以，毛領導下的中國始終沒有加入“華沙條約”和“經互會”。

1958年蘇聯向中國提供了兩枚地對地近程導彈模型，中國做好了原於彈爆炸的模擬試驗的一切準備，但蘇聯專家沒有接到蘇聯當局的指示，以安全係數不高為由，沒有進行試驗。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他又說：“打原子彈沒有經驗，不知道死多少，最好人口剩下一半，次好剩下1/3，全世界27億人，還有9億多人。9億人也好辦事，幾個五年計劃就發展起來，換來個帝國主義滅亡，資本主義全部消滅，取得永久和平。所以說，真打原子戰，不見得是壞事，是壞事也是好事。”1958年他對中共上層說：世界大戰並不可怕。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出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出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第三次世界大戰如果爆發，就可以實現世界大同。第三次世界大戰應該早打、大打、打核戰爭，在中國打。第三次世界大戰如果爆發，我建議蘇聯假裝坐觀，由我來帶領中國人民把美國軍隊吸引到中國戰場，我們同美國軍隊打常規戰。戰爭擴大滾雪球，然後我們假裝敗退，逐步把美國軍隊引入中國內地，使美國軍隊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從而迫使美國向中國戰場投入主力軍隊。當美國將主力軍隊投入中國戰場後，請蘇聯向中國戰場突然投射原子彈，將美國主力軍隊一舉殲滅在中國的戰場上。這樣的一場世界大戰中國可能會死掉4億人口。但是中國用2/3人口的犧牲，卻換來一個大同的世界還是值得的（當時中國的統計人口是6億。死掉四億人，還剩兩億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國就又可以恢復到6億人口了。

相比之下，二次世界大戰全世界共死了 3 千多萬人，不過是毛的零頭。而且二次世界大戰死那麼多人未見得是戰爭狂人在戰前的預計和初衷。因為在戰前，戰爭狂人無不把勝利想得很輕鬆，陷入戰爭泥潭不能自拔才是無休止地殺人。再說希特勒和日本鬼子要殺死的是外族人，而毛首先預計的是死自己的同胞。4 億人，那可是我們的同胞啊，戰爭一旦爆發，成了脫韁野馬，6 億中國人豈不是全搭進去了？中國人豈不是死絕了！一個自稱是人民的大救星，預謀讓他的國家裡每個 3 口人之家都死掉兩口，到底是大救星還是魔鬼？當然是魔鬼！

更令赫魯雪夫屈辱的是，毛當著六十四國代表的面，提起幾個月前那場企圖搞掉赫的政變，稱搞陰謀的帶頭人莫洛托夫為“老同志，有很長的鬥爭歷史”，說赫的路線僅僅是“比較正確”。毛講到這裡時，整個大廳陷入死一般的沉寂。會外毛常常說：“我們熱愛莫洛托夫。”毛三番五次讚美莫洛托夫的原因是，莫 1955 年曾說毛可以與蘇共“共同領導”共產主義陣營。對這些輕蔑、侮辱，赫魯雪夫都忍了，在回憶錄中說：毛是個“自大狂”。毛很清楚赫的這個弱點，無論他怎樣欺負赫，赫也不會跟他決裂。他將不斷利用這一點來為自己服務。

1958 年 6 月 28 日毛澤東對軍內一批領導人講話說，大躍進勝利，中國成為先進強國後將向太平洋擴張，最後獨霸全球。他說“現在太平洋不太平，只有我們佔領了太平洋才會太平。”講到這裡林彪插話說，“我們必須建設強大軍艦，準備在日本、菲律賓和三藩市登陸。”毛接著說，“我們建成這樣的軍艦要多久？1962 年我們煉出××噸鋼鐵時。”8 月 19 日，毛澤東又對一些省市領導人說，“未來我們將成立地球管理委員會，為全地球制定統一計畫。”

1958 年 6 月，周恩來寫信給赫魯雪夫要求提供生產核潛艇的技術、設備，此外還要航空母艦和其他軍艦。7 月 21 日，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會見毛時提出，

赫魯雪夫希望中國考慮與蘇聯一起建立一個聯合艦隊，毛答道：看來你們是想控制我們。1958年7月31日，赫魯雪夫秘訪北京。毛刻意羞辱了這位曾在蘇聯盛大款待他的貴賓。毛穿著游泳褲，在中南海游泳池見赫魯雪夫。他讓赫下池泡水。赫換上在游泳池旁換衣間內存放的游泳褲，跳進水裡。赫不會游泳，套了一個救生圈。赫在回憶錄中，對毛為這種無禮的接待方法極端厭惡。毛拒絕了赫魯雪夫在中國建“長波電臺”和與中國搞“聯合艦隊”的提議；毛提出要蘇貸款，由中方自建，蘇方同意，中方又不落實；蘇方提出海軍在中國港口加油與度假時又遭毛拒絕。赫魯雪夫許諾幫助中國在黃河或其他河流邊建一個製造核潛艇的大工廠，大量生產潛水艇。

赫魯雪夫離開中國不久，1958年8月23日毛澤東下令炮轟金門製造第二次台海危機。其間的“八二三”空戰，中共百架飛機非但不能殲滅中華民國32架飛機中的任何一架，卻被中華民國空軍殲滅了近20架飛機。美國艦隊駛入臺灣海峽，美國務卿杜勒斯向中共發出警告，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赫魯雪夫立即派外長葛羅米柯到北京評估局勢。毛告訴葛羅米柯，他願意與赫魯雪夫討論在某個階段，因台海問題與美國打起核戰爭時中蘇如何協同作戰的問題，然後提到蘇聯可能會因此滅國的可怕前景。他問葛羅米柯，戰爭結束後“我們將在甚麼地方建立社會主義世界的首都？”暗示莫斯科將會摧毀。毛然後建議，可以在太平洋造一個人造島作共產世界的新首都。葛羅米柯十分驚駭，拍電報回國彙報未敢將毛此話寫進去。

赫魯雪夫在毛恐嚇下，同意軍援。在金門炮戰開始後，他於9月16日告訴中國駐蘇大使，說蘇聯可派攜有火箭的圖-16轟炸機到中國助戰。中國雖沒有轟炸機，卻不願接受蘇聯人助戰，只想自行製造轟炸機，希望蘇聯援助。赫立即同

意。毛勒索蘇聯成功後即停止炮轟金門，10月14日寫信給赫魯雪夫說，他為中國能單獨與美國打核戰感到很高興。他說，“為了我們最後的勝利，為了完全消滅帝國主義，我國人民願意承受美國的首次核打擊。這不過是死一大堆人罷了。”

1959年1月，兩架樣機以及另外兩架的散裝件和有關圖紙已運到中國，使中國從組裝開始，進行仿製，從此有了自己的轟炸機。1959年2月4日簽訂了驚人的“新技術援助協定”，規定蘇聯幫助中國建造整套先進武器、軍艦，包括常規動力導彈潛艇、潛對地彈道導彈等。第一次台海危機使毛從莫斯科挖出了原子彈的秘密，這次所得更豐。

毛不久恢復了炮打金門，但只是象徵性的，單日打，雙日停。這種典型的毛式揮金如土令總參謀長黃克誠深感不解，問毛：“既然我們並不準備真打，炮轟的意義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錢，搞得到處都緊張，何必呢？”毛無言以對，只有指責黃是個“右”的參謀”，不久黃被打倒。昂貴的炮彈朝金門島傾瀉了20年，直到1979年1月1日才終止。

金門炮戰是毛想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因為美台簽訂了同盟條約，中蘇也是親密的戰略合作夥伴。所幸蘇美看清了毛的企圖，才避免了被毛拖入戰爭，才避免了全世界的又一次生靈塗炭。可官方的教科書上卻解釋說，當年的金門炮戰，是為了防止蔣介石脫離大陸，阻止美帝國主義插手臺灣。這種違背常識的胡編亂造，雖為毛爭了臉面，卻令世人為之噴飯。

毛澤東在事先沒有通報蘇聯的情況下突然炮擊金門，並導致遠東危機的升級。

毛在一次黨內會議上明確承認，與赫魯雪夫見面時“根本沒有談什麼金門問題。如果說了一句話也就算談了，但是一句話也沒有談到。”後來見到赫魯雪夫，毛澤東又得意地說，美國人“以為我們在炮打金門問題上達成了協定。其實，那時

我們雙方並沒有談這個問題”。赫魯雪夫曾當面質問毛澤東：作為盟友，蘇聯不知道中國明天會做什麼？炮擊行動本身充分表明中國不贊成蘇聯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對外政策，毛澤東根本無視同盟的存在。

2·光屁股搞原子彈

1958年9月，一枚美國最新式的“響尾蛇(Sidewinder)”空對空導彈從一架臺灣飛機上完整未爆地落在中國國土上。赫魯雪夫緊急要求中方讓蘇聯專家研究這枚導彈，但中方聲稱他們找不到導彈。赫魯雪夫的兒子、導彈專家的謝爾蓋(Sergei Khrushchev)回憶道：“第一次，父親感到“兄弟般的友誼”上有著很深的裂痕。第一次，他思索到底該不該向中國提供最新軍事技術，教他們怎麼造導彈和核彈頭。”

1959年2月，赫魯雪夫拒絕向中國提供本應交付的研製R-12型中程彈道導彈的資料；中國遂轉交這枚已經拆卸多次的新式導彈時，蘇方研究人員發現缺少了一個關鍵性部件——紅外線彈頭感測器。赫魯雪夫在回憶錄裡寫道：“我們認為這是無理的，是侮辱我們。任何人處在我們的地位都會感到痛苦。我們對他們沒有秘密，什麼都給了他們。而他們得了件寶貝，卻不讓我們分享。”赫魯雪夫得出結論，毛只是利用蘇聯為他的私利服務，心裡想的不是共產主義陣營的利益，毛“急不可耐地要統治世界”；“我一看到毛就像看到史達林一樣。他講起話來那麼像史達林……我相信毛的一生也像史達林一樣，害著權迷心竅的自大狂症”。他下令拖延核技術轉讓。6月20日，他停止供應中國原子彈樣品和技術資料。

1959年9月赫魯雪夫為改善蘇美關係而訪美，動身前以蘇美正在討論簽署禁止核子試驗條約而決定取消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的合同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中共則指赫撕毀協議是向美國討好：“赫魯雪夫想控制中國，沒有得逞

之後，就想依靠美國來解決世界問題，不惜犧牲中國的利益”，甚至可能同西方主要是美國站在一起反對中國。1959年10月中蘇兩國領導人在北京發生的爭吵，從根本上惡化了中蘇兩國間的關係。毛與赫爭吵時說：“你給我們扣了好些頂帽子。……不該（在金門）打炮，大躍進也不對，就是認為我們左。那麼我也送你一頂帽子，就是右傾機會主義”。1959年10月7日，一架從臺灣出發的美制U二型高空偵察機在北京近郊通縣上空被擊落，世人皆瞠目結舌，美、台更是不明所以。這是世界在實戰中用導彈擊落敵機的首例。毛澤東認為對外國訪客承認使用蘇制導彈不光彩，便說是“用竹竿捅下來的”。其實那枚開創世界首例的導彈，正是蘇聯送的。1959年底，蘇聯核技術專家全部撤回蘇聯。但為時已晚，中國已經掌握了製造核彈的所有基本條件。蘇聯的軍事技術轉讓，雖然有了限制，但沒有停止。1960年轉讓的設計圖紙達1010份，比1958年還多。毛想抓緊時間先把蘇聯技術拿到手，“中國將在8年內相當強大起來。”

1959~1961年全國出現了罕見的大饑荒，有良心的科學家和一些中共政要主張原子彈工程下馬。當時政府一心一意想著造原子彈、導彈，因此急需大量黃金外匯進口相關的設備材料。周恩來提出，一切為核工程開綠燈，“要人給人，要物給物，要錢給錢，一路順風。”1961年夏，外交部長陳毅說：“脫褲子當，也要把原子彈、導彈搞出來”。60年代他在一次電視講話中說：“我等打第三次大戰把頭髮都等白了！”毛不惜一切代價要出口農產品買他想要的東西。1959年和1960年間，中國出口了680萬噸糧食，農民則餓死了3500萬。

1962年11月，一個中央專門委員會成立，周恩來當主任，協同數十萬人，指揮空前龐大的協作體系，保證兩年內爆炸第一顆原子彈。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高度集中，進行了無數次的轟爆試驗。每一次，全國通訊線路都有將近一半

被佔用，整個國家，工業也好，民生也好，不斷地被停電停水、交通停運。

1964年10月16日中國核爆炸成功時，毛澤東是唯一一個公開歡慶的國家領袖。私下裡他還寫了兩句詩以資慶祝：“原子彈說爆就爆，其樂無窮！”1968年11月中國正在文革動亂中，毛澤東會晤來訪的澳大利亞毛派領袖希爾(Hill)時說，“依我之見，世界需要統一。歷史上很多人，包括蒙古人、羅馬人、亞力山大大帝、拿破崙、大英帝國都想統一世界。今天美國和蘇聯都想統一世界。希特勒也想統一世界。但他們都失敗了。讓我看來，統一世界的可能性還在，我認為世界是可以統一的。”毛認為統一世界的任務非他莫屬，因為中國人多，而且不怕死。他說“這兩個國家（指美蘇）人口太少，分散開來人力不夠。而且他們怕打核戰爭。他們不怕消滅其它國家的人民，但害怕自己的人民被消滅。”他說，“再過五年我國情況將變好…再過五年…”弦外之音，那時就是毛開始統一世界的時候了。

據專家估算，中國製造第一顆核彈花的錢（按1957年價格）是411億美元。這些錢要是用在國際市場上買小麥，可以給全國人民在兩年中每人每天增加三百熱卡，也就是說，中國人當時一個人也不會餓死。毛澤東的第一顆核彈致死的中國人，是美國在日本投下的兩顆核彈加起來炸死的人的100多倍。

第一顆原子彈的成本高達數百億元，但中國軍隊裝備和技術水準仍流於拼刺刀、扔手榴彈的原始水準，1979年中越軍隊大較量，沒有原子彈的越南軍隊表現得更強悍。

1969年蘇聯曾向美國多次提議，對中國的核基地來一次打擊，以永遠消除中國的核威脅，但遭美國反對。若非美國阻撓，中國新強、青海、甘肅、四川四省將會受到蘇聯的毀滅性打擊，中國可能死數百萬人，其情景會比廣島長崎原子

彈爆炸更慘烈。

為了中國的原子彈，有六萬內地優秀工人在五、六十年代被迫放棄正常的生活調到羅布泊，他們至今仍在沙漠深處貧困潦倒。他們說：“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

中共在東突厥進行核試爆，使當地人的身心受到摧殘，大批居民患癌症，並使許多實驗基地附近的兒童和青少年先天殘疾。位於新疆塔克拉瑪幹沙漠邊緣的羅布泊在過去的三十年裡一直是中國核子試驗基地，總共進行了 47 次核子試驗，其中有些實驗當量超出廣島核彈的三百倍，甚至在英國也能監測到這種實驗的放射塵埃。政府的秘密檔顯示，新疆核實驗基地附近居民的癌症和相關疾病發病率比全國其它地區高出 39%。

第 130 節 決裂蘇聯的九評

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在經濟上趕超蘇聯，從而好爭奪國際共運領袖地位。1958 年 11 月 30 日，赫魯雪夫在與波蘭領導人哥莫爾卡會談時，表示了對人民公社的反感。不過，這個內部談話當時並不為人知。不久以後，西方傳聞，蘇聯領導人私下發表了對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儘管後來蘇聯報刊駁斥說，這是西方在造謠。赫魯雪夫在回憶錄中說，赫看到“五年趕上英國，再長一點時間趕上美國”的口號時“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莫斯科不斷傳聞中國土法煉鋼，包括宋慶齡也在院子裡搞土高爐的笑話。周恩來大躍進時專程赴蘇求援，訴說煉鋼情況很糟，蘇乃派一副總理去中國，該員回國向赫報告說：“他們把一切都毀了”。他去參觀一個軋鋼廠，見到的廠長竟是一名獸醫。周告訴他，冶金工程師都下鄉鍛煉思想去了。赫遂在蘇共 21 大，不指名地批評中國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問題，是為了給蘇聯幹部“打預防針”，免得對中國“盲目效仿”。

赫魯雪夫還提到，因保加利亞共產黨第一書記訪問中國後，保加利亞報紙上開始連篇累牘地發表有關公社和“大躍進”的文章，並出現了把集體農莊擴大到令人難以置信的規模。蘇聯領導人感到有必要出面制止這種荒謬事情的發生。1959年7月18日赫魯雪夫在波蘭一個群眾大會上發表講話，回憶並檢討了蘇聯20年代在農村建立公社的錯誤。與21大的報告相比，這個講話也沒有提到中國，但波蘭報紙在發表時刪去了有關公社的一段話，而《真理報》卻在7月21日予以全文發表。這個講話激怒了毛澤東，他決定向赫魯雪夫公開出擊。

據國務院外事辦公室1959年2月3日整理的材料，在中共幹部當中，有如下說法：“以蘇聯為首的提法應改為以蘇中為首”，“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已轉移到中國”，“以蘇聯為首只是表現在經濟建設實力上”。有人認為“蘇聯的七年計畫不夠躍進，應該給蘇聯提意見催他們前進”，甚至還有人說“我們中央的負責同志放到哪個國家都能當主席”。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毛黨當時的心態。毛希望他的創舉得到國內外，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承認。然而，毛等來的不是人們的理解和支持，而是各級幹部普遍的檢討和非議。難怪彭德懷一封私人信件就捅了馬蜂窩——毛澤東決心反擊那些對他的共產主義試驗傑作評頭品足的人。

毛澤東在1959年7月16日向會議印發了彭德懷的意見書，怒氣未消。接著又是外交部的報告，說在蘇聯幹部中普遍流傳著有關中國當前某些困難情況的說法，認為中國黨犯了錯誤。毛澤東強壓怒火，不動聲色地向會議印發了這些材料。7月28日赫魯雪夫關於公社問題的講話送上了廬山。蘇聯領導人竟然也加入了這場爭論，而且是站在黨內右傾分子一邊，這是毛澤東無論如何也不能容忍的。第二天毛批示：將有關材料印發會議代表，“請同志們研究一下，看蘇聯曾經垮

臺的公社和我們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個東西；看我們的人民公社究竟會不會垮臺；……合乎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為地解散，也是辦不到的。”批示發出後，毛澤東意猶未盡，8月1日又將上述檔批給中聯部部長王稼祥：“我寫了幾句話，其意是駁赫魯雪夫的。將來我擬寫文宣傳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雪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於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你看如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毛不僅把彭德懷與赫魯雪夫掛起鉤來，而且已經決心向赫魯雪夫發起進攻了。

8月19日，毛澤東致信陳伯達等人，要求他們下到各省去認真準備人民公社的材料，並說：“為了駁斥國內外敵人和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對“人民公社的攻擊、誣蔑和懷疑”，“必須向一切人作戰”，其目的是“破蘇聯同志們中的許多反對派和懷疑派”。9月4日，毛澤東又接連致信胡喬木和吳冷西，考慮10月份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赫魯雪夫關於公社問題的講話，以“使他越處於被動，使全國人民知道赫魯雪夫是反公社的”，還指示以通訊方式發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國報紙讚揚和宣傳八屆八中全會決議的情況，“以壯士氣，可以將蘇聯某些人的軍”。9月12日劉少奇送來了給《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誌寫的一篇文章《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劉少奇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寫道：“在文章中是埋有許多暗刺的，是批駁外國同志的，是否適當？請您核定！”這裡的“外國同志”當然是指蘇共領導人。毛大悅，批示：“看過，很好。”又說：“可以這樣寫，不寫反而不好。”10月1日《人民日報》和《紅旗》第19期轉載了這篇文章。

在這樣的背景下，赫魯雪夫第三次來華訪問參加了中國的國慶10周年招待

會，招待會期間，陳毅、彭真、周恩來輪番出場主動找赫魯雪夫辯論，陳毅更是擺出一介武夫的形像。而毛澤東在這場爭論中卻始終站在一邊幸災樂禍。蘇聯人感到，對中共根本不能進行任何批評。赫魯雪夫氣憤地說：“我們有多麼美妙的局面：一方面，你們使用‘以蘇聯為首’的套話，另一方面，你們不讓我們說一句話。我們談論的是什麼樣的平等？”儘管爭論主要是圍繞對外政策進行的，但毛頭腦中考慮的還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問題，以至10月4日在東郊機場為赫魯雪夫送行時，毛澤東仍然大講特講“大躍進”取得了怎樣的成績，人民群眾如何創造了“人民公社”，與蘇聯歷史上的公社相比，中國的人民公社有哪些優越性等等。赫魯雪夫剛回到西伯利亞就公開發表批評中國黨的言論，甚至影射毛澤東是“好鬥的公雞”。

1959年9月赫魯雪夫訪問美國前後，蘇聯的外交政策出現重大調整，赫魯雪夫提出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和平共處、和平競爭、和平過渡”（中共稱之為“三和論”）以及“爭取建立一個沒有武器、沒有軍隊、沒有戰爭的世界”（中共簡稱“三無論”）。蘇聯要求緩和，中國則製造緊張；蘇聯希望和平環境，中國則鼓動革命情緒。毛認為，赫魯雪夫及蘇共的這些觀點造成了整個國際共運的思想混亂。於是，中共的秀才班子奉毛令，在列寧誕辰90周年之際，於1960年4月在《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了三篇文章——《沿著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列寧主義萬歲》，開始全面批判蘇共及國際共運中的“修正主義”。這3篇文章涉及世界形勢、列寧主義是否過時、馬列的革命學說、戰爭與和平、和平與帝國主義、革命鬥爭與議會鬥爭等命題。據吳冷西回憶，從1960年的《列寧主義萬歲》這3篇文章開始，中共高層建立了起草反修文章的工作班子。這個小組從1962年11月開始正式工

作，1963年2月政治局常委會議正式決定由康生任組長、吳冷西擔任副組長、整個工作由鄧小平主持。這個班子直到“文革”時才解散。為了搞好這個檔並為後來寫文章作準備，曾經收集和整理了大約400萬字的資料。

1960年5月下旬，毛澤東又分別與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和丹麥共產黨主席耶斯佩森談話，正式表明中共不贊成和平共處、和平過渡，指責蘇聯和東歐各黨放棄了階級觀點，甚至點名批評赫魯雪夫，批評“大衛營精神”，還表示“將來要算算帳”。6月上旬，中共領導人又在世界工聯會議期間公開散發批評蘇共的材料，試圖壓服蘇聯改正“錯誤”。

蘇共由一個政治局委員的名義發表文章進行反擊。1960年6月20日至25日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羅馬尼亞工人黨第3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蘇共代表團向各共黨代表散發了給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信中駁斥了中共在上述3篇文章中的觀點。中共代表團也散發聲明，點名批評赫魯雪夫。赫魯雪夫決心在經濟上向中共施以顏色。7月16日，蘇聯政府正式照會中國外交部，限期撤退全部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從而撕毀了與中國合作的幾乎所有經濟合同。

1960年11月赫魯雪夫在蘇共第81次黨代會上說：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總路線是和平共處，裁軍是防止戰爭的根本道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具備可能性；要注意防止國際共運中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等。

1961年，蘇聯主動地恢復了對中國國防方面和經濟方面的援助，並且主動提出，願意向中國轉讓先進的米格21型殲擊機的生產技術，願意幫助中國解決一些糧食困難，比如通過貸款形式提供給中國100萬噸糧食和50萬噸古巴糖等。

1961年10月17日召開的蘇共22大，北京選派周恩來和彭真代表中共中央

出席這次大會，北京沒有預料到赫魯雪夫會對阿爾巴尼亞發動猛烈進攻。阿爾巴尼亞是在整個中蘇爭論期間唯一最堅定地支持中國，並為此受到圍攻和壓制的一個小黨、小國。為此，中國不能不表示出極大的不滿。22 大決定把史達林遺體移出列寧墓，葬於克里姆林宮牆下，並將斯大林格勒改稱伏爾加格勒；同時開除了莫洛托夫等人的黨籍；宣佈蘇聯將從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發展成為全民國家，20 年內建成共產主義；在世界範圍內提倡改良主義、人道主義、“三無”世界等。對此，周恩來在請示了毛澤東後，做出了強烈的反應。他在 19 日的大會致辭中明確表示反對在兄弟黨的代表大會上攻擊另一個兄弟黨，更在 21 日親率代表團向史達林墓敬獻花圈，並於 23 日晚提前離會，啟程回國，以示對赫魯雪夫的不滿。毛澤東親率劉少奇、朱德、鄧小平等全體中共高層領導人到北京機場迎接，對周恩來的行動表示了充分的肯定。

1961 年 11 月 29 日，中國因蘇共在 22 大上批評阿爾巴尼亞而與蘇聯公開決裂。《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了蘇阿兩黨圍繞這場爭吵各執一辭的文章和信件。

當 1961 年 7 月底，赫魯雪夫拋出了所謂“現代的《共產黨宣言》”，宣稱蘇聯將走向全民國家，毛澤東就在 9 月份的一次會議上提出：現在的問題是，赫魯雪夫到底代表什麼階層？代表高薪階層。而他代表的階層與帝國主義代表的階層實際上是相同的。因此，反對他的人都是低薪的普通工人、農民。在毛看來，蘇共“22 大”是地道的修正主義。他明確講：“馬克思領導過巴黎公社，後來失敗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第一國際，後來分裂了。恩格斯又建立起了第二國際，這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但第二國際後來也變質了，變成修正主義伯恩施坦主義的政黨，那時，天好像要垮下來，但是，列寧同伯恩施坦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打敗了伯恩施坦主義，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列寧建立了第三國際代替第

二國際，並且在俄國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在列寧的故鄉蘇聯，出現了新的伯恩斯坦主義，蘇共變為修正主義，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是否因此天就會垮下來呢？不會的。過去天就沒有垮過嘛！今後也不會有天垮下來的事情發生。現在時代和過去不同了。世界上 90%以上的人民要革命，要反帝，蘇共絕大多數黨員和蘇聯人民也要革命，要社會主義。”毛把與赫魯雪夫的分歧歸結為：根本的問題是全世界除社會主義國家以外的 2/3 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問題，屬於社會主義國家 1/3 的人民要不要繼續革命的問題。赫魯雪夫是代表老闆階級、代表資產階級，不要繼續革命、不要共產主義。劉少奇也指出，“三和兩全（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及全民黨、全民國家）”是赫魯雪夫修正主義的路線的概括。

當時毛不在北京，在京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及政治局常委會決定，首先反擊義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裡亞蒂。當時的國際共運中批評（中共認為屬於“攻擊”）中共的政黨很多，為什麼中共偏偏挑選陶裡亞蒂作為第一個公開打擊的對象呢？陶裡亞蒂長期主張“結構改革論”，這一理論比赫魯雪夫在蘇共“20大”上提出的“和平過渡論”更早、更系統。1962年12月，在意共第四次代表大會上陶裡亞蒂公開批評中共。當時中共認為，陶裡亞蒂的講話“稍有理論色彩”，他的觀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篡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核心——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這一思潮的典型理論。批判陶裡亞蒂的文章《陶裡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發表於1962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報》。這篇社論傳給在杭州的毛澤東閱後，毛誇獎說：“寫得很好”。吳冷西在書中提到：“我們評論捷共和意共領導或現代修正主義的論點，其實也就是蘇共領導人的觀點。”換言之，論戰中期階段採用的是“指桑罵槐”手法。

由於毛以史達林主義、列寧主義的正宗自居，高調抨擊蘇共的“修正主義”，

這種教條主義和好鬥姿態導致中共與社會主義陣營其它共產黨和工人黨的關係空前緊張。從 1962 年 11 月初至 1963 年 1 月下旬，保共、捷共、匈牙利工人黨、義大利共產黨、東德的統一社會黨分別在各自的黨代表大會上批評中共，中共因此成為被“兄弟黨”“圍剿”的對象。

1963 年 2 月 15 日毛親自審改《人民日報》社論《再論陶裡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時寫道：“他們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們挑起了公開爭論，我們有什麼辦法呢？難道還能如過去那樣緘默不言嗎？”此後，毛開始公開批評中國代表團在世界裁軍大會上的妥協做法，說 1962 年上半年一個短時期內，我們黨內少數同志相當發了狂，主張“三和一少”，就是對帝國主義和氣一點，對反動派和氣一點，對修正主義和氣一點，對亞非拉人民的革命鬥爭少援助一點。這是修正主義的路線，遷就了赫魯雪夫，把我們自己搞得很狼狽。我們必須反對我們自己內部的修正主義，因為他們要“向資產階級投降”。毛宣佈：“我們現在轉入了反攻”。

1963 年 2 月 21 日，蘇共中央突然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提議停止公開論戰，並建議兩黨舉行高級會議。經過反復交涉，中共中央於 5 月 6 日決定接受蘇方建議，派鄧小平、彭真率團參加兩黨高級會談。1963 年毛澤東會見蘇聯駐中國大使契爾年科時說，有 43 個黨罵我們，但中共其實深為這場爭論的擴大化和在爭論中帶頭挑戰蘇共而感到自豪。1963 年 3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收到了蘇共中央的來信，信中提出會談需要討論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毛很快指示由康生負責，組織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作為對蘇共中央這一來信的答覆。4 月 3 日，毛澤東帶病在家中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發動對蘇共的全面批判，與蘇共翻臉。因此，4 月 4 日的《人民日報》奉命將蘇共這封

兩黨之間內部往來的信件發表出來，從此兩黨之間的爭端就在全國和全世界公開化了。毛指令鄧小平在北京主持一個寫作班子起草一篇公開反擊的文稿，同時要求陳伯達在杭州單獨組織另一篇文稿，兩地平行作業。4月底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了這兩篇文稿。5月3日至5日，在鄧小平主持下進一步討論了這兩篇稿子。5月5日政治局常委會議再次專門討論了這兩篇稿子的修改問題。從5月17日起，鄧小平組織“反修文章起草小組”的“秀才”們在釣魚臺賓館修改文稿，鄧小平、彭真均搬進釣魚臺居住，直接參與討論修改，一周後拿出了初稿。

當時，中共在國際共運中非常孤立，只與少數亞洲國家的共產黨還有往來。為了爭取其中一些黨的積極表態，中共還“徵求”了一向由其扶持的緬甸、馬來西亞、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共產黨的“意見”；趁新西蘭共黨總書記威爾科克斯訪華，毛於5月22日向他“徵求意見”；5月底、6月初又“徵求”了北朝鮮的意見；此外，中共對外聯絡部聘用的一些外國共產黨顧問也參與了一些意見。吳冷西披露：毛不惜血本拉攏越共，派鄧小平帶著此文的草稿和提供200億經濟援助的承諾趕赴越南（1956年中共就無償贈送越南8億人民幣），用巨額經濟援助換取越共支持。這200億人民幣相當於1963年國民收入的1/5、財政收入的60%。時值大躍進重創國力、幾千萬人餓死不久，全國老少面黃肌瘦、營養不良，毛竟置6億國民的生計于不顧，傾國庫欲“收買”越共，以壯大其與蘇共“決戰”之勢。真是荒唐到了極點！

該文修改稿先經6月10日的政治局常委會議通過，再經6月12日的政治局會議通過，最後由毛定稿，然後派專人送到莫斯科，由駐蘇聯大使潘自力約見蘇共負責人遞交了此信。

6月14日，《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一文公開發表，中心思

想是強調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強調革命的不間斷性和徹底性，反對赫魯雪夫所主張的“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政策，反對說社會主義社會可以形成所謂的“全民國家”和“全民黨”。中共提出了與蘇共相反的“國際共運總路線”：“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者及其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陣營，逐步實現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完全勝利，建立一個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剝削制度的新世界。這就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中共就蘇共的“三和原則”、“社會主義陣營問題”、“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最兇惡的敵人”、“建立反帝統一戰線問題”、“亞非拉國家及反帝問題”、“與社會民主黨劃清界限”、“和平過渡論”、“禁止核武器問題”、“和平共處問題”、“無產階級專政與全民黨問題”、“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問題”、“兄弟黨之間的準則”等全面批判了蘇共。

在“領袖、政黨、群眾、階級的關係問題”中：中共採取了完全反對“反對個人崇拜”的立場，連應該“反對不正確的個人崇拜”也不說了。文章說：“幾年以來，有些人違反列寧關於領袖、政黨、階級、群眾之間相互關係的完整學說，提出所謂‘反對個人迷信’，是錯誤的，有害的。”“提出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實際上是把領袖同群眾對立起來，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統一領導，渙散黨的戰鬥力，瓦解黨的隊伍。”“有些人大肆進行所謂‘反對個人迷信’，而在實際上竭力醜化無產階級政黨，醜化無產階級專政……”

面對毛把中蘇分歧全面公開的做法，蘇聯迅速反應。在6月18日的蘇共中央全會上，赫魯雪夫抨擊毛使中蘇分歧“尖銳化到極點”，並拒絕接受中方的建議。全會不僅就即將舉行的中蘇兩黨會談作出決定，要求蘇方代表團必須堅持蘇

共 20 大、21 大、22 大所確定的路線，而且決定在更大的範圍裡公開批評中國黨的路線。7 月 14 日蘇聯發表了《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同時將中共的這封信公開見報。中共認為：蘇共 7 月 14 日的這封“公開信”開始對中共領導人進行“指名道性惡毒攻擊”，“蘇共的行動表明，赫魯雪夫撕破了假面具，露出了反華真面目，進行公開論戰”。但實際上，早在 4 月 4 日中共率先公佈 3 月 30 日蘇共中央信件時，雙方的論戰就事實上已曝光。

7 月 5 日，由鄧小平率領，包括彭真、康生在內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到達莫斯科，雙方會談一直持續到 20 日。在這種氣氛下的會談結果可想而知。代表團于會談結束後回國時，毛澤東再度親率政治局主要領導人前往機場迎接。很明顯，毛澤東並不在意會談的結果，他明確指出：我們現在與蘇聯的分歧是敵對性質的矛盾了。從此兩黨之間“撕破臉皮”的公開論爭就正式開始了。從 1963 年 9 月 6 日這一天起，在此後的 1 年內中共接連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陸續發表了針對蘇共的系列論戰文章，即所謂“九評”。

一評：“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1963 年 9 月 6 日）。文章把中蘇兩黨的分歧追溯到蘇共“二十大”，毫不隱瞞地說：“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實為中蘇兩黨]的一系列原則分歧……是從 1956 年的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始的。”文章把蘇共“20 大”反對史達林個人迷信的做法說成是犯了“原則錯誤”，並把這種“錯誤”上網為“修正主義”。

二評：“史達林主義問題”（1963 年 9 月 13 日），把反對個人迷信全部否定了。在如何對待史達林的問題上，文章提出了兩個主要論點。一是聲稱應全面、

客觀、科學地分析史達林的功過。文章不否認史達林的一些錯誤，如脫離實際、脫離群眾，混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肅反擴大化等等。文章極力為史達林辯解，說什麼“史達林的錯誤，有些是原則性的錯誤，有些是具體工作中的錯誤；有些是可以避免的錯誤，有些是……難以避免的錯誤”。特別關於“肅反”，說肅反“正確地”懲辦了“很多”反革命分子，同時也“錯判”了“一些”好人。與此同時，文章卻把蘇聯人民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歸功於史達林。於是文章就斷言，史達林是“功大於過”；“史達林的一生，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者的一生，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一生”。文章的論據是非常荒唐的。首先，文章毫無根據地臆測史達林在肅反中殺的壞人“很多”而錯判的好人則只是“一些”，而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卻是：象後來毛所幹的一樣，史達林所殺的壞人是“極少”、“極少”，而所殺的好人卻是“很多”、“很多”，多到數百萬，他簡直是一個殺人惡魔！其次，文章把蘇聯人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歸功於史達林，然後拿這些“功績”同他的罪惡比較，於是藉口“全面”、“客觀”、“科學”來大肆頌揚史達林，而全不顧千百萬冤死者的呼喊，好象只要史達林沒有把蘇聯人民的大多數殺光，他就“功大於過”，這純粹是殺人犯的邏輯。再次，拿史達林的罪行同倍倍爾等人的“錯誤”作類比更是荒謬的。倍倍爾等人縱使有“錯誤”，也只不過是理論上、觀點上的錯誤，而史達林的“錯誤”則是令人髮指的大規模殺人罪行，這如何能夠類比！

毛澤東之所以對赫魯雪夫揭露史達林罪行這件事切齒痛恨，是因為：1) 他本人一貫奉行史達林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路線，在井岡山肅“AB團”，在延安搞“搶救運動”，在建國初期搞肅反“擴大化”，1955年搞“反胡風集團”運動，1957年搞反“右派”鬥爭，雙手也沾滿了無辜者的鮮血，而面對成千上

萬屈死的冤魂他象史達林一樣沒有一點歉疚。毛與史達林在性格方面有許多相似，例如專橫、固執、陰險、狠毒，這些性格特徵也是一切暴君共有的。既然是一路貨，所以當赫魯雪夫揭露史達林罪行時，毛就不免感到切膚之痛。2) 他大力維護史達林的威望，其目的是為了維護共產主義專制制度，如果這種制度跨台了，黨內民主制確立起來了，那麼他個人的專制統治就會受到威脅。因此，在中共“八大”上，劉、鄧在報告中表示支持反對個人迷信時，他是耿耿於懷的。但當時迫於國際共運的大氣候，他不便與赫魯雪夫公開決裂，也不便對劉、鄧採取措施。等到文革發動起來，他就開始翻舊帳，把劉、鄧反對個人迷信視為一大罪狀。3) 出於他的個人信念。毛從未體驗過民主制度下的政治生活，在他心目中史達林恐怖統治的一切做法都是天經地義的，都是為了維護社會主義制度所必需的。他抱著這個信念至死不悟，因此他不能容忍反對史達林。

三評：“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1963年9月13日）。該文否認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認為南共和鐵托已經“變修”，成為帝國主義的走狗，國內的經濟、政治陷入一片混亂。其實，南斯拉夫物質之豐富、市場之繁榮、人民生活水準之高，決非“三評”中所描寫的狀況，更非當時的中國所能望其項背。南斯拉夫反對的是史達林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他們的工人自治理論（如聯合勞動、工人自治等）均取自馬克思的著作。他們堅持按勞分配原則，工資分配表是按照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書中的圖示編制的，整個社會的分配沒有太大差別；企業中的最高權力屬於工人委員會，工人享有參與和決策權，經濟上的民主決非其它社會主義國家所能相比；在政治上，人民有權參與地方議會和上級議會的選舉，選舉是差額和無記名的；人民能自由取得護照並出入國境，更享有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罷工和遊行示威的自由。南斯拉夫的鐵托夫人想插

手政治，引起人們不滿，鐵托斷然與之離婚；於是南斯拉夫人民稱讚說，“鐵托丟了一個皇后，贏了一盤棋（指國際象棋）”。

四評：“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10月22日）；五評：“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1963年11月19日）。六評：“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1963年12月12日）。六評文章列舉中蘇兩黨的“原則”分歧包含三個要點。其中第一個是：“為了爭取實現和平共處，要不要同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反動派進行鬥爭？實現和平共處，能不能消除社會主義同帝國主義之間的對立和鬥爭？”這是指責赫魯雪夫只要“共處”而不要“鬥爭”。這種指責是沒有什麼道理的。歷史的事實是，赫魯雪夫在柏林危機和加勒比海危機中，曾冒著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同西方國家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只是由於對立雙方的克制才避免了衝突的升級。而相反，毛則在戰後賠款問題上向日本讓步，在有關中國自己領土主權的香港和臺灣問題上向英國和美國讓步。這說明，他只是希望讓人家去“鬥”，而自己則只想“坐山觀虎鬥”。按毛及其御用文人的邏輯，要和平就無需鬥爭，要鬥爭就沒有和平，而既然要鬥爭，第三次世界大戰就不可避免。事實上，毛正是以這種理論為基礎制定其外交政策的。直到鄧小平當政後，才修正了毛的觀點，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

毛為首的中共當時為什麼要大張旗鼓地反對赫魯雪夫的“和平共處”論呢？

原因如下：

第一，1958年“大躍進”徹底失敗，中國經濟走到崩潰邊緣，饑餓籠罩著全國，引起人民的強烈不滿。為了轉移國內矛盾，他故意渲染國際緊張氣氛，用戰爭威脅來嚇唬人民。例如，他早不提晚不提，偏偏在“大躍進”失敗後提出“備戰”、“備荒”，後來又提出“深挖洞、廣積糧”，那無非是讓人民群眾心甘情

願去忍饑挨餓。

第二，1958年“大躍進”失敗後，毛對通過和平競賽在經濟上“超英、趕美”已經喪失了信心，因此他希望尋求戰爭方式來解決問題。於是他提出，要立足早打、大打、打核大戰，準備死幾億人口。到了1960年，他甚至急於要打世界大戰，中共《紅旗》雜誌毫不掩飾地期望：“勝利的人民，他們在帝國主義死亡的廢墟上，將會以極迅速的步伐，創造出比資本主義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創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將來。”這些話是多麼露骨！

第三，他希望唆使蘇聯採取強硬政策，引發美蘇大戰，使其兩敗俱傷，以坐收漁人之利，然後稱雄世界。這在1962年加勒比海危機期間表現得特別明顯。危機爆發前，中國政府聲明支持蘇聯進行核子試驗，危機發生時聲明支持蘇聯向古巴運送導彈，危機結束後又指責蘇聯對美國退讓。西方報紙看出了毛的用心，11月7日美國《紐約時報》說：“北京早已準備好戰鬥到只剩下最後一個美國人和最後一個俄國人”。

非常有意思的是，當初毛想牽著赫魯雪夫的鼻子走向世界大戰，當赫魯雪夫不肯就範的時候，他後來就轉而與美國和解共同對付蘇聯，反對所謂“社會帝國主義”，同時也跟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鬧翻，社會主義陣營也不要了。真是30年河東、40年河西，對外政策變化的這種隨意性和無原則性雖近荒唐，但也不難理解。因為這時毛澤東正全力以赴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在他看來，“修正主義”是最大的危險，因此“反修、防修”是頭等大事。

七評：“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1964年2月4日）。

八評：“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雪夫修正主義”（1964年3月31日）。文章說：“馬克思主義一向公開聲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馬克思主義指出，暴力

革命是社會主義社會誕生的產婆……”文章引用列寧的話：“歷史上從來沒有過一次不經過國內戰爭的大革命，並且也沒有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會認為，不經過國內戰爭就能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文章還引用史達林關於搞社會主義沒有暴力革命“顯然是不能的”的話。這種引經據典的學究式的批駁是沒有什麼說服力的。其次，用所謂的“歷史”和“現實”的事實來批駁赫魯雪夫。例如，批駁蘇共領導關於 1918 年到 1919 年匈牙利革命是和平過渡的論點，說這種論點“完全是偽造歷史”。再次，批駁赫魯雪夫的“議會道路”。文章依據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共黨選票數量的變化，做出結論說：“通過‘議會道路’實現社會主義，完全是不可能的。”

他們的分歧並非“原則”分歧，而不過是策略分歧。赫魯雪夫不過是想用“和平”的橄欖枝迷惑西方國家，暗中積蓄力量，以便最終以實力地位對資本主義不戰而勝。而毛澤東則急於推進世界革命，特別是急於推進所謂“第三世界”的革命，以擺脫當時自己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孤立地位。歷史的現實是，共產黨人只要還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條，他們就不會贏得廣大群眾的擁護，就不會和平地獲得政權，相反地倒可能和平地丟掉已經到手的政權，就象後來的東歐和蘇聯那樣。而毛澤東暴力革命的觀點在實踐中也遭到了一系列的失敗，例如他極力支持的 1965 年 9 月 30 日印尼共產黨暴動的失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九評：“關於赫魯雪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1964 年 7 月 14 日。毛超英趕美的豪言壯語刺激了蘇共 21 大提出要建設共產主義的口號，結果當然不可能成功，反而引起毛的幸災樂禍。

這九篇文章，都是經過常委討論修改，由毛主席審定的。1964 年毛在家裡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時提到：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主要花在同赫魯雪夫鬥爭中。

據中共統計，在雙方論戰中蘇聯前後發表了 2000 多篇文章，而中國發表文章的總數目前尚無人統計。在長達 10 年的“中蘇大論戰”過程裡中共上層的意見是相當一致的，並無任何不同的聲音。

第 131 節 拉攏洋人來捧場

中蘇翻臉發生在大躍進全面摧毀了國民經濟之後，全國百姓嗷嗷待糧，各行各業百廢待興，可那時中共領導人真正熱衷的卻不是救國民於水火；相反，毛澤東、政治局及其常委會花了大量時間去開會反復討論幾篇批判蘇共的文章，逐詞逐句反復推敲，甚至直接代替“秀才班子”幹起了耍嘴皮子、搖筆桿子之類的工作。為什麼舞文弄墨會成為政治局和中共領導人的“頭等大事”呢？他們並不是故意不幹正事，而是在舞文弄墨的背後有大圖謀——為毛澤東爭國際共運的“精神教父”地位。在中共高層看來，這比國計民生重要得多。

自從赫魯雪夫否定史達林、鐵托號召把史達林主義分子趕下臺之後，毛及其同事們立即意識到社會主義政權開始面臨“合法性”危機，但同時他們也看到了機會。既然以蘇共為首的國際共產主義陣營主流“出了修正主義”，毛共通過高舉史達林主義的旗幟就有可能代替史達林而成為國際共運的旗手和“精神教父”，那樣中共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將達到頂峰。正如吳冷西所說，中共發表的“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 2 篇文章在全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中國黨在國際上越來越引人注目”。這種“巨大的影響”和“引人注目”感正是當時毛及其同事們的動力，因此他們才廢寢忘食、夜以繼日地舞文弄墨，“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可見：中蘇交惡的根本原因並非主義之爭，更不是毛要奮起捍衛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交惡的根本的原因，在於對史達林的批判與毛想當世界無產階級領袖的衝突，批判史達林不利於毛當世界

領袖，所以，毛不惜與蘇聯決裂。

毛澤東在 1960 年的北戴河政治局常委會上就蔑視地把赫魯雪夫稱為“銀樣蠟槍頭”。毛及中共其它領導人過去在史達林面前從來不敢公開挑戰，現在終於找到了挑戰物件。史達林在世時毛即使有再大的野心也只能埋藏在心中，而赫魯雪夫給了毛登臺演出的機會之後，毛看到了爭當世界領袖的“良機”，自然就不再安分下去了。

在 1961 年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鄧小平說，“如果不是中國黨站起來說話，任何其它兄弟黨都不可能起阻擋它的作用。在整個鬥爭過程中，我們黨領頭，左派高興，中間派發生動搖，而以赫魯雪夫為代表的右派最後只好退卻”。鄧小平在 1962 年的“7000 人大會”之前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現在擺在我們黨面前和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面前的一個十分嚴肅的任務，就是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反對修正主義思潮。現在全世界確實只有中國這個大黨能夠頂住赫魯雪夫修正主義的壓力。”爭當世界革命領頭羊的野心躍然而出！

中共為取代蘇聯成為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它向亞非各地派出文化代表團，做戰爭宣傳並支持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同時企圖通過經濟援助贏得亞非國家的聲援。大幅度擴大對外援助，使國民蒙受了巨大犧牲。1958~1962 年，中國哀鴻遍野、餓殍遍地，毛澤東為首的政府對外援助卻高達 23 億 6000 萬元以上，其中援助阿爾巴尼亞、北朝鮮、越南、古巴、蒙古等社會主義國家的部分為 18 億 7000 萬，援助亞洲、非洲民族主義國家的部分近 5 億元。其中，1961 年和 1962 年中國對外援助支出合計為 13 億 7 千萬元。1960 年 1 月卡斯楚的戰友格瓦拉到北京，毛“借”給他 6 千萬美元，告訴他“不必歸還”

寧可餓死中國人、也要拯救他國人。在饑餓最為嚴重的 1960 年，中國成立

了專門的機構從事援外，數額也在那一年激增。中國不但是世界窮國中唯一的提供援外的，而且提供的援助額占人均收入的百分比是最高的。援助常常送給那些生活水準遠高於中國的國家，比如匈牙利。食品給了他們只影響生活水準的高低，但對中國人來說卻有生與死的關係。。

毛為擺脫孤立狀態，用物質援助收買一些小國家為其捧場。阿爾巴尼亞在 1958 年就跟中國要了 50 萬盧布。1959 年中國政府購買的 220 萬蒲式耳加拿大小麥，送給了阿爾巴尼亞。當中國人餓死數千萬的時候，阿爾巴尼亞人由於中國贈送大量食品，不知道什麼是“定量配給”。該國當時到北京談判的首席代表說：在中國能明顯看到饑荒，我們什麼都跟中國要，“我覺得可恥”。1961 年 1 月，因阿爾巴尼亞和中國一起反對赫魯雪夫，又得到 500 萬盧布。從 1954 年至 1978 年，援助阿爾巴尼亞 200 億美元。毛澤東、周恩來將人民血汗錢大把大把拿去“支持世界革命”，而不讓人民吃飽穿暖，十足是滿清“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的心態。毛先後給了印度支那地區 2 百億美元。

正是毛及其同事們當時堅持的史達林主義教條把中國推進了死胡同，不可避免地導致了“文革”這場大災難。赫魯雪夫描述文革，他說在影片上看到的中國人“白癡般地一遍又一遍地念毛澤東語錄，看到人類尊嚴被踐踏到如此地步，我簡直要嘔吐。”他把紅衛兵的野蠻暴行比作沙皇伊凡的恐怖御林軍。赫魯雪夫在回憶錄中不隱晦地表示“我始終喜歡劉少奇”（他不知道劉早在 1969 年已死於開封）“我也很喜歡彭德懷”。他對文革的評語是“根本不是什麼革命，而是一場矛頭指向中國人民和中國黨的反革命”。

1964 年 10 月蘇共中央撤銷赫魯雪夫的領導職務，勃列日涅夫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中共抱著改善關係的願望，派周恩來率團赴蘇參加十月革命慶祝活動。

但是蘇共新領導卻聲稱他們在對華政策上和赫魯雪夫“甚至沒有細微的差別”。

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蘇先後在珍寶島（面積0.7平方公里）發生了三次較大規模的武裝衝突。由於中方有準備，蘇方被毀坦克、裝甲車17輛，蘇軍死58人，傷94人。蘇方“吃了虧”，並圖謀用核武器對我馬蘭核基地進行打擊。

1969年蘇聯製造新疆鐵列克提事件，血腥屠殺屠殺我邊防軍戰士，造成重大人員損失。1969年3月10日在珍寶島事件後，蘇聯暴徒襲擊了莫斯科中國駐蘇聯大使館。1966—1980年蘇聯夥同眾多華約國家，製造蘇-蒙-印-越反華包圍圈、在我北方邊境陳兵百萬。中蘇關係也隨之到了最低點。中共開始大規模修建防空洞備戰。兩國在經濟上毫不往來，在政治上相互攻擊，在軍事上重兵對峙，在外交上各自為政，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80年代中期。

第十八章 史無前例的文革暴政

第132節 “四清”運動

為對付1962年蔓延了半個中國的的包產到戶，毛策劃了第三次社教運動。1963年2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毛說：“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我們的幹部……絕大多數不懂社會主義，責任在我們，我們沒有教育嘛。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一下。社會主義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劉少奇說：“總是口裡講階級鬥爭，不辦事情，不好。現在就正式部署一下行動，搞一個階級鬥爭。物件是投機倒把，貪污盜竊，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蜕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

在這次會上，兩人共同確定在全國展開五反、四清，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五反在城市，即反貪污、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四清在農村，即清帳、清倉、清財務、清工分。到運動後期，都簡稱為“四清”。清的內容，開始限在經濟領域，後期則上升到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隊伍的“大四清”。

劉少奇認為“四清運動”要解決的“是亡黨亡國的問題，使人民當權還是少數剝削者當權的問題”（1963年2月25日）。他第一個把這個運動提高到“亡黨亡國”的嚇人高度。

3月毛澤東批示：“階級鬥爭有分黨內外嗎？注意：右傾正搶佔陣地。”拒絕暫緩在非黨員和機關、團體中開展“五反”運動的建議。

5月2～12日，毛在杭州主持制定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5月20日公開發表時指出：“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主義勢力正在對我們倡狂進攻”。要求：“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開展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堅決打退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勢力的進攻”。

1963年6月8日的中央會議上，毛澤東講話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義怎麼辦”的問題。劉少奇答：“一個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獨立。”

1963年初湖南零陵地委“大揭階級鬥爭蓋子”的經驗問世，4月河北邢臺經驗上報；一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平地掀起，鬥爭物件就是“資本主義復辟，民主革命不徹底”。

四清運動中出現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問題，機關、企業、公社、大隊都搞“專政”隔離室、拘留所。在農村也出現了捆綁罰跪、吊人等極端現象，比如“在湖

南常德地區，發生了亂搞鬥爭、打人、亂搜查、重點集訓、亂扣帽子、亂立罰規等現象，據不完全統計，在 11 個區中共鬥爭了 331 人，其中被打的 21 人、被捆的 65 人、被吊的 3 人、被罰跪的 42 人。”

1963 年 8、9、10 月，各地都發生了自殺事件。山西、陝西、安徽、江西、湖北等地都發生了地主、富農子女全家自殺事件。

以廣東為例：時任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把階級鬥爭當作頭等大事，指定省委書記趙紫陽和省委秘書長張根生，分任四清工作團團長、副團長，限期開赴試點。由省直機關抽調千余名幹部組成的工作團，於 1963 年 8 月底開赴揭陽縣，並在縣城住了一個月，閉門學習和整頓。這次四清工作團的學習和整頓，一開始就強調“階級鬥爭”，人人必須過“社會主義關”，氣氛十分緊張。因個人歷史或思想作風犯錯，經批判仍然被認為過不了“關”的，不論黨員、團員或非黨團員幹部，一律清除出工作團，回原單位等待處理。最後宣佈紀律：1. 必須與貧農“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工作團員一律不准吃肉、魚、蛋；2. 一律不准送禮受禮、行賄受賄；3. 一律不准談戀愛，嚴禁亂搞男女關係。違者，一律開除黨籍、公職，情節特別嚴重者，移送勞改或判刑。這種嚴酷的氣氛自然又造成了諸多的冤案。

針對上述問題，在劉少奇的主持下，9 月中央制定了《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即《後十條》），11 月《後十條》下發各地。

《後十條》強調團結 95% 以上的幹群，提出了如何避免過激問題，但運動仍沒有得到控制。例如：湖北省第一批試點鋪開後前後死了 2000 多人，第二批試點開始後，僅襄陽在 25 天內就死了 74 人。廣東在這年秋冬的試點中，共發生自

殺案件 602 起，死亡 503 人。

1964 年 2 月 29 日毛在北京對金日成說，在中國各種“搞地下工作”的壞人有 1000 萬人，6 億 5000 萬人口中，這種人就占了 1/65，就是 65 人中有 1 個。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個黨也是如此。我們同高崗、彭德懷也是如此，他們是我們的敵人，也是你們的敵人。動搖分子總是會有的。1962 年上半年，我們黨內有些人主張‘三和一少’。什麼是‘三和一少’呢？就是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各國反動派要和，就像對尼赫魯那樣的反動派也要和。一少是，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要少一點，要少支持世界革命”。毛說：“為了防止中國出現修正主義掌權，從現在起就要大講特講反修防修的鬥爭問題，大講特講階級鬥爭和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我擔心，我死以後，中國會出現資本主義復辟……”金問：“有這種可能嗎？”毛熄滅了手上的煙頭，擺一擺手說：“什麼樣的情況都有可能發生，但我不希望中國變得像蘇聯那樣出現資本主義復辟；如果真的那樣，我們這麼多革命烈士的血就白流了——現在我還沒有死，在我們黨的中央內部就有人敢公開提出來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這些人還在，他們還不鬧翻天？……中國是要搞社會主義的，這一條不能變。為了防止中國出現資本主義復辟，所以我們才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堅持無產階級專政。”

“四清”、“五反”被視為國內反修防修、挖修正主義根子的一個重大戰略措施。在運動中，一些試點單位總結出被認為是“階級敵人篡奪領導權”或幹部“和平演變”的典型材料。1964 年初劉少奇說“和平演變”已演變到高級機關（市、省），在群眾未充分發動之前，不能強調團結 95%以上的幹部。劉在 1 月 3 日的中宣部和文藝界的座談會上開創了用中央首長點名的方式把著名作家（孟超、

田漢、陳半丁等) 打成“反革命”的先河。

毛澤東最初是估計有 20% 的生產隊的政權不再共產黨手裡，後來受到包括劉少奇、周恩來、彭真等人一再彙報的尖銳的階級鬥爭動向的影響，認為：“我們這個國家有 1/3 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裡”。劉少奇還進一步認為：“1/3 打不住……而是大多數。所以，革命非搞不可”。於是，毛認為 40% 左右的領導權不在無產階級手中。1964 年 5 月 15 日至 6 月 17 日，毛澤東提出：“農村、城市搞四、五年，不要急急忙忙收。城市五反，要增加劃階級的內容，是階級社會就有階級區分”。6 月，毛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這是我們的子孫後代能不能沿著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道路繼續前進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能不能勝利地防止赫魯雪夫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的問題”。劉回答說：“如果出了這種情況，一個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獨立。”7 月 15 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不要提收，政治上批判嚴，火燒一下怕什麼？你是正的、清的，火燒一下也有好處。在文化、文藝、學術、教育、理論界，我們提倡要引火焚身”。

權力者是惡的平方。1964 年 8 月 6 日中共湖南省委發出《關於處理常甯縣委主要成員腐爛變質問題的決定》。內稱：“1963 年春，常寧縣委五個正副書記，四個亂搞女人，副書記兼縣長張宗光腐爛透頂，張自 1957 年以來，利用職權，強姦、調戲婦女 69 人，王、張、何三個書記，同縣委辦公室主任（女）長期通姦、安插親信、包庇壞人；1961 年張宗光派人去廣州非法套購黑市手錶，削價賣給科局以上幹部，套購工業用布 27 萬餘尺，克扣私分民用生、婚、喪等專用布票 3.2 萬餘尺（當時每人全年僅有 3 尺布票）。對張宗光開除黨籍，判處無期

徒刑。另三名撤職降薪，一人病故，不再處理。”張縣長經常在暗室抱女人打電話指揮批鬥會，常帶著情婦進省開會，局長為之站崗放哨。一天清早，通信員推開一個副書記的門進去打掃，突然發現該副書記正和辦公室主任睡在一張床上，馬上退了出來。該書記為了殺人滅口，竟然誣陷這個通信員有精神病叫公安局逮捕起來了。常寧這樁醜聞，中央把它當作階級敵人的進攻，決心用五、六年時間，將城鄉“社會主義教育”搞徹底。9月9日，中共湖南省委組織“萬人社教工作團”，進駐常寧。第一批挨鬥的物件有21204人。白天勞動，晚上接受審查、批鬥，發動“貧協”鬥爭“四不清幹部”。採用對敵方式，人心惶惶。有因家裡抄光、典賣衣物，甚至自殺者。1965年1月中央發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23條）。大多數被整者，相繼被解放出來。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的234人，判刑或勞教者5人，劃成“新資產階級分子”和補劃“地主”成分4人。第一批四清剛結束，為了鞏固社教成果，漁池公社留下一名組長當教導員，其實這名教導員早已看中社裡的一個婦聯主任，馬上同她勾搭上了。公社裡的人看不慣了，一個早上活活捉了這對雙雙。

1964年8月，中共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負責。1964年8月1日，劉少奇在中央機關會議上說：“你們到了農村以後，要做一兩個月的秘密工作，扎扎实實地搞紮根串聯。……現在用毛主席過去那種開調查會的形式來瞭解情況，已經遠遠不夠用了，已經過時了，已經不頂用了。……王光美同志在河北桃園搞了四清，取得了一個很好的經驗，這就是必須紮根串聯。其他同志的四清，可以說還沒有入門呢，都還沒有走上正規，連一個公社也沒有搞好，過去的一年是打了敗仗而不是打了勝仗。我在這裡宣佈，取得一兩個典型的直接經驗對一個領導幹部事關重要，如果還不下去，高高在上，那就沒有資格當中央委員了”（見

師東兵《張春橋在獄中》第 312 頁)。以前上級下鄉調查，光找幹部介紹，不會把幹部的問題暴露出來。桃園經驗算是找到了對付壞幹部的辦法。當然這辦法是“運動”式的，不是法治，冤案錯案難免。關鍵就是“毛主席的辦法已經不頂用了”，有了這句話，劉幾十年吹捧毛的功勞，全都變成零。劉少奇說完馬上後悔，曾經扣押講話記錄，親自刪改。劉還把毛的話，“三天不學習，就趕不上劉少奇”的“最高指示”口頭傳達到全國各基層黨支部。劉少奇的講話據說是陳伯達火速傳達給毛的，為此陳立了一大功。江青聽了以後，哭著對毛澤東說，史達林死後赫魯雪夫才作秘密報告，現在你還沒死，人家就作公開報告了。這是決心打倒劉少奇的一個關鍵起點。顯然，“史達林之憂”是“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動機之一。

劉修改了《後十條》，1964 年 9 月 18 日頒發。修正的《後十條》認為：敵人拉攏腐蝕幹部，“建立反革命的兩面政權”，是“敵人反對我們的主要形式”；認為“這次運動，是一次比土地改革運動更為廣泛、更為複雜、更為深刻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要重新劃分階級成分；規定“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也就是把基層幹部都撤到一邊。劉依靠工作隊，先秘密串連、摸清情況，然後發動群眾來整幹部和地富。全國各地開展四清的單位，改變了過去以縣委領導為主；實行是在省委、地委領導下集中搞一縣。如江蘇省組織了一支 6 萬人的農村四清工作隊和一支 2 萬人的城市工作隊；山東省參加運動的工作人員共 54000 人。

當局把階級鬥爭的形勢看得更嚴重，甚至認為許多單位爛掉了。中央連續轉發甘肅省委和冶金部黨組《關於奪回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領導權的報告》、天津市委《關於小站地區奪權鬥爭的報告》以及關於河北省撫寧縣桃園大隊社教運動的經驗總結等檔，強調進行奪權鬥爭；從而使運動出現打擊面過寬等問題。陝西

省長安縣進行四清時，鬥爭手段以揭發批判為主，造成不交待問題不行的局面。對其中的“壞中之壞”、“霸中之霸”，大張旗鼓進行公判，對大部分則採用“小戰鬥”的辦法解決。對於那些久鬥不服的“死頑固”、“牛皮筋”等，狠批硬鬥，甚至動手打耳光、碰頭，有的當場被打得頭破血流。為文革中的逼、供、打、砸、搶提供了極壞的樣板。一種叫“燕飛”的廣泛使用的批鬥人的模式，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鬥人時極為流行的“噴氣式”，可能就發源于劉少奇和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到1964年秋，僅北京郊區通縣，自殺的有70多起，死了50多人。山西洪洞縣也死了四、五十人。

1964年12月12日，毛在陳正人的“四清工作組”的蹲點報告即“關於洛陽拖拉機廠蹲點報告”的批示中，首次提出了所謂“官僚主義者階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的說法。矛頭指嚮劉少奇，批示說：“我們的工業究竟有多少在經營管理方面已經資本主義化了？我看不止1/2，要一個一個地清查改造，主要根源來自上邊。…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二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一個多月的工作會議。1964年12月20日在一次很小規模的常委擴大會上，兩個主席爭論起來：劉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毛則認為，地富是後臺老闆，前臺是“四不清”幹部，“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你只搞地富，貧下中農還是通不過的，迫切的是幹部，就是要發動群眾整我們這個黨。

劉少奇不同意毛的提法，他和緩地解釋說：四清運動中，各種矛盾交織在一

起，很複雜，還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為敵我矛盾。

毛激動地回擊道：“我們這個運動，叫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什麼‘四清’、‘四不清’運動，什麼多種矛盾交叉的運動，哪有那麼多交叉？所謂‘四清’、‘四不清’，什麼社會裡都能整；黨內外矛盾交叉，什麼黨都能用。沒有說明矛盾的性質！不是別的什麼主義的教育運動，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劉少奇認為頂多只能說“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者”，他請教式地問道：“對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都要消亡了，怎麼可能有什麼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脫口而出：“張霖之就是”。劉少奇不敢再問了，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毛點誰的名，誰就倒了；1967年1月22日，張被造反派批鬥毆打至死，是文革中最早被毆打至死的正部級官員。1964年12月24日，毛直截了當地說：“首先要解決領導權問題，然後再解決經濟上的四不清問題。…凡是敵人操縱或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被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地方，都必須進行奪權的鬥爭，要堅持發動群眾”。

1964年12月26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邀請部分中央領導人、各大區主要負責人及少數部長、勞模、科學家，歡聚在一起過他的71歲生日。宴席共分三桌，毛澤東坐在按品字形擺的三張桌子上方那張的首席，陳永貴、錢學森、邢燕子、陶鑄、羅瑞卿、謝富治、汪東興和曾志等人在座。而劉少奇、胡耀邦和中共各大區書記以及江青則分坐另外兩桌。毛澤東一到會場就說：“今天不是請客，更不是祝壽，我拿自己的稿費請大家吃頓飯，也算是實行‘四同’吧！”“不能

光吃飯，還要講講話呀！有些人一摸到一點東西就翹尾巴，這不好。摸到一點不要翹，摸到兩點三點，也不要翹。”毛在入席前，對李富春說，你們什麼事情都不向我講，你們搞獨立王國！曾志認為，毛不像開玩笑，而且不像是在批評李富春，而是另有所指，室內空氣頓時緊張起來。他給部分人遞煙後繼續說：“現在用幾盒香煙就可以把一個黨支部書記給賄賂了。如果把女兒嫁給一個幹部，那就要什麼有什麼。他們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5月、6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認為，全國基層有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裡，我還擔心黨中央出修正主義！修正主義的出現標誌著資產階級在政治舞臺上的興起。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物件，革命物件，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絕不能依靠他們。”

12月28日下午，毛澤東怒氣衝衝地拿著《黨章》和《憲法》到會。毛澤東說：“我只講這兩個問題，一個是頭一條性質問題，一個是第十六條工作態度問題。如果還有幾句就是請你們回去找黨章看一下，憲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講民主自由的。有一本書，《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件》，第100頁到104頁，你們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過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書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章的第一條中間講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然後第八十七條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譬如我們這些人算不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如果算的話，那麼有沒有言論自由？准不准我們和你們講幾句話？”

當毛講這些話時，表情十分嚴肅。在座的人都摸不著頭腦，不知道毛是對誰講的。實際上，毛澤東是有所指的。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前，負責會議組織工作的鄧小平考慮到這次會議是一般性質的工作會議，曾向毛澤東提出，如果事情

忙，可以不參加會議。在一次會議上，劉少奇在毛澤東講話時插話，由於劉少奇沒有意識到毛澤東準備講的話比較長，毛澤東只講了個開頭就被劉少奇打斷了。這兩件事使毛澤東非常不滿，所以特意拿了兩本書到會，並且在講話中發了脾氣。毛只是在自己需要的時候把憲法拿出來當個“擋箭牌”而已。

1965年1月3日，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再次選舉劉少奇為國家主席的當晚，毛在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一個小型會議上又一次批評劉少奇對“四清”運動的做法。他說：“四清工作隊集中大批人員，是搞人海戰術；學習檔40天不進村，是搞繁瑣哲學；反人家的右傾，實際自己右傾；不依靠群眾，紮根串連，結果冷冷清清……”毛澤東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

1月5日，在繼續進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批評劉少奇的觀點，並嚴厲地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認為資產階級幾乎已無所不在無處不有，各地區、各部門、各級政府和權力機構相當部分為資產階級所佔據，四清與文化批判都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必須發動一場大革命奪回被資產階級攫取的權力。他說服其它領導人進行一場“文化革命”。被任命來實施“文化革命”的，是由政治局成員和北京市委書記彭真領導的“五人小組”；包括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長兼文化部長陸定一，書記處書記康生，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新華社兼《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五人。

這次衝突結束後，修訂頒佈了《二十三條》。《二十三條》最重要的是明確提出了又提出“四清”運動的重點就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矛頭實指劉少奇。《二十三條》頒佈後，城鄉四清運動進入了以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大四清階段。同時，各地在開展運動中，強調突出政治，

強調用毛著作指導四清，掀起了學習毛著作的熱潮，對毛的個人崇拜開始流行。

從 1963 年持續到 1965 年 5 月的三年多的“四清”運動僅僅覆蓋了中國 1/3 的城鄉地區，就有 532 萬 7350 多人受批判；7 萬 7 千多人被迫害致死（城市有 4128 人被害；農村有 73432 人被害）。在 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這些案子的絕大多數，包括劉少奇宣導的四清典型經驗中的全部案子，都作為冤、假、錯案平反。

第 133 節 學雷鋒運動

林彪，1907 年 12 月生於湖北省黃岡縣林家大灣。1925 年林彪進入黃埔軍校第四期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 年參加北伐戰爭。1927 年參加南昌起義。1932 年年僅 25 歲的林彪擔任了紅軍主力紅一軍團軍團長。1937 年 30 歲的林彪擔任八路軍主力 115 師師長，同年 9 月指揮了平型關戰鬥。國共第二次內戰期間，林彪擔任中共第四野戰軍司令，從東北一直打到海南島，是當時中共實力最強的野戰軍。1949 年中共建政以後，林彪于 1951 年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在 1955 年 9 月被授予元帥軍銜，在十大元帥裡面名列第三，位於朱德和彭德懷之後。當時他 48 歲，是最年輕的元帥。林彪是一個對權力非常淡泊的人；十大元帥授勳儀式，林彪都沒有出席。在 1949 年到 1959 年期間，林彪並沒有承擔什麼實質性的工作，處於休養狀態。1954 年，林彪被任命為副總理。1955 年 4 月，林彪和鄧小平一起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58 年在中共八屆五中全會上，林彪成為中共政治局常委、副主席。1959 年廬山會議以後，林彪取代彭德懷，擔任中共軍委第一副主席，並且以副總理的身份兼任國防部長。廬山會議毛彭衝突的結局表明，毛澤東與他的同事們在權威上的距離有天壤之別。作為毛的接班人，劉少奇首先表現出堅定擁護個人崇拜的姿態。1959 年 8 月 17 日，他在中央

工作會議上發表長篇講話，進一步讚揚毛澤東，鼓吹個人崇拜。“理論權威”康生不甘落後。1959年底，他公開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最高標準，最後標準。”

鼓吹個人崇拜最力的當屬林彪。他從毛彭衝突中認清了毛澤東晚年的致命弱點，意識到搞個人崇拜是“得一人者得天下”、謀取個人權位的捷徑。“大躍進”受挫後，黨內一線領導人都在致力於糾正工作中的失誤，林彪卻獨樹一幟，在軍隊內部首先不遺餘力地搞起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竭力塑造自己毛澤東思想捍衛者的形象。1959年9月至10月，林彪在全軍高級幹部會議上大講頂峰論。在1960年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宣稱毛澤東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林彪主持搞的《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提出了一個響亮口號：“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1961年1月，林彪提出了後來影響巨大、流傳甚廣的學毛著“21字方針”：“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林彪開始大肆鼓吹毛澤東思想，借《毛選》四卷髮行之際，大力掀起“學毛選”活動；在《解放軍報》報頭上每天刊登一條毛澤東的語錄。“背警句”也是林彪在此時的發明創造。他要《解放軍報》在報眼的位置刊登毛主席語錄。他提出，對毛主席著作中最重要的篇章，要反復學，反復用，對於其中的許多警句，要熟讀、熟記，能夠背誦出來。他提倡和推行的“三八作風”，“四個第一”，“四好連隊”，“五好戰士”，開展了“政治選美”，即選取幾個政治“典型模範人物”作為向社會廣泛宣傳的範本，從而形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解放軍效忠毛的運動。

雷鋒就是軍隊政工部門營造出來的“宣傳品”。1963年3月2日，毛在批

閱了一份瀋陽軍區呈報的關於某汽車團學“毛著”標兵、五好戰士雷鋒因公殉職的事蹟演示文稿，揮毫寫下“向雷鋒同志學習”的七個大字，之後要求中央政治局委員、元帥、大將們都來題辭，以便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中開展一次“學雷鋒、樹新風”活動。於是，大員們紛紛遵命揮毫。劉少奇的題詞為：“向雷鋒同志學習，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林彪的題詞是：“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連向來不太過問具體國事的朱德也在題詞中準確把握住關鍵：“學習雷鋒，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所有的題詞都在同一天的全國所有報刊上，以頭版大幅位置發表。結果是：把解放軍的學毛著運動，大張旗鼓的推向全國各行各業。

雷鋒的生死月日都與 3 月 5 日無關，毛為什麼要選擇這一天？因為史達林是在 1953 年 3 月 5 日死的，學習雷鋒不過是學習史達林的具體化而已！蘇聯反史達林的個人迷信，中國就是要把對史達林的迷信推向人類的頂峰；這就是毛的心理。史達林稱其黨人為特殊的材料——鋼鐵製成，雷鋒就是鋼鐵造黨後剩下的邊角餘料製成的螺絲釘而已。“向雷鋒同志學習”的實質，就是要全國人民像雷鋒那樣迷信領袖，做一個機械人，唯毛是從。

毛澤東號召全國軍民“向雷鋒同志學習”，逐漸演變成為全國軍民向毛主席學習、效忠的運動。其實質就是毛澤東自己號令全國軍民向自己學習。在連篇累牘的宣傳當中，最常見的照片就是雷鋒坐在卡車駕駛室裡學習《毛選》。除了效忠黨以外，雷鋒的“事蹟”其實完全是一大堆平凡無奇而又漏洞百出的瑣碎小事。雷鋒究竟做了多少好事，又比其他人出色多少，根本就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通過這個“政治偶像”號召全民把《毛澤東選集》當“聖經”來讀，從而把毛本人當神來敬。於是，開始了新一輪狂熱的全民造神運動。

在這場規模空前的全民造神運動中，有兩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北京的人民出版社奉命組織一班編輯人員，加工整理一一實為捉筆代刀代寫《雷鋒日記》，嗣後大量印行，作為全國軍民的活的政治教材；二是文藝界大動員，學雷鋒、唱雷鋒、演雷鋒、寫雷鋒。雷鋒成為不食人間煙火的偉大英雄。《白毛女》作者之一的賀敬之，創作了階梯式的政治抒情長詩《雷鋒之歌》，把學雷鋒、學毛著跟批判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反黨罪行”捏合在一起。

雷鋒 1960 年 1 月應徵入伍，62 年 8 月死於車禍。在他死後，發現他的日記記載都是對黨、對毛感恩戴德和幫助婦女、老人及貧苦農民。雷鋒還寫了一首詩：“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生下了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雷鋒作為一個軍人，不守軍紀，離軍營到火車站去接送一個不認識的婦女，這種事允許嗎？雷鋒自己穿的襪子有幾十個補丁，卻寄給災區 200 多元（當時這是一筆不小的數目），那時軍人每月補貼只有 7 元，即使一分不花的攢，也得攢個三、四年。另外雷鋒還省下錢給其他一些貧窮的人。

改革開放後，共青團中央在報上登了雷鋒的英格納表和皮箱的照片，這說明雷鋒不是苦行僧。現在的人們不知道這兩樣東西在五十年代，是比較富有的家庭才能擁有的貴重物品，一般大學畢業生的月工資才 50 幾元，當時一隻英格納表要 180 元，皮箱則在 100-200 元之間。而雷鋒是僅有 7 元生活補貼的解放軍戰士，怎麼能買得起這麼貴重的東西？同時也與一隻襪子才值幾角錢，而又逢上數十個補丁這事，成了鮮明反差。

何況一個兵無論走到哪裡，其日常生活都有照相拍片留念，這可能嗎？“雷鋒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車”，雷鋒在火車上擦桌子，領導是怎麼知道的？難道說雷鋒連這麼點小事也向組織彙報？“有時候熄燈睡覺了，他還找地方去看

書學習。他晚上常到連部辦公室去學習”。作者肯定沒當過兵，軍隊裡有鐵的紀律，熄燈了就得睡覺，哪能允許當兵的熄了燈還到處亂跑，找地方去看毛選？

西點軍校學雷鋒的謠言，從 60 年代就開始流傳，後來盛傳西點軍校也學習中國的《人民日報》。新華網、人民網、中青網、《長江日報》、《北京晨報》、《中國民兵》都散佈過這個謠言。中央電視臺還做了一期“雷鋒出國”的訪談節目，梁曉聲等知名作家侃侃而談。於是，許多中國人去西點軍校“尋找雷鋒精神”，最後竟然逼得西點軍校不得不出面闢謠。

作為“雷鋒精神”創造者的林彪或作為“雷鋒精神”守護者的毛澤東，都沒有想到，雷鋒的政治生命居然會超過毛、林本人。這正是愚民政治的可怕之處，也是這種意識形態宣傳結出的一大怪胎。如今庇護並鼓吹“雷鋒精神”，又有了進一步的“時代意義”，那就是從中可強化“黨指揮槍、槍效忠於黨”的政治原則；而且還從“雷鋒”身上提煉出為黨而死、在所不惜的“革命”精神。“雷鋒精神”依然在“教導”著人們充當“黨的螺絲釘”。



(中共聲勢浩大地慶祝蘇聯 51 周年國慶)

雷鋒生前怎樣都不會想到，自己會被“法老們”製成一具政治教條的“木乃伊”，承載著權力的神話、愚民的誓言和欺世盜名的詛咒。那樣一個瘋狂的時代所發酵出來的低智符號尚在今日揮舞，這反襯出我們仍然生活在家天下的精神世界。面對全球文明和現代社會，“雷鋒精神”是一個陳舊僵化、愚昧無知和自大狂妄的混合。維繫這一“政治圖騰”只能證明當代政治的貧困。愚民政策不除，民智難開、民風難清。徹底消解雷鋒神話是潮流所向。

毛澤東對林彪的這些做法相當欣賞，他說：“解放軍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經林彪同志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之後，比較過去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他還說，“誰說中國人沒有創造？四個第一好，這是個創造”。1963年，毛澤東發出號召：“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這充份顯示了毛澤東對林彪的滿意程度。

共黨不光統治國家，還要統治每一個人的思想。以毛思想獨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於億萬人腦中。1964年5月，林彪授意解放軍總政治部編輯出版《毛主席語錄》。在這本很快便以“紅寶書”著稱並被人們頂禮膜拜的書的前言中，林彪宣稱“毛澤東同志天才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告誡人們要“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從而掀起了學習毛著作的熱潮。“紅寶書”不僅成了中共的“寶貝黨典”，而且成了人民的“聖經寶卷”。截至1967年，《毛主席語錄》已經印刷出版6.28億冊，幾乎人手一冊；《毛澤東選集》1.5億冊；“毛主席像”印了12.4億張，接近人均兩張。最過分的是，文革時期，大量製造毛的像章，甚至造飛機的上好鋁材也被來製造個人崇拜。據不完全統計，全國總共做了35億個毛像章。當時

的中國人口是 7 億，平均每人 5 枚。毛澤東製造個人崇拜的巨大危害，不僅是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而且讓中國陷於盲目崇拜的瘋狂和思想僵化的深淵，讓國人心甘情願地做奴隸。

神化毛在文革前，就已經成了一場文藝運動、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歌頌毛的歌曲諸如“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深……”“北京有個金太陽”“祝願毛主席萬壽無疆”等等等等，已經唱徹中國大陸；篡改了中共黨史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於 1964 年搬上舞臺。

到了 1965 年，毛和毛思想已經完全被神化。街道上，房間中，到處懸掛著毛的塑像和照片。而顯而易見，毛是非常贊同這種個人崇拜的。他在 1965 年 1 月 9 日與斯諾的談話中提出，個人崇拜是一筆政治財產，史達林曾是個人崇拜的中心，而赫魯雪夫沒有個人崇拜，因而垮臺了。毛認為他的大權旁落，別人不聽他的話了。為了把失去的權奪回來，需要對他的個人崇拜，需要把自己放在至尊無上的地位（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404 頁）。1970 年毛澤東再次對斯諾談到個人崇拜問題，用“文革”前夕的情況來為自己辯護，說：“那個時候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省的黨權，各地方的權，還有北京市的權，我也管不了，所以那個時候無所謂個人崇拜，倒是需要搞一點崇拜”。

毛澤東這些話使一些學者誤認為，毛劉之間的鬥爭是權力鬥爭，“文革”是這種權力鬥爭的公開爆發。實際上，劉的地位和威望遠不能對毛澤東構成威脅，更談不上向毛爭權。要說有鬥爭的話，是毛鬥別人，而不是別人鬥他。毛抱怨失去了權力，難道不是他自己要求退居第二線的嗎？那個時候對他的個人崇拜已經到了空前的程度了，怎麼說沒有個人崇拜？他需要更多的個人崇拜，並不是因為

他失去了權力，而是因為他嫌對自己的崇拜還不夠，他還要進一步提高和鞏固自己的權力和權威。沒有個人崇拜，“文革”是發動不起來的。

1966年1月19日，各報紙發表解放軍舉行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消息，提出把毛主席的指示，當成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1月25日，各報刊登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報告《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決執行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報告引用林彪的話說：“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主義的頂峰，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又說：“毛主席的書是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話，水準最高，威信最高，力量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對我軍來說，最好的武器不是飛機，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彈，最好的武器是毛澤東思想。”文革中只誦讀一本“經”——毛主席語錄，發展到不背語錄就無法在食堂買飯，買東西、坐汽車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語錄。全國人民實行著“早請示，晚彙報”，每天數次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早晚兩次政治禱告。人人寫思想彙報，檢討是否符合毛思想。

第 134 節 文革爆發

1· 批判《海瑞罷官》

1948年11月，明史專家吳晗來到河北省平山縣的西柏坡，將他在當年8月份寫完準備再版的《朱元璋傳》的修改稿送毛澤東閱正，《朱元璋傳》以朱元璋影射蔣介石。毛閱讀了書稿，還約吳晗談了兩次。毛把中國知識份子歷來公認的朱元璋殘酷暴虐的一面說成是為鞏固其權力之所必需，毛指出吳晗“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

學習海瑞是毛澤東又一次“釣魚”。1959年4月，中共上海會議期間，毛大力提倡“海瑞精神”，號召大家就“大躍進”、人民公社化以來的種種失誤大

膽陳言，將“六不怕”（指不怕帶機會主義帽子、不怕撤職、不怕開除、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精神與海瑞的直言進諫結合起來。但毛卻私下對人說：“講海瑞，我很後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1959年7月廬山會議上，彭德懷披肝瀝膽上陳“萬言書”，結果被冠以“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毛的解釋是：“海瑞搬家了，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階級。現在搬到右傾司令部去了，向著馬克思主義作鬥爭。這樣的海瑞，是右派海瑞”。

胡喬木聽到毛澤東號召學習海瑞，就囑咐吳晗寫關於海瑞的文章的。北京市副市長吳晗遂於1959年6月間發表了《海瑞罵皇帝》一文。9月，他又寫了《論海瑞》。1960年，吳晗應京劇表演藝術家馬連良之約，創作了以“左派海瑞”與“右派官僚集團”作鬥爭為主線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此劇本發表和演出後，受到廣泛好評。毛當時亦稱讚過。

批判《海瑞罷官》點燃了“文革”之火。1962年8月，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重提階級和階級鬥爭。柯慶施向毛澤東進言：《海瑞罷官》借古諷今。1964年底，康生向毛密報《海瑞罷官》這齣戲與1959年廬山會議有關，是為彭德懷翻案！海瑞敢罵皇帝，彭德懷敢頂撞毛，這就是這兩個人物之間的相似之處。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劃炮製批判文章。

1965年4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整文化部領導問題的批復》，免去了齊燕銘、夏衍等在文化部的領導職務。也就是說，在文化界已經有“走資派”率先被免去了“官位”。

1965年8月毛澤東審定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第十稿。後來，儘管他認為文章“沒有擊中要害”，可是在當時的情況下，似乎也很難再改了，於是就批准發表。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洋洋數萬言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章指出，《海瑞罷官》鼓吹“單幹風”、“翻案風”，是毒草，其主題思想就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權。給吳晗戴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大帽子。

11月11~28日，北京各報刊在18天內都未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各報刊多次請示是否可以轉載，彭真不讓轉載。彭真還在許多場合責備上海市委發表姚文元文章不打招呼，“黨性到那裡去了”。毛認為彭真是吳晗的後臺，北京市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

11月28日 在周恩來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會堂西大廳開會，討論北京報紙轉載姚文元同志文章的問題。彭真同志一到，就問“吳晗現在怎樣？”北京市委書記鄧拓說，“吳晗很緊張，因為他知道這次批判有來頭。”彭真同志大聲說：“什麼來頭不來頭，不用管，只問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毛認為這是狂妄地露骨地反對他。

11月29日《文匯報》發表一個版的讀者來信，要求開展《海瑞罷官》問題的討論。《解放軍報》轉載姚文，編者按指出，《海瑞罷官》是一株大毒草。《北京日報》轉載姚文，但該報編者按表示不支持姚文，反而強調對《海瑞罷官》這齣戲有不同意見，應該展開討論。

11月30日《人民日報》在《學術研究》欄轉載姚文。編者按語按照彭真同志的意見，只把這個問題作為學術問題來討論，並且強調“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沒有表示支援姚文元同志文章。按語的最後一段，引用毛主席的話，指出對那些有毒素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要進行鬥爭。這是周恩來同志加的。

12月8日《紅旗》發表戚本禹同志題為《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的文章，批評了以翦伯贊、吳晗的歷史觀，但沒有指名。1961年以來，翦伯贊先後發表文章，提出既要重視階級觀點，又要注意歷史主義的意見。戚本禹稱此觀點是“超階級”的資產階級觀點。

12月8日至15日，由毛澤東主持在上海舉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批判了羅瑞卿“篡軍反黨”，羅瑞卿被調離了軍事方面的領導崗位。

12月14日彭真在國際飯店開北京市委工作會議時，把吳晗找去，對他說，“你錯的就檢討，對的就堅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是直接給吳晗撐腰，要他堅持立場。

12月22日毛主席同彭真、康生、楊成武等同志談話。毛說：《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彭真同志立刻辯解說，我們經過調查，沒有發現吳晗同彭德懷有什麼組織聯繫。其實，這個問題，稍加調查就可以搞清楚。但是，毛澤東並不關心吳晗是不是冤枉的問題，這對毛澤東並不重要；對毛澤東重要的是，他需要一個藉口，來打擊北京市委、彭德懷和劉少奇。

在毛身邊工作了17年的秘書田家英，因刪了毛談話中關於海瑞罷官的“要害”的內容，被江青、陳伯達抓住不放，給田家英定了一條“篡改毛澤東著作”的罪名。田又因為對“頂峰”論、“最高最活”論的批駁而惹惱了林彪。這是1965年6月29日的事。羅瑞卿召集有關人員，討論為總政治部編印的《毛主席語錄》的再版前言。前言中寫入了林彪“發明”的毛澤東思想“最高最活”，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的提法。為了慎重起見，羅瑞卿打電話徵求田家英的意見。田家英回答說：最高最活的說法不確切，不好理解，也不好翻譯。最

高，那麼今後再不能高了？既然有最高，是不是還有次高啊？最活，是不是還有次活？既然講活，就會有死，難道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死的？說是頂峰，也不科學，到了頂峰，難道以後不能再發展了？田家英的這些話，在羅瑞卿被批判時又被揭露出來。毛派戚本禹、王力等人在 1966 年 5 月 22 日大會上宣佈田家英的罪狀，逼迫田家英搬出中南海。5 月 23 日上午，年僅 44 歲的田家英，忍受不了誣陷和侮辱，悲憤地自盡了！據汪東興的材料，田家英不是自殺，而是他殺。6 月中旬，毛澤東曾對李志綏醫生說：“這次死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殺。現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興天下大亂。”他大大低估了這場運動的瘋狂。文革初期自殺的人 20 萬左右。僅一個陝西省，文革中自殺的黨、政幹部就有兩千多名。

後來，張春橋要《文匯報》總編輯找到曾寫來信的上海敬業中學學生馬捷，進行個別輔導。這個天真的學生，在專人的幫助下，寫了一篇批判姚文元的文章。馬捷的文章一刊出，果然引來了一些讀者來稿。《文匯報》接二連三發表了一批反駁姚文元的文章。但是，文學界、史學界的一些著名人士卻仍然按兵不動。於是，他們決定以《文匯報》編輯部名義，發出請柬，在 12 月 31 日開座談會，請上海史學界、文藝界的代表人物，座談《海瑞罷官》問題。會議主持者說，只是“內部談談，聽聽各位意見，不算帳”，哪知會議剛一結束，馬上公開發表會議發言記錄，“把魚釣住了！”後來，凡是為吳晗鳴不平或不同意姚文元文章的人，都遭到殘酷的鬥爭。著名學者李平心因為反對姚文元的“清官比貪官更壞”的觀點，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的吹鼓手”，遭到多次批鬥，含冤逝世。歷史學家周予同因為說姚文元的文章是“亂箭射人”，幾次被揪到山東曲阜批鬥，受傷癱瘓。最初那位被輔導寫批評姚文元文章的中學生馬捷，也被打成了反動學生。

吳晗一家 4 口，有 3 人遭難。吳晗被打得口吐鮮血，於 1969 年 10 月 11 日

自殺身亡，終年 60 歲！妻子袁震被打成“反革命家屬”，在勞改隊全身癱瘓，受折磨而死。女兒吳小彥，頭打破，牙打掉，關進精神病院，身心俱殘，含冤離開人間。惟有兒子吳小彰，闖過重重難關，頑強地活了下來。瘋狂的虐殺，還曾波及曾在舞臺上演過海瑞的著名藝術家、共產黨員周信芳。他在遭受拷打，遊街示眾，兩次被捕入獄之後，同他的被打得遍體鱗傷的夫人，一起受折磨死去。他的兒子、兒媳、孫女也都受到株連。

2· 批判《二月提綱》

1966 年 2 月，彭真批評姚文元“把純粹的學術問題當成政治問題來對待”，試圖將《海瑞罷官》的爭論，納入學術討論的軌道。2 月 3 日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召集了五人小組擴大會議，寫出了《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亦即《二月提綱》。2 月 12 日由中央轉發到全黨。根據提綱的精神，中宣部沒同意發表關鋒、戚本禹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

毛對《二月提綱》表示不滿，3 月 17 日至 20 日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指出，我們在解放以後，對知識份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現在許多地方對於這個問題認識還很差，學術批判還沒有開展起來。各地都要注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麼人手裡，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我們要培養自己的年青的學術權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壓他們的稿件。毛澤東重申“郭老（沫若）、范（文瀾）老兩老要保護。郭老是好人”，“功大於過”；兩人“還是要作一點自我批評為好”。

3月25日《紅旗》發表戚本禹、林傑、閻長貴的文章，題目是《翦伯贊同志的歷史觀點應當批判》，稱他是“資產階級史學代表人物”、其文章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綱領”。

3月底，毛澤東連續找康生、江青、張春橋等談話，嚴厲指責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壓制左派，不准革命。毛還說吳晗和翦伯贊是“學閥”，包庇他們的則是“大黨閥”（暗指北京市委書記彭真等乃至劉少奇）；如果再包庇壞人，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小組都要解散。毛說，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作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康生立即回京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傳達毛的最新指示，決定撤銷《二月提綱》。但是最初起草的《通知》只有一句話，即：“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轉《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現予撤銷。”這個《通知》再次讓毛感到不滿意。

江青在獲得了林彪的支持後，於2月2~20日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根據這個會議整理的《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明確提出了文藝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號召“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紀要經毛澤東三次審閱修改後，由他建議以中央軍委名義報送中央批准，於4月10日轉發全黨。這樣，絕大多數作家和幹部就成為“黑線人物”。

1966年4月，《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報刊先後發表《〈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等文章，進而把皇帝罷了海瑞的官，同廬山會議上撤銷了彭德懷職務一事聯繫在一起。

郭沫若早於 1951 年在天安門城樓上就當著毛澤東的面打出一面錦旗，上書“我們永遠跟著你！”這是文化界向毛澤東獻忠的濫觴。1963 年郭沫若為毛澤東在飛機上所攝照片題詩：“難怪陽光格外明亮，原來窗內與窗外有著兩個太陽。”創肉麻為有趣以示忠的先河。

1966 年 4 月 14 日，人大副委員長郭沫若在人大常委會第 30 次（擴大）會議上發言說：“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們燒掉，沒有一點價值”。4 月 28 日《光明日報》發表了郭沫若的檢討，題目是《向工農兵群眾學習，為工農兵群眾服務》。5 月 5 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全國各報也都相繼轉載。郭沫若的奇文一經公開發表，國外輿論一片譁然：中國要“焚書坑儒”，許多日本友好人士甚至要求專程到中國訪問郭沫若，看他是否被迫發表“焚書”言論。此時，北京大學已開闢了一個專門批判郭沫若的專欄，那裡貼滿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報，大字報甚至貼到了郭沫若寓所門前。流言蜚語更是紛至遝來，其中編造得最離奇最惡毒的，是指控他不久前為長篇小說《歐陽海之歌》題寫書名中的“海”字，隱有“反毛澤東”的字樣。紅衛兵為此到郭沫若寓所門前示威，“勒令”他限期交代“反毛澤東”的彌天大罪。6 月 5 日，亞非作家常設局紀念“講話”討論會閉幕式上，這次討論會的東道主、中國文聯主席郭沫若竟被安排在後排就座。戚本禹到會作長篇講話，郭沫若不僅要洗耳恭聽，還必須向戚本禹鞠躬致敬，在閉幕詞中說：“戚本禹同志為我們作了富於啟發性的報告”，“不能不表示衷心的感謝”。這個閉幕詞標題就是《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郭沫若意猶未盡，竟即席朗誦一首詩：“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獻給各位同志和同學。”

詩的題目是：《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

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

使中國舞臺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那個寫出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的郭沫若，那個敢於挑戰一切強權、敢於挑戰一切壓迫的鬥士郭沫若，竟然在公開場合、竟然當著那麼多中外知名人士的面，毫無掩飾地阿諛一個政治暴發戶，僅僅是為了自保。這其實又豈止是郭沫若一個人的悲劇！

1966年6月下旬，在北京召開了有53個國家和地區的160多位元作家參加的亞非作家緊急會議，郭沫若以中國代表團團長的身份，作了題為《亞非作家團結反帝的歷史使命》的長篇發言。在發言的最後部分談到自己4月14日的檢討，他解釋道：我說用今天的標準看來，我以前所寫東西沒有什麼價值，嚴格地說應該燒掉。這是我責任感的昇華，完全出自我內心深處的聲音。但我把這話傳播出去，出乎意外地驚動了全世界。有不少真摯的朋友對我表示了深切的關懷，我向他們致以謝意。但在資本主義國家和現代修正主義國家的報紙和刊物上，卻卷起了一陣相當規模的反華浪潮。他們有意歪曲我的發言，藉以反對我國的文化大革命。有趣的是日本有一位批評家，說我是被迫檢討，要燒自己的書，比二千多年前焚書坑儒的秦始皇還要殘暴和傲慢。郭沫若聲明：這種指責是沒有道理的——“作為對人民負責的革命作家要不斷進行自我改造，不斷進行嚴格的自我批評，在我們這裡是極其平常的事情。”

郭的三兒子郭民英，因在中央音樂學院用家裡的答錄機欣賞西方音樂，被人告密，毛下令“類似這樣的事應該抓一抓。”民英在1967年自殺。

郭沫若的二子郭世英 1962 年進北大哲學系，和幾個同學討論問題：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階級鬥爭？毛澤東思想能不能一分為二？大躍進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郭沫若大義滅親，把此事主動地報給公安局。1963 年郭世英被打成了“反革命”，在農場勞改兩年後，郭沫若安排他進了北農大。1968 年春，郭世英的舊案被重新提起，又成了反革命分子。4 月 21 日夜裡被打死後，又從三樓窗口扔下，年僅 26 歲。

1973 年春，毛澤東寫了一首批評他的順口溜：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毛澤東還把他讀過 5 遍的郭沫若的史學名著《十批判書》翻了出來，在同王洪文、張春橋談話時，毛澤東說：“郭老不僅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國民黨也是一樣啊！林彪也是啊！我贊成郭老的歷史分期，奴隸制以春秋戰國之間為界。但也不能大罵秦始皇。”毛澤東指令：趕排大字本的《十批判書》，供“評法批儒”之用。

《十批判書》是郭沫若在抗戰時期寫成的，主要是影射和鞭撻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書中對秦始皇一分為二：統一中國是功，焚書坑儒是罪。力倡“一分為二”的毛以秦始皇自居，當然容不得對秦始皇的一分為二。1973 年 8 月 5 日毛澤東讓江青記下他的新作——《讀封建論·贈郭老》：“勸君少罵秦始皇，焚燒書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毛澤東對江青說：歷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會前期有建樹的，都是法家。這些人都主張法治，犯了法就殺頭，主張厚今薄古。儒家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都是主張厚古薄今的。

1974 年 1 月 25 日，郭沫若被指定參加北京“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江青毫不留情地點了 82 歲的郭沫若的名，說他的《十批判書》不對，說他對待孔子的

態度和林彪一樣。在公開場合被點名指責，這在郭沫若的歷史上可說是空前絕後。

郭沫若不得不抱病捉筆，寫兩首詩給毛澤東，以為回答：春雷動地布昭蘇，滄海群龍競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餘辜。十批大錯明如火，柳論高瞻燦若朱。願與工農齊步伐，滌除污濁繪新圖。讀書卅載探龍穴，雲水茫茫未得珠。知有神方醫俗骨，難排蠱毒困窮隅。豈甘樗櫟悲繩墨，願竭駑駘效策驅。最幸春雷驚大地，寸心初覺識歸途。

費孝通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恨不得把過去的歷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乾乾淨淨，然後重新一筆一筆寫過一遍”。

歷史學家範文瀾受了中央文革組長康生、陳伯達批評後，立即寫信給劉大年：“請你助黎澍同志加強批評。愈過頭愈好，不過頭，別人會來補的，那就麻煩了。”接著又寫一信給黎澍：“你毫不留情地加上自我批評的文字，愈過頭愈好，請你站在敵對者的方面，儘量抨擊，不大大抨擊，將來自有人出來抨擊，那就被動了”。

詩人郭小川在五七幹校時致信妻子說：“早已下定決心，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辦事，永遠在學習毛澤東思想，和工農兵結合中改造世界觀，永遠生活戰鬥在第一線。”在宣佈恢復黨的組織生活時，又致信妻子說：“我的‘鬥私批修’並不好，尚有一個問題需要補鬥。……同志們都在祝賀我，但我認識到這只是革命的新起點，沒有什麼可滿足的，只是鬥爭和改造的任務更加加重而已。”五七幹校本來是一個帶有集體懲罰性質的勞動場所，臧克家陶然寫了大量讚美詩。他在詩集《憶向陽》的序言中寫道：“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我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到了湖北咸寧幹校。這個日子，我永生不能忘。它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座分

界碑。”一九七五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隨即寫詩助陣；一年過後形勢大變，複歌頌英明領袖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不論風向如何，唱頌歌是詩人的本份。

1966年4月10~15日彭真連續開北京市委常委會，匆忙要所屬各級黨組織進行對吳晗、鄧拓、廖沫沙[北京市委統戰部長]的批判，用假積極來掩護他們包庇壞人的“錯誤”。

1966年4月16日，毛在杭州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彭真的“錯誤”，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等問題。

4月16日在彭真同志直接指揮下，北京市委在《北京日報》上，以三個版的篇幅，發表了吳晗、鄧拓、廖沫沙三個人的材料，並且加了一個《北京日報》和《前線》的編者按語。

4月19日中央書記處通知首都各單位：（一）《北京日報》十六日的編者按語和材料，因為北京市委毫無自我批評，首都各報都不要轉載。各報按原訂計畫發表學術批判文章。（二）各高等院校、各機關、各基層單位，停止執行北京市委佈置的那種製造混亂的措施。

1966年4月21日，是劉在中央會議上第一個點名他的親信彭真為“反黨分子”。其後鄧小平等人都和彭作了堅決的鬥爭。

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繼續召開。這次會議一直開到28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5月4日《解放軍報》發表題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社論，指出應該全面“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

級思想”。5月7日，毛澤東就如何搞好軍隊的後勤工作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出軍隊不但要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還要從事工、農業生產，搞四清。而且各行各業都要這樣做。該信後被稱為“五七指示”。

5月9日《解放軍報》發表高炬同志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光明日報》發表何明同志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偽》。《解放軍報》和《光明日報》同時發表一批材料：《鄧拓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發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評“三家村”》。第二天，全國各報刊轉載了這篇文章。很多文藝工作者，已在本單位被揪出來批判鬥爭。

5月11日《紅旗》發表戚本禹的文章：《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

5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林傑同志的文章：《揭破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

5月15日，中共中央下發了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的一封信，毛說：“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從而把文革由對一批電影和舞臺劇的攻擊，升級為對一大批人特別是在教育界的攻擊。

1966年5月16日，劉少奇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文革的綱領性的檔《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說，“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是毛加上的。這“文化領域的專政”，是以反對“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名義，摧毀古代

文化和外來文化，“封、資、修”便是“文化專政”的物件。特別令人驚心動魄的是毛親自加上的這樣一段話：“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五.一六通知》羅列了《二月提綱》的“十大罪狀”，“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是陳伯達，副組長是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和張春橋。

“中央文革”雖然以陳伯達為組長，實際上江青說話算數。而江青的背後就是毛澤東。

《五.一六通知》通過的這一天，已被公認為“文革”正式開始的一天。

在中央通過《5.16通知》的當天，姚文元、戚本禹等人又在人民日報等報刊上辱罵鄧拓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頭目”，“是一個叛徒”。這位中共華北局書記處候補書記、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在5月17日夜晚上悲憤地寫了《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與妻訣別書》，于18日凌晨服毒身亡，成為那段黑暗歲月的第一位以死抗爭的殉道者，終年僅54。

3·林彪、周恩來吹捧毛澤東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个嶄新的階段。”“毛主席所經過的事情，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多得多。”

“毛主席廣泛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在當代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19 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恩格斯。20 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同志。不要不服氣，不行就不行。” “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的行動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雪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這次講話後被稱為“政變經”的講話，經中央同意，轉發到全國，事先也得到過毛的認可。毛該感到滿意，現在終於有人公開說他超過馬克思了。

1966 年 5 月 21 日，周恩來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三個問題：防止反革命政變問題，領導和群眾問題，保持晚節問題。在第一個問題中，周開明宗義地指出：“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講話（即林彪 518 關於政變問題的講話），講得很好”。然後他大批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主要問題是防止修正主義當權。彭、羅、陸、楊是一個一個地奪取我們的陣地，有筆桿，有槍桿，有黨權。第二是防止修正主義發生政變。第三要防止修正主義的軍事政變……對政變的危險，同意林彪同志的講話，中央與地方以中央為主，國內與國外以國內為主，黨內與黨外以黨內為主，上邊與下邊以上邊為主”。周的側重點完全在子虛烏有的所謂“反革命政變”上。周和林彪的估計一樣，出於他們的某種政治需要，他們都估計得比毛更黑暗，更極左。周的講話就顯然比毛的五一六通知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他講話的第二部分，即“領導與群眾問題”中，周積極鼓吹對毛的個人崇拜，甚至提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這個偉大時代的頂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與列寧一樣是天才的領袖，是世界人民的領袖……通過文化大

革命的活動，我們要更好地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不僅在中國，而且要在全世界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周還用同樣的語彙吹捧林彪：“對毛澤東思想提得最早，舉得最高，發揮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力”。早在4月30日，周在“首都各界十萬人歡迎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集會上的講話”中吹捧說：“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走向滅亡和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

在第三部分“保持晚節問題”中，周向全黨提出：“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領袖，百年以後也是領袖。晚節不忠，一筆勾銷……”他更以李秀成、瞿秋白為例說明“晚節不忠”的危險。他指責剛受到戚本禹批判的已故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為“叛徒”（原因是瞿秋白臨死時寫了一篇《多餘的話》，說自己不該參加政治活動）周提出：“不因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毀掉。這些人都是無恥的”。由於周第一個主張對死者墓地的打砸搶，數月後，瞿、李兩人的墓地即被紅衛兵全部毀掉，紅衛兵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破壞墳墓的高潮。

周恩來和林彪的關係好過他和毛澤東的關係。1966年8月31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時，周恩來親自安排了檢閱車輛，毛澤東與賀龍為第一車，林彪是乘第二輛車。但這次檢閱的照片要登報時卻出現了問題，即如何在報上予以說明，最後周恩來發明了林彪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一詞，以突出林彪的地位。周恩來不論是會上講話，還是在會下打電話，對林彪都是統稱“副帥”，經常說副帥如何如何；不稱“林彪同志”，只說“副帥”。周恩來在1969年4月14日中共九大的一次全體會議上說：“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

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奮鬥中自然引伸出來的最正確的結論，是完全符合事實的。他得到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熱烈擁護，也得到全世界廣大革命人民的支援。我們不僅為著我們偉大領袖，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而感到無限幸福，我們還為有了眾所公認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他還說：“林彪同志成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開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義失敗後率領一部份起義部隊走上井岡山，接受毛主席領導的一位光榮代表。”林彪當場站起來說：我林彪沒什麼，一切都是毛主席，我如果跟著賀龍、朱德，早就完了，沒有今天。林彪激動地流下了眼淚。這便是文革期間井岡山“朱毛會師”變成“毛林會師”的源頭。林彪死後，汪東興在林彪家裡面抄出很多周恩來送給林彪的東西，包括他們一起拍的好多照片。

1968年3月27日周恩來在北京的十萬人大會上主動介紹了“江青同志的戰鬥生平”。他說江青當年寫過“戰鬥的文章”，“紅文章”，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勤奮的學生”，對同志“能熱情認真地幫助”，對敵人“敢於把他們端出來”。他還在大會上兩次帶頭高呼“誓死保衛江青同志！”當周得知毛決心倒劉，便在公開場合大肆批劉，並出任“劉少奇專案審查小組”組長一職。周不僅完全同意定劉為“叛徒、內奸、工賊”，甚至在有關文件中批示：“此人該殺”。1968年9月25日周恩來在劉少奇審查報告上批寫道：“劉賊是大叛徒、大工賊、大內奸、大特務、大漢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惡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周恩來是元帥賀龍的入黨介紹人，兩個人關係密切。中共南昌暴動中，周恩來是最高領導人，賀龍則是暴動的總指揮。1966年9月25日周恩來對“首都大

專學校紅衛兵”負責人談話時故意透露玄機：“（南昌起義）我和朱德同志、林彪同志、陳毅同志，我是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故意抹去南昌起義的主要軍事指揮者賀龍的名字，在起義的主要負責人當中加上了當時僅是個連長的林彪。這種對賀龍的貶低就是一種關於賀龍要垮臺的暗示。1967年1月，毛和周恩來兩個人在中南海專門研究賀龍的問題；賀龍因為不幸聽見了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說要“搞掉毛”的話，成為毛疑心的焦點，毛主席決定對賀龍採取隔離措施；周立即代表中央向賀龍宣佈對他進行審查。1968年10月31日毛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發表講話說：“過去說對賀龍是一批二保，因為他是二方面軍的代表。現在看來不能保了，因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從成鈞、許光達、廖漢生等的揭發材料看來，他是破壞我們這個軍隊的。他背地搞篡軍反黨企圖是有的，但是沒有來得及”。毛澤東特別提及的揭發人都是賀龍自己親信。周在賀龍的逮捕令上寫下數百字的批語，大罵賀龍一通。林彪死後，毛澤東表示：“看來賀龍的案子假了。”周恩來馬上派人把賀龍的遺孀薛明從貴州接回北京。1975年6月9日，周恩來抱病出席賀龍骨灰安放儀式，親自致悼詞，先後向賀龍遺像鞠躬7次，並且哭著向薛明道歉說“沒有保護好”賀龍。

有關周恩來當年堅決支持毛發動文革的責任，連前中共領導人都覺得實在難以否認。1980年3月20日，鄧小平在看了中央起草小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提綱後，就與部分政治局委員談到過周在文革中的“錯誤和過失”：“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薦了林彪為黨的副主席、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在起草九大黨章時，又把林彪作為既定接班人，並以法加以確立；周恩來在中共九大籌備期間，曾提名江青、葉群為政治局委員；在中共十大籌備期間又曾建議江青為政治局常委（毛澤東給擋了下來）；關於設國家主席一職，也是周恩來在

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由林彪擔任的建議；在劉少奇問題上，在彭德懷、賀龍、陶鑄等人的問題上，周恩來也是有過失的”。胡耀邦、陳雲也認為周對文革的發動等重大問題“是有一定責任的，不能都歸於當時政治環境、氣候，否則就不是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楊尚昆承認周恩來“講過一些違心的話，做過一些違心的事，甚至說過錯話，辦過錯事”。

文革初期，周曾經親自在國務院系統抓了三個試點：國家對外文委，中國科學院和國家科委。其結果是這三個單位的負責人被他一手打成了張彥反黨集團、韓光反黨集團和張勁夫反黨集團。周在萬人大會上斷言：“他們不單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又是一個陰謀集團，當然各有各的系統，但是總之性質相同”。1966年9月，周恩來在他主持起草的一個中央文件中提出：“要把所有幹部都放到火裡燒一燒”，此文後被毛壓下未發。在國家僑委的兩個主要負責人廖承志和方方中，廖是周的親信而方則不是。周為了保廖，便在1967年1月3日近萬人的“奪取僑務界文化大革命新勝利誓師大會”上公開煽動打方，並作了如下異乎尋常的發言：“我同意你們提出的要打倒中僑委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們挖掘出來的這個代表人物很對，是誰？是方方。我現在供給你們一份材料：在去年文化大革命當中，已經有人揭發，方方與香港的資產階級代理人商訂的大量寄去我們國內的所謂風景片子，實際上是照了我們許多的地面和建築物，簡直是把我們山河出賣給外國的反動派”。今天再看這樣的發言，真會感到已不是什麼“上綱上線”，而跡近“天方夜譚”。因為以周貴為一國總理之尊，竟然會把風景片和間諜活動混為一談！

4·朱德批鬥會

5月23日，政治局全票通過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正式撤銷了彭真、

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四人的全部職務。5月24日發出《關於陸定一同志和楊尚昆同志錯誤問題的說明》，雖然在文件中說“會議決定，中央成立專案審查委員會，進一步審查彭、陸、羅、楊四同志的反黨活動和他們之間的不正常關係”，實際上已把他們打成了“反黨集團”。這一通知地方發到縣委以上，軍隊通知到團級以上。文化大革命之火就是這樣燃燒起來的。

在中共中央的檔案館裡，有一份標號為“19660523”的會議紀錄。此份檔記錄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在23日的會議，對朱德元帥的嚴厲批判，即發生在那一天。

地點：人民大會堂河北廳。主持人：劉少奇。

朱德首先因為對批判彭、羅、陸、楊持消極態度而被責令作檢討：“我過去的錯誤已經作過兩次檢查，第一次是在高饒問題發生以後，我在會上作了檢討。第二次是彭德懷問題發生後，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了檢討，那次檢討比較長一點。”朱德接著又講了他過去的錯誤，即二十年代井岡山上的問題和紅軍第四軍“七大”的問題。張鼎丞、林彪、陳毅、周恩來先後發言和插話。陳毅批判朱德歷史問題的發言很激烈很長。

林彪：彭德懷原來就是聯合這個，聯合那個，犯了這個錯誤又犯了那個錯誤，都是為了個人野心。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必須徹底揭發鬥爭到底把他搞臭，否則不行。這樣做對你對黨都有好處，這樣，你才可能改好，否則不可能。廬山會議揭發出來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大的勝利。消滅黨的一個最大的隱患。主席幾次講黨有可能分裂，實際就指彭德懷——朱德。廬山會議也考慮到是否要徹底揭開，權衡利害，認為應該堅決揭開，消滅這一隱患，否則會繼續發展，萬一主席到百年之後，就會出現更大的問題。現在揭開，展開堅決鬥爭，保衛總

路線，教育全黨，鞏固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這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發鬥爭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當然我們是希望你改的。

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檢討得很不夠。有人當是他自己檢討的，不是的！是黨中央決定讓他脫褲子的，不檢討不行。你們是不知道的，陳毅批評他的並不過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當領袖。高崗事情，他也主張輪流，想當主席，自己本事行嗎？你一天都沒做過總司令，南昌起義後，是無政府，亂走，是陳毅指揮到井岡山的；遵義會議前是李德指揮；以後是毛主席指揮；抗戰時期在前方指揮（按：也不是朱德指揮）。解放戰爭是主席指揮。你是不行的，但自以為還行。你脫離指揮，下井岡山向南打，三個營損失二個，打敗仗無辦法，還是主席接你回來的。林彪又把問題引導到彭羅陸楊問題上來：“去年羅瑞卿問題發生以後，在上海會議上他（指朱德）還講，不能講毛澤東思想是世界馬列主義的頂峰，頂峰還會發展嗎？大概頂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魯雪夫。”

陳毅：“朱德我要問你：你是不是要搞政變？”朱德：“搞政變我沒有這個力量，也沒有這個膽量。”陳毅：“我看你是要黃袍加身，當皇帝。你還大力讚揚赫魯雪夫。你野心非常大。”烏蘭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還說，人蓋棺了是不能定論的。我們講赫魯雪夫反對史達林是錯的，是修正主義的。他說，咱們同蘇聯還是要搞好，他也離不開我們。”

薄一波：“朱老總經常講蘭花。他說，自古以來，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種蘭花。”

朱德：“說到現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說黃袍加身。”

周恩來：“反對毛主席我都領導過。甯都會議也是我領導的。雖然弼時同志

從後方來了，因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員代替了嘛。這是我一生最大的錯誤和罪惡。王明路線我也犯了，四中全會我也參加了。所以我最大的過錯是 1931 年到 1935 年遵義會議這四年之長。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後洛川會議，然後王明回來。1937 年底到 1938 年武漢時代，這都是路線性質的嚴重錯誤。當然還有其他錯誤。解放後還犯過反冒進錯誤等等。這幾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至於朱德同志的賬那就更多了。從井岡山一直打到梅縣，都是盲動主義、軍閥主義、流寇主義。然後是立三路線，你也犯了。然後是王明路線四年，然後又是洛川會議。那時王明沒回來，那還不是反對毛主席，你沒有領導？然後王明回來。第二次王明路線一直到六中全會，以後還有一些“殘餘”。幾十年歷史，朱德同志跟張國燾鬥爭，前一半應歸功於劉伯承的推動。如果沒有劉伯承在那裡，黃袍加身，你頂得住嗎？後一半是賀龍同志，弼時同志，關向應同志的共同推動，才北上了。如果沒有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後，那多了。毛主席常說，高饒彭黃的事，你都沾過邊嘛。你到處發表意見，是一個危險的事。……我們不放心，常委中有這樣一個定時炸彈，毛主席也擔心。毛主席說過，你就是跑龍套，可是你到處亂說話。你要談話，得寫個稿子，跟我們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義，就是有錯誤嘛。我當著資產階級國家的元首尼雷爾的面說：南昌起義，我有錯誤。他聽了很為驚奇：你還有錯誤？那時錯誤嘛，城市觀點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對你（朱德）的不滿告訴大家，希望你們大家監督。”

最後鄧小平宣佈了中央對彭、羅、陸、楊處理的決定，與會者一致通過。

人們不難理解林彪對朱德“置於死地而後快”的兇狠。因為朱德曾是紅軍的司令，林彪只有通過打倒他來建立自己在軍內的最高威信。然而，會議的主持人

不是林彪，也不是“四人幫”，卻是“文革”黨內的最大受難者劉少奇。對朱德批鬥最凶最狠的也不是康生和“四人幫”，而是中共至今仍要維持高大完美形象的陳毅和周恩來：他們甚至無中生有地指責朱德“要搞政變”、“要黃袍加身，當皇帝”、“是定時炸彈”。另外，積極參與批判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們，如薄一波、烏蘭夫、張鼎丞等人，也無一不是後來的文革受難者和中共今天的“革命”元老，和中共有關“文革”造孽者林彪、“四人幫”毫無瓜葛。如果公開了這些人在“文革”發動中的積極主動地批鬥別人，尤其是對憨厚老實的朱德元帥無限上綱、狠鬥惡打的言行，怎麼還能把罪責往林彪、“四人幫”身上一推了之呢？

看完這個記錄稿，最令人心酸的是 80 歲的朱德在林彪和陳毅咄咄逼人的“有野心”、“要黃袍加身，當皇帝”的質問下的囁嚅自辯：“我 80 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說黃袍加身。”——這點淺顯的道理，難道所有這些政治局委員們都不懂嗎？既然彭、陸、羅、楊都已揪了出來，還有誰是毛澤東所說的“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呢？為了不成為被打擊的靶子，他們一定會即刻表現出對毛澤東指示的無條件的擁護，一定會製造出一個“階級鬥爭”的目標來表達他們對最高領袖指示的堅決擁護、聞風而動的。其潛意識中的目的，自然是害別人、保自己。

據當時的華北局負責人李雪峰回憶，他和與會代表在 5 月 18 日聽林彪的“政變經”講話時便知道矛頭所指是劉少奇：“他沒有點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劉少奇。劉沒有講什麼”。陳伯達在獄中回憶說：“到 1965 年 12 月，我才從毛主席的談話中知道，（整個）戰略部署的鬥爭是對劉少奇的。當時除了林彪、江青、總理、康生、謝富治、汪東興和我之外，幾乎沒有人知道”。可見，毛並沒有佈

置任何人去批鬥朱德，批鬥者也心知肚明朱德並不是毛所言的“赫魯雪夫那樣的人物”。那麼，為什麼最後還會是他成了眾口一詞的批判物件呢？

從上述記錄稿的開卷說明中來看，批鬥的直接起因是朱德“因為對批判彭羅陸楊持消極態度而被責令作檢討”。這說明兩個問題：一是所有的與會者，包括後來被打成彭羅陸楊“黑後臺”的劉少奇和鄧小平，都對這一冤案的態度要比朱德無情堅決的多。這正說明了黨內鬥爭的毫無人性人情的醜陋風氣：只要某人一“出事”，不管他是誰，不管是自己的老部下還是老朋友，也不管他們之間有多大的情誼，這個人便會即刻成為眾矢之的，人人喊打、頃刻為人拋棄。二是如果有什麼人膽敢“持消極態度”（如朱德那樣）不肯助紂為虐，以鄰為壑、落石下井，那麼這個人也會立刻成為人人喊打的眾矢之的。如果說林彪的“政變經”是為了造成一種發動文革絞肉機所必需的恐怖氣氛，那麼幾乎所有政治局成員對朱德的批判正是大力地推行和蔓延了這種恐怖氣氛，推動了文革絞肉機的轟然起動。

在朱德頭上開刀，是“柿子挑軟的捏”：既可以表達自己對最高領袖毛的忠心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的擁護，又沒有任何在未來派系鬥爭中受到報復的危險性。從這一點上來看陳毅等人的醜惡表演，便不難理解個中奧秘了。另外，在井岡山和紅軍時期的所謂“反毛”錯誤，其實陳毅比朱德要卷得更深。陳毅對朱德所謂歷史問題的“很激烈很長”的發言，以及他多次對朱的極端反常的“黃袍加身”的責問，更包含著某種“先發制人”地歪曲歷史、推卸責任的卑下。從這點上來看，陳毅何止是被動地捲入文革，完全是主動地通過批判他的老戰友朱德，歪曲歷史事實來表達對毛的忠心。如此，毛在文革中一再保陳也就不難理解了。

與陳毅相比，周恩來的演技要爐火純青得多了。他對朱德的批判從自己與

“朱德同志一起”的“反對毛主席”的錯誤誠懇地檢討起，但兇狠的結論卻是“至於朱德同志的賬那就更多了”。周竟把朱上綱上線為“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在政治局常委中的“一個定時炸彈”。周對朱德的痛下針砭，正是他向毛又一次表示了忠心。

劉少奇系的幹部在朱德問題上的表演更具悲劇性。劉的幹將薄一波把朱德種蘭花污蔑成政治問題。鄧小平 5 月 31 日急忙趕到《人民日報》改組領導班子。劉和鄧小平一起在 6 月 27 日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講話，極力提倡對毛的個人崇拜，鼓吹林彪的“政變經”。劉還對他的親信彭真等人說出了這樣的話：“彭真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就反對周總理，也反對陳毅、小平同志，也反對我。在我面前搞兩面派，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彭真是長期隱藏在我們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者”。劉的政治經驗和權術水準決不在與會者之下，他決不會沒有一點感覺。但縱觀歷史便不難明白，劉對毛的攻擊一貫採取犧牲他人和以比毛更為極左的殘酷鬥爭去迎合的“禍水他引”的策略。“四清”運動時，毛對他不滿，劉便立刻搞出“桃園經驗”，搞得比毛還左的。他和鄧小平拋出彭、羅、陸、楊，主持對朱德的批判，都是為了犧牲別人去填飽毛的政治絞肉機。一言以蔽之：害別人、保自己。

這份緊鎖在中央檔案館裡的記錄稿說明：“無產階級革命家們”從來就沒有人反對過文革和任何一種殘酷的“階級鬥爭”。有的只是在毛獨面前的爭先恐後的表忠心和比賽他們的“革命性”。更為醜陋的是，這種表忠心和比賽“革命性”的行為是以出賣和犧牲戰友、朋友、親人和無辜者為必要前提的。可悲的是，這種毫無原則的“害別人、保自己”的行為，在中共黨內已由恐懼到麻木，由麻木到蔚然成風、最後到了見怪不怪集體無意識的地步。

其實，朱德曾是一位被毛澤東擔心的人物。朱德一直被視為“老右”。1956年他率中共代表團列席蘇共 20 大——會上赫魯雪夫做了反史達林的秘密報告。朱德發電報回北京，表示中共也應擁護蘇共決策，也應反個人迷信。毛見電報後生氣地說“朱德糊塗，朱德和赫魯雪夫都靠不住”。解放後朱德基本上是掛名的兼職，以明哲保身的方式混日子。丁抒曾描述到，在大躍進中“另一位副主席朱德，人稱朱總司令，也處於類似的‘不能說話’的境地中。一位四年前解甲歸田的副軍長楊增華特地從湖北農村跑到北京，找到朱德說：‘總司令，我來討個命令，鄉里興不得煉鐵，也吃不得食堂了。把老百姓都搞苦了。你給我一句話，我就走。’朱德將手搭在他肩上，為難地說：‘我一定把你的意見向黨中央反映，但是我們都無權違背中央的方針。’‘那我要給中央寫信’，楊說，‘我要問一問，是誰興的這些尖板眼！’‘這不是你的事！’朱德不高興了：‘太太平平地過你的日子，種你的田吧！該說的話我都說幹了。’‘沒法子想了嗎？’‘好自為之吧。’朱德深深地歎了一口氣。”

廬山會議上朱德說過“食堂全垮了也不見得就是壞事”，“吃飯不要錢那一套，行不通嘛”一類的發言，也成了批判的靶子。毛曾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張聞天、李銳是右派，朱德也是右派（彭程、王芳《廬山·一九五九年》）。徐向前回憶說：“廬山會議期間，朱德同志因實事求是地反映人民疾苦，對大躍進中的某些做法提出不同意見，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但他“以大局為重，泰然處之，寧肯忍受委屈而決不怨天尤人”（1986年11月30日《人民日報》海外版）。1959年10月毛將朱德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檢討批轉給全國縣團級黨委，顯然是要打擊其威信。1960年3月朱德在其老家四川儀隴與父老同喝食堂“清薄的稀飯”，“難過得許久說不出話來”。在大災荒期間，朱德在中南海挖野菜，對國

內的災情憂心如焚。儘管他每年多次下基層，“對中央內部的事情卻知道甚少，他也不打聽”。

文革期間，毛澤東將朱德定位為“中國頭號大軍閥”，曾被紅衛兵揪鬥。可是朱德的威望仍然依舊。毛還是保下了朱德，稱“對朱總司令還是要保”，“朱毛，朱毛，我就是豬耳朵上的一根毛”，但朱德基本上還是處於“不能亂說亂動”的境地。

中國三巨頭周朱毛皆去世於 1976 同一年裡，這有點不尋常。周 1 月 8，朱 7 月 6，毛 9 月 9。在 1976 年毛澤東生病奄奄一息的時候，年逾 90 的朱德身體仍然健康。朱德在會議上對江青說：就是主席死了，也輪不到你；還有我呢。過了不久，6 月，朱德獲口頭通知，於某日下午二時半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澳大利亞總理。朱德習慣地提前到達，下午二時便在會場等候。天氣炎熱，空調卻沒開，這對朱德倒沒什麼，因為當時他家中也沒安空調。後來空調開了，時間過了很久，外賓卻總等不來。去問，說是時間改了，改成四時半（事後去查，日程一開始就是定為四時半，從未有二時半之說）。朱德只好老老實實地等下去，可是空調越來越冷，整整受凍近兩個小時。朱當晚發病拉肚子，病情重到不得不去 301 醫院時，醫院卻無法從中央保健局調來病歷——兩日前病歷被人調走。臨床醫生在沒有病歷情況下，依常規開了藥，朱則病情日重，終於十數日後去世。當日的那位臨床醫生，後來突然死亡，——那是後話。其實朱德是被毒殺的，死後全身焦黑，典型的劇毒。皮定鈞中將因窺測到奧秘被暗殺。以毛澤東借四人幫為首的朱德治喪委員會規定，在舉行朱德的追悼會時，誰都不准瞻仰朱德的遺容。參加朱德追悼會的中央領導、生前戰友、親朋好友均遵守這條“鐵的紀律”，只有二個人不遵守“紀律”。一位是從朝鮮專程趕來奔喪的金日成，另一位便是福州軍區

司令皮定鈞中將。皮定鈞天不怕地不怕，你不讓我看我偏要看。不看不知道看了嚇一跳。揭開朱德身上覆蓋的黨旗，在腥紅的黨旗下，朱德面容發黑，裸露的雙手也焦黑焦黑，皮定鈞心中有了數，次日不聲不響帶了秘書、警衛和陪送的八三四一部隊警衛乘專機返回福州。飛臨福建上空時，座機撞向漳浦縣境內的灶山，機上人員無一生還。皮定鈞遇難那天天氣晴朗，灶山僅高四百公尺，正常飛行不會撞山。事件發生後漳州軍分區派出五十多名軍人會同漳浦公安局長以及二名蘇聯專家（飛機為前蘇聯製造）在十多公里範圍內地毯式搜山，搜遍一草一木難覓撞山痕跡。機上死的除皮定鈞外，還有皮定鈞的秘書和衛士三人，正副駕駛員以及八三四一部隊二人。除正副駕駛員外，其餘七人中有六個人的佩槍曾經駁火。張愛萍在 301 住院養傷期間，有人給他吃了一副湯藥，若不是當時負責警衛的趙某搶救及時，一定也死於非命。朱家總覺得朱死得不明不白（可能是捕風捉影），康克清總說，汪東興一日不開口，真相一日不得白。那時老毛心想，我死豈能讓朱德周恩來活著？你們倆必須先死。

第 135 節 文革 50 天

自 1966 年 5 月到 8 月，劉鄧主持的中央批發、轉發過近十個有關文革的中央文件，其中點了近兩百名高級幹部的名，把他們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頭面人物”，責令報刊進行批判。他們中有有中宣部副部長周揚、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文化部副部長兼文聯副主席夏衍等等當時文化界的主要領導。僅在中南地區，被他們點名批判的就有廣東省作協副主席、《羊城晚報》副總編輯秦牧、中山醫院黨委書記兼院長柯麟、副書記兼副院長劉志明、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副校長何定華、前黨委書記朱劭天、武漢市文化局黨委書記程雲、文聯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聯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鄭州大學黨委書記王培育、副校長、省社聯主席郭

曉棠、廣西區黨委宣傳部副部長陸地，等。長期以來，人們一直錯誤地以為：這些黨內“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是毛揪出來的，其實對他們下手的是劉鄧。

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學系青年講師聶元梓帶領學生在北大校園裡貼出了一張大字報，指責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壓制對吳晗事件的討論，並號召一切革命的知識份子參加戰鬥。大字報很快被學校撕掉了。當天下午，全北大包括北大附中召開了內部廣播大會，陸平講話說：現在右派又開始向黨進攻了，全校師生要奮起反擊。相關人員受到了處罰。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周恩來說：“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不是掃一切幹部，而是掃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壞、右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就是文化革命的物件。

當晚八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將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抨擊北大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的大字報全文播發，毛稱這張大字報是“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

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支持聶元梓大字報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號召不管黑幫“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都要把他們“徹底摧毀”。6月2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用“紅衛兵”名義貼出的第一張大字報的標題是：“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該大字報說：“凡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不管他是什麼人，不管他打著什麼旗號，不管他有多麼高的地位，統統都要砸得稀爛。”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稍後作的“造反歌”詞，則是“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各省委、市委為了應付中央，也為了保護自己，紛紛丟車保帥，拋出一些幹部，說他們是“走資派”，作為批判的靶子。因為是“文化革命”，文教界首當其衝，各大學的校長或黨委書記便成了運動的頭一批鬥爭物件。繼北大

的陸平、彭佩雲被宣佈為“反革命黑幫”之後，北京和各地眾多大學的書記、校長紛紛倒臺。

為了取代已爛掉的各大學黨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依歷次政治運動的辦法，向各大學和文教單位派出暫行黨委職能的工作組。1966年北京60所高校中有47所派了工作組。北京市各中學的工作隊是由團中央系統抽調了1500多名幹部組成的。僅在北京市的文教機關，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隊，其中僅清華大學就派出了5百多人的龐大隊伍。

劉少奇派工作組到大學和中學，就是為了貫徹“5.16通知”的精神，到教育界從“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那裡“奪權，並以中央八條（內外有別、不上街、不遊行等）作為約束學生行為的規範。這引發了激進學生和工作組之間的矛盾。學生指責工作組壓制革命，工作組指責這些學生干擾運動的主攻方向、別有用心、對抗黨的領導。於是校園裡出現了攻擊工作組的大字報，個別院校甚至發生了趕工作組的事件。對此，劉鄧遂立即責令工作組展開“反干擾”運動。“反干擾”運動的具體作法就是給群眾進行“左、中、右”排隊、把敢於給領導提意見的人打成“右派”、“反革命”、整他們的黑材料等等。同時，工作組組織了以那些享有特權的幹部子女領導的學生組織，試圖將毛所攻擊的“當權派”的目標轉向“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和那些階級出身不好的人身上。

西安交通大學率先掀起了造反的旗幟，當工作組開進交大時，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到一個頤指氣使的女大學生身上。她叫李世英，是“鬧事的尖子”，寫了20多張攻擊校黨委和省委的大字報。工作組組織其他學生寫大字報對李世英進行批駁，罵她是“美女蛇”，隨後工作組索性逮捕了她，並將她和另外一批學生頭頭戴上高帽子遊校批鬥。6月9日中午，李世英從關押她的房間窗戶裡跳樓自

殺，幸好自殺未遂。後來，毛澤東稱李世英為“學生領袖”。

6月8日，北京郵電學院發生了驅逐工作組事件。繼北京郵電學院趕走工作組之後，幾乎所有學校都出現了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許多紅衛兵引用毛澤東《送瘟神》的詩詞，要操場上、飯廳前焚燒紙糊箴紮的“瘟神”，高唱“紙船明燭照天燒”的語錄歌。

北京中央財政金融學院發生了“十號事件”。6月10日，金融系十名青年教師和系裡的一部分學生組織群眾集會，把矛頭指向了商業部派來的工作組。院黨委陳如龍和工作組把該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工作組召集金融系的教師幹部在下午和晚上連續兩次組織鬥爭會，實行逼供信，強迫造反師生承認是“反革命”，交代“反黨綱領”。據當事人的控訴，在工作組和校當局的煽動蒙蔽下，“不明真相的群眾不分晝夜到我們宿舍圍攻、聲討、鬥爭、示威，在樓道走廊、宿舍內外、床上桌子上、書上圖片上、抽屜裡以至煙盒火柴盒上，到處貼滿了‘打倒XXX’，‘反革命’，‘反黨分子’，‘混蛋’等標語、口號，甚至把標語、漫畫貼在我們背上，對我們實行體罰和人身污辱”。“晚上一點鐘以後，還有人每過一會來敲打一次門，不叫我們睡覺。他們還讓同學晝夜站崗放哨看守我們，甚至拿著木槍、木棍看著我們，對我們實行隔離，不准我們找人談話，不准我們出外買紙煙，監視我們的一切行動。當我們向他們提出了強烈抗議後，他們還說什麼這是‘群眾運動嘛’，‘是可以理解的’”。

北京大學是全國最早派進工作組的。工作組6月初進校後，立即“揪”出了一大批人鬥爭，很快發生了教員自殺的事情。

6月18日，在北京大學發生了未經工作組允許的毆打“黑幫”的事件，後被稱為“6.18事件”。6月18日，北大工作組召集全校師生開大會，紅衛兵們

根本不予理睬，在 38 樓設置“鬥鬼台”、“斬妖台”，揪出以陸平為首的 40 多個“黑幫分子”，掛牌子、抹黑臉、戴高帽、罰跪、遊鬥、往頭上扣字紙簍、駕噴氣式飛機……“6.18 事件”的受害者胡壽文老師那時是北京大學生物系講師。那天幾個學生沖到他前面，把一根繩子往他脖子上一套，拖了他就走。胡壽文那時 35 歲，腿腳還很靈便，但他跟不上學生的速度，跌倒在地，那幾個學生繼續拖他，繩子勒住他的脖子，胡壽文不能喘氣，幾乎昏死過去，他滾爬中用雙手使勁拉住繩子，才稍微鬆弛一點繩子的緊勒，沒被勒死。

雖然那天被暴力鬥爭的人，也都是工作組的攻擊對象，但是北大工作組不允許未經過他們批准的“批鬥”行動。工作組為此寫了第九號簡報，報告他們如何制止這種現象。劉少奇向全國批轉了這個簡報，並且寫下批語說：“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這個批語表明，劉少奇不反對“鬥”，但反對“亂鬥”。

北京林學院“6.20”事件圍繞一份《談話紀要》的文件展開。6 月 20 日清晨，林學院學生蔣書銘、曾憲均五人根據訪問新市委接待站大學組許克敏後所得記錄，整理成大字報《與新市委許克敏同志談話紀要》（也稱《22 個問題》）。這份大字報回答了當時運動中所提出的一些問題，深受群眾歡迎，廣為傳抄，不脛而走，到六月底，就貼遍了哈爾濱、呼和浩特、上海等 34 座大中城市。這份大字報，被薄一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綱領”、“大毒草”，聲言要“消除流毒，肅清影響”。大字報的作者、林學院的五位學生被打成“反黨小集團”，遭受長期的殘酷鬥爭。據此，薄一波把林院定為“反干擾”的重點學院之一。7 月 9 日，工作組召集十二個院校四千餘人參加的“批判反動的二十二個

問題大會”，鬥爭蔣書銘等人達八小時之久，並宣佈“取消蔣書銘等的預備黨員資格”。

清華工作組把清華大學轉抄這份大字報的三個人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教師史 XX 因翻印《談話紀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據不完全统计，四千餘人因傳抄這張大字報而被打成‘反革命’，四人被逼自殺身死，二人吐血，二個人被逼死。”

這張大字報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不過是“對出身不好的人更要歡迎他們揭發問題”、“有人盲目地擁護黨委，以為通過運動可以入上黨，或當個好黨員，那就倒楣了”等話，以及把運動的政策向群眾公開、和群眾直接見面等。10月24日，在中央文革的主持下這張大字報才徹底平了反，被打成‘反革命’的大字報作者和轉抄者才得到了解放。最後，“迫使北京林學院原工作組組長賀 XX 承認錯誤，北京市委對錯誤處理‘二十二個問題’作了公開檢討，收抄回一部分‘黑材料’，給蔣書銘等同志恢復和補發了助學金。”

清華大學 20 歲的學生蒯大富 6 月 21 日在一張大字報上寫道：“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奪權。從前權在校黨委手裡，我們和他們鬥，把它奪過來了。現在，權在工作組手裡，那我們每個革命左派就應該考慮，這個權是否代表我們？代表我們則擁護，不代表我們，則再奪權。”

批語轉到參加清華工作組，王光美指出：右派學生蒯大富要奪權。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打電話給工作組指示反擊。6 月 24 日工作組組長葉林指出“蒯大富向工作組奪權是一種反革命行為”。6 月 26 日，清華園舉行了“擁護工作組”的示威遊行。師生們高呼“無限信賴工作組”、“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黨”等口號。根據劉的指示，清華工作組進行“反蒯鬥爭”，蒯大富多次被批鬥並被關押 18

天，開除團籍。挨鬥的學生領袖中，有一人自殺身亡。

6月24日，在清華附中貼出了《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報，這份戰鬥檄文似的紅衛兵宣言一經貼出，迅速引起了巨大反響。後來，黨報黨刊曾予以全文轉載，毛澤東對該文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文章中他們大聲疾呼：“修正主義統治學校十七年了，現在不反，更待何時？”排炮般的驚嘆號和問號讓人感到觸目驚心：“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我們說，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說，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一句話，敢造反。”

工作組看了大字報，覺得難於理解、不可思議。現在是共產黨的天下，造誰的反呢？他們認為“造反”這個口號在社會主義中國不適用，是不確切的或者說是錯誤的。因此，雙方開始了新一輪的爭論。紅衛兵招來了更大的打擊。地質學院附中和25中的紅衛兵組織被定為“反革命集團”，強行解散，大批紅衛兵被戴上高帽子遊街。

於是，清華附中紅衛兵于7月4日和7月27日又分別貼出了《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和《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並且引用毛澤東語錄為他們正名：“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下一次辯論的會上，紅衛兵明確指出他們造反是遵循毛澤東的教導，在毛選某頁上。工作組的人不太相信，毛主席怎麼會說這樣的話？他們翻開毛選，果真如此，上頭白紙黑字印得清清楚楚，造反有理。工作組只好目瞪口呆，無話可說。

以劉鄧為首的“中央”在全國機關、企事業單位等所有社會單元細胞中展開了第二次“反右”運動。6月10日中央會議上，劉少奇提出“這次運動可能和

1957年差不多，要打擊三、四十萬個右派分子”。這第二次“反右”比九年前的第一次“反右”更為惡劣、兇猛。它的打擊面比第一次反右廣泛得多，被打擊的不但有知識份子，而且還有許多工人群眾。在第一次“反右”中，將某人打成“右派”的根據主要是他“鳴放”會議上的公開言論來批鬥。第二次反右根本沒叫人說話，而是翻檔案。誰的檔案黑一些，誰就是；根據某人的家庭出身、個人成份就認定此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或搜集某人平時有什麼“牢騷怪話”，私下有些什麼“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黨的領導”的言論，以此把他打成“小吳晗、小鄧拓”、“仇視黨、仇視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4月中旬，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武漢洪山賓館會議會上提出了文化大革命是“四清”加“反右”的觀點。7月3日，王任重和陶鑄起草了《給湖北省委的信》，信中說：“首先打擊最猖狂最兇惡的敵人，即首先打擊大多數群眾最痛恨的敵人。……有的是幹部、教師和大學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賊先擒王，槍打出頭鳥……學校可以把最壞的右派學生揪出來集中地鬥，打掉他們的氣焰”。

武漢大學工作組的負責人提出：“文化大革命是57年反右的最高階段”。武漢大學“全校幹部和教師（總數是1242人）被打成‘黑幫’、‘黑線’的232人，黨支部副書記和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幹部被打成‘黑幫’的108人，有4個單位總支的一般幹部被100%打成黑幫或靠邊站。工作組拋出武大‘三家村’以後，又在各系各單位大揪小‘三家村’，有的單位硬性抓出三個來湊成一個‘村’，全校有大小‘三家村’十多家，總務處一個單位就有四個‘三家村’，修繕組、機械廠的工人也成了所謂“三家村”的大老闆。”

一起駭人聽聞的事件發生在武漢墨水湖中學。六月初，該校師生蕭維業等人寫大字報揭發學校當權派壓制學生革命的行為，遭到學校當權派的威脅；後來工

作組進校，由王任重親自出馬，把師生的行動看作是“反革命階級報復”、“反革命暴亂的典型”。6月21日，學校工作組接到市委的指示，第二天就把這些起來造反的群眾打成“反革命”，分別看押起來，組織群眾鬥爭。7月11日，公安局逮捕了他們，關進武漢監獄，先後審訊了六次，威嚇他們說：“你們有兩條路，如果不承認，等著你們的就是棺材、監獄、判無期徒刑，承認了你們是反革命，你們就有活路。”不久，他們就被分別判刑，其中有的被判處死刑緩刑兩年，最小的3個16歲的學生，也被判刑五年或三年。同時，工作組根據王任重的指示，舉辦了“武漢墨水湖中學現行反革命罪行展”，把造反群眾說成是“假左派、真右派”、“法西斯暴徒”等等。這個展覽會展出了兩個星期，在武漢市造成很大影響。王任重還親自指示，要為這件事寫社論和報導，武漢市長親自審稿，市委機關刊物《支部生活》已排了版，《公安報》搶先登載，還計畫8月5日在漢口新華路體育場開公審大會。

劉少奇在批轉中南局的報告說，在中學生中間和在大學生中間要抓1%的右派。當時的中學生，中國是好幾千萬，高中生大概就有兩千萬，大學生150萬。百分之一就是210萬。57反右是55萬，最後是搞了300萬。如果在在中學生和大學生中間搞210萬，加上工廠和社會上，那可能就搞出個1000萬右派。所以，劉少奇文革路線很成問題。

北京。6月9日，第一批工作組進駐北京師大一附中。當時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是該校高一學生，她可以經常向劉少奇彙報情況，而劉少奇也根據女兒的彙報，做出指示，讓劉平平轉達給工作組。她最早開始在中學裡攻擊學校校長兼黨委書記劉超，並當上了該校文革委員會的頭頭。6月17日以勾德元為首的新工作組進校，新工作組進校不到十小時，就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宣佈：“我們已經掌

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團‘三家村’的全部資料，師大一附中，四類學校，黨支部是黑黨支部！”兩天後，劉少奇親自向工作組下達命令，定了校長兼黨委書記劉超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並說：“敵人占 5%是指全國，具體到你們學校和黨支部，那就不行了！”於是，該校將近 90%的幹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幫分子”，77%的班主任被圍攻，他們被迫進行非法的長期的“勞改”，以至受毒刑拷打。

6 月 20 日，師大一附中的學生陳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幹出身、中共預備黨員）貼出題為《揪出鑽進我們肝臟的牛鬼蛇神！》的大字報，認為工作組“盜用黨的名義，利用職權，進行一系列反黨反社會主義勾當”，“千方百計地製造糾紛，煽動、挑撥、好象對待敵人一樣鬥爭革命同志，轉移群眾的鬥爭視線”。大字報貼出的當天，劉少奇接見了工作組組長勾德元等四人，說：“寫大字報的人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大字報誰都可以利用。現在人家向你們進攻，這好嘛。敵人出來了，這個蛇出洞了，你消滅他就容易了。”

從 6 月 24-30 日，根據劉少奇的指示，一附中工作組有計劃地組織了對陳永康、何方方等學生的三次大規模的鬥爭會，每次都有幾百人參加，僅第一次鬥爭會就開了 8 小時，鬥爭會還引發了工作組贊許下的武鬥。工作組 7 月 11 日向劉少奇彙報說：“陳、何等人經過我們三次大辯論，已打下了他們的氣焰，現在還在學校檢查。第二次辯論會有一個左派學生打陳一個嘴巴。另一名反工作組的學生，害怕辯論，嚇得跑回家了，三天沒來學校，還揚言要絕食、要以死來威脅我們。”三次鬥爭會後，全校 1 千名師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 150 名之多。有一個班還被打成了“右派班”，該班“只有一個左派，一個中間偏左，其餘全是右派。”被鬥的學生在學校遭到極端的歧視。

看看北京師大女附中。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在該校上學，小平通過鄧榕瞭解該校的運動情況。小平親自指示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把師大女附中當作運動重點。6月4日，團中央派出了中學的第一個工作組進入師大女附中，並公開宣稱“教師都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按法律應該坐監獄，應該判處死刑”、“教師是四清對象”、“學生都是修正主義苗子”。工作組進校後對教師進行排隊、整理材料，挑起了群眾之間、師生之間的對立，有的學生在教研組門上貼上“鬼齋”、在教師宿舍區貼上“狼狗窩”。

6月17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貼出了題為《工作組站在什麼立場上》的大字報，問工作組“是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資產階級保皇派”。在工作組的策劃下，當晚全校召開大會，就這張大字報展開了“大辯論”，不少學生跳上臺去大叫反工作組就是反黨等等，對造反學生的圍攻直到深夜十二點，而後又叫各班回去繼續和造反學生進行“辯論”。會後鄧榕趕回家向鄧小平彙報，鄧說：“反工作組不對，這符合了社會上反工作組的逆流。”小平一句話，導致了許多的學生被打成“反革命”，有的同學被逼出了神經分裂症。

鄧榕後來對師大女附中的五十天回憶到：“鄧小平多次和我說：要不斷地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選准打擊目標’。在我做大隊工作的時候，忠實地執行了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讓各班輔導員首先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實際上就是排‘黑名單’，找出依靠物件和打擊物件。有的班共分七、八類之多，開幾次輔導員會也都說各班誰是左派，誰是右派……。當時，一些班裡的領導小組成員出身不怎麼好，由於受反動血統論之毒害，我極端的唯出身論，滿腦子想得都是‘奪權’，在排黑名單之後，就大搞奪權鬥爭，想把各班都換上我們信任的人，熱衷於調查家庭問題，今天你是領導小組的，明天一調查

出你家有問題，就換掉。為了開一個改選會，商量半天，估計各種情況。惡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學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憤，然後再改選、換掉，完全是運動群眾。”

五十天內，女附中的幹部統統“靠邊站”，6個校一級領導幹部5個被鬥，6個教研組長也有5個被揪鬥，37個班主任有32個被圍攻鬥爭，教師被圍攻、鬥爭的占50%以上。

在“反干擾”時期，劉少奇的“工作組”製造了一系列冤假錯案，僅僅在6月下旬的20餘天時間裡，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統計，工作組把10211名學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師打成“反革命”。民眾和青年學生反“工作組”的情緒日益高漲。

7月初，劉鄧制定一個對中學幹部、教師進行“集訓”的方案，以便結束中學運動，儘快開學。集訓期間，全國的教師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殘，很多幹部教師講，去集訓就象進了“集中營”，有的教師說：“再過幾天，我就要被逼瘋了！”有的教師寫了遺囑、絕命書。

7月18日，毛主席在暢遊長江後，從武漢回到北京。當天聽取了江青等人關於工作組的彙報，看了一些學校反工作組的材料。

7月21日，毛就在他“對中央首長的講話”中說：“5月25日聶元梓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巴黎公社的宣言書，意義超過巴黎公社，這種大字報我們是寫不出來的。”緊接著，毛居然講了一個真實的小故事。他說：“……有幾個少先隊員給他們的爸爸貼大字報，說爸爸忘記了過去，沒有給我們講毛澤東思想，只是問我們在學校的分數，好的給獎賞……我叫陳伯達同志告訴這些小朋友：大字報寫得好。”毛不但發現了少年的“無知可用”，而且發現了自己的“神威所及”，他決心要利用了。“我要向大家講：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軍！

要把他們充分發動起來。……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的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有人天天說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而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為資產階級服務……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7月21日，陳伯達派中央文革小組長的年輕成員關鋒、王力趕赴清華大學，看望被王光美工作組關押的蒯大富，表示慰問和支持。

7月24日上午，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會議，作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決定。毛澤東說：“不要搞工作組，不要發號施令……”

7月26日，毛澤東乾脆下了這樣的斷言：“全國95%的工作組犯了方向錯誤。”

7月26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四下北大，召開了第二次萬人辯論大會，在張承先的安排下，李洋洋代表三十一名高幹子弟（包括毛澤東的兒媳韶華）聯合發言，“給工作組唱讚歌”，認為工作組的錯誤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但遭到另一些人的批駁。江青在大會上告訴大家：“昨天同志們遞上來的條子，毛主席都一張一張地看了。毛主席最瞭解群眾，最關心群眾，最支持群眾革命行動！”這時全場情緒激動，口號四起。接著陳伯達講話說：“我們建議撤掉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這是一個阻礙同學們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組。”

7月29日，人民大會堂召開了“北京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在會上，劉少奇在派工作組的問題上作了檢查，批評自己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隱身在幕後的毛澤東聽了嗤之以鼻地說：“什麼老革命，是老反革命”（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455頁）。1966年不同尋常的50天至此結束。

第 136 節 橫掃一切的紅色恐怖

6 月間，打人之風剛開始盛行，北京新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在這個最高指示下，他們將打人提升為紅色恐怖。

7 月 28 日，毛的妻子江青在北京海澱區中學學生代表會上轉述了毛關於於暴力行動的話：“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江青還說：“我們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嘛”。接著，江青等來到北京大學，在全校萬人大會上宣佈：“6.18 事件”是“革命事件”，工作組錯了。

8 月 1 日，毛澤東致信清華附中紅衛兵，對他們的兩張大字報：《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和《再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表示熱烈地支持，支持他們起來“造反”。在這封信裡，毛還特別提到了北大附中的紅衛兵彭小蒙的名字。而這個彭小蒙，就是 7 月 26 日在北京大學當著江青和一萬多人面，用銅頭皮帶打了北大“工作組”組長張承先的那個女中學生，是她開了在大會主席臺上公然打人的先例。後來，毛澤東還把這個在大會主席臺上開了打人先例的彭小蒙請上了天安門城樓，與自己一起檢閱他的紅衛兵們。此信作為重要文件，在當天開幕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印發。而紅衛兵也自此由地下轉為公開，毆打老師以及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也迅速蔓延，“6.18 事件”被使用過的暴力手段被廣泛運用並且大大強化。前一階段被工作組“揪”出來的人首先遭到殘酷虐待和拷打。

毛在 8 月 4 日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譴責派工作組是“鎮壓學生運動”，“是路線錯誤”。在這次會上，葉劍英被“擴大”進來為毛助陣。當葉劍英說到“我

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麼牛鬼蛇神”時，毛聲色俱厲地指斥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林彪沒出席這次會。

8月5號毛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攻擊以劉少奇為首的一大批領導幹部在50多天裡“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劉當時不過是派工作組和轉發了一個關於制止亂打亂鬥的檔而已。派工作組本是得到毛同意的，可是毛不認帳了，讓劉、鄧承擔全部責任。這張大字報還提示說：“聯繫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這張大字報提出中央有另外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雖未點名，但明顯地是指劉少奇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一些領導人。8月7日全會印發了毛的大字報給各位代表。8月17日又以中央文件形式下發到縣、團級。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把林彪列在第二位、陶鑄列在第4位、劉少奇列第8位。當時包括林彪在內，中共有五位副主席。而陶鑄不是副主席。為了擺脫程式上的尷尬，在副主席周恩來的建議下，除了林彪其他人的副主席的頭銜都拿掉，這樣，林彪就成了唯一的副主席。

8月8日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因檔內容共分為十六條，因此又簡稱為“十六條”。文件說：“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十六條》規定這次運動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

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這個檔強調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這場運動要“敢”字當頭，不要怕出亂子，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等等。

8月4日，北師大女附中初二(四)班的紅衛兵，就用一根長繩子將同班10名“黑五類出身”同學的脖子，一個接著一個的捆成一串，在教室裡進行“鬥爭”。北京101中學的紅衛兵把校門分成一大一小兩個，命令“黑五類子弟”出入只許走小門，並稱小門為“狗洞”，以侮辱出身不好的同學。在北京第一中學，不但有由教師組成的“牛鬼蛇神勞改隊”，而且有一個由兩百名學生組成的“狗崽子隊”，這個狗崽子隊遭遇了本校紅衛兵的太多凌辱，甚至是下流的侮辱。8月5日，北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學生打死了副校長卞仲耘。她的先生第二天天就上街買了一部相機，將其妻卞仲耘被學生毒打致死的慘況全部紀錄下來，珍貴的文革紀錄片“我雖死去”就是根據他的攝影紀錄，在四十年後製作的。在卞仲耘被打死的第二天，該校學生排球隊長楊友麗，因遭到“鬥爭”和侮辱，服安眠藥自殺，幸而未死。清華附中的高一學生楊愛倫，因在學校被鬥爭和關押，而臥軌自殺，幸被撞成重傷。該校高二學生、“右派分子”的女兒郭蘭蕙，也因遭遇紅衛兵批鬥而服毒自殺，死時才19歲。北京西城區太平橋中學的一位年僅15歲的女學生，只因說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紅五類出身”，就遭到紅衛兵同學用銅頭皮帶和棍棒從下午一直打到傍晚，然後悲慘死去。北京市第27中學的一名初中學生，也因被指控在開會時把《毛主席語錄》坐在身子底下，就被本校紅衛兵在

教室裡將她毒打至死。中國人民大學附中一位“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學生甯志平，被紅衛兵關押在學校裡，連一隻耳朵也被同校的紅衛兵割掉了。北京第十三中學的紅衛兵不僅用一條鐵鍊栓在“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任春林的脖子上，還強迫他從家裡象狗一樣爬到學校的“紅色刑訊室”去領受毒打。該校還有一個所謂“黑五類子弟”、初中三年級學生武素鵬，竟然被同校的紅衛兵捆在一條麻袋裡，用民兵訓練用的木槍狠打，直到把他活活打死。在北京第六中學，出身于“小業主”家庭的高三學生王光華，因未得到紅衛兵的准許就去外地“革命串連”，回校後即就被關進學校的監獄之中被毒打致死……

8月初，佩戴有“紅衛兵”字樣的袖章的學生開始出現在北京街頭。“紅衛兵”最初指的是1917年蘇俄共產革命時的工人和士兵武裝。此時的“紅衛兵”顧名思義就是保衛毛的戰士。在毛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鼓勵下，短短幾個星期，全國每一所大學和中學都建立了紅衛兵組織。數以萬計的青年學生在“造反有理”的口號下，殺向了“資產階級權威”。

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學的紅衛兵擬就《最後通牒——向舊世界宣戰》，宣佈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理髮館、裁縫鋪、照相館、舊書攤……等等，統統都不例外。”一切外來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掃蕩目標。中學紅衛兵（加上少數大學生）殺向街頭，以打爛一切“四舊”物品為宗旨，把北京城內外砸了個遍。

6~7月的第二次“反右”運動，直接導致了8月以中共高幹子弟為骨幹的血統論紅衛兵所掀起的“紅色恐怖”狂潮。同時也證明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中共黨人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不惜犧牲普通百姓。其殘酷無情並不亞于毛。劉鄧們的子女繼承了父輩的未竟之業。這些自認為出身好的幹部子女發明了“血統論”，

即老子英雄兒好漢。他們在父輩的默許和支持下，開始用拳頭、軍用腰帶、棍棒來對出身不好的“黑五類”（從前的地主，富農和資本家的子女，以及知識份子的子女）進行毆打乃至殘殺。在這一期間，這批“血統論紅衛兵”的瘋狂殘暴完全超乎了人們的想像。“血統論紅衛兵”的暴行是極為令人髮指的。人們實在無法想像有什麼理由要對與自己無仇無怨、毫無抵抗力，匍匐在腳下的弱者施以鞭抽棒打，甚至活活打死。這種萬分野蠻的行徑是古斯巴達人和希特勒黨衛軍都做不出的。

紅衛兵復辟了“鎮反”運動中曾使用過的“強姦刑”。清華大學一些造反派捉住對立面頭頭的女秘書時，不僅逼迫她自己念認罪書，通過高音喇叭向全校廣播，而且有多名大學生、紅衛兵輪奸她。清華大學武鬥結束，工宣隊進校，在住人的教室裡，多次發現用過的避孕套。有的地方還鼓勵強姦黑五類的女兒和妻子，意在通過強姦來報舊社會的“階級仇恨”。

儘管“血統論紅衛兵”的瘋狂殘暴行為完全偏離了毛政治清洗的軌道，但毛一時並沒有制止它。因為這些瘋狂的青少年學生宣佈他們是毛的“紅衛兵”。他們在對“黑五類”進行狂暴殘殺的同時，口中高呼“毛主席萬歲！毛澤東思想萬歲”！就在這批中共幹部子弟紅衛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澤東作出了從未有過的舉動，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他們的代表。

8月18號，毛欣然的在天安門城樓上讓東北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打死卞仲耘的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給他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毛問她：“你叫什麼名字？”她說：“叫宋彬彬。”毛問：“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她說：“是。”毛說：“要武嘛！””，在“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的背景歡呼聲中，現場女播音員說：“敬愛的毛主席，您的話我們記住了。”宋彬彬改

名“宋要武”，她所在的北師大女附中，就是中共的皇家女子主學，也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毛終於公開號召“要武”了。為了搞亂天下，以便亂中奪權，他決心不顧一切。北京紅衛兵被派去全國教授如何打人，如何剃“陰陽頭”，如何叫挨打的人舔自己流在地上的血。據專家考證，宋要武還是文革中第一個打死人的革命小將，並且開創了文革武鬥和對黑五類大屠殺的先河。她與人作殺人比賽，有一紅衛兵打死了六人，她就打死八人。宋彬彬是打死老舍、打死儲安平的兇手。

宋任窮在任八路軍 129 師政治部副主任時，成為政委鄧小平的鐵杆死黨，成為鼓惑逼迫士兵充當炮灰的著名的政工首腦‘宋大牙’。文革開始，宋彬彬率領紅衛兵瘋狂打殺地富反壞右，乃秉承鄧小平宋任窮的意志，企圖引開毛澤東清洗功狗的屠刀。不幸，宋任窮還是免不了作為鄧小平的死黨被毛遠新取代。這段時間，李長春攀上了宋彬彬。1975 年鄧小平復出，宋任窮也在東北恢復當權，把 31 歲的女婿李長春提拔為副局級。1987、1989 宋任窮兩次立功打倒胡耀邦趙紫陽，李長春連升三級副省長、省長、省委書記，從遼寧經過河南、廣東‘轉官’，終於成為內閣九常委之八。

由於公安局長們擔心讓學生在街上隨意打死人，運動過後被追究。毛澤東於 8 月 22 日親自批轉了《嚴禁出動員警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文件，規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動員警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員警一律不得進入學校。除了……現行反革命份子，……運動中一律不逮捕人”。於是全國的員警都對紅衛兵行兇打人殺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最高指示”傳遍全國，殺戮在全國範圍進行。譬如廣州，有人“目睹七位右派朋友被打死”。全國在這場“紅色恐怖”被殺者應不下十萬。

對於紅衛兵任意打死人的情況，謝富治十分清楚。謝富治在會議上還說：“群

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

謝富治還召集各省、市公安局局長開會，說：“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們根本管不著。”一個省的公安局長問：“拘捕起來總可以吧？”

謝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來，你們能捕得光嗎？全國九千萬個紅衛兵，到時，他們不沖你的安公局就好了。”他還指示“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

8月18日，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並再次表示支持紅衛兵運動。當時的天安門廣場上，是一望無際的人群。數百萬紅衛兵的口號聲驚天動地。

林彪在大會的講話中，表示堅決支持紅衛兵敢闖、敢幹、敢造反的“革命精神”，鼓動紅衛兵“打倒一切”，提出要“破四舊”，“我們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我們要掃除一切害人蟲，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林彪的指示無疑給紅衛兵們指明了鬥爭的方向，而且破四舊可以使紅衛兵從校園沖向社會，能充分體現紅衛兵的威風。狂熱的紅衛兵們迫不及待的行動了。

如果說“8.18”前，“文化大革命”還只是中國大地上滾動的、令人驚駭的陣陣悶雷，那麼在“8.18”後，它就成了把整個民族衝擊得暈頭轉向的狂風暴雨了，暴力大規模升級。一批教育工作者在學校中被活活打死，而且，紅衛兵進入機關和居民住宅，搗毀書籍文物，並且毆打虐待甚至打死和平居民。紅衛兵的行為得到了最高當局的熱烈支持。

從8月20日始，一些紅衛兵走上首都街頭，張貼大字報、集會、發表演說，散發關於破四舊的傳單，並打響了北京破四舊的第一槍。北京市第二中學3千多

名紅衛兵充當了“尖刀連”的角色，他們首先沖向市內各主要街道路口，張貼革命宣言《向世界宣戰》，其宣言中寫道：“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我們要批判、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所有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理髮館、裁縫鋪、照相館、舊書攤，統統都在當破之列。現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在衝擊著資產階級老爺們盤踞的各個陣地，資產階級的溫床保不住了！”

“我們要求在最短的時間內改掉港式衣裙，剃去怪式發樣，燒毀黃色書刊和下流照片。‘牛仔褲’可以改為短褲，餘下部分可以做補丁。‘火箭鞋’可以削平，改為涼鞋，高跟鞋改為平底鞋，壞書壞照片做廢品處理。

“我們要管。我們要管到底。我們一定要堵住一切鑽向資本主義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義的溫床，決不留情！”

破四舊從改名開始。紅衛兵在市民們的配合和支持下，將商店、工廠、學校、公社等統統改成具有革命意味的名字。“長安街”改為“東方紅大路”，“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為“反修路”，“王府井大街”改為“防修路”，“光華路”改為“援越路”，“王府井商場”改為“北京市百貨商店”，“東安市場”改為“東風市場”，“協和醫院”改為“反帝醫院”，“同仁醫院”改為“工農兵醫院”……。

8月20日傍晚，北京市25中、63中、15中、36中等其它中學的上萬名紅衛兵也開始動手了。掛了70多年的“全聚德”招牌被砸了個稀巴爛，正式換成了“北京烤鴨店”的新招牌；“亨得利鐘錶店”改名為“首都鐘錶店”，革命職工“無不拍手稱快”；當紅衛兵把沿用資本家名字命名的“順昌服裝店”改為“東風服裝店”時，街道上頓時響起一片掌聲，革命群眾齊聲高呼：“東風壓倒西風！”“毛主席萬歲！”……

8月2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1966年第11期發表了評論員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8月22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向全國報導北京紅衛兵的偉大功勳。

8月23日毛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我看北京亂的不厲害”，“北京太文明了”。《人民日報》發佈消息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浪潮席捲首都街道，紅衛兵猛烈衝擊資產階級的風俗習慣，廣大革命群眾最熱烈最堅決的支持紅衛兵小將的革命造反精神”。在消息旁邊還配以社論《好得很！》。在毛的支持下，在宣傳喉舌的助威下，紅禍迅速向全國蔓延開來。

新華社8月25日播發了一則新聞稿，詳細報導了“各地革命小將向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發動總攻擊”的情況，並且聲稱，紅衛兵破四舊“受到了廣大工人和貧農、下中農群眾最熱烈最堅決的支持。

破四舊的活靶子是那些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8月23日夜到24日晨，一些北京紅衛兵發出致各民主黨派的《最後通牒》，限令各民主黨派在72小時之內自行解散並登報聲明。民主黨派在京中央委員100餘人被紅衛兵鬥爭或抄家，占總數的2/3以上。其中民革中央委員31人，民盟36人，民進8人，農工民主黨8人，九三學社8人。工商聯僅在8月24日下午被揪鬥者就有13人。8月25日，各民主黨派機關紛紛貼出“通告”，聲稱“我們堅決接受紅衛兵的意見，從即日起停止辦公”。連宋慶齡也受到了衝擊。

民革中央副主席張治中的秘書余湛邦所撰《張治中將軍年譜》記載：“8月28日張治中從北戴河回京，回家不到2小時，紅衛兵即進門抄家。氣勢洶洶，咄咄逼人。以後又來了4次。由於中共中央統戰部事前已打過招呼，所以第一次張還能沉得住氣。第二次，紅衛兵指著張的鼻子質問：‘你是什麼人，是什麼歷

史？」張在久病之後，身體本已極度衰弱，至此再也忍不住了。他搖晃著顛巍巍的身子，猛然從靠椅上站起大叫：‘你去問毛主席去！你去問周總理去！’事後，張對家人和親信說：‘若干年後，這將成為一個大笑話！’”

當時正在病中的紡織工業部部長、民革北京市委主任委員蔣光鼐，是被一群女紅衛兵抄的家。這些女紅衛兵闖進蔣家住宅後，兇狠地叫蔣家的人全部集中到客廳裡，聽她們宣讀《告民主黨派最後通牒》。然後罵罵咧咧，東翻西找，把稍微值錢一點的東西都拉走了。

民盟中央委員、著名哲學家馮友蘭被紅衛兵抄家後，家門被貼上了“馮友蘭的黑窩”大字標語，兒女均被牽連受到批判，甚至連上幼稚園的小孫子也受到“退園”處理。

8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盛讚紅衛兵的“鬥爭鋒芒，所向披靡”，稱“一切藏在牆角裡的老寄生蟲，都逃不出紅衛兵銳利的眼睛。這些吸血蟲，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一個一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他們隱藏的各種變天帳、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衛兵拿出來示眾了。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勳。”這“功勳”中就包括對民主黨派人士的迫害。

民進中央常委、著名作家謝冰心被抄家後，紅衛兵辦了一個“抄家物資展覽會”，在展覽會文字說明中將謝冰心和丈夫稱作“吸血鬼”。

紅衛兵到民盟中央常委、著名建築學教授梁思成家中抄家，將他家西餐具中的果醬刀、餐刀、水果刀收到一起，說是“準備暴動”的罪證。梁妻林洙剛想聲辯，就挨了一耳光。隨後，紅衛兵又從梁思成已故前妻林徽因的母親房間裡搜出一把鑄有“蔣中正贈”字樣的短劍，當作梁思成藏有蔣介石贈劍“夢想變天復辟”

的罪證——其實那把劍是林徽因的小弟林恒在抗日戰爭中從航空軍校畢業時的紀念品，林恒在對日作戰中壯烈殉國了，痛失愛子的林母因而留下這把劍以作紀念。

在紅衛兵“破四舊”中受到迫害最為典型的民主黨派人士，大概要數曾任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員的“大右派”、經濟學家章乃器了。他在遭受紅衛兵衝擊後不久寫成的《七十自述》中記敘，這是他有生以來所遇到的最大的災禍，從8月24日到31日，整整八個晝夜，他在絕食中受到百般拷打，折磨他的方法有：用鋼絲包橡皮的鞭子打，劃了火柴燒手，用汽槍射擊頭面，用水壺灌鼻孔，強迫吃骯髒的食物，用油彩塗臉，用氨水灌鼻孔……

1966年8月29日，著名無黨派民主人士、86歲高齡的章士釗也遭到前來抄家的北京大學紅衛兵殘暴凌辱和折磨。

在上海，從8月23日到9月8日，紅衛兵抄家84222戶，其中高級知識份子和教師1231戶。上海郊區川沙縣有7800多戶人家被抄。在蘇州，被抄家者64056戶。浙江嵊縣，8千餘戶被抄。全國城鎮鄉村被抄家的總數當接近1千萬戶。各地所抄出的財物，大量是生活用品，有家俱、衣物、被褥、化妝品、鞋襪、毛巾、電視機、鋼琴、手風琴等等，一律置放在光天化日下，任憑風吹雨打，日曬夜露。破四舊後期，這些財物大多數被作廉價處理。

搜繳財產中，僅圖書、字畫、文物三樣就達17萬件以上，其中包括知名人士周瘦鵑視若生命的“飲馬圖”、“石孚”和“裂雲穿石”的三盆盆景。散存在各地民間的珍貴字畫、書刊、器皿、飾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在“破四舊”中，多少知識份子珍藏的孤本書和字畫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紙漿。章伯鈞家藏書超過一萬冊，被紅衛兵頭頭用來烤火取暖，剩下的則送往造紙廠打

成紙漿。

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徵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收藏的名字畫，只落得“四舊”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

杭州名學者馬一浮是中央文史館副館長，他的家被搜羅一空。抄家者席捲而去之前，他懇求道：“留下一方硯臺給我寫寫字，好不好？”誰知得到的卻是一記耳光。84歲的馬老悲憤交集，不久即死去。

著名作家沈從文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軍管會的軍代表指著他工作室裡的圖書資料說：“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沒有什麼不服”，沈答道，“要燒就燒”。於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說》在內的幾書架珍貴書籍被搬到院子裡，一把火全都燒成了灰。常和沈來往的畫家范增，無中生有地揭發沈一百多條“罪狀”，使沈在劫難逃，揪入牛棚。

1985年有數人一起訪問沈從文，說起“文革”中他打掃女廁所，在場一位元女記者動情地擁住他肩膀說：“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不想，83歲的老人當下抱著她的胳膊，嚎啕大哭起來，“哭得就像個受了委屈的孩子，什麼話都不說，鼻涕眼淚滿臉地大哭”。

新疆首府烏魯木齊新華書店的存書，被搬到大街上一把火通通燒掉。黑龍江省中蘇邊境上的嘉蔭縣，中學生沖進縣文化館，將戲裝、圖書搬到街上，全都燒成了灰。

周恩來對“革命師生”說：“獅子非搬掉不可，對獅子來一個最後通牒，連

我們這個(包括新華門在內)獅子統統搬掉了。對獅子下最後通牒，我是同意的，因為那獅子是封建產物。”

1964年毛澤東說過：“擺設盆花是舊社會留下來的，是封建士大夫階級、資產階級公子哥兒提籠架鳥的人玩的。那些吃飽了飯沒事做的人，才有閒工夫養花擺花。”1966年周恩來到毛澤東住處見不到花，毛說：他不喜歡養花，叫花工都搬走了。周回家後立即通知下屬，將兩間花房的花全部送到了植物園。

1958年青海部份藏民以“為民族、保宗教”作口號發動叛亂後，中共即亂捕亂殺，“把當地寺院基本摧毀掃光”，兩萬多藏民冤死獄中，幾占當時全國藏族人口的1%。導致1959年更大規模的叛亂。叛亂平定後，中共完全無視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在各藏區大肆拆寺院、鬥喇嘛、毀菩薩、燒經書。

1966年中央民族學院借用外語學院的操場召開萬人大會鬥爭班禪。會中曾強迫他吃屎，因為據說有人曾用班禪的糞便做成藥丸，給人治病。周恩來對西藏學生說：“達賴叛國……班禪其實和達賴一樣，但有區別，要反達賴就得利用班禪。現在農奴的逐步解放，不能不觸及到他們的利益。他就不幹了，寫出了萬言書，反黨。最近你們對他進行了三次鬥爭，很好。這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大革命，就是要把喇嘛制度徹底打碎，解放喇嘛。……現在，西藏正在破四舊、打廟宇、破喇嘛制度，這都很好。佛像，群眾要毀可以毀一些，但也要考慮保留幾所大廟，否則，老年人會對我們不滿意。”

從紅八月始，寺院、道觀和名勝古跡、字畫、古玩作為“封、資、修”立即成了紅衛兵們的破壞對象。以佛像為例，北京頤和園萬壽山頂有一千尊琉璃浮雕塑像，經“破四舊”，都五官不全，無一完好。八國聯軍的兵痞槍擊萬壽山琉璃佛像純為取樂，並不存心毀滅中華文化。而毛思武裝起來的紅衛兵砸佛像，目的

是剷除“舊文化”，他們在頤和園內仔細搜索，凡是畫了人物的，一律用白漆塗刷覆蓋，僅留下花草不予革命。全國都如此這般。

中國第一個佛教寺院是東漢初年在洛陽城外營建的白馬寺。寺院旁邊有個白馬寺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率領農民去革命，亂砸一通，一千多年的遼代泥塑十八羅漢被毀，兩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被焚。稀世之寶玉馬被砸爛。幾年後，柬埔寨流亡君主諾羅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馬寺，周恩來趕緊下令將北京故宮裡的貝葉經和京郊香山碧雲寺的清代十八羅漢運到洛陽，來個冒名頂替，才解決了外交難題”。

建于唐代的四川什邡縣慧劍寺，寺內有宋代畫像和明代高手畫的五百羅漢像。在“紅八月”中，那些珍貴的古代壁畫被灰漿塗抹而徹底毀掉。新疆吐魯番有個千佛洞，洞內壁畫是珍貴的藝術品。二十世紀初，俄、英、德等國貪婪的商人曾盜割洞內壁畫，賣到西方。那壁畫流失到國外，是中國的損失。但畢竟還珍藏在博物館裡，並未毀掉。而中國人自己幹的“破四舊”，卻將剩下的壁畫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乾脆將壁畫用黃泥水塗抹得一塌糊塗，存心讓那些壁畫成為廢物。所以文學家阿英（錢杏村）說：“過去帝國主義劫奪我們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夢想有朝一日全收回來。現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讓這些不肖子孫毀滅了，倒不如讓外國人保存起來，總不至於毀滅，還能留存在人間。”

山西代縣有個天臺寺，建於 1600 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間，塑像、壁畫甚為珍貴。雖然地處遠離縣城的山溝，‘破四舊’者不畏艱險，前去將塑像、壁畫一掃而空。……

1966 年的一天，康生要譚厚蘭去山東曲阜孔廟造反。譚厚蘭帶領 200 餘人，在曲阜召開了搗毀孔廟的萬人大會。從 11 月 9 日至 12 月 7 日，他們共毀壞文物

6000 餘件，燒毀古書 2700 餘冊，各種字畫 900 多軸，歷代石碑 1000 餘座，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物的國寶 70 餘件，珍版書籍 1000 多冊，這場浩劫是全國“破四舊”運動中損失最為慘重的。

陝西周至縣有兩千五百年前老子講經授學並留下傳世之作《道德經》的樓觀台。以他當年講經的‘說經台’為中心，方圓十裡之內，散佈著五十多處古跡，包括唐高祖李淵為他修的、迄今已有 1300 多年歷史的‘宗聖宮’。如今樓觀台等古跡被破壞，道士們則全都被迫離開。按教規，道士出家後永不得刮鬍子、剃頭。現在則被迫剃頭、脫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員，有的還成了當地農家的上門女婿。……山東嶗山道家聖地全被搗毀焚燒。……吉林市文廟是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破四舊中嚴重受損（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

王羲之寫下流傳千古的《蘭亭集序》的蘭亭不但被毀，連王羲之本人的墳墓也被毀掉，吳承恩的江蘇故居被砸了，吳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蘇東坡親筆書寫的《醉翁亭記》石碑被“革命小將”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

據同興撰寫的《十年浩劫——京城血淚》一文記載：北京市 1958 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來的 6843 處文物古跡中，有 4922 處被毀掉，其中大多數毀於 1966 年 8、9 月間的破四舊中。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市僅從各個煉銅廠裡就搶救出來各類金屬文物 117 噸；從造紙廠搶救出圖書資料 320 噸；從各個查抄物資的集中點挑揀出字畫 18.5 萬件，古舊圖書 236 萬冊，其它各類雜項文物 53 萬多件。

1966 年 5 月 15 日，毛澤東發出了“保衛首都”的指示。周恩來和葉劍英立刻上書毛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成立以葉劍英為組長，楊成武、謝富治為付組長，劉志堅、李雪峰、汪東興等參加的首都工作組，負責保衛首都安全工作，直接對中央政治局負責”。

5月16日宣佈打倒所謂的“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後，首都工作組採取了一系列“保衛首都安全”的措施，除了自5月18日起調63軍的189師和65軍的193師進駐北京各要害部門及所有的宣傳機關之外，工作組還有一個長期計畫，即通過公安局大規模遣返驅逐所謂的“成份不好”的居民。

1966年8月，北京由中共高幹子女組織的第一批“老紅衛兵”——“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是在周恩來的“親自關懷”下成立的；他們的“通令”是由周恩來的親信周榮鑫（國務院秘書長）、許明（國務院付秘書長）、李夢夫等人修定後公佈的。一個當年僅16歲的中學生對“紅八月”回憶：“1966年8月，北京工人體育場批鬥小的10萬人大會，我們學校的紅xx是召集人之一，因為他們組織的一個人挨了我的紮。在會上他們把我打得極慘，可當時在坐的中央首長包括周總理等沒一個人制止，由此開了全北京市的打人風。”周作為這些老紅衛兵、尤其是西糾的顧問，是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正是因為周恩來等領導人從不當面有力地制止他們殘害群眾，只是事後才馬後炮式地說幾句，才造成了他們在校園裡以“批鬥”為名殺戮教師；在社會上以“抄家”為名搶掠市民的財產，以“階級鬥爭”為名殘殺所謂的“牛鬼蛇神”；又以“遣返”為名，把近10萬居民強行趕出北京押往農村。

在北京的火車站給這些人設立了特別的入口。紅衛兵在那裡把守。很多人在車站被打甚至打死。這些人的傢俱都已經被沒收。有些人帶了衣服和做飯的用具。在廣安門火車站，他們帶的衣服被沒收（當時是夏天）。每人只准許帶一隻碗，一家人只准許帶一隻鍋，其餘的炊具都被沒收。有些人在去農村的路上被打死。比如，1966年8月29日，北京第八中學的紅衛兵在從北京開往長沙的火車上，打死了一個這樣的老年女人。1966年夏天，上海的人也曾經在火車站看到從火

車上抬下來的多具屍體，是在“遣返”路上被打死的人。

這些人到農村後，農村把他們當作專政對象對待。這些人中的一些，到了農村被鬥爭，而且沒有住的地方，沒有吃的東西，很快就死亡了。譬如：何潔夫是北京農業大學的職員，他的妻子高吉章是同一所大學的會計。他們夫婦被列入遣返名單之中，被遣送到廣西農村。1967年11月14日，何潔夫在村子裡被打死。他們的只有7歲大的兒子看到父親被活活打死，精神受了刺激，以致後來也不能完全恢復正常。

據中共中央1980年第77號檔中的附件材料所公佈的資料，1966年8、9月間的40天裡，僅北京市就打死了1772人！1966年8、9月間，僅北京市被趕出城市遣回原籍者就達到85198人。北京市家被抄的多達11.4萬戶。北京市抄家所抄走的黃金10.31萬兩，白銀34.52萬兩，現金5545.99萬元，文物和玉器61.36萬件，被沒收的私房52萬間。其中私人自住房82230間，共有124萬平方米的私房遭此厄運。

康生說：“天津呀、北京呀、上海呀、武漢呀，抄了資本家的家，光抄出黃金就是120萬兩，就是60噸；白銀12萬噸，這還不包括銀元。……據說有些紅衛兵拿過來一看，不知道這個是美元，就燒掉了一些……成績是偉大的。”目擊者稱，每次毛接見紅衛兵後，天安門廣場總是一片狼藉，在丟棄的鞋帽和紅寶書中，竟然夾雜著不少的金銀飾品。

在革命小將看來，金子是資本家或地主或任何反動派的象徵。北京有位叫何敏的女子，自己沒有金子，可她母親有金子，母親誤以為子女沒有問題，偷偷地將金子藏在了女兒女婿的箱子裡，沒告訴他們。何敏不知道箱子裡有母親偷放的金子。紅衛兵抄家時發現了金子，當場將何敏的丈夫打死，就地挖個坑埋了。何

敏則被送進監獄，判了十年徒刑，在關押了九年半之後，她在獄中懸樑自盡。

由於被強行抄家、毆打和驅逐的近 10 萬居民返京後不斷上訴，1967 年 3 月 18 日，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公佈了“關於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送後返京人員的處理辦法”，中共中央 1967 年 101 號檔將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的這一檔轉發全國。這一“通告”仍然聲稱，所謂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地、富、反、壞、佑分子（包括摘了帽子後表現不好的）”、“查有證據漏劃的地富反壞份子”、“堅持反動立場的資本家、房產主”和“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等不得返回北京。

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大城市蔓延，多達 40 萬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連有地主成份的共黨高幹的父母也未能倖免。這種遣返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的。中共早在 1962 年就開始安排的大規模政治迫害運動。“文革”前擔任市長的彭真就公開講過，要把北京市的居民成份純淨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居民全部趕出北京。

紅衛兵在“造反有理”的口號下，到處串連、煽風點火、亂揪亂鬥。許多文物毀於此時，許多中國的優秀知識份子死於此時。那些孤傲清高的知識份子尤其倒楣。他們白天得接受拳腳交加的批鬥；夜晚還得接受來自內心的良心和道德的審判——那是一場不亞于白天批鬥場面的痛苦折磨。於是不少人選擇了死。“文革”期間發生的知識份子自殺現象達到了 1949 年以後的最高峰。在文革的發源地北京大學，當那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出現後，全校被關被鬥的所謂“反動學術權威”多達 500 多人，有一個時期燕園天天都有跳樓和上吊的。

一位天津老大夫說：1966 年 8、9 月間，在“紅色風暴”剛刮起的日子，他在海河上的解放橋上經常看見有屍體從河面上漂過，如果站立的時間長一些，還

會見到兩、三具。

1966年8月4日，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吳興華在“勞改隊”中勞動時，被逼迫喝了校園中水溝裡的污水，其中從附近化工廠排出廢水，然後中毒昏倒，當天晚上死亡，時年44歲。但北大的權力者硬說他是自殺的，他們命令醫院解剖屍體。

老舍，作家，1899年生，任北京市作家協會主席和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1966年8月23日，北京大學和北京第八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學生闖到文化局和文聯機關，對那裡的牛鬼蛇神動手施暴。下午3點，在8月的烈日下，這些人被一個一個叫出來，每叫出來一個，就被套上一塊寫著他們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排成一排站在院子裡。4點鐘，把老舍和其它28人裝上兩輛大卡車，運到東城區國子監“文廟”的院子裡。那裡曾是皇帝時代的最高學術教育機構，後來成了首都圖書館。紅衛兵在院子裡架起了一個大火堆，焚燒戲劇服裝和書籍等，烈焰熊熊，口號聲震天：“打倒反黨份子”！“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

那天和他一起被打的人有老作家肖軍，肖軍列出了其它被鬥者的名字，他們是：肖軍、駱賓基、荀慧生、白雲生、侯喜瑞、顧森柏、方華、郝成、陳天戈、王誠可、趙鼎新、張孟庚、曾伯融、蘇辛群、季明、張國礎、商白葦、金紫光、王松生、張增年、宋海波、張治、張季純、端木蕻良、田蘭、江風（《肖軍紀念集》800頁，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0）。還缺兩個名字。這些人都是北京市文化局和“文學藝術家聯合會”的作家、藝術家和幹部。荀慧生是著名演員，肖軍、駱賓基和端木蕻良是老作家，趙鼎新是文化局長。

幾個女紅衛兵用銅頭皮帶劈面抽打老作家肖軍，給他掛上了“反動文人肖軍”“反革命份子肖軍”等幾塊大黑牌子，還在他的名字上畫了紅色的大叉子，並且

把他的頭髮剪掉。

這 29 人被強迫在火堆前跪下來，頭頂地。站在他們身後的有數百名紅衛兵。有的紅衛兵拿來了舞臺道具木刀、長槍和金瓜錘，對他們劈頭蓋臉地亂打。有的紅衛兵解下腰間的軍用銅頭皮帶，狠狠地抽打他們。當時正值盛夏，人們身穿單衣。銅頭皮帶打下去，一下一塊血漬，打得衣服的布絲都深深嵌進肉裡。這 29 人後有紅衛兵，前有大火堆，無處躲閃。他們咬緊牙關，無聲地忍受了三個小時的毒打和折磨。

老舍被打得頭破血流，有人撕下一塊戲裝上的白綢水袖替他包紮。被毒打完後，這 29 人被拖上卡車回到文化局可是回到文聯，另一支幾百人的紅衛兵隊伍已經等候在那裡。老舍被抓到文聯大門外水泥花壇上示眾。肖軍被禁閉在傳達室隔壁的一間小房子裡罰站，不給水喝，不給飯吃。他的子女到機關找他，也遭毆打。肖軍被關了一個多月才准許回家。

當時在場的作家楊沫，在三個月後的日記中追記 8 月 23 日的情景道：“在文聯樓門前的臺階上，有幾個女學生緊圍他，詢問他，不時還用皮帶抽打兩下。我們都被迫圍繞在這個會場邊。當時，我不敢走開，站在旁邊，心如火燎。我們中的一位作家還當場站出來，義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楊沫文集》下冊第 5 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4 年）。

在紅衛兵要老舍手舉黑牌低頭時，他卻昂然揚起了頭，並將黑牌憤然朝地下摔去。不料，黑牌碰到了一位紅衛兵的身上。於是拳頭伴著口號，皮帶夾著唾沫，又挨了一頓揍。這時，有人說他是現行反革命，應當法辦（此人是作家浩然，意圖是先將他從紅衛兵手裡救出）。經過一番爭奪，老舍被塞進了汽車。紅衛兵的拳頭紛紛在車殼和車窗上敲打，尾隨而去。在當地派出所裡，中學紅衛兵們，不

少是女八中的女兵，又輪番打他，一直到深夜。臨走時命令他第二天早晨拿著現行反革命的黑牌，到北京市文聯報到。

8月24日一早，他對三歲的孫女說了句“和爺爺說再見”，然後就離開家，到了城北的太平湖。因他未在機關中出現，有紅衛兵拎著銅頭皮帶到他家中找尋。老舍身上帶有筆和紙，他投湖前在湖邊坐了一整天。他是有時間也有紙筆寫下遺書再自殺的。但在自殺前，卻沒有寫一個字。在1966年恐怖的日子，用文字表達自己的看法是比死亡更為困難的事情。

老舍死前也許會想到他發表在1951年10月1日的《人民文學》上《新社會就是一座大學校》的文章。該文說：我到得相當早，可是林下已經坐滿了人。開會了。臺上宣佈開會宗旨和惡霸們的罪狀。台下，在適當的時機，一組跟著一組，前後左右，喊出“打倒惡霸”與“擁護人民政府”的口號；而後全體齊喊，聲音象一片海潮。人民的聲音就是人民的力量，這力量足以使惡人顫抖。惡霸們到了臺上。台下多少拳頭，多少手指，都伸出去，象多少把刺刀，對著仇敵。惡霸們，滿臉橫肉的惡霸們，不敢抬起頭來。他們跪下了。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臺去控訴。控訴到最傷心的時候，台下許多人喊“打”。我，和我旁邊的知識份子，也不知不覺的喊出來。“打，為什麼不打呢？！”警士攔住去打惡霸的人，我的嘴和幾百個嘴一齊喊：“該打！該打！”這一喊哪，教我變成了另一個人！

我向來是個文文雅雅的人。不錯，我恨惡霸與壞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訴大會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憤怒，激動了我，我變成了大家中的一個。他們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群眾的力量，義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澀。說真的，文雅值幾個錢一斤呢？恨仇敵，愛國家，才是有價值的、

崇高的感情。

老舍描寫的“控訴大會”，活脫脫就是 15 後老舍自己身受的那場“鬥爭會”的翻版。老舍寫出的被鬥者的具體罪行就是“白吃油餅三十年”。這樣的故事，應到法庭上去仔細說明，才能決定是什麼性質的罪行。但在“鬥爭會”的氣氛中，只聽單方面的話，不講法律準則，一片喊打之聲就興起並實施了，老舍還覺得理所應當。在老舍被鬥的事件裡，鬥他的人說他“拿了美金”。這是指他 1946 年接受美國國務院的邀請訪問美國，這種訪問是邀請方提供旅行花銷的。而且在 1966 年，他也確實被攻擊為“文壇惡霸”。在他投湖之前，他應該對這種反法律反人道的逼死了他的“鬥爭會”的有所思考和分析，或許感到了慚愧。

老舍也許會想到：1955 年 5 月 25 日老舍以北京市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主席的名義發表聲明：《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二批材料》“使我們更深刻地認清了胡風的反革命罪行。……我們要求依法取消他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資格，開除他的中國作家協會會籍，撤銷他所擔任的一切職務！我們要求大張旗鼓地把鬥爭進行到底，徹底搞清胡風的政治背景”。而且，老舍在看了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二第三批材料以後，接連寫了《掃除為人民唾棄的垃圾》和《都來參加戰鬥吧》兩文，認為胡風集團“是一夥牛鬼蛇神，為人民唾棄的垃圾！他們天天吃著人民供給的糧食，卻仇恨人民民主專政的一切，幹著顛覆人民政權的罪行。這些破壞人民事業的暗藏的反革命罪犯，應依法予以嚴懲”！這就是報應啊！

8 月 24 日夜，老舍是手握著一卷平素抄錄的毛主席語錄邁出生命的最後一步的，走進了太平湖。在他的屍體四周的水面上漂浮著陪伴他的，就是他手書的毛主席語錄。8 月 25 日早晨，在西城區太平湖上發現了老舍的屍體。

由老舍開始，許多人選擇太平湖了結了自己。短短的一星期內，它竟成為殉難者的聖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這裡投湖。當時北京的紅衛兵中流傳著一句話，“打死個人，不就是 28 塊錢的事嗎？”死者的家屬被要求付 28 元火葬費，但不能保留骨灰。

8 月下旬，紅衛兵每天在北京活活打死數百人，還有大量的人在被毒打後自殺，以致儘管焚屍爐把屍體不計姓名地成批焚燒，火葬場仍然有大量死屍堆積。焚屍爐超負荷工作。這樣一來，造成了焚燒屍體和保管骨灰的困難。古代對判處死刑的犯人，允許家屬收屍築墳。文革對人的迫害一直到了骨灰，不許保存。

1966 年 8 月，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研究員謝家榮，作為“反動學術權威”遭到鬥爭（包括下跪和被打），晚上在家中服大劑量安眠藥自殺。他寫下了遺書。家屬發現他死亡時，也看到了遺書。他們當即燒毀了遺書，說他是心臟病發作去世的。儘管如此，謝家榮還是被送上解剖台進行屍體解剖。解剖後醫生作證說沒有證據說他是自殺的。他被打開的胸腔還未縫合，就被拖走火葬。這樣作，屍體被解剖，但是免除了作為自殺者會遭到的死後鬥爭。

左奶奶和馬大娘，北京東廠胡同六號居民。東廠胡同位於北京東城，在最熱鬧的王府井大街和“東四”之間。明代皇帝的秘密員警——東廠設於此地，是這個胡同的名字來源。左奶奶的丈夫左慶明，早年曾開過一個賣劈柴的鋪子，是個小業主。他們有一些房子，一部份自己住，有一些出租。早在文革前多年，鋪子已歸公了，出租給人的房子也由房管局“代管”了。1966 年他們夫婦都已 70 多歲，這一對夫婦都是虔誠的佛教徒。

馬大娘和她的丈夫當時就租了原屬左家的兩間小屋，她和左奶奶住在一個院子裡。馬大娘的丈夫是個工人。她沒有正式工作，在胡同裡幫人作家務掙錢。8

月 24 日下午三點左右，一群中學生紅衛兵來抄了左家。他們逼左奶奶交出黃金、手槍和所謂“變天賬”。左奶奶交不出來。紅衛兵把左奶奶綁在葡萄架子上，用帶有銅扣的軍用皮帶抽打。

馬大娘見到左奶奶挨打，知道左先生一旦回家，會被打得更加厲害。她走到胡同口外，在那裡等候。左先生從大街上回來的時候，她告訴他家中出事了，叫他逃走。由於馬大娘報信，左先生沒有回家，也沒有在那天被打死。紅衛兵發現馬大娘報信後，立即把馬大娘也綁到葡萄架子上和左奶奶一起被打。紅衛兵還多次用桶提來沸水，從他們頭上澆下去。

據一位鄰居講，聽到左奶奶和馬大娘的一聲聲慘叫，她實在無法忍受。她離開了家，走到胡同外面的大街上，坐在馬路沿子上。後來天黑了，只好回家。可是拷打還在進行。那天天氣非常熱。她把門窗全部嚴嚴關起，用枕頭捂住耳朵，可是還是聽到他們的淒厲的慘叫聲。到了半夜三點鐘，拷打聲突然靜下來了。然後，五點鐘的時候，有卡車開來了。有人在黑暗中大聲問：“六號，六號，六號在哪兒？”

原來那是火葬場來收屍體的卡車。鄰居們聽到了把屍體“砰砰”扔上卡車的聲音。直到很多年後，她一聽到人問“六號在哪兒”，都會猛然一驚，回想到那一天的景象，依然感到膽戰心驚。另一位耳聞者說，打左奶奶和馬大娘的時候，聲音“象殺豬一樣”。實際上，左奶奶和馬大娘被殺害，他們受到的對待比豬不如。豬被沸水燙而除毛是在被殺死以後，而不是以前。豬被用刀子一下子殺死，並不經受死前的長時間折磨。鄰居用“殺豬一樣”來形容，是因為他們找不到別的修辭方式來描述這種前所未有的野蠻。

在那一天，8 月 24 日，東廠胡同 2 號的居民孫琢良和他的妻子也紅衛兵被

打死。孫琢良是北京有名的技術精良的眼鏡師。他能配製非常好的眼鏡。他曾經在那一帶開過一個眼鏡商店，擁有自己的住房。這些就是紅衛兵打死他和他的妻子的理由。

那一天，東廠胡同西頭也有母女二人被打死。沒有找到能記起他們名字的人。有人說，那位母親平常穿著比較講究，手上戴過一枚金戒指。

1966年8月24日那一天，東廠胡同裡至少有六個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

1966年夏天在北京，像左奶奶和馬大娘這樣被紅衛兵打死的和平居民，有數千之多。他們中沒有一個是犯有任何死罪的，也沒有任何一個經過了法庭審判。他們都是北京的守法市民。他們從來沒有反對當權者，他們甚至也沒有反抗他們遭到的虐待和拷打。他們完全被動。他們忍耐並且服從。如果他們是戰俘，也不至於會被殺害。但是，他們被殺害了，而且是用這樣殘酷的方法殺害的。北京東四有一家“資本家”，“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

胡喬木的女兒上臺發言批鬥老爸，喊的口號中有“砸爛胡喬木的狗頭！”

著名文學翻譯家傅雷，把畢生的時間和精力凝固在十五卷《傅雷譯文選》中，共約500萬字。1957年，傅雷被劃右派，災難波及到他的正在波蘭留學的長子傅聰。1958年12月，傅聰留學畢業，從波蘭乘飛機出走英國。傅聰說：我是從波蘭被召回國內參加反右整風的。我寫了個檢查，後來仍被允許回波蘭繼續學習。我走後，對父親的批判越來越擴大化了。我在波蘭聽到很多關於他的傳說。1958年12月，我留學畢業，如果我回來，勢必是‘父親揭發兒子，兒子揭發父親’，可是我和父親都不會這樣做。我是被逼上梁山的。當然，對我的出走，我永遠是內疚的。”1966年8月30日，夜晚11點多鐘，傅家大門外響起了急促的敲門

聲，中間還夾雜著粗野的踢門聲。來人是上海音樂學院的紅衛兵。他們進行長達四天四夜的大抄家，最後從閣樓上查獲了傅雷姑母寄存在傅家多年的、傅雷從未打開過的一隻箱子。紅衛兵敲掉箱子上的鎖，在一面老得已經模糊不清的鏡子背面，發現嵌著蔣介石的畫像；在一本舊畫報上，翻到了一張宋美齡的照片。“大右派傅雷窩藏反黨罪證！”在震天的口號聲中，傅雷夫婦被按倒在地，並被勒令跪著。9月2日上午，傅雷夫婦被拉到大門口，站在長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眾。四周，是黑壓壓的沉默著的人群，再後面，是一排排大字報欄。

9月3日凌晨，傅雷夫婦將那床浦東土布做成的被單撕開，打結，懸在鐵窗橫框上。他們在地上放上方凳，並鋪上棉胎，以免方凳踢倒著地時發出太響的響聲……。就這樣，傅雷夫婦上吊自盡于鐵窗兩側。中國翻譯界的一代巨匠，在茫茫長夜中憤然離開了人世。

在中國大地上，從不曾有那麼多人在那麼短暫的時期內，死於最古老的刑具——棍棒、皮帶。殺與已無冤無仇的人，紅衛兵靠的就是一冊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報告》。

在中共建立的“血統論”政治意識影響下，政治迫害者往往把“黑五類”看作是政治對手（如某些“造反派”組織）的“社會基礎”，借屠殺“政治賤民”來鞏固其權力和地位。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曾要求公安幹警不要去阻攔紅衛兵，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情報。下面通過兩個案例，說明國家機器當時是如何指導屠殺事件的。

案例一：在北京市1966年“紅八月”期間大紅羅廠南巷20號發生的一件駭人聽聞的血案中，韓模寧一家不但被抄被沒收，全家九口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五口。據國內學者調查，將這些“紅衛兵”引到韓家行兇的是當地派出所的民警羅

某。負責當地治安的片警敢於領人行兇殺人，且血案發生後聽任兇手揚長而去，這肯定不是民警個人的自行決定，他顯然是奉有上級指令的，否則絕不敢如此膽大妄為。

案例二：1966年8月25日，北京第15女子中學的“紅衛兵”去橄欖市附近廣渠門大街121號的房主李文波（小業主成份）處抄家，這些“颯爽英姿”（實為殺氣騰騰）的女“紅衛兵”們翻箱倒櫃、掀開屋頂，毆打李文波、劉文秀夫婦，逼他們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槍枝、黃金”，甚至還不准劉文秀上廁所。李文波在忍無可忍中拿起菜刀抵抗，於是被當場活活打死。這又是當地的片警和居委會把那些女“紅衛兵”引到李文波家中行兇的。周恩來在接見紅衛兵時的講話中將李文波的抵抗指為“反動資本家對紅衛兵行兇”；接著周恩來下令，由北京市法院於1966年9月12日以“行兇殺人”的罪名將劉文秀判處死刑。其實，就連當時參與行兇的“紅衛兵”都沒有說劉文秀本人有“行兇殺人”行為。李文波夫婦被害血案在1981年已經被平反，但無論是當時參與行兇的“紅衛兵”，還是公開動用國家機器為“紅色恐怖”助威的中共主要領導人，都未承擔任何責任。

此後，周恩來還下令由政府出面組織“紅衛兵聯絡站”大肆抄家，並直接派解放軍保護“紅衛兵”的抄家行動。這樣，“紅衛兵”的暴力和殺戮行為就得到了國家機器的直接指導、支持和保護。得到政府鼓勵與支持的“老紅衛兵”們更加肆無忌憚了，他們竟然把迫害、兇殺案件譽為反抗“階級敵人的報復”的“欖杆市前灑碧血”事件。接著，“老紅衛兵”們以打擊“階級敵人的報復”為名，掀起了新一輪更瘋狂的殺人高潮。

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屬的大興縣公安局的局務會上，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其講話要點是：1）公安機關不要出面制止紅衛兵的暴力和殺

戮，“我們過去的許多規定都不適用了”；2）“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3）公安幹警要為“紅衛兵”的抄家暴力“當參謀，提供黑五類的情報，協助抄家。”會後大興縣公安局立即制定了在縣內發動群眾屠殺“黑五類”的計畫。組織殺人行動的是公社的主任、黨委副書記，動手殘殺“黑五類”、連孩子都不放過的則是民兵。

從8月27日到9月1日的4天時間，大興縣18個公社、48個大隊被殺害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滿門抄斬22戶，其中年齡最大者80歲，最小的出生才38天！最獸性瘋狂的是大辛莊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一人獨釀16條人命，最後他癱倒在地。組織殺人行動的是公安局的主任、黨委書記。動手殺人，連孩子都不放過的大多是民兵。“紅色恐怖”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法西斯恐怖”！

鄧鵬說：“我有一個同事，出身不好，他的父母是地主。文革初期，他因為自己的思想和言論，出了一點差錯，就受到了種種不公的待遇。他受到不公待遇的時候，受到其他紅衛兵攻擊的時候，他這個事情就很容易牽連到他的家庭出身上。這個同事顯然喪失了理智。他回到他的老家，和他的弟弟一塊兒到他父親的墳墓那兒去，把他父親的墳墓掘開，挖出父親的屍骨，然後用鋤頭把父親的頭蓋骨，屍體的頭蓋骨給敲碎了，來發洩自己心中的怨恨。”

8月全國學生開始大串連，29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向紅衛兵致敬》的社論。

8月31日毛在天安門城樓第二次接見50多萬紅衛兵，林彪在接見大會上首次提出了“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的頌詞。他說：“紅衛兵和其它青少年的革命組織，像雨後春筍一樣的發展起來。他們走上街頭，橫掃四舊。文化大革命，已經觸及到政治，觸及到經濟。學校的鬥、批、

改，發展到社會的鬥、批、改。群眾的革命洪流，正在蕩滌著舊社會遺留下來的
一切污泥濁水，改變著我國的整個社會面貌。”

周恩來在 31 日的接見會上說“現在，全國各地的同學到北京來交流經驗，
北京的同學也到全國各地去進行革命串聯，我們認為，這是一種很好的事情，我
們支持你們。中央決定，全國各地的大學生全部和中學生一部分代表，可以分期
分批地到北京來。”

由於運輸系統的飽和和巨大困難，周曾請示毛澤東對串聯人數加以限制，但
是毛澤東卻堅持搞大串聯不變。9 月 5 日，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外地革命師生來
北京參觀革命運動的通知》，啟動了全國性的吃住行都不要一文錢的大串聯；全
國各類學校幾乎都“停課鬧革命”。

周恩來不得不召集國務院、北京市和軍隊各部門負責人開會，全心全意“接
待毛主席請來的客人”。毛澤東在西郊機場接見紅衛兵，由於機場跑道不夠長，
周恩來親自佈置，軍隊連夜施工，臨時擴展機場跑道，兩側各延伸 250 米，並築
路修橋，以便大隊人馬順利通過。紅衛兵大串聯到了井岡山，由於山上沒有足夠
的糧食，學生出現斷食現象，周恩來緊急動員武漢、南昌、廣州、福州、杭州等
人群眾蒸饅頭，做麵包、餅乾和點心，命吳法憲派空軍飛機向井岡山空投食品，
前後持續了半個多月，才使大多數學生免於餓死。

9 月 18 日林彪在《關於把毛主席的著作提高到一個新階段的指示》中說，
老三篇最容易懂，但最不容易作到。要把老三篇作為座右銘來學……自此，學習、
背誦老三篇風靡全國。

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和檢閱“革命小將”或“紅衛兵小將”的活動並沒有
到此為止，而是越來越多：9 月 15 日 100 萬，10 月 1 日 150 萬，10 月 8 日 150

萬，11月10日至11日200萬，11月25日到26日250萬；據報導，先後8次接見紅衛兵和“文化革命大軍”，總人數達1100萬。

1966年10月1日，解放軍上海第二軍醫大學造反派的代表、陶鑄的女兒陶斯亮在天安門上向毛澤東告狀，指責軍隊院校壓制文革。於是，在毛的壓力下，林彪10月5日發出《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除野戰部隊外，取消對軍隊院校搞文革的種種限制。軍校和一些機關人員隨後開始對軍隊領導人造反奪權，並且揪鬥虐待了許多軍方高級將領。黨中央立即批轉了這一檔，宣佈取消由黨委領導運動的規定。從此，“踢開黨委鬧革命”成為流行的口號。文革小組策動造反派，把攻擊的火力集中轉向各級黨政領導機關。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著重批判以劉鄧為首的一批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的領導人執行的一條旨在鎮壓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從而為“文化大革命”掃清障礙。但與會者對於批判劉少奇並不積極。經文革小組提議，周恩來親自給吳法憲下令，由空軍派出專機，將各地的造反派頭頭們接來北京，一起參加討伐劉少奇的大會。這些造反派頭頭一到北京，就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批劉鬥爭。16日，在毛的授意下，陳伯達在全體會議上作了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又名《兩個月運動總結》）的長篇報告。報告說，這場文化大革命本來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劉鄧制訂了一條“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是整走資派，反而是鎮壓人民。人民群眾應該起來批判這些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領導幹部，領導幹部應該接受群眾的批判。會後，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風暴便在全國掀起。

10月，北京各個高校首先開展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運動，11月

發展到一般機關、事業、企業單位，高潮出現在 11 月中到年底。地方各級黨委和各單位黨的領導人被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紅衛兵運動起了極大促進作用。他們在學校裡把工作組批倒以後便沖向社會，到機關、工廠裡“串連”。他們大膽的行動鼓舞了社會上的群眾。群眾批判“書記”們的音量增高了。甚至有的機關、工廠裡的群眾起來效仿“造反派紅衛兵”的做法。敢於沖進單位的黨委辦公室、保衛科、武裝部去查抄單位領導收藏的整群眾的“黑材料”。更有甚者，在沒有鑰匙的情況下，把檔案櫃打爛，搶走“黑材料”。

1966 年 11 月，中央發出在工業交通系統和在農村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兩個檔（簡稱工業十條和農業十條），改變了運動只限於文教部門和黨政機關的原定部署，要求把運動擴展到工廠農村，這是造成全國大混亂的又一個嚴重步驟。

第 137 節 武鬥

1966 年 12 月 26 日，毛在他的生日上，舉杯的祝詞竟是“慶賀全國全面內戰開始”！

1967 年 1 月 2 日，毛指示：開展全面的階級鬥爭，重點是北京、上海、天津、東北。在毛的親信張春橋和姚文元的直接操縱下，以王洪文、潘國平等人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 1967 年 1 月 6 號掀起所謂的“一月風暴”，率先全面奪取了上海市的黨政權力。毛澤東在 1 月 8 號發表講話對這種行動表示支持，說“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他指示中共中央向上海造反派發賀電，號召全國學習上海的經驗。

1 月 30 日，他在一份關於階級鬥爭情況的報告上寫了個批示：“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子。

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判，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這是文革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從那後，運動的矛頭就要對準普通人了。毛的設想是：支持群眾組織奪權，但不讓群眾組織掌權。打了頭陣的 1966 年 8 月“老紅衛兵”，到 1967 年初被中共拋棄了，不少人還被宣佈為“聯動分子”而入獄。

江青要求林彪點名批判蕭華，被林拒絕。1967 年 1 月 20 日，葉劍英借助毛澤東要保蕭華的指示，與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頂了起來，拍桌子拍斷了小手指。被稱為林彪第一大將的黃永勝對江青和中央文革進行指責。這就是所謂的“大鬧京西賓館事件”。葉劍英當天到林彪住處彙報。林彪大怒說：叫他們也來打倒我好了。並且馬上把江青找來訓斥一頓，而且要把江青趕走。軍中老師們被林彪的態度所鼓舞，隨即由徐向前登門向林彪反映情況。林彪當場口述幾條命令，包括軍人不得擅離職守；不許自由抓人、抄家、封門、體罰和變相體罰；不許衝擊軍事機關等等。林彪隨後親自面見毛澤東，請他批准了這幾項命令，最終形成了中央軍委《八條命令》。林彪因此對毛說：“你批了八條，真是萬歲，萬歲，萬萬歲！” 1967 年 1 月 25 日，造反派揪鬥邱會作，打斷了他的肋骨。林彪聞訊找來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手書命令“立即放出邱會作”。葉群和陳伯達隨即拿著林彪的手令到造反派那裡救出了邱會作。1968 年，林彪對軍委辦事組成員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說：“對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主席搞什麼就讓他搞吧。但是軍隊不能亂。軍隊穩定了，地方亂一點，天塌不下來；軍隊亂了，就不得了了。”

1 月 21 日，毛在對南京軍區黨委關於是否派軍隊支持造反派的一份《請示報告》上批示：“林彪同志：應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革命群眾。以後凡有真正革

命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文化大革命）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應重新發佈命令，以前命令作廢。請酌。”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佈了《關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25日《解放軍報》發表題為《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社論。以“決定”和“社論”為起點，中國人民解放軍各部隊開始介入地方。3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首次將“三支兩軍”作為一個整體向全軍發佈。此後，“三支兩軍”便奉命逐步在全國各地展開。

新疆“石河子事件”。1967年1月25日至26日，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石河子的一個汽車團的造反派要奪權，當權派不服，請部隊派人支持。造反派4000餘人，衝擊武裝部門，奪取槍支。零點，雙方開始槍戰。造成5人死亡，6人受傷。槍戰在白天再一次發生，從武裝部門一直打到公共汽車站。此一戰役雙方共死24人，傷74人。事後，雙方互抓對立派人員施以酷刑，甚至將女青年衣褲脫光爆屍。

二月實行軍事管制後，全國大肆“鎮壓反革命”，抓捕造反派。2月4日中央文革指示：“湖南軍區對《湘江風雷》、《紅旗軍》的反動頭目，應該立即採取專政措施。”於是湖南駐軍和公安局在與造反派對立的群眾組織的幫助下大逮捕，全省約十萬人入獄。譬如黔陽縣，“湘江風雷”支隊長以上的骨幹部四百餘人被拘捕關押。

1967年2月5日，內蒙古軍區負責人制定了屠殺在軍區大院門口示威的“造反派”的計畫，該軍區軍訓部副部長柳青故意開槍打死了內蒙古師院的學生韓桐，這是“文革”時期軍隊殺害平民的第一槍。幸好內蒙古的“造反派”組織非常克

制，預謀的屠殺才沒有擴大。

成都軍區於2月17日開始在四川全省範圍內“鎮壓反革命”，抓了數萬人。如安岳縣公安局於2月19日以“反革命罪”拘捕一百多名造反派，取締了22個造反派組織。同日，宜賓縣公安機關逮捕、拘留九百餘名紅旗派成員。這就是後來所說的“二月鎮反”。

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在軍委副主席葉劍英的批准下，調動13個連的軍隊向佔領《青海日報》社的學生“造反派”開槍開炮，打死174人，打傷224人。趙永夫繼續在全省範圍鎮壓反革命。全省“僅逮捕、拘留、看管和軟禁的即達10157人，其中逮捕4131人，拘留2522人，看管和軟禁3504人。”一個牢房是兩層鋪，原來最多住24人，但塞進了70-80人，甚至有塞進100多人的。有個牢房由於關人太多，上層鋪坍塌，壓碎一個人的腦袋，當即死亡。在貴德縣，“武裝部執行西寧衛戍區司令部命令，對全縣造反派組織頭目及部份成員，逮捕入獄；副縣長曹廷九被扭送監獄。

天津3月27日6千人沖南開大學，50人重傷，220人受傷。

成都4月4日到11日連續發生6次武鬥，死傷1萬人。

北京4月13日4千人武鬥，傷數百人。北京從4月30-5月10日這13天裡，發生了50人以上規模死傷的武鬥133次。

蘭州4月18日軍區司令楊嘉瑞、政委王世泰、胡繼裳指揮十萬群眾，爭奪《甘肅日報》社，重傷27人，輕傷70人，屍體投入黃河。

鄭州4月下旬3000人武鬥，傷340人。

南昌4月30日報導 四百餘鄉鎮發生流血武鬥 全市54間工廠33間停工。

石家莊5月1日 動員軍車150輛 毛派245人傷，15人重傷百餘人被捕。

成都 5 月 1 日到 5 月 4 日動員十萬人，毛派死 11 人，傷 2400 人，重傷 700 人，被俘千餘，5 月 6 日 反毛派 20 萬人沖入成都，死百餘人，二千人受重傷入院。。

鄭州 5 月上旬 5 萬反毛群眾，毛派紅衛兵死傷數百。

上海青浦縣 5 月 4 日，竟連續三次發生大規模武鬥，涉及人數達 7000 多人。

四川宜賓 5 月 4 日起，小規模武鬥連綿不斷。到 5 月 15 日，演變成大規模武鬥，成都有上萬人前來支援，雙方傷亡慘重。

重慶武鬥事件：1967 年 5 月，重慶兩派動用各種常規武器相互開火，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門碼頭，一連數日，嘉陵江上都可見到漂浮的死屍。

重慶 5 月 6、7 日，2 萬人武鬥，死 300 人，傷者無計，另撞沉毛派渡輪。7789 部隊政委張繼臣指揮反毛派群眾進攻毛派，毛派死 200 餘人。

佳木斯 5 月 6 日，2 萬人武鬥，毛派死 11 人，被捕 150 人。

長沙 5 月 5 日，毛派死 22 人，6 日死 39 人 兩派爭奪廣播電臺。

宜賓 5 月 13 日，2 萬反毛派死 200 餘人，傷 1900 人，28 人被活埋，700 人被捕，軍人支持反毛分子鎮壓毛派紅衛兵。樂山 5 月中，百余紅衛兵被活埋。

宜賓 5 月 13~16 日，3 萬人武鬥，毛派死 300 人，傷 1500，被俘 700 餘人，24 名活埋。攻擊毛派據守的建築物。

昆明 5 月 29 日，反毛派 3 萬人包圍毛派 2200 人，毛派僅 500 人逃出，死 266 人，重傷千人。昆明軍區與雲南省軍區對打。

鄭州 6 月初，1 萬人武鬥，死 105 人。軍區政委何運洪指揮群眾襲擊“二七公社”。

長沙 6 月 6 日，死 62 人。

6月，毛澤東派其警衛部隊到北京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等幾家工廠，實行軍事管制。新華印刷廠軍管會進廠不到兩個月，就揪出了10個“反革命分子”。他們總結出“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說：“對那些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惡毒攻擊中央文革、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一旦發現，就狠狠打擊，毫不留情”。

河北農大武鬥事件：1967年6月23日，河北農大兩派發生武鬥，死7人，傷250餘人。

1967年武漢地區主要有兩大群眾組織：一個是人數較少的“工人總部”派，簡稱“工總”；另一個是人數眾多的“百萬雄師”派。其中“工總”經常組織衝擊軍隊機關，是名副其實的“造反”派，而“百萬雄師”則屬於支持軍隊的群眾組織。1967年2月初武漢工總、二司、九一三等造反組織奪了“長江日報”的權，發表了“二八聲明”。

以司令員陳再道和政委鐘漢華為首的武漢軍區，2月28日公開反對“二八聲明”，3月21日宣佈工總為“反動組織”，勒令其解散，並逮捕了朱鴻霞為首的400多名工總頭目。

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是四方面軍的將領，他在對待劉少奇的問題上不願落井下石，因此成為中央文革一千人的眼中釘。江青等人便秘密派人下去暗中支持“工總”。而“工總”得到支持後，公然打出了“打倒陳再道，解放全中原”的標語，從而使武漢的武鬥一再升級。

4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確對待革命小將》，意在警告武漢、成都等地軍隊領導，不要壓制紅衛兵和造反派。4月6日頒佈中央軍委《十條命令》，要求軍隊正確對待群眾組織。武漢軍區雖被迫釋放了除朱鴻霞等人外的大多數工

總頭目；但不同意給工總平反。正在支左的 8201 部隊（湖北軍區獨立師）參與了百萬雄師專業武鬥隊的建立和指揮。

從 1967 年 4 月 27 日到 6 月 3 日一個多月中，武漢就發生武鬥 120 多次。6 月 4 日到 15 日，11 天內發生武鬥 80 餘。而從 6 月 16 日到 24 日，8 天內武鬥發生 50 餘次，在武鬥中被打死的人有 350 餘人，重傷 1500 多，輕傷者 1 萬 5 千餘，參加武鬥的工人、農民達 5 萬多人，使 2400 餘處工廠停工。7 月 15 日，造反派數萬人在青山區遊行、漢口遊行，在武勝路電車公司埋伏的“百萬雄師”衝擊遊行隊伍，傷工人學生多人。研究者王紹光說，造反派死 10 人，37 人重傷，80 人輕傷。

周恩來為此先期去了武漢，找陳再道、鐘漢華等人談話，做他們的思想工作。周知道，毛澤東對陳再道的看法是一介武夫，掀不起什麼風浪來。毛的意思是要陳再道做個檢討，承認先前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錯誤，轉而支援造反派，從而得到“工總”等造反派的諒解，以此為基礎促成“工總”和“百萬雄師”的大聯合，穩定武漢地區的局勢。

7 月 14 日，毛澤東坐專列抵達武漢，下榻在東湖賓館。周向毛做了彙報。毛澤東指示解決武漢的問題還是要靠武漢軍區，要轉變對待革命左派的態度。

“工總”是革命派，要為工總平反；“三鋼”、“三新”是革命組織；“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百萬雄師”要受些委屈，但要堅持聯合，工作由中央來做。

7 月 18 日周傳達了毛的指示精神，周恩來隨即返京。18 日晚，王力和謝富治去了“工總”的司令部，對造反派們大加撫慰，並宣佈“工總”是革命左派，而“百萬雄師”是保守派。第二天，“工總”組織人馬敲鑼打鼓，在武漢三鎮到處用高音喇叭廣播王力和謝富治的講話錄音。而被打成保守組織的“百萬雄師”

則群情激憤，把不滿全都發洩到了王力身上。

19 日深夜獨立師作戰部長召集會議，成立獨立師和百萬雄師聯合的“專揪王力指揮部”。20 日凌晨 5 點 10 分，獨立師軍車數十輛從前、後門沖進東湖賓館；緊接著 41 輛“百萬雄師”武裝車輛和“武漢公安”3 輛大型救火車跟進。王力、中央文革辦事組張根成被獨立師軍人和“百萬雄師”帶到了軍區大院 4 號樓。並在軍區大院公開批鬥並毆打王力（被打傷腳踝），逼他對武漢形勢和“百萬雄師”性質重新表態。

10 點後，武裝大遊行開始。有各種車輛 396 部，其中消防車 27 輛，空軍軍車 15 輛，打獨立師、8216 部隊旗幟的車 83 輛，用載重卡車改焊的裝甲車上十輛（一說“數千輛卡車排成四路縱隊”），“百萬雄師”亦出動 200 多輛汽車，數萬人馬。滿街“揪出謝富治”“打倒王力”口號。武漢三鎮工廠停工、交通中斷、街道堵塞。車至湖北大學前，一位獨立師軍官連開數槍，“百萬雄師”吶喊沖進學校，毒打群眾，重傷三人，打死一人。

在遊行的大道和其他地方，馬路和單位裡的群眾，一旦被人指認為造反派，即被怒氣衝衝的“百萬雄師”毒打，怕事的人紛紛躲避。

21 日獨立師、“百萬雄師”繼續武裝遊行。下午，8201 部隊衝擊湖北大學，發射數百發子彈；幾個人（包括賣冰棍的孩子）倒在“百萬雄師”槍下，200 餘人被關押。一些中學校受到洗劫。深夜，“百萬雄師”電話不斷打到水電學院總機和其他院校，威脅道：“二癩子（按：對二司學生的卑稱），今天晚上血洗你們學校”！由於懷疑王力藏在 8199 部隊，8201 部隊武力搜查 8199 某部七連。當日“百萬雄師”和 8201 部隊出動卡車約 900 餘輛。據調查，在武漢約有兩千餘名 8201 的官兵參加事件活動。

24日，“百萬雄師”發起對體育學院和測繪學院的攻擊。攻打體院的“百萬雄師”約一萬多人：晚上，18車人馬包圍體院大樓，進駐測繪學院和新華工的空軍前去制止武鬥。24日黃昏，“百萬雄師”一萬多人攻打體院，攻擊隊伍的前頭已經到達了體院，尾部還在漢陽。大批武裝“百萬雄師”對體育學院、測繪學院的圍攻，受到造反派的武力反抗，也受到由周恩來調入的空軍部隊的制止。

周20日下午返漢，安排毛21日凌晨2時從武漢王家墩機場起飛到了上海。21日，25軍3個步兵師從九江、開封向武漢運動。15軍空降部隊佔領了孝感機場，運動到黃陂。東海艦隊三艘炮艦從長江口啟程當晚可達漢口。22日周恩來、謝富治、王力等回京。

22日當晚，林彪主持中央文革會議，聽取謝富治關於武漢情況的彙報。會議決定：武漢“7.20事件”為“反革命”。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紅尖兵”《從政治上思想上徹底打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提出“揪軍內一小撮”。一時間，各地衝擊軍事機關、揪鬥軍隊將領之風空前嚴重。各種造反組織明目張膽地搶奪部隊的武器裝備，各地的武鬥大規模升級，嚴重流血事件頻頻發生。7月28日獨立師被調出整訓。徐向前、徐海東、彭紹輝等被指控為“7.20事件”後臺，遭到抄家。據湖北省委統計，“7.20事件”後，全省被打死的幹部和群眾多達18.4萬多人。僅武漢市，打傷打殘者6.6萬人，打死600多人。

8月4日，在上海的毛澤東以“潤之”的署名單獨寫信給江青，認為全國75%以上的軍分區以上的幹部支持右派，因此要武裝左派，決定發槍，“好像部隊不可靠了，要搞第二武裝”。就在同一天，張春橋、王洪文指揮上海“工總司”10多萬人血洗“聯司”盤踞的上海柴油機廠，從上午8點開始，運用彈弓、大鏟車、

高壓水龍頭、消防車、船隻、雲梯、敢死隊，展開進攻。到下午 4 點攻下大樓。此次武鬥死 18 人，傷 983 人，致殘 121 人，被拘押者 663 人。沒有毛澤東的首肯或默許，張春橋之流能這麼膽大妄為嗎？

1967 年 8 月，開封化肥廠發生武鬥。雙方傷亡慘重，有些被俘者被當場活埋。

山東鄒城武鬥事件：在一次武鬥中，一派打死對方 18 人，竟將死者掛在樹上練習打靶。

“7.20 事件”發生之後，福建省福州市發生了火燒交際處事件。兩派群眾對峙，短兵相接。部隊派兵制止，士兵們手挽著手築成人牆試圖把兩派群眾隔開，以致許多士兵手臂被打骨折。當場被抓獲的人，有的被蒙上棉被，灑上汽油，活活燒死。1967 年北京紅衛兵掀起了一股對外國使館“打砸燒”的恐怖活動：6 月 18 日他們砸了印度駐華大使館；7 月 3 日砸了緬甸駐華大使館；8 月 5 日砸了印尼駐華大使館。

1966 年，左派人士在澳門藉氹仔擴建學校事件，最終釀成暴亂，澳葡政府武力鎮壓，最後在中共多方施壓下，澳督無奈向澳門左派人士公開道歉及答允澳共的一切要求，包括不允許國民黨人士在澳門合法活動，親共份子至此全面控制澳門。

1967 年，香港出現了“六七暴動”。暴動前期都是周恩來批准的，後來鬧得不可收拾，他才出來講不能再這樣搞下去了。六七暴動就是在香港的中國銀行掛毛主席像，“早請示，晚彙報”搞個人崇拜，煽動罷工，要“解放”香港。4 月中旬，新蒲崗人造塑膠花廠發生工潮，左派份子企圖將香港演變成第二個澳門，積極介入工潮活動。5 月 6 日，塑膠花廠工人與防暴隊發生衝突，21 人被捕。左

派工會工聯會到場聲援，開始與港英政府在街頭上對抗。5月16日，工聯會領導人物楊光等人成立“鬥委會”，公開呼籲左派人士走上街並使用暴力與港英政府抗爭，後來左派暴徒更在街上開置自製炸彈，嚴重影響市民生活，有市民、消防人員、英軍、警員和拆彈專家因而斃命。最後香港軍警採取行動後，他們高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到處進行恐怖活動，製造流血衝突；就採取路邊炸彈戰術，這種路邊放炸彈炸軍警的戰術。8月20日下午，暴徒在北角清華街擺放炸彈，八歲女童黃綺文及其兩歲弟弟黃兆勳出來遊玩，無知觸摸炸彈，被炸得肚破腸流、死狀至慘。消息傳出，全港市民同感悲憤，並齊聲責罵。林彬指斥左派人士喪盡天良。由於清華街慘案深入人心，加上林彬廣播理直氣壯，言辭動人，聲淚俱下，更掀起人們的共鳴。到了這時，左派覺得非對付林彬不可。8月24日上午8時45分，林彬與弟弟林光海照常上班，兩人上車後由林光海駕駛，剛轉入文福道近文運道處，前面有數人在修路、打手勢叫停車。林光海當即停下。這時有四個年青暴徒上前，先向車頭澆了一桶汽油，然後丟進去火把，頓時汽油燃燒，車頭變成火海。林彬打開車門出來，已經渾身是火，在地下滾了一時，仍然未熄。林光海在車頭就未能及時走出來。此時樓上居民看見趕快下來撲救，最後火雖被滅熄，但兩人均已氣息奄奄。員警到場後，暴徒已逃匿無蹤，兩人即送往伊利沙白醫院急救，林彬於次日(8月25日)不治逝世，而林光海昏迷至8月30日亦告不治。林彬遇害的消息傳出，全港市民，除少數左派外，無不切齒悲憤。各界人士，並紛紛自動捐款慰問林氏遺孀鄭女士，警方懸紅五萬元緝凶，商業電臺立即增加十萬元，成為香港有史以來最高的花紅，但是暴徒行兇之後，當時有消息稱早已準備特別船隻逃往澳門，由於當時左派在澳門已經無法無天，凶徒逃到澳門後便無法緝獲。港共頭目所以要謀害林彬，是想藉此嚇倒不同政見人

士，結果卻適得其反，所以本來反共、罵共的人沒有一個退縮，大家只有更勇敢批評左派人士的暴行。左派的新晚報居然不知恥刊登一位名叫“鋤奸隊”的來信，聲稱將林彬“正法”，一時更引起讀者的憤怒，自由報紙撰論，勸告港府對暴徒要採取堅定行動以疏導民憤，否則只要有人振臂高呼“撲殺左仔為林彬報仇”，相信最多半天的時間，所有共黨在港的機構不論通訊社、報紙、國貨公司及電影院，一切機構及人員將一掃而光。香港政府瞭解這種情形，林彬與林光海的靈柩停在殯儀館裡，一直不敢出殯，恐怕到時有數十萬市民到場送林氏兄弟時化怨憤為力量，衝擊本港的左派機構，社會情況將更為變得混亂。兩靈柩一直停放到九月六日清早，才秘密下葬。

林彬死去的當天晚上，商業電臺又在固定節目時播出“大丈夫日記”，當劇中播到林彬之死的悲痛情況時所有播音員真的大哭起來。播音室內人哭，聽收音機的聽眾也跟著哭，這半個小時中，港九新界，除一小撮暴徒外，人人流淚，戶戶哀哭！同年9月17日，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以閃電手法，將林彬夫人及三位分別六歲、三歲及一歲的女兒們接到臺北定居，後來一家四口再到加拿大居住。中華民國政府更將林彬封為烈士，靈位供奉于臺北忠烈祠。

林彬事件激起市民對左派的強烈不滿。香港政府對左派作出更強烈鎮壓。因為林彬的敢言作風，香港商業電臺曾被香港市民視為敢言的電臺。他的住所“18樓C座”數十年來成為商業電臺一個諷刺時弊的節目名稱，而商業電臺的辦公室在1997年前一直掛有林彬及林光海的遺像，訓示同工不要忘記他們的犧牲。

香港回歸後，當年策劃放炸彈的鬥委會頭目楊光獲得特區政府的大紫荊勳章，因暴亂被判監的曾德成最近也成為特區的行政高官。一個又一個過去參與或支持暴亂的人，被特區政府的勳章和官職來正面肯定，除了侮辱了當年的死難者外，

更加令香港這個國際都會蒙羞！

1967 年的香港暴動統計數字

死亡人數：51 人（警員 10 人，英軍 1 人，消防 1 人，市民及其它 39 人）

受傷人數：832 人（警員 212 人）

被檢控人數：1936 人

懷疑炸彈：8074 個

真炸彈：1167 個

1967 年 8 月 7 日，王力來到北京外語學院發表了著名的“八·七講話”，號召“造外交部的反”、“奪外交部的權！”8 月 22 日，他們竟把英國的代辦處給燒掉了！還把英國的大使唐納德·霍布森拉出來批鬥，並要求所有的英國代辦處的工作人員向毛像鞠躬“請罪”。這完全和伊朗佔領美國使館的恐怖主義活動一樣。8 月 23 日的《人民日報》讚揚了這一行動。姚登山等人在奪了外交部的權後，給英國下最後通牒，勒令對方在幾天內撤出香港。

8 月 25 日由毛澤東批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開展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中，提出：“關於武裝革命群眾，必須在條件成熟的地方，由當地人民解放軍弄清情況，通過協商，報告中央批准，然後有計劃、有步驟地實施。”毛澤東有關發槍武裝造反派（即所謂“左派”）的想法，造成了給武鬥火上加油的嚴重後果。全國被群眾組織搶去的部隊槍支和民兵槍支共多少？後來總參有關部門上報了一個大概統計數字：500 多萬！這就是說，被搶去的槍支恰巧與當時全軍兵力的總數相等！

毛澤東對這一期間（1967 年 7、8、9 月）全國各地爆發大規模武鬥的“全面內戰”情況居然給予高度評價：“七、八、九三個月，形勢發展很快，全國無

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

1967年8月間，康生指示駐寧夏的部隊支持一派，“必要時可發槍自衛”，並在青銅峽地區鎮壓“保守派”，打死、打傷各一百餘人。

1967年8月28日經康生批准，駐寧夏野戰部隊某師以“鎮壓反革命叛亂”為名，開槍開炮，屠殺了青銅峽縣的一派群眾組織“大聯合籌備處”成員101人，打傷133人。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道縣人武部組織基層民兵屠殺當地屬於“湘江風雷”的“造反派”成員和“黑五類”：“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1590個生產隊、2778戶，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殺4193人，逼迫自殺326人。

19歲的唐水蘭再過一周就要做母親了。1967年8月驟來的腥風血雨無情地毀滅她。唐水蘭娘家的成份不好，她無從逃脫厄運。丈夫這邊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派民兵張天沙送她回下柳大隊與娘家人一道接受審判；而下柳大隊也派了民兵唐某某來“接人”。三人走到一座茶山時，太陽都偏西了。兩個民兵有些不耐煩了，悄悄合計：既然送她回娘家去殺，還不如就在這茶林裡搞掉算了，省得麻煩。當時張天沙才二十多歲，一身蠻牛勁。他抽出隨身攜帶的一根鋼條，猛地朝汗水淋漓的唐水蘭刺去，鋒利的鋼條從背部直穿腹部。唐水蘭一聲尖叫，回頭憤怒地望著兇手。張天沙上前一把扯下唐水蘭的褲子，看到胎兒在肚皮裡猛跳。他又抽出背上的馬刀，在唐水蘭肚皮上劃了兩下，胎兒就伴著血漿流出來了。唐水蘭本能地伸出雙手去抱自己的孩子，但沒抱住，人就倒下去了。只有兩隻血淋淋的手固執地伸向遠方……張天沙回到隊上，四處炫耀：“媽的，我左右兩下一劃，毛毛就出來了！”

祥林鋪公社吊高樓大隊有這樣一對夫妻。男的是公社的基幹民兵，身強力壯；女的是地主的女兒，漂亮賢淑，又讀過中學，能歌善舞。兩人結婚不到兩年，相親相愛，夫唱婦隨。1967年8月26日，女的回九家山娘家探親，正趕上娘家一屋大小被抓，自己也被該大隊民兵一併抓去審問。時逢女人的丈夫執行任務從九家山過路，有人告訴他，“你堂客被捆在大隊祠堂的柱子上了，你還不快去救她！”男的趕去，最後竟遠遠站著，躲開妻子乞求的目光。審訊的人問他：“你看怎麼處理？”他竟回道：“由你們處理，殺了算了。”

女的被民兵們牽走了，一棒子打昏過去，第二天又醒了過來。九家山的幹部們一商量，她已嫁給貧農了，照理就是貧農的人，還是交還吊高樓大隊處理。於是，女的又被送回家中。女的跪在丈夫面前苦苦哀求：“你看，我肚子裡已有崽了，你用手摸摸。不信，可去公社醫院檢查。”可這位貧農的兒子不為所動，決絕地說：“沒得崽的，殺了算了”。見沒人動手，他就親自把已折磨得不像個人樣的妻子捆起來，押到大隊部，與另外一些敵人一同送上殺場，並帶頭在妻子頭上砍了兩扁擔。傍邊的兩個民兵接著一個用石頭砸，一個用烏銃打……這年輕美貌少婦的生命連同她腹中的孩子，就這樣結束在她的丈夫和他(她)的父親手裡。

有個何姓農民，只因父親是小地主，他和他的子女也都算是階級敵人。他被民兵用槍逼著挖了個坑，將自己的三個最小的才五歲的孩子活埋。然後給自己挖坑，由民兵活埋他。

小學教師蔣漢正家庭出身是地主，該殺；他的妻子周群(橫嶺中心小學教員)出身雖是貧農，可是嫁給了該殺的人，也該死；他們的三個孩子是地主的孫子，更不能留下。民兵營長帶領民兵將全村待消滅的20人押到山上後，黨支部書記宣佈：“我們是貧、下中農最高法院，今天要判你們死刑！”隨即將他們一一推

進石灰岩溶洞。周群被民兵強制按在地上，後腦門猛挨一鋼釘，然後被一腳踢入那無底深淵。不知道過了多久，周群在洞裡忽然聽到有人叫媽媽。這時，她蘇醒了過來。原來她摔在了別人身上沒死。第二天，有人不斷往硝眼裡扔石頭。周群和她的大女兒原本躺在洞的上層，被石頭一打，又跌到了底層。這時，她驚異地發現丈夫和另外兩個孩子都在那裡，旁邊都是屍體，但他們都僥倖活下來了。洞裡又黑又冷，一家人只能坐在屍體上。丈夫被鐵絲綁著，怎麼也解不開。三個孩子又饑又渴，直叫肚子餓。周群急得手足無措，丈夫蔣漢正已經神經失常了，一個勁地在堆積如山的屍體旁來回走著。這裡不分白天黑夜，也不知熬了多少天，孩子們漸漸不發聲了。先是大兒子，後是小兒子，周群緊緊抱住女兒，但還是無濟於事。丈夫要水喝，周群脫下一件衣服，在水裡浸濕，擰著給他喝。他喉頭動了幾下，卻喝不下去，頭一歪，死了。七天七夜之後，周群的兩位學生設法將她救出了硝眼。此時，五口之家就剩下她一個人活了下來。

受道縣殺人事件影響，全地區其餘 10 個縣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殺了人。全零陵地區（含道縣）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 9093 人，其中被殺 7696 人，逼迫自殺 1397 人；另外，致傷致殘 2146 人。死亡人員按當時的成份劃分：四類分子 3576 人，四類分子子女 4057 人，貧下中農 1049 人（大多數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問題），其它成份 411 人。其中未成年人 826 人。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 78 歲，最小的才 10 天。”

階級鬥爭理論把人異化成了魔鬼。文革廣西、湖南一帶風行殺地主，將人肉煮了吃；吃人肉時，為了防止旁人告發或將來嘲笑自己，領頭的便強迫在場的所有人都吃人肉。

浙江空五軍政委陳勵耘、陸軍第二十軍政委南萍夥同杭州造反派頭頭張永生、

武裝鎮壓蕭山、富陽兩縣。在蕭山打死 27 人，大部份是抓獲後活活拷打死的；在富陽打死 135 人，打殘 319 人，燒毀房屋 1200 餘間。浙江嵊縣雙方共戰死 191 人。

散文家劉燁園在《托咐》中寫道：“1967 年 10 月，浙江省溫州平陽某大隊兩天內集體槍殺 76 人；同年 11 月，某縣民兵槍殺 69 人；1968 年 7 月，某軍分區調動八縣兩礦一廠一郊武裝人員進攻某群眾組織，打死 146 人；同月，某縣以‘群眾專政’為名，殺死 3681 人，使 176 戶全家滅絕，占全縣‘文革’中死亡人數 93%；同年 8 月，軍隊和某群眾組織攻打另一群眾組織，據不完全統計，僅此一戰，打死 1342 人，俘虜 8945 人。走到某照相館門口，仍不解恨，光天化日之下，又隨意槍殺其中 26 人；還是這個月，軍隊聯合十縣及多家兵工廠的武裝人員，一次圍剿某縣群眾組織就抓捕一萬餘人（當時全縣人口十萬人左右），槍殺 1016 人……；全縣 86 個大隊，81 個殺了人……此類事件，不堪枚舉！我曾略做統計，成批殺人之事，各縣市皆有。幾十年後平反，證明幾萬冤魂，全系無辜被害！而殺人手段之殘忍，諸如挖肝取心、活割生殖器官烹食之類，若非官方檔所載，當事人供認不諱，誰敢信之？”

虐待俘虜是文革中武鬥一大特色。武鬥中死亡者相當大一部份是被虐殺的戰俘。如河北雄縣由軍隊三十八軍支持的那一派動用大炮攻打對立面，攻克對方據點後，將俘虜都用鐵絲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從肛門穿進、陰戶穿出，遊街之後，全部槍殺。

陝西安康縣武鬥中亂打濫殺俘虜 286 人，自殺 20 人。亂打濫殺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槍打、絞死，還有讓被殺者背炸藥包、手榴彈炸死，甚至一次“審訊”活埋了 13 人。

山西長治劉格平派在中央的壓力下交出武器後，成了對方肆虐、報復的對象。江西宜豐縣的一派到上高縣去武鬥，死了四人。回來召開追悼會，為了給死去的烈士祭魂，會上悍然槍殺了三名從上高縣抓來的無辜老百姓。

廣州作家秦牧曾這樣記述在廣州街頭所見：“人們咬著匕首，抬屍遊行。在一些中學門口，看到因武鬥而死的學生的訃告，上面大書‘享年十七歲’、‘永垂不朽’等字眼。”一天早上，“當我走回報社的時候，一路都看到路樹吊屍的景象。那些屍體，大多是被打破了頭顱、鮮血迸流的。在從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見到 8 具這樣的屍體。”一年多的武鬥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應在 30 萬至 50 萬之間。

江青說，四川“武打全國出名了”，“重慶打得稀爛，陣線就比較清楚了。好得很！”全國在單次武鬥中傷亡最大的，是四川瀘州。一仗打死 2 千餘人，另有 8 千多人成殘廢。

重慶 7 月 3 日，“8.15”派動用了發射鵝卵石、石塊的自製土炮、鳥槍。“砸派”“猛虎團”武鬥人員被土炮打死 2 人，傷數十人。7 月 6 日，“悍紅總部”出動大批武鬥人員，在北碚對重慶光學儀錶廠的“砸派”據點發動進攻。武鬥中死 3 人，打傷“砸派”數十人。“悍紅總部”佔領了北碚地區大部，並出動大軍，打下了 23 中。7 月 7 日，兩派深夜在北碚的浦陵機器廠（上海內遷廠）武鬥，廠內設備遭到嚴重破壞，全廠停產。從次日起，“8.15”派武裝包圍該廠，切斷了該廠的糧、菜、煤、水供應，該廠上海援內職工被迫于 7 月 15 日全部返回上海。同日，兩派在嘉陵江南橋頭武鬥，“8.15”派在進攻砸派佔據的市二輕局大樓時被小口徑步槍打死 2 人。這是重慶武鬥中第一次開槍打死人事件。

7 月 8 日，“砸派”在北碚發起反擊，“砸派”的“猛虎團”派出大批武鬥

人員前往“8.15”派控制的位於北碚的紅岩機器廠，營救“砸派”被抓人員。兩派展開大規模武鬥，雙方使用了小口徑步槍、獵槍等武器。武鬥中，雙方死9人，傷數人，雙方各有100余人被對方抓走。變電所被炸毀，全廠停產。8日增援中梁山武鬥後留駐于戰旗小學的重大“八·一五”“301”武鬥隊，于黎明前以自製土噴火器和土炮伏擊從煤校返回重慶電機廠的砸派武鬥隊，砸派被土噴火器燒死2人，燒成輕、重傷各2人，鋼釘刺死1人，重大“8.15”武鬥隊被自己土炮噴出的火焰燒成重傷1人。當天上午，重大“8.15”武鬥隊又在該地區突襲了過路的“砸派”河運學校“航鋒”武鬥隊，刺傷、俘虜多人。

7月25日，“8.15”與“反到底”派在重慶工業學校發生大規模武鬥。武鬥中，槍支代替了石頭、鐵棒，造成數十人傷亡。7月28日晚11時，“反到底”派200餘人趁天黑，摸到了“8.15”派佔領的軍用工廠——嘉陵機械廠，潛入廠房，偷走3挺機槍，30多支步槍、衝鋒槍和一批彈藥。在回撤時，被哨樓裡護廠的紅衛兵發覺，當即以猛烈的高射機槍火力掃射。“反到底”紅衛兵也組織還擊。一名紅衛兵被高射機槍的數發子彈攔腰打成兩截，另一名紅衛兵的腦袋也被高射機槍威力巨大的子彈打掉。數名紅衛兵倒在了血泊中。

這次武鬥中，重大“8.15”武鬥隊使用了非法私設的電臺進行聯絡。

7月14日，為解決四川武鬥問題，中央代表謝富治、王力到達重慶，在重慶警備區司令部接見兩派代表，分別作了要求立即停止武鬥的講話。陪同中央代表到渝的四川省革籌組組長張國華、副組長劉結挺上午9時發佈停止武鬥的六條命令。重慶國防工業系統兩派的“8.15”派“八一兵團”與“反到底”派“軍工井岡山”達成停止武鬥14條協定。中央代表謝富治應邀主持了簽字儀式。兩派代表三千余人召開“團結大會”。隨即，中央代表趕赴武漢，處理“百萬雄師”

問題。協議轉眼就被雙方撕毀。就在當天，兩派在北碚區前進公社（鄰接西師、西農）發生武鬥，“8.15”派動用了民兵槍枝，雙方互有死傷。

7月15日，四川省革籌組組長、成都軍區政委張國華與副組長劉結挺及中央代表、貴州省革委會主任李再含一起，到武鬥嚴重的北碚區西南師範學院、西南農學院、重紡五廠等單位視察。7月17日，張國華、劉結挺等在北碚區分別接見兩派群眾。要求兩派停戰，上交武器。張、劉並於當天與中央代表李再含一起，于午後1時至晚上10時半，在重慶警備區小禮堂接見“砸派”代表，作停戰繳槍工作。

7月中旬後，“砸派”改稱為“反到底”。7月17日，西師“831”、西農“826”到北碚街上向駐軍上繳武器，與“8.15”派發生武鬥，雙方發生槍戰，互有傷亡。7月23日，以西師“831”為首的“反到底”派，組織上千人的隊伍，到“8.15”派控制的北碚街上遊行示威，擁護中央對武漢“720”事件的處理決定。“悍紅總部”立即出動幾大組織數千人的武鬥隊伍，兩派發生武鬥。在雙方混戰中，“反到底”派因準備不足，受創嚴重。據“反到底”派稱：在該武鬥中，其受傷者達百餘人。當晚，“8.15”派向西南師範學院發動進攻。西師“831”于次日凌晨撤離學校。7月24日，“8.15”派在化龍橋地區向控制的重慶工業學校發起進攻，攻佔該校。武鬥中該校“反到底”派“紅岩兵團”死10人。重大“8.15”的“301”武鬥隊張全興和“戰地攝影師”唐世軒被小口徑步槍擊中身亡。重慶大學“8.15”打通了通往市區的道路，建立起重慶工業學校的“新據點”。當日，“反到底”派在體育館外召開聲討“720”事件、聲援武漢造反派大會。會前，得知工業校被“8.15”派攻佔，“反到底”派“工總司負責人黃廉在發言中，號召反擊，並連續三次將“敵人不投降，就叫它滅亡”，錯呼為“敵

人不滅亡，就叫它投降”，可見其激昂之情。

7月31日，“反到底”派從青木關向北碚的“8.15”派發起進攻，兩派在北碚區展開大規模武鬥。武鬥中，雙方死3人，傷13人。“8.15”派北碚區“捍紅總部”頭頭下令，將北碚青木關至歇馬場的小灣公路橋炸毀。

7月31日，重慶市郊榮昌縣，兩派發生大規模武鬥。參加武鬥的人員700余人，使用了機槍、步槍、手榴彈等武器。雙方被打死78人，此戰持續到8月6日。

“8.15”派因有軍方的支持，又佔據了市“革聯會”的權力位置，在“文攻武衛”高潮中占居優勢。隨著武鬥的發展，重慶大學“8.15戰鬥團”建立了“衛戍司令部”、“301野戰隊”等專業武鬥組織；各區“8.15”派也建立了“捍紅指揮部”等武鬥指揮機構。

7月，“反到底”派組織了“文攻武衛連”，後來擴充為“文攻武衛團”。並先後組建了“北碚猛虎團”、“黃山警備區”等專業武鬥組織。

為了“純潔紅色根據地”，兩派都實行了清理“階級隊伍”的措施，即將對立派組織成員甚至家屬清除出其控制的單位和住宅。為避免戰火燒身，或淪為“戰俘”，兩派組織或僅持有其中一派觀點的數十萬群眾，流亡到川內各地和全國，或投親靠友，或流離失所。

8月3日，國營望江機器廠武鬥人員，用高射炮擊沉了重慶軍分區的交通艇，艇上的3名解放軍士兵被打死。自此日起，長江、嘉陵江兩大河道被強行封航，一有船隻出現就立即開炮。這次封航達40餘天。

8月5日，兩派在國營建設機床廠清水池發生了大規模武鬥。除了步槍、衝鋒槍、手榴彈、輕機槍外，還動用了坦克、高射機槍等武器。雙方死亡22人，

傷者近千人。

8月8日，國營望江機械廠的武鬥組織用改裝的三艘炮船組成“長江艦隊”，在江上橫衝直撞，並沿長江炮擊了東風造船廠、紅港大樓、國營長江電工廠及沿江船隻。並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門，打死24人，傷129人，擊沉船隻3艘，打壞12艘。

8月12日，兩派在嘉陵機械廠再次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直接參戰人員逾千名，支援上萬人。武鬥中動用各種槍炮、坦克、戰車，雙方死亡數十人，傷600餘人。

8月13日望江機械廠武鬥組織向設在郭家沱中學的部隊指揮部發動攻擊，打死4人。

被困於體育館將近半個月之久的“反到底”派也大感困頓。不僅糧食蔬菜幾近斷絕，其武鬥人員生活困窘，時刻擔心被“8.15”派拉閘斷電；而且與江北本派佔據的各軍工大廠聯繫中斷，時刻有被攻佔的危險。為打破“8.15”派的圍困，“反到底”派決定再次發動對嘉陵江大橋的“攻擊戰，奪取對大橋的控制權”。

8月6日，兩派在嘉陵江大橋兩端展開槍炮戰，江北棗兒坡上的市副食品乾果戰備物資甲級倉庫被擊中起火焚毀，直接經濟損失84萬餘元。當天，兩派談判，達成於本日12時無條件停火的三條協議，但轉眼即遭破壞。

8月14日下午，“反到底”派在江北區委和長安廠架設了十七八門大炮，6點15分，十幾門大炮一齊開炮，攻擊“8.15”派佔據的輕工局大樓、六中和印刷廠等據點。“8.15”派的大炮也進行了反擊，但很快遭到對方炮火的摧毀性打擊。炮轟過後，“8.15”派發起進攻，武鬥者們赤膊上陣，穿著短褲，手持步槍和衝鋒槍，在橋上匍匐前進，以表示學習當年紅軍長征中攻打瀘定橋的視死如歸

的決心。經過激戰，“反到底”派佔領了嘉陵江大橋。

據事後統計，此次炮轟，僅“反到底”派的大炮大約發射了五六千發炮彈。而據黃廉向中央彙報說，共計打了1萬多發炮彈。南橋頭二輕局大樓被炮火擊中，整個大樓起火燃燒。焚毀六中學生宿舍一棟，印嘉陵印刷廠被炮火擊中焚毀停產，市委大院遭炮擊。此次武鬥，共計打死27人，焚毀了二輕局辦公大樓，燒毀了1300余名幹部的檔案案和財會帳目等，嘉陵印刷廠被炮火擊中焚毀停產。武鬥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55萬餘元。1982年，黃廉受到審判。其中關於嘉陵江大橋武鬥一事，判決書列舉的傷亡和損失數字是：“這次武鬥造成打死11人，打傷多人，燒毀重慶市第二輕工業局辦公大樓、重慶第六中學一棟學生宿舍、嘉陵印刷廠廠房及部分設備，燒毀大樓幹部檔案、財會帳目、檔資料，後果嚴重。”

8月18日，兩派繼續在沙坪坎番家坪地區發生大規模武鬥，動用了坦克、裝甲車、高射重機槍。雙方死亡人數達128人，傷者無數。此次流血慘案一直進行到8月20日。

8月22日，兩派在南岸區上新街發生武鬥。打死22人，傷數十人，損失財產無數。同日，重慶警備司令部3輛小車途經山城寬銀幕電影院時，被武鬥組織伏擊，打死1名處長，打傷5人。8月28日，北碚區3000餘人在歇馬場424部隊駐地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死亡40人，經濟損失重大。8月中下旬，兩派在楊家坪地區發生大規模武鬥，參戰人數4000多人。經過一周激戰，楊家坪街道房屋成為一片廢墟，慘不忍睹，雙方死亡人數達200餘人。

10月27日，解放軍重慶通訊兵工程學院警衛連駐地發生武鬥流血事件。32名學院成員及附近群眾被打死，53人受傷。

1968年3月中旬，川東北石油處在長壽雲台處本部發生武鬥，持續六天七

夜，有 40 余名武鬥人員魂歸西天。4 月 7 日，國營長安機器廠又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動用輕重機槍、坦克、大炮等，工廠被炸成一片廢墟，死傷人員無數。4 月 28 日，兩派武鬥致使長安機器廠發生大火。晚 9 點 10 分，市消防大隊前往救火現場，途徑重慶鋼鐵廠時，竟遭槍擊，9 人死於非命，30 多人倒在血泊中，3 輛消防車被打壞。

到 7 月 9 日，兩派武鬥組織仍然在江陵機械廠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動用坦克、大炮、輕重機槍等，附近居民住宅被炮彈擊得千瘡百孔，造成大批武鬥人員和無辜居民偽亡。

山西武鬥，以長治地區最烈。軍分區和當地空軍駐軍分別支持兩派。軍分區集中各縣民兵組成“剿匪兵團”，打開軍火庫，武數萬民兵，由軍分區首長指揮攻城戰。在攻克一座煤礦的激戰中，僅守方即陣亡 2 百多人，數百人負傷。而守方曾在一次交戰中將參戰的役官兵 12 個整連外帶四個班全部繳械、俘虜。“雙方打死打傷參戰人員不計其數”。

陝西省勉縣武鬥死亡 85 人，其中打死 47 人、武器走火死亡 12 人、汽車肇事死亡 13 人、觸電死亡 1 人、打死無辜群眾 3 人。蒲城縣雙方及無辜老百姓死 34 人。城區十餘條街道的 2 萬多所民房被燒。安康縣武鬥，歷時一年，毀房屋 3300 餘間，死亡 784 人。

根據兩廣和湖北的縣誌統計：廣西省各縣受迫害人數為 12,616 人，其中各縣死亡人數平均為 574 人，受傷人數平均為 266.4 人；廣東省各縣受迫害人數為 6,788.6 人，其中各縣死亡人數平均為 311.6 人，受傷人數平均為 28.1 人；湖北省各縣受迫害人數為 2,317.5 人，其中各縣死亡人數平均為 10.8 人，受傷人數平均為 44.5 人。

第 138 節 廣西大屠殺與吃人運動

1·兩派武鬥

1967 年上海的一月奪權後，成立新的政權，毛澤東稱之為“革命委員會”。接著有黑龍江、貴州、山東等省的造反派也奪了權，相繼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時，《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東北的曙光》；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時，發表社論《西南的春雷》以示慶賀支持，也表明了毛澤東支持成立新政權的決心。在此種形勢下，各地的許多領導幹部，原來是壓造反派的，現在則召開表態支持造反派了。在廣西首先站出來承認錯誤並表態支援造反派是賀希明（區人民政府副主席）、霍泛（區黨委候補書記）、傅雨田（區人民政府副主席）、謝王崗（原欽州地區組織部長）等黨政領導幹部。於 1967 年 2 月 19 日發表聯合聲明，支持廣西造反派。

1967 年 4 月 19 日，廣西區黨委書記處書記伍晉南、廣西區人民政府副主席賀希明、廣西區黨委候補書記霍泛發表“四.一九”聲明的大字報。4 月 22 日，以大中學校學生和一部份工人造反派為主，成立了“廣西四.二二革命行動指揮部”，下又分為南寧廣西“四.二二”，柳州、桂林、梧州“造反大軍”及柳州鐵路局工機聯、桂林“老多”（廣西師院學生造反派）。“4.22”則是支伍反韋的造反派，主要是由青年學生、市民、工人、下層知識份子及少數幹部組成，知識層面較高，對官僚階層和現實社會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

接著，保守派在廣西成立了“聯指”。由於廣西第一書記兼廣州軍區第一政委韋國清的多年經營，廣西的多數黨團組織、各區縣武裝部、武裝民兵，在廣西軍區軍管會的直接支持下成立了“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死保韋國清和軍區，打擊五（晉南）賀（希明）霍（泛）傅（雨田）謝（王崗）袁（家柯）。

這一派人多勢眾，組織嚴密；他們大多是既得利益者，更傾向於維護既往的政權和秩序。“聯指”擁有現實當權者以及軍隊和幾乎整個縣鄉政權的支持。下又分為南寧、柳州、桂林、梧州“聯指”和柳州鐵路局“鋼聯指”。

文革開始，毛澤東和中央文革要靠造反派打開局面，支持過“四二二”。不久，毛又要保他的“廣西老朋友”韋國清過關，“四二二”便被中央文革派拋棄。當廣西造反派被韋國清和廣西軍區支持的“聯指”打得眼看招架不住時，1967年8月24日，周恩來代表中央表態：廣西“4.22”是造反派！廣西“4.22”才得以苟延殘喘。

1967年秋冬，“聯指”開始在廣西各地成批屠殺“4.22”。欽州地區的靈山縣“聯指”的“飛虎隊”在五個公社成批屠殺靈山“革聯”（即“4.22”群眾）。

1968年1月18日靈山“革聯”控訴團200多人第二次到南寧廣西軍區控訴靈山“聯指”亂殺人的罪行，但廣西軍區對靈山“聯指”亂殺人命聽而不聞，甚至縱容“聯指”對“4.22”屠殺。1月20日廣西“工總”和河池地區部份群眾400多人來到廣西軍區請願，聲援靈山“革聯”控訴團，揭發各地“聯指”屠殺無辜群眾的罪行，譴責廣西軍區以“支左”之名，行支一派壓一派之實。廣西軍區不但給“聯指”武器，在各地慫恿“聯指”對“4.22”進行圍剿，而且還命令“4.22”放下武器，束手待斃。在此關頭，柳州鐵路局工機聯“4.22”《紅衛兵戰報》發表編輯部文章，號召反對繳槍，試圖武裝自衛。

而廣西當權派控制的《廣西日報》則發表對“4.22”批判的社論。4月9日，《廣西聯指報》發表社論，公開叫囂：韋老爺（韋國清）出錢，軍區出槍，“聯指”出人，向“階級敵人”主動地不停頓地發起猛死的攻擊，向“階級敵人”刮起

12 級颱風。

2·莫須有的“反共救國團”

1968 年春，“聯指”利用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的指示，開始了製造屠殺合法藉口的工作。

《容縣誌》記載：1967 年“11 月中旬，石寨區武裝部長在縣召開的會議上，介紹古兆鄉所謂破獲‘反共救國軍’組織，和實行‘群眾專政’的經驗，全縣亂殺人的惡果由此開始。此後，全縣有 738 人無辜被打死”（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6 頁）。

1967 年 12 月 25 日至 27 日，廣西玉林地區的容縣“聯指”調集 400 多人，全副武裝攻打黎村“4.22”，打死 12 人，傷 21 人。黎村“4.22”被打散後一千多人外逃梧州和廣東信宜等地。“聯指”攻打黎村先後吃去國庫糧食 36000 多斤，開支 18000 多元。1968 年 1 月 18 日，廣西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央文革、中央軍委、廣州軍區發出《關於容縣黎村問題的初步調查報告》的電報，偏袒“聯指”一方鎮壓“4.22”。勝者為王，容縣“聯指”和廣西“聯指”把容縣的“4.22”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組織。1968 年 1 月 17 日，《廣西聯指報》公佈容縣 43 個“反共救國團”等“反革命組織”，並進行鎮壓。

1968 年 2 月 6 日玉林地區“聯指”組織 2000 多人，配備步槍 800 多支，輕重機槍 26 挺，衝鋒槍 407 支，各種炮八門，手槍 164 支，以及自製坦克一輛，攻打“4.22”派據點，包圍兩天後，攻下據點，抓獲 13 人，全部槍殺，在圍攻時“聯指”死 8 人，“4.22”死 5 人，在事件中明代建築物萬花樓被炸毀，炸毀民房 72 間，吃去國家糧食 14000 多斤，肉類 8800 多斤，耗費國家資金 20000 多元。

為了擴大“4.22”莫須有的“反共救國團”罪名的影響，廣西“聯指”的喉舌——《廣西聯指報》1968年2月17日刊登《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不准牛鬼蛇神翻天——向全區人民提供一份觸目驚心的階級鬥爭材料》一文，公佈所謂玉林專區“聯指”戰士和貧下中農揭發容縣一批“反共救國團”組織。這批“反共救國團”是：容縣“4.22革總”的“反共救國隊”；長壽公社的“反共救國軍”；大鵬公社的“西江地下反共救軍”、“殺人戰鬥隊”及“反共救國軍第三軍”；松山公社的“反共救國軍”；下河公社的“反共救國軍”和“反共救國軍第四集團軍”；寺堂公社的“反共集團第四軍”；黎木公社的“反共救國軍”；頂底公社的“反共支修集團軍”；半月公社的“反共第一方面軍”；三岸公社的“新編步兵師第一獨立師”；沙田公社的“反共救國軍第三集團軍”；石扶公社的“反共救國軍”；大水公社的“反共救國軍青年獨立團”；尋陽公社的“反共救國團”等等。嗚呼！小小一個容縣遍地“盛產”“反共救國團”，且“反共”的編制也在“放衛星”……

從4月23日起至29日止，玉林專區革委會召開全專區政工會議，刮“十二級颱風”（大屠殺）。全專區文革中死亡10156人，其中大部分是在刮“12級颱風”中被殺害的。

1968年5月17日，廣西革籌、廣西軍區向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所謂《破獲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一案報告》的電報。電報說“我區破獲一起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組織，已捕獲團長一人，副團長三人，政治部主任三人，經濟部長一人，支隊長四人，聯絡站負責人共63人。繳獲反動組織綱領、反革命刊物、入團登記表、印鑒、與國外敵特機關聯繫的秘密通信地址及部分槍支彈藥等罪證。”電報還說“該反革命組織涉

及南寧市及南寧、玉林、欽州、柳州等四個地區。於今年（1968年）2月2日正式合併定名為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分團下設大隊、中隊，全區已發展匪徒兩千人”。“發展組織和活動特點是：利用群眾組織中的派性，易地活動，鑽進群眾組織，互相串連。靠打砸搶補給經費，通過武鬥掌握武器。總部設在南寧市解放路新華街，（廣西‘4.22’控制區）利用‘4.22’據點造反樓做聯絡站，與越僑有聯繫”。

根據官方“處遺”調查結論，所謂破獲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一案，是廣西軍區、廣西革籌利用“老反團”追查“新反團”，打擊鎮壓廣西“4.22”造反派群眾組織的特大冤假錯案。這宗假案是解放軍“支左”幹部王生江授意從廣西“4.22”分化出來的羅振龍、曾學文憑空編造杜撰出來的，廣西軍區一手策劃炮製。廣西軍區、區革籌向中央報告後，部署全區追捕槍殺大批無辜幹部群眾。這宗特大冤假錯案，遲至1984年才平反

“反團”案一公佈，千百萬反對派的平民百姓就成為他們要消滅的“階級敵人”，首當其衝的是當時自治區的“走資派”謝王崗、袁家柯、霍泛、賀希明、傅雨田等，其實是省委一級不同意韋國清做法的幹部，皆被定的罪行。

5月20日，廣西革籌、廣西軍區發出《關於繼續深入偵破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問題的指示》。指示說，我區破獲“反共救國團”是一起重大的“反革命”案件，不僅涉及面廣，而且敵人鑽進群眾組織（“四.二二”）利用派性發展串連。已捕的69名罪犯，主要罪犯已捕獲，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各級革委會和軍分區黨委，還要進一步引起重視，把這一案當作一個戰役來抓，指定專人，組織專門辦公室，充分發動群眾，力求迅速徹底偵破，並儘快結案懲處。當前該案工作重點是集中罪證，集中主犯，追組織，追聯繫……

6月15日，廣西軍區副政委、南寧市革委會主任韓世福在南寧市各級革委會負責人大會上說，廣西已破獲了一個反革命集團——“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總部設在南寧市。韓世福要求各單位徹底破案，開展“三查”運動：一查“走資派”幕後活動；二查“叛徒”、“特務”活動；三查地、富、反、壞、右的活動。為成立廣西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掃清障礙。

6月17日，廣西革籌、廣西軍區發佈《關於破獲“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案件的公告》。《公告》稱：這個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混入了群眾組織（指“四.二二”中，）有的還當了群眾組織的頭頭，打著造反旗號，狡猾地利用群眾組織掩護他們進行反革命活動……現在，這個反革命集團並沒有完全摧毀，必須徹底追查組織。

《公告》發佈後廣西各級革委會、人武部和“聯指”組織群眾，掀起了聲討“反共救國團”的熱潮，有的地方還召開“聲討大會”、“誓師大會”，公開的、集中的對“四.二二”造反派進行大屠殺，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錯案。

據南寧市383個單位不完全統計，已被列為參加所謂“反共救國團”的有3547人（全部是“四.二二”派的），其中已被批鬥的1722人，關押957人，大搞逼、供、信，嚴刑拷打，強迫承認“反團分子”。結果被打致死37人，被逼自殺身亡34人，打成殘廢者2人，下落不明4人（南寧市清理“反共救國團”專案領導小組于1979年已否定“新反團”假案，並作了初步處理，但沒有公開平反）。

據官方的《武鳴縣誌》記載：武鳴縣從6月22日至7月5日，12個公社有11個先後召開“反共救國團”的萬人大會。因為公告編造了“反共救國團”狂叫“殺貧農”的綱領，二十年前的貧農被煽動起來殺二十年前的地主富農。在會

場內外打死 698 人，加上被迫自殺的一共達 856 人，其中兩江公社一天就打死 159 人。在會上當場被打死的及會後，死者大多數是“四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份子）及其親屬。

武鳴縣的一個公社，在趕集時將 60 多人押到墟場，一字排開，用鐵錘逐一砸開腦門。相鄰一個公社，將 40 多名“反”字型大小押到集上，全部用亂棍打死。

武鳴縣“自開聲討會至追查結束，被打死及迫害致死 1546 人。”整個武鳴縣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約 2500 人，其中“農村居民 2176 人”，而非正常死亡的“農村居民”中，“四類分子及其部份親屬 1800 多人”（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30-32 頁）。

上林是南寧附近一山區小縣，人口少，但殺人按比例全自治區第一。一陣“階級鬥爭的十二級颱風”刮來，人們便開始亂抓亂打亂殺。一時間殺人如麻，縣城電線杆上皆掛滿人頭。

上林縣從 6 月 29 日至 7 月 2 日止，共挖出“反共救國團”、“反共救國軍”等 17 個反革命組織。僅 7 月份，全縣打鬥致死 334 人。

1968 年 8 月 16 日，上林縣三裡區革委會召開群眾大會，將“23 種人”及他們的親屬，全部拉到會場批鬥，當場活活打死 167 人！據新編《上林縣誌》說，這僅僅是該縣成批殺人事件中的一起事件。該縣被打死和迫害致死共 1906 人。

上林縣三裡公社曾發生一起大屠殺，一次殺害 160 餘人。起因一起“國會縱火案”：在軍隊支持下，一派成立革委會後，加緊打擊另一派。幾人密謀，半夜用一小炸藥包在公社革委牆上爆破了一直徑不超過一米的窟窿。天未明，廣播喇叭就公佈這是對立派破壞新生紅色政權的罪行，號召以戰鬥來保衛。隨即開始大

肆逮捕，將對立派骨幹及“牛鬼蛇神”160餘人押解到河邊，一聲令下，用刺刀、槍托、大棒驅趕到河中。有些人高呼著“毛主席萬歲”向河中走去。橋上的民兵打靶似地射殺未淹死的人。一水性好的人潛泳順水逃遁，人們沿岸追了二裡，將其擊斃，無一倖免。那天到過現場的人都扔掉了鞋：血泊沒腳，鞋全泡透了。

賓陽縣新僑區打死的兩百多人中，多數是被扣上“反共救國團”、“青年黨”帽子被殺害的。賓陽縣，在軍隊革委會主任王建勳的直接指揮下，自7月26日至8月6日的11天時間裡，打死了3951人（其中農村居民3441人，致使176戶全家滅絕）。賓陽縣“聯指”憑恃縣武裝部的支持，在鄉鎮墟市上見到“四.二二”的人就亂棍打死，街上擺滿了死人。繼而再殺五類分子，當地最有名的醫生是地主出身，也被殺害。廣西賓陽縣革委會發動向階級敵人進攻後，全縣開始瘋狂打人。縣醫院院長以及內科主任、外科主任，3人被活活打死。

3月16日**天等縣**革委會成立，在縣武裝部長馬政華等人的多次佈置和策劃下，從3月8日至27日的十多天裡，全縣發生190多起殺人事件，共殺害630多人，僅3月18日的一天發生31起殺人案件，殺害102人。祥元鄉兩起殺人事件，共殺46人，造成16戶無男人，9戶滅絕。死者農會沖的女兒，被兇手黃正建等人輪奸後強迫嫁給兇手農朝豐。死者農朝權、農良甯的妻子被強嫁給兇手黃正健、蒙加豐為妻。至年底全縣被打死、迫害致死1651人”（《天等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頁）。天等縣把荷公社的懷安、吉蘭兩個大隊被扣上“反共救國團”罪名有103人，其中被打死49人，占這兩個大隊“文革”死亡61人的80%。該縣殺死、害死1651人。

臨桂縣從6月中旬至8月底，被扣上“暗殺團”、“反共救國軍”等莫須有罪名而遭殺害的達1991人，其中國家幹部326人，工人79人，學生53人，城

鎮居民 68 人，農民 547 人，地富反壞右分子及子女 918 人。臨桂縣殺害及迫害致死 2051 人。

臨桂縣革委會委員胥 XX，在“七.三”佈告下達後，親自策劃指揮殺害大批黨政幹部和無辜群眾，其中有縣委副書記、副縣長等 19 名縣區幹部。胥某親手殺死 3 人，這個人殺人手段殘忍，但為他辦理人事檔案的軍隊當權者，把他的檔案寫得幹乾淨淨，而且是立場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為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立了功”等等。胥某 1971 年 9 月以照顧父母為名，調回四川綦江縣還擔任了工商技校綦江分校的副校長。1984 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公安機關逮捕了胥犯，對他的檔案清清白白感到驚訝。

8 月 21 日，**大新縣**大嶺大隊把脈生產隊社員許振益，被該大隊文書周均定揪鬥逼供，被逼承認參加“反共救國團”，還供出許定武等 56 人是“反團”成員，假案逼成後，該大隊革委組織以周均定為首的“專案組”和以農德為首的民兵糾察隊，把“反共救國團”成員關押吊打逼供，先後用木棍、鋼釘、槍殺害 33 人。

《公告》發佈後，北流縣成立了“揪反團指揮部”。6 月 26 日，該縣革委會主任李國偉主持召開三萬人參加的徹底摧毀“反共救國團”的誓師大會。動員佈置全縣追查“反共救國團”。亂揪、亂鬥、亂殺人十分嚴重。玉林專區革委會把北流縣的做法，印發簡報推廣。玉林、桂林、貴縣、容縣等縣很快掀起追查“反共救國團”高潮，大搞嚴刑逼供，造成大批冤假錯案。玉林專區被當作“反共救國團”立案審查、關押、殘酷批鬥的有 5213 人，廳級幹部 1 人，縣級十部 23 人。許多人遭受折磨，被破壞致死、致殘致傷。

1968 年 6 月 19 日至 20 日，廣西“聯指”武裝包圍水電廳設計院“火種”

據點大樓，屠殺 62 條人命，並滅屍於邕江河裡，釀成“火種”慘案。屠殺有功的“聯指”頭頭廖煒雄，當上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區黨委常委、組織部副部長、宣傳部長等要職，還榮獲中共“九大”代表；顏景堂當上自治區革委會副主任、團區委書記等職；潘玉臣當上區公安廳副廳長。

南寧地區的扶綏縣篤邦公社，在文革中是地、縣、區三級重點，是嚴抓“階級鬥爭”的樣板。從 1967 年 5 月至 1968 年 10 月，縣、區曾先後九次在此召開現場會。特別是 1968 年 5 月中旬扶綏縣革委在此召開的一次現場會，參加人數達 1064 人。會後篤邦大隊共揪鬥 58 人，打死 6 人。挖出“反共救國團”、“紅青戰鬥團”、“中國救民黨”等三個“反革命組織”和四個“經濟犯罪團夥”。篤邦公社在追查“反團”中，大搞嚴刑逼供，非法使用踢、打、跪、吊和諸如罰被鬥者輪流吃屎尿，將被害人光身從 20 米高的陡坡上滾下，把人塞進洩洪管（水管）讓水從另一端沖出，將人脫光衣服推進石灰池中翻滾等罕見的 18 種酷刑。其迫害手段之殘酷、兇狠，達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程度。南寧地區還專門推廣這令人髮指的扶綏“篤邦經驗”。1968 年 8 月 9 日，南寧專區革委以南革發（66）100 號檔，《介紹扶綏縣開展對敵的經驗：“充分發動群眾，穩、准、狠地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揪出階級敵人 1500 人，並揭露了一批反革命組織，如‘反共救國團’、‘青年黨’、‘救民黨’”》等。9 月 10 日，在橫縣召開的南寧專區“積代會”上又印發了篤邦公社開展大批判的材料。

文革中周恩來四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第一、二次接見兩派代表，說兩派都是革命組織，第三次接見說廣西造反派是革命群眾組織。公安部長謝富治 1968 年 5 月公開說：“打死人更是錯上加錯。但出現這種（殺人的）事是因為缺少經驗；所以就不必追究責任了。”

1968年5月21日拂曉，柳州“造反大軍”（“4.22”）頭頭白鑿平、廖偉嚴和“柳鐵工機聯”頭頭王反修、李振嶺為對付“聯指”的圍剿，組織幾千人到柳州火車站“五三八”列車調度段搶援越軍列8個車皮的武裝彈藥，王反修、李振嶺以“李向陽”之名給押車的解放軍寫了收條。該事件令中央震驚。

1968年5月21日拂曉，柳州“造反大軍”和“柳鐵工機聯”頭頭白鑿平、廖偉然、王反修、李振林等人，為了對付柳州“聯指”的武裝圍剿，組織幾千人到柳州鐵路局538調度場，搶援越子彈八個車廂11888箱，共計1700萬發。王反修、李振林還以“李向陽”之名給押車的解放軍戰士寫下了收條。事情發生後，區革籌，廣西軍區立即電報中央。

同一天（21日）上午十點二十分，總參謀長黃永勝給歐致富（廣西軍區司令員）、霍成忠（55軍副軍長）來電：“請歐、霍二人負責處理柳州搶援越物資的問題”，“給群眾組織做工作，搶子彈要追回，要向他們指出，他們這樣做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是違背國際主義原則的，這種行為是錯誤的。”

5月25日，歐致富、霍成忠命令駐柳州部隊高炮70師所屬兩個團、144師兩個營的兵力，對柳州“造反大軍”和柳鐵“工機聯”的幾個“據點”實行武裝包圍，強行收繳“造反大軍”和“工機聯”一方的武器彈藥。企圖一勞永逸地解除造反派的武裝。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廣西當局武裝“聯指”，打壓造反派到動用部隊對造反派實行武裝包圍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柳州民眾的義憤。在部隊把幾個“據點”包圍後，柳州有十餘萬群眾對前來包圍據點的解放軍實行反包圍。群眾高呼：“反對廣西軍區支一派、壓一派，把槍彈暗送給‘聯指’，屠殺‘四二二’！”

“廣西軍區為何不收繳‘聯指’搶走的槍彈？”、“‘造反大軍’不能空手等

死！”……解放軍被群眾包圍後，在互相交手中，部隊二十多人受傷，二人重傷後身亡，群眾反包圍又奪解放軍七百多支槍。

5月底至6月上旬，柳州“聯指”為了配合“大部隊”進攻柳州“造反大軍”，提前處理關押在柳州市禮堂，不同觀點的“審查物件”，分五批拉到柳江河邊殺害，共殺害有名單的42人，有的被鐵絲捆綁手腳推下江河淹死，有的拉到河邊集體槍殺。楊蘭生、楊岩生兩兄弟漂流到遠處上岸。楊岩生又被抓獲，拉到河邊再次殺害，屍體推下河裡。

一天，武宣縣畜牧場場長在柳江釣魚，見到從柳州方向飄來屍體，十分鐘內數了9具。作家秦牧說廣西“大量屍體被綁在木排上，從梧州一直飄流到廣東的肇慶等地”，正是如此。

1968年6、7、8月，在廣西境內的邕江、柳江、灕江、桂江、紅水河等大小河流漂浮無數受難者的屍體，順江而下，經西江流域的梧州、肇慶、廣州，直達下游入海口的香港，連綿不斷，觸目驚心，廣西文革大屠殺的紅色恐怖，令港人震驚！1984年“處遺”工作中，官方對此概況道：“殺人之多，全國之冠；殺戮之慘，歷史罕見”。

柳州市於6月19日由市軍管會、柳鐵公安處、柳州警司聯合發出公告，追查“反共救國團”。僅14個單位上報結果，受審查的438人，其中被關押45人，迫害致死16人。

6月26日，柳州地區的柳江、忻城、象州、武宣四縣和合山礦“聯指”兩千多武裝人員包圍柳江縣進德“造反大軍”槎山加工廠據點。前線總指揮、柳江縣革委會主任宋吉月在戰前動員說：槎山盤踞著一股“武裝土匪”，還有“反共救國團”一定要把他們殲滅。而駐軍在槎山加工廠的只有12人，（大部分是紅

衛兵)七支槍。圍剿時當場打死4人，俘虜8人，俘後槍殺了4人。打死了“反團”分子以後，把死者的人頭割下來，貼上“反團”標記掛在德圩、拉堡圩示眾。其血腥場面極為恐怖！僅防城縣的一個黃竹塘大隊，就因為“反共救國團”案而“捆綁吊打致死6人，被迫自殺17人(救活13人)，暗殺3人，外逃1人，重傷21人，造成駭人聽聞的慘案”(《防城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頁)。

2月16日，“聯指”攻打柳州地區融安縣的銅鼓橋。“聯指”方面抓獲“俘虜”36人，押解途中15人被殺害，雙方對打死5人……7月17日解放軍6977部隊武裝殲滅融安縣“4.22”農總，俘虜120多人，打死多人，繳獲槍支140多支，爾後又抓捕80多人。從6月16日到8月10日，融安縣共殺害304人。僅1968年在8月21日至23日短短三天裡，融安縣就有1006人被暴民用木棒、石頭、磚頭活活虐殺。融安縣有一條“寡婦街”(龍妙鄉被稱之為“十八寡婦鄉”)。一條街的男人和男嬰均被屠戮殆盡，唯存女性。殺完人，便殺被害者的豬雞鴨鵝，賤價拍賣家產，買酒“慶功”，行同盜匪，無恥之尤！

7月19日柳江縣洛滿區革委會發出“洛滿告急”，宣稱18日上午有100多個全副武裝的“4.22”暴徒包圍鳳山公社“聯指”糾察隊。呼籲柳州、河池地區各縣“聯指”和柳州地事“聯指”派出武裝支持，圍殲“暴徒”。當天柳州地事“聯指”發出“關於洛滿區“7.18”反革命事件的嚴重聲明”。

7月21日柳江縣革委會召開常委會議，討論幾縣“聯指”聯合圍剿福塘“4.22”造反大軍問題。會後縣革委將攻打福塘的決定向軍分區請示。柳州軍分區請示廣州軍區同意攻打，並同意調動八縣、兩礦、一郊、一廠“聯指”武裝聯合攻打福塘，並成立“剿匪”指揮部。7月24日凌晨4點，忻城、來賓、武宣、

柳城、宜山、環江、象州、柳江等八縣和合山礦、八一礦、柳州鋼鐵廠、柳州郊區“聯指”3000多人，攻打柳江縣福塘區“造反大軍”。

當時從柳州逃到福塘避難的柳州造反大軍40-50人(大部分是柳鋼的，而且不少人家在福塘)，在23日前已逃離福塘了，只有當地“4.22”觀點的農民50-60人。在被包圍後，他們分別逃上單華山、十二料山和良上村(地處深山裡)。

“聯指”3000多人搜山圍村，抓獲70多人，立即槍殺25人，經過幾天圍剿後，各縣“聯指”大部分撤離福塘，留下部分武裝人員繼續清剿“殘匪”。在清剿中又槍殺打死120多個農民，柳江縣“保衛隊”韋德金在良上村見一婦女背著一個小孩從外面回來，說這婦人是“4.22”的“情報員”，開槍把婦人打翻在地，婦人未斷氣，韋德金又補了一槍，婦人含冤死了，年僅兩歲的小孩見媽媽被打死後，放聲大哭嚎叫，韋德金又用石頭把小孩砸死。“聯指”聯合攻打福塘，共打死146人，開支現金10.4萬多元，糧食5萬多斤。

百色地區成立清查“反共救國團”領導小組和專案辦公室，半年多全地區共追查“反共救國團”嫌疑案104起，批鬥9274人，其中打死、逼死1073人，打傷致殘2135人。那坡縣在全縣範圍內進行追查後，城廂區追逼出“反共救國團”15個軍，40名團長；德隆區追逼出一個師；百都、下華、龍合三個區各追逼出一個團。百合區追逼出“反共救國軍”——“南疆反共暴動組”。平孟區追逼出一批人參加“反共救國團”。縣直機關追逼出“反共救國團”師長黃莊，副師長張增奎，師政委鐘耀飄，副政委梅其武和一批“反共救國團”的團、營、連、排、班骨幹。全縣追捕“反共救國團”551人，其中被活活打死和殺死8人，打傷致殘43人，47人被定為“現行反革命”罪而被捕判刑。

都安縣縣長、副縣長被誣為“反團”指揮，縣委副書記、糧食局副局長、農

業局長、公安局長、糧食局長、法院院長等都被誣為“反團”，迫害致死，全縣11天打死338人。

從2月7日至5月27日上思縣被鬥打1125人，被殺39人。

上思“**枯那事件**”。5月17日，上思縣人武部長、公檢法軍管主任段振邦介入地方支“召開各公社領導、大隊民兵營長、治保主任會議，以民兵“槍換肩”為名佈置收繳“4.22”中民兵的槍支，裝備“聯指”。枯那大隊“聯指”民兵營長梁國雄奉段振邦之令，策劃收繳“4.22”派的槍支，大隊治保主任甯協利拒交槍給“聯指”並開槍打死李巨才。事件發生後，段振邦向欽州軍分區謊報說，27日發現枯那大隊有土匪30~40人，全副武裝伏擊我民兵……段振邦在謊報“匪情”的同時，派副部長韓剛生率“聯指”民兵200多人開赴枯那“剿匪”，一無所獲。7月9日欽州地區公檢法軍營向自治區報告：“枯那大隊並未發現土匪”。

段振邦為實現派性殺人的目的，於8月16日又向欽州軍分區報告請示廣西軍區，軍區命令：“要搞掉他！”於是，縣人武部立即成立“剿匪”指揮部，欽州軍分區副司令員楊伊銘前來坐鎮“剿匪”。調動上思縣“聯指”民兵和東興縣“聯指”民兵及部隊共1000多人包圍上思“匪區”，設卡搜山，沿戶清查，伏擊聚殲。結果，依然沒有發現一個土匪。

8月23日段振邦又生一計，由縣革委會張貼“剿匪”佈告。佈告要在全縣範圍內進行挖黑窩、拔釘子的清匪運動。段振邦在公正公社大會上宣佈：“誰跟山上土匪有聯繫，一律槍斃！”這場指鹿為馬、玉石俱焚的大屠殺，終於落到了“4.22”派的幹部群眾身上，給他們冠以“通匪、濟匪、窩匪”之罪名，大抓大捕1671人，慘遭殺害973人，其中國家幹部149人，特別嚴重的是枯那大隊被

冤殺了 61 名無辜的平民百姓。

上思縣思陽公社一婦女，丈夫被殺後，為兇手強佔為妻，並生下兩個孩子。至 1983 年全面處理文革遺留問題時，方得知現夫是殺害前夫之兇手，海恨交加。為了不給仇人留下後代，狠心將兩兒砍死，神經分裂，成了瘋子。

2 月 11 日至 20 日，靈山召開學毛著積極分子暨貧下中農代表會期間，靈城打死 3 人陳屍示眾。大會號召對敵鎮壓，中間有人佈置殺人，新圩公社回去殺 5 人，第二天早趕回開會。

2 月 25 日至 28 日，大新縣召開縣區村武裝部長、民兵營長會議。武裝部長周永山在閉幕時講，為迎接縣革委會的成立，對不守法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要實行專政，不要心慈手軟。會議後 17 天內，全縣被殺害 239 人。

合浦縣，“2 月，縣城及各公社先後召開批鬥大會，刮起了一股亂殺人的歪風，至 5 月間，全縣被殺和被迫害致死 961 人”（《合浦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28 頁）。

3 月上旬，宜山縣發生兩派大規模武鬥。“聯指”數千人圍攻“4.22”據點。8 日“造反大軍”的群眾近萬人，從城裡走出時，在東片、西片被殺害多人。

3 月，寧明縣由軍隊支左人員主持成立革委會後，即將一個群眾組織“上石農總”定為反革命組織，出動軍隊、民兵圍剿，槍殺、迫害致死 110 多人。

3 月 19 日崇左縣武裝部政委馬風池參加天等縣革委會成立的代表大會。崇左縣以天等縣為榜樣，結果籌備成立革委會前就殺死 94 人。

3 月 18 日，欽州地區公檢法軍管會反映(3 月 5 日至 12 日)全專區共殺人 2000 左右，其中靈山縣殺了 1000 多人(這時在欽州地區上思縣、防城縣、靈山縣等已殺人成風)。

1968年3月23日晚9時廣西隆安縣布泉區武裝部長黃以荃指揮高峰鄉(後改為大隊)鄉長兼民兵營長周朝珠和布泉鄉黨支書隆秀佳兩人組織民兵將高峰鄉四類分子梁受玉、韋信家兩人綁架到龍厚山打死後剖腹取肝、膽煮食，為了殺人滅跡還將屍體丟下深洞。這起野蠻事件沒有得到處理，導致該公社從3月下旬到5月又發生剖腹取肝事件11起，殺害22人。

3月下旬，陸川縣“聯指”在武裝部支持下，策劃對“4.22”圍剿。“4.22”派被殺110人，受審查1萬多人，原縣委書記周履光等8人被槍殺後，用炸藥毀屍。

4月上旬，巴馬瑤族自治縣“4.22”部分人從縣城撤至羌圩公社下乙屯，縣武裝部副部長李彥智組織民兵和“聯指”數百人武裝圍剿少數派“4.22”，此次共殺害30戶(全屯46戶)殺死56人，燒毀民房44戶133間(全屯140間)估計財產損失約7萬多元。

1968年4月13日，貴縣舉行慶祝革委會成立大會，在革委會名單中，由於把“聯指”頭頭當作“4.22”代表，引起“4.22”不滿，並衝擊慶祝大會。“聯指”開槍打死了一小孩劉小圈，“4.22”抬劉小圈屍體衝擊大會主席臺，砸爛縣革委會牌子。接著貴縣“聯指”提出刮“12級颱風”(大屠殺)。一是圍攻炸毀“4.22”據點，二是清理街道，抓人殺人。在10天時間裡，捕了數百人，除當場打死外，其餘分別關押。從“4.13”後的一個月，將關押的全部槍殺，貴縣城區被害致死的230多人。事後，各區社也仿照縣城做法，紛紛成立‘保衛紅色政權指揮部’、‘貧下中農聯合指揮部’、‘鎮壓反革命指揮部’、‘貧下中農法庭’等等，使全縣殺人風迅速蔓延，席捲全縣。3月27~5月22日，貴縣石龍公社松英大隊覃錫明(原鄉長)等分12批用槍棍、鋤打死無辜群眾40人(其中未

成年的 12 人，還有雙目失明老婦人、未滿 10 個月的嬰兒)；有 13 戶男性全被殺光，殺後洗劫被害者財物。貴縣一個兇手還深藏兩個人肝到 1983 年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時候才被迫交出來。據統計，受這一場‘十二級颱風’的影響，全縣 5、6 月份有 2129 人被鬥、打或被殺死”（《貴港市志》，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5 頁）。貴縣殺害及迫害致死 3138 人。

1968 年 4 月 14 日浦北縣北通公社十專學大隊聽了地區革委主任電話會議講話後，召開大隊領導成員會議決定：4 月 15 日殺 24 人，4 月 16 日又殺 52 人。從 4 月 5 日至 5 月 6 日殺 56 戶 92 人(其中 15 戶被殺絕，1 戶 17 人被殺 13 人)，共刮死者財物 2701.27 元(內改嫁證明費 218 元，設卡哨搜人身 4151 元，收生產隊上交殺人費 1016.40 元)，大米 769 斤。

4 月 15 日，浦北縣北通公社旱田大隊革委主任策劃殺 22 人，規定看守民兵每人每天補助 5 角錢，3 個民兵負責殺 1 個人，得 3 元賞錢，3 個晚上共殺 22 人(其中殺絕 5 戶)。殺人前進行搜刮，沒收家產，規定地富寡婦及其女兒出嫁需經“雙打”委員會批准(“雙打”即打擊現行反革命、打投機倒把)。張玉使等 24 人改嫁時被大隊、生產隊徵稅費和兩女出嫁費共 894 元，旱田大隊殺人前後共索取錢物 3066.41 元，全部被吃喝完。

4 月 21 日，龍州縣“聯指”和人武部的幹部武裝包圍“4.22”“工總”工商聯據點，“俘虜”90 多人，將 12 人作為壞頭頭槍殺。事件發生後，南寧地區不作處理。結果致使該縣繼續殺人，從 4-6 月共打死殺死 177 人，占全縣在文革中死亡人數的 40%。

陸川縣部署“十二級颱風”，掀起了殺人新高潮，全縣 11 個公社 155 個大隊，有 154 個大隊佈置殺人，從 4 月 26 日至 29 日，全縣共殺害 1229 人。城鄉

各地，陳屍百里。

1968年4月30日，廣西駐軍8個連的解放軍戰士和民兵一起開赴寧明縣的上石公社，對寧明“上石農總”進行武裝圍剿。5月1日打下“上石農總”，俘虜三、四十人，“上石農總”被定為反動組織，有4人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被判各種徒刑的達22人，有4人判勞改關押在途中死亡，在圍剿和批鬥中打死和逼死108人。1980年，南寧地區中級法院與寧明縣公檢法組成此案調查組，發現根本沒“制定反革命計畫和行動綱領”的東西。

5月24日地處鐘山縣的平桂礦務局“4.22”被圍剿。賀縣、鐘山、富川、昭平縣和梧州地市“聯指”，調集5600多人到平桂圍剿只有800多人的“4.22”派群眾，這場圍剿持續50多天時間，從5月24日開始到7月8日結束，平礦“4.22”慘遭殺害。

6月19日凌雲縣人武部政委、縣革委主任王德堂陰謀策劃，殺害縣委書記趙永禧等21名幹部、教師和學生。6月19日下午王德堂直接策劃縣工代會主任韋德帶領一夥兇手拉趙永禧等三十多幹部、教師和學生上街游鬥。趙永禧等11人當場被打死，20多人被打致傷殘。20日上午王德堂向“積代會”佈置殺人。於是“積代會”後全縣屠殺全面展開。王德堂還先後多次強姦被害者的妻子及女兒共6人，王德堂被封為“支左”的好幹部。

3. 吃人事件

據廣西各地《文革大事記》記載，南寧地區的隆安縣、大新縣、上林縣、武鳴縣，以及玉林地區的貴縣都發生割肉挖肝煮吃的野蠻事件。最慘無人道者，首推剖腹食肝了。

1968年3月23日晚上九時隆安縣布泉區武裝部長黃以荃主謀策劃，指揮

該區高峰鄉（後改為大隊）鄉長兼民兵營長周朝珠和布泉鄉黨委支書隆秀佳倆人組織民兵黃光權、馮品業等將高峰鄉四類分子梁愛玉、韋倍家倆人綁架到龍厚山（地名）剖腹取肝、膽煮食，為了殺人滅跡，還將屍體丟下深洞，這是一起野蠻殘殺人命事件，但由於沒有得到及時的處理，導致該區後來亂殺人剖腹取肝的事件不斷發生。

據“處遺”調查統計該區從 1968 年 3 月下旬至 5 月發生殺人剖腹取肝膽的事件 11 起 21 人，其殺人手段極其野蠻殘忍。據《欽州地區文革大事記》記載，僅欽州地區的靈山縣壇墟、新墟兩公社就有 22 例，合浦縣石康公社有 18 例，浦北縣北通公社定更大隊有 19 例，欽州縣小董茶場有 3 例。

1968 年 4 月 25 日，廣西浦北縣北通公社定更大隊分四批殺了 180 人，並剖腹取肝煮食飲酒，策劃者和兇手還對剩下的寡婦、女兒勒令改嫁，並徵收改嫁費（證明費）。北通公社博學大隊劉繼秀、劉家錦等九人把劉振堅打死後，對其未滿 17 歲的女兒，強行輪奸，然後打死，並剖腹取肝、切下奶子和生殖器回去煮著吃掉。

武鳴縣華僑農場有 2~3 萬人，大部份是華僑，都是“4.22”派成員，遭到軍人的屠殺。武鳴華僑農場 1300 人集體上京告狀，要求中央保障歸僑人身安全。當時的縣革委、人武部頭頭調動民兵在雙橋鄉攔截，當場捕 74 人，歸僑崔光榮當天被槍殺。後來逼出一個“反共救國團武鳴華僑農場支隊”，並宣佈上京告狀是反革命事件。歸僑和國內職工 1337 人被列為審查、鬥爭對象，其中有 221 人被抓捕，202 人被關押，162 人被吊打，107 人被打逼死，341 戶人家被抄。駐紮當地的野戰軍有些部隊支持“4.22”，不得不派了一個連去繳了縣武裝部的械，才止住屠殺。武鳴華僑農場有 1 百多個幹部群眾被兇手挖肝割肉吃個精光。

5月28日，大新縣昌明公社，大隊民兵趙榮廷指派趙興廷等20多個民兵槍殺何以路等3人，殺害後還剖腹取肝、陳屍野外。全地區在5月、6月份共打死和迫害致死3152人。

1968年7月30日至8月7日上林縣“聯指”總部調動400多人到南寧市參加圍剿“4.22”的武鬥，武鬥中上林“聯指”有4人陣亡。上林“聯指”分別於8月2日在上林縣城、8月3日在巷賢區、8月7日在喬賢區召開三次聲勢浩大的“追悼會”，共打死“4.22”“四類分子”（地富反壞）103人。其中：8月1日打死4人，8月2日打死13人；8月3日打死13人；8月7日打死78人。16歲的農中學生覃恒河被拉到潘連標（“聯指”陣亡民兵）墓地，當場槍殺陪祭。喬賢大隊的蒙光忠被打死後，還被兇手剖腹取肝煮吃。古樓大隊潘展才、潘展光、潘海青、潘棉波等四人被打死後不准家屬收屍埋葬，強迫死者親屬拿出柴火500斤，黃豆5斤，火油5斤，然後強迫潘成昌用火燒自己親生兒子潘展才、潘展光和兄弟潘海青、潘棉波的屍體，燒了兩天多，他邊哭邊燒，泣不成聲。原獨山大隊黨支書蘇蘭生被塞進豬籠來回翻滾，然後兇手用鐵釘把他雙手釘在牆壁上致死，慘不忍睹。

人們記得的案例是：某Q將人活活剖腹取肝後得意洋洋提回家吃。半途見一人，問：被殺者同意你吃他肝了嗎？答曰沒問。不行不行，他若不答應，你吃他的肝沒用。某將肝丟棄，又去抓了一個“階級敵人”，用種種酷刑，逼迫被害者同意被食，遂活剖取肝而食。

上林縣一位殺人而食的支部書記在遊擊隊時就吃過人，文革時也吃了人。問：“人肝怎麼做最好吃？”他答道：“烤著吃最好吃，香。煮的有腥味。”——上帝啊，他們吃過多少人呀？吃過人的老人英勇無畏地說：“對，什麼我都承認。

我已八十六歲了。反正活不了幾天了……為什麼要殺他？他父親上山當土匪，弄得全村不安，……他父親有什麼罪惡？把村裡準備燒磚瓦的一垛草放火燒了！害得大家沒東西燒磚瓦！……是我殺了他。全村人都擁護我。毛主席說：不是我們殺了他，就是他殺了我們！你死我活，階級鬥爭！……是我動的手。頭一把刀割不動，扔了。第二把刀才切開。……伸手去掏心肝，血熱得燙手。只好從河裡舀水沖，沖涼了我把心肝掏出來，一人切一塊，全村人拿回家吃了。……”

1968年9月7日至17日，上思縣革委會召開“農業學大寨”四級幹部會，會上貫徹“七.三”佈告，以三代會（農代會、工代會、紅代會）名義在上思中學召開“群眾專政”大會，公開殺害12人，並將部分死者剖腹取肝，拿到縣革委飯堂煮食。食人肝者竟然也有縣、社領導幹部。該縣思陽公社武裝部長王召騰下到和星大隊佈置殺人，當晚殺了鄧雁雄一人，並剖腹取肝與兇手一起煮食。他還勉勵大家都要吃，說吃了人肝膽子就大。次日，王召騰又佈置殺害四人，剖腹取肝，傳令每兩三個生產隊分一人肝吃，以致“共同專政”。

廣西吃人狂潮經歷了三個階段：1) 開始階段：其特點是偷偷摸摸，恐怖陰森。某縣一案卷記錄了一個典型場面：深夜，殺人兇手們摸到殺人現場剖腹取心肝。由於恐怖慌亂，加之尚無經驗，割回來一看竟是肺。只有戰戰兢兢再去。……煮好了，有人回家提來酒，有人找來佐料，就著灶口將熄的火光，幾個人悄悄地搶食，誰也不說一句話。次日晨，喚同夥來吃剩下的；怕人們不敢吃，詭稱是牛肝牛心。待吃完後才得意洋洋宣佈吃的是某某的心肝……

2) 高潮階段：大張旗鼓，轟轟烈烈。此時，活取心肝已積累了相當經驗，加之吃過人肉的老遊擊隊員傳授，技術已臻于完善。譬如活人開膛，只須在軟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腳往肚子上一踩，（如受害者是綁在樹上，則用

膝蓋往肚子上一頂——)心與肚便豁然而出。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餘下的任人分割。紅旗飄飄，口號聲聲，場面盛大而雄壯。有的村莊則別具特色：將人肉與豬肉切作大小相同的塊兒煮熟，將大鍋置於視線之上，村人每人過來一塊。

1968年5月13日武宣縣“聯指”攻打“造反大軍”(“4.22”)，原因是5月4日武宣“紅衛兵團”抓獲桐嶺公社“聯指”梁達堅，並收走了120多元錢物，數日後“紅衛兵團”釋放了梁達堅而未退錢物，“聯指”就以“武宣縣貧下中農指揮部”名義調集600人並請貴縣300多人支援，共900多人對“造反大軍”的北樓、北街、武宣小學據點，執行武裝包圍，打死97人，毀掉房屋67間，價值37900元；共有37戶被抄家，抄去財物價值26600多元。

6月15日武宣縣發生了大規模吃人肉的野蠻事件。五星大隊“聯指”民兵李坤壽、彭振興、李振華等將“造反大軍”劉業龍、陳天掌等4人拉到三裡圩遊鬥。在車縫社門口，劉業龍、陳天掌等四人被兇手打死。李坤壽等拔起尖刀，挖死者的肝、割他們的肉，拿回大隊部去會餐品賞。“七.三”佈告下達後，“聯指”又調動貴縣、桂平縣“聯指”武裝民兵500多人前來支持“剿匪”，打死殺死523人，其中被吃掉肉肝的75人。這是官方的資料。據民間的統計，武宣縣有200多人被野蠻吃掉。其中：被吃肉後砍頭的1人，挖心肝的75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連腳底板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

3) 群眾性瘋狂階段：其特點可以一句話概括：吃人的群眾運動。如在武宣，象大疫橫行之際吃屍吃紅了眼的狗群，人們終於吃人吃瘋了。動不動拖出一排人“批鬥”，每鬥必吃，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斷氣，人們蜂擁而上，掣出事先準備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塊肉便割哪塊肉。某老太太搶割了一葉人肝，

高高興興拎回家去。其時正下微雨，人血和著雨水從肝上流下來，在老太太的身後留下長長一條淡紅色的血痕。還有一老太太聽說吃眼睛可補眼，她眼神兒已不好，便成天到處轉悠，見有“批鬥會”，便擠進人叢作好準備。受害者一被打翻在地，她便從籃子裡摸出尖刀，剝去眼睛掉頭便走。有幾位老頭子則專吃人腦，每人在人腦上砸進一根鋼管，趴下就著鋼管吸食，如幾個人合夥以麥管吸食一瓶優酪乳！有婦女背著孩子來，見人肉已割盡（有時連腳底板的肉全割淨，只剩一副剔得乾乾淨淨的骨架），萬分失悔：孩子體弱多病，想給孩子吃點人肉補補身子。

一般群眾都捲入了吃人狂潮。吃人的大瘟疫席捲武宣大地。其登峰造極之形式是毫無誇張的“人肉筵席”：將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燴、煎，製作成豐盛菜肴，喝酒猜拳，論功行賞。吃人之極盛時期，連最高權力機構——武宣縣革命委員會的食堂裡都煮過人肉！在武宣縣武宣中學，甚至出現了大批學生批鬥完老師、校長之後，在校園內就地架起簡易爐灶，將他們剖腹臠割、煮熟分食的慘劇。吳樹芳老師在批鬥中被打死後，肝被烘烤藥用”（見《北京文學》1998年9期）。

桐玲中學副校長黃家憑，曾任遊擊隊桂支18大隊長。解放後，他任倉梧縣副縣長。在五十年代中期的一次政治運動中，查出他曾有變節行為，遭到打擊。事情是這樣的：一次國民黨軍隊將他及村人包圍在一山洞中，喊話要他出來繳槍。本來山洞中有足夠的糧食，完全可以長期堅持，但為了洞內外大批群眾的安全，黃某只好出來繳槍，村民得以平安。沒過幾天，他又上山拉起了隊伍，轉戰于桂東山區。調查核實：他並未出賣同志、出賣機密。1962年，他得到平反；但留了個小小的尾巴：在困難時期產生動搖。縣政府於是給了他個級別大致相當的重

點中學校長。文革開始，黃家憑被打成“叛徒”，大小會批鬥，1968年7月1日晚被殺死。翌日晨兇手黃佩農、張繼鋒等學生挖他的肝、剝他的肉，以示與之劃清界限。割肉很快形成風潮，整個中學校園內，到處是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火煙繚繞，腥風飄蕩。收屍的“牛鬼蛇神”教師後來追述，黃校長被割得只剩下一副骨架子，用兩個挑土的竹簸箕一裝便挑去埋了。第一個割肉者誰？竟是校長大兒子的女友！此人原來狂熱追求校長公子，此時為擺脫關係，竟惡狠狠第一個操刀割肉而食！吃校長肉的學生們至今當官掌權。

7月17日上江大隊“聯指”頭頭組織批鬥“造反大軍”廖天龍等4人，一幫兇手把廖天龍等4人殺死後，拉屍體到平昭碼頭，有李燦熙、徐達財、樊榮生等人割下死者的肉肝和生殖器，拿回大隊部煎炒、猜拳喝酒會餐。參加吃人肉宴餐的有陳達財等23人。

某頭頭被擒，被剖腹挖肝，分食殆盡。後將他被剔得只剩副骨架子的殘骸掛在鬧市示眾，逼他妻子跪地請罪。一兇手執匕首在她背上劃了一刀，惋惜道：瘦了點，不好吃！然後逼問：這是你男人嗎？是。你男人是反革命嗎？是。女人已身懷六甲，血汗如雨。折磨夠了，最後說：你不是愛你男人嗎？你就抱著他人頭睡覺！於是將早已砍落的人頭塞給她，硬逼女人抱頭睡覺。在這種毫無人性的折磨下，女人精神分裂。

某案，村支書將對立派某人妻子姦污，怕日後報仇雪恨，遂煽動村人將其全村同姓人家不分老幼悉數捉拿，並威脅利誘村人押解這些無辜者乘船渡過黔江，在縣城墟亭附近的鬧市區批鬥致死，割食殆盡。這便是武宣獨有的一例“滅族”案。

某案，一女民兵因參予殺人堅定勇敢，且專吃男人生殖器，並因此入黨做官，

官至武宣縣革委副主任。但該女革委副主任拒不承認專吃生殖器，只承認一起吃過人。最後的處理是開除黨籍，撤銷領導職務，現已調離武宣。縣處遺辦人員談此案時，稱：她當年還未出嫁，估計也幹不出那種事……。——當然，你可以估計她幹不出那種事，我也可以估計在吃人狂潮到立案偵查這長達五、六年的時間裡，她完全可以憑藉權力和關係把罪行掩蓋得天衣無縫。

11屆3中全會否定了文革，唯有廣西繼續堅持派性，拒不處理武宣等縣吃人肉的野蠻事件，後來中央幾次追查過問，區黨委竟有人說“武宣歷來有吃人的習慣”。廣西群眾曾強烈要求“吃過人的人不能再當幹部”！而廣西最高當局韋國清的回答是：“為什麼不能繼續當幹部？對吃過人的人也要作具體分析！”可見，參與吃人的黨員、幹部數量之多。

廣西出現了吃人的群眾運動。僅廣西省被吃掉的一萬多人中，吃人者很多是為補自己的身體。廣西有人想起人肝能滋陰補肝，竟在“無產階級專政”物件中，專門選取年輕體壯的，將其殺害後選新鮮優良的人肝，精心制做了一廣口瓶用瓦罐培炙的人肝粉，要敬獻給“偉大領袖毛主席”，以“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後來一看形勢不對，於是自己一天幾勺給吃了個乾淨。貴縣的一個殺人兇手還深藏了兩個人肝多年，直到1982年文革處遺時才被迫交出來。……挖人肝、吃人肉，分明是虎豹豺狼的野蠻行徑！中國人，你怎麼叫人？

4. 桂林武鬥

5月12日，桂林地、市“聯指”負責人在荔浦縣召開12縣聯合指揮部會議（資源缺席）。會上，“聯指”頭頭造謠煽動說：桂林有十多個國民黨將級軍官參加“造反大軍”，國民黨連長以上人員已組成一個團，集中在市文化宮。因此，呼籲各縣行動起來保衛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5月中旬，“造反

大軍”成立了地、市“造反大軍文攻武衛總指揮部”。5月17日，12個縣的“聯指”代表86人，先後到達桂林，住在東方紅飯店。地、市“聯指”負責人到代表住地看望了代表。5月19日晚，地、市革委會和駐軍負責人在榕湖飯店小禮堂接見了“聯指”代表。5月24日，“造反大軍”攻打桂林農械廠“聯指”派。武鬥中，雙方各死2人，並打死駐廠解放軍戰士1人，炸壞廠辦公樓。

6月初，桂林地、市“造反大軍”組織人員從桂林軍分區倉庫搶走各種槍支3300支、子彈250萬發、手榴彈3000多枚、炮彈7500發。搶槍時打傷解放軍5人，“造反大軍”被打死2人。在此期間，“聯指”也先後組織人員進行奪槍行動達20餘次，為大規模武鬥準備了武器。6月5日，在地區革委會和桂林軍分區部分負責人的支援下，桂林地區12個縣的武裝部和“聯指”先後組織了8000多名武鬥人員開進桂林，桂林地、市“聯指”負責人在東方紅飯店開會，成立了“桂林地區保衛革命委員會總指揮部”。當天，總指揮部發出《通令》聲稱：地、市造反大軍必須無條件投降。如膽敢抗拒，則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之。6月7日，“桂林地區保衛革命委員會總指揮部桂北分部”成立，又稱“桂北民兵師”。

6月6日，“造反大軍”的武鬥人員分別在甲山招待所附近的公路和北門貯木場附近的鐵路叉口，伏擊“聯指”派汽車，當場打死“聯指”人員15人，傷多人。6月12日和22日，“聯指”派武鬥人員向“造反大軍”據守的榕樹飯店發動進攻，雙方發生激烈槍戰。6月13日至28日，兩派在北門一帶展開激烈爭奪戰。6月13日，全州、興安、桂鐵等地的民兵，向北站的“造反大軍”攻擊。武鬥中，躲在防空洞內的北站職工及家屬被炸死5人，有6人被當作俘虜抓到地區林業局“聯指”民兵師駐地，活活打死5人。6月15日，地、市“造反

大軍”攻打“聯指”西線一帶。雙方交火中引起北門百貨倉庫起火，燒毀了倉庫和大批商品，損失達 661 萬元。6 月 20 日，“聯指”總部在五一飯店召開會議，研究擬定“南北夾擊、縮小包圍圈”的戰役部署；會後，雙方進行拉鋸戰，攻防交錯。6 月 22 日，南片“聯指”攻打桂林師範和榕湖飯店一帶；北片“聯指”於 23 日清晨向桂北火車站、虞山廟和百貨二級站發起進攻。6 月 25 日，地、市“造反大軍”轉守為攻，集中力量反擊北片“聯指”。“聯指”被迫撤退到地區水電設備修造廠和靈川縣城一帶。這一階段的武鬥，雙方共死亡近 100 人，並打死無辜群眾 10 多人。6 月 26~28 日，“桂北民兵師”總部決定到興安國防四五三倉庫奪槍，並成立了奪槍指揮部。6 月 30 日至 7 月 4 日，在奪槍指揮部的組織下，先後有桂林地區 12 個縣的武鬥民兵，及桂林市“聯指”人員、柳鋼部分“聯指”人員，連續 5 天對軍事國防單位 453 倉庫發起 11 次衝擊，衝擊人數從 500 多人增至 1 萬多人。許多人腰插短槍，手持匕首等兇器，對守衛倉庫的解放軍戰士拳打腳踢，甚至開槍，致使解放指戰員 114 人負傷。這次搶槍事件中，共搶走槍支 5636 支、子彈 325 萬發、火炮 61 門、炮彈 11137 發、手榴彈 124428 枚、爆破筒 114 根、各種軍需物資和私人物品 783 件。這次奪槍，不僅為大規模武鬥提供了武器，而且暴露了國家軍事機密，後果極為嚴重。

7 月 11 日，“聯指”召集各縣武鬥民兵團的負責人，在工人療養院開會。會議決定發起“西山戰役”，成立了南北片指揮部。與此同時，“造反大軍”亦在西山集結兵力，誓與“聯指”決一死戰。7 月 13 日“聯指”民兵從西、南、北三面向“造反大軍”的陣地發起總攻。雙方在西山一帶展開激戰，一直到 24 日才停火。“西山戰役”雙方共死亡 249 人。

7 月 13 日至 8 月 3 日，兩派展開“西線”激戰。“聯指”武鬥人員在炮火

的掩護下，分別從西、南、北三面向“造反大軍”陣地發動總攻。西山一帶炮聲震天，槍彈如雨，硝煙瀰漫。兩派武鬥員在橋頭山、雷劈山、白岩山、癩子山、飛鳳山和打靶場等地進行反復爭奪，殊死拼搏。為了在火力上佔優勢，雙方使用了加農炮、榴彈炮和迫擊炮互相轟擊，一些炮彈落在武鬥區內的部隊、機關、學校宿舍區，使大批無辜群眾受到傷亡。

在這場 6 月～7 月進入高潮的桂林兩派大戰中，“聯指”武鬥人員向地區貯木場、氣象站、外貿倉庫、桂林北站等“造反大軍”據點發起進攻。“造反大軍”武鬥人員則攻佔了機械廠、鑄造廠、冷凍廠、麵粉廠、第一糧庫和鹽倉。隨後，兩派在觀音山和虞山廟等地進行反復爭奪，後為“造反大軍”所佔領。激戰期間，“造反大軍”據守的化工原料倉庫，被“聯指”派武鬥人員發射的迫擊炮彈擊中，引起易燃物資起火，大火燃燒了兩天兩夜，物資損失數十萬元。“聯指”據守的北門倉庫，也被“造反大軍”發射的炸藥包擊中引起大火，燃燒了 3 三 3 夜，造成國家物資損失 661.6 萬多元。武鬥最後形成了僵持狀態。

在這場武鬥中，發生了大量的虐待俘虜的慘案。6 月 12 日桂林“聯指”在桂林南站對面東方紅飯店語錄牌樓建立的一個專門關押人的“看守所”內，先後關押了 258 人，其中被害致死 35 人，致傷致死 75 人。7 月 14 日前來參加桂林圍剿“造反大軍”的平樂縣武鬥人員伍學強、林海等 24 人，沖上“看守所”樓上將被關押的桂林針織廠職工唐躍武和候徽等 12 人拉到桂林十一中對面樹林裡集體槍殺。

7 月 25 日，中央文革領導人接見了廣西兩派代表，接見中，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溫玉成等嚴厲斥責了桂林“造反大軍”包圍第三監獄、勞改工廠，成立“接管監獄領導小組”，是要造無產階級

司令部的反；將桂林武鬥責任歸罪於“造反大軍”。而對桂林駐軍 141 師和軍分區偏向“聯指”派的問題，也提出了批評。

周恩來表態：桂林市的問題，“老多”要多負一些責任；城外的問題，“聯指”多負一些責任。“七.二五”講話對桂林震動很大。儘管“造反大軍”的頭頭們哀歎中央文革對造反派是卸磨殺驢，但為了避免更加險惡的後果，“造反大軍”很快放棄鬥爭，其人員四處潰逃，以求避免遭到殘酷迫害。此後，桂林地區武鬥逐步縮小。到 8 月初，武鬥基本結束。

這場歷時近三個月的桂林大武鬥，兩派參戰人員共達 1 萬多人，搶奪了大量國防武器裝備，據不完全統計，奪槍 13272 支、炮 81 門、子彈 837 萬發、炮彈 19090 發、手榴彈 23 萬枚。武鬥中動用了當時的新式步槍、衝鋒槍、輕重機槍、高射機槍，以至火箭筒、迫擊炮等，打死了武鬥人員和無辜群眾 600 多人，受傷者數以千計；許多房屋被毀於戰火，大批珍貴文物被毀被盜；整個美麗的桂林山城，陷於一片戰火硝煙和血腥恐怖之中，鐵路運輸中斷，大批的物資被燒被搶，學生停課，工廠停產，機關無法上班，城市設施、風景文物被毀，這場武鬥，使國家遭到了嚴重損失，給桂林地區人民帶來了慘重災難。

8 月 6 日，桂林地、市“革委會”發出全面收繳槍支的公告。從 9 日至 16 日，兩派共交槍 3804 支（其中“造反大軍”交 3719 支、“聯指”交 85 支）、交子彈 158 萬發（其中“造反大軍”交 157 萬發、“聯指”交 1 萬發）。

8 月 20 日以桂林地、市、革委會名義和桂林警備司令部、政治部聯合署名發佈了“關於進一步全面落實中央“七.三”佈告的公告”。公告以解除武鬥據點、收繳武器、清理外來人員為由，對“四二二”桂林“造反大軍”進行全面鎮壓。此前，他們已收繳了“造反大軍”的武器，搗毀了所有的據點，潰不成軍的

“造反大軍”已毫無抵抗能力了。但為了徹底鎮壓造反派，市革委會和軍分區以“聯指”武鬥人員為主體編了 2000 多人的“工人糾察隊”，配備精良武器；匯同桂林地區 12 個縣“聯指”武鬥隊共 1 萬多人，於 8 月 20 日凌晨三點包圍桂林市，接連四天四夜，進行大規模搜捕，1 萬多人被逮捕關押，5 千多戶被抄家，劫走財物，被直接殺死的有 345 人。羅織各種各樣的罪名，如“反共救國團”、“叛徒”、“特務”、“反革命”、“牛鬼蛇神”等等；關押期間動用 15 種刑罰審訊，又有近千人死於非命。桂林 8 月 20 日開始的抓、抄、遊鬥風持續了一個多月。9 月 4 日的一次游鬥中興安中學學生蔣孝生手持“五四”式手槍向著被遊鬥的對象連續開槍射擊 7 發子彈打死 6 人(此人 74 年入黨任大隊支書、大隊長)。據桂林市革委會 68 年向區革委彙報：“8.20”到“9.20”一個月打死 90 多人。據處遺辦統計“8.20”至年底殺死 160 人，批鬥死、遊鬥死 94 人，自殺 91 人，總計 345 人。“聯指”的 22 個委員，不管是策劃武鬥，指揮武鬥，參加武鬥，指揮亂殺人，親自殺人，策劃搶奪武器，罪惡累累的委員，不僅不予追究責任，反而成為“執行‘正確路線’的精英”，保衛“紅色政權”的“功臣”部隊升官進級。例如桂林“聯指”主要頭頭、組織策劃武鬥犯了罪的曾名軒、曹鐵軍等人，都升了官。

5. 殘暴之極

1968 年 7 月 3 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針對廣西地區發生破壞鐵路交通、搶劫援越物資、衝擊軍隊、搶奪武器等事件的“佈告”（習稱“七.三”佈告），韋國清等利用此機，指使“聯指”把對立派當敵人，造成駭人驚聞的大血案。1968 年 7 月至 8 月一個多月中，廣西軍區、各專、市、縣革委會和各地“聯指”指揮部以“七.三”佈告為武器，鎮壓“階級敵人”，

全區共殺害和迫害致死 84000 多人。

7 月 9 日廣西軍區派出兩架飛機，從憑祥至南寧空投“七.三”佈告傳單 90000 多份。駐南寧柳州部隊組織 51 個宣傳隊，南寧市有 5000 多人的宣傳隊進行宣傳，開辦 660 個學習班，有 5 萬多人參加。7 月 11 日，廣西區革籌小組和廣西軍區召開 3 萬人大會歡呼“七.三佈告”的公佈，接著廣西軍區負責人宣佈謝王崗、袁家柯為國民黨大特務、假黨員、走資派等。所有的口徑都是“4.22”是違反“七.三佈告”的“階級敵人”，這些現行反革命都在“4.22”那裡，必須堅決“鎮壓”。7 月 19 日《廣西日報》刊登的“誓把謝王崗、袁家柯批倒批臭”一文說：“謝王崗和蔣匪特務組織裡應外合，發展特務組織，建立特務情報站……在擔任欽州地委組織部長期間：利用職權安插了大批的特務、叛徒、地主惡霸、資本家在黨政機關工作……”但沒有任何證據！

7 月 15 日廣西軍區在南寧人民公園召開 15 萬人參加的、“堅決擁護貫徹和捍衛“七.三”佈告大會。韋國清在報告中號召：嚴懲一小撮“現行反革命分子”，為自治區革委會成立掃清道路。會後“聯指”在全區掀起屠殺“4.22”的狂潮，將所謂“障礙”革委會成立的人(主要是指“4.22”派和地富反壞右)，打死和槍殺，以此作為迎接和祝賀區革委會的成立。

1968 年夏，中共中央又發佈了針對陝西造反派的“七.二四”佈告。“七.二四命令”下達後後，軍隊對“四.二二派”進行圍剿。

7 月 15 日南寧市革委，廣西“聯指”遵照廣西軍區 8 日發出的“關於清理流竄人員的指示”(指的是各地“4.22”被“聯指”圍剿後進城逃命者)。他們以“治委會”之名，“清理”戶口，抓捕了 280 多人，殺害 33 人，還有的人被抓之後，至今生死不明。

1968年7月15日，邕江北岸南岸只見人群車炮往往返返，無數白色安全帽和鋼盔閃爍發光。軍隊和“聯指”的高音喇叭已經開到最大的限度，震動整個南寧，好像邕江大橋也在搖晃。中午12時，“4.22”一派控制的解放路、百貨大樓、區展覽館等據點遭到猛烈炮轟，一朵朵煙雲騰起，百貨大樓所有的視窗都吐出濃濃的黑煙，大樓東側象癱塌的碉堡，樓前的朝陽路，坑坑窪窪。大樓正西北邊是朝陽廣場，廣場中間已被兩尺多高的野草所遮蓋，野草之中躺伏著軍區和“聯指”的炮手……。

百貨大樓的南邊是中華街和解放路，多數是平民老百姓的矮小瓦房。這些重重疊疊的小瓦房的居民，被認為是“反共救國團的老巢”。其實，此地居民，多是解放前貧窮的老百姓、小商小販和自由職業者。人們聽到轟轟的炮聲，接著是機關槍掃射聲，還有步槍，衝鋒槍聲。“四二二”的廣播喇叭被炸啞了，南寧市上空只剩下“聯指之聲”還在廣播：“‘4.22’一小撮階級敵人，殺害我‘聯指’戰士，手段野蠻，罪惡滔天，今天他們又製造了一起震憾天下的血案……”這種謊言也被廣西軍區當作“4.22”的罪狀報告給了中央。第二天的炮火更加猛烈，解放路、滅資路、上國街、博愛街、冒出滾滾的濃煙。

21日上午9-12點，軍隊和“聯指”又從南寧桂劇院據點對準百貨大樓開炮，大樓二、三樓起火燃燒。27日，再次攻打百貨大樓，使用了高射機槍、四零火箭炮、七五無後座力炮以及土坦克發射上去的炸藥包，大樓東北面牆徹底崩塌，二、三樓再次被大火燃燒，大樓附近的民房、機關宿舍全部中彈起火燃燒。經過半個月炮火的摧殘，解放路、南倫街、華強路，自強路，上國街，新華街、永寧街、和樂街等只剩下了斷壁殘垣。

1968年7月25日，中共搞了《中央、中央文革首長接見廣西來京學習的兩

派群眾部分同志和軍隊部分幹部時的重要指示》。時間是 1968 年 7 月 25 日凌晨 1 時 5 分至 6 時 15 分。地點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出席的中央領導人有周恩來（總理，中央政治局常委）、陳伯達（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上海市革委會第一副主任）、謝富治（副總理、公安部長、北京市革委會主任）、黃永勝（總參謀長、廣東省革委會主任）吳法憲（副總參謀長、空軍司令）、溫玉成（副總參謀長、北京衛戍區司令員）。被接見的是廣西的兩派“聯指”和“四·二二”來京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代表，以及廣西駐軍的部分幹部。

在長達五小時零十分會議上，中央首長充滿了對廣西“四·二二”派的猛烈抨擊和譴責，是文革時中央領導人對群眾組織一中少有的。完全形成了“群起而攻之”，只准認罪不准抗辯的局面。比如，講話中說到南寧大火時，有這麼一段訓斥“四·二二”派代表的話。

總理：房子燒了那麼多，就是你們“四·二二”燒的。

黃永勝：百貨大樓是你們占的，火不是你們放的是誰放的？

當時親歷會場“四·二二”派的“柳州鐵路局工機聯”頭頭錢文俊所描述的场景：整個主席臺都在信口雌黃，連周恩來也變了個人。明明南寧的大火是軍隊和“聯指”炮轟造成的，我們卻成了放火的“四·二二”……我終於明白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含義。整個接見的局面就成了討伐我們的算帳會。……

在這個講話中，還提到了一個聳人聽聞的“反共救國團”問題。周恩來和康生說：“反共救國團”的總部設在廣州，在廣西有分團。更重要的是，這兩位領導人都把“反共救國團”與兩個群眾組織——廣西的“四·二二”和廣東的“紅旗”聯繫在一起。

雖然這個講話只是針對廣西造反派的問題而作，但卻成了對全國各地的文革運動起著非同尋常指導作用的“重要指示”。這時“無產階級司令部”已經把造反派擺在了“革命物件”的地位上，昔日的“鐵掃帚”變成了被掃除的歷史垃圾。

“七二五講話”對廣西當權者韋國清所代表的軍方和廣西“聯指”來說，無異於屠殺“四.二二”的“尚方寶劍”。

“7.28”毛澤東召集造反派紅衛兵五大領袖——即清華井岡山兵團蒯大富、新北大公社的聶元梓、北航紅旗戰鬥隊二司的韓愛晶、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三司的王大賓、北師大井岡山公社一司的譚厚蘭談話，毛說：“有人講，廣西的佈告（指“七.三”佈告）只適用廣西，在我們這裡不適用，陝西的佈告（指“七.二四”佈告）只適用陝西。那現在再發一個全國的佈告。如果誰繼續造反，打解放軍，搶劫軍用物資，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就要打圍剿，繼續頑抗，就有實行殲滅。”林彪說：“現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國民黨分子，他們打著造反的旗號，燒了一千多間房子，還不讓救火。”毛說：“國民黨還不是這樣？這是階級敵人的一種垂死掙扎，燒房子要犯大錯誤的”；“現在是輪到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

7月31日15時開始對“四二二”派佔據的展覽館發動大圍剿。經過一陣猛烈炮擊後，戰鬥從晚上打到第二天早8點，耗費高射炮彈690發，機關槍子彈1000多發，衝鋒槍、步槍子彈17000多發，消滅展覽館主要火力點。軍隊共抓獲“俘虜”473人，打死23人。

8月2日，革籌小組和軍區負責人向中央檢討說：“我們對新‘4.22’所屬展覽館據點實行強行‘進駐’和‘收繳武器’，事先沒有向中央請示報告，是嚴

重錯誤，特向中央檢討，請中央給予批評”。軍區負責人就在檢討的當天，命令部隊和南寧、武鳴、邕寧等縣“聯指”武鬥人員大舉包圍“4.22”的解放路據點，那裡的12條街道被打成一片廢墟……。

8月5日地面上的圍剿基本結束，打死反對派人員1470人，抓獲“俘虜”6445人和居民2500人，可見當時戰況的激烈和殘酷。事後，“聯指”用翻斗車搬運屍體，運到二塘煤礦丟下廢礦坑680具，就近火化694具，在朝陽溝掩埋75具，從解放路俘出的人員在中途被打死的有52人，其中有一批“俘虜”路經“廣州照相館”門前時，26人遭軍隊槍殺。據不完全統計，到8日為止，抓獲“俘虜”9845人。

被“俘虜”的人員，交給各縣拉回去“處理”7012人，其中被打死的2324人，被當作“要犯”長期關押的有246人。南寧市解放路一帶被解放軍炮火轟毀的街巷有33條，各種房子2820座（間），建築面積46萬平方米，使街道的5個分社，1萬多戶，5萬多居民無家可歸，財產損失價值6000萬元以上。

1968年的8月8日，在廣西發生了一宗慘無人道的集體謀殺案。面對廣西軍區和聯指武裝人員的大軍圍剿，“4.22”近3千人（一說7千人）躲進了地下人防工程。軍隊和聯指一時無法攻入，因為南寧的地下人防工程，有獨立的供水供電系統和通風防毒氣設施，還有供幾萬人堅守數月的糧食儲備。

徹底消滅反對派是廣西軍區和聯指的既定方針，不久他們便擬定了用水淹的最後殲滅方案：打開邕江上游左江水電站攔河大壩的大閘，水淹南寧，活活溺死人防工程中的最後一批反對派。為此，聯指的頭目去請示韋國清時，韋國清佯作大怒：“你們混帳！我管不了你們打派仗的雞巴臭事！左江大壩是否開閘洩洪，我更管不了那麼具體！全自治區現在亂成一窩蜂，黨政軍民學，工農商學兵，農

林牧副漁，哪一行不要我來抓？還有抗美援朝，是毛主席、黨中央親自交下的任務，我必須全力以赴。你們那些屁事，我哪有時間過問？”

但聯指頭目立即領會了韋國清的弦外之音：這不過是一場“派仗”，微不足道；二是韋國清點撥他們可將人為的大壩開閘，說成是“洩洪”，即因山洪爆發，電站大壩超過警戒線，幾乎年年都要開閘的，不是很自然嗎？於是聯指頭頭立刻命令控制左江水電站的聯指成員開閘，向南寧的水渠及邕江放水。根據當時的《廣西日報》報導，邕江河水上漲到 74 米，數千間民房受威脅，水不斷上升，甚至超過了 58 年 74.71 米的水位。從南寧火車站走朝陽路去百貨大樓，都要坐船，可見水漲之高。而人防工事所在的解放路的位置正處在邕江邊上，地理位置比朝陽路還要低，走朝陽路要坐船，解放路水淹的情況可想而知。

在防空洞中的人員，因為河水暴漲，不少人只好爬出來投降，卻當場被殺。堅守在工事中的數千反對派和他們的家屬，全部被活活溺死。只見隨著滔滔的洪水，一具一具的屍體漂浮上來。以往漂浮在洪水上面的是野草、斷木和一些家禽屍體，如今的邕江河水馱浮的是廣西千千萬萬的人屍，從南寧的邕江到珠江的三角洲，河水的流淌要多少日日夜夜，人們不得而知。但是在這個時候，港澳地區的人們卻發現了一具具屍體從上游漂來，港澳的報紙驚呼：“廣西武鬥造成人員大量傷亡，屍體漂至大海……”，一時震動世界。

韋國清等馬上明令沿江各縣打撈屍體，每撈一具，可報銷人民幣 10 元。更多的屍體爛在了南寧的地下人防工程裡。自 1968 年起的整整幾年內，儘管省市革委會派人不斷向各個地道口裡噴射福馬克林、六六六等強力消毒劑，南寧市區總是有一股揮之不去的腐臭味。

接下來，那個向韋國清口頭請示這宗集體謀殺案的主角，聯指的頭目，在

1970 年被韋國清下令以“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不久便死在獄中。

消滅了南寧的反對派後，韋國清立刻對剩下的各地“殘餘分子”進行斬盡殺絕。

8 月 1 日由凌雲、樂業、巴馬縣人武部帶領的三縣“聯指”武鬥隊和 6911 部隊進入鳳山縣，會同該縣“聯指”和人武部中隊共 1000 多人武裝圍剿“七.二九”兵團。這天，解放軍和凌雲縣“聯指”武裝隊包圍了江洲洞，洞裡有男女老少 100 多人，其中武裝民兵 10 多人。解放軍和凌雲“聯指”圍攻三天三夜後，洞裡彈盡糧絕(只有七支步槍)，老人和小孩呼叫救命，於是洞裡提出，保證他們人身安全，即可繳槍投降，解放軍和“聯指”同意。

8 月 3 日上午，洞內派出代表黃顯應、陸祖業、陸淪貴“談判”，指揮圍攻山洞的凌雲縣人武部科長盧元俊主持“和談會議”，雙方達成協議：“洞內“七.二九”繳槍投降，保證全部人身安全。”經雙方簽字後，“七.二九”先交槍，後出洞。解放軍和“聯指”收繳槍支後，把出洞的男女老少全部押到大隊部倉庫關起來。3 小時後，槍殺了 7 人，其中一個小孩僅 12 歲，而後又殺害了十多人。這就是震驚河池、百色地區的“江洲慘案”。但在十年浩劫裡，卻被稱之為“江洲剿匪大捷”。盧元俊等人“立功受獎”。

5 月 12 日廣西“聯指”總指揮部通過所屬的“瀝血兵”搞“禽獸展覽”。將林執真(原區水電廳副廳長)、張祖貴(原地質局處長)、黃海泉(原欽州地區手工業經理部副經理)，“4.22”“雄鷹”成員以及孔祥興等 20 人拉到南寧市建築研究所，關進木籠，組織群眾前來觀看，展覽三天時間。爾後廣西“聯指”搞“禽獸”展覽遍及全區，受害者達 10000 多人。

8 月 12 日解放軍南寧警備司令部於開始舉辦“活人展覽”，將反對派 26 個

所謂的“戰犯”、“特務”、“走資派”掛上黑牌，關進鐵籠，當禽獸展覽，組織了 50 萬人參觀。軍隊帶頭，各地紛紛仿效，一時抓反對派作“禽獸展覽”風行全省，又有不少人慘死在鐵籠內。

8 月 18 日，軍區調宜山、河池、巴馬等 9 個縣的“聯指”武裝會同軍隊共 3000 多人“進駐”鳳山，以“強行收繳”武器為名，抓捕 1 萬多人，而當時全縣人口僅 103138 人！經這一次圍剿，就槍殺了 1016 人，占整個文革中死人人數 1331 人的 77%（《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第 117 頁），經過武裝圍殲後，鳳山縣革委會終於在 25 日宣告成立。

鳳山縣的“殘匪”居然跑入深山，軍隊故技重演，假稱下山交槍一個不殺，並強迫“殘匪”家屬上山動員親人下山。“殘匪”韋明景被父親動員下山，第二天便成了槍口下的鬼（年僅 17 歲），從此韋明樂、韋明成、韋明立三兄弟長期不敢下山，廣西軍區派兵圍剿那三兄弟，居然從 1968 年圍剿到 1982 年。鳳山縣打死 1300 人，被關押毒打數萬人。

官方的內部機密文件《廣西文革大事記》對廣西各地“七.三”佈告頒發後的屠殺情況有如下記載：南寧地區自“七.三”佈告下達至 10 月止共揪出壞人 60061 人（佈告公佈前揪鬥 11685 人），7 月打死、逼死 2738 人，大戰 8、9 月的結果。八月死 5943 人，九月份死 1252 人，兩個月打死、逼死 7195 人占全年死亡人數 40.6%。桂林地區在“七.三”佈告前全地區死亡 1859 人，之後死亡 9087 人（共計 10946 人），占死亡人數 90%左右。

博白縣，“在貫徹‘七三’佈告過程中，全縣各地不斷發生亂抓、亂關、亂打、亂殺人的事件，到 9 月底為止，全縣被打死的幹部群眾共 337 名。”在整個文革中，該縣非正常死亡者達千人（《博白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

第 618 頁)。

博白縣有一浪蕩貧下中農子弟趁亂欲強姦一地富女兒，女不從，便將女殺死。又要求入黨、表揚。領導說：光我們知道還不行，得讓大家都瞭解你的事蹟……。

該無賴將被害者頭顱割下，到公社中學，趁放學之際在籃球場上以人頭作球，蹦來跳去，“投籃”不休，引得人山人海圍觀，人人自愧弗如。於是大會表揚，光榮入黨……。

蒙山縣被打死和迫害致死 850 餘人，其中以“清理階級隊伍”的名義私刑致死 603 人。蒙山縣某村大殺牛鬼蛇神，連吃奶的孩子也不放過。先虐殺其父母，然後用繩索往孩子們脖子上一套，拖上就走。有稍大的孩子，認得是常來家打牌喝酒的熟人，叫道，×伯伯，你莫開玩笑……。話音未落，已被套住喉嚨。案卷上兇手們的供詞：“我們套上就跑，背後大路上塵土飛揚。……”沒到地方，孩子們大多已被勒死、拖死，連哭都沒哭一聲。把孩子們扔進一廢棄的防空壕，再抱起大石往裡砸……。

扶綏縣，“7 月下旬至 8 月初，落實中央‘七三’佈告，縣革命委員會……層層召開現場會，揪鬥所謂‘走資派、特務、現行反革命分子’和‘牛鬼蛇神等……造成非正常死亡 500 多人，致傷殘多人，後果嚴重”（《扶綏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第 19 頁）。

平果縣，在“刮十二級颱風”中“全縣被亂殺的 715 人，……被迫害至死的 216 人”。（《平果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401 頁）。橫縣，“被無辜打死或被迫致死的有 1 千多人”（《橫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25 頁）。

羅成麼佬族自治縣，“6 月 15 日，在縣城廣場召開‘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

進攻誓師大會’，錯誤批鬥 150 多人，其中死 59 人。之後，亂殺人風遍及全縣，致死全縣 1389 名幹部群眾無辜死亡”（《羅成麼佬族自治縣志》，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8 頁）。

陽朔縣，“文革中打死 639 人”（《陽朔縣誌》，廣西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16 頁）。

1967 年 10 月 3 日廣西全州縣東山公社三江大隊，以民兵營長黃天輝為首，將該大隊地、富、分子及其子女 76 人，集體坑殺於蛇形黃瓜弄。……7 月至 12 月各公社成立所謂‘貧下中農法庭’，全縣槍殺 859 名四類分子（地、富、反、壞）及其子女”。

全州縣於 1968 年 7 月 8 日召開執行“七·三”佈告誓師大會，7 月共開批鬥會 1107 次，165062 人，被批鬥者 2179 人。7 月 13 日縣革委主任說現在農村殺人比較多，要看得慣，領導要站在運動前頭，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全縣共殺人 1111 人，占全縣死亡人數的 57.4%。當文革最殘酷的時期於 1971 年結束時，全州縣共有 2156 名男女和兒童被害而死。

德保縣貫徹“七·三”佈告，以各公社召開萬人批鬥大會的辦法向下貫徹。7 月 7 日那甲公社召開萬人批鬥大會，傳達“七·三”佈告和縣三級幹部會議會議精神，公社武裝部長（縣革委副主任）作大會報告，宣佈以大隊為單位，擺開戰場，把所謂四類分子和“反團”（反共救國團）187 人進行批鬥，當場死傷 19 人（各占一半）。各公社均採用此辦法進行貫徹，到 7 月 20 日宣佈全縣已抓了壞人 1200 人。8 月 5 日縣裡召開大會控訴揭發“反革命分子羅仕彥罪狀會”，在講臺前跪著的“反革命”共 700 人，糾察隊、民兵的等動手打罵，下麵哭聲震耳。到 8 月 5 日止，農村共揪鬥幹部、群眾 2120 人，全縣死人 312 人，其中貫徹“七·三”

佈告前 98 人，之後 214 人。

6~8 月河池地區“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形成高潮。全地區 10 個縣共鬥、打、逼死 7864 人，其中鳳山、宜山、巴馬、羅城、都安 5 個縣害死千人以上。

都安縣在向專區革委報告中說：從革委成立到“七.三”佈告公佈，這一階級鬥爭特點，主要是橫掃積極敵人顛覆革委會的現行破壞活動，這一階段全縣共揪鬥 7367 人。在“七.三”佈告威力下，一個“三查一清”運動迅速在全縣開展起來。到 8 月底 9 月上旬共揪鬥 12185 人，挖出 61 個反動組織，特別是“反團”和“中國青年黨”。

9 月陸川縣集中中小學校老師集訓，貫徹“七.三”佈告，搞鬥、批、改、清理積極隊伍。一大批中學老師受到摧殘，陸川中學 80 多名教師職工被殺 11 人，批鬥 56 人。未廠中學 22 名教職工被殺 7 人，陸川中學校長前後被鬥 120 次後逝世（這是比 66 年 7、8 月集訓老師進行批鬥更為嚴重的又一次對教師的摧殘）。

上述被殺人數，只不過是整個文革中每縣非正常死亡人數的一部份而已。

辱屍毀屍，被害者死得悲慘，死後更慘，兇手的手段血腥殘忍甚至變態。上思縣思陽公社女青年陸玉江，靈山縣廣江小學青年女教師黃少萍，合浦縣石康鎮婦女陳國蓮，被打殺後，兇手又用棍棒插入陰道，裸體陳屍路旁。欽州縣城“聯指”圍剿“四.二二”造反派，“四.二二”廣播員陸潔珍被抓獲刺死後，兇手把她褲子扯掉，滅絕人性地把大號電光鞭炮塞入陰道，點燃爆炸，慘狀難以言敘。東興縣那勒公社那柏大隊槍殺張月業時，張中彈未死，公社“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主任陳德基，使用雷管插入張的鼻孔內引爆，炸得血肉橫飛。

柳州鐵路局的一份調查報告記載了如下段令人作嘔的文字：“1968 年 10 月 7 日，因 6 月武鬥死亡埋在桂林工務段後面山坡上的靈川縣公路段黃紹鴻和九屋

公社民兵石安保的親屬來取屍骨。上午，在桂林工務段的潘廣志和唐景麟的積極配合下，強令桂鐵地區黨委書記錢星林等幹部群眾（包括小孩）五、六十人用手扒墳。更殘忍的是，由於屍骨埋的時間不長，骨上還有腐爛肌肉沾連，唐景麟即令他們脫衣服包骨，每人用舌頭舔骨 3 下，揚言誰不舔就打死誰，吐口水也要打。在唐等人的威逼下，每人都被迫舔了 3 下屍骨。”

全區的殺人兇手，殺人手段殘忍至極，成批殺人到處有之，成批敲死有之，成批爆破致死有之，成批戳死有之，成批擲下礦井有之，成批丟下山洞有之，剖腹挖肝有之，割肉挖眼有之，割頭示眾有之，吊割陰莖有之，先奸後殺有之，殺夫奸妻、奸女有之，成批溺死有之。廣西大地，腥風血雨，冤案如山，悲慘狀況，史無前例。據 1982 年中央工作組不完全統計，這場大屠殺，死人近 20 萬之眾。

在中共的煽動、指揮下，欽州地區文革被迫害者達 22100 餘人，致死 10420 人。百色地區被打死 1073 人；河池地區被打死 7000 多人，其中有五個縣被打死千人以上。不僅如此，當局還對殺人兇手進行種種嘉獎，致使不少人以殺人邀功。如欽州城郊復員軍人梁衛東，為立“新功”，為安排工作，便殺三人，得意洋洋地前往縣武裝部請功。又如合浦縣一大隊文革組長，怕人說自己立場不堅定，策劃殺人時把自己的親外甥也列入名單殺掉了。“殺人者有功”這絕非一句空言，全欽州地區殺人後入黨的就有 1153 人，殺人後提幹的有 458 人，殺人後被招工有的有 637 人（不含北海市）。殺人兇手們還有不少被提到各級領導崗位上去。官方內部出版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披露：“據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就有 20,000 多人是入黨後殺人的，有 9,000 多人是殺人後入黨的，還有與殺人有牽連的黨員 19,000 多人”。從中可看出，廣西有近 48,000 名共產黨員是殺人兇手。

第 139 節 抓叛徒和打倒劉少奇

如果說毛澤東是比希特勒兇殘十倍的大魔頭，劉少奇則是比毛澤東“善良”十倍的二魔頭。劉少奇的人品比起一位侵華日軍司令官的人品來都相差太遠，他為了權力，兇殘地害了他的同窗好友、救命恩人——楊劍雄先生。

楊劍雄先生與劉少奇都是湖南省長沙市寧鄉縣花明樓人，楊劉兩家都是當地富豪。楊劍雄與劉少奇從小學到中學同班就讀，且為密友，但後來分別走上了國共兩條不同的道路。劉少奇在長沙被捕時，楊劍雄是當時湖南省國民政府的第二號實權人物，僅位居趙恒惕之下。楊劍雄作為劉少奇的同窗好友，他設法將劉少奇釋放了。1949年，湖南省國民政府的楊劍雄、黎澤泰先生等官員隨程潛先生一起入仕中共政府，成為參事室參事。1950年，楊劍雄曾先後對黎澤泰先生等僚友說：我和劉少奇是這樣一種關係，又是同窗，還是他的救命恩人；我要到北京去找他，我不能只不過是當個參事，要搞個大官當當。楊劍雄去北京後，劉少奇拒絕見他，宣稱不認識此人。楊劍雄離京返長沙之當日即被捕，大約兩三天后即被處決。

文革時，寧鄉縣公安局的霍局長向中央文革小組提交了一份劉少奇當時寫給他的親筆信：“霍青同志：既然楊劍雄是當地惡霸地主，請按黨的政策辦理。劉少奇 1950年”。

1966年8~9月間，天津南開大學的學生在調查該校前黨委書記高仰雲（時任河北省政協副主席）的問題時，發現1930年代中他曾坐過牢，於是著手追查高的歷史。因聽說高在牢裡生病時，前中央黨校黨委書記楊獻珍曾喂過他飯。而楊是1964年被毛點名批判下臺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他們便去北京找到了楊獻珍。經過“七審楊獻珍”，他們從他那裡得到了他們曾填寫“自首書”、

刊登《反共啟事》出獄的情況，並說出一同出獄的人名：薄一波（1966年時是國務院副總理）、劉瀾濤（西北局第一書記）、胡錫奎（西北局書記處書記）、安子文（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楚離（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劉錫五（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廖魯言（農業部部長兼黨組書記）、周仲英（國家經委副主任）、徐子榮（公安部副部長）、趙林（吉林省第一書記）、王德（中南局書記處書記）、王其梅（西藏工委書記）、侯振亞（福建省委書記）等，全是劉少奇系的幹部。儘管楊獻珍再三對他們說，他們當時是假自首，是根據黨組織的決定那麼做的，中央早已作過結論，紅衛兵卻不根本不相信毛澤東會同意共產黨員向敵人假投降。所以薄一波等人一定是叛徒無疑。十一月初，他們發出《告全國人民書》，到處宣傳他們揪出了一個大叛徒集團。

與此同時，西北局所在地西安的大學紅衛兵在追查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的問題時也發現，在《華北日報》刊登《反共啟事》的“劉華甫”就是劉瀾濤。紅衛兵來勢洶洶，劉瀾濤於11月23日向周恩來緊急請示。周恩來於24日擬寫了中共中央給西北局的批復：“請向南開大學紅衛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戰鬥隊同學說明，他們揭發的劉瀾濤同志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們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來中央查處，不要在大會上公佈和追查”。

此時，長春的大學生從天津南開大學紅衛兵處得知，“六十一人叛徒集團”裡的“羅林詳”就是吉林省委第一書記趙林的化名，於25日貼出“趙林是大叛徒”的標語。周恩來指示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不能讓小將們在這個問題上胡亂發難”。

1966年12月18日在江青、康生、謝富治的直接指揮、控制下，成立了“王光美專案組”。1966年12月25日北京清華大學五千余人在蒯大富等人的帶領

下，在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上打出了“徹底打倒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的旗號，並散發《劉少奇破壞文化大革命、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十大罪狀》的傳單，把“打倒劉少奇”運動推向全社會。遊行隊伍在天安門廣場召開了“徹底打倒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選舉的國家主席，統統都不算數了！

1967年初，毛澤東發現能用來清除劉少奇系的幹部的罪名並不多。而那批幹部不除，他們就還留在中央委員會裡，開起會來都還有一票。要將薄一波按“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定罪並不容易。而紅衛兵抓“叛徒”提醒了他：劉少奇系的幹部基本來自國民黨統治區，被捕過的比例相當高。給他們一頂“叛徒”的帽子，問題就全解決了。

1967年3月16日，康生搞的中共中央檔《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61人的自首叛變材料》送到毛那裡。文件中說，“薄一波等人自首叛變出獄，是劉少奇策劃和決定，張聞天同意，背著毛主席幹的”，“揭露這個叛徒集團，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毛思的偉大勝利”，毛顯然非常滿意，他不在乎文件中“背著毛主席幹的”是句謊言，大筆一揮，批准印發全國。那“61人叛徒集團”中還活著的成員中，有22名擔任省委書記、副省長、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的職務，13人為司局級幹部。這些劉少奇麾下的所謂“白區幹部”都被殃及，成了“叛徒”，基本被清除。1950年中共進軍西藏時的先遣隊司令員兼政委王其梅、東北大慶油田副總指揮王新波等被殘酷整死。

接著，康生又弄出了個“新疆叛徒集團”。原來，1945年底蔣介石委派親中共的張治中去新疆主政之前，周恩來要求張設法釋放100餘名已被關押了幾年的共產黨員。張到新疆後，在忙於成立新疆民族聯合政府之際，幾次給蔣介石打

電報請求釋放那批在押的共產黨，終獲蔣首肯。1946年6月，那批幹部“聲明脫黨出獄”。那批人回到延安時，毛曾親赴歡迎晚會。現在康生卻說：“新疆回來的那批人是叛徒集團，他們和張治中勾結起來隱瞞歷史回延安的。”在他的煽動下，紅衛兵四處衝擊那些幹部所在的機關，把他們揪出去鬥爭。

那批人中有一個時任江西省省長的方志純，1959年夏，毛在江西廬山開會時，趁江青遠在杭州，托方志純夫婦秘密安排，將其20年未見的前妻賀子珍（雖並未履行離婚手續）接到廬山，見了一面。江青探知方志純牽線的事後，沒有馬上發作。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現在江青宣佈方是“新疆叛徒集團”的首腦，唆使北京的紅衛兵到江西把他抓走，關進了監獄。方志純在鐵窗下蹲了8年。他幸運，活了下來。可是90名同被投入監獄的“新疆叛徒集團”成員被折磨死了24個，包括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三書記馬明方。

揪“叛徒”是個行之有效的好辦法，只要被捕過，就可以指為叛徒而打倒。1967年初，毛澤東決定搞倒陶鑄，江青1月4日接見湖北紅衛兵代表時宣佈“他是叛徒，我們有證據”，陶便被整死了。1967年9月，黃永勝給江青寫信，建議審查中共廣東地下黨問題。結果7千多人被批鬥、關押。死者中包括副省長林鏘雲夫婦等。文革初期的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劉志堅被打倒，也是因為“叛變”。抗日戰爭期間，有一天劉志堅被日軍俘虜，但當天中共冀南部隊司令部就接到地下情報組織的消息說日軍將通過某地，於是打了個伏擊，將劉救了出來。顯而易見，他不是叛徒。但江青要打倒此人，就給了他一個“叛徒”標籤，關了起來。

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楚離曾擔任冀東黨的領導人，領導過1938年冀東大暴動。李被打成叛徒後，冀東黨組織也遭殃。1967年12月26號，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在唐山宣佈，“解放前黨的冀東黨組織可能是一個叛徒黨”。他一句

話就在全縣範圍內大抓“叛徒”，結果受迫害的達 84000 餘人，其中 2955 人死亡，763 人致殘。

“抓叛徒”成了運動。一時間，全國各地凡被捕過的人，差不多都成了“叛徒”。據全國統計，僅在 1967 年的頭五個月裡，因歷史上曾被捕、被俘，被指控為“自首變節”或有自首變節嫌疑的人，共達 5200 餘名，其中有幾百人被殘害致死。

文革時，知道江青底細的人都遭到迫害。1942 年，秘密的中共地下黨員王瑩及其丈夫謝和賡在周恩來指示安排下赴美國留學。王是個傑出的演員，還是個作家。1943 年春，她曾應美國政府邀請在白宮演出抗戰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和抗戰歌曲。大概由於共產黨員身份暴露，王瑩夫婦于 1954 年被誣以“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罪名下獄。後經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女作家賽珍珠等人的聲援，王瑩夫婦被驅逐出境，1955 年底回到中國。反右運動中，謝和賡被打成右派，被送北大荒勞改了幾年。1966 年王瑩和謝和賡被捕入獄。謝和賡坐了 8 年監獄，出來時神經已失常。王瑩被關進監獄，1974 年被打死在獄中，死亡書上沒有名字，僅有一個代號“6742”。

1968 年 2 月，江青、陳伯達、姚文元等接見天津市革委會及群眾組織代表宣佈天津作家協會主席方紀是“劉、鄧反革命司令部在文藝上的代言人”，天津市委書記王亢之是後臺。兩天後，王自殺身亡，方被投入監獄。因江青又說天津市公安局與方紀合夥“專了我們的政”，天津市公安局遂成“黑窩”，1200 余幹警被審查。據方紀說，所謂“審查”，實則“濫施酷刑，刑罰名目之繁多，手段之殘忍，駭人聽聞，令人髮指。”該局幹警被逼死、整死的多達 44 人，包括局長江楓。北京公安局近 1 千名幹警被定為“敵我矛盾”，送勞改農場。

江青說天津市委書記王亢之的家鄉河北深澤縣有一個叛徒集團，於是天津市有 307 人被打成“深澤叛徒集團”成員。主管深澤縣的石家莊地區革委會撥一筆經費去抓叛徒。有個中白莊大隊，“深挖”中打死了 3 人。縣抓叛徒辦公室下令將揪出的叛徒弄到縣城集市上“亮貨”：一排排彎腰掛牌或戴著大號高帽的“黑貨”站在臨街靠巷的房頂上（當地房子均平頂），任人觀賞，亮過“貨”的有 1500 多人，受株連的達 3 萬多，占全縣人口總數的 1/5。

其實江青自己也被捕叛變過。她 1934 年 9 月被捕，經人交保釋放前也寫過自首書。她當時不到 20 歲。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1938 年春在天津被捕，9 月轉押北平，和那“61 人”成了難友。陳被判處兩年徒刑，但關了不到一年就通過大革命時期陳任其秘書的國民黨將領張貞出面，填寫“改過書”後保釋出獄。如今他們在劉少奇的歷史問題上大作文章，不過是看准這是一條扳倒劉少奇的捷徑罷了。

1967 年 1 月，劉少奇在中南海裡面被“鬥”，其專用電話被拆除。1967 年 1 月 6 日，蒯大富的手下把劉的孩子平平扣起來，然後給劉家打電話說平平出了車禍，被汽車軋斷了腿，現在醫院裡，需要家長來簽字後動手術截肢。劉少奇夫婦焦急萬分，一同跑去醫院。造反派本來只是想把王光美騙出來鬥爭一番取樂，沒想到劉少奇也來了，嚇了一跳。造反派支走了劉少奇。1 月 13 日夜裡，毛用車把劉接到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同劉進行了單獨談話。造反派的那場鬧劇毛完全知道，明知故問：“平平的腿好了沒有？”他建議劉讀幾本書，特別提到《機械唯物主義》和《機械人》，說是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和狄德羅（Denis Diderot）寫的。從書名可以看出，毛要劉不要太“機械”，太死板，要劉違心地認罪。劉沒有照毛說的辦，而是向毛再次要求辭去一切職務，下鄉當農民種地。

他要求毛結束文革，只懲罰他一個人，不要整其他幹部，不要讓國家再受損失。毛不置可否，只向劉告別，要劉保重身體。就這樣，毛把跟他共事將近三十年的副手送到門口，送上死路。

3月9日，陳伯達在中央軍委召開的軍以上幹部會上傳達毛澤東對《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意見：“毛認為，這本書脫離階級鬥爭…是唯心論，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欺人之談”。21日，中央常委討論“劉少奇在1929年叛黨嫌疑問題”。毛批准康生寫的劉少奇曾被捕叛變、應立案審查的報告，並指定康生負責劉少奇一案。30日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刊登在《紅旗》上；3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放這篇文章。這是徹底打倒劉少奇的號角。

4月10日，清華大學召開了30萬人的批鬥大會，主鬥劉的夫人王光美，並在她的脖頸上掛了一大圈破鞋，恣意對她進行人格侮辱。對國家主席的夫人都如此違法無理，對各地被奪了權的黨政領導幹部及其家屬如何蹂躪，就可想而知了！劉少奇則被《人民日報》不指名地稱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7月，幾十萬“革命造反派”在中南海牆外“揪劉”一個多月。以大學生的“革命造反組織”為首，據說有20萬“革命群眾”，駐紮在中南海牆外，要求把劉少奇“揪出中南海”。

發起這一行動的是北京建工學院的“造反派”，中南海西側的府右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鑼鼓喧天，口號聲歌聲不斷。全市各個單位的“造反派”都前來支持。大卡車從郊區的大學校園運來食品、宣傳品和廣播器材。學生組織的報紙上還留下關於這一行動的一篇紀實文章，題目叫做“三十一天慨而慷”（這是從毛詩“天翻地覆慨而慷”演化來的）。

31天慷慨激烈的“揪劉”行動，學生們成為一時的風雲人物。和他們在紅牆外的行動配合，紅牆內對劉少奇的“鬥爭”殘酷程度在升級。但是學生只得到了劉少奇的書面檢討，始終連劉少奇的面也沒有見到，也未有機會進入中南海。

可笑而又可怕的是，1970年，在新一輪“清查5.16運動”中，1967年的“揪劉”變成了“圍困中南海反革命事件”。在當時關於這一事件的正式“報告”中，一方面繼續把劉少奇稱作“劉賊”，另一方面，對組織“揪劉”的學生，作結論為“以‘揪劉’為幌子，用‘絕食’手段，造輿論，拉隊伍，搞暴亂事件，以反總理為目標，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進行反革命奪權”（北京建工學院調查組，1971年2月25日，油印打字稿）。

一批“揪劉”的積極分子被“隔離審查”和“鬥爭”，被強迫“交待問題”和“認罪”。在這個過程中，北京建築工業學院機電系二年級的女學生董臨平上吊自殺。她20剛出頭。她是該校“造反派組織”“紅衛兵八一戰鬥團”的頭頭之一。

1967年8月5日毛《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張貼一周年，《人民日報》登載了大字報全文，並發表《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社論。為紀念毛的大字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召開了300萬人的誓師大會。同日，在中南海內，召開了“批鬥劉、鄧、陶大會”，與天安門廣場的誓師大會相呼應。江青說：批鬥會要“拍電影、拍成紀錄片，好放給全國人民看。”

8月的北京，酷熱難當。劉少奇、王光美被幾個彪形大漢架進了會場。拳打腳踢，坐“噴氣式”，大漢們揪著劉稀疏的白髮，強迫他抬起頭來，拍照錄影。在長達兩個多小時的批鬥會上，劉不斷遭到野蠻的謾罵和扭打。他的每一次答辯，

都被一陣陣口號聲所打斷，隨之，一本本語錄本劈面打來，劉鼻青臉腫。會畢，劉、王被押到會場一角，被強按著頭，向兩幅巨型漫畫上的紅衛兵小將鞠躬。鼻青臉腫的劉少奇，鞋子不知什麼時候被踩掉了，他穿著襪子，雙腿象灌鉛似的一跛一跛走回了辦公室。他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要秘書轉達他的抗議：“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你們怎麼對待我個人，這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的尊嚴。誰罷免了我國家主席？要審判，也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你們這樣做，是在污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為什麼不讓我講話？憲法保障每一個公民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破壞憲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劉少奇倒楣時想到憲法；在此之前，多少違反憲法的事情發生了，他是國家主席，他說了什麼？1950年代劉少奇就說說過：“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看來實際靠人，法律只能作為參考”。既然只是參考，是自己參考呢？還是給批鬥你的人參考呢？其實，劉的導師列寧早就說過：“專政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

毛很清楚他從前的同事、部下們在受什麼樣的罪。紀登奎副總理曾回憶，毛問他挨了多少次鬥，紀說他挨了幾百次鬥，坐了“噴氣式飛機”。“毛主席聽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還親自學做噴氣式的樣子，低頭、彎腰、並把兩手朝後高高舉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1967年9月劉的妻子被逮捕關進監獄，子女被趕出中南海，在中南海劉少奇的家裡連夜築起一堵高牆，不准劉少奇再步出房門。劉少奇的兒女的文章《勝利的鮮花獻給您》一文中還有另外的一句話，“他們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維生素和治療糖尿病的D860也停了”。停止糖尿病的藥，是比停止維生素，會帶來嚴

重得多的後果。

1968年夏，劉病重。“沒人幫他換洗衣服，沒人扶他上廁所大小便，以至屎尿拉在衣服上。長期臥床，造成雙下肢肌肉萎縮，枯瘦如柴，身上長滿了褥瘡。……並用繃帶將劉雙腿緊緊綁在床上，不許鬆動”。把已癱瘓的人綁在床上，是故意的虐待！

1968年10月13~31日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當時原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被誣陷為“叛徒”、“特務”、“反黨分子”、“裡通外國分子”的，占總數的52.7%；他們被剝奪了出席會議的權利。被允許出席的中央委員中許多人是剛剛從“牛棚”（關押“牛鬼蛇神”的地方）中解放出來的。八大一次會議選出的中央委員總數97人，除去世10人外，到會者只有40人，不足半數。開會時決定從被允許出席的候補中央委員中增補10人為中央委員，才使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人數剛剛超過半數。八屆候補中央委員98人，除增補為中央委員10人和去世12人外，只有9人出席會議。而被擴大吸收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軍委辦事組成員、各省、市、自治區革委會和各大軍區主要負責人等的總數達74人，占出席會議人員總數的55%以上。全會批准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宣佈“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中央委員陳少敏在通過決議時拒絕舉手。十二中全會公報說：“這個報告以充分的證據查明：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

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中發〔68〕152號、155號檔向全國散發了《劉少奇在1925年、1927年、1929年被捕叛變、投降敵人、充當內奸、工賊的反革命

罪行》的審查報告。該報告是用無中生有的材料編織成的。該檔指控劉 1929 年在東北被捕後投降，“由於劉積極地給大軍閥張學良提供情報，使滿洲省委及其所屬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許多共產黨員被捕、被殺。”歷史事實是“在張作霖、張學良統治東北時期，除一位鼓動兵變的共黨韓淵波被殺外，直到“9.18 事變”為止，東北沒有任何同志被殺。別具“匠心”的是，黨還蓄意選在 11 月 2 日劉入古稀這一天，全國所有報紙向億萬人民公佈了上述決議。毛澤東和周恩來特意囑咐汪東興帶給劉少奇一個生日禮物——收音機，目的是讓他聽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公報：把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劉少奇當即渾身顫抖、大汗淋漓、繼而呼吸急促、大口嘔吐，血壓陡升至 260/130 毫米汞柱，體溫攝氏 40 度！劉病情急劇惡化。由於他長期被固定捆綁在床上，一動也不能動，他的頸部、背部、臀部、腳後跟都是流膿水的褥瘡，疼痛難忍。由於他疼起來時一旦抓住衣物或他人手臂就不撒手，人們乾脆就在他每只手中塞一個硬塑膠瓶子。到他臨去世時，兩個硬塑膠瓶子都被握成了葫蘆形。

翦伯贊曾任北大副校長，與毛澤東交往很深。文革正式發動後不久，北大就把翦伯贊揪了出來，他因“寫文章不引用毛主席的語錄”，還“為吳晗鳴冤叫屈”，被戴上了“漏網大右派”、“反共老手”等帽子，被造反派批鬥達百餘場，且幾乎每次都受到拳打腳踢，後不升級到日夜被審訊和逼供，乃至幾乎被趕出家門。1966 年 6 月 3 日，《人民日報》發表重磅炸彈的文章：《打倒史學界的東霸天、西霸天》，矛頭直指範文瀾和翦伯贊。隨之，歷史系的向達、邵循正、週一良、鄧廣銘、楊人楩等也統統被打成“牛鬼蛇神”。

1968 年 10 月毛澤東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的講話中提出對“資產階級學術權威”

也要給予出路，而“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並且以翦伯贊、馮友蘭為例，他說：“北京大學有一個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只懂得唯物主義，不懂得唯心主義，如果要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翦伯贊是講帝王將相的，我們要知道一點帝王將相的事，也得去找他。這些人都是有用的，我對於知識份子，要尊重他們的人格。”於是身處逆境中的馮友蘭、翦伯贊，就在“工宣隊”的安排和自己感激的心情下寫信感謝毛澤東。北大軍宣隊向馮、翦傳達了“最高指示”，翦伯贊夫婦還得到了優待，他們被遷入一幢小樓獨家居住，與此同時還被派了一位元為他們服務的工人。

1968年12月4日劉少奇專案組的副組長，一個叫巫中的軍人帶著幾名副手直奔燕南園。巫中向翦伯贊指明開始於1935年的國共南京談判是劉少奇叛賣共產黨的活動。蔣介石、劉少奇之間周旋的人，就是譚小岑、呂振羽和翦伯贊等人。巫中說：黨中央已經查明劉為叛徒、內奸、工賊，將在“九大”公佈。你只要就這件事寫一份材料加以證明，再簽上字，就沒你的事了。翦伯贊沉默不語。巫中又說：“好吧！你想想吧。這是給你的一個機會。我等著！”翦伯贊還是拒絕作證。巫中最後給翦伯贊留下3天時間的考慮，說完揚長而去。3天，是翦伯贊70年人生最漫長的3天。這3天，他仔細回憶起一件件往事，但怎麼也回憶不起劉少奇有過“叛變”行為。第三天，巫中又來了，一聽翦伯贊還是“回憶不起來”那句話，頓時暴跳如雷，指著翦伯贊的鼻子叫道：“你不交代清楚，只能是死路一條！”離去時還留下一句話：“我還要來的！你不交代清楚我決不放過你！”此後，巫中每隔兩天就來一次，而且每次越來越氣急敗壞，每次越逼越緊。翦伯贊夫婦默默相對而坐，甚至通宵不眠。翦伯贊開始向管理人員索要安眠藥，直到藥量達到死。12月18日下午，巫中帶著一群人又來，審了近兩個小時，翦伯贊

拒絕作出違反事實的交代。巫中猛地從腰中拔出手槍，往桌上一拍，說：“今天你要不老實交代，老子就槍斃了你！”翦伯贊閉口不語。巫中沖到跟前，把手槍頂在翦伯贊的鼻孔底下，大吼：“快說，不說馬上就槍斃你！”為了繼續恐嚇他，巫中拿出筆記本寫了幾個字，交給同來的人；翦伯贊誤以為是叫人來實行拘捕。即使如此，在巫中獨留的時刻，他依然拒絕交代。第二天，人們發現翦伯贊夫婦服用過量“速可眠”，離開了人世。只見翦伯贊夫婦各睡一張床，揭開被子，兩人都整齊齊地穿戴著嶄新的衣服和鞋子。在翦伯贊中山裝的兩個下衣袋裡，各搜出一張二指寬的紙條，展開一看，一張寫著：“我實在交代不去（出）來，走了這條絕路。”另一張則寫著：“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其狀頗似上海傅雷夫之死。毛澤東聽到消息後極為震怒，此前宣佈給翦伯贊“出路”是要通過這個典型給知識份子以“出路”。隨後毛澤東和周恩來又嚴厲批評了謝富治，而負責“軍管”北京的那支部隊隨之也被調往外地。隨即毛澤東委託謝靜宜向馮友蘭致意，馮友蘭趕緊“寫了一封信，還作了一首詩，托謝靜宜轉達。”這首詩說：“善救物者無棄物，善救人者無棄人。若有東風勤著力，朽株也要綠成蔭。”週一良也回憶說：“紅衛兵把我們身邊的剪子、小刀以至剃須保險刀都收繳了去……”。翦伯贊死矣，甚至沒有留下任何骨灰。1979年2月22日，在他的追悼會上，擺放在會場前方的骨灰盒裡，只有3件物品：一是翦伯贊的老花眼鏡，一是馮玉祥曾送給他的自來水筆，一是他們夫婦的合影。

1969年10月，劉少奇已渾身糜爛腥臭，骨瘦如柴，氣息奄奄。中央特派員既不讓其洗澡，也不准翻身換衣服。而是把他扒個精光，包在一床被子中用飛機從北京空運到開封，監禁在一個碉堡地下室裡。他發高燒時不但不給用藥，還把醫護人員全部調走，臨死時，劉已沒有人形，蓬亂的白髮有二尺長。11月13日，

劉少奇死亡。劉的死亡卡片上這樣寫著：姓名：劉衛黃；職業：無業；死因：病死。

在高壓恐怖政策下仍敢為劉鳴不平、以致被定為“反革命”而判刑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 1980 年 9 月前的統計，因這個冤案受株連被判刑的達二萬八千多人。不少人被槍決，包括寧夏中學教師朱守中、遼寧省委機關女幹部張志新。

第 140 節 “清理階級隊伍”

1968 年 5 月，姚文元將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的文章送毛澤東批閱時，用了“清理階級隊伍”這個名詞。毛澤東批示：“建議此件批發全國。……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此件是寫得最好的。”從此“清理階級隊伍”即在全國展開。1968 年至 1969 年的清隊，是“清理階級隊伍”的簡稱。這是毛澤東和周恩來聯手“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

1968 年清階時的紅色颱風，更甚於 1966 年 8-9 月份的紅色恐怖。一縣揪鬥的人都在萬人以上。譬如湖南寧鄉縣，一場清階就“新挖出階級敵人 9835 個”。廣東和平縣，全縣被揪鬥 1.2 萬餘人。陝西西鄉縣大打清隊人民戰爭，揪鬥了 1 萬多人。安康縣，清理階級敵人 1.1 萬多名，其中 8.5 千多被定為“敵我矛盾”。四川新津縣，被揪鬥的在萬人以上。什邡縣審查、鬥爭了 1 萬多人後，宣佈清理出 2.6 千多個各類“分子”。

浙江淳安縣，清理出各類階級敵人 1.1 萬多人。武義縣，九月掀起清階運動，有 11471 人被審查批鬥。5 月 1 日浙江武義縣建立革命委員會後，即成立“文攻武衛指揮部”。該指揮部先後關押了 6425 人，其中打成重傷的 181 人，被打死、謀害和自殺的 59 人。

江蘇昆山縣總共 46 萬人，各類分子天天被掛上寫明“分子”種類的牌子，

押上街遊行。至年底，全縣共揪鬥 1.8 萬餘人。高郵縣，有 13326 人被當作地、富、反、壞、右和叛徒、特務、反動會道徒而審查。

如東縣六月初開始大打對敵鬥爭的人民戰爭，揪鬥 1.5 萬餘人，其中 8.4 千餘人被定為敵我矛盾。武進縣革委會的口號是“刮 24 級紅色颱風”，五月間，先將縣一級的牛鬼蛇神 1 百多人掛上牌子、大會批鬥，滿城遊街。於是上行下效，各級革委會揪出 14600 多人批鬥。

廣西大新縣，人口共 20 萬，揪出了 3 千多人。僅 12 萬人口的安徽祁門縣，揪鬥了 2,648 人。僅 3.25 萬人的陝西甘泉縣，清出階級敵人 1155 名，8 人自殺。

全國 2 千餘縣，被揪鬥者超過 2 千萬，加上數百大中小城市，共有 3 千萬人在清階中被批鬥迫害。這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

全國兩千餘縣，一般死於“清階”的都在一百人以上。遼寧台安縣城鄉各單位用法西斯的手段私立公堂、嚴刑拷打……橡皮鞭、鬥弓子、木棒子、爐勾子，各種刑具交替使用，噴氣式、掛黑板、舉磚頭、跪碗渣，應有盡有。“新挖出各種階級敵人 1288 名，使 135 人死亡、許多人致殘。43 人被投獄判刑。

一縣打死一百多人是多數。如黑龍江省賓縣，揪出各類分子 925 名，致死 143 人，占被揪鬥人員的 15.45%。致殘 32 人。雲南鎮雄縣，省革委會派去工作隊指導，造成 107 人非正常死亡。彌勒縣向階級敵人發起猛烈進攻，在批鬥中進行非法吊打，全縣傷殘死亡數百人。

上海青浦縣 1967 年下半年開始小規模武鬥，斷斷續續一年，總共死亡 20 人，傷 100 左右。可從 1968 年 3 月縣革命委員會成立後，從 4 月開始成立各級“清理階級隊伍領導小組”，光打死、自殺的“清隊對象”就達 170 人。

人口特少的縣，在清隊中被整死的人數才少於 100。譬如中蘇邊境上的人口

僅數萬的愛暉縣，關押看管了 1500 多人，造成 65 人非正常死亡。望奎縣造成 1883 人的冤、假、錯案，55 人非正常死亡。人口 3.25 萬的陝西甘泉縣，清出階級敵人 1155 名，其中 8 人自殺。

一般說來，自殺數遠大於被打死的。譬如人口僅六萬多的遼寧長海縣，在清階中 109 人非正常死亡。其中 5 人被刑求致死，其餘多為被逼無奈而自殺。四川射洪縣，清隊中普遍出現掛黑牌、穿白褂、關牛棚、扣工資、捆打吊罵等現象……以致先後自殺 73 人。

這場運動，不少縣的非正常死亡超過 2 百。上海寶山縣清隊中經縣革委會審批的揪鬥對象 1702 人，非正常死亡 334 人（自殺 220 人），還有 12 人逃跑後下落不明，應為自殺身亡了。松江縣，5063 人遭揪鬥，236 人非正常死亡。金山縣被逼自殺的達 291 人，6 人出逃。川沙縣，5063 人遭揪鬥，236 人非正常死亡。崇明縣，清隊中非正常死亡者達 456 人。

雲南武定縣，由於酷刑逼供、誘供，造成 121 人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達 4 百人以上。吉林省榆樹縣，僅 1968 年清隊擴大化，就使無辜的幹部、群眾死傷達 1800 多人。

1968 年 5 月，山西鄉寧“亂捕亂鬥、掛牌遊街、毆打幹部群眾 1200 多人次，其中打死 26 人，打傷打殘 50 多人。六月，抓捕一批中學生，打死 3 人，打傷打殘 10 多人。

湖南寧鄉縣，1 千多人被扣以打砸搶抄抓分子、造反派壞頭頭罪名關押，自此造反派組織解體。有人統計，1969 年清理階級隊伍時，湖南省還活埋了 4 萬人。

江西掌權的革命委員會主任軍人程世清。該省的口號是“三查”：查叛徒、

查特務、查現行反革命。“群眾辦案、群眾定性、群眾判刑”。所謂“群眾”，當然就是在各基層單位掌了權的人。程世清說：“殺死一個階級敵人，就節省了我們一顆子彈”。

武甯縣的“三查”，有個特殊的刑罰——割耳朵。武甯縣黃沙大隊已在“三查”中用酷刑打死了三個人。大隊負責人到縣裡聽了報告後，回去傳達說，打死一個把反革命分子，還節約幾顆子彈。他馬上召開大會，將早已鬥爭、拷打過幾十次的小隊會計鄭家樹（祖父是地主、父親曾在國民黨時期做過鄉長）揪去鬥爭，由他的弟弟動手，割了他的右耳。鄭昏倒後，被人抬回家。大隊派人對他下了通令：“明夜到大隊交待問題，再不交待，命都不留你”。為尋活路，他不得不出逃，隱姓埋名流浪了 11 年。

1968 年江西在“三查”中瘋狂殺害所謂的階級敵人。於都縣殺了五百多，興國縣殺人 270 餘名。興國縣某公社抓來 19 名“階級敵人”，這 19 人被捆在公社大院的樹上，正準備殺掉。這時縣裡來人通知說，必須停止隨意殺人的風氣。有人正準備給這些人鬆綁，可公社“三查”領導小組負責人說：“既然綁來了，放也麻煩。反正明天就不殺了，今天還是殺了吧。”這十幾條人命就這樣斷送了。

瑞金縣的一個公社，將預先選定的“三查”對象集中起來，要他們上山挖樹洞。挖好洞後，便向看押者報告。未等講完，報告者便被一頓鐵鋤砸死，推進洞裡埋掉了事。事後，公社的負責人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階級敵人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我們活學活用了，階級敵人也得給自己準備墳墓。”傾刻間，該縣殺人達 300 多名。

瑞金縣有個小理髮店，有三個剃頭師傅。其中兩個說自己是革命群眾，而另一個是“現行反革命”。這兩個人就成立了一個“革命群眾法庭”，拿起《毛主

席語錄》，對另一個說：“根據《毛主席語錄》第幾頁第幾條，現在判處你死刑，立即執行。”這兩個人就把他給殺死了。殺死以後，還在理髮店門口張貼了一張佈告。

江西萬年縣，總共 21 萬人，一下子抓出 8107 個階級敵人，全部押往農村勞動改造。凡被深挖細找出來的階級敵人，無不慘遭毒刑，誣陷逼供，屈打成招。

“群眾專政指揮部”採用的刑罰種類有捆綁、吊打、壓杠子、占凳頭、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噴氣式、電觸、紅鐵烙、灌吃大糞、開水澆頭、大熱天反穿羊皮大衣曬太陽等數十種。大黃公社一位女醫生被誣為現行反革命，揪出來用電觸乳頭，用開水澆陰道，當場昏死，目不忍睹。據公安局統計，全縣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 214 人。

遼寧省新金縣武裝部副政委王立龍是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標兵。1968 年 4 月，他帶了兩名助手到下面公社去尋找階級鬥爭的新情況。當他一聽說有個大隊黨支部書記同一個姑娘許連榮有染時，馬上斷定這就是階級鬥爭！是敵人向共產黨幹部施了美人計。因為許連榮長得比較漂亮，許的哥哥讀中學時，曾被誣參加“反動組織”判 3 年管制。

在“革命樣板戲”《白毛女》中，楊白勞被逼按指印，回家對女兒無法交待而自殺。而實際並無被逼按指印的事，這戲是當年延安的文化人編出來的。而今的真實故事是：許連榮被嚴刑拷打，被打得死去活來不得不“招供”，“按指印”後被放回家。當天晚上，許氏一家，老夫婦、兩個兒子及三個女兒，7 口人一起上吊死。許連榮腰間別著一份遺書，要求對她的屍體進行檢查。檢驗結果是：她還是個處女。

1968 年，甘肅省革委會主任、蘭州軍區政委冼恒漢提出要在農村“刮十二

級颱風”，“用無產階級專政的辦法辦農業”。1) 利用民兵舉辦“勞改班”。譬如慶陽地區關押了七千多人，施用酷刑幾十種。2) 以“大幹社會主義”為名，不論炎夏寒冬，強迫農民每天幹活十幾個小時。3) 在專政的口號下，農村幹部打人罵人罰人成風。有的地委書記、縣委書記甚至揚言“打出了高產就受獎勵”、“學大寨還不死幾個人！”後來國務院和中國社科院赴甘肅聯合調查，寫了個報告說：“估計全省直接被害致死的農民不少於萬人，冤案如山”。

湖南鳳凰縣把所有的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集中到由民兵看守的指定地點，然後逐戶翻箱倒櫃搜查，稱是政治大搜查。1968年9月，湖南攸縣在全縣橫掃政治垃圾，抄家5千多戶，拘捕了9千餘人。

雲南省革委會主任譚甫仁卻提出：“對地主富農進行第二次革命”。於是全省沒收地富的所謂多餘財產。地、富、反、壞、右再次任人宰割。

甘肅正寧縣革命委員會認為1966年的破四舊不夠徹底，宣佈進行政治、經濟大掃除。他們派出清查小組在全縣範圍內對地、富、反、壞、右及少數農戶，強行索要和搜查黃金、白銀、銀元。全縣清掃出白銀2585兩，銀1.5萬兩……

江西豐城縣泉港公社，四月間成立革命委員會，五月裡就以揪鬥牛鬼蛇神的名義行動起來，沒收一大批黃金、白銀和銀元，折合人民幣287,885元。沒收地富房屋92幢。

江蘇如東縣大刮紅色颱風，僅3千戶人家的掘港鎮就有60人被關押，183戶被封門抄家。1966年全國大抄家時沒抄盡的黃金、銀元，這次基本搜羅乾淨，甚至連傢俱被查抄。

經過這場大掃除，中國民間的黃金及銀元才算大致搜羅殆盡。工廠、城市的“紅色颱風”也不弱。山東棗莊在“清階”中被抄家的就有5014戶。江西洪都

機械廠是一間大型飛機製造廠。4 百多人被抄家，造成 10 人死亡。

早已離開農村的前地主富農被揪回去鬥爭。漫畫家、主持《漫畫》雜誌 10 年的米穀四歲喪父，由寡母一手拉扯大。他被批鬥後送靜海縣團泊窪農場。1968 年 9 月，留在北京家中的母親被故鄉浙江海寧來的人揪走，按地主婆之罪日夜批鬥。月底，老母自縊身亡。

中共搞土改時，地主、富農的財產已被全部剝奪。他們現在也是人民公社社員，也靠勞動吃飯，而且在貧下中農監督下，比別人勞動得更多。可他們一人另冊，今生今世便永遠是四類分子，其子女甚至孫子、孫女都是賤民。

黑龍江省黑河地區地處與蘇聯接壤，黑龍江省革委會主任潘復生說：“黑河地區特務如毛”。嘉蔭縣“私設監所六十五處，關押人，共用刑罰種樣；致死七人，致殘 192 人。”望奎縣重點在深挖蘇聯、外蒙古和朝鮮“特務”。許多人以莫須有的罪名被看管、批鬥，造成 1883 人的冤、假、錯案，55 人非正常死亡。

吉林省延吉縣深挖地下國民黨特務，深挖朝鮮特務，“棒子底下出特務”，只有 110 戶人家的樺田生產大隊竟有 44 人被揪鬥，致死致傷 41 人。

遼寧凌源縣，僅子虛烏有的“國民黨反共救國團”一案便揪了 913 人，致死 25 人，致殘 51 人。從菲律賓歸國的幹部 2 百多人被打成美蔣特務集團，致死 10 多人。陳伯達下令整肅的遼寧叛徒集團案就致死了 180 人。

陳伯達親抵邯鄲市對清查國民黨案作了指示後，隸屬邯鄲的邱縣運動愈搞愈烈。教育局局長劉雷也成了“國民黨員”。他被關押後，很快在刑訊拷打時死去。他的手指被斬下，泡在防腐液裡。想要揪誰，就寫一份說誰是國民黨員的“揭發材料”，把劉雷的手指取出，按上紅指印，算是人證。就這樣，50 多人先後成為“國民黨員”。

山東廣饒縣大王橋村出了兩位國民黨將領。李延年是與日寇血戰台兒莊的將軍，駐防徐州時，老百姓捐資修建“延年橋”。李玉堂為國民黨海南島守軍司令，1949年與中共葉劍英部聯絡，決定率部起義，因事泄未成。李在臺灣被槍決。1968年春，凡與李家有一點聯繫的就統統揪出來。誰為李家牽過馬、誰給李延年的奶媽祝過壽？誰的父親到李府喝過酒？5百戶的莊子，揪出了2百多人。入夜，2百多人的掃街隊在村子的胡同裡都擺不開。

國家乒乓球隊教練傅其芳、姜永寧因為是從香港回來的而被懷疑是特務，相繼懸樑自盡。1959年為中國掙得第一個世界冠軍稱號的乒乓球運動員容國團也是從香港回來的，也是特務嫌犯。1968年6月20日，寫下了“不要懷疑我是敵人”的遺書，用一根繩子將自己吊在一棵槐樹上，年僅三十歲。周恩來在聞知容的死訊後，過問體育界說：“對有名的運動員、教練不允許批鬥關押！”莊則棟等人因此獲得了解放。

1938年起，中共東北抗日聯軍中有十幾個人被蘇聯紅軍挑選到邊防部隊當偵察員，潛回中國，偵察日軍邊防設施、工事，直到抗戰勝利後才歸國。安徽大學政治部副主任李東光是其中之一。清階時，他被指為“蘇修特務”，投入監獄關了五年。他的戰友們“關的關，坐牢的坐牢，死的死……”

山東棗莊“反黨叛亂反革命事件”，11720人被關押，10659人遭到毒打，打傷後留有後遺症者2425人，致殘的692人，被打死逼死的94人。

在臨沂地區弄出一個“馬陵山遊擊隊土匪集團”，在這一事件中，全地區有4萬多人被抓捕、關押和慘遭毒打，有9千多人被打傷致殘，有569人被打死和逼死。

在全國的清理階級隊伍中，把所謂漏網的分子們補上也一大內容。內蒙古

伊金霍洛旗，在農村牧區搞重劃階級成份運動，“錯劃成份 480 戶，錯誤批鬥 683 人，受株連 2118 人。當時死亡 17 人，嚴重傷殘久治無效後期死亡 20 人，致殘 30 人。”

江西景德鎮在清階中，新挖出敵對階級分子 972 人，其中地主 156 人，富農 145 人，資本家 464 人，叛徒、特務、反革命、壞份子 207 人。此外，還有 380 個懷疑對象，現在先懷疑你，下次再來什麼運動時他們就將是新的“漏網地主”。

1968 年 1 月 21 日，康生指控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是叛徒，並憑空捏造了一個“國民黨雲南特務組”。他下令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當場逮捕趙之後，整個雲南便抓起“執行趙健民國民黨雲南特務組計畫”的分子來。僅此一案，雲南省 138 萬人被牽連，17000 餘人被打死、逼死，61000 多人被打殘。僅昆明地區就死了 1473 人，打殘 9661 人。

一些群眾組織如被認為有異端行為也會遭到當局殘酷鎮壓。如雲南的群眾組織滇西挺進隊被說是要叛國，軍隊進行圍剿，用機槍掃射，20 鐘後將該組織數千人屠殺殆盡。

雲南省清階的主要內容是“劃線”。在兩派鬥爭中站錯了線的便入了另冊。一時間，昆明街頭上貼滿了“槍斃”的佈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補上告示了事。

據 1975 年的統計，受到各種刑訊逼供、審查監禁的達 30 萬人，其中 3.7 萬人死於非命。

知識份子集中的地方是當然的清階重點。一個大學批鬥牛鬼蛇神時，一個老教師的脖子上掛著個黑牌，上寫“歷史反革命”，因為他曾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鬥爭會上，一位十五歲的少年跳上臺去，對他大喝一聲；跪下，接著對

長者左右開弓一頓耳光。台下的群眾則報以熱烈的掌聲。因為這少年就是那老教師的兒子。少年還在臺上向毛主席保證，回到家裡，也還要對其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湖南大學自校革委會成立後，亂捕亂關和遊鬥的就有 3 百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殺死亡的 18 人，長期挨鬥折磨致死的 6 人，被錯判刑的 16 人。據蘭州大學統計，在清階中被審查的達 450 人，迫害致死的就有 23 人。

在安徽大學支左的軍代表在該校搞法西斯專政，製造了大批冤、假、錯案。安大原有教職工 809 人，受審查的有 262 人，其中被非法專政的有 120 人……並有 5 人被迫自殺。”

清華大學 6 千名教職員工，1/5 被審查，178 人被定為敵我矛盾。12 人自殺，包括兩位一級教授。北京大學在文革初和清階期間，共有 24 位教授自殺。

吳偉能是北京大學歷史系幹部。1968 年年底，他被辦了“學習班”——當時整人的一種形式。他在 1959 年的言論被揭發出來：吳偉能的父親，1958 年冬天在江蘇一個名叫“幸福”的人民公社裡，因沒飯吃而餓死。為此，吳偉能對人說過“幸福公社不幸福”。這被當作“攻擊三面紅旗”的言論。1968 年 11 月 4 日晚上，吳偉能在圓明園東北角投水自殺。他死後的第二天，北大歷史系開了他的批判會，他被扣上反革命、叛黨（指自殺）等六項罪名。

蘇州大學有十幾人自殺，基本上是所謂有歷史問題的老教師。有跳樓的，有跳河的，有跳井的。還有喝農藥的，自己用斧子朝腦門上砍死的。

華東師範大學的清隊運動為時半年，8 百多學生定為敵我矛盾，六十多人自殺。自殺猶如一場死亡比賽，有臥軌、跳樓、割脈、服毒各種方式，是全上海最悲慘的單位。

李季谷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1968年，李因其歷史問題被審查。7月25日，他的專案組逼迫他交代問題，強迫他跪了一整天，並用燃燒的香煙多次燙他的後背和脖頸。審問延續到深夜。當天夜裡，李季谷教授投入華東師範大學校園中的麗娃河自殺身死。學校當局說他畏罪自殺，召開了對他的批鬥會。因為李季谷已經身死，就畫了一張他的漫畫像，由歷史系的另外兩個也在被審查的“牛鬼蛇神”舉著這張像站在台前，替他接受批鬥。

文革中，一大批人遭鬥爭後自殺；死後，還被稱為“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是“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毛澤東語），要“遺臭萬年”。自殺可成為繼續迫害的藉口。他們死後仍要被戴上各種罪名，家屬子女繼續蒙受迫害。文革的殘酷不但在於逼人自殺，還在於繼續殘害已經自殺的人。這種對人的逼迫的極端程度，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

中央戲劇學院圖書管理員符冰是女作家謝冰瑩的女兒。謝冰瑩抗戰勝利後應臺灣師範大學之聘渡海而去，再也沒有回來；生父符號1950年應章伯均之邀到北京交通部任職，五七年反右時與部長章伯鈞一道成為右派分子，清理階級隊伍中被遣送回湖北老家仙桃。所以，符冰成了戲劇學院當然的清階物件。在一次圍鬥後，她爬上學院建築的最高層，縱身而下。於是學校給符號發了一則電報，電文僅一句話：“反革命、右派符號的女兒符冰反對革命群眾的鬥爭，自絕於人民，跳樓自殺”。

在沒有大學的縣城，清階重點就是中、小學教師。江西崇義縣將全縣教師集中起來審查，清除了2/3。河北邢臺縣，4百多名教師在清階中被審查，8人被逼自殺身亡。

山西省山陰縣，6百多名教師集中到縣裡清階，一位剛從北京分配去的大學

生記述道：這窮鄉僻壤鬥起人來比大城市野蠻得多。有時把縣長、縣委書記們弄來批鬥，用鐵絲栓上幾十斤的大糞桶掛在脖子上，一邊鬥還一邊往桶裡扔石頭，糞汁濺得滿身滿臉。有的人熬不住就自殺，找不到自殺的傢伙，便在吃飯時把筷子插進鼻孔，把頭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進腦子；還有的跳糞坑活活憋死……

廣東和平縣，1100 餘名中、小學教師，424 名被抓起來審查。全縣被揪鬥 1.2 萬餘人……非正常死亡 243 人，被迫害致傷致殘者 750 餘人。

支左的軍隊幹部把天津市塘沽城面廠的 8 個工程師定為特務，施加種種酷刑，結果八位元工程師全部打死。

國防科委第九研究院（核武器研究院）所屬 221 廠及開採核燃料的礦區，由科委派出的工作組負責人趙登程與科委副主任趙啟明（原海軍副司令）指揮“清隊”。他們下達指示：“不殺人打不開局面”。在他們指揮下，該廠設了 40 餘處監獄，先後關押了 4 千餘人。從全國各地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調去的 1 百多名專家、教授、工程師，90%成了“特務”、“反革命”。全廠被打死、被逼自殺的達 59 人，包括九院副院長，打傷、打殘的則有 3 百多。被逼瘋的大人和因雙親被抓而嚇瘋的小孩近百名。

江西景德鎮陶瓷研究所集中了中國最優秀的陶瓷研究人員。五月下旬，清查的颱風刮到該所，157 名研究人員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中國青年反共救國軍。拷打是題內之事，所長傅德鑫和一位女翻譯含冤致死，不少人受傷致殘。1968 年 12 月，省革委會指示撤銷景德鎮陶瓷學院和陶瓷研究所。教員、研究人員們或送農村，或去工廠，毛澤東所說的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又消滅了兩處。

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 6 百多人被誣為特務，其中 2 百多人被隔離審查，2 人被活活打死，10 人打成殘廢，4 人自殺，包括 1949 年從美國歸來的

女科學家雷宏淑；另有 9 人自殺獲救未死。粗略估計，死於“清隊”的人數應在 50 萬人以上。

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蕭光琰 1950 年自美國歸來，1957 年成為內控右派；如今則加了個反革命特務的頭銜。1968 年 10 月，該所工宣隊派出專政隊，將他家的財物抄沒一空，把他關進了牛棚。在挨了數不清的斥罵和鞭打後，他服安眠藥結束了生命。於是工宣隊張貼“特大喜訊”，歡呼“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勝利”，又把正在農場勞動改造的蕭的妻子、原美籍華人甄素輝（大連海運學院教師）拉去，要她“繼續交待”。甄見到丈夫的遺體後，決心赴黃泉與丈夫同在，便以看望女兒為由請假回家，與年僅 15 歲的女兒一併服藥而死。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和大連海運學院的工宣隊聯合成立專案組，大肆追查“以蕭光琰為中心的特務集團”，一下株連了幾十個人。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發現這是個“工人階級佔領科研部門”的好樣板，將其經驗登上了《人民日報》。

張海默，北京電影製片廠的劇作家，1968 年 5 月 16 日被裝入麻袋，封住口，亂棍打死在攝影棚內，年 45 歲。在江青說“上海人藝還是老傢伙霸佔舞臺，最壞了”後，上海人藝一團團長高重實被連續三天拷打逼供，自殺身亡。

四川省級文藝機關辦的學習班裡有“專政大軍”，幾個月間打死逼死 7 人，包括著名的電影演員馮哲。被打傷的達 40 餘人。川劇名演員張德成、瓊蓮芳都是這樣悲慘死去。

三月，上海當局宣佈拘留名京劇演員周信芳，其子周少麟也被拘捕。其妻對兒媳說：“別哭了，一切都結束了。”遂絕食，三天后死去。

嚴鳳英，著名表演藝術家，以主演黃梅戲《天仙配》而聞名天下。“文革”一開始就被誣為“文藝黑線人物”、“宣傳封資修的美女蛇”，並被誣為“國民

黨潛伏特務”，“肚子裡還藏著特務密電和微型收發報機”而屢遭批鬥，於 1968 年 4 月 7 日夜自殺身亡，慘死在安徽醫學院附屬醫學內科病房裡，年僅 37 歲。當時安徽省紅梅戲劇團（為了顯示革命性，將“黃梅戲”改名為“紅梅藝”）的革命代理人對她的定論是：“畏罪自殺，死有餘辜”。為了尋找所謂的特務“發報機”，她的喉嚨還被割開挖出，五臟六腑也被打開。

革命樣板戲之一的京劇《沙家浜》是根據滬劇《蘆蕩火種》改編的。上海鋼管廠的青年工人談元泉不明白《沙家浜》已成江青的專利樣板，原來的滬劇不得再登臺。他與幾位滬劇愛好者在里弄裡演出了《蘆蕩火種》。1969 年 9 月，有人將此事報告給徐景賢，徐在市革委會的會議上說“這不是一般的演戲，這是破壞樣板戲的現行反革命行為”，4 位滬劇愛好者都被逮捕。徐景賢說，應該判處談死刑，談元泉就死在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槍口下。

中共反智的頂峰是“文化大革命”。毛反復強調“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知識成了不好的東西。知識份子被稱為“臭老九”，有文化的人要向沒有文化的人學習。

毛以對文藝界的大掃蕩揭開文革序幕，以廢除高考制度為正式登場鑼鼓，繼而停辦大學，污辱知識份子。為了實施對知識份子的再教育，北京清華大學的教師們被發派到了江西南昌的鯉魚洲。這個地方血吸蟲流行，原來的勞改營都被迫搬遷。教師們只要沾了河裡的水就馬上染病。一個個肝硬化，肝腹水，很多人喪失生活勞動的能力。

1968 年 12 月 22 日起，全國有 800 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他們許多是當年的紅衛兵；有很多人死在了農村，或一輩子生活在了農村。即便後來返城，也面臨著諸多的生活問題。這是愚民政策登峰造極的發展：全面廢除文化教育還不夠，

又“改造”已有點文化知識的人，讓他們知道厲害，不敢亂說亂動，以求全國上下全是愚民和順民；十億人民只剩下一顆腦袋，愚民愚到這種層次，真是可驚可詫可歌可泣成了中華一絕矣。

文革中的自殺行為一直延續了幾年，僅上海市在 1968 年到 1969 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飽受侮辱和折磨後自殺的人即達一萬多人。有人在分析文革大量自殺現象的三大特徵：一是超高百分比，自殺創下了駭人聽聞的新記錄；二是全方位分佈，自殺者幾乎遍佈一切黨派、團體、職業、年齡和職位；三是自殺者中，集中了一批中華民族最優秀的人物，是以中國最珍稀的知識份子為主的。陳璉是蔣介石心腹陳佈雷的女兒，背叛父親投身革命；田家英更是毛澤東多年秘書，結果都被逼上絕路。1968 年，楊朔在單位裡被列為重點批鬥對象。他自殺的時候，55 歲。甚至一家幾口共赴黃泉的。來自延安、拍攝“開國大典”的著名攝影記者陳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對。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標，但毛澤東有“文革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的指示，國民黨時期的老工人也成了鬥爭對象。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廠是毛澤東親自抓的所謂“六廠二校”之一，是全國“清隊”運動的樣板。毛派出北京衛戍區 8341 部隊於 1968 年 9 月進駐該廠實行軍管。由軍宣隊主事，新華社派員幫助總結經驗，弄出一份《認真落實毛主席的對敵鬥爭政策，清理和改造階級敵人》的報告，印發全國，讓全國照此辦理。軍宣隊大搞群眾辦案，1400 多名 1949 年前進廠的老工人中，9 百多人被審查，32 人戴上各類帽子接受群眾專政的批鬥，4 人逮捕入獄，逼得 14 名老工人自殺身亡。有 1 老工人因無端被冤，與軍代表吵罵時動了手，被以“行兇鬧事，進行階級報復”的罪名判處 15 年徒刑。

甘肅玉門油礦曾是國民黨執政時期中國主要的石油企業，凡共產黨接管油礦

時年滿十八歲的都要“過篩子”。油礦革委會大刮“十二級颱風”，揪出了 2 千多人後還說：“玉門三萬多人，現在才刮出兩千多，不算多。”革委會大肆追查“玉門油礦潛伏特務組織”，整死了 9 名幹部和 8 名工人，數百人被毒打致殘、精神失常。全國各地石油部門都有曾在玉門工作過的職工。“玉門潛伏特務”案還波及到了全國石油部門，不知製造了多少冤案。

大慶油田自 1967 年 3 月起實行軍管，革委會成立時由陸軍第 16 軍副軍長諸傳禹擔任主任。1968 年初開始清階，自殺、打死人的現象不斷發生，並逐漸增多，一至四月份自殺 15 人，五至六月份自殺 36 人，打死 7 人。

陝西銅川市焦坪煤礦挖出一個“反共救國軍”，省革委會副主任胡煒（21 軍軍長或政委）親自驅車到焦坪煤礦督陣，嚴刑逼供。無端株連多達 5 百多人，含冤自殺的 8 人。

石家莊鐵路局的“清隊”，是一場大血案。僅這一血案，被迫害的幹部、工人，就達 1645 人，其中致死 48 人，致殘 128 人。

柴達木盆地，戈壁灘深處的 32109 石油鑽井隊，不足百人，揪出了十幾個反革命分子，包括當年與王連喜一起打出第一口油井的于連傑。

陝西漢中的飛機廠自 11 月開始大揪國民黨特務，從在國民黨時期就在工廠做過工的老工人入手。先將 60 多人抓進學習班，用刑訊逼供，然後擴大特務集團的範圍，有 5 百多人為定為特務分子，株連 1 千多人。在審訊中，捆綁抽打、鐵絲勒嘴、假槍斃是土方，烤大燈泡、關乾燥箱、全身通電用的則是現代化設備。1969 年 3 月的萬人批鬥大會還請了中央及外省包括北京、天津等地的 2 百多名代表到場觀摩學習。運動中逼死了 21 人，包括一個聽說丈夫被定為特務、用煤油澆身自焚的家屬。全廠另有 15 人自殺未亡，74 人被打傷打殘。

銅川市焦坪煤礦將一名曾在國民黨軍隊當過兵的老工人熊坤抓起來，要他交待罪行。在三天三夜沒喝到一口水、還在爐邊幹烤的情況下，他被迫亂說一通，說在 1962 年參加過反共救國軍，還是個副司令。礦革委會一見抓出個大鯊魚，馬上往上報告邀功。上級也正需要出戰果，於是層層上報，一直報到了省裡。省革委會副主任胡煒(21 軍軍長)親自驅車到焦坪煤礦督陣，嚴刑逼供成績巨大，連不識字的、以買豆腐為生的也成了國民黨的“少將師長”，瞎了一隻眼、斷了一隻手，以割荊條編織器皿為業的也戴上了“胡宗南部少將旅長”的桂冠。最終證明那是子虛烏有的事，無端受株連卻多達 5 百多人，含冤自殺的有 8 人。

1968 年夏開始的石家莊鐵路局的清隊，1 千多人被誣為特務組織的成員，關進牛棚：凡被揪進牛棚的，一律編成號碼，所受刑罰，名目繁多：老虎凳、灌涼水、打落牙齒逼迫吞進肚、將窩窩頭扔在地上強迫雙手被綁的的犯人趴在地上如狗一般吃食；有如摔跤般將“特務”活活摔死；一早起床逼迫特務們用小便互相沖腦袋；逼迫他們互相拷打，然後互相舔血喝尿。文革後官方的記載說：許多下流無恥的非刑，有汗紙筆……連日本法西斯的“憲兵隊”和國民黨的“渣滓洞”、“白公館”也望塵莫及！僅這一血案，被迫害的幹部、工人，就達 1645 人，其中致死 48 人，致殘 128 人。

第 141 節 對少數民族的鎮壓（“內人黨”事件）

1966 年 5 月 22~7 月 25 日，在中共中央華北局工作會議上，有計劃地開始對烏蘭夫等蒙古族領導幹部進行誣陷。7 月 2 日，劉少奇、鄧小平代表中央對烏蘭夫進行了極其嚴厲的批評；此二公以“五一六通知”為綱，指斥烏蘭夫不搞階級鬥爭，犯了地方民族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嚴重錯誤，把他打成全國省委書記中的第一個“走資派”。不久，在劉鄧的指示下，7 月底由華北局解學恭等人起草的

《關於烏蘭夫錯誤問題的報告》呈送中央。報告確認烏蘭夫有五大錯誤：①反對毛澤東思想，另打旗幟，自立體系，②反對階級鬥爭，反對社會主義革命，③對修正主義卑躬屈膝，④以《三五宣言》為綱領，進行民族分裂活動，搞獨立王國。1961年1月，為了讓人們瞭解內蒙古自治區的歷史，烏蘭夫決定向內蒙古的各級幹部印發1935年毛澤東主席發表的《對內蒙古人民宣言》。這一舉動竟被指為“以1935年《宣言》為綱領進行民族分裂活動，搞獨立王國”；而且歪曲事實，說1935年毛澤東《對內蒙古人民宣言》是“當時黨內教條主義者假借毛主席的名義發表的”。⑤安插親信，篡奪領導權。報告結論為：“烏蘭夫的錯誤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是破壞祖國統一、搞獨立王國的民族分裂主義、修正主義的錯誤，實質上是內蒙古黨組織中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烏蘭夫錯誤的揭露和批判，是挖出了一顆埋在黨內的定時炸彈。”

1967年11月1日，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中共調原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滕海清出任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內蒙古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之後，很快發動了一場所謂“挖烏蘭夫黑線，肅烏蘭夫流毒”的運動，簡稱“挖肅”運動。

經滕海清及其打手的精心部署，挖出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王再天，內蒙古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特古斯，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哈豐阿、朋斯克，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特木爾巴根，以及巴圖巴根、博彥巴圖、鮑蔭紮布、木倫、義達嘎、巴圖等一大批蒙古族領導幹部被打入“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最後，將內蒙古的蒙古族幹部，無論是西部的，還是東部的，絕大多數都被打入了“烏蘭夫叛黨集團”。

1968年2月4日，康生指示在內蒙古抓“內人黨”。“內人黨”——內蒙

古人民革命黨成立於 1924 年，以實現內蒙古自治為目標。後因蘇聯插手，其中的國民黨被清除，該黨名存實亡。1945 年，該黨恢復，並由中共黨員烏蘭夫等控制。中共怕它無法控制，1946 年指示停止活動。內蒙古頭子滕海清挖“內人黨”挖到了蒙古包，而且挖到了羊群裡。上百萬人受到株連，80 萬人遭逮捕和關押，近 10[或 35]萬人被迫害致死。上致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吉雅泰，自治區副主席哈豐阿，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特木爾巴根，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達理紮雅，自治區副秘書長嘎如布僧格，師範學院院長左智，內蒙古大學歷史系主任何志，內蒙古歷史研究所所長勇夫等；下至普通農、牧民，甚至還有婦女、兒童。

在挖“內人黨”的運動中，打擊的對象主要是蒙古族，同時也有其他少數民族，有一些漢人也受到牽連。所使用的酷刑中，如吊打、老虎凳、過電、釘竹簽、烙鐵燙等，都是家常便飯的事，還有許多慘無人道的刑法。如在哲裡盟曾有婦女被逼著與公牛交配；尚有兩眼被挖出者，叫做取走兩隻燈泡。錫林郭勒盟有被活埋的，有被割去耳朵的，其慘狀經歷者不堪回首。斷胳膊、斷腿多是小意思。所謂審查，完全等同於法西斯殘害。一個被誣為內人黨的男青年拒絕招供，竟被割下了生殖器。一個才 20 歲的“內人黨”被架在火上烤，直至烤死。一個女青年被疑為內人黨，審訊時被專案人員用一根木楔從陰道插入子宮，活活折磨死。

漢蒙雜居的巴林左旗八一大隊，在漢人黨支部副書記宋振廷主持下揪新內人黨，僅 120 多戶人家，就有 14 口被整死，還有 16 人被拷打而終身殘廢。武川縣自 10 月起挖新內人黨，至次年 5 月，全縣 80 人死於非命，傷殘者甚眾。挖“內人黨”不只限於內蒙古境內，同時也挖到了新疆、青海、甘肅和東北等地的蒙古族聚居區，只要是蒙古人，就難逃一劫。

1968年7月20日，滕海清及其打手們又拋出了一份檔——《關於在牧區劃分和清理階級成份的幾項政策規定(草案)》，全面否定了中共“不鬥、不分、不劃階級”，“牧工、牧主兩利”的一貫政策，決定在牧區劃分階級、鬥牧主，分牲畜。在牧區劃分牧主、富牧、上中牧、中牧、下中牧、貧牧等兩個階級，六個階層。牧主、富牧是牧區的剝削階級。這是滕海清等人對中共階級鬥爭哲學的一大發展。這還不夠，又要在蒙古人所信奉的藏傳佛教喇嘛中劃分階級，以喇嘛的學位來劃分。真可謂：千古奇聞！

凡是劃分為牧主、富牧、封建上層、宗教上層份子的人，剝奪其公民權，沒收他們的全部金銀珠寶，大量現款，所有牧畜，凍結其所有的銀行存款，直接歸國庫所有。

林彪提出了一個歪點子，叫“政治邊防”，強迫幾十萬蒙古人從邊境地區向內遷徙，趁機向內蒙古大批移民。霎時間，翻天覆地，一片混亂。

在宗教上，內蒙古境內的約1500座寺院被打、砸、搶。認為蒙古人信奉佛教，就會懷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故要徹底砸爛。喇嘛所遭受的迫害，足令聞者毛骨悚然。佛教文物被毀壞逸盡，珍貴的“大藏經”等經典被付之一炬。除畝產歸公外，甚至連喇嘛的個人生活資料也被沒收。更有甚者，佛像被砸爛之後，佛頭上巨大的鑽石、紅寶石等不翼而飛，即被那些目不識丁的軍人所偷。

蒙古人騎著馬，衝破層層封鎖，跑到北京，站在天安門前，默默地訴說內蒙古人民的冤情。最著名的是，內蒙古的“八百鐵漢”，裸露著上身，將碗口大的毛主席像章別在胸脯的肌肉上，來到中南海門前，哭訴內蒙古人民所受的災難。引來成千上萬的北京市軍民，人們極為同情，暗罵……蒙古人的憤怒之情，隨著種種慘案的公佈於眾而日益高漲。到處都有受害者及其家屬舉行的街頭控訴會和

刑具展覽會，數以千計的青年學生和市民走上街頭，高呼“向滕海清討還血債！”“挖內人黨是政治騙局！”還有許多死亡家屬自發組織起來，起名曰：“五十孤兒上訪團”、“一百寡婦上訪團”、“軍隊幹部家屬申冤團”等等，都來到滕海清的官邸呼冤求救，哭天喊地，真是令人心碎。

1968年10月1日，中共的國慶日前，中共總理周恩來接到其侄女自內蒙古偏遠的邊境牧區寄來的信，說：有十幾戶的草原蒙古包中，只有三戶不是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的。

毛澤東說：在清理內人黨運動中，內蒙古已經擴大化了。但是毛澤東沒有向內蒙古人民道歉，只將犯下滔天罪行的滕海清調往濟南軍區任副司令員而已。

1969年7月5日，正當蒙古族人民對所受迫害進行強烈抗爭的時候，中共中央未經人民代表大會討論，決定：將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劃歸黑龍江省；哲裡木盟劃歸吉林省；昭烏達盟劃歸遼寧省；巴彥淖爾盟劃歸寧夏回族自治區；阿拉善盟劃歸甘肅省。最後，原內蒙古自治區的2/3領土被瓜分。1969年12月19日，中共決定對內蒙古實行全面軍管。

據清格爾圖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統治下，有15萬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第142節 “一打三反”運動

1970年的“一打三反”的內容是：打擊現行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官員們只對“一打”感興趣。

1970年春開始的“一打”是對“清隊”時未完全解決的文革中對立派的最後的鎮壓。譬如上海集中追查曾參與炮打張春橋的學生，王秀珍說“對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軟”，市委部署清查，僅復旦大學等六所大學就有120多人被逮捕、監禁、5人被逼自殺，3人被逼瘋。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塗寫《毛主席語

錄》，在“一打三反”中被判處死刑，押往刑場執刑前，喉管被割斷，免得他呼喊“反動口號”。

文革後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報告：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錯判死刑尤為突出。寧夏錯殺70人中，1970年判處的有68人；天津市錯殺的28人中，1970年判處的有22人。

1970年2月，北京市所有機關、學校、工廠企業都收到了一份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發佈的《通知》。這份北京市軍管會的通知裡，首犯是顧文選。1957年時，顧文選是北京大學西方語言系的學生。在1957年的“整風運動”中，該系開了個“控訴會”，顧文選是上臺控訴的同學之一。後來顧文選就被打成了右派，他天真地躲回杭州家裡。結果被抓回北京，判了五年徒刑。刑滿後，他還是不能離開勞改的茶澱清河農場。絕望中，顧文選北上到了蘇聯。但被引渡給了中國當局。成為北京五十五名現行反革命中的首犯。

“顧文選等五十五名罪犯”中還有一位是1957年時的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沈元。沈元聰明異常，作為右派分子在北京郊區勞動改造期間，還寫了幾篇論文，投給《歷史研究》，為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黎澍賞識，設法將他調到該所工作。文革中，黎澍成“反動學術權威”，無法再保護沈元。沈元被鬥得受不了，買了盒黑鞋油，塗在臉上扮成黑人，進了馬里大使館。他欲申請政治避難，誰知馬里使館轉手就把他交給了中共，他也就“罪該萬死”了。

除少數例外，那批人都死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槍口下。行刑前的宣判大會上，行將被槍斃的人的舌頭是被勒住的，因為要防止他們呼喊口號。因寫了《出身論》而被毛澤東批准處決的遇羅克和別人不同的。他從沒害過眼病，眼角膜可以派用場。所以臨刑前，員警從那批應“立即執行”的人犯中將他挑出，塞進一輛警車

拉離了現場。他的家人不明所以，直到十年後才得知，一份只允許醫生閱讀的內部資料曾披露：遇羅克的眼角膜被移植給別人，手術成功……當初警方沒有按例向遇家收取子彈費，大約就是因為眼角膜已抵了子彈費。

貴州貴陽市建築公司女技術員馬綿珍於 1970 年 1 月張貼了一張批評省革委會主任蘭亦農的大字報，被警方拘留。此後成為階級鬥爭的樣品，被貴陽市各單位輪番“借”走，接受批鬥。2 月 25 日，她被借到了貴陽市糕點廠。在該廠的批鬥會上，她喊出了“打倒林彪！打倒江青！”的口號。當場被擊倒，嘴裡堵上浸了油漆的抹布後，被正式逮捕。從那日起她開始絕食，省革委會當局指示公安局一定要讓她活到槍決的那一天，強行給她鼻飼。5 月 10 日，當局在貴陽春雷廣場組織了 20 萬人的公審大會，將她拉去宣佈“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宣判會結束後，這女子又被拉上卡車滿城遊街。直到下午四時才拉到郊區野地，按成跪姿，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給她的最後洗禮，死時年僅 30 歲。

1970 年 3 月 28 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同市公安機關軍事管制委員會下達了對“中國共產主義聯盟”刑事判決書，13 人被定為“首犯”和“主犯”，“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其餘 13 名“同案犯”則判處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此 26 人多為 1957 年反右運動的受害者。1966 年 8 月，他們在勞改農場裡分別組織了“中國共產主義聯盟”和“科學共產主義”兩個組織。任大熊：1957 年為北大數學系青年助教。整風時，他從圖書館借出刊有赫魯雪夫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的英國《工人日報》，與兩位學生共同翻譯後張貼在校園裡供同學們閱讀。結果反右時三人均被打成右派。任被判處無期徒刑。文化革命開始後，1970 年 3 月，山西大同公安機關軍管會宣佈破獲一個名叫“中國共產主義聯盟”的“現行反革命暴亂集團”，一舉槍決 13 名“首犯”和“主犯”，任大熊是“主犯”之一。

雲南鎮雄縣的官方記載，便把“清隊”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談：“省革委派工作隊來鎮雄指導‘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107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匯縣“一打三反”，審查、鬥爭了3千餘人，造成非正常死亡62人。寶山縣“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份子”結合，共清出5千多“有問題的物件”、41人被迫自殺。青海貴德縣，“一打三反”中14人自殺，後全部平反昭雪。

一打三反濫殺無辜。陝西安康縣農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陰暗無光，無法張貼毛澤東標準像；小孩呼喊“毛主席萬歲”，他說了一句“哪裡能活一萬歲”，成“現行反革命”，被縣軍管會判處死刑，於1970年6月槍決。副縣長雷雲祺、縣政協常委張開印、屬1949年起義投誠後留用的人員。軍管會以“反革命”罪將他們槍決。該縣“一打三反”中拘捕254人，槍決17人，判刑12人，戴“反革命”帽子25人，20人自殺身亡。

1969年3月，湖南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庸縣女社員丁祖曉給州委機關寫信抨擊當局強迫農民供“寶書台”，逼得農民賣豬換“紅寶書”、甚至把買油鹽醬醋的錢、孩子的書錢都拿去“請毛主席像”：“這恰如封建王朝的上朝，把毛主席當封建帝王，天天朝拜。”4月21日中共九大閉幕，全縣都忙著紮“忠”字牌樓，掛“忠”字旗。丁祖曉和姐姐丁祖霞連夜寫了好幾張傳單，由丁祖曉進城散發。她們呼籲一切正直的革命人們：“不要甘於做奴隸，起來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姐妹倆被捕後，她們的同學、青年女社員李啟順決定聲援她們；她刻鋼板、油印了一批《告革命人民書》，由她的妹妹李啟才深夜進城散發。於是這一雙姐妹也落了網。1970年5月8日，丁祖曉被拉到該縣鷺鷥河邊槍斃。李啟順則被“借”給吉首縣，在吉首遊街示眾後遭槍殺。

1970年8月的一天，人口僅30萬的省會銀川市近10萬人擠滿體育場和四周的街道，觀看公判“現反”。這天判決的是以13名青年學生為成員的反動組織“共產主義自修大學”。因1名女性已在關押期間觸電自殺，其餘12人，3名“死刑，立即執行”。被槍決者之一的吳述樟年僅22歲，最大的罪惡時：曾在《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頂一萬句的旁空處，寫過“放屁”二字。他們的主要罪名是書寫各種反動的論政文章。

其中魯志立（北京農業大學1970屆畢業生）撰寫的《什麼是法西斯主義》說：“當局禁止一切為世界公認的民主權利以至人民의思想和言論自由，殘酷鎮壓一切反對或僅僅不同意暴力統治的人民，甚至採用公開的恐怖手段。竭力推行種種仇視人類的反動謬論，例如宣傳反動血統論，人為製造階級與階級劃分論等來迷惑籠絡一部分人以達到鎮壓人民的目的。此外還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實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隸主義的盲目服從精神，宣揚個人迷信和領袖至上的神話，從意識形態上已墮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義。”

3月22日，甘肅省會蘭州的萬人宣判大會結束後，20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車遊街示眾，然後到達軍警密佈的刑場。被殺者之一是甘肅師範大學歷史系老教授張師亮。因在該系的學術討論會上他曾批評過毛澤東，認為毛澤東的“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的說法，不妥當、不全面。

2月17日，江西省會南昌召開萬人宣判大會，22歲的吳曉飛被槍決。他的罪名是曾寫下兩篇論文說：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抨擊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無政府主義氾濫的根源，對劉少奇的迫害“不擇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由於中央將判處死刑的審批權下放給各省、市，各地利用此機會殺了很多政治犯。三月間，湖南“長沙當局開了兩次大的殺人大會每次處決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四月的一天，當局又宣佈次日將判處 60 多名反革命份子死刑。可第二天上午九時，有線廣播突然通知，宣判大會取消了。原來，中央發現地方殺人過多，需要有所控制，突然收回了判處死刑的審批權。這樣長沙的一批反革命份子便幸運地由死刑改成了 15 年徒刑。

1970 年 10 月，廣州軍區令員丁盛聽說海南島白沙縣一名女醫士官朋華在監獄裡還寫文章罵林彪，便親自支持會議，將她判處死刑。臨槍決前怕她呼喊口號，特用一節竹筒塞進她嘴裡，穿上鐵絲紮在腦後。比槍斃張志新前割斷喉管稍為文明一點。

福建省龍岩縣適中公社農民謝洪水，土地改革中，他們家分了一塊土地，全家對共產黨感恩戴德。1960 年家家戶戶斷糧，全公社餓死了 4 百多口人。他外出尋活路，卻被當作“盲流”扣押，做苦工，妻離子死。直到“三自一包”政策傳下來，龍岩的農民才有了一條活路。由此，他和當地很多農民一樣，仇恨毛澤東而熱愛劉少奇。1966 年 10 月，他成立了一個“中國共產黨幸福委員會”，聲稱由劉少奇直接領導。他們出版了兩期《大眾之聲》的小報，擬定了中央委員的名單，其中有劉少奇、彭德懷、彭真、鄧小平、周恩來、朱德、宋慶齡、董必武等，還有早年在閩西領導革命、龍岩老百姓都熟悉的鄧子恢、張鼎丞等，唯獨沒有毛澤東、林彪、江青，也沒有他們自己。在他們編寫的《軍委密件》中，強調“要跟劉少奇走，要推翻毛澤東，以人民的利益為重，興起學習《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高潮”……

1967 年 6 月他們編寫《黨章》，主要內容是：“我們堅持執行三自一包、

三合一少、四大自由，取消階級，取消集體；我們的最終目的是徹底消滅毛林集團，為人民爭取最大的自由和幸福。” 近三百人參加了該會，農民入會的決心書上寫明“擁護劉少奇”，入會相片反面寫著“為共產主義奮鬥”。相鄰的南靖縣的農民聞訊，有的趕去要求入會。蒲田、仙遊等縣，有農民自行搞起了“幸福會”。

當“偵破工作隊”宣傳劉少奇的罪行材料時，絕大多數會員公開針鋒相對地為劉少奇辯護。謝洪水、謝永祺被捕後，仍然抗辯說：“大躍進……造成國家困難，那是毛主席的錯，劉少奇提出三自一包才扭轉了困難局面。”

結果，謝洪水、謝永祺等 19 人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謝百添、謝尋興在勞改營中繼續為劉少奇辯護，被加“罪”而改判成死刑，立即執行。未被逮捕的人中，有十二人被逼自殺身亡，八人被打傷致死。有的人被槍斃後，妻子、母親也被逼自殺身死。

由於“清隊”、“一打”、“清查五一六份子”三場運動，一個連著一個，江蘇省只籠統公佈了這三場運動中受迫害的人的總數：把幾十萬無辜的幹部、組織打成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和“五一六”份子，加以迫害，成千上萬人致傷、致殘、致死。

文革 10 年間總死亡人數相當高，北京市因冤獄而死的即有 9800 多人。上海被“立案審查”的有 24 萬餘人，被折磨致死、自殺的超過 1 萬人，被逼瘋、打殘的更多。至於縣以下單位，全國 2 千餘縣，平均每個縣死亡當在五百至 1 千人。陝西安康縣，文革中非正常死亡 1300 人。官方的統計數字是：“總的估計，因大量冤假錯案受到誣陷、迫害和株連的達到一億人以上”。“去台人員家屬”中的冤、假、錯冤多達 10 多萬。

第 143 節 慘絕人寰的“沙甸事件”

1967 年，雲南的回族聚居區蒙自縣沙甸回民丟了鋤頭、鐮刀、扁擔、穀籬，舉起紙裱的小紅旗，成立了毛澤東思想的“造反隊”、“戰鬥隊”、“兵團”。聽上邊說清真寺在被掃的“四舊”之列，於是，部分群眾拿出了“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瘋狂地燒起宗教經典和“地富反壞右”家的書籍來。那氣勢，若秦始皇在世也是要自歎不如的。“毛澤東思想大無畏造反兵團”、“毛澤東思想紅色造反隊”衝擊並關閉了清真寺。

一場爭奪清真寺的鬥爭展開了。拉鋸爭奪清真寺越演越烈，沙甸馬上成了“造反”與“捍衛”，“革命”與“復辟”的勇士們的用武之地——開始武鬥，刀槍相見。大家都把自己的知識、謀略盡情地具體發揮，對自己的“敵人”要進行“革命的大掃除”了。

沙甸的“左派”人數不多，但靠山硬，去部隊那裡領了武器，帶著其它地方的“左派”，來攻打“復辟”的沙甸。1968 年 7 月，包圍了沙甸，炮打爛了清真寺的屋頂和部分民房。雙方都死了人，沙甸沒被攻破。

1968 年 11 月，雲南省革命委員會一、二號文件宣傳隊（支左部隊）包圍了沙甸，並展開了輿論攻勢。在強有力的宣傳攻勢下，大家都把希望寄託在“宣傳隊”會很好執行黨的政策上，於是把準備對抗的武器全部交了出去。12 月 8 日，沙甸回民夾道歡迎宣傳隊（解放軍）進村。“宣傳隊”進住清真寺。吃豬肉，豬骨頭丟在水井裡。

清理階級隊伍，“反軍亂軍黑幹將”、“宗教復辟急先鋒”、“跳樑小丑”、“小爬蟲”抓起了兩百多。對這些人專政，反復開鬥爭、批判大會，捆、梆、吊、打，有人在吊打中死去。強迫這些人學豬叫、學豬爬、學豬滾，有一孕婦滾得小

產。

極左路線的推行者，要用“行動”來證明他們是“最最革命的”。狠狠打擊信教者，正是左的革命表現。沙甸搞以教劃線，禮拜、把齋者是批鬥對象。公開宣佈：“信教就是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反對共產黨的領導”。

“抓革命、促生產”，沙甸的幾百“牛鬼蛇神”抓出來了，生產“上去了”，學大寨的標兵生產隊每個勞動日值 8 角，其它生產隊還在 2 角、3 角、4 角中徘徊。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九個生產隊都評政治工分，政治思想好的人工分就多，否則就少。

在艱苦漫長的歲月裡生存發展起來的回回民族，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宗教感情，團結力最堅，鬥爭性最強，不能接受對自己的侮辱與糟蹋。

為了維護回回民族的尊嚴，為了得到正當的生存權利，保持自己的風俗習慣、信仰自由，1973 年 10 月，在馬伯華等同志帶領下，以開放清真寺為起點，回民拉開鬥爭的序幕。

可是，開放清真寺被說成是“宗教復辟”，州縣工作隊進村，調子更進一步：“民族鬥爭說到底就是階級鬥爭……”。過開齋節被說成“反革命集會”，進行武裝阻攔未奏效。

1974 年春節後不久，沙甸村的回民們，準備恢復過“齋月”。當一月後的新月重現時，便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民們最盛大的“大開齋節”。這麼重大的回回族節日，竟被蠻橫地禁止。

1974 年 5 月底，蒙自縣公安局抓馬紹美，因此群眾包圍了工作隊駐地，強烈要求放人。工作隊卻卷起行李溜了。

1974 年 8 月，周興到沙甸，承認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還存在，答覆可以

清查生產隊的經濟帳目。周興離開沙甸，前言盡否，“黑帳”依舊……

1974年10月，沙甸等地回民上訪（昆明）要求落實政策，要求解決在少數民族地方存在的經濟、民族、宗教方面的問題。得到的答覆是：“這是鬧事”，“這是反對黨的領導”。

雞街地區成立了“民兵聯合指揮部”。民兵進行示威，用大字報“揭露”沙甸“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披著宗教外衣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

1974年12月初，沙甸成立“回民民兵團”。12月中旬，當時的雲南省委常委一要員到沙甸，雞街民兵聯合指揮部的民兵藉口保駕包圍沙甸，荷槍實彈，進行威脅。沙甸回民不甘受辱，徒手奪槍2支，但也付出了死亡1人、重傷3人的巨大代價。對方民兵雖被回民俘虜七人，都得到回民的優待，教育後而放歸。

1974年12月31日沙甸回民在要求蒙自縣委落實政策、解決問題，在僵局的情況下衝擊了縣委機關和縣武裝部，結果被官方民兵騙到蒙自二中，打死14回民，重傷16回民，回民一怒之下，攻下對方，擊斃其12人。

1975年1月1日，中央通知馬伯華、鄭全書、馬紹美等回民代表十人與雲南省委一起赴京解決問題。做了兩天的思想工作後，1月3日晚，回民代表與省委常委一起，乘坐國務院派來的專機抵達北京。1975年元月上旬，貫徹中共中央1975二號檔，即關於浙江、雲南停止武鬥，收繳武器的通知。雲南省委為貫徹此檔，專門成立了雲南收繳槍支執行小組。半個月時間，沙甸等地回民上繳了全部槍支彈藥。

1975年2月中旬，建水縣館驛等村回民集中到回族村子——雙山做聖節。香木橋大隊肖家莊的民兵持槍前往威脅挑釁，做節的回民在驚怒之下欲奪其槍，未成，反被打死九人。引起了在二月下旬沙甸等地回民的第二次赴昆上訪。

3月5日王洪文令駐玉溪的部隊炮擊玉溪西營清真寺。玉溪昆明等地開始抓捕“鬧事”的回民頭頭。沙甸空氣緊張，人心惶惶。5月初，幾個團的部隊要進駐沙甸，群眾怕重吃1968年部隊進村後的虧，竭力阻攔進村，因此部隊未進成。5月23日，周興等人以雲南省委的名義發了“通告”，並用飛機到沙甸上空撒發。“通告”把回民群眾要求落實政策說成是被“反動教長”和“反革命分子”煽動起來的“鬧事”，幾個回民頭頭是違法的，只有放下武器（其實沒有武器），迎接解放軍進村，才是唯一出路。

回民義憤填膺，幾千份“通告”一下就被集中成幾大麻袋，小夥子們簇擁著扛到工作隊駐地——雞街糖廠的大門口，一把火燒了。

當時紅河州的一個領導人說：“現在回民就象一頭瘋牛，我們要把她（他）引入火坑。”

7月中旬，雲南的周興等人命令回民代表回沙甸做工作，交出武器（特別強調交出新式武器）和歡迎部隊進村。沒有什麼新式武器，當然也就無法交出。關於自製的土武器，大家表示在接受群眾的條件後就交。條件即：歡迎少而精的部隊進村落實政策。沙甸這麼一個村子，怎能容納幾個團的部隊？解放沙甸時，對付國民黨的一個團只需要一連的解放軍，今天到沙甸落實政策卻要進駐幾個團的部隊！六八年部隊進村的教訓，大家記憶猶新……

群眾堅持只歡迎少數部隊進村落實政策的意見。當局最後無恥地給沙甸等地回民扣上“與蘇修、敵特掛鉤，要成立伊斯蘭共和國、要叛亂、有地道、有新式武器”的政治罪名。險惡用心，昭然若揭。可惜回回知道得太晚了。

1975年7月經鄧小平控制的軍委的批准，昆明軍區出動5個師上萬人的野戰部隊，以鎮壓“民族叛亂”的名義，出動大炮、裝甲車，對雲南省蒙自縣沙甸

村的回民進行了鎮壓。

1975年7月29日凌晨三點，“四人幫”開始對沙甸回民武裝鎮壓。村邊站崗的回民民兵，被把手腳捆起來丟到糞池中溺斃；沙甸父老被槍炮聲驚醒；大清真寺的守衛者殉難；沙甸大清真寺被武裝人員佔領。凌晨四點多，沙甸回民憑據地形熟，進行反攻。付出上百人殉教的巨大代價，奪回了。大清真寺，始得到一點現代武器的裝備。此時，西營已被部隊佔領，後山、馬家井、林家巷、金雞寨、川方寨的部分生產隊場院及民房也被官方武裝人員控制，於是，在這黎明前的黑暗裡，街戰、巷戰、以住房為據點的攻守戰在殘酷地進行著，在火箭筒的爆炸聲、火光裡，在槍炮的呼嘯聲中回民一片片倒下。沙甸人沒有屈服。到天亮時，又收復了部分民房據點，收回幾間自己的房屋，又付出幾百條寶貴生命的代價。

更為淒慘者，沒抵抗的回回們——有的被打死在堂屋中，有的被擊斃於門旁，甚至有的被槍殺於床上；有的指望逃生，願意當俘虜被押出村去，卻在押送途中被槍殺。

群情震怒，憑據用無數生命換來的那幾支步槍、機槍、手榴彈，以及那些自製的土武器奮起抵抗。有多少本不想抵抗的人，最後也含酸忍淚拿起那點土炸藥去尋同歸於盡的對象。然而真正找到同歸於盡的物件的並不多，自己反而喪生的卻不少。

炮火越來越猛烈。中午，三所清真寺開始被炮擊，哪裡的房屋堅固哪裡被炮擊。哪裡出現炊煙哪裡被炮擊，哪裡有水井哪裡就被火力封鎖。無須說明，大家都清楚了，這是沙甸穆斯林的滅頂之災。於是，以安拉的考驗、以樂園的恩典、以回回民族的氣節相互安慰著、鼓勵著、遺囑著……此時，望生哪有生之路，望存哪有存之地？

29日入夜，炮火有所減弱。但只要哪裡房屋透出光亮，隨著炮彈就劃破黑暗，呼嘯著在哪裡爆炸，於是慘痛的呻吟聲、幼兒被驚嚇的哭聲……撕肝裂肺。

30日，進攻的武裝人員放棄對老沙甸村內的部分控制點，縮小村外包圍圈，佔領制高點及有利地形，在無線電報話員的指揮下，對老沙甸村子進行更猛烈的轟擊，火焰噴射器也用上，老沙甸成了一片火海。入夜，馬伯華帶領部分群眾也撤到金雞寨。通過商議，決定做群眾的思想工作，出村逃生，身體健康者可設法轉移。

31日，通過反復勸說，2千餘老弱婦幼、傷殘病的回民集隊出村，以求生存。出村的群眾馬上被分住幾個小集中營辦學習班，頭頭們銀鐐入獄。入夜，突圍轉移未成，在川方寨發生遭遇戰，傷亡慘重，馬伯華腳被手榴彈炸傷，只好撤回金雞寨。

8月1、2日這兩晝兩夜中，金雞寨、川方寨兩村的房屋據點爭奪戰從未間斷。一方是擁有現代化武器裝備，一方僅憑精神；一方是訓練有素的武裝人員，一方是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怎樣拚呀！在炮火硝煙迷漫中，在血洗之後，老沙甸與川方寨已沒有抵抗力量了。

8月3日，金雞寨已被進攻人員控制一半左右，爭奪、拼搏仍在進行。炮火依然未斷。在已被進攻人員控制的地段，殘酷的“清剿”在繼續，傷殘的“回匪俘虜”被提著腳手，象丟死羊一樣丟上汽車，運去“醫治”，而有的乾脆在現場補槍，來個“快性”。

8月4日，157名男女老幼回族群眾舉著雙手，集隊從金雞寨南面出村，指望求生。當走到大田埂上的時候，幾挺機槍一齊開火，一分鐘之後，屍橫遍地，血流成渠，隨即驗屍，未亡者進行補槍。現有五名倖存者以為鐵證，其中三名是

補槍也未補死的。

下午六時許，炮火摧毀了金雞寨南面幾間僅存的小民房，馬伯華等同志壯烈殉難。當大部份村民都躲進地窖、地道時，竟用大炮、火箭筒將村莊化為廢墟、夷為平地。

入夜，又進行了最後的“清剿”，戰鬥始告結束。

這七天八夜，不知耗費了多少彈藥。被摧毀的民房 4400 多間，被奪去生命的沙甸回民 9 百人，傷殘 6 百餘人，進剿者死傷人數不得而知。以參加“沙甸叛亂”的罪名遭到同樣武裝鎮壓的還有開遠縣的新寨、硯山縣的車白泥、田心茂龍、松毛坡、文山的茂克等。整個事件中回民共死亡 1600 餘人。

1979 年 2 月，中共雲南省委、昆明軍區黨委聯發了（79）7 號檔，即“關於沙甸事件的平反通知”。檔指出：“一九六八年以來，由於潭甫仁、周興推行林彪、‘四人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大搞以人劃線、層層站隊，支一派、壓一派，嚴重分裂了各族幹部群眾，甚至採取了侮辱回民群眾的錯誤做法，傷害了民族感情，破壞了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破壞了民族團結，引起了沙甸等地回族群眾的強烈不滿。問題發生後，1974 年 5 月，中央作了正確指示，要周興親自處理，落實政策，周興卻堅持錯誤、採取一系列激化矛盾的錯誤做法，釀成了 1975 年 7 月沙甸事件，造成了嚴重後果。因此，沙甸事件並不是反革命叛亂，採取軍事解決是錯誤的。經黨中央批准，原定（以沙甸為中心的反革命武裝叛亂）的結論應予撤銷，這個事件中涉及的廣大回族幹部群眾應予平反。”

中共雲南省委民族工作部同時發了（79）1 號檔。即“關於處理沙甸事件遺留問題的通知”。國家補助修建了七所清真寺。落實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1980 年 7 月，省委民族工作部又發了（80）142 號文件，即“關於沙甸事件

平反善後經費的若干補充意見”。按照檔精神，紅河州委、個舊市委處理了孤老、孤兒、半孤兒以及死難家屬的撫恤救濟問題、傷殘人員的醫療補助問題。全民所有制單位招收了二百名符合招工條件的孤兒及受害家屬子女；沙甸劃為經濟作物區，吃國家返銷糧。

1987年8月，針對雲南省委、昆明軍區黨委聯發（79）7號文件第3條留下的尾巴，雲南省委發了（87）31號檔，即《關於撤銷中共雲南省委、中共昆明軍區委員會聯發（1979）7號檔中個別結論的通知》。（87）31號檔指出：“……實踐證明，這個檔（指79）7號檔）總的是正確的。在貫徹執行過程中，也發現檔第三條中關於“馬伯華、馬開志、鄭全書、馬紹美等幾個人對抗中央指示，使矛盾激化，是有錯誤的。特別是他們成立非法秘密組織，妄圖背叛祖國，搞打砸搶造成流血事件，破壞民族團結，是有確鑿罪行的。但考慮到歷史原因，馬伯華、鄭全書、馬紹美可以不作為反革命分子對待”。這一結論不確，經過反復查證，其結果是：一、關於“非法秘密組織”，是指“罕指奔位協”，它是在“文化大革命”不正常的歷史條件下，少數人搞起來的一個宗教性組織，不應作為罪行。二、關於“妄圖背叛祖國”問題，查無實據。所謂背叛祖國的罪行不能成立，應予否定。三、關於打砸搶問題，確實是存在的，打砸搶是錯誤的。鑒於“沙甸事件”這一特殊情況，不再追究。據此，經請示中央同意，將聯發（79）7號檔第三條結論，予以撤銷”。

此外，雲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評審四類分子”，刑訊逼供，在批鬥會上被打死和用刀子捅死的達6人，被迫自殺10人。四川涼山彝族區1956年“民主改革”後，黑彝阿侯（奴隸主）交出一切財產，僅留一點土地和牲口維生。文革時，阿侯還被視為奴隸主。副縣長批准區革委會主任帶領紅衛兵將所有的阿侯

及其家屬全部槍殺。只有一個阿侯家臥在血泊中的兒媳婦身下吮吸乳頭的嬰兒，被一當年的女奴救起，躲往另一部落而倖存。區革委會主任殺人有功，升任副縣長。新疆維吾爾地區 1949 年國民黨的統計維吾爾人是 4 百萬，到了 1951 年中共的人口統計是 3 百萬(這些人是被王震所殺)。到了 1952 年，為掩人耳目，又統計為 4 百萬。自 1990 年到 2000 年，被中共處決以及迫害死於獄中的維族人等有 700 多人，被中共關押、收審的人數達 56 萬人。

第 145 節 割喉與生摘犯人器官

更有慘絕人寰的事例：張志新僅因寫反毛澤東的日記，先讓看管她的四名公安輪奸；獄警多次毫無人性地將她衣服扒光，把手反銬在背後，投進男犯人牢房，任人輪奸，終至精神失常。1975 年 4 月 4 日被劊子手們慘無人地道割了喉管的，以免她喊話，然後才槍斃。

《槍口，對準了中國的良心》—— 熊光炯

一枝‘無產階級專政’牌號的槍，對準了一個女共產黨員的胸口！……

中國的良心啊，豈能忍受這種奇恥大辱，清明雨，洗不淨不清明的時候——

野心取代了良心，獸性代替了人性，權力槍斃了法律，暴政絞殺了自由……

1935 年秋趙一曼任東北抗日聯軍第 3 軍第 2 團政治委員。是年 11 月，她掩護部隊突圍，身負重傷；後被日軍俘獲。1936 年 8 月，被殺害，時年 31 歲。趙一曼女士慷慨赴死時，尚能高唱《紅旗歌》、能夠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號。

比較趙一曼和張志新，一個臨行前高歌猛進、口號喊得山響，一個喉管被割、悲憤無言、默默死去。日軍沒有割趙一曼女士的喉管，反倒是中國人割了自己同

族的喉管！一個眼看就要被殺死的人，讓她說幾句話，留下幾句遺言，這最起碼的人道、這最後的言論自由也剝奪了，如此滅絕人性，豈不是連日寇都不如？割喉管實質上是割一個人的言論自由。

行刑前割喉的犯人，張志新不是第一個。曾用鐵絲勒住犯人的舌頭和嘴巴，史東生是用針線縫了嘴唇再槍斃的。後來一位醫生發明了割氣管的方法，張志新是第 41 個被割喉的。

1970 年，18 歲的中學生黎蓮所遭遇到的行刑方式更加慘無人道。“那是一個黑雲低垂、大雨滂沱的日子。為了避免劫刑場，黎蓮被秘密拖到另一城市執刑。囚車快到另一城市時，一輛救護車跟了上來。剛貼近，兩輛車都停了。兩名穿白大褂的人跳下救護車，匆匆爬上了囚車。囚車裡，四個人高馬大的武裝員警一下將黎蓮扳轉身，臉和身子緊貼車壁上。衣被往上一擡，來不及使用麻醉藥，一把鋒光閃閃的手術刀就在她的右腰處劃開了一個巴掌大的口子。……一個滴著殷紅鮮血的腎，潑刺刺地落在潔白的瓷盤上。……來不及縫合，也沒有想到要給一個十幾分鐘後就得跌撲在黃土泥漿上的犯人作縫合……那血，如汨汨的小溪，無聲地從紗布、藥棉裡滲透出來，從她的上衣裡滲透出來，染紅了囚車的甲板……”

而在一家醫院的手術室裡，一個奄奄一息的“革命幹部”正在等著種植這顆從血泊中掠奪來的腎（引文出自《黎蓮》，見金石開編著《歷史的代價——文革死亡檔案》中國大地出版社 1993 年版）。獸醫給豬和牛做手術，都仁愛地為豬或牛的刀口抹上一些香油用以消毒。可中國的法院、中國的公安局、中國的軍醫，當他們聯合起來以國家的名義處置囚徒時，卻既不屑於打麻藥，也不屑於抹一絲香油。如此殘酷的真實，如此真實的殘酷！這一刀紮下去，使五千年中國文明立時成了一個謊言。整個中國歷史必須以這個細節為切入口重新改寫。

看看國民黨槍斃人的情形：第二天清晨，瞿秋白起床後，自己換上洗淨的黑短褂、白中褲、黑襪、黑布鞋。梳洗後，坐在桌前，點上煙，喝著茶，翻閱著唐詩，寫下“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的絕命詩。整 8 時，36 師特務連連長廖祥光進屋說：“恭賀瞿先生，今天是個好日子。”接著出示了蔣介石的“槍決令”。瞿秋白沒停筆，把詩寫完，附上跋後，起身跟著廖祥光步行到長汀中山公園拍照。瞿秋白信步行至八角亭前，已見亭中放著酒菜四碟，白酒一瓶。瞿秋白獨坐其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酒喝到一半，瞿秋白說：“人之工餘，為小快樂；夜間安眠，為大快樂；辭世長逝，為真快樂。”酒喝完，他緩步走出中山公園，手執香煙，神色自若，沿途用俄語唱著他翻譯的《國際歌》和《紅軍歌》。到了羅漢嶺下，他找了塊空地北面盤足坐下，回頭看了看行刑者說：“此地甚好。”接著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共產主義萬歲！”從容就義。其實，瞿秋白死於中共“借刀殺人”。

1969 年江西青年女工李九蓮因為同情劉少奇、反對林彪而入獄。12 名曾為李九蓮辯護過的幹部群眾，同時被判以重刑……”李九蓮憤怒地喊道“就是我有錯誤，也是認識上的錯誤，你們為什麼要殺我？”她拒絕在死刑判決書上簽字。臨刑前，她在一片手紙上寫道：“我向冰冷的鐵牆咳一聲，還能聽到一聲回音，而向活人呼喚千萬遍，恰似呼喚一個死人！”為什麼沒有一聲回音？難道活人都死了嗎？不，沒有死，死的只是良知和靈魂。

1977 年 12 月 14 日上午，在贛州市體育場召開 3 萬人的公判大會。李九蓮身穿黑色囚衣，腳戴鐐銬，五花大綁，被插長牌“現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蓮”，被按跪在主席臺上，她的嘴巴裡塞著一塊竹筒，以防她喊反動口號。遊街後，李九蓮被押到西郊通天岩刑場。讓她跪下，她死活不跪，劊子手懶得動手，一槍擊中

其腿，才把李九蓮打成跪下的姿勢，槍殺於兩棵小松樹之間，享年 31 歲。她的死相很慘苦，鼻孔流著二縷黑血，半張開的嘴巴也躺著血，雙眼微睜，眉頭緊皺……李九蓮極刑後曝屍荒野數日，除了一群蟻虻在這具屍體亂爬亂鑽外，沒有人理會這具血肉模糊的殘骸。最後有一個人對這具開始發臭的屍體產生興趣，是贛南機械廠的退休老工人何康賢，他姦污屍體後割去了雙乳和陰部。

李九蓮的同案殉難者鐘海源的遭遇更令人髮指。她在被打斷小腿骨的情況下，居然站了起來，拖著沉重的鐐銬，在監獄的牆上寫下了“打倒華國鋒！”的口號。

1978 年 4 月 30 日，鐘海源也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罪名就是“惡毒攻擊華主席”。與李九蓮不同，鐘海源聽完死刑判決後，毫不猶豫地簽了名，然後把筆一甩，扭頭就走。法院的人喝住她，問她有什麼後事要交代？她平靜地說“跟你們講話白費勁，我們信仰不同。”昂首離去。看守們暗暗咋舌。

鐘海源被五花大綁，先在監獄裡批鬥，又是揪頭髮，彎腰低頭，接著掛大牌子遊街，又是背後插一個斬牌，又是用繩子勒住喉嚨，又是一長串威風凜凜的車隊……那場面遠遠勝過北洋軍閥、國民黨、日本侵略兵殺人時的排場！

南昌九十二野戰醫院住著一位飛行員，高幹子弟，患腎功能衰竭，急需移植腎，且必須從活體上取。據說，女腎比男腎好，尤其是年輕女人的腎更好……醫院通過部隊領導轉告行刑的一位副營長，不能一槍打死，要留活體取腎。

為了保護好她的腎，遊街時，一個頭戴白口罩的軍人示意押解人員按住她，從後面給鐘海源左右肋下個打了一針。那針頭又長又粗，金屬針管，可能是給大牲畜用的，直紮進她的腎臟……竟然連衣服也不脫，隔著短大衣就捅進去，鐘海源嘴被堵住，全身劇烈地顫抖。

到了刑場，架到指定地點，副營長故意朝她右背打了一槍，然後由早已等候

在那的幾個醫務人員，把她迅速抬進附近一輛篷布軍車，在臨時搭起的手術臺上活著剖取鐘海源的腎，一縷縷鮮血溢滿了車廂底版，滴滴嗒嗒濺落在地上。也許是車廂裡太滑，一位軍醫用拖把來回擦著底版上的血，之後又擠進一個塑膠桶裡，幾次之後，竟盛滿了半桶血。

中國人一判了死刑，這個人就不再是人，好象就成了實驗室的青蛙，老鼠，她的腎也和鐵礦一樣，屬於國家所有，國家可以自由支配。鐘海源的遺體沒有暴棄荒郊野外，而是被九十二野戰醫院拉走，供醫生們作解剖標本。

某高幹患有嚴重的眼病，想做器官移植手術，換一雙年青健康的好眼。於是，公安局就把一個打成“反革命”的小夥子處以死刑。最殘酷的是，為了確保被移植的眼睛鮮活，執刑者和醫生一道，竟先動手挖出小夥子的雙眼，然後再把“犯人”槍斃。

第 146 節 林彪之死

1968 年 10 月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的新黨章草案明確寫上了“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1969 年九大通過的新的黨章明確提到“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林彪成了中共法定的二號人物。林彪委託陳伯達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被毛推翻，因為林和陳伯達主張要發展生產力。毛改由康生、張春橋再起草而後通過。毛一味地主張階級鬥爭，對張春橋越來越青睞，甚至要選張春橋做接班人。一次，張春橋隨同毛澤東在蘇州和林彪談話。毛澤東問林彪：我年紀大了，你身體也不好，以後準備把班交給誰？見林彪不吭聲，毛又追問：你看小張（指張春橋）怎麼樣？”而林彪並不滿意張春橋。

起初並不明朗的分歧，在 1970 年 8 月 23 日於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上再次凸顯。在會上，陳伯達首先發言，大談天才論，批駁張春橋反對說毛澤東是天才的說法；陳稱讚毛的偉大、英明，要毛當國家主席。5 月份，毛曾讓汪東興向政治局傳達的指示是，建議不設國家主席，如設國家主席，反正我不當，可讓林彪當。林馬上打電話給毛秘書，“林副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當時高層討論的是誰當的問題。汪東興在 9 屆 2 中全會小組會上發言，堅決支持毛任國家主席，暗指張春橋反對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一時間，參加會議的人紛紛聲討張春橋，連陳毅元帥和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等都“義憤填膺”，喊打聲一片。用康生後來的話說就是：“吳法憲造謠，汪東興點火，陳伯達起哄，陳毅跳出來”；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惟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使地球停轉之勢”。張春橋、姚文元很孤立，竟跑到毛處，跪下抱住毛大腿，哭濕了毛的褲子，求毛支持。8 月 25 號下午，毛怒氣衝衝地說：“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誰堅持設，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他還沖著林彪說：“我勸你也不要當國家主席！”他說出重話：“你們再繼續這樣搞下去，我就下山，讓你們去鬧。再不然，就辭掉黨中央的主席！”設不設國家主席老毛從沒給過定論，不過是釣餌。毛後來說林彪想當國家主席，要“搶班奪權”，未免牽強附會。一個副帥，當個禮儀性的國家主席會奪誰的權？這是毛的欲加之罪。8 月 31 日毛指示全會開始批陳伯達。

廬山會議的結果是：設國家主席免談，陳伯達失去了政治局常委的職務。為了把問題弄成敵我矛盾，毛澤東不惜給曾經長期擔任自己政治秘書，自己親自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加上莫須有的罪名，說“陳伯達早期就是一個國民黨分子，混入黨內以後，又在 1931 年被捕叛變，成了特務，一貫跟隨王明、劉少奇反共”；是“劉少奇式的假馬克思主義者和政治騙子”。毛澤東、康生指

吳法憲等人搞“軍事俱樂部”。

9月7日參加廬山會議的代表們陸續下了山，但是毛對軍委辦事組並未放鬆追查。周恩來與康生奉毛澤東指示在9月9-12日兩次召集黃吳李邱談話，繼續追查廬山上的問題。

毛澤東“甩石頭、摻沙子、挖牆腳”。毛在廬山會議上曾急招黃永勝上山，意圖拉黃反戈一擊，但是黃永勝不為所動，毛大為失望。11月13日毛澤東批黃說“廬山會議發難，你黃永勝是個頭。你們辦事組一統天下，我要打破你們的一統天下。我現在要謝富治、紀登奎參加你們辦事組。”其後的華北會議上毛又一舉打倒了北京軍區司令鄭維山和中共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此二人成為廬山會議後第一批倒臺的中央高級幹部。

1970年10月8日，毛澤東給林彪寫了一封信，告訴他：“秋風又起，保重身體。”林彪12日覆信說：“我深感不適宜為主席的接班人，請主席酌定，我完全擁護主席的決定。”這相當於是變相認錯。儘管毛回復說：“此議不妥，你我在路線上、在大是大非的鬥爭中基本還是一致的”，但是從毛後來對林彪步步緊逼的行動來看，毛澤東並沒有接受林彪的讓步。就是在這個月，毛澤東得了一場肺炎。據毛的保健醫生李志綏的回憶，毛把周恩來派來的醫生認定是林彪派來的，是林彪想加害於他，說“林彪大概希望我的肺爛了”。1970年12月毛在同美國記者愛德格·斯諾談話時針對林彪對他個人崇拜的“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這“四個偉大”說：“什麼四個偉大，討厭！”幾乎是公開表達對林的不滿。並由此設下陰謀倒林的圈套，周也再次充當了毛的幫兇。

1971年1月召開的軍委擴大會原本是部署當年的軍事工作，但毛卻在簡報上批示“請告各地同志，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時，重點在批陳，其次才是整風。不

要學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更不要學華北前期，批陳不痛不癢，如李、鄭主持時期那樣。”此時的陳伯達早已是死老虎，被送進了秦城監獄。毛澤東的用意很明顯，就是要壓軍委辦事組公開檢討。軍委辦事組諸人只好再次召集已散會回家的軍隊幹部連夜開會作檢討。

軍委擴大會上，林彪並未露面。幾個老帥如朱德、聶榮臻、李先念等都沒有批軍委辦事組。軍政委王輝球和副司令王秉璋揭發了吳法憲在廬山上串聯搞批張，引起轟動，吳法憲受到圍攻。黃永勝當即電告葉群，當晚林彪和葉群從北戴河趕回北京。廬山會議後，林彪的態度就是不講話，不作檢討，周恩來曾對吳說“林副主席要是以講話的形式檢討幾句就好了。”總的來看，廬山會議後，軍委辦事組被毛澤東窮追猛打。林彪和軍委辦事組基本上是處於檢討之中等待被打倒的過程中，他們的倒臺僅僅是個時間的問題。

按官方的說法：1971年2月，林彪授意林立果“先搞個計畫”，提醒他要“懂得武裝鬥爭的重要性，……我們不能束手待斃。”1971年3月21日，林立果、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在上海秘密所站密謀。他們研究了林彪的“接班”問題，認為有三種可能：一是林彪“和平接班”。周宇馳說，五六年就差不多了，甚至可能更短。林立果說，五六年還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變化就很大，很難說“首長”的地位還一定能保得住。當然和平過渡的辦法最好。二是林彪“被人搶班”。周宇馳認為一下不可能，最起碼三年以後。林立果認為，很難說，主席威信高，他要誰倒還不是一句話，“首長”隨時都可能被趕下臺。三是林彪“提前搶班”。可有兩個辦法：把張春橋一夥搞掉，保持“首長”地位不變，再和平過渡；直接謀害毛澤東，但毛澤東影響大、威信高，以後政治上不好收拾，盡可能不這樣幹。他們商定：爭取“和平過渡”，做好“武裝起義”的準備。先

做兩件事：寫個計畫和讓空四軍組建一個“教導隊”。林立果確定計劃名稱為“武裝起義”諧音的“571工程”計畫。

林立果1967年初進空軍黨委辦公室任秘書。1969年10月林立果為空軍黨辦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1970年林立果在空軍基層蹲點後，搞了兩個調查報告，提出有關空軍建設的十個問題，建議研製垂直起降的飛機和短距離起降的飛機。這兩個報告得到毛澤東與林彪的同意後，空軍黨委還作了專門的討論。林立果在廣州空軍搞了一個“空九師飛行訓練安全經驗總結”，吳法憲覺得有說服力，於是上報總參。這個材料還得到毛澤東、林彪批准下發，並在空九師開了一個現場會。林立果在文革期間沒有參加任何造反活動，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毛澤東的子女們，如李敏、李訥、毛遠新都是響噹噹的造反派，通過造反奪權運動一步登天。林立果在空軍搞了一些科研活動，尤其是林立果注重對外國軍事實力的研究，通過調研小組的工作，林立果搞了一些發明創造。這些都不是坐吃乾飯就可搞出來的東西，而是要腳踏實地作研究的結果。“913事件”後所揭露出的林立果“罪行”，無非就是林立果在廣州、上海和北京等地的所謂“據點”的“罪證”，不過就是一些攝影、錄音器材，有些還是林立果搞科研成果，此外還有“水陸兩用汽車”，也是林立果的科研成果之一。至於指責林立果要搞政變殺毛一事，最多不過就是一個“荊軻刺秦王”的室內設想而已。

林立果不是皇帝，用“選妃”來比喻，並不恰當。他不過就是要找一個物件，而且是在母親葉群的主導下。最後，林立果找到一個叫做“張甯”的女士為伴，他真誠地對待張寧，與普通人的戀情沒什麼不同。張寧本人寫書（《塵劫》），證明了這一點。在那樣一個血雨腥風的年代，那麼多人對毛澤東狂熱盲從，林立果不僅從中覺悟，還萌生刺殺暴君의勇敢念頭，何其難能可貴？僅此一點，林立果

堪稱當代英雄。其勇敢精神，可以與荊軻刺秦、施道芬格謀刺希特勒，相提並論。

林立果代表了那個時代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一群年輕人。其中，可能多多少少有林彪的人格影響，但林立果的思想和境界，超越了他的父親林彪。

1971年4月15日，中共召開批陳整風彙報會。開會之前，毛希望林彪出席並且講話，林彪拒絕從命。毛大為光火，借著黃吳李邱發洩他對林彪的不滿，對他們說：“你們已經到了懸崖的邊沿了！是跳下去，還是推下去、還是拉回來的問題。能不能拉回來全看你們自己了。”1971年“五一”節晚上，毛按慣例登上天安門觀看廣場上的慶祝活動。林彪不想參加，後來在葉群的哭訴哀求之下，林彪才勉強前往呆了五分鐘，而且自始至終沒和坐在同一張桌子上的毛講一句話，就竟自離去。同年6月，羅馬尼亞共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訪問中國，毛堅持要林彪陪同接見，林彪勉強出席，但是賓主剛剛寒暄完，林彪便退到外面，直到會見結束。不過，林彪在此期間也想單獨面見毛澤東，緩和關係。他和葉群幾次打電話求見毛澤東，但是毛澤東避而不見。林彪不得不求助於他討厭的江青，甚至跑到釣魚臺為江青做模特，拍下一張後來刊登在《解放軍畫報》上的讀“毛選”的照片。但是仍然沒能見到毛澤東。

8月，曾擔任過毛機要員的清華大學革委會副主任謝靜宜向毛轉達了她丈夫從空軍黨委辦公室傳來的消息，說林立果在空軍成立了秘密組織，包括“聯合艦隊”、“上海小組”和“教導隊”，在做武裝奪權的準備。這時，毛覺得有條件解決林彪問題了。8月15日毛澤東乘坐自己的專列從北京出發，前往南方巡視，他把自己的真實意圖告訴了周恩來，就是要解決林彪的問題，穩住他認為有可能跟著林彪走的部隊。在南巡期間，毛特別接見了林彪親自提拔和安排的武漢軍區政委劉豐和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還有後來被定為林彪死黨的空五軍政委王維國

和江西省軍區政委程世清等人，同他們大談黨內“第十次路線鬥爭”。

毛說：“這次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不徹底，還沒有總結。”“有人看我年紀老了，快要上天了，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黑手不止陳伯達一個，還有黑手。”毛澤東還專門和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談話說，“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有作個人結論，”他同時又說：“他當然要負一些責任。”他還說：“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為首的改也難。歷史上，陳獨秀改了沒有？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濤、高崗、饒漱石改了沒有？沒有改。”

毛澤東9月10日批復周恩來有關中共九屆三中全會準備工作的信件時就說要“補選常委”，顯示在林彪被打倒之前毛已經做好了換人的準備。

9月6日，林立果的副手周宇馳和海軍政委李作鵬分別把毛的南巡講話的內容報告給林彪和葉群。據說，林彪聽到毛的講話內容後，表示“不想活了”，做好了挨整的準備。但林立果卻不想坐以待斃，準備動用自己的“聯合艦隊”與毛拼一個魚死網破，或者讓林彪到廣州另立中央，與毛分庭抗禮。接下來，根據中國官方的說法，林立果在9月7日向“聯合艦隊”下達了一級戰備命令。9月8日，林彪發出“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的武裝政變的手令。林彪、林立果及其同夥隨後進行了一連串的秘密行動，包括炸鐵路橋和襲擊毛的專列，企圖在毛澤東南巡途中刺殺他和中共上層領導人等等。不過，很多文革研究人員認為，官方的說法並不足以使人信服，這一段史實至今仍然是撲朔迷離。

實際上，毛澤東早在9月3日到杭州之後就開始了反常的行蹤，直接指揮自己的專列作出了各種和過去慣例不一致的做法，最後神不知、鬼不覺地提前返回北京。進北京之前，毛澤東先在郊外的豐台和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軍區第三

政委紀登奎、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和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談話，隨後命令李德生調動 38 軍的一個師到北京西北面的南口待命，然後於 12 日下午四點零五分回到北京。儘管毛澤東提前回到北京一事只有幾個人知道，連坐鎮北京的周恩來都被蒙在鼓裡，但是林立果和葉群在毛澤東的專列還在豐台的時候就得到了消息。他們可能以為毛澤東發現了他們什麼秘密，因此十分驚慌。

當天晚上 7 點多，林立果乘坐 256 號三叉戟飛機從北京飛到山海關，連夜抵達距離山海關機場 40 分鐘車程的北戴河。林彪的女兒林立衡偷聽到林彪、葉群和林立果商量出走的事，出於對父親的愛護，於晚上 10 點通過林彪住處的 8341 警衛部隊向汪東興報告說，林立果和葉群想把林彪綁架走。聽到消息，中央警衛團立即進入一級戰備狀態。在中南海和釣魚臺增加崗哨，挖掘工事，設置路障，並且在要道口上架起了機槍，如臨大敵一般。晚上 11 點半，周恩來打電話給葉群，尋問 256 號專機的情況，並且表示要到北戴河去看林彪。已經如驚弓之鳥的林彪一家以為周恩來要來抓他們，即刻驅車前往山海關機場。

有學者研究認為，是毛有意害死了林彪。林彪登機前後有許多疑點。比如加油車為何沒有給飛機加上足夠的油；加油車為何在周已控制機場的情況下，還在準備給飛機加油？為什麼飛機爆炸後顯示右側機翼有人為放置炸彈的可能？為什麼在林彪登上飛機後要設置“禁空令”？根據中共披露的資料，1971 年 9 月 13 日 0 點 32 分，林彪等人乘坐的 256 號飛機從山海關機場起飛，先向西飛，然後調頭北飛，又沿著中蒙邊境飛了一段時間，然後進入蒙古國，飛往蘇蒙邊境，後又折回，往中國邊境方向飛來，途中因燃料不夠，迫降蒙古溫都爾汗失敗，於 2 點 25 分左右在蒙古的溫都爾汗附近墜毀，機上 8 男 1 女全部喪生。

“九一三事件”後，軍隊有 1000 多名軍以上的將領受到清洗和牽連，包括

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和第一副司令員溫玉成、福州軍區政委周赤萍、武漢軍區政委劉豐、新疆軍區司令員龍書金和江西省軍區政委程世清等等。有人說，因林彪案受到株連的人達到 30 萬人。

1971 年 12 月，毛受林彪事件的刺激重病一場，周恩來聞迅即去探視。當毛的眼睛慢慢睜開時，周激動地撲到主席床邊，雙手緊握毛的手，滿含著淚水說：“主席，主席，大權還在你的手裡！”此情此景令人感慨：毛對權力迷戀到了何種程度。

1971 年年終由官方正式公佈《“571 工程”紀要》（於新野執筆）

9 屆 2 中後，政局不穩，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尖銳，右派勢力抬頭，軍隊受壓。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幹部實際生活水準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眾叛親離。

一場政治危機正在蘊醞釀，奪權正在進行，對方目標在改變接班人。中國正在進行一場逐漸地和平演變式的政變。這種政變形式是他們慣用手法，他們“故伎重演”。政變正朝著有利於筆桿子，而不利於槍桿子方向發展。

因此，我們要以暴力革命的突變來阻止和平演變式的反革命漸變。反之，如果我們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變，一旦他們得逞，不知有多少人頭落地，中國革命不知要推遲多少年。一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將落在別人手上。我方力量經過幾年準備，在思想上、組織上、軍事上的水準都有相當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質基礎。在全國，只有我們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氣勃勃。革命的領導權落在誰的頭上，未來政權就落在誰的頭上，取得了革命領導權就取得了未來的政權。革命領導權歷史地落在我

們艦隊頭上。和國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們的準備和力量比他們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們比當時蘇維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迴旋餘地大，空軍機動能力強。比較起來，空軍搞五七一比較容易得到全國政權。

兩種可能性：奪取全國政權，割據局面。

必要性、必然性。B-52 好景不長，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幾年內安排後事，對我們不放心。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後發制人，軍事行動上先發制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正在受到嚴重威脅，筆桿子託派集團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馬列主義，為他們私利服務。他們用假革命的詞藻代替馬列主義，用來欺騙和蒙蔽中國人民的思想。當前他們的繼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他們的革命對象實際是中國人民，而首當其衝的是軍隊和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家長制生活。當然，我們不否定他在統一中國的歷史作用，正因為如此，我們革命者在歷史上曾給過他應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現在他濫用中國人民給其信人和地位，歷史地走向反面，實際上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為了向中國人民負責，向中國歷史負責，我們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基本條件、有利條件：國內政治矛盾激化，危機四伏。獨裁者越來越不得人心，統治集團內部很不穩定，爭權奪利、勾心鬥角、幾乎白熱化。軍隊受壓，軍心不穩；高級中上層幹部不服、不滿，並且握有兵權。一小撮秀才仗勢橫行霸道，四面樹敵，頭腦發脹，對自己估計過高。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高級幹部敢怒不敢言。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識份子上山下鄉，等於

變相勞改。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現充當炮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

戰術上時機和手段。B-52 在我手中，敵主力艦均在我手心之中。屬於自投羅網式：利用上層集會一網打盡。先斬局部爪牙，先和 B-52 既成事實，逼迫 B-52 就範，為逼宮形式。利用特種手段如毒氣、細菌武器、轟炸、543、車禍、暗殺、綁架、城市遊擊小分隊。……

動員群眾口號、綱領。全軍指戰員團結起來！全黨團結起來！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個真正屬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對外：全世界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我們對外政策是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承認現有的與各國的外交關係，保護使館人員的安全。

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全軍指戰員團結起來，全黨團結起來。用民富國強代替他“國富”民窮，使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得到真正解放。用真正馬列主義作為我們指導思想，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代替 B-52 的封建專制的社會主義，即社會封建主義。全國工人、農民、機關幹部、各行各業要堅守崗位，努力生產，保護國家財富和檔案，遵守和維護社會秩序。因此，各地區、各單位、各部門之間，不准串聯。全國武裝力量要服從統率部的集中統一指揮，堅決嚴厲鎮壓反革命叛亂和一切反革命破壞活動！……

政策和策略。打著 B-52 旗號打擊 B-52 力量，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緩和群眾的輿論，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解放大多數。集中打擊 B-52 及其一小

撮獨裁者。我們的政策：解放一大片（大多數），保護（團結）一大片……他們所謂打擊一小撮保護大多數，不過是每次集中火力打擊一批，各個擊破。他們今天利用這個打擊那個；明天利用那個打擊這個。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來就是一大批。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統治權術不僅挑動幹部鬥幹部、群眾鬥群眾，而且挑動軍隊鬥軍隊、黨員鬥黨員，是中國武鬥的最大宣導者。他製造矛盾，製造分裂，以達到他們分而治之、各個擊破，鞏固維持他的統治地位的目的。他知道同時向所有人進攻，那就等於自取滅亡，所以他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今天甜言蜜語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他是他的座上賓，明天就成了他階下囚；從幾十年的歷史看，究竟有哪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的人，不被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押的關壓押，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的親身兒子也被他逼瘋。他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象走馬燈式垮臺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羊。過去，對 B-52 宣傳，有的是出於歷史需要；有的照顧全民族統一、團結大局；有的出於抵禦外來侵敵；有的出於他的法西斯的壓力之下；對廣大群眾來說，主要是有的是不瞭解他的內情。對於這些同志，我們都給予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予以諒解和保護。對過去 B-52 以莫須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給於（予）政治上的解放。

注：B-52 指毛澤東，敵主力艦指當時的中央負責同志。

事實上，毛澤東在中國的統治與史達林在蘇聯的統治，是沒有什麼本質區別的，其根本特點，一是專制獨裁，而且這種專制獨裁是有著列寧所提供的充分理

論根據的；二是打著社會主義招牌，並且以社會主義名義犯下無數罪行。鄧小平在批評毛澤東的錯誤時，多次提到“封建主義性質的東西”。可見，《紀要》對毛澤東政權性質的認定是很準確的，是有先見之明的。《紀要》要對歷次運動中受到打擊的人“一律給予政治上的解放”。可見林彪對毛搞的歷次政治運動是不贊成的。《紀要》在經濟上提出用“民富國強”去代替毛澤東的“‘國富’民窮”。這是林彪富民富國的經濟綱領。林彪曾對“大躍進”持反對態度。

有人說：林彪事件也非叛逃事件，而是周恩來精心策劃的暗殺事件。林彪並非出逃，而是被周恩來借機騙上飛機，由周恩來的特工人員作飛行員執行所謂的特殊任務，最後被中共的戰鬥機擊落，墜落于蒙古溫都爾汗，偽裝成空難事故，最後的政治定性是林彪叛逃，變成反革命集團，隨後的周恩來機器迅速啟動，許多的誣陷林彪的偽造資料在周恩來的精心設計下新鮮出爐。今天國人見到的林彪事件實際上就是毛澤東企圖廢林彪、周恩來設計殺林彪全家，毛澤東定性林彪企圖搶班奪權、周恩來偽造證據的所謂林彪事件。

葉劍英說過，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萬人，受波及遭殃者達 6 億人。僅雲南、內蒙古少數民族地區就有 727,000 名幹部遭到迫害；其中有 34000 人被迫害致死。浪費了 8 千億人民幣（見《交鋒》第 10 頁）。這些數字難道不可怕嗎？《白毛女》的廣告中有一個警句：“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可毛澤東發動的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又把鬼變成了人；特別是“文革”中，不計其數的無辜者在一夜之間變成了“牛鬼蛇神”。文革不僅是生命的損失，最大的損失是對人性的摧殘和對高貴品德的摧殘。令人遺憾的是，似乎除了“四人幫”外，其它所有的中國人都成了受害者。如果不認真追究“文革”的根源，就不能甩脫這一沉重的道德包袱，重建民族自信。昨天，毛可以將千百萬條生命作犧牲品而

不受譴責，今天，商人就敢制假售假謀財害命。因此，必須徹底否定文革。

毛曾多次說，“我一生只做過兩件事，一是打倒蔣介石，二是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如果把毛發動文革徹底否定了，就等於否定了半個毛澤東，那就不是“三七開”，而是“五五開”了！中國大陸對歷史的反思，已把“打倒蔣介石”到底對不對的疑問，擺到了共黨的面前。如果打蔣被否了，那毛就是“十、零”開，就“只有罪行，沒有功勞”了。

毛澤東自 1949 年奪到政權以來，發動過一系列政治運動或政治兼經濟運動，如鎮壓反革命、土改、三反五反、打老虎、三大改造、合作化、反右、人民公社、大躍進、反右傾、小四清、大四清、文化大革命等。這些大大小小的運動，把茫茫九州大地上的幾億人民象捏泥人一樣地折騰、玩弄、侮辱、踐踏，可謂無所不用其極。毛澤東的權力巨大。那麼，是誰賦予毛澤東那樣大的權力呢？“文化大革命”中，毛曾經大言不慚地說：“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工人階級給的，是占人口 95% 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試問：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授予毛澤東如此大的權力？是契約合同，還是投票選舉？這兩者都不是。那麼，毛的權力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也不是。因為毛澤東是無神論者，根本不相信天命，他的權力就不是上天所授。那麼，毛的權力究竟是從哪裡來的呢？平心而論，毛澤東的說法還是有些真實性的，他那廣大無邊的權力確實“是工人階級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但是，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都沒有用契約合同和投票選舉的方式授予毛以權力，那毛又是如何獲得來自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的權力的呢？這就關係到專制政治的秘密——專制權力是怎麼形成的問題。

林彪說：“政權就是鎮壓之權。”毛澤東用槍桿子奪得天下後，進一步用槍

桿子威懾、彈壓天下。這個威懾、彈壓的物件包括工人階級、農民、商人、知識份子在内的所有社會成員。毛澤東利用他的爪牙機構各級黨委、政府、政法委、公檢法、軍隊、保衛部門、秘密員警，用階級鬥爭為武器，發動一場又一場運動，目的在於：

1、肉體上不斷、反復地消滅“反動階級”，製造恐怖，不但使“反動階級”的力量受到削弱，而且收到震懾所有社會成員的效果。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引用了伊斯門（1883-1969）的話說：“史達林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壞，更殘酷無情、野蠻、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無可救藥。”胡績偉說：“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比法西斯主義更壞，比史達林主義更殘酷無情、野蠻、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無可救藥。”

王若水李慎之說，1949年後，世界上最革命的理論與最專制的傳統相結合，使中國形成了最黑暗的毛澤東三十年的統治，毛的專制超過了史達林。方毅說：毛澤東是一個暴君；毛澤東所作的惡，比秦皇以來 2200 年的“歷史總惡”還多。毛自詡秦始皇加馬克思，他以霸道和對人民專政為己任，毛一輩子都是殺人整人。他不斷地以殺人來取樂，以整人尋開心；不殺人不整人，他就得不到快樂。他的敵人、朋友，自己人、共和國主席，自己的救命恩人，全都是他取樂的物件。他對戰爭、對血腥、對殺戮有著天然的親和力，他在講話中多次說：“武鬥有兩個好處，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戰經驗，第二個好處是暴露了壞人。……再鬥十年，地球照樣轉動，天也不會掉下來”。“我才不怕打，一聽打仗我就高興，北京算什麼打？無非冷兵器，開了幾槍。四川才算打，雙方都有幾萬人，有槍有炮，聽說還有無線電”（1968年7月28日召見首都紅代會負責人的談話）。“去搞階級鬥爭，那是大學，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什麼‘北大’、‘人大’，還是那個大學好！

我就是綠林大學的，在那裡學了點東西”（1964年8月18日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們開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們不怕死。有一個時期軍隊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贊成”（1964年12月2日中央工作座談會紀要）。他雙手沾滿中國人民的鮮血。僅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後就餓死5千萬人。餓死人與殺死人有什麼區別？如果毛澤東不邪惡，還有誰邪惡？如果毛澤東不是魔鬼，那還有誰是魔鬼？大陸某些文人用馬屁語言，把他胡做非為說成是詩人的浪漫、是理想主義的試驗家。真是人性喪盡的胡說。毛用“一小撮”的辦法，把人民分為三六九等，幾千一批、幾萬一批、幾百萬一批，直到文化大革命幾億人全都掉進了毛的絞肉機裡，這時他仍然說是一小撮。他使暫時不被整的人自以為是站在人民大眾的大多數一邊，而心甘樂意地去替毛擔任打手、吹鼓手等等角色。

毛澤東的秘書李銳先生說：“毛澤東建國有功，治國有罪。”這個說法仍然是錯誤的。毛澤東的建國不是功，而是罪。不僅是罪，而且是罪大惡極。對毛澤東必須“十、零”開，就是“只有罪行，沒有功勞”了，已經遺臭萬年了。1949年之前，中國並不是沒有國，也不是沒有政府。毛澤東的革命實質是武裝叛亂。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中展示出來的毛澤東，是一個心胸狹隘、心機陰狠、手段毒辣、語言粗暴的獨裁者。

在整個人類歷史上，如果以殺人數量排名的話，毛澤東當之無愧地超越希特勒、史達林和日本天皇而排名第一。希特勒、日本帝國主義與毛澤東的罪惡比，差得太遠。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日寇攻陷，瘋狂的倭人進城後，對無辜居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進行了長達兩個月的大屠殺。據不完全統計，集體屠殺中國軍民19萬餘人，零散殺害居民僅收埋的屍體就達15萬多具。日寇在南京

大屠殺中，兩個月殺害 34 萬人，每個月平均殺害 17 萬人。毛在掌政期間，27 年殺害 8 千萬人，每個月平均殺害 24 萬 6914 人；毛每個月比日寇多殺害 76914 人。這是因為，漢奸毛除了是我們民族的敵人，還是製造階級的兇手（村村見血，紅色恐怖萬歲），比日寇多了一層殺人需要。毛不愧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漢奸。他 27 年暴政，充分延長了南京大屠殺，執行了日寇想做而沒有做到的獸行，更徹底、更大規模、更長時間地進行了“三光政策”。例如，日寇搶走霸佔了中國人的許多財產，毛則搶走霸佔了中國人的全部財產。日本人推行奴化教育，毛則嫌奴化還不夠，干脆關閉了全部學校，其中大學被關閉到他死，這僅僅因為他自己考不上大學，只能在大學裡短期看管圖書（即使連看管圖書也不稱職）。毛竊國期間的許多“創舉”實際上是繼承了日寇佔領時期的奴化措施，如糧食配給、統購統銷、驅民修路、思想灌輸、強迫勞改和集體屠殺。

2、實行“公有制”，佔據一切生產資料，讓所有社會成員喪失維持生計的來源，使之完全受毛的擺佈。被毛澤東封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原本叫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的意思是一無所有，沒有生產資料。在毛澤東的統治下，工人階級還是無產階級，依然一無所有，沒有生產資料。生產資料是國家的，工人階級必須給國家打工領取工資才能活命，否則絕無生存的來源。農民經過合作化等一系列運動，土地被全部沒收，土地成了人民公社也即國家的佔有物，實際上也成了無產階級。商人經過“三大改造”和一系列“割資本主義尾巴”，到“文化大革命”時期，事實上已經不存在了。知識份子更是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除了為“新中國”效命，別無出路。這樣，工人，農民、商人、知識份子，也即所有社會成員的全體，沒有任何生產資料，吃穿用住都要依賴“國家”，除了農民外，包括工人在內的其他階層成員稍有“不軌”，就會被開除，就會喪失生活來源，

不得不惟命是從。

3、對所有社會成員不斷“洗腦”，使之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思想頭腦，使之成為自覺的“馴服工具”，“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

以上三點，使得所有社會成員在專制政權對自身的切身威脅之下不得不服從其統治。社會成員的無條件服從讓毛有了隨其意志任意處置、擺佈、愚弄、壓迫的權力。試想，如果廣大群眾不服從毛澤東的統治，那毛澤東的統治將如何維持？所以，毛澤東的權力來自毛澤東運用恐怖、剝奪、“洗腦”的手段，迫使廣大社會成員的服從。

蘆笛說：“（中世紀）全歐統一在教皇的神權下；教會成了各級黨委宣傳部，強行把亞里斯多德的哲學當成‘馬列主義’式的官定意識形態”。完全胡說八道！當時歐洲有天主教和東正教之分，哪裡有“全歐統一在教皇的神權下？”其實，西歐的皇帝、國王們曾多次操縱教皇，教皇一度成了德國皇帝、法國國王的工具，哪裡有什麼教皇的最高權威？

文革的黑暗遠遠超過了中世紀，蘆笛把二者相提並論，說明了蘆笛對中世紀歷史的一無所知。毛澤東巨大的權力來自於三壟斷：壟斷一切權力的軍事專政制度，壟斷一切財富的公有制制度。壟斷一切思想的意識形態制度。西歐的教皇哪裡有什麼三壟斷？教皇不是軍委主席，不能指揮軍隊，多次淪為皇帝、國王的階下囚；教皇也不是計委主任，指揮不了企業的運行；教皇更不是宣傳部長，所以，反對教皇的《十日談》和宗教改革才能發生。

毛澤東死後，在太湖中心每到半夜凌晨都有全國各地方言的男女冤魂喊冤，都是在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中被錯誤殺害的人呼喊冤枉。冤魂在哭嚎！夜夜哀哭，震天動地！當時胡耀邦、趙紫陽、習仲勳、萬里都異口同聲地說：“我們黨解放

後歷次政治運動所做的一切壞事，真正達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要立即下達檔，平反一切冤假錯案！”陳雲當場拍板：“就是毛澤東欽定的胡風案件也要平，就是解放前的冤假錯案包括王實味、許繼慎、段德昌、何篤才等同志的冤案也要平！”

2003年5月，黨建讀物出版社出版了《知識份子工作手冊》；該《手冊》在第50條“落實黨的知識份子政策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詞目解釋中，披露了自1978年至1987年“十三大”前，平反知識份子冤假錯案達680多萬件。這意味著，1949年至1978年所發生的知識份子冤假錯案，至少680多萬件。因為，並不是所有的冤假錯案都可平反；所有平反的冤假錯案不一定被主管部門的所統計。據宋任窮1981年說，建國後培養的中專以上知識份子數量為800多萬，加上建國前遺下來的人數，知識份子總數約1000萬。知識份子冤假錯案人均達到了0.68個，即每3個中專文化程度以上的中國人中，有兩個以上的人在1978年前遭受過冤假錯案，有過禽獸不如的遭遇。

毛澤東之罪惡，遠遠超過史達林。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為日後蘇聯民主巨變埋下伏筆；鄧小平卻包庇毛澤東，為屠殺預留了空間。果然，鄧小平主導的六四大屠殺，與戈巴契夫引領的民主演變，幾乎發生在同一時期，形成了黑暗與光明的強烈對照。一出“六四”屠城，就足以抹煞鄧小平的一生。鄧臨死，就只能吩咐，連骨灰都不留了，更莫提上八寶山。

所以說“共產主義運動是一台高效絞肉機”，它奉行目的至上與權力至上兩大原則，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為保權力不惜一切。為此，它不僅絞殺敵人，一旦按照它自身的邏輯啟動起來，連自己陣營的人也不放過；不僅絞殺普通大眾，也絞殺時賢精英；不僅絞殺人的肉身，也絞殺人的思想、意志和尊嚴。因此，它對於中國人民和人類文明的戕害是無以復加的。

中共陰魂是蛇妖 殘殺人命千萬條 馬列德國無人要 老毛拿來當至寶
無賴匪頭搞暴動 流氓痞子跟著跑 八十餘年禍中國 神州處處冤魂飄
花言巧語騙百姓 陰險狡詐詭計刁 鎮反土改開殺戒 三反五反又舉刀
村村流血戶戶鬥 枉殺平民知多少 引蛇出洞耍陽謀 右派百萬折英豪
超英趕美放空炮 三年饑荒吃野草 人民餓死五千萬 老毛反說形勢好
十年文化大革命 濫殺無辜掀高潮 文攻武衛發狂飆 珍貴文物都毀掉
毛魔死去人民笑 野蠻屠殺仍在搞 天安門前殺學生 六四血案人人曉

第十九章 慘無人道的城鄉隔離制

極權制下的奴隸可分為兩大類：農奴與非農人口之奴。最慘的是農奴，不僅沒有謀生自由、沒有遷徙自由、旅行自由，連生存自由都被剝奪殆盡。他們的待遇如野生動物，自由如圈管動物，自衛能力如被捆綁住的動物。除了高考、招工、招幹、當兵特殊途徑逃出農牢外，其餘統統被束縛於出生地終身為奴，在野生狀態下勤勞吃草，在管制狀態下任人剝皮放血。由於集體農奴占全國人口的八成以上，所以社會主義制度是地道的農奴制度。由於農奴與非農之奴的總和超過 95% 以上，所以社會主義制度又是個地道的全民奴隸制度。共產主義——是地道的奴隸共慘主義，奴隸主的共用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地道的中華奴隸國。

第 147 節 政府壓迫農民

1· 城裡人和鄉下人完全是兩種制度環境

為了趕英超美的戰略，中共不惜以犧牲全國人民、特別占總人口 80% 的農民的利益，強行發展重工業、軍事工業和核武器。同時，為了政權的穩固就必須首先要穩定城市，而穩定城市的政策就是以剝削沒有任何福利的農村來養活享有各

種福利優惠的城裡人。

在公有制下，掌權者人為地提高工業品價格，使之與農產品價格形成“剪刀差”，把那個“差額”，作為實現工業化所需的“原始積累”資本。據農業部統計：從 1952 年至 1978 年，工業品與農產品不公平交換，製造的“剪刀差”累計 7140 億人民幣，整個 60 年代國家每年的財政收入只有幾百億元，相當於大陸當時好幾年的 GNP 之和。

從 1978 年至 1991 年這種非等價剝削就達 13000 億人民幣，相當於每年國民生產總值的 22%！也就是說，1/5 的城市貴族每年從 4/5 的賤民身上白白多拿 22% 的勞動成果。到 1994 年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為 670 億元，加上農業和鄉鎮企業上交的稅收，每年直接或間接為國家提供 1000 億元的積累資金。

據中國社科院統計：占人口 80% 農村人口的消費能力，由改革初占消費市場份額的 65% 降到 1985 年的 42%，至今已降到 37%。也就是說，只占 20% 的“非農業人口”反而消費了 63% 的社會商品！

農民收入低、成為苛捐雜稅的對象。1980 年至 1998 年，農民人均負擔性支出由 0.24 元增加到 98 元，年均增長速度為 39%。同期，農民人均純收入由 191.33 元增加到 2161.98 元，年均增長速度為 14%，負擔的增長速度快於收入增長速度 25 個百分點。按人均純收入分層次看，高收入組農民人均負擔率 3.3%，而低收入群體的負擔率為 9.9%，後者比前者高出 6.6 個百分點。現在中國城鎮居民人均每年稅額為 37 元，農民人均稅額則為 146 元，是城市居民的近 4 倍。農民的人均收入每年 2000 多塊錢，不是可支配收入，這些收入中還含著種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糧食。國家按農產品產量的 8.4% 來收取農業稅，如果把農民自己消費和投入生產的這一塊除開，那肯定是 20% 多或更高的稅率了。再如果把糧食加工流

通環節的稅率考慮進去，農業的稅率可能就在 30%以上了。

一個農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幾百塊錢，要交稅；城裡人一個月有幾百塊錢的社會保障。城裡人做生意虧本，可以不做；農民種地虧本，可不可以不種？不種可不可以不納稅？不可以，不種地照樣納稅。農業是最弱質的產業，農民是最弱勢的群體，卻面對最不優惠的稅收政策。農民怎麼不貧困呢？

憲法規定，農村土地集體所有。但農民的土地不能自主的進入市場交易，只能先給國家徵用。國家徵用 1 畝地幾千不等，轉手就賣幾萬、幾十萬、幾百萬；農民自己在自己的地裡蓋廠子還得先給國家徵用了再買回來；農民在自己的地裡挖魚塘可以嗎？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錢給國家。海南島有一個農民為了養雞蓋了 2000 多個章，花了三年的時間才建起來。國家啊國家！農民占國家的 70%，怎麼就不代表國家呢？

據統計“國家”每年從農民的土地上拿走數百億甚至更多的錢。國家 2003 年 3 月 1 號出臺了《土地承包法》。這部法律規定土地的承包期 30-50 年不變。越是占地多的越有能力進城，很多進城的人當“地主”收租；越是占地少的越沒有能力進城，只能給“地主”種地。貴州省的土地是 80 年代初期分到戶的，後來一直沒有調整過，20 多年過去了，土地佔用嚴重的不平衡，很多沒地的人租種他人的土地，一年交 300 斤的租子，此外還要交農業稅。這樣的農民怎麼不窮啊！土地是集體所有，人不在集體裡了，自然就應該將土地交還集體；集體所有，但集體卻沒有收回、分配、甚至調整土地的權利，眼看著集體的成員被“新地主”剝削、受窮而束手無策！這正在孕育著革命啊！

城裡人依法享受各類福利保障，諸如醫療、糧票、油票等；而農村人處處遭遇歧視，沒有任何醫療和社會福利保障。在四川安縣農村當過三年知青蔡詠梅說：

“她所在的生產隊 200 多人，大饑荒餓死了 100 多，有的全家死絕。……記得一次我和生產隊隊長及幾個男社員有事上四十裡外的縣城，我帶了糧票，而農民都是用帕子包了大米去換飯。知青是城裡來的，回家探親可用大米去公社調換糧票，但農民沒有這種權利。安縣的農民出遠門都是帶著大米，用一塊布包了，然後到可以換飯的小飯鋪，用飯鋪的秤小心秤個 6 兩換一碗沒鹽沒菜的白飯。這種大米換飯的方式只在鄉鎮小縣城通行，在成都就從未聽說過這回事”。

政府讓農村人自己掏錢搞保障，城裡人國家掏錢搞保障。政府讓農村人自己掏錢搞公共建設，城裡人國家掏錢搞公共建設。

中國政府讓農村人自己掏錢辦教育，城裡人國家掏錢辦教育。中國教育部調查後說：一個農民上大學的機會只有一個城鎮人的 1/29。

《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衛生統計年鑒 2004 年》記載，2003 年我國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 2622.2 元，農村居民的平均住院費用 2236 元，在農民的人均純收入尚包括實物收入的情況下，可以說農村居民如果得了大病，農民一年的現金收入尚不能支付住一次院的費用。因此，疾病是中國農村居民致貧或返貧的主要原因。

中國的權力和市場配置資源，結果是絕大部分配置給了強勢階層。醫療資源 80% 都在縣以上；教育資源主要配置在清華、北大這樣的學校裡；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在城市。在不少地方，公共資源配置成了權力和權力、權力和資本的交易遊戲。例如，1998 年大洪水後，國家拿出數百億元治理大江大河，長江大堤每方土 12 元，這樣的好事給了大資本家做了；大資本家轉包給農村的拖拉機施工，每方土 3.6 元承包出去，一方土坐地淨賺 8 元多。

2·城裡人和鄉下人完全是兩種國民待遇

911 屆滿周年之際，死難者的遺屬爆發了一波“公平”之爭。911 事件後美國民間的慈善募捐，是史上空前的。主持募捐的組織當初主要側重點是殉職者（消防員、救護員、員警等）。因為：死得最壯烈的就是他們——某位死裡逃生的丹麥遊客回憶，當逃難者拾級而下時，拯救者卻拾級而上，一警員指點著胸前的徽章對丹麥人說：“請記住我的名字，告訴人們我在做的事。”他自知斷無生機矣！員警尚如此，更別說扛著沉重器械往上爬的消防員、救護員了。其後，捐款額之巨遠超預期，而聯邦基金會又多次捐助了大筆款項，於是主持的慈善機構決定惠及所有的死難者，平均每家遺屬將得到 180 萬美元撫恤，但並非平攤，而是殉職消防、救護人員每家分得 103 萬 7 千美元；殉職員警每家約分得 90 萬美元；而非應急殉職的死難者遺屬每戶約得 14 萬 6 千元。分配善款的計畫惹起軒然大波，死難者遺屬指為嚴重不公，認為 911 罹難的人都是上班時的犧牲者。反對者話音未落，首先出來支援他們的卻是殉職人員的家屬，這些悲情難泯的遺屬對逾百萬的捐助善款受之有愧，紛紛表示：生命無價，人人生而平等，沒有貴賤之分，我們都失去了親人，大家是一個生命共同體，應該一視同仁，無論是消防、救護人員、警員抑或平民，都應平均發放撫恤善款。911 罹難者來自 86 個國家和地區，他們中間不少為非美國公民的外籍人士，其遺屬的平等權益卻得到了美國公民的尊重和支持。這就是公民社會道德意識，雖然他們日常生活中也會為“意外傷害”、“財產歸屬”之類大打官司，但涉及社會公平，卻有著公民的共識。

然而專制使人麻木，中國人對待社會不公、對待弱勢群體，卻是那樣缺乏同情心。“因為古代傳來而至今還在的許多差別，使人們各各分離，遂不能再感到別人的痛苦；並且因為自己各有奴使別人，吃掉別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卻自己同有被奴役被吃掉的將來。於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就一直排

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而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魯迅《透底》）。

1999年1月4日，建成僅為3年的重慶綦江彩虹橋突然整體坍塌，造成40人死亡、和其它數十人受傷的驚人慘禍。對綦江虹橋垮塌遇難者的賠償中，政府施行了一種公然羞辱農民的賠法：城市身分者每人賠4.845萬元；農民出身者則僅賠2.2萬元！

2004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頒佈的《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因交通事故身亡的上海城市居民可獲得死亡補償金近30萬元，而農村戶口只能獲得13萬元左右。山東省2003年市民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8399.9元和3150.5元，相差1.66倍多。依照《解釋》的規定，“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按二十年計算。”這就是說，一個農村居民侵害了一個城鎮居民的生命，他要用53年多的收入才能支付一個城鎮居民的死亡賠償金；反之，一個城鎮居民只需7年半的收入即可支付一個農村居民的死亡賠償金。

《楚天都市報》11月18日報導：今年5月，女清潔工胡某不幸被撞身亡。胡的家人則提出，胡已在城市生活10餘年，應為城裡人。經法院查實，胡某戶籍仍在農村，因此判胡某家屬獲賠9萬餘元。按《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標準》規定：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322元／年，農村居民則為2567元／年，城鄉之間年可支配收入相差數千元。僅死亡賠償金一項，可支配收入乘以20年賠償年限，城鄉不同，賠償額會相差上十萬。一個司機闖傷人後面對大筆醫療費用的賠償時說：“把人闖死了賠得還少些！”

新加坡006航班失事，其賠償標準為：每人40萬美元，無差別待遇！

前兩年幾名福建民工在以色列被巴人恐怖襲擊殺害。以色列一調查，是非法勞工。以色列說非法勞工也是人，負責他家庭孩子的教育到成年，負責父母到臨終的開銷，並給予撫恤金，總共加起來近 500 萬元人民幣。而阿拉法特卻連一句道歉的話都沒有。

而且，員警還吃戶口。農村戶口要轉為非農戶口就得走後門行賄。李昌平說：90 年代初期縣城的戶口每年出售 100 個、200 個、500 個不等，每個 20000 元、30000 元不等。一些農民，借債也給自己的孩子買戶口，買高價戶口還要開“後門”，那時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後門，有的人真是哭著求我幫忙。再到後來，全國都賣戶口了，有的城市一個戶口賣十幾萬甚至更高，現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戶口，依然還要出高價，我在北京工作好幾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為買不起戶口。戶口這個東西，吸走了多少農村的財富，罪該萬死！

第 119 節 對農民的恐怖統治

1· 中國政府一直給最勞苦的流動公民以“罪犯待遇”和“瘋子待遇”

遷徙自由由來已久，它包括選擇住所的自由、旅行的自由和變更住所的自由三個方面。唐朝大詩人李白描述的“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是多麼快意呀！杜甫也有詩句為：“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如果沒有遷徙自由，即使有今天的高速公路，有輪船和飛機，李白、杜甫的遷徙快感也不會產生，那會天天都是“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1911 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就有規定了“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民國時期，國民黨推行的是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的戶籍制度，即使如此，人民還是可以遷徙，進城經商、做工，或到別處投親靠友，戶口並沒有跟其它的東

西關聯起來。

1939年，陝甘寧邊區的憲法性法規中也有遷徙自由的規定，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九十條第二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當時中國公民確實享有這種自由。1954年至1956年是戶口遷移最頻繁的時期，全國遷移人數達7700萬，其中包括大量農民自發進入城鎮居住並被企業招工。

1958年1月9日，毛澤東以主席令頒佈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條例》第十條規定：“公民由農村遷往城市，必須持有城市勞動部門的錄用證明，學校的錄取證明，或者城市戶口登記機關的准予遷入證明，向常住地戶口登記機關申請辦理遷出手續。”這樣就正式確立了戶口遷移審批制度和憑證落戶制度，並以法規的形式限制農村戶口遷往城市。這種法規是明顯違憲的，但在“人大於法”的年代，沒有人對此提出異議。1975年四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通過第二部憲法，公民的這一基本權利被剝奪了。對中國公民尤其是農民具有頭等重要意義的這一憲法權利，在1978和1982年先後制定的兩部憲法中一直沒有恢復。悄悄地剝奪公民的遷徙權利，政府有何信用可言？

195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是城鄉隔離的支柱。據發展導報《高價證件沒完沒了困擾打工者》披露，到深圳打工的農民，得付出累計上千元證件費用，才能取得出賣勞力的資格。其中，必須在家鄉辦理的身份證、邊防證、未婚證、計生證，省與省之間收費不等。例如，在江西，一張花了一個多月才拿到手的身份證要花80多元，一張邊防證120元，未婚證60元，計生證45元。就是說，打工者還未出省就被公安、計生等部門敲走了3百多元。在四川，邊防證、未婚證、計生證分別收費250元、130元和80元，僅三項已經460元了，再加上身份證，至少得500元以上。到深圳後，高價

證件繼續得辦。一張暫住證 300 元，如果進廠打工，又是幾十元一個工作證外加幾百元押金。輸出省和接受省的收費兩頭相加，是 1 千多元，占農民人均年收入的一半以上。而且，種種高價證件中，除身份證外都是短期證件，有效期最高的一年，低的只有兩個月。

沒有暫住證，農民就成了城市的野狗，得不到法律的保護。在工廠工作是非法的、在街頭叫賣是非法的、甚至在大街上行走也是非法的……如果雇主克扣工資，或者任意延長工作時間，也哭天不應叫地無門，因為他和雇主之間的勞動關係不受法律保護……如果誰想挑戰暫住證制度，那麼員警就可以“依法”一天也不讓你住！

一位民工說：“1998 年冬妻女來中山看我。我在中山石岐老安山臨時租了一間房子，住進去第二天夜晚，治安員查房，我拿身份證、結婚證給他們看，都不行；沒有暫住證每人罰款 80 元，我解釋遭到了大聲訓斥及謾罵，並要帶我們走，嚇得四歲的女兒大哭。我怕嚇壞小孩就給了他們 240 元錢。三年後妻女再來廣東，她不肯，說廣東有壞蛋。”

湖北安陸的姚芳，年僅 20 歲。她懷著對幸福生活的憧憬，來到廣東，在南海鹽步制衣廠打工。因為在凌晨 2 時許被查房查證，而被嚇死[見《南方都市報》]。

深圳張女士稱，在去年春節前一天深夜被查房時，丈夫因為要照顧有孕在身的她，開門動作慢了一點，結果被治安員當場打倒在地，而張女士也因驚嚇當場流產。

南海鹽步的一群“外來工”稱，有次深夜查房時，只因他們動作慢了些，查房的就用手銬把裡面的 5 位“外來工”銬走關押，打了一頓後，每人罰款 500 元。

城市員警可以隨時把自己的同胞以“收容”的名義囚禁起來，迫使他們向國庫交數百、上千元的贖金。怪不得有人要借高利貸才能到收容站“贖人”。據被收容過的人向記者介紹說，向員警、護工（收容站工作人員）下跪求饒是常事。

2003年3月17日，大學畢業生27歲的孫志剛上街因為沒有帶暫住證，在廣州被收容後，被活活打死了。當年在中國的日本統治區沒有帶良民證的中國人被抓時，日本人還不致打人殺人，找來良民證就放人。在孫志剛之前，不知有過多少“孫志剛”。《南方週末》載，安徽潛山縣梅城鎮馮彩雲的兒子徐英東1999年在北京被收容後下落不明，70多歲的老母親多次上北京尋找兒子，希望交錢領人，一直未能找到，“奔波和傷心使老人變得遲緩了”。

1998年10月5日，我國政府簽署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2條規定“合法處在一國領土內的每一個人有權享受遷徙自由和選擇住所的自由”。

印尼1998年廢除了對中國移民隔離和歧視的“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稱呼，而中國的城市仍然把中國公民分為本地人和“外來人口”。

中國農民離開自己的家鄉，在戶口所在地市、縣範圍以外的城市暫住三日以上，就必須申報暫住登記。但城市居民到農村去卻不用辦暫住登記。一個公民在自己的國家要辦“暫住證”，世界上哪個國家有這樣的規定？中國公民，在中國的土地上，為什麼只能暫住？！

在湖南株洲、衡陽一帶，常有廣東警方用火車、汽車將一批批骨瘦如柴、氣息奄奄的奴隸拋棄後揚長而去。據活著的奴隸們訴說：廣東員警經常半夜出動來搜捕外地打工者，交不起罰款的，就將女的賣到髮廊，男的賣給一些工地老闆做奴隸，一旦奴隸們生病或快累死時，便叫員警把他們抬上車到廣西、湖南一帶拋

棄。廣東一省 2000 年就強制收容 58 萬人次，其中符合“規定”的，即所謂“流浪乞討、賣淫嫖娼”僅占一成左右。“流浪乞討”難道就可以構成被抓被關、罰款做苦役，乃至可能遭到孫志剛式命運的理由嗎？

在徐州收容所，北京歹徒苗長順以 700 元，從該所人員手裡買走了 8 個少女，逼迫她們在京賣淫。在開往廣州的火車上，一位女孩跳車自盡！因她沒票而乘警要以二百元的身價將她賣給廣東的收容站！女孩寧願選擇死也不去收容站，收容站比奧斯威辛集中營還恐怖。

鳳凰衛視報導：《湖南一收容所駭人內幕 不交錢竟被活活打死》。僅有 10 名員工的漣源市收容遣送站已不滿足政府每年 12 萬元的撥款，為了廣開財源，該站站長肖某決定施行《最低收費標準》。標準中將偷、扒、吸毒、賣淫、隨車叫賣及一般流浪乞討人員分為 A、B、C 三類，分別按省外、省內、市內不同檔次，10 日以下每人收取 1000 元、800 元、700 元不等管理費，10 日以上則按每人 1400 元、1200 元、900 元等不同的標準收取。幾年中，在站裡負責財務的郭先禮統計的資金有近 320 萬元。”

在廣州被騙被搶淪落街頭的江蘇少婦不僅沒有得到員警的關懷，還被送到了收容站，在收容站她貼身的幾千塊錢又被掠奪一空，還多次遭到收容站雇工們的輪奸。

《中國青年報》報導：1999 年 26 歲的湖南籍農村少婦蘇萍，與珠海一家公司簽訂了小飾品代理銷售協定，隨後來到廣州，剛出火車站卻被人搶走了行李。接著，“兩位巡警走了過來，拉起我就走。我趕快拿出揣在身上的結婚證、外出務工證和珠海市的暫住證遞過去，可他們連看都沒看，順手便扔了。隨後，我被強行推上了一輛後廂封閉的警車。”她被送進有收容外來人口功能的精神病醫院，

與數十名男人同處一室。“天黑不久，那房間裡的一個男人就在眾目睽睽之下強姦了我。有很多人幫他，還威脅要殺我。我怕極了，一個勁兒地哭喊，不敢作任何反抗。進來幾個小時了，也沒人告訴我這是個什麼地方，那簡直就是人們常說的地獄！過了些時候，幾個男人把我挾持上三樓一間有更多男人的房間裡。在那裡，兩個男人在幾十個男人的起哄下，又分別強姦了我，直到我昏死過去。”在此後的兩天兩夜裡，這位少婦被不計其數的暴徒輪奸，直到丈夫從外地趕來領她。但需交 2000 元才能放人，經過討價還價，並私下塞給有關人員 200 元“紅包”，放人的費用才降為 500 元。

2001 年 4 月 9 日，在深汕高速公路，海豐收容遣送中轉站(後改為汕尾市收容遣送中轉站，現為汕尾市社會救助站)一輛中巴起火，車上 25 名被收容人員全部被活活燒死的。

2003 年 1 月 24 日晚，5 名外來工在廣州被關上收容車後沒多久，便從高速行駛的收容車上一個接一個地掉下來。這 5 名外來工除 1 人受輕傷當場“逃跑”外，其餘 4 人被摔死。2004 年 4 月在廣東東莞由於查暫住證引發百人械鬥。

領袖喜歡在“國慶”的慶典上揮手，數十萬記的民工便被員警驅出京城。一位曾被遣返 4 次的來京打工者悲哀地說：“每當全國人民喜慶的日子，就是我們最害怕的日子，白天不敢出門，晚上不敢開燈，我們在辛苦地建設北京城，北京城卻沒有我們容身之地”。有點大事兒外地人就倒楣，香港回歸、澳門回歸、大運會，外地人被送回去不少。

天安門從來不“愛”一個農民的孩子。作為外地人的子女，其平等的生活權利和受教育權利從一開始就註定要被剝奪，民間教育一直受到壓制和歧視。你孩子沒戶口上不了學，有多少同胞及其子女在戶籍制度的欺壓下煎熬。農民的孩子

在城市中得不到受教育的機會，而那些自願為民工的孩子提供服務的好心人，卻被政府看作搗亂分子和壞人。在北師大組織“農民之子”社團的大學生徐偉，因為摯愛農民兄弟並質疑官方的農村政策，就被安全部門秘密逮捕並以“顛覆國家”的罪名判處十年徒刑。這樣，誰還敢為農民說一句公道話呢？

城市居民失業了，還有一份救濟金；農民碰上天災人禍領什麼？一個公民在貧困潦倒時尋求社會救助的自由也要剝奪嗎？一個農民可能曾經為北京或者上海市交納幾十萬元的稅款，破了產被迫流浪街頭，是沒有最低生活保障的，等待他的只有收容和驅逐！

在美國，窮人有露宿街頭的權力！在舊中國，安徽鳳陽人“奴家沒有兒郎賣，背著花鼓走四方”。可根據國務院 1982 年 5 月 12 日發佈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第 2 條規定，家居農村流入城市乞討或者露宿街頭生活無著的，就會被收容、遣送。如果瞎子阿炳活在今天，在上海地鐵口拉著低沉淒涼的二胡小調，等待他的是什麼呢？是被扔進收容遣送站！你將聽不到《二泉映月》的優美旋律！

收容遣送制度是一種明顯違背《憲法》的城市特權制度，只針對本國農民而不是市民。這樣一種世所罕見歧視性制度安排。在市場經濟的權力尋租中，收容遣送制度已不折不扣地蛻變為城市執法部門限制外來人口流動、撈取集體和個人私利、濫施淫威的“合法管道”。眾多的事實已經表明，收容遣送制度與市場經濟要求的人口自由流動和統一的大市場相背離，與轉移大量的農村人口、加快城市化進程相背離，與依法治國、建設現代法治國家相背離，與遵守《世界人權宣言》、履行國際人權公約相背離，與中華民族建設政治文明相背離。

北京的招聘廣告中常常要求“有北京市城鎮正式戶口”。這是歧視性招聘。

憲法規定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勞動法則肯定“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我國政府 1997 年 10 月 27 日正式簽署的聯合國《關於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也規定：“本公約締約各國承認工作權，包括人人應有機會憑其自由選擇和接受的工作來謀生的權利，並將採取適當步驟來保障這一權利。”用工單位要求應聘者必須具有城市戶口的做法是違法的，是對公民權的侵犯；地方政府的相關規定也是違法違憲的，是對公民權的侵犯。

馬克思當年挖苦諷刺資本主義社會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因為工人可以“自由”地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中國農民進城想憑自己的智慧、體力、勤勞和血汗養活自己都不能，連要求資本家“剝削”的權力也沒有。允許進城農民幹的，往往是為城市居民所不齒的低賤工種，都與髒險累毒沾邊。難道農民就是天生的賤民？

在城鄉分治的戶籍制度下，市場經濟所必須的勞動力自由流動受到百般刁難。勞動法等法律已承認的公民擇業自由和營業自由的前提之一是異地擇業和營業的自由。現行戶籍制度在侵害公民遷徙自由的同時，也在侵害公民的擇業自由和營業自由。

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合法打工的民工，所受到的歧視，遠遠高於在美國非法打工的中國難民，象難民的孩子在美國享有免費的基本教育，而民工的孩子在中國城市受教育要交大筆借讀費。美國大眾討厭中國的偷渡客，但對於那些可憐的人，美國政府還是撥出大量的經費，為他們提供足夠的醫療服務和法律服務，保證他們的健康、權利，給他們吃喝，送他們回家，做這些事沒有收過他們一分錢；而這些人回國後，不知廉恥中國政府卻收了這些窮人許多錢。毫無疑問，最歧視中國人民的就是中國政府。

對農民的隔離是中國的恥辱。中國的隔離制度用活生生的事例，把它的醜陋展示給世界：城市自稱要率先實現現代化，卻以農民的隔離為代價；國家自稱要實行法治，卻以歧視農民為前提，這簡直是南轅北轍！中國的隔離制度，使中國的城市形同歐洲中世紀的封建莊園。在一個連起碼的居住和遷徙自由都沒有的國家，怎麼可能出現民族的大融合？這個表面上統一的國家，卻有著分裂的人民。農民被剝奪了做人的尊嚴和權利，成了沒有首陀羅之名的首陀羅。農民不再是一種職業，農民成了世襲最底層的等級。

無論農民在城市生活了多長時間，都是“外地人”，無論遇到多麼地不公正，我們只能默默的忍受、只有無奈的呻吟，可我們一樣納稅，無法像當年的英國人那樣宣稱“無代議士不納稅”。按照現行的選舉制度，中國公民只能在戶籍所在地選舉和被選舉！一個在城裡出生的農民的兒女到了 18 歲，也許他們從來沒有到過父親的家鄉，卻只能在那裡才有選舉和被選舉權：這就是現行的選舉制度！這樣，一萬個農民也頂不了一個城裡人！

2003 年 12 月《人民日報》報導廣東韶關中級人民法院舉行的拖欠民工工錢兌現會上，國道 323 線乳源縣城段改建工程的民工，經過 10 年的艱苦追薪，終於在國務院總理、廣東省省長層層批示後從該市中院領到了首批被拖欠工錢 29.3 萬元。區區幾十萬的欠薪歷時十年追討，驚動了各級政府乃至國務院總理，那 1500 多億的欠薪要拖到何年何月才能還清？一公司經理狡辯說，拖欠工資是為了企業的長遠發展，是為職工的長遠利益著想。他們發的是不義之財，順理成章，當然也就為富不仁了。

2004 年國慶日前，來自黑龍江的王氏兄弟來京打工，被一家職業公司收了 2000 元押金，不僅沒找到工作，連押金也要下回來，他倆去了派出所、工商局

舉報，還是要不回押金。9月22日下午，他倆來到朝陽區勁松東口的華騰大廈職介公司，點火自焚。幾乎是同一天，在北京昌平區名佳花園專案工地，20多名農民工追討工資時遭到砍殺，其中8人傷勢嚴重。自國慶日以來，短短15天，就有近20人不遠萬里來天安門前上演自焚、跳水、縱火等慘劇。

現在，中國政府已經簽署了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第十二條第一款明確規定：“合法處在一國領土內的每一個人在該領土內有權享受遷徙自由和選擇住所的自由。”據此，應當儘快在下一次修憲中恢復公民的遷徙自由。農民如果不能自由遷徙到城市中合法居住，不僅在經濟利益和社會福利上受損，而且根本無法行使公民的政治權利，譬如享有在實際居住地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2· 赤裸裸的暴力統治

德國總理施羅德在德西南城市曼海姆簽名時，一名52歲的男子扇了他一記耳光。頓時，施羅德的臉頰變紅。在場的4名警衛立即將該男子帶往警局，不久，“襲擊者”被釋放了。這位向總理“動手”的失業教師沒有被刑事拘留，更沒有以“妨礙公務罪”、“侮辱領導罪”、“故意傷害罪”而下獄，這顯示了一個法治社會應有的理性。而中國的公民呢？

山東有一位名叫邢樹貞的農民，因為一樁莫須有的縱火案，22歲的時候被當時的大隊黨支部副書記、民兵連長等人殘忍地割掉了睪丸，造成了終身殘疾。

在中國的農村，縣鄉兩級政府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每當農民結束了收穫的時候，最怕的是什麼？春耕夏種，秋收冬閒，農民最怕的就是村幹部和縣鄉兩級政府。索要農業稅，收取集資款，順便帶上各種各樣的名堂。農民在無錢上交的時候，等待的不是政府的起訴，而是無數的毆打和敲詐。在縣鄉兩級公安系統暴

力工具的協助下，農民在恐怖中等待惡魔的一次次的降臨！縣鄉兩級政府實際上就是政府搜刮百姓，勒索錢財的“搜錢器”！在幹部的眼裡，昔日的鄉親不過是他們搜羅錢財，送禮求榮，以便等待提升的工具和源泉！於是，這些出自農村本土本地的人卻成了最大的惡魔！實際上，就是土匪和惡霸的化身！縣鄉兩級政府的官員操縱農村選舉，對真正的民主選舉的村官實行打壓！扶持村霸和類似黑幫的人物統治農村！因為這些人的野蠻正是他們索要錢財的“利器”！在他們眼裡，“共產黨”只是個符號，他們甚至不知道共產黨的宗旨到底是什麼？他們只知道，“上面讓我要錢，我便要錢；讓我打人，我便打人”！原則、正義——全是路邊的野花，無人問津！

湖北農民為苛捐雜稅上訪省政府沒人理，無錢買火車票回家，走投無路，以毛筆在武昌大街上寫下：“黑、黑、黑、黑呀”，服毒自殺。《荊州日報》報導此事，記者、編輯被開除，主編被警告。2000年1月枝江市百里洲鎮寶月寺村村民張加貴當選村主任，因堅持清理村裡1997~1999年的財務帳目，深夜在自家遭人暴打，10月死亡。肇事者至今未歸案。

1996年，湖北潛江市澤口辦事處在十多個農民的脖子上掛上“抗交農稅”的牌子，押著他們遊遍了辦事處下轄的十多個村莊，遊鄉遊了8個多小時。五天半的時間裡，170多個農民被徵稅官員暴打，一個剛生完孩子的婦女被打得下身直流血，一個村民的右眼被踢得鮮血淋漓，一個老人的肋骨被打斷……潛江漁洋鎮鎮委書記袁作振帶隊，把三戶欠款農民的房屋內牆拆掉，把農民家裡煮飯的鐵鍋砸爛，然後警告村民說，誰要作欠款典型戶和上訪積極戶，就要這樣被整治（王瑩：新蘭村農民負擔何時能減輕？人民日報，1998年12月22日）。

農民最糟糕的日子不是饑餓或居住在漆黑的陋室裡，真正的折磨是騎著發亮

摩托的徵稅隊的到來。2000年5、6月份，董灘村的村民的房門被竹根灘鎮政府組建的夏征（夏糧徵收）小分隊拆掉了。根據潛江市的檔規定，農民負擔每畝地不得超過200元。可董灘村每畝地平均上交將近300元錢；國家曾經有檔規定，辦理結婚證至多只能收取工本費2到10元。可是董灘的農民辦個結婚證要交300到600元不等。村民袁書希，因為欠了村裡500元錢，夏征小分隊的人不由分說，就要把袁捆起來。在追打的過程中，袁的短褲被他們撕破了，逼得沒辦法只好跳河，差點連命都沒了。村民周絞蘭，家裡的米、棉絮、門、冰箱全部被“徵收”走了，床被掀翻了，桌椅板凳被砸壞了，慘不忍睹。董灘村有19名村民，因欠交不明不白的稅費，被夏征小分隊非法的關押和毆打。這些村民不分男女，一起關在潮濕、蚊蟲叮咬的小房間裡，吃喝拉撒都在裡面，惡臭難聞。這個房間由夏征小分隊的人專門看守。據被關押的村民回憶，看守人折磨人的手法花樣翻新。比如，他們規定村民跪在他們劃的圈圈裡，如果跪的姿勢不合他們的規定，立刻拳腳相加；他們命令村民的頭、腹部和膝蓋同時貼著牆面站著，堅持不到二十分鐘，村民便倒下了。每個被關押的村民都必須交看守費10元錢，每頓飯都由家人送來。送來的飯菜必須經過看守的檢查才能吃，如果飯菜不錯，看守便不准送去。理由是：把農民抓來，是來受苦不是來享福的。非人的折磨，使村民的身體留下病根。據說某個村民因為被看守者狠踢私處，從此喪失性生活能力。村裡的張幫爽老人被徵稅幹部打成重傷，家裡的口糧全部被搶，最後含恨尋了短見。竹根灘鎮政府強迫老人的子女簽了一份《安葬協商意見》，補貼死者家屬5000元錢。一樁命案，就此了事。曾詳均回憶了被抓被打的情形：他們罰我站，總是打我，打得我直冒冷汗，眼淚直流。

2002年10月18日中午，潛江市政府的大門被五輛掛著白布橫幅的拖拉機

堵死，一群淚流如雨、聲音嘶啞的農民抬著一具死屍往政府大院沖。政府大院鐵門緊鎖，上百個武警和機關幹部在鐵門的裡側站成幾排，拼死擋住農民的去路。好幾千群眾圍觀這令人驚駭的一幕。死者是龍灣鎮西湖村的農民李明學，年僅 43 歲，患有先天性殘疾。他因不堪農業稅的重負絕望自殺。有人統計過，說他是那年潛江市因為農業稅死去的第 4 個農民。

兩天前，16 日下午 3 點多鐘，尋湖村的幾個村幹部開著拖拉機來到李明學的家收稅。李明學的妻子也是個殘疾人，小時候患病後留下智障的後遺症，生活不能自理。李有兩個孩子，一個 12 歲，一個 8 歲。12 歲的孩子因為交不起學費，讀到小學五年級就輟學了。李的父親已經 70 多歲，是一個瘦弱多病的老人。由於李家生活太困難，又是殘疾人家庭。民政部門每年給李家補助 50 斤大米和 50 元錢。村幹部收稅的時候，李明學說：“去年民政局給我的大米和錢，你們扣掉不給我，為什麼還來問我收稅？你們先把大米給我”。說完，李明學把自家的大門鎖上，一個村幹部當即用鐮刀把李明學家的門鎖劈斷。幾個人沖進屋子裡，強行把屋子裡僅存的幾袋糧食統統搬到了拖拉機上；這是李明學一家的口糧。看著口糧被搶，李明學拿起一把鐮刀把裝糧食的麻袋一個個割破，糧食因此撒了滿地。村幹部對李明學一頓拳打腳踢之後，發動拖拉機準備開走。李明學連滾帶爬地躺在拖拉機底下，把拖拉機的輸油管砍斷，連連招呼十多歲的孩子趕緊把稻穀搬回家。智障的妻子呆呆得看著，不知道該做些什麼，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那是一個雨天。雨水打在每一個人的身上和臉上。李明學躺在拖拉機底下，幾乎成了一個泥人。當李明學不要命的躺在拖拉機底下的時候，村幹部用手機和村部聯絡，不久，又來了一輛拖拉機。幾個村幹部把李摠住，另外的村幹部把糧食搬到另外的車上，“突、突、突……”發動了拖拉機。絕望的李明學對在場的村幹部

說：“我-把-我-老-婆-和-兩-個-孩-子-交-給-你-們-了。”說完，他走進了房間，拴上房門，再也沒有出來。回過神來的老父親和年幼的孩子哭喊著沖進房間，而李早已經喝下了一瓶劇毒農藥。老父親和孩子將口吐白沫的李明學拖出家門，哭天搶地地高喊救命。村幹部此刻卻不見了蹤影，開著拖拉機凱旋而歸。李明學被村民送進了醫院，他拒絕治療，執意要到另外一個世界去。17日晚上，李明學永遠的閉上了雙眼，再也沒有醒來。古代的中國農民躲進虎狼出沒的大山，寧肯冒著被老虎吃掉的危險，也不願面對多如牛毛的苛捐雜稅。因為，“苛政猛於虎”。2002年10月17日晚上，因為農業稅，農民李明學永遠地躺下了。

2003年7月，位於陝西省安康市旬陽縣桐木鄉的湧泉村，5天之內連續發生了3起農民自殺事件。這3位自殺的村民分別是56歲的李立文、31歲的李祥和32歲的陳音富，李立文在7月11日自殺後被搶救過來，而李祥和陳音富分別在7月13日和15日自殺身亡。

李立文家有三口人。兒子外出打工但收入很少，難以補貼家用。妻子是聾啞人，智力不太正常，無法從事正常的勞動。他的家裡只有兩間土房，陳設十分簡陋。李立文一次喝下了十支農藥自殺，自殺的態度顯然十分堅決。但幸運的是，他被搶救了過來。他說自己之所以選擇自殺，是因為“我在退耕還林的地裡栽了桑樹，套種了黃豆和紅薯，但工作組強迫拔了它們，還要罰款，沒有錢、沒有辦法。”李立文家裡的兩畝四分地，屬於享受國家退耕還林政策補助的地塊。按照國家《退耕還林條例》規定，退耕還林者應當按照作業設計和合同的要求植樹種草，禁止林糧間作和破壞原有林草植被的行為。是年六月，旬陽縣對全縣二十八個鄉鎮的退耕還林工作進行全面檢查。而將湧泉村成為鄉里退耕還林核查整改的試點。鄉上派出工作組在七天之內對湧泉村進行“地毯式”核查，徹底解決存在

的問題。李立文在退耕還林的地裡套種了紅薯、黃豆等糧食作物，在這次桐木鄉工作組的核查整改中，被要求或立即將糧食作物拔除。李立文告訴記者：“一共要交五百六十塊罰款，但家裡一年的收入連兩百塊都不到，吃鹽的錢都沒有。”李立文身上穿的是一件兒子穿舊的衣服，他自己從未買過新衣服，連自殺喝的農藥都是賒來的。李立文活了過來，當地幹部不僅沒有一點自責，而且責備喝藥農民說：“你說沒有錢，怎麼有錢買農藥自殺？”

然而，另一位自殺者、第三村民小組小組長李祥卻永遠離開了人間。年齡僅僅三十一歲的李祥，家裡只有岳母、妻子和兩個孩子。他是家中唯一的勞動力，他清醒地知道自己的離開將給親人帶來怎樣大的悲痛和苦難。湧泉村第三村民小組共有近四十戶村民，他們大都套種了經濟效益較高的烤煙。由鄉人大副主任薛成芳擔任組長的工作組對這一組進行核查整改，而李祥則負責配合工作組開展工作。李祥是一個正值壯年、性格直爽、既受村民歡迎又與鄉幹部工作配合良好的村民小組長。據李祥的妻子講，李祥服毒自殺的前一天，曾帶領工作組在向退耕還林不到位的村民收回國家發給的補貼，並“替村民講了幾句話”。李祥替村民“講話”，是因為年初鄉里駐村幹部曾號召村民大力發展烤煙種植，並提出可以在退耕還林的地塊進行。但正當烤煙即將成熟、農民馬上要見到效益時，桐木鄉卻開始了退耕還林的核查整改工作，李祥覺得無法跟農民交代，於是選擇了一了百了的道路。

就在派出所民警介入李祥死因調查之後的第二天，湧泉村的自殺事件再次發生。在李祥的葬禮上，村民陳音富被民警叫走。在被連續審訊七個多小時以後，陳音富疲憊不堪地回到了家中。幾個小時之後，陳音富的屍體被村民們發現。7月21日，旬陽縣公安局對李祥和陳音富的死亡事件出具了一個完全對工作組有利

的調查報告。對於李祥和陳音富的死因，報告引用了一些村民的話作為結論：“李祥平常膽子小、心眼兒小，受不了氣，遇事想不開，就服毒死了，不怪政府工作人員。”而陳音富個人素質差，未見過大世面，心理脆弱，認為派出所找他就是追究他的責任。這三個農民的自殺，已然凸現出當代中國血淋淋的社會現實，即：當權者的基本國策，已經從古代中國的“官逼民反”進化到了當代中國的“官逼民死”。

新華網 2004 年 6 月 30 日報導：“河南省宜陽縣農民王幸福，從 2002 年 11 月到 2003 年 8 月，先後秘密調查該縣 13 個鄉鎮的 230 戶被毆打[75 名群眾被打傷]、被非法拘禁、被搶糧搶物的農家。當他那份含著泥水、血水、汗水和淚水的調查報告輾轉送到河南省和國家稅務總局等有關部門時，暴力徵稅事件終於露出了冰山一角。王幸福電話被監控處境危險。

鄧縣裴家村村長裴安軍，去李三家強收攤派費不成，把他 15 歲的閨女帶到村辦公室強姦！李三到鎮派出所告狀，所長將李三拉倒裴家，按住李三的頭，讓他給村長磕頭賠罪。這位裴村長連續十多年被評為優秀黨員，並選為當地人大代表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先進個人！

河南省上蔡縣河楊集鎮黨委書記 1998 年 11 月 24 日凌晨 4 點左右，該鎮黨委書記鄭玉江又帶領上蔡縣公安、法院、司法、財政等單位的 300 多人氣勢洶洶來到中街村，到村民家就撬門砸鎖，進屋就翻箱倒櫃，見東西就拿，見人就抓，上訪人張愛臣愛人嘴被打腫，10 歲兒子張孝峰胳膊被打傷，砸壞物品 200 多件，搶走東西 3000 多件，糧食 10 萬多斤，總價值 30 多萬元，同時，每人交罰款幾千元到 1 萬元。鎮政府想千方設百計攤派、收費、罰款，農民被明目張膽地敲詐、盤剝和掠奪。全鎮幾千個家庭被抄家，幾百萬元的財產被侵吞，另外，還有

數萬元不給收據的罰款。根據規定，家裡死人，必須去火葬場火化，去火葬場的專車由鄉村的地方官員或他們的親屬提供，車費 200 元。火化費 600 多元，加骨灰盒就 700 多元。這樣，死一個人，就要付出 1000 元左右，而當地農民一年的純收入不過幾百元。一個人死後被埋到了桃園，幹部們除扒出屍體焚燒加倍罰款其家人外，把桃園也燒了！有一個男子長期生病、久治不愈、花了很多錢，家裡人看他死了，怕鄉里知道了再花費巨額火葬費用，就連夜將屍體偷偷埋掉。但鄉里還是知道了[舉報人有 100 元的獎勵]，命令扒出屍體，令人毛骨悚然的情景出現了：那個屍體竟是坐在棺材裡死掉的，渾身血淋淋的，手指甲磨掉了。他被自己的親人誤認為死亡給活埋了，死者的妻子當場哭昏過去。不是出於對高額火葬費用的恐懼，他的家人不會如此匆匆把人埋掉的。農民走投無路，只好賣血。

2004 年 7 月 30 日江蘇省徐州市豐縣趙莊鎮趙廟村趙紅新因未能及時交納不合理的稅費，村主任趙汝林四刀將其活活捅死。

《中國農民調查》用“八個想像不到”描述了他們眼中的中國農村，就是“想像不到的貧困、想像不到的罪惡、想像不到的苦難、想像不到的無奈、想像不到的抗爭、想像不到的沉默、想像不到的感動和想像不到的悲壯”。書中記載了：

安徽利辛縣路營村農民丁作明帶頭向縣委反映村幹部亂收提留款、農民負擔過重等問題，村幹部及鄉領導為此記恨，動用執法人員把他拉到員警派出所活活打死；

固鎮縣小張莊村幹部橫徵暴斂，村民要求清算村財務帳目，有案在身卻沒服刑的村委會副主任竟然帶著兒子提著刀，向村民清帳小組的代表大開殺戒，砍成四死一傷；

臨泉縣王營村王俊彬等人向上級反映村幹部亂攤派、亂集資、亂罰款，結果整個村莊遭到執法部門鎮壓，千多村民倉皇逃到鄰省。因為鄉政府野蠻徵稅打死農民，1995 年下半年，王營村的 70 多個農民上訪到北京，在天安門廣場向國旗集體下跪。這一幕震驚中外。

有個程莊鎮，為了要多點經費，強令村民多交早交，村民拒絕，就被集體抓進“思想政治學校”，除了要付 50 到 100 元不等的“乘車費”，每人每天還要交上 20 元的伙食費和住宿費。交了錢，還得體罰，繞圈曬太陽之外，父子兄弟之間還要相互往對方的臉上打巴掌，不響不算，一次規定三十下。一時間，親人相殘，巴掌扇臉之聲響成一片。

1995 年 11 月 4 日，在安徽省阜南縣中崗鎮沈寨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沈可理持槍徵收提留款，當場槍殺 1 人、槍傷 2 人的恐怖血案。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主持人去安徽省阜南沈寨村採訪，並作專題報導，全國反應強烈，中央警告電視臺：下不為例。2004 年 5 月 27 日，阜南縣袁集鎮寧大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張金彪及其兩個兒子，在當地派出所兩名員警跟隨下，將本村的王勇砍死。由於張金彪非法截留上百萬元的征地補償款，遭到許多村民的抵制。老實憨厚的王勇成了張金彪父子發洩私憤和實施報復的犧牲品。

第 148 節 機構臃腫敲骨吸髓

2008 年 4 月初國家發改委公佈的縣財政赤字資料為例，目前，全國平均每個縣的赤字約 1 個億，全國赤字縣占全國縣域的比重達 3/4。據北大教授平新喬 2001 年的計算，全國縣及縣以下的財政虧空約達 2100 億元；他根據一般情況下債務約為赤字 5 倍的規律，測算出中國縣鄉債務規模超過 1 萬億元。湖南省衡南縣是個財政窮縣，歷年來財政累計負債高達 7 億元。一些教師工資只發 70%，就

連縣鄉公路改造、鄉村扶貧等都得從幹部工資中扣錢來補“窟窿”。但就是這樣一個窮縣，僅 2003 年就花費近 500 萬元為“公車消費”埋單。除了縣環保局、縣委黨校、縣紀委買的是幾萬元一輛的北京吉普、金杯麵包車之外，縣檢察院、交警隊、移民局、物價局、國土局等都將目標“鎖定”為廣州本田、帕薩特等直逼政策上限（湖南省規定公務車車價須在 25 萬元以內、排量 2.0 升以下）的中高檔豪華轎車。另一個被列為國家扶貧重點縣的陝西省蒲城縣，近年來蒲城縣財政赤字每年都在 2000 萬元以上，至 2005 年縣財政負債總額超過 5 億元，農民現金收入水準僅為全國平均水準的 42%。但該縣於 2005 年舉辦了一場歷時兩個多月的喜迎元旦大型歌詠比賽活動，耗資近 400 萬元。

中國縣、鄉、村三級吃財政的人員高達 6000 多萬人。監利縣棋盤鄉加上教師和在外工作的幹部共 2000 多人吃財政。1999 年，監利縣棋盤鄉全鄉農民實際負擔 1382 萬元，其中合理負擔只 580 萬元，而全鄉的農業收入總共不足 1000 萬元。這意味著農民種田的全部所得都用來交稅費還差著近一半！從 1996 年開始，監利全縣債務每年以 2 億元的速度增長。

鄉村債務嚴峻。據有關統計資料：一是鄉村債務的覆蓋面廣，有資料顯示：全國 65% 的鄉村負債，尤以中西部不發達的地區為甚，比如湖北鄉級負債面在 95% 以上，村級負債面也在 90% 以上，幾乎是鄉鄉有債，村村欠錢。

二是鄉村債務的基數大。1999 年全國鄉村債務總額大約在 6000 億元左右；到 2004 年鄉村負債總額已達 1 萬億元。2005 年，全國鄉村債務總體規模大致在 1 萬億元，占我國 GDP 比重的 5%，占財政收入的比重約為 30%，鄉村債務總額負擔實際上已超過長期建設國債負擔。

據甘肅日報報導：2004 年 8 月，一位李姓的農民建築隊負責人的舉動引起

廣泛的注意。當地一個鄉政府欠了他 30 多萬元的建築工程款，前後要了 5 年時間，幾乎是分文未得，被迫無奈的情況下，他自製炸藥準備引爆他建築的鄉鎮樓房，這才引起省市官員的“關注”。這些問題在農村層出不窮。在中原一個縣的鄉鎮，有一位李姓的“農村大戶”，1995 年至 1999 年先後借給村官 20 萬元錢完成稅費任務，2002 年，這個大戶不幸患了重病，需要錢救治，過去村官信誓旦旦的許諾都變成了一紙空文。他找村官討要，村官說是帳目上交鎮裡去了，他找鄉鎮幹部討要，鄉鎮幹部說是前任的事情無法解決，就這樣踢皮球，他採取家人圍堵、封鎖鄉鎮政府大門、住在鄉鎮幹部家裡不走的辦法索要，數次討要，像敲麻糖一樣弄到零碎的資金，直到 2004 年含恨去逝，也沒有討到屬於自己的一半借資。幾年來，在要債人追討下，大多數鄉鎮、農村幹部已沒有了廉恥與尊嚴：破罐子破摔；認為債是前任欠下的，與已無干，奉行“認帳加賴帳”的策略。而且弄一分錢用一分錢，照樣吃喝玩樂。

民革中央對德陽的調研顯示，至 2001 年底，德陽全市鄉村兩級的負債總額為 33 億元，負債規模龐大，其中鄉級債務總額近 30 億，相當於鄉鎮財政收入的近 5 倍，鄉鎮平均負債近 2 千萬元，村平均負債 23 萬元。以中國 5 萬個鄉鎮粗略統計，中國鄉鎮債務就超過萬億。除了這些直接負債外，德陽市的鄉村兩級都有為數不小的間接或隱性債務，其中鄉（鎮）政府為單位和個人擔保債務 5.6 億多元，逾期的就達 4.9 億之多，逾期債務約占擔保總額的 83%；村級組織為所屬企業、其它單位和個人提供擔保債務 6 千多萬元，大部分逾期未還。

四川省通江縣 2002 年底鄉級負債 5.32 億元，村級負債 3.89 億元，僅村級負債就相當於該縣當年一般預算收入的 13 倍。

三是鄉村債務的增速快。2001 年我國村級債務達 1483 億元，平均每個村負

債 20 萬元，而 2003 年 3 月 9 日的《財經時報》就報導，村級財政債務已平均達到了 50 萬元；2004 年第 40 期《瞭望東方週刊》更是指出，據專家估計，中國僅鄉鎮一級債務就以每年 200 億元的速度遞增。四是不良債務多。不良債務占總債務的 53.14%，很多債權都超過實效期，債權回收的難度大，債務很多都是民間私人借貸，利息高，還債期短，壓力大。

鄉政府的幹部，70 年代住鄉下，而到了 98 年，95% 的鄉鎮幹部家在縣城裡。每年鄉幹部出門要有公車和司機、汽油保險全國就要花去 5 千億。買手機，出國的花費全壓在農民頭上。當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完全不能表達自己的意願和訴求的時候，他們就成了為政權苟活著的“准動物”；所以，農民的生活水準如何，政府並不在乎，政府唯一關心的是農民能否提供當局需要的農產品，並養活黨的基層幹部。農民是沒有說不的自由，他們只能用腳表態，就是離鄉背土進城活命。可他們留在故鄉的家屬仍然是地方官員手中的人質，在外打工的人還有義務要交錢養活故鄉的黨政幹部。最極端的，湖北的一個鎮政府出現全鄉農民逃亡，這個鎮的農民在海南揀破爛，但不管在天涯海角，家鄉的稅錢還需要交。鄉政府的幹部遠征到海口市，向在海口撿垃圾的本鄉人收人頭稅。理由很簡單，你們都跑海口去了，我們鄉政府靠誰養活？拿錢來，甯管你逃哪去。

湖北省連“經濟十強縣(市)”的縣、鄉、村三級都普遍債務累累，其中“首強”仙桃市光市級財政負債就達 1.4 億元，而另一“十強”天門市則已超過 4 億元。湖北省天門市現有村級債務總額為 3.34 億元，村平近 50 萬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對襄陽的調查表明，1998 年底襄陽縣鄉村債務為 8.34 億元，2000 年清查是 12.5 億元，其中鎮級負債 3.3 億元，村級負債 9.2 億元。2001 年 6 月普查為 14.1 億元，其中鎮級負債 4.1 億元，村組負債 10 億元。湖

北一些欠債的基層，鎮長、鄉長都紛紛外出打工了；河南某鎮，除了鎮長、副鎮長還上班，其餘人都已經“罷工”。在安徽某鎮，連鎮長辦公室的電話都因為欠費停機了。安徽省平芋鎮政府因為還不起酒樓的錢，政府辦公大樓被法院判給了債權人。

李昌平說：作為基層組織和基層政府，不違法也是不能生存的，因為財政只給了 60%的預算，還有 40%要靠創收。以派出所為例，只給人頭經費的 60%，沒有辦案經費，公安局不僅沒有錢給派出所，派出所還得每年給公安局交 8 萬元錢。派出所從哪裡搞錢，當然是用自己的權力找老百姓搞錢，這就是“靠違法養所謂的執法”。基層的法庭也是吃了原告吃被告。

監利縣侯王村侯大爺和老伴 1999 年交了整整 700 元的人頭稅，他步行十多裡讓棋盤鄉的李昌平解答一道難題：“請問李書記，中國的哪一朝哪一代，要七十多歲的老人交人頭稅？我們年輕的時候，修過‘三線’，修過長江大堤，農業學大寨，搞了二十多年的水利建設，落得一身病。老了，鄉里不僅不養我們，還要我們老人養鄉里，天理難容啊！”

李昌平給朱鎔基總理寫信反應“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李昌平的信件曝光之後，朱鎔基的批示很快被省市縣的領導們糊弄過去，腐敗分子們一方面以組織的名義報告李昌平的“嚴重錯誤”，另一方面則變本加厲地侵害監利人民的利益，李昌平不得不辭職踏上了外出打工之路。這一事實，既是朱鎔基堂堂一國總理的恥辱，也說明中共政權內部已經難以徹底解決“三農”問題，而只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了。

在李昌平辭職後的 3 個月裡，棋盤鄉竟有 4 個農民死于收繳稅費的過程中。一姓堯的農民 1995 年欠村提留 3500 元，2000 年鄉村幹部要該農民連本帶利交

19000 元，該農民答應連本帶利交 14000 元，鄉村幹部仍然將其帶到鄉里和同樣交不起“負擔”的 11 個村民關進一個“小黑屋”，由於天寒地凍……數天后，竟凍死在送往醫院的途中。類似事件，該縣在 2000 年連續發生了三起。

武漢後湖鄉有個黑泥糊村，一年花掉農民血汗錢 39.4 萬元，其中光招待往來單位釣魚、進餐的費用就高達 31.6 萬元（黑泥糊村選舉緣何起風波？見《瞭望》1997 年第 16 期）。

1996 年安徽合肥市郊區在清理農村財務時，從 2000 多個行政村挖出貪污挪用公款的幹部 1000 余人，涉及金額 32 億元。安徽省霍邱縣降低上級補助標準，克扣 1804 戶災區群眾的建房資金 360 萬元。阜南縣 3 個鄉鎮的 17 名幹部弄虛作假，騙取並私分國家蓄滯洪區運用補償資金 20 萬元，嚴重侵害農民利益。

河北定州市明月店鎮許多農民反映，施行承包責任制以來，他們年年向國家繳售糧油，但從來沒有得到一分錢，都被村幹部“三提五統”了（農村出了一個權勢階層，見《廣角鏡月刊》1999 年 1 月號）。河北省 1996 年鬧了一場水災，那時省人大通過了收取河道維修費，直到現在，省財政收入早已翻了幾番，可收費分文不減。殘疾人就業明明是政府的職責，可人大通過了一紙檔，就交給了社會。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義務教育經費完全由政府承擔，我國除了收稅還有教育費附加，但學校收費依然有增無減。最可恨的是衛生局下屬的官方獻血中心。他們號召民眾無償獻血，可他們賣給醫院的基本上是高價血。患者如果不能無償使用血液，搞義務獻血還有什麼意義？查查血站收到的義務獻血數量和高價賣血數量，再看看各地獻血中心的辦公條件，工資福利、職工住房，大家就不難明白什麼叫現代吸血鬼。

誰越窮誰越多交稅費，誰越富誰越少交稅費。河南扶溝縣小陳莊村，這個村

裡面的村支書、村主任、會計等主要領導的特權之一是不用付電費。這些村“三大幹”的電費都由農民為他們分攤，用他們自己的話說，“這是老規矩”（電到村頭五毛二 農民用時一塊三，《經濟參考報》1998年8月21日）。

一公斤假種子會賺上50至100元錢。黑龍江省綏化市蘭西縣假種子案件拖了2年沒有得到解決，100余戶受害農民的切身利益得不到維護。綏化市周邊的農村，假種子現象越來越嚴重。在綏化市蘭西縣農村、望奎縣農村和青岡縣農村，種子銷售點鱗次櫛比，記者隨意進入一家種子銷售點，得到的介紹都是“我的種子是北京×××公司生產的……”，記者隨後按照種子銷售點老闆提供的公司名稱一查，大多數都是子虛烏有的公司。綏化市望奎縣種子管理站站長康士義告訴記者，望奎縣種子管理站在3個月時間裡，發現假種子案件18起。自從蘭西縣假種子案件一拖2年之後，很多假種子製造者、銷售者都存在著“總理批示的案件都能拖到現在，所以抓住我也不會有什麼大事”的心理，“目前在綏化市各農村，制假種、售假種的人都有恃無恐，給種子管理站的打擊工作帶來了很大的難度。”

對於農民，世界其它國家都是免稅的，並且享受財政補貼。歐盟各國的“農業人口”為10%左右，目前每年給予本國農民的“支援”為930億美元。美國農業人口不到3%，其人口在800萬左右，美國政府每一年給農民、農業的“補貼”是1000億美元。美國農民也種地，但是他們運用高科技種地，而且廣泛收集資訊適應市場，借期貨手段規避風險，把種地當作人生的一大快樂與追求。占本國人口1%的美國農民不僅養活了本國人，而且使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農產品出口國。美國農業企業資產有9000億美元，年產值高達1萬億美元，比中國2000年的國民生產總值還多。在美國沒有“農民意識”這一概念。

印度農民沒有苛捐雜稅。印度農民占總人口的比例和中國差不多，但印度政府根本不從農業上提取稅收；印度克拉拉邦的農民不僅沒負擔，邦裡消費稅的80%還要給農民。他們一個鄉的幹部才七八人，全是民選；而中國一個鄉的幹部卻有七、八十人。印度幹部選拔權在人民手裡，當官就給老百姓送禮了，印度農民比中國農民輕鬆的多。在中國，每年用於跑官的錢不是小數目，這些錢還得從老百姓身上收回來。提拔的幹部越多、幹部換的越勤，老百姓的負擔就越重。中國有世界上最吃苦的農民，有較高的單產，但農民稅賦太重。有民謠說“五十六頂大蓋帽，壓著一頂破草帽”、一些鄉鎮對於不交納稅費的農民採取的是“挑走穀子，拉走豬子，拆掉房子，戴上銬子，讓他坐號子。”在這種情形之下，農民到哪裡去申訴？2004年，整個中國農民暴動就有5萬2千件；365天除一下，一天就是140多件。公安部長周永康說，2004年約有370萬人參加了7.4萬次“群眾事件”，即203件/日。

第149節 比奴隸還不如的中國農民

曹錦清在《黃河邊的中國——一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說：處於中國社會最底層的農民深受三害之苦：一是自然災害，二是地方政府之害，三是市場價格波動之害。

當代最典型的蓄奴現象是在蘇丹和茅利塔尼亞。那兒奴隸的價格隨行就市。1988年，一支自動步槍可以換六七個奴隸少年。1989年，尼羅河上丁卡部落的一個婦女或兒童，在市場上標價90美元，到1990年，由於搶人事件大增，奴隸供過於求，價格跌到15美元，奴隸販子就把有些兒童運到利比亞去賣。當代奴隸大約有2700萬到4000萬。

南非的人均收入處在世界中上等水準，1992年的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

但在財富分配方面，占總人口 7 成多的黑人擁有了不到南非財富的 2 成。《人口登記法》是南非種族隔離政策支柱和象徵，種族主義者曾以素質為由長期剝奪黑人的選舉權利。種族隔離的“家園理論”說：“所有班圖人在其保留地都有其固定的家園，他們進入其它地區或城區僅僅是暫時性質而且是出於經濟原因。換句話說，他們只是作為找工作的人員而不是作為移居者被允許進入的。班圖人一出保留地，也就沒有政治權利。”

1963 年 8 月毛澤東在《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鬥爭的聲明》（《毛澤東文集》1999 年版第八卷）中說：“美國黑人共一千九百余萬人，約占美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一。他們在社會中處於被奴役、被壓迫和被歧視的地位。絕大部分黑人被剝奪了選舉權。他們一般只能從事最笨重和最受輕視的勞動；他們的平均工資只及白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把這段文章裡的“美國黑人”改成“中國農民”，是多麼的貼切！惟一不貼切的是，中國農民的平均工資，不到城裡人的 1/5，比 50 年前的美國黑人慘得多！戶籍隔離制度存在，意味著中國存在著一個奴隸主集團，它使農民成為賤民、成為奴隸；它讓一個“文明古國”淪為世界上最大的野蠻之國；它在羞辱著人類的良知！在經濟權利上面，中國農民極其類似于百年前美國林肯時代的黑奴。他們的終生，只有義務，沒有權利；只有勞役，沒有報酬。

中國從比非洲人過得更窮、更悲慘的農民身上榨取錢財，來接濟“非洲兄弟”。生為農民，你這輩子就沉浸在“鋤禾日當午”這樣原始生存模式中了。農民真是太不幸了，拖累他們的，無疑是天下最糟糕、最狠毒的一種專制。共產黨當年用“消滅差別人人平等”的口號，煽動農民造反。今天，中國農民在中國私有財產裡所占的份額僅占 4%，在我們這個城鄉人口比是 1:3（即 25:75）；財富

擁有比例是 96:4；人均財富擁有額僅為城市人口的 1/72，用百分比為 1.388%。相比城市人，農民真是一貧如洗。

中國社科院收入分配課題組以 1988 年、1995 年、2002 年全國範圍的住戶調查資料，發掘出了一項世界之最：以城鄉為界劃線的中國人口在收入上的差距處在“世界最高”！中國官方承認，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可能達到 6:1，而多數別的國家，這個比率只有 1.5:1。也就是說：世界最不公平的國家是中國！中國農民是世界上受到最不公平對待的倒楣蛋！整個一個歷史就是“興，農民苦！亡，農民更苦”！

50 個中國富豪的資產，相當於 5000 萬中國農民的年純收入；而 300 萬個百萬富翁的資產，則相當於 9 億中國農民 2 年的純收入。2003 年，北京市的人均年收入已增加到近 5 萬元，而 2003 年中國農村人平收入才 2000 元出頭，相差了近 25 倍。

連豬狗都不如。農民挑土石方，實質上是被迫在為國家做無償的苦力勞動。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剝削制度叫做“義務工”制（也叫“農田水利任務”）。在任何一個文明的國家，修堤、築路、建工程，是依靠全體國民之力、由國庫撥款來完成。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第四條，明文規定：“任何人不得（役）使為奴隸或奴役”。然而，中國的農民，卻在 50 幾年中，在這樣無償、繁重的勞役裡，耗費著生命，看不到終結的日子！

大包乾帶給農民的好處一點一點地又都被各級政府悄悄拿走了，如今是交不夠國家的，留不足集體的，剩下就沒有一點是自己的！農民為國家勞役付出，到年底後的結算才回知道：一年忙到頭，非但沒有什麼收穫，反而欠國家一屁股的債！通常，要把自家私下喂了一年的肥豬白白交給國家抵償債務，依舊還不清。

哪有奴隸無償為奴隸主幹了一年之後，還欠奴隸主債的事！中國農民連奴隸都不如！

中國雖是個農民國家，但農民卻處在社會鏈的最末端。鄙視農民、看不起農民的觀念，深植在每一個人心中。譬如：貪官犯罪後，在法庭上請求寬恕時，都說只要能留他一條命，他哪怕下鄉種地都可以。這就是根深蒂固的歧視農民的觀念在作祟。農民莫非連罪犯都不如？國家主席劉少奇最後向毛澤東乞求時都說過相同的話，更不用說其它人了。現在城裡人犯了罪，懲罰措施之一仍是吊銷其城市戶口，趕到農村去。“文化大革命”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農民把最好的房間給他們住，讓他們吃白米飯，而農民吃的是菜飯。有誰聽說過餓死知識青年呢？沒有。可那個時候有很多農民餓死了。有些知青回到城後，講述在農村的苦難，說在農村浪費了十年的青春。但是這句話的潛臺詞是說世世代代的農民根本不是人——農民是人中的垃圾！正是主流人群把農民看作垃圾人，才有這些不平等的制度。

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向記者回憶幾年前的一次經歷：正月初四，我要去上班，看看棋盤鄉農民怎麼過年，哪知公路上成群結隊的外出打工的人群像滾滾洪流。不管是什麼車，只要是向南，統統塞滿了人。我開著的桑塔納也被農民攔下，車裡一下子上來了五個農民。一個四五十歲的農民說：他家去年種了40畝地，一家三代面朝黃土背朝天地忙了一年，交了各種稅費20000多斤，自己只剩下3000斤穀子。穀子收完了，老婆也累倒了，住院七天花去了2000多元，把自家的糧食賣光了，還借了2000元。他氣憤地說，這真不是個世道！一個青年農民憤憤地說：“你們當官的心太黑，不出去沒有活路。”我的車子開進角湖村，到處是骨肉分離，擁抱泣別的場面。那些可憐的孩子死死抱住父母的雙腿不

放，欲走的父母傷心地痛哭著，不停地抽打孩子的雙手。這個村的村長是我中學同學，兄弟四個，除了他全帶著老婆出外打工去了，他老婆也跟著去了。他們初四的清晨就去了長沙，去晚了去年打下的拾破爛和擦皮鞋的地盤就會被別人占了。只剩年逾花甲的老父母照看著四家的 10 個孫子。老人拉著我的手說：“他哥哥，這個政策要變一變，再不變老百姓可是沒法子生活了！”看著我的老同學過去英俊端莊現在蒼老無奈的父母，我的淚水一下流出來了。我的這位村長老同學憤憤說：“農民還有什麼？有家不能歸，一半以上的成年人在外謀生；有地不敢種，勞累一年還欠著別人錢，什麼道理。上有老人不能盡孝；下有小孩不能成才。一生辛勞，淨養活你們這些幹部、奸商了！你們反而不把農民當人看。農民活在這個世上還有什麼意思？”

農村的現實是：“盲流如‘洪水’、負擔如‘泰山’、債台如‘珠峰’、幹部如‘蝗蟲’、責任制如‘枷鎖’、政策如‘謊言’、假話如‘真理’。少壯打工去，剩下童與孤，又見負擔長，唯望天地哭”。監利縣侯王村侯孟軒有一次去看望妻子。妻子帶著本村 8 個婦女住一間 9 平方米的破房子，8 個人全擠在地鋪上。為了節省兩餐飯錢，每天靠給餐館老闆抹桌子、洗碗盤換取剩飯剩菜過日子。侯哀歎：“我們農民不是人，連豬狗都不如啊！”

《四川新聞網》報導，成都郭家橋一建築工地近 100 民工回食堂吃午飯。半小時後，最先進餐的 8 位民工紛紛出現頭痛、腹痛、發燒、嘔吐、心慌等症狀。內江民工尹世詳一邊輸液一邊說，“他們簡直沒有把我們民工當成人，我們吃的東西比豬都不如啊！”

中國食物安全與營養健康高層論壇發佈消息：中國人優質蛋白不足和主要食物營養元素不平衡；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營養與食品衛生研究所所長楊曉光博士作出的結論說：中國人普遍存在“潛在饑餓”，特別是農民的身體素質太成問題

了，在各個指標上已經全面落後日本；中國營養學會理事長葛可佑也下結論說：中國兒童的總體（即農村兒童）生長發育要達到國際標準的水準，至少還需 15-20 年時間……

像幾千年來的“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這樣不公的局面一樣，“成年養豬者（或養牛、牧羊者），不是吃肉人”。農民作為中國社會裡主要的肉食生產者和提供者；生產的肉食，絕大多數進了城市人的胃腸。千百年來前輩農民所能利用的蛋白質資源，已不復存在了。

按原人均年收入 625 元貧困標準，中國的窮人是 3000 多萬人，日均收入只有 2 美分！是美國標準的 1.78%。美國貧困人口的標準是四口之家年收入 16895 美元（14 萬元人民幣），人均 4224 美元（約合 35059 元人民幣，月均 2922 元）；2003 年調整後的貧困人口標準是年 637 元、月均 53 元人民幣，只是美國標準的 1/55。2004 年 7 月國務院扶貧辦劉堅說：“去年未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不但沒減少，反而增加了 80 萬人”。

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字，全世界通用標準為每人每天生活費用不足 2 美元（每人每月約 500 元人民幣）即為貧困人口。每人每天生活費用不足 1 美元者（每人每月約 250 元人民幣）為最貧困人口。“國務院研究室”在 2005 年一份調研報告披露：全國 8.3 億農民，人均年收入為 98 美元。其中，西北、西南農村農民人均年收入 44 美元。最富裕的農村農民僅有 2500 萬人，人均年收入為 525 美元。有 7 億農民從未到過城市。

1996 年起，由於中國增加糧食進口，農產品價格不斷下降，至 2000 年秋，降至每種一畝小麥要虧損 8 美元的水準，使農民陷入困境。鄂東浠水縣農民、前勞改釋放犯沈清海寫給縣長的一封信——“種田不如當囚徒”。信中說：“我一

家三口，三畝地，上交費共計 1080 元。這三畝地一年之內能出多少錢？三畝地除去上交剩下的還不如一個囚徒的生活水準。囚犯的生活水準每人每月 100 元左右，醫藥費報銷，水電敞開供應，不擔心什麼”。記者調查後發現的情況比這位元農民反映的情況還要嚴重（見《瞭望》1996 年第 12 期第 16 頁）。

中國監獄學會副會長王明迪在他寫的“中國監獄的人權保障”一文中說：1997 年全國罪犯每人每月平均伙食費為 102 元，還有自己的菜地、雞舍羊圈，產品全部供罪犯食用。罪犯還全部實行免費醫療、免費教育，被服由國家統一配發。每人每月零用錢 7 元。參加勞動的罪犯每月可領到十幾元至三百多元不等的工資，及時發放勞動保護用品和津貼。即使不算工資，罪犯每人每年食品消費和零用錢就有 1308 元。中國貧困人口每人每年 637 元的標準中，食品消費標準為 60%，即 382 元，也就是說，監獄罪犯食品消費水準是貧困人口的 4 倍，而且 637 元的貧困線意味著每個貧困人口實際上還達不到犯人的標準。

一名蹲過監獄的法律學者算過一筆帳：一個監獄囚犯的關押費用，遠遠高於國家用在一名清華或北大學生身上的費用，而且監獄裡所關的大都是無罪和輕罪重判的弱勢公民！！中國大多數公民的生活品質，還比不本國監獄中的一名囚犯，偌大一個神州大地，其實就是一個供極少數人花天酒地、為所欲為的次等監獄！！

對很多被困在農村的窮人來說，當乞丐正成為一種越來越有吸引力的“職業”，一個乞丐的收入可能相當於一個農民的 10 倍。中國每天消費不足一美元的“貧困人口”都得是公佈數字 18.8%、2.44 億的一倍以上，甚至更多，有可能達到六個億。如果按日均消費兩美元做為貧困人口的標準，中國的貧困人口將不少於八億，直奔十億人大關。農村的社會危機勢驅動農村人口加速向城市

流動而隨之蔓延到城市，使城市中的不公正問題日夜突出，造成了一黨專制的全域性危機。

中國官方估計目前有六百萬娼妓，這個數字接近香港總人口，更比全國軍隊 240 萬總人數多出一點五倍。香港學者認為，內地出現龐大賣淫大軍，跟城鄉生活水準差異有關。

《中國青年報》2003 年 11 月 21 日報導：中國每年大約有 28.7 萬人自殺，其中 80% 以上自殺者和自殺未遂者都是農民。全國農村每年有 15 萬人服用農藥自殺死亡，50 萬人服用農藥自殺未遂。農民的自殺率是每 10 萬人中 27.2 人，而城裡人的自殺率是每 10 萬人中有 9.4 人，農民的自殺率是城裡人的自殺率的 3 倍。占世界總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婦女自殺的人數就占了世界婦女自殺總人數的 56%。……中國農民，在一國人口中占絕對多數的人群淪為弱勢境地，是舉世罕見的。農民弱勢的存在，是中國的恥辱，是政治不文明的表現。

中國權貴呀，你在隔離了自己 3/4 的人民的時，你實際就在隔離中泯滅了中國 3/4 的有效勞動、泯滅了中國 3/4 的智慧、泯滅了中國 3/4 的綜合國力、泯滅了中國邁向富強的可能——所以，我們 13 億人創造的經濟能力，只相當於三千萬人口國家的經濟能力！中國人也是人啊，怎能因為人口眾多而貶值？

第 150 節 吃人不吐骨頭的動物社會

法國思想家愛爾維修說：政府壟斷教育思想，而且絕對只為極少數的極權專制者服務，其結果，必然造成全社會思維器官的嚴重衰退。

愛爾維修又說，“禁錮思想壓制言論，就會使人民成為瞎子、聾子和白癡，瞎子的東西比明眼人的東西更容易偷，一個白癡民族要比一個開明民族容易哄騙、容易統治。”

統治者完全掌控了媒體，民眾成了政治上的聾啞人，他們只能知道毛澤東偉大、正確的。從而使人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言動”。這裡的“禮”字應改成“理”字確切些。當然，這個理字，不是真理公理天理，而是黨理，即是否有利於黨的統治。

凡事根據這條黨理來定奪。不該你看的，就不讓你看，讓你成個睜眼瞎。譬如說，香港七一大遊行，就不讓人民看。所以在人民的眼中，香港這兩次大規模的遊行就壓根兒沒發生。從中央到地方，電視畫面千篇一律：熱心幹部深入基層送關懷送溫暖，人民公僕日夜操勞抓改革抓廉政；廣大群眾感激涕零齊唱新時代好，普通百姓飲水思源同贊黨親。至於天天發生在實際生活中那些個壞的陰的暗的黑的髒的醜的邪的惡的毒的東西，能上電視者屈指可數。不奇怪，事關光輝形象，怎麼能給你們這些草民輕易看見？

不該你聽的，就不讓你聽，讓你的倆耳成個擺設。不用說境外的反動電臺你不能聽的；就是國內消息，你也只能聽讚歌頌曲，譬如神舟上天世貿入圍等等，均為利好消息。但是大興安嶺大火熊熊，廣東傻斯病毒洶洶，到處礦難淒淒，河南艾滋患者慘慘，無一不是先捂蓋子，儘量少報導或表面化的歌功頌德式的報導。有人想把共產黨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刊登在《解放日報》和《新華日報》上的文章題為《歷史的先聲》出版，結果不准！

不該你說的，就不讓你說。我就是要讓你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陳為軍想來 H 南揭愛滋病的蓋子，就被圍追堵截；章詒和敢為幾個最終未被摘帽的右派分子評功擺好，就禁了書；陳桂棣敢為最下賤的農民鳴冤叫屈，被告上法庭；喻華峰的《南方都市報》報傻斯、報孫志剛風頭出盡，就得嘗嘗蹲八年大牢的滋味。

王亞南說過：專制國家就是瘋子+騙子+聾子+啞子。專制國的人員構成=殘暴

的瘋子似的皇帝+騙子似太監、官僚+聾啞的螺絲釘化的百姓。統治集團希望人民是瞎子、聾子、啞巴，聽憑他們任意的擺佈，不要有任何不滿、抗議、爭辯。經過兩千多年儒奴學的思想壟斷，中國早已成了地球上最大的人形動物園。螺絲釘化的百姓成了官員們任意宰割的家畜。

國家動物園化、人民動物化，可以說是專制統治的傳家法寶。公然把一部分國人稱之為獸的是毛：要消滅一切牛鬼蛇神。這些牛鬼蛇神就是黑五類地富反壞右。這些所謂的地富反壞右實際上是在經濟政治科學文化等各個領域裡的精英。戴著牛鬼蛇神帽子的牛鬼蛇神們，實際中的生活遭遇也確實是鬼一般的非人。《芙蓉鎮》裡的“一對黑夫妻、兩個狗男女”秦書田就對胡玉音說：“活下去，像狗一樣地活下去”。

人們缺德化。這一招最陰最毒最下流最無恥，這一招就是讓人民放棄最後的道德底線，變得沒有廉恥感也沒有是非感，沒有正義感也沒有罪惡感。

執政初期，殺地主老財，正確；改革開放，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英明。黨旗上繡上鐵錘鐮刀，正確；黨章裡歡迎紅頂資本家入夥，英明。黨當年鼓動工人罷工，光榮；共產黨如今不許工人罷工，偉大。農民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土地，好！農民因人民公社化失去土地，好！農民在承包經營時又得到土地，好！農民在圈地運動中再失去土地，好！總之，好！好！還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來就是好！人民必須永遠感恩戴德。天大地大不如黨的能力大，爹親娘親不如黨的領導親，千好萬好不如黨的政策好，河深海深不如黨的恩情深。

馬曾預言：工人階級最終失去的只是鎖鏈，而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在當今的阿 Q 國，工人和農民的狀況也許恰好相反。他們失去了整個世界，而獲得的只是鎖鏈。儘管如此，苦難的老百姓們還被逼迫著強裝笑顏感謝皇上聖明。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經過了對人民長期不懈的艱苦卓絕的“不可使知之”的瞎子化聾子化啞巴化、“不可使思之”的太監化和“不可使恥之”的妓女化之後，終於迎來了“民可使由之”的嶄新時代。

第一類人豺狼化。既是豺狼當道，當先表此類。此類由貪官污吏和奸商惡霸組成，無仁無德，貪婪成性。官僚和資本的糾纏交錯是其最典型的形態。手握公權，貪贓枉法，化公為私，中飽私囊。大肆侵吞國有資產，揮霍浪費國家資源。花天酒地，紙醉金迷，荒淫無度，醉生夢死。橫行霸道，魚肉鄉里。為非作歹，遺禍一方。乃人間之大惡，獸中之大害者也。

第二類人鷹犬化。此類攀豺附狼，依託權貴。多為御用文人，豢養名士。就炎附勢，騎牆觀草。見風使舵，兩面三刀。豺雲亦雲，拾狼牙慧。豺步亦步，狼趨亦趨。有勇有謀，無氣無節。甘心情願成為豺狼的幫忙、幫閒和幫兇，成為豺狼的打手、護從和跟班，成為豺狼的鷹爪子和狗腿子、護院禽和看家犬。實乃鮮廉寡恥之徒卑鄙齷齪之輩，深為他類所不齒。

第三類人豬羊化。此類獨立獨行，明哲保身。治則胸圖大志，亂則偏安一隅。不似鷹犬之類甘願助紂為虐，但為豺狼逼迫又不得不隨波逐流。生活舒適充實富足，有小資美譽。性情隨和溫順儒雅，文質彬彬。滿足於自己的小家庭生活和圈子交遊，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對豺狼鷹犬憤恨而無語，對牛馬遭遇同情而無助。多為高薪文人職員即所謂白領者。

第四類人牛馬化。此類屬禽獸化之後最為悲慘淒苦的一類。雖量巨而勢力薄，雖群大而聲音渺，屬最弱小的弱勢無勢群體。由農村父老加上城市中被邊緣化之輩如無崗可上之工人無業可就之青年組成。是為全世界提供物美價廉產品而所需最廉價勞動力的主要來源。他們度日如年，掙扎在水深火熱之中。牛馬們吃苦

最多，幹活最累，掙錢最少，負擔最重，地位最低，生活最艱，日子最難，常自歎實際上比牛馬還不如。

官方宣傳：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官員是人民的僕人。可這就怪了：僕人武裝到了牙齒，主人赤手空拳，主人身上偶爾帶把刀都被僕人定性為兇器。天底下，還能找出這樣窩囊的“主人”和這樣強悍的“僕人”嗎？

我親愛的公僕大人！蒙您賜我主人翁的名稱，
我感到了極大的惶恐，同時也覺得您在尋開心！
明明您是高高在上的大人，明明我是低低在下的百姓，
您發命令，我來拼命。倒說您是公僕，我是主人？
我住馬棚，您住廳堂，我吃骨頭，您吃蹄膀。
弄得不好，大人肝火旺，拿我出氣，遍體鱗傷！
大人自稱公僕實在冤枉，把我叫做主人更不敢當。
您的名字應該修改修改，我也不願再幹這一行。
我想辭職，您看怎樣？主人翁的台銜原封奉上。
我情願名副其實地做驢子，動物學上的驢子，倒也堂皇！
我給您騎，理所應當；我給您踢，理所應當；
我給您打，理所應當；不聲不響，驢子之相！
我親愛的騎師大人！請騎吧！請不必作勢裝腔，
賤驢的腦筋簡單異常，您的韁繩，我的方向！
但願您不要打得我太傷，好讓我的服務歲月久長，
標語口號，概請節省，驢主，驢主，何必再唱！

參考資料：約翰·羅爾斯：正義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科恩：論民主。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1988。

王勇飛、張貴成：中國法理學研究綜述與評價。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

賴彭城等：國際人權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阿馬蒂亞·森：民主的價值觀放之四海而皆準。見《民主與科學》網。

賀衛方：憲政路上的絆腳石與推動力。見《中國法官》網。

中國大百科全書. 政治學卷. 1992。

胡適選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楊小凱文集。見公法評論網、法律思想網、遞進民主網。

劉軍甯文集。見思想評論網、田野來風網、思想境界網。

曹思源文集。見中國事務網、新世紀網、思源網。

王若水文集。見王若水網。

劉宗正文集。見民主論壇網。

曹長青文集。見曹長青網。

曹思源文集。見海外網站。

任不寐文集。見中國事物網。

李銳文集。見五柳村網、浴火鳳凰網、北京社會經濟所網。

錢理群文集。見學而思網。

特蕾莎文集。見公法評論網、信仰之門網。

馬丁·路德·金：我有一個夢。見百年共和網

大躍進研究。見北京社會經濟所網、墨閒居網。

